

梦醒时分

六十年风云透析与述评

牛立华著

全书总目录

前言

概述

相关图片

第一分册 青少年时代的梦

第一章 北平“解放”前后

一、战争前夕

二、和平解放

(1) 傅作义处在多重包围之中

1、百万大军压境

2、中共地下党的活动

3、傅作义身边潜伏着许多中共党员和亲共人士

(2) 艰难的和谈

(3) 八路军进了北平

1、入城式

2、约法八章

3、借故解除傅作义警卫团

4、整理市容

5、开国大典

第二章 回忆中学时光

一、崇实中学的一年

二、从辍学到转入市立中学

三、中学时期的思想变化

(1) 接受共产主义，加入少先队

(2) 两篇文章的影响至深

四、“抗美援朝”

(1) 一场本不该发生的战争

(2) 金日成穷兵黩武狂妄发动南进战争

(3) 斯大林野心勃勃积极策划朝鲜战争

(4) 毛泽东欲称霸亚洲仓促出兵朝鲜

(5) 应该从朝鲜战争汲取的教训

五、中学时期的梦彻底破灭了

第三章 华北兵工职业学校时期

第四章 长江电工厂

第二分册 追溯反右派运动

楔子：遑论“左”与“右”

第五章 反右派运动历程

一、阴谋和阳谋

(1) 毛泽东蓄谋反右由来已久

(2) 毛泽东是怎样施展阴谋与阳谋的？

(3) 反右决策是什么时候确定的？

二、毛泽东长篇讲话出笼前后

(1) 人民内部矛盾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

(2) 执政党面临着方向性的选择，毛泽东选择了邪

(3) 毛泽东粉墨登场——巧言令色鲜矣仁

“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讲话实录

关于此讲话实录的说明

三、整风与反右

(1) 大鸣大放的始作俑者是谁？

(2) 陈其通的插曲和毛泽东的翻云覆雨

(3) 多数知识分子循规蹈矩、谨言慎行

(4) 一篇《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引起的波澜

(5) 《文汇报》与《电影的锣鼓》

(6) 《人民日报》紧急执行毛泽东“诱敌深入”的阴谋

(7) 所谓大毒草是毛泽东做了反右部署以后“诱”出来的

(8) 国民党员卢郁文充当了反右的马前卒

四、反右的重头戏一整肃民主党派

(1) 毛泽东嫉恨知识分子根深蒂固 共产党谋求独裁专政源远流长

(2) 高唱民主引社会名流栖居门下 蓄谋独裁将民主斗士禁锢笼中

(3) 纵横捭阖玩弄联合政府于股掌之上 软硬兼施措置民主党派于奴妾之间

(4) 政治协商终成泡影 共同纲领虚晃一枪

(5) 章伯钧逆来顺受坦坦荡荡 沈钧儒卑躬屈节战战兢兢

(6) 罗隆基恃才傲物不识时变 储安平见微知著难得糊涂

(7) 陈铭枢坦诚诤谏率先上当 李济深俯首称臣卖友求荣

(8) 毛泽东睚眦必报 张东荪三代蒙冤

(9) 龙云直言不讳难逃厄运 程潜明哲保身苟且偷安

(10) 章乃器含垢忍耻刚正不阿 黄炎培饮泣吞声祸及子孙

(11) 马叙伦因病免祸逃过一难 林汉达不幸遭殃遗恨百年

(12) 三千食客人人投降缴械 九万儒生个个匿影藏形

追记：文革中的民主党派

五、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1) 葛佩琦的所谓“杀共产党人”纯系捏造

六、大学生中的反右运动

(1) 陈奉孝：我所知道的北大整风反右运动

(2) 几位校园右派

1、张元勋

2、沈泽宜

3、陈奉孝

4、林昭

5、谭天荣与林希翎

七、四川和重庆的几位右派

(1) 董时光

(2) 刘盛亚

- (3) 邱原
- (4) 张文澄
- (5) 冯元春
- (6) 流沙河

八、中共内部的派系之争

九、论及反右不得不提的人和事

- (1) 无耻文人郭沫若的卑劣表演
- (2) 残忍屠夫邓小平是反右的操刀手
- (3) 从法律角度审视“反右”

十、三百多万人被划为右派分子

- (1) 右派群体的组成与征貌
 - 1、右派群体的年龄段
 - 2、右派群体的地域分布
 - 3、右派群体的职业分布
 - 4、宜宾地方志记载的反右
 - 5、右派分子是些什么人？

十一、我被打成右派分子的经过

- (1) 军工企业的鸣放
- (2) 我在反右运动中
- (3) 戴上了右派帽子
- (4) 监督劳动
- (5) 送劳动教养

第三分册 非法关押九年

第六章 渣滓洞两年

- 一、石板坡看守所
- 二、中美合作所
- 三、新建机械厂

第七章 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

- 一、虚幻的总路线，云中的假大空
- 二、三面红旗迎风招展，五股妖风肆虐成灾
- 三、连续三年“特大自然灾害”是怎么来的
- 四、疯狂的大跃进
- 五、妄想的人民公社
- 六、彭德怀之死
- 七、转载：公安工作“大跃进”

第八章 成都七年

- 一、初识成都和“为人民服务”
- 二、劳改企业大发展
- 三、难忘的1960-1961年
 - (1) 暗淡的现实 荒诞的社论
 - (2) 中苏大论战
 - (3) 全民大饥饿、举国大浮肿
 - (4) 官方在干什么？
 - (5) 居民与官员的差别

- (6) “高级”点心“高级”菜
- (7) 毛泽东吃什么？干什么？
- (8) 毛泽东的专用住所
- (9) 粮食增量法和代食品运动
- (10) 六十年代的蓉城风景线
- (11) 新闻疗法

四、彷徨的 1962-1964 年

五、1965-1966 年的思考

六、回过头来看劳动教养

七、宁夏街的日子

- (1) 逮捕入狱
- (2) 十七号监舍
- (3) 受髡刑
- (4) 如此审讯
- (5) 判决与终审
- (6) 别开生面的批斗会

八、红卫兵的崛起与消亡

第四分册 黑牢炼狱十三年

第九章 深山老林服苦役

一、川西监狱群一瞥

二、苗溪茶场一览

三、苗溪茶场第十三中队概况

- (1) 房屋建筑
- (2) 狱卒和武警
- (3) 狱中酷刑肆虐
- (4) 因反对滥施酷刑而受酷刑
- (5) 全国武斗成风

四、劳改纪实

- (1) 服刑人员的组成
- (2) 劳动场所
- (3) 镣铐、绳子和禁闭室
- (4) 劳动改造和劳动光荣
- (5) 劳改犯的生活状况
 - 1、衣不蔽体
 - 2、食不果腹
 - 3、打牙祭
 - 4、四害猖獗
 - 5、住不如畜
 - 6、转载：秦城监狱恐怖见闻
 - 7、《夹边沟记事》拾遗

五、狱中之狱

- (1) 关入小监
- (2) 小监的生存环境
- (3) 面临的抉择

(4) 戴着背铐写自述

(5) 活着出来了

(6) 一场虚惊

六、中共九大——愚人节的滑稽戏

七、劳改轶事

(1) 历时三年冒险交出了一封信

(2) 监狱里的打手

(3) 炮兵参谋尹显慧之死

(4) 猪舍倒塌了，小李死了

(5) 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是谁人规定的？

(6) 轰然一声、壮烈一举

八、动荡的一九七六年

(1) 周恩来病故

(2) 朱德逝世

(3) 毛泽东死了

(4) 彻底剥除毛泽东的伪装，揭露其无法无天的罪恶行径

(5) 秘制水晶棺，修建纪念堂

(6) 华国锋当政

九、八人帮解体 四人帮覆灭

“英明领袖”抓纲治国

十、文革期间死于非命的罹难者

(1) 文革中被残酷迫害致死的人

(2) 文革中自杀的知识精英

十一、文革——邪恶对正义的戕害，必须彻底否定

(1) 王容芬，一个中国人应该知道的名字

(2) 青年思想家刘文辉壮烈牺牲

(3) 遇罗克之死

(4) 音乐家陆洪恩死前慷慨直言

(5) 巾帼英豪李九莲和钟海源

(6) 英杰俊彦陆兰秀血染苏州

(7) 张志新的生前死后和中共新闻、司法的特色

(8) 禁言文革意在掩盖历史

转载：人们可以相互原谅，但历史从未宽恕任何罪恶

转载：文革对中国灾难性的影响

第五分册 噩梦醒来是早晨

第十章 “改正”与“平反”

一、右派“改正”

二、无罪释放

三、狱吏对平反人员的态度

四、等待分配和善后问题

(1) 回到消防机械厂

(2) 吴钧涛的点拨

(3) 走访四川省劳改局

(4) 曲啸之流的表演

(5) “改正”了什么？

五、重返长江电工厂

(1) 回厂初期

(2) 评定技术职称

(3) 职工大学任教

(4) 评定高级职称

第十一章 饱经沧桑方不惑

(1) 中共两个《历史决议》都是有悖历史的捏造

(2) 牢记文革教训

(3) 冷眼观察“胡温新政”

(4) 认真识别什么是“社会主义”

(5) “逆向淘汰”将毁掉中国！

(6) 张雪忠的犀利评论

(7) “两头真”现象

(8) 应为社会主义正名

(9) 普京在莫斯科“悲伤墙”落成典礼上的讲话

(10) 从建国 60 周年大阅兵想到的

(11) 转载：天地翻覆——中国文化大革命历史(杨继绳)

(12) 转载：对他做出正确评价是中华民族必须迈过的一道坎

(13) 转载：从《中国的陷阱》到《中国：溃而不崩》

(14) 转载：中国的出路

(15) 二十一世纪人类的选择——民主社会主义

(16) 邓小平政治遗嘱和辛子陵的推介

后记

前言

这是一部自传体纪实作品，旨在通过个人经历反映时代的一个侧面。历史学家说过，千千万万普通民众的真实生活才是真正的历史。

今天，很多年轻人不知道过去那段真实的历史，至今仍然不能毫无禁忌的反思过去，也不能全面彻底的拨乱反正。不正视历史，华夏就无从振兴，不纠正错误，国人就难享太平。这是国家和民族的悲哀！也是我并非名人而执意写这部自传的动机。

1957 年，我被划成右派分子，旋即从军工企业的科技人员一变而成被监督劳动的对象，再变而成劳动教养分子，三变而成背负着重刑的劳改犯，从二十岁到四十三岁，人生的黄金时段，基本是在监狱里度过的。但这一期间我并没有变，始终是关心国家命运的一介书生，之所以被再三迫害，是党内寡头日益变本加厉地谋求独裁、一味以阴谋和阳谋镇压人民造成的恶果。

“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口头上讲着对右派分子要“给出路”，公开的文件赫然写着对右派分子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实际上却一而再、再而三地把昔日的同志、同盟、朋友推向苦难的深渊。把一个戴着红领巾长大的、热爱党、笃信社会主义的共青团员诬陷为敌对分子，不仅推翻在地，还要再踏上一只脚，恶狠狠地狂呼“叫你永世不得翻身”。

二十三年的炼狱人生，使我受尽了人间折磨，不止一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依然对中国共产党怀着希冀与期望；历尽劫难仍然对

未来充满信心。然而，后来的几十年，尤其是 1989 年以后，严酷的事实教育了我，共产主义的理想接二连三地被击毁。“伟光正”花环的背后原来是暴力、虚伪和谎言。

反右运动已过去了五十五年，许多难友离开了人世，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临死也没有明白为什么中共和毛泽东如此恶毒和残忍。我还幸运地活着，虽年近耄耋，却还能在有生之年书写回忆录，以“幸存者的歌”，告慰和祭奠那数百万屈死的英灵。

回忆录贵在真实。写作中坚持不刻意丑化也不刻意美化，更不虚构。人物、时间、地点都有据可查。

记录个人的经历必然要涉及到当时的环境和周围的人和事，写自传并非只是申冤诉苦，不是单纯地表达个人恩怨，也不是文过饰非，而是要如实记录事件，探讨事件发生的原因。对推动社会进步的，充分肯定；对阻碍社会发展的，则严厉批判。历史是客观存在的事实，真相只有一个，从不同的角度观察会有不同的感受。有人不同意我的看法，是正常的，可以讨论、辩论，真理是越辩越明的。我不幸经历了二十余年苦难的折磨，或者说有幸见证了历史的真实一面，对某些历史问题的看法，和没有感受那段真实经历的朋友们可能有些差异。只有通过讨论，才能更全面地、更完整地、更真实地记述历史，以史为鉴，避免重蹈覆辙。让未来的执政者不再成为历史车轮的绊脚石，让子孙后代不再为了思考而坐牢，让中国不再发生为了呼唤自由而失去自由，为了争取民主而遭遇镇压的悲剧。

岁月流逝，垂垂老矣；历尽沧桑，心底无私。记录饱尝苦难的经历，掀开魔鬼狰狞的面纱，匡正华夏，重整乾坤，是历史老人的责任，也是垂暮之年的乐事。“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概述

自传从我十二岁开始写起，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年龄段呢？那一年中国处在大动荡之中，作为一个十二岁的孩子，头脑中尚未形成固定的政治观念，刚刚学习中国近现代史，即看到自鸦片战争以来百余年的历史充斥着外侮、内战、腐败、灾荒与衰落。短暂的童年，身受过异族侵略者的奴役压迫，目睹过官僚阶层的贪污腐化，感受着国共两党相争造成的战乱。父亲给我起的名字叫“立华”，意在企盼泱泱中华自立于世界。但是人们失望了，充斥着内忧外患的童年在脑海里留下的只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理念和忧国忧民的意识。这或许是那一代人共有的特色，也是被中共视为右派的原因。中共是任由他们篡国、窃国，绝不准别人爱国、忧国的。

1949 年初，我对共产党毫无了解，一片空白正好书写最新最美的图画。那一年，共产党高举着“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大旗，高唱着“团结、独立、自由、民主”的歌曲，高喊着“为人民服务”的口号，以胜利之师的姿态，浩浩荡荡开进了古老的北平。

北平的民众经历过无数朝廷，光是民国大总统就走马灯似地换过好几个，孙中山、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曹锟，都在总统宝座上呆过一阵子。见惯不惊的北平人对这一次国共两党改朝换代、走马换将，寄存着无数期许也保留着些许怀疑。

中共进城初期，花大力气清理城市废墟，涤荡污泥浊水，禁毒、戒赌、灭娼，稳定市场物价，恢复经济发展。中共的官员们衣着朴素，态度和蔼，

关心民众，平易近人。毛泽东虚怀若谷，礼贤下士，在昆明湖为程潜执桨，在怀仁堂与柳亚子吟诗唱和，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民众的疑虑逐渐消失，百姓的生活渐趋稳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歌声，唱遍黄河南北。

我很快地就接受了共产党的宣传，开始用共产主义的刀斧，雕琢那纯洁而无知的灵魂，对共产党和毛泽东从感恩到信仰乃至崇拜。开国大典之际，我见到毛泽东穿着灰色中山服在天安门城楼上向群众挥手，激动地高喊“毛主席万岁”，嗓子喊哑了，两天说不出话来。稚嫩的意识被共产主义理想占领，随即成为新中国第一批少先队员，戴上了红领巾，以赤子之心宣誓要做共产主义的接班人。

1949年到1956年，国内没有大的战乱，人民指望休生养息。中国是农业大国，中共执政以后，在短暂的时间内，部分地释放了农业生产力，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以发挥，粮食等最基本的生活物资有了保障。国家依靠农民的辛勤劳动，利用工农产品的剪刀差积累资金，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恢复和发展基础工业，在苏联的援助下新建和扩建一百五十六个工程项目，可谓百业俱兴。虽经历消耗大量国力的“抗美援朝”，民众的生活仍有些许提高。中共的威信可谓达到了顶峰，我也成了虔诚的共青团员。没有一点不良动机，没有个人私心杂念，一心做党的助手和后备军，立志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

1957年是中国历史的重大转折年。在此之前，毛泽东屡露峥嵘，发起过“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思想改造”，批判《武训传》，批判《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适，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批判“反冒进”等一系列政治运动。但似乎都距我很远，没有切身感受。苏共二十大和东欧波匈事件之后，毛泽东加速推进酝酿已久的剪除异己、强化独裁的预谋和计划，经过伪装、诱惑、埋伏、布阵，此番向他视为心腹之患的民主党派和视为肉中之刺的知识分子发动攻势了。善良的人们轻信了毛泽东的巧言令色，中了他的阴谋诡计。三百多万热爱祖国、绝大多数也拥护共产党的知识分子，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和名目繁多的各类分子，投入劳教、劳改。从表面上看，毛泽东通过自导自演的恶作剧削减了民主力量，消除了本来就不存在的反对派，维护了独裁专断。实际上，则是开创了压制民主，堵塞言路的先河，造成了万马齐喑、唯我独尊的政治局面。在众多同盟者、同路人、民众面前暴露了伪善面目，显出了狡诈、阴险、残暴的法西斯原形，其威信一落千丈。由此之后只能依靠强权与暴力、欺骗与恐吓维持其反动统治，使中国进入了摧毁道德、灭绝人性、亵渎文化、残虐生灵的共产主义乌托邦时代。在政治上出尔反尔，以对敌人的手段对人民，玩弄阴谋、阳谋的毛泽东还值得崇拜吗？我不能不开始这样思索。

1958年到1961年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所谓三面红旗，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饿死了数千万群众，三年期间非正常死亡人数超过了八年抗战中的死亡总数，也超过了中国历史上两千多年饿死人数的总和。一贯助纣为虐的刘少奇都慨叹“饿死人是要上书的”，毛泽东却漠然处之，继续做他的皇帝梦。在残酷的事实面前，我不能不对号称共产主义舵手的那些人物产生怀疑，为什么共产主义带来的竟是饿殍遍野？我心中的偶像怎么成了草菅人命的魔鬼？

1962年中共中央北戴河会议，毛泽东的“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出笼了，1963年毛泽东又提出了“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口号，

“极左”路线日益猖狂，城乡监狱人满为患。国际上，毛泽东妄图取代苏联成为共产主义集团霸主，一方面用金钱收买亚非拉各国中的激进分子，输出“革命”，一方面挑起中苏论战，发表“九评”。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引自中共中央悼词）和同样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刘少奇（引自中共中央悼词）政见相左，势不两立了，以“四清”为契机，展开了你死我活的斗争。神仙打仗，凡人遭殃。亿万人民由此生灵涂炭，千载文明历尽十年浩劫。不禁令人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谁是马克思主义者？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人究竟想干什么？又干了些什么？产生了一连串的疑问。

1966年，毛泽东独霸“党天下”进而谋取“家天下”的私欲日益膨胀，他急于排除异己，发动了罪恶昭著的“文化大革命”。周恩来极力效忠毛泽东，以其威望和睿智控制着复杂纷乱的局面，不遗余力地维护和延长毛泽东的反动统治。刘少奇、彭德怀、贺龙、陶铸等一大批跟随毛泽东“闹革命”的开国元勋被迫害致死，为毛泽东夺取江山立下赫赫战功的林彪被逼不得已坠机身亡。众多的国人被投入监狱、关进牛棚。一千七百万青年学生被驱赶下乡，当了所谓“知青”，国民经济面临崩溃，文化遗产横遭破坏，毛泽东及其帮凶祸国殃民的罪恶罄竹难书，死有余辜。

1976年，那个宣扬要活一百五十多岁的“大救星”一命呜呼。被掏出了心、肝、脾、肺、肾等五脏六腑的僵尸，在地下室停留还不到一个月，做着女皇梦的江青、权欲熏心的毛远新，就被毛泽东钦定的接班人华国锋抓了起来。毛泽东垂死之际仍欲安插毛远新、江青等亲信充当政治局常委、妄图延续家天下的痴人之梦彻底破灭了。

“四人帮”想当初充当毛泽东的走狗，今日狂吠这个反动，明日狂吠那个反动，迫害无辜，蹂躏百姓，如今沦为阶下之囚，名副其实地带上了反动的帽子，成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历经华国锋短暂执政的过渡期，1978年，被毛泽东定为“死不悔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毛泽东面前保证“永不翻案”的邓小平复出。他是毛泽东极左路线的得力干将之一，镇反、反右的急先锋。然而，由于介入了毛、刘的权力之争，文革中几乎被开除党籍，尝到了被整的滋味，在江西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当了一名钳工。他一面韬光养晦以待时机，一面反思了建国以来经济建设失败的教训，开始认识到，二战以后世界两大阵营冷战阶段，所谓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发展远远落后于欧、美、日等国家，也远远落后于亚洲四小龙，高唱了几十年的社会主义优越性化作了一缕青烟。

从1917年开始，在世界范围内进行了社会制度孰优孰劣的试验，将近八十年的时间，付出了多少财富甚至血的代价，无一例外地证明了谁施行极权社会主义谁就越来越穷，不改革断无出路。他抛出了“不管黑猫白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的邓小平理论，打着共产主义的旗子，走着权贵资本主义的道路，依靠工农产品价格的剪刀差，依靠农民工的廉价劳动力，逐渐地扭转了毛泽东时期物资极度匮乏的局面，使国民进入了勉强维持温饱阶段。在这个时期也造就了大大小小的特权阶层人物，权贵集团的少数人依仗权势、假公济私，摇幌着共产主义的旗帜，积累了大量私人财富。少数寡头极权统治被美其名曰“中国特色”。

邓小平是毛的继承人，也具有强人的性格，敢于独断专行，他曾大言不惭地说：“毛在毛说了算，我在我说了算”。他号令改革开放就像毛泽东今日

联苏反美，翌日联美反苏一样可以随心所欲，施展权谋。在政治体制上虽然也称需要改革，却不见明显的行动。基本点是不惜一切维护中共的极权统治，绝对不能给人民自由、民主。他复出后，独断专行。数千万党员认可的总书记，被他定为分裂党而遭软禁；将无端迫害数百万知识分子的反右运动，定论为只是扩大化；用军队镇压和平请愿的学生和民众；无不打上邓氏独裁的烙印。乃至经济上虽有长足发展，政治上却停步不前。

总体来说，邓小平是皇权体制的局部改良者。冲破教条主义束缚，引进市场经济体制，纠正闭关锁国政策，废除中共领导终身制等等，是他的功劳。表面上退休赋闲，暗地里以太上皇自居，和毛泽东一样把自己凌驾于党和国家之上，一手扳倒三个总书记（取代华国锋，撤换胡耀邦，罢黜赵紫阳），一言指定两个接班人（仓促提拔江泽民，隔代指定胡锦涛），是他的劣迹。炮轰云南回民聚居的沙甸村、武力镇压天安门和平请愿的学生则是他的罪过。

二十一世纪，世界进入了独立、自由、民主日益深入人心的时代。古老的东方大国却依然固步自封。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却只能抱残守缺的低能儿胡锦涛纠集了一帮颟顸愚蠢、贪婪成性、权欲熏心的官僚和衙内，披着“和谐”的外衣，强化一党专政；打着“维稳”的旗号，剥夺普通百姓人权；唱着执政为民的红歌，横征暴敛，巧取豪夺；喊着科学发展的口号，透支未来，贻害子孙。依然靠暴力和谎言严酷地统治着十三亿中国人民。

我作为一个历经日本占领、国民党统治、共产党专权的耄耋老人；一个曾经笃信共产主义却被共产党投入炼狱的幸存者，在人生的最后阶段才略微触摸了历史。纵览世界，凡是美其名曰共产主义的，无一不是法西斯式的专制独裁，无一不是阻碍历史前进的逆流。我们这一代应该承担历史责任，揭露、遏止和消灭这股逆流。振兴中华，与世界各国和平共进。这便是一个八旬老人写作本书的主旨和想要达到的目的。

某些人看来，本自传竟敢批判毛泽东，似为大逆不道之作，甚至会被扣上一个反动的帽子。在此有必要澄清什么叫革命，什么叫反动。

按照毛泽东的说法，“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革命就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毛泽东当政期间，是否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呢？历史给与了否定的回答。他狂热地鼓吹人民公社，强行扭曲的生产关系成了生产力的桎梏，严重束缚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导致粮食减产，物资匮乏、赤地千里、哀鸿遍野；他置人民死活于不顾，以备战为名，盲目发展军火工业，造成市场萧条，民不聊生；三年困难时期饿死数千万民众。

按照马克思的说法，革命是社会矛盾激化的产物。财富分配不均，权力分配不均都会引起冲突、激化和危机，不平则鸣，于是便要用革命的手段解决社会矛盾，消除不平，建立新的社会秩序和生产关系。毛泽东当政期间，是否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呢？历史也给予了否定的回答，他压制民主，剥夺自由；大兴冤狱，镇压无辜；强奸民意，唯我独尊；制造矛盾，挑动斗争；泯灭道德，摧毁文明；使人民不得温饱，置社会于动乱之中。

无论按照毛泽东自己的说法还是按照马克思的观点，都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毛泽东及其帮凶是中国历史上危害最大的反动派。**一切记载、揭露、抨击毛泽东罪恶行为的应该是正义、进步、革命之举。



作者 1957 年 5 月反右前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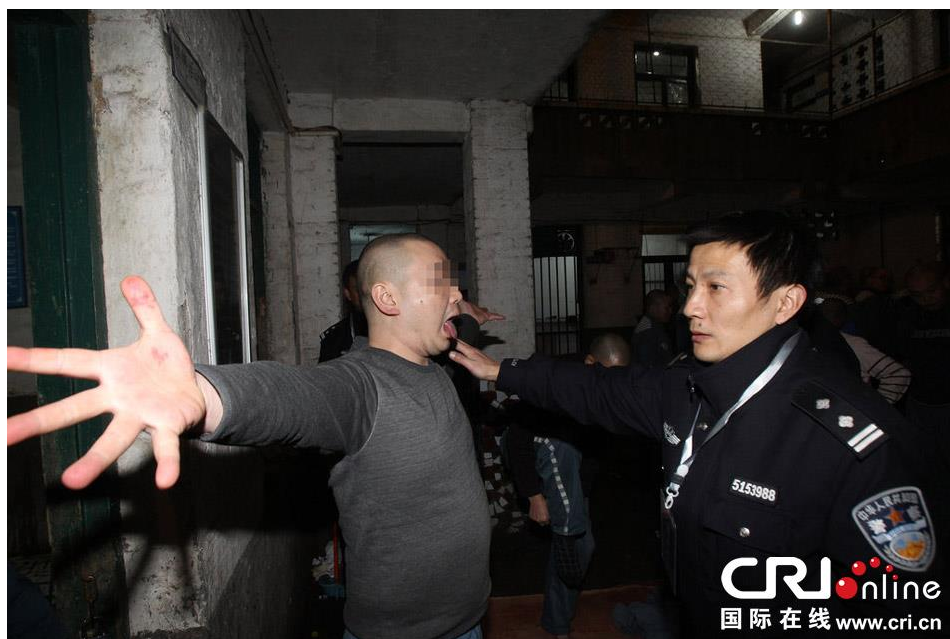
作者 1966 年 5 月文革前夜



作者 2012 年 5 月开始撰写回忆录



作者 2017 年 5 月回忆录即将脱稿



川南监狱搬迁



这个被批斗的人是东北抗联早期的组织者和领导之一
李范五（曾任吉东特委书记、黑龙江省省委副书记、
黑龙江省省长、林业部第一副部长）

精神摧残+肉体折磨=革命？









夏 衍——国务院文化部付部长



中国剧协主席、党组书记田汉



文化部副部长 周扬







请君入瓮

在1958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上，毛说：“法律这个东西没有也不行，但我们有我们的一套中国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了，我们基本上不靠那些，主要靠决议、开会，一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维持秩序。”这时，刘少奇插话，“到底是法治还是人治，看来实际是靠人，法律只能做办事的参考。”







搗毀清華園



放牛的山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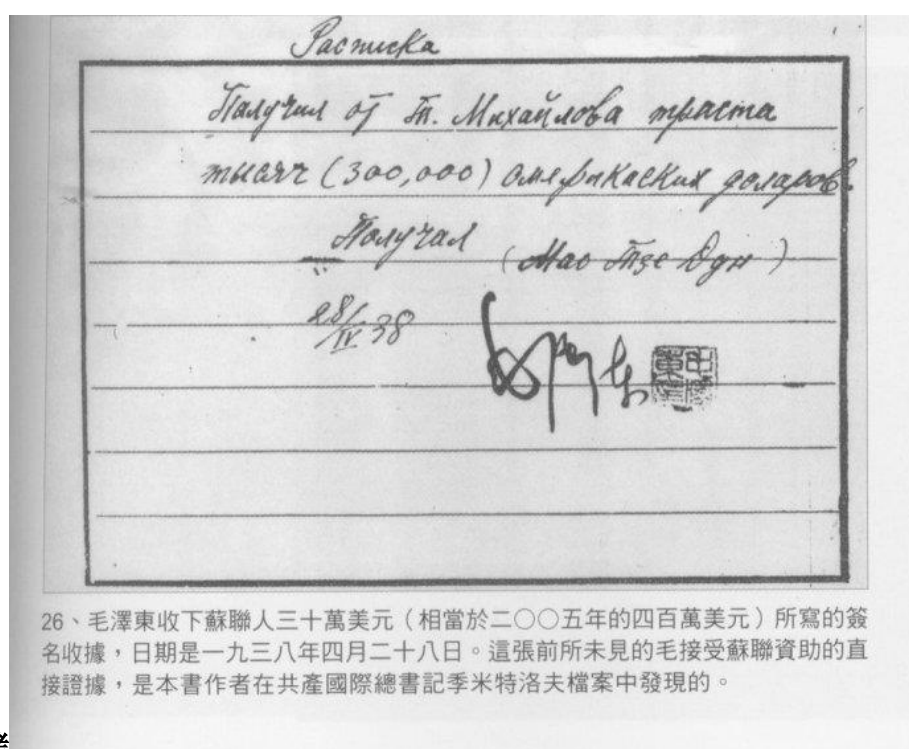


华国锋陵园





在小监内戴着背铐写的自述



背铐



黑白
档案

【文革记忆】黑白档案系列微博

批斗罗瑞卿



批斗彭德怀



票证



入城式步兵



沙坪农场



四川雅安芦山县



脚镣



五花大绑



八人帮



土高炉劳民伤财



老照片·旧书交易 www.Lzp.cn

团中央机关斗争胡跃帮，胡克实，王 伟

文革批斗



文革批斗



王一伦——黑龙江省付省长



文革时期



西安某劳教所发放棉被场景



永定门入城



游街示众



早请示



张玉凤和儿子



中共之土手铐



转移监狱



下图为批斗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



第一章 北平“解放”前后

一、战争前夕

1948年初冬，那年我十二岁，国共两党争夺权力的斗争进入了白热化决战阶段。

东北战场，双方投入总兵力一百二十余万，在各自的黄埔名将率领下进行着一个个城市、一个个山头、一个个村庄、一个个阵地的角逐，每天都有成千年轻的生命牺牲，上万的官兵流血。战争激烈残酷无前。从1948年9月12日到11月2日，历时五十二天，共军以伤亡六万九千人的代价，毙伤国军五万七千人，俘虏三十二万人，迫使国军起义投诚九万人，取得了胜利。

中原大地战事正酣，共军投入六十万兵力、五百四十余万民工，发动了淮海战役，国军八十万精锐部队困守在徐州、蚌埠一线。中原逐鹿，势在必得，从战场上逃出来的人说，徐州一带已经成了一片火海，居民房屋的玻璃没有一块不被震得粉碎，弥漫的硝烟天昏地暗，昼夜不停的炮声震耳欲聋，横陈的尸体、濒死的伤员，惨不忍睹。战争还在激烈的进行着。据战后统计，从1948年11月6日至1949年1月10日，历时六十六天，共军伤亡十一万余人（未包括民工的大量伤亡），歼灭（击毙、击伤、俘虏和投诚、起义）国军五十五万余人。

战乱声中，古老的北平却相对的平静。

我家住在地安门外旧鼓楼大街铸钟胡同。

铸钟胡同地处北城平民区，道路相对狭窄、房屋大多简陋，是个不惹眼的小巷。文革期间，一代名儒梁漱溟先生住在这条胡同的破旧房屋里，居然逃脱了批斗。

六百年前，这里却是当时的大钟铸造圣地，胡同名称即由此而来。

1421年在这里铸造了闻名遐迩的永乐大钟，钟体净重42吨，连蒲牢（钟之纽耳）等总重46.5吨，高6.75米，钟肩外径2.4米，口沿外径3.3米，内外壁铸有经文230184字。轻撞之，声音清脆悠扬；重撞之，声音浑厚洪亮；余音绕梁可达三分钟之久，方圆五十里皆可闻其声，堪称世界一绝。

至今仍高悬于北京钟楼之上的大铜钟也出于此地，铸造于明朝永乐年间。该钟统高7.02米、钟肩直径2.52米，口沿直径3.4米，总重63吨。据传说大钟久铸不成，限期将至，铸造师之女为解父难，奋身投入熔铜炉中，钟遂成。后人建“金炉圣母铸钟娘娘庙”祭祀之。我家即紧邻该庙后山墙，记得大殿屋脊上有一铜质大象，背负一宝瓶，宝瓶中有三支羽箭，年少时未知其含义，只感觉到一种庄重和威严。后来听说，此饰物含有“吉祥平安”（脊象瓶安的谐音）之寓意。在没有找到更有根据的典籍以前，权当就是人们善良的愿望吧。该庙文革遭破坏，今已成居民大杂院，只留下了铸钟娘娘的凄美故事。但愿能够一代一代地相传下去，与大钟共存。

铸钟厂究竟铸造了多少口钟，已经失察。今日之铸钟胡同只剩下简陋的宅院、低矮的房屋、风蚀的老砖、斑驳的院墙，无声地诉说着岁月的痕迹。

我家从1940年开始租用铸钟胡同二十四号院，是一座陈旧的三合院，房东是曾任过伪满洲国立法院院长的赵欣伯，他家房产颇多，1949年以后均被中共没收为国有。

二十四号院有五间北房，两间东房，两间西房，中间是大约六十平米的

院子，南面紧邻金炉圣母铸钟娘娘庙的后山墙。挨着南墙根有一棵枝干挺拔的香椿树，院子的东北角儿有一棵介于乔木和灌木之间的丁香树。春夏之际，高大的香椿枝繁叶茂，绿影遮阴；矮小的丁香繁花似锦，淡香袭人；冬天了，树叶都已经落掉，只剩下干枯得似乎没有生命的树干和树枝，默默地承受着肃杀的寒冬，期待着来年的春风化雨。

这年十一月中旬的一天，清晨六点半钟我照例按时起床了，家里的其他人还在沉睡。我起来的第一件事是把昨晚搬放在屋檐下的炉子搬到东房和北房之间用镀锌铁板搭建的小棚子里，翻过来倒出炉灰，选出没有烧尽的煤核儿放在炉算子上，把地面打扫干净，然后找一点废纸，在炉口点燃了以后，丢进炉膛里，赶紧扔几根细劈柴，燃起来以后再加八、九根粗劈柴，待火苗儿窜起来的时候，立即撮一簸箕煤球儿倒在炉子里，罩上拔火筒儿，浓浓的煤烟升腾而起，弥漫在故都寂静的清晨，炉子里的煤球就要被点燃，将在寒冷的冬天释放出光和热。

随后拿起笤帚扫院子，只把风刮来的枯叶和丢弃的垃圾扫到一块，放到垃圾桶里，地面上的土是不扫走的，哪里低洼把这些土扫到哪里，用脚踩紧，以便保持院子的平整。这件事几分钟就做完了。

下一步该扫胡同了，这需要先打开街门，那时候北平的住家户白天是不关街门的，现在还有些人家儿保持着这个习俗，您走在北京的胡同仍然可以看到少数白天不关街门的院落。不过多数居民都与时俱进，处在当局称道的和谐社会、太平盛世，白天晚上都关门闭户了。当时一般的街门也就是个木板门，晚上关起来只消用门插销插上，通常不上锁，力气大点的人一脚就能够踹开，不像现在中国流行的钢板制造的双锁防盗门那么结实。那时候不兴社会主义，也不讲什么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更没有宣扬全面小康，但当时盗贼似乎不多，人们好像缺乏防盗的概念。

我打开街门刚要扫胡同，抬头一看，胡同两边的墙上贴了一些平时很少见的、用红、黄、绿、蓝等色纸张写的标语：“保卫故都北平”、“把拳头缩回来再打出去”、“誓与故都共存亡”等等。大约是昨天半夜贴的，那时我正在睡梦之中，一点动静都没有感觉到。那么冷的天气，浆糊都要被冻硬了吧，是什么人贴的呢？北平那么多大街小巷，要是每个胡同都贴标语，不知道需要多少人忙活多长时间。我想赶快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想知道昨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于是加快了扫街的速度，从自家的门前很快就扫到邻居的门口了，总长大约二十米，算是完成了“黎明即起，洒扫庭除”的任务，这是父亲、母亲给我这个长子定下的规矩。

回到我住的靠东边那间小北屋里，舀水，洗手，刷牙，洗脸。从笼屉里拿出一个昨天蒸好的冷窝头，放在书包里，背起书包，出门上学了。

前天才下过一场大雪，屋顶、墙头、干枯的树枝上都还留着银白色的积雪。

清晨的胡同里，寂静冷清，寒风凛冽。不时一阵风吹来，挟带着本已躺在墙头、树枝上的雪花，扑在脸上更多了一些凉意，禁不住打了几个寒颤，四周还没有行人，平添了几分空虚和孤独。

铸钟胡同是一条“厂”字形的胡同，东口在旧鼓楼大街，南口在鼓楼西大街，胡同宽窄不一，最宽的地方在西南半段，也不过四五米，东半段比较窄，大约两米左右，小汽车都很难开得过去。整个胡同不长，总共只有六十三户门牌，也就是六十三个大小不等的院落，有的是一家独住，有的是几家

共处。大半的院落里都有树，一般是槐树、枣树。

我走在胡同里不停地朝两边看，每隔五米左右就有一条标语，都是保卫北平的口号。

我快步走着，出了胡同东口，便是旧鼓楼大街，这是一条靠近京城中轴线的南北向大街，往两头看了看，公路两边卖烧饼、油条的；卖杏茶、面茶的；卖切糕、年糕、炸糕的；卖煮白薯、烤白薯的；卖油茶、油炒面的；卖包子、炒肝儿的……；平时的小摊儿都在，每个摊位都热气腾腾的，井然有序的做着生意，都有两三位、四五位顾客，或站或坐地吃着早点。从他们依然安详的神态，似乎看不出昨晚发生了什么事。

路旁的小商贩各有绝活儿，擅长制作物美价廉的早点，讲究的是货真价实，童叟无欺，还要保持风味小吃的特色，旧鼓楼大街的跳坑烧饼、面茶、炸糕都有点名气。他们起早贪黑的出来摆摊儿，既赚点钱养家糊口，也给早晨上班、上学的人提供了方便。那个年代没有城管驱逐小贩的事，听说从北洋军阀那时候起，官府对这些摆摊儿卖早点的就不征什么税。这些小摊儿清晨七点各就各位，上午九点左右把周围打扫得干干净净撤市，回去做自己的家务事，第二天早晨四、五点钟就要起床准备出摊儿的事情，挣点钱也很辛苦。我的二姨和大姨家的表哥都是做这种小生意的，二姨和二姨夫在东皇城根卖油条、油饼、豆浆等早点；大姨家的表哥用一个独轮架子车走街串巷，经营时鲜水果。亲戚之间时常来往，让我从小就了解了处于社会底层的艰难生活。

清晨，路上的行人还不多，骑自行车的也和往常一样，不慌不忙的赶着路，没有明显的变化。横穿过旧鼓楼大街，稍往北拐，接着往东走，进入了娘娘庙胡同，随后是豆腐池胡同[1]、法通寺胡同、分司厅胡同。这四个胡同互相连接组成了东西走向的一条支路。

平时，我上学走这四条胡同，大约需要二十五分钟，那天加快了脚步，用了不到二十分钟。出了分司厅胡同东口就是安定门大街，对面的一家铺子挂着一个盘面很大、字迹清晰的钟，可以看时间。

我匆匆的走着，穿过安定门大街进入北三条，那就是我初中的母校崇实中学所在地。胡同里也有新贴的标语，顾不上看其中的内容了，五步并作四步走，三步合成两步行，匆匆来到了学校门前。

与往日不同的是，平时很难看到的校长罗遇唐先生站在校门旁边，迎接着陆续来到的学生。他花白的头发依然梳理得十分整齐，身穿一件深灰色的长棉袍，围着一条很长的枣红色羊毛围巾，面部表情凝重，隐含着几分幽怨，几分无奈。

这时候临近八点钟，学生三五成群的来到校门口，都以惊讶的眼光看看校长，罗校长的下颚频频的微微的动着，像是在向同学们点头，眼睛里透露出难以名状的神态，目送一批又一批学生走进校门。

进了校门，左边的墙上贴着一张白纸黑字的大布告，内容主要是说因战争原因学校暂时停课，同学们不要在学校停留，立即回家告知家长，何时开学等候通知。

我和同学们一起走进校园，没看见老师，只见操场当中架着轻、重机枪，墙边一排树干上拴着高大的战马，操场北边靠近图书馆一侧有几个军人站着指手划脚的不知道在商谈着什么。

进入教室，匆匆忙忙地收拾一下书桌，把所有的东西放进书包。陆续进

来的同学，相互之间只是简单地打个招呼，似乎北平就要打仗了，大家都紧张得没有了多余的话，就又匆匆忙忙地走出教室和学校，回头看了看校门，恋恋不舍地走出了安内北三条胡同。

回去的时候，我没有走来时那条最近的路，也没有立即回家，而是到安定门大街略作逗留，想看看临近战争的市井变化。

清朝期间，北京内城以旗人为主，八旗各有方位。正黄旗驻德胜门；镶黄旗驻安定门；正白旗驻东直门；镶白旗驻朝阳门；正红旗驻西直门；镶红旗驻阜成门；正蓝旗驻崇文门；镶蓝旗驻宣武门；汉人多居外城。辛亥革命以后才打乱了这个布局，并于1928年将北京改名为北平特别市。

老北平素有“东富、西贵，南贫、北穷”之说。东城居住的大多是商贾富豪，西城则以达官贵人的府邸为主，南城和北城多为平民百姓。当然这只是泛泛而论，南北二区也有大户人家修建的深庭大院，东西两侧也有小商小贩居住的斗室蜗居。

从清末至民国三、四十年代，北平最繁华的街道是“东四西单鼓楼前”。系指东四、西单、鼓楼、前门一带，总括了北京东西南北四城繁华地段。

东四因恒利、恒兴、恒和、恒源钱庄均在附近，商贾云集，买卖兴隆，且与隆福寺毗邻，每逢一、四、七赶庙会，分外热闹。

从宣武门到西单牌楼这一条街，民间艺人比较集中，曲艺杂耍、特色小吃、民俗表演吸引了不少游人，再往北边走点，阜成门与西四之间的白塔寺也是著名的庙会，每逢二、五、八也吸引了摩肩接踵的人流。

鼓楼前面的地安门大街集中了北城的商店、饭庄，附近又有什刹海、北海公园，是休闲、购物的好去处。

前门一带茶楼酒肆、戏院曲园鳞次栉比，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繁华程度更在东四、西单、鼓楼之上。

安定门大街属于北半城，但它的南端临近东四牌楼，中间又有雍和宫、国子监、孔庙等文化圣地。这条街包容了贫穷与富贵、高雅与粗俗、显赫与卑贱、繁华与静谧诸多元素，悠闲地逛逛，基本上能够领略北平的特色。

街道两面没有高楼大厦，也很少名家字号。倒是沿街的小贩门类繁多，阵阵吆喝，声情并茂。卖估衣的、卖古玩的、卖打药的、卖小吃的，应有尽有。三教九流，和谐共处。1948年底，政局混乱，这里也难免不受影响；散兵游勇、残废军人走投无路，为了生存也做点小买卖；东北流亡学生[2]大多是山海关外的地主、富农家庭出身，如今土地被没收，老爹被批斗，断了生活来源，也来到鱼龙混杂的安定门大街，挣碗饭吃。有的叫卖着鹿茸和不知真假的东北野山人参，有的手里拿着几块袁大头、帆船、站立洋人（老百姓根据币面图案对银元约定俗成的称谓），一边敲打做声，一边喊着“买两块，卖两块”，做起了倒卖银元的生意。

我在安定门大街逛了大约半个小时，市容街景与平时差不多，来来往往的人对于战事的紧迫似乎无动于衷，人们的脸上没有惊慌的神色，不知道是故都人的沉稳、大气，还是习惯、麻木。

沿着安定门大街往南走到交道口再往西拐，顺着鼓楼东大街经过小经厂胡同、锣鼓巷、宝钞胡同到鼓楼。这是一条店铺林立的繁华大道，沿街也看不出什么变化，门面都在开着，门口的招牌、幌子还都是擦得很干净，该吆喝的还是那么起劲儿吆喝，饭馆儿的伙计热情的招呼着过往行人。马路中间的有轨电车照样行驶，一阵阵叮叮当当的声音还是那么清脆，悦耳。

一个多钟头的时间，我走了几条胡同，穿越了两条大街，路上并没有看见多少军人。可能是一场败仗下来，疲惫不堪，正在蒙头酣睡吧。

回到家里，父亲骑自行车上班去了，两个妹妹上的小学没有停课，要等到中午才回来吃饭，母亲在家和几个工友织着地毯（我家当时是个小的地毯作坊，母亲也参加劳作，织出来的地毯交给商行出售），三岁的弟弟无忧无虑的在屋里跑来跑去，年近花甲的姥姥在东边的屋子里做着针线活儿。

我向母亲说，学校让军队占了，听说八路军要进攻北平，已经占据了周围的县城，国军打败了，退到城里来了，有一个师部驻扎在我们学校，学校停课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复课，老师都回家了，学生在家里等通知。母亲听了没说什么，学校停课大概在她意料之中。从此我就辍学在家，不知道哪一天才能继续读书。

在孩子的眼里看起来，北平城内没有什么改变，然而近两个月来战争的阴影确实实的越来越近了，起初不时听到一些炮声，有的时候还夹杂着枪声，沉闷的重机枪和清脆的步枪，清晰可辨。

傅作义时任华北剿匪司令部总司令，统辖五十余万官兵，其中将近一半为傅作义的察绥军嫡系，另一多半是黄埔系的中央军，由石觉[3]、李文[4]、袁朴[5]等人指挥。

1948年11月13日，北平守城部队举行保卫华北大阅兵，傅作义发表公开演说，扬言要以总体战保卫华北，慷慨激昂，不可一世。

士兵们列队高呼“固守华北、战无不胜、前途光明”，群情激奋、喊声震天，大有与华北共存亡之势。

第二天，《平明日报》在头版刊登大幅照片和专题报道，极力渲染守城部队誓与共产党决一死战，声称华北、平津固若金汤。表面看来华北决战难以避免。

守城部队很早就开始构筑城墙上的防御工事，以前老百姓可以任意登城，十月份以后，内外城的城墙就禁止百姓行走了，上面来往的全是军人。北平城墙高约10~11米，内城的城墙基宽18.6米、顶宽15米，外城的城墙基宽9.9米、顶宽6.6米，相当坚固。这时候城墙被当做重要防御阵地，守城部队在上面修建了不少轻重机枪掩体，东南面的几段城墙下面还开了豁口，便于城内外沟通。

北平的城墙虽然坚固，但毕竟面积有限，不能容纳众多的兵力，不能适应多兵种和特种武器，更不能前后移动，只能用于被动防守，不能当做大决战的主战场。真正实力的较量还是在城墙外面，所以大部分兵力部署在郊外。从城墙根儿起，往外扩展一千到一千五百米地区被列为防守北平的主战场，修建了大量的碉堡群，傅作义的嫡系部队防守西北方，划归傅作义指挥的中央军主力防守东南方。随着时间的推移，共军对北平的包围圈逐渐缩小，面对着即将攻占北平的百万大军，守城部队已经显得势单力薄，且成了笼中之鸟。

不久，驻守外围的国军连吃败仗，大量官兵退入市区。没有那么多的营房，派出所的户籍警察和地段上的保甲长挨家挨户地游说，或许还有点硬性摊派，让军人分散住在居民的家里。快过年了，谁也不愿意接受素不相识的军人，何况很多家庭中还有大闺女、小媳妇，住进外人很不方便，但是没办法，不接受也得接受。幸好户籍警察知道我们家中人口多，住房不宽敞，我们这个小院儿没有住兵，邻居们的家里凡是住房比较宽裕的都住上了国民党

的兵。老百姓很反感，但是敢怒不敢言。

进入十二月中旬，枪炮声日益迫近，不久就听说海淀、丰台、南苑、通州都成了八路军的地盘，圆明园、颐和园、八大处、香山、玉泉山、清华大学、燕京大学也被共军“保护”起来了，北平这座孤城已经是四面合围、兵临城下了。南苑机场被占领了，国军赶着修建所谓的环城公路，慌里慌张的在东单和天坛南面修建临时机场，砍了不少百年古树，实在是可惜。

从当时外电报道，可以感受战事的紧迫。摘录几条如下：

【路透社天津廿日电】天津益紧，机场形势不可乐观，城内外布满防御工事及战壕，警备队已经成立。北仓以北（津西十哩）各地都已受到严重威胁。津沽间铁路中断，张贵庄、军粮城间铁轨被移走，铁桥一座被炸毁，修理车前往维护，行至半路即被共军击退。

【法新社冀东廿日电】共军于十九日晨攻占塘沽港与天津间的重要铁路据点军粮城。同日另部攻占天津西北二十哩之杨村车站。又共军同时占领北平西南之长辛店与卢沟桥，该地距北平仅七哩。

【美联社北平廿日电】北平南郊夜战，国军至少两个师反攻南苑机场，在公路及旷野上推进。共军昨起自南苑逐渐迫近城垣。昨天观战者出城可走到距机场一哩之处，今天只能走一半路程了。其它方面战事沉寂。众信北平的命运仍将在会议上决定，无疑有很多事情正在幕后进行。

《新民报》引述某军事观察家的话：“如果林彪打下天津，北平完全孤立，共军将不经激烈战斗占领北平。如果北平南方的供应线永久切断，则国军没有理由死守北平”。

《新民报》据相当可靠的消息报道，北平实际上已经完全孤立，重新打通供应线的希望几乎等于零。

【合众社北平廿日电】三个美国陆军武官和四个记者因为要到南苑机场企图离开北平而进入共军大炮射程以内险遭击毙。共军一75毫米炮弹在他们附近爆炸。下面是合众社记者诺吉克叙述的当时情形：十九日傅作义命令收复南苑机场，我们即到前线去看看发无线电到青岛让派飞机来北平接我们是否安全。当第一颗炮弹飞过我们即平卧地上，第二次炮弹飞过了，还未来得及拍去身上的泥土时，第三颗炮弹又在附近爆炸。以后我们决定回到城中，计划在城中临时机场上的跑道起飞，但因跑道短而软，大飞机降落起飞很危险。我们希望用青岛派来的飞机起飞。

上述报道比较真实，也显示了通讯社及报纸尚有新闻和言论自由，不仅可以报道战况，对属于绝密的北平和谈及战事进程也敢于披露和揣测。那时的当局并没有查禁通讯社和报纸，新闻审查远不如今日之严格，也未以扰乱军心或颠覆国家治记者之罪。

北平城里的老百姓似乎仍然没有兵荒马乱的感觉。我家的地毯作坊也照常作业，姥姥到三姨家去了，家里的买菜做饭等等事情就落在我的身上了。我天天上街，看不出什么大的变化。

表面看来，当时国民党的部队还真想保卫北平与共军决战，为了赶在大战前构筑好城外的防御工事，开始征集老百姓出钱出力，就是说家家户户要派劳动力，十天轮一次，有钱的可以买劳动力顶替出工，生活穷苦的无业人员则以此为临时职业。我家里的经济不算富裕，只有出劳力。当时我父亲在灯市口一家经营地毯、古玩、玉石摆件的中华实业商行担任襄理职务，每天都要上班，于是这个出劳动力修筑工事的差事只好落在我这个长子头上了。

第一次应征，早晨起来带上干粮和自备的一把铁锹到指定的地点集合，一共三十几个人，都戴着棉帽子和手套，多数扛着锄头、铁锹，少数人空着手，一个个冒着严寒无精打采地走到德胜门城楼下面。一个军官模样的人准备带队出城，他逐一念着户主的名字，来的人逐个的应到，那些职业劳动力需要记住户主的名字应答。全部应到完毕，那个军官喊了三个人出列，其中有我，我那时身高不到1.4米，身子骨儿也比较单薄，另外是两个年龄比我爸爸还大的、体形瘦小的老大爷，他让我们回去，还明确地告诉我们只要应了到就算出工，但是希望下次派能够挖工事的人。我跟着两位大爷回过头来慢慢地往铸钟胡同方向走，两位大爷挺高兴，一边走一边说笑，没让在城外顶着风沙干活儿，等于是出来溜达了一趟，早晨起来活动活动腰腿，我心里可是因为没有能够出城看看战场而有点欠然。

第二次轮到我家出工，已经是1948年12月底了，照例走到城门口被淘汰了，我那时候好奇心很强，也不知道什么叫危险，就想看看打仗是什么样儿，我走到那个军官跟前说：我能够干修工事的活儿，他也挺干脆地说：好！那就走！

我们一路出了城，清晨的薄雾还笼罩着这座城市，一片阴霾。到了城外才看到战争的可怕，从德胜门起，关厢、马甸这一带的民房几乎全被拆光了，一片荒芜，到处坑坑洼洼，只看到些断壁残垣，一阵风刮起来，尘土飞扬，黄沙漫卷，更显得衰微破败，凄惨荒凉。门板，房梁等大一点的木料都拿去构建工事了，用不上的零散木料、窗户框子等凌乱的堆在一片片瓦砾上。没有人烟，老百姓不知道都疏散到哪儿去了。

带队的军人一再提醒我们，附近埋下了地雷，路边插着的小纸旗子和摆放的小碟子、小碗儿就是埋着地雷的标记，千万不要去动，我的心里有点紧张了，抬起脚来要先看看才敢落地。

这次出城，我的反战情绪被激发起来，而且牢牢地植入脑海里了。人与人之间应该和谐相处，各人干各人的行当，相互依存，挣钱吃饭，为什么要打仗呢？我想到了墨子的“非攻”；想到了春秋五霸、战国七雄；想起了亚历山大、奥古斯都、希特勒、嬴政、忽必烈、黄巢、李自成……；想到了历史上的东征西杀无非几个政治或军事寡头争权夺利，战争的受害者都是老百姓，“一将功成万骨枯”……。

到了预定的工地，挖战壕，按照地面白灰画的线挖到一定的深度，不是很累，基本上没有人监督，只有一两个士兵来回检查工程质量，无非是挖够宽度和深度。在郊外，炮声听起来比城里强烈得多，不仅震耳还真有点震心，重机枪的声音连绵不断，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让人感觉附近就在打仗。来做工的人多数是熟悉的邻居，相互照应着，谁也不敢乱走动。

中午，一声哨子响，有人高喊：“父老乡亲们！休息了，准备吃饭了。”于是各自拿出带来的干粮，多数是烙饼、馒头、窝头之类自做的面食，很少有人带菜。天气冷，干粮也是冷的，那个军人告诉我们旁边有个保温桶，是刚烧的开水，几个胆子大的人从路边捡了一些木头，放在还没有挖好的战壕里，点火取暖。

国民党的军队也讲政治，一个挂着上尉军衔的人走过来说：乡亲们，辛苦了，都是毛泽东不要和平建国给大家带来的苦难等等，谁也没有注意听，也没有人回答。那是我第一次听说毛泽东这个名字，据说是共产党的头子。

下午四点钟左右，收工了，列队进城各自回家。这时候几位以出卖劳动

力为生的中年人，解开了缠在腰间的绳子，到瓦砾堆上捡遗留的木料，捆成一捆背在肩上往回走，这不能发国难财，可以节省一点买劈柴的钱吧，日子艰难呀。

一月上旬，战争的气氛越来越浓，从早到晚轻重机枪和隆隆的炮声不绝于耳，有的时候甚至很激烈，炮弹已经打到城里边来了。此时，北平城外大部分阵地已被共军占领，共军不时向城内打炮，不过属于试射性质，并非大举进攻，目标是北平警备司令部、东单和天坛临时机场等军事要地。潜伏在北平城内的地下党，派人暗地观察炮弹的落点，即时向攻城部队拍发电报，炮手随即修正弹道，乃使弹无虚发，击中要害。此举起到了对守城部队震慑和威胁作用。才修的天坛临时机场被炸，幸好炮弹没有落到祈年殿上。听说八路军离城很近，邻居之间传说着八路军几次攻打德胜门和西直门的消息，谁也不能辨别真假。

我们家里织地毯的活儿停了，我父亲小心翼翼的把八仙桌后面那个条案上摆着的花瓶、自鸣钟和多宝阁里摆着的古玩、瓷器、玉石盆景都拿下来，用废报纸和旧布包好，装在木箱里，放到床铺底下了。屋里顿时显得空空荡荡的。读小学的妹妹也提前放了寒假。

北平当时有将近两百万居民。中央军和傅作义的部队总共约六十万人，原来分散在从张家口到北平、天津、塘沽数百公里的狭长防线上。北平外围的争夺战打响以后，傅作义的部队连连兵败，仓促退至北平城内，北平城里一下子增加了十多万人口，都要吃要喝，由于事先没有粮草准备，造成生活物资匮乏。物价飞涨，米珠薪桂，蔬菜、煤炭都十分紧张。

蒋介石为了控制北平的局势，派飞机给守城部队运口粮，然而北平城四周有百万攻城大军，大部分配置的是东北战场缴获的美式装备，自然是不缺少防空武器的，因此国民党的运输机不敢低飞，只有在高空投放，目标是东单和天坛的临时机场，由于高空风大，眼看着一袋袋大米、白面落到北平城内的“三海”[6]里，砸破薄冰落在水里的只能喂鱼了，落在冰面上的则被军民争抢一空，还有些落在胡同里，砸了不少民房。傅作义说这是“添乱”，老蒋也就停止了这个无济于事的空投。

老百姓有一点钱马上买粮食等生活必需品，大米、小米、白面、玉米面等虽然还没有脱销，也要一早就去买。我家里腾空了一个大水缸，存了一缸小米，大约有四、五百斤。

北平的蔬菜往日都是每天从郊外送进城里，围城之后攻守双方似乎达成了某种默契，限制性地开放了朝阳门等少数城门，每日清晨卖菜的农民用独轮车或骡马车把菜蔬拉到城门口。北平的城门楼子多数都是两道门，外门和内门之间是一个长74~108米、宽65~85米的矩形空间，俗称瓮城。大约七点钟打开外城门，卖菜的老乡进入瓮城逐一接受检查，确认没有夹带武器才打开内城门，这时候等着买菜的商人蜂拥进入瓮城，用银元交易，不到一个小时全部菜就卖光了，顾客回到城里，关闭内城门，这时再打开外城门放卖菜的农民出城。普通老百姓很少到瓮城买菜，还是在离家比较近的商贩手里买一点高价菜，日子越过越艰难。

鼓楼前面的地安门大街，商店还在营业，路上的行人明显的减少了，行走的脚步明显的加快了，都是来去匆匆的样子，熟人见面也不像平常那样一聊可能在马路边站上半个钟头，而是一边走着一边打个招呼，还是北平人见面常说的那句老话“吃了吗？您”、“偏过了，您”。

人们尽量避免在外面逗留，恐惧和紧张的氛围笼罩着整个城市，看来大战在所难免，似乎有一触即发之势。

附注

[1]1918～1920年，湖南杨昌济先生（1871～1920）应蔡元培之聘，任北京大学伦理学教授，月薪三百元，寓居豆腐池胡同十五号。经杨昌济推荐，毛泽东从1918年9月起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做了三个月的抄写工，每月八元钱的薪水，当时毛泽东与蔡和森寄居在恩师杨昌济先生家中，得以与杨先生的女儿杨开慧交往，两个年轻人常在紫禁城护城河边或北海的垂柳下散步、谈心。1918年底毛泽东返回南方，1920年1月杨昌济先生英年病逝，杨开慧和母亲向振熙、兄长杨开智一起护送父亲灵柩回长沙安葬，由此离开北平。毛泽东于同年冬季与十九岁的杨开慧在长沙宣布结婚，杨成为毛的第二位妻子（毛的第一位妻子是其父毛顺生包办的比毛泽东大四岁的当地大户人家的美丽村姑罗一秀，罗在毛家住了三年，体贴丈夫，孝敬公婆，1910年春因病逝世）。1927年9月毛泽东上了井冈山，当年10月结识了号称永新一枝花的十八岁的贺子珍，毛泽东不理湖南的妻儿，不顾党员的议论，大言不惭地宣布与贺子珍“相爱”、同居。其时杨开慧带着毛的两个孩子留在长沙，1930年7月下旬，红军占领长沙，8月5日被迫撤出，同月24日再次攻长沙未克，急返井冈山，毛泽东当时任攻打长沙部队的总前委书记，因另有新欢，竟未与近在咫尺的杨开慧相见，杨开慧也未随红军撤离，1930年11月死于非命。而今豆腐池胡同十五号杨昌济旧宅门口旁边的山墙上做了一块“毛主席故居”的匾额。

[2]1947年底，东北民主联军发动攻势迅速占领了东北广大城乡，国民党军队被压缩在沈阳、长春、锦州等几个孤立地区。撤退过程中以建立东北临时大学、临时中学的名义，将大批东北学生送到关内，流亡北平。1948年7月，北平市参议会通过《救济来平学生办法》，决定停发生活费，将学生征召入伍，实行军训，引起强烈不满。7月5日数千名东北学生群集东交民巷北平市参议会会长许惠东住所抗议。经磋商达成协议，学生兴高采烈地退出现场，因人数众多，过道狭窄，群情兴奋，难免拥挤，北平警备司令陈继承却于此时调集军队开枪镇压，打死九人，伤一百余人。市民无比愤怒，北平各校学生怒不可遏，纷纷游行抗议，傅作义素来与陈继承不和，借此向蒋介石提出辞呈，南京政府见势不妙，不得不将肇事头目陈继承等人撤职查办，优抚死伤学生，并允诺立即发放生活费和解决学生读书问题，一场风暴暂时平息。

[3]石觉（1908～1986）广西桂林人，少年丧父，家贫，十六岁考入黄埔军校三期，毕业后任排长、营长等职，参与围剿红军。抗战期间率部开赴华北与日军作战，参加南口战役、台儿庄大战，武汉会战等，以智勇双全见称。

1948年任华北剿总第九兵团司令，上将军衔。其所属部队全系美式装备，自视甚高，坚决反共，不愿接受和平改编，1949年1月24日偕同李文、袁朴、骆振韶等百余国军将领乘蒋介石派来的飞机离开北平，协同汤恩伯防守上海，后撤至舟山，转赴台湾，晚年在台湾倡导太极拳，卒于台北。

[4]李文（1905～1977）湖南新邵人，1924年入黄埔一期，历任排、连、营、团长，抗战爆发后授陆军少将，参与淞沪、武汉、豫东会战，功勋卓著，抗战胜利后晋升中将。

1948年任华北剿总副总司令兼第四兵团司令，不愿接受和平改编，与石觉等高级将领乘飞机逃往南京，旋赴西安任第五兵团司令，1949年12月27日率部在四川邛崃向人民解放军投诚，被集中于重庆教导总队学习，1950年3月伺机摆脱监视潜

逃香港，后经蒋介石允许转赴台湾。曾任国防部中将高参，1977年在台北逝世

[5]袁朴（1904~1991）湖南新化人，黄埔一期学员，曾参与北伐，讨伐陈炯明等战役，抗日战争期间参加淞沪会战。1948年5月任十六军军长，驻防北平，升任陆军中将，坚决反共，不参与和平改编，乘飞机离开北平后被任命为西安绥靖公署干部训练团教育长，随后去台湾任第一军团司令、陆军副总司令等职，授二级上将军衔，卒于台北。

[6]北平故宫西侧有一片连绵的湖泊，碧波荡漾、楼宇错落、绿瓦红墙、树影婆娑，风光绮丽、景色幽雅，统称太液池，是谓皇城西苑三海，即北海、中海、南海。北海与中海水面相通以金鳌玉蝀桥为界，中海与南海合称中南海，两海之间隔一狭长陆地，分布着勤政殿、颐年堂、丰泽园等知名建筑，部分水面相通，有蜈蚣桥一座。中南海占地100公顷，水面约50公顷，北海占地约70公顷，水面38公顷。西苑三海旧为皇家园林，清帝逊位后，北海被辟为平民公园任人游览。中南海曾被袁世凯占用，民国期间曾作为公园对平民开放，可入园垂钓。49年后成为中共中央及国务院驻地和中共高层要员的住所。

二、和平“解放”

（1）傅作义处在多重包围之中

华北五省剿匪总司令部成立于1947年11月，受蒋介石任命，傅作义充任总司令。剿匪总部最初设在北平西郊原日本人构建的“新北京”（如今的公主坟附近），后迁至中南海居仁堂内。傅作义进入北平以后，战局日益不利，内乱纷纷攘攘。城外传来的战报是“阵地丢失”、“伤亡惨重”，城内中共地下党和民主人士组织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示威游行接二连三，屡禁不绝。傅作义处在如下几重包围之中：

1、百万大军压境

1948年初，国共双方在华北地区集结了上百万兵力，剑拔弩张枕戈待旦。傅作义以总司令名义统辖六十余万部队，防守以平津为重点的华北五省。共军在华北主要是聂荣臻统辖的晋冀热察部队，总共三十余万人，难以发动大规模攻势。

1948年秋，林彪指挥的东北野战军（1945年10月称“东北人民自治军”。1946年1月改称“东北民主联军”。1948年1月1日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1948年7月改称“东北野战军”）连连得手，1948年9月即着手发动意欲占领东北全境的辽沈战役。9月12日开始攻打锦州，10月19日长春守敌郑洞国率部投诚[1]，11月2日共军攻克沈阳，历时五十二天，中共取代国民政府占领了整个东北。

按照军事家的正常估计，在东北战场，双方投入总兵力百万以上，双方死伤兵员十余万人，战争空前激烈，且时在严冬，如此大规模的作战结束以后，势必要有一个较长时间的休整。恢复建制、补充兵员、增补武器弹药等等，按惯例需要三个月到半年，傅作义和蒋介石正是这样推断的。傅作义报请蒋介石并得到蒋的同意给予编制和装备，打算利用三个月的时间扩充二十万到五十万兵员，若能实现，届时手中即有雄兵百万，有了实力则可战，可和。

不料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在辽沈战役刚刚结束的十一月初，即令东北野战军迅速秘密入关。毛泽东特发指令，强调要“不惜疲劳，不怕减员，不怕受冻受饥”（见《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1306页），要求东北野战军连续作

战。

在毛泽东眼里，士兵都是党的驯服工具。比如司令员韩先楚率领的东北野战军第三纵队，在辽沈战役中打四平、攻锦州、战辽西，多次担任主攻任务，伤亡甚重，缺员一万多人，听说要进关作战，连忙补充了六千七百多名“翻身”农民和一千三百多名原国民党士兵，即匆匆忙忙上路，夜间急行军，直奔北平东南。

1948年11月23日，林彪、罗荣桓命东北野战军八个纵队先期开拔，不走山海关，而走人迹罕至的冷口和喜峰口，且昼伏夜行、隐蔽入关。数十万人，一千余门大炮，一百余辆坦克，一百三十余辆装甲车，三千多辆汽车，十四五万匹战马，八千多辆兽力车，白天隐蔽在山地丛林中，黄昏以后急行军。与此同时，新华社和东北各广播电台大量播发各部队在沈阳、新民、营口、锦州等地召开祝捷庆功大会的消息，迷惑和麻痹对方。林彪于11月30日率指挥机关和后续六个纵队启程南下，此后一个星期，新华社播报的还是林彪在沈阳活动的消息，新华社可信乎？兵不厌诈。直到12月7日，林彪、罗荣桓等到达河北蓟县孟家楼村，设立了平津战役指挥部，傅作义等尚未发觉。及至发现东北野战军八十余万人马已经大举入关和中共华北各兵团会合，傅作义捶胸顿足，难挽厄运。作为军事家，他深知已处在百万大军的包围之中，可以说败局已定了。

2、中共地下党的活动

外有百万大军团团围困，内有中共地下党频繁活动，华北剿总惶惶不可终日。

从1942年中共个别党员即潜入北平，本着“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积极备战。中共华北局不断地培训、派遣人员，潜入北平，深藏在各行各业。临近平津战事开端之时，北平已有三千多名地下党员，共产党的外围秘密组织“民主青年同盟”、“民主青年联盟”也发展了五千多盟员。那时北平有两百万人口，从数量上看，中共地下组织的成员不过占城市人口的0.5%，但这批人的活动能力都很强，社会关系广泛，不可小视。

刘仁[2]当时是中共华北局城市工作部负责人，坐镇在妙峰山下普照寺，并在河北沧县泊镇开设永茂公司为掩护，自任老板，往返两地指挥北平的地下党，武光[3]为副书记。中共华北局城市工作部下设学生工作委员会、工人工作委员会、铁路工作委员会、平民工作委员会、警宪工作委员会、文化工作委员会等。

北平的地下组织以学生工作委员会规模最大，成员占整个地下组织的三分之二。

原北方局领导的潜伏在平津地区活动的称北系学委，余涤清[4]、杨伯箴任书记，崔月犁[5]为秘书长。

原南方局领导的抗战胜利后从西南等地回到平津地区的称南系学委，王汉斌[6]任书记，袁永熙[7]为秘书长。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法大学、朝阳大学、辅仁大学、中国大学、铁道大学、蒙藏学院、华北文法学院、国立艺术专科学校等十二所大专院校，对国民党高喊着“党团退出学校”的口号，不时组织游行，暗地里却都秘密地建立了中共党支部或党总支。

在五十多所中学里，河北高中、男三中、男四中、师大男附中、女一中、

女二中、女三中、师大女附中、辅仁女中、育英、汇文、贝满、崇德、求实、成达、志成、艺文、大同、惠中、育青等多数学校都成立了中共党支部。各大、中学校都有中共外围组织“民主青年同盟”、“民主青年联盟”支部。

除学校以外，地下党还渗透到各行各业，组建工作委员会。

工人工作委员会书记为常明、张鸿舜[8]，铁路工作委员会书记为叶克明[9]，警宪工作委员会书记为屈绍健，平民工作委员会书记为苏一夫、赵凡[10]，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为张文松。

各工作委员会分工明确，直线领导，很少横向联系。分别在工厂、报社、铁路、电信，商店，乃至国民党的党、政、军、警、宪、特机关内从事颠覆国民党的地下活动。据相关人士透露，早在1948年春天，北平的地下党就开始利用各种关系认识、结交、拉拢国民党上层人士、民主党派首领和社会名流，并且在国军中展开形式多样的策反活动。

北平地下党有多个联络处，均指定专人掌控，相互之间没有来往，对一般党员更是保密的。1941年开始筹建电台。电台设在西四北大街龙云电料行内，刘仁直接掌控。当时收集到的有关日伪军政机关的活动情况随时通过电台发送后方，到1948年底，龙云电料行已引起怀疑，不便进行活动，遂将电台迁至羊溢胡同（羊尾巴胡同或羊肉胡同）36号。地下党有三处秘密电台，一台设置在地安门帽儿胡同2号（原来在旧鼓楼大街118号），一台在北平西四粉子胡同20号（1937年建立，北方局使用），西单九九照相馆内的电台由崔月犁掌管，接发地点在一个尼姑庵里。中共北平各电台的波长、呼号、密码经常变换，多次搬家，三台轮换发报。

传送情报有专人负责，均为单线联系，各管一段互不交往。譬如，西单商场北门外有一个小烟摊，地下党员老曹原籍河北南部某县，在当地任小学教师。1942年潜入北平。地下党组织给他在金鱼池土井胡同5号院租了一间房，付了三个月房租，作为安身之地。地下党是没有工资的，老曹从此就自谋生计，以卖羊头肉[11]为生，每天上午从李记白水羊头趸来，趸不到就自己加工，煮好了，天擦黑时挎上篮子沿街叫卖。冬天带着毡帽，老棉袄，腰里系着黑布带子，老棉裤，扎着裤脚，一路走一路吆喝，拉长声三个字“羊一头肉”。但有一项工作是必须完成的，即每隔一天就到西单商场口子上指定的小摊买一包“红土牌香烟”。某日买烟时，卖烟的看了他一眼，用手指轻轻的在一包烟盒上点了两下。老曹拿走烟以后连忙在一个僻静的小胡同把烟盒打开，烟盒上口写着几个字，命其到宣武门大街与某人联系。老曹到北平四年了，第一次领受任务，不免有点紧张和兴奋，临近天黑时分，挎上羊头肉篮子，疾步走到宣武门接上了头。潜伏在军统内部的608号通过老曹送出了准备逮捕中共地下党百余人的名单和偷袭西柏坡的情报。可惜老曹于1948年冬因肺病去世，没有等到北平解放的那一天。

当时的地下党员多为单线联系。分散在五行八作，各自为战，相互保密。中共除了在国民党政府内安插、发展党员外，还将触角下探到各个基层。北平最大的浴池字号“东升平”，坐落在前门老火车站附近，位于繁华地段，内部设施完善。浴池共有三层，第三层楼上为特等官堂单间盆浴，达官贵人，高级军官常来洗澡，地下党的头目也在这里接头，李福海等地下党员以澡堂搓澡工为掩护，专司打探消息，传递情报。前门庆乐戏院查票的傅世钧，大生号油盐店的伙计张喜增，井儿胡同卖麻绳的孙春元，平津被服总厂的裁缝孟志元等皆为地下党员。拉洋车的、蹬三轮的、打鼓儿的（打着小鼓走街串

巷收购古玩、玉器、摆件等物)、收破烂儿的(收购旧衣物、家具为主)等沿街串巷流动的人员中,也潜伏着许多地下党员。北平地方检察院的检察官,北平地方法院的推事中,也有好几位地下党员。

1949年2月4日,人民解放军进驻北平入城仪式的第二天,中共北平地下党员在位于国会街(今宣武门内西大街)的北京大学四院礼堂举行会师大会。北平城地下党员3376人中的2000多人出席了这次大会。当时出席会师大会的有林彪、聂荣臻、薄一波、叶剑英、彭真等。林彪是第一个讲话的,他的第一句话就说,北平地下党从今天开始从地下转到地上了。

1949年6月18日,中共北京市委正式宣布了公开党的决定,即在“七一”前公开所有的党组织。

附注

[1]共军从1948年5月即包围长春,林彪奉毛泽东之命把长春围了个水泄不通,严密封锁,要将长春变做一座死城。其目的是迫使城中百姓与守军争食,造成长春粮尽而降。

五个月的围困,全城七百余万平方米建筑,二百三十余万平方米被灭绝性破坏,其余也破损严重。一切木质结构部分,大到房架,小到交通标志牌,乃至沥青路面,或用于修筑工事,或充作燃料,而一切可以当做食物的东西,如树皮、树叶之类,都被送入口中,饿死者成千累万,人相食频频发生,长春成了饿殍之城,白骨之城。“兵不血刃”的长春之战,把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推上了第一线。

战前超过120万人口的繁华都市新京长春,战后只剩下17万人。

国共两党内斗之惨烈,草菅人命之恶毒,使人世间的一切苦难都黯然失色了!

[2]刘仁(1909~1973)四川酉阳人。1927年参加共产党,长期在中共晋察冀分局从事兵运工作。1942年任中共华北局城工部长,主管平津两地和华北的地下活动,大力发展地下党,组织反蒋示威游行,促成傅作义接收和平改编。建国后历任中共北京市委组织部长,副书记,第二书记,中共华北局书记处书记等职,文革伊始即以“敌特分子”之罪名被捕入狱,镣铐加身,备受折磨,惨死狱中。

[3]武光(1912~)原名张青甫,河北深泽县人。1928年参加国民党,任深泽县党部宣传部长。1930年只身闯北平,1931年加入共产党,在晋察冀边区从事党务工作,曾以洋车夫的身份为掩护,在北平参与地下活动。抗战胜利后任中共北平市委副书记、中共察哈尔省委组织部长。建国后任中共长沙地委书记,北京航空学院院长。1967年被逮捕入狱,关押七年半、流放三年半。1979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4]余涤清(1917~1999)河北获鹿人。1935年在河北省立第一师范参加一二九运动,1936年入党,1938年赴延安,1942年转入晋察冀,负责发展北平地下党,1945年9月任北平地下党学委书记,1946年2月入住北平,化名刘泽清,以国文教员为掩护,组织学运,引导反蒋游行示威。平津战役中参与和谈,建国后任北京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

[5]崔月犁(1920~1998)原名张广印,化名刘灏,河北深县人。1937年加入共产党,长期在平津地区从事地下活动,任北平学生工作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负责上层人士统战工作和在傅作义身边安插中共人员监视傅作义动态等等。1948年参与中共和傅作义的谈判。文革中被关押在秦城监狱八年之久。1975年出狱后任北京市政协副主席,1982年任卫生部部长。

[6]王汉斌(1925~)福建惠安人。1941年在缅甸参加共产党,1942~1946

年在西南联大历史系学习，任民青第一支部委员、地下党第一支部委员，1946~1947在《平民日报》任编辑，负责清华、北师大等地下党，任学委委员。建国后任共青团北京市委大学部长，文革中被下放劳动。1975年任北京冶金机械厂革委会副主任，1992年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93年当选全国人大副委员长，1997年推举为中国法学会名誉会长。

[7]袁永熙（1917~1999），贵州省修文人。1938年考入西南联大经济系，同年参加共产党，任西南联大党总支书记，1945年发动以云南学生为主的一二·一反内战运动，1946年返回北平以金城银行研究员身份为掩护，任中共北平南系学委领导人，曾组织抗议美军暴行和5.20反内战游行示威等。建国后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校长助理。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在清河农场劳动改造，文革中多次被毒打、批斗。1978年平反后任北京经济学院院长，晚年长期瘫痪，1999年病逝。

[8]张鸿舜（1918~1978）河北井陉人。1938年参加共产党，任游击队长。1944年赴门头沟发动煤矿工人罢工，组建“门头沟地区工委”，自任书记。1946年门头沟二、三百名工人被当局拘捕，地区工委奉命撤销。1947年任中共北平市政工人工作委员会委员。建国后任北京市总工会副主席，北京市建材局长，建工局长等职，1978年因癌症病逝。

[9]叶克明（1913~1997）北京市人。1936年加入共产党，潜伏在铁路系统从事地下工作，曾任中共北平铁路工作委员会书记。建国后任铁道部监察局副局长。运输总局副局长，财务局长等职。1997年病逝。

[10]赵凡（1917~）河南鄢陵人。1937年参加共产党，任中共灵丘、应县县委书记，北平市平民工作委员会书记，负责浴池、油盐店、杂货铺、三轮（洋）车、警察等平民阶层中的地下工作。建国后任北京市委农村工作部长，北京市副市长，农林、农垦部副部长等职。

[11]白水羊头是以羊头为主要食材做成的，始于清道光年间，由前门外廊房二条马玉昆首创，历经咸丰、同治、光绪、宣统等七代人一脉相承。《燕京小食品杂咏》中称马家的白水羊头：“十月燕京冷朔风，羊头上市味无穷”白水羊头选料严格，制作精细，刀工讲究，成品色白洁净，肉片又大又薄，蘸着特制的椒盐吃，软嫩清脆醇香不腻，风味独特。深受北京市民喜爱。

3、傅作义身边潜伏着许多中共党员和亲共人士

共产党在傅作义周围布下了一张无形的“促谈”或叫促降网。

阎又文：1914年生，山西省万荣县荣河镇人。1936年，就读于山西大学法学院。读书期间曾参加中共地下党员杜任之、张友渔等主持的社团“中外语文学会”。1938年，秘密加入中共，1939年11月在延安七里铺训练班第二期结业后，被中共安排到国民党西北军阀马鸿逵部队。寻机转入晋军傅作义部。阎又文与傅作义是山西荣河同乡，逐步取得傅的信任后，在傅作义处担任文书，秘书。升任少将新闻处长、《奋斗日报》社长、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政工处副处长。按照上级指示，阎又文长期未与中共组织发生联系。整个抗日战争时期，阎又文这个高级内线一直没有被启用。1945年，傅作义被蒋介石任命为华北“剿总”总司令，阎又文为“剿总”司令部的新闻发言人。此时，中共急需获取傅作义部队军事情报。于是，派特工王玉设法寻找阎又文，与其单线联系。不久，阎又文受命为傅作义起草一封致中共的电报，阎又文立即告知中共地下党，周恩来与毛泽东商议后指示：这封信要写，而且要骂得狠一些，要让傅作义和他的官兵兴高采烈，得意忘形，让我们的指战

员看后，在战场上恨不能把敌人一口吃掉。于是，便有了傅作义痛斥毛泽东的《致毛泽东的公开信》文稿。多家报刊予以刊登，显示傅作义抗敌之决心。阎又文每周六在北海公园漪澜堂召开新闻发布会。他安排王玉以记者身份参会，其间将情报交与王玉。阎又文收集的情报包括作战部署如《北平城防方案》、《北平城垣作战计划》及详细地图和军事实力、将领概况、傅蒋矛盾、傅之想法及思想斗争等，为中央决策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为北平和平解放奠定了基础。2009年在北京市档案馆展出的“北平和平解放史料展”，将阎又文与刘厚同、何思源、傅冬菊等并列为北平和平解放的功臣。1962年阎又文病逝于北京，享年48岁。

崔月犁：1920年生，河北深县人。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3年3月被派往北平、天津地区从事地下党工作。在此期间，任北平学生工作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职员工作委员会书记。1948年曾以中共代表的身份参与和平解放北平的工作。负责上层统战工作和在傅作义身边安插中共人员，掌握傅作义动态。文革期间被镣铐加身关押在秦城监狱。毛泽东逝世后复出，曾任卫生部长，1998年在北京逝世，享年78岁。

杜敬之：又名杜勤书（1909—1995）。山西万荣县人。早年留学日本，“七七事变”返国投身抗日。历任傅作义部少将卫生处长、少将参议、北平惠民医院院长等职，同时兼任傅将军保健医生；居住在锦什坊油篓胡同6号，是中共地下党的联络点之一。

杜任之：1905年5月出生，山西省万荣县人。1924——1926年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大学预科班”。1927年11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9年初留学德国，先后入柏林大学德语学院、哥廷根大学、费莱堡大学学习。1933年10月受上海反帝同盟总部委派回山西宣传策动抗战救亡，秘密开展革命活动。公开身份为山西大学文学院、教育学院讲师。1944年又被聘为国立山西大学教授、他是杜敬之的胞兄。北平和谈时期与崔月犁单线联系。

余涤清：北平地下党学委书记。

关世雄：广东番禺人，1944年毕业于日本东京法政大学政经系。曾任北平朝阳大学讲师、副教授。1946年加入民盟，为北平负责人之一。1947年加入中共，为地下党员。多次奉劝傅作义反蒋亲共。文革期间备受冲击、批斗、关押，幸未丧命。毛泽东逝世后，被安排为北京市成人教育协会会长。

王甦：中共地下党员，傅作义军中的“荣军中校”，深受傅信任。平津战役肇始，他受刘仁指挥，负责军事策反，他与国民党北平铁甲列车总队第一大队大队长于维交往甚深。商定，一旦解放军开始攻城，他们就分别从前门车站等地，朝永定门方向突破，内外夹击，接应解放军迅速进城，并以火力封锁东单临时机场，防止敌人从空中逃跑。

王甦负责联系的崇文门、西直门保证进攻时开城门。

与此同时，又极力拉拢傅作义的“王牌”主力第三十五军的副军长兼第二六二师师长丁宗宪。丁宗宪是黄埔四期生，与中共地下党员吴哲子和刘学周交好。为结拜兄弟。曾当面承诺，若共军攻城，将亲率第三十五军和二六二师单独起义，放开德胜门至安定门一线防地，与解放军里应外合，迅速解决战斗。

经多方劝诱，国民党92军军长候镜如（河南永城人，黄埔一期，1925年周恩来介绍其加入中共，长期潜伏在国民党内）、副军长黄翔暗中保证起义。

以上种种，因北平和平解放，未能实施，但王甦之功仍不可没。王甦死于文革期间，详情未见报道。

刘光人：河北蠡县人。生于1922年。1940年毕业于华北联大文学系。同年参加中共。1941年开始发表作品。1943年被派遣到北平从事地下工作。其公开身份是《平明日报》首席记者，主要负责军政要闻。北平城防司令楚溪春原任河北省主席时与其父多有交往，刘光人不时以晚辈身份前去探望，恭敬毕至，楚颇为嘉许。1948年底，楚溪春视察北平城防工事，刘光人以记者身份随同前往，历时三天对北平城防了若指掌，暗自记录。随即冒着生命危险骑一辆自行车以采访新闻为名只身出了西直门，历经艰险见到了攻城部队，递交了有关城防情报。旋即回到城内继续充当记者。1955年始公开其共产党员身份，调至北京市公安局，先后任文书、秘书、副局长。文革伊始被隔离审查十年，在监狱关押了四年。毛泽东死了以后始获平反。2014年1月刘光人因病逝世，享年91岁。

李炳泉：1919年出生于山东济南。抗日战争爆发后随其母颠簸流离，逃至昆明，考入西南联大地质系就读。其间，认识了联大中共地下党支部书记袁永熙，随即参与抗日救亡工作。1940年入党。1942年底，李炳泉到达重庆，找到十八集团军办事处，与中共中央南方局负责青年工作的钱瑛接上了关系，钱瑛要他继续留在国民党统治区隐藏做地下工作，可以找工作也可以读书，与她保持单线联系，1943年李炳泉考入复旦大学外文系三年级，以学生身份为掩护从事地下工作。1946年春赴北平，进入由民主人士主持的《道报》当记者，又转入天主教主办的《益世报》任记者，后经其堂兄“剿总”少将联络处长李腾九推荐，到《平民日报》任采访部主任。《平民日报》这份国民党的北平机关报中，竟然有20多位记者编辑是中共地下党员。刘光人、李炳泉等人皆为骨干。李炳泉在《平民日报》期间，以记者身份做了两件大事：一是率先披露和报导了轰动全国的“沈崇事件”。大力鼓动群众抗议美军暴行。12月30日，北大、清华、北师大、燕大等高校的学生联合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由此波及全国，掀起了内战爆发以后的第一次学生运动高潮。李炳泉先后撰写几十篇稿件，不断为学生运动撑腰鼓劲，影响甚大。另一件事是李炳泉及时获取并传递了一个重要情报，使面临遭受袭击的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躲过一劫。1948年10月，蒋介石为挽救华北政局到北平督战，命令傅作义部偷袭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李炳泉一向“注意搜集敌军的动向”。这一次，他利用广泛的“交朋结友”，酒酣耳熟之际从傅作义部下骑兵旅旅长鄂友三那里得知，他将于10月28日偷袭西柏坡，“去端共产党的老窝”。李炳泉迅速由地下电台报告给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得到这一重要情报后，紧急动员军民迎战，使前来偷袭的国民党九十四军及鄂友三的骑兵旅无功而返。

李炳泉最重要的历史功绩是他作为北平地下党的代表亲自联络并直接参加了北平和平谈判，促成傅作义率部起义。他通过其堂兄、华北剿总少将联络处长李腾九，于1948年12月10日进入中南海居仁堂傅作义的办公室。以中共地下党代表的名义，敦促傅作义和平谈判。中共授权他与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中共地下党员）单线联系，随时掌握傅作义的动态。其后，先后三次冒着生命危险，穿越国共双方防线。在通过两军对峙的无人区时，随时可能成为双方射击的目标。1948年12月19日，中共方面由东北野战军（后称第四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出面，与傅作义的代表崔载之谈判。李炳泉参与其事。几经辗转周折，协议仍未达成。中共向傅作义部发起进攻。22日攻克新

保安，全歼傅作义的主力三十五军军部和两个师；24日解放张家口；1949年1月1日，毛泽东电示林彪，要求认真做好傅作义的工作，并将关于谈判的六点意见派人直接告诉傅作义。当晚，林彪、聂荣臻亲自找李炳泉谈话，要他立即回北平向傅作义转达毛泽东关于谈判的六点意见。为防止泄密，当即由林彪口授，李炳泉记录下来默诵。博闻强记的李炳泉很快把这445字的电报背得滚瓜烂熟，林彪、聂荣臻要李炳泉背一遍给他们听，果然一字不漏。1月2日，李炳泉按照商定的联络办法，由联络员王朝纲陪同到共军前沿阵地清河镇，然后独自飞步第二次穿过流弹横飞的无人区。在德胜门外顺利通过岗哨盘查，当晚抵达城内，第二天一早就由李腾九陪同，当面向傅作义传达了毛泽东的六点意见，促成傅作义下定了放下武器的决心。李炳泉见事情已有眉目，又第三次穿越生死线，回到平津战役前线司令部向林彪、聂荣臻做了汇报。1949年1月7日，傅作义秘密派出周北峰少将和民盟的张东荪出城进行谈判。9日，中共由林彪、聂荣臻、罗荣桓亲自出面。双方草签了《会谈纪要》。1月15日天津被中共攻克，傅作义大势已去，《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协议》终于达成。李炳泉意气昂扬的返回北平。北平宣告和平解放。

中共建国后，李炳泉长期在新闻战线工作，业绩显赫，颇受同仁赞誉。文革开始，李炳泉被以“变节投敌的反革命分子”、“国民党特务”“特务嫌疑分子”等种种罪名，遭受关押、批斗、毒打，于1969年致死，尸骨无存。

周北峰：1903年出生，山西永济市人。青年时期留学法国，就读于耶鲁士大学，获经济学硕士学位。后来又到苏联、英国、法国、瑞士等国家学习。1932年留学归国后不久，到山西大学任教，为杜任之好友。北平和谈之时先后任傅作义“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民事处、土地处少将处长。授权代表傅作义与中共谈判。

刘厚同：辛亥革命老人，山西学生军总教练，军士学校校长，傅作义的老师，高级政治顾问，深受傅作义信任，其女儿刘杭生是中共外围组织民主青年联盟地下盟员。1948年2月刘厚同就和傅作义讲过和谈问题，他建议可以接受中共联合政府的主张，以军力谋求在联合政府中的位置。战端发生以后，刘厚同以长辈身份拉拢了王甦、35军副军长丁宗宪，国民党河北省主席楚溪春，北平企业公司经理冯杰宸等和傅作义说得上话的人，立主和谈。

李腾九：傅作义部少将联络处长，居住在东交民巷御河桥原日本大使馆。李炳泉之堂兄。

付冬菊：傅作义的长女，西南联大毕业，中共地下党员，时任《大公报》记者。1948年9月到北平，其丈夫周毅之也是中共党员，以照料傅之生活为名，与傅作义居住在同一官邸之内。11月2日辽沈战役结束，11月3日傅作义去南京开会，临行前冬菊试探傅作义，傅曾问是否毛派来的？11月7日傅作义从南京回来，9日中午请杜聿明吃饭，10日去孙连仲官邸看望卫立煌并把蒋令其扣押卫立煌的电报给了卫立煌。11月17日傅问冬菊：是否真共产党，并拟了给毛泽东的电报，令其发出。未见回复。傅冬菊每日下午均与中共地下党指定之联络人见面，汇报傅作义动态。

1948年12月14日兵临城下之际，傅作义派崔载之、李炳泉出城到平津前线指挥部试探和平谈判。谈判期间张家口、新保安失守。25日晨，傅作义见中共公布之战犯名单，大怒。傅作义的公馆在西城小酱坊胡同。刘厚同来劝说其息怒，强忍心中之气，力争和谈。1949年1月1日毛泽东给傅一信，即“元旦六条”，解释战犯名单。1948年12月底，傅作义接邓宝珊来北平。

邓宝珊是民国时期纵横西北几十年的智囊人物，早年参加中国同盟会，是国军的陆军上将。辛亥革命时，曾参加新疆伊犁起义。1924年任国民二军师长。后代理甘肃省主席。1932年起，任西安绥靖公署驻甘行署主任、新一军军长等职。抗日战争期间，任第二十一军团军团长、晋陕绥边区总司令，多次到延安与共产党领导人会晤，赞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1948年8月，邓宝珊任华北“剿总”副总司令。

1948年底，毛泽东密令东北野战军紧急入关，切断了傅作义的退路。这天，邓宝珊在华北学院院长王捷三的家里秘密会见了中共地下组织代表崔月犁。崔月犁对邓宝珊说道：“您和傅先生是多年的朋友，希望您劝傅先生赶快下决心和谈，时间不多了，要争取北平和平解放，为人民做好事。”邓宝珊当即表示：“国民党败局已定，我会尽我所能，劝傅先生。”当天晚上，邓宝珊来到中南海傅作义的办公室。傅作义痛苦地说道：“我担心北平和平解决后，军队一交出去，共产党翻脸，到时血本无归，我无法向几十万弟兄们交代啊！”。邓宝珊说：“抗战时，我在陕北与共产党打过几年交道，他们待人诚恳，重感情，讲信用，一看就知道是一群干大事业的人。如果宜生兄认为有必要，我可以出城与共产党再作商谈。”傅作义眼里充满信任地说：“好，那我就全权委托你了。”邓将此信息告诉了中共地下党，云傅作义下定决心了。1948年12月25日邓与解放军最早入城的苏静处长看望傅作义，邓交了一封没有封口的信给付冬菊，措辞严厉并限1月20日前放下武器。1949年1月13日，邓宝珊由“华北剿总”司令部少将周北峰陪同，冒着凛冽寒风前往解放军平津前线部队驻地谈判。1月15日上午，林彪、罗荣桓、聂荣臻与邓宝珊、周北峰举行正式谈判，进展比较顺利，1月22日，正式宣布北平和平起义。2月1日《人民日报》以“北平解放经过”为题全文发表了中共限令傅作义放下武器的信。傅作义已无能为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邓宝珊曾被任命为甘肃省人民政府主席、省长。“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抄了他的家，重病在身的邓宝珊向周恩来求救，才得以入住医院。终因年老体衰，于1968年11月逝世，享年74岁。

吴煜恒：湖北省英山县人，生于1884年。毕业于安徽省政法专门学校及北平司法讲习所。北伐胜利后，国民政府迁至武汉，成立武汉地方高等法院，吴煜恒任高院推事。1926年由董必武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调苏州高等法院任庭长。在此期间，吴煜恒的中共党组织关系接转到上海中央特科，1938年，吴调贵阳高等法院。因抗战爆发，吴煜恒的中共党员组织关系失落，失去了组织联系。抗战时他到重庆见到董必武，提出要去延安，董必武告诉他：你留在重庆比去延安作用还要大。因而他继续以他的特殊身份帮助中共做一些工作。1944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参加民主宪政运动。担任过重庆新华日报社法律顾问。为民盟负责人之一，与董必武长期保持来往。北平和谈开始时，中共北平城工部长崔月犁与傅作义的代表开始接触时，均是在北平高等法院。1963年6月3日，吴煜恒在北京因车祸逝世，享年80岁。

王捷三：1898年生，陕西韩城人。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西北联合大学教授、北洋工学院西北分院教授。1945年受胡宗南之邀，任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秘书长。后李宗仁约他任北平行辕政务处处长。同时，王接办私立华北文法学院，并任院长，聘请了一批有学识的进步教师任教。学院设俄语专业，有意掩护进步人士及中共地下党员。1948年底，中共党组织派员通过他

与邓宝珊、傅作义联系，为北平和平解放做了许多工作。北平和平解放后，王入政治研究所学习。1950年回陕西，先后在西北大学、西安师范学院、陕西师范大学任哲学与文学教授。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1966年3月31日逝世。

曾延毅：生于1893年（清光绪十九年），湖北黄冈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五期炮兵科毕业。1920年10月调升山西督署军事处少校参谋。1925年1月调升独立第49团团长。8月调任炮兵第4团团长。1928年1月兵败涿州后匿居天津。6月出任天津市公安局局长。10月调升炮兵第4旅少将旅长。1930年11月调任绥远省军事处处长。1935年4月19日任陆军少将。1937年1月升任第35军中将军长。10月兼任太原戒严司令。1948年11月出任华北“剿总”中将高参。他是傅作义的把兄弟，同窗好友。其女儿曾长宁（天津大学哲学系学生，中共地下党员）与傅冬菊常有接触。曾延毅1949年1月参加北平和平解放。曾任天津市政协委员。1965年2月病逝。

外有百万大军压境，内受重重包围。中共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傅作义岌岌可危矣。

（2）艰难的和谈

随着战争日益迫近，和平的呼声也渐渐地高起来了，我家里订有一份《新民报》，以前我多半看连续刊载的小说，比如张恨水的《偶像》《虎贲万岁》《五子登科》；还有就是市井新闻，比如四川出了一个不吃饭的杨妹[1]；北平新新电影院出了一个拍花贼[2]；沈崇事件[3]；讽刺北平市前市长熊斌的漫画《塔先生外传》等等。那时小孩子还不知道关心时局，北平被包围以后似乎长大了，开始注意北平的战局与和平了。每天起床后就盼着报纸早点来，那时候报纸有专人送到住家户，七点钟前后，送报人在住家门口拉长了声音喊一声“报——”，随即将报纸从门缝塞入门内，我立刻跑出去拿，抢先看有关和平谈判的消息。

战局与和谈都属于军事秘密，老百姓自然难以了解其内幕。不过当时的报纸民办居多，当局控制得不严，新闻审查制度远不如共产党执政这么缜密健全，记者们往往通过各种渠道打探消息，千方百计地总要透露些似乎机密的内容。

过了若干年甚至半个世纪，随着更多资料的解密，才明白和平谈判错综复杂、一波三折，国共双方斗智斗勇、煞费苦心。

现在回想起来，无论从哪方面看，处在上升阶段的共产党总是棋高一着，在政治、军事的全局中总是处于主动地位，人尽其才，调动了一切积极因素，利用了一切可能利用的力量，迫使傅作义就范。中共对傅作义的幕僚和下属百般拉拢、分化瓦解、招降纳叛、各个击破。毛泽东早有成竹在胸，只要傅作义的军队放下武器、接受改编，待大局已定之后，再一个一个地收拾。

傅作义呢？则完全处于被动的状态，堪称危机四伏、内外交困，惶惶不可终日。

傅作义一面高唱保卫北平的口号，摆出与共军决战的架势，示形于外。一面暗度陈仓，与中共秘密联系和谈。11月13日，北平守城部队大张旗鼓地在较场阅兵，扬言与共军决一死战。11月14日《平明日报》刊登大幅照片和专论，宣扬平津守城部队士气高昂，平津城防牢不可破。11月17日即通过他的大女儿中共地下党员傅冬菊给毛泽东发去求和信。

北平和平解放谈判，肇始于此。

1948年11月18日，中共中央军委给林（林彪）、罗（罗荣桓）、刘（刘亚楼）的电报中说：“傅作义经过彭泽湘[4]及符定一[5]和我们接洽起义，据称傅起义大致已定。目前考虑者为起义时间、对付华北蒋军及与我党联系等问题。现符定一已到石门，明后日即可见面”。

北平和平解放正式谈判，先后进行了三次：

第一次谈判是在1948年12月中旬。当时东北野战军八十余万人马已经大举入关和中共华北各兵团会合，对平津地区形成百万大军包围之势，局部战役已经打响。枪声、炮声不绝于耳，北平城内人心惶惶。傅作义派《平民日报》社社长崔载之为代表同记者李炳泉（中共地下党员）一起，带电台和报务员、译电员到三河县平津前线司令部所在地，与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进行了谈判。双方交换意见后，崔载之回北平向傅作义报告，李炳泉携电台和报务员、译电员留下，以便联系。

第二次谈判是在1949年1月6日至10日。当时傅部主力35军被歼，平津战役胜负大局已定。傅作义派周北峰、张东荪到河北蓟县八里庄，同平津前线司令部领导人林彪、聂荣臻、罗荣桓和刘亚楼进行谈判。这次谈判有很大进展。中共提出了改编国民党军的方案，对傅起义人员一律不咎既往。双方草签了《会谈纪要》。

第三次谈判是同年1月14日至17日。14日上午人民解放军向天津守敌发起总攻。当天傅作义派邓宝珊、周北峰作为全权代表，到通县西五里桥平津前线司令部，与林彪、聂荣臻、罗荣桓和刘亚楼进行谈判。谈判取得了成功，16日双方签署了《关于北平和平解决的初步协议》14条。19日双方代表在城内华北“总部”联谊处经磋商后，将协议正文增补为18条，附件4条，共22条。东北野战军参谋处长苏静与华北“总部”政工处长王克俊及崔载之，分别代表双方在《关于北平和平解决问题的协议书》上签字。

北平前市长何思源被称为和平老人，他1946年10月任北平市市长，在任期间施政宽松，为官清廉，同情学生运动，深得各界拥戴。后因支持李宗仁竞选，反对内战，呼吁蒋介石交出权力等事触怒了当权派，1948年6月被贬官去职，北平市参议会随即推举他为北平荣誉市民，赠送金钥匙一把。平津被围时他是北平市民间和平谈判首席代表，由他斡旋和平，国共双方面大概都可以接受。那时报纸上每天都有和平谈判的消息以及何思源行踪的报道。1949年1月17日凌晨，何思源的寓所（北平市东华门锡拉胡同十九号）被炸，何氏全家六口一死五伤，后查出系毛人凤指使部下所为，意在阻扰和平谈判。何思源不顾个人安危，竭力向傅作义进言，劝其接受“八项条件”，并于1月18日手臂缠着绷带毅然率领民间和谈代表出城与共军谈判。

盼望和平是多数老百姓的期望。盼啊，盼，1949年1月21日傅作义在接受共产党提出“八项条件”的基础上，和共方的平津前线司令部达成了和平解决北平的协议，《新民报》刊登了这个消息。

1949年1月21日，傅作义在华北“剿总”机关及军以上人员会议上，宣布了北平城内国民党守军接受和平改编。发出了《关于全部守城部队开出城外听候改编的通告》。众将领尤其是黄埔系诸将领顿时哭声一片，傅作义当即表示：凡不愿意接受改编的，他负责派飞机送至南京。同时将《协议》诸点经国民党中央社北平分社向全国发表。22日，傅作义在《关于北平和平解决问题的协议书》上签字，并发表广播讲话。

翌日，北平城内守军二十五万人立即撤至城外指定地点接受改编。分散

安插在老百姓家中居住的士兵全都搬走了，北平市民终于可以在和平的氛围中过一个欢乐的春节了。

从1月22日到1月31日，是权力交接的过渡期，城外早已被共军占领，已经是“解放区”了，傅作义管辖的军警还在负责维持城内的治安，1月31日共产党的部队“中国人民解放军”接管了全部防务，正式宣告北平“和平解放”。

至此，共产党动用百万兵力，从1948年11月29日到1949年1月31日，历时六十四天的平津战役胜利结束，共军以伤亡三万九千人的代价，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五十二万余人，完全占领了平津地区。

连同辽沈战役、淮海战役总共歼敌一百五十五万余人，国民党军的精锐师团丧失殆尽，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的局势基本确定。

附注：

[1]1948年，四川省石柱县桥头坝村发现一农家女杨妹“九年不食”，经当时重庆卫生局观察三周，确认杨妹当真不食人间烟火，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布新闻，各报纷纷报道，九年不吃飯居然能够欢蹦乱跳，本来有悖能量守恒定律，那些昏聩的官僚却认为找到了节约粮食的好办法，可解百姓饥寒交迫之苦，当时的重庆市市长杨森亲自接见，中央社、《申报》等媒体大肆炒作，轰动国际。后在众多科学家和医生的质疑和要求下，重新对杨妹昼夜观察，秘密监视，终于发现杨家这位姑娘头脑灵活，动作敏捷，乘人不备之时暗自窃取食物，杨妹九年不食的神话终至破灭，画饼充饥、愚弄群众的奇闻和闹剧匆匆收场。腐败的社会必定要闹出特异功能的笑话。

[2]1947年北平新新电影院潜藏着黑社会组织，从事非法开设钱庄，贩卖人口等罪恶活动。其成员叶启明用迷药拐骗电影院门口卖茶少女王大丽，不料王大丽很快清醒，从新新电影院地下室逃出报案，事情败露以后叶启明被判处七年徒刑，新新电影院被国民政府没收，改名为国民电影院，中共进城后更名为首都电影院。

[3]1946年12月24日晚，北京大学先修班学生沈崇去平安电影院看过电影返家途中，被美国海军陆战队伍长皮尔逊胁持到东单操场旁边的树林内强奸，翌日北平民间通讯社立即在报纸上发出新闻，北平市警察局长会同国民党之中央社电令各报不要刊登有关此事的消息，26日，北平《世界日报》《北平日报》《新生报》《经世日报》等数家报纸不顾国民党中央社和警察局之干预，均以醒目标题刊发报道，《新民报》还将中央社企图封锁消息的电令公诸于世。事件传出后，北平、天津、上海、南京、武汉、重庆等全国数十个大中城市的学生和各界人士五十余万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罢课、示威游行，抗议美军暴行，相继提出严惩凶手、赔偿道歉，废除“中美商约”等口号。以民盟为首的十五个民主团体强烈要求“立即驱逐美军出境”。社会贤达和民主人士李济深、郭沫若、沈钧儒、章伯钧、周建人、张东荪、张奚若、张申府、马寅初等也大力呼吁美军撤出中国。从当年12月到1947年5月，各地“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示威活动连绵不断，极大地动摇了国民党的统治。

[4]彭泽湘（1899~1970），湖南岳阳县人。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1月他再次遭到蒋介石通缉被迫逃往香港。在香港他与李济深等一起继续为反蒋抗日进行活动并与人一起恢复建立第三党。1948年11月专程从香港赴北平为争取傅作义起义做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于1952年被安排到人民出版社从事翻译和编辑工作。1970年1月20日在北京病逝，终年71岁。

[5]符定一（1877~1958），字宇澄，号悔庵，湖南衡山县白果塘人。幼读家塾，

稍长入衡阳南路师范学堂，后入京师大学堂，1908年毕业，奏奖举人，曾任资政院秘书、顺天高等学堂教习。辛亥革命后回湘从事教育工作，历任岳麓书院山长、湖南省教育总会会长、湖南省立第一中学校校长、湖南师范学校校长。1912年创办省立一中。1926年6月，任北洋政府财政部次长，兼盐务署署长、稽核总所总办。1946年6月曾去延安，1948年10月，到达西柏坡。中共建国后，出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第一任馆长。1958年5月病逝。

（3）八路军进了北平

1、入城式

据说原来毛泽东得知傅作义已经在《关于北平和平解决问题的协议书》上签字后，曾经安排中共军从1月26日大规模进城，1月29日举行入城式。林彪和罗荣桓、聂荣臻等前线指挥官考虑到那年的1月29日是农历大年初一，为了让老百姓过一个相对安定的春节，部队从1月22日起分散进城接防，入城式推迟到2月3日（农历正月初六）举行。

入城式是由当时的平津前线司令部筹划的，当时确定由东北野战军第4纵队1个师和特种兵的6个团参加入城式。入城式总指挥是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接到命令后，部队立即开赴南苑机场集中训练。只有十多天时间，主要练习入城式队形、队列、行进速度。刚从前线下来的车炮上满是泥土，部队连夜刷洗、喷涂。两天之后，参加入城式的大炮、坦克、装甲车、汽车，都焕然一新。

经过在京郊和天津前线十几个昼夜的浴血奋战，战士们的棉衣被血、水、汗、泥浸透过多次，有的油黑发亮，有的露出了棉絮，因此，搞好个人卫生，也成为训练期间一项必不可少的任务。经过拆洗、相互调剂、以旧换新等手段，战士的服装鞋帽乃至绑腿、背包、背包绳都基本达到八成新以上的水平了。部队白天紧张地排练队形，夜间检修、擦拭车辆火炮。战士们完全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整天嘴里讲的，心里盼的，都是在入城式这天，向全北平、全中国以至全世界展示胜利之师的雄姿。

按照野战军司令部的指示，先在地图上研究选择入城式行进路线，并确定先由炮四团团团长徐昭、装甲团团团长丁铁石，带两台车进城勘察。因为野战军司令部要求，游行队伍要经过美国使馆门前，所以他们2人重点勘察了东交民巷附近的道路。

1月31日下午，参加入城式的部队几位指战员分乘一辆吉普和一辆中卡，进城勘察游行路线。由永定门、前门进城，经东交民巷到东单、东四，北新桥、走地安门大街到西四、西单、宣武门。街上空荡荡的，行人很少。沿途确定好可以通行车、炮、坦克的路线。然后由广安门出城，回到南苑驻地。走了这一趟以后，即打电话向刘亚楼参谋长汇报勘察结果，并由徐昭和王岳石两位团长起草书面报告，司令部同意按上述路线游行。

与此同时，部队首长和北平地下党取得联系，动员和组织地下党员和“民主青年同盟”、“民主青年联盟”的盟员积极参与入城式，按分派的地段站在街道两旁，组织欢迎群众，维护秩序，防止坏人捣乱，必要时部队可派出着便装的人员携带武器予以协助，确保入城式万无一失。

傅作义以和平的方式把北平移交给共产党了。当时为了防止敌特破坏，入城式的具体时间和地点并没有在北平城内广泛宣传。但喜欢热闹的北平老百姓早就知道了入城式的消息，一边迎接着正月初六开市大吉，一边等待着

看八路军进城。

为了看入城式，我提前两天就从铸钟厂胡同搬到东四南大街灯市口父亲供职的中华实业商行暂住了。

老北平的春节习俗，初一到初五街上的铺面都上起护窗板，挂上喜庆的连环画窗帘，除了油盐杂货和米粮店在门板上留一个小洞营业以外，其它行业一律不开市。掌柜的走亲戚、拜年去了，看柜台的伙计们在铺子里打麻将、推牌九，既是娱乐也是赌钱。愿意出去玩的还可以轮流着逛逛庙会。初六一早，掌柜带领全体员工烧香、送神、放鞭炮，伙计们猛劲摇动算盘、敲打秤盘，图个响响当当，大吉大利。左邻右舍的铺面相互攀比，看谁爆竹放得多、放得响，看谁闹得红火，在热闹的气氛中取下护窗板，八点来钟天光大亮正式营业。

2月3日这天清晨，北风呼啸，天气很冷。刚蒙蒙亮，部队就赶着起床，检查发动车辆、坦克。游行队伍7点钟左右出发，8点多钟开到永定门内大街，摆好队形向前门大街行进。

这时，天桥以北的前门大街上，已站满夹道欢迎的群众队伍。9时许，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叶剑英、刘亚楼等来到前门箭楼东边空地上。东北野战军第4纵队和特种兵的首长、以及北平市委负责人刘仁等也都来了。9时半，各路首长登上前门箭楼，第4纵队的领导登上路西的一座银行小楼。10时，4颗照明弹升上天空，庄严隆重的入城式开始了。

入城式游行队伍以装甲车为先导，第一辆车上插着一面红色指挥旗和毛泽东与朱德的巨幅画像，红旗在呼呼的北风中飒飒作响。装甲车队一条线似的列队前进。在前门大街上，装甲车队被欢迎的群众围起来，学生们爬上装甲车贴标语。当深绿色的美造大道奇车拖着美造、日造大炮开过来时，欢迎的人群又拥上前去，高呼口号，爬到大炮上贴标语，标语贴完了，就用笔在炮上写。最后战士身上也贴上了标语。“庆祝北平解放！”“欢迎解放军！”“解放全中国！”每门炮上都布满花花绿绿的标语，车上撒满彩色纸和小旗。学生们争先恐后地往车上挤，热情地和战士握手，上不去车的人，围着大炮扭起秧歌。有的手擎着炮架，有的干脆骑到炮身上。兴高采烈的人群，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表达对子弟兵的爱戴与欢迎。

随着隆隆响声，坦克开过来了，欢迎的人群再次沸腾起来。坦克上很快爬满了人，贴满了标语。游行队伍在群众的夹道欢迎和口号声中，缓缓驶过前门，向东转向东交民巷。有意在使馆区内展现胜利之师的雄姿。

钢铁洪流般的装甲车、大炮和坦克，浩浩荡荡地通过东交民巷后。按照预定的路线向北行进，驶过崇文门内大街、东单、东四、在北新桥转向、沿着地安门大街一直向西，经过鼓楼，太平仓，与另一路从西直门入城的部队会合，再折向南行，经西四、西单、西长安街、和平门、骡马市大街，由广安门出城，返回南苑驻地。回到南苑机场时已经是下午六点钟了。

参加入城式的步兵队伍分两路，一路从南苑出发，紧随在战车队伍后面。沿着既定路线行进。另一路则由北平西北面的西直门入城，在西四牌楼和从南苑出发的队伍会合后向南走，由西长安街转和平门，向西出广安门，回南苑机场。

步兵们个个戴着具有东北特色的狗皮帽子，背着整齐划一的军用背包和擦得锃亮的单兵武器，上身着棉衣，系着军用腰带；下身为单裤，打着绑腿；一律美式军鞋，精神抖擞，表情略显严肃，步伐整齐，目光炯炯有神。引得

站在大街两边的民众悄悄议论，国民党的兵遇见这样的队伍怎么能不败呢。

人们期待着新中国能有个新气象，期盼着中华民族的振兴，期盼着和平、民主、自由。期盼着祖国日益繁荣昌盛，期盼着过安定日子，期盼着美好的未来。

2、约法八章

实际上，从1949年1月22日开始，共产党的先遣工作队就已经大量进城了，大街小巷贴满了《安民告示》和《约法八章》。

《中国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约法八章》全文如下：

一、保护全体人民生命财产，望我全体人民严守秩序，各安生业。如有反革命分子或其他破坏分子乘机捣乱，抢劫破坏者，一经查出，定予严办。

二、保护民族工商业。凡属私人经营之工厂、商店、银行、仓库等，一律保护，不受侵犯。望各业员工照常生产，各行商店照常营业。

三、没收官僚资本。凡属国民党反动政府经营之工厂、商店、银行、仓库、铁路、邮政、电灯、电报、电话、自来水等，均为民主政府接管。其中如有一部分民营资本经调查属实者，当承认其所有权。所有在官僚企业中供职之人员，在民主政府接管前，均须照旧供职，并负责保护资财、机器、图表、账册、档案等，听候接收处理。保护有功者奖，怠工破坏者罚。其愿继续服务者，在民主政府接管后，准予量才录用。

四、保护一切公私学校、医院、文化教育机关、体育场所及其它一切公共建筑，任何人不得破坏。学校教职员、文化教育卫生机关及其他社会公益机关供职人员，均照常供职，本军一律保护，不受侵犯。

五、除首要的战争罪犯及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外，凡属国民党省、市、县各级政府的大小官员、国大代表、立法监察委员、参议员、警察人员、区乡镇保甲人员，凡不持枪抵抗、不阴谋破坏者，本军一律不加俘虏或逮捕，并责成上述人员各安职守，服从本军及民主政府的命令，负责保护各机关资财、档案，听候接收处理。这些人员中，凡有一技之长而无反动行为或严重劣迹者，民主政府准予分别录用。如有乘机破坏、偷盗舞弊，携带公款、公物、档案潜逃，或拒不交待者，定予依法惩办。

六、为确保城市治安，安定社会秩序，一切散兵游勇均应向当地政府、本军部队及警备司令部或公安局投诚报到，凡自动投诚报到并将所有武器交出者，概不追究。其不报到及隐藏武器者，即予逮捕查究，绝不姑宽。窝藏不报者，亦须受应得的处分。

七、保护外国侨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一切外国侨民，必须遵守本军及民主政府的法令，不得进行间谍活动，不得有反对中国革命事业的行为不得隐匿战争罪犯、反革命分子及其他罪犯，否则，当受本军及民主政府的法律制裁。

八、无论在本军进城以前和进城以后，城内一切市民及各界人士，均须共同负责，维持全城秩序，免遭破坏。凡保护有功者奖，阴谋破坏者罚。

惊魂未定的老百姓驻足而立，一字一句地阅读着约法八章的内容，若有所思。这约法八章虽然透露着不少杀气，但从字面来看也算合情合理。比如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承认私有产权；对国民党的大小官员只要不持枪抵抗、不阴谋破坏，一律不加俘虏和逮捕；散兵游勇交出武器概不追究等等，都深得民心，对于安定当时的社会秩序起了极大的作用。

接管人员挨家挨户的访问老百姓，衣着俭朴，态度和蔼。来我家的是一位二十几岁的年轻人，一身灰色棉衣棉裤，自称姓徐名舟，据说是北京大学西语系的地下党员。他隔三差五就来我家探望，辅导我复读英语，教我背诵英文短诗，叮嘱我复习功课，亲切如兄长。不久他告诉我，位于小石桥的七中要招插班生，让我准备应试。解放初期的共产党干部，给我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也是我后来积极要求入少先队、入共青团、入共产党的原因。

3、借故解除傅作义警卫团

1949年初春，毛泽东离开平山县西柏坡，3月25日住进了位于北京西郊香山南麓半山腰的双清别墅。这里环境幽雅，苍翠的竹林、遮天的银杏、挺拔的松柏、古朴的建筑，胜如人间仙境。别墅后面的石壁中间，有两股碗口大的清泉汨汨上涌。乾隆皇帝在泉边石崖上题有“双清”二字。这也是“双清别墅”之名的由来。毛泽东入住后，此处对外称“劳动大学”，简称“劳大”。与“老大”谐音。

一天，周恩来突然打电话给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说傅作义警卫团的一些人要到“劳动大学”闹事，命他派一个团迅速赶到香山，执行保卫毛主席的任务。

原来，最初傅作义在与中共方面商讨接受改编事宜时，曾要求毛泽东给他留下一个军不要改编，毛泽东不同意。傅作义退求其次希望保留警卫团，说是担心自己投降后会被蒋介石暗杀。毛泽东同意了这个要求，并许诺傅作义警卫团的待遇与解放军官兵相同。这是毛泽东的权宜之计，他想的是先让傅作义交出部队放下武器，再伺机解除警卫团的武装。随后，傅作义所属的二十五万官兵开出北平，接受改编。春节过后，警卫团官兵连续两个月未领到薪饷，情绪不安。听说中共首脑机关在香山（当时不知道毛泽东住在双清别墅），纷纷要求请愿。4月初的一天，警卫团的一个营负责执勤，另两个营的官兵在营长带领下，将该团中的中共政工人员看管起来后，排着队向香山进发。官兵们没有携带武器，因为他们知道，带上武器就是兵变，而不带武器只能算是请愿。这时，中共安插在警卫团中的“线人”见势不妙，立刻赶去向周恩来报告。这就有了周恩来要聂荣臻派兵弹压的电话。聂荣臻派出的部队赶到香山后，闹事的官兵已递交了请愿书返回到翠微路兵营。但毛泽东仍以防止兵变为理由要解除这个团的武装。中共派兵包围了兵营，将警卫团全部缴械，并逮捕了两个带队请愿的营长和警卫团的三个团级军官。傅作义得知这一事情后，先是派秘书王克俊向聂荣臻抗议，又亲自赶到北京市市长叶剑英处，指责共产党说话不算数。后来傅作义本人又来到香山向毛泽东质问。毛泽东说：“请傅先生谅解我们的处理方法。我们知道蒋介石这个人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我就不信他就不在我们身边安插特务，不在你的身边安插奸细。你的警卫工作应由解放军来担任。”毛泽东下令释放了被逮捕的军官，并将傅的警卫团减为警卫排，只允许保留35人贴身警卫。对于毛泽东的做法，傅作义有口难言，他知道不给警卫团官兵发饷是毛泽东的主意，目的就是诱使官兵们闹饷，最后再以“弹压兵变”为借口撤销该编制。傅作义此时寄人篱下，虽然心中有气却无可奈何。嗣后，毛泽东让他担任了水利部长，兼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以示抚慰。傅作义明知这两个官衔是个虚名，败军之将，岂可多言。

4、整理市容

北平以和平的方式移交了政权，相对完整地保留了故都建筑，但还不能

说北平没有遭受战争的破坏。城门外一公里到两公里的房子基本被拆光，修建了不少碉堡，傅作义号称守城名将，曾经幻想以集群式碉堡防御共产党的进攻，现在五十多万部队以和平改编的名义投降了，碉堡需要拆除，民房需要重建，土地需要复耕，交通需要恢复，可谓百废待举。

城里的建筑和各项设施虽然没有受到严重的损毁，但是从1947年以来，共产党的实力逐渐增强，军事上从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不断地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政治上高喊废除一党专政，打着民主、自由的旗子，拉拢民主党派，倡议组建联合政府；经济上实行土改，将无偿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贫雇农，然后动员贫雇农中的青壮年参军，保卫胜利果实；这个措施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生产力，又扩大了兵员，乃至攻陷东北，围困华北，占领北平。

国民党呢？前线节节败退，后院频频起火。国民政府的上层官僚已经感到日暮途穷，既无心戡乱更无意建国；中层官吏则忙于搜刮民财，寻找退路；下层官员不理国事，拖天混日，甚至盼着共产党早点打赢，不打仗了，过好安定日子。

及至1948年秋冬，北平已处在共产党百万大军重重包围之中，党政要员个个如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有条件的纷纷准备南逃，没办法南逃的消极怠工、听天由命，根本谈不到市政建设。留给共产党的是一座衰微破败，满目疮痍的城市，百业凋敝，民不聊生。

中共接手北平以后，做了大量安民工作，笼络人心。整理市容是其中之一。一开始是动员老百姓“各扫门前雪”。随后是挨家挨户分配名额由入城干部带领在指定地段平整地面，粉刷墙壁，搬除障碍，打扫清洁。大街小巷都有了焕然一新的感觉。

5、开国大典

1949年9月30日下午五点钟，临近放学回家的时间，全体同学在操场集合。刘惠民校长向大家宣布：明天在天安门[1]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典礼，我校和西城区兄弟学校一起参加。

话音还没有落，同学们兴奋地一边喊一边跳了起来，校长一再在台上招手，让大家安静，不知道谁带头鼓掌，顿时掌声伴着欢呼声再掀高潮，持续了两三分钟才渐渐地平静。

紧接着校长一条一条地念注意事项，要点是一切行动听指挥，特别强调如果发生意外绝对不许乱跑，防止帝国主义和蒋匪帮破坏[2]。

还要求服装整齐，上着白色长袖衬衣，下穿深蓝色长裤，自备干粮，不准带水壶，不准带照相机，可以带一两个苹果或梨，10月1日清晨六点钟在学校操场集合。

我高兴兴地回到家里，看到我父亲提前下班了，他先说话，满脸笑容的问我明天是不是上天安门，我说了学校的安排，他说：他们工商联会也要参加，对服装和水壶没有限制，一向很严肃的父亲今天显得十分高兴和得意，表达了他对“新中国”的期待。

中共进入北平以来，经常组织学生游行。2月12日庆祝北平和平解放大会、4月23日庆祝南京解放、4月24日庆祝太原解放、五一国际劳动节、五四中国青年节都组织了集会游行，隔几天就要上一次街，我基本上适应了，不过这次特别兴奋，据说要接受毛主席的检阅，还要举行阅兵式。

第二天早晨不到五点钟我就起床了，洗漱完毕，吃了半个窝头，喝了一

点水，带上昨天父亲特意买的梨和昨晚特意蒸的豆沙包子，直奔学校。

大约五点半钟，同学们就已经来齐了，高中部举着白底红字“北京市第七中学”的横幅和无数面绸子制的红旗。初中部是红艳艳的纸旗，准少年儿童队员[3]每人一个红纸做的五角星灯笼。

六点整，从学校出发，三百人左右的队伍出了小石桥胡同沿着旧鼓楼大街走地安门、景山东街、北池子、南池子，一路欢欣鼓舞、兴高采烈来到了指定地点——天安门东边紧挨着长安街北侧的红墙下面，路对面是威武的解放军步兵战士。

天空下起了毛毛雨，雨不大，外面的衣服只是被淋得潮而未湿，同学们井然有序的站着，情绪高昂，精神饱满，要学习对面的解放军，一动不动，甚至很少眨眼睛。

同学们在原地站了大约一小时，一个带着红袖套的指挥引领着我们进入会场。这时大约九点多钟，会场上已经站满了参加庆典的群众，小雨还没有完全停，绝大多数都没有拿伞，大家却似乎没有感到雨的存在，依然笑逐颜开，只盼望着期待已久的开国大典，渴望赶快看到毛主席。

举行开国大典时天安门修葺一新，城楼上横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正中悬挂着毛泽东的巨幅画像(40年代着冠照)。两旁的标语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万岁”，西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那时的天安门广场比现在小得多，东西三座门(正式名称为长安左门、长安右门)及南面长长的甬道，甬道两边长长的红墙，正南门即砖石结构的中华门都还存在，形成了一个丁字形的封闭会场。经过几个月的整理与修葺，与八个月前北平刚解放时的天安门前比较，可说是焕然一新，宽广平坦得多了。在现在国旗旗杆的地方已竖了一根当时看来已很高的旗杆，旗杆上有一个金色的顶。中华门外正阳门、前门箭楼两旁的许多建筑物上都张灯挂旗。“北平东站”、“北平西站”的大字一夜间都改成“北京东站”、“北京西站”了。

那天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天安门参加开国大典的群众据说有三十万。人群和旗帜、彩绸、鲜花、灯饰，汇成了喜庆的锦秀海洋。人们伫立在蒙蒙小雨中，偶尔蹲一会儿，相互说笑着。领队不时指挥着唱歌，“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团结就是力量”“你是灯塔”“年轻人，火热的心”等歌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人与人之间毫无隔阂，虽然来自不同的单位，都亲如一家，有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感觉，洋溢着对新中国的期待与希望。萌动着团结一致建设新中国的信心与决心。

10月1日下午两点左右，雨住了。据说典礼即将开始，人们停止了喧嚣，天安门广场安静了，这时从广播中传来了熟悉的《东方红》乐曲，广场歌声骤起，大地欢声雷动。毛泽东和朱德一前一后，最先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当林伯渠宣布大会开始后，在代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乐曲声中，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和委员就位。毛泽东庄严宣布：“同胞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在今天成立了！”

人们抬头仰望，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上冉冉升起。与此同时，代表着54个民族(当时确认的数字)的54门礼炮齐鸣28响，如报春惊雷般回荡在天地间，伴随着人们的欢呼声，经久不息。升旗之后，毛泽东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虽然听不清具体的内容，大家知道是毛主席的声音。广播中送来的喜讯和传来的欢呼声也把我们的带到了天

安门城楼上。毛主席宣读完公告后，阅兵开始。检阅司令员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兼阅兵总司令），阅兵总指挥是聂荣臻。

阅兵式在横贯东西的长安街进行，广场上的多数人因相距太远，人头攒动，看不到细节，只能从广播中听到一点现场播报的声音。首先由聂荣臻陪同朱总司令坐敞篷车开始检阅。检阅完，朱总司令回到城楼主席台宣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命令的最重要内容为“坚决执行中央人民政府和伟大的人民领袖毛主席的一切命令，迅速肃清国民党反动军队的残余，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国土，同时肃清土匪和其他一切反革命匪徒，镇压他们的一切反抗和捣乱行为。”因为当时华南的两广、海南、华东的福建一部分、西南全部（四川、西康、贵州、云南、西藏）均未解放，新疆虽宣布和平起义，解放军尚未到达迪化（乌鲁木齐），更不要说还有台湾，所以朱总司令的命令是有针对性的。命令发布后，阅兵分列式随即开始。受阅部队以海军两个排为前导，接着是一个步兵师、华北陆军军官学校、一个炮兵师、一个战车师、一个骑兵师相继跟进。空军包括战斗机、蚊式机、教练机共 17 架在全场上空自东向西飞行受阅。整个阅兵式历时 3 小时。

阅兵式最激动人心的是飞行。下午四时许，位于北京郊外南苑机场待命的飞行员望见绿色信号弹呼啸升空，17 架飞机在北京上空盘旋待命。17 架飞机中，有 9 架是 P-51 型战斗机，2 架是蚊式战斗机，3 架是 C-46 型运输机，1 架是 L-5 型通讯联络机，2 架是 PT-19 型初级教练机。17 架飞机要形成一个纵队跟进队形通过天安门上空，与地面的坦克队列相呼应。

17 架飞机 5 种机型，飞行速度相差很大。两种战斗机的时速是 600 公里，L-5 型通讯联络机和 PT-19 型初级教练机的时速不足 200 公里。但上级要求，通过天安门时必须队列整齐、分秒不差，确实很有难度。

飞行领队是刘善本[4]和王延洲[5]。都是国民党训练有素的驾驶员。他们经过反复摸索和精确计算，飞行队决定起飞的顺序按照先小后大，先慢后快，同时还专门选择了 3 个不同的航线进入点：战斗机速度最快，从通县进入；运输机为中速，从建国门和通县之间进入；其余飞机从建国门东侧进入。按此方案经过多次合练后，可以保证开国大典时万无一失。

下午 4 点半，在通县双桥上空盘旋待命的飞机。依机型分组分别在 900 米、600 米、450 米的高度，由东向西依次进入航线。4 点 35 分，飞机轰鸣而来，受阅分列式正式开始，飞机飞过天安门上空时，下面是一片红色旗帜的海洋和响彻云霄的欢呼声。

前面 9 架领航的 P-51 型战斗机飞过天安门后，指挥部下令：“9 架 P-51 再通过天安门一次。”驾驶员按照原来预定复飞一次的方案，在复兴门上空作右后转弯，沿西直门、德胜门、东直门、再转向建国门，当到达东单上空时，正好与第六分队的教练机相衔接，所以在地面观看的群众都以为受阅的飞机是 26 架。

直到临近晚间的六点多钟，我们这边的队伍才开始移动，接着队伍越来越快，最后竟小跑起来。到了东长安街，稍稍整顿了一下队形，十多人一行，手挽手、肩并肩，疾步向前……

当队伍接近天安门城楼，人们几乎都顾不得保持队形了，大家只有一个心思：毛主席在哪里？

那天，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中间，身着灰色的中山装，频频向我们招手，我处在队列的右边，靠近天安门城楼一侧的位置上，看得还比较真切……

此时，整个队伍的脚步不觉地慢了下来，大家都不愿意向前走，但又被后面的队伍推着，队形、步伐都乱了套。据说那天游行过后，地上掉了好多好多鞋，回头去捡是根本不可能的。第二天清场时，拉走了几大汽车学生们遗落的鞋。

从清晨出发等待到日落西山[6]，在广场站立了十多个小时，盼望着的就是通过天安门时接受毛主席的检阅，在那一瞬间到来的时刻，我高呼着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终于看到毛主席了，激动得泪水横流，直到游行队伍走过了三座门，我还在深情地回首翘望。对毛泽东的崇拜，从那时候起已经深深地铭刻在幼小的心灵。

历经了数十年，亲身经历了一件又一件残酷的现实，镇反、三反五反、肃反、反胡风、反右、反右倾、一打三反、反右倾翻案……乃至文革浩劫期间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毛泽东发动的一系列以整人害人为目的的政治运动，使中国人民陷入深重的灾难之中，也日益暴露了毛泽东的真实面目，根深蒂固的帝王思想，诡异凶残的阴暗心理，专横霸道的流氓作风，口蜜腹剑的卑劣手段，在千百万群众的眼睛里再也掩盖不住了，由此使他的个人威信一落千丈，从一个受人尊敬的领袖变成了欺世盗名的魔头，亡党的罪魁，殃民的祸首。我是一个政治上的迟钝者，且幼年中毒太深，对毛泽东的崇拜久久未能消失，进入八十年代，才渐渐地觉悟，经过了几十年的思索，再思索，逐渐地看清了中共和毛泽东的反动本质，直到晚年才对他批判揭露。毛泽东必将遗臭万年。

附注

[1]当时的天安门广场仍沿袭清朝末年的格局，呈T字形，东端为长安左门，西端为长安右门，东西之间相距370米，南北宽约80米的地段用石板铺砌，称为“天街”，原来是颁诏时官员跪听之地。

天街中部与南北向的御街连成一体，直到中华门，总长540米，御街宽约200米，整个T形广场有红色宫墙与皇城相连，实际是封闭的紫禁城前区，总面积只有11万平方米。

1954年扩建时拆除了长安左门、长安右门。1959年拆除南端的中华门和周围的宫墙，继后再次扩建，逐渐定格为南北长880米，东西宽500米，总面积44万平方米的矩形广场，连同周边相关地段整个地区面积大约52万平方米。

[2]1949年5月4日，中共与国民党之间的战争尚未结束，国民党从青岛派出六架B-24轰炸机，轰炸南苑机场，毁伤飞机四架，炸毁房屋近两百间，伤亡24人。由此北平市军管会大肆宣传，加强管制，强调防空袭、防破坏。青岛虽已于当年6月2日解放，从台湾派飞机的可能仍然存在，官方还时常提醒市民，残余的特务尚未肃清，需要保持高度警惕。开国大典之所以定在下午三点钟，临近日落之时，而不在旭日东升的八九点钟，即出于考虑防止国民党派飞机轰炸。当时B-24的飞行速度只有420公里/小时，且不能夜航，从舟山起飞到达北平上空需五小时，即使完成了轰炸，也难以在日落之前返回基地。

[3]1949年10月13日中国少年儿童队正式成立，在此之前北京市市立中学初中部已着手吸收少年儿童队员。1953年6月中国少年儿童队改名为中国少年先锋队。

[4]刘善本（1915—1968），山东省昌乐县泊庄人。1935年，在“航空救国”的思想影响下，考入航空学校。1937年3月，转入杭州笕桥中央航空学校总校。1943年秋，赴美学习，先后在4所航校和基地进行B—24型轰炸机飞行训练。1946年6

月26日,刘善本利用由昆明飞往成都运送军火的机会,在机组人员张受益、唐世跃、唐玉文的配合下,驾驶530号B—24型轰炸机,飞抵延安,受到中共热烈欢迎。毛泽东、朱德亲临欢迎大会,接见机组人员。开国大典时,刘善本驾驶C—46型飞机飞越天安门上空。备受殊荣。1949年参加中国共产党,被任命为航校副校长,刘善本具有高超的驾驶技术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作战坚毅果断,为人豪爽热情,遇事严谨求实。1955年,他被授予大校军衔,并荣获一级解放勋章。1964年,晋升空军少将军衔。“文化大革命”中,以“假起义,真特务”“攻击毛主席”“反对林副统帅”之罪名遭到秘密关押和无端审讯,以及残酷迫害,于1968年3月10日审讯途中被活活打死。终年53岁。

[5] 王延洲(1920-2012)山东日照市东港区人,国民党空军飞行员。曾因击落多架敌机,获王牌飞行员称号。1946年驾机投奔中共,开国大典时他驾P-51战斗机通过天安门上空。抗美援朝战争中,分别击落击伤美军F-86飞机各一架,荣立二等功。1957年7月反右运动中被判刑入狱。在狱中,法院送来离婚判决书。王延洲大发雷霆,把判决书撕得粉碎。但是,县大狱就是县大狱!手铐、脚镣,禁闭、饿饭……无休止的残酷折磨,他被迫与妻子离了婚。1961年6月,监狱因饥饿减员时,他被遣回了老家山东日照孙家村务农。“文革”期间,王延洲被诬陷为现行反革命,在村中接受监督改造。从1961年到1983年,王延洲屈辱地在农村生活了二十三年,1983年初,县里的统战部部长夏良柏来到孙家村大队视察工作,发现了王延洲的冤情。决定亲自为王延洲写信联系,落实政策。1983年12月,经空军有关部门审定,恢复了王延洲驾机起义人员的待遇。次年,他的原单位安阳航空运动学校也派人到日照找到他,宣布了平反结论。2011年8月下旬,王延洲和发妻齐书云在山东日照再度相见,两位耄耋老人总是拉着手,似乎,生怕再分开。有情人终于团聚。2012年王延洲病逝。享年92岁。

[6] 开国大典的地点和时间;;1949年7月,中共中央就成立了由周恩来为主任,彭真、聂荣臻、林伯渠、李维汉等人为副主任的开国大典筹备委员会。责成杨成武与华北军区司令部起草了一个《阅兵典礼方案》。阅兵方案提供了两个地点供中央最后确定:一个是西苑机场,场地宽阔,展得开,无须阻断交通,但须另搭两三个看台,工程大,且赶不上天安门城楼宏伟壮观;另一个就是天安门广场,须断绝交通4小时,当时的长安街较窄,不能按照正规阅兵的行进分列式,只能允许横排步兵十二路纵队、骑兵三路纵队和装甲车两路纵队。

周恩来在阅兵方案的报告上签注了意见:阅兵地点以天安门前为好,时间到时再定。检阅指挥员由聂荣臻担任,阅兵司令员请朱德同志担任。

开国大典的具体时间直到十月一日上午10时才对外广播宣布。

第二章 回忆中学时光

一、崇实中学的一年

我启蒙读书是在临近后海的崇实小学。崇实小学和地处交道口的崇实中学都是由教会兴办和管理的私立学校。1937年以后,华北沦陷,日军占据北平,崇实小学和崇实中学改名为鸦儿胡同小学和大三条中学,抗战胜利后恢复校名。1949年后所有的教会学校被中共强令接管改为官办,如今崇实小学叫鸦儿胡同小学,崇实中学改叫北京市第二十一中学了。

崇实中学是美国传教士丁韪良[1]1865年兴办的学校。北平还有育英中

学（灯市口）、贝满女中（灯市口）、汇文中学（崇文门）、慕贞女中（崇文门）、崇慈女中（交道口）、崇德中学（绒线胡同）、笃志女中（绒线胡同）、潞河中学（通州）、辅仁大学附中（柳荫街）辅仁大学女中（太平仓胡同）等教会中学。

崇实中学教学严谨，外号儿“监狱”，其管理之严格可想而知。

崇实中学的校歌是：我崇实，重劳工，根基巩固邦家宁。教育做人，为勤俭朴诚。崇实前程如日升月恒，松柏繁茂峥嵘。同学奋勉齐努力，驰骋奔腾，做全球晨钟……。

北平还有一些中学也有外号儿，体现着北平人的幽默。如求实“小店儿”，进德“茶馆儿”，大同“花园儿”，大中“门脸儿”……。小店儿是交钱就能住宿，茶馆儿是给钱就有座位，意味通常招不满学生。大同中学坐落在东四南大街原来的一座王府里，楼台亭阁，红绿相间，山石草木，错落有致，尽显园林之美。大中中学男校离交道口不远，面临大街，居中的拱形校门富丽堂皇、古朴典雅，颇为壮观，吸引了不少过路行人的目光。校门两边是玲珑剔透、美轮美奂的铁栅栏，十分气派。

1949年以前，北平的中学有三类，即公立、私立和教会学校。无论哪一类，都是男女分校。

公立中学数量不多，概以数字命名，如一中、二中、三中、女一中、女二中等等，大多有一定历史，师资力量比较强，教学质量良好，且学费低廉，一个学生全年费用大约相当于普通工人家庭年收入的百分之二，为一般市民首选，唯因报名者众多，考分低者常不得入门。

私立中学良莠不齐，但多数还是比较讲求教学质量的，个别学校甚至相当优秀，通常对入学要求不严，学费大约是公立中学的两倍。志成、弘达、孔德、四存等男中和翊教、华光、佑贞、协化等女中较为出名，如今北京的所谓重点中学很多是在这些学校的基础上演化而来的。私立中学校舍大多因陋就简、或借用、或租用，多数是平房。但教师大都是师范大学毕业的，人称“师大派”。大同中学和华北中学系北大校友创办，是谓“北大派”，蔡元培曾兼任华北中学首任校长。

教会学校以注重教学质量著称。任课老师至少是大学本科毕业学历，英语一般由外籍教师任课，比较重视体育和课外活动，倡导独立思考、提倡学生自治；校舍建筑优良、教学设施完善；实验室不乏进口仪器。唯学费高昂，大约相当于公立中学的六倍。为扩大优秀生的来源，成绩突出的学生可减免学费。育英、汇文、崇实、崇德等男中，和贝满、慕贞、崇慈、笃志等女中为当时八大教会名校。数十年来培养了众多优秀学生，其中不少人成了国家的栋梁之才。

我小学毕业报考北平市立一中，该校地处宝钞胡同，离我住家很近，又是一所名校。然而运气不佳，基础不扎实，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数学试卷一道异化的“鸡兔同笼”试题难住了我，由此即失掉20分，以至名落孙山。

当时不兴统一招生，各类学校错开了招生、考试日期，市立中学招生结束，只得退求其次报考教会学校，幸好入学考试成绩进入前六名，获准免费资格得以进入崇实中学。

教会学校的同学大多家境殷实，我属于穷学生之列，多次分得奶粉、毛线、衣物等救济物资。

读了一年多，战事骤起，虽然父母亲都在工作，但均属工薪阶层收入不

高，物价却不断飞涨，我不能保证每学期的考试成绩都在前六名之内，如果不能再享受免费待遇，则可能中途辍学。此时因战事停课，战争结束后能不能在教会学校继续读书尚难预料，设法转入收费低廉的市立中学是完成学业的唯一途径。

我在崇实中学的时间不长，但印象深刻，少年时代的往事，历历如在目前。

崇实中学的校舍简洁明快、朴实典雅，校园大致呈矩形，东西长两百余米，南北宽约一百米。进校门西侧是略带哥特式建筑风格的教学楼，北侧是学生宿舍楼，均为砖木结构。楼顶刻着醒目的“1905”字样，标志着这两座楼的竣工年代。

教学楼地下一层为实验室，地面上四层为各年级教室，音乐及美术课为专用教室。全楼采用木质地板，木制旋转楼梯。教室设计独特，进门有一玄关，若在上上课期间有人开门，教师可以看得见，听课的学生看不见，教师有权禁止其入内。教室内的窗户是上下推拉式，窗框两侧有绳子和藏在框体内的配重砣相连，可以任意选择开启度，全开时玻璃窗即整体隐藏在墙壁之内。教学楼顶部有一个塔形的钟楼，早上第一节课和下午放学由工友拉动底楼的绳子，钟声随之响起，清脆嘹亮，传之甚远；中间的各节课则由工友摇铃，以免钟声惊扰四邻。

宿舍楼坐北朝南、面迎校门。底层为行政办公场所，二至四层供住学生使用，每个寝室的面积约十二平米，通常住四人。

校门东侧为大操场，有椭圆形跑道、篮、排球场、单杠、双杠、跳高、跳远等体育设施。操场的东南角有一面独立的形似影壁的高墙，供学生玩“墙球”，这是崇实中学的特色之一，今已失传。

操场北部是一排平房，即图书馆和阅览室。崇实中学 1865 年建校，历史悠久，藏书丰富，数量之多、门类之全在北平众多中学中名列前茅。

学校每年都由学生自治会和校务委员会编辑出版年刊。16 开本、80 页左右，版面丰富、图文并茂、印刷精美，言论自由、兼容并蓄。即使校长也可以被幽默一番，甚受师生欢迎。

学校早期办有印刷厂、织毯厂、皮革制品厂，供家境贫困的学生半工半读，抗战后停办。

当时中学称老师为先生，教会学校优秀教师众多，给我印象深刻的是：

英语教师斯柯达女士，来自美国，年约四十，体态丰满，笑容可掬，无论冬夏着长裙时居多。上课准时，绝无迟到或拖堂现象。讲课灵活生动，寓语法于课文之中，且善于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让初次接触外语的学生在轻松的环境中学外语，培养了学生学习外语的兴趣，教会学校的学生外语比较好，和启蒙老师分不开。

动植物老师赵先生，年当半百，常年西装革履，上课时虽带有教材却放在讲台一角从不翻阅，对某个动物或植物的界、门、纲、目、科、属、种，生长特点，生活习性等烂熟于胸，娓娓道来绝无半点差错。讲课有条有理，一丝不苟，无意之中培养了学生严谨认真的学风。动物课曾让学生动手解剖青蛙，老师示范解剖白兔，印象深刻。

语文教师张先生，体质羸弱，经年穿灰、蓝等素色长袍，颇有书卷气。他知识渊博，记忆超群，讲课声音抑扬顿挫恰到好处，能够抓住同学的心理，不时穿插一些稗官野史，文人轶事，即使在春夏交接容易困乏的季节，上语

文课绝对不会打瞌睡。他强调古文，要求学生熟背经典文章和名诗名赋，《桃花源记》、《小石潭记》、《醉翁亭记》、《核舟记》、《祭十二郎文》、《归去来辞》、《三吏》、《三别》、《琵琶行》等均在必须熟背之列。

师从张先生让我体会到学古文甚至背古文并非复古，熟读文言文有利于提高驾驭汉字的能力，对于写好白话文也大有裨益。

张先生倡导练习书法，他的粉笔字潇洒浑朴，外柔内刚，颇见功底。我记得同班学友中刘敬华的硬笔行书流利舒畅，郭宪法的楷书严谨规整，多次受到张先生夸奖。

张先生还喜欢快速交卷的学生，每次考试他都坐镇现场亲手收卷。有一次我第一个交卷，他拿过去看了看说：字是敲门砖哪！那意思好像是说字写得不好居然抢了头卷，使我下决心练字，遗憾的是现在也没有达到让张先生满意的程度。

张先生批改作文甚为认真，无论何人，无论好坏，均有批语。某次我交了一篇不足三百字的作文，张先生阅后的批语如是写着：“文通字顺，内容切题，但过于简短，堪为懒惰者之模范”至今记忆犹新。

教会学校自然有宗教色彩，利用各种机会宣传基督教，但绝不勉强。每天上午九点四十分在顶楼音乐教室，由牧师讲授“上帝创世”“原罪救赎”“天堂地狱”等基督教教义；音乐老师弹奏钢琴、吟唱圣歌（通常称为唱诗）；时间只有二十分钟，学生自由参加。回想起来当时全校学生大约有五百人，而音乐教室的容纳量只有六十人左右，也就是说约有十分之一的学生参加宗教活动。

教会学校宣扬博爱、平等、怜悯、宽恕、谦卑、爱人如己等宗教理念。我的外祖母笃信佛教，信佛教的人讲因果报应、诸佛在心。佛经上说：“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这四句偈语是三世一切诸佛的教诫，也可以说是佛教的定义。我家的邻居是虔诚的伊斯兰教徒，伊斯兰是阿拉伯语音译，原意为“顺从”、“和平”，一切任凭真主安排。信奉伊斯兰教的人统称为“穆斯林”（Muslim，意为“顺从者”）。

我少年时期对这三种宗教偶有接触以后，萌生了一个想法，即宗教都是虚幻的。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伊斯兰教的创始人穆罕默德，基督教的创始人耶稣，编造了无数神话甚至离奇荒诞的故事让人们“相信”，旨在统一人们的思想和信仰。佛教要求人们忍耐顺从，以脱离苦海。基督教要求人们忍受苦难，死后可以升入天堂。伊斯兰教要求相信人都要经历今生和后世，行善者进天堂，作恶者下火狱。

年纪稍大一点，我又接触了种种主义（三民主义，共产主义，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唯物主义、唯心主义、保守主义、浪漫主义、帝国主义、极权主义、民主主义、封建主义、理想主义、自由主义、现实主义等等）。朦胧地感觉到宗教和主义有相似之处，都是力图统一人们思想的工具。宗教在统一社会意志、增强社会凝聚力、协调社会关系、降低社会内耗、稳定社会秩序等方面起过难以替代的作用。随着科学的进一步发展，宗教对于科学的容纳能力越来越差，宗教的神秘外壳日益暴露其致命的弱点，种种神灵怪异难以让人们迷信。主义便应运而生，主义的倡导者还是想借某种主义统一社会意志，归根结底是为了便于统治。所以我虽接触过多种宗教但不信任何宗教。接触过诸多主义，除了青少年期相信过共产主义以外，再也不会相信任何主义与宗教了。树立了不迷信，多比较，求真理，

尽信书不如无书……等观念，也算是一种主义吧。

附注：

[1]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 1827-1916) 美国印第安纳州人，基督教新教教会长老派传教士，1850 年来中国，在中国生活了六十二个年头，堪称首屈一指的“中国通”。大半时间从事翻译、教育工作。1865 年任北京同文馆教习，同年创办北京崇实中学，并在 1865 至 1885 年间任该校校长。1869 到 1894 年任北京同文馆总教习。1898 年，中国第一所大学——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成立，丁韪良被任命为首任总教习(即校长)，光绪帝授予二品顶戴，开学之际，他当着众多中外来宾之面向中国的圣人孔子画像鞠躬致意，此举被某些基督教人士视为基督的叛徒。1916 年在北京住所下厨房时去世，终年 89 岁，与妻子同葬于西直门外墓地。现已无迹可寻。他对中国教育事业所做的贡献却是不可磨灭的。

二、从辍学到转入市立中学

1949 年 2 月，中共接管北平政权，大批接管干部随军队入城，遍布于各个机关、学校、工厂、商店。接管北平市西城区的徐舟年约二十几岁，原系北大西语系的学生、地下党员，入城后态度和蔼礼貌有加，经常深入大街小巷走访住户人家，关心民众疾苦，宣传共产党的为人民服务政策。他到我家时，见我因战事失学在家，分外关切。某日他特意跑来告诉我北平市立七中要招插班生的消息。

那时北平私立中学尤其是教会学校的学费远高于市立中学，家中仅靠父母的微薄收入维持生活，因子女众多，负担日益沉重，我还能不能读书，尚在两可之间，看来继续就读于教会学校的希望不大。得知市立中学招插班生，对我而言，是天大的喜讯。禀告父母以后，急急忙忙的报了名。随后便加紧临阵磨枪，应付考试。

二月下旬的一天，风和日丽，虽然早晨起来气温还很低，摄氏零度左右，路边还有积雪，我却感到没有冷，一路快步走到学校，经监考老师验过准考证，进入考场。教室内陆陆续续地来人，基本上坐满了。将近四十名考生，计划从中录取六名，我的心里还是有点紧张。

第一堂考语文，只有两道题。

一是作文，题目是“我的志愿”，这个题目不难，我阅读过大量类似的范文，记住了一些名言警句。我的志愿是做一名教师，那时候很崇拜教师，老百姓也很尊重教师。围绕着“国将兴，必尊师而重傅”抒发个人情感，基本上是一挥而就，七八百字的文章很快就写完了。

第二道题还真难，要应试的学生回答“解放”后看过哪些书，举出一本政治的、一本文艺的书籍，谈自己的读后感。我的老天!“解放”还不到一个月，我哪里看过什么新书哟！冥思苦想了一阵，只好编故事了。

政治书籍我说看过《新民主主义论》。坦而言之，且不说我没看过这篇文章，即使看也未见得能够看懂，一个年仅十二岁、从未接触过社会与政治的孩子，怎么能看懂毛泽东真真假假的鸿篇巨著呢？但在中共进城这短短的一个月里，通过接管干部的宣传和道听途说，多少知道一点新民主主义的概念。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在共产党领导下由工农群众联合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废除一党专政，建立没有剥削、没有压迫，充分民主、高度自由、文化进步、经济发达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并逐

步迈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在这些概念的基础上略加扩展，用三百字左右回答了第一问。

文艺书籍呢？休学期间，我整天在家里承担着买菜、做饭、打扫卫生等任务，有时还要照顾年小的弟弟妹妹，没有多少时间看书。好在当时大街上的招贴画随处可见，《白毛女》、《血泪仇》的故事几乎家喻户晓。于是我选择《白毛女》借题发挥，抨击封建地主，赞颂中国共产党解放了广大受压迫的人民，写就了两百多字的答案。

第二堂考数学，我没有重大失误。

三天以后发榜，我以第三名的成绩进入北平市第七中学。

七中的前身是李镜湖律师 1931 年创办的镜湖中学，校址在锦什坊街王府仓胡同四十六号，1941 年改为北京市公立第七中学，抗战胜利后原校址被政府征做他用，学校迁至旧鼓楼大街小石桥胡同二号。

小石桥胡同地处繁华与幽静交界的中间地段，往北是安定门和德胜门之间的城墙，往南是钟楼、鼓楼和地安门大街。东面的出口是旧鼓楼大街，西邻积水潭。

胡同不长，名气不小，宽敞清静，古朴幽雅。

东头的小石桥一号院是伪满洲国立法院院长赵欣伯的府邸，十七号院是日伪时期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荫泰的私宅。一个胡同住着两个烜赫一时的大汉奸。

尽西头的二十四号院是清末邮政大臣盛宣怀的府邸，是一座中国庭园式建筑，全园占地数十亩，有各类房屋四十余间。1949 年以后国家副主席董必武寓此，后被中共要员康生占据，现为竹园宾馆。园内长廊曲折、楼阁相续，古朴典雅、曲径通幽，假山喷泉、错落有致，绿影婆娑、动静相宜。春季百花芳菲，夏季竹林荫翳，秋天硕果竞艳，冬日苍松傲雪。

口口声声自称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人民公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才有特权住此豪宅大院。

七中的小石桥校址面积狭小，房屋陈旧，难以适应城市人口增多教育事业蓬勃发展的需要。1952 年，北京市教育局拨款为七中在旧鼓楼大街豁口外（今工人日报社所在地）修建新校舍，1953 年秋竣工。新校址占地约七十亩，建教学楼两座，办公楼一座，礼堂兼饭厅一座，还有部分平房作为实验室和学生宿舍。然不久该校址即被政府指定卖给工人日报社，不得不在德外大街安德路重新建校。安德路校址占地三十余亩。建教学楼一座，内有教室二十二间，实验室三个，办公室若干；修建学生宿舍一座，可容纳五百人住宿；礼堂兼饭厅一座；体育场一万余平米。新校总投资 103 亿元旧币（折合新币 103 万元）。六十年弹指一挥间，现在的 103 万元在北京二环路以内顶多能买个二十平米的一居室。说不清是国民经济还是物价，竟如此快速增长了数百倍，都归结于六十年辉煌成就，令人叹为观止。

当时七中在小石桥的校园占地不及二十亩，初期有学生二百余人，教职员工二十余位。由于校园相对狭小，而七中的不少学生来自远郊甚至邻近的县份，所以校方在附近的张旺胡同、草场胡同、酒醋局胡同购置了三处民房，供学生住宿。

校舍及教学设施较之教会学校相去甚远，在市立中学中也属于比较简陋的，全仗着十几位忠于教育事业、富有教学经验、关爱青年学生的老师和勤劳敬业的教职员工支撑着这所学校。

七中的学生大多家境贫困，吃着窝头咸菜，穿着粗布衣裳，偶有同学穿了一双皮鞋便会引起人们围观，夸赞。他踢起足球来也显得特别带劲。同学之间和睦相处，亲若兄弟。其中于书香家居农村，在校期间学习刻苦，考试成绩优秀，据说家庭属于小地主，张毅兴住在地安门烟袋斜街，父亲是某小商店老板，这两位同学都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当时并没有受到歧视。张泰基的父母均为教师，他性格开朗敦厚，是少先队中队长，和我关系甚好，初中毕业后各奔前程杳无音信，八十年代，我坐了二十多年牢房平反出狱后回京探视父亲和兄弟姐妹时，听说此三位同学均在文革期间死于非命，忆起少年光景，不胜惋惜之至。社会之大竟然容不下几个孑然小民，是为何故焉？

和平“解放”以后，北平军管会派杨民、王在田、常玉、张谦四人接管学校。1949年10月成立党支部，杨民为书记，王在田任校长。与此前后不久全国大小单位都建立了党的机构，党委、党组或党支部。国民党统治时期学生游行时曾经高喊的“废除一党专政”，“党团退出学校”等口号，一时间成了过眼烟云，飘到九天之外去了。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毛泽东是人民的大救星”等等观念，开始注入每一个年轻学生的脑海，我也是其中的一个。

三、中学时期的思想变化

（1）接受共产主义，加入少先队

进校初期，政治活动居多，各种集会游行不断，“南京解放”、“太原解放”、“上海解放”都组织学生敲锣打鼓，上街游行。五一劳动节、五四青年节、七七抗战十二周年纪念都在天安门组织了盛大集会。对于这些活动，绝大多数同学都是满腔热情，积极参与，丝毫没有耽误了功课的感觉。

学唱革命歌曲是在校的主要活动之一，杨民亲自教唱《国际歌》，讲解歌词含义。当时还学了《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东方红》、《你是灯塔》、《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团结就是力量》等等，大约几十首，其中《团结就是力量》的歌词印象最为深刻，至今仍在记忆之中，“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力量，这力量是铁，这力量是钢，比铁还硬，比钢还强，向着法西斯蒂开火，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向着太阳，向着自由，向着新中国，发出万丈光芒！”。这首歌诞生于1943年6月，由牧虹作词，卢肃谱曲，创作于晋察冀边区平山县，是为小歌剧《团结就是力量》谱写的幕终曲。问世至今，历久弥新，传唱七十余年不衰，可见人们对法西斯的愤恨，对民主、自由的向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看来还要继续唱下去。

学校还组织了腰鼓队、秧歌队，每天下午五点到六点的课外活动时间，操场就是腰鼓队和秧歌队的天下，咚巴-咚巴、咚巴咚巴咚巴；锵锵起锵起、锵锵锵锵起锵起的鼓乐声不绝于耳，天真幼稚的学生都处于兴高采烈、欢欣鼓舞之中。

还有一项活动就是参加义务劳动，我记得进校不久就参与翻修旧鼓楼大街，那时候这条大街是土路，既无石子更无水泥或沥青，路面坑坑洼洼，天晴一包土，下雨一街泥。政府组织沿街各个铺面和两边胡同里的居民、学生自带工具，分别承包一段，铲高填低，将路面规整成弧形，市政委员会派来压路机进行滚压，完工以后看起来果然清爽舒心，引来一片赞叹之声。不料春夏之交雨水增多，淋湿了路面，车辆通行之后难免车辙，不消几日，路面恢复原状，劳民伤财，前功尽弃。走过场和形式主义的歪风那时就已经显现

出来了。可当时由于对共产党充满了好感，谁也没意识到这个问题。

学校开设了政治课，每周三节，由杨民、常玉主讲。内容是社会发展史，讲怎么从猿猴变成人，劳动创造世界，工人和农民养活了资本家和地主。讲从原始社会进化到奴隶社会，而后是封建社会，再后是资本主义社会，最后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说这是历史的必然规律。讲毛泽东说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出了一个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出了一个社会主义阵营，按照这个推理，如果打第三次世界大战必然是出来一个红色的地球，全世界都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了，说这是历史的必然规律。讲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是建立没有剥削，没有压迫；充分民主，非常自由；经济发达，生活优裕；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社会。讲苏联人生活优裕、道德高尚、享受着最广泛的民主和自由，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讲美帝国主义已经进入没落、腐朽、衰亡的垂死阶段，即将在地球上消失等等。那时还由学校组织看了不少苏联电影，如《普通一兵》《青年近卫军》《幸福的生活》等等。

现在看来这些政治课都成了笑话、空话、假话、梦话，那时却使幼稚的青少年深信不疑，立志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呢。

当时流行的小说有：《暴风骤雨》（周立波），《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丁玲），《新儿女英雄传》（袁静、孔厥），《吕梁英雄传》（马烽、西戎），《敌后武工队》（冯至），《动荡的十年》（佚名），《丹娘》（彼·里多夫），《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柳·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娅），《普通一兵》（巴维尔·茹尔巴），《青年近卫军》（法捷耶夫），《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奥斯特洛夫斯基），《被开垦的处女地》（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肖洛霍夫），《母亲》（高尔基），《我的大学》（高尔基），《雾·雨·电》（巴金），《家·春·秋》（巴金）《子夜》（茅盾），《热风》（鲁迅），《伪自由书》（鲁迅）和赵树理等编写的描述解放区生活的作品，渐渐地取代了《三侠剑》《小五义》《包公案》等旧时小说，占据了中学生的书包。

初中阶段是少年最可塑的时期，当时城市生活尚属稳定，“年年斗，月月斗，天天斗”尚未盛行。老百姓之间还保留着传统的淳朴民风，千遍万遍呼喊着共产主义是天堂的口号，大街小巷张贴着共产党万岁的标语，年幼无知的孩子似乎什么都不怀疑，好像谁也没有见过的共产主义明天就要来到似的，前途一片光明。

我随之萌生了要为共产主义社会奋斗的志向，1949年10月加入少年儿童队，誓做共产主义接班人。

（2）两篇文章的影响至深

初中阶段有两篇文章发人深省。

元末明初浙江金华人宋濂写的《送东阳马生序》。摘录原文如下：

余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每假借于藏书之家，手自笔录，计日以还。天大寒，砚冰坚，手指不可屈伸，弗之怠，录毕，走送之，不敢稍逾约。是以人多以书假余，余因得遍观群书。

既加冠，益慕圣贤之道。又患无硕师名人与游，尝趋百里外，从乡之先达执经叩问。先达德隆望尊，门人弟子填其室，未尝稍降辞色。余立侍左右，援疑质理，俯身倾耳以请；或遇其叱咄，色愈恭，礼愈至，不敢出一言以复；俟其欣悦，则又请焉。故余虽愚。卒获有所闻。

当余之从师也，负篋曳屣，行深山巨谷中。穷冬烈风，大雪深数尺，足肤皲裂而不知。至舍，四支僵劲不能动，媵人持汤沃灌，以衾拥覆，

久而乃和。寓逆旅，主人日再食，无鲜肥滋味之享。同舍生皆被绮绣，戴朱缨宝饰之帽，腰白玉之环，左佩刀，右备容臭，烨然若神人；余则缊袍敝衣处其间，略无慕艳意。以中有足乐者，不知口体之奉不若人也。盖余之勤且艰若此。今虽耄老，未有所成，犹幸预君子之列，而承天子之宠光，缀公卿之后，日侍坐，备顾问，四海亦谬称其氏名，况才之过于余者乎？

今诸生学于太学，县官日有廩稍之供，父母岁有裘葛之遗，无冻馁之患矣；坐大厦之下而诵《诗》《书》，无奔走之劳矣；有司业、博士为之师，未有问而不告，求而不得者也；凡所宜有之书皆集于此，不必若余之手录，假诸人而后见也。其业有不精，德有不成者，非天质之卑，则心不若余之专耳，岂他人之过哉？

东阳马生君则在太学已二年，流辈甚称其贤。余朝京师，生以乡人子谒余。撰长书以为贽，辞甚畅达。与之论辨，言和而色夷。自谓少时用心于学甚劳。是可谓善学者矣。其将归见其亲也，余故道为学之难以告之。谓余勉乡人以学者，余之志也；诋我夸际遇之盛而骄乡人者，岂知余者哉！

作者宋濂是明初的散文家，他被誉为“开国文臣之首”，《送东阳马生序》是宋濂写于晚年的一篇劝学之作。他循循善诱地向前来拜谒的后辈同乡马君则叙述自己青少年时代求学的艰难和勤奋学习的经历。文章不长，全文不过七百字。读后却颇有启发。

首先要“嗜学”，即有求知欲，而且要从幼时培养，莫等闲白了少年头。还要创造学习条件，没钱买书就去借，冒着严寒抄录。要守信用，要按时归还，好借好还再借不难。求学问要访名师，名师出高徒。对老师“礼愈至，色愈恭”这不是装模作样，谦恭、虚心是求学的必须。要安贫乐道，“缊袍敝衣处其间，略无慕艳意，以中有足乐者，不知口体之奉不若人也”求真知不慕虚荣，不贪图享受。

这篇文章影响着我的一生，甚至影响到我对子女的教育。

清代四川丹棱人彭端淑写的《为学一首示子侄》。其原文为：

天下事有难易乎？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不为，则易者亦难矣。人之为学有难易乎？学之，则难者亦易矣；不学，则易者亦难矣。

吾资之昏，不逮人也；吾材之庸，不逮人也。旦旦而学之，久而不怠焉，迄乎成，而亦不知其昏与庸也。吾资之聪，倍人也；吾材之敏，倍人也；屏弃而不用，其与昏与庸无以异也。圣人之道，卒于鲁也传之。然则昏庸聪敏之用，岂有常哉！

蜀之鄙有二僧，其一贫，其一富。贫者语于富者曰：“吾欲之南海，何如？”富者曰：“子何恃而往？”曰：“吾一瓶一钵足矣。”富者曰：“吾数年来欲买舟而下，犹未能也，子何恃而往？”越明年，贫者自南海还，以告富者。富者有惭色。

西蜀之去南海，不知几千里也。僧富者不能至而贫者至焉。人之立志，顾不如蜀鄙之僧哉？

是故聪与敏，可恃而不可恃也。自恃其聪与敏而不学者，自败者也。昏与庸可限而不可限也；不自限其昏与庸而力学不倦者，自力者也。

彭端淑的这篇文章只有三百七十三个字，简短、精炼，却富含人生哲理。世间万事“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不为，则易者亦难矣。”是全文的主旨。

《为学》一文，予人启示颇多，概要的说，有：

看准了或认定了的事，就需要义无反顾，就需要毫不动摇，就需要坚定不移，就需要持之以恒。

信心是一种智慧，也是一种勇气，有之未必然，无之则必不然。

不进则退，不学则愚，不思则殆。

空谈误国，空想误事。

只有践行、力行才能收获人生。

人生路上，修身养德、勤奋努力，自然会取得理想成就……

四、“抗美援朝”

(1) 一场本不该发生的战争。

20 世纪 50 年代，在位于亚洲东部的朝鲜半岛发生了一场大规模战争。这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最大的一场局部战争。交战双方最初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与大韩民国，后来中国和以美国为首的由十六个国家组成的“联合国军”先后加入了各自支持的一方。双方投入兵力达 300 万。整个战争历时三年，给双方都造成了巨大的生命和财产损失。

这场曾被中共称之为“抗美援朝”的战争，仅中国方面就死亡了 36 万人（前苏联文件解密，说中国军队伤亡 100 万人；邓小平曾告诉日本共产党领袖，中国军队死亡 40 万人；康生也对阿尔巴尼亚的领袖霍查(Enver Hoxha)说过中国人死亡 40 万。志愿军副司令洪学智也说：“我们在朝鲜战场上牺牲了几十万同志”。现在官方公开只承认死亡 18 万，不知依据何在。） 耗费物资约 560 万吨，花费钱财 60 万亿元人民币（旧币）。据官方的文件说，这场战争至少使中国的经济发展推迟了十年！另一方面，因为战场主要是在朝鲜，所以朝鲜人民的生命和财产损失更大一些。

时隔半个多世纪，追溯往事，尽管中国、朝鲜的有关档案没有解密，但毕竟透露了一点点信息。二十世纪末，美国与苏联保存的有关朝鲜问题的档案解密，揭开了事实真相。已经不能任由某些人一手遮天用谎言解说历史了。人们不禁发现，那是一场本不该发生的战争。

朝鲜战争贯穿于我中学阶段一半以上的时间，影响至深。不得不为之记录以戒。

那场战争是如何发生的呢？让我们从朝鲜的历史说起：

朝鲜是一个文明古国，面积约 22 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中国的湖南省。早在公元一世纪，就是一个统一的王朝，14 世纪定国号为朝鲜。历史上朝鲜曾长期归为中原王朝的附属国，也曾多次遭受外来的入侵，1910 年日俄战争后沦为日本的殖民地。1945 年 7 月，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三巨头在波茨坦开会，会后发表了著名的“波茨坦公告”，要求日本投降。公告重申了两年前中、美、英三国首脑在“开罗宣言”中做出的关于“使朝鲜独立”的内容。

1896 年日俄密谋瓜分朝鲜，日本曾向沙俄秘密提出以三八线为分界线，得到沙俄默认。二战即将终止时，美国于 1945 年 8 月 16 日向苏联提出，以北纬 38 度线为受降的分界线。斯大林对此表示同意。从此，朝鲜南北双方以此为界，形成了分割的局面。

三八线是一条人为的朝鲜南北分界线，这条约 300 公里长的分界线斜穿朝鲜半岛，它截断了 75 条小溪和 12 条河流，以不同的角度越过崇山峻岭，穿过 181 条小路、104 条乡村土路、15 条道际公路和 8 条高级公路，以及 6

条南北铁路线。显然，无论从地理视角来看，还是从便于行政管理和利于经济发展来说，三八线都不是一条合理的国家分界线。

四十年代末期，朝鲜有人口三千万，其中三八线以北有 900 万人，面积占朝鲜半岛总面积的 57%。南方有人口 2100 万，面积仅占 43%[1]。

1945 年 8 月 6 日和 9 日，美国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了原子弹。苏联见到日本屈从于原子弹的威力即将投降，唯恐失掉远东利益，于是忙着在 8 月 8 日对日宣战，苏军分路进入中国东北后，随即攻入朝鲜北部，于 8 月 19 日收复了平壤，并迅速占领了朝鲜的整个北方。

1945 年 10 月 10 日，时任苏联远东方面军第 88 步兵教导旅（又称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第一营营长的金日成率 66 名在苏联哈巴罗夫斯克受训的朝鲜军官和部分士兵乘坐苏联“普加乔夫”号货轮在元山港上岸，不久后被苏联军政府选中，作为北朝鲜领导人[2]。苏军占领朝鲜北部后，美军与日本正式签订了投降书，并于 1945 年 9 月 8 日进驻朝鲜南部，形成了对峙局面。使得朝鲜半岛人民在摆脱了日本侵略者的奴役之后，又陷入了民族分裂的痛苦，并且埋下了战争的祸根。

1948 年 8 月 15 日，在朝鲜半岛南半部美军控制地区，70 多岁的李承晚在美国的扶持下成立了“大韩民国”。1948 年 9 月 9 日，在朝鲜半岛北半部苏军控制地区，成立了以 36 岁的金日成为首相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而后，根据雅尔塔协定，苏美双方分别于 1948 年底和 1949 年 6 月从朝鲜半岛撤军。人为制造的同一民族的两个国家在三八线两侧严峻地对峙着。

当然，从逻辑上讲，三八线的出现只是为未来南北朝鲜冲突以至爆发战争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如果没有美苏在远东的对抗，如果朝鲜民族的内部冲突没有激化，如果世界没有出现冷战局面，那么这种可能性就难以转化为现实性。可惜，历史是朝着与这些假设相反的方向发展的。

朝鲜战争爆发的最深刻的根源是美苏势力在远东的对抗。具体表现就是三八线的划定。历史证明，后来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以及朝鲜民族的分裂是围绕这条北纬 38 度线发展起来的。而涉及三八线的军事行动做为一条主线，也贯穿了朝鲜冲突和朝鲜战争的全过程：南北朝鲜的军事冲突是沿着三八线开始的；北朝鲜军队越过三八线的进攻招致了美国全面卷入战争；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向北进击又促使中国出兵朝鲜；中国军队因未接受停火协议而打过三八线，被联合国扣上了“侵略者”的罪名；美国将军麦克阿瑟也因再次主张越过三八线，被杜鲁门总统罢免；停战谈判是沿三八线的停火而开始的；在三年残酷的战争中双方为争夺三八线造成数百万生灵涂炭。最后，战争的结局仍然是大体以三八线做为南北朝鲜的分界线。周而复始，终点即是起点。朝鲜战争的始末造就了北纬三八线的知名度。

(2) 金日成穷兵黩武狂妄发动南进战争

1912 年 4 月 15 日，金日成出生于朝鲜平安南道大同郡古平面南里，初名金成柱，参加抗日联军后更名金日成。其父金亨稷曾在朝鲜明新学校教书，1917 年秋，金亨稷因参加反日团体被判刑一年，囚禁在平壤监狱。出狱后他带领全家迁往中国吉林省临江县避祸，后又迁往抚松县。1927 年初，金成柱赴吉林毓文中学学习。毓文中学是私立学校，教授国文的是中共党员尚钺[3]。尚钺对金成柱的成长有深远影响。六十年代，金日成来中国访问时，曾向周恩来打听尚钺的下落。因尚钺正处在因思想右倾被“批判、改造”阶段，师生未能相见。

金日成野心勃勃，妄图独霸朝鲜。但他深知自己是苏联扶持起来的，对于朝鲜南北统一这样的大事，没有斯大林允许是万万不能的。金日成在 1949 年就提出通过军事手段推进“革命”，“完成统一大业”。然而，此时斯大林认为在朝鲜发动战争的条件尚未成熟，苏联当时在朝鲜半岛的目标是维持三八线现状，避免与美国发生直接的冲突，因此莫斯科严厉禁止金日成发动战争。

斯大林的决定令金日成感到沮丧，金日成想要采取军事行动，必须等待莫斯科开放绿灯。

金日成虽然勉强接受了莫斯科的意见，却仍在继续积极备战。他想探探毛泽东态度。

毛泽东一向主张“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自然会支持金日成的想法。不过，在中国革命战争尚未结束、攻占台湾的战役尚未实施、国家尚未统一的情况下，中共很难赞成北朝鲜的计划。毛泽东答应在需要的时候，**可以把中共军队中的三个朝鲜师转给北朝鲜，如果朝鲜半岛发生战争，中共“将提供力所能及的一切援助，特别是上述师的给养和武器”**。但是，毛泽东劝告金日成，即使在美国撤军而日本人也没有回来的情况下，也“不要急于向南朝鲜发动进攻，而是等待更有利的形势”。

日本占领朝鲜期间，有很多朝鲜人进入中国东北境内（据 2000 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居住在中国的朝鲜族人口数为 1923842。），其中有一部分人参加了中共的军队。国共内战时期，中共东北部队中又增加了许多朝鲜族战士。抗日战争结束后，便陆续有朝鲜战士回国，较为集中的是由武亭[4]率领的包括一千名朝鲜籍士兵的一个团。1949 年 5 月，朝鲜人民军政治部主任金一到北平时，向毛泽东转交了一封朝鲜劳动党中央的信，旧话重提，请求必要时把中国人民解放军编制中的朝鲜师转属朝鲜政府。金一走后，毛泽东便指示在东北的高岗，准备安排驻扎在沈阳和长春的两个朝鲜师于 1949 年 7、8 月回国。这两个师，即李德山任师长的 164 师（实员 10821 人）和方虎山任师长的 166 师（实员 10320 人），当时均属东北军区建制，于 1949 年 7 月先期回国进入朝鲜。最后一支朝鲜师（邓克明任师长的 156 师，实员 14000 人）于 1950 年 4 月 18 日到达元山时，金日成和斯大林在莫斯科已经下决心要进行一场战争了。从客观上讲，三个经过战争锻炼的朝鲜师回国，对于金日成发动突袭，的确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中共当年先后为北朝鲜提供兵力约 6.9 万人，成为人民军的主力。战前北朝鲜已经拥有十个步兵师，一个坦克师，一个空军师，总兵力 13.5 万人，加上从中国回来的和由苏联武装起来的新兵，朝鲜现役军人已达 30 万。有 150 辆 T-34 坦克；大量重型火炮；180 架作战飞机。苏联援助的其它军事装备和武器弹药也于 1950 年初运到，使部队齐装满员；当时南韩军总兵力约 9.5 万人，八个师只有四个接近满员，24 架教练机，没有坦克和重武器，甚至连反坦克地雷都没有。军力对比北朝鲜明显占有优势。金日成自以为重兵在手，稳操胜券，狂妄不可一世，不久便悍然发动了朝鲜战争，打响了侵入韩国的第一枪。

(3) 斯大林野心勃勃积极策划朝鲜战争

1949 年 12 月 6 日晚 9 时，毛泽东乘坐美国送给蒋介石、蒋尚未坐过的、代号为 9002 的专列驶出北京前门火车站启程访苏。通过艰难的谈判，双方签订了新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苏联长期控制中国长春铁路和旅顺、大连港的特权即将丧失。保证苏联拥有通向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正是苏联实现其远东战略的基本要求。斯大林必须采取补救措施。而处于朝鲜半岛

中部和南部的元山、仁川、釜山和济州岛的几个港口，早在 1945 年就是苏联觊觎已久的目标。为了保持苏联在远东的战略优势，斯大林图谋实现对整个朝鲜半岛的控制，以替代在中国东北丧失的战略地位。于是，莫斯科一改两个月前阻止金日成动武的表态，决定积极支持北朝鲜发动突击战，迅速统一朝鲜半岛。

斯大林野心勃勃、金日成跃跃欲试、二者一拍即合。于是，1950 年初金日成应邀访苏。

此时毛泽东还没有离开莫斯科（毛泽东首次访苏在苏联停留了两个多月，1949 年 12 月 6 日从北京出发，1950 年 2 月 17 日才从莫斯科启程回国），斯大林把毛泽东晾在一边，处心积虑地解决朝鲜问题了。为了加强北朝鲜的军事力量以及人民军的组织和指挥能力，莫斯科同意金日成再组建三个步兵师，此后，苏联便开始大规模向朝鲜提供武器装备。苏联于 1950 年按照朝鲜提交的物资申请单向朝鲜提供 1.2-1.3 亿卢布的军事技术装备，朝鲜则相应地保证向苏联提供价值 1.33 亿卢布的黄金、白银和钼精矿。

莫斯科担心的问题是一旦爆发战争，美国是否出兵干涉。据金日成的译员文日回忆，金日成立即向斯大林保证，美国不会参与这场战争，理由是，这是一次果断的突袭，因为将会有 20 万南朝鲜共产党员发动起义，加上南方游击队对朝鲜人民军的支持，进攻将在三天之内取得胜利。即使美国有心干预，也没有时间进行军事准备和部署。斯大林强调，对南方采取军事行动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美国不进行干预，二是一定要获得中国领导人的支持。

金日成极为自信，扬言完全能够依靠自己的军队统一朝鲜。美国不会冒险发动一场大的战争，中国无力干预朝鲜的内部事务。于是斯大林在 1950 年 1 月至 4 月间决定支持金日成发动统一朝鲜半岛的战争。

5 月 13 日，金日成秘访北京，通报了准备进攻南方的计划。毛泽东说：他曾设想等中国攻占了台湾后，朝鲜再进攻南方，那时中国就可以给予朝鲜充分的支援。金日成对此颇为反感，在他看来，既然莫斯科已经首肯给予援助，他此番到中国，只是奉斯大林之命而行。因此会谈刚一结束，金日成即当着毛泽东的面向苏联大使罗申宣称，所有问题都达成了一致意见。在踌躇满志的金日成面前，毛泽东的尴尬是可以想象的。

嗣后，朝鲜对中国封锁军事情报，战争在没有事先通知中国的情况下爆发了。

1950 年 5 月上旬苏联即大量调换在朝鲜人民军中的苏联军事顾问，用作战参谋替换了那些以个人名义在朝鲜负责军事训练的军人，并为朝鲜军队制订了“先发制人的进攻作战计划”。到 5 月底，朝鲜人民军向三八线集结的行动已经准备就绪。在金日成的坚持下，军事行动开始的时间确定在 1950 年 6 月 25 日。按照进攻计划，朝鲜人民军每天可推进 15-20 公里，预计主要的军事行动在 22-27 天之内完成。届时金日成就可以一统天下，在南北朝鲜为所欲为了。

金日成从北京返回后，立即命令朝鲜各部队于 6 月 24 日 24 时进入出发位置。军事行动于当地时间（25 日）4 时 40 分开始。

1950 年 6 月 25 日凌晨，朝鲜半岛下着大雨，突然！在三八线北侧，一颗接着一颗的信号弹腾空而起，信号弹沿着三八线绵延了几百公里，几百门火炮同时向南方军队开火，短短几个小时朝鲜军队就突破韩军防线。朝鲜战争就这样爆发了！进攻前的炮火准备进行了 20-40 分

钟，摧毁了南韩军大部工事和设施。随后，步兵开始行动，迅速展开进攻。在开始的3小时后，个别部队与军团已向前推进了3-5公里。人民军部队的攻击完全出乎敌军的意料。敌军仅在瓮津、开城与汉城诸方向进行了有限抵抗。而较有组织的抵抗则是12个小时以后才开始的。

战斗第一天攻克的城市有：瓮津、开城、松隅里等。

6月26日，人民军部队继续进攻，不断向南朝鲜领土纵深推进。仅仅用了一天的时间，即彻底扫荡了瓮津半岛、开城地区；第6师的部队强渡海湾并攻占了金浦机场方向的居民点。在汉城方向，第1、4师攻占了汶山、东豆川等城市，第2师攻占了道府春川市。在日本海沿岸一带，朝鲜部队也在继续推进。苏联参与了进攻南朝鲜军事行动的所有策划、准备和实施过程，只是为了避免引起美国的干预和遭到世界舆论的指责，斯大林采取了较为隐蔽的措施。在进攻开始时，斯大林下令召回在朝鲜人民军前线部队中的所有苏联顾问。当时赫鲁晓夫询问其中的原委，斯大林回答说：“我们不想留下证据被人家指控我们参与了这件事。”

6月26日，韩国遭受入侵的第2天，自由世界同仇敌忾，联合国安理会以13比1（苏联缺席，南斯拉夫投反对票）的票数通过议案，美、韩、英、法等17个国家组成联合国军，解救南韩之危机。其中，人口仅数十万、全国兵力只有1个营的卢森堡也派出1个排44人参战。7月1日，由约500名美军官兵组成的史密斯特遣队被空运到釜山附近，成为美军赴朝的第一支地面部队。应美军所请，日本秘密出动46艘扫雷艇、1200名军人负担扫雷任务。此外，数十个国家向韩国提供了各种形式的援助，连号称“世界上最穷的国家”海地政府都捐赠了2千美元，让韩国人感念至今。

当美国纠集联合国军准备军事干预时，苏联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完全可以一票否决，可是偏偏到了投票的关键时刻，苏联代表却“因故”缺席！故意把联合国军放进朝鲜。后来得知，这是斯大林的阴谋，他就是通过联合国出兵逼迫毛泽东出兵，把驻欧洲的美军吸引到东亚，减轻苏联在欧洲的压力。毛泽东自称英明一世，结果被斯大林耍了，把本来要和中国建交的世界强国树为敌人，延误了发展的大好时机。据说毛泽东对此非常后悔。斯大林死后，毛泽东不止一次埋怨斯大林关于侵韩的决定是个“极大的错误”，说上了斯大林的当。

斯大林和金日成对中国封锁了消息和情报。在战争爆发前，所有苏联卖给朝鲜的武器都是从海路，而不是通过中国铁路运抵朝鲜的，这样做的目的是不让中国获知朝鲜的准备工作。以至朝鲜战争爆发的最初消息，毛泽东竟是从外国报纸上得知的。战争爆发后第三天，金日成才派一名校级军官到北京通报情况。毛泽东对此十分不满，事后对秘书师哲说：“他们是我们的近邻，战争爆发也不和我们商量，现在才来打招呼”。金日成在踌躇满志、信心十足的时候，显然不希望中国插手朝鲜事务，而斯大林在考虑对朝鲜半岛的政策时，对于中国有两点顾忌：既担心毛泽东在事前反对莫斯科的决定，又担心局势发生困难时毛泽东置身事外，不听从莫斯科的指挥。所以，斯大林一方面要金日成征询毛泽东的意见、要中国同意发动战争，一方面又对中国封锁消息。这样既可以保证苏联的战略决策被顺利接受，又可以保证苏联的战略目标得以实现。斯大林的如意算盘是：如果战争进展顺利，苏联得以控制全朝鲜，即使失去东北，仍可以保证苏联在远东的战略利益；如果出现危机和困难，则由中国承担责任，其结果同样可以实现苏联的既定目标。

当时，中共在东南沿海集中了 16 个军的兵力，准备渡海攻占台湾。在东北地区，只有几个担任地方警备任务的公安师和一个集体转业、开荒种地的 42 军。因此，毛泽东此时不愿意看到在中国北方邻国发生一场可能导致美国干涉亚洲事务给中国安全造成威胁的战争。但是，自认为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当然领袖、一心想扩展统治范围成为亚洲霸主的毛泽东，既要屈从斯大林，又不能拒绝金日成，于是中国只能接受既成事实。为朝鲜战争唱赞歌。那时报纸上刊登的是朝鲜战争捷报，广播里放送的是朝鲜歌曲。至今我还记得好几首：例如“汹涌的临津江，滚滚流向前。雄伟的马良山，屹立在江边。苍松翠柏常年绿，悬崖陡壁高齐天。像一个英雄的朝鲜人，日夜守卫在…………”

朝鲜初战告捷，举国兴奋。金日成部队之所以能势如破竹般越过三八线、拿下汉城，打垮南韩防御体系，除了武器装备方面有苏联的大力支持外，主要是从中国齐装满员回国参战的三个朝鲜师。这三个师原是中国第四野战军林彪的部队，战斗力极强。尤其擅长突然袭击。仅用两个月，即席卷南韩大部分领土。李承晚政权面临覆灭的危险。

6 月 30 日，美国总统杜鲁门下令美国陆军介入朝鲜战争。7 月 1 日，美军第 24 步兵师从日本空运到韩国南端的釜山。7 月 7 日，联合国通过决议，组织联合国军支持韩国作战，除美军外，澳大利亚等 15 个国家也都象征性地派出了部队，总计 3.9 万人，于 7 月上旬陆续到达朝鲜。任命麦克阿瑟为联合国军总司令。沃克中将为联合国军在朝鲜的战地指挥官。7 月 14 日，韩国总统李承晚也把军队指挥权交给了沃克中将。战争实质上变成了北朝鲜军队与联合国军作战。

7 月 5 日，朝鲜人民军与联合国军所属美军第 24 师在汉城以南 48 公里处接战，继续以破竹之势向南韩腹地推进，两个月，席卷南韩大部分领土，把联合国军赶到了北纬 35 度线上长 140 公里、宽 90 公里的釜山半岛，背后就是大海。沃克中将在釜山半岛组织了顽强的防御，美军第 1 海军陆战队混编旅和第 2 步兵师也于 7 月底适时赶到投入作战。8 月 15 日，金日成发布命令，要求在 8 月份完全解放南朝鲜国土。但朝鲜人民军已成强弩之末，面对联合国军参战，付出重大伤亡的代价也未能突破釜山防线。战争日趋紧张、激烈。

9 月 15 日，麦克阿瑟率领第 10 军（由美军陆战队第 1 师和第 7 师编成）7 万余人和韩国陆战队 5000 人，在 260 余艘舰艇和 500 架飞机的配合下，于朝鲜半岛西海岸的蜂腰部月尾岛登陆，第二天占领仁川。美步兵第 7 师往南挺进，在乌山与北进的联军会合，斩断了朝鲜人民军的后方补给线。9 月 26 日美军夺回汉城，而后兵分两路，沿着东海岸和西海岸向三八线推进。朝鲜人民军主力八个师被隔断在南方釜山战线，在后撤突围中伤亡 5.8 万人，后方空虚，节节败退。金日成所部溃不成军，连滚带爬地逃窜。幸好崔庸健率残部左冲右突，于 10 月 1 日退回三八线以北，10 月 19 日撤出首都平壤。金日成率北朝鲜首脑机关退到距鸭绿江 50 公里的江界。当时作为共产主义阵营老大哥的斯大林提议放弃朝鲜半岛，让金日成撤往吉林通化组织流亡政府。

(4) 毛泽东欲称霸亚洲仓促出兵朝鲜

朝鲜战争爆发以后，中国立即加强了东北地区的战争戒备。在鸭绿江我方一侧部署三个军的兵力，并通知朝鲜方面：如果美国出兵，只要他们不越过“三八线”，我们也不过鸭绿江；如果美国越过“三八线”，中国即以志愿军的名义出兵参战。金日成对此婉言谢绝，信心十足地说：“中国没有出兵

的必要”。然而事与愿违，金日成发动战争后，仅仅得意了两个月，就被联合国军打得惶惶如丧家之犬了。

联合国军大举登陆朝鲜，金日成节节败退之际，10月1日，麦克阿瑟下令“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向北推进。同日，斯大林急电毛泽东，建议中国至少派五六个师，迅速进至“三八线”附近，以掩护朝鲜人民军在后方组织后备力量。与此同时，金日成也派特使朴宪永到北京紧急请求中国给予军事支援。

10月2日凌晨，毛泽东急电高岗立即来京开会，商讨朝鲜局势。当日下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他认为这件事一定要管，否则美国人将得意忘形，更加猖獗。中共几个高层人士众口一词：**出兵朝鲜，意味着中美交火，可能导致美国正式向我宣战，把战火直接引向我国。这样，不仅会打乱国家的经济恢复和建设计划，而且美国是西方世界霸主、头号军事强国，军队装备精良，还拥有核武器，中美一旦直接交火，能否打得赢，没有绝对把握。宜慎重考虑。**

尽管中国多数领导人如林彪等对出兵朝鲜颇有异议，但在斯大林的怂恿下，毛泽东和刘少奇等还是表示要出兵朝鲜。周恩来模棱两可，不明确表态。毛泽东问林彪：“美国会不会过鸭绿江？这场战争是在中国打还是在朝鲜打？”毛泽东主张与其在中国打不如在朝鲜打。林彪认为“美国不会过鸭绿江。”“美国无意侵略中国，否则国共三年内战时早已介入。”林向毛拍胸脯保证：“如果美国侵犯中国，我带兵抗美！”林彪的意见是：“当务之急应养息兵力恢复国力，入朝不是上策。”但林彪的意见却被毛否定了。中共元老聂荣臻日后回忆，他当时曾向毛泽东建议：

“不到万不得已，最好不要打这一仗。”远在莫斯科的周恩来发来坏消息，斯大林避免苏美直接冲突，不愿派苏联空军入朝配合作战。当时朱德已年逾花甲，林彪、粟裕、徐向前等人疾病缠身不宜远征，纵有雄兵百万，无奈一将难求。毛泽东犹豫不决之际，紧急电召远在西北的彭德怀进京议事。彭德怀带着一大包有关西北经济建设的文件下了飞机直奔中南海，才知道是讨论入朝参战问题，因无思想准备，没有发言。当晚，毛泽东约彭德怀私下密谈。毛泽东说服了彭德怀，让其指挥主要由原四野官兵组成的志愿军入朝作战。彭德怀慨然应允。1950年10月8日毛泽东签发了《关于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同日，通过驻朝使馆将命令抄送金日成。中共决定出兵了。

1950年10月，麦克阿瑟正在挥兵北进，扬言要在感恩节（11月23日）前结束战争。“联合国军”集中四个军十个师另一个旅、一个空降团，总共13万人的兵力，采取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于东西两线（主力置于西线）分兵多路，向鸭绿江边疾进。金日成面临组织流亡政府退往中国东北的命运。

毛泽东支持金日成挑起战争的目的

毛泽东支持金日成挑起韩战有他自己的目的：**以抵制美国侵入远东为借口，要求斯大林帮助中共快速建成军事工业，取得原子弹技术，迅速成为军事强国，以便挑战斯大林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地位。**毛为了实现个人的政治野心，完全不考人命牺牲，也不考虑朝鲜人民的切身利益。可谓狂妄至极。

1950年7月1日，毛派周恩来告诉苏联驻华大使“现在我们必须建立我们的空军和海军，以便对付美国的武装力量。”8月19日毛对苏联使节Yudin说，“美国可以派30或40个师，中国可以将他们碾得粉碎”。8月初，北朝鲜军队已占领90%南韩领土，但9月15日，美军在38度线附近的仁川登陆，切断了大量北朝鲜军队；9月29日，金日成向斯大林求救，

要求中国派志愿军。10月1日，斯电毛称“到了中国人行动的时刻。若你认为可能派军队支持朝鲜，那么你应至少派5至6个师越过38线，可称做志愿军。”[5]毛立即行动，于10月2日凌晨两点下令早已居中朝边境集结待命的军队随时准备出发。直到此时，毛才将此重大问题提交政治局讨论，几乎所有的政治局成员皆强烈反对出兵朝鲜，包括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则小心翼翼左顾右盼。后来毛说援朝决定是一个半人作出决定的，这半个人即是周恩来。林彪反对最强烈，指出与美对抗将引发巨大问题，美国有绝对控空权，大炮的优势达四十比一，若中国介入，美国可能轰炸中国大城市，摧毁中国的工业基地，还可能向中国投掷原子弹。

毛的野心与赌徒心使他认为美国不敢向中国投原子弹，且毛有最基本的资源：取之不尽的中国人命，尤其是毛想趁机处置大量原国军投降部队，刻意将这些部队送至朝鲜当炮灰，以除后患。10月2日毛电斯，强调出兵面临的难题，许多人反对，故还需讨论，旨在讨价还价。次日周恩来召见印度驻华大使：如果美军越过38线，中国将干涉。10月5日，联合国军已打过38线，斯电毛提醒中国人多次承诺愿意出兵援朝。若不出兵，将不会帮助中国建空军和海军。

毛泽东抗美援朝的真实动机

分析家们认为，这场战争是在斯大林逼迫下发动的，这只是一方面，因为有史料证明，当时中共高层的头子们除毛泽东外，一开始都不赞成打这场外战，主张恢复内战后的和平建设，如果毛泽东采纳集体意见，斯大林也无可奈何。所以我们要排除那些虚伪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空洞口号，应该从毛泽东的封建帝王本性和中共的集团利益来分析抗美援朝战争。

应该说，抗美援朝是中共取得政权后发动的第一次对外侵略战争，为什么说是侵略战争，而不是什么保家卫国呢？因为这仗打的是攻不是守，是把军队开到朝鲜国土的纵深，打的主要也是朝鲜人。不要说什么唇亡齿寒，金家父子至今也不承认是中国人帮它打了这场战争，因为打响第一枪的是北朝鲜，南朝鲜是反侵略，所以中国出师无名，只好将正规军以志愿军的名义参战。另外，志愿军入朝时间也不是中共教科书中宣传的那样：“战火已经烧到鸭绿江边”。而是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攻占平壤时，三八线距中朝边境还远着呢，所谓烧到鸭绿江边，是说美国飞机轰炸朝鲜新义州，中共对美国人的警告是以三八线为界的，不是鸭绿江，以三八线为界，显然是替北朝鲜保家卫国。据史料记载，联合国部队是1950年10月7日越过三八线的，毛泽东于次日就决定了出兵。16日志愿军的先头部队第42军就开始从辑安渡过鸭绿江。18日毛泽东再次召开中共中央会议研究出兵朝鲜问题。19日联合国军攻占平壤，当晚，志愿军开始大举过江。

10月19日，正当敌人越过平壤、元山一线时，彭德怀将军率领中国人民志愿军四个军（第38、第39、第40、第42军）、三个炮兵师和一个高炮团共26万人秘密渡过鸭绿江。为了隐蔽，部队黄昏行动，拂晓停止。21日，“联合国军”攻占平壤，麦克阿瑟认为中国出兵的可能性极小，声称要在11月23日感恩节前占领全朝鲜。他当时还不知道中国人民志愿军已经渡过鸭绿江正在预定地区布下口袋等着他呢。

志愿军渡江后，按照彭德怀的布署，立即择地埋伏准备阻击，联合国军仍处在对金日成北窜逃军连续追击的态势，还在分兵冒进。10月20日，西线韩军第6、第7、第8师已进至顺川、新仓里、成川一线，距离德川、宁远我预定防御地区仅90至130公里；东线韩军首都师已进至五老里、洪原等地，

到达了我预定防御地区。东西线之间相距 80 公里。彭德怀决定集中三个军于西线，采取分割包围战术，各个歼灭韩军的三个师，争取首战的胜利。

10 月 25 日，西线敌军以师或团为单位，继续冒进。其先头团韩第 6 师第 7 团前出至鸭绿江畔楚山以南的古场洞地区。我进至北镇以东地区的第 40 军第 118 师，奉命采取同敌预期遭遇的姿态进占北镇至温井间公路以北高地，准备伏击由北镇前进的韩第 6 师后续部队。10 时许，敌第 6 师第 2 团之先头第 3 营及一个炮兵中队，乘车由温井向北镇进犯，当其进至丰下洞至两水洞之间地区时，我第 118 师第 354 团在第 353 团配合下先敌开火，采取拦头、截尾、斩腰的战法，向敌发起突然而猛烈的攻击，将其全部歼灭。当夜，第 118 师、第 120 师又乘胜进攻温井之敌，26 日凌晨占领温井。北进的李承晚军 1 师、6 师先头部队遭志愿军伏击，被歼千余人，揭开了“抗美援朝”的帷幕。

从 10 月 25 日到 11 月 5 日，历时 10 天的抗美援朝战争第一次战役共歼灭“联合国军”15000 余人，打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自古兵家甚为重视的初战，志愿军旗开得胜，稳定了朝鲜半岛的战局，鼓舞了士气。1950 年 10 月 25 日，被中共定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纪念日。彭德怀设想，如能歼灭南朝鲜 1、6 两师，美 24 师，骑 1 师或给予歼灭性打击时，我即可越过三八线相机取汉城。如对上述敌人不能给予歼灭性打击时，即使能越过三八线也不宜攻取汉城。因过远南进，将敌驱至大邱、大田一带，会增加以后作战困难，故拟在三八线以北数十里停止，让敌军占据三八线，等待明年再战时歼灭敌主力”。志愿军入朝参战并取得第一次战役的胜利，使“联合国军”在感恩节前占领全朝鲜的计划未能实现。麦克阿瑟此时已经知道中国派兵参战了。1950 年 11 月 9 日，联合国军确定：在未完全判明中国军队参战意图前，继续坚持以军事进攻迅速占领全朝鲜的原定计划。在朝鲜战场，麦克阿瑟准备发动“最后的攻势”，计划先以地面部队进行试探性进攻，查明志愿军实力和行动企图，以航空兵摧毁与封锁鸭绿江上所有桥梁和渡口，阻止中国继续向朝鲜战场增兵；赶在鸭绿江冰封前抢占全朝鲜。

此时“联合国军”在前线的地面部队增至 5 个军共 13 个师 3 个旅另 1 个空降团，计 22 万余人，比第一次战役增加了 8 万多人；拥有充足的弹药和飞机 1200 余架，各类战车数千辆。志愿军采取内线作战、诱敌深入、各个击破的方针，计划在西线将“联合国军”诱至大馆洞、温井、妙香山、平南镇一线，集中 6 个军的兵力歼灭之；在东线将其诱至旧津里、长津湖一线，由第 9 兵团歼灭之。此时，在朝鲜的志愿军已达 9 个军 30 个师 38 万余人，在东西两线均形成优势兵力。

1950 年 11 月 6 日，“联合国军”以一部兵力开始实施试探性进攻。志愿军按预定计划以部分兵力节节抗击，主力向后转移，7 日开始先后放弃黄草岭、飞虎山、博川和德川等地阵地。10 日，“联合国军”全线向北推进，但行动比较谨慎，前进速度缓慢。志愿军为诱其尽快进入预定战场，分散其兵力，遂于 16 日停止阻击中的反击行动，加速北撤。“联合国军”被志愿军继续后退所迷惑，错误判断是“怯战退走”，兵力“最多不过六七万人”，便加快进攻速度。至 21 日，其西线部队进至嘉山、龙山洞至德川、宁远一线，东线部队进至长津湖地区，完成了战役展开。此时，志愿军主力已全部转移至预定集结地域，西线第 50、第 66、第 39、第 40、第 38 军和第 42 军主力已分别到达定州西北、龟城、泰川、云山、德川以北及宁远东北地区，东线

第9兵团已全部到达长津湖地区。11月24日，“联合国军”在全线发起“圣诞节结束朝鲜战争”的总攻势。志愿军为进一步使敌人产生错觉，继续以部分兵力实施运动防御，至11月25日将“联合国军”诱至预定战场。当日黄昏，志愿军在西线发起战役反击。当时气温降至-30℃以下，志愿军指战员在高山雪地顽强作战，至28日晨，将陆战第1师主力及第7师1个加强团分别包围于下碣隅里、柳潭里和新兴里地区，并攻占富盛里、死鹰岭、新岱里阵地，切断了美军各被围部队之间及其与后续部队的联系。美军被围部队为打开通路，连续不断地猛攻志愿军阵地。第9兵团一面组织抗击，一面调整部署，准备反击。“联合国军”在东西两线遭到沉重打击后，为保存实力、减少无谓牺牲，麦克阿瑟于12月3日命令部队向“三八线”实施总退却。志愿军乘胜追击，历时近一个月的激烈战斗，“联合国军”实力虽未被全歼，但辎重损失颇多，弹药消耗巨大，且全部被打退到“三八线”以南，第二次战役遂告结束。此役，志愿军歼灭南朝鲜军第7、第8师大部及土耳其旅一部，缴获大量武器，给美军第2、第7师和陆战第1师严重打击，重创美军第25师、骑兵第1师，共毙伤俘敌3.6万余人，将战线推至“三八线”南北地区，粉碎了“联合国军”迅速占领朝鲜北半部的企图，迫使其由进攻转入防御。作战中，志愿军共伤亡4万余人，其中因严冬奇寒伤亡者高达4000余人。

两次战役后，志愿军伤亡惨重。同时，当地已入冬，战士们没有冬装，出现严重冻伤[5]，这些都让彭德怀很焦虑。在给毛泽东的电报里，他没直说不好继续作战，但透露“此役结束后，需补新兵。……目前，粮、弹、鞋、油、盐均不能按时接济，主要原因是无飞机掩护，铁道运输全无保证，随修随炸”等。毛泽东仍坚持让彭德怀不怕困难继续南进。

1950年12月31日17时，志愿军经短促炮火准备，在约二百公里的正面上发起了全线进攻，是为志愿军入朝后的第三次战役。是突破三八线的一次进攻战役。经七昼夜的连续进攻，歼灭“联合国军”19800余人，挺进八十至一百一十公里，攻占了汉城，前出到三七线附近。但在作战过程中，中朝军队并未歼灭敌军的重兵集团，说明敌军是在有计划地南撤，志愿军司令部的高级将领敏锐地识破了敌军企图引诱志愿军深入，重演仁川登陆故伎的策略；同时志愿军连续作战，部队极度疲劳，减员也大，亟待休整补充；加之部队南进，使运输线延长，供应更加困难。这些情况表明，志愿军已不宜继续追击，第三次战役遂于一月八日结束。

彭德怀对战争之惨烈，众多年轻生命的牺牲，入朝两个月部队即减员十万余人，感到心情极端沉重，对金日成盲目狂妄发动战争十分不满。1951年1月11日下午5时，彭德怀与金日成和时任朝鲜外务相的朴宪永在君子里司令部会谈时，怒气冲冲地说：“你们过去说美国不会出兵，从不设想如果美国出兵怎么办？你们认为美国一定会退出朝鲜，但不考虑一下如果美军不退出朝鲜怎么办？你们希望速胜，而又不作具体准备，其结果只延长战争，你们把战争胜利寄托于侥幸，就可能把战争引向失败！志愿军休整补充需两个月，没有相当准备前，1个师也不能南进。如果认为我彭德怀的中朝联军总司令不称职，可以撤职，以至杀头！”金日成对此不以为然，但向斯大林打了报告。

我志愿军兵团是悄悄潜入朝鲜的，联合国军根本不知道。当时的情景是朝鲜军队失去战斗力，一路逃窜。联合国军队大摇大摆走在公路上，放着音

乐，完全没有戒备。志愿军 26 万精兵突然发动攻击，打得他们一时措手不及，兵败如山倒。此时联合国提出停战建议。

毛泽东被初战小胜冲昏了头脑，拒绝联合国停战建议，决定武力统一朝鲜，不顾彭德怀的反对，下令越过三八线并在 1951 年 1 月 31 日务必占领汉城。1951 年 1 月，中国又为金日成输送了 10 万名朝鲜族战士，重建溃败的朝鲜人民军。1951 年 1 月 13 日，即中国军队取得第三次战役的胜利以后，联合国大会政治委员会讨论并通过了“朝鲜问题三人委员会”在十三国提案基础上提出的关于解决朝鲜问题基本原则的“补充报告”。该报告建议，立即实现停火；举行一次政治会议以恢复和平；外国部队分阶段撤出，并安排朝鲜人民进行选举；为统一和管理朝鲜做出安排；停火之后召开一次由英、美、苏和共产党中国参加的会议，以解决远东的问题，其中包括台湾的地位和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对于中国来说，这的确是一次实现停战的绝好机会。如果中国军队屯兵三八线附近，接受联合国的条件，开始停战谈判，那么无论在政治、外交还是军事上，可以说是有理、有利、有节。然而，中国拒绝了联合国议案。这时的中国外交听命于斯大林。斯大林决心要在朝鲜继续打下去（1950 年 12 月 7 日葛罗米柯给苏联驻联合国大使维辛斯基的电报，转达政治局的指令：“我们认为，在这种形势下，您关于停止朝鲜军事行动的建议是不正确的。”）英国、瑞典、印度等十三国提案（特别是补充意见）本来是对中国持同情立场，联合国能够通过这个提案也表明了多数国家对中国的友好态度以及要求和平的愿望。1951 年 1 月 17 日，周恩来受毛泽东之命宣布中国拒绝停火议案，而且还指责其为美国的阴谋，结果伤害了许多国家的感情。

当中国表示拒绝联合国提案后，一切都变了。1 月 30 日联大政治委员会以 44 票对 7 票（7 票弃权）通过了美国提出的控诉中国为“侵略者”的提案。尽管其中不乏受美国操纵的因素，但也表明了联合国多数国家对中国的失望。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从此被长期搁置起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谴责中国“侵略”的提案（表决时，作为常任理事国的苏联代表仍然因故缺席，未能行使否决权），中国变成了“侵略国家”（由于当局极力封锁消息，中国多数民众至今仍不知此事）。同时美军开始反攻。从那以后，志愿军才真正感受到美军的战斗力。虽然毛泽东不顾彭德怀的一再反对和我军大量减员、后勤跟不上的实际情况，下令进行第四次和第五次战役，尽管苏联空军的掩护扩大到三八线以北，但结果却是只有招架之功，概无还手之力，两个军被包围，不但丢掉汉城，退到三八线以北，被俘的志愿军就达 1.7 万人。两场战役下来，志愿军元气大伤，毛泽东被迫放弃原来有利于我国的停战条件，6 月 23 日接受了美国提出的停战条件。

第三次战役胜利后，金日成和朝鲜方面速胜和盲目乐观的情绪又有滋长，不察“敌阴谋诱我深入到洛东江的早已设好的坚固阵地，并诱我攻坚”，力主追击。彭德怀于 1951 年 1 月 8 日命令部队停止进攻，全军休整。此举引起朝鲜方面的强烈不满和反对。苏驻朝大使也出来帮助朝鲜说话。斯大林得知中朝之间在军事指挥上的争论后，曾在一封电报中说，“中国志愿军的领导是正确的”，“毫无疑义，真理在彭德怀同志手里”，称赞彭以那样劣势的装备打败了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帝国主义，是当代天才的军事家。斯大林还批评苏联大使不懂军事，不准他再干扰彭德怀的指挥。经过一段休整后，遵照斯大林的授权，由彭德怀统一指挥的中朝联军又发起了第四和第五次战

役，双方不断增兵，战争规模越打越大。 敌方参战兵力：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共 16 个国家的军队。除了美国以外，还有 15 个参战国：英国、法国、加拿大、荷兰、菲律宾、泰国、土耳其、新西兰、澳大利亚、比利时、哥伦比亚、埃塞俄比亚、卢森堡、希腊、南非联邦，通称 16 国，如果再加上南韩，即为 17 国。另外，还有五个派有医疗队的国家，即丹麦、印度、意大利、挪威、瑞典。敌方在朝鲜战场上的最大兵力达 111 万余人。中国出兵朝鲜，等同于宣布自己完全投靠苏联、与世界为敌。我方参战兵力：中国、朝鲜和苏联(出动了一些空军)，在朝鲜战场上的最大兵力 180 余万人（另有资料说：中国入朝参战的各种部队共计 190 万，补充兵源近 50 万，共计 240 万。另外，还有东北军区 60 万支前民工入朝出战勤。究竟何者为准，待考证），其中中国志愿军 134 万余人，朝鲜人民军 45 万余人。志愿军先后入朝的部队共有：步兵 27 个军、空军 12 个师、炮兵 15 个师、铁道兵 10 个师、坦克 3 个师、公安军 2 个师、工兵 14 个团。先后入朝部队占全军陆军的百分之七十、空军的百分之四十一、炮兵的百分之七十三、防空军的百分之六十、坦克兵的百分之三十、工兵的百分之五十七、公安军的百分之十一、铁道兵的百分之百。在战争期间，敌我双方陆续投入到战场上的总兵力已近 300 万人。

第四、五次战役双方展开了长期的拉锯战。中国军队的重大牺牲多是跨过“三八线”以后付出的！本来是我军把美军打回“三八线”，结果成了美军把我军打回并打过了“三八线”，形成实际控制线。最终也只能在这条实际控制线签订停战协议。1951 年 6 月 30 日“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奉美政府命令提出停战谈判的要求，7 月 1 日金日成、彭德怀立即复电同意。1951 年 7 月 10 日开始谈判。由于斯大林有令：“实行强硬路线，不能有急于结束谈判的表现。”打打停停，停战谈判拖延下来。毛泽东是什么样的人？看得起谁？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在他眼里也不过是“只识弯弓射大雕”。现在却不得不低下头来，放弃原来提出的解决台湾以及我国在联合国席位的要求。可见他知道这仗是无法打下去了。对于毛泽东来讲，这只是痛苦的开头，后面的屈辱一个接一个。谈判开始，战争并没有停止，因为停战的条件谈不拢。先是因为停战线，因为美军又打过了三八线，因此中国坚持“停战线以三八线为准，美国退回到三八线”。美军难以接受。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则坚持以实际控制线为停战线。毛泽东非常恼火，统一不了朝鲜也就罢了，连三八线都拿不回来，北朝鲜的国土面积由此减少了两千余平方公里，这口气咽不下去！下令继续打，把美军赶回三八线。这时双方就是为了面子而打，对于军队来讲，荣誉胜于生命。打了两个月，不但没有把美军赶回三八线，美军实际控制线平均又向北推进了 2 公里（此时朝鲜国土面积已较战前缩减了 3870 平方公里）。毛泽东不得不再次屈从于美国的条件，同意在实际控制线停火。接着又因为战俘问题继续打。美方俘虏中国籍战俘 2.14 万人；而中朝方面俘虏的战俘，只有美英籍战俘 4417 人。美国打着人道主义的旗子，说尊重中国战俘的自由选择权（1949 年 10 月，金门战役失败后，跑回来的解放军团营干部被枪毙、被判刑，使许多战俘害怕因被俘而遭清算，因此拒绝回国），只同意遣返中国战俘 6400 人（实际回来 7110）。毛泽东认为这对中国来讲是奇耻大辱，不顾金日成反对（金日成认为打下去不值，新死的人会增加未被遣返人），再度开战，著名的上甘岭战斗就是这期间发生的[6]。如此打了将近两年，双方伤亡惨重，仍然难分胜负。1953 年斯大林死后，苏联决定停止对朝鲜战争的援助，毛泽东被迫接受美国的战俘条件，朝鲜战争

结束。中国战俘 1.47 万人去了台湾。金日成、毛泽东两次一统朝鲜的作战计划都失败了，而联合国决定出兵“击退武装进攻并恢复这一地区的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计划反而实现了。

目前除了中国、朝鲜外，全世界对这场战争的看法是，联合国军队制止了侵略者的进攻，确保了东亚的和平。毛泽东在战争中后期对美国要求一再退让，回过头来说“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别说世界其他国家不信，斯大林就不信，他千方百计避免和美军正面交锋。中国还有一个宣传调子是美军怕死，证据就是美军每个人身上都带着多国文字的投降布条[7]。这是两国理念的不同，中国对于投降的，处置极为严厉；而美国认为在取胜无望的情况下，保存生命更重要，即使当过俘虏，回来也是英雄。最典型的就是越战俘虏麦凯恩曾在上届美国总统大选中作为共和党候选人竞选。这在中国似乎是不可思议的。1953 年 7 月 27 日朝鲜停战协定签字，代表中国人民志愿军签字的是彭德怀将军，代表朝鲜人民军签字的是金日成元帅，代表联合国军签字的是第三任总司令克拉克上将。

毛泽东“抗美援朝”的第一个动机：“安内”必先“攘外”。

任何历史条件下的“攘外”，都是统治者“安内”的强硬理由，中共刚刚以武力取得政权，也要靠武力来巩固，使国家处于战争状态，实行极端手段镇压民间的反抗就是统治者最好的策略。所以伴随抗美援朝的，是国内一系列的镇压运动，肃反镇反，三反五反，以血腥屠杀清洗了一大批旧政权留下的对抗势力，也震慑了人民百姓的潜在反叛意识。这个动机符合中共集团的整体利益，只要毛泽东把这个动机提出来，就再不会有人反对出兵朝鲜，可以说它促使了中共高层内部对韩战的意见达成统一。

因为刚刚结束了内战的中国，“保家卫国”这一口号具有极大的欺骗性，加上阶级斗争的恐怖，所以抗美援朝战争是就有了历史动力，这个动力就是：“工人和农民努力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为战争提供了 560 万吨的物资。”（见《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在“备战、备荒为人民”这个杀气腾腾的口号下，中国人民被中共长期奴役，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中共也是一直以“帝修反亡我之心不死”为借口，将国家置于准战争状态，实行半军事管制维持它的专制政权。

第二个动机：借韩战之机剥夺彭、林的军权。

彭德怀和林彪是中共武力夺取政权的最大功臣。林彪坐镇中南，彭德怀坐镇西北，这二人对毛泽东最忠实，恰恰也令毛泽东最不放心。狡兔死走狗烹，中国历朝历代的皇帝大都是在取得“天下”后大杀功臣，毛泽东更不能例外，但他不是象宋太祖那样杯酒释兵权，也不是朱元璋那样火烧功臣楼，而是临阵易帅，巧妙地使了个换头术，将林与他的四野分离，将彭与他的一野分离。毛泽东在高层最后决策时突然宣布林的“病况”，说他见不得亮光听不得水声还天天拉稀，建议他去苏联疗养，林一听立刻就明白了，只好顺坡下驴的放弃了四野。被火急秘密从大西北催回来的彭还蒙在鼓里，以为是毛泽东格外看重他。临阵易帅本是兵家大忌，将领们只有指挥自己的军队才能得心应手，不然就会造成巨大的牺牲，事实也的确如此，这个兵家大忌从“万岁军”那里得到了验证。但毛泽东在意的是自己的权力，人民会付出多大生命代价，他是不在意的，而且志愿军死的人越多，才越符合他的本意，也就是他的第三个动机。

第三个动机，就是借韩战消耗原国军兵员。

在冷兵器时代，战争杀俘是个规则，这是因战俘能构成反叛因素，商王朝就是被驱赶到前线的奴隶（战俘）起义断送掉的，秦朝的白起坑杀四十万赵卒，也是因惧怕战俘造反。毛泽东当然明白这个道理，他肯定也想消灭战俘，但现代战争需要炮灰，毛打内战的高招是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即以几倍的兵力搞人海战术围歼打援，大量的兵员空白只能以战俘来填补，好在国民党军队的士兵都是农民，在整编过程中进行洗脑和奴化教育后就迅速投入前线，所以，中共军队在内战中迅速膨胀壮大，是大批国军投诚和收编俘虏的结果。

特别是四野，它的前身东北民主联军后称东北野战军，是1945年从山东军区和冀热辽部队调进的八路军6万，新四军3万，连同党政军干部总共才13万余人。到年底时，总兵力就发展到27万。1947年7月至1948年11月间，辽沈战役结束，歼国民党军47万，大批俘虏士兵补入部队，为主力部队输送兵员37万。至此，东北野战军总兵力已超过百万。其建制是：第38、39、40、41、42、43、44、45、46、47、48、49军，长春起义的国民党军第60军整编为第50军。平津战役后，改编国民党军52万余人。1949年3月，东北野战军改称第四野战军，南下参加渡江战役，6月，歼白崇禧部主力21万余人。在向中南进军过程中，又以80%的兵力清剿收编土匪。7月，以国民党军第19兵团起义的4个师改编为第51军。10月，长沙起义的国民党军第1兵团改编为第52、第53军。至1950年1月，成立中南军区时，四野兵力已达130万人。

在韩战中，志愿军主力是以四野为主的部队，先期入朝的是38军、39军、40军、42军以及66军，和东北边防军炮兵司令部所属地炮兵第1、2、8师。但实际上，早在金日成南犯时，一支中国军队就已经加入战争了，这支队伍是解放军中的朝鲜族士兵组成的三个师，是金日成组建人民军时向毛泽东讨要的，成为人民军的主力。那么解放军哪里来的这么多朝鲜士兵呢？原来，他们是四野收编的关东军余部。日本关东军在投降前尚有七十万人，但并非全部是日本军人，这是因为太平洋战场几度抽调其主力，不得不从朝鲜和台湾征集兵员，所以后期的关东军组成，有相当一部分士兵是“满洲国”伪军、朝鲜军和台湾军。老一辈人东北人都知道，甚至在伪满警察中，也有很多朝鲜人，被称谓二鬼子。苏军出兵东北后，关东军全面崩溃，其中八万多被击毙，六十万投降。投降的日军一部分被苏联人押解到苏联境内服苦役，其余被遣返日本，非日本籍的俘虏就被四野的前身——东北民主联军收编了。这些非日籍的原关东军士兵，受过严格的正规军训练，所以战斗力很强，和日本军人差不多，虽然打不过苏军机械化部队，但打国民党军队和南韩军队还是没问题的。

原国民党军队投诚起义，一小部分是因将领被中共策反统战，或者本身就是中共的人，而大部分都是在形势逼迫下不得已而为之，前者是可以继续带兵的，比如曾泽生，就要带着他的50军亲自上朝鲜战场。而后者是不能带兵的，比如陈明仁，只能给个高官厚禄养起来，他的52军，53军也全部开进朝鲜。中共为防止军队反叛，保持党指挥枪的高度原则，在原国民党投诚部队被整编后，加入了大量政治干部和党员骨干，所以在朝鲜战场就能有效地挟持士兵或战俘。

显然，比较有政治头脑的原国民党军士兵，特别是青年军这类知识化的国军士兵，四野中早期收编的国军兵员，大部来自国民党青年军，还有

原关东军的中国籍士兵，都具有高中以上的文化，他们对两种社会制度有明确的比较，即使是农民出身的士兵在朝鲜战场被俘后，也会很明显地认识到：吃炒面和吃罐头绝对是不同的生活，联合国部队的飞机大炮与步枪刺刀也是绝对的武器差别，两相对照的结果，自然要选择投奔自由这条路，甚至百分之八十的志愿军战俘都是这个选择，这可能是中共始料未及的。毛泽东不怕志愿军战士被炮火炸飞，怕的是他们被俘，更怕他们反叛，他的本意是将那些原国军战俘们从肉体上消灭在朝鲜战争中，和白起坑杀赵卒是一个用心，所以他要力争将战俘们弄回国内管教，不能让他们跑到台湾去替国民党反共。

尽管两万多战俘有近一万五千人投奔了自由，毛泽东发动抗美援朝战争的这三个险恶动机还是如愿以偿，特别是第三个动机，他免去了内战后裁军的风险，因为一部分军队改编为武警部队了，一是降低了常规武器的军备投入，二是没有影响军人的切身利益，这也等于是裁军。

最后，第四个动机，就是毛泽东想搞家天下，为太子立本。

毛太子岸英的阅历太浅，除了当翻译和搞了几天土改，没有一丝战功和太多政治资历，太子亲征应该是毛搞世袭的如意算盘，韩战打下来，太子就有了战功，就能掌握军队，使解放军成为毛家军。如果真正的想保家卫国，他应该命太子下连队去当普通士兵，一级一级的靠战功提升，但毛岸英刚过鸭绿江即被安插在司令部里，显然一方面是为了监督彭大将军，另一方面是提高战功的起点，这个资历就不是从士兵开始的，而是从指挥官开始的，那么彭的所有英明指挥，都应该有太子亲征的一半，料他彭德怀到那时候也不敢不承认。无奈人算不如天算，太子违反了战斗纪律暴露了目标，葬身于汽油弹的火海中，毛泽东这个最自私的动机失败了，从此彭大将军也成了他的夺子仇敌，不除不快。

从毛泽东发动抗美援朝战争为始，到邓时代的中越边境冲突为终结，中共的对外局部战争都不是以真正的民族利益为出发点，而是借对外战争来平息内患巩固政权，出于这样的动机，所以每次战争都没有值得夸耀的胜利。

军拖入北韩越北越好”，毛绑架了韩战，以达他自己扩充军力的目的而根本不顾金日成的利益。7月10日，联合国军与中朝联军开始停战谈判，所有事项均顺利，唯遣返战俘问题上，美国坚持自愿非强制原则，毛坚持一揽子全部返中国。两万中国战俘大多是原国军，绝大多数不愿意回中国大陆。美军主要出于人道和政治因素坚持非强制遣返，而毛却指示谈判者“不许放走一个人”。金正日巴不得结束这场偷鸡不成失把米输定了的战争，“没有理由为这些政治上不可靠的战俘遣返而继续战争”。但毛根本不在乎战俘，他的目的是借战争，快速建成军事工业。于是战争继续没完没了的打。

1952年7月14日金日成致电毛泽东请求毛接受妥协，朝鲜已被炸得面目全非，1/3成人死亡；毛电复否决金的请求。金由于更害怕毛将他废黜，故只好忍气吞声（后来事实证明，毛曾阴谋废黜金正日）。

韩战中美军损失了3000架飞机，死亡37000人。美国公众不愿意接受高死亡，故反战情绪高涨，支持韩战者仅33%。1953年2月2日，新当选总统爱森豪威尔在国会演讲中言及他可能动用原子弹对付中共。这对毛简直是音乐，毛趁机要斯大林帮助实现毛野心勃勃的核工业，毛梦寐以求的原子弹。斯大林不想给毛原子弹，故于2月28日决定结束韩战，当晚斯中风，

3月5日去世。斯死后，马林科夫告诉周恩来苏拟结束韩战，但毛坚持继续打下去。因毛想要苏联的原子弹技术，但苏坚拒之，毛才指示接受自愿遣返原则结束韩战。1953年7月27日达成最后停战协议。代表中国人民志愿军签字的是彭德怀将军，代表朝鲜人民军签字的是金日成元帅，代表联合国军签字的是第三任总司令克拉克上将。

(5)应该从朝鲜战争汲取的教训

1953年7月27日晚9点，撼天动地的朝鲜战争终于画上句号。这场战争，曾经给无数人留下难以磨灭的伤痛。60年后的今天，美、韩、朝都以史上最高规格来纪念韩战停战60周年，1995年7月27日，美国在华盛顿国家广场树立了朝鲜战争将士国家纪念碑(National Korean War Veterans Memorial)[8]。让人们永远记住在朝鲜战争中牺牲的英烈。我们应该从朝鲜战争汲取些什么教训呢？看看朝鲜战争的结局吧。

1、斯大林的如意算盘几乎全部实现，中国的参战吸引了大量美军兵力，减轻了苏联在欧洲面对的压力，使其得以强化对东欧诸国的统治。朝鲜战争期间苏联大量售卖平时难以卖出的武器，也发了一笔横财；但也暴露了共产暴力的反动面目。

2、日本和台湾也是大赢家。日本能有今天，多依仗中国当年出兵朝鲜，扩大的朝鲜战争使得美国就近把日本当做后勤补给基地。132亿美金的军事订货使日本战后迅速起死回生；

3、美国虽然付出了4万4千名士兵的生命（阵亡36000，失踪8000），但是通过朝鲜战争牢固建立了美、日、韩、澳、台湾以及东南亚国家的亚太军事同盟，一个北美国家居然牢固掌握了亚太事务的主导权，数十年来获得了巨大的国家利益；

4、金日成又被打回了战争起点，国土还减少了三千多平方公里，在中国人民面前进一步暴露了流氓和无赖的嘴脸；但是巩固了家族统治和世袭体制。

对于中国来说，朝鲜战争弊大于利。

一是拖延了台湾问题的解决，而且这一拖就是半个多世纪。用唱戏的话说就是这个“气口”断了。断就断在了朝鲜战争。到现在，台湾问题的“气口”能不能接上都是个问题。

二是直接的经济损失。北朝鲜发动侵略战争，把中国拖入泥潭，而苏联作为共产国际的老大，一方面以一种命令的姿态指挥中共和朝鲜进行战争，另一方面，又小心翼翼地避免直接跟华盛顿擦枪走火。中国出人，出钱，苏联乘机大卖军火，去朝鲜打仗，就成了“朝鲜战争”的一个奇观。中华人民共和国，刚从连年战争中缓过一口气，正是百废待举的时候，朝鲜战争每年花掉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20%！举一国1/5的财力进行一场战争，其残酷性可想而知。更不幸的是，中国还因为苏联的援助而背上了一身债务，到60年代末仍未还清。这对于一个经济基础薄弱的国家来说，其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上百万的中华儿女在惨烈的朝鲜战争中牺牲、负伤，多少家庭妻离子散。中共领导人以炎黄子孙的血肉之躯抵挡联合国军的钢铁与火药，就为了保护一个视民众为奴隶的世袭小朝廷。

第三，中国参战的一个重要目的，是要尽快加入联合国，战争的结果，使得中国更加脱离了国际格局，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给中国戴上了侵略者的帽子，被多数国家孤立。加入联合国的梦想一拖就是20多年。这场战争，

直接导致中国在战争以后的几十年里的荒谬和闭关锁国状态的形成，延缓了社会的发展，使人民长期处在饥饿和贫困之中，中共却蒙蔽视听，叫嚷“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明明是饥荒遍布、物资奇缺，国民经济面临崩溃，却被说成是“到处莺歌燕舞”。直到毛泽东死了以后，历经改革开放才进入温饱阶段。

附注：

[1] 据2014年统计：朝鲜领土面积120540平方公里，现有人口约二千五百万，人均GDP 783美元；韩国领土面积100210平方公里，现有人口约五千万，人均GDP 28739美元。

[2] 据朝鲜中央电视台纪录片《为了祖国的光复》宣传，是金日成在1945年向朝鲜人民军发布了解放祖国的总攻命令，日本帝国主义遭到朝鲜人民军的痛击溃不成军，金日成被说成是亲自指挥朝鲜人民军解放祖国的英雄。

[3] 尚钺（1902—1982），原名宗武，字健庵，河南罗山县人，著名历史学家，1921年入北京大学预科，后转入本科英国文学系肄业。曾在吉林省毓文中学任教。1927年9月在开封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爆发后，尚钺开始研究历史。1942年到云南大学任讲师、副教授。1946年由上海入山东解放区，任山东大学教授。1950年尚钺历任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历史教研室主任兼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历史研究所学术委员等职。1957年他受到反右运动的强烈冲击。1959年，尚钺、孙冶方和巴人（王任叔）等成为史学界、经济学界和文学界右倾机会主义的代表人物，受到中共极左分子策划的全国性批判。1960年，受到党政双重处分。毛泽东逝世后，中共对尚钺等人的所谓的问题予以甄别。尚钺于1978年调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主任，1982年逝世。尚钺在其晚年著作中留下一段名言：“一个优秀的历史学家，应该能辨别历史发展的方向，他所争的不是一时之是非，而是万世之是非；所追求的不是一时的荣显，而是客观的真理。”

[4] 武亭（1905—1952）本名金武亭，朝鲜将领。1905年生于朝鲜咸镜北道镜城郡，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唯一全程走过长征的朝鲜人，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最早的创始人之一，也是朝鲜早期的第二号领导人。1948年2月，朝鲜人民军成立，武亭正式担任炮兵总司令，中将军衔。武亭英勇善战但缺乏政治斗争经验。他为人刚直，性格暴躁，不适于在勾心斗角的政治集团中生存。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成立以后，在首相金日成和副首相朴宪永两大政治集团夹缝中的武亭更加失意。1952年病逝于朝鲜。

[5] 长津湖地区是朝鲜北部最为苦寒的地区，海拔在1000至2000米之间，林木茂密，道路狭窄，人烟稀少，夜间最低温度接近摄氏零下40度，当年又是五十年不遇的严冬。1950年冬，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九兵团的第20军、第27军和第26军与美国海军陆战1师狭路相逢，惨烈交手，史称“长津湖战役”。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中国人穿着单薄的服装，拿着简陋的武器，饥肠辘辘，在零下三四十摄氏度的严寒中无休无止地冲锋，冒着美国人猛烈的轰炸和密集的弹雨，勇往直前。

风停雪住，曙光再次降临在长津湖。苍白无力的日头慢慢升起到群山上以后，里兹伯格的部队开始往1081高地运动。昨夜的风雪彻底扫荡了长津湖地区所有的崇山峻岭，使得整个山区的面貌发生了显而易见的变化。原有的积雪被狂风吹得无影无踪，而前进的道路又被新的积雪所覆盖，陆战队走走停停，用了很长时间才到达1081高地的山脚下。高地上静悄悄的，寒冷的阳光洒在雪原上，视野之中是一片阴

森森的银白。没有枪声，没有喊声，也没有黄蜂般飞舞的手榴弹弹雨，大地上一片安详。里兹伯格团长有点莫名其妙，因为这种安详过于反常，中国人的无声无息也叫他摸不着头脑。以基本的常识而言，中国人不可能不向 1081 这个最后的关隘派出阻击部队，他心里想也许有不同寻常的事情要发生。里兹伯格命令他的陆战队员加倍小心，占领山头上的阵地。

美国人终于小心翼翼爬上了山头，他们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积雪覆盖的塹壕之中是一具具中国军人僵硬的身体，他们一个挨着一个趴在自己的战斗位置上，有百十号人，都据枪而待，枪口全都指向下面的道路，那是陆战队将要经过的地方。这些中国人的衣着都非常单薄，没有大衣，多数人还戴着单帽、穿着单鞋。冰雪在他们的脸上凝结成了寒霜，每个人的眉毛胡子上都挂着密集细小的冰凌，微风拂过，铮铮有声。阵地上的中国人好像都睡着了，听任美国人来到他们的身旁而无动于衷，他们就那样趴卧着，每个人的武器都已冻结在自己的手中，而每个人脸上又是那样得神态端详。里兹伯格听到陆战队的报告以后也爬上了 1081 高地，他为同一幕景象所震撼。这就是与他们鏖战了 20 多天的中国军队，就是层层包围着他们、一波又一波不断向他们进攻的中国人，就是这些人，他们宁愿冻死也决不放弃自己的阵地。这是些什么人啊？他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他们为什么如此顽强，为什么具备着这样非同寻常的意志力？里兹伯格微微并拢的手指在钢盔的边沿上碰了碰，对着静静趴在阵地上的中国人行了个庄重的军礼。

[6] 上甘岭战役是 1952 年 10-11 月，志愿军在朝鲜金化东北上甘岭地区进行的坚守防御作战。美军调集兵力 6 万余人，大炮 300 余门，坦克 170 多辆，出动飞机 3000 多架次，对志愿军两个连约 3.7 平方公里的阵地上，倾泻炮弹 190 余万发，炸弹 5000 余枚。战斗激烈程度为前所罕见，特别是炮兵火力密度，已超过二次大战最高水平。我方阵地山头被削低两米，高地的土石被炸松 1-2 米，成了一片焦土。上甘岭战役，持续鏖战 43 天，敌我反复争夺阵地达 59 次，志愿军击退联合国军 900 多次冲锋。上甘岭一战，双方伤亡四万余人，尸横遍野，每平方公里尸体高达一万具以上，为世界战争史之最。

[7] 中国抗日战争期间，美国空军在陈纳德将军率领下来华，为避免飞机迫降或人员跳伞后受到侵害，军人都穿着一件印有“洋人来华助战，军民一体保护”字样的背心，以便于当地百姓救助。

[8] 美国朝鲜战争阵亡将士纪念碑，落成于 1995 年 7 月 27 日，位于华盛顿草地广场、林肯纪念堂的东南侧，占地将近 1 公顷。纪念园区里有 19 座不锈钢雕像，每座高 2 米以上，重约 450 公斤。曾经参战的所有军种在雕像中都有了代表。全景墙长 49 米，厚 2.4 米，由 100 多吨抛光的花岗石砌成，墙上镶嵌着 2400 名官兵的照片。该纪念碑已成为华盛顿的一个重要景观。

五、中学时期的梦彻底破灭了

中共进入北平后，我接受了共产主义教育，倡导无神论，世界上从来也没有救世主，要革命，要通过努力改变世界，进入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平等的共产主义社会，不是死后进天堂，而是活着建设天堂。那时候，少年的我认为“主义”比宗教现实得多，“主义”没有迷信色彩，“共产主义”是崇高的理想，于是做起了“中国梦”。梦想着天堂般的生活，美妙无比，幸福无边。毛泽东曾预言，只需二十年到五十年，中国就会进入共产主义。

如今过了近七十年，留下的多是噩梦。梦醒时分，回忆往事，渐渐地明白了，所谓主义和邪教一样，都是散布幻觉，控制人们思想，让人们相信大

救星，做他的驯服工具。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等莫不如是。
中学时期的梦彻底破灭了。

第三章 华北兵工职业学校时期

一、入学

1951 年初中毕业，父母的想法是让我升入高中。当时的名校北京一中和四中离我住家都不远，一中在宝钞胡同，四中在西什库，走路顶多 20 分钟。以我的成绩，考取问题不大。但父母的工资收入不高，哥哥和姐姐都是初中毕业就参加了工作，哥哥正在朝鲜作战。我和两个妹妹在中小学读书。我如果进高中，势必要上大学，高中三年大学四年，七年都要家里负担……。踌躇之际在报纸上看到一则华北兵工职业学校的招生广告[1]，校址在山西太原。学制四年，以机械、化工专业为主，学习期间即算参加革命，享受供给制待遇，不但不要学费伙食费，还要发棉衣和单衣。我到该校北京招生办事处咨询，工作人员热情接待，态度可亲，我于是当即报了名。前几天奉父母之命在四中也报了名。那时普通中学和职业学校的考试时间是错开的，普高先考，职高后考。一般家庭不甚富裕的多报考职高。考试期到了，我评估自己的初中成绩，有把握上职高，所以没进四中考场，白交了报名费，家里也没有过问。华北兵工开考那两天我专心致志的做答卷。十天后发榜，我看到了自己的名字，排在二十几名。8 月 10 日父亲送我到前门火车站，随即由校方领队率领进站登车，一群年轻人兴高采烈井然有序地奔赴太原。

我第一次出远门儿，感觉什么都是新奇的。火车开出北京站不久我就开始晕车，两节车厢都是十几岁的孩子，虽然现在是一个学校的同学了，大多初次见面，彼此还比较生疏。幸好沿途各个车站都有卖冰棍的，五分钱一只，一路上吃了 11 只冰棍晕车症状略微缓解，火车一路向西，过了井陉才昏昏沉沉的睡了一阵，第二天上午到了太原火车站，早有几辆运货的大卡车在站外等候，大约 150 名从北京来的新生陆续上了车，相互扶持着站在车厢里。汽车开出站几分钟便驶上了乡村公路，当时的公路既非沥青路面也非水泥路面，就是土路，八月份的天气骄阳似火，汽车跑起来一路尘土飞扬黄烟滚滚，看一眼车上的人，由于没作防沙尘的准备，既没有口罩也没有头巾，个个黄沙扑面，女同学大多用手绢儿或毛巾捂着鼻子和嘴。好在离开北京的时候都有思想准备，全车没有一个人有怨言，情绪仍然十分饱满。招生站的工作人员曾说过进华北兵工就算参加革命，多数人都有一种自豪感，革命嘛，吃点灰尘算不了什么。汽车颠颠簸簸地开了一个小时才到达太原北郊上兰村，终于到了。招生站说的距太原市区不到 30 里，原来是 20 多公里。

下车后第一件事就是洗脸，进校门的一片空地早已有数十人迎候，男女都有，笑容可掬，他们的年龄在 20-30 岁之间，像学生家长似的。见了我们就像大人见了孩子一样，为我们拍身上的土、拿行李、领路，十分亲切。随后把我们带到一排排平房前面，每间房安排四个人，不分班组，先住下再说。进屋就是炕，上面铺着一床新草席，别无任何家具。进屋把简单的行李放在土炕上，拿出脸盆找地方打水，当时学校还没有自来水，只有一个蓄水池，水是人工从池塘挑上去的，蓄水池下面只有一个水龙头，新同学莫名其妙，老同学指着远方正在修建的水塔说：水塔修好了就有自来水了。匆匆忙忙洗了把脸，就有人喊新来的同学集合开饭，于是各个屋子里的人都带上自备的

碗筷走出来，由老同学带着往厨房走去。大米饭炒茄子，一人一份儿。我不喜欢吃茄子，只打了饭，米很白饭很香，据说是山西晋祠附近出产的水稻。饭后各回各屋，每间屋里都有两三位老同学向新同学介绍情况，由于他们操各省方言，有些话听不懂，大体是说他们是八路军晋冀鲁豫军分区兵工厂的工人，文化程度初中以上的集中到太原学习，初中以下的在石家庄补习，今年首次在北京和山西两地招收了310名应届初中毕业生，山西同学明后天就会到校。学校现在的校址是多年前废弃的一所中学，正在大兴土木修建教学大楼和新宿舍，目前条件较差，希望新同学们安下心来，克服暂时困难。有什么问题可随时反映。下午三点，北京招生办的那几个人来到临时宿舍，说：校长知道首批新生已经到校很高兴，让我们好好照顾从大城市初来山沟沟的同学，他正在太原开会，一会儿就赶回来看望你们。

随着老同学的邀约，同学们熟悉学校环境，我们去看了离学校不远的汾河[2]和校园内的寒泉[3]以及正在大兴土木的校园。据说是清华大学营造系设计的，由太原建筑公司施工，明年即可投入使用。

从汾河边回来稍事休息，就快到六点了，于是又集合到厨房（当时尚无食堂）打饭。小米饭和炒土豆丝。我还在排着队，看见前面好几个女同学端着饭碗哭了，这哭似乎有传染性，从呜呜咽咽抽抽泣泣到涕泪俱下泣不成声。男同学默默不语，炊事员手足无措。恰在此时，校长风尘仆仆地回来了，他径直来到厨房前，一看这个场面，来不及和同学们谈话，先责问司务长，司务长以立正姿势回答说，新同学大概有点想家，今天下午的饭一下子增加那么多米，欠点火候，有点硬。校长拿了个小碗盛了点饭尝了两口，随即说：搞的什么名堂？重新煮！然后才转过身来对着新同学说：等会儿吃饭吧，厨房正在煮汤面。大约半小时面煮好了，哭声也停了，吃饱了各回各的宿舍。

天渐渐地黑了，每间屋发了一个墨水瓶改制的煤油灯，据说正在安装发电机，等几天就有电灯了。我们屋里的四个人多早地就吹灯睡觉了。但是睡不着，原因是蚊子太厉害，凡是露着的胳膊、腿一会儿就起了几个包，于是赶快起来点灯，穿上长袖衣服和长裤，用毛巾把脸盖上。

睡到半夜，不时传来“学员解手”的声音。厕所离住房大约二三十米，没有路灯，当天是七月初九，应该有半轮明月的，月光大概被云遮住了，院子里漆黑一片。突然听到“站住！不许动！”，又一声“举起手来！”，随即战战兢兢的声音“这不是举着呢嘛”。原来是隔壁的某同学出门解手没有喊“学员解手”，被哨兵吓了一跳，自动举手了。惹得屋里人一阵笑声。

1951年8月12日星期日，到学校的第二天，清早起来同学中议论纷纷，有的后悔来这个学校，有的想退学。我因为是自己愿意来的，没有退路，学校管吃管住，又在大兴土木建校，前景乐观，父母虽然都在北京城里，但收入不高，子女众多，我从小就是吃窝头咸菜长大的，过惯了穷日子。所以没发表意见。属于安心留校的一类。吃过早饭后，新同学分成几批，由老同学带领逛上兰村。老同学都很熟悉当地的商店，带着我们买电筒、睡裤、大号搪瓷盅子等等，并提醒我们最好三五成群的来，当地“清匪反霸”尚未结束，尽量不要单独行动。新同学频频点头称是，心里难免有些紧张害怕。在老同学带领下临近中午才回到学校，校门口停着两辆大卡车，部分山西同学已经来报到了，据说下午还要来一百多人。我们带着刚到的同学打水洗脸，吃中午饭（还是大米饭炒茄子），随后睡午觉，准备着下午欢迎新同学。下午不到两点，就都从炕上爬起来，原来的老同学也出来几十个人，加上昨天从

北京来的几十个人，集合坐在礼堂门口的台阶上聊天，不到三点，招生办的工作人员也来到校门口，不一会儿四辆卡车鱼贯而入，停在礼堂前面，一百多山西同学陆续跳下了车，随后跟昨天一样安排住处打水洗脸，新老同学一起聊天。老同学态度亲切，新同学朝气蓬勃，寂静的校园一下子热闹起来。华北兵工初始阶段总共只有五百多学生，其中晋冀鲁豫军区兵工厂调干生二百余名，党员占 50%以上，有好几位知名的劳动英雄，如太行山黄崖洞兵工厂的炮弹大王甄荣典以及刘润田，柴栋梁等。

8 月 20 日举行开学典礼，新老同学分别组成四个专业 14 个班正式上课了。

二、老师和教员

从我上小学的第一天，父母就不断灌输“听老师的话”“尊敬老师”等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观。但在学生的眼里却不是这样的，比如鸦儿胡同小学张校长十分严厉，常用一把他专用的竹戒尺打学生手板儿，还有一位胖胖的女老师常拧着学生的耳朵强迫罚站。学生并不特别尊重他们，也不喜欢听他们讲课，还给他们起了外号儿，“板儿张”“胖胖”。有一位段德辉老师讲课风趣动人，即使生气，也就是用教鞭指指学生，很少打人，却受到学生的普遍尊重。我从小时候起就形成了“打骂不能树立威信，知识丰富才可服人”的观念。

华北兵工学校把教师分作“老师”和“教员”两类，源自于他们的政治身份。老师是聘请来的，教员则是从旧政府人员中留用的。教数理化的老师是解放前毕业的大学本科生，教制图的教员是阎锡山部队的炮兵参谋，教语文的教员据说当过某县的县长，体育也是教员。各位教员都比较敬业，比如制图教员做了好几个模型有助于同学建立立体概念，讲课也中规中矩一丝不苟。语文教员文言文知识丰富，擅长于用简练的文字表述事物，对工程技术人员书写论文大有裨益。体育教员指导学生练习篮球、田径等体育竞技项目，地处远郊的华北兵工校参加太原市大中学生运动会，团体总分在数十个大中学校中位列第二和第四之间。1952 年以后陆续招聘了更多的教师，那几位留用的教员不知发配到何处，既不见踪影，也听不到他们的信息了。

1953 年新开了《俄语》和《热处理车间设备》，两门课。俄语由一位苏联专家 19 岁的女儿教语音，一位东北某大学毕业的丁老师讲授语法和课文，进度很慢，1954 年学校将俄语从必修课改为选修课，每个班级都有五六个学习比较吃力的同学放弃了俄语学习，我当时在班里的成绩名列前茅（连续三学期获优等生奖状），出于好高骛远，急于求成的想法而不再听俄语课，却买了一本俄华词典，每天晚饭后查词典翻译一本俄文《感应加热》的小册子。丁老师知道以后并没有因为我不听他的课而嫌弃我，当我在自学过程中遇到疑难问题向他请教时，他仍然耐心解答。我长大了以后对丁老师愈益崇敬，他心地善良，心胸宽广，令人终生难忘。

《热处理车间设备》的老师第一天来上课的时候，进得教室门来，第一件事是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了三个斗大的汉字——钱剑晨，虽然是粉笔字，间架结构稳重匀称，横竖撇捺凸显着毛笔字的锋芒，我左右看了看旁边的同学，皆对“字写得真漂亮”流露赞叹之色，张着嘴几乎要喊出“好”来。这位钱老师在同学中留下的第一印象是十分美好的。接着他又写起了板书，行楷体字迹端庄，密密麻麻的一黑板，全班同学都在认真的抄录。有的同学喜欢爱写板书的老师，我不喜欢死记硬背板书，喜欢擅于讲述的老师。普通口语的速度大约每分钟 200-350 个汉字，书写速度不过 80-120 个汉字，知识比

较丰富的老师在讲课过程中有时会突发灵感，讲出画龙点睛般的语言，传授给学生的知识要多的多。《热处理车间设备》这门课要求老师知识面宽，见多识广，有一定工厂实践经验。这位钱老师才从大学毕业，第一次教这样的课，确实有点难，而且当时我们是全国第一个热处理专业班，没有可以借鉴的教材，需要自编讲义，就更难为他了。就兵器工业而言，枪械厂，炮厂，子弹厂，发动机厂，坦克厂，汽车厂产品各异，所用材料和工艺差别很大，品种繁多。实现工艺要求所需的设备千差万异。譬如加热炉就有燃料炉（煤炉、油炉、煤气炉等）、电炉（电阻丝、电阻带、碳化硅、电热管等）、箱式炉、井式炉、罩式炉、盐浴炉、网带炉、气垫炉等等。还有诸多的检验测量仪表，电气控制设备等，如何选择和正确地使用设备是技术人员必须掌握的知识。钱老师只找了一些产品样本，把规格参数写在黑板上让大家抄录，对产品特点，使用方法等寥寥数语一带而过。1953年到工厂实习，第一次见到热处理车间设备，所有同学多都感到茫然不知，毫无概念。才觉得“热处理车间设备”这门课没讲什么东西。钱老师不怕误人子弟，只图沽名钓誉，我对他的印象渐渐地不好起来，但从来没有正面顶撞，还是聚精会神的听他讲课，要应付考试。只是在抄录的笔记本上打了一些问号，暗自质疑。我的书桌从不上锁（既无国家机密也无个人隐私，全班40个同学只有十几个人书桌上锁，大部分都不上锁）。但几次发现书桌被人翻过，并没有遗失东西，显然是翻阅我的笔记本。**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4]。我大体上知道是哪几个人干的，但没有确凿的证据，不便明言，只是有时要念叨两句“偷翻别人的书桌是小人动作。”对此我没有在意，更没有想到这句话竟然成了导致我坐了二十多年牢房的罪状。

1979年5月长江电工厂党委派保卫处长李春生和落实政策办公室主任杨玉林到监狱给我看了《关于对牛立华原划为右派分子复查情况和处理意见》，上面写着“……现在是**小人统治天下与事实不符，实际情况是牛立华对个别老师和同学不满，针对性的说过现在是在小人的统治下**。1954年11月华北第二工业学校的毕业生鉴定表上却写成“现在是**小人统治天下**”，一字之差，构成了反动言论。”这个鉴定应该是钱剑晨写的，他当时是班主任。就是他这句歪曲捏造的毕业鉴定‘现在是小人统治天下’成了被划为右派的由头，害得我坐了二十多年牢（档案里还有什么恶毒的陷害词句至今我不知道）。五十年代钱剑晨调离了太原，没听说有什么成就。如此奸佞之徒在毛泽东时代是吃得开的，在我的心目中他永远是卑鄙的小人。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小人得志的国家。因为正直的人永远敢于挑战威权直言犯上，只有无才无德的奸佞小人，才会通过依附权力来弥补自身不足。而依附权力之人，永远行奴才之事，阿谀谄媚，鱼肉弱小。所以，权力不死，小人永远有机可乘，而正义之士，始终被逆向淘汰。浩然正气的文天祥在押解途中写下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之千古名句。抗金名将精忠报国怒发冲冠的岳鹏举以“莫须有”之罪名被害于风波亭，就是先例。

谈及至此，顺便说说中共的档案。对每个工作人员建立档案，记录其优点、缺点、主要业绩、重大失误，便于扬长避短，量才使用是必要的。但档案必须实事求是，客观公正，而且应该让本人知道档案内容，允许提出个人意见。中共之人事档案则被列为见不得人的密件。譬如刘少奇，文革前是“中共中央的杰出领导”，文革中却被中共中央认定为“叛徒、内奸、工贼”，1980年5月在中共中央为刘少奇拟定的悼词中又被盖棺论定为“伟大的马克思主

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随着当权者的需要任意编写，变幻莫测，形同儿戏。

我本人反右前是“优秀共青团员”，被推举为“重庆市社会主义建设青年积极分子”，从来没有做过有损于党和国家的事，反右中曾在指定的小组就指定的题目发表了个人见解，被有意或无意歪曲，仅仅为此，一夜之间被认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极右分子”，为此坐了二十几年牢，毛泽东死了以后经反复查证确认为“错划”方予以“改正”。1979年我看了长江电工厂党委签注的《关于对牛立华原划为右派分子复查情况和处理意见》才知道在我的档案里竟然无中生有地记载着1954年就被诬蔑为说过“……现在是小人统治天下”，这么一句查无旁证的话，档案里还写了什么东西至今不得而知。中共这种见不得人的档案制度，不知害了多少人。

1987年在长江电工厂评定技术职称时，厂部办公室主任杨代吉（政工出身）在职称申报表上签注意见，毫无根据地信手拈来将学历写成中学毕业，工龄写成19年，纯属捏造（这张表我还保留着呢）。中共若是光明磊落的，对于个人档案就应该公开，至少应当让本人有所了解吧。

在毛泽东时代，中共盲目夸大阶级斗争，施行赤色恐怖。不仅对下属子民任意分成多少类，制造矛盾，挑动群众斗群众。还随心所欲地给人们戴上名目繁多的侮辱性帽子（当时流行的帽子有地、富、反、坏、右等数十种之多），列为专政对象。毛泽东不仅对中国人民霸道独裁，对外国领袖也妄加指责任意结论。例如，1956年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说：“南斯拉夫的同志们在困难条件下，作了坚持社会主义的可贵的努力。”1960年在《列宁主义万岁》中却称南斯拉夫为修正主义。1963年发表的“九评”则霸气十足地公然辱骂“铁托叛徒集团”。全凭毛泽东的出尔反尔，颠来倒去的一张嘴信口雌黄。还恬不知耻地自称为“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实乃岂有此理。

附注：

[1] 华北兵工职业学校的前身是1941年八路军总司令部由彭德怀提议在太行山武乡县攀龙镇温庄村创办的太行工业学校，这是中共和军队的第一所兵工学校。1949年，学校迁太原后，更名为华北兵工职业学校。薄一波曾题词“人民兵工第一校”。后又曾称华北兵工工业学校、太原机械制造工业学校。1958年升格为太原机械学院。1963年划归国防科委领导，是当时国防工业八个本科院校之一。1971年划归五机部，遵照毛泽东的‘五七指示’当年7月停办。改成了收容剩余人员的工厂。毛泽东死了以后，1983年恢复办学，更名为华北工学院，2004年6月，经国防科工委决定，增加投资扩大规模，新建校舍，更名为中北大学。为兵器工业系统七大高等院校（通称兵工七子）之一。

[2] 汾河，是黄河的第二大支流。源头在神池县太平庄乡，汾河流域包括忻州、太原、晋中、吕梁、临汾、运城六市中的41个县（市、区），全长713公里，汾河自发源地至太原市兰村为上游，兰村至灵霍山峡入口为中游，以下为下游。在万荣县汇入黄河。

汾河是山西最大的河流，被山西人称为母亲河，对山西省的历史文化有深远的影响。

[3] 烈（冽）石寒泉，位于汾河出山口东岸，泉水来自于数十丈高的冽石山石壁之中，华北兵工职业学校内有一幽静的小院，据说是阎锡山的避暑之地，曲径通幽处有一水潭，方广数丈，清澈见底。潭之西南侧有一泉眼，泉从潭底淙淙汨汨不

急不缓地涌出来，喷珠吐玉般地跃出水面半尺多高。凉气袭人，沁透心脾。长期以来寒泉之水注入汾河，涵养山西百姓。1950年后，政府在附近的土堂村建起水厂，铺设地下管道。引水送往市区各工厂和居民区，成为太原市工业用水和市民生活用水的主要来源。上世纪80年代中期，太原地区水位下降，冽石寒泉干涸。

[4]“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出自《论语·述而》，是自古以来人们所熟知的一句名言。许多人常常将此写成条幅，悬于室中，以激励自己。

第四章 长江电工厂

1955年2月中旬，我们被分配到西南的十八个同学从太原出发，兴高采烈地奔向大西南。不知道是出于保密还是其它原因，每个人的具体单位秘而不宣，说是到了四川省兵工局才能分晓，那时候的年轻人完全没考虑离家远近、工作环境，工资待遇等个人问题，一切服从党的安排，毫不犹豫地踏上了千里征途。

当时四川还没有出川的铁路干线，境内只有一条历经四十年，于1952年6月才建成通车的成渝铁路，所以只能从太原坐火车到武汉，然后转乘轮船到重庆。不料到了武汉以后，恰逢新兵入伍高峰，运力紧张，无法买到船票，我们在武汉滞留了半个多月，才买到从武汉到宜昌的五等舱客票，也就是甲板上的统铺，期盼着尽快工作的同学们没有享受的概念，不管几等舱，一心想的就是赶快参加工作，为祖国的富强昌盛做贡献。到了宜昌又因为客运力量不足，耽搁了三四天，幸好一条民生公司的小轮船“民来”号还有十几个铺位，总算买到了船票，从宜昌南津关进三峡，一路领略风景，穿越激流险滩，3月8日中午才到重庆朝天门码头。

旅途可谓不顺利，从太原到重庆竟然花费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但是也给了我们了解武汉和宜昌的机会，因为是刚刚毕业的学生，还没有挣钱，生活比较节俭，不愿意给父母增加负担，在校期间，每月八元伙食费，路途上按出差补助标准，每天一元钱。幸好当时物价不高，公园免票的居多，黄鹤楼的门票也不过五分钱，在饭馆里吃饭，一荤菜一汤，大米饭随便吃，每顿只要三角钱。我们十八个人坐三张桌子，一桌六个人，每桌随心所欲、变着花样要六个不同品种的菜，比如糖醋鱼、烧三鲜、炒肉片、西红柿炒鸡蛋、红烧牛肉、粉蒸排骨各一份，再加上两大碗白菜豆腐汤，三笼大米饭，一共才一元八角钱，吃得同学们大快朵颐，心花怒放，至今回想起来，美味在口、意犹未尽。如今过了六十年，据说社会主义有无比的优越性，取得了辉煌成就，居民收入高、物价可控，进入全面小康了，然而，六个人吃这样一顿饭至少要花费人民币壹百五十元，物价涨了七八十倍，而今武汉黄鹤楼的门票八十元，涨了一百六十倍。我也从一个青年技术员变成了年逾古稀、白发苍苍的高级工程师，工资收入呢？从数额上看，增加了五十倍，基本相当于物价上涨幅度。其他昔日的同学除了当官的以外，也和我差不多。干了四十几年工作，购买力不仅没有提高，反而略有降低，这就是事实，谎言是无济于事的。

带队的组长是轻兵器专业的郭伟贤（共产党员），他持学校开具的分配通知到四川兵工局报到，回来以后才告诉我们十八个人的分配去向，我和朱茂

鉴分配到重庆七九一厂，何君亮、李宏振等在二九六厂，凌蓬山、车景霞等在四九七厂，安孝堂等在四五六厂，只有林潭如一个人分在了二一四技工学校，总算落实了单位。当日下午十八个人就地解散，分头持兵工局开具的介绍信到各自的单位报到。

我和朱茂鉴从朝天门坐公交车到菜园坝，然后沿着长江边满是鹅卵石的路往渡口方向走，走了大约二十分钟才看见趸船，上去拿出四川省兵工局开的介绍信，被允许登船，不一会儿，轮渡启动，几分钟就从长江北岸到了南岸，进入了七九一厂的地界。

进厂以后有半年的实习期，主要是熟悉情况，认识同事，便于今后开展工作。我和朱茂鉴被安排在技术科实习，指导老师是雷仲眉、任光祥。

五十年代，兵工厂的保密工作十分严格，一般人员被限定在各自的车间范围内活动，不允许串通。技术人员和管理干部根据工作需要持有特殊通行证才能够进入指定的车间。

我先后在工具科热处理工段、铜加工车间实习，这些工种一律任用男职工，青年工人大约占三分之二。以后又走马观花般地看了看弹头弹壳车间的主要生产设备和加工情况，对枪弹制造的全过程有了大体上的了解。最后在中心试验室实习了一个月，结束了半年的实习期。我被分派在技术科热处理组担任技术员。

进厂初期我是有些不满情绪的，就热处理专业而言，枪械、火炮；坦克、战车、发动机等工厂较枪弹厂重要得多，那些产品对机械性能的要求较高，原材料品种多，高强度钢、耐磨钢、弹簧钢等应有尽有，热处理工艺复杂，淬火、调质、渗碳、氮化等一应俱全。枪弹厂的原材料单一，仅三七黄铜一种。热处理只是再结晶退火，工艺简单，技术要求也不高。但当时主导我的思想是服从分配，做党的驯服工具。所以很快就安下心来，以搞好枪弹热处理为自己的终身职业，认真钻研技术，力争做得最好，还自学了英、俄、日等外语，可以阅读和翻译相关技术资料。历年撰写了《黄铜的热处理》《对枪弹底火击穿机理的讨论》《底火片的机械性能》《高频喷镀》《某些水溶性淬火介质的冷却特性》等论文及数十篇译述。分别在《轻兵器》《铜加工》《金属热处理》《四川兵工学报》等刊物发表。1956年由长江电工厂党委推举参加重庆市知识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被选为长江电工厂共青团团委委员等多项兼职。无论是政治上还是技术上，我对长江电工厂都是充满感情的，对中共的领导是欣然接受的。但反右运动一来，在个别人的歪曲捏造下，在急于完成毛泽东下达的要揪出5%右派分子的指令下，我被无辜地沉入罪恶的深渊。历经二十余年磨难，直到毛泽东死了三年以后，中共扬言要“拨乱反正”之时，才重见天日。

第五章 追溯反右派运动

楔子：遑论“左”与“右”

“左”与“右”之概念由来已久。人类有意识形态以来，即有“左”“右”之分。上古时期左与右只是方位之称，并无正误之别。如《诗经 小雅》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中古时期，左与右有了尊卑贵贱之选择。如春秋时代的思想家老子著述的《道德经》中有曰：“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

在西方，政治上的左派与右派之说，源于 1789 年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三级会议。当时，主张民主共和、政教分离的激进派议员坐在左边。支持君主立宪、宗教立法的温和派议员坐在右边。从此，激进派被称为左派，温和派被称为右派。

后来，马克思、列宁的余孽将这一含义引入歧途，妄称右派即资产阶级反动派，左派即无产阶级革命派。

在共产党的文化术语中，通常将“左”定义为激进、强硬、改革；将“右”定义为保守、温和、妥协。

左倾表现为超越客观实际，脱离现实条件，陷入空想、盲动、狂热的主观随意状态。把梦境说成天堂，把空想当做现实，把谬论吹成真理。右倾是认识落后于实际，不能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与时俱进，把本来可以办到的事视若困难重重，徘徊不前。

这些基于马克思、列宁理念的左右观，到了中国共产党手里，似乎变成了小孩玩的橡胶泥，可以随意揉捏，像鸡就是鸡，像狗就是狗，即使非驴非马，还可称之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四不像。

就中共而言，尤其是就毛泽东而言，本就没有固定的信仰，也没有固定的政治理念。他擅长的是打家劫舍，聚众造反，阴谋诡计，谋朝篡位，骄奢淫欲，作威作福。所谓马克思主义，也就是装点门面的幌子，借以招徕顾客；或者是色彩斑斓的虎皮，用来吓唬民众。权在谁的手里，谁就是马克思主义，甚至自封为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探究其实，他完全是装腔作势，故弄玄虚，巧言惑众，狂人妄语。就像洪秀全自称是上帝的儿子一样荒谬，查一下 DNA，毛泽东与马克思八百杆子也沾不上边儿。

他们无所谓左，也无所谓右，权！权！权！才是他们心之所系，也是他们追求的唯一目标，权、钱、色为其“三个代表”，中共之权贵高官莫不如是。广大党员皆为供党魁任意驱使的驯服工具。

在中共手里，左派和右派帽子宛如杂耍演员的道具，想给谁戴，就给谁戴。或者换来换去的戴在一个人的头上，博人一笑而已。

1957 年那些不满现状，敢于针砭时弊、揭露矛盾、推动社会进步，要求革新、提出政改意见的志士仁人实际上应该是革命派，而那些保守的维护反动统治权威的才是真正的反革命派。毛泽东有意混淆概念，意在用阴谋整肃知识分子，维护独裁专政。朱正在《1957 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一书中曾言及此点。后来，周伦佐在他的书中也作过详细论述，文革期间的电子杂志《昨天》选载了那一部分。

人们不会忘记，文化大革命时，无论是造反派还是保皇派，都自称是左派而指责对方是右派。打砸抢是左派，抄别人的家是左派，破坏文物古迹是左派，女中学生打死校长是左派，考试交白卷也是左派。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打倒陶铸，打倒贺龙，都是左派的革命行动。于是，国家主席成了内奸、工贼；中共中央总书记成了死不悔改的走资派；中共中央宣传部长成了叛徒；两把菜刀起家的元帅成了大土匪、大军阀；科学家进了牛棚，爱国者进了监狱，政治流氓泼皮无赖进了中南海。毛泽东掀起的是一个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罪恶时代。明明是泯灭道德，毁灭文明的痞子流氓争权夺利，却美其名曰触及灵魂的“文化大革命”。明明是勾心斗角挑动群众的混战、内讧，甚至刀枪相见、棍棒交加、私刑武斗，血染江河。毛泽东却赞之曰：“形势大好，不是小好”（1967 年 11 月 9 日《解放军报》）。岂不是黑白

颠倒,是非混淆。

毛泽东还说：“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可是，1967年1月13日，以中共中央、国务院名义颁布的《公安六条》赫然写着“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据此，哪个革命的左派要是想碰毛泽东一根毫毛，想看看皇帝究竟穿没穿衣服，立即就会被打成反革命，抓进监牢，甚至格杀勿论。这叫做“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

究竟什么是左，什么是右呢？

举几个真实的也是令人啼笑皆非更是荒谬绝伦的例子：

“左派”陈沂成了“右派”分子

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大讲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当着一千八百多名与会人员的面说：“中国五百万知识分子，拥护马列主义的是少数，反对马列主义的也是少数，大部分是中间状态，军委陈沂他们是‘左派’”

毛泽东当场点名问道：“陈沂到了没有？”坐在后排的陈沂马上站起来应声：“到！”毛泽东指着陈沂说：“他们是‘左派’”陈沂由此十分得意，自以为是钦封的“左派”。于是反右开始后连续在报纸上发表批判右派分子的文章，傲然不可一世。

八个月以后，1957年10月，苏联新西伯利亚芭蕾舞剧团访问中国。毛泽东去天桥剧场看演出，陈沂的座位在5排1座，毛泽东在6排1座，陈毅和苏联大使尤金分坐在毛泽东左右。毛泽东进场时，全场站起来鼓掌欢迎，陈沂转过身来正好和毛泽东对面。那天陈沂穿戴整齐，佩戴少将军衔。毛泽东一见陈沂，就拉着他的手说：“陈沂同志，你翻身了！”陈沂一时没明白过来，张着嘴、愣住了，毛又说：“这几个月，‘右派’整得你好苦嘛！”毛泽东指的是前段时间陈沂的几个部下发表了一篇题为《我们对当前文艺问题的意见》，遭到社会上一些人的批评，说该文是教条主义，说陈沂等人是“毛泽东的御林军”。这一切都起源于毛泽东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和3月8日接见文艺界代表时的讲话，毛泽东当时气愤地指出陈沂属下那四个人（陈其通，陈亚丁，马寒冰，鲁勒）写的文章是教条主义，是抵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跟中央唱反调，于是招致了一帮喽啰对陈其通等人的围攻。现在却对陈沂说“右派整得你好苦嘛”，似乎他与围攻毫不相干，毛泽东狡猾的秉性可见一斑。陈沂回答道：“是主席的‘六条标准’帮助了我翻身。”毛泽东笑了，然后说：“是啊！你不懂呀，毒草总是要出来的，怕，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让他们出来嘛。出来就锄嘛，锄了还可以当肥料嘛！”陈沂当时确实不懂毛泽东的用意——“引蛇出洞”。后来毛泽东坐下来，跟陈毅介绍说：“你认识他吗？他是军委文化部长陈沂同志，他们是‘左派’。”陈毅笑着说：“认识认识，我们常打交道，我们是老朋友了。”

在反右高潮甚嚣尘上的形势下，1957年内，陈沂两次被毛泽东御赐为“左派”，越发兴高采烈，小人受宠若惊，得意近乎忘形，狂然目中无人。由此得罪了毛泽东的宠臣、湖南老乡，时任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主任的谭政大将。

1958年“反右补课”，3月1日《人民日报》以醒目之标题《假左派真右派真假大白》开始点名批判陈沂。随后，中共中央军委报经毛泽东批准，认定陈沂为右派分子。3月23日将其开除党籍、开除军籍，发配到黑龙江某农场监督劳动，原每月三百八十元工资改为二十八元生活费。历经二十一年劳

动改造、入狱关押等折磨（见网易视频《“文化将军”陈沂》和陈沂夫人马楠的回忆，载于上海政协文稿）。毛泽东死后，陈沂始获平反，1979年被任命为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主管意识形态工作。他究竟算是左派还是右派呢？

那个把陈沂打为右派分子的谭政，该是左派了吧？孰料1960年10月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被加上了“反对毛泽东思想”、“在总政治部结成反党宗派集团”、充当“彭德怀、黄克诚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军事俱乐部的‘政治部主任’”等罪名，遭到批判、斗争，受到撤职、降职处分。“文化大革命”期间被关押入狱。和陈沂合为一派，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

中共的绝大多数官员，从中央到地方。从党主席、总书记到下面的党委书记，支部书记，多数都是极端自私、心毒手狠的整人派、害人派。在相互倾轧的权欲斗争中，尔虞我诈，无情无义，心怀奸诈，时刻提防，既要设法整人也要躲避自身挨整。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林彪、邓小平、彭真、谭政、陈沂等等莫不如此。

批判林彪，极左突变极右

1971年9月13日林彪坠机温都尔汗之后，毛泽东生了一场大病。亲密战友，他一手扶植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竟然离他而去，无论是“哀莫大于心死”还是拒绝承认现实，必须向全国有个交代。左思右想，他发动了“批林整风”运动，把文革期间他制造的罪孽统统推到林彪身上，死人蒙冤，查无对证。于是他钦定“左派”是反革命，林彪是“左派”的总后台。

1972年6月28日，毛泽东会见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时说：“我们的‘左派’是什么一些人呢？就是火烧英国代办处的那些人。今天打倒总理，明天要打倒陈毅，后天要打倒叶剑英。”这些所谓‘左派’现在都在班房里头。我们这里早几年天下大乱，全国各地都打，全面内战。两边都发枪，一共发了一百万支枪吧（笔者注：他怎么知道这个数字呢？他不是说过不要武斗吗？原来这都是他策划的，口是心非的毛泽东就是武斗的幕后黑手！）。这一派军队支持这一派，那一派军队支持那一派，打。被那些‘左派’夺了权。一个半月（外交部）权不在我们手里，在那些所谓的‘左派’手里。这些所谓‘左派’，其实就是反革命。……总后台的人现在也过去了，叫林彪。”（摘自《国际冷战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历经文革运动的人们都还记得，文革初期，毛泽东发表语录“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续，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紧接着《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公诸于世（1966年8月7日中共内部刊发，1967年8月5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由此，“造反”“造反”“造反”之吼声遍于全国，打、砸、抢、烧、杀之暴行横扫华夏，一切土匪、流氓、痞子都自封为“左派”。“今天打倒周恩来，明天要打倒陈毅，后天要打倒叶剑英”的策动者和幕后黑手或者说总后台就是毛泽东。人们还记得，毛泽东也穿上了军装戴上了红卫兵的袖章，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洋洋得意，这不是明目张胆地昭示他就是左派的总司令嘛。

周恩来得悉毛泽东将林彪定为左派的表态以后，着手清理文革的“极左”流毒。

1972年8月1日，周恩来在外交部驻外使节会议的讲话中提出批判林彪

的“极左”。他对《人民日报》负责人说：“极左”思潮不批透，你们就没有勇气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他还在全国计划会议、公安会议、科学会议上明确提出在“批林整风”中要批判“极左”思潮。这些都是有记录的存有文字档案的。

但是周恩来的主张遭到张春桥、姚文元的反对。

8月上旬，姚文元便找《人民日报》负责人打招呼：“批判极左思潮不要过头！”

1972年10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署名“龙岩”的《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一文，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龙岩”，是中共黑龙江省委理论组的化名。同日的报纸上还刊载了另外两篇文章。组成了一个批判“极左”的专版，颇引人注目。

“龙岩”的文章，引起了张春桥和姚文元的注意。此二人立即布置《文汇报》在上海召开“工人座谈会”。随即于11月4日在《文汇报》的内部刊物《文汇情况》上发表“工人座谈会纪要”，公然指责“龙岩”的文章是“错误”的，是“否定‘文革’”、“右倾回潮”。

1972年11月28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外交部在《关于召开外事会议的请示报告》中，提出：“彻底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煽动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

11月30日，周恩来在报告上批示：“拟同意。”

12月1日，张春桥批示：“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否仍然是极左思潮？批林是否就是批极左和无政府主义？我正在考虑。”

12月2日，江青批示：“我个人认为应批林彪卖国贼的极右，同时批他在某些问题上的形“左”实右。在批林彪叛徒的同时也应着重讲一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

12月6日，张、姚二人在一次讲话中说林彪是“极右”。他们要求批判林彪的极右。个中原因很简单，“四人帮”与林彪一样，都是在毛泽东的怂恿和庇护下，靠打着“左”的旗号、喊着“左”的口号上台的。批判极“左”，岂不是批到“四人帮”头上？批判极左矛头必然指向毛泽东。批极右，自然可以保护和发展极“左”。

由此引发了周恩来与江青一伙的直接交锋。

分歧最后由毛泽东裁决。

12月17日，毛泽东找周恩来、张春桥、姚文元谈话。

这时的毛泽东出尔反尔，改变了自己接见班达拉奈克夫人时提出的“林彪是极左派总后台”的说法。毛泽东自问自答地说：“批极左，还是批右？”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烟，若有所思地说：“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想了一会儿，似乎从死胡同里找到了方向，皱着眉头摇了两三分钟脑袋才慢吞吞地说：“林彪是极左？是极右？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这是他憋了半天好不容易想出来的一段话，又成了“最高指示”。

至此，出尔反尔武断专横的昏君一锤定音，把林彪从极左改为极右。

周恩来失败的原因在于：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本身就是极左。批极“左”，不就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毛泽东吗？他是死不认错的。

周恩来当初跟着毛泽东称林彪是极左，如今又要顺着毛泽东说林彪是极右，好在他练就了一身见风转舵的功夫，于是又一次使出浑身解数迎和毛泽

东。

张春桥、姚文元把毛泽东的谈话精神写入两报一刊社论。1973年元旦两报一刊发表的社论《新年献词》中，强调了“批林整风”的重点是批判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

从此，“批林整风”不再批林彪的极左，而是批林彪的极右。批判林彪极右的结果是越批越“左”。极“左”思潮更上一层楼。

据曾任周恩来秘书、武警指挥学院原副院长纪东回忆，一向饰演温文尔雅角色的周恩来竟激愤地连说脏话。那是1973年元旦，周恩来一边看报纸一边骂“他妈的”，然后把报纸啪地一声朝右后方摔去，又甩出一句骂人话：“他妈的，怎么不是极左，就是极左嘛！”（见纪东所著《难忘的八年》，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9月第一版）

批判四人帮，极右再变极左

“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中一贯斥责别人是“右”“右派”“右倾”，声嘶力竭地叫嚷只有他们才是响当当的“左派”，毛泽东对此是首肯的。

“四人帮”竭力鼓吹“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进行到底”、“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解放世界上四分之三受苦受难的人民”、“砸烂封、资、修”“人民解放军要支持左派”等等极左的口号，毛泽东也是确认的。

“四人帮”垮台以后，海内外报纸一度称王、张、江、姚为“极左”、激进派。当时英国报纸唯一的驻京人员尼杰尔·韦德是最早报道“四人帮”事件的外国记者，1976年10月12日，他在英国《每日电讯报》头版头条率先发布：“毛的遗孀被捕”，用的标题是《华粉碎极左分子》。也就是说，在“四人帮”被捕时，韦德便果断地判定他们是一伙“极左分子”。可是，自称为“英明领袖”的华国锋，却连一个普通的外国记者都不如！

1976年10月中旬，华国锋对参加“打招呼”会的西北组高级干部说：“四人帮”是“极右派！”他进一步发挥说：“四人帮”这个“反革命黑帮的社会基础是地富反坏和新老资产阶级”，“他们是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典型代表”。华国锋针对海外报刊的报道说：“答案只有一个，他们是极右派，是彻头彻尾的走资派，是穷凶极恶的反革命派。什么‘左派’，什么‘激进派’！他们右得不能再右了。”华国锋的武断言论，引起海内外舆论一片哗然。

华国锋为什么会作出“四人帮”是“极右派”的结论呢？追根溯源，因为毛泽东一系列倒行逆施都被自定义为左派，曾对林彪作出不是“极左”而是“极右”的论断。于是，“忠于伟大领袖毛泽东”的奴才华国锋，很自然地也就作出了“四人帮”不是“极左”而是“极右”的推论。

“四人帮”到底是“左”还是“右”呢？

多数人说“四人帮”是“左”，而且是“极左”。手握大权的华国锋却认定为“右”，是“极右”。他在不同场合的讲话中，反复强调要批判四人帮的“极右”，他之所以这样说是有缘由的，因为他就是极左路线的鼓吹者，“反右”的打手，反击右倾翻案的急先锋，毛泽东的乏走狗，怎么能允许批判“左”呢？

在华国锋的指使下，1976年11月中旬，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宣传工作座谈会，部署批判“四人帮”的任务，只提批判“四人帮”的极右，闭口不提批“左”。

11月28日，《人民日报》根据会议精神发表了社论《彻底揭发批判“四

人帮”》。社论紧随者华国锋的思路说：“‘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代表了地、富、反、坏和新老资产阶级的利益，反映了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愿望。他们推行的是一条祸国殃民的路线，亡党亡国的路线，是一条极右的路线。”

社论要求抓住这个“极右实质”进行彻底揭发批判。

华国锋之所以强调批判“四人帮”的“极右”，一是因为“极左”思潮泛滥多年，流毒甚广，被蒙蔽的群众尤其是党内官僚对极左的反动性尚未认清。二是因为华国锋本人就是在极“左”思潮发展到颠峰之际，被毛泽东提拔上台的。他是极左路线的受益者，其政治生命与极左密不可分。

华国锋的思想体系也是“左”的。他在“肃反”、“反右”、“文化大革命”中坚决执行了“极左”的路线和方针。他与“四人帮”之间的矛盾是权力之争，并不是路线之争。因此，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仍然顽固地维护“左”的一套，尽量避免批判“极左”，竭力扬言批判“极右”，就不足为奇了。

1977年4月13日，上海《解放日报》以整版篇幅刊载署名为“本报大批判组”的长文，揭批张春桥在《解放日报》期间的反革命罪行，标题颇为新颖：《乔装“左派”的极右派》。此文虽说是“批判张春桥”，但却是把张春桥作为“极右派”加以批判的。张春桥明明是极左派，怎么会成了“极右派”呢？这种理论上的谬误，充满粉碎“四人帮”不久的中国报刊。这种理论上的谬误，追根溯源，出自装腔作势的华国锋。

“英明领袖”一言在先，追随华国锋的御用文人如蝇逐臭，于是批判“极右”的文章充斥于报刊。如：

《假左真右的哲学表现》（《文史哲》1978年02期）

《政治上反动透顶 理论上荒谬绝伦》（《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7年04期）

《彻头彻尾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极右派谬论》（《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77年04期）

诸如此类的文章充斥于各类报刊，不胜枚举。年长一点的人都还记忆犹新吧？

1977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发表的公报中说：

“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披着马列主义的外衣，肆意篡改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篡改党的基本路线，蓄意颠倒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敌我关系，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推行一条极右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四人帮”是一伙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是一伙彻头彻尾的极右派，是一伙新老反革命结成的黑帮。他们是地主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典型代表，是蒋介石国民党在我们党内的典型代表。他们的社会基础是地富反坏和新老资产阶级。他们的一切罪恶活动，都是由他们的反动阶级本性决定的。我们党同“四人帮”的斗争，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是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斗争的继续。”

这个决议是全体中央委员举手通过的，也就是说，当时位列中共高层的一群人都顺承“英明领袖”华国锋的观点，确认“四人帮”是“极右”。邓小平出席了这次会议，他也举了手，而且在闭幕会上做了重要

讲话，表示完全赞同会议公报。也就是说，邓小平当时也是主张批“极右”的。

然而，言之不凿，信者寥寥。华国锋把“四人帮”定为“极右”，使批判“四人帮”的斗争无法深入下去。

好事的文人墨客试图突破这个障碍。

1977年10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两篇文章，指出“四人帮”和林彪均为“假左伪装”。这种提法和当时所说的“极右”已经有些差别，但还未敢越过雷池，仅仅把“左”字提了出来，尽管称之为“假左”。

1978年3月23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为1972年“龙岩”批“左”翻案的文章。假借陈年往事，隐隐约约地表达了当下应该批“左”。含而不露，可谓用心良苦。

但《人民日报》此举受到了“上面”的批评。

不久，《人民日报》硬着头皮发表了《评“四人帮”的极左》一文，对“四人帮”的极左实质进行了深刻的分析，此文有些来头，迫使“上面”勉为其难地不再坚持认定“四人帮”是“极右”，但又不愿完全否定，于是继承毛泽东所说的“形左实右”，改头换面地创造了一个新词——“假左真右”。

一段时间，从中央到地方的报纸以及某几个高等院校的学报，趋之若鹜地发表批判四人帮“形左实右”“假左真右”的文章，积案盈箱，让人目不暇接。有好事者可去图书馆查阅当年的报纸。

1978年，那个被“反击右倾翻案风”打下去的邓小平站出来，迫使华国锋靠边站之后，邓小平一举推翻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斩钉截铁地认定“四人帮”为“极左”。

如蚁附膻的理论家们又连篇累牍发表批判“极左”的文章。年长一点的人也没有忘得一干二净吧？

短短的两年时间，“四人帮”从被定性为“极左”突然变成“极右”，再变成“形左实右”、“假左真右”，又变成“极左”。如此变来变去，让人不糊涂都难。

1978年，曾任河南、黑龙江两省第一书记等职的潘复生对来看望他的老朋友说：我坐国民党监狱时，对自己为什么坐监心如明镜。可建国后，一会儿说我“右”了，一会儿又说我“左”了，始终弄不明白。

上述事例表明，中国共产党的最高层领导和理论家是分不清“左”和“右”的。敢于直抒己见的人少而又少[1]。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们也是左右不分、是非不辨的墙头草，举手表决的木偶，盲目服从的奴才。他们毫无政治原则，只晓得在主子面前摇尾乞怜，谁当权就为谁唱赞歌，曲意逢迎，邀功讨赏。左和右是他们玩弄的辞藻，挥动的帽子，杀人的匕首。说你是左你就是左，说他是右他就是右。既然可以指鹿为马，自然可以指左为右了。

认清了中国共产党的本质，再来看中共发动的各个政治运动，就会言必有中，左右逢源了。

闲话少说，书归正传。接下来追记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

附注：

[1]1968年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上最后表决“永远开除”刘少奇党籍的决议。在号称最民主的会议上，一百余名中央委员均举手赞成，中共

元老朱德也不得不曲着臂把握着拳的手放到右耳的旁边，只有陈少敏一个人趴在桌上，用右手捂住左胸，没有举手。她年近七旬且患有重病，1927年入党，曾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资格老，无人敢惹。她没有家庭、没有儿女，一切都无所谓……。第二天，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见报，公然写着“一致通过”。陈少敏用拐杖指着地说：“一致个屁！我就没有举手”。

一、阴谋和阳谋

“反右”或者说整肃民主党派、威慑知识分子、压抑自由思想，遏制民主思潮，是毛泽东由来已久的预谋，也是建国以后毛泽东念念不忘、耿耿于怀的心事。

多年来，毛泽东一直在处心积虑地窥测方向、寻找机会，谋求绝对的一党专政体制，压制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强化个人独裁。

苏共二十大揭开了反对个人崇拜、进行政治改革的帷幕，引发了东欧一些国家摆脱苏联控制、推动民主化的进程。这是东欧国家广大人民群众觉悟提高的表现，这是对斯大林主义铁蹄统治的反抗，这是对名为社会主义实际是独裁专制体制的挑战。

野心勃勃的斯大林不仅对苏联人民任意宰割，还时刻觊觎着东欧各国的领土，1939年8月23日苏联和德国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秘密议定把北欧和东欧瓜分，拼入德国和苏联的势力范围。1939年9月1日，德国闪击波兰，挑起了二战。苏联趁火打劫，开始向西扩展疆域，建立所谓的“东方战线”，9月17日，苏联红军穿过边界进入波兰东部，两天后，与德国军队配合作战。9月27日，华沙沦陷，波兰被瓜分。德国人占领了拥有2200万人口的37000平方哩土地，苏联人占领了拥有1300万人口的77000平方哩土地。不到一个月，欧洲最大的国家之一波兰就已完全地从地图上消失。

有人据此判定二战的发动者应该是希特勒和斯大林，想来不无道理。只是由于希特勒统领世界的野心日益膨胀，狂妄不可一世。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命令德军大举入侵苏联，迫使走投无路的斯大林放弃了苏德条约，转而与英美联合，结成了同盟，才导致后来的反法西斯联军在诺曼底登陆，开辟了欧洲第二战场，对希特勒施以致命打击。二战结束后，斯大林除占领波兰数万平方公里土地以外，还委派具有苏联国籍的罗科索夫斯基元帅充任波兰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防部长。二战结束十余年苏联仍在匈牙利保持着大量的驻军。

波兰和匈牙利，作为独立国家的人民，对苏联的霸道行径深有感受。是可忍孰不可忍，1956年秋，酷爱民主、自由的波兰、匈牙利民众走上街头，以和平的方式表达维护国家主权，捍卫民族独立，实行民主宪政的要求。

然而，和平游行遭到了无情镇压。

亲苏的波兰政府调集装甲师、步兵师一万余人，对游行群众开枪，造成七十四人死亡，八百余人受伤，六百五十八人被拘捕。

匈牙利更为不幸，在中共头目毛泽东、周恩来极力怂恿下，苏军以十七个师二十万兵力向布达佩斯发动军事行动，从10月23日到11月4日整整十三天，七千八百多人丧生，一万二千余人受伤，拘捕关押三万有余，数百名民主运动的领导者被处决，另有二十余万匈牙利人逃往西方成为难民，四万七千人流亡美国。

波匈事件是反对独裁专政的民主化运动，其重大意义在于波兰和匈牙利民众用鲜血和生命撕开了斯大林暴政的铁幕，向全世界人民揭示了那些高喊“人民民主”“工农兵当家做主”“共产党代表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幸福社会”，原来是残酷、野蛮、黑暗、恐怖的独裁统治。广大工农兵群众义愤填膺地起来维护国家独立和民众权利，竟然遭到本国共产党和外国军队血腥镇压。

一时之胜在于力，千古之胜在于理。波匈人民没有被武力屈服，历史潮流是不可抗拒的，二十世纪末，波兰和匈牙利人民终于摈弃了伪社会主义，摆脱了法西斯式的反动统治，走上了独立自由民主的道路。

波匈事件发生以后，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说：“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没有在阶级斗争中训练无产阶级，分清敌我，分清是非，分清唯心论和唯物论。现在呢，自食其果，烧到自己头上来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23页）。

隔了几天，他对匈牙利事件产生的原因，作了个归纳：“官僚主义，脱离群众，工业方针错误，工人减薪，资本家简单地被打倒，知识分子未被改造，反革命分子没有镇压。”（毛泽东在第十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结束语提纲，手稿，1957年3月1日）。

人的观念不同对同一事件会做出不同的判断，毛泽东执政以来，“批武训”“批胡适”“批俞平伯”“反胡风”“清匪反霸”“镇反”“三反”“五反”“肃反”等等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使老百姓常年处在反、反、反的鼓噪喧嚣声中，生活在斗、斗、斗的恐怖氛围之下，冤狱遍于国中，道德渐次沦亡。

善良的炎黄子孙历经连年战乱，盼望着休养生息，安居乐业。毛泽东的斗争哲学引起了人们的疑虑，但多数人都还没有看透毛泽东的残暴本质。年长的人饱经沧桑，精于世故，只求明哲保身，多半是逆来顺受，不敢怒也不敢言。涉世不深的年轻人，对毛泽东还有种种幻想甚至迷信，对共产主义还存在着不切实际的向往与憧憬，笔者就是其中的一个，我从戴上红领巾那一天起，真心实意地发誓做共产主义的接班人。历经了几十年炼狱生涯，才慢慢的明白了一点道理，那共产主义的美梦只是一面独裁专制的招魂幡，如今已经渐行渐远了。但当权的中共头子仍痴迷于专制的梦，几十年间曾变幻出各种各样的称谓，总括言之，美其名曰中国梦，继续欺骗着老百姓。好在多数人民渐渐觉醒，不那么轻易上当了。让痴迷于专制独裁的脑残做梦去吧。

中国老百姓的善良和忍耐力堪称世界之最，1956年前后苏联和东欧的社会动荡没有在中国激起太大的波澜，基本是平静的。

波匈事件之前，中国大陆历经“清匪反霸”“镇反”“肃反”“三反、五反”“反胡风”等政治运动，老百姓慑于淫威，心存余悸，不敢怒也不敢言。1956年毛泽东对中共的肃反充分肯定，他说：“还有反革命，但是已经大为减少。”他还提出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的方针，即百分之九十几不捉（《毛泽东选集》第五卷281页），似乎进入了太平盛世。到了1957年，怎么突然冒出了数百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呢？尽管以“反右”之名，将上百万知识分子置于“无产阶级专政”铁蹄之下，禁锢起来。接踵而至的却不是“天下太平”“五谷丰登”，而是“三年饥荒、十年浩劫”。动乱非但不止而且愈演愈烈呢？

苏联和东欧1956年的动荡乃至以后的剧变，靠高压建立起来的所谓社会

主义阵营终于分崩离析，并不是因为肃反不彻底，更不是因为那些国家没有一个好男儿，而是那些国家内号称共产主义者的领导人长期视人民为奴隶，对人民实行暴政的必然结果。苏联和东欧举国皆为好男儿，在重重铁幕的黑暗统治之下，在党治高于一切，特务横行无忌的环境中，韬光养晦，厚积薄发，逐渐觉醒的人民终于推翻了布尔什维克主导的以列宁斯大林为首要人物的专制独裁的反动统治。

长期以来，中共一直宣扬前苏联的解体和前苏共的灭亡，是美国的和平演变战略起了极大作用，但从一些前苏联领导人的反思中，我们看到这种作用绝非中共宣扬的那样大，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前苏联政治制度的内部原因。

关于苏联解体和苏共灭亡的说法纵有千条万条，归根结蒂的原因是前苏联长期执行反人民反民主的政治制度。

请看一些前苏联领导人的反思：

针对苏联的解体，俄罗斯总统普京曾说：“谁不为苏联解体而惋惜，谁就没有良心；谁想恢复过去的苏联，谁就没有头脑。”

苏联前总理雷日科夫说：“我们监守自盗，行贿受贿，无论在报纸、新闻还是讲台上，都谎话连篇，我们一面沉溺于自己的谎言，一面为彼此佩戴奖章。所有人都这么干，从上到下，从下到上。”

俄罗斯现任总理梅德韦杰夫在接受《消息报》的采访时说：“过去苏联那种不顾人民死活的现代化”，“给国家争面子的现代化”，“领导人对军事威力的崇拜的现代化”，以及为了“炫耀帝国光荣的现代化”，所有要让民众成为所谓的“国家成功”的受害者的发展模式，都被实践证明是背离了人类文明的。

在苏共亡党十周年的祭日，俄共中央委员会主席久加诺夫[1]曾尖锐地指出：苏联解体、苏共亡党的根本原因在于三垄断：“意识形态垄断，大搞一言堂（对新闻与意识控制）；权力垄断，大搞政治暴力（即一党执政）；利益垄断，大搞特权（即经济特权）。 ”

俄罗斯第一副总理舒瓦诺夫在接受凤凰电视台记者采访时则认为：人治与半计划半统治经济体制是导致苏联解体的重要因素。

苏共以凌驾于政府与法律之上的特权，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组织人事上、财政上享受特权，成为不折不扣的官僚特权集团。把共产教义写入宪法，“合法”地剥夺公民的政治信仰自由，实行强迫信仰、全民服从。苏共政治洗脑和政治传销是通过国民实施系统化、工程化的洗脑教育和热爱党、顺从党、把一切奉献给党的奴化教育来实现的。对于洗脑不成的、不接受政治传销者，苏共采取全面专政、武力镇压、肉体消灭之方针。古拉格群岛式的监狱遍布苏联各地[2]，苏共防民甚于防贼。为了维持三垄断的特权，苏共在政府、军队、警察等各个部门派驻党委，把政府、军队、警察变成苏共的党产，变成监视人民、恐吓人民、镇压人民的工具。通过实施三垄断，苏共拥有超越法律和政府之上的组织特权、财政特权、新闻垄断权等一系列特权。苏共是苏联境内唯一可以自由发展党员的政党，苏共严密地掌控了报纸、通讯社、电台等传媒机构，所有传媒都要姓党，都是党的喉舌。苏共不仅向政府、军队、企事业单位派出常驻党委，苏共还设立有专门管理军队的军事委员会，还有管理司法、检察的专门部门，财政特权方面，苏共的活动资金由国家财政无条件供给。由于不存在资金问题，苏共建立了庞大的组织机构，党校、党报、党史办、各级党委、军队里面的政委等等。如此庞大的

组织机构如果不是寄生于国家财政，根本就无法维系。这些都是只有苏共才能拥有的特权。尽管苏共把苏联造成了一个用合金钢加固的铁桶，然而，物极必反。按照久加诺夫的说法，以上所述的三垄断，就是苏共亡党的根本原因。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后来者理当引以为戒！

苏联之解体虽爆发于瞬间，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列宁的同代人普列汉诺夫和考茨基生前均曾预测，专制独裁的统治终将崩溃。南斯拉夫副总统德热拉斯（现译吉拉斯）的《新阶级》，指出“共产主义革命是以取消阶级为号召开始，但最后竟造成一个握有空前绝对权威的新阶级。它将留下人类历史上最可耻的篇章”。

蒋介石 1923 年赴苏联考察后在给孙中山的报告中也指出了苏共统治的弊端。毛泽东对斯大林的暴虐无道也不是没有觉察，但他基于暴君的本性，逆历史潮流而行。他认为必须彻底消灭“资产阶级”；强化改造、奴役知识分子；更加大力地镇压“反革命”；将中国的民主势力扼杀殆尽，让全国人民都成为他的驯服工具，也就是俯首听命的奴隶，方能去掉阻碍其独裁统治的心腹之患，完成其家天下的梦想。这就是毛泽东急于制造借口，掀起“反右”运动的缘由。

所谓“右派进攻”完全是毛泽东一手制造出来的，是他把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当作敌人对待的恶果。所谓“右派言论”大多是要求革除封建专制社会的弊病、以现代政治文明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的真知灼见和金玉良言。被毛泽东认定为毒草，加以扼杀，乃至言路闭塞，万马齐喑。终于招致了三年饥馑、十年浩劫。实乃深重之罪孽，1957 年的反右必须彻底否定。

“大鸣大放”则是毛泽东蓄谋已久、用尽心机想出来的办法。从 1956 年开始酝酿，1957 年初具体策划，随即煽动、诱惑，摆出一副唯恐天下不乱的架势，设置种种陷阱，意在“引蛇出洞”。联想 1942 年延安整风初期的“延安之春”和 1966 年文革起始的“炮打司令部”，就可以认知，这是毛泽东的一贯伎俩，也是他耍惯了的、自以为得意的阴谋手段。

如果真的有毒蛇，为除其害，引蛇出洞也不失为一种良策，问题在于根本不存在毒蛇，引出来的也不是毒蛇。清人黄遵宪《感事》诗云：“金玦庞凉含隐痛，杯弓蛇影负奇冤。”

毛泽东望风捕影，疑神疑鬼，臆造了被他称之为牛鬼蛇神的敌人，重蹈斯大林以残酷手段剪除异己、戮杀无辜的老路。

毛泽东出于绝对一元化领导（即“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需要；出于对波匈事件的恐惧；出于担忧自己死后遭受斯大林之厄运。他认为波匈事件之所以发生，是因为“肃反”不彻底；斯大林之所以被掘墓暴尸，是没有消除潜藏在身边的赫鲁晓夫。

毛泽东灵魂深处向往的是封建制、奴隶制的独裁专政，是“简在帝心，乾纲独断”随心所欲的极权统治。他认为民主思想、民主党派是推行独裁专政的最大障碍；他认为知识分子是倡导科学民主、追求独立自由的动力和载体；因而视千百万相信共产党真的要整风而直言相谏的仁人义士为毒蛇；视千百万出于维护中共政权、改善党群关系而仗义执言、针砭时弊的热血青年为猛兽；视千百万追求民主、维护宪法，志在振兴中华的爱国人士为牛鬼蛇神；必欲除之而后快，这就是他发起反右运动的起因。

毛泽东曾多次自喻为马克思加秦始皇，他的思想体系，的确与秦始

皇同出一辙，甚至更为暴戾恣睢。秦嬴政称帝后，置郡县、废分封、通沟渠、修长城、销兵器、建行宫；还要车同轨、书同文、度同尺、权同衡、钱同币、行同伦。嬴政强化独裁一意孤行，穷兵黩武好大喜功。劳民伤财导致民不聊生。禁锢百姓引起怨声载道。毛泽东登基后不仅建立了严酷的户口制度，限制了人民的活动范围和自由，还要严格管制人民的生活方式，强行统一人们的思想意识，即所谓触及灵魂，恨不得让世人皆成为他的驯服工具，盲目顺从，指鹿为马，任其随意驱使。故而在二十世纪还效法秦始皇焚书坑儒的倒行逆施，大力“反右”。目的是削弱民主党派，震慑知识分子，推行一党专政，强化独裁统治。

古今中外数千年历史证明，个人独裁达到巅峰之时，就是专制政权衰亡之始。

秦始皇的胡作非为不但没有起到延长其统治的作用，反而加速了秦朝的覆灭。毛泽东熟读史书，但并未领会到治国之道的真谛，他熟记的是阴谋和权术，他没有体察到秦朝二世而亡是暴政所致，反而认为秦始皇肃反不彻底，没有消灭张良、陈平等（1957年在青岛会议上毛泽东的讲话）。于是权令智昏地想超越秦始皇，妄图制造唯我独尊的清一色政治局面，厉行秦宰相李斯所谓“督责”之术，“灭仁义之途，掩驰说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聪掩明，内独视听。”自然这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既毁了他自己，也毁了中国共产党，更危害了中国人民。他向往的是生前唯我独尊，死后名垂千古。最终却落得个身败名裂、遗臭万年的下场。

毛泽东为《人民日报》写过一篇社论，即刊登于1957年7月1日的《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文中写道“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牛鬼蛇神只有让它们出笼，才好歼灭它们，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才便于锄掉。”

“阳谋”两个字不是1957年创造的新名词，1949年3月13日毛泽东在西柏坡做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总结报告时，就使用过“阳谋”这两个字。他在批判王明时说：“整风运动提高了同志们的嗅觉，缩小了教条主义的市场。有人说，这是阴谋，是要取而代之的。其实，这不是阴谋，而是阳谋，也是要取而代之”。在那次会议上，毛泽东彻底打倒了王明，他以胜利者的姿态对王明极尽讽刺、嘲笑之能事，志得意满，溢于言表。1957年毛泽东再次使用阳谋这个词，显示了反右阴谋得逞的洋洋心态。

毛泽东承认这是“谋”。既然是“谋”，就绝不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更不是“肝胆相照，荣辱与共”。谋是预谋、计谋、权谋、蓄谋，是圈套、是蛊惑、是诓骗、是陷阱。

阴谋也罢，阳谋也罢，毛泽东以骇人听闻的手段谋杀了数百万爱国的志士仁人，自以为得计，其实是威信扫地的开始、自掘坟墓的开始。1957年成了中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由此国内的政治、经济、文化每况愈下，逐渐演绎成三年饥荒、十年浩劫。祸国殃民，贻害无穷。玩弄阴谋或阳谋的人毋庸置疑地会遭到历史的唾弃，最终将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自称始皇，欲传万世，开中央极权之先河，树私家天下之基业的嬴政只传了二世，却落得千载骂名。就是先例。

毛泽东尝自誉为“马克思加秦始皇”，其实很不恰当。马克思是埋头书斋、愤世嫉俗的激进思想家，毛泽东是占山为王、心狠手辣的政治流氓。二人的性格修养、精神气质格格不入；作为草莽“革命家”、“山大王”，毛泽东的人

生经历、为人处事与天潢贵胄秦始皇亦相去甚远。毛泽东暴虐成性，妄图用严刑苛法统治民众，老百姓只能做驯服工具，不敢妄议腹诽。其结果是四面树敌。毛泽东在中国历史中必将遗臭万年。

时人有一对联：焚书坑儒思万世而家天下 嬴政何其愚也，
斩木揭竿将百人以族强秦 陈涉不亦雄哉。

附注：

[1]安德列耶维奇·久加诺夫是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俄罗斯国家杜马共产党党团领导人。1944年出生于奥尔洛夫州翟特涅茨区梅姆单诺村的一个三代教师世家。中学毕业后在中学当过教师。随后被保送到师范学院深造。大学二年级时应征入伍。1966年在军队中加入苏联共产党。从师范学院物理数学系毕业后又到社会科学院读研究生，获得哲学副博士学位。曾在师范学院高等数学和哲学教研室任教。从1967年开始从事工会、共青团和共产党的工作。任过共青团区、市、州委员会第一书记，苏共州委会宣传鼓动部部长。1983年—1989年任苏共中央宣传部局长；1989年—1990年，任苏共中央意识形态部副部长，主持研究俄罗斯的历史问题。1991年苏联解体后，成立俄罗斯共产党。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中央书记。1992年任俄罗斯人民爱国力量委员会主席、俄罗斯杜马两主席之一，是俄罗斯著名的政治活动家。

[2]《古拉格群岛》(Архипелаг Гулаг)是由苏联作家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著作的一部反映苏联奴隶劳动和集中营故事的书。中文译本由群众出版社1996年12月出版。此书创作于1962年至1973年间。这部长达140万字的巨著，堪称苏联列宁和斯大林时期法制历史最精炼的描摹。获诺贝尔文学奖。实际上前苏联并没有古拉格群岛这个地理名称，它是索尔仁尼琴的一种比喻说法，索尔仁尼琴把整个苏联比作海洋，在这个海洋上处处皆是监狱和集中营的岛屿，他把这些岛屿称为古拉格群岛。作者在古拉格集中营中生活过，是书中事件的目击者和第一手材料的获得者，他出狱后采访了270位人士，为书中所写的事提供了证词。

(1) 毛泽东蓄谋反右由来已久

“反右”这个词是不准确的，既已约定俗成，暂且姑妄用之。事实证明，绝大多数即99.99%的所谓右派分子都是人为制造出来的。毛泽东死了以后，中共中央承认均系错划，公开宣布予以改正。既然都不是右派，反右岂不成了没有目标的抽象术语，当时反的是什么呢？正确的答案应该是：反人民，反民主。

1956年波匈事件后，毛泽东施展一系列阴谋与阳谋，发动的是一场反人民、反民主的极权专制运动。主要目的是：整肃民主党派、威慑知识分子、压抑自由思想、遏制民主思潮。

笔者写本段落的时间是2012年6月，恰是反右运动五十五周年。浏览相关资料发现，近二十年研究整风反右的学者颇多，动机与目的各异，观点和结论纷呈。研究者的出发点不一样，对同一事件往往会作出不同的解释，这应该是允许的，也是可以理解的。当然，在各陈己见的解释或答案中，只有一个是接近正确的。历史学家的责任是通过认真的考据、缜密的论证，让人们知道历史事件的本来面目，而不是涂脂抹粉或美容整形。

现在流行的对五七年反右运动的说法大约有七八种，有的说，毛泽东本意是整风，右派分子借机猖狂进攻，才不得已转为反右；有的说，整风

进行过程中，极少数人的过激言论，刺伤了毛泽东的自尊心，迫使毛泽东反击；有的说，毛泽东高瞻远瞩，洞察秋毫，做了整风与反右两手准备，右派分子言论出格，导致毛泽东先行反右；有的说，毛泽东是叶公好龙，本来想和风细雨的整风，但听到右派分子的言论，似乎有兴风作浪之感，所以赶快反右；有的说，整风的失控才导致了“反右”的大逆转；有的说：毛泽东预谋利用群众的不满情绪攻一下在八大期间压制他的政治对手，不料鸣放的矛头对准了他本人，因而恼羞成怒，急着转向大力反右；

以上这几种说法，都是以当时确实存在着“右派分子”，并且这些右派分子曾经“猖狂进攻”为前提的。二十二年后复查证明，99.99%的右派分子都属于错划，既然右派分子均属于虚乌有，所谓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过激言论、言论出格、兴风作浪等等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无皮之毛，纯属诬陷捏造了。

当然也有的说，毛泽东从一开始就预谋反右，以整风的名义整肃民主党派，打压知识分子。

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概括而言大体上可归纳为两派：

一派认为：以整风为名行反右之实，是毛泽东的预谋；百家争鸣是“引蛇出洞”的策略；五七年整风是一场压制民主的极权运动。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慎之（《毛主席是什么时候决定引蛇出洞的》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副主任杜光（《反右运动与民主革命》《当代中国研究》2007年第3期），前水电部副部长、曾任毛泽东兼职秘书的李锐（《毛泽东与反右派斗争》《炎黄春秋》2008），和众多亲历过反右运动的人士持此观点。

另一派认为：毛泽东确曾设想整风，希望借助党外知识界力量，通过“和风细雨”的方式，遏制共产党内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只是由于右派分子“妄图推翻”才转向反右。著名学者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沈志华在其2010年所著《一九五七年整风运动是如何开始的》一文中持此观点。中共中央党校的年轻教授韩钢在香港等地演说并摄录视频，广为传播，表达了同样论点。中共官方大力宣扬这个论点，文章甚多，附和者众。

经历过1955年反胡风和1957年反右运动的知名作家舒芜曾言道：毛泽东当时并没有“引蛇出洞”的想法。舒芜还说：“我为什么有这样一个判断呢？就是因为我亲自听了他的讲话。一个人假也不能假到那个程度吧，何况是毛泽东。这种感觉只有到了现场才会有。”舒芜没有提出可靠的论据，只凭个人感觉，就下了这个断语。尽管他到过现场、听到过毛泽东的声音，有了美妙的感觉，似乎对毛泽东崇拜得五体投地，在反胡风活动中，他交出了不少私人信件，终于将胡风打成了反革命分子，乃至让胡风坐了二十多年监狱（毛泽东死后五年，中共中央确认胡风一案是冤假错案，予以平反）。事实证明，舒芜的“感觉”是完全地错了，脑子里灌的是满满的迷魂汤。他对毛泽东阴险伪善的本质全无察觉，以致自己最终也没有逃脱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厄运，还落得一个卖友求荣的恶名，被众人鄙视，称其为出卖耶稣的犹大，抑郁终生，带着无限的遗憾见上帝去了。（笔者注：翻阅有关资料发现，胡风早在舒芜交信之前曾检举揭发舒芜是叛党分子，只是未引起中共高层的注意。实质上，胡风事件是中共建国后胡风和周扬争夺文艺理论界话语权的政治斗争，毛泽东倾向于维护周扬，由此胡风被打成了反革命。为什么人们恨犹大而不恨下令把耶稣钉上十字架的罗马总督呢？谁是胡风事件的罪魁祸首，应该是

很明白的事了吧。)

中年学者孙其明在《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03期著文,用十分武断的语气说:“从整风转向反右发生在1957年5月中旬,其根本原因在于整风鸣放中社会各界对党的缺点错误提出的尖锐批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民主化诉求、民主党派中活跃分子基于参政的欲望而提出的各种要求,均大大超出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所能接受的限度,促使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改变整风的初衷,作出了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要造反”的论断,并下决心开展反右运动。”

孙其明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咬定了整风转向反右的具体时间,精确到以日计算;概无根据地判定社会各界对中共的缺点错误提出尖锐批评是“整风”转向的根本原因。难道缺点和错误是不允许批评的吗?主观推断民众的诉求和民主党派中某些活跃分子的要求超越了毛泽东和中共预设的“限度”。但没有说明究竟什么是“限度”,五月中旬以前什么时候宣布过“限度”和“限度”的具体范围。谁超越了什么限度;凭空臆测毛泽东被迫改变了“整风”的“初衷”,但没有说明“初衷”包含的内容和改变了什么;毫无疑问地认定知识分子“要造反”是促使中共下决心反右的起因,却没有指出哪些人造了什么反,有什么“要造反”的罪证。孙其明所言各点均缺乏深入的考据,仅仅是空泛的有论无证,逻辑上也很混乱,似乎都站不住脚,不值一驳。

还有一类作者,如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奚兆永,奚先生年近耄耋,值得尊重。据称常在《毛泽东旗帜网》、《乌有之乡网》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网》等国内知名“左”派网站发表文章,扬言其文章被多人博客转载,沾沾自喜,引以为荣。某日晚饭后,我得一小空,打开电脑偶然随机欣赏其文,希望能从中汲取教益。认真读来只感觉奚兆永教授善于拉虎皮作大旗,处处引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证明毛泽东的伟大。但是毫无逻辑,了无证据,更无理论。奚先生对与其观点不同的作者大加鞭伐,费尽思索也没有找到合适的术语。于是给别人扣了许多“攻击”“污蔑”“一派胡言”等帽子。辱骂和恐吓绝不是战斗,其文章只是情绪化的宣泄,且有不少错别字,颇有文革初期红卫兵书写大字报的遗风。愚以为不堪入论文之流。既不入流,为节省时间在此暂不讨论了。

究竟哪一个论点更符合实际呢?在毛泽东的内心深处。中国知识分子到底处于什么位置呢?他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打压知识分子呢?这需要广泛收集资料,认真研究毛泽东的言行,佐之以旁证再下结论。本文仅举毛泽东成年以后形成文字的几个例证,供读者辨识。

1、1951年出版《毛泽东选集》时,毛泽东亲自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定为开篇之作。该文写于国共合作时期,当时毛泽东任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汪精卫推荐他当上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毛泽东的这篇文章相继刊登于《革命》1925年12月号,《中国农民》1926年2月号,《中国青年》1926年3月号,并在广州和汕头发行了单行本。载入《毛泽东选集》的文章与原文相较,篇幅缩减一半,内容面目全非,该属另当别论之作了。

1925年出版之原文把中国社会各阶级划分为五大类,即:大资产阶级,中产阶级(1951年出版的《毛选》明确“中产阶级”主要是指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原文曰:第一类“大资产阶级”包括买办阶级、大地主、官僚、军阀和反动派知识阶级,毛泽东强调:“反动派知识阶级——上列四种人附属物,如

买办性质的银行工商业高等员司，军阀政府之高等事务员，政客，一部分东西洋留学生，一部分大学和专门学校的教授、学生，大律师等都是这一类（笔者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应该划在这一类吧）。这一个阶级与民族革命之目的完全不相容，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乃极端的反革命派。其人数大概不出一百万，即四万万中四百分之一，乃民族革命运动中之死敌。”

对于第二类，原文曰：“中产阶级包括华资银行工商阶级，小地主和许多高等知识分子。”“高等知识分子——华商银行工商业之从业员，大部分东西洋留学生，大部分大学专门学校教授、学生，小律师等都是这一类。”毛泽东把这类知识分子分为右翼和左翼，小地主家庭出身的留学生和大学生是中产阶级的“右翼”，因为他们“染受了许多资本主义国的洋气”，而且与教会、买办阶级有联系。毛泽东断定：只要国民革命的争斗加紧，他们“一定会站入帝国主义一边，一定变为完全的反革命，一定会成为我们正面的敌人。”原书所附表格“中产阶级对于革命的态度”一栏中写明：“右翼邻于反革命，左翼有时可参加革命，然易与敌人妥协，全体看来是半反革命。”文章结语说：“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应该把他当做我们的敌人——即现时非敌人也去敌人不远；其左翼可以把他当做我们的朋友——但不是真正的朋友，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不要让他乱了我们的阵线！”

对于第三类，即“小资产阶级”。原文说：“如自耕农，小商，手工业主，小知识阶级——小员司，小事务员，中学学生及中小学教员，小律师等，都属于这一类。”毛泽东将这类人分为左、中、右三部分，断言其左翼“欢迎”革命，中间派平时可保持中立，右翼“平时近似中产阶级之半反革命”。

从毛泽东早期的著作中可以看出，他从投入政治生涯开始，敌视知识分子的心态就已经萌生了。1925年，他以共产党员的身份任国民党的宣传部长，拿着国民政府的薪水，口头上叫嚷着与民族资产阶级合作，其内心深处却认定当时的大部分知识分子不外乎“极端的反革命派”“民族革命运动中之死敌”“完全的反革命”“正面的敌人”“全体看来是半反革命”。即使被他称为左翼的也只是“可以把他当做我们的朋友——但不是真正的朋友，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不要让他乱了我们的阵线！”

毛泽东在文章结语中说：全国四万万中，大资产阶级一百万人，中产阶级四百万人。“我们真正的敌人有多少？有一百万。那可友可敌的中间派有多少？有四百万。让这四百万算做敌人（笔者注：既然是可友可敌，为什么不争取做朋友而非要算做敌人呢？概因毛泽东骨子里是怀疑一切，仇视一切的），他们也不过有一个五百万人的团体，依然抵不住三万万九千五百万人。”（笔者注：毛泽东在这里玩了一个花招，毫无根据也毫无证据地把他自己列入了三万万九千五百万人之中，历史证明，毛泽东除了口头上喊过“为人民服务”以外，实际上他一直是“伟大领袖”“大救星”自居的。人民在他的心目中是驯服工具，是奴隶，是草芥。）显而易见，中共建党不久毛泽东就把中产阶级划入敌对营垒，为了实现他心目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中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是要被消灭的。

谁是毛泽东最信赖的依靠力量呢？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有这么一段话：“我这次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所得到的最重要的成果：即流氓地痞之向来为社会所唾弃之辈，实为农村革命之最勇敢、最彻底、最坚决者”[1]。毛泽东一生唱着革命的高调，高叫着“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这是毛泽东1939年12月21日在延安各界庆祝

斯大林六十寿辰大会上的讲话中说的，公开发表于1949年12月20日的《人民日报》）。殊不知革命与造反是有原则区别的，革命具有正义性，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事业。造反是含有贬义的，古今中外的历史发展证明，那些以地痞流氓为主力的造反者即使夺取了政权，也只能是混世魔王掌权，建立一个蒙昧、野蛮和反人类的极权专政体制。只能称为造反，不能称为革命。他们在夺取政权后所开展的有组织和大规模的血腥迫害，与他们根深蒂固的土匪政治理念和草寇意识形态，是一脉相承的。于人民是有害无益的。中国历史上的赤眉、黄巾、铜马、黄巢、李自成、洪秀全等皆利用社会底层民众对吏治腐败、赋役繁重、赏罚不平等弊端的不满，聚众造反，大多提出过均贫富的口号，假借“均贫富”烧杀抢掠，一时得逞，有的造反首领还做了一阵子皇帝，照样严刑苛法，贪图自我享乐。对推动社会进步并无大益。众多民众深受其害。

1950年初，毛泽东在内部一次谈话中谈到知识分子时，说过这样一些惊人之言：中国知识分子不外乎两类：一类是读书越多越糊涂；一类是知识越多越反动。毛泽东解释：第一类是封建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他们读的是孔孟之道，所以读得越多越糊涂；第二类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接受个人民主思想，越多就越反动。基于这种观念，他把众多知识分子列入敌人的范畴就不足为奇了。利用血腥手段压制民主，剿杀和奴役知识分子成了终其一生的事业，五七年的反右是一个大的战役。庆父不死，鲁难未已。流毒不除，国无宁日。对毛泽东的错误思想和罪恶行径必须彻底批判、认真清算。

2、大量吸收知识分子与抢救运动。1937年9月6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前，当地极度缺乏知识分子，文盲率高达99%。为了不断扩大地盘，建立割据政权，拉拢民主人士，开展统战工作，瓦解国民党统治，中共中央意识到急需与国民党争夺知识分子。毛泽东为此写了一篇文章《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并宣布了一系列宽容的优待政策。由此，大后方的知识分子蜂拥而入。当时奔赴延安的知识分子大体可归为三类，即叛逆者、逃亡者、追求者。第一类是因思想、政治、道德等被视为离经叛道而受到追捕、监禁的文化人，如丁玲、艾思奇、范文澜、艾青等人；第二类可称为逃亡者，包括因事业失意而另觅出路，如在上海论战“国防文学”的周扬，参与“两个口号论争”的徐懋庸；或情场失意而离开原住地的人，如与鲁迅、许广平陷入感情纠葛的高长虹；以及因故土沦陷而被迫远离家乡的人，如“九一八”后流落重庆、桂林的东北文人肖军、罗烽、舒群等；第三类是或为生计，或为信仰，或为理想或兼而有之的追求者，如王实味，冼星海、何其芳、茅盾、朱光潜、沈鸿等。任弼时1943年12月在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说：“抗战后到延安的知识分子总共四万余人，就文化程度而言，初中以上占71%”。

抗日中期，爱国军人在前方浴血奋战，大后方军民节衣缩食，抵御着日寇狂轰滥炸，捍卫着中华民族的尊严。中共却蜷缩在延安用了三年多时间大肆争权夺利，名之曰整风。青年知识分子从全国各地涌入延安后，接触到现实，由于原来的生活环境、文化层次不同，门派杂陈，异想纷呈，观念有别，信仰差异。毛泽东一方面殚精竭虑玩弄阴谋打倒王明等对手，奚落张闻天等人为教条主义，以阴谋手段褫夺张国焘兵权逼其出走，驯化周恩来等人为其奴仆，得以坐上了延安第一把交椅。一方面想方设法控制知识分子的思想言行，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他效法秦始皇，竭力打压知识分子。在1942年开始的“整风”和“抢救运动”中，知识分子被说成是“原罪”的载体、

“异端”的传播者，惨遭恐吓和迫害。仅延安那个弹丸之地的各种学校、党政机关单位，共揪出一万五千个特务。轮番批斗，坦白交代。1926 年在北京大学读书时即曾参加共产党的王实味，在延安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副刊上发表杂文《野百合花》[2]，批评延安干部待遇上“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等级制度”，并响应整风的号召在墙报《矢与的》上鼓动群众向“大人物”提意见，惹怒了毛泽东。被定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和“组织五人反党集团”，遭连续批斗关押，神经失常，1947 年行军途中被砍首后丢入枯井。

历史经验证明，毛泽东只允许知识分子俯首听命，做他的驯服工具，不允许民众有丝毫异见。严禁“妄议”和“腹诽”。1910 年秋，他在东山小学写过一首《咏蛙》诗：“独坐池塘如虎踞，绿杨树下养精神。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3]。夜郎自大、唯我独尊的思想伴随了他的一生，直至死亡。但无论怎么美化，毛泽东终究只是个池塘里的癞蛤蟆，只能搅浑一池水，不废江河万古流。

3、1949 年 3 月，中共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召开七届二中全会，公报宣称，今后国内的基本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在毛泽东的眼里，知识分子历来被视为资产阶级的附属物，乃皮上之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以强化阶级斗争的理论为指导思想，知识分子便成了革命的对象。当时界定的知识分子，包括大中专学校的教授、教师、作家，文学艺术界人士，新闻、出版界的编辑、记者、翻译，科技界的科学家、研究人员，学者，理论工作者，工程技术人员，以及医药卫生界的医生，专业人士和大学生等，全国约有五百万人。1950 年 6 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的发言中指出：“帝国主义在我国设立的教会学校和宗教界中的反动势力反对我们，这些都是我们的敌人。”又说，“知识分子中的一个相当多数，与国民党、蒋介石反动政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崇洋媚外、媚美，与我们格格不入，必须进行思想改造。”在毛泽东眼里，相当多数知识分子都被划入敌人的范畴，都是改造的对象。只能任由俯仰，毫无人权可言。

4、早在 1945 年 4 月，重庆谈判之前，毛泽东在中共召开七大之际就曾说：“我们战胜蒋介石、革命成功以后，主要的斗争对象就是民主党派了”。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中说了这样一段话：“自由资产阶级也同我们争领导权，不要以为自由资产阶级就革命得不得了，同共产党差不多。自由资产阶级也有它独立的意见，有它独立的政治团体，现在就是民主同盟。”（《毛泽东文集》第三卷第 306 页）。他还说：“民主同盟是旧民主主义，我们是新民主主义，这是基本的区分（《毛泽东文集》第三卷第 386 页）。不知道民主同盟的领导人读到毛泽东上述文章时怎么想的，如果早一点读了、懂了，就不会有五七年那档子事了。

1947 年 10 月，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必须将革命战争进行到底反对刘航琛一类反动计划的指示》，其中说：“等到蒋介石及其反动集团一经打倒，我们的基本打击方向，即应转到使自由资产阶级首先是其中的右翼孤立起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六册，第 512—513 页）毛泽东审稿时加写了如下一段话：“在蒋介石打倒以后，因为自由资产阶级特别是其右翼的政治倾向是反对我们的，所以我们必须在政治上打击他们，使他们从群众中孤立起来，即是使群众从自由资产阶级的影响下解放出来。但这并不是把他们当作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一样立即打倒他们，那时，还将有他们

的代表参加政府，以便使群众从经验中认识他们特别是其右翼的反动性，而一步一步地抛弃他们”（《毛泽东文集》第四卷，第312页）。这段话表明，早在1947年毛泽东就确定了民主党派必将被抛弃的命运。而不是1957年的临时动议。后来所谓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都是欺人之谈。民主党派的诸位领导人对此似乎毫无觉察，于是只能束手就擒了。

1947年11月30日，毛泽东曾致电斯大林，就在未来的政权中排除民主党派，推行一党专政之事做过请示，电报中说：“中国革命取得彻底胜利的时期，要像苏联和南斯拉夫那样，除中共之外，所有政党都要离开政治舞台，这样会大大巩固中国革命。”斯大林拖到1948年4月20日才予以回答，他不同意中共立即排除民主党派，直截了当地说：中共在保持自己领导地位的同时，应该同民主党派合作，成立联合政府（《毛泽东同斯大林往来书信中的两份电报》载于《中共党史研究》2001年第2期）。毛不敢抗命，中共才在第一届政府机构里安排了几个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作为“联合政府”的点缀。这成了他耿耿于怀的心事，对民主党派他是必欲除之而后快的。

从1947到1957年这段时间，毛泽东、周恩来二人费尽心机、弄权使谋，对民主同盟及其他民主党派极尽拉拢、渗透、分化、瓦解、招安、控制之能事。1957年反右运动的主要目的就是剿杀民主党派，毛泽东倚仗权势和阴谋与阳谋达到了目的，此后，中国的民主党派就名存实亡了。只能充当几个政治花瓶，成了装点门面的摆设。

5、193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中说：“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多数是可以归入小资产阶级范畴的”（《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04页）。1957年3月8日，毛泽东着力于制造打击知识分子的舆论，他和文艺界代表谈话时说：“有人问资产阶级思想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区别，我就分不出来。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属于一个范畴。”“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反动起来，也很厉害”。“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光看出身，我指的是他们接受的是资产阶级学校教育，而资产阶级是按照它的利益来教育人的”（《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252页）。四天之后，他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说：“我们现在的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是从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有些人即使出身于工人农民的家庭，但是在解放以前受的是资产阶级的教育，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273页）。

好一个毛泽东！早先说中国的知识分子多数是归入小资产阶级的，十八年后，他的马列主义水平该是提高了吧，居然说分不出来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了，看来是越来越糊涂了，越来越蛮不讲理了。他还说：“即使出身于工人农民，因为受过资产阶级教育，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按照这个说法，五十年代的中国还有不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吗？出身于地主富农官僚家庭的邓小平、毛泽东、周恩来随便怎么也逃不脱是地主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毛泽东之所以信口雌黄，在于他正在酝酿一场整肃知识分子的运动，称之为反右派斗争。善良的中国知识分子还以为他真的要整风呢。

6、毛泽东在反右前后的言论和动作

1949年8月，毛泽东进入北平不久，一面与民主党派的头目游园品茗，吟诗唱和，笼络人心；一面耿耿于怀在新华社发表文稿，对民主人士予以抨击。“他们认为共产党是不好的，国民党也不见得好的”，“有些人口头上说拥护，

骨子里是看。”“他们的头脑中还残留着许多反动的即反人民的思想”他们“对美国存在有幻想”。（《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1429 页）

民主人士之所以支持或拥护共产党，就是基于共产党提出了“独立、自由、民主、富强的中华民主共和国”这个建国纲领。而毛泽东想的却是独裁专政，与口头上叫喊的“建国纲领”是背道而驰的。民主人士相信了那个“建国纲领”，执意要实行那个“建国纲领”，于是就成了毛泽东构建专制社会的最大障碍。他念念不忘的就是要整肃或灭绝民主党派。

1953 年 9 月，政权初步巩固。毛泽东在政务院会议上当众大骂梁漱溟，撕破了他礼贤下士的伪装，“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暴露了他对民主人士的仇视态度。

1956 年苏共批判斯大林以后，毛泽东面对国内外的种种压力，曾经设想适当“松动”，首先顾虑的就是民主人士。4 月 25 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给民主人士定性，提醒中共高层不要放松警惕，他说：“所有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虽然都表示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但是他们中的许多人，实际上就是程度不同的反对派。”（《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279 页）

波匈事件后，也就是 1956 年下半年，在毛泽东看来，要防止匈牙利事件在中国重演，维护他的专制统治，就必须打掉民主人士这个心头之患，就必须根除民主、自由的存身之地。

1956 年 11 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说：“有几位司局长一级的知识分子干部，主张要大民主，……就是采用西方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度，学西方的‘议会民主’、‘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那一套。他们这种主张缺乏马克思主义观点，缺乏阶级观点，是错误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323 页）

“你要搞资产阶级大民主，我就提出整风，就是思想改造。把学生们统统发动起来批评你，每个学校设一个关卡，你要过关，通过才算了事。”（《毛泽东选集》第五卷，326 页）这段话一语道破了整风的目的就是整人，针对的是民主人士。他说这话的时间是 1956 年 11 月，在毛泽东看来，整风就是对应于大民主的反措施，还没整风呢就想着怎么反右了。比某些人说的 1957 年 5 月中旬才从整风转向反右早了至少半年。

1957 年 1 月 18 日毛泽东对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说：“如果天下有变，……地主，富农，资产阶级，民主党派，都要分化。他们老于世故，许多人现在隐藏着。”（《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333 页）。在毛泽东的眼里，这些都是潜在的敌人，是他必欲消灭的对象。

1 月 27 日他又说：“对民主人士，我们要让他们唱对台戏，放手让他们批评。……至于梁漱溟、彭一湖、章乃器那一类人，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放出来有利，……他们讲的话越错越好，犯的错误越大越好，要让他暴露，后发制人，不要先发制人。”（《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 355 页）

所谓“让他暴露、后发制人”，不就是“引蛇出洞”之意吗？

章乃器被毛泽东声色俱厉地点名时，身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任粮食部部长。在毛泽东眼里，章乃器早已被列入另册了。这就等于在党内公开宣布：对章乃器这类人是要算总账的。这时距中共中央宣布准备整风还有三个多月呢，这次省市党委书记会议实际上就是对民主人士“钓鱼”的党内动员会。当然是极端秘密的。

1957 年 3 月 21 日，毛泽东在南京对党内高级干部说：“不要误会我在这

里提倡妖魔鬼怪。我不是提倡这个东西，是想消灭它。而消灭的办法是让它出现。……我们要放，要硬着头皮让他们攻。有些知识分子害怕放长线钓大鱼。放长线钓大鱼也有一定道理。”

1957年5月，毛泽东主持撰写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说：“这一次批评运动和整风运动，是共产党发动的。毒草共香花同生，牛鬼蛇神与麟凤龟龙并长，这是我们所料到的，也是我们所希望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427页）

这里说的很明白，运动是共产党发动的，发动者都坦率的承认了，还有什么理由为其辩护说是“被迫反击”呢？

毛泽东对于利用“整风”做诱饵自鸣得意。1957年6月8日他在为中共中央起草文件时承认：“现在我们主动的整风，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使之分割在各个机关各个学校去演习，去处理，分割为许多小的‘匈牙利’，而且党政基本上不溃乱，只溃乱一小部分（这部分溃乱正好，挤出了脓包），利益极大。”（《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33页）

短短的几句话，毛泽东两次提及“主动”二字，而且明确了整风就是“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引蛇出洞”“聚而歼之”的阴谋不是昭然若揭了吗？作案的人都承认了，有什么理由为他翻案呢？

毛泽东的类似言论不胜枚举，为节省篇幅，此处不再赘述。

以上各点已充分说明毛泽东之所以在1957年大肆反右，不是一时兴起，也不是被右派分子“猖狂进攻”激怒，更不是从安心整风转向反右，而是一场蓄谋已久的反人民反民主的独裁专政运动。是一贯敌视知识分子的必然表现，是急于肃杀民主党派的霸道行径，白纸黑字历历在目，难道还有怀疑吗？

附注：

[1] 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首次全文发表在中共湖南省委机关报刊物《战士》1927年3月号上。1952年刊载于《毛泽东选集》时，删除了这一段话和“有土皆豪，无绅不劣”等口号。据当时的中共中央委员李维汉回忆：（1927年）毛泽东回湖南调查以后，在省委干部会议上作报告。他在报告里讲的贫农、赤贫，有的是指农村中的二流子、油子。这种人的确一无所有，革命起来，他打先锋……他有革命性的一面，但破坏性也大。毛主席开始作报告中很欣赏这一些人。这种人……东游西逛，到处赌钱，调戏妇女、械斗。我对毛主席说：“这种人，乡下老百姓是很不赞成、很不喜欢，很有意见的，你还提倡？”《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支持了“左”的倾向，这种“左”的倾向对以后土地革命时期杀尽土豪劣绅也有影响。1927年秋，红军在湖南南部一带搞武装暴动，每占一处就大杀大烧。后来中共领导人任弼时说：过去在湖南老苏区给了老百姓的一个印象，就是杀人杀得厉害。如在湖南暴动时烧了很多房子，杀了很多；在苏区内也杀了很多。老百姓对我们有恐惧心理。我们应该检讨过去在苏维埃时代杀人杀得太多。

[2] 王实味：《野百合花》全文如下（原载1942年3月13、23日延安《解放日报》“文艺”副刊）

一、我们生活里缺少什么？

延安青年近来似乎生活得有些不起劲，而且似乎肚子里装得有不舒服。

为什么呢？我们生活里缺少什么呢？有人会回答说：我们营养不良，我们缺少维他命，所以……。另有人会回答说：延安男女的比例是“十八比一”，许多青年找不到爱人，所以……。还有人会回答说：延安生活太单调，太枯燥，缺少娱乐，

所以……这些回答都不是没有道理的。要吃得好一点，要有异性配偶，要生活得有趣，这些都是天经地义。但谁也不能不承认：延安的青年，都是抱定牺牲精神来从事革命，并不是来追求食色的满足和生活的快乐。说他们不起劲，甚至肚子里装着不舒服，就是为了这些问题不能圆满解决，我不敢轻于同意。那么，我们生活里到底缺些什么呢？下面一段谈话可能透露一些消息。

新年假期中，一天晚上从友人处归来，昏黑里，前面有两个青年女同志在低声而兴奋地谈着话。我们相距丈多远，我放轻脚步凝神谛听着：

“……动不动，就说人家小资产阶级平均主义；其实，他自己倒真有点特殊主义。事事都只顾自己特殊化，对下面同志，身体好也罢坏也罢，病也罢，死也罢，差不多漠不关心！”

“哼，到处乌鸦一般黑，我们底××同志还不也是这样！”“说得好听！阶级友爱呀，什么呀——屁！好像连人对人的同情心都没有！平常见人装得笑嘻嘻，其实是皮笑肉不笑，肉笑心不笑。稍不如意，就瞪起眼睛，搭出首长架子来训人。”

“大头子是这样，小头子也是这样。我们底科长，×××，对上毕恭毕敬的，对我们，却是神气活现，好几次同志病了，他连看都不伸头看一下。可是，一次老鹰抓了他一只小鸡，你看他多么关心这件大事呀！以后每次看见老鹰飞来，他都嚎嚎的叫，扔土块去打它——自私自利的家伙！”

沉默了一下。我一方面佩服这位女同志口齿尖利，一方面惘然若有所失。

“害病的同志真太多了，想起来叫人难过。其实，害病，倒并不希望那类人来看你。他只能给你添难受。他底声音、表情、态度，都不使你感觉他对你有什么关怀、爱护。”

“我两年来换了三四个工作机关，那些首长以及科长、主任之类，真正关心干部爱护干部的，实在太少了。”

“是呀，一点不也错！他对别人没有一点爱，别人自然也一点不爱他。要是做群众工作，非垮台不可……。”

她们还继续低声兴奋地谈着。因为要分路，我就只听到这里为止，这段谈话也许有偏颇，有夸张，其中的“形象”也许没有太大的普遍性：但我们决不能否认它有镜子底作用。我们生活里到底缺少什么呢？镜子里看吧。

二、碰“碰壁”

在本报“青年之页”第12期上，读到一位同志底标题为“碰壁”的文章，不禁有感。先抄两段原文：

新从大后方来的一位中年朋友，看到延安青年忍不住些微拂意的事；牢骚满腹，到处发泄的情形，深以为不然地说：“这算得什么！我们在外面不知碰了多少壁，受人多少气……”

他的话是对的。延安虽也有着令人生气的“脸色”，和一些不能尽如人意的事物；可是在一个碰壁多少次，尝够人生冷暖的人看来，却是微乎其微，算不得什么的。至於在入世未深的青年，尤其是学生出身的，那就迥乎不同了。家庭和学校哺乳他们成人，爱和热向他们细语着人生，教他们描摹单纯和美丽的憧憬；现实的丑恶和冷淡于他们是陌生的，无怪乎他们一遇到小小的风浪就要叫嚷，感到从来未有的不安。

我不知道作者这位“中年朋友”是怎样的一个人，但我认为他底这种知足者常乐的人生哲学，不但不是“对的”，而是有害的。青年的可贵，在于他们纯洁，敏感，热情，勇敢，他们充满着生命底新锐的力。别人没有感觉的黑暗，他们先感觉；别人没有看到的肮脏，他们先看到；别人不愿说不敢说的话，他们大胆地说，因此，

他们意见多一些，但不见得就是“牢骚”；他们的话或许说得不够四平八稳，但也不见得就是“叫嚷”。我们应该从这些所谓“牢骚”“叫嚷”和“不安”的现象里，去探求那产生这些现象的问题底本质，合理地（注意：合理地！青年不见得总是“盲目的叫嚣”。）消除这些现象的根源。说延安比“外面”好得多，教导青年不发“牢骚”，说延安的黑暗方面只是“些微拂意的事”，“算不得什么”，这丝毫不能解决问题。是的，延安比“外面”好得多，但延安可能而且必须更好一点。

当然，青年常表现不冷静，不沉着。这似乎是“碰壁”作者底主题。但青年如果真个个都是“少年老成”起来，那世界该有多么寂寞呀！其实，延安青年已经够老成了，前文所引那两位女同志底“牢骚”，便是在昏黑中用低沉的声音发出的。我们不但应该讨厌这种“牢骚”，而且应该把它当作镜子照一照自己。

说延安“学生出身”的青年是“家庭和学校哺乳他们成人，爱和热向他们细语着人生……”我认为这多少有些主观主义。延安青年虽然绝大多数是“学生出身”，“入世未深”，没有“尝够人生冷暖”，但他们也绝大多数是从各种不同的痛苦斗争道路走到延安来的，过去的生活不见得有那样多的“爱和热”；相反他们倒是懂得了“恨和冷”，才到革命阵营里来追求“爱和热”的。依“碰壁”作者底看法，仿佛延安青年都是娇生惯养。或许因为没有糖果吃就发起“牢骚”来，至于“丑恶和冷淡”，对于他们也并不是“陌生”；正因为认识了“丑恶和冷淡”，他们才到延安来追求“美丽和温暖”，他们才看到延安的“丑恶和冷淡”而“忍不住”要发“牢骚”，以期引起大家注意，把这“丑恶和冷淡”减至最小限度。

1938年冬天，我们党曾大规模的检查工作，当时党中央号召同志们要“议论纷纷”，“意见不管正确不正确都尽管提”，我希望这样的大检查再来一次，听听一般下层青年底“牢骚”。这对我们底工作一定有很大的好处。

三、“必然性”“天塌不下来”与“小事情”

“我们底阵营存在于黑暗的旧社会，因此其中也有黑暗，这是有必然性的。”对呀，这是马克思主义，然而，这只是半截马克思主义，还有更重要的后半截，却被“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大师”们忘记了。这后半截应该是：在认识这必然性以后，我们就须要以战斗的布尔塞维克能动性，去防止黑暗底产生，削减黑暗底滋长，最大限度地发挥意识对存在的反作用。要想在今天，把我们阵营里一切黑暗消灭净尽，这是不可能的；但把黑暗削减至最小限度，却不但不可能，而且必要。可是，“大师”们不惟不曾强调这一点，而且很少提到这一点。他们只指出“必然性”就睡觉去了。

其实，不仅睡觉而已。在“必然性”底借口之下，“大师”们对自己也就很宽容了。他们在睡梦中对自己温情地说：同志，你也是从旧社会里出来的呀，你灵魂中有一点小小黑暗，那是必然的事，别脸红吧。

于是，我们在那儿间接助长黑暗，甚至直接制造黑暗！

在“必然性”底“理论”之后，有一种“民族形式”的“理论”叫做“天塌不下来”。是的，天是不会塌下来的。可是，我们底工作和事业，是否因为“天塌不下来”就不受损失呢？这一层“大师”们的脑子绝少想到甚至从未想到。如果让这“必然性”“必然”地发展下去，则天——革命事业的天——是“必然”要塌下来的。别那么安心吧。

与此相关的还有一种叫做“小事情”的“理论”。你批评他，他说你不应该注意“小事情”。有的“大师”甚至说，“妈的个X，女同志好注意小事情，现在男同志也好注意小事情！”是呀，在延安，大概不会出什么叛党叛国的大事情的，但每个人做人行事的小事情，都有的在那儿帮助光明，有的在那儿帮助黑暗。而“大人物”生活中的“小事情”，更足以在人们心里或是唤起温暖，或是引起寂寞。

四、平均主义与等级制度

听说，曾有某同志用与这同样的题目，在他本机关底墙报上写文章，结果被该机关“首长”批评打击，致陷于半狂状态。我希望这是传闻失实。但连稚嫩的小鬼都确凿曾有疯狂的，则大人之疯狂，恐怕也不是不会有的事。虽然我也自觉神经不像有些人那么“健康”，但自信还有着足够的生命，在任何情形下都不至陷于疯狂，所以，敢继某同志之后，也来谈平均主义与等级制度。

共产主义不是平均主义（而且我们今天也不是在进行共产主义革命），这不需要我来做八股，因为，我敢保证，没有半个伙伕（我不敢写“炊事员”，因为我觉得这有些讽刺画意味；但与他们谈话时，我底理性和良心却叫我永远以最温和的语调称呼他们“炊事员同志”——多么可怜的一点温暖呵！）会妄想与“首长”过同样的生活。谈到等级制度，问题就稍微麻烦一点。

一种人说：我们延安并没有等级制度；这不合事实，因为它实际存在着。另一种人说：是的，我们有等级制度，但它是合理的。这就需要大家用脑子想一想。

说等级制度是合理的人，大约有以下几种道理：一、根据“各尽所能，各取所值”的原则，负责任更大的人应该多享受一点；二、三三制政府不久就要实行薪给制，待遇自然有等差；三、苏联也有等级制。

这些理由，我认为都有商量余地。关于一，我们今天还在艰难困苦的革命过程中，大家都是拖着困惫的躯体支撑着煎熬，许许多多人都失去了最可宝贵的健康，因此无论谁，似乎都还谈不到“取值”和“享受”；相反，负责任更大的人，倒更应该表现与下层同甘苦（这倒是真正应该发扬的民族美德）的精神，使下层对他有衷心的爱，这才能产生真正的铁一般的团结。当然，对于那些健康上需要特殊优待的重要负责者，予以特殊的优待是合理的而且是必要的。一般负重要责任者，也可略予优待。关于二，三三制政府的薪给制，也不应有太大的等差，对非党人员可稍优待，党员还是应该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以感动更多的党外人士来与我们合作。关于三，恕我冒昧，我请这种“言必称希腊”的“大师”闭嘴。

我并非平均主义者，但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却实在不见得必要与合理——尤其是在衣服问题上（笔者自己是所谓“干部服小厨房”阶层，葡萄并不酸）一切应该依合理与必要的原则来解决。如果一方面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面汤，青年学生一天只得到两餐稀粥（在问到是否吃得饱的时候，党员还得起模范作用回答：吃得饱！），另一方面有些颇为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以致下对上感觉他们是异类，对他们不惟没有爱，而且——这是叫人想来不能不有些“不安”的。

老是讲“爱”，讲“温暖”，也许是“小资产阶级感情作用”吧？ 听候批判。
王实味

笔者注：读者察觉出这几个写在墙报上的小段文章有什么剧毒值得杀头吗？然而王实味确确实实因此掉了脑袋，时年41岁。四十四年后（或者说毛泽东死了十五年后），在众多当事人的要求与奔走下，1991年王实味始获“平反”。被叫了一声“同志”。此时王实味被掩埋在枯井里几十年，人老了，脑袋和身体也已经分离多年了，是否能够听到这迟来的呼唤呢？这呼唤又是给谁听的呢？

[3]此首咏蛙诗被某些文人骚客吹捧为“伟人气度”“领袖胸襟”。据考证：唐太宗李世民曾写过一首咏蛙诗：独坐井边如虎形，柳烟树下养心精。春来唯君先开口，却无鱼鳖敢作声。明朝嘉靖年间浙江永嘉人张璁少年求学时被老师罚跪池边所作咏蛙诗：独蹲池边似虎形，绿杨树下养精神。春来吾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

声！明朝奸臣严嵩也曾作咏蛙诗：独坐池边如虎形。绿杨树下弹鸣琴。春来我不先开口，谁个虫儿敢作声。《英山县志》记载，清末湖北名士郑正鹄五短身材，其貌不扬，初授天水县令，当地官吏画《青蛙图》呈上，请郑县令题诗。郑正鹄将画卷展开一看，深谙画中寓意，遂当众挥笔题了一首七绝《咏蛙》：小小青蛙似虎形，河边大树好遮荫，明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17岁的毛泽东应试小学五年级时写的咏蛙诗算什么呢？是“伟人气度”“领袖胸襟”，还是抄袭、剽窃呢？

（2）毛泽东是怎样施展阴谋与阳谋的？

1956年，赫鲁晓夫揭开了斯大林黑暗统治的内幕，波兰、匈牙利人民掀起了波涛汹涌的民主浪潮。国内，周恩来、陈云提出了“反冒进”口号；中共八大作出了“反对个人崇拜，加强集体领导”的决议；修订的党章中取消了“毛泽东思想”的提法。

这一切，对毛泽东构成了巨大的冲击。

同时，由于“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的结束，私营企业均已公私合营，原属于资产阶级的人士虽然还活在世上，但作为一个阶级已不复存在。中国本就脆弱的资产阶级已处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管控之下，从理论上讲，阶级矛盾已经基本上消失，阶级斗争的观念需要一定的修正。用惯了“阶级斗争”这把大刀肆意乱砍乱杀的毛泽东，似乎受到了约束。

在这种大背景下，被迫处于战略守势的毛泽东，念念不忘阶级斗争，意欲用这个制造恐怖、加强独裁的武器。重新执掌绝对权力。

1942年，他假借延安整风，高叫“反对主观主义”、“反对宗派主义”、“反对党八股”的口号，矛头对准留学归来的、亲莫斯科共产国际的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以纵横捭阖、阴谋阳谋的手段彻底打倒了王明，降服了博古，贬低了张闻天，驯服了周恩来；通过对丁玲、王实味等人的批判和“抢救运动”，在中国共产党内树立了毛泽东个人的绝对权威。

1943年3月20日，毛泽东在中共总书记张闻天率“延安农村工作调查团”到晋西北进行调查研究时，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并推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张闻天回延安后正式将总书记一职移交给毛泽东。毛泽东取代张闻天，当上了中共中央主席，并且取得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共中央书记处的“最后决定权”，这才是毛泽东梦寐以求的命根子，嗣后几十年直到垂死之际，他始终紧紧地攥着，绝不撒手。有了这个权，他才可以独裁专断，为所欲为。这就是延安整风的出发点和目标。当年毛泽东用阴谋诡计达到了目的。

1956年上半年，斯大林逝世以后波匈事件尚未发生之时，毛泽东做的是霸主之梦。他想再度公演一齣“延安之春”。宣扬“民主”“自由”“新思维”，提出“人民内部矛盾”新理念；寻找一切机会表现他比斯大林更长于深谋远虑，选贤任能；比赫鲁晓夫更善于高瞻远瞩，运筹帷幄；妄图取代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地位。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论十大关系》。这篇文章中有许多惊世骇俗之笔，惜当时并未公开发表。现刊于《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中的文章是1975年7月邓小平组织几个秀才按照他的需要加工修改，报请毛泽东审阅后的定稿，内容文字已与原讲话稿大不相同。当

时已病入膏肓的毛泽东即使心有余，也力不从心了，只得在修改稿上歪歪扭扭地签了“同意”二字。

原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慎之保留了一份当时讲话的记录稿，在其后来所著文章中有些披露，譬如毛泽东曾说：

“也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甚至是反革命的力量。”

“人要有统一性，也要有独立性；要有纪律性，也要有无纪律；要有集体主义，也要有自由主义。”

“中央成立一个体制小组，专门研究如何划分权力。”

“美国发展快，其政治制度必有可以学习之处。我们反对它，只反对它的帝国主义。”

“苏联只有一个党，到底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看来还是几个党好。……共产党要万岁，民主党派也要万岁。”

“对犯错误的人要看他是否改，不犯错误的人是没有的，不要学习斯大林，斯大林对犯错误的人不让改正，这是不好的。”等等。

胡乔木是善于揣摩主子意图的奴才。他在讲述毛泽东 1956 年上半年的心情时说：“苏联揭露的斯大林的统治，其黑暗不下于历史上任何最专制暴虐的统治。毛泽东日思夜想走出一条比苏联好的路子来。”

毛泽东那时候在美妙的梦里似乎真的成了社会主义阵营的霸主。洋洋乎不可一世。

不料一觉春梦未醒，迎来多事之秋。到了下半年，波匈事件相继爆发，霸权主义频遭谴责，民主运动风起云涌。自由呼声逐潮高涨。迷蒙中毛泽东预感到社会主义阵营有土崩瓦解的危险，个人统治地位面临分崩离析的严重威胁。为了重振雄风，他故伎重演，刻意制造重大的社会矛盾。通过苦思冥想、精心设计了一个大骗局，即模拟 1941 年延安整风的做法，对外昭示共产党将开展反对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整风运动”，然后频频发表讲话，伪装谦恭地请求民主人士参与开门整风，貌似热忱地号召党外人士、知识分子给共产党提意见。真实意图在于寻找把柄、消除异己，巩固其梦寐以求的独裁统治。

1956 年，中共召开第八次党代会前后，毛泽东多次提出：要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技术革命上来；他公开说：在我国，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阶级矛盾已不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以及社会中的各种关系，以便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来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

毛泽东在党的八大预备会议第一次会上说：八大要把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作风切实反一下。

9 月 15 日，在八大开幕词中他又指出：这三风是违反马列主义的观点和作风，不利于党内的团结，阻碍我们事业的进步，必须通过思想教育来大力克服。

1956 年 11 月，中共中央召开八届二中全会，11 月 15 日，毛泽东在会上说：“我们准备在明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风是在我们历史上行之有效的办法。以后凡是人民内部的事情，党内的事情，都要用整风的方法，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而不是用武力来解决”。这是第一次披露整风信息。表面上，他高唱的是整顿共产党的不正之风，暗地里，他出于防范“波匈事件”，已经在构思如何“引蛇出洞”了。

为了不致使人怀疑他的阴谋，也为了消除人们对延安整风的余悸，他信誓旦旦地宣称：“这次整风运动，应该是一次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运动，应该是一个恰如其分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运动。”

“不要开批评大会，或者斗争大会。”“不论在座谈会、小组会上，进行批评的时候，或者个别交谈的时候，都应该放手鼓励批评，坚决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不应该肯定自己的一切，拒绝别人的批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1957年5月1日《人民日报》）

说得多么地好听动人，又是多么地委婉诚恳。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些都是口是心非的鬼话。是毛泽东惯用的骗术伎俩。

毛泽东一边宣扬整风采取和风细雨的方式，强调不用武力来解决，一边寻找各种机会极尽煽动挑拨之能事。在谈及少数人闹事时说：“现在，有这样一些人，好像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了。这样的人，群众反对他，打石头，打锄头，我看是该当，我最欢迎。而且有些时候，只有打才能解决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五卷325页）

他还举例说：“成都有一百多学生要到北京请愿，一个列车上的学生在四川省广元车站就被阻止了，另外一个列车上的学生到了洛阳，没有能到北京来。我的意见，周总理的意见是应该放到北京来，到有关部门去拜访。要允许工人罢工，允许群众示威。游行示威在宪法上是有根据的。以后修改宪法，我主张加一个罢工自由，要允许工人罢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325页）。

毛泽东这些讲话完全是谎言、骗局。1954年宪法是他在杭州被称为西湖第一名园的刘庄宾馆住了三个月，带领一套写作班子亲自过问编写的，当时他坚持不准写进允许罢工的条款。1957年夏天四川农学院刘天眷等九个学生组成了“赴蓉代表团”，打算从雅安到成都向中共四川省委、省政府、省高教局反映四川农学院有关迁校事宜和广大师生的意见。尚未成行，即遭到当权者组织的刁难与阻挠，此事在反右斗争中被定性为“四川农学院反革命闹事案”。九名学生无一例外地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和右派分子，锒铛入狱，押送到劳改、劳教场地服苦役去了。

1956年12月8日，在全国工商联座谈会上，毛泽东说：“我们的政府，是跟人民商量办事。可以叫它商量政府，不是板起面孔训人的，不是意见不对就给他一棒子，打得他头朝下，脚朝天。我们叫人民政府，你们有意见尽可讲，我们不会借故整人。”

1957年初，毛泽东对“引蛇出洞”“诱敌深入”“请君入瓮”已经匠于心、胸有定见，表面上却装模作样地说了许许多多沁人心脾、感人肺腑的娓娓动听之言，如：

1957年1月，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他说：“对党外人士，我们要让他们唱对台戏，放手让他们批评。”

“不允许工人罢工是不正确的，宪法上没有禁止罢工；贴标语是言论自由，开会是集会自由。”

“对付官僚主义，最好是罢工罢课打扁担，因为老不解决问题嘛！”

1957年2月16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中央报刊、作家协会、科学院和共青团的负责人开会，谈文艺思想问题。他反复强调“双百”方针，

再三说：属于精神世界的问题，属于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只能用说理的方法和争鸣的方法来解决，绝不能用压制的办法来解决。

在这次会上，毛泽东提出批判胡适的问题，他说：开始批判胡适的时候很好，但后来就有点片面性了，把胡适的一切全部抹煞了，以后要写一两篇文章补救一下。他还说“对康有为、梁启超也不能抹煞”。他强调说：对思想上有严重错误的人，有敌对思想的人，也要团结他们，改造他们。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贯彻“统筹兼顾，各得其所”。应该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以便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应该贯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笔下也是如此。

1957年2月27日，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毛泽东做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当着一千八百多名与会人员的面，他装作宽仁厚德的样子说：“左倾教条主义者，以前采用的党内斗争办法叫做‘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我们采用一个新方法，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

“我们找到一个公式：团结—批评—团结。或者说：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人民内部矛盾，都可以用这种方法：团结—批评—团结。六亿人口里头，可以发展到解除武装的敌人……一经解除武装，我们就用另一种态度对待他们了。对这些劳改犯的人，我们也是这个方法对待，从团结的愿望出发。”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现在不是放多了，是少了，应该再放。”

1957年3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无论哪种干部、政府，缺点、错误都应该接受批评，并且成为习惯。人民政府成了习惯，批评就没有事。批评对了，当然很好，批评错了，没有事，这就是言者无罪嘛！”

“人民是有批评权利的，宪法是应该实行的，言论、集会、结社、出版有自由。”（笔者注：毛泽东的上述言论没有一句是付诸于行的，都是骗人的鬼话。直到现在，当权者还声嘶力竭地叫唤不得“妄议”呢。）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什么叫长期？共产党有多少寿命，就是民主党派有多少寿命。如何监督？就是属于批评建议，用这些方法监督嘛！”

1957年3月6日，在九省市宣传文教部长座谈会上，毛泽东说：“我们对五百万知识分子，几亿农民、多少万民族资本家和民主人士，打是不适宜的。要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包括有杀父、杀夫、杀子之仇的，有些血肉相连被镇压的。”

1957年3月8日，在同文艺界人士谈话时，毛泽东又提到党要整顿三风，并说中央委员会要开一次会，发一个指示，今年准备，明年开始。

1957年3月10日，与新闻出版界代表谈话：“开会的时候，要党内外的人在一起，共产党不要关起门来开会。”

1957年3月12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面对三百八十多名中共宣传干部和一百余名特邀党外人士郑重宣布：“疾风暴雨的阶级斗争时代已经过去了”。毛泽东还说：“中央决定今年开始党内整风，方法是学习和研究一些文件的基础上，每个人检查自己的思想和工作。既要开展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纠正缺点和错误，又要和风细雨，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反对一棍子把人打死的方法。这次整风不再是狂风大雨，也不是中雨，是小雨，是毛毛雨，下个不停的毛毛雨。”

他还在会上大谈“党中央的意见就是不能收，只能放”。“放，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

“收，就是不许人家说不同的意见，不许人家发表错误的意见，发表了就‘一棍子打死’。这不是解决矛盾的办法，而是扩大矛盾的办法。”

会后，他又南下，分别在天津、济南、南京、上海等地作报告、搞座谈。宣传他的“新思维”，宣传“双百方针”和“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要求党内干部放心大胆地让民主党派和党外知识分子讲话，不要为此设置“障碍”。他还把自己的做法不无风趣地称为“游说”，轻松幽默地说：“我变成了一个游说先生”。中共中央的其他领导人，如刘少奇等也紧跟毛泽东，做了不少类似的演说，相互配合施展其阴谋。

1957年3月18日，毛泽东在济南安抚被阶级斗争斗怕了的知识分子说：“现在阶级斗争不斗了，阶级斗争停止了。现在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

4月11日，他将北京大学冯友兰、贺麟，上海复旦大学周谷城，中央民族学院费孝通等十余位教授请到中南海，对他们说：“我感觉你们这些当教授的被搞苦了。……我们现在要整风。我们党对整教条主义是有经验的，你们有什么意见尽管说出来，不会对你们怎么样的。”（《人物》1987年第5期91页）

听到毛泽东讲话，知识界和民主人士反应热烈。在场者没一个知道毛泽东正在谋划“把他们的政治资本剥夺干净”，更不知道二十天前毛泽东在南京党员干部会议的演说中把他们比喻成了狗：知识分子有一条尾巴，要泼它一瓢冷水。狗，泼它一瓢冷水，尾巴就夹起来了。

章伯钧听到毛的讲话“兴奋异常”，立即在民盟以个人名义进行了传达，民盟还印发了讲话记录稿。章伯钧对“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评价甚高，认为“这一概念的提出，是政治的，也是哲学的，虽是矛盾论的延续，但有其创造性。这个概念还是一把时代的钥匙，运用好了，能建立起一种社会主义的民主生活方式”。

罗隆基认为，这是“扫除党与非党间隔膜，加强团结的对症良方”，“不仅可以减少郁积，消除隔膜，并且是，是非愈辩愈明，真理愈争愈显，百川异流，总是同归于海”（《人民日报》1957年3月23日）。

储安平看到讲话的传达稿后，赞誉有加，立即建议九三学社中央转发。

傅雷当年在给家人的信中把自己的感觉和理解讲得更加具体：“那种口吻，音调，特别亲切平易，极富于幽默感”；“他的马克思主义是到了化境的。随手拈来，都成妙谛，出之以极自然的态度，无形中渗透听众的心”。（《傅雷家书》第158页。）

三、四月间，全国政协和各民主党派先后召开会议，与会人员交口赞扬，表示拥护毛泽东的讲话，也期待着整顿作风后的中国共产党提高治国理政的能力，使中国真正地独立、自由、民主、富强。

人们谈论最多的就是“双百”方针。

冯友兰称赞这一政策可以“保证我国学术的正常发展”（《人民日报》1957年3月16日）。

王蒙认为参加这次会议是“胜读十年书”。对自己的思想改造提出了新的课题。（《新华半月刊》1957年第10号）。

上海各界的普遍反映是：听了这个讲话以后，对今后的事业更加充满了信心。“好些过去不肯说话或不多说话的人，这次都解除顾虑，滔滔地畅所欲

言。好些座谈会上都有激烈的争论”。这种讨论已成为“上海知识界思想生活中的一件大事，给初春的上海，更增添了蓬蓬勃勃的生气”。（《人民日报》1957年4月16日）

许多人的心情正像费孝通的文章《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所说：“百家争鸣实实在在地打中了许多知识分子的心”，“百家争鸣的和风一吹，知识分子的积极因素应时而动了起来”（《人民日报》1957年3月24日）。

回想起来，五十五年前如果不是一场阴谋，毛泽东那甜言蜜语般的讲话能够落实一二，让爱国的知识分子把心里话说出来，让蒙受委屈的人把苦水倾吐出来，真正地实行一点点民主，中华民族的振兴是指日可待的，全面小康早已不在话下，富民强国绝非画饼充饥，更不是空幻的中国梦。遗憾的是六亿中国人民轻信了花言巧语，屈服于专政的压力，上了大当。至今有些人还在那里揉眼睛，寻找着东南西北呢。

1957年4月30日，毛泽东率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等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上约见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民主人士，就开展整风运动征询意见，参加谈话会的共计四十四人。

毛泽东在会上说：“现在已造成批评的空气，这种空气应继续下去。揭露出来的矛盾在报上发表，可以引起大家的注意，不然官僚主义永远不得解决。”

他还对各民主党派领导人说：“大学里如果对党委制有意见，可以考虑取消；教授治校，恐怕有道理。由邓小平同志负责找党外人士和中国民主同盟、九三学社等开座谈会，对有职有权和学校党委制问题征求意见。”

他指出：整风总的题目是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反对三个主义，非党员自愿参加，自由退出。

他强调：整风的办法就是有意见就说，党内外打成一片。表示热诚欢迎他们帮助共产党开展整风运动。

再次强调中共坚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1]

毛泽东面对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回顾前些日子的鸣放时说：“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希望对老和尚也提些意见。”

5月间，中共中央多次发出指示，严肃指出：从揭露出来的问题看，我们党内有一部分人存在着反人民的思想作风……党员不尊重党外人士，高人一等，盛气凌人，虽非全部，但甚普遍。这种错误倾向，必须完全扳过来，而且越快越好。

5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写成的社论《为什么要整风》，表示中共决心“使全体人民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有充份的自由、平等和主人翁的感觉”，此篇社论令许多人为之一振，以为从此真的有充份的自由，可以无所禁忌了，可以“不平则鸣”，“有气则放”了。

1957年5月3日毛泽东在接见保加利亚军事代表团谈到整风运动时说：对党的缺点和错误，要公开在报纸上批评。要党内党外一块来，大多数知识分子和党外人士是和党一道的。共产党的缺点可以公开批评，人民政府的缺点也可以公开批评，要使公开批评成为习惯，言者无罪。

1957年5月4日，中共中央颁发毛泽东起草的《组织党外人士继续对党的缺点错误展开批评的指示》，内中指出：“最近两个月以来，在各种有党外人士参加的会议上和报纸刊物上所展开的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分析和对于党政所犯错误的批评，对于党和人民政府纠正错误，提高

威信极为有益，应当继续展开，深入进行，不要停顿或间断……由党邀请党外人士开座谈会，请他们畅所欲言地对工作上的缺点错误提出意见。”

5月6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继续组织党外人士对党政所犯错误缺点展开批评的指示》。

5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为什么要用和风细雨的方法来整风》。随后，《人民日报》又以党员来信的形式，刊登了陶铸夫人曾志（时任广东省委）的一篇文章《应当怎样理解和运用和风细雨的原则》。

这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动向，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似乎都没有如此强调“和风细雨”的重要性。毛泽东心里很明白，提起整风二字难免不让人想起当年延安整风大搞刑讯逼供，令人毛骨悚然的往事。所以要让人写文章，鼓吹一下这次整风是和风细雨。看来中国共产党真的要一改“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为“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了。后来的事实证明，“和风细雨”是虚假的托词，腥风恶雨才是真实的手段，这是毛泽东施展阴谋诡计的组成部分。

从5月8日起，中共中央和地方相继召开大大小小的座谈会，广泛地按照预定名单邀请各界民主人士，征求对各级党组织的意见，实际上是“请君入瓮”。

1957年5月16日，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里又一次说：自从展开人民内部矛盾的党内外公开讨论以来，异常迅速地揭露了各方面的矛盾。这些矛盾的详细情况，我们过去几乎完全不知道。现在如实地揭露出来，很好。党外人士对我们的批评，不管如何尖锐，基本上是诚恳的、正确的。

就在发出这个指示的前一天，也就是5月15日，毛泽东秘密地写就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其内容和措辞与这个公开指示截然相反。16日发布的公开指示声称：“党外人士对我们的批评，不管如何尖锐，基本上是诚恳的、正确的。”15日拟就的秘密文件则咬牙切齿、杀气腾腾地说右派如何猖狂，要打一场大战，“诱敌深入”“聚而歼之”。

5月15日的秘密文件和5月16日的公开指示出自毛泽东一人之手，写作时间相距不过一天，但是内容迥然相异，措辞冰火不容。前者是写给党内高层人士看的，有许多秘密的指令，隐藏着血腥的杀机，是要落到实处的；后者是写给不明就里的群众看的，说了些动听的言辞，展现着长者的宽厚，是虚与委蛇的，是为了“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

毛泽东一身而兼四任，十足的两面派，地道的伪君子，狡黠的阴谋家，凶残的刽子手。

遵照毛泽东的布置，中共中央统战部从1957年5月8日至6月3日召开了十三次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国务院和中共中央统战部联合召开了二十五次工商界人士座谈会。全国各省（区）、地、市、县各级党委也纷纷召开党外人士、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由主要负责人亲自出面到各单位殷勤邀请当地各界精英与会，并恳请他们发言，帮助共产党整风。因此，1957年5月出现了知识界空前的“大鸣大放”的局面。

善良的人们经过毛泽东和中共两年的忽悠和鼓动，似乎有一股股暖流在心中涌动，他们不知道，正当他们充满激动和鼓舞之际，收拾中国知识分子的阴谋诡计已经在悄悄地进行了。开展整风运动只是阴谋诡计的第一步，5

月1日在《人民日报》上刊登的整风指示，只是一张号召书、动员令，知识分子会不会中计还很难说。为此除了继续做动员和宣传工作之外，中共宣传部门和统战部门召开了名目繁多的座谈会，务必要让大家畅开心扉，做到畅所欲言。开始时大家拘束不敢发言，经过连续不断的开会动员，总不能像“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吧。那种坐着冷板凳，大眼瞪小眼冷场情景是令人尴尬的，给人的印象似乎这些文人对共产党的真诚整风抱有抵触和怀疑，如果给党留下这种印象就不好了，哪怕不发言，表表态也是要的嘛。于是紧闭的嘴巴不用撬也会自动地张口说了，一个个开始发言向党提意见了。十多天之后，这些发言者人人都成了毛泽东和中共的“俎上肉”，被任意宰割了。

表面上，毛泽东满脸含笑、振振有词地到处宣扬“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又祭起了“民主、自由”的大旗，做出了俨然要整风的姿态。然而暗地里却以极端秘密的方式向党内高级干部做诱敌深入的部署。这些指示和密令告诉各地报纸要继续刊登右翼分子的文章，越反动越好，但要缩小比重，而左翼分子的文章要逐步多登。这都说明毛泽东策划于密室的阴谋诡计已经向阳谋方向转变，把“鸣”和“放”，朝“收”和“打”的方向转变了。

随后，共产党的一些高级领导人怀里揣着毛泽东“诱敌深入”的锦囊妙计，在全国人民面前淋漓尽致地表演着“虚心纳谏”、“礼贤下士”的“良好风范”。他们带着笑容，残忍地实施着毛泽东“引蛇出洞，诱而杀之”的阴谋。

新华通讯社社长吴冷西号召“有意见提完，有批评提完，有气出完，有冤伸完”。

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宣称“我们不能只准放鲜花，不能放毒草”“只准放鲜花，不准放毒草是教条主义”。

辽宁省主管文教的书记李荒在《辽宁日报》发表《有话放出来最好》、《要受得起批评》等文，鼓励人们“大胆放、大胆鸣”。

江苏省委书记许家屯说：“不平就要鸣”，“鸣出来就能有利于矛盾的解决，就能得到平”。

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针对有人说中共是“先放后收再整”，保证“不会有收”，“今天放，明天放，后天还是放。更不会被整”。

5月25日，周扬已经知道毛泽东的反右意图以后，仍然对参加文艺工作者座谈会的代表们说：“希望大家的意见提得尖锐一点，你们太客气了，你们的批评只是一分，可是，我体会到我们的缺点在十分。”其态度之诚恳，言语之动人，怎么也不会想到周扬是在奉旨诱骗。

善良的人民信以为真，喜出望外！在经历严厉管制八年之后，中共似乎要改弦更张了，从中共各级党政要员嘴里透露的信息中，似乎感受到一缕缕和煦的春风，终于出现了一点点自由的缝隙。

一时之间，深受感动的各界精英人士，尽其所知，热诚地向共产党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俾使共产党提高领导艺术，更好地管理国家。

一时之间，各界民众也将自己的感受和想法告诉各级党委，期盼着改善党群关系。

尤其是那些尚未出茅庐的青年学生，和参加工作不久的年轻干部、技术人员、教师等，这些诚心憧憬共产主义社会的共青团员，敞开胸怀、张开双臂、欢快地期盼着迎面吹来和煦的春风，以赤子之心率直地针砭

时弊，渴望着中共改进领导方式，切实兑现民主、自由等诺言。让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更加巩固，让理想中的社会主义更加美好。

然而，诚朴的亿万中国人哪里知道，一个巨大的阴谋正在孕育！毛泽东那娓娓动听的言语背后，隐藏着森森杀机！

风云突变！

从毛泽东 1956 年 11 月扬言整风算起，仅仅过去短暂的几个月；从中共中央下达第一个整风运动的指示算起，不过十八天；从 1957 年 5 月 8 日召开第一次党外人士座谈会算起，仅仅过去一个星期。

1957 年 5 月 15 日，毛泽东撰写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以极端秘密的方式在党内高层中传布，预作了反右部署，明确提出继续诱敌深入，以便聚而歼之。

毛泽东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是深思熟虑、反复斟酌的。第一稿的原题是《走向反面》，署名“本报评论员”。看来最初的设想是在《人民日报》上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排出清样后，毛泽东把题目改成《事情正在起变化》，署名改为“中央政治研究室”。也就是说，毛泽东认为此文不宜公开发表，只想在党内刊物上登载。他还在清样上方加注了八个字“内部文件，注意保存”。

过了几天，毛泽东忽而又改变了主意，并未将此文在党内刊物上发表，而是决定只给极少数人传阅。他修改了部分内容后，在清样上批示：“刘、周、朱、陈、彭真阅。如认为可用，请尚昆印若干份，发给中央一级和省市一级负责同志。退尚昆办。”

杨尚昆按毛泽东的布置将此文送给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等人圈阅后，原件返还给毛泽东。毛泽东再次批示：“尚昆同志：此文请即印发中央一级若干同志并印送各省市、内蒙党委，新疆、西藏不要发。北京及外地发多少份为宜，请加酌定。”

杨尚昆于 6 月 12 日将此件印发给毛泽东指定的人员，并呈送毛泽东一份。毛泽东看了以后，把署名改成毛泽东，把时间明确为 1957 年 5 月 15 日。并加写了一行字：不登报纸，不让新闻记者知道，不给党内不可靠的人。大概要待半年或一年之后，才考虑在中国报纸上发表。

毛泽东写这篇文件，可谓煞费心机。一级保密，二改标题，三易署名，多次批示。而且特别强调：不让新闻记者知道，不给党内不可靠的人。一开始只给中共八届中央委员会几个副主席看，对具体的印刷份数和传阅范围，都作了严格的界定，可见毛泽东对这篇文章的重视。应该是指导反右运动的纲领性文件，是集“阳谋”和“阴谋”于一体的高度机密。所以中共对其内容长期秘而不宣，原件写了些什么，是怎么说的，至今未予透露。

1977 年 4 月，时隔二十年，在毛泽东死了七个月以后，这篇文章收录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中出版。公开出版时，其内容和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以及在全国宣传会议上的讲话一样，早已被改得面目全非，属于篡改历史之赝品了。即便如此，从修改后的文稿中仍不难看出毛泽东对当时政治形势的错误论断和隐含着的杀伐之声。他写道：“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右派在和我们“互争对中间派的领导权”。“有反共情绪的右派分子为了达到他们的企图，他们不顾一切，想要在中国这块土地刮起一阵

害禾稼、毁房屋的七级以上的台风。”毛泽东还写道：“我党有大批的知识分子新党员（青年团员就更多），其中有一部分确实具有相当严重的修正主义思想。”“他们欣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反对党的领导。”“他们跟社会上的右翼知识分子互相呼应，联成一起，亲如弟兄。”毛泽东把这场人为的斗争，称之为“一场大规模的思想战争和政治战争”，他说：“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杀气腾腾，跃然纸上。

毛泽东向党内高层下发这个文件，实际是反右的战役部署。也就是说，从五月中旬起，毛泽东已经在排兵布阵，设置陷阱，一场空前规模的大围剿如箭在弦、一触即发。

1957年5月20日，中共中央又发了一个秘密文件，即所谓《关于加强当前运动的领导的指示》，再次明确要求各省市党委必须立即做好准备，待中央一声令下，即大举“反右”。

5月25日毛泽东在接见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时的讲话，最后提到了这么一句话：“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议论行动是完全错误的。”毛泽东已经在磨刀霍霍了。但这句话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太多注意，只有政治嗅觉敏感的人才能嗅出其中的异味。

于是毛泽东又选中了一个德高望重的何香凝先生来透露他的信息。6月1日在统战部最后一次会议上，何香凝有一个书面发言。她指出：过去国民党内有革命派，不革命派，假革命派，反革命派；而革命派就是左派，不革命派就是中间派，假革命派会变成反革命派，反革命派就是右派。她认为现在“极少数人脑子里憧憬的是欧美式的政治，这些人我认为是右派了。”她希望“批评和教育右派”。于是这个“右派”名词通过何香凝捅了出来，毛泽东要把这批人打成“右派”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了。

6月6日，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关于抓紧时间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中说：“必须注意争取中间派，团结左派，以便时机一成熟，即动员他们反击右派和反动分子。”

继后，毛泽东更加明确地提出：“每个党报均要准备几十篇文章，从当地高潮开始跌落起，即陆续发表。”逐渐“将空气完全转变过来”。

1957年6月8日，中华民族历史上又一个黑色日子！

这一天，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以内部文件的形式逐级下达；

这一天，毛泽东部署胡乔木等人为《人民日报》撰写的重要社论《这是为什么？》在头版头条正式刊发。

毛泽东向党内通报反右斗争的情况：“北京条件已成熟，《人民日报》已于6月8日开始反击反动派。”“各地情况不同，何时开始反击，要看当地情况决定。”并指出：“这次运动中，一定要使反动分子在公众面前丢脸出丑。”

这一天，一场反右派斗争随即按照这样的部署，在全国范围开展起来。

这一天，吹响了震惊世界的反右号角！

这一天，气候骤变！半年来中共着力描绘的阳光清丽、和风荡漾，立时变成了压顶而来的乌云翻滚、朔风狂号！

这一天，“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立时变成了万马齐喑，万花凋零！

这一天，中华民族的数百万精英变成了不如猪狗、不如牛马的社会弃儿、现代奴隶。此后，在歧视中、在凌辱中、在折磨中，苟且偷生。历尽折磨二十余载，含冤死亡十之七八。

这一天，“漫漫黑夜乍现曦光”的毛泽东“新思维”，忽而消失得无影无踪，顿时又退回到了“暗无天日”的漫漫长夜！

再看毛泽东，从这一天起，换了另一副面孔，另一种语言。

1957年6月8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中说：

“省市级机关和高等学校大鸣大放的时间，大约十五天左右即足。……反动分子将到本机关、本学校以外的工厂、学校去活动，要预作布置，实行挡驾。”

“要召集工厂主要干部及老工人开会，说明有一些不好的资本家，不好的知识分子及社会上的反动分子正在向工人阶级及共产党猖狂进攻，要推倒工人阶级领导的政权，切记不要上他们的当。”

“街上贴反动标语，动员群众撕毁”

“高等学校组织教授座谈，向党提意见，尽量使右派吐出一切毒素来，登在报上。可以让他们向学生讲演，让学生自由表示态度。最好让反动的教授、讲师、助教及学生大吐毒素，畅所欲言。”

“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使之分割在各个机关各个学校去演习，去处理，分割为许多小‘匈牙利’，而且党政基本上不溃乱，只溃乱一小部分（这部分溃乱正好，挤出了脓包），利益极大。”（以上引文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31-433页）

随后《人民日报》又陆续发表《工人说话了》（6月10日）、《不平静的春天》（6月22日）等社论。这些社论按照毛泽东的臆想，虚构了“敌情”。

社论说：在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名义之下，少数右派分子正在向共产党的领导权挑战，甚至公然叫嚣要共产党“下台”。右派分子对于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不甘心的，匈牙利事件加强了他们的一种想象，在所有制方面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基础的国家，仍然可以推翻，可以变质。这些社论，都是经过毛泽东和邓小平审阅过的，有的是毛泽东亲自起草或修改过的。

1957年6月26日，中共中央在《关于打击、孤立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指示》中明确指出：对于右派的数量不要估计不足，划得太少，重点强调右派划得太少是右的，也是危险的。

6月29日，经毛泽东批改发出的《中央关于争取团结中间分子的指示》中说：对极右分子必须打得准，打得狠，来不得温情主义。

1957年7月1日，毛泽东为《人民日报》写了《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的社论，其中不但点名批判根本不存在的所谓“章罗同盟”，还恶狠狠地说：“民盟在百家争鸣过程和整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恶劣，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都是自外于人民的，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还有农工民主党，一模一样。”“整个春季，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其源盖出于章罗同盟。”

在这篇社论中，毛泽东公开宣称右派分子就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派”。还无中生有地说：“这种人不但有言论，而且有行动，他们是有罪的，‘言者无罪’对他们不适用。”“他们对于亡国、共产是不甘心的。”

1957年7月8日，毛泽东在上海说：

“对这些右派，我们现在正在围剿……对右派要挖，现在还要挖，不能松动！……这个时候的右派，现在才晓得和风细雨的好处，现在是暴雨天。”

“右派的老祖宗就是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发源地都是在北京。北京那个地方越乱越好，乱得越透越好。”（《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 446、448 页）

1957 年 7 月，中共在青岛召开省、市委书记会议期间，毛泽东写了《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进一步给右派定性说：“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對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向工人阶级和共产党举行猖狂进攻的资产阶级右派是反动派、反革命派。”

1957 年 7 月 18 日，毛泽东还在青岛会议上凶神恶煞咬牙切齿地叫嚷：“历史上留下一大批王八蛋，一路敲锣打鼓，拥护了七年是假的。到了现在，他们就翘尾巴了。每年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政协会议，总是要对付他们一场。通过法案，他们都举手；下去视察，他们就找岔子，并且搞组织活动。”（笔者注：“对付”这两个字用得极好，是毛泽东的心里话，原来人代会和政协不是征求民意，而是用来对付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毛泽东称之为历史上留下的一大批王八蛋）。

他凶相毕露咬牙切齿地说：

“民主党派要抓住其中的右派，狠狠地打！”

“全国人大要改选，经过反右派，一定要换掉一大批！”（笔者注：毛泽东不小心，一语道破，人大选举是操纵在中共手里的）

“右派分子虽然多，但头儿已经打了。把头子打了，就不好作怪了，”

“以后采取剥笋政策……象张轸[2]那样的家伙，就要狠狠地整！”

“反革命搞得厉害的地方，要镇压！肃反不彻底的要杀一些人！”（笔者注：毛泽东一年前在《论十大关系》中多次说“一个不杀，大部不捉”原来又是假的，这里借用一句毛泽东的常用词语——放屁。给他自己的言论定位倒是恰如其分的）

“有反必肃！抓起来再说。不能象胡老头（胡志明）那样，‘罪己诏’千万不能下！”

“把一些右派都搞去劳动教养！”

“地、富、反革命、摘了帽子的，要调皮再给戴上，搞个劳动教养条例，死刑不要轻易废掉。孙悟空没有紧箍咒不行……各省市对民主党派，不管其中央，予以腰斩！”

1957 年 10 月 7 日，中共召开八届三中全会。毛泽东公然否定墨迹未干的中共八大决议说：“八大决议说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制度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讲道理不能这样讲……”。在此之前，1957 年 3 月 21 日，毛泽东在杭州听取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安徽四省一市关于思想动态的汇报时也说过：“八大决议关于先进生产关系与落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说法，是犯了个错误，理论上是不正确的。”

毛泽东一个人就可以否定不久前全体代表包括他自己在内举手通过的中共八大决议，对这种违背党章的独断专行，与会的中共中央委员没有一个敢表示异议，这就是中共所谓的党内民主。还能说中共中央里面有“好男儿”吗？

毛泽东公开宣布：“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是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上层小资产阶级、农村富裕中农。”

跌入恐怖陷阱中的右派们不禁失声惊呼：原来，这是一场阴谋！

毛泽东象一个志满意得的无赖，对着战战兢兢的人们，幸灾乐祸，粲然一笑：“不是阴谋，是‘阳谋’。我早已说过：‘牛鬼蛇神只有让他们出笼，才能歼灭他们；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才能锄掉。’”

这是在玩弄文字游戏。手握绝对权力的毛泽东丝毫不掩饰自己的洋洋得意，他坦承：是早有预谋，尔等可奈我何？！

难道，这不是经典的对人民行骗术、耍阴谋吗？

如果有人认为以上所述尚不足以证明的话，再看（请特别注意前前后后的时间）：

在 1957 年 1 月 18 日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破口大骂：“苏共‘二十大’的台风一刮，中国也有那么一些蚂蚁出洞”，“党内党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人捧得好呵！开口波兹南，闭口匈牙利。这一下就露出头来，蚂蚁出洞了，乌龟王八都出来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334 页）

他还气势汹汹地说：“社会上的歪风一定要打下去。无论党内也好，民主人士中间也好，青年学生中间也好，凡是歪风，就是说，不是个别人的错误，而是形成了一股风的，一定要打下去。”（《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350 页）

1 月 27 日，也是在这次会议上，他向中共的高级干部面授机宜：“对民主人士，我们要让他们唱对台戏，放手让他们批评。……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放出来有利，……经过讨论，使他们孤立起来。……他们要闹，就让他们闹够……他们讲的话越错越好，犯的错误越大越好，……有一些要让他们暴露，后发制人……”（《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355 页）这能叫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吗！

这段话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毛泽东已经定下了“诱敌深入”的方针，或者说毛泽东在 1957 年 1 月就已经定下了对民主人士实行“聚而歼之”的策略。

从毛泽东谈话的语气、用词和内容来看，这绝不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而是地地道道的阴谋。

这时距中共中央 4 月 27 日颁发第一个整风文件还有三个月，也就是说尚未启动整风，因此不存在右派分子“趁整风之机”放肆地向中共和社会主义进攻的问题。而毛泽东却已经在磨刀霍霍准备大开杀戒了。

1957 年 3 月 17 日，毛泽东在天津对党内高级干部说：“反马列主义思想暴露出来不可怕，而且正有作用。我们需要那些东西跟我们来见面，以便和它作斗争。”

1957 年 3 月 20 日，在上海对党内高级干部说：“对于有些有毒素的文章或者别的有毒素的东西，我们要批判要斗争，但是用不着怕。”

1957 年 3 月 21 日在南京对党内高级干部说：“不要误会我在这里提倡妖魔鬼怪。我不是提倡这个东西，是想消灭它。而消灭的办法是让它出现。……我们要放，要硬着头皮让他们攻。有些知识分子害怕放长线钓大鱼。放长线钓大鱼也有一定道理。我们现在让批评，再去分析。”

1957 年 5 月 14 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关于报导党外人士对党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评的指示》。指示中说：“对于党外人士的错误的批评，

特别是对右倾分子的言论，目前不要反驳，以便使他们畅所欲言。我们各地的报纸应该继续充分报导党外人士的言论，特别是对右倾分子、反共分子的言论，必须原样地、不加粉饰地报导出来，使群众明了他们的面目。”

1957年5月15日，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向中央常委汇报座谈会情况时，毛泽东说：“他们这样搞，将来会整到他们自己头上。”当李维汉谈到有位高级民主人士说有些党外人士对共产党的批评是“姑嫂打架”时，他脸色阴冷，插了一句话，斩钉截铁：“不是姑嫂，是敌我！”当时，四座皆惊，茫然不知所措。

5月15日深夜，毛泽东奋笔疾书，写成《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发给党内高级干部阅读。

文中写道：“左，或者说是教条主义，持这种立场和态度的人，大多是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如果说前一段整风鸣放的锋芒主要是针对教条主义，那么现在到了把风向转过来的时候了……现在应当注意批判修正主义。”

该文还说：“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他们不顾一切，想要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刮起一阵害禾稼、毁房屋的七级以上的台风。什么拥护人民民主专政，拥护人民政府，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对于右派来说，都是假的，切记不要相信。不论是民主党派内的右派，教育界的右派，文学艺术界的右派，新闻界的右派，科技界的右派，工商界的右派，都是如此。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正兴高采烈。我们还要让他们再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我们越有利益。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现在大批的鱼浮到水面来了，并不要钓。”（《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第469～476页）。

1957年5月16日，毛泽东又亲笔起草了《中央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的党内文件。指出：“最近一些天以来，社会上有少数带有反共情绪的人跃跃欲试，发表一些带有煽动性的言论……请你们注意，放手让他们发表，并且暂时（几个星期内）不要批驳，使右翼分子在人民面前暴露其反动面目。”这一文件即刻发给“各省委、直属市委、自治区党委，各中央直属部委首长，各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的负责同志”

5月14日、5月15日、5月16日，连续三天，毛泽东都在殚精竭虑地也是极端秘密地部署反右，其紧张程度不亚于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各级党组织才加大了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的频度和规模。

1957年5月20日，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再次给党内干部下达了一个更为重要的密令《关于加强对当前运动领导的指示》。密令强调：“现在的情况是……右翼分子的言论颇为猖狂。但有些人的反动面目还没有暴露或暴露的不够。”

要求各地党报“继续登载一些右翼分子的反动言论，最好是登那些能够充分暴露他们的反动面目的言论（越反动的越好）。”

“左翼分子这一阶段不宜多讲话，共产党采取暂时不讲的方针。”“在一个短时期内，党员仍以暂不发言为好。”

同时，中央指示各级党委“必须指导宣传部门和党报，立即着手分类研究右翼的反动言论和其它资产阶级观点，准备在适当时机（中央届时另作通知）发表一些论文和社论，予以反驳和批判。”

“在最近期间，应该集中力量先在机关、文教系统内解决我们同党外人士和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此外不要点火，特别不要同时在工厂和学校中发动工人和学生的批评运动，因为工人、学生一经发动起来，就会提出许多具体要求，没有很大精力是处理不了的。因此在报纸上，目前不应该挑起这两个方面的问题，不要登载工人、学生、农民闹事的消息，不要登载对经济政策、工资政策的争论。”

这个密令，隐藏着毛泽东的阴谋，也泄露了在哪里“点火”，和在哪里“挑起”，都是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由受命于毛泽东的共产党员执行的。所谓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猖狂进攻”“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都是嫁祸于人的谎言，是阿道夫·希特勒国会纵火案的翻版，是欺骗群众、蒙蔽舆论的权术。

1957年7月1日，毛泽东亲笔撰写了《人民日报》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得意之余，字里行间公开泄露了开展反右派运动乃蓄谋已久的天机。文中写道：“共产党看出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这一场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让资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发动这一场战争，报纸在一个期间内，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见，对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不予回击，一切整风的机关学校的党组织，对于这种猖狂进攻在一个时期内，也一概不予回击，从而聚积力量，等待时机成熟实行反击。”

1957年7月9日，毛泽东在上海干部会议上说：“右派进攻的时候，我们的政策是这样，就是只听不说。有那么几个星期，硬着头皮，把耳朵扯长一点，就听，话是一句不说。而且不通知团员，不通知党员，也不通知支部书记，不通知支部委员会，让他们混战一场，个人自己打主意。”

他接着说：“北京学校的党员大概是崩溃了百分之五，团员崩溃的多一点，也许是百分之十，或许还多一点。这种崩溃，我说是天公地道。百分之十也好，百分之二十也好，百分之三十也好，百分之四十也好，总而言之，崩溃了我就高兴得很。……那（哪）一年清党、清团清的这么干净呀？0 他们自己跑出去了，不要我们清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44、445页）

上面这段话，充分显示了毛泽东的丑恶心理，党团员“崩溃”百分之四十他竟然高兴得很。朕即天下的心态暴露无遗。

这是安心党内整风吗？这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吗？

不是！绝对不是。

这是毛泽东卑劣人格的表露，是公然对人民包括相当部分党团员行骗术、施阴谋的铁证。

少数无视客观事实，仍想替毛泽东诡辩的先生们，请你们听一听当时的中国共产党高层学者是怎样讲的吧。对于反右派运动，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校长杨献珍先生曾给过一个经典评价：“一个堂堂执政大党，不敢光明磊落地表明自己的态度，竟然鬼鬼祟祟采取两面三刀的手段，实在太不成话了！”

李维汉在晚年所著的回忆录《回忆与研究》中说：“工商会座谈期间，有人提出真正的资本家与会不多，代表性不够，于是又不断扩大规模，找了北京的吴金粹、天津的董少臣、上海的李康年等到会鸣放，后来这些人都被划为右派。这个做法实际上是‘引蛇出洞’，把对敌斗争的一套用于人民内部，混淆了敌我，这个教训是深刻的。”（《回忆与研究》第843页）

讲道德，是为政的基础；讲诚信，是基础的基础。为政者无诚无信，竟然欺骗人民！无信而不立，能立得起来吗？

一贯靠暴力和谎言实行独裁统治，对人民要尽流氓和无赖手段，竟然侈谈“伟大”，侈谈“开天辟地第一伟人”！实乃滑天下之大稽。

附注：

[1]春秋战国时期的《诗经·周南·关雎·序》中已经提到“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宋朝朱熹在其《集注》中赞誉曾子的名言“吾日三省吾身，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宋朝的苏洵在其《衡论》“远虑”篇中提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为君臣相知，互不猜疑的标准。

毛泽东则把上述古人的论述综合起来，在1945年4月24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做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提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将其作为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以达到党内外团结的原则。

1957年4月30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召集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请他们积极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为消除党外人士的思想顾虑，他再次代表中国共产党重申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合作原则。

毛泽东一贯口是心非，他集古人之名言大肆宣扬，从来都是忽悠人的。

[2]张轸（1894-1981）河南罗山县人。保定军校、日本士官学校毕业。1925年任黄埔军校战术教官。北伐时期在程潜所部任团长，首先攻入南京。抗战时参加台儿庄战役，受到最高统帅部嘉奖，晋升为第十三军长。1938年6月参加武汉保卫战，次年晋升为中将。1949年5月，率部二万五千余人在武汉起义，毛泽东电贺，称其为“贵将军一流人物”。1955年获一级解放勋章。后任中共第五十一军军长、河南省副省长等职。1957年他鸣放说：“我告诉朋友，我是党外人，做挂名的副省长里面一个，是个闲散的人，称不上官僚，官都不成为官，僚是潦倒的潦。遇着党员要低头”他举例说明自己的处境：“有一次，由于不了解党的规矩，在会的讲台上，我以为我是副省长，自然站在前排正中。哪知一个干部指责我：‘哪个排定你站在这里的？这里是省委书记、省长站的位置。你知道不知道，随便乱站破坏会场秩序，是犯错误的。’我就知趣后退向台下走，那干部如巨雷一声喊道：‘你走哪里去？你发态度吗？你真不进步，你的位置在前排右角。’”这一段描述，充分表明了张轸这个副省长在党员干部心目中的地位，排座次是封建帝王和山寨草寇十分看重的事。随后张轸被划为右派，文革中再受冲击。1979年平反，1981年在郑州病逝，终年八十七岁。

（3）反右决策是什么时候确定的？

本章第一句话就说，“反右”是毛泽东由来已久的预谋，更是建国以后毛泽东念念不忘，耿耿于怀的心事。但具体到1957年的反右是什么时候决定的，至今纷说不一。

回顾历史，查阅毛泽东当时的讲话和文章，可以发现，在毛泽东所谓“多事之秋”的1955-1956年，他本人的思想也有过跌宕起伏的变化。“反右”既然是阳谋和阴谋，也就不便明令宣示，直到他一命呜呼也没有把这见不得人的卑劣罪行公之于众。但从他那一两年的言行中，是可以看出些端倪的。

从苏共二十大到1956年上半年，斯大林暴虐统治的铁幕刚刚被撕开一角，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阴暗面遭到了世界民众的谴责。赫鲁晓夫试图改革，但尚无先例，经验不足，缺乏借鉴，难孚众望。

斯大林死亡后，毛泽东觊觎社会主义阵营领袖的野心日益增强，毛泽东曾表示愿意从斯大林专权的失败中吸取教训，对内提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口号；提出所谓“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念；提出对民主党派施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指示周恩来做《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等等；对外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推行睦邻的外交路线；倡导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应该平等；反对大国沙文主义等等。且不论这些是真是假，和其中包含着的阴谋和谬误，至少从当时毛泽东的言谈中可以看出，他企图造成一种印象，他正在寻求一条不同于斯大林统治模式的社会主义道路。也就是适当扩大民主，营造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1956年上半年，中国的天空似乎透出了一线曙光。但是，这个阶段的时间长度不过四、五个月，以1956年4月5日发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述《论十大关系》为顶峰。此后即云翻雨覆，所谓新思维成了稍纵即逝的昙花一现或虚无缥缈的海市蜃楼。乃至后来演变为阴谋阳谋。

1956年6月和10月，波兰和匈牙利相继发生了民主化革命的群众运动，两国人民要求改变受控于苏联的独裁专政体制，希望执政党实行改革，消除“社会主义”的弊病。

在波匈事件面前，毛泽东的思想起了骤然的变化，他看到了社会主义政权是不巩固的，还有被推翻的可能。但是他没有认清，政权之所以不巩固，是因为斯大林、拉科西、以及东欧所谓社会主义集团国家的领导者和他们本人的所作所为，早已背离了社会主义或者说歪曲了社会主义。在这些国家，社会主义只是一个空泛的驱壳，应该在“社会主义”这四个字前面加一个“伪”字，因为包括苏联在内的所谓社会主义国家，实际上毫无例外地都是专制独裁。极权统治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铁幕政策导致了人民的反感，大兴冤狱造成了仇恨的对立，高压手段引起了群众的不满。这才是人民厌恶伪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因。

毛泽东错误地认为必须用“无产阶级专政”的法西斯手段消灭一切异见，尤其是知识分子的自由、民主思想，以实现其空想中的伪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他放弃了扩大民主的“新思维”，转而考虑用强化阶级斗争的办法维护统治，他认为知识分子是最危险的潜在民主势力，念念不忘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1]。

这个思想在1956年11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已有所表露。

他说：“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哥穆尔卡、匈牙利的一些人就拿起这把刀子杀苏联，反所谓斯大林主义。”

“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

“不依靠群众进行阶级斗争，不分清敌我，这很危险。”

“对反革命一定要杀掉一批，另外还捉起来一批，管制一批。”

“有几位司局长一级的知识分子干部，主张要大民主，……就是采用西方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度，学西方的‘议会民主’、‘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那一套。他们这种主张缺乏马克思主义观点，缺乏阶级观点，是错误的。”

“你要搞资产阶级大民主，我就提出整风，就是思想改造。把学生们统统发动起来批评你，每个学校设一个关卡，你要过关，通过才算了事。”（以上引文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313-329 页）。

从以上讲话中可以看出，波匈事件以后，毛泽东已经开始酝酿“反右”，扬言一定要杀掉一批，另外还要捉起来一批，管制一批，他的思想深处隐含着耸动的杀机。

1957 年初，毛泽东基于对波匈事件的错误定性，严重夸大敌情，担心政权是否能够巩固，由此认定必须挖掘潜在的敌人，狠狠打击知识分子和以知识分子为主要组成的民主党派。

1957 年初，中共中央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即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毛泽东召开这个会议的目的在于利用波匈事件，威胁和恐吓党内高层幕僚，宣扬有人要推翻共产党，挟持中共高层中昏聩的官员和别有用心政客，执行“诱敌深入”的战术，准备大举“反右”。名义是维护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对外则宣称中国共产党要再次整风，实质是强化法西斯独裁统治。也是导致中共衰落并走向灭亡的开始。

1 月 18 日和 27 日，会议开始和结束时，毛泽东都作了长篇讲话，“思想动向”是他讲话的主要议题。在这两个讲话中，毛泽东的“敌情”观念、“反右”意图和“斗争”策略，都讲得十分明白。

他说：“我们高等学校的学生，据北京市的调查，大多数是地主、富农、资产阶级以及富裕中农的子弟，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出身的还不到百分之二十。在一部分大学生中间，哥穆尔卡很吃得开，铁托、卡德尔也很吃得开。”

毛泽东视大部分高等学校的学生为危险人物。这就是后来在学生中抓了大量右派分子的原因。

他又说：“乡下的地主、富农，城市里的资本家、民主党派，多数还比较守规矩，他们在波兰、匈牙利闹风潮的时候还没有闹乱子，……如果天下有变，一个原子弹把北京、上海打得稀烂，这些人不起变化呀？那就难说了。”

毛泽东公然把民主党派归入地主、富农、资本家一类，虽然肯定了中国的地主、富农、资本家、民主党派并没有趁波匈事件“闹乱子”，但是他极度担心这些人“闹乱子”。

实际上，1956 年出现的一些“乱子”比较多的是农民退社，个别的工人罢工，极少数学生罢课。其原因多半是经济利益受到了触犯，和官方的承诺没有兑现。至于地主、富农、资本家和民主党派，早已被收拾得服服帖帖，不敢乱说乱动了。绝大多数都小心翼翼地但求无过，按照毛泽东的说法，夹着尾巴做人了，哪里还有“闹乱子”的心思和胆量。即使有些不满，只能在背后嘀咕两声，谁还敢犯上作乱呢？毛泽东失道寡助，自感心虚。时时刻刻怀疑有人要“闹乱子”。

他还说：“逃到台湾去的国民党不过十分之一，留在大陆上的有十分之九。留下来的这一部分，我们正在改造他们。”

毛泽东也害怕这些人“闹乱子”。1949 年以后，留在大陆的国民党，遭

杀戮、关押、管制的以百万计，但毕竟还没有杀完，毛泽东最担心的是“人还在，心不死”。

他提醒说：“还有资产阶级，还有地主、富农，还有恶霸和反革命。他们是被剥夺的阶级，现在我们压迫他们，他们心怀仇恨，很多人一有机会就要发作。”

在毛泽东看来，这都是危险因素。意欲找机会彻底消灭之。

他强调说：“资本家加上跟他们有联系的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文化技术知识一般比较高。我们把这个阶级买过来，剥夺他们的政治资本，……我们要把他们的政治资本剥夺干净，没有剥夺干净的还要剥。”

毛泽东在公开场合口头上说尊重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心里想的却是把他们的政治资本剥夺干净，一语泄露了玄机。

他问与会人员：“电影《武训传》你们看了没有？那里头有一支笔，几丈长，象征文化人，那一扫可厉害啦。他们现在要出来，大概是要扫我们了。是不是想复辟？”

简直是草木皆兵了！毛泽东用漫画式的手法、把电影里武训行乞办学用的那支笔夸张为几丈长，吓唬手下的官员。蛊惑他们反对文化人。

他还说：“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现在有一种偏向，就是重安排不重改造，安排很多，改造很少。”“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来，不敢去改造知识分子了。我们敢于改造资本家，为什么对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不敢改造呢？”

毛泽东念念不忘的是改造知识分子，1949年以后，中国的知识界尤其是中老年知识分子经历了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已经是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毛泽东还认为“改造很少”，看来只有肉体消灭才是毛泽东的终极目的。

毛泽东说：“在我们国家里还有少数人闹事，基本原因就在于社会上仍然有各种的对立的方面——正面和反面，仍然有对立的阶级，对立的人们，对立的意见。”

“有些民主人士和教授放的那些怪论，跟我们也是对立的。”

“学生中间跟我们对立的也不少。现在的大学生大多数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其中有反对我们的人，毫不奇怪。”

“在我们党内，也有各种对立的意见。”

“江苏做了一个调查，有的地区，县区乡三级干部中间，有百分之三十的人替农民叫苦。……这些叫苦的人到底代表谁呢？他们不是代表广大农民群众，而是代表少数富裕农民。”

在毛泽东的眼里，这个是对立面，那个也是对立面，他从来不想一想，为什么那么多昔日的同志和盟友成了对立面，是谁把他们驱赶到对立面去的呢？

他还说：“总而言之，去年这一年是多事之秋，国际上赫鲁晓夫、哥穆尔卡闹风潮的一年，国内是社会主义改造很激烈的一年。现在还是多事之秋，各种思想还要继续暴露出来，希望同志们注意。”

“对民主人士，我们要让他们唱对台戏，……他们要闹，就让他们闹够。多行不义必自毙。他们讲的话越错越好，犯的错误越大越好，这样他们就越孤立。”

“在国内，无非是出全国性的大乱子，出‘匈牙利事件’，有几百万人起来反对我们，占领几百个县，而且打到北京来。……现在我们得了天下，还是要从最坏的可能来设想。”[2]

“我相信，假如出一次全国性的大乱子，那时总会有群众和他们的领袖人物来收拾时局，也许是我们，也许是别人。”

“如果有人用什么大民主来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我们就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毛泽东的拿手好戏就是将个人的独裁专断美其名曰无产阶级的专政。离开专政他是活不下去的。

（以上引号内的文字均出自《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

毛泽东的这个讲话是对党内高层领导说的，含有阴谋部分，故没有及时发表，直到1977年才将经过大量删改的文本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1957年有一个这次会议的讲话记录，严格限定在少数人中流传，1967年，文革混乱之际，清华大学曾翻印辑入《学习资料》第二册（1957-1961），个别人有收藏。现摘录部分毛泽东当时的部分言论如下：

“去年下半年以来，有一股右倾机会主义的风，在地面之上、云层之下流动，党内外有一股反社会主义的逆流。”

“匈牙利事件的一个好处，就是把我们中国的这些蚂蚁引出了洞。”

“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后，……中国也有少数蚂蚁想出洞活动。现在赫鲁晓夫改变了，蚂蚁也缩回去了。”

对毛泽东来说，那些“缩回去的蚂蚁”是潜在的威胁，不消除它们，他在中南海里食不甘味，寝不安席。波兰、匈牙利不久前的人民抗争告诉他，知识分子鼓动工农造反，推翻一个昨日还貌似强大的共产党政权不是不可能的。

毛泽东需要把那些“蚂蚁”引诱出来，然后聚而歼之。他决定利用“双百方针”。

他说：“百家争鸣有好处，让那些牛鬼蛇神鬼子王八都出来”。

毛泽东在党内高层会议上一不留心说了上述一句实话，对百家争鸣的意图做了诠释。之所以提出“百家争鸣”的口号是为了把他眼里的牛鬼蛇神引出来，而不是真正的让人们就学术问题和施政方针各抒己见。

“让牛鬼蛇神都出来闹一闹”（毛泽东1957年4月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

“小资产阶级专政，把你搞下来他专政。想搞匈牙利的，要整一、二十年。”

“各省要开群众大会、演讲会、辩论会，展开争论，看谁胜利。……有屁让他放，不放对我不利，放出来让大家鉴别香臭。社会发生分化，我们争取大家，大家认为臭，他就被孤立了。”

这里毛所谓的“他”，显然就是毛泽东幻想中的敌人——“右派分子”。

有多少“他”呢？毛泽东心里已有大体估计。他紧接着说：

“不要怕闹，闹的越大越长越好。……哪里有脓包，有细菌，总是要爆发的。大省五万，中省三万，小省一万。准备闹事，年终结账。”

1957年初春之际，毛泽东就准备“秋后算账”“年终结账”了。当时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合计起来“秋后算账”的即有百万之众。毛泽东钦定的这个数字，在邓小平等人的努力下，没有等到年终，1957年夏天就超额

完成了。

在这次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还透露了哪些人已经被他内定为右派以及如何处理右派分子的信息，他说：

“对于萧军、丁玲之类的人，杀、关、管都不好，要抓他许多小辫子，在社会上把他搞臭。”

想当年在延安的时候，丁玲和毛泽东过从甚密，是少数几个无需请示、约定，就可以进入毛泽东窑洞彻夜长谈的“挚友”。萧军也是和毛泽东交往频繁、称兄道弟、关系密切的人。而今毛泽东对丁玲、萧军耿耿于怀，不知恨从何来？1957年初尚未反右，就要抓小辫子，就要把他们搞臭，可见毛泽东对他们的恨已经很深了，不知出于何种原因？反右取得“重大胜利”之后，丁玲被发配到北大荒劳动改造，萧军则身陷囹圄。直到1976年毛泽东呜呼哀哉，这两个人才重见天日。

毛泽东随即责成周恩来制定劳动教养条例，下令加速修建劳教场所。也就是为多数右派分子准备“出路”。

由此可知，从1956年10月匈牙利事件到1957年1月，占据毛泽东头脑、使他不安的就是中国党内外那股“反社会主义的逆流”，尽管事实上它并不存在。毛泽东心怀鬼胎，杯中之弓影便成了毒蛇之化身。他要设计圈套将其歼灭。也就是说，1957年初，“引蛇出洞，聚而歼之”的阴谋已经成竹在胸。只待东风乍起，就要火烧赤壁了。

纵观毛泽东的一系列活动，可以推断：毛泽东发动的反右战役设想于1956年下半年，谋划于1956年10至12月，决策于1957年1月，布阵于1957年2至5月，实施于1957年6至7月。

反右的策略和方针乃至给右派分子安排的“出路”，在1957年1月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就已经确定了。诸多白纸黑字记录在案，难道还有什么值得怀疑的吗？

这时候整风尚未开始，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是1957年4月27日才发出的。

反右的决策成形于前，整风的指示发布于后。所以不能说毛泽东原来计划的是整风，后来被迫转成反右。

其实，毛泽东自己并未讳言此点。1957年7月1日，他在《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一文中说：“本报及一切党报，在5月8日至6月7日这个期间，执行了中央的指示，正是这样做的。其目的是让螭魅魍魉，牛鬼蛇神‘大鸣大放’，让毒草大长特长，使人民看得见，大吃一惊，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些东西，以便动手歼灭这些丑类。”（《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36页）。

毛泽东在启动反右大围剿之后，道出了1957年所有党报之所以在一段时间内有选择地大肆渲染所谓右派言论，甚至不惜采取断章取义、无中生有、歪曲捏造等卑劣手段，制造右派言论，然后望风捕影地栽赃于某人头上，都是执行中共中央指示，都是在实施其欲擒故纵的阴谋诡计。并不是安心听取民主人士的意见，也不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搞什么整风，毛泽东压根儿就不是想整风，而是要“动手歼灭”臆想中的敌人。

1957年10月9日，他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说：“去年下半年，阶级斗争有过缓和，那是有意要缓和一下。但是，你一缓和，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地主、富农以及一部分富裕中农，就向我们进攻，就是今年的事。

我们缓和一下，他进攻，那也好，我们取得主动。正像人民日报一篇社论所说的，‘树欲静而风不止’。他要吹风嘛！他要吹几级台风，那么好，我们就搞“防护林带”。这就是反右派，就是整风。（《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75——476页）。

这里说得更明白，缓和阶级斗争是有意的，意在诱敌深入。毛泽东直言不讳地说：“这就是反右派，就是整风。”他并没有把反右和整风截然分开，本来就是一回事嘛。为什么有些人非要把它分开呢？做学问不应该是这个做法吧？

他所说的那篇人民日报社论，标题是《不平常的春天》，出自胡乔木之手，发表于1957年6月22日。

毛泽东从1957年1月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以后，就紧锣密鼓地落实他那个“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计划，一个个阴谋和阳谋相继实施，他要营造一个“不平常的春天”。

1957年1月到4月，毛泽东使尽浑身解数“引蛇出洞”。四处煽风点火“蛊惑人心”。影响最大的是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和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附注：

[1]1956年3月17日，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政治局正式批准成立裴多菲俱乐部，让它作为匈牙利劳动青年联盟下属的一个组织合法存在，并设立了一个委员会作为监督领导机构，二十名委员中有十七名党员，其中包括中央委员索洛伊·贝拉、安迪奇·伊丽莎白、党报总编辑霍尔瓦特·马通、党中央宣传局局长诺格拉迪·山道尔、劳动青年联盟中央书记霍洛什·埃尔文和科学文化局副局长奥尔班·拉斯洛等。1956年10月，组织成立不久，人员多为兼职，活动尚未展开。

在中共舆论的极力鼓吹下，有不少人将裴多菲俱乐部误认为是1956年匈牙利事件的“罪魁祸首”。实际上，那个事件是匈牙利社会矛盾长期积累，终于爆发的结果，而裴多菲俱乐部只不过是个体很普通的学术团体，成立不久，根本没有能力发动和组织那样一次全国性的行动。不过，历史也让它在那个事件发生前的特定时期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原新华社驻匈牙利首席记者侯凤菁先生曾著《裴多菲俱乐部真相》一文，刊载于《炎黄春秋》2008年第五期，有兴趣的读者可参阅。

[2] 笔者注：毛泽东在这里一不留心当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的面说：“现在我们得了天下”，这里的我们别无其他解释，只能是中国共产党。但当储安平6月1日在中共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照本宣科宣读他的书面发言中说：“解放以后，知识分子都热烈拥护党，接受党的领导，但是这几年来党群关系不好，而且成为目前我国政治生活中急需调整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究竟何在？据我看来，关键在‘党天下’这个思想问题上。”仅仅说了“党天下”这个思想问题，还没说“党天下”就是事实。即被认为是猖狂向党进攻，打成右派而且不予改正，该怎么解释呢？毛泽东比储安平早5个月就承认共产党得了天下，难道不是嘛？

二、毛泽东长篇讲话出笼前后 [1]

（1）人民内部矛盾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

1956年到1957年之交，在我国部分城市和乡村，发生了少数人闹事的事件。

首先在农村，不少地方发生了农民闹社事件。

1956年11月，河北省反映：合作化以后农村干群关系紧张，秦皇岛市郊范家店村，因区乡干部不民主，酿成群众性(六十多人)到市农林局请愿的事件。

12月，广东省反映：近几个月来，各地不断发生合作化社员闹退社的事情。据不完全统计，退社户数已达七万多户，占入社总农户的1%。已垮掉102个社。正在闹退社的还有十二万七千余户，约占入社总农户的2%。在个别地区社员退社曾发展为群众性的风潮，出现了抢割稻谷，抢分粮食，拉回耕牛，强种原来自己的耕地的混乱局面，并不时发生围攻，殴打区、乡、社干部的事件。

1957年3月，河南省反映：去冬以来，在临汝、永城、夏邑、新乡等13个县发生了社员闹社、退社和闹粮事件，殴打干部66人，拉走牲畜4966头，抢分社内粮食125000斤，种子24000斤，饲料25000斤。

5月，江苏省反映：今春以来，全省各地发生了闹退社、闹分社、闹粮食、闹救济、闹干部作风，以及乡与乡、社与社、农民与渔民之间争耕地，争水面，争肥源的事件。泰县社员闹退社事件在几个乡范围成片发生，有两千多人到县里请愿。

6月，浙江省反映：去冬今春以来，仙游县33个乡镇中有29个乡镇发生了闹退社、闹分社和殴打干部，哄闹政府的事件。全县302个合作社中，完全垮台的116，部分垮台的为55个，入社农户由农户的91%下降为19%，被打干部107人，社干部家被搜查者403户。在宁波地区，已退社的约占入社农户的5%，想退社的达到20%。全省共发生请愿、殴打、哄闹事件1100起。

上述情况，在辽宁、安徽、江西、四川、湖北、陕西等省农村也有发生。

在农村，农民与国家之间因基建占地，矿山占地，国营农场占地，国营渔场占湖等原因，也出现了种种矛盾和纠纷。

其次在城市，工厂的工人罢工、请愿的事件也屡有发生，并呈上升趋势。全国总工会反映：1956年一年中不完全统计，工人罢工事件二十九起，请愿事件五十七起，共八十六起。其中，第一季度六起，第二季度十九起，第三季度二十起，第四季度四十一一起。罢工请愿的人数，每一起一般为十多人至数十人，多者一、二百人，甚至上千人。

天津市反映：1956年10月到1957年6月的八个月中，发生工人闹事一百一十起，直接间接参加闹事的人有3683人。广东省反映：1956年全省发生工人罢工闹事事件一百三十六起。

在一部分学校，也发生了学生罢课请愿事件。据团中央1957年3月统计：1956年10月以来，在高等院校，中等专业学校发生学生罢课请愿事件三十起，参加和波及的人数约一万人。

地质部石家庄干部学校学生因学习和工作问题闹事，强行登车到京请愿，延误进京列车七小时。

兰州林校学生因寒假回家问题闹事，罢课四天，殴打民警和省委干部。

1956年以来，在山东、辽宁、江西、陕西、甘肃、福建、浙江等地，还发生了复员军人请愿闹事事件。

1956年到1957年各种闹事事件的频繁发生，绝非一时的偶然，它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

首先，国家以强制手段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新建立的生产关系不能适

应生产力的发展，经济的增长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随着大规模疾风暴雨式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人民内部之间的矛盾，包括领导和群众之间的矛盾，集体和个人之间的矛盾，这部分人与那部分人之间的矛盾逐渐显露和突出，成为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其次，1956年所谓社会主义改造的急促完成，遗留和积累了不少问题，加剧了人民内部之间的矛盾。如农业合作化后期要求过急，工作粗糙，把许多不愿入社的农民拉入社内；由于经营管理工作跟不上，造成相当部分农业社减产减收；有的社由于规模过大，穷村沾了富村的光，穷队揩了富队的油；有的地方在社员入社时对牲畜、农具折价过低，到期却又不予以偿还；由于合作社集中统一过多，对社员个人利益和自由剥夺太多，有的社不许社员搞副业，限制社员串亲戚和赶集；有的社长期不公布帐目，干部多吃多占，贪污盗窃，打骂社员。这些问题的存在，自然引起社员的不满，在得不到及时妥善解决的情况下，就迫不得已以极端形式表现出来。

再次，1956年经济建设贪多贪大，超过了实际所能承受的限度，造成了新的矛盾。如1956年招生招工过多，基建规模和各方面的建设压缩以后，新招收的学生、工人的学习和工作无法安排。某些单位招生招工时许愿过多，进校进厂后不能兑现，也引起学生、工人的不满。对上述问题，有的领导不能予以认真妥善的解决，或漠不关心，麻痹大意，拖延敷衍，或用简单粗暴的办法加以压制，从而激化了矛盾。

第四，中共掌权以后，干部中存在着盲目乐观情绪，对人民内部矛盾上升并可能激化的状况，缺乏足够认识和警惕。干部中日益增长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不良倾向。有的干部以为合作化后的农民成为集体化农民，一切事情都可以用行政命令的方法解决，社员稍有违背，就被扣上“落后”、“反党”、“破坏合作社”的帽子，受到扣工分、不发救济款和购粮证等处罚，甚至捆绑吊打，草菅人命。一旦矛盾激化，便重弹阶级斗争的老调，宣称是少数不良分子利用人民内部矛盾煽风点火，制造事端。打着无产阶级专政的旗号，寻找借口，加大镇压力度。

最后，以上一切表现，归根结底的缘由是中共坚持一党专政，奴役和盘剥全国民众。毛泽东向往的是独裁专断，使用暴力和谎言维持其统治。

除以上闹事事件外，1956年1月知识分子工作会议和5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提出以后，知识分子信以为真。久被压抑的思想略见活跃，出于振兴中华，富民强国的美好愿望，对执政党和政府的工作，特别是中共对知识分子的政策试探着提出批评、建议，要求民主和自由的呼声有所表露。

总之，1956年到1957年之交，中国社会处在一个急剧变动的时期，敌我矛盾下降，社会管理方面的矛盾上升，成为国家政治、经济生活的主题。

（2）执政党面临着方向性的选择，毛泽东选择了邪路

1956年各地闹事事件的出现，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波兰、匈牙利事件的发生，更提高了他的警觉。

斯大林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矛盾，更不承认人民内部存在着矛盾。他认为，团结一致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一旦人民内部出现矛盾，包括党内一些重大问题上发生意见分歧，斯大林不能从内部找原因，而是简单地把它归结为来自外面的帝国主义的操纵和破坏。结果，把许多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处理，冤枉了许多忠诚的共产主义

战士和善良的公民，给原苏联国家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也给日后苏联解体植入了潜在的基因。

1956年，斯大林问题被揭露以后，在毛泽东主持下经过政治局多次讨论写成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文章指出，那种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不会再有矛盾存在的认识，是一种天真烂漫的想法。文章认为，只要还存在主观和客观的矛盾，还存在着先进和落后的矛盾，还存在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那末，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和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必然存在，并且通过各种形式表现出来。

在1956年11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到了国内少数人闹事的问题。他说：“无非是矛盾。世界充满着矛盾。”“现在，在所有制方面同民族资本主义和小生产的矛盾也基本上解决了，别的方面的矛盾又突出出来了，新的矛盾又发生了”。

他提出：“人民内部的事情，党的事情，都要用整风的方法，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而不是用武力来解决”。后来的事实证明，这又是一句假话。

12月4日，他在给黄炎培的信中，明确提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概念。他说：“社会总是充满着矛盾。即使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也是如此。不过矛盾的性质和阶级社会有所不同罢了。既有矛盾就要揭露和解决。有两种揭露和解决的方法：一种是对敌（这指的是特务破坏分子）我之间的，一种是人民内部的（包括党派内部的，党派与党派之间的）。前者是用镇压的方法，后者是用说服的方法，即批评的方法”。他还提出：“我们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了，但是人民内部的问题仍将层出不穷，解决的方法，就是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团结这样一种方法”。

12月29日，中共中央发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其中也论及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所存在的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即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以及对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不同处理方法。

1957年1月，毛泽东在中共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上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也是对立统一的，有人民内部的对立统一，有敌我之间的对立统一。在我们国家里还有少数人闹事，基本原因就在于社会上仍然有各种对立的方面——正面和反面，仍然有对立的阶级，对立的人们，对立的意见”。“在我们党内，也有各种对立的意见”。“所以，社会上少数人闹事，年年都会有。”他还说：“发生少数人闹事，有些是由于领导上存在着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在政治的或经济的政策上犯了错误。还有一些不是政策不对头，而是工作方法不对，太生硬了”。他向与会同志提出，“怎样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一门科学，值得好好研究”。

在客观存在的人民内部矛盾这个问题面前，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

中共党内相当多的人对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表示不理解。有的说，现在是“天下太平”，“一切顺利”，“并不存在什么人民内部矛盾”。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有的说“人民和领导之间的矛盾，官僚主义者有责任，人民群众也有责任”。有的担心发扬民主，克服官僚主义，可能会产生无政府主义，否定一切。有的怕坏人钻空子，怕放出来错误的东西难以收场，“从此天下多事”，工作不好做了。有的还怀疑中央是否“右”了，提出还要不要专政，专谁的政。不少干部感到措手不及，顾虑多端，举步不前。

与党内干部的反应大相径庭，非党人士、知识分子尤其是青年学生反应热烈，情绪高涨，兴致勃勃。他们基本上都是拥护共产党的，其中相当部分是共产党员或共青团员。他们认为：应该接受苏联的教训，正视并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实行中共一直宣扬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逐步建立健全法制，使中国成为独立、自由、民主的国家。有的说：走向民主，是共产党眼光远、气魄大、有信心的表现。

当然，也有相当多的人听了讲话或传达以后，仍然心存疑虑，谨言慎行，抱着等等看的态度。

在人民内部矛盾日益突出、一党专政的弱点日益暴露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面临着两条道路的选择。

一条是顺应世界潮流，进行政治和体制改革，扩大民主，切实保证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允许人们发表不同的意见，既允许歌功颂德，也允许针砭时弊。认真研究国内各阶层的现状和要求，积极协调国内各阶层利益，采取适当方式缓和与化解矛盾，促进国民经济逐步提高，不断地推动社会向前发展，并联合世界上一切以平等待我之民族，争取世界和平，振兴中华，从而使国家逐步地富强起来。这是一条前景光明的生路，是一条有利于巩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提高毛泽东个人声誉的正确道路。也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文中和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时曾经宣扬的主张。

一条是加强极权统治，用铁与血的手段消灭异己，扼杀民主，驱使民众做执政党的驯服工具，以法西斯式的镇压遏制矛盾，短时间可能出现“舆论一律”，甚至也可以做到一时富国强兵，如三十年代希特勒那样。但这是一条后患无穷的死路。于国家、于共产党、于毛泽东本人都是十分不利的下策。

毛泽东感知了人民内部矛盾的存在，也想过是否可以用民主的方式处理人民内部矛盾。1956年上半年，更确切地说，在苏共二十大以后波匈事件之前的那一段短暂的时间内，毛泽东表示应该从斯大林所犯错误中吸取教训，一方面鼓吹他的“新思维”，一方面也曾试图有限度地放松对人民的管制。以此表示他比斯大林、赫鲁晓夫高明，他的路线正确，他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他懂辩证法，或者说，他才配当共产世界的领袖。比如：有意对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实行比以前宽松一点的政策，给他们较多的发言权和较大的活动空间；准许个别学校开设唯心主义课程；部分地解禁了传统剧目；各省市新增了些文学刊物，发表了一些“干预生活”的作品；准许服装多样化，女性可以穿花衣服了（烫头发仍被禁止）；引进了一些香港和印度、法国等地的电影；以前被称作靡靡之音的《四季歌》也准唱了等等。禁锢森严的大铁门开了一条狭窄的小缝，透进了一丝亮光。毛泽东怡然自得，似乎成了开明君主，他要创造一条不同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道路，力争成为斯大林死了之后社会主义集团的当然领袖。

1956年的波匈事件震动强烈，使毛泽东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波匈事件之初，毛泽东显然知道这是斯大林时期大国沙文主义长期干涉别国内部事务造成的后果，也是人民群众对极权统治的不满，和对禁锢个性的抗争。若能因势利导，尊重人民，以和平的方式对话，改善领导机制，问题是应该能够解决的。但当时的统治集团采取了欺骗与镇压的手段，特别是中共支持苏共对匈牙利进行武装干涉，招致了一场国际上的反共高潮。与此同时，中国国内也出现了一些揭露共产党所犯错误的言论，

和农业合作社社员退社、个别地方工人罢工、学生罢课事件。国际国内的新情况，使毛泽东陡然改变了对波匈事件的最初认识和分析。

他武断地认为：“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他更加担心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引起的震荡会断送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惊扰他作共产世界霸主的美梦，削弱他向往已久的极权统治。他迫不及待地要站出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他迷信暴力，迷信“乾纲独断”的统治术，他对当时的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所谓扩大民主的“新思维”，像一颗脱离了运行轨道的流星，闪耀了一瞬间摇曳的寒光，就黯然消失了。

在扩大民主与加强独裁之间，毛泽东出于根深蒂固的帝王思想和唯我独尊的领袖欲望，丧心病狂地选择了后者。

他又回到阶级斗争的老路上，假借党内整风，人为地制造矛盾，施展阴谋诡计，意欲消灭一切民主、自由的载体，发动了一场反右派运动。

由此使国家陷入了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阶级斗争的惊涛骇浪之中。紧接着掀起一阵乌托邦式的共产主义旋风，打着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旗号，使中国进入了一个曲折颠簸的极其困难的时期，造成长达三年之久饥荒漫野，饿殍遍地的惨象。随后，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兴起，更是中国历史空前的大倒退，亿万人民不幸的大浩劫。摧毁文化、泯灭人性、破坏经济、湮没道德，中华文明毁于一旦，优良传统付之东流，至今未能恢复。毛泽东的一系列罪恶行为由此愈演愈烈，历史的教训是不能忘记的。

(3) 毛泽东粉墨登场——巧言令色鲜矣仁[1]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作了长篇讲话，向人们描绘金碧辉煌的中国梦。到会一千八百余人，听了他的演说。

3月6日上午，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播放了这个讲话的录音，再次向人们绘声绘色地描述美妙无比的海市蜃楼。感动了不少人，包括章伯钧那样的政治领袖，徐铸成那样的报坛巨匠，傅雷那样的翻译名家，龙云那样的起义将领。他们都曾赞叹不已，甚至为之倾倒，认为中共吸取了苏共的教训，改弦更张，由此中国将踏上民主、科学、自由、富强之路。

四、五月份，在全国地、师级以上单位组织党内外人士收听了这个讲话录音，无论在什么级别的场合播放录音，都宣布了一条纪律，即不准记录。中共中央随后印发了若干讲话稿作为内部文件逐级传达，传达时也不准记录，传达后立即收回原件。

如果讲话是光明磊落的，为什么不准记录呢？中国人常说“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不准记录，就是不负责任，说话不算数；就是蓄谋赖账，安心欺骗。显然，这个讲话是毛泽东施展阴谋诡计的一个组成部分，意在“诱敌深入”“请君入瓮”。不准记录就是害怕留下把柄，除此之外，找不到其它理由了吧。

以下是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的发言。

同志们：

我今天讲这样一个问题，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因为，现在我们所碰到的问题，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是一个重要问题。占我们很多的时间，问题很多。当然嘛，两个问题，两个矛盾，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相互之间矛盾，两个问题都要谈，但是今天讨论的重点放在第二个问题，即人民内部矛盾问题。

一、两类矛盾：这两类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

同志们，多年来我们谈过这个问题，过去我们常常谈到过两个口号：分清敌我，分清是非。要分清敌我就是分清什么是敌人，什么是人民，要分清是非就是讲人民内部的矛盾问题，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是是非问题，不是敌我问题。敌我问题是不是也是是非问题呢？我们和蒋介石、帝国主义、封建阶级、官僚资产阶级究竟谁是谁非？也是是非问题，但是这是性质不同的是非问题，普通习惯的说法，把它叫做敌我问题，以便两者比较，人民内部问题叫做是非问题。两类矛盾：一类是对抗性的矛盾，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就是非对抗性的矛盾。人民日报写了文章叫做“再论无产阶级专政历史经验”，人民日报那篇文章主要是说国际方面的问题，讲两类矛盾是说国际方面的，很少说国内方面的事，并且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究竟如何解决没有做详细的分析，只有原则的说明，这就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制度和民主集中制两个制度的相互关系问题。

这两个制度的区别。专政干什么？专政管理事情属于那些范围呢？专政就是为了对付敌人，解决敌我之间的矛盾，就是压迫敌人。这里，不只是讲镇压，除了镇压以外，比如讲不给选举权，比如讲他们不能自由出版报纸。敌对阶级，比如那些地主阶级，帝国主义分子就不能让他们在我们这里自由出版报纸，剥夺他们言论自由，剥夺他们的选举权，这都是属于专政范围内的问题。是阶级对阶级的专政，要行使专政就是民主集中制。谁行使专政？就是人民啦，阶级专政，就是阶级对阶级的专政，你要去管制他，要去杀他，你要去捉他，当然要经过人民政府压制它，专它的政。专政不适用于人民内部的范围。

现在我们讲民主集中制。说到人民内部范围的问题，只要不是敌人，就是人民，在这个范围内，就不是专政问题，不是谁向谁专政的问题，人民自己不向自己专政，而是民主问题。因为宪法规定人民有选举权，有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这是民主的问题。但是民主要有领导，是集中领导下的民主，不是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不是人民的要求。

大民主、小民主。匈牙利事件、波兰事件出来以后，有些人很高兴，来一个大民主吧！似乎高兴这个事情，所谓大民主就是几十万人到大街上游行示威，要知道历史上，自古以来，所谓大民主，搞群众民主运动，都是对付敌对阶级的。但是我们有些同志，党外朋友，当然是少数人，他们搞不清这个，另外有少数人，有敌对情绪，哪一天，像匈牙利、波兰一样，想用大民主的办法把人民政府整一下，哪一天学波兰一样，学匈牙利一样，把共产党整一下，说共产党太专政了，这个共产党使我过不下去了，整你一下我就甘心了。有一个大学生发表声明，他要杀很多人，要杀几百人！几百少了，要杀几千、几万、几十万、几百万。当然要杀那么多是做不到的，过甚其辞，真要他杀也杀不了那么多，但也表现了一种心理状态。

另外，有些人是很幼稚的，不懂得世界上的具体情况，他们认为欧洲的民主、自由很好，认为我们这个太少了。说人民代表大会跟西方议会民主比，要差，要学外国，搞议会民主化，主要搞两党专政，这一党在上，那一党在

下，有两个通讯社，唱对台戏。有人提出要早一点取消专政，有人说民主是目的，我们跟他们说，民主是手段。其实民主又是目的又是手段，归根到底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民主是属于政治范畴的，是属于上层建筑的，它们为经济基础服务的，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经济生活、文化生活才是它的目的。一说民主是手段，就不那么爱听，就不舒服了，一讲民主是目的就高兴一点。

自由。说外国的自由很好，我们的自由很少。我们就跟他们讲，外国自由也不那么多，是少数人的自由，资产阶级自由是做样子的。世界上没有抽象的自由，自由是有阶级性的，最具体的自由，看什么阶级，看什么集团。英国保守党有保守党的自由，工党有工党的自由，保守党要打苏伊士运河，工党宣传不要打苏伊士运河。保守党里头分裂了一部分人，比如艾登的那一个助手，外交部副大臣，叫做纳丁，他就宣传，写了一篇文章，宣传他的观点，反对打苏伊士，艾登有艾登的自由，纳丁有纳丁的自由，阶级的自由，阶级有那个集团的自由，甚至于少数人、个别人的自由。抽象的一般的自由，世界上就没有那种东西。

思想问题。人民内部的问题，不能够采用粗暴的方法来解决，用粗暴的办法来解决思想问题，来解决精神世界的问题，解决人民内部的问题，这样的办法都是错误的，企图用粗暴的办法，行政命令的办法，压制的办法来解决思想问题，是没有效力的，是有害的，比如宗教不能用行政命令消灭，不能强制人家不信教，唯心主义也不能强制人家不相信。

凡属于思想方面的问题，应该用说服教育的办法，应该用讨论的办法，辩论的办法，批评的办法，教育的办法，说服的办法，使人家相信你。

民族资产阶级究竟应该放在那一类？放在第一类，还是放在第二类矛盾呢？这个问题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历史经验”中也没有谈到。但是大家知道，民族资产阶级是不放在第一类的，不放在敌我矛盾这一类，而是放在人民内部矛盾这一类里。因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民族资产阶级愿意接受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愿意走向社会主义，因为这样的理由，民族资产阶级同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不同。由于这样的不同，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就是说和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对抗的两个阶级，是对抗性的矛盾，但是对抗性的矛盾，如果处理的恰当，也可能转化为非对抗性的矛盾，由第一类矛盾转化为第二类矛盾，处理不恰当，不是采取争取、团结教育的方针，势必发展成为对抗性的矛盾，如果我们要把它放在第一类，也就会成为第一类矛盾。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资产阶级，刚才提出的几个问题，就是讲人民内部矛盾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要如何处理是一个新问题，历史上马克思和恩克斯对这个问题谈的很少。列宁曾经简单地谈到过，他说：对抗消灭了，矛盾存在着。所谓对抗消灭了，那是说阶级消灭了，但是人民内部还有矛盾的，列宁说人民之间还有矛盾。但是列宁来不及全面的分析这个问题，人民内部的矛盾有没有可能由非对抗性的矛盾转化为对抗性的矛盾呢？应该说是有可能性的，但是列宁那时还没有可能详细说明，还没有那么多时间来观察这个问题。

斯大林当政的时期，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曾经把两类矛盾混淆起来了，本来是人民内部的问题，比如有人说政府的怪话，说政府，不满意政府，不满意共产党，批评政府，批评共产党的缺点，不满意政府。这里有两种人，有敌人批评我们，有敌人不满意共产党，也有人民批评我们，有人民批评共产党，这应该分别。但是，斯大林在很长期时期内，他是不加分别的，把自

己人的批评也当成反革命，把敌我矛盾扩大了，把人民内部矛盾也当作敌我矛盾处理。结果是只能讲好话，不能讲坏话，只能歌功颂德，不能批评，谁如果批评了，那么就被怀疑是反革命，就有坐班房的危险，就有杀头的危险。

这两类矛盾本来是容易混淆的，我们在肃反工作中，也曾经把好人当成坏人处理，本来不是反革命，怀疑是反革命去斗是有没有呢？有，从前有，现在还有，我们只有一条，强调要分清界线，有些斗错了的要平反，并且在延安的时候，就规定机关、学校、部队、人民团体查出的反革命分子一个不杀，小的反革命不杀，大的反革命也不杀，实际上执行这一条，法律上没有规定这一条，因为法律上还有少数例外的情况，但是我们实际上是执行了这一条例，一个不杀，有了这一条就保证了万一错了的时候，有挽回的余地。

容易混淆表现在两派：“左”派、右派，有右倾思想的人不分敌我，认敌为我，不分敌我，这样的人还有，我们现在这还有。在我们看来，在广大群众看来是敌人，他说这是朋友。比如我这里有一份材料，有位同志写信给我，现在发给大家了，是反对释放康泽，在他看来，康泽是敌人。这个人去年十二月出席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代表大会代表，是湖北襄阳人，康泽过去在襄阳工作过，他就反对释放康泽。在他看来，康泽是敌人，但是在过去康泽的朋友的人看来，就不同了，他们的感情思想就不同了，和人民有很大的差别，敌我不分。有人说美国的月亮比中国还好，我不赞成，美国月亮和中国月亮是一个月亮，没有分别，但是说美国的月亮比中国好，我就不同意，为什么你那月亮就比中国月亮好呢！

“左”派，左倾机会主义者。所谓左是打引号的左，不是真正的左。这部分人过分强调敌我矛盾，比如斯大林就是这样的人。我们也有这样的人，强调过分，曾把本来是第二类矛盾，本来是人民内部矛盾错认为是第一类矛盾，是敌我矛盾，在肃反中屡次出现。我已经说过，这是“左的”。我们在肃反中也有过这种偏向，这是“左”的。在延安的时候，一九四二年我们就提出了这样的口号：团结——批评——团结。我们做出这样一条公式，这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公式，讲的详细一点，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那个时候是为了解决共产党内部的矛盾，就是教条主义与广大党员之间的矛盾，与马克思之间的矛盾，鉴于以前所采取的方针，这个方针是从西天取经取来的，那个“西天”就是斯大林，叫做“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个错误方针曾经给革命带来了很大损失，根据地损失百分之九十以上，白区损失百分之百，后来我们反对教条主义，不采取“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办法，而是采取了另一个办法，另一个方针，团结他们，团结——批评——团结，一九四二年经过几年到一九四五年，中国共产党开七大的时候，就达到了团结的目的。

为什么第一个团结要有团结的愿望呢？如果没有团结的愿望，如果不从团结愿望出发，你主观没有准备，势必一斗就乱，一斗就不可收拾，势必会变成“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经过这个过程，我们找到一个公式：团结——批评——团结。

我们这个方针，后来逐步推广到党外，到北京我们对全国各民主党派用这个办法，不是你死我活，用这个办法很灵，民主党派也灵了，工商界也灵了。前年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在北京开第一次工商界代表人物会议，他们批评了一百多条，结果很好，没有伤感情，把问题解决了。资本家可以采取这个办法，资本家是剥削者，剥削者也可以采用这个办法，我看要台湾采取这个

办法是比较困难的，他们也是剥削者，要蒋介石采用这个办法也是比较困难的。你们要我们批评杜勒斯也是不行的，对杜勒斯就不能从团结愿望出发，经过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但是民族资产阶级是完全可能采取这个办法的，经验已经证明了。

犯错误的人，有各种各样的人，劳动人民、有各种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人、资产阶级思想的人、有唯心主义的人、有形而上学思想的人、宗教界，都可以用这个办法，推广这个办法，发展到整个人民内部。学校、工厂、合作社、商店、机关、部队，六亿人口都可以用这个办法，甚至还可以发展到对付解除了武装的敌人，没有解除武装以前，兵对兵，将对将，你死我活，一经解除武装，我们就用另一种态度对付他们了，就可以用这个办法，对劳改人犯，我们也用这个办法对付，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俘虏、解除武装的敌人，特务解除了武装，就是认清他是特务，决定不杀了，怎么办？改造他。改造就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你还叫他活嘛，不要消灭他嘛。

一九五六年五月二日我们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了十条，讨论了十条，十条中有两条，一条是敌我，一条是是非，一条是敌我关系，一条是是非关系，所谓是非关系就是人民内部相互关系的矛盾问题。

二、肃反问题

肃反这个问题就是第一类矛盾问题，我说比较起来，我们国家的肃反工作究竟做得怎样呢？是很坏还是很好？我看有缺点，但和别的国家比较起来，我们是比较好的，比苏联好，比匈牙利也好。

苏联太左，我们没有那么左，这不是我们聪明，而是学习了苏联的经验，我们在南方根据地的时候，也有左，那时不懂得，吃了亏，后来也纠正了。在延安规定了九条，一律不杀，大部不抓。在北京更有进步，比苏联的肃反，我们是两个类型，在斯大林当政时期，他那个类型搞的不好，苏联的肃反也有两方面，一方面是真正肃清了反革命，这是对的，但另一方面也错杀了很多好人，重要的人，象共产党代表大会的代表，杀了百分之九十，中央委员杀了多少？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的代表抓起来跟杀掉的占百分之八十，而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上选出来的中央委员抓起来跟杀掉的占百分之五十。我们没有干这件事，是鉴于他了。错杀的我们也有，大肃反的时候，一九五〇年、一九五一年、一九五二年，那三年的大肃反也有的。杀土豪劣绅在五类反革命里也有，但是根本上没有错，那一批人应该杀。一共杀了多少人呢？这三年一共杀了七十万，杀错的也有，但那些人绝大多数应该杀的，后几年一共杀了七万不到八万，去年就不杀了，只杀少数个别的人了。

有的朋友说，你们这些人就是这样反复无常，说“早知今日，何必当初”！香港报纸上把我们账给加多了，它说我们杀掉了二千万，二千万减掉七十万等于一千九百三十万，它给我们多算了一千九百三十万，何如是之甚也，哪里杀这些人，哪里来的二千万，七十万则有之，那批人是要杀的，不杀，人民抬不起头来，要解放生产力，他们是束缚生产力的，是恶霸，这些东霸天、西霸天、南霸天、北霸天，不杀不能平民愤，现在有些朋友们想翻这个案是错误的，我看这个案翻不得，你如果一翻，农民就拿起扁担来，工人就拿起铁锤来打我们。

比起匈牙利，匈牙利对反革命差不多根本没肃，杀了拉伊克，他们倒是把革命分子杀了几个，对于反革命杀的很少，所以出了匈牙利事件。我们国家外国人看法说：匈牙利这样事件以后，中国局面很稳固。外国人在这里看

了也是如此，我们自己也这样觉得。匈牙利事件以后，有什么风波没有呢？有那么一点小风波，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春水是吹皱，但七级台风引起的大波浪是没有的，为什么呢？原因很多，肃反把反革命基本肃清了，剩下的没有几个了。还有少数的极少，这不是第一条，第一条还不能讲这个，第一条是我们几十年革命斗争锻炼出来的根据地，解放军，共产党，民主人士。几十年锻炼我们的党是生了根的，我们的军队是有战斗力的，经过长期锻炼的，我们是经过根据地逐步发展起来的，不是突然的。民主人士也经过锻炼，共过患难的。学生们也有锻炼的，知识分子经过改造，什么“一二九”、“九一八”、“五卅”运动、“五四”运动、抵制日货、反对帝国主义，民先队等等锻炼的，这是第一个。第一个是我们从反对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长期斗争中锻炼出来的。人民有教育，包括知识分子，也有教育，包括知识分子自我教育、自我改造，匈牙利则没有。第二条，我们把反革命分子肃得差不多了，还有一点，但很少。当然也还有别的因素，比如经济措施，比如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团结民主党派。

现在，我们的大学生的成份怎样呢？我们的大学生有百分之八十是地主、富农、资产阶级的子女，而匈牙利的大学生百分之六十是工人、农民子弟，百分之六十的工农子弟大游行，听裴多非俱乐部的命令。我们百分之八十是地主、富农、资产阶级子弟，虽然也有少数人要搞大民主，可是他们没有裴多非俱乐部，他们爱国，除了少数人讲怪话，绝大多数都是爱国主义者，是赞成社会主义的，是要把中国建立一个强大国家的，他们有这样理想，所以我们比匈牙利好。

比较起来，我们的肃反没有苏联那么左，没有匈牙利那么右。方针，我们是有反必肃，有错必纠。有反革命就要肃清，有错误就纠正嘛。有没有过火呢？有。有没有漏掉呢？也有。过火的漏掉的都有，我们肃反是群众路线，这个群众路线当然也有他的毛病，群众路线是好的，比苏联公安机关单枪匹马干要好，因为群众在斗争中可以得到锻炼，犯错误也得到犯错误的经验，搞对了也有搞对了的经验。

我们希望肃反中的这些毛病要加以纠正，最近中共中央已采取步骤要纠正这些缺点。我们提议今、明年，如果时间来得及，今年搞得好，今年就可以搞完，来一个大检查，全面检查一次，总结经验。中央由人大常委会、政协主持，地方由省市人民委员会和政协主持，个别的检查不见得很有效力的。

我们目的是，第一不要泼冷水，第二要帮助他们。向广大干部泼冷水是不好的，“都错了”“就是你们搞错了”，结果使所有的干部抬不起头来。一不要泼冷水，二是有错必纠，一定要改正那个错误。这包括公安、监察、法院、劳改部门都有许多毛病，这样由人大常委、政协常委主持，希望凡是身体能坚持的人民代表、政协委员都要去参加，全面检查一次，这对我们法制工作会有很大帮助的，地方也有人民代表、政协委员去参加。

还有反革命，但是不多了，这是两句话，是表明两件事情。第一条，还有反革命，有人说反革命没有了，天下太平了，我们可以把枕头塞得高高的睡觉了，这不符合事实，确实还有。地球上有个中国，中国有个北京，北京有个航空学院，航空学院里有个共产党支部，总支部有个副书记叫马云峰，这也应该给他扬名一下吧，他就写标语，叫什么“反对苏联出兵匈牙利”，他也不跟党委商量，这位支部副书记秘密写了很多标语，到处都贴了，实际上这位党员就是赞成反革命暴动的人，赞成西方国家援助匈牙利反革命。所以

应该肯定还有反革命分子，过火的、漏掉的都有，那个人不一定是反革命，他有反动思想，这个人后来开除了党籍，但是还留他在那里读书。因为他有反动思想，也有反动行为，但是不是说他是蒋介石派来的人，怎么样也不是的。在北京的学校、工厂中发现的反动标语还不少。所以无反革命论是不对的，天下太平没有反革命了，这个思想是不对的。

第二条，但是不多了，就是反革命很少了，这样一条也要肯定，如果说现在还有很多反革命，其结果就会搞乱，至少，我说十个指头，九个指头去了，只剩下一个，可能只是个小指头，不是还有百分之百，可能只有百分之一，可能只有千分之一的反革命了，总之不多了。

是不是应该大赦？这个大赦的问题，有些朋友很感兴趣，我对这件事不那么积极，是消极分子，所以就未免与一些朋友有一点小小的摩擦，大赦可赦不得呀，有人说宪法上规定了，你当主席的就可以不执行宪法吗？我说不用这个名义，实际上可以赦，但不一定用大赦这个名字，不要一下子都放出来。如果大赦，势必要把康泽、王耀武、宣统皇帝、杜聿明这些人都赦出去，这些大的都赦了，老百姓就反对，班房里的犯人又有话讲了，“大反革命你们都赦了，小的就更更要赦，我为什么你们不赦呢？”一齐都赦掉，所有的犯人都回家了，法院无事可做，检察机关都可以不要了。有人说台湾蒋介石都可赦，为什么康泽就不能赦？谁说的要赦蒋介石？没有哪个赦他，人民代表大会也没有做出决定赦蒋介石，我们只是向蒋介石建议，如果你起义，台湾方面人要起义便成起义将领，可以取得赦免的权利条件，现在不是我们不叫蒋匪帮了吗？可是蒋介石天天叫我们作共匪，对民主人士他也不客气，叫做“逆”，如张逆治中之类，不是在报纸上发表了吗？

是不是永远不放呢？那也不是，不是永远不赦，我看慢慢放，我说今天放一个，明天放一个，阴放一个，阳放一个，不登报，也不下命令，对少数著名的人士，将来考虑。比如宣统皇帝怎么处理？，人家是皇帝，是我们的顶头上司，上了四十五岁以上的人，都是他的部下，都是他的臣民百姓，但是这位宣统皇帝，他得罪了人民。将来是可以放的，但现在还不能赦，现在不能大赦，放出来对他们自己也没益处，对康泽也没有益处，对杜聿明也没有益处。放出来，人民不谅解。那么他们现在可以学习，又请他们参观，看看天安门、看看武汉大桥、看看工厂、看看农村、看看报纸，看看就是学习。学习、看报纸、研究吧，是不是找点工作给他们做，也可以考虑，就在班房里做点工作吧，逐步放掉那些改悔比较好的人，不要在报纸上登载，因为这个是人民的问题，不然农民拿起扁担，工人拿起铁锤来打，我们是受不了的，我们是手无缚鸡之力。

三、社会主义改造

讲这么几点，一个问题是合作化。去年下半年以来，上半年那个热潮过去以后，人们冷静的想了想，又发生一些问题了，上半年合作化的优越性就很大，一到下半年好像优越性小了，来了一阵风，不是台风，而是有那么一股小风，说合作化不行了。

今天发的文件里有一个王国藩合作社的材料，请各位看一下，这里缺少一个坏的，一个坏的典型，将来要找几种类型，这是一个好的典型，是很艰苦奋斗的。这是河北省遵化县一个好的典型。合作社一定要在艰苦奋斗中建立起来，什么事情都是有困难的，新生事物的成长是要经过曲折的，要经过批评的。人们不习惯过集体生活，人们对集体生活不习惯，特别是富裕中农，

富裕中农最不习惯，拥护合作社的是什么人呢？是贫农、下中农，对合作化不满意的是什么人呢？除了地主、富农以外，就是富裕中农，表示很不满意的有的地方大概占全体农民百分之一，有的地方占百分之二、有的地方百分之三，有的地方占百分之五，总是百分之几。因为富裕中农在合作社头几年是不如他的理想，比他单干时候要差，因为不能请工了，不能雇长工、短工了。那么要多少时间合作化才能巩固呢？现在的合作社绝大多数才全国只有一年多一点的历史，就是去年这一年，前年一个冬天。一年多一点的历史，我们就要求那么好是不行的，是要逐步才能巩固的，大约需要五年，过去一年了，今年起还有四年，比如王国藩合作社，他有五年了。河北省遵化县，靠近长城，靠近热河有那么个县叫遵化县，这个合作社完全巩固了。

农民生活有没有改善呢？有所改善，七年来，一九五〇年起，七年以来增加了一千四百亿斤粮食，一九四九年只有二千二百亿斤粮食，全国农民生产的粮食七年来增加了一千四百亿斤，现在有三千六百亿斤粮食了。去年我们有三千六百九十亿斤粮食，因此，农民生活有相当大的改善，说农民生活没有改善，这种观点是不符合事实的。有一部分农民生活还没有改善，缺粮户大概还有百分之十左右，有的地方百分之十五左右，缺粮户在逐步消灭中，我看再过三年、四年、我们不是说巩固要五年吗，五年，大概有五年缺粮户就消灭了，以后统购统销就只统购不统销了，农民我就不销粮食给他了，准备几年之内，我们不增加购粮的数目，准备八年之内，国家不增加购粮数目，增产不增购。现在农民手里有多少粮食呢？有三千六百亿斤粮食，去年国家征购农业税是小部分，大部分是买来的，购来的，征同购，征农业税和购粮这两部分合起来是八百零二亿斤粮食，三千六百亿斤粮食国家手中拿了八百零二亿斤，统销在农村有多少？全国农村缺粮户和灾区农民、经济作物区如种棉花的农民，只销三百九十亿斤，四百亿斤，八百亿斤减少三百九十亿斤，城市和出口只有四百亿斤多一点，出口只有三十八亿斤，四十亿斤，城市人口吃的后备粮合起来只有四百亿斤多一点，如果我们还有二、三年只征购这么多粮，农民的粮食就要多起来了，农民就会富起来，就可以多养猪、多养牲口，农民可以储备一部分，所以说农民生活没有改善，农民一片叫苦声是不符合事实的。我们有些干部也这样叫，他们实际上是代表富裕中农的，因为干部有了几个钱，寄点钱回家，今年寄点，明年寄点，几年之内他家里有了钱，就成了富裕中农，富裕中农叫的最厉害，就影响我们一些干部，有些民主人士也受了些影响，大概他们在农村有亲属、朋友之类，这个就要加以分析。也有民主人士，也有共产党，有非共产党，跟着一起喊：合作社没有优越性。说合作社没有优越性。我看合作社还是有优越性，不信，你们看看王国藩合作社吧。为什么匈牙利、波兰合作社搞不起来呢？波兰只有百分之六农村人口加入合作社，一阵风吹掉了大部分。哥穆尔卡一篇演说就崩溃了，一万多个合作社，只剩下一千多个，吹掉了十分之九。

在我们国家，能够这样快的合作化，这有好多原因，第一个是最基本的原因，就是地少人多，人多的要命，每人的土地很少，集合起来比较好。第二，我们党和人民政府所采取的步骤，采取有步骤的，分几步，分几个步骤，采取了分几步走的办法，因此我们与苏联合作化的过程不同，他们的合作化几年不增产，而且减产，我们的合作化是增产，如去年我们增产了二百亿斤。

除掉富裕中农叫苦，因此引起了我们党内外叫之外，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农民真苦，就是刚才讲的百分之几的缺粮户。还有一个就是农村和城市的比

较，城市工资比较高，现在农民每年每人平均收入六十块，有高于六十块的，有低于六十块的，比如五十块、四十块还可以过，三十块就差了，还有二十块，还有十七块的，一家四口十七块，四七二十八，六十八元要过一年，那才是最苦的，但是高的也有，有高到一百多元的，有没有二百多元的？有二百多元的。有的一个人一千块，家庭四个人就四千块，几年之后你们看，农民会比工人富，你们看吧。工人方面，有些徒工的工资不大适当，一到城市三十元一个月，有一部分工资是不大适当的，对农民有刺激，但是城市生活与农村生活是两种生活，农村一个人有五十、六十元钱，一年一家就有二百四十元收入，那就很可以过生活了，有个地方算了账，有四十八块钱收入，每人四十八块钱，一家四口每人四十八元，那生活很好了。乡村里许多东西不要花钱买，城市样样东西都要钱，这是两种情况，把两种情况混同起来是不适当的。

四、资本主义改造

我没研究，但我鼻子闻到那么一点东西，也在这说两句。在资本主义改造方面，也有那么一股小小的风，也是“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说是资本家不要改造了，跟工人差不多了，甚至说资本家还要比工人高明一点，有那么一些人这样说，当然可能是少数的人，有这样一种思想，资本家要改造，工人为什么不改造呢？谁说工人不要改造？工人要改造，工人在阶级斗争中间改造整个社会，也改造自己，这是恩克斯说的。在阶级斗争中间，改造了其他人，也把自己改造了，无产阶级不解放全人类，那么，他自己也不能解放。他是统筹兼顾，这是个战略方针。拿我们中国来说，如果不解放六亿人口，工人阶级本身就不能够解放，所以他在阶级斗争中间要改造自己的。比如我们在座的这些人，我们每年都有进步，这也是一种改造。我这个人从前也是知识分子，各种思想都有，喜旺嘉措先生，你那个佛教我拜过菩萨的，我朝过南岳山，为我母亲还愿，我信过无政府主义，认为那个无政府主义很好，又信过康德的唯心主义，你们看我这个人多复杂，马克思主义是后来钻进去的，把我脑筋改了一下，名字曰改造，主要是在几十年来的阶级斗争中改造的。资本家那样高明，一点都不改造了？我看不然，我都要改造，你不要改造了吗？资本家没有两面性了？只有一面性了？这是形而上学的观点，只有一面性事物不能发展，总有缺点，两点论，优点缺点，而且资产阶级根子还没有脱离，资产阶级还没有摘掉帽子，摘掉帽子也要改造，还有一个时期思想改造。这种观点如果胜利，那么资产阶级的学习任务就没有了。现在我们大家都要学习嘛，政府工作人员都要学习嘛，反而资产阶级不要学习了，那短训班就不要开了，这是不对的，我看不符合工商业者多数人的愿望，他们是愿意学习的，有些资本家经四十天学习就大不相同，回到工厂面目一新，与公方代表有了共同语言了，跟公方代表以前是格格不入，你是资本家，我是公方代表，两人客气得很，貌合神离，同床异梦，现在你算是资本家，还算我是资本家？我算是资本家吗？我进了四十天的训练班，回来时有了共同语言。有些人生怕听改造二字，改造这个东西，美国人叫洗脑筋，我们叫改造，我看美国人确实是洗脑筋，美国人可洗得凶，我们这个还文明一点。按着一些人的说法，资本家不要改造了，那么我们的宪法也要修改，因为宪法说：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那都一样了，工人不仅和农民一样，而且跟资本家一样，那工人阶级的领导就要取消了，这是不行的，我刚才声明了这不是多数人的意见，这是有些人在说。

五、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

前面说的，我们六亿人口有很大进步，工人、农民、民主人士都有进步，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也有很大进步，但是也有不正确的思想，也有歪风，有那么一些波动。波匈事件出现以后，有一些怪议论，我已经说过，讨厌马克思主义，只愿意钻业务、说将来可以赚薪水、无非是为吃饭，此外还有一个讨老婆、讨老公，大概是这两件事。一个叫吃饭、一个叫生孩子。至于什么政治、什么前途、理想看得不那么重，好像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兴了一个时期，从去年下半年起就不那么行时了，也有这个缺点，所以要加强思想工作、加强政治工作，在我们青年中间，在知识分子中间，进一步改造自己，还是要提倡改造，不要避免这个改造。

过去那些思想改造有些粗糙，有些地方伤了人，现在不要搞那样的改造，除了努力学习业务以外，在思想上有所进步，政治上也有进步，要学习一点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一点时事，学点政治，这个东西很有必要，如果没有这个东西，就没有灵魂，光搞业务，就学那样一个专业，一辈子都吃不完，没有政治工作，不做政治工作是不行的。

最近一个时期，思想改造工作、政治工作减弱了，教育部门不管政治工作。高等教育部应管政治工作，共产党要管，青年团要管，行政部门、政府也应当管。以前叫做德育、智育、体育，我们现在变成两育了，智育专搞智育，此外插点体操，就叫体育，德育不要了，只有体育、智育。所谓德育就是学习政治、学习马克思主义，学点这些东西。现在只注意智育、体育这两育，这是不好的。

六、增产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又来了，不是反过了吗？不是搞过了吗？现在又反铺张浪费，共产党就是那一套，而且摸得共产党不过就是那么一套，几个月以后就没事了。现在有那么一种议论，这个是不是真的呢？我看也有点真，真正反一次的时候是三反，那个时候把铺张浪费、贪污、腐化反了一反，后来没有再反了。有一年也提倡过节约，那时节约什么东西呢？那是讲节约非生产性的基本建设，降低标准，就是前年节约了二十多亿，很大一笔钱。但有些地方节约不当，节约结果工程不好，节约过了，另外，在生产方面节约原料不当，以至降低了质量，就是基本建设降低了质量，生产降低了质量，这些是那次的缺点，但成绩很大，节约出来二十多亿。别的一般的没有搞节约，那一次机关、学校、工厂、合作社、商业系统、运输系统都没有搞。现在要提倡节约，我们要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反对铺张浪费。这样一来，现在就开始成效，桌椅、板凳都不买了，地毯没有人要了，我有一批地毯出卖，在座的没有买主，我看如果你们不要，我就没有办法，大家提倡增产节约，我有那么多地毯可见不得了，现在反到我身上来了！这一回比较要搞彻底一些。我打个比喻，像洗脸一样，你们各位是怎样洗的呀，一个礼拜洗一次是不是吗？据我所知道的，许多人洗脸是一天一次，至少。有的一天洗几次，为什么道理？为什么一付脸要天天洗？干什么？不是增产，也不是节约。无非是为了面貌要漂亮一点，为了使尊容漂亮一点，每天洗一次面，这无论是共产党和非共产党都搞这事嘛。并非共产党员提倡才洗脸，从古以来就洗脸嘛！现在反对贪污、浪费，这东西就等于我们洗脸一样，人就是经常要洗脸的，人不是别的动物，别的动物它就不洗，人是高级动物，所以他就洗脸。我们的党，民主党派的一些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知识分子、工商业者、工人阶级、

农民、手工业者，六亿人口，我们来提倡一个节约。现在搞得不像样子，许多人无非是升官发财的思想大为发展，去年评级，评出一些毛病来了，评级无非是争名夺利，争名于朝，夺利于市。

七、统筹兼顾，适当安排

这是一条战略方针，所谓统筹兼顾，就是对六亿人口统筹兼顾。同志们都是负责的同志，替国家负责的，我们办事、做计划、想问题，总要从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我们这个国家有这么多人，这一点是世界各国都没有的，它就有这么多人，六亿人口。我们有这么多人，要提倡少生一点，有计划的生育。我看人类他对自己最不会管理自己，对于工厂的生产，工厂里生产布匹、生产桌椅板凳、生产钢铁，都有计划，对于生产人类自己就是没有计划，就是无政府主义的，无政府、无计划、无组织、无纪律，这可不得了！这样子搞下去，我看人类要提前大拼的，就是趋于灭亡。中国六亿人口，增加十倍是多少？就是六十亿，那个时候，就快接近灭亡了，没有东西吃，加以卫生工作，预防针一打，娃娃那么多可不得了。大家都是年高德硕，我今天不着重讲这个问题，邵力子先生是专门名家，他是大学专科毕业，比我高明，还有李德全部长也很注意。这个政府可能要设一个部门，政府设立一个生产计划部好不好？或者设立一个节育委员会吧，节育委员会，作为政府机关。人民团体也可搞一个组织，组织人民团体来提倡，因为要解决一些技术问题，要拨一笔经费，要想办法，要做宣传，这个问题今天不能多讲，可以研究。

讲救灾。全国几乎每年都有灾，有很多灾民，要给他们粮食。比如讲统销，苏联就没有这样做。我们把一切城市、乡村无粮户、缺粮户都计算在内，安排工商业者就业，安排社会失业者就业，统兼工作，各方面的统筹工作，所有这些都算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去年这一年，差不多有三百多万人就业，麻烦，问题也很大，按照计划，原来只要八十万人，而实际上差不多增加到三百万人，多了二百多万人，工资支付就多了。不仅这八十万人增加了，原有的一千八百多万人的工资都有多多少少的增加。去年新增加差不多三百万，这个负担很重了。但是失业是不是完全消灭了？还没有。比如广州现在还有相当多的失业人员，他们说要想办法，不能一律而论。上海也还有一些失业的人，其它地方多多少少也还有一些，但是失业的人数已经减少了。

有些人提倡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这个办法很值得考虑。我看我们这些人宁可工资低一些，比如我们这些人十年八年不增加薪水，我这一提出来。可能你们大多数要反对，也许你们反对，也许你们赞成，如果高级人员十年不增薪，我看也死不了人，不会死人的，以不死人为原则，年可以高，德可以劲，为什么德劲？不增薪不就是德劲吗？要增就下面增一点。

学生问题怎么办？有百分之四十的学龄儿童没有学校，人民政府并非万能政府，人民政府办事不能一步登天，现在还有百分之四十的人没有学校进。另外还有一件事，叫做四百万，今年有四百万高小毕业生不能升中学，没有法子升中学，没有地方、没有经费，除了应升的之外，今年按计划升学的之外，有四百万不能升，高校毕业生就要回到生产队里头去，包括农村的。有多少初中生不能升高中呢？有四十万，有多少高中生不能升大学呢？一说四万，一说八万，一说九万。（周恩来：初中是八十万，不是四十万）噢！初中八十万，不是四十万，这个早晚时间不同。八十万初中毕业生不能升高中，好多人就业也是问题，要等候就业，八十万这么多嘛！有九万高中生不能升大学，能否就业也有问题，要等候安排，等候也是一种安排，如排队买肉，

一条长龙在后面等候，前面已经卖完了，排到后面的买不到只好回家。这个问题是相当大的一个问题，也很要紧，要请大家考虑，政府也考虑，今年这计划就是那么多钱，一句话，钱就是那么多，只能办那么多事。休息一下。

（彭真：休息十五分钟）

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这个人民内部的矛盾，列宁不是说过吗，人民内部是有矛盾的，“对抗消灭了，矛盾存在着”。我说列宁那个时候，他还不可能全面深刻分析这个问题，缺乏经验，因为十月革命以后的时间很短，他就死了。列宁死后斯大林当政，在一个长时期内，他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有矛盾，但到他的晚年，他是一九五三年死的，在一九五二年的时候，他写了一本叫做《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书。在那本书里承认过，在社会主义制度中，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也是有矛盾的，两者处理得好，矛盾就可以不发展为对抗性的矛盾，处理得不好，也会发展为对抗。（周总理说：他用“冲突”两个字，实际上是“对抗”）发展为冲突，斯大林也已经看到这点了。

苏联有四十年革命经验，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者领导革命斗争，从搞根据地开始，一九二七年，比苏联同志迟了十年，他们是一九一七年胜利，革命胜利，革命开始胜利。我们就是一九二七年开始在一些地方建立根据地。一九二七年，三七，四七，五七年，我们也有了三十年的经验。

应当肯定，社会主义社会矛盾是存在的，基本矛盾是这样的矛盾，就是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的矛盾，这些矛盾都表现为人民内部的矛盾。因为这个时候，社会主义社会没有剥削者，都是所有者，所有制是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没有私人的资本家、私人土地所有者、私人的工厂所有者、企业所有者。

斯大林，我们讲，他相当缺乏辩证法，但不是说他没有辩证法。我们在人民日报的文章里说他：他部分的但是严重的违反了辩证唯物主义，是那么说的。在他的影响下，写了一本书，叫做《简明哲学词典》，是由两个人写的，其中一个就是苏联大使尤金，这是在斯大林影响下写的，在讲同一性的条件下，他有一个题目叫同一性，说了半天，驳了形式逻辑的同一性，根本就没有分析清楚形式逻辑的同一性跟辩证法的同一性是不是一回事，这本书说到同一性，然后就引用恩格斯的话，恩格斯讲没有什么同一性，实际上什么东西都存在变化，客观实际上没有什么同一，然后他就来个形而上学，他说对立性的东西，相互排斥的对立物不能说它有同一性。斯大林认为对立的東西没有同一性，他认为互相对立的东西，不能有同一性。你比如说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这两个阶级在一个社会里，他们是没有一个同一性的，只有相互排斥，只有斗争，战争与和平没有同一性，生与死没有同一性，如果说这些东西有同一性就是错误的原理。斯大林死了以后，苏联哲学家，苏联在这个问题上开始有所变化，我看的東西不多，但是看到他们开始有所变化，就是斯大林在哲学上有相当多的形而上学的观点，所谓形而上学观点就是绝对的、静止的、片面的、不能转化的。战争就是战争，资产阶级就是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就是无产阶级。我们的看法不同，互相排斥的东西是有同一性的，可以转化的。我们认为资产阶级可以转化为无产阶级，被压迫的无产阶级可以转化为国家的主人，战争可以转化为和平，和平可以转化为战争，生转化为死，死也转化为生。他在同一性中引了恩格斯的话以后（恩格斯那话是没有形而上学的）就来了一个形而上学，这两个东西它是不变化不能统一的，不

转化的，但是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说得好，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矛盾，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而且处理的不好可以成为对抗的东西。这东西说得好，不过不彻底。我说他的辩证法是一个含羞的辩证法，是个羞羞答答的辩证法，或者叫吞吞吐吐的辩证法。我们现在来看这个问题，应该承认，社会主义存在着矛盾，基本的矛盾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政治、法律、宗教、哲学这些意识形态），这些意识形态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它要符合于经济基础，如果不符合就要发生矛盾。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几个口号是怎样提出来的呢？就是承认社会上存在各种不同的矛盾，在艺术上、文学上，它就是表现为百花齐放。这个百花齐放里头包括这样的东西，就是各种不同的花，但是也包括一些性质不同的花，比如讲百家争鸣里头有唯心论，百花齐放，可能胡风坐在班房里头，胡风的灵魂却活在世界上，写出胡风那类作品还是可能的。但是只要他没有破坏行为。胡风他为什么？它就是组织秘密团体，那东西不好。只要他不搞秘密团体，你开那一点花，我们中国面积很大，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开那么一点花有什么要紧呐？开那么一点花给大家看看有什么要紧，大家可以批评嘛，说你这花我不喜欢。闲花野草有些是毒草，你如果只要粮食，只要小麦、大麦、苞米、小米、大米，根本不要野草是不可能的。这个东西，每年农民都要除草，你们不信，今年春耕你们去看一看，那土里就要长草，不晓得那草从哪里来的。总而言之，年年长草，农民是年年要锄草的，就像人天天要洗脸一样，只要粮食不要草，禁止一切野草不准它生长，这行不行？事实上是不行的，还是要长的，你锄就是了。如果有人下一个命令，所有的野草都不长了，那当然省事，那农民很感谢，但事实上有那么多种野草和粮食竞争，其中还有些毒草。一株香花，一株毒草，我说你当然是要鲜花，但是不能禁止长野草，只要鲜花不要野草、毒草，办不到。教条主义也并不是香花，教条主义是什么花？教条主义是不是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并不是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也是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东西，教条主义它的方法是形而上学的方法，片面性、孤立性的，搞片面是不加分析的，形而上学，这个学问古代就有了，但是特别在资产阶级时代发展。它不但在国外有，在中国也有。

难分香花、毒草，曾经在人们眼里看起来，很多东西在开始出现的时候，许多新生事物，在旧社会几乎是一切新生事物都要被打击的，比如马克思主义曾经被人们认为是野草、认为是毒草。国民党、同盟会、孙中山、那时清朝政府看孙中山认为他是毒草嘛！把共产党叫做匪党嘛，共匪嘛，跟共产党往来叫通匪嘛，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开会，这是由毒草变成香花了。但是在台湾那个地方，他还说我们是毒草，还叫共匪。孔夫子也是不被承认的，孔夫子这老先生，他一生不得志，他的道理人家不相信。耶稣，耶稣在开始时也是社会不承认的。佛教怎么样，释迦牟尼怎么样？也是经过那么一个过程，受压迫，社会不承认。耶稣教到了马丁路德的新教也是社会上不承认的。孙行者，孙悟空为什么封孙悟空弼马温呢？把孙悟空封为弼马温就是不承认他，他自己封号，自己对自己的评价（干部鉴定）他自己的鉴定叫齐天大圣，玉皇大帝给他鉴定，搞他个弼马温，就是说是毒草，因为他也是不被人承认的。薛仁贵当火头军，薛仁贵不是当过火头军吗，这是张士贵给他鉴定的。哥白尼的天文学长期不敢出版，死了以后多少年，然后才被人家承认。意大利的伽利略他的物理学、达尔文他的进化论，在开始时人家都不承认。我看了一

本科学小册子，安眠药的历史，安眠药是什么人发明的？是德国一个卖药的店员发明的，德国人不承认，法国人承认，把他请到法国去了，承认他的发明，然后德国也承认了。中国人有个李烈钧，国民党的中央委员，此人死了，他是第一次从中国到马赛，从马赛坐火车到巴黎到，他吃安眠药，他说这东西好，能使人睡觉，他是中国第一个吃到安眠药的人。美国一个跳舞的，舞蹈家，叫邓肯，她生孩子，生头一个孩子非常痛苦，等到生第二个孩子用安眠药，就不痛苦了。我是说世界上一切发明，政治的、科学的、文学艺术的，开始时都要受到阻碍，不被承认的。司马迁的史记开始也不被承认嘛，他的目的是藏之名山，长期保存，不能出版，当时没有出版机关，大家抄几份，那么大，一卷一卷的，运输也困难。总而言之，新东西、新生力量要被社会承认，是要经过艰苦奋斗的，我们这个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不同一些，还是有许多新生东西要受压制的。碰到官僚主义者、碰到顽固派，究竟什么是香花？什么是毒草？斯大林曾经是百分之百的香花，赫鲁晓夫一棒子，毒草。现在又香起来了。

最近有些批评，我这都是讲共产党，共产党里也有右派有左派，右派的如中央宣传部有个干部叫钟惦棐，他用假名字写了两篇文章，把过去的电影说的一塌糊涂，否定一切，这篇文章现在引起批评了，引起争论了，但是台湾很赏识这篇文章。另外几位左派，就是我们军委政治部文化部部长陈沂，他的部下陈其通、马寒冰等四位同志，在一月七日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声明，四个人署名，实际上是怀疑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所谓自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口号提出以后，就没有大作品了，这个罪名结论作得过早了一点。因为陆定一同志那篇文章是六月写的，去年七月份发表的，八月、九月、十月、十一月、十二月，等到这四位写文章是今年一月七日发表的，才只有五个月的时间，几百万字的作品怎样写得成呢？所以只说没有大作品，把事情说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以来大家都不搞大作品了，不搞马克思主义作品了，不搞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了，尽搞些坏的了。到现在这么久了，我们人民日报是什么态度我也不清楚。在一月中旬和下旬开的省市党委书记会议上，我把他们四个人的声明文章印发给大家看了，当时有人民日报的同志在座，他表示了什么？对这件事也没有表示态度，现在又过了差不多一个月了，究竟怎么办？你们发表这个东西是赞成还是反对，还没有表示态度，今天在座的有没有人民日报的同志？你总要处理一下嘛（邓拓站起来答复：来了，照办。）你们人民日报是赞成呢？反对呢？你们总要处理一下吧？如果自己没有主张，那就和中央的同志研究一下嘛，看看如何处理。我表示我的态度，我不赞成这篇文章，那文章是错误的。但是世界上的东西各有不同，各人喜欢各人的，钟惦棐那篇文章实际上有人喜欢，台湾喜欢。陈其通、马寒冰的文章社会主义国家很喜欢，苏联真理报就登出来了，真理报就不登陆定一同志的那一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文章。就喜欢陈其通、马寒冰四位同志的。此外，捷克登了，罗马尼亚登了，很有市场（台上有人说，是文学报登了，不是真理报）是文学报？不是真理报？那还好一点（笑）“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各人喜欢各人的东西，气味相投，教条主义喜欢教条主义，机会主义喜欢机会主义，还是很有市场的。恐怕值得批评一下。

有一位青年作家王蒙，不是王明，大概是王明的兄弟吧，写了一篇文章《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惹出事来了，有赞成的，有反对的，一研究，这个反对者也是一位共产党员，是共产党跟共产党打架，有人讲得他一点好处也

没有，其中也有马寒冰的批评，他批评说是北京市一个共产党区委书记有官僚主义，有人说北京是中央所在地不能批评，说这个典型环境选择的不好。大概选择在上海比较妥当，我这个地方就不行，彭真的这个地方就不行，因为是中央所在地就不能选择为典型，不晓得这个道理是从哪里学来的？马克思主义我看得很少，但是我没有看到过中央所在地就不出官僚主义，中央还出官僚主义，中央所在地为什么不能出呢？中央出过什么人物呢？中央出过陈独秀、出过张国涛、出过高岗、饶漱石、还出过李立三、王明，那么多哩！这一条道理，也是批评不对。

马克思主义还是要发展的，不是一个时期就完了，要按照情况继承发展，而教条主义并不是马克思主义，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机会主义也是反马克思主义的。

中国有六亿人口，其中农民、手工业者、小商小贩有五亿多，地主、富农、资产阶级有五千万，所以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大王国，而不是小王国，小资产阶级有五亿几千万，这是一个客观存在。你要这些人一点意见都不发表，统统口上打封条，只在吃饭时开一次，吃完饭就封起来，那怎么行呢？口有两大作用：一曰吃饭，二曰讲话。你把他口封住，这是很难办到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一定要反映，而且要顽强地表现自己，要千方百计的用各种方法表现自己，我们不能够用压制的办法不让他表现，只能在他表现的时候跟他们辩论，说：同志！你的话里有点不大妥，加以分析，写文章批评。这些文章不是教条主义的的文章，不能使用形而上学的方法，而要使用辩证的方法，要有说服力，写出的文章要有充分的说服力。

老干部能不能批评呢？这个批评的问题在马克思说来，从来没有一次说过批评要分新老干部，说只能批评新干部，不能批评老干部。我们宪法上规定，人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共产党员、非共产党员犯了错误，有错误思想，受批评也要一律平等。有一批人比如是共产党的老干部或者是民主党派的老干部，因为他们老，就享受一种不受批评的权利，这行不行呢？我看不行。活着不受批评死了也得受批评，我们就批评过死人，批评过孔夫子，我们就不就讲过：打倒孔家店，批评过孔夫子吗？人家已经死了几千年了，还受了批评，现在孔夫子又好了一点。斯大林也是死后受批评的，活人能批评，死人也要批评，活人死人都能批评，不分官职大小，老稚长短。是不是你越老可以越享福，避免批评呢？我看不行，犯了错误以后，总是要批评的。凭老资格吃饭可不可以？我说可以吃饭，你老资格可以，这一方面承认。就是因为他老，他胡子那么长，没有他不行，他有作用，可以帮助你们跑龙套，起这个作用，摇旗呐喊，拍拍巴掌帮助人家。我看见梅兰芳就跑过龙套，跟人家合作，拿个刀站在那里，梅兰芳还在演戏，梅兰芳在座吗？你八十还有作用，就是跑龙套。我这个人的作用，只能起一些跑龙套的作用，唱主角不行了，唱主角是我们周总理这些人物了，你们各位唱。比如西厢记是唱那个红娘，我是不能唱了，我是那个老太太的角色，西厢记里头那个老夫人，出来唱那么几句，转那么几下子就进去了，你如果尽唱，唱得多了，人家会赶你走的，而且老资格不管你怎么老，做事更要正确，你活了一百岁，九十九年做了好事，一百岁做了个大混蛋的事也是不行的，犯了错误也不能因为老资格而不受批评。拉科西就是这样，曾经做过什么好事我不知道，假如拉科西他没有做什么坏事，但是最后做了一件大坏事，你就不能因为是老资格而不受批评。新干部当然也一样，新干部大部分是青年人，新干部的缺点应该

批评教育，和老干部比较起来倒是可以原谅。列宁说过：“因为他们年轻上帝会原谅他们的”。对老资格的人应该严格一点，青年们也要严格也要帮助，如果光对青年人要求严格，老太爷们搞得特别舒服，我看那不见得好，要作长期耐心的教育。

中央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个方针许多人实际是不赞成的，是不是我的话讲过头了？我说十个高级干部里面大概有九个不赞成，或者半赞成，或者思想不通，真正通的，真正认为这个方针是正确的少数，所以很需要做工作，做说服工作。

对于辩证唯物主义的对立的方面，比如讲唯心主义应该给予批评，要批评，不批评是不行的。对文艺作品中间反映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倾向的东西要有批评，要有适当的批评，要有说服力的批评，教条主义的批评不能解决问题，而是助长这些不好的东西，这是人民内部教育自己和发展自己事业的一个方针。

正确的东西是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世界上无论什么新的东西，无论什么有生命力的东西，都是跟旧事物、旧的东西作斗争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跟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发展起来的，我们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要想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土地上生长起来，就要和非马克思主义的甚至敌对东西一起作斗争。那些跟马克思主义不符合的，有些不符合的少，有些不符合的多，有些甚至是敌对的。这些统统都长起来的香花或毒草，它长起来有什么可怕呢？没什么可怕的，我觉得没有什么可怕的，年年长草，中国已经长了几十万年了嘛，现在不过是继续长嘛，你如果下一道命令，禁止什么花不准开，什么草都不准长，而其中很可能在不好的花里有好花，如历史上的进化论，伽利略、哥白尼这样一些花草。戴着马克思主义帽子的东西，有时候不见得是真马克思主义者，比如斯大林就是七分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有三分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有三分资产阶级，七分马克思主义。这些基本的道理。马克思主义的生命，要继续生长，是跟不同的事物作斗争，在一块互相批评在批评斗争中才能发展。

现在我们的同志把这些观点联系不起来，不晓得讲了多少次，多少年。像统一战线、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反对形而上学、反对唯心主义、反对教条主义这一套，一等到写文章、演说、开会做议论、做工作时，就统统忘记了，没有批评，没有治病救人的意思，没有帮助人的意思，一棍子打倒。

我们不说这方面，从这个问题我想到种牛痘的问题，为什么种牛痘？你们出过没有？我是出过的，出的不是牛痘，是类似天花的一种，你们出了痘子，就是因为没种牛痘，种了牛痘你的身体就和这个病毒作斗争，斗争的结果就产生免疫力，不和疾病作斗争就不能产生免疫力，所以我说一辈子没有害病的人是很危险的，经常害病是个好事，可以产生免疫力。

九、如何处理罢工，罢课，游行示威，请愿事件

同志们，文件中有几个是关于这类问题的，一个是昆明航空学校为什么没闹事？（这里缺乏一个闹事的材料，最好找一个闹事典型材料印一下）这是一个没有官僚主义的，如果办学校的人，都照这个办法办，那就好咯，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办学校的方法。认识当前青年的思想状况。今天大家都看到了两个材料，青年团中央的材料说：去年全国二十八个城市中，大学、中学，听说二十几个学校的七千多个学生闹事。这个分析相当好，我看无非是官僚

主义和学生幼稚，青年工人、学生不知天高地厚，不知道艰苦奋斗，学校当局、办事人，各种的欺骗他们，又不和他们同甘共苦。还有一个是工人罢工、请愿。总工会的材料说：据不完全统计，有五十多起罢工，其中几个人的，几十个人的多，最大一次有一千多人罢工。

这是人民内部矛盾，如何处理呢？人民内部的矛盾是会经常不断发生的，罢工、罢课、农民要扁担，去年有，今年还会有，前几年也有，不能都归咎于匈牙利事件，说匈牙利事件以来，中国的事情就难办了，你看有几千学生罢课了，有一部分工人罢工了，游行示威了，那么怎么办呢？这个问题我搞了几条，提出四条来，大家看对不对。

第一条、努力克服官僚主义，那么人家就不罢工嘛！努力地克服官僚主义，恰当地处理矛盾，那人家就不罢工了，就不闹了。

第二条、官僚主义没有克服，他要闹怎么办？让闹不让闹？有两个方针，一个是不让闹，凡闹事者就说是反革命，就说是造反。我前面说过，反革命是有的，但是很少了，这些闹事不能说主要是反革命，而主要是我们工作中的缺点。我们不会教育、不会去领导。让闹还是不让闹，我说还是让他闹。罢工他要罢，农民他要闹，学生要罢课，农民要打扁担嘛！因为你没有解决问题嘛。

第三条、闹起来的时候，草率收兵好不好，也有两个方针。刚闹了两三天，闹的人还没有过瘾，当局就急于结束，这就发生矛盾，这怎么解决？我说要闹就让他闹个够，施复亮先生就闹过事（好像在浙江），我也是闹过事（在学校里），因为问题不得解决嘛！并且要闹让他闹够，一个星期不够两个星期，两个星期不够就三个星期，三个星期不够四个星期，总而言之，闹够了就不闹了。把闹事的过程，当作一个教育的过程，做政治课的过程。过去我们的政治工作做的不够，思想工作没有做好，官僚主义应该看做一个罢工、罢课、农民要扁担，看做是我们改进工作，教育工人、学生的一个过程。

第四条、闹事的领袖人物、头子要不要开除？我看不应该开除，除个别人之外，如他拿刀子行凶杀人，那只好到公安局坐班房，因为他杀人是现行犯。如果你又不打人、又不杀人，没有那么严重，那就不要开除，开除罢工、罢课的领袖人物的办法是资产阶级的办法，正确的领袖人物应该留下，错误的也应该留下，错误的领袖人物留下来干什么呢？留下来当“教员”，因为他犯错误了，有些个别的清除出了特务分子，是不是让他离开学校？我看让他学习，只要他不是现行犯，一个学校留下几个特务分子又有什么不好呢？一定要搞得那么干干净净你就舒服了吗？所以清华大学那位学生要杀几千万人，现在留下，他留下来当“教员”，因为他发表了这样一个有名的宣言，是难得请到的。我讲的这四条，第一条努力克服官僚主义使之不闹；第二，要闹就让他闹；第三，闹得不够，让他闹够；第四，不要开除，开除是国民党的办法，我们要以反国民党之道而行之。

我看将来问题还很多，人心不齐，人民几亿人口，人民里面有许多人和我们想法不同，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就是我们的工作人员，我们共产党员，学校负责人，工厂的负责人，合作社的负责人，机关里面的负责人，乃是来自五湖四海，许多人文化也不高，不过文化高的人，知识分子，也不见得不错，有时候知识分子比那些文化低的人犯的错误还要大，那些知识分子犯起错误来可厉害。我们党“左”倾、“右”倾都犯过，都是知识分子犯

的，陈独秀—知识分子、李立三—知识分子、王明—知识分子、张国焘—知识分子，高岗不算，饶漱石也是知识分子。

十、闹事出乱子是好事还是坏事

罢工、罢课、游行、请愿，这许多示威，我看又好又不好，有两重性嘛！商品不是有两重性吗？罢工、罢课也有两重性，匈牙利事件是有两重性的，你们说匈牙利事件好不好呢？我说又好又不好，当然不好，因为匈牙利闹事，但是匈牙利做了一件很好的事情，反革命帮了我们的大忙，匈牙利这件事停下来，比过去巩固，现在的匈牙利比过去不闹事的匈牙利要好，社会主义阵营各国都取得了教训，所以匈牙利闹事有两重性，又好又不好，全世界反苏反共高潮，第一次发生特别是最近的几次全世界范围的，我们该怎么看呢？我看当然不好。第二条，好，这是好事。因为帝国主义的反苏、反共，锻炼了共产党。法国共产党把机关报打烂，瑞士共产党搞得非常不好，总书记躲在山上，躲在我们大使馆里不敢见面，不敢出去，见面就打，大批党员脱党，荷兰、比利时很多脱党的，英国知识分子，知识越高越要脱党，所以知识分子有两种，越大知识分子越不赞成共产党，混了几年、几十年的老党员也要脱党。脱党好不好？又好又不好，主要的还是好。你脱出去了，为什么不好呢？我们这个有位胡适，这位先生，现在他大做文章，我们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他说，他提倡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批评斯大林这件事情怎么看法？我看也是商品的两重性，批评斯大林有两方面的性质，一方面实在有好处，一方面是不好的。揭破对斯大林的迷信，揭掉盖子，使人解放出来，这是一个解放运动，这当然好。但是他揭的方法不对，没有好好分析，一棍子打死，这一方面激起了去年下半年全世界几股大风潮，后来又引起了匈牙利事件、波兰事件。所以有他的错误方面，我们在公开的文章上虽然没有指出二十次代表大会，但实际上讲了，我们和苏联同志当面讲了，讲什么呢？讲他们对斯大林问题处理不当，讲他们的大国主义。

这个美国不承认我们，我看也有两个方面：不承认我们当然不好，联合国我们不能进去，他说这个世界上没有这个国家，我们应该被承认而他不承认，这当然不好，但是也有极大的好处，美国不承认我们，我很舒服。我和许多朋友交换过意见，总而言之，我没有说服他们就是了，我觉得美国现在不承认我们可以，最好再过六年，第二个五年计划完成，至少六年以后再承认，这样比较好，最好是十一年以后，就是第三个五年计划完成以后，再让他在我们取得合法地位，现在让他们进来对我们利益不大，没有他们我们也能建设，等我们建设得差不多，请他们来看一看，他进来一看就悔之晚矣！凡是美国的尾巴一撇，硬起来说不承认中国，我就高兴。他一说要承认，我就有点发愁，因为美国的参谋长是美国人，不是我们这里的聂荣臻，或者那一个跟他打主意，但是我们也要有准备，如果承认得快怎么办？这是接受一定要承认，我说不行，他不承认我们接受，他一定要承认我们那也接受，但是这里有一个台湾问题，台湾必须归我们，这个东西，有文章可做。不归还台湾，你承认我不算，你不给我们台湾，承认我们也不理，英国就是这样承认我们，可是在联合国里投蒋介石的票，所以我们和他是半外交关系，不派正式代表，只派代办，所以这里有文章可做。

去年有几篇错误的文章，刚才我不是批评了那几位同志吗，同时也要感谢他们，错误文章也办了一件好事，因为给我们根据，使我们批评有了对象。

有教条主义的文章，这篇文章出了几篇，还要多出一点，也有机会主义的文章，给我们反批评的依据。没有大作品、好文章，没有好影片怎么办？，我说这是坏事，因为没有嘛。长期没有终究就要来的。因为它总要有的，就要产生出大作品、好影片。因为“物极必反”，坏事做得愈多，好事就要来了。这个辩证法不是马列主义才发明，是我们中国的老子，就是那个老子天下第一的老子早就曾这样说过，他说凡是坏的里面，要看成有好的，好的里面，看成有坏的。祸中有福，福中有祸。“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塞翁得马焉知非祸”？就是说：坏事中应该看里面有好事，还有人家烧掉房子去贺喜的哩！日本人打到中国占领了大半个中国，还占领了菲律宾、印尼和东南亚许多国家，日本人叫胜利，中国叫失败。但是中国这个失败包含一个胜利，日本人的胜利包含着失败。结果果然胜利转化为失败，而被占领国家，象中国的失败转化为胜利。难道不是这样吗？希特勒兵临城下，列宁格勒、莫斯科、斯大林格勒，把整个欧洲都占领了，就要胜利，但是包含着失败，而被占领的欧洲，苏联的大半个国家却包含了一个要胜利。现在要不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你们看，这个等会儿再讲。中国有两条，一是穷，二是蠢，文化水平低。说中国人很聪明，可是文化很低不识字。一个生活水平不高，一个文化水平不高，生活水平很低，文化水平很低。这件事情也要看出他的两面性，我们革命就靠这两条，一个穷，一个文化水平不高。如果说中国人富起来，像西方世界那样的生活水平，就不能革命，生活水平那么高，其缺点是不革命，还不如我们这些文盲，我看还是我们这些文盲好(笑)，当然要消灭文盲，提倡识字，我这里不是来提倡继续保存文盲。我们搞社会主义改造这么快，这个东西就是因为中国太穷了。

如果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怎么样？马上就打，比如讲，我们散会后就听到广播，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怎么办？你们怎么想？有没有这个思想准备？我看要有这种精神准备，要打就打，象学生闹事那样，要闹就闹，那是人民内部矛盾，这是敌我矛盾。他要打你有什么办法呢？全世界再打一次第三次世界大战，把人类消灭一半，有人说要统统消灭干净，我就不相信这个道理，我和尼赫鲁辩论过，巴基斯坦总理也和我辩论过。我说第三次世界大战打起来，我们第一条是不欢迎，第二条是也可以(笑)。我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出了一个苏联，有两亿人口，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果社会主义国家从两亿增加到九亿人口。第三次大战，大概至少要达到十五亿到二十亿，剩下的就不多了。所以战争也有两面性，资产阶级不是有两面性吗，商品不是有两重性吗，战争也有两重性，有破坏的方面，同时也能调动人民的积极性，使人民精神状态紧张起来，使人民觉悟起来，使革命爆发。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战打起来，你们怎么办呢？比方又像日本占领中国一样，把北京、天津、郑州、武汉、广州都占领了，是不是大家就嚎啕大哭呢？如果是那样，我们只是一个哭脸，那我们连蒋委员长也不如了，蒋委员长并不哭脸，蒋介石还打打呢，我们大家都经过的，没有哭脸。第三次世界大战要打就打，你有多少原子弹和氢弹？我们是一个也没有，我们是小米加步枪，但是打的结果，归根到底，你是要打败仗的，因为你是反动的、落后的，虽然经济先进，文化先进，可是政治是落后的，你是违反人民意愿。全世界只有两个国家灭亡不了，一个是苏联，一个是中国，地势苏联靠北冰洋，我们靠昆仑山(笑声)，灭亡不了，所以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我看也有两重性。日本人和我谈话说：“很对不起，侵略了你们”。我说：“朋友，你们做了‘好事’”。他给我搞糊涂了。我说：

你们不打进来，不占领那么多地方，中国人民就教育不过来。我说：你们当“教员”，调动了全中国人民，来反抗你们，这就是你们的‘功劳’”。

国际间的事情就是相互影响，互相渗透，从前有人写了一首诗说：两个泥菩萨，统统打烂，用水调和，再捏成两个菩萨。两个泥菩萨结果就成了你里面有我，我里面有你。现在的世界也是这样，资本主义社会泥菩萨里面有我们，社会主义泥菩萨里有他们。匈牙利有很多人听美国之音、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广播，苏联也有很多人听，中国也有听的，会受影响，还有特务，那是天天计算我们来了。有些地主把地契、田契保存起来，有些国民党员听了就把国民党的文件保存起来，把国民党的党证保存起来，等到那一天国民党回来好作证明。我们也有党证嘛。向坏处去想，打大仗，一个打，一个不打，第一条我们要准备他打，因为他们发疯嘛，当然打的结果是我们取得胜利。现在我们已经九亿人口，加一倍就是十八亿人口。第二条我看一个长时期打不起来，可能给我们十几年的时间，或者更多一些。但打大仗也不一定是坏事，甚至是好事。建设怎么办呢？建设只好停下来，专门打仗。但是现在情况，这个帝国主义他对我们搞什么？对社会主义阵营搞互相渗透，他们希望波兰、匈牙利事件发生。

现在世界上主要的矛盾是什么？是帝国主义争殖民地，就是争亚非国家，美国帝国主义同欧洲帝国主义，英、法之类，争殖民地，这是他们主要矛盾。现在世界上有三种力量，一种叫社会主义力量，一种叫民族独立力量，一种叫帝国主义力量。这三种力量斗争，而这第二种力量，就是民族独立运动力量，纳赛尔等可以和我们合作，在某些问题上，在和平问题上、在反对帝国主义问题上，程度不同，可以跟我们的合作的。打仗对帝国主义的利益不大，和我们打仗的结果对他们好处不大。不打仗呢？用抢地盘的方法，美国人与英国人争亚洲，美国人和法国人也和英国人争非洲，美国石油大王洛克菲勒给艾森豪威尔的一封信，他的方针就是我们的估计，好像是我们叫他怎么办他就怎么办。他主要的目标不是进攻我们，而是针对英、法。有三类国家，一种是巴基斯坦亲美的，还有一种是中立国，象印度这类，还有一类是殖民地，完全没有独立，如摩洛哥、阿尔及利亚这些国家。石油大王洛克菲勒这封信是去年一月写的，今年不知什么地方找出来，在德国，东德报上登了，我们现在已全文公布发表了，很值得看一下。

十一、少数民族和大汉族主义问题

中国有几千万少数民族，他们所居住的地方很广，占全国百分之五十到六十，可是人口占全国百分之六，我过去讲《十大关系》中，也有一条讲汉族和少数民族关系一定要搞好，这个问题主要是解决大汉族主义的问题，解决了吗？还是没有解决好。共产党今年准备召开一次中央会议，专门讨论统一战线和少数民族问题，一定要改变这个大汉族主义作风，思想情绪，包办代替，不尊重少数民族作风。西藏有一派人他们想搞独立国，现在这个当局有些动摇，这回印度请求我们采取让他们回去，他们现在已经回到了西藏，美国人就做工作。印度有个地方叫哥伦堡，那个地方就是专门对西藏做破坏工作的地方，尼赫鲁自己对周总理说，哥伦堡间谍中心，主要是美国、英国。要是西藏独立我能是这样，你搞独立就搞，你要独立我是不让独立的，我们不同意。我们有协定十七条。总理在印度和达赖谈了几次话，劝他们还是回来好，和搞独立运动的人、和住在哥伦堡的人也谈了话，劝他们还是回来好，你若在印度，以后到美国，不见得有利。总理跟他谈了几次话。又跟其他搞

独立运动的人，有这么一堆人住在哥伦比亚的，也跟他们谈了话，还是回来。至于改革。十七条规定，改是一定要改的，但是改要得到你们同意，你们不改就不改，你们最近几年不改就不改。我们现在对他们这样说了，第二个五年计划不改，第三个五年计划改不改看你们的意思，如果你们说改那就改，说不改还可以不改，为什么要那样急呢？

十二、中国可能三、四年个五年计划内逐步改变面貌

工业化的道路苏联有一个，我们现在走的道路是否完全和苏联相同呢？我想有一些不同。在十大关系里头，有几条，几大关系都讲到这个问题，重、轻、农的比例。重工业、轻工业、农业的投资比例。采取比较过去要有相当的一点改变。苏联是九比一，就是百分之九十比百分之十，百分之九十是重工业，百分之十的轻工业同农业。对于农业有点刮的太多，对农业有一点像“竭泽而渔”的味道，要的太多，当然刮来的钱是搞建设了，不是进了腰包咯。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农民的积极性不高，市场就不繁荣，重工业的市场在什么地方呢？重工业的市场在轻工业、农业。市场就是这几亿人，其中有五亿是农民。我们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八比一，实行的结果是七比一，比苏联好。苏联不是九比一么？重工九，轻农一。我们是重工八（周总理：没有农业，就是重、轻），没有农业，加上农业，那这个比例要重新考虑一下，我看这个比第二个五年计划还要考虑一下。可以搞到六比一是否可以？请国务院研究一下。总而言之，轻工业、农业使它发展起来，轻工业、农业这两个东西差不多是一个东西，没有农业就没有轻工业，没有轻工业就没有农业。一个是原料，一个是市场。农业供给原料，轻工业就以农业作为市场。重工业是不是优先发展，那么六比一还是优先，这边占六，那边只占一么，还优先。重工业还优先。但走新的道路，是否比苏联那样工业化的速度反而快一些。但是这样做看起来工业化是慢一点，我看反而要比他们快一些，现在希望寄托在那上头，我看反而比他可能比他快一些。因为苏联在二十一年内，以钢为例，老底子是一千万吨，我们九十万吨，一九一三年战争的时候，苏联钢是四千万吨，一九一七年革命，一八、一九、二〇这三年不算，打内战。从一九二一年算起，一九二一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九四一年夏天，这时间有二十一年半，二十一年半里头，由四千万吨钢增加了一千四千万吨，合起来是一千八千万吨。我们的老底子是一千万吨，不是讲的一九四九年，而是讲的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时的最高年产量九十万吨，我们从一九五〇年算起，二十一年是哪一年？假如帝国主义给我们二十年的时间，可不可能？我前面说到。有两种可能，一种不给，一种给，不给就打起来了，当然给就给，不给就打，打个天翻地覆，天下大乱了。结果赤化全世界，即使不是全世界，也是大半个世界，打了以后再建设，这也是一个办法。他要打有什么办法？更大的可能是他不打，很有可能给我们这样一个时间。二十一年照苏联那样，一九五〇年，二十一年么就是到一九七〇年，第三个五年计划到一九六七年，六八、六九、七〇年还有三年。我们说工业化要三个五年计划或者还多一点的时间，我看差不多，二十一年，钢九十万吨，我看可以断定二十一年以后不只发展到一千八千万吨，可能有二千多万吨。如果我们采取我们现在采取的这个方针，迂回一点，在市场方面多做点工作，使农民吃饱，使农民有购买力，轻工业又有了原料，又有了市场，重工业也就有了市场，化学肥料有了市场，卡车钢材有了市场，水利投资要用钢，钢材有市场，用于轻工业、农业的电力事业要发展起来。

关于经济问题，我今天不准备多讲，也没有时间。这个问题我们还缺乏经验，才搞七年。革命比较有经验，如何做革命斗争，政治斗争我们有经验，我们翻过筋斗，犯过错误，积累了很多经验。而搞经济这个东西没有多少经验，我希望经济工作中不要像在革命斗争付出那样大的代价，像根据地那样翻那么大的筋斗，把南方根据地丧失干净，来了个二万五千里长征，剩下一个陕北根据地。军队损失了百分之九十，党也损失了百分之九十，白区工作几乎损失百分之百，只有这样的教训才把我们教育过来。那么在经济上是否可以缩短一点时间？相当缩短一点，不要那么长，犯错误所受的损失不要那么大，在革命中取得经验，花那样大的代价，要求就是这样一点。但是我们还缺乏经验，究竟怎样恰当，有许多事情还要积累经验。

苏联要不要学习？苏联好不好？有人说不好。我看还是一个很好的国家。谁能给我们设计、装备这么多工厂呢？帮助我们国家建设这样多的工厂呢？美国给我们没有？英国给我们没有？日本给我们没有？法国给我们没有？都不给。谁人给我们设计军事工厂、飞机、大炮、坦克？还是社会主义的苏联。苏联有缺点这是一回事，但是它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是和他们一个类型的国家，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他们也是社会主义国家，只有这么一个国家援助我们，是不是？一切国家都要学，美国也要学，这一点是肯定了的，单学苏联，不是这样讲的，一切国家都要学，英文也要学、法文也要学、德文也要学、日本文也要学，单学俄文不够，但我们主要是学苏联，苏联是我们学习的重点，因为只有他们给我们这些东西，只有他们委派工程师给我们设计，教会我们的人能够自己设计，只有他们能够给我们装备，科学合作也是一样，原子能除了苏联，那个国家能帮助我们搞？所以苏联是学习的重点。

学习有两种态度，一种一切什么都学，就是教条主义，坏经验、不适用的经验都搬来，好的坏的一起搬来，这是一种态度，这种态度不好。我们讲的是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谁要你学习学习落后的经验，我们并没有提出口号要学习苏联落后经验，报纸上也没有登过，但有时候实际上有的经验是落后的经验，标签上写了个先进经验，实际上是落后经验，不应学习而我们也就学来了，也不少，这一部分要避免。

要和苏联团结，要和一切社会主义国家团结，这是个基本的，因为我们就是这么一堆人比较可靠。第二才是亚非国家。至于帝国主义，那些人是没有良心的，杜勒斯有那么多良心？我就不相信，你又不给帮助，不搞机器来，有什么良心？天天骂我们，还强占着台湾不走、不放。

同志们，谈多了么。几点钟了？七点了。三点、四点、五点、六点、七点，没有时间了，不讲了。[2]

以上是毛泽东 1957 年 2 月 27 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原题为《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

这篇讲话记录整理成文后，于 1957 年 3 月 30 日报送毛泽东。1957 年 5 月上旬至 6 月中旬，毛泽东对讲话整理稿作了多次修改和补充，并多次征求党内有关人士意见。据邓力群 1999 年著文回忆：参加修改中央宣传工作会议和最高国务会议讲话的有胡乔木、田家英、陈伯达、邓力群。毛泽东让胡乔木修改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田家英根据记录稿负责整理宣传工作会议记录。田家英的整理稿，很快得到毛泽东认可，但没有即时发表，毛泽

东死了以后又经过修改才收编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里。最高国务会议的讲话，由胡乔木按记录整理，整理稿交到了毛泽东手里以后他不断地进行修改，毛泽东让胡乔木、陈伯达等提意见，实际上，这几个人没能提什么意见，今天毛泽东改一稿出来给他们看，他们正在读，明天又有一稿出来，5月10日到6月19日，三十九天里改了十四次。陈伯达、胡乔木等还没有揣摩到毛泽东前次的修改意图，新的修改又来了，乃至无从下手，不敢轻举妄动，每次都是毛泽东自己改，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修改。陈伯达曾经考虑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里十二个矛盾的次序加以调整，先讲什么，后讲什么，反复考虑，还是提不出满意的方案，也就作罢了。

5月7日，毛泽东在第一次修改稿上，将题目改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修改和征求意见稿中，毛泽东还写了不少批语。

5月10日，他批示将几经修改后的稿子作为“草稿第一稿”在小范围内印发征求意见，写的批语是：“印小型十二份，大型三份，连原稿送来。版留。”

“请收到此件的同志提出修改意见，交陈伯达同志汇总修改。毛泽东 五月十日”

5月24日，他批示将“第二稿”印发征求意见，写的批语是：“再打清样（大本），即发在京各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外加田家英、胡绳、邓力群。各同志：此件请即看，在你们认为应当修改的地方动笔加以修改，于五月二十六日退回中央办公厅杨尚昆同志，为盼。毛泽东五月廿四日”。

5月25日，他批示将“第三稿”印发征求意见，写的批语是：“田家英同志：即印发在京各中央委员、候补委员，田家英、胡绳、邓力群，今天到会各省市负责同志（卅余人），务于今日晚十二时以前送到多人手里，特别是各省市来的人。毛即”。“各位同志：这是第三稿，还要修改。请你们在收到后，在你们认为应当修改的地方即行动笔加以修改，于六月五日以前将原件退还杨尚昆同志为盼！毛泽东五月二十五日”。

5月27日，他批示将“第四稿”印发征求意见，写的批语是：“田家英同志：请再印，印数如此次到会人数，于今天晚上九时以前发到到会各人手里。改处校正勿误。毛泽东 五月廿七日”。“各位同志：这是第四稿。请看‘百花齐放’那一节，有一段重要的修改。还要修改。请你们在收到后，在你们认为应当修改的地方，即行动笔加以修改，于日内将原件退还杨尚昆同志为盼！毛泽东 五月二十七日”。

5月28日，他批示将“第五稿”印发征求意见，写的批语是：“在三小时内，印发各省市党委书记，每省（市、自治区）一份，另发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候补书记每人一份，另发田家英、邓力群、胡绳各一份。将以前几次所发各稿全部收回。原稿退毛”。“各位同志：这是第五稿。请你们在收到后，在你们认为应当修改的地方，即行动笔加以修改，于日内将原件退还杨尚昆同志，了盼！毛泽东五月二十八日”。

6月9日毛泽东在他自己标明的“六月八日修正稿”上批示：“即打清样35份，于本日上午九时交杨尚昆同志，即分送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及田家英。另即刻付翻译。毛泽东六月九日上午二时。”

这个讲话整理稿，经毛泽东审定，于6月17日最后定稿。

6月19日，在《人民日报》上首次公开发表。

6月19日正式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时，仅仅保留了讲话的某些内容，一半以上已经是面目全非。如果把基本据实记录的文稿

和《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刊载的文章对照比较，自会一目了然，此处不再赘述。

从讲话到文稿，需要做一些技术加工和文字修饰，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必要的。但是不能无限制地改变中心内容和基本主旨。如果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情况的变化，讲演者需要修正自己的观念，可以另写一篇文章。毛泽东篡改了讲话的大部分内容和重要论断，却在发表时仍然标注这是2月27日的讲话，岂不是“驴唇不对马嘴”。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对他是不适用的，他本来就是衣冠禽兽的伪君子。

在多次修改中，毛泽东删掉了相当多的内容，加进去了一些和整个讲话很不协调的论断，对国内形势，特别是对阶级斗争的形势，对思想战线上的主要危险，对知识分子的估计都有实质性的改变。

毛泽东在修改稿中加进去了在中国政治生活中必须坚持的六条政治标准。

前面强调“必须坚持”，随后既自相矛盾又装模作样地说：提出这些标准，是为了帮助人民发展对于各种问题的自由讨论，而不是为了妨碍这种讨论。不赞成这些标准的人们仍然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见来辩论。

毛泽东又在这里撒谎。后来的事实证明，对于“六条标准”不仅不容许辩论，连讨论都不行，甚至完全符合六条标准的意见，也被强词夺理、颠倒黑白地扣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帽子，遭到无情打击。许多人就这样被关押了二十多年，直到毛泽东死了以后才含含糊糊地被“改正”。

随着反右派斗争的不断扩大，背离实际的“左”的思想愈来愈严重。十月份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就否定了“八大”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中有关主要矛盾的科学论断，以及对知识分子属性的判断和对双百方针的解释。虽然以后毛泽东在一些文章和讲话中也提到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并在口头上宣扬要在中国造成一个既有集中又有民主，既有纪律又有自由，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那样一种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但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前提下，在权力斗争压倒一切的情况下，在独断专行登峰造极的环境中，这个局面已经难以形成了。这不能不是背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所造成的一个苦果。

行文至此，笔者朦胧地感觉到，“人民内部矛盾”这个提法，是概念模糊的伪命题，是值得商榷的。在法治国家，无所谓人民内部和人民外部，无论是谁犯了法，均按照统一的法律审理、裁决。有了“人民内部矛盾”提法，必然发生无穷的混乱。首先，“人民”和“敌人”并没有严格而明确的法律界定。由谁认定“人民”和“敌人”，也没有明确的权限规定。从毛泽东到一个乡村支部书记，都可以把反对自己的人或自己不满意的人说成“敌人”，无需经过调查、审讯等法律程序即可将其变成专政对象。毛泽东这个提法貌似新颖，实则故弄玄虚、混淆是非。限于篇幅，此处暂不赘述，容笔者深入研究后，另文评说。

附注：

[1]六十年后重读毛泽东的这篇讲话，经过历史的验证，只感觉毛泽东当时的讲话装腔作势，故弄玄虚，充斥着空话，谎话，信口雌黄，痴人妄语。只能用巧言令色鲜矣仁概括之。巧言令色鲜矣仁是一个汉语词汇，出自孔子《论语·学而》。意思是花言巧语，装出和颜悦色的样子，这种人的仁心就很少了。

[2] 以上讲话稿引自“法治论坛”(bbs.chinacourt.org)，并参照刘国梁先生的记录稿，修改了少数错字辑录而成。

刘国梁先生对记录稿有一个简短的说明，照录如下：

(刘国梁 1957-5-20 依据中共内部文件照抄，1999-11 誊清，2006-2-9 打字。)

1957 年 2 月 27 日毛泽东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报告，那时我在北京航空工业学校任教，毛主席讲话录音在学校内部传达。他的讲话生动、幽默，会场掌声阵阵，十分热烈。

1957 年 4 月我带领毕业生到沈阳黎明机械厂（航空发动机 410 厂）进行毕业设计，5 月 20 日这天，厂党委下发传达毛主席《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讲话录音的中央文件，要求传达后即刻收回，原文三十四页。传达后大家十分振奋，在文件收回之前，为了长久收留，就组织数人分头照抄复写数份，我收留一份至今。

1957 年 6 月 19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报告，依据当时的形势文章内容作了重大修改，经对照与讲话录音记录原文差别很大。

时至今日，已近五十年之久，这份抄录复写件，纸质脆弱，有的字迹潦草难辨，为了便于保存，1999 年 11 月我尽力进行重新誊清复写，以便今后阅读和研究。

还由于当年抄写匆忙，各人字迹不同，有的潦草难以辨认，难免有遗漏、错误之处，在誊清时尽量纠正，保持原文标点、字义。但仍会有错、漏、误和可疑之处，实属难免，就用（）和 X 标出，请阅读中着力研究、领会和更正之。

三、整风与反右

有人说：毛泽东原本是安心整风的，只是由于右派分子猖狂进攻，才不得已发动反右派运动。真的是这样吗？

中共中央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说：“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

这段话的意思是：右派“发动进攻”在前，共产党被迫“进行反击”在后，反右斗争是一场“防御战”、“保卫战”。

事实是这样吗？

对这个问题，我当时也很不清楚，被蒙蔽了几十年。

经历了，思考了，探索了五十多年，才逐渐地明白，整风和反右是毛泽东预谋的一个战役的两个称谓。整风是假，反右是真；整风是虚，反右是实；整风是挂在屋檐下迎风招摇企图大肆贩卖假货的幌子，反右才是毛泽东的真实目的。

反右派斗争是毛泽东蓄谋已久、精心策划、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阴谋和阳谋。毛泽东的终极目标是摧毁党内外知识分子中的民主思想和人格独立精神，乃至肉体消灭一切敢于对专政独裁提出异议的爱国人士。彻底构建一党专政、个人独断专行的极权统治。妄图实现家天下，让全中国人民都做他的奴隶，做驯服的工具。他则高高在上，自作始皇，谋求万世不竭。

几十年过去了，回顾一下整风反右的过程和毛泽东当时的所作所为，有助于让阴谋和阳谋大白于天下。

请看事实：

1957年5月15日毛泽东撰写《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时，采取了严格保密的方式，只在党内高层人士中公开了反右运动的部署。

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连毛泽东在内一共是二十二个人。政治局委员是：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林彪、林伯渠、董必武、罗荣桓、陈毅、李富春、彭德怀、刘伯承、贺龙、李先念，政治局候补委员是：乌兰夫、张闻天、陆定一、陈伯达、康生、薄一波。这二十二个人当中，陈云、李富春、刘伯承和张闻天没有在文件上签字或注明已阅，其余的十七人以签字的形式确认看过这个文件，且没有提出异议，也就是说，他们明确地知道了毛泽东安心“反右”。但在中共独裁的体制下，谁也不敢做声。

李维汉和周扬等人虽不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但很快就从传闻中知道了毛泽东的这个意图。

李维汉在其晚年所著《回忆与研究》中写道：在毛泽东责成他召开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期间，“中央要反右的方针在我脑子里已经很清楚了”。

知名作家黄秋耘在《风雨年华》中描述了1957年5月18日晚他在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兼党组书记邵荃麟那里获知“风向转了”这个政治信息的状况。

他写道：“我们正谈得起劲的时候，桌上的电话铃声响了，邵荃麟连忙走过去接电话，不到两分钟，他登时脸色苍白，手腕发抖，神情显得慌乱而阴沉，只是连声答应：‘嗯！嗯！’最后只说了一句，‘明白了，好！我马上就来。’

我看了一下手表，已经是九点二十分了，肯定是发生了出人意料之外的重大事件，要召开紧急会议。他放下了电话，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周扬来的电话，唔，转了！’。

黄秋耘还写道：“这个‘急刹车’的措施可能已经酝酿了一段时间，直到五月中旬才决定下来。周扬那一级的高级干部（他当时是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央宣传部主管文艺的副部长）至早也到五月中旬稍晚一些时间才确知这一消息”。黄秋耘据此认为，毛泽东决定进行“反右派运动”的部署在5月18日那天已经传达到周扬这一级的干部。

把5月15日定为反右运动中的重要转折点，多数人是没有疑义的。

问题在于：5月15日以前毛泽东是不是着眼于整风而没有预谋反右呢？整风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5月15日之前是不是有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猖狂进攻呢？

让我们继续回顾：

1956年8月30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上提及了党内存在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但是没有谈整风的话题。

1956年11月15日，匈牙利事件发生十余天之后，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第一次提出“我们准备在明年开展整风运动”并说“上半年发通知，下半年整风，中间隔几个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327页）。

整什么风呢？毛泽东说“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中央决定后，先发通知，把项目开出来”，“预先出告示，到期进行整风，不是‘不教而诛’，这是一种小民主的方法。”（《毛泽东选集》第

五卷 327 页)。毛泽东在这里说的是按照中共中央开出来的项目,用“小民主”的方法在共产党内部整顿三风。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还说了一段很重要也很耐人寻味的话:“现在,民主党派,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大民主。如果搞大民主,民主党派就被消灭了,就不能长期共存了。”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说:“你要搞资产阶级大民主,我就提出整风,就是思想改造,把学生们统统发动起来批评你,每一个学校设一个关卡,你要过关,通过才算了事。所以,教授还是怕无产阶级大民主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326 页)。

这段话之所以重要,在于它说出了“整风”是针对民主党派和部分知识分子要求民主的反措施,整风就是思想改造,整风就是整人。指出了整风的方法和目的,就是要发动群众设立关卡,让整风的对象人人过关。

这段话泄露了毛泽东整风的真意,以后的事态发展证明毛泽东也是这么做的。前面所谓的整主观主义、整宗派主义、整官僚主义,原来只是虚晃一枪。

过了五个多月,1957 年 4 月 27 日,中共中央发布了第一个整风文件《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隔了四天,《人民日报》才全文刊登,可见是不慌不忙的。

这个文件分为五个部分,全文大约二千五百字。这公开发表的文件和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讲的那段话截然不同,公开的文件是写给人们看的,具体的行动是按照党内秘密指示撸起袖子干的。

文中提出了:

(1) 中央认为有必要按照“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的方针,在全党重新进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

(2) 这次整风运动应当以毛泽东同志今年二月在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和三月在中央召开的宣传会议上代表中央所作的两个报告为思想的指导,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作为当前整风的主题。

(3) 这次整风运动,应该是一次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运动,应该是一次恰如其分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运动,一般不要开批评大会或斗争大会,应该放手鼓励批评,坚决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对于在整风运动中检查出来犯了错误的人,不论错误大小,除严重违法乱纪者外,一概不给以组织上的处分。

非党员愿意参加整风运动,应该欢迎。但是必须完全出于自愿,不得强迫,并且允许随时自由退出。

(4) 在进行整风运动的同时,应该在全党提倡各级党政军有劳动力的主要领导人员以一部分时间同工人农民一起参加体力劳动的办法,并且使这个办法逐步地形成一种永久的制度。使领导者同群众打成一片,使人民内部的关系面貌一新,

(5) 这次整风运动,应该首先从县级以上、军队团级以上的党的组织以及大的厂矿和大专学校的党的组织开始,并且应该首先从检查领导干部的思想作风开始。

整风的组织领导办法和具体工作计划，由中央直属党委、中央国家机关党委、总政治部和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自己规定实行，并且希望于收到本指示以后两星期内能够将这种具体计划报告中央。

这个公开发布的指示，属于“示形于外”之类的官样文章，看不出反右迹象和暗藏的杀机，似乎只是一场和风细雨的天气预告。

文件明确指出：坚决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文件特别强调：对于在整风运动中检查出来犯了错误的人，不论错误大小，除严重违法乱纪者外，一概不给予组织上的处分。

后来的事实证明，以上五条没有一条是切实执行了的。纯属骗人的鬼话。

文件不等于报纸，报纸不等于现实，是中共靠谎言维持其统治的一贯作风。

中共一向强调统一，没有中共中央的指示，各地不敢轻举妄动。第一个整风运动的指示是1957年4月27日下达的，即使一天也不耽搁，整风最早的启动日期只能在4月27日以后。

5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在毛泽东授意下写的社论《为什么要整风》，5月7日又发了一篇社论《为什么要用和风细雨的办法来整风》。这两篇社论仅仅是诠释中共中央的指示，可谓供观赏的应景之作，用以愚弄和麻痹人民，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具体内容。

一个内部文件再加上两篇社论，就是整风的全部开场锣鼓。有人打锣，有人敲鼓，似乎煞有介事地要开台唱戏了。

文件需要传达，整风需要部署，各地区、各单位要编制具体计划，并按照毛泽东的要求，在两周内上报中央，得到中央认可或批准才敢行动，中央不认可谁也不敢擅自行动。还要等待毛泽东所说“把项目开出来”才能够按照中央开列的清单逐一进行对照检查。这些工作都需要时间，从4月27日算起，两周以后就是5月10日了。也就是说，即使马不停蹄，要真开展整风运动，也是5月10日以后的事情。

然而，开台锣鼓响了一阵，或者说只敲了两三声，就悄悄地收场了。此后就再也没有整风的报道，毛泽东所说的“把项目开出来”也成了一纸空文，直到他一命呜呼也没有“把项目开出来”。中央没开项目，下面也就无从动作，谁也不敢轻举妄动，所谓的整风只是吆喝了一两声，没有任何实际行动。

尽管中共只是吆喝了一两声要整风，尚未见行动，但据说在这十来天内“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引自《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于是中共中央认为“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似乎中共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由毛泽东亲自出马，于1957年5月15日向党内高层人士发布反右的战役部署，随后采取各种手段“引蛇出洞”、“诱敌深入”。轰轰烈烈的疾风暴雨式的反右自此而始。

从4月27日到5月15日。满打满算也不过十九天的时间，这短短的十多天里，是谁要大鸣大放呢？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鼓吹了什么呢？发动了什么进攻呢？用的是什么武器呢？俘虏或杀害了中共几兵几卒？占领了几座碉堡？放肆到什么程度呢？且看如下章节。

(1) 大鸣大放的始作俑者是谁？

1981年6月中共中央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说：“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

必须严肃地指出，这个提法有悖历史的真实。

“极少数”究竟是多少呢？按照中共中央的统计，1978年复查后全国只留下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九十六名右派未予改正，也就是中共中央反复查证后认定只有这九十六个人是真正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即使他们百分之百地都鼓吹了大鸣大放，也不过九十六个人而已。在他们中间，哪几个属于“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的极少数呢？查阅批斗他们时所加的罪名，和各级共党组织为这九十六名右派分子拟定的书面罪状，没有一个是“鼓吹大鸣大放”，也就是说，所谓极少数实际上等于零，这是中共历经二十二年验证认定的事实。堂而皇之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为什么置此于不顾，在那里胡说八道呢？

大鸣大放不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的，而是毛泽东极力叫嚣的。

把毛泽东叫做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是人们不能接受的。他没有那个品，也不够那个格。

应该根据事实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

1951年，国内戏曲界就京剧的未来发生了争论，一派认为是国粹，应全部继承；一派断定是封建糟粕，应予以取消。1951年4月，梅兰芳请毛泽东为中国戏曲研究院正式成立题词，他挥毫写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八个字，表明各种戏曲都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加以继承和发展。由此，“百花齐放”的口号得以流传。

1953年，中宣部就历史研究、文字改革、语文教学问题组织三个委员会，毛泽东指定陈伯达为历史研究委员会主任。当陈向毛请示创办《历史研究》刊物的宗旨时，毛回答说：“百家争鸣”。陈伯达于10月份向部分委员传达了毛的圣谕。

但在这个时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只是在少数人中辗转相传，没有扩展。1956年上半年，毛泽东的“新思维”初露端倪，允许电台偶尔播放周璇唱的《四季歌》“春季里来绿满窗，大姑娘窗下绣鸳鸯……”

1956年4月2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表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54页）。“双百方针”得以在部分人中公开。

1956年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七次会议上正式提出实行双百方针。他说：现在春天来了嘛，一百种花都让他开放，不要让几种花开放，还有几种花不让他开放，这就叫百花齐放。又说：百家争鸣是诸子百家，春秋战国时代，二千年前那个时候，有许多学说，大家自由争论，现在我们也需要这个。他指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李森科、非李森科，我们搞不清，有那么多的学说，那么多的自然科学，就是社会科学，这一派，那一派，让他们去说，在刊物上、报纸上可以说各种意见。（笔者注：毛泽东这段话也只能归之于“放屁”。）

1956年5月2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向党内外知识界一千余人作了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他说：“我们所主张的‘百花齐

放，百家争鸣’是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意见的自由。”“我们主张政治上必须分清敌我，我们又主张人民内部一定要有自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人民内部的自由在文艺工作和科学领域中的表现。”在自然科学工作方面，他指出：“在某一医学上，生物学或其他自然科学学说上，贴上什么‘封建’‘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无产阶级’‘资产阶级’之类的阶级标签，……是错误的。”在文学艺术工作方面，他指出：限制创作的题材“只许写工农兵题材，只许写新社会，只许写新人物等等，这种限制是不对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对批评工作来说，就是批评的自由和反批评的自由”，而现在的批评，有些令人害怕，应当纠正。

该讲稿经毛泽东6月8日审定后，《人民日报》1956年6月13日全文刊发，向海内外公开宣布。日后世人称之为“双百方针”。

1957年3月12日，在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说：“‘放’还是‘收’？这是个方针问题。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一个基本性的、同时也是长期性的方针，……”。“这个方针，不但是使科学和艺术发展的好方法，而且推而广之，也是我们进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毛泽东文集》第七卷278、279页）

中共中央第一个整风文件《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是4月27日议定，5月1日《人民日报》才全文刊登的。三月份，整风过程尚未启动，“右派分子”还蒙在鼓里。毛泽东就已经大力鼓吹“放”，而且要作为基本性的、长期性的方针，推而广之了。明明是毛泽东在那里不停地喧嚣，怎么能说“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呢？

3月17日，在天津党员干部会议上，毛泽东说：“……至于马克思主义可不可以批评，人民政府可不可以批评，共产党可不可以批评，老干部可不可以批评，我看没一样不可以批评的。”

3月20日，在上海党员干部会议上他又说：“不但纯粹的科学问题上，而且涉及政治性的是非问题上，只要不属于反革命一类，也应该让他们自由说话。”

毛泽东撰写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说：“这一次批评运动和整风运动，是共产党发动的。毒草共香花同生，牛鬼蛇神与麟凤龟龙并长，这是我们所料到的，也是我们所希望的。”

既然在5月15日前就已“料到”，又寄“希望”，显然是预设的陷阱。

1957年6月6日，毛泽东把“大鸣大放”写进了由他起草的党中央《关于抓紧时间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中：“各省市一级机关高等学校及地方一级机关，用大鸣大放的方法整风，请即抓紧进行。”

6月8日又把“大鸣大放”写进标题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党内指示：“省市机关和高等学校大鸣大放的时间，大约十五天左右即足。”在这个《指示》里，毛泽东还对“大鸣大放”的运作方式做了具体部署：“要组织每个党派开座谈会，左中右的人都参加。正反两方面的意见都让其暴露，派记者予以报导。我们巧妙地推动左、中分子发言，反击右派。……高等学校组织教授座谈，尽量使右派吐出一切毒素来，……最好让反动的教授、讲师、助教及学生大吐毒素，畅所欲言。”（《毛泽东选集》第五卷431页）

1957年7月1日，在《人民日报》刊发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

应当批判》中，毛泽东说得更露骨，更彻底。他说：“共产党看出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这一场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让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发动这一场战争”。“在五月八日至六月七日这个期间，对资产阶级反动右派的猖狂进攻不予回击”，“其目的是让魑魅魍魉，牛鬼蛇神‘大鸣大放’”，“从而聚集能量，等待时机成熟，实行反击”。“让……发动……”这不是“来来来，你先碰我一下”小流氓常用的挑衅手段么？

7月，在中央青岛会议上，毛泽东更明确地把“大鸣大放”列为整风“四个阶段”之首。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八届三中全会上说：“今年这一年，群众创造了一种革命形式，群众斗争的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

又说：“我们找到了这个形式，适合现在这个群众斗争的内容，适合现在阶级斗争的内容，适合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抓住了这个形式，今后的事情好办得多了。”

“这种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形式，最适合发挥群众的主动性，提高群众的责任心。”

还说：“我们的民主传统今年是一个很大的发展，以后要把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种形式传下去。这种形式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民主。”

以上引文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467 页、468 页。在毛泽东发表的讲话和所写的文章中，宣扬“大鸣大放”的词句比比皆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撰稿人充耳不闻，视而不见。莫非都成了聋子和瞎子，或是都得了失忆症。

而且，毛泽东讲的“大鸣大放”并非只限于“文学艺术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毛泽东极力把“鸣放”引向政治，什么“适合现在这个群众斗争的内容”、“适合现在阶级斗争的内容”、“群众创造了一种革命形式”、“这种形式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民主”等等，难道不是政治？但是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三次会议上却说：“后来右派要涉及政治”，明明是毛泽东要涉及政治，却委蛇于人，实属不知人间有羞耻二字。他本来就是地地道道的流氓。

当年曾经流行一条“语录”——政治是统帅，政治是灵魂，政治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言必称政治的毛泽东，把大鸣大放涉及了政治的责任推给他认定的右派，只能是更加暴露其无赖的嘴脸。

事实上，正是毛泽东把“大鸣大放”作为阴谋与阳谋的重要手段而大力鼓吹，极力诱惑，将数百万热爱祖国、憧憬社会主义、拥戴毛泽东的志士仁人，尤其是年轻干部、技术人员、教师和青年学生推进苦难的深渊，惨遭二十余年折磨。毛泽东却在那里狞笑着宣告取得了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毛泽东极为欣赏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在其权力达到顶峰也是临近垂死之际，这所谓“四大”被载入 1975 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之中。

宪法第十三条赫然写着：“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是人民群众创造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新形式。国家保障人民群众运用这种形式，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以利于巩固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毛泽东主持编定的宪法条文里明明写着大鸣大放是“革命的新形式”，是为了造成某种“政治局面”，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难道没有涉及政治？难道七五年宪法是右派分子的不屑子孙编写的？

宪法中写得很明白，“四大”是人民群众创造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新形式。不是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鼓吹的，切勿张冠李戴。

毛泽东死了以后，再次修改宪法时才把毛泽东视为宝贝的七五年宪法第十三条去掉。也就是把毛泽东称之为“社会主义民主”的东西像脏水一样泼出去了，原来社会主义是不需要民主的。

毛泽东早在 1956 年和 1957 年初即多次鼓吹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些言论已录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1981 年中共中央通过历史决议的时候，数百名据说是学习过毛泽东著作的中央委员竟然视而不见，装起糊涂来了，把“大鸣大放”说成是“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的，岂非咄咄怪事。

诚如上述，大鸣大放的吹鼓手是中共称之为伟大领袖实为政治流氓的毛泽东，而不是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将大鸣大放引向政治以便“引蛇出洞”“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始作俑者也是毛泽东。白纸黑字不容篡改，历史事实岂能歪曲，这个经中共中央六中全会认真讨论、投票通过、堪称十分严肃的《历史问题的决议》也充斥着谎言，中共还有什么话是真实的呢？！

(2) 陈其通的插曲和毛泽东的翻云覆雨

陈其通（1916—2001），四川省巴中县人。十六岁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十七岁加入中国共产党。任红四军第十一师政治部宣传队队长，少共巴中县委书记。1935 年参加了长征。中共掌权后任军队政治部文化部文艺处副处长兼总政治部文工团团长，总政文化部副部长等职，一贯追随极左路线，自称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因反右有功，1961 年晋升少将军衔，煊赫一时。正在他平步青云、自鸣得意之际，文革乍起，陈其通被认定为反党分子，受到批判和监禁。在狱中其体重减轻了一半，视力严重衰退，双耳失聪，牙齿全部脱落，临近花甲之年，中枢神经崩溃，无法进行正常思维，丧失了工作能力，长期生活在疾病煎熬中，2001 年逝世。

1956 年，中共提出了“百花齐放”的口号，表面上有限地放松了文化管制和思想禁锢。小说、诗歌创作略见宽松；某些“干预生活”的作品如《在桥梁工地上》、《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等得以发表并引起讨论；某些传统剧目，如《四郎探母》、《王宝钏》、《翠屏山》等解禁；三四十年的电影如《马路天使》、《十字街头》、《夜半歌声》、《一江春水向东流》等被允许上演；个别鬼戏如《活捉王魁》、《乌盆记》等偶尔被允许登台演出。

此事引起陈其通的关注和兴趣，似乎找到了表演的机会。于是联络其属下陈亚丁、马寒冰、鲁勒等人写了一篇文章《我们对当前文艺工作的意见》，刊登在 1957 年 1 月 7 日《人民日报》第七版头条位置。文章开头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唱颂歌，因为所谓双百方针是毛泽东提出来的，谁也不敢公然反对“圣旨”。陈其通等四人抽象地赞颂双百方针给文艺“带来了新的繁荣和无限的创造性”，随后笔锋一转，以较多的文字论述文艺界的现状说：提出“双百方针”后，“在过去的一年中，

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向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越来越没有人提倡了”，“使文学艺术的战斗性减弱了，时代的面貌模糊了，时代的声音低沉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光辉在文学艺术这面镜子中光彩暗淡了”，“自从提出‘百花齐放’以后，有许多人只热衷于翻老箱底，热衷于走捷径去改编旧的……”该文章共两千余字，大量篇幅是对“双百方针”的疑虑和指责，认为它带来了负面结果。

1957年初，毛泽东集中精力实施其“引蛇出洞”“聚而歼之”的预谋，高度关注报纸上讨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文章。《人民日报》刊载的“四人文章”，立刻引起了他的注意，当即通知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吩咐道：“请将此文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及月中到会各位同志。”杨尚昆自然明白“月中到会”是指中央定于1月18日至27日在北京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于是遵命而行。

毛泽东还重点批示：“这篇文章值得注意。文章有片面性，但他们是忠心耿耿为党为国，没有他们，会亡党亡国。”

毛泽东于1月14日在中南海约见《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袁水拍和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臧克家，在与两位诗人讨论诗歌的时候，毛泽东谈到了“四人文章”，并说：听说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后，大家不写革命题材了。对作家要安排，要管与不管相结合，要写重大题材。

1月7日的批示和1月14日的讲话暴露了毛泽东的灵魂深处仍然认为“左派”是避免亡党亡国的依靠力量，潜藏着的下意识还是必须防范右派和对作家的思想和写作方向仍需严加控制。

然而，《人民日报》发表了陈其通等人的文章以后，关于“百家争鸣”的讨论明显减少，歌功颂德之声渐次增多。这又引起了毛泽东的警觉，陈其通等人的论调是否代表了一种思潮，不利于施展“引蛇出洞”的阴谋诡计呢？！

1月18日，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在北京开幕，与会者都领到了“四人文章”，毛泽东当天作长篇讲话，又专门说到陈其通等四人的观点。在讲话中，毛泽东对这篇文章从竭力推荐突然转为极端不满，他说：“百花齐放，我看还是要放。有些同志认为，只能放香花，不能放毒草。这种看法，表明他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很不理解。”

三天以后，毛泽东在同一个会议上讲话说：“在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当然不能让毒草到处泛滥。无论在党内，还是在思想界、文艺界，主要是占统治地位的，必须力争是香花，是马克思主义的。”

以上模棱两可甚至相互矛盾的讲话让参加会议的《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左右为难了，他判断不了“伟大领袖”对“四人文章”是肯定还是否定，是真的不满意还是另有所指。实际上，像邓拓那样判断不清毛泽东真实意图的不在少数，参加会议的各省市区书记们回到地方以后，大都没有把毛泽东对“四人文章”的批评传达下去。

由于省市区书记们大多认为毛泽东肯定了“四人文章”，所以在传达的时候，不免美言几句。该文作者之一马寒冰甚为得意，极为活跃，在1957年2月号的《文艺学习》上又发表了一篇题为《一部不真实的作品》的文章，批评1956年9月《人民文学》杂志上刊登的王蒙短篇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马寒冰认为二十二岁的王蒙批评的官僚主义现象在边远地区也许会存在，而北京是中央所在地，不可能存在。

不久前受到毛泽东赞扬，批评了俞平伯“红学”观点的两个“小人物”之一的李希凡，认为机会又来了，于是和马寒冰遥相呼应，在2月9日的上海《文汇报》发表文章《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

陈其通等人的文章发表后，文坛开始沉寂。毛泽东感觉不妙，唯恐暴露“引蛇出洞”的预谋，影响“诱敌深入”诡计的施展。于是连忙召见邓拓，说陈其通等人的文章有教条主义，要写文章予以批评。

新发表的马寒冰、李希凡两篇文章，毛泽东也及时读到了。

1957年2月16日中午时分，毛泽东才起床不久，吃罢了中午饭，便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中央报刊、中国作家协会、科学院、共青团领导人座谈文艺思想，共二十八人参加，其中有部分党外人士。

毛泽东讲话一开场就说起了马寒冰和李希凡对王蒙《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的批评。毛泽东说：“这篇小说有缺点，需要帮助他，对待起义将领也要帮助，为什么对青年人不采取帮助的态度呢？”

“有些同志批评王蒙，说他写的不真实，中央附近不该有官僚主义。我认为这个观点不对。我要反过来问。为什么中央附近就不会产生官僚主义呢？中央内部也产生坏人嘛！”

毛泽东认为，马寒冰的文章是用“教条主义”来批评人家的文章，是没有力量的。李希凡的文章言之无物、故弄玄虚。

毛泽东随后大段阐述了要坚持“双百方针”的观点。

这天，毛泽东是在很小范围里讲话，没有安排迅速传达，马寒冰毫不知情，自以为《人民日报》和《文艺学习》都发表了自己的文章，成名在即，一个部队的处长级歌词作者（马寒冰是《新疆好》《我骑着马儿过草原》等歌曲的词作者）俨然成了梦寐以求的“文艺评论家”，而且被毛泽东夸奖是“忠心耿耿，为党为国”。得志之余，意犹未尽，于是又写出一篇批评王蒙的文章《香花还是毒草》，寄到《人民日报》。报社文艺部准备发表，已排出清样，结果送审时被先阅者送到了毛泽东那里。毛泽东一看，又是马寒冰写的，什么人竟敢如此大胆！接二连三地干扰“引蛇出洞”！这就促使他进一步发表批评意见，要在党内干部中讨论“双百”方针该不该贯彻和如何贯彻的问题。

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作了以“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为题的长篇讲话。这次讲话的内容和后来正式发表时有明显不同。毛泽东在讲话中不满地提到了陈其通等人的文章，他问道：“《人民日报》何时答复四个人？似乎毫无准备，也不请示。”从“也不请示”这一句话来看，负面情绪已在其中，而且意在督促“答复”。

毛泽东在讲话中再一次点名批评了马寒冰。他说：“有一位青年作家叫王蒙，不是王明，大概是王明的兄弟吧！（笑声）写了一篇叫做《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也发生事情了，有赞成的，有反对的。后来研究，反对者也是一位共产党员，是共产党和共产党打架。讲得他一点好处也没有，其中有马寒冰的批评。”“说中央所在地不出官僚主义”。

3月8日，毛泽东在和文艺界代表谈话时说：党内提过批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现在还没有展开。中央委员会要开一次会，发一个指示，今年准备，明年开始，这也要有一个酝酿时期。决议要在今年上半年做出来。现在党内还没有统一思想，什么是官僚主义，如何批评，认识还不一致。整风开展起来，那时候就好批评了。现在刚刚批评一下，陈其通等就发表文章，无非是来阻止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毛泽东几次在会议上谈到，《人民日报》发表了“四人文章”却没有呼应或辩驳文章，没有指出“四人文章”的“教条主义”问题。

邓拓和文艺部主任袁水拍闻讯深感被动，立即着手改进。由陈其通四人文章引起的风波，给邓拓带来极大的困惑，因为他最初认为毛泽东赞同陈其通等人的文章。

参加了毛泽东召集的会议后，邓拓回到报社在一个小范围会议上曾责怪自己说：“我真奇怪我的耳朵是不是听反了？”言外之意即领袖的态度多变，使他措手不及。

这时，《人民日报》文艺部收到一篇投稿《对陈其通等同志的‘意见’的意见》，非常切题。这篇署名“陈辽”的文章刊登于3月1日《人民日报》第七版，正是原先刊登陈其通等人文章的位置。

陈辽，江苏海门人，高中肄业参加新四军，时任中共第六十军第二十二速成中学政治教员，是一位二十五岁的大尉军官。他读到陈其通等四人的文章后，有不同看法，用三四天时间写出商榷文章，投寄人民日报编辑部，两个月后登了出来。陈辽指出：“四人文章”中“有不少有价值的意见，对目前的文艺工作是有好处的”，随即却说：“四人文章”有毛病，“在于他们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以后的文艺工作中的个别的、不是根本性的缺点，当作全面的、根本性的缺点，于是也就认为目前的文艺工作简直是‘糟得很’了，是很堪忧虑的了”。

陈辽的文章打响了批评“四人文章”的“第一枪”，迎合了毛泽东鼓吹“鸣放”的策略，因而受到毛泽东的赞扬。

接着，《人民日报》刊登了茅盾批评陈其通等人的文章《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反对教条主义和小资产阶级思想》。茅盾说：他们的文章是缺乏说服力的，批评方法是教条主义的，其结果不但不能对小资产阶级思想作有效的斗争，而且给读者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原来是弊多利少的印象，给广大的、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下鼓舞活跃的知识分子一瓢冷水。我们的工作方法应当是让大家来“放”，来“鸣”，开展自由讨论，从讨论中加强马列主义的思想教育。

《人民日报》于4月4日集中发表了批评“四人文章”的一组读者来信。

4月11日发表了周扬的批评，指出“四人文章”是“用教条主义的眼光，带着宗派的情绪去观察事物”。

4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批评陈其通等人的文章有“左”的教条主义的观点，只主张“收”，不主张“放”。社论认为陈其通等人的“收”，“就是不许人家说不同的意见，不许人家发表错误的意见，发表了就一棍子打死”，社论认为陈其通的方针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毛泽东读了《人民日报》对四人文章的围剿才略微消了点对邓拓的怒气。

在1957年初的几个里，毛泽东多次把“四人文章”当作“教条主义”来批评，同时把钟惦棐作为“右倾机会主义”的代表拿出来批评。然而他在催促《人民日报》批评“四人文章”的同时，并不催促批评钟惦棐。这表明，毛泽东主要还是从排除障碍、动员鸣放的角度来观察形势的。毛泽东清楚，对于“右”的观点，从来不会缺少批评，不必他来催促。

“四人文章”作者之一马寒冰本想借此文章出人头地、升官发财，不料被毛泽东连续点名批评，这个利欲熏心、天天指望着攀上高枝的政治教员，

心理承受不住了，于1957年6月服用安眠药自杀，投机不成反误了自家性命，年仅41岁。

就在当月，国内形势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反右”飙风骤起，风向转了。陈其通等人的文章在六月份以后不再受到批评。毛泽东本人，早在五月中旬就撰写党内指示《事情正在起变化》，为“教条主义”松绑了，毛泽东写道：“有一部分人有教条主义错误思想，这些人大都是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就是看问题的方法有‘左’的片面性。……几个月以来，人们都在批判教条主义，却放过了修正主义。”毛泽东出尔反尔何其快也。

到六月间，毛泽东修改《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时，对“教条主义”的性质作了新解释，他说：“在现在的情况下，修正主义是比教条主义更有害的东西。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修正主义的批判。”

1957年夏天，“反右”运动如火如荼，失去了一位战友的陈其通、陈亚丁在1957年8月21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克服教条主义，投入反右派斗争》的文章，检讨自己是“沾染了较多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先用“马克思主义”做护身符，把自己保护起来，扬言现在要克服“教条主义”，执行“双百”方针，投入反对“右派”的斗争。陈其通摇身一变，从反对“双百方针”成了紧跟毛泽东的积极分子。

第一个发表自己的观点与“四人文章”商榷的陈辽，曾受过毛泽东多次夸奖，却在“反右”中大祸临头。本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反对教条主义的文章，而且受到毛泽东的称赞，是炙手可热的荣耀，不料几个月后，“反右”狂飙陡卷，黑白颠倒乾坤。陈其通、陈亚丁在《人民日报》发表新的文章，洋洋得意；陈辽马上受到追查，俯首低头。这给陈辽此后二十年的命运带来了巨大不幸，被划为“中右”，开除军籍控制使用，只好在基层小心翼翼地夹着尾巴做人，直到“文革”结束后才稍有转机，然已临近知天命之年，无所作为了。

“反右”进入高潮之后，毛泽东对“四人文章”的态度继续转变，沉默了一段时间后，在1958年3月22日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特意谈到“四人文章”说：“陈其通等四人的文章虽然是错误的，但敢于提出不同意见，这点可取。”

由陈其通等四人文章引起的风波，一时间扑朔迷离，在理论上造成了混乱，还造成了两位参与争论者的巨大不幸，是惨痛的历史教训。更为严重的是，由于毛泽东对批判“教条主义”降温，为“宁左勿右”的思潮打开了方便之门，掺杂了种种极左思想和私欲的反对“修正主义”的概念从此贯穿毛泽东的一言一行，直到他生命的终点。同时，由于他对“四人文章”的看法不停地摇摆和变化，随心所欲，言无定见，信口开河，反复无常，给两个互不相识的普通军官带来了命运悲剧和人生坎坷，实属害人不浅。

（3）多数知识分子循规蹈矩、谨言慎行

翻阅一下1957年4月27日到5月15日的《人民日报》等国内著名的报纸期刊，没有发现任何“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一类的右派言论。更无所谓猖狂进攻。

即使是未出茅庐，不知天高地厚的青年学生，和涉世不深，缺乏社会经验的年轻干部，此时也没有出格的言行，都对中共的整风抱着善良的愿望和由衷的期待，对民主、自由、繁荣的社会主义怀着美好的憧憬。年轻人多数

被蒙在了鼓里，认为中国共产党诚心诚意欢迎人民帮助它整风，要人民大胆鸣放，“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却不知道毛泽东另外有话：“鸣好鸣坏由他们自己负责。反正总有一天要整到自己头上来的。”“共产党要让骂一下子，让他们骂几个月。”“有人说放长线钓大鱼，也有一些道理。”“这不叫诱敌深入，叫自投罗网。”

中老年知识分子因历练较多，心有余悸。多数人都还记得，1953年9月在一次政协会议上，毛泽东态度骄横跋扈语言污秽粗俗，当众斥骂梁漱溟，直言自己是没有“雅量”纳谏的人。如今却突然换上一副虚怀若谷、礼贤下士的姿态，让党外人士舍得一身剐，给共产党提意见，不但要给小和尚提意见，还要给老和尚提意见，实属天方夜谭。年纪大一点的知识分子，不由得心存疑虑，还是谨言慎行为妙。

共产党执政七八年来，“思想改造”、“镇反”、“批判胡适”、“批《武训传》”、“批《红楼梦研究》”、“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肃反”等等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矛头所向无一不是知识分子。不仅要知识分子“洗脑”，而且要“洗心革面”、“脱胎换骨”。知识界和民主党派诸多人士都是改造的对象，耳畔听到的是自我批判、相互揭发、会上斗争、会下反省、当众检讨、私下噤声，而今要大家畅所欲言，帮助共产党整风，挑共产党的毛病，揭共产党的短处，不得不考虑这是真的还是假的。是梦境还是现实。

相当多的人仍然怀有疑惧。在听完毛泽东讲话后的小组会上，仍有人不相信共产党是否会真正实行“言者无罪”。

有的人甚至明说：“要我发言，先要给我一张铁券。”（铁卷是古代帝王赐给臣子世代享受优厚待遇或免罪、免死的凭证。）发此言者的意思是希望中共切实兑现“言者无罪”的承诺。

“七君子”之一，上海复旦大学王造时教授，心有余悸地对《光明日报》记者说：希望当局“发表一个比较具体的声明，保证除现行反革命分子外，一切思想问题都不在追究之列。”（1957年5月1日《光明日报》。）

5月5日，《光明日报》编辑部在上海召开座谈会，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潘世兹说出了自己的顾虑：“今天我把什么话都讲出来，过一个时期，一年或许两年，我讲过的话是不是要算账？”“现在整风是整党内，过一个时期，是否要轮到我们？”

中国民主建国会副主任委员胡子昂扬言自己顾虑不多，但他在5月9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召集的会上说：“工商界有人……怀疑‘放’、‘鸣’、与‘整’是三部曲，‘放’、‘鸣’以后有被‘整’的危险。”

在中国人民银行非党干部座谈上，金融学家朱绍文说：“这几年来知识分子受到了损伤和压抑，他们的心情深处已经像是一潭积水，欲鸣无力，欲放无胆了。”（1957年5月15日《人民日报》，）。

东北工学院许冶同教授在校党委召开的座谈会上对人们为什么会“欲放无胆”作了一番解释：“过去向领导提出批评者就被认为对党不满和扣上‘反动分子’的帽子，平素交往较密者被认为‘反动小集团’，在肃反时都成为斗争的对象，肃反后都成了惊弓之鸟……所以在此次会上，不愿发言，恐自取其咎……”（1957年7月6日《沈阳日报》）。

“含情欲说宫中事，鹦鹉前头不敢言。”广州《工商周刊》编辑樊建华在谈论人们为何不愿鸣放的文章中引了这两句唐诗，道出了多数知识分子的心声。

1937年即参加中共的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在一篇短文中谈到知识分子对“鸣放”的心态时说：“他们还在揣测，这是真放还是假放，如果是放，放多少，放了以后还收不收。放是手段还是目的，是为了繁荣文化学术，还是挖思想、整人，以及哪些问题能争鸣，哪些问题不能争鸣等等。”（1957年4月20日《人民日报》）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穆木天说：“尽管学校当局召开了几次教授座谈会，可是教师还是顾虑重重，不敢大胆提意见，怕再遭一次无妄之灾。因为在师大，教师被发配、降级等等之类的阴谋报复，是早有前例的。”“闻者不戒，言者有罪，是师大几年来一贯的传统。”（1957年5月17日《光明日报》）

直到5月下旬，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集的“鸣放座谈会”上，共产党会不会搞“秋后算账”还是被当作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提了出来。

但是，一些民主党派的头目因为有机会多次接触中共高层和亲耳聆听毛泽东的蛊惑，他们把毛泽东当做了“人”，岂不知毛泽东是真正的“魔”。他们走火入魔了，竟然相信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要求他们帮助中共改正缺点、纠正不良之风是有诚意的。

5月2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副主席龙云在会上告诉大家：“过去几个大运动，都是共产党整人，现在是不是共产党想测验大家的思想，以便以后整人？”“现在时机不同了，共产党是执政党，怎么会出尔反尔，开这样的大玩笑，让大家把思想暴露出来，以后再整？”（1957年5月24日《人民日报》）。

森林工业部部长、民盟副主席罗隆基也没有察觉毛泽东有整人的意图。在同一天的会上，他表示不赞成某些人要共产党保证将来不搞打击报复的意见。他说：“要毛主席出来讲话保证，那是笑话。”但他也觉得缺乏保障，便提出了一个方案，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一个委员会来保证这一点，而且建议全国上下都设立这种委员会，形成一个系统，不但审查过去运动中的偏差，为过去受了委屈的人平反，而且可以制止以后可能发生的对批评者打击报复的事件。他说：“这样既检查了肃反中的遗留问题，又配合了整风。”（1957年5月23日《人民日报》。）

概而言之，1957年春，年轻人对中共的所谓整风深信不疑，中老年知识分子半信半疑，少数民主党派的领袖欲信存疑。或者说，多数知识分子对“大鸣大放”还不甚了解，处在彷徨犹豫阶段。

1981年中共中央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中说：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

既然是“放肆地”就不是“隐蔽地”。既然是“发动”，就不是“被动”。历史是难以掩盖的，是否请中共把那些可以归之于“放肆地进攻”的具体事例昭示一二，是谁曾经放肆地进攻呢？用的是什么武器？毁掉了哪些阵地呢？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决议有什么依据呢？用什么证明它不是诬陷、臆测和谎言呢？既然1981年仍认定是右派分子们“放肆地发动进攻”，为什么1978年又要宣布99.99%的右派均系错划，即时予以“改正”呢？岂不是自相矛盾、自抽嘴巴吗？

决议用了“妄图”两个字，看来颇有学问，查阅词典，妄图是谋划的意思，是虚拟的贪婪心态，是脑子里的想法，是尚未发生的事，中共又怎么知道的呢？仅仅凭借“妄图”就可以任意定罪吗？就可以将数十万志士仁人长期关押在劳改、劳教单位，刑满以后也不释放，关死为止

吗??!!。

二十多年后，中共承认，99.99%以上的所谓右派分子都不是右派分子，给予“改正”。一个个莘莘学子翩翩少年谦谦儒生被改造成了弓腰驼背两鬓斑白龙钟潦倒的老人，青春已逝，事业无成，甚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既不是彻底平反，也没有经济补偿，能够“改正”的是什么呢!!!???

(4) 一篇《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引起的波澜

鸣放初期，多数民主党派成员和知识分子的顾虑尚未打消，就连大名鼎鼎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写了一篇《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也是再三斟酌、反复修改，写完后又请著名女作家冰心为其勘误。一篇七千多字的文章居然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才战战兢兢地投寄到报社。不料在毛泽东倡导大鸣大放的 1957 年春天，在据说社会主义中国具有最广泛民主和言论最自由的 1957 年春天，这篇文章竟被说成是“资产阶级右派进攻的信号弹”，费孝通也由此成了“极右分子”。

如今反右已经过去了五十五年，费孝通也已谢世七年，重新阅读这篇文章，无论怎么吹毛求疵也看不出“信号弹”的痕迹。该文其实只是谨小慎微地说出了知识分子心灵深处的一些想法。

费孝通这篇文章主要谈了学校中的老年知识分子在中共中央提出“向科学进军”“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以后心情的变化。摘录如下：

“多年来，经过了狂风暴雨般的运动，受到了多次社会主义胜利高潮的感染，加上日积月累的学习，知识分子原本已起了变化。去年一月，周总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像春雷般起了惊蛰作用，接着百家争鸣的和风一吹，知识分子的积极因素应时而动了起来。但是对一般老知识分子来说，现在好像还是早春天气。他们的生气正在冒着，但还有一点腴腆，自信力不那么强，顾虑似乎不少。早春天气，未免乍寒乍暖，这原是最难将息的时节。”

“前年年底，我曾到南京、苏州、杭州走过一趟。一路上也会到不少老朋友，在他们谈吐之间，令人感觉到有一种寂寞之感，当一个人碰到一桩心爱的事而自己却又觉得没有份的时候，心里油然而生的那种无可奈何的意味。这些老知识分子当他们搞清楚了社会主义是什么时候，他们是倾心向往的。但是未免发觉得迟了一步，似乎前进的队伍里已没有他们的地位，心上怎能不浮起了墙外行人“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的感叹。”

“周总理的报告对于那些心怀寂寞的朋友们所起的鼓舞作用是难于言喻的，甚至有人用了“再度解放”来形容自己的心情。知识分子在新社会里的地位是肯定了，心跟着落了窠，安了。心安了，眼睛会向前看，要看出自己前途，因此，对自己也提出了新的要求。有的敢于申请入党了，有的私下计议，有余钱要买些大部头书，搞点基本建设。这种长期打算的念头正反映那些老知识分子心情的转变。不说别人，连我自己都把二十四史搬上了书架，最近还买了一部《资治通鉴》。”

“接着想谈谈百家争鸣。百家争鸣实实在在地打中了许多知识分子的心，太好了。据我的了解，百家争鸣就是通过自由讨论来明确是非，即是知识分子进一步的思想改造，在观点、方法上更进一步的接受辩证唯物主义。百家争鸣可以保障不会冤屈任何一点正确的东西，而且给任何一点可以长成为正

确的东西充分发展的条件。这样，可以防止积极转化为消极，而使知识分子的潜力充分发挥出来。百家争鸣的方针贯彻得怎样了呢？和“向科学进军”来比较似乎又差一些。先从知识分子方面来说，他们对百家争鸣是热心的，心里热，嘴却还是很紧，最好是别人争，自己听。要自己出头，那还得瞧瞧，等一等再说，不为天下先。依我接触到的范围来说，不肯敞开暴露思想的人还是占多数。这一年来，情况是有些好转，在一定场合下，有些人是肯吐露些知心话了，但是还是相当腼腆的。

究竟顾虑些什么呢？对百家争鸣的方针不明白的人当然还有，怕是个圈套，搜集些思想情况，等又来个运动时可以好好整一整。我记得有一次座谈会上有一位朋友说得很生动，他说，我不是怕挨批评，我们以前还不是大家有被批评的，学术论战还是搞过，现在可挨不得，因为一有人说自己有了唯心主义，明天上课学生的脸色就不同，自己脚也软了。面子是很现实的东西，戴上一个‘落后分子’的帽子，就会被打入冷宫，一直会影响到物质基础，因为这是‘德’，评薪评级、进修出国，甚至谈恋爱，找爱人都会受到影响。这个风气现在是正在转变中，但是积重难返，牵涉的面广，也不是一下就转得过来的。‘明哲保身’，‘不吃眼前亏’的思想还没有全消的知识分子，想到了不鸣无妨，鸣了说不定会自讨麻烦，结果是何必开口。”

“另一方面是具体领导知识分子工作的人对于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不是都搞通了呢？也不全是通的。有些是一上来就有的担心。‘中央定的方针当然是正确的。但是我们这里具体情况还没有条件。’接着有些人想把这个方针圈个范围：先圈在学术里，再圈在教学之外，这样一来就可以不出乱子了。等到鸣了起来，嗅到一些唯心主义的气味，就有人打起警钟：‘唯心主义泛滥了’，‘资产阶级的思想又冒头了’。大有好容易把妖魔锁住了，这石碣一揭开，又会冲出来，捣乱人间的样子。对这方针抗拒的人固然不算多，但是对这方针不太热心，等着瞧瞧再说的人似乎并不少。”

“草色遥看近却无”——这原是早春天气应有的风光。”

“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意味着他们的积极性是动起来了，特别表现在提高业务的要求上，但是消极因素还是很多的。他们对百家争鸣还是顾虑重重，不敢鸣，不敢争；至于和实际政治关系比较密切的问题上，大多更是守口如瓶，有点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神气。比如说：波匈事件发生时，我正在边区旅行，没有直接听到当时高级知识分子的反映，但是去年年底回到城市里和朋友们谈起了这些事，我的印象是这样大的事情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引起的波动却是不大的。一方面这是好的，说明我们的这些知识分子立场是稳的；但另一方面，如果仔细了解一下，可以看到他并不是思想上是非辨别得很清楚所以很稳，而是没有深刻地动过脑筋，古井没有生波，不很关心。”（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3月24日）

读我这本传记的朋友们从上述摘录中看得出来费孝通当年是在发射向中共进攻的信号弹么？有一点点火药味儿么？有一丝丝放肆的迹象么？

费孝通这篇文章只是小心翼翼地道出了知识分子的内心疑虑，隐约含蓄地流露了对乍暖还寒的顾忌。

我有幸经历了那些个不眠的岁月。

《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发表以后不久，中共即展开了硝烟弥漫的反右斗争。当时国内的大报、小报连篇累牍地批判费孝通，他被斥责为“章罗联

盟的军师”，戴上了极右分子的帽子，随后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当了一名炊事员，直到六十二岁因年老体弱退休。2005年逝世于北京。

费孝通 1910 年生于江苏吴江，1938 年获英国伦敦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主修人类学。先后任云南大学教授，西南联大教授，清华大学教授，北京大学教授。曾在美国丹佛获国际应用人类学会马林诺夫斯基名誉奖，在英国伦敦获英国皇家人类学学会赫胥黎奖，在美国纽约获大英百科全书奖，在日本福冈获亚洲文化奖，在菲律宾拉蒙·麦格赛赛获“社会领袖奖”。还先后获得英国伦敦经济政治学院授予的荣誉院士，澳门东亚大学社会科学博士，香港大学文学博士等荣誉。

费孝通有过两次婚姻。1935 年他从清华大学毕业后，偕同校友也是社会学者的新婚妻子王同惠赴广西大瑶山进行社会调查，向导悄然离去，二人在山林中迷路，费孝通误踏虎阱，腰腿受伤；王同惠心急如焚，慌忙寻求救援，不慎失足山涧，溺水身亡，那一天是他们结婚的第 108 天。1939 年，经人介绍，费孝通结识了前妻在江苏女子师范就读时的同班同学孟吟，同是天涯沦落人，相互倾心，结为伉俪，相携相依，载浮载沉，同甘苦，共患难，终生相伴。1994 年孟吟病逝，费老回想五十五载风雨春秋，感慨万千，吟诗悼亡妻曰：老妻久病，终得永息。老夫忆旧，幽明难接。往事如烟，忧患重积。颠簸万里，悲喜交集。少怀初衷，今犹如昔。残枫经秋，星火不熄。这首诗充分表达了费孝通对孟吟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在艰难困苦的日子里与自己不离不弃的欣慰之情。十年之后，即 2005 年 4 月 24 日，95 岁的费孝通从容追随之至爱老伴孟吟而去，为自己传奇的爱情故事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抗战期间，费孝通身居大后方仍专心致志其学术研究，然物资匮乏，通货膨胀，日本飞机不时轰炸，党派头目独裁专权。费孝通对此十分不满，写了大量针砭时弊抨击民国政府文章，参加民主同盟，支持学生运动。从而获得了“民主教授”的美誉。

但是在难忘的 1957 年，费孝通被批斗的一文不值。帽子一项接一项往他头上扣。“章罗联盟的核心人物”“政治投机家”“极端个人主义者”“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封建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反动分子”等等，还有一些不足挂齿的人身攻击。这些帽子都是经中共要员审查后扣上去的，无一不言之凿凿，据称均有根有据。

毛泽东一命呜呼以后，费孝通的“右派”被认定系“错划”，给予“改正”。并于八十年代被中共推举为人大副委员长，阶下囚竟然成了座上客。想一想，在那个黑白颠倒的罪恶的毛泽东时代，国家主席可以变成“叛徒、内奸、工贼”，阿世媚俗绯闻不断的三流演员可以被捧为文化大革命的旗手，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 1957 年那场反右的鼓噪声中，对于那篇《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仅就一个题目中的“早春”二字便被具有高度觉悟的“文人名流”发掘出不少“反动毒素”。有人说：全国解放就是阳光普照、春满大地，费孝通把 1957 年初说成是早春，就是否定解放，否定 1949 年到 1956 年底的大好形势；有人说：早春之前意味着严冬，费孝通说现在才是早春，暗指在此之前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寒冬的肃杀；还有的说：早春之后气温渐渐升高，接着就是烈日当头的酷暑，春天的百花还能开放么？有人批判费孝通在文中用了“乍寒乍暖”四个字，是恶毒地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忽冷忽热，出尔反尔；费孝通说知识分子在周恩来讲过话后是

“再度解放”，就是说 1949 年以后他们没有得到解放；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极尽断章取义、肆意歪曲、移花接木、辱骂攻击之能事，充分展示了中共的一大特色。

当年的费孝通无论是用“早春”还是“晚秋”，或是“仲夏”，抑是“隆冬”，在无理取闹的诡辩者包围之中，总归是有口难辩，在劫难逃。从中倒可以看出中国某些用笔杀人的御用文人之丑恶嘴脸和阴暗心理。此种污蔑陷害、无限上纲之风，在毛泽东极力鼓动下，文革时期获得长足发展，达到登峰造极之地步，直至今日尚未消除，当局不时以“颠覆国家”“寻衅滋事”“聚众骚乱”的罪名威胁、恐吓、镇压要求民主改革的人士，不可不说是中国特色的历史悲剧仍然在继续上演，一阵一阵的还在蔓延。

1957 年 5 月 4 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名义发了一个党内文件《组织党外人士继续对党的缺点错误展开批评》（毛泽东文集第七卷 296 页）。此件文字不多，内容十分重要，全文抄录如下：

最近两个月以来，在各种有党外人士参加的会议上和报纸刊物上所展开的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分析和对于党政所犯错误缺点的批评，对于党与人民政府改正错误，提高威信，极为有益，应当继续展开，深入批判，不要停顿或间断。其中有一些批评得不正确，或者在一篇批评中有些观点不正确，当然应当予以反批评，不应当听任错误思想流行，而不予回答（要研究回答的时机并采取分析的态度，要有充分说服力），但是大多数的批评是说得中肯的，对于加强团结，改善工作，极为有益。即使是错误的批评，也暴露了一部分人的面貌，利于我们在将来帮助他们进行思想改造。现在整风开始，中央已同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领导人士商好，他们暂时（至少几个月内）不要表示态度，不要在各民主党派内和社会上号召整风，而要继续展开对我党缺点错误的批判，以利于我党整风，否则对于我党整风是不利的（没有社会压力，整风不易收效）。他们同意此种做法。只要我党整风成功，我党就会取得完全的主动，那时就可以推动社会各界整风了（这里首先指知识界）。此点请你们注意。党外人士参加我党整风座谈会和整风小组，是请他们向我们提意见，作批评，而不是要他们批评他们自己，此点也请你们注意。如有不便之处，则以不请党外人士参加整风，而由党邀请党外人士开座谈会，请他们畅所欲言地对工作上缺点错误提出意见为妥。请你们按当地情况斟酌处理。

毛泽东在这里摆出一副虚怀若谷的姿态，一副坦然纳谏的风格。和他 1957 年 1 月 18 日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破口大骂乌龟王八判若两人。暗地里却让李维汉赶快组织“座谈会”收集党外人士的“反动言论”，施展阴谋以便将他们打倒。毛泽东历来就是伪装成道貌岸然的痞子加流氓，一边当婊子，一边立牌坊。

在这个文件中，毛泽东肯定了最近两个月来展开的对于党政所犯错误缺点的批评，大多数是中肯的，他说了两次“极为有益”。对于错误的批评，他说应当予以反批评，将来帮助他们进行思想改造，态度似乎也是诚恳的，没有什么猖狂进攻、大毒草之类的言辞。

毛泽东这样说，至少可以作为还没有发现有人向中共发动猖狂进攻的佐证吧。

但是在另外的场合，比如1957年1月他曾声色俱厉地大骂：“党内党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人捧得好呵！开口波兹南，闭口匈牙利。这一下就露出头来，蚂蚁出洞了，乌龟王八都出来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334 页）1957年7月在青岛会议上凶神恶煞地叫嚷：“历史上留下一大批王八蛋，一路敲锣打鼓，拥护了七年是假的。”

这1957年1月和7月的流氓语言与5月的文章相比，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呢？善良的人们，还能轻易相信毛泽东其人么？

（5）《文汇报》与《电影的锣鼓》

《文汇报》是几个落魄文人1938年在上海创办的民间报纸。1947年5月国民党政府因故加强新闻管制，《新民报》、《文汇报》等均被封闭，部分同仁转移至香港于1948年9月创办香港《文汇报》。1949年6月21日上海《文汇报》在沪复刊，时为私营报纸，1952年改为公私合营，1956年迁往北京与《小学教师》杂志合并成为隶属于教育部的机关报，定名为《教师报》。《教师报》读者群有限，且《文汇报》的原编辑们大多家居上海，进京后夫妻两地分居，多有不便。1956年毛泽东提出百家争鸣的方针，为制造繁荣局面，经上级批准，《文汇报》重回故地，于1956年10月1日在上海复刊。定位为中共领导下的民间报纸。徐铸成任社长兼总编辑。《文汇报》复刊伊始恰逢毛泽东大肆宣扬“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之时，《文汇报》便确定以“为双百方针鸣锣开道”为宗旨，力争把报纸办出特色。

该报驻京记者姚芳藻刚刚三十岁，新闻专科毕业，曾任过《联合晚报》及香港《文汇报》记者，年轻有为，追求卓越。1956年11月某日，她兴致勃勃地来到位于北京沙滩正街的中共中央宣传部电影局，拜访1938年入党的、时已颇负盛名的电影评论家钟惦棐。她说：《文汇报》为了贯彻双百方针，准备对电影方面的问题组织一些讨论。钟惦棐甚为支持，并向她谈了国产影片上座率不好是影响电影事业发展的大问题，1949年以来曾拍过几部深受群众欢迎的上座率很高的电影，如：《白毛女》、《天仙配》、《梁山伯与祝英台》、《平原游击队》等，但也有不少作品票房价值很差，连成本也收不回来。动员大家讨论可以集思广益，吸收群众的智慧，拍出更多观众喜闻乐见的片子，更好地繁荣发展我国的电影事业。

姚芳藻回到报社向领导做了汇报，积极建议开展关于电影问题的讨论。于是1956年11月14日出版的《文汇报》上发表了“国产片上座率情况不好”的新闻，配发一篇短评“为什么好的国产片这么少？”，还刊载了几篇读者来稿。算是敲响了“电影的锣鼓”。

讨论进行了两个多月，《文汇报》刊发了四五十篇文章。既有演员的诉求，也有导演的祈望，更多的是观众评论和意见、建议。看来还需要一篇总结性的文章。于是又找到了钟惦棐，报社认为他熟悉电影界的情况，且擅长评议，文笔犀利、简练、尖锐、泼辣、深刻，一针见血，没有套话，也决不隔靴搔痒。定能胜此大任。钟惦棐慨然允诺，下面就是他赶写出来的文章，标题是《电影的锣鼓》。分别刊登在《文艺报》1956年第23期和1956年12月15日出版的《文汇报》上。现全文摘抄于后：

电影的锣鼓

钟惦棐

前几个月，当音乐方面正在讨论民族形式问题，戏剧方面正在讨论《琵琶记》和《如兄如弟》的时候，有人便发问：为什么电影这样沉寂？难道电

影已经没有问题了？但11月间，电影的锣鼓就响了。

电影的锣鼓先从上海方面敲起来，是有道理的。这里是我国电影的发祥之地和我国著名电影艺术家们的汇集之区。经过七年的岁月，使他们足以辨明，电影——这一群众性最广泛的艺术，究竟该怎样才是。按照过去的经验，无疑应该丢掉一些东西，但亦需要保留一些东西，而其中最主要的是电影与观众的联系，丢掉这个，便丢掉了一切。

这场锣鼓，也正是从电影与观众这个点子上敲起来的。在上海，《一件提案》的上座率是9%，《土地》是20%，《春风吹到诺敏河》与《闽江橘子红》是23%，另据北京《光明日报》的报道：从1953年到今年6月，国产片共发行了一百多部，其中有70%以上没有收回成本，有的只收回成本的10%。纪录片《幸福的儿童》竟连广告费也没收回！

这就找到了检验问题的标准。为什么，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明确了，工农兵及一般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有了显着的提高，而国产影片的观众却如此不景气！这是否就同时暴露了两个问题：一、电影是一百个愿意为工农兵服务，而观众却很少，这被服务的“工农兵”对象，岂不成了抽象？二、电影为工农兵服务，是否就意味着在题材的比重上尽量地描写工农兵，甚至所谓“工农兵电影”！

事态的发展迫使我们记住：绝不可以把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和影片的观众对立起来；绝不可以把影片的社会价值、艺术价值和影片的票房价值对立起来；绝不可以把电影为工农兵服务理解为“工农兵电影”。

“工农兵电影”，至今还是件“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的事情，而其含义又是十分暧昧。它可以解释做电影为工农兵服务，也可以解释做电影只能描写工农兵。但按其实践效果检验，它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性质是明显的。其所以是教条主义的，便在于它把党提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正确指示僵化了，并且作了错误的解释；其所以是宗派主义的，便在于它企图以此去分别中国过去的电影，把那些电影，统称为“小资产阶级的电影”。把那些影片，统称为“消极片”！

这种只要现在不要过去的作法，无异是拒人于千里之外。演员孙景璐喊出：“最重要的是关心人！”上官云珠认为：“这些年来，在我们厂里有些演员都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甚至还有一种很不好的气氛，认为有些来自旧社会的演员，今天还没有能力创造出新的人物形象。”舒适说：“1955年末拍《南岛风云》之前，上官也是被积压的一员，在偶然的机会上主演了《南岛风云》。片成后她扮演护士符若华很成功。于是上官开始忙起来了。”“像上官这样有能力的演员，过去独当一面的演员，大大小小的有才能的演员，我们剧团里多的是，潜力非常雄厚，不过是没有被发掘罢了。”而导演孙瑜，则提出了“尊重电影的艺术传统”。而所谓“传统”问题，在这里实际表现成为对人的看法。对“电影圈”内如此，对“电影圈”外也如此，老舍的《救救电影》，便说明了这些年来关起门来搞电影的方法是行不通的。

上海《文汇报》在11月份发表的二十四篇文章，就问题的性质看，可分作两类：一是属于电影的组织领导的，即以行政的方式领导创作，以机关的方式领导生产；一是属于电影的思想领导的，这便是中国电影的传统问题，题材褊狭问题，与所谓“导演中心”等问题。

领导电影创作最简便的方式，便是作计划，发指示，作决定和开会，而作计划最简便的方式又无过于规定题材比例：工业，10个，工农，15个，以

及如此等等。解决创作思想问题，则是“决定”最有效，局里的、部里的、或某某负责人说的，都是决定，不听也得听。一年一度的学习会，再加上一个总结，便什么问题都解决了。至今有人觉得电影界的学习空气不浓厚，但这种一年一度的传道方法，如何能使大家懂得持久的、日积月累的学习的必要呢？

这种以行政方式领导创作的方法，完全可以使事情按部就班地进行着，而且条理井然，请示和报告的制度都进行得令人欣慰。但是最后被感光在胶片上的东西却也如请示、报告、开会一样索然。广大观众不欢迎这类国产影片，岂不是并不需要太高深的理论也可以明了的么？

电影事业管理局，顾名思义，是代理国家管理全国电影事业的行政机构。但这些年来，这里除了讨论剧本等等之外，一个剧本该发多少稿费，一个电影导演在拍完影片之后该给多少酬金，纸带录音机可否改做磁性录音机，也通通要呈请批准。但往往又是影片要开拍了，剧本没有批准，影片都拍完上映过了，酬金发不下来，纸带录音机只需稍加改动，便可产生更好的效果，但是为了要等待电影局统一全国的技术规格，这样的改变便成为不可能。

但是问题还在于：为什么会有关于“狗”，关于“黑框眼镜”。关于“敲门”和关于“道谢”的干涉？为什么会有“人物统一规格”？为什么“审稿制度繁复”？（以上均见《文汇报》的讨论）这在于我们有许多领导人对列宁所说的：“电影是教育群众的最强有力的工具之一”，“在所有的艺术中，电影对于我们是最重要的”理解的不很正确。因为它重要，深怕它搞不好，也就出现了像《祝福》电影中鲁四老爷教阿牛描红的情景。关心过多，也就往往变成干涉过多。

这并不是说列宁的说法是不对的，也不是说不需要关心、不能有任何干涉。而是说，电影既是最重要的，既然它和群众有着最密切的联系，对它的领导须注意符合电影创作和生产的规律。违背了这种规律，即不尊重列宁在另一地方所说的：“文学事业最不能机械地平均、标准化，少数服从多数。无可争论，在这个事业上绝对必须保证个人创造性、个人爱好的广大空间，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大空间……”管的人越多，对电影的成长阻碍也越大。事实证明，当1951年文化部门成立电影指导委员会时期，领导力量比任何时候都强大，但结果，却是全年没有一部故事影片！

国家也需要对电影事业作通盘的筹划与管理，但管理得太具体，太严，过分地强调统一规格，统一调度，则都是不适宜于电影制作的。关于中国电影的传统问题，甚至有人表示怀疑，有人则十分肯定。此二者，我们以为是值得继续讨论的。但退一步说，中国电影便是没有传统，那么，中国的电影工作者，从“明星”到“联华”，到“电通”，到“昆仑”、“长城”，是否也还有些比较好的经验呢？在制片，在组织创作，在编剧、导演、演员、摄影、发行等方面，是否也还有许多值得学习的东西呢？

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只有某些具有宗派主义情绪的人，才是急于要把这些一脚踢开！而且希望踢得愈远愈好，不然就似乎要妨碍什么！

说过去的一古脑儿都对，不会妨碍什么，这也不见得。但它首先要妨碍的，岂不正是这种宗派主义的情绪和作法么？孙景璐在上海厂工作了六七年，居然连领导者也不知道她还演过《日出》里的翠喜和小东西，而且演得很好，这样不了解人，如何谈得到尊重！而最重要的，目前有许多有经验的电影艺术家不能充分发挥出创作上的潜力，而只能唯唯听命于行政负责人员的指挥，

尚未进入创作，已经畏首畏尾，如何谈得到电影艺术的创造？没有创造，如何谈得到电影事业的繁荣！

艺术创作必须保证有最大限度的自由，必须充分尊重艺术家的风格，而不是“磨平”它。所谓“导演中心”，乃是指为了克服当前导演在摄制组工作时感觉婆婆过多而且过严，某些艺术描写的细节都要遭受干涉的情景而言。样林嫂手中的鱼掉不掉？何时掉？这完全是创作人员，首先是导演自己的事。如果这样的事都须由行政决定，要导演干什么？“导演中心”自然还有组织影片创作，团结电影艺术家们在一起工作并逐渐形成创作核心形成流派的意义。但它绝不是说，电影文学的基础对导演不具有约束的意义。影片的风格就其最根本的意义上讲，是由电影文学剧本所提供，而由导演所完成的。

目前，我国电影生产体制正在进行改组工作，其方向，就是为了使得它更加适合于电影制作的规律。但其中，电影演员的培养和使用，是特别值得加以注意的。它牵涉到，电影制片厂应不应该有自己的演员？如果应该有，对他们怎样使用和培养？如果不应该有，对他们怎样安排？

在当前的锣鼓声中，以改善电影演员工作的锣鼓为最响。这是因为他们在电影艺术干部中人数最多，问题积累的也多。但目前有个更加具体的问题，即电影制片厂是否应有上百的职业电影演员？没有，制片厂将会感到成天向文化部打报告之苦，向剧院借演员之苦；而能否借到，尚是问题。但为了省掉这些麻烦，便使人数众多的电影演员们终年甚至数年“失业”，终年甚至数年过着惶惶不安的生活。既不能工作，又不能学习，白白地浪费掉自己的青春！即便是说，演员们终年都在摄制组，演技是否就能够有效的提高，这也还是个问题。很早便有人说过：电影绝不培养演员。因为演员在镜头前面的活动时间总是很短的。能够真正培养演员、锻炼演员的场合还是在舞台上。

我们不以为问题的结论便是如此，但这却是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需要提请文化主管部门来认真考虑的。

电影的锣鼓敲起来了，许多电影工作者对我国当前电影工作的弊端提出了中肯的批评和建议，这是党的“百家争鸣”的政策的最好的收益，也是我国电影新的繁荣的征兆。文化主管部门亦准备对此采取一些有效措施。但组织措施不能同时解决许多创作理论上的问题，也不能够说当制片生产体制一经改革之后，所有电影工作者的电影文化水平便能够立刻大大提高。因之我们很希望这讨论还能继续深入下去，真正为我国电影事业打开一个新的局面。

此文刊出后，引起了海内外舆论的注意。1957年1月15日，《香港时报》转载了台湾大道通讯社所发的一篇名为《重重压迫束缚下，大陆电影事业惨不堪言》的通讯。作者从其立场出发，大量引用《电影的锣鼓》中的材料，故作惊人之笔地在文章结尾时说：“身陷大陆的全体电影工作者，被迫害压抑得太久了，现在居然敲起了反暴的锣鼓。”

《电影的锣鼓》成了“反暴的锣鼓”，钟惦棐真落了个“跳进黄河洗不清”。

毛泽东密切注视着“鸣放”的动向，每天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翻阅国内出版的各大报纸。对于《文汇报》组织的这场讨论，自然不会放过。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时，严厉地点名批评说：共产党里也有右派有左派，中宣部有个干部叫钟惦棐，他写了一篇文章，把过去说了个一塌糊涂，否定一切。这篇文章引起批评了，引起争论了，台湾很赏识他的文章。

著名京剧大师梅兰芳亲耳聆听了毛泽东的讲话后，回到家里所作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出《电影的锣鼓》，一字一句认认真真地轻声读了两遍，他对朋友说：“这篇文章我一口气看了两遍，怎么就看不出它到底错在哪儿？”话剧演员赵蕴如把文章看了一遍又一遍，也始终看不出错在哪里，但既然毛主席说它有错它就肯定有错，看不出错误那就表明自己的政治水平太低，急得赵蕴如不停地用拳头捶击自己的脑袋，好让自己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

然而就因为毛泽东的讲话，钟惦棐被划为右派分子，在急风暴雨的反右派斗争中，钟惦棐作为中国电影界的“右派首领”，享受到的也是高规格的批斗。从1957年8月4日起至9月27日，在文化部新落成的大礼堂里，连续召开十五次声势浩大的批斗会，钟惦棐被勒令“规规矩矩，老实交待”，没完没了地作检讨。钟惦棐受到的惩罚是严厉的，开除党籍，罢官，下放农场监督劳动。钟惦棐沉默着接受了一切对他的惩处，全家从中宣部机关宿舍被赶到振兴巷6号一个大杂院里。而他本人，则被贬逐到渤海边上的唐山柏各庄农场“劳改”，专司厕所管理，在长达四年的时间里（即38岁至42岁，那无疑是一个学者精力最充沛的人生阶段），每天把粪便掏出来，晒干，打碎，发酵。似乎只有那污秽的粪便才是给知识分子洗脑的对症良方。

1957年3月10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丰泽园接见新闻界代表，曾握着《文汇报》总编辑徐铸成的手，夸赞《文汇报》办得好，他说：“这次对电影的批评很有益，但是电影局开门不够，他们的文章有肯定一切的倾向。”“大家一批评又把门关得死死的，我看大多数批评文章提出的问题，对于改革我们的电影是很有益的。现在的电影，我就不喜欢看。当然也有好的，不要否定一切。批评凡是符合事实的，电影局必须接受，否则电影工作不能改进。你们报上发表的文章，第一个时期批评的多，第二个时期肯定的多，现在可以组织文章，把它们统一起来，好的肯定，不好的批评，电影局不理是不对的。这次争论暴露了问题，对电影局和写文章的都有好处”（《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188页）。

此时的毛泽东是否还想得起2月27日他讲过的话呢？就同一题目的两个讲话，语气截然不同，立意大相径庭，究竟何者为是，何者属于放屁（毛泽东的常用词）呢？

1971年，钟惦棐被押送到天津团泊洼农场“劳改”，领导发挥他的“专长”，仍安排他管理厕所。

1978年，钟惦棐的错划右派获得改正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在此期间，他为新时期的电影美学理论呕心沥血，撰写了百万字的理论、评论和美学论文，开创了中国影评一代新风，被誉为中国电影美学的奠基人。1987年3月20日病逝于北京，终年68岁。

（6）《人民日报》紧急执行毛泽东“诱敌深入”的阴谋

1957年2、3月间，毛泽东接连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和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做了长篇发言。这是他精心准备的，前一个发言从下午三时讲到将近下午七时，后一个发言从下午五时讲到六时五十分。讲话的主旨就是“煽风点火”，鼓动人们“大鸣大放”。

他说：“不要怕向我们共产党人提批评建议。‘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我们在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斗争的时候必须有这种大无畏精神。在共产党人方面，我们要为这些合作者创造有利条件……”

“放，就是放手让大家提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

论。……我们主张放的方针，现在还是放得不够，不是放得过多。”

听过这两个讲话传达的人都会记得毛泽东在这两个会议上极尽煽动、蛊惑之能事。我当时在重庆长江电工厂冶金处当技术员，对毛泽东“广开言路，虚心纳谏的“诚意”深信不疑，他老人家号召给党提意见要有“舍得一身剐”的大无畏精神，承诺共产党要为这些合作者创造有利条件。还有什么话不能说呢？谁知毛泽东已经准备了无数竹槎、木桩、绞索、屠刀，竟然要大开杀戒呢。

毛泽东做了上述两个讲话以后，密切注意各界的反应。当他打开每天必看的《人民日报》时，却大失所望。

熟谙政治斗争却尚未识破毛泽东之阴谋与阳谋的人民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邓拓，对毛泽东颇为出格的言论还不明就里，究竟是真是假，还要观察一段时间，邓拓是了解毛泽东的为人的，因此暂时“按兵不动”。他把持的《人民日报》对前一个讲话只刊登了简单的新闻，对后一个讲话竟然没有报道。当时，《人民日报》的年轻编辑李庄见《中国青年报》等报刊登载了不少针砭时弊的言论十分吸引读者。曾请示邓拓“可不可以刊登一些批评共产党的言论？”邓拓警告这个年轻人说：“不要锣鼓一响就出来”。据长期担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的胡绩伟说：（邓拓）比我们更有远见，更了解伟大领袖。他不仅看出毛主席这番话很快会变，而且还很可能潜伏着一场“引蛇出洞”的灾难。因而，他当时用自己的脑子进行了一些独立思考。他的政治经验比我们丰富，政治警觉性也高。邓拓可以称得上是对“引蛇出洞”的“阴谋”有预见的人物之一。

代表毛泽东掌控《人民日报》的中宣部副部长胡乔木也支持邓，暂不刊登毛泽东游说期间的讲话。

邓拓乃前清举人邓鸿予之后，1912年生于福建，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四十年代对毛泽东极为崇拜，1942年任晋察冀日报社长期间，首次撰文提出《纪念七一，全党学习和掌握毛泽东主义》，1944年主持编辑出版了中国第一部《毛泽东选集》，大力鼓吹毛泽东的丰功伟绩。建国后。毛泽东的真实面貌日益暴露，邓拓有所觉察，但仍紧追密随，倍加小心，唯恐触动孽龙之逆鳞，祸及自身。

作为中共中央喉舌的机关报，对伟大领袖的“新思维”如此冷漠，毛泽东大为愤怒，4月初，他把邓拓、胡绩伟、王若水等人召到自己的卧室里训话。他躺在床上，“像训斥孙子似地”（胡绩伟语）训道：“党的报纸对党的政策要及时宣传，宣传工作会议未登消息，是个错误。这次会议是党内外人士合开的，为什么不登消息？最高国务会议为什么不发社论？为什么把党的报纸秘密起来？这里有鬼，鬼在什么地方？“共产党的报纸没有声音。你们按兵不动，反而让非党的报纸拿了我们的旗帜整我们。过去说你们是书生办报，不对，应当说是死人办报。你们多半是同中央的方针唱反调，是抵触、反对中央的方针，不赞成中央的方针的。”他又骂邓拓“占着茅坑不拉屎”，“我看你像汉元帝，优柔寡断。你当了皇帝非亡国不可。”同时，还斥责几位副总编辑：“不敢起来革邓拓的命。”

毛泽东气急败坏地质问：“《人民日报》到底是谁家的报纸？是“人民日报”还是“国民日报”？”

《人民日报》挨了毛泽东的斥责以后，赶紧认错、立即改正，忙不迭地于1957年4月10日发表社论《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

方针》。

社论明确地说：“目前的问题不是放得太宽而是放得不够，党的任务是要继续放手，坚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社论说：“到现在为止，党内还有不少同志对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实际上是不同意的，因此他们就片面地收集了一些消极的现象，加以渲染和夸大，企图由此来证明这方针的‘危害’，由此来‘劝告’党赶快改变自己的方针……”

“有些人对于党的方针抱着不同的想法，照他们看来，这样下去思想界将会一团混乱，文化科学发展的方向将要模糊，资产阶级思想将要泛滥，马克思主义理论将要动摇……。总而言之，前途简直是不堪设想。”

“本报1月7日所发表的陈其通、陈亚丁、马寒冰、鲁勒等四同志的文章《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就是这种倾向的一个代表。他们在文章里对于目前文艺界状况画了一幅吓人的暗淡的图画：‘在过去的一年中，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向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越来越很少有人提倡了。’‘真正反映当前重大政治斗争的主题有些作家不敢写了，也很少有人再提倡了。……因此，使文学艺术的战斗性减弱了，时代的面貌模糊了，时代的声低沉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光辉在文学艺术这面镜子里光彩暗淡了。’很明显，这种估计是对于事实的一种极端歪曲”。

这篇社论的发表，表明《人民日报》积极响应和拥戴毛泽东的“双百”方针，提倡“大鸣大放”。实际上是为毛泽东的“引蛇出洞”大造舆论。

《人民日报》是舆论界的大哥大，是中共中央的喉舌。这篇社论的发表，引起了轰动效应，第二天，众多报纸纷纷转载。三天以后，也就是4月13日，《人民日报》再发一篇社论《怎样对待人民内部矛盾》，诠释和阐述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讲话的基本思想。此时毛泽东后来定名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稿尚未公开发表。

4月17日，《人民日报》又一篇社论《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刊载于重要版面。

4月19日，《人民日报》以醒目大标题《中共北京市委召开宣传工作会议讨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报道中共北京市委邀请“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二百九十多人”参加北京市委宣传工作会议。报道说：“大家赞成‘放’，认为目前北京‘放’得不够”。还说：“有些人对‘放’还有顾虑，怕‘放’出毒草使群众中毒，怕造成思想混乱”；“有些人还顾虑自己‘放’了唯心主义后遭到打击”。

同一天的《人民日报》还刊载中共广东省委召开宣传工作会议的消息，报道说：“广东省目前的情况是又想‘放’又怕‘放’”。

4月21日、22日，《人民日报》连续两天刊载《天津的教授们关于百家争鸣的座谈》。

这时，邓拓明确地告诉李庄，“把记者都派出去，对于批评共产党的言论，一字不改照登，这一阶段就写这类稿子。”从来没见过党报发表“反党言论”的李庄不明白这是为什么，却也“预感到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了。”

紧接着，《人民日报》报道中共河北省委以及全国各省、市委召开宣传工作会议的消息。

4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两篇来自文艺界的报道《文艺刊物如何贯彻“放的”方针？》和《文艺创作不要受教条主义的束缚》。这两篇报道透露

了文艺界的动向：

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在回答《文汇报》记者时说：“陈其通等人的文章，对鸣放实际起到一种障碍作用”。4月22日在一个座谈会上讲：“现在不是要小放，要大放。”5月15日，他在接见日本戏剧访华团时说：“人民有言论、集会、出版的自由，人民可以宣传社会主义，也可以批评社会主义；可以宣传马克思主义，也可以批评马克思主义”。

文化部部长茅盾在《人民日报》上撰文批评陈其通等人阻碍“鸣”、“放”，指出：“简单地采取禁止‘放’和‘鸣’的方法，不能解决问题。……我们的工作方法应当是让大家来‘放’，来‘鸣’。开展自由讨论，……”。4月22日《人民日报》又报导了他在一个座谈会上说：“目前情况，主要是要克服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因为目前对教条主义的批判还存在着各种顾虑。”他还说：“有人形容一些编辑部的状况是‘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我看还是先大开了再说”。

部队作家们的意见也很尖锐，认为陈其通等人写的《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认识错误，态度粗暴，不合事实，后果不好。

4月23日，又是一篇《人民日报》社论，《全党必须认真学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

4月25日，《人民日报》刊登《上海知识界的新气象》，赞扬说：“人们认为这次大讨论是三个字：好！好！好！毫无顾虑地提意见，这是一好；各种意见充分交流，这是二好；对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有利，这是三好。”

从这天起，《人民日报》开辟专栏，以《听了毛主席讲话受到极大鼓舞，各地知识分子谈“百家争鸣”》为题，连续报道全国文化界、教育界、科学界知名人士的心得、体会和意见。诸如：

著名画家傅抱石说：“过去不敢‘放’，是怕扣帽子。”

山东省文联主席于黑丁说：“目前知识分子有两种顾虑，一是怕犯了错误遭到粗暴打击；二是怕正确意见不能发挥作用。”

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发表《为什么会有“早春”之感》一文，其中说：“早春就是意味着一直到现在还看不到万紫千红、鸟语花香的美景，能够看到的只是花的蓓蕾，能够听到的只是鸣的前奏。”：“……我的看法，主要是放得不够。”是有些地方或部门的领导，“现在还是不敢大放，甚至不敢小放、小小放。”知识分子“鸣不鸣要看放不放，鸣到什么程度，要看放到什么程度。有人说，‘我们是大放则大鸣，小放则小鸣，不放则不鸣。’……”。

中国民主促进会浙江筹委会副主委、杭州市副市长陈礼节说：“浙江知识分子在‘鸣’和‘放’上还有顾虑，因为怕‘钓鱼’和怕挨整。”

民革中央常委、四川省教育厅副厅长罗承烈说：“粗暴批评就会使人怀疑‘鸣’、‘放’的目的是放长线、钓大鱼。”

上海著名文化人黄裳用诗人般的语言充满激情地呼喊：“让春天早些来到吧，让激流的力量推动我们的生活快速前进吧。”

这些知识分子在毛泽东的鼓动下，跃跃欲试却又欲言又止，真可谓“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既觉得有话要说，参与“大鸣大放”，又害怕中共“放长线，钓大鱼”。1949年以来他们确实被整怕了。

于是《人民日报》连续发表多篇文章，让人们打消顾虑。

4月26日，《人民日报》再发社论《从各民主党派的会议谈“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毛泽东运筹帷幄，通过训斥邓拓，扭转了《人民日报》消极抵制的态度，一变而成“大鸣大放”的吹鼓手，“诱敌深入”的急先锋。其它各报见中南海的喉舌如此卖力，丝毫不敢怠慢，紧随其后，纷纷发表社论。如：

4月13日上海《解放日报》刊登社论《我们赞成“放”》。

4月21日上海《解放日报》再发社论《只能“放”不能“收”》。

4月23日江苏《新华日报》发表社论《大胆“放”，好得很》。

与此同时，中共的高级干部和毛泽东本人亲自出马竭力鼓吹鸣放。

4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在北京宣传工作会议上讲：“怕鸣放的人是怯懦的人，是没本事的人。我们欢迎齐放，欢迎争鸣。当前主要的问题是对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放得不够，鸣得不够，要放手放，放手鸣。”

4月30日，毛泽东责成中共中央统战部把各民主党派的头面人物请上天安门城楼。

毛泽东“满面春风”地说：“明天是五一国际劳动节，《人民日报》要登载《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中国共产党全党就要行动起来。今天请各位来是要请各位帮助我党整风。”“中共中央书记处和统战部要主动找党外人士开座谈会，征求意见。”

毛泽东还说：“现在是新时代和新任务，阶级斗争结束，向自然界宣战！”

毛泽东的话使在座的民主人士放松了对阴谋和阳谋的戒备，舒心地笑了。

毛泽东还讲了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问题，着重号召民主人士揭露教育、卫生等部门的官僚主义。他说：“多攻一下，切实攻一下，在报上发表，可以引起大家的注意，不然官僚主义永远不能解决。”他还说：“这次要党内外一起‘内外夹攻’，以便使党的整风切实收到成效。”毛泽东接二连三地号召“攻”、鼓吹“攻”、煽动“攻”。后来，凡是对官僚提了一点意见的都被认定成了“恶毒攻击”，数十万人因此劳改、劳教，甚至客死他乡含冤九泉。

对高等学校的领导体制，毛泽东提出由邓小平负责找党外人士和民盟、九三学社等开座谈会，对有职有权和学校党委制的问题征求意见。他说：“民主人士只有职而无权无责，确实不好，党内外应改成平等关系，不是形式上的，而是真正有职有权。”他近乎挑逗似的针对党委制表态说：“教授治校恐怕有道理，是否分成两个组织，一个校务委员会管行政，一个教授会议管教学。”“党章有一条规定，工厂、农村、部队、学校要实行党委制，现在看党委制恐怕不合适，要改一下。职权应当集中在校务委员会和教授会，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有什么办法和意见都到那里去讲，人家赞成的就做，不赞成的就不做”（以上引文见北京清华大学编《学习资料 1957-1961》第47页）。

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谈笑风生，再次“诚恳地”强调中共在整风中坚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原则。

毛泽东还戏谑地自称是“老和尚”，希望大家向“老和尚”提意见。引得大家哈哈大笑，对阴谋诡计的警惕性几乎完全失去了。

毛泽东自编自导自演的阴谋剧，迷惑了善良的人们。

毛泽东手下的喽罗们纷纷追随其主子大肆鼓噪。

5月5日，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省委召开的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上说：“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武汉地区最近放了一点，但很不够；鸣了一些，但不起劲。为何放不开，鸣不起来？有人说党群之间隔着一堵墙，……不管是什么，都要打倒它。”

5月11日，毛泽东的“好学生”、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在两千七百余人参加的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这次会议标志着上海整风运动开始。一些党员的缺点、错误，是与上海市委存在的缺点和错误分不开的。上海党在整风中要紧紧围绕中共中央关于整风的指示中所指出的五个方面来进行检查。检查要从科长以上负责干部开始，特别要从上海市委开始。整风时间至少半年，办法是边学习、边检查、边改进、边处理，目前应该坚决地放，大胆地放，……”

5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副总理李富春，在重庆市向四千多名干部讲话，要求大家打破“五怕”思想，“党和毛主席都表示要大家大胆放，大胆鸣，用不着顾虑什么。”

5月18日-19日，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在中山大学、华南师范学院，共听取了教授们十三个小时的意见。他表示“今天没有谁是旧知识分子。”他要求教授们“打消一切顾虑，大胆讲话。”

5月30日，中国人民大学召开鸣放座谈会。当李景汉教授说到有人主张要“收”时，副校长胡锡奎立刻插话：“要大放、大鸣的”。

一霎时，毛泽东号召“放”，中共中央号召“放”，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报纸充斥着“鸣”“放”、“大鸣大放”。在中共中央喉舌的鼓吹下，“鸣放”、“大鸣大放”成了纵贯南北、横穿东西、跨越五岭、漫布三江的热闹话题。

在一片“大鸣大放”的喧嚣声中，《人民日报》将毛泽东“诱敌深入”的阴谋推到了高潮。

(7) 所谓大毒草是毛泽东做了反右部署以后“诱”出来的。

回顾1957年的反右历程，一些著名的右派言论，被钦定为最恶毒、最猖狂、最露骨的三株大毒草(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储安平的“党天下”)，以及章乃器、葛佩琦等知名右派和林希翎、谭天荣等学生右派都不是在“鸣放”初期出现的。而是在1957年5月15日毛泽东暗地里做了反右部署以后，在中共中央多方鼓励、动员、引诱、煽惑下，中了毛泽东“引蛇出洞”“诱敌深入”之奸计，而进入中共中央早在几个月前就已经预设好了的埋伏圈之内。

所有后来被指为“最猖狂”的“右派言论”，都是在5月15日以后，在劝说、诱导下“放”出来的。

章伯钧关于“政治设计院”的言论 5月21日

罗隆基建议中共设立“平反委员会” 5月22日

储安平的“党天下”之说 6月1日

章乃器的“向资本主义学习” 5月31日

中国人民大学葛佩琦鸣放发言被篡改为“杀共产党人”见报 5月30日

北京大学第一张大字报《是时候了》 5月19日

清华大学贴出第一张大字报《要求开辟民主墙》 5月24日

北大物理系学生谭天荣的大字报“一株毒草” 5月20日

人大女生林希翎第一次去北大演讲，抨击“封建社会主义” 5月23日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现第一张大字报《向北大同学学习》 5月28日

昨日之事，历历如在目前，中国的知识分子手无寸铁，唯一的“进攻”武器就是言论(口头的或书面的)，唯一的“进攻”方式就是响应中共的号召向共产党提意见。他们的发言都有记录在案，日期是明确的，绝不能把5月15日以后的发言说成是5月15日以前就“猖狂进攻”了吧。

事后了解，凡因“鸣放”而被划为右派的，绝大多数都是5月15日以后坠入陷阱的。

许多后来被打成右派分子的人，在听了帮助党整风的号召以后，心存疑惑，怎么也不肯发言，是中共各级党组织再三再四地请求他们帮助党整风。许多人禁不住大大小小的支部书记“面带笑容”的动员，不得不说了几句不痛不痒的意见，而这几条不痛不痒的意见，后来就被“伟大、光荣、正确”的党用来把他们打成了右派分子。经受了二十余年专政的压迫。

2015年5月20日，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的朱镕基给习近平写了一封信。其中有曰：“1957年听从党的号召‘大鸣大放’，1958年因大鸣大放被党打成右派，开除党籍。当时我30岁，心中纳闷。不是纳闷党设局钓鱼，而是纳闷自己怎么会有右派思想，这右派思想从何而来。后来我想通了，这哪里是右派思想，分明是人的思想嘛。严格来说，人人都是右派，区别在于你说还是没说。说了的便是右派，藏着掖着的便不是右派。”

朱镕基这话只说对了一半，历史证明，许多藏着掖着的也没有逃脱被打成右派分子的厄运。

事实上，很多右派分子都是毛泽东预先圈定的。1975年11月，周扬刚从秦城监狱的牢房里放出来，听说冯雪峰尚属摘帽右派，党籍也未恢复，且身患绝症，肺癌晚期，穷愁潦倒。不禁痛哭流涕，深感愧对故人。有人问道：“当年你怎么下得了手呢？”周扬此时才说：“抓右派之前，主席给我一个名单，名单上的人都要一一戴上帽子，而且要我每天汇报‘战果’。我说，有的人鸣放期间不讲话，没有材料，怎么办？主席说，翻延安的老账！”

周扬晚年有所忏悔，才道出了当年的秘密。

在反右运动方兴未艾之际，有的人预感到这次运动来者不善，因此咬紧牙关，不提意见，不鸣不放，努力回避。但结果，不少这样的人也被打成了右派分子。给他们加罪名的依据是：他们虽然口头上没反党，内心在反党，对运动抱着抵触的态度。

诚然，有些年轻人，尤其是那些尚未涉世的青年学生，说了一些辛辣，尖刻的话。五十几年后，回过头来看，被秘密枪毙了的北京大学女生林昭、被施以极刑处死的四川大学女生冯元春、被铁定为右派的中国人民大学女生林希翎，在1957年的发言中，情绪难免激动，用词略有偏颇，但其矛头所指并非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而是不利于巩固共产党领导的种种弊端。当初若能采纳一二，毛泽东的威信或许会进一步提高，中国的富强或许会更早来到。如今却成了过往的遗憾。三个杰出的女学生被残酷迫害乃至枪杀，毛泽东又多了一笔沉重的血债。

我所在的重庆长江电工厂，七月初才开始鸣放，三十几个“右派”和“反社会主义分子”，无一不是因为没有被识破毛泽东的阴谋和阳谋以及种种诡计，还幻想着真的帮助党整风而受骗上当的。

为了诱敌深入，毛泽东一面磨刀霍霍，一面责成李维汉（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组织召开大型座谈会，据说是给大鸣大放提供场所。

毛泽东号召大家讲话，号召“鸣放”，号召“大鸣大放”，号召——用十五天之后毛泽东的语言——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

于是中共中央统战部从1957年5月8日至6月3日在全国政协礼堂召开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座谈会，总共开了十三次，七十多人发言。

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国务院第八办公室从5月15日至6月8日在国务院礼

堂联合召开工商界人士座谈会，总共开了二十五次，一百零八人发言。

与此同时，国务院各部门党委，各省、市委以及文联、高等学校党委也都召开了党外人士座谈会。

名义上这些座谈会的目的是帮助中国共产党整风，实际上却是按照毛泽东的战役部署收集各界人士的言论，再经过歪曲、捏造，以便寻找活靶子，确定打击目标和突破口。

1957年5月8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第一次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会议由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和副部长平杰三主持。

李维汉开宗明义地说：“召集这个会的目的，就是请大家帮助我们进行整风，帮助我们改正缺点和错误。通过统一战线来推动我们整风，这在我们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因此，希望大家多发表一些批评意见。”可谓循循善诱。

“诱”出了发言，再采用只攻一点、不及其余；断章取义、以偏概全；穿凿附会、横加歪曲；移花接木、无中生有等手法，制造“毒草”。于是坦诚相见便成了“猖狂进攻”，直言奉告便成了“篡党夺权”，针砭时弊便成了“恶毒攻击”，维护民主便成了“妄图复辟”。本来是“百花竟放”，却成了“毒草丛生”。

（8）国民党员卢郁文充当了反右的马前卒

卢郁文这个名字至今已沉没在历史的垃圾堆里被多数人遗忘，1957年6月间，他可是个烜赫一时的风云人物哟。

事情的起因是：毛泽东为施展“引蛇出洞”的阴谋，号召各界人士对共产党提批评意见，责成李维汉从5月8日起组织各民主党派召开座谈会。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国务院秘书长助理卢郁文5月25日在民革中央小组扩大会议上讨论怎样帮助共产党整风时，率先以“捍卫党”的“左”派姿态慷慨陈词。对某些给中共提意见者猛烈抨击。他那一番言论或许是出于明哲保身，表明他忠于共产党（不久前，他曾交过两次入党申请书）。也许是为了提醒昔日的同僚注意发言的分寸，切勿伤了共产党的毫发和毛泽东的逆鳞。毕竟他在国务院工作多年，对共党官场的内幕略有了解，对毛泽东的内心想法有所揣摩。如果当时真是这样，可说是他的一片好心。不料他的发言刊登在报纸上以后，竟收到三十余封匿名信，既有支持他的，也有反对他的，据说个别来信夹杂着“为虎作伥”“无耻之徒”等不逊之词，也有劝告他“回头是岸”的。既然是百家争鸣，自然是观点纷呈，见仁见智议论纷纷才是正常的。对执政的共产党都可以提意见，对一个国民党的贰臣卢郁文说点什么也算不上犯罪，不足为怪。1957年6月5日，卢郁文在座谈会后将这些匿名信交给了中共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以表对中共忠心或许还为了博得一点宠幸。为他才交的入党申请书增加一点分量，李维汉立即转交给毛泽东。

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吴冷西在回忆录中记载着：“6月7日，……毛主席找胡乔木和我到他家中谈话。当我们一起到他卧室时，发现没有其他人参加这次谈话。我们刚坐下来，毛主席就兴高采烈地说，今天报上登了卢郁文在座谈会上的发言，说他收到匿名信，对他攻击、辱骂和恫吓。这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发动反击右派的好机会。”

随后毛泽东发了一通议论，他说：这封恫吓信好就好在它攻击的是党外人士，而且是民革成员；好就好在它是匿名的，不署名更可以使人们广泛地联想到一种倾向，一股势力。过去几天我就一直考虑什么时候抓住什么机会

发动反击。现在机会来了，马上抓住它，用《人民日报》社论的形式发动反击右派的斗争。社论的题目是《这是为什么？》。（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39~40页）

这篇文章是《人民日报》理论部主任林韦奉胡乔木之命拟的初稿，经擅长揣摩圣意的胡乔木通篇修改，送毛泽东审阅时毛又改了几十个字，成了定稿。

两个秀才不敢怠慢，按照毛泽东的部署，赶快回报社打出了清样，呈送毛泽东认定后，该篇文章刊登在6月8日《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这篇社论成了人民日报第一篇对“右派”的讨伐檄文，第一篇火药味十足向“右派”开火的战斗宣言。由此，一场轰轰烈烈涉及四百余万“极右”“右派”“中右”“右倾”“反党”“反社会主义”等各类分子的反右斗争大幕正式拉开。“公元1957年6月8日”被载入了史册。卢郁文成了向右派打响第一枪的人。

卢郁文其人到底为何方神圣呢？

卢郁文1900年12月生于河北省卢龙县木井镇卢柏各庄。他祖父那一代，曾是一个殷实大户，门额上悬着一块不知谁赠的“一方善士”的匾，门外是一个很宽很高的石台阶，在乡下显得十分气派。卢家在木井镇上开有药店，还有钱庄。卢郁文在家乡读了私塾、中学后，1918年考入北平高等师范（北京师范大学前身）英语专业，毕业后在师大附中当了近四年的英语教员。1925年在北京秘密加入了国民党。1926年夏，卢郁文经由国民党北京市组织的安排，到湖南任国民革命军政治部宣传科上校科长。1929年赴英国政治经济学院留学。回国后先后在北平师范大学、北京大学、河北训政学院、天津法商学院等校教授经济学。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卢郁文化装成商人，转道天津奔赴南京。任国民政府行政院编审，后随国民政府西迁武汉最后迁至重庆，先后任军事委员会工矿调整处主任秘书，全国粮食管理委员会主任秘书等职，1944年初改任国家总动员委员会物资处长，这个委员会是一个战时的临时协调性机构，委员长由蒋介石兼任。卢郁文在这里干了不到一年，被调到新疆任财政厅厅长。翌年抗日胜利，卢郁文请求辞去新疆职务，张治中多方挽留未成，临行时让他带了一封致蒋介石的亲笔信，信中对卢郁文着力推荐。蒋介石一见卢郁文即提出让他去任西北经济委员会主任，他婉言谢辞。找到资源委员会委员长钱昌照，谋了一个参事的闲职，1947年国民党“行宪”卢郁文通过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的关系，当上了立法委员。卢郁文在国民党高层中朋友甚多，于右任、汤恩伯等均与其有过交往，中共党员杨秀峰（49年后曾任高教部部长、最高法院院长）也被其称为挚友。他在官场中可谓左右逢源、游刃有余。1949年国共和谈时，张治中推荐他担任国民党代表团秘书长。和谈破裂后他留在北平，倒向中共，被周恩来委以政务院参事、秘书长助理等职。

卢郁文膝下有六名子女，长子卢存学就读于燕京大学新闻系，1949年3月加入中共之四野后随军南下。1950年在广西转业，任《桂林日报》副刊编辑。但与领导之关系不甚融洽。

《这是为什么？》发表后，卢郁文声名远扬，卢存学担心父亲的安全，特地请假到京探父。卢告之家中尚平安，且住宅附近似有便衣巡逻，不知是为了保障卢家的安全，还是监视卢府所有人的行动。他对儿子不放心，为此抽时间与其长谈。为避免窃听，父子二人离家外出，在中山公园一个僻静的小山坡上。卢告诫儿子：“领导不管水平高低，他代表党。你对他不满，就

是反党！因为你不可能直接反对党中央。在中央的反右派斗争中，凡是对党员提意见的，甚至对拥护党的积极分子提意见，都被视为反党。你回去要赶快认错。”在听了儿子卢存学禀报所在报社的情况介绍后，卢郁文估计儿子有可能被正在向纵深、向基层发展的“反右”狂潮卷进去，因此他忧心忡忡，嘱咐儿子回去后主动检讨。他告诉儿子，“反对党中央是反党，反对地方组织也是反党，甚至反对某个党员、某个人都可能被认为是反党。”“你跟领导搞不来，人家不说你是团结问题，不说你为人处世欠妥，而说你是反对党的领导。”“你说你从心里没有反党，我相信，但谁能证明？左派的心和右派的心挖出来都是血淋淋的一块肉。”“要知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欲减之罪也是何患无辞的。”

几番叮嘱语重心长，但一切都晚了！卢存学于1958年4月16日被《桂林日报》社划为右派！1960年国庆后摘帽，改称为“摘帽右派”。1961年向党交心，他再陷“阳谋”圈套，被关押……文革一来，屡遭批斗，劫难重重。1980年5月方被“改正”，列为统战对象，安排在广西北海市任民革主任委员。2009年病逝于广西。

1957年，卢郁文因为一封匿名信，成为反右运动的新闻人物，1957年6月6日，在国务院举行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卢郁文揭露有人写匿名信对他进行辱骂和恐吓并当场宣读了这封匿名信。第二天，《人民日报》披露了这件事，第三天发表了社论《这是为什么？》引用了“匿名信”部分内容进行批判，此即“匿名信事件”大致经过。

从表面上看，这个事件是“反右运动”的导火索和转折点。自“匿名信事件”后，局势为之产生了急剧的变化，从良性的方向转向了恶性后果。由此掀起了全国范围的“反右”运动，并且被恶性扩大化，致使数百万人蒙受冤屈。这是卢郁文始料未及的。

但实际上，早在5月15日，毛泽东已经写好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向全党发出了“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党内指示，号召要打一场大战，正在厉兵秣马，枕戈待旦，处心积虑地寻求进攻机会之际。卢郁文的匿名信事件不过是发动反右斗争的一个借口而已，无论有没有匿名信事件，反右已箭在弦上，势在必行。因此，这个事件，实际上的意义并不大。

反右之后，卢郁文官运亨通。他晋升民革中央常委，国务院副秘书长。1964年担任全国政协常委兼副秘书长。

“文化大革命”时，年逾花甲的卢郁文对当时中国发生的一切都感到迷惘、困惑、不安。那时，他还是属于被保护之列，未受到冲击，但是汽车、电话被取消了，保姆被解雇了，象棋、扑克牌被红卫兵勒令烧掉了；大儿子被划成右派分子关进了牛棚，女儿被抄家，卢××失踪了，卢××自杀未遂，卢××被挂牌批斗，卢××陪斗，六个子女无一幸免。“文革”的“打倒风”和“抓叛徒风”刮起时，他的心脏病和糖尿病已很严重，但几乎每天都要提心吊胆地接待外调人员。这些人颐指气使，态度粗暴，动辄拍桌子训斥，弄得他十分烦恼气愤又不敢有丝毫流露。就在这种沉闷反常的氛围中，1968年10月6日，卢郁文吃罢晚饭，把筷子往桌上一放，倒靠在藤椅上与世长辞了，医生诊断是突发性心肌梗塞，也有说是被吓死的。享年68岁。他带着许多困惑、带着对分散在各地子女命运的担心去了。死后经毛泽东特准为之举行追悼会，骨灰放入八宝山革命公墓，《人民日报》上发表讣告。虽然追悼会开

得异常简短，无人致词，无人交谈，但在当时已算是难得的礼遇了。我至今弄不清他该算名垂千古还是遗臭万年呢。

四、反右的重头戏一整肃民主党派

整肃民主党派是毛泽东掀起反右运动的主要目的，也是反右运动的重头戏。正如谈楚汉相争必谈鸿门设宴、垓下之围；讲三国演义必讲赤壁鏖兵、白帝托孤一样，追忆反右派运动的起因、过程和结局，不能不谈毛泽东如何整肃、降服民主党派。五十几年之后回顾这段往事，可以更清楚地看出毛泽东“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的枭雄心理，和玩弄权术、口蜜腹剑的蛇蝎心肠；也可以看出中国民主党的精英们屈从于中共淫威而自相鱼肉、自残自虐、不堪一击的软弱本质；更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是如何用谎言与暴力欺骗、统治人民的本性与特色。从而以史为鉴，不再重蹈覆辙，摈弃一党专政，更加坚定地推进民主运动。使泱泱中华融入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理想社会。

且看整肃民主党派十二回。

1、毛泽东嫉恨知识分子根深蒂固 共产党谋求独裁专政源远流长

毛泽东祖籍江西，生于湖南。

据《毛泽东祖籍溯源》和《韶山毛氏族谱》记载，其先祖毛太华原居江西吉州(现吉水县)。1363年，群雄争霸，朱元璋与陈友谅展开鄱阳湖大战，陈兵败，中箭而死。朱元璋占据了江南诸郡。毛太华由此转入朱元璋部，随其远征云南，在云南丽江澜沧卫落脚。娶当地纳西族王氏为妻，先后生八子。朱元璋即位后以军功行赏，毛太华受封于湘，因功微身轻，未授品爵，仅赐田土四百亩。毛感恩不尽，于是携二子入湖南，居湘乡北门外绯紫桥，十余年后迁至韶山冲，为韶山毛氏第一人。毛泽东为其二十世孙。2001年6月，云南省永胜县程海南岸河口毛家村山沟烂泥中挖掘出一块康熙年间所立、记载毛太华生平简历的墓碑，可为毛氏家族由滇入湘之佐证。

毛氏从江西经云南转入湖南，历明清两代，其后人并无显赫战功，数百年间，人丁繁衍，已成为韶山地区之大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韶山毛氏家族长期以农为业，中小地主而已，无大起大落，名不见经传。

传至毛泽东的祖父毛恩普(字寅宾，号翼臣。1846-1904)时，家道中落。毛恩普幼时读过几年私塾，身体羸弱，不善耕作，靠祖上留下的二十余亩薄田度日，屡试秀才不中，染有赌博恶习，娶妻刘氏，生有一男二女，人口增加，入不敷出，外欠债务日益增多，不得不典当变卖土地，被邻人讥笑为好吃懒做、败家子。

毛泽东之父毛貽昌(字顺生，号良弼。1870-1920)生于举家艰难之际，只读过两三年私塾便随其父在家务农。稍长，毛貽昌见债主盈门，吵骂不休，颇难应付，于是外出参加湘军，当差领饷，每月有四元大洋，贴补家用。毛貽昌从军后，其母刘氏不堪忍受家庭重负，不辞而别，毛貽昌闻讯即去职还乡，协其父操持家务。因他在外闯荡数年，可谓见过世面，觉察到单纯务农难以发家，随即做起了稻米生意。没有本金，便从韶山亲朋好友处立据借贷稻谷，自行加工成米，既赚了工钱又落下米糠喂猪，再租船将米运至湘潭、长沙等粮价较高的地区销售，返程带些日用百货回韶山售卖，利润颇丰。数年间即还清债务，赎回原有土地，并新置田土若干亩，在长沙、湘潭、韶山等地开设多家商铺，主营稻米，兼营牛、猪，自行印制发售类似于今日股票之“毛义顺堂”钱票，俨然成为韶山之大户，暴发之土豪。

毛贻昌 1885 年成婚，妻文氏（文素勤，排行第七，世称七妹），生五子二女，长、次子及二女均夭折，1893 年第三子降生，毛贻昌听信算命人说：此子需外养八年，方能顺利成长，并拜附近山中一青褐色巨石为乾娘（毛泽东幼名石三伢子缘于此），从小寄养在家境殷实的舅父家中，受外婆宠惯，养成了率性而为，随心所欲的个性。

毛泽东八岁那年，毛贻昌徒步三十余里到湘乡唐家峪岳父母家，将儿子接回，看着体魄健壮，比同龄孩子高出半头的三伢子，他那瘦削的脸上现出了得意的笑容。

三伢子回到韶山冲后，毛贻昌于 1902 年将他送到离家一百余米的韶山南岸私塾，拜邹春培老先生为师，每日诵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学磨墨、握笔、描红。毛泽东寄居外婆家中时曾随同表哥文运昌、文南松在二舅父文正莹所办私塾玩耍，有时也随读听课，练练毛笔字，所以对这些启蒙功课视若轻车熟路，在同学中属佼佼者，初时曾受老师夸奖。不久，其顽劣本性渐次暴露，坐无坐相，站无站相、趁塾师不在，带头下池塘洗澡、爬树上房、偷吃邹阿婆在屋顶上晾晒的果乾，且时常顶撞老师。进学堂两年有余（笔者注：在毛泽东读过的七个私塾中，南岸学堂是时间最长的一个，其余不过三五月而已），多次违规，屡教不改，众人不厌其烦。邹塾师与毛泽东的祖父同辈，为人正直，教学严谨，注重名誉。他怕石三伢子这等行为坏了学堂的规矩，于是找毛贻昌说：“贵公子聪明，学得快，我这儿是初等启蒙学堂，还是要为贵公子另择学堂深造为好”。明为婉言夸赞，实则严词劝退。毛贻昌无奈，只有将儿子责骂一顿，择校转学。

1951 年毛泽东进北京以后得知邹春培早已谢世，曾邀请其子邹普勋进京，忆起在南岸私塾读书时的情景时毛泽东说：“邹先生是个好人啊！他是个严师啊。我那时读书顽皮，不懂得严是爱、宽是害，还造过他的反哩！”

如今南岸私塾修缮一新，已成韶山旅游景点之一，赚几个门票钱。学堂内还张贴着表明“课堂纪律”的告示：“教不严，师之惰。不尊师者罚跪；嘻笑打闹者罚站；不专心致志者打板；逃学者罚跪；有违先圣训者除名。”石三伢子诸条皆为屡犯，焉能不被开除。

1904 年秋，毛泽东转到关公桥私塾毛咏生先生处。本家先生对本族子弟要求更严。三伢子任性、散漫、顽皮的行为惹得先生气忿，时常重点督导。不料这种管教方式适得其反，某日三伢子因故受先生责打，心中不服，竟至逃学，不知去往何处。毛咏生害怕十岁顽童发生意外，毛贻昌担心宝贝儿子生命安危，文七妹心急如焚以泪洗面。幸好第三日在离家不远的山间密林深处将其找到，毛老夫子心中石头终于落地，孽子之父喜忧参半怒气未消，慈母爱子心切悄声埋怨老师太狠，石三伢子怕打屁股再次转学。

1905 年春，三伢子来到桥头湾私塾周少希先生处，听老师开讲四书五经，并着重练习书法，初学欧阳询，再学钱南国。一天，塾师外出办事，学生则如脱缰野马，四处玩耍。老师回来时见毛泽东一人坐在课堂看书，他悄悄走近，三伢子全神贯注，周塾师惊异有加，仔细打量，原来《四书五经》底下还压着一本书，猛然间夺取到手，原来是一本禁书《薛刚反唐》，毛泽东突然一惊，周塾师怒目而视，厉声斥责道：“你！你！你是反叛！”“我不教你这样的反叛学生，收拾东西，回去！”毛泽东本就对周少希惯常用戒尺责打学生不满，撅着嘴从老师手里要回《薛刚反唐》，悻悻地离开了桥头湾。但他并没有回家，而是沿着韶河河堤走，路过上屋场（毛泽东故居）没有进屋，

一直走了六里多路，走到东茅塘伯祖父家里，二老以为私塾放假，让其住下去，一连住了好几天。毛贻昌和文七妹四处寻找，不见爱子踪影，气病了。第八天，毛泽东回家了，但不敢进屋，邻居告诉了他的父母说：三伢子在塘堤边上看书，毛贻昌应允不打他，这才进了家门。

1906年秋，毛泽东转到韶山井湾里私塾，塾师是毛宇居，他是毛泽东的族兄，比毛泽东只大12岁，为人正直、练达，诗文书法颇具功底。韶山冲的乡邻常请他代写书信、对联等，有“韶山一枝笔”的美称。毛泽东在其门下主要读春秋三传等经史书籍，偷偷地看了《精忠说岳》《水浒传》《三国演义》《隋唐演义》《西游记》等等闲书，不时顶撞先生，又被劝退。

1906年冬至1909年秋毛泽东因故停学在家[1]。

1907年，毛泽东辍学在家期间，离上屋场不远的李家屋场回来了一位先生，他比毛泽东大19岁，毕业于湘潭师范与湖南政法学堂，做了一名小学教员。当时戊戌变法虽已失败，维新思想却广为流传。他要打破封建迷信，主张“弃庙兴学”，还主张不拜孔子、不读《论语》，改学天文、地理、算术、生物等西学。本来是一种进步，但操之过急，不合时宜。他竟然把清溪寺里供奉的观音菩萨、十八罗汉都打了个稀烂，引得舆论一片哗然，不仅遭到族长、士绅们反对，穷苦农民也说他中了洋鬼子的邪气。李漱清“革命”的后果是丢了饭碗，湘潭县上七都小学将他辞退回家。但他那些时髦的举动，却对闭塞在韶山乡间的毛泽东产生了重大影响，使毛泽东滋生了走出家乡，出去见见世面、干一番事业的强烈愿望。萌生了“造反有理”的思想。

1909年，毛贻昌为了一小片柴山的所有权和人打官司，自认为有理却输了，于是想让三伢子重新读书，学法律，为此转到韶山乌龟井私塾，拜毕业于政法学堂、以讼笔著称于韶山一带的毛岱钟（其父毛简臣在左宗棠部当过钱粮师爷）为师。毛泽东不喜欢法律和诉讼，仍痴迷于水泊梁山、打家劫舍、替天行道等故事，不到半年，再次被塾师除名。

1910年初，毛泽东转到韶山东茅塘私塾求学。塾师毛麓钟是毛泽东的堂伯父，前清秀才。毛泽东在他的指导下，攻读了《纲鉴类纂》、《史记》、《日知录》，和《资治通鉴》、《孙子兵法》、《贞观政要》等关于“治乱兴衰之书”。并教毛泽东赋诗填词等。

此时毛泽东之原配妻子罗一秀去世，他独守孤灯，枕冷衾寒，触景伤情，心绪不安。再加上听信了李漱清的宣传，于是决心外出。由此结束了在家乡私塾求学的阶段。

毛泽东成年以后多次扬言他少年读私塾是“六年孔夫子”，实际上只读了四年，有两年多辍学在家。他读遍了韶山冲所有的私塾，以放浪形骸顽皮捣蛋著称，换了七八位老师，为人所不齿。但就毛泽东个人而言，少年时期的生活是丰富多彩的。他天资聪颖，身体健康，自由散漫，不拘一格，读私塾期间不仅打下了古文初步基础，也读了许多“新书”和“杂书”。塾师的严格管束培植了他的逆反心理；老夫子古板的讲授、囿于定见的解读，使他萌生了对知识分子的偏见；严父的动辄打骂铸就了他的叛逆性格；《水浒传》、《三国演义》启发了他对占山为王、弄权使谋的兴趣。这些青少年时期形成的潜意识，贯穿了他的终生。

1910年秋，17岁的毛泽东挑着简单的行李，离开闭塞的韶山冲，步行五十里山路，到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继续读书。在学堂里他读了维新派在日本编辑出版的《新民丛报》，开始崇拜康有为、梁启超；读了《世界英豪传》，

十分钦佩华盛顿、林肯、卢梭、孟德斯鸠；读了《盛世危言》，自命不凡地振臂高呼“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在这座小学里，他比同班学生大了五六岁，高人一头，若野雉之于鸡雏，自我感觉良好。

1911年春，18岁的毛泽东考入长沙的湘乡驻省中学堂，第一次乘船到省会城市，什么都是新鲜的，什么都想跃跃欲试。他带头剪掉了辫子，并且伙同几个积极分子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把十几个迟疑不决同学的辫子强行剪掉了。在革命党办的《民立报》上读到黄花岗起义的新闻后，在学校的墙壁上张贴文章。支持推翻满清、建立民国。提出把孙中山请回来当大总统，让康有为做内阁总理，梁启超做外交部长。尽管他不了解孙中山和康、梁之间政治主张迥然不同，就强行搭配，设定了政府的人事安排，但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公开表达政见，满以为必将引人注目，隔夜就会成为名人。然而此事并没有掀起波澜，被视作狂言瞽说，不屑一顾。那张“大字报”第三天就被风刮走，不见踪影了。毛泽东从自视甚高一下子跌落到自卑、失望。如果此事发生在中共执政的1957年，三伢子非被打成“反革命”“妄图篡党夺权”不可，等着他的将是批斗、游街、劳教、劳改，甚至枪毙。那才叫风光呢。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长沙革命党积极响应，热衷于政治的毛泽东投笔从戎，成为湖南新军二十五混成旅五十标第一营左队的一名士兵。

1912年清帝退位，毛泽东入伍半年还是个列兵，只落得背着一支烂步枪在操场上跑来跑去，学了些“立正”“稍息”“向右看齐”……，没有捞到官职。于是退伍回长沙，继续求学。

他像个无头苍蝇似的乱飞乱碰，开始关注报纸上的招生广告，先后报考了警察学堂、肥皂制造学校、法政学堂等，都不如意。

三月间，毛泽东考取了湖南公立高等商业学校，但一个月后因为英文跟不上教学而退学。转而考入湖南省立高等中学校，半年后，毛觉得课程要求高，且校规繁琐，断然从该校退学，寄居在长沙新安巷的湘乡会馆，每天步行三里路，到浏阳门外定王台的湖南省立图书馆自学。据说先后读了卢梭的《民约论》、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亚当·斯密的《原富》、孟德斯鸠的《法意》、赫胥黎的《天演论》、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等，无教学大纲，无考试评比。谁也不知道他在此期间究竟学到了什么。此事被其父知悉，毛贻昌不同意毛泽东这种漫无目标的自修，老爷子扬言拒绝继续提供费用。迫使三伢子上正式学堂。

1913年春，20岁的毛泽东考入不收学费的湖南省立第四师范，1914年2月该校并入省立第一师范。在校期间，毛泽东仍想着“造反”“革命”……积极参与驱逐校长张干的鼓动、罢课、请愿等活动，险遭开除。捱到1918年6月，25岁的毛泽东终于从中师毕业了。成就了最高学历。

1917年和1919年，毛泽东曾两次居住在岳麓书院的半学斋，倡导所谓新村主义。

1918年4月14日，毛泽东与蔡和森、萧瑜（子升）等在湖南长沙刘家台子蔡和森家中创办新民学会。新民学会取义于“大学之道在新民。……日日新，又日新”，经过争辩，新民学会确定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萧子升为总干事。

1919年7月14日毛泽东和几位同学一起创办了《湘江评论》。出了一期即被湖南军阀张继尧查封。

新民学会和《湘江评论》均未涉及马列主义。

1918年9月，毛泽东和李维汉、蔡和森、罗章龙、萧子升等二十四个湖南籍老乡去了北京。为了解决生活问题，经杨昌济介绍、李大钊核准，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当了一名助理员，负责扫地、收拾屋子，读者登记等杂务。当时，蔡元培主持的北大先后聘请了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时代的旗手”，正是知识界新思潮的发源地，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然而“德先生”（Democracy，民主）和“赛先生”（Science，科学）在毛身上没有留下什么痕迹。在此期间，毛泽东有幸认识了许多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和成员，如张申府、胡适、梁漱溟、傅斯年、罗家伦，张国焘、邓中夏等，然而初来乍到、不修边幅、且操着一口湖南土话的毛泽东无知无闻，乃至无人理睬。这本来是很正常的，那些热衷于学术和关心时局的大忙人怎么会重视一个新来的临时工呢？但自视甚高的毛泽东想跻身于学者名流之列却不得其门而入，他感觉被人忽略、被人歧视，精神上很压抑，属于妄想型的心理失常。由是他的自卑心理愈发加重，对知识分子的成见也愈益加深。既自惭形秽又气傲心高，自誉为“独坐池塘如虎踞”的毛泽东，不到半年就径自回湖南去了。如果说，北大那段经历留下了什么痕迹的话，那就是在图书馆工作时感受歧视而产生的终身未消的对知识分子的敌意。

毛泽东执政后，一次也没有进过北京大学的门。进城初期，他倒常去清华大学，但只是半夜去，因为那里有当时北京唯一的室内游泳池。他去是为了洗澡和游泳。对北大他是不屑回顾的，他对知识分子的敌视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知识分子后来的命运。

中共召开一大时，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当教师，闻讯开会的消息后，卖了一件大衣购买了火车票。虽然毛泽东从湖南赶到上海，但他并非共产党员（1965年董必武写过书面证词，明确指出毛泽东当时并未入党。湖南第一个党支部是1921年10月成立的。）毛泽东既然到了上海，经筹办会务的负责人李达允许，准予列席。

笔者查阅有关资料也未发现当时湖南有共青团组织。只有个与马列主义不沾边儿的新民学会和一个销售时尚书籍与期刊杂志的文化书社。

1981年6月，在中央召开的讨论建国后若干历史问题的预备会上，涉及到评价毛泽东是否为建党领袖的问题时，党内元老陈云说：“建党他有份，建国他有功，治国他无能，文革他有罪”驳斥了毛泽东是中共缔造者的传言。

1922年中共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据毛泽东回忆：“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我本想参加，可是忘记了开会的地点，又找不到任何同志，结果没能出席。”（笔者注：以上引文见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对此事的记述。表明毛泽东对共产党和党代会是心不在焉的。党代会也没把他看作什么正经玩意儿。）

1923年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毛泽东恰在广州，他大力鼓吹参与过中共一大。由此得以正式代表身份莅会。至于何时入党，介绍人是谁至今仍属悬案。乃中共党史中的一个谜。或许他从来没办过入党手续。

从历届中共代表大会的选举结果可以看出，七大以前，毛泽东只有偶然一次即第三次代表会时当选过委员，多数时间处于边缘位置。中共的大权操控在激进的知识分子手里。

1927年8月毛泽东奉湖南省委之命发动秋收起义，起义被政府军击溃后毛泽东率残部约700人逃往湘赣边界，1928年4月朱德和陈毅等率所部一万余人上井冈山，同毛泽东执掌的秋收起义残部会合，成立了工农革命军，创

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毛泽东虽然上井冈山的时间比朱德早，但所率秋收起义后的残兵败将只处在依附于人的地位，朱德率众上山后才成立工农红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时称朱毛红军。毛泽东在苏区不但被架空，而且一度失去了话语权，精神倍受压抑，郁闷纠结。虽然1930年由当时的中共中央主席向忠发推荐他当上了中华苏维埃主席，但并没有改变被人轻贱的境遇，仍然处于被排斥的状态。任弼时不点名地批评他“狭隘经验论”，他刻骨铭心地记在心里，几十年后在庐山会议上还反复提起。博古、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军事顾问，奥地利人）等人对他说：“山沟里是没有马列主义的”，何凯丰在遵义会议上笑话他“你懂什么马列主义，顶多是看《孙子兵法》、《三国演义》打仗！”都极大地伤害了他的自尊心，以致他独掌大权以后还念念不忘。

这一系列心理创伤，使得毛泽东产生了进攻性的自卑情结，表现为自尊心超强，过敏，多疑，斤斤计较，睚眦必报。

性格的偏激加重了他对知识分子的憎恨和仇视心理，执政后便动用国家暴力，持续歧视与迫害知识分子。

贯其终生，他讲过许多诋毁知识和知识分子的话，兹摘录几条如下：

“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

“知识越多越反动。”

“你看谁人知识高呀？还是那些不大识字的人，他们知识高。”

“智慧都是从群众那里来的。我历来讲，知识分子是最无知识的。这是讲得透底。知识分子把尾巴一翘，比孙行者的尾巴还长。孙行者七十二变，最后把尾巴变成个旗杆，那么长。知识分子翘起尾巴来可不得了呀！老子就是不算天下第一，也算天下第二”。

“去搞阶级斗争，那是大学，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什么北大、人大，还是那个大学好！我就是绿林大学的，在那里学了点东西”。

“医学教育用不着收什么高中生初中生，高小毕业学三年就够了。华佗读的是几年制？明朝的李时珍读的是几年制？”

1957年2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也不忘挖苦一阵，他说：“那些知识分子犯起错误来可厉害。我们党‘左’倾、‘右’倾都犯过，都是知识分子犯的，陈独秀—知识分子、李立三—知识分子、王明—知识分子、张国焘—知识分子，高岗不算，饶漱石也是知识分子。”

“对于资产阶级教授们的学问，应以狗屁视之，等于乌有，鄙视，藐视，蔑视，等于英美西方世界的力量和学问应当鄙视藐视蔑视一样。”

“那些大学教授和大学生们只会啃书本（这是一项比较最容易的工作），他们一不会打仗，二不会革命，三不会做工，四不会耕田。他们的知识贫乏得很、讲起这些来，一窍不通。他们中的很多人确有一项学问，就是反共反人民反革命，至今还是如此。他们也有‘术’就是反革命的方法。所以我常说，知识分子和工农分子比较起来是最没有学问的人。他们不自惭形秽，整天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如此下去，除了干反革命，搞资产阶级复辟，培养修正主义以外，其他一样也不会。”（上列引语见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118页，第12册35页，第13册171页、182页。）

以上所述就是毛泽东的知识分子观及其形成过程，也是他掌权后中国知识分子一直受打压的缘由。

中国共产党是什么时候诞生的，缔造者究竟是谁？

追溯一下 1920 年上海首次建党和 1921 年中共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人员组成及其结局，或许更有利于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追求以及毛泽东篡改历史，突出个人的劣根性。

许多党史著作淡化中共和共产国际的关系，少说甚至不说。好像中共是土生土长，在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中应运而生进而茁壮成长的。其实，情况并非如此。近些年，才逐步透露了一些真实情况，中共是共产国际派人来推动建立起来的，而共产国际不过是苏共手里的工具。苏共派来的催生者就是 27 岁的俄国人维金斯基，他是中共建党的第一个操盘手。1920 年 3 月，他奉列宁之命到了北京找到李大钊谈建党之事。李说：“这个问题太大，你要到上海去找仲甫先生谈。”仲甫先生即陈独秀[1]。

陈独秀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时与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2]过从甚密，二人皆为倡导马克思学说的先驱。“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涌现了一批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建党的倡议很合他们的胃口，但是，他们当时高举的还是“民主”和“科学”这两面大旗。一时和维金斯基带来的观点一列宁主义，还是有距离的。当时在中国，欧洲社会党的声誉较好，所以陈独秀主张叫“社会党”。李大钊说：“还是尊重共产国际的意见吧。”李大钊曾在 1919 年《新青年》第 6 卷第 5 号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是一篇两万多字的长文，连载于《新青年》。李大钊是把马克思主义介绍到中国来的第一人，陈独秀对他极为尊重。但二人皆对马克思之学说有所保留，这也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后中国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共同心态。“五四”时代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还是具有自由的思想 and 独立的人格。当时讯息不畅，传来的是“十月革命”胜利了，工人翻身成为社会的主人了。这给中国力图革新的知识分子带来了无限的惊喜和巨大的冲击。孙中山早年曾两次和欧洲社会党国际联系，要求他们“帮助我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之后呢，他也大笔一挥，要“以俄为师”了。可见“十月革命”对中国的影响是强烈的。“十月革命”七十四年以后，俄国把“十月革命”改成“十月政变”，把“列宁格勒”这个城市通过全民投票重新改为“彼得堡”，即不再承认“十月革命”的革命性。历经七十余年的实践和反思，多数俄国人认为列宁不如彼得大帝，因为他把历史拉回更加专制和残暴的一个时期。人们摒弃了列宁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苏联终于分崩离析，苏共终于解体。

1920 年，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维金斯基带来的思想就是马克思 30 岁时写的《共产党宣言》的精神，即“两个决裂”（和私有制以及私有观念决裂），进行暴力革命，搞无产阶级专政。还有列宁所发展的三个内容：一、在经济落后的国家也能搞社会主义革命；二、帝国主义到了崩溃的前夜；三、要建立一个铁的纪律的政党。

维金斯基还为中国建党带来了足够的经费一金卢布，这种物质的力量也是不可忽视的。开会、印刷宣传品，派人出差活动，处处需要钱。这在前苏联解密的档案中留下了明细的支出账目，数额很可观。中共一大通过的决议明确宣布：中国共产党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决议第六条明文规定“党中央委员会应每月向第三国际报告工作”。当时有人叫中共为“卢布党”。更为明显的是，中共早期建设的“国中之国”一瑞金政权，也叫“苏维埃”。更加不堪回首的是中共成立后即沿袭了列宁斯大林时期的党内自残自虐，派性斗争，杀害了成千上万的志士仁人。毛泽东统治时期尤其为甚。

附注：

[1]陈独秀(1879—1942年)，原名乾生，字仲甫，号实庵，安徽省怀宁县人。清末秀才，五次东渡日本断续学习英、日、法语和西欧文学，回国后蔡元培延聘他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是二十世纪初中国著名思想家、政治人物、语言学家。他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之一，1915年创办白话文刊物《新青年》，在发刊词中开明宗义指出“人权说”“生物进化论”“社会主义”是近代文明的特征。率先在中国打出“科学”与“民主”大旗，批判儒教和传统道德，倡导“打倒孔家店”，被誉为五四运动的精神领袖。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建人及首任总书记，并连任五届。陈独秀性格率直，内蕴刚强；脾气暴躁，动辄拍桌子摔茶杯，不善团结同仁；财务不公开，有家长作风。但不记私仇，不加害他人，不搞阴谋诡计。书生办党，缺乏经验，对共产国际之操控时有不满，1927年7月被共产国际褫夺了中共党内领导职务，1929年因为反对“毕其功于一役”的全国大暴动计划，在中东路事件中反对当时中共提出的“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被开除党籍。之后，陈独秀思想开始向托洛茨基靠近，对斯大林进行了批判，并于1931年成立中国托派组织。

1932年陈独秀以创办非法政党的罪名被捕。国民党各地党部及部分军政要员纷纷致电蒋介石，要求予以严惩。共产党也发表消息和评论，称他为资产阶级走狗、反共先锋。与此相对，名噪全国的大律师章士钊主动提出免费为其出庭辩护，胡适之、傅斯年等知名学者挺身为其说情。德国科学家爱因斯坦、英国哲学家罗素、美国教育家杜威等世界名人也致电蒋介石，要求释放陈独秀。

1933年4月，公开审判，章士钊在法庭慷慨陈词，陈独秀的自辩词和章士钊的辩护词在天津《益世报》全文刊发，其他报纸纷纷转载，一时轰动全国。其后，陈被“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的罪名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囚禁于南京老虎桥第一监狱。

在狱中，陈利用国民党的优待条件，大量阅读古今中外的书籍，潜心研究中国古代语言文字、孔子、道家学说等，完成了不少有价值的学术论著。1936年3月，陈独秀在《火花》发表了《无产阶级与民主主义》，指出“最浅薄的见解，莫如把民主主义看作是资产阶级的专利”。他公开宣扬“民主主义乃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一种动力。”直言“斯大林不懂得这一点，抛弃了民主主义，代之以官僚主义，乃至于把党，把各级苏维埃，把职工会，把整个无产阶级政权，糟蹋得简直比考茨基所预言的还要丑陋。”

1937年8月，陈独秀提前获释。中共发表文章《陈独秀先生到何处去》，提出只要他承认当年的错误可以恢复党籍，被陈拒绝。康生等人在共产党的刊物上说陈独秀接受日本津贴，做“日特汉奸”，遭陈严词驳斥，由此与中共决绝。此后，他拒绝出任国民政府劳动部长，拒绝蒋介石出资让他组织“新共党”，拒绝胡适的邀请去美国，拒绝谭平山要他出面组织第三党的建议。陈最后长期隐居在四川江津，以教书为生，保持低调。穷愁潦倒中继续对文学和民主发展历程进行研究，特别对斯大林时代的反思，被后人认为无出其右者。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因病于四川江津鹤山坪石墙院逝世，享年63岁。

陈独秀生前曾撰一诗《题西乡南洲游猎图》，诗曰：勤王革命皆形迹，有逆吾心罔不鸣。直尺不遗身后恨，枉寻徒屈自由身。驰驱甘入棘荆地，顾盼莫非羊豕群。男子立身唯一剑，不知事败与功成。或可为其自身之写照。

[2]李大钊(1889—1927年)，字守常，河北乐亭人。自幼父母双亡，由祖父供养，1907年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1913年冬考取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学专业。通过

日文间接地了解了一点马克思理论。1915年李大钊放弃学业返回上海，参加了由梁启超、孙洪伊等组织的宪法研究会，1918年初，经章士钊推荐，蔡元培聘请李大钊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这时俄国十月革命引起世人的关注，李大钊虽然未能身临其境了解事情真相，但他根据自己的理想和信念，写了一批歌颂苏俄的文章，公开宣扬“试看将来之全球，必是赤旗的世界”，由此名声鹊起。五四运动以后，中国进入一个军阀混战的时期。李大钊热衷于从事现实政治，不仅在苏共的支持下创建了中国共产党，而且还努力吹捧苏共的加拉罕、说服孙中山、建议国民政府联俄、容共。1924年国民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李大钊甚受孙中山器重，当选为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他在会上公开承认自己是苏共党员，共产国际成员。1925年五卅运动和1926年三一八运动，李大钊是主要的策划者和组织者。据顾维钧回忆，李大钊在请愿书中提出：“即使把外蒙置于苏俄统治下，那里的人民也可以生活得更好。”对此卖国举动，北洋政府甚为忌恨。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后，李大钊与赵世炎等人在北京组织五万余人的示威。1926年3月，李大钊领导并参加了北京“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三一八运动。张作霖入驻北京后，随即以“假借共产学说，煽动群众，屡肇事端”为由，对李大钊下达通缉令。李逃入了位于东交民巷的苏联大使馆。他在使馆区内继续操持着国共两党的日常事物，1927年4月6日，张作霖派三百名特警强行搜查苏俄使馆，逮捕李大钊等六十余人，搜出大量军火和七大卡车文件档案，其中有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对中国各派别的联系证据和秘密指令，例如责成中共党员操控国民党，消灭北洋政府等。李大钊关押期间多有老实交代，对人员组成、内部分工甚至工薪待遇均供认不讳。张作霖看到部分供词后勃然大怒，于1927年4月28日将李大钊等二十人处以绞刑。随后着手翻译整理搜查出的档案资料，择其要者辑成《苏联阴谋文件汇编》由京师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少量印刷，公诸于世。苏共计划之恶毒、手段之阴险、行为之卑鄙暴露无遗。激起了轩然大波，举国上下愤慨无比，导致共产党落到了千夫所指的境地。当时国共合作，不少共产党人已经在国民党内身居要职，比如毛泽东当时就任国民政府宣传部长、周恩来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党诸多要害部门落入共产党掌控之中。李大钊事件暴露之后，蒋介石作出了“清共”的决定，并由此直接导致了所谓的“四一二事变”和“七一五事变”，大量的共产党人被捕被杀。国共合作毁于一旦，两党斗争变本加厉，刀兵相见血流成河，苦了善良百姓，误了泱泱中华。（笔者注：李大钊的《狱中自述》现存于北京档案馆，《苏联阴谋文件汇编》台湾南港图书馆有收藏，国内百度网站可查阅一斑）。

上海建党人员及其结局

中共建党始于上海，1920年5月陈独秀与共产国际代表维金斯基洽谈后，邀约俞秀松等五人初步磋商建党事宜。1920年8月陈独秀与戴季陶、邵力子、李达等人在维金斯基参与和指导下集会，起草了党纲，通过了决议。确定陈独秀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任总书记，是为中国最早的共产党组织。

现在苏联档案解密了，大量历史资料证明苏共通过共产国际催生了中国共产党，中共早期的活动均听命于共产国际（笔者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组织力量把这个浩大的档案翻译过来了，1997年开始出版了《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从档案1920——1925卷（第一集31页），可以看到维金斯基在1920年8月12日从上海写回去的汇报，开始即说：“我在这儿的工作成果是：在上海成立了中共革命局，由5人组成——4名中国革命者和我。下设三个部，即出版部、宣传部、组织部。”当时已明确5

位领导核心，书记为陈独秀，出版部长为汪原放[2]，宣传部长李达，组织部长张国焘，维金斯基是共产国际的当然代表。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1920年8月22日，在上海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还办了党刊《共产党》，公开打出了共产党的旗号。这一年，在上海渔阳里办了党校，对外名为“外国语学校”。任弼时、罗亦农、萧劲光、刘少奇等都曾在党校学习，后来他们都曾担任过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党校还送了一批又一批人员到苏联去学习。可惜，毛泽东当时没有到过这里，所以1920年这一段建党历史就常被抹杀和掩盖，因为毛泽东出席了中共一大，长期以来便把1921年7月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日认作建党日。实际上中共是1920年诞生的，建党一年后的7月23日才筹集召开一大，并不是召开了一大才建党。虽然一大也很重要，但把一大作为建党的标志是牵强附会的，也是有悖于历史的。主要的建党人陈独秀、李大钊和专门从苏联来推动建党的维金斯基都没有参加这次会议，可见当时并不认为它是一个建党的会议，因为建党的工作一年前早就完成了。毛泽东不顾历史事实执意认定中共是1921年7月1日诞生的。并把一大会址认作中共的诞生地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如果一个政党对自己的历史都不能说真话，叫人们怎样能相信它呢。

文革前夕，中共曾拟议在上海渔阳里建党故地建纪念馆，后突然停止，至今还是近百年前的旧貌。嗣后，中共将一大会址（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三号李汉俊的住处和嘉兴南湖中的一条游船）认定为建党圣地，盖因毛泽东没参与建党只出席过中共一大。

毛泽东历来精于篡改历史，突出个人，不断营造个人崇拜，文革期间达到巅峰。毛泽东并未参与1920年的建党伟业，当时他也不是共产党员，只是在中共召开一大时，经李达准许列席了会议，做了一次应景式的短暂发言，与会人员对其印象不深，也没有留下记录。今天，在“一大”会址陈列馆可以看到六十年代塑造的蜡像，只有毛泽东站在那里作宣讲状，大家皆凝神恭听，毛泽东俨然成了建党的核心人物。今天“一大”会址的群体蜡像就是篡改历史凭空造神的重要伪证。

然而，历史是难以篡改的。对1920年那段建党历史，当事人有许多回忆材料。如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保存的一份写于1921年初的档案材料中写道：“中共是去年成立的，领导人是享有威信的《新青年》主编陈独秀同志。”

施复亮（施存统）的回忆：“1920年6月间，筹备成立了共产党。起草党纲十多条，我抄了一份送日本。”

张太雷在1921年初写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说：“中国最初的共产党支部，是1920年5月组织成立的。”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

史实资料载明，毛泽东从来没有介入过建党事宜，不能称为中共的缔造者。

参与首次建党工作的有：

陈独秀（1879-1942）安徽安庆人。清末秀才，曾五次东渡日本求学，辗转于多个学校，短暂习造船，后转为以学日、英、法语为主，一度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攻读西欧文学，归国后任北大教授。1920年组建共产党，1929年被中共以“右倾投降”之罪名开除出党。陈独秀被国际解除总书记职务并开除党籍之前，曾通知他到苏联去学习，他断然拒绝了。他说：“我干中国革命，到苏联去学什么！中国革命为什么要苏联领导，苏联的革命要我领导行不行呢？”浩然正气铮铮铁骨，虽败犹荣。陈独秀在建党之后，曾连任五届中共

总书记，到开“六大”时，全体代表被通知到苏联去开会，陈独秀竟被拒之于门外。这次大会最后宣布的总书记是斯大林指定的向忠发[3]。在斯大林看来，他是老子他有这个权力，他要用小学文化的向忠发改造知识分子为主要组成的中国共产党。陈独秀 1942 年病逝于四川江津。

李达（1890-1966）湖南零陵人。北平师范毕业，1917 年曾赴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攻读理科。在日期间初步接触共产学说，读了几本马克思的书。1920 年回国参与建党，自诩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1923 年自称因与陈独秀意见不和而脱党，1927 年陈独秀被撤职乃至嗣后被中共开除党籍，李达并未及时回归共产党，而是脱离政治活动，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充当教授。1949 年中共得势后，李达多次在毛泽东面前检讨，被允重新入党。随之紧跟毛泽东亦步亦趋，自吹自擂，甚为得意。1957 年他任武汉大学校长，将师生总数百分之十打为右派分子，居全国高校之首，李达“功”不可没。1966 年文革伊始，衰老病弱之李达被批斗，缘由之一是“叛党”和曾经说过中共召开一大时毛泽东不是党员，乃至受尽侮辱、游街、罚跪等折磨，无奈之中语无伦次地高叫“我是叛的陈独秀的党，不是毛泽东的党！”（王炯华：《李达评传》，第 480 页，人民出版社第一版）。他写信给毛泽东：“主席：我有难，请救我一命。李达顿首。七月十九日。”毛批复“陶铸阅后，转任重同志酌处。毛泽东八月十日。”

尽管比毛泽东大三岁的李达“顿首”求饶，毛泽东只令下属“酌处”，并没有救命。李达没有等到毛泽东施救，1966 年 8 月 24 日，这位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呜呼哀哉了。8 月 25 日，在李达尸体即将火化时，学校宣读了经中共中央同意的中共湖北省委关于“开除李达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戴上地主分子帽子，进行监督改造的决定”，并宣布“李达已死”。

李汉俊（1890-1927）湖北潜江人。东京帝国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通晓日、德、英、法四国语言，热衷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原著，并在诸多刊物上发表九十余篇宣传共产主义的论文和译述。1920 年参与建党，共产国际驻华代表马林说，李汉俊是中共中“最有理论修养的同志”。他事业心很强，编辑党刊、起草党纲、筹备一大、提供会场、代理书记，为难得之人才。性格深沉不露，内蕴刚强，有些自视甚高，持才傲物。因与陈独秀、张国焘等人意见不合，1924 年脱党，1926 年入国民党。1927 年被桂系军阀暗杀致死。

沈玄庐（1883-1928）浙江萧山人。大地主家庭，清末秀才，做过云南楚雄广通县知事。因惩治贪官污吏得罪上司，1909 年辞官回乡。1920 年初，浙江第一师范发生了驱逐省长齐耀湘、教育厅长夏敬观的学生运动。沈玄庐积极支持。同年 8 月与陈独秀等共同发起成立上海共产党组织，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者之一。嗣后和陈独秀等一起指导上海工人运动，和俞秀松等在浙江创建共产党组织。随陈独秀南下广州筹建地方党组等。1921 年 9 月他回家乡成立了中国现代史上第一个农民协会，短短两个月时间，萧山、绍兴和上虞三县八十多个乡村相继成立农民协会，冲击当地政府，引起社会严重不安。1925 年沈玄庐脱离共产党。曾写一短信揭露“共产党搞得太滥，什么人都可以参加，连地痞流氓、拆白党也拉进来了。”还说瞿秋白拐走了他的儿媳杨之华等等，成了坚决的反共派。1928 年被身份不明的杀手置于死命。

陈望道（1891-1977）浙江义乌人。1915 年赴日本留学，先后入早稻田大学、中央大学学习文学、哲学。1919 年回国任中学语文教师，是年冬，经戴季陶推荐、沈玄庐出资三十银元润笔，委托陈望道依照日文版本翻译《共产

党宣言》。陈独秀跟共产国际代表维金斯基商议。维金斯基拨出一笔经费，在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成裕里十二号，租了一间房子，建立了一个小型印刷厂——“又新印刷厂”，印刷厂承印的第一本书，便是《共产党宣言》。1920年8月出版，首次印刷一千册，不久即销售一空，多次再版。陈望道属于学者型人才，不擅政治活动，虽然参与陈独秀等人建党，1923年即脱党。中共执政后任复旦大学校长、民盟中央副主席。1977年病逝。

俞秀松(1899-1939)浙江诸暨人。1916年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五四运动时为浙江学生领导骨干之一。1920年5月在上海参与组建中国共产党，同年8月受陈独秀委托创建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被推选为首任书记。1925年率二十五人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俞秀松为人正直，与同在苏联的王明、康生多有不睦，1935年受共产国际指派回新疆工作。1937年“肃反运动”中被认定为“托派分子”，1939年2月21日在莫斯科被枪杀毙命。

施存统(1899-1970)又名施复亮，浙江诸暨人。1917年入浙江第一师范，1920年春，施存统的一篇文章《非孝》引发浙江学潮，事件平息后被迫离开一师。经沈玄庐介绍认识了戴季陶和陈独秀。1920年6月，戴季陶资助他赴日本学习，随即与周佛海协商建立旅日共产主义小组。1922年因参与日本共产党活动被捕，关押十余日后驱逐出境，遣送回国。回国后受中共中央委派接替俞秀松主持社会主义青年团工作，1922年5月在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团中央书记。1923年以神经衰弱为由辞去党内一切职务，赴上海大学任教授，与王一知结婚。1925年发现其妻子与隔壁邻居、中共政治局委员、有妻之夫张太雷同居，勃然大怒，愤而退党。1970年11月底，施复亮含恨逝世。著名作曲家施光南为施复亮之子。

杨明斋(1882-1938)山东平度人。贫苦农民出身，1901年赴海参崴做工，入俄罗斯籍，参加俄共。1920年随共产国际代表维金斯基来华，担任翻译并协助陈独秀组建中共。1925年受中共派遣到莫斯科中山大学任副校长，他性情率直，待人宽厚，质朴谦逊，深受学生尊重，诸学子多以叔伯称之。1927年国共关系破裂，共产国际将失败的责任推之于陈独秀，无人敢于反对。愤而不平的杨明斋，在无法与中共中央取得联系的情况下，拟向共产国际为陈独秀申诉。自筹路费，历经千辛万苦只身越过中苏边界，被苏联当局捕获，以偷越国境之名判处流放三年，1938年被共产国际以捏造之罪名处以死刑。苏共解体后始获平反。

中共召开一大前，上海地区的党员除以上八名创建者外又增加了九人，即：

陈公培(1901-1968)湖南长沙人。金陵大学肄业，1920年参加上海共产小组，加入中共后赴法国勤工俭学，因与蔡和森等聚众占领里昂中法大学被驱除出境，1921年奉命赴海南建立党组织，1924年入黄埔军校二期，参与北伐、东征，1927年南昌起义失败后脱离共产党，保留国民党籍。1968年病逝。

邵力子(1882-1967)浙江绍兴人。清末举人，上海震旦学院毕业，同盟会会员，国民党员。1920年5月邵力子与陈独秀等人在上海发起建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1921年转为共产党员，1926年8月因工作需要，接受了陈独秀、瞿秋白的建议，与中共脱离组织关系，长期在国民政府充任要员。1967年卒于北京。

沈雁冰(1896-1981)浙江桐乡人。北大预科，1921年初入党，1926年

脱党，知名作家。笔名茅盾。1981年3月病逝于北京，死后经中共高层认可于1981年8月恢复党籍。

林伯渠(1886-1960)湖南安福人。1902年入湖南西路师范学堂。1904年春，赴日本东京弘文学校公费留学。1905年加入同盟会，1920年任孙中山大元帅府参议。1921年1月加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失败后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2年学成归国。60岁时在延安娶了个26岁的妻子，此后即紧随毛泽东，奉命行事。中共建国后长期在中共高层任职，1960年病逝于北京。妻子朱明两年后自杀身亡。

李启汉(1898-1927)湖南江华人。早年就读湖南岳云中学，后入北大旁听，1921年在上海加入共党，结识青帮女子，打入青帮，随意出入各工厂。李启汉能操多种省份方言，伶牙俐齿，善于鼓动，先后参与上海烟厂、香港海员、浦东纱厂、上海邮局大罢工。被称为“纵火队长”。1927年4月被国民政府逮捕，枪杀于广州。

袁振英(1894-1979)，广东东莞人，曾就读北大西洋文学系，无政府主义者，1920参与组党，1921年赴法国留学即脱党。

李中(1896-1951)，湖南湘乡人，1918年毕业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1920年寄住在陈独秀家中时入党，“四·一二”事变后脱党。

沈泽民(1900-1933)，沈雁冰的胞弟。1916年夏考入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1920年夏东渡日本，学习日文。1921年春返国。1925年下半年，沈泽民与俞秀松、张闻天、伍修权、王稼祥、卜世琦等三百余人分批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1年1月，在六届四中全会上，沈泽民当选为中央委员，担任宣传部长。1933年被留在苏区，因患疟疾去世。

周佛海(1897-1948)湖南沅陵人。1917年赴日本留学，1920年与陈独秀共同组建中国共产党，1924年脱离共产党入国民党，后沦为汉奸，抗战胜利后被国民政府关押，1948年因心脏病复发死于南京老虎桥狱中。

以上十七名早期党员，数年内自行退党、脱党十一名（其行动很难证明他们曾经是共产主义的信仰者，顶多是追求时髦的愤青）；被中共开除了一名；被共产国际罗织罪名枪杀了二名；被国民政府枪杀了一名；病逝了一名；延至1949年，修成“正果”的仅林伯渠一人。

中国国民党人大力协助建立中国共产党

纵观中共党史，说起建党，大多只提李大钊、陈独秀和《新青年》。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还曾一度宣称中共的缔造者是伟大领袖毛泽东。谁要是说国民党人和《民国日报》为中共的成立发挥过重大的作用。必定被斥之为是谬论、是污蔑。然而这才是不争的历史事实。

中共党史为什么不提或少提《民国日报》在中共成立前的作用呢？因为《民国日报》是国民党的中央机关报！

这里着重提一下邵力子这个人。邵力子乃清末举人。早年加入同盟会。追随孙中山推翻满清，先后任黄埔军校秘书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长、甘肃省主席，陕西省政府主席，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华民国驻苏联大使等职，是国民党元老之一。

1916年1月，邵力子在上海创办《民国日报》，由他本人任《民国日报》总经理，《觉悟》副刊主编。协助邵力子编辑《觉悟》副刊的，则是翻译《共产党宣言》的陈望道。

据统计，邵力子主持《觉悟》副刊时，发表宣传马列主义的政论性文章

达 950 篇之多，特别是对社会主义进行了专门的介绍。邵力子本人撰写的作品有：《提倡社会主义决不是好奇》、《布尔什维克的真像》、《共产与公道》、《拒受遗产和共产主义》、《主义与时代》、《心与力》、《马克思的思想》、《救中国的对症良药》、《社会主义与公妻》、《读苏维埃俄罗斯代表加拉罕氏宣言》等。国民党中央机关报的总经理、副刊主编，写了这么多宣传社会主义的文章，岂不耐人寻味。

在《觉悟》副刊上发表过文章、后来成为著名共产党人的还有李大钊、陈独秀、李达、瞿秋白、李汉俊、恽代英、陈望道、施存统、沈雁冰、沈泽民、肖楚女、向警予、包惠僧、刘仁静、张闻天、张太雷、方志敏、任弼时、罗章龙、陈毅、杨之华等等……，阵容何等强大！

主张三民主义的国民党中央机关报，竟不遗余力地宣传社会主义，副刊编辑竟是《共产党宣言》的译者，可见当时国民党的组织是多么开放与豁达。

1920 年夏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即在各秘密发展党员，截至 1921 年 7 月，全国已有党员五十余名（北京上海两地占大多数，湖北、广东、山东等地有少许自行组织的共产党小组），建立全国性共产党组织的条件渐趋成熟，邵力子与陈独秀、李达、李汉俊、张国焘等，为中共“一大”的召开经常通宵达旦地在邵力子家紧张筹备。邵力子不但参与起草了“一大”文件，还参与了“一大”的联络和总务工作。

1921 年 7 月 23 日晚 8 时，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三号李汉俊的住处秘密召开。

后来怀疑有密探监视，为了安全起见，“一大”转移至嘉兴南湖。也是邵力子建议的。

邵力子说：“上海到嘉兴坐火车只要两个小时，我有一绍兴同乡好友陈仪，是浙军师长。他的部队驻防在杭州嘉兴一带，安全上出不了问题。”这才是移会嘉兴的真正原因。

中共成立后，邵力子先后编入第三组和第一组，与邓中夏、瞿秋白、向警予、林伯渠、张太雷一起过组织生活。1922 年，他出任国共两党共同创办的上海大学副校长。

尽管后来邵力子退出了中共，但却是“中共中央研究决定”的，“是为了党的利益和党今后工作的需要”。邵力子则表示：“一切以大局出发，服从组织的决定，今后在党外继续为党效力。”

对邵力子的建党之功是不容抹杀的。

还有一件不容忽视也不容忘记的事，即：中共“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纲》，起草人竟然是戴季陶——后来成了国民党最著名的反共理论家。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上海成立时，戴季陶的住址即成为青年团所在地，对外挂“外国语学校”的牌子，实际上是准共产党小组，所以，戴季陶的家实际上也是共产党小组所在地。

1920 年 6 月间，陈独秀在上海倡导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戴季陶撰写了不少文章，着力宣传民主思想，宣传社会主义思潮，对共产主义学说也作了广泛介绍。他尝试用共产主义说明中国伦理问题，称赞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天才”，称马克思是“近代经济学的大家”、“近代社会运动的先觉”。朱执信等人创办的《建设杂志》还陆续登载过他由日文转译的考茨基著《马克思资本论解说》。

鉴于大家公认戴季陶的文笔较好，于是决定由他起草《中国共产党党纲》。

讨论定稿时，戴季陶发现在他所拟的原稿内增加了：“共产党员不做资产阶级政府的官吏，不加入资产阶级的政治团体。”等四五个条款。这是建党筹备组成员经讨论后加上去的。明摆着是要和孙中山的资产阶级政府作对。戴季陶倒吸了一口凉气，他总算明白，共产党与他心目中设想的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共产党不准备与政府合作，也不会走通过议会合法夺权的道路。

戴季陶明确表态，他说：我不能参加中共，只要孙中山在世一天，我就决不可能参加其他的政党。戴季陶为中共的创建做了不少前期准备工作，和邵力子不同的是：戴季陶后来坚决反共，邵力子则一贯主张国共合作、戴季陶最终没有参加中共。由于世界观的不同，他渐渐与共产主义分道扬镳了。

在中共一大召开三年之后，戴季陶成了国民党右派的旗帜性人物，成了蒋介石的理论写手和幕僚。

历史往往是错综复杂的，历史人物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蔡元培先生曾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保驾护航，摇旗呐喊，积极支持陈独秀、李大钊。后来又鼎力支持蒋介石策动“四·一二”清党，并为蒋介石、宋美龄主持婚礼。

蒋介石也曾亲共，还把儿子蒋经国送到苏联留学，让他熟悉共产主义。1923年8月蒋介石曾奉孙中山之命，率领共产党员张太雷等赴苏联考察了三个月。但从苏俄回来后，立即给廖仲恺写信，苦口婆心劝其“迷途知返”在呈交给孙中山的考察报告中，蒋介石不厌其烦地陈述“在苏联的社会中或是俄共中，斗争正在公开的与非公开的进行着”。“关于此点，如我不亲自访俄，决不是在国时想象所能及的”。“综括我在俄考察三个月所得的印象，乃使我在无形之中，产生一种感觉，就是“苏维埃政治制度乃是专制和恐怖的组织，与我们的三民主义的政治制度是根本不能兼容的。”“俄共政权如一旦臻于强固时，其帝俄沙皇时代的政治野心之复活，并非不可能，则其对于我国的后患，将不堪设想”“我未往苏联之前，乃是十分相信俄共对我们国民革命的援助，是出于平等待我的至诚，而绝无私心恶意的。但是我一到苏俄考察的结果，使我的理想和信心完全消失。我断定了本党联俄容共的政策，虽可对抗西方殖民于一时，决不能达到国家独立自由的目的；更感觉苏俄所谓‘世界革命’的策略与目的，比西方殖民地主义，对于东方民族独立运动，更危险。”

国、共两党都以孙中山的继承者自居，孙先生撒手人寰以后，中国的政党势力就分成了左、右二途。共产党和国民党从貌合神离的兄弟变成不共戴天的敌人，注定要经历一场你死我活的决斗。

《战国策·臣道》有曰：“朋党比周，以环主图私为务，是篡臣者也。”国共两党之所以不能合作，盖因俱为结党营私之辈，都是为了一个“权”字。争权则是为了夺利。在没有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的前提保证之下，两党合作只是权宜之计。明争暗斗，纵横捭阖，乃至刀兵相见，血染江河是必定无疑的。幻想一个信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党、一个谋求独裁专政的党、一个惯耍阴谋的党，转变成实行民主，天下为公。也必定是枉然的。谓予不信，请拭目以待。

中共一大是哪些人参加的？结局如何？

共产国际派驻中国建党人：

马林（1883-1942）荷兰人。生于鹿特丹，17岁当铁路工人，随即加入荷兰社会民主党，1913年赴荷属东印度参与创建印尼共产党。1916年退出荷

兰社民党转而加入荷兰共产党。1920 年，受列宁派遣前往中国并主持中共一大。马林性格倔强、擅长辩论，声色俱厉、目光逼人，因力促国共合作，与陈独秀等不和。在一天的会上，他讲了两个多小时，是代表国际居高临下作指示。并批评说：“你们花了这么多钱，工作成绩太差！”周佛海在他的《寒风集》中说：“陈独秀是个硬汉子，他为此拒绝和马林见面。陈独秀说‘我们花得并不多，大量是你们任意挥霍了’，要求马林认错，否则拒不见面。”——这就是陈独秀的性格！

1927 年，马林与荷共决裂，自组政党并加入第四国际，不久即脱离，转而同英国独立工党和西班牙联合工人党结盟。马林短暂的一生至少参加过七个党，堪称职业党棍。1940 年德国占领荷兰，马林组织抗德游击队。1942 年被纳粹抓获后枪决。

尼克尔斯基（1889-1938）俄国人。生于贝加尔，1916 年在西伯利亚当列兵，1920 年转入红军，1921 年加入俄共。随即作为马林的助手来中国协助组建中国共产党，出席了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并讲话。以后在苏俄远东边区全权代表处工作，曾任原苏联内务部国家安全领导委员会第七处全权代表。1938 以“间谍罪”被捕，同年 9 月在哈巴罗夫斯克执行枪决。

上海代表：

李达（简历见前页）

李汉俊（简历见前页）

武汉代表：

董必武（1886-1975）湖北黄安人。清末秀才，早年拥护孙中山，加入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在武昌军政府中任职。1914 年赴东京私立大学学习法律，参加中华革命党。1915 年回国，“五四”运动后转向拥护陈独秀，在武汉筹建共产主义小组。参加中共一大后回湖北发动农民运动，造反夺权。1927 年国共合作破裂后转入地下秘密活动。1928 年赴苏联接受特务培训，1932 年回国。抗战及国共内战期间，董必武掌控中共谍报部门，深通奸细之道，潜伏在国民党内部的高级将领熊向晖、郭汝瑰、韩练成等皆为其所使，后人称之为“谍王”。中共建国后董必武身居要职，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代主席等职。1975 年病逝。

陈潭秋（1896-1943）湖北黄冈人。1919 年毕业于武昌高等学校英语班。1920 年和董必武等发起成立武汉共产主义小组，中共一大后曾任武昌地委书记、江西省委书记、满洲省委书记等职。1935 年赴苏联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1939 年回国，任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负责人。1943 年秋被盛世才秘密杀害于狱中。

济南代表：

王烬美（1898-1925）山东诸城人。高小毕业后在家自学多年，20 岁时考入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19 年积极参加五四运动，1920 年与山东省立一中学生邓恩铭等人发起成立励新学会，7 月赴上海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返回山东后组建了中共山东支部，自任书记。是年冬被以“危险分子”嫌疑开除学籍。1922 年 1 月赴苏联参加远东共产党代表会并参观、学习。1922 年 11 月先后领导山海关、秦皇岛等地的罢工运动，并为开滦五矿总同盟罢工指挥部成员之一。1923 年 10 月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国民党。1925 年领导胶济铁路和四方机车厂工人大罢工、青岛纱厂工人联合大罢工。1925 年 8 月在青岛病逝，时年 27 岁。

邓恩铭（1901-1931）贵州荔波人，水族。1918 年投奔在山东当县官的二叔，并以“侄少爷”的身份进入省立第一中学。翌年在五四运动中结识了第一师范的王烬美，随与其共同组建中共山东支部、参加中共一大、赴苏联参观学习。返国后遵照中共高层指示，将工作重点放在济南、青岛、淄博等工矿区，以鼓动罢工为主，青岛纱厂罢工声势浩大震惊中外，1925 年 5 月 4 日当局将其拘捕，11 日释放，但被逐出青岛。1927 年夏，国共合作彻底破裂，邓恩铭时任中共青岛市委书记，不得不转入地下斗争。1928 年再次被捕，两次组织越狱未成，1931 年被枪杀于济南。

北京代表：

张国焘（1897-1979），江西萍乡人，1916 年考入北大理工预科，五四运动时崭露头角，1920 年与李达、张申府等三人筹建共产党北京小组。1921 年参加中共一大并被选为会议主席，中共一大至六大期间，除第三届党代会时因不赞同共产国际关于中共党员全部参加国民党的指令而落选外。一、二、四、五、六届党代会均被选入核心领导层。1927 年国共合作破裂后转入武装斗争，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所辖四方面军的人数超过中共其他各军团之总和。长征后期，四方面军奉中共中央之命西征，谓之构建连接苏联之通道，为此深入不毛之地，后勤补养困难，行军速度猛降。被马步芳、马鸿逵所部击溃于祁连山下，几乎全军覆灭，徐向前等化装成乞丐侥幸逃出，仅少数人跑到延安。张国焘实力尽失，党内地位不稳，随即被边缘化，并遭到批判，屡受毛泽东排挤。1938 年投奔国民党并参加军统，上演了一幕“中共缔造者背叛中共，中共捉拿其缔造者”的活报剧。1947 年，周恩来曾指使特工在燕山别墅暗杀张国焘，因张提前离去，只杀了张的四名军统保镖。张国焘 1979 年 12 月在加拿大多伦多一养老院病逝。

刘仁静（1902-1987），湖北应城人，1918 年入北大物理系，后转入英语系。1920 年加入共产党，主张以武装暴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反对以任何形式与孙中山的国民党合作。1926 年赴苏联学习，返国途中到土耳其小岛上看望被苏共开除的托洛茨基，回国后拒绝汇报探访详情被开除出党。1929 年投奔国民党，曾任三青团宣传处科员，国民党第十战区战干四团教官等。中共建国后刘仁静连忙检讨，被安排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文革期间遭关押十二年，出狱后任人民出版社特约翻译、国务院参事。1987 年横穿公路时被公交车撞伤，头骨破裂致死。

湖南代表：

何叔衡（1876-1935）湖南宁乡人。1902 年秀才，1913 年 37 岁考入湖南一师，毕业后在乡间中学任教。1920 年 9 月与易礼容、毛泽东、彭璜等人成立长沙文化书社（中共一大开会的通知即是李达寄至文化书社的），销售各种书报杂志，赚取差价以贴补日常开支。易礼容任经理。1921 年何叔衡出席中共一大，木讷少言，被张国焘讥笑为不懂马列。1928 年 6 月赴苏联出席中共六大。9 月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1930 年 7 月回国后，在上海负责全国互济会工作，1931 年 11 月，奉命进入江西瑞金，1934 年 10 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他被留在苏区坚持游击战争。1935 年 2 月在长汀突围战斗时牺牲。

毛泽东（1893-1976）湖南湘潭人，1918 年毕业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1942 年起任中共中央主席，掌控中共数十年。1949 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立为国家主席。宣扬阶级斗争，强化独裁专政，自称无法无天。相继发动“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1976 年病逝，遗体暂存

于天安门广场之停尸房，盖棺尚未论定，功过有待评说。

广东代表：

陈公博(1892—1946)广东南海县人，1907年在家乡参与组建“三点会”反清，1917年于广州法政专校毕业，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20年毕业回广州后创办了宣传马克思主义及社会主义的《群报》。1920年与陈独秀、谭平山等组成共产党广州支部。1921年携新婚妻子代表广州赴上海参加中共一大。1922年6月，陈宣布退党，赴美国留学。1925年于哥伦比亚大学硕士毕业后加入国民党，并出任国立中山大学代理校长。1940年3月到南京，成立与日本合作的“国民政府”。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南京国民政府宣布解散，陈公博逃亡日本被国军伞兵押回中国。1946年4月在江苏高等法院受审，以通谋敌国罪处以死刑。

周佛海（简历见前页）

包惠僧(1894~1979)湖北黄冈人。湖北省立第一师范毕业。1920年参加武汉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7月，受陈独秀委派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任中共武汉区委会委员长等职。1925年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1927年脱离共产党。1930年参加发起成立第三党（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随后恢复国民党党籍。历任国民党政府武汉行营参议、户政司司长、人口局局长。1948年去澳门。1949年11月从澳门回到北京。恳求董必武、周恩来宽恕，被安排在内务部任研究员、国务院参事等职。“文革”初期，年逾古稀的包惠僧受到冲击，被打断了右腿。从二十年代起，包惠僧历经四十余载变幻沧桑，始终把陈独秀写给他的一百多封信带在身边，精心装裱作为传家之宝。文革破“四旧”时，包惠僧心惊肉跳，害怕受到牵连，竟然将其付之一炬。陈独秀不但是创建中共的元勋，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著名的学者、教授、大学问家。陈独秀的墨宝传世不多，有极高的文物价值。包惠僧在“文革”中烧掉的不仅是中国现代史上的重要文物和史料，也是他年轻时追求的理想、事业、友谊……。熊熊的火焰熄灭了，一切都化作了缕缕青烟。1979年7月这个曾发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却在国民党内为官半世的包惠僧病逝于北京。

中共一大十三名代表中，就年龄而言，最小的19岁，最大的45岁，平均年龄不足28岁。就文化程度而言，留学日本4人；北大毕业2人；北大肄业1人；北大三年级1人；师范毕业3人；师范三年级1人；高中一年级1人。就结局而言，沦为汉奸2人，脱党1人，退党并加入国民党4人，1925年病逝1人，1931年被敌方枪杀1人，1935年战斗中牺牲1人，1943年被军阀杀害1人。以共产党员身份活到中共建国仅毛泽东、董必武二人。

中共的早期党员清一色知识分子，没有一个工人农民，也就是没有一个人是无产阶级，凭什么自称代表工农？自称无产阶级呢？被加冕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号称共产主义革命领袖的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金日成、波尔布特、卡斯特罗没有一个出身于无产阶级，察其终生也从来没有为无产阶级服务，只是口头上高喊而已。中共早期的领导人多是不得意的封建地富后裔。不知出于何故，都成了无产阶级的头面人物。

中共成立伊始即确定了排他性。

中共一大讨论通过了“无产阶级不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应该始终与其他党派进行斗争”的决议。（一大决议的具体内容可从百度网站查阅）

一大拟定的共产党纲领第三条明确写着“中国共产党彻底断绝与资产阶

级的黄色知识分子及与其类似的其他党派有任何联系。”

一大决议第五条载明了对现有政党的态度，即“对现有其他政党，应采取独立的进取的政策。在政治斗争中，在反对军阀主义和官僚制度的斗争中，在争取言论、出版、集会自由的斗争中，我们应始终站在完全独立的立场上，只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

中共甫一成立即向苏共俯首称臣。

中共一大通过的决议明确宣布：中国共产党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决议第六条明文规定“党中央委员会应每月向第三国际报告工作”。对此，陈独秀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发生过严重分歧，在翌年的中共二大上，内外压力迫使陈独秀妥协才得以解决。

1991年苏联解体以后，原苏共中央档案解密，档案中记载从1923年到1927年的五年中，苏共中央政治局为讨论中国问题开过122次会，作出过738个决议，平均两天半一个。大事如孙中山在世时为操控国民党，指令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并控制其党务，夺取其领导权，对外美其名曰国共合作。小事如蒋介石执掌国民党大权以后，何时派何人找蒋介石谈话，谈话要注意什么等，都有具体指示。

显然，中国共产党从它出生的那天起只是个庶出的儿子党。由此，列宁把持的布尔什维克在中国有了代理人，后来发展成国中之国。

1931年11月7日在中国领土上建立了一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都为江西省瑞金，设计有国旗，号称工农政权，却起了一个由俄语音译而来的洋奴味十足的名字“苏维埃”，开了世界之先例。控制地区称为苏区，发行的纸币名为苏币，纸币上印的是列宁的头像，一切行动受命于共产国际，竟公然号召“武装保卫苏联”，不仅如此，还在当时颁布的“宪法”第十四条明目张胆地写着分裂祖国的条文“中国境内的各少数民族和各个地区的人民都脱离中国、独立建国”。

苏维埃的幽灵在中国游荡了数年，“中华苏维埃”因在中国国民党第五次剿共战争中失利被迫于1934年10月撤离江西。1935年10月转移至陕甘地区，当年12月瓦窑堡会议后改号为“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加上了“人民”二字以欺骗民众。

抗日战争爆发，民族主义高涨，1937年9月22日中共才不得已取消“苏维埃”这个为中国人民所不齿，有卖国之嫌的字样。试想，如果中共掌权后有人成立类似苏维埃这样的组织，必然被称之为里通外国的反革命集团，遭到绞杀殆尽的厄运。究竟谁是毫无民主、自由的法西斯，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中共建党初期即强调无产阶级专政。

中共成立伊始即自命代表无产阶级，声称其指导思想是马列主义。且看马列是怎么论述无产阶级专政的：

马克思说：通过把一切劳动资料转交给生产者的办法消灭现存压迫条件，从而迫使每一个体力适合于工作的人为保证自己的生存而工作，这样，我们就会消灭阶级统治和阶级压迫的唯一的基礎。但是，必须先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才可能实现这种变革，而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的军队。（《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43页）。

列宁说：“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是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采用暴力手段来获得和维持的政权，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列宁全集》第35卷，北京出版社，1985）。“专政的科学概念无非是不受任何限制的、绝对不受任

何法律或规章约束而直接依靠暴力的政权。”（《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289页）

列宁讲得很明白，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暴力，就是绝对不受任何法律或规章约束而直接依靠暴力的政权。马克思说的也很具体，无产阶级专政就是迫使每一个体力适合于工作的人为保证自己的生存而工作。这两位马列主义的先贤大师没有讲谁有资格不受任何法律约束？谁来行使专政？谁有权迫使别人？没有讲劳动者除了被迫使劳动以外还有什么自由？除了保证自己的生存之外还有什么权利？譬如能不能够繁殖后代以供奴隶主继续驱使？除了生存之外能不能分享一点点“剩余价值”？对于体力不支脑力尚可的人可不可以思考？可不可以发出一点声音？他们还算不算无产阶级？他们是国家的主人还是奴隶？等等。

笔者愚笨，读了多遍马克思和列宁的经典语言，至今不解他们两位伟人描述的在迫使下劳动不就是劳改队的特征吗？是共产主义社会还是奴隶社会？或者就是一回事。聪明的读者多读几遍，是否能够了解共产主义的内涵，说明共产主义与奴隶社会的差别呢？笔者愿闻赐教，以解谜团。

纵观几十年的历史，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中共中央党校的教授及形形色色的中共理论家，没有一个人对中共中央视若命根子的“无产阶级专政”作出过严谨的阐述。

毛泽东1945年4月24日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说：有些人怀疑共产党得势以后，是否会学俄国那样，来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和一党制度。接着连忙许诺“否”“否”，并装作理论家的样子说：人民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有原则区别的，蒙蔽了相当民众。

1949年6月30日中共建国前夕，毛泽东手握大权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公然叫嚷“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总之是一样”（《毛泽东选集》第四卷，1412页）。

1966年文革开始以后又疯传了一阵毛泽东语录“无产阶级专政是群众专政”，于是，群众专政一哄而起，新老监狱人满为患，牛棚蛇窟遍地丛生；一直到毛泽东呜呼哀哉，华国锋接着闹腾了两年不见起色，才渐渐地偃旗息鼓，至今也还没有回到依法治国的轨道上来。查看百度等网站和中共中央操控的几种报刊，不时地可以欣赏到几篇奇文，诸如《鼓吹宪政，就是削弱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形式》《人民民主专政的实质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并不输理》等等，大多是断章摘句之作。马列著作编译局的秀才们也拿不出像样的文章，没有人敢出来诠释什么叫无产阶级专政。其局长衣俊卿顶着博士头衔，披着马列主义的外衣却原来是个“满嘴马列，满腹盗娼”的猎艳高手，忙于贪色敛财，早就把无产阶级专政置之脑后了。

1993年，邓小平说过：“……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讲人民民主专政，比较容易为人所接受。”他一语泄露了天机，也否定了毛泽东所谓人民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有原则区别的论调。原来改变称法是为了比较容易为人所接受。如此说来，独裁专制可以称为人民民主，作威作福的官老爷可以称为人民公仆，自称是人民的儿子实际上就是骑在人民头上的太上皇了。人们是否都应该接受呢？

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宪法，中国1954年颁布第一部，以后在1975年、1978年、1982年、1988年、1993年、1999年、2004年相继修改过七次，关

于国家性质从人民民主专政改成无产阶级专政又改回人民民主专政。都是马列专家级的人物酒足饭饱之后，一边喷云吐雾，一边引经据典、反复讨论拟定的，改变的是名称前缀，不变的是专政实质。什么人民、民主等等，原来都是糊弄老百姓的鬼把戏。从毛泽东到各地的封疆大吏乃至遍布村镇的党棍、兵痞，念念不忘的就是阶级斗争，就是专政。

中共早期党员是什么人？

前已述及，中共一大与会人员的年龄平均不足 28 岁。陈独秀首次在上海建党时期发展的党员平均年龄也只有 31 岁。查其出身，除杨明斋因家境贫困早年流亡俄国当过短暂工人外，没有一个沾了无产阶级的边儿，绝大多数是学生，多半是被社会边缘化了的知识分子，激进青年。用当代的话说叫做愤青。他们的共同特点是：不满现状、自视甚高；开口主义、闭口革命、囫圇吞枣、一知半解；愤世嫉俗、标新立异；风流成性、放荡不羁；充盈着渴望改变现状的激情，满怀着谋求个人出路的幻想。睥睨天下，目无余子。傲视一切，粪土当年万户侯；心存奢望，欲与天公试比高；失败的如项羽，堪做个末路英雄；成功的若刘邦，不过是得势的痞子。就是这些人，摇着“无产阶级专政”的旗帜，统治中国几十年。喊着“为人民服务”的口号，享受着奴隶主般的生活。用谎言和暴力驱赶着亿万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百姓在“社会主义”大道上紧跑慢跑，饿死几千万还要美其名曰奔向共产主义天堂。这就是近百年的中国史，这就是昔日愤青们的中国梦？

附注：

[1] 毛泽东十三岁那年，经常逃学到山上玩耍，认识了一个家住东茅塘、比他小月份的细妹子，在一个艳阳高照、暖气融融的日子，密林深处，鸟语花香，三伢子和细妹子无拘无束，尽情嬉闹，情不自禁地偷吃了禁果。塾师发现后，告到毛贻昌处，少年毛泽东挨了一顿打骂，由此辍学。为了拴住儿子的心，翌年，将家住韶山杨林桥的罗鹤楼之长女、十八岁的罗一秀，明媒正娶地迎进了家门。一秀体态丰盈、性格温顺，勤劳朴实，婚后夫妻恩爱，公婆称心；相处三年，全家满意，毛泽东乐在其中。惜 1910 年正月初二罗一秀因病去世，毛泽东为此惆怅不已，为避免触景伤情，同年秋毛泽东离家外出读书。（湖南著名书法家、毛泽东历史研究者彭明道先生对此著有专述，毛氏宗谱上也有记载。坊间所传毛泽东自称与罗一秀同居一室三年，未行夫妻之礼，当属妄言或讹传）

[2] 汪原放(1897-1980)，现代出版家、翻译家。安徽绩溪人。1913 年到上海，进其叔父汪孟邹开设的亚东图书馆工作，不久，被聘为亚东图书馆编辑，与陈独秀等人时有来往。1920 年由陈独秀推荐一度任中共出版部长。同年秋天，因形势恶化，返回上海亚东图书馆，与中共党组织长期失去了联系，此后在各出版机构从事编辑工作。1925 年由陈乔年、郭伯和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为了掩护身份，在三十三军谋了一个少校军衔的参谋。1927 年春，在汉口任《民国日报》经理，大革命失败后回亚东图书馆，从此与党失去联系。1980 年 4 月 1 日在上海逝世。

[3] 向忠发，1880 年生于上海，小学五年辍学，14 岁入汉阳兵工厂当学徒，以后几经波折，因其活动能力较强和热心助人而被吸收参加汉冶萍工会工作。几年之后，即 1921 年，他成为拥有上千名会员的汉冶萍工会的副委员长。次年，由包惠僧、许白昊介绍加入中共。1928 年 6 月，苏联组织近百名中共干部和工人到莫斯科开中共六大。中共五大时，共有代表 82 人，其中 71 人为知识分子，工农分子仅 11 人。而这一次，由共产国际审定的六大代表共 84 人，工农分子占 50 人，知识分子

仅 34 人，以至周恩来曾忿忿不平地称这次的代表中“暴徒一大堆”。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正式提出了中共中央委员候选名单，在这个 36 人的名单里，工人占了 22 个。随后斯大林指定由向忠发取代陈独秀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文化粗浅、道德败坏、吃喝嫖赌俱全，1931 年因有人检举被国民政府逮捕，见其毫无利用价值，第三日即被枪杀。国民党中央局副局长徐恩增曾著一文谈及向忠发被捕真相，有兴趣的读者可从百度上查阅。

二、高唱民主引社会名流栖居门下 蓄谋独裁将民主斗士禁锢笼中 近代中国民间的党派雏形起始于满清末年。

1894 年孙中山在檀香山成立兴中会，1903 年黄兴在湖南长沙成立华兴会，1904 年章太炎于上海成立光复会，1905 年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成立同盟会……。

全国公开的和秘密的社团不下数十个，多数只留下了一些微不足道的历史踪迹，于国于民无大益。

1912 年 8 月 11 日，同盟会、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和共和实进会五个政团于北京安庆会馆集会，就合并为国民党一事达成协议。13 日发表宣言说：“共和之制，国民为国主体，吾人于使人不忘其义，故颜其名曰国民党。” 8 月 25 日下午 1 时，国民党成立大会在北京虎坊桥湖广会馆举行。由此诞生了当时国内第一大党。

1913 年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即有国民党、共和党、统一党、民主党等党派，主张推行民主宪政，要求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后因军阀混战、动乱不已，由书生和政客、谋士组成的党派无权无势，未成气候。

1919 年，在列宁操控的苏共支持下，孙中山在上海法租界召开会议改组国民党，1924 年 1 月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同意了苏联“联俄容共”的要求。成为中国第一个正式的党派。

1920 年 8 月，陈独秀等八人在共产国际派员参与指导并包揽全部费用的情况下，成立了共产党临时中央，陈独秀任中央书记。

1921 年 7 月下旬在上海李汉俊的住处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全国有五十余名党员，其中北平、上海两地党员占总人数的三分之二，均为知识分子。

抗战期间，虽然国民党一党独大，但蒋介石受英美民主制度的影响，开放了党禁。中共打着“拥蒋抗日”的旗帜趁机扩展地盘，特别着重扩大武装力量，鼓吹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党员人数从 1937 年的不足四万发展到 1945 年的一百二十余万，乃至成为中国第二大党，打着工农的旗号，誓与国民党争夺天下。

四十年代，民主潮流波涛汹涌，西南一隅英才辈出，组党参政之风高涨，中国的民主党派几经分化、改组，渐趋成熟，有了一定的发言权，尽管其实力特别是武装力量无法与国共两党匹敌，但由于民主党派吸纳的主要是知识分子和社会名流，在政治理念和给人的印象上深得民心，其影响在国统区尤其不可小觑，乃至在大后方发展成游离于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第三势力。

不难想象，当国共两党任何一方占据绝对优势时，那些以儒生和策士组成的民主党派都难以有生存空间，“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笔者注：可惜那些民主党派的精英一直幻想着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焉能不被淘汰）。

民主党派历史上的崛起，与国共两党激烈争斗密切相关，在两党相持不下的情况下，国民党和共产党都要尽力争取民主党派的支持，以彰显自己的合法性，民主党派也借机提出所谓“中间路线”、“第三条道路”，希望在

宪法框架下，实行民主，踏入政坛，分得部分权利。

客观地说，中国的民主党派是在国共两党相互争斗的夹缝中生存并逐渐壮大的。

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最高级领袖蒋介石和毛泽东在重庆谈判，签定了《双十协定》，同意避免内战。1946年1月，由国共两党和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按照新通过的《宪法草案案》规定，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将成为历史，共产党也表示愿意放弃武装夺取政权的做法，将自己纳入民主宪政国家的体制。中国将建立一个民主宪政国家。这标志着，自1927年开始的国共武装斗争终将结束，它们都不再追求单独统治这个国家。

周恩来对马歇尔说过：“我们要英美式宪法，假如能像美国宪法那样，我们便满意了，只怕不可得”。毛泽东深知“有枪就是草头王”，重庆谈判期间，表面上认可军队国家化，还喊过好几次“蒋委员长万岁”，回到延安却立即声称：“一支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毛泽东选集》第四卷1107页）原来真实的打算还是武装夺取政权。

1946年4月15日，中共在苏军撤走长春一个小时内突袭长春机场并占领长春，随后又紧随撤退的苏军占领了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为了夺取东北战略要地，国民党紧急空运精锐部队到东北战场，国共两军在四平，长春等地展开激战。6月下旬，国共双方在关内中原地区发生激烈冲突。在国民党不愿其他党派分享权力，共产党不愿放弃武力夺取政权的情况下，战争日益剧烈，和平化为灰烬。

1946年7月，内战全面爆发。国民党由于经济政策失误，军事指挥不当，且妄自尊大，对民主党派采取“合则留，不合则散”的粗暴方针，以为靠高压即可维稳，拘捕爱国民主人士，强令解散民主同盟等，由此失去了民主党派支持，将民主党派中那些中立者推向了共产党一方，起了一个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的作用，导致国民党更加孤立，失去民心，加速了自身的失败。

共产党在江西连吃败仗逃到延安以后，不断地打着抗日的旗帜招兵买马、扩大实力。一切反对蒋介石的派别和第三势力是中共拉拢的主要目标。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人深知，“抗日”“民主”“反对内战”“和平建国”是最具诱惑力的口号，于是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自我标榜为抗日英雄、民主斗士、和平卫士。共产党依靠“统一战线”“和平”“民主”“自由”等美丽的谎言，蒙蔽和笼络了大多数民主党派。利用民主党派发动反蒋游行示威，即开辟“第二战场”，终于击败了国民党，取得了政权。

共产党夺权后，谋求的是一党专政，民主党派已无利用价值，取消民主党派已在毛泽东的预谋之中，但斯大林不同意中国立即取缔民主党派。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不敢抗命，反复斟酌后，留下了几个民主党派作为点缀民主政治的花瓶。

抗战期间和国共彻底破裂之前，国民党是允许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办报的。1938年1月11日，《新华日报》在汉口正式创刊，全国公开发行。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报社迁至重庆继续出版。报社由周恩来、董必武领导，潘梓年、华岗、吴克坚、章汉夫、夏衍等人具体负责。主要撰稿人有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彭德怀、叶剑英、王若飞、邓颖超、吴玉章、博古、董必武、陆定一、乔冠华等。冯玉祥、郭沫若、茅盾、柳亚子、沈钧儒、黄炎培、邓初民、陶行知、张西曼、胡厥文、胡子昂、马寅初、梁漱溟等也为此报经常撰稿。当时的《新华日报》公开抨击一党专政，主张军

队国家化，谴责贪污腐败，宣扬英美民主，指名道姓地批评蒋介石、何应钦、张群等国民党要员。

六十年以后读《新华日报》刊载的文章，实有隔世之感，中共执政后的所作所为与其当初的承诺大相径庭。当时的中共对一党专政是何等的深恶痛绝，对民主自由是何等的梦寐以求，对贪污腐化是何等的嫉恶如仇。然而中共执政以后，一朝权在手，竟然罔顾天下之大不韪，强化一党专政，遏制民主自由，极度贪污腐化，甚至草菅人命、滥杀无辜，其残暴程度较斯大林、希特勒有过之而无不及，事实俱在，难以抵赖。

现摘录部分当年中共发表的言论如下，供读者对比：

我们要求的政府，必须是能够真正代表民意的政府；这个政府一定要有全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人民也一定要能够自由地去支持政府，和有一切机会去影响政府的政策。这就是民主制的意义。（《毛泽东选集》第二卷354页）

中国缺少的东西固然很多，但是主要的就是少了两件东西：一件是独立，一件是民主。这两件东西少了一件，中国的事情就办不好。（《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689 页）

“只有法西斯才会残酷地镇压人民的民主诉求，只有法西斯才会扼杀人民的自由及一切自由。”（毛泽东，1946 年）

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因此，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它应该受人民的监督，而决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旨。它的党员应该站在民众之中，而决不应该站在民众之上。（《毛泽东选集》第三卷707页）

有人怀疑共产党得势之后，是否会学俄国那样，来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和一党制度。我们的答复是：我们这个新民主主义不可能、不应该是一个阶级专政和一党独占政府机构的制度。并郑重承诺保障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等自由。（毛泽东《论联合政府》）

共产党要夺取政权，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这是一种恶意的造谣与诬蔑。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但并不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刘少奇选集》上卷第 172 页）

中国现在的顽固派，正是这样。他们口里的宪政，不过是‘挂羊头卖狗肉’。他们是在挂宪政的羊头，卖一党专政的狗肉。我并不是随便骂他们，我的话是有根据的，这根据就在于他们一面谈宪政，一面却不给人民以丝毫的自由。”（《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694 页）

目前推行民主政治，主要关键在于结束一党治国。……因为此问题一日不解决，则国事势必包揽于一党之手；才智之士，无从引进；良好建议，不能实行。因而所谓民主，无论搬出何种花样，只是空有其名而已。（《解放日报》1941年10月28日）

选举权是一个民主国家的人民所必须享有的最低限度的、起码的政治权利。民主国家，主权在民；人民是主人翁，官吏是公仆，代议士是人民的代表，好像是监督和管理仆役的管家。如果人民没有选举权，不能选举官吏和代议士，则这个国家决不是民主国家，决不是民治国家了。（新华日报社论1944年2月2日，毛泽东）

我们认为下面这些要求是适当的，并且是最低限度的。……要求取消一

切镇压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等项自由的反动法令，使人民获得充分的自由权利；（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

“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是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们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按：指美国总统罗斯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提出的“言论和表达的自由”、“信仰上帝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以及与各民主强国的合作。这里不需要橡皮子弹。

（《答路透社记者甘贝尔问》《毛泽东文集》第四卷27页）

我们完全赞成军队国家化与废止私人拥有军队，这两件事的共同前提就是国家民主化。通常所说的“共产党军队”，按其实际乃是中国人民在战争中自愿组织起来而仅仅服务于保卫祖国的军队，这是一种新型的军队，与过去中国一切属于个人的旧式军队完全不同。它的民主性质为中国军队之真正国家化提供了可贵的经验，足为中国其他军队改进的参考。（《答路透社记者甘贝尔问》《毛泽东文集》第四卷27页）

中国现在所需要的是民主主义，在全国氛围内推行民主制度，使人民获得一切现代自由，以真正自由的普选方式选举中央及地方政府。（《同英国记者斯坦因的谈话》《毛泽东文集》第三卷182页）

宪政是什么呢？就是民主的政治。……中国的顽固派并不是真正要这种宪政，而是借此欺骗人民。他们实际上要的是法西斯主义的一党专政。（《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690 页）

要彻底地、充分地、有效地实行普选制，使人民能在实际上，享有“普通”、“平等”的选举权、被选举权，则必须如中山先生所说，在选举以前，“保障各地方团体及人民有选举之自由，有提出议案及宣传、讨论之自由。”也就是“确定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完全自由权。”否则，所谓选举权，仍不过是纸上的权利罢了。（《新华日报》1944年2月2日）

愚民政策虽然造成了沙漠，却绝难征服民心。（《解放日报》1942年4月23日）

民主和言论自由，实在是分不开的。我们应当把民主国先进的好例，作为我们实现民主的榜样。（《新华日报》1944年4月19日）

像林肯总统和罗斯福总统那样的民主的政治生活中产生的领袖，是虽在战时也一点不害怕民主制度的巡行的。他们不害怕民主的批评和指责，他们不害怕人民公意的渲泄，他们也不害怕足以影响他们的地位的全民的选举。他们不仅不害怕这些民主制度，而且他们坚决地维护支持这些民主制度。因此他们才被人民选中了，是大家所需要的人。（《新华日报》1944年11月15日）

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毛泽东答中外记者团《解放日报》1944年6月13日）

由于各个国家的历史发展、社会状况等具体条件的不同，他们各自所实行的民主政治，可能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存在着多少差异。但无论如何，它们之间有一个基本点是相同的，那就是政权为人民所握有，为人民所运用，而且为着人民的幸福和利益而服务。这样的政权必然尊重和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使失掉自由权利的人民重新获得自由权利；没有失掉自由权利的充分享有自由权利；特别是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这些作为实行民主政治的

基本条件的人民的最低限度的自由权利，是必须切实而充分地加以保障的。

（《新华日报》1943年9月15日社论）

二十年来，尤其是最近几年，我们天天见的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政府所颁布的法令，其是否为人民着想，姑置不论。最使人愤慨的是连这样的法，政府并未遵守。政府天天要人民守法，而政府自己却天天违法。这样的作风，和民主二字相距十万八千里！所以民主云云者是真是假，我们卑之无甚高论，第一步先看政府所发的那些空头民主支票究竟兑现了百分之几？如果已经写在白纸上的黑字尚不能兑现，还有什么话可说？所以在政治协商会议开会以前，我们先要请把那些诺言来兑现，从这一点起码应做的小事上，望政府示人民以大信。（《新华日报》1946年2月1日）

限制自由、镇压人民，完全是日德意法西斯一脉真传，无论如何贴金绘彩，也没法让吃过自由果实的人士，尝出一点民主的甜味的。（《新华日报》1944年3月5日）

民主制度比不民主制度更好，这和机器工业比手工业生产更好一样，在外国如此，在中国也如此。而且也只能有在某国发展起来的民主，却没有只适用于某国的民主。有人说：中国虽然要民主，但中国的民主有点特别，是不给人民以自由的。这种说法的荒谬，也和说太阳历只适用外国、中国人只能用阴历一样。（《新华日报》1944年5月17日）

这正如前天座谈会主席左舜生先生说的：“我们不去敦促，自由这一客人是永远不会进我们的门的！”（《新华日报》1944年5月16日）

曾经有一种看法，以为民主可以等人家给与。以为天下有好心人把民主给人民，于是就有了等待这种“民主”，正如等待二百万元的头奖一样。但是中外古今的历史都证明了，民主是从人民的争取和斗争中得到的成果，决不是一种可以幸得的礼物。（《新华日报》1945年7月3日）

“平等”与“自由”为什么被民主国家这样重视，重视到认为没有这就无从谈民主政治呢？这是很简单的。国父孙中山先生曾经说：“提倡人民权利，便是公天下的道理。公天下和家天下的道理是相反的；天下为公，人人的权利都是很平的；到了家天下，人人的权利便有不平，……所以对外族打不平，便要提倡民族主义。对于国内打不平，便要提倡民权主义”。英美民主政治所重视的平等，正是这一含义…假如至今英美仍不准人民有平等的权利，那末怎样能够谈得到民主、怎样能够实现民治呢？说到“自由”也是一样，如果连人民言论、集会、身体的自由都不允许，则民治从何谈起？…民主政治的主要标志是人民有自由平等的权利…民主的潮流正在汹涌，现在是民权的时代，人民应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身体的自由是真理，实现民主政治是真理，真理是要胜利的。（《新华日报》1944年3月30日）

年青的民主的美国，曾经产生过华盛顿、杰弗逊、林肯、威尔逊，也产生过在这一次世界大战中领导反法西斯战争的民主领袖罗斯福。这些伟大的公民们有一个传统的特点，就是民主，就是为多数的人民争取自由和民主。美国现在是反法西斯战争中联合国四大主要国之一，担负了彻底消灭法西斯、消灭侵略、建立世界永久和平安全的重大责任，从美国的革命历史，从美国人民爱好民主自由的传统精神，从美国人民的真正利益，我们深信美国将继续罗斯福的民主政策，不会忽视世界各处，尤其是中国人民的声音，人民的要求。（《新华日报》1945年7月4日）

如何使青年的思想和行动能有正当的发展...可分两种,一种是主张思想统制。这就是说,把一定范围以内的思想,灌输给青年,对于这种思想是没有怀疑和选择的余地的...。另一种主张是思想自由...。只有自觉和自愿,才能产生心悦诚服的信仰,和惊天动地的创造活动。一般民众都是如此,青年尤其是这样。如果走相反的道路,则结果都是十分可悲的。有许多事实说明在强迫注入的训练之下,青年感到很大的痛苦...这种办法是必须改正的。我们主张思想应当是自由的。(《新华日报》1941年6月2日)

统制思想,以求安于一尊;箝制言论,以使莫敢予毒,这是中国过去专制时代的愚民政策,这是欧洲中古黑暗时代的现象,这是法西斯主义的办法,这是促使文化的倒退,决不适于今日民主的世界,尤不适于必须力求进步的中国...言论出版的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件,没有言论出版的自由便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不民主便不能团结统一,不能争取胜利,不能建国,也不能在战后的世界中享受永久和平的幸福...新闻自由,是民主的标帜;没有新闻自由,便没有真正的民主。反之,民主自由是新闻自由的基础,没有政治的民主而要得到真正的新闻自由,决不可能。(《新华日报》1945年3月31日)

作统治者的喉舌,看起来象自由了,但那自由也只限于豪奴、恶仆应得的“自由”,超出范围就是不行的。也就是说你尽可以有吆喝奴隶——人民大众的自由,但对主子则必需奉命唯谨的,毕恭毕敬,半点也不敢自由。(《新华日报》1946年9月1日)

要真正做到出版自由,必须彻底废除现行检查办法。(《新华日报》1945年6月26日)

——为了国家利益和革命事业,我们应该贡献出自己的一切。但这必须先解决两个问题,第一,我们那样牺牲自己是真正为了国家和革命么?第二,我们所有的一切是些什么?...一面说青年“根本不能谈民主”,一面是叫青年“必须牺牲个人的自由”,这就是在我们这个国度里对青年所施行的“标准”的“民主自由”的教育...那不过是为着要装装门面而已。(《新华日报》1945年4月15日)

“民主已经成了世界的潮流,谁要反抗这潮流,谁就要遭受灭顶之祸……”(《新华日报》社论《民主第一》1943年9月15日)

民主,只有民主,才能使中国新生,才能使青年获得肉体与精神的解放。没有民主,便不能存在和发展为人民服务的科学。没有民主,便不能有人民的自由思想,而没有民主与科学,中国便绝对不可能由落后变为先进,绝对不可能由贫弱变为富强。(1946年5月4日《解放日报》发表的社论)

“民主的潮流正在汹涌,现在是民权的时代,人民应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身体的自由是真理,实现民主政治是真理,真理是要胜利的,所以高举民主的大旗奋斗着的世界和中国人民是一定要胜利的。”(《新华日报》1944年3月30日)

毛泽东还曾大力称赞美国的民主,1944年7月4日《解放日报》刊发了标题为《祝美国国庆日——自由民主的伟大斗争日》的社论:

“今天美国国庆日。1776年7月4日,美国人民在华盛顿,杰斐逊等民主主义伟大先驱的领导下,宣布了民族的独立。美国的独立是处于这样的历史条件:它不但代表美国的民族利益,而且代表美国的民主利益,代表美国要求自由的多数人民而与美国当时的保皇党——大地主、大商人、职业宗教

家的集团相对立，这样，领导独立战争的华盛顿就不但完成了民族任务，同时也完成了政治上经济上的民主任务，而被选举为人类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的民主共和国的第一个大总统了，同样，杰斐逊总统，不但是独立宣言的起草者，同时也是消灭大地主法案、思想自由法案、全民教育法案、禁止输入奴隶和限制奴隶法案的起草者。这个事实，就说明了美国独立运动的丰富历史内容，也就说明了美国为什么成为资本主义世界最典型的民主国，而且直到今天，也与社会主义的苏联成为民主世界的双璧。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这些社会主义的伟大思想家和行动家，对于美国的战斗民主主义及其在世界史上的进步作用，从来都是给予最高度评价的。美国的战斗民主主义有其光荣的历史传统，美国的独立不是唾手可得，是在八年的对外战争与更长期的对内斗争中完成的。列宁说，这是历史上“最伟大的，真正解放和真正革命的战争”之一。

民主的美国已经有了它的同伴，孙中山的事业已经有了它的继承者，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的势力。我们共产党人现在所进行的工作乃是华盛顿、杰斐逊、林肯等早已在美国进行过的工作，它一定会得到而且已经得到民主的美国的同情……

7月4日万岁！

民主的美国万岁！”

从年幼的时候起，我们就觉得美国是个特别可亲的国家。我们相信，这该不单因为她没有强占过中国的土地，她也没对中国发动过侵略性的战争；更基本地说，中国人对美国的好感，是发源于从美国国民性中发散出来的民主的风度，博大的心怀……但是，在这一切之前，之上，美国在民主政治上对落后的中国做了一个示范的先驱，教育了中国人学习华盛顿、学习林肯，学习杰弗逊，使我们懂得了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中国需要大胆、公正、诚实。（《新华日报》1943年7月4日）

美国人民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我党的奋斗目标，就是推翻独裁的国民党反动派，建立美国式的民主制度，使全国人民能享受民主带来的幸福。我相信，当中国人民为民主而奋斗时，美国人民会支持我们。（毛泽东1944年与到访延安的美国代表团的讲话）

蒋介石说，中国不能搞民主，中国需要的是一个中央集权的政府，使中国走向稳定，只有稳定了，中国才能走向富强。这是什么强盗逻辑啊。以稳定为由，拒绝民主，充分暴露了蒋介石这个独裁者的本质。谁搞独裁，谁就不得人心，谁就会被热爱民主的人民打倒。（周恩来 1946）

一个民主国家，主权应该在人民手中，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如果一个号称民主的国家，而主权不在人民手中，这决不是正轨，只能算是变态，就不是民主国家……不结束党治，不实行人民普选，如何能实现民主？把人民的权利交给人民！（《新华日报》1945年9月27日社论）

他们（国民党）以为中国实现民主政治，不是今天的事，而是若干年以后的事，他们希望中国人民知识与教育程度提高到欧美资产阶级民主国家那样，再来实现民主政治。其实在民主制度之下才更容易教育和训练民众。（《新华日报》1939年2月25日）

单说英美吧。英美是民主国家。这是人人公认的。英美人民有各种民主权利。为了国际的地位，必须从保障基本的民主权利开步走。恐惧是懦夫，疑虑是自私，反对便是倒行。我们再度呼吁：保障人民的基本民主权利。（《新

华日报》社论1944年2月1日)

“统制思想，以求安于一尊；箝制言论，以使莫敢予毒，这是中国过去专制时代的愚民政策，这是欧洲中古黑暗时代的现象，这是法西斯主义的办法，这是促使文化的倒退，决不适于今日民主的世界，尤不适于必须力求进步的中国。”(1945年年3月31日《新华日报》转载)

中国人民为争取民主而努力，所要的自然真货，不是代用品。化一下妆，当做民主的代用品，方法虽然巧妙，然而和人民的愿望相去十万八千里。中国的人民都在睁着眼看：不要拿民主的代用品来欺骗我们啊！(《新华日报》1945年1月28日)

现在是非变不可了！但如何变呢？换句话说我们一切要民主。我们一切制度、政策以及其他种种，都要向着能配合世界转变上去改造。(《新华日报》1945年4月8日)

张群(国民党宣传部长)说，中国人民要爱国，对蒋总裁效忠。是的，人民是要爱国，但爱的是属于人民的国家，而不是属于一小撮反动派的国家。反动派没路走了，就会煽动极端的仇外情绪，来转移视线，缓和统治危机。(周恩来1946)

法西斯的新闻“理论家”居然公开无耻地鼓吹“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报纸”的主张。它们对于“异己”的进步报纸，采取各色各样的限制、吞并和消灭的办法，如检查稿件、任意删削，威胁读者、阻碍推销，派遣特务打入报馆、逐渐攘夺管理权，最后则强迫收买，勒令封闭。(《解放日报》1943年9月1日)

1946年1月16日，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在向政治协商会议提交《和平建国纲领》的同时，做了《关于军队国家化问题》的发言。其基本内容可以概括为：军党分立，军民分治，以政治军，以文统武，以及军队民主教育。

周恩来说：“要认识过去历史的发展。造成国内军队派系不同之现象，有其政治的历史原因。中共所领导的武装，是被逼而拿起武器来的。现在要所有军队国家化，我们非常同意。”

他说：“和平建国方案是政治协商会议主题之一。这个方案包括两大项目：一是政治民主化，一是军队国家化。”

他还说：“军队要属于人民，是最难做到的一件事。这种军队应该不是站在人民之上，而是人民的子弟兵，因为人民以其血汗所得来养兵，为的是保护自己。军队能够这样做，才真正是国家的军队、人民的军队。”他又说：“如果没有军队的国家化，各种政治力量凡事都要用拳头、用枪炮来‘商量’那就会成为一种反人民的武装集团，一种披着‘国家’外衣的政治土匪。”

1946年3月，中共《新华日报》以“一党独裁，遍地是灾”为题发表社论，大力抨击国民党政权。

翻开四十年代的新华日报，查阅毛泽东等人发表的文章和演说，反对独裁、要求民主的言论比比皆是。可谓无一日不高喊民主，无一日不诅咒独裁。时光过了六十余年，现在来看，当时中共一切有关民主自由的言论，都是蒙蔽群众，笼络人心的盗名欺世之谈。《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是民主主义的幌子，“土改”“清匪”“镇反”等杀人如麻的运动才是无情的现实，充分暴露中共施行的是专断独裁的血腥统治。毛泽东等人三、四十年代鼓吹的民主、宪政，都是为夺取政权而诌出来的花言巧语。掌权以后，中

国共产党之所以如此践踏民主、草菅人命、劣迹斑斑，不是因为它放弃了民主的初衷，而是它逐渐地显出了专制的原形。

请看毛泽东掌权后在党内高层会议上就宪法的讲话：

“我们不少同志，就是迷信宪法，以为宪法就是治国安邦的灵丹妙药，企图把党置于宪法的约束之下。我从来不相信法律，更不相信宪法，我就是要破除这种宪法迷信。”

“国民党有宪法，也挺当回事，还不是被我们赶到了台湾？我们党没有宪法，无法无天，结果不是胜利了吗？……”

“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也是历来不主张制定宪法的，可是，建国后，考虑到洋人国家大都制定了宪法，以及中国知识分子还没有完全成为党的驯服工具的情况，为了改造和教育人民群众，巩固党的领导，还是要制定宪法的嘛！”

“制定宪法，本质上就是否定党的领导，在政治上是极具有害的！”

“当然啦！宪法制定是制定了！执行不执行，执行到什么程度，还是要以党的指示为准。只有傻瓜和反党分子才会脱离党的领导，执行宪法。”

“在不得以而为之的情况下，我们一定要化害为利，最大限度的缩小宪法的约束，坚持党的领导。当然啦，将来如果有一天，条件成熟了，有人提议废除宪法，永远不要制定宪法，我会第一个举手的，不举手的肯定是国民党。”

对比毛泽东掌权前后发表的有关民主与法制的言论，其流氓与无赖的本性岂不是昭然若揭吗！

今日之民众已难于愚弄，“满口马列，满腹盗娼”已经败露，虽然当权者还在用层出不穷的花样欺骗百姓。从世界潮流来看，从中国人民日益觉醒来看，反民主的独裁势力在穷途末路上招摇的时间不会很长了，无论怎么改头换面，必将被民众识破并永远抛弃。

1945年7月，黄炎培（时年六十七岁，民主建国会发起人）、褚辅成（时年七十三岁，九三学社发起人）、章伯钧（时年五十岁，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发起人）、冷遹（时年六十三岁，民主建国会创办人）、傅斯年（时年四十九岁，著名教授）、左舜生（时年五十二岁，青年党创办人）等六人以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身份访问了延安。所谓“窑洞对”，就是毛泽东在这个时候做的表态。黄炎培问毛泽东：“怎么能摆脱中国王朝更迭的周期律？”毛泽东回答：“我们已经找到一条新路，这条新路就是民主”。这句话颇适合当时的民意，黄炎培离开延安后，写了一本《延安归来》，书中对毛泽东之民主承诺极力推崇，中共重庆办事处为其大量印刷、传播。殊不知黄炎培等一行六人在延安逗留五天的所有活动，都是中共精心安排的，他们不可能看到延安的真实情况，不知道延安整风之际把一万五千余人当做“特务”“反革命”严加批斗，不知道王实味撰写杂文《野百合花》，批评了延安的“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歌舞升平以及干部与群众之间“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等级制度而被关押，更无从了解中共党内独断专行的统治体制。仅凭走马观花式的访问，轻信了毛泽东的花言巧语。傅斯年、左舜生等人虽对中共之所谓民主持保留态度，但比起黄炎培当时在社会贤达中的威望堪称身微言轻。在黄炎培、章伯钧等人的鼓吹下，民主党派或第三势力与中共由此开始联合起来反对内战，反对蒋介石一党专政。

抗战胜利后，在政治民主化呼声高涨的热潮中又诞生了民主建国会、民

主促进会等组织，中共对这些组织极尽拉拢之能事，即所谓结成统一战线，以此争取民心，加速夺取政权的进程。

1945年10月，中共与国民政府表面上签订了《双十协定》，双方口头上均称要“和平建国”，实际上都在扩军备战。1946年，《双十协定》的墨迹未乾，国共两党原形毕露，终于大打出手。战事愈演愈烈，各民主党派构成的中间势力呼吁和平、民主，公开反对蒋介石，抵制一党专政，与中共的关系日益密切，因而受到国民政府的弹压甚至强令解散。压迫越深反抗越大，蒋介石的弹压政策，使民主党派更加靠拢中共，其头目大多躲避在香港遥控指挥，配合中共不断发起“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蒋介石的严重失误造成了众叛亲离的局面，他对此束手无策，民心渐失。

1947年底，蒋军在战场上屡屡失利，大势已去。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紧密策划，力求将民主党派拉拢于旗下。

1948年4月30日，中共借纪念五一劳动节之机，发布了《五一宣言》，郑重宣布：

“今年的‘五一’劳动节，是中国人民走向全国胜利的日子”

“今年的‘五一’劳动节，是中国人民死敌蒋介石走向灭亡的日子”

“打到南京去，活捉伪总统蒋介石！”

《五一宣言》号召：

“全国劳动人民团结起来，联合全国知识分子、自由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和其他爱国分子，巩固与扩大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为着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共同奋斗”

“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细心的读者势必注意到了，在这些宣言和口号中，民主党派和社会贤达都列在重要位置，都是中共首先拉拢的对象。然而，毛泽东1947年11月30日曾给斯大林去电，就未来政府实行一党专政（这是毛泽东梦寐以求的）做过明确的表述，斯大林在1948年4月20日的回电中，否定了毛泽东的主张，毫无含糊地指出中共应该容纳民主党派。米高扬据此得出结论：“众所周知，由于这个建议，中共改变了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政策”（[俄]A.列多夫斯基《米高扬的秘密赴华使命》，载于《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5年第5期）。毛泽东摇身一变，从力图一党专政到高唱联合政府。连忙发布《五一宣言》，鼓吹政治协商，俱为应景之作，是策略的需要，当不得真的。

《五一宣言》的词句颇为动听，又是政治协商，又是联合政府，似乎煞有介事。然而，毛泽东此时说的“联合政府”与他1945年写《论联合政府》时所谓的“联合政府”是有很大差别的。那时是联合起来反对执政的国民党、反对一党专政、以要求民主为手段夺取政权。《五一宣言》中的联合政府是承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接受“新民主主义”思想，成立以中共为核心的政府。

民主党派的精英们当时正处在捉襟见肘、进退维艰之际，见了“民主联合政府”几个字，不免有绝处逢生之感，顾不得仔细推敲，连忙积极响应。5月2日，李济深、沈钧儒与在港的各民主党派代表齐聚一堂，对“五一”口号进行了热烈广泛的讨论。5月5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李济深、何香凝，中国民主同盟的沈钧儒、章伯钧，中国民主促进会的马叙伦、王绍鏊，中国致公党的陈其尤，中国农工党的彭泽民，中国人民救国会的李章达，中国国

民党民主促进会的蔡廷锴，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的谭平山和无党派民主人士郭沫若，联名致电毛泽东，响应中共“五一”号召，拥护召开新政协。

同一天，他们还向国内各报馆、各团体及全国同胞发出《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的通电》，指出：中共“五一”号召“事关国家民族前途，至为重要。全国人士自宜迅速集中意志，研讨办法，以期根绝反动，实现民主。用特奉达，至希速予策进。”

5月7日，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发表《拥护中共“五一”号召告台湾同胞书》。

当时在上海处于地下状态的民主建国会中央也于5月23日秘密召开常务理事会议，通过决议，响应中共“五一”号召。

各民主党派为准备召开新政协，从6月份起，在民盟中央的倡议下，以香港为中心开展了一场新政协运动。纷纷举行讨论会、座谈会；撰写文章，贡献意见，研究办法，草拟方案；在当时，形成了一个为召开新政协献计献策的热潮。

周恩来抓紧时机，责成中共华南分局、香港工委，从1948年9月开始一直到1949年3月，分批把滞留的民主人士撤离香港。第一批接送北上的有沈钧儒、谭平山、蔡廷锴、章伯钧、林一元等十余人，他们于当年9月乘坐中共所属“联合公司”租借的苏联货轮，经台湾海峡、大连，到朝鲜的罗津，然后赴哈尔滨。第二批有郭沫若、马叙伦、许广平、陈其尤、沙千里、丘哲、曹梦君等人，11月23日出发，乘坐中共所辖“华润公司”租借挂挪威国旗的货船，经大连，丹东到哈尔滨。第三批民主人士有李济深、茅盾、朱蕴山、章乃器、彭泽民、邓初民、王绍鏊、柳亚子、马寅初、洪深、施复亮、翦伯赞、梅龚彬、沈志成、吴茂荪、孙起孟等三十余人，仍租苏联货船到大连，换乘火车经沈阳到哈尔滨。第四批民主人士是1949年3月14日从香港出发的，有黄炎培、盛丕华等人，3月25日到达北平。

从1948年9月起，历经半年有余，大大小小二十多次，接送民主人士和文化精英一千余人离开香港。

当时国民党对数百名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民主人士以及数百名文化界知名人士悄然离港，感到非常惊奇，然而棋输一着，回天乏术了。

中共未进北平前，国内稍具规模的民主党派有十余个。1947年11月30日，毛泽东曾致电斯大林，表示“在中国革命取得最终胜利时，根据苏联和南斯拉夫的榜样，除中国共产党以外，全部政党都应退出政治舞台，这样能大大巩固中国革命。”（此电文及斯大林的复电刊于《中共党史研究》2001年第2期）。斯大林在复电中写道：“我们认为，中国各在野党代表着中国居民中间阶层，并且，他们反对国民党集团，他们还将在很长时间内存在。中共应该与他们合作，但必须保持领导地位。”斯大林在苏联坚持一党专政却要求中共保留党外有党的局面，其动机与目的有待研究，似有钳制中共之嫌，也是荒唐的中国特色“党要领导党”制度的来源。当时，毛泽东慑于斯大林的权势，不得不服从，口头上喊着长期共存，然而心存耿介。这便是斯大林死后，毛泽东曾多次批评他对中国革命“出过错误主意”的缘由之一。

政党是一部分人基于政治见解和利益一致组成的联合体，不同的政党，有不同的政见和利益，相互之间是不存在领导与被领导关系的。如果一种信仰、主张、利益，能够领导另一种信仰、主张或利益，世界上就不存在信仰自由和多元化了。政党是独立的，政党之间无论大小是平等的，绝对不会是从属关系。正如世界上有一百多个国家，大小不同，制度各异，但都是平等

的。所谓“一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理论上是荒谬的，将其他党置于某个党的领导之下，绝对不可能做到“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更不可能是“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实质上只能是一党专政。行一党专政之霸道，求多党合作之美名，无异于婊子立牌坊。

1948年之时，毛泽东一党专政的设想未获斯大林批准，只好暂时保留几个民主党派，徐图良策。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人进入北平初期对此煞费苦心，既然不便完全取消，有的主张将当时存在的民主党派全盘接收，严加监控；有的主张只保留长期和中共密切往来的民革、民盟、民建三个民主党派。反复讨论难于决断，直到1950年3月中共召开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时才由毛泽东最终拍板。将张君勱等人领导的民主社会党和左舜生等人领导的青年党定为反动组织，予以查禁，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和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并入民革，救国会宣布解散。最后留下了八个，即：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简称民盟）、中国民主建国会（简称民建）、中国民主促进会（简称民进）、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和台湾民主自治同盟。

这个排序据说是中共依照各个党派表态响应《五一宣言》的先后顺序并参照各党派代表人物及其所在党派的社会地位、所做贡献拟定的，这个排序得到了各党派的共识，至今未敢擅动。

若按照人数多少排序，大体上是：民盟，民建，民进，九三学社，农工民主党，民革，致公党，台盟。

应该指出的是，民主党派的去或留，合并或解散，不是各党派自己做主的，而是由中共几个寡头决定的。也就是说，中共建国伊始，各民主党派就失去了生存的自主权。事实上已成为笼中之鸟，只能遥望远处的蓝天，聊发几声无奈的啁啾，欲飞乏力，有翅难展了。

从政治学角度和世界范围观察，作为政党，本是一群人基于自己的政治见解和共同利益结成的社团。自主的政治纲领、独立的组织机构和足够的经济来源，是组成政党的三个要素。政党还要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和代表性，或者说政党必然是某个社会阶层的代表，它要为此阶层表达意见、争取权利。民革成立于1948年，主要集中在原国民党军政人员和与国民党有历史联系的群体；民盟成立于1941年，主要是文教和科技界的高、中级知识分子；民建成立于1945年，面向工商等经济界人士；民进成立于1945年，主要由文化教育和出版领域的高中级知识分子组成；农工党成立于1930年，也是知识分子集中之组织，侧重医药卫生界；致公党成立于1925年，其组成为归侨和侨眷；九三学社成立于1945年，成员多为科技界的高、中级知识分子；台盟当然以吸纳台湾省籍人士为主。1949年以前，中国的民主党派基本是这样的，各党派之间有个心照不宣的原则，从不逾矩。

中共执政以后，把削弱、控制、改造民主党派列为主要任务，一步一步地将昔日的民主党派改造成寄人篱下、任由俯仰的舍人。

1949年后，国民党在大陆失势，政权归于中共，毛泽东大权在握，一改呼吁民主为高叫独裁，他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写道：“你们独裁。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图穷匕首见，执政伊始即原形毕露。

毛泽东用怎样的手段整肃民主党派，加强独裁呢？且看下回分解。

三、纵横捭阖玩弄联合政府于股掌之上 软硬兼施措置民主党派于奴妾之间

在中共的全权操办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第一届全体会议于1949年9月21日至9月30日在北平举行。中国共产党及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等单位的代表（含候补代表）共662人参加了会议。

这次会议代行了中国的立法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制定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决定了新中国的名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议定了国都定于北平（1949年9月27日改名为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纪年采用公元，国歌未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国旗定为五星红旗等具体事项。

9月30日，第一届全体会议的最后一天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

同时选出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五十六人，名单如下：陈毅、贺龙、李立三、林伯渠、叶剑英、何香凝（民革）、林彪、彭德怀、刘伯承、吴玉章、徐向前、彭真、薄一波、聂荣臻、周恩来、董必武、赛福鼎、饶漱石、陈嘉庚（无党派）、罗荣桓、邓子恢、乌兰夫、徐特立、蔡畅、刘格平、马寅初（无党派）、陈云、康生、林枫、马叙伦（民进）、郭沫若（无党派）、张云逸、邓小平、高崇民（民盟）、沈钧儒（民盟）、沈雁冰（无党派）、陈叔通（无党派）、司徒美堂（致公党）、李锡九（民革）、黄炎培（民建）、蔡廷锴（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习仲勋、彭泽民（农工党）、张治中（民革）、傅作义（无党派）、李烛尘（民建）、李章达（救国会）、章伯钧（农工党）、程潜（民革）、张奚若（无党派）、陈铭枢（民联）、谭平山（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张难先（无党派）、柳亚子（民革）、张东荪（民盟）、龙云（民革）。其中非共产党员占五分之二以上。乍看起来，好像是个“联合政府”。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即将成立。当日下午2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选举产生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第一次会议，一致决议：接受《共同纲领》为政府施政方针，向各国政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愿与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选举林伯渠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任命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毛泽东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为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沈钧儒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罗荣桓为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并责成他们从速组成各项政府机关，推行各项政府工作。

这个会总共开了不到一个小时，那么多议程，都要表决。可以想见，代表们只是忙忙迭迭地举手通过而已，何来协商？从建国第一天起，民主党派就只有俯首听命的份儿了，不过那时各民主党派的头目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初进政府，大小小小安了个一官半职，尽管什么权也没有，但挂了个XX部长的头衔，自以为跻身国家领导层了，正在得意之际，难免忘形。觥筹交错，醉意朦胧分不清东南西北了。面红耳热，喜笑颜开，忘记了昔日之民主追求。

会议结束后，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及各位委员集体出发，乘车出中南海东门，前往天安门城楼出席开国典礼。

下午三时，聚集在天安门广场淋了半天小雨的三十万军民，翘首期待的开国大典终于开始了。

毛泽东带着浓重的湖南口音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军乐团奏《义勇军进行曲》，广场中央升起第一面

五星红旗。毛泽东宣读中央人民政府公告之后，举行盛大的阅兵式，然后是群众游行。直至晚九时以后，人群才逐渐散尽。

那一天，我在天安门广场上，以一个中学生的身份，经历了全过程。虽然绝大部分时间都在毫无遮拦的露天站着，淋着小雨，周围是密密麻麻的人群，看不见阅兵式和其他游行队伍，兴奋的心情却贯穿始终。轮到中学生游行已是晚上八点，在经过天安门城楼时，鼓足了劲，诚心诚意、倾尽心力地喊了无数遍“毛主席万岁”，开始做起了美丽的中国梦。做了七十年梦才明白，梦只是太虚幻境中的臆想。尽管美妙无比，却是当不得真的。

1949年5月某日，毛泽东召见黄克诚时突然发问：“今后的主要任务是什么？”黄答：“当然是发展生产”毛说：“不对，主要任务还是阶级斗争，要解决资产阶级问题”（《黄克诚自述》第217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

1949年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三次会议，讨论通过了政务院及其所属各委员会，各部、院、署、行的负责人，同时通过任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署和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等机构的负责人。中央人民政府的各组织机构至此全部建立起来。会议任命董必武、陈云、郭沫若、黄炎培为政务院副总理，李维汉为秘书长；任命董必武为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主任，陈云为财经委员会主任，郭沫若为文教委员会主任，谭平山为人民监察委员会主任；任命谢觉哉为内务部部长，罗瑞卿为公安部部长，薄一波为财政部部长，陈郁为燃料工业部部长，杨立三为食品工业部部长，黄炎培为轻工业部部长，滕代远为铁道部部长，朱学范为邮电部部长，章伯钧为交通部部长，李书城为农业部部长，梁希为林垦部部长，傅作义为水利部部长，李立三为劳动部部长，史良为司法部部长，陈绍禹为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李维汉为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何香凝为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郭沫若为科学院院长，邹大鹏为情报总署署长，孔原为海关总署署长，胡乔木为新闻总署署长，胡愈之为出版总署署长，南汉宸为人民银行行长；任命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程潜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徐向前为总参谋长。

形式上，中央人民政府的全部负责人选，都经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充分协商。实际上，数月前即由中共内定。当时，中央人民政府六位副主席中，宋庆龄、李济深、张澜不是共产党员。政务院四位副总理中郭沫若、黄炎培属非党人士。十五位政务委员中谭平山、章伯钧、马叙伦、陈劭先、王昆仑、罗隆基、章乃器、邵力子、黄绍竑等九人是各民主党派成员。政务院下属三十四个部门的正、副职负责人中，也安排了二十余位非共产党人士。摆出了一副“联合政府”的架子，煞是引得世人瞩目。

莫非中共会践行早先的承诺，组织联合政府？

历史事实证明，这个容纳了民主党派的“联合政府”只是毛泽东伪装民主、蒙蔽视听的权宜之计，仅仅摆设了一个多月时间，就被毛泽东偷梁换柱，变成了名存实亡的躯壳。

1949年11月9日，也就是建国后的一个月零八天，毛泽东发布了《关于在中央人民政府内建立中国共产党党组的决定》，明确政务院各部门概由党组领导，各党组直属中共中央政治局。从此，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单位，都成了中共中央下属的办事机构。一切国家大事，都由中共中央说了算，实际上就是由独掌最后决定权的毛泽东说了算。民主联合政府变成了独裁专制政府。而在这些机构里当部长、副部长

的非党人士，只能是操控于中共之手的提线木偶，命系悬丝，俯仰由人。

随后，1950年，中共包揽了八个民主党派的经济。表面上，各个党派的活动经费均由国库开支，免除了筹措经费的困扰，实际上，中共以国家名义控制了民主党派的经济命脉。在此之前，各个民主党派的经费都是自筹的，以企业或实业的盈利和社会捐款为主。中共掌权后，对私营工商业的政策是“利用、限制、改造”。民主党派成员掌控的企业受到严格的限制，资本家成了被改造的对象，民主党派断绝了经济来源。手中无钱，寸步难行，一筹莫展之际，中共答应提供经费，八个民主党派的头目一扫愁云，笑逐颜开，顾不得独立自主了，只有任人摆布，成了中共的附庸。中共并没有出一分钱，中共是靠纳税人养活的，纳税人不仅养活着中共的庞大机构也养活着任由中共摆弄的食客。俗话说，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软，民主党派失去了经济上的独立，也就失去了政治上的独立，唯有仰人鼻息了。

紧接着，中共牢牢地掌控了民主党派的组织人事权。1950年，中共统战部长李维汉宣布，各民主党派不能在军队、军事机关、军事院校以及军工单位发展成员。后来，又将这个范围扩展到情报机关、驻外使领馆、少数民族地区。朝鲜战争爆发后，铁路实行军管，又将铁路系统纳入其中。军方发言人多次谈到要保证党（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任何民主党派不得染指，那可是共产党的命根子，碰不得的。

不仅如此，民主党派的各级领导人和代表人选以及任职，必须报中共统战部认可。主席、主任委员，中央常委，没有上命是不敢擅自遴选的，就是各省市的委员也必须统战部点头方能就任。各民主党派成员充任人大、政协职务也须经统战部许可。黄炎培日记有一则记载：“统战部提出让民建成员冷遹当全国政协委员，民建内部诸多同仁表示反对，但中共上海市委潘汉年坚持，大家越是反对，潘汉年越是坚持，卒不敢有异议。”此处一“卒”字，生动传神地道出了黄炎培彼时的地位和心态。用词贴切，不愧为前清举人。

各民主党派成立之初，中共密令共产党员加入，以加强直接监控，例如1922年即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胡愈之，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谢雪红，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王昆仑、朱蕴山，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沙千里，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高崇民等，都是打入民主党派且担任重要职务、肩负特殊使命的共产党员。

五十年代，中共进一步对民主党派的组成加以改造，一些中共党员公开地或秘密地渗入各民主党派，同时，吸收某些民主党派成员参加中国共产党，接受共产党的指令。曾任民革主席的屈武、民盟主席丁石孙、台盟主席张克辉、致公党中央主席罗豪才、九三学社中央主席韩启德都是中共党员。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既是民建成员，也是中共党员。原九三学社中央主席许德珩、原大资本家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和民建副主席荣毅仁，也都加入了中共。有人把这种现象比作是：把自己的丫鬟送给民主党派当夫人，把民主党派的夫人弄来当丫鬟。这不是真实的事，却是绝妙的比喻，惟妙惟肖地形容了中共和民主党派的相互关系和相互的地位。

在民进网站上曾经有一个反映民进内部有4.8%交叉党员的帖子，后来这个内容被删除了，意在对全国人民保密。执政党变成了地下党，钻到盟友的肚子里，是为了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吗？

概而言之，1949到1956年期间，民主党派发生了很多变化。它的成员增加了，它的组织成分改变了，在领导层中掺入了中共党员，监控其日常活

动；民主党派的人事大权受中共统战部制约，各个民主党派中央一级的头目须经中共认可或指定；它的经费由独立自筹和党内捐助改由国库开支，变成了政权的附属机关；党员的发展领域和人数也受到严格的限制。至此，民主党派的政治、经济、人事的独立权丧失殆尽。

1954年颁布由中共拟定的宪法，政府格局重新做了调整。一方面，中央人民政府被撤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取代了原中央人民政府的职能，把政务院改为国务院。另一个就是，人事安排上有了很大的变化。原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和副总理的党外人士改任人大副委员长，他们不再是副总理或副主席。政协变成了一个统一战线组织，只是一个咨询机构，不再具有立法和监察的权力。

毛泽东何许人也，他深知光是用“杯酒释兵权”的办法削弱民主党派还不足以令其臣服，还需要杀鸡儆猴。如《易经》所述：“大凌小者，警以诱之。刚中而应，行险而顺。”就是说：强大者要控制弱下者，要用震慑的办法去迫使他。用强硬的办法去压服他。

毛泽东熟读史书，《韩非子》记载：姜太公灭了商纣，周朝立基之后，要罗致一批人才为国家效力。在齐国有一位贤人狂橘，很受当地各界人士推崇。姜太公慕名，想请他出来做事，拜访了三次，都吃闭门羹。姜太公忽然把他杀了，周公旦想救也没来得及，随后问姜太公：“狂橘是一位贤人，不求富贵显达，自己拙井而饮，耕田而食，正所谓隐者无累于世，为什么把他杀了？”姜太公说：“四海之内，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天下大定之时，人人应为国家出力。只有两个立场，不是拥护就是反对，绝不容有犹豫或中立思想存在，以狂橘这种不合作态度，如果人人学他，那还有什么可用之民。可纳之饷呢？所以把他杀了，目的在于以儆效尤！果然经此一杀，不皈依或不顺从周朝的人都不敢自鸣清高，而服服帖帖地为周所使了。

毛泽东首先拿民盟的张东荪试刀。为什么选择张东荪作独裁大旗的祭品呢？原因至少有三个，（1）张东荪敢于当面顶撞毛泽东，反对投靠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政策。（2）张东荪敢于不投票给毛泽东，致使其未能以全票当选中央人民政府主席。（3）张东荪在民盟中地位很高，在学者名流中的社会声望也甚高，是“第三势力”“中间路线”的代表人物，令其噤声，可以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

张东荪（1886—1973），浙江省杭州人，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毕业，清末进士。1911年曾追随孙中山，1912年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张东荪立意脱离政治，改做哲学家、政论家。在近代中国风云变换的环境下，他总是力图坚持自己的立场，发出自己的声音，如在北洋政府和国民党人的对峙中，他一方面对袁世凯违反法制破坏共和的行为严辞抨击，另一方面指责国民党发动“二次革命”是“乱党之罪”；一方面引进社会主义思潮，和陈独秀、张申府等人商议筹建共产党，另一方面又说“吾知过激主义不来中国则已，来则必无法救药矣”。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寇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一直关注着中国命运的张东荪形成了调和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共产党与国民党，借以共同对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所谓“中间性的政治路线”。在燕京大学，他一面教书、著述，一面关注和研究国内外时局的发展，与中共地下党接触，介绍学生离开北平到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或西南大后方。

1941年12月8日，日本对美国宣战，日本宪兵包围并强占了燕京大学，

张东荪与其他十名燕大教授被捕。鉴于张东荪是当时中国知名的哲学家和学者，又在日本留过学，日本宪兵企图拉拢他为日本人做事。拟请张东荪做教育部长，北京市长。具有强烈爱国意识的张东荪利用各种借口断然拒绝，并四次自杀以示抗议，高风亮节，不屈服于日寇的淫威。1942年6月18日，张东荪被日军判处一年半徒刑，缓刑三年。在写了一纸“出狱以后不离开北平”的保证书后，他被保释出狱。张东荪爱护青年，为祖国而不惜以死抗争的爱国主义行为，符合他的性格、文化信念、和道德精神。深受敬重。

抗战胜利后，张东荪被选为民盟中央常委，他提出中国急需的是实现“政治民主”和“军队国家化”蒋介石、宋子文曾专门宴请张东荪，劝其参加政府，张说：“最好还是保留一个参加和谈的身份”婉言拒绝。

1946年初，政治协商会议决定当年召开国民大会。经各方协商，党派及社会贤达代表共七百名，名额分配如下：国民党二百二十名，共产党一百九十名，民盟一百二十名，中国青年党一百名，社会贤达七十名。同年十月国共军事冲突扩大，中共就代表名额和东北问题提出异议，双方僵持不下，国民政府为及早结束训政，决定单方面召集国民大会，此举立即招致中共反对，并极力拉拢民盟拒绝参加。和张东荪相交多年的民社党党魁张君勱决定率民社党参加国民党策划的国民大会，并派员向张东荪游说。张东荪在原则问题上毫不退让。他气愤地说：“简直是胡闹，想做官，想做官罢了！”兴趣爱好相投的多年老友从此绝交，再未相见。并决定将张君勱开除出民盟。这一举动对中共抵制国民大会的方针是极大的支持。

张东荪等人仍然幻想以不偏不倚的第三方立场，调和国共冲突，使中国走上和平民主的道路。他认为中国应该走一条既不同于欧美、又异于苏联的“第三条道路”。其主张要点有三：一是调和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两大制度，建立“中间性的政制”；二是改变国共两大党性质，建立联合政府，走民主之路；三是在国际上调和美苏关系，谋求世界的安定与中国的和平。张东荪的讲演与文章引起了许多知识分子的反响和共鸣，在当时舆论界掀起了一股鼓吹“中间路线”的政治思潮，张氏本人成为当时国际国内舆论关注的焦点人物。毛泽东对此是早有了解的。毛泽东曾说过：“对于社会问题的解决，显然有两派主张：一派主张改造，一派则主张改良。前者如陈独秀诸人，后者如梁启超、张东荪诸人。”（《毛泽东文集》第一卷第1页）

1948年底，中共围困北平的时候，驻守北平的傅作义与中共就北平问题进行谈判，由于双方开出的条件相差太远，谈判一度陷入僵局。为打破僵局，中共想到了张东荪，希望寻找一位有影响的民主人士参与谈判，能够发挥缓冲、调停的作用。毛泽东在给林彪的电报中写道：“……转告傅作义派有地位的能负责的代表和张东荪一道出城到你们那里来谈判。”张东荪受人重托不辱使命，在和傅作义会晤的过程中帮助他下定了和平移交北平城的决心。

1949年1月6日至10日，为保护北平的文物古迹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张东荪以六十四岁高龄，随同傅作义的代表周北峰，轻装简从，冒着严寒和战火的危险，越过封锁线，到达河北蓟县八里庄，同平津前线司令部领导人林彪、聂荣臻、罗荣桓和刘亚楼进行谈判。张东荪出于向往和平的意愿、减少生灵涂炭的决心和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夙夜匪懈，耐心斡旋，促使国共双方草签了《会谈纪要》。

1月14日，傅作义派邓宝珊、周北峰作为全权代表，到通县西五里桥平津前线司令部，与林彪、聂荣臻、罗荣桓和刘亚楼再次谈判。16日双方签署

了《关于北平和平解决的初步协议》十四条。

19日双方代表在城内华北“总部”联谊处经磋商后，将协议正文增补为十八条，附件四条，共二十二条。东北野战军参谋处长苏静与华北国军“总部”政工处长王克俊及崔载之，分别代表双方在《关于北平和平解决问题的协议书》上签字。

1月31日，中共军队入城接管防务，傅作义统辖的守城部队开赴远郊，接受改编。至此，北平问题宣告和平解决。使驰名世界的文化古都免于战火，完整地保存下来，为中共定都北平奠定了基础。

毛泽东事后在颐和园一次会议上当着许多人的面，竖起大拇指说：“北平和平解放，张先生第一功。”张东荪后来也认为，使千年古都免遭刀兵战火，是他一生中所做的最得意的一件事情。

北平问题和平解决以后，张东荪名声大振，仅次于张澜和沈钧儒，成了民盟的第三号人物。然此时之张东荪并未居功自骄，而是功成身退，回到燕京大学，重执教鞭，埋头著述，自甘寂寞，尽显书生本色。

这一年元月下旬，张东荪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费孝通教授和燕京大学政治系主任严景耀教授，燕京大学社会学系雷洁琼教授等人到西柏坡会见毛泽东，与中共商谈民主党派参与未来政府之事。他们之被邀前去，既是准国家政权的首长为得到全国、特别是知识分子的支持，希望他们认可新政权，亦是对他们的礼待与重视。会谈时，毛泽东对民主人士中普遍存在的“中间路线”主张和反对外交“一边倒”的观点进行了批评，认为包括张氏在内的很多知识分子存在严重的“亲美”、“恐苏”思想。费孝通、雷洁琼等人虽然对“一边倒”也有保留，但迫于大势，在毛泽东面前连连点头称是，只有张东荪固执己见，特别是他坚持认为中国要想发展就不能和美国交恶，可以亲苏但也要联美，走中间道路，中国不能充当美苏两大国冲突的牺牲品，与毛泽东一味亲苏的“一边倒”可谓针锋相对，引起毛泽东极大的不悦。从而埋下了日后被整的伏笔。如果张东荪要以保全北平之功劳换取荣华富贵，凭借他与中共长期之交往，再加上他在知识界的威望和影响力，只要顺从毛泽东，献上些溢美之词，本来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得费孝通、雷洁琼求之不得的地位，但那就不是张东荪一介书生的本色了。

张东荪从毛泽东的谈话中感到说服中共改变外交方针是不可能的，便本着其一贯坚持的“中间路线”思路，企图借助个人的声望，利用民间渠道向美国方面表示，中国并无与美国对抗的意图，希望美国不要把战火烧到中国来。正是在这种心理支配下，当张东荪碰到了自称与美国方面有联系的王志奇时，便寄予了很大的期望。身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却幻想依靠个人的力量和声望打通中美关系，张东荪的书生气灼然可见，此事果然成了张东荪一蹶不振的把柄，后来被认定为“投敌叛国”“美国特务”。

1949年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1]选举中央人民政府组成人员。正式代表576名，毛泽东以575票当选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美中不足的是没有以全票当选开国后第一任主席。事后查明，差这一票并不是毛泽东出于“谦虚”没有投给自己，而是燕京大学的教授张东荪投了一张反对票。张东荪破坏了毛泽东获得“全票”的梦想，伤害了毛泽东脆弱的自尊心。张东荪之所以这样做，缘于他在西柏坡时毛泽东给他留下了刚愎自用的印象，他认为这样的人不宜做政府主席。他明知差一票不会影响选举结果，仍然固守着不为赏赐而折腰的风骨。毛泽东当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主席，但对张东荪这一张反对票耿耿于怀，有人在毛泽东面前谈及对张东荪的处理时，毛泽东曾言道：“在如来佛掌中”，看来毛泽东早已成竹在胸，张东荪难逃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厄运了。

1951年，思想改造运动骤然兴起，正在“思想改造”运动中接受重点批判的张东荪被毛泽东点名认定为“敌特分子”。虽然张东荪拒不承认自己是美国特务，更不承认自己是卖国和叛国分子，中共也拿不出有力的证据，但毛泽东认定的谁敢不从？1952年10月，民盟将张东荪开除，张东荪辞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和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后，其数十年丰富多彩的政治生命宣告结束[2]。由此民盟及其他民主党派的“民主斗士”，只能见风转舵。独立品格日渐消退，独立精神近乎摧毁。

张东荪被毛泽东认定为“敌特分子”以后，剥夺了公民权，迁出北大，在海淀区成府街一大杂院内居住。1968年1月23日。八十二岁高龄的张东荪被投进北京昌平秦城监狱，禁止家人探视。既未公开审讯，也未公布罪状。1972年，毛泽东摇动橄榄枝频频向美国示意，邀请尼克松访华，打开了中美建交的大门。最早建议中国与美国保持外交关系而被扣上“美国奸细”帽子的张东荪，在秦城监狱病危，他留给亲人的最后一句话是：“还是我对。”

1973年6月，张东荪溘然逝于秦城监狱。终年86岁。遗著有《道德哲学》、《认识论》、《科学与哲学》、《多元认识论重述》、《阶级问题》、《知识与文化》、《思想与社会》、《理性与民主》等。

此后数年，中美正式建交。如今中美两国叫做“建设性战略合作伙伴”了。张东荪与毛泽东孰是孰非耶？

附注：

[1] 1945年10月国共两党重庆谈判时，即商定“由国民政府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邀请各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共商国事”。并写进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1946年1月10日至31日，国共两党和民主人士在重庆举行了“政治协商会议”，确立了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并提出了对《中华民国宪法》草案的若干修正的建议。1949年中共占据北平后，于6月份召集各党派代表，商议建政事宜，先称“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旋改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此处所谓“人民”，意在以共产党一党专政为基础，吸收共产党认可的“民主党派”，排除国民党及其他党派的政治协商会议。

四、政治协商终成泡影 共同纲领虚晃一枪

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而建立起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根据1949年9月29日通过的《共同纲领》，乃是“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经济上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各种经济成分“分工合作，各得其所”；政治上“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总的发展纲领是“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而奋斗”。尽管有着“专政”之类的词句，但基本上已经初具民主主义的色彩。看来政治协商指日可待了。

然而实际上，建国伊始所有属于国家大政方针的问题，都是由中共或者毛泽东一人说了算的，许多中共高层人士均不得染指，何况一般民众，更何况原国民党的败军之将，所谓政治协商只不过是一句空话。

譬如出兵朝鲜这等大事只有少数中共高层要员参加过讨论，而且是在多

数人不同意草率出兵的情况下，毛泽东仓促决定的。从未就此召开过政治协商会议。

又如，早在1949年11月，毛泽东即明令宣布：政务院各部门概由中共派驻的党组领导，各党组直属中共中央政治局。某几个部虽然安排民主人士做了部长，不过是傀儡而已，政府部门的行政大权尽归于中共党组，俨然是以党代政，还有政治协商的气息吗？

再如，1938年11月6日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就强调了“党指挥枪”的原则。军队必须完全地绝对地无条件地置于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军队的一切活动都必须服从于和服务于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共同纲领》第二十条赫然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统一的军队，即人民解放军和人民公安部队受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统率，”实际上尽人皆知，中国大陆的所有军队皆由中共中央军委统辖。其他所有政府机构是无权过问军队事物的。在中共看来，军队的事是绝对不许“政治协商”的。那个所谓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在纸面上也没有保留多长时间，就随着共同纲领的废除而消失了。

毛泽东早年说过：“美国人民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我党的奋斗目标，就是推翻独裁的国民党反动派，建立美国式的民主制度，使全国人民能享受民主带来的幸福。我相信，当中国人民为民主而奋斗时，美国人民会支持我们。”（毛泽东1944年与到访延安的美国代表团的讲话）。

1949年元月，张东荪偕同费孝通、雷洁琼等人，应毛泽东之邀访问西柏坡，谈及“一面倒”的外交政策时，张东荪向毛泽东进言：可以联苏但也不宜与美国交恶，当场即引起毛泽东极大不满，毛认为张东荪竟敢妄议由他确定的政策，于是寻找和制造种种罪名将年已82岁的张东荪关入秦城监狱，并迫害他全家。（见本书第五章第三段第十小节《毛泽东睚眦必报，张东荪三代蒙冤》）

五十年代初期，我国生产力水平还不高，资本主义的发展还很幼稚，民主自由的观念有待培育，而封建专制主义的传统却根深蒂固地存在于社会的各个角落。因此，这个时期的历史任务，是继续深入地开展民主主义革命。诚如毛泽东自己所说：“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所谓“经过民主主义”，就意味着大力发展生产，肃清封建专制主义在各个领域的影响。只有完成这个过程，才有条件考虑如何实现社会主义。

但是，毛泽东却在民主革命远未完成的条件下，匆匆忙忙地发动“社会主义”革命，要铲除当时还很幼弱的私有经济。可是，社会上还没有社会主义因素，怎么办呢？就像盖房子需要材料一样，当时的中国社会，只有两种构件，一种是发展民主主义构件，一种是沿袭封建专制主义的传统构件。社会主义既然要打倒资本主义，就必然要选择封建专制主义的构件。所完成的建筑，虽然高高飘扬着社会主义的旗帜，实际上却只能是一座封建专制主义的大厦。这就是说，当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实际上是封建专制主义的复辟，同社会主义风马牛不相及。

1953年，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提出党在农村中最根本的任务就是教育和促进农民逐步联合、组织起来，实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变农业个体经济为合作经济。开始时组织初级社，以土地入股，并以土地进行分红。本质还没有脱离以私有制为基础。高级社则不以土地进行分红，而是按出工进行分配，即按劳分配，本质上是以公有制为基础。1956

年底，全国参加农业合作社的农户达到 96.3%，其中加入高级社的农户为 87.8%。至此，全国农村基本上实行了农业合作化，而且以高级社为主。三年时间就让农民与土地脱了勾，把土地改革时给农民的恩惠全收回来了。农业集体公有制从此产生，至于后来盛行一时的人民公社，实际就是政社合一的更高形式的高级社。中共党内略懂经济的周恩来、陈云和主管农村工作的邓子恢，支持毛泽东的改革，但主张有步骤的进行，循序渐进。被毛泽东斥之为“小脚女人走路”“离右派只有五十步了”等等。连中共高层人士对毛泽东的独断专行略有异议，都要受到严厉呵斥，还妄谈什么“政治协商”呢。

共同纲领还规定，在经济制度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取消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一切特权，没收官僚资本归人民的国家所有，有步骤地将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保护国家的公共财产和合作社的财产。保护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及其私有财产，发展新民主主义的人民经济，稳步地变农业国为工业国。”在经济政策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国家应在经营范围、原料供给、销售市场、劳动条件、技术装备、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调剂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使社会各种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后来的历史证明，在中国“社会主义”改造中，最大的问题和偏差，就是农业合作化搞得过快、过急、过左。过早地没收属于农民私有的土地。一切均按照毛泽东脑子里想象的乌托邦进行。这种不顾当时农业生产物质技术极为薄弱、生产力非常低下的客观实际，盲目简单地进行生产关系的大幅度调整和变革的行动，实际上严重地违背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而太快的工作进程，势必造成强迫命令、长官意志和行政干涉。其后果是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平均主义盛行，影响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这种靠官本位、主观主义和“左”倾思潮综合作用而人造出来的“社会主义”农业经济体制，只能靠政治手段、行政方法来维持，缺少必要的经济运行机制和发展动因，为以后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乃至“文化大革命”等人祸灾难埋下隐患。耕种公地的结果是农民们没有直接的责任感，生产积极性不高，发生了社会懈怠现象。当个体认为自己的工作已湮没在团体之中，个人的劳动报酬与劳动成果没有直接关联，就会在团体中懈怠下来。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人民公社体制下农作物严重减产，实行包产到户后粮食产量能够大幅提高。

以“三大改造”（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后来的反右运动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革命，彻底扭转了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把一个新生未久的民主主义社会，推上封建专制主义的轨道。反右运动是实现这个转变过程的重要环节，它的矛头指向天然具有民主性的社会力量——知识分子，消除了这个阶层对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威胁，从而完成社会转向封建专制主义的复辟过程。运动的罪魁祸首固然是毛泽东，但发挥重大作用的是邓小平，他应该为背弃民主主义、复辟封建专制主义承担不可推诿的罪责。

反右以后，万马齐喑。再也没人敢对中共的倒行逆施“妄加议论”了。

毛泽东在四十年代曾多次发表崇尚美国民主的言论，如：“美国人民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我党的奋斗目标，就是推翻独裁的国民党反动派，建立美国

式的民主制度,使全国人民能享受民主带来的幸福.我相信,当中国人民为民主而奋斗时,美国人民会支持我们。”(毛泽东1944年与到访延安的美国代表团的讲话)“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是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们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按:指美国总统罗斯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提出的“言论和表达的自由”、“信仰上帝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以及与各民主强国的合作。这里不需要橡皮子弹。(《答路透社记者甘贝尔问》《毛泽东文集》第四卷27页)。但是实际上,毛泽东掌权以后民主的诺言即被抛置于脑后,不仅从未实行,甚至没有人再敢提起了,否则就会被戴上“崇美”或“反动”的帽子,被推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了。美丽动听的政治协商成了虚无缥缈的海市蜃楼,洋洋乎六千余言的共同纲领成了银样蜡枪头。

五、章伯钧逆来顺受坦坦荡荡 沈钧儒卑躬屈节战战兢兢

中国民主同盟曾被毛泽东称之为“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盟友,他们曾大力支持共产党,反对蒋介石,被毛泽东称赞为搞垮国民政府的“第二战场”或“第二条战线”,从军事上配合了第一条战线作战,为三大战役的胜利立下过汗马功劳。民盟的张东荪等说服傅作义交出军权(实际上是缴械投降)帮助中共以和平方式占领了北平。并配合中共接管城市,稳定局面,为建国和巩固政权献计献策。

从1949到1956年,毛泽东采用种种手段,使民主党派不敢再言民主,使联合政府名存实亡,达到了他预定的目的。在此期间,民主党派按照中共设定的步骤沦为清谈凑趣的闲客,点缀民主的花瓶,掩饰独裁的遮羞布,吹捧中共的应声虫。

即便如此,毛泽东仍牵萦于心,觉得这些人碍手碍脚,必欲除之而后快。于是,1957年夏季以整风为幌子,不择手段制造民主党派妄图推翻共产党的舆论,对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大加鞑伐。

1957年之际,八个民主党派的总人数不过九万余人,民盟独占三万余人,当时中共已有一千二百余万党员,是民主党派总人数的一百三十余倍,是民盟总人数的四百倍,是民建、民革人数的一千余倍。人数仅为中共四百分之一乃至千分之一,既无权又无钱更没有武装力量的小党,竟然被说成要篡夺中共的领导权,岂非天方夜谭。

毛泽东是怎么用阴谋与阳谋,一个一个地收拾他心目中的“右派分子”呢?他选择谁作为突破口呢?“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毛泽东选中了成员人数最多、在知识分子中影响最大的中国民主同盟为突破口。一声令下,万炮齐轰,手无寸铁、毫无戒备的文弱书生,被打得落花流水,成了毛泽东独裁暴政祭坛上的牺牲品。

反右大戏是从打击民盟副主席章伯钧开场的。在一阵急急风的锣鼓声中,掀开了大幕。

章伯钧,安徽枞阳人,生于1895年。1916年考入武昌高等师范(今武汉大学)英语系。1922年,以安徽省公费赴德国留学,获博士学位。在柏林大学哲学系攻读黑格尔和马克思哲学理论,认真阅读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用德文撰写的原著,而不是俄译本,更不是从俄文本转译的中文本。在德国期间他与朱德同住一室,经朱德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回国后,任中山大学教授。

参加北伐，任北伐军总司令部政治部宣传科长、秘书长、副主任，第九军党代表。参加“八一”南昌起义，被任命为起义军总指挥部副主任。同年底脱离中国共产党。1928年在上海与谭平山等酝酿成立中华革命党。1930年同邓演达等创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1933年参加“闽变”，任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土地委员会主任。抗日战争时期，力主积极抗战，与中共合作，被国民党除名。1941年参与筹组民主政团同盟，任中央常委兼组织委员会主任。抗战胜利后，章伯钧主张民主建国，反对内战，反对国民党，支持共产党。1947年民盟被迫解散后，同沈钧儒等在香港召开民盟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在香港恢复民盟总部和与中共的合作。1947年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改组为中国农工民主党，章伯钧任主席。1948年，章伯钧受周恩来之托，深入虎穴说服国民党第九十六军军长吴化文率部二万余人宣布起义，为中共占领济南打开了缺口。同年响应中共“五一”号召，从香港到东北解放区，参与筹备新政协。1949年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章伯钧的二弟章伯韬为中国留法勤工俭学语文部主任，中共党员，返国后任职于延安，患肺结核加之操劳过度，英年早逝。其三弟章伯仁曾留学日本，后赴苏联，共产党员，继王明之后担任过远东区伯力学校校长，在斯大林时代的大清洗中以“间谍罪”遇害，中共追认为烈士。其堂侄章培毅武汉大学电机系学生，十九岁加入民盟从事民主运动，1949殉难于重庆渣滓洞。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章伯钧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政务委员，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农工民主党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长，《光明日报》社社长等职。

1957年在“大鸣大放”中提出批评共产党的政治见解，被指为要搞“政治设计院”。1957年6月8日成为中国第一号资产阶级“右派分子”。1958年1月25日，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会举行了第六届第四次会议，决定撤销章伯钧的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执行局委员职务。1958年1月26日，民盟中央宣布撤销章伯钧民盟中央第一副主席兼组织部长的职务。1月31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十三次会议，撤销了章伯钧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部长职务。

被划为右派后，章伯钧淡出政治舞台，渐少公开活动；只能偶尔与右派同仁喝茶、聊聊天、吃顿饭、看场戏；不敢议政，也不能议政了。他于1969年5月17日在北京因胃癌病逝，一代英杰抱憾归天，享年七十有四。

1957年5月，中共中央奉毛泽东之命召开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是阴谋和阳谋的具体步骤之一，旨在让圈定的目标“入瓮”。章伯钧是民主党派的头面人物，既然运动的重点是整肃民主党派，章伯钧自然首当其冲。他从5月8日即被邀请参加座谈会，而且被安置在主宾沙发上，煞是风光显赫。但是前几次会议他却很少发言，即使发言也是赞誉有加，歌功颂德居多。于是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亲自打电话催促，“恳请”他在座谈会上给中共提批评意见。章伯钧再三推托，申明自己的观点和意见平时都讲过了。李维汉说：“平时讲的不算数，一定要在会上讲”，得到章伯钧确认一定发言的承诺以后，李维汉才放下电话。李维汉在其晚年著作《回忆与研究》中明白地承认：“中央要反右的方针在我脑子里已经清楚了”（《回忆与研究》第834页），他曾经隐约地提醒胡子婴和黄炎培，让他们说话注意，这两位得以避开了划为右派的厄运。但是对毛泽东意欲打击的章伯钧，不但未敢保

护而且诱其入围。或许他当时未料到反右会有如此之残酷，直到晚年，李维汉才受到良心的谴责，有所忏悔。

1957年5月21日下午，腹泻未愈的章伯钧乘坐“吉姆”汽车驶往政协礼堂，参加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民主党派负责人第八次座谈会。坐在车上，心里还不知道一会儿该说什么？到了会议室，甫才坐定，即应邀发言，于是边想边说。

以下是《人民日报》对章伯钧这次即兴发言的报道：

民盟副主席章伯钧说，今天他谈个人的意见：第一点，近二十多天来，全国各地都在谈论人民内部矛盾，帮助共产党整风，提出了很多意见，看来是很正常。共产党的领导，共产党的政策，共产党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精神，民主精神，已经得到了极大的效果。

这在中国政治史上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都是一件新的事情。兄弟国家很重视。帝国主义国家想找我们的毛病，但找不到。

比如近两周来提出的学校中的党委治校的问题，引起了很多的讨论。就我接触到的朋友来说，大家的看法基本接近，都认为共产党的领导是不可缺少的，党是可以从政治上领导科学的。但是，另一方面，大家也都感到这种制度有缺点，发生了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的缺点。因此，大家认为应该更多地听取教授和学生的意见。这证明，鸣、放并不影响共产党的领导，而是愈益提高了共产党的威信。

现在应该提出进一步的要求。最近我参加了北京的一些座谈会，感到仍有人没有把话说完。在一次高级技术人员座谈会上，有人发言后问我到底怎样，下边可能顾虑更多。因此，今后应该彻底地广开言路。现在光是中上层人物的意见，固然能够反映很多方面的意见，但是，还应该普及到下层才好。下层干部在几年来对国家贡献很大，其功不小；但是犯了不少错误。因此希望这次整风能听一听基层人民的意见。

“党内一决定就那么干下去是不能达到预期目的的。”

其次，谈几个问题：几年来，特别是从去年政协会议以后，国家领导方面很重视各方面的意见，民主生活日渐丰富。今后有关国家的政策、方针性的重大问题，可以多听一听各方面的意见。如这次整风，结合检查改进工作，当然是好的。过去，作了许多轰轰烈烈的好事，但是，有些事情也给国家带来了损失。如果在工作进行之初，就多听听人大常委会、政协、民主党派的意见，就可以少走弯路。如扫盲运动、五年一贯制、推广双轮双铧犁等问题，如果事先经过国务院的部长们，根据材料，多方面地进行讨论，或经过民主党派、高级知识分子、专家的讨论，就会减少损失。如果党内一决定，就那么干下去，是不能达到预期目的的。

又如体制问题、中央和地方的分权问题，去年只交地方党委书记和少数党外高级干部进行讨论。主要是党内讨论。应该利用政协、人大的各种委员会、民主党派去讨论，这些人都有相当的认识和经验。

再如文字改革，我认为既不是国防机密，又不是阶级斗争问题，是一个人民内部的矛盾问题，却只由少数热心分子作了讨论。这样，是不是人人都搞通了呢？我看包括党内的一些同志，大有问题，相当混乱。如果文字改革问题，等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我没有意见，我不能反对；如果是文化问题，就应该在党内外展开讨论，应该多从学术、政治、道理上进行讨论。陈梦家在文汇报上的意见，我部分地同意。

“政协、人大、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设计院。”

现在工业方面有许多设计院，可是政治上的许多设施，就没有一个设计院。我看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四个设计院。应该多发挥这些设计院的作用。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设，要事先交他们讨论，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

现在大学里对党委制很不满意，应该展开广泛的讨论，制度是可以补充的，因为大家都是走社会主义的路。这样搞，民主生活的内容就会丰富起来。

政协、人大不要等到期满，今年就可以进行明年所要作的大事的讨论，不能全靠视察制度，对国家准备作的事情要经常地讨论。近来，政协委员到了下面视察工作，工作是增多了。但还不能停留于视察工作，要进一步让大家经常讨论国家的重大问题。

“国务院开会常拿出成品，这种形式主义的会议可以少开。”

大多数教授都反映说会多，这要看什么样的会。顿使是千篇一律的报告会，形式主义的会，最好是少开一点。比如国务院开会常是拿出成品要我们表示意见，这样的形式主义的会，是可以少开的，但如果能够提出问题，拿出材料认真讨论，有丰富的内容，能够发挥各个人的见解，这种会大家不会感到多的。关于体制问题，如何搞，大家可以深刻讨论，文字改革问题也可以由大家讨论。

在政协、人大常委会里面，共产党中央要考虑放上一批能干的共产党员。共产党的许多领导同志，有知识，有精力，可否在统一安排的原则下，分配一部分参加到上述机构里面，经常同各方面的人士交换意见，而不要像现在的一些共产党的同志那样，只是看看你们怎么讲，今后人大常委会、政协讨论问题，各部应该有常务部长出席代表各部说明政策。这不是资本主义国家议会政治。

近一两年来，政府对于老年的知识分子，有所安排，收到了极大的效果。但是，还有些名望较小的社会知识分子，思想已经起了很大变化，生活也有困难，政府应当有适当的政策，逐步地解决他们的问题。

镇反、三反、肃反中的遗留问题，一再讨论，党和政府应该下决心，检查一下，检查要有准备，要好好做。

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在革命中发生了极大的作用。这方面的经验还得总结一下。从马克思、列宁那里找理论根据教育共产党员，那固然必要；但是还不如从实际生活中，从孙中山同中国共产党合作开始直到现在的统一战线（5月22日《人民日报》）

仔细阅读章伯钧先生这个发言，均为帮助中国共产党整风的肺腑之言，是希望中国共产党提高领导艺术，巩固其领导地位的忠言，很难找到“逆耳”的词语。他所说的“政治设计院”明确地指出是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绝不是超越中国共产党领导之外的什么机构，完全是符合宪法的。不料却被毛泽东定为“著名右派观点”蒙受了数十年历史冤屈。虽然毛泽东死后章伯钧的骨灰移至八宝山，与中共要员的骨灰同居第一室，然而其右派分子之冤名却未予改正，中共意欲用此种方式掩耳盗铃地证明反右正确。

二十余年之后，章伯钧的女儿章诒和在接受采访时曾经透露：

“刊于1957年5月22日《人民日报》的发言，最终成了我父亲划右的罪状和定性材料。罪状的第一条是主张政治设计院；罪状的最后一条是反对文字改革，另了一条是主张‘轮流坐庄’。

1980 年中共中央决定给百分之九十九的右派“改正”，决定保留五个右派分子，以证明反右是正确的，必要的，领导者的错误在于‘扩大化’。在此决定下达的前一天，中央统战部把我母亲（由我陪同）找去谈话。谈话大意是：‘既然中央给反右定性为扩大化，那么就需要保留一些右派，要保留右派，就需要保留右派中的头面人物；要保留右派的头面人物，自然就需要保留章伯钧先生’。又说：‘当年给章先生划右的材料都不确实，从政治设计院到反对文字改革，都不能成立。而‘轮流坐庄’则是程潜批判右派时说的，也被安到章伯钧先生头上。现在我们重新整理了材料，右派定性用的是孙大光的揭发材料。说罢，问我母亲有何感想。母亲说：‘对此决定，我只能服从，而不能赞成。’有关领导说：‘服从就好。以后我们对您及章家会有所照顾的。’”（引自章诒和著《越是崎岖越坦平——回忆我的父亲章伯钧》）

毛泽东用强权操纵“群众”把民盟的首领“批深、批透、批臭”。如今过了五十五年，人们渐渐地明白了，觉悟了。笔者预测：反右运动的发起者、中华民族的罪人毛泽东造孽多端，必将成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毛像下墙，毛尸出堂”为期不远矣。

1957 年，民盟的名誉领导即民盟中央主席是沈钧儒，他在反右运动中又是怎么表现的呢？

沈钧儒（1875—1963），字秉甫，号衡山，浙江嘉兴人。出身书香门第，长于官宦世家，1903 年应试中举人。次年，应殿试得“赐进士出身”衔，1905 年以新科进士被清政府派赴日本留学，习政治法律。回国后参加立宪运动和辛亥革命。1912 年 4 月，沈钧儒被选为统一共和党参议员，5 月加入中国同盟会，8 月转为国民党党员。

沈钧儒曾任浙江参议院议员、浙江军政府教育司司长。1926 年参加国共合作的浙江省临时政府，任秘书长等职，与宣中华（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党团书记，1924 年加入中共）多有接触。1927 年国民党内部分左右两派斗争日益激烈，4 月 11 日国民党右派发动清党，宣中华被捕。沈钧儒被关押了七天，由此结下了对蒋介石的宿怨，日益倾向中共，是著名的亲共派。

1936 年沈钧儒发起组织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本为抗日救亡组织，因公开反蒋，被国民政府拘捕，为“七君子”之一员[1]。出狱后与中共的联系更为密切，反蒋也越发积极。1939 年向周恩来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要求，被中共婉拒。

1941 年代表救国会参加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筹建工作。1941 年救国会反对《苏日互不侵犯条约》，集体研讨后由王造时执笔写了一封《致斯大林元帅的信》，救国会九位领袖人物签了名，沈钧儒的名字签在第一位。中共认为这封信有反苏倾向，周恩来找沈钧儒谈话，他立即诚惶诚恐地表示：“我一时糊涂，错了。”[2]

1946 年沈钧儒代表救国会参加旧政协[3]。1947 年 11 月民盟被勒令解散后，沈钧儒于 1948 年 1 月在香港主持民盟一届三中全会，重建民盟组织，宣布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并赴解放区筹备新政协。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50 年和 1962 年先后两次申请加入中共，甚至说如果不能入党也希望在死后能被追认为中共党员。他的要求没有被满足，因为上头认为“以民主人士中的一个左派旗帜来肯定他的贡献更为有利。”

沈钧儒 1952 年曾患严重肺炎，住院治疗，因年老体衰，对药物的承受能力较差，病愈后，记忆力、文字表达能力等均明显衰退，一直处于休养之中。1963 年 6 月 11 日，沈钧儒在北京医院病逝。终年 88 岁。

1957 年 4 月初，反右斗争尚未启动，毛泽东在中南海约见沈钧儒，面授机宜。盛夏之际反右运动轰轰烈烈，民盟不少精英被“引蛇出洞”，如章伯钧、罗隆基、孙大雨、费孝通……而作为民盟的最高领导，沈钧儒安然无恙。由此，他对毛泽东感恩不尽，常存敬畏之心。

此后，沈钧儒常在衣袋中放一纸条。上书：“你是不是听党的话？你是不是听毛主席的话？你是不是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你对人民究竟做了什么事情？”时已年逾耄耋的老先生，无论人前人后随时都会拿出纸条自省，时时告诫自己，勿越雷池半步，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战战兢兢之状依稀可见。本来身材就不高的沈先生，日益低头弓腰，在人前更显得矮了一截。当年法庭的铮铮硬汉、怒斥国民党要员，为了宪政而英勇奋斗的民主斗士，进入 1949 年之后，面对种种践踏法律的非常局面，却不能再起而争辩，而常用沉默替代言说。也许是五、六十年代中国的造神运动遮蔽了他原本敏锐的双眼，也许是年老病弱之躯难以抵抗强大的不民主势力，也许……。这位历经三朝的元老，毕竟是位历史人物，不能以现代的观点过高地去要求他。

1957 年夏季，沈钧儒年逾八旬，且大病初愈，本可以体弱为由不参加有关活动，但他为了表示积极，讨好中共，超前落实毛泽东四月份的叮嘱和吩咐，5 月 17 日反右还没有正式开始，章伯钧、罗隆基等尚未在座谈会上发言之际，便在《人民日报》上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表示：“要批判章、罗等人的错误言论。”

此后，他明知民盟内根本没有一个“章罗联盟”的存在，却在 9 月 11 日发表公告称：

“中国民主同盟在资产阶级右派向党、向人民、向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中，起了特别恶劣的影响和作用。这是因为在一个时期内，由民盟两个副主席章伯钧、罗隆基所形成的‘章罗联盟’的右派反动路线——从政治路线到组织路线，曾经在盟内占了上风。‘章罗联盟’的骨干分子在不同情况下和不同程度上控制了民盟中央和许多地方组织的领导机关的实权。他们在国家生活的许多部门特别是文教部门还参加了领导工作。他们以及在他们影响下的大小右派分子，利用民盟组织的合法地位，利用帮助党整风的机会，在全国和地方上，在高教界、科学界、新闻界、出版界、文化艺术界和其他方面，充当主帅和大小头目，筹划、发动、号召和组织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

‘章罗联盟’事实上成为全国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发号施令的最高司令部，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事业犯下了严重的罪行。”

反右期间，有那么几位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在批斗右派分子的讲话、指示和撰写的重要报刊文章中，常常比中共的各级官员还要疾言厉色，用词之激烈，态度之专横有过之而无不及。当时发表的这些讲话，给后人留下了一份重新认识、思考和定位中国所谓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重要历史记录。

这份公告由谁起草不得而知。但是以民盟主席沈钧儒的名义刊登在《人民日报》上的。对一个民主党派的主席来说，这无疑是一种组织性的自残！当年身处逆境的罗隆基读了这份公告后疼痛锥心，几经忍耐，还是按捺不住，写了一封长信给沈钧儒，进行了义愤填膺的反驳。

罗隆基致沈钧儒的信约写于1957年9月下旬，全文三千六百余字，择要摘录如下：

衡老：

在九月十一日发表的“中国民主同盟当前的严重政治任务”一文中，我公以民盟主席身份，正式采用“章罗联盟”这个名称，并且说“‘章罗联盟’事实上成为全国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最高司令部”，这对我来说，是万分严重的指控。“章罗联盟”这个名词的来源和事实根据是什么，我直到今天还不知道。经过三个月的反省后，我的良心告诉我，“章罗联盟”这个罪案对我来说，绝对没有事实根据，是个极大的冤枉。这个冤案的真象，今天不能明白，将来总会明白，我生前不能明白，死后总会明白。现在我愿向我公说明这样几点：

这两年来我在民主同盟的工作，在我这方面，都是经过公开正当手续的工作，我同章伯钧绝对没有什么勾结，更没有形成什么联盟。

两年来我同章伯钧绝对没有两人单独地聚谈过一次，更没有两人单独地商谈过民盟事务或其它政治问题。我已经请求周总理和统战部彻底查究“章罗联盟”这件事。我这样声明：

“倘若查出我同章伯钧两年来两人的确有任何秘密勾结，秘密联系，秘密阴谋，或两人共同秘密地对任何盟的地方组织或全国任何盟员发出过任何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纲领或指示，我愿受国家严厉的惩治。”

两年来我在民盟的工作都是同四个副主席和秘书长进行五人的事先协商，重要事件必经过常务委员会的座谈和批准而后执行。绝对没有什么事是我同章伯钧两人秘密商量后隐瞒着其他副主席而执行了的，没有什么事是我同章伯钧两人所坚持，为其他副主席和民盟常务委员会所反对而执行了的。这些经过，史良、高崇民两位副主席和胡愈之秘书长都是参加五人小组的人，都是清楚的。民盟两年来进行工作的情况，我公亦大体都知道。我同章伯钧绝对没有什么私人的勾结，更没有形成什么联盟。

总起来说，这两年来，我在民盟的工作，没有任何一件事是我同章伯钧有了勾结，排除了其他副主席和秘书长而做的，亦没有任何一件事是由于章罗二人的勾结，强制民盟而做的。两年来我同章伯钧就绝对没有任何勾结，因此，就绝对没有形成什么联盟。……

我坚决不承认有所谓的“章罗联盟”，我是根据事实和我的良心说的，我绝对不是企图推卸责任，洗刷罪过……

我同章伯钧的认识，亦有了将近二十年的历史。我同他在性格上，在作风上，特别是在政治主张和政治活动上，分歧太多太大，我们不可能形成所谓的联盟，两年来亦绝对没有勾结形成联盟的事实。两年来由于我接受了盟内许多负责同志的劝告，在盟务上同章伯钧比较合作，但我同盟内许多负责同志亦一般都是合作。合作的目的是为着加强盟的团结，做好盟的工作，不是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倘我公今天就肯定“章罗联盟”实有其事，并指所谓的“联盟”为“全国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最高司令部”使我受见疑之辜，遭无验之告，罪责既过分加重，冤案必失当造成，我固长此衔冤饮恨，此亦仁者所不取也。我公忠厚长者，爱人以德，必肯查清事实，追究真象，明辨是非，主持公道，实为殷切之望。区区真诚之怀，不敢因顾嫌而不畅陈所见，肺腑之言，幸祈谅解。

三年来我绝对没有什么宗派团体。三年来我没有派任何人到任何地方做任何政治活动，我没有写信或托任何人带口信给盟内外任何人指示盟务或其他政治活动。这都是铁一般的事实。因此，我不止没有同章伯钧有任何勾结，亦没有同盟内外任何人有什么勾结。……

沈钧儒看了这封信后未置可否，也没有公开表态，面对“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的情况，沈钧儒身为民主同盟中央主席，或许是心存旁鹜，或许是谨小慎微，既不能泯灭良心不顾事实地说昔日的盟友如今要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推翻社会主义制度；更不敢忤逆犯上，说共产党有丝毫差错。在行动上必须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任由中共安插在民盟内部的中共党员胡愈之、吴晗、高崇民等人各显身手开展民盟内部的反右派斗争。

对于陆续被划为右派分子的民盟成员，沈钧儒只能聊表抚慰。分别请了几个原民盟主要成员吃饭，席间貌合神离，酒香无知己，话少不投机，彼此心照不宣，虚与委蛇一番。大概他也就只能做到这一步了吧。昔日七君子……

毛泽东发动反右派运动的主要目的是整肃民主党派、驯化知识分子，1957年底这个任务可谓已经完成，历经半年多疾风暴雨式的群众斗争，数十万“右派分子”已被收罗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巨网之中，但他犹不甘心，随即又发扬“宜将剩勇追穷寇”“痛打落水狗”的精神，掀起“反右补课”运动。在阵阵“人民江山坐得牢，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得意洋洋的歌声中，扩大打击面，增加打击力度，给更多的人戴上右派帽子，划入黑五类，列为专政对象。对那些未戴帽子的知识分子也要加上紧箍咒，进行必要的威慑、恐吓、屈辱，使其臣服。

1958年1月，反右高潮过去不久，毛泽东在第十四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说：“每个人要把心交给别人，不要隔张纸，你心里想什么东西，交给别人。鲁迅的作品很好，他把他的心与读者交流。不能象蒋介石那样，总是叫人不摸底‘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轻抛一片心’，这不适合今天的社会的。……要把心交给别人。”在成都会议上，他谈到民主党派誓师问题时说：“可以搞，交心可以。另外要帮助他们动员知识分子参加。”于是在中共的策划下，八个民主党派中没有打成右派的几位头头忙不迭地组织召开“向党交心”誓师大会。

1958年3月16日，在初春的寒风中，万余名经历第一阶段“反右”，能与腐朽阶级、腐朽思想、腐朽同类划清界限，毅然决裂，得到中共高抬贵手而侥幸过关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聚集在天安门广场向党交心。下午三时，大会开始，民盟中央主席沈钧儒冒着簌簌的寒风站在台上，颤巍巍的代表各民主党派在《开会词》中作出了卑谄足恭的保证：“我们决心把民主党派成员的千颗心，万颗心，联成一颗心，把这颗心献给党，献给人民，献给社会主义……。我们请党，请毛主席，请全国人民作我们的监誓人，随时考验我们的忠诚和决心，督促我们向前，再向前！跃进，再跃进！”（载《今日新闻》1958年3月17日）

李济深自己逃脱了右派帽子，对毛感恩戴德、低首下心地表示，海枯石烂绝不动摇，要以效忠报答。他说：“中国共产党是领导我们全国人民乘风破浪向前跃进的舵手，是我们民主党派的灯塔。我们在今天的大会上，向共产党和毛主席提出保证：我们永远坚定不移地跟着共产党前进，永远作共产

党的忠实助手；党所好者好之，党所恶者恶之，为社会主义事业献出一切力量。海枯石烂，任何风浪，此志绝不动摇。……

得到毛泽东赦免的黄炎培在社会主义自我改造促进大会上，也做了类似的表态。他说：“我个人和今天到会的同志们的心情，真是热烈到了一百万分。我们每个人的心头，都燃烧着献身于社会主义事业的火焰，我们是多么兴奋呀！”在这信誓旦旦的“热烈”“兴奋”里，他是否忘记了一家人中被划了七个右派分子，谁知道他吞咽的是皇恩浩荡的琼浆还是饮冰茹檠的苦水呢？

这是第一次以中国所有的民主党派的名义在天安门广场上表演的效忠会，比后来文革中红卫兵的效忠会早了八年！

沈钧儒老先生不顾自己八十多岁的高龄和带病之躯，与郭沫若一起在春寒料峭的北京天安门广场率领一支队伍沿著长安街向西走，队伍里众多人抬着一个高大的木架，上面挂着“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社会主义自我改造公约”的条文，红底黄字，煞是惹人注目，然而距离太远，看不清具体内容。在他们的背后，八十岁的黄炎培、七十三岁的李济深等人则另率一支队伍向东走，人们高举一个巨大的、外面是鲜艳的红布里面是白色棉花做成的“心”，上面写着“把心交给党”五个大字。“改造公约”向西，“赤胆忠心”向东，谁人设计的行走方向？不是明显的貌合神离吗？把心交给党，交给哪个党？没有人提出这个问题。当“热爱党”比“热爱共产党”显得更亲切，也绝不会引起“热爱哪个党”的误会时，我们就知道，那些“民主党派”已经行将就木了。

那天，天色阴晦，天安门城楼上空无一人，既没有悬挂红色的宫灯也没有迎风招展的红旗，更显得冷峻肃穆、深不可测。黄色琉璃瓦的房脊上落着几只乌黑的寒鸦，似乎在俯视着人间的喜怒哀乐。两边的观礼台静静地躺在那里，连一个可移动物体的影子也没有。东西长安街上稀稀拉拉的行人偶尔驻足张望，流露出难以名状的表情，说不出是同情，是可怜，是哀叹，是鄙视，还是不屑一顾。街边群众的表情或许就是当代中国民主党派的真实写照。噫吁兮，呜呼哀哉！

附注：

[1]七君子：救国会以亲共、亲苏著称，时常抨击蒋介石。1936年11月23日南京国民政府以“危害民国”罪逮捕了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史良、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等七位救国会的领导人。这七人都是知名的社会贤达，被捕后人们称之为“七君子”。他们在狱中各司其职，各守其业，邹韬奋继续撰写《经历》，王造时翻译拉斯基的《国家论》，章乃器写《救亡运动论》，沙千里写《七人之狱》，沈钧儒每日临池挥毫为上海法学院义务募款，李公朴手不释卷，史良在别处另居一室向在押女犯讲解法律知识、撰写文章。事件发生后，中国共产党发动社会各界人士营救。宋庆龄、何香凝、胡愈之等十六人要求入狱与沈钧儒等人一起坐监，给蒋介石加压。在诸多压力下国民政府于1937年7月31日将七人释放。

[2]苏日互不侵犯条约：1941年4月13苏联和日本在莫斯科签订《苏日中立条约》。条约共四条，第二条为：倘缔约国之一方成为一个或数个第三国敌对行动的对象时，则缔约国之他方，在冲突期间，即应始终遵守中立。条约所附《共同宣言》的内容为：苏日双方政府为保证两国和平与友好邦交起见，兹特郑重宣言，苏联誓当尊重“满洲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日本誓当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之

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当时中国正处在与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的艰难时节，这个条约起了什么作用，自当一目了然。国人略有微词，即斥之为“反苏”是为何故呢？

[3]旧政协：1946年1月10日—31日，政协会议在重庆召开。参加者有国民党代表8人，共产党代表7人，民主同盟代表9人，青年党代表5人，无党派人士9人，共38人。这次政治协商会议经过激烈的争论，通过了和平建国纲领、关于军事问题的协议、关于国民大会的协议、关于宪法草案问题的协议、关于改组政府的协议等五项协议。后由于国民党对民主宪政缺乏诚意，共产党坚持武装夺取政权，内战爆发，旧政协解体。

六、罗隆基持才傲物不识时变 储安平见微知著难得糊涂

罗隆基，江西安福人，生于1896年。1913年以江西省总分第一的成绩考入清华留美预备班。1919年“五四运动”时，罗隆基为学生领袖之一，因活动激烈，两次被追捕，于5月6日入狱，后被校方营救出狱。1921年赴美留学，先后入威斯康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政治学，后转入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师从著名学者拉斯基，获政治学博士学位。1928年回国后即任光华大学任教，并创办《新月》杂志担任主编，时常发表抨击国民党的言论和文章。“九一八事变”后，罗在上海各大学公开演讲，主张武力抗日。1932年罗隆基北上天津，任《益世报》社论主笔，兼任南开大学政治系教授。他在《益世报》上不断发表言辞激烈的社论，如《一国三公僵政局》、《可以战矣》、《再论对日方针》、《剿共胜利不算光荣》、《攘外即可安内》等，批评政府对日方针。抗战期间，罗隆基转移至大后方，积极参加发起创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支持中国共产党，谴责国民党。抗战胜利后罗隆基全力从事民主运动，他在重庆、南京和上海期间，与周恩来、董必武等来往甚密，在重大问题上和中国共产党密切合作，为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同国民党进行斗争。1949年9月，他以中国民主同盟代表的身份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为新中国的建立作出了贡献。建国后，罗隆基历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委员、森林工业部部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世界和平大会宣传部长，民盟中央副主席等职。1957年反右运动中，被划为右派。1958年1月26日，民盟中央宣布撤消罗隆基民盟中央副主席职务，31日，撤消全国人大代表资格，同时国务院撤消其森林工业部部长职务。从此淡出政治舞台。1965年12月7日子夜，罗隆基因心脏病突发，孑然一身猝然离开人世。他没有妻子，没有子女。他死去的时候，头上还戴着“右派分子”帽子，没有举办追悼会。

1986年10月24日，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在全国政协礼堂三楼大厅隆重纪念罗隆基先生90周年诞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盟中央代主席楚图南讲述了罗隆基的生平事迹。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统战部部长阎明复在会上追述了罗隆基先生的一生，热忱肯定了罗隆基先生的革命贡献，认为他是知名的爱国民主人士和政治活动家。罗隆基的主要著作有《人权论集》、《政治论文集》和《斥美帝国务卿艾奇逊》等。

1957年，罗隆基多次应中共中央统战部之邀请，参加座谈会。既然中共开展整风运动，又竭诚地欢迎民主人士提批评意见，罗隆基如约而至。罗隆基早就对声势浩大、席卷全国的“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持怀疑态度，他对朋友说过：“胡风会是反革命？我不相信！”。他还对“肃反”、“三反”、

“五反”运动中的过左行为有不同看法。于是在 1957 年 5 月 22 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民主党派负责人第九次座谈会上,或者说在毛泽东 5 月 15 日向中共高层下达反右部署一周以后,这位已经被中共中央列为重点整肃对象、自己却还蒙在鼓里的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发言了。

以下是《人民日报》关于罗隆基发言的报道:

他谈到顾虑与保证问题,他说:为了鼓励大家“鸣”“放”,并保证“鸣”“放”得好,我觉得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政协可以成立一个有共产党、民主党派的成员和其他方面人士参加的委员会,以检查过去三反、五反和肃反工作中的偏差,并鼓励受委屈的人士向这个委员会申诉。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指示过,由人大常委和政协常委成立一个机构来检查肃反偏差。他拥护这主张。他说,成立这么一个委员会有三大好处:

一、可以鼓励有意见的人向委员会申诉。地方上的一些知识分子都希望有说话的地方,并且希望“条条道路通北京”,认为有意见传到北京,就是“上情下达”。因此,有了这个委员会,就可以使有委屈的人不至于没地方申诉。

二、可以更好地做好平反工作。王昆仑先生说,现在有人以为今天的“鸣”“放”是三部曲:放、收、整。其实这不外是经验主义者错误的主观主义设想出来的公式。过去许多大运动造成一些隔阂。过去的运动都有平反工作。不过,过去的平反工作往往是:人民代表大会把意见转给地方,地方又将意见转给有关单位领导的组织去处理。这样就很难做到“有错必纠”了。如果成立了这么一个委员会,那就可以将平反的机构和“三反”、“五反”、“肃反”的机构分开来。过去的运动是共产党领导的,今天平反有各民主党派人士参加,那就更有利于做平反工作。

三、在“鸣”、“放”中,就有人有顾虑。谁也不敢保证,对“放”与“鸣”绝对不会有人打击报复。有了这个委员会,受到打击报复的人就可以直接向委员会控诉。这样,有报复思想的人就害怕,真的受到报复的人也有路可走。

这样的委员会,中央有,地方也应该有,而且中央可以领导地方的这样的委员会;全国有这么样的有系统的机构,一定能够保证“鸣”“放”得好。我这个仅是建议,很不成熟,不知道是否妥当。(以上报道刊登于 1957 年 5 月 23 日《人民日报》)

毛泽东 1957 年 2 月 27 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即:“我们希望肃反中的这些毛病要加以纠正,最近中共中央已采取步骤要纠正这些缺点。我们提议今、明年,如果时间来得及,今年搞得好,今年就可以搞完,来一个大检查,全面检查一次,总结经验。中央由人大常委会、政协主持,地方由省市人民委员会和政协主持,个别的检查不见得很有效力的。”

罗隆基在统战部召开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的发言是顺着毛泽东上述讲话的内容说的,完全没有取共产党而代之的想法。各位读者仔细地看一看,罗隆基建议的“平反委员会”有攻击党的痕迹吗?有取消党的领导意图吗?然而在 1957 年,却被毛泽东钦定为三大右派言论之一,被定为全国第二号“右派分子”,昔日中共的盟友遭到了致命的打击。

1957 年,罗隆基善意的建议遭到了恶意的批判,乃至以后的文革期间冤狱遍于国中,暴政横行无忌。直接受冤枉者约二千万人,间接受影响者高达一亿人(叶剑英语)。

历史证明了罗隆基关于胡风问题的见解是完全正确的。历史证明了罗隆基关于“平反委员会”的建议是十分有益的。然而在1957年的中国，这却都成了罪状。

1957年，毛泽东还坐在屋子里臆造了一个“章罗同盟”。他说：“整个春季，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其源盖出于章罗同盟”。

章伯钧与罗隆基虽同为中国人民民主同盟领导人，但观念多有不同、作风相差甚远，这是由来已久、众人皆知的事实。然而就凭毛泽东一句话，便陡然冒出来一个“章罗同盟”。

7月1日，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文中，在批判该报为资产阶级右派充当“喉舌”的同时，指责中国人民民主同盟和中国农工民主党“在百家争鸣过程和整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恶劣。”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的，都是自外于人民，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

章伯钧读后说：“我这次讲话（指5月21日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帮助中共整风提意见的座谈会上的发言）是上了大当。”并从文笔、语调、气势上一口断定，这篇社论必为毛泽东所书。

罗隆基读罢，也沉不住气了，最受不了的一个名词，就是“章罗联盟”。他两次跑到章伯钧家，质问道：“伯钧，凭什么说我俩搞联盟？”

章伯钧答：“我也不知道，我无法回答你。”

罗隆基为了表达愤懑之气与决绝之心，平素不持手杖的他，在第二次去章伯钧家的时候，特意带上一根细木手杖，进门便怒颜相对，厉言相加，所有的话都是站在客厅中央讲的，整座院子都能听见咆哮之声。章伯钧只有沉默。因为“章罗联盟”之于他，也是最最不能理解和万万不能接受的。

临走时，发指眦裂的罗隆基，高喊：“章伯钧，我告诉你，从前，我没有和你联盟！现在，我没有和你联盟！今后，也永远不会和你联盟！”遂以手杖击地，折成三段，抛在章伯钧的面前，拂袖而去。这就是毛泽东所谓的章罗同盟。

在《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一文中毛泽东还说：“严重的是《文汇报》编辑部，这个编辑部是该报闹资产阶级方向期间挂帅印的，包袱沉重，不易解脱。帅上有帅，攻之者说有，辩之者说无；并且指名道姓，说是章罗同盟中的罗隆基。两帅之间还有一帅，就是《文汇报》驻京办事处负责人浦熙修，是一位能干的女将。人们说：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就是文汇报的这样一个民盟右派系统”。在这里，毛泽东又凭空捏造了一个“右派系统”。

实际上，文汇报并不存在一个“民盟右派系统”。

在整风运动开始之前，《文汇报》总编辑徐铸成因得到毛泽东的表扬，破格以非党人士担任中国新闻界访苏代表团团长，3月27日出国，5月9日才回国。浦熙修作为人大代表，于4月15日去黑龙江考察，5月20日方回京，整理材料一个星期，27日才到报社工作。罗隆基随同郭沫若于6月3日到斯里兰卡参加世界和平理事会去了，6月22日才回到北京。即使他们三个人要在《文汇报》搞一个右派系统，时间也不允许。那时候还没有手机，无从通讯联系。他们6月下旬才回到北京，其时反右号角已经吹得震天价响，章伯钧、罗隆基和浦熙修、徐铸成就只有在众目睽睽之下做检讨的份儿了。

然而，嘴巴上高叫“实事求是”，高叫“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的毛泽东，却一口咬定“章罗同盟”和“民盟的右派系统”，直到他死了以后才澄清事实，确认“章罗同盟”为莫须有，用把章伯钧等人的骨灰移放到八宝山的方式遮掩了毛泽东的无耻谎言。

储安平，江苏宜兴人，生于1909年。1928年入光华大学政治系，1932年毕业。1935年留学英国，入伦敦大学经济学院政治系，师从拉斯基教授。1938年归国，到《中央日报》任主笔兼国际版编辑，其后到中央政治学校研究院任研究员。1941年，到湘西“国立兰田师范学院”教英国史和世界政治概论。1945年抗战胜利，随学校内迁到重庆，自11月始主编《客观》周刊。1946年，任上海复旦大学教授，同年9月1日出版《观察》期刊。《观察》刊载的文章多以精英知识分子放言论事，以犀利的笔锋，对政治、军事、经济的焦点问题作了尽可能客观的报道和评论，抨击国民党的弊端，时局艰危亦不避让，自许“实亦因为今日国家这仅有的一点正气，却寄托在我们肩上，虽然刀枪环绕，亦不能不冒为之”。1948年12月24日《观察》被国民党查封。1949年11月，《观察》正式复刊，依旧由他主编。1950年5月16日，《观察》终刊。储安平随后任《新华书店》总店副总经理。1952年，改任中央出版总署发行局副局长。1957年4月1日，出任《光明日报》总编辑。1957年6月1日，在统战部召开的整风座谈会上发表《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见》的发言，即“党天下”，从此成为中国第三号大右派。1966年10月，储安平失踪[1]。

1957年，储安平在6月1日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做了“党天下”的发言。

对此，他事后有一个交代：“解放以后，一般来说，我很少在外面说话。九三学社、作家协会来邀，都未发言，多少采取逃避的态度。一则我对发言的积极性不高，二则我也没有什么具体的问题要谈。所以统战部座谈会开得很久，我一直没有去。”

五月末，座谈会已接近尾声，中共中央统战部查对预置在阴谋网中的重要民主人士名单，发现这位九三学社和民主同盟的双重会员、新任《光明日报》总编辑尚未发言，似成漏网之鱼。于是，在5月30日至少两次电话给储安平，急切邀请他参加会议，并恳请他务必在6月1日的座谈会上发一次言。储安平碍难推脱，只得惟命是从，5月31日上午还在报社工作，下午在家写发言稿。他是做了书面准备的，6月1日在中共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照本宣科，第二天《人民日报》立即报道，基本全文刊载了储安平的发言，题目是《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

储安平说：“解放以后，知识分子都热烈拥护党，接受党的领导，但是这几年来党群关系不好，而且成为目前我国政治生活中急需调整的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的关键究竟何在？据我看来，关键在‘党天下’这个思想问题上。”

储安平认为，“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忘了自己也还是国家的主人。

“政党取得政权的主要目的是实现他的理想，推行他的政策。为了保证政策的贯彻，巩固已得的政权，党需要掌握国家机关中的某些枢纽，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

“但是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事无巨细，都要看党颜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

他认为，“在国家大政上，党外人士都心甘情愿跟着党走，但跟着党走，是因为党的理想伟大，政策正确，并不表示党外人士就没有自己的见解，就没有自尊心和对国家的责任感。”

“这几年来，很多党员的才能和他所担当的职务很不相称。既没有做好工作，使国家受到损害，又不能使人心服，加剧了党群关系的紧张，但其过失不在那些党员，而在党为什么要把不相称的党员安置在各种岗位上。”

“党这样做，是不是‘莫非王土’那样的思想，从而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

他认为，“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

“今天宗派主义突出，党群关系不好，是一个全国性的现象。”

“共产党是一个有高度组织纪律的党，对于这样一些全国性的缺点，和党中央的领导有没有关系？”

“最近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没有人提意见。”

“我现在想举一件例子，向毛主席和周总理请教。解放以前，我们听到毛主席倡议与党外人士组织联合政府。1949年开国以后，当时中央人民政府六个副主席中有三个党外人士，四个副总理中有两个党外人士，也还像个联合政府的样子，可是后来政府改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只有一位，原来中央人民政府的几个非党副主席，他们的椅子都搬到人大常委会去了，这且不说，现在国务院的副总理有十二位之多，其中没有一个非党人士，是不是非党人士中没有人可坐此交椅，或者没有一个人可以被培植来担任这样的职务？”

他说，“从团结党外人士、团结全国的愿望出发，考虑到国内和国际上的观感，这样的安排是不是还可以研究？”

他认为，“只要有党和非党的存在，就有党和非党的矛盾。”

“这种矛盾不可能完全消灭，但是处理得当，可以缓和到最大限度。”

“党外人士热烈欢迎这次党的整风。我们都愿意在党的领导下尽其一得之愚以期对国事有所贡献。”

“但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党的力量是这样强大，民主党派所能发挥的作用，毕竟有其限度，因而这种矛盾怎样缓和，党群关系怎样协调，以及今后党怎样更尊重党外人士的主人翁地位，在政治措施上怎样更宽容，更以德治人，使全国无论是才智之士抑或子子小民都能各得其所，这些问题，主要还是要由党来考虑解决。”（《人民日报》1957年6月2日）

储安平的这些话说得既深刻到位又很诚恳，即便今天读来也是忠直之言，智慧之言，字字珠玑，感人肺腑。所以当时当场博得一片喝彩，

马寅初、梁漱溟等人击节赞叹：大哉斯言！如果这样的言论是“右派”言论，那为了早日实现中国的进步，应该更多一些才好。

储安平的发一言一经《人民日报》公布，民众反响热烈，但愿中共能从其诤言中吸取营养，改善党群关系，提高领导艺术。倘能如此，既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也有利于调动各界人士的积极性。

然而，毛泽东看到储安平这个发言以后，却火爆三丈，认定“党天下”是大毒草。事实上，毛泽东本人不久前就承认过“党天下”，1957年1月27日他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说：“现在我们得了天下”（《毛泽东选集》第五卷353页）。这里的“我们”是谁呢？出席这个会议的没有一个非党人士，全是中共的高级领导人，省市自治区的党委书记，毛泽东在与会者面前称“我们”，毫无疑义，指的就是共产党。当时他想的就是党天下（1966年以后他想的就是“家天下”了），实行的也是党天下，却不敢承认，一旦有人点破，就百般抵赖，心里有什么鬼呢？其实，储安平当时的发言还没有完全点破，他给中共留足了面子，只说是“党群关系不好，关键在‘党天下’这个思想问题上”。

毛泽东在世时曾多次强调：“工农商学兵，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党指挥枪”，“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些话不就是“一切权力属于党”或者说“党天下”的注解吗？怎么出自储安平之口说的一点隐喻就成了恶毒攻击呢？

原来是因为储安平的一句实话，道明了一党专政的实质，撕裂了寡人独裁的伪装，掀开了“人民当家做主”的遮羞布。

储安平是著名报人，国民党时期创办《观察》周刊，以求真敢言名扬天下。

我们来看看储安平在蒋介石的“黑暗、独裁”统治时期有怎样的胆量和言论。

储安平极力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他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写道：

“我们要求终止一党专政。这种一党专政的终止，决不仅仅是一种形式上的终止，必须同时是一种精神上的终止。一党专政在精神上的主要特征和主要苦痛，是人民的各种基本公民权利没有保障。人民的基本公民权利包括人身自由、居住自由、职业自由、财产自由、宗教自由、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及结社自由。其中人身自由尤为一切自由的基本。我们所以要求上述各种基本的公民权利，仅仅是因为只有人民能获得上述的基本民权，人民的智慧的、道德的、身体的能力，始能作充分优性的发展，以充实国家的生命，培养社会的活力，提高政治的道德，促进文化的进步；从而产生合理的政治活动和安定的社会秩序。”

储安平还公开指责国民党政权是罪恶的缺德的：

他写道：“若从历史的眼光看，这个前後统治了中国二十年的政府，实实在在耽误了中国的国运，它阻碍中国的进步。”“现政权最大最不能宽恕的罪恶，就是由於它的缺德的统治，大大的促成了中国人民道德的堕落。在这个政府的作风和统治之下，一切不守法的、不道德的、没有良心人格的人，都比一般奉公守法洁身自好的人，容易生活下去。在这个政府的作风和治理下，除了极少数坚贞的人物，仍能保持他们的人品、意趣和工作理想之外，大多数人都已趋於取巧、投机、幸进、不守信用、不负责任、不讲公道、强凶霸道、为劣作恶。在这种混乱的情形

之下，大家已失去了生活的目标，失去了努力的自信，失去了一切崇高的理想，结果是人的品格愈降愈低，社会的风气愈来愈坏。”

储安平公开宣称国民党必败；

他尖锐地指出：国民党执政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他所采用以维护其政权的方法；只此一着，毁坏全局。政党要获取政权，原为题中必有之义：在野的要想法获取政权，在朝的要维护其既得的政权；中外古今，无有例外。欧美的政党都是以政绩来维护政权，无论内政外交、经济文化，执政当局总是处处为国家前途着想，时时替人民的福利打算。只要政绩良好，人民自然拥护政府，政权自然不会动摇。这是一条积极的以政绩来维护政权的道路。相反，国民党走的是一条消极的只知道加强政治控制来维护既得政权的死路。历观往史，没有一个政府能够不顾人民而犹能长久维持其政权者。不顾人民苦乐的政府，必然失去人心；不为人民福利打算的施政，必然不能使国家社会得到健全的发展。……政绩腐败，人心怨愤；人心怨愤，政权动摇；政权动摇，执政者的控制势需加紧；压制越紧，反动更烈。如此回圈，互为因果，而终必全盘倾溃，不能收拾。”

储安平的这些文章直言仗义，饱含锋芒，对当时国民党的腐败与黑暗做了尖刻有力的批判，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好评，激发了热血青年反蒋的斗志，引起了当局的不满。

1948年底，国民党把《观察》周刊封了。

储安平应邀来到了宣称要实行联合政府、民主政治的“解放区”，满怀希望地投奔了“光明”。

储安平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上的讲话并不激烈，无非是说了些大实话。委婉地指出一些党的干部不称职，含蓄地埋怨中共说话不算话，建国之初承诺搞联合政府，之后却把政府中的非共产党人士挤出了政府。

这样的发言比起他在国民党时言论，要温和一百倍，属于善意的进谏和理性的责问。

但毛泽东不能接受和容忍这样的进谏和责问。在储安平发言后的第八天，毛泽东起草了《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党内指示。吹响了全国反右斗争进军号。储安平被打成大右派，是全国五十五万右派中最大的五个右派之一。随后他被撤职并送到郊县劳动改造。之后，妻离子散。

归根结蒂他只是一介书生，对社会虽有比较深刻的认识，但对毛泽东的伪善和阴险未能明辨，当别人在引蛇出洞时，他却自投罗网，竟以身殉，这不仅是知识分子的悲剧，也是中国的悲剧。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储安平又被揪出批斗，饱受了红卫兵的抄家、打骂、侮辱。被勒令每天打扫街道，作为一个有思想有尊严的知识分子，他选择了绝路，以死抗争。当时他只有五十七岁。

其实，“党天下”的说法并不是储安平的创造，“党天下”的原始发明人，是三十年代国民党统治时期的罗隆基。

三十年代罗隆基就用这个说法批评过国民党，“党在国上”这是那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最看不过的。

1930年2月10日出版的《新月》杂志刊载罗隆基的《我们要什么样的

政治制度》，文中写道：“国民党可以抄袭共产党的策略，把党放在国上，别的党又何尝不可抄国民党的策略，把党放在国上，秦始皇打到了天下，自己做皇帝。刘邦打到了天下，当然亦做皇帝。曹操、司马懿打到了天下，当然亦做皇帝。这就是‘家天下’的故事。国民党革命成功，可以说‘党在国上’，其它的党革命成功，当然亦可以说‘党在国上’。这当然成了持续不断的‘党天下’。”

在“党天下”的政治体制下，罗隆基必然要遭受“言论罪”的惩罚。1930年11月4日下午，罗隆基在吴淞中国公学教员休息室被上海市公安局派员抓捕，幸亏有胡适、蔡元培等人的多方营救，才于几个小时后被释放回家。

这次被捕，对心高气傲、才子风流的罗隆基造成精神刺激，并由此产生相应的逆反心理。罗隆基随后在自己主编的《新月》第3卷第3期上发表《我的被捕的经过与反感》一文，进一步发挥了他的“党天下”理论：“照这样看来，国家没有保障人权的根本大法，固为问题，已经公布之普通法律，政府和党员，不肯遵守，又为一问题。党员指挥军警，军警执行司法，这是政府和党员不守法的证据……一言以蔽之：‘党权高于国，党员高于法’，这是我们小民生命上最大的危险。这与法治的原则，根本相违背。”

好在当年的文化人可以自由流动，罗隆基随后便来到天津，担任《益世报》主笔，再后来又南开大学做兼职讲师并到北平晨报社担任社长。

1931年“九一八”事变期间，罗隆基在《沈阳事变》等一系列《益世报》社评中，对蒋介石及国民党政府进行猛烈抨击。

胡适日记中就留下了对于罗隆基的经典评估：“今晚看晚报，始知罗隆基主持社论的天津《益世报》。晚上罗君来，我们谈了两三个钟头。罗君自以为受国民党的压迫，故不能不感到凡反对国民党之运动总不免引起他的同情。此仍是不能划清公私界限。此是政论家之大忌。”

耐人寻味的是，罗隆基因“不明大体”而犯下的“政论家之大忌”，并没有报应在国民党执政时期，而是报应在了1957年中共发动的名为党内整风实则是反右派运动的陷阱之中。

罗隆基是公开指责国民党，概不遮拦地多次在民办刊物上用尖刻的言辞抨击党天下。储安平是在共产党主持召开的号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座谈会上委婉含蓄地发言：他认为党群关系不好的“关键在‘党天下’这个思想问题上。”是非轻重一目了然。毛泽东听到了“党天下”三个字就恨之入骨，暴跳如雷，必欲置其于死地的缘由究竟是什么呢？

附注：

[1]储安平的发妻是端木露茜，二人相识于光华大学，后偕同赴英国留学。储学政治经济学，端木学教育学。婚后共同生活了十年，育有四个孩子，望英、望德、望瑞（女儿）和望华。后因性格差异，于1944年离异。五十年代中期储安平与原籍上海的易吟先女士再婚（1957年储被打成“右派”后，易被迫离异，后来嫁给了原国民党将领宋希濂，1980年赴美国定居）。“反右”以后，储安平妻离子散，穷愁潦倒，先后在石景山等地监督劳动。“文革”爆发后，储安平遭受红卫兵和造反派的反复抄家。一位邻居鼓着勇气探看，只见储安平被一伙不明身份的红卫兵和造反派残酷毒打，奄奄一息，架拖而去，从此就再没有回来。接着“蹈海自杀”、“深山出家”的传言便纷纷扬扬，真假难辨了。

2015年5月19日储安平先生衣冠冢在江苏宜兴落成，墓园中高耸着一块“人

文之灵”石碑。参加祭奠者有“英雄献祭在国，魂兮归来在乡。于今唯留衣冠，何其悲也”的表述，催人泪下。但愿储先生在天之灵能有所感知。人们只能在感叹声中怀念这位执著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了。

七、陈铭枢坦诚诤谏率先上当 李济深俯首称臣卖友求荣

另一个遭惨重打击的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民革”源于国民党的分裂。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内部激烈分化，一部份号称左派的人士和与蒋介石素有芥蒂的人士为了争夺权利，打着反对蒋介石独裁政策和争取民主的旗帜，于1945年秋成立了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1946年春成立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等民主组织。1947年，国民党内各民主组织的领导人和一些民主人士先后到达香港，11月举行国民党民主派第一次代表大会。1948年1月在香港临时拼凑成立了一个组织，即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选举领导机构，中共早期秘密党员宋庆龄为名誉主席、李济深为主席。同时发表宣言，明确提出“推翻蒋介石卖国独裁政权，实现中国独立、民主与和平”。

1949年11月按照中共的旨意，又将“民革”、“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以及国民党其他左派人士合并成为“民革”。

它的成员大部分是国民党军政人员，政治经验丰富但有原罪之感。败军之将，不再言政。所以在鸣大放中谨言慎行，反右时，不易被抓住把柄，即使歪曲捏造也难于上纲上线。毛泽东有办法，叫做新账老账一起算。在算老账时，抹杀其功，夸大其过，甚至指功为罪。于是其头面人物都被扣上反共反人民的右派大帽子。毛泽东的真实意图是让民革及一切民主党派噤声，唯有俯首帖耳，任其摆布。

反右时民革最先被抛出的是陈铭枢。

陈铭枢(1890-1965)，广东合浦人，早年参加同盟会，武昌起义时随宋教仁攻打南京，失败后赴日本求学。陈是国民党内有名的儒将和诗人，又兼具佛学家的身份，别号真如居士。1925年2月奉命东征陈炯明、10月率部南征，收复广东茂名、合浦等地。1926年7月率第10师北伐，与独立团一道攻占汀泗桥、贺胜桥，参加攻打武昌战役，因战功显赫被称为“铁军”。1929年奉命赴江西围剿红军，1931年任江西剿共右翼军总司令，因剿共不力被蒋介石调离。1932年任京沪卫戍司令，爱国将领蔡廷锴、蒋光鼐皆其部下，统辖十九路军进行“一二八”淞沪之战，给日军以重创，敌方死伤累万，迫使日军三易其帅，十九路军由此声名大振。1933年与李济深等人发动“闽变”，在福州成立中华共和国革命政府，谋求与中共在江西建立的苏维埃合作，共同反蒋。失败后去香港组织反蒋同盟。1936年赞同中国共产党发布的《八一宣言》，继续进行团结各党派抗日救国活动，同年游欧洲。1937年抗战爆发回国参战，蒋介石只给他上将头衔不予军权，任国民政府军委会参议虚职。战后他拒绝剿共，出走欧洲，随即与共产党积极合作。三年内战期间，不顾个人安危，参与策反陈仪、程潜、陈瑞河、赵祖康等起义。1949年出席了第一届政协会议，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和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常委等职。

1957年5月8日，中共中央统战部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举行座谈会。在座谈会上，大家发言踊跃，陈铭枢听了别人的讲话后，想到前几天在社会主义学院听到章伯钧在民盟传达关于毛主席对学校中党委制的意见，又从报上看到有人曾提议撤销学校中的党委制，随之，他依据自

已视察高校的经验，发表了个人看法。他认为，当前学校的领导多半是靠党、团、工会这“一条鞭”进行工作，值得研究。他认为今后应该更多地依靠教师和学生。他谨慎地表示，学校中党委制，今后也应该从多方面进行考虑。他说，机关中的党组和学校中的党委制有很大区别，党组今后仍然应该存在。他严肃认真地写了《向非党人士求师求友》一文，交《人民日报》于5月12日发表，希望中共能更好地信任党外人士，给他们创造更多的发挥自己作用的机会。

5月16日，他在统战部座谈会上听到有人认为“只提缺点，怕影响干部情绪”的说法，又表示不同意见。他说：“从延安整风以来，以至这次整风，党与非党人士所提出的批评，都谈缺点，没有谈优点，这是符合党的整风精神的。我认为这是好现象。”5月17日，《人民日报》以陈铭枢说：“只谈缺点不谈优点才符合整风精神”的黑体小标题，刊登了他的发言。跛脚将军哪里知道此时他已经入瓮。

进入六月，反右运动开始，矛头直指陈铭枢。北伐、反蒋、抗日、亲共、策反等功绩统统不提了，只攻其“剿共”，打成右派就成为手到擒拿的事了。据民革1957年12月编印的《揭露批判右派分子陈铭枢反党言行大会发言汇集》记载，当时的民革主席李济深严词训斥陈铭枢，称其为企图篡夺民革中央领导、集反动之大成的右派巨魁。民革中央委员、1925年即加入中共的屈武以《驳斥陈铭枢给毛主席的信》为题，揭露其新罪。陈铭枢自然是在劫难逃了。

陈铭枢之所以成为民革中首当其冲的右派分子，缘起于毛泽东“退位”之说。

1957年4月30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约见民主党派人士谈整风问题，座谈即将结束时他说：明年二届人大，一定辞去国家主席，减少一部分工作，以便集中精力研究一些问题。并说：要透点消息出去，否则老百姓不了解。（《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673页）。对此，中共党内反应谨慎，与会人员莫名其妙，未敢表态。

精于世故的黄炎培、陈叔通，第二天即致信刘少奇、周恩来，信中除对毛泽东大加赞颂以外，还说了许多毛泽东最想听到的话：“昨毛主席于会议上最后提到下届选举主席不提毛主席的名，并嘱我们透露消息。我们两个人意见：不说拥戴的空话，而要从我们国家的现实着想。”“台湾尚未解放，国际两大阵营尚在剧烈斗争的时候。在此期间，最高领导人还是不变动为好。”“集体领导中突出的个人威信，仍是维系全国人民的重要一环。”“此事关系重大，应请先由党、政府慎重考虑，暂不透露。特以密陈。”

四天之后，毛泽东对此信加了批注，重申不连任国家主席的意见，并要求将此信及批注印发中共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党的八大代表，各省市区党委，全国人大代表及政协委员。这哪里是“透点消息”，显然是广而告之。司马昭之心也。

当日没有登上天安门城楼的民革中常委陈铭枢，5月15日听到传达，对毛泽东透露出的不再连任国家主席之说信以为真，在鸣放气氛高涨的形势下，极为兴奋，对毛泽东十分钦佩，决意效法古人，上书诤谏。5月18日急就一信，拟择黄道吉日上书陈事。

信中说：昨在民革中央听到传达您4月30日讲话中有将于明年大选时辞去主席职务一节，初觉突然，旋思以乃至美至喜之事。非目光烁射俯察寰区，

照见未来者，决不足以有此。……目前党中央领导核心空前团结，政权在握，内外翕和，党内济济多士，全国亦不乏上驷之才，革命大业，来日方长。您乘时引退，率天下以谦让，矫末俗之竞奔，开贤路以待后起，留有余以补不足。此天下之至公，大智、大勇、大仁之所为也。华盛顿以开国元首，当国八年即行引退，卒奠定了美国的资本主义世界，今历史家尤乐道之。您所建造的伟绩以及此项出乎此类、拔乎其萃的智举，所含意义之深且广，华盛顿瞠乎其后者矣。

您此一举，不仅打破个人崇拜，树立世界高洁宏大的风范，对于百千万党与非党干部，亦能使之发扬蹈厉，知所警惕。特别对非党人士之享高位，尤斤斤于名位得失者，知有所懔，风行革化，拭目可待……

信中对毛泽东也有所批评。他指出毛泽东在个人修养上“热而不淡，疾而不舒，躁而难宁，察而难周”难免影响到察人听言、决策定计的睿断，以及在政策措施上“畸轻畸重、失缓失急。”他批评毛泽东所接触的党外人士，“……我素稔您乐于与非党人士接触，这是难能可贵的。但我从旁观察，所常接触者，仍多趋附之辈，耿介不苟者实属寥寥。至于能犯颜敢谏者，我尚未见其人。”希望毛泽东“深入体察，以求究竟”。他还说“建国后，党为化敌为友，对来自旧中国的某些人士，使用多从效用出发，很少兼及其品格与能力的遴选，以次拔擢，累累若若，闾茸满目，修洁潜光。至于贪天之功者有之，不虞之誉者有之，争名猎位禄蠹充斥。以至党内有不平之气，党外啧有烦言，尤其甚者，新社会风貌受其玷污，工农干部受其影响，青年学生蒙其毒害。此种世俗之见，虽由来已久，但以革命作幌子，包藏卑媚，相将成风，尤足殷虑。……”

他批评毛泽东“有时尚不免为喜怒所乘，在一个浪潮之下，轻易挫伤高级干部的自尊心和他们的固有地位。有时被狡黠者乘您喜怒之际，俟隙淆乱黑白，投其所好。”“有时候尚不免轻信干部的虚伪汇报与教条主义的分析方法，未经郑重细致的研究，即作过激的决定”等。

陈铭枢对毛泽东散布出来的不当下届国家主席的政治语言，作了完全错误的理解，以为毛泽东真的要从权力顶峰上引退，因而大为赞叹，希望毛泽东将国家大事托付给刘少奇、周恩来等人，“暂息仔肩，深入群众，体察民情，提高修养”，“为再度重任国家冲要准备”。信中还流露了对个人遭受冷落的不满说：“您那治病救人是有伟大感动力的，不知道感动了多少阶级敌人把他们变成热爱您的知心朋友了，为什么我一个人始终争取不到您的治疗呢？安心把我关在门外，加重我的病痛呢？”

此信并未发出，只在极少数“挚友”中征求意见，以求更臻完美。民革成员屈武是陈铭枢的“挚友”之一，看到这封信后，没有提意见，却来了个公然揭露，其时恰值反右高潮，众皆哗然，信稿成了犯上作乱的罪证。1957年7月15日《人民日报》第二版发文：《陈铭枢公然诬蔑毛主席》，说他“狂妄无耻”、“是一个包藏祸心、丧心病狂、忘恩负义的反动份子。”陈铭枢被定为极右分子。跛脚将军有苦难言，由此胸含鬱结，闷闷不乐，1965年病歿于北京。从此，陈铭枢这个人就在政坛消失了。

毛泽东死了以后，陈铭枢于1979年获平反，据称恢复了名誉。

纵观陈铭枢的信稿（仅为信稿，曾在少数挚友中征求意见确认措辞是否得当，并未宣扬也未投寄），某些诤言虽显锋露芒，但确属真知灼见，是出于对毛泽东的崇敬与爱护，然而在1957年却被认定是大逆不道。毛泽东尚在世

时便对毛作如是批评，尤其直指毛欠缺政治修养，陈铭枢堪称胆大妄为第一人。

毛泽东多次号召“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但终其一生，牢牢地把持着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印把子，决不准任何人染指。

黄炎培、陈叔通的“劝留”上书，不呈给毛泽东而递交给刘少奇、周恩来，显有讽劝二位的深意，令刘、周无法开口，为毛预留发挥空间；而陈铭枢竟以“暂息仔肩，以国事付刘、周诸领导人物”直接向毛进言，偏要弄假成真，岂不惹火烧身。

以国士诤臣自命，企望明主以师友待之，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通病。殊不知他们心目中的明主，是个实实在在的昏君，地地道道的暴君。

对不连任“期期以为未可”的黄炎培、陈叔通深随圣意，承蒙眷顾。“反右”大战前夜（1957年6月5日）受到毛泽东召见，面授机宜，让他们围剿钦定的右派分子章乃器、章伯钧和罗隆基。此二人违心受命，得以保全，安贵尊荣直到老死。（有关记载见《毛泽东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逢先知、金冲及主编）

轻信毛泽东，声称“退位”乃“至美至喜之事”的陈铭枢，则戴上右派帽子贬职赋闲（仅保留全国政协委员）郁郁而终。

“真如居士”陈铭枢圆寂一年以后，毛泽东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后人庆幸佛法护佑陈铭枢逃过了那一场人间浩劫。

将并未发出、仅仅是征求意见稿作为检举材料以求恩宠的“挚友”屈武，文革中以“反革命”罪被投入秦城监狱关押了六年多，其妻子于芝秀、岳母高仲琳遭受冲击，先后逝世。因果报应，昭明著目，苍天有眼乎？

民革中常委陈铭枢率先落入网中，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是怎么躲过一劫的呢？

李济深（1885年—1959年），字任潮，广西苍梧人。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任教于黄埔军校，曾担任黄埔军校副校长。

北伐期间支持蒋介石，以后又多次反蒋，1933年曾于福建事变时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任政府主席。与地处江西的“中华苏维埃”签订《反蒋抗日军事协定》，谋求与“苏维埃”合作。福建事变失败后逃往香港。

1937年抗战伊始，蒋介石不计前嫌，撤销对李济深的通缉令，并任命李济深先后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战地党政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主任、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院长等职，还授予李济深陆军一级上将军衔。

抗战胜利后，李济深联络李章达、蔡廷锴等成立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并任主席。再次联络国民党内“民主人士”反对蒋介石。1947年3月9日，李济深在香港发表《对时局意见》，号召国民党内“每一个对国家负有责任感的人”勇敢地站出来“改正党内反动派的错误政策”。5月，国民党中央以“背叛党国”的罪名，将李济深第三次“永远开除党籍”，并下令“全国通缉”。

李济深脱离国民党后，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投奔共产党。

中国接管政权后，李济深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

1949年11月、1956年2月和1958年11月，在民革第二、三、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李济深均当选为民革中央主席。

1959年10月，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七十四岁。

1957年6月初，民革中央副主席龙云，常委黄绍竑、陈铭枢、谭惕吾相继被打成右派，反右的各路打手们欲壑难填，紧锣密鼓地收集材料，制造舆论，下一个猎物就是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他们要打一个“大老虎”。

民革大院里已经贴出了揭露李济深的大字报，右派帽子已经悬在李济深头顶上方，随时都有掉下来的可能。他感到山雨欲来又苦无计谋，终日处在惊恐状态之中，反右风暴吓得他茶不思，饭不香，日不安，夜不寐，惶惶不可终日。

李济深的儿子、女儿有一段回忆（见姜建、王庆华著《李济深与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一版）。部分摘录如下：

“在五七年反右派斗争的最高潮时期，有一段时间爸爸不到民革中央机关去了，整天在家愁眉不展，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思考问题。茶饭不香，吃得很少，晚上也睡不好。他考虑什么事，遇到了什么难题，从不对我们讲，我们也不敢问。但就在这种情况下，一天夜里，家里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说中央一位领导要找爸爸有事，请他乘车立即去中南海。爸爸不知道党中央找他有什么事，就像往常一样，立即起身乘车去了中南海。大约一个多小时，父亲回到家中，家里人都在等着他。回来后，他的脸色与刚去时大不相同了，笑嘻嘻地说，毛主席找他去谈了话。谈话内容他没有讲，但第二天就吩咐家里人去买北京烤鸭，准备加餐。中午，大家陪父亲一起吃饭，他喜笑颜开，情绪很好，完全改变了多日以来愁眉不展的状态。事后，我们从妈妈周月卿口中得知：这次毛主席找父亲，是因为知道有人要把他划为右派，故特地找他去，对他说，党中央不会这样做，要他放心。听说毛主席为此事还对有关人员发了脾气。毛主席说：‘在民革中，我就认李任潮（李济深的号），他不能动。’毛主席和父亲谈话后，民革中央的那些‘左’派对爸爸也改变了态度，再不敢把矛头对着爸爸了。”

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提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口号。同年9月，刘少奇在中共八大报告中正式宣布以“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作为共产党同民主党派关系的基本方针。

这个口号从字面上看意味着中共和各民主党派之间具有独立、平等的地位，不存在中共可以统辖民主党派的特权。一些诙谐幽默之士赞之曰：“长期共存，荣幸，荣幸；互相监督，岂敢，岂敢”。玩笑之言确乎是真实写照。

反右运动中，“动”谁，和“不动”谁，全凭毛泽东一句话！李济深反蒋反了几十年，蒋介石还能对他：“不计前嫌”封为陆军一级上将，投奔毛泽东以后，只能挂一个虚名，每逢运动都被吓得胆战心惊，惶惶乎如丧家之犬。

毛泽东为什么要保李济深呢？因为建国后在中共允许保留的八个民主党派中民革位序第一，民革是中共为点缀“宽仁厚德”“人民民主”留下来的“组织”，其成员是国民党旧军政人员，败军之将，岂敢言勇，赤手空拳，无兵无卒，政治资本已被剥光，对共产党已经没有丝毫威胁。李济深是民革主席，此时已经72岁，老态龙钟，步履蹒跚，眼花耳聋，发枯齿落，不会有什么作为了。但是民革影响犹在，台湾和海外还有大量国民党人，需要统战。毛泽东通常总是把“第一”保下来。例如，保一个荣毅仁，就意味着保住了国旗上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那颗星。保一个李济深，就保住了作为花瓶的民主党派，保住了统一战线。总不能把花瓶一下子都打烂吧，还需要装点门面呢。

李济深是反蒋的一面旗帜，他被国民党一大选为中央执委，他做过国民

革命军第四军军长，黄埔军校副校长，广东政府主席。后来因为反蒋，被蒋介石软禁于南京。1933年，他又参加了十九路军发动的福建事变，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这是在国难深重的“九一八事变”之后，继中共建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之后的第二个分裂国家的政权。这个谋朝篡位的政权甫才建立，就派代表到瑞金和中华苏维埃政府密商共同反蒋。这个分裂国家的政权虽然只存在了两个月即被蒋介石消灭，但在当时却明显地支持了共产党造反。所以反右时对他格外开恩，民革是要打倒的，民革的头子还是可供驱使的。

毛泽东没有给李济深戴右派帽子，李济深感激涕零，他要以行动表示忠心，为毛泽东效犬马之劳，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充当打手。于是不顾年老体衰，强逞精神，对民革副主席龙云、常委黄绍竑、陈铭枢等大加挞伐，乘人之危落井下石，这正是毛泽东对他网开一面的用意。

6月18日，民革中央开大会批判右派的反动言论。李济深第一个发言，他批评龙云怀疑苏联、污蔑苏联的谬论，是离开了社会主义立场。他声色俱厉地说：龙云伪装成爱国的面貌，扬言抗美援朝期间向苏联借的外债，应该延期二、三十年归还。龙云无视苏联对我国的巨大援助，提出了所谓苏联从我国东北拆走机器的问题，恶意地污蔑苏联，实属反动透顶。

民革中央召开批判黄绍竑的大会时。李济深还是第一个发言，他说：黄绍竑对中国人民的伟大成就，从来不是欢欣鼓舞，而是找岔子，给党和政府抹黑脸。李济深“怒不可遏”地说：大量事实证明，黄绍竑是有纲领、有计划进行阴谋活动的右派头子。他的纲领，旨在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破坏民族团结，推翻社会主义制度。黄绍竑和广东右派分子罗翼群，在肃反问题和农民问题上向共产党和人民进攻，北呼南应。企图把人民的天下搞乱，使反革命分子复辟。

李济深在批判陈铭枢的大会上说，右派分子陈铭枢为了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和反对社会主义，制定了一套向共产党进攻的纲领，妄图使资本主义复辟和使反革命统治者卷土重来。他为了推销他的反动纲领，到处拉拢落后分子，组织败类，从事种种阴谋活动，并且企图篡夺民革中央领导，控制民革地方组织。他是一个口是心非、造谣生事的右派阴谋家。他采取两面派手法向共产党进行恶毒的攻击。

龙云、黄绍竑、陈铭枢和李济深都是国民政府的军政要员，曾经反蒋的斗士，生死相依几十年，堪称战友和同志。他难道真是认为“黄绍竑是有纲领、有计划进行阴谋活动的右派头子。他的纲领，旨在推翻共产党的领导……”、陈铭枢是“卑鄙无耻的政治野心家”吗？虽说这是逢场作戏，演给毛泽东看的，但是七十几岁的李济深老先生也是民国时期的头面人物，当着众多昔日部下的面，色厉内荏地揭露以往的挚友，采取无中生有，无限上纲的手法，戴帽子，打棍子，妄加罪名，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的精彩表演，未必不是一场出卖灵魂的丑表功。

李济深反蒋通共几十年，又处在八个民主党派第一党主席的地位，连自身的安全都要依靠执政党的主席高抬贵手，都要依靠充当毛泽东的打手自保，又遑论其余的人们！毛泽东坐在中南海菊香书屋的躺椅上，看几只恶犬狂吠，不免流露几丝微笑。

八、毛泽东睚眦必报，张东荪三代蒙冤

前回书说到，北平“和平解放”以后，张东荪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费孝通教授和燕京大学政治系主任严景耀教授，燕京大学社会学系雷洁琼教授等人，曾于1949年元月下旬应中共之邀到西柏坡会见毛泽东，与中共商谈民主党派参与未来政府之事。张东荪斗胆建议在外交上不宜“一边倒”。可以亲苏但也要联美，走中间道路，中国不能充当美苏两大国冲突的牺牲品。毛泽东当时就十分不悦，当年9月30日在怀仁堂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选举国家主席时，张东荪竟然对候选人毛泽东投了反对票，导致毛泽东未能全票当选。

张东荪，男，1886年生，知名政治学者，“中国民主同盟”成员，1949年时是燕京大学哲学系系主任，燕京大学取消后，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1968年1月从北京大学教工宿舍家中被“逮捕”的时候，已经82岁。他被抓走以后，他的家人五年中一直不知道他被关在哪里。直到1972年底，家人才知道他被关在北京远郊的“秦城”监狱。1973年6月，张东荪死在“秦城”监狱中。

文革期间，不但张东荪本人，还有他的儿孙，都经历了恐怖的遭遇。

当张东荪被逮捕并关入“秦城”的同时，他的大儿子、北京大学生物系教授张宗炳也被逮捕，并关押于“秦城”监狱。但是张宗炳和他的父亲互相并不知道他们都被关在同一监狱中。

张宗炳1914年7月17日出生在浙江杭州。1934年获燕京大学学士学位，1936年获研究生院硕士学位，1938年获美国康乃尔大学博士学位。1949年-1953年任北京大学生物系教授，兼任中国科学院昆虫研究所毒理室研究员以及农药学会顾问、浙江农业大学顾问教授等职。共发表180余篇论文，出版20余本专著，1968年被捕时是北京大学生物系教授。五年以后家人才知道他被关押在秦城监狱。探监后见他已精神错乱，经再三申请，当局始准予监外就医，入精神病院，逐渐治愈。毛泽东逝世后方得平反，恢复工作，1988年病逝。

张宗炳的妻子刘拙如，是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图书馆的职员。张宗炳被逮捕，刘拙如也因此在其单位中被“批判斗争”，并且被“扭送”到海淀公安局，她在那里被监禁了近一年。（“由革命群众扭送公安局”是当时流行的说法，是一种无需经过任何法律程序、由各单位的“革命群众组织”出面来捕人的办法，被广泛使用。）

“秦城”监狱位于北京郊区。这是一座司法部无权过问、直属于中共中央的特种监狱，不关押普通犯人，权力当局专门用这个监狱来关押一些地位较高或者名声很大的非刑事“罪犯”，也就是说，这是一座在法律之外的监狱。这座监狱修建并启用于文革以前，五十年代即先后关押饶漱石、潘汉年、扬帆等中共高层要犯。文革爆发后，秦城监狱成了政治斗争的重灾区，500余名高干及其亲属被关押，包括彭真、陆定一、薄一波、张闻天等人，还有当时的铁道部部长刘建章，北京市副市长刘仁，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以及刘少奇、陆定一、彭真的夫人王光美、严慰冰、张洁清等。为接纳走资派，秦城监狱进行了扩建，增盖了四百余间牢房。1968年，这座监狱关入了大量的共产党高级干部，包括文革以前督造这座监狱的公安部负责人冯基平。同时，“秦城”也关押了张东荪和张宗炳这样的“高级知识分子”。那里的人被逮捕和长期关押，不需要经过哪怕走形式的法律程序，也不用经过法院。

“秦城”监狱对被关押的人施行的肉体的和心理的折磨，和普通人被关的监狱略有不同，但是恶毒程度是一样的。关普通人的监狱非常拥挤，而且强

迫从事高强度体力劳动。在“秦城”，则把被关押者一个一个单独囚禁，数年里不能和人说话，不能和家人通信。

张东荪有三个儿子。和他一起被关进“秦城”监狱的是长子张宗炳。张宗炳大学毕业后，以第一名成绩考取当时的生物公费留学，到美国的康乃尔大学取得博士学位。朋友们都说他是绝顶聪明的人，流传着关于他的过人才智的有趣故事。1959年他提出了“黏虫迁飞系统”，解决了中国黏虫等病虫的来源问题。除了生物专业上的成就，他还会数门外国语，并且在诗词绘画书法上都很有造诣。他口才也好。因此，张宗炳和陈同度教授一起，文革前被认为是北京大学生物系讲课讲得最好最生动的两位教授。1980年代初他精神病愈后，在北京大学教公共课“普通生物学”，上百人来听课，能讲得台下掌声四起。但是，另一位和他一样受学生欢迎的生物教授陈同度，却已经在1968年8月28日，在文革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审查”和折磨，服毒自杀了。在北大生物系，还有两名教员和陈同度在同一年自杀。

张东荪的次子张宗燧1915年6月1日生于浙江杭州，十五岁时考入燕京大学物理系，次年转清华大学，1934年张宗燧年入清华研究院开始研究。1938年获英国剑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并先后去丹麦、瑞士进行科学研究。1939年回国并任重庆中央大学物理系教授。1945年以英国文化协会高级研究员身份赴英国剑桥大学进行科学研究。1947年赴美国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院、费城加尼基工业大学工作。五十年代回国，从事理论物理学研究，文革时是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张宗燧热爱祖国，解放前夕毅然回国，他热爱科学，刻苦钻研业务，在理论物理的研究和培养人才方面，贡献了自己的一生。张宗燧主要从事理论物理特别是统计物理、量子力学、量子电动力学和量子场论等方面的研究与教学工作。是中国较早从事量子场论研究的学者之一，30年代后期即进行量子场论方面的研究，在量子场论的形式体系的建立，特别是高阶微商、高自旋粒子的量子场论等方面很有创见，取得多项当时国际先进水平的研究成果。40年代后期，在理论的数学形式、洛伦兹群的表示、重正化理论、统计物理、层子模型等方面作了不少研究并取得多项重要成果。有《电动力学和狭义相对论》等专著。1945年，抗战胜利，受李约瑟博士推荐，张宗燧再次赴英工作，时年三十岁。1946-1947年间，他在剑桥完成四篇高水平的论文。他提出要在剑桥开课，狄拉克予以支持并安排他讲授场论，这是中国人第一次步上剑桥讲坛。有鉴于他在统计物理合作现象理论和建立量子场论形式体系的重要贡献，张宗燧在国际理论物理学界获得了很高的声誉，成为剑桥哲学学会会员，并被录入美国《世界名人录》(1950年版)。1953年，张宗燧回国后被安排到北京师范大学。在师大四年工作期间，教授理论力学、热力学、统计物理、量子力学等主要课程，在《物理学报》、《数学学报》和《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上发表论文九篇，为提高该校理论物理的教学和研究水平，作出了贡献。苏联专家来北师大举办理论物理进修班，校方安排张宗燧去做教学辅导答疑工作。张宗燧却向校方坦言，他一人即可承担全部进修课程，毋须烦劳苏联专家；校方大为震怒，不以中国有自信人才而高兴，反以“自高自大”的帽子予以打杀。幸好此位苏联专家早就知道宗燧的学术水准，而对宗燧敬重有加，不仅转荐宗燧开设较深的选修课程，并且让他指导学员的结业论文，两人精诚合作，相得益彰。

其间，又有波兰著名理论物理学家英菲尔德来访，要见张宗燧。当英菲尔德听说宗燧在师范大学任教，只讲授基础课程后，大呼浪费人才。张宗燧

毕生以国际一流水平鞭策自己，却很少言及治学的经验。他反对急功近利，惟以为心态平和，才能有所创见。他天赋甚高，却又深信熟能生巧，因此毕生勤奋有加，事事精益求精，遗有论文五十余篇和专著两册。张宗燧率真坦荡，既有科学的直觉，便无法苟且政治之歪曲。他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与西方的和苏联的学者，皆能相处，亦能较量。他在失望中过早离绝人世，但他的学识和成就，正直与冤屈，都将永远留在人们心中。1969年6月30日，张宗燧在单位中被关起来“审查”。在极左路线极度猖獗之际，一个极为自信的学者，竟堕入极度的失望之中，他在北京中关村中国科学院宿舍31楼服用过量安眠药自杀。结束了辉煌而又委屈的一生。年仅54岁。张东荪的三儿子张宗颖在大学里先学化学后来改学习社会学，1950年代初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被取消，他在天津市文化用品公司采购站做一般的职员工作。文革开始，张宗颖和其妻子吕乃朴遭到“斗争”后，一起服毒自杀。张宗颖死时46岁。

张宗炳的儿子张鹤慈，1963年时是北京师范学院学生。他与几个中学同学结社写诗和议论政治。他们的活动被公安部门发现，随即被逮捕。经过审讯关押后，张鹤慈被送往茶淀劳改农场“劳动教养”三年。三年期满后正逢“文革”，他又被加重处理：“戴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他在“劳改农场”一共待了16年。

张宗颖的儿子张佑慈，文革时在天津当工人，他的父母在1966年自杀后，他因“企图给父母报仇”等“反革命罪行”，被判刑15年。1978年张佑慈获“平反”被释放时，已经在监狱中被关了十多年。

就这样，在文革中，张东荪自己被关死在监狱中，他的三个儿子，两个自杀，一个被长期关押后精神失常。他的两个孙子被判重刑，长期监禁。

这样的遭遇听起来就象恐怖小说：一家人一个接一个地落入悲惨结局。张家人的遭遇和恐怖小说的不同之处，不在于恐怖的程度，而在于在小说中往往说出所有的恐怖的细节，那些细节却都出于虚构；对张家人来说，可怕的细节实实在在真真切切地发生过了，可是却从未被记述下来。文革中的事情，最真实的也是可怕的细节，往往被隐瞒了，或者被掩盖了。我们只是从这些词语：逮捕（不经过正常法律程序），秘密监狱（“秦城”），秘密关押，“由革命群众扭送公安机关”，精神失常，自杀，“劳动教养”，以“反革命罪”判刑，来了解这种恐怖的程度。其实，在相当程度上，连细节都未有机会说出的恐怖，是更加深重的恐怖，对千千万万的别的人有更大的恐吓和威慑作用。

另外的一个不同之处是，在恐怖小说里，制造恐怖的是一个或者几个坏人，是一种个人的行动，一般属于私仇。在张家的故事中，就其中的每一个个人的死来说，其中私仇的因素也许不可完全排除，但是使这一大家庭中那么多人都遭受陷害与荼毒，却是起因于毛泽东个人的睚眦必报。

1949年1月张东荪偕同费孝通、雷洁琼等民主人士应邀访问西柏坡时，曾对毛泽东的“一面倒”外交政策聊发议论，他认为新中国可以联苏但不宜与美国交恶。当时就引起过毛泽东的不满。1949年9月建国前夕，政治协商会议投票选举国家主席，与会代表576人，毛泽东以575票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未能以全票当选，心中颇为不悦，事后派人调查，原来是张东荪投了反对票，有人曾问及对张东荪应如何处理时，毛泽东言道：“在如来佛的掌心里”。于是就有了张东荪在思想改造运动中怎么检讨也过不了关，随即被民主同盟开除，后来又被冠以“敌特分子”之名，乃至逮捕关押在秦

城监狱直至死亡为止的惨剧。至此，我们应该进一步反思文革，认清文革各个阶段的目标和手段，以及文革得以产生的制度和根源。

文革要打击所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按照毛泽东的说法，因为知识分子的世界观是资产阶级的，所以他们就是资产阶级。），所以张东荪和他的儿子都被打击。文革要打击一切不同思想，所以张东荪的孙子遭到严厉处罚。文革封闭中国，国门紧锁，所以众多受害者无路可逃，只能逐个被整治，束手就擒。

张家所遭受的恐怖绝不只是针对他们一家的。和他们类似的人都遭受恐怖和迫害。“文革”对人的打击杀伤总量，由于缺乏记载和报道，更由于不准阅读档案资料，普通人很难对此进行统计。但是从了解到的局部情况，比如说一个家庭，我们可以看出打击杀伤的密度，从而也可能作出一些总量的估算和感受到文革大图景的基本概貌。（笔者注：本文主要取材于王友琴著《北大教授张东荪三代七人坐牢，四死一疯二重刑！》原载新浪微博）

九、龙云直言不讳难逃厄运 程潜明哲保身苟且偷安

民革中央副主席龙云（1884-1962），字志舟，彝族，祖籍四川金阳，生于云南昭通。1914年毕业于云南陆军讲武堂。1928年任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国民革命军第三十八军军长、国民革命军第十三路军总指挥。

龙云有一笔“反共”旧账，1935年红军一部进入云南时，龙云被蒋介石任命为剿共第二路军总司令。黔滇绥靖公署主任，指挥所部阻击途经云南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二方面军。但龙云与蒋介石素有芥蒂，对蒋的命令阳奉之，阴违之，并未刻意围剿，而是虚张声势，网开一面，意在使红军不在云南滞留，由此红军才得以脱身，辗转跑到了延安。到了1957年，龙云被旧账重提，命名为“反共老手”。

抗战期间，龙云主政云南并兼任陆军副总司令。龙云先后派遣滇军二十多万赴前线，参加了包括“台儿庄战役”等大小战役，伤亡十多万人，为抗战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

在后方，他积极支持和保护民主运动，允许中共在五华山设立电台。同意中共《新华日报》报社在昆明设立分处，发售《新华日报》和《群众》半月刊以及民盟机关报《民主周刊》。默许在昆明成立“中国民主青年同盟”、“民主工人同盟”、“新民主主义同盟”等亲共反蒋的组织，战时只有昆明这个城市，才有这样的“民主”运动，一时被誉为“民主堡垒”。

龙云对爱国民主运动持比较开明的态度，他自己也于1944年秘密加入民主同盟。龙云对云南的教育比较重视，除大力兴建扩展云南大学外，对抗战期间由外地迁往云南的学校如西南联大、中山大学、同济大学、中正医学院、华中大学等，均热情接待，不仅从经济上大力支持，还从政治、生活等各方面对广大师生予以关照。龙云保护了西南联大的部分教授，阻碍了中央政府代理人控制大学校园政治思想的措施。有人说：“西南联大在四川或其它蒋介石可以直接控制的地方，就不可能保持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原则，也不可能成为民主堡垒。”是符合实际的。

龙云还十分重视农业和交通建设。扩大粮食耕地，减轻税收，存粮积谷，力争粮食自给。抗战期间，军队和人口大批涌入，而云南粮食无缺，端赖于此。他积极倡导修建公路，短短几年修通了滇黔公路、滇康公路、川滇西路、滇川东路、滇桂公路、滇康公路。特别是后来修建的

滇缅公路，极大地支持了中国的抗日战争，也促进了云南的社会发展。

龙云素来与蒋介石貌合神离。1941年3月上旬，蒋介石派三青团组织处长康泽到昆明，企图抓捕反蒋亲共学生，遭到龙云抵制。1942年1月7日，西南联大学生发起讨孔（祥熙）游行，龙云又一次以“等因奉此”的公文旅行来应付，不采取实际行动。

1943年至1945年10月，中国共产党委派时任南方局宣传部长的华岗到云南与龙云联络，试图争取其支持中共，双方建立了长期的沟通。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卢汉率滇军抵越受降时，蒋介石命昆明防守司令部司令长官杜聿明围攻五华山，逼龙云下台，此次，结束了他18年的云南执政生涯。被软禁于南京。1948年9月，龙云在美国原驻华空军14航空队司令陈纳德的帮助和精心安排下，化装逃出南京，经广州去香港。

1949年8月13日，他与四十四位国民党同仁在香港发表声明，表示脱离国民党反动集团。宣布起义，拥护中共领导。

1950年1月30日龙云偕夫人顾映秋等离开香港北上，到达北京后，龙云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云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

1957年，龙云响应号召，于5月至7月在几次座谈会上发言，对中共在教育、土改、少数民族政策等方面提出了意见。他说：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土改搞得过急，使民族关系很紧张，个别地区还发生了民族叛乱。本是可以避免的，过左的政策造成了失误。

鸣放中他着重谈了中苏关系：

（1）抗美援朝战争的经费，全部由中国负担，不合理。

（2）第一、第二两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借款给盟国，又实施租借法案，后来他们有的赖了帐，有的美国不要他们还。苏联对我国借款，十几年都还不清，还要付利息。中国为社会主义而战，结果如此。

（3）苏军解放我国中国东北时，拆走了工厂中的一些许多机器，有无代价？偿还不偿还？

（4）我国援外预算太大，主张抓紧压缩对外的援助。

龙云素以直言不讳著称，他的发言并非毫无道理，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却被说成是“反苏”“反对社会主义”“反党”，“挑拨民族关系”等，被戴上右派帽子。

龙云所谈，都是事实。1954年中苏分歧已见端倪（见《毛泽东外交文选》第603页），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等中共要员对斯大林之暴虐残忍，意欲独霸共产世界之野心了如指掌，斯大林死了以后，毛泽东急切地想充任社会主义阵营的霸主，1956年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两论》，剑指苏共。由于毛泽东自知羽翼未丰，只能偶尔放放暗箭，不敢明目张胆地反苏，表面上还维系着“中苏友好”。于是龙云的言论就成了“毒草”，毛泽东一箭双雕，一是麻痹苏联以示友好，真正的目的则是借此将原国民党军政人员打入冷宫。

令人唏嘘的是，龙云晚年非常悲凉。建国后中共在1950年的镇反运动中，其子龙绳曾以叛乱之名被杀。反右运动中，龙云因批评时事被划为右派，抑郁寡欢，1962年在北京去世。

几年后，中苏公开翻脸，中共大骂苏联是社会帝国主义、大国沙文主义。毛泽东反苏是革命派，龙云对斯大林之贪婪暴政略有非议却被戴上了右派帽

子。实乃岂有此理！1962年龙云含恨病逝。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在石林上的题字也被刮掉。毛泽东死了四年以后，1980年7月龙云之右派奇冤才得以“改正”。其在石林上的题字又被镌刻于巨石之上。

民革还有一位副主席，反右中只受了一点虚惊，基本安然无恙，他就是程潜。

程潜(1882-1968)，字颂云，湖南醴陵人，清末秀才，同盟会会员，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毕业。辛亥革命后，曾任湘军都督府参谋长、非常大总统府陆军总长，广东大本营军政部部长。1920年孙中山第二次在广州发动护法运动时，被任命为陆军次长。七七事变后指挥平汉路抗日，1938年起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1940年调任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至抗战胜利。1949年8月，在长沙宣布起义，同年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湖南省省长、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副主席。1968年1月，程潜在家中摔成骨折后住进北京医院。4月9日由于肺炎引起大量出血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七岁。

程潜以老谋深算著称，长于明哲保身。

1948年，蒋介石已露败象，国民党内人心涣散。召开国民大会前，蒋介石邀请程潜参与第一届副总统竞选。竞选进入最后一轮，只剩下孙科、李宗仁、程潜三人角逐时，蒋介石劝程潜退出竞选，把自己的票转给孙科，程潜一气之下把票都给了李宗仁，成就了李代总统的金陵残梦，令蒋介石支持的孙科未能当选。

程潜放弃副总统竞选后随即回湘主政，任长沙绥靖公署主任，下辖湖南、江西两省。程潜回到湖南，立刻招兵买马，扩充实力，为最后时刻的选择增添筹码。

经过精细准备和仔细思量，1949年8月5日，率部在长沙起义。1949年，在中国鼎革之变的关键时刻，国内所有的政治势力都不得不做出抉择，尤其是那些既不是共产党，又不是蒋介石嫡系的人。在内战最后时刻，程潜毅然和平起义，作为一名军人、一个党国元老，那一定是个深思熟虑的艰难选择。

1949年8月30日，毛泽东亲自草拟电文发给程潜：“新政协召开在即，拟请颂公及仇亦山、陈子良出席，共商国事，倘能命驾，毋任欢迎。”程潜来北平，受到了中共高层的特殊礼遇。

9月9日，程潜乘坐的火车抵达北平，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林伯渠等到火车站迎接。在北平的前门火车站，毛泽东握住程潜的手说：“颂云兄，久违了，可好啊！”毛泽东亲自到火车站迎接的民主人士，一个是宋庆龄，另一个就是程潜。

1952年秋天，毛泽东特邀程潜到中南海划船，两人坐上游船，毛泽东要亲自为程潜执桨。程潜忙说：“使不得，你是国家元首，又年近花甲，怎么好你为我划船。”“哪里，哪里。你是国民党元老，又是我的老上级，家乡人，还分什么彼此，何况你已古稀之年，总不能叫你为我划船吧。”在影片《开国大典》中，毛泽东为程潜划船的故事被搬上银幕，广为流传。

1957年，毛泽东下决心反右，为此号召党外人士“大鸣大放”，帮助共产党“整风”。夏天，湖南省政协召开大会，许多人提了意见，大会秘书组整理的发言稿一件件都呈送给程潜审阅，他在上面的批示总是四个字——“留

存，送京。”

6月6日，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从北京打电话到长沙，说要派专机接程潜和湖南省副省长唐生智到北京参加整风座谈会。8日，专机飞抵北京，同一天的《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拉开了“反右”的序幕。

程潜回到北京东城宽街2号的寓所，刚进门就听门卫汇报“周总理来了”。这一次，周恩来特意把程潜的政治秘书杨慎之叫住，对他说：“孟潇的文章是你执笔的吧？”原来，1957年3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署名唐生智（字孟潇）的文章，实际上就是杨慎之代笔。这篇文章“左”得恰到好处，发表后反响如潮。周恩来接着说：“我们邀请颂公来北京参加座谈会，他年事已高，你多出点主意。”之后，周恩来和程潜在客厅里谈了一个多小时。两个人谈了什么，没人知道，但两人肯定是达成了某种默契。据杨慎之秘书回忆：周恩来走后，程潜就吩咐秘书写一篇发言稿，准备在第二天的民革中央全会上发言。在政治风云突变之际，程潜究竟怎么想的，谁都难以揣摩透。文章是秘书随“风”转舵的产品，也是这种默契的体现。

第二天，程潜在民革中央的会议上照稿宣读了这篇讲话。讲话中谈道：“要不要共产党领导？这本来不是一个问题。谁在今天还提出这样的问题，或者向共产党的领导权进攻，只表明他在政治上的幼稚无知和狂妄……且不说共产党的强大，且不说宪法规定了共产党对我们国家事务的领导权，退一万步，请问：不要共产党领导，谁来领导？……我们民革代表旧军政人员，其他的民主党派各代表一定阶层、阶级，这是中国政治历史形势和阶级力量对比决定的。”这番话后来被总结成“政治领导不能轮流坐庄”

当日，人民日报记者来访，说程潜将军的发言十分好，明天全文见报。中宣部部长陆定一的意思是以《民主党派何去何从？》为标题。这篇文章的发表，在当时敏感的政治气氛下产生了轰动性的效果，对“反右”运动产生了影响。后来，这“轮流坐庄”的罪名莫名其妙地安到了章伯钧头上。对于民革成员的遭遇，程潜看得很明白。1957年夏天，程星龄被打成右派，随后，湖南掀起了批判程星龄的高潮。中央统战部的负责人向程潜打招呼，程潜貌似处之泰然，可私下里却说：“程星龄是我族弟，蒋介石讨厌他，他和共产党联系多，曾身陷国民党囹圄，还是我借机保他出来。长沙和平起义，他参与谋划，功不可没。现在要打他成右派，这不是杀鸡儆猴吗？”在“城头变幻大王旗”的近代中国，人们不得不做出选择，而选择的前提是看得懂，洞穿一眼万里，回顾百年沧桑。很少有人在整个一生中能几起几落始终不被彻底打倒，程潜算是一个。

十、章乃器含垢忍耻刚正不阿 黄炎培饮泣吞声祸及子孙

抗日战争结束后，大后方民主运动蓬勃发展。以黄炎培为首的“中华职教社”和以胡厥文为代表的“迁川工厂联合会”，联合一些民族工商业者和文化教育界人士，于1945年12月16日在重庆白象街西南实业大厦内宣告成立民主建国会，其基本政治纲领是民主和建设。后经选举，黄炎培为主任委员，李烛尘、章乃器、南汉宸、胡厥文等为副主任委员。

1949年后，民主建国会列于中共认可的八个民主党派之中，就人数而言，民主建国会仅次于民盟，位列第二。鉴于民建成员多为资本家一类的中产阶级，毛泽东早在1925年就说过：“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应该把他当做我们的敌人，即现时非敌人也去敌人不远；其左翼可以把他当做我们的朋友，但不是真正的朋友，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不要让他乱了我们的阵线！”

1959年8月16日，在庐山召开的中共八届八中全会闭幕会上，毛泽东说：“我喜欢交几个右派朋友，同章士钊、黄炎培我都谈得来，有个比较；连右派都不知道，那怎么行。在中国社会做工作，没有几个右派朋友，我看你首先就不正确。”可见在毛泽东眼里，民建成员基本上是被视为右派的。民建主任黄炎培与毛泽东接触较多，黄炎培长于趋炎附势，且处事圆滑善于交友。反右运动爆发前夕，中共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听说黄炎培、胡子婴等从外地考察回来准备在座谈会上踊跃发言，恐其言多有失，曾让孙起孟婉转关照，叮嘱他们谨言慎行，由此，黄、胡二人未进入罗网。

章乃器则自持与中共长期交往，仗义疏财，且言直口快，自认为和中共是“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诤友，不料早已被毛泽东载入另册，1957年大祸临头。

章乃器（1897-1977）浙江青田人。1918年毕业于浙江商业学校，入银行当练习生，后逐步提拔到浙江实业银行副总经理。1927年冬，章乃器独立创办《新评论》半月刊，抨击国民党新军阀对内屠杀、对日妥协的政策。1929年春，国民党当局以“袒共”罪名，将《新评论》查禁。

其后数年中，章乃器不断发表文章，批评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主张“移剿共之师以抗日”、“非攘外无以安内。”

1935年与宋庆龄、沈钧儒等组织救国会，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1936年11月23日，国民党当局以“危害民国”的罪名，将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史良、沙千里逮捕，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这一事件激化了国民党内部的矛盾，诱发了“西安事变”。

1938年章乃器在安徽省任财政厅长之际，努力支援新四军，以统一财政的名义，每月补助新四军三万银元，并多次派人给新四军送去金鸡纳霜等大批急需药品。

1944年，在董必武建议下章乃器联络黄炎培、胡厥文和工商界知名人士和共同发起、组织、筹建“中国民主建国会”。成为中共盟友。

1947年国民党当局加紧了对民主人士的迫害，章乃器被迫流亡香港。他在港发表《乾纲重振》、《新的转捩点》等文章，表达了与国民党当局决裂、向往新中国的信念。

1948年5月，章乃器等民建在港理监事发表声明，支持中共召开新政协、建立新中国的政治主张。这一时期各民主党派在港共同发表的宣言文件，大部分是他起草的。年底，章接到毛泽东的电报，邀请他北上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当时他在香港创立的港九地产公司正蒸蒸日上。但他以国事为重，毅然束装北上，舍弃了个人的事业。

建国初期，章乃器被任命为粮食部部长。他还是全国工商联副主任，中国民主建国会副主席。

1957年，章乃器通过独立思考，对国家的民主和法制建设、新时期的阶级关系及个人崇拜等问题提出意见，被打为“右派”。

章乃器怎样攻击了中国共产党呢？请看《人民日报》的报道：

1957年5月31日章乃器在中国民主建国会全国工商改造辅导工作座谈会上发言说：现在公私合营企业问题严重，生产水平不如前，工作效率比过去还差，这是是非不明，轻才重党的许多不合理的人事制度造

下来的恶果。官僚主义，其害处比资本主义还要危险。何以有些社会主义企业的工作效率反不如现代化的资本主义企业呢？理由很简单，资本家除了要图利外，还有一种企业心。为了图利，为了搞好企业，他们自然要用人才。像我们现在某些企业暴露出来的偏差，在现代的资本主义企业中是很难存在的。因此对于资本主义生产上和经营上的经验和知识应该接受下来。工商业者现在已经没有剥削，定息也不是剥削，资产阶级带了生产资料进社会主义，比赤手空拳喊口号，贴标语的人还光荣。要给工商业者平等的人格，不是给几顶大帽子，不是“压服”而是“说服”的方法来帮助他们改造。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可怕的敌人，因资本主义在中国不可能复辟，但官僚主义时时刻刻会在人们思想中复辟。如果社会主义企业加上官僚主义，那么它的效率就将比资本主义企业低。我并不是留恋资本主义。但资本主义也有好有坏，我们应吸取对社会主义有益的东西。为什么有些社会主义企业经营得反而不如过去的现代化私营企业呢？这是因为资本家为了图利，善于选用人才，并且对人才的培养、提拔，还要尽量表示公平，不这样，他就很难和别人竞争。而社会主义企业却不能做到这点。只有作到是非分明，按功过提拔安排，才能真正发挥工商业者的积极性。（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6月2日）

章乃器对国营企业的批评，在二十余年之后的改革开放中得到了证实，他说的那些的确是国营企业的宿疾，是必须革除的弊病。而在当年却被黑白颠倒地说成是“反对社会主义”。

章乃器还说过：“思想改造工作要做的自然一些，不能粗暴，不要神秘，不要仅仅喊没有内容的抽象的口号，不要神化任何人。大家都是人，没有哪个是神，包括毛主席在内。毛主席就一贯反对把他神化起来”这段完全正确的发言，被扣上了“反对毛主席”的大帽子。毛泽东在1957年1月召开的党内高层会议上就曾恶狠狠地点名批判章乃器，1957年10月13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三次会议上还念念不忘心头之恨，还要声色俱厉地训斥、奚落章乃器一番。（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88、489页）

反右运动轰轰烈烈，在毛泽东的授意下，章乃器被列为重点攻击目标。他又是怎么表现的呢？

1957年6月8日的《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社论《这是为什么？》。同日，中共中央下达了党内指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反右派”斗争就从这一天正式开始。

当其他人已在冥思苦想如何逃脱劫难的时候，章乃器却要作反批评。他在6月10日工商界座谈会的书面发言中说：“在帮助党进行整风的时候，只要是根据事实，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完全可以不提优点，只提缺点，这是正常的；和党共事日久，说话不从‘拥护一番’说起，而是老老实实‘开门见山’地说，更是正常的。这都说不上什么‘脱离社会主义’或者‘脱离领导’”他批评少数人是乘机用贬低别人来抬高自己的方法，以求对自己有利，表现“惟我独忠”的姿态。他表示相信“整风运动是一定要进行到底的；共产党绝不做半途而废的事情。共产党代表了工人阶级忠诚老实的品质，是不会表面一套，里面一套的，不要怕扣帽子，更不要怕受打击，党是会明是非的，是非最后也一定会明的。”

在6月15日和17日民建、工商联常委联席会议上，他两度与人舌战，逐条反驳对他的批判。针对有人歪曲他的观点，他提出：“希望大家看看我的文章。批驳一个人的文章不要不看就来批判，不要认为是毒草就不看了，不要怕毒草，毒草也要先经过化验”。他强调：“我认为毛主席提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提出党整风，是个很英明的号召。过去由于有‘墙’有‘沟’，许多力量在互相防范，互相摩擦，互相戒备中抵消浪费掉了……如果在整风运动中，把‘墙’拆掉，把‘沟’填平，过去互相抵消的力量变成互相协作，共同为社会主义事业努力，我想，把社会主义事业加快三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的速度，是完全可能的。”

在当时的形势之下，根本不可能有平心静气的说理。章乃器引经据典的辩词，淹没在“这是两条路线斗争”“你要搞资本主义”“否定党的领导”之类的口号声和帽子堆中。

也许是对这种无意义的对峙感到孤寂，也许是预感到被推上祭坛的命运已定，而有了“一切放下”的悟性，他在会上说了这样的话：“有人要求民主党派轮流执政，我是不赞成的。假如由民主党派轮流执政，我从民建某些同志的行为来看，我是会被陷害的。”“我这人不勉强争取做左派，但是为了革命利益也不怕别人给我戴右派的帽子。”

有了上述悟性，章乃器的态度显得更加洒脱，仍然手持被视为他的标志的烟斗，在各种场合应付各种批判。

6月15日《光明日报》社召开紧急社务会议，批判社长章伯钧、总编辑储安平。该报当时是民主党派共有的报纸，各党派都有领导人担任社务委员。黄炎培是社务委员，过去是常常主动出席的，这次却临时把开会通知书转给了章乃器。章乃器也是社务委员，出席会议是分内之事，他坦然与会。

这时的章伯钧、储安平，已被中共孤立，芸芸众生避之惟恐不远，批之惟恐不痛，更不用说为他们辩护了。章乃器自己也是众叛亲离，却一反常态替他们二人说起话来了。他说：“储安平的言论（即《党天下》一文），从政治来看是不能说离开了社会主义的。他的动机还是为了国家好。”“并不是说对于毛主席和周总理，就不能提意见。毛主席和周总理他们本人是欢迎提意见的。但是可以写一封信或请派个人来谈一谈。”“公开发表可能伤害全党、党中央威信的言论，这一点，负责精神是不够的。应当很郑重。”

6月16日的第二次社务会议上，章乃器批评章伯钧：“我的宗兄主要是官僚主义。宗派主义还不显著，我看他是粗枝大叶，兼职也太多，管得太多，身兼两个党派的主席、副主席，又是政协、人大、交通部。也许党务管得细。《光明日报》和国务院的事，该打屁股。”“安平向你请教，恐怕你说话是相当随便，坦白，是好的，这恐怕给安平错觉，助长他错误思想的发展……。我的宗兄！你对国务会议很马虎，很少发言，很少研究，经常迟到早退，责任心不够。因此，你翻过来讲国务会议开得不好，不发扬民主、不深入细致，我不同意”。

章乃器在发言中谈了对整风的看法。他说：“我从前到外地视察，开座谈会，发现有几种人态度不正常。1.旧知识分子、旧人员；2.工商业者；3.没有民族关系的宗教界人士。这几种人，常察言观色，情绪不正常。因此，我感到过去几次大运动，是必需的，但遗留下来的副作用，

是严重的。这次整风中发现，有许多人已往看来庸庸碌碌，这次大鸣大放，发表的意见从理论到业务，头头是道，天才都发展出来了，我非常高兴。”

对于这次运动中的人际关系，他另有一番高论：“据我同医院接触，有两种病人特别多，一是神经衰弱，二是血压高。我想，在运动中，斗人者难免得这种病，被斗者更难免。所以我讲，现在阶级已经基本消灭，阶级特性也可以说已经基本消灭，大家是一致在向人类的共性过渡。不要没有人情味。人，不论党与非党、公方与私方，应该互信……。我想，在自己的思想未通之前，应该心安理得，轻松地愉快地考虑。因为问心无愧，何必惊惶？希望在整风中，批评者、被批评者都本着和风细雨的精神。”

章乃器呼唤和风细雨，迎接他的却是雷电冰雹。6月18日，即座谈会之后两天，民建中常会撤销了他的《光明日报》社务委员职务，19日民建、工商联又通过决议，停止他在两会的一切职务，一场围剿式的大批判铺天盖地而来。

6月20日，民建的两位处长奉命来家中与章乃器谈话，要他作检讨。章乃器回答说：现在要我检讨，我只有反批评。但他仍表示，粮食部的业务工作我还是继续干。我准备给国务院写报告，要求检查我的言论和行动，是否反对社会主义，如果反对，就解除我的粮食部长职务好了。人大、政协明年再提名选举时，不要再提我的名。两处长问：毛主席的文章发表了，你是否可以据其中的精神作检查？他回答：我觉得，我的言行没有违背那六条标准。

两处长所说的毛主席文章，即指毛泽东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题的讲话。在前一段的批判中，不断有人搬用讲话中的内容打“语录仗”。由于大家听的都是录音，记录上不尽相同，批判中常常为此争论不休。6月16日，这篇讲话经过“整理”、“补充”后，在《人民日报》正式发表。其最主要的补充，是在原讲话宣布“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之后，加上了一笔“但是”，添加上的这一段话在此后许多年被反复宣传得沸沸扬扬，即强调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章伯钧也是聆听过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的当事人，本指望能靠这篇讲话的内容保护一下自己，及至看到正式文本与当时讲话的内容面目全非，不由得惊呼：“完了，完了，全变了！”

由于多年来不断搞运动，历史也变成了任人随意涂抹的小姑娘。当章乃器“走红”时，他的履历可以是投身抗日救亡和民主革命，一贯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民主人士，到了墙倒众人推之际，便有了下列种种说法：“爱国是假的”“他的抗日救国是为了创造向蒋卖身投靠的资本”“勾结特务、反革命、右派分子进行阴谋活动”“破坏土改”“一贯违法乱纪的不法资本家”“组织反党小集团”等等，等等。翻开当年的报刊，这样的批判词比比皆是，大多出自与章乃器共事多年的一些老友之口。有不少是歪曲章乃器原意的批判：如章乃器原话是“定息不是剥削而是不劳而获的收入”，截去后半句就变成“定息不是剥削”，与原来的意思大不一样。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在毛泽东钦点之下，一群反右打手竟

相狂吠，汪汪之声不绝于耳，一阵乱咬，章乃器被定为顽固不化的右派分子则属必然了。

在一次国务院举行全体会议上，讨论周恩来提出的《政府工作报告》，报告谈到当前的反右，并有一段批判章乃器的文字。读到此处，章乃器突然站起来，直责周恩来：“你是总理，我是协助你工作的国务院干部，过去工作中遇到问题，总是大家共同分担困难。现在我遇到了问题，作为总理，批评帮助他工作八九年的干部，只根据他所说的两三句话，就说他是反对社会主义，这个断语，是不是值得考虑？”

一番话直指人心，语惊四座。向以折冲樽俎、辩才无碍著称的周公竟一时语塞。在场的其他人见势头不好，群起而攻之才化解了周恩来之窘态。由此章乃器遭到批判和罢职，被赶出北京朝阳门外的公寓，迁入北京东郊呼家楼一幢普通的民宅，在一间不到十二平方米的小屋里度日，小屋的门终日敞开着，好接受来自各方面的监督。但他坚持自己的政治见解，拒绝在“右派”结论上签字。

为体现一下“来去自由”的政策，1965年中共选了四位著名的右派谈话，看看谁想享受一下这种“自由”，到海外走走。章乃器和章伯钧的回答都是不去。章乃器的儿子不解，便问父亲为什么不去。他说：“在大陆我是名牌人物，谁也不好把我干掉，生命有保障。到了香港，出了问题反而说不清了”。罗隆基说我是想去的，但现在不去；罗隆基于同年冬因心脏病在寓所中猝然身故，没留下骨灰。刘王立明说有子女在海外，很想念他们。翌年“文革”爆发，想见儿女的刘王立明被关押，1970年殁死狱中。文革抄家时章伯钧被打伤，1969年因癌症逝世。文革初期70岁的章乃器遭到残酷迫害，被“红卫兵”打得遍体鳞伤，幸好他善于调养，在逆境中竟然活到了80岁。

“文化大革命”中的一天，几个挟着公文包的大汉来到呼家楼那间小屋，气势汹汹地说：“你在安徽曾与张劲夫有过来往，张劲夫是叛徒，你写一份证明材料。”说罢，来人拿出一打纸，摔在章乃器面前。章乃器冷冷地回答：“我不知道张劲夫是叛徒，无从写起。”来人威胁他：“你不写，罪上加罪。”章乃器仰天大笑：“到底我还是社会主义公民。不实事求是，连做公民的资格也没有。”来人色厉内荏：“太猖狂了。”章乃器一把扯过让他写材料的纸，撕成碎片，声色俱厉地说：“我不会歪曲历史！”

1977年5月13日，一生刚正不阿的章乃器先生在北京逝世，享年80岁。

中共中央给章乃器落实政策，前后共计有三次。

第一次是1975年国家决定特赦全部国民党战犯的信息传出后，章乃器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谈及当年自己在香港是有工作的，为了建设新中国才应邀回来，现在国民党战犯均已特赦，自己的问题多年仍未解决。毛泽东当时并未明确答复，后来陈云向章乃器宣布，中央决定给他摘帽，要他认真吸取教训，并准备安排他的工作。章乃器当即表示，自己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对于没有宣布彻底平反，感到不够。就这样，始终不承认自己是“右派”的章乃器，仅仅被不明不白地摘掉了“右派”帽子。1977年5月13日，章乃器离开了人世。在当时“两个凡是”甚嚣尘上的形势下，举行了一个小型的追悼会，悼词在肯定他“在

历史上为人民做过好事”的同时，还不忘指出他“犯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错误”。

第二次落实政策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1980年改正“右派”的中共中央60号文件起草时，章乃器原被列在“不予改正”之列，在胡耀邦和陈云、邓小平直接过问下，克服了不少阻力，章乃器“右派”错案终于在1980年6月得到改正，他的骨灰于1982年5月移放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室。享受国家级领导的殊荣了。

第三次落实政策是在邓小平逝世后，香港回归前夕。经中共中央批准，于1997年4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了纪念章乃器先生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中共中央统战部长在讲话中指出：“章乃器先生是一位英勇的爱国民主战士”，对他“一生所表现出来的爱国民主精神和与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的光荣历史，对其为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事业中所做出的贡献，表示深切的怀念和敬佩”。

章乃器遗著有：《章乃器论文选》《中国货币金融问题》《激流集》《出狱前后》《论中国经济的改造》《章乃器文集》等。

章乃器是民主建国会的主要发起人之一，但其年龄、资历、阅历均在黄炎培之下，民建实际是在黄炎培掌控之中，黄炎培又是怎么逃过一劫的呢？

黄炎培（1878-1965），号楚南，字任之。江苏川沙人。1899中秀才，1902年中乡试举人。次年在家乡办校，因鼓吹反清被捕入狱，在江南巡抚“就地正法”批文到达一小时前，由基督教外籍牧师保出，逃亡日本，一年后事息归国。1905年参加同盟会，辛亥革命后，任江苏省教育司长，省教育会副会长，上海申报馆旅行记者。1914年春，在安徽、江西、浙江、山东、北京、天津等地考察了五个月。随中国游美实业团体在美国考察了二十五个城市五十二所学校。此后又赴日本、菲律宾、南洋各地和英国考察，每次考察均有记录，并结集出版。由此声名大振。

黄炎培是中国民主同盟和中国民主建国会的创始人之一。1917年创办中华职业教育社及学校，自此从事教育事业达三十二年。北洋政府两次请他担任教育总长，他坚辞不就；蒋介石请他迁居南京，许以官位，并表示想提携其后辈，他不为所动。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国共合作成立国民参政会，黄炎培作为国共两党之外的社会贤达，成为国民参政员。1941年黄炎培发起成立民盟并任第一任主席，1945年他创立民建并任第一任主委。

1945年，黄炎培、傅斯年、章伯钧等六位国民参政员受邀参观了延安。在那里，他与毛泽东进行了一场著名的谈话，即所谓“窑洞对”。黄炎培居然就相信了中国历史上这最大的独夫民贼的美丽谎言。

据史料记载，毛泽东与黄炎培进行这席所谓“周期率和民主”的谈话之前不久，曾在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上讲话时说：在打倒了国民党以后，中共的斗争对象就是民主党派。黄炎培对此茫然不知。

1921年黄炎培被委任教育总长而不肯就职，声称“终生不为官吏”。中共执政后，他以七十四岁高龄当了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后又于1954年当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自此，黄炎培目睹了“土改”、“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反右”“庐山会议彭德怀被整”“三年大饥荒”“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等人祸。心中作何？

1957反右运动中，黄炎培的六个子女（黄万里，清华大学教授、著名水

利专家；黄必信，大连工学院电工教研室主任，划为右派后文革初期上吊自杀，其15岁小女失踪，其妻余启云为物理教师，在黄必信逝世两周年之际自杀身亡；黄大能，著名混凝土专家；黄素回，大学教师；黄路，金陵女子大学毕业，中华医学会成员；黄小同，燕京大学肄业，北京八十中英语教师；）、一个女婿（陈锵，著名心血管内科专家，陈立夫的后代，内蒙医学院院长）皆被打成右派。而黄炎培为了自保，竟违心地与儿女划清界限、断绝来往。还以耄耋之身在天安门广场率队游行“向党交心”，写诗表示要学习做“新人”。昔日反国民政府的社会贤达，成了仰毛泽东鼻息的奴才。“心”都没了，还能干什么呢？

黄炎培去世于1965年，逃脱了“文化大革命”的茶毒和迫害。而其夫人姚维钧在受尽凌辱之后于1968年含冤自尽。

十一、马叙伦因病免祸逃过一难 林汉达不幸遭殃遗恨百年

中国民主促进会（简称民进）是以从事教育文化出版工作的高中级知识分子为主的、以“发扬民主精神，推进中国民主政治之实现”为宗旨的政治组织。主要创始人有马叙伦、王绍鏊、周建人、许广平、林汉达等人。民进成立于1945年12月30日。在其宣言中提出立即结束一党专制、还政于民、立即停止内战、保障人民自由权利等政治主张。随之发起和组织了有十多万群众参加的反内战大会，在国民党统治区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民主运动。马叙伦为报刊撰写了百余篇战斗檄文，抨击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反对内战，矛头直指蒋介石。当时的国民政府对其无可奈何，只是偶尔监视。马叙伦于1947年底去香港，1948年10同郭沫若等人一起投奔中共。

中共执政后，民进慑于淫威，再也不敢提“废除一党专政”“保障人民自由权利”等政治口号，只能按照中共的布置，参与《教师法》、《职业教育法》、《义务教育法》等法规的文字编写工作。1958年，民进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一切为了社会主义”和“服务与改造相结合”的宗旨，沉沦为中共之御用工具、自甘堕落为改造对象，昔日促进民主之风采不复存矣。

1949年，民进主席马叙伦被任命为第一任教育部部长。马叙伦体弱多病，1954年时已届古稀，龙钟老态，步履蹒跚，遂辞去教育部长之职。1957年，马叙伦患脑软化症，神经系统功能逐渐衰退，失去了生活自理能力。也因此躲过了反右之劫。

反右运动中，毛泽东选择了民进副主席林汉达作为靶子，将这位长期追随中共的燕京大学教授、教务长，《中国语文》杂志总编辑，教育部副部长划为右派分子，以震慑民主促进会诸人。

林汉达（1900-1972）浙江慈溪人。我国著名语言学家、文字学家、教育家，杰出的爱国民主人士。民进中央副主席。系第一、第二、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他1924年毕业于杭州之江大学（浙江大学前身），任宁波四明中学英语教师。1928年秋应聘为上海世界书局编辑，后为英文编辑部主任、出版部主任。1937年考入美国科罗拉多州立大学研究生院，专攻民众教育，一年获得硕士学位，三年读满了学分，获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中国民众教育的发展与中国文字改革的关系》倡导利用拉丁文作为扫除文盲的工具，获得了美国金钥匙奖。（据说此奖当时仅费孝通与林汉达两人得过）

1939年秋，林汉达回国后任华东大学英语系教授、教务长，教育学院院长等职。林汉达本为一介书生，为人质朴，精研学术，知识渊博，著作丰富，

颇受学生尊重和同仁拥戴。抗战胜利后，林汉达在中共促使下参加了民主运动。他频频发表演说，反对内战，呼吁和平，强调只有政治民主化教育事业才能发展。反对一党专政，支持中共参政，成为反蒋运动的骨干。林汉达的演讲深刻、生动、尖锐、泼辣、有强烈的鼓动性和说服力。它们像一团团烈火，燃烧着人民群众的斗志；又像一把利剑，直刺独裁者的咽喉，惹得保守派十分嫉恨。当局视马叙伦和林汉达如眼中钉、肉中刺，动员个别学生上街张贴“打倒失意政客马叙伦！”、“打倒青年贩子林汉达！”的标语。这种愚蠢的做法使马叙伦和林汉达更加倒向中共。

1946年6月23日，民主促进会在上海组织数万人召开反内战集会，并向南京国民政府请愿。王绍鏊、陶行知、林汉达是大会执行主席。林汉达在大会上慷慨激昂地说：“现在，中国人民没有人愿意打内战。中国的主权属于全国人民！”

“六·二三”事件后的第二天，上海报纸上就登出警局通缉林汉达的消息，在中共上海地下党安排策划下，林汉达1946年秋秘密奔赴东北，化名林涛，任关东文协理事长、大连市新文字协会主任、辽北省教育厅厅长。1949年作为民进代表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共执政后，历任燕京大学教授、教务长，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中央扫盲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教育部副部长等职，深孚众望，1956年8月当选为民进第四届中央副主席。

林汉达先生从上世纪二十年代起即从事研究和写作，治学严谨，著作丰富，涉猎甚广，颇有影响。教育方面的著作有《向传统教育挑战》、《西洋教育史讲话》等；文字改革方面有《中国拼音文字的出路》《中国拼音文字的整理》等；通俗历史读物有《上下五千年》《东周列国故事新编》《前后汉故事新编》《三国故事》等，共达六十余种，是一份极其珍贵的文化遗产。特别是他的通俗历史读物，深受几代青少年读者的欢迎。林汉达先生驾驭文字的能力非同一般，语言朴实、规范、优雅，虽然都是浅易的白话，但那有力的节奏，美妙的韵律，不知不觉就吸引了读者，并足以让一代代的人久久回味。

林汉达为人正直，不擅谄媚，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文革中又将其打成反革命，发配到宁夏平罗县农场劳动改造，身心备受折磨，1972年7月23日含冤去世。

查阅《人民日报》1958年辑录之《林汉达研究资料汇编》，林汉达的主要右派言论如下：

在中央统战部召开的民主党派座谈会上谈有职无权问题时说：“我不是讲我个人有职无权，而是说整个教育部都是有职无权。很多事情，教育部都不知道。教育部通知发下去，不灵，加上国务院还不行，非得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指示才行。政府部门有什么用？”谈到扫盲工作时，他说：“过去做得比较好，1956年就冒进，七年计划要三年完成，实际上是纸上谈兵”。“肯定你有成绩，就有成绩，说有偏差，就有偏差”。7月3日在马叙伦家里他还说过这样的话：“反右派斗争搞得好，可以避免匈牙利事件，搞得不好，就很难说”。林汉达还说过：“知识分子做人真难，你靠拢领导，别人说你是往上爬，跟下级交往，说你是拉拢群众，在同级干部之间跑跑，又说你搞小圈子，这样只好闭门谢客，老死不相往来”。

林汉达的这些话是按照毛泽东号召民主党派参与整风时所说的“把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作风切实反一下”的谏诤之言，是对中共的领导

方法提些意见，毫无削弱共产党领导权之意。然而在 1958 年，这就成了把一个教育家，文字学家，历史学家打成右派、置于死地的罪状，今日读来犹令人心酸。

反右后，民主促进会一蹶不振。文革期间，民进和其他民主党派一样，被勒令停止活动。其成员无一人敢于抗争。

八十年代以后，中共下令，定性民主党派为参政党，民进相继提出了许多口号，如：“坚持增强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继承传统，以党为师，立会为公，参政为民”“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切实加强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领导班子建设、机关建设，努力提高全会整体素质和参政议政水平”等，这些口号还有民进的特色么？完全是中共的附庸了吧！

笔者写作途中于 2012 年 11 月底查看中国民主促进会的网页，最后的信息披露日期是 2010 年 12 月，已有将近两年没有更换信息内容了，他们是如何参政议政的呢？

十二、三千食客人人投降缴械 九万儒生个个匿影藏形

1957 年春夏之交，毛泽东即以“新帐老账一起算”的手法，将民盟的章伯钧、罗隆基、费孝通、曾昭抡、黄药眠、叶笃义、钱端升、冯友兰、钱伟长、吴景超、刘王立明、陈新桂、潘大逵、沈志远、徐铸成、浦熙修、彭文应、陈仁炳、王毅斋、王文光、姜震中、杜迈之、马哲民等；民革的龙云、陈铭枢、黄绍竑、谭惕吾、张轸等；中国农工民主党的韩兆鹗、张申府、章伯钧、黄琪翔、黄现璠、李士豪、李伯球、张云川、邓昊明、李述中等；中国民主建国会、工商联的钱孙卿、李琢庵、章乃器、李康年、向德、毕鸣岐、姚顺甫、潘锬璋、郑立斋、张东木等；中国九三学社的许德珩、金宝善、顾执中、陆侃如、袁翰青、储安平；中国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的谢雪红等；中国民主促进会的林汉达等；中国致公党的陈其尤等八个民主党派的主要领导人收入囊中。并以雷挺万钧之势，扫荡民主党派基层组织，使其一蹶不振，唯有乞哀告怜。毛泽东实现了他的梦想，中国由此万马齐喑，天下一统了。

经过 1957 年夏天的剿杀，不堪一击的书生纷纷落马。毛泽东躲在中南海的菊香书屋里叼着雪茄狡黠地笑了，表面看来他似乎胜利了，实际上却是身败名裂的开始。自掘坟墓的开始，随着作恶多端，他渐渐地被埋葬了，最终成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1958 年 1 月，反右运动大体告一段落之际，民盟中央常委会召开第十七次（扩大）会议，由时任民盟中央副主席的高崇民（安插在民盟内部的共产党员，反右期间的积极分子，文革期间被关入秦城监狱，1971 年死于非命。）做《中国民主同盟反右派斗争的基本情况》报告。他当时说：全国各地民盟的右派到 1957 年底共有 3378 人，占全体盟员的 10.5%。民盟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划为右派的共 59 人，约占民盟中委和候补中委总人数的三分之一。各省（市）委员会主委、副主委 30 人，占全部主委、副主委总人数 100 人的 30%；各县（市）委员会主委、副主委 74 人，占总数 230 人的 32%。也就是说民盟各地的头面人物三分之一都被打成了右派。1958 年春夏，毛泽东摧毁民盟的决心犹未尽，于是邓小平奉旨推动“反右补课”。“补课”以后，中国民主同盟中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数跃增为 5173 人，占盟员总数的 15%以

上。骨干分子跃增为 89 人（见叶永烈著《反右派始末》第 643 页“章罗联盟”八十九名骨干分子名单），几乎为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总数的一半。除了潜藏在民盟内部的共产党员胡愈之、吴晗、高崇民等吓出了一身冷汗，战战兢兢地领受中共的旨意，将共事多年的民盟盟员推入右派的泥坑，保住了自己的位置，绝大多数盟员则连滚带爬地告饶请罪，从此中国民主同盟沦为执政党的御用工具，装点厅堂的饰品。

追记：反右以后各个民主党派人士基本上处于匿影藏形状态，接踵而来的文革又遭了一次浩劫，老的老，死的死。。经过文革的洗礼，其二代三代多数都学乖了，能求得给口饭吃就夹着尾巴做人吧。但愿他们还没有完全数典忘祖。

文革中的民主党派

虽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一再强调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重点是整中共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文革第一个被用来“开刀祭旗”的受害者，却是著名反右积极分子、历史学家、历史剧《海瑞罢官》的作者吴晗。他被公开点名批判时，不仅是中共党员，北京市副市长，而且是民主党派领袖和元老，身任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和民盟北京市委主任委员。此外，最先揪出的所谓“三家村黑帮”三人中，一人是吴晗，另一人是中共北京市委专与民主党派及无党派民主人士打交道的统战部部长廖沫沙。也就是说，“三家村”中有两人与民主党派有关。这一事件预示了民主党派在文革时期的命运。

红卫兵发出最后通牒，民主党派停止活动

1966 年“十六条”公布后第十天，得到毛泽东支持的红卫兵运动如狂飙骤起，终于将打击的矛头公开指向了各民主党派。8 月 23 日夜到 24 日晨，一些北京红卫兵发出致各民主党的《最后通牒》，限令各民主党派在 72 小时之内自行解散并登报声明。从 8 月 25 日起，北京各民主党派中央机关纷纷贴出“通告”，以大体相同的语言表示“坚决接受红卫兵的意见，自即日起停止办公，报请党中央处理”。北京的这股红色风暴很快就刮到全国各地，民主党派在全国陷入灭顶之灾。

据当时的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金城回忆：红卫兵对各民主党派机关发出“最后通牒”，“勒令”各民主党派自行解散。大批民主党派负责人、无党派爱国人士、工商业者上层代表人物以及少数民族、宗教、华侨的头面人物，非党高级知识份子被抄家、被揪斗。红卫兵中的一些不良份子趁机打家劫舍，令人发指的残忍行为到处出现。恐怖气氛笼罩着各大城市。而毛泽东与中共中央并没有对红卫兵“勒令解散”民主党派这一重大行动明确表态。

周恩来曾在 9 月 2 日起草“有关红卫兵的几点意见（未定稿）”，对红卫兵提出十条要求，其中一条载有“对于在国家统一战线中具有合法地位的民主人士和对于有贡献的科学家和科学技术人员，只要没有发现现行反革命活动，应该加以保护”。次日上午他召集中央领导人开会研究，这份文件因遭到康生等人反对而没有通过。9 月 14 日，周恩来主持中央碰头会，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顾问的陶铸根据会议精神起草了“关于抓紧研究文化大革命中有关社会政策问题的通知”，其中列出当前急需解决的八个方面问题中，就包括“对民主党派、民族资产阶级、工商联及其代表性人物的政策”。周恩来作了多次修改后，交中央文革小组，请他们先行派出各报记者或其他工作人员调查研究、收集材料，准备国庆节后讨论解决。在 9 月 22 日召开的国务院各口、各部委党组成员会议上，周恩来又提到包括

民主党派政策在内的若干政策，大家都要想一想，国庆节抓一抓。但此事也未见下文。

10月3日，周恩来在中南海礼堂对来京观礼的全国红卫兵代表讲话中，批评了红卫兵砸南京孙中山铜像和给宋庆龄贴大字报等错误行动，谈到有人提出要关政协和民主党派的门，不要政协，不要民主党派时，周恩来说：“关一个时期是可以的，房子你们占一个时期也可以，但不能永远这样，不能把东西搞坏。”并明确说“政协还是要的”，“毛主席还是政协名誉主席，我还是主席哪！”但仍未对民主党派的存废问题作出明确表态。

8月27日，由“红卫兵战校”（即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发出的《对目前形势的十点估计》传单中，第八点“关于破四旧”说到：“有些重大行动（如取缔民主党派等）应该先动口，向中央、市委报告，在中央、市委的统一领导下再动手，不然会给中央工作造成很大的被动。”从这段话可知，当时红卫兵“取缔民主党派”的行动受到来自中共中央和北京新市委的委婉批评，但未受到根本否定。

在红卫兵勒令解散民主党派、各民主党派停止活动两个月之后的10月24日晚，毛泽东主持召开汇报会议，他在听取中央工作会议的汇报时才对这个问题表态。他说：“民主党派还要，政协也还要，向红卫兵讲清楚。”但是，毛泽东这一讲话当时并未公开传达，事后也未对此加以强调，因此未能像其他“最高指示”一样产生影响。民主党派仍然未能恢复活动。

民主党派人士在“破四旧”中遭到残酷打击

自“破四旧”狂潮掀起开始，代表毛主席、党中央声音的“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和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就一直在为之呐喊助威。8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好得很！〉，《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做得对！做得好！〉；8月24日，《红旗》杂志发表评论员文章〈向革命的青少年致敬〉……在这片“好得很”的欢呼声中，民主党派人士受到第一次大规模迫害。

据民革中央副主席张治中的秘书余湛邦所撰《张治中将军年谱》记载：8月28日张治中从北戴河回京，（此时“文革”已开始）回家坐下不到两小时，红卫兵即进门抄家。气势汹汹，咄咄逼人。以后又来了4次。由于中共中央统战部事前已打过招呼，所以第一次张还能沉得住气。第二次，红卫兵指著张的鼻子质问：“你是甚么人，是甚么历史？”张在久病之后，身体本已极度衰弱，至此再也忍不住了。他摇晃著颤巍巍的身子，猛然从靠椅上站起大叫：“你去问毛主席去！你去问周总理去！”事后，张对家人和亲信说：“若干年后，这将成为一个大笑话！”

当时正在病中的纺织工业部部长、民革中央常委、民革北京市委主任委员蒋光鼐，被一帮女红卫兵抄家。这些女红卫兵闯进蒋家住宅后，凶狠地叫蒋家的人全部集中到客厅里，听她们宣读通篇是凌辱言辞的《告民主党派最后通牒》。然后骂骂咧咧，东翻西找，把稍微值钱一点的东西都拉走了。

民盟中央委员、著名哲学家冯友兰被红卫兵抄家后，家门被贴上了“冯友兰的黑窝”大字标语，儿女均被牵连受到批判，甚至连上幼儿园的小孙子也受到“退园”处理。

在恐怖浪潮席卷京城的8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盛赞红卫兵的“斗争锋芒，所向披靡”，称“一切藏在墙角里的老寄生虫，都逃不出红卫兵锐利的眼睛。这些吸血虫，这些人民的仇敌，

正在一个一个地被红卫兵揪了出来。他们隐藏的金银财宝，被红卫兵拿出来展览了。他们隐藏的各种变天帐、各种杀人武器，也被红卫兵拿出来示众了。这是我们红卫兵的功勋”。

民进中央常委、著名作家谢冰心被抄家后，红卫兵办了一个“抄家物资展览会”，在展览会文字说明中将谢冰心和丈夫称作“吸血鬼”。红卫兵到民盟中央常委、著名建筑学教授梁思成家中抄家，将他家中的果酱刀、餐刀、水果刀收到一起，说是“准备暴动”的罪证。梁妻林洙刚想声辩，就挨了一记耳光。随后，红卫兵又从梁思成已故前妻林徽因的母亲房间里搜出一把镌有“蒋中正赠”字样的短剑，当作梁思成藏有蒋介石赠剑“梦想变天复箴”的罪证——其实那把剑是林徽因的小弟林恒在抗日战争中从航空军校毕业时的纪念品，林恒在对日作战中壮烈殉国了，痛失爱子的林母因而留下这把剑以作纪念。

在红卫兵“破四旧”中受到最典型迫害的民主党派人士，大概要数曾任民建中央副主任委员的“大右派”、经济学家章乃器了。他在遭受红卫兵冲击后不久写成的〈七十自述〉中说，这是他有生以来所遇到的最大灾祸，从8月24日到31日，整整八个昼夜，他在绝食中受到百般拷打。折磨他的方法有：用钢丝包橡皮的鞭子打，划了火柴烧手，用气枪射击头面，用水壶灌鼻孔，强迫吃肮脏的食物，用油彩涂脸，用氨水灌鼻孔……。

在1970年底，中央国家机关统战系统军管组曾按照周恩来的提议，对文化大革命初期遭到红卫兵查抄的人大、政协机关所属民主党派和知名人士的情况进行调查，查明共有68人。

最能反映民主党派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命运的典型事件，莫过于中国民主同盟等民主党派的诞生地、被誉为“民主之家”的重庆“特园”遭到了毁灭。

“特园”是抗日战争时期陪都重庆著名民主人士鲜英的公馆，当年他不顾国民党当局威胁，经常接纳中共代表和各界民主人士到公馆内活动，而被中共中央南方局负责人董必武誉为“民主之家”。郭沫若、冯玉祥分别为之题写过“民主之家”匾额。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等都是“特园”的常客。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谈判时，“特园”曾作为中共代表团的对外活动场所，毛泽东曾三次亲临“特园”与民主人士共商国是，并在这里说过：“这是‘民主之家’，我也回到家里了！”“今天，我们聚会在‘民主之家’，今后，我们共同努力，生活在‘民主之国’！”解放后，“特园”主人、民盟中央委员鲜英被划成右派份子，“特园”从此冷落下来。

文革初期，1966年8月，“特园”被重庆大学赤卫军查抄。园内挖地一尺，各屋内翻了个遍，大客厅内珍贵的历史见证物签名轴（上有抗战胜利前后到过“特园”的国共两党要人及各界名人的签名）不见了，凡被认为是封资修的东西都在查抄封存之列。鲜英的家属后来从看守他们的赤卫军口里得知，鲜宅是当时市领导点名首批抄家名单中七家之首。由市公安局、重大赤卫军组成抄家队伍进驻“特园”。赤卫军总部就设在“特园”。这显然不应视为“群众性自发行动”。后来重庆造反派的两大派武斗发展成真枪实弹的全面内战，“特园”的主要建筑——接待过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并曾多次作为国共两党谈判场所和中共代表团新闻发布会场所的达观楼，被其中一派红卫兵作为武斗据点。在该武斗队战败撤退时，因销毁传单资料而引起火灾，达观楼化为废墟。毛泽东赞赏过的“民主之家”被他所提倡的“大民主”毁掉。

有关文化大革命与民主党派的一份名单

1966年8月30日晨，86岁高龄的著名无党派民主人士章士钊，因前一夜遭到前来抄家的北京大学红卫兵的残暴凌辱和折磨，愤然上书毛泽东，恳求“在可能范围内稍微圆转一下”。毛泽东指示“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周恩来立即拟定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名单中列出的12个著名人士，除去中共方面的郭沫若和无党派的宋庆龄（曾任民革中央名誉主席）、章士钊、傅作义、张奚若外，其余7人是民主党派领袖：民革中央副主席程潜，民革中央主席何香凝，民革中央副主席、和平解放台湾工作委员会主任张治中，民革中央常委、社会联系工作委员会主任邵力子，民革中央常委蒋光鼐，民革中央副主席蔡廷锴，民建中央常委、“救国会七君子”之一的沙千里。周恩来在仓促间写成的这份名单中，只列入了民革和民建两个党派的部分负责人，其他民主党派无人列入名单。显然，周恩来在开列名单时主要不是从这些人士的党派身份上考虑的。在这份名单中还规定了六类干部（外加李宗仁一人）为保护对象，第五类即“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只是这一“负责人”的含义不像其他几类干部如“副委员长、人大常委、（政协）副主席”、“（国务院）部长、副部长”等那样明确（直到两年多之后，周恩来在致国务院直属口军代表的信中才写明了“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即他们的中央委员、省市党部委员”）。

许多文章在谈及这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时，都只谈到其重要意义而未具体考察其实际作用。在文化大革命那样的特定时期，连毛泽东的“最高指示”也常常被加以各取所需的理解而得不到认真执行，更何况这样一份名单？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属名单中明确规定的第二类保护对象，却在这份名单提出四个月之后在残酷斗争中被迫害致死。即使是列入这份名单中的几位民主党派领袖人物，也并未得到切实有效的保护。如蒋光鼐、张治中虽然没有受皮肉之苦，但精神上仍受折磨，健康状况急剧恶化，先后在抑郁中去世。蒋光鼐是文化大革命中去世的第一个中共党外部长级干部（纺织工业部部长），时值大动乱的1967年6月，以致有关工作人员竟然没有以周恩来的名义给追悼会送花圈，在追悼会后受到周恩来严厉批评。张治中病危时，其一女二婿正被隔离审查，经周恩来与专案组交涉，张治中才得以同家人作临终前的团聚。

而名列保护名单上7位民主党派人士之首的程潜，情况更糟。1968年初，程潜在家中摔成骨折后住进北京医院，周恩来派来大夫和护士，护士是林伯渠的儿媳，是一位很有经验的护士长。在制订手术方案后，周恩来批准了。但是很快发生变动，周恩来派来的大夫、护士全部被撤换了，治疗方案全部改变，换上来的医护人员对程潜的态度很粗暴。程潜因腿痛要求按摩，工作人员竟说：“你还让人侍候？像你这种人，任何人任何时候都可以给你贴大字报。”程潜夫人郭翼青后来说：“对于程老的死我们是有怀疑的。因为程老身体本来很好，医生说基本上恢复了，但医院突然撤人，改变方案。这里恐怕会有政治原因的。”1968年4月9日程潜病逝后，对他这样身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常委、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的“国家领导人”是否应该举行追悼活动竟无人敢作主。直到周恩来闻讯后作出明确指示，人们才著手筹备追悼活动。追悼会于4月12日由民革中央主持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开得颇为冷清。

周恩来其时因中共高层领导内突发所谓“杨余傅反党集团”事件而忙碌不堪，以致未能出席程潜的追悼会，直到第二天晚间才抽出时间专程到程潜家表示悼念。这时，在程潜去世的第二天，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为此发表的社论《芙蓉国里尽朝晖》和成立、庆祝大会上通过的《给毛主席的致敬电》中，均回顾了湖南的革命斗争历程，但只字未提程潜为湖南和平解放一事所作出的贡献，而且在社论中公布的毛泽东“最新指示”，还提出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中共及其领导下的革命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出现了“国民党残渣余孽”的新提法。在那个形而上学空前猖獗的年代，与国民党有著较深历史渊源而且名称中就有“国民党”字样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自然就被许多人视同於国民党或“国民党残渣余孽”。因此，像程潜这样的国民党起义将领是否被算作“国民党残渣余孽”之内，就成了一个让人担心的问题。於是，在周恩来向程潜家属表示慰问时，程潜夫人郭翼青鼓起勇气问周恩来：“程潜究竟算甚么人？我家到底算甚么成分？”当时全场震惊。直到周恩来回答：“颂公当然是革命干部嘛！”“你们家庭当然是革命家庭嘛！”程潜所有在场亲属才如释重负。

但是，周恩来的这个表态只是对程潜一人而言。反观同样为湖南和平解放作出贡献的湖南军政界耆宿、民革中央常委唐生智，就受到了另一种对待。据唐生智的外孙女艾晓明回忆：当时正在接受审查的唐生智从报上看到程潜去世的消息，感慨地说，颂公死得值得，周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都出席了追悼会（引者注：此说有误）。这话被汇报到了造反派那里，省政协的一个年轻造反派头头，竟跑来打了年已八旬的全国政协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唐生智一记耳光，还责骂：“你还想这种待遇么？”与这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相对立的，还有另外几份与民主党派有关的名单。

1980年11月2日，在公审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上，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检查长兼特别检查厅厅长黄火青宣读的《起诉书》中第5、6两条指控：1968年8月27日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和他的妻子曹轶欧指使中共中央组织部负责人郭玉峰，编造了《关于三届人大常委委员政治情况的报告》和《关于四届政协常委委员政治情况的报告》。两个报告都经康生亲笔修改、审定，将115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的60人和159名全国政协常委会委员中的74人分别诬陷为“叛徒”、“叛徒嫌疑”、“特务”、“特务嫌疑”、“国特”、“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走资派”、“三反份子”、“里通外国”等。在这两份“黑名单”中，民主党派人士被列入的有：民革中央副主席张治中，民建中央副主任委员胡子昂，民革中央秘书长梅龚彬，民革中央常委、宣传部长王昆仑，民盟中央副主席史良，民革中央常委唐生智，民盟中央副主席胡愈之，民盟中央常委梁思成，致公党中央主席陈其尤，民革中央常委陈劭先，九三学社中央常委赵九章，九三学社成员茅以升，民建中央副主任委员胡厥文，民盟中央副主席高崇民，民盟中央常委、民盟河北省委主任委员刘清扬，民革中央常委朱蕴山，民建中央常委、民建辽宁省委暨沈阳市主任委员巩天民，民盟中央副主席楚图南，民盟中央常委、宣传部长萨空了，民建中央副主任委员孙起孟，民进中央副主席车向忱，民建中央秘书长孙晓村，民革中央常委朱学范，民革中央常委刘斐，民建中央委员、民建云南省委主任委员寸树声，民盟中央常委吴鸿宾等。

《起诉书》中指控的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第 38 条罪行即是对民主党派的迫害，其中指出：各民主党派领导人遭到诬陷、迫害的有：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邓宝珊，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高崇民、吴晗，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副主任委员孙起孟，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副主席车向忱，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主席团委员周谷城，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潘菽。各民主党派和全国工商联的中央常委、委员和候补委员大批受到诬陷、迫害，黄绍竑、梅龚彬、楚溪春、高崇民、刘清扬、潘光旦、刘王立明、刘念义、王性尧、唐巽泽、许崇清、李平心、陈麟瑞、郑天保、王家楫、刘锡瑛、张玺、王天强等被迫害致死。

《起诉书》中所列举的“被迫害致死”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的职务分别是：黄绍竑，民革中央常委；梅龚彬，民革中央秘书长；楚溪春，民革中央副秘书长；高崇民，民盟中央副主席；刘清扬，民盟中央常委、民盟河北省主任委员；潘光旦，民盟中央常委；刘王立明，民盟中央委员；刘念义，民建中央常委、民建上海市委副秘书长；王性尧，民建中央委员、民建上海市委常委；唐巽泽，民建中央常委、民建浙江省委主任委员；许崇清，民进中央常委、民进广州市委主任委员、民盟中央常委兼民盟广东省委主任委员；李平心，民进中央委员；陈麟瑞，民进中央委员、民进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郑天保，致公党中央常委、秘书长；王家楫，九三学社中央常委；刘锡瑛，九三学社中央常委；张玺，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九三学社青岛分社主任委员；王天强，台盟福建省支部主任委员。

这份“被迫害致死”的名单并不完备，比如其中就缺少农工民主党人士。其实，农工民主党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的同样大有人在，如该党前中央主席章伯钧，该党中央主席团委员兼秘书长郭则沉、中央委员黄琪翔等人，都应列名其中。此外，这份名单里提及的主要是各民主党派的中央及省级领导人，尚未包括其基层干部和普通党员。

民主党派人士竭力理解文化大革命

1966 年国庆节前，周恩来曾打算向参加国庆观礼的高级民主人士说明和解释文化大革命的方针政策，以帮助其“理解”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金城奉命通知有关民主人士。可是，毛泽东检阅游行队伍的庆典结束后，民主人士在天安门城楼上休息厅里苦等了半个多小时也没见到周恩来，最后只好满腹狐疑地离去。事后方知，那天毛泽东因为广场上人们的狂热欢呼而一时心血来潮，走下了天安门城楼，走到人群中去了。周恩来只好紧跟著毛泽东以保护其安全。一次与高级民主人士的谈话会，就因毛泽东这一随意性的举动而告吹。不过，尽管那天周恩来与高级民主人士的谈话会未能开成，尽管他们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但他们出於对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高度敬仰与信任，仍然竭力让自己去理解、去“紧跟”。

这方面的例子不少。如 1966 年 8 月 31 日毛泽东第二次接见红卫兵时，蒋光鼐抱病去天安门城楼参加接见活动。周恩来问他抄家情况，他为了表示对毛主席支持的红卫兵有正确态度，只好淡淡地回答：“来过了，不过还斯文。”同年国庆节，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见到张治中时问：“红卫兵到你家没有？”张治中说：“去了。”毛泽东有些惊讶：“啊！你既不是当权派，更不是党内的当权派，他们到你家里干甚么？”张治中也没有趁机申诉。周

周恩来在天安门城楼上问民建中央副主任委员胡子昂挨斗情况，胡子昂撒谎说“没挨斗”。

民盟中央常委梁思成是竭力理解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典型。当清华大学红卫兵分裂成两大派后，不管哪一派都要揪斗他。他对此不但不气愤反而高兴，因为他天真地认为这是学生们不再打内战，开始听毛主席的话，搞“斗批改”了。张治中病危之时，於 1968 年 10 月 10 日口授的“遗嘱”中留下了这样的话：“尤其经过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社会面貌，人的面貌，都起了剧烈深刻的变化，一切走向革命化的道路”，并认为自己生活在这样的时代“确实是没有甚么遗憾的”。从这份打著深深的文化大革命烙印的“遗嘱”可以看出，民主党派人士是何等虔诚地要求自己“紧跟”毛泽东的“战略部署”，拥护这场文化大革命。

民主党派在文化大革命深入后的命运

随著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深入，毛泽东与中共中央不断呼吁“掌握斗争大方向”，搞好“革命大批判”，引导红卫兵和造反派将打击矛头指向中共“党内走资派”。但是这并不意味著民主党派就躲过了劫难，因为他们的历史就是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的历史。

在当时的“揪叛徒”恶浪中，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等人於 1967 年制造了所谓“新疆叛徒集团”冤案，诬陷在 1942 年和 1943 年被新疆军阀盛世才逮捕关押、抗战胜利后获释的中共干部 131 人“投敌叛变”，并将打击矛头指向了民革中央副主席张治中。康生甚至说这是“叛徒”和“国民党”张治中相勾结，好在共产党内潜伏下来。张治中听到这个说法后，悲愤地说：“这怎么可能？这不是没有了是非黑白了吗？”

周恩来在对红卫兵谈话中说明了新疆出狱一事的经过：张治中是受他之嘱，将一批被国民党关押的中共干部释放，党中央早已做了结论：张治中才幸免於难，但精神受到打击，健康日趋恶化。当年由他释放并精心护送回延安的马明方、张子意、杨之华、方志纯、高登榜等 92 名中共高级干部仍被立案侦查、批斗迫害。马明方等 26 人更被迫害致死。

张治中毕竟因被周恩来列入“应予保护”的名单而免去了直接的人身迫害，但民革中央常委唐生智则因中共党内的刘少奇、贺龙两大案而被迫害致死。唐生智的外孙女艾晓明回忆：1968 年 2 月，中央军委文革专案组到长沙，要唐生智检举 1927 年刘少奇命令武汉工人纠察队交枪一事。在此之前，已有人找唐生智数次个别谈话，逼他检举此事。唐生智只知道武汉工人交了枪，但究竟是工人自动交的还是奉谁之命，则不得而知。由於他不愿无中生有，因而受到审查逼供，白日交代，夜里反省，有家归不得。专案人员又反覆启发提示，要他检举贺龙的所谓历史问题。专案组某政委甚至掏出手枪威胁唐生智。

张治中与唐生智都是因中共党内的要案牵连而受到迫害。在这场重点打击中共“党内走资派”的运动中，却另有一个以民主党派人士为主要打击对象的重庆“一号专案”。

自 1968 年 9 月至 1971 年 9 月，重庆市革命委员会以“清查武斗黑手”、“清理阶级队伍”名义组织了一个所谓“管训队”，集中管训以民主党派成员（其中多为起义、投诚的原国民党高级军政官吏）为主的“牛鬼蛇神”236 人，对他们进行法西斯的刑讯逼供，不仅“挖出”涉及刘少奇、贺龙、叶剑英、杨尚昆、李维汉、张友渔等中共高级干部的所谓“政历问题”材料数百

件，还炮制出一个以三位民革领导人：民革中央委员裴昌会（全国人大代表、国防委员、重庆市副市长）、民革中央候补委员鲁崇义（全国政协委员、重庆市人委参事室主任）和民革中央委员、民革重庆市委主任委员夏仲实（全国政协委员）为首的所谓“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反革命集团”嫌疑案，即重庆“一号专案”。

这个天方夜谭式的冤案，诬称裴、鲁、夏等从1967年2月开始即密谋策划，串连他们解放前的旧部下、旧关系，并请示了“走资派”任白戈（在文化大革命初被打倒的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兼市长）、李止舟、廖伯康（在文化大革命前与萧泽宽一起被打成“萧李廖反党集团”的中共重庆市委领导干部）的同意，於1967年3月在民革重庆市委礼堂召开了“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反革命组织成立大会，裴昌会宣布集团军设总部，所辖两个军，三个独立师，总司令裴昌会，副总司令兼参谋长夏仲实，副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鲁崇义，第二军军长卿云灿。兵力来源：插手群众组织；战略方针：立足四川，发展云南，联络缅甸，迎接反攻。并设专用电台，与台湾、上海、广州等地联系，待机暴动……。

在长达三年的“管训”中，此冤案涉及的人员从精神到肉体都受到百般摧残，被强加了“潜伏特务”、“武斗黑手”、“残渣余孽”、“投敌叛国”等诸多罪名。裴昌会等人被迫害致残，夏仲实等人被迫害致死。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两年多之后，这一大冤案才得以平反昭雪。类似这样的冤案在文化大革命中可谓比比皆是，罄竹难书，许多民主党派人士还作为“要犯”被关入了北京秦城监狱。

除了对民主党派政治人物的迫害外，对民主党派高级知识份子所谓“反动学术权威”的“落实政策”，也是另类形式的精神迫害。例如，1969年1月底，毛泽东派驻清华大学的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负责人迟群，向全校师生员工传达了经毛泽东审阅、由中共中央批发全国学习的清华大学所谓“坚决执行对知识份子‘再教育’、‘给出路’政策的经验”，这个经验被称为“毛主席亲手树立的样板”。其中说，革命群众按照毛泽东“学问再多，方向不对，等於无用”的指示，把清华大学的著名建筑学权威梁思成、机械学权威刘仙洲、力学权威钱伟长这三个“反动学术权威”典型批倒了、批臭了，成了“废品”、“垃圾”。批了之后怎样“给出路”呢？对梁思成、刘仙洲这样“年纪太大，用处不大”的人，所给的出路就是“养起来，留作反面教员”。宣传队认为这是伟大领袖对梁思成的大恩大德，居然还派人到医院去向正在住院治病的梁思成当面传达这个文件。梁妻林洙回忆：后来当我翻阅他的笔记本时才发现，从1月26日到2月27日他没有写一个字。沉默！这是他的回答。对知识份子来说往往生活上的艰苦不是最可怕的，最难以忍受的是人格的侮辱与恶意的嘲弄。

1969年4月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陆续恢复活动，但民主党派仍未恢复活动。5月4日，周恩来致信国务院直属口军代表转人大、政协军代表，要求给派往各民主党派机关的军代表谈谈政策。

“机关革命造反派的任务是清理机关干部的队伍，而不要去斗批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即他们的中央委员、省市党部委员。如他们中间出现了现行的反革命份子，自当别论，但也需先报告军管代表，得中央或省、市革委会同意后，方能采取行动。机关干部也要在清理队伍时，按具体情况区别对待，不能以中共党内标准要求。”1970年2月，周恩来对进驻各民主党派机关的军代表

指示：对民主人士不能那样随便揪斗；如果党外人士有政治历史问题，可以背靠背地进行审查；历史问题，既往不咎，如有现行反革命，另当别论。之后，又几次向有关部门提出，要把已下放劳动的民主党派人士中的中央委员以上人员，从干校抽调回来。从周恩来这几次指示，我们可以从反面得知，民主党派在文革中受到的迫害决不亚于中共干部。

民主党派的“十月晋言”

在竭力使自己理解文化大革命的同时，也有民主党派领导人向毛泽东直接表示了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作过曲折的抗争。

久已患病在家，停止了一切政治活动的张治中，虽然在后来留下的“遗嘱”中表示了对文化大革命的虔诚拥护，但1967年国庆节在天安门城楼上见到毛泽东时，仍委婉地对毛泽东说：“您的步子走得太快，我们跟不上了。”

“现在被打倒的人不止百分之五了吧？”在当时，这是无人敢说的话。毛泽东是否回答了张治中？是怎样回答的？我们不得而知。

程潜在他家附近发现贴出了丑化朱德的大字报和漫画时十分气愤，叫女儿赶快用“毛泽东思想万岁”的标语将其覆盖。当社会上开始出现批判刘少奇的浪潮时，他坚持让服务员把刘少奇的像挂起来，并说：“还没有取消少奇同志国家主席的职务，为甚么不能挂呢？”

在当时的形势下，民主党派领导人之间已很少往来，以避免是非，但程潜有一天仍然将朱蕴山请来家里，谈及对江青的一些做法很不满，不知该如何向毛主席进谏。朱蕴山劝告他千万不要写信，以免落入江青一夥手里，最好是有机会见到毛泽东时当面直言。程潜和毛泽东的关系一直很密切，以往他每次提出见毛泽东，都是有求必应的。但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多次提出见毛泽东的请求都没有回音，使他失去了“进谏”的机会。

1972年10月，几位著名高层民主党派人士共同向毛泽东和中央提意见，亦即所谓的“十月晋言”。事缘林彪事件之后的1972年夏，毛泽东的姨表兄王季范在京病重，作为王季范的学生和挚友，民盟中央委员、民盟湖南省委主任委员周世钊专程进京探望。王季范去世后，周世钊在追悼会上致悼词。此后，周世钊在京拜访了一些老朋友，如民盟中央副主席胡愈之、民进中央副主席杨东黻、民盟中央副主席楚图南、民盟中央常委兼宣传部部长萨空了、民盟中央常委李文宜和胡愈之夫人、民盟中央常委沈兹九等。大家无不为国事担忧，并达成了要向毛泽东上书言事的共识。於是，周世钊通过王季范之女、当时常在毛泽东身边担任翻译的王海容，向毛泽东表示想要“晋言”的意思。随后，几位民主人士在胡愈之家中进行了认真商量，并决定：为避免有人与负责外交工作的周恩来为难而不谈外交问题；为避免犯江青的忌讳而不谈文艺问题。最后由胡愈之将要谈的问题归纳为广开言路、教育问题、青年问题三个方面，并确定了由胡愈之、周世钊、杨东黻分别进行准备。

10月2日晚，王海容陪同周世钊到中南海见毛泽东，周世钊当面递交了他於8月5日就写好的近四千字长信，信中谈了八个方面的问题：严惩林彪集团中罪行特别严重的头目；落实干部政策；解放知识份子；总结解放军支左的经验教训；青年教育问题（包括恢复共青团、少先队）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严重后果；恢复尖端科学研究，除恢复理工科大学外还要恢复文科大学；开放书禁，改变青年工人、农民和学生除政治理论外没有其他书可读的状况；设立受理群众申诉的机关，健全法制。周世钊向毛泽东反映了对

当时形势的一些看法，长谈了3个小时，并转达了胡愈之等人希望见面晋言的愿望。毛泽东指定汪东兴去听取意见。

於是，从10月3日下午到10月5日下午，汪东兴听取了这几位民主人士的意见。其间，时任中共中央委员、国务院业务组负责人的华国锋前来听过一个半天。谈话由当时的中共中央统战部负责人李金德记录。胡愈之著重谈发扬民主、广开言路的问题；周世钊著重谈教育问题；杨东黻著重谈青年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胡愈之在谈话中明确提出希望在可能的条件下恢复民主党派的的活动，即使是恢复部分代表人物的活动也好，并提出恢复由民主党派办的报纸。

至今尚无公开材料可以让我们了解毛泽东对周世钊的信和这次民主党派人士“晋言”的看法，但可以确定的是，胡愈之提出恢复民主党派活动的请求并非全无反响。在“晋言”一个月之后的11月12日，周恩来批准恢复孙中山诞辰纪念活动，明确由全国政协、民革中央和中共中央统战部出面举办纪念仪式。虽然还只是礼仪性的活动，但是民革这次是以民主党派身份而不是以“爱国人士”身份出面了。又过了两年多，周恩来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才提到了“进一步发展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包括爱国民主党派、爱国人士、爱国侨胞和港澳同胞的革命统一战线”，算是明确了民主党派在“革命统一战线”中的名份（尽管仍未恢复其组织活动）。

这次文化大革命期间民主人士直接向毛泽东和中央提出不同意见的行动，是有背景的。1971年8月27日，毛泽东在长沙与湖南省军政领导人卜占亚、华国锋谈话，曾谈及民主党派，他说：“你们对民主党派的问题要研究研究，看还要不要？”“民主党派还要存在。有的地方说不要了，不要太急了，急不得。”“对民主党派来说，他们没有搞翻案，他们也没有发指示。作为民主党派来说，还是可以存在的。”还说：“应该把民主党派的牌子都挂起来”，“把民主党派搞掉了，有甚么好处呢？一个‘拖’字解决不了问题，存在的问题在他们挂起牌子以后，可以再了解、再调查、再处理嘛”。大约是得悉了毛泽东的有关讲话精神，1971年9月，周恩来指示让下放到全国人大、政协机关“五七干校”劳动的民主党派中央委员返回北京；1971年底中共中央在京召开上层爱国人士座谈会，传达中共中央关于揭批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的一系列文件及林彪事件后中央采取的若干重要措施。会议期间，周恩来询问了一些民主人士的身体和生活情况，肯定他们对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所做的工作，提倡大家要做中国共产党的“诤友”，但是并未提及民主党派恢复组织活动的事。

在文化大革命之后，楚图南在一篇悼念胡愈之的文章中谈及“十月晋言”一事时说：“据说这些问题都被详细记录下来，并上报了，但却无结果，并且得到相反的反应。”

自1957年反右派运动以后，民主党派“万马齐喑”，很难再对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制订的国家大政方针提出不同意见。1972年“十月晋言”，如此全面地反映了对文化大革命的不同意见，不仅要算是民主党派在文化大革命中最高层、最直接的一次曲折抗争，而且可能要算是自反右派运动以后民主党派最大胆的一次“参政议政”行动。这是值得在文化大革命史上大书一笔的事件，也是民主党派在文化大革命中最光彩的一页。

五、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1) 葛佩琦的所谓“杀共产党人”纯系捏造

葛佩琦，山东平度人，生于 1911 年，1930 年入北平崇实中学，因家境贫困，靠亲友援助和半工半读维持学业，1933 年考入北京大学，1937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

“一二·九”运动时，任北京大学学生会副主席，是当时北大学生抗日救亡运动领导人之一，与黄华，姚依林等同为无人不晓的学生运动领袖。

1937 年北平沦陷后，葛佩琦投笔从戎，到豫东打游击，并于 193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 年后从事中共地下党的秘密工作。曾任南京平津学生流亡同学会执行委员、豫东抗日游击司令部政训处长等职。

抗战胜利后，他受中共派遣，潜伏在国民党军政机构，解放战争时期，他打进国民党第一战区长官部，参与建立地下联络站，中共著名特工熊向晖多次通过这个联络站送出绝密情报，使胡宗南进犯延安败绩连连。1946 年 2 月葛佩琦又奉命打入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部，在杜聿明身边任少将督察和东北通讯处长，他将来自国军心脏的大量情报，交给单线联系人李年，再通过秘密电台源源不断地摆到毛泽东的案头，为“料事如神”的毛泽东、林彪攻城略地，提供了东北地区最高军事机关的核心机密。

葛佩琦长期以国军少将身份从事地下工作，身居虎穴，不顾个人安危，传送重要情报，为中共占领东北、夺取政权做出过很大贡献。

1947 年底，他的联系人李年和组织关系领导人赵耀武先后被捕，下落不明，由此失去了同共产党的联系。

毛泽东入驻中南海坐定江山以后，“狡兔死走狗烹”，对原先的中共特工人员狠下杀手，因为他们知道得太多了。1955 年毛亲自下令，秘密逮捕了特工大头目、时任上海市副市长的潘汉年[1]，更早些还抓了广东省公安厅厅长陈泊[2]、上海市公安局长杨帆[3]等人……；葛佩琦“解放后”已是平头百姓，得以让他逍遥了几年，到反右时才下手。

中共建国后，葛佩琦被安置到中国人民大学当一名教师。1957 年被划为右派，中国人民大学党委随即以歪曲捏造、无中生有之手段罗列罪名，认定其为现行反革命。葛佩琦于 1957 年 12 月 24 日被捕入狱，1959 年 6 月 29 日以反革命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1975 年，因葛佩琦曾是国民党少将，属“战犯”之列，坐了十八年牢狱，获特赦，时年六十五岁。

由于在监狱中身心备受摧残，害严重眼病未能及时治疗，出狱时单目失明，另一只眼睛也只有 0.1 的视力；双腿痼疾，也因延误医治而落下残疾，需要架着双拐才能走路。毛泽东把一个冒着生命危险为中共夺取政权立下了汗马功劳的健康人变成了残疾人。

1976 年，毛泽东死了以后，胡耀邦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开始平反冤假错案。葛佩琦以病弱之躯多方上访，几经周折，幸好当年入党介绍人刘子久尚健在，个别当年从事地下工作的联系人也历经文革等政治运动之磨难，劫后余生，为其出具证明材料，克服了重重阻力，1980 年在中共中央直接过问下方获平反，1983 年恢复了中断三十五年的党组织关系。

1993 年 1 月 13 日上午十一时五十五分，葛佩琦心脏病复发，抢救无效而辞世，终年八十三岁。

生前著有《葛佩琦回忆录》，叙述了个人坎坷的一生，全书 208 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4 年曾出版和少量印刷。

葛佩琦是怎么被打成右派又被认定为历史和现行反革命，判处无期徒刑的呢？

1948 年 11 月 2 日，沈阳“解放”。葛佩琦怀着无比兴奋的激情去寻找党的领导机关，理直气壮地要求明确党员身份。但是，辽沈战役刚刚结束，平津战役方兴未艾，地下工作尚未公开，无人出面证明其身份，因此他还是一名“党外人士”。只得先找个工作维持生活，凭借其北京大学学士的资历，进了中国人民大学，在工业经济系任物理讲师。

在中国人民大学期间，从 1951 年 2 月起，他每个月都要面见党总支书记一次，要求调查恢复他的组织关系。得到的回答是“老三句”：你的问题时间长了，问题复杂，不好解决。他还直接给学校党委写过三次申诉信，并把中共华北局经过“函调”、确认他入过党做过地下工作的材料转给了学校党委，但均如泥牛入海，始终没有得到确切的回答。

此事是不是很难查证呢？答曰：否！因为中共情报机构对战争时期的情报和地下党的组织关系以及地下党员的个人表现均有记录，以“绝密”等级，保存在中共中央档案馆，只要认真核查，是不难得出结论的。然而多数政工官员忙于政治运动、忙于尔诈我虞、忙于勾心斗角、忙于争权夺利、忙于阿谀谄媚，无暇也不愿认真复查对自己没有好处的事情。乃至葛佩琦的党籍问题拖了九年也未见分晓。这不免使他很寒心，也是他在鸣放中发泄怨气的原因。

1957 年春，毛泽东鼓吹大鸣大放，中国人民大学党委接连两次给葛佩琦送来书面通知，要他参加“党外人士座谈会”。实际目的是“引蛇出洞”“请君入瓮”。

葛佩琦觉得他本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只是由于地下组织被破坏，单线联系人被捕而断了组织关系，党委对自己的一再申诉似乎置若罔闻，凭什么要把自己列为“党外人士”？所以拒绝参加。

第三次，又送来了通知，并有系总支的一位党员当面动员：“校党委三次请你参加座谈会你都不去，这不太合适吧。”这样，他才心怀愤懑地参加座谈会。

到了会场，校党委书记再次强调“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并说这是毛主席的教导，请大家打消顾虑，踊跃发言。

在一些真正的党外人士发言之后，葛佩琦说：我不是作为党外人士参加这个会的，我是作为 1938 年就已经入党的老党员来向党委反映意见的，我的党籍问题，不是搞不清楚，而是你们对流过血汗的同志冷若冰霜，像现在这样的党群关系，如果还需要做地下工作，群众很难再保护我们，就会被敌人杀掉。

葛佩琦还就党员不要脱离群众，不要看不起党外知识分子，党员干部不能生活特殊化，努力克服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等等，给党委提了意见，并语重心长、忧心忡忡地阐述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

5 月 26 日，《北京日报》第二版头条，发表了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在近两日连续召开教师座谈会的消息。文中共有五个小标题，比较详细地报道了八位教授、讲师的发言。

最后一个标题是《葛佩琪（琦）谈党群关系》。其全文是：工业经济系讲师葛佩琪（琦）的发言引起人们的注意，他认为“今天的党群关系比起 1949 年差了十万八千里”，他说“群众为什么对我们（党和政府）起恶感呢？因为我们做的事没有他们想像的那样好。老百姓的生活没有提高，提高的只是共产党”。他甚至提出，现在共产党工作做得好没话说，做不好，群众就可能打共产党，杀共产党的头，可能推翻他。他接着提出：现在学校领导上总爱说这个公式：大家意见很好，能处理的就处理，不能处理的就解释清楚。他认为有错就应该承认，当不了校长可以自己申请调动，自己造成的错误应该自请处分。今天不是再用这个公式的时候了。

对《北京日报》的这一报道，葛佩琦没有提出意见。虽然内容失实，但和中共某些领导人常说的“弄得不好，就会亡党、亡国、”的忧党忧国之情，并没有本质的不同；而且“群众为什么对我们有恶感，因为我们做的事情没有他们想像的那样好”，显然是一个共产党员的语气。

第二天，即 5 月 27 日，他看到了中国人民大学内部刊物《人民大学周报》第一百四十八期的报道，甚为惊愕。因为该刊物断章取义、恶意篡改了他的发言，竟然说葛佩琦扬言：“不要不相信我们知识分子。搞得好，可以；不好，群众可以打倒你们，杀共产党人；推翻你们，这不能说不爱国，因为共产党人不为人民服务。”

当天下午，他就面见了学校副校长、校党委副书记聂真[4]，指着《人民大学周报》的这段话情急气冲地说：“这不是有意诬陷我吗？”聂真不阴不阳地说：“葛佩琦同志，你不要着急；党是实事求是的，登错了，可以更正”。

然而，嗣后不但没有更正，而且风声闹得越来越大，越来越离谱，在 6 月 8 日全国正式“反击右派猖狂进攻”之前就对他展开了“批判揭露”。

5 月 31 日，《人民日报》第七版，发表了《中国人民大学继续举行座谈会，教师们从不同观点提出问题》的报道，并用醒目的黑体字列了五个小标题。其中四个都是某某人说的一句话，都是一般的批评建议，惟有第五个小标题不但长了好几倍，而且用词十分险恶：葛佩琦认为：今天党群关系与解放前相比，差了十万八千里，党员起了监视群众的便衣警察的作用。他说：“不要共产党领导，人家也不会卖国”。葛佩琦还说：“1949 年共产党进城时，老百姓都是‘箪食壶浆’‘以迎王师’来欢迎。今天老百姓对共产党是‘敬鬼神而远之’。……中国历史上好多这样的例子，当统治者没得到统治地位的时候，老百姓是欢迎他的。但他们一旦得到了统治地位，而不顾人民利益时，人民就要反对他们。……1945 年抗战胜利时，受了日本人压迫了八年的老百姓也欢迎过国民党，后来国民党的大员搞‘五子登科’，人民就反对他们。现在的情况不同了，老百姓对共产党的意见很多了。共产党若不自觉也是危险的。”

《人民日报》1957 年 6 月 8 日第二次报道了葛佩琦“反共言论”，摘录如下：

葛佩琦说，至今群众对鸣放还有顾虑，具体反映了群众对共产党的话不敢信任，共产党对这一点应特别重视，因为“民无信不立”。我还要重复一遍。群众总要推翻共产党，杀共产党人，若你们再不改，不争口气，腐化下去，那必是这条道路，总有这么一天。这也是合乎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只空喊万岁是没有用的。

他说，群众为什么不敢信任共产党呢？因为群众在八年中体会到共产党善变，如去年中央指示照顾知识分子，校部派公务员送饭送水，今年实行精简节约，又取消了公务员。党组织对人，认为有用时，把杀过朋友，杀过同志，杀过党内人都当作宝贝；不用时，把为党流过血和汗的人关在大门之外，冷若冰霜。有些党员六亲不认，连儿子同爸爸都不接近，儿子入党给妈妈来信称同志。这些事例说明群众不信任共产党是完全合乎情理的。

他又说，1949年群众对共产党不会有这么多意见。三害不铲除，狂澜既倒，挽狂澜既倒的可能是除三害，另一个可能被狂澜冲走，葬身鱼腹。

葛佩琦看到6月8日的《人民日报》以后，无比气愤！《人民大学周报》刊登的发言尚可称断章取义、恶意篡改，《人民日报》刊登的发言只能叫无中生有，歪曲捏造！

他当即写了更正信，并于第二天上午亲自送给了《人民日报》社，信的全文如下：

编辑同志：

六月八日你报七版刊登的我的那个发言，有些地方和原意有出入，请予更正。“我要重述一遍……只空喊万岁是没有用的”这段报道的全文是：“我要重述一遍，群众总要推翻共产党，杀共产党人。若你们再不改，不争口气，腐化下去，那必是这条道路，总有这么一天。这也是合乎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只空喊万岁是没有用的。”应改为“在这次整风中，如果党内同志不积极改正缺点，继续争取群众的信任，那不仅可以自趋灭亡，而且发展下去，可以危及党的生存。”

葛佩琦 1957年6月9日

要求《人民日报》更正的信送到了，可是在当时，除了心怀叵测、别有所图的少数人之外，大多数人都处于“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的状态。对“右派”的批判揭露只能火上浇油，谁敢于公开为“右派”辩解或澄清呢。

《人民日报》对葛佩琦的这封更正信不但未予置理，而且对他的批判日益变本加厉。

不过，人民日报社还是做了一件好事，没有立即销毁葛佩琦这封要求更正的来信，而是将它归档保存。1980年，在铁箱里沉睡了二十三年之久的这封信终见天日，成了为葛佩琦“改正”错划右派的重要证据之一。原来葛佩琦的所谓“杀共产党人”是《人民日报》某编辑妙笔生花编造出来的诬语，是他们惯用的伎俩。此类手法历久不衰，在那个时代，国家主席可以变成叛徒、内奸、工贼，痞子流氓可以成为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亩产水稻可以十多万斤，鸡毛可以飞上天。什么人间奇迹都创造得出来。

1957年6月14日，《人民日报》以南京电、保定电、沈阳电，发表了三篇外地批判葛佩琦的报道，同时刊发了《葛佩琦的学生痛斥葛佩琦》的文章。

6月15日，又登出著名人士马寅初的《我对储安平葛佩琦的言论发表些意见》。

6月16日，在《坚决粉碎右派的进攻》的大标题下，不但有《农业劳动模范痛驳葛佩琦》的小标题，在《复员军人号召保卫革命果实》的那一段，还说“葛佩琦、王德周之流说共产党员‘无恶不作’”。

6月17日，《人民日报》第二版刊发了新华社的报道：《人民大学教授抨击葛佩琦王德周》。

6月18日,《人民日报》第七版《坚决捍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北京矿业学院矿工和革命军人出身的学生座谈》,大批葛佩琦。

6月20日《人民日报》头版《按不住心头怒火,恨透了右派野心》的总标题下,老苏区人民、河北一农业社农民以及一些著名烈士的夫人集会或谈话,痛斥葛佩琦的“杀共产党”、“要共产党下台”……

《人民日报》肆无忌惮地篡改葛佩琦的发言。诸多媒体用语就更为“精炼”,变成了“葛佩琦要杀共产党人、右派要杀共产党!”这已经和葛佩琦5月24日的发言原文风马牛不相及,完全成了造谣。接着《人民日报》等媒体连续多天刊登了工农商学兵各式人等的讲话、文章,大肆挾伐要杀共产党的那帮右派分子。在如火如荼的大批判中,是不容许当事人澄清事实的,既不容许申辩,也不容许核实,更不容许辩驳。中共利用手中掌握的各种舆论工具造成全国共讨之的局面,终于掀起了反右高潮!

在党中央喉舌《人民日报》的如此带动下,全国大小报刊迅速掀起大批大揭“葛佩琦要杀共产党人”的高潮。一贯紧跟毛泽东为非作歹、长于乘人之危的反右干将邓力群[5]巧舌如簧,笔下生花,妄称葛佩琦“要杀成千成万共产党人”,更让葛佩琦成了“人人得而诛之”的头号反共人物,被“理所当然”地划成了“极右分子”。

1957年7月3日,在反右高潮中,《人民日报》以捕风捉影,亦真亦幻的手法,揭露了葛佩琦的“反动历史”:

原来,葛佩琦曾经做过国民党第一战区长官部少将参议,1937年他在北大毕业,以后流亡到洛阳,一度参加共产党,不久被清除出党,就投奔了国民党反动头子胡宗南。由于他知道共产党的内幕,又积极地反共反人民,很得胡宗南的欢心,做官一帆风顺。抗战胜利后,又在东北任国民党中宣部东北新闻通讯处处长和国民党东北长官保安部、政治部二组少将组长,在沈阳时,他曾经组织山东同乡会自己担任主席。这时更露骨地表现了他的反动言行。他以山东同乡会名义发过通电给他的主子蒋介石,请求讨伐鲁镇“共匪”,请求制止其它地区的“共匪”进驻山东,还给当时的国民党山东省主席王耀武打电报,要求限期肃清“奸匪”,以安桑梓。另外又给毛主席发过电报,内容是“停止赤化山东”。从这里反映了他的反动立场是多么明确。一直到今天,他的阶级立场并没有改变。

仔细阅读这段“反动历史”可以看出其中时间错位,事无依据等诸多漏洞。但是,对一般读者来说,却极易造成葛佩琦的反动本性实属根深蒂固,由来已久的印象,得出他在1957年扬言杀共产党人是有历史缘由的结论。

不过,历史开了一个玩笑,1993年1月26日,新华社为葛佩琦的去世发了一则电讯,高度评价了葛佩琦的一生。电讯中这样写道:

葛佩琦同志1911年生于山东省平度县,1935年参加革命,1938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他在“一二·九”运动时期任北京大学学生会副主席,是当时北大学生抗日救亡运动领导人之一。他曾两次遭国民党政府逮捕入狱,在狱中他坚贞不屈,表现出革命者的气节。他多次受党指派,在国民党军政机构长期从事地下工作,不顾个人安危,为革命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葛佩琦自1951年起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并被捕入狱,虽长时间蒙受冤屈,但他襟怀坦白,心胸开朗,正确对待个人不幸遭遇,保持革命者气节。1975年获宽大释放。1980年在党中央直接关怀下获平反,1983年恢复了中断多年的党的组织关系。葛佩琦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他刚直

不阿，心胸豁达，对革命的信念始终没有动摇过。在冤案平反之后，他以新的姿态投入四化建设，抱病著述，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为人民贡献一生。他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从不以老革命的身份自居，始终保持一个革命者的本色。

同样是中共中央的宣传机构，1957年和1993年对葛佩琦的报道，居然有天壤之别，一个高喊负责责任的政党，一个高叫“世界上怕就怕认真”的党首，竟然玩弄文字游戏于股掌之上，任意歪曲历史，岂不耐人寻味么？

帽子戴上是一夜之间的事，要摘掉它则难上加难。

1957年以后，葛佩琦戴着极右分子和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三顶帽子，先后在北京、山西大同大青窑煤矿、山西祁县监狱等地劳改。坐了十八年牢房。

1975年底葛佩琦被特赦以后，暂时居住在北京市北郊清河镇从一家农民借的房子里，既无户口又无生活来源，靠经济本来就十分拮据的女儿给一点赡养费维持生活。经过整整一年多的摸索奔波，才艰难地解决了户口和每月二十八斤粮票、十八元生活费，总算可以苟延残喘，维持生命了。

他于1977年3月8日搬进了北京东城交道口大街九十六号大杂院，孤寡一人住在破烂不堪只有半拉窗户的八平方米小屋里。这个大杂院，原住的十五户人家，有十四户是工人家庭，另一户男主人是中学教师，女主人也是工人。

在葛佩琦即将从北郊清河搬来之前，当地派出所的民警和居委会的干部来到这个院子向众人宣布：有一个“老右派”、“国民党少将”、“要杀共产党人”的葛佩琦特赦出来了，要住到这里，大伙儿对他应该划清界限，提高警惕，“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可是，这院子里的工人阶级，偏偏不信这些“循循善诱”，他们相信“耳听为虚、眼见为实”。邻居们看到了这个孤老头儿，戴着深度眼镜，拄着自制的双拐，白发满头，瘦骨嶙嶙，慈眉善目，语言平和，由于视力不佳，连手中的钞票是多少钱都看不准，更分不清粮票与油票，等于是个睁眼瞎子。

葛佩琦的悲惨遭遇和凄苦生活激起了邻居们的同情与怜悯，善良的人们无一例外的给以关照。其中尤以隔壁李学俭一家对他格外亲切，为其做家务、买东西，甚至自家包了饺子、做了什么好吃的，也要给老头儿端一碗。让他体会到了蕴藏在普通老百姓之中的人间真情，和那些披着红色外衣高唱执政为民的共党党棍、政客迥然不同。

1978年9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1978]第55号文件，宣布对错划右派分子可予以改正的政策，葛佩琦闻讯后，立即向中国人民大学提出申诉，经办人以种种借口推脱，据云他的问题是现行反革命，不在复查之列。

10月中旬，葛佩琦迫不得已拜访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成仿吾。成仿吾询问了有关情况，口头表示同情，并说会把他的书面报告转给人事处。

几天后葛佩琦到人事处查问处理结果，一位干部回答说：你的报告转来了，但成校长没有在上面批一个字，我们无法处理。

12月25日，葛佩琦冒着隆冬严寒到中央组织部信访处上访，领了一张登记表和接谈号码，按照那个号码需要等到第三天才能接待，幸有好心人看到葛佩琦拄着双拐，浑身冷得发抖，双目近乎失明，主动提出与他交换号码，让他当日即可接谈。接待上访的人问明他是1957年的葛佩琦后，即与上级通

电话，大约十分钟后，告诉他：领导准备接见你，但今天领导在外面开会，让葛佩琦后天上午再来。

12月27日上午八点，葛佩琦再到中央组织部信访处，受到宣教干部局郝一民局长接见，葛佩琦陈述了个人历史和蒙冤情况，提出了三点要求：（1）请求恢复党组织关系；（2）请求改正错划右派；（3）请求平反冤案。郝一民态度热情诚恳，针对葛佩琦的具体情况，建议他重新写一份书面材料，并指出：最好先要求改正错划右派，因为不改正错划右派不能恢复党籍。

1979年元月的一天，雪后初晴，朔风凛冽，寒气袭人。葛佩琦穿着破旧的棉衣、架着双拐再次上访，将新写的书面材料交给了中共中央组织部郝一民局长。

1979年4月初，葛佩琦拜访了人民大学“右派摘帽”办公室负责人，询问对他的“右派”问题复查进展如何。这位负责人说：“中央组织部已经转来了你的申诉材料，我们正在复查”。葛佩琦告诉他，1957年5月27日《人民大学周报》歪曲了他发言的原意，他当即向学校党委副书记聂真提出异议，要求更正。同年6月8日《人民日报》刊登的据说也是他的那个“发言”，与他的原发言完全不相符，他在次日就送信给《人民日报》编辑部要求更正。按照中央宣布的政策，被他要求更正过的那些“发言”不能作为划“右派”的依据。这位负责人以冷峻的口吻说：“我们研究研究再说”。

后来得知，这个“研究研究”是很慎重的。把当年在人民大学经历过“整风反右”的一些学生班组党支部书记，都请了回去“研究研究”。研究的结果，谁也说不出来葛佩琦“要杀共产党人”的事实。但据说他这个“右派”是毛泽东亲自划定的，毛泽东的阴魂还在，谁也不敢出面为他平反。

葛佩琦眼巴巴地望着这个“研究研究”，整整望了七个月。

1979年11月12日，人民大学党委派人给他送来了《关于葛佩琦右派问题的复查结论》。《结论》把1957年报纸上刊登的那些对他的歪曲诬陷之词重复一遍之后说：“不属于错划，不予改正”。葛佩琦当即表示：不同意这个《结论》，继续申诉！

第二天，葛佩琦步履蹒跚地去北京市法律顾问处咨询。律师答复说：“依法而言，报纸上刊登的那些没有经你签字同意的‘言论’，是没有法律效力的，是不能作为划你右派的依据的……”。

有了这一答复，葛佩琦开始了新一轮上访申诉。负责解决“右派”难题的五大部——中组部、中宣部、统战部、公安部、民政部，他都去遍了，有的还去了好多次。对于一个一瘸一拐、双目近乎失明的老人来说，每次上访都要付出极大的艰辛。各部门接待人员都说，人民大学的那个《复查结论》已由有关方面批准，他们不便再过问；有的还加上一句：阻力太大，爱莫能助。中组部的一位年轻的接待人员一语泄露了天机：你的问题已经定型了，没有中央领导的指示，难以起死回生。

葛佩琦从这位年轻人的话里受到启发，在国务院参事、原中国人民大学人事处处长李逸三鼓励下，死马权当活马医，决定上访胡耀邦。

1980年4月2日下午五时，葛佩琦独自一人来到王府井富强胡同，门口的警卫员向胡耀邦办公室禀告了葛佩琦来访的事，随即一名干部出来接待，见了葛佩琦以后说：我知道你的名字。葛佩琦面交了一份五百字左右的书面材料，接待人说：明天下午五点，你来看处理情况。

次日下午葛佩琦按时前往，昨天接待他的那位干部在门口交给他一个加印红框的大信封，让他持此信到中组部找陈野萍副部长。

1980年4月4日上午，葛佩琦拿着胡耀邦的批示信来到中组部，办公室秘书任小彬出来接待说：陈副部长外出开会去了，此事须待陈部长决定，你可用电话和我联系。

过了几天，葛佩琦打电话给任小彬，任回答说：陈副部长已指定专人接见你，并告知了接见的地点。

大约一周以后，葛佩琦如约而至，见到了干审局的一位副局长。

这位副局长和蔼而又严肃地说：人民大学的《复查结论》，认为划你为右派不属错划，你为什么不同意？

葛佩琦：这个《复查结论》，是以1957年报纸上刊登的那些对我的诬陷不实之词为依据得出来的。那些话不是我说的，报纸在刊登之前，没有征求过我的意见，更没有我的签字同意，这是没有法律效力的。根据没有法律效力的话作出的《复查结论》，我当然不能同意。

副局长：你说你没有说过那些话，可有什么证据？

葛佩琦：有！我有人证与书证。1957年5月27日，《人民日报周报》登出那些话之后，我就到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作了更正。党委副书记、副校长聂真同志接见了。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登出那些诬陷我的话，第二天我本人送信给《人民日报》，要求予以更正。

副局长：好，今天就先谈到这里。对于你提出的问题，我们将通知有关方面重新复查，查出来的材料会与你见面的。

1980年7月下旬，葛佩琦再次走访中国人民大学右派摘帽办公室，看到了复查材料，其中就有1957年6月9日葛佩琦写给人民日报社要求更正不实报道的那封信。

1980年夏季和1980年11月20日，葛佩琦的老上级、时任国务院参事的李逸三分别给国务院总理和中共总书记胡耀邦写了信，帮助葛佩琦申冤。信写得言之有据，情真意切。

1980年12月10日上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正式开庭，庭长刘罗彬宣读了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80）高刑监字第893号《刑事再审判决书》，宣告葛佩琦无罪。

直到此时，一直沉默的原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聂真，得知葛佩琦多方上访，有可能平反的信息，才在上级部门的催问下，承认《人民日报周报》1957年5月27日的报道不尽真实，承认葛佩琦曾要求更正，但当时未予更正。

1982年1月10日，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作出了：“根据中共中央（78）55号文件和（80）60号文件的精神，对葛佩琦的一九五七年划为右派分子的问题进行复查，予以改正”的《恢复结论》。

这个《恢复结论》，即刻被报送到中共北京市委教育工作部和北京市委常委会。

1982年2月，北京市常委会发出“京常字（82）2号通知”说：一九八二年一月二十九日，市委书记办公会议同意中国人民大学党委意见，对葛佩琦的右派问题予以改正。

1982年2月18日，北京市委教育工作部以“（82）京高教字011号”文件形式，向中国人民大学党委转达了市委常委会的通知。

1982年3月18日，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下发了经北京市委批准的《复查结论》。

细心的读者可能注意到了，上面列举的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市市委常委会、北京市委教育工作部对葛佩琦的右派问题，只说予以改正并没有承认错划，甚至连“同志”二字也略而未用。中共内部的顽固派千方百计的玩弄文字游戏，阻挠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所以葛佩琦还存在着恢复党籍和“错划”和“改正”的问题。

1982年5月4日，葛佩琦给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写了一封信，陈述了他的经历和目前亟待解决的党籍问题。罗青长发函证明，当年西安地下情报组织负责人赵耀斌在给葛佩琦接上情报工作关系时，就同时给他接上了党的组织关系。也就是四十年代的档案里已经明确地记载着葛佩琦是奉命打入国民党内部从事地下工作的党员。

1982年6月18日，人民大学党委收到罗青长这份材料的同时，也收到了葛佩琦当年的主要入党介绍人刘子久给人民大学党委的信：建议恢复葛佩琦的党籍。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将这些材料报送给北京市委组织部。

又经过将近一年，1983年5月23日，北京市委组织部做出决定：恢复葛佩琦同志的党籍，党龄从1938年7月起连续计算。

1985年6月14日，葛佩琦向北京市委申诉，请求解决右派复查中遗留的不承认错划问题。

1986年2月6日，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厅发文：葛佩琦同志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的问题，属于错划，予以改正。

至此，共产党内的权势者绞杀“不合朕意”之共产党人，长达三十年的大悲剧，始才落幕。

1957年葛佩琦一夜之间被划为右派，到1986年才得到“改正”，其间经过二十九年。二十九年啊！人的一生有几个二十九年呢？

从1978年葛佩琦开始申诉到1986年得到平反，竟然历时九年。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官僚机构的办事效率。

拨乱反正何其难也。

像葛佩琦这样的人，以莫须有的罪名，罗织成“罪”，含冤受屈几十年，在中国何止成千累万，这只能说在劫难逃或者时代的悲剧！

这“劫”从何而来？“悲”从何而生？是值得今天和后世一切心存良善的人们认真思索的！

葛佩琦事例，是恶意造假、精心策划的阴谋和阳谋之一。1957年6月，毛泽东认为“引蛇出洞”已达到足可一网打尽的目的，毋需再假装整风了，于是撕破脸皮以葛佩琦为一发重炮炮弹，开始了雷霆万钧的反右斗争。

葛佩琦被打成右派的情节也颇具典型意义，绝大多数右派被戴帽前都意料不到自己会成为阶级敌人，他们还没有看透毛泽东的“阳谋”，他们对中共毫无戒心，满腔热忱地响应中共整风号召后纷纷中计落马。在反右运动中，葛佩琦可算是一个标志性人物。

葛佩琦被改正后，《人民日报》等主流媒体并没有承认“右派要杀共产党”是假话，只是不再提起。有人推测认为，当时《人民日报》发表的几篇文章是毛泽东亲自修改的，安在葛佩琦头上那几句最恶毒的言论也是毛泽东妄加的，所以《人民日报》只保留了葛佩琦要求更正的来信，存档备查，却无人敢于更正那篇置人于死地的不实报道。果真如此的话，毛泽东何其卑劣，又

何其歹毒也！

时至今日，大陆又有几人知道“解放前”和“反右”时葛佩琦的经历？
有几人知道葛佩琦是为中共夺取政权建有奇功的老共产党员？

一旦让百姓知道真相后，还有几人会相信满怀纯真信仰的老共产党人要
“杀共产党”？

当局对反右信息的独家把持，蒙骗了全中国人民。联想到1989年，仅仅靠一个在党内已毫无职务的小矮人说一句话，就确定共产党的总书记企图分裂党，因而被罢黜，软禁十六年，直到含冤弃世，岂不发人深醒么。

笔者在本书里对葛佩琦这个案例颇着笔墨，在于它比较典型地涵盖了“鸣放”“反右”“迫害”“改正”的全过程，为了让后人知道那一段真实的历史，避免中国重蹈覆辙。累赘之处，望予谅解。

附注：

[1]潘汉年(1906-1977)，江苏宜兴人。192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初期从事文化工作，主办《幻洲》杂志，参加创造社。1926年应郭沫若之邀到南昌担任《革命军日报》主编。1927年赴上海，任“左翼文化总同盟”中组书记，为中共拉拢文化界人士，开创了三十年代初左翼文化大发展的局面。

1931年春，中共任命潘汉年为“特科”领导人，负责情报及保卫工作，由此，他就成了一个神秘的特工人员。潘汉年既做党的秘密工作，又做上层的统战工作。一项是绝密的地下活动，一项是半公开的社会活动。他巧妙地把公开的工作与秘密的工作结合起来，利用与社会人士的公开关系掩护党的秘密工作，既为中共窃取了重要情报又保护了自己。

1933年调任苏区中宣部部长，1934年随军长征，1935年与陈云一起赴莫斯科恢复和共产国际的联系。1936年4月回国担任国共谈判联系人，为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发挥了特殊作用。

1939年8月23日，斯大林为了把德国法西斯的战火引向西欧、引向英国，与希特勒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1939年9月28日又在莫斯科签订了《德苏友好和边界条约》。并授意中共可考虑对侵华日军采取适当对策，毛泽东对此心领神会，秘密派遣最出色、最能干的情报大将潘汉年潜赴上海，伺机与汪精卫联系，此事非同小可，属极端绝密，中共内部仅毛泽东周恩来二人知晓。（笔者注：写作途中发现网上披露了《毛润之写给汪兆铭的亲笔信》，真假待确认，姑妄录之，聊作参考。）毛润之写给汪兆铭的亲笔信

“汪主席兆铭先生：

近安！

自民国十三年广州一别来，距今已有十八年整矣！民国十三年国民党一大时，润之承蒙汪主席提携，以布衣之身虚添中央宣传部长之职，先后多次聆听汪主席教诲，让润之受益终身。

遥想庚戌年岁，汪主席不惜以身犯险，只身刺杀满清摄政伪王载丰。虽说功败垂成，但是汪主席“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之为革命献身之豪迈，却鼓舞了众多仁人志士为国捐躯之勇气。当时年仅弱冠的润之，拜读此诗时，兆铭先生的冲天豪气，让润之膜拜不已。所以次年辛亥岁，武昌起义之偶然成功，终将数千年奴役中华的封建独裁体制，扔进了历史垃圾堆，这其实应归功于兆铭先生前年的光辉榜样。然兆铭先生恢复自由后，并未持功贪恋权位，而是游学欧洲寻求建国大计。中山先生驾鹤西游后，汪主席主政中央，率军北伐成功，

一统中华。

惜与蒋委员长政见不一，蒋委员长因疑，苏俄蚕食中华之野心，毅然清党。汪主席再次出游，寻求救国之良方。润之不才，竟然以区区数百之农夫与蒋委员长逐鹿中原。后因日寇入侵，润之和蒋委员长何归于好，共御外敌。

而汪主席不惜自身声名，效法程婴存赵之举，甘冒让世人和历史污赠汉奸之名。前往沦陷区组织政府，服务人民，试图以和平建国运动，图谋保存中华之血脉。其勇气比舍身刺杀载丰，更可钦佩。不论是润之的敌后抗战、还是蒋委员长的正面血拼，或者汪主席的和平建国运动。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保存中华血脉之传承。可谓是殊途同归。

今我项英部，因听命于苏俄，致使蒋委员长误会，造成兄弟阋墙，让中华国防力量白白流失。为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我部将移防苏北，中间如有和汪主席的和平军有粗误之处，还望汪主席敕令部署，互不侵害。勿使中华国防力量流失。另我部医药奇缺，望汪主席有所周济。

润之

民国 31 年暮春、于延安拜上！”

1944 年 4 月潘汉年获悉侵华日军增兵五十万攻击中国的“一号作战计划”使延安方面预作准备几乎未遭攻击，贡献甚大。1944 年底潘汉年奉命北驰延安，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毛泽东为其举酒庆功。

1945 年潘汉年急赴东北，接管苏占区。1946 年再度南下，继续开展情报、统战工作，把许多绝密情报巧妙地送到中共代表团所在地“周公馆”，因此获得“潘汉年的消息实在灵通”之美誉。

1947 年各民主党派人士纷纷到香港从事组织活动，潘汉年随即赴港投入紧张的统战工作。1948 年底，他克服重重困难，妥善地安排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马寅初、马叙伦、郭沫若、沈雁冰等大批民主人士秘密离港转到东北、华北解放区。从 1948 年 8 月至 1949 年 3 月，先后送走了 20 余批民主人士，总数达 350 人以上，没有一次失误，为政协的顺利召开，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1949 年中共建立政权后，潘汉年任上海市委书记、副市长。1955 年，关押在上海提篮桥监狱中的敌伪人员中有人揭发潘汉年曾与汪精卫秘密相见，潘十分紧张，考虑良久，决定向老上级陈毅讲清楚那件事。1955 年 4 月 2 日陈毅听了潘汉年的汇报以后，请他放心，谁也不会怀疑你潘汉年对革命的忠诚，并答应明日即去中南海禀告毛泽东，只要毛泽东说句话，料想不会追查。孰料毛泽东听到陈毅的报告后，于 4 月 3 日当晚即下令罗瑞卿“秘密逮捕”。先后被关押在北京秦城监狱、团河农场等地，1963 年以内奸之罪判处徒刑十五年，文革掀起后，矛头再次指向潘汉年，1976 年 1 月宣布判处无期徒刑。

1977 年 4 月 14 日潘汉年含冤病逝于湖南茶陵米江茶场（湖南省第三劳改农场）。

1982 年 8 月 23 日，中共中央正式为潘汉年平反，文件指出：“潘汉年同志几十年的革命实践充分说明，他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久经考验的优秀共产党员，在政治上对党忠诚，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对于下令逮捕潘汉年的魔头，先后判处其有期徒刑十五年和无期徒刑制造冤狱的酷吏却未予追究。

[2]陈泊（1909-1972），原名卢茂煊，广东省乐会县人。1926 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37 年到延安负责中央及地方治安保卫工作。1942 年 5 月破获国民党“汉中特训班”，一网打尽潜入延安的特务五十六人，被毛泽东誉为“延安的福尔摩斯”。1943 年 6 月，抓捕了不惜以生命为代价、冒充新四军旅长赴延安向毛泽东汇报工作、寻机用无声手枪刺杀毛泽东的国民党军统高级特务田守尧，为此，陈泊得到中共中央社会部表彰嘉奖。1949 年 10 月，陈泊到广东任广东省公安厅厅长兼广州市公安局局长，短时间内破获抢劫、放火、杀人案件三百余起，抓捕人犯一千五百多人，缴获电台十三部、各类长短武器逾千支，得到叶剑英的首肯和赞扬。1950 年春，罗瑞卿察言观色，看出毛泽东欲打击地方势力，随以时任北平市公安局长的谭政文取代广东的陈泊。1951 年 1 月 24 日罗瑞卿亲抵广州宣布拘禁陈泊和广州市公安局副局长陈坤，谭政文当着叶剑英和罗瑞卿的面揭发陈泊和陈坤为国民党中统特务，并骇人听闻地说他们已发展特务二百余人，随即在广东省和广州市公安系统内大肆抓捕了一千余名特务嫌疑分子。1953 年陈泊被判处徒刑十年，对已在 1952 年含冤去世的陈坤也判处了八年徒刑。1961 年陈泊刑满释放仅五天即再次被莫名其妙地抓捕，押送至湖北沙洋劳改农场监督管制。1972 年陈泊病死狱中。

1982 年 5 月，折腾了三十年，一千多人无端受到牵连的“两陈冤案”得以昭雪。陈泊、陈坤恢复名誉，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其余人等全部甄别平反。

这个中共建国以来公安系统内部的大案纯系罗瑞卿媚主求宠和谭政文挟私报复造成的，从中可以看出中共高层领导的人品和道德以及凶残成性的真面目。

[3]扬帆（1912-1999），原名石蕴华，江苏常熟人。1932 年考入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是北大的学生领袖之一，193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爆发后扬帆担任上海戏剧界救亡协会组织部长。1939 年任新四军教导总队政治辅导员，新四军副军长项英的秘书，军法处副处长等职。1949 年后任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局长，破获多起大案。三十年代扬帆在上海工作期间，曾与江青的前夫唐纳同事，也知道江青学识浅薄、风流成性、见利思迁等个人品行，此事曾于 1939 年向项英反映，被毛泽东认为形似毁谤江青实质对准的是毛泽东。于是责成罗瑞卿过问。1954 年 12 月 31 日傍晚，扬帆被秘密扣押送北京受审，关押十一年后于 1965 年 8 月被判处十六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83 年 8 月获彻底平反。1999 年 2 月 20 日在上海华东医院逝世。

[4]聂真（1908-2005），河南滑县人，出身富豪之家，是北平中法大学肄业生，1930 年参加中共，长期从事党务政工工作，其妻子王前曾是刘少奇的第四位夫人，文革初始即大力揭发前夫刘少奇的丑恶嘴脸和欺骗行为。聂真的妹妹聂元梓是文化大革命中出了名的造反女将。聂真 1954 年任中国人民大学党委第一副书记、副校长，1957 年他竭力执行毛泽东“引蛇出洞”的阴谋，把大批思维活跃，响应党中央号召帮助党整风的志士仁人打成右派，中国人民大学成了反右的重灾区，聂真的顶戴花翎是浸透了鲜血的。1978 年中共开始纠正反右错误，聂真迟迟不动，极力阻挠。这个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刽子手始终受到中共重用，七十五岁时调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任副院长，2005 年病逝。

[5]邓力群（1915-），湖南省桂东县人。北京大学肄业，193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延安党校教务处秘书、延安马列研究院党委书记、中共中央办公厅第一办公室组长、《红旗》杂志副总编等职。1975 年后任中国社会科

学院副院长、中央宣传部部长。1982 年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其晚年著作《邓力群自述》由香港大风出版社 2006 年 3 月出版。

值得一提的是，据说邓力群做过一个梦，遭到邓小平的抨击。邓小平在 1980 年中共中央理论务虚会上有这样一番讲话，网上流传了很久，中共未予否认，摘录如下，权当奇文共赏吧；

“邓力群同志做了一个梦：他说他梦到中国遍地是贪官。胡扯！我们的干部都是共产党人，是我们亲手提拔的，即使有点官僚主义，也到不了贪官的份上，再说，还有公检法么。如果真是那样，我们的改革就出了问题了。

他还说：梦到了中国会有资产阶级。不能！我们 49 年就消灭了资产阶级，搞建设，怎么会有资产阶级呢？阶级斗争还没有搞完？文革思想！

我们应该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他们会去帮助落后的人们，最后达到共同富裕。咱们孩子们都是从小受共产主义教育的，他们会去帮助别人的。我放心！

邓力群同志还梦到：中国有了黑社会。荒唐！香港，台湾才会有呢。我们消灭黑社会 31 年了，中国现在不会有，将来富裕了也不会有。否则，我们的改革真就出了问题了！

邓力群同志还梦到：有钱人杀人，逍遥法外，穷人有苦无处诉。共产党员脱离群众。不可能！我们党在文革中才会脱离群众，现在改革了，党的工作会越来越好，共产党员离群众会越来越近的。实践会检验这点的！

邓力群同志又梦到：工人失业了，下岗了。资本家回来了搞剥削。农民没有地种。人民受二茬罪。这不荒唐吗。我们现在的工作是太多，还怕工人不够呢。粮食都不够，农民怎么没有地种呢？要是真这样，我们的改革就走上邪路了！

最可笑的是邓力群同志还梦到：中国到处是妓女，性病，穷人把女儿送进地狱。我看，邓力群同志太过分了。我不会连蒋介石都不如吧。共产党早就消灭性病了。主席，总理虽然不在了，可是我还在，陈云在，这么多老同志还在，难道说无数先烈换来的会葬送在我们手里吗？实践会检验真理。说什么也没有用，如果改革改掉了社会主义，我邓小平就是历史的罪人！”（来自中华论坛 club.china.com）

六、大学生中的反右运动

1911 年，18 岁的毛泽东在学校的墙壁上张贴文章。扬言推翻满清、建立民国。提出把孙中山请回来当大总统，让康有为做内阁总理，梁启超做外交部长。反叛之心，跃然纸上。满清皇帝没有下令抓捕他，只当做无知少年的狂言妄语，未于置理。1925 年秋，毛泽东写过一首词《沁园春·长沙》，其中有云：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在他的诗词中还有：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等词语，倾慕皇权称王称霸的野心昭然若揭。后人赞之曰“伟人气度”。其实，综观其一生所为，不过是一个满脑子帝王梦，不讲信义缺少起码人格和道德的鸡鸣狗盗之徒而已。1957 年他三番五次倡导大鸣大放，号召人们畅所欲言，宣扬“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他信誓旦旦地宣称：“这次整风运动，应该是一次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运动……放手鼓励批评，大鸣大放，坚决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1957 年 5 月 1 日《人民日报》）

话音未落即出尔反尔，原来是个“诱敌深入”的诡计。随之，他施展一切阴谋、阳谋，发动轰轰烈烈的反右派运动，将五十五万多志士仁人（一说是3178470人）打成右派分子横加迫害。多少年轻人死于非命，多少家庭破碎支离。直到毛泽东死了以后，中共中央五部联合复查，承认99.99%均系错划，五七年那场运动反的只是毛泽东神经中的假想敌。右派分子都是编造出来的。中共中央方吞吞吐吐地予以“改正”。反右已过去了将近六十年，笔者选择了几篇回忆文章，转载于此，铭感不忘。

（1）陈奉孝：我所知道的北大整风反右运动

今年去参加北大百年校庆，许多同学都劝我写一写当年北大整风反右运动的那一段历史，说实在话，我本不想写，如果我想写的话早就写了。二十多年的监狱劳改生活，各种各样的刑罚和折磨差不多我都经受过，人们常说“九死一生”，而我却早已超过了这个数字，我是真正死里逃生侥幸活着出来的，对于过去的伤痛，我宁可忘却。再说我已有了一个幸福的小家庭，更不想再惹什么麻烦给老婆孩子带来不幸。可是大家都劝我说，你应该写，因为你是当年那场运动的核心人物，掌握了解的情况比较多，你如果不写，随着我们大家年事已高，将来想写恐怕也写不成了，这段历史恐怕就要被湮没。因此我写下了下面这段史料。

我看过不少有关“文革”的个人回忆录，其中有一些不免掺杂着对个人的美化和掩饰，明眼人看来，对其历史的真实性会打折扣，因此要我写，我就只能按照它的历史原貌来写，不夸大、不美化、不掩盖。但由于事隔久远，我的记忆可能有错误，希望了解当年情况的同学和朋友，对文中的错误给予指正，遗漏的重要之处给予补充。

1957年5月19日下午五点左右，在大饭厅东门右侧贴出了历史系三年级学生许南亭的第一张大字报，无标题，内容是：“全国开团代会，清华有代表，北大有没有？是谁？谁选的？”因为正值开饭前夕，许多同学都围着看。我看到这张大字报后，立即回宿舍约集了张景中、杨路、钱如平等写了另一张大字报，标题为《自由论坛》，提出了“取消党委负责制，成立校务委员会，实行民主办校”，“取消秘密档案制度，实行人事档案公开”，“取消政治课必修制，改为政治课选修”，“取消留学生内部选派制度，实行考试选拔制度”，“开辟自由论坛，确保言论、集会、出版、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等五项主张，这一下炸了。因为是开饭时间，同学们里三层外三层地围观，不少人是端着饭碗边吃边看。由于这张大字报的内容全是政治性的，后来这些人被打成右派就是必然的了。

这张大字报只是一颗火星，大爆炸是在第二天，即5月20日早晨。19日夜里，北大校园就骚动了，我住的二十八楼许多房间灯都亮着，同学们在热烈地辩论，我一方面参加辩论，一方面不时地到校园里观察动静。我发现校园里一群群同学都在议论这件事，往常第三阅览室挤得满满的，有的同学为了早占一个座位，开饭前就把书包提前放下，可今天晚上竟有差不多一半座位空着。第二天大家到大饭厅吃饭时，发现在东门左侧又出现了一张大字报，是一首长诗，题目叫《是时候了！》作者署名沈泽宜、张元勋。这首诗充满激情，号召人们是时候了，去参加战斗，向“三害”（即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发起猛攻。看的人很多，无不叫好，说张、沈二人是才

子。这张大字报一下就在北大掀起了十二级巨浪，北大沸腾了，因此我们把五七年的整风反右运动叫做“五一九”民主运动。

当天下午，物理系四年级同学谭天荣又贴出一张令人惊疑的大字报《一株毒草》。1956年共产党号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并说在鸣放中难免有毒草出现，怎么办？把毒草锄掉当做肥料就是了。这张大字报是从哲学上来批判“三害”的，特别是批判教条主义的。谭平时酷爱哲学，读过黑格尔、恩格斯的大量著作，当时有人找他辩论，他能背出大段的原文，并指出在哪本书的哪一页，这的确使不少人惊叹不已。这张大字报不仅引起了同学们的好奇，也引起了不少老教授的兴趣。当然，作为一名学生，他的知识是有限的，其论点也不一定是完全正确的，其论据更不一定是无懈可击的，虽然如此，这张大字报却显露了一个青年学生的才华。

相隔一两天，哲学系又冒出了两个大右派龙英华和叶予胜。特别是龙英华，他跟谭天荣一样，也是从哲学的角度论述“三害”产生的根源并进行批判的，立论之严谨似乎比谭天荣的文章更具说服力，故人称“小小考茨基”。不久物理系又冒出了三个大右派：一个是沈迪克，化名谈谈，贴出大字报批判北大党委的宗派主义；一个是严仲强，贴出大字报，名为《自由主义者宣言》，对共产党发动的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进行批判，提倡思想自由；另一个是刘奇弟，他在大饭厅南门贴出了一张很长的大字报，取名为《为胡风招幡》，要求为胡风平反（当时谣传胡已死在天津监狱）。这还了得！“胡风反革命集团”是毛泽东钦定的，现在竟然有人敢公开要求为胡风平反，简直是不知天高地厚！毫无疑问，这张大字报的出现被定为反革命事件，反右后期，刘奇弟就是为此而被捕的。与此同时，西语系又搞了一个“三害”控诉会，组织者是贺永增和一位助教周铎，控诉人是刚入学不久的一年级同学顾文选。顾原在杭州公安局工作，五五年由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搞了一次大规模的肃反运动，那时顾在公安局里亲眼看到了大量无辜的人受牵连而遭受迫害，他看不惯，替人说话，结果也被打成反革命，还受到了严刑拷打。五六年共产党也觉察到了肃反有点扩大化了，因此提出了一个口号，叫做“有反必肃，有错必纠”，顾被放出来了，以社会青年的身份考入了北大西语系。他在控诉会上以个人的遭遇，对“三害”进行了控诉。名义上是控诉“三害”，实际上是揭露公安系统的残暴。与会的同学，听了以后都哭了。后来他的这次发言，百花学社为他出了专文，取名就叫《一个人的遭遇》。为胡风招幡和控诉会后来被定为反革命事件，刘奇弟被捕后判刑十五年，后被折磨死在劳改队的小号里。顾文选被捕后判无期徒刑，后来他越狱逃到北朝鲜，被引渡回来，召开公判会枪毙了。物理系的女右派李雪琴参加过这次宣判大会。

再就是化学系的李燕生。李本人非常喜爱文学，尤其能背诵大量的古诗词。他模仿“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处空余黄鹤楼”那首有名的凭吊黄鹤楼的古诗，改写了一首“昔人已乘民主去，此处空余民主楼”的诗贴在了高高的山墙上，别人的大字报想盖也盖不上，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看过这首诗的人，包括中文系的一些老先生，都认为李有点“偏才”。当夜李还用扫帚把蘸着石灰水在好几条马路上写了“民主路”、“自由路”等。北大党委有点慌了，开始组织反击，但党委书记毕竟是一位忠厚仁者，他主张用辩论说理的方法批判某些同学的右派言行，很不得力。还有一点需要提一提的，当时各系的党组织继续动员大家给党提意见，帮助党整风。头脑比较冷静的同学感到有

点不对头，躲在一边当观潮派，还有那些即将毕业的同学怕影响毕业考试和毕业分配，也不愿卷进这场运动中去。动员他们给党提意见，他们也不提，但架不住党、团组织一再动员，结果有人为了响应党的号召，给党提了意见，后来都被打成了右派。数力系四年级的李力就是其中一个。李力当时是班长，支部多次召集他们班开会，动员他们在离开母校前，给党留下宝贵的意见，三番五次动员，就是没人说话，这样交不了差，后来大家就说，李力你是班长，就代表大家说两句算了。没办法，李力就不疼不痒地提了几条意见，内容大体是关于毕业分配问题，结果他被打成了右派。七九年我在北大招待所住着，等待落实政策，遇见了李力，他对我说：“你、谭天荣、张元勋等人被打成右派是活该，谁叫你们当时闹得那么欢呢！我又不想提什么意见，是大家硬把我选上的，倒霉透了！”像李力这样的右派大量存在。

谭天荣继续贴他的《第二株毒草》《第三株毒草》，并贴出了《退团声明》，一时成为全校的焦点人物。

从第一张大字报贴出到此时，各系的右派基本上都是各自为战，大家互不认识，互不通气的，其观点也五花八门，乱糟糟的。我觉得这样不行，容易被各个击破，应当把各系的右派联合起来，用一个声音说话，这样才有力量。西语系的贺永增、东语系的谭金水、数力系的赵清、中文系的王国乡等人跟我的想法一样，为此我们便分头到各系与各系的右派联系，最后在未名湖畔的花神庙开了一次秘密会议。会是晚上开的，参加的人有张景中、杨路、谭天荣、龙英华、王国乡和我。大家研究的结果决定成立一个组织，谭天荣坚持取名为“黑格尔——恩格斯学派”。当时我并不同意这个名字，我觉得这个名字口气太大，再说我们这些人除你谭天荣读过较多的哲学著作外，其他人对哲学知之甚少。但谭天荣当时的名气太大了，大家也就迁就他，同意了，于是第二天一早贴出了海报，宣布召开“黑格尔——恩格斯学派”成立大会。会是大约在晚七点在一个阶梯教室召开的，参加的人很多，整个教室都坐满了。会上很多同学不同意“黑格尔——恩格斯学派”这个名字，于是张景中建议改名为“百花学社”，因为这是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年代诞生的，这正合我意。我首先表示同意，大家也一致赞同，就这样鼓掌通过了。会议并没有搞什么组织章程之类的东西，只决定今后大家要加强联系，扩大宣传，创办刊物，但怎么办，取什么名字，都没有定下来。会后决定把中文系的张元勋、沈泽宜拉进来，因为他们二人因写了《是时候了！》那首诗，在全校影响很大，又有文才，于是我就亲自去找张元勋联系。张、沈二人原想自己独立山头，但也感到力量单薄，又加上我的劝说，就同意了。我们又在我住的宿舍开了一次联系会，参加的除我外有谭天荣、张元勋、沈泽宜、崔德甫、王国乡、龙英华、叶予胜、袁橹林（经济系同学，是一位装了一条假腿的荣军，调干生）、张景中、杨路、谭金水、赵清、李燕生等人。大家讨论决定，组织的名字还叫百花学社，办的刊物取名为《广场》。这个名字是张元勋起的，他说，五四运动发源于北大，当时有两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建筑，一个是北大的红楼，是学生宿舍，另一个就是北大的民主广场，它是当时民主力量集合的地方。现在北大团委和学生办了一个刊物叫《红楼》，我们就办一个刊物叫《广场》，对着干。大家一致赞同，并决定把《广场》作为百花学社的社团刊物，选举谭天荣为百花学社的社长，成立了秘书股、组织股、宣传股、总务股等。选我为秘书长并兼管组织股和总务股，宣传股由张元勋、张景中等人负责，同时决定了当前的两大任务：加强宣传和出版

刊物《广场》。《广场》的主编是张元勋，副主编是沈泽宜、王国乡，编委有崔德甫、叶予胜等人。《广场》的宗旨是继承和发扬五四运动的爱国民主传统，提倡学术自由，不论右派的文章和反右派的文章，凡是有一定水平的都登。第二天正式发表《百花学社成立宣言》，是我的同班同学钱如平代写的，因为他的毛笔字写得很好。宣言的详细内容已记不清了，主要是宣布要发扬五四精神，把“五一九”民主运动进行到底。

关于加强宣传方面，当时主要做了这样几件事：

第一、加强与北京各大学的联系。谭天荣、谭金水、李燕生、王国乡和我等都分头到清华、人大、北师大、北京石油学院、北京航空学院等大学去与这些大学的学生进行了联系，具体情况记不清了，只记得我联系的主要是石油学院的周乐甫、北师大的严景旭和人的林希翎（程海果），但大部分时间我还是在家坐阵，负责接待外校来访的学生，我住的宿舍实际上成了百花学社的总部。

林希翎第一次来北大看大字报是王国乡、陈爱文、江文等中文系同学领来的，当时我还不知道（因为是在百花学社成立之前）。林看过北大的大字报后，回人大就公开发表演说，批评苏联斯大林的错误和我国“左”的文艺政策，在人大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当时的人大不收应届高中毕业生，收的全是保送的调干生，是专门为国家培养干部的，林希翎本人也是由部队调干保送到人大读书的。那时她已从新闻系毕业并当过一段《中国青年报》的实习记者，又回到人大读法律系的研究生。从革命阵营里培养长大的一位女战士居然站出来公开批评苏联老大哥和党的文艺政策，自然会引起中共领导的重视。林第二次来北大是我和李燕生、王国乡等人以百花学社的名义请来的。当时我们在北大三角地搭了一个台子，林希翎登台发表演讲，内容与她在人大的演讲一样，会场十分热烈，也有人上台与她辩论，台下人山人海，影响极大。林讲完话，许多同学让她签名，当时还被照了相。后来国家还专门出了一个反右运动的纪录片，其中就有林希翎和谭天荣等人的形象，所以后来林希翎成了家喻户晓的学生中的头号大右派，至今仍然活在世上没有改正的右派只有林希翎一人。林的真名是程海果，提起林希翎的名字，人人都知道，但知道她的真名的人并不多，林希翎是她的笔名。为此我专门去访问过她，了解到她的身世是很悲惨的。

西语系的讲师黄继忠老师也带领一部分学生去清华“点火”，黄老师本人并不是百花学社成员，去的学生中有百花学社的。

第二，组织人去北京市委请愿，质问北京市委：《人民日报》为什么不登北大整风运动的消息？当时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态度非常强硬，他说《人民日报》是我们共产党的报纸，登什么我们说了算，你们想让我们的报纸宣传你们的错误言论，那是妄想！并威胁说，如果你们要上街，那你们自便，但后果你们自负。

第三，组织人去人民日报社门前贴了一张大字报，也是质问《人民日报》为什么不登北大整风运动的消息，是张元勋带领几个人去的，当时遭到了围攻。

第四，组织百花学社的成员利用同学关系，把北大整风中出现的大字报油印、抄写出来，寄往全国各大学，为此山东大学的孙广义和陈琦都受了牵连，后来均被打成右派，劳动教养十多年。

第五，组织人去天津南开大学、天津大学等院校介绍北大整风运动的经验，是我组织的，但我未去，大家让我在家坐阵。去的人是谭天荣、张景中、刘奇弟等人，路费是由我给筹措的。

第六，组织人去与民主党派取得联系，争取他们的支持。许南亭去了民主建国会，因为他是民建秘书长许汉三的儿子，也是民建主委章乃器的义子。我去了“九三”和民盟。开始他们都表示支持我们，但后来一开始反右，我们再去找他们时，他们都回避了，令我非常失望。

第七，以百花学社为一方，以北大团委为另一方在大饭厅开了一次辩论会。辩论会的主题很分散，其中有关于“三害”产生的根源问题，有如何继承五四精神、继续发扬民主的问题，还有应该不应该民主办校、教授治校的问题。当时我参加了并发了言，谭天荣、龙英华、张景中等都发了言。团委书记石幼嫻，还有其他人也参加了，学生会主席胡启立没有参加，不久他就调到全国学联去了，任全国学联主席。

第八，以百花学社的名义参加了哲学系的一次辩论会，具体内容记不得了，只记得主要是龙英华跟他们系的那些“卫道士”们进行辩论，我只是带领百花学社的部分成员去助阵的。

另外，有一件事应该提一下，那就是关于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这个报告被美国特工搞到手后，西方各大报纸都登了出来，这对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冲击极大。中国共产党一开始矢口否认这个报告的存在，但北大有苏联、东欧的留学生，还有英文报纸，这个报纸的某些内容早已在北大流传开了。四十年过去了，回过头来看看，这个报告实际上也是五七年我国那场政治运动的诱因之一。

数学系年轻助教任大熊从图书馆借了英文版的英国《工人日报》，那上面刊有这份报告，因为文章比较长，由任大熊、陶懋颀和我三人各取一部分翻译了出来。整风运动开始后，认识了林希翎，她说她能搞到这份报告，中央委员都有，她的男友是胡耀邦的机要秘书，可以弄出来看看。后来她真的把这份报告拿给我们看了，我们将它与我们翻译的核对一下，准备以《广场》特刊发表，后来反右开始，《广场》仅出了一期就夭折了，这份报告始终也没刊印出来。当然，后来中苏两党决裂，中国报纸也全文登载了这份报告。不过这件事成了任、陶、林和我的一大罪状。林的男友以泄密罪被判七年徒刑，任大熊被判无期，后被折磨致死。在劳改队里，陶先生也被打成右派，受了不少磨难。

关于出版《广场》的问题，当时的分工是这样的，主编张元勋和副主编沈泽宜负责审稿，王国乡和崔德甫负责组稿，但由于张、沈二人忙于搞街头演讲，参加辩论会，这项工作主要是由王国乡和崔德甫来干的，而文章多半是由赵清、谭金水、林树果、张锡锬、李雪琴等人分头从大字报上抄下来的，交给王国乡，由王国乡选定稿件后交给我去负责出版。张元勋设计了封面并写了发刊词，所收文章有王国乡的《“五一九”民主运动回顾》、沈泽宜、张元勋的诗《是时候了！》、王书瑶的一篇文章、江文的《论人事档案制度》、陈爱文的《论社会主义》等等。除《是时候了！》这首号角诗外，王国乡的那篇文章是很有分量的，文章论述了“五一九”民主运动是五四运动的继续，是建国后群众民主运动的萌芽。今天看来，当时写的东西虽不乏稚气，但对今后推进我国民主事业的发展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幸好我还保留一本《广场》，1994年林希翎由法国回来找我，说她要在反右四十周年时出版一本关

于1957年整风反右的书，我就把这本仅存的资料给了她，但不知为什么至今未见她的书出来。另外需要说明的，这本《广场》实际上是李燕生保存下来的，1979年右派改正平反后，他给了我。

要出版刊物最大的问题是钱。钱从哪里来？大家都是穷学生。首先是百花学社的成员捐献，当时谭天荣和我都把自己除书以外的东西都卖了，我把自己的衣服、箱子、棉大衣、被子通通都拿到海淀老虎洞卖了，最后我就只剩下身上穿的一套单衣和一条线毯子，但这仍然是杯水车薪。怎么办？我们决定在全校范围内募捐。张元勋在大饭厅前挂出了一条醒目的横幅“救救孩子！”号召同学们捐款。同学们捐款很踊跃，大约捐了一万元左右。钱全由我保管，我用一个小箱子锁着，就放在我的床头上。每个捐款人都有名单，也由我保存，反右白热化后，为了怕祸及捐款者，我把名单烧了。

关于捐钱，不能不提到马寅初老校长和化学系的傅鹰老教授。在此之前不久，马老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他那篇著名的后来受到毛泽东点名批判的关于人口论的文章，得了五百元稿费，张元勋等人找到马老，要求他支持同学们的爱国民主运动，马老答应将这笔稿费捐给我们，但后来由于受到党委的压力，当张元勋等人去取这笔钱时，校长秘书说，对你们办的这个刊物不清楚，钱暂时不能捐，结果钱没有拿到手。化学系的李燕生、张锡锬和我找到傅教授家，他说：“你们搞民主运动我是支持的，但你们要求党委退出学校，我不赞成。国民党统治时期大学里的情况我清楚，现在有党委领导比没有党委领导好。”这句话至今我记

忆犹新。傅老的经济情况并不宽裕，没有捐。

张元勋设计好了《广场》的封面，找人制好了版，又与崔德甫等人联系好了《工人日报》印刷厂（当时在六铺炕），买了一百令新闻纸，计划出一万册，在校内外卖。稿件和纸张交给《工人日报》印刷厂，他们答应一个星期后取，可是等一个星期后张元勋等人去取时，却遭到了围攻，稿件和纸张全部被扣压，并且说我们是在放毒，攻击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这显然是当时的北大党委和北京市委搞的。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了那篇著名的社论《工人说话了！》，接着又发表了《这是为什么？》（批判葛佩琦的），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的反右运动开始了。

我们并不甘心，几个百花学社的骨干研究决定自己油印，可剩下的钱不多了，就是在这时我把自己值钱的衣物全卖了，凑了一点钱，买了少量的大白纸和一部手推式油印机，在我的房间里开始了油印。参加油印的除我外，主要有赵清、林树果、李燕生、肇恒标、谭金水、张锡锬等人，连物理系的两个后来被打成右派的女生李雪琴和朱志英好像也参加了。有人负责刻蜡板，有人负责油印装订，连续干了三四个昼夜没睡觉，一共印了五百份。由于匆匆忙忙，刻板 and 油印的质量都很差，有些字印得还不清楚。除了百花学社的成员人手一册外，其余的部分拿到大马路上去散发，不一会儿就被抢光了（后来才知道，其中不少是党委派人去收的）。在散发的同时宣布《广场》暂时停刊，这就是《广场》从诞生到停刊的大致情况。

反右在步步深入，北大右派的活动也没有停止。贺永增告诉我，由于党委书记领导反右不力，彭真曾到北大秘密坐阵指挥了一段时间，后来就把陆平调来了。

陆平在北大的第一次公开亮相是7月初在大饭厅开的一次全校大会上。他在会上向右派分子发出警告：“右派分子要悬崖勒马，否则矛盾性质就要

变质！”他正讲着话，不知谁把大饭厅的一个暖水瓶不小心弄倒了，“砰”的一声响，有人叫喊说右派分子放炸弹，引起了一阵小小的骚动。

针对陆平的讲话，第二天我贴出了一张大字报，题目是《如此伎俩》，内容是对全校右派说的，保守派的凶相露出来了，他们可能要采取镇压措施抓人了，并说我们决不后退，要让民主的烈火把保守派烧尽等等。在整个运动中我以自己的名字写的大字报就两张，一张是《如此伎俩》，另一张是早些时间写的《年轻人，我们是北大的主人！》，这两张大字报情绪过于偏激，因此仅就这两张大字报将我打成右派，在当时看来那是定而不可移的。

在整个运动期间，我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各系的右派之间搞联络和组织活动，不像谭天荣、张元勋、沈泽宜、张景中、龙英华等人公开出头露面较多，也正因为如此，我被称做“阴谋家”，谭天荣被称做“野心家”。“阴谋家”也好，“野心家”也好，对于一个二十岁刚刚出头的毛孩子，这恐怕有点太“过奖”了吧。

谭天荣、张元勋、张景中、龙英华等人都遭到了大规模的围攻，大会小会接受批判，而我却没有，仅在年级里开了一次批判会，是党总支部书记张世龙主持的。在会上我态度顽固，拒不检讨，会就开不下去了，此后再也没有理我。我知道这不是好事，预感到自己可能要被捕。谭天荣也拒不检讨，还贴了最后一张大字报《第四株毒草》。右派分子被纷纷监视了起来。校园里出现了一些新面孔，有的戴红牌校徽，有的戴白牌校徽，贺永增告诉我，这是公安部和北京市公安局派进来的，并说我早就被人盯上了。他建议应该撤退，保存实力，于是我便秘密召集张元勋、贺永增、赵清、谭金水等人晚上在未名湖畔的树林里开了个小会，决定百花学社解散，第二天贴出了宣布解散的通告。

此后百花学社再没有任何集体活动，联系都是采取单线的形式。记得后来我与赵清、谭金水等人在长河开了一次碰头会，与张元勋、李亚白在香山一个小饭馆里开了另一次碰头会，研究的问题都是如何“过关”的问题。

在强大的反右攻势下，右派阵营迅速土崩瓦解，右派分子大都在大大小小的批判会上作了检讨。沈泽宜第一个在全校大会上作了检讨，并宣布跟张元勋绝交。反右斗争也由辩论会变成了批斗会，由君子动口不动手变成了推推搡搡，按头弯腰（当然还没有后来“文革”期间的“喷气式”），由说理批判变成了人身攻击。有一部分右派的检讨是假的，想蒙混过关，但大部分人的检讨还是真的，但不管是真检讨还是假检讨，都过不了关，有的人十遍八遍检讨还是被认为是“态度不老实”。当时拒不检讨的只有刘奇弟、谭天荣、严仲强和我，后来听说还有梁世辉，我们这些被称为“死硬分子”。尤其是我，在仅有的一次对我的批判会上，我不但不检讨，反而强调百花学社的一切活动都是合法的，因为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我估计自己可能被捕，因此从这时开始，我筹划逃跑。

这期间发生了两起使反右运动火上浇油的事件。一件是地质地理系同学郑瑞超贴了一张小字报，内容是说成立了“中华革命党”，并说要吸收整风运动中敢于向共产党展开斗争的积极分子入党，落款是“中华革命党北京市支部”。另一件是钱如平化名“谈论”，在半夜里贴的一张大字报，号召要预备好刀和枪准备战斗等等。这简直是胡闹！这非但帮助不了右派，相反地是授人以柄，郑也不是百花学社的成员。这两件事成了北大的反革命事件。郑瑞超当天夜里就被捕了，听说是他又到另一个大学去贴同样的小字报被当

场抓住的。钱如平贴完他那张大字报后跑回他老家浙江去了，可是因为百花学社成立宣言是他抄写的，从笔迹上迅速破了案，从浙江老家抓了回来。郑、钱二人都是开全校大会宣布逮捕的，后来郑被判刑六年，钱被判刑五年。借着这两件事北大党委把反右运动推向了顶峰。另外，右派营垒里也确实有那么一两个人品行不端，这正好成了被攻击的口实，这使我感到又气愤又难过。

表面上我虽然态度强硬，拒不检讨，但说老实话，内心里也感到惶恐和灰心。我感到惶恐和灰心的是：第一，右派掀起的这场轰轰烈烈的争民主运动，为什么如此不堪一击呢？要知道，当时冒出来的右派分子绝大多数是学生中的佼佼者，用现在的话说，都是学生中的“精英分子”；第二，我感到自己空有一腔热情，但理论知识实在太贫乏了。说实在话，当时的右派，包括社会上民主党派中的所谓大右派，虽然都从不同角度，针对不同的问题，对共产党提出了批评，不管这些意见正确与否，也不管提批评意见的真实动机如何，却没有一个人能从理论上系统地对当时的社会现实进行批判。当然，现在分析起来，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这恐怕也不可能。

我想出国去学习，想去南斯拉夫或英国。当时我天真地认为，南斯拉夫实行的“工人自治”可能是一种理想的社会制度。也想去英国，因为听说英国是一个学术最自由的国家，还听说当时国际上成立了一个“大陆知识分子、知识青年援救会”，对从大陆逃出去的知识分子、知识青年进行援助。这个组织在香港、伦敦、东京都有，想读书他们也会提供帮助。被捕后才知道，那不过是国民党搞的一个特务组织，而当时我并不向往人剥削人的资本主义制度，我向往的是社会公正。

我首先去了印度大使馆，门口有中国警察站岗，根本进不去，又去了英国代办处，同样如此。外国驻华使馆门前都有中国警察把门，设岗楼，任何一个普通的中国老百姓要想进去是不可能的。不仅如此，你想往外国驻华使馆打电话也打不进去，因为电话都必须由设在门口的警察岗楼往里转，随便一个中国老百姓往外国驻华使馆打电话，他是不给转的。因为我是在8月份开始这样做的，公安部门还没有下令抓人，后来就不行了，只要你往外国驻华使馆打电话，不等你放下电话，警察就来了。我被捕后认识了两个人，一个是人大的何铁生，另一个是北师大的陆正，他们都是因为往外国驻华使馆打电话而被捕的。陆正被判十二年，何铁生被判十五年。后来我又去了南斯拉夫大使馆，它不在东交民巷，而是在后圆恩寺一条小胡同里，一般人根本不知道，是贺永增不知从什么渠道打听告诉我的。离大使馆门口大约三十米左右的拐角处，有一棵大槐树，我是爬树翻墙进去的。我向他们说明来意，要求他们把我弄出国去，并主动向他们提供了方法，能否把我装进一只大木箱里带出去，因为外交人员的行李是不检查的。他们笑了，说这是不可能的。当时我的想法是多么天真幼稚！不过他们对我表示很同情，因为当时我的名字已上了报纸，最后他们把我和一个南斯拉夫留学生一起用车送了出来，如果我自己单独出来，肯定会被捕的。

三次尝试失败，我就决定冒险越境，可是我身上没有多少钱了，仅够买一张去天津的火车票钱，我想我可以从塘沽新港下海游到外国船上去，于是我就买了一个救生圈，把一些油印的大字报用蜡纸包好系在腰里，准备到了塘沽后，我就找机会下海。

9月份天气已经凉了，我身上只穿一件单衣（这是我惟一的衣服），找刘奇弟借了一件线衣穿上，但并没有告诉他我要到哪里去，然后找到谭天荣，

把我仅剩的几元钱菜票给了他，因为他那时太困难了，总是吃米饭泡酱油，小饭厅的酱油是不要钱的。我告诉他我要走了。知道我要逃跑的只有谭天荣一人，时间是1957年9月16日。

十多天前贺永增就告诉我说，你长尾巴了。一点也不错，最近一段时间，不论我走到哪里，总有一个三十岁左右，细高条戴眼镜的人离我不远，我从谭天荣宿舍出来向南校门走去，那人总离我二三十米距离跟着我。为了甩掉他，我乘32路车先进了北京动物园，他也进去，我左转右转总也甩不掉他。出动物园乘101无轨我去了前门火车站，买票上了火车。他也上了火车，跟我在一个车厢，相隔三四排座位。我有点紧张。到了天津我出了站就向对面一个饭店跑去，他大步走。我进入饭店正门后就从旁门跑出来又跑回了车站，这时正好有一辆开往塘沽方向的火车，没有买票我就挤了上去，这回真的把他甩掉了。到了塘沽，下了火车，我走到露天码头往远处张望，看有没有轮船的灯光。正在我张望的时候，不知从什么地方冒出两个人来，一下就把我扭住了。我挣扎着问他们要干什么，他们也不说话，硬把我扭到了不远处的派出所。出来一个头头问我：“黑灯瞎火（那天正好断电）你在码头上转来转去打算干什么？”我说：“不干什么，看看大海！”他嘿嘿一笑，下令：“搜他身上！”因为我腰里系着些油印的大字报和学生证，鼓鼓囊囊的，这下坏了！那家伙笑了：“你不是小偷，你就是北京大学的右派分子陈奉孝啊！想逃跑是不是？”我不吭声，我知道任何辩解都是徒劳的。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天黑没有电灯，码头上有很多露天仓库，我在那里转悠，他们可能认为我打算偷东西，所以才抓我的，未成想抓的竟然是北京大学的一个大右派！他们立即跟北京市检察院通了电话，用打字机现打的逮捕证，要我签字，我不签。不多会儿来了一辆吉普车，把我押上车，里面早已坐着一个人，正是我的那条“尾巴”。当夜吉普车飞快地开到了北京市草岚子看守所，时间大约是半夜两点左右。以上就是我能回忆起来的当年北大整风反右运动以及我在这一运动中的活动的大致情况。

1979年我的“反革命”罪平了反。从1979年7月到1980年7月整整一年时间，我住在北大朗润园招待所，等待右派改正。一间大屋子里住着十多个等待改正的右派，大多数是陆续来，陆续走的，其中张元勋、张景中、赵清、林树果、叶予胜、张亚航、王英超等人都在那里住过。物理系一位姓黄的同学（名字记不起来了），他在劳教中被化学毒物弄瞎了眼，要求北大给治，北大可能是因为费用太高，迟迟不答应，到我离开时，他还在招待所住着，他的情况最惨。

住招待所时听他们说，当年的右派有四人被枪毙了。

第一个是哲学系的黄宗羲，他是1958年被枪毙的。听说黄原来是党员，建国前夕入的党，已有八年党龄，是调干生，贫雇农出身。他本来是哲学系反右领导小组成员，但他反对搞人身攻击，反对批判右派时动手动脚，结果被认为是立场不稳，同情右派。他当然不服，自恃出身好，与反右领导小组的其他成员弄得越来越僵，最后让他在一间屋里反省，并派一个人监视着他。后来因为一件小事两人吵起来动了手，他打不过那个人，就拿出随身带的一把水果刀，将那人的脸划破了。这可好，立即被捕，最后以“右派杀人罪”枪毙了，为此还向各大学发了通报。黄临上刑场前，他的老婆孩子都来了，法院的人问他对家人还有什么话要说，他对老婆说：“我死后你不要守着，早点找一个人家，好好教育孩子跟着党、跟着毛主席走社会主义道路。”他

说的这些话都被记录下来了，“文革”时期那么乱，但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档案完好无损。七九年给右派改正时，北大落实政策办公室的人犯了难，查看了法院黄的档案，找了当时监视他的那位同学了解了情况，证实了当时他俩是因为一件小事口角打起来的，那位同学脸上只是被划破了一道小口子，特别是黄临死前说的话，显然这是一大冤案。可是人已经死了，怎么办？北大落实政策办公室的人还是很负责的，据说在乐亭县找到了他原来的老婆，但她已经嫁人了，又找到了他的儿子，当时在唐山市当架子工，给了他两千元钱，算是落实了政策。

第二个被枪毙的是西语系的顾文选。听李雪琴说，顾原判无期，六〇年越狱跑到了北朝鲜，后被引渡回来开宣判大会枪毙的，李雪琴参加了那次大会。他为什么往北朝鲜跑呢？我猜想，六〇年中苏交恶后，北朝鲜有亲华派和亲苏派，金日成是亲华的，有那么一段时间金日成不大露面，顾可能作了错误的判断，冒死逃出了监狱，却又自投罗网，白送了一条性命。六二至六九年中苏大论战期间，我那时正在兴凯湖农场劳改，与苏联仅隔一条三十米左右宽的苏尔察河，要跑过去是很容易的，有不少犯人和劳改就业人员跑过去，结果像顾一样都被送回来枪毙了。

第三个被枪毙的是中文系的林昭。听张元勋讲，林昭原本不是右派，她与张元勋有一段恋情，张被打成右派后，团组织叫她与张断绝关系，她不但与张断绝关系，而且多次为张鸣不平，就这样一步步升级成了右派，进而成了“反革命”。在狱中她坚贞不屈，受尽了折磨。1968年被枪毙前，张还冒充是她的未婚夫前去探过监，结果张回到就业的劳改农场后被关了禁闭。

这次参加北大百年校庆，见到了同班同学于邵，他说他保留了林昭的一缕头发，给她修了一座墓，墓就在苏州。于邵和林昭只是同乡，不像张元勋与林还有一段恋情，他能冒着风险为林昭立墓，我不禁对他肃然起敬，将来有一天我一定要去林昭的墓前看看的。

第四个被枪毙的是化学系的张锡琨。“文革”期间他一直被关在四川一处劳教队里，听张的妹妹张锡铮于1986年在青岛亲口对我说，她去劳教队了解情况时，劳教队的管教干部对她说，张锡琨是在劳教队里企图组织逃跑被枪毙的，时间是已经粉碎“四人帮”后的1976年底。当时我问张锡铮，锡琨后来平反没有？她说没有。我又问为什么不争取平反？她说，一是那个劳教队坚持不给平反，二是怕这事再折腾起来会影响孩子们，因为孩子们压根儿就不知道这件事。

除以上四人外，任大熊和刘奇弟都是被折磨死在劳改队里的。我知道刘奇弟原本就是肺结核病，劳改队那种严酷的环境他是活不出来的。听别人说他后来疯了，被塞进了像狗洞子一样的小号里，疾病加冻饿而死。这样的小号我在兴凯湖农场就被关了十个月。小号高一米，宽八十公分，长一米五左右，像我这样一米六三的小个子，在里面站不起来，也伸不直腿，底下仅铺着二十公分左右厚的一些稻草，一天只给三两八钱的玉米面窝窝头吃，身上还戴着脚镣手铐，像我这样能活着出来的，确实算是“命大”。贺永增只判了五年，但也是因为有病和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在监狱里自杀了。

关于“三两八”我附带插上两句。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社会上的人的粮食定量都非常低，不少人得浮肿病饿死了，监狱劳改队的情况能好吗？据说有一位北京监狱的法医研究出来一项“成果”，如果一个人不干活，每天吃三两七钱五的苞米面就饿不死，四舍五入，改为三两八。对于那些在监

狱劳改队里又犯了错误关禁闭的犯人，每天就给他三两八的苞米面吃，有人居然被关了一年多没有饿死，我看该法医真应该得诺贝尔生物奖。不过当年被关过小号的人都知道那是什么滋味，提起“三两八”没有不害怕的。我举一个具体的例子，一个名叫孙得高的犯人，他是烈士遗孤，山东莱阳人，父母都被日本鬼子活埋了，解放后他当了海军，是少尉。50年代初，全国都向苏联老大哥学习，形成了学跳舞的热潮。孙得高那时在旅大市，学跳舞入了迷，并交了个女朋友。这当然要花钱，他那点军饷是不够的，于是便向战友借钱，借了又不还。有一次一位战友当着他的女朋友向他要钱，他认为伤了他的面子，把人家打了，结果被关了禁闭。他又把禁闭室砸了。这下不得了，被军法处判了三年徒刑。他更不服了，继续闹，加刑到七年，并转到北京监狱。他觉得自己的父母都被日本鬼子杀害了，为这点小事就被判刑有些想不通，越是想不通就越闹，结果加刑到十五年。这下他认为完了，闹得更厉害，并且打了监狱长一个嘴巴。这可不得了，犯人打管教干部是要被判死刑的，但考虑到他毕竟是烈士的遗孤，给他加刑到死缓，将他关进小号里，一关就是三个月。监狱长问他：“孙得高，你服不服？”他说：“我服了，我在敌人的机枪面前没有低过头，这回可把我饿服了。”放出来他真成了皮包骨头了。

大名鼎鼎的谭天荣却比较幸运的，他虽然经受了多年的劳教，但“文革”一开始，便被遣送回了老家湘潭接受群众专政。不少当年的右派在“文革”期间遭受了第二次迫害，而谭天荣回老家却被保护起来了。谭对我说，当时在他老家不论公社还是大队，掌权的都是他本家，给他在山坳里找了一间茅屋躲了起来，别人根本不知道他是谁，他便在茅屋里搞学问，1978年平反后，他便陆续发表论文，现在已是青岛大学的教授了。杨路、王国乡和王书瑶的情况也大体如此。张景中的情况就更具有传奇色彩了，他被劳教二十多年，去过新疆，但在劳教期间，劳动之余他继续思考钻研数学，1979年平反后与杨路联名陆续在学报上发表大量论文，张、杨二人现已是世界知名的数学家。张景中还成了中科院院士，党的十五大代表；杨路则是九届全国人大代表。这也算是当年北大右派的骄傲吧！

还应当提一提的是林希翎。不知为什么，1973年毛泽东忽然想到了林希翎，问她现在哪里。工作人员说她还在监狱里。毛又问还有多长时间。工作人员说大约还有半年。毛又说让她出来吧！就这样她被提前半年释放了。回到老家被安排在一家工厂里监督劳动，并在官方“拉郎配”下与一名比她小十岁的人结了婚。七八年右派开始改正平反，为了说明反右派只是“扩大化”了，而不是全错了，林的右派问题没有改正，她成了活在世上惟一个没有被改正的右派。八五年经胡耀邦批准，她去了法国，因为她的父亲在法国。她是带着她的八十岁的老母亲和两个孩子一起去的，临走前她与丈夫离了婚，并给她的丈夫（现在应该说是前夫）在香港一家船务公司找了一份工作。她已入了法国籍，是法籍华人自由撰稿人。

林去法国后，台湾的海外组织曾多次拉拢她加入，她都拒绝了。林的父亲是亲台湾国民党的，她与她的父亲不和，后来她的父亲去了美国。80年代后期，台湾当局曾邀请她去台湾访问过一次并请她发表讲话，当然是希望她讲一些关于大陆共产党的坏话，她不但没讲，反而对台湾的时局进行了抨击。为此回法国时，途经美国遭人暗算，出了车祸，撞断了四条肋骨。以上情况都是九四年她回国与我相见时亲自对我讲的。她的两个儿子，大儿子已大学

毕业，小儿子九六年刚考上大学便加入了邪教自杀了。她发誓要与邪教周旋到底。

林希翎是第一个提出“权大还是法大”向官僚特权挑战的人，

应当说明的是，拿今天的情况与当年相比，中国的确已经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了解当年历史情况的人大概都知道，如果以当年打右派的标准来衡量今天中国人的言论，那么除了幼儿园的孩子和不会说话的哑巴，上至中央领导，下至平民百姓，恐怕通通都要被打成右派，包括目前那些“老左”们也不能幸免，这绝不是笑谈。从中国的国情来看，民主的道路恐怕是漫长的，但世界历史的大潮流是谁也无法阻挡的。凡是真正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的人，都应该为此而尽到自己应尽的力量。新世纪的曙光已在前头，一个真正自由、平等、民主、繁荣、昌盛的新中国的到来已经为期不远了。

陈奉孝 1998 年 5 月 19 日

<http://sq.k12.com.cn/bbs/index.php?t=msg&th=244356&start=0&rid=0>

（2）几位校园右派

1、张元勋

关于我（张元勋自述）

我的祖籍是江苏赣榆县。1933 年生。1954 年于青岛一中高中毕业，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

1957 年的春天，中国共产党整风，我因担任北京大学学生自办的刊物《广场》的主编，撰写《广场发刊词》、《编后记》，以及与人合写短诗《是时候了》等大字报而被划为“极右派”，遭受轮番批斗，于 1957 年 12 月 25 日以“反革命罪”被逮捕，判刑八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而后被押送至北京南郊之团河农场河北省宁河县之茶淀清河农场等荒凉地区劳动改造。1965 年刑满，但仍未离开劳改队，继续留在清河农场，接受“无产阶级专政”，戴着“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在劳动机关的管制下劳动度日。

1966 年文化大革命起，被押送到山东省劳改队所属的章丘埠村煤矿，在煤井下挖煤四年；1970 年又被押送至山东济宁六四劳改农场，继续着劳动改造的生活。

1977 年，由于“四人帮”的倒台，我的被监管的生活获得了政策性的放松，就在这一年的秋天，我结了婚。我的妻子怀着对我的同情与敬佩之情，嫁给我这个四十四岁的将知天命的“反革命分子”，那时她仅二十六岁。她无意旁顾险恶的环境以及没有希望的未来，毅然把她美丽的青春与我的严峻的危运联结在一起！怀着生死与共的凛然之情，顶着漫天风雨，分担了压在我头上的无情重负！

1979 年的秋天，我当了父亲，我的不幸的儿子来到这人世的早晨，他的父母就像两个乞丐，我们的财产就只有一条旧棉被。而我竟无处去为他报户口，他是万里浩荡神州中的无计存身的奴隶的后裔，是一个编外的黑人。

1979 年 11 月 24 日上午，在山东省济宁劳改队的办公室里，我接受了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项目组的法官们的平反裁决，他们郑重宣告：推翻 1957 年的判决，宣告我无罪！

北京大学党委用心良苦，几经协商，依政策的就地安置的精神，把我安置到曲阜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直到今天，养生于此。我担任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十年之间，完成了讲师—副教授—教授的三级跳，并担任了先秦两

汉文学的硕士研究生的导师之职。

1994年夏退休，离开了短暂的教学生涯。工作紧张与生活贫困是这十五载执教生活的两大特色，忙于生计，以活妻儿，点滴余闲，苦心撰著，断断续续，终得二十三万言，成《九歌十辩》一卷，献诸学林，博人一哂而已！

关于《是时候了》

在毛泽东引蛇出洞的阳谋中，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张元勋、沈泽宜在1957年5月19日贴出了用诗写的《是时候了》大字报，揭开了北大5.19民主运动的序幕：

是时候了，
年轻人放开嗓子唱
把我们的痛苦和爱情一齐写在纸上
不要背地里不平、背地里愤慨、背地里忧伤。
心中的甜酸苦辣都抖出来、见见天光。
即使批评和指责急雨般地落在头上
新生的草木从不害怕太阳的照耀
我的诗是一支火炬
烧毁一切人世的藩篱
它的光芒无法遮拦
因为它的火种来自——“五四”!!!

张元勋遗著《北大往事与林昭之死》节选：

终于又闻脚步声自外室响起！我的神经突然紧张，一下子达到了极致：我意识到与我们阔别九载、历尽苦难的林昭即将出现在我的面前！

林昭终于走进接见室！她的脸色失血般地苍白与瘦削，窄窄的鼻梁及两侧的双颊上的那稀疏的、淡淡的几点雀斑使我忆起她那花迎朝日般的当年！长发披在肩膀上，散落在背部，覆盖着可抵腰间，看来有一半已是白发！披着一件旧夹上衣（一件小翻领的外套）已破旧不堪了，围着一条长裙，据说本是一条白色的床单！脚上，一双极旧的有绊带的黑布鞋。最令人注目而又不忍一睹的是她头上顶着的一方白布，上面用鲜血涂抹成的一个手掌大的冤字！这个字，向着青天，可谓冤气冲天！

她站在门内一步向我嫣然一笑！整个室内三十双眼睛都一齐注视着。我无法猜测此时此刻他们都想了些什么？是不是都进入了一级战备状态？还是想到人世间有大悲怆、大无畏、大欢喜、大冤枉！整个室内无论是带枪的武士还是不带枪的狱警，以及那便装俊美的女郎，都被这一笑的嫣然而惊诧着、困惑着，甚至是震撼着。后来，他们告诉我：在他们的记忆里从未见过林昭的如此一笑，这实在是她这八九年来在这黑暗、阴冷、与世隔绝的非人世界里的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展现的迷人的、永恒的美丽与春色！使我又依稀地看到那两条粗粗的短辫子以及飞飘着的白绢蝴蝶结的昔日风采！

我从坐椅上站了起来，似乎也有微笑，静静地看着林昭缓缓地走向那个虚席。她捧着一个旧布包，一大卷卫生纸。一位身着医生白大褂、内着警服的女警医一直搀扶着她，她们的身后，是一佩枪的警士。

林昭就坐在我的对面，隔着那个案子，那位文雅的女警医与佩枪的警士坐在她的两侧，与我则是面面相觑。

“开场白”是坐在我身边的一位管教干部向林昭发出的警告：“林昭，今天张元勋来与你接见，这是政府对你们的关怀，希望你通过这次接见受到教育，以便加速自己的认罪与改造……”乏味之至。其语未休便被林昭的话打断，但那位管教干部并未激怒，甚至尴尬地望着我，向我说：这是常事。林昭视其言为老生常谈而不屑一顾，抬手指向周围，问我：这些人，你们那里叫做什么？我未敢回答，不知怎样措词才不会激怒周围的那些监管者！我此刻最怕的是中途被他们停止这次接见！这个心理很快便被坐在我身旁的那位管教干部察觉了，他很客气地对我说：不要紧，怎么说都不要紧！林昭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高兴过，所以，她的话也从来没有比今天更客气的了！我们已经听惯了，不要紧。既然如此，我明白了，乃答：“队长”。林昭颇感兴趣地说：一样的，一样的！我们这里还叫“政府”！与他们说话，要先喊“报告政府”；在北大跟语言学家朱德熙先生学现代汉语，还没听见朱先生说过人变成了“政府”！在这里谬误已是习惯。然后高声说：这帮东西怎么能是政府呢？我怎么能相信他们是共产党呢？我尽量作出一副毫无表情的神态，故意把话题引开，我说：平常把自己打扮一下，把头发梳起来。打扮？打扮什么？女为悦己者容。稍停，她问：什么时候来到上海的？我答：五四。又问：家里都好吗？我答：都好！都非常惦记你、挂念你！都希望你好好改造、平安出狱。她打断了我的话，高声说：出狱？已经是不可能的了！他们早就告诉我：要枪毙我！这已是早晚的事了：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他们可以唆使一群女流氓、娼妓一齐来打我，故意地把我调到“大号”里去与这些社会渣滓同室而居，每天每晚都要在他们（以手指周围）的主使下开会对我斗争，开始这群泼妇也瞎三话四地讲一些无知而下流的语言，可笑的是她们竟连我是什么犯都一点也不知道，骂我“不要脸”！真是可笑！她们这帮东西！她们是干什么的？我是干什么的。他们竟然还知道“要脸”！她们理屈词穷，气急败坏，于是对我一齐动手，群起而攻之。可以想象，这样的斗争会就是对林昭的肉体的摧残！实际上就是一种变相的酷刑！解放后虽然标榜“废除狱内体罚”，而许多地方仍采用开斗争会的方式鼓动犯人打犯人，依然进行着这类人身的折磨，其残忍野蛮的程度真可谓骇人听闻！那些女犯为了“立功”，斗争林昭乃是她们“积极靠拢政府，与坏人坏事作斗争”的立功良机，所以对林昭越是殴打得凶狠与残忍，就越算是“积极改造”、“靠拢政府”，立功也就越大！在这样的诱导与唆使下，林昭几乎天天都在群妇的撕、掐、踢、打的非人虐待中煎熬着。她说：我怎么能抵挡得了这一群泼妇的又撕、又打、又掐、又踢，甚至又咬、又挖、又抓的疯狂摧残呢？每天几乎都要有一次这样的摧残，每次起码要两个小时以上，每次我都口鼻出血、脸被抓破、满身疼痛，衣服、裤子都被撕破了，钮扣撕掉，有时甚至唆使这些泼妇扒掉我的衣服，叫做“脱胎换骨”！那些家伙（她指着周围）在一旁看热闹！可见他们是多么无耻，内心是多么肮脏！头发也被一绺一绺地揪了下来。说到这里，林昭举手取下头上的「冤」字顶巾，用手指把长发分理给我看：在那半是白发的根部，她所指之处，乃见大者如枣，小者如蚕豆般的头发揪掉后的光秃头皮。她又说：因为知道你要来接见，怕打伤了我无法出来见人，故这几天斗争会没有开，我也被调到一个“单号”里单独关押，其实就是让我养伤，以掩盖狱内无法无天的暴行！但，头发揪掉了，伤痕犹在！衣服也是他们撕的，你看。她披着的衣服里面是一件极旧的衬衣，已经没有扣子，仔细看去，才发现是针线缝死了的无法脱下。她又说：这是一帮禽兽。指着周围：他们想

强奸我！所以我只能把衣服缝起来。我发现：她的衣服与裤子都是缝在一起的。她说：大小便则撕开，完了再缝！无非妹妹每月都给我送线来。她边说边咳嗽，不时地撕下一块一块的卫生纸，把带血的唾液吐在纸上，团作纸团扔在脚边。但他们还不解恨，还要给我带上手铐，有时还是背铐；稍停问我：你知道什么叫“背铐”吧？我点了点头。一直还极力故作静而不怒的那些管教干部此时也无法再故作下去了，向我说：她胡说！她神经不正常，你不要相信她的这些话。“神经不正常？”——林昭抢白说，世界上哪个国家对神经不正常的人的疯话法律上予以定罪？你们定我反革命罪的时候怎么不说我是神经不正常呢？

我沉默着不敢发言，便插嘴说：不要说这些了，说些别的。“不要紧”。林昭又抢白说，顶多也就是死！他们杀机已定，哀求之与痛斥之，其结果完全相同！几个月前妈妈接见时告诉我你想来看我，问我行不行？问我行不行有什么用！我告诉妈妈你问他们去！总算走运，他们同意了，许多天以前也通知了我，我盼着你来，就是想告诉你前面的这些话，我随时都会被杀，相信历史总会有一天人们会说到今天的苦难！希望你把今天的苦难告诉给未来的人们！并希望你把我的文稿、信件搜集整理成三个专集：诗歌集题名《自由颂》、散文集题名《过去的生活》，书信集题名《情书一束》。」稍停：妈妈年迈无能，妹妹弟弟皆不能独立，还望多多关怀、体恤与扶掖。语未毕而泪如雨下，痛哭失声，悲噎不止，以致无法再说下去。

许宪民先生尽量保持着一副安详的神态，这时，说了这天接见中的第一句也是唯一的一句话：不要哭！张元勋这么远来看你，你这么一哭，他也不会哭起来了么？“他不会哭”。林昭立即从悲噎中平静下来，又说：他是男的，不会哭。

后来（接见结束，林昭离去之后），那位管教干部告诉我：在他们的记忆里也从未见林昭的如此一哭，这实在是八九年来在这黑暗、阴冷、与世隔绝的非人世界里，她第一次宣泄了自己的悲痛！

冷静下来。我向她说：给你带来一点东西，都是食品，监狱里最需要吃的东西。她才注视那个放在案子上面的大提包，这是我昨天从淮海路的食物店里买来的。其中，有三个品类的蛋糕，八市斤的听装奶粉，印着美丽图案的听装大白兔奶糖，以及香蕉、桔子、苹果。于是，按照监狱的规矩，我把那个大提包推到坐在我身旁的管教干部的面前。他一件一件地取出，放到案子上，然后一包一包地打开，听装奶粉与听装大白兔奶糖本是原装商品，也一一撕破密封，撬开盒盖，并用铁钎子向奶粉中上下刺入，凡十几次。检查完毕，我把这堆东西推到林昭的面前，她笑了，拿起一块蛋糕递给我，说：你送来的这些东西，现在是我的了，我请你吃。我拒绝了，我希望的是多留一点给她！我说：你吃吧！我在外边随时可以去买。她说：也好。于是咬了一口，她忽然向身边的那位女警医严肃地说：倒一杯水。女警医向室外只一挥手，立即就有一个年轻狱警送进来一把暖瓶和一个茶杯，女警医把杯中倒满开水递给林昭，于是便边饮边吃，显得非常自得。我说：今天我们在这儿相会，可谓之“蓝桥会”吧。（我国古代有“蓝桥会”的故事，描述裴航与云英的爱情，他们约会于“蓝桥驿”。而“提篮桥”与蓝桥驿以蓝桥与蓝桥同音而巧合。）林昭又一笑，接着说：又是“井台会”。（井台会，这里用的是《白兔记》中的井台认母的故事，以包含探监的不仅是我，还有许宪民先生在場，是她们的母女之会。）

这时，坐在我身旁的那位「管教干部」向我宣布：「已经中午十一点了。提醒我们接见即将结束，分别的时间快到了，这真是相见时难别亦难了！此时，林昭向我说：你过来，到我这边来。她站起来向我招手，

要我从案子的这边走到那边。靠近她，我迟疑了。这时，那位管教干部又表现了理解与关怀，主动向我说：可以！可以！你可以过去。

我于是绕过案子坐在林昭的对面，确确实实是促膝而谈

这是最高潮的时刻：所有的人都似乎怀以极大的兴致欣赏着！连那威严的武警的脸上也浮现着松弛的表情，那踞坐于“讲坛”上的四位女郎，全神贯注而又津津有味、用极微细的上海方言简短地切切耳语

林昭在沉思中，终于说：赠给你一首诗。于是她轻声地吟诵，韵圆而铿锵：篮桥、井台共笑之，天涯幽阻最忧思；旧游飘零音情断，感君凜然忘生死。犹记海淀冬别夜，吞声九载逝如斯；朝日不终风和雨，轮回再觅剪烛时。

2、沈泽宜

沈泽宜（1933-2014 年）笔名梦洲，浙江湖州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湖州师范学院教授。1953 年秋，考入北大西语系英文专业，翌年转入中文系。

1957 年，在“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精神的鼓舞下，北大学生激情爆发，以张元勋和沈泽宜的诗歌《是时候了》为导火索，学生们没日没夜地贴大字报，争论、质疑、拥护。

1958 年毕业。同年秋至陕西省榆林市（原榆林地区）子洲县双湖峪中学做乡村教师。

“文革”中被捕入狱，1969 年还乡，做泥水小工、搬运工、筑路工等十年。

1978 年，复出任教，担任湖州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浙江文学院特约研究员、浙江省作协特约诗歌研究员。

2003 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2012 年，担任在嘉兴举行的江南“月河·月老”杯全国爱情诗大赛评委。

著有《诗的真实世界》、《梦洲诗论》、《西塞娜十四行诗》等，创作诗歌千首。

《诗经新解》，上海学林出版社，2000 年

本书收入了《诗经》这部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每首诗均有详细的白话文对照及注释和精辟的解读。该书有助于读者更好地读懂这部诗集，从而对我国早期的诗歌艺术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沈泽宜诗选》，花城出版社，2009 年

沈泽宜 2014 年 9 月因病逝世，先生的弟子、诗人伊甸在告别仪式上有一个简短的发言，从中可看出先生的为人。转载于此，寄托怀念。

各位朋友：

沈泽宜老师的去世，让我们感到无限悲伤。

从我进入湖州师专读书算起，认识沈老师已整整 31 年了。1985 年我从湖州师专毕业后，我们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平均隔一两个月就要见一次面。我们一起谈论诗歌，回忆历史，臧否人物。他总是慷慨激昂，充满自信，很多时候他带给我艺术上思想上的各种启发，有时候我们也有过争论。“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我相信沈老师是理解并原谅我的冒犯的。这一切，现在都化作了无比珍贵的记忆。

在最近的二十年中，我们几个跟沈老师来往最密切的学生，更多地是把他当作一个朋友，一个可以无话不谈的朋友，一个有鲜明个性也有明显缺点的朋友和兄长。每每他一声令下，我就从嘉兴专程赶来陪他聊天，陪他打牌，陪他喝酒。相处越多，感情越深。以后，当我再次来到湖州，湖州的大街小巷，湖州的六客堂茶室，湖州的碧潮苑小区再也找不到沈老师的身影时，我肯定会怅然若失，心里会涌起一阵阵的酸楚。最近几年，我越来越感到人生的短促，生命的脆弱，死亡的强大，但我父母活着，沈老师活着，他们像一堵堵高高的墙，为我挡住了死神。现在，沈老师这一堵墙轰然倒塌，我感到了自己内心的惊慌和虚弱。

沈老师活过的这81年，是我们这个民族最多灾多难的时代，战争、反右、文革……这一系列的劫难给民族，也给沈老师带来了数不尽的苦难。前天，女诗人安琪发来了给沈老师的挽辞：“孤独一生，关怀却如此宽广。”我加上一句成为一副挽联：“才华四溢，苦难竟这般深重！”五十年代考上北大中文系的天之骄子，才华、理想、激情都像太阳一样绚烂辉煌，但残酷的打击让他沦入人间地狱，二十多年后虽然平反，但他终于孤独一生，始终没有自己的家，没有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在这里，我要感谢他的保姆张冬花及其家人，你们在沈老师最后的岁月里，把他看作自己的亲人，给了他家的感觉，让他离开这个世界时，走得平静，安详

沈泽宜老师的生命价值在于：他不仅是一个才华横溢的诗人、评论家、学者，一个以自己的激情、思想和才华影响无数学生的优秀教师，同时，他的风云变幻的一生，正是一个时代的缩影。他的一生的历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的八十年的历史，或者说，一个时代的历史浓缩在他的身上。陀思妥夫斯基说过：“我怕我配不上我所受的苦难。”沈老师是配得上他的苦难的。他的诗歌，他的自传，给一个时代的民族的苦难作了见证。为此，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向他献上我们内心深处的敬意！

记得十多年前一个春节，沈老师在年初一打来电话说要来嘉兴看我，我正忙于亲戚间的节日应酬，让他年初五来，第二天他又打来电话，我让他年初四来，年初三他又来电话，一接通他就说：伊甸，我已经在你楼下了！现在回想起来，我深深地理解了他在农历过年这个亲人团圆的传统节日里，他的那种难以形容的孤独和脆弱。我后悔在他生前没能更多地陪陪他。

前天，在沈老师刚刚告别人世之际，张冬花交给我沈老师去世前写的一篇对我诗歌的评论，题目是《诗人伊甸》。这可能是沈老师一生中写的最后一篇文章。其中一段写到我们之间的关系：“我和伊甸相交已30多年，跟他的关系是亦师亦友；但我从不敢妄自尊大，仅仅定位为朋友，兄弟。”看到“朋友、兄弟”这四个字，泪水盈满了我的眼眶。

沈老师，我们会永远怀念你！

3、陈奉孝

（文中*处代表当局忌讳的不同的敏感词，可见作者写作时如履薄冰的心态）

回到老家潍坊后，我去拜访我当年的高三班主任孙其昌老师。一见面，孙老师就说：“奉孝！你被打成右派是在我意料之中的。”我说：“孙老师！您被打成右派是在我意料之外的。”孙老师家庭出身地主，在上大学时稀里糊涂被国民党特务学生拉进了“三青团”，但什么事情也没干。解放前夕，

大学里的国民党、三青团等组织拼命拉学生加入，以便与*在大学里的地下组织相对抗。当时加入到国民党、三青团等组织去的学生，大部分是碍于好同学、好朋友的面子，稀里糊涂被拉进去的，并非出于本愿，加入进去也只不过是挂个名罢了。孙老师就是其中的一个。解放后号召国民党员、三青团员登记，孙老师就登记了。他觉得自己又没干过什么坏事，他相信*是讲究实事求是、光明磊落的。

他1952年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跟李希凡是同班同学。他被分配到潍坊一中教书后，表现一直很积极，还多次申请入党。一九五七年整风运动中，那时他是潍坊市政协委员。政协开会，*号召给*提意见，在一个政协小组会上，别人提意见，他作记录，但他一条意见也没提。到政协大会发言时，各小组要在大会上汇报本小组学习讨论、给*提意见的情况。他所在的那个小组，大家都说：“孙老师，既然是您作的记录，您又是教语文的，您就把大家发言的记录整理一下，代表咱们小组去汇报一下算了。”结果大伙提的那些意见都算在了他头上，他被打成了“右派”。孙老师还对我说：“奉孝！当时我连一个字的意见都没提，大家选我当记录，又选我整理一下记录代表小组去发言，我推脱不过，只好去。再说那些意见都是些鸡毛蒜皮的问题，并没有对*不满的言论，我怎么也没想到，最后居然把我打成了右派”。

实际上当年象孙老师这样的“右派”，全国不计其数。后来想想，象孙老师那样，家庭出身是地主，又参加过“三青团”，有这样的历史背景的人，在那场政治运动中恐怕是在劫难逃的。你就是一句话不说，为了凑够那个百分之五，最后也要把你凑上。因此说，孙老师当年表现那么积极，多次申请入党，那不过是他自己的一厢情愿罢了。

孙老师说，我被打成“右派”是在他意料之中的，为什么呢？被捕后，我自己也作过认真的反思。实际上一个人的命运，既有其偶然性，也有其必然性。

第一、我家庭出身写的虽然是“资产阶级”，实际上只不过是小业主。在反右运动之前的历次政治运动中，我的家庭没有受到任何冲击，不象有的“右派”同学，其父亲或亲属在镇反、肃反运动中遭到*、受到*，因此对*不满甚至有一定的仇恨情绪。

第二，我本人在反右运动之前，没受到过任何冲击，不象有的同学如刘奇弟在五五年肃反运动中因为替胡风鸣不平受到过*。

第三，我的家庭成员和亲属没有一个在国民党政权里干过事的，因此跟国民党政权没有任何瓜葛，不象有的同学，其父兄在国民党政权里干过事，大陆解放前跑到了台湾或海外，故此对国民党政权还存有某种好感。相反的，我对解放前夕的国民党政权一点好感也没有。那时我虽然年纪尚小，但也懂事了。解放前夕，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的情况我也看到过。象我家那种在旧社会属于中、下水平的人家，生计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解放后，生活反而好多了。因此，从经济的利害关系上来讲，我跟解放后的*政权没有任何矛盾。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我最后走上了“右派”的道路呢？实事求是、毫不隐瞒、认真解剖一下自己，大概有以下几种原因。

五一年的“镇反”运动对我的思想冲击很大。在“镇反”运动中，我的家庭成员虽然没有受到过任何*，可我的老师和同学的父亲却有很多被*了。潍坊一中有两名教课教的最好的老师李百凡和孙耀君被*了。李百凡是教几何的，孙耀君是教化学的。李百凡老师教几何课，教的最好，我又喜欢数学，

因此对他很崇拜。他被*，在我的心里蒙上了很大的阴影。除他们二人被*外，还有一个姓黄的老师上吊自杀了。另外，一个教高三数学的于保一老师和一个教地理的谢翔宇老师也被抓起来判了刑。

另外，一个跟我从小学到初三，一直是同班的女同学李明娟的父亲也被*了。那年我和她都在读初三，还差两个月就初中毕业了，结果李明娟退了学。她父亲是国民党的一个军医，我小时候常到她家去玩，我觉得她父亲是一个很和善的人。当然究竟过去她父亲有什么罪恶，我不可能知道，也许是因为对李明娟的同情，对她父亲的被*，我心里一直很难过。

还有一个叫于宏毅的同学，平时跟我也不错，他父亲也被*了，罪名是“认贼作父，私放蒋匪将领李弥”。这件事情我记得非常清楚。他父亲的名字叫于省初，解放后是潍坊市工商联副主任。李弥原是国民党第八军军长，日本投降后第一批进驻潍县的国民党军队（那时不叫潍坊市），跟于省初有交情。淮海战役李弥的部队被消灭了，李弥本人却只身化装逃回了潍坊。于省初把他藏在自己家的地窖子里，给他开了个假路条，李弥逃到了青岛（那时青岛还没有解放）。李弥逃到青岛后，当时青岛有一份报纸叫“民言报”，在报纸上登了这样一则大标题消息：“潍县民心不死，送李将军还青”，结果被青岛的*地下工作者侦察出来了，是于省初私放的他。五一年“镇反”时把于省初枪毙了。

枪毙于省初的刑场就在白浪河上游洋灰桥南的河滩上，许多人跑去看，我还去看过，因此至今我记得非常扎实。此外，我的同学的父、兄还有很多被杀、被判刑的。当时我想，潍坊刚一解放时，*号召国民党员、三青团员登记，并且一再宣传，*绝不实行报复政策，那为什么一下杀、抓这么多人呢？特别是于省初，解放战争中被俘虏的国民党将领，一个也没有杀，那么私放一个国民党将领就该被杀吗？我那时虽然年纪还小，但总觉得*说的和做的不是一回事。

在1952年至1953年的“三反”、“五反”中，我有个最要好的同学李传湘的父亲被逼上吊自杀了。李传湘跟我住同一条街，我经常到他家去，上学都一块去、放学一块回家。我跟他的关系非常密切。他父亲是一个非常传统、非常忠厚老实的人。那时他在一家姓李的资本家里当帐房先生，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会计师。“五反”时，怀疑姓李的资本家有偷税、漏税等“五毒”行为，可是又查不出什么来，于是就把李传湘的父亲先抓起来当“老虎”打，企图从李的父亲那里找到突破口。那时打“老虎”时就用了不少很残暴的手段，让跪砖头、站在高凳子上弯腰、皮带抽等手段。可李的父亲非常老实胆小，他又交待不出什么东西来，结果吓的上吊自杀了。李传湘家八、九口人全靠他父亲挣钱养活，父亲一死，这一家就象塌了天一样，生活无法维持了。不得已，李传湘高二没念完就退了学，到一家商店当了店员，那时他还不满十八岁，就挑起了全家生活的重担。这件事对我的影响也很大。我亲眼看到，当时被整的所谓“不法资本家”有很多都是冤枉的。我就怀疑，为什么*总是一次一次的运动整人，这应该吗？

当时学校里同学之间、师生之间的关系一点也不融洽。那时“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即后来改名的共青团）在学校里发展团员，只有那些政治上要求“进步”，整天向团组织汇报自己的思想情况、汇报别的同学的思想言论等等的同学才能入团，不象现在学校里那样（现在中学里差不多所有的同学都是共青团员）。这无形中在同学之间造成了一种隔阂。更有甚者，我们班

里有个党员（“文革”后他全变了，因此我不提他的名字），人人都怕他，连老师都怕他。上课时如果有哪个老师在课堂上讲什么不满的话，他就偷偷记下来，向学校党支部汇报（这可能是党组织交给他的任务）。有一天一位教物理的张连镒老师在课堂上讲，他在清华大学念书时就有一支手枪，后来抗日战争爆发，去了西南联大，他还保留着这只手枪。张老师他既不是国民党党员，也不是三青团员，但这人说话太随便。在他讲这些话时，那位党员同学正在偷偷的记。因为他正坐在我的后排，被我一回头看见了。我对这些事产生了极大的反感。我觉得这跟国民党时期，利用一些特务学生盯进步学生的稍没有什么区别。

第四，我喜欢理科，尤其喜欢数学，成绩非常突出。初中毕业时，我是全潍坊市唯一一个不用参加升学考试就进入高中的学生。实际上我在念初中时就自学了很大一部分高中数学的内容，上高中时我又自学了不少大学数学的内容，想“成名成家”的思想很严重。我不愿意参加政治活动。解放后，为了配合土改、镇反、抗美援朝，学校三天两头组织一些宣传活动，我不参加，我觉得参加那么多社会活动浪费我的时间。团支部叫我写入团申请书，我也不写。我说，入了团以后整天开会，耽误学习。因此我成了走“白专道路”的典型。

1954年高中毕业时，学校选拔留苏预备生，选拔上以后先到北京俄语学院学习一年俄语，然后直接送到苏联各大学去学习。我非常希望能被选上，因为我的学习成绩太突出了。我是全校、全市出名的尖子生，那个第二名的成绩比我差一大截。可是最后选了六名同学，没有我，这对我的打击太大了。后来在学校最有威信的化学老师郑忻亭老先生告诉我：“好几位老师推荐过你，因为你平时不靠拢组织，政治上不要求进步，所以学校党支部没有同意。”为了这件事我找过黄道源校长。黄道源校长本来是一位很受学生尊敬的老校长，他对学习好的学生很器重，可是因为上级在选拔留苏预备生问题上有严格的条件（主要是政治条件），他也不敢违背。他对我说：“我知道你学习成绩特别突出，但选拔留苏预备生，除了学习好这一个条件外，还有其它条件。学习好这个条件你当然够了，但其它条件你都不够，不过你不要灰心，只要努力，在国内大学学习将来也一样能取得成就的。你如果愿意，学校可以保送你到哈尔滨工业大学去学习。哈工大的教师百分之七十是苏联专家”。我说：“不用了！我相信凭我的学习成绩，在国内我想考哪个大学都能考上！”

学校最后公布的六名留苏预备生全是家庭出身好的，军烈属子弟或平时政治思想表现特别进步的同学。这件事对我的刺激特别大，我认为伤了我的自尊心。因此在最后考大学填报志愿时，我就只填了一个大学一个系，即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其余的志愿，包括是否服从分配，让我全都划掉了。通过这件事，我认为*是在排除异己，只培养自己的人。从此种下了对*的一种不满情绪。

第五，进入北大以后，我感到北大的“左”的气氛比在中学里还严重，整天讲思想改造，究竟要改造什么呢？难道一个人想通过自我奋斗成名成家不对吗？难道只要党、团组织说什么，你就信什么，不允许人有独立思考的余地、只能作应声虫，这样才对？我觉得不对。人应该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不能上级说什么，党、团组织说什么，你就信什么。当时在北大，党员和积极争取入党的团员与一般同学之间有着明显的隔阂。正如后来沈泽宜和张元

勋在“是时候了！”那首有名的号角诗里写的那样，人们之间存在这一种“藩篱”，好象有一堵墙隔在人们中间，彼此之间不能坦率地交谈。

第六，进入北大第一年，我的“成名成家”思想依然很严重，因此学习也比较努力。但慢慢地我了解到，毕业后凡是被派出国留学深造（当时主要是去苏联）或被分配到科学院、名牌大学工作的并不是学习成绩最好的同学，而是把政治思想表现放在第一位。我感到有点心灰意冷。

第七，1955年的“肃反”运动，我本人虽然没有受到任何冲击，但学校里搞的很恐怖，整个暑假没让回家，整天开会学习，还在全校大会上抓人。本班的孙乾同学，家住辽宁省抚顺市，因为说了当年苏联红军进东北的时候强奸中国妇女，结果被批斗，差点被打成反革命（他说的是事实，后来反右期间翻老帐，又把他打成了“右派”）。社会上文艺界大批抓人，全国的气氛都搞的很恐怖。我觉得这种气氛太不正常了，我慢慢的产生了想离开这个国家的想法。

第八，1956年发生了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事件。当时中国政府虽然矢口否认这个“秘密报告”的存在，可是北大有几百苏联和东欧的留学生，这个“秘密报告”很快就在北大流传开来。我突然对这件事情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有一天我在第三阅览室看见任大熊老师在看一张英国的“工人日报”，我凑过去一看，正是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因为我的英语基础比较好，基本上能看懂，于是我也借来看（后来在五七年整风反右期间，任大熊、陶懋顺和我还一起翻译了这个报告，想在“广场”上发表。反右后期，“广场”被迫停刊，未发表成）。从这个报告里我了解到斯大林统治的残暴。我又联想到中国搞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镇反、肃反等政治运动，我觉得中国跟苏联一样，也有类似的情况。

过去我是不关心政治的，报纸从来不看，一心埋头读书，梦想“成名成家”，可现在突然对政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报纸天天看，而且看了后自己琢磨。我不相信报纸上说的都是真话。十月份又发生了波兰的“波茨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苏联出兵进行了血腥的*。中国政府为苏联的出兵叫好。这时我开始认真的思考，我觉得苏联、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制度绝不是一种理想的社会制度。虽然如此，直到被捕，我始终没有怀疑社会主义的公有制。我始终认为，不管怎么说，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了剥削，就这一点来说，比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就是一个进步。苏联、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弊端不是在公有制上，而是在它的政治制度上。因为苏联和中国过去都是封建专制主义的国家，特别是中国，封建社会延续了几千年，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根深蒂固，因此在这样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而是一种封建式的社会主义。过去除了在课堂上学的“联共党史”、“政治经济学”以外，我几乎没看过任何政治和经济学方面的书，因此我当时的这种认识肯定是肤浅的、幼稚的。可是正是这些想法和认识，成了我后来被打成“右派”的思想基础。也许这就是孙老师所说的，我被打成“右派”是在他意料之中的。

以上我对自己思想发展过程的反思完全是真实的，赤裸的，我不想隐瞒半点什么，我只想把一个真实的我彻底暴露给世人看。

陈奉孝 1998年10月

4、林昭

苏州市郊木渎镇灵岩山有一个安息公墓，整个陵园相当简陋，只是每座墓的面积不算逼仄。陵园一隅有一个女学生的衣冠冢。其中并没有骨灰，而是她的一缕头发和部分遗物。这座坟墓边一直装着闭路监控，不时还有警察把守。文革不早就被官方否定了吗？为什么在文革中被杀掉的她，今天还让它们那么的恐惧呢？连普通人去纪念一下都不被允许。她是谁呢？

她叫林昭。是那个年代坚贞不屈的“右派”，她在陷身囹圄后，不惜以死同暴政抗争，写血书坚持自己的思考和理念。她是在暴政下为数寥寥的大写的人之一。其思想的光辉远远超越了我们这个时代。林昭的精神，将来一定能发扬光大，也许我们这一代，看不到我们想要看到的结果，但历史的潮流，终将能按照它的必然的规律向前发展。

林昭（1932年12月16日—1968年4月29日），原名彭令昭，林昭是其笔名。苏州人。林昭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因公开支持北京大学学生张元勋的大字报“是时候了”而被划为右派，后因“阴谋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罪，反革命罪”在1960年起被长期关押于上海提篮桥监狱，在狱中她坚持自己的信仰，并书写了二十万字的血书与日记，控诉了中国当局的对她残酷政治迫害和压迫，表达自己追求人权，自由和平等的信念和追求。1968年4月29日林昭被当局在上海秘密枪决，当局从未正式公布过判处林昭死刑的罪名。

毛泽东死了以后，1980年8月22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撤销之前的判决，以林昭患有精神病为由平反为无罪，并认定该案为冤杀无辜。1980年上海高院再次做出复审，认定以精神病撤销判决不妥，撤销1980年裁定，但仍与之前判决一并撤销，宣布林昭无罪。

林昭出生于苏州。父亲彭国彦曾做过吴县县长，母亲许宪民很早就参与进步活动，大舅舅许金元曾任中共江苏省委青年部长，四·一二事变中，被国民党处决。林昭毕业后随苏南农村工作团参加苏南农村土改。

受家庭的影响，年幼的林昭对共产党闹革命抱有很大的热情，在景海中学高中毕业后，林昭不顾母亲反对，于1949年7月考入了“革命摇篮”苏南新闻专科学校，毕业后林昭随苏南农村工作团参加苏南农村土改。1952年开始在《常州民报》、常州文联工作，期间林昭深入工人之中，撰写了许多报导，歌颂共产党。

1954年，林昭以江苏省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由于林昭勤学多思，受到游国恩教授的赞赏，建议林昭调入文学专业，未果。林昭与另一位才女张玲任校刊编辑，负责副刊《未名湖》。

1955年春，林昭参加了北大诗社，任《北大诗刊》编辑。1956年秋，《北大诗刊》停办后，林昭成为综合性学生文艺刊物《红楼》的编委会成员之一，被称为“红楼里的林姑娘”。该刊物主编是乐黛云。《红楼》第2期的责任编辑是林昭和张元勋。

1957年5月19日，张元勋等贴出大字报《是时候了！》，这是为了响应毛泽东多次倡议的大鸣大放号召，帮助共产党清除三害整顿作风。

随后几天，北大的大字报越来越多，学生互相辩论，有人提出张元勋等人的大字报是反革命煽动，扣了一大堆帽子，似乎必欲将人置之于死地。5月22日，在那些勇于发表独立思想和观点的学生受到一群知识愚氓们的诽谤和众人明哲保身的缄默中，她挺身而出、跳上桌子，用她那浑厚而富于感染力的女中音，大义凛然地保护那些受围攻的思想者的人格和权利。林昭在辩论中，公开反对那些上纲上线的批评，并说：“我料到一旦说话也就会遭到

像今晚这样的讨伐！我一直觉得组织性与良心在矛盾着。她主张以理服人，不赞成无端谩骂。愤然批评知识群氓们的粗暴行为。

（笔者注：5月19日北大校园出现第一张大字报，5月20日《是时候了》被广为传诵，5月22日持不同论点的学生即针锋相对地辩论起来，5月23日林希翎第一次到北大发表演说即受到部分学生的围攻和校方监控。由此看来，“右派分子”的“自由活动”充其量不超过三天，仅仅是说几句话、贴几张大字报，共产党毫发无损。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这是为什么？》，将提意见的言论说成是右派分子“乘机向党进攻”。由此被打入罪恶的深渊乃至失去了可贵的生命，这究竟是谁向谁进攻呢？）。

1957年秋，张元勋、林昭等人被打成右派分子，林昭吞服大量安眠药自杀，但被及时抢救过来。于是被认定她在对抗、“态度恶劣”，于是她被加重处分：劳动教养三年。林昭不服，跑到团中央质问：“当年蔡元培先生在北大任校长时，曾慨然向北洋军阀政府去保释‘五四’被捕的学生，现在他们（指北大领导）却把学生送进去，良知何在？”后因新闻专业副系主任罗列怜其体弱多病，冒险为之说情，林昭得以留在新闻专业资料室接受群众“监督改造”。

1957年12月25日，张元勋被秘密逮捕，判刑八年。北大当时约有八千学子，反右运动中近一千名师生被打成右派，他们中的许多人，被开除公职与学籍，发配到边疆荒野，历尽了千般辛苦，受尽了百般折磨。20多年后据说均系错划，方得以“改正”。

1958年6月起，林昭在人大新闻系资料室监督劳动，期间与同在资料室“劳动考察”的人大学生“右派分子”甘粹产生爱情，他们提出结婚申请，但上级批评他们谈情说爱是抗拒改造，不准他们结婚。

1959年9月，甘粹被发配到新疆进行劳动改造。林昭病情加重，冬天咳血加剧，请假要求回上海休养。

1960年春，人大校长吴玉章先生批示准假，林昭由母亲接回上海。通过调养，林昭病情渐有好转，并在上海认识了兰州大学的研究生顾雁、徐诚，当时兰大的张春元等人，正在准备筹办针砭时弊的《星火》杂志，随后林昭的长诗《海鸥之歌》和《普鲁米修斯受难之日》，在《星火》第一期上发表。但很快涉及《星火》的人员，都被抓捕。1960年10月，林昭被逮捕入狱。

1962年初，林昭得以保外就医。期间曾要求上海的无国籍侨民阿诺，将《我们是无罪的》、《给北大校长陆平的信》等带到海外发表。

1962年12月，林昭又被捕入狱。在狱中林昭曾多次绝食、自杀，并分别两次给当时的上海市长柯庆施、《人民日报》写信，反映案情并表达政治见解，都没有回音。林昭在狱中，没有笔和纸，竟然都是用血在白色的被单上写作（有二十万字之多）。另外，由于林昭拒绝违心地服从，被狱卒视为表现恶劣，遭受较严重的虐待，林昭在血书中写到：“光是镣铐一事人们就玩出了不知多少花样来：一副反铐，两副反铐；时而平行，时而交叉，等等不一。臂肘之上至今创痕犹在不消说了，最最惨无人道酷无人理的是：不论在我绝食之中，在我胃炎发病痛得死去活来之时，乃至在妇女生理特殊情况一月经期间，不仅从未为我解除过镣铐，甚至从未有所减轻！一比如在两副镣铐中暂且除去一副”。

1965年3月23日，林昭开始写《告人类》。

1965年5月31日，开庭审判，林昭被判有期徒刑20年。林昭随后血书《判决后的申明》。

1965年下半年，第三次给《人民日报》写信。

1966年5月6日，北大同学张元勋来到上海，同林昭母亲许宪民到上海提篮桥监狱看望她。

1968年4月29日，阴雨啜泣的上海：那群政治恶棍和流氓鹰犬把瘦弱的林昭从病床上拖走，塞死她的嘴、勒紧她的喉咙，秘密架到死刑场，他们没有胆量让林昭控诉，他们没有胆量面对人民，他们没有胆量向世界公开宣判林昭犯的是什么“罪行”，他们更没有胆量公开宣布执行死刑。这是中国最黑暗的一天，中国人最耻辱的一天，中国大地最血腥、最悲怆的一天。独夫民贼、整个国家以罪人之身永远跪在这位英姿挺拔的圣女身后。她已飘然飞升，化为灿烂的永恒。

林昭父亲在女儿被捕后，服药自杀。林昭母亲则精神失常，后死于上海街头。林昭的弟弟彭恩华，2004年8月3日逝世于美国 Sandy, Utah，享年59岁。林昭的妹妹彭令范现居美国。

1980年8月22日，上海高级法院“沪高刑复字435号判决书”，宣布林昭无罪，结论为“这是一次冤杀无辜”。林昭被平反后，在北大的追悼会上，有一副挽联，上联是“？”，下联是“！”。无声胜有声。

2004年4月22日，林昭骨灰被安葬在苏州灵岩山，但只是“衣冠冢”，尸体至今不知所在。仿佛是命运的巧合，其舅舅许金元也在万物复苏的四月天（中共江苏省青年部部长，“四·一二”事变中牺牲）被装入麻袋尸沉长江，尸骨无存。林昭曾在狱中做《家祭》一首祭奠舅舅许金元：“四月十二日——沉埋在灰尘中的日期，三十七年前的血谁复记忆？死者已矣，后人作家祭，但此一腔血泪。舅舅啊——甥女在红色的牢狱中哭您！我知道您——在国际歌的旋律里，教我的是妈，而教妈的是您！假如您知道，您为之牺牲的亿万同胞，而今只是不自由的罪人和饥饿的奴隶！”

林昭的档案，包括在狱中写的大量血书，1980年代曾一度开放，但不久又被封存。至今流传的关于林昭的资料多为其生前亲友的回忆，许觉民有一本书叫《林昭，不再被遗忘》，可时至今日究竟还有多少人记得那些在那个不堪回首的年代中陨灭的英灵！

林昭的舅舅许觉民在2006年11月13日逝世。

在一批北大人相继入狱，全国景象一片肃杀的情况下，林昭竟不可自己地按着自己的良心走了下去。

根据越来越清晰可靠的材料，林昭本来并不激烈，厄运本来是可以逃过的。但是，当“右派分子”们受到讨伐的时候，她出于打抱不平，赞成说理斗争，不赞成恶意批斗，跳出来了。由此被打成右派分子，起初她的处境还不是很惨。但是，在大饥荒的年月，她出于为民请命又站出来了。她与张春元等合编《星火》，不仅发表诗歌，还四处搜集各地党政负责人和民主党派负责人名字，企图把写好的文章寄给他们，使他们正视人民的苦难，遏止极左政策。结果众所周知，围绕《星火》的几十个人被作为“反革命集团”全部抓捕。被捕之后，林昭仍然在抗争。她的一些抗争看上去毫无意义，考察林昭的行为，正如她的难友们所说，的确是“拿鸡蛋去碰石头”。林昭偏偏要以自己这颗鸡蛋的微薄之力去碰石头。她说：“我相信成千上万个鸡蛋去撞击，这顽石最终会被击碎的！”尽管有人认为这话一点儿说服力也没有。

但正是这样的话，使人们看到了一个真正的理想主义者，一个真正为理想而献身的战士。在广州的黄花岗上，就埋着不少这样的人。

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形象是黯淡的，林昭再次带来了光彩。她是一个象征，一种精神和人格的象征。

对林昭进行人格评价，人们不能不顾及偷生的大多数，同时，却不能不面对林昭。从这个意义上说，林昭的姿态不仅使一段历史有了些许亮光，而且拯救了人们的道德底线。

林昭冤案平反始末 作者：彭令范 转自《学人说史》

编者按：彭令范女士是林昭的妹妹，现居美国。她这篇文章，详细披露了林昭案历经两次复查，方得平反的过程。读后我们才知道，主持林昭案平反的上海高院院长关子展，原是彭令范在上海第二医学院的老领导，如果不是有此机缘，林昭要脱去“精神病”的罪名，恐怕还要经历很多波折。

以下即彭令范女士所著原文：

1979年2月28日，我收到北京大学党委寄来的姊姊林昭的右派分子改正通知。这时我想到，应该向有关部门申请复查和平反林昭的反革命罪和死刑判决，同时也必须为我母亲许宪民（1911-1975）的“反革命分子”罪名平反。

母亲受到牵连

“文革”前，我母亲是“民革”苏州市委副主任、市政协委员、中国民主同盟盟员、苏州市汽车公司副董事长、苏州公共汽车公司副经理，她在1949年后的历次运动中幸存了下来，但在“文革”中却为了林昭的缘故，也成了反革命分子，死于非命。她的平反须通过高一级——江苏省的有关部门，甚至民主党派的中央批准核定。

我同时做这两件事（母亲和姊姊的平反），必须尽一切努力。在那个年代，我用了几乎所有的时间，写了几百封信给我以为能给我们帮助的人，用菲薄的工资从上海跑南京，跑北京，找寻和访问所有和我母亲、姊姊有关的人，大多数是母亲的同志和朋友，有些是中共党员，在毛泽东去世、“文革”结束后，官复原职，同时我也作了一些调查研究，找出原始资料和有用证物。没有任何人帮助我做这件事，人们不敢涉及这棘手的问题，包括我的亲弟弟。我完全靠自己做这事，只有上帝照看着我。

我母亲的追悼会于1980年2月10日在苏州举行，与会者百余人，不乏知名人士，如孙中山第八位秘书田桓、台湾裕隆汽车公司老板的长兄严庆祥等，不胜枚举。另外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百余份唁电、挽联。《苏州日报》报道了这一新闻，母亲再一次被称为同志。

第一次复查

姊姊的平反过程是非常错综复杂的，并带有一定的神秘色彩。1980年8月22日，我收到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寄来的《刑事判决书》（沪高刑复字第435号），判决书虽然宣告林昭无罪，但给出的理由却是：

现经本院复查查明：林昭在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份子”后，因精神上受到刺激，1959年8月开始就患有精神病，嗣后，曾以写长诗、文章等表示不满，并非犯罪行为。1965年对林昭以反革命罪判徒刑显属不当，应予纠正。林昭被错判服刑后，精神病复发，又曾用写血书、诗歌、日记以及呼喊口号表示不服，1968年将林昭在病发期间的行为，又以反革命罪处以极刑，显属错杀，应予纠正。据此，本院特重新判决如下：

一、撤销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 1962 年静刑字第 171 号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 1967 年度沪中刑(一)字第 16 号两次判决。

二、对林昭宣告无罪。

所以这里是错划“右派分子”，错判“反革命”服刑，错杀，三错到底，主要归咎于她的“精神病”。我并不认可这平反的“措词”，但当时只能得到这样的平反判决。因为林昭的“精神病”，法院没有发还家属任何遗物。我曾去信要求发还一些她的遗物（我的目标是她的遗稿），但杳无音讯。

然而奇迹出现了！我所在的上海第二医学院（编者注：1952 年院系调整中由圣约翰大学医学院、震旦大学医学院及同德医学院合并而成）的党委书记兼院长、“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关子展（1914-1996），“文革”后恢复名誉任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编者注：关子展在 1979 年 12 月 30 日结束的上海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当选为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看到他的任命在报上发表后，我立即写信给他。

我与关子展的相识

我与关子展的相识，很有戏剧性。

1975 年我母亲去世后，我体内各种生理系统不平衡，经常生病，1976 年经急诊住入我们医学院附属的广慈医院（编者注：今瑞金医院前身）。当我的病情略见好转后，就帮医生护士做些简单的工作。有一天，我到一个小房间给病人发药，一开门，我惊讶地叫道：“关院长！”“我已不再是院长了，”他说。“不，你是我们的院长，我的院长。”我答道。当时他罹患高血压、心脏病，因为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当时是重点打击对象。自此以后，我和关院长逐渐熟悉和接近。

我们谈医学，他问我：“你是不是好学生好医生？”

我说：“当然。”

他说：“我要问你老师……”

有时他会对护士说：“叫 728（我的病床号）来看我。”当时他虽然被允许住进他领导下的医学院附属医院，带有“保护”性质，但被与外界隔离。我是医生，有些“情报渠道”，所以会告诉他一些敏感消息或道听途说的小道新闻（有时小道亦来自大道）。我尊敬他是我们学院的院长，这本来是人之常情，但这种常情却超出了“文革”的常情，大概给他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中间没有任何政治因素。我从未想到，有一天他会给予我难以想象、不可思议、出乎意料的帮助，使我终生感激难忘。

林昭的追悼会

我写了好几封信给关子展。第一封是 1980 年 8 月 26 日，然后是同年 9 月 2 日和 9 月 26 日，提出为林昭开追悼会的要求，同时希望在他的领导下，重新复查林昭案件。我用外交词令暗示，以精神病为由平反似不符实际。

如果不是关院长，其它人大概不会为“精神病”操心，因为林昭已经得到平反了。

结果在 1980 年 12 月 11 日，林昭追悼会在北京中国新闻社召开。与会者有全国政协副秘书长聂真、北大林昭的老师，还有苏南新闻专科学校、北京大学、人民大学林昭的同学，以及林昭在人大资料室监督劳动时遇到的刘少奇前夫人王前等，共百余人。我保留了追悼会的录音磁带和所有资料，包括来自全国各地的唁电、唁信和挽联约八十余份。

参加追悼会大多数人，都希望我能全力去为林昭的“精神病”平反，“只有你能做这件事！”这是人们对我的期待。

《人民日报》报道“子弹费”

1981年1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报道林彪、江青集团案审判情况的长篇通讯《历史的审判》（由新华社总编辑穆青与郭超人、陆拂为合写），其中有一段提及林昭的案件：

她（林昭）就义的详细经过至今无从查考，我们只知道这样一个消息：1968年5月1日清晨，几个“有关方面”的代表找到了她年迈的母亲，宣告林昭已于4月29日被枪决。由于“反革命分子”耗费了一发子弹，她的家属必须交纳五分钱的子弹费。这真是使人毛骨悚然的天下奇闻！在中世纪被判“火刑”烧死的犯人无须交付柴火费，在现代资产阶级国家用“电椅”处死的犯人也从未交过电费，唯有在林、江的法西斯统治下，人们竟要为自己的死刑付费，这不能不说是又一个“史无前例”的创造发明！也许在若干年以后，我们的后代对上述这一切将难以置信，但不幸的是，它确实是发生在我们这一代人生活中的事实。我们每一个活着的人，都曾经为它感到极度的羞耻。

《人民日报》面向全世界发行，并有各种不同语言的翻译，所以林昭的故事，特别是五分钱子弹费的故事，早在1980年代已在国外流传，我曾看到几个地方（法国等）提及。

这篇通讯发表后，上海公安局很恼怒，“肯定是林昭的那些记者同学干的（写的）！”诚然，陆拂为是林昭北大、苏南新专的两度同学。

再一次复查

1981年2月10日，上海静安区人民法院赵凤岱找我去谈话，他当时是复查组组长，他首先问我林昭的精神状态，“你是医生，你如何看她的精神状态？”“她去上海精神病总院鉴定过数次，但她仍关在监狱里，没有住精神病院。”我答道。赵先生是一个正派的人，后来我们彼此配合、理解甚佳。有一天，他对我说：“第一次见到你时，你的眼睛里充满了怒火。”

1981年3月，陈伟斯先生写了最早关于我姊姊的文章《林昭之死》，发表在上海《民主与法制》杂志上。复查组组长赵先生让陈伟斯看了一房间林昭的档案，只能看，不准抄录，以一天为限。陈伟斯大概是政治系统之外、唯一看到这些档案的人。陈先生是我母亲的同志和朋友（我称他陈叔叔），中共党员、新闻记者，也是右派分子，曾在劳改营被劳教20年。平反后，重新回到新闻界工作。

与此同时，赵先生曾多次提及“我们的院长对林昭案非常关心并直接参与”。1981年12月30日，我收到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的另一份判决书：

本院于1980年8月22日复查……对林昭宣告无罪在案。经本院院长发现，本案改判判决在适用法律上仍属不当，由审判委员会决定再审。

现经本院再审查明：林昭于1958年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被错划为“右派份子”，于是以写长诗、文章等表示不满；1968年林昭在被错判服刑期间，又先后用写血书、诗歌、日记以及呼喊口号表示不服。按林昭以上行为，根本不构成犯罪；而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均以反革命定罪处刑是错误的。本院于1980年8月22日复查改判时，否定林昭犯有反革命罪，撤销原来两个错误判决，对林昭宣告无罪是正确的。但据以宣告无罪的理由是说林昭因患有精神病，在病发期间的行

为，不应以反革命罪论处。如上所述，林昭的行为既不构成犯罪，故本院（80）沪高刑复字第 435 号判决在适用法律上亦属不当，均应与前两个判决一并予以纠正。据此，本院判决如下：

一、撤销本院（80）沪高复刑字第 435 号、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 1967 年度沪中刑（一）字第 16 号和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 1962 年静刑字第 171 号判决。

二、对林昭宣告无罪。

这次复查，不仅去掉了“精神病”的借口，并加以否定。至此，林昭的平反，最终完成了。我没有辜负人们对我的要求。

1982 年 3 月，我收到赵凤岱先生发还我的林昭给人民日报编辑部的信 137 页。

我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讲我认识关院长和他在林昭平反中的作用。直到 1999 年，我写了一篇《我的姊姊林昭》发表在苏南新专的“五七年情缘”专刊上，约略地提到这事，现在又 14 年过去了，我应该把这件事讲清楚，在那个年代中，谁帮助使林昭获得了平反，取得了林昭的案卷。

我从来没有机会感谢关院长。他给我的帮助，我铭记终生，感激不尽。但我认为他有一个真正共产党人的良知，捍卫法律的尊严。

神秘人物的馈赠

1982 年春末的一天，我们医院党支部书记对我说：“明天下午 2 点你要到上海公安局去一次，有人要找你谈话。”“什么主题？”我问道。“你去了就会知道。”“去找谁？”我再问。“没有名字，你准时到，讲你的名字就可以了。”

次日，我到了那里，通报姓名之后，警卫把我领到一个邻近公安局入口处的办公室。几分钟后，一个四十岁左右、表情阴郁的人走了进来，他注视了我两秒钟，“你是林昭的妹妹？”他问道。“是的。”我说。然后他就开始讲述。我感到很意外，他没有问我任何问题。

“我希望你知道，你姊姊的案例自始至终我们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从在监狱里如何对待她（注：林昭被反铐 484 天），到最后判决死刑，甚至她的平反，都是非常复杂的过程，可能你也知道一些。因为你姊姊的案子，有些干部丢了工作，甚至坐了牢，下场很悲惨。”我不知道如何应答，也不明白他为什么告诉我这些情况。我没有准备应该怎么讲，也是怕讲错，“所以有两个司令部？”这是我在这次会见中唯一的几句话。

然后他继续讲：“你姊姊的死刑判决，是中央政治局作出的最后决定。”室内死一样的寂静。我感到空气似乎凝结成冰。我们两人没有什么要说的了。或者说，在任何关键性的时刻，语言都是无力的。

最后，他说：“这里有几本笔记，你姊姊的日记和写作摘要。你大概希望能保留。”“是的，当然！”我答道，“这是不是她的笔迹？”他问道。

“是的，这正是她的笔迹！”然后他问，“你有什么要讲吗？”“没有，感谢你给我她的笔记。”我没有敢问他的名字，我想他也不会告诉我。

这就是林昭三本笔记簿日记和其它资料的来源。

1. 《战场日记——留给公众和后世的记录（1967. 2. 9-2. 23）》
2. 《血书家信致母亲附血书抗议（1966. 10. 4; 1967. 10. 14-1968. 1. 14）》
3. 《心灵的战歌，我呼吁人类（1967. 11. 23-30）》
4. 《课卷（1966. 1. 11-2. 27）》

我非常感谢这位神秘的知情人物向我透露林昭案的一点儿内幕，他给我的这些可贵的日记和“课卷”，填补了姊姊狱中生活的空缺，也提供了研究中国近代史中那些铁腕政治人物的重要线索，同时告诉我们如何研究林昭的案卷。2009年10月，我把这些遗稿和林昭给人民日报编辑部的信，捐赠给了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所。

我常常为此人祈祷（虽然或许他并不需要我的祈祷），他大概是一定级别的公安干部，但他仍具有正派、合乎礼仪的人性和善良的道德观念。他给我林昭的笔记，只因为我是她的妹妹，但或许他要让这世界了解某些内幕，在未来的岁月为历史研究提供线索和暗示。（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小档案】

关子展（1914-1996），山西霍县人，1936年参加革命，曾任晋中公安局侦察科长、太原市公安局办公室主任、山西省公安厅调查研究室主任、华北局社会部办公室副主任等职，1954年调公安部任办公厅副主任、人民防空局局长。1957年调任上海第二医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1977年任上海市教育卫生办公室副主任，1978年当选上海市七届人大代表，上海市政协常委，中共上海市委委员，同年任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党组书记。1983年当选上海市八届人大常委、法制委员会主任。

林昭难友张元勋去世后，彭令范填了一首词聊表纪念，这里一并发表，以飨读者。

临江仙·悼张元勋

四十余年弹指去，人间天上茫茫。平生细诉九回肠。营营从楚辞，几度历风霜。

劫后风华依旧在，中途不思归航。尘寰错落负流光。麟儿椿萱慰，何必话沧桑。

5、谭天荣与林希翎

写反右不能不涉及学校，那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必然的反右重灾区，岂容忽视。写学生中的反右不能不写谭天荣和林希翎，他俩是毛泽东钦定的右派学生首领。岂能省略。但当我构思此章节的时候，却颇感为难，一直拖到猴年春节以后才动笔。仔细阅读有关史料的记叙，我竟然发现这两个当年的学生，都属于热爱祖国，热爱共产党一类。尤其是对毛泽东，虽然对他的独裁专断有些不满，却都还怀着几分敬意和一定程度的崇拜。他们对毛泽东说的“要整顿三风”信以为真。对毛泽东高声叫喊的“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坚信不疑。恨不得一下子把中共肌肤上的痈疽疔疖剷除得干干净净，早日进入仁爱平等民主自由的社会主义天堂。然而，事与愿违，天堂没有进成，却落入了毛泽东预先设置的反右陷阱。

如今反右已经过去近一个花甲，已是耄耋老人的谭天荣，还在他钟爱的物理海洋中徜徉，波涛滚滚，浪花翻腾，一波接着一波，涌向前方！2012年笔者曾在北京和他见了一面，当时他年逾八旬仍孤身一人，后来听说找了一个老伴，照料他的晚年生活，垂垂老矣。

林希翎历尽磨难，2009年客逝于法国巴黎。在她的家乡浙江温岭，存放着部分骸骨。时常有五湖四海的民众来此瞻仰她的墓碑，寄托无限的哀思。告慰她的英灵，展望着美好的明天。

下面是一些有关谭天荣和林希翎的纪事。

谭天荣

先看看当时某些报纸刊载的谭天荣之反动言论：

北大学生谭天荣站出来说：章伯钧、储安平、章乃器等人并非什么右派，而是代表民主力量的人。

物理系学生谭天荣认为，应该对资本主义有个新的解释。

他主张全民直接选举，反对用法律规定共产党在国家的领导地位。

他还抨击人民日报是“封锁真理的万里长城”。

并对列宁与毛泽东予以批判：列宁同志的宇宙观和认识论，在出发点上有原则性的错误……他一般否认有绝对的自然规律……把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加在物理学上，所以他提出的物理学方面的一些命题，在科学上是没有价值的，而且造成了很坏的影响。

毛主席发表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是赤裸裸的唯心主义，不是唯物主义……是帝王思想的变相复活，是一种古代封建意识。

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人为的盗窃国家政权的一种新颖名词。

苏联的工人阶级的专政，也是欺骗人民的口号。人民一切无自由。

明眼人不难识别，以上例证都是掐头去尾、断章取义之典型。谭天荣写过多篇自传型叙事文，文中大多揉入了不少深奥的数学和物理学，一般人难以看懂。我从中选择了两篇最通俗易懂的，全文载录于后。欲了解谭天荣其人和他在反右前后的遭遇，请看 2013 年他写的《谭天荣自述》和 2007 年写的《当年我们太年轻了》。

谭天荣：

谭天荣自述

引言

由于历史的误会，我在 1957 年成了学生中的大右派，毛主席封我为“学生领袖”，当时的报纸把我描绘成一个政治上的妖魔鬼怪，并为我编了很多神话故事，似乎我能呼风唤雨。实际上，在我这一生中，只有两个月——1957 年的 5 月中旬到 7 月中旬——曾经关心政治。就是这两个月所发生的事情，使得我在别人眼里成了另一个人。在这里，我想简单地介绍一下我的“右派经历”，以还我本来面目。

如果我能回到 1957 年

人们常说：“历史不允许假设。”按照我的理解，这句话是告诉我们：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不要惋惜，不要后悔，不要沉迷于不着边际的幻想：

“当时我要是如此这般，我的一生就会如何如何。”与其如此，倒不如从既定的现实出发考虑当前的问题。如果我的理解没错，那么这句话应该是积极的。

但我觉得“历史不允许假设”这句话也有它消极的一面。对于历史学来说，似乎很难回避这样的问题：“如果某一历史事件的结局和实际发生的相反，以后的发展进程将会如何？”在这个问题面前，一味强调“历史不允许假设”似乎成了掩盖自己懒惰或无知的空话。对于某个人来说，在回忆某些往事时，也有一个问题会时不时地跳出来困扰自己：“如果某件事情能够从头开始，我该怎么做？”这时，“历史不允许假设”这句话就成了拒绝对自己进行反思和忏悔的遁词。

我现在就面临这样一个问题，不止一个人问过我：“如果 1957 年的整风运动从头开始，你还会不会参加鸣放？”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明确的：“否！”

且不说我为当年的鸣放付出了怎样的代价，事实已经证明，我根本不是“搞政治”的材料，至于当“领袖”，我更是一窍不通。就我的本性来说，我应该远离政治，一心一意钻研物理学，那样无论对别人还是对我自己都会好得多。在那个该死的1957年夏季，我千不该万不该卷入什么“鸣放”。但是，还有另一个问题：如果时间能回到1957年五月十九日以后不久的某一天，我还有没有另一种选择呢？回答是：“有！”

直到反右运动结束时，我也没有“低头认罪”，原因是我极为天真，始终认为自己确实是响应党的号召，真心真意地帮助党整风。我认为自己从来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甚至连稍稍不利于党整风的言论也没有。只有到了1958年的春天，我才明白了别人早已一清二楚的事实：我们这些右派分子的问题根本不是自己是否诚心帮助党整风的问题，我们对这次运动的理解从头到尾都是错误的；更主要的是，我们对党、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也从头到尾都是错误的。当我终于认识到这一点时，对身边的一位朋友说：“你知道，在鸣放时，我并没有说出我的全部观点。对那时的神灵，我也没有少烧香；甚至连斯大林我也尽量为他辩护。如果说我对这些神灵还有些不敬之处，也不过是对列宁略有微辞，而且也仅限于在学术范围之内。凡是我自己认为对党对社会主义可能不利的话，我一句也没有说过。早知道落下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虚名，不如早打正经主意。”

看来，对于我在1957年五一九运动的表现，别人对我的看法与我对自己的看法不尽相同。例如，在一本颇有名的书中，对我有这样一段描写：“北京大学的学生领袖谭天荣在大字报里点名批判了毛：‘毛主席发表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是赤裸裸的唯心主义，不是唯物主义……是帝王思想的变相复活，是一种古代封建意识……。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人为的盗窃国家政权的一种新颖名词。……苏联的工人阶级的专政，也是欺骗人民的口号，完全是党巨人阶级独裁，人民一切无自由。’”

我不怀疑作者写这段话时对我的善意，或许他还是在有意或无意地美化我。但我不得不指出其中某些地方的言过其实：我确实批评过《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篇文章“是赤裸裸的唯心主义”，但远没有“点名批判毛”。那时我心迟眼钝，甚至并不知道这篇文章是毛主席写的。我批评的只是“人民日报”，因为文章是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当然，既然当时我甚至对列宁也略有微辞，对伟大领袖的“雄文四卷”不可能没有“腹诽”，但那时我没有说过半句对伟大领袖不敬的话。这并不是我有先见之明，为自己留了后路，而是因为我认为整风是毛主席发动的，如果对毛主席说三道四，将会对整风不利。总之，我想的不是自己的安全（李逵式的赤膊上阵），而是国家和民族的利益（难以置信的天真幼稚）。

按照我现在的认识，既然我已经批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样的文章，对神灵们再烧香磕头就完全没有意义了。事已至此，我应该把自己当时所想到的对新社会、对共和国、对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对“毛泽东思想”以及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认识，毫无保留地提出，免得徒担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虚名。

一言以蔽之，如果说我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一不做”，那么我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就是“二不休”。这就是我对自已1957年所作所为的总的看法。

我还是侥幸活过来

2004年11月8日，是我母校湘乡一中百年校庆，我专程从青岛赶往故乡参加这一盛典。在一个展厅里展示了母校自建国以来考上北大与清华的校友的姓名，我榜上有名，我是湘乡一中第一个考上北大的。但在另一个展厅里，却把另一个后来考上北大的校友的名字列在我的前面，不仅如此，在这个榜上，清华又列在北大之前，这样，在这个曾考上北大与清华的校友榜上，我就名列第六了。我心里想，谁这么粗心大意，把我的一个“湘乡一中之最”给弄没了？或许是作为安慰吧，在我们高五班聚会时，我获得了另一个“湘乡一中之最”：在场的18位同学一致“推举”我为校友中“经历最坎坷的人”。在获此殊荣时我微微一笑，我想当时没有人知道我这一笑多么苦涩。

被划成右派以后，我“劳动”了22年，在这22年的炼狱人生中，我确实没有少吃苦头，甚至曾不止一次与死神擦肩而过，如果再“坎坷”一点点，我就不能参加这次同学聚会了。但是，“经历最坎坷的人”的称号我还是受之有愧，我亲眼看到许多难友离开了人世，说一千道一万，我毕竟还是幸存者，当然就算不上经历最坎坷的人。

其实，对于那些经历更坎坷的人来说，大多数也是平静而又安详地告别人世的。我手头有几位难友的回忆录，他们对这种生与死的和平过渡作了极为平实的冷峻的描写。

有一位难友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死亡的乌云笼罩着整个于家岭。周围的人在一个个地死去，无声无息。严寒的冬天正伴随着死神，张开大嘴吞噬着这里的芸芸众生。最早死去的往往是那些原本体强力健的壮劳动力，因为他们旺盛的基础代谢最难适应突如其来的饥荒。随后，更多的是那些失去免疫力的病毒感染者，和由于耗尽体内积蓄而渐渐凋敝的老人。人们已经习惯了看到死亡，对死亡也已经不再恐惧。我们这些人自己也正在死去，也许我们已经死去，只是还没有得到承认。”

另一位难友在回忆录中写道：“凡是1960年在兴凯湖农场劳改过的犯人都知道，这一年是最难熬的一年。尤其是春播，在整个春播的四十多天里，大雨小雨总下个不停，没有几个好天气。为了抢播，每个犯人发了一块大约一平方米左右的塑料布披在身上，顶着雨水平地、播种。又冷又饿，早上三点多钟到地里，晚上八点多钟才回来。在收工的路上，有些体弱的犯人走着走着就倒下了，带工的干部命令几个身体好点的犯人轮换着连拖带背的把倒下去的犯人弄回去，不久就死了，有的甚至就死在路上。其实这些人并没有什么大病，只不过是像一盏油灯一样，油都熬干了。有些犯人夜里就死在监舍的土炕上，有个罪名是‘历反’的犯人，还不到四十岁，个子很高，瘦得像高粱秆似的，有一天晚上收工回来他饿得昏倒在路上，带工队长叫几个体力好一点的犯人连架带拖将他弄回了监舍去。他正好挨着我睡觉，半夜我起来解手，发现他死了，告诉值夜班的犯人，值夜班的犯人又报告了值班队长，值班队长说：‘死了就死了呗！半夜三更往哪里弄？等天亮再说。’吓得我和另外挨他睡觉的犯人后半夜根本没有睡着觉。天一亮，叫两个犯人抬出去挖个坑埋了拉倒。开始我还有点害怕，这种事情发生的多了，习惯了，也就不怕了。”

第三位难友在回忆录中写道：“在1960年冬天的一个晚上，寒流又一次经过这里，第二天清晨，我隔壁的房里没有人出来打早饭，到中午时才发现，房里的十五位难友安安静静地睡在各自的床上，再也没有醒来。面对此情此景，杰克·伦敦能不能激发出灵感再构思一个人与自然殊死搏斗的故事呢？

乔治·奥威尔能不能在他那漫画式的小说中添增新的一页呢？不！让文学家们见鬼去吧！这里不需要激情与伤感！也不需要分析与综合！事情是最最平常、最最简单的：日历又翻过了一页，又有十五个人民的敌人悄悄地越过了比纸还薄的生与死的分界面，被动地进入了‘自绝于人民’的队伍。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还有一位当医生的难友在回忆录中写道：“……垂危的往医院送……绝大部分是从劳改、劳教农场送来的劳改、劳教犯人。他们一点活动能力也没有了，由送来的人把他们抬到病床上。这些人来了以后，当天或第二天就死去，有的拖了几天，最终还是结束了生命。”

在那些日子里，我对周围的人一个个死去也经历了一个大同小异的“适应”过程，我自己也长时间徘徊在生与死的分界面上，但不管怎么说，我还是侥幸活过来了。

除了挨饿以外，高墙下的生活还有其他的苦难。但是，苦难决不是我的劳改生涯的全部，下面我要说的是我这一段经历的另一个侧面。

阶下囚的自学

记得在湘乡一中上学时，一位语文老师对我们说起过他“坐西牢”的往事，其中谈到在西牢中难友们用功学习和难友之间的纯真情谊，我当时非常向往。

后来，我也“坐牢”了，我曾经有十一年在劳改单位接受“劳动教养”，但这里和我想象中的西牢可大不一样。区别之一是，西牢至少是“默许”犯人自学，而这里的管教干部对我们自学却深恶痛绝。按理说，禁止我们这些“教养分子”自学完全没有必要：第一，我们每天从事超负荷的、以折磨人作为主要目的的劳动，还有开不完的斗争会、批判会、帮助会、学习会、生活检讨会，……谁还有精力自学？第二，我们这些人原来是“天之骄子”的大学生，一下沦为“阶下囚”，前途渺茫，度日如年，谁还有心思自学？第三，自学在这里是不受欢迎的，管教干部虎视眈眈，“积极分子”无孔不入，谁还有胆量自学？

然而，人毕竟是各式各样的，偏偏有人每天在十几个小时的劳动之余，还有那么一点点精力；偏偏有人虽然跌入深渊，却依旧心向天空，希望之星还没有完全熄灭；偏偏有人虽然经过七斗八斗，成了惊弓之鸟，但在自学这件事上，却仍然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在各种不利条件下，抓紧每一分钟自学。我，就是这些人中间的一个。

“管教”我们的干部大多是农民出身，由部队转业来的。我们管他们叫“队长”，队长们总是对知识和知识分子怀着莫名其妙的仇恨。我原来以为这种仇恨源于“农民的狭隘性”，后来我回到故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时才发现，事情并非如此。大多数农民虽然对知识不感兴趣，但并不讨厌知识，他们对知识分子虽然说不上崇敬，但也决不仇恨。队长们能从部队转业到“公安五处”来工作是经过选拔的，“鲜明的阶级感情”当然是选拔的重要条件，而仇恨知识和知识分子正是这种“阶级感情”的表现方式。事实上，队长们在已经来到公安五处工作以后，上级对他们的这种培养与选拔的过程还在继续。有一位队长（我至今还记得他那张善良而又稚气的脸）对我们的自学稍稍宽容一些，不久就被调走了；另一位队长，一天到晚用各种方式折腾我们，使得自学实际上成为不可能的事，他却因此不断受到表扬。从这件事似乎可以看出，在队长们仇恨知识与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背后，还有更深刻的

社会历史原因。

不言而喻，在队长们敌对的目光下进行自学，就得不在乎“表现不好”之类的评语，不在乎“反改造分子”之类的桂冠，也不在乎与如此这般的评语和桂冠相关的各种“待遇”。

至于积极分子们，他们一天到晚想捞稻草以显示自己的靠拢政府，“自学”这种“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当然成了他们取之不尽的稻草堆。你看这位积极分子，狡黠的目光四处打探，时不时拿出小本子写呀写的，你要自学，就得有倒霉的思想准备，他虽然不能枪毙你、不能给你判刑，但对你还是有的是办法，“小人之伎俩，诚可畏也。”

就算你有不顾这一切的大无畏精神，自学还要有“时间”与“书籍”这样两个条件。

在农场干的是农业活，冬季是农闲，“队部”就安排了活儿最重的“土方”工程。其它稍微闲一点的时候，队长们也总能想办法叫你瞎忙乎，千方百计不让你自学。尽管如此，我们这些“反改造分子”总能见缝插针，几分钟、几十分钟、几小时；在节假日，当队长们有所疏忽时，甚至有整天的时间自学。要知道我们在那里整整 11 年，这些零碎时间的总和还是颇为可观的哩！

再说自学的第二个条件：书。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书当然谈不上自学。幸运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我们这些大学生的书还没有完全被没收。大墙内有数不清的恩恩怨怨，我几乎全忘了，但有几个曾借书给我的“同学”却至今难以忘怀。1961 年，我在茶淀农场遇到了北大数学系的孙传仪，他有一本阿克曼著的《数理逻辑基础》，我要借，他面有难色，我写了一张字条给他：“请借我三天，我把其中的公式抄下来就还给你。”他终于答应了，还不止三天。人真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动物，那时我的粮食定量是每月十五斤白薯面，实际上其中的大部分还是代食品，每日有一钱油，其它就是“瓜菜代”了。每日吃这样的东西还要劳动，我已经虚弱不堪，但看到这本书我还是难以抑止兴奋之情，尽管每天收工以后非常疲惫，仍然利用难得的喘息时间抄起书来。当我把书还给孙传仪时，我已在一个小本本上抄下了书的部分内容：几个命题演算和谓词演算的形式体系，层次演算中的一个例子：用狄德金的实数定义证明“上确界定理”。对于数理逻辑，这自然只是沧海一粟，但已够我啃好几年了。

1962 年，右派集中到了北京大兴县团河农场的的一个分场——三余庄。在那里，我遇到北大数学系的杨路，他曾借给我一本数学系用的分析学教程，真使我感激不尽。我把书拆开钉成两本，用刚刚学到的数理逻辑一个一个地证明书中的定理，其乐无穷。

另一个令我难忘的三余庄人是中国人民大学的贺毅，他借给我一套《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我如饥似渴地读了又读，特别是其中的《路易·波拿巴政变记》（现在译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我甚至把其中的许多段落背得滚瓜烂熟。

还有一个我忘不了的难友叫谢自渝，他奇迹般地保存下很多书，其中甚至有整套的《资本论》。真不容易，他全借给了我，我不可能从头到尾通读，但也获益匪浅。

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1969 年冬，由于“战备疏散”，我们三余庄人（那时已经调到茶淀农场）

终于各奔东西。临走时还搞了一次检举揭发运动，揪出了很多“现行反革命”，最后揪出了“赵筠秋、谭天荣、陈海诤反革命小集团”。我像1957年一样，又一次承担了全部责任。当时队部的干部似乎很匆忙，无暇顾及我们，“小集团”一事似乎也就不了了之。但是几十年后我却听说，当时在公安部的内部报纸上曾刊登过这样一则消息：“反革命分子谭天荣已被正法”。不知是误传，还是原来真有此决定，只是后来却不知何故取消了。总之，《资本论》和其他马克思与恩格斯的经典著作把我带进了马克思的科学宫殿，也差一点把我带进了坟墓，但我又一次侥幸活过来了。

“战备疏散”的结果是，我被遣送回湖南老家，在家乡种地，开始“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时我惊喜地发现，农民并没有“队长”们那种对知识和知识分子的仇恨之心。虽然他们也嘲笑我把一年分到的一点少得可怜的钱都买了纸、笔和书，但他们很少干扰我的工作，就是那些公社干部也仅限于劝我“换一个题目吧”（意思是要我搞一点与农业生产有关的课题）！有了这点自由，我就可以踏踏实实地自学了。

现在回想起来，1969至1979在家务农的十年，乃是我一生学习的黄金时期。在“劳动教养”时我更年轻，但那时我没有学习的自由；“落实政策”以后条件更好，但我的年龄又大了一点，脑子不太听使唤了。诚然，这十年我的学习条件也不算好：没有书桌，甚至连放书桌的地方也没有，手头也没有一本书，连最后一个笔记本也在“文化大革命”中“扫四旧”时被没收了。就常情来说，在这样的条件下要研究物理学，无异于唐·吉珂德与风车搏斗，而我却正是一个现代的唐·吉珂德。

1978年，我被摘掉了“右派”帽子。第二年“落实政策”，我终于重返大学。

结束语

从我上述的“右派历程”来看，我原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年轻人，如果说有什么特点的话，也就是遇到问题爱刨根问底，比别人多了一点求知欲，说得难听一点，就是爱胡思乱想，不安分守己；说得好听一点，就是热爱学习，追求真理。像我这样一个人，如果能在学术上纵马驰骋，披荆斩棘，而不是在政治运动中被整得死去活来，对我自己对别人都会好得多。什么时候我们才能迎来这样的环境呢？

谭天荣：

当年我们太年轻了

我们“校园右派”，即大学生和青年教师中的“右派”，是一个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成长起来的一个特殊的群体，我们的优点与缺点，我们的功绩与过失，我们的崛起与沦殁，都刻有这个时代的印记。今天，“反右运动”过去了整整五十年，这个群体中的许多人已经去世，活着的人也进入了耄耋之年，作为这个群体中的一员，我试图从一个特殊的角度，为这个群体作一个盖棺之前的论定。

在“反右运动”中，我们被说成是“野心家”，还说我们“对党有刻骨仇恨”。当年我正在北大，是运动的对象。我不知道那时北大校园里有没有年方弱冠的“野心家”，倒是真有“对党有刻骨仇恨”的人。可据我所知，除了极个别的例外，这些真正仇恨党的人并没有成为右派分子，因为他们在整风运动中“明智”地一言不发，或者说一些言不由衷的套话。反之，我们被划成

右派，被整得死去活来的青年对党并没有仇恨，只有忠诚与热爱。当年对党的忠诚与热爱未必是我们这个群体历史上的闪光点，却是不争的事实，我们“校园右派”，本来就是一群一贯追求革命，追求进步的人。

因为我们一贯追求革命，追求进步，在1957年的整风运动中，我们向党奉上了一颗赤子之心，我们当年所提的意见和要求的正确性和预见性，已经为历史所证实。

然而，也正因为我们一贯追求革命，追求进步，在1957年的整风运动之前，我们曾经犯过一些错误。今天，我们不想回避这一问题，相反，对于我们祖国所经历的无尽劫难，我们将勇敢地承担自己本该承担的一份责任，但也理直气壮地拒绝把不该我们负责的罪过硬扣在我们的头上。

在“校园右派”中，大多数人在上大学之前只是在校的中学生。诚然，他们中的许多人“曾为‘镇压反革命’摇旗呐喊；曾为‘社会主义改造的新成就’欢呼雀跃。”这种“条件反射”式的反应一向被认为是“朴素的阶级感情”的表现！被认为是对阶级敌人的蛊惑“一尘不染”！正是“反右运动”让这些“一尘不染”的孩子们领会了他们的“朴素的阶级感情”的真正含义：每当这样一个孩子被扣上“右派分子”的帽子时，周围的同学立刻为“反右运动进一步深入”而摇旗呐喊，为“又揪出一个”而欢呼雀跃。只有在这个时候，这个孩子才意识到自己过去多么幼稚无知，多么麻木不仁。尽管如此，过去的他也仅仅是幼稚无知、麻木不仁而已，既没有为灭绝人性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充当过打手，也不曾为灾难性的“社会主义改造”推波助澜。如果谴责他是“对专制合法性认同的奴才”，那就太不知分寸了。

在“校园右派”中，绝大多数人曾经在“抗美援朝”运动中争先恐后地为“保家卫国”而报名参军，其中的佼佼者曾经“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他们没有在战场上倒在“联合国军”的枪口下，却在回国后中了“阳谋”的子弹，从“最可爱的人”一夜之间变成“不可接触的贱民”，甚至有人到了生命的最后一息还带着“右派分子”的帽子。今天我们已经知道，朝鲜战争是金日成的士兵开的第一枪，把这场战争理解为“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是说不过去的。从根本上说，朝鲜战争是一场“两大阵营”争霸的战争，对双方来说都不能说是正义的。不幸的是，我们中国人却为这场战争付出了骇人听闻的代价。对于过来人，当年的朝鲜战争实在是自己心路历程上的一道伤心岭！尽管如此，我们并不认为当年的志愿军战士们本人有什么过失。如果有人谴责当年他们抛头颅洒热血的行为是“助纣为虐”，反过来颂扬当年拒绝参军、或参军以后当逃兵的行为“有先见之明”，那就是混淆是非、颠倒黑白了。

在“校园右派”中，有些人在上大学之前曾经积极参加当年的各种运动，例如林昭就曾经参加过土改运动。诚然，当年的土改运动在完成农村民主改革、消灭封建剥削的名义下，有太多的负面效应：土改运动用暴力“消灭地主”使我国的传统文化遭到毁灭性的打击，还使大批地主的儿女失学几乎造成中学生的“断代”；土改运动“打击富农”破坏了农村主要的生产力，至今还未能恢复；更糟糕的是，从深远的社会效果来看，土改运动没有为消灭阶级消灭剥削创造条件，却为“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浩劫奠定基础。

当年，林昭投身土改运动日以继夜地工作，并为之献出了自己的青春与健康。她那时还那么年轻，看不到土改运动的全貌，更不可能知道其深远的后果。但她恰好是因为在土改运动中看到了一些新社会的阴暗面，觉察到“组

织性和良心的矛盾”，从而孕育了后来的惊天地泣鬼神的“普罗米修斯精神”。因此，我们决不认为参加土改是林昭短促而光辉的生命中的一个污点。如果有人因此而谴责林昭是“自上贼船，为虎作伥”，那只能是别有用心。

在1957年整风运动之前，正如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中的卡拉说的：“我们太年轻了……！”我们“校园右派”在这一时期所犯的各种错误都是由于年轻人的轻信。马克思曾经说“轻信”是最能原谅的缺点，可对于我们，这一缺点却给我们带来一个接一个的灾难。

生活太复杂了，动机与效果的关系更是颠三倒四，追究我们“校园右派”在这一时期的行为的历史责任将是一个历史学与伦理学的难题。但相对说来，通过我们在这时期的行为来透视我们的道德品质却容易得多。人们的行为的社会效果会随着阶级斗争的形势的改变而改变；但人们的行为所表现的个人秉性方面的特征：是正派还是邪恶，是坚强还是懦弱，是与人为善还是“与人斗争，其乐无穷”，是为理想献身还是损人利己……却不会随着他们的行为的社会效果的改变而改变。我们并不否认阶级斗争在人类历史中的重要作用，但我们始终相信，在阶级斗争的腥风血雨的上空，还有永恒的人性的晴空。

像人们常说的那样，我们是“在红旗下长大的”。尽管“红旗下”的“江山”灰暗而又血腥，但我们的前辈当年在“打江山”的过程中，却接受过人类先进思想的指导，有过自我牺牲的英雄行为。在共和国初建的那些日子里，我们幸运地得以在他们的先进思想和英雄行为的余温下成长，生活在一种进取、独立思考而又互助互爱的精神环境之中。想起那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我们至今还感到甜丝丝的。诚然，这种精神环境使我们长期带着玫瑰色的眼镜看待新中国的现实，但它也造就了我们“五十年代”的一代人的特殊素质。

与后来的“学习雷锋”的积极分子迥然不同，我们“五十年代”的一代人的行为方式立足于理想主义而不是立足于愚昧，我们相信“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全靠自己救自己”，不需要某一“人民的大救星”每日每时的教导以及无所不在的庇护。我们的理想社会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而不是由一些“小螺丝钉”和其他组件铰接成的一架机器。我们能够分辨“牛虻”“保尔·柯察金”式的忘我精神与“草原英雄小姐妹”的“亡命护羊”以及欧阳海的“舍身救马”的“忘我精神”之间的区别。我们的座右铭是“献身于人类最壮丽的事业”，而不是“生命诚可贵，马羊价更高”！？

“五十年代”的一代人的这种特殊素质在我们“校园右派”中得到最充分的表现：当年，我们因“响应党的号召”而中了“阳谋”的诡计，虽经九死一生却仍然历劫不悔。今天，我们在各种工作岗位上任劳任怨，从不计较报酬；我们在任何条件下都忠于职守，决不偷奸取巧；我们珍爱自己，在最严酷的环境下也保持人的尊严；我们相互信任，至今还像兄弟姐妹般相互关怀爱护，与周围其他的人也和睦相处。即使当年在“高墙”之内，我们的劳动还是那么出色，我们的“难友”之间的友情还是那么纯真，甚至使得一同“改造”的“小流氓”们都深为感动。

我并不认为，“校园右派”一个个都是无私无畏的典范，但作为一个群体，我们却是一个非凡的时代留下的非凡的瑰宝。

林希翎：原名程海果，1935年生，浙江温岭人。1949年夏在杭州上中学时，入伍中共军队。五十年代初到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习。在此

期间，她从当时文坛“热点人物”林默涵、李希凡和蓝翎三人姓名中各取一字，合成“林希翎”三字，为笔名。偶尔发表点短文，崭露头角。

1957年毛泽东号召“大鸣大放”，她在本校和北大，发表了七次“惊世骇俗”的演说，一度被誉为“勇敢的化身”、“带刺的玫瑰”。在随之而来的反右运动中，她成了“反党急先锋”和“带着天使面具的魔鬼”等等。被毛泽东认定为“学生右派首领”。

林希翎鸣放最初是在北大广场。人大和北大相距不远，她是晚饭后散步到北大，见到广场辩论，才“路见不平”、发表了自己的意见的。且看林希翎在北大的两次发言(根据记录整理)：

1957年5月23日第一次发言：

我今天很激动，到北大吸到了新鲜空气，而人大是教条主义的老窝，官僚气太重，还是北大有民主传统，继承了五四的传统。胡风是不是反革命？这个问题还不能肯定，现在下此结论，未免过早。我过去也写过文章批判胡风，现在想起来真是幼稚，很可耻。现在看来加给他反革命罪名的根据是很荒谬的。胡风是对中央递意见书，怎能说这个意见书就是反革命的纲领呢？为什么向党中央提意见就是反革命呢？这是斯大林主义的方法。胡风意见书基本上是正确的，例如，他批评庸俗社会学，要动摇机械论的统治，庸俗社会学、机械论就是教条主义，他反对公式化概念化，现在的文艺作品就是公式化概念化。文艺是反映生活的，现在的生活是公式化概念化的，机械的单调的。他反对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主席说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这个讲话是抗日时期发表的，现在情况变了，知识分子也成工农兵了，不适用了。毛主席的话又不是金科玉律，为什么不能反对呢？胡风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有不同的意见，现在百家争鸣，很多人不是也有不同的意见吗？刘绍棠就发表了一篇文章，不赞成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胡风反对宗派主义，党内是有宗派主义的，胡风触犯了文艺界的首长周扬、何其芳，所以才整他。胡风分子中有个别人有历史问题，但并不都是反革命分子，例如谢韬就是个很好的教员，很早就搞革命运动，从三批材料来看，不能说他是反革命。胡风的纲领若在今天提出来，就不会说他是反革命，若是鲁迅提出来，就更不是反革命了。说他们通信秘密，哪个人的信不是秘密的呢？说他们私人间的友谊是小集团，这就使得人相互不敢说真话，难怪有人说共产党六亲不认了！

按照法律只有企图推翻政权的才能叫反革命分子，而胡风显然不是这样的。今年4月，最高检察院谭副检察长到人民大学作报告时，有人问他胡风问题怎样了，他说：现在侦察工作已经结束，但胡风很不虚心不接受意见！同志们，这说明什么呢？两年还想不公布胡风案件的下文，我看共产党是有些为难，没法下台，错了也不肯认错，估计毛主席可能有两种心情：①明知错了，不承认，②毛主席自己明白了，但高级干部中很多人还不通，现在若对胡风平反，是有困难的。

从赫鲁晓夫二十大上的秘密报告中可以看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是这样被逼上梁山的。我们知道列宁在的时候，季诺维也夫曾出卖过情报，而列宁仍给他工作。在革命胜利到斯大林消灭了他们的肉体，这是斯大林的专横。赫鲁晓夫否认美国国务院发表的关于斯大林问题的秘密报告，说是美国间谍机关制造的，这很笨，真是撒下了弥天大谎。如果说是间谍搞的，那这间谍就是赫鲁晓夫自己！

《斯大林时代》一书出版了，这本书很好，斯特朗是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他对苏联的情况很了解，但这本书只有十一级以上的干部才能看。苏联说这本书是反动的，文汇报登出来后，苏联还质问我，这不是苏联干涉我国内政吗？我国也是肃反扩大化，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我们的法制是不健全的。例如南京肃反时，一个晚上把逮捕证发给各单位一下子就逮捕了二千多人。连某礼堂都住满了犯人，后来又都放了出来。我曾经在区法院实习过，最近人民代表要去检查肃反工作，毛主席下了一道命令，要检查过去所有的案件，现在从法院、检察院到公安局都忙着修改案卷，起诉书错了的修改，没有理由的补上理由，但是这还叫什么检查呢？

我有很多问题同意南斯拉夫的看法，铁托演说中很多是好的。我就认为个人崇拜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产物。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所有社会现象都有社会历史根源，斯大林问题绝不是斯大林个人的问题，斯大林问题只会发生在苏联这种国家，因苏联过去是封建的帝国主义国家，中国也是一样，没有资产阶级的民主传统。

我觉得公有制比私有制好，但我认为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如果是的话，也是非典型的社会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应该是很民主的，但我们这里是不民主的，我管这个社会叫做在封建基础上产生的社会主义，是非典型的社会主义，我们要为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而斗争！现在共产党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很严重，我们不要以为共产党用整风的办法，采取改良主义的办法，向人民让点步就够了，我知道有很多人愿意听我的话，但也有些人害怕我的讲话，我要讲下去。我经过研究，认为历史上所有的统治阶级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的民主都有局限性，共产党的民主也有局限性，在革命大风暴中和人民在一起，当革命胜利了就要镇压人民，采取愚民的政策，这是最笨的办法。现在他们封锁新闻，例如北大如此轰轰烈烈，为什么报纸就不报道！人民群众不是阿斗，真正要解决问题只有靠历史创造者人民群众行动起来。我们是正直的人，正直的人到处都有？不仅北大，还有南京大学、武汉大学、西北大学：各地大都联合起来，匈牙利人民的血没有白流：我们今天争到这一点小小的民主，是和他们分不开的！我不害怕，大家不欢迎我，我就滚蛋，我既然到这里来，就是冒着危险，坐牢也没关系。听说现在有风声要收了，想封住人民的嘴吧，这是最愚蠢的。北大是放了，高级知识分子是放了，但广大基层还没有放，现在揭发的远不及实际生活中的1%，因为这些教授都是老头，很世故，我们青年长个脑袋是干什么的呢？难道是让人家牵着鼻子走的吗？我们要说话！北大是放了，但我还不大乐观，因为还有很多卫道者，他们想把先烈用鲜血换来的社会主义成果，作为他们向上爬的台阶。

同学们，我们说话要警惕，不要让他们钻了我们的空子。我们今天的斗争不限于发发牢骚，对一切缺点不能用改良主义的办法！我们要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让每个人过真正的人一样的生活。

5月27日在北大作第二次发言。

她首先声明：

上次的发言是在冒失和激动的情况下谈的，都是胡说八道。但对全部发言完全负责。上次会场秩序很不好，这一点北大没有人大好，人大同学的组织性、纪律性很强。今天要求你们耐心听我讲完，即使我是反革命，也请等我讲完了再到法院告我去。接着她谈了以下几个问题：（一）制度问题：关于

个人崇拜问题，我同意铁托同志的意见，个人崇拜与社会制度有关（不是指公有制和私有制的制度，而是指具体的制度），如庞大的官僚机构，产生了官僚主义分子。现在党也在精简机构，我衷心地拥护。再如，特权分子产生的原因也与一些不合理的制度有关，如看文件，要按级别，党团员也是一种特权，能够留学，参加游园。因此，要克服错误，就要从根本上改革这一切制度，上次谈到不要改良主义，也就是这个意思。（二）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它反映了上层建筑与基础的矛盾，也即意识形态不能适应公有制基础的矛盾。如“三害”即与政治制度有关，与公有制不相容。这个矛盾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原因是意识落后于存在。人民内部矛盾在我国表现为领导与被领导的矛盾，这个矛盾目前是非对抗性的，发展下去可能会转化为对抗性的。现在已有局部表现为对抗性，如某些地区的罢工、罢课等，我在东北、玉门曾经看到过这些现象。（三）上次我谈到各个统治阶级都有共同性、局限性，这在哲学上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如马克思说：“法律是反映统治阶级的意志的”，这在各个社会形态里都是适应的。在阶级差别消灭以前，各个统治阶级都有它的局限性，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矛盾是對抗性的，在公有制社会里，这种矛盾是可能被认识的，也可能被克服的。今天的整风就是克服这种矛盾的方式，如果不除“三害”，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四）“三害”的哲学基础是黑格尔灵魂的复活。现在在大学里讲课提到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时，总是说这是最好的社会。这个“最”字，本身就是形而上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我看只是一个社会阶段，因此他们的“最”字，就是以形而上学代替了辩证法。在现实生活中，许多人只歌颂正面，而对阴暗的一面避而不谈。如动员上海工人到西北参加建设，只谈西北如何美好，结果工人去了不是那么回事，就罢工。我对现实生活是不满的，即使是五百年后出世的话，我也会不满。如果对现实满意的话，如何推动社会向前发展？人们对现实不满是正常的，应该鼓励人们对现实不满。我认为公有制比私有制进了一步，问题是使公有制再前进一步，有人提出了定息20年，我坚决不同意，我赞成马上取消定息。（五）一个政党也好、一个人也好，进步的标准是能不能正确地反映社会发展的要求，能不能推动社会进步。不能的话，就是反动。斯大林在后期阻碍社会发展，因此是反动的。他杀了那么多人，如果不是斯大林的错误，二次大战不一定起来。不是斯大林的错误，赫鲁晓夫领导的十万人也不会全死掉。（六）整风问题，（1）主要的危害，是不敢大放大鸣。我前次曾经说过80%的高级干部不同意百花齐放，这不是没有根据的，这是毛主席自己说的。至于高级干部退出会场，是指民革主持的会场上有高干参加，后来退出了会场。上次我说中央在收，这话说错了。但确有人在喊收，北大写了那么多大字报，新华社的“内部参考”登着，许多干部说北大不得了。这是他们神经衰弱。（2）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对斯大林和毛主席的评价。斯大林的后半期是反动的。毛主席可贵的一点在于他有辩证法的思想，善于发现错误，改正错误，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但并非他没有犯过错误。个人崇拜在中国也有，但毛主席很清醒，如他去年6月横渡长江，当时不让报道，可见他是谦虚的。主席写几首诗给诗刊，创刊词上有人评价，说主席不仅是伟大的政治家，也是伟大的诗人。我看主席看了会很生气，这话多么肉麻。有人说主席写的字最好，我看不见得。（3）胡风问题。我说胡风不是反革命，人大已给我戴上反革命的帽子了，宣布我是反革命，晚上到公园都有人监视我。胡风是不是反革命，从法律观点来看，

谁也不能肯定，因为现在法院尚未判决。同时，这个案子这样搞也是不合法的。哪有一个案子搞了这么久还不宣判，即使特务案件，也不能二三年不结案。如果将来“诉讼法”公布了就不能这样做了。现在党也感到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我看主席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一点小小的错误。这也不足为奇，是受了斯大林的影响，加上客观上舒芜把他们以前的信发表了，结果就从文艺问题扩大到政治问题。我可以肯定，如果这个问题发生在现在的话，就不会把他当反革命处理。现在对这问题提出怀疑的人很多，要求重新处理的愿望很迫切。我对南斯拉夫问题很感兴趣，我认为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中比较民主的。

在林希翎讲完话以后，有几个北大的教员和学生上台反驳，在他们反驳以后林又接着发言。她说：上次有人揭我的底子，说我就是报上登过的林希翎，和刚才有些人的发言，都说明神经衰弱者的条件反射，到处是反革命。肃反扩大化的问题。我看到有一个公式，就是反个别领导=反组织=反党=反人民，从这个逻辑得出一个反革命的结论。我的讲话付出了不少的代价，说我是反革命，极为卑鄙，我提出抗议！上次我来发言后，就有人在辩论台柱上贴一条子，“林希翎女士来北大一趟，我的水碗不见了。”同志们，那天我走的时候，北大有八个人送我，我并没有偷你的水碗！（掌声）几天来北大学生川流不息地到我家去拜访我，其中有一个同学说，我来向你自首。上次在会上扰乱秩序，破坏你的发言，都是支部书记布置让我做的。

林希翎通“天”入狱

林希翎的问题之所以严重，是因为通了“天”。

开始“鸣放”不久，林希翎的几次演讲和辩论记录，就被“摘编”成“内参”，直送中央领导人。毛泽东看后，马上封林为“学生右派领袖”。刘少奇随之批道：“极右分子，请公安部注意”。

林希翎迅即被“不可置疑”地定为右派。当年11月，为进一步执行“中央指示”，北京公安部门准备好了逮捕林希翎的材料，但是因为运动开始时中央招呼过，右派问题不予法办，顾及社会影响，暂时按兵不动，林才没有马上享受“专政”待遇。当有关报告呈送到伟大领袖那儿时，毛又宽宏大量地批示：“开除学籍，留校监督劳动，当反面教员。”

中央书记处书记兼北京市委书记彭真，亲自传达和宣布了毛的批示和处理决定。周恩来还让人通知林希翎，参加北京各院校五七届毕业生的大会，他在讲话中提到林时，只说她在鸣放中“犯了错误”。林本人又感到了“党的温暖”。人们以为，对林的处理也就到此为止了。

哪知1958年有关方面又接到人民大学的报告（此时人民大学由该校党委第一书记、副校长聂真主持反右工作），说林“从不低头认罪，坚持反动立场”，甚至“公开抗拒劳动”还制造了一个纯属捏造的所谓“殴打监督她的学生宋津生”的口实，……反动气焰极为嚣张”。

当年，刘少奇在中山公园的“七一”晚会上跳舞时，见到人民大学的学生，说起林希翎的上述表现，刘顺便关照道：“那你们应当对她加强监督嘛！”。

这一新指示马上被贯彻执行了。早就“注意”着林希翎的副总理兼公安部长罗瑞卿，亲自来到人民大学，在人大党委会上说：“林希翎这样的大右派，在人大是改造不好的，还是交给我吧，我有办法对她强制改造。”于是，林希翎就从留校劳动，改为由专政机关“加强监督”。

为了做得“合理合法”，使社会上“没话说”，公安机关先借口林希翎

“殴打学生”事件，于1958年7月21日深夜，将她秘密抓捕，开始宣布对她只是拘留五天，又以“态度不好”再关十五天，在这二十天中，公安机关在人大党委的配合下，迅速搜集、编造林希翎的罪行材料，以“反革命罪”将她正式逮捕，接着由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她进行“审判”，她就由学生右派“突击提升”为反革命分子。随后判处十五年徒刑，而且把她的老母亲抓来开万人大会批斗毒打。林希翎被投入北京草岚子监狱，因拒不认罪，上脚镣手铐达半年之久[1]。

请看1959年8月《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59）中刑反字第451号，

“1956年因中国青年报发表《灵魂处长着脓疮》一文，对被告进行了批评之后，被告即借此展开活动，书写所谓《一个青年公民的控诉书》，印了200份在全国各地广为散发，文中以捏造事实，歪曲真相等手段对学校的党组织进行恶毒的污蔑与攻击，因而使党和国家在政治上受到很大损失，在社会上已造成了很大的反动影响。”（笔者注：印了区区200份，竟然能在全各地广为散发？还能使党和国家在政治上受到很大损失，在社会上造成了很大的反动影响。《人民日报》每天都印刷数百万份，从繁华都市发到穷乡僻壤。莫非抵挡不住一个22岁女学生的“进攻”。这是什么原因呢？）

“1957年当我党整风运动开始后，被告以为时机已到，即积极进行活动，于同年5月23日在北京大学公开作反动演讲二次，继而又在人民大学的多次辩论会上散布大量的反动言论，主要的是：污蔑‘苏联和我国均不是社会主义制度’，人民民主专政有‘阴暗的一面’，‘三害与现存制度有关’，辱骂我党‘镇压人民，对人民采取愚民政策’，污蔑我党说‘党内有一大批混蛋’，并污蔑说‘人民内部矛盾，领导与被领导的矛盾是统治与被统治之间的矛盾’，‘人民代表大会贯彻民主是瞪眼说瞎话，民主党派是点缀’，我国‘没有法律，法律是形式主义’，公然为反革命分子胡风辩护说：‘证明胡风集团是反革命的材料是苍白无力和荒谬的’，此外，还对我国的各项政策法规及历次的政治运动进行攻击与诽谤，还大肆谩骂党和国家的领袖。公开号召反动分子大胆向党进攻，公然煽动说：‘各地大学联合起来，匈牙利人民的血没有白流，我们今天争取到小小民主是和他们分不开的’，叫嚣‘要行动起来’，进行所谓‘彻底革命’，号召和煽动反动分子进行反革命活动。”

据此，林希翎被判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林希翎开始关在北京草岚子监狱，“一号命令”发布后，被解送到她的原籍浙江省的蒋堂劳改农场。

1973年春，毛泽东在一次接见外宾后忽然心血来潮，问当时的北京市委书记吴德说：那个林希翎，现在在哪里工作？她好不好？浙江省委闻讯，着即释放了反革命犯林希翎。她被分配到位于偏僻山区的金华武义县农机厂，当了一个每月工资35元的工人。县委书记王登林悄悄告诉她，所以能提前出狱并安排工作，是毛主席的最高指示，让她永远感谢老人家给予她的关怀与温暖。

1975年底，林希翎听说邓小平重新主持中央工作并且开始全面整顿，感到自己和国家都有了希望，为改善处境，她赴京上访去找“邓大人”。邓大人没见到却引来了灾星。1976年1月9日深夜，一群警察闯进她临时借住的地方，把她押送到海淀区看守所，关了两昼夜，再押解出京，交原地地革命

组织严加看管，认真审查。她立刻成了当地“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活靶子”和“阶级斗争新动向”的“活教材”，她经受了一场场批斗、审讯和毒打。被迫交代怎样和北京的“反革命及其黑后台”合谋，“破坏文化大革命、颠覆无产阶级专政”。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她刚想和全民一样为之欢庆，却突然被揪了出来。1977年初的一个深夜，她正生病，丈夫上夜班不在家，不久前揪斗她的造反战士们，在一位党支部副书记的指挥下，砸开门冲了进来，先对她来了一顿狠揍，又在幼子的号哭和老母的哀求声中，将她嘴里塞上毛巾，五花大绑，脖子挂上写有“大右派，反革命”的大黑牌子，拉出去站在一条板凳上，接受批斗。几个月前斗她时，说邓小平是她的“黑后台”，这次她的后台又成了“四人帮”！

1979年3月，林希翎再次赴京申诉，人民大学党委断然拒绝为她改正，并重新认定她的各项“罪行”。北京市人民法院“决定驳回申诉，仍维持原判。”至此，她的这次赴京申诉完全失败。

无路可退的林希翎，决定直接上书邓小平。信中写道：“在这种非常的情况下，我才不得不给您写信，请求您委派思想解放、正直无私的清官来全面复查我的冤案，听取我的申诉和意见，根据党的政策和国家的法律对我做出实事求是和公正的结论，我和我的家属亲人以及所有被株连者都将不胜感激。信发出后，毫无下文。可怜的林希翎竟然忘记了反右的操刀手就是邓小平。

林希翎的生父程品偕是民国政府税务部门的一个小职员，1947年就离开了大陆，一度不知下落。1962年他忽然从香港给林母原籍来了信，重新有了联系。但得知女儿是“大右派”和“反革命”，不敢造次回国探望。八十年代，林父一再表示希望他们出去团聚。思夫心切的母亲林静枝就和林希翎不断申请去港探亲。但是当地掌管出入境大权的公安机关只准许林母出境却严禁林希翎出境。直到1983年5月，林希翎愤而上书：《我的大声疾呼——致中央党政领导的一封信》，一个月后，她终于获准经广州奔赴香港。在到达深圳当天，林希翎就随着出境人群，跨过了罗湖桥中心线。那轻轻一步，不仅跨进了另一个“世界”，也跨越了一个“时代”。

1983年10月，应法国一家学术团体的邀请去了法国，她从此在法国定居，靠救济金维持生活。

2009年9月21日，林希翎病逝于法国巴黎。

她的部分遗骸骨灰埋葬在浙江温岭，林希翎的墓前有一块碑，上面镌刻着她生前说过的一段话：我在中国看到的是一种愚昧的幸福，很少有所说的智慧痛苦了，可惜我至死不会愚昧。我恐怕与任何当权者都难以合作，是一个永远的批判者。幸运的是，在民间我有大批朋友，志同道合者。感谢上帝，在我九死一生之际，总会派出天使，将我带出死亡的幽谷。我也无怨无悔，将身上的十字架背负到生命……

林希翎的感染力

反右运动开始后，共党元老吴玉章曾表示：对一个年轻的学生不宜公开批判；林被戴上“右派帽子”后，吴老曾让外孙蓝其邦代他去看望过林希翎，后来又派人把她叫到自己养病的地方，反复开导告诫她。使得一批反右骨干们对吴老很不满。碍于吴玉章的地位和声望，左派干将奈何他不得，就以支持帮助过林希翎为由，将在人大学习的蓝其邦打成右派。

原任内务部长，1957年又成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谢觉哉，反右以前就了解到林希翎对我国法制问题有一些看法，让秘书吉世霖写信，鼓励她好好学习，以后又让吉秘书继续与她联系。林希翎被打成右派后，吉秘书的信就成了与右派来往的“罪证”，结果也当了右派，被开除党籍，发配回乡当农民，弄得老婆离婚，老母上了吊！谢觉哉身为最高法院院长，但根本“救”不了林希翎，只能利用视察监狱的机会，从小窗口悄悄看她一眼，又嘱咐监狱负责人对包括林希翎在内的全体人犯，都应给予人道主义待遇。

林希翎1956年写批评苏联《共产党人》杂志的论文和反驳别人对她的批评前后，曾去中南海“上访”，试图向毛泽东等最高领导人反映情况。接待她的中办干部王文表示一定负责地把问题转达上去。也许王文在汇报时表露了自己的态度，竟也因此被划成了右派，丢了党籍，下放农村教书度日。妻子被株连，一气之下自杀，子女被迫上山下乡，其中一个想不开，走了母亲之路！

林希翎的同学魏式昭，志愿军转业，支部派她“帮助”林希翎，她在生活上帮助了林，被认为“失去立场”，当了“保姆”，也被划为右派。由她引起，丈夫、弟弟和一些部队战友，接二连三地都被打成了右派，虽然这些人根本不认识林希翎。

同林希翎有过交往的同乡洪禹平，在幻灯制片厂从事文学编辑工作，1957年，他已经调回家乡浙江，从未参与也完全不知道林希翎在鸣放中的事，但因与林有老关系，不仅把他本人，还连带他的哥哥、姐姐都划成了右派。

此外，从本校同学到外校师生，以及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文艺报和人民文学等的编辑记者和作家们，还有与她素不相识的读者，凡曾经支持或赞同，甚至仅仅同情或接触过林希翎的人，很多都被划为右派。

她在服刑期间，女护士张风云对她十分同情，林希翎便请她代发一封托郭沫若转交毛泽东的信（因郭曾赞扬林为“才女”）。哪知这位郭老把信批转到北京市公安局。市局立刻将张风云拘押审问，并开除其团籍、公职，还关了一年监狱。右派摘帽改正时，她和全家到处上访，请求落实政策，得到的答复是：“林希翎没有改正和平反，张风云也绝对不能平反。”成了“终生右派”的“陪葬”。

至于林希翎一家人，更是在劫难逃，无一幸免。母亲丢了工作，又作为反革命家属和全家“充军”到宁夏农场，几乎饿死在那儿；一个妹妹在当地生根落户，一直留在宁夏；另几个弟弟妹妹也都背着她的“黑锅”，有的在农村当木工，有的上不了学，很小就当农村的“贱民”。

林希翎说：“单单在北京，因我被打成右派的就有一百七十多人，在全国各地更是不计其数。”

五十年后再看林希翎事件

2008年，爱思想网站(<http://www.aisixiang.com>)登载了浙江大学教授张允若先生所著《读林希翎当年在北大的演说词》一文。笔者读后受益颇丰，现择要摘录，与读者共赏：

从两次演说来看，林希翎当年确有点年少气盛、锋芒毕露，但是她那种关心国事、敢想敢说的精神是可贵的。她的那些话是对现存社会秩序的大胆的挑战，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被视为离经叛道、犯上作乱这是必然的。但是，时光流过了半个多世纪以后，我们重新来审视一下，这一切真是“极端

反动”的“反革命言论”吗？就因为这些言词，她就该永远作为“反面教员”定格在共和国的历史上吗？其实，作为一种政治现象，所谓“右”和“左”、反动和进步，决不应该以是否符合某个人或某个集团的主张为标准的，它是要以历史的发展作为坐标来衡量的。凡是符合历史发展潮流、趋势和方向的，便是“左”的、进步的，凡是不符合历史潮流、趋势，甚至逆历史发展的方向而动的，便是“右”的、保守的甚至反动的。那末，林希翎的言论是违背、还是符合历史发展潮流和方向的呢？我们不妨作点具体分析。

首先，关于胡风问题，这是她演说时集中谈论的问题。1955年，以批判胡风给党中央的意见书为由头，文艺界开展了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随后，《人民日报》分三次发表了胡风和他的友人之间的信件，毛泽东亲自评点，总称为“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不久汇集成书，毛泽东又亲自作序，对事件作了十分严厉的结论。这件事牵涉面不小，在知识界影响极为广泛、反响极为强烈。事隔二十多年后，中共中央才对这个案件，进行了重新审理，1980年对胡风本人进行了平反，以后又对相关人员一一甄别，对整个“反革命集团案”作了彻底否定，强加于人的种种罪名被一一推倒。历史发展已经证明，林希翎等人当年对此案的质疑是完全正确的，而且正是一种政治敏锐性的表现。可惜的是这种质疑马上被一棍子打死，可惜的是胡风这桩冤案迁延数十年才得以昭雪，几十年间因涉足这个雷区而派生的新冤案也就难以计数。

其次，她所批评的肃反扩大化问题，是当时“鸣放”中的热点之一。根据当时官方公布的材料，在1955-1956年开展的肃反运动中，各行各业中作为嫌疑对象立案审查的人员有140多万（全国知识分子总数才500万），最后定案为反革命的81000名（不到立案数的6%），其中绝大部分是“历史反革命”，够得上称为“现行反革命”的为3800名（不到立案数的0.03%）。在运动中，对于立案对象不仅化费大量人力内查外调，而且大会小会批斗，逼迫交代，不少人被隔离软禁，甚至逮捕关押，实在查不出罪证时才予以释放。肃反运动在高等学校也搞得十分激烈，群众意见很大，这都是客观存在的问题。笔者当时刚参加工作，也目睹运动的种种景象，一位比我年长的室友因不堪逼迫，悬梁自尽，后来什么也没查出来，就此不了了之。所以林希翎以及她的同伴们对肃反扩大化的批评显然是有的放矢的。林希翎演讲中提到的整人逻辑，即“反领导→反组织→反党→反人民”公式，这也不是新鲜事，因为这不仅存在于肃反运动，实际上是历次运动中的铁定规则，就在她发言之后不久开展的“反右”运动，更把这一铁定规则推上了新的高峰。许多人就是因为批评了领导、甚至只是批评了基层组织的个别领导，就被视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当时有个十分流行的、强词夺理的说法：党的领导是具体的、是通过一个个具体的组织具体的人来实现的，所以谁要是反对（批评往往就等于反对）这些具体的组织、具体的人，实质上就是反对党的领导。谁要是一面表示拥护党的领导，一面又反对（批评往往就等于反对）这些具体的领导者，那就是“抽象肯定、具体否定”，而这又是“反动派的惯用伎俩”。这种逻辑甚至进一步延伸扩展，在有些地方，谁要是反对某个党员甚至某个“党外积极分子”，就被视为“反党”，而“反党”就等于“反社会主义”、“反人民”、“反革命”，不少人就是这样被扣上“右派”、“反动派”的帽子的。这就是今天的年轻人不太懂得的“上纲上线”，这种“上纲上线”的逻辑，今天看来当然是十分荒谬的。

第三，关于当时社会政治制度存在的缺陷和问题，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已为党内外许多人所认识，有些还写进了党的决议、见诸于胡耀邦、邓小平等党的领导人的言论中。其中包括反对个人崇拜问题、发展党和国家的民主问题、健全法制和建设法治国家的问题、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问题、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等等。当年林希翎等人从实际生活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争论中，已经敏锐地觉察到这方面的问题，并且勇敢地加以指出、要求重视和解决，可谓切中时弊，见人所未曾见、言人所未敢言。尽管由于客观条件的局限，这方面的观点表述得还不够完善，但基本精神无疑是正确的，如果这些见解当时能得到认真的考虑，哪怕只是进入主政者考虑的视野、只是允许进入民间讨论的平台，那也会对国家发展大有益处。整个国家也许会在较为宽松的讨论中（也就是名副其实的百家争鸣的气氛中），逐步调整航向、完善机制，不至于走那么大的弯路，也不至于发展到“文化大革命”这样不可收拾的地步。

第四，她主张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从根本上解决社会制度的缺陷，这是一种比较激进的态度，也是毛泽东和党的高层最为敏感的态度。因为这很容易被理解为试图推翻共产党的政权，尽管林希翎完全否认这点、并且坚决抗议给她扣反革命的帽子。那末，她究竟是不是从事了颠覆现存政权的活动、触犯了刑律呢？这是要以事实为依据来作判断的，而不是摘取几句话加以上纲上线就能认定的。此其一。其二，事实上，当年 2 月 27 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以“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题所作的讲话（这一讲话在 6 月 19 日发表时作了许多重要的改动），就是在动员群众打消顾虑、进行“鸣放”、以便改进党和国家的领导方式的。这篇讲话就曾说过要对肃反运动进行一次大检查，总结经验，纠正错误，还提出由人大常委会和政协全国委员会主持这件事。在谈到群众闹事时，他还十分明确地表示：“这些闹事者不能说主要是反革命，主要是我们工作中的缺点，我们不会教育，我们不会领导。”

“闹起来就让他闹个够，不要草率收兵。闹够了就不闹了。应该把罢工、罢课、农民打扁担，看作是我们改善工作，教育工人学生的过程。”（这些话在后来发表的文本中全都改了）。领导人既然在号召和动员群众发表意见，甚至提倡要“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为什么人家就不能响应号召、真正行动起来呢？其三，从现代民主的理念来看，通过合法的途径（包括正常的会议、合法的媒介、甚至公众集会游行等方式，而不是非法的密谋活动和煽动暴力），批评甚至抨击现存政权，要求改革现行的体制、方针、政策，这是完全正常的行为。既然执政党正在号召大家发表意见，她运用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利，建议发动和依靠群众来改革体制、克服缺陷，哪能作为治罪的依据呢？

这些便是笔者对五十年前林希翎演说词的一点思考。众所周知，林希翎为这些言词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她的一生受尽磨难，度过了十五年铁窗生涯，失去了全部青春年华，一个敢想敢说才华出众的年轻人，一个本可以为国家和社会作出很大贡献的女子，她的大半生就这样损毁了。八十年代以后，她突破种种阻挠，来到了近代民主思潮的发源地法国，并在那里定居；据说在年逾古稀之后，还曾向最高当局提出“改正右派结论”的要求，可是未能如愿。时耶？命耶？人们只有扼腕长叹而已。

不过，作为一个有良知、有头脑的中国人，总该对民族的历史和历史事件作些理性思考的。如果说五十年代看不清楚的是非，到八十年代就该看得

清楚些了；如果说八十年代看不清楚的是非，到了 21 世纪总该看得清楚些了。如果说，在人类现代化、民主化的潮流，已经磅礴于全世界的今天，还去固守专制主义年代的价值观，把一切民主自由的意识、把一切依法行使公民权利，都视为犯上作乱，这种思想上的僵化，恐怕已非毛泽东批评别人时爱说的“花岗岩脑袋”所能比拟的了。大概属于茅厕坑的石头又臭又硬吧。

这几年来笔者总是在想，如果把 1957 年各路“右派”的种种言论的原件找出来，汇集成册，细细研究，一定会有许多新的发现，而且会对正确地认识共和国的历史、真正地以史为鉴大有裨益。现在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当年在青年学生和知识界出现的决不是什么“右派进攻”，而是一场新的思想解放运动、一场社会主义的民主运动，可是这一运动刚兴起就被官方的“反右”斗争扼杀了。这就更需要对这段历史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把一切颠倒了的是非重新颠倒过来，并且从中吸取思想营养，以推动当前的思想解放。为此就必须排除干扰，解除言禁，解密历史资料，允许自由讨论，允许发表和出版有关论著和史料。对历史研究设置禁区，这决不是对国家民族负责的态度，也决不是唯物主义者应有的态度。

附注：

[1] 中共公安部颁布的《监狱、劳改队管教工作细则》中明文规定：罪犯加戴手铐、脚镣的时间，除经人民法院确定执行死刑等待执行的以外，一般为七天，最长不得超过十五天。实际上，据笔者亲历，在中国的监狱里日夜戴手铐脚镣有十年以上的，文革期间，关押在公安部直属秦城监狱里的刘仁（前中共北京市委副书记、副市长）、崔月犁（彭真的秘书、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北京市政协秘书长）、冯基平（北京市政法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市副市长）、徐子荣（公安部办公厅主任、副部长）均曾戴镣铐长达四年以上。详见本书第八章。

（3）10 万右派学子 没有开花就枯萎

一位资深的学者说：当代中国自陈寅恪、傅斯年之后再无大师。我十分赞同此语。翻阅历史残章，方知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旧中国”，堪称群星灿烂，人才荟萃，大师如云，巨匠溢朝。1999 年，共和国 50 华诞，中央隆重表彰并授予功勋奖章的研制“两弹一星”的 23 位功勋，许多皆师出西南联大叶企孙教授门下，而这位功勋之父、功勋之祖的中国物理奠基人，竟然在“十年文革”中被毛泽东的“红卫兵”活活害死。树都拔了，还能有果吗？

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曾有一句名言：“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此言十分有理。新政前的大学没有党委，是校长、院长说了算，用不着向谁请示汇报，敢作敢当。叶企孙教授在任清华大学物理学院院长时，毫无门户之见，从 1928 年起，他先后聘请熊庆来、吴有训、萨本栋、张子高、周培源、赵忠尧、任之恭、霍秉权、孟昭英、王竹溪等具有真才实学的大师到清华和西南联大任教。吴有训来清华任教时，将吴的工资定得比自己的高。在教学中，他发现吴的工作能力很强，便于 1937 年主动辞去理学院院长职务，推荐吴有训担任，直到后来吴有训调任中央大学当校长，他才再继任西南联大理学院院长。

反之，现今体制之下，大学有这样高风亮节的校长、院长吗？多是争名于朝，抢利于市，庸俗不堪的奴才与工具，哪是办好院校的表率？

体制是当前中国教育不出人才、不出大师的根子，而一元化的党委负责

制又是扼杀人才的屠刀。“一切听从党安排”。教授没有新观念，学生自然没有新思想。没有新观念和新思想的大学，只能出蠢才、庸才、奴才，自无人才可言。如果说 1952 年的院系调整，彻底摧毁了前清至民国一套行之有效的教学运行机制，那么 1957 年的“反右斗争”就是把成就大师的的胚胎、芽子，全部连根拔除，斩尽杀绝了。

北京大学物理系高材生宋林松先生深有体会地说，1950 年新政伊始，国家百废待兴，极需知识分子领军和参与各个领域的建设，毛泽东却把中国知识分子中最活跃、最具创造能力的那部分人打成了右派份子，而且人数超过了知识分子总数的十分之一，这是对中华民族的犯罪。50 年代前期每年都有海外学人归国参加建设，1957 年起一个也不回来了，不愿回来送死了。反右结束，周天寒彻，白茫茫一片！全国的脑袋和思维都不存在了，只有领袖的脖子上长有脑袋。谬种流传，遗毒至今。

没有独立的人格，没有自由的思想，没有批判的精神，怎么能创新？一个社会是个整体，一个人的人生观也是个整体，很难设想，政治上那么禁锢、思想上那么压抑，却能在科学上思考出超越全世界所有人的创新。自此相互仇视和厮杀成为社会主流，爱心荡然无存。传统的人类精神文明，维系社会生活的公认道德准则遭到了空前的破坏。巍巍庙堂，泱泱华夏，“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谗人高张，贤士无名。”暴力把谎言和伪命题当真理来推行。这就是 1957 年后的中国！

由于我是一个深受其害的“贱民”，对毛泽东一手发动的“反右斗争”给国家民族带来的灾难万分地痛心疾首。我认为这场反人性、反民主、反进步、反法治，疯狂残害精英的运动，受伤害最深的不是民主党派、国家机关干部，而是在校的大学生。大学时代本应是人生最为美好、最为珍贵、最为有理想、有追求的年代，根本不懂得阶级斗争的残酷与血腥，以为铺满鲜花的社会主义道路是自由的，却不知万支毒箭和无底的陷阱在等待着他们的到来。在“革命”的名义下，这些莘莘学子一下子就沦落成人间最为低贱的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成为政治祭坛上无辜的羔羊。正如俄国诗人涅克拉索夫的诗句：“还没有开花就枯萎，在一个阴天的早晨”，便不能不黯然神伤。

在那场巨大的民族灾难中，中国名校北京大学抓了 600 多名学生右派；“庚子赔款”开办的清华大学，抓出 500 多个有才华的学生右派；北工、北地、北航也为数不少。笔者所在地的川大、川医、川师、川农四校多达数千人。北师大雷一宁难友所在的中文系，240 多人就有 50 多人被划为右派分子，占了五分之一强。按此推断，当时全国有 80 余万大学生，沦为“贱民”的不少于十万人，这是多么一个庞大数字？

记得，为抗击日寇，在日本侵略者占领贵州独山，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之时，蒋经国先生号召学生参加远征军，提出“十万青年十万军，寸寸山河铁铸成！”而毛泽东却在和平年代把 10 余万大学生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剥夺了他们学习深造的权利，为祖国工作的权利，全成为“专政”对象，失去尊严，失去人格，有的还屈死狱中，飘首刑场……怎不叫人涕泪纵横，怒问苍天：

十万学生十万冤，花季少年哭轩辕；
焉知发奋终身罪，无良肖小庆弹冠。

今天，这些受害者，已经两鬓斑白的学子，仍希望中共改过自新，从根本上摒弃毛泽东的治国理念，回到当年所承诺的民主自由的建国之路上。

七、四川和重庆的几位右派

(1) 董时光

重庆第一个本土右派是董时光先生，我在写回忆录时拟定了要为之作记。为此走访了几位当年在西南师范学院就读的老人，查阅了据云曾与董时光先生在一起劳教的张先痴、陆清福之著作，动笔之际发现了岩石先生2010年5月发表在网上的文章忠于历史简明扼要，比我写的初稿好得多，惜与岩石先生素不相识，也不知道联系地址，未经允许，冒昧的摘录如下：

董时光，四川垫江人，一门三兄弟都是国内外著名学者专家。他居三，1948年大学毕业后去美国西海岸深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爱国青年董时光激情澎湃，他寄望于共产党，期盼祖国从此振兴，经常在学校宣传列宁主义和新中国的巨大发展变化，成为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注意对象，视他为共产主义狂热分子。1955年，已经获得博士学位的董时光被驱离出境。

他和一大批学子取道香港回到北京那天，周恩来亲自到机场迎接，并一一与他们握手交谈。周恩来见着他的第一句话：“董先生，祖国人民欢迎您！我们共产党欢迎您！欢迎您们回来建设社会主义祖国。”

当时几所著名大学力聘，因其兄董时恒是西南师范学院体育系教授，乡情使他选择了西南师范学院。分配到教育系任讲师。

1957年“整风运动”中。院党委多次邀请他帮助党整风给党提意见。他怀着信任共产党的真诚，把美国的教育制度毫无保留地作了介绍，希望借鉴美国一些经验改进教育事业。《重庆日报》又邀请他将发言写成文章，5月29日以一个整版的篇幅并冠以《我与“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的斗争》的标题发表。其主要思想是“教育应由专家学者管，党委不要干预太多。”

而后几天，董时光鸣放的大块文章、讲话，先后在《重庆日报》、《四川日报》多次刊出。在西师，他几次主持民主论坛，每次校内外几千人参加；校内几乎每天都有他写的油印短文，张贴在各主要路口。其时，董时光成了重庆高校中大受师生欢迎的大鸣大放明星，重庆大学、西南政法学院、重庆师专等十多所高校纷纷请他去演讲。董先生西装革履，风度翩翩，妙语连珠，让同学们倾心不已。

仅仅几天时间，风向突变，董时光被定为重庆市第一批“极右”分子，学院斗，报上批，但他坚不认罪认错，说：“我要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不会万里迢迢离开美国回到中国来，美国联邦调查局就不会说我是亲共的危险分子。你们请我提意见，说“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闻者足戒言者无罪”，现在一下子变成有罪了，共产党不是出尔反尔吗？要说我有罪，首先是你有罪！你们西师党委是教唆犯！”

董时光先生义正词严、铿锵有力的抗辩并未逃脱“开除公职，劳动教养”的处理，1958年1月他被押解到了位于深山老林里的沙坪农场。

四川省峨边沙坪劳教农场在凉山彝族自治州峨边县境内，曾暂属乐山市管辖。前有滔滔咆哮的大渡河，后有莽莽苍苍的原始森林，海拔平均2500米以上。

严酷的饥饿很快戕杀了董先生的人性和尊严，一个海归博士也成了一条觅食的野兽！

余习广先生在以李天德先生回忆录为基本依据又做过大量调查撰写的《铁血吁天录》一书写道：

“这些民族精英，现在却成了猪狗不如的阶下囚。由于饥饿和过重的体力劳动，很多人患了水肿，据从该劳改营出来的人反映，绝大多数“犯人”，相继死于大饥荒，成了无棺而埋的野鬼。”（笔者注：据不完全统计，三年困难时期，沙坪茶场非正常死亡人数在六千以上，1966年春我曾去峨边沙坪小住，镇上卖小食品的商贩仍以当年右派遗留的书籍为包装用纸，其中不乏外文经典著作。）

“董时光个子精瘦矮小，鼻梁上架付深度的近视眼镜，身上还穿着质地很好的美式服装，走路老低着头，沉默少言，像思考着什么。劳动上体力不支，但胃口特好。据说他被送劳教时带有不少钱，可是很少见他买东西吃，不知是出于节俭还是怕露富，但在抢饭上，却又一马当先。我记得最清楚的每次吃完饭，他都用指头去刮黄桶里残留下的星点米浆，要不把洗碗缸里的清水倒去，留下稍稍带糊状的泔水取来喝下。有一次干警嘲弄地问他：“董时光，苞谷糊糊好吃不？”他冷冷地回答：“好吃极了！比美国面包还好吃。”由于饥饿，由于折磨，由于人与人之间短少温暖与关怀，似乎大家都变得很恶，成了一条条以饱食一顿为最大快乐的野兽。在这残酷恶劣的环境下，一些难友竟去偷窃别人随身携带的钱和粮票，或家里寄来的吃食，真叫防不胜防。于是，有钱粮的人将它缝制在衣服中，有吃食的人出工背在身上。董时光也把成叠钞票缝制在背心里，暗夜中竟被窃去几十元，害得大家相互怀疑了几天。自此，睡觉时把背心穿在身上，免去失窃的危险，但他终于未免去死亡的厄运。”

“1958年4月15日，四川省公安厅劳改局调集了全省四五千名年轻力壮的“右派”建立了四川省公安厅劳改局“四一五”筑路支队（笔者注：总人数约八千，其中右派分子占70%左右），董时光被调入该支队，修筑内昆铁路。内昆铁路要在崇山峻岭中放炮炸石开山劈岭架桥修路挖隧道，“罪该万死”的右派当然是最佳人选。不少人因此摔下悬崖绝壁，尸骨难寻。1959年10月，内昆铁路停工下马，“四一五”筑路支队又转战凉山修成昆铁路，此时口粮下降，菜里看不见油珠，劳动强度极大，饥饿再次向袭来，大批右派水肿，工地上经常发生猝死。”

1960年3月，成昆铁路下马，“四一五”劳改筑路支队部分右派和反革命被送到雷波、屏山、马边三县交界的“雷马屏劳改农场”，那里是大凉山和五莲峰山脉交界的大山区，荒无人烟的蛮荒之地。董时光当养马的马倌。当时大饥荒席卷劳改农场，董时光也全身浮肿，饥饿和劳累已经把他折磨得完全脱了人形，严重时走路都摔跟头。一天，他竟然有了个在他看来一定是比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更加伟大的发现：在马粪蛋中，竟有一两颗没消化了的胡豆！他赶紧动手，在一堆马粪找胡豆，然后淘洗干净，比人参还宝贵地放进了口中。从此，董时光最大的乐趣，就是在马粪中寻找那比珠宝更珍贵的胡豆，并将找到的胡豆洗净晒干，积攒起来，以备更严重时充饥救命。一段时间，他竟积攒了一小袋！一天，他正吃点心似的享受那胡豆时，被“同改”发现，立即向干部汇报，说大右派董时光偷吃马粮。批斗会上，干部安排的“改造积极分子”带头，其他犯人一拥而上，将他当场打断三根肋骨，口吐血沫。

1961年他在“415”之际，某日遇上一位老乡，他用衣物换了一些乾牛肉，竟一口气吃完，造成肠梗阻致死。终年48岁。

他们的遗体均没有棺木，也没有属于自己单独的坟头，均是几人、几十人、甚至上百人埋在一起。名人尚且如人，无名的人可想而知了。沙坪茶场的坟场叫南瓜山，数千人的尸骨早已荡然无存。雷马屏农场和筑路支队的坟场已无名可考。

悲哉！中国的知识精英啊！谁叫你要离开“水深火热”的资本主义？

七十年代末，右派“改正”，董时光问题仍得不到解决。家人反复申诉，他大哥董时进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州立大学教授、国际知名农学家、美国国务院农业顾问，多次来信给中共中央，引起有关方面重视。1984年5月13日，西南师范学院才为他“改正”。

如此一个热爱祖国热爱共产党向往民主的民族精英、一个当时极其稀缺的海归博士，究竟何罪之有？！然而，竟然遭受如此残酷的迫害！竟然如此凄惨地死于非命！世界上也只有共产党统治之下才会出现这样的事。

笔者补记：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办公室1957年8月编印的《重庆右派言论选辑》第一集里首篇就是董时光的右派言论。现在重读这些所谓的“右派言论”，可以清楚地看到，董时光哪里是在“反党”，分明是在一片诚心帮党整风，助党治病。然而善良的“右派”们都没想到这“病人”会像曹操对待华佗一样对待他们，认定为其诊病治病者是存心要他的命，因此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为揭露历史真相，对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办公室1957年8月编印的《重庆右派言论选辑》也原封不动的辑录如下：

请你们先不要怪群众不喜欢你们，请先分析一下为什么群众不喜欢接近你们。你们应该扪心自问，你是不是真在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还是只在表面上作出为人民服务的样子？当“组织”“纪律”同人民利益违背时，你是宁可牺牲人民的利益去取得组织上的表扬呢，还是不顾领导上的打击，其他党员的批评，坚决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呢？——《我看高等学校的党群关系》（原载西师“学习简报”第二期）

在历史上，有了某种改革运动时，凡是努力参加者，我们称之为“进步”。凡是死守着腐朽的旧东西不热心改革者，我们称之为“落后”。凡是坚决同要求改革的人作斗争，我们称之为“反动”，凡是同反动者作斗争者，我们称之为“革命”，革命倒不一定要流血不可，也不一定要推翻某一个政府。

共产党员们，在过去你们已经推翻了腐朽的国民党政府，解放了中国，在那时候，你们是革命的，你们在进步的事业中走在人民前边，因此你们是进步的。在今天，在这样一个轰轰烈烈的伟大的整风运动中，大家都在积极的为党诊察病源，你们之中竟有一些说党没有病，你说党有病这是侮辱党，是反党，反革命。更有一些人手拿凶器，杀气腾腾地准备打死一切给党看病的人，那么你们自己不再是进步和革命了。是什么呢？在上述那四个范畴内属于那一种范畴，你们自己去想吧！——《“进步”“落后”“反动”与“革命”》（原载西师“白丁报”，黑板报）

在今天凡是袒护党的缺点，和不积极给党治病，甚至为党讳疾忌医的分子才是真正的落后分子；一切倡言改革的都是进步，一切阻挡改良的都是反动。这种人虽然在表面上好像站稳拥护党的立场，但事实上他的立场并不是党，而只是党的阴暗的一面。如果这一类人在这次运动中击败了热心给党看病的人们，那么，党便可能指日而亡！

我在任何时候也没有说过“三反”、“五反”、“肃反”就是为了要屠杀人民，这些运动的实质是清除旧社会的余毒；但不幸有很多人利用这些运动大量的

屠杀人民，使运动完全变了质。这些运动是必要的，但我敢大胆的说，这些运动都作得很坏。拿我们这个学校来说，“三反”中打了十几只老虎，但结果一个也不是真的；“肃反”中我们被斗争的对象有多少我不太清楚，但是结果也并没有一个是真的。我们学校如此，别的地方也不会好得太多，因为农村里，小机关里那些领导的水平比西师更差，那些群众文化水平更低，更好欺负，几次运动中情况可能比西师更糟。

党员们常为自己作错了的事辩护，他们说：成绩是肯定的。但是我以为打了一只老虎而连累十只无辜的羔羊，应该肯定错误，而不是成绩！纵使斗争，一百个人中斗错了十个人，就应当是极严重的错误（人命关天），何况他们斗的一百人中，尚有八、九十个人是斗争错了的呢？这些领导运动的人因为自己不肯虚心调查与研究，去找那一个真该打击的，便不分青红皂白的乱打，在100个人中打到一个真的，他们也沾沾自喜，以为有功。我昨天所说在过去的几次运动中攻击人身，甚至杀害人身的正是指这些人。今天出来“卫道”，反对攻击人身的人们，在当时可挺身出来为无辜者的人权说过话么？

我要向你们请教，什么是阶级斗争？像思想改造难道也是阶级斗争吗？必须要残酷的肉体伤害吗？什么“纯学术观点”、“纯技术观点”、“不问政治”，这难道也应该拿来斗争吗？应该把人家关起，写坦白书、逼得人家把自己骂得狗血淋头，害得人家得精神病，自杀吗？贪污本来是刑事案件，同反革命不同，为什么也算在阶级斗争的账里？而且请特别注意，当时斗争的程序，并非是先证实了罪行后施以处分，而是在毫无根据地先施行残酷的肉刑，使人屈打成招。如果说这就是阶级斗争的话，那么，我可以明明白白告诉大家！我反对阶级斗争。

对于共产主义我是绝对赞成，对于共产党，我只能相对拥护。所谓相对是说有的时候拥护，有的时候不拥护，它作对了便拥护它，它背叛了共产主义便不拥护它，如果党只是表面拥护共产主义，实际上在建立封建王朝，我不但要反对它，而且一定拼老命去打倒它！这一点，我不但对你们说，而且还要告诉毛主席本人。……总之，党并不是宗教，并不是上帝启示的，党是人组织成的，党的政策是人作出来的，人是不可能没有错误的，因而党也是不可能完全正确的。因此对于党我是不能无条件拥护的。过去几次运动中，三令五申，不许肉刑逼供，但是可曾有几个党员遵守呢？这些违法乱纪的党员受到惩罚吗？这一点便可见得党是偏私的，有宗派主义的，偏心自己党员，掩饰他们的错误。而且那几个运动是否一定要采取斗争的方式，也是值得怀疑的，我不赞成这种办法！但是这并不等于反党，而且反对党的某些政策，并不等于就要打倒党。你们自称为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可是你竟说党是绝对正确的，当年斯大林何尝不是绝对正确的，而今又怎样了呢？我先告诉你们，今天的许多事情，正确与否，同将来的历史书上所论一定有很多不同。如果大家肯仔细观察，也可以发现许多昨天认为正确的，今天认为正确的，明天却不一定正确。要把眼光放远些，只看到鼻子尖是不会明白任何事情的，这里我要奉劝青年们，无论你是学什么的都必须读点历史，这可以帮助扩大你们的眼界。

“鸣”、“放”是征求大家对党的批评，而不是征求对党的歌颂，今天企图以大帽子来压服“鸣”、“放”的人，我认为是党的叛徒，宗派主义、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支持者。

他们口口声声说我反党，但当党患了重病在生死关头，毛主席给党发起

了一次起死回生的运动时，这些人却打击给党治病的人，反对给党看病，请问你们是不是反党的？——《我的答辩》（原载西师“鸣放园地”十三期）

有很多人申请入党，我不能说申请入党的人都不好，这里有许多人是真正要求进步要求有机会为人民服务，我很敬仰，但是不幸有很多不是这样的人，我举西师的一、二个例子，这种人很多，不过我交游不广，一天关在屋里头只晓得一、二个。西南师范学院去年有一位讲师申请入党，很快就批准了，在入党征求意见时，群众没有一个人对他无意见，没有哪一个意见不是尖锐的，都涉及到品质问题，但是这个人入党了，是怎么入党的，请听听党对他的考语五个大字：“一贯靠拢党”，就凭这点就入了党。说明什么问题？说明某些党员自认为我就是党，只要靠拢我就是靠拢党，就是这么个问题。这事情到现在，还在议论纷纷，有位先生谈得好，他说：党批准了他，但是群众并没批准他。

党是一个介绍一个，如果一个坏蛋作了党员，再介绍十个这样的坏蛋入党，十个坏蛋再介绍 100 个坏蛋入党，这样发展下去党还有什么前途呢？我这番话难道还不是对党关心的吗？还不是苦口良药吗？这些人偏偏说是反党反人民的，所以我要呼吁在选择党员的时候要慎重考虑，这是我对党最忠诚的劝告，希望党的成员都是好人，像人的每个细胞都是好的才会健康，如果一个人身上长满了一片毒瘤子，还能说健康吗？这般道理我们还不是对党忠心耿耿的表示吗？

我主张党员不要忘记他们的口号，到现在这个口号是空的，要重新提出来大家必须重视这个口号，那就是吃苦在前，享福在后。具体说来我希望同样水平两个人的情况下，党员比非党员的薪水要低一些，同学分配工作，要把那些党员们分配在边远的地方，无人愿意去的地方，因为他们自认为水平高，不抱怨，如果真的作到这样，相信现在那些要求入党的人决不入党，那阵要求入党的人才是真正抱定牺牲精神为人民服务的，党会永远健康，永远存在下去，永远为人民所爱戴。这是我的建议。党员不舒服，我也管不了。

是不是全国大小机构上上下下都要个党委领导才能体现出党的领导呢，我觉得不然，如照这说法每个家庭都要有个党委，不然你这个家庭就没有党的领导，就是反党的。

我们晓得在过去三反、五反、肃反几个大运动中，冤枉了很多好人，在别地方我不清楚，西师也打了十几只老虎，把人关了几个月，后来放出来他们说不是老虎。这并不是一个学校，是全国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我们要提出对这些受冤的人政府要赔偿他们的损失，我知道有的案件是赔了，有的案件没有赔，即或赔了也非常的不够，完全是一种意思，表面，没有作到真正赔偿地步。如像打老虎时说你贪污了几千几万，打我一下说贪污了二千，他说不够再打一下说三千，不够我说五千，还不够，我说我贪污了一万，许多事情都是这样来的，于是很多人就关起来了，赃款也退给国家了。大家知道这是怎么退出来的呢？绝大多数人是把家里的东西当尽卖光甚至还借了很多债，连饭都没有吃的，来赔偿，所谓的赃款大家知道要卖多少东西，在卖东西时买东西的人又拼命的煞价，一万块钱的东西只卖两千，到后来说某人不是老虎，把两千块钱还给他，这两千块钱是不是赔偿了损失？实际上就只赔了你两千，还有八千政府没有赔。这只光是谈经济上的赔偿，只是表面的事情，还有名誉上的赔偿作得很差，没有赔。我们要求政府对这些人登大字报慎重声明，我所说的并不是你们那个大字报，而是在报上登大字声明，说某

人是冤枉的，并没有犯罪，而且要在当初斗争时那样的场合下公开道歉（如像当初到的这样多人出席，现在也要这多人出席），恢复人家的名誉，并且由当时的主犯应该检讨，第二、我还主张要惩办凶首（恐怕是我第一次提凶首的）。我觉得凡是没有证据诬赖别人，使别人遭受打击的这种，应当当成凶首看待，按罪的轻重对这些人定罪。这是否就毁掉了党的威信呢？不会的，而更会加强共产党的威信，这会叫老百姓看到共产党是大公无私的，决不偏袒自己的党员，共产党作错了事必定纠正，而更会加强党的威信，拥护共产党。现在最不合理的情形是当初被诬赖为老虎的人，后来证明他不是老虎，但是领导上还是一直把这件事情当成他的历史污点。这种人的薪水比人低几等，政治地位也比别人低，这一点必须纠正，既然人家没有罪，你就应当把别人当成无罪的人看待，这些人没有污点，污点是你加上去的，应当取消。另外是与此相反的事情，当时运动中打击别人的人，许多打虎将，大家都很熟悉的，后来证明这些打虎将是胡作非为，但是现在他的历史上还添上光荣的一条，说他曾经打过虎，待遇比别人高，入党条件比别人好，在入党上还要加上这一条打过虎，我不知道这是甚么公理？打错了人的人，不受惩罚已经是万分宽大，但是居然还要优待他，我真不知道这是甚么道理？

我首先要说明用政治来改造人的思想是没有用处的，我觉得共产党口口声声说他们是唯物论者，但是我看见他们作的许多事情好像是比资产阶级还要唯心些。他们以为口号、标语、什么政治课就能改造人的思想，这就是很明显的一个表现，这个说法是违反唯物论，是唯心的看法。……大家还是学了一些东西，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学到东西，学到的什么呢？只是学到些名词，不是学到名词的意义，是学到名词字眼，如像资产阶级思想是什么都不懂得，这是学的结果，学了后用处还是有的，就是用来骂人，他看你不顺眼说，你是资产阶级思想，你分析问题不同了便说你是形而上学，试问耽误了那么多时间来学有什么用呢！所以我主张取消政治学习。——《在重庆大学的讲演》

行文至此，笔者感谢当时的重庆市委宣传部，留存了董时光的讲演实录。

董的即席发言，表现出思路清晰，说理逻辑严密，在当时可谓见解超前，提出一些社会学、法学、教育学方面的问题。今天看来是一篇对中共的“诚挚劝告”。可惜，他提出的问题直到他死后五十五年的今天也没有解决。“党是一个介绍一个，如果一个坏蛋作了党员，再介绍十个这样的坏蛋入党，十个坏蛋再介绍 100 个坏蛋入党，这样发展下去党还有什么前途呢？”——这是精彩地形象地说明今天党官阶层腐败群体化的原因。仍然值得深思。

（2）刘盛亚

四川巴县人，1915 年生于重庆大梁子（今新华路附近），1935 年赴德国法兰克福大学留学，正遇纳粹上台，以揭露纳粹的纪实散文 16 篇崭露头角，《在卅字旗下》为其成名之作，20 多岁就跻身于罗曼·罗兰与斯蒂芬·茨威格等反纳粹作家行列，为中国最早的反法西斯作家，抗日期间赴国难返国。25 岁即被聘为川大与内迁乐山的武汉大学教授，且由戏剧大家熊佛西聘为四川省剧校教师，与江安执教国立剧专之吴祖光，共誉为南北神童；返重庆后，他一度任过由张恨水、聂绀弩、吴祖光主编之《新民报》副刊主编，还由郭沫若聘为他属下群益出版社总编。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重庆文联执委，专业作家。1949 年后供职重庆文联，专业创作。反右时划他右派者认为：“老子来自延安，虽是中学生，喝过延河水，就是无产阶级。你刘盛亚出身教授家庭（其父刘伯量原是北大农学院院长，此时仍任川大农学院院长），且出洋喝

过海水洋水，岂非资产阶级乎？”寻不出言论划他右派，便以六年前刘盛亚发表之小说《再生记》引起过争议为由，拖入右网，投入劳动教养。40岁刚出头，就于大饥饿之1960年代初，饿死于服苦役之峨边沙坪劳教营。1980年，省文联作出决定，当年认定刘盛亚为右派系错划，予以改正。为他开追悼会，放的骨灰盒竟是空的。家属去峨边寻骨骸，该地饿死右派数千，坟堆竟未见一个。刘盛亚年轻时著文反法西斯，盛年竟死于法西斯之囚，西斯已灭，而东斯更嚣也。刘盛亚1930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长篇小说《夜雾》、《彩虹曲》、《水浒外传》，传记文学《木工黄荣昌》，译著戏剧剧本《巴黎圣母院》、《浮士德》，诗集《尼伯龙根歌》、《少年游》、《歌德诗选》、《海涅诗选》，短篇小说集《萝茜娜》，《蔡特金传》等。

（3）邱原

曾用笔名邱漾，1928年出生四川井研，四川大学文工团团长，慧而俊，敏而学，博而专，孝且悌；在家是父母膝下孝子；在昆仲中，节衣缩食供弟邱仲澎完成四川音乐学院作曲系学业；邱原任省文联编辑与创作员时，重视提携后进。八十年代颇具声誉之作家周克芹私下语邻居流沙河曰：“众多称吾师者，皆逐名之辈耳，而吾文学启蒙、引路者，唯年少所交邱原也。邱原多艺多才，省文联中，能著小说、诗歌、散文，能写电影剧本，能粉墨登场，且能任导演者，唯邱原。”因性豁达喜友朋，酒酣放言，临风抒怀，被诬为省文联裴多芬俱乐部成员，打为右派，开除单位，因艺才护身，居成都江湖仍生活无虞无忧，见服劳役之流沙河拉车负重过街，汗透裤衩，乃呼其歇足茶馆，语曰：“难苦熬，可出单位，随我生活，我有一碗饭，你也不少一碗。”有任侠气。凡生存有困危者右派，投其门下，如四川师院开除之右派孙某、李某，铁路文工团吴某，皆由他办之文化作坊收纳，竟乞丐怜悯相公，若齐国孟尝君之养士，却非田公子之富贵也。乃引公安视为招降纳逆之敌对势力，诬为右派反革命集团，以附会毛泽东之“人还在心不死”之阶级斗争论点，而实为助失业者有业，悯有难者无辜，有利社会安定也。至文革时，已入狱作家茜子难熬全面专政之苦，求助于邱原，恰有流沙河忘在箱底百斤全国粮票赠来，遂转赠茜子出逃。茜子逃至川西北深山被捕，邱原亦被逮捕，囚禁在成都宁夏街监狱，在逼供讯的残酷折磨中，以筷子磨磋砖头磨厉，插入动脉血管自杀而亡。被血迹浸透的被子重达几十斤，其妻张天秀领回遗物，在锦江河冲洗时，半河水都染成了血红色；引人忆及邓拓诗云：“莫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出血斑斑”。毛泽东施展的反右阴谋，不是一句“扩大化”就可以了结的。

（4）张文澄

张文澄（1915—1998），四川仁寿县人。1937年2月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随即加入中共，抗日战争时期在四川从事地下工作，1941年被周恩来派赴云南任调研组长。1946年任公开的中共四川省委副秘书长。后在上海、香港工作，在武汉任市委常委。中共执政后任重庆市委常委、宣传部长。1957年被打成右派反党集团的首犯。“右派改正”复出后任西南政法学院、重庆大学党委书记。1983年任重庆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张文澄生前曾于1989年4月16日和22日，分两次讲述了他（时任中共重庆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在“反右”运动中的经历。还写过一本《难忘的1957年》（只在家属中传阅过）。记录整理者李畅培时为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红岩春秋》主编，记录稿以“我是怎样被打成右派的”为题，

发表在《炎黄春秋》和有关网站（在百度等网站输入此题目即可查阅全文），全文7900余字，没有列出张文澄的反党言行，只写了张文澄在某次选举时没有投李井泉的赞成票，李执意将其打成右派。文中描述了当时四川、重庆党内高层干部之间貌合神离、尔诈我虞的场景。有兴趣的读者可上网查阅，对于了解反右内幕是大有裨益的。

（5）冯元春

冯元春，(1935-1970)，女，四川省青神县人，出身农民，读书成绩不错，每年都有资格领取助学补助金。高中毕业后考入位于成都的四川大学，1957年时，年方22岁，为四川大学生物系四年级学生。

五七年春夏之交反右运动骤然兴起，毛泽东号召“大鸣大放”，他在演说和文章中三番五次引用俗语“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倡导青年追求真理应该有这种大无畏精神。还多次说“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希望对老和尚也提些意见。

反右前夕，毛泽东着力“引蛇出洞”说了不少蛊惑人心的花言巧语，诸如：对思想上有严重错误的人，有敌对思想的人，也要团结他们，改造他们。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贯彻“统筹兼顾，各得其所”。应该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以便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应该贯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笔下也是如此。

毛泽东还说过“六亿人口里头，可以发展到解除武装的敌人……一经解除武装，我们就用另一种态度对待他们了。对这些劳改犯的人，我们也是这个方法对待，从团结的愿望出发。”“我们对五百万知识分子，几亿农民、多少万民族资本家和民主人士，打是不适宜的。要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包括有杀父、杀夫、杀子之仇的，有些血肉相连被镇压的。”

冯元春不知天高地厚，信以为真。她是川大乃至四川最先批判毛泽东的人。冯元春为人稳重，不爱说话，也不写文章，性格执拗倔强，敢说敢当，不畏权势，不轻易改变和放弃自己的观点。她是一个很有思想与见地的人，在“整风鸣放”前夕，她特爱看报纸，还一头扎进图书馆翻查历史资料，对1955年“胡风反革反革命集团”一案作了认真的研究。为了帮助党风，还专程回到家乡去对“统购统销”、“农业合作社”进行了实地调查了解，听取农民意见。还读了北京大学邮来的美国记者安娜路易丝·斯特朗撰写的《斯大林时代》，因而形成了一系列崭新的政治理念。在大鸣大放中就无所顾忌地鸣放了出来。

遗憾的是她没有留下亲笔撰写的文字材料，没有大字报，没有文章。乃至今天只能从经过他人“加工”“毒化”“编纂”的文字中寻找踪迹，难免失真。

四川大学图书馆曾长期收存着当年批判斗争冯元春时《人民川大》所刊登的材料，标题是《我校反右斗争的一次巨大胜利》。记载着：“冯元春的反动本质全被揭穿，她的全部[论点]已彻底破产，她所捏造或歪曲的二十条[事实]全部揭穿，她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本质已经完全暴露。”冯元春到底有什么“论点”和“事实”呢？据那些编造材料摘录如下：

冯元春说：“土地改革不应该把土地分给农民”；“三反、五反是暴力是乱搞”；“统购统销是变相剥削农民”；“助学金是共产党用来收买人的”；“共产党

用封官许愿高价收买一些人入团入党，养了一批寄生虫。好些领导干部狗屁不通，是党棍”；“现在的报纸和电影全是歌功颂德的东西”。

冯元春说：“根据已发表的材料观察，高饶的罪名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我们请问，党中央和毛主席有缺点难道就不能反对吗？这不是出于个人崇拜是什么？高饶没有反人民，他和暴力集团也没有联系，而毛主席却以暴力逮捕他，这是违反宪法的。报上公布高饶另一罪名是生活腐化、侮辱妇女，但为什么被侮辱的妇女却没有提出控诉呢？按照法律，这类是应该有被害人指控才能定罪的。因此，毛主席是犯了错误，是斯大林思想在作祟。”

冯元春说，“毛主席提出逮捕胡风的根据是：(1)反党；(2)上书 30 万言；(3)组织反革命集团。“毛主席经常说：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为什么胡风先生公开向共产党中央上书三十万言就成了罪人了呢？而且还把别人朋友之间的来信公布出来，说是反革命罪证。这不是毛泽东公然破坏法律，自己打自己的嘴巴？毛泽东主席的特权思想，和历史上一切统治者的特权一模一样，他认定谁是反革命谁就是反革命。（笔者注：1955 年毛泽东把胡风等人定成“反革命”后，广大知识分子心中是不服气的，但却没有人敢于公开提出来，只是背后私下嘀咕而已，而冯元春却敢挺身而出，面对数千听众讲出自己观点，不能不使人赞叹！）

冯元春说，“共产党这个剥削集团是巧妙的，残酷是空前的。”“豢养了一大批不务正业，专门监视别人思想言论行动的政治工作人员。这些人不学无术狗屁不通，只会扣帽子。或是说：‘我是一个党员，是马列主义武装起来的。’他们就这样靠吸取别人脑汁而生活，他们对待老教授是那样蛮横、无理，是最卑鄙的一种人。”

冯元春说：“共产党的特权行为严重，表现在用人制度上的‘奴才论’，以及对党外人士的打击和对知识分子所谓的‘思想改造’上。只能说他们好，不能说他们的不是。”“我校汤教授为人忠诚，是个忠于客观事实的自然科学家，就因为他爱提意见，在肃反中就认为是反革命分子。在大会上进行斗争，说他是美国派来的间谍。汤教授确是一个忠于事实的人。”

冯元春说：“共产党对外政策是一边倒，倒向苏联，处处说苏联好，没有民族气节。”“台湾局势紧张就是倒向苏联成的。实际苏联远不如美国。美国工人生活水平相当于我国的大学教授，一个月二、三百美元，每三个美国人就有一辆汽车，这些足于说明美国生产力高。而剥削集团的宣传机器却歪曲事实，说美国有多少工人失业，经济危机又多么严重。”

冯元春说：“中国黑暗，苏联更黑暗。”“到处都是便衣警察在监视老百姓的行动。”“解放后工人工资没有怎样提高，农村闹粮荒农民吃不饱，生活还不如从前。”她“坚持孙中山先生的救国理念，踏着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鲜血前进！”

冯元春说：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就是用暴力夺取政权后的统治阶级组成的政府，借用军队、警察、监狱去镇压老百姓，他们不给人民任何民主自由的权力，也不遵循法律去依法办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制定通过的‘宪法’仅是一纸空文，毛泽东要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想打倒谁就打倒谁，想关押谁就关押谁，这决不是马列主义者，是彻头彻尾的独裁！”

冯元春说：“我们再来看看共产党，这个集团对工人农民的剥削是巧妙的、残酷是空前的。工人加班不给加班工资，美其名曰‘奉献’；农民辛辛苦苦种出的粮食自己不能支配，大部分被国家统购去再无存粮，今后要是发生一点

灾害便会饿死人。再看共产党的各个单位都豢养了一大批不务正业，专门监视别人思想、言论、行动的政治工作人员，美其名曰改造别人思想，实际上是狗屁不通，只会扣帽子，或是说我是一个党员，是马列主义武装起来的。他们就这样靠吸取别人脑汁而生活，他们对待老教授是那样横蛮、无理，是最卑鄙的一种人。

据此冯元春被划为极右，随之以现行反革命罪逮捕，冯元春被捕后关押在省公安厅梓潼巷看守所，在关押中拒不认罪，坚持自己是帮助党整风针砭时弊。被判处有期徒刑 15 年。押送简阳平泉农场劳改；又以拒不认罪服管之理由加刑，判无期徒刑，送四川省属南充监狱劳改。

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把国家主席刘少奇打倒、清除出党时。冯元春笑曰：“我称他是杀功臣之刘邦、朱元璋，岂妄言哉？”被人听见，报之狱管。此时，文革正讲加强全面专政，仅凭传说的一句话就可以治罪。凡攻击已坐上神坛达到君师合一之毛泽东，皆罪不容诛。

冯元春有前科，更属严惩对象，由军管公、检、法系统之军人不经什么审判，先游街示众侮辱，她个儿不高，五花大绑地捆扎着，背上插有三角尖形的白色死牌，胸前挂着写有“冯元春”打上红叉的大纸牌。冯元春昂头挺胸站立着，两个恶狠狠的军人死死压住她的脖子。一条细麻绳像勒进了她的皮肉，在颈脖处还缠了一圈，让她叫不出声音来。虽然由于血脉不通，冯元春脸呈青紫色，但她仍金刚怒目，毫无畏惧……

押至市郊火花公社广场，由农民斗争时，即用钢钎与锄头戳她、挖她，已奄奄一息，再连发数枪致其毙命。北京大学女右派林昭是秘密处死，还残忍地向家属索取子弹费；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的张志新则是受尽了百般折磨与侮辱后，被先割喉以防其喊出声音，再残杀致死的。四川大学女右派冯元春之遇难，受的是原始的中世纪之酷刑矣！

下令杀她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毛泽东豢养在四川的一条恶狼李井泉。

（6）流沙河

四川是个反右运动的重灾区，被打的右派分子位居各省前列，处罚也重。只有 50 人不到的《成都日报》，就有 14 位编采人员被打成右派；150 人的《四川日报》就有 50 多人被打成右派。

四川还是最先拉开了反右序幕的省份，它是由一篇只有 300 字的一首散文诗《草木篇》引起的。诗的作者流沙河，原名余勋坦，1931 年生，四川金堂县人。17 岁就开始写作诗歌、小说，发表诗集《农村夜曲》、《告别火星》、《流沙河诗集》、《游踪》、《故园别》等，是个很有才华的青年作家。1956 年 10 月他从北京中国作协举办的《青年文学创作讲习班》学习回来，在火车上以物寓情，以情言志写下了直抒胸臆的散文诗。此时，四川文联为了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繁荣文学艺术创作，正在筹办一个纯诗歌性的刊物《星星》[1]，并于 1957 年 1 月面世，《草木篇》就发表在《星星》创刊号上。刊物编辑人员仅 4 人，即：白航、白峡、石天河、流沙河。时人称之为二白二河[2]

《星星》一问世，就面临着被扼杀的风险。第一期面世仅 14 天，就在《四川日报》上受到批评家的严厉批判。批判开始时集中于主编白航的一段话和短诗《吻》。该刊主编白航对记者所说的一段话：

要是没有党中央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刊物是办不起来的。诗歌的春天来到了！不单是诗，整个文学也一样，正在解冻。

“解冻”一词很快便惹来了麻烦。1957年初，《成都日报》在报道《星星》创刊的新闻时，引述了1月14日，《四川日报》刊载署名春生的《百花齐放与死鼠乱抛》一文，对《星星》主编白航的谈话进行批判。文章武断地推论：这无异于说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件公布之前，文艺是被冻结了的，也即是说根本没有文艺的。该文指责《星星》不是“百花齐放”，而是“死鼠乱抛”。作者还例举了《星星》创刊号上的短诗《吻》，认为“与二十年前曾在蒋介石统治区流行过的‘桃花江上美人窝’、‘妹妹我爱你’之类的货色是差不多的”。这位署名春生的作者来头不小，他就是主管全省文艺工作的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李亚群。这个反右打手，曾把不少年轻人送进了劳改队，文革中他也被打倒，成了修正主义分子。此时他吐露出忏悔的心语：“过去我把很多有才华的年轻人搞进劳改队，以为教训他们几年，谁知再也不要不回来了。唉，报应啊报应！”

不过，起初的批判，还未涉及《草木篇》，也未涉及流沙河。率先向《草木篇》发难的是著名作家曦波，此人也有来头，是省文联党委委员，《草地》杂志主编李友欣。1月17日，他在《四川日报》发表《“白杨”的抗辩（外一章）》，仿照《草木篇》的笔调，公开批判《草木篇》。他虽然没有给《草木篇》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大帽子，但认定诗中所流露的“孤傲”情绪，是宣扬“无原则的硬骨头”精神，带有敌视人民的倾向。并说“假若你仇视这个世界，最好离开地球。”于是人们开始把注意力集中于《草木篇》。

从一月到三月的不足两个月时间里，仅《四川日报》《成都日报》和《草地》文艺月刊就发表了24篇文章，称它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大毒草”。就这样一篇普普通通的散文诗《草木篇》，立即变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大毒草”。不过批判一阵之后，好像逐渐地缓和了下来。原来在此期间毛泽东作了两次报告，1957年2月27日在第十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了后来称之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3月12日又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作了报告，这两次报告都是为了打消人们的各种顾虑，鼓励人们大胆地“放”的。四川文联出席会议的代表在传达毛泽东的指示时，曾讲了毛泽东对《星星》和《草木篇》的态度，说：“1、毛泽东面带讪笑、反话正说幽默地问大家：〈草木篇〉你们都看了没有？好文章嘛！没有看的，应该找来看看。2、‘关关雎鸠’（指批判〈吻〉）的问题嘛，我看就算了。3、刊物不要停，要继续办下去。4、有杀父之仇的人，还是可以教育改造的。对流沙河（其父因地主成分而被镇压），还是要团结教育。对犯错误的人，都应该采取‘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对我们自己的（犯错误的）同志，更应该教育。5、百花齐放的方针是要放，放了毒草也不要怕，毒草锄了可以肥田，完全没有毒草是不可能的。6、批评，不要“一棍子打死”，要允许人家反批评，不要压，苏联现在还在压，我看不好。”

流沙河等人以为反击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的时机已经成熟，纷纷开炮，支持他们的人也立即表态，其中有四川大学中文系教授、老作家张默生，西南民族学院教授何剑薰等人，认为对《草木篇》的批判是错误的。而流沙河更是在一次会上发表了两个小时的发言，大吐苦水，反对对他的批判和对新生事物的围剿。其实他们是错误地估计了毛泽东的意图，此时的毛泽东正在磨刀霍霍，暗里悄悄地酝酿着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为了能引蛇出洞，避免打草惊蛇，才对《草木篇》和流沙河说出几句安抚的话语，以免打乱他围剿歼灭知识分子的计划。

果然就在流沙河等几个小青年欢呼毛泽东就是伟大的时候，《四川日报》在头版以通栏标题《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写信写稿给本报对流沙河的发言进行驳斥》发表了批判文章。文中还对流沙河家庭和父亲进行了揭底，看起来批判《草木篇》要把作者的祖宗十八代历史也一起揭批。一场文学艺术上的论点之争变成了政治上你死我活的斗争。四川省委特地向各地发出红头文件，展开更大规模的大围剿运动。就在流沙河为自己辩护的发言刊登在《四川日报》后第三天，6月8日毛泽东反击右派的《这是为什么？》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场以党和全国人民名义向知识分子宣战的宣战书发布了。从此流沙河和《草木篇》成为四川文艺界批判的头号目标，全国也掀起了批判高潮。自此，全省不少单位、学校在划分“右派分子”标准时，均以《草木篇》为杠杆。凡是支持赞成《草木篇》的人，无论你是党员还是干部，是专家还是学者，是年过七旬的白发老人，还是稚气未消的十五岁少年，也无论是男是女，是尼姑还是和尚，均被划成右派分子。据有关方面粗略统计，为《草木篇》而沦为右派的，全省以至全国不少于一万人。这一万人，就是一万多条年轻、美丽、潇洒、活泼的生命：一万个幸福的家庭，顷刻全被毛泽东的“阳谋”（其实是阴谋）撕得粉碎，化为乌有。自此中国进入了最黑暗、最野蛮、最荒唐的时代，留下亘古绝唱。

四川省除了揪出十来万右派之外，还揪出了许多“反党集团”、“反革命集团”，仅五个集团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和右派分子的人数达15000人之多。由于流沙河的被迫交待，他和文艺界及单位里同事朋友被打成了“七人反党小集团”的成员，除了流沙河一人因“低头认罪”“检举揭发”留机关监督劳动随之下放到金堂县做了一名锯木工以外，其余六人一个比一个惨，一个比一个苦。储一天（《草地》文艺刊物编辑）被判处死缓；石天河（《星星》诗刊编辑）被判处十五年徒刑；邱原（省文联干部）在关押期间用磨尖了的竹筷戳破动脉自杀。遥攀（《草地》编辑）死于狱中，茜子（《草地》编辑）被判二十年徒刑，晓枫（《成都日报》编辑）被关押在劳动教养场所服苦役二十余年。以上这七个人又是“四川省文艺界二十四人反革命集团”的成员，这里有编辑、记者、诗人、学生、印刷厂工人、干部，甚至还有一个是自贡市文联的主席张宇高。一篇只有300字的散文诗（如果把白居易的两句诗去掉，把草木篇题目加上，就是300字而已），竟要用一万条鲜活的生命去陪葬去祭奠，

这是个什么世界！？那么这是怎么样的一篇文章呢？让我们来看看它的全貌，下面就是《草木篇》全文：

草木篇：

白杨：她，一柄绿光闪闪的长剑，孤零零地立在平原，高指蓝天。也许，一场暴风会把她连根拔去。但，纵然死了吧，她的腰也不肯向谁弯一弯！

藤：他纠缠着丁香，往上爬，爬，爬……终于把花挂上树梢。丁香被缠死了，砍作柴烧了。他倒在地上，喘着气，窥视着另一株树……

仙人掌：她不想用鲜花向主人献媚，遍身披上刺刀。主人把她逐出花园，也不给水喝。在野地里，在沙漠中，她活着，繁殖着儿女……

梅：在姐姐妹妹里，她的爱情来得最迟。春天，百花用媚笑引诱蝴蝶的时候，她却把自己悄悄地许给了冬天的白雪。轻佻的蝴蝶是不配吻她灼，正如别的花不配被白雪抚爱一样。在姐姐妹妹里，她笑得最晚，笑得最美丽。

毒菌：在阳光照不到的河畔，他出现了。白天，用美丽的彩衣，黑夜，用暗绿的磷火，诱惑人类。然而，连三岁的孩子也不去采他。因为，妈妈说过，那是毒蛇吐的唾液……

整篇文章没有出现“党”、“人民”和“社会主义”等字句，但是当时它却成了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大毒草，据说这几首小诗可以推翻共产党的领导。颠覆拥有几百万军队和警察与法庭的政权。流沙河与其他千万计的人为此而付出了沉重的甚至是生命的代价。

流沙河的儿子于文革第二年1967年出生，就在“黑五类”子女的阴影下长大，在文革浩劫的苦水中泡大。当他稍知世事起，就听别人说他的父亲是个写了大毒草《草木篇》后成了大右派的。于是在他的幼小的心灵中，《草木篇》可谓“如雷贯耳”，他多想亲眼看一看这篇文章究竟写的是是什么。直到1978年文革结束后在一次翻看旧书时，终于看到了这篇梦寐以求的《草木篇》，但是看过之后，他大失所望。他对其父亲说：“那有什么？！我本来以为《草木篇》一定好厉害呢！”

今天当我们用另一种目光去审视这篇散文诗时，我们可否这样来看：组诗热情地歌颂了孤直不屈、刚正不阿、忠贞不二的美好品格。诗人通过白杨那种宁死也不肯向谁弯腰的精神，赞美了在任何险恶的环境中也不卑躬屈膝的高贵品格；通过仙人掌没有奴颜媚骨，终至被逐出花园，既对它那种顽强不屈的节操给以充分肯定，也对它的不幸命运寄予深切同情；通过梅花一旦把自己许给白雪，便一心等待冬天的到来，赞美了对爱情忠贞不渝的高贵品质，也启示人们在政治生活中同样要保持这种品格。组诗还无情地揭露了损人利己、善于伪装、暗中害人的丑恶行为。诗人在篇首引用唐代诗人白居易：“寄言立身者，勿学柔弱苗”的诗句，题旨就是：“告诫人们不要学篇中所写的“藤”和“毒菌”。藤为了达到向上爬的目的，不惜采取损人利己的手段，乃至把人置于死地；而毒菌则善于用漂亮的外衣包裹自己以害人，从而提醒人们要善于识破他们的伪装，

警惕现实生活中的两面派。因此这是一篇在艺术构思上以小见大，在表现手法上托物喻人，在感情抒发上憎爱分明，在语言运用上刚柔并济，堪称当代咏物诗中的佳作。组诗借写草木歌颂生活中的真善美，也鞭挞立身处世中的假丑恶，表达了作者的“善恶之心、坦诚大度和刚直人格”。但是作者本人对《草木篇》并没有如此高的评价，当此文被收进《重放的鲜花》一书中后，他对此文的自我评说是：“鲜不鲜，很难说。说它们是花，我看不太像。无论如何，我写的那一篇，看来看去，既不悦目，闻来闻去，也不悦鼻，没法提供‘美的享受’。它是火，它是烟，它是狼粪的点燃，绝不是花瓶插的，盆栽的，园植的，野生的，它都不是，它不可能使人娱而忘忧，只会使人思而忘嬉。”

附注：

[1]《星星》诗刊创刊于1957年1月1日，32开本，全国发行。是中共建国后创刊最早的诗刊，也是目前中国最具影响力的诗刊。创刊时主要编辑人员：白航（编辑部主任）石天河（执行编辑），流沙河，白峡。1960年10月停刊，1978年10月复刊。改革开放后《星星》重新焕发了生机。《星星》诗刊是中国社科院评定的国家级中文类核心期刊之一，也是中宣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等单位评定的国家优秀期刊、新闻出版总署双效期刊，曾获国家期刊奖、国家重点社科期刊奖。

[2]此四人当时均被划为右派分子，纷纷被劳教、劳改。毛泽东死了以后，中共五部门反复查证，确认均为错划、错判。1979年方获“改正”和“平反”。幸运的是都还活着。

白航：原名刘新民，1926年生，河北高阳人。笔名谢燕白。中共党员。华北联合大学文学系毕业。1945年进入晋察冀解放区参加革命工作，抗战胜利后回天津做地下工作，1946年到联大学习，毕业后参加解放军18兵团文工团创作组，转战太原、陕西入成都，后转业四川文联。1957年创办《星星》诗刊，曾被错划右派。《星星》复刊后任主编、编审。历任中国作协期刊委员会委员，全国新诗评奖委员等。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8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蓝色幽默》、《白航诗选》、《诗歌创作漫谈》、《简论李白和杜甫》等。曾获文学期刊优秀编辑奖及四川省诗歌奖。

白峡：原名刘叶隆，1919年生，山东省巨野人，40年代初期开始写作，1941年在四川中江县教书时，曾在成都《华西时报》发表散文《夜记》。1944年至1946年初，在四川万县为地方报纸先后编辑《小朋友》和《中学生》等副刊。五十年代调入四川省文联。1957年因《星星》诗刊事件被错划为右派，1979年平反。白峡出版诗集《春耕》、《春天的蓓蕾》（与人合作），又与人合编了一本《四川歌谣选》

石天河：原名周天哲，1924年生。湖南长沙人。中共党员。1947年后历任《救国日报》、《南京日报》及《中国日报》记者、编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西南服务团团员，《川南日报》编辑、读者服务组长，四川省文联组联部秘书，理论批评组长，《星星》诗刊编委、执行编辑，反右运动中曾被投入冤狱关押二十余年，平反后任重庆师范专科学校（现名：重庆文理学院）副教授。1946年开始发表作品。1954年加入中国作协西南分会。2010年6月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出版了石天河先生所著《逝川忆语——星星诗祸亲历记》。全书约四十万字，资料翔实，文笔细腻，图图絮语，血泪文章。颇多启人深思之处。建议读者寻机一阅。

八、中共内部的派系之争

仔细翻阅各地区的反右资料不难发现，原地下党成员在反右运动中多半受了冲击，概因毛泽东的门户之见是由来已久的。建国初期毛泽东对处置地下党有一个“十六字方针”，即“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

浙江省长沙文汉和他的妻子，省委宣传部代部长、原南京地下市委书记陈修良，首先成为党内职位最高的大右派夫妻。沙文汉和浙江省委领导干部杨思一（副省长、原浙东游击根据地金萧支队领导人）、彭瑞林、孙章录（原苏浙皖边区工委书记）等四人被冠以“地方主义反党集团”，打成右派。四人之外，另有三位省委委员被打成右派。

在北京，原昆明西南联大地下党骨干，如袁永熙、李凌等，一大批地下党员被划为“右派”。

在福建，原闽中地下党负责人被当作叛徒、特务、内奸开除党籍，逮捕入狱。冤案涉及一千多名地下党员，大多是地下党在厦门大学、集美学校和其他院校吸收的革命知识分子。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留在云南的地下党领导人郑伯克和各地地下党组织建立和领导的反蒋武装滇桂黔边区纵队（简称“边纵”），在三年多时间里，在城市民主运动推动下，以大中学生为骨干，发展成为主力队伍五万多人、县区民兵十万余人的武装力量。遍及滇桂黔三省的147个县境。建国后，在“整党”、“反地方主义”、“反右派”等历次政治运动中，云南的地下党员和“边纵”人员，大都成为重点审查、斗争对象，被强加了许多污蔑不实之词，受到种种迫害，并且株连家属子女。1957年开始，云南大量地下党和边纵干部被打成右派，1958年又进行“反右、反地方主义、反地方民族主义”补课。原地下党昆明市工委书记、滇西工委书记、滇西人民自卫军指挥员黄平（后为改编的解放军滇桂黔七支队司令员兼政委），被反复批斗，划为“右派分子”。云南省委组织部长郑敦（原滇桂黔边区省委常委）、副部长王镜如被打成“郑王反党集团”。在这个“反党集团”冤案中，定为“反党集团骨干”的省管干部就有158人，其中有地下党干部122人。反右运动中，原“边纵”人员90%以上被划为右派分子。

对于“反右”期间原地下党员普遍遭到诬陷和残酷迫害，人们有一种解释，说毛泽东的目标是对着周恩来的。因为抗日战争时期以周恩来为首的南方局（包括以后的南京局、上海局）领导着整个国民党统治区地下党的斗争。把地下党统统抹黑了，总账就要算到周恩来头上。现在看来，事情还不仅如此，还有更远的源头，更深刻的背景。把历次政治运动中迫害地下党员和知识分子的现象，用全国解放之初就提出的对地下党的“十六字方针”来审视，人们就会大彻大悟，甚至大吃一惊。原来在毛泽东的建设新中国的大战略中，原地下党员和其他从事地下斗争的革命知识分子，最终是要被“淘汰”干净的。“反右”可说是毛泽东“淘汰”这些人的总策划中的一个环节。这个针对地下党的十六字方针，实质上主要是针对知识分子的，因为知识分子是地下党的主要构成。毛泽东根深蒂固的敌视知识分子思想是中共内部派系斗争的总根源。各地区地下党分别以“地方主义”、“反党集团”等名义遭到清洗。其中的领导干部，尤其被视为“心腹之患”。1957年8月，毛泽东在《1957年的夏季形势》一文中，提出“党内有纳吉”，就预示着反右斗争是包括党内领导干部的。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毛泽东举浙江沙文汉的例子。震慑原地下党

成员，并威胁周恩来，说他离右派只有五十步之遥。

四川也是地下党的一个重灾区。据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长、原地下党员张文澄生前在一次报告中说，全四川解放的时候有地下党员约12000名，解放后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大批大批受到错误处理，到80年代初，剩下不过2000人。张文澄也被毛泽东的宠臣时任西南局第一书记的李井泉打成右派，1979年始获改正。

四川地下党拥有大量党员及其领导的外围组织，并建立和发展了华蓥山武装斗争根据地。但在解放后、特别是重庆及四川各地区合并为四川省委之后，这支力量遭到连续不断的迫害，反右斗争就是大规模迫害地下党的一次运动。除了地下党老党员张文澄 1957 年被批为“右派反党集团”头子以外，地下党谢予、卢光特、赵隆侃等二十余人也被划为右派。这期间被划为右派的地下党领导骨干还有赵唯（1935 年领导云阳武装暴动、华蓥山武装起义后担任川东游击纵队司令员）、廖林生（原川南工委书记）、范硕默（原川东区党委领导骨干）等多人。

毛泽东借反右之机大肆排除异己

五十五年前席卷中国大陆的反右派运动，盖棺定论为一场整肃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的运动。五十五年光阴荏苒，根据当年受害者和历史学家挖掘出来的史料证明，毛泽东施展“阴谋”和“阳谋”的最终目的，如同以后反右倾机会主义、四清运动和文革一样，都是为了清理门户，排除异己，打击他认为尚未驯服的人，为谋求家天下扫清障碍。

中共党内揪出右派二十四万

反右派运动总共打出多少右派？从官方公开发布的五十五万二千八百七十七人至某些学者提供的三百多万，莫衷一是，尚待中共解密档案和考证，本文不作最终认定。为了叙述方便，采用二个比较数据，其一是官方明令宣布的右派分子五十五万二千八百七十七人；其二是周恩来于 1956 年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报告中提到当年全国小教以上知识分子共计五百五十万人。依照这二个数字，右派占知识分子总数已达十分之一以上。

1957 年 5 月 15 日毛泽东在《我对局势的几点看法》的党内指示中写道：

“看来党外知识分子中，右派约占百分之十五到二十，可能是保守的。党内知识分子约占百分之五到十。民主党派中右派可能高达百分之二十以上。高等学校中的右派也不会少于百分之十。”党内右派百分之五到十这个数字毛泽东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呢？且看看中共相关机构发布过的数据：

1957 年 6 月 29 日，中共中央发布的文件中写明：根据毛泽东的口头估计“全国大约有右派四千人左右。”

1957 年 7 月 9 日，毛泽东亲自起草的一份通知中说：“准确的骨干名单扩大了一倍，全国不是四千人，而是八千人。”

1957 年 9 月，中共召开八届三中全会时，全国已划六万余右派分子，当时毛泽东估计全国右派分子的数量是十五万人。

1958 年，毛泽东在汉口会议上说：“全国有右派三十万人。”

1958 年 5 月 3 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宣布：反右斗争取得阶段性胜利，定性为右派集团二万二千零七十一人，右倾集团一万七千四百三十三个，反党集团四千一百二十七个；定为右派分子三百十七万八千四百七十人，列为中右一百四十三万七千五百六十二人；其中，党员右派分子二十七万八千九百三十二人，高等院校教职员右派分子三万六千四百二十八人，高等院

校学生右派分子二万零七百四十五人。在运动中，非正常死亡四千一百七十七人。

1976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汇编的报告中说：“在整个反右运动中，有二百零一万三千三百余人被定为右派。有七万二千七百多人被捕，二万二千一百多人自杀，有三千五百多人非正常死亡和失踪。”

上列中共公开发表的数据表明，毛泽东的几次预测纯粹是毫无根据的信口雌黄，胡说八道。1978年，中共中央组织部、统战部等五部联合复查，确认全国只有96位“右派”未予改正，其余五十几万右派均为错划，获得了改正。说明毛泽东的所谓预测，纯属瞎扯。这些数字狠狠地打了毛泽东一个耳光。谁还信他的胡说呢？

1956年中共八大时有党员一千二百余万人。参照八大代表成份分析，百分之六十为工农，工农不划右。百分之四十可以划右的党员包括各级干部、知识分子、军官和其他阶层，约有四百八十万之众。根据毛泽东在反右前夕信口开河订下的指标——党内右派百分之五到十这个数字，约有二十四到四十八万之众。

1959年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发表的党内文件《县委书记以上受到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汇编》和1958年11月7日中共中央组织部红头文件《关于今后接受党员工作的意见》透露，自1957年6月至1958年6月，党员总数共减少二十七万。扣除自然死亡、划右以外的其他因素、因内控右派或中右而劝退或取消预备期的党员而外，分散在各行各业的党员右派总数在二十到二十四万左右，占五十五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名官定右派总数的百分之三十六到四十三。在反右派运动中受清洗党员数量之大、比例之高，正是中共至今依然秘而不宣、刻意隐瞒的原因之一。

1958年3月至9月26日在成都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在讲话中认为，党内反右运动“实际上是一次清党，一千二百万党员中，清除二十万，百把万，不算多。”毛泽东不是数学家，经济建设方面的数据搞得一塌糊涂。但在确定阶级斗争政治运动的打击指标方面，却自命为金口玉言。毛泽东订下的党内右派指标之二十万底线，由邓小平超额完成了。二十二年后复查证明均为扩大化，其中包含着多少无辜的生命和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惨剧，岂是轻轻一笔“扩大化”所能遮掩。

这个数据不包括党内划的中右分子和内控右派，他们受到的是开除党籍以外的其他党纪处分，对外保密，组织部门掌握。例如乔冠华和杨献珍，乔冠华时任外交部长助理，在鸣放中赞成实行美国国会两院制，外交部长陈毅说：“乔冠华是外交部右派的首领，是露骨的，彻头彻尾的反革命，足够定为右派。”但处理时上报中央书记处，批复仅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中共中央党校校长杨献珍起初一个右派都没有抓出来，刘少奇警告他：“我看你就像个右派。”中央书记处撤掉他的职，他只得让秘书马鸿模当了右派。他成了内控右派。刘少奇当了一阵子相面术专家，却没有看出毛泽东的奸诈之相，到头来落得个死无葬身之地。也算因果报应吧。

毛泽东借机清除党内异己，刘少奇无能为力

毛泽东搞阶级斗争政治运动的手段高明，善于打迂回战、包围战，清扫外围、攻其核心。反右运动从知识分子、民主党派、青年学生、社会基层开始。当群众发动起来外围扫清了，便逐渐将矛头转向党内，由下而上地指向高层。如果说毛泽东的真正战略目标在反右运动中尚算遮遮盖盖、避人耳目

的话，到了文化大革命便昭然若揭了，其目的只有一个，怕人“夺权鞭尸”。

反右运动可划分为鸣放、反击、补课、处理四个阶段，尤其要注意“反右补课”这个阶段，大多数党内高层右派是在补课中补出来的。毛泽东十分明白“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这个常理。他把反右运动最终打击目标定位在不听中央（毛泽东）号令的诸侯、地方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分子、打游击和地下党出身的原白区党内干部、有民主意识的党内知识分子，这些人可统称为党内民主（反对）派。

早在1956年11月，中共召开八届二中全会之际，毛泽东于14日晚间作了临时发言说：“东欧一些国家不断在政治上混乱，基本问题是领导层没有阶级斗争观念，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新老反革命没有搞掉，这方面我们要引以为戒——我敢说，我们党内也有阶级斗争。”原来毛泽东早已有在党内进行阶级斗争的打算。可是刘少奇不大同意毛的看法，急忙补充道：

“毛泽东同志讲话是他个人意见，中央政治局没有讨论过，会议要备案。”

1957年反右开始不久，毛泽东便急于借助社会上的反右运动清理门户，铲除党内隐患。他提醒亲信：“请各地注意党内的鲨鱼。”在7月28日《人民日报》社论《反右斗争是对于每个共产党员的重大考验》中，毛泽东明确指出有人是资产阶级右派的“内应”。同月在青岛举行的省委书记会议上，毛进一步挑明：“所有的人都要过社会主义关，某些老干部特别重要，其中有些人是过不去的。实际上这次整风在党内就是清党，但对外不说。”毛至此才明确了他对反右运动的真实企图。

毛泽东出巡亲定十大反党集团

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自1958年至1960年出版了内部发行的五卷本《关于清除党内的右派分子决定汇编》。其中披露党内行政十三级以上高干右派分子和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材料二百八十五份。除三十三份是1957年和1959年分别处理的个案以外，其余二百五十二份材料都是在1958年反右补课运动中判定的案子。即在1958年反右补课中，行政十三级以上党内高干中划的右派分子和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占总数的百分之八十八点四四。

在这二百五十二个案例中，省部级以上高干一百多人，有三十九个是集团性案件，即“右派反党集团”、“地方主义右派反党集团”或“地方民族主义右派反党集团”。他们之中有中央候补委员、部长、司局长、省委书记、省长、市地县委书记、中将、少将、大校，身居高位要津。难怪毛泽东惊呼江山变色。

用离京出巡鼓动地方诸侯，是毛泽东开展阶级斗争、利用政治运动排除异己的方式，直至文革末期寿终正寝。1957年底毛访苏归来，旅尘未除，便马不停蹄数度离京，至1958年3、4月间，共密访全国近二十个省市自治区，在各地挖出一大批“混进党内”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地方主义分子、地方民族主义分子、阶级异己分子。不论地位多高、资格多老，一律开除党籍，清除出党。被他在巡游中揪出的十大反党集团有：

以浙江省长沙文汉为首的沙、杨（思一）、彭（瑞林）、孙（章碌）地方主义、宗派主义右派反党集团；

以安徽省委书记李世农为首的李、杨、李、陈右派反党集团；

以甘肃省副省长、省委常委孙殿才为首的孙、梁（大钧）、陈（成义）地方主义右派反党集团；

云南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长郑敦、副部长王镜如右派反党集团；

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区党委常委陈再励为首的陈、王、骆、王、廖地方主义右派反党集团；

以青海省省长、省委第二书记孙作宾（极右分子）为首的青海省委右派反党集团；

河北省党委常委刘洪涛右派反党集团；

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热赛拉夫、常委伊敏诺夫为首的地方民族主义反党集团；

广东省委副书记兼副省长冯白驹、古大存为首的地方主义反党集团。

党内右派可分六类

按照党内右派的出身、职业和政治理念，可区分为如下几类：

第一类是中央和地方具有民主意识的、知识分子出身的高干。

浙江省长沙文汉，1925 年加入中共，主张党政分家，严格执行统战政策，被诬为“资产阶级政权观”“右倾投降主义”；

1932 年入党的监察部常务副部长兼党组书记王翰主持全国监察工作，反对用阶级斗争取代司法监察，反对制造冤假错案，也成了右派分子；

中宣部秘书长兼机关党委书记李之珪仗义执言，抵制批斗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这些人都受过高等教育，思想开明，被毛泽东视为异类，划为右派。

1955 年到 1956 年农业合作化高潮中与毛泽东唱反调提倡“包产到户”的中共浙江省永嘉县委副书记李云河与中共广西环江县县委副书记兼县长王定都是党内民主派代表人物，均为右派。王定死后环江人民在他坟头树起一块巨大石碑，上书：“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不屈不挠争民主的人民英雄”。这才是民众对昔日右派分子的评价。

第二类党内右派是遭到打击报复的不同政见者。

青海省委书记兼省长孙作宾二十年代入党，1957 年被划为极右分子，他的右派罪行仅仅是批评第一书记作风专横；

上海市委组织部部长周克和同济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薛尚实批评华东局书记柯庆施独断专行均被柯打为右派，酿成有名的“一霸事件”，“一霸”系指柯庆施；

重庆市委书记处书记张文澄不投李井泉的票被划为右派；成都团市委宣传部长黄一龙批评李井泉“一言堂”，也划为右派。这种对不同意见打击报复的后果是党内无人敢说真话，导至浮夸虚报盛行，造成饿殍遍野的“大跃进”。

第三类党内右派是白区武装斗争和地下党出身的干部。

南京地下党员二千多人，两次整党处理四百六十六人，开除二百零五人。地下党市委书记陈修良（沙文汉妻）是中共三大女谍之一，中共进城后一路降职，反右时任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代部长，划为极右；

江西省中共闽浙赣边区城工部一百二十七名党员因领导人出差错惨遭枪决，其中胡显中学生党小组五名成员连同入党介绍人全打成右派。

云南的滇桂黔边区纵队是共产党的公开武装力量，结果有 85%被打成右派。因为当地没有什么知识分子，他们就成了完成右派指标的牺牲品，也为军队转业干部的提升提供了足够的上升空间。

第四类党内右派是所谓地方主义分子和地方民族主义分子。

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指出：“反地方主义，全国都要进行。地方主义者，实际上是右派，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按照毛泽东指示，广东省反右运动重点是大反地方主义。全省揪出右派三万六千八百零八人，各级干部中有一万二千多人因犯地方主义错误而划为右派；中共云南省委书记谢富治在云南省委扩大会议上疯狂叫嚣：“要像挖山药蛋一样在地下党、边纵中挖右派。”谢富治仅在滇东北就揪出散布在昭通、鲁甸等十一个县市原边疆纵队地下党地师级、县团级右派干部二千多人。广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等省区都大抓地方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右派。

第五类是中共在意识形态文宣部门的各级领导。

从中央到地方几乎一网打尽。他们中有中宣部秘书长李之珪、解放军总政文化部长陈沂少将、人民出版社社长冯雪峰、浙江省文化局长黄源等人。

第六类是中共的枪杆子右派，部队共揪出三万多名右派。

军中反右以批判刘伯承、萧克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作为主线条。将军级的有代刘伯承受过的南京军事学院教官刘宗宽中将、长期潜伏在蒋介石身边的中共特别党员郭汝瑰中将、第一支进藏部队司令员兼政委范明少将、总政文化部长陈沂少将。毛泽东称萧克上将为“军中右派代表”，但未公开戴帽；总参谋长张爱萍也因受朱可夫事件影响而受批判。

在军队右派中蔡铁根大校长征干部出身，担任过彭德怀秘书，为刘伯承辩护而划为右派，文革中惨遭枪决；

全国特等战斗英雄邵喜德少校（蒙族）因批评苏联教官而划为右派。

朱镕基——党内右派的一类典型

据中共中央监委五卷本《清除党内右派汇编》和各地地方志披露，反右运动中从中央到地方揪出的右派反党集团有一百多个，党内右派二十多万人。1958年的反右补课运动实际上是中共建政后第一次大规模地用政治运动方式整肃党内民主派和反对派，清理门户。划为党内右派的，不论其地位高低、资格多老，从中央到地方，有的是具有民主意识、反对专制独裁；有的维护地方权益，挑战中央权威；至少是政见不同，他们应当都属于党内民主派。

这一场重大的党内斗争盖子几乎揭不开有多种原因，首先是中共将反右设定为历史禁区，不让触及纵深；其次强调内外有别，以组织纪律加以制约，使当事人和知情者不敢说出真相。右派改正后官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的态度颇具代表性。

在他担任国务院总理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有记者追问他1958年当右派的事。他闪烁其词地回答：“这一段经历对我的教育是很深刻的，但是也是很很不愉快的。因此我也不想再提这件事了。”党内高层右派的态度类似朱镕基，不愿再揭疮疤。而中共官方也竭力掩饰这段内斗历史。

邓小平在专门研究起用朱镕基时，问起朱是否正确对待自己的右派问题，举出邓自己历史上三次被打倒的经历，要求朱以事业为重，不计个人恩怨。朱当然心领神会，“夹着尾巴做官”。说了不少豪言壮语，蒙蔽民众。学费翻番、房价暴涨、工人下岗，才是他的“政绩”，也是他当政时造下的恶果。对于民众的质询，他一直讳莫如深，似乎都与他无关，先把儿子朱云来、女儿朱燕来送出国留学，然后安排朱云来（美国威斯康辛大学，修读大气物理科学）当了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朱燕来（加拿大雷吉那大学社会学硕士）任中银香港（控股）有限公司副总裁。朱镕基的行为基本代表党内右派干部的姿态，只顾捞取既得利益，还要装扮成清廉，糊弄百姓。

装模作样，竭力避免和阻扰他人揭这个历史疮疤。

五十五年前那场反右派运动，系由整肃知识分子和清党两部分组成，以整肃知识分子开始，以清党告终。其直接后果是引发了饿死三千七百余万人的大灾难。以河南省为例，揪出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后，在全省干部中大抓“小潘复生”，全省挖出右派七万多人，占全国右派百分之十五；党内右派干部二万三千余人，亦占全省右派百分之十五。河南省老百姓针对这两个百分之十五说，河南省的高产和卫星是用拳头打出来的。信阳地区右派抓得最多，共八千六百九十六人，占全省右派九分之一，饿死人也最多，超过 100 万。毛泽东的罪虐深重，不能轻饶。

九、论及反右不得不提

（1）郭沫若的丑恶表演

一百二十年前，四川省乐山县沙湾镇出了一个郭沫若，我在少年时期就知道了中国有这样一位鼎鼎大名的诗人。1949 年以后，读了他的一些作品，如《屈原》《孔雀胆》《棠棣之花》《女神》等等，感受到他激情澎湃、思维新颖、有强烈的爱与憎，有浪漫的恨与情。以后又了解到郭沫若不仅能诗善文，长于编剧，而且精通考古，擅于著述。是甲骨文研究的名家，古代史断代的权威，其书法也自成一派，潇洒清俊，刚中见柔，北京故宫博物院、中山公园和不少游览胜地多有他的题字。我那时还是无知的少年，虽然没有读过他的史学专著，更不懂甲骨文的奥妙，也不明白书法的精髓，但对知识渊博、涉猎甚广、著作颇丰的郭沫若，不由得萌生了一种景仰、羡慕、尊敬的感情。中共建国后，郭沫若头上的光环一个接着一个，文学家、诗人、剧作家、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书法家、学者和新诗的奠基人、历史剧的开创者、革命家、社会活动家等等，让人目不暇接。他被推崇为继鲁迅之后革命文化界的领军人物，蜚声海内外，使年幼的孩子们更增加了对他的崇敬。

1949 年 10 月 13 日，郭沫若出席了在中山公园音乐堂举行的少年儿童队成立大会。当他登上讲台发表演说的时候，我和来自各地的中国第一批少年儿童队员的代表们欢欣鼓舞得几乎沸腾起来，我们以能够见到大师级名人而骄傲。我们用心地聆听，他的声音婉转阴柔，带着浓重的四川乐山方言腔调，听起来有点含混不清，却可以感受到诗歌朗诵一般的抑扬顿挫，有时他提高了声调，忽而又拉长了尾音，给人一种无限的遐想。

中国少年儿童队队歌歌词出自郭沫若之手，由小提琴名家马思聪谱曲，那天郭沫若朗诵了这首歌词：我们新中国的儿童/ 我们新少年的先锋/ 团结起来继承我们的父兄/ 不怕艰难 不怕担子重/ 为了新中国的建设而奋斗/ 学习伟大的领袖/ 毛泽东…… 引来了热烈的欢呼和雷鸣般的掌声。中共执政初期，人们，尤其是幼稚无知的孩子们，对郭沫若是以名人相看的，甚至是某些人崇拜的偶像。我那时是个初中的学生，学识浅薄，1949 年和 1950 年社会活动很多，为了升学又不能耽误功课，所以没有很多时间看课外读物，尽管郭沫若的书我读的不多，但丝毫没有减弱我对他的敬仰。

1956 年中共吹响了“向科学进军”的号角；敲起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鼓点；祭起了“民主，自由”的大旗。

4 月 28 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看这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

5月2日，第七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进一步阐述这一问题：现在春天来了嘛，一百种花都让它开放，不要只让几种花开放，还有几种花不让他开放，这就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诸子百家，春秋战国时代，两千年前那个时候，有许多学说，大家自由争论，现在我們也需要这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

1956年5月26日，郭沫若邀请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在中国科学院和中国文联召开的会议上，作了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

随后，郭沫若在中国科学院发表演说：鼓吹“双百方针”，号召“大鸣大放”，宣扬“拆墙填沟”，倡导“广开言路”，俨然紧跟毛泽东的“新思维”。

1957年的五、六月间，郭沫若一次次发表谈话，赞颂“双百方针”的伟大意义，他还说：“由于政策执行上有了偏差，发生了教条主义和公式主义的倾向，影响了科学和文艺的发展。因此，我认为有必要由党来阐明正确的方针政策，一以克服偏差，二以解除顾虑；这样来促进科学和文艺的发展”（见《雄鸡集·关于发展学术与文艺的问题》）。

他以满腔的热忱准备认真听取群众对整党的意见，还在中国科学院举行的第三次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座谈会上明确表示：今后要经常跟大家采取谈心的方式，把彼此间的“墙”拆掉。并号召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家们积极参加整风，要大家四面八方来拆墙。

6月3日他率领中国代表团赴斯里兰卡参加世界和平理事会，6月22日返回北京。郭沫若略事休息，即凝神专注地留意、探询《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一文以后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当他确认毛泽东决意大力反右的政治意图以后，便在6月27日接受了《光明日报》的采访，发表谈话。第二天即以《拨开云雾见青天》为题刊载于《光明日报》。

郭沫若在文中说：“在一个短时期内，右派分子的种种谬论，曾经哄骗了一些人，引起了一些紊乱。但是，它只象一团团乌云，把太阳遮了一下。……今天已经是‘拨开云雾见青天了’。乌云消散，太阳更加光芒万丈……”

毛泽东看了这篇文章，当日即给胡乔木一信：

乔木同志：

郭沫若此篇，请《人民日报》全文转载，新华社全文播发。

毛泽东 六月二十八日

《人民日报》不敢怠慢，6月29日即全文转载，只是把题目改成了《乌云消散，太阳更加万丈光芒——郭沫若谈反右派斗争》。

那时国内反右运动已如火如荼，许多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连呼上了“言者无罪”的当。郭沫若在谈话中重点讲了“言者无罪”问题，他说：“可能还有人这样问：不是说‘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吗？怎么言者又有罪了呢？”

“实际上，答复这个问题很简单：‘无罪者的言者无罪，有罪者的言者还是有罪的’。”

我看了登载这篇文章的《人民日报》，不禁莫名其妙。“大文豪”郭沫若怎么满嘴胡言呢？

郭沫若以民主人士的身份对毛泽东所说的“言者无罪”作了流氓无赖式的诠释。他以科学院院长、文学大师之尊号如此回答，无异于公然替中共违背“言者无罪”的承诺找借口，或者说替毛泽东‘引蛇出洞’的‘阳谋’作

无理强辩。

假如他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有罪之言有罪，无罪之言无罪”，虽然是油腔滑调、避实就虚的外交辞令式回答，在语法上和逻辑上却还说得过去。他当时所说的“无罪者的言者无罪，有罪者的言者还是有罪的”堪称逻辑混乱、语法不通、界限不明。首先，何谓“无罪者的言者”，何谓“有罪者的言者”？由谁界定“无罪者”和“有罪者”？根据什么判定“有罪者”和“无罪者”？

“无罪者”的言必定无罪吗？辱骂、诽谤、造谣也无罪吗？“有罪者”喊共产党万岁是不是也有罪呢？郭沫若把“言者无罪”界定在主观随意认定的“无罪者”范围之内，而毛泽东又可以主观随意地把他不满意的人认定为“有罪者”，无论其言若何，皆为“言者有罪”，由此，在中国大开“以言定罪”的先河。毛泽东和郭沫若，一主一奴，配合的那样默契，实属沆瀣一气，一丘之貉。

过了几天，毛泽东为《人民日报》撰写社论，题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其中对因言获罪的右派作了这样的定论：“这种人不但有言论，而且有行动，他们是有罪的，‘言者无罪’对他们不适用。他们不但是言者，而且是行者”。在这里，毛泽东又进了一步，连言与行之间存在着区别也不承认了。这种强词夺理，霸道专横的论调和郭沫若的上述答记者问，堪称前后呼应，如出一辙。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有一段名言：言语并不构成罪体，它们仅仅栖息在思想里，有时候沉默不言比一切语言表示的意义还更多。所以无论什么地方如果制定了言语是罪体这么一条法律，那么，不但不再有自由民主可言，甚至连自由民主的影子也看不见了！

1957年，五千年文明古国“以言定罪”之风大开，数百万人被推入苦难的深渊。

郭沫若在出席了几次批判“右派分子”的座谈会后，更在文章中公开提出：“据我的看法，文艺界的现况，实在不是民主不够而是集中不够，不是自由太少而是纪律太少，不是个性不能发展而是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发展个性的统一意志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来……”（《向中国人民解放军看齐》，1957年7月31日《人民日报》）。

随后，郭沫若充当起“反右”的积极分子，在批判“右派分子”的大小会议上，坚决向“资产阶级右派”发起猛烈的“反击”。还赋诗一首（《纪念“七七”——用鲁迅韵》），表述了其反右之志：

右派猖狂蠢动时，温情那许一丝丝！已将率土成公物，竟有妖魔倒大旗。

毒草必须成粪壤，争鸣方好咏新诗。勿忘二十年前事，起舞中宵共振衣。

当时郭氏身兼多项要职，包括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等。但他又是所谓无党派民主人士。于是不少有分量的批判发言，都出自其口中或笔下。

郭沫若在反右运动拉开战幕后，非但多次主持高规格的批判会，更以斗士的身份直接上阵。例如对冯雪峰的清算，他知道毛泽东对冯雪峰颇为不满，对周扬宠爱有加，因而极力抬捧周扬，打击资格更老并且参加过长征的冯雪峰。在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上，抓住冯的历史旧账做文章说：“二十年前在上海分裂文艺战线，闹出两个文艺口号之争，完全是冯雪峰的作怪，今天被揭发了，而他却把责任全推在鲁迅身上去了。”（《人民日报》，57年9月28日）

在反右高潮中举行的一届人大四次会议上，郭沫若作了大会发言，题为《驳斥一个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这是针对民盟中央五月份的一份文件而发的，该文件名为《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由曾昭抡、千家驹、华罗庚、童第周和钱伟长五位科学家组成一个小组草拟后呈交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一共提了五个问题，仅仅是意见，并未公开发表。而郭沫若竟别有用心地称之为“科学纲领”，意在无限拔高，便于小题大做。

对于第一条意见，即“保护科学家”问题，郭驳斥曰：这显然是企图造成一种印象，我国科学家受到威胁，或者迫害，需要加以“保护”。事实上有人说过这样的话：“解放以来，中国知识分子遭了浩劫。”他们这样不顾事实危言耸听的目的，不外是想离间科学家同党和政府的关系，引诱他们走上错误的道路。郭沫若这番话确有分量，只是他所引的那句知识分子遭浩劫的话，并未出现于《意见》中，乃郭沫若移花接木，以坐实“危言耸听”这个断语。而且，原文说“保护”，并不是指受到威胁或者迫害的意思。只不过是一种特别强调的修辞手法，意思不过是格外强调保证科学家的工作环境和条件。其实，这个理念是周恩来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提出来的（《周恩来选集》下卷，171页）。周恩来说就是正确，民盟跟着提出就是错误。这是什么逻辑？

第二条意见提出，“不要主观地先行规定谁是领导、谁是‘火车头’，科学研究工作除少数必须集中外，应尽可能把研究工作去‘就人’，科学家在那里，研究工作就放在那里。”郭沫若称这就是“反对有计划有重点地发展科学工作，反对科学工作的统一领导，其结果就是要使我国不能充分利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来发展科学事业，就是要使我国科学工作长期停留在落后的状态”。堂堂科学院院长如此立论，这前提和结论之间有着怎样的逻辑关系，郭沫若没有说。

第三条主张“业务与政治并重。人民内部在培养机会上应一视同仁，对于有培养前途的青年都应当平等地看待。”郭沫若认为这是“企图以资产阶级虚伪的‘平等’观，在青年中进行挑拨和煽动，指望造成一部分青年对党和政府不满”。他用下面这段话阐述“无产阶级真实的不平等观”：“如果要‘一视同仁’，那倒真正是不平等了。先说工农学生吧，大家知道旧中国在反动统治之下，工农子女被剥夺了受教育，特别是受高等教育的权利。现在，反动统治已经推翻了，对于这个不合理的不平等的状况，难道我们不应该尽最大力量来加以改变吗？”在这里，郭沫若剑走偏锋，歪曲那几位科学家的原意，妄图以阶级斗争的邪说，压制人才。

第四条是关于社会科学的问题。意见书认为：“对待旧的社会科学应当是改造而不是取消”。郭沫若反驳称：“那种‘恢复’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主张，实际上是开倒车，反对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社会科学。如果按着这个主张去做，其结果是削弱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领导，而使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重新泛滥。”

第五条是指出：“在社会科学方面的另一偏向是往往把政策措施或政府法令当成客观规律”。郭在此次大会发言中未予批判，因为一时还没有想好怎样立论。两个多月后的9月18日，他在中国科学院召开的座谈会上这样批判说：“暂且不说党和政府的政策法令是体现着客观规律的，也暂且不说许许多多的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是把宣传解释党和政府的政策，作为自己光荣的职责的，现在我们只问问右派先生们，党和政府究竟在什么时候禁止过社会科

学研究工作者对客观经济规律进行研究呢？”（《人民日报》，1957年9月19日）。意见书上有的，郭沫若批判，意见书没有的，也要批判。郭在人代会的发言称：“党和政府的方针是：科学研究工作要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意见书中对于这点一字不提。”郭沫若据此断言：“意见书是一个彻头彻尾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科学工作纲领”。郭的话意味着，没有提到什么就是反对什么！郭沫若总结说：“这不是一个孤立的文件，而是章伯钧等右派分子企图夺取国家领导权，首先是文教工作领导权的阴谋的一部分。”（《人民日报》，1957年7月6日）

在7月14日中科院召集的座谈会上，郭沫若以主持人的身份，质问曾昭抡、钱伟长说：“你们身为科学院学部委员，唯恐中国科学院工作不陷于无政府状态，是何居心？”（《人民日报》，1957年7月15日）曾、钱二人欲辩无从，后来都被划为右派，成了著名自然科学家中的罹祸者。

郭沫若对社会科学方面学者的批判，更为粗暴、更加露骨。

他在中科院召开的座谈会上说：“中国共产党和一切马克思主义者对于现代资产阶级的反动的哲学和反动的‘社会科学’，包括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历史学等等，不论过去和现在，都只能采取原则否定的态度。但是资产阶级右派居然公开要求我们改变这种态度，并且用一切卑鄙的手段，来辱骂、诬蔑和丑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企图打倒马克思列宁主义这面战斗的旗帜，以便为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复辟，为资产阶级反动统治的复辟，铺平道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难道能够作丝毫的让步吗？”（《人民日报》，1957年9月19日）

他还批判了北大教授陈振汉，他说：陈振汉“秉承章罗联盟的意旨，首先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工作大肆攻击”，把这位经济学家在五、六月间和另外五名学者教授集会座谈后写成的《我们对于当前经济科学工作的一些意见》，说成是旨在夺权的大毒草。尽管陈振汉的文章尚未最后定稿，从来没有发表过。而且第二稿还表明了拥护六条标准、肯定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态度，还是过不了关。陈振汉被划为右派分子，剥夺了讲课和著述的权利，六十年代下放到江西鲤鱼洲农场劳动改造，直到1979年才重新回到教学与科研单位。

9月16日，郭沫若在文物界反右派的会上，对著名学者叶恭绰、宋文彬以及湖南的陈裕新进行了批判，说什么“革命的破坏是在所难免的”，“我看有很多城墙是可以不必保存的”（《人民日报》，1957年9月30日）。这是为肆意破坏文化遗产的行径辩护，也是落井下石，把提出善意批评者推入右派泥潭的罪恶行径。

今天看来，郭沫若的批判发言完全经不起推敲。但当时被批判者根本没有澄清和申辩的机会，郭沫若当年自然是大获全胜了，反右后，郭沫若即公开了重新入党的共产党员身份，随后一跃为中共中央委员。然而，历史是无情的，郭沫若在历史上留下了不堪回首的污点与笑柄，为世人所诟病，千载骂名是注定了的。

一个人如果出于信仰，对持异见者检举、揭发、批判，是可以理解的，也是无可非议的。不同理念的交锋，正是百家争鸣的一种形式。各引一端，崇其所善；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各据其理，相互诘难；允许各个学术流派发表见解，是促进学术繁荣的重要手段；允许各个政治派别宣扬主张，是推动政治开明的主要标志。

中国历史上不乏用暴力或权术爬上皇帝宝座的,这类昏君必然强调他们是真龙天子,只有他掌握了宇宙真理,他的信口雌黄也是圣旨,绝对禁止妄议。略有微词即被视作谋朝篡位,杀无赦。

毛泽东和中共高唱的所谓百家争鸣,实际上却是一家独鸣,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皇权霸道。

郭沫若对他人的所谓批判,并不是出于信仰和理念的差异,而是仰人鼻息、趋炎附势的丑态表演。

这位从1949年起即红极大陆、炙手可热的文联主席、科学院院长、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在1957年反右期间的表现,却令人齿冷。从那时起,他在我心中的偶像形象全然消失了。或者说演化成了一个跳梁小丑。

1979年我出狱以后,才有可能读到郭沫若更多的文章和相关史料,对郭沫若的认识逐渐深化,原来华丽衣冠掩盖的是个无耻文人。

郭沫若先后称颂过蒋介石、斯大林、毛泽东、鲁迅、江青、邓小平、华国锋等人,也抨击过蒋介石、江青、邓小平、鲁迅等人,他是没有固定信仰的。

1926年初他加入了有实权的国民党,充任蒋介石统率的北伐军总政治部中将副主任。1927年,时任(武汉)国民政府主席的汪精卫与时任(南京)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发生矛盾。武汉政府挟中央正统之威,颇占天时、地利、人和。在很多人看来,蒋介石背叛政府,面临政府军的讨伐,又在北上时受挫,不久就会身败名裂。如果在此时挺身反蒋,支持武汉政府,是将来在武汉政府中青云直上的大好机会。

郭沫若聪明有余,焉能不知。

于是,1927年3月31日,郭沫若在南昌朱德家中,写成讨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文章明确指责:“蒋介石是流氓地痞、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卖国军阀、所有一切反动派——反革命势力的中心力量”,是一个“比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张宗昌等还要凶顽、还要狠毒、还要狡猾的刽子手”。号召全国军民起来反蒋。郭沫若一面派人将文章送到武汉《中央日报》上发表,一面在南昌印成小册子广为散发。一时间郭沫若名声大振,俨然是工农武装的代言人,俨然是武汉政府的反蒋先锋。

《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发表后没几天,蒋介石在南京发动“四一二政变”,成立南京国民政府。汪精卫在武汉以国民党中央的名义发表通电:“蒋中正屠杀民众,摧残党部,甘为反动,罪恶昭彰。已经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开除党籍,免去本人所兼各职。著全国将士及各革命团体拿解中央,按反革命罪条例惩治。”并任命唐生智为东征军总司令,准备武力讨伐蒋介石。

此时,郭沫若辗转来到武汉,投奔汪精卫政府。令郭沫若意想不到的,作为反蒋功臣的他,却遭到了汪精卫的冷遇。原来,汪精卫与蒋介石在诸多观念上是一致的。他认为郭沫若与共产党勾结甚紧,因此也被视为另类。不久,汪精卫在武汉下令“清党”,解散工农武装。郭沫若见事不可为,乃掉头南下,于1927年8月4日回到南昌,参加了周恩来、朱德、贺龙领导的南昌起义。并经周恩来、李一氓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一所破旧的小学校里,宣读了入党誓词。

此后的局势,却令郭沫若徒唤奈何。在李宗仁、朱培德等人的斡旋下,蒋介石下野,武汉国民政府于8月19日宣布迁都南京,史称“宁汉合流”。南昌起义失败,郭沫若于1928年2月流亡日本。从此开始了长达十年之久的

海外生活，并与共产党失去联系。文革中，郭沫若的这段“脱党”经历被视为“叛党”。在他写的一首《水调歌头》词中，郭沫若还故作委屈地写道：“诬我前曾叛党，更复流氓成性，罪恶十分深……”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郭沫若从日本回国。周扬请他去延安，他拒绝了，陈诚邀他去武汉，他“立即命驾”。不仅如此，还托国民党元老吴稚晖通融，求见蒋介石。蒋介石不计“讨蒋檄文”之前嫌，于1937年9月24日在陈布雷的陪同下会见了郭沫若，郭沫若受宠若惊，“恭恭敬敬地向蒋委员长忏悔过去的罪过，要求蒋委员长饶恕他，他要献身党国，将功折罪……”会见后，郭沫若赶紧写了一篇《蒋委员长会见记》在报上发表，文章中对蒋介石大加颂扬，三次描写蒋的眼睛：“眼睛分外的亮”、“眼睛分外有神”、“眼神表示了抗战的决心”。

人们皆知郭氏有《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却不知此公还有《蒋委员长会见记》。《蒋委员长会见记》在大陆已经见不到踪影，《郭沫若全集》当然也不会收录。如果不了解宁汉分裂时期的史实，人们会误以为，郭沫若在蒋介石的统治之下敢于拍案而起，还是个很有血性的人物。岂不知当时郭沫若身在武汉阵营，绝无安全之虞，更无性命之忧。1937年之后，才真正是在蒋介石的统治之下，此时郭沫若只好见风转舵，摇尾乞怜地写《蒋委员长会见记》了。

抗战期间，郭沫若被蒋介石委任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住着国民政府划拨的房子（办公、居住两用，位于重庆沙坪坝区西永镇赖家桥，占地面积10190平方米，建筑面积1566平方米，建筑风格为清晚期四合院，穿斗结构，斜山式屋顶，小青瓦屋面。另在市中区凉亭子天官府八号有一栋砖木结构的老式三层洋楼，是为郭沫若的官邸）。郭沫若拿着国民政府发的薪水，时常与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周恩来、董必武等人和民主党派领袖人物张澜、沈钧儒等人以及国民党内高层人士冯玉祥、于右任等人来往，向蒋介石要平等、自由、民主、人权。先后在《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上发表各种稿件三百零二篇。1940年1月11日《新华日报》创刊两周年，郭沫若为其题词，写道：“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连话都不让老百姓说，那是很危险的事。反之，能代表老百姓说话的，那力量比长江大河还要浩大。”蒋介石知其为人，未予深究。

1949年以后，郭沫若被钦定为文化界的班头，享受着副委员长的待遇，居住在深宅大院。郭氏故居在北京前海西街十八号，清代乾隆年间这里是和珅的花园，咸丰、同治年间是恭王府的外宅，清朝灭亡后，同仁堂乐家药铺的乐松生寓居于此，中共掌权后，乐氏家人将此豪宅捐献。五十年代初作为蒙古驻华大使馆，此后宋庆龄曾在此短时居住。六十年代初，郭沫若、于立群从北京西四大院胡同5号迁入。它基本上仍是二进四合院结构，但是高大、宽敞、厚重、精美，远非一般四合院可比。院内有两重花园和一座假山，前院有一棵高大的银杏树，二进院中种植着腊梅和海棠，后院有葡萄和紫藤攀爬的藤萝架，朱红色的大门由警卫把守著，显赫非常。郭沫若在朱门之内可以尽享酒肉，却再也不敢在毛泽东面前提“平等、自由、民主、人权”，堕落成了卑躬屈膝，吮痛舐痔的奴才。

郭沫若的所作所为是瑕是瑜，纷说不一，好在历史摆在那里，也有不少鸿篇巨著论及其人，笔者不再赘述。只摘录这位大诗人写的几首诗词和部分名言，既可欣赏文豪的杰作，也可从中看出他是否有信仰，信仰的是什么。

（一）为斯大林寿辰所作《我向你高呼万岁》（摘录）

我向你高呼万岁，斯大林元帅，你是全人类的解放者，今天是你的七十寿辰，我向你高呼万岁。你的七十岁已经是地质学上的年龄了，已经是天文学上的年龄了，你已经活了七千亿万恒河沙数地质年，你还要活下七千亿万恒河沙数天文年。……原子弹的威力在你面前只是儿戏，细菌战的威胁在你面前只是梦呓，你的光暖使南北两冰洋化为暖流，你的润泽使撒哈拉沙漠化为沃土。（原载《观察》，1949年12月16日）

（二）赞颂毛泽东（四首）

1、天安门上红旗扬，毛主席画像挂墙上，亿万人民齐声唱，毛主席万岁万万岁，万岁万岁寿无疆。毛主席呀毛主席，你真赛过我亲爷爷。（郭沫若文选第十二卷第765页）

在这里，郭沫若把自己写成了毛泽东的龟孙子，倒真是一幅惟妙惟肖的自画像。

2、毛泽东的旗帜随风飘扬，人民欢呼声来自四面八方，来自帕米尔高原，来自太平洋，来自珠穆朗玛峰，来自鸭绿江。毛泽东的党，领导新中国胜利成长。万岁毛泽东，万岁中国共产党！（1950年作《工农兵歌唱七一》）

郭沫若在此大胆地称颂“毛泽东的党”，实为创举！毛泽东看了以后心里是怎么想的呢？无需问，从此后郭沫若不断地被冠以各种头衔，就知道毛泽东很喜欢这类阿谀。

3、泽及中华 十亿万人民皆被润

东升红日 五千年瘴气尽收之（嵌字对，作于文革期间）

4、在一万公尺的高空，在图—104的飞机之上，难怪阳光是加倍地明亮，机内和机外有着两个太阳！不倦的精神啊，崇高的思想，凝成了交响曲的乐章。象静穆的崇山峻岭，也象浩渺无际的重洋！《题毛主席在飞机中工作的摄影》

（三）《天外天归》满江红

1963年7月5日，邓小平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到莫斯科与苏联谈判。7月21日，代表团回国，郭沫若到机场欢迎，当场赋《满江红》一首，大肆歌颂反修战士邓小平。

天外天归，机场上，欢呼声壮。遥望去，红旗卷海，翻波涌浪。半月长谈争正义，四方公论明真相。枉心劳，颠倒是和非，狂哉妄。

白为黑，谁受诳？纸包火，何能挡！笑蠢才，自掘墓坑营葬。高树铭旌三叩首，跪参导弹孤哀样。有人民，历史转车轮，宣判状。

（四）《四海通知遍》水调歌头

1976年5月12日，同一个郭沫若写下了另一阕牌名为《水调歌头》的《四海通知遍》，点名道姓地大骂邓小平。

四海通知遍，文革卷风云。阶级斗争纲举，打倒刘和林。十载春风化雨，喜见山花烂漫。莺梭织锦勤。茁茁新苗壮，天下凯歌声。

走资派，奋螳臂，邓小平。妄图倒退，奈“翻案不得人心”。“三项为纲”批透，复辟罪行怒讨，动地走雷霆。主席挥巨手，团结大进军。（见1976年6月号《诗刊》）

（五）邓小平重新掌权时，他又积极写文章，极力赞美道：“邓副主席的讲话，我表示衷心的拥护和热烈欢呼。……”（1978年4月1日《人民日报》）

(六)《沁园春》“……中国的赫鲁晓夫，公然内在，铁帚无情定扫完……”，(1967年6月30日对“打倒刘少奇”的表态。)

(七)1967年6月5日在“亚非作家常设局”讨论会上当着中外众多与会者朗诵“口号诗”《献给江青》：

亲爱的江青同志，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你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你奋不顾身的在文艺战线上陷阵冲锋，使中国舞台充满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我们要使世界舞台充满着工农兵的英雄形象！……毛主席的光辉著作是我们永远的精神食粮，我们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学习白求恩那样高尚，我们要做新愚公，把帝修反三座大山投入海洋！毛主席啊，你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我们祝愿你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万寿无疆！

(八)毛泽东死后不久，“四人帮”随即就擒，此时全国人民欢欣鼓舞，饮酒祝贺喜讯，以“三个公螃蟹，一个母螃蟹”作为最好的下酒菜。郭沫若写了《水调歌头·大快人心事》(1976年10月21日首先发表于《解放军报》，11月1日《人民日报》转载)

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张。还有精生白骨，自比则天武后，铁帚扫而光。篡党夺权者，一枕梦黄粱。

野心大，阴谋毒，诡计狂。真是罪该万死，迫害红太阳！接班人是俊杰，遗志继承果断，功绩何辉煌。拥护华主席，拥护党中央。

他还有一首也是讽刺“四人帮”的著名诗歌。

江水泛滥，王八上岸；张牙舞爪，摇旗呐喊。

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四人在他的笔下，显然小丑无比。

1976年底，郭沫若又作一曲《东风第一枝·迎接一九七七年》，其上阙是：

战果辉煌，凯歌高唱，东风欣有主。梅花万树朝阳，铁骑干营迎曙。严经考验，新历史重整机杼。望前途曲折光明，迈出坚强脚步。

旧主子刚死，他又开始谄媚新主人，故有“东风欣有主”之句，一个“欣”字，勾勒其心情神貌，堪称活灵活现的奴才。这个新主人是“政坛过客”华国锋。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亡其鸣也哀。1978年，郭沫若一命呜呼了，临死之时说了什么呢？他说：“毛主席的思想比天高，比海深……”那时毛泽东已被掏出了五脏六腑仅剩了一个驱壳，郭沫若仍要装腔作势，不言善后，不敢哀鸣。愧对了“人”字，甚至也不如濒死的禽鸟。

有论者指出，郭沫若打压异见者，吹捧当权者，尤其对斯大林、毛泽东以及江青的阿谀奉承，简直匪夷所思，其目的为求自保。此言有一定道理，但郭沫若在人性泯灭的毛泽东面前却未能完全如愿。“批林批孔”时，江青在万人大会上当面羞辱他，他一再向毛泽东写诗，认错忏悔。更可悲的是，他的两个儿子郭民英[1]和郭世英[2]先后在1967年和1968年因不堪文革期间的暴力肆虐而死于非命。郭沫若闻讯后，一句话都不敢说，只有默默地坐在桌前抄写儿子的日记，一页又一页，一本又一本，他用那支茶褐色笔杆的狼毫抄写了整整八本。毛笔流下的墨或许就是为人之父的血，溷湿的宣纸或许就是爱子展开的生命。郭沫若死后，其第三任妻子于立群亦于1979年自缢去世。他和他的至亲落得此种下场，莫不值得后人深思。

郭沫若的话剧《屈原》中有一段婬娟怒斥宋玉的戏。婬娟发现学生宋玉有背叛老师的行为，就怒斥他说：“你这没有骨气的文人。”1949年后，郭

沫若丧失了人格和独立、再也不敢发表独到的见解，他成了政治的应声虫。他的观点，也完全随着政治气候的变化而变来变去，极尽阿谀谄媚之能事。他自己创作的那句台词，“你这没有骨气的文人”，用在他自己身上，倒是很合适的。如果考虑到他几十年玩世不恭的生活作风，伪善的行径，政治的投机，道德的堕落，给他一个日本式的名字，称其为“人品太次郎”，不甚为过吧。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在一个封建国家或者说跟封建相近的专制国家，大臣如果敢骂皇帝或者敢于直言相谏，并不单纯是这个大臣有多么大胆，多么正直，而是说明主宰这个大臣的皇帝宽厚仁德。比如说魏征和包拯，这两个人之所以敢于直言犯上，为民伸冤，是因为有一个比较开明、能够容忍他们，让他们存在的皇帝。某些历史小说以包拯或是魏征的政绩来说明皇上无能，未免失之偏颇。其实，中华五千年，代代都有魏征，都有包拯，只是皇上没有允许他们存在罢了。郭沫若在国民党时代敢骂蒋介石，说明蒋介石在一定程度上还有容人的雅量。如果说，郭沫若 1949 年以前还多多少少算得上是一个有点才气的文人的话，那么，郭沫若皈依中共以后的表现，实在只能是一个小丑式的奴才了。本来的大文豪，能够被中共改造成小丑，足以说明中共改造魔力的巨大。郭沫若 1949 年后种种卑劣的表现也不能完全怪他自己，原因在于巍巍中华已经失去了那种让人说真话、保持独立思想的土壤。或许这也算作笔者为郭沫若开脱些罪责吧。

附注

[1] 郭民英，1943 年生于重庆，是郭沫若和于立群的第四个孩子，颇具音乐天赋，六十年代入中央音乐学院，学习小提琴。1964 年的一天，郭民英将家中的一架盘式录音机带到班上，与同学一起欣赏古典音乐。有好事者写信给毛泽东，以阶级斗争观点反映中央音乐学院存在的“严重问题”。毛泽东确认“信是写得好的”并作了批示。由此郭民英陷入被批判的境地，两大罪名，一是炫耀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二是崇洋迷古。郭民英内心极为痛苦，1965 年春夏间，黯然神伤地离开了中央音乐学院。郭沫若夫妇望子成龙心切，为其另找出路，亲自登门，向总参谋长罗瑞卿求助。很快，郭民英去了一个经过挑选的海军部队。文革开始，批斗风暴愈演愈烈，郭民英极端恐惧，没有留下任何遗言，于 1967 年 4 月悄悄地结束了年仅 24 岁的生命。其时，自杀意味着自绝于人民。失去爱子的郭沫若夫妇伤心欲绝，可还要向中共组织交代问题，为“没有教育好子女”而检讨。

[2] 郭世英是郭沫若十一个子女中最受珍爱的儿子。1968 年 4 月 22 日，他被北京农业大学的造反派毒打三天之后，反绑着双手冲出三楼的窗户坠地身亡。是毒打致死后被扔出窗外？还是反抗凌辱，跳楼自杀？至今没有结论。那些作恶的当事人缄口不言，“伟光正”的党也置若罔闻，似乎什么事都没有发生。郭沫若的女儿和秘书在郭世英跳楼后 3 小时赶到农大，只见尸体伤痕累累，捆绑的绳索深深地勒进了肉里。

郭世英天资聪颖，颇有个性，善于独立思考。中学时曾与三五知己组织诗社，并与友人探讨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是不是阶级斗争？大跃进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毛泽东思想能不能一分为二？共产主义是否就是乌托邦？他曾对其母亲说：“你看看父亲青年时代的作品，他可以自由地表白自我，为什么我不行？”他二十六岁就结束了生命，他至死也不明白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要泯灭人性、压抑个性，不允许独立思考。

（2）邓小平是反右的操刀手

1957年的反右运动，是一场镇压知识分子的反文明运动，也是压制民主思想和践踏人权的专制主义运动。这个运动的策划者是毛泽东，最高层的执行者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罗瑞卿、周扬等。

邓小平当时身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总书记之要职。他与彭真（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法书记、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北京市市长）被毛泽东任命为中共中央反右领导小组正、副组长。邓、彭两人不遗余力，推波助澜地积极参与策划并具体领导、实施了围剿“右派分子”的政治阴谋。

毛泽东之所以选择邓小平为反右的挂帅人物是经过慎密考究的。

1930-1933年，毛泽东被贬期间，在瑞金担任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长的邓小平由于赞同推行毛泽东占领农村，割据山头的主张而受到排挤，因此和毛泽东形成了“患难之交”。

此后，邓小平一直是毛泽东最器重的一个人。

邓小平也是一个善于察言观色，对毛泽东极力吹捧，阿谀谄媚的人。早在1947年6月21日，邓小平见毛泽东在共产党内已位列九五之尊，在冀鲁豫一次干部会上的讲话中就说：“凡是自己思想与毛主席相抵触时，要无条件承认自己错了，因为历史证明毛主席是绝对正确的，没有一点不对；凡是地主与农民发生纠纷，不用调查，要首先承认农民是对的，地主是错的，这是立场问题，要无条件提倡。”（何方：《从延安一路走来的反思》，上册，第178页，明报出版社，2007年9月初版）

1952年，在成都担任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的邓小平镇反有功，奉调进京，担任政务院常务副总理和财经委副主任。

1953年邓小平在反对刘少奇、周恩来、薄一波的新税制风波中紧跟毛泽东。毛让他取代薄一波担任财政部长。

1954年，邓小平向毛泽东告密“高岗曾拉拢我一起拱倒刘少奇，我拒绝了”以显示其对毛泽东的忠心。从而掀开了打击“高饶反党集团”的序幕，由此被毛泽东视为亲信。

1954年4月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和组织部长。由此从政府工作转为党的工作。从而和毛泽东的接触更多，关系日益密切。

1954年9月任中央军委委员。

1955年4月任中央政治局委员。

1956年9月的中共八大，毛泽东亲自提名邓小平为政治局常委兼中央总书记。主持书记处工作。在毛的策划下，书记处控制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是一元化的权力中心。

从其进京后连续升迁，可以看出，反右前邓已深得毛的信任。毛泽东认为邓小平思想上最忠诚，政治上最可靠，行动上最得力，跟得最紧。文革期间邓小平虽然被打倒两次，但毛泽东始终没有像对待刘少奇那样开除他的党籍，没有置其于死地，盖源于邓小平与毛泽东本是一丘之貉。

1957年，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之一的邓小平，比较早地察觉了毛泽东整肃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的意图，对毛的“阳谋”心领神会，一狼一狈，可谓配合默契。

反右运动是毛邓的一次十分得意的合作，毛泽东出谋划策，邓小平指挥落实，把将近五百万人打成“右派分子”、“反社会主义分子”和“右倾分子”。

邓小平直到死也没有彻底否定中共的“反右”运动。

反右运动中还有一些“左派”人物，例如，周扬主持了文化部门的反右运动，李维汉操办了统战系统的反右运动。周、李是受邓小平指挥的，他们二人分别管辖一个系统、一个部门的反右运动，而邓小平则是全局性的，他操控全国各个系统、各个部门的反右运动。邓小平当反右运动领导小组组长，是身体力行的，积极主动的，殚精竭虑的。

邓小平在反右运动中是怎样表现的呢？

（一）积极执行引蛇出洞的阴谋

1957年4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4月11日晚，邓小平和陆定一、陈伯达、康生谈话。邓说：“我赞成放，放得尽些，才能让各阶级都出来表现。不放，怎样来辩论？放半年，不够，放一年。左派要有准备”。此时，离中共中央发布第一个整风文件《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还有半个多月，多数人还蒙在鼓里，邓小平窥测到了毛泽东的阴谋和阳谋，由他授意，让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胡乔木撰写了人民日报社论《为甚么要整风？》一文，为鸣放煽风点火。

随后他远赴西安、广东等地宣扬“双百方针”，鼓吹大鸣大放，实则为阴谋构陷，诱人入围。赵紫阳回忆邓小平到广东做整风动员报告时说过“放长线，钓大鱼”。

5月4日，邓小平以中央书记处名义发出《关于继续组织党外人士对党政所犯错误缺点展开批评》的指示，旨在为“引蛇出洞”设下陷阱。

1957年5、6月间，邓小平直接指挥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座谈会，密切关注民主党派和工商界代表人士的发言，搜罗编定内部参考，向毛泽东汇报情况。发现尚未入围的民主党派头面人物，责成李维汉等抓紧时间，设法让他们参加座谈会并发言。当时，《人民日报》和全国各大报纸刊登的“右派言论”大都来源于此。

继而中央书记处又在6月6日发出《关于抓紧时间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做收网前的最后诱惑。

6月8日，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指示。这时，中共中央已经明令“反右斗争”开始了，《人民日报》已经发表了《这是为什么？》。但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的这个毛泽东亲自撰写的《指示》还在诱敌深入。《指示》说：“请你们注意各民主党派中反动分子的猖狂进攻。要组织各个党派自己开座谈会，左中右的人都参加，正反两面意见都让其暴露，派记者予以报道。”“在高潮未落前，党报正面文章少登（可以登些中间派文章）。 ”

“高等学校组织教授座谈，向党提意见，尽量使右派吐出一切毒素来，登在报上。可以让他们向学生讲演，让学生自由表示态度。”

“最好让反动的教授、讲师助教及学生大吐毒素，畅所欲言。”（《毛泽东选集》第五卷432页）。

6月10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会后中央书记处发出《在反击右派分子的斗争中对人物应有具体分析》的指示。开始大力反右。

6月17日，邓小平以反右领导小组组长的身份作了《如何领导当前整风运动反右斗争》的报告；接着邓小平便在青岛举行的中共省市党委书记会议上，亲自部署全国的反右运动。邓所领导的中央书记处就是陷害右派的大本

营，而邓小平是这个大本营里的总指挥。

6月2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打击孤立资产阶级右派份子的指示》。文中说：前些日子，向工人阶级猖狂进攻的资产阶级右派，现在开始溃退了。我们必须认真地组织群众，组织民主人士中的左派和“中左”分子，趁热打铁，乘势追击，紧紧地抓住已经暴露出的这伙阶级敌人，实行内外夹击，无情地给他们以歼灭性的打击。我们务必在这场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中，粉碎已经暴露出的真正反社会主义、反人民、反共的右派的领导骨干。

7月7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批转《吉林省委关于高等学校反右斗争的情况》的报告。要求巩固成绩，扩大战果。

8月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继续深入反对右派分子》的指示。

《指示》指出，在深入反对右派分子的斗争中，现在一方面正向地县两级（在城市是向区级和大型矿基层）展开，一方面又必须在中央一级和省市自治区一级各单位深入地加以挖掘。要把登报的极右分子达到极右派的20%、30%、40%或50%，揭露他们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反动言行，使他们在公众面前出丑。

《指示》要求，对党内团内右派分子，只要是同党外团外右派分子政治面貌相同的，必须一视同仁，一律批判。该登报的，即应登报。

（二）极力扩大打击面

据陈伯达之子陈晓农编撰的《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一书记载：鸣放时期，毛泽东曾派陈伯达去北大看大字报，陈看后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反右领导小组报告说：“不值得大惊小怪，没甚么不得了。”而邓小平却在他主持的省市书记会议上说：“现在时间比金子还宝贵，要书记们赶快回去收集右派言论，否则晚了，收集不到了。”陈伯达听到“很惊讶”，他认为，人总会说错话的，这样收集，牵涉太多，“反右搞得那样扩大化，小平同志有很大责任”。

这段记载说明，一些不谙世事的青年学生，和一些书生气十足的教师，对共产党毫无戒心，相信了毛泽东要整风的鬼话。也说明邓小平之流对待少不更事的学生和埋头书斋的教师不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而是寻把柄、拿过错、抓辫子、找靶子，准备打棍子，戴帽子。邓小平的心理状态和毛泽东一样，就是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说的“他们讲的话越错越好，犯的错误越大越好”。邓和毛都是利用“双百方针”欲擒故纵，利用“大鸣大放”捕风捉影。利用“整风运动”挖掘尚未变成驯服工具、敢于发表异见的人士，张网捕之，聚而歼之。目的在于加强名曰无产阶级专政实际是个人独断专权的法西斯统治。

1957年9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一份题为《中共中央关于严肃对待党内右派分子问题的指示》。

《指示》说：随着反右派斗争在全国各地、各界的深入开展，党内的右派分子也更多地暴露出来了。据统计，已发现的党内右派分子约三万余人，其中多数是解放前后入党的，也有不少是一二年以上党龄的老党员。从党内发现出这些右派分子，是这次反右派斗争的很大成绩，对于党的巩固和纯洁，具有重大的意义。

《指示》严厉批评说：现在还有一些同志，在反对党内右派分子的斗争中，存在着比较严重的温情主义。对于同党外右派分子政治面貌完全相同的“党员”，往往姑息宽容，不愿意把他们划为右派，特别是对于一些应该划为

右派的老党员，更加惋惜、心软，下不了手。这是完全错误的。

《指示》指出：运动中，一个党员应否划为右派分子，应该同党外人士应否划为右派分子一样对待。党内右派分子有着“共产党员”的招牌，有较多的政治资本，因而也就容易欺骗、蒙蔽和影响群众。同时，他们又和党外的右派分子相呼应，相配合，从堡垒内部向党进攻，因而对党的危害就更加严重。党内右派分子的党龄愈长，职位愈高，对党的危害就愈大。因此，决不应该因为他们是党员而有所宽容，决不应该漏掉真正的党内右派分子。否则，不但不利于开展反右派斗争，而且对于纯洁党的队伍和提高党的战斗力，是尤其有害的。

反右运动在邓小平处心积虑，望风捕影的努力下，最后呈报给毛泽东的是五十五万余人，大大超出了毛泽东原来的估计，扩大了一百多倍！“八大”后刚刚上台的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急于要做出成绩，在反右运动中，深知毛泽东的意图是彻底消灭异见人士，因而挖空心思扩大打击面，妄图将存在自由民主思想的人士斩尽杀绝，达到党内党外、举国上下舆论一律，称得上是尽职尽责！刘少奇、彭真、周扬等也秉承毛泽东的意愿，亦步亦趋，与邓小平一起蝇营狗苟，乃至造成数百万人被打入另册的罪孽。

此时，中共中央尚未制定和公布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在全国已经划定了数十（百）万右派分子，即将发配到深山老林、大漠荒原，强迫劳动改造之时，才于1957年10月15日匆匆忙忙地发布了一个“中共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实际上是事后确认各地区和各部门划定的右派。

邓小平对中共党内的老革命、老干部一样心狠手辣，无情无义。将沙文汉、潘复生、陈再励、欧百川、王翰、杨思一、陈沂、丁玲、江丰、冯雪峰、艾青等定为右派份子，都是经过毛泽东指定，邓小平落实；或邓小平首肯，毛泽东确认的。陈沂被打成右派后，陈毅听闻，感到惊奇，毛泽东不久前才说过陈沂是左派，怎么成了右派呢？于是给总政治部主任谭政大将打电话。谭回答：“你不了解情况”。原来陈沂的右派也是邓小平指定的，谭政才敢顶撞陈毅，陈沂正是因为听到毛泽东的首肯以后趾高气扬无意得罪了谭政，而遭谭政报复的。

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作《关于整风运动工作报告》，以极左面目大力批判党内“温情主义”，斥责说：“现在还有一些同志，在反对党内右派分子斗争中，表现了较严重的温情主义，特别是对一些应该划为右派的老党员更加惋惜、心软、下不了手，这种情结必须加以克服”。

在反右运动的全过程，邓小平亲自指挥和部署反右战役，甚至哪些人划为右派他也要具体干预。

例如新华社的李慎之，早年投奔中共，在重庆新华日报社工作，建国后在新华社主编《参考资料》，供中央高层参阅。1955年，作为周恩来的外交秘书，李慎之陪同周恩来出席日内瓦会议，亚非会议。波匈事件之后，李慎之曾应召向毛泽东报告苏联批判斯大林后世界各国的反应，向毛泽东建议普及公民教育和宪法教育，还政于民，实行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反右运动中，有人欲将其打成右派，也有人不赞成，邓小平闻讯后，在一次会上说：“对这样严重的右派言论，新华社还有人说李慎之是位很有才华的好同志而不是右派分子。”斩钉截铁，一语定案。

据杜光先生在《中央高级党校的整风反右运动》一文中记载：57年8月23日，邓小平亲自主持国家机关党委、全国总工会和高级党校三个单位的整

风，督战反右运动，指定要把肖鲁等人划为右派，并批评高级党校在整风反右领导工作中的“右倾”思想。邓小平严厉地指斥说：“肖鲁的问题，你们第一次上报他的材料时，中央就批准把他划为右派，你们怎么现在还在犹豫？”“如果这样的人不划为右派，党内就没有什么右派了。”“这样的人不搞出去，他就不知道怎样才象一个共产党员。”

经过 1957 年的反右运动，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已经有数十万人。1958 年春天，邓小平还一再警告说，目前的问题是存在“姑息养奸，养痍遗患”的右倾保守思想。因此，搞了一次“反右补课”。有些单位规定了右派分子的数额，没有达到规定标准的，要增加新的右派，完成任务。又有不少人在反右补课的战略安排下成为右派。著名翻译家傅雷等人就是这样“补”成右派分子的。

这段史实再次印证，反右扩大化的直接责任者就是邓小平。

近日看到“乌有之乡”等网站和某些作者的文章，把反右的错误完全推到邓小平和刘少奇身上，说什么毛泽东只想划几千名右派，邓小平、刘少奇等人把这个数字扩大了一百倍。显然，这也是有失公允的。邓小平和刘少奇以及周恩来、彭真等人在反右运动中固然也作恶多端，邓小平任意扩大打击面，刘少奇在 1958 年 5 月 5 日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率先将右派分子同地主、反革命并入一类，简称“地、富、反、坏、右”实行专政。但从总体上说，他们是听命于毛泽东的，是看毛泽东的眼色行事的。五七年的反右派运动是毛泽东蓄谋已久一手策划的，并且是全程操控，事无巨细咸决于毛。邓小平彭真等俱是毛泽东的功狗，看主人的眼色狂吠乱咬。

整个反右运动都是在毛泽东密切关注下进行的，有些人被划为右派还是他钦点的。毛泽东表面上说过许多“宽仁厚德”（应该叫口蜜腹剑）的话，例如他说：对清华大学那个扬言杀几千几万人的学生（机械系焊接专业学生武天保，后来查明所谓杀人之说纯系误传，就如同给葛佩琦妄加“杀共产党人”的罪名一样，属恶意陷害）不要开除等等（《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355 页），毛泽东还在多种场合说：谭天荣、林希翎等也宜留在学校，让他们继续读书，做反面教员。继后的事实证明，谭天荣被送往北大荒兴凯湖农场劳动教养；林希翎以“反革命分子”之罪名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先后在北京草岚子监狱、浙江省蒋堂劳改农场关押。北大与清华的数百名年轻学子，多数都被送去劳教、劳改，受尽了迫害与折磨。至今仍活在世上者鲜矣。

1957 年 6 月 29 日，由毛泽东拟稿、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的《关于争取团结中间分子的指示》中还说：

一、对于那些仅有右派言论，但并无右派行动的那些人，应把他们和既有言论又有行动（许多人还有历史上劣迹）的那些极右派加以区别，在对前者进行批评的时候，要完全采取说理和与人为善的态度，不要轻率地扣以右派的帽子。这样做，对于安定和争取、团结中间分子，对于打击、孤立和分化极右派，都是十分必要的。

二、右派和极右派的人数，以北京三十四个高等学校及几十个机关中，需要在各种范围点名批判的，大约有四百人左右，全国大约有四千人左右，你们应当排个队，使自己心中有数。

毛泽东说的这些话可信吗？1957 年 6 月下旬，光是北京大学就揪出了八百余名右派分子，清华大学也划了五百七十多名学生右派，毛泽东对此是了如指掌的。他说的那些对青年学生“宽大为怀”的话和他说过的许多话一样，

是骗人的。反右或者说反民主运动的罪魁祸首非毛泽东莫属，邓小平、刘少奇、彭真等人虽然也做了很多坏事，参与迫害了成千上万的善良百姓，但相对毛泽东而言，他们只能是为虎作伥的帮凶，邓小平是帮凶之首。

（三）残酷迫害知识分子

邓小平很清楚，毛泽东借整风之名发动反右派运动，其真实目的是消灭有碍独裁专政的民主人士，因此顺承毛泽东的意志，主张应将高层的、有影响的右派分子抓到监牢里去，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1957年下半年，邓小平主持过一次重要会议。此时，反右斗争已取得“重大胜利”。会议的主题是讨论对重要右派分子的处理办法。右派分子中有一些很有影响、地位很高的人。如：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三个部长；黄绍竑、龙云两个民盟副主席；费孝通、钱伟长等著名科学家；陈铭枢、黄琪翔等知名人士；以及谭天荣、林希翎等学生领袖。中共中央书记处列了一个名单，一共六十四人，邓小平和彭真主张逮捕法办，毛泽东没有核准。毛泽东不是心存宽厚，也不是不想把这些右派分子斩尽杀绝，而是更加老谋深算。毛泽东采取的办法是，对民主党派的头面人物政治上扫地出门，留几个活靶子，儆示民众，让人们噤声。对多数右派分子送劳动教养或发配到边远地区劳动改造。把一切“不安定”的因素，封闭起来，禁锢起来。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让他们在艰苦的环境中身心交瘁，不疾而亡，实际也是这样执行的，1978年粗略统计，昔日之右派尚存活于世者不过十之二三。实践证明，这是更阴险、更残酷的惩罚。

1957年下半年开始，大量右派分子被关进牢狱之中，或者类似监狱的劳动教养场所。如北京的清河农场、团河农场；甘肃荒漠中的夹边沟农场；北大荒冰天雪地的兴凯湖农场；四川省大小凉山的数十个农场、硫磺矿、石棉矿、铅锌矿。大批的右派分子在接踵而至的大饥荒中活活饿死在监牢里，饿死在劳教农场里。相当多的人被关在监狱或劳教场所，长达二十余年，超过了有期徒刑的法定最高年限，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食不果腹，衣不蔽体，苟延残喘地在深山、荒漠服苦役，惨死者不计其数，直到毛泽东死了以后，侥幸存活的右派分子才得以重归社会，昔日的莘莘学子已两鬓灰白，当年的社会精英已皓首弓腰。

夹边沟，是甘肃酒泉境内巴丹吉林沙漠边缘一个昔日的劳改农场，1957年10月至1960年底，这里关押了甘肃省三千余名右派。在天寒地冻的沙漠中，他们与世隔绝，承受着罕见的大饥荒，还要终日劳作。为了生存，几乎吃尽了荒漠上能吃的和不应该吃的所有东西，有的不得不吃有毒的蜥蜴，有的吃拌了农药的麦子，结果纷纷中毒而死。更多的右派是因长期饥饿而患浮肿病而死。有的右派分子脸肿得眼睛都睁不开了，腿肿得穿不上鞋了。“每天晚上入睡的时候，谁也不知道明天是否会醒来，”由于极度饥饿和虚弱，大都在睡眠中死去，没有呻吟，没有呼唤，一点痛苦的挣扎都没有，就静静死去了。1960年的冬天，夹边沟右派们陷入了生命的绝境，反右运动的余波中出现了最惊心动魄的一幕：幸存的右派撕开死了的右派的身体，取出他们的内脏，因为这些先死者实在瘦得皮包骨头，一点肉也找不到了。三年时间里，饿死了大约百分之八十。（以上参见杨显惠著《夹边沟记事》）

进入东北兴凯湖农场的右派分子的命运同样凄惨。五十年代，全国政权更迭的时候，巫宁坤正在美国读博士，出于国内的邀请和对祖国建设的热情，他放弃了美国比较优厚的生活，回国为国家效力，结果却不断地受到怀疑、

批判，最后被打成右派，又被抓进了监牢。他后来辗转到北大荒农场，侥幸活了下来，改革开放后到了美国，写过一本回忆录《一滴泪》。这本书记载了兴凯湖农场的右派们如何在天寒地冻下沉重地劳动，大饥荒年代右派们又如何一个个饿死倒地。作者那时也患上了浮肿病，生命如游丝。幸运的是，他的妻子、他的全家，千方百计地收集食物，辗转送到肃寒凝地的农场，救生命于垂危，使他度过了饥荒，而与他一起的许多右派就永远地长眠在那块荒凉的土地上。

全国更多的监狱、劳改队、和劳教场所的右派，大批地饿死在那个饥饿而专制的年代。他们的凄惨命运，是毛泽东、邓小平大力反右、将右派收监、实行法西斯专政造成的。

成百万民族精英被打成右派分子后，亲属受到株连，一人受难，全家遭殃，累及父母子女、甚至株连九族之外的亲朋好友。清华大学著名教授钱伟长的几个子女皆因有个右派父亲而被大学拒之门外，其他人的遭遇可想而知。二十余年，人生有几个二十余年呢，妻离子散、家败人亡的惨剧，无计其数。毛邓的罪恶罄竹难书。

在世界文明史和专政史上，毛、邓操控的反右运动之残酷，可以说是史无前例。

（四）拒不承认反右错误

反右运动结束二十多年后，面对社会各阶层人士的强烈要求，胡耀邦等顺应潮流，提出给当年的右派平反时，邓小平仍然顽固不化，他说：“1957年的反右是必要的，没有错。只是在各方面的压力之下，才模棱两可地抛出了“改正”这个词汇。试问，既然没有错，改正什么呢？

1980年1月6日他在中共中央会议上还坚持说：“另外我想提醒一下，1957年反右斗争是必要的和正确的，简单地说，斗争本身没有错，问题是它过份扩大化了”。

邓小平的女儿毛毛（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也回忆道：“父亲始终认为，不能说整个运动是错误的。”邓小平对反右的“保留态度”不能简单地归咎于他“刚愎自用，推脱错误责任”。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在政治上和毛泽东是沆瀣一气的，根深蒂固地迷信独裁专制，将人民群众的善意批评看作是对自己统治权力的挑战和进攻。所以抵死不认错，没有丝毫负咎感。

多年以后，邓仍念念不忘其在反右中的‘政绩’。他说：“1949年到1957年，我们用八年时间基本上完成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入社会主义。这个时期出来一股思潮，它的核心是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的领导。有些人是杀气腾腾的啊！当时不反击这种思潮是不行的。问题出在哪里呢？问题是随着运动的发展，扩大化了，打击面太大了，打击的分量也太重。”“但是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1957年不存在反社会主义的思潮，或者对这种思潮不应该反击。总之，1957年的反右本身没有错。”（《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3-244页）

邓小平少年时期曾赴法国勤工俭学，但却毫无民主意识。当时他只有十六岁。小学毕业才上初中，到了法国以后只在法国西部边陲小镇学了五个月法语，远没有达到独立阅读法文原著的水平，更无需侈谈读马克思原著了。没钱了，不得不辍学打工，入了瘪三赤佬之流。后来自称当了第二代领导人的核心，他一会儿反自由化，一会儿批精神污染，一会儿赶这个总书记下台，一会儿扶那个总书记上台，一会儿下令派野战部队不惜一切代价对天安门广

场手无寸铁的学生“清场”……。他什么时候发扬了一点社会主义的民主呢？始终没有。（国内搜狗网站收藏多篇邓小平等人赴法勤工俭学的文章，可以一阅）。

尽人皆知，反右运动与文革运动，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严重灾难，造成了重大损失，理应全盘否定。

邓小平，作为反右运动与文革运动的风云人物，对这两场运动却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在文革运动中他是受害者，其家人也遭到了迫害，邓小平对他自家带来苦难的文革自是深恶痛绝，因而予以彻底否定。虽然他给毛泽东写了书面保证，声称“永不翻案”，在毛死了以后，却要冲破那个禁区，反对两个“凡是”，打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旗号，摘掉了“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帽子，窃取他人的工作业绩于自身，加冕为“总设计师”。反右运动中他是领导者，和毛泽东一同策划了阴谋和“阳谋”，具体执行了残酷迫害知识份子的政策，邓小平是先锋是主将，整了许多人，害了许多家庭，他对给众多知识分子带去苦难的反右运动坚决肯定，同样的生命，同样的迫害，同样的苦难，同样的悲哀，邓小平出于维护个人的威权和政绩，对反右运动执意肯定，对反右的恶果漠然置之，只轻描淡写地承认有些扩大化。毛泽东死了以后，邓小平成为中共的实际领袖，传承独裁统治长达二十年，其流毒至今没有肃清，其罪孽至今尚未清算。

根据邓小平构建的框架，中共中央有关部门“英明”地留下了五个右派分子不予改正，维持原来的右派结论。这五个右派分子是，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彭文应，陈仁炳。北京三个，上海两个，均为中国民主同盟盟员。这五个右派分子的存在，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妄图用它证明反右运动是正确的，必要的，你看，不是还有五个货真价实的右派分子吗？留下这五个人不予改正，还在于用它证明领导反右运动的邓小平也是正确的，晚年的邓小平企图用这个不能成立的理由掩盖真实的历史，推脱罪责。对这种掩耳盗铃、自欺欺人的做法，群众是不能接受的，世人皆曰欲盖弥彰，邓小平弄巧反而成拙。

后来对反右运动的所谓改正，只是个体的摘帽、纠错，对整个运动，没有彻底否定。而且对经历二十余年磨难的受害者不道歉，不赔偿。其根源就在于邓小平的“必要论”、“正确论”。

中央制定了方针，地方的党棍群起效仿，全国一共留下了九十六名不予改正的右派，当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的右派都划错了，全国只剩下九十六名时，依旧坚持“反右是必要的，正确的”，只是扩大化了，难道可以取信于民吗？！

耐人寻味的是，邓小平在反右斗争中立下了汗马功劳，1957年春夏之际，由他拟定和发布的文件像雪片一样飞来飞去，由他制造的冤案遍于国中，然而，他在世时编纂的《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竟未收录《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等一系列反右期间的得意之作，似乎烜赫一时的中共中央反右领导小组组长未曾介入反右运动。中国从来没有反右。此举再明白不过地透露了邓小平做贼心虚、不敢面对历史责任、妄图掩饰其罪恶的卑劣心理。历史是无情的，邓小平无论怎样遮掩，必将被历史记录在案，他逃脱不了历史的审判。终将认定他是法西斯式专制独裁的乏走狗。

（3）从法律角度审视“反右”

在中国大陆，一切违法行为，按规定是由公、检、法依照国家法律查处的。而右派则自始至终都是由中共各级党委依照党中央的文件和毛泽东的指令查处的。根据这一事实，我们站在国家法律和依法治国的立场上，重新审视半个世纪前的反右斗争，不难揭示出诸多‘令人发指、无法无天’的问题。

1、任何政党无权踢开国家公、检、法职能部门直接惩处公民，这是古今中外所有政党一致公认必须遵守的准则，中共各级党委直接给公民以戴右派帽子和列为专政对象的惩处，是违背这一准则的。

2、中共党章规定，党对党员的最高处分是开除党籍，党章并没有规定党具有直接惩处公民的职能，中共各级党委直接给公民以戴右派帽子的惩处，被视作黑五类。是违背党章和国法的。

3、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未曾授予中共司法特权、中国也没有哪部法律赋予中共直接惩处公民的权力，中共各级党委直接给公民以戴右派帽子的惩处，是无法可依、违背法律的。

4、世界上任何政党都无权直接惩处另一政党的成员。中共和各民主党派都应该是政治上平等、组织上独立的政党，是兄弟党，不是父子党。中共各级党委直接给各民主党派成员以戴右派帽子的惩处，是违背组织原则的。

5、原本无罪无错的公民，被强行打成右派，并强制送劳动教养，监禁，劳改，剥夺人身自由长达 22 年之久，是违背宪法、践踏法律的行为。公民的人身自由是受到国家法律保护的，公民未经法定程序的审理，即行剥夺人身自由，是非法拘禁，也可视为政治压迫。

6、原本无罪无错的公民，被强行打成右派，剥夺人身自由长达 22 年之久。经复查后确认无罪，予以改正。恢复名誉、恢复工作，但只给工龄，不给工资，辛勤劳动 22 年，不给一分钱报酬，是违背宪法规定的按劳取酬的原则的。

7、全国有五十万余人被打成右派，1978 年复查后确认除 96 人外其余均为错划，予以改正。也就是说错划的占总数的 99.99%（数据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和事件的回顾》，下卷，619 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3 年版）。而邓小平却无视这一反右斗争出错率在 99.99% 的客观事实，信口雌黄、臆断认定，反右斗争本身没有错，仅只是“扩大化”而已。这既违背实事求是原则、又背叛唯物主义精神。

8、1957 年毛泽东第一个以《人民日报》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的名义公开揭露章罗（反党反社会主义）同盟。1980 年 6 月 11 日，中共中央确认当时章罗同盟并不存在（详见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关于爱国人士中右派复查问题请示报告〉的通知》）。这足以证明，所谓章罗同盟纯系捏造。捏造罪名属于诬陷，是违法犯罪的。必须依法追究毛泽东的罪恶。

综上所述，反右斗争全错、非法、违宪，决不是什么‘扩大化’。认真分析，“反右”违法之处颇多，中共当局口头上说依法治国，实际上对“反右”之违法置若罔闻。焉能取信于民。

十、三百多万人被划为右派分子

什么是“右派”？资本家、地主、工人、农民等等，可以根据资产多少和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确定其身份，而右派，只是根据他们的一两句话，甚至是强加上的被歪曲的言论，就粗暴地断定他们对共产党的政治态度，并据此确定其政治身份，而且不容申辩，不经核实，不许质证，无需法律认定。

一旦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即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政治贱民，这在全世界也是没有先例的。这是毛泽东臭名昭著的创举，是法西斯统治的罪恶之一。

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曾大谈所谓鲜花毒草，而且举了马克思、哥白尼、伽利略、达尔文等人为例，概括为“新东西，新生力量要被社会承认，是要经过艰苦奋斗的。”鼓励或煽动人们“大鸣大放”。

在篡改后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他列出了“六条标准”。但跟着说：“提出这些标准，是为了帮助人民发展对于各种问题的自由讨论，而不是妨碍这种讨论。”还说：“不赞成这些标准的人们仍然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见来辩论。”可见这不是划定右派的标准。

对于如何划分右派，毛泽东没有给出一个界定，中共中央没有给出一个界定，全国人大常委会也没有给出一个界定。可是从1957年6月8日开始（中共内部文件是从5月15日起部署反右），全中国，从北京到省、地、县各级都掀起了围剿“右派”的运动，大张旗鼓，烈烈轰轰，昏天黑地，草木皆兵。当数十万、上百万计的人在毫无法律准则的情况下被打成右派之后，中共中央于1957年10月15日，也就是围剿右派分子五个月以后，才下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规定“凡言论、行动属于下列性质者，应划为右派分子”。

标准一共六条：

1、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城市和农村中的社会主义革命，反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关于社会经济的基本政策（如工业化、统购统销等）；否定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坚持资本主义立场，宣扬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剥削。

2、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民主集中制。攻击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和人民政府的外交政策；攻击肃清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否定“五大运动”的成就；反对对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改造；攻击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人事制度和干部政策；要求用资产阶级的政治法律和文化教育代替社会主义的政治法律和文化教育。

3、反对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反对共产党对于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的领导；以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党为目的而恶意地攻击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员、污蔑工农干部和革命积极分子、污蔑共产党的革命活动和组织原则。

4、以反对社会主义和反对共产党为目的而分裂人民的团结。煽动群众反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煽动工人和农民的分裂；煽动各民族之间的分裂；污蔑社会主义阵营，煽动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之间的分裂。

5、组织和积极参加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的小集团；蓄谋推翻某一部部门或者某一基层单位的共产党的领导；煽动反对共产党、反对人民政府的骚乱。

6、为犯有上述罪行的右派分子出主意，拉关系，通情报，向他们报告革命组织的机密。

就凭这样一个没有任何可操作性的文件，笼而统之的标准，没有年龄的上限下限，没有任何限制条款，更没有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和授权，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就划定了数十上百万右派分子。并被专政了二十余年，超越了有期徒刑的最高年限。

最为滑稽的是，后来确定是否“错划”、是否“改正”的时候，据说也是按照这个标准。

下面举几个如今已成为历史的真实例子，看看右派是怎么产生的：

1957年10月11日，北京市文联在团中央礼堂召开批斗青年作家刘绍棠的大会，邓友梅上台发言，他能言善辩，语音铿锵，加上自身欲挣脱罗网的潜意识，对刘绍棠违心的批判相当出色。当他红头涨脸，嘴巴离开麦克风迈步下台，台下响起掌声时，市文联秘书长田稼突然向台下黑压压的群众高声宣布：“同志们！不要为他鼓掌，不要被他的假象欺骗，他——他也被划为右派分子了！”，众皆愕然。（见从维熙著《走向混沌》）

1957年7月1日，民盟北京市委在北京市西单的长安大戏院召开“反右”动员大会。会议主持人是民盟北京市委主委吴晗。知名建筑材料专家黄大能参加了会议，他在单位一直是先进分子，正在积极地向党组织靠拢，准备加入中国共产党，自然要关心政治。吴晗作了动员报告以后，当场宣布民盟内部“罗隆基反党集团”的名单，费孝通、曾昭抡、潘光旦、浦熙修……大家摒气息声地听着。读完后，吴晗转身准备回到自己的座位。完了吗？可以松口气了吧。就在这一霎那，吴晗又转回身，对着话筒大声说：“还有一个——黄大能。”于是乎，黄炎培的儿子原本是入党积极分子的黄大能，从天上一下子坠入了深渊，也成了右派。（肖伟俐著《大家风范》，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0年1月22日）

在那个是非不分、诡辩泛滥、强词夺理的年代，随便说一句话，都可以上纲上线到反对共产党。比如，一个人说：“希望今后加强党的领导”，这话无可非议吧？但是，那些安心给人戴帽子的文痞却说：今后加强党的领导就是影射现在党的领导无能、无力，实质上是否定党的领导。划个右派理由充足得很吧。1957年多数右派就是这么来的。显而易见，反右运动是极端荒谬的，是严重违反宪法、践踏法治、视人民政治权利为儿戏的反民主行为！

1957年究竟打了多少右派？至今已五十五年了，仍然是说法不一。

从1957年反右以来，有如下说法和纪录：

1957年6月29日，中共中央《关于争取、团结中间分子的指示》中根据毛泽东的口头估计说：“全国大约有右派四千人左右。”

1957年7月9日，毛泽东亲自起草了《中央关于增加点名批判的右派骨干分子人数的通知》中说：“准确的骨干名单扩大了一倍，全国不是四千人，而是八千人。”仅仅过了十天，毛泽东“高瞻远瞩、洞察秋毫、科学预见”的右派数量翻了一番，还说这是“准确”的。（笔者注：毛泽东说的头一个数字四千是泛泛的右派总数。后一个数字八千指明了是右派骨干。如果不是信口开河的糊涂虫能这样胡说八道吗？当时他还没老得不堪呀）

1957年9月，中央八届三中全会时，全国又划了六万二千多人为右派分子，当时毛泽东估计全国右派分子的数量是十五万人。接着又向各地发出划右派的百分比指标。

1958年，毛泽东在汉口会议上说：“全国有右派三十万人，把三十万右派搞臭了！”距毛泽东当初说的四千人不到一年的时间，右派分子的数量增长了七十五倍。

1959年9月，中共中央《关于摘掉确实悔改的右派分子的帽子的指示》中说：“……全国揭发出右派分子约四十五万人。”

1960年9月17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组织部和中央统战部《关于右派分子工作的几点意见的报告》中说：“……在全国四十四万名右派分子中……”

1962年，中共中央发了一个[1962]544号文件，其中说“……不经过中央和省委批准，不得再划右派”。

由此可见，反右一直未停，一边揪斗，一边处理，一边给极少数人摘帽，一边继续抓“右派”。四五年间究竟抓了多少右派，无人能够说清，中共中央也不愿意说清。

1976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汇编的报告中说：“在整个反右运动中，有二百零一万三千三百余人被定为右派。有七万二千七百多人被捕，二万二千一百多人自杀，有三千五百多人非正常死亡和失踪。”

1979年，中共中央批准中央五部门《关于继续执行中央[1978]55号文件几个问题的请示》中说：“……至七月中旬，属于错划已经改正的有493,000人，占所划右派的89.95%。”按此推算，百分之百应该是：548,111人。

1979年2月17日，刘澜涛在“改正右派工作经验交流会”上讲话说：“当时共划了右派540,000人，占当时干部人数9,530,000人的5.7%。”

1979年9月，中共中央中发[1979]65号文件《关于继续执行中央[1978]55号文件几个问题的请示》中说：“……在反右中被定为‘中右分子’及‘反社会主义分子’……其中仅失去公职的就有160,000人，这些人虽未戴右派帽子，但有的所受处分，比右派还重，处境困难……。”（笔者注：右派分子一般除了枪毙、编个罪名判刑，就是劳动教养二十余年。在劳改、劳教时有饿死、累死、自杀、致病、致残各种悲惨结局。不知道“比右派还重”重到什么水平？详情从未听说过，至今也没有人披露，也许他们不好说出口。）65号文件中还写着：“此外，当年在农村小学教师和基层干部也划了不少右派，虽然后来中央下令不许在农村小学和基层干部中划右派，但是为时已晚，划和不划已经乱了套。这部分人也不在少数。”戴或没戴右派帽子，却按右派，甚至重于右派的处理办法处理的“中右分子”大体上也有几十万。按照这个没有具体数字的说法，已划右派的和当作右派处理的人，实际上已经超过了百万。

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在第十一届五中全会上为1957年反右辩护时说：“57、58年的反右派是‘正确的’，‘必要的’……我们反了2,900,000右派。”（台湾新闻周刊沙兹伯里著，林君彦译《新皇朝》第161页）

1989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丛进先生著《曲折发展的岁月》一书中说：全国右派共划了552,877人。

1990年6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说：“57年划右派估计有40——70万人。”

1991年，香港九十年代出版社出版的丁抒先生所著《阳谋》一书中说：“根据调查，反右运动总共被打成右派的人是一百三十万人。”

1993年，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说：“错划了右派五十五万人。”

1993年，朝华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左祸》中说：“五七年划右派552,973人。”

1995年出版的叶永烈先生所著《反右派始末》中说：“1980年，‘右派分子’的改正工作基本结束。全国的右派总数有了精确的统计，即五十五万多人。当然，这仅仅是指‘正宗’的‘右派分子’，还不包括‘中右分子’和‘反

社会主义分子。如果把这些‘分子’和受牵连的家属们计算在内，那就达数百万之众！”

1998年5月，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朱正先生著《1957年的夏季》中有一种说法是：“德国乌利·弗朗茨著《邓小平——中国式的政治传奇》一书中说：“1957年划右派800,000人，株连2,900,000人。”

后来，被委以专责处理右派的统战部、公安部有关部门，处理完“改正”问题，也没有公布一个确切的右派总人数。匆匆了结了这宗历经二十二年的糊里糊涂政治大案。

1958年划完大城市的右派，1960年中共中央还发了一个文件，强调“不经过省委批准不得再划右派。”可见当时划右时真的是“放开”了，所有的党组织都有权划，谁划得多谁立场坚定，谁就是左派，就会得到提拔、重用。各单位、各地在毛泽东的鼓动下大力划右，以至连中央也控制不了，弄不清楚究竟有多少了。

实际上，1979年中共中央中发[1979]65号文件的说法，已经否定了五十多万的说法，不明确地说实际上已经超过了百万。

2006年2月，传来一个信息，中共中央部分档案解密，其中与反右运动有关的有：

1956年11月10日至15日，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14日晚，毛泽东临时发言，他在会上说：“东欧一些国家不断在政治上混乱，基本问题是领导层没有阶级斗争观念，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新老反革命没有搞掉，这方面我们要引以为戒……我敢说，我们党内也有阶级斗争。”

刘少奇在会上补充发言，说：“毛泽东同志的讲话是他个人的意见，中央政治局没讨论过，会议要备案。”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发表了题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会议进行了三天。毛泽东提出：“革命时期大规模疾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斗争要几经反覆，还要持续五十年、一百年。你们信不信？我看，坐在主席台上，也有不信的。”

1957年4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1957年4月11日晚，毛泽东和陆定一、陈伯达、康生谈话。毛泽东说：“我赞成放，放得尽些，才能让各阶级都出来表现。不放，怎样来辩论？放半年，不够，放一年。左派要有准备。”

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

5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为什么要整风？》的社论。毛泽东作了指示：“不要搞那么多条条框框来束缚，要改。怕放，无非怕引火烧身。”

5月8日至5月12日，全国各地召开二万八千二百五十多次各类会议，向党中央、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提出了三十七万二千三百四十五条意见、建议。

毛泽东在《情况汇总》上作了批示：“一放，各阶级就会表现出来，原形也毕露。共产党执政还不到八年，就有三十多万条意见、错误、罪状，那共

产党是不是该下台？那我姓毛的不是要重返井冈山！”毛泽东已经耿耿于怀、磨刀霍霍了。

5月13日至14日，中央政治局讨论局势，意见分歧，但同意“要正确引导，要再观察一个时期”。

5月15日，毛泽东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此文先送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阅，而后建议发至党内十七级以上干部参阅。

政治局委员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林彪、林伯渠、董必武、罗荣桓、陈毅、李富春、彭德怀、刘伯承、贺龙、李先念；政治局候补委员为：乌兰夫、张闻天、陆定一、陈伯达、康生、薄一波。

陈云、李富春、刘伯承、张闻天四人阅后，没有在毛泽东文章上标注意见或签署“已阅”。

毛泽东的文章，在党内分二个阶段下达：第一个阶段，发至十级以上干部；第二个阶段，再发至十七级以上干部。

毛泽东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说：“我党有大批的知识分子新党员（青年团员就更多），其中有一部分确实具有相当严重的修正主义思想。他们跟社会上的右翼知识分子互相呼应，联成一起，亲如弟兄。社会上的中间派是大量的，他们大约占全体党外知识分子的百分之七十左右，而左派大约占百分之二十左右，右派大约占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依情况而不同。”“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现在大批的鱼自己浮到水面上来了，并不要钓。”

1957年6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该指示称：“这是建国以来，一场大战，战斗是无烟、无光的，在党的心脏展开。他们大多已在不同领导岗位，有一定追随力量。”

1957年7月17日至21日，毛泽东决定在青岛召开一次省市委书记会议，会议讨论了关于反右斗争的部署。会议期间，毛泽东写了《一九五七夏季形势》一文，作为党内文件印发。毛泽东在青岛会议上说：“匈牙利事件会不会在中国重演？我看有可能，可能五年、十年，也可能不用五年。纳吉式人物有可能在会场内。”

这时，会场内有三十五张纸条递上主席台。大会主席周恩来当场宣读了这些纸条。其中有支持毛的意见，并要求毛泽东能公开谁是纳吉式人物；也有反对毛泽东这种无的放矢的观点。

1957年6月30日，人大副委员长宋庆龄致信毛泽东主席，对全国范围在党内、民主党派内、知识学术界展开反右斗争，表示十分忧虑、十分诧异、十分惊奇，要求对没有行动“反党”的右派、右倾人士，作不同意见的争论处理。

1957年6月10日，人大副委员长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陈叔通，分别写信给中共中央政治局、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信中都对展开反右斗争表示很不能理解。李济深在信中写道：在政治上出尔反尔、营造斗争气氛、制造对立阶层，会造成深远创伤。

1958年5月3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宣布：反右斗争取得阶段性胜利，定性为右派集团二万二千零七十一人，右倾集团一万七千四百三十三个，反党集团四千一百二十七人；定为右派分子三百七十七万八千四百七十人，列

为中右一百四十三万七千五百六十二人；其中，党员右派分子二十七万八千九百三十二人，高等院校教职员工右派分子三万六千四百二十八人，高等院校学生右派分子二万零七百四十五人。在运动中，非正常死亡四千一百七十七人。此件只限于在政治局委员中传达，严禁超越限定范围。

从上述各种说法可以看出，究竟有多少右派分子，尚未见确切数据，当局对此讳莫如深。

笔者倾向于采纳最后这组数字，即 1958 年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宣布的数字——三百七十七万八千四百七十人。有待中共中央公布真实数字予以确认。在未得到确认之前，本文暂以中共中央以各种方式确认并多次公布的数据五十五万余人为据。

在这些被错划为右派的人中，有多年同共产党合作、为推动国共两党政权更迭作出过重大贡献的民主党派人士；有风尘仆仆从海外归来或拒绝随国民党逃往台湾志在重振华夏的学者名流；有将自己的巨额资产奉献给国家且富有管理经验的工商业者；有初出茅庐不谙世故、满腔热情意欲振兴中华的青年学生；有对中国共产党深信不疑、直言相谏、忠心报国的志士仁人；也有入党多年曾经为中共夺取政权出生入死、历经磨难的共产党人。他们被划成右派以后，历尽了千般辛楚，受尽了百般折磨。有多少家庭四分五裂妻离子散，有多少人含冤负屈命丧黄泉。历经二十余年的劫难，1979 年“改正”时存活在世的只有十万余人了。

至今又过了三十余年，目前还活着的昔日之右派分子据说还有一万五千人（《往事微痕》的编者统计为九千五百余人），大都年逾古稀、或逾耄耋，垂垂老矣。但愿期颐之年有缘相会，看看反右六十周年、七十周年的中国是否能够废除罪恶的一党专政，进入民主社会。这是世界大趋势，任何人想阻挡也阻挡不了，逆历史车轮而动者，必将被碾为齑粉。

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公布了许多苏共以往见不得人的罪恶档案，让人们了解了历史的真象。中共及中国政府何时也能公布一些本该解密的档案，让人们了解真实的历史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最民主的吗？最民主莫非需要长期向人民隐瞒真象吗？

（1）右派群体的组成与征貌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但却很难完成的命题。

反右运动已经过去五十五年，遭此厄运的人们，在心灵与肉体备受煎熬的炼狱中，耗尽了人生的黄金时段，相当多数经不起残酷的折磨，含冤离开了人世，至今仍活着的也已年逾古稀，老态龙钟，步履蹒跚，一饭三矢。研究这场悲剧的起因、过程、结局、后果，并不仅仅是伸冤，也不仅仅是伤感，而是希望类似的悲剧不再重演。这一切都离不开调查、分析、统计每个右派分子的遭遇和经历，由于涉及人数高达数百万，且当局对反右档案百般封锁，此项研究实难进行。以中共之作风，为掩饰其罪恶，不仅会隐瞒真相、封锁信息，还很可能大量销毁资料，或许这将是历史的遗憾。

1957 年 7 月，毛泽东在青岛会议上凶神恶煞地将右派定义为“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派”。操纵和强迫大大小小的党棍以蒙蔽和威胁的手段运动群众，丧心病狂地“反右”，短短数月间即抓出了五十五万多右派分子。

1981 年召开的中共中央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

史问题的决议》也置事实于不顾，危言耸听地宣称右派分子“乘机鼓吹大鸣大放”、“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仍然肯定反右是正确的。

按照毛泽东和中共的预想，清除了右派分子就该天下太平，五谷丰登了吧，然而事实恰恰相反，随着时间的推移，反右恶果暴露的日益清晰。人们看到了，1957年以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道德每下愈况。历经大跃进、高产卫星引来的是全民饥肠辘辘，万众举步维艰。

毛泽东叫嚷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不过是垂死的狂人臆造的谬论；中共片面强调阶级斗争，人为制造矛盾，使全国人民饱受精神桎梏，处在人人自危的恐怖氛围之中，严重地阻碍了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三面红旗”、“文化大革命”等祸国殃民的倒行逆施，让亿万民众蒙受了灭绝人性的灾难与浩劫。在严峻的事实面前，嘴里高喊着“实事求是”的党政要员没有一个敢于触动毛泽东的逆鳞，直到混世魔王死了以后，中共才不得不承认反右是重大失误，但是仍然没有坦承错误的勇气，也没有彻底纠正错误的决心，在邓小平的主使下，把动机、手段、结果、理论、实践都绝对错了的反右运动，既轻描淡写又荒谬绝伦地说成是“扩大化”，于是来了个不明不白的“改正”，而不是甄别平反。

进入1978年，举国民众要求平反冤假错案的呼声日益高涨，中共中央在反右二十二年后才遮遮掩掩地承认当年并没有那么多“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反动派，经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统战部、公安部、民政部联合复查确认，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以上的右派均系错划。全国只留下九十六名所谓右派不予改正，用以遮人耳目。

事实上，当时根本不存在意欲篡党夺权的右派分子，个别人在反胡风或肃反运动中受过审查、批斗等不公正待遇，对共产党可能有些成见或愤懑的情绪，还远没有达到势不两立的敌对程度。作为执政党如果真的能像毛泽东高唱的“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适当化解矛盾，有以善处，是可以相逢一笑泯恩仇的。右派分子是毛泽东一步一步逼出来的，右派群体是毛泽东及其帮凶无中生有制造出来的。一次一次的政治运动使中共专制独裁的面目日益暴露，极权统治遭到日益强烈的反抗和摒弃，最终必将消失在人民的唾骂声中。

右派群体人数众多：中共正式宣布的右派分子即高达五十五万三千余人，连同被冠以“中右”、“暗右”、“内控右派”、“反社会主义分子”等名目的，累计四百余万。

年龄跨越很大：从十二岁到一百一十八岁，童叟不限；

文化参差不齐：从小学生到博士后，兼收并蓄；

行业范围甚宽：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研、新闻、出版、卫生、军队、演艺，无所不包；

职务千差万别：书记、省长、学者、作家、教授、编辑、记者、医生、军官，纷纷入围；

三教九流俱在：主教、牧师、阿訇、和尚、尼姑、道士、唱京戏的、演评剧的、说相声的、讲评书的、唱大鼓的、演杂技的，一网在内。

他们当中有：（少数人名有重复，盖因这些人一身而兼几任，如费孝通既是民盟骨干又是著名社会学家也是知名教育工作者）

共产党和政府、军队中的高级干部：

潘复生：1908-1980。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
古大存：1897-1966。广东省委书记兼副省长。
沙文汉：1908-1964。浙江省省长。
孙作宾：1908-2002。青海省省长。
欧百川：1894-1970。贵州省副省长。
陈再励：1897-1975。广西省副省长。
李世农：1911-2006。安徽省副省长。
杨思一：1901-1957。浙江省副省长。
孙殿才：1909-1975。甘肃省副省长。
陈成义：1906-1957。甘肃省副省长。
程星龄：1900-1987。湖南省副省长。
王毅斋：1896-1972。河南省副省长。
王 翰：1911-1981。监察部常务副部长。
彭瑞林：1912-1990。浙江省委常委、省检察长。
陈 沂：1912-2002。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少将。

民主同盟著名右派：

章伯钧：1895-1969。早年在德国攻读哲学，获博士学位，1923 年曾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交通部部长。中国农工民主党创办人，农工民主党主席。

罗隆基：1896-1965。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博士。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森林工业部部长。

费孝通：1910-2005。伦敦大学哲学博士。中国社会学奠基人，中央民族学院教授，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

曾昭抡：1899-1967。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博士。著名化学家、北京大学教务长兼化学系主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

陈仁炳：1909-1990。美国密执安大学哲学博士。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民主同盟上海市副主任委员。

彭文应：1904-1962。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硕士。中国民主同盟上海市委副主任。

钱端升：1900-1990。美国哈佛大学哲学博士。著名法学家、北京政法学院教授，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

叶笃义：1912-2004。燕京大学政治系毕业。法律出版社社长，全国政协副秘书长，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

潘光旦：1889-1967。毕业于清华大学，后入美国深造，回国后在多所大学任教，社会学家、优生学家、清华百年史四大哲人之一。中央民族学院教授。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

黄药眠：1903-1987。早年赴日本留学，1928 年曾加入中国共产党，曾被中共派往苏联，参与共产国际。文艺理论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

范朴斋：1895-1970。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国务院参事。

钱伟长：1912-2010。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博士后。力学家、清华大学副校长，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

吴景超：1901-1968。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社会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

潘大逵：1901-1991。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硕士。法学家，中国民主同盟四川省主任委员。

沈志远：1902-1965。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受中共派遣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五年。经济学家，中国民主同盟上海支部主任委员。

徐铸成：1907-1997。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著名新闻工作者、《文汇报》总编辑。

浦熙修：1910-1970。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著名女记者、《文汇报》副总编辑。

王毅斋：1896-1972。维也纳大学经济学博士、河南大学教授。中国民主同盟河南省主任委员。

王文光：1915-2000。西北工学院纺织系毕业。纺织工业专家、中国民主同盟山西省副主任委员。

姜震中：教授、中国民主同盟浙江省主任委员。

马哲民：1899-1980。先后在柏林大学和早稻田大学就读，1922 年曾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南财经学院院长、中国民主同盟湖北省主任委员。

杜迈之：1917-1984。四十年代云南大学政治系毕业。中国民主同盟湖南省秘书长。

陈新桂：1913-1988。燕京大学毕业。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宣传委员。

刘王立明：女，1896-1970。美国芝加哥大学硕士。著名妇女运动活动家、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

王国松：1903-1983，美国康奈尔大学博士。著名电机工程专家、一级教授、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

张志和：1894-1975。青年时入陆军第一预备学校，1927 年曾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 年后任国务院参事，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

农工民主党著名右派：

韩兆鹗：1890-1970。1921 年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中国农工民主党陕西省主任委员、副省长。

张申府：1893-1986。1913 年考入北京大学，1920 年赴法国深造并在里昂中法大学教授逻辑学。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周恩来和朱德的入党介绍人，哲学教授。

黄琪翔：1898-1970。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曾赴德国留学。原国民党高级将领，中国农工民主党副主席。

黄现璠：1899-1982。壮族，青年时期在北京师范大学攻读九年，后到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留学。历史学家。广西师范大学教授。

李士豪：1900-1972。日本明治大学经济系毕业，著名民主人士，农工民主党浙江省主委。

李伯球：1904-1986。1925 年入黄埔军校，毕业后参军，又入上海大陆大学深造。长期与中共合作的民主人士，农工民主党中央常委。

张云川：1902-？ 国务院参事，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委员。

邓昊明：1904-？ 江苏省政协副主席、农工民主党江苏省主任委员。

李述中：1907-1974。东京帝国大学农经系毕业。福建省政协副主席、农工民主党福建省主任委员。

李健生：女，1908-1990。章伯钧夫人，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候补委员。

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著名右派：

龙云：1884-1962。彝族、云南陆军讲武学堂毕业。爱国将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副主席。

陈铭枢：1889-1965。青年时期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原国民党上将。全国人大常委、民革中央常委。

张轸：1894-1981。日本士官学校毕业，著名起义将领。河南省副省长、民革中央委员。

黄绍竑：1895-1966。1916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

谭惕吾：女，1902-1997。1926年北京大学法学院肄业。著名律师、中国政法学会主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

民主建国会、工商联著名右派：

钱孙卿：1887-1975。1911年肄业于南京两江政法学堂。江苏省工商联主任委员、民主建国会江苏省副主任。

李琢庵：1894-1964。经济学家、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

章乃器：1897-1977。救国会七君子之一，粮食部部长，民主建国会中央副主任。

李康年：1898-1964。著名企业家，公私合营带头人，民主建国会上海市委员。

向德：1901-1985。著名实业家，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委。

毕鸣岐：1902-1971。著名工商业家、天津市副市长、全国工商联副主席。

姚顺甫：1904-1973。丝织业首领、民主建国会杭州市副主任。

潘锬章：安徽省政协副主席、民主建国会安徽省主任委员。

郑立斋：甘肃省工商联主任委员、民主建国会兰州市委副主任。

张东木：1913-2001。济南市政协副主席、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

九三学社著名右派：

许德珩：九三学社主任委员，水产部部长。

金宝善：1893-1984。毕业于日本千叶大学医学部，后赴美国深造，获硕士学位。公共卫生专家、九三学社卫生部支社主任委员。

顾执中：1898-1995。东吴大学肄业，资深记者。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九三学社中央候补委员。

陆侃如：1903-1978。历史学家、《文史哲》主编、山东大学副校长、九三学社中央常委。

袁翰青：1905-1994。美国伊利诺大学博士。著名有机化学家、化学史研究带头人、九三学社中央委员。

储安平：1909-1966。复旦大学教授、光明日报总编辑、九三学社中央委员。

民主促进会著名右派：

林汉达：1900-1972。美国科罗拉多州立大学硕士。教育部副部长、中国民主促进会副主席。

致公党著名右派：

陈其尤：1892-1970。日本东京中央大学政经系毕业。中国致公党主席。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著名右派：

谢雪红：1901-1970。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创始人、主席。

自然科学界著名右派：

金宝善：中国近代卫生事业奠基者之一。

程士范：1892-1960。北洋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中国现代著名土木工程学家。

曾昭抡：中国现代化学奠基人之一。

王国松：中国电机工程学会发起人之一。

袁翰青：中国现代著名化学家。

钱伟长：中国现代力学奠基人之一。

雷天觉：1913-2005。北京大学工学院毕业，中国现代机床工业奠基人之一。

社会科学界著名右派：

陈 达：1982-1975。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中国人口学开拓者之一、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李景汉：1895-1986。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硕士。社会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吴泽霖：1898-1990，美国俄亥俄州大学博士。教育家、中央民族学院教授。

潘光旦：著名社会学家、中央民族学院教授。

马哲民：1899-1980。先后在德国柏林大学和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中南财经学院院长、社会学教授。

钱端升：著名法学家、北京政法学院院长。

吴文藻：著名社会学家、民族学家、人类学家、中央民族学院教授。

吴景超：著名社会学家、清华三才子之一、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谭惕吾：女、著名律师、中国政法学会主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常务委员。

沈志远：经济学家、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

王造时：救国会七君子之一、复旦大学教授。

费孝通：社会学家。

王铁崖：法学家、北京大学教授。

陶大镛：1918-2010。经济学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

何家栋：1923-2006。著名思想家、出版家，1945 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工人出版社创办人。

文学界著名右派：

冯雪峰：1903-1976。作家，192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

陈企霞：1913-1988。作家、文艺理论家，1933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宋云彬：1897-1979。著名文史学者，1924 年加入过中国共产党。浙江省文史馆馆长。

巴 人：1901-1972。原名王任叔，1924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党委书记。

萧 军：1907-1988。作家，1938 年曾赴延安，1940-1946 年在延安鲁艺工作，与毛泽东关系密切。

孙大雨：1905-1997。清华大学毕业后赴美深造，在耶鲁大学研究英国文学。著名文学翻译家、莎士比亚研究专家。复旦大学教授。

傅 雷：1908-1966。十九岁到巴黎大学就读，四年后回国，著名法国文学翻译家。

艾 青：1910-1996。诗人，早年留学法国，1944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萧 乾：1910-1999。著名记者、文学家、翻译家，曾在剑桥大学研究文学，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

罗 烽：1909-1991，作家，1929 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东北文联第一副主席。

穆木天：1900-1971。日本东京大学毕业，现代诗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姚雪垠：1910-1999。著名小说家，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席。

徐懋庸：1911-1977。作家，193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武汉大学党委书记、副校长。

白 朗：女，1912-1994。作家，中共共产党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

冯亦代：1913-2005。文学翻译家，英文《中国文学》编辑部主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

黄秋耘：1918-2001。193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作家，《文艺学习》编委。

萧也牧：1918-1970。194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作家，中国青年出版社文学编辑室副主任。

钟敬文：1903-2002。民俗学家，民间文学大师，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施蛰存：1905-2003。作家、翻译家，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公 木：1910-1998。原名张永年，当代诗人。1930 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8 年入党。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所长。

吴祖光：1917-2003，著名戏剧家。

秦兆阳：1916-1994，早年赴延安，1941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作家

《人民文学》副主编。

王若望：1918-2001，三十年代在上海参加左翼作家联盟，1937 年赴延安，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文艺月报》副主编。

石天河：1924 年生于湖南长沙，本名周天哲。1948 年投入中共，1949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诗人，文学评论家，《星星》诗刊执行编辑。

刘宾雁：1925-2005，中国当代散文作家。1944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国青年报》记者。

公 刘：1927-2003。当代诗人。1948 年即追随中国共产党，随部队进军大西南。

高晓声：1928-1999。小说作家。

陆文夫：1928-2005。1949 年追随中共，著名作家，苏州文联副主席。

白桦：1930 年出生于河南信阳，1947 年参加中国军队。作家。

李国文：1930 年出生于江苏盐城，1949 年毕业于南京戏剧专科学校，曾赴朝鲜当志愿军，著名作家。

邓友梅：1931 年生于天津，1944 年参加八路军，1952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北京市文联成员。

流沙河：1932 生于四川成都，《星星》诗刊编辑，《草木篇》的作者。

从维熙：1933 年出生于河北省玉田县，曾任小学教师、报社记者，1956 年开始专业创作。

邵燕祥：1933 年生于北平，1951 年即发表诗集，1953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著名诗人。

王蒙：1934 年生，当代作家，《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作者。

刘绍棠：1936-1997。中共党员，青年作家。

新闻界著名右派：

徐铸成

储安平

浦熙修

陆诒：1911-1997。著名新闻工作者兼复旦大学教授。

彭子冈：女，1914-1988。毕业于北平中国大学，193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公报》著名记者，《旅行家》杂志主编。

戈扬：女，1914-2009。早年投奔延安，在周恩来手下工作，任新华分社社长。五七年时任《新观察》主编。

陈模：1923 年生于江苏泰州，193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国青年报》副总编辑。

陈铭德：1897-1989。北平国立法政大学毕业。《新民报》创始人。

邓季惺：女，1907-1995。陈铭德夫人，《新民报》协理。

梅朵：1920-2011。《大众电影》创办人、主编。

姚芳藻：1926 年生。梅朵夫人，《文汇报》著名记者之一。

美术界著名右派：

叶恭绰：1881-1968 年。国共内战期间避居香港。1949 年后应周恩来之邀回到北京。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1955 年任北京中国画院院长。1957 年加入中国农工民主党。

刘海粟：1896-1994。美术教育家，南京艺术学院院长。

邓散木：1898-1963。书法、篆刻家。

庞薰琹：1906-1985。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副院长。

江丰：1910-1982。版画家、中央美术学院院长。

丁聪：1916-2009。漫画家。

教育界著名右派：

陈达、李景汉、吴泽霖、潘光旦、马哲民、黄现璠、林汉达、钱端升、吴文藻、吴景超、雷海宗、沈志远、王造时、黄药眠、陆侃如、孙大雨、费孝通、葛佩琦、陶大镛等

民族学界著名右派：

吴泽霖、潘光旦、黄现璠、吴文藻、费孝通等

历史学界著名右派：

黄现璠：1899-1982。壮族。广西师范大学教授。国际知名民族学家、历史学家、教育家。中国现代民族学奠基人之一，黄现璠一生著述丰硕，学术声誉卓著。

向 达：1900-1966。著名历史学家、敦煌学家。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

雷海宗：1902-1962。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学贯中西的历史学家。南开大学教授。

王重民：1903-1975。中国古文献学家、图书馆学家。北京大学图书馆系主任。

陈梦家：1911-1966。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诗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宗教界著名右派：

虚云禅师：1840-1959。中国佛教协会首席发起人、名誉会长，全国政协委员。

吴德正：1851-1959。回族，宁夏固原大阿訇。

刘龄九：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秘书，基督教刊物《田家》主编。

赵振亚：1902-1976。天主教天津教区主教。

澍培法师：1897-1986，吉林长春般若寺方丈。

马震武：1895-1961。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主任，全国政协委员。
大学生中的著名右派：

林 昭：1932-1968。北京大学文学系学生。

林希翎：1935-2009。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生。

谭天荣：1935年生，湖南湘潭人。北京大学物理系学生。

冯元春：1935-1970。四川省青神县人。四川大学生物系学生。

戏剧、曲艺界著名右派：

李万春：1911-1985。著名京剧武生演员，有美猴王之称。

奚啸伯：1910-1977。著名京剧老生演员，四大须生之一。

叶盛兰：1914-1978。著名京剧小生演员。

叶盛长：1922-2001。著名京剧老生演员。

叶盛章：1912~1966。京剧艺术有史以来首创丑行挑班第一人。也是迄今为止惟一一位享有“流派”鼻祖之誉的丑角艺术大师。

连振东：京剧演员，侯派花脸。

新凤霞：女，1927-1998。著名评剧演员。

连阔如：1903-1971。著名评书大师、中国曲艺研究会副主席。

曹宝禄：1910-1988。著名单弦演唱艺人。

马三立：1914-2003。著名相声演员。

何 迟：1920-1991。青年时即赴延安，194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戏曲剧作家、曲艺作家。

以上所载不过一百余名，属名人之列（高级官员，著名学者、民主党派领导人、其他社会名流），可称为知名右派。是五十五万三千多右派分子的五千分之一。若按三百多万右派分子计，则仅仅是三万分之一。

名人毕竟是少数，从总体上看，绝大多数右派分子或者说右派的主体均非知名人士，只是有一些文化的普通老百姓。

反右运动已过去五十余年，长期以来中共对反右之错误和严重后果噤若寒蝉，百般封锁，操纵舆论，掩盖真相。有历史责任感的民众和学者出于吸取教训，明鉴未来的美好愿望，克服重重困难对“反右”进行研究。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写了多篇论著并倡导建立“1957年学”，一些记述反右运动的论著，和追忆个人苦难史的回忆录，冲破层层禁锢陆续问世。叶永烈的《反右派始末》、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郭道晖的《五七风云》、丁抒的《阳谋》、朱正的《一九五七年的夏季》、胡平的《禅机-1957 苦难的祭坛》；以及戴煌的《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和凤鸣的《经历我的 1957 年》、巫宁坤的《一滴泪》、石天河的《逝川忆语》、张先痴的《格拉古轶事》、陆清福的《左右春秋》等均有相当读者。前几部专著基本勾画了反右运动的来龙去脉和毛泽东翻云覆雨、做张做致的表现，以及社会名流被打成右派前后的遭遇。后几部自传体作品则以深沉悲抑的笔触记录了个人在社会底层乃至监狱中惨不忍睹的苦难经历。

不无遗憾的是，已发表的著作对知名人士的描述较多，对在数量上占绝对多数的普通右派群体很少提及，或者说，这些专著记述了反右运动的某个局部，未能概括其全貌。事实上，社会名流和基层群众中的反右运动在时间先后、斗争形式、打击力度、处理方法上是有很大差异的。尽可能充分地研究反右运动的各个侧面才能够真正了解和评价这个对中国历史影响深远的政治灾难。

2008 年，广东中山大学社会学教授李若建博士曾对这个被忽略的群体进行过开拓性的研究，发表了论文《庶民右派：基层反右运动的社会学解读》；香港地区的凌文秀、陈榆林、岑超南诸先生编辑出版了《五七右派列传》；成都的冉云飞先生收集整理了《右派资料知见录》等史料；寓居北京的老记者铁流编辑印刷了《往事微痕》，刊出上千万字的历史文稿，对反右运动和“右派分子”的惨痛遭遇留下了文字记载；北京大学焦国标先生收集、整理、编辑了《黑五类忆旧》；蒋绥民、博绳武汇编了《五七心声》；重庆的蒋维亮、曹贞干、李国元、郑汉生等人创办了不定期刊物《巴山夜雨》。他们的工作深受五七难友的赞誉和支持，也希望今后有更多优秀的作品出现，聚沙成塔，为五七年那场运动留下全面的、真实的、立体的记录。

笔者仅就个人所见，对右派群体概况略作描述，聊以填空补缺，权充引玉之砖。

1、右派群体的年龄段

我所在的原单位——重庆长江电工厂，1957 年划了二十几名右派分子，年龄最大的保密科副科长张子敬不过三十四岁，医院党支部书记黄光禄三十二岁，机关党支部书记吴超三十岁，其余的均在三十岁以下。

投入劳教、劳改以后，我历经重庆新建机械厂、四川省劳改局加工厂、四川磨床厂、成都通惠汽车修配厂、四川消防机械厂、苗溪茶场等多个劳改单位，耗去二十三年光阴。虽然限于当时的身份和处境，作为阶下囚，看不到有关档案资料，无法详实统计各单位右派分子的具体数目和年龄分布，但也有概略的了解。

仔细回想，大多数被划为右派的是二十岁到三十岁的年轻人，如果将右派人数和年龄画成正态分布曲线，这个年龄段即是突兀的山峰。

在写回忆录的时候，查阅相关资料发现，最小的右派分子是只有十二岁的小学生，最大的右派是一百一十八岁的老和尚。

稚气未消、不知“党”为何物的儿童，以及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僧人，都被带上“反党”的帽子，堪称中共之杰作，世界之奇闻。

小学生在劳改场所改造了二十多年，得了个“改正”通知书，总算活出来了。老和尚被关进牛棚，因年迈体衰，受不了折磨，不久就魂归离恨天、面见佛祖去了。

现摘录几位小难友的简况如下：

张克锦，四川达州市通川区人。反右运动初期，中共号召“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当时四川达县一家鞋帽生产合作社的职工冉某，给城关镇某位领导提意见，大字报中附有一幅含有喻讽之意的漫画。冉某由此被划为右派，不久跳大桥自杀身亡。那位镇领导犹不罢休，查出漫画系张克锦所画，当时张克锦只有十二岁，尚在小学读书，五年级，对鸣放之事毫不了解，他及他的家人与该镇领导互不相识，素无瓜葛芥蒂。只因张克锦从小有绘画天赋，曾获得过少儿绘画大奖，小有名气，邻居冉某请其帮忙画了一幅题为《一手遮天的XXX》漫画，不料闯了大祸。1958年4月的一天，张克锦正在上课之时，居委会的治安保卫主任将其唤出教室，据说是到城关镇“领奖”，张克锦大步流星地随着治保主任走到会场，只见黑压压一片人群正在批斗右派分子，毫无发奖的氛围，正在惊呆之际，被两个彪形大汉反剪双手推到台上，“打倒右派分子张克锦”的口号声顿时响起，只吓得他嚎啕大哭起来，由此入狱。有关领导认真研究后认为，把一个十二岁的孩子叫做“右派分子”似难以服众，于是创造性地冠以“右童分子”之名，将其送到劳改场所，七年后刑满，继续在劳改队苦受折磨。二十一年后的1979年，达县通川区第一小学收到其《平反通知书》，方摘帽、改正。退休前系达州市通川区总工会工人文化宫美术专业干部。张克锦爱好广泛，除绘画、书法外，尤喜读书、集邮，亦为京剧票友，拉琴吊嗓，自娱自乐。目前仍健在。四川省文化局主管的通俗刊物《龙门阵》2009年总第230期第32页刊载了张克锦的故事。

佟信顺（1942-1960），河北省人，家庭三代都是工人。他身材矮小，性格懦弱，北京冶金中等专业学校学生。1957年整风之际，他给美国总统写了一封信，试图探问美国的民主是什么形式。信投放在邮筒里，不知怎么却落入了学校党总支书记手里，是邮递员的误投吗？书记说：“就凭你给我们头号敌人——美帝的头子写信，就能打你个‘极右分子’”，于是，十六岁的佟信顺以右派罪名送清河茶淀农场劳动教养。1960年大饥荒中冻饿而死，他哥哥到农场收尸，泪流满面地反复喊着一句话“他还是个孩子呀，他还是个孩子呀……”

李曰垓（1941-2010），云南昭通人。1941年12月23日出生，自幼聪颖好学，十三岁初中毕业，被昭通专属招募为通讯员，后任机要员，负责保管文件、电报、档案。1957年夏天，他只有十五岁半，少不更事，只晓得认真工作，不懂得巴结上级，没有遵照其顶头上司某专员的意图修改其私人档案，为这位专员文过饰非，隐恶扬善。即被该专员借反右之机暗中定为右派

分子，成了少年政治犯、思想犯。1958年，刚满16岁的李曰垓，被戴上“右派”帽子送劳动教养。从1958年元旦开始至1978年底，度过了二十年零八个月的铁窗岁月，其间因不认罪，三次遭到逮捕，关入监狱，长期戴脚镣手铐，禁闭在单人牢房……。有关他的档案材料多达300万字。在右派中算得上是异类。1979年改正以后在昭通中等专业学校任语文教师，2010年4月26日因心肌梗阻在云南逝世。其遗著《生命燃烧于暗夜》由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出版。

王安琪，辽宁锦州人。1957年，十七岁的王安琪以优异成绩考入吉林大学物理系，作为秋季刚刚入学的一年级新生，躲过了“鸣放”阶段，在反右中没有出格的表现，但他自视甚高，对已经揭发出来的“右派分子”，妄加议论，偶有与党委不同的见解，因而受到批评。在轰轰烈烈的反右运动中受到批斗，本为小事一桩，他却极为抵触，持才傲上，顽强抗争。由此被开除学籍，遣返回乡，劳动改造。在社会底层挣扎了二十余年，1979年始得“改正”。如今也已年逾古稀了。

汤朴胜，别名费彝生，四川岳池人。其祖父早年曾参加同盟会，二十年代组织“川北民军”反对当地军阀，1932年被杀害于南充，1986年经民政部追认为烈士。其父为国民党军统财务处长，1949年参加起义，皈依中共。费彝生十七岁考入西南师范大学数学系，入学不久即被划为右派分子，1979年获改正。

1998年秋，其母校召开国庆、中秋茶话会时，汤朴胜朗读了一副自撰的对联。其上下联是：

“封建军阀之孙，军统特务之子，狗崽子当然是血统反共小右派。”

“革命烈士吾祖，起义将领吾父。汤朴胜无愧于数学教育大教授。”

横批是“拨乱反正”。

由此对联可略见其身世和自视甚高、桀骜不驯的个性。

李天德，1939年生于四川荣县。其父李佛海靠染布谋生，1942年遭日本空袭蒙难。十一岁时，其母病逝，随长兄度日，十二岁入少先队，十五岁入共青团，十六岁考入重庆大学冶金系。李天德家境困苦，但聪颖好学、兴趣广泛，进入重庆大学后被推举为学生会宣传部副部长。1957年反右中划为右派分子，监督劳动期间，曾与云南籍“右派”同学商量，想去云南谋生，尚未成行即被认定“妄图偷越国境”，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刑满后被强制留场就业，1965年又以写反动剧本之罪名判处六年徒刑，1975年李天德写了致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的万言书《献国策》，否定文革和“三面红旗”等极左路线（该件曾一度被中国革命博物馆收藏），1976年2月，雅安地区法院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李天德死刑，后经雅安地区中级法院改判为有期徒刑二十年。毛泽东死了三年以后，李天德始获平反。

年龄大的右派分子多为社会知名人士。虚云禅师一百一十八岁；吴德正大阿訇一百零七岁；广西省副省长陈再励七十岁；湖南省副省长程星龄五十七岁；浙江省省长沙文汉四十九岁；甘肃省副省长孙殿才四十八岁；冒广生八十六岁；张申府六十四岁；章伯钧六十二岁；罗隆基六十一岁；章乃器六十岁；储安平四十八岁；葛佩琦四十六岁。

这里也记录几位年长右派的简况：

虚云禅师：（1840-1959），湖南湘乡人。俗姓肖，初名古岩，字德清。十九岁至福建鼓山涌泉寺出家，二十七岁离鼓山，先后在江浙名山大刹参访耆宿，研习经教，参究禅宗。此后又云游陕西终南山、四川峨眉山、拉萨三大寺，并由西藏到印度、锡兰、缅甸等国，朝礼佛迹。由缅甸回国后，朝拜云南鸡足山，经贵州、湖南、湖北等地，礼安徽九华山，再至扬州高旻寺参加禅七法会，1918年主持昆明云栖寺修复，同时参与或主持兴福寺、节竹寺、胜因寺、松隐寺、太华寺、普贤寺等的修复。虚云禅师数十年全心护持祖庭，兴规矩，肃寺风，颁规约，创办佛学院，培育僧才。同时，广结外缘，多方募化，修葺寺宇，重建楼阁，添买田亩，兴办林场，弘扬农禅，深孚众望。

1951年镇反运动中，中共地方干部怀疑逃亡地主和土匪潜藏在云门寺，且猜测云门寺有大量金银财宝。于是派民兵百余人包围了云门寺，将老和尚及百余僧侣分别囚于禅堂及法堂，大事搜索，上自瓦盖，下及地砖，搜了两日，未搜到金银财物，乃殴打众僧，亦无所获，数名大汉以木棒铁棍殴打年逾百岁的虚云老和尚，逼其交出金银财物，打得老和尚五窍流血，肋骨断折。打手们见寺庙确无财宝可寻，才怅然离去。直到五月间“云门事变”传到韶州，大鉴寺僧人通知海内外同门，联合营救。北京当局电令地方政府严查，云门之围始解。

1952年4月，周恩来为控制佛教僧众，粉饰宗教自由，电邀虚云禅师离云门北上，李济深、陈铭枢、叶遐庵、赵朴初等迎老和尚于火车站，驻锡于北京什刹海附近的广化寺。11月在北京出席中国佛教协会发起人会议，并被推为首席发起人。在虚云老和尚向中央政府的呈书中，他力请中央政府规定人民有信仰宗教之自由，提出了不许再拆寺院、毁佛像、焚经书，不许强逼僧尼还俗，按僧众人数分配田亩等寺院保护管理办法。

1953年6月3日中国佛教协会正式成立，虚云被选举为名誉会长。是年，虚云被聘为全国政协委员。

1955年，虚云老和尚不满人民信仰受到压制，拒绝出任佛教协会会长，1957年被内定为右派。遣送江西监督劳动。

1959年10月13日，虚云法师在江西云居山真如寺圆寂。世寿120岁。

吴德正大阿訇：（1851—1959），宁夏泾源县人。1862年，陕西暴发回民起义，反抗清廷的民族压迫，吴德正随义军餐风露宿，辗转西北五省，历时十年，跋涉数万里，战乱后，在泾源县定居，投入清真寺习学经典，四十岁以后，在包头、绥远（呼市）、固原、泾源等大清真寺任教，历七十个春秋。1952年高寿一百零一时，辞学回家养老。五八劫难期间，对百岁老阿訇也不放过，在固原参加阿訇集训，遭受数月批斗，戴上了右派分子帽子。交给生产队监督改造，1959年斋月来临之际，历经三朝，饱经风霜的吴德正阿訇，含冤离开人世。

冒广生：（1873-1959），字鹤亭，元世祖忽必烈之后，其祖辈定居江苏如皋。十七岁参加县试，取得第一名。翌年参加府试，再取第一，中了秀才。二十一岁参加科举考试，又考取第一，中了举人，由此名声大震。冒广生功校讎、善诗词、勤著述，抗战期间曾任国史馆编纂。1957年春，冒广生撰写了《对目前整风的一点意见》，颇含歌功颂德之意，发表于《人民日报》，引起毛泽东关注。六月三十日深夜，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边接见冒广生（其子冒舒湮陪同拜见），接见时冒老坦言说：“现在党内正在整风，我是经历

过几个朝代的人，共产党能把中国搞得这样强大，譬如一头雄狮，身上也不免长几只虱子。古人云：虱虽小，为害亦大焉。可得提防呀！”。毛泽东以手捂胸从容答曰：“我一定牢记在心上”。冒老又说：“国家有道，则庶人不议，人民敢说话是好事，不因其语近偏激而以为忤”。毛泽东答之曰：“老先生高论极是”、“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这个方针一定不变”。毛泽东原想得到老人的称颂，不料冒广生屡出劝戒之言，提醒其慎重反右，毛泽东表面上做出虚怀若谷的姿态，实则对冒广生倚老卖老之忠谏耿耿于怀。毛泽东是睚眦之怨必报的人，随后，冒氏父子皆被划为右派分子。1959年8月冒鹤亭老先生郁郁病逝于上海。

陈再励：（1887-1975），湖南省平江市人。少年时在造纸作坊做童工，1925年加入中共，组织工人罢工。1928年参加平江暴动。抗战初期任新四军民运部长，1943年调入延安，为中共七大代表。后随军进入东北，任民运部长和组织部长。1957年任广西副省长，省委常委。1957年6月，他针对广西饿死人事件提出要向中央如实汇报，核实产量，下拨粮食。大声疾呼：“不能高高在上，不关心群众死活”。这些言行得罪了省委主要领导刘建勋等人，于是趁毛泽东到广西视察时反映陈再励“诋毁农业合作化”，“攻击党的正确领导”。毛泽东听罢大为震怒，立即宣布将陈再励和支持他的几个省级干部打成“陈王骆王廖廖右派反党集团”，开除党籍，遣送各地劳动。1975年陈再励含冤病逝于长沙。1979年，中共中央和广西省委决定为陈再励、王梦周、骆明、王浩、廖原、廖联原等六人改正和平反。

张申府（1893-1986），原名张崧年，河北献县人。1913年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17年北大聘其为助教，在此期间和李大钊、陈独秀相识，他们三人于1918年创办了《每周评论》。1920年，共产国际东方局代表维津斯基来华，拟在中国建立共产党。李大钊、陈独秀，张申府三人组成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基层组织——北京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和1922年张申府先后介绍张国焘、周恩来、朱德、孙炳文等加入共产党。1925年在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讨论党的纲领时，因反对与国民党结盟而与蔡和森、张太雷等发生争执，愤然退党。此后以教学和翻译、著述为生，先后在暨南大学、大陆大学、大夏大学、中国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校任教，并参与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邓演达、章伯钧、黄琪翔等人组建民主党派的活动。1948年在《观察》杂志发表了题为《呼吁和平》的文章，被中共认定是为蒋介石争取喘息机会。中共建国后，张申府被全面封杀，不准抛头露面，不准公开演讲，不准发表文章，他只能在孤寂冷清中度过余生。周恩来安排他在北京图书馆当了一名研究员，靠微薄薪金为生。1957年划为右派分子，文革中再受冲击，1979年获“改正”，1986年逝世，享年九十三岁。

程星龄（1900-1987），湖南醴陵人，国民党一级上将程潜的族弟。192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教育系，1927年投笔从戎，参加北伐，因不满蒋介石专断，愤然离职。先后在上海劳动大学、安徽宿县煤矿、北平故宫博物院等地任职。1945年底，因与中共某些人士关系密切，以“包庇共产党员”罪被捕，关押在台湾，1947年经刘斐等联名担保获释。1948年8月，应同乡好友余志宏（中共党员，时任湖南省工委代表）之邀，冒死从台湾经香港回到长沙，策动程潜、陈明仁起义成功，被邀参加开

国大典，受到毛泽东亲切接见并称他为“党外的布尔什维克”。五十年代任湖南省副省长兼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1957年被毛泽东钦点为右派分子，1978年获“改正”。1987年逝世。中共湖南省委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2、右派群体的地域分布

1957年之际，全国二十九个省市，上至北京、上海等繁华城市，下至边远山区、穷乡僻壤，无一处没有右派。毛泽东说了：“凡有人群的地方都会有左中右，一万年以后还会是这样。”哪里要是找不到右派，岂不是违背了毛泽东思想，当地负责人就必然是右派。在这个谬论的驱动下，各地的中共党政要员在反右运动中唯恐落于人后，无所不用其极，短短的几个月之内，据官方公布就挖掘出了五十多万右派分子。继后，通过“反右补课、扩大战果”，据《争鸣》月刊披露，1958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内部公布了一个数据，即右派分子三百一十七万八千四百七十人，中右分子一百四十三万七千五百六十二人，合计四百六十一万余人。

毛泽东发动反右运动的动机和目的是降服民主党派，驯化知识分子，加强独裁专政。采用的手法是号召各界“帮助党整风”，再从个别人的发言中断章取义，甚至歪曲捏造、无中生有，然后利用舆论工具故弄玄虚地宣扬“右派向中共猖狂进攻，妄图推翻中国共产党”。继而操纵心怀叵测的共产党员，挑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大轰大嗡，不容分说、不许申辩，随心所欲地给人戴上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大帽子，名曰“右派分子”。然后不经法律程序，或撤职、或开除、或劳教、或劳改，总之划为阶级敌人，施以专政。当时流行的语言叫做“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这一脚竟然踏了二十多年，超越了有期徒刑的最高年限，被踏死的无计其数。直到毛泽东死了两年之后的1978年，才陆续“摘帽”“改正”。至今还活着的不过一万余人了，被称呼为“原右派分子”。

从1957年5月8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第一次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到6月8日（毛泽东主持撰写的《这是为什么？》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发）的一个月间，反右运动基本是在民主党派头面人物和知识分子比较集中的大城市，如：北京、天津、上海、沈阳、武汉、重庆等地进行的。

毛泽东说过：北京那个地方越乱越好，乱得越透越好（《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48页）。“民主党派要抓住其中的右派，狠狠地打！”“右派分子虽然多，但头儿已经打了。把头子打了，就不好作怪了，”（毛泽东在青岛会议上的讲话）。

翻开每天的报纸，6月8日以前，着重刊登的是中共中央统战部奉毛泽东之命、居心险恶收集的党外人士的发言。6月8日以后，扑面而来的则是中共组织“左派”撰写的大批判稿和右派分子的检讨。

大城市，尤其是首都北京这个政治中心，自然应该是政治角逐的激烈之地，然而除了少数尚未涉世的年轻学生发表了一些比较尖刻的言辞以外，绝大多数人包括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军政人员和民主人士，在所谓大鸣大放中的言论都是虽有所诤却含蓄有加，一是因为他们对中国共产党有拥戴之意，心存侥幸，幻想多多。二是受历次政治运动的冲击，难免余悸在心，顾虑重重。

历经五十五年以后，回过头来看看当时被毛泽东认定为三株大毒草的“政治设计院”“平反委员会”“党天下”，无一不是以肯定共产党的领导为前提，只就思想倾向、工作方式等委婉地提了一些建议。

无论是年轻学生还是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原本是无意挑战中共之领导权的。针砭时弊的目的在于响应中共中央“帮助党整风”的号召，促进中共改变工作作风，提高执政能力，或者说是为了维护其领导地位。

可是再看看 1957 年 6、7、8 三个月的报纸，几个无一兵一卒的秀才被描绘成呼风唤雨、吹沙走石的妖魔鬼怪，似乎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真的向拥有数百万军队的中共发动了进攻。

实际上，那些没有看透毛泽东的阴谋、不明就里的秀才们，只是在指定的会议上就指定的题目发了几句言，会议都是由大大小小的党支部书记主持的，北京并没有乱。

1957 年夏季骤然呈现的烽火连天、雷鸣电闪，是毛泽东制造的魔幻场景，是蒙蔽民众，渲染敌情，制造独裁王国的赤色恐怖。硝烟弥漫，炮火轰鸣，中共借机大开杀戒，毛泽东一纸电令，既没有进攻能力又毫无防御本领的知识分子便纷纷落马了。

打扫战场时发现，北京、天津、上海等地竟然就是那么几个手无寸铁的书生。所谓乱，纯粹是毛泽东制造的假象。

1978 年复查，北京只有三个，即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上海只有两个，即陈仁炳、彭文应，被列为保留下来的右派，而且其罪名也是虚构的，沉冤至今未雪。

北京留了三个捏造出来的“右派”样本，引得各地争相仿效，全国一共认定了九十六名“右派”，其余五十五万余名“右派分子”均系错划。九十六比五十五万，放大了五千七百多倍，中共中央却大言不惭地以此证明“反右是必要的，正确的”，仅仅是“扩大化”。实乃岂有此理，一派胡言。

下表即为根据各省市地方志统计的官方数字。

表一 各地右派人数及占当地城镇人口的比重（千人 ‰）

地区	城镇人口	右派人数	右派占城镇人口比重 ‰
全国	106195	553	5.2
北京	4011	12	3.0
天津	3225	5	1.6
河北	5734	26	4.5
山西	2892	11	3.8
内蒙古	1964	4	2.0
辽宁	9379	25	2.6
吉林	3838	10	2.6
黑龙江	5651	12	2.1
上海	6897	15	2.2
江苏	7661	13	1.7
浙江	3645	14	3.8
安徽	3147	30	9.5
福建	1906	7	3.7
江西	2354	12	5.1
山东	5367	46	8.6
河南	5281	71	13.4
湖北	4114	46	11.2
湖南	3150	34	9.8
广东	5409	37	6.8
广西	1622	14	8.6
四川	7797	61	7.8
贵州	1949	10	5.1
云南	2436	10	4.1
陕西	2884	8	2.8
甘肃	2308	12	5.2
青海	527	13	24.7
新疆	1022	3	2.9
军队		6	

从表一所列数据可以看出：

（一）右派不是集中在北京、天津、上海等政治敏感、人口众多、知识分子比例较高的大城市。而是分布在广大的县、乡、镇。

依照官方公布的数字，北京市有一万二千余人被打成右派分子，约占当时城镇人口（享用商品粮待遇的“非农业人口”）总数的 3%，天津市为 1.6%，上海为 2.2%。

从省际来看，当年东北三省、江苏、浙江、福建等经济相对发达、生活较为稳定的地区，右派比重也较低，大体在 1.7‰到 3.8‰之内。

内蒙、陕西等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重点开发，工业建设方兴未艾、急需人才的省份，右派的比重也不高，在 2.0‰到 2.8‰之间。

青海属边远地区，人烟稀少，交通不便，居住分散，经济相对落后，

更非政治敏感区，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数竟高达城镇人口的 24.7%，居全国之冠。

河南、湖北、湖南、安徽、山东、广西等省右派分子的比例也相当高，均在 8%以上。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呢？个中缘由实在耐人寻味，原来划多少右派分子取决于当地中共头目的个人好恶，完全是脑袋发热定下的指标。本文随后将对此有所评述。

从省内来看，知识分子相对集中的城市，比如省会和省辖市，右派的比重远远低于穷乡僻壤，越是偏远落后、欠缺文化的地区制造出来的右派越多。

以河南省为例，全省制造右派分子 70806 人，占城镇人口的 13.4%，省会郑州的右派分子只占 2.8%，全部省辖市中右派分子占 4.1%，而各专区划为右派分子的竟高达 65072 人，占地区城镇户口人数的 31.5%。例如：商丘专区共揪出右派分子 8533 人，其中商丘市 406 人，占全市城镇人口的 7.1%，商丘各县揪出右派分子 8127 人，占县区城镇人口的 31.3%。

表二 河南省部分市、县右派人数分布

地区	城镇人口(千人)	右派人数	右派占城镇人口的比重%
全省	5281	70806	13.4
全部省辖市	1386	5734	4.1
郑州	459	1273	2.8
开封	248	1339	5.4
洛阳	230	867	3.8
平顶山	36	495	13.8
安阳	104	408	3.9
鹤壁	18	232	12.9
新乡	158	344	2.2
焦作	93	569	6.1
三门峡	40	207	5.2
全部专区	2052	65072	31.5
商丘全区	273	8533	31.3
商丘市	57	406	7.1
商丘各县	216	8127	37.6
南阳全区	272	8693	32
南阳市	55	351	6.4
南阳各县	217	8342	34.8

这些数据表明，大中城市或者说知识分子比较集中的政治敏感地区，并没有发生中共所说的大规模“篡党夺权”活动和过激行为。尽管毛泽东和邓小平、刘少奇、周恩来、彭真（此五人为中央级的反右运动的罪魁祸首）等中共要员大肆宣扬“右派分子猖狂进攻”，“右派分子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还不惜以阴谋、阳谋等手段编造罪名，毕竟没有足够的事实根据，仍然无法给更多的人戴上右派帽子。大中城市文化层次较高，在众目睽睽之下，中共要维持其统治，伪装尚不能完全剥去。

地方就不一样了，中共形式上是统一的，实际上诸多地方都是各自为政，在党国体制、书记挂帅、大权独揽的极权制度下，中央、省、地区、县、乡镇把持的各级政权机构，均为独立王国。越是偏僻闭塞地区，地头蛇的势力和权力越大。五七年之际，“反对党员个人就是反对党的领导”之说甚嚣尘上，地方一霸借此大做文章，整肃他人，以达到任其所为，无人敢于监督的目的。“反右”正是打击陷害排除异己，实现政治野心的大好机会。

毛泽东下令反右，心怀叵测的中共地方官员蜂拥而起，争先恐后。他们深谙中共政治运动的妙处，大轰大嗡、紧跟、投机，是博得上司赏识、获取政治表现的手法，是加官晋爵的主要途径。越到基层越无人约束，在中共官场中，无做人的原则可言，见风使舵、挟嫌报复、落井下石，比比皆是。损人利己不以为耻，栽赃陷害习以为常。于是大力揪抓右派以作进身之阶，大力揪抓右派以防民之口，既可向上邀功，又可独揽大权。这是造成基层右派人数远高于大中城市的主要原因。

数据表明，大中城市划为右派的人数仅占右派总数的 20%，绝大多数右派分子工作生活在小城市和乡村。而且越是基层，右派的比重越高。

（二）反右特别积极的省份，多是由毛泽东的宠臣主政。

河南的吴芝圃，安徽的曾希圣，山东的舒同，四川的李井泉，甘肃的张仲良均为毛泽东之宠臣。时人称之为五虎上将。但不是镇守边关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将军，而是鱼肉百姓镇压民众的走狗。他们和青海的高峰、湖北的王任重、湖南的华国锋、广西的刘建勋等都是反右派的急先锋，大跃进的吹鼓手，制造冤狱的酷吏，草菅人命的魔头。

他们一切行为的出发点和归宿是如何保住自己的权利和地位。热衷的是贪婪权欲，信奉的是唯上是从。他们深知投毛泽东之所好是升官的捷径，于是嘴里喊着“绝对忠诚”，实际做的是独霸一方；极尽阿谀谄媚、曲意逢迎之能事；玩弄结党营私、拉帮结派的手段；翻雨覆雨、出尔反尔是其惯常表现；相互倾轧、打击陷害是其惯用伎俩；视人民为奴隶、视百姓如草芥为其共同特点；“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为其崇奉的信条；且看以下实例：

吴芝圃积极反右，饿死三百余万民众

吴芝圃（1906—1967），河南杞县人，高中肄业，1925 年 12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 年曾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1957 年时为河南省省长，中共河南省委第二书记。

潘复生（1908—1980），山东省文登县人，中师毕业，1931 年 12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的年龄比吴芝圃小两岁，党龄比吴芝圃少六年，1952 年平原省撤销以后，调入河南省，毛泽东指定他任第一书记。

吴芝圃自认为在中原地区苦斗了二十多年，无论是资历还是战功，都是潘复生望尘莫及的，理所当然不甘心屈居潘复生之下。潘复生自认为能文能武，持才傲众，并不把吴芝圃看在眼里。两个人的矛盾、在政治斗争的风雨中孕育、沉积。

1957 年夏，中共掀起反右派运动。此时的潘复生出于发展生产、稳定社会秩序的需要，主持制订了《关于奖励发展农业生产，争取秋季农业大丰收的宣传要点》，和《关于不在县以下机关开展反右派分子斗争的指示》，经省委常委通过并发出。

吴芝圃一方面举手赞成，同意发出文件，一方面敏锐的意识到，潘复生错估了形势，毛泽东注重的并不是农业生产，而是加强专政，压制民主思

潮。于是，他抓住这个时机，暗中进行活动，准备一举搞垮潘复生。

1957年8月，中共河南省委召开第五次全会（扩大），吴芝圃在会议期间突然发难，批判潘复生的“右倾错误”，他揭露《宣传要点》是发展资本主义的黑纲领；《关于不在县级以下机关开展反右派斗争的指示》是抵制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战略部署，违背了马列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

吴芝圃是河南人，又一直在河南工作，亲朋故旧众多，关系盘根错节。在吴芝圃的操纵下，会议决定收回上述文件，大张旗鼓地在基层开展反右斗争，总共揪出右派分子七万余人，居全国之首位。毛泽东在1958年3月8日至26日的成都会议上肯定了河南的反右运动，也肯定了吴芝圃。

1958年5月，中国共产党召开八大二次会议，潘复生告病请假。吴芝圃迎合毛泽东的旨意，在会上作了题为“右倾机会主义是当前党内的主要危险”的发言，指名道姓地批评潘复生。“揭露”潘复生造成的种种“恶果”，他指出：“潘复生的错误是非常严重的，是一种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河南对他这种错误思想斗争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是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胜利，是河南工作由被动向主动的转折点。”

毛泽东表扬了吴芝圃这个发言，带头为其鼓掌。毛泽东在会议结束前的讲话中，点名批评了一些人，潘复生名列其中。参加八大二次会议的河南小组，从5月18日到20日，把病中的潘复生从医院拉到会场，对他进行了连续三个半天的揭发批判。5月18日，中共中央通知河南省委，免去潘复生河南省委第一书记的职务，由吴芝圃代替。

1958年6月6日到7月1日。中共河南省委第九次全体（扩大）会议召开，主题是传达八大二次会议精神，内容是集中批判“潘、杨、王”反党集团。潘，是潘复生，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兼省军区政委；杨，是杨珏，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王，是王庭栋，河南省委副秘书长，这三个人都是从平原省调入河南任职的。吴芝圃在这次会上给“潘、杨、王”列出了八条罪状，强调指出：他们已经完全形成了“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宗派集团”，同他们斗争的性质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是坚持执行中央正确路线和反对、歪曲、修正中央路线的斗争。”

这场狗咬狗式权力斗争、宗派矛盾和观念分歧借着“反右派”运动发作。吴芝圃发动的突然袭击，攻势凌厉毫不手软，凭着自己在河南三十年打下的人脉基础，硬是把潘复生杨珏、王庭栋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从而实际上把持了河南的党政领导权。几个月时间，几乎各县都揪出了“小潘复生”，这些“小潘复生”所遭受的摧残比潘复生严重得多。据估计，全省揪出“小潘杨王”十多万人，受株连的干部群众不下二十万人，摧残致死一百多人。

在毛泽东决意反右的大背景下，潘复生终于没有斗过“地头蛇”。

打倒了潘复生，吴芝圃被任命为河南省委第一书记。他是反右有功而升官的，上台以后继续反右。以激进的态度推行“三面红旗”。使河南成了全国注目的地方。粮食产量“放高产卫星”是河南最先搞起来的，人民公社是河南最先创造的，不讲科学地兴修水利，深翻、密植也起自河南。河南不断地出经验，《人民日报》经常介绍河南的经验。在当时人们的眼中，河南省已经成为全国“大跃进”的旗帜，吴芝圃成为全国“大跃进”的“先锋”。

自1957年河南揪出七万名右派分子以后，知识界已经噤若寒蝉。1958年又揪出“潘杨王反党集团”，在党内和干部中形成了政治高压气氛，更没有人敢讲真话了。一任吴芝圃等人胡作非为，吴芝圃宣称：河南要在四年内实

现共产主义。

吴芝圃还有一项讨好毛泽东的杰作，现在在河南郑州北郊黄河岸边还留有一座豪华的园林型别墅群——“河南省委第三招待所”。起初的设计意图是为毛泽东建造行宫，当时正值河南省内田园荒芜、民不聊生、饿殍遍野，但这些宫殿照样大兴土木。吴芝圃为了让中共中央在郑州开一次全国党代表大会，用高征购、高积累聚敛起来的民脂民膏兴建了这个宫殿群，它永远将吴芝圃铭刻在累累白骨堆起来的墓碑上。

1958年是吴芝圃风光无限的一年。6月底7月初，华北六省市农业协作会议在农业跃进中心的郑州召开。8月6日，在吴芝圃等人的陪同下，毛泽东兴致勃勃地来到新乡县七里营公社视察社办工业和棉田。他看到公社大牌后点头说“人民公社，名字好”，并转身对吴芝圃说：“吴书记，有希望啊！你们河南都像这样就好了。”

然而好景不长，吴芝圃一味蛮干造成工农业生产严重倒退，最终把河南人民推入了地狱，酿成了震惊全国的“信阳事件”，浮肿病遍布城乡，饿死人事件连连发生，虽经大力掩饰，层层隐瞒，无奈饿殍数字过于庞大，仅八百余万人口的信阳专区，饿死者多达一百余万，占全区总人口的13.2%（1961年1月13日信阳地区呈报中共中央的数字）。

此时毛泽东生气地说“吴芝圃，你对，你搞得快，可能你是马列主义，我是机会主义。”他又对别人说“这种人表面上‘左’，实际上是形‘左’实右，缺乏经验，不深入群众。”诡诈狡黠的毛泽东撇干了自己的责任，把错误完全推到吴芝圃身上了。

1961年毛泽东撤了吴芝圃河南省委第一书记之职，调刘建勋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同时，中共河南省委作出《关于潘复生同志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平反决议》，为潘、杨、王平反。

1961年，吴芝圃“沉痛”地检讨说：“省委和我犯的错误严重得很，罪恶也大得很……组织上无论如何严肃处理，我都没话讲的。处以极刑，我也应引颈受戮。”“我欠河南5000万人民的债一辈子也还不清。”

吴芝圃死于“文革”最狂热的1967年。当时，劫后余生的河南人借着“造反”的狂潮，义愤填膺地谋划清算1959—1961年“吴芝圃的罪行”，称他为“屠杀河南人民的刽子手”，并筹划派人赴广州把他“揪”回河南来“批斗”。吓得吴芝圃胆战心惊，病情加重，死在广州的医院里。

吴芝圃生前与邓小平交好，1979年1月24日，邓小平做主，为吴芝圃“平反”并召开追悼会。悼词中宣称：吴芝圃“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鞠躬尽瘁，无私地贡献了自己的一生”。把一个造成数百万河南同胞生灵涂炭的酷吏描绘成“救黎民于水火，解百姓于倒悬”的菩萨。如此颠倒黑白，篡改历史是邓小平的一贯伎俩，也是中共的固有特色。

中共究竟是为人民服务还是为毛泽东及其宠臣树碑在此昭然若揭了。不知1959—1961年河南那数百万“饿死鬼”在九泉之下对此会有何感受？活着的人又该如何对待。

佞臣舒同，罪不容诛

舒同是毛泽东的宠臣之一，1905年生于江西东乡县，本名宜禄、字文藻。其父舒仁兴原是个理发匠，后来在县城十字街开了一家小饭馆，前清秀才梁翘偶来饭馆用餐，见一小童巧言善辩，逗人喜欢，免费收为蒙童，舒宜禄遂改名舒同，开始读《四书》《五经》，练习书法。1916年舒同入小学，1920

年考入江西抚州师范学校。1926 年秋，北伐军攻占抚州，此时正是国共合作的鼎盛时段，舒同和几个同学四处书写张贴欢迎标语，引起北伐军内中共特派员曾燕堂的注意，介绍舒同加入了国民党和共产党。他脚踩两只船，先后任共产党东乡县委书记、国民党东乡县党部常委。1927 年“四·一二”政变后，国共关系破裂，舒同遭国民政府通缉，辗转于武汉、上海、安徽、南京等地，改名换姓隐匿于国民党一军校中充当雇员。后潜逃远遁至老家江西，偶遇旧日相识，于 1930 年重新加入红军，任红四军政治部秘书等职。抗日战争时期，任晋察冀军区政治部主任，延安整风时承担军委整风审干工作。1954 年 8 月毛泽东指派他任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兼济南军区第一政委。1957 年毛泽东掀起反右运动，舒同积极响应，唯恐落于人后，无所不用其极。57 年初秋，山东全省认定的右派分子人数已占城镇人口总数的 2.1%，和陕西、吉林、辽宁、黑龙江等省相近，略高于内蒙、江苏的比例。舒同为取悦毛泽东，不满意已经取得的“成绩”，连忙下达“整风补课”任务，在省直机关 54 个厅局中，接到补课任务的厅局有 47 个，受到重点补课的厅局级干部占 21.55%、处级干部占 14.17%、县委委员一级的占 12.9%、由此增加右派三万四千八百余人、开除党籍一万一千九百余人。使山东省的右派分子比例跃升至全国前六名之列。舒同自认为立了大功。

凡沉迷于争功邀宠者必然以打击他人为进身之阶。反右运动中，全国各大小单位都有一帮丧心病狂、趋炎附势之徒，紧跟毛泽东大搞残酷斗争。广东将省委书记古大存、副省长冯白驹等打成“地方主义反党集团”；甘肃将副省长孙殿才、陈成义等打成“右派反党集团”；青海将省长孙作宾等打成“地方主义右派反党集团”……作为山东省第一书记的舒同，反右初期即揪出“向明、王少庸反党宗派集团”，“王卓如右派反党集团”报经毛泽东批准，撤了赵健民的省委书记和省长之职，这位地下党时期的省委组织部长，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军区司令员、第二野战军第十七军的政委兼军长，被定性为“反党集团”的首恶。舒同排挤了赵健民以后，日益有恃无恐更为飞扬跋扈，独断专行，扩大打击面，镇压人民。据 1963 年 12 月公布，在 1958 年“整风补课”、拔“白旗”，1959 年“反右倾”、“反瞒产私分”，1960 年冬和 1961 年春“整风整社”、“民主革命补课”等故意制造的政治运动中，山东全省被重点批判、处分的干部群众多达 53.8 万多人。

舒同为讨好毛泽东及中共头目，1958 年主持在济南修建了园林式的南郊宾馆，占地面积 1160 亩。特意为毛、刘、周、朱、陈、林、邓盖了七栋小楼。园内树木葱茏，环境静谧。东邻风景秀丽的千佛山，西毗苍松覆盖的英雄岭，南倚雄峻逶迤的泰山峰，北靠花树锦簇的植物园。还为毛泽东修建了人工湖和专用游泳池。毛泽东死后多年始接待外宾及各地游客。

在农业上，1958 年后，舒同掀起“三面红旗”四处招摇，在全省大放高产卫星，虚报粮食产量，造成全省供应紧张，馆陶、济宁、菏泽地区相继发生饿死人事件，舒同鼓吹的浮夸风、共产风，最后造成山东省四五百万人饿死的惨剧。山东与河南、安徽、四川和甘肃诸省并列为全国的重灾区，不是天时气候使然，主要是这些以能干著称的奸佞之徒更唯上，更左，更无视民间疾苦。

1960 年 4、5 月份，山东省召开粮食分配会议，舒同无视接二连三的大面积饿死人事件，对全省粮荒爆发的严峻局面置之不理，仍坚持高指标、高征购，在全省大搞反瞒产私分运动，用暴力抢夺农民口粮。翻箱倒柜一颗不

留。有的人家把谷仓里最后的谷子交上去之后，全家上吊自杀了。

聊城专区范县在大跃进期间提出 1960 年过渡到共产主义，毛泽东十分欣赏，并说：“范县的报告是一首诗”由此舒同更加洋洋得意，大刮共产风。其时人民公社的弊端已日益暴露，公共食堂已难为无米之炊，早就停伙了，吃野菜，吃野草，吃树皮，吃观音土，吃得脚肥脸肿，疾病大量蔓延，饿死人的事层出不穷。公社社员们面对土皇帝肆无忌惮的暴行，只能忍气吞声。淄博地委王成怀向舒同汇报说淄博专区死了 11 万人，舒同满不在乎地说：“安徽，江苏也死了许多人，不值得大惊小怪的”当时还有许多干部向省委汇报饿死人和诸多人相食的事件，都被告知“勿听信传言”。并通告全省各地“禁止传谣”。发现传播者要严加追究。

1960 年 7 月中旬，中共召开北戴河会议，提出保粮，保钢，保外贸出口三大任务。8 月初舒同带着贴身女护士到青岛开会，名义是传达贯彻中央精神。他只参加非参加不可的会议，其余时间就是带着护士游山玩水，打牌跳舞。还要给女护士堕胎，因而有意拖长时间。一个传达会竟开了四十多天，听说陈云要来济南视察才匆忙返回济南，秋种时节已经错过，救灾措施没有落实，饥荒日益严重。山东农村劳动力从 2173 万锐减到 1790 万。耕畜减少了 237 万头，耕地面积比 1957 年减少了 1900 万亩。盐碱地由 1500 万亩增加到 2000 万亩。当年山东粮食总产量只有 160 亿斤(上报的数字是 400 亿斤)，和战乱的 1949 年大体相当。

1960 年 10 月，舒同被撤销职务。其继任曾希圣上任之初曾在就职报告中列举了山东省委主要负责人舒同“破坏耕作制度”，“大刮五风”，“大批饿死人”等严重错误，还特别提到“据初步发现，全省人吃人事件七十余起”毛泽东闻之默不作声。

舒同以擅长书法沽名钓誉，其女曾著文赞之曰“百年之后，人们可能忘记父亲所有的职务，但不会忘记他的书法。”行文至此，笔者认为舒同之女所言似失之偏颇。舒之字体，肥腴谄佞柔弱无骨，与毛之肆虐挥洒隐含刀锋恰成对比。有人戏称，“毛之能容者，皆舒类也”。百年之后，有正义感、有历史责任感的人们可能忘记舒同所有的书法，但不会忘记他的罪孽。毕竟，那是数百万山东人的生命啊。

恶霸曾希圣，死有余辜

1958 年 3 月 10 日《人民日报》一版头条刊登社论《对敌人必须专政到底——论安徽省委揭露李世农反党集团的巨大胜利》，刊登通讯《肃清无产阶级专政取消论——从李世农反党集团手中夺回了专政职能的刀把子》；二版用整版刊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在安徽省委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的总结发言；三版用半版刊登《中共安徽省委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关于开除右派分子李世农、杨效椿、李锐党籍的决议》。《人民日报》如此大张声势，一时震惊全国。

其实这是一条迟到的新闻。因为早在 43 天前，安徽省委已经议决开除李世农(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杨效椿(省委委员、省检察长、省委组织部副部长)、李锐(省委委员、省副检察长)的党籍，并将三人定性为“李世农反党集团”

《人民日报》为何此时公布该案呢?是为了给毛泽东 1958 年 3 月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烘托气氛。毛泽东说：“阶级斗争发展到这个阶段，隐藏在党内的资产阶级分子一定会暴露出来，不出来反而是怪事。”毛泽东说：“许多

人过去看不清楚，如李世农过去就未看出来。”“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有反党集团，如广东、广西、安徽、浙江、山东、新疆、甘肃、青海八省区就有，他们要推翻领导，自己挂帅；另一种情况像四川那样，有右派活动。是不是各省都大同小异，这是阶级斗争规律。”曾希圣当面向毛泽东汇报说：李世农坚持资产阶级的法制观点，早在肃反运动中就包庇和宽纵反革命分子，今年又反抗省委提出的在政法部门反右倾的斗争，并且组织右派分子在政法战线上向党猖狂进攻。毛泽东听后表态：“看来李世农是个坏人。”曾希圣拿到了尚方宝剑，沾沾自喜，《人民日报》就此吹捧毛泽东“高瞻远瞩、洞察秋毫”

安徽的反右派斗争，在曾希圣的主导下，共划右派分子 31472 人，位居全国第五。曾希圣独出心裁，花样翻新，他将中央划右派的六条标准扩大为十二条，增加了六条，即：丑化党的领导，丑化积极分子，挑拨党群关系，挑拨群众关系，反对农业“三改”，反对河网化。这十二条标准，可以随意把一个人打成右派分子。安徽的反右派斗争是从文教界开刀的。首先是中共安徽省委文教部副部长、安徽省文联党组书记兼主席戴岳为首的 16 人被打成“文联右派反党集团”，占该单位编制 43 人的 37%；接着，安徽文联党组成员、《江淮文学》副主编王影和副主编石青等被打成又一个“右派反党集团”；省文化局以陈仲、张熙才、余建民为主要成员也被打成“反党集团”。随之反右派斗争在教育、卫生、科技部门展开，所划右派越来越多，斗争越来越残酷。仅省立医院和安徽医科大学及其附属医院，副主任医师以上高级职称被打成右派的就有 58 人，占高级职称人员的 39.5%。在三万多右派中，有 25137 人是文、教、卫和科研单位的知识精英、科研骨干。

1958 年到 1960 年全省仅公安机关就逮捕了 17 万多人，集训、劳教了二十多万人，给 38 万多人戴上了地、富、反、坏、右帽子。

曾希圣 1904 年出生于湖南兴宁县一乡绅家庭。1920 年秋考入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1924 年考入黄埔军校，曾就读于中国国民党政训班，加入改组后的国民党。1926 年 7 月，随军北伐，先后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团指导员、汉口教导团军事队队长等职，1927 年加入共产党。

1949 年 4 月至 1952 年 1 月，曾希圣先后担任皖北区党委书记和安徽省委书记，李世农是河北巨鹿人，1930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副书记，是曾希圣的主要助手。两人在工作中产生过一些龃龉，曾希圣素有曾霸王之称，听不进李世农的意见遂日益不和。于是借反右之机将对方置于死地。“李世农反党集团”一案由此而生。该案株连甚广，伤及属中央管理的干部 33 人、省委管理的干部 77 人，另有 3000 余人被批判、处分。省检察院被划右派分子和坏分子 21 人，占总人数的 27%。地(市)检察院正、副检察长共 16 人，其中 11 人被打成右派分子，芜湖市副检察长周玉志和马鞍山市副检察长林钧源等在劳改中含恨离世。曾希圣之狠毒恶燥可见一斑。

在宁“左”勿右的思想指导下，安徽全省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魏心一(省委委员、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等也被打成“反党集团”。安徽所划右派分子占全国的 5.7%。

曾希圣作风霸道，略有异议即遭无情打击。反右后他紧跟毛泽东，随即掀起极端狂热的“大跃进”，不恤民力，独断专行，盲目蛮干，把安徽省变成了“共产主义乌托邦”的试验场。严重破坏生产力。

1955 年，安徽全省粮食总产量曾达到 230.58 亿斤，民众聊可温饱。1958 年至 1960 年，三面红旗迎风招展，高产卫星连连不断，丰收喜报频频捷传，

实际那三年粮食的总共产量只有 452.02 亿斤，向中央虚报为 820.91 亿斤。

“高估产”带来“高征购、高调拨”，导致全省哀鸿遍野、饿殍载道。1959-1961 年安徽省因饥饿而死的人数有说六百万的，也有说九百万的，官方出版的《安徽省志·人口志》则承认为 407 万！对此，作为大权在握的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责有攸归，罪该万死。

1959 年春，在省城合肥贴出一张大标语：“打倒曾胖子，杀死余妖精”（曾希圣妻子余淑），发泄心中的愤懑情绪。曾希圣下令追查，折腾半年时间，花了大量人力、物力，逼死了两个“犯罪嫌疑人”，这起所谓“反标案”最终也没有破获。曾希圣非常恼火，几次把侦破人员叫去训斥，叫他们“滚！”说“我养活你们还不如养一条狗”。其蛮横霸道令人发指，这就是共产党高官的真实嘴脸和嚣张气焰。

曾希圣紧跟毛泽东“钢铁元帅升帐”的部署，在安徽创造了世界上最大的“炼钢炉”。将一条山沟的两头用土石封口堵死，将山上的树砍一些，推下山沟，然后把铁矿石、收来的铁器推下山沟。再砍一些树推下去，再堆一些铁矿石、铁器，这样堆上三、四层，直到把山上的树砍光。然后放火将树木点燃，烧上几天。等火熄了派人下去一看，到处是烧出来的铁疙瘩、还有没烧完的树木，没烧到的铁矿石、铁器。于是调动人马，将铁疙瘩、铁器选出来，敲锣打鼓，运到县委去报喜：炼出了多少多少吨“好钢”。消息传到四川，连忙派人到安徽取经。西南左王李井泉听了汇报都连连摇头说：曾希圣真是胡搞，这个搞法四川不能学。

群众在挨饿，农村在死人，曾希圣下令“找一个夏天喝稀饭不出汗的地方”大兴土木，命省长黄岩当总指挥，在岳西县石关，修建了一个庞大的别墅群，每个省委书记处书记都有一幢小楼，花费巨大。还专门为毛泽东修了一幢房子，内部装饰穷奢极欲。这要耗费多少民脂民膏，又要有多少黎民百姓在这种奢侈的劳役中力竭而亡！真正是一边粒米如珠，饥民人相食；一边是食民而肥、骄奢淫逸的贪官酷吏！

1959 年安徽即出现饿死人现象，1960 年愈演愈烈，起初曾希圣竭力封锁消息，妄图隐瞒真相。庐山会议后，将张恺帆（无为县人，时为安徽省委常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曾在无为县开仓赈灾）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成了安徽省的“小彭德怀”，受此案牵连的达 28741 人。但饿死人的事仍层出不穷。对此曾希圣大伤脑筋，情急之中他同意下边搞包产到户。为了应付中央，他在名词上动脑筋，起名为“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包工包产责任制。秋后，实行包产到户的生产队占了全省的 85.4%。据省里对 36 个县的调查表明，施行责任田后平均亩产比上年增长 38.9%。“责任田”被干部群众誉为“救命田”。

1961 年 3 月 15、16 日，他把试行“责任田”的事向毛泽东作了详细汇报。当时，毛泽东面对全国饥荒一筹莫展，得知实行“责任田”可以大幅度增加粮食产量时，便对曾希圣说：“你们试验嘛！搞坏了检讨就是了。如果搞好了，能增产 10 亿斤粮食，那就是一件大事。”曾希圣立即通知安徽省委，兴奋地对下属说：“现在已经通天了，可以搞。”毛泽东随即又说：“你们认为没有毛病，就可以普遍推广。”并叮嘱道：“如果‘责任田’确有好处，可以多搞一点。”1962 年 12 月，粮食饥荒稍有缓解，毛泽东到苏州视察，打电话叫来曾希圣，对他说：“生产开始恢复了，是否把这个办法（指责任田）变回来。”曾希圣回答说：“群众刚刚尝到甜头，是否让群众再搞一段

时间。”毛泽东没有明确表态。随后由刘少奇出面组织安徽的县团级干部对曾希圣展开批判，会议期间曾有人极力主张开除他的党籍，甚至提出要杀他的头。但对曾希圣最致命的打击并不在于那些“批判”，而在于毛泽东对他的态度已经变化了。在曾希圣推行“包产到户”之前，毛泽东一直对他宠爱有加，即使知悉安徽省大量饿死人以后，毛泽东对他仍不失宠信，当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因饿死人太多而遭免职后，毛还特命曾希圣兼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而当1961年曾希圣在安徽推行“包产到户”，尤其是毛要他“把这个办法（指责任田）变回来”却遭到拒绝后，毛对曾希圣的“信任”和“喜爱”完全丧失了。在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任由刘少奇主持对曾希圣的“批判会”，最后毛泽东决定撤去曾希圣的省委第一书记职务，显然是因为他的“包产到户”严重威胁到了“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声誉，而这“三面红旗”是在毛泽东的主导下“树起”的，“三面红旗”如果倒了，毛泽东在党内至高无上的权威地位也就岌岌可危了，这是毛泽东绝对不能容忍的。毛泽东不顾民众的死活也要维护他个人的所谓权威。

曾希圣文革初期受到群众猛烈批斗，曾跪在地上连连请求饶他活命。1968年7月15日在北京病逝，终年64岁。闻讯曾希圣亡故的信息后，安徽人弹冠相庆说：这个老龟孙可算死了！！

华国锋反右立功，两年连升三级

从1953年到1959年这一时期，周小舟担任湖南省第一书记。周小舟1935年毕业于北平师范大学文学院国文系，曾任过毛泽东秘书。1943年后调往晋察冀分局，任冀晋区第一地委书记兼第一军分区政治委员。华国锋是周小舟的老部下，四十年代即追随其左右，前倨后恭，俯首听命。1949年后随周小舟入湖南，委任为湘阴县、湘潭县委书记。1956年5月，由周小舟推荐，华国锋从湘潭地委升任湖南省人民委员会文教办公室主任，开始从地区级领导进入省级领导。1957年，突遇反右斗争疾风暴雨。华国锋主管文教，冲锋在前。湖南的“反右派运动”如火如荼，许多人无辜地被打成“右派分子”。周小舟对此深感不能适应，借口“多日失眠，精神不佳，”向中共中央请求休养，于当年远赴青岛，修身养性。周小舟远离湖南后，华国锋更加有恃无恐地大举反右，到了九月，湖南省揪出的右派比七月底增加三倍多，党内右派比七月底增加四倍有余。《湖南日报》编辑部里，挖出了一个全国仅有的特大“反党右派集团”。那些敢于坚持正确办报方针的业务骨干几乎一网打尽，都成了右派。华国锋因“反右”有功，于1957年11月升任中共湖南省委统战部部长。在“宣传华国锋”的热潮中长沙第五中学党支部发表了《华主席指挥我们战斗》一文，记述了华国锋当时积极领导“反右派运动”的情况：“师生们怎么也不会忘记，1957年4月下旬，主管全省文教工作的华国锋同志，身着青布便服，走进了我们的校园。他一到学校，就广泛与师生们交谈。华国锋同志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望远镜和显微镜，洞察教育战线两个阶级的生死搏斗，看穿了阶级敌人的狰狞面目。有一次，华国锋同志参加语文教研组的“鸣放会”，一个右派分子在会上恶毒攻击党的方针政策。华国锋同志冷静沉着地听着这个坏蛋的“鸣放”，目光炯炯，稳若泰山地向群众表示，我们欢迎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的革命群众向党提意见，帮助党整风，也要警惕阶级敌人的捣乱和破坏。在党中央发出反右派斗争的战斗号令后，华国锋同志亲自部署了我校反右派斗争，指挥我们取得了这场斗争的伟大胜利。”

以“中国共产党湖南省委员会”名义发表的《华国锋同志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卓越继承者》一文中，也写及华国锋是怎样积极投入“反右派运动”的：“1957年，资产阶级右派趁我党整风之机，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当时刘少奇在湖南的代理人，与右派分子一唱一和，互相呼应，更加助长了他们的反动气焰。而担任省委统战部部长的华国锋同志，坚决地站在斗争的第一线，按照毛主席、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因势利导地组织和领导了反右派斗争。他根据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中的光辉思想，深刻地指出，这场“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经济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后必不可少的补充和必不可免的继续”，“是关系到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斗争，如果这一仗不打胜，社会主义就将没有希望”。华国锋同志坚定沉着，放手开展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经常分析阶级斗争的形势，及时组织群众进行反击，充分揭露批判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打退了他们的猖狂进攻。”

1958年7月，湖南揪出的右派分子数量位居全国第四（按占城镇人口比例统计），业绩显赫，由此华国锋升任湖南省副省长、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这样，华国锋一个阶梯一个阶梯向上迈，从县到地区，从地区到省，进入湖南省的领导核心之中。他是踏着右派分子的身躯向上爬的。从华国锋上述行为中能说他是一个老实人吗？非也！只能说他是一个极端狡猾，心毒手狠的滥官酷吏。华国锋的双手是沾满了鲜血的。

酷吏高峰，反右积极，罪孽深重

高峰是毛泽东的宠臣之一，由于罪恶昭著，民愤极大，中共未敢宣传，所以知之者不多。笔者在此着墨，实欲让人了解酷吏之凶狠，中共之歹毒。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高峰1914年生于陕西省清涧县一农民家庭，小学文化。十四岁高小毕业即未安心务农，美其名曰参加秘密革命工作（见《华讯词典》所载高峰简历）。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二十一岁任中共清涧县委书记。中共掌权后，高峰从1954年起任青海省委第一书记兼青海军区第一政治委员。

1957年，高峰反右异常积极，地广人稀的青海省当时以游牧为主，只有城镇人口五十三万，竟然抓出右派分子一万三千余人。右派人数与此相近的地区有：邻近青海的甘肃省当时城镇人口二百三十余万，抓了一万二千余名右派；比较富裕的江苏省城镇人口七百六十六万，抓了一万三千余名右派；全国政治中心北京市“非农业人口”约四百万，抓了一万二千余名右派。就所抓右派占城镇人口比例而言，青海省居全国之冠。

高峰嫉贤妒能，青海省省长孙作宾1927年入党，党龄比高峰多六年，年龄比高峰长六岁。凶狠的高峰玩弄手段将孙作宾及其夫人刘杰打成右派分子，开除党籍，监督劳动。副省长扎喜旺徐（1938年在延安加入中共的藏族党员）被认定为“地方保护主义”，被撤销一切职务。高峰由此日益独断专行，越发受到毛泽东宠信，也更加得意忘形。

1958年1月22日，毛泽东亲自审阅下发的《1958年公安工作计划要点》确定了公安工作“大跃进”的方向和目标——“把应该逮捕的人坚决依法逮捕起来，把应该管制的人坚决依法管制起来；协助有关部门清查企业内部的坏分子，把其中的大部分人坚决清除出去；对于已经摘掉帽子又有违法行为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一律戴回帽子”。

1958年4月9日，高峰在青海省公安工作座谈会上说：“有些人虽然没

有现行破坏活动，但可能是危险分子，可以采取秘密逮捕的方法，把他们搞起来，要搞得很艺术，谁也发现不了；要采取多种多样的办法，如让他们打架、互相告状、扭送等等。把危险分子都搞掉了，社会问题也就少了”；“谁叫他们在这个时候捣乱，把他们抓起来，一个不放，死也要让他们死在监狱里。”以上言辞充分展现了这个高官的土匪本色，俨然和毛泽东同出一辙。

甘肃的甘南藏族自治州规定对二十一种人可以逮捕，而且“对已捕获的一个也不能释放，未捕获的应想尽一切办法追捕归案”。该州在两年内将藏人总人口百分之八点六关进监狱。由于高峰指令州县大肆抓人，引起藏、蒙、回族等民众严重不安，个别地区发生反抗事件，高峰主张“把叛乱消灭在预谋中”，甚至提出要“以军事围剿为主、政治争取为辅”，得到毛泽东批准，从内蒙调来蒙族骑兵，进行“平叛”。

1959年，为迎合毛泽东的狂热思想，贯彻庐山会议精神，高峰提出“誓死保卫大跃进”的口号，开始大规模捕人，向中央报告1960年捕人指标15000人，实际全年逮捕18177人。青海省1958-1960年共逮捕63064人，约占全省平均人口2.6%，每38人就逮捕1人。以“反革命分子”，“反社会主义分子”，“坏分子”等罪名，将这些人关入监狱，横加折磨。青海互助县58年7月24日一夜逮捕1152人，占人口1.2%，每83人逮捕1人。酷吏的暴政，严重地破坏了生产力，造成青海有史以来的大饥荒。青海省湟中县1960年非正常死亡13.84%。正和县1960年非正常死亡11.34%。杂多县1960年非正常死亡13.61%。（杨继绳：《墓碑》539页）青海民和县1958—1960年饿死20984人，外流、逃荒而死在外面13646人，死绝492户，全县净减少人口25%。面对严重的饥荒和日益增多的非正常死亡，高峰非但不采取任何救灾措施，反而大搞所谓“反右倾”，“反瞒产私分”，对农牧民实行专政。青海民和县为此在三年间逮捕2680人，管制1091人，判刑2966人。大跃进中，青海红山生产队队长戚元法，眼见全队已饿死44%，萌发人性，偷了集体储备粮送给群众，以解饥寒交迫。为此被打成“坏分子”。该生产队共饿死人口87%。1960年4月，青海窝子生产队长马贤珍在全队已饿死27%的情况下，给社员分了些集体粮，被打成“坏分子”遭逮捕，判刑五年（以上数字来源于当时记录在案向上汇报的档案资料，见《炎黄春秋》2010年第1期）。

高峰主政青海时，就像1957年反右有指标一样，“平叛”时抓人也有指标。这个指标经常高得离奇，而且总是超额完成。以青海省玉树州为例，中共青海省委要州里抓二千到二千五百人，州委告诉下面说：“捕错了州委负责，漏掉了下面负责。”后来的官方州志披露，共抓了二万二千七百八十多人，超额十倍。青海省委给中央的报告中承认，仅1958年所抓的人，就占全省蒙藏总人口的百分之十左右。苛政猛于虎，1958年到1960年在青海发生了几场大规模“战役”，大量男性青壮年死于冲突或者逃亡。这百分之十其实就是把藏人部落里尚存的男性青壮年一网打尽，其中很多人死在监狱中。甘南部分地区分配的抓人指标甚至超过了当地成年人的总数。由于青海死人太多，引起民愤，毛泽东不得不于1961年将高峰撤职，但不久即令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处书记去了。罪恶昭著的高峰紧紧追随毛泽东死于1976年11月。

走狗李井泉，恶有恶报

笔者1955年进川，当时还是个年方弱冠的小伙子。定居重庆历经六十余年，如今已是步履蹒跚的耄耋老人了。

划为右派、强制劳教、强迫劳改，都在李井泉当政时期。他心毒手狠，诡秘狡诈，鱼肉百姓，专制独裁。在四川的历届省委书记当中，名声最差的就是毛泽东的宠臣李井泉。

客观地说，文革前的地方官员，尤其是各省委书记，在执行毛泽东的过左政策中，有不得已的苦衷。但是，李井泉在一味取悦上司，罔顾民间疾苦这一点上是尤其过分的。

我手头有关李井泉的资料不多，以下据网上所刊文章拼凑而成。望读者批评指正。

李井泉主政四川十七年（1949 - 1966），一贯极左。通常是在中央已经过左的政策上再加倍偏左。对此，白桦的评语是比较贴切的：“李井泉不仅不折不扣，而且变本加厉地执行极左的方针，硬是把一个天府之国治理成一个饥饿之乡，在四川，有口皆骂，实在是很难！很多四川人在“文革”中对李井泉有过冒犯，但至今不悔。”（白桦：《我所见到的胡耀邦》）

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中，全国的“右派分子”人数是55万多人，占知识分子总数的百分之十一，而四川被打成“右派分子”人数是5万余人，另外还有6万多人被打成“中右分子”。四川的知识分子人口比例低于全国，“右派分子”的人口比例则远高于全国。

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李井泉是围攻彭德怀的最卖力的干将之一。其间有派系的因素，也有现实的因素。派系的因素是李井泉属贺龙一派，贺龙因为与彭德怀有历史恩怨，在“庐山会议”上被毛泽东挑起攻彭，李井泉当然也得卖力。现实的因素则因李井泉治下的四川在“大跃进”中属“人祸”最重的几个省，出于自保也非得斗倒彭德怀不可。

从1958年到1962年，四川官方的死亡统计数字是812万余人。在中央已经开始纠正左的政策的时候，李井泉出于打击反对者的需要，还扣住老毛的《党内通信》不下发，致使四川的经济复苏晚于全国其他省份。丁抒的《从“大跃进”到大饥荒》、《人祸》，东夫的《麦苗儿青菜花黄——川西大跃进纪实》对此有较详细的描述。当时死人最多的省份是四川、河南、安徽、甘肃、山东。除了四川以外，河南的吴芝甫、安徽的曾希圣、甘肃的张仲良、山东的舒同都被调离了省委第一书记的职位去任闲职。只有李井泉，不仅没调职，还被提升为西南局第一书记。文革以前，每年的国庆节，成都市中心的明代皇城都要模仿北京天安门城楼的式样装扮起来，称为“小天安门”。李井泉俨然是“西南王”不可一世。

“七千人大会”上，中央收到了四川干部的检举信，检举李井泉欺瞒中央。同时，李井泉受到众多与会代表的非难，还有人要求中央将李井泉调出四川。李井泉在邓小平的保护下过了关，回川以后不是认真改过，反而动用公安机关追查检举人，图谋打击报复。

李井泉最为人痛恨的事是在1959年宣布四川省粮票作废，使得许多人勒紧裤腰带积攒的一点存粮化为乌有。直到今日，在四川还有人提起此事就愤愤不平。（见 愚人：《大饥荒遗事》、何蜀：《为民请命的“萧李廖反党事件”》）

李井泉最为人痛恨的话是当有人谈起“大跃进”饿死人的时候，李井泉说：“中国这么大，哪朝哪代没有人饿死！”完全没有把饿死人这件事当回事。（见丁抒：《从“大跃进”到大饥荒》）

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在说起河南饿死人的时候表示过：“我欠河南五千万人民的债一辈子也还不清。”李井泉视民众生命如蝼蚁却连连升官，成为毛泽东的宠臣，充分暴露了这帮土匪的本色，和“为人民服务”的谎言。

当时分管农业的省委副书记廖志高（1965年接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后来也承认：“在当时的情况下，四川省委包括我自己，在制定、执行有关政策或工作中失误主要有三条：公共食堂解散得晚了，社员的自留地恢复得迟了，这两条比全国其他各省市大约迟了半年到一年；特别是错误地搞反瞒产私分，虽然时间不长，但影响大、后果严重。这三条失误给群众带来更大困难，对人口非正常死亡问题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是我们应当记取的沉痛教训。”

不知李井泉对自己在大跃进中的所作所为有何感想，至今没见到这方面的材料。

李井泉是在南昌起义的部队撤出南昌的时候参加中共的。后来到井冈山、到中央苏区，一直作到红四军秘书长，所以文革前在四川有李井泉是老毛的秘书的说法。长征中一、四方面军会师以后，李井泉派到左路军，和四方面军一起南下。后来，二、四方面军会师以后又在二方面军任职，从此以后一直在贺龙手下。两人关系极好，据龙门阵称是儿女亲家。贺龙与邓小平解放初期在重庆建立了非同一般的关系，因而邓小平对李井泉也十分看重。

李井泉作风霸道，容不得半点不同意见。四川文革前的老干部基本上分为三个部分：跟随贺龙、李井泉南下的一野晋绥干部，跟随刘伯承、邓小平入川的二野干部，四川地下党干部。李井泉的做法是排挤二野，打击地下党。当然如果谁要是给他提意见，那就不管是哪个山头都得打击。以下是几个著名的冤案：

1958年1月，重庆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张文澄，只因对某上级领导人的不民主作风提出了批评，就被打成右派分子，并在宣传系统中整出一个打击面很大的“张文澄右派反党集团”。（见何蜀：《红岩》作者罗广斌在“文革”中）

1963年4月，重庆市委干部萧泽宽（市委常委、组织部长）、李止舟（市委候补委员、副秘书长）、廖伯康（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兼团市委书记）对西南局领导人李井泉的左倾错误提出批评，被打成了“萧、李、廖右倾反党集团”。（见何蜀：《为民请命的“萧李廖反党事件”》）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在各地仿效北京“揪三家村”的高潮中，又一批原地下党人被李井泉当作“黑帮分子”抛了出来。曾在四川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的原西南局办公厅副主任张黎群被打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西南局宣传部副部长马识途、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李亚群、著名作家沙汀三人被打成了四川的“三家村”。（见何蜀：《红岩》作者罗广斌在“文革”中）

此外，还有在文革中影响极大的刘结挺、张西挺夫妇的案件。其实刘、张二人亦属极左，因与李井泉不和，文革前刘结挺被撤销了宜宾地委书记，张西挺被撤销宜宾市委书记。文革中刘、张起来造反，成为全国知名的造反派干部，九大时分别为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文革后被判刑，所以此案至今未见到一个公正客观的描述。

1966年11月10日，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以后，彭真和老毛对抗，一直拖到11月29日才在《北京日报》转载。李井泉对于

是否在《四川日报》转载，也很伤脑筋。于是打电话给邓小平，恰好邓小平不在，于是又给贺龙打电话。贺龙明确回答说：不转载。这样一来《四川日报》一直拖到12月14日才转载。这一点后来成为红卫兵、造反派攻击李井泉的口实。

文革中，李井泉遇到了比他更左十倍的红卫兵、造反派，被斗得家破人亡：本人遭到造反派的绑架，毒打（见何蜀的《“红卫兵绑架李井泉”始末》）；夫人肖里在揪斗中头发全部被扯光，最后含冤自杀；儿子李明清因为反对中央文革，被北京航空学院的红卫兵围攻殴打，还没有断气即被火化。实在是很惨。

毛泽东奸诈虚伪，崇奉的是功利主义。待人接物没有一句真话，用人时百般赞誉，整人时不择手段。如在延安时他称颂刘少奇“三天不学习，不如刘少奇”赞扬彭德怀“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六十年代刘少奇成了“叛徒、内奸、工贼”被永远开除出党，囚死在开封地下室。彭德怀成了“里通外国的反党分子”文革期间被折磨致死。文革前，毛泽东支持李井泉大搞赤色恐怖，压制民主，荼毒百姓。文革中四川民众喊出了“打倒李井泉，解放大西南”的口号。毛泽东为掩盖自己的罪恶，将文革的各种弊病推之于地方官员。多次说李井泉的坏话，例如“四川文化大革命之所以困难，主要是刘（少奇）、邓（小平）、李井泉搞的，他们把刘结挺打成反革命，把他开除党，这次才翻过来。”“四川、贵州最乱，主要是贺（龙）、罗（瑞卿）、李（井泉）搞的”。乃至李井泉和各大局书记、省委书记一样受到打击，被毛泽东定为“走资派”。

在《中共中央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中，李井泉被定性为搞“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独立王国”。对此，李井泉曾连连喊冤。如果问他一句：“中国这么大，哪朝哪代没有人冤死！”他又怎样想呢？

“林彪事件”后，李井泉被解放出来，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寓居他的原籍江西临川，双下肢截瘫，一直低调，不问政事。直到1989年去世。

（三）凡是反右积极的省份都是大跃进猖獗的省份。

笔者举以上几例旨在说明：酷吏当权的省份和地区是反右的重灾区，毛泽东怂恿其宠臣无视民主，将大量爱国的志士仁人打成右派，威吓民众，以噤其声；怂恿视人民生命如草芥的酷吏恣意胡作非为，鱼肉乡里，以盈其欲。反右的重灾区随后便成了大跃进的重灾区，大饥荒的重灾区，饿死人的重灾区，两者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必然的恶果。

3、右派群体的职业分布

按照中共中央的说法，右派分子是妄图篡党夺权的，其矛头所向必然是党政要害部门，其主要成员必然长于老谋深算，或勇于明火执仗。然而，认真统计却让人大吃一惊，如本章第二节所述，越是偏远地区抓出来的右派越多，穷乡僻壤夺什么权呢？又是什么人在“夺权”呢？下面是某些地方县志记载的零星数据，限于篇幅，仅举数例，全国各地的情况基本相同。

山东省

日照县划右派176人，其中机关干部59人，中小学教师106人，其他11人。

泰安地区工交企业划右派61人；机关干部划右派344人；中小学教师划右派1215人。

临沂地区右派的行业分布：教师占56.8%、工交财贸占20.4%、机关占

19.5%、其他占3.3%。

梁山县机关干部中有88人定为右派，占干部总数的4.4%；小学教师中150人定为右派，占教师总数的11.4%。

河南省

汤阴县一中教师划右派30余名，占全校教师总数的一半。

长垣县1069名干部有73人被划为右派分子，1477名教职员中有291人被划为右派分子。1958年11月下旬进行反右“补课”，又有82人被定为右派，其中：教师77名、干部5名。

淅川县教师中33.9%的人被划为右派。

濮阳县的右派构成是：县直机关占27.9%；区、乡干部占12.0%；中小学教职员51.7%；师范学生占8.4%。

鲁山县右派分子549人，占参加反右派运动总人数的12.5%，其中：干部占干部总数的7.1%；中小学教师占教师总数的25.3%。

河南全省共划右派约七万余人，其中教师四万一千人，占右派总数的58%

湖南省

郴州地区右派2232人，其中地委常委1人，科级以上干部104人，一般干部553人，工程技术、医务、财务人员172人，中小学教师1374人，工人11人，工商业者8人，民警8人，中学生1人。

宁乡县是湖南省划右派最多的县之一，共划右派1027人，其中小学教师占76.2%，中学教师占4.6%，中小学教师合计占80.8%。

新邵县划右派分子363人，中小学教师占75%。

安乡县划右派分子231人，中小学教师占84%。

浏阳县中小学教师被划右派分子的达452人，占教师总人数的18.2%。划右派面最大的浏阳三中，全校24名教师，16名被划为右派。这可能是全国右派分子比例最高的中学。

除了中小学教师之外，大中专院校的学生也有不少被打成右派的。北京的高等院校就有三千多学生被打成右派，约占北京市右派总数的24%。估计全国右派学生人数三万人以上，占全国右派总数的5.5%。

根据上面的资料，可以概略的估算，在基层划定的右派分子中，大约50-60%是中小学教师，20-30%是县级以下基层干部，还有5%左右是大中专学校的学生。也就是说，居住在县、乡、镇的小人物构成右派分子的75-85%，甚至更多一些。

1957年大半年的时间，从鼓吹鸣放到大举反右，报纸上刊载的多是大城市中民主党派头面人物、知名教授、社会名流和部分涉世未深的青年学生鸣放期间怎样“向党猖狂进攻”，反右以后如何“低头认罪”。对县级以下中小学教师的动态很少提及。

众所周知，中小学教师尤其是在县、乡、镇从事教学工作的老师，五十年代时待遇甚低，生活艰苦，白天站在讲台上授课，晚上在昏暗的灯光下批改作业，每天都工作八小时以上，不仅时刻牵念着学生，还有繁忙的家务，需要赡养父母，需要抚育子女，因而无暇参与政治活动。说他们要篡党夺权，纯属莫须有的谎言，至今也难以令人相信。坦言之，中小学教师鲜有热衷于政治的，读者的亲朋好友中不乏从教数十年的教师，很容易了解他们的心中所想无非是安定的生活而已。若能得天下英才而教之，是为“怡乐也”，如能桃李满天下，平生之愿足矣。说中小学教师具有政治野心，意欲篡党夺权，纯

系恶毒诬蔑。

为什么全国数百万右派当中，教师占了半数以上呢？

（一）毛泽东掀起的反右运动，矛头所指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对此，基层的官员是心领神会的，五十年代的政府官员，多数是从部队抽调的转业军人和陆续招募的“工农干部”，以及土改、镇反等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一般文化不高，对知识分子心存成见。在知识分子面前，他们有自惭形秽的心态；在同事之间有唯我独尊的感觉；当然还有向上爬的欲望，甚至独霸一方的野心。运动一来，他们急于察言观色、窥测方向，迎合上级意图，捕提升官机会。反右既然是整知识分子，县、乡、镇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非学校莫属，虽然政府机关中也有知识分子，但数量较少，且概为同僚，抬头不见低头见，难免官官相护，有的则是沾亲带故、盘根错节，不便下手。于是学校就成了县、乡、镇反右的主战场，大抓右派，超额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和指标。

（二）中共建国初期，中小学教师大多非工人或贫下中农出身。一些有历史问题的人，比如参加过三青团[1]、同志会[2]等，和家族中1949年后有被杀、被关、被管人员，则必须远离政权机构，不能进入机要部门，往往被安排到学校教书。

反右运动中，非工农家庭出身者以及历史上有前科者（不管此前科是否属实）首当其冲。五十年代中小学在职人员中，这类人占相当比重，继后，大都成了右派分子，这是教师队伍中右派分子数量甚多的原因之一。

河南省方城县在1956年的肃反运动中从中学教职员中清查反革命分子三十八人，占总人数的26.4%。其中特务一人，反动党团骨干十八人，反动会道门头子一人，伪军政官吏十七人，特务嫌疑一人。这些人并非“罪大恶极”，由于查不出劣迹，或者证据不足，因此清出后均未作处理。1957年反右中他们不少人声称冤枉，请求甄别，被当权者视为攻击肃反，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终成右派。1958年新旧问题一并处理，除一人死亡外，只有七人继续留用。逮捕法办一人，其余分别下放、开除、管制、劳动教养。（参见《方城县志》）

（三）五十年代，中小学老师的工作地点就是学校，职业环境相对封闭，使他们很少与外界接触，整天和学生打交道，与政权机构“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五十年代，中小学老师与当地官员没有利害冲突，也很少错综复杂的关系网，不谙中共官场那一套尔虞我诈的潜规则，相对来说比较单纯。年轻的教师往往出于对中国共产党的绝对信任，说话没有顾忌，难免轻一句重一句，容易被心怀叵测的官员抓住把柄，乃至被定为右派分子。他们生活在基层，与各种各样的家长时相交往，对平民的生活和思想状况比较了解，又有一点文化知识，容易接受新事物，绝大多数对共产党是拥护和服从的，相当一部分是共产党员或共青团员。中共中央号召大鸣大放，自然会积极响应。既然是帮助党整风，中共中央又三令五申：“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善良的人们深信不疑，于是针对乡镇干部的工作作风，生活作风，群众关系，假公济私等方面的问题，直言不讳地提出批评意见。语气再缓和，态度再委婉，按照“批评党员个人就是攻击党，丑化党”的悖论，统统被划为右派。

（四）县、乡、镇各级机构均由上级下达右派指标。完不成者被视为右倾，超额完成者被视为捍卫党的领导，认真贯彻上级指示，受此褒奖者多有

升迁机会。县、乡、镇各级领导，乃至下属科、室、股均由一把手说了算，实质上是家长制，一言堂。且划分是否为右派并无严格的标准，也无需经过法律程序。于是这些远离中央，盘踞在地方的官员，尤其是偏远地区，贫穷地区的当权者，一句话就可以决定一个人的命运，说谁是右派，谁就是右派。当时中共中央多次散布右派分子按人民内部矛盾对待，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谁也没有料到毛泽东暗里布置的是“斩尽杀绝”或“劳教他一二十年”。所以纷纷大抓右派，超额完成上级下达的指标。

中共绝大多数官员深中“毛泽东思想”之毒，只认“党性”，灭绝人性。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势，为了攫取更多的私利，在反右运动中极尽表现，大笔一挥，把那些平时看不惯的，或给自己提过意见的人，统统打成右派。以致基层的右派人数远远高于大中城市。使数十万“右派分子”遭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甚至被关押二十余年，乃至惨死狱中的厄运。

附注

[1] 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国国民党下属的青年组织，简称“三青团”。抗日战争爆发后，在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下，各地爱国青年广泛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建立起许多团体。1938年4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设立三青团。同年7月9日，三青团在武昌正式成立。蒋介石任团长。由陈诚、陈立夫、康泽等三十一人组成中央干事会，陈诚、张治中先后任书记长。成立之初，正值抗日战争激烈进行之际，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各地蓬勃兴起。三青团在抗日救国的名义下，开展了一些活动，如在各地建立青年馆、招待所，安置流亡青年和学生；举办夏令营、运动会和文娱康乐活动；建立战地服务队、宣传队，慰问前方将士、伤病员和军人家属；开设青年服务社，举办一些生活福利事业等。抗日战争后期，三青团着力扩大组织，在学校、机关、团体，出现了“集体入团”、“举手入团”等现象。向青年灌输封建思想和宣扬“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理念。中共建国后被认定为反动组织。

[2] 1938年春，阎锡山的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撤退到临汾温泉村，成立了“同志会”。阎锡山自任会长，公开宣扬的宗旨为共同抗日，追求民族复兴。抗战胜利后，阎锡山强调在山西实行“物产证券”和“按劳分配”，动员全省的人力、物力、财力，奋斗自强，扬言赶上现代化国家，并吸收大量青年学生参加同志会。中共建国后“同志会”被认定为反动组织。

4、宜宾地方志记载的反右

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期，中共曾经提了一阵子“拨乱反正”的口号，相对来说是一个思想比较“解放”、社会比较“宽容”的时期，一批伤痕文学相继出版，如刘心武的《班主任》、卢新华的《伤痕》、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冯骥才的《铺花的歧路》、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等。一批追述反右运动电影陆续上映，如《天云山传奇》《苦难的心》《牧马人》《芙蓉镇》《燕归来》等。由于当时的政治形势、思想环境尚未明朗，文艺界仍然存在着“写暴露”“写悲剧”的禁忌。同时大多数作者仍然难以摆脱以往“左”的创作观念的惯性影响，所以还不能“知无不言”。在此期间，地方志的编写工作也被重新列入了日程，虽然史学工作者仍被厚厚的帘幕遮挡着，但历史的年轮是无法回避也无法绕开的，陈旧的帘幕中间难免有一些裂隙，1957年终于在某些方志中留下了些许痕迹。以下就是宜宾地方志中的点滴记载：

宜宾县从1957年5月到1958年7月，共有22810人参加了这一运动。

393 人划为右派，804 人划为反社会主义分子；

兴文县 1957 年 9 月开始整风，共划右派 214 人，另有 66 人虽未划为右派，但亦“受到不同程度的党纪和政纪处分”；

珙县整风历时 4 个月，涉及全县 22 个村、645 个农业社，共有 94 人划为右派；

南溪县从 1957 年 9 月起，共有 223 名机关事业干部划为右派，390 工人、农民、居民划为反社会主义分子；

长宁县机关 37 个单位 836 人分为 18 个组进行整风，共有 151 人划为右派，257 人划为反社会主义分子；

屏山县 1957 年之“大事记”记载：“5 月 23 至 28，县委召开宣传工作会议，开始整风和反右派斗争，运动中错划右派 106 人。1981 年以后全部改正”

筠连县 1957 年之“大事记”记：“10 月 5 日，召开一届二次人代会，开展‘反右斗争’，翌年春，全县共划右派分子 102 人，‘反社会主义分子’328 人”；

宜宾市 1957 年 7 月，“运动至 1958 年 7 月结束，有 188 人划为‘右派分子’”；

高县 1957 年“5 月 24 日，成立整风领导小组，县委召开‘贯彻大鸣大放帮助党提意见开展整风运动宣传工作’”，“108 人错划为右派分子”；

江安县县志只写了一句：“8 月，党内整风转为反‘右派’运动；

尽管上面摘录的这些数字显得十分枯燥。但是，它是由那么多因响应政府号召却被政府无情“屠戮”身心的一个又一个鲜活的生命堆积起来的。全地区十个县市，其中两县无数字留下外，共有 1471 人划成了在当时认为是“十恶不赦”的右派分子。今天重读这些数据时，作为经历过那场运动的耄耋老人，眼前即刻浮现出在这些数字后面的一个又一个鲜活的生命，以及那些鲜活生命蒙冤受难的悲惨场景。这些数字便不再枯燥，依旧触目惊心！灵魂震颤！

收集到一册筠连县红花村志（2004 年 10 月印），在 1957 年“大事记”里写着：“12 月，开展‘反右’斗争，至翌年春，全村共划‘右派分子’4 名。”当时这个村连老带少总共不足 500 人，文化最高的不过初中。

宜宾一所国家重点中学的校志（2006 年印）。在 1957 年“大事记”中只有三件事记录在案。一件是“引导学生走又红又专道路”；一件是一名学生的水彩画入选北京全国青少年画展；第三件事就是反右。这本金光闪闪的校志是这样记录反右的，“夏，在教师中开展‘整风反右’斗争，在学生中开展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方向的教育”。这里，倘若我们从来就未曾听说过“反右”为何事、“右派”为何人，那么，在这本校志里，我们的后辈还会认为，公元 1957 年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那场“反右”，只是一件和一张中学生的水彩画入选画展等同的、值得记载和庆祝的事一样。说得多么轻巧。

5、右派分子是些什么人？

无论是名人还是平民，被毛泽东统称为右派的这个群体，既没有统一的理念，也没有统一的纲领，更没有统一的组织。他们分散于山南海北，遍布于五行八作。笔者在祸起“反右”导致的二十三年劳教、劳改期间，接触了众多右派分子。但在写回忆录之前，或者说在没有对右派群体的年龄、地域、职业分布进行调查、考证、分析之前，也误认为被划为右

派分子的人多半是有政治诉求的民主党派的头面人物、热衷于针砭时弊的新闻界人士、强调科学与民主的学者教授、喜欢标新立异的作家名流、天真地追求个性解放与自由的青年学生。诚然，上述几类人被划为右派分子的比例很高，但认真统计后发现，他们并不是右派的主体，在具体的统计数据面前，总算透露了一丝缝隙。我惊愕了，完全没有想到多数右派分子是名不见经传的极为普通的知识分子，中小学教师和工作在基层的文职人员、技术干部等竟然占了一半以上，居然成了右派的主体。笔者试着将他们分作如下几类：

（一）较早地发现了社会存在的诸多矛盾的人。这部分人轻信了中共要整风的号召，善意地对共产党提意见，旨在希望共产党切实改进作风，使社会主义制度日益完善。这部分人在右派总体人数中占十之七八，以年轻者居多，二十岁到三十岁之间吧。大半是党团员。他们说的话不见得都是正确的，更非百分之百的真知灼见，但绝不是恶毒攻击，而是希望共产党提高领导能力，消除社会弊病，巩固政权。没有一丝一毫赶共产党下台的意思。

（二）对个别党员或领导的工作作风或生活作风提了意见的人。

（三）在思想改造或反胡风等运动和工作中受了委屈，希望得以澄清的人。例如重庆某厂理化室技术员，共青团员张思起将一本化学分析操作规程（并非机密资料，一般新华书店有售）带回宿舍学习，不慎遗失，因此受到留团察看处分，历经一年处分尚未撤销，鸣放期间表示了一点委屈，即被打成右派。调离大城市，在一个县办工厂改造，拉家带口饱受艰辛。1979年方获改正。

（四）响应毛泽东“大鸣大放”的号召，针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等脱离群众的行为提出意见，希望改善党群关系的人。

（五）对统购统销、物资匮乏略有不满，率直提意见的人。

（六）受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的影响，建议中共接受苏联的教训，扩大民主，抑制个人崇拜，防止独断专行的人。

（七）家庭出身或个人历史被视为有问题，中共将其列入另册的人。

（八）个人要求没有得到满足发了牢骚的人。

（九）单位领导看不惯的人。

（十）遭领导打击报复的人。

（十一）开玩笑的：五七年反右高峰时，电影界奉命拍了一部新闻纪录片《反右派斗争》，在全国各地放映，中央美术学院的一名学生杜某，看了林希翎在北大发表演说的镜头以后，脱口而出说了一声：“能和她谈场恋爱就好了”。由此而成右派。

（十二）充数的：王孝明，四川万县人氏，原重庆市朝天门码头的装卸工，身强体健，为人随和，斗大的字认识不到一箩筐，写自己的名字都需别人代笔。1957年反右运动来袭，上级下了指标，必须抓出右派。站长和党支部抓耳挠腮苦于完不成任务之际，忽见王孝明干活归来，于是“坦诚”地对他说：我们单位需要送一个人去劳动教养，学习几个月，回来后当干部，打算派你去……，王孝明竟大声答应，“要得”“要得”。于是1958年被押送上了峨边县的宋家山，分在大堡作业区，终日承担从山下将生活用品运上山的任务。劳教队的残酷与饥饿让这个憨厚的老实人怎么也想不通，他曾托人给原单位写质疑信，均如泥牛入海。1960年春，因饥饿难耐，误食剧毒野生植物，水肿加腹泻，命丧黄泉了。终年不过三十岁。（此段据当年曾在峨边劳教

的原重庆市公安局秘书蒋伯龄、原重庆市委团校副教授林宪君原著缩写)。

(十三) 喜欢标新立异的人、喜欢出风头的人。

(十四) 原因不明的。

以上分类十分笼统，实际的反右运动怪态百出、千差万别，完全是中共大小头头随心所欲的恣意妄为，兹举两个例子，似有助于了解“右派分子”是怎么制造出来的。

启功先生的自述：原载《书摘》2005 年第 1 期

1957 年北师大由陈校长亲自主持评议新增教授人选。

我在辅仁和师大干了这么多年，又是陈校长亲自提拔上来的，现在又由陈校长亲自主持会议，大家看着陈校长的面子也会投我一票。那天散会后我在路上遇到了音乐系的钢琴教授老志诚先生，他主动和我打招呼：“祝贺你，百分之百地通过，赞成你任教授。”我当然很高兴，但好景不长，教授的位置还没坐热，就赶上反右斗争，我被划为右派，教授也被黜免，落一个降级使用，继续当我的副教授，工资也降了级。

说起我这个右派，还有些特殊之处。我是 1958 年被补划为右派的，而且划定单位也不是我关系所在的北京师范大学，而是中国画院。而且别的右派大都有“言论”现行，即响应党“大鸣大放”的号召，给党提意见，说了些什么。我是全没有。

事情的经历和其中的原委是这样的：

我对绘画的爱好始终痴心不改，在解放前后，我的绘画水平达到了有生以来的最高水平，在国画界已经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解放后的前几年，文化艺术还有一些发展的空间，我的绘画事业也在不断前进。比如在 1951~1952 年期间，文化部还在北海公园的漪澜堂举办过中国绘画展，我拿出了四幅我最得意的作品参展。展览后，这些画也没再发还作者，等于由文化部“收藏”，据说后来“文化大革命”时，不知被什么人抄走都卖给了日本人。文革后，又不断被国人买回，有一张是我最用心的作品，被人买回后，还找到我，让我题词，看着这样一张最心爱的作品毫无代价地就成了别人的收藏品，我心里真有些惋惜，但我还是给他题了。在事业比较顺利的时候，心情自然愉快，我和当时的许多画界的朋友关系都很好。

后来绘画界准备成立全国性的专业组织——中国画院，要组织这样一个有权威、有影响的组织，必须由一个大家都认可的人物来出面，很多人想到了著名学者、书画家叶恭绰先生。此事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支持。当时叶恭绰先生住在香港，周总理亲自给他写信，邀请他回来主持此事。叶先生被周总理的信任所感动，慨然应允。回来后，自然成为画院院长的最热门人选。叶先生是陈校长的老朋友，我自然也和他很熟识，而且有些私交。如当我母亲去世时，我到南城的一家店去为母亲买装裹(入殓所穿之衣)，路过荣宝斋，见到叶先生，他看我很伤心，问我怎么回事，我和他说起了我的不幸身世以及我们孤儿寡母的艰辛，他安慰我说：“我也是孤儿。”边说边流下热泪，令我至今都很感动。又如他向别人介绍我时曾夸奖说：“贵胄天皇之后常出一些聪明绝代人才。”所以承蒙他的信任，有些事就交给我办，比如到上海去考察上海画院的有关情况和经验，以便更好地筹办中国画院，为此我真的到上海一带作了详细的调查研究，取得了很多经验。这样，在别人眼里我自然成了叶先生的红人。

但这种情况却引起了一些人的嫉恨。当时在美术界还有一位先生，他是

党内的，掌有一定的实权，他当然不希望叶先生回来主持画院，深知叶先生在美术界享有崇高的声望，他一回来，大家一定都会站在他那一边，自己的权势必定会受到很大的伤害；而要想保住自己的地位，就必须借这场反右运动把叶先生打倒。

而在这位先生眼中，我属于叶先生的死党，所以要打倒叶先生必须一并打倒我，而通过打倒叶先生周围的人也才能罗织罪名最终打倒他。于是我成了必然的牺牲品。

但把一个人打成右派，总要找点理由和借口，但凡了解一点我的人都知道，我是不会在所谓给党提意见的会上提什么意见的，不用说给党提意见了，就是给朋友，我也不会提什么意见。但怎么找借口呢？正应了经过千锤百炼考验的那条古训：“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经过多方搜集挖掘，终于找到了这样一条罪状：我曾称赞过画家徐燕荪的画有个性风格，并引用了“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的诗句，来形容称赞他代表的这一派画风在新时代中会有新希望。于是他们就根据这句话无限上纲，说我不满当时的大好形势，意欲脱离党的领导，大搞个人主义。当时的批判会是在朝阳门内文化部礼堂举行的，那次会後我被正式打成右派。叶恭绰先生，还有我称赞过的徐燕荪先生，当然也都按既定方针打成右派，可谓一网打尽。

至于他们二人打成右派的具体经过和理由我不太清楚，不好妄加说明，但我自己确是那位先生亲自过问、亲自操办的。当然这场运动胜利之後，他在美术界的地位更炙手可热，呼风唤雨了。

我也记不清是哪年，大约过了一两年，我的右派帽子又摘掉了。我之所以记不清，是因为没有一个很明确郑重的手续正式宣布这件事，而且当时是在画院戴的，在师大摘，师大也说不清是怎么回事，总之我稀里糊涂地被戴上右派帽子，又稀里糊涂地被摘掉帽子。

当时政策规定，对有些摘帽的人不叫现行右派分子了，而叫“摘帽右派”——其实，还是另一种形式的右派。我虽然没有这个正式名称，但群众哪分得清谁属于正式的“摘帽右派”，谁不属于“摘帽右派”？当时对“摘帽右派”有这样一句非常经典的话，叫“帽子拿在群众手中”——不老实随时可以给你再戴上。我十分清楚这一点，日久天长就成了口头语。比如冬天出门找帽子戴，如发现是别人替我拿着，我会马上脱口而出：“帽子拿在群众手中”；如自己取来帽子，马上会脱口而出：“帽子拿在自己手中”。不管拿在谁的手中，反正随时有重新被扣上的危险，能不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战战兢兢吗？日久天长，熟悉我的人都知道这个典故，冬天出门前，都询问：“帽子拿在谁的手中？”或者我自己回答：“帽子拿在自己手中呢。”或者别人回答：“帽子拿在群众手中呢。”

有人常问我：“你这么老实，没有一句言论，没有一句不满，竟被打成右派，觉得冤枉不冤枉？”说实在的，我虽然深知当右派的滋味，但并没有特别冤枉的想法。我和有些人不同，他们可能有过一段光荣的“革命史”，自认为是“革命者”，完全是本着良好愿望，站在革命的或积极要求进步的立场上，响应党的号召，向党建言献策的，很多人都是想“抚顺鳞”的，一旦被加上“批逆鳞”的罪名，他们当然想不通。但我深知我的情况不同于他们。当时我老伴也时常为这件事伤心哭泣，我就这样劝慰她：“算了，咱们也谈不上冤枉。咱们是封建余孽，你想，资产阶级都要革咱们的命，更不用说要革资产阶级命的无产阶级了，现在革命需要抓一部分右派，不抓咱们抓谁？咱们能

成‘左派’吗？既然不是‘左派’，可不就是右派吗？

幸好母亲她们刚去世，要不然让她们知道了还不知要为我怎么操心牵挂、担惊受怕呢？”这里虽有劝慰的成分，但确是实情，说穿了，就是这么回事，没有什么可冤枉的，没有什么可奇怪的。我老伴非常通情达理，不但不埋怨我，而且踏下心来和我共渡难关。直到“文化大革命”後，拨乱反正，我的右派才算彻底、正式平反。

我当时住在小乘巷的斗室里，系总支书记刘模到我家宣读了正式决定，摘掉右派帽子，取消原来的不实结论。我当时写下了几句话，表达了一下我的感想，其中有“至诚感戴对我的教育和鼓励”。在一般人看来，既然彻底平反，正式明确原来的右派是不实之词，那还有什么教育可谈？所以他还问我这句是什么意思，以为我是在讽刺。其实，我一点讽刺的意思也没有，这确实是我的心里话：从今我更要处处小心，这不就是对我的教育吗？而令我奇怪的是，摘帽之後，那位给我戴帽的先生好像没事人一样，照样和我寒暄周旋，真称得上“翻手为云覆手雨”，“宰相肚里能撑船”了。

要说右派的故事，还要属叶恭绰先生。他可是真冤啊。我当时是个无名小卒，但他是大名鼎鼎的社会名流，又是受周总理亲自邀请真心诚意地抱着报效国家的愿望回来的，但回来没落个别的，却落个右派，怎么能不冤？他也到处申诉。怎么向别人申诉我不知道，但通过陈校长我却知道。他和陈校长是多年的至交，在辅仁时期即过往甚密，打成右派後，他给陈校长写了很多信，既有申明，又有诉苦，极力表白自己不是右派，并想通过陈校长的威望告白当局和大家。陈校长也真够仗义执言，冒着为右派鸣冤叫屈的危险，竟把这些信交到中央，至于是交给周总理还是其他人，我就知道了。後来也就摘帽了，继续让他在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

叶先生的高明在于他善于汲取教训。毛主席曾给他亲笔写过大幅横披的《沁园春雪》，从此他把它挂在堂屋的正墙上，上面再悬挂着毛主席像。毛主席还给叶先生写过很多亲笔信，叶先生把它们分别放在最贵重的箱子或抽屉的最上面，作为“镇箱之宝”。後来，更厉害的“文化大革命”时，红卫兵前来抄家，打开一个箱子，看到上面有一封毛主席的亲笔信，再打开另一个箱子，看到上面又有一封毛主席的亲笔信，不知这位有什么来头，不敢贸然行事，只好悻悻而去。也凭着他的信多，换了别人还是不行。

以往我遭受挫折的时候陈校长都帮助了我，援救了我，但这次政治运动中他想再“护犊子”似的护着我也不成了。可陈校长此时的关心更使我感动。一次他去逛琉璃厂发现我收藏的明、清字画都流入那里的字画店，知道我一定是生活困难，才把这些心爱的收藏卖掉，于是他出钱买下了这些字画，并立即派秘书来看望我，询问我的生活情况，还送来一百元钱。这在精神上给了我很大的安慰，再加上亲人、朋友的帮助，我才在逆境中鼓起继续生活下去的勇气。（笔者注：这是右派分子猖狂进攻，还是欲加之罪？岂是一句“错划”就可以了结的吗？）

一个中学生看反右运动

写作途中，在天涯微博看到一篇文章，发人深省，反右运动大有裨益，的确启发了人们的觉悟。转载于此：

1957年8月底，过完暑假，我又回到学校。在进入主楼的楼道后，我发现在各个教研室的两边的墙体上，悬挂着许多写满了毛笔字的纸张，仔细一看，都是打退“恶毒的右派分子”猖狂进攻内容的。仅仅一个多月的时间，

在北京八中这块不大的地盘上，竟然像“雨后春笋”，冒出这么多“恶毒的右派分子”！

“右派”是干什么的？我们并不懂。那个时候，只从报纸上知道他们是向党发动进攻的一个群体。向党疯狂进攻的人，一定不是好人。在一个中学里，居然能够隐藏下来这么多“坏人”。而且他们还要向党进攻，实在是令人可怕的事情。

班主任在开学后的第二周，在教室庄严宣布：“现在，右派分子正在向党发起猖狂进攻。学校的老师正在开展反右斗争，你们看到的那些大字报就是反击右派的。学校的高中部参加反右的政治运动，初中学生照常上课，不搞反右。”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听到“政治运动”的概念，第一次听到“大字报”的概念，也是第一次听到“右派”和“反党”的概念。从此，我就把“大字报”、“右派”、“政治运动”和“反党”联系在一起了。在我看来，凡是有大字报的地方，必定有右派分子在活动，凡是有右派分子活动的地方，就必然会政治运动，凡是有政治运动的地方，必然有大字报……

过了九年，我就是根据这样的简单逻辑，断定那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性质的。

从那个时候起，我就被“政治运动”困惑了 20 年，始终没有搞清楚“政治运动”究竟是个什么东东。直到我在 1977 年 5 月 23 日在已满 35 岁时，被钢厂的两个小小的“无产阶级继续革命家”当做“现行反革命”被“政治运动”了二年半，经过上百次的批斗，才突然豁然开朗，明白了“政治运动”的“深刻”内涵和外延。简单说来“整人”就是“政治运动”的内涵，整不同观点的人，就是“政治运动”的外延，对被整的人进行“批斗”，然后送入那见不得人的地方，就是“政治运动”的结局。

现在，我对这个“政治运动”，实在来说，已经由畏惧而敬而远之了：哪里有政治运动，我就离开哪里，无论是何人领导了何种政治运动，我都要离得远远的。在我看来，一旦被卷入或者主动参与“政治”运动，就距离遭殃的日子不远了。

1957 年的 8 月，我刚刚进入 16 岁，还是一个什么事情都想搞明白，又什么事情都搞不明白的少年。好奇心驱使我要看个究竟，看看大字报上写些什么，特别是看看教我的那些老师，他们给别人写些什么，别人又给他们写些什么。看看他们是怎么样“反党”，别人又是怎样“反对反党”的。

写乔老师的大字报就贴在语文教研室的外面墙壁上。内容是批判他的资产阶级教育方向。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弄清楚什么是资产阶级，更不懂资产阶级教育方向是个什么玩意儿。

我正在看关于乔的大字报时，有人从背后拍了我的肩膀。“上课去，你看不懂。”我回头一看，正是乔老师。他说：“我家三代贫农，我反那家子‘党’？”在他看来，反党的人，不是地、富、资本家，就是来自国民党中的人，或者是被送进监狱的人。他不属于这些人，所以他有底气。也许他在想，到最后，说不定谁是“右派”呢。

他照样微笑着，和平时的微笑，并没有什么两样，一点也没有人们所说的那种疯狂进攻他人的样子。我真佩服他的大度。他的大度成为我以后的榜样。在过了 20 年以后，我在钢厂被陈常委发起的“继续革命”的“政治运动”运动了二年半，被他判定为“混进共产党队伍”的、在“钢厂的资产阶级代

表人物”后，就是以这位老师为榜样：你批你的，我笑我的，老皮厚脸，又奈我何？就这样，居然经过二年半“批斗”的“考验”，意外地活下来了。

教我们语音的那位老师，姓严，具体叫什么名字，我忘记了，是四川人。因为他个头矮小，走起路来，总是挺着胸脯，高耸着肩膀，三步并做两步走，两只大眼也格外有神，我们在背后戏称他为“平仄大师”。因为他不仅给我们讲b、p、m、f，还讲做诗的诀窍：押韵一定要做到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其他的太复杂，不记也罢。

这个“不记也罢”，教会了我写“打油诗”，闲着没事，写上几句，倒也可以打发一些时光，直至今日。

自从有人贴了张大字报，揭发他是旧文人，解放前曾经反对过学生运动，他开始发蔫了。从此他把头埋得很低，很低，本来就很矮小的身材显得更加矮小。他经常弯着腰干，瞅着地面发愣，似乎心事忡忡，看到人们迎面走来，总是客气地让开道路，在一边毕恭毕敬地站好，似乎是在向人们“低头认罪”。走路时再也没有以前那样神气了，不仅步履艰难，而且慢得出奇，开始两步分成三步走了。他突然变老了。

我当时还不明白，大字报为什么使他急速变老，不就是一张大字报吗？

那个时候，我哪里知道大字报的厉害：一张大字报可以毁掉一个人乃至全家的前程，可以让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在文化大革命中，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一张评论这张“马列主义”的“马列主义”的大字报，曾经使全国陷入十年的动乱，使成千上万的善良人的性命活活丢掉，使数也数不清的人们抹脖子上吊，跳河的跳河，跳坑的跳坑，跳楼的跳楼，吃安眠药的吃安眠药，割腕的割腕……

他每天照样给我们上课，照样教我们的语音。只不过他的声音再没有以前那么高亢，而是显得过于低沉，没有一点生气。不久，又听人说他被“右派”了，不来上课了，再后来，换了语音老师，从此就不知道他的音信了。也许他已经到了他不愿意去也必须去的地方。他被“政治运动”给“政治”了。如果他还活着，已经90多岁了。他能活到现在吗？如天假其年，他也许会等到右派的帽子被风吹去的那一天。

9年以后，在文革初期，我和几位同学徒步串联，在双流，遇见成都一工卫校的一行6人。其中有个同学叫做朱的，刚刚18岁，中等个子，在强忍的微笑后面总流露出一丝悲伤。看得出来，她有时和大家一起唱歌、跳舞，都是强打精神，实际上是心事忡忡，内心忍着巨大的伤痛。

后来，我才知道，她之所以如此，和她的家世有关：她的父母都是音乐学院的教师，在1957年夏天因为“响应”号召，当了一回“提意见”的积极分子，率先提了意见，说领导有官僚主义，轻视学生的专业培养。结果被说成“疯狂进攻”。“进攻”而又“疯狂”，实在是“可恶至极”，自然是应该尝尝“疯狂”的味道：夫妻双双被定为右派分子，流放到雅安茶场劳动。由于体弱多病，在文革前夕，学院“法外开恩”，将他们召回，做些打杂的工作，但是右派的帽子依然戴得牢实，只发给他们可以维持简单的新陈代谢的生活费。她的母亲提前进入“老年痴呆”的行列。父亲常年有病，不久就带着“右派”的帽子走了，撇下妻女三人。

朱是老大，由于生活困难，只有经常把妹妹带到学校吃饭。同学倒也大方，多一个人，不就是多一双筷子吗？并没有人“揭发”其“不劳而食”行为，更没有因此而引发出什么“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风波。

看来年少者比那些善于进行阶级斗争的大人们更懂得什么叫“人性”。

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她的出身不好，几个战斗队为了保持自己战斗队的阶级队伍“纯洁性”，都不要她加入组织。最后，还是我的妻子等人“敌我不分”，拉上了她一起长征串联，而且和我们共同走了近 3000 公里的山山水水，饱览了云、贵、川的大好河山。

被划成的右派及其子女们，一直到 1978 年才得以松口气，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全国 55 万右派基本“改正”。据说，全国只有 96 个右派未或改正，中央一级留了章、罗、储、彭、陈、林，其余省市留了 90 名。

林是学生时代就加入“右派”大军的人物。林希翎，属于“后起之秀”的“贱民”。

林定为右派，是她为胡风叫屈。让人不解的是，“胡风集团”所有成员都已经平反，按说给为胡风叫屈的人平反，应在情理之中。她在 1979 年 3 月曾经接到王文（叶剑英办公室工作人员，我们村的 1938 年参加革命的有良心的军人，实际是姓宋。宋家是我家的世交。）的一封信，要求她到北京找中央平反。林到了北京，没有如愿。母校“人大”让她好好“改造”，北京中院让她“痛改前非”。

什么是“痛改前非”？莫非让她戴着右派这顶帽子去见阎王，才是“痛改前非”？她失望了，于是先到香港，后到法国，2009 年 9 月 21 日在法国悄悄地离开了人世。

被划为右派的人，大部分已经离开人世，再过 10 年，20 年，“右派”分子的可以活动的肉体也会在中国绝迹。剩下的几位该不该平反，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这场运动让人明白，凡是属于思想认识的东西，只能让这种认识在人们的思想中存在一个时期，等到社会前进了，或者社会的实践证明这种思想不合社会前进的节拍，人们自然要抛弃不合时宜的思想。但是，在这以前，不能也不应该使用“专政”乃至“暴力”的手段压制乃至镇压不同的思想。

秦始皇强行推广一体化的法家学说，没有奏效；汉武帝独尊儒术，也没有成功……这就是我不同意用极端的手段对待不同思想的根本原因。

有人说，这个运动基本上是“正确”的，错就错在扩大化。这就使人很不明白，划了 55 万个右派，到最后只有几十个人不能平反，还说这个运动是“正确”的，就未免有点饰非之嫌了……

有感于右派人数之多，有打油诗为证：

当初只说钓大鱼，秋后竟把小虾煎。帽子等于钳口令，天下从此无逆言。

附注：

[1]启功（1912——2005），自称“姓启名功”，字元白，也作元伯，号苑北居士，北京市满人。雍正皇帝的第九代孙。中国当代著名书画家、教育家、古典文献学家、鉴定家、红学家、诗人，国学大师。曾任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教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博士研究生导师、九三学社顾问、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世界华人书画家联合会主席，中国佛教协会、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顾问，西泠印社社长。

十一、我被打成右派分子的经过

(1) 军工企业的“鸣放”

军工企业一向注重职工的家庭出身和政治教育。一旦发现某人家庭出身“地主”、“资本家”或者有海外关系即设法调离和另行安排工作，甚至有遣送回乡，管制劳动的。

军工企业一贯强调党的领导。党、团员在全体员工中所占比例高达 25% 左右。强调组织性、纪律性，强调下级服从上级，强调保密制度，强调政治工作。

军工企业对于“大民主”、“大字报”、“大鸣大放”、“大辩论”视为天外之物，那是学校等“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做的游戏，军工企业是谢绝游戏的。所以在中共极力鼓吹“鸣放”的四五月份，军工企业毫无声色。没有一张大字报，也没有什么社团组织或个人发表演说或宣言。更没有请愿、罢工、游行、示威等过激的活动。

军工企业是不允许民主党派存在的，所以尽管有一些高级知识分子，但是绝无民盟、农工民主党或九三学社成员。

军工企业的知识分子集中在各个科、室，一个办公室不过五六个人、七八个人，专业虽然接近，分工则有不同，忙于本身工作，极少谈及工作以外的话题，每个人的一言一行都在众目睽睽之下，便于管理。科、室党团员占总人数的 70% 以上，有组织严密的共产党和共青团支部。党团员有互相帮助（监督）和关心（监督）群众的责任和义务。

五十年代，企业里大学本科以上的知识分子屈指可数，全厂不过二十名，均为技术人员，这部分人家庭出身自然是非无产阶级，1949 年以前能够上大学的，其家庭不会是贫下中农。这些人能够留在军工企业担任技术员或工程师，是因为中共接管军工企业不久就发生了朝鲜战争，前方需要大量军火，因而旧有人员凡无重大政治问题的全部留用。一般都是被查过三代的，即除本人必须出身良好、历史清楚以外，其父母、祖父母一辈和直、旁系亲属中不能有被杀、被关、被管制人员，对有海外关系的也诸多疑忌。比如我进厂时的实习导师雷仲眉，1949 年西南兵工专门学校化工系毕业，其父亲和兄长早年去美国和台湾，其舅父康心如是老同盟会员、著名金融家、重庆美丰银行总经理，有这样的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显然不能在军工企业久留，于是 1956 年就被调离军工企业，转到民用企业成都量具刃具厂去了。

留用人员并非都是技术精英，其中不乏如钱钟书在《围城》中所述之方鸿渐者，混了一个文凭而已，再加上他们求学期间正赶上兵荒马乱，学校纷纷内迁，教材也趋于老化，因而具真才实学者不多。中共建国后贯彻“一边倒”方针，全面效法苏联，这部分接受英美体系教育的技术人员一时也难于适应。技术上力不从心，政治上又背着家庭出身不好的包袱，有一种原罪之感，因而处在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境地。自然是谨小慎微，不敢越雷池一步。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即处世练达、循规蹈矩，受了“莫谈国事”的影响，从不多言多语。既不歌功颂德，因为那是违心之论；也决不针砭时弊，因为那是危险之举。按时上下班，力求不出差错，回到家里，吃好吃点、喝好点，守着老婆孩子过日子，兴致来了或与邻居玩玩桥牌，或下几盘围棋、象棋，看看电影，听听戏，概不议政，属于“今天的天气，哈哈”之类。1957 年的春天，他们也看报纸，看的过程中偶有蹙眉，或偶有一丝微笑，都是一闪而过，心里怎么想的却毫不外露，口头上说的是共产党好，好在什么地方又说不出，他们在兵工厂给共产党造枪炮弹，拿着共产党发的工资，不

说主子的坏话总是不会错的。这部分人在轰轰烈烈的反右运动中，竟然全部幸免，没有一个人被划为右派。

长江电工厂的留用人员还有一点特殊的经历，“抗美援朝”战争中前线战士使用的枪弹曾经发生“黄铜弹壳裂口”事件。信息传至后方，不由分说地将负责弹壳生产工艺的技术人员一网打尽、逮捕入狱。这七个人关在监狱里了，此后生产的弹壳仍偶有裂口发生，关押审查了一年多仍不明就里，找不到他们破坏的把柄。经多方“专家”论证，才知道三七黄铜是一种应力腐蚀开裂敏感材料，由这种材料做成的弹壳在潮湿环境，或有氨、汞离子和低温状态下极易开裂，二次世界大战中时有发生，四十年代即发表过涉及此一题目的诸多论文。本来这不是深奥的学问，旧有的教科书上早已讲述，当时称为“自裂”（自然或自己开裂）；“季裂”（某个季节容易开裂，多见于稻田施肥季节）或“置裂”（放置时开裂），后来被定名为应力腐蚀开裂（Stress Corrosion Cracking）。当时长江电工厂的技术人员（包括被逮捕入狱的和未被逮捕仍留在工作岗位的），可能缺乏这方面的知识，抑或即使知道也不敢明说。以致这七位四十年代的大学毕业生在监狱里关押了将近两年，幸好五十年代初期军工企业内部整人之风还不那么盛行，后来以“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的名义放出来了，恢复原职。由此这些人格格外小心翼翼，从来不谈狱中之事，更加远离政治。共产党整风也好，不整风也罢，一律敬鬼神而远之。他们竟然也躲脱了反右的厄运。

长江电工厂十多位四十年代大学本科和专科毕业的技术人员 1956 年晋升职称均被定为工程师，每月工资一百二十到一百五十元。当时大米 0.085 元一斤，猪肉 0.30-0.39 元一斤，时令蔬菜几分钱一斤。厂内食堂早餐馒头稀饭咸菜，午餐和晚餐都是四菜一汤，有荤有素，每月只收伙食费八元，他们当时的工资可以养活十五六个人。1956 年，知识分子忽而被重视，办起了中灶食堂，早晨馒头、花卷、包子、大米粥，还配有一荤一素佐餐菜，中午和晚上都是三荤一素加一个荤汤，每月伙食费也只有十五元，既有一种优越感，又享受着美味佳肴。那时候职工待遇还传承着 1949 年以前的惯例：在厂医院看病无需挂号费，药品和检查治疗费全部报销；孩子读书学费也不高，中专和大学不仅不收学费每月还有十几元的助学金；住房是单位分配，无需私人购买也没有房租，水电费每月大约二元左右。生活相对安定，不存在五十年后“三个代表”和“胡温新政”“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时期形成的医疗、教育、住房三座大山。多数人对现实生活是满意的，基本上愿意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至于民主、自由、人权等等，中国人本来要求就不高，据说知识分子也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了，都发了工会会员证，人到中年也没有什么奢望了。因此对共产党整风提不出什么意见，或许有些人是心存疑虑不敢提意见，他们对社会看得比较透，对共产党根本不抱什么希望，也就没有了幻想。你整你的风，我上我的班，挣钱吃饭，力保平安无事就好。这部分人也逃脱了反右的冲击。

留用人员之外，就是中共建国后毕业的大、中专毕业生，这些人只有二十多岁，几乎都是党团员，在校期间接受了初步“马列主义”教育，毕业分配到国防企业，据说是受信任的，有一种荣誉感。第一个五年计划方兴未艾，广播、报纸天天宣传的是国家呈现百业俱兴、欣欣向荣的大好形势，年轻人大多深信不疑；五十年代初期，“总路线是各项工作的灯塔！”的口号喊得震天价响，这些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的热血青年企盼着祖国富强，憧憬

着美妙无比的共产主义社会早日来到，学习兵工楷模吴运铎（号称“中国的保尔柯察金”）的自传《把一切献给党》，按照刘少奇所著《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之要求，做党的“驯服工具”。1956 年中共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口号以后，好学上进的青年人把钻研技术放在了相当重要的位置，就是谈恋爱，也把对方是否爱学习列为主要的条件来考虑。政治上是受信任的一代，基本上都是业务骨干。职称上，1952 年毕业的大专生多数是二级技术员（工资八十四元）个别是一级技术员（工资九十五元）；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生多数是三级技术员（工资七十四元）；1955 年毕业的中专生也能评定为四级技术员（工资六十六元）；加上一些津贴、奖金，每月可以有一百元左右或至少七八十元的收入。按照当时的物价水平和消费水准，一个这样的年轻人可以养活十个人（工厂食堂每月伙食费八元）。如今城镇人口每人每月伙食费按低标准也要七八百元，折算起来，那时一个工作两年到三四年的大中专毕业生每月收入相当于现在的六千多到八千元，就实际购买力而言，远远高于取得六十年辉煌成果后的平均工资，而且那时候无住房、医疗、子女教育之虞，彼时之“小康”远远高于今日之“小康”。我在军工企业工作了四十年，以高级工程师职称退休，目前每月收入只有 2088.30 元，在重庆这个物价每年递增居高不下的城市，养活两个人都有捉襟见肘之感。相对比较，五十年代的待遇可谓不低。谁还能发什么牢骚呢？

年轻人求知欲强，思维活跃，用技术人员的理念看社会。拥护中国共产党，信仰甚至崇拜毛泽东，憧憬据说是人人平等、个个幸福的共产主义社会。响应党的号召，不懂政治却关心政治，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却关心国家的前途。寄希望通过整风改善党群关系，改进党的领导。对阴谋和“阳谋”毫无警惕，对中共毫无戒心，更没有识破毛泽东“引蛇出洞、聚而歼之”的阴谋诡计。

1949 年我成了“新中国”第一批少年先锋队队员，1956 年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虔诚地右手握拳屈臂于肩头之上郑重地宣誓，要做共产主义接班人，做中国共产党的后备军。虽然我没有李劫夫[1]那种似乎对毛泽东顶礼膜拜到五体投地的程度，但也绝没有他那样投机取巧、攀高结贵以图功名利禄的龌龊心理。而是从内心深处，视党为带路人，视毛泽东为革命领袖，毫无见外之心。决心跟着他奔向共产主义社会。

我当时在长江电工厂冶金科，担任热处理技术员兼技术组长，主管全厂所有军、民产品的热处理技术工作。是长江电工厂各科室中最年轻的技术组长。

科长李一平工程师，是武汉大学（1938 年迁至四川乐山，1945 年抗战胜利后迁回武汉）1944 年毕业生，无党派人士。主管有色金属压力加工。

副科长张文达工程师，兵工专科学校 1951 年毕业，共产党员。兼管有色金属压力加工。

主管化学分析的刘栋（1949 年兵专毕业）、主管物理实验的王德祿（1939 年同济大学毕业）和主管表面处理的唐恢绪（1949 年兵专毕业）都是 1956 年才提升的工程师，均为无党派人士。

各专业组的组长和技术骨干吴世俊、戴文熙、任光祥、黄中聿、朱茂鉴、郑孔慧、李伯珍、陈功文、黄同仁等均为年龄不超过三十岁的、建国以后从大中专学校毕业的党团员。

党总支书记吴超是 1947 年参加“革命”随之入党的初中生，在那时候也

算知识分子了。

整个冶金科这个群体，相互之间来往不多，上班时，各人致力于自己的工作，下班后，有家的回家，暂时没有家的年轻人回单身宿舍，关系不是那么密切。但是相互之间也没有什么芥蒂，保持着既是同事，又是朋友的状态，总体来说是正常的、真诚的、友善的。绝大多数既无害人之心，也无防人之虞。彼此和谐共处。

1956年，周恩来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共中央提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口号，都曾经使满怀热情、拥护中共领导，憧憬社会主义美好未来的同事们为之一振，尤其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们更为兴奋，似乎共产主义的理想就要实现，高度民主、充分自由、精神舒畅、物质富足的社会即将来临。

1957年春季，党委传达了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和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以后，人们的思想更为活跃。闻听共产党准备整风，深得人心；对中共中央号召大鸣大放，深信不疑。关心政治的气氛日益浓重，每天报纸来了，都抓紧工间操的时间争着看上一眼，生怕漏掉了什么好消息。每周星期五下午政治学习时，踊跃读报、发言，一片赞颂之声。

进入1957年5、6月间，报纸上刊登了一些给中国共产党提意见的言论，也有一些牢骚和过激的言辞，比如重庆西南师范学院的讲师董时光就在长篇发言里流露了他放弃美国优越的生活条件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却始终有不被信任，坐冷板凳的感觉。上海的李康年提出定息应该二十年。云南的龙云提出“抗美援朝”的经费全部由中国负担不合理，苏联老大哥也该负担一些等等。对这些言论，多数人认为都有一定道理，个别言论是带着情绪说出来的，有一点牢骚，但都没有丝毫反对共产党领导的意味。所以没有过于指责，大家认为既然让大鸣大放，就难免有错误言论，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嘛。个别的错误言论不能动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对于经过分析或鉴别，确认是错误的言论，可以批评教育，以理服人，何况有些言论还不一定就是错误的呢。按照毛泽东说的，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没有什么问题是不可解决的。

这段时间，报纸上刊登的“鸣放”消息，多数来自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各地党委组织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上的发言。我在当时，既没有识破统战部诱使某些人发言是毛泽东的阴谋与阳谋，也没有感觉到那些人的发言是什么“猖狂进攻”。个别人的某些言论有一点怨气，敢于在中国共产党面前流露委屈之情，也是还信任党的表示。让大家说话总是好事，有利于形成“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那样一种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这是毛泽东倡导的，也是老百姓向往的。

军工企业的“鸣放”一直是有序的，是在党委领导、部署下，各个党支部具体操控下进行的。没有任何集会、结社，哪怕是三五个人在茶馆里闲谈，更没有人贴过一张大字报。每周星期五的学习会上，发言固然热烈，基本上都是拥护中国共产党，希望通过整风克服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纠正不良之风，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决然没有“乌云压城”“猖狂进攻”“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感。

附注：

[1] 李劫夫（1913—1976），吉林人。1937年赴延安，先后在延安人民剧社、

西北战地服务团工作。1943年在晋察冀边区任宣传干事。1946年赴东北，任文工团长等职。1949年后任沈阳音乐学院院长。擅长紧跟政治形势，文革中为毛泽东公开发表的所有诗词都谱了曲，还写了大量“语录歌”和赞颂毛泽东的歌曲，如“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等。1971年林彪红极一时，李劫夫积极投靠，为其所作西江月《重上井冈山》谱曲并拟编《紧跟林主席向前进》之歌。林彪垮台后，李劫夫被关押审查，1976年猝逝于“学习班”中。

(2) 我在反右运动中

1、简单的历史

我出生在一个小资产阶级的家庭里，1949年我还是个十多岁的孩子，但也身受过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役和压迫，目睹过国民党溃败前夕那种贪污腐化、丧权辱国的独裁统治，对旧社会我是深恶痛绝的。中共掌权后，我的家庭成员乃至亲属无一人被杀、被关、被管，作为小市民，没有了国家战乱，生活更加安定，因此对中共持欢迎态度。我的哥哥不久就参军南下，投入了渡江战役，赴朝作战，朝鲜停战后长期在部队保卫部门工作，共产党员，大校。我的姐姐也参加工作，加入了共产党。1949年前，因私立学校学费太贵，我正失学在家，是接管北平的地下党干部介绍我到市立中学，得以继续读书，因此我对“解放”怀有特殊的好感，就更属必然了。所以很快就成为一名少先队员，稍长又加入了共青团。1951年我离开北京到太原读书，全系公费，我的一点知识和技能都是国家培养教育的结果。毕业后，分配在国防工厂工作，领导对我是重视与信任的，不到两年就让我代替原来的工程师，担任冶金科热处理业务组组长，主持全厂的热处理工作，并直接负责国防产品的研制与工艺。政治上也给以很高的待遇，例如：让我出席重庆市社会主义建设青年积极分子大会，出席团代会，选为厂团委委员，多次评为先进生产者，选入厂职工代表大会主席团，担任全厂青年监督岗岗长等等。经济上，每月收入高达七十余元，这对于一个二十岁的青年人来说，实在是甚为优厚了。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无论从阶级根源来看，还是从历史根源来看，或是从社会根源来看，我不可能，实际上也没有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任何不满的情绪，更不要说产生仇恨的心理了。

我那时的思想是中间偏左。所谓中间，是我生性不愿意盲从，对任何事情都喜欢刨根问底，学理工的人追求客观真理。所谓偏左，是那时我笃信中共的教义，向往共产主义社会，1957年初才递交了入党申请书，虽然尚未获得党员的称号，但时时以心目中的党员标准要求自己，力求做到一言一行维护党的权威和利益。初恋女友是共产党员，她的父亲和哥哥也是共产党员，我也真心实意地争取早日入党。

2、反右前的思想状况和表现

1956年，苏共二十大召开后，《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包括米高扬发言在内的苏共公开发表的所有重要文件，而新华社的《内部参考》则详细报道了西方报纸对和平共处方针和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评论，以及苏联为大批三十年代政治镇压受害者平反的消息，这在中国社会引起了十分强烈的反响。通过《内部参考》的报道可以看出，各地干部、知识分子、民主党派、工商界人士都感到“吃惊和迷惑”，出现了“各种混乱思想”和“种种揣测”，主要集中在对斯大林式个人崇拜的否定、对社会主义民主的怀疑和对南斯拉夫的评价等一些理论上，都希望中共中央给予明确解释和指导。1956年

初，我的思想也有些困惑，以往对苏联的了解来源于报纸的宣传和电影、小说等媒体的渲染，一派大好形势，充满阳光的幸福生活。怎么“苏联揭露的斯大林的统治，其黑暗不下于历史上任何最专制暴虐的统治。”（胡乔木 1956 年语）当时报纸上还透露：30 年代初，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中央夸大了阶级斗争的严重性，以 1934 年 12 月 1 日发生的谢尔盖·基洛夫遇刺事件为导火线，展开了大规模的肃反运动。1935 年 1 月审讯了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 16 名前苏共高级官员，均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此后，清洗镇压的规模迅速扩大，全国掀起了一场“揭发和铲除人民敌人”的运动。在此期间，130 万人被判刑，其中 68.2 万人遭枪杀，很多人遭到逮捕，被关押在古拉格劳改营里。除了社会科学领域的专家学者受到批评及政治迫害以外，自然科学界的权威人士也难逃厄运，例如，物理学的专家院士以及几乎所有的学术带头人都被称之为“敌对思想的走私犯”，许多人被捕处死。事后有人估计，在 30 年代透过政治大整肃、流放及古拉格集中营，迫害致死者多达 2000 万人。1957 年 2 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时说了苏联肃反的失误：“共产党代表大会的代表，杀了百分之九十，中央委员杀了多少？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的代表抓起来跟杀掉的占百分之八十，而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上选出来的中央委员抓起来跟杀掉的占百分之五十。”

看到这些报道后，心中不免依稀有些疑虑，要想建设社会主义，还需付出巨大的努力。毛主席提出的以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整风运动，正当其时。共青团员作为党的后备军应该积极投入运动，帮助党除三害，接受苏联的教训。早日实现“既有集中又有民主，既有纪律又有自由，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毛泽东 1957 年 7 月语）。当时我深信毛泽东的花言巧语，对阴谋、阳谋、陷阱毫无警觉。乃至误坠深渊，经受了二十三年牢狱之灾。直到毛泽东死了三年以后，中共才承认右派划错了，给与“改正”。我入狱时恰风华正茂，出狱时已老态龙钟。含冤负屈二十三年，无任何补偿，制造冤狱的罪魁祸首仍在法外逍遥，反右积极分子没有受惩处，有的还加官进爵。能叫做“拨乱反正”吗！不由得让人深思。

3、我在“鸣放”中说了什么

重庆长江电工厂的“鸣放”开展的比较晚，大约是七月中旬。

那时《人民日报》已经连续发表了多篇社论和评论员文章，轰轰烈烈的反右派斗争高潮不断，不管是阴谋还是“阳谋”，均已昭然若揭。民主党派的头面人物纷纷落马，报纸的版面除了重大事件的新闻报道以外，几乎全是“社会名流”揭发批判右派分子的文章和知名右派分子的检讨。

随着反右狂飙大作，《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已随风转舵——

前曾述及，1956 年东欧发生波匈事件以后，毛泽东即预谋大力围剿中国的民主人士。1957 年 1 月，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就已经向党内高级干部表明了反右的决心和准备采取的方式与策略。但是 1957 年 3 月，他却使出浑身解数、在民主人士面前装模作样地演起戏来了。

1957 年 3 月 10 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丰泽园接见新闻界代表，他握着《文汇报》总编辑徐铸成的手说：“你就是徐铸成同志？你们《文汇报》办得好啊，琴棋书画、梅兰竹菊、花鸟虫鱼，应有尽有，真是办得活泼。我下午起身必先找你们的报看，然后看《人民日报》，有工夫再翻翻其他报纸。”对《文汇报》给予充分肯定。徐铸成受宠若惊，决心按照毛泽东肯定的方针办好《文

汇报》。仅仅过了两个多月，毛泽东翻云覆雨，一口咬定《文汇报》是资产阶级方向，将《文汇报》扫荡殆尽，钦定徐铸成、浦熙修等抗战期间积极反蒋、力撑中共的盟友为右派分子，随即该报落入中共上海市委掌握之中，只有歌功颂德的份儿了。

随着反右暴雨肆虐，《光明日报》的编辑大权也重归中共据有——

《光明日报》虽然是中国民主同盟的中央机关报，筹办人和首任总编辑却是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对外却不公开其共党“特科”身份而以民主人士姿态从事社会活动的胡愈之。第二任总编辑邵宗汉，第三任总编辑常芝青也都是共产党员。

1957年3月10日，毛泽东在接见新闻出版界人士时，忽然问常芝青：“你是不是共产党员？”实际上毛泽东从来就非常注意抓舆论工具，各个有影响的报刊尤其是他重点关注的对象，主要头目甚至是由他钦定的。以其精明不会不知道《光明日报》的总编辑历来是中共党员，此问是明知故问，常芝青据实回答：“是”。毛泽东装作很随意的样子说道：“共产党替民主党派办报，这不好吧！”

于是在中共中央统战部的丛患下，《光明日报》忙不迭地更换总编辑，第一任非共产党员总编辑储安平4月1日兴冲冲地走马上任，不料这一刻即成为储安平人生厄运的开始，一共做了六十八天的总编辑，落得一顶右派帽子，九年折磨和死而不知所终的谜团。

毛泽东导演的《光明日报》更换非党总编辑的游戏，成了一场悲剧，利用这场戏，摧毁心腹之患民主同盟的使命完成了，《光明日报》重新由共产党收入囊中。以后几十年再也无人敢提“共产党替民主党派办报，这不好吧”。

1957年6、7、8月间，所有舆论工具都在中共严格控制之下，以绝对压倒之优势渲染反右派斗争大获全胜。

在这种情况下，稍微有一点头脑的人都会审时度势、谨言慎行。真有反党思想的人更会避其锋芒、韬光养晦。只有崇拜毛泽东、相信共产党真的要整风、真的让人挑毛病找缺点，不识时务的才会误入圈套。

长江电工厂的所谓鸣放，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展开的。实际上是批判报纸上已经公布的右派分子及其言论。党支部动员大家踊跃发言，每个人均需表态，不留任何死角，或者说叫人人过关吧。作为正在积极争取尽快入党的共青团员，理当踊跃响应党的号召，批驳右派论点。

鸣放期间，我没有写过一张大字报，更没有“四处煽风点火、八方串联呼应”。仅仅在指定的小组会上就指定的题目在党支部书记坐镇下发过几次言，谈及了“党天下”和肃反问题。

当时的大致情况是这样的：

1957年6、7月间，储安平的“党天下”之说，成了反右斗争的众矢之的，在众多传媒工具的鼓噪之下，世人皆批“党天下”，似乎不批“党天下”就不是反右。就不是中国人了。

在批判储安平的“党天下”时，许多人都是说：储安平说全国大小单位都是党员做头儿，不是事实，是捏造、是诬蔑。例如：长江电工厂冶金科和会计科科长就不是党员；某某组长也不是党员，等等。

我认为这种批判还不足以使人折服，既不符合客观存在的事实，也缺乏说服力。事实上，全国大小单位明摆着都是党员做头儿嘛，为什么不敢承认呢？于是我在批判“党天下”的学习小组会上说：我看，无需回避全国大小

单位都是党员做头儿这个事实，虽然有的科长不是党员，某几个组长也不是党员（笔者注：至少是团员，军工企业的班组长非党员即团员），但每个科室都有党支部，科长要受支部书记的领导，党指挥一切嘛，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既定原则，是公之于众的事。支部书记总是党员吧，非党员科长能够不听支部书记的话吗？能够不接受支部书记的领导吗？不能吧。因此，事实上是由党员做头儿。我认为，应该由党员做头儿。首先，天下是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流血牺牲打下来的，不由共产党做头儿，由谁做头儿呢？打天下不就是为了掌权吗？再说，共产党员并不是天生的，是从群众当中的优秀分子里产生的，党章总纲第一句话就是“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不由优秀分子做头儿，不由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做头儿，难道由落后分子做头儿？所以说，全国大小单位都由党员做头儿是很正常的，我赞同这种做法。如果说这就是“党天下”的话，那么，我赞成这种党天下，我拥护这种党天下。

我这段发言，完全是出于维护共产党的领导，丝毫没有削弱党的领导之意图；也没有反对党员做头儿的含意。现在看来，我当时的发言是在“左”的思想支配下，以标新立异的方式批判储安平“党天下”论点。那时我才交了入党申请书，正在积极争取入党呢。

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你们独裁。’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同一篇文章里还说：“‘你们不仁。’正是这样。”（《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1412、1413 页）

“独裁”和“不仁”应该是比“党天下”更难听的词汇，毛泽东都能坦然接受，这或许是伟人的气度。可为什么到了 1957 年一听到“党天下”三个字就气急败坏、怒不可遏、暴跳如雷。比承认“独裁”“不仁”还恼火呢？我当时真是百思不得其解。

在我作了上述发言以后，学习小组的成员任光祥（冶金科技技术员，当时也是正在争取入党的积极分子）[1]编辑了一期黑板报，其中一篇报道位于醒目位置，相当于头版头条吧，用彩色粉笔写的标题是“牛立华赞成党天下”。我看了以后，曾请他照发言记录予以补充和更正，以免引起误会，造成我附和储安平的印象。储安平的党天下言论中隐含着些许为民主党派争权的寓意，我是赞成共产党坐天下，拥护全国大小单位都该由党员当头儿，与储安平的观念是完全相反的。事后，任光祥未予更正，我也没有意识到问题会那么严重，因而未认真追究。不料，一期黑板报上以讹传讹的歪曲报道竟成了导致我坐了二十余年班房的主要罪状。

在讨论肃反问题时，我发言说：有人攻击“肃反搞错百分之九十”，是极端错误的。肃反的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难免的。一开始我就明确地表态，充分肯定了肃反的成绩。

是谁攻击肃反搞错百分之九十呢？迄今未知。其来源出于 1957 年 6 月 26 日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届会议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其中说：“有人认为肃反的偏差竟达到百分之九十以上，这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对周恩来这个论断，我数年来查阅了不少资料，翻看了许多法律界右派分子当年“猖狂进攻”的言论，谭惕吾、黄绍竑、杨玉清、王造时、钱端升、楼邦彦、杨兆龙等法律界知名人士，1957 年对肃反提出过批评，但没有一个人提及肃反错误的百分比，即使那个年轻气盛、桀骜不驯、独树一帜、口无遮拦的女大学生林希翎，也没说过肃反搞错百分之九十。只有广西壮族自治区

副检察长徐江萍向自治区党委流露过这样的观点，徐江萍认为“肃反没有必要采取兴师动众的方式，肃反中，冤案、错案占百分之五十。”这是我见到的、最大的肃反偏差率。周恩来写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的那句话，根据不知何在。《人民日报》是公开出版的，《政府工作报告》是全文发表的，总理说话是要有根据的。这肃反偏差达到百分之九十以上是从何而来的呢？应该让周恩来老实交代。

在学习小组会，我站在充分肯定肃反成绩的立场上说：肃反工作不是容易的事，反革命分子的脸上没有刻字，为了彻底肃清反革命，有必要对一些可疑的人进行审查，只要肃出了反革命就是巨大的成绩。不能因为多审查了一些人，就说肃反搞错了。这好像挖定时炸弹一样，有时难免把可疑的地点都挖一下，只要挖出了定时炸弹，哪怕只挖出来一个呢，都是很大的成绩。绝不能说因为多挖了几个坑，就否定这个工作。肃反的成绩是必须肯定的，因为它相当彻底地肃清了反革命。若说肃反的缺点，也有，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说：“我们的肃反工作，成绩是主要的，但是也有错误。”“过火的，漏掉的都有。”毛主席对肃反工作的论断是客观的、正确的。说到肃反的缺点，我感觉肃反方式有一点点粗糙。例如，本厂在肃反运动中武装搜查了一些人，也开大会斗争了一些人，结论都不是反革命。事后，党支部还表示了赔礼道歉。有的在肃反运动中被开除团籍，以后又恢复了团籍。错搜错斗的做法虽然得到了纠正，在当时却伤害了一些人的自尊心，在大庭广众之下，被几支枪压着总不是滋味。其实，完全可以采用比较隐蔽的审查方式，同样可以搞清问题嘛。从全国来看，投入肃反运动的人恐怕不止一千万，设若百分之九十九都搞对了，错搜错斗的只占百分之一，其比例可以说是很小的，但绝对数字就有十万，影响还是比较大的。我认为今后凡是涉及到人的工作应该更慎重些，适当讲究方式方法。

我发言后，还是由任光祥写了一篇报道，刊载在黑板报上，安了一个更加惊人的标题“牛立华说肃反搞错十万人”。

我看到以后，除了在口头上提出异议，让任光祥按照发言记录进行补充和更正以外，还立即写了一篇书面申明，强调说肃反的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难免的。如果用科学实验来做比喻，经过几次实验最后得到成功，我们决不能认为前几次试验没有成功，就说整个实验搞错了，恰恰相反，应该说这项实验成功了。肃反工作也是如此，我并不是说“肃反搞错十万人”，只是说有少量的错搜错斗现象，虽然有时是难免的，甚至只占百分之一，最好也总结经验，今后把工作做得更好一些。

经历过中共所谓群众运动的人都能理解，我的申明没有起到作用，任光祥编写的黑板报稿件已成先入为主。

当时和我在同一个学习小组的人还没有提出什么问题。和我素无来往、业务上也很少联系、远在另一个院落的动力科技技术员邓达仁[2]既不了解我发言的具体内容，也没有看到我的申明，仅仅根据任光祥写的黑板报，就确认我赞成储安平“党天下”，我说了“肃反搞错十万人”。他在7月13日贴出了第一张“牛立华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的大字报。吹起了把我打成右派分子的喇叭。

那天是星期六，我的发言明明是维护党的威严，却被如此误解，心中十分难过，当晚没有吃饭，当夜辗转难眠。同一间寝室的陈功文（党员，团支部书记）还劝我放宽心。第二天他陪我到重庆市繁华地段的解放碑和平电影

院看了两场电影。

周一过后，气氛突变。可以想象，在反右斗争正值高潮的时候，谁也不能压抑“群众”的“积极性”；更不可能替我辩解。那时长江电工厂尚未揭露出右派分子，我就成了首当其冲的人物。这时我的心情非常痛苦，承认吧，那些话都不是我的原意，是任光祥编的黑板报标题。不承认吧，又要受到连续的斗争，而且还会被认为是“顽固抵赖”，是“自绝于人民”，真是左右为难。

我看到周恩来 1957 年 6 月 26 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曾说：“右派分子能够幡然悔悟，接受改造，社会主义改造的大门对他们开着”。《人民日报》1957 年 7 月 8 日在其社论《斗争正在深入》一文中也说：“对大多数右派分子，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还是适用的”。说得多么宽厚仁慈，多么好听啊。

当时我误信了周恩来和《人民日报》的谎言，以为即使划成右派分子，问题似乎也不严重，我既不是资产阶级政客，也不是妄图篡党夺权的个人野心家，只是一个才出校门不久的年轻人，正在争取入党的共青团员。既然“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还适用，也就是通过批判或斗争，最后还要达到团结的目的。况且毛泽东多次强调，这次整风“坚决执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不仅执行，而且坚决，可谓信誓旦旦。我一直崇敬的伟大领袖总不至于自食其言吧？毛泽东在 6 月 19 日才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提出了“六条标准”，但他紧接着说：“不赞成这些标准的人们仍然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见来辩论。”连六条标准都可以辩论，还有什么话不能说呢？如果说错了，改正就是了。我愿意虚心接受大家的意见，历经反右的洗礼以后，心情更加舒畅地跟着中国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也就没有再申辩和澄清。

不料这两条歪曲报道就成了划右的重要依据。在党支部组织的座谈会上说了几句话，发言时间加起来也不过十五分钟。竟然成了猖狂进攻，对中共毫发无损的发言被认定为妄图推翻共产党。害得我坐了二十几年牢，历经九死一生的磨难。岂是一句反右扩大化就能掩盖的罪恶吗？毛泽东的罪孽罄竹难书。终究是要清算的。

附注：

[1]任光祥，同济高工毕业，1952 年被分配在重庆长江电工厂，任冶金科技术员，当时也是正在争取入党的积极分子。1957 年我之被划为右派分子，起因于他的歪曲报道，但我不认为他是有意陷害，他的骨子里就是阿谀谄媚，吹牛撒谎，随风转舵。或者说是个庸俗卑下猥琐之人。1979 年长江厂保卫处长到监狱复查我的问题时，我曾在书面材料里写道：无论任光祥现在爬到如何高的位置，在我的心目中，他始终是个卑鄙的小人。1980 年我回厂落实政策后，他只当了一个车间的技术组长，本性难移，技术上没什么进步，吹牛拍马的毛病依然。我回厂就任技术处冶金组主管，他四处吹嘘：牛立华懂几国外语、牛立华技术高超……，仍然满口不实之词，令人生厌。任光祥 2002 年逝世。

[2]邓达仁，某专科学校毕业的青年技术员，大约长我四五岁。1980 年我落实政策后，邓达仁找机会请我吃饭，并透露他也被划为“暗右”，过了二十几年如临深渊的生活，谈及往事，我们相对哈哈大笑，摒弃前嫌。如今他已作古，一切都成了过去。

4、五十五年后的再回顾

写这段回忆录的时间是 2012 年夏季，反右运动已经过了五十五年。1957 年，我年方弱冠，出于维护共产党的领导，建议改进工作作风，说过“我赞成党天下”（是赞成由党员做头儿，而不是赞成储安平的“党天下”之说）和“肃反搞错十万人”。如今我年近耄耋，数十年的阅历使我越发感觉“党天下”和“肃反搞错十万人”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是中共长期未愈的痼疾，导致亡党的沉疴。然而毛泽东及后续的中共党魁们讳疾忌医，千方百计地文过饰非，到处扬言这个应该姓党那个也应该姓党，不仅是党员而且要全国民众都做党的驯服工具。就是不敢承认“党天下”这个既定事实。也竭力回避承认肃反的错误，毫无改弦更张之意，也无拨乱反正之心，警钟仍需长鸣。

“党天下”是千真万确的、无可辩驳的事实

纵观毛泽东大权独揽的作风，和中国共产党执政前后的历史，毛泽东历来向往的就是党天下，或者叫一党专政。文革时更日益明显地暴露出他居心叵测的终极目标是比党天下更甚的家天下，事无巨细均由他一个人说了算，临死前还提出了一个政治局常委名单，妄想由他的小老婆江青、亲侄子毛远新操控党政大权。

中共建国以来实行的也是党天下，“工农商学兵，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党指挥枪”“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党政工团”已经成了尽人皆知的老生常谈。说得最好听也只能是“党和人民”，党还是要排在人民前面。这些话不就是党在一切之上“一切权力属于党”或者说“党天下”的诠释吗？

周恩来 1975 年 1 月 13 日在四届人大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我们必须坚决拥护党的一元化领导。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我们各方面的工作，都必须置于各级党委的统一领导之下。他临死之前以抱病之身还不忘谆谆告诫来者坚守党天下的原则，用心可谓良苦。

由中共包办制定的宪法序言里有一条就是：坚持党的领导、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是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的。用法律形式把党天下固化了，还能说不是党天下吗？

1957 年 1 月 27 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公开对各地党的头目说：“现在我们得了天下”（《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353 页），他比储安平早四个多月就公开在高级干部中宣称是党天下了。从这点来看，毛泽东算是说了一句真话，一不留神承认了党天下。

中共元老之一陈云说过：“把权交给我们的子女，他们至少不会掘我们的祖坟。”一语道破了大权在中共几个头目手里，而且准备父传子、子传孙。他们从没想过主权在民，以民为主。担心的是挖他们的祖坟。

王震曾气势汹汹地叫嚣：“我们的政权是牺牲了两千万人得来的。谁想要，拿两千万人头来换！”在他们的心里，天下就是共产党（实际上只是党内高层一小撮）的，是不容别人染指的。

1957 年 8 月 13 日，在济南的党员干部会议上，毛泽东盛气凌人地质问：“民主党派有什么资格监督共产党？究竟天下是谁打下来的？”这两句话表明，毛泽东时常挂在嘴边上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是欺人之谈。在毛泽东内心深处，很早就想建立‘一党治天下’的政权。唯一的理由是：天下是

我们共产党打下来的。他在这里否定了举国民众“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浴血奋战；否定了全国人民争取民主的艰苦卓绝斗争；否定了众多民主党派人物的极力配合；把夺取天下之功归之于一个党，甚至他一个人。

有那么一个党，三代世袭，二十九岁的毛头小伙子就继承大位，当了党政军一把手，掌握着生杀大权，这无疑是地地道道的家天下，然而掌权者却利用种种舆论工具蒙蔽百姓说是人民民主，叫做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希特勒被世界人民公认为独裁专制的法西斯魔鬼，他指挥的军队还没有向本国老百姓和学生开过枪，没有用坦克碾压静坐请愿的公民。他的党叫做“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既是社会主义又是工人，名字也是很好听的。实际却是独裁专政、穷兵黩武的法西斯。似可发人深省吧。

中共执政以来，国土沦丧之事秘而不宣。封建王朝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中共掌权以来将上百万平方公里大好河山割让给邻国，未经人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未经全民公决，未公开报道，均由一党独裁，暗箱操作，未战败而失国土，实为党天下卖国之罪。兹举数例，望国人牢记。

（一）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以北六十多万平方公里，乌苏里江以东四十余万平方公里，以及库页岛等地。还有新疆数万平方公里土地，拱手划给了苏俄。

这些领土虽然是早年被沙俄侵占的，但民国以来的历届中国政府没有放弃索回它的权利。在号称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共产党手里，未经全国人民大会议决，彻底划给了苏俄。

1920年9月27日苏俄《加拉罕第二次规划宣言》第一条写道：“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宣布，以前俄国历届政府同中国订立的一切条约全部无效，放弃以前夺取中国的一切领土和中国境内的一切俄国租界，并将沙俄政府和俄国资本家阶级从中国夺得的一切，都无偿地永久归还中国。”

（笔者注：历史证明，加拉汗宣言纯属苏共狡黠的外交伎俩，加拉罕宣言不具有正式国际法的内涵和效力，它是苏俄政客对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愚弄，大肆鼓吹加拉罕宣言的目的在于使苏共摆脱当时的困境，拓展东方政权。一篇虚妄的宣言竟然使孙中山和部分中国民众误认为苏俄是“以平等待我之民族”。数十年间，苏俄并未兑现加拉罕宣言中的任一条款，至今还占领着上百万平方公里中国土地。1924年5月21日中国与原苏联正式签署了《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该协定是中俄、中苏两国间在十九世纪后半叶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后的第一个“平等条约”，协定写明：在签字后一个月内，双方举行会议，并在这一会议中“将中国政府与前帝俄政府所订一切条约概行废止，根据相互平等原则及苏俄两次对华宣言的精神，重新订约”。协定规定：“苏联废除帝俄政府与第三国订立的妨碍中国主权及利益的一切条约与协定，双方声明以后任何一方均不订立有损对方主权和利益的协定。”根据国际法原则，《中俄瑷珲条约》、《中俄北京条约》等依靠武力或武力威胁强加给中国的，并因此侵占了中国一百五十余万平方公里土地的条约，中国有权不承认，有权要求废除。毛泽东虽然说过不要收回沙皇占领的土地，但并未签约。1989年5月16日，邓小平宣布，要求苏共承认上述条约是不平等的，但愿意以这些条约为基础讨论中苏边界问题。1991年5月16日中共党魁江泽民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五·一六协定》，即《中苏国界东段协定》，大好河

山尽失矣！究竟是谁在卖国？其罪责不可不究。

（二）五十年代，毛泽东在被共产国际孤立的困境中，为争取朝鲜成为反苏盟友，把长白山的一半（更准确的说法是 53%）和八个山峰中的三个，包括半个天池划给了北朝鲜金氏政权。

（三）1956 年中缅边界条约把原属于云南省的江心坡、南坎等地划让给了缅甸，总面积十八万平方公里，略大于安徽省的面积。占缅甸现有国土面积六十七万平方公里的四分之一强。

（四）部分西沙群岛，南海二十三个岛礁，以及原属云南的老山地区、原属广西的法卡山、原属海南的白龙尾岛划归越南。

北部湾是个圆形的世界少有的辽阔的大海湾。白龙尾岛就是这个海湾的圆心，有了它，可以轻易控制整个北部湾。自古以来直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都是中国领土。在美越战争期间，为了给海防和河内的防空增加预警时间，毛泽东和周恩来未经全国人大讨论即擅自决定把白龙尾岛划入越南领土。毛泽东和周恩来这两个卖国贼的责任不可不究。

（五）毛泽东为了与印度争当亚非拉新独立国家的龙头老大，将部分喜马拉雅山划给与中国并没有领土争端的尼泊尔。前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主编的《当代中国外交》，透露了割让珠穆朗玛峰是“最高领袖”的亲自决断。

（六）中印之战的结局众所周知。中共穷兵黩武，劳民伤财，牺牲了数万年轻的生命。战后，印度至今仍占领中国十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

再看中共对人民和政府的控制：

中共中央坐镇中南海发号施令，各项政策源出于此。1957 年 7 月 10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胡乔木撰写的社论，题目是《党不能发号施令吗？》，公然扬言中共就是要发号施令，岂非党天下？

中共历年给不少人安过“篡党夺权”的罪名，从来没说过篡人民之权，可见一切权力都在党的手里攥着，人民是没有权的。所谓人民代表只是握手、举手、拍手、挥手而已。总揽一切大权的中共能说不是党天下么？

国务院各部委均设党组，各党组直属中共中央政治局。个别的部长虽然不是党员，但部长只能执行党组的决定，不敢越雷池一步。岂非党天下乎？

全国大小单位无论是机关、学校、工厂、矿山、企业、商店、乡镇、街道、法院、检察院、公安局、监狱乃至幼儿园、托儿所、养老院、甚至行进的列车，均设有党委会或党支部、党小组，行政领导多数是党员，事无巨细一概服从党指挥，以党代政，比比皆是，这不叫党天下，又叫什么呢？

点缀门面的民主党派由中共中央统战部统辖，其主要领导人形式上是选举出来的，实际上是事先经中共中央统战部认可的，中共还在民主党派安插了许多不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监督和控制其活动，美其名曰“肝胆相照”，实际上是一党专政，一党专政不就是党天下么。

中共渗透诸多，宗教也不放过。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中国天主教大主教傅铁山，中国基督教协会会长丁光训都是中共秘密党员。他们心中可以无佛，可以无玛利亚，可以无耶稣，但必须有党。他们披着居士、神父、牧师的外衣，吃的是民脂民膏，是给党做事的。

军队更是党紧抓不放的，虽然国防开支、军人薪饷皆由纳税人提供，但

兵力调动、军衔授予概由中共中央军委甚至只能由军委主席决定。党指挥枪，可以向手无寸铁、和平请愿的学生开枪；党指挥坦克，可以从学生的身上碾过。

1950年，从东北野战军中抽调三个师，合计6.9万人，连军官带士兵和全部武器装备，送给妄图发动战争的金日成，既没有全民公决，也未经政治协商会议讨论，未经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大会议批准，毛泽东和中共几个头子说了算，这难道不是党天下？

按照官方的说法，共产党建党九十年、执政六十多年，每天都“按照历史规律”代表人民说话，党是人民的领导核心、是人民大救星；党代表人民利益。要求每个中国人都要拥护党、热爱党、忠于党，做党的驯服工具、做党机器中的一颗螺丝钉。人民都成螺丝钉了，还不是党天下？

有一首歌，“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传遍了大江南北，从幼儿园的孩子到两鬓花白的老人都要唱，党比天还大，这不仅是党天下，似乎宇宙都归属共产党了。毛泽东填了一首词，“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狂妄之徒简直把自己吹到天外去了，比党天下的野心还大。

在那个年代，从小就受党的教育，要听党的话，坚定不移地跟着党走。从小就被灌输：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党就没有人民大众；没有党，就没有我们这几代生在红旗下长在前线下的人；没有党，就没有幸福的生活；还虚构了所谓“三座大山”和“四大家族”的压迫，没有党，今天就可能生活在水深火热中。五千年华夏文明似乎不如共产暴政，巍巍昆仑似乎全靠党支撑着呢。

人们从小就知道，要无条件接受党的教育，长大了要把自己的一切献给党，为党的事业奋斗终生。在每个幼小的心灵里灌输了党至高无上的概念。

1943年，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毛泽东亲笔为习仲勋书写“党的利益在第一位”的题词。

以上种种，不都是党天下的例证嘛。

再看看关系到普通老百姓切身权益的事。五十年代，上学念书学什么专业要服从分配，喜欢化学的可能被分配到数学系，理由是一切服从党安排。毕业后呢，该从事有关数学的工作吧，却被分配到中学教物理，理由还是一切服从党安排。参加工作只能在党指定的单位，只能服从安排，不允许跳槽，没有选择的自由。“做党的驯服工具”是当年对广大党员、团员甚至群众的基本要求。个人的命运完全掌控在党的手里，这叫不叫党天下？

五十年代，一个人结婚要向上级党组织写书面报告，“组织”上不批准，婚便结不成。生几个孩子也要由党决定，一会儿奖励多生，提倡英雄母亲，一会儿又走极端，只准生一个，都是党的政策，都由党说了算。

每一个人的每一个细胞都是属于党的，个人根本没有丝毫掌握自己命运的权利。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个人的生老病死、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全都掌握在党的手里面，“把一切献给党”是当时最流行的口号，这不叫党天下还能叫什么呢？

本章写作途中，笔者读到了2012年6月18日的《北京日报》，据云：2010年4月，北京市纪委和市委宣传部委托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成立“中国古今官德研究”项目课题组，组织历史学、哲学、科学社会主义等方面骨干专家进行专题研究，其研究成果《中国古今官德研究》丛书当日面世。书中称，随

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共产党完成了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化，持有国家的公权力，做官不可避免，撕下了共产党员不做官的遮羞布。为党天下编造理论根据。

2012年11月8日，中共在北京召开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个动作是全体起立唱国歌，“党代会”开成了“国代会”。干脆撕下了掩饰党天下的遮羞布，党国不分昭然若揭，以党代国显而易见，国家就是党的。这岂不是向全国人民公示党天下吗？

2012年11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题目为《社会主义法治强调党的事业至上》的社论，文中说：“社会主义法治强调的是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据查，“三个至上”的提法来源于2007年末胡锦涛在同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代表、全国大法官、大检察官座谈时发表的内部讲话。意在要法律为巩固党的统治地位服务。党的事业至上是第一位的，其他两个至上是遮人眼目的美丽辞藻而已。

2013年3月8日，即将卸任的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做常委会工作报告，他说：“我们自觉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领导，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基本要求，落实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使党组织推荐的人选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人员，从法律上制度上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落实，保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充分发挥，确保人大各项工作，无论是立法、监督工作，还是决定重大事项、行使人事任免权，都有利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有利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有利于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

吴邦国当了十年人大委员长，该不是白痴吧，他的话毫无隐讳，人大必须为党的利益服务，充当共产党的驯服工具。宪法中写的所谓“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不过是一句欺骗民众的书面语言，在“最高”之上还有一个“更高”，人大是在它领导之下的、是必须贯彻它的意图的，它就是高踞一切之上的“党”，人大仅仅是通过有利于党的法律条款而设的办事机构，是履行法定程序的橡皮图章和投票木偶。天下是党的，人民是要供党驱使的。

前苏共主席团秘书阿夫哈尔托诺夫（五十年代投入西方后在美国任教授），在其一部关于苏共党史的学术著作《党治制的由来》中，将“党天下”论证为“党治制”，是共产党执政国家的特色。“党天下”是中国口语化短语概括出来的一个社会生活无所不在的事实！

诸如此类不胜枚举，中共挟持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所有社会资源，并迫使全体中国人听从其号令，服从其指挥，充当驯服工具。概言之，中共政权是亘古以来彻头彻尾的党天下。

然而，1957年夏季，“党天下”三个字竟犯了中共之大忌，千百万人由此被投入炼狱，这又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中共害怕人们揭露事实真相吧。

储安平在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说，他不赞成“党天下”这种思想，被打成了右派。我在长江电工厂冶金科党支部组织的学习会上说我赞成“党天下”，和储安平针锋相对，也被打成了右派。明明是党天下，却不敢承认，岂能服人？焉能长久？

肃反究竟搞错了多少人？

就全国的肃反运动而言，究竟错搜、错斗、错捕、错判了多少人，是一个绝密数字，至今未予公开。

笔者在《中国广播网兵团分网》（新疆乌鲁木齐市金银大道新闻大厦七

楼，电话：0991-8532976，E-mail：cn@cnr.cn）见到一篇写于2009年1月16日的文章，全文抄录如下：

1955年7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开展斗争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全国各地先后开展了肃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同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彻底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指示》，要求在全国范围内，按照中央“七一”指示规定，进一步开展肃清一切暗藏反革命分子的运动。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兵团各单位从1955年8月上旬起，开展了群众性的肃反运动。参加这次肃反运动的总人数为98120人，共批斗794人，从中查出反革命分子339人，变节分子6人，阶级异己分子74人，坏分子63人，政治骗子1人，逃亡地主2人，共计485人。

另外有5642人主动坦白交待了个人问题，共写检举揭发材料22076份。

根据中央“大部不捉，一个不杀”的方针，在运动中逮捕判刑55人，判处管制、收容教养50人，行政处分98人，免于处分83人。对于不够捕判的分子，兵团于1956年3月成立劳动教养队，将其集中进行审查，先后集中审查128人。

兵团的肃反工作先后经过四个多月，基本上贯彻和执行了上级的指示，但由于有些单位在斗争中打击面较宽、简单急躁，也错斗、错捕了一部分好人。根据中共中央“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精神，兵团党委于1957年8月发出了《关于肃反善后工作的指示》，对错斗、错捕的好人，做了甄别平反工作。据统计：属错斗的24人，错定为反革命的2人，错捕4人，为108人写了文字结论，为109人修改了结论。同时，对该定为反革命而未定的24人、该捕未捕的7人、该判未判的7人依据政策规定重新做了处理。（来源：新绿洲网 责编：艾吉尔古丽。）

从这篇记述新疆建设兵团肃反情况的文章中可以看到：

该兵团从1955年8月上旬开始肃反，历经四个多月，也就是1956年元旦前，肃反运动基本结束。在肃反中被批斗的人数是794人，查出反革命分子339人，也就是肃反的准确率为42.7%，其他待清理人员146人，集中劳动教养128人。

1957年8月，即一年以后，兵团党委发出《关于肃反善后工作的指示》。对错斗、错捕的好人，做了甄别平反工作。为247人进行了有错必纠，也就是“过火的”纠正率为72.8%；对34人实行了该定为反革命的定，该捕的捕，该判的判，也就是“漏掉的”为4.3%。合计起来，被批斗的人数794人，肃出反革命等126人（339-247+34），正确率为16%，错捕、错斗率为84%。

这个数字，比广西壮族自治区检察院副检察长徐江萍所说的“偏差率百分之五十”要大得多。或者说徐江萍所言非虚，据此把他定为右派是冤枉的。

另据河北省房山县编辑的《房山文史资料》第十一辑所载王硕儒《房山县五十年代肃反运动》一文刊载，该县1955年8月2日开始肃反，组织了81名骨干，对99个肃反对象进行清查，截至1956年初，第一次肃反基本结束，清出特务分子11人、土匪1人、反动党团骨干4人、反动会道门骨干1人、国民党军政警宪人员中反动分子10人、流氓分子1人、其他坏分子4人，合计32人。以肃反对象99人为基数，有历史问题或被认为反动的，即反革命性质的26人，肃反的正确率为26.3%，连同其他（土匪、流氓、坏分子）算在一起，肃反的正确率为32.3%，均未达到50%的准确率。

1956年2至5月，房山县委对此次肃反进行了甄别和复查，1956年5月8日复查结束，最后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14人、刑事犯罪分子1人。按此计

算，肃反的正确率为 15%，错搜错斗的占 85%。（以上数据见 2006 年 6 月 12 日刊载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房山区委员会编辑的《房山文史资料》）。

新疆建设兵团与河北省房山县相隔数千里，也不属于一个系统，但其肃反正确率和错斗率极为接近，是巧合还是全国大抵如此呢？

再来看看 1957 年 7 月 18 日的《人民日报》，这一天该报发表了一篇由中共理论权威胡乔木撰写的社论《在肃反问题上驳斥右派》。为了肯定肃反成绩，胡乔木利用其中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秘书的特殊身份，可以近乎无限制地查阅档案，择优录用，编写社论。该篇社论强调肃反运动有四大成绩，列举了部分一般人查不到的有关肃反的数据，其中说：

“第一，清查出来的反革命分子，就现已经定案的来说，有八万一千多名（普通的历史反革命分子，由于国家采取了更加宽大处理的政策，不以反革命分子论处，没有计算在内）。 ”

这八万一千多人，是曾经列为肃反对象，清查以后定案为反革命分子，也就是说，这是肃反运动中查出来的，按照当时的政策，查他们是查对了，肃对了的。

“第二，由于肃反运动，反革命分子内部日益趋向于分化和瓦解。一年多来，全国有十九万余名反革命分子投案自首。”

所谓投案自首，可以认为是在肃反开始，未经清查、批斗，主动交代的。这十九万余人被定为反革命分子，权当准确无误。可以不计入肃反中曾被错斗数字。

“第三，在肃反运动中，还有一百三十多万人弄清楚了各种各样的政治问题。”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在肃反运动中给一百三十多万人写出了并非反革命分子的结论。这些人曾经被怀疑为反革命分子，因而列为肃反对象，经过立案、搜查，清算、斗争，内查外调，坦白交代等程序，确认为还够不上反革命分子。或者说在肃反运动中，这部分人属于错搜、错斗的范畴。

这篇驳斥右派的社论意在肯定和宣扬肃反运动的成绩，但它还是一不留心坦率地承认了肃反运动有错误。社论说：“不少单位错斗了一些好人。这些单位曾经根据一些不确实的材料，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和仔细的分析，把本来没有政治问题的好人错认为坏人。还有一些人平日工作上出过容易引起怀疑的差错，肃反运动一来，这些单位的领导方面没有冷静地加以分析，混淆了工作上的差错和反革命破坏，以致把这些人当作反革命分子斗争了。……错斗了一些好人，伤了他们的感情，损害了他们的名誉，使其中一些人暂时地同党和政府疏远了，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某些环节暂时地受到了一定的损失，对于这些错误必须坦白承认，并且彻底纠正。”

这篇社论还承认，“在 1955 年肃反运动初期小组斗争的高潮当中”，“在一个短的时间内，有些地方，在斗争方式上犯了错误，例如打人骂人等等”。这打人骂人，当然更加是伤感情、损名誉的事。

依照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胡乔木先生在这篇社论中列举的数字，在干部队伍中列为肃反对象的应该是一百四十万人以上，肃出来反革命分子八万一千多人，肃反的准确率为百分之六，错搜、错斗率为百分之九十四。由此看来，说肃反错搜、错斗率百分之一，肃反搞错十万人，是大大地肯定肃反成绩。大大地缩小肃反错误了。不仅不应该划为右派，还应当列入比胡

乔木还左的歌功颂德派呢。然而我却因此被关押了二十余年。

5、大轰大嗡 难逃厄运

毛泽东一贯主张并擅长群众运动，所谓群众运动，就是发动群众参加运动，利用各种手段鼓动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甚至狂热性。利用群众单纯、天真、有时难免盲目的本性，使群众冲锋陷阵。当然，所有这一切都要在党的指挥下进行，党牢牢掌控群众运动的方向，终极目的是实现党的意图，党及其头目是群众运动的操纵者。党又是什么呢？听党的话究竟是听谁的话呢？想来想去，党只不过是政治集团。政治集团的权利集中在极少数人即所谓领袖的手里，甚至掌控在一个人手里，即毛泽东极为重视的“最后决定权”。所谓听党的话，实际上就是听那个人的话，听奴隶主的话，听皇上的话。基层的广大党员也是群众，群众实际上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范畴，中国的群众绝大多数是正直、善良、忠厚的，但是，也有一些奸诈之徒、痞子流氓和以打击别人作为进身之阶的市侩。后者往往比老实、厚道的群众更善于抛头露面、见风使舵、投机取巧。于是，他们往往充当了各次运动的急先锋和整人的打手。运用群众运动的斗争方式，必然会造成简单、粗暴、过激、伤及无辜、打击一大片的恶劣后果。出了问题以后，那些幕后操纵者可以很容易地撇清责任，将一切恶行推之于群众的“革命热情”。读过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可明白，所谓群众运动，实际上是少数人运动群众，实现其政治目的的手法。毛泽东精通此道。1957年的反右运动是其得意之作；文革初期的红卫兵运动则是其顶峰之作。

长江电工厂大搞群众运动，挖出了一个右派分子牛立华以后，党委动员群众乘胜追击，不几天就陆续揪出了张子敬（保密科副科长，党员）、黄光禄（职工医院党支部书记）、吴超（1947年入党的机关支部党支部书记）、吴承厚（教育科教师，共青团员）、张思起（理化实验室技术员，共青团员）、王树良（供应科干部，参加过淮海战役的转业军人）等二十多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长江电工厂一下子热闹起来了。

厂部办公室附近的大花厅贴满了声讨右派分子的大字报，和右派分子写的检讨书。高音喇叭里播放着“社会主义好……，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的歌曲。通往厂门口的路途两边，张贴着五颜六色的漫画和花花绿绿的标语。劳光剧场出售的电影票背面加印了“右派分子牛立华必须低头认罪”的口号。食堂、图书馆等人群密集的场所，也都高高挂着反右的宣传画。图文并茂，声色诱人，直看得眼花缭乱，宛如太平盛世的重大节日，只差腰鼓队、秧歌队和军乐队来凑热闹了。

一天中午下班，厂门口挂出了一幅大型招贴画，幅面不小于3X4米，远远望去，下半幅画面好像是枝繁叶茂的万年青和红、黄、白色月季花组成的篱障，灌木丛中突出的是一个戴眼镜的青年半身像，玉树临风般地站在色彩缤纷的花丛中，神态自若气宇轩昂；他的头顶上是蔚蓝色的天空和五彩祥云，冷色与暖色交织，鲜明绮丽柔和温馨，不禁让人赞叹，好一幅郊野春游图！

我随着人流走近，注目观望，原来是一个人首蛇身像。红、黄、白、绿、黑是盘踞着的蛇身，那个青年昂首眺望着远方，似笑非笑，头顶上的朵朵祥云竟是从那个青年口中吐出的毒气，淡淡的雾色中含着绯红色字迹“我赞成党天下”“肃反搞错十万人”……哦！原来画的是我。但画面很美，不由得说了一声：“画得好”，站在那里多看了一会儿。

不料，此一评价下午即传到冶金科党支部，原来的书记吴超被打成右派

分子了，上级任命了一位临时书记。

他问我：“你看了宣传画说了什么？是不是很抵触？”

我略微沉思，回想了一下，低着头回答说：“我只说了一句‘画得好’”。就是这三个字，没有多说一个字。

临时书记步步紧逼：“为什么这么说？！你想达到什么目的！？”

我被逼无奈，顶了他一句：“我认为那幅画的确画得好，切实描绘了牛鬼蛇神的真面貌。说画得好是抵触？说画得不好行吗？可能要被认为是‘反感’、‘反攻’、‘嚣张’吧？”如果一言不发，可能被认为是‘心怀不满，暗自仇恨’吧？”

这位支部书记原以为又抓住了右派分子的一个把柄，可以邀功请赏了，却陷于理屈词穷的境地，真可谓没事找事，吃饱了撑的。

这件事也让我感觉到而今是耳目众多，不仅隔墙有耳，身边也有耳，一言一行都有人密切监视，社会主义自由民主的优越性无处不在。

原来每周星期五下午的政治学习，扩展为每周三次，批斗会一个接着一个。据说一些县城的批斗会有让右派分子下跪的，甚至有跪在瓷渣上接受“帮助”的（见陆清福著《左右春秋》第55页，天马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版），也有动手动脚的。地处大城市的兵工厂属地师级，政策水平较高，还没有“武斗”，我还没有受皮肉之苦。多数时间是坐在那里听，偶尔站一会儿，也就两三个小时，批斗者踊跃发言，口号声此起彼伏，地球还以固有的速度转动，没有受到干扰，时间到了就下班。

起初，我仔细听批判者的发言，凡是沾一点边儿的意见，我都认真记录，以便今后改正缺点。有时候也想心平气和地澄清一些问题，让大家了解我的真实思想，说明我不反党，不反社会主义。可这样的机会不多，我刚说几句，就被打断，“不许右派分子牛立华继续放毒”，“不许顽固抵赖”，“态度老实点”等等吼叫声连绵不断。随着批斗会越来越多，批判者的发言多数都是重复来重复去，张三说了李四说，李四说了王五又说，王五说了赵六再说，赵六说了又转给张三，好像击鼓传花游戏一样，轮到下次会议发言，几乎是旧调重弹、毫无新意，翻来覆去，千篇一律。我也就懒得记录了。

我的校友朱茂鉴在批判会上的发言倒屡出新意，至今未能忘记。他和我都是北京人，一起入学，一同毕业，一同分配到长江电工厂，住一个单身宿舍，在一个食堂吃饭，挨着床铺睡觉。照理说，彼此该是很了解的，如今过了几十年，回想起来，我最不了解的就是他。《论语》里有一句话：“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不知人，是我的弱点之一。他当年揭发，我在校期间曾经组织“铁志”小集团，让我交代活动情况。那是1951年的事，以前在学校里，同学之间都是喊外号儿，挺随便的，只有在正式场合才喊名字，反倒觉得拘束了。“解放”了，突然喊“同志”、“男同志”、“女同志”“张同志”“李同志”，十几岁的孩子觉得很好笑、不习惯。有个外号“大嘴”、真名刘敬方的同学，冷不丁的冒一句：“什么铜志？我们是铁志”，几个在场的同学嘻嘻哈哈地随和着说：“铁志、铁志”，“刘铁志”、“朱铁志”、“牛铁志”……新鲜了几天，也就忘记了这个称呼。朱茂鉴记性好，六七年前的与反右毫无关系的旧事重提，似乎要挖掘出一个历史反革命集团来。这就是“铁志”小集团，不是我兴起的，是刘敬方的一句玩笑。让我怎么交代？怎么检讨呢？成了小集团，性质就严重了，中国共产党最善于捏造各种各样的小集团，安上个“拉帮结派”的罪名，党同伐异。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胡风反革命

集团，都是莫须有制造出来的，记忆犹新。朱茂鉴真的是好钢用在刀刃上，运动高潮中使出了这个杀手锏。他得了个“立场坚定”、“反右积极”、“火线入党”的好处，在反右运动中立了功，自然要得一点犒赏，1958年后，他担任了重庆虎溪电机厂的党委委员、总工程师兼副厂长，大小也是个顶戴花翎，也算飞黄腾达了吧，在我眼里无非是个宦官而已。八十年代，我落实政策后和他见过面，得知他身患糖尿病，心脏病，原配妻子张正曦患精神病，严重到在荒山上裸跑，不幸中年早逝，不免让人心酸。留下三个女儿，两个是精神分裂症，怪可怜的。八十年代后期，朱茂鉴和建设机床厂的一位姓屠的女会计再婚，退休后再无联系，不知道他是否还健在，心脏病是否痊愈？生活美满否？还没到21世纪，听说他未满70岁就死了。

1957年的7、8月，批斗会隔三岔五，大字报习以为常，我渐渐地麻木了。一开头那种认真听取意见的心情飞到九天之外去了，前几天那种饮食不安、辗转难眠，甚至为遭到误解而痛不欲生的想法早已化作了一缕烟云，随风而逝了。采取了听之任之，泰然处之的对策。

但是我也在认真地思索，要说是我的错，扪心自问，我真的没有想过反对共产党，作为一名技术人员，只想为祖国的富强尽绵薄之力，做好本职工作，也想攀登科学高峰，有朝一日自成一家之言，著书立说。我没有丝毫政治野心，说实话，有时还真看不起那些吃政治饭的人。我费了很大的劲反省，可怎么也反省不出来我要推翻共产党。说不是我的错吧，为什么从领导到群众都一致地批判我呢？科长张文达是很善良的好人，他不会栽赃陷害别人。许多昔日的同学和朋友，也都是正派的人，应该不会乘人之危、落井下石吧。可能还是我的错，不然为什么多数人都反对我呢？我反复思考毛泽东说过的话“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尽可能找到“犯错误”的思想根源和历史根源。我需要时间反省，“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中国不乏长于诡辩之士，张冠可以李戴，指鹿妄称为马。反右运动中涌现了一大批这样的“人才”。例如：我写的第一份检讨书用的题目是《我的初步检查》，贴出来不久，当天下午的批斗会上就有人对“初步”两个字大肆鞑伐，说什么“初步”是逃避深挖思想根源；“初步”是还有埋伏；“初步”是预留后路；“初步”是阴险狡诈；“初步”是麻痹群众；“初步”是烟幕弹；“初步”是迷魂汤……。我在检讨书里用了一些成语和引文，如“流短蜚长”“罪不容诛”“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等，被说成是哗众取宠，堆砌辞藻，卖弄文笔；检讨书篇幅少，叫做毫无诚意，应付了事，企图蒙混过关；检讨书写上三千字，叫做王大娘的裹脚，又臭又长，故意浪费群众的时间。不仅写检讨左右为难，就是走路也有人百般挑剔，低着头走路，说是伪装老实，博取同情；昂着头走路，说是趾高气扬，拒不认罪；走得慢，说是消极抵抗，心怀鬼胎；走得快，说是凶相毕露，满不在乎。批斗会上，花样天天翻新，怪论层出不穷，让我长了不少见识。原来中共所谓的辩证法就是随心所欲胡说八道。

回忆起当年的反右运动，忘不了党支部书记吴超。他是1947年参加中共的，随部队进军西南，接管兵工厂，任厂部办公室秘书，1956年调任机关党支部书记，辖管工艺科、冶金科、机动科、检验科等知识分子相对集中的科室。为人忠厚，谨言慎行。1957年，我被打成右派分子之际，他在党委会上表态，不赞同把我划为右派，主张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再加上别人检举他议

论某党委书记是“理论书记”，某党委书记是“一把抓书记”，于是他也成了右派分子。开除党籍，在机修车间当了十多年锻工，六十年代在郊区找了一个农民结婚，他整天抡着铁锤打铁谋生养家，育有两个女儿、两个儿子。1978年获得改正时，他已年逾知天命，个人申请退休，以便让其农村户口的儿子顶替工厂的名额，跳出“农门”。吴支书目前居住在重庆远郊，有时在湖边垂钓，有时在茶馆闲聊，还能打点小麻将，倒也怡然自得。

1957年9月，大轰大嗡的批斗告一段落，当时对右派分子并未处理，还让我参加了某项国防产品的试制工作。这时，我继续抱着低头认罪的态度，以为很快就会摘掉帽子，工作中任劳任怨，夜以继日，在试制地点与实验室之间跑上跑下，幻想以自己的努力表明我是热爱党、热爱祖国、愿意献身国防科技事业的青年，幻想得到党和群众的理解。新产品研制成功了，别人受奖了，我却被解职了。

1958年4月，长江电工厂宣布了对右派分子的处理。王树良被逮捕入狱，个别的被送劳动教养，我则被开除团籍、开除工会会籍，调至运输科监督劳动，每月只发十二元生活费，而且没有确定的期限，因事外出必须向当地公安局派出所请假，也就是完全被当做敌人，列为专政对象，享受管制分子的待遇了。原来准备1958年和我结婚的女朋友（共产党员）也因此而不能继续保持关系，忽然一阵无情棒，打得鸳鸯各一方，两个人不能接触，即使偶尔在路上相遇，也只能扭过头去，眼望地面，一语不发。这种处理使我深陷在痛苦之中。因而对长江电工厂的反右运动极为不满。1958年4月14日和5月9日，我给远在山西的同学高通山写了两封信，发泄了压抑已久的不满情绪，信中说：“反右是形而上学的扣帽子”、“每月十二元生活费连饭也不够吃”、“这种处理表面看来比劳动教养轻，实则很重，没有期限”等等。这两封信，我亲手投放到邮政局悬挂的信箱里，却不知怎么落入了长江电工厂党委的手中，成了“不服改造、继续放毒”的“证据”，三个月后以此为借口，强迫送劳动教养。

（3）戴上了右派帽子

一个戴着红领巾长大的、热爱党、热爱祖国的共青团员，一夜之间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右派。从1957年7月下旬起，我就被冠以右派分子的头衔。

戴上右派帽子犹如害了严重的瘟疫，似乎全身带着强烈传染的病菌和毒素，比麻风病还厉害，比艾滋病还危险，在中共大力传播恐怖气氛与威胁下，周围的人唯恐避而不及，文化程度越高越知道传染病可怕，离得也就越远。

冶金科副科长张文达，四川内江人，中共党员，性情纯和、待人宽厚，他膝下无子女，1957年元月看到我远离故乡和父母，只身在重庆，分外关心，让我到他家里过春节（那年1月30日除夕，31日是春节），他和师母刘老师做了不少好吃的，给了我像在自己父母身边那样的温暖。如今才过了半年，我被打成了右派，他要保持“党性”，只能抛却人性，竟然不敢理我了。行政上他是我的领导，年龄上他是我的前辈，业务上他是我的师长，党团上他是我的上级，我被划成右派，这一切好像都不存在了，见了面不说一句话，即使在路上对面相遇，也各走各的，视同陌生人。1979年我平反后回到原单位，他已任长江电工厂总工程师，又请我赴家宴，看电影，甚为热情。并告诉我他在内江工作的弟弟也被打成右派，将近二十年不敢公开往来，亲情受到压抑，直到1979年右派获得改正才恢复了兄弟间的来往。毛泽东的政治运动人

为地制造隔阂，泯灭人性，让亲人成了路人，让同志成了敌人。

和我住在一个寝室的陈功文和黄中聿，年龄相差无几，都是单身，朝夕相处、天天见面。我们是同一个专业，工作同在一个组；都是共青团员，同在一个支部；白天在一个食堂吃饭，晚上在一个书桌学习，夜间在一个屋子里睡觉；可以说彼此是无所不至的了解，如今也成了陌生人，住在一间屋里却几乎一句话也不说了。陈功文是党员，自然要承担监督我的责任，我的一举一动他都要向党支部汇报以便掌握阶级斗争新动向。1957年10月前后，反右运动的形势和国务院颁布《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发表《为什么要实行劳动教养》的社论，让我意识到“劳动教养”就是中共给右派分子安排的“出路”。不由得预作准备，把我历年购买的专业书籍通过邮局寄回北京老家，交给我父母保管，幻想着今后可能还用得着，先后寄走了五六十公斤（如果不寄走，就丢失了）。又买了一根扁担和几根捆行李用的绳子，准备随时启程，奔赴劳动教养场所，这些党支部都了如指掌。甚至我晚上离开宿舍外出两个小时，看了场什么电影，路上和几个人攀谈过，党支部也有所了解，可谓无微不至的关怀。毛泽东的政治运动人为地制造对立，压抑良知，让党员成了特务。

倒是八九岁的小孩子不怕传染瘟疫，上学的路上看到我，还趋近来喊“叔叔”，胆子大一点的仰着头、天真地问：“叔叔！你是右派分子呀？”我哭笑不得地点头称是。旁边的几个孩子想在我身上找到什么东西似的一边傻笑一边喊：“嘿嘿，右派，右派”，有的喊：“坏蛋，坏蛋”。他们大概听信了铺天盖地的宣传，右派分子要进攻、要杀人、要放毒，不是青面獠牙就是三头六臂；要么会呼风唤雨，搅得周天阴霾四布、飞沙走石；不然就是手提紫焰蛇牙宝、脚踏金霞风火轮的妖怪。怎么会是个带着眼镜、手无寸铁的文弱书生呢？这牛鬼蛇神戴着眼镜，说话斯文，竟然跟他们的语文老师差不多，会放毒箭吗？我看着他们胸前佩戴的红领巾，看着他们稚嫩无邪的笑容，心里在想：几年前，我在天安门前喊毛主席万岁，嗓子都喊哑了，那时候也像你们一样要做共产主义接班人。我爱党，可党怎么不但不接受我纯真的爱还要把我当做敌人呢？再过十一、二年，你们到了我这个年龄，或许不会这样了。那时候，中国富强了、民主了、自由了，不会再以友为敌了吧？或许你们将来是幸福的。

掐指算来，他们二十岁正赶上1968或1969年，文革尚未结束，武斗渐趋尾声，一打三反运动方兴未艾。成千上万的红卫兵历经了打砸抢、抄家、破四旧、大串联的鼎盛阶段，狂热地替毛泽东冲锋陷阵，毛泽东利用年幼无知，感情冲动的学生实现了打倒刘少奇等人的政治目的以后，该卸磨杀驴了，于是勒令解散红卫兵。大学还没有恢复招生，无书可读；众多企业处在维持阶段，无业可就；国民经济横遭破坏，物资供应严重不足；让这一大批躁动不安的年轻人在城市里游手好闲，对社会是个不稳定因素。怎么办？毛泽东足智多谋，一声令下：“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一千七百万知识青年纷纷被“最高指示”驱赶下乡，毛泽东死了以后，一部分知青才陆续回城，一部分就在农村安家落户了，其遭遇之凄惨，不少专著有所记载，本文不再赘述。而今想想，当初追着我喊右派分子的那几个孩子现在也年逾花甲了，如今是否安在？毛泽东的政治运动给他们带来的是幸福还是灾难呢？

老工人对右派分子的看法有所不同。有一个时期，安排我在供应科废品

库劳动，开敞的库房里只有一位年近六十的老赵师傅和我两个人，他是北方人，文化不高，没有专业技术，只能干些体力活儿。共产党员，觉悟高，抗毒能力强，不怕被右派传染。我在他的监督下劳动，把冲压车间送来的废料分类，用剪刀把还可以利用的部分剪下来，擦干净，放在废品回收箱里。面积太小的、奇形怪状不能再利用的边角料则堆积在一起，送到打包机里打包，提供给铸造车间当做废钢重熔。这个活儿又脏又累，在拉拽废料过程中还很容易刮破衣服、伤到手，一般工人都不愿意干，派给这位老实的党员干，没话说，共产党员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嘛。我来了以后，有人陪他说说话，他没有了孤独感。一个人干起来吃力的活儿，两个人协同着干，他有了轻松感。交给他一个右派分子监督改造，是组织对他的信任，他有了荣誉感。他看我不抽烟、不喝酒、不迟到、不早退，我的力气虽然不大，但总比老年人动作灵活点，稍微累一点的活儿我争着干，抢着干，我们一老一小配合得挺好。于是双方都有了好感。有一天他小声地跟我说：“今天晚上到我家吃饺子去，牛肉芹菜、猪肉韭菜两种馅儿，我老伴儿已经包好了。”我听了心里一热，我没喊他赵师傅，对他说：“赵大爷，我要不是右派一定去您家里吃饺子，可现在不行，您要跟我划清界限呀！”我眼角里流出了泪继续说：“等我摘了帽子再去吧，不然您要受连累，挨批评的。”他叹了一口气说：“这叫哪门子事儿呀？一个好好的孩子，非要说是右派，吃顿饭又招谁惹谁了，这叫什么世道？”“真他妈的不是东西”。大约上面看他对我监督不力，没过多久把我调离了废品库。老赵师傅不久就退休了，我劳教了几年之后听说他生了病，久治不愈，见马克思去了，唉！一个淳朴善良的老工人，一个同情右派份子的共产党员，就这样悄悄地走了。我悄悄地哭了。

长江电工厂有一个礼堂兼电影院，叫劳光剧场，大约是劳动光荣的意思吧。不知道劳动教养、劳动改造是否也很光荣。劳光剧场除了星期一休息以外，每晚都有一场电影，星期天白天也有一场或两场，甲票一角钱，乙票五分钱。反右运动之前，我很少看电影。因为单身宿舍的多数年轻技术员都在学习，王俊麟、张思起在上夜大学；王鹏飞向往川大数学系，积极准备应考；陈功文上中专班；我每周有两个晚上在中专班教物理，自己还在学外语，翻译点技术资料，都需要时间。反右以后，教师不能当了，外语也不能学了，以免说是崇洋特别是崇美，或者不重视思想改造，个人心情也不好，干脆看电影去。票房里是一个老师傅售票，他见我来了，给了一张十二排一号的甲票，第二天我又去看电影，他拿给我的又是十二排一号，第三天我再去，还是这个号，我不由得看了这位老师傅一眼，他说：“我看你以前很少来，看看电影，散散心吧！这张票你来不来我都不卖了，给你留着。”听了 he 这句话，胸中猛然涌动一股热流，但是不敢表达外露，我只有用含着泪的眼睛默默地看着老师傅，点点头，表示感谢。在那段时间，劳光剧场十二排一号这个最佳位置成了我的专座。需知，长江电工厂党委为了营造反右运动的声势，每张电影票的背面都加印一个口号“右派分子牛立华必须低头认罪”，这位卖电影票的老师傅给我如此优待，是让我低头认罪吧。

我在电动机车间劳动的时候，抬电动机劳累过度，腰肌劳损。在厂医院找西医看病，打封闭，不见效，医生不敢给我开休假证明，只有悄悄地对我说：想办法多休息，不要过度疲劳。为了完成任务，我只有忍着疼痛，咬紧牙关，抬着一百多公斤重的电动机往来于装配工段、检验室、库房之间。腰疼得要命，不敢出一句怨言。我找一位老中医，他问了问病情，检查了一下，

开了一个处方，让我不要到厂医院的药房拿药，自己到外面的药铺买药。我遵命而行，吃了两服药，症状就消失了。老医生的秘方真的很管用。他对外人留一手，对我没有保留。

送我劳动教养那一天，从批斗会出来大约四点半，回到宿舍简单收拾一下东西，差不多五点了，需要坐轮船渡过长江，然后再乘车或步行，估计到收容所已经过了开饭时间，所以需要吃了晚饭再走，不能饿着肚子去劳动教养。护送我的吴世俊和我一起进了铜元局街道上的餐厅，因为还没到开饭时间，餐厅显得比较冷清，二十来张方桌竟然一个顾客也没有。桌子擦得很干净，几把悬吊在天花板上的风扇一动不动。餐厅服务人员看见我来了，没有开口却投来了温和的目光，大约刚开了批斗会我被劳动教养的消息已经传遍了大街小巷，也进入了这个餐厅，是好奇？是同情？是疑虑？是担心？我不清楚。吴世俊不吃饭，我一个人吃，只要了一份西红柿炒鸡蛋，我记得连饭带菜一共是三毛五分钱。喊堂的服务员高声对着后厨报了菜名，按动电扭打开了餐厅里全部风扇，随后进了厨房。不一会儿他又出来重新擦了擦本来很干净的桌子，摆上了碗筷。跟着菜炒好了，端上来我一看，是个大盘子，份量比平时几乎多了一倍，我抬头看了他一眼，他什么话也没说，只是轻轻地点了一下头，冲我使了个眼色，示意我快吃吧，目光里隐含着难言的深情，我无言了。

反右以后处处有冷眼，处处也有温情，世态固然炎凉，人间自有道义。

毛泽东利用政治运动扼杀人性，人为地制造矛盾和斗争。他从意识形态上、体制管理上、党团活动上造成人与人之间相互窥探、监督，大兴告密之风，逐渐地泯灭人间的真情、友情、亲情。让人变得更为自私自利，却打着“斗私批修”的幌子。后来的文革期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内部勾心斗角、争权夺利，有目共睹。各造反派之间相互倾轧不惜动用刀枪，均起源于毛泽东对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的破坏，其流毒至今尚未肃清，这是毛泽东的主要罪恶之一。欲恢复民族美德，至少还需要几十年的时间。

（4）监督劳动

1957年9月，冶金科、工艺科、机动科联合召开批斗会，讨论对我的处分问题。实际上，对人的处理大权是掌握在党委手里的，之所以交给群众讨论，一是起警示作用；二是起震慑作用；三是做做样子，假意走群众路线。我知道这样的会议不可能形成有效决议，但是想了解平时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同事们对反右的看法和态度，所以用心地听着。多数人的发言模棱两可，只说让我认真学习，深刻反省，通过劳动改造世界观。少数反右积极分子提出应该送劳动教养。只有一位姓艾名育华的表演引人注目。艾育华是1944年同济大学宜宾校区的毕业生（抗战期间，同济大学由上海迁至浙江金华，再至江西赣州、广西八步、云南昆明，于1940年到达宜宾李庄，抗战胜利后才返回上海）。他个子不高，长得很敦实，走起路来噎噎的。喜欢踢足球，打乒乓球，擅长抽杀；他还拉得一手好京胡，能唱两句西皮二黄，看来也是一个公子哥儿。最大的特点是烟不离口，那烟卷好像是粘在他下嘴唇上似的，他可以随便说话，无需手指夹着，他在那里侃侃而谈，烟卷不住地在嘴角上阵阵冒烟随之颤动，却掉不下来，堪称绝技。我和他极少来往，不在一个科室，业务上没什么联系，他比我大二十多岁，偶有接触我都视他为前辈，以老师相称。当天会上他慷慨陈词，中气十足，声震瓦屋。鸣放期间，我和他不在一个学习组，所以他并不知道我在鸣放中说了什么，是怎样说的。但在这天

的会上，他一边喷云吐雾一边口出狂言，开头第一句话就是“牛立华十分反动”。我很想听听他的下文，总该举出一点理由来吧，他接着说“牛立华反动透顶”，紧接着的还是无边无际的扣帽子，什么“牛立华想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妄图复辟资本主义”、“是帝国主义的走狗”等等。最后建议是“逮捕法办”。1980年我落实政策回到长江电工厂技术处，艾育华因年事已高，退居二线，当了个顾问，据称反右运动中他因家庭出身不好被划为“暗右”，内部控制使用，日子也不好过，反右运动中那么积极，竟然没有得到主子甩的一块骨头，也够可怜的。八十年代中期，他已年逾花甲，某日，不知是谁在他的办公桌上放了一份退休登记表，他拿起来看了看，悄悄地填写完毕，第二天就没来上班了。他退休后，菜园坝的山坡上有个重庆电冰箱厂，曾慕其名聘请这位同济大学毕业的、兵工厂的高级工程师“发挥余热”，没有料到艾老先生只知道怎么制造枪弹弹头，连弹壳工艺都弄不清楚，更甭说电冰箱那么大的家伙了。人家花钱聘任指望发挥余热，却一点温度都没有，除了吃饭，只在烟灰缸里留下满满的烟灰，于是被婉言辞退了。艾育华归家后郁郁寡欢，不久即魂归西天了。

开过这次会议后，我还在冶金科上班，工资从六十九元降到五十元，当然同时取消了全部奖金。对此，我毫无怨言，尽管我觉得自己没有犯错误，但被划成了右派，总要有个惩罚的表示，出于顾全大局，对这个只降薪而仍然保留职务的处分，坦然接受，并加倍努力工作。业余则绝大多数时间呆在宿舍里，那时候没有电视，我也不会摆弄收音机，于是埋头学习外语，翻译苏俄科技文章，当时我国唯一的金属热处理专业杂志《锻压与热处理》尚在初创阶段，每月一期，内容堪称丰富，每期都刊登几篇译文，便于我国科技人员了解国外热处理技术的发展水平，甚为有益。我试着给该刊投寄稿件。我的第一篇译文《高频喷镀》就是1957年国庆前后投寄给该刊发表的。以后陆续翻译和撰写了《莱比锡国际热处理展览会概况》《对某些气体渗碳剂的讨论》《某些水溶性淬火液的冷却特性》等文章，均因“作者系右派，不宜刊出”。编辑部寄了一份印刷好了的清样，文革抄家时不知去向。1959年春夏之交《金属热处理》期刊曾派编辑李长府来重庆组稿，他专程到新建机械厂（劳改劳教单位）提出不能用我的名字，上级有规定右派分子的文章一律不刊发（从法律上说，右派和劳教都没有褫夺公民权，实际上被列为专政对象，被剥夺了一切权利），建议改用新建机械厂名义。我婉言相拒。

1957年初秋，兵器工业部（当时称第二机械部）下令长江电工厂试制硬质合金，任务落实在工艺技术科热处理组，也就是我所在的这个组，领导确定由黄中聿负责（山东工学院热处理专业毕业，现已年逾耄耋，仍健在，居住在铜元局原址），我当时已经靠边站，不再承担任何技术工作，被分配到车间监督劳动去了、但仍然想着硬质合金的试制任务。买了《钨钼冶金学》《粉末冶金学教程》等专业书籍，某日进城在新华书店外文部看到一本俄文版《硬质合金》，原著为德文，全书四百余页，理论与实践并重，内容丰富详实。我买了一本回来后看了一个星期，便跟黄中聿说我打算将它译成中文。于是先翻译第一章绪论，然后将译稿寄给二机部主管硬质合金试制的章简家工程师请他审阅。大约半个月章简家来了回信表示译文可用，国内尚无硬质合金专著，望抓紧译出，并找了一个通晓德语的陆颖，建议我依照俄文版翻译，陆颖参照德文版校对，力争如实反映原著的内容和风格。正在积极准备的时候，北京传来消息，陆颖被打成了右派，不久我即被劳动教养，此事只得终止，

成了一件憾事。

从1957年10月起,大概上面有指示右派分子是阶级敌人,不能接触国防机密,于是我被调离了技术科. 安排在八车间监督劳动。八车间生产手电筒, 主要销往农村。车间拥有二十几台冲压机床。工人年龄偏大文化不高, 多半是解放前就进了厂的老工人。车间主任也是工人出身, 他把我带到生产场地, 对着几十位工人说: 这就是牛立华, 犯了错误, 下放到我们车间劳动, 大家要多……(大概要说多监督他, 终究没说出口) 帮助他, 随即把我交给了工段长。车间机器轰鸣, 噪音很高。他带我一台冲床前, 教我操作要领, 再三说你初来乍到没有定额, 不要急着超额, 安全第一, 千万别伤了手, 态度和蔼亲若父兄。我在八车间劳动了两个多月, 上班时间机器轰鸣, 基本上不说话, 下班回宿舍也没什么言语, 看看业务书籍。虽然还是认为反右不讲理乱扣帽子, 想起来心里难免有点别扭。读了两三遍《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 对共产党似乎有了一些了解。苏共历史上也曾闹过七八次大清洗, 制造了无数冤狱, 毛泽东走的是斯大林的覆辙, 看来是在劫难逃, 只好忍气吞声度过这一劫吧。过了元旦突然通知我改到电机车间上班, 和一个老工人抬电机, 从装配工段抬到性能检测工段, 再把检验合格的电机抬到库房。不合格的退回装配工段。每天两脚不停地跑三角形。电机重量在50-100公斤之间, 老师傅年近五十, 起肩之际他总要把绳子往他那边挪一挪, 让我少吃些力, 我则尽量拉近点, 告诉他我能行。电机产量日渐增多, 抬电机的人却没有增加, 就是我们两个。老师傅总是说快点快点, 烟瘾发了都是边走边抽, 舍不得坐下来休息一会儿。某日, 抬一近百公斤的电机, 猛一起肩, 突然摔倒在地, 老师傅搀扶我到医务室, 判定为腰肌劳损, 暂时不能担抬了, 于是被安排在车间当勤杂工, 每天提前两小时上班, 把待加工的铸造毛坯摆放在机床旁边, 陆续补充数量, 保证各个机床不停工待料的前提下可以坐着休息。下班后打扫车间, 清除地面车屑垃圾。我发现年纪大的老工人都非常客气, 两三个年轻的小伙子却像是借了谷子还了糠似的一脸不高兴, 其中一个姓白的二级工, 只要看到我坐着喝两口水, 立马就喊: 牛立华! 搬两个毛坯过来! 我走到他的机床边看了一眼, 清晨放的毛坯数量足够他一个班用的, 但还是给他又多摆了两个。下班时我走到那儿看了看, 地面上还有三个胚子没加工, 不由得咳了一声。随着产量增加, 车间勤杂工要跟着三班倒, 早班8-16点, 中班16-24点, 深夜班0-8点。鉴于右派分子是阶级敌人, 做夜班不便监督, 于是让我离开了电机车间到运输队。当时的原材料如钢材、煤炭、砖瓦等, 除一部分由汽车承运外, 相当部分走水路(长江电工厂在铜元局江边建有码头和趸船。拥有一艘轮渡每日来往于长江两岸, 三艘货轮承担水路运输, 其中一艘可远航上海。1981年长江大桥建立后, 轮渡停用货轮停驶)。货到码头后, 运输队靠肩挑人抬分别送到车间和库房。第一天到运输队遇上挑砖, 18块砖一挑, 从江边挑到65车间, 修建厂房。党小组长带着我选了一根扁担一套挑砖的架子向江边码头走去, 我在旁边看着怎么装砖, 轮到我了, 杨师傅说: 你只挑14匹, 我说: 还是挑18匹吧, 我能行。我随着他上了路, 从江边往前走一路上坡大约两公里, 是当时铜元局的主干道, 名曰大田坝正街。百货商店、餐厅、银行、邮局、照相馆、理发店、川益小学、新华书店等等一应俱全的社会服务单位都在这条街上。是当时铜元局最繁华的、人来人往最密集的道路。我和十几位四五十岁老师傅一路走来, 街道两边总有些人观

看。真得感谢长江厂党委让人看到了据说是推翻共产党的小伙子不是青面獠牙，也没有猖狂进攻，也看到了毛泽东的所谓言者无罪是怎么回事。在运输队的几个月，使我有机会接触文化不高、长期从事笨重体力劳动的老工人（其中有多位共产党员），他们的想法很朴实，据说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是国家主人了，自己没技术就该担抬，养家糊口嘛。下了班回家能有二两江津老白干儿就心满意足了。都劝我莫谈国是，据说以前茶馆都贴着这样的告示。在运输队几个月，劳动强度是大一点，下了班就想躺着休息，饭量增大了，身体结实了。心想劳动一年总该撤销处分了吧。历朝历代都有冤案，都有冲军发配的。我忍辱负重，委曲求全，不会无限惩罚吧。不料毛泽东对右派是要置之于死地的。随之而来的是长达二十二年的牢狱之灾。

（5）送劳动教养

1958年7月4日，星期五，号称长江三大火炉的山城重庆持续了多日燥热天气，没有一点点风，空气似乎停止了流动，死一般的沉寂。

下午两点半，烈日当头，我戴着一顶破草帽匆匆地赶往运输队，准备上班，还不知道下午会分配什么任务。

路上看见不少员工往劳光剧场走去，我没有得到通知，况且是个右派分子，不便多问，依然走我的路。一路上没有人和我打招呼，昔日的同事、好友也只是抬抬眼皮看一眼就赶快把头转向一边，害怕惹火烧身似的。我见了他们也是敬鬼神而远之。

本来规定三点钟上班，我通常提前一刻钟，以免迟到，今天似乎来得早了一点，大部分人还没有到。

运输队的支部书记来了，他告诉我到劳光剧场开会，并且喊杨师傅（即是工作组组长也是党小组长）一路同行。我和杨师傅一前一后地走着，到了剧场，杨组长找个座位和我紧邻而坐。这时候还不到三点钟。

舞台上空无一人，正中间摆了一张长桌和椅子，大约是执行主席的位置。台口立着一个麦克风，有谁要讲话吧。侧幕的旁边还摆了一套桌椅，好像是给来宾准备的。

忽然舞台上空降下来一个横幅“批斗右派分子牛立华大会”，红底黑字，煞是醒目。看来今天的会是冲着我来的，也是早有准备的。往常开会横幅早就挂好了，今天手忙脚乱地临时牵挂，不知道是出于保密还是措手不及。

1957年8、9月间开过不少次批斗会，十月份以后所谓的批判就偃旗息鼓了，我被铁定为右派分子，撤销了职务，每月六十九元的工资变成了十二元生活费，先后在废料回收库房、手电筒车间、电动机车间、和运输队监督劳动，一直是循规蹈矩夹着尾巴做人。

长江电工厂的党政领导似乎超额完成了上面下达的指标，抓足了右派分子，保住了自己的官位和利益，不再过问反右的事，半年多没有人和我谈过话，也不再受批判了，今天不知道哪股水发了，突然开起了批斗大会。

从反右以来批斗会开过无数次，一般是小组会或者冶金科支部会、规模最大也就是冶金科、机动科、工艺科三个单位联合的机关支部大会，少者十余人，多者三四十人，最多也不过六七十人。每次批斗会都是只能听，不能说，偶有答辩都会被立即制止。在劳光剧场召开全厂范围的批斗大会这还是第一次，足见中共长江电工厂党委对我十分重视，实在有点受宠若惊。

既然是全厂大会，总该挑选出几个严肃认真的能言善辩之士，讲一点道

理吧。我还真想领教领教，在真知灼见面前我愿意服输，也想找个机会说明我的观点和反右运动的真相，实事求是地表明我从来没有反对过共产党，更没有反社会主义的言行，所谓右派言论都是被歪曲了以后再强加在我头上的，这个想法在心里憋了很久了，我要求多次，而且说明不需要对等辩论，“左派”分子讲一个小时，我这个右派分子只消讲一刻钟，看看谁的发言有说服力。但愿今天的大会能够给我这样的机会，常言道真理越辩越明，怕辩论就不是真理了。

党委书记王东明上台了，他主持今天的大会，宣布开会后，他就点名让我到台上接受批判。我走上舞台坐在旁边的座位上，掏出随身携带的小本子，抱着认真听取批判的态度准备认真记录，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嘛。毛泽东可以自食前言，我却恪守这条古训。

王东明首先发言，不愧是中共政工出身，吹牛不打草稿，整人不择手段。一开头就是大帽子，说什么：“牛立华进厂以来一贯思想反动，大鸣大放期间猖狂向党进攻，利用中国共产党整风的机会大肆放毒，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反对工人阶级、反对工农联盟、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苏联专家、反对中苏友好、反…反…咳、咳”，他说出这个“反”字以后，没有下文了，干咳了两声，该反的都反了，大概他也不知道究竟还要反什么了。

他说了这么多反对，每一个反对都是一桩罪名，实际事例呢？没有，也莫须有。

他紧接着说：“经过群众揭发和上级领导机关确认，牛立华被定为右派分子，监督劳动期间拒不认罪，抗拒改造，对毛主席发动和领导的伟大的反右斗争十分不满。广大职工要擦亮眼睛，跟右派分子牛立华斗争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至于究竟有什么抗拒改造的表现，也是莫须有。

人们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给人定罪多多少少也需要搜集几个词句、编造几个罪状吧，堂而皇之的党委书记竟然在做了充分准备的批斗大会上找不到适当的词语，只晓得扣大帽子，堪称无能，无赖，或许也是无奈。

接着是群众发言，第一个上来的人我不认识，据说是代表八车间全体职工对我进行声讨，说什么牛立华是要恢复旧社会，让工人阶级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妄想骑在工人阶级头上作威作福，剥削工人阶级的剩余价值，企图让少数人发财，让广大劳动人民在社会底层挣扎，剥夺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权利等等无稽之谈。

平时我和工人的关系都是很好的，也听老工人说过解放前的生活，那时重庆民生公司的船员、兵工厂的工人，纱厂女工待遇都是令人羡慕的，只要能够进厂当工人，靠每月的工资养活一家五六口人不成问题。五十年代初期重庆裕华纱厂的工人为了支援国家抗美援朝，还提出过降低工资的倡议。我叔叔四十年代就是北平七十兵工厂（原址在北平安定门外，1950年整体迁往山西阳泉）的工人，胸前佩戴一个椭圆形的铜牌，不会被征兵，每月按家庭人口发煤、米、油、盐，保障基本生活，以便工人安心生产。1949年以后，工人“当家作主”了，工资并没有增加，直到1956年实行八级工资制，才略有调整，平均数并没有超过解放初期的水准。真正实行低工资、低福利制，靠廉价劳动力积累财富，最大限度地剥削工人、农民，赋少数人以特权，实行寡头统治的恰恰是中国共产党。

第二位上台发言的我也不认识，此人说起话来摇头晃脑、两眼朝天，口沫横飞、嗓音沙哑。说什么：牛立华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安放在长江电工厂的定时炸弹，牛立华年龄不大，野心不小，他就是要破坏兵工厂，推翻共产党，我们工人阶级坚决不答应。谁反对共产党，我们就要扒了他的皮，抽了他的筋，吃了他的肉。我听他这些话纯粹是满口胡言，一副流氓加痞子的无理谩骂，没有记录的必要，于是拿着笔记本当做扇子慢慢地搨起来，任他信口雌黄。他说到最后几次高举右臂，似乎要喊口号，想了几分钟，说了一句：“我们强烈要求政府把牛立华这个危险分子永远开除长江电工厂，逮捕法办，判他无期徒刑。”引起底下坐着的人一阵哄笑，这个猥琐的小丑下台了。

第三位发言的是运输队的党支部书记，我在他管辖之下强迫劳动了几个月，他从来没找我谈过话，我也不屑于巴结领导，因此接触太少，至今连他姓什么都搞忘了。只记得他曾经当过道士，不知道他是否信奉过“元始天尊”，是否诵读过《南华真经》，是否修炼过“九阳神功”。只听说他1949年前，头戴葛巾、身穿道袍、脚着布袜、足踏草履，在路边上摆过挂摊，为过往行人占卜算命。手握三个铜钱，摆弄六爻八卦，口中念念有词，不是为了积德行善，而是以此为生，收取卦礼混碗饭吃而已。1949年后摇身一变，抛却了张天师、吕洞宾，皈依了马克思、毛泽东。改行当了支部书记，大小也是共产党的一个官了。

他上得台来，把麦克风往下按了按，以高昂的、略带女声的音调，开始大批判，我注意地听着他说些什么。第一句话是：“右派分子牛立华是党培养出来的”，我一听，这话说得不假，右派分子帽子是中国共产党给我戴上的。他接着说：但是牛立华不明真理、不辨邪正、鬼迷心窍、误入歧途，乳臭未干竟然要想推翻中国共产党，共产党上顺天意、下察民情，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这是盘古王开天地以来的真理。推翻共产党是十恶不赦的大罪。对知恩不报、冥顽不灵的右派分子，必须斗争到底。现在我来揭发牛立华在运输队监督劳动期间的抗拒改造行为。

(1) 拉拢腐蚀工人阶级。据我们调查牛立华是不抽烟的，可是他身上总带着香烟，还买冰棍，妄图用一根烟卷、一支冰棍削弱工人阶级对他的监督……。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运输队多数都是文化不高的工人，担煤炭、挑砖瓦、抬钢材，爬坡上坎，劳动强度比较大，很容易疲劳困倦。工间休息的时候，老工人大都吸支烟。有的工人师傅对我说，吸支烟可以解乏，吸支烟干活有劲，还主动送给我烟，我不能白抽人家的烟呀，于是有时候就买一包烟（那时候红金、恒大等纸烟两角钱一包），休息的时候，也给老师傅敬烟，还个人情。我记得这位支部书记到工地视察的时候，赶上大家休息，我也给过他纸烟，他并没有“拒腐蚀，永不沾”，还冲我笑了笑。遇见烈日当空、口干舌燥，我偶尔买几只冰棍（三分钱一只），大家解解渴。我真没想到，一根纸烟、一支冰棍可以腐蚀一个阶级。工人阶级那么容易腐蚀？！

(2) 伪装积极，麻痹工人阶级的斗志。右派分子牛立华由厂党委安排在运输队监督改造，表面上看，不多言不多语，服从分配，装出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暗地里却散布委屈情绪，向老工人宣扬他小时候在天安门广场戴着红领巾参加游行，喊毛主席万岁嗓子都喊哑了，博取同情。这就是严重地对反右斗争不满，不承认自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妄图逃避工人阶

级对他的监督改造……

(3) 扰乱生产，给国家造成损失。领导派他在河坝收卵石，实收卵石的数量和他开出的票据数字相差五、六个立方，给国家造成经济损失……

1958年6月初，因基本建设需要大量卵石和碎石，长江电工厂动员了不少职工家属在长江边收集和捶打卵石。重庆的夏季，酷暑难当，长江边一片开阔的河滩上卵石遍地，连一颗树也没有，老老少少的家属们为了增加一点收入也为了支援国家建设，冒着当空的烈日，用铁爪篱把适合需要的卵石刨在一起，一个人挑或两个人抬，一箩筐一箩筐地把卵石运到指定地点，堆在一起，等待工厂来人过秤收方，职工家属们凭收据领取劳务费，每一百斤付给五分钱（那时大米八九分钱一斤）。虽然劳务费很低，但家属们的积极性很高，人多秤少，过秤的速度很慢，十来天的功夫，江边就堆起了数十堆卵石等待收方。收方的工作需要计算，领导就派了一位参加过抗日战争的残废军人张师傅（共产党员）和我这个右派分子每天到江边干这个差事。我们虽然不挑不抬，但在太阳地里晒着，围绕着台秤转来转去，招呼着几十位职工家属，工作还是很累的，看着那些家属（绝大部分是中老年妇女，还有部分十几岁的孩子）一会儿弯腰驼背在河滩上刨卵石，一会儿大筐小篓地运送卵石，仅用一顶破草帽遮挡灼热的太阳，汗流浹背，气喘吁吁。心里不禁想着，中国的老百姓真好，快点建成社会主义就可以享福了，耳边似乎响起了当时最流行的歌曲“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国家人们地位高……”。

六月中旬的一天早晨，领导突然通知，卵石的数量大体上够了，况且长江的洪水期马上就要到了，今天尽量把职工家属堆好的卵石收完，从明天起不再收方。我看了看张师傅，意思是说“怎么办？”，张师傅不慌不忙，挥挥手，好像表示“到江边再说”。他让我带一个皮尺，我们一路走一路想办法。到了江边，招呼清晨即来刨卵石的职工家属们，先停一下劳动，告诉大家卵石够用了，明天就不收方了。人群中立刻响起了乱哄哄的喊叫声，骚乱之势一触即发。江边还堆着他们辛勤的劳动果实，不收方，就拿不到劳务费，岂不是白干了。我对大家说：要是一堆一堆的过秤，肯定收不完，但是请大家放心，我们一定想办法把你们已经堆成堆的卵石收完，人群的躁动才稍稍平静。我说：咱们选大中小三堆，过秤，大家记住这三堆的模样，其它的堆我们量体积，这样就快了，一天保证收完。大家同意，开始行动。我先仔细量了这三堆的体积，按照每立方2.66吨的容重计算出来重量，大声宣布我的预测数，然后过秤。职工家属们拥挤在台秤边上围观，三堆的重量出来了，和我刚才说的预测数相差不大，没超过两百斤的，这时候家属议论纷纷，他们不称我右派分子，称牛老师，还说有文化就是好，算得比过秤还准确。取得了信任以后，就一堆一堆地量方，十来位家属跟着我和张师傅，协助拉皮尺，我计算后报出数字，征求大家的意见，不管那堆卵石是谁堆起来的，众人的回答基本都是“要得，要得”，我照着这个数字开收据。半天多的时间，把河边的卵石全部收方完毕，一共是一百多立方。我和张师傅给劳动者写完了收条，盖好了红色的印章，大家才平和地散去。过了几天，厂里组织运输队一挑一挑的从河边担到工地，期间又过了一次秤，称完了的数据和我们量体积的数据相差五、六个立方（装框的时候是否把地面上的卵石都收干净了呢？），一个立方的工钱是2.66元，也就是工厂多付了13.30元或15.96元劳务费，这就是给国家造成的重大经济损失，我的过错。

回想起来，这位由道士改任支部书记的发言并没有捏造，虽然也有几个

大帽子，但揭发的事实够不上严厉的惩罚，他也是受命于上级党委，不得不发这个言吧。

三位群众发言以后，党委书记王东明走到台前，对着麦克风问我：“群众对你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行为义愤填膺，刚才检举的是不是事实？”

我坐在椅子上没动，抬头看了他一眼，随即回答说：“有的是事实，有的不是事实”。

接着就站起来，准备往麦克风后面走，我想趁开大会的机会申辩几句，谈谈我的观点，让群众了解我是怎么想的，然后再批判。王东明不愧是党委书记，据说还当过兵，警觉性极高，连忙跨前一步占据有利地形，挡住我的去路，一边连声喊着“坐下”“坐下”一边用双手捂住了麦克风。

王东明抢占住麦克风说：“到现在，牛立华还不老老实实在地认罪，还说群众的检举不是事实，充分证明他是要带着花岗岩脑袋见上帝，国防企业不能容纳这样的右派分子，经厂党委研究决定，并报请上级机关审核，重庆市劳动教养五人小组批准，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极右分子牛立华实行强制劳动教养，立即执行。”

这时候，劳光剧场舞台耳幕的旁边，站了两个厂保卫科的人向我招手，我随着他们回到单身宿舍，幸好我早就料到劳动教养是毛泽东为右派分子安排的出路，事先有所准备，只用了十来分钟，就收拾好了。

1958年，多少在形式上还讲点政策，没有武装押送，只派了工艺科的技术员吴世俊（共产党员）护送，暗中是否有保卫科的人员跟踪监视，我没有注意。

我一边走一边想，怎么送劳动教养这么容易呢？究竟加给我的是什么罪名，没人告诉过我。上级机关“审核”，劳动教养五人小组“批准”的依据是什么呢？既然叫做“审”，总该问问我吧。既然叫做“核”，总该查实吧。当事人毫不知情就送劳动教养，仅凭几句被歪曲的话，仅仅凭黑板报上一个未经本人确认的标题就可以定罪，不经审讯，未予核实，无所谓法律程序，无一纸法律文书。不容申辩，更不准上诉，何以服天下？！

1958年7月4日，对我来说是难忘的日子。

第六章 渣滓洞两年

一、石板坡看守所

大鸣大放期间，中共中央多次宣告“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号召人们帮助共产党整风。众多轻信了无耻谎言的人们出于针砭时弊，改进领导作风向中共提了各种意见和建议。由此被划为右派分子。被毛泽东在青岛会议上确定为敌我矛盾，承蒙“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宽仁厚德”，据说仍当做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究竟是怎么宽大的呢？请看事实：

进入1958年，多数右派分子陆陆续续被抓进了关押罪犯的看守所。一部分等待判刑，一部分劳动教养。由此领略到了中共所谓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原来是被列为专政对象，不定期关押，置人于九死一生的严酷与残忍。

1958年7月4日我被“宽大”到重庆石板坡看守所。这个看守所是个临时转运站，总部在重庆石板坡。反右和大跃进以来，公安部门抓的人越来越多，原来的看守所容纳不下，新开辟了不少据点，抓进来的人先在这些转运

站临时关几天或几十天，然后分发到各地。

转运站位于重庆下半城，当时的门牌大约是解放东路九十六号，坐南朝北面临狭窄的街道，有两道铁栅栏门，门两边各有一个木制岗亭，由持枪武警值守。路上的行人是不准接近这铁栅栏门的。里面靠两边的墙壁是两排木板搭建的通铺，除了木板铺以外，空无一物，没有桌子也没有椅子或者凳子，甚至没有一把扫帚，一块抹布。

被关进来的人一般都是匆匆忙忙地被押解来的，只带着很简单的行李，因为是夏天，无需盖厚实的棉被，一个个无精打采、愁眉苦脸地或卷缩着身子或伸直双腿靠着墙坐在铺上。白天在铺上学习（读重庆日报），夜晚在铺上睡觉，开饭时在铺上就餐，思家时在铺上流泪，忧国时在铺上哀叹。

我是下午六点多钟被关进这个看守所的，大约一百平方米的房间已经收容了十几个人，及至晚上八点钟还不断地有人来，九点钟左右，长长的木板铺已经挤满了四十多位相互陌生的“同学”。“同学”是看守所规定的称呼，右派分子、反社会主义分子、坏分子、偷盗者、贪污者、诈骗者、男女关系不正常者、被诬告与被陷害者……被冠以五花八门的帽子而送劳动教养的各类人员，一律称为同学，在这里相互学习。

当夜无话。

第二天早上七点钟起床，每人发一瓢稀饭，十几个人一小盆咸菜。刚吃完就来了两个看守，忙不迭的点名，然后宣布纪律：不准交头接耳、不准来回走动、不准串通案情、不准高声喧哗、不准…不准…等等。

才关进来的人心神不定，没有注意听，如今更记不住有哪些内容了，当时的感觉就是严厉，透露着腾腾杀气。

随后是规规矩矩地坐下读报。说是读报，实际上是指定一个人在那里有气无力地照着报纸念念有词，在座的每个人都是刚刚被抓进来，生死存亡未保，前途难以预料，心事重重，情绪不稳，谁还有心听那重复谎言的读报呢？

转运站的公安干警是不管思想改造的，属于临时看守性质，只要关进来的人不逃跑，不惹事，一般是不闻不问的。

因为我原籍北京，普通话比较标准，所以被指定为读报人；大概因为我戴着眼镜，像是有点文化，所以还兼任学习组长，负责来人登记和维持室内秩序。好在多数人都是知书达理的，刚刚进到看守所还有点恐惧和陌生感，处处小心，不惹是生非，很好管理。

临近九点钟，铁栅栏门外来了一个女学生，因为我在最靠近门口的位置，所以发现的比较早，也看得比较清楚。

她胆怯怯地在铁栅栏门外来回走，眼睛始终盯着略显黑暗的大房子转来转去，像是找寻什么人。她年龄二十岁左右，眉清目秀，朴实无华。明亮的眼睛，聪慧与纯真同在；齐耳的秀发，活力与温柔共存；岗亭里的武警看着这么漂亮而又天真的女学生近在咫尺，不像恐怖分子，竟然没有横加干涉。

靠里面坐着的一个小伙子忽地站了起来，往门前走了两步，似乎是要去会见这个女孩，离铁栅栏门还有三米却犹豫不决地停住了脚步，用手扶了扶眼镜，不知所措。我看了看登记簿，他是昨天下午八点多钟送来的，西南师范大学三年级学生，右派分子，看来胆子挺小的。

这时候旁边一位年纪比较大的同学小声地问他：“门口那个是你什么人？”，他回答说：“女朋友”。这位年长的同学给他出主意说：“你尽管去，武警要问，就说是你妹妹，劳动教养没有剥夺公民权，不能拒绝探视，

跟他们讲道理。”

小伙子这才走到门口，隔着两道铁栅栏和那个女孩子打招呼。左边那个武警面无表情地喝道：“你是干什么的？”小伙子大声回答说：“她是我妹妹，问我要什么衣服和生活用品”。武警说：“快点，不要耽误时间。”我坐在铺上暗自好笑，这个小伙子胆子大了，聪明了，学会说谎了。看守所真是培养人的地方，胜似中央党校。

这两个和我年龄相仿的年轻人，一个在门里一个在门外，隔着两道铁栅栏门，轻轻地说着什么，恋恋不舍的嘀咕了至少有十五分钟吧。武警居然没有再过问。

我想起了自己的女朋友，我深深爱着的而且怀有一种敬意的共产党员刘巩贻，不知道她现在怎么想，今后又会如何？

这两个年轻人大概和我一样，也相信周恩来 1957 年 6 月 26 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届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所说的“右派分子能够幡然悔悟，接受改造，社会主义改造的大门对他们开着”。幻想着经过一年半载或最多两年劳动教养的惩罚就可以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甚至重新入团、入党，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公民，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奋斗，继续自己的事业，构建幸福的家庭。

现在回想起来，周恩来的这句谎言当时不知道蒙蔽和麻痹了多少人。1958 年以后，政治运动接连不断，劳动教养的右派分子绝大多数都被投入苦难的深渊，即使解除劳动教养也被强制性地留在劳教（劳改）单位，中共中央有个“多留少放”的内部指示，摘掉帽子的叫“摘帽右派”，仍然处在社会的最底层，许多才华洋溢的青年不明不白地死在监狱里了，直到临死还对共产党抱着幻想。社会主义改造的大门就是这样敞开着，原来那是一扇通往地狱之门。

一个浙江大学毕业的年轻教师在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峨边县沙坪茶场劳动教养，1961 年摘掉右派帽子、解除劳教、留场就业，天天干着开荒种地的营生，1965 年积劳成疾，重病之际给一个朋友写信说：“人活一辈子要学习一辈子，改造是无限的，惩罚却应该是有限的，罪罚相当才是治国之道，我相信党不会惩罚我一辈子吧！”。他在浙江和四川的深山老林里劳教三年多，解除劳教后又被强制留在农场四年多，总共八年多的时间，只落得妻离子散、无家可归。临近人生的终点，还沉迷在美丽的也是虚无的梦幻之中，还认为中国共产党不会惩罚他一辈子。一天夜里，他做尽了中国梦，永远闭上了眼睛，他是含着笑还是噙着泪从地狱走向天堂的呢？

笔者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反右运动已经过去五十五年了，那两个年轻人隔着铁栅栏门会面的场景，仍历历如在目前。女学生忧郁无助的眼睛，男青年激愤无奈的目光，依然令人难忘。他们还活着吗？他被送到什么地方“改造”去了呢？他什么时候摘的帽子呢？得到“改正”了吗？她一直等着他吗？有情人终成眷属了吗？……几十年光阴，一个个问题，我去问谁呢？

第三天中午临近十一点钟，一辆吉普车停在门前，车上下来三个人，其中两个走到岗亭跟前，拿出介绍信给值班武警，武警走出岗亭，开了外面的铁栅栏门又开了里面的铁栅栏门，随后让站在旁边那个肤色黝黑、体型健美青年提着简单的行李进了看守所，两道铁栅栏门哗啦、哗啦又关上了。

进来的这个人约二十五六岁，身高 1.8 米左右，上身穿铁红色运动衫，下身穿蓝灰色体操裤。胸肌饱满，肩平背直。两道剑眉如墨，双目炯炯如珠。

好一个英俊的小伙子。

他进得门来，向前跨了一步，仍然提着行李站在那里，上上下下打量这个房间，一副怒气未消的神态，看样子是才从批斗会上下来的。

我主动招呼他，请他过来登记。他说：“登什么记？！”，我耐心地回答说：“这里是转运站，进来都要登记，公安干警要点名”。

他听了以后未知可否，依然站在那里，目光凝聚，微微地摇了摇头。愤愤不平。

停了一分钟，我继续客客气气地说：“你的名字是…？”他说了名字。我随即写在纸上，可惜如今我已经想不起来了。

我又问：“什么单位送来的？”他很不耐烦地瞧了我一眼，狠狠地说：“一机校”。

我笑了一笑说：“哦！一机校，国防系统的”。随后又说：“是右派吧？”。

他把手里的行李重重地往空着的铺板上一撂，怒目而视地对着我说：“右派怎么了？！”。

我抬起头、含着笑、看着他的眼睛、缓缓地说：“我也是国防系统的，右派，前天才来的”。

他一听，态度一下子亲切起来，快步趋近我说：“你也是右派？”，我说：“怎么？不像么？我来了两天了，这间屋里一半以上是右派”。

他用目光横扫了一下房间，好像在问，怎么这么多右派？

我招呼他坐到木板铺上来，然后问他：“才开的批斗会？”，他点了点头说：“全是乱扣帽子，一机校不讲理！”，我说：“不单是一机校，都一样，全国都一样。本来都是一家人，从来没想过要反党、反社会主义，却偏要说是向党进攻，一股劲儿地要把同志说成是敌人，敌人多了有什么好处呢？我真不明白这是为什么”。他气愤愤地说：“这是为什么？一派胡言，一派胡言！”。

我提醒他：“小声点”。随后我们悄悄地攀谈起来，我告诉他那边的几位是西南师范大学的，对面铺上的几位是重庆大学的，还有 296 厂（建设机床厂）、256 厂（西南车辆厂）、456 厂（长安机器厂）、152 厂（江陵机械厂）等等兵工厂的。他看了看大家，摇了摇头，哀叹了一声，怒气渐渐地消了。

他是四川体育学院毕业的，在重庆一机校（如今的重庆理工大学）担任体育教师，1958 年反右补课，不明就里地被安上了一些无中生有的罪名，成了莫名其妙的右派分子。难怪胸中憋着一股愤懑之气，等待着他的又是什么呢？五十多年过去了，英俊的小伙子该是年近耄耋，须发斑白了吧？如今他在何方呢？

还是这一天，刚刚吃过午饭，两个身穿干警服的看守从后院来到几乎住满了人的大房间，挨着个儿的巡视了一遍，然后逐一点着人头，“你”“你”

“你”……站这边来！房间里总共四十来个人，他挑了三十个左右，全是身强力壮的。他说：“出去参加劳动，进来了就要接受改造，积极劳动，争取早一点摘掉帽子。”随后对我说：“你还是组织大家学习、读报，规规矩矩的啊！”。

门口的值班武警打开了两道铁栅栏门，刚才被挑中了的“同学”陆续走到街沿的人行道上，重新站队，那两名干警清点了准确人数，不多不少，恰恰三十个。一声口令“向右转，齐步走”，队伍沿着下半城公路朝那面走去。

晚上七点，天还没黑，中午出去劳动的那些人回来了，只有二十九个，

少了一个。莫非他这么快就改造好了？这看守所真有改造速成法？回来的人赶忙拥到后门打饭，每人一大碗空心菜煮稀饭。1958年毛泽东发起的大跃进刚刚起步，饥荒还不明显，粮食还没有定量，稀饭还比较稠，可以吃饱。

饭后，天已经黑了，吊在房梁上的电灯只有40瓦，不是很亮，也就不读了。我悄悄地问回来的人：“怎么少了一个？”，他回答说：“不知道，派我们到朝天门码头捞木材，上游发了洪水，顺流漂下来的木筏子有的被冲散了，零散的木料漂浮在回水沱，大家在齐腰深的水里把木料拖上岸，都很积极，争取摘帽子呀！只顾埋头干活儿，没有顾及左右，六点多钟上岸集合，清点人数的时候才发现少了一个。”

他接着说：“不知道是被洪水冲走了，还是逃跑了？洪水季节两江汇合处水流很急，漩涡特多，在水里逃跑的可能性不大。”

我在想，要是逃跑了还可以抓回来继续“改造”，要是被洪水冲走了，可就惨了。为了在水里捞一根木头失去了年轻的生命却戴着右派分子的帽子。我和他的年龄相近，今后的路还很长，不知道会遇见多少激流、漩涡、险滩……阴曹地府的小鬼对于带着右派帽子的是否也另眼看待呢？

第四天上午大约九点，那两位干警陪同一个膀大腰圆的中年人又来挑人，这回是手里拿着名单逐一点名核对。先叫名字，然后核对单位、工种、技术等级。连我在内一共选了十八个人，都是技术工人或技术员，大约不是到长江里捞木头了。跟着喊收拾行李，开门列队，再点一次名。这时候我才看见门外停着两辆大卡车，前面一辆车上已经装满了人，或立或坐，有男有女，不知道是从什么地方拉来的。我们依次上了后面这辆车，车厢大，人员少，不挤。此时从看守所里面开出来一辆中吉普，停在我们这辆车后面。三辆车同时启动，向西驶去，途经菜园坝、李子坝、化龙桥、小龙坎、沙坪坝，杨公桥，直奔歌乐山方向。

莫非要把我们送到“中美合作所”的白公馆、渣滓洞关起来吗？

要命的地方呀！不禁一阵寒慄。

二、中美合作所

提起重庆歌乐山下的“中美合作所”，就令人毛骨悚然。1950年我在北京就参观过《白公馆、渣滓洞展览》，在少年的脑海里留下了极为恐怖的印象，也激发了对帝国主义的仇恨。

五十年代，这个简称为“中美合作所”的战时跨国军事情报合作机构，成了广为人们熟知的“美蒋罪行”的代名词。原国民党当局在重庆歌乐山下设立的那两个关押政治犯的监狱——白公馆和渣滓洞，曾被称作是“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的组成部分。1954年建立的歌乐山纪念馆也曾一度名为“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美蒋罪行展览馆”。

1958年到1959年底，我在这里被关押了将近两年，住宿就在原军统局所属的一个院子里，在梅园下面的杨家山附近，六十年代后已拆毁。当时我和周绍文（同济大学1944年毕业，劳改）、金品熹（上海交通大学1955年毕业，劳教）等八、九个人被安排从事工厂扩建的设计任务，为新建的车间提供设备图纸，劳动地点就在原中美合作所副所长美籍人士梅乐斯[1]的办公场所，今称梅园，了解了一点点真实情况，未敢透露。

六十年代以后出现的长篇小说《红岩》，和由此改编的电影《烈火中永生》、歌剧《江姐》等文艺作品，使中美合作所声名远扬，只要一提起中美合作所，便会使人联想到杀人魔窟。

在官方大力支持与宣扬下，《红岩》成为当时最轰动、最畅销的长篇小说，先后印刷了一千万册，曾被中宣部副部长林默涵誉之为“党史小说”，直到今天，仍有人把《红岩》当作昔日重庆及四川地下党斗争的历史记录。小说中的人物时常被人们拿来与现实中的真人“对号”。近来重庆沙坪坝磁器口搞“千年古镇“旅游”开发，甚至为《红岩》中的虚构人物华子良修建了“华子良事迹陈列室”。这说明许多人确实把这部小说当成了真实的历史纪实。

但是，认真查阅历史资料就会发现，这部“党史小说”也跟中共组织“专家”花了十几年时间编写的“党史”一样，存在大量虚构情节和讹误之说。兹例举如下：

《红岩》描述共产党员刘思扬第二次被捕时写道：“押送他的汽车经过‘中美合作所警卫森严的大门’驶进白公馆集中营”，进去后登记时，他看到登记簿上有中美合作所的英文缩写等细节。

小说中写到渣滓洞监狱政治犯组织绝食斗争和 1949 年新年联欢会时，特地描写了监狱看守长给美国“特别顾问”打电话请示报告的细节。

在小说中，国民党特务头子徐鹏飞威胁许云峰：“你可受不了四十八套美国刑法！”改编成电影《烈火中永生》后，这句话改成了审讯江竹筠时的台词，“美国刑法”改成了“中美合作所的几十套刑法”。电影中的徐鹏飞审讯江竹筠时还有这样几句话：“你别忘了，这里是中美合作所！”，“真想尝尝中美合作所的几十套刑法？”，“老实告诉你，进了中美合作所，就是死尸，也得给我开口！”。

在小说《红岩》第十九章中，更虚构了这样一个给读者以强烈印象的情节：共产党员成岗被带到“中美合作所特别医院”接受审讯，“医生”在一个长着“黄麻似的鬃发”“高高隆起的鼻梁”“灰蓝颜色”眼睛“白皮肤”的“美国医生”指挥下，给成岗注射麻醉剂后进行诱供……

在根据小说《红岩》改编的歌剧《江姐》第六场（场景说明：重庆“中美合作所”渣滓洞集中营审讯室）中，特务头子沈养斋对渣滓洞监狱政治犯闹事发牢骚说：“……这几个月来，他们绝食、抗议、斗争，搞得我们手足无措！试问堂堂中美合作所，如今闹成了个什么样子！？”看守魏吉伯对江竹筠说：“你，你要知道，这是中美合作所，进来了就别想出去！”沈养斋还向江竹筠唱了一曲（剧中第三十七曲）：“这是中美合作所，歌乐山前黑铁牢，美式刑法四十八套，渣滓洞白骨比天高！”……

从以上的描述中，会让人感觉到中美合作所就是渣滓洞、白公馆。渣滓洞、白公馆就是中美合作所属下的监狱。

然而这一切都是罗广斌[2]、杨益言[3]无中生有编造的故事。

写小说就是编故事，荒诞、神怪、诡异、幻想、影射都可以用小说表现，允许无奇不有。《西游记》《聊斋志异》《八十天环绕地球》《鲁滨逊漂流记》等不乏神怪、鬼狐、科幻，多有奇思妙想，均堪称世界名著。流传至今，经久不衰。

但是纪实文学不是小说，纪实最忌讳失真，打着自传、纪实的幌子，为了政治需要欺世盗名、胡编乱造，则属于卑劣的行为。中共极力宣扬的《红岩》《高玉宝》《雷锋》《宜宾白毛女》“冷月英坐水牢”“泥塑收租院”等等均属此类。

《红岩》的全部情节是以 1948 年重庆及四川地下党遭到大破坏为背景展开的。

《红岩》中的叛徒甫志高，只是一个沙磁区委委员。这样一个小角色，能造成那么大的全局性的破坏吗？

实际上，重庆和川东地下党一百三十三人被捕，潜伏人员几乎全军覆灭，是重庆市委主要负责人刘国定、冉益智等集体“叛变”造成的。刘国定是川东临委委员、重庆市委书记（分管工人运动），冉益智是重庆市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分管学生运动），他们的“叛变”又引出李文祥（重庆市城区区委书记）、涂孝文（中共七大代表，川东临时工委书记兼下川东地工委书记）、骆安靖（上川东地工委委员）、蒲华辅（川康特委书记）等人“叛变”。川东地下党高层叛变十二人，主要领导干部占了一半。《红岩》把重庆和四川地下党基本上被一网打尽的罪责推之于小小的甫志高，意在表明中共高层领导都是坚贞不屈的，实属违背历史的真实。刘少奇的地位该很高了吧，按照毛泽东的说法，他还是叛徒、内奸、工贼呢。贺龙受批斗时的名号就是大军阀、大土匪。

作为小说，不可能没有虚构。但是现实主义文学的要素之一是细节的真实，对于以具体历史事件和具体地点为背景的“历史小说”、“党史小说”，就更不能不讲究细节的真实，不应在人所共知的历史事实及地点上随意编造，张冠李戴。正如写一部以北京为背景的小说，就不能把北海写成在德胜门外面的北郊，也不允许把卢沟桥写在景山公园里，这应该是起码的常识。《红岩》这方面的错讹却比比皆是，例如：

《红岩》49页写到：“在飞来寺中苏文协，他（成岗）真的见到毛主席了……”众所周知，当年中苏文化协会在重庆中山一路黄家垭口，而飞来寺则在中山二路原苏联驻华大使馆一侧（现第三人民医院内），两地相距好几里路呢。国共两党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也没有在飞来寺逗留过。

《红岩》56页描写“江姐来到浓雾弥漫的朝天门码头……”乘民运轮上华蓥山。华蓥山在川北，乘船需从嘉陵江溯江而上，嘉陵江的轮船都在千厮门码头上下，并不在朝天门码头。

《红岩》95页描写特务机关：“这里，老街32号，堂皇的铁门上，横署两个篆字——‘慈居’……”。老街34号“慈居”是一座砖木结构二楼一底的建筑，老式木门，根本没有铁门，实际是山墙上横署两个隶书“慈居”。

《红岩》363页中说：“杨虎城将军和他的幼子囚在白公馆顶楼上，他们是半年前才被秘密押来，特务从来不准他下楼。他的秘书宋绮云夫妇，被囚禁在一间地下牢房里，也不准和他见面。”实际上，杨虎城一家四口于1947年4月30日由贵州息烽玄天洞转移到重庆磁器口杨家山军统“四一图书馆”后面一平房内单独关押。1949年2月1日杨虎城一家三口，和关押在白公馆的宋绮云一家三口及阎继明、张醒民又被转移至贵阳黔灵山麒麟洞。杨虎城一家从未被关押在白公馆顶楼上。

《红岩》204页写到叶挺《囚歌》时，通过被关押在渣滓洞监狱的新四军战士龙光华之口说：“军长在楼下二室写过这首诗，我把它抄在墙上给大家看。”历史事实是：1942年1月3日，叶挺将军从桂林押解到重庆，在军统望龙门看守所、白公馆看守所短期囚禁后，即移监军统“乡下办事处”蒋家院子单独囚禁。11月21日，叶挺在蒋家院子写了《囚歌》，署名“六面碰壁居士”。叶挺夫人李秀文前来探监时，叶挺将《囚歌》和给郭沫若的一封信一并交李带出监狱，送到和平路天官府郭寓，交给了郭沫若。25日，叶挺移禁湖北恩施。叶挺从未被关押在渣滓洞监狱。渣滓洞监狱只关押普通政

治犯，高级人士在另外地点拘禁。

《红岩》为塑造英雄形象，极力渲染《挺进报》印刷人成岗在审讯中高声朗诵“我的自白书”。经查证，这个“自白书”是1956年《重庆日报》副刊编辑杨本泉在办公桌前品着茶琢磨出来的字句。《红岩》作者把这首诗移花接木到成岗身上，还煞有介事地做为陈然（成岗的原型）遗作，收入《革命烈士诗抄》，编入小学课本。皆是有悖事实的捏造。

《红岩》577页说：国民党逃跑前对重庆大爆炸“布置了一百多个目标……”事实是：1949年11月18日，国民党在重庆成立临时指挥部，划定了十一个破坏地区，委派了指挥官，确定爆炸目标十八处：其中发电厂二个，兵工厂十个、仓库三所，桥梁二座和国际广播电台一处。在罗广斌、杨益言的笔下，十八个变成“一百多个目标”，纯属信口开河。

《红岩》481页的注释①中，对重庆“九二”火灾作了这样的说明：“1949年9月2日，国民党在市区纵火。朝天门一带市区尽成焦土，数万人无家可归，死亡达万余人。”这一注释也是错的。早在五十年代，重庆公安机关就已查明“九二”火灾不是“国民党特务纵火”，火头是陕西街赣江街十七号油腊铺三楼佃户陈树章家的两个女儿“玩火”引起，因这一带都是木结构穿斗房屋和棚户，烈日、旋风，加上无水，朝天门顿成火海，大火延续十多小时，受灾9601户，灾民四万余人，有户口可查的死者2568人，掩埋尸体2874具，伤4000余人。这是早已澄清的史实，《红岩》的数字不知从何而来。

此外，小说中历史、地理细节上的错误还有：

蒋介石的专机“美龄号”错写成了“中美号”。

“在重庆、江津之间的江口夜渡长江”占领江津机场。江口在綦江、江津之间，且当时江津尚无机场。

小说434页写到“司徒雷登还呆坐在南京，尽管共军开进了大使馆，他还赖在那里……”这个“共军开进了美国大使馆”的说法完全违背史实，违背国际法也违背共军入城时的“约法八章”，是根本没有的事。

诸如此类，不胜枚举。罗广斌、杨益言的“杰作”充斥着无尽的谎言。

2011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和新闻出版总署为庆祝建党九十周年组织出版了由著名报告文学作家、中国作协副主席何建明和重庆红岩文化研究专家、博物馆研究员历华合著的《忠诚与背叛——告诉你一个真实的红岩》。据云该书“通过采访大屠杀中幸存的革命者及其后代，查阅大量解密的历史档案，以数十幅珍贵历史照片，图文并茂地还原了真实的历史细节”。书中指出：江姐受竹签刺手指酷刑是虚构的，根本没有这种刑罚。江姐在狱中绣红旗也是移栽过来的（关押在男监的罗广斌等曾在红色被面上用米饭粒粘贴过一个草纸做的五角星）。

2007年7月，历经三年筹备，《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史实》展览，正式在歌乐山烈士陵园文物保护区原“中美合作所”气象台旧址开馆展出，该馆以更为接近真实的历史资料，向人们展示出许多有关“中美合作所”的秘密。同时也更正了因电影和小说中用谎言堆积的艺术加工给人们造成的不合史实的某些印象。我曾两次前往参观核实有关史料，有兴趣的读者不妨来此一游。

展览表明，中美合作所与《挺进报》事件，乃至白公馆、渣滓洞大屠杀没有任何关系。《红岩》小说等出版物中有关中美合作所的描写，基本上都是与历史事实不符的虚构。

中共接管重庆后，把杨虎城、宋绮云两家和渣滓洞、白公馆、新世界饭

店等处关押的政治犯被杀害事件，统称为“11·27大屠杀”。1950年春节前，在渝女师（现大同路小学），举办了“磁器口大屠杀革命烈士遗物展”。当时，还没有把这屠杀事件和“中美合作所”搭界。后来朝鲜战争骤起，因“仇视美帝”的政治需要才改称为“中美合作所大屠杀”

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馆长历华（现任重庆市文化局副局长）著文宣称，由于历史、政治原因和中美合作所总部所在与国民党军统歌乐山集中营同处一个地理区域等原因，在建国后的几十年里，“中美合作所”与军统设在歌乐山下的集中营长期被相提并论，但历史的真实并非如此。歌乐山烈士陵园和国内史学界有关同仁近年来研究一再表明，“中美合作所”是一个中美联合抗日的国际军事情报机构。“中美合作所”与军统歌乐山集中营没有直接的联系，“中美合作所”的美方人员也没有参与过军统特务迫害政治犯的活动。“中美合作所”与白公馆、渣滓洞看守所原来不是一回事。

小说《红岩》中特务头子徐鹏飞的原型——当年西南的国民党特工人员徐远举，从未在中美合作所任过职，他调到重庆先后任行辕二处处长、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时，中美合作所已经撤销。小说《红岩》却让徐鹏飞口口声声说“这里是中美合作所”，显然与历史相违。

白公馆原为四川军阀杨森部下师长白驹的乡间别墅，为一楼一底的砖木结构房屋，总建筑面积为1200平方米，1939年秋，军统局出了三十两黄金购买过来，将原在小龙坎枣子堡的保密局重庆看守所迁入，用作临时看守所，俗称白公馆看守所，共有牢房十六间。

1943年春，当“中美合作所”建立时，白公馆看守所奉命将人犯迁往渣滓洞，白公馆房屋重新装修后让给美方人员作为住所，名为中美合作所第三招待所。

抗战胜利后“中美合作所”撤销，美方人员回国，白公馆重归保密局，1946年底，才又恢复关押政治犯的职能，名称叫国防部保密局看守所，主要关押国民党当局认为是“要犯”的较高级别政治犯。

1949年11月，白公馆看守所共关押五十四人，其中属白公馆看守所关押的政治犯、嫌疑犯、特务违纪人员二十七人，西南长官公署二处寄押的二十七人。“11·27”杀害二十八人（白公馆二十人，二处寄押八人，其中一人中三枪未死），释放七人，脱逃十九人（系二处寄押，内有小孩二人）。中共夺取政权后，用以关押国民党战犯，直到1963年改建成展览馆。

渣滓洞隶属于西南长官公署行辕二处。原为一人工采煤的小煤矿，煤少渣多，因而得名。地面上有内外两院，是采煤工人和经管人员的住处。1939年军统强行收购改为牢房，外院为特务办公之处，内院是囚禁之地，为一楼一底的砖木结构房屋，有男牢房十六间，女牢房两间，总建筑面积约1300平方米。1946年底将人犯迁回白公馆后，曾一度关门。1947年底又重新启用，称为重庆行辕第二看守所，主要关押1947年“六一大逮捕”中抓捕的教育、新闻界人士；“小民革”地下武装案被捕人员；川东三次武装起义被俘、被捕人员；《挺进报》事件被捕人员；民革川东、川康分会成员等。

白公馆和渣滓洞两处监狱总共可以容纳三百余名在押人员。

“中美合作所”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由中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长蒋介石和美国总统罗斯福批准建立的国际情报合作机构。成立目的是为中美两国共同对日作战。当时中美合作所并非是为“反共”、“反人民”而建立的法西斯集中营，而是在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中建立的跨国军事情报合作机构。

这种机构那时也并非只此一家。

1938年7月15日中苏技术研究所悄然成立。首任所长贺耀祖，副所长郑介民和苏方的瓦西列夫，任务是对日军进行电讯侦测和情报派遣。初期地址在汉口市特四区台儿庄路八十六号，后迁至重庆市来龙巷庆德里一号，另在南岸黄山上设有电讯侦测总台，南岸汪山上建有供苏方人员住宿的两幢宿舍。主要侦收和研究日军电讯密码。苏方提供了大批电讯器材。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苏联无暇东顾，军统局也认为苏方提供的电讯器材不够先进而失去合作热情。该所于1943年3月撤销。

1941年9月在重庆沙坪坝红槽房建立了中英特种技术合作所。后因在援助及训练等问题上与英方意见严重分歧。军统局认为英国投入甚少，颇为吝啬，另有企图，这一合作于1942年4月夭折。

1942年夏，流亡的法国戴高乐政府也曾派代表来中国，与军统局谈判建立中法特种技术合作所，主要是为了侦译法国维希傀儡政府的密电，法方来人对业务不熟悉，国民党当局对流亡的法国政府也缺乏信心，最终未能谈妥。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英对日、德宣战。由于美、日双方所处的地理位置决定了他们之间的战争基本上是在海上和空中进行，美国需要获得在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的气象水文资料。1941年12月3日，国民政府军政部职员池步洲[4]破译出日本海军将偷袭珍珠港的密电，经蒋介石批准，由戴笠将这份密电告知军统美国站站长、中国驻美使馆武官萧勃，然后通过中国驻美大使郭德权透露给美五角大楼海军司令部。美方海军自以为实力强大，日本不敢轻举妄动，因此该重要情报未引起美方重视。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得手，美国海军损失惨重，这才意识到国民党军统局在情报方面有所作为，而且大有潜力。由此，美国海军部看中了国民党军统局局长戴笠。双方随即开始接触。1943年国民党政府和美国政府签订秘密协定，成立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搜集有关对日作战情报，为国民党当局训练特种技术人员。

“中美合作所”成立于1943年4月，结束于1945年底。在此期间，“中美合作所”在电讯侦测、密码破译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如1945年初，中美合作所为了获取自二十世纪初以来积累的最完整中国东南沿海的气象资料，奇袭被日军占领的保存着这批气象资料的福建与台湾海峡之间的乌丘岛，从而在冲绳岛战役中保证盟军在该战役中获胜。中美合作所经过电讯侦测与密码破译，使得美国空军得以击落日本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的座机。中美合作所还建立了一百六十五座气象台、通讯电台、观测哨等，为作战提供气象信息。此外，还展开对日心理战，在中国沦陷区用秘密电台干扰日本广播并进行反宣传。印制汪精卫政权储蓄券的假钞偷运到沦陷区，扰乱当地金融。美军为军统提供了九千余吨特工器材、武器弹药、军用物资和两千辆卡车。装备了十万余名军统人员，加强了中方对日作战的能力。美方先后派遣了两千余名美国情报人员来到中国开展培训，开设通讯、刺杀、爆破、情报搜集等训练班。还建立了上千张床位的大型医院。

中共挺进西南后，全盘接收原国民党军统局所占土地、建筑及物资。白公馆继续用作牢房，因面积太小，只能关押一百来人，远远满足不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于是在原军统局所属范围内新增了“松山化工厂”和“新建机械厂”两座监狱，关押数千名犯人从事生产劳动。监狱规模和关押人数较国民党时期大了数十倍。

1954年8月在原中美合作所停车场旧址建成西南政法学院。

1954年修建了占地面积约一亩的烈士墓，建立纪念碑，恢复部分旧址原貌。

1963年后，松山化工厂迁至重庆天星桥红槽房正街一百号。新建机械厂将在押犯人及就业人员转移到德阳等地，整个工厂交给重庆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不再隶属于劳改系统，后改组成重庆汽车发动机厂。1995年在原址组建中美合资重庆康明斯发动机有限公司。制造大功率柴油机组。

1963年原中美合作所以及原国民党军统局所属大部分地区划作“歌乐山烈士陵园”用地。成立专门机构，建立了展览馆。

附注

[1]梅乐斯(Milton E. Miles, 1900—1961)亦译“梅乐士”、“迈尔斯”。美国海军情报官员。1922年美国海军学院毕业。曾获哥伦比亚大学电机硕士学位。两度在美国海军驻华部队任职。1942年再度到华任美海军驻华顾问组组长，美战略情报局远东协调主任，获海军准将衔。1943年任中美合作所副所长。帮助国民党政府训练特工，支持陈纳德的“对日空中战略计划”。1945年中美合作所撤销后离华。后曾在拉丁美洲从事情报活动。1958年获海军中将衔，著有《一种不同的战争》。

[2]罗广斌(1924—1967)四川忠县人。其父罗宇涵为四川大学法学院训导，其异母兄罗广文为国民党十五兵团中将司令。罗家声势显赫、田产富足、生活优裕。罗广斌十五岁在洪雅读初中时早恋，遭家庭严管，在逆反心理支持下出逃昆明，入西南联大附中，由此认识了同乡中共地下党员马识途等人，在此阶段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参加反对国民党的斗争。1948年3月由刘国志、江竹筠介绍入党。同年9月因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副书记冉益智叛变被捕，关押在渣滓洞和白公馆，1949年11月27日深夜买通看守从白公馆越狱成功。后在共青团重庆市委工作，1956年开始编写小说，《红岩》出版后声名大振，但始终未被重用，待遇也不高，心怀不满。文革初期带头造反夺权，1967初年被关押批斗，2月10日从关押地点大坪马家堡后勤工程学院楼房坠下身亡，究竟是自杀还是他杀，至今未予披露。

[3]杨益言(1925—)四川武胜人。其父为银行职员，少年时期在重庆北碚兼善中学读书，1944年考入从上海迁至四川南溪李庄的同济大学，抗战胜利后随学校赴上海继续读书，喜欢社交，擅长演说，积极参加学生运动，曾因此被捕，但他其时并非共产党员，短暂关押后即释放出狱。1948年返回重庆，在中国铅笔厂子弟校任教，因频繁邮寄同学通讯录引起怀疑，于1948年8月再次被捕。在渣滓洞监狱中结识了罗广斌等人。1949年4月由其在重庆市警察局任职的堂兄花钱“通门子”被释放出狱。中共接管重庆后，杨益言在共青团重庆市委工作，1952年经刘德彬介绍，始加入中国共产党。1956年后专业写作，以编造《红岩》出名，其中多有不实之词。文革期间被认定为叛徒，关押了四年。八十年代任中国作家协会四川分会副主席。其女儿已定居美国，杨益言晚年两次申请去美国，均被拒签，现居成都。患糖尿病和脑血栓，已失语。

[4]池步洲(1908—2003)福建闽清人。家贫，聪颖好学，十九岁赴日本东京大学，毕业后又入早稻田大学深造。后在中国驻日本大使馆任职，与日籍女士白滨英子成婚。1937年抗战爆发，他毅然挈妇将雏回国，夫妇二人初期在中央广播电台担任日语广播撰稿和播音，1939年3月池步洲奉命从事破译日军密电码的研究工作，一介书生并未参加任何特务组织。他和两个报务员在重庆两路口租用的民房中仅一个月就破译了数百封日本外务省的电报，为此获军政部奖章一枚。继后多次破译重要密电，如：日本偷袭珍珠港、山本五十六乘飞机出巡日程、日本空军袭击印度加

尔各答计划等机密，功勋卓著。抗战胜利后，他不愿参加国共内战，辞去军政部职务，隐居闽清，后在上海中国银行任职员。1949年拒绝随蒋军去台湾。中共接管上海后，池步洲动员其长子参加中共军队，自己继续在中国银行任职。1951年镇反，池步洲被捕入狱，以“在国民党特务机关从事密电的破译工作”等罪名判刑十二年。1963年刑满释放，文革中再次受冲击，幸未丧命。1979年始受聘于上海社会科学院从事经济史研究，时已年逾古稀。1983年3月池步洲在上海巧遇当年顶头上司李直峰（中共潜藏于国民党中统局之地下党员）、霍实子，两位耄耋老人也受尽牢狱之灾，九死一生之余秉笔直书证明池步洲一身清白，抗战有功。由是上海高级人民法院予以平反，三十年冤狱得以澄清，被委以上海市长宁区政协委员。池步洲晚年随其日籍妻子定居日本，2003年病逝，享年96岁。

三、新建机械厂

1949年底，中共接管了原国民党军统局在歌乐山下占用的五千余亩土地，所有地面建筑和各类物资。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统计局成立于湖北武汉，初时规模很小，人员不过百名，陈立夫为局长。1938年戴笠接管后，大肆扩张，1938年10月下旬，武汉陷落，军统局奉命西迁重庆。起初只占据了重庆市区观音岩下罗家湾的警察训练所，共有一座三层、一座二层的旧式楼房，和一片大小不等的平房，以后把隔壁重庆市警察局游民习艺所占了过来，随后强迫买下枣子岚垭“漱庐”的三层楼花园洋房、罗家湾十九号的花园公馆。这样，罗家湾一带成了庞大的军统办公和宿舍区，占地面积约两百亩。

抗战期间重庆市区屡遭日寇轰炸，位于市中区的罗家湾多次受日本飞机侵扰，为避免损失，戴笠派人在重庆西北郊歌乐山下磁器口缫丝厂设立军统局乡下办事处，并购买磁器口对面山上的庙宇五灵观，组建了立人小学。陆续购买了白公馆、松林坡、杨家山、钟家山、余家院子、蒋家院子、渣滓洞等处的大片土地，共五千余亩，修建各类房屋八百余间，成为军统局的主要基地。

中共接管后，白公馆继续作为监狱，用于关押国民党战犯。

1951年，随着镇反运动逐渐深入，监狱人满为患，白公馆和渣滓洞这两个加起来只能容纳三百余人的监狱，满足不了形势发展的需要。于是在歌乐山磁器口、五灵观、杨家山一带原军统局旧址上，新建了松山化工厂和新建机械厂两个可以关押、容纳数千人劳动改造的监狱，就关押人数而言，比渣滓洞和白公馆大了十余倍。

松山化工厂生产轻质碳酸钙、重质碳酸钙和活性碳酸钙等化工产品。原料就是当地山上的石灰石，经煅烧、水化、碳化、脱水、干燥、磨粉等工序。产品广泛用于橡胶、油漆、涂料、造纸等行业。五十年代设备简陋，大部分是手工操作，人工碎石，碓窝捶粉，操作人员常年与灰尘相伴，劳动条件十分恶劣。

新建机械厂规模更大，生产矿山机械、煤矿用斗车、球罐（一种钢制球形容器，主要用于贮存液体或气体物料，制造有一定难度）、小火车机车、柴油机、煤气机、鼓风机、汽车配件等。

新建机械厂是重庆市劳改系统的重点企业，当时的厂长王贵恒是老公安，和重庆市各个看守所都比较熟悉，事先和他们打了招呼，一旦有技术人员，技术工人，京剧、川戏演员抓进了看守所，优先通知新建机械厂。看来这位

厂长重视知识、技能和人才，也喜好戏曲。

我的劳动教养生活即从新建机械厂开始，择要记载如下：

(1) 三种人都是廉价劳动力

新建机械厂关押着一千多名服刑人员，拘管着将近一千名刑满释放被强制留在劳改队里的“就业人员”，清一色的男性。1958 年随着反右运动的节节胜利又新增了劳动教养人员，由此有了十余名女性。

服刑人员（通常叫犯人或劳改犯）、就业人员、劳教分子，是新建机械厂人员构成的三个部分，统称三类人员。中共执政后将国人分为几等几类，壁垒森严。三类人员，五类分子，臭老九等均属专政对象。

服刑人员的成分复杂，既有大量以历史反革命罪判处徒刑的原国民党军政人员，也有一贯道、吸毒贩毒、贪污盗窃等刑事犯，和少量交通肇事、医疗事故等过失犯。年龄以三十到五十岁居多。

按照劳改局内部财务规定，每个犯人每月费用为十七元（当时大米每斤 0.1 元），其中八元为伙食费（不发给本人，交食堂统一使用），另外，还根据狱中表现、技术等级，发给二元到六元不等的零用钱，用以购买肥皂，牙膏等物品（笔者注：此项零用钱从 1961 年缩减为不分等级每人每月二元五角，文革伊始再被压缩，改为每月一元钱）。其余为服装费等杂项开支，犯人服刑期间按规定必须穿囚服，一年可以领取一套单衣，三年可以领取一套棉衣。

五十年代的犯人大都服从管教，慑于专政威力，不敢擅越雷池。至于是否认罪则另当别论。

中共建国初期，对于原国民党军政人员，除少数上层人士出于统战需要被授予虚名，安排一官半职以外，绝大多数中下层人员均被视作“历史反革命”，毛泽东在中共高干会议上曾说：“逃到台湾去的国民党不过十分之一，留在大陆上的有十分之九。留下来的这一部分，我们正在改造他们。”他担心这部分人闹乱子，念念不忘寻机消灭之。

为了稳定政权，或斗争形势需要，或制造恐怖气氛需要，中共借土地改革之机大开杀戒，以“地主”、“土豪”、“劣绅”之罪名，一毙了之，或者假借土改积极分子之手捆绑吊打致死。对没有现行破坏活动，仅仅是历史问题的“反革命分子”，则逮捕入狱，刑期一般不长，三五年而已，不像大跃进以后和文革期间动辄十五年、二十年有期徒刑。那时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就是很重的惩罚了。所以到 1958 年，解放初期逮捕判刑的相当一部分人该出狱了。然而这一部分人中的多数都被强制性地留在监狱管理范围之内，叫做“就业人员”，实际上是长期关押。

按照公开发表的文件，刑满就该释放。五十年代的劳改条例规定只有无家可归、无业可就、或本人自愿申请才能留厂（场）就业。但是中共中央有内部指示“多留少放”。公开发表的文件是写给民众和外国人看的，内部指示才是必须切实执行的，这是中国共产党一贯的作风。

1958 年我第一次进劳改单位，第一次听说“就业人员”这个名词，也是第一次有机会接触“就业人员”。才知道在当时的中国只要进了劳改队，除个别情况以外，就别想出去了，所谓“风都吹得进来，雷都打不出去”。哪怕只判一年徒刑，刑满不是释放而是被强制性地留在劳改队，名曰“就业人员”，和犯人的区别是：

1、凡是没有剥夺政治权利的，名义上有公民权，但是无从行使，也不能加入工会；

- 2、不关押在有高墙电网的监狱里，居住在就业人员宿舍；
- 3、有家眷的周末可以回家团聚，平时不准在外留宿；
- 4、不再是无偿劳动，每个月有几十元工资（当然远低于社会上同等级别的工资，大约相当于一半左右）；通常被称为“二劳改”。

就业人员的精神世界处在迷惘、彷徨、绝望之中，他们的内心是痛苦的。劳改犯盼着混满刑期，就业人员盼着什么呢？“二劳改”是没有期限的。

监狱的墙上写着“改恶从善，前途光明”，刑满了还被强制性地留在劳改队就是前途？就是光明？就是中共常常说的“给出路”？混沌天下，路在何方？

1959年底，我随新建机械厂所有劳教人员调往成都，热处理车间的就业人员方则正（三反五反运动中因小额贪污被判刑三年，1954年刑满被强迫留厂就业）和我含泪话别说：你们到了成都可能会摘帽子，我这项就业人员的帽子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摘掉呢？我被判刑，老婆答应等我三年，可三年满了又过了五年，相当于抗战八年了，还是离不开劳改队。孩子生病没钱医治，死了。老婆在外面承受着巨大的精神上的和经济上的压力，等我回家，等了八年，没盼头了，离婚了……。这是多数就业人员共同的命运。唉！可怜的中国特色就业人员。

新建机械厂是劳改企业，1958年才开始收容第一批劳动教养人员。

新建机械厂的领导人意识到在即将投入劳动教养的“右派分子”和“反社会主义分子”当中有相当一部分年富力强的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虽然新建机械厂拥有一批具真才实学的技术人员和技师，但多半是国民党时期留下来的，背负着负有原罪的思想包袱，工作谨小慎微，且年龄偏大，知识未免老化。右派分子多数是建国初期毕业的学生，年轻有为、进取心甚强，接收这批人有利于新建机械厂的发展。于是向四川省劳改局申请，准备接纳劳动教养人员，省劳改局正在为劳动教养分子源源而来，劳动教养场所人满为患、不敷需要而焦虑，于是顺水推舟、慨然允诺。新建机械厂才得以到公安局下属转运站和看守所收集刚刚抓进来的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由是才有了本章第一节所述的那一幕。

五十年代，新建机械厂能够制造球罐，制造铁路机车（窄轨），该厂铸造的道奇汽车发动机缸体和缸盖可以出口，1958年还制造了先进牌小轿车参与北京展览会。在工业基础比较坚实的重庆，新建机械厂的技术实力也是屈指可数的。这个厂的主管从建厂初期就注意搜罗技术人才。新建机械厂的犯人和就业人员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有真才实学的。例如：

周绍文，四十年代同济大学机械工程系毕业，就职于重庆第二十九兵工厂（重庆钢铁公司前身），任少校技正（国民政府时期兵工厂的技术人员是有军衔的，通常本科毕业为中尉，硕士毕业为上尉，博士毕业为少校。少校技正相当于工程师）。1951年三反五反运动中涉及“星四聚餐会”一案，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

当时新闻报道说：“重庆公安机关破获一个‘反动奸商的地下指挥机构’‘星四聚餐会’，五人被捕”，“该组织是重庆一批著名资本家组成的，他们合谋策划收买国营企业工作人员和主管干部，垄断政府按计划分派的加工订货，有组织地掠夺国家财产达120亿元（旧币，相当于币制改革后的120万元），严重损害了国家经济。与其相关的外围组织‘星五聚餐会’‘星六聚餐会’‘造船小组’‘十一厂联络处’‘会计师座谈会’等亦被取缔”。

此案曾上达毛泽东（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 58 页），一时成为铁案。

1951 年周绍文任重庆钢铁厂基本建设处生产科长，陈松柏工程师负责外包工程。他们与重庆市工商局副局长孙济世、西南工业部经理处科长钱绍武和几个承包工程的设备制造厂负责人时有聚会，有时共进午餐或晚餐，三反五反运动中被认定有舞弊行为，定名为“星四聚餐会”，一网打尽，投入劳改。

周绍文在新建机械厂享受特殊待遇：

1、可蓄发，不强制剃光头；

2、允许穿普通服装，不必穿劳改囚服；

3、准带家属，在监舍外居住。其妻子安排在厂医院药房司药，其儿子在附近就学读书；

4、有一定数额的工资；

5、身份是犯人，对外则被称为新建机械厂总工程师，厂内所有技术文件须经他签字认可；

这在当时是很了不起的事，一说明建国初期的确需要人才，二表明新建机械厂的党政领导也重视人才，三说明共产党的政策可以任意伸缩，有相当的灵活性。

周绍文知识面广，且极为敬业，为新建机械厂的发展可谓殚精竭虑。新建机械厂能够从不足百人的作坊式生产发展到上千人的非标准设备制造厂，承担重庆多数厂不能承担的任务，与周绍文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新建机械厂切实发挥周绍文的技术专长，充分利用他和重庆相关工厂主管人员的良好关系，获取了大量图纸资料，我在劳动教养期间设计的台车式退火炉、化铁炉等都借鉴了通过他取得的图纸。

周绍文虚心好学，诲人不倦，学而无厌。他比我年长二十岁，1958 年竟提出向我学俄语，以便阅读俄文版《旋转活塞发动机》，作为新建机械厂开拓新产品的技术储备。1984 年我在重庆与他相遇，他已能流畅地阅读俄文原版《普希金诗选》，其俄语水平远远超过了我。他坦言是在文革期间关押在牛棚里读俄文版《毛泽东选集》的成果。六七十年代，新建机械厂引进法国发动机制造技术和日本设备，他又自学法语和日语，达到了可以阅读原文技术资料的水平。在技术人员中能够掌握英、德、俄、法、日等五国语言的，为数不多。

由于是毛泽东钦定的案件，周绍文表现虽好却没有减刑。1971 年刑满就业，直到 1984 年，毛泽东死了多年以后，“星四聚餐会”案件才得以甄别澄清，原来是一个冤案。周绍文回到重庆钢铁公司，恢复了名誉，时已年近古稀矣。

李经文，三十年代大学毕业，长期在兵工厂从事技术工作。四十年代后期任某兵工厂所长（相当于车间主任）。1948 年李经文属下一位中共地下党员被捕，中共执政后怀疑李经文是举报人，于是 1950 年李被捕入狱，判处七年有期徒刑，在重庆新建机械厂劳改。他入狱后谨小慎微，兢兢业业，认真钻研刀具设计，那时候中国齿轮加工技术还比较落后，新建机械厂能够生产各类汽车齿轮和变速箱主轴、副轴，在全国都有点知名度，李经文有一定的贡献。

1984 年查明，那位被捕者的举报人不是李经文，由是得以平反，其时他已年届耄耋。当他回到原来所在的兵工厂办理善后事宜时，尽管昔日同事有

的担任了总工程师，有的是高级顾问，他的职称却还是技术员（中共制定的政策，平反只能恢复原职称，原工资）。那十余位年逾花甲的老人在他来到时夹道欢迎，临别时列队相送，从厂中心走了一里多路，把他送到公交车站，沿途民众看着厂里的高级人士以十分尊重的神情护送着一位衣衫简朴到寒酸地步的老人，不免惊讶。三十余年的冤狱改变了李经文的人生历程。昔日的同事了解李经文的为人，都知道他属于技术型的一介书生，说话略有口吃，不善表达，重亲情，讲义气，不问政治。当时就怀疑可能是冤案，但三十多年谁也不敢声张，甚至也不敢悄悄议论，连李经文这三个字都很少提及，否则担一个攻击肃反的罪名岂不是吃不了兜着走。

新建机械厂还关押着原德国容克飞机厂的工程师康泰洪、留学归来的重庆机床厂总工程师王德法、当时重庆市唯一的焊接技师马立道、经验丰富的铸造技师韩尊习等一大批技术人才。在五十年代初期这是极为难得的财富。

1957年突发的“反右派运动”，使一大批年轻有为、年富力强的科研机构的研究人员、高等院校理工科的师生，厂矿企业的技术人员和能工巧匠，坠入毛泽东预设的陷阱，沦为劳改、劳教人员，被源源不断地送到劳改场所。

新建机械厂1958年下半年即扩大收容平均年龄二十余岁的劳教分子三百余人，技术实力明显增强。

该厂之所以能够生产技术难度比较高的产品，乃至发展成大马力柴油发动机制造厂，进而被世界知名的美国康明斯（CUMMINS）看中，组建合资企业。其基础是众多劳改犯和劳教人员奠定的。

（2）劳教人员的生活条件

住房：新建机械厂是按照监狱的思路设计修建的。关押犯人的监舍在高墙电网之内，四角都有岗楼，持枪武警昼夜监守，犯人进出都必须有公安干警率领。劳动教养不能等同于判处徒刑的罪犯，至少形式上要有所区别，所以劳教分子没有住在监舍大院。

还有一个院子是就业人员的住地，房屋结构和监舍没有区别，但是四周的岗楼上没有武装值守，只是门口有一个值班室，二十四小时有干警监守，就业人员可凭胸前佩戴的椭圆形证章出门。而劳教人员是被限制自由的，不允许随便外出，为了便于管理避免混淆，也不适合劳教分子居住。

初到新建机械厂的四十几个人被安置在一套临时腾空的家属住房之内，是一座红砖小楼。空徒四壁，木质地板，没有床也没有桌椅板凳。一个挨一个地挤在大约八十平米的地铺上，每人占用面积不到两平方米，人挤着人，大家以“同学”相称。不少结过婚的人抛妻离子，又过起了集体生活。

在原单位的时候，右派分子是要遭人冷眼的，时时受管制，处处受监督。家属和孩子也要被另眼看待，心理压力很大，日子是很难过的。来到这里一律平等，相互理解，互相尊重，精神压力解除了，住的虽然挤了点，心情却开朗了，似乎忘记了一肚子冤屈，斗室之内居然时常泛起笑声。据说劳动教养是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只是行政处分，在这里低个头、认个错，不消一两年又可以成为完整的公民，甚至还想重新入团、入党，暂时做半个公民也就是人生的一段插曲而已。进来的右派分子还很乐观呢。

大约每隔一周，就有新“同学”被“押解”进来，工厂腾出了一个库房给新同学住，很快就住满了，又要想办法腾房。1958年，中国的劳动教养事业处在蓬勃发展阶段，毛泽东和邓小平在中南海里得意地笑呢。

过了一周，在厂房旁边的空地上搭建了一座大席棚，粗毛竹捆绑支架，

竹席包围四周，斜坡屋顶是油毛毡，顶架上有电灯。席棚内分成许多隔断，像是火车的卧铺车厢，每个隔断可以睡六个人，整个席棚能够容纳二百四十人。

1958年8月中旬，我们从几个分散的住地搬进了大席棚，总共大约一百二三十人，铺位还空着一半。当时还是夏季，席棚遮阴但能通风透光，人虽多却不是很热，就是怕下雨，屋顶虽然不漏，但外面下雨里面的地上流水，因此地面上不能放东西，不然就会被浸湿甚至被冲跑。

临近国庆了，估计有大量新“同学”要来。

还没到国庆，九月上旬大席棚就住满了人。加上另外居住的女劳教，新建机械厂的劳动教养人员接近三百人了。两个月增长了七倍，在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大跃进运动中，其增长速度处于各行各业的领先地位。

十月中旬，所有男劳教再一次迁居，搬到了一个国民党军统局留下的院子里，地处梅园下面不远的杨家山附近，这里是砖柱砖墙三合院，院子后面是山，院子前面是一个可以容纳四五百人的操场。

院子里有三栋房屋，成凹字形分布，总面积大约有六百平方米。屋子里没有床铺，没有桌椅板凳，没有一件可以称得上家具的物品。劳教分子一个挨一个地睡在梆硬的三合土地面上，除了列与列之间留了大约0.5米宽的走道以外，每个人大约占地1.0平方米。不管是教授还是文盲，无论是老头子还是小伙子，一律平等，或许这就是共产主义社会的雏形吧。

住进去大约半个月以后，管教股买了一些稻草，组织全体劳教人员到农民的水田埂上，每人取两捆，拿回来铺在又冷又硬的三合土地面上，第一晚睡上去，简直像是睡在席梦思软床上一样，真得感谢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让我们有这样美的享受。

三合院左侧二十米开外还有一间面积约八十平方米临时搭盖的房子，作为厨房，抽调了两个犯人炊事员，其中一位有一点跛。院子后边是一个狭长形的厕所。吃喝拉撒睡全有着落了，可以安心改造了。

劳教人员的行李都十分简单，一床铺盖，几件必要的换洗衣服叠起来当枕头，大约一半的人还带着书籍，排成一排放在两人之间，使本来就不宽的睡眠位置更窄了，也就0.5米左右。新建机械厂三百多劳教分子就在这样的环境里住了一年多时间，直到1959年底调离歌乐山。

从进新建机械厂第一天起，就由公安干部指定编组并任命组长，过了几天才发现，所谓组长多数是因男女关系或偷盗而被劳教的人员，据说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之类。干部找他们谈过话，对他们说右派等人虽然也有公民权，但实际上属于敌我矛盾，要加强对右派分子的监督，随时向政府报告。这些组长们闻听此言，立即受宠若惊、喜形于色，尽管和右派分子同睡一个地铺，同吃一锅饭，却有了高人一等的感觉。右派分子们自认倒霉，早知今日，当初去偷盗、去嫖娼宿妓，即使到了劳改队也能得到“信任”，何至于落到被小偷监管的地步。殊不知男盗女娼中的相当一部人都上了分化瓦解的当，由是劳教分子之间监督告密之风盛行。

劳教食堂的演变，等级日益森严

1958年5月，新建机械厂开始收容劳教人员，起初人数不多，总共不过四五十人，每人每月发生活费十五元（按当时物价，可以购买一百五十斤大米），这个标准大体上与服刑期间的犯人相当。犯人的费用除零花钱发给个人外，伙食费、服装费等均由管教干部掌控，对劳教人员则是把伙食费、服装

费、零用钱等都发给个人。金额上和犯人的数量差不多，政府没有剥夺劳教分子的公民权，让这些人充分享受财产使用权和支配权，是一种神圣的政治待遇。至于 1957 年《人民日报》社论明文刊载的“对他们同样实行按劳动成果给工资报酬的原则”和毛泽东、刘少奇等人说的对劳教人员如何有工资待遇等均属欺骗人民的谎言，从来没有兑现过。

新建机械厂原来只有两个食堂，一个是犯人食堂，另一个食堂以刑满释放仍被强制留在厂内的就业人员为主，有少量家属不在厂内的公安干部也在这个食堂就餐，劳教人员来了以后，因为当时名义上是有公民权的，所以也被安排在这个食堂，不管是公安干部还是就业人员抑或是劳教分子，依次排队，食堂只认饭票不认人。八月份以后，劳教人员从四五十人急剧增加到二百余人，出于等级观念，成立了劳教、就业食堂，把公安干部清除出去了，他们专门成立了小食堂，自然是享受高人一等的待遇。到了十月份，所有男性劳教人员搬到原国民党军统局占据的杨家山大院居住，随之有了劳教人员专用食堂。至此，就食堂而言，在新建机械厂内形成了“干部食堂”“就业人员食堂”“劳教分子食堂”“劳改犯食堂”四个层次。

为了一目了然，干部穿警服佩戴警徽，就业人员胸前佩戴椭圆形铜质徽章，劳教分子左胸佩戴白色垂直布条，劳改犯人左胸横向佩戴黄色布条。布条戴久了难免沾染上五颜六色，当等级森严的各类人员交杂相处动来动去时，从旁边一眼望去，犹如百花齐放，时时展现着社会主义国家特色。

（3）管教制度

开始下笔欲纪录管教制度，仔细回想，劳教原来跟中共的所有法规一样，无制无度，即毛泽东常自喻的“和尚打伞，无法无天”。

1958 年初进劳教场所的人，多数都看过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决定》全文和配发的社论刊载于 1957 年 8 月 4 日《人民日报》）。

《决定》第一条第二款宣称：“罪行轻微，不追究刑事责任的反革命分子，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都是**“应当加以收容实行劳动教养”**的。1957 年 7 月 18 日，毛泽东责成周恩来**“要搞个劳动教养条例，除了少数知名人士之外，把一些右派都搞去劳动教养。”**国务院的所谓《决定》是毛泽东耳提面命、周恩来言听计从的产物，是针对大多数右派分子的。当时法律规定追究刑事责任的最轻刑罚是六个月有期徒刑。既然劳动教养收容的是“罪行轻微，不追究刑事责任”的人员，也就是说还没达到必须予以刑事惩处的条款。关押期限不会超过半年吧。所以初进劳教队的绝大多数右派分子虽然都不承认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行为，但都采取了委曲求全、逆来顺受的态度，表面上全是服管服教、循规蹈矩的。心想要不了半年就会放出去，都是年轻人，受点罪也无所谓。不料劳教竟然有长达 22 年的，超过了有期徒刑的最高限度。造成了多少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悲剧。此恨绵绵无绝期。毛泽东践踏法律，草菅人命的罪恶必须清算。

当时的劳教场所即使如新建机械厂这样成立多年的劳改单位也遇到了新问题。1957 年 7 月，中共在青岛召开省、市委书记会议期间，毛泽东写了《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在这篇文章中给右派定性说：“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向工人阶级和共产党举行猖狂进攻的资产阶级右派是反动派、反革命派。字里行间隐含着毛泽东咬牙切齿的仇恨和不共戴天的狰狞。然而，他又在不同场合多次宣扬**对右派分子按人**

民内部矛盾处理，甚至指名道姓地说不要开除谭天荣、林希翎等学生右派以显示其宽仁厚德（笔者注：毛泽东的最高指示不管用了。谭天荣被发往北大荒等地劳教了 11 年。林希翎被判处有期徒刑 15 年。）。周恩来 1957 年 6 月 26 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曾说：“**右派分子能够幡然悔悟，接受改造，社会主义改造的大门对他们开着**”。《人民日报》1957 年 7 月 8 日在其社论《斗争正在深入》一文中也说：“**对大多数右派分子，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还是适用的**”。

既然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就不能列为专政对象吧。既然是治病救人总不能往死里整吧。后来的事实证明，兴凯湖农场、夹边沟农场、峨边沙坪农场、天全硫磺矿等地无数的白骨和冤魂证明，毛泽东多次咬牙切齿地发狠话、耍阴谋。把所有敢于对他提意见的人不仅要打倒而且要整死。毛泽东一贯心狠手辣，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等追随他数十年的开国元勋均死于他的魔掌，敢于针砭时弊反对个人崇拜的青年学生、仁人志士，难免死于非命。

1991 年我曾回到新建机械厂拜访五十年代任该厂技术科长的高国恒（老共产党员），谈及往事时他说：当时很为难，特别是对右派，分寸不易掌握，名义上还有选举权，业务上都是新建厂的技术骨干，不能视为敌人。上级一再强调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是敌我矛盾，是专政对象，必须划清界限，又不能不视为敌人。一不留神就要犯“左倾”或“右倾”错误。

（4）特赦

1959 年 10 月，中共中央为庆贺建国十周年发布特赦令。众多右派分子喜形于色。几个年纪大一点的人持观望态度。

该特赦令全文如下：

一、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的战争罪犯，关押已满十年，确实改恶从善的，予以释放。

二、反革命罪犯，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以下（包括判处有期徒刑五年）、服刑时间已经达到刑期二分之一以上、确实改恶从善的，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以上、服刑时间已经达到刑期三分之二以上、确实改恶从善的，予以释放。

三、普通刑事罪犯，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以下（包括判处有期徒刑五年）、服刑时间已经达到刑期三分之一以上、确实改恶从善的，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以上、服刑时间已经达到刑期二分之一以上、确实改恶从善的，予以释放。

四、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罪犯，缓刑时间已满一年、确实有改恶从善表现的，可以减为无期徒刑或十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五、判处无期徒刑的罪犯，服刑时间已满七年、确实有改恶从善表现的，可以减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这个命令，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于一九五九年九月颁布。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执行。

实际上，新建机械厂的犯人没有一个享受到特赦。特赦的是关押在锦州等地的高级战犯（杜聿明、廖耀湘、宋希濂等）和伪满洲国皇帝溥仪等人。

劳教处分原来说是针对罪行轻微不够判刑标准的人（参看 1956 年 1 月 10 日中共中央奉毛泽东指令发布的《关于省、市立即筹办劳动教养机构的指示》）。

中国刑法规定最低的有期徒刑是六个月，达不到这个标准，显然是指若关押的话期限应少于六个月。但在毛泽东时代，这个针对**罪行轻微不够判刑标准的人**制定的劳教惩罚，起初是不宣布期限的，从 1955 年 8 月开始推行

劳动教养到2013年11月12日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决定废止劳动教养制度，据实施了58年后统计，对曾经被劳教过的四百万人，实际执行的期限最短的是2年最长的是22年。

四川省1957年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的六万余人(未计入1958年10月后划的右派和中右、暗右等数万人)，第一批摘掉右派帽子解除劳教的是1959年10月袁明亮等六人。摘掉帽子后被强制留在劳教场所，名曰就业人员。1960年极少摘帽，1961年和1962年上半年全国的右派分子相继摘帽十余万人，1962年后右派摘帽处于半停顿状态，直到1978年毛泽东死了两年以后，中共中央在胡耀邦赵紫阳主政期间才给全部右派摘帽，并宣布99.99%的右派均系错划，予以改正。但对反右运动的罪魁祸首和反右中大肆制造冤狱、迫害无辜的打手未予追责，反右的流毒远未肃清。

在毛泽东时代，中共对右派分子的仇视与压迫和残害从未停止，1959年颁布的特赦根本不包括这些“罪行轻微不够判刑标准的人”。

第七章 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

1958年中共中央正式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十个字组成的三个词组。1960年5月以前曾被称作“三个法宝”，5月以后改称为“三面红旗”。历史的检验已经证明，“三面红旗”是“极左”思想的具体表现，是独裁专政的疯狂之举，是共产主义乌托邦的痴心妄想，不但严重损害国民经济发展，更给人民生活带来了巨大灾难。“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不是什么旗帜和法宝。它祭起的只是阵阵妖风，飞沙走石，天昏地暗，还夹着一股股血腥气。它的作用是让人们认识了毛泽东的愚顽、刚愎自用和中共政权的法西斯本质。它的好处是以实践验证了所谓“共产理论”和“计划经济”的荒谬绝伦。

一、虚幻的总路线，云中的假大空。

1958年5月，中共在北京召开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也就是吹响了“大跃进”的号角。

刘少奇在政治报告中用中共特有的党化语言和词汇对此做了解释，他说这条总路线的基本点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国际团结；在继续完成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逐步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条件下，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在集中领导、全面规划、分工协作的条件下，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尽快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社会主义国家。**”

从字面上看，这个总路线冠冕堂皇，无可非议，似乎找不到反对的理由。问题在于制定这个总路线的人从来没有执行它，只是忽悠老百姓的南柯一梦而已。中共向来是以梦吃糊弄人的。

历史走过了一个花甲，六十年的变迁历历在目，在事实面前，中共的空话、大话、谎言和欺骗都已破灭，一切歪门邪道都显出了原形，以史为鉴。我们按照当初刘少奇宣读的那个基本点，逐条检视一下，看看它是怎么执行的。

“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执行了吗？没有。

反右运动“以言定罪”，歪曲捏造，栽赃陷害。把数百万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积极响应中共号召、为振兴中华而仗义执言的知识分子和热血青年划为“右派”；把满腔热忱为国家富强而努力工作的朋友当做敌人；把稍有异议的人斥之为阶级敌人，必欲除之而后快。为此大力兴建监狱和劳教场所，把这些人关押起来。还有无数善良的人被定为“中右”或“暗右”，在本人毫无知情的状况下“控制使用”。中共中央在反右运动中唯恐工人群众不入圈套，信誓旦旦地说：“工人中不划右派”，仅仅过了一个月，余音仍在绕梁，不料中共中央在“五类分子”之外又增加了“反社会主义分子”的称号，与五类分子同等对待，投入劳改或劳教，发配到深山，横加迫害。由此在国内造成一种万马齐喑的政治局面。毛泽东自称他无法无天，把自己凌驾于人民、国家之上，恣意胡作非为，朕即是党。逼得周恩来、陈云、李富春等党内同僚也不得不做检讨。这是调动积极因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吗？！

“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执行了吗？没有。

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高喊全民所有。名义上属全民所有的资产，人民却没有知情权、更没有使用权和支配权。既不公开账目，也不按期分红，能叫做全民所有吗？在农村搞什么“一大二公”，剥夺了生产队的生产资料和农民的自主经营权，不是“巩固”而是彻底破坏了集体经济。

“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国际团结”执行了吗？没有。

首先应该指出，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讲过，人民民主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是有原则上的不同的（见《毛泽东选集》第三卷1010页），1954年制定的宪法在总纲中对国家性质的表述用的也是“人民民主”这四个字。1958年宪法并未修改。“无产阶级专政”的提法是不符合宪法精神的。

刘少奇是中共党内第二号人物，擅自更改宪法确定的国家性质，可见中共从来就没有把宪法看在眼里，根本就没有想过要认真执行。他们一心想的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而这个“无产阶级”也是一个幌子，实际上是一党专政。后几年的发展，特别是六十年代中期以后，实行的是赤裸裸的法西斯专政。刘少奇也被毛泽东请君入瓮，成了专政对象，惨死于开封地下室。

中共党内只有毛泽东一个人说了算，他可以把整人害人起家的康生提拔为政治局常委，他可以把痞子王洪文提拔成中共中央副主席，他可以让那个风流成性、生活糜烂的三流演员以文化革命的旗手之名横行霸道，迫害无辜，以“中央文革小组”取代政治局，祸害天下。

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家也是毛泽东一个人说了算，他可以不经任何法律程序，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于不顾，连个过场都不走，任意批斗国家主席，撤换北京市长、公安部长、国防部长，他可以安插一个历史上当过汉奸的半文盲陈永贵^[1]任国务院副总理。

毛泽东把大权独揽的一言堂美其名曰“无产阶级专政”，这是强奸无产阶级，是比一党专政还要霸道的绝对个人独裁。

毛泽东急欲充当共产世界霸主，挑起中苏矛盾；鼓动镇压匈牙利民主革命；干预日本共产党内政；重金收买阿尔巴尼亚的霍查；在印度尼西亚输出共产革命制造混乱，导致上百万华侨惨遭屠杀……难道都是无产阶级国际团结？

“在继续完成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逐步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执行了吗？没有。

1958年大跃进人为地造成了连续三年大饥荒。经济上大刮共产风、浮夸

风、瞎指挥；政治上唯我独尊，排除异己，残害同僚；思想垄断，压制民主，大搞一言堂，大兴文字狱。刘少奇等人对毛泽东的错误路线稍作修正，实行“三自一包”，熬到1964年才吃了几顿饱饭，毛泽东就又开始了他所谓“不断革命”的政治运动。随心所欲地瞎折腾，先是搞什么“四清”，接着就是批判《海瑞罢官》，利用盲然躁动的“红卫兵”“破四旧”“打砸抢”“武斗”，美其名曰“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大革文化命”。以暴力摧毁千古文明遗产，用邪恶凌侵华夏传统美德。肆意制造了祸国殃民的十年大浩劫。

“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条件下，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执行了吗？没有。

翻翻那几年的报纸，就可以看到所谓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是不断变化的，朝令夕改，出尔反而。1958年提的是“**优先发展重工业**”，1959年变成了一整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1962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忽而将它改成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据说这是伟大的创造。1962年3月忽而变成了“**按照农轻重的次序进行安排**”，又是一个伟大的创造。花样不断翻新，口号层出不穷，全凭毛泽东一张嘴在那里信口雌黄，玩弄文字游戏。总路线成了杂技演员手里耍来耍去的绳子。不断地变换。唯一不变的是物资极端匮乏，举国饥寒交迫。

我这里不是说施政方针不能变，施政方针应该随着客观条件的变化与时俱进。而是说不要用毛泽东那些天花乱坠的口号欺骗人民，愚弄人民。无端变化的事实表明中国共产党没有慎思熟虑的执政理念也没有通达应变的执政能力。只能在水里乱摸石头。却永远过不了河。

“在集中领导、全面规划、分工协作的条件下，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执行了吗？没有。

大跃进一来，一切都乱了套。九千万民众炼钢，号称“钢铁元帅升帐”。三千万农夫开矿，谓之“矿山先锋先行”。土高炉星罗棋布，采矿点漫山遍野，中南海里也要炼钢，戈壁滩上也要出铁。大批农民上山挖矿，搞得庄稼烂在地里无人收获，老弱妇孺留守在家，民兵昼夜守望，饿着肚子无计可施。既不准外出逃荒，也不准私自开垦，导致饿死数千万饥民。

“尽快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社会主义国家”。实现了吗？没有。

“尽快地”究竟是多快呢？照毛泽东的说法，超英赶美也就是七八年、十来年的事。笔者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将近六十年，中国和欧美在经济、技术方面的差距不是逐渐缩小，而是日益增大了。这是有目共睹的现实，社会制度的优劣昭然若揭，事实胜于雄辩。

综上所述，那个所谓总路线，一条也没有执行。本来就是海市蜃楼，仅能远望，不可近观。但是却要人们顶礼膜拜、山呼万岁，稍有疑问就会被划入另类，或劳改，或劳教。那几年因此而被关押的人成千累万，由此成为监狱里的廉价农奴，再加上束缚在“人民公社”土地上的数亿劳动力供中共驱使。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却每下逾况，乃至六十年代国民经济临近崩溃的边缘。“现代国家不是奴隶能够建成的”（胡适语）有了实际例证。这大概是总路线最大的成果。

附注：

[1] 陈永贵(1915年-1986年)，山西昔阳大寨人。半文盲但向来擅于察言观色投机取巧。日本统治山西时，他是大寨村的维持会会长，并加入过日伪组织“兴亚

会”；国民党统治山西时，他是大寨村村长；1949年以后，他又成了中共大寨党支部书记。六十年代初期，他得到了毛泽东的赏识。从此一步登天，成了红极一时的“农业学大寨”领军人物。被任命为山西省委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文革期间曾有人上书检举陈永贵曾是地道的汉奸，毛阅后，下令将该报告销毁，任何人不准再提及此事。四人帮覆灭后，陈永贵才销声匿迹。

二、三面红旗迎风招展，五股妖风肆虐横行

总路线已经过去了将近六十年，似乎烟消云散了。但对经历过那如痴如狂岁月的人来说，是刻骨铭心的。每每回忆起来，总有不少感慨和沉思。实践证明，它是毛泽东的倒行逆施。由于当局讳疾忌医，至今没有彻底批判。其流毒远未肃清。少数别有用心心的极左分子还在文过饰非，百般掩盖毛泽东的罪恶；还有些人出于“为尊者讳”，避重就轻地把千古荒唐事归咎于毛泽东好大喜功、急于求成，导致的决策失误；一部分心地善良的人们还没有走出被蒙蔽的阴影，认为毛泽东预想的总路线是为了加快中国经济的发展，动机和愿望是好的，只是具体做法违反了经济规律。

我觉得有必要深入讨论，明辨是非。揭露和清算毛泽东动机不良、违天逆理的罪虐。从中汲取教训，方可避免重蹈覆辙。肃清其流毒才能振兴中华。

从近年来披露的许多历史资料来看，毛泽东咬定总路线、发动大跃进，其内在的主要动力是加强对民众的控制与压榨，把世人当做任其驱使的奴隶，建立极权统治，谋求“不世之功”，不仅在中国做“始皇”，还妄图夺取“国际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权”称霸于世界。他痴迷于当地球的酋长。

1953年斯大林去世以后，毛泽东就觊觎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的交椅，他自以为将五六亿人口的中国引入了社会主义集团，功高盖世。中共靠小米加步枪（其实是数百万年轻士兵的血肉之躯）击溃了国民政府八百万军队，取得了政权。在朝鲜战场以劣势武器（更主要的是数十万士兵的牺牲，上百万人的伤残）抵挡了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使得苏联和东欧国家以及亚非拉等地的共产激进分子承认了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地位。但是毛泽东深知“弱国无外交”，五十年代初期，中国的经济技术实力远远落后于苏联和东欧各国，毛泽东知道手里要有足够的钢铁和武器才能使那些国家折服。战争中，他利用穷困的农民，承诺分给他们土地和一部分掠夺来的浮财，使他们为之冲锋陷阵，夺取政权。建国后，他必须寻找一种快速发展经济的方法，以确保其霸主地位。毛泽东蛊惑煽动群众，打仗靠的是人海战术，冒死冲锋陷阵的士兵和推小车、抬担架、做布鞋、送粮草的老百姓。毛泽东缺乏科学知识，也不懂经济，但颇为自信且刚愎自用，一味幻想搞建设不会比打仗更难，只要把群众驱动起来就可以实现他的美梦，充当共产世界霸主。人性中那种狂妄、急躁、专横、权欲、暴戾等等东西恶性膨胀。

1955年9月和12月，毛泽东两次为《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写序言，批判邓子恢等人为小脚女人走路。意欲尽快将分散在农民手里的土地收归国有，进而达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梦境。让全国百姓皆成为“家天下”的驯服工具。

1956年新年伊始，“国有化高潮迅猛发展”。1月15日，北京市长彭真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欣然宣布：“我们的首都已经跑步进入社会主义了！”随后几天，天津、上海等118个大中城市，纷纷宣告资本主义工商业已经全部公私合营，社会主义改造全部完成。也进入了社会主义。

毛泽东签发的《人民日报》1956年元旦社论《为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中提出了“多、快、好、省”等似是而非的、后来成为总路线基本点的欺骗性口号。

随着“多快好省”的提出，1956年各项工作出现了不切实际的冒进倾向。党内出现的这种反常的冒进趋势，当即引起了陈云、周恩来等人的警觉，他们直接掌管经济工作，知道财政、资源、市场等方面还有许多问题，试图对操之过急的妄想加以限制，于是在6月20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由胡乔木拟稿的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社论刊出后还没有来得及行动，就被毛泽东认定为“右倾”。

1956年初，南宁会议期间，毛泽东把这篇社论作为反冒进的材料，做了许多批语，如“庸俗辩证法”，“庸俗马克思主义”，毛泽东用红笔在社论中的“由于缺少深入的调查研究工作，对实际情况了解不够，心中无数，有盲目性，在这种情况下，处理事情当然就容易偏于一面、发生片面性”一段话旁边，划了三道竖线，打了一个问号，又写道：“尖锐地针对我”。毛还在会上拿着这篇社论，念一段，批一段。他说：“这篇社论针对谁？是针对我的《高潮》序言提出批评。于是对周恩来等人耿耿于怀，又一次埋下了日后整他的伏笔。

1957年11月毛泽东访问苏联，克里姆林宫大厅里灯火通明，赫鲁晓夫正在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祝大会上作报告，他的声调高亢而激昂，在宣读了一连串钢铁、煤炭、石油、天然气、电力、水泥、毛织品、皮鞋等产品的计划产量后，他以更高的声音宣称：“我们正处在历史发展的新阶段。我们这里已经为过渡到共产主义建设的更高阶段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创造了一切物质前提和精神前提……现在，当苏联经过四十年的发展在国民经济、科学、技术和文化的提高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并且已经建成了社会主义的时候，共产主义已经不再遥远，共产主义的光辉宏伟的大厦正日益清晰地在全世界各族人民的眼前显现出来……”

听到赫鲁晓夫这些话，全体代表起立，掌声雷动，人人脸上泛着激动不已的红光，一群乌托邦分子似乎真的看到了那座被赫鲁晓夫描绘成金碧辉煌的共产主义大厦。

在全场为赫鲁晓夫鼓掌、欢呼声中，毛泽东坐不住了，来开会就是要争夺领导权的，岂能让赫鲁晓夫出尽风头？他焉能服输？大会休息时，毛泽东在克里姆林宫同英国共产党领导人波立特和高兰谈话。他说：苏联在十五年后，将在某些主要产品的总产量和人均方面超过美国；中国在十五年后将超过英国。我们今年的钢产量是五百二十万吨，第二个五年计划之后将是一千二百万吨，第三个五年计划之后将是两千万到两千五百万吨，第四个五年计划之后将是四千万到四千五百万吨。（笔者注：实际上，第二个五年计划末中国的钢产量仅为667万吨；第三个五年计划末为1779万吨；第四个五年计划末中国的钢产量为2390万吨；1976年为2046万吨；1977年为2374万吨；1978年底从日本新日铁株式会社引进整厂设备与技术建设宝钢，1983年钢铁产量才达到4002万吨。）**历史证明：浮夸虚报，吹牛皮，说大话是毛泽东开的头。“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日后肆虐成灾、屡禁不止的“五风”就是从这儿刮起来的。**（所谓“五风”，中共中央曾以文字明确，是：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干部特殊化风。这“五风”是与“三面红旗”共生的。）

11月18日，在六十四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争强好胜的毛泽东慷慨激昂地向世人宣布：我国今年有了520万吨钢，再过5年，可以有1000万到1500万吨钢，再过5年，可以有2000万到2500万吨钢；再过5年，可以有3500万到4000万吨钢……。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十五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十五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两个共产党的首脑根本不知道钢产量只是工业发展方面的一个指标，还不能表征国家的整体发展水平和民众的生活质量。历史已经证明，赫鲁晓夫、毛泽东全是瞎叫唤。

1957年11月21日，毛泽东从莫斯科回国，越发飘飘然，更加沉醉于他的黄粱美梦[1]。出于维护他的至尊地位，禁绝妄议朝纲，他开始公开批评周恩来、陈云右倾保守。毛泽东亲自审阅批发的一篇《人民日报》社论中首次提出：“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

1958年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元旦社论《乘风破浪》，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在15年左右的时间内，在钢铁和其他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在这以后，还要进一步发展生产力，准备再用二十年到三十年的时间在经济上赶上并且超过美国，以便逐步地由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

1958年1月至4月在杭州、南宁、北京、成都和汉口连续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或中央工作会议上，对1956年的“反冒进”进行了愈来愈激烈的批评。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向周恩来、陈云发出了揶揄式的警告：“右派把你们一抛，抛得跟他们相距不远，大概五十米远……”

1958年5月毛泽东在北京召开“八大”二次会议，连续不断地批反冒进，周恩来、陈云相继作了检讨以后，毛泽东在会上还多次发出要注意“我们党内搞得不好要分裂”的警告，威胁说：假如“有些人不顾大局”，“那就要分裂”，“谁不照顾大局，谁就会跌筋斗”

在这种情况下，在毛泽东独霸朝纲的形势下，面对迅速掀起的“大跃进”运动，党内已经很难发表不同意见了；暴虐反右流毒尚在，知识分子余悸犹存。中国陷入了万马齐喑，朝野噤声的死气沉沉的现实社会。“大跃进”变成了大跃退。

1958年8月4日，徐水县大寺各庄虚岁16的郑德伸看到村里的干部一早就忙碌起来，把一些旧屋子的土坯墙拆掉，用碎土坯把通往县城的土路修得平平整整。他问，这是谁要来啊？村干部说，这回要来个大的！在村里粮食加工厂负责发电和碾磨粮食的郑德伸很快见到了这位大人物。下午4点左右，郑德伸正忙着加工粮食，一大帮穿着蓝衣服的人进了加工厂，站成两排。“裤袋里都鼓鼓的，有枪。”然后，他就看见毛泽东大踏步地出现在自己面前。

这一天，毛泽东在河北省书记处书记解学恭、河北省副省长张明河、保定地委第一书记李悦农和徐水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簇拥下在徐水视察。

随行记者在《人民日报》刊载了如下报道：毛泽东问“今年的麦子收得好吗？”“很好！比哪一年都强。”社主任李江生连忙回答。毛泽东又问：“每亩平均收少斤？”支书阎玉如抢先答道：“七百五十四斤”。毛泽东赞叹地说：“不少啊！”随后又问大秋作物的预计产量；问了社里的，又问全县的。县委书记张国忠告诉主席说：今年全县夏秋两季一共计划要拿到十二亿斤粮食，平均每亩产两千斤。张国忠又说，主要是山药（当地农民对红薯的称谓）高

产，全县共种了春夏山药三十五万亩。毛主席听过以后，不觉睁大了眼睛，笑嘻嘻地看了看屋里的人，说道：“要收那么多粮食呀！”这时候，主席显然是想起了张国忠在路上介绍的本县情况，就伸出手来搬着手指拇，算帐一般地说：“你们夏收才拿到九千多万斤粮食呢！秋季要收十一亿呀！你们全县三十一万多人口，怎么吃得完那么多粮食啊？你们粮食多了怎么办啊？”随后又说“其实粮食多了还是好！”“多了，国家不要，谁也不要，农业社员们自己多吃嘛！一天吃五顿也行嘛！”跟着参观了徐水细菌肥料厂等单位。8月4日、5日，毛泽东视察了河北省的徐水、安国县的农村后，于5日晚11时，来到了河南的新乡。

毛泽东视察后第三天，中央大员争相接踵而至。先是刘少奇下来搞“共产主义试点”，紧接着周恩来、李先念、薄一波、邓子恢，邓小平、谭震林、谭政、刘澜涛、胡乔木、彭真、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陈叔通等都来参观学习，纷纷鼓掌叫好，有的还写诗赞颂，著文讴歌。这些高踞于庙堂之上的肉食者，竟然没有看出土高炉炼出的不能称为铁，亩产吨粮只是画饼难以充饥。一个狂人“指鹿为马”，百官皆喊“绝不是驴”，“千人争喏喏，无人敢愕愕”。这样的政治生态，不酿举国大难才怪哩！

随后徐水掀起了各种各样的“大办风”，光是大学就办了101所。“大辩论”随之兴起，并在农村演变成了绑、打、吊、罚、送劳改等邪恶之风。县委领导干部召开会议讲：“我县建了三个劳改劳教农场，每个农场都需要一千多人，赶快速捕，往农场送。哪个乡完不成任务，劳改党委书记。”那几年全县仅劳教人员即高达7295人。大概这就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特色吧。

8月12日，河北省委书记处召开会议，研究徐水共产主义试点的问题。由中央有关部门七十人和省、地、县一百二十余人组成了徐水县向共产主义过渡规划小组。

8月26日在《徐水报》上公开发表了新《规划》。将奋斗目标规定为：**1959年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并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到1963年即进入伟大的共产主义社会。**

河北徐水县是全国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样板。一时间，人们摩肩接踵地跑到徐水参观。赫鲁晓夫得知这一信息后，连忙派塔斯社记者到那里看个究竟。不看则已，一看则让人目瞪口呆。苏联式的共产主义有土豆和牛肉，还有小家庭和钢琴，而中国的共产主义却是政治挂帅加上窝窝头。于是赫鲁晓夫嘲笑说：“中国共产主义是喝大锅清水汤，苏联是土豆烧牛肉。”气得毛泽东无言以对，耿耿于怀。由此即对赫鲁晓夫开始了破口大骂。

此后的发展就无需赘言了，一群痞子流氓是干不成好事的。曾几何时，徐水农业减产，工业亏损，商店关门，学校停办。县委书记张国忠被戴上了反革命帽子，前前后后被管制劳动二十年，1980年河北省委才撤销了对他的处分。那些头脑发昏叫嚷一天可以吃五顿，搞共产主义试点的人没有站出来承担任何责任。还继续被吹捧为一贯正确，无比英明，高瞻远瞩，洞察秋毫。

1958年9月，毛泽东在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继续大肆吹牛皮，他说：“今年要争取产钢一千一百万吨，比去年翻一番。明年增加两千万，争取三千万吨。后年再搞两千万，不是五千万吗？苦战三年，五千万吨钢。那么，全世界除了苏联和美国，我们就是第三位。苏联去年就五千万，加三年，他可以搞六千万。我们苦战三年，有可能超过五千万，接近苏联，再加两年，到1962年，可能出八千万到一亿吨钢（笔者注：1962年实际完成667万吨），

接近美国（美国 1962 年钢的实际产量为 8920.2 万吨）。第二个五年计划就要接近或赶上美国。再加两年，七年，搞一亿五千万吨，超过美国，变成天下第一。粮食，苦战三年，今年可能是七千到八千亿斤，明年翻一番，就可能是一万五千亿斤。后年就要放低步调了。因为粮食还要找出路。”他不断地做着黄粱美梦，幻想着美梦就要成真呢。这段胡言乱语是有文字记录的，当时的报纸把它当作金科玉律也曾大肆宣传。这样的疯子竟然是泱泱中华的伟大领袖，岂能不祸国殃民？！

1958 年 3 月，中南海收到一份报告，介绍了河南一个县改变落后面貌的事迹。毛泽东看后兴奋不已，欣然命笔，写了一篇《介绍一个合作社》的短文，刊登在 6 月 1 日的《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上，他宣布：“由此看来，我国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毛泽东还对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说：“十年可以赶上英国，再有十年可以赶上美国”，还说：“二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赶上英美是留了五年到七年的余地的”这时毛泽东才 65 岁，权欲熏心地犯了糊涂，不仅飘飘然而且有点昏昏然了。

刘少奇紧随毛泽东，7 月初，他在北京石景山发电厂同工人谈话时说：“现在赶上英国不是十几年。两三年就行了。明年后年就要超过英国。”“十五年超过美国的问题，其实也用不了十五年，七八年就行了。”“中国进入共产主义不要好久，你们大家都可以看到共产主义。”刘少奇追随着毛泽东也说起了昏话。

1958 年 7 月 19 日，刘少奇在天津说：“一个乡一个社”。将来是否叫“社”？“农庄”也包括不了，因为有工业、有学校、有商业、又有民兵，生孩子也有人管，生老病死都在这里，这是共产主义公社。”

1958 年 8 月刘少奇派人到山东寿张县了解高额丰产情况，写回的调查报告中提出了“人有多大胆 地有多高产”的主观唯心口号。刘少奇极力推崇。

1958 年 9 月 10 日至 11 日刘少奇到河北徐水视察，当他听到有人说，给山药灌狗肉汤亩产可以收 120 万斤时，即说道“那么作真有效果吗。哈哈，你们可以养狗啊，狗很容易繁殖嘛”。

刘少奇很赞赏密植，看过一些密植作物，他说：“你们这里种大畦子的方法不错，只要畦跟畦之间留个小垅道，能进去人就行。要锄草、间苗的话可以作个寸把宽的小锄，也可以用镊子夹。”（笔者注：“灌狗肉汤可以提高红薯产量”“用镊子除草”这样的混账话，只有中共要员才说得出来）。

1958 年 9 月 19 日到 28 日刘少奇到江苏常熟县视察，参观中稻丰产实验田时，和平人民公社党委书记告诉他一亩田可以打一万斤。刘少奇笑着说“一万斤还能再多嘛。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

刘少奇一再赞扬各地从公社里组织大批“远征队”上山采矿的做法。他说：“现在各地方炼钢铁、采矿石、修水利都是采取大搞群众运动的办法，各人自带工具、自备粮食，或者实行粮食供给制或者半供给半工资制，这办法很好，一个钢铁基地就集中了几千几万人，这是一种共产主义精神，是新的劳动工资制度的萌芽，它给我们今后新办工厂的劳动制度开辟了一个崭新的道路。”刘少奇这段话不仅助长了各地的瞎指挥，还对劳动制度的改革进行了误导。

9 月 27 日，他在南京向党员干部讲话时说：“江苏省有 300 多万人炼钢铁，大多是从农村调去的。他们搭起棚子就干，情绪很高，不扯皮、不闹待遇，

也不闹什么劳动保险，什么工资太少。江苏省只有 50 万产业工人 现在炼钢铁的就有 300 万。哪个大呢？是 300 万大吧。这就为我们创造了一种新的劳动制度。炼钢铁可以这么做，是不是开纱厂也可以这么做。比如。这个纱厂要两千名工人 请你们哪两个县调两千工人，那么机械厂是不是可以这样做呢。共产主义劳动是没有报酬的，因为你横竖有饭吃，各取所需，不需要另一个报酬，而且是没有定额的”。

这里罗列刘少奇一系列煽惑“五风”的谬论，不是把“五风”的起因归咎于刘少奇。而是说，中共高层人物中的多数都把毛泽东的痴人呓语当做了金口玉言。只能无知地跟着吹捧，不敢有丝毫妄议。刘少奇跟得最紧，下场也最惨。报应！

屡试不第的没落文人洪秀全没有读过《圣经》，仅凭基督徒梁发编写的《劝世良言》一书[2]，即逢人便宣传他所理解的基督教教义，称之为“拜上帝教”。自称是上帝的二儿子，耶稣的弟弟。自命为“天王”。利用人们的愚昧，居然当了十几年沉迷于酒色的皇上。

中共有两位号称马列主义水平最高的权威、没认真读过《资本论》，只念过几遍《共产党宣言》，看过两遍《哥达纲领批判》。就故弄玄虚地四处叫喊，连续放出无知妄说般的豪言壮语。造成的后果就是举国上下大话、空话、谎话风靡无忌，浮夸、虚报、捏造泛滥成灾，强迫、恐怖、暴力肆意横行。最终是欺骗众人又被下属欺骗。祸国殃民。

在这方面，最“经典”的当属农业的“高产卫星”。

1958 年 6 月 8 日，《河南日报》报道：遂平县卫星农业社亩产小麦 2105 斤，这是全国第一个“高产卫星”，新华社广播后在全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出现了全国“卫星”竞相争放的局面。据当时的党报登载：6 月 11 日河北魏县 2394 斤；6 月 12 日河南遂平 3530 斤；6 月 16 日湖北谷城 4353 斤；6 月 18 日河南商丘 4412 斤；6 月 21 日河南辉县 4535 斤；6 月 23 日湖北谷城 4689 斤；6 月 30 日河北安国 5103 斤。一个赛一个“高产”。都得到了毛泽东、刘少奇等混蛋的夸赞。

1958 年 6 月底，国家统计局在保定召开全国统计工作现场会，提出统计工作必须“为政治服务”的方针，“卫星”就放得更大了。以下都是党的喉舌《人民日报》发布的信息：

7 月 23 日，河南西平县和平农业社小麦亩产 7320 斤。

9 月 22 日，青海省楚什克农场小麦亩产 8585 斤，这是小麦的最高亩产量。

8 月 13 日，湖北麻城溪河乡建国第一农业社亩产早稻 36956 斤。

8 月 22 日，安徽繁昌县峨山乡东方红三社亩产中稻 43075.9 斤。

8 月 30 日，湖北应城百湖乡长春社亩产中稻 43869 斤。

9 月 1 日，湖北麻城熊家沟乡建新六社亩产中稻 52599 斤。

9 月 5 日，广东蒲县星子乡田北社亩产中稻 60435 斤。

9 月 18 日，四川郫县友爱乡第九农业社亩产中稻 82525 斤。

9 月 18 日，广西环江红旗人民公社亩产中稻 130434 斤 10 两 4 钱。（中国市斤，十六两为一斤，所以还有十两四钱的小数）。这是水稻的最高亩产量。

这些高产卫星是怎样放出来的？我们解剖两个卫星就知其余了。

河南信阳鸡公山公社的水稻，8 月下旬基本成熟。公社党委连续开会，研究如何放出水稻高产卫星。公社党委认为，能否放出水稻高产卫星，不仅

取决于党委的决心，而且也取决于党委一班人的统一认识和统一口径（所谓统一认识、统一口径，就是对弄虚作假不能有任何怀疑，上级公布后不能说三道四）。共同欺骗中央、欺骗群众、欺骗舆论。这作为全体委员必须遵守的政治纪律。放水稻高产卫星，必须要内定一个标准，经过党委研究确定，不能低于四万五千斤。28日晚，公社党委在新集大队召开放水稻高产卫星动员大会。免不了一顿划拳行令、酒肉吃喝。公社书记要求参加放卫星的全体社员，要统一组织，听从社队干部指挥，不该问的绝对不问，不该讲的绝对不讲，有说三道四者按右倾论处。29日早晨六时许，二百零五名社员，在社队干部的组织下开始收割水稻。30日下午，六亩六分三厘试验田及其周围总共四百三十多亩水稻都集中统一堆放在十三个打谷场中，日夜突击打场，9月1日中午十二点打收结束。然后过秤计算产量。过秤结果共打稻谷三十二万四千三百七十五斤五两。这本是四百三十六亩的产量，鸡公山公社党委将其认定为六亩六分三厘试验田的产量， $(324375.5 \text{ 斤} \div 6.63 \text{ 亩} = 48925 \text{ 斤/亩})$ ，得出亩产48925斤的卫星记录。迅速敲锣打鼓向县委报喜；然后，县委报地委，地委报省委，省委报中央，中央登报广播，宣布“卫星”上天了。

《人民日报》1958年9月18日报道的最大一颗水稻“卫星”又是怎么来的呢？

原来，在看到湖北麻城县建国一社创早稻每亩36956斤的亩产纪录后，广西环江县委也决心放出一颗更大的“卫星”，地委有一位领导亲临指导，他透露信息说：“湖北亩产3万多斤的卫星是移栽来的，那天全社动员4个生产队的劳动力，将另外8亩稻田的禾苗连根带泥拔出，用门板或梯子抬着，运到这块试验田中，移栽在一起。由于移并过来的禾苗太多，密不透风，据说把鸡蛋随便地放在禾苗上面滚动也不会掉下去。现在形势发展很快，要想创造全国卫星，一亩没有10万斤恐怕放不出去。”（摘自：“大跃进粮食卫星出笼前后”，2006年3月民主与法制时报，罗平汉，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教授，现为博士生导师）。

有了可贵的情报，环江制定了放“卫星”的具体实施方案，并选择城关农业社的一块面积为1.13亩的试验田作为“卫星”田，让社员先将田里的禾苗全部拔出，接着，组织社员、干部和中小学教师共计近千人，从两个大队100多亩中稻田中，选出长势最好且已成熟的禾苗，连苗带泥移并到试验田里。这年9月初，环江县委向柳州地委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报喜说，将要发射一颗亩产超过10万斤的中稻“卫星”。自治区十分重视，第一书记韦国清亲自布置。特地向各新闻单位和有关电影制片厂发出邀请，请其进行现场采访，还组织了一些部门的干部以及广西农学院、广西大学等科研院所的教授、专家，组成了验收团进行现场验收。于是，又一颗亩产稻谷130434斤的高产卫星飞向了天空。

这些浮夸上来的产量不但令中国有些人浑然陶醉，也蒙骗了国际友人，捷克斯洛伐克和一直被农业问题困扰的前苏联等国家纷纷来函，询问中国采用了何等先进技术，把产量提得如此之高，并希望派专家帮他们提高农作物产量。原苏联闻听说中国已经进入共产主义了，曾派米高扬带队来中国考察。我不知道后来中国如何回答的，也不知道这些国家从此以后还相不相信中国的报道？

应该指出，如果把浮夸、虚报产量的责任统归于基层的生产队，公社，那也有失偏颇。这样的产量是一层一层压下来的，从毛泽东开始，一级压一

级。有的上级领导坐镇生产队，逼着生产队报出放卫星的产量，不报不撤离。至于这样的产量是否真实，那是另一回事了。真正说实话，关心国家命运的人早已被打成右派分子或关在监狱里，被剥夺了话语权。

1958年8月25日，农业部党组报告：1958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超过八千亿斤。

9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有所保留地宣布：1958年粮食产量将达到六千亿斤到七千亿斤，比上年增长60~90%；棉花产量七千万担，比上年增长一倍以上。

9月5日，毛泽东在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说：“几亿劳动群众，工人农民，他们现在感觉得心里舒畅，搞大跃进。这就是整风反右的结果。……今年大概可以差不多增产一倍（粮食），即有可能从去年三千七百亿斤，增到七千几百亿斤。棉花，去年是三千三百万担，今年大概有七千万担，可以超过一倍。烟叶可以超过三、四倍。只有油料只超过半倍，还是不足的。麻类作物过去没有注意，没有抓紧。钢铁可能翻一番。……今年如果搞到七千多亿斤粮食，明年如果又翻一番，就是一万五千亿斤。明年也许不能搞这么多，太搞多了，除了人吃马喂之外，现在还没有找到用途，也许会发生问题。但是明年总是可能超过一万亿斤。”

谎话说多了，说谎的人自己也信以为真了，毛泽东甚至为粮食多了没地方存放而担忧。而且谁要不信，就被认为是攻击三面红旗，那几年因此被判处徒刑的人不计其数。

我的罪状上赫然列在第一条的“反动言论”就是恶毒攻击“三面红旗下面执行过左”（仅仅说下面执行过左，还没说上面决策错误，就被判刑十五年。这张盖着大红印章的罪状至今仍保存在案。我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公诸于世。）

1958年9月，中共掌控的媒体向全世界发布了相关信息并报道了毛泽东的讲话。一言出口，驷马难追。人们都关注着中国的大跃进。然而，秋收一过就发现，根本没有这么多粮食。武昌会议（1958年11月21日至27日）假戏真唱。毛泽东决心按各省虚报的产量跟他的第一书记们要粮食（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过“**准备八年之内，国家不增加购粮数目，增产不增购**”。才隔了一年就不作数了，言而无信，恬不知耻。）。于是，省委书记逼地委书记，地委书记逼县委书记，县委书记逼公社书记，公社书记逼生产队长，交不出高指标的粮食来，就说他们伙同农民瞒产私分了。于是大会批斗、挨户抄家、捆绑吊打、翻缸倒柜，把农民的口粮和种子搜了个精光。再加上扩大外援、多出口粮食换黄金，用以购买核技术。由此导致大饥荒，活活饿死数千万民众。

作为典型实例，一位多年在驻马店行署和宣传部门工作的作家康健，他根据自己七年的实地采访，写成《辉煌的幻灭——人民公社警示录》一书，对河南南部大跃进历史事实、当事人采访实录等均有详尽生动的记载（1998年4月三次印刷，发行50100册，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发行）。

1959年秋天，《人民日报》继续连篇累牍地报道秋粮大丰收的消息：说江西取得了“亘古未有的大丰收”，农民“生活显著上升”；河北“粮食超产一、二成”；贵州“玉米大面积丰收”；青海“增产一成到二成以上”；山东、安徽、江苏“齐报秋粮丰收”。1960年夏天依然报道《从长江到黄河流域，揭开了农业大丰收的序幕》。接着又说：人民公社已使我国农民永远摆脱了那种每遭自然灾害必然有成百万、成千万人饥饿、逃荒和死亡的历史命运。

仅仅过了三个月，一贯谎话连篇的《人民日报》突然在 1960 年国庆社论中宣布：“两年来，全国大部分地区连续遭受严重自然灾害。”当时我在成都四川磨床厂因被认定为右派分子而劳动教养。整天饿着肚子，水肿病缠身，强打着精神从事设计绘图和理化检验工作。从社论中意识到吹了几年的大肥皂泡破了，中共终于承认粮食减产了，但还是没说真话，把减产的原因推给了老天。后因情况未见好转，又把口号变成“三年自然灾害”，再变成“连续三年特大自然灾害”。“百年未有的严重自然灾害”等等谎言，继续蒙骗民众。

1961 年 1 月 14 日，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主持。

经过一番铺垫以后，中共中央发布八届九中全会公报宣称：“在 1959 年的严重的自然灾害之后，1960 年又遭到百年未有的严重自然灾害。”中共中央全会认定的，谁还敢反对？这是“连续三年特大自然灾害”之说无需气象资料佐证，只消《人民日报》、中央广播电台多发消息，而广泛流行的原因。直到毛泽东死了以后，中共中央召开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取消了“连续三年特大自然灾害”的提法，改称“三年困难时期”。至于自然灾害，党说有就有，党说没有就没有。反正是空话连篇、谎言无数。来无影去无踪，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笔者注：中国幅员辽阔，年年都会有旱涝风霜以及其它大小不等的自然灾害。中华五千年文明史就是炎黄子孙与天灾人祸的奋斗史。专业学者查阅两千余年的气象记录发现，1959—1962 年我国绝大多数地区基本上属于风调雨顺，并无特大自然灾害）[3]。

我翻阅了那几年的元旦社论，让我们看看《人民日报》是怎么报道的吧。

1954 年元旦社论：去年的农业生产，虽然因为部分地区受灾，没有完成增产的计划；我国粮食的总产量与一九五二年相比，还是不相上下。

1955 年元旦社论：虽然去年我国遭遇到近百年未有的洪水，但是全国的粮食总产量仍然比前年增加了百分之三左右。

1956 年元旦社论：第一个五年计划将被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

1957 年元旦社论：1956 年的粮食产量比 1955 年增加了二百多亿斤。

1958 年元旦社论：1957 年粮食产量仍比 1956 年增产，达到三千七百亿斤，比 1952 年增加了六百一十多亿斤；

1959 年元旦社论：“农业战线上，粮食将达到七千五百亿斤左右，比 1957 年增加一倍以上。

1960 年元旦社论：1959 年，农业生产，就全国说来，仍然得到了比 1958 年更大的丰收。农业总产值显著地超额完成了国家的计划。（笔者注：从 1960 年起《人民日报》奉上级指示不报具体数字了，社论与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公报直接抵触，究竟孰是孰非？何者为真呢？）

1961 年元旦社论：1960 年的农业生产计划和依靠农业供给原料的轻工业生产计划都没有能够完成。

1962 年元旦社论：1961 年我国人民所取得的最重要的成就是战胜了连续第三年的严重自然灾害，在粮食方面得到了较 1960 年为好的收成。

1963 年元旦社论：1962 年取得了比 1961 年好的中上年景的农业收成。

仔细看以上元旦社论，只有 1961 年说 1960 年没有完成计划（并没有明确是否严重减产）。其余各年都是增产的。真实情况如何？读者和笔者心知肚明。

法西斯魔头希特勒曾说过：“利用报纸，可以使人民视地狱为天堂。”希

特勒的密友、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说过：“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这是执政党的成功呢？还是执政党的堕落呢？看来极权统治的共性是**暴力和谎言**。暴力和谎言可能维稳一时，但终究是灭亡前的垂死挣扎。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也

附注：

[1]青年卢生，旅途经过邯郸，住在一家客店里。道人吕洞宾也住在这家客店里，卢生同吕翁谈话之间，连连怨叹自己穷困的境况。吕翁便从行李中取出一个枕头来，对卢生说：“你枕着这个枕头睡，就可以获得荣华富贵。”这时，店主人正在煮饭（黄色的小米饭），离开饭时间尚早，卢生就枕着这个枕头，先睡一会。不想一躺下去立刻做起梦来。在梦里，他娶了清河崔府里一位高贵而美丽的小姐，生活阔绰，十分体面。第二年，又考中“进士”，后来步步高升，做官一直做到“节度使”，“御史大夫”，还当了十年“宰相”，后来以受封为“燕国公”。五个儿子，都和名门望族对了亲，而且也都做了大官：一共有十几个孙子，个个都聪明出众。真是子孙满堂，福祿齐全。他一直活到八十多岁才寿终正寝。梦一结束，他也就醒来了。这时，他才发觉店主人煮的黄粱饭还没有熟呢。

[2]《劝世良言》是基督教新教派最早的中文布道书。由中国传教士梁发著于1832年（道光十二年）。全书共9卷，约9万字，书中多半集《圣经》章节结合中国人情风俗，借用某些儒家言论，阐发基督新教基本教义，曾在广州付印刊行。

[3]公元前17世纪至公元前11世纪，在我国商代，由畜牧业为主逐渐转变为以农业生产为主，就出现了最简单的气象记录。1936年在殷朝古都（今河南省安阳县）发掘出一些甲骨，上面有这样的记载：“壬申雪，止雨酉昼；己卯雹，乙酉大雨”等。这些记载，说明了一些雨雪的起止日期。从中可见我国在三千多年前就注意天气的变化。这可算是世界上最早的气象记录了。

自汉代以来，我国古代史书和地方志上，对大旱、洪涝、霜雪、冰雹等等都有记录。我们的祖先，不仅注意表象观察，而且力求探索其内部规律，公元前即可以作出一些短期的天气预报。

三、连续三年特大自然灾害是怎么来的？

这场“自然灾害”在很多方面可以说创造了前无古人、可能也是后无来者的记录，让中国人至今仍闻之色变，心有余悸。这场“自然灾害”的严重性和奇特性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持续时间之长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上绝无仅有。历时三年有余，自从人类有明确的历史记录以来，未曾出现过持续时间如此之长的自然灾害。中共当局一会儿称之为连续三年，一会儿又呼之曰百年未遇。既然是百年未遇，怎么那三年竟年年相遇呢？

2、波及范围之广也是绝无仅有。

1929-1930年北方八省曾遭受过严重的旱涝之灾。《宝鸡县志》记载：“民国十七年宝鸡亢旱十二个月，禾苗尽死，夏秋无收，粮价腾飞，人曾相食。”“民国十八年，天大旱，全年无雨，渭水涸竭，壮者外逃求生，弱者坐以待毙，乞讨者甚多，饿殍遍野。”《岐山县志》记载：“无麦无禾，山童赤地，草根树皮掘食已尽，十室九空。斗麦从四五角钱猛增至二十元（银元）。宝鸡岐山、扶风、千阳、陇县和麟游县更是赤野千里，青草全无，苗尽枯槁，饥民盈野，饿殍载道。”《同官（今铜川）县志》的“合作救济志”一章，记载有

“民国十七年，自夏至冬不雨。十八年，旱灾，大饥，斗粟七元余，人食树皮树根殆尽，死者无算。大灾之后必有大疫。西府地区爆发了“真性霍乱”。官方统计，西府五县感染患病者共计 20194 人，死亡 12861 人。其中岐山病死 130 人，麟游县病死 89 人，凤翔县病死 6740 人，眉县病死 1189 人，陇县病死 4713 人。

据民国十九年底统计，这场以两年大旱为主，伴随着风灾、雹灾、虫灾、瘟疫、水灾、火灾、兵匪之灾的大饥荒。使陕西全境 92 县悉数蒙难，八百里秦川赤野千里、尸骨遍地，大饥荒两年有余，导致北方八省 1300 多万人死亡。

中共掌权后的 1958-1962 年则被称为 960 万平方公里全部受灾，从东北松江平原到岭南琼崖海岛、从新疆喀什到浙江舟山无一幸免。巍巍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从未出现过波及范围如此之广的自然灾害。放到整个世界，能与之相比的大概只有第四纪冰川。那场自然灾害波及了整个地球。

3、死亡人数之多骇人听闻。从猿进化成人以来，到这次灾害之前，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自然灾害，可能是发生在 1556 年 1 月 23 日（明嘉靖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的陕西华阴大地震。据各州府县志记载，死亡了 83 万人。但和这次相比无疑是小巫见大巫。这次“自然灾害”的死亡人数很有可能超过了人类有史以来在自然灾害中死亡人数的总和。据史书记载，从盘古开天、三皇五帝到 1949 年中共上台执政之前的 2129 年中，共发生 203 次死亡万人以上的重大气候灾害，累计死亡 2992 万多人。（《大自然探索》1984 年第十期，陈玉琼，高建国《中国历史上一万人以上的重大气候灾害的时间特征》）

1958-1962 年死了多少人呢？众说纷纭，容后文详述。

4、灾害细节扑朔迷离，到底是水灾、旱灾、蝗虫、飓风？还是山崩、地裂、海啸、泥石流？抑或是太阳活动异常、宇宙射线爆发、彗星撞击地球？至今没有明确的定论。可能是因为有太多的人在那场灾害中死去，幸存下来的人要么年龄太小记不清往事，要么被饿得精神失常、脑力损伤。导致今天的人们对那场灾害的调查困难重重。灾害发生后不过几十年，关于这场灾害的详情就神秘地消失了，各类历史典籍不见翔实记载，只留下少数人残留在脑海中的模糊记忆。一场死亡数千万人的大饥荒，短短几十年后便几乎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得无影无踪，这在整个人类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三面红旗猎猎之际，毛泽东美梦正酣，眼睛还没睁开，诗兴勃然骤起，不禁吟道“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似乎丰收在望，不免喜形于色。他半躺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内宽大的硬木床上，喷云吐雾，静待佳音。孰料传来的竟然是大饥荒消息。不由得坐起身来，正在怒气丛生一筹莫展之际，河南省最早向中央报告，“连续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因吃了不干净的食物和不注意卫生，造成一些地方发生了死人情况”。毛泽东灵机一动，立即将此件批转全国。心领神会而又急于推卸责任的各省委连呼“妙哉、妙哉”。正好以此为范本，在上报材料时纷纷效仿，可找到了死人的缘由，通通推之于天灾。任凭法院判决老天爷去吧，判处无期徒刑地球和月亮照样转，只要不落在自己头上就行。

斯时，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共又一次“拯救民众”了；随之，全国各省、地、县纷纷成立“防病治病领导小组”“防灾抗灾办公室”同时，“严重自然灾害”“连续三年特大自然灾害”“百年未有的严重自然灾害”等提法鼓噪一时，家喻户晓。于是，罪魁祸首变成了救民众于饥馑的英雄了！历史的逻辑竟然如此不堪！

然而世界上总有一些认真的人对此类宣传持怀疑态度。大约是 1961 年，成都通惠门四川磨床厂一位农民出身、初中文化的车工赵 XX，将一把小麦种子撒在厂区内尚未拆除的城墙废墟上，既未浇水也未施肥，任其自生自灭。来年端午前竟然收获了半脸盆小麦。老赵欣喜之余说了句“这就是自然灾害！”。为此老赵被延长劳动教养两年，其罪名据说是攻击了三面红旗。

1966 年以后，我从成都转移到原西康省蛮荒腹地的深山老林，问及当地农民那三年是怎么过的，有的说“过苦日子”有的说“过粮食关”有的说“年成不好”有的说“别提了”“140 多人的生产队经过那三年以后，剩了不到 80 人”，多数上了年纪的老百姓叫“过汤汤关”，即“没有馍，光喝汤”。倒是比较形象。

海外一些学者则称之为三年大饥荒，西方学者称其为大跃进饥荒。

中共当局迄今未能提供确凿的原始天气数据证明连续三年全国发生了严峻的自然灾害，而更多的证据表明，那三年没有大规模的自然灾害。从气象资料看，自古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那三年仍属风调雨顺。之所以沦为饥荒最为严重的省份，在于错误的分配政策，严重破坏了农业生产，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量粮食被中央强令外调，而本省留存粮食尚不足四川省总产出的 10%，蜀中百姓遭此荼毒，谁之罪耶？下面的表格或可见一斑。

四川省历年稻谷产量、征购及农业人口占有量

年度	产量(万吨)	征购量(万吨)	占产量%	农业人口	人均(公斤)
1953 年	1143.0	448.8	39.3	5,839.0	119
1954 年	1225.5	534.8	43.6	5,894.3	117
1955 年	1189.0	463.7	39.0	6,008.9	121
1956 年	1316.5	464.7	35.3	6,096.1	140
1957 年	1256.0	528.4	42.1	6,188.5	116
1958 年	1209.5	543.1	44.9	6,038.6	110
1959 年	822.0	576.0	70.1	5,814.2	42
1960 年	632.0	418.2	66.2	5,552.3	38
1961 年	576.5	321.3	55.7	5,487.4	46

说明：表中数据为原粮，即尚未加工成大米的稻谷。

农村人口人均占有量 = (产量 - 征购量) ÷ 农业人口。

资料来源：《四川省情》第 561 页；《四川省志·农业志》表 1-2、3-4。

面对亘古少见的大饥荒，国内外一些认真的学者偏要刨根问底，以严谨的科学态度探讨其真正原因，以绝后患。他们查阅大量气象资料后发现：那三年，中国个别地区确有程度不同的水、旱、风、雹之害。但从整体来看 1959-1961 年中国大部分地区是难得的“风调雨顺”之年。一些学者研究气象日志后指出：中国大陆拥有 960 万平方公里的陆地国土面积，跨越亚寒带、温带、亚热带、热带等几个气候带，自然条件多样化，正常情况下自然灾害只可能是局部性和暂时性的，发生连续三年的、全国性灾害的可能性几乎没有，有文字记载的中国两千多年历史也从未发生过全国性的遍及各个角落的长期自然灾害。“连续三年特大自然灾害”根本不可能。没有可靠的气象记录作依据的论断，是不可信的，是难于成立的。由此，“连续三年特大自然灾害”

“百年未有的严重自然灾害”等提法才略微降低了些调门。

随后，“苏修逼债”“苏修卡我们脖子”“苏修比着箍箍买鸡蛋”等风声四起。众所周知，国际间的贸易对于货物数量、质量、交货时间、地点以及验

收标准、检验方法，付款方式等均有毫不含糊的严格规定。不是任何一方可以擅自更改的。所谓“比着箍箍买鸡蛋”纯属无稽之谈。

六十年代初，毛泽东挑起中苏大论战，以咄咄逼人之势发表《九评》，中苏两党相互攻击，关系恶化。1969年，双方在黑龙江的珍宝岛和新疆的铁列克提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矛盾达到高潮。1969年9月，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参加越南领导人胡志明的葬礼后路过北京，和周恩来等在北京机场秘密会晤，双方多有让步，紧张局势才得到缓解。

1960年7月16日，苏联以中国不信任苏联专家、不尊重苏联专家建议，以及向苏联专家散发反苏文章为由，照会中国政府，决定召回全部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毛泽东即于当月18日在北戴河会议上大谈自力更生问题。并指示周恩来算一下要多少年才能还清苏联债务。周恩来把帐算出来说，中国欠苏联80亿卢布，过去我们每年还5亿，照此计算需16年才能还清。如果按每年还8亿计算，也要10年才能还清。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说：10年太长了，要勒紧裤腰带，争取五年内把债务还清。于是政治局决定，各省成立外贸小组，挤出东西来还债。[见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1999年版，第335—338页]

据当年主管财政的副总理李先念在《关于1961年和1962年国家决算的报告》中所列举的数字，中国尚欠苏联的外债和利息共计57.43亿元人民币。这个数目与中国每年600亿元的财政支出相比，只是一个不大的额度，完全不可能造成巨大的经济困难

美国也曾主动提出不带有任何政治条件的粮食援助。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侯锐教授在《试论肯尼迪时期美国针对中国自然灾害的政策调整》一文中称，“1961年1月25日，肯尼迪就职后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当有记者问及粮食问题时他表示：中共最近还在出口食品，因此不必向其提供粮食，但是接着又说美国关心世界任何地方的饥谨，如果既存在对食品的需要也有这样的请求，那么‘不管其来自何方，美国都会乐于给予考虑’肯尼迪曾表示，基于人道主义原则，向中国出口500万吨小麦，可以缓期付款。毛泽东表示中国没有饥荒，未予置理。3月4日，美国政府给驻波兰大使馆发电文，直接对会谈大使比姆做出指示：“如果王炳南方面真有对食品的紧急请求和需要，那么美国会乐于考虑答应其需求；要是人民的生活受到了影响，美国将纯粹从人道主义立场给予尽可能的帮助”。美国方面的援助，被王炳南以中国不要“施舍”、“不会拿原则去做交易”为理由拒绝。在1961年8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向毛泽东提出，可否通过当时同中国关系比较密切的法国转口购买美国粮食，毛泽东表示可以。不久后，美国粮食也通过转口进入中国。毛泽东出于掩盖他的胡作非为给中国带来的灾难。在所谓“自然灾害”时期，非但不接受外国援助，反而大量输出粮食。根据外交部解密档案，1960年4月，以政府名义，无偿赠送几内亚大米1万吨。除对几内亚的援助外，1960年还有15000吨小麦支援阿尔巴尼亚。1961年8月，老挝来函要求支援稻种。中国也决定援助15吨。张戎在《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一书中指出，中国的粮食出口仅1958、1959两年就高达700万吨，可以为3800万人每天提供八百四十热卡。这还不包括肉类、食油、蛋品等大量的出口。

逼债，关键是一个逼字。苏联武力强大，毋庸置疑。苏联的军方发出过武力威胁吗？外交或是政府的其它部门发出过类似的通牒吗？找不到记载。苏联是否用过商业手段逼债，没有记录。所有提到苏联逼债的文章和书籍，都

是中国人自己编的,铺天盖地,汗牛充栋,可就是找不到任何逼债的具体行为和过程。所谓“逼债”唯一能找到的出处是,1960年12月17日,苏联外贸部部长帕托利切夫约见中国驻苏大使刘晓,指责中国方面未与苏联协商,就单方面把贸易欠债偿还期限确定为五年,并以中方违约为由,表示短期内不再向中国提供汽油。不过,苏共高层不支持帕托利切夫的做法,此事很快得到化解,帕托利切夫再也没有提及该事,紧张关系很快缓和。

近年来,倒是有一些与逼债相反的记录逐渐浮出水面,摘抄部分如下:当中国发生大量饿死人的惨剧以后,苏联政府和赫鲁晓夫闻讯以后,马上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立即援助中国。当赫鲁晓夫兴冲冲地让苏联驻中国大使向周恩来沟通,准备就援助中国事宜与中国协商。周恩来与苏联驻中国大使谈话以后,马上向毛汇报,但是,被毛一口回绝。毛说什么**“哪怕把全中国人都饿死也不要赫秃子的一粒粮食,中国党和政府是有志气的。我们不但不要苏联的援助,而且还要把欠苏联的债提前还清”**。中国大饥荒日益严重之时,1961年2月27日,赫鲁晓夫再次致函毛泽东,提出鉴于中国发生食品供应方面的困难,苏联愿意以贷款的形式向中国提供100万吨粮食和50万吨古巴糖,并且表示10亿卢布的贸易逆差可以分5年偿还,不计利息。还提出可以应中国政府要求重新派遣专家。这分明是善意的表示,面对三面红旗遭遇惨败而恼羞成怒的毛泽东,记恨赫鲁晓夫对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批评,不顾大饥荒和大量死人的严峻现实,意气用事,对赫鲁晓夫的善意断然拒绝。后经周恩来和陈云协调,从苏联接受了数十万吨粮食,以解东北地区极度缺粮的燃眉之急。并经由苏联进口了大量古巴糖和伊拉克蜜枣,缓解了部分饥荒,年纪大一点的人多半都看见过或者吃过土黄色的古巴粗糖和绵软的伊拉克蜜枣。

1961年4月8日中苏双方签署并公开发表了《中苏贸易会谈公报》。明文记载着:**“对于中国因农业遭灾而在1960年贸易业务中产生的对苏联欠帐问题。苏联方面表示充分谅解,并向中国政府提出,上述欠帐在五年内分期偿还,不计利息。苏联还建议,在今年8月底以前以借用的方式供应中国五十万吨糖,以后在1964-1967年期间归还,不计利息。中国方面以感激的心情接受了这一建议。”**该公报当时曾刊载于《人民日报》以及国内各省市报纸。

此公报在中国报纸上刊出后,苏联逼债的谎言才渐渐消声。长期以来中共在老百姓中散布苏修逼债,中共为什么不拿出逼债的证据或苏联索要债务的信函宣示一二呢?

“苏联修正主义”“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等,都是“伟大领袖”制造民族矛盾,用以掩盖国内危机、转移民众视线的手段而已。

“连续三年特大自然灾害”“苏联逼债”成为推卸1960~1962年大饥荒责任的理由,成为向全国人民推诿造成苦日子原因的无奈解释!

直到1980年后,中共中央才悄悄取消“连续三年特大自然灾害”的提法,改称“三年困难时期”。

五十年前的大饥荒对中国影响巨大。多难兴邦,殷忧启圣。

太史公司马迁有曰“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问世。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一个政党一个国家乃至一个公民只有认真去反思过去的问题和错误，才能取得进步。

越王勾践兵败于吴王夫差之后，卧薪尝胆，励精图治，重用贤臣。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终于雪了会稽之耻。

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毫不讳言地说，“我看到路上有 5 个饿殍，倒在田坎旁边，倒在桥下和路边，我亲眼看见啊，那很凄惨！”他之所以苦心孤诣地寻求水稻高产之路，就是深受那场惨绝人寰的饥荒刺激。立志为国家增产粮食。

那场政治饥荒的万般悲苦催人泪下。在中国造就了不少文笔犀利、鞭辟入里的作家，阎连科、刘震云、莫言、贾平凹等无不是为了能摆脱饥饿才走上写作之路，终于写出了《受活》《四书》；《温故一九四二》《一句顶一万句》；《红高粱》《檀香刑》；《废都》《浮躁》等传世名作。

然而，某些当局人士至今仍执迷不悟，终日沉迷于“太平盛世、歌舞升平”的梦境中。继续用谎言和空话蒙蔽民众。我禁不住要高呼，善良的兄弟姐妹醒醒吧，炎黄子孙当奋起，振兴华夏在今朝。

那几年究竟死了多少人？

前面谈及 1958-1962 年死了多少人时，笔者故意留了一个悬念，不是卖关子。实在是说来话长。

改革开放前，中共一直严格保密那几年的人口变动情况。

1983 年，国家统计局报经国务院批准，才在这年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中，第一次向国内外公布了 1949 到 1982 年户口登记的每个年度的人口数字。透露了 1960 年人口总数比上年净减 1000 万人的消息。

1991 年 8 月末，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胡绳主编、邓小平题写书名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出版，该书以无可争议的权威性指出：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左”倾错误的一再发展……1959 年的粮食产量比 1958 年实际产量减少 600 亿斤，当年征购粮食反比上年增加 173 亿斤，达到 1348 亿斤，超过实际产量的三分之一。

1960 年粮食产量进一步降为 2870 亿斤，比 1959 年又减少了 530 亿斤，跌落到 1951 年的水平。1960 年同 1957 年相比，城乡人民平均粮食消费量减少了 99.4%。

许多地区因食物营养不足而相当普遍地发生浮肿病，不少省份农村人口死亡增加、由于出生率大幅度大面积降低，死亡率显著增高，据正式统计 1960 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 1000 万。（见该书第 368 至 369 页）。

官方数据的公布，引发了中外民间学者对大跃进正常死亡人数的研究，比较公认的数字是 3000 万以上。

历史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曹树基的研究成果《大饥荒：1959-1961 年的中国人口》，原刊于《中国人口科学》2005 年第一期，后由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于 2005 年出版，这个研究成果是以省县地方志关于人口变动的统计为基础的，作者自述引用地方志 1050 种，立论客观，数据扎实，接近真实地反映了三年大跃进全国饿死人的情况。

曹树基先生的贡献是把三年大跃进饿死人的问题由估计推算阶段推进到统计计算阶段，他的分省列表数字建立在对 1462 个县统计资料“认真求证”的基础上，这就向全面揭开三年大跃进饿死人的真相前进了关键性的一步。

数据表明，四年大跃进中，全国非正常死亡人口合计约 3245.8 万人。全国各灾区省（不包括内蒙古、新疆和西藏）非正常死亡人口占各省灾前人口

总数的 5%。

笔者 1955 年即到四川定居。天府之国那几年的境况如何呢？

先引录一篇《饥饿的农村触目惊心》这是原四川人民广播电台高级记者林

雪对原四川省政协主席廖伯康[1]的访谈录。原文有个副标题“我向中央讲实情”全文如下：

1960 年，全国性的“大跃进”已经进行了三年，人们面临的现实，是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1960 年的粮食产量已经下降到 2870 亿斤，比“大跃进”前的 1957 年下降了 26%，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四川的情况更加严重。从 1959 年至 1961 年，粮食年年大幅度减产，到 1961 年粮食产量已经下降到 260 亿斤，比 1958 年的 420 亿斤下降了 38%，甚至比 1949 年还少收 30 亿斤。可是，当时的西南局和四川省委主要领导（笔者注：即西南王李井泉）却继续执行极“左”路线，对上浮夸虚报，隐瞒四川农业生产的实际情况，对下实行“一言堂”，压制党内民主，对敢讲真话的同志打击报复。他高唱着“发扬共产主义风格”的高调，继续大量往省外调粮，仅 1958 年至 1960 年三年就外调 157 亿斤，几乎相当于前五年外调粮食的总数，其中严重减产的 1960 年还外调了 68 亿 4 千万斤，大致相当于当年产量的 1/4 还多。就在他骄傲地宣称四川外调粮食“居全国之冠”的同时，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农村却大量饿死人，城市也普遍饿饭，老百姓怨声载道。

1960 年 11 月，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十二条”）。信中指出：坚决反对和彻底纠正“大跃进”以来“一平二调”的错误；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小规模的家庭副业；少扣多分，尽力做到 90% 的社员增加收入；有领导有计划地恢复农村集市，活跃农村经济。与此同时，中央还调派了万名干部下乡进行整风整社运动。时任中共重庆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兼共青团重庆市委书记的廖伯康也奉命下乡参加运动，并担任重庆整风整社工作团办公室副主任，负责与当时重庆所属三个县的工作团进行联络。

一大群在城里指挥“大跃进”的干部们，来到离自己并不遥远的农村，所看到的情况触目惊心。树砍光了，房子拆来烧了，社员的很多东西都归公了，为办食堂甚至连社员的锅灶也搬走了，家里不准煮饭冒烟。长寿是当时重庆三个县中的重灾区，1960 年饿死的人数以万计，有些生产队“到处家徒四壁，犹如猪圈。强壮劳力丧失，剩下孤儿寡母，令人惨不忍睹”。廖伯康到长寿渡舟公社作调查，看到的是田地荒芜，十室九空。其中的两件事情，令已经八十高龄的他，至今心潮难平。一件事是干部们走进一户“人家”，屋里什么也没有：没有床，没有被褥，没有锅和灶台，连房子都没有了墙，用稀疏的包谷秆扎起的笆子挡不住冬天的寒风；屋里只有一个用来到食堂去吃饭的破碗，一个空空如也的柜子。一个没有了父母亲人的孤儿用呆滞的目光，看着眼前的这群从城里来的“大干部”。解放不过十来年，工作团的干部们不是刚刚走下枪林弹雨的战场，就是刚刚走出九死一生的地下险境，在残酷革命斗争中也算是“见多识广”。可是他们在这个孤儿的目光面前，却不能自己。统战部来的周怀瑾，跑到一边去失声痛哭。他是从北平大学的课堂走进革命队伍的，对于解放后人民当家做主的幸福生活，曾经抱着十分美好的憧憬。

另一件事，是廖伯康从工作团的同志口中知道的，说的是农村的一个老头儿，亲人都饿死了，只带着一个孙女儿活着。那年月的邻居爱管“闲事”，

好久没看见那孙女出来玩，就去报了案。派出所的同志到老头屋里屋外前前后后都看了一遍，确实没有孙女的影子。临出门的时候，有人随手揭起了锅盖，才发现锅里赫然煮着一只小胳膊和一只小腿儿。孙女其他的部位，已经被她爷爷那些天“慢慢省着”吃掉了！这件事情令全县震惊，也让公安局的同志很为难，最后决定，逮捕老头，但没有判死刑。大好河山，勤劳的人民，在解放已经十多年的“大好形势”中，在“粮食亩产超万斤”的高调下，老百姓竟然饿得吃掉了自己唯一的亲人！工作组在农村认真传达“十二条”指示精神，老百姓听了“大干部”们的话，都相信党中央的政策始终是正确的，问题出在公社大队的这些“歪嘴和尚”把“真经”给念歪了。那些刚刚还在对社员们指手画脚的社队干部们被揪上了台，社员们就像当年控诉恶霸地主一样，哭诉他们如何抄家抢粮、拆灶砸锅，还将那些饿得不得不去庄稼地里偷粮食的人捆绑吊打，致伤致残，甚至逼死人命。一时间，社队的干部们被批斗、撤职、抄家、逮捕，搞得杀气腾腾。

可是一个问题在工作团的干部们心里展开了：为什么那些执行上级指示最坚决的社队，干部们就越是显得面目可憎可恶，生产就越糟糕？而那些执行上级指示时打了“折扣”的地方，反而还比较“先进”，死人比较少。究竟是基层干部执行政策时发生了偏差，还是上级的方针政策错了？工作团的许多干部都是早年怀着崇高的理想参加革命的，在严峻的现实面前，他们不得不对高调满天的“大跃进”进行深入的思考。其实，这些思考早在“大跃进”之初就有人开始了，并且在庐山会议上提出来，虽然遭到高层的强硬压制，可依然在全党各个层面蔓延开来。

上报中央的《综合简报》被扣下来了。

1962年1月，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名的“七千人大会”在北京召开。会议通知中明确指出：1958年以来，中央和地方的工作中发生了一些缺点和错误，并且产生了一些不正确的观点和作风，妨碍当前克服困难，必须召开一次较大规模的会议来统一思想认识。1月30日，毛泽东在大会上作了长篇讲话，中心是讲民主集中制，强调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让群众讲话。有了错误，一定要作自我批评，让人批评（笔者注：1957年有人针砭了时弊，即被划为右派，强制劳改劳教。1959年彭德怀批评了小资产阶级狂热，便被罢官革职。谁还敢批评？）。毛泽东在会上也作了自我批评，承认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还有很大的盲目性，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

“七千人大会”后，重庆市召开全委会传达会议精神。在会上，许多人对当时的四川省委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大家认为，四川这些年大量饿死人，与省委提出的发扬“共产主义风格”、大量往外调粮有直接关系。近几年四川农村生产力究竟破坏到什么程度，群众生活困难究竟严重到什么程度，全省这几年非正常死亡究竟有多少人，这些情况省委是否如实向中央作了汇报，请省委给大家一个说法。有人说，近年来四川非正常死亡这么多人，省里却不敢正视现实，共产党员对人民生命冷漠到如此程度，实在令人痛心。从1958年的下半年开始，毛主席和中央就开始纠正“五风”，以后又陆续作了很多讲话。对这些指示，凡是合自己口味的，省委主要负责人就传达，不合口味的就强调四川情况特殊，拒不执行，有时甚至根本不传达。省委主要领导动不动就把一些普通问题提到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原则上去，运动不断。1960年冬开始的农村“整风整社”本来是为了纠正前些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可他却大谈阶级斗争，大搞“揭盖子”，夺取政权，不但没有制止错误，反而

在极“左”的道路上越走越远。1961年又在全省搞了两次大逮捕、三次运动。干部在执行上级指示中犯了一点错误就斗臭、斗透、斗垮，还要查成分、查历史、查社会关系，翻老账，株连家属。1957年以前大家还敢讲话，党内上下级意见不一致时，可以争得面红耳赤。1957年以后就不同了，省委主要领导大搞“一言堂”，谁提了不同意见，就给人家扣上“党内反对派”、“反党分子”的帽子，下面的人都不敢讲真话。

这次全委扩大会议结束时，时任重庆市委第一书记的任白戈作了总结，他以自己的党性向与会者作了两条保证：**第一，一定把大家提出的问题如实地向中央反映；第二，对提意见的同志决不打击报复。**

重庆全委会后，部分代表们又到成都参加四川省委召开的“扩大工作会议”，再次把意见全盘托出。廖伯康根据重庆会议上的小组发言记录，搞出了一个《综合简报》送给任白戈，请他向省委和中央汇报。一次偶然的机会，廖伯康发现自己整理的这份《综合简报》没有用上报中央的红色刊头，用的是只限发到省委常委（不上报也不下发）的绿色刊头。他心里一凉：重庆的《综合简报》被省里捂住了，没能上报到中央，省内也只有几个常委知道，任白戈的保证落了空。后来才知道：省委主要负责人看了这份《综合简报》，加上重庆小组的发言，吃惊不小，便批了个“此件只发常委”。

向毛主席告状

由于中央“七千人会议”前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从1961年初到1962年的上半年，全国的形势逐渐有所好转，可是四川饿死人的事却还在继续。1961年，四川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安法孝带领“整风整社工作团”到了重庆附近的江北县，副团长、团省委副书记王毓培告诉廖伯康：江北县还在饿死人。也在这个时期，四川省委组织部副部长苗前明到涪陵召开川东片区组织工作座谈会，会后路过重庆时，提到涪陵地区各县加在一起死了350万人；雅安地区荥经县委书记说他那个县人口死了一半，有的一个村死得一个人不剩，死人都没有人埋，只得派另外一个村的人去埋人，这些埋人的没有吃的又要挖坑，是重体力劳动，结果埋人的人也死了，只好再从其他村调人来埋这些埋人的人。

1961年初，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同志给18个省、市团委书记写过一封信，强调要进行调查研究，如实反映情况，总结经验教训；还提出青年团要做党的助手，就应做党的耳目，要说实话，做政治上、政策上的助手。当年的五六月间，在重庆团市委机关中层以上干部学习会上，大家对面临的形势和存在的问题坦荡陈言。重庆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萧泽宽和中共重庆市委候补委员、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李止舟有时也到团市委来，同大家一起议论。会上有人提问：四川问题如此严重，饿死了那么多人，中央知道不知道？廖伯康说：根据我的判断，中央不完全清楚。市团委副书记于克书提出：我们是不是可以给中央写封信，反映一下情况？廖伯康没直接回答，只是说安徽的问题开始很严重，盖子揭不开，后来有人给毛主席写了信，毛主席派人去一查，就把盖子揭开了。一听这话，几个副书记都积极赞成给中央写信反映四川的情况，并公推于克书来写，因为他任过巴县整风整社工作团副团长，比较了解农村的情况。于克书在淮海战役期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以后随部队南下到了重庆，廖伯康调市委办公厅之后，他担任主持工作的重庆团市委副总书记。于克书最后下决心给毛泽东写信，是在四川省委工作会议之后。他听廖伯康说，在省委工作会上，重庆组提的意见全都被捂下来

了，没能反映到中央去，便决定给毛主席写信。信的署名是“一个共产党员”，没有署真名。为防止查对笔迹、查出从哪里寄出的，这封信写好后又请团市委打字员（是个哑巴）打印，并托人带到武汉寄出。一次列席重庆市委常委会时，他悄悄对廖伯康说：“我给毛主席写了封信！”还将信的打印稿给了廖伯康。廖伯康看完后顺手递给李止舟，说：“你看这封信写得怎样？”李止舟看后说：“没得用，毛主席收不到。”

四川饿死了一千万

1962年6月，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身为团中央委员的廖伯康和团中央候补委员于克书一道赴京参会。此前，廖伯康收集了很多资料，想借此机会，向时任团中央书记的胡耀邦同志反映四川的严峻情况。

廖伯康到了北京，原在重庆团市委工作的老同事、老朋友向洛新、陈家俊夫妇请他吃饭，曾德林、罗玉清夫妇作陪。向洛新时任团中央《中国青年报》的群运部长，后任团中央学校工作部副部长；曾德林时任团中央候补书记兼办公厅主任。

饭桌上很丰富，引起廖伯康无限的感慨：“在重庆要想吃到这些东西，太难了。”曾德林说：“四川怎么搞的，不断有人写信来说吃不饱，浮肿病多，要求我们寄粮票回去。”

廖伯康长叹了一口气说：“实际情况比你们知道的要严重得多。你们只知道城里的困难，干部家庭的困难，而真正困难的地方，饿死人的情况，你们根本就不了解。×××对中央封锁情况，许多问题中央都不知道。”

廖伯康说的那些情况，引起曾德林深深的忧虑，随即向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作了汇报。

因为“七千人大会”后各地传达贯彻会议精神的情况尚未充分反映到中央，党中央便建议此次团中央全会在原定议程之前，先用三天时间让大家充分反映各地传达贯彻“七千人大会”的情况，以及当前存在的问题和干部的情绪。在三天的小组会上，平时敢说真话的廖伯康基本上没有发言，他知道，在这样人多嘴杂的地方说话不合适。这个情况引起了耀邦同志的注意，他决定单独找廖伯康谈一谈。

胡耀邦过去找地方来的同志了解情况，一般都带有秘书、速记员和有关业务部门负责人，这次他只是拿了厚厚的一摞稿纸和一大把削好的铅笔，只身来到廖伯康住的前门饭店。在前门饭店偌大一个会议室里，只有他和廖伯康两人对谈。廖伯康努力控制住自己激动的情绪，平静地说，胡耀邦也平静地听，默默地记，只是不时停笔插话，说某个问题安徽有，某个问题甘肃有，某类事件河南发生过。在那个特殊的环境里，人们都很敏感，廖伯康隐约觉得耀邦同志似乎有点为四川那位主要领导辩护，情绪陡然低落，谈话就这样结束了。

令廖伯康没想到的是，胡耀邦不仅将谈话笔录交给了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克实，由胡克实整理了一份简报送到中央，还口头向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兼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作了汇报。杨尚昆决定找廖伯康和于克书谈话。为了“掩人耳目”，团中央以调廖伯康参加起草团中央全会文件的名义向小组请了假，于克书则是由团中央办公厅通知小组，说要找他了解一些情况。1962年6月28日下午，廖伯康和于克书乘专车来到中南海中央书记处的一间小会议室。入座后，尚昆同志对廖说：“听说你反映情况有顾虑，有什么顾虑啊？你们省里李大章、廖志高我找他们谈过。重庆的廖苏华我也找她谈过，不过

她不了解情况，谈不出什么来。我也找任白戈谈过，他有顾虑不敢讲实情。唉！不怕官，只怕管嘛，我要处在他那个位置，我也怕。最近我还找了一位四川来京开会的省委部长谈，他环顾左右而言他，同我打太极拳，你今天不是来跟我打太极拳的吧？”

廖伯康解释说：“我长期在城市工作，对全局的情况、尤其是农村的情况不完全了解，怕反映的情况不够全面。”

杨尚昆同志说：“又不是要你们来解决问题，只是要你们来反映情况，你们怕什么？国务院办公厅收到一位逃荒到陕西的四川人写的一封信，题目是《一字一泪诉川情》，这封信把四川的悲惨状况写得非常具体，国务院办公厅转给了中央办公厅。唉，我们看了也很震惊啊，还送给中央有关领导同志看了。”尚昆同志提到中央办公厅还收到一封信，这封信写得很好，简明扼要，只有两页半，明确提出四川的问题是没有认真执行中央政策，是政策出了偏差造成的严重后果。廖伯康一听，知道于克书写的那封匿名信中央也收到了。

尚昆同志继续说：“我们知道四川死人的情况严重，但详情如何，得不到证实。我们要四川报，四川始终未报。我们找民政部问，四川情况如此严重，你们是管救济的，那里究竟死了多少人？民政部说是400万，实际上他们是通过四川省民政厅报的，中央不相信。然后又找公安部，公安部是管户口的，那时的粮票、布票、油票、肥皂、火柴等一切生活用品都同户口挂钩，死一个人就抹掉一个人，这个数字应该准确啊！公安部查的结果，当然也是通过四川省公安厅，说是800万。中央依然不相信，但究竟死了多少人，中央不清楚。你说说，四川究竟死了多少人？”

廖伯康举起一个指头，说：“死了1000万。”

“1000万？！你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

“是从省委正式文件上来的。”

“全国县以上的文件都要送中央办公厅，为什么我不知道？”

廖伯康说：“我看文件和你看文件不一样，你看文件是备查，我看文件是要贯彻执行，所以我要研究文件。1962年5月，省委批转《省委行政机关编制小组关于全省国家机关、党派、人民团体精简工作的意见（草案）》，规定各市、地、州要分别按照城乡人口的比例定编。这个文件本来很简单，但后面附有一个各个地区的人口数字及各地干部定编数。我一看，1960年底的四川人口总数是6236万，而国家统计局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上1957年的四川人口是7215.7万，两数相减正好约为一千万。这只是从文件上推算出的数字，实际上恐怕不止。”

杨尚昆问：“为什么？”

廖伯康说：“从1957年到1960年还有人口的自然增长数没有包括进来，这还只是到1960年的数字，从1961年到1962年上半年，全国形势都好转了，四川却还在饿死人。1961年底，江北县还有人饿死；涪陵地区先后饿死了350万；1962年3月省委传达七千人大会的时候，雅安地区荥经县委书记说他那个县的人饿死了一半，前任县委书记姚青到任不到半年，就因为全县饿死人太多被捕判刑。这份简报刚刚发出就被收回去了，别说中央，就连四川的同志也不完全知道。雅安地委宣传部副部长刘恩，早在1959年就到荥经调查饿死人的情况，并写成报告上报，结果被打成三反分子。根据这些情况估计，四川饿死的人，起码比我推算的还要多出250万！但我正式反映只说死了1000万。”

尚昆同志听到这里，一拍大腿说：“就是你这个数字！”说着吩咐秘书将书记处小会议室里的一个保密柜打开，从里面拿出一个折叠账本式本子，打开看了一下，又说了一句，“就是你这个数字！”

尚昆同志说：“在和平建设时期为什么会死这么多人？依你看，究竟在哪些政策、工作上出了问题？”廖伯康停顿了一会儿，让自己的情绪平静了一下，接着说：四川主要的问题，是没有认真贯彻执行中央“纠偏”的有关政策。比如说农村自留地问题，1959年6月中央下发《关于社员私养家禽、家畜、自留地等四个问题的指示》，指出大集体中的小私有，在一个长时间内是必要的，有利于生产的发展，也有利于人民生活的安排。而×××却把这个文件扣下来了，不准下发。困难时期老百姓把自留地称为“救命地”，“救命地”长拖不决，也是饿死人很多的重要原因。廖伯康问道：1961年我们四川搞了个“新三反”，实质上就是“反瞒产私分”，不知道是中央布置的还是四川自己搞的？杨尚昆同志说，中央根本就没有布置过什么“新三反”。廖伯康说：事实上，从1959年起毛泽东意识到“浮夸风”问题，多次提出不得在农民中反瞒产私分，后来中央又就此问题专门发文，可谓三令五申，但一直到1961年上半年，四川还在各地大搞反瞒产私分，抄家抓人。×××还一贯主观臆断，搞瞎指挥。他在全省搞亩产万斤的“万斤亩”运动，这明明是假的，也不准人怀疑，哪个怀疑哪个挨整，而且蛮横地说我就不相信搞不出来，我搞不出来，我的儿子也要把它搞出来。他在全川硬性规定必须放干冬水田种小麦。结果水放不干，造成小麦播种时积水歉收。第二年春天田中无水，秧又插不下去，水稻也大幅度减产，两头失着。粮食减产了，他不是纠正自己的过失，还要做假面子，在铁路、公路、交通沿线搞所谓的“高产路”，把远离公路的人力物力畜力肥料都集中在“高产路”沿线做给人看，造成了新的“一平二调”。他还大搞“一个样”，规定拉绳插秧搞密植，无论山上山下、平坝丘陵，栽种收割都要一个样。这样瞎胡搞粮食能不减产吗？杨尚昆说：“是不是因为他是北方人，不了解南方的情况啊？”于克书在旁边插话说：“他不是北方人，是南方江西人。”廖伯康接着说：问题不在于是什么地方的人，而是走不走群众路线，有没有群众观点，听不听群众呼声的问题。四川饿死这么多人，×××的对策却是向中央封锁消息，不准谈饿死人的情况，谁要谈，就是小资产阶级动摇性和软弱性的表现。1958年四川人均占有粮食630多斤（包括种子、饲料和工业用粮）。到了1961年，这个数字下降到373斤。三年之内下降了将近一半！情况已经如此严峻，×××还是继续欺上瞒下，硬绷面子，狠心克扣群众的口粮。四川城市居民每月口粮是21斤，干部只有19斤，有的地方甚至只有17斤。农村社员每天的口粮由公共食堂控制，一般是老秤（16两为1斤）的4至5两原粮（即谷子），打出米来只有老秤的2到3两，折合新秤只有1到2两米，城里居民每月供应2两肉和糕点，农民根本就没有。这么低的标准，有的地方还不落实，只有空指标没有粮食。1960年7月1日，省委突然一道命令宣布粮票作废，把老百姓苦苦积攒下的4800万斤粮食化为乌有，这种做法在全国也是绝无仅有的。此外，上调的粮食里面还有一部分是宝成铁路修成前边远地区运不出去的死角粮，是从万县等地调了一批民工用人力去背出来的，而那些地方的人民更加贫困。这样搞怎么可能不饿死人！

听到这里，杨尚昆同志感慨地说：“你们今天所谈的情况，很多中央都不知道，只知道四川上调的粮食多。四川口粮定量低我们知道，我有个老同学

在江津白沙教书，让我给他寄点粮票去，我哪有粮票啊，只好给他寄了 100 元钱去。”

谈话进行了三个半钟头，期间杨尚昆同志不断率直地表达自己的看法：“难怪中央向四川要传达贯彻中央七千人大会精神的总结报告，省委办公厅总说还没有整理好。”“问他们死了多少人，四川省民政厅报的是 400 万，公安部查的是 800 万，我这里还有个数字大约是 1000 万，不知四川搞的什么鬼！”最后他问：“你们今天谈了许多情况和问题，依你们的看法，总起来是些什么问题？”廖伯康想了想说：“李止舟对此说过一句话：上不听中央，下不听群众。我看是合乎实际的。”

告别时，廖伯康对杨尚昆同志说：“今天我们反映的只是问题的一部分，建议中央派人去进一步深入了解。最好是派一批四川籍的司局级干部以返乡探亲访友名义进行暗访式调查。因为派部长一级的干部到下面要报告省公安厅，而司局级干部用不着，也不那么引人注目，可以自由找人谈话。还有，”廖伯康犹豫了一下，还是把话说了出来，“我们今天向中央反映情况的事希望保密，万一传回四川，我们便活不出来了。”

杨尚昆同志笑了笑说：“你也是办公厅主任，有人向你反映问题，你会怎么处理？”

悲怆的“反党集团”

廖伯康和于克书向杨尚昆同志汇报后的第四天，即 1962 年的 7 月 2 日，由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书记处开会，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杨尚昆等人参加。杨尚昆同志在会上汇报了四川的情况和问题，并反映了廖伯康和于克书要求中央派司局级干部到四川进行深入调查的建议。小平同志说：那就按照他们的意见，派人去。

当时杨尚昆分管组织工作，他让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在中央机关司局长一级的四川籍干部中提个名单。为此安子文专门在中南海西楼召开了几次部的党组书记会议，提出了一个 16 人的名单交给杨尚昆同志。后来又多了一个不是四川人的萧风。萧风原任《人民日报》社总编室主任兼报社机关党委书记，当时刚调到中央办公厅任财贸组组长。要求他参加的理由，是他参加过对安徽饿死人事件的“揭盖子”工作，有调查研究经验，而且他当时的关系还在《人民日报》社，可以用记者身份找人谈话，比较方便。

这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西楼会议”。这次会议是保密的，除参加者外，其他的部党组成员都不能告诉。派出的 17 名干部分头到了四川，大部分都先以探亲的名义回到自己的家乡，再去各处进行调查。17 名干部回到北京后都交了调查报告。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对于这次调查很关注，所有的调查报告他都看过，并打算请刘少奇同志阅后转给毛泽东。

天有不测之风云。1962 年 8 月，距离“七千人大会”还不到 8 个月，毛泽东在中央北戴河工作会议上就提出阶级、形势、矛盾问题，这个题目随后成了 9 月在北京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的主要议题。毛泽东发表了多次讲话，将当时党内外一些干部群众要求纠正“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和“反右倾”斗争扩大化错误看做是“阶级斗争的反映”、“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的表现”，是“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还说近年来刮“平反风”是不对的；1959 年的“反右倾”不能一风吹。在这样的形势下，上述所有调查报告一下子没有了音信。

可是四川省委主要领导却早就通过各种途径看到了于克书给毛主席写的

信，还了解到有人向中央反映过四川的情况，一旦风向逆转，就开始了大范围的追查。所有与此事有关的人统统落入“天网”，大量的“反动言行”被揭发出来，最后都集中到了时任重庆市委常委、组织部长萧泽宽，时任中共重庆市委候补委员、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李止舟和廖伯康身上，揪出了一个所谓的“萧李廖反党集团”。中央有关部门得知后，通过很多途径给四川省委主要领导打招呼，甚至说你要再查就查到中央头上了，可他毫不理睬，继续狠批猛斗。中央也没有办法，只好打算把几个人调离四川。萧泽宽被中组部调到了中侨办，当了个政治部主任。中联部部长李初梨准备把李止舟调到他那里去，已经担任高教部政治部主任的曾德林也准备把廖伯康调到自己手下，算是“惹不起躲得起”。可是当中联部来调李止舟的时候，四川省委主要领导人说，李止舟是我们准备开除党籍的人，你们怎么还要他？弄得中联部只好作罢，而廖伯康的调动，更是无从说起了。最后，廖伯康被“留党察看两年，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下放到建筑工地劳动；李止舟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下放到一个机砖厂当厂长。重庆团市委的5个副书记被撤了4个。于克书和赵济被免除团市委副书记的职务调往基层；副书记王竹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贬到重庆市水上运输公司去当了个副经理。直到20年后的1982年，划入此案的人才得到平反。1993年，廖伯康从四川省政协主席的岗位上离休。2000年10月，他开始撰写关于此事的回忆录，这篇题为《历史长河里的一个旋涡四川“萧李廖事件”回眸》的文章被收入《当代四川要事实录（第一辑）》，2005年11月由四川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此时，“萧李廖”集团中的其他两位已经去世，中央曾介入此事的胡耀邦、杨尚昆、贺龙、刘少奇、田家英等同志也相继离去。然而，这个事件在中国当代史上留下的印记，却是永远无法磨灭的。但愿人们能从中认真总结经验，让这样的悲剧不要在中国大地上重演。

我读了原四川人民广播电台高级记者林雪对原四川省政协主席廖伯康^[1]的访谈录之后有如下一些感想：

（1）廖伯康等人提供的数据，来源于推测、臆断、估计，传闻。没有确切的统计数据做依据。譬如说“涪陵地区先后饿死了350万”是听四川省委组织部副部长苗前明（他才从涪陵开了座谈会回来）说的，虽然六十年代涪陵的辖区包括黔江、酉阳、秀山、彭水、石柱等后来划归黔江地区的五县，但毕竟不是人口密集区，也不是天灾最严重的地区，非正常死亡数竟占到全四川（含重庆）的三分之一，显得有些突兀。但廖伯康能够接受访谈，坦率陈言。还是值得钦佩与赞许的。

（2）向中央反映情况时顾虑重重，对李井泉祸国殃民、荼毒百姓的罪孽少有涉及，只轻描淡写地揭发了李井泉的霸道行径和独裁作风。但廖伯康等人敢于撕裂铁幕、不顾个人安危，透露了中共省级官僚之间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内幕。仍属功不可没。

（3）反映意见以后立即想做的是调离四川，即“惹不起躲得起”。归根结底是为了摆脱李井泉的宰割。并不是真正的为民请命。

（4）还在渲染毛泽东是被人蒙蔽了，认为他不了解下情。这就大错特错了。

毛泽东比谁都清楚农业确实大幅度减产，他自己捅了大漏子，但他是绝不能承认错误的。1959年毛泽东发过几封“党内通信”，其中确有“包产问题。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

的那一套指标。”等措辞激烈的语句，似乎真要改弦更张了。但是，当曾希圣在安徽少量推行“包产到户”获得显著效益后准备大面积推广以解决粮荒问题时，毛泽东却决定撤去他省委第一书记的职务，因为“包产到户”是毛泽东心中的大忌，是切切不可执行的。党内通信中的那些话都是故作姿态，欺哄世人的。翻雨覆雨，出尔反尔是毛泽东惯用的伎俩。他是明知故犯，绝非受人蒙蔽。

从表面上看，毛泽东也说过一些可谓彻头彻尾的纠左言论，如称高产指标是“吹牛而已”，“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收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等等（其中有“”号的字句都是《党内通信》的原文）。这些话都是毛泽东用来欺骗民众的。他在暗地里对李井泉说过，现在“空气不好”“你要顶住”。庐山会议前，毛泽东也说过“要退够”等言词，甚至解散了不少公共食堂。上了庐山，搬来了救兵，即以批判彭德怀为借口，大力“反右倾”。痴迷于他醉心已久的乌托邦，打击一切党内反对派。以镇压手段重树个人权威。再次掀起大办公共食堂的高潮。毛泽东尽管嘴里喊着“为人民服务”，实际上从未关心过民众的疾苦，他痴迷的是乾纲独断，是独裁专政，是家天下，是做皇帝，是万岁万万岁。

毛泽东在其认定的“大跃进”路线上从未动摇过，他的所谓“纠左”不过是在党内众多异议和基层情况恶化的压力下以退为进的韬晦之计，这也是他在历次运动中屡试不爽的政治手法。而李井泉自从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后，有了更多的与毛泽东直接接触的机会，通过毛的一些“交底”的话，再通过邓小平这条线的沟通，李井泉比党内许多人更了解毛的真实意向和思路，所以才有恃无恐地加以发挥，无所顾忌地变本加厉。

客观地说，文革前的地方官员，尤其是各省委书记，在执行中央的过左政策中，有不得已的苦衷。但是，李井泉在一味取悦上司，罔顾民间疾苦这一点上是格外突出的。李井泉主政四川十七年（1949 - 1966），硬是把一个物阜民丰的天府之国治理成一个民穷财尽的饥饿之乡，还深受毛泽东重用。为什么呢？

在这场发生在没有战乱，甚至没有大灾时期的旷世饥荒中，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非正常死亡最严重的恰恰是一些由毛泽东宠臣主政的粮食主产区。也是地方暴政最为残虐的地区。比如四川（李井泉）、河南（吴芝圃）、安徽（曾希圣）、山东（舒同）、甘肃（张仲良）等，是任由毛泽东宠信的“五虎上将”胡作非为而导致赤地千里、饿殍遍野的。相对而言，山西、吉林和陕西虽然也遭遇大跃进造成的饥荒，但没有酿成钜灾，没有那样高的死亡率。

当时陕西政府发现饿死人现象后，果断地将原先高征购的过头粮返销给各公社大队，并及时撤销了大食堂，成立救助浮肿者的病人灶，将可怜的救命粮食分到各户，恢复自留地和集市……事实证明这些应急措施非常有效，也使陕西成为近邻甘肃人心目中的天堂。

甘肃当时由毛泽东的宠臣张仲良主政，执行极左路线，使拥有著名粮仓河西走廊的甘肃，成为三年大饥荒时期死人最多的五个省份之一。无数甘肃饥民不顾政府的层层阻拦，如同1942年的河南饥民一样，沿着陇海铁路逃难到关中。在饥荒压力下，很多有家室的女人只身逃过来，又与陕西男人结婚生子。饥荒过后，甘肃男人带着孩子找过来，请求女人回“老家”。这种人间悲剧成为那场饥荒留给陕甘两省持续多年的伤疤。据说胡耀邦主持陕西期间，

被遣返甘肃的这种“甘省客”达数十万，可以想象那种生离死别的悲伤和痛苦，绝不亚于饥荒本身之残忍。

一个黄河边的陕西农民侯永禄从民国 29 年开始记日记，这就是 2006 年出版的《农民日记》。他在 1961 年 1 月 15 日记载了几条民谚：“王书记想升官，打一石报两石，把社员饿得怪叫唤。”“人民公社好，顿顿吃不饱。”“鼓足干劲，一天半斤。”“毛主席万岁，喝糊糊站队。”同年 1 月 24 日写道：“社员的口粮标准每月平均只有 15 斤，3 岁以下的小孩每月只有 3 斤；全大队半年来共死亡 50 人，其中因营养极为缺乏而死亡的就有侯金海、侯江云、侯武举、侯堂弟、侯妙才、侯狮子、侯喜钱、高新斗、高三捷、侯文伯等 10 人。”

知名财经作家时寒冰原籍豫南，他在一篇博客中记录了他母亲在大饥荒的遭遇：“1959 年，所有家庭的锅碗瓢盆被没收，一律吃大食堂。但由于干部虚夸，虚报粮食产量，上面要求多交公粮，交不上去的有的被活活打死。家里都没有粮食吃了。大食堂只能喝稀汤。人们饥饿难忍。舅舅饿得端着碗不松手。姥姥去地里弄些草根、菜叶在铁锹上面煮，驻队干部看见谁家生火就闯进去，看到好吃的就端走，看到不好吃的就砸掉……就这样，母亲才两岁的妹妹在哭声弱下来的时候，饿死了。母亲说：“村里谁家死人，都不会说，有的直接把死人吃了，有的瞒着多分一碗稀汤……XXX 的娘，就是把家里死掉的孙女吃掉活下来的，她吃了 7 个人。”想到小时候见到的那位和善的老人，我突然有种不寒而栗的感觉。”

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和饥荒研究专家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认为绝大多数饥荒的起因不仅是因为食物产量下降，也因为不合理或者是低效的食物分配，而且通常结合着对于问题严重程度认识的信息匮乏或者干脆是有意的误导信息。在中国这场 59—61 年的大饥荒中，城镇居民享有定量的口粮。与此相对比的是，因为新的集体经济，农村的下级官员抢着虚报他们公社收获的产量，而留给当地农民极少的剩余做口粮。森认为导致饥荒的自然原因，比如自然灾害，在导致包含中国大饥荒在内的现代饥荒的各种原因中是相当次要的，因为这些自然因素很容易通过合理的政府经济政策来应对。而毛的中国恰恰在因为错误的经济政策而每年饿死百万计人的情况下，没有在议会或者报纸出现批评的声音。因为缺乏反对党和自由媒体，毛的错误经济政策能够持续四年得不到校正，从而造成了现代社会最大规模的饥荒。

现在回到“那几年究竟死了多少人？”这个问题上来

1959—1961 年，曾被中共称之为“连续三年特大自然灾害”时期。

实际上，中国人口大规模死亡发生在 1958 年至 1962 年期间，持续了四年多，其中以 1959 年至 1961 年最为惨烈。全国性大饥荒结束后，中国人并没有立即摆脱饥饿，全国仍处在普遍的半饥饿状态之中，直到八十年代初期，农村普遍实行“包产到户”以后，才得到改善。饥饿是很多中国人幼时的记忆。

中国政府方面，截至 2011 年，未直接公布非正常死亡人数。当局长期保密，越发激起了研究者的兴趣和好奇心。对此课题探索者颇多。论点纷呈，各执一端，既有认为完全不存在非正常死亡的观点，也有认为死亡人数逾四千万甚至八千万的观点。在尚未定论的阶段，百家争鸣本属常态。有一个自称退休职工的北原[3]竟然无端谩骂起来。将支持饿死三千万以上之说者，称之为企图动摇和否定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

还有一个后生（他比我小十多岁，故称之为后生）学名孙经先，是江苏

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宣称从 2010 年下半年开始，用了整整三年的时间对这一问题进行系统研究，于 2013 年 11 月 8 日写出了一篇题目是《“饿死三千万”不是事实》的文章，刊登在《红旗文稿》2013/21 期。经查：该文曾于 8 月 23 日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中国社会科学报》上。知名双月刊《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 年第 6 期也曾刊载过孙经先“系统研究”尚未完成前的作品《关于我国 20 世纪 60 年代人口变动问题的研究》。孙经先用了整整三年的时间进行“系统研究”后，于 2013 年发表的文章，除了具体数字略有差别外，基本重复了 2011 年（系统研究前）的观点，即：**重报户籍被注销、漏报户籍未注册等原因，是 1960-1964 年中国户籍人口大幅度非正常减少的根本原因，与人口死亡无关。**

2012 年前后孙经先还撰写了《彻底揭露“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的重大谣言》（此文 2016-05-25 日再次发布于相关网站）《人口统计学中的虚拟人口理论及其应用》等文章。他在上述文章中写道“我国 1960 年实际人口数比 1959 年要增加大约 600 万左右。”

他还在乌有之乡网站举办过关于人口问题专题演讲。指责他人的文章“荒谬可笑”是“重大谣言”。

这个后生还在他写的文章中对美国人口与人口学委员会主席、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安斯利·科尔、中国国家人口研究课题负责人西安交大人口研究所所长蒋正华教授、上海交大历史系教授曹树基、新华社高级记者、中国新闻学院教授杨继绳、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编、知名哲学家胡绳、以及金辉、王维志、丁抒等发表过有关人口问题文章的学者予以抨击。指责这些人的研究“都是错误的”并以实例说明其“荒谬性”。还认定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和 1983 年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年报等传播了“重大谣言”。扬言要“彻底摧毁”。摆出了“横扫一切”的架势。

我仔细阅读了孙经先的文章，不是毫无可取之处。也不是绝无瑕疵和错误。孙经先这个后生偶有所得即自以为是，拿着鸡毛当令箭，斥责诸位前辈的文章为“荒唐可笑，极其荒谬”等等。还说：“如果他们懂得超线性死亡的真正含义，他们这样做就只能说明他们是蓄意欺骗；如果他们不懂得超线性死亡的真正含义，他们这样做就只能说明他们在数学和人口统计学上的无知。”似乎只有他一个人才懂得“超线性死亡”这个专业基础课必修常识似的。我不是反对批评前人和名师。能够找到老师的错误，说明得到了真传，听懂了，而且有了更深的认识。我喜欢这样的学生，这才是后起之秀、得意门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嘛。对于前辈大师的文章尽可以批评甚至批判。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倒在沙滩上。这是潮流涌动的规律，也是历史发展、社会前进的规律。我不赞赏的是，孙经先用了太多刻薄的言语，嚣张不可一世。这个后生的年纪也不小了，今年 68 岁了。他的思维方式似乎还停留在当年充当红卫兵阶段，只晓得辱骂，还没有学会文明语言。似乎还没有懂得礼义，也不知道天高地厚。孙经先这些毛病不改的话，他这一辈子也好不到哪儿去，谓予不信，拭目以待。

闲话说多了，还是言归正传吧。

大饥荒的死难人数，主要出处和来源有三个，一是人口学的计算，二是根据地方史志和年鉴进行统计，三是国家解密档案。

1984 年，美国人口与人口学委员会主席、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安斯利·科尔（Ansley Coale）根据中国三次人口普查数据以及 1983 年公布的千分之一

抽样生育率进行研究和计算后认为，1958-1962 年大饥荒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造成的人口损失总计达 5549 万人。

法国国立人口研究所所长卡洛（G. Calot）认为，1958~1963 年有 2700 万人过量死亡，有 2900 万婴儿没有出生。

香港大学人文学院讲座教授冯克，用了 4 年遍阅全国解封档案，在 2010 年 9 月出版的《毛泽东的大饥荒—1958-1962 年的中国浩劫史》一书中指出，大跃进造成 4500 万人非正常死亡。

2004 年版《大英百科全书》称，中国大跃进饥荒导致了多达 2000 万人死亡。

2008 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十卷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列举了各方观点，结论是从 1959 年到 1961 年，非正常死亡人数约为 2144 万，如果从 1958 年算起，那总数接近 3000 万。

1986 年，国家人口研究课题负责人、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蒋正华利用历次人口普查数据和其它相关资料编制出中国人口完全生命表，并建立数学模型得出，“在 1959-1960 年，非正常死亡总人数约为 1700 万人”。

2005 年，上海交大历史系教授曹树基采用人口学和历史地理学方法，统计计算出 1959-1961 年中国各地非正常死亡人口数。笔者辑录曹树基《1959—1961 年中国的人口死亡（3250 万）及其成因》一文所载部分（非正常死亡比例前十名）数据如下：

省 名	灾前人口	非正常死亡	比例 %	排序
安徽	3446.0	633.0	18.37	1
四川	7191.5	940.2	13.07	2
贵州	1706.4	174.6	10.23	3
湖南	3651.9	248.6	6.81	4
甘肃	1585.7	102.3	6.45	5
河南	4805.8	293.9	6.12	6
广西	2009.9	93.1	4.63	7
云南	1918.3	80.4	4.19	8
山东	5343.5	180.6	3.38	9
江苏	5296.3	152.7	2.88	10

2008 年，《墓碑》一书中根据广泛收集的数据结合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提出“大饥荒期间，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大约 3600 万人。

曾在国务院办公厅任职的曹思源先生在一次演讲中说：大跃进期间全国饿死的人数已经解密了，是 3756 万。（1961 年底，粮食部长陈国栋、国家统计局局长贾启允、粮食部办公厅主任周伯萍等三人奉周恩来之命，让各省填写了一个有关粮食和人口变动的统计表，经汇总整理以后，这份报表当时只报周恩来和毛泽东两人。原件曾保存于中国档案馆）

2005 年 11 月，香港《争鸣》杂志对档案解封情况进行了报道。该杂志称，中共中央已于当年九月对 1959 年至 1962 年档案解封，但只准有限的高干接触这些档案。

学术界对中国当年非正常死亡人数的研究，都以中国政府官方发布的调查和统计数据为基础。迄今为止，在三年困难时期是否有非正常死亡、死亡人口数量等方面，都还存在着广泛争议。还没有绝对的定论。我取其中可信

度较高的五个说法供读者参考：

1、著名党史研究专家、中国史学会原会长、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金冲及教授在《二十世纪中国史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一版）一书中，首次披露中国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饿死的民众达 3860 万人。

2、谢文斗先生根据《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的资料计算，1958~1962 年累计全国非正常死亡人口 5496 万人。其中：1958 年 506 万人；1959 年 573 万人；1960 年 2537 万人；1961 年 1692 万人；1962 年 188 万人。

3、北京大学医学部孙尚拱教授根据国家人口年鉴的数据建立统计模型估算认为：那三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约 4400 万人。

4、新华社高级记者、中国新闻学院教授杨继绳先生苦心励志、多方采访，旁征博引，严密考证。历经十余载，写出了《墓碑》一书。认定那三年非正常死亡人数在 3600 万人左右。

5、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先后在中央党校、国务院研究中心、国务院办公厅和国家体改委工作的曹思源先生在一次演讲中说：大跃进期间（1958-1960）全国饿死的人数已经解密了，是 3756 万。

应该指出，上述死亡人数中包含大跃进期间被折磨致死的部分。

据中共湖南省委监察委员会 1960 年 12 月的一份材料透露，该省祁阳县 1959 年以来死亡 2556 人，其中与干部违法乱纪有关的 928 人，计打死烧死 56 人，逼死 102 人，饿死 216 人，折磨致死 554 人。

据 1961 年春中央、省、地、县联合调查组对湖南省湘潭县的调查，“大跃进”以来，这个县原作业组长以上干部 18097 人，打人的有 4021 人，占 22.3%。被打群众 34466 人，当场被打死的 52 人，打后死的 549 人，扣饭饿死的 400 人，打后自杀的 125 人，被打成残废的 332 人，打后流产的妇女 187 人，因被打和扣饭而外逃的 12676 人

河南信阳地区为追逼粮食，仅 1959 年 11 月至 1960 年 7 月公安机关就正式逮捕 1774 人，其中 36 人死在狱中；短期拘留的更是达到 19720 人，死在拘留所的 667 人！新县白雀园的一次现场会上，一名大队干部报不出数字，就被五匹马一匹套住头部，另外四匹套住四肢，咔嚓一下，五马分尸

四川省荣经县是全国饿死人比例最高的县之一。在“反瞒产运动”中，县委书记姚青调动武装民兵荷枪实弹挨家搜粮，对“不老实”的干部和群众，采用了拳打脚踢、罚跪、揪头发、伤耳朵、捆绑、吊打、人烧人、火烧、锄把捅阴道、刀砍、活埋等 37 种惩罚手段，其中最惨的、有案可查的是把一个年轻妇女的腿劈开，用锄把直接从阴道捅进去，活活的捅死。充分展现了痞子、流氓的本性和特色。

香港大学历史系教授冯克在《毛泽东的大饥荒》一书中指出，从中国近年公布的官方文件来粗略推算，1958 年到 1962 年期间，大约有 6%到 8%的非正常死亡者死于酷刑或直接处决

据时任河北张家口地委第一书记胡开明回忆：“鉴于蔚县死人太多，省委工作队……来到蔚县……调查解决饿死人问题。他们惊异地发现，在大多数公社死亡人数急剧增加的情况下，阳原片区（蔚县后分为蔚县和阳原县）却死人很少，特别是东城公社情况最好”。原来东城公社的书记武万升瞒着县委秘密放粮，从公社的储备粮中分给每个农民十斤口粮，由社员领回家食用，

相邻的公社闻讯，也秘密放了粮，阳原县的农民就是这样获救的

安徽凤阳县县委书记赵玉书“带人到一个大队检查浮肿病情况，问公社医院王善良，为什么浮肿病越治越多，你们少什么药？王医师说：就少一味药，粮食！结果赵书记当场令公社召开大会批斗王善良，并通知公安局，在批斗会一结束，把他当场逮捕”从此，缺粮就只能意会不可言传了。

历史不会永远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女孩”。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历史档案的逐渐解密，真相必将大白于天下。

附录：写作途中，友人提供了一篇阮耀钟先生刊发的文章《毛泽东谈死人》，转录在此，与读者共赏：

【耀钟的话】这是我在网上搜集的“毛泽东谈死人”，我不敢保证全都正确无误，但我都注明了出处，每个出处都有超链接，点击即可查看原文。不知各位看完本文后会有何感想，我看完后，觉得可怕，一个对死人满不在乎，把“人”仅仅看作数字的国家领导人，人民岂能不遭殃？！

(1) 1957年，他在莫斯科对苏联领导人说：“为了世界革命的胜利，我们准备牺牲三亿中国人。”

1957年11月，毛泽东率代表团访问苏联，18日在莫斯科开共产党阵营最高级会议，毛泽东在大会上即席演说。毛谈到核战争：“要设想一下，如果爆发战争要死多少人。全世界二十七亿人口，可能损失三分之一；再多一点，可能损失一半。……我说，极而言之，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二十七亿，一定还要多。”这话令全场鸦雀无声，面对如此一个核战争狂人，台下都炸开了锅，吓倒了多数东欧国家的党头儿。他们只有“二战”中跟意大利和德国打仗的经验，不理解毛泽东在国共内战中不把同胞当人对待的“人海战术”。这太具冒险性和具战斗性，他们没法操作，弄不好搭进自己的命，很害怕这个结果。捷克斯洛伐克总书记诺沃提尼拿着咖啡直哆嗦，事后他说中国6亿人，我们才2000万啊，叫我们怎么个死法？波兰的总书记哥穆尔卡也表示不解。在场的意大利代表英格劳(Pietro Ingrao)对我们说：大厅里听众感到震惊、生气，感到“人”对毛无非是数字，死人他满不在乎，核战争他毫不介意，还挺欢迎。南斯拉夫首席代表卡德尔听毛讲完后想：“再清楚不过了，毛泽东想要战争。”就连信仰斯大林主义的法国共产党也很反感。赫鲁晓夫更是大失所望，在其回忆录里，说毛“就象一个疯子”。关于核战争的这个说法吓倒了一片人。（“毛准备死四亿中国人来打第三次世界大战”）

(2) 大跃进一开始，毛就告诫中共高层做好大批死人的思想准备。在为大跃进揭幕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他大谈死亡是白喜事：“是喜事，确实是喜事。你们设想，如果孔夫子还在，也在怀仁堂开会，他二千多岁了，就不妙。讲辩证法，又不赞成死亡，是形而上学。庄子死了妻子以后鼓盆而歌是正确的，人死应开庆祝会。”乍一听来，毛好像是信口开河讲哲理。但这代表他的政策。安徽一个公社党委书记被带去看饿死的人堆时，几乎是在重复毛的话：“人要不死，天底下还装不下呢！……人有生就有死，那哪个人能保就哪天不死？”有些地区规定死人后“不准哭，不准带孝”。

(3) 1958年11月21日至23日在武昌洪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毛泽东在11月21日召开的大会上很有预见地说：“这样一来，我看搞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人。广西死了人，陈漫远不是撤了吗？！死五千万人你们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

头也成问题。”（“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第一次讲话” 1958 年 11 月 21 日上午）

（4）1958 年 12 月 9 日，毛泽东在八届六中全会上说：“人要不灭亡那不得了。灭亡有好处，可以做肥料。” “一个国家的领导人为何会这样对待自己的人民？”）

（5）荷兰历史学家冯克出版的《毛的大饥荒》一书中提到，毛泽东在 1959 年 3 月 25 日的上海秘密会议上，要大幅度提高征缴粮食。当有人担心饿死人的时候，毛说了如下魔鬼语言：“大家吃不饱，大家死，不如死一半，让另一半人能吃饱”。“一个国家的领导人为何会这样对待自己的人民？”）

（6）大饥荒时苏联要援助 50 万吨食糖和 300 万吨粮食给中国，毛却说：“哪怕把全中国人都饿死也不要赫秃子一粒粮食。中国党和政府是有志气的，我们不但不要苏联的援助，还要把欠苏联的债还清。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中国有几亿人口，饿死几千万人算啥大不了的事呀！让妇女敞开生孩子，死的几千万人，过几年不就又回来啦！”（“一个国家的领导人为何会这样对待自己的人民？”）

（7）美国新任总统肯尼迪及其政府对中国的情况并未袖手旁观，而是给予了特别的关注。他们认为，中国国内的严峻形势在短期内不会得到缓解，这必将导致更多的中国人死亡，因此，决定尝试通过粮食援助，向中国伸出橄榄枝，并制定了援助方案。不过，在中美双方的沟通中，王炳南传达了毛泽东的立场：虽然中国受到了连续几年的自然灾害的影响，但是，中国人民有信心战胜困难，赢得胜利，绝不会依靠别人、尤其美国人的施舍过日子，更不会拿原则做交易。美国人再三表示，他们的 500 万吨小麦的援助计划，是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的，甚至硬通货的支付方式，也可以在情况好转后再兑现。中方仍然断然拒绝，并以幽默的口吻转达了毛泽东的建议：如果美方需要我们的帮助，我们也愿意勒紧裤带援助一些大米和小麦。美国代表顿现窘态，中国代表哈哈大笑。中国再一次展现了她的骨气！（“一个国家的领导人为何会这样对待自己的人民？”）

（8）1961 年，毛泽东在接待来访的法国社会党领袖后来的法国总统密特朗时，针对西方世界有关中国发生大饥荒的传言说，“我再重复说一遍，中国没有饥荒。”许多西方人对毛的这番话信以为真。毛泽东显然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9）1964 年中央决定进行全国人口普查，成立人口普查领导小组，让我（杨尚昆）当组长。事情是这样的，随着精减城市人口 2000 万任务的完成，国民经济调整取得重大成效，为了摸清我国人口状况，为编制国民经济第三个五年计划和十五年设想提供准确数据，距第一次人口普查已经 11 年的第二次人口普查提上议事日程。2 月 10 日，中央决定我（杨尚昆）为人口普查领导小组组长，周荣鑫、徐子荣为副组长。那时进行人口普查，没有现代化手段，普查项目也比较简单，主要依托公安部门的户籍管理力量进行。经过几个月的紧张工作，取得了 1964 年 7 月 1 日的人口数据：全国（不包括港、澳、台）人口为 6.9458 亿人，比第一次人口普查时的 6.0193 亿人增加了近 1 亿人。但是在普查中发现，1960 年底全国人口为 6.6207 亿人，比 1959 年底减少约 1000 万人，自然增长率为-4.57%，其中县以下自然增长率为-9.23%。这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出现人口负增长。尽管当时统计手段落后，统计数据不可能十分准确，但却大体上反映了那时部分农村由于各种

原因发生的非正常死亡现象，是一个很值得重视的情况。人口普查各项数据汇总后，我们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淡淡一笑说，我从来不相信你们的那些统计数字。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就这样结束了。（杨尚昆：在中央办公厅的20年）

饿死了几千万，毛泽东淡淡一笑，也不考虑一下是否应该辞职。饿死了几千万，毛泽东以“不相信你们的那些统计数字”，一言盖之，无耻！

听说，杨尚昆的回忆录中央不让出版，希望能尽快出版杨尚昆的回忆录。笔者估计杨尚昆上述话，必是查阅了他们当年的统计数据后写的，否则人口自然增长率不可能精确到百万分之一！希望尽快公布当年的统计结果。

对于生命的冷漠，是专制制度的一大特征。一个国家领导人，一把手，人称“大救星”，如此看待人民的生命，怎能不成为“大灾星”，中华大地发生大饥荒、十年浩劫，在所难免。

1960年南阳大饥荒纪实

南阳，古称宛，河南省辖市，位于河南省西南部、豫鄂陕三省交界地带，因地处伏牛山以南，汉水以北而得名。南阳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有3000年的建城史，西汉时为全国六大都会之一，曾孕育出“科圣”张衡、“医圣”张仲景、“商圣”范蠡、“智圣”诸葛亮、“谋圣”姜子牙等历史名人。三国时期，南阳是诸葛亮躬耕隐居之地、刘备“三顾茅庐”之处。南阳为豫陕鄂区域性中心城市、豫西南政治、经济、文化、科教、交通、金融和商贸中心，城市规模位居河南第三。先后荣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国家园林城市、中国月季之乡等称号。这样一个物阜民丰的地区在毛泽东时代却被祸害得成了大饥荒的重灾区。南阳人毛罄江花了数年时间，采访众多群众，以朴实的语言，记录了那场大饥荒的实况。是揭露毛泽东罪恶的具体例证。特转载于后：

1960年南阳大饥荒民间实录 原文作者：毛罄江

前言：上世纪1960年前后，一场惨绝人寰的大饥荒在中国大地上肆虐蔓延，农村更甚，河南是重灾区。1970年代初，我上中学时，家里只三间房，其中一间租赁给了进城积肥的生产队的两个农民。夏天的夜晚在院子里纳凉之时，其中一个农民给我讲述了农村1960年大饥荒的亲身经历，甚至讲到过饿极了的人吃死人肉，杀小孩子吃。在红旗下长大的我感到震惊又可怕。中学毕业后，我到农村插队劳动将近4年，接触到更多的农民，听到了大饥荒时的更多事情。可惜那时候我只是听却没有记录下来。直到今天，我决心记录南阳家乡1960年大饥荒的真实情况，已经相继采访了一些当事人。其中有的人善于描述，如之一的李某某。有的人不善于表达，如之五的那个农民。可我坚持一条，那就是忠实记录，只在表述上理顺次序而不作任何添加，尽量保持当事人的原始讲述。我今天公布这些实录，一是让大家知道那段真实而惨痛的历史，二是提醒自己要有毅力把这项工作继续下去。我如今还在上班，只能抽时间采访整理，只好采取先城后乡，先近后远进行采访。以后退休时间充足了，我要多往农村去采访更多的老人，为南阳1960年大饥荒时留下一部民间实录。

1960年南阳大饥荒民间实录之一

口述人：李某某 男 74岁 退休干部 2006年11月11日下午记录于李某某家中。

要说60年大饥荒，根子还在大跃进吃食堂炼钢铁，我就从58年说起吧。58年可以说是风调雨顺大丰产，但不丰收。为啥子？人为造成的，听我慢慢说。夏季麦

收，浮夸风盛行，虚报产量，亩产 300 斤小麦能报 800 斤，其实那时候小麦亩产大多是 200 多斤。当时实行统购统销，上级以下边报的粮食产量按比例留口粮。因为虚报的产量高，上缴的小麦也多，生产队留的口粮就少。有的队小麦基本上征收完了，有的队千方百计瞒一点，口粮就能多留一点。例如在杨楼公社，有的队人均口粮有 60 多斤小麦，有的队人均口粮才 20 多斤小麦。我所在的大队土地多，58 年麦季人均口粮近百斤，在全县可以说是寥寥无几。黄狼山大队还存有一些黑豆，当时每个生产队是一个食堂，吃食堂时，队长挺精明，把黑豆磨成豆腐，搀到稀面条汤锅里，再和点面，看着稠乎乎的。

夏天在食堂里还基本能吃饱，到了八九月份，大炼钢铁开始了。一个公社或几个大队集中到一块，修建小高炉炼钢铁。杨楼公社的炼钢铁处选在一个叫尚洞的岗坡上，一共修建了 800 个小高炉。修建时都是就地取材，挖土和泥巴垒成圆柱体，外径 80 公分到 1 米，内径 60 公分左右。把农民家里的水缸砸破，再把缸渣碎片碾成沫子做高炉底座的内芯。小高炉修建的多，看起来密密麻麻，点起火更有气势，夜里十多里地外都能看见火光冲天。公社一个领导知道我有些文化，就让我写诗歌颂扬小高炉。我写的顺口溜现在还能背下来：天上繁星点点，地上红光闪闪，王母惊呼玉帝打颤，感叹天上不如人间。

烧炉子的燃料起初是木料，杨楼公社范围内，碗口粗的树木全部砍完当柴火，另外家家户户的门板、木床、桌子、椅子、凳子，都拉到小高炉处当柴烧。专门有人负责劈柴，那些柜子箱子，八磅大铁锤砸下去就粉身碎骨，然后把这些干柴垒成垛子，有两米多高，一米多宽，象寨墙似的，最多时弯弯曲曲足有一里地长。砍伐的树木锯成半米长或一米长的树段，也堆成堆，把这些湿柴搭配着那些干柴烧。有一次要放卫星，就是 800 个炉子都冒火，连续烧七天七夜。一般是两三人包一个炉子，人都得在炉子边守候着，瞌睡了打个盹。

你得保证七天七夜不能停火，如果哪个炉子火灭了，检查团发现就要“炒铁蛋。”就是五六十人到上百人的积极分子围成一圈，勒令那些炉子灭了火的消极分子站在中间，这边踢一脚，那边打一拳，把那些消极分子打的晕头转向。有一个农民对炼钢铁说了怪话，被别人揭发。为了杀一儆百，干脆临时搭建了一个两米多高的台子，几十个积极分子把那个说怪话的农民围在中间，打的鼻青脸肿。最后那个农民被一脚踢下高台，摔得顺嘴流血动弹不得，也不知道后来是死是活。炼钢铁天天吃蒸红薯煮红薯，吃的人只吐酸水。58 年那年秋庄稼

长的好，红薯又多又大，有经验的老农估计亩产在 3000 多斤。可男女劳力都去炼钢铁，庄稼丰产不丰收。秋天又下了连阴雨，红薯沤烂在地里，也没晒红薯干。豆荚炸口豆子发芽，玉米在秸杆上发芽有一砣多长。你想想，如果当时把那些红薯收回来储存到地窖里，能当多少人的口粮啊！后来木柴树段烧光了，公社就组织农民去平顶山担煤。从方城到平顶山 100 多里路，一路上看到地里的红薯被犁翻起来扔在地里，担煤的农民带着做饭锅，走到那里，就捡路边地里的红薯煮着吃。小高炉用当地的贫铁矿石，铁矿石烧化后，个别炉子流出来一些黑乎乎的铁，可是铁和渣凝结在一起，一敲就破。烧到冬天，上级又要求修建 20 个高 6 米的大高炉，外径有两米到三米，内径有一米到两米，底座还是用缸渣碗渣碎片碾成沫子。因为缸渣不够了，就砸农民家的瓷碗。经过所谓的土专家指导，这次大高炉除了用铁矿石，还用“引铁”，就是把铁车轱辘，农民家里的铁锅、铁门环，铁门鼻等铁器收集一空，放到高炉里。当铁矿石烧化时，还要放石灰石，目的是促使铁浆和铁渣分离。20 个大高炉确实炼出了 1000 多斤铁，产量最高的卫星炉产有二三斤铁，都是一种粗生铁，据说能打造简单的犁铧等农具，别无他用，真是劳民伤财得不偿失。

大炼钢铁后，秋庄稼没收回来，大队小队家底都空了。59年初，我又被送回南阳附近的环城公社包庄生产队劳动。那时候农村食堂还没散，顿顿喝用麦糝子搅的稀饭，十天半月才吃顿稀面条，饿的前心贴后背。59年麦子收成不错，可还是虚报产量，统购透底，生产队存粮很少。59年秋季干旱歉收，用农民的话说就是半收。红薯亩产有1000多斤，玉米高粱豆子收成差。到了60年春季，饥荒就显露出来了。从3月份开始，就开始饿死人了。也就是这时候，我又被送到十里庙砖瓦厂劳动，那里有定量供应，现在回想起来是救了我一命。6月份麦子成熟时，我们在外面劳动，看到附近的地里，有人饿的忍耐不住，掐麦穗揉搓后吃麦籽。当时有许多从唐河等县逃荒过来的灾民，个个面黄肌瘦，他们先被集中到南阳收容站，然后被送到砖瓦厂。一个唐河县祁仪公社的小伙子偷偷告诉我，他们那里树皮被扒吃光了，大雁在野地里拉的雁屎，人们也捡着吃。饿死的人很多，有的村子死人都没人抬出去掩埋，因为都饿的走不动了。一天傍晚，我进城路上，看到一个个饥民面无表情，夕阳下拖着瘦长的身影，在路上蹒跚挪动。有的走着走着，就一头栽在路边，再也爬不起来了。真可以说是饿殍载道，可是谁也无能力去救去管。我老家是邓县文渠公社李楼村，100多口人饿死20多个。其中一家是地主，别人敢去偷青苗吃，他一家不敢，结果11口人被饿死7口。由于文渠公社饿死人多，区委书记郑某某害怕追究责任，就开枪自杀了。60年秋季收成好一些，又开始了“拔钉子”，凡是拿印把拿勺把的基层干部，统统集中起来整治批斗，连邓县的县长和县委书记也不能逃脱。县长和我是熟人，后来告诉我，在“拔钉子”期间整天喝稀汤，饿的受不了，有次上厕所，看见墙头上搭有半干的红薯秧子，就拽下来往嘴里填。南阳地区邓县、唐河县是重灾区，唐河县饿死50多万人，县委书记害怕上级追查，领着全家跳井自杀，只有大儿子自己爬上井口，还有一个儿子在外地上学得以幸免。

以我的亲身经历来看，我认为60年大饥荒饿死人不是天灾，而绝对是人祸。

1960年南阳大饥荒民间实录（二）

口述人：孙某某 退休工人 男 70岁 采访地点：住宅小区门口 2006年11月12日下午

1950年，我才14岁。大哥在南阳一家工厂工作，经他引荐我进厂当了通讯员，负责给领导打水、断饭、取报纸信件等杂事。一直干到54年，下车间当了工人。我是地主成分出身不好，只是埋头干活，不敢多说话。到了58年，我当时已经结婚生子，儿子有一岁多了。有一次开会去的晚了一会儿，领导问我为啥来晚了？我实话实说：上街排队给儿子买个烧红薯吃，才来晚了。顺口一句话，说者无心，听者有意。随后就开我的分析斗争会，说我对社会主义不满，被扣上了“反社会主义分子”的大帽子，交群众监督劳动。

1960年春天，我在农村的嫂子领着儿子突然上门，一见面吓我一跳，嫂子和侄子都是瘦的皮包骨头，饿的人不人鬼不鬼的。嫂子说生产队食堂断顿了，已经饿死人了，再不跑娘俩也要饿死，就拄个棍子领着孩子一路要饭往南阳来投靠亲戚。家家都没啥吃，一路上要饭也要不来，娘俩饿得晃悠不动。厂里食堂开饭时，我打回的饭还不够她娘俩吃。

60年秋天，厂里干脆宣布把我开除公职，派人带枪押送回祖籍劳动改造。我老家是邓县十林公社黄岗大队柳堰生产队，可大队让我到了赵岗生产队。因为60年春节前后农村断粮，就开始饿死人，赵岗生产队的人死的死，跑的跑，就剩下些妇女小孩，没人干活，我去了算个男劳力。回去时生产队食堂还没散伙，吃的饭不重样，就是把不剥皮的红薯切成小块，再配上红薯叶子煮，开饭时一个人给舀一瓢，那一瓢有两碗。可是那时候人们饿极了，别说两碗稀汤，五碗都不够喝。绝大多数

人都有浮肿病，脸色黄，浑身肿，不拄棍子都站不稳走不动。只有掌握实权的干部多吃多占脸上光堂些。下地干活时，看到许多低矮的新坟头。乡亲们说，春上饿死的人多，哪还有棺材，木料都让大炼钢铁烧光了，死的人都是挖个坑软埋。人们饿的有气无力，坑也挖不深，坟头也就不大。后来死的人更多了，有的一家饿死三、四口人。死的人多，大人小孩都没人埋，也饿得没力气抬死尸挖墓坑了，就干脆埋到红薯窖里。61年春天生产队食堂散伙了，每家按人头分点红薯、玉米糝，干红薯叶，自家做饭饿的轻了。那年秋季收成稍好，62年又允许农民有自留地，赵岗生产队一人二分自留地，种些庄稼收成是自己的，这才度过了鬼门关。现在我回想起来还后怕，如果是59年秋天把我押送回去，我这地主成分谁管你死活，在60年非饿死不可。

1960年南阳大饥荒民间实录（三）

口述人 吕某某 退休工人 男 60岁 采访地点：住宅小区吕某某家中 2006年11月12日晚

我老家在南阳地区唐河县源潭公社宋沟大队杜楼村。大跃进时我小学三年级，辍学回家参加劳动，算个半劳力。我们那里57年初开始吃食堂，大多农民不愿意去，干部和积极分子先去，每家兑粮食，顿顿做好吃的，吃干饭蒸馍，故意眼气吸引人，就这还没有几家愿去。57年四五月份，干部到各家各户收粮食，强行让吃食堂。四个生产队开了4个食堂，人们都得去吃。开始吃的还好，熬米汤，蒸红薯，炒菜是白菜萝卜，有方桌，有凳子，大家在一起吃饭热热闹闹还挺新鲜。58年初两个生产队的食堂合成一个，吃饭人更多了。大蒸笼直径有一米多，十几层，吃饭时稀饭一人一碗，蒸红薯一人三斤，还能吃饱。58年大炼钢铁开始后，我到处拣砖头，垒小土炉。小高炉直径有2米，高有4米，大风箱有3米长，得用几个人才能拉动。家家户户门上、柜子上、箱子上的铁器铜器都被拧走去炼钢铁。我还跟着大队人马去白河捞铁砂，先用铁锹在河边沙里挖个大坑，把80公分宽、2米长的筛子铺在上面，用水冲沙子。沙子冲走了，黑铁砂留下了，用手捧起来放到筐子里，满一筐了抬到小高炉去炼钢铁。59年秋季种了麦后，上级不让捞铁砂了，一人发了两个小米窝头，

我就步行回家了。回去后食堂散了，没粮食吃了，人们这才想起地里没收回来的红薯，一窝蜂去挖那些已经沤坏了的红薯吃。红薯挖完了，再去找那些红薯码子。地里实在找不到吃食了，又想起粪坑里有积肥用的坏红薯，人们又翻开粪坑扒拉起来。积肥时还没粪尿，人们也顾不得脏臭，扒出来红薯洗洗再吃。啥都吃完了，就去吃青燕麦。把燕麦洗洗，切切，放些盐在锅里炒炒，就这样吃。燕麦吃光了，再找大雁屎，放碾子上压成沫子，在锅里炒一下吃。冬天饿的受不了，在地里吃豌豆秧，吃的一嘴绿沫子。快过春节了，实在没吃的，政府救济来了，一人发一块月饼大小的榨过油的芝麻饼，第二回发的是榨过油的花生饼，第三回发的是榨过油的蓖麻饼。蓖麻饼有毒，人们饥不择食，吃了后上吐下泻头晕眼花。过春节时，上级按一个人3斤麦子发救济，人们又集中到食堂来，把麦子在石磨上碾，人们都饿的有气无力，几个成年人都推不动石碾。大家轮着推，麦子只碾两遍，就下锅做麦麸汤喝。葫芦瓢一人三瓢，就那还不够喝。麦麸汤稀的能照见人影，我三叔在食堂里说了句：端起碗，晃人眼。意思是说稀汤象清水，把人的眼睛都照花了。干部听到后窜上来把碗夺过去，当场批斗我三叔，罪名是恶毒攻击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能照见人影的麦麸稀汤大年三十喝到初一就没有了，上边又把剩余的麦子收走了。过了春节后，人们就没见过一粒粮食，只有吃白菜根，腊菜根，猪牙草，扒榆树皮。春天将榆钱，将柳叶吃。我和两个弟弟都饿的胳膊腿精细，走路一步三晃。爹娘看

撑不下去了，就给当兵复员后留在黑龙江虎林县一个农场的哥哥去信求助。哥哥来信让赶快开迁移证明。我家5口人，办了6个准迁证。为啥子，因为没有路费，正好村里一个志愿军老兵愿意去，他也饿得不行，就主动拿出几百元复员费当路费。我们6个人又是赶路又是坐车，在路上走了几天几夜，才赶到东北。那里土地多，灾荒不严重，在去农场的路上，我从一个豆杆垛下扒出几粒黄豆，放嘴里一嚼真是香啊。见到哥哥嫂子后，吃饭是玉米糁汤和窝窝头，哥哥只准我们喝稀汤，怕猛一下吃窝窝头肚子受不了。1964年我当了兵，觉得父母带我们到东北是救了全家人的命。许多战友都说家乡家里都饿死了人。我的班长是63年的兵，家在湖北北边紧靠河南地界。69年部队让他复员，班长就痛哭流涕。因为他全家人在60年都饿死了，村里看他是孤儿，才把他送去当兵。班长哭着说，我回去找谁呢？住哪儿呢？后来部队又多留他一年。

回想60年，比比现在，还是改革开放好。我现在住着水电气暖齐全的三室两厅，吃穿不愁。现在城里人平常吃饭就比过去过年吃的还好，农村粮食也吃不完，家家都能吃上白面馍了。

1960年南阳大饥荒民间实录（四）

口述人 何某某 退休干部 男 62岁 采访地点：宾馆 2006年11月14日晚
我老家在南阳镇平县石佛寺公社石佛寺大队第三生产队。提起60年，我现在还记忆犹新心有余悸。我给你从统购统销说起。记得是53年开始统购统销，就是想方设法让农民卖余粮。那时候粮食产量低，一亩小麦多则产100多斤，少则产几十斤。哪有多少余粮？不交干部就逼着交，逼的有人上吊。一搞统购统销，市面上粮食也少了，人们碗里的饭也稀了。有个顺口溜讽刺统购统销，我现在还能背下来。

“端起碗，照相馆。”（意思是说碗里稀汤能看见人脸）。

“毛主席万岁，买馍排队。”（当时供应紧张，买馍也要排队。）

“站了半天，买了一千。（当时一千元折合后来一角钱，能买两个小馍。）

后来搞合作化，就开会让生产队长报余粮，哪个生产队长第一个报产量必定倒霉。因为你报亩产小麦200斤本来就有虚头，后报的生产队长肯定要一个比一个报的多报的高。先报产量的生产队长就是落后分子，要被“扫暮气”，就是拿扫帚往他身上打扫。这还是温柔客气的。还有“过筛子”，就是让落后分子站在中间，一圈人围着推搡来推搡去，推的你站立不稳直跌跟斗。折磨人的还有“坐飞机”，就是让落后分子站在板凳上，屁股撅起来，两只胳膊向后伸着，一圈人围观监督。时间长了姿势不标准，下边一踢凳子，摔你个人仰马翻鼻青脸肿。交了公粮，一人才分几十斤麦子。我们老家58年麦收前开始吃食堂，一开始能吃饱，糊涂饭，汤面条，蒸红薯面拌红薯叶的窝窝头。58年吃食堂还有一个怪现象，就是各家不准住自家房子，必须住到别的人家去。名义上说是共产主义了，其实是好抬你的家具扒你房子，门窗梁柱檩条都扒了当柴烧。吃食堂时我也下学了，因为我父亲去世早，我是老大就回来劳动，怕人家说我们没男劳力干活，吃食堂是沾便宜。大炼钢铁都集中在大队所在地老毕庄，烧炉子砍伐了好多大树。男女劳力到河里淘铁砂，炼不出铁，就把农民家中沾铁的物件都收走当原料。59年秋粮长的也行，可强壮劳力都去炼钢铁了，耽误了收秋。等劳力们元旦前回来，红薯、豆子、玉米都烂到地里了，还错过了种麦时间，只好犁地种些豌豆。59年没收来粮食，食堂没了家底，人们就吃不饱了，可我们生产队还没饿死人。60年春天就不行了，食堂断粮，政府发带皮的谷子，一人一天7钱，煮的稀汤象是刷锅水，喝了撒泡尿肚里就没啥了，人饿得走路都摇晃，这只脚踢那只脚。我们生产队有80多人，60岁以上的老人和5岁以下的小孩饿死十五六个，比例绝对超过百分之十。成年人青年人耐抗一点，可也饿的走了样脱

了相，浑身浮肿，胳膊腿细，肚子大，就象现在电视上照片上那些非洲灾民。我们生产队多亏种下的那些豌豆，没饿死的人吃豌豆青苗才勉强保命。我熬过了饥荒，1964 年当兵走了。

现在看来，饿死人不是天灾，祸根就是浮夸风大锅饭就是瞎指挥穷折腾。炼钢铁劳民伤财。吃食堂饿死人不说，对环境破坏也厉害。过去我们那里是大树参天，草木茂盛。我曾经放过牛，牛走着吃草，走着走着，又高又密的荒草能把牛遮掩住。可大炼钢铁砍了大树，吃食堂又接着砍树，破坏了植被，现在是荒坡秃岭穷山断水。大炼钢铁吃食堂既是坑害当年的老百姓，又是祸及子孙遗害无穷啊！

1960 年南阳大饥荒民间实录（五）

口述人 张某某 57 岁 男 农民 采访地点：河南省南阳市内乡县砣岖乡街上
2006 年 12 月 13 日上午

我家就在这里的寺河村尚岗组，57 年吃食堂时我才 8 岁，家家户户不准有锅不准点火。我家藏了口锅，有天烧了锅热水，几个队干部看见烟囱冒烟了，马上冲到我家里，抓起铁锅狠狠摔在地上摔成了几块。食堂开始吃的是糊汤面，还能吃饱。57 年后半年就把粮食吃的差不多见底了，食堂开始吃红薯，蚕豆叶放点盐当菜。我们这里是岗坡地，当时种小麦少，种红薯多，58 年在食堂里主要吃红薯，可也限量。每人一顿是 8 两蒸红薯带一碗稀玉米汤，端起碗来能照见人影。59 年日子更难过，连红薯也吃不上了，人们就吃干红薯叶，吃野菜，吃野草，吃树叶，吃树皮，饿极了还偷吃青苗。有一天队里用红薯生红薯芽子，我趁大人不注意，偷了一个红薯跑到僻静处，一吃觉得比蜜糖还甜啊！60 年春上，村里就开始饿死人，尚岗生产队吃食堂时 108 人，饿死了 31 人。饿死的人没人抬，都饿得没了气力挖墓坑，有的死尸被老鼠掏吃了眼睛，露着俩黑窟窿，看着又惨又怕。队干部夜里能偷偷吃小灶，一个也没饿死。队干部就吆喝人们，把尸首拖到沟里，填上土掩埋了。邻近的淅川县饿死人更多，我姑姑嫁到七八里路远的淅川县唐房村，60 年春上食堂有许多天不冒烟，一个生产队仅剩下 20 多人，有一家四口都饿死了，这户人家也绝后了。当时人们傻呀，饿死也不敢往外跑。话说回来，就是跑你能跑到哪里？你也跑不远，都没啥吃的，逃荒要饭也没人给你。还活着的人都饿的大腿精细，身上浮肿，走路拄个棍子一摇三晃迈不动步子。

我记得 1960 年前后，我们村就没有妇女生小孩，后来知道都是饿的绝经了。1963 年，我们这里分了自留地，允许开小片荒地，这才慢慢缓过劲。可没过几年安生日子，66 年又开始文化大革命，穷折腾啊。

现在好了，粮食吃不完，农村也能吃上白面馍，吃肉也不稀罕了。特别是现在政府免了农业税，农民负担轻省了。我种了麦子后闲着没事，就到镇上干零活，一天给 20 元。你要打听 60 年的事到淅川去，那里比内乡饿死人多。

1960 年南阳大饥荒民间实录（六）

口述人 张某某 85 岁 男 离休干部 采访地点：河南省南阳市张某某家中
2007 年 3 月 13 日上午

1947 年，我高中毕业后参加了中共豫西南六分区武装工作队。48 年 10 月南阳解放后，我们 100 多人的队伍开进了城市。那时候百废待兴，到处都缺少人需要人。南阳市副市长兼酒精厂厂长邰士芳和我认识，把我调到了酒精厂。上班干的第一件事，就是从西峡运来两车火纸，再卖到社旗，赚点钱去买粮食制曲。后来我一直在工厂生产技术科上班，1957 年反右刚开始时，厂里的锅炉坏了，我到省工业厅去请技师来修锅炉，那时候郑州已经开始反右派。本来我家庭出身不好，平常说话做事都很谨慎。我看到这个风头后，回来更胆小更老实了。组织号召提意见，我啥

话也不说，可以说没有一点言论。可后来为啥子被打成右派？就因为上级给酒精厂分派了 10 多个右派指标，特派员袁世定抓反右运动，他为了完成任务，自己关起门来编造材料，写上张某某说，共产党不好，现在吃不饱。当时也确实吃不饱，可这话我根本就没说，自然不承认。你不承认，领导就白天黑夜召集积极分子批斗你。你还不承认，领导就逼供诱供，说你承认吧，承认了包你没事，保你过关。咱相信领导的话，就违心承认了。这一被迫承认不打紧，马上就被监督劳动。等上边报批后，就全副武装把我们这 10 多个右派押送到农村劳动。1957 年五一之前，我被押送到方城县独树公社下曹村劳动改造，老婆和 4 个孩子被赶回社旗农村老家。

我到农村后，就住在一户农民家里。农民为人忠厚淳朴，也没有歧视我，对我还很关照。那时候农村已经开始大炼钢铁吃食堂，我和一个社员每天去放树。干部说已经快实现共产主义了，谁家的树都可以锯，村里村外碗口粗的树都放光了。放倒的树去烧木炭，再拉到小高炉当燃料炼钢铁。1958 年初冬，我又被指使去修鸭河水库。干了 3 个月，上级又让右派回南阳集中学习。学习时听说要给右派平反，大家暗自高兴。后来又听说毛主席不同意，扬言给右派平反他就不干了。过后，不让右派们学习了，在几个村庄轮流劳动。令人哭笑不得的是，整人的人也被打成了右派，卷烟厂的和柴油机厂的反右运动特派员不知道说错了什么话，也成了右派分子。那时候还在吃食堂，就是发几个蒸红薯。卷烟厂的特派员也是右派分子苏文华吃红薯时把红薯皮揭扔了，革命群众看到后一涌而上，开现场会批斗他。后来食堂连红薯也没有了，只是喝菜汤。菜汤里有菜叶萝卜，吃饭时一人一瓢，撑得肚子大，一撒尿肚子又空了，人人都饿的身上浮肿。幸运的是我劳动的地方是市郊菜队，没粮食，多少有菜，虽然饿，还没饿死人。我老家社旗大冯营前营村就惨了，1960 年前后，一个村两个生产队饿死 54 人。我那 4 个孩子饿得在床上起不来，我老婆去打水，关系好的乡邻在食堂做饭，不吭声偷偷扔到水桶里两疙瘩芝麻叶。我老婆回家后，让几个孩子吃了，几个人才缓过口气。1961 年初，组织允许我回家看看，家里一贫如洗，地上铺了些干草当床，盖的破被子露着棉花套子。老婆孩子见到我，抱头痛成一团。

（张某某之子插话：父亲被打成右派被集中劳动改造，母亲带着我们兄弟姐妹回去时，我那年才 4 岁。1958 年开始吃食堂，也就是粗茶淡饭，起初还能吃饱。大家敞开肚子吃，很快生产队就被吃空了家底。大炼钢铁又耽误了秋收，后来就开始喝稀汤。1959 年，一天一人三两八钱的定量，干部多吃多占，群众还吃不到这个量。1960 年三两八钱的定量也没了，人们稀汤也喝不上了，吃糠、吃野菜，吃牛粪，吃大雁屎，把玉米芯用石碾碾碎吃，到酒精厂挑酒糟吃，人们都饿极了，只要能填肚子的东西，都往嘴里咽。你问吃树皮没有？树木在大炼钢铁时被砍光了，连树皮也没得吃。家里人饿极了吃牛粪，牛拉粪了都去抢，回来后家里也没锅，铁锅在大炼钢铁时都砸了当原料了，食堂解散后铁锅也买不到。我妈就用个破洗脸盆子，把牛粪拍成饼状，放在洗脸盆里用火烧烧，填肚里充饥。我爷爷抗不住，饿死了，死时皮包骨头，顶多几十斤，我妈和我们几个饿的都动不了，乡邻帮忙才把爷爷埋了。）

苦日子一直熬到四人帮倒台后，才给右派改正，我一家老小才能挺起腰杆做人。那个年代真是不愿想，想起来就掉眼泪。还是现在好，吃的饱穿的好，说话也自由自在。我要养好身体多活几年，享享老来福。

1960 年南阳大饥荒民间实录（七）

口述人 袁某某 55 岁 男 民间艺人 采访地点：南阳市袁某某住所 2007 年 3 月 20 日下午

记得 58 年大跃进吃食堂时，我才 5 岁。我家 9 口人，父母、3 个哥哥，1 个

嫂子，两个姐姐和我。吃食堂那是干部逼迫的，把各家的铁锅都收走去炼钢铁，锅台也拆了。干部带人挨家挨户搜查，把家具粮食都拉走集中到生产队，你不去吃食堂就没啥吃。可去吃食堂也饿肚子，开饭时，大人是一个黑窝头，小娃子是半块黑窝头，喝的稀汤照见人影，汤里面有些红薯叶和野菜。我们那儿一开始吃食堂就没家底，统购统销早把农民家里的粮食挤干净了。上面派人来检查，都是弄虚作假，在粮食囤下面放些红薯藤叶包谷芯，上面铺上一层布，再摊上一层粮食。上边来人一看，粮食满囤堆的冒尖，不给你拨粮食，还要调你粮食。自打吃食堂，人人饿的受不了，只有干部日子好过，夜里在食堂关起门吃小灶。我大哥原本在区政府工作，父亲怕他为催粮什么的得罪人，就不让他干了，回来后就饿的受不了，就带着我大嫂先跑山西去了。58年冬天，惠庄开始有人饿死，死的人有老人，有小孩，也有青壮劳力。有个乡邻名叫惠大祥，实在饿极了，看见牛拉粪手抓着就填嘴里。人饿成那样动都不想动，干部还要让农民出工炼钢铁挖水渠。你要敢往外跑，抓回来就要绳捆索绑挨批斗。

父母眼看撑不下去了，就商量着外逃保命。59年春上种棉花时，父亲留下看家，母亲带着我和两个哥哥两个姐姐趁一个半夜跑了。我年纪小跑不动，二哥担着挑子，一头挑个薄被子，一头挑个花篓，让我坐里面。我们一家从高庙向南到桐河，再向郭滩，走到一个村庄时迷路了，来回转悠一直到天亮。我坐在花篓里面，不时看见路两边有饿死的人，曝尸野外也没人管没人埋。这个记忆在我脑子里一直抹不掉。从郭滩再往南走，路过一个村庄时，路边地里刚种了棉花，地头有洒落的棉籽。母亲看到后象见了宝物，一家人就蹲在低头拣棉籽。拣了两小捧，母亲带着我们到村里找了一户人家，借了个石臼把棉籽捶碎，又借用人家的盆子添水烧火熬了点汤，一家人喝汤垫垫肚子。上路不久坏事了，个个呕吐不止。母亲才知道棉籽用了农药六六粉拌种，这是中毒了。母亲呕吐的轻一些，因为母亲喝的少，想让儿女多喝点。她赶快用碗端路边河沟里的水，让我们几个喝。吐净了肚里的东西，总算没出人命。到了夜里，一家6口人找了个避风的地方，挤在一起盖那一床薄棉被。白天接着走，记得路过一个街面时，我饿的头都抬不起来。二哥用身上仅有的5毛钱，买了一个熟兔子头。那兔子头放的天数长，已经干了，我咬着吃了才好受点。三哥比我只大4岁，也是走不动，见二哥没让他吃兔子头，就边走边骂，骂二哥偏心。

一家人跑到河南靠近湖北的地界，还是吃不饱，又跑到湖北枣阳丰乐河。那里地亩宽人口少，当地人看我二哥和两个姐姐都能干活，就收留了我们。落脚安置住下之后，母亲捎信让我舅舅也来了。1960年春天，父亲也饿的受不了跑来了。一家人在湖北三年，我就在湖北上的小学。后来湖北地方政府下令，不准收留外地人。我们打听老家食堂散了，允许开自留地了，一家老小拉着架子车回来了。

大饥荒过去已经40多年了，可我一想起来还感到后怕。现在虽然吃的饱吃的好，可我还是不敢糟蹋粮食。我真是饿怕了，一辈子都忘不了。

1960年南阳大饥荒民间实录（八）

口述人 张某某 61岁 男 退休工人 采访地点：南阳市张某某住所 2007年3月21日晚上

我1946年出生，老家在邓县赵集公社宋岗大队第六生产队。58年我十二岁，正在上小学。说饿死人是天灾我不信，58年我们那儿粮食丰收，麦场上麦秸堆天拥地，有只老母猪在场里扒个窝下小猪，小猪会跑了，人们才知道。

记得是下半年开始吃食堂，主食就是蒸红薯，随便吃，管你肚子饱。喝汤多是蒸红薯水，有时候也吃面条。隔些天还要改善生活，蒸白面杠子馍，或者把蒸红薯用手捏成糊状，搀些白面发酵后蒸熟，还说这就是面包。现在回想起来，如果不吃

食堂，就是灾年粮食少也饿不死人，后来饿死人就是集体吃食堂惹的祸根。人们敞开肚皮吃，吃的少了只嫌吃亏，谁也不心疼不节俭粮食。59年下半年粮食紧张了，稀面汤就象现在的捞面汤，劳力一人三碗，老人一人两碗，小娃子一人一碗。有的人把稀面汤用瓦罐掂回家，再挽些野菜、树叶熬熬，看着稠些，一家人分喝了。人们吃不饱饿啊，千方百计找东西吃。我就吃过燕麦、黄蒿、刺角芽、槐树叶、榆树皮，样数多了。

大炼钢铁把茶杯粗的树都砍光了，还有小榆树。人们把榆树外面的一层皮刮掉，把二层皮剥下来，放在瓦上焙干了，用石臼捣碎吃。人们把燕麦薅回来后，洗洗切成段，用铁锅用瓦盆烧火一加热就吃了。农民家里的铁锅是被干部收走了，个别家里还藏有铁锅。燕麦薅光了，胆大的就薅麦苗吃。黄蒿味道苦，弄回来后烧热水滤一下去去苦味再吃。村里村外的小槐树，发一次芽人们捋一次，发的芽还赶不上人们捋的快。有一天我和母亲捋回来一些槐树芽，用藏起来的那口铁锅扒拉一下吃了。队长见我家院子冒烟了，赶来搜出了那口铁锅，说你家也没啥东西可罚，当场把铁锅摔破走了。

到了60年，人们饿的更狠了，我还吃过青蛙卵，吃过蝌蚪，吃过蝎虎，吃过老鼠。扒房子逮住几只蝎虎，打死放在瓦上一烤，半生不熟连骨头都嚼嚼咽了。那时候老鼠也饿得跑不快，逮住老鼠一剥皮，用勺子烧火一燎吃了。有一次，我从河沟里弄回来一盆子青蛙卵，偷偷点火煮熟，饥不择食盛碗里就吃。谁知道那青蛙卵黏糊糊太热，一下子把我口腔都烫破了。快过年时，我哥从湖北回来，带了一小筐红萝卜和一棵大白菜。我趁大人不注意，拿了一根红萝卜，躲屋里用被子蒙着头啃，真觉得味道甜啊！那棵大白菜吃完后，我把白菜根埋到院子里，一发芽我就掰着吃，后来等不及发芽了，我又把白菜根也扒出来啃吃了。

上学的时候，同学们个个饿的有气无力，靠着墙根晒太阳捉虱子。一次放学回家，我看见村里有个老太婆坐在门口，瘦的皮包骨头，穿一件破棉袄，手从棉袄破洞抓棉絮塞嘴里嚼，一咽一伸脖子。

（张某某老伴插话：那时候人饿的瘦不要紧，就怕虚胖浮肿。人一浮肿，手一按一个窝，脸肿的把眼挤成一条缝。我老家的村子离宋岗不远，大队办了个病院，把浮肿病人都集中到那里面。可病院也不是有东西吃，人都饿疯了，谁也顾不上谁。我有个邻居喊老五奶的，儿子害浮肿也进了病院。老五奶从北坡沟里拣回来一个死娃子，回家后把头剃了，脚剃了，把身子煮了。她自己还舍不得多吃，盛瓦罐掂到病院让儿子吃。儿子问是啥肉？老五奶说你甭管啥肉快趁热吃吧！老五奶回家路上下起了小雨，她又冷又饿，脚一滑摔倒起不来了，就趴在地上呼喊。我父亲听到喊声，赶去扶起她到我家屋里，烧拢一堆柴火让她取暖。

59年冬天我四爷死了，留下一床破棉被。父亲把那床破棉被拿出来给老五奶披上，才把她暖过来。老五奶的儿子也没躲过这一关，还是饿死了。我当时不知道老五奶煮死娃子的事，后来一块在地里挖野菜，老五奶才亲口告诉我，还说人肉吃着香。）

我爷爷60年元月死了，用个白茬棺材埋了。到了3月份，食堂没柴火烧，队干部带人扒我爷爷的坟。土扒开后露出棺材，我坐在棺材上阻拦，被大人拉开。人们撬开棺材，我看见爷爷尸首还没腐烂，胡子还是好好的。人们把棺材盖和四周的木板起走，只留下棺材底板，又填土掩埋了我爷爷的尸首。我奶奶是过罢春节死的，没木料做棺材，用麦秸稿秆一卷埋了。同队张明甫的父亲和兄弟都饿死了，用牛车拉着路过我家门口，车上并排躺两具稿秆卷着的尸首，脚还在外面露着。张明甫哭一声爹啊，用鞭子打一下牛，让牛走快点。可是牛也饿的瘦骨嶙峋，哪能走的快？59年

到 60 年上半年，我们大队就只有死人没有添人，生小孩也活不了，母亲饿的没奶水，那时候又没奶粉。宋岗大队有 20 多个生产队，大队就在翟郭村附近划出一块地，规定饿死的人都埋那里，后来那块地被大家叫做乱葬坟。

那时候虽然饿，可人们胆小老实啊！公社就有粮库，库里也有粮食，可领导不敢放粮，老百姓也不敢抢粮。60 年生产队发红薯芽子时，人们也不敢偷吃红薯，谁偷吃被发现要斗你打你。当时打人成风，大队干部打小队干部，小队干部打社员群众。当干部相对好过，开会、查夜能在食堂吃点夜饭。人们饿的走不动路，还得去上工。队长敲几遍钟，人们才晃晃悠悠赶到。60 年快割麦时，不知道从哪里调来一些大米，量也不大。人们把大米用石磨碾成粉，食堂烧汤让大家喝，喝了才有点力气割麦。割麦时候，人们在地里把麦穗用手一揉一搓吃生麦粒，或者把麦穗点火一燎吃了。在场上打麦的时候，人人都偷麦子，往鞋壳簍里装麦子，在裤子里面掖一个小布袋装麦子，然后借口上厕所，回家把麦子倒出来。干部这时也是睁只眼合只眼装着没看见。麦子豌豆下来后是正经粮食，人们炒麦子吃，煮豌豆吃。

人饿的饥肠辘辘，吃到嗓门还嫌饿，有的人吃的多消化不了，反而胀死了。60 年下半年食堂散了，开始“拔钉子”，把生产队长以上的干部都集中到邓县茶鼓楼。民愤大的撤职继续关押，民愤小的又回来继续当官。我熬过了饥荒，1964 年当兵走了。

1960 年南阳大饥荒民间实录（九）

口述人 崔某某 83 岁 男 农民 采访地点：南阳市崔某某住所 2007 年 3 月 23 日上午

我家在南召县马柿坪公社南坪大队第三生产队。我出身贫苦，干活老实，不惜力气，先后当过初级社干部，高级社干部，1957 年还当过一段副社长，吃上了公家饭。干不多长时间，自己辞职不干了，为啥子，心里头怕哟！记得是 1957 年的一天上午，县供销社的两个右派被押到马柿坪来了。那时候上级号召大鸣大放，动员大家提意见，领导还在会上动员说，热爱毛主席，就要提毛主席的缺点，就是帮毛主席洗脸擦灰。这俩右派也不会给毛主席提啥子意见，可能是给领导提了意见，对当时一些事说了怪话，结果就被打成了右派。

这俩右派一来就被关进了黑屋，我们吃过午饭后，一个县里来的领导大喝一声，把那俩坏蛋押出来批斗！几个人跑到屋里，把那俩右派拽着胳膊按着头押了出来。人们一拥而上，拳头打，耳光扇，那个年青的右派脸上被打的黑青，头发被拽掉几缕子，短头发的右派也被打的脸上黑一块青一块。县领导说，低头认罪！那俩右派就赶快低头。领导又说，学个飞机走。那俩右派把两只胳膊朝后伸，头向前拱，有人还上前把俩右派的胳膊朝上使劲拧，疼的俩右派呲牙咧嘴也不敢吭声。把俩右派摆治够了，又押着在马柿坪街上游街，后来也不知道把这俩右派弄哪儿了。经过这件事，我想谁不说句错话，说错话就这狠劲整，我真害怕，就回家种地还当农民去了。

我们那儿是浅山区，麦子产量不行，全靠秋季。58 年不是灾年，那年玉米收成不错，生产队收的玉米堆满了场边的仓库。可浮夸风厉害，逼着下面虚报产量，玉米产量能报到一亩 2000 斤，交的公粮也多。58 年农历六月十八，我们村开始吃食堂，一个食堂有近百十口人。开始不管伙食好坏能吃饱，麦糝子玉米糝子掺野菜熬汤，等六七天蒸一回黑窝头，让干活的劳力吃。58 年冬天就吃不饱了，一人一天定量是八两毛粮，干部、炊事员再多吃点，社员群众还吃不到八两。黑窝头也不蒸了，都喝稀汤。老人大人一人三碗，半小伙子一人一碗半，小娃子一人一碗。喝了稀汤肚子揷起来了，一会儿洒泡尿又饿了，只有眼巴眼望等着吃下一顿。为啥子？家里粮食都被搜光了，大锅小锅也被掂走了，只留下床和被褥衣服。食堂吃不饱，人们

就吃山野菜。野菜吃光了，人们把玉米芯放石磨上碾，碾不碎放锅里炒糊，再放石磨上碾，然后筛筛煮着吃，吃嘴里不好下咽，拉嗓子，吃了屙屎也作难。

人们吃不饱，还得炼钢铁。我就负责烧炉子，炼钢铁用的是从河里淘的铁砂和从各家各户收上来的铁器。三天三夜炼一炉，出的铁水冷却后是生铁，做犁铧等农具还能用。树不论大小，一律放倒烧木炭，木炭再去当燃料炼钢铁。有一天，上级又要大跃进放卫星，要求一夜建三个炼钢铁的红炉。那炉子有两米多高，我在炉膛里抹泥巴，已经熬了三天三夜，实在撑不住了，就迷迷糊糊睡着了。后半夜猛一惊醒，听见外面人声乱吵吵，出来一看，原来是负责烧炉子的两个人也困的睡着了，让炉子跑火灭了。干部巡逻发现后，要开他俩的斗争会。其中一个人是我老伴的 본家叔叔苏某某，干部让他站在中间，众人用拳头打用脚踢，我叔叔崔某某也上去又打又踢表现积极。谁知干部又说，崔某某，你也站那儿，该斗你了！众人又围上来打我那本家叔叔。我老伴的本家叔叔苏某某刚才挨了我叔叔的打，这会儿报复他，打的更起劲。那时候人们也不知道咋啦，吃不饱饭整治人还恁有劲头。

59 年食堂的饭更稀了，稀的象是刷锅水。干部炊事员到最后吃，锅底还沉点稠的。人们饿的头晕眼花，瘦的皮包骨头。后来有人饿极了，还吃滑石面，把滑石面和水拍拍，烙成饼吃，吃了拉不下屎，肚子胀的青疼。有的人饿的身上浮肿透亮，大队成立了病院，把浮肿病人集中起来。俺们那里饿死的有老人，有大人，有小娃子。（崔某某老伴苏某某插话：我那大闺女是 58 年生的，起初还有点奶水。食堂吃不饱，奶水也没了，我也饿的没气力，早上抱着闺女就起不来床，得把她放在床上，自己才能慢慢起身，再给她穿衣服。那时候有小孩的妇女也得下地，把小孩交给一个妇女专门照看。我闺女在食堂的定量是一天一两玉米面，我把她的口粮称回来，搅玉米糊涂喂她，总算捡回一条小命。）

1960 年，饥荒更严重，县里又四处抽调劳力去修建周湾水库。我也去了，人有上万人，每天抬石头，挖土方，在一个山口筑拦河大坝。一个大队建一个炉灶做饭，自己带些玉米糝，顿顿喝稀汤，肚子吃不饱，活重受不了，有人就偷跑。抓不回来便宜你，抓回来就是拳打脚踢斗争你。南坪、白庄两个大队去的劳力编成一个连队，男男女女四五十人住两小间房，地上是连趟铺，一个挨一个，女的住门边，方便出去解手。上级知道我过去当过干部，就让我当了连长。领导亲口对我交代说，你前边那个连长管教不好，有的偷懒，有的装病。你当连长只管打，打坏了我负责！那时候打人成风，团级营级干部指挥连长打人，看谁干的慢就打。我知道人们刚吃了饭，干头遍活还有点力气，半晌就没劲干活了。一天吃早饭时，我站那儿讲了几句，我说老少爷们都是乡亲，我也下不去手打人。不是大家不愿干活，而是没劲干活。大家最好别跑，吃过饭干了头遍活，只要团长营长不来，你们可以歇歇。看领导来了，大家赶紧卖劲干活。你们少受罪，我也少作难。大伙一听都同意，以后我们连干活，领导没在时悠着点，看见领导来了多挑快跑，领导夸我带队带的好。大伙累死累活修好了周湾水库，上边又说山洪来了冲毁大坝，下游遭水灾更严重，又把大坝给扒了，我们都回去了。60 年下半年食堂散了，大家各回各家重起炉灶，后来又允许农民向生产队借地自种自吃，虽然还是吃粗粮多，好歹不饿肚子了。

附注

[1]廖伯康：1924 年生，重庆市人。中央大学经济系毕业。194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重庆、上海等地从事地下工作。1949 年后，曾任重庆共青团市委副书记、书记，中共重庆市委办公厅副主任，1985 年任中共重庆市委书记。1988 年任四川省第六届政协主席。1962 年，在任中共重庆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兼共青团重庆市委书记

记期间，因向中央报告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四川非正常死亡人口 1000 多万的情况，被打成“萧李廖反党集团”下放到建筑工地劳动。1982 年获得平反。

[2]《农民日记》是陕西合阳农民侯永禄“农民五部曲”中的第一部，24 万字。出版后引起了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上百个国内外媒体的广泛关注，好评如潮。《农民日记》被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推荐为“农家书屋”重点出版物。截止 2013 年 1 月，《农民日记》已 7 次印刷，发行量高达 4 万 5 千册。

[3] 署名北原，自称退休职工，曾去法国、日本、台湾等地游览，在各地街头均接到一些赠阅报刊，都有“中国三年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的内容，回国后即在网站发表《人口非正常死亡问题的若干解析》一文。其中说：某些西方敌对势力反复炒作中国饿死几千万人，而且一再夸大，把它描述成是中共的“蓄意性罪恶”，企图动摇和否定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北原何许人也？偏爱到西方敌对势力盛行的地方旅游，又收到那么多恶意中伤的资料，回国后不辨真假大肆宣扬，意欲何为呢？

四、疯狂的大跃进

“大跃进”运动是指 1958 年至 1960 年间，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极“左”路线的运动，是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1]及其以后不断地错误批判 1956 年反冒进的基础上发动起来的，是毛泽东极端“左”倾冒进的产物。是毛泽东狂热冲动造成的恶果，是一场因“伟大领袖”愚昧无知、妄自尊大、刚愎自用和意欲称霸于世界而造成的民族大灾难！

1958 年 8 月 17 日至 30 日，在毛泽东直接操控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成员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以及政府各有关部门党组的负责人。会议通过的文件表明，毛泽东及其死党在经济建设方面急于求成、在生产关系方面急于过渡的“左”倾错误指导思想，已经发展到了极为严重的程度。

1957 年，毛泽东以阴谋、阳谋等卑鄙手段压制民主，堵塞言路，禁绝了爱国知识分子的忠谏。毛泽东日益骄横跋扈，逆耳之言全被拒之门外。淫威之下，阿谀逢迎、趋炎附势之徒越来越多。他洋洋自得地发动了大跃进，于是“高产卫星”连连升空。自愿挣表现的钱学森立即加以论证：“亩产 4 万斤不是空谈”（见 1958 年 6 月 16 日《人民日报》）他还在一份杂志上证明：每亩土地可吸收能量 94 万斤，亩产粮食至少 5-8 万斤（笔者注：稍具一点点农业知识和学过初等算术的人都懂得，只要知道稻谷的千粒重和松装比重，自然算得出来容积，如果亩产真能有五万公斤的话，把晒乾风净的稻谷堆在一亩面积的地坪上，堆积高度在 0.2 米左右。那位善于逢迎的科学家钱学森据说知识渊博，怎么利令智昏到这种程度呢？）。农民出身的毛泽东被鬼迷心窍，竟然听信了钱学森的胡说八道，随之而来的倒行逆施终于酿成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一场大祸。遍布城乡的大饥荒导致国民经济严重衰退，数亿民众陷于困难时期。

毛泽东迷恋高产、高产、高产。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疯产骗子应声而出。毛泽东为此提出“粮食多了怎么办？”的“难题”，虚夸和造假已成了“史无前例”的历史笑柄，更成为国人罹受“史无前例”大灾难的前奏。湖北王任重主管的麻城孝感水稻亩产 6 万斤，李井泉执掌的郫县亩产稻谷 8 万斤，韦国清麾下的环江县亩产水稻 13 万斤，河北徐水亩产红薯百万斤。这是党的喉舌《人民日报》公布的数字，而且全有验收纪录。敢有怀疑者，纵不坐牢

也难逃被批判斗争。有好事者，如去查阅当年的各省报刊，定能看到更多的疯产纪录。毛泽东见了这些疯产纪录，明知是假，却要假戏真唱。大笔一挥，征购粮的数额当然也就大跃进起来。正当报刊宣扬公社食堂吃得饱吃得好时，食堂已经烧干锅煮眼泪了。国庆十年天府之国的省会成都街头就出现过饿殍，警察悄悄处理完事，当然不会洩密。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毛泽东等人极度自信，在胜利面前冲昏了头脑，自以为与天斗、与地斗无所不能，所向无敌[2]，盲目而又狂妄地夸大主观意志和主观能动性的作用，因而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提出之后，没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就轻率地推动贻害无穷的“大跃进”。

毛泽东少年时期即有出人头地的妄想。他应试小学五年级招生考试，交上去的答卷就抄录了一首“咏蛙”诗。“独坐池塘如虎踞，绿杨树下养精神。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1935年10月遵义会议后，他刚进入当时的领导圈子，有了部分军事指挥权，便唱出了“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

1937年丁玲到了延安，毛泽东与其过从甚密。丁玲曾坦言他们三天三夜在一个窑洞里。某次在延安瓦窑堡与丁玲深夜密谈，毛问道：“丁玲，你看现在咱们的延安像不像一个偏安的小朝廷？”丁玲回答说：我看不像，没有文武百官嘛！”“这还不简单呀！”主席马上把毛笔和纸推到我面前，说，“来，你先开个名单，再由我来封文武百官就是了。”毛主席一边写名字，一边在这些人的名字下面写官职，这个是御史大夫，那个是吏部尚书、兵部尚书什么的，还有丞相、太傅等等。弄完了这个，他突然又对我说：“丁玲，现在文武百官有了。既然是个朝廷，那就无论大小，都得有三宫六院呀！来，来，你再报些名字，我来封赐就是了。”一听这个，我马上站起来说：“这我可不敢！要是让贺子珍大姐知道，她肯定会打我的”，据说毛封贺子珍为皇后，封丁玲为贵妃。张闻天夫人刘英在一篇回忆文章中曾提到毛泽东常称张为“明君”（张闻天1935年10月—1943年4月期间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称刘英为“娘娘”。

1980年，丁玲在庐山疗养时曾回忆说：这尽管是玩笑，但也确实说明了毛主席的头脑中确实是有帝王思想啊！他晚年之所以会犯大错误，尤其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大错误，不能不说他的帝王思想起了不小的作用啊！

1949年毛泽东进入北京、入住中南海，野心便日益膨胀。不过因朝鲜战争而受阻，未敢张狂表现。昔日陈胜在大泽乡揭竿而起时曾高呼“帝王将相宁有种乎？”项羽看到秦始皇巡游会稽的盛况不禁喊出“彼可取而代之也”均表明了一代强人的雄心壮志。成功以后若能以人为本、重视民生、强国富民者，被视为有道明君。中国历史上的开元、文景时期曾有过短暂的太平盛世。只为了霸权而谋求个人享受、视民为草芥、独裁专政者，如秦始皇，洪秀全之流必定是暴君昏君，遗臭万年。毛泽东的所作所为，诸如嗜杀成性、暴虐无道、口蜜腹剑、阴谋阳谋、诛杀异己、残害忠良、骄奢淫逸、道德败坏等在暴君中皆属下下之列，概属于民族罪人。

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毛泽东觊觎共产世界霸主的野心日益彰显。无奈国民经济的发展水平远低于苏俄和欧美各国，必须奋力赶超，方能立于世界。真正为人民的领袖，应尊重人民，着力于发展生产，轻赋税、免徭役。逐步

提高人民的福祉，让老百姓心情舒畅、安居乐业。政权自然会日益巩固。毛泽东口头上喊着“为人民服务”，想的则是自己做霸主，而不顾老百姓死活。他说过“核战争有什么了不起，全世界 27 亿人，死一半还剩一半，中国 6 亿人，死一半还剩 3 亿，[3]”当大跃进的恣意妄为造成遍布城乡的大饥荒而导致非正常死亡人数猛增至千万以上时，刘少奇胆战心惊地对毛泽东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毛听不得逆耳之言，由此对刘少奇之忌恨日益加深。嗣后，他费尽心机用了几年时间，殚精竭虑地以叛徒、内奸、工贼之罪名将刘少奇囚禁于河南开封一地地下室。1969 年 11 月 12 日刘少奇终于耐不住折磨死于非命。时年 71 岁。

毛泽东妄图通过所谓的大跃进，使中国在 15 年或更短的时间内，跃入世界强国前列，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十年内超过英国、十五年内赶上美国（所谓“超英赶美”）。

1958 年 8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会议，确定了一批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提出 1958 年钢产量翻番，作为实现“大跃进”的重要步骤，必须达到 1070 万吨。

“大跃进”运动，在生产发展上追求高速度，以实现工农业生产高指标为目标。要求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成倍、几倍、甚至几十倍地增长。例如，提出钢产量 1958 年要比 1957 年翻一番，由 535 万吨达到 1070 万吨，1959 年要比 1958 年再翻番，由 1070 万吨达到 3000 万吨。粮食产量 1958 年要比 1957 年增产 80%，由 3900 亿斤达到 7000 亿斤左右，1959 年要比 1958 年增产 50%，由 7000 亿斤左右达到 10500 亿斤。“大跃进”运动在建设上追求大规模，提出了名目繁多的全党全民“大办”“特办”的口号，例如，全党全民大炼钢铁，大办煤矿、大办铁路，大办电力，大办万头猪场，大办万只鸡山。在这样的目标和口号下，基本建设投资急剧膨胀，三年间，基建投资总额高达 1006 亿元，比一五计划时期基本建设总投资几乎高出一倍。积累率突然猛增，三年间平均每年积累率高达 39.1%。由于硬要完成那些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必然导致瞎指挥盛行，浮夸风泛滥，广大群众生活遇到了严重的困难。

1958 年 6 月初，国家计委提出《第二个五年计划要点》，其中提出五年超过英国，十年赶上美国。这个文件得到了毛泽东的首肯，并批示：“这是一个很好的文件，值得认真一读”。到了 6 月 17 日，又提出“两年超过英国”的报告，毛泽东看后，非常高兴，又亲笔批示。因为是领袖亲自批示的，文件精神很快就传达到基层单位。大家听后既兴奋又茫然。兴奋的是落后的中国，能够超过英国、赶上美国，确实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茫然是大家不知道如何赶超，英、美国国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无人所知。报纸上天天宣传西方国家是腐朽的、没落的、衰亡的、垂死的，正在一天天烂下去。既然就要烂透了，为什么还要赶超呢？是比赛哪个烂得快吗，谁也说不清。当时消息的来源，只有一家官方的报纸，没有其他的渠道。既便是对英、美国家的报道，也是社会的阴暗面，至于全面的情况，国人可谓一无所知。学习的结果，只能是做好本职工作，党叫干啥就干啥吧！

1958 年秋，农业战线传来“喜讯”，国内各大媒体先后刊登湖北省长风农业生产合作社，早稻亩产 15361 斤，放了一个大“卫星”。随即农业部公布夏粮产量同比增长 69%，总产量比美国还多出 40 亿斤。《人民日报》喜讯不断，捷报频传。标兵榜样天天涌现，高产卫星日日升空。亩产万斤粮的消息层出不穷，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人们议论纷纷，怎么粮食特大丰收，

却加强了定量管制呢？随之就普遍实行购买粮食制品必须使用粮票了。有的人不相信粮食大丰收，立即被扣一个反对国家粮食政策，污蔑社会主义的帽子。从此人们再也不敢就粮食问题妄加议论了。肚子饿瘪了只能悄悄地紧紧裤腰带。

《人民日报》带了头，地方报纸纷纷效仿。之后，各地区抓农业的领导干部，亲自抓“试验田”。到了秋收季节，亩产万斤粮的报道，便接踵而来，从南到北比比皆是。更有甚者，亩产不仅能够产万斤粮，而且还能够产十多万斤粮。

1958年10月1日《天津日报》报道，天津市的东郊区新立村水稻试验田，亩产12万斤，并称在田间的稻谷上可以坐人，公开让群众参观。相关报纸刊载了大幅照片。吸引了无数人的目光。新立村位于天津市东郊，市内各单位便纷纷组织人员前去学习，到了田间，看到在一亩地中，稻子一棵挨着一棵，不见空隙，如同一个大稻子垛。有人出于好奇，看后便问带领参观的人员（非农民），这些稻子是如何种植的？怎样管理的？经介绍是采用密植的办法，深翻土地，多施肥料，白天要用鼓风机向里边通风，晚上要有灯光照射。参观后，大家还是有很多疑虑，在当时也就不便多问了。毛泽东亲自视察过新立村的“试验田”伟大领袖既可高瞻远瞩，又能明察秋毫。难道还有假的吗？由此，天津市东郊新立村在全国名声大噪，显赫一时。但好景不长，新立村风光了几天就露了原形。第二年饥荒遍野，新立村随之销声匿迹，为什么隐姓埋名了呢？原来又是个弄虚作假的典型。10月8日和10日两天，《天津日报》还分别报道过天津市双林农场“试验田”，亩产稻谷126339斤的特大消息。一时轰动全国，真可谓压倒群雄独领风骚。谁知后来揭露还是一个假家伙。

1958年底，国务院为满足毛泽东的意愿，使钢产量比57年翻一番，提出了“以钢为纲”的口号，号召全民炼钢。但由于不懂技术，不知道如何炼钢，甚至不知道钢和铁有什么区别。为了完成炼钢任务，只有把家里沾点儿铁的物件，铁锅、铁铲、护栏、门窗等丢到炉火中熏黑，或烧结成一个个的铁疙瘩。既消耗了燃料、电力，又毁坏了现有器具，造成极大的浪费。却成了炼钢的伟绩。

冶炼钢铁需要铁矿石、焦炭等材料。由于铁矿不足，于是迫使三千万农民上山采矿，导致现有田地因无人耕作而荒芜，粮食产量锐减。

炼铁炼钢都需要大量燃料。只好上山砍伐林木，把一座又一座青山砍得光光的，破坏了水土保持，引发日后泥石流频繁出现。其实这些天灾都是人为的。

1975年，笔者曾趁检查评比农业学大寨成果之机会，乘车游览了四川天全、芦山县境内绵亘数十里的高山，金龙山和纱帽山上的植被俱遭破坏，只留下了直径一尺有余、高约一尺的树桩。据当地老乡说，1958年前那里曾经是大树参天、野兽出没的原始森林，七八个人不携带武器是不敢进山的。

广东增城是全国著名的荔枝之乡，大跃进中增城已经挂满了果子的荔枝树在此浩劫中大部分被砍去用作炼钢了。

建造炼铁高炉、炼钢平炉、转炉，都需要耐高温的建筑材料，中国敢于冒称专家的很多，什么牛都能吹，有人说年代越久远的砖越耐烧，于是把古代文物建筑拆了，把那些并不能承受高温的陈年砖块拿去建造炉子，炉子烧坏了，一斤钢也没炼出来，还说文物也要为炼钢服务。

要说对中国自然生态的破坏，三个后三十年也抵不上“大跃进”三年。以河南省为例，“大炼钢铁”几乎砍光了豫南大别山、桐柏山上的森林。由于大炼钢铁和维持大食堂的燃料需要，豫东平原地区几乎所有的茶杯粗以上的树木都被砍伐殆尽，各个村庄都光秃秃的像被火烧了一样。黄河故道由于植被荡然无存，导致严重沙漠化，春季几乎每个星期都有沙尘暴，遮天蔽日，白昼如同夜晚，狂风卷走了百姓屋上铺的麦草，裹挟的沙子打死了麦苗，造成减产甚至绝收。“大办水利化”提倡“一块天对一块地”，到处开挖运河和坑塘，完全破坏了原有的自然水循环系统，使地下水位上升，将盐碱带到地表，大片良田变成寸草不生的盐碱地，白茫茫一片。豫南豫西山区几百万人大修水库，累死饿死百姓不计其数，建起的水库由于不按科学办事，绝大部分有严重质量缺陷，未见其利反而大受其害。惨绝人寰的豫南大水灾，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几个“大跃进”时代修建的大型水库溃坝导致的大洪水。直到今天，残留的“大跃进”时期的病危水库仍在危害百姓，一到汛期即被列为防范重点。河南一省尚且如此，全国可想而知。

1958年8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会议，到月底结束。在会上研究了超英赶美、大炼钢铁和成立人民公社等重大问题。随后，会议精神很快就传达到基层单位。从9月份开始，在工业企业当中，打破了常规，为了完成全年的生产计划，实行大干苦战，每日工作12个小时以上。霎时间，整个单位就沸腾起来。职工在生产一线苦战，生产记录不断刷新，高产“卫星”也是连续不断升空。为了鼓舞职工的生产情绪，宣传报道也搞得热火朝天。对超额完成计划的车间、班组和机台，由单位领导亲自出面，敲锣打鼓送去喜报，给予鼓励，职工之间展开了你追我赶的火热局面。管理人员，也走出科室到现场办公，为生产第一线服务。每到中班或夜班，职工食堂的炊管人员，把饭菜送到车间。即便是节假日，职工也放弃了公休，主动到工厂上班。这样的苦战，一直持续到年底，方告一段落，恢复了正常的作息时间。回头一看，所谓战绩就是贴在墙上的几张残破红纸。到此时，全体职工已经是疲惫不堪筋疲力尽了。

在大跃进过程中，出现了很多虚报产量的事。其中最著名的是河北徐水县，为了学习农业经验，1958年10月份，各地党委组织群众到徐水县参观。因为徐水县在“大跃进”的过程中，曾经放了一亩地产山药120万斤、小麦12万斤、皮棉5000斤、全县粮食亩产2000斤等高产“卫星”。毛泽东在1958年8月4日到徐水县视察时，县委书记张国忠亲自向他汇报的，毛泽东听后大加赞许。《人民日报》随之竭力吹捧。从此，徐水县这个名字响遍全国，一时成为“大跃进”的明星，各地的党政领导干部纷纷来到此处学习取经。进入县城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巨大的标语口号，什么“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徐水号称一年收获粮食12亿斤。

《人民日报》对这种弄虚作假的欺骗行为大肆宣扬、赞誉。依照浮夸虚报的数字制定的国家征收粮食额度，竟然大大超出实际产量。农民家里的桶缸钵俱都被翻了一个底朝天，还完不成征购计划。这是导致大饥荒的主要原因。几年之后才知道，张国忠被戴上了反革命分子帽子，受到了管制处分，原来种种高产数据都是骗局。

“**浮夸风**”作为“大跃进运动”的伴生事物之一，肆虐横行。由此引发的“反瞒产”、高征购，搜刮尽了农民的口粮和留存的种子，在当时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浩劫就是大量农民的非正常死亡。大跃进之后的几十年甚至直至

现在，独霸一方的某些官僚，为了追求政绩，仍旧使用虚报数据，如财政收入、GDP总量、国民收入，甚至计划生育玩的都是数字游戏。

1958年11月至1959年7月间，在饥荒日益严重，民间怨声载道，众多党内同僚质疑声中，毛泽东不得不表示要纠正左倾错误，被迫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压低1959年的工农业生产指标。庐山会议召开之际，要求党内高级干部畅所欲言，意见不少，彭德怀写了一封三千余字的信直呈毛泽东，委婉地对大跃进的弊病提出批评，毛泽东看了以后竟然恼羞成怒，把一个预定纠左的会议变成“反右倾”批判所谓彭德怀右倾反党集团，使纠正错误的努力中断，而党内“左”倾错误更加发展。1960年提出要长期保持“大跃进”，继续要求工农业生产达到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对1959年上半年压缩指标进行不公正的指责，一味强调反对右倾，极力宣扬鼓足干劲。在各地粮食告急的情况下，还不断追加基建投资、追加基建项目，钢年产量指标一吨也不能少。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又再度全面地泛滥起来。

从1958年“大跃进”开始的三年“左”倾冒进，导致了国民经济比例的大失调，并造成严重的经济困难。

毛泽东发动大跃进完全不是为了强国富民，1959年初，大跃进的弊病日益显露，国民经济遭受严重损失。物资匮乏，饥荒遍野。公共食堂难做无米之炊，万千饥民以草根树皮度日。稍有理智、稍有爱国之心、稍有以民为本思想的正常人，绝对应该悬崖勒马，改弦更张，救民于水火。狂人毛泽东对此置若罔闻，仍然一意孤行。他毫无工业常识，不讲经济规律，无视客观现实。继续蛊惑群众。扬言只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发扬敢想敢说敢干的精神。就可以创造世界奇迹。就可以亩产万斤粮，日产万吨钢。鼓动和强迫全国各条战线“反右倾”，以致工农业生产连续大衰退。

1958年的钢产量，原计划是620万吨，这是2月1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通过的。5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把本年的钢产量增加到800万至850万吨。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钢铁翻一番，就是要从1957年的535万吨达到1958年的1070万吨。河南省新乡市放出一天产生铁102万吨的高产“卫星”。周恩来看到这个材料后，问身边搞过钢铁生产的秘书顾明这有无可能，顾明回答说：我们在鞍山钢铁厂，炼一吨生铁，需要铁矿石三、四吨，炼焦用煤二、三吨，加上石灰石、辅助材料等要十多吨。102万吨生铁，需要1000多万吨的运输量，所以这不可能是真的。周恩来听了只是轻微地摇了摇头，未明确表态。

大批农民上山炼铁，许多地方分不清什么是铁矿石，把比较重的黑石头块当成铁矿，也弄不清一吨是多少，把一担当作一吨。大办钢铁，使国家直接损失几百亿元，大伤了我国经济的元气。反对右倾的运动，使经济战线上一些敢讲真话的人几乎都挨了批斗，有的甚至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会议上，确定要把钢铁作为全党的第一位大事来抓，年计划要完成1070万吨，实现翻一番。时间已经过去了四分之三，还有一个季度要完成这个目标，可以说是根本办不到的。既然中央已经决定，只能完成任务，于是便号召全民大炼钢铁，大搞群众运动。不是专业工厂，又无炼钢设备，更不懂炼钢技术，如何炼出钢铁？岂不是天方夜谭。在“没有干不到的，只有想不到的”口号指引下，要大胆解放思想。还是从农村开始，农民在田间垒起了小土炉，就炼起钢来了。经验很快传开，顿时，田野间的小土炉星罗棋布，火光冲天。农民兄弟能够做到的，城里工人老大哥就更没

有问题了。上级领导机关给企业直接下达了钢铁指标，各企业也都先后开始炼钢了。请看当时新华印刷厂一位职工的回忆：“厂领导决定抽出一部分年青的管理人员，组成炼钢队伍，我也被抽调出来大炼钢铁。由于厂院存有纸张、油墨之类的原材料，又都是易燃物品，只好选择厂外职工食堂的小院内，盘起了几座小土炉，通上风箱，将煤炭点燃后再续上废铁，就开始冶炼起来。煤炭消耗很多，炉火也很旺盛，可就是化不开废铁，反而把土炉给烧塌了。经过了解，方知修土炉尚需耐火材料。于是就请教懂炼钢技术的师傅，重新垒起了土炉。这次确实有收获，终于把废铁给烧结在一起了。因为是废铁与煤炭混合烧制，所以炼出来的钢都成为豆腐渣形状，这就是我们炼出来的钢铁。上报数字，赢得一阵表扬”这些事情老百姓心里都很清楚，在当时的情况下，又有谁敢于发表个人的意见呢？因为1957年反右派运动刚刚过去。如果说错了话，不知道又要扣上一顶什么名称的“帽子”呢？老百姓只好“唯上是听”“唯上是从”罢了！

1959年的路子继续1958年的走，继续“以钢为纲”，挤农业，挤轻工业，挤人民生活，市场情况越来越紧张。1960年又是高指标，国家经委年初就提出“开门红、满堂红、月月红、红到底”的口号，要动员9000万人搞钢铁。1958年到1960年这三年“大跃进”，实际上是我国经济建设史上的三年大冒进。积累率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由1957年的24.9%上升到1959年的43.9%，创历史最高水平。三年基建投资总额超过“一五”期间投资总额的1.5倍，而农业总产值1960年比1957年下降30%。它使我国国民经济的比例遭到严重破坏，给国民经济造成极大损失。再加上年年都有的局部地区自然灾害，我国经济陷入了严重的困境：物资缺乏，通货膨胀，物价上涨，人民生活困难。自建国以来“老子天下第一”的心态，在斯大林去世、赫鲁晓夫粗鲁莽撞的机遇下，迅速膨胀为“超英赶美”压苏联，争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地位，“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极度狂燥状态！大跃进是毛泽东狂热冲动的产物，是一场因“伟大领袖”个人好恶和乖戾残暴性格而造成的民族大灾难！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严重破坏了我国的生产力，促使国民经济水平失调，人民生活水平下降，造成了我国1959--1961年的连续三年的困难时期。从1959年到1961年，长时间被称为“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国民经济跌入空前的萧条低迷。全国工厂关停近半，2千多万新招职工被驱回农村。因粮食的短缺，广大乡村爆发大面积的饿死人现象，非正常死亡人口超过3千万，个别地方甚至出现了“人相食”的惨况。历史教训不容忘记，毛泽东的罪恶必须清算。

附注

[1]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扩大），简称中共八届三中全会（扩大）于1957年9月20日—10月9日在北京中南海召开。

会上，邓小平作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和会议的总结发言；毛泽东在会议结束前作了题为《做革命的促进派》的讲话。

全会在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问题上，改变了党的八大关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论断，认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对1956年采取的纠正冒进倾向的正确方针作了错误的批判，这对后来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产生了不良影响。

[2]1964年开展了四清运动，在这次运动中，毛泽东与刘少奇的矛盾激化。毛

泽东对刘少奇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

[3] 这个谬论是毛泽东访苏时在克里姆林宫说的。1961年联合国大会上，苏联总理赫鲁晓夫发言时特意把它拿出来当笑料。结果全球人类都知道了：原来统治中国的，是一个视百姓如草芥的战争狂人。

五、严酷的人民公社

所谓人民公社，就是把大家集中起来，有饭一起吃，有事一起干。这是什么呢？兵营！按照毛泽东的说法，叫做：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说白了就是要把整个社会变成一个组织有序便于奴役的兵营。

但这不是毛泽东的发明，在他之前，已经有过一些号称雄才大略的人物做过类似的实验，无一例外的都失败了。

第一个有如此痴心妄想的就是毛泽东的偶像、两千多年前的嬴政。一个邯郸弃儿在吕不韦运作下侥幸于13岁登上王位，20岁亲理朝政。他独揽大权后，以严刑苛法束缚百姓，收尽天下兵器铸成十二金人，防民造反。他废除封建宗法，推行郡县制。官员的任命权概属皇帝，实行中央集权，最上层就是嬴政和他的子孙。自称始皇妄图传万世而不朽。

他以暴政治国，史书多有记载：

1、徵敛无度，赋税奇重：农民收获2/3以上缴给国家。维持庞大的军费开支和盖宫殿、修长城，造陵墓等工程建设。

2、箝制思想，焚书坑儒：嬴政妄图统一民众思想，规定史书非秦纪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论》者，悉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

3. 骄奢淫逸，滥用民力：在首都附近造阿房宫、在骊山北麓修始皇陵，在咸阳周围复制六国宫殿二百七十余座。动用民夫七十万人以上。服兵役人数远超二百万，占壮年男子三分之一以上。

4、严刑峻法，民怨鼎沸：秦始皇主张轻罪重罚，单是死刑就有车裂等十多种，还有连坐和族诛等刑法，一家犯法邻里连坐，一人死罪诛及三族，百姓动辄被罚充苦役或惨遭酷刑。修骊山陵墓即有刑徒七十万之众[1]

5、刚愎自用，独断专行，拒谏饰非，不纳忠言：嬴政性格内向、多疑、妄想、专制、暴虐、冷酷无情。开以言定罪之先河。严禁妄议朝政，诽谤和妖言罪皆受重刑。辅佐其夺取天下的韩非竟被五马分尸。长子扶苏派去做大将蒙恬监军。双双死于非命。

6、个人崇拜，登峰造极：先后五次大规模巡游，在名山胜地刻石记功，炫耀声威。嬴政生前听到的是一片颂歌。自称始皇，意欲万寿无疆。派徐福率五百童男五百童女越东海求长生不老之药。却只活了49岁。

秦始皇的所作所为都是建立在对广大劳动人民残酷剥削和压榨之上的，这种剥削和压榨超过了社会所能承受的限度，致使社会简单的再生产都难以维持下去，他失败了。失败的原因并非完全是继任者无能，而是那些严刑苛法条文制度根本不适合社会需要。阻碍了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民众不堪忍受，陈胜、吴广率先揭竿而起，天下响应，群雄争霸，导致暴秦二世而亡。嬴政作恶多端，死后必定是遗臭万年。

过了一千多年，又有一位皇帝重新拾起这个梦想，他叫朱元璋。朱元璋依借社会底层民众的力量赶走了元帝国，重新建立起汉人帝国，然后他又制

定一系列律令，希望中国成为一个井然有序的帝国。他大开杀戒。从七品芝麻官杀到第一功臣开国丞相李善长，把官吏来来回回杀了好几遍。为了加强中央集权，他废除了宰相制度。亲自操控锦衣卫、东、西厂、内行厂等四大特务机构，缇骑四处，天下骚动。最后，他依然失败了。

从嬴政到朱元璋，他们都有一个极大的矛盾。都妄图用强权和暴政压制和束缚百姓。尤其是禁锢思想，严防腹诽和妄议。从秦帝国到明帝国，妄自尊大，自认上国。沾沾自喜于万邦来朝，依然躺在四大发明上。思想没超过春秋诸子之范畴。

毛泽东青年时期幻想过改良，崇拜过孙文、梁启超、康有为。读了《世界英豪传》，又十分钦佩华盛顿、林肯、卢梭、孟德斯鸠；1917年和1919年，毛泽东曾两次居住在湖南长沙岳麓书院的半学斋，在此期间他伙同蔡和森、萧瑜（萧子升）、罗章龙、彭璜、萧三、何叔衡、熊瑾玎、陈子博、周世钊、易礼容、李凤池、邹彝鼎等创办了《湘江评论》，建立了新民学会。由萧瑜任总干事。新民学会取义于“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学会起初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并未提及什么主义。与马克思、恩格斯毫不沾边。

1918-1919年间曾一度宣扬“新村主义”[2]、年轻人追赶时髦而已。

1918年9月，毛泽东和李维汉、蔡和森、罗章龙、萧子升等二十四四个湖南籍老乡去了北京。那时列宁在德国威廉二世支持下，用暴力推翻立足未稳的临时政府，建立了一党专政的苏联。所谓“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李大钊、陈独秀、张国焘等掀起了一股研究马克思学说的热潮。北京大学的十余个激进青年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毛泽东时在北大图书馆当临时工，与李大钊、陈独秀等人见过面，却极少接触。毛泽东不懂外语，当时马克思著作尚无中文译本。毛的兴趣也不高，在北大不到半年就径自回湖南去了。一方面在小学充任教师，一方面着意于《湘江评论》和新民学会。

新民学会是1918年4月14日在湖南长沙刘家台子蔡和森家中召开的成立会。蔡和森1919年底偕母亲葛健豪、妹妹蔡畅与女友向警予前往法国，在法国期间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乃多次致信毛泽东，力主成立共产党。

1921年元月在长沙的新民学会成员就走什么道路问题讨论了两个多小时。最后表决的结果是：参加会议的18名会员，尽管都没去过苏联，但都听说那里发生了“革命”，掌控了政权。有12人赞成布尔什维克主义。至此，新民学会始宣扬为奉行马克思主义为主要信仰的团体。对马列主义一无所知的毛泽东便俨然成为马列主义者了。1921年3月后，由于会员减少，新民学会停止了活动。

毛泽东性喜读书，也看过不少书。中南海内他的书房里藏书近十万册。其中当然不乏马列名著。但从摆放位置、翻阅程度可以看出，《二十四史》《资治通鉴》《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等是他最常看的书。毛泽东一生喜欢读《三国》，从少年牛背，到老年床头，《三国》伴随终身，成了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重要参考读物。三国时期是烽火连天的岁月，也是人才辈出的乱世。雄才大略的曹孟德，智慧超群的诸葛亮，风流倜傥的周公瑾，折而不挠的刘玄德，一个个都是中国历史上的杰出人物，毛泽东曾多次对三国时期的英雄豪杰点评议论。

1958年，他笔锋一转，突然对偏居一隅、不算出众的三国人物五斗米教

教主张鲁不惜笔墨，极力推崇。又是出于何故呢？

五十年代初，出于增加粮食产量和提高单产的目标，掀起了开荒和兴修农田灌溉系统的高潮。1950年10月14日，政务院发布《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毛泽东题写了“一定要把淮河修好”八个字，镌刻在一块耸立在洪泽湖大堤内坐西朝东的乾隆御碑上，吸引着过往行人。

治淮工程时断时续。“五十年代淘米洗菜，六十年代洗衣灌溉，七十年代水质变坏，八十年代鱼虾绝代，九十年代身心受害”，这段歌谣反映了淮河两岸民众的真实感受。

“一定要把淮河修好”喊了几十年，修好没修好，淮河见分晓。1991年淮河流域暴雨成灾，**2003年大洪水**，2007年淮河特大洪涝。使政府进一步了解了淮河防洪的严峻局面。于是国务院又开会编订治淮规划，但愿“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碑刻能起点警示作用，少喊两句空话，多干点实事。让淮河沿线的炎黄子孙能过上安定日子。

五十年代的水利建设，是导致农村组织形式改革的因素之一。对此，薄一波作过说明：“由于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要求在大面积土地上统一规划，修建长达几公里、几十公里、甚至上百公里的灌溉渠系，一些较大工程的建设需要大批的劳动力和资金，建成后的使用又要求做到大体与受益单位的投入（劳动力、土地、资金）相适应，这就不仅涉及农业生产合作社之间的经济关系问题，而且还涉及村与村、乡与乡、区与区，甚至县与县之间的经济关系问题。在当时的条件下，不可能也不允许根据商品经济的原则，按照各农业社投入的大小，与受益挂钩进行结算，只能从调整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规模和调整行政区划方面打主意”。1957年冬，投入农田水利建设的劳动力达到一亿人，这种客观形势加速了小社并大社的步伐。1956年出现的高级社，规模已较大。安徽省有16个社规模在3500户以上，河南省千户以上的大社有495个。1958年，为了适应农田水利化和在几年内实现耕作机械化的目标加速了向大社的转变。辽宁平均每社2000户左右，最大的为18000多户；河南平均每社4000户左右。

在这种背景下，中共中央开始了对农村组织制度的新构想。而且还要找一点理论根据，以证明是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于是责成邓力群编马恩列斯论社会主义，陆定一编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还要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搞个试验（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党史出版社，第728页第732页）邓力群、陆定一组织一帮“秀才”在马列书堆中寻章摘句，印刷成册，以中共中央名义下发。彰显中共要员通晓马列。

毛泽东则连忙翻起古书来。他要在中国历史的漫漫长河中寻找遗迹，证明中国农民历来就具有共产主义梦想。《三国志张鲁传》恰好就有他所需要的记载，张鲁政权的以道治国、平均主义深深牵动了毛泽东的思绪，成了他推进人民公社的思想源泉和原始教材之一。于是，在毛泽东眼里，张鲁和马克思并驾齐驱了。

1958年11月，毛泽东在参加郑州会议时，直接坦露了对张鲁政权的观点。他说：汉中有个张鲁，他搞过吃饭不要钱，凡是过路人，在饭铺吃饭吃肉都不要钱。他搞了30年，人们都高兴那个制度，这有种社会主义的作风，我们的社会主义由来已久了。（按照毛泽东的说法，一千八百多年前中国就有社会主义了。）

1958年12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说，我们找到了一种建设

社会主义的形式，便于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也便于由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全民所有制，便于办工农商学兵。他再次把《张鲁传》拿出来，显示他博古通今。说中国历史上早就有人民公社这种组织形式，不要大惊小怪，不要当小脚女人，而是应该面对现实，大刀阔斧地把公社化运动引向深入。

毛泽东批示印发《三国志》中的《张鲁传》，让中央委员认真学习，他还在1958年12月7日和10日写下长段文字，对区区几百字的《张鲁传》进行了两次倾情批注。连同会议文件一同印发给与会人员。从中共历史看，在高规格的中央全会上把古代的个人传记作为会议材料下发的，唯有《张鲁传》。这令与会的中央委员感到突然，也令后人感到不解。怎么号称马列主义者的伟大领袖信奉起满嘴符咒的张天师来了？其实，毛泽东既不懂马列也不懂张氏的五斗米道。现将这两段批语抄录于下：（原载于《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1993年版）

批语一：晋、陈寿三国志张鲁传这里所说的群众性医疗运动，有点像我们人民公社免费医疗的味道，不过那时是神道的，也好，那时只好用神通。道路上饭铺里吃饭不要钱，最有意思，开了我们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河。大约有一千六百年的时间了，贫农、下中农的生产、消费和人们的心情还是大体相同的，都是一穷二白。不同的是生产力于今进步许多了。解放以后，人们掌握了自己这块天地了，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但一穷二白古今是接近的。所以这个张鲁传值得一看。张鲁的祖父创教人张陵，一名张道陵，就是江西龙虎山反动透顶的那个张天师的祖宗，水浒传第一回描写了龙虎山的场面。三国时代的道教是遍于全国的，群众运动的。在北方有天公将军张角三兄弟最为广大的革命的群众运动，他们的口号是“苍天当〈己〉死，黄天当立”[3]。苍天，汉朝统治阶级。黄天，农民阶级。于吉在东吴也有极大的群众运动，是那时道教的一派。张道陵张鲁是梁、益派。史称这派与北方派的路线基本相同。其后，历代都有大小规模不同的众多的农民革命斗争，其性质当然与现在马克思主义革命运动根本不相同。但有相同的一点，就是极端贫苦农民广大阶层梦想平等、自由，摆脱贫困，丰衣足食。在一方面，带有资产阶级急进民主派的性质。另一方面，则带有原始社会主义性质，表现在互助关系上。第三方面，带有封建性质，表现在小农的私有制、上层建筑的封建制——从天公将军张角到天王洪秀全。宋朝的摩尼教，杨么，钟相，元末的明教，红军，明朝的徐鸿儒，唐赛儿，李自成，清朝的白莲教，上帝教（太平天国），义和团，为其最著者。我对我国历史没有研究，只有一些零星感触。对上述性质的分析，可能有错误。但带有不自觉的原始社会主义色彩这一点就最贫苦的群众来说，而不是就他们的领袖们（张角、张鲁、黄巢、方腊、刘福通、韩林儿、李自成、朱元璋、洪秀全等等）来说，则是可以确定的。现在的人民公社运动，是有我国的历史来源的。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没有来得及将农民中的上层和中层造成资本主义化，但是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反动联盟，却在几十年中将大多数农民造成了一支半无产阶级的革命军，就是说，替无产阶级造成了一支最伟大最可靠最坚决的同盟军。毛泽东 1958年12月7日在武昌

批语二：我国从汉末到今一千多年，情况如天地悬隔。但是从某几点看起来，例如，贫农、下中农的一穷二白，还有某些相似。汉末北方的黄巾运动，规模极大，称为太平道。在南方，有于吉领导的群众运动，也是道教。

在西方（以汉中为中心的陕南川北区域），有五斗米道。史称，五斗米道与太平道“大都相似”，是一条路线的运动。又称，张鲁等，张陵（一称张道陵，其流风余裔经千余年转化为江西龙虎山为地主阶级服务的极端反人民的张天师道，水浒传第一回“冯太尉误走魔鬼”有极神气的描写，一看使人神旺，同志们看过了吧？），张修，张鲁祖孙三世行五斗三世，行五斗米道。行五斗米道，“民夷便乐”，可见大受群众欢迎。其法，信教者出五斗米，以神道治病；置义舍（大路上的公共宿舍），吃饭不要钱（目的似乎是招来关中区域的流民）；修治道路（以犯轻微错误的人修路）；“犯法者三原而后行刑”（以说服为主要方法）；“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祭酒“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近乎政社合一，劳武结合，但以小农经济为基础），这几条，就是五斗米道的经济、政治纲领。中国从秦末陈涉大泽乡（徐州附近）群众暴动起，到清末义和拳运动止，二千年中，大规模的农民革命运动，几乎没有停止过。同全世界一样，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毛泽东 1958 年 12 月 10 日于武昌

这两条批语存于中央文献中，从行文立意到遣词造句，顶多也就是中学水平。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党校联合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提出的书面报告《关于〈毛泽东选集〉中著作原稿的审核、考证意见》披露，《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的一百六十余篇著作中，由毛泽东执笔起草的只有十二篇，别人拟稿、经毛泽东修改的有十三篇，其余诸篇分别由瞿秋白、周恩来、任弼时、王稼祥、张闻天、谢觉哉、董必武、林伯渠、刘少奇、艾思奇、陈伯达、康生、胡乔木、陆定一、杨献珍、邓力群等，以及毛泽东的秘书、中共中央办公厅有关班子的成员写作。毛泽东署名而已。毛之道貌岸然，沐猴而冠也。

1958 年后，毛泽东一口咬定在他领导下中国已然迈向了“共产主义”的天堂，而作为“共产主义”的标志之一，就是所谓“吃饭不要钱”的“公共食堂”。

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是虚伪的假象，实际上吃的是自己的劳动成果。即如在饭馆吃饭要钱，在家里吃饭不要钱一样，那是因为每月的工资收入已经交给了家庭的主管。毛泽东之所以再三强调公共食堂无比优越，其内在玄机是借此剥夺农民的自有口粮和家产，化私为公，便于对农民加强控制，使农民成为既没有生产资料又没有生活资料的毫无自由的奴隶。毛泽东生长在农村，深知农民对土地的依赖，他用“耕者有其田”“保卫胜利果实”的口号欺骗群众，用暴力手段没收地主的土地和浮财。分给农民后，便动员农民参军，数百万农民兄弟穿上了军装，出生入死，前赴后继，牺牲了上百万生命为中共夺取政权，毛泽东则进入中南海坐上了第一把交椅。

天下甫定，毛泽东即通过“人民公社”将土地收回，耕牛、骡马、犁耙等也公社化了，锅碗盆瓢再交给公共食堂，农民就一无所有了，只好规规矩矩地受其统治。给公社干一天活只挣几角钱，甚至几分钱，还赶不上以往给地主干活的长工。

1962 年，我曾在成都近郊龙爪堰农场劳动半年，与老农多有接触。旧时长工给地主干活，有选择雇主的自由，甚至于跨县打工，没有户口限制，刻薄的地主名声不好，就难以请到长工。按四川的规矩，长工的工资以年计，通常为四石到六石谷子（1600 斤到 2400 斤），东家提供食宿，粗茶淡饭也要让长工吃饱，围腰、草鞋、叶子烟由东家供给，初二、十六打牙祭，栽秧时

晚餐有酒、打谷时要打么台（加餐）。

在所谓象征共产主义天堂的“人民公社”，农民不能任意流动，毫无自由，饿着肚子也要出工，劳动一天只能得相当于几分钱或几角钱的所谓“工分”，年底才能结算。1966-1979年。四川省芦山县芦阳公社万家山生产队140多人，有三分之一的家庭全年收入不够自己的口粮钱。起早贪黑劳动了一年还要欠债。毛泽东口口声声说他是农民的儿子，但在实际上他对农民极尽压榨剥削之能事，阴险狡诈无以复加。其流毒至今也未肃清，号称执政为民的政府仍然靠盘剥农民（含农民工）、压低工农劳动报酬的办法积累财富。国家的财富哪里来的？公务员和大大小小的官老爷是不能创造财富的，他们是社会财富的消耗者，为国家增加物质财富的是农民、工人和其它体力和脑力劳动者，而今这些人依然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

人民公社的杰作就是办大食堂，宣传说，办食堂可以节省各家各户做饭的时间，可以增加劳动时间，更重要的是增加了共产主义因素。资料上说，至1958年底全国共办起了360多万个公共食堂。90%以上的农民在食堂吃饭。因为在食堂吃大锅饭，吃饭不但不要钱，而且还大张旗鼓地宣传敞开肚皮吃饭。许多公共食堂开流水席，社员随到随吃。个别地方还给过往行人大开方便之门，来了就吃，吃了就走。但人们的觉悟终没到共产主义，人们放开肚皮吃，生怕吃少了吃亏，结果一年的收成，只在短短的几个月内被吃空。大食堂不但吃空了生产队的家底，更严重的是挫伤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许多不出工或不出力的人同那些积极出工出力的人同样吃，后者就觉得吃亏，劳动也就不积极了，这也是造成三年自然灾害的一个重要原因。人民公社的“原教旨”指导思想是“一大二公穷过渡”，组织原则即军事共产主义，社会结构为共产、共食、共居的新村乌托邦。人民公社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建立起军事化共产主义体制。

1959年8月，庐山风云骤起，为民请命的彭德怀，在“万言书”中一句“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诘难，激起毛泽东歇斯底里的勃然大怒，一场“反右倾”、“更大跃进”势不可挡。从此，中国社会彻底改变了因面对困境而实施半年之久的调整方向，并由此陷入了长达三年之久而造成4000万人死难于斯的大饥荒和大灾难！“反右倾”运动，在“打倒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同时，党内370余万敢于讲真话的正直之士被打成“右倾反党”分子，这还不包括在9月“鸣放”运动中远远大于此数的被动员起来“鸣放”而治罪的广大社员群众！

但是，毛泽东决不甘心承认失败，更不愿意为他所造成的失败承担责任。

1958年底，公共食堂已经不能让农民吃饱，人们怨声载道，但毛泽东仍然执迷不悟，在翌年七月到八月的庐山会议上他大谈特谈“食堂是个好东西”、“开天辟地”、“了不起”、“合乎历史要求”，并把反对公共食堂列为“右倾反党集团”的罪名之一。因此，庐山会议后全国又掀起了第二次大办公共食堂的高潮。不过，由于高征购和“反瞒产私分”运动，农村中的粮食大部份被收缴国库，“大炼钢铁”、“公社化”等运动造成1959年全国农业大减产，农村存粮很快消耗殆尽，公共食堂面临无米之炊。于是就逼出了所谓的“粮食增量法”和“代食品”。在这个过程中，也充满了“报喜不报忧”的“政治正确”和虚夸造假的“革命作风”。中共则动用所有宣传机构鼓唇弄舌，大力宣扬“连续三年特大自然灾害”“百年未有的严重自然灾害”等等谎言，掩饰人为的罪责。

附注

[1] 西汉初年，文帝、景帝吸取秦亡于严刑苛法的教训，改革刑罚制度。秦代法律规定，罪人的父母、兄弟、姊妹、妻子和子女都要连坐，重的处死，轻的没入为官奴婢，称为“收孥相坐律令”，文帝明令废止。秦代时诽谤和妖言罪皆受重刑，文帝下诏废除。秦代大多数罪人没有刑期，终生服劳役。文帝诏令根据犯罪情节轻重，规定服刑期限，罪人服刑期满，免为庶人，使“罪人有期”。秦代有黥、劓、刖、宫四种肉刑，文帝废除黥、劓、刖，改用笞刑代替。但笞数既多，往往是笞未毕而人已死。因此景帝时，两次下令减少笞数，并对执行笞刑的刑具和执行方法作了具体规定，“自是笞者得全”。

肉刑废除后，刑罚主要为笞刑、劳役刑和死刑，隋朝《开皇律》正式确立了封建制五刑：笞、杖、徒、流、死，并一直沿用至清朝末年。

[2] 法国无政府党人亨利·孚岱于1903年曾在法国与比利时接壤处试办“鹰山共产村”；日本武者小路实笃于1910年在《白桦》杂志上开始宣传新村主义。毛泽东、张昆弟等1918年寄居长沙岳麓书院时，曾计议建设新村；恽代英、林育南1919年在湖北时，也对建设新村作过设想。认为只有新村才是自由社会的大本营。其实，这一思潮只不过是一种中国式的空想社会主义。如同清末李汝珍所著长篇小说《镜花缘》。

[3] “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是东汉末年爆发的黄巾起义军呼喊的口号。“苍天”指汉王朝，汉代官军的衣服以苍青色为主。“黄天”是指以黄巾包头的起义军。意思是说汉朝即将灭亡，取代汉朝的将是黄巾军。所以黄巾军不是宗教活动，更不是社会主义，是以宗教为掩饰的造反组织。张角为东汉太平道创始人和黄巾军领袖。冀州钜鹿人。张角本是个不第秀才，相传入山采药时遇一老人，以天书三卷授之。遂创立了“太平道”，以阴阳五行、符篆咒语为根本教法，号称善治疑难杂症。教病人叩头思过，并以符水饮之，得病日浅而愈者，则云此人信道；其或不愈，则为不信道”。十余年间发展徒众达数十万，遍及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把几十万农民组织成三十六“方”。张角和弟子秘约在甲子年（公元184年）三月五日，各地同时起义。由于叛徒唐周告密，提前于当年二月起义。起义被汉军剿灭，张角病死。

六、彭德怀[1]之死

1953年，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彭德怀从朝鲜回国，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1958年12月，60岁的彭德怀回到家乡湖南湘潭。先后到乌石、韶山、平江等地深入调研。亲眼看到了农村的现状，取得了第一手材料。发现浮夸虚报的数字后，慨叹地说“如此造假，真令人害怕！”他深感小高炉炼铁代价太大，劳民伤财、得不偿失，不是发展方向。在敬老院里看到老人缺吃少穿，以瓜菜充饥，冬天睡篾席，盖破被，他忍不住说：“这是什么幸福院，有名无实！”回京后，他如实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反映了问题。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他先后七次在小组会上发言，反映实际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眼见会议即将结束（原曾拟于7月15日闭会）。《议定记录》两次修改尚未定稿。于是在7月14日给毛泽东呈上一封信，本是彭德怀写给毛的私信。三天之后，毛宣布延长会期，并将这封信印发给全体与会人员。毛泽东随即在会上做了措辞严厉的讲话，使这次本意纠左的庐山会议变成了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

周小舟等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问题进行揭发批判的大会。由此，毛泽东的“极左”邪念日益猖獗，独裁专断横行无忌。乃导致十年浩劫，生灵涂炭。百姓遭殃，贻害无穷。其流毒至今尚未肃清。

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致毛泽东的信全文如下：

主席：

这次庐山会议是重要的。我在西北小组有几次插言，在小组会还没有讲完的一些意见，特写给你作参考。但我这个简单人类似张飞，确有其粗，而无其细。因此，是否有参考价值请斟酌。不妥之处，烦请指示。

甲、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成绩是肯定无疑的。根据国家计委几个核实后的指标来看，一九五八年较一九五七年工农业总产值增长了百分之四十八点四，其中工业增长了百分之六十六点一，农副业增长了百分之二十五（粮棉增长百分之三十是肯定的），国家财政收入增长了百分之四十三点五。这样的增长速度，是世界各国从未有过的。突破了社会主义建设速度的成规，特别是像我国经济基础薄弱，技术设备落后，通过大跃进，基本上证实了多快好省的总路线是正确的。不仅是我国伟大的成就，在社会主义阵营也将长期的起积极作用。

一九五八年的基本建设，现在看来有些项目是过急过多了一些，分散了一部分资金，推迟了一部分必成项目，这是一个缺点。基本原因是缺乏经验，对这点体会不深，认识过迟。因此，一九五九年就不仅没有把步伐放慢一点，加以适当控制，而且继续大跃进，这就使不平衡现象没有得到及时调整，增加了新的暂时困难。但这些建设，终究是国家建设所需要的，在今后一两年内或者稍许长一点时间，就会逐步收到效益的。现在还有一些缺门和薄弱环节，致使生产不能成套，有些物质缺乏十分必要的储备，使发生了失调现象和出现新的不平衡就难以及时调整，这就是当前困难的所在。因此，在安排明年度（一九六〇年）计划时，更应当放在实事求是和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加以认真考虑。对一九五八年和一九五九年上半年有些基本建设项目实在无法完成的，也必须下最大决心暂时停止。在这方面必须有所舍，才能有所取，否则严重失调现象将要延长，某些方面的被动局面难以摆脱，将妨碍今后四年赶英和超英的跃进速度。国家计委虽有安排，但因各种原因难以决断。

一九五八年农村公社化，是具有伟大意义的，这不仅使我国农民将彻底摆脱贫困，而且是加速建成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正确途径。虽然在所有制问题上，曾有一段混乱，具体工作中出现了一些缺点错误，这当然是严重的现象。但是经过武昌、郑州、上海等一系列会议，基本已经得到纠正，混乱情况基本上已经过去，已经逐步的走上按劳分配的正常轨道。

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中，解决了失业问题。在我们这样人口众多的、经济落后的国度里，能够迅速得到解决，不是小事，而是大事。

在全民炼钢铁中，多办了一些小土高炉，浪费了一些资源（物力、财力）和人力，当然是一笔较大损失。但是得到对全国地质作了一次规模巨大的初步普查，培养了不少技术人员，广大干部在这一运动中得到了锻炼和提高。虽然付出了一笔学费（补贴二十余亿），即在这一方面也是有失有得的。

仅从上述几点来看，成绩确是伟大的。但也有不少深刻的经验教训。认真地加以分析，是必要的有益的。

乙、如何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这次会议，到会同志都正在探讨去年

以来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并且提出了不少有益的意见。通过这次讨论，将会使我们党的工作得到极大好处，变某些方面的被动为主动。进一步体现社会主义经济法则，使经常存在着的不平衡现象，得到及时调整，正确的认识“积极平衡”的意义。

据我看，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中所出现的一些缺点错误，有一些是难以避免的。如同我们党三十多年来领导历次革命运动一样，在伟大成绩中总是有缺点的，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现时我们在建设工作中所面临的突出矛盾，是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面的紧张。就其性质看，这种情况的发展已影响到工农之间、城市各阶层之间和农民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是关系到我们今后动员广大群众继续实现一次跃进的关键所在。

过去一个时期工作中所出现的一些缺点错误，原因是多方面的。其客观因素是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不熟悉，没有完整的经验，对社会主义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体会不深，对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没有贯彻到各方面的实际工作中去。我们在处理经济建设中的问题时，总还没有像处理炮击金门、平定西藏叛乱等政治问题那样得心应手。另一方面，客观形势是我国一穷（还有一部分人吃不饱饭，去年棉布平均每人还只十尺，可缝一套单衣和两条裤衩）二白的落后状态，人民迫切要求改变现状。其次是国际形势的有利趋势。这些也是促使我们大跃进的重要因素。利用这一有利时机，适应广大人民要求，加速我们的建设工作，尽快改变我们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创造更为有利的国际局面，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

过去一个时期，在我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也暴露出不少值得注意的问题。这主要是：

1. 浮夸风气较普遍地滋长起来。去年北戴河会议时，对粮食产量估计过大造成了一种假象。大家都感到粮食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因此就可以腾出手来大搞工业了。在对发展钢铁的认识上，有严重的片面性，没有认真地研究炼钢、轧钢和碎石设备，煤碳、矿石、炼焦设备，坑木来源，运输能力，劳力增加，购买力扩大，市场商品如何安排等等。总之，是没有必要的平衡计划。这些也同样是犯了不够实事求是的毛病。这恐怕是产生一系列问题的起因。浮夸风气，吹遍各地区各部门，一些不可置信的奇迹也见之于报刊，确使党的威信蒙受重大损失。当时从各方面的报告材料看，共产主义大有很快到来之势，使不少同志的脑子发起热来。在粮棉高产、钢铁加番的浪潮中，铺张浪费就随着发展起来。秋收粗糙，不计成本，把穷日子当富日子过。严重的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不容易得到真实情况。直到武昌会议和今年一月省市书记会议时，仍然没有全部弄清形势真象。产生这种浮夸风气，是有其社会原因的，值得很好的研究。这也与我们有些工作只有任务指标，而缺乏具体措施是有关系的。虽然主席在去年就已经提出全党要把冲天干劲和科学分析结合起来，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看来是为多数领导同志所领会，我也是不例外的。

2. 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在 1958 年的大跃进中，我和其他不少同志一样，为大跃进的成绩和群众运动的热情所迷惑，一些“左”的倾向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抢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风，把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了。在思想方法上，往往把战略性的布局 and 具体措施，长远性的方针和当前步骤，全体与局部，大集体与小集体等关系混淆起来。如主席提出的“少种、高产、多收”，

“十五年赶上英国”等号召，都是属于战略性、长远性的方针，我们则缺乏研究，不注意研究当前具体情况，把工作安排在积极而又是稳妥可靠的基础上。有些指标也逐级提高，层层加码，把本来需要几年或者十几年才能达到的要求，变成一年或者几个月就要做到的指标。因此就脱离了实际，得不到群众的支持。诸如过早否定等价交换法则，过早提出吃饭不要钱，某些地区认为粮食丰产了，一度取消统销政策，提倡放开肚皮吃，以及某些技术不经鉴定就贸然推广，有些经济法则和科学规律轻易被否定等，都是一种“左”的倾向。在这些同志看来，只要提出政治挂帅，就可以代替一切，忘记了政治挂帅是提高劳动自觉、保证产品数量质量的提高，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加速我们的经济建设。政治挂帅不能代替经济法则，更不可能代替经济工作中的具体措施。政治挂帅与经济工作中的确切有效措施，两者必须并重，不可偏重偏废。纠正这些左的现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倾保守思想还要困难些，这是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所证明了的。去年下半年，似乎出现了一种空气，注意了反右倾保守思想，而忽略了主观主义左的方面。经过去年冬郑州会议以后一系列措施，一些左的现象基本上纠正过来了，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这个胜利既教育了全党同志，又没有损伤同志们的积极性。

现在对国内形势已基本上弄清楚了，特别是经过最近几次会议，党内大多数同志的认识已基本一致。目前的任务，就是全党团结一致，继续努力工作。我觉得系统地总结一下我们去年下半年以来工作中的成绩和教训，进一步教育全党同志，甚有益处。其目的是要达到明辨是非，提高思想。一般地不去追究个人责任。反之，是不利于团结，不利于事业的。属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等问题的不熟悉方面，经过去年下半年以来的实践和探讨，有些问题是可以弄清楚的。有些问题再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摸索，也是可以学会的。属于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的问题，已经有了这次深刻教训，使我们较易觉醒和体会了。但要彻底克服，还是要经过一番艰苦努力的。正如主席在这次会议中所指示的：“成绩伟大，问题很多，经验丰富，前途光明。”主动在我，全党团结起来艰苦奋斗，继续跃进的条件是存在的。今年明年和今后四年计划必将胜利完成，十五年赶上英国的奋斗目标，在今后四年内可以基本实现，某些重要产品也肯定可以超过英国。这就是我们伟大的成绩和光明的前途。

顺致

敬礼！

彭德怀一九五九年七月十四日

这封信言辞恳切、语调和缓。虽意在为民请命，但给毛泽东留够了面子。文过饰非之处比比皆是，彭德怀可谓用心良苦。毛泽东看后竟然大发雷霆。如果按个人来讲，彭德怀完全可以避过这一次腥风血雨，甚至“文化大革命”他都可以避得过。他的夫人浦安修女士，就多次连哭带劝地说：老头子你是个国防部长，你是个军人，是个大元帅，你谈这个建设干什么？你谈大跃进干什么？你这不是找麻烦吗？彭德怀说不是，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是中央政治局委员，我对整个国家的发展负有责任。而且我是一个农民，我不能说瞎话，你说千斤稻万斤粮，我就到一个队里面去调查，问公社书记，问县委书记，说你们这儿打粮食怎么样？他说我们这儿亩产红薯8万斤，力争明年亩产24万斤[1]。彭德怀对浦安修说：这完全是不可能的，浮夸虚报到这种程度，还能不管吗？

彭德怀在庐山于1959年7月13日给毛泽东写信。信写好后，彭德怀几经阅看修改，才郑重地签上自己的名字，又在信封上写了“毛主席亲收”几字，才坦然而坚定地参谋说：“你马上送到主席那里。”这天是7月14日中午。

在这封信中，既总结了大跃进的成绩，又客观而又尖锐地指出了存在的问题及产生问题的根源，以及如何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他深知在一些中央主要领导人当中，对当时党在指导思想上的“左”倾现象有所察觉和担心，但刘少奇不便讲，周恩来刚被批了“反冒进”不能讲，陈云、邓小平未上山，只有自己来讲了。

毛泽东把彭德怀写给他个人的信，看成是“下战书”，大加挞伐。林彪、康生等人乘机翻出陈年老账，彭德怀气得“骂娘二十天”，厄运从此开始。

毛泽东对彭德怀历史上有过多次误会，1936年东渡黄河彭德怀认为“这是一点也不能大意的”有过犹豫；1940年彭发动百团大战，毛认为暴露了共军实力；朝鲜战争期间，彭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总司令，高岗在东北主持工作，前线的后勤供应及许多事情牵涉到东北。这样一来，两人的接触自然较多。高岗对朝鲜前线的各方面支援非常尽力，亲自去过两次朝鲜，彭德怀对他怀有好感。都让毛泽东认为是彭德怀有异心，耿耿于怀，必欲除之。终于找到借口，爆发了。

7月15日上午，中央办公厅发下通知：会议延长，日期不定。

彭德怀看了通知后，掠过一丝激动，思忖着：看来我的信起了作用——毛主席接到了信，要解决问题了。

周恩来看过彭德怀的信后，李锐问：“您有什么看法？”周轻松地回达道：“那不会有什么吧。”

令彭德怀无论如何没有想到的是，7月16日下午，在会议上，他看到自己的信被印成文件，毛泽东在信的首页加上一行醒目的大字标题——《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并加批语：“印发各同志参考。”彭德怀的情绪立即坠入空谷：“我写给主席个人的信，怎么成了‘意见书’？怎么还要专门讨论呢？”一种不祥之兆攫住了他。随后在西北小组的会议上，彭德怀要求收回这封私人信件。

然而，开弓没得回头箭！这封三千字的信被称为“万言书”，就象被点燃的柴草堆，形成了烧得彭德怀焦头烂额的“烈火”。

在7月27日的会议上，情绪激动的毛泽东，以一种高亢洪亮的语音，配以有力的手势，讲道：“……我晓得你彭德怀从延安整风以来就不服气，憋了那么久，这次就发到庐山上来了。好家伙，简直要把汉阳峰推下去！你我共事30年，你是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有意见为什么不在郑州会议上提出来？不在成都会议上提出来？庐山会议快结束了，怕是没有了机会，是不是？所以，就下了战书！你骂了20天，指名道姓，喋喋不休，还要怎么样？”

失去了控制的彭德怀不由“嚯”地站起来，不顾一切地拉大嗓门吼道：“在延安，你操了我40天娘（毛泽东在日常口语和演讲中惯用操你娘之类的粗俗语言），我操你20天的娘还不行？”

“哦，你要操娘？”毛泽东的声音反而小了，保持着一种固有的镇静。他把手里的大半截香烟用力戳灭在烟灰缸里，将嘴唇抿得很紧，在场众人的心黯然沉了下去……

其后的情形是，会议延长，斗争升级。林彪、康生、陈伯达、柯庆施、

李井泉等人纷纷跳将出来，翻出许多历史旧账。彭德怀悲惨的晚年政治命运，从此开始……

1959年，彭德怀成为了庐山会议的焦点人物，所有的问题都围绕彭德怀元帅展开。一场不见刀光剑影，但却充满火药味的“战争”就这样拉开了帷幕。

庐山会议之后的一次军委扩大会议上，彭德怀和黄克诚成为众矢之的。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曾经与彭、黄两人肩并肩一起作战、患难与共的将军们，一个个噤若寒蝉，全都低下了头，以沉默来换取自保，在毛泽东的淫威下，似乎选择自保才是唯一出路。

为了肃清30年来的“流毒和影响”，与林彪交好的吴法宪第一个站了出来。时任空军政委的他，率先发言：“在这里，我要向彭德怀讨还血债。”此言一出，全场震惊，无数的目光都聚集到了吴法宪的身上，颇为自得的他，再一次张口向众人解释道：“彭德怀在长征途中欠了红一军团战士的血债，他亲手杀害了一军团的一位连长。”

听到吴法宪这一番话，林彪喜出望外，做出了一副十分气愤的样子，拍着桌子怒斥道：“他恨不得将一军团一口气吃完，统统杀尽！只因一军团是毛主席亲手缔造与领导的。”

林彪的这一番话，顿时让会议上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犹如死一般的寂静。谁也没有料想到，这样一个漏洞百出的谎言就这样堂而皇之的出笼了。

突然，只听到“嚯”地一声，一个人影突兀的站了起来，钟伟指着林彪，怒斥道：“完全就是污蔑，当时枪毙那位连长我就在场，彭总当时并不在场，他对于这件事并不知情！”

说到激动之处，钟伟忍不住的咳了起来，深吸了一口气后，又接着说道：“当时正处于攻打娄山关，在敌人猛烈的攻击下，那位连长却见机想要临阵脱逃，还鼓动别人与他一起反水，这样的人难道不该枪毙吗？如果你们当时在场，都会亲自动手。当时一军团的罗瑞卿也在场，征询过他的意见，也是同样的意思。不杀他们，难道等他们反过来杀我们嘛！”

钟伟越说越激动，一股脑儿的全端了出来：“我看，是有人存心在挑刺，翻旧账，挑拨一军团和三军团的关系。这中间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彭总如果有私心建立军事俱乐部，那我也就是其中一员，将我也拉去枪毙吧！”

随着钟伟越说越激动，最后竟然高喊起来，而钟伟的发言，也得到了在座许多人的赞许，人们眼中已然被钟伟的一番举动湿漉了眼睛，个子矮小的钟伟，瞬间在众人眼中变得高大威猛、气宇轩扬起来。

然而，由于钟伟的一番慷慨激昂的发言，林彪被堵得说不出一句话来，最终以“扰乱会场”的罪名架出了会议室，从此这位中国的“巴顿”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中。

钟伟不畏强权的仗义执言，也让当时身处困境的彭德怀颇为感动，真是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十几年过去之后，彭老总在弥留之际，嘴中依旧喃喃念叨着钟伟的名字，让人心酸不已。钟伟少将于1984年在北京去世，享年70岁。

8月16日，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举行最后一次大会，毛泽东继续从理论的高度批判彭德怀：“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从来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只不过是混到无产阶级队伍里来的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派。他们从来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只不过是党的同路人。革命是历史的见证人，革命的群众运动

是大海怒涛，一切妖魔鬼怪都被冲走了，社会上各种人物的嘴脸，被区别得清清楚楚，党内也是同样。”

毛泽东讲话之后，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定》等文件。彭德怀被罢官免职，到京郊吴家花园挂甲屯闲居，遭软禁了。从这天起，彭德怀退出了党中央领导核心，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

实事求是地说，毛泽东与彭德怀在长达 30 多年的岁月里，两人之间基本上是相互支持、密切合作的，并不是所谓“三七开”。彭德怀固然脾气暴躁，但对毛泽东一直是忠心耿耿、敬重有加的。对于这一点，毛泽东后来也不得不予以认同。1965 年 9 月 23 日，毛泽东在会见即将到大西南“三线”任职的彭德怀时，讲话中“诚恳”地说道：“对你应该一分为二，我自己也是这样。立三路线时，三军团有人反对过赣江，你说要过，一言为定。在一二三次反‘围剿’时，我们合作得很好。反革命的‘富田事变’，写了三封挑拨离间的假信，送给你、朱德、黄公略，你立即派人将此信送来，还发表了宣言，反对‘富田事变’。反对张国焘的分裂斗争也是坚定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还有抗美援朝，都是有功绩的。”

在 1965 年 9 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提出，考虑到战备形势，彭德怀等人不宜留在首都，并提议把他们挂职下放，分配到外地去。彭德怀闻讯后说“我不去，让毛主席找我谈。”毛泽东于是把彭德怀叫到中南海，两人关起门来谈了五个小时，可是对外只公布七百多字，还有很多话到现在都没公布。幸好，彭德怀晚年在吴家花园时，把他和毛泽东几十年关系中深层次的秘密全部跟杨献珍讲了，讲得非常详细。

按照杨的记忆，在那五个小时里，彭德怀和毛泽东拍桌子瞪眼吵得一塌糊涂，彭德怀是略占上风，毛泽东理屈词穷。

彭德怀质问毛泽东，庐山会议我给你写了封信，本来是提意见，给你个人做参考，怎么成为我反党的纲领了？

毛泽东张口结舌说不出来，就东扯西拉，只好说：“可能真理在你这边，”

彭德怀说：什么叫可能，本来就在我这边，“可能”是什么意思？

毛泽东最后就赖帐了，他说：你这个意见书骂了我嘛，所以我对你气才大。彭德怀说我哪儿骂你了，我没骂你，对你很恭敬的。毛泽东说，你说我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毛泽东认定“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是骂人的脏话，硬是把彭德怀的质问搪塞了过去。

这次谈话后，毛泽东即派彭德怀到四川参加三线建设去了。

口蜜腹剑的毛泽东准备发动文化大革命了，要把他认为的危险人物逐出北京。于是，一边佯装伪善地安抚彭德怀一边给心腹宠臣李井泉下御旨，令其监督彭德怀。李井泉时任三线建设办公室主任、西南局第一书记。彭德怀赴川报到后，李井泉不与他见面。却暗地布置人员监视其一言一行，密报毛泽东。

时间没过三个月，即 1965 年 12 月 21 日，毛泽东在杭州对陈伯达等人说：姚文元文章“很好”，点了吴晗的名，“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 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见《五一六通知》附件）尽管“文革”的主要目标并非对着彭德怀，但这几句话对彭来说肯定是不祥之兆。

1966 年 12 月，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下令、命北京地质学院红卫兵

把彭德怀从四川揪回来。戚本禹是直接发出指令的人，但他被判 18 年徒刑所列罪行中却没有这一条。在审判戚本禹的法庭上，辩护律师傅志人说：“戚本禹指使学生把彭德怀从四川挟持回到北京，是江青首先提出来的，要‘把彭德怀弄回来’，在这之后戚本禹才指派学生行动的。”（《历史的审判》续集，群众出版社 1996 年版）

原来，到四川揪彭德怀，是毛泽东、周恩来在一次中央会议上决定的。周恩来给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李钟奇和地质学院红卫兵领袖王大宾的手令是**“把反党分子彭德怀交北京卫戍区”**。

高越农先生对毛彭这次谈话有如下点评：

自从闯下了饿死 3700 万中国老百姓的弥天大祸以来，毛泽东清夜扪心，早已明白：真理在彭德怀这边。但是，为了权力、脸面，他决不肯承认真理不在自己手里。而且，他深知在这样一个个人崇拜蔓延的极权国家里，有负于一个彭德怀算不得什么。同样，有负于潘汉年更是无所谓的。在 20 世纪里最著名的三个独裁者斯大林、希特勒和毛泽东的心都是互通的。

1967 年元旦，彭德怀致信毛泽东，说：“你命我去三线建委，除任第三副主任外，未担任其他工作，辜负了您的期望。12 月 22 日晚在成都被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抓到该部驻成都分部。23 日转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红卫兵，于 27 日押解到京。现被关在中央警卫部队……看押。向您最后一次敬礼！祝您万寿无疆！”（见《彭德怀全传》），彭总这封信撕心裂肺，信发出后如石沉大海，毛泽东不予置理。未能减轻他的厄运。此后，被多次批斗，肋骨被打断三根。在北京卫戍区囚禁了八年。严禁任何人探视。

1973 年春，六年的铁窗生活和无情折磨，使彭德怀患了癌症。大便出血，身体完全虚脱，由于癌细胞不断扩散，身上疼痛难忍。躺在牢房木床上，不断地发出痛苦的叫声。

卫戍区监护点联系送阜外医院，院方听到彭德怀三个字，百般推脱不肯接受。又联系卫戍区第一师医院，同样遭到了拒绝。直到大出血的第七天晚上，才转到解放军 301 医院。

为了对外保密，对于彭德怀所住的 14 病室第 5 床，改称 145，不准医生和任何人喊他的名字。同时，还将屋内的窗户全部用报纸糊上，以免外面能看到里面，也防止彭德怀看到外面。在一间阴冷潮湿的病房里，门窗紧闭，照不进一缕阳光。不准他写字，不准听广播。

“历史是最无情的。历史会审判他们，也会对我做出公正的评价。”这是彭德怀最后的呼声和愿望。

1974 年 11 月 29 日 14 时 52 分，彭德怀元帅死在 301 医院 14 号病室的 5 号病床上，时年 76 岁。

附注

[1] 彭德怀（1898-1974）幼年家境贫困，10 岁时即曾随祖母外出讨饭，备受欺凌。18 岁入湘军当兵。20 岁时与表妹周瑞莲订了婚约。1920 年彭德怀离家投军之际，周瑞莲家遭天灾负债累累，瑞莲因反抗卖身抵债而跳崖身亡。得知消息的彭德怀独自跑到山上，失声痛哭……40 年后彭德怀曾到瑞莲家的故址低首徘徊，寄托哀思。

1922 年，在亲友撮合下，24 岁的湘军军官彭德怀，娶了尚不满 14 周岁的货郎之女刘细妹，给她改名刘坤模。1928 年平江起义后，彭德怀随军上了井冈山，让她

回家，答应革命胜利后去接她，不料从此失去联系。刘坤模以“匪属”之身，漂泊辗转，历尽艰辛，走投无路之下，另嫁他人，生有一女。80年刘坤模写了本《和彭德怀在一起的日子》，对老彭还是一片深情。1987年刘坤模老太太回湖南乌石彭总故居参观，写下一诗：“横刀人不见，乌石缅雄风，华夏开新宇，犹忆大将军”。读之令人落泪。

1938年，40岁的彭德怀在延安娶了陕北公学教员浦安修。她是北师大历史系的学生，在校学习期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婚后无子女，但共度战争岁月，感情甚笃。在太行山上，彭德怀和浦安修经历了多次生死考验。1942年5月，太行山根据地遭到日军残酷的“扫荡”，八路军和北方局机关分散突围，浦安修与滕代远夫人林一失踪，彭德怀在清点突围人员的名单时，发现没有妻子的名字，心中一沉。原来，浦安修在一个山洞藏了好几天，归队后又累又困，在屋里睡着了。彭德怀得知后，冲进屋里拉着浦安修的手说：“我以为你牺牲了，正要派人去寻你的尸体呢，八路军副总司令的老婆，死活都不能落到鬼子手里啊……”这种沥血浴火的话，从彭德怀口中讲出，更显惊天豪气。庐山会议后，彭德怀与浦安修几经斟酌，决定离婚。彭德怀一生无儿无女，三次婚恋均无善终。乃至性格粗暴，说话难听，动辄骂人。这可能都跟他缺乏家庭温暖、心情不顺有关。

一代良将屈死于毛泽东之手，实为亘古奇冤也。

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决定为彭德怀平反昭雪。骨灰从成都公墓殡仪馆移放至北京八宝山，然后按彭德怀遗愿，将骨灰安葬在他的家乡墓地，终于入土为安。

杨尚昆说：他对敌人的雷霆之威，对党的赤子之忧，政治上的松柏之节，生活上的冰雪之操和作风上的朴实无华，使我们永远敬重。

萧华说他：丹心昭日月，骨硬胜铁钢。

张爱萍说他：刚正不阿耻权术，万言上书誉神州。他算得上一个真正的人。

[2]甘薯的密度依品种不同，大体在1-1.2 g/cm³之间。在一亩地面上铺满甘薯，堆积高度达到八寸，才可能有24万斤。河北徐水浮夸虚报每亩产甘薯120万斤，甘薯块茎的堆积高度应在四尺以上，弱智都不会相信，洞察秋毫的毛泽东却相信了。

七、转载：公安工作“大跃进”

原作题目：一个省公安厅长的追忆(原载于凯迪社区 > 史海钩沉 2010-2)

作者简介：尹曙生，1937年出生，安徽舒城县南港镇人。1961年毕业于北京政法学院（现中国政法大学），进入国家公安部工作。1963年调入青海省公安厅。1977年调入安徽省公安厅，任省公安厅政策法律研究室副主任；1983年起任安徽省公安厅副厅长、常务副厅长；兼任安徽省警察学会会长、法制心理学会会长、法学会副会长，安徽大学兼职教授。尹曙生在工作之余从事理论研究和文学创作。曾主编出版了120万字的《安徽公安志》，获全国和安徽省一等奖；写有50万字的理论文章，发表在国内外刊物上，并多次在全国、全省获奖。尹曙生先后发表过200万字的文学著作，其主要作品有：报告文学集《阅案沉思》长篇小说《时代悲歌》《教授之死》《抗争》《生死情缘》等等。

以下即为《一个省公安厅长的追忆》原作全文：

笔者在公安机关工作了一辈子，对公安工作很有感情。写这篇文章心情很沉重。目的是为了总结经验教训，避免重犯历史错误。公安工作的基本经验就是党的领导、群众路线和依法办事。但是，对党的领导必须要有正确的

理解，那就是严格按照在党的领导下制定的宪法和法律办事，树立宪法和法律的绝对权威，任何人、任何一级组织，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都不能把自己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不能把公安、政法部门变成自己的附庸，来推行违反宪法和法律的错误的方针和政策。严格依法办事就是最好的接受党的领导，因为宪法和法律体现了党的意志、人民的意志，代表了党的根本利益、人民的根本利益。新时期公安机关和广大公安民警，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和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努力奋斗，顽强拼搏，勇往直前，不怕牺牲，为维护社会大局的稳定，做出了很大贡献，很多人牺牲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受到了党和人民的充分肯定和赞扬。改革开放30年来，公安工作没有犯大的、方向性的错误，一条重要的经验就是：在党的领导下，不断排除各种干扰，坚决按照宪法和法律办事。现在还有极少数地方领导人，为了推行自己错误的政策，往往动用专政工具压制人民群众，造成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这种情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否则，建设和谐社会就是一句空话。

笔者生来有幸，赶上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使我能亲身体会到半个多世纪的风云变幻，明白很多道理。尽管在这些政治运动中，我也曾险象环生，但每次都能安然度过。比起那些遭到灭顶之灾的无辜同时代人，我是很幸运的。

1950年暑假，我还是一个上中学的少年，作为学生代表之一，参加了安徽省在芜湖市举办的中学教师思想改造运动，任务是规劝老师交代自己的历史问题，为期三个月。因为我政治觉悟低，什么也不懂，对老师毕恭毕敬，说话还脸红，帮助老师更是无从谈起，于是当上了义务勤杂工。不过开批判斗争大会，我们学生代表都参加，看到尊敬的老师被人指着鼻子羞辱、谩骂，真不是滋味，既同情又无奈，害怕出什么问题。

把全省一千多名“有问题”的老师，集中到今天的安徽师范大学改造思想，是安徽省教育界解放后的一件大事。大学建筑物围绕褚山，风景十分优美，站在山上，滚滚长江就在脚下流淌。只要有空，还是孩子的我们，到山上尽情地玩乐。可是，自从有几个老师过不了关，吊死在褚山的树林里，从此再也没有人敢上山了。

思想改造运动结束后，一些老师神秘失踪了，后来知道，他们是反革命，被抓起来了。

1955年、1956年的内部肃反运动中，母校舒城中学最好的语文老师 and 历史老师，两个自杀，一个被逮捕判刑，死在劳改农场（1978年后都平反了），又一次震动了我。余悸未消，1957年秋，我考入北京政法学院（现中国政法大学），正赶上反右派斗争，入校不久的一天，亲眼目睹院长钱端升从印尼访问归来，学校从机场将他直接送到礼堂进行批斗。他在整风运动中给院党委提了几条意见，一点也不尖锐，却在他出国后将他划为右派。在整风运动中，中央派他代表中国法学家出国访问，他怎么也想不到会是这样的结局。1954年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时，毛泽东亲笔写信给他，聘任他为宪法总顾问，毛的亲笔信还作为校史展览过，说明他在法学界的地位是很高的。钱端升和学校的许多老师、同学被打成右派的事实，使我深刻认识到“祸从口出”的道理，从此小心翼翼，不敢胡言乱语，安然渡过了一个又一个政治运动。

1958年，全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提出短时期内在主要工业产品方面超英（国）、赶美（国），十几年内甚至几年内过渡到共产主义。

于是“大跃进”、公社化、大炼钢铁如火如荼开展起来。我们学校也建了十几座小高炉，用木材和煤炭炼铁，我也参加了，炼了几个月，一块合格的铁也没炼出来。1959年春天，饥饿在全国逐步蔓延起来，到了1960年，由于饥饿，营养不良，我也得了肝炎病、浮肿病，三个多月不能上课，住院治疗（那时医院人满为患，住不上医院，学校腾出十几间房子，安置病人，医院定期派医生来看看）。所谓治疗，就是不上课（那时北京的学校体育课一律停止，有的学校上半天课），卧床休息，减少热量消耗，增加点营养品。三个月我得到2斤鸡蛋、一斤猪肉的营养品补助。到了这年年底，全国先后有几千万人因饥饿而死亡，其中包括我的两个在农村的叔伯堂兄和我的亲姐夫。

可是就在1958年，亩产几千斤、几万斤、十几万斤粮食的新闻报道铺天盖地，国家领导人还为粮食吃不完发愁呢！

1961年秋，我大学毕业，填的三个志愿都是当教师。可是公安部到学校挑学生，偏偏把我挑去，不去还不行。北京政法学院三个应届毕业生进了公安部大门。去报到后才知道，中央已经把公安部副部长王昭调到青海省担任省委第二书记兼省长，纠正左倾路线错误。王昭去了以后，发现那里的公、检、法机关在“大跃进”运动中，违法乱纪十分严重，需要彻底整顿，需要充实力量，于是他向公安部要人，我们三个进入公安部的大学生和部机关几十名干部调到青海省，充实政法部门，主要是公安部门。我到了青海省公安厅，接待上访群众、处理申诉案件，配合省委复查案件办公室，调查处理重大冤假错案，使我有机会了解到，公安机关为了配合“大跃进”运动，自己也搞起“大跃进”，运用专政工具，压制广大人民群众。造成了巨大的人间悲剧。

那么，公安工作“大跃进”运动是怎么搞起来的呢？

1958年1月1日，经过毛泽东亲自审阅、修改的《人民日报》元旦社论《乘风破浪》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口号，要求“在15年左右的时间内，在钢铁和其它主要工业品产量方面赶上或超过英国……争取1958年农业生产大跃进或大丰收。

公安部闻风而动，于1月22日召集部分省市公安厅局长参加汇报会，讨论公安工作如何开展“大跃进”的问题，会上制订了《1958年公安工作计划要点》，作为公安工作“大跃进”的方向和目标。“要点”明确要求全国公安机关“努力实现无15元以上的盗窃案，无10元以上损失的火灾，无较大群众性迷信活动，无赌博的‘四无’农业合作社和无破坏事故，无百元以上盗窃案、无10元以上火灾的机关、企业、学校”。

这个计划要点是经毛泽东亲自审阅、认可下发的。同经济建设“大跃进”一样，这是一个根本不可能实现的、空想的计划。同时，“要点”并没有提出达到这一计划目标的具体有效办法，而是笼统要求各级公安机关“把应该逮捕的人坚决依法逮捕起来，把应该管制的人坚决依法管制起来；协助有关部门清查内部的坏分子，把其中的大部分人坚决清除出去；对已经摘掉帽子又有违法行为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一律戴回帽子。”

什么叫“应该逮捕”？什么叫“应该管制”？“依法”，依什么法？没有可操作性，各人有各人的解释，怎么解释都有道理。这就给滥施刑罚的人提供了政策依据。同时这一段话也明白无误地告诉各级公安机关，要动用专政工具，来保卫、促进“大跃进”运动政治任务的完成。

贵州省公安厅积极响应，于1958年2月率先提出开展“无火灾、无积案、

无土匪、无盗窃、无骚乱、无烟毒流行、无赌博活动”的“七无”运动。公安部立即发文，向全国公安机关推广贵州省的做法。于是，全国各级公安机关积极响应，在“七无”的基础上，开展“十无”、“百无”运动。有些地方感到这些“无”都不能反映公安工作“大跃进”的现实，提出了“玻璃板”、“水晶石”的设想，就是把整个社会搞得像玻璃板、水晶石那样干净、明亮，没有一丝尘埃，不要说没有任何犯罪，就是夫妻吵架、婆媳拌嘴都不会有。这些提法受到了当时中央主管政法工作领导的赞扬。

公安工作“大跃进”的口号有了，目标有了，如何实现呢？办法就是动用专政工具，把社会上那些被认为是坏人和可能成为坏人的人，统统抓起来，关进看守所、拘留所、收容审查所、集训队、监狱，让他们没有办法搞破坏活动。1958年4月9日，青海省委书记高峰在公安工作座谈会上说，“有些人虽然没有现行破坏活动，但可能是危险分子，可以采取秘密逮捕的方法，把他们搞起来，要搞得很艺术，谁也发现不了；要采取多种多样的办法，如让他们打架、互相告状、扭送等等。把危险分子都搞掉了，社会问题就少了”；“谁叫他们在这个时候（大跃进）捣乱，把他们抓起来，一个不放，死也要让他们死在监狱里。”

于是，从中央到地方，层层制定捕人计划，下达捕人指标。“大跃进”嘛！上级将捕人计划指标下达到下级，下级层层加码，捕人指标越来越大，所以从1958年到1960年，很多地方捕人数超过1949年到1957年的总和。安徽省1957年逮捕犯罪嫌疑人8000多人，而1958年中央下达的捕人指标是4.5万人，结果安徽省超额完成任务，全年逮捕了10.1万多人；到1960年，3年共逮捕17.3万多人。被逮捕的人中，大多数是无辜的劳动群众，他们或因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公共食堂、刮共产风不满，说说牢骚话；或因为饥饿，为了活命而偷青吃青；或为了避免饿死，私分生产队的粮食；或为了活命外流被当作流窜犯拘捕。被捕的人中1/3左右死在关押场所，造成了巨大的人间惨案。安徽省3年中死在劳改农场、看守所的已决犯和未决犯罪嫌疑人、劳教人员5万多人，占这些人员总数31%。青海省省属劳改、劳教系统3年死亡三类人员（劳改犯人、刑满就业人员、劳教人员）49304人，占总数16万人的30%。

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在“大跃进”运动中，独断专行，盲目蛮干，全省哀鸿遍野、饿殍载道，400万人被活活饿死，就这样，老百姓也是敢怒而不敢言，因为稍有反抗，就得坐监狱，就得被整死。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有那么一个人忍不住了，于1959年春，在省城合肥贴出一张大标语：“打倒曾胖子，杀死余妖精”（曾希圣妻子姓余），发泄心中的愤懑情绪。曾希圣下令公安机关限期破案，强迫机关干部（包括省委机关）人人写字，核对笔迹，先后共排查1.8万人，笔迹鉴定3000人，秘密搜查4000人。对一些重点对象，采取跟踪盯梢、秘密检查来往信件，在其住所安装窃听器。在受审查的人员中，有厅级干部6人，逮捕、拘留、停职反省“犯罪嫌疑人”各1人。折腾半年时间，花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逼死了两个“犯罪嫌疑人”，这起所谓“反标案”最终也没有破获。曾希圣非常恼火，几次把侦破人员叫去训斥，叫他们“滚！”说“我养活你们还不如养一条狗”。公安机关成了曾希圣的私人侦探社。在那个年代，领导人（包括基层领导，公社、大队领导）对谁不满，写个条子，就可以把人关进监狱。这就是他们认为的“应该逮捕”的人。

青海省1958—1960年三年中就逮捕了63064人，占这三年全省平均人口244万的2.6%，等于1949年至1957年逮捕人数总和19077人的3.3倍。其中，1958年为了推动“大跃进”，镇压反对派，逮捕了40602人。随着“大跃进”运动乱象的不断发生，毛泽东于1958年底、1959年春，在郑州两次召开会议，主动纠左，公安部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要求公安机关执行“三少”政策，即“杀人要少，捕人要少，管制也要比过去少”。所以1959年全国捕人、拘留人大幅度减少。安徽省逮捕人数由1958年的10万多人一下子降到8115人。青海省1959年逮捕4345人，只有1958年的1/9。1960年全国公安机关为了贯彻庐山会议精神，反击右倾机会主义评论，反瞒产私分、反富裕中农，层层揪“小彭德怀”，又大规模捕人、拘留人，青海省全年又逮捕了18177人。安徽省又逮捕了5万多人。逮捕人数这样大起大落，不是由社会治安叛乱情况决定的，完全是根据领导人的指示，为了配合政治运动而逮捕、拘留人，这是那个年代普遍的做法。

逮捕人时，不按任何程序办事，完全采取战争年代打仗、搞运动的办法，集中抓捕。很多被捕、被判刑的人，没有犯罪事实和材料，有的人连档案都没有；有的人被捕后死了，但是不知道死者姓什名谁；有的人被判了刑，但是没有出过庭，没有和法官见过面，稀里糊涂被送到劳改农场，由于没有档案，成了劳改农场黑人黑户。青海省的浩门农场，就有800多个黑人黑户劳改犯，不知道为什么把这些人由东南沿海地区送来劳改，不知道每个人判了多少年刑期，他们统统成了无期徒刑犯人，死了也无法通知家属。王昭到青海主政后，全省有3000多名“黑人黑户劳改犯”侥幸没死被释放回家。

下面用青海省几个县的典型例子，看看公安工作“大跃进”是怎么操作的。

1958年7月1日，中共互助县委给省委写了一个报告，叫做《打击敌人防止叛乱的报告》，向省委邀功。互助县根本就没有发生过叛乱。报告称：“1958年6月，互助县公安局抽调52名干部，组成12个工作组，分别到各乡，于24日一个晚上逮捕1152名。其中社会上1075名，机关77名。”

一个不到10万人口的小县，一个晚上逮捕这么多人，会是什么情景？简直无法想象。1959年、1960年人口大量死亡，这个县还在捕人；不仅逮捕普通老百姓，还把那些同情老百姓的基层干部也逮捕起来。1960年4月，该县红崖子沟公石郎大队窝子生产队农民马贤珍当生产队长，可全队150多人已经有40多人饿死。他的70多岁的老妈妈对他说：你当生产队长的任务首先就是要救人，不然全队的人都饿死了，你给谁当队长？在母亲的启发下，他冒着瞒产私分就要坐牢甚至杀头的风险，将生产队仅有的4420斤粮食偷偷分给社员，还将生产队4只羊换了800斤蔬菜分给社员。他知道就这点粮食、蔬菜仍然不能解决问题，主动带领社员到山上挖野菜，渡过难关，使生产队饿死人状况暂时停止。可他的行为很快被生产大队干部发现，报告公社，于是公安局以“坏分子”罪名将他逮捕，被法院判刑5年。丹麻公社丹麻大队红山生产队队长戚元法，眼见全队117名社员饿死51人，他感到如不采取措施，全队的人都得饿死。可是生产队已经没有粮食。一天晚上，他带领身体尚能动弹的7个社员，偷了大队几百斤青稞，没有磨成粉，连夜偷着煮熟，挨家挨户送到社员家里，天还没亮，被大队干部发现，报告公安局，公安干警来抓他，没有饿死还能动弹的社员为他送行。其中一位69多岁的农民对执行民警说：我们生产队100多人，现在只剩下50来人，要不是戚队长给我们

分点粮食，恐怕都饿死了。公安同志，我们只要求一件事，你们不能虐待他，不能把他整死，我们还等他回来救我们呢。公安局以“坏分子”罪将戚元法带到县城集训队集训3个月。一个月后，戚元法死在集训队。而这个生产队最后只有18个人没有饿死，幸存下来。

民和县是青海省的东大门，自然条件较好，适合种植小麦、青稞、土豆和多种水果，湟水流经该县，经兰州入黄河，两岸景色秀丽，是青海省的粮仓和水果大县。王昭到青海主政后，派省委工作组（我有幸参加）深入调查发现，由于人祸而非天灾，该县1958年至1960年饿死20984人，外出逃荒而死在外面的5721人，外流下落不明的（实际死在外面）7925人，全县净减少人口25%。死亡最严重的古鄯公社李家山生产大队，原有1318人，饿死601人，占总人口46%。全县死绝的有492户、1623人，被收容的孤儿867名。就是这个县，发生人吃人案件33起，被吃46人。其中煮吃尸体38具；杀死自己或别人小孩而煮食者8人，被害小孩5人。就在人民生活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该县领导不顾人民死活，搞“大跃进”，反右倾机会主义，反瞒产私分，用专政手段残酷对待稍有微词的人民群众。三年间逮捕2680人，管制1091人，劳教、集训1915人，被判刑罚的2966人。

被关押的人，受到刑讯逼供和饥饿的威胁，造成大量死亡，而当政者却无动于衷。3年中死在这个县看守所、拘留所的就729人。1960年8月，接替罗瑞卿担任公安部长已经一年的谢富治，到该县公安局视察，亲眼目睹干警从看守所将死人往外抬，经询问，知道看守所天天都有死人，他对公安局长说：“看守所天天死人，你也不采取措施制止，不怕夜里鬼来找你麻烦吗？！”在公安工作上竭力执行左倾路线的谢富治忽然良心发现，说明问题有多严重！他对陪同视察的公安厅厅长杨树芳说：今年青海省计划捕人指标要和去年（1959年）大体持平，不得超过。然后他到新疆视察，回北京路过兰州，又把杨树芳叫去，对他说，今年青海省捕人指标一定要控制在中央下达的5000人之内，要超过，必须报中央批准。杨树芳立即向省委书记高峰汇报谢富治的意见，高峰主持省常委会，讨论捕人指标，并在会上说：“今年是誓死保卫大跃进，坚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关键年，捕人不能少。”于是省委向中央报告，全年捕人指标15000人。报告上去后，中央和谢富治都没有表态，实际是同意省委意见，结果全年逮捕了18000多人。

青海省人口最多、最大的农业县——湟中县，是青海省的粮仓，也是饿死人最多的县。可是群众不敢反抗。因为这个县的副县长兼公安局长安有芳，是推行左倾路线的急先锋。他在全县搞捕人比赛，哪个派出所捕人多，他就奖励、插红旗；哪个派出所捕人少，就批评，领导人受处分，给派出所插白旗。仅1958年6月，他根据省里提出的“将反革命捕光，枪支收光，案件破光”的“三光”指示和下达的捕人指标，提出“苦战六昼夜，捕人六百名”的口号。结果6天捕了841人，其中有通奸行为而被捕的270人，占总数32%。该县汉东公社元山生产队，1960年春天，每人每天只能吃2两（16两1斤）粮食，14岁的学生李占祥，全家11口人，饿死7人，无奈之下，他跑到大队饲养场，偷了2只小羊羔，回家杀死煮吃，维持了5天，第6天，他到大队食堂打饭，端了半瓦罐青稞面汤，在回家路上，他喝了两口，感到和喝水差不多，一气之下，将瓦罐摔碎，蹲在地上哭了起来。他想，过不了几天，全家人都将饿死。于是，他回家拿上镰刀，带着绳子，再次跑到饲养场，乘饲养员不在，将一头毛驴的腿和脖子捆上，割了一只驴耳朵跑回家中。饲养

员回饲养场发现驴耳朵被割，报告生产大队干部。饲养员和大队干部顺着滴血，找到李占祥家，他正在刮驴耳朵上面的毛，还搜查到两张羔羊皮，人赃俱获。大队干部将他捆上，把他耳朵穿个洞挂着割下的驴耳朵，送到公安局，受到这位局长的表扬，并以“杀害牲畜罪”将李占祥逮捕，判处10年徒刑。1961年7月，省委工作组到湟中县检查公安局自查自纠情况，问新来的公安局长，为什么李占祥还不释放，局长说，李占祥偷大队羊羔、割驴耳朵，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我们拿不准，所以没放。王昭听汇报后说：李占祥家11口人饿死7口，他为了活命不得已才那样做，再说他还是个孩子，按法律规定也不应该逮捕呀！这样，李占祥才被释放回家。回家后知道全家人除他外全饿死了。他带着几件破衣服，到新疆去找他叔叔去了。

1960年7月23日，安有芳到上新庄公社检查工作，决定逮捕几十人，当派出所长念“犯罪嫌疑人”材料时，他睡着了，又不敢叫醒他，继续念，等他醒了，所长问：以上的人怎么处理？他迷迷糊糊，连声说“捕、捕、捕”，就这样，一晚他就决定逮捕37人。

1958年6月22日，中共乐都县委向各乡、镇下达了一个详细的捕人计划指标，通过这个计划指标，让大家看看有多荒唐！

下面原文照抄，一字不改：“全县各类敌人的打击指标（捕人）总捕人数是400至450名。其中宗教人员7至9名，地富分子80至85名，反坏分子95至100名，敌伪军政官吏70至80名，五方面敌人（恶霸、土匪、特务、反动党团骨干、敌伪军政警宪人员——笔者注）30至35名，管制分子15至20名，劳改释放犯、反革命家属40至45名，撤消管制分子26至30名，一贯道徒、巫婆神汉30至36名，开除机关、学校交社（会）管制监督生产的反坏分子7至10名。按乡镇分：碾伯镇捕28至30名，老鸦镇捕15至17名，瞿昙乡捕27至29名，岗沟乡捕26至28名，洪水乡捕12至14名，高店乡捕11至13名，峰堆乡捕14至16名，马营乡捕16至17名，李家乡捕19至20名，寿乐乡捕11至13名，共和乡捕13至15名，水磨乡捕13至14名，高庙镇捕20至28名，雨润乡捕13至14名，新仁乡捕16至18名，蒲台乡捕19至21名，中巴乡捕16至18名，城台乡捕17至19名，马场乡捕18至19名，芦花乡捕15至17名，中岭乡捕12至13名，引胜乡捕18至20名，达拉乡捕15至17名，双堡乡捕9至10名，宗教寺庙捕7至10名。时间要求：六月二十五日开始至七月十五日结束，六月二十日先逮捕一批，七月三日至五日再捕一批，最后于七月十二日至十五日把所掌握的对象全部捕捉起来。”

这么详尽周密的捕人计划，堪称“一绝”。今天的年轻人会问，怎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不会吧！我要郑重告诉他们，这些令人难以置信的荒唐事，在我们的共和国确确实实发生过。而且还不是一个地方发生过。

当时主管政法工作的中央领导，非常欣赏一句口号：叫做“一长代三长（公安局长、检察长、法院院长），一员顶三员（侦查员、检察员、审判员）；下去一把抓，回来再分家。”在这个口号指导下，公、检、法三机关等于一个机关，没有任何制约和监督。党、政领导，三家干警，带上空白逮捕证，走到哪里捕到那里；想逮捕谁，就逮捕谁；所谓回来再分家，也根本不分家。1959年12月，西宁市公安局抽调15名干警到湟中县三合公社开展“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副市长惠普对他们说：“你们下去是贯彻中央庐山会议精神，坚决反击右倾翻案风，任务很艰巨。为了打开工作局面，必须逮捕一些人，

在需要时，你们可以先捕人，然后到局里办手续。”结果，工作组到公社不久，就决定逮捕 58 个人。惠普自己下乡，总是带着空白逮捕证，走到哪里捕到哪里，他说这样做“要捕即用，手续简便”。

由于公、检、法三家变成一家，被逮捕的人就一定会判刑。有的地方捕人太多，法院审判员少，于是事先将判决书印好，判人的时候不开庭，不和被告人见面，不审问，只在印好的判决书上填上姓名和刑期即可。玉树州法院有一张判决书竟判了 183 人。判决书这样写道：“被告×××，解放前一贯不务正业，品质极端恶劣，曾先后奸污有夫之妇 607 人，强奸妇女 51 人，鸡奸 305 人，互相鸡奸 30 人”。大家可能看不懂这莫须有的罪名，更看不懂这判决书是怎么回事。原来这 183 人中有 11 个妇女，172 个男人，把他们通奸（包括男女）、强奸、鸡奸、互相鸡奸（男人）累计统计起来，得出那个总数，而不分每个人有多少这样的行为，可是从文字上看，似乎这 183 人每人都强奸了 607 个人，包括 11 个妇女，也犯了强奸、鸡奸罪。这张判决书，是省委工作组到捕人比例最高的玉树州检查时发现的。以后我随领导到玉树，亲眼目睹了这张判决书。

这张判决书可以作为“文物”珍藏起来，以教育后人，告诉他们，什么叫草菅人命。

“大跃进”时期包括历次政治运动中发生的种种荒谬透顶的违法乱纪行为，根子在上面，在中央。没有中央的路线错误，这种情况是不会发生的。比如，在极左年代，逮捕人犯由中央下达计划指标，就很荒唐，哪里还有实事求是精神？

1962 年中央七千人大会后，中央政法领导小组给中央写了一个《1958 年至 1961 年政法工作总结报告》。报告说：“在充分肯定政法工作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实际工作中也发生了一些缺点和错误，主要表现在：第一，公安机关、法院和检察院，错捕了少数不应当捕、不应当判的人。少数基层公安机关不按照国家法律办事，用拘留、劳动教养和集训等办法，变相地逮捕了一些人。还有一些无权逮捕人犯的机关单位（如公社、大队、工地、企业、学校），甚至个别党委机关、个别负责人，也非法行使逮捕、拘留的权力。或者滥用拘留、劳教、集训等手段，变相捕人、押人。尤其严重的是，极少数地方负责干部采取逮捕、拘留、判刑等法律手段，去推行他们违背中央路线、方针的错误政策……”

1958 年公安工作要点明确提出“把应该逮捕的人依法逮捕起来，把应该管制的人依法管制起来”。什么是“应该”、依什么“法”？从中央到地方没有人把法律放在眼里。毛泽东在 1958 年 8 月 21 日北戴河协作区主任会议上说：“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民法和刑法那一类法律都不需要了。民法刑法那样多条谁记得了？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我们每个决议都是法，开会也是法……我们主要靠会议，一年搞四会，大跃进，就没有时间犯法！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根据毛泽东的讲话精神，中央政法领导小组马上写了一个报告，题目是《关于人民公社化后政法工作一些问题向主席、中央的报告》，明确提出：“刑法、民法、诉讼法已经没有必要制定。”当时这三个法律案已经起草完毕，多次修改，成熟了，但是由于法律虚无主义思想作怪，一直没有经全国人大通过，现在中央政法领导小组干脆说这三部法律没有必要制定，政法部门机关怎么执法？只能依据党的决议、领导人的指示办事。中央政法领导小组自己不按法办事，把错误全部推给下面，是不

公平的。

刘少奇看了这个总结报告有个批语，说：“这几年的政法工作的错误，主要是用处理敌我问题的办法去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用对付敌人的专政办法来处理自己人的问题，处理劳动人民的问题，这是个根本错误。这不是共产党的方法，而是国民党的作风，是站在人民之上，向人民施用压力。”

刘少奇对政法工作错误性质的批语一针见血。但是他没有明确指出错误发生在地方，根子在中央；没有明确指出从中央到地方都不按法律办事，是错误发生的根本原因。

不过也不奇怪。在“大跃进”时期，刘少奇是“大跃进”运动的积极鼓吹者、实践者，也是法律虚无主义者。1958年8月21日他在北戴河协作区主任会议上也说过：“到底是人治还是法治？看来实际上靠人，法律只能做办事参考。党的决议就是法。”有了毛泽东、刘少奇的讲话，所以在“大跃进”时期，各级党委的决议都成了法，领导人的话也是法，倒霉的只有老百姓了。

“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红卫兵斗争刘少奇时，一次他拿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说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受宪法保护，你们斗争我是违法的。可是在宪法和法律被践踏殆尽的情况下，宪法和法律已经不能保护他了，被残酷迫害致死，令人无限感慨。他说过“党的决议就是法”。所以1968年八届十二中全会决议定刘少奇为“叛徒、内奸、工贼”，宣布“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这样一个违反宪法的党的决议，送了刘少奇的命。

不尊重宪法和法律，就得不到宪法和法律保护。其教训是刻骨铭心的。

第八章 成都七年

一、初识成都和“为人民服务”

经过一夜轰鸣，昨晚十九点从重庆开出的火车于今日上午六点多钟抵达四川省会城市成都，拥挤在硬座车厢内的一百多名劳教分子奉命在车厢内略作滞留，待其他旅客下车，一长串人流奔向出站口以后，才整装下车。到了站台上，突然出现五六个押运人员，右手插在裤兜里，以警惕的目光监视着每个人的行动，列队清点人数，确认一个不少，鱼贯而行，走出了成都火车站。站前的坝子里早有几辆敞篷大卡车迎候了，俨然有什么重要人物要到达的样子，周围有几个身穿便衣的人来回巡视，阻拦闲杂人等接近那几辆卡车。我们那时都很年轻，大都二十多岁，动作灵活迅速，抱着到成都摘帽子的心情，几分钟的时间就秩序井然地陆续登上了卡车。

站前游人不多，五十年代，成渝之间只有一条铁路，商品经济不甚发达，来往人员稀疏。重庆至成都每天只有一趟客车往返，每列客车满员可容纳一千四百人，上座率不及百分之七十，列车每小时平均行驶速度不到四十公里。

毛泽东极力宣扬的“超英赶美”“大跃进”已经轰轰烈烈一年多了，报纸上说农业获得空前大丰收，钢产量翻了一番。最明显的成效就是物资短缺、市场萧条，民众饥肠辘辘、百姓瘦骨嶙嶙，外出旅行的近乎绝迹，探亲访友的寥若晨星。

汽车沿着人民北路南行，许多人都是第一次来成都，站在拥挤的车厢内用好奇的目光东张西望。街道不宽，但是平直，不像重庆那样随时都要爬坡

上坎。当时成都街道两旁没有高楼大厦，多半是两三层的建筑，间或看到四层楼高的红砖房就算是鹤立鸡群了。

公路上来往的车辆也不多，除了自行车以外，紧挨着人行道不时出现几辆人拉的架架车，间或驶过一两辆脚踏三轮车，偶尔有一辆小汽车或运货的卡车。公交车隔好几分钟才有一辆，车顶上背负着几乎和车身一样长的鼓鼓囊囊的橡胶大气包，据说缺少汽油，改用了石油气，于是公交车只好背着气包去旅行。

公路两边的便道上，稀稀拉拉的行人不紧不慢地走着，临街的店铺开着灯关着门，似乎没有什么生意。不时看见一些小茶馆，稀疏的灯光笼罩在蒙蒙的雾气中，散落在茶桌四周的竹椅上坐满了清晨即来品茶的顾客，中老年居多。或许是天气比较冷的缘故，整个城市好像还没有起床。

1956 年我读过一篇文章《瞬息千变话成都》，是当时的成都市市长米建书写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我记得那篇文章语言生动、文字优美，把成都描绘得风光旖旎，引人入胜。早就想来成都看看蜀汉名城的古韵，川西坝子的胜景，因为在军工企业上班，任务繁忙，难得找到机会，今天以右派兼劳教的身份，向成都说一声，我来了！你将会给我什么样的感受呢？

汽车行过昔日的皇城后子门，豁然开朗。前面是一条纵贯南北的穿城大道，路面宽六十四米，长数公里（如今已延长到二十公里），平坦笔直，两边栽着匀整的法国梧桐，极目望去，颇为壮观，透露着新兴城市的轩昂气派。看来这条路的设计者颇有超前意识，据说是成都市副市长李劫人[1]力主仿照巴黎香榭丽舍大街修建，务求开阔宽广，得到市长米建书的支持，经多方讨论才确定方案，1958 年建成开通，命名为人民路南段，后改称人民南路。今日已经成为成都市日益繁华的标志性主干道。

中共喜欢用人民这两个字冠名，此举源于毛泽东 1948 年 9 月的一次讲话，他说：“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各级政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各种政权机关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如法院叫人民法院，军队叫人民解放军。以示和蒋介石政权不同”（《毛泽东文集》第五卷，第 135—136 页）。

有了圣谕，于是，神州大地出现了人民共和国、人民政府、人民政协、人民代表、人民大会堂、人民英雄纪念碑、人民解放军、人民警察、人民日报、人民银行、人民币、人民法院、人民公园、人民铁道、人民邮电、人民大学、人民医院、人民公社、人民公仆、人民勤务员……乃至“为人民服务”、“执政为民”、“以民为本”“以人民为中心”等等。

然而，凡门口挂“人民”二字招牌的地方，岗哨持枪而立，戒备森严，一般人民是不能随意进出的，这就是“人民政府”。

好不容易找到一个“人民银行”，还不办理个人储蓄业务，原来是制定货币政策、发行人民币的要害机构，闲人免进。

只有“人民医院”准备好了钱就可以进去，却又是人们不愿意时常走动的地方。

《人民日报》挂着一个人民的头衔，可又说它是党的喉舌。它姓党。究竟是人民的还是党的呢？老百姓莫名其妙。大跃进时期亩产水稻十三万斤就是它的头版头条，你相信吗？修了三峡水库，万吨巨轮可以直航重庆，你看见了吗？现在重庆到上海的客轮，除了保留一艘旅游船以外，已全部停航。如果直航的话，过船闸要耽误五六个小时，由此，一条大江被截成了两段，所谓万吨巨轮直航重庆成了痴人说梦，《人民日报》除了满纸荒唐的谎言，没有

真话，它能代表民意吗？

地处偏僻小巷、门口的匾额上没有冠以“人民”二字的厕所，倒还允许随便进出，似乎只有那里体现了为人民服务。一旦命名为“人民公厕”，大概就要收费了。

每年三月“人民代表”齐聚北京，住高级宾馆，品美酒佳肴，当局要出动数十万军警严加保护，平均每个代表有二百五十个保卫人员，把人民与他们的“代表”隔离开来。胆敢接近“人民代表”反映情况、递交申诉材料的人，立即抓走。人民说：不要这些代表也罢。

民本思想，我国古代早已有之，西周传世古籍《尚书》里就已经提出，“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的理念，人民是国家的根本，必须顺从人民的意愿。春秋战国时期，孟子更明确地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见《孟子·尽心下》）的政治观点，还说“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见《孟子·万章下》）。也就是说，当君主有大的过错而又不听多次谏阻时，就可以变易其位，另立新君。

这些古代的民本思想是华夏文明的宝贵遗产。可惜的是，它没有转化成完善的民主制度，只在历史上留下了绵亘两千余年的空谷足音。

需要注意的是，民本思想不等同于民主思想，“以民为本”和“以民为主”迥然不同。

民本思想是封建时代、君主专制时代的产物，是为专制政体服务的。民本思想是从统治者的立场出发的，而不是从人民的立场出发的，为政以民为本，是为了统治者能得天下并保天下，于是有了“为人民服务”“以人民为中心”等招摇口号。

民主思想则与此完全不同。民主思想是从人民的立场出发的，人民具有天赋权利，统治者的统治权由人民授予，只能按照人民的意志及全体人民制定的宪法进行统治，不能代替人民作主，更不能擅自作主；各级官吏只是人民公仆，决不是什么父母官，也不是什么领导核心，更不是什么大救星；人民有权罢免不称职、不按自己意志办事的任何官员。公仆的职责是为社会服务而不是强迫人民做驯服的工具，公仆的待遇不应该超出人民数十倍，公仆退休后不应享受各种特权。

中国共产党无时不在宣扬人民当家作主，无处不以人民之名树立牌坊，走近中共中央所在地，迎面扑来的是中南海新华门里影壁上几个恣肆张扬的镀金大字“为人民服务”。可千万不要忘记，“人民”是不能随意进出这个地方的，即使是中共的高官，未经允许也不准擅入宫门。就在这占地一千五百余亩的皇家禁苑里，住着一个高踞于人民之上的太上皇，天安门上挂着的是他的画像，《东方红》里唱的是“他是人民大救星”，中南海里里外外，直接为他服务的不下数百人，“大救星”主宰着人民的生死存亡。他效法秦始皇，痴迷于长生不老，在他晚年临近垂死之际，人民要天天喊“万岁！万岁！万万岁！”，“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为他祁寿。他权欲熏心，谋取家天下而不得；殚精竭虑，欲求老不死而未竟。到头来只剩下孤家寡人，免不了还是一具僵尸。死了以后还在广场中央修建了一个偌大的停尸房，每年花费上千万元的腐尸维护费，继续“为人民服务”呢。

毛泽东的继承者不敢露骨地效法封建皇帝让人喊万岁了，但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那个党总在人民之上。只听他们常常说“党和人民”“党和政府”“党政工团”“党指挥枪”“听党的话”甚至公然叫嚷“党的利益高于一切”（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党的事业至上”（2007年末胡锦涛在同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代表、全国大法官、大检察官座谈时发表的内部讲话）。还有官员责问记者：“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2009年6月17日某记者采访河南郑州规划局，质疑在经济适用房土地上修建别墅问题，该局副局长逯军面对记者语出惊人：“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在中共这些官员眼里，所谓“执政为民”，只是维护自己手中权力、地位和利益的幌子。正因如此，才会有全国政协委员、山东省政协主席孙淑义对世界通行的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反唇相讥：“老百姓为什么不公布财产？”才会有海事局党组书记林嘉祥酒后乱性，猥亵十一岁女童，事情败露后，疯狂地叫嚣：“我就是干了，怎么样？要多少钱你们开个价吧。我给钱嘛！”“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北京交通部派下来的，级别和你们市长一样高。我掐了小孩的脖子又怎么样，你们这些人算个屁呀！敢跟我斗，看我怎么收拾你们！”满口说的是具有中共特色的豪言壮语，地道的中共本色。流传了一段时间的“屁民”之说就是从这儿兴起来的。

在这些人身上，公共权力已经异化为维护私利的冠冕和颐指气使的权杖。“一切属于人民，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一切归功于人民”的承诺何存？！“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誓言安在？！俱都成了梦呓和谎言。

当大火熊熊燃烧，剧场面临垮塌时，政府官员[2]高喊：“大家不要动，都坐下，让领导先走”致使烧死了三百二十三个学生，保护了二十五名领导[3]。

当交通堵塞，成都执勤交警中队长驱赶过往车辆时喊的是：“我只管领导安全，是领导重要还是你们这些人重要？”[4]。一个动漫游戏博览会，顶大的官儿也就是省市一把手吧，要是中央的“公仆”来了，必定是警车开道，封锁交通，把“主人”驱赶到远远的，这就是执政为民？

中共从来没说过“人民和党”，没说过“党要听人民的话”。只说过人民要听党的话，要做党的驯服工具。究竟是党为人民服务，还是要人民供其驱使，岂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翻阅历史典籍，观察古今社会，发现以“人民”做幌子的并非只此一家。意大利大独裁者墨索里尼是打着“人民”旗号攫取国家政权的，他掌控的法西斯党机关报即称为《意大利人民报》；纳粹德国于1944年为审判未遂政变参与者而设立的特别法庭称为“人民法庭”；1945年4月30日，杀人魔王希特勒在柏林地下元首府中饮弹自尽，其个人遗嘱中写道：“我愿意在这个我‘为人民服务’了十二年的地方结束自己的生命”；明明是父传子、子传孙的金氏封建世袭王朝，其军队却称为“人民军”；发生于七十年代、导致千余教徒“被自杀”的恐怖邪教组织也自称“人民圣殿教”；诸如此类，把人民写在自己额头上的独裁者、暴君及“爱国者”应该还有很多。人民啊！还能再相信这些骗人的谎言吗？！

据说共产主义是要消灭阶级、消灭党的，可是直到如今还在不停地喊那个党万岁，人民只是党的驯服工具，甚至只是一颗螺丝钉。不仅是“工具”、

是“螺丝钉”，而且要“驯服”，还要“永不生锈”，无论怎么解读，“驯服工具”这个称谓，都跟“主人”两个字挂不上号，倒好像是奴隶似的。一旦那个党认为你稍有不驯服，就可以送去劳改、劳教，任由宰割，用专政手段让你驯服，中共执政几十年，这种例子数以千万计。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 2011 年“七一”讲话中高叫“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总共一万四千余字的讲话，“人民”二字出现了一百三十六次之多，口头上对人民是何等重视哟！然而，在他执政的年代，社会现实却是禁言、禁书、禁报、封闭网络；强拆民房，阻拦上访、秘密抓捕、迫害持不同政见者，关押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胡（锦涛）温（家宝）当政期间，人权恶化、司法倒退、权贵崛起、腐败加剧，独裁统治愈演愈烈，贪官酷吏肆意横行。四个直辖市的共产党头目，三个（北京的陈希同、上海的陈良宇、重庆的薄熙来）都成了横征暴敛、巧取豪夺、鱼肉乡里、胡作非为、腐化堕落的罪犯，直辖市头目的犯罪率高达 75%，原来就是他们在“为人民服务”。

2012 年 11 月，中共召开十八大。在两万八千余字的政治报告中，“人民”二字出现了一百四十五次，简直是把人民举过了头顶。二千二百七十个党员代表聚在北京，开个换届大会，竟有一百六十万公安干警、一百二十万武警战士一线待命。北京市出动了七十万警察，动员了一百四十万志愿者，十一万安全保卫人员“誓死保卫十八大”，防民甚于防寇。会议期间，市区四百公里范围内不准放鸽子、不准放风筝、不准放气球、不准放玩具航模；进入天安门广场必须经过 X 光照射安全检查[5]；途经长安街的各类车辆不准打开车窗，市区内七万多辆出租车被强令拆下车窗摇柄，防止乘客开窗散发传单；公园的游船停止运营，防止民众仿照中共一大在游船上集会；天空警用直升机盘旋，地下数十米安保人员密布，地铁每节车厢配置一名专业红袖标站岗；商店里的菜刀一律撤柜，必须购买的话要凭身份证，登记实名；农民工随身携带的工具被扣留在火车站安检处；北京四环路以内所有工地暂停施工，严防上百万农民工携带锄头、铁锹揭竿而起；所有大型会议，包括音乐会，甚至国际马拉松比赛均被延期，唯恐聚众闹事；往常十一月中旬供暖提前到月初，以便让人们更多地呆在家里，减少外出，防民甚于防敌。好一派“以民为本”“执政为民”“人民当家作主”的太平盛世景象。一个被数百万人“誓死捍卫”的党内会议，每天都在无限制地挥霍着纳税人的血汗钱，光是数百万保安人员的值班补贴即高达数十亿元，远远超过美国大选的费用，中共换届会议均由国库开支，共产党是不花一分钱的，用的全是民脂民膏。这也叫为人民服务？！

附注：

[1] 李劫人（1891-1962），生于四川成都，祖籍湖北黄陂，中国现代具有世界影响的文学大师之一，也是中国现代重要的法国文学翻译家，知名社会活动家、实业家。原名李家祥，常用笔名劫人。中学时代大量阅读中外文学名著，擅长讲述故事。1912 年发表处女作《游园会》，1919 年赴法国留学。23 岁任《四川群报》主笔、编辑，《川报》总编辑。建国后曾任成都市副市长、四川文联副主席等职。代表作有《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和《大波》。另外，发表各种著译作品几百万字。

[2] 况丽，女，生于 1956 年，原系新疆石油管理局教育培训中心党委副书记。是 1994 年克拉玛依大火（一二八事件）不指挥打开安全门让学生疏散，只顾自己逃

生的人。就因为她一句“同学们不要动，让领导先走”使数百名学童葬身火海。

在死者家属强烈要求下，1995年，法院以玩忽职守罪判处况丽有期徒刑四年。她出狱后，居然恢复职务，重新入了党！现在任职：中石化云南分公司总经理，安宁市对二甲苯（para-xylene 缩写为PX）项目总负责人。

[3] 1994年12月8日，新疆克拉玛依市教育局为欢迎上级派来的“义务教育与扫盲评估验收团”的二十五位官员，组织全市能歌善舞的中小学生七百九十六人在友谊馆剧场举办“专场文艺演出”。因舞台纱幕太靠近光柱灯，被烤燃而引起火灾。当燃烧的火团不断地从舞台上空掉下时，克拉玛依市教育局的官员出来对着学生和教师高声喊叫：“大家都坐下，不要动！让领导先走！”。一句“让领导先走”的呐喊，喊出了二十五个“领导”“奇迹般”衣冠楚楚地撤离会场，喊出了自己的官运亨通，也喊出了三百二十三个学生和三十六位教师的惨不忍睹的尸体！这就是高唱为人民服务的政党！

[4] 2010年12月11日，首届西部动漫游戏节博览会在成都双流体育中心召开。上午9时20分，参会代表乘坐的汽车经过人民广场路段，大约十分钟后即将抵达会场大门，此时大门外侧正有三辆车等待进入，执勤交警副队长梁忠上前用手拍打一辆车的车窗，命该车司机迅速驶离。司机询问时，梁忠高声喊道：“我只为领导服务”“我只管领导的安全”。

[5] 1949年以前进入天安门广场历来是无需安检的，我那时刚上中学，身上不带一分钱，一年要跑几次天安门，就是贪玩。五十年代后期开始设置便衣警察，二十世纪初期增加了巡逻警车，2008年在天安门广场入口设置了九个配置了X射线透视装置的安检通道，游人必须经过安检才能进入，每逢重大节日和游人比较密集的时候还有便衣警察和几只防暴犬参与搜索。看来人民政府对人民越来越严加防范了。

二、劳改企业大发展

言归正传，当年满载着右派和劳教分子的大卡车在人民南路上只行驶了几分钟便到了目的地，新南门附近的一个巷子，门牌好像是建国西街七十五号。停下车，人们被驱赶进一个布局杂乱的院落，大门口没有牌子，这里是劳教人员的住地，简陋的房屋，潮湿的地面，没有床，没有任何家具。铺了一层稻草就成了睡觉的地方。

后来才知道这里叫“劳改局加工厂”，是四川省劳改局1959年才组建的工厂，收容着一百多个劳动教养人员。生产车间在住地附近的同兴上街六号，百余人挤在简陋的厂房里从事机械加工劳动，承接来料加工，按图制造。规模虽然不大，却有点名气，一是出于对劳教单位的好奇，二是这个工厂里面有一些能工巧匠，搜罗一点破旧机床，经过他们的手可以整旧如新。那时候不仅生活资料奇缺，生产资料也十分紧俏。机械厂买不到机床、工具、量具、刀具，他们凭借着严师传授的车、钳工技术和几把简陋的卡钳，可以制造出简易车床，劳改局加工厂赖以起家的那十多台仿C612车床就出自他们之手。车钳工尤其是钳工离不开使用锉刀，市面上无货供应，一个姓柳的劳教工匠靠錾头、錾子就能够做出粗细齿锉刀，而那些錾头、錾子也是这些人一件一件自己制造的。

“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这些独具中国特色的政治运动都取得了巨大成果，极大地促进了劳改和劳教事业的发展，监狱数量不断增多，监狱规模不断扩大，均应该归功于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吧。

毛泽东 1951 年 4 月 20 日致电各中央书记时说：“将许多犯人列为无期徒刑，离开本县，由国家分批集中，从事筑路、修河、垦荒、造屋等生产事业。”他这个“英明”指示得到了良好的贯彻。四川省的李井泉（后升任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紧跟毛泽东的战略部署，是“极左”路线的得力干将，除了在荒无人烟的大小凉山地区修建了星罗棋布的监狱以外，还从各个劳改农场抽调了八千余名身强体健的劳教人员组建了“四一五筑路支队”远赴云南、转战川陕，修建铁路。

五十年代末期，四川省劳改局成立了以劳动教养人员为主体的建筑工程队，承接大型工程。当时成都市引为骄傲的锦江宾馆是蓉城最高建筑，劳改局的建筑工程队是施工主力。此外还修建了不少监狱工程，便于保密，也属于让两劳人员（即劳改、劳教人员）作茧自缚吧。

进入六十年代，报纸上宣扬的是形势越来越好，大好形势的具体体现之一是劳改、劳教人员越来越多，尽管监狱、看守所不断扩大规模，仍有人满为患之虞。

名不见经传的“劳改局加工厂”遇此良机，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新南门的地址狭小，于 1960 年搬迁到青羊宫对面的通惠门，占地面积扩大了十倍，保留加工厂建制，成立了铸造、锻造、机械加工、装配等四个车间，新组建了拥有员工三百余人的汽车修配分厂，半年多的时间，即从百十来人的简易作坊发展到总体规模近千人的机械制造厂。

劳改局加工厂起初为公安、检察、司法等部门修理汽车，承接委托加工，继而发展到为劳改农场和工厂提供技术装备，比如为德阳机制砖瓦厂制造大型砖机等等。1960 年开始制造平面磨床，1961 年初具规模，可以成批生产几种型号的平面磨床，跻身于全国十大磨床厂之列，由此劳改局加工厂正式更名为四川磨床厂。1963 年，磨床产量日益增加，需要大型铸造车间，通惠门场地又已显狭窄，于是在成都北门外天回镇附近另行征地，按照监狱的布局建造新厂，可以关押数千服刑人员，该厂延续至今，已有五十余年历史，目前尚有一千八百余名在押劳改犯。（笔者补记：写作途中闻悉，2012 年，磨床厂关押之犯人已被转移到自贡、德阳、绵阳等地。原址另有他用。据说准备用作四川省第一座女子监狱，看来监狱事业又要大发展了。）

四川磨床厂迁出通惠门以后，汽车修配分厂留在原地，随之扩大规模，增添人员，定名为通惠汽车修配厂。保留汽车修配业务，扩展消防产品，生产灭火器、消防栓、消防泵、进而发展到制造整体消防车。并在成都龙泉驿大面铺征地建设水泵分厂。1964 年，通惠汽车修配厂更名为四川消防机械总厂。

六十年代初，柴油机物资紧俏，四川省劳改局在成都外北驷马桥征集数百亩土地，从磨床厂、消防机械厂、新生电机厂等劳改企业抽调人员，创办动力机械厂，当时是成都市最大的机械厂，可容纳八九千人劳动改造。

短短的五、六年时间，一个百十来人的劳改局加工厂，发展成了四川磨床厂、成都动力机械厂、四川消防机械总厂、通惠汽车修配厂等四个中型工厂，总共可容纳万余人。劳改企业的发展速度堪称惊人，或许这就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吧。

此外，成都市还有新生电机厂，新生机电工具厂，新生印刷厂，成都劳动工厂等等，均属劳改企业。

成都市工业基础比较薄弱，五十年代初期，几乎没有规模较大的工厂。劳改企业的长足发展，一下子给成都市增加了十来个工业企业。后来兴建了

成都钢铁厂、成都无缝钢管厂、成都量具刃具厂、四川化工厂、四川棉纺织品一厂、和位于东郊的几个军工电子产品厂。六十年代陆续从沿海地区内迁了飞机制造、发动机制造等行业，成都市的工业才有了一点基础。在机械制造系统，劳改企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劳改企业空前发展，说明什么问题呢？是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吗？

据说资本主义国家是极少数人统治多数人，是资产阶级专政，法西斯专政。广大人民群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处在受压迫的地位，期盼着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国家则具有最广泛的民主，绝大多数人都是国家的主人，只有极少数人属于专政对象。按照这个说法，资本主义国家监狱的数量和关押人数的比例都应该大于社会主义国家，怎么斯大林执政的前苏联、波尔布特执政的民主柬埔寨以及毛泽东执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有庞大的监狱和劳改营，被关押人员在国民总数中的比例远远大于被称作法西斯专政的国家呢？哪位马列主义的理论家能够对此作出解释呢？

从1959年底到1966年11月，我在成都生活了七年，1961年12月22日以前的身份是戴着右派帽子的劳动教养分子，1961年12月22日到1966年9月30日的身份是摘掉右派帽子、解除劳动教养被强制留在劳改场所劳动的就业人员。

虽然从1957年8月我被无端地划为右派分子，又于1958年被无理地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在重庆新建机械厂被专政了一年多。但是由于从小接受的是共产主义教育，五十年代即加入了共青团，曾经发誓要为中国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生。六十年代初期，对中共之谎言与欺骗尚未识破，对中共的邪恶本质尚未认清，对毛泽东依然敬仰崇拜，尽管感觉“反胡风”“反右”等政治运动不正常，“大跃进”也违反了经济发展规律，尽管个人受到了不公正待遇，强加给我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名，被列为专政对象，却只把它当作了个案，没有从党国体制上找原因，没有上升到理论层面去认识，对中国共产党还存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我在成都这七年，经历了大跃进、大论战、大饥荒、大浮肿乃至文化大革命，中共的谎言与暴力日益显露，不得不使我这个学理工的、对政治比较迟钝的一介书生，对共产党的本质和执政行为产生了怀疑。一桩桩一件件含着血与泪的事实，逐渐地动摇了我对共产教义的笃信，破除了我对毛泽东的崇拜。

这里借用毛泽东1963年5月说过的一段话“无数客观外界的现象通过人的眼、耳、鼻、舌、身这五个官能反映到自己的头脑中来，开始是感性认识。这种感性认识的材料积累多了，就会产生一个飞跃，变成了理性认识，这就是思想。”（《毛泽东文集》第八卷第320页）

以下记录的就是我在成都七年历经的重大事件和思想变化过程。

三、难忘的1960-1961年

（1）暗淡的现实 荒诞的社论

1959年的冬天气温偏低，或许是因为腹中无食的缘故，显得特别冷。粮食定量二十一斤，每月要支援灾区节约二斤，就只剩了十九斤。二十几岁的小伙子怎么能吃得饱呢。平日菜蔬也很少，每人每天供应半斤到一斤蔬菜，大半是萝卜缨、厚皮菜、空心菜。每人每月供应四分之一斤猪肉（后来改成八分之一斤，而且有好几个月没有供应）、四分之一斤菜籽油、八分之一斤糖果，除此之外就没有其它副食品了。

伟大领袖号召“低标准，瓜菜代”，可哪里去找瓜和菜呢？农民都在挨饿，城里人也没有菜吃了，劳动教养分子终日关在高墙之内，连瓜、菜的影子也看不见。四处张望，只有东南风和西北风，那是不能用来填饱肚子的，冷风袭来更加重了饥寒。人们期盼着六十年代能少挨一点饿。

六十年代第一天，《人民日报》发表了标题为《展望六十年代》的元旦社论。连续十多天，关在大门里的劳教人员每天晚上都要不厌其烦地学习这篇元旦社论。据说，不管什么话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

技术科的十几个劳教分子散乱地坐在凳子上，揣着两只手、蜷缩着骨瘦如柴的身躯，半闭着无精打采的眼睛，心不在焉地听读报。成都的腊月，晚间气温在零度左右，因为买不到玻璃，破烂的窗户只能用旧报纸暂时糊上，不时吹来阵阵寒风，簌簌作响。读元旦社论，据说可以认清大好形势，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促进思想改造。但是不能防寒，也不能充饥。心里怎么也暖和不起来。

社论开宗明义地说：“过去的十年经历了伟大的、深刻的变化，而新的十年在我们面前展现着无限的光明和希望。”

无限的光明和希望，多么诱人啊！其实，人们只要一点点光明和一点点希望就够了，那就是需要一个简易的烤火炉和吃顿饱饭。1956年跑步进入社会主义，进来三年多了，离共产主义应该越来越近了，怎么肚子却越来越空了、天气也似乎越来越冷了呢？吃顿饱饭是人生的最低要求，如今竟然成了奢望。现在又有了光明和希望，但愿这回不是谎言，不是欺骗，不是幻觉，不是梦境。

社论充分肯定“三面红旗”说：“党和人民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之下，根据最近时期的经验，找到了三个法宝，这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大跃进的发展速度和人民公社的组织形式。它们究竟是不是正确和有效呢？究竟是不是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呢？如果1958年还没有解除某些人的疑问的话，那么，1959年的经验就给了这些问题以进一步的肯定的回答。”

社论说得真好，疑问都被解除了，庐山会议上批斗了彭德怀，彭大将军被罢官撤职，国防部长当不成了，开国元帅在北京西郊挂甲屯种地去了，谁还敢有疑问？谁有疑问谁就是右倾机会主义，谁就被戴上反党的帽子，谁还敢说半个“不”字呢？

社论歌颂1959年的巨大成就说：“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关于在1959年提前三年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主要指标的号召，已经胜利地实现了。”

中南海的喉舌发出声音说：指标胜利实现了。老百姓的感受是物资严重匮乏了，几个月吃不上一顿饱饭了。

社论还说：“1959年的工业总产值大大超过了国家的计划，其中钢产量达到一千三百多万吨，即比1958年增长了五百万吨以上，或者60%以上。工业产品，无论重工业和轻工业，品种都有了增加，质量都有了提高，成本都有了降低。”听起来多么鼓舞人心啊。

我参加过1958年的炼钢，知道那是什么钢。收集各种各样的废钢废铁，包括居民煮饭用的铁锅、住户的铁门、甚至桥梁和公路的栏杆，放在“土高炉”里熏一熏、烤一烤、烧一烧，摇身一变成了中国特色钢，都计入产量了，就是这样东拼西凑，也没有达到一千八百万吨钢的预定指标。

品种增加了？天府之国的省会，偌大的成都市竟然买不到牙膏、鞋油、打火石、圆珠笔、缝衣针了。至于进口货（可以吃的东西）更成了稀缺物资，

老百姓只能望洋兴叹。

元旦社论继续说：“农业生产，在战胜了几十年未有的特大自然灾害之后，就全国说来，仍然得到了比 1958 年更大的丰收。农业总产值显著地超额完成了国家的计划。”

请注意并牢记，《人民日报》1960 年的元旦社论说 1959 年得到了比 1958 年更大的丰收，农业总产值显著地超额完成了国家计划。过了一年，还是这个《人民日报》，1961 年的元旦社论《争取世界和平和国内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胜利》是怎么说的呢？社论中有这样一句话：“**尽管整个工业战线都受到农业两年歉收的影响……**”两年歉收无疑是说 1959 年和 1960 年农业减产了。前面说 1959 年取得了比 1958 年更大的丰收，后面说 1959 年农业歉收，在这里，1961 年的《人民日报》打了 1960 年《人民日报》的耳光。中共似应查一查，这两篇社论是谁执笔的，连谎话都说不圆，还当什么主笔。昏君用的都是蠢材和奴才。

社论以赞颂的口吻说：“全国人民公社的组织日益健全，优越性日益显著，在农民中的威信日益增高。人民的收入增加了，市场的供应也相应地增加了。”

“人民的文化教育事业也得到了迅速的进展。”

“总之，全国城乡都洋溢着欣欣向荣的气象。”

好一个欣欣向荣！食品极度短缺，由营养不良引起的浮肿、消瘦等疾病广泛蔓延，除了中南海以外，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也未能幸免。贫血、紫绀、甲状腺肿、干眼病、佝偻病、脚气病、癞皮病、妇女绝经、小儿疳积等与营养不良密切相关的疾病患者高达数亿，饿死人的事层出不穷。《人民日报》元旦社论的作者大笔一挥，都成了欣欣向荣。

社论继续撒谎说：“由于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确定无疑的胜利，全中国的生活正在沸腾着。被解放了的六亿五千万人这样一个伟大的生产力，正在向着充分认清了的目的地，沿着充分认清了的路线，采取着充分认清了的方法，开足马力向前飞跑。”

我真的想不出来用什么语言形容元旦社论作者那无耻的心态和拙劣的文笔。经过 1958 年和 1959 年两年的实验，毛泽东叫嚷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都遭遇了巨大的失败，搞得国无宁日、民不聊生。竟然还吹嘘取得了“确定无疑的胜利”，还一连串用了三个“充分认清”，看来毛泽东是要在群众已经“充分认清”，他却执迷不悟的死路上顽固地走下去，毫无悔改之意了。

社论批驳“日暮途穷、卑鄙无耻的帝国主义者和各国反动派”说：“按照美国的宣传机器说来，1959 年却是中国‘最暗淡的年份’和‘最贫困的年份’。如果所谓‘最暗淡’和‘最贫困’就是这么一回事，那么，就让一些靠‘美援’维持统治的国家也来一些这样的‘暗淡’和‘贫困’吧！可惜，即使帝国主义者愿意这样作，他们也绝对不可能作到这一点。”

不知道社论的作者是吃饱了撑的还是饿糊涂了，竟然玩起了幽默，讥笑帝国主义和那些靠美援维持统治的国家。六十年代亚洲四小龙靠美援，他们真的没有做到像中国这样的暗淡和贫困，他们绝对不愿意这样做，也绝对不会这样做，那里的领导人没有让民众挨饿，更没有人为地制造大饥荒，六十年代恰恰是这些国家经济高速腾飞、国民收入快速增长的阶段。美国的宣传机器也真的是大错而特错，1959 年的确不是中国最暗淡、最贫困的年份，后

来的事实证明，1960年和1961年较之1959年更暗淡、更贫困。《人民日报》元旦社论的幽默成了对中共中央的绝妙讽刺。时光过了五十多年，现在拿出当时的社论回顾一下，有哪一句不是笨拙的谎言呢？

按照固定的模式，元旦社论谈了国内还要谈国际。

尽管中苏分歧由来已久，斯大林在世时，毛泽东处在被压抑的状态，不敢怒也不敢言。斯大林一命呜呼，毛泽东去掉了压在头上的大石头，他自以为在共产世界中的辈分、资格、地位、水平、功绩都无人能及，不满足于在中国唯我独尊，还野心勃勃地想称雄世界，无一日不觊觎着“地球酋长”这个宝座。及至后来还狂妄地宣称目前唯一居住着数十亿人类的星球是“小小寰球”，似乎偌大的地球都容纳不下他这个混世魔王了。斯大林一死，毛泽东就处心积虑、摩拳擦掌，着手夺取共产世界的霸主地位。

1954年中苏分歧即初露端倪[1]，1956年中共公开发表“论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2]，隐约地批驳苏联共产党。1959年中苏已处在公开分裂的前夜。但《人民日报》1960年的元旦社论还是冠冕堂皇、也是虚伪透顶地表示：“加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各国的团结，加强国际工人阶级的团结，加强社会主义力量同民族独立运动的团结，加强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团结，是取得这一斗争的胜利的最重要的保证。中国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兄弟般的团结，是社会主义各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是永远牢不可破的。帝国主义者和各国反动派永远也休想看到他们有可能破坏这种团结的一天。那些蓄谋损害这种友谊的人是不可能得到人民的支持的。因此，在未来的十年中，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将不断地获得巩固和发展，这是毫无疑问的。”

社论说中苏团结“永远牢不可破”、“在未来十年中，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将不断地获得巩固和发展”而且“毫无疑问”。

六十年代已经匆匆过去，回首往事，那十年恰恰是中苏论战愈演愈烈、中苏交恶日益严重的十年。历史给了《人民日报》1960年元旦社论一记沉重的耳光。我为中国有这样谎话连篇的《人民日报》社论作者感到耻辱。

社论高调预言未来说：“六十年代将是社会主义继续取得胜利的时代。毛泽东同志说：社会主义制度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一个不以人们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不管反动派怎样企图阻止历史车轮的前进，革命或迟或早总会发生，并且将必然取得胜利。”

这个伟大的预言实现了吗？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历史给出了最真实的回答。

《人民日报》的元旦社论是中南海的声音，笔者写回忆录的时候，1960年已经成为历史。五十年后检验，这篇社论没有一句真话。在历史的真实面前，谎言就是谎言。

附注

[1] 1960年5月25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见胡志明时曾提到，赫鲁晓夫1955年会见阿登纳时说要提防中国的“黄祸”，可见这个人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见吴冷西：《十年论战》上册，第350页）。

1974年5月25日，毛泽东会见英国前首相爱德华·希思时，希思问：“中苏的分歧主要是在思想方面呢，还是苏联的强权政治所致？主席如何判断苏联对中国的目的和动机？”毛泽东回答：“中苏的分歧要从1954年开始算起。因为1955年阿登纳到莫斯科，赫鲁晓夫就对阿登纳说，中国不得了了。”（见《毛泽东外交文选》，第

603 页)。

[2]1956年4月中共发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1956年12月发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公开了中共在评价斯大林，反对个人崇拜，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路线、策略，世界和平与战争等诸多问题上与苏共不同的观点，含蓄地批评苏共领导，表露中共才是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为争夺共产世界的领导权做舆论准备。

(2) 中苏大论战

《人民日报》1960年元旦社论声称：“未来的十年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将不断地获得巩固和发展，中苏团结是两国乃至全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永远牢不可破”。

事实上，1959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上海会议就提出了反对修正主义的口号，其矛头直指赫鲁晓夫。表面宣称以苏联为首，暗地里插上一刀，这是毛泽东的阴谋还是阳谋呢？

六十年代中共是怎样维护中苏团结的呢？请看如下一系列动作：

1960年4月，中共以纪念列宁诞辰九十周年为由，发表《列宁主义万岁》《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和《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等三篇文章，公开批判南斯拉夫修正主义，影射赫鲁晓夫；1962年12月到1963年3月发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等七篇文章；1963年6月发表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来信的答复《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1963年9月至1964年7月连续发表九篇文章评论苏共中央《给苏共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简称“九评”）。

为此专门成立了中央反修文件起草小组，直属中央政治局常委，组长康生，副组长吴冷西，组员有廖承志、伍修权、刘宁一、乔冠华等，实际领导是邓小平。此外，中联部、外交部、中宣部、中央编译局、中央党校、中央调查部、新华社、人民日报社、《红旗》杂志社、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等单位豢养的“专家学者”，也随时根据需要提供信息和材料。

为了论战，中方花大力气收集苏联和其他各国共产党领导人有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讲话和决议，收集美国总统、国务卿、国防部长、英国首相和政府高级官员的讲话，收集西方国家主要报刊的评论，以求在文章中旁征博引、显示不凡。

“九评”的每篇文章，都是毛泽东拟定题目、授命写作、亲自修改，最后拍板而成，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也参与其中。“九评”以“真理在手”、“唯我独革”的心态，以气势压人、讽刺奚落的口气，以及连珠炮式的不容答辩的反诘疑问，使撰稿人和许多当事人津津乐道、自鸣得意。俨然认为中方大获全胜。但这只是关起门来的臆想。实际上，中共发布的政论性文章完全听命于毛泽东变幻莫测的意识与好恶，强词夺理，论据不足，尖酸刻薄，诡辩有术，且有很大的随意性。例如：1956年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说：“南斯拉夫的同志们在困难条件下，作了坚持社会主义的可贵的努力。”1960年在《列宁主义万岁》中却称南斯拉夫为修正主义。1963年发表的“九评”则霸气十足地公然辱骂“铁托叛徒集团”。

五十年过去了，当初争论的一些重大问题，历史已经给出了答案，比如世界大战是否可以避免；东西方之间是否应该通过谈判解决争端；裁军是否有利于缓和紧张局势；是争取和平共处、和平竞赛，还是通过输出革命或战争彻底埋葬资本主义等等。都已经成为人们的普通常识。

当时，包括苏联在内的欧美共产党人，由于处于更为开放的环境，拥有更为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生产力，他们对于科学技术进步带来的变化，对于把握世界发展的潮流和趋势，显得更敏锐和准确一些。对于社会主义国家需要改革自己的经济和政治体制，看得更清楚一些，显得更迫切一些。然而，当现实主义的、温和理智的立场碰上教条主义的、激进狂热的立场，而双方都打着同样的某种经典教义的旗帜时，往往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后者在气势上甚至容易占上风。

只有历史的发展才能使那些盲动的空想家失掉虚幻的光环，中共自以为是得意之作“九评”，如今已成为不攻自破的笑谈。

现在的人很难设想，一个大国的最高领导层竟然在举国之众饿着肚子的情况下，强调“反修、防修”是立党立国的头等大事。把如此之大的精力、如此之多的时间、如此之宝贵的人力和行政资源，投入到经历如此之长久的和别国的意识形态争论之中。只能表明毛泽东的狂妄与无知，视人民如草芥，视权欲为生命，彰显其争当世界领袖的狼子野心。

邓小平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回顾和总结中苏论战时说：“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在变化了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邓小平这句话是不是否定了“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呢？应该说邓小平历经文革中三落三起之后，开始承认了现实。

对毛泽东来说，论战达到了把赫鲁晓夫搞臭的目的。后来毛泽东把对外的“反修”变成对内的“反修”，发动文化大革命，他只是靠把刘少奇称为“现在正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就轻而易举地打倒了他。这方面的恶果是形成了一种政治思维定式，对探索改革，敢于冲破束缚的人，只要暗示他可能是“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只要暗示必须警惕他“在斯大林死后作秘密报告”，就一定能让他噤声，使任何变革的意图化为泡影。

当毛泽东搞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时，赫鲁晓夫称之为“不切实际的幻想”和“小资产阶级狂热”，而毛泽东则在游泳池旁穿着睡衣会见这位苏联最高领导人，毛泽东自以为高高在上，不可一世，国际外交界则嗤之以有失体统、不懂礼节、丧失人格。毛泽东的痞子本质暴露无遗。赫鲁晓夫见毛泽东如此傲慢，自然不能认输，随即脱了衣裤跳到游泳池里和毛泽东对话，两个大国领袖光着膀子会谈，成了世界外交史上的新鲜事。

除了“大论战”，中共在六十年代还做了哪些加强中苏团结的事情呢？

1960年在莫斯科举行的八十一国共产党大会上，苏共否定斯大林，力求破除个人迷信给苏联带来的沉重影响，让苏联更好地发展。中共代表周恩来当场予以严厉批评与驳斥，并率代表团提前回国，以示抗议。中共认为斯大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否定斯大林就是丑化共产主义运动，给帝国主义者以可乘之机。

1960年5月1日，苏联击落了一架美国U2侦察机，美苏关系降温，中国借机大肆宣扬美帝国主义侵略本性不会改变，强调斗争哲学，暗指苏共对帝国主义妥协。

6月2日在北京召开的世界工联理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上，中方代表刘宁一与工联执行局委员商定不把中苏分歧带到理事会公开的会议上去。但是，6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邀请近四十名国外工会领导人（共产党员）共赴晚宴，饭后进行了座谈。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宣布座谈会开始时说：

共产党之间对某些重大的理论问题有不同的意见，中国同志认为应该公开地谈谈这些分歧。随后，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批评了苏共二十大的路线。在会议的开幕式上，中国代表的长篇发言继续宣传中共的观点，并对苏联和其他兄弟党的路线、立场和外交政策进行批评。引起苏共强烈不满。苏共批评中共“在会场外搞分裂活动”。

6月底，苏共在五十多个国家共产党参加的布加勒斯特会议上抨击中国“脱离了马列主义”“把两党分歧公开化”。彭真在会上与赫鲁晓夫针锋相对，并散发了批评苏共及赫鲁晓夫的书面声明。公开称苏共是“老子党”，苏联是“大国沙文主义”“社会帝国主义”。

1958年9月台海危机时，中国在空战中意外地得到了一颗没有爆炸的响尾蛇导弹，当时苏联尚未掌握这种空对空导弹的制导技术，因此向中国索要，欲进行解剖研究，中国百般推诿，自行拆卸后未解其中奥秘。翌年，苏联按协议提供给中国的原子弹样品已经装车待运，赫鲁晓夫见中国在响尾蛇导弹问题上的做法有违同盟之约，下令不予发车。中国没有得到那颗样品原子弹，中苏矛盾日益加剧。

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正式照会中国外交部：鉴于中国推行大跃进，粗暴地拒绝苏联专家建议，并在来华的苏联专家中散发《列宁主义万岁》（俄文版）等含有与苏共立场相背离观点的小册子，监视苏联专家行动等不友好的作法，苏联将限期召回全部在华工作的苏联专家。中国认为苏联“背信弃义”，并把三年困难部分归咎于此。8月底苏联在华专家及其家属全部撤离。中共随即在国民中掀起反苏浪潮，宣传苏共撤退专家是造成国民经济困难的主要原因之一，转移群众视线，掩盖由于政策错误造成的全民大饥荒。

对于1959-1961年的大饥荒，中共中央长期称之为“三年自然灾害”，或“连续三年特大自然灾害”。不完全统计，1960-1976年仅《人民日报》就有一百七十余篇使用这个术语。1981年6月《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问题的决议》对这一时期的提法是：“**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此后这一文过饰非的、把人祸造成的灾害加于老天的社会名词才从中国人的词汇中消失，而代之以“三年困难时期”。但仍将“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列为造成大饥荒的原因。

毋庸置疑，苏联撤退专家对中国经济发展有一定负面影响。但其影响微乎其微。出于政治目的，中国宣传机构着力夸大这种影响。实际上，从1957年起，在经济援助领域的苏联专家就开始逐渐减少了。如果说专家撤离造成了困难，那么主要也是在军事工业系统，三年困难时期滑坡最严重的农林牧渔等行业没有苏联专家，因此不存在撤退专家的影响问题。根据官方数据，截至1960年7月1日，在中国总共有1292名苏联专家，一机部467人，二机部252人，冶金部101人，水电部60人，化工部37人，地质部和地质总局27人，医疗保健系统21人，教育部系统28人。这些专家80%以上在国防企业或与国防工业相关的部委和科研机构中工作。而在煤炭部、石油部、农业机械制造部、建设部、轻工部、农业部、农垦部以及铁路运输和通讯等部门，只有1-7名苏联专家，水产部、粮食部、纺织部等则没有苏联专家。所以，对于中国的经济建设来说，苏联专家的撤离是有一定影响，但造成经济滑坡和供应紧张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自己的政策失误，与苏联撤退专家没有多大的直接关系。但是，赫鲁晓夫撤退专家是一种不理智的行为，在中共夸大其词的宣传下，严重地伤害了中国人的感情，乃至成为中苏分裂的重要原

困。

1961年2月27日，赫鲁晓夫致函毛泽东，提出鉴于中国发生食品供应方面的困难，苏联愿意以贷款的形式向中国提供100万吨粮食和50万吨古巴糖，并且表示10亿卢布的贸易逆差可以分5年偿还，不计利息。还提出可以应中国政府要求重新派遣专家，毛泽东断然拒绝。后经周恩来和陈云协调，从苏联接受了数十万吨粮食，以解东北地区极度缺粮的燃眉之急。并经由苏联进口了大量古巴糖和伊拉克蜜枣，缓解了部分饥荒，年纪大一点的人多半都看见过或者吃过土黄色的古巴粗糖和绵软的伊拉克蜜枣吧。

时过五十年，从解密的档案来看，前苏联不仅没有逼债行为，还对中国充分理解。1961年4月8日双方签署的《中苏贸易会谈公报》记载着：“对于中国因农业遭灾而在1960年贸易业务中产生的对苏联欠帐问题。苏联方面表示充分谅解，并向中国政府提出，上述欠帐在五年内分期偿还，不计利息。苏联还建议，在今年8月底以前以借用的方式供应中国五十万吨糖，以后在1964-1967年期间归还，不计利息。中国方面以感激的心情接受了这一建议。”当时的中国报纸全文刊载了上述《会谈公报》，此后苏修逼债的论调才渐渐收敛。

中苏领导人在意识形态上迥然不同，对战争的看法存在着巨大分歧。苏共认为现代核战争会导致世界大战和人类的灭亡，和平共处是唯一选项，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可以在和平竞赛中超越资本主义社会。毛泽东掌控的中共认为如果爆发世界大战，社会主义必将获得胜利，革命和武装斗争是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必经之路，新的世界大战不可避免，在战争中灭亡的是帝国主义，而不是人类。毛泽东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就爆发世界战争问题说过：“极而言之，死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二十七亿”（见《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326页）。言为心声，毛泽东的心中没有人民，人民可以死掉一半，只有他自己要万岁、万万岁。

中共说苏共是修正主义、分裂主义、霸权主义。苏共说中共是教条主义、左倾机会主义、好战分子。

1962年毛泽东对苏联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的让步进行批判，认为赫鲁晓夫“从机会主义蜕变为投降主义”。苏联则认为中共的立场会导致核战争。

1962年中国和印度发生边界战争，苏联在道义上支持印度。

1963年3月30日，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来信，特别提出了苏共的“三和”[1]、“两全”[2]和“三无”[3]的国际共产主义总路线。

1963年6月14日，中共中央在给苏共中央的复信中提出了与苏共根本对立的总路线。

1963年7月5日至20日，中共代表团和苏共代表团在莫斯科举行会谈。在会谈期间，苏共中央于十四日发表《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对中共的复信进行全面系统的评议和反驳。为此，毛泽东从1963年9月6日至1964年7月14日亲自主持发表了九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两党之间的论战达到顶峰。

中共认为资本主义已经在苏联复辟，苏联已不再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理所当然地跃升为反帝反修的世界革命中心。在中国尚未摆脱饥荒的年代不惜用重金拉拢亚非拉地区的共产党和激进分子，甚至把触角伸到欧洲，扶持阿尔巴尼亚的霍查[4]。花费了数百亿人民币和大量物资，点燃了这一只毛泽

东所谓的“欧洲社会主义明灯”。

1964年10月赫鲁晓夫下台之后，周恩来率团访问苏联，回国后向毛泽东报告苏联并没有改变路线的趋势，中共继续批判苏联执行“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路线”。

1966年，中国开展文化大革命，中苏虽未断交，但两国关系基本冻结。

1967年红卫兵冲击苏联驻北京大使馆。

1968年，苏联在新疆附近大量增兵。中国也将大量军队从南方转移到东北、华北、西北地区。双方剑拔弩张，严阵对峙。同时苏联和蒙古达成协议，苏军帮助蒙古的南方边防，并在那里驻军。

1968年8月，苏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镇压“布拉格之春”，中国把苏联称作“社会帝国主义”。

1969年，双方在黑龙江的珍宝岛和新疆的铁列克提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很多西方观察家认为两国开战在所难免。

1969年9月，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参加越南领导人胡志明的葬礼后路过北京，在机场会议室和周恩来等秘密会晤。之后局势得到缓解。

综上所述，整个六十年代的中苏关系和《人民日报》一九六〇年元旦社论说的恰好相反，不仅不是大团结，反而是大论战，大分裂，甚至大打出手。在事实面前，还能相信中共喉舌《人民日报》散布的的谎言吗？

附注

[1]三和即“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

[2]两全即“全民国家、全民党”

[3]三无即“无武器、无军队、无战争”

[4] 阿尔巴尼亚地处欧洲东南部，面积2.87万平方公里，人口320万。阿尔巴尼亚的掌权者、阿劳动党第一书记霍查原来紧跟斯大林，不惜与近邻南斯拉夫断交。赫鲁晓夫上台后批判斯大林，霍查即与苏联决裂、断交。中苏分歧后，霍查投靠中国，六十年代中阿关系密切，中国在十九年之内给阿尔巴尼亚经济、军事援助总值达数百亿元，粮食一百八十万吨。霍查独断专行，对内大清洗，包括其“亲密战友”部长会议主席谢胡在内的众多高级干部均死于非命；对外自称纯正马克思主义，频频与邻国绝交。七十年代，霍查公开反对中美接触，批评毛泽东，中阿关系恶化，濒临断交。邓小平仿效赫鲁晓夫当年对中国的做法，断绝援助，撤退专家。九十年代阿尔巴尼亚废除一党专政，独裁者、杀人魔王霍查被掘坟暴尸，阿尔巴尼亚终于走上了民主道路，二十一世纪加入北约。

(3) 全民大饥饿、举国大浮肿

1960年元旦社论说着无限光明和希望，人们大脑的储存功能却浮现着回忆和联想。我想起了一年前《人民日报》发表的1959年元旦社论，标题是《迎接新的更伟大的胜利》，社论总结了1958年大跃进的辉煌成果，其中说：“在工业战线上，钢的产量将达到一千一百万吨左右。在农业战线上，粮食将达到七千五百亿斤左右，比1957年增加一倍以上。棉花将达到六千七百万担左右，比1957年增加一倍以上。油料增长50%左右。”

按照《人民日报》的说法1958年是中国历史上的特大丰收年！这是真话还是假话呢？

1958年粮食特大丰收以后，人们不仅没有享受到大丰收的成果，反而尝

受了大歉收的恶果。官方一步一步压低粮食定量，民众一扣一扣勒紧腰间的裤带。人们感受到的是大饥荒、大灾难，大浮肿。部分地区频频出现饿死人的事件。所以彭德怀才忍不住要为民众鼓与呼。事后得知，所谓七千五百万斤是身为总理的周恩来和统计部门根据北戴河会议精神[1]拍拍脑袋编造的数字，当年粮食的实际产量还不足四千亿斤。为了欺骗老百姓，歌颂大跃进，竟然浮夸虚报了一倍。

毛泽东说：“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这是 1957 年 11 月 17 日毛泽东在莫斯科大学接见数千名中国留苏学生和实习生时说的，言犹在耳。这句名言至今还很有作用，那就是告诉人们，经常撒谎的人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我说的绝对是真话，我最讲认真”。

1960 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说：“1959 年农业生产，在战胜了几十年未有的特大自然灾害之后，就全国说来，仍然得到了比 1958 年更大的丰收。农业总产值显著地超额完成了国家的计划。”

这里所谓“得到了比 1958 年更大的丰收”，该怎么解读呢？

1958 年粮食产量达到七千五百亿斤，比 1957 年增长了一倍以上，更大的丰收是多大呢？莫非又增长了一倍？

这里所谓“显著地超额完成了国家的计划”又该怎么解读呢？1959 年 4 月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大会审议批准国务院根据中共中央建议提出的 1959 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计划规定 1959 年钢产量为一千八百万吨，粮食产量为一万零五百亿斤。看看元旦社论中公布的数据，钢产量一千三百多万吨，粮食产量没有具体数字，天晓得是否完成了预定的一万零五百亿斤的计划。

社论的作者竟然昏聩到这种程度，短短的一篇社论，前后矛盾、破绽百出，胡乔木、邓力群、陈伯达之流的中共笔杆子不能自圆其说，明察秋毫的毛泽东圈阅时竟然没有发现，说明了什么呢？肥皂泡怎么也吹不起来，不吹自破。

中共数十年如一日坚信“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2]，社论再一次证明中共的喉舌《人民日报》又在那个畸形大脑的支配下撒了无数次谎。说谎的次数早已超过一千零一次，成为天方夜谭了。

事实上，1960 年是饥饿的一年。

下面转载一篇原四川日报记者现寓居成都的耄耋老人曾伯炎先生撰写的随笔，以飨读者：

曾伯炎：我为杨继绳的《墓碑》作证 2016-07

我已 84 岁了。六十年前青春期的饥饿，如刻在心上的碑刻，任岁月流淌的冲刷，后来的温饱累积去掩盖，那些饿殍脸上如死鱼的眼神，胸膛上，裸露出五线谱一般的肋骨，脸上，只剩的皮包骨瘦削，两个太阳穴凹下，可以装进两只鸽蛋，脚肚没了，开始是肿得小腿与大腿同样粗胀，俟后，是枯瘦成小腿与大腿萎缩成麻杆一样细弱。多少人，就是这么几肿几缩，成了饿死鬼。

这是小凉山上中国古拉格群岛中的饿史。它的名字叫：中国四川 102 信箱，省劳改局的名字叫：峨边沙坪劳教支队，对外公开的名字叫：地方国营峨边沙坪农场。这里死的右派，因囚禁的超过甘肃夹边沟右派的数倍，死的也超过数倍。

这1957年反右运动后，省劳改局派人临时找出的一片荒山，赶造囚右派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德国人囚死的是异族犹太人，中国红色政权饿死的是汉族青壮年知识人，还包括将来接开荒种地的班几千劳教的少年儿童，那些稚嫩生命，更经不住大荒原上大饥饿的摧折，死亡的悲惨过程，笔者接受《南方周末》记者的采访，两年前一公开，已震惊海内外。

大跃进引发1959年至1962年全国大饥荒。今天，60岁以上的人，都有铭心的记忆，从劳改劳教营活出来的人，更有刻骨的记忆了。

就是在任何丰年，牢里的牢饭，也吃得囚者喊饿。那么，全民全社会都在空腹难熬，牢里的饥饿，就更加倍翻番了。若囚进前些年镇反、土改年代建的劳改农场，经老囚徒血汗打下一些基础，有些自给，还略有些抗饥资源，峨边这劳教营正白手起家，在小凉山海拔颇高的雪地开荒建牢，就更经不起这饥饿的重击了。但我侥幸活出白骨堆，回到人间，还活到84岁，岂非老天爷留我作证吗？当我看见杨继绳记录全国饿死人的调查，写的那本《墓碑》获美国哈佛的评奖，当局不仅阻他赴美受奖，还遭御用文人与媒体攻击，我这从饥饿中幸存者，便按捺不住心中的积怨，以证人身份出场，要为杨继绳一辩，更为饿死小凉山几千右派申冤了。

反右运动中，我由四川日报送劳教，同去劳教的编辑记者就有10人，1960年，就饿死3人，他们是出身西南联大的萧鸿逵，出自中共地下组织的高原，出自焦作工学院的薛迪生。理论组组长鲁南没死在劳教营，死在放她回到山东的乡下。这4/10的死亡率，恰与我在劳教营建筑中队死亡率相近。1960年1月，队长叫我领10人入原始森林打柴，不到1月，由寒冷、饥饿加超强劳作，就死了张安庆（省团校）董伦（远征军）段辉全（刚中专毕业）都是20岁出头的壮汉，董伦去滇缅打过日军，也只30来岁。劳教营死人死得崩溃，农场场长梁村夫被追责判刑了。

那时，一面押人上山，一面赶建牛棚式的工棚，农场建筑队竟有3个中队，近千人，赶建荒山工棚中，我睡过劳改犯修成渝铁路已破烂不堪的帐篷，睡过猪圈。后来挤睡在那树皮板与牛毛毡搭的工棚里，半夜挤出去小便，转来就无法再挤进人缝。但是，到了1960年，自从夜半，在工棚听见有人惊呼：秦彪死了。且每天派人抬病号下山去医院，工棚对面木工房在连夜用豁皮板钉棺材。原来睡得如罐头里沙丁鱼般的挤压，变得可横睡竖躺了，请问：被死神领走的是多少，还不清楚明白吗？最青壮的建筑中队，死亡率这么高，像教过我的化学老师张守庸年届50的人，还是1930年代清华毕业生，也押来劳教，就更难熬出这饥饿加苦役的地狱了。后来，我问川大右派学生戴虞俊，张老师与你曾在梨儿坪中队，我曾遇见，后来呢？他告诉我：饿死在1960年筑路中了。

牢中的饥饿，很典型，那么，牢外呢？

1962年，解除劳教的原四川人民出版社副总编汤远烈，专栏作家，以笔名丁老坎在民国《工商导报》写讽刺专栏，脍炙人口。他当右派是画了一张漫画，讽刺说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做成的，画了一个穿干部服的人，露出许多草，意指这特殊材料者，草包也。这种讽刺，民国的报刊上几乎天天可见，共朝就犯禁了。这年他解除劳教获探亲假，回到成都家里，牢里出来的饿鬼，就多吃了家中定量的口粮，那时成都居民月供粮只有19斤，引起儿子口出怨言，汤远烈一气回到会理铅锌矿劳教营，就服毒自杀了。这父子关系，不是被饥饿撕裂，对人生的绝望，不是脑子肚子全被专政专出的吗？

我今天的妻告我，成都人叫的1960年过粮食关，她与三妹饿得慌了，忍不住把留给姐放学回来吃的饭，分来吃了，害得姐也脚肿，差点丧命。

我在劳教营饿得慌了，把妈的一床绣大牡丹花湘绣被面，向森工局工人换了一斤粮票救急。妈听说了，省吃俭用凑了3斤豆面，正设法寄我，街上遇见李家永，是她教过的学生，称他正好在峨边川南森工局，可带给我。结果全带入他的肚子了。说明非劳教的工人，也是成天饥肠辘辘哟！

翌年，我奔母丧返梓，西药店工作的蒋海福告我一个惊人故事：合兴乡山上有一村，每家饿死的人断气前，都要到本村那转业军人那里去求情，请他口下留情。因为他刨死人副肉吃，已吃顺了口，吃出了名。凡来求她者，礼收了，情领了，仍照吃不改。由此，也可证明：牢外社会的饥饿，也非那些否定杨继绳调查者，随意以如簧巧舌能抹去的吧。

10年前，为纪念反右50周年，也为纪念死于劳教营那些右派难友，我撰写那本《幸存者手记》时，曾再回到峨边沙坪劳教茶场，除了给这本手记添补一些照片，还了解作家刘盛亚的死亡真象。有说他死于阴家坪中队，萧赛告诉我：刘是死于医院，他还在坟堆上插过写有名字的木牌。为什么要调查，因为刘盛亚的夫人魏德芳大姐常见面话旧，更重要的原因是：刘盛亚是中国第一个写反法西斯作品的作家，却死在中国奥斯维辛式集中营式的峨边劳教营，更值得详记了。

找到原阴家坪中队廖卫生员，他记忆的是死在抬刘盛亚下医院途中，我记在书上。开同学会时，读了我这本手记的杨继业同学找到我，说出一段他亲历的与刘盛亚相关的情节，他说：你知道那劳教农场用草蓬搭的医院背后的山坡，是许多死人的乱葬岗，1960年，医院旁的劳教铁厂还在炼铁，我这大学学铸造的右派还在那里掌火。这天晚饭后，叫加班抬什么上山，回来路经乱葬岗，见一个人头滚在土沟，我知道是医院埋的人，被狗刨出来吃尸体后剩的，十分痛心，便捡起来寻到那新埋的坟堆，再次埋下。埋后，发现立着一块木条，写着：刘盛亚之墓几字。

看来，萧赛说他做的标记在那乱葬岗，被杨继业证实了。只是这惨酷的后事，我压在心里，魏德芳大姐在世时，我一直不敢讲出来。

著名记者杨继绳以纪实手法撰写的《墓碑》面世以后，轰动世界。国内部分文人奉命围剿，为了驳斥诬蔑杨继绳的那些御用文人，让我再揭示一段饿死人的细节，出现在1960年四川成都金牛坝的地委书记会上。川报叫记者吴中福去采访已是下午四点，他说自己肚子饿得咕咕叫，骑在自行车上没力气，半小时的路，竟骑了1个多小时。赶到金牛坝招待所，已开晚饭，东寻坐位西寻坐位，都坐满了，只有上面一桌坐得略显稀疏，熟人招呼我坐下，一看，省委书记李井泉正坐上方。我已饿慌了，埋头只顾吃，吃着吃着，只听温江地委的田春开口了，他说：李政委，温江都在死人了，我看这金牛坝还在用一桶一桶的洋芋催肥猪哩！吴中福侧目看李井泉怎么回答，只见李井泉恨了田春一眼说：我们是统治阶级，就该吃！这一句话，就把那座大门上写的“为人民服务”变成谎言与屁话了。

四川有一句名谚：金温江银郫县，肥沃要数温郫崇新灌。诸葛亮谓天府之国，即是川西这片平原，乃全国著名粮仓。这饿死人的事，出在非战乱年月，历史未见。1962年，我到新都马家乡音乐学院农场探亲，见竹林有些庄院的门锁着，问其故？答曰：这是全家饿死的绝户也。较田春说温江地区的开始出现饿殍，更深化了。就是这年，成都亲朋告诉我：中山公园对面的茶

馆，是北方来的汉子买女子的市场，饿得太瘦了的女人，还嫌弃，要肥点的，用秤称出重量，像猪那么论斤计价。难道这种惨酷的悲剧，不是严酷饥饿造出的荒诞，那些诬蔑杨继绳夸大饿死人了，还用统计错误来掩饰，掩得了吗？百年前，列宁做德皇威廉的德奸，领5千万金马克去破坏一战，颠覆克伦斯基与孟什维克成立的民主联合政府，今天，已从德国档案中曝光，老夫也在此将我脑库里的饥饿档案，披露于此，而饿死中国几千万人的档案，最终也会大白于天下，就是打开1962年七千人大会那些逼毛泽东无法不检讨的发言，也将曝光大饥荒的许多真象！用暴力加谎言维持的政权，这两项，都不可靠，最可靠的，还是民心！（全文完）

再来看看老百姓是怎么度过这个社会主义幸福年的吧。下面是一位小学教师杨金声的记录（发表于2014-8-26 无为论坛，原题为**我亲历的瓜菜代生活**，原文照录，未予更改）：

“三年困难时期，我在安徽省无为县当教师。那时粮食极其紧缺，比黄金还贵重，有钱能买到黄金，而无粮票或粮本，持钱去粮站根本买不到粮食。1958年大炼钢铁时，曾要我们“放开肚皮吃饭，鼓足干劲生产”，可是不到两个月，口粮月供应标准又恢复到28市斤。从1959年春季起，再降为24市斤（内含不能吃的杂糠，两个月后取消杂糠），继又降为22市斤，后来稳定在25市斤，还要节约一斤（由粮站代扣），实为24市斤。

在国家干部月口粮供应标准为22市斤时，县城和农村集镇上吃商品粮的居民，分别降为17市斤和16市斤。

当时市场上既买不到高蛋白、高脂肪鱼肉荤腥等食物，也买不到豆类和豆制品。国家粮站米价是一角三厘一市斤，黑市米和粮票4元一市斤，只听说有人偷卖米和粮票，但从未见人买过，因私自买卖粮食系破坏粮食政策，是违法犯罪行为，谁敢公开买卖？我当时月工资36元，不够买10市斤黑市米，全靠仅有的24市斤口粮和4市两（合十两制为2.5两）菜籽油活命。当时县邮电局营业间里供寄信人贴邮票用的糍糊，一放到柜台上就被人偷吃光，足见当时充饥度命的食物，紧张奇缺到何等程度！

那时我正年轻，食量大，消化力强，24市斤口粮只够吃二十三四天左右，每天吃饭不是斤斤计较，而是两两计算。我每周要上16节课，且大都排在上午，如某天上午授课量不重，只有一节或两节，学校食堂早餐稀饭即使很浓稠，也舍不得多吃一分稀饭（学校食堂一斤粮票购一角二分饭票，付一角二分钱）；要是上午授课量重，有三节课，食堂早餐稀饭即使稀得“一口吹三条浪”，也得忍痛吃三分饭票的稀饭，否则是撑不住的，特别是上午第四节课，饿得肚皮紧贴脊梁骨，上气不接下气，靠在黑板上，硬撑着将课讲完，下课铃一响，就像战士冲锋一样冲进食堂，不管青菜萝卜，还是冬南二瓜（校内园地师生共同生产的），首先买一碗（限购一碗，不准多购，学生也一样），填进饿得发慌的空肚里，然后再买三分饭票的饭，绝不敢多吃一分饭。晚餐也是如此，先吃瓜菜，后吃两三分饭票的饭，因晚上办公要到深夜11点左右才敢下班，反“右派”后的“大跃进”，谁敢不积极？晚上9点多钟就下班，怕人说没干劲，思想落后，空熬着肚皮，也要撑到11点钟左右。

那时，若遗失10来斤粮票或饭票等于自绝生路，谁也救不了你。家庭因饭票短缺或遗失，而产生互相猜疑、指责、谩骂、造成夫妻反目、兄弟齟齬、母女不欢、姐妹失和的事时有发生。有位中层干部，家里有四个子女，将从

食堂打回的饭，按各人的供应标准数量，用秤分而食之（农村较普遍），谁也不能多吃多沾谁一点。这种看似无情而实则无奈的荒唐怪诞的生活方式，是享受着充裕物质生活的今天青年无法理解的，但它却在我们这辈人的生活旅程中，留下极其沉重的苦涩与酸楚。

在这种情况下，“低标准，瓜菜代”是当时整个社会求生存、想活命的人必然趋势。那时大小会议经常讲，连几岁的孩子都知道“低标准，瓜菜代”是什么含义，因为这关系到每个人的生命能否延续维持下去的极其严重问题，是头等大事。

秋冬季节，冬南二瓜吃尽了，青菜萝卜生长速度慢，赶不上吃的需求，上级号召我们大搞“小秋收”来充饥度命。所谓“小秋收”，顾名思义，是和大秋收相对而言，大秋收是指农田里生长的庄稼，农民种的粮食，而“小秋收”则是指野生植物，农产品的下脚料，如米糠、稗子、秕稻，以及极少的水面植物和水生螺丝肉、蚌肉等。

当时任县委副书记的谢永康同志，曾奉命代表县委在一次动员县直机关干部大搞“小秋收”的大会上说，现在证明，凡是猪能吃的一切东西，人都能吃！所以我们要大搞“小秋收”，以解决目前的困难（大意）。四十二年后的今天，我仍清楚地记得他说过的这句话。

谢永康同志是我省当时县委书记中极少数大学出身的知识分子，以他的文化知识水准和道德良心，无论如何，这句话他是说不出口的。解放些年了，怎么能要老百姓吃猪食呢？但是，当时庐山会议精神已经传达，正在贯彻执行，全国正在抓“彭德怀分子”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我们县正在抓“张恺帆爪牙”和“小张恺帆分子”，他能说什么呢？

在粮食极端短缺的情况下，1960年10月26日的县委常委会议上，议定可抵口粮的“小秋收”有下列各种名称（每种都有具体数字，共一亿斤，从略）：

藕、荸荠、茨菇、菱角、芡实、高瓜（茭白）、玉米叶、玉米皮芯、高粱秆、黄豆秆子、芝麻秆子、花生藤、花生壳、橡子、毛栗、葛根、蕨根、野绿豆、野泥豆、山萝卜、野凉茶、大头薇、菱蒿、野红花草、马兰草、水草、鹅耳肠、野菜、荷叶秆子、芡实秆子、螺丝、蚌肉等，共32种。

上述“小秋收”中的玉米叶、玉米皮芯、高粱秆、黄豆秆子、芝麻秆子、花生藤、花生壳、荷叶秆子、芡实秆子等，连猪都不吃，人怎能吃？

实际上，为了充饥度命，人们早就在寻找能吃的野生植物了。1959年冬天，在青菜萝卜供不应求时，我们学校曾派人去城外水塘里捞红浮萍，洗净磨碎，掺一点稗子粉，做成浮萍粑粑，供应师生，一分饭票买两个。我至今仍记得浮萍粑粑的味道，一股青气，粗糙微涩，难以下咽，但饥肠难熬，只得勉强吞咽下肚，胃是没有味觉的，只觉得不舒服，呼呼作响，且有隐疼感，远没有茭瓜青菜萝卜充饥好受。一位在农村工作过的同志告诉我，他在农村吃过苦涩难咽的山芋藤子、巴根草和双季稻根做的粑粑，他愤愤地说：“那是稻草！猪都不吃，人怎能吃？吃这种东西度命，怎能不死人？！”

国家干部、县城里和乡村集镇上吃商品粮的居民，不论月供应量是22市斤也好，还是18、16市斤也好，多少还有一点成品粮大米能熬粥度命，而最苦、最惨、最目不忍睹的是我们的衣食父母、生产粮食的农民，在“大跃进”刮起的“共产风”袭击下，他们的家禽家畜被这股妖风刮掉了；他们的自留地被刮掉了；他们烧饭的锅被刮掉了。为了迎合好大喜功者的狂热虚荣心理，严重的浮夸风造成对农田里的庄稼高额估产，高额估产带来的高额

征购，高额征购调走包括农民口粮、种子在内的大量粮食，仅剩下的一点不够农民糊口的粮食，又全集中在公共食堂里。而公共食堂的大权，完全被基层干部生产队长把持着，成了卡农民咽喉的“鬼门关”。当时的顺口溜有云：

“一两二两，饿不死队长，一钱二钱，饿不死炊事员。”

据我县公安局统计：1959年，全县饿死82278人，1960年，饿死126524人。1957年年底统计，全县人口为982979人，1960年底为662557人，减少人口320422人。1961年饿死的人数还未统计在内。据此推算，“大跃进”的三年“共产风”时期，即使扣除正常死亡人数，全县饿死人应在30万人以上。

这种现象到底是如何造成的？

前国家主席刘少奇1962年元月27日在中共中央七千人大会上的报告中说：这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原报告在传达时，曾有人说：“三分天灾讲多了，七分人祸还讲少了。”以我们安徽无为县来说，这句话完全正确。从1958年到1961年这4年我县的气象资料看，无论是从月降水量、最长连续降水日数和最长连续无降水日数看，还是从暴雨日数和暴雨连续日数看，既不存在涝灾，也不存在旱灾，虽不像古书上说的五日一风、十日一雨，但气象资料表明，绝对构不成自然灾害，正如本地老农所说，那几年（1958年至1961年）基本风调雨顺，何来自然灾害？三十余万人被饿死，完全是一场人祸。”

社会上的教师是那样生活着，劳改队里如何呢？

地处甘肃定西的夹边沟农场关押了三千多名右派分子，1962年尚且活着的只有饿得奄奄一息的六百人了。

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县的峨边沙坪农（茶）场，关押着将近两万人，死了三分之一，不得不把场长梁村夫抓出来判了七年徒刑，做个以平民愤的样子。但随后不久梁村夫即平反出狱，另有高就了，原来又演了一场假戏。

三年困难时期已经过去五十多年了，档案该解密了吧？中共要是光明磊落的，就把那时候各个监狱的死亡人数公布出来，尽管死亡通知书是做了假的（所有饿死的都写的是病死），只要敢于公布数字，也算尊重民众的知情权，让人民了解一下中共管辖的监狱是多么人道，如果不敢这样做是不是心中有鬼呢？

1998年，杨显惠先生编著的《夹边沟记事》对甘肃这个劳改农场三年困难时期在押右派劳教人员的死亡概况有所描述，此书出版以后即被禁。著名作家叶永烈所著《反右派始末》和其它涉及反右的书刊均被当局禁绝，这又是为什么呢？

那时我在四川省劳改局所属通惠汽车修配厂技术科戴着右派帽子劳动教养。每月粮食定量二十一斤，奉命支援灾区（不知道是哪个灾区）上交二斤，实际每月只有十九斤，按月大月小折合，每天306克到316克，早餐66克，中餐和晚餐各120克。

1960年上半年，主食还是大米，六月份以后，成都市库存大米要吃光了，市内除了受重点保护的机关团体、部队、警察以外，不再供应大米。幸好粮库还有点糯米，糯米香糯粘滑，是做醪糟、年糕、元宵的好材料，拿来当饭吃真的可惜了，中秋节需要糯米打糍粑，正月十五需要糯米包汤圆（元宵），到时候又到哪里去找糯米呢？看来天府之国真的是寅吃卯粮，过一天算一天了。隔了十来天，糯米也没有了，据说粮库翻仓倒底还有点胡豆（又名蚕豆），

是做郫县豆瓣用的原料和十月份要用的种子，拿出来吃了再说。午餐和晚餐都只有 120 克粮食定量，大约 180-200 颗胡豆。食堂炊事员把定量的胡豆提前八小时放在小瓦罐里用水泡胀，然后上笼蒸熟。开饭时凭饭票领取，每人一罐。拿回来舍不得吃，几个人坐在屋檐下面数胡豆的颗数，张三的是 198 颗，李四的是 189 颗，少了 9 颗，李四心里怪不是滋味，怎么会少了呢？他竟然没有想到胡豆的颗粒大小不一样，说不定 189 颗比 198 颗还重一些呢，名牌大学理工科毕业的分子都饿昏了，糊涂了。数完了，一颗一颗地放在嘴里慢慢地咀嚼，一顿饭大概要一个小时。尽管经过细嚼慢咽，顿顿吃胡豆，肚子里还是要胀气，四川的老百姓说：“一颗胡豆十个屁，加颗豌豆不断气”。幸好那时候毛泽东还没有发表那首绝妙好词《鸟儿问答》[3]，“不须放屁”还不是最高指示。否则吃胡豆的人们要增加一条和毛泽东对着干的罪状了。

主食欠缺，蔬菜等副食品也极度匮乏。1958 年，随着公社化运动的兴起，农民的自留地被收回了，一切生产资料归公，那时候还没有形成规模化的蔬菜基地，市场的蔬菜供应骤然减少，机关干部、社会公众每人每天一斤蔬菜都很难保证，蔬菜的数量不足，自然更谈不上品种了。被列为专政对象的劳教分子还能说什么呢？劳教人员吃的大宗菜就是萝卜缨、空心菜、厚皮菜，老梭边（卷心菜外边的老叶子，青绿色）。能够给点水煮萝卜缨、水煮厚皮菜、水煮空心菜已经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充分体现了，没有毛主席哪会有这样的幸福生活呀！

成都地处川西平原中心，得都江堰自流灌溉之便利，自古以来盛产蔬菜，韭菜、芹菜、韭黄、蒜薹、茄子、莴笋、萝卜，扁豆、黄瓜等品种繁多，以质优价廉闻名于世，大跃进以来全都销声匿迹，隐姓埋名了。偶有出产，早就被号称“为人民服务”的公仆们先天下之忧而忧之了。至于可以充饥的南瓜、土豆、芋头、山药等等更是在市场里三年不见踪影，不知道跑到哪儿朝圣去了。

中国的传统食品豆腐、豆腐干、豆皮，从 1958 年以来就不再露面，问问两三岁的小孩，竟然不知道豆腐是白色的还是黑色的，豆腐是软的还是硬的。《论语》记载孔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是说仲尼先生痴迷于韶乐，忘记了红烧肉的味道。而今我们受惠于毛泽东的恩泽，三年不知有豆腐了。

那时候黄豆是内部控制物资，市面上一颗黄豆也看不到。十七级以上干部每月特供二斤黄豆、一斤白糖；十三级以上干部再加两斤猪肉，两斤鸡蛋。一时有“糖豆干部”“肉蛋干部”之称，算是大跃进创造的新名词，那都是骑在人民头上“为人民服务”的“公仆”享受的“特供”，当家做主的人民是难以问津的。

普通的城镇居民每人每月供应四分之一斤食用植物油（最困难的 1960 年到 1961 年上半年每月供应八分之一斤），折合每天只有 4.1 克。某些人克扣一点，炊事员再多吃一点，所剩还有多少呢？

4.1 克是什么概念呢？会做菜的人都知道，炒一盘极普通的素菜，比如炒白菜、洋葱、土豆丝、茄子、莴笋等等，每一斤鲜菜大约需要食用油 80 克到 120 克。4.1 克只相当炒一盘素菜需用油的三十分之一到二十分之一。或者说一个月的油只能炒一盘素菜。这就是中共一再宣扬油料作物大丰收，反复高唱“他为人民谋幸福，呼儿嗨呀……”给老百姓的定量标准。比日本侵略中国、奴役和压迫中国人民时还苛刻。

日本占领北平期间实行严格的配给制度，初期，每户居民能买到少量大米，其余是面粉和杂粮。1943年，日本在华北地区实行“米谷统制”，完全垄断了稻米的生产、收购和储存，在华的日本人供应大米，中国的老百姓则与大米绝缘了，每人每天大约有一斤玉米、高粱、小米等杂粮。1942年11月起，日伪当局配给“混合面”，这是将仓库中多年积存的变质小麦及各种杂粮混合磨成的面粉，蒸熟以后呈咖啡色，有霉腐味。市场上有高价粮食，数量很少，需清晨排队购买。豆饼、红薯干、豆渣等都成了市民赖以充饥的食物。我家的饭桌上经常会出现这些东西，饥不择食，好歹还没有浮肿、没有被饿死。

展现着无限光明和希望的六十年代来临了，开年的第一件事就是全民大浮肿。

1959年压缩粮食定量以来，普遍的是消瘦，肌肉萎缩、皮肤松弛、面无光泽，到了下半年转成了浮肿，最先出现在年龄偏大的几个人身上。从小腿开始，然后是脸部，逐渐发展到全身浮肿，严重的时候两个眼睛几乎眯成了一条缝。皮肤呈现尸体般的苍白色，感觉皮肤变厚，肤面很干燥，轻轻碰到什么东西就会乌青一块，浮肿了以后，皮肤像湿的面团一样，用手指按下去就会出现一个凹坑，好几分钟不能恢复原样。头发会变得很细还稍有点卷，像一把枯蒿，毫无光泽，轻轻一扯就会整片地连根脱落。每个手指关节都隐隐作疼，四肢倦怠无力，肌肉不可控制地抽搐，四肢开始失去整合能力。牙龈开始流血，对着镜子会看见舌头也肿起来了，或者收缩了，干燥开裂，嘴唇开始皲裂，像粉一样的脱皮。

多数人都伴随着夜盲，黄昏一到，就会像瞎子一样，摸着墙壁走路，什么都看不见了。白天对光异样地敏感，一点点光都让你的眼睛觉得刺痛，受不了。耳朵干枯得近乎半透明。贫血日益严重，站立着就头晕，蹲下就站不起来，无法平衡。会泻肚子泻到虚脱晕眩，脖子上的甲状腺增大，严重的出现腹水，意识开始混乱不清，目光浑浊，涣散……。

进入六十年代，除了炊事员以外，所有劳动教养的人员都肿起来了。

为什么浮肿呢？一开始说是食用了不洁食物，引起消化吸收障碍造成的，奇怪的是劳教人员吃的都是食堂的大锅饭、大锅菜，炊事员吃的还多些，他们怎么不浮肿呢？后来管教干部统一了口径，说是因为盐巴吃多了。劳教人员都在食堂吃饭，主食无论是大米，玉米还是胡豆，都不含食盐的成分。蔬菜呢？每天不到一斤，分成早中晚三顿，每顿饭只有一小撮菜，厨房统一加盐，想多吃点盐都吃不到。这盐巴吃多了的理由怎么也难于成立，可它出自管教干部之口，管教干部据说是代表党和政府的，跟最高指示差不多，神圣得不可侵犯。谁也不敢明目张胆地反对。

中共常说“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却从来不讲认真，始终不承认浮肿是长期营养不良、蛋白质严重缺乏的后果（翻阅有关医学书籍，蛋白质摄入量达到人体需要量的30%，四五个月内不会有明显的浮肿）。得了浮肿病以后，浑身无力，倍感疲乏，走路抬腿都很费劲，上台阶的时候要用手把腿抬起来才能跨上一步。

当时我在为磨床厂筹建理化实验室，上班的时候出于热爱专业的思想，强打起精神做实验，编规程，琢磨快速、准确、节省成本的分析方法，还要给主管我们的公安干部讲化学课。下了班则既不脱衣服也不脱鞋，鞋带都懒得解开，浑身泄了气似的，一下子精疲力尽地瘫倒在床铺上，除了呼吸以外，

一动不动，话也不想说，实在是又饿又累。

在漫长的冬季更深切地体验了饥寒交迫的滋味。一个二十几岁的小伙子竟然像快要死了的人一样，一米七三的身高，体重还不到四十公斤。

我1957年被划为右派，曾经给远在北京的父母写信，告诉他们在监督劳动期间不发工资了，每月收入从六十九元降低到十二元，一个季度汇一百元给父母的赡养费无以为继了。1958年被强制劳动教养，我没有告诉家里，怕父母担忧，想着只要一年半载就可以摘掉帽子、解除劳教，在给他们的信中只说是从长江电工厂调到了新建机械厂，从体力劳动到从事专业技术工作，每月的生活费从十二元增加到十五元。父亲来信说这是党对我的关怀与照顾，让我好好改造，听党的话，争取早日摘掉右派帽子。

到了1960年，我的浮肿越来越厉害，从小腿慢慢地上移，而且出现了腹水，这是危险的信号，面临死亡威胁。我不得不告诉家里，向父母求援，希望给我寄一点消除浮肿病的药物。年迈的父母亲立即给我寄来了包裹。不料被劳教场所退回了，理由是“内有食品，单位拒收”。当时主管干部是胥炳生，大约二十岁，深受极左思潮的毒害，十足的蠢才和奴才。从某中专校机械制造专业毕业后分配到劳改队，穿上一件公安干警的制服自以为当上了大官似的，耀武扬威不可一世，对待劳教人员视同囚犯，置法律、政策于不顾，强制检查公民的来往信件，在不通知本人的情况下勒令退回寄来的包裹。胥炳生这个人属于年轻不懂事，还不是最坏的，更有甚者是把家属寄给关押人员的包裹私吞，狱卒在收到包裹以后，发现内有食品，可立即私下拆包，自家享用去了，劳改和劳教人员只能够得到家属寄来的衣物和日用品，有时甚至不知道家里寄来了包裹，即使知道了，也敢怒不敢言，专政对象能从狱卒的虎口里夺食吗？狱卒和狱吏可是党的化身哪。

父母亲收到退回的包裹以后给我来信，责问我究竟出了什么事，听说监狱都允许探视，允许送生活用品，为什么你所在的单位连包裹都不能收？！莫非犯了什么滔天大罪，被关押在死牢里了？！死牢也允许送食品呀！面对父母的责问，我能说些什么呢，他们了解的是1949年以前的监狱，他们不知道中共的监狱是无法无天的。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我只能如实相告，向父母说明我已经被劳动教养一年多了。因为来往信件都是要经过严格检查的，不敢实言相告这个劳教场所有那么一些不懂法律、不讲政策、蛮不讲理的酷吏，擅自做主退回了包裹，只能撒谎说工厂几次搬迁地址未定，邮路尚未通畅。胥炳生还活着，居住在成都外北四川磨床厂退休员工宿舍，听说他有所忏悔，当时属于年轻不懂事，可以原谅的吧。

附注

[1] 1958年8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了毛泽东亲自主持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以及国家机关各部门党组负责人等。这次会议极左思潮濒临荒谬与疯狂的地步。通过了一系列祸国殃民的决定。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1959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问题的决定》指出：“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主要目标是：粮食产量达到8000亿斤到10000亿斤，钢产量达到2700万吨，争取3000万吨，铜40万吨，铝30万吨，机床产量达到30万台，发电量达到550亿度，煤产量达到3.7亿吨，石油产量达到800万吨，水泥产量达到3000万吨，化肥产量达到530万吨，棉纱产量达到1000万件，新建铁路10500公里……”

[2] 戈培尔，德国纳粹党魁之一，他有一句名言，即“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此名言后来受到全世界独裁者青睐，被广范应用，屡试不爽，甚为灵验。回顾历史可以发现，中共的许多做法与戈氏极其相似。戈培尔任宣传部长后就开始造神运动，他动员利用所有宣传工具，天天无休止地向德国民众宣传：希特勒是上帝派来拯救德国人民的大救星；跟着元首就是胜利；元首永远是正确的；希特勒是星星般的天才；没有元首德国将不存在等等，无所不用其极地吹捧法西斯头子希特勒。并协助希特勒在全国进行文化纳粹化，一切不符合纳粹口味的书籍统统焚毁，在柏林仅一个晚上就焚毁了两万册书，一百多年前德国大文豪海涅的书也在焚毁之内，对纳粹稍有不满的人立刻就被送到集中营关押、杀害。鼓吹一个思想，一个主义，一本书。并在全中国建立多种纳粹组织，学龄队，少年队，少女队，青年团等等。经过十几年每天轰炸式的宣传，使许多德国年轻人迷信、崇拜希特勒，拿起武器冲向战场疯狂屠杀欧洲各国人民，给世界各国人民和德国人带来巨大灾难。戈培尔的名言虽被鄙视，批判，但其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给人类带来的危害不亚于当年……

[3]毛泽东 1965 年秋写了一首寓言诗词《念奴娇·鸟儿问答》，初次发表于 1976 年 1 月。原词如下：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背负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间城郭。

炮火连天，弹痕遍地，吓倒蓬间雀。怎么得了，哎呀我要飞跃。

借问君去何方，雀儿答道：有仙山琼阁。

不见前年秋月朗，订了三家条约。

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

（4）官方在干什么？

巍巍华夏，幅员辽阔。纵横一万里，高低数千仞。险峰峡谷和平原同在，江河湖海与沙漠共存。海拔差异极大，纬度范围甚宽，且处于环太平洋地震带和欧亚地震带之间，风暴在所难免，旱涝时有发生，自然灾害与五千年的文明相伴相随，中华民族正是在同灾荒的顽强抗争中繁衍昌盛起来的。这里，既包括普通百姓做出的牺牲和贡献，也包括历代王朝在防灾、减灾、救灾方面做出的努力。

中国古代遇上自然灾害造成农业歉收，封建皇帝是怎么对待的呢？

罪己诏：据史书记载，商汤在桑林中祈雨时曾说“六事”，要求帝王在灾害发生后，要及时地对政道、民生、俭奢、宫政、官员受贿、谗言盛行等等有关吏治民生的情况进行检讨。祈求上天宽恕所犯的罪恶，达到天地人之间的和谐，以求农业经济复苏。

康熙十八年北京发生八级大地震，当时的统治者康熙发了“罪己诏”，言道：“地忽大震，皆因朕功不德，政治未协，大小臣工弗能恪共职业，以致阴阳不和，灾异示儆。”大灾面前，古人不能理智地做出应对，认为天灾缘于人祸。那时候的人不像中共这样明明是人祸硬要说成是天灾。

拜天祭神：这当然是耗费大量人力物力的无用之举。《史记·滑稽列传》中《西门豹治邺》一文讲述了邺县县令西门豹破除迷信、兴修水利、造福于民的故事。对祭鬼神以求免灾的愚蠢行为做了批判。

开仓赈粮：历朝统治者对灾区施行赈救的态度大多还是积极的。如汉元时期的大海啸，汉元帝灾后即“诏吏虚仓廩，开府库赈救，赐寒者衣”。就是把存储在粮仓里的粮谷、保管在府库中的银两拿出来存物救济灾民，发放衣物帮助灾民御寒。

《元史·赵宏伟传》中记载：大德五年（1301年），“大风海溢，润、常、江阴等州庐舍多荡没，民乏食。（赵）宏伟将发廩以赈，有司以未得报为辞，宏伟曰：‘民旦暮饥，擅发有罪，我先坐。’遂发之，全活者十余万。”由于这个官员不避罪责，冒着政治风险及时赈济，挽救了十多万灾民的生命。大德皇帝没有以擅发库粮治罪，反而加官进爵委以重任。

明代嘉靖年间，发生涝灾。主持两淮盐政的吴悌“先发漕赈之而后奏闻”（《明史·儒林列传二·吴悌》）。

到清代，赈济已经比较完善了。赈济的形式主要有正赈、大赈、展赈、摘赈以及煮赈和工赈。最紧急的赈灾方式为正赈：即不论成灾分数，不分级次贫民，即行概赈一个月，又称急赈或普赈。这样可以节省时间，减少审核的手续，尽快把赈济品发放到灾民手中。

移民就粟：即难民迁徙，使之到没有受灾的地方，也就是允许逃荒。这种救助方式，早在西周时期就有了。《周礼》中记载“若食不能人二鬴，则令邦国移民就谷”。原文意思是，如果不能每人分配到300斤米（一年的消耗量），就可以施行移民。《孟子·梁惠王上》中有记载：“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河东就是山西，河内即陕西。山西有灾就移民到陕西，陕西有灾则移民到山西。

对于1958年大跃进以来全国范围的大浮肿，大逃荒和大量增加的非正常死亡现象，中共中央和各级政府究竟有何反应？又是怎样处置的呢？

1960年初，地方党政高级官员参加庐山会议后，对毛泽东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将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打成反党集团的过程记忆犹新。从会议初期准备反“左”，一夜之间转成了反“右”。谁要是转得慢了一点，立即就会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毛泽东手里帽子多得很呢，只有他可以随心所欲，翻脸不认人。

多数官员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竭力迎合毛泽东的意图，隐匿灾情不报，继续大刮浮夸风。最高领袖存有讳疾忌医、讳灾忌荒的心理，一些地方官对此心领神会，因为报灾就意味自我否定，减产就意味着否定三面红旗，因此他们明知哀鸿遍野也不上报，眼见百姓大批死亡，也不放粮（一些地方粮库仍存有粮食）。

那几个极左路线的干将，如上海的柯庆施、四川的李井泉、河南的吴芝圃、山东的舒同、甘肃的张仲良等人，越发得意忘形，坚持高征购，反对所谓瞒产私分，置人民生死于不顾，变本加厉地剥夺农民的基本口粮，导致灾情愈加严重。

三年困难和庐山会议暴露了也证实了中共的各级干部不外乎明哲保身、见风转舵、投机取巧、卖身求荣这么几类人。包括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林彪、王震、李先念等高级干部在内，他们当中的有些人可能不赞同毛泽东的某些做法，但是没有一个站出来“为人民服务”，没有一个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没有一个敢于反对毛泽东的倒行逆施。彭德怀在农村调查的时候，发现广大群众处在大饥饿中，非正常死亡日益严重，以极其委婉的语言给党中央主席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旨在希望最高层领导体察民情，纠正偏差。这是符合宪法也符合党章的，这是有利于维护毛泽东威信의忠言，也是有利于巩固执政党统治地位的良策。然而毛泽东是不允许别人说他有丝毫错误的，为此龙颜大怒，调集了林彪等可以为其利用的实力派人物，急上庐山，对彭德怀大兴挞伐。在庐山会议上，没有一个人敢公开地为彭德怀说几

句公道话，他们为了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和官位，做了毛泽东的附庸，一致举手通过撤其职、罢其官。平时高唱的“人民利益”到哪里去了？马克思主义原则到哪里去了？党内民主到哪里去了？坚持真理到哪里去了？

事实证明，他们绝对不是人民的公仆，绝对不能代表人民的利益，从来也没有代表过人民的利益。他们是打着共产主义旗号的封建王朝之宠臣，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法西斯独裁专政的帮凶。

中国历代有作为的封建皇帝对于饥荒问题都十分重视，逐渐地摸索出了一套应对方法，到清代已建立起较为完善的报灾、勘灾制度，朝廷通过放粮、免征、出贷、移民就粟、以工代赈等减轻百姓痛苦。

中共建国后，五十年代初期，政府在勘灾、救灾方面也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但 1957 年以后，民意得不到表达，民怨得不到申诉，毛泽东视人民为奴隶，用他自己的话说，叫做无法无天。随之而来的大跃进和接踵而来的反右倾运动破坏了报灾、救灾机制，乃至饿死数千万民众，造成了令人痛心的后果。

六十年代初期，中共中央根据下面虚报的材料，继续鼓吹全国粮食取得了大丰收，仓禀饱满，不仅可供国内需求，还可用于出口换汇。

基于上述假设，所谓的人民政府有哪些反应？做了哪些工作呢？

对浮肿病的反应：1958 年大跃进运动兴起后，民众吃了一个多月的饱饭，公共食堂即面临无米之炊，浮肿病悄然蔓延，各地有关浮肿病的内部通报，层层上报中央。中央绝口不提浮肿是长期营养不良、严重缺乏蛋白质造成的，对农村的浮肿置若罔闻，对城市的浮肿病人每天可凭医生证明领取一小袋（约 50 克）康复散（米糠、麦麸、大豆和少量古巴糖混在一起的粉状物）。乃至千百万为国家提供粮食的农民死于非命。

对人口外流的反应：1958 年下半年，山东、甘肃、河南等地农民开始大量外流逃荒。流向北京、沈阳、呼和浩特、包头、乌鲁木齐等城市。据 1959 年 4 月不完全统计：河北省外流人口二十八万；山东省外流人口三十二万；河南省外流人口三十八万。1960 年 1 至 4 月，无票乘火车的外流农民即达十七万人次，比 1959 年同期增加三倍，大部分来自鲁、冀、豫、皖。前往东北的占 60%，前往西北的占 20%，其它城市占 20%。同年 1 至 6 月，流入内蒙的多达六十万人。

对于农村人口外流，中共中央定名为“盲流”。河南、安徽等省素有荒年外出乞讨的传统，1959 年 3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紧急通知》，要求各地政府进行封锁、拦阻，严禁逃荒。其后，在各个交通枢纽设立收容站，强制收容。对于流入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郊区的外流农民，一律遣返原籍。古代尚有移民就粟的避灾政策，中共执掌政权，饥饿的农民失去了逃荒的权利，只有在原籍继续坐以待毙一条路了。

对经济下滑严重影响对香港副食品供应和出口供应的反应：1958 年 11 月后，由于农副产品供应紧张，内地供港的副食品急剧减少。中共的对策是动员群众少吃肉、蛋，1959 年 5 月，国内城乡市场基本已不供应猪肉、鲜蛋。在大城市，除保证对少数享有特权的高干实行特种供应外，将居民供应压缩到最低限度，或停止供应，以全力支援出口。河南省积极响应中央的号召，提出口号：国庆节前不吃肉，不吃蛋，或少吃蛋。湖北省规定：从县到省，除特殊需要外，一律停止供应肉食。1959 年 4 月，武汉市将停止肉食供应的范围扩大到餐馆、合作食堂、糕点铺。偶有供应，群众排队如长龙。

对大城市节日供应困难的反应：1959年1月至4月，上海市市民的猪肉供应减少了35.92%，家禽减少75.19%，蛋减少79.56%，鸡、鸭、鱼在市场里难见踪迹，原每人每月供应猪肉六两（老秤）已难以为继，降低到每人每月二两。粮店开始以山芋丝、红薯干作为居民的定量口粮。全国首善地区北京市的节日供应也捉襟见肘。1959年端午节，即使北京也无应令食品，马寅初慨叹：活了七十八岁，第一次没过端午节。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傅鹰在家养了几只小鸡，望眼欲穿地期盼着它赶快长大、生蛋。与大城市相比，中小城市的供应更加困难。1959年山东省枣庄市黑市地瓜（红薯）干0.8元一斤，洋槐树叶0.05元一斤（当时官价大米0.1元一斤）。

对非正常死亡人数激增的反应：1957年12月，各地就有非正常死亡的内部通报。1958-1959年后，情况日趋严重。对于此类非正常死亡事件，中共的基本态度是隐瞒真相拒不承认。大肆宣扬“阶级敌人散布谣言”“社会主义国家没有饿死人”。待到饿殍逐渐增多，难以隐瞒之际，认定事件起因是“民主革命不彻底”，“阶级敌人制造灾情”。要求以阶级斗争的方式反击阶级敌人的破坏。

中共领导层对上述所有“消极现象”的总体判断是：

全国粮食形势一片大好。1960年1月26日，国务院下发文件宣布，1958、1959年粮食获得特大丰收。当前粮食形势好得很，国家粮食库存在1959年6月底343亿斤的基础上，1960年6月底将达到500亿斤。据后来披露，1960年6月底的实际库存仅为127亿斤。

按照毛泽东的讲法，判定消极现象仅是“一个指头”的问题，其它“九个指头”都是好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是毛泽东思想的具体体现，不容怀疑。

坚持大办公社食堂的政策。”庐山会议后，再次强令没收农民自留地；1960年3月后，统一将粮食分配到食堂（不分到农民手中）。到了4月，全国农村已有4.4亿人参加了食堂。

将社会各界对粮食供应方面的意见，一律视为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的反映，把群众对粮食供应方面的不满定性为“闹粮”。

将“社会主义不会饿死人”定为一条铁律，严格审查新闻报道，所有文字材料都必须经此条铁律的过滤。开动所有舆论机器，花大力气宣传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不厌其烦地重复“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翻一下当时的报纸，此类宣传比比皆是。

基于以上判断，中共认定各地粮食告急，造成“粮食紧张空气”的重要原因是“农民和基层社队瞒产私分。”此即是1959年以来一直未间断进行的“反瞒产斗争”，一部分农村基层干部和家里保存了少数口粮的农民被严刑拷打。

具体到粮食问题，中共领导层采取了六项措施：

继续大量出口粮食：1958年出口粮食制品266万吨，1959年激增为415万吨，创下了粮食出口新纪录。1960年继续大量出口。东欧国家鉴于中国宣传粮食大丰收，要求中国在1960年供应84.7万吨，比1959年提高50%。

继续高征购：1958年的征购比例为粮食产量的29.4%，1959年上升为39.7%，据1959年11月27日统计，全国征粮1077亿斤。其中，1959年10月，全国收购入库粮食241.8亿斤，比上一年同期增加153.7亿斤，增长一倍半。1960年征购比例仍高达35.6%。

减少城乡粮食销量：1959年7月至11月，全国农村销售127亿斤，比上一年减少40亿斤；城市销售346亿斤，比上一年减少40亿斤。

大力压缩城镇人口：中共高层心知肚明农民已被压干剥净，再也无法搜刮粮食，于是向城镇开刀。中共中央、国务院短期内连续下达《关于减少城镇人口和压缩城镇粮食销量的9条办法》、《关于核实城市人口和粮食供应的紧急指示》、《关于进一步精简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的决定》等三个红头文件，采用种种手段勒令部分城镇人口下乡。自1961年1月到1963年6月，全国职工减少1887万人，城镇人口减少2600万人，吃商品粮人数减少2800万人。

调动宣传工具大力鼓吹节约用粮。树立“好日子当苦日子过”的新概念。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提出，要“富日子当穷日子过，宽日子当紧日子过，计划用粮，节约用粮，粮菜混吃，吃饱吃好”，同时要“纠正部分农民多分多留多吃粮食的想法”。农村人民公社的墙壁上刷写着毛泽东的语录“闲时吃稀，忙时吃干，平时半稀半干，杂以番薯、青菜之类”。毛泽东的这段语录和晋惠帝司马衷之昏聩极其相似，老百姓连树皮、草根都吃光了，哪里还有粮食煮半干半稀呢？

大力加强阶级斗争观念，充分肯定“三面红旗”的巨大成绩，谁反对“三面红旗”就处以劳教、劳改。

但是，粮食问题似乎又很严重。在此背景下，1960年3月，中共对各地缺粮问题正式作出反应：在坚持既定原则下（没收自留地，粮食分配到食堂，不停止出口粮食），通过“组织人民经济生活”，推广粮食食用增量法，以达到节粮和支持出口的目的。

从1960年3月开始，“组织人民经济生活”一词频繁出现在中央文件和各种报刊，在当时的语境下，这个词汇包含两层涵义：

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向群众解释当前各项经济政策的合理性和必要性，重点解释“为什么粮食大丰收了反而需要节粮？”也就是企图用谎言欺骗民众。

通过各级党组织具体落实增产节约、计划用粮的措施，压缩居民口粮供应数量，对有异议者施以专政，叫做“打击阶级敌人的造谣破坏活动”。

“组织人民经济生活”所面临的最大困难是官方宣传与人民生活水平下降之间的巨大反差。1960年后，《人民日报》等不断宣传1958年、1959年取得了空前大丰收，但群众的生活却每况愈下。群众对“三面红旗”的不满，已经从城市发展到农村和边疆。一些零星资料对此有所反映：

福建省晋江县深沪渔民“攻击”粮食政策说，毛主席当主席，一顿吃四两；刘少奇当主席，一顿吃三两；以后再一个主席，不知吃几两？

晋江县华侨侨眷八九千人，“争着要出国或跑香港”。

沈阳“有一些坏分子扬言”，给饿饭的孩子照个像，给毛泽东寄去。

包头钢铁公司有几个工人甚至要把带沙粒的小米饭送给中南海。

针对各地出现的大量不满言论，各级党委把加强专政与欺骗宣传结合起来。公安部长谢富治要求各地专政机关“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重点打击五类分子的“造谣”、“诬蔑”和“反动言论”。在打击、震慑阶级敌人破坏活动的同时，各级党委重点向群众宣讲“十年伟大成就”和“今后的幸福远景”，以澄清群众的“模糊观念”并按照下面的几条原则，统一宣传口径。

粮食究竟有没有取得大丰收？官方的答案是：“坚信粮食取得了大丰收，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任何动摇”。

为什么粮食大丰收了，还要号召节粮？为什么各条战线都取得了胜利，却买不到日用品？官方的答案是：“不是粮食少了，而是吃得人多了”，“不是东西少了，而是买得人多了”。

强调国家利益至上，帝修反亡我之心不死，全世界还有三分之二的民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共产主义者的理想是解放全人类。教育群众设身处地，站在国家的角度考虑这个问题，不应一讲节粮就埋怨、发牢骚。“胸怀祖国，放眼世界”是当时最流行的口号。

社会主义制度无比优越，绝不会饿死人。说农民被饿死完全是阶级敌人的造谣、诬蔑。轻信和传播谣言者将被治罪。

上述种种充分说明，以国家权力为后盾，以暴力和谎言为手段，通过舆论强化意识形态灌输，加强对老百姓的行动、言论和思想控制。利用国家掌握的各种传媒，把满目萧肃、哀鸿遍野的现实社会，变幻为“万紫千红”，“满园春色”。只是这种意识形态的遮蔽效果实在过于强大，竟也误导了毛泽东等人，让他们还在中南海里继续做着共产主义乌托邦的黄粱美梦。他们是最爱说梦话的，并要求老百姓听信他们的梦呓。

1960年5月，中共领导层逐日感受粮食问题的严重性质。事情的起因是，辽宁工业基地和京、津、沪的粮食供应已难以为继，上海的粮食仅有一周的存量。但直至此时，中共对粮食和农村危机的深度和广度仍模糊不清，或者是装糊涂。仅仅把问题理解为调运粮食出现了困难。

5月28日，中共中央向各地发出紧急调粮指示。6月6日，中共中央再度发出《关于为京、津、沪和辽宁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

令人惊奇的是，即使到了这一步，一些领导干部仍在继续隐瞒饥荒的真相。周恩来以后回忆道，在1960年夏天召开的北戴河会议上，他本人“已经意识到粮食有问题，但大家不承认，结果把真实情况给掩盖起来了”。

周恩来所说的“大家”既有中央干部，包括他本人，也有省级大员。

就在这次北戴河会议期间，毛泽东召见李富春、薄一波、陈正人谈话，要求全国大搞小洋群、小土群，今冬要动员7000万人来大炼钢铁。毛的这个指示很快就具体化为1960年7月后兴起的“保粮保钢运动”。

“保粮保钢”运动的核心是试图以政治运动的方式提高钢产量和解决农村粮食问题。虽然中央到此时对各省的粮食情况仍不摸底，但大致已知道饥荒十分严重了，这才有了“全党动员，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口号。

毋庸置疑，在全国人民尤其是广大农民饥肠辘辘的情况下，根本无法完成1860万吨钢生产的任务，而在继续坚持公社食堂制度的前提下反五风（反共产风、反浮夸风、反强迫命令风、反瞎指挥风、反干部特殊化之总称），动员干部下乡整社，对解决大饥荒显然也无济于事。

就在“保粮保钢”运动全面展开之际，农村饿死人现象已发展到令人恐怖的程度。仅山东省章丘县黄河公社一地，从6月初至8月15日，已死亡642人。其中8月1日至15日，死亡229人，平均每天死亡15.2人。

在非常形势下，中共高层没有着力解决人们食不果腹的问题，反而加大对民众的统治和盘剥。9月7日，中央发出《关于压低农村和城市的口粮标准的指示》，规定除少数重体力劳动者外，城镇居民每人每月降低2斤口粮。

文件首次承认“夏收之后，浮肿病、非正常死亡和人口外流现象继续发生”但明知故犯，继续压低口粮供应标准。

四川省的李井泉尤其恶劣，1960年8月23日，四川全省范围内在没有事先公告的情况下，突然发行新版四川省地方粮票，百姓手里的旧版粮票不予兑换，全部作废，理由是发现有人制造假粮票。群众勒紧裤带节省下的粮票是安排了用途的，一夜之间成了废纸，总共大约四千八百万斤。一段时间内，所有食品店、饭馆都关门。人们怨声载道，李井泉心毒手狠、置之不理。幸好人民银行没有学他的办法，如果以发现有人制造假钞票为由，将流通的人民币全部作废，不予兑换，将会造成什么后果呢？

作废粮票的起因是四川省大跃进中大搞浮夸，粮食减产，又外调太多，天府之国也大量饿死人，国库的存粮已不能兑现民众手中的粮票。

四川省粮票作废前，1960年7月28日，李井泉给国务院写信，提出：“现在库存不多，外调任务如果超过当年购销后的差额，那省内的安排就毫无办法。特别是去年因为征购较多，曾引起今年出现许多问题，因此，本年度粮食外调任务，很有必要给四川省缓和一下。”但是周恩来说“你们怕四川饿死人，但北京、上海饿死人影响更坏”。

数日过后，四川省委正在召开地委书记会议，突然接到李先念打来的电话，还要调一亿斤粮食。李井泉让财办主任张韶方（后来是主管财办的副省长）跟李先念说，调一亿斤粮食，四川就要死多少人，你看他还调不调？张韶方照此回复电话，李先念的态度很强硬，说：“死人也得调！”会场上所有的人听到这话以后，鸦雀无声。大家闷着抽烟，谁也不说一句话，闷了半个小时，散会。为了大局就只有作废粮票了。文化大革命中李井泉受到冲击批斗，其夫人肖里在揪斗中头发全部被扯光，最后自杀；儿子李明清被北京航空学院的红卫兵以反对中央文革之罪名殴打致死。但无人同情，他作废粮票的事缺德至极，影响甚深。也算是报应吧。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中共的所有官员从来唯上是从，叫做顾全大局，明知会死人，为了乌纱帽也要硬性调粮，置民众死活于不顾。李井泉调粮有功，1961年升任西南局第一书记，统管云贵川三省。一向高唱代表工农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在制造了大饥荒又明知农村灾情更为严重的情况下，顾虑的是中共在大城市的影响，为掩盖其罪恶，把饥荒转嫁给更需要粮食、濒临死亡的农民，造成四川饿死一千余万人的惨剧。最终目的是维护其反动统治，却在那里高喊“为人民服务”。

（5）居民与官员的差别

现在许多年轻人没有经历过那三年困难时期，出于对目前中共官员贪污腐败和社会不公日益严重的不满，在某些人鼓动下，竟至幻想回归毛泽东时代，梦想毛泽东时代是为人民服务的。我理解年轻朋友的心情，但不得不说，如果你不属于特权阶层，在那个年代可能饿得瘦骨嶙嶙或者早就见马克思去了。以下是原北京市第二商业局干部高智勇先生的记述，读了以后便会知道毛泽东时代是如何对待人民，又如何豢养官吏的。特原封不动地摘录于后：

缘起

1958年的“大跃进”，由于工作严重失误，左倾错误在各个领域泛滥成灾，造成国民经济失衡。伴随而来的是“大跃进”后期发生在全国（大陆地区）的空前大饥荒。

这场灾难同样波及“首善之区”的北京，出现了有史以来很少遇到过的商品匮乏，食物短缺，市场紧张。

然而，幸运的是，北京作为首都，有着独一无二的“政治优势”。党中央采取非常措施，全国各地、各兄弟省市皆以“政治大局”为重，用行政手段压缩当地人民的基本需求，全力以赴支援北京。居住在京城和平头百姓也沾了光，——最低生活水准得到维持，且远远高于外省市居民生活水准，而此时神州大地饿殍遍野。

民以食为天

京城用粮全靠外地调入，自1959年以后，调入发生困难，越来越少。曾一度出现库存用粮不够维持六天需求的紧急状态。当时全市人口不足400万（享用商品粮待遇的“非农业人口”），遵照党中央指示：居民口粮低标准供应，把自1954年“统购统销”后实行的居民“凭证”供粮改为“凭票”供应。凡是在京有正式户口（所谓“吃商品粮的”）每人按月发放粮票。粮票分为：粗粮票，面粉票，大米票……粮食定量依年龄大小，因人而异，从婴儿降生的3斤、少儿6斤、儿童8斤……至成人21斤不等。此外还依身份不同，指标各异，如在校大中学生、机关干部、特殊工种……略有所增加。其中面粉供应占总定量20%，大米占10%，其余供应粗粮——玉米面、白薯干、有时只供应高粱面儿、鲜白薯等杂粮。

婴儿发给奶证，每日两瓶，每瓶半磅。满周岁的，供应1瓶，再掺兑“代乳粉”。代乳粉票和婴儿糖票，每月各发一张。凭票到指定商店可购代乳粉1市斤（由黄豆粉、大米粉及少许奶粉掺兑而成）和黄砂糖2两（古巴产的）。

由于口粮标准低，副食品短缺，人们饥饿，加之受社会影响，粮管部门在定量变更及旧粮票销毁的管理上时有漏洞出现，一时间贪污、偷盗、倒卖粮票以及印制假粮票的案件屡有发生，1961年1市斤北京市粮票黑市价格3元（当时生产第一线的工人80%以上月薪为三四十元），1市斤全国通用粮票黑市价格4元，1市斤北京市面票黑市价格5元。

当年，作为多数居民的“骨干”副食品猪肉自1959年元月起凭票供应。凡是在京有正式户口的，每人每月三张票（分为上、中、下旬各一张）每票供应鲜肉1——3两，依货源状况而定，肉少时供应1两，肉多时不得超过3两。但自同年5月起，把每人每月的三张票削减为两张（上半月、下半月各一张）。

1960年猪肉货源急剧减少，到当年7月起已无鲜肉可供应居民，即随将月市场投放陈年肉罐头顶替鲜肉供应。数张票集中起来可买到一盒（听）罐头。

1961年起，将原发放的每张肉票面额最多3两削减为2两。同年4月，用库存的鸡、鸭、鱼罐头顶替鲜肉。6月到年底，对居民停止供猪肉。

牛、羊肉自1959年元月起凭票供应。凡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居民，在京有正式户口的，每位每月发给“清真肉票”三张，票面标明：上旬、中旬、下旬，每张票一次性使用，可购鲜肉1——3两（牛、羊肉二者选一）。货源不足时，曾从西北调入骆驼肉顶替牛肉供应。同时规定：下货（内脏）顶替鲜肉分量。

据官方统计：1961年北京市人均肉食消费量是8两半（全年），是有史以来北京居民消费水平最低的一年。但仍远远高于其它兄弟省市。（统计数字见《北京副食品商业志》2002年版）

1960 年，蔬菜被正式划为“国家二类商品”。强化“产销统管”体制。对居民实行凭票限量供应。凡是在京有正式户口的，每人每天供应鲜菜 2 两（100 克），但品种有限。萝卜、土豆、白菜等任择其一，以土豆居多。另外还发放有少量的“葱票”，持票可购买到少许葱、姜、蒜等，主要由“居委会”安排，重点是照顾基层革命军烈属。但有时出现凭票也无菜可买的情况，只好持票买腌菜或咸菜（腌酱菜也凭票供应）。

冬贮大白菜凭《北京市居民副食购货证》每户供应数斤，十余斤不等，这要根据货源状况而定。

鸡蛋自 1958 年元月起就实行限量供应，凭《北京市居民副食购货证》每户每月供应 1 市斤，但超过十口人的“大户”，每户每月增加 1 斤。

1960 年至 1961 年，鸡蛋对普通居民停供。仅按中央有关规定，对“特需”人员提供，如在京的领导干部，全国顶尖级的知识分子；驻京外交人员等。

花生和瓜子一年“品尝”一回。每逢春节光临，每户居民凭证供应带壳花生半斤和瓜子 2 两（熟）。花生与瓜子属油料作物，早在 1953 年即被列为“统购统销”物资。国家有关部门对此一直掌控很紧。直到 1965 年以后，才由每户居民每年供应半斤改为每人供应半斤和瓜子 2 两。这是后话。

食糖供应凭《北京市居民副食购货证》每人每月供应 2 两。水果块糖或黄砂糖二者选一。黄砂糖是从古巴进口的。

食油供应按在京正式户口，每人每月发放油票一张。凭此票可购食油三两（十六进制），品种以豆油或棉籽油（当时叫卫生油）居多。花生油则在年、节期间少量投放市场。

此外，春节每户额外增发“节日补助油票”一张。凭此票可购香油（芝麻油）1 两。

食盐供应凭《北京市居民副食购货证》每户每月供应 1 市斤。大粒粗盐或精盐，任择其一。超过十口人的“大户”可增加半斤。

稀黄酱每月每户凭证供应半斤（无包装，自备器皿），超过十口人“大户”增加半斤。

芝麻酱供应逢三节（春节、国庆、五一）凭《北京市居民副食购货证》每户供应一两（50 克），无包装，自带器皿。

此外，逢年过节还有粗粉条二两，粉丝一两，花椒半两、大料半两、木耳半两，黄花半两，碱面儿（食用碳酸钠）半两，皆凭《北京市居民副食购货证》按户供应。

酱油（低档）、醋（散装）基本是敞开供应，但每次购量不得超过 3 斤。所幸不限次数。群众称之“限量不限次”。

糕点食品自 1958 年下半年起，供应趋紧张，毕竟是粮油制成，为弥补日常饮食热量不足，许多居民抢购充饥，出现排长队“景观”，市场经常脱销。自 1959 年春节起，正式实行凭证限量供应。凭《北京市居民副食购货证》每户可购 1 市斤，品种任选，主要是三大类，蛋糕、桃酥、江米条，其它花样儿品种不多。后来由于糕点原料短缺，自当年 9 月起，由凭证供应改为“凭票”。每户每月发给糕点票和饼干票各一张。凭票购买糕点半斤和饼干 2 两，同时另加收北京市粮票 4 两（全国通用粮票不行）。

茶叶自 1959 年起被划为“国家二类物资”。鉴于当年基本国策“以粮为纲”，茶田大幅压缩，改种农作物，产量锐减，市场罕见。

1960年中秋、国庆两节，居民凭《北京市居民副食购货证》每户供应茶叶1两（低档）。

1961年春节，每户居民凭证供应茶叶1两（低档）。1962年，货源更紧张，市场脱销。考虑到“政治影响”，不得不从中央各大机关、部队招待所、宾馆等单位库存茶叶中回收一小部分填补首都市场“空白”。据官方统计：当年回收茶叶达484公担，缓解了市场紧张。同年国庆，每户居民凭证供应1两（中档）。郊区农户供应半两（低档）。在企、事业单位有正式“集体户口”的单身汉凭《个人购货证》每人供应2钱。

北京的餐饮业（各类餐馆、饭庄）奉市委之命于1960年7月30日实行就餐收粮票制度。自古以来，北京餐饮业闻名遐迩，名菜佳肴，应时迭出，烹制精细、选料考究，滋味各异。然而，这一历史形成的特色，自1953年实行“粮油统购统销政策”后，发生根本性转变。原料采购受到严格限制，其经营品种、饭菜质量大打折扣。继而是1956年的“公私合营”，管理体制变更，许多老字号餐馆、饭庄被“合并”，撤点，有相当一部分关门歇业，剩下的勉强维持，但要隶属于新成立的国营“饮食公司”管理。此时仍基本能敞开供应，主要提供些大众化的主食馒头、烙饼之类。可是到1959年底，又发生变化，当时由于粮油茶肉蛋短缺，北京附近周边城镇（天津、保定、石家庄等地）的大小饭馆率先实行就餐收粮票制度，加之当地居民口粮标准低，副食品奇缺，许多外地居民集中涌入北京，专程觅食就餐。一时间京城大小餐馆门前出现前所未有的排长龙景观。人流云集，彻夜不散。从晚上开始排（次日早餐），清晨早餐过后又排起午餐队，午饭后又开始排晚餐队，晚餐过后又开始排次日早餐队……循环往复。往往一家多人轮番上阵，同时又有大批本市居民也加入队列……毕竟此时主食尚不收粮票！此状况引起中央高度重视，不仅粮油消耗量大，且局面混乱，“政治影响”太坏。对此，经中共北京市委提议，并报请党中央批准，自1960年7月30日零时起，北京市辖区内的饭馆，餐厅一律凭票供应。仅保留少数高档饭馆，不收粮票，但价格昂贵，高价菜肴，非普通居民所能享用（计有东安市场内的东来顺、王府井大街路东侧的萃花楼饭庄、西单北大街的曲园酒楼、王府井大街北口路东华侨大厦内的大同酒家等约十八处）。欲到这些高级饭馆用餐者须提前一日在饭庄门前预约，领取“号牌”，次日凭“号牌”入座用餐。每日“号牌”数额有限。

1960年11月14日，党中央发出紧急指示，要求立即开展大规模采集和制造代食品的群众运动，以渡困难。党中央根据科学院的建议，向全国人民推荐了若干种代用食品。例如玉米秆粉、小麦秆粉、橡子面粉、小球藻等。党中央要求大规模地动员群众，自己动手，土法为主，自做自吃。为了做好这件事，中央成立了领导小组，设立了专门的办公室，并要求各地区也要设立相应机构，负责对这一运动的具体指导。

由于口粮标准低和副食品严重短缺，人们摄取热量不足，不少群众患了浮肿、肝炎等疾病。经医院确诊“无误”可领取“康复粉票”一张，凭票到指定地点可买“康复粉”一份（麦麸、豆粉与砂糖掺制），每日用开水冲食数次。据老者回忆道：“疗效还行”。

确保“特需”万无一失

北京作为首都，集中了党中央、国务院、人大、政协、解放军、公安等首脑机关的一大批领导干部。为了保障这一特殊群体的日常消费，坚持“为

党中央服务”的主旨，北京在物资和商品供应工作中坚持确保重点、照顾特需、全力以赴、万无一失。

“特需”又称“特供”。机构正式名曰：“北京市食品供应站”。坐落在东安门大街34号，对外通称：34号。从不叫全名。它的前身是原公安部八局五处——食品保卫处。早在共党建政之初，为了保卫伟大领袖及其战友们的人身安全和身体健康，公安部曾设食品专供站，即：中南海特需供应站。这个“特需供应站”对外称“北京饭店招待所”，起初是处级单位，下设四科一室，并管辖几个专用生产基地，规模较大者是巨山农场，专为中央领导人生产、特制、加工优质的粮油、菜蔬、水果、肉、鸡鸭、蛋、奶……等副食品。基地建有专用屠宰厂、肉食加工厂、糕点糖果加工厂、熟食制作车间、检测化验室等专门设施。这些设施当时皆属最先进的，甚至连猪舍、养牛场……皆聘请苏联专家设计与建筑。

此后，随着政权稳固，特需供应工作越来越完善，不断充实。到1956年，这项长期“政治任务”由公安部正式移交北京市负责。移交时隶属北京市第三商业局，后又划归二商局，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充实，不断完善，并建立了一整套完备的长效机制，沿袭至今。

“特需”主要“特”在三个方面：第一安全（绝对安全、万无一失），其二高质量、高水准，第三方便。为了做到这些，食物从原料生产、采摘、采购、监测、加工、制作、化验、包装、调运、配送、验收……等各环节，皆由专职人员、专门车间、专用设备、专库、专车……进行。做到：“数量、质量、品种、及时、安全”五个保证，一丝不苟、绝不松懈、全力以赴、万无一失。

“特需”商品包括：粮油食品、猪牛羊肉、禽类、各类蛋品、各类海鲜、乳品、生猛野味、糕点、糖果、小食品、调味品、罐头、烟酒茶，熟食、鲜菜、干果、硬果、蔬菜、杂货……及日用品、招待品等等，丰富多彩，应有尽有，且精华荟萃。

特需供应无小事。为了做到绝对安全，其业务干部和职工皆由市商业局选调，但保卫干部和化验人员则由公安部八局任命和市公安局选派。工作人员不仅是“政治可靠”思想过硬，而且其出身背景、家庭成分皆经严格审查。他们不仅认真执行中央制定的“特供政策”和“组织纪律”，还能把服务对象“需求什么？喜好何物？”深入研究、探索，认真落实。由于工作成绩优异，服务对象满意，受到中央多次表彰，曾有九位同志先后荣获毛主席接见。

享有“特需”待遇的干部的特供标准依每人的权位高低、官职大小、级别不同，有所差异，除享有“一级勤务”的首长之外，二级首长、三级首长……逐级逊色。如人大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与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简称四副双高）中央明确规定：除按照北京市居民定量供应之外，每户每天再供应鲜肉1斤，每月供给鸡蛋6斤，白糖2斤，甲级香烟2条，食油、果蔬等适量。

正、副部长一级的，除享有北京市居民待遇之外，每人每月再供给鲜肉4斤，鸡蛋3斤，白糖2斤、甲级香烟2条，鲜菜、果蔬不等。

正副司局长一级的，每位每月再供鲜肉2斤、鸡蛋2斤、白糖1斤，甲、乙级香烟各一条。

除在中央、人大、政协、国务院之外，而在北京市、地方上的国营大企业、大单位任职的，凡是行政七级以上的，每人每月再供给鲜肉 4 斤、鸡蛋 3 斤、白糖 2 斤，甲级香烟 2 条。

行政七级以下、十三级以上的（当时干部划分为 25 个行政层级，十三级以上属“高干”）每位每月再供给鲜肉 2 斤、鸡蛋 2 斤、白糖 2 斤，甲级香烟一条。

行政十三级以下、十七级以上的，除享受普通居民的低标准供应之外，每位每月仅能得到 2 斤黄豆、1 斤白糖的额外“关照”。群众诙谐地称呼这个档次的是“糖豆儿干部”。

除此之外，还有“军特需”、“国宴特需”、“两会特需”、“外国专家特需”……不一而足。虽皆属“特供”范围，但规格不一，标准各异。这里仅以体育运动员为例（与外国不一样，我们是“举国体制”，体育经费皆由国家拨），对即将参加国际比赛（注：困难时期在京仅举办一次国际赛事，即第 26 届乒乓球赛）在京集训的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和领队，每人每天供给鲜肉 2 两半。

凡是达到国家“运动健将”一级水平的，在京比赛期间，每位每天供应鲜肉 4 两（据考证，当时享有这一待遇者仅两位：陈镜开（举重）、穆祥雄（游泳））。

对即将参加全国比赛的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和领队，在京集训和比赛期间，每人每天供给鲜肉 1 两半。

“侨汇供应”：困难时期为尽可能多赚外汇，充实国库，党中央决定“对在大陆的侨眷实行商品供应优惠政策”。凡是从境外汇入的外币，折合成人民币超过 100 元的，可凭“侨汇券”增加供应粮食 6 公斤（大米、面粉和豆类各占 1/3）、食油 1 公斤（花生油、豆油二者选一）、白糖 2 斤，鲜肉 2 斤（猪牛羊肉任择其一），此外还有棉布 10 尺。

票！票！票！什么都要票

大饥荒引发连锁反应——物资匮乏。1960 年党中央决定：减少民用棉布供应。布票按人头发放，凡是在京有正式户口的（吃商品粮的），每人全年四尺五寸，继后压缩到一尺八寸，只够打补丁用。当时的拆洗缝补业总有做不完的活儿——您送去无论多么破旧不堪的衣物都能补好，做上。打一块补丁，除了收钱，还要按尺寸大小收取布票。

1964 年后，情况稍缓，发放布票略增。除布票外，还发行过：棉花票、绒衣票、汗衫票、背心票、裤衩票、胶鞋票、棉鞋票……有一时期，买缝衣线也收布票，一寸布票可买一小团。生了娃的妇女，发给“油布票”一张，凭票可买到三尺油布。

为了分配有限商品，还发放过：肥皂票、火柴票、烟筒票、铁炉子票、铁锅票、铝壶票、生炉子用的“劈柴票”和“炭煤票”。还有大衣柜票、大木箱子票、木床票、圆桌票、闹钟票、手表票、电灯泡票、缝纫机票、自行车票等。这些票都是一次性的，按票面规定的数量购买。据不完全统计，北京市 1961 年度凭票供应物品达 69 种，还不包括“凭证”的。

1961 年底又发行“工业券”。从此，除凭证和凭票之外的商品皆“凭券”供应。工业券发放是在职人员按其工资收入比例，平均每 20 元工资配一张券。购买范围较广：毛巾、毛毯、毛线、手帕、电池、轴线、铁锅、铝盆、铝饭盒、搪瓷面盆、搪瓷口杯、搪瓷便盆、线手套、铁壳暖水壶、竹壳暖瓶、运

运动鞋，雨伞、棉胶鞋、缝衣针、缝衣线、油布雨衣、夹胶雨衣，人造棉制品，尼龙内衣裤、皮鞋、闹钟、收音机、腰带、刀剪、进口刀片、各类箱包、巧克力糖块及定量之外的香烟、茶叶、白酒等。

城里供应紧张，京郊大地的农村更困难。由于办“人民公社”，社员被迫吃“集体食堂”，淳朴的农民响应党的号召，把自家铁锅、铁勺等家伙无偿捐献出来，投入高炉熔炼，大炼钢铁。1961年“公共食堂”办不下去了，各家农户不得不重起炉灶，但又买不到铁锅等炊具，纷纷涌入城里寻购。然而，市区的商品几乎全都“凭证”或“凭票”供应，农民根本买不到东西。

因此，农民不得不忍饥挨饿，把省下的点滴口粮和小土特产与城市居民进行调剂、私下交换，换一点生存必须物品。针对这种现象，中央发指示：任何人不得私下进行物品交换、买卖、贩运。1961年10月9日，北京市工商、公安部门全面出击，仅一天之内就取缔、查获私下交换物品案件13977起（罪名黑市交易），抓获69913人。公检法机关“从重从速”审查处理一万余名，“依法”逮捕100余名，管制34名，“劳动教养”100余名，拘留700余名，“劳动教育审查”1000余名，其余的强制遣送原籍或由所在单位领回去处理。

(6)“高级”点心“高级”菜

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正式决定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财政部门汇报时提出：由于大跃进期间投资失控，不得不多发货币，导致严重通货膨胀，每年赤字均在三十亿元以上。回笼这部分滥发的钞票是面临的巨大问题。

据分析，超发的九十五亿元钞票中，机关、企业等社会团体约有四十亿元；城市居民手里约有二十八亿元，每人平均二十一元；农民手里约有二十七亿元，每人平均五元。农业连续三年减产，农副产品奇缺；工业生产萎靡不振，市场物资匮乏，没有可供回笼货币的物质基础。市场购买力和商品之间每年的差额大约三十亿元，严重影响社会稳定。

中共要员陈云因对大跃进持怀疑态度，被毛泽东晾在一边坐了几年冷板凳，现在请他回来，参与中央财经小组工作。他在1961年1月19日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了《安排市场要网开一面》的讲话，其中说道：“糕点问题，这看来是一件小事，但却能缓和人心、增加营养、回笼货币。现在什么东西都凭证供应，有钱也不能多买。按人口凭证分配的办法，社会主义国家在必要时可以采取，在战时则必须采取。现在供应紧张，应该‘两条腿走路’，即有些商品凭证分配，有些商品只要有钞票就可以买。出售糕点，一种是便宜的，五角或六角钱一斤，凭证供应；另外一种是高价的，有钱就可以买。在供应紧张的时候，总要网开一面，不能都搞平均主义。用这个办法回笼货币。要充分利用进口的糖和麦子，把它们集中使用到对我们最有利的方面。进口糖可以用于制作高级糖果和高级糕点，进口麦子、面粉可以做高级糕点，麸皮可以做猪饲料。猪肉可以开馆子，卖炒肉片、炒肉丝。把这些办法联系在一起，可以解决不少问题。要放手敞开来卖，不要怕抢购。全国资本家定息一年最多一亿元，高级糖果平均五元一斤，一亿元只能买一万吨。高级知识分子最多二十万人，就算每人买一百斤，也不过一万吨。五千万职工，平均每人买一斤，也只有两万多吨。而进口糖已到货的就有十几万吨，在路上的有二十几万吨，第二季度还有三十万吨。开始买得多些，这是心理作用。敞开卖之后，卖速一定会降下来。现在百货公司什么都要凭证，这不行。要摆出

几样自由买的东西来卖。将来在一部分地区，与其提高粮食供应标准，不如让它经过糕点这个渠道出去比较好。”

以上就是陈云的“良策”。这条“良策”的出发点和目的是回笼货币，并不是救民众于水火，更不是改善民生。

所谓高级糖果和高级糕点并不高级，只是部分地采用了传统的制作工艺，相对地减少了一些偷工减料，其质量和口感仍然赶不上 1957 年前的水平，实际上是乘机卖高价。

在陈云的大力推动下，2 月 25 日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在向中共中央报送的《关于继续扩大高价糖果和高价糕点供应范围的报告》中指出：要把高价糖果的供应范围扩大到全国所有的城市和乡村，把高级糕点的供应范围扩大到全国一切大中小城镇；一律不凭证，不限量；利润收入一律归国库，不归经营单位，企业不分成。

1961 年 1 月，全国四十多个大中城市试行销售高价糖果和高价糕点，仅三十天就售出一千八百万斤，回笼货币八千多万元。初期的成功使中共中央决定在 1961 年 3 月底以前在全国推广，大中小城镇都卖高价糖果和高价点心，加大货币回笼速度。

1960 年以前，饮食业是不收粮票的。大跃进不断发展，报纸上喜讯频传，粮食供应却日益紧张。各地报经中央同意，中西餐厅、饭馆，小食店、点心铺等餐饮业一律实行收取粮票供应食品。中共当局尝到了卖高价糖果和高价糕点的甜头以后，积极举办高级饭馆，不收粮票，高价销售各类荤菜和名酒。仅四月份全国即开办高级饭馆 841 家。

轻工系统还拿出了积压在仓库里的数千万双尼龙袜子高价销售。

高价商品的定价原则是从当时高货币持有者手中以五分之一的代价回笼货币。或者说，实际上是将超额发行的人民币购买力贬值到百分之二十的水平进行回收。以便大大降低通货膨胀的压力。

民众面临饥饿时，政府不仅不救民众于水火，反而乘火打劫、暴敛民财。

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这一经济学家创造的高价点心、高价菜经营策略取得了预期的效果。1961 年仅销售高价糖果、高价糕点、高价菜和零杯名酒即回笼货币三十八亿元，其中高价利润二十六亿元。从 1961 年到 1965 年，高价商品销售额一百二十多亿元，比按平价销售多回笼货币七十亿元。1961 年和 1962 年实现的高价利润就相当于 1960 年和 1961 年货币净投放的 92.6%。

(7) 毛泽东吃什么？干什么？

毛泽东生前死后，大唱赞歌者不计其数。任何社会，趋炎附势者、不明真相者、盲目迷信者总是有的。希特勒死了那么多年，至今还有纳粹余党，人各有志，不足为怪。歌颂毛泽东的一些人编造了许多故事，声称毛泽东的生活十分简朴，一双鞋穿了几十年，一件睡衣有几十块补丁，一日三餐么，都是极普通的饭菜，三年困难时期甚至戒了荤腥，连肉也不吃了。这是真的吗？

请看由中南海大内总管汪东兴、贴身丫头张玉凤充当顾问，红旗出版社 1996 年印刷出版、今日湘潭毛泽东纪念馆收藏并展出的《毛泽东遗物事典》中有关毛泽东日常伙食的记载：

毛泽东特别喜欢吃长沙东方红渔场的活鱼。为此安排专机每周定期往返北京—长沙，专门为他空运活鱼。为防止“阶级敌人破坏”，还挑选祖宗三代皆为贫下中农组成基干民兵连，专门负责活鱼的捕捞、挑选、装箱、押运。

往返数千公里，用国家专机为个人运送活鱼，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广大农民被要求“糠菜半年粮”的悲惨时代，这算什么呢？毛享受的其它特供食品还包括从香港购买澳大利亚麦片，玉泉山农场由山泉水灌溉生产的大米，西山脚下巨山农场则供应毛喜欢的时鲜蔬菜、肉类和牛奶。冬天的蔬菜则是由广东提供。

1961年4月26日（三年困难时期），几位工作人员会同厨师为毛泽东精心订制了一份菜谱。从保存下来的西餐菜谱来看，内容尽管谈不上十分丰富，但已比较周到的照顾到了毛泽东的饮食喜好。

1961年4月制订的西餐菜谱中包括下列这些异国风味的鱼虾：蒸鱼布丁、铁扒桂鱼、煎（炸）桂鱼、软炸桂鱼、烤鱼青、莫斯科红烤鱼、吉士百烤鱼、烤青菜鱼、波兰煮鱼、铁扒大虾、烤虾圭、虾面盒、炸大虾、咖喱大虾、罐焖大虾、软炸大虾、生菜大虾等等。

毛泽东对西餐中鸡的做法很是推崇。六十年代初，工作人员制订西餐菜谱时，在鸡类上列出了这些一般人闻所未闻的西菜名称：黄油鸡卷（鸡排）、软煎鸡排、鸡肉饼、鸡肉丸、大王鸡肉饼、鸡肉丝、罐焖鸡、红焖鸡、葱头焖鸡、青菜焖鸡、纸包鸡、鸡丁敏士、椰子鸡、奶油鸡等等。

猪肉类：烤猪排、烤猪腿、炸猪里脊、炸猪排、溜猪排、法国猪排、意式奶猪等等。

牛羊肉有：羊肉串、烤羊腿、烤马骏、白烩羊肉、煎羊排、煎羊肝、牛扒、煎牛肉、咖喱牛肉、伏太牛肉、酸牛肉，烩牛尾等等。

毛泽东六十年代吃过的西菜汤有，奶油汤、牛尾汤、红菜汤、鸡杂汤、腰子汤、葱头汤、红花鸡汤、饺子汤、红鱼汤、卜菜泥汤、巴粒米汤、什锦汤、鸡蓉鲍鱼汤、鸡汤蓉汤、意国面条汤、龙须菜汤等等。都是有案可稽的。

以上只是部分西菜菜谱，他每天的饮食还是以中菜为主，只是偶尔加上几个西菜，或是西菜肉类，或是西菜汤类。

中菜菜谱名目更为繁多，为节省篇幅，此处从略。

毛泽东当时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且年事已高，吃好一点，照顾他的饮食爱好和必要的营养是很正常的，本无可非议。问题在于他是一面吃着由名厨特制的美饌佳肴，一面对外宣称艰苦朴素，散布困难时期连肉都不吃了的谎言，是不是伪善得近乎卑劣了呢？要是真的和老百姓同甘共苦，三年困难时期还能够那样“红光满面，神采奕奕”吗？

毛泽东每月的伙食费是多少呢？中南海画册编辑委员会编辑，北京西苑出版出版的《平凡与伟大——毛泽东中南海遗物轶事》一书中有一张帐页照片，明白地写着1961年7月的伙食费是654.82元，除伙食费外，还有水果费86.65元。当时普通城镇居民的伙食费约8至12元，也就是说，毛泽东的伙食费相当于寻常百姓的六十到九十倍。1961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的黄金价格是3.04元/克，毛泽东当月伙食费相当于243.9克黄金。笔者写此文章的时候是2013年1月16日，查询了一下当时的金价，上海黄金交易所AU99.99黄金期货收盘价是335.02元，市场千足金首饰价格高达418元，按期货价计算，毛泽东一个月的伙食费（243.9克黄金）折合成人民币为81711.4元，也相当一百来人的伙食费吧。是艰苦朴素还是骄奢淫逸呢？

再看看毛泽东的饭后一支烟吧。毛泽东烟瘾很大，有一天吸烟超过五十支的纪录。起初他吸的是上海特制中华牌香烟，后来贺龙向其推荐四川什邡的雪茄烟，深得毛泽东喜爱。什邡烟厂有详细记载，择要摘录如下：

什邡雪茄四十年代即以清凉香醇、有止咳化痰之效享有盛名，六十年代改进配方，研制出新型手工雪茄供西南局书记李井泉及成都军区领导品尝，获一致好评。毛泽东认定此烟后，每月派专人从北京前往成都军区取烟。每批烟的“必经之路”是：什邡烟厂—成都军区—中央警卫局—中央特供处（服务处），然后被送至毛泽东手中。中央办公厅认为什邡雪茄烟经手之多、运转时间之长都是不安全的因素。于是决定在北京生产，以便监控。经过严格政审，选中黄炳福、姜跃秀、刘宗贵、范国荣等技术骨干，举家从四川迁至首都北京。从安全、保密、方便的角度出发，没有把生产场地设在人员众多的北京卷烟厂，而是选在中南海对面的南长街八十号，这里原是驻匈牙利大使柴泽民住地，是一座内外套双层四合院。选定该址以后，按照什邡烟厂卷制雪茄烟对生产环境的要求进行全面改造，里院是生产区，房上装有铁丝网，室内按手工卷烟要求，分为卷烟、晾烟、蒸烟三个套间；外院是宿舍、食堂等生活区。平时，这里大门紧闭，附近的居民谁也不知道这里是何处所在。由中央警卫团的危德纯负责小组的思想政治工作，北京市公安局的柏宝英负责小组的安全保卫工作。小组还有从北京烟厂选来的两位辅导工，一名1939年入党的炊事员、两名锅炉工。会议向小组提出了“三保”要求，即保安全、保质量、保数量。基于不搞对外牌号、便于内部称呼联络等，生产小组对外叫“360信箱”（小组的通讯地址），对内则称“一三二”。这个名字只是两种烟的型号，即十三号和二号。其中十三号供应邓小平、李先念、吴德、王震、余秋里、姚依林等人，二号是为毛泽东制造的特供烟。

精品雪茄对烟叶的要求十分挑剔。四川省新都县独桥河两岸共有二百亩生产优质烟叶的油沙地，其中五十亩可生产出精品烟叶。这种烟叶的独特之处在于燃烧后不落灰，烟灰呈白色，抽吸时喉咙可感到丝丝凉意，且点着的烟长时间搁置也不会熄灭。为制做出精品雪茄，烟叶采摘后都要用红曲、醪糟、蜂蜜、茶水、白酒，喷洒在烟叶上发酵处理，然后打成捆，存放三年后再运往北京备用。烟叶送到北京后，先在所用的烟叶上喷洒酒和清水，使之留香、除杂气。润湿的烟叶存放到第二天，然后再选叶，通常一捆五十斤的烟叶经过精挑细选后，能用上的也只有十斤左右。随后是蒸叶，将选好的烟叶加入四川特曲、桂皮酒泡上十二个小时后上笼屉蒸，取出后再用四川毛尖茶浸泡半小时后捞出，待每张烟叶表面的水分晾干后，加入内蒙的甘草流浸膏、越南的金鞭桂皮、缅甸的香料、四川的特曲酒存放十二小时以上。后面的工序繁多，此处不再赘述。生产的全过程都在中央办公厅和北京市政府委派人员危德纯、柏宝英的监督下进行，对所有人员实行严格保密的半军事化管理，一三二小组每月可生产雪茄四千余支。当时每一百支（十包）向吸烟者收费六元，不及成本的百分之一。1976年毛泽东死了，一三二小组又拖了两年，1978年以后停止生产，一三二小组被遣散。厂房的前院移交北京市委；后院移交北京卷烟厂，后成为北京烟草贸易中心第一展销部。现今为北京市西城区烟草专卖局的办公地及所属有限公司卷烟专卖店。

从毛泽东吸烟这件小事，应该可以看出他是为人民服务还是人民为他服务了吧？

毛泽东身边还有好几个为他个人服务的小组：

1、医疗组：毛泽东口口声声说，知识越多越反动，大力提倡赤脚医生，可是为他医疗保健的医疗小组，全是穿着鞋的知名医生，大部分是留洋归来的专家，没有一个赤脚医生。其保健医生有李志绥、徐涛、卞志强、胡旭东、吴洁、周光裕、吴阶平等。还有众多医护人员，昼夜守护，随叫随到。

2、大字本组：所谓“大字本”组，就是将毛泽东要看的书，特别注释后，排成“大号字”的编辑出版组。第一次开始注释毛泽东所要求看的古籍是《晋书》中的《谢安传》、《谢玄传》、《桓伊传》、《刘牢之传》。承担这一任务的主要是复旦大学和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教授与专家。这种注释出版的大字本，每次只印十五本。后来，毛泽东发现印十五本有可能被他人阅读，于是改成只印五本，成了只为毛泽东个人阅读的专有读物。随着毛泽东的白内障病的加重，大字本印刷成了“三十六磅特大号”了。而当时并没有这种字体，字模是由当时在上海澳门路的中华印刷厂特地为毛泽东翻制的。

3、吟唱小组：与大字本相关，又产生并成立了古诗词“吟唱小组”，并“秘密”录制。其组织和录音工作由文化部部长于会泳主持。据中共党史出版社《毛泽东生活档案》记载，“在北京西苑旅社做了间录音房，有时也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音室录制。吟唱者许多都是文艺界的名流，如岳美缇、蔡瑶先、姚炳淑等。乐曲演奏家更是名流荟萃，琵琶演员刘德海、二胡演员闵惠芬、笛子演员张晓辉等。一共录制了多少？韶山陈列馆所存就有古诗词磁带五十九盒之多。参加这一小组的工作人员前后有过很多，为了便于演唱者更准确地把握诗词的含意和意境，又从北京大学调来四名古典文学教授为演员们讲解。其中最有名的莫过于 1975 年毛泽东做白内障手术时放的曲子《满江红》，是上海昆剧院岳美缇录制的。

4、少女陪舞：跳舞是毛的一大嗜好。在延安时，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教会了这帮“革命家”们跳交际舞，毛很快着迷，于是每周都组织舞会。毛泽东入住北平后，专门成立了中南海文工团，以革命的名义从各大军区文艺团体中选调“不满 18 岁、面貌清秀、体态端正”的少女陪舞作乐，必要时奉命去北戴河别墅、青岛八大处别墅区寻欢。朝鲜停战后，志愿军文工团中的文艺女兵大都并入中南海文工团。后因彭德怀称之为“选妃子”，不得不撤销了中南海文工团，但每周周末的舞会照常举办，1960 年全国人民处在大饥荒中，中南海的舞会改为每周两次，直到文革中期，毛泽东日益衰老，才取消舞会。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3 年出版的《中华杂文百年精华》刊有河南杂文家王大海先生的《白头宫女说玄宗》一文，其中引用了一位海政歌舞团员的回忆录《和中央首长跳舞的日子》部分段落，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一位本来是海军疗养院护士后为文工团员，从杭州到首都近十年间执行“重大政治任务”，即陪伴各位中央首长跳舞的回忆。回忆的主人当时还是一位女孩子，说她开始“执行任务”是在杭州“汪庄”（西子湖畔一座高级园林式别墅，门禁森严，普通人难以踏入），后来从杭州调到北京，进了“海政歌舞团”。她经常去执行光荣伟大的任务：参加中南海、紫光阁等举行的舞会，多次为伟大领袖伴舞——时间是 1957 年至“文化大革命”。回忆录的主人写道：“那时天天有舞会，我们没觉得腻而是很想去，因为每场下来，精神和物质方面的快乐都有。精神方面自然是觉得光荣自豪；物质方面呢，舞会中间有一盘盘的炒杏仁儿、大香蕉和其他水果点心，都是平常吃不到的东西，十一二点舞会散场。首长们都走了，我们留下吃了夜宵再回去，夜宵

是很丰富的，有鱼有肉，这一切，对我们这些女孩子来说，都非常美好。有时候吃完夜宵还招待看参考电影，都是香港的。”杂文作者王大海点评说：“这位当年的美丽少女写得明白：时间是在 1957 年后的那几年，那是怎样的‘岁月’？！”“不正是大跃进、大饥荒、饿死人的时代吗？仅仅是在中原这块沃土上，饿死的农民数以百万计……联想到这儿，我的心为之颤栗了！”

5、戏曲小组：毛泽东所到之地，一般都要组织戏曲演出，并由电视转播车为毛泽东播放。1974 年，毛泽东在长沙休养期间，湘剧院、花鼓戏剧院的一些演员都接到了演出旧剧如《生死牌》、《讨学钱》一类戏的演出任务。演员们都不知为何要演出这些被文革批臭了的旧戏，一开始都不大敢登台。后来有华国锋传话，这才放心演出。当时湖南还没有转播设备，中央又为之调来了特有设备，为毛泽东直播。不料，这个直播的东西，被江西等邻近省份的一些有收看设备的老干部收到，纷纷向湖南省委举报，认为湖南在搞复辟。

6、特殊服务组：张玉凤（1944-）耐心细致、善解人意，以列车员进中南海；孟锦云（1948-）温柔体贴、活泼靓丽，以舞蹈演员进中南海；陈惠敏（1948-）以风骚性感进中南海；上官云珠（1920-1968）以成熟艳丽进中南海。空政文工团的演员，宾馆里年轻又有姿色的女服务员，如庐山服务局会弹琵琶的白玉莲，杭州西湖别墅擅长按摩的保健护士杨丽清，武汉杂技团擅长柔术的杂技之花夏菊丽等等，都曾为毛泽东提供过特殊服务，具体服务内容可以用“无微不至”概括，此处不再赘言。

毛泽东出巡的专列是从德国进口的，自带发电机，有空调，有全套办公设施和医务室，在当时是最先进、最舒适的，可以说就是移动宫殿。他出巡时，办公、吃住通常是在专列上，除了开会，很少住地方的宾馆。专列共十二节车厢，能容纳大批随从。他的一位厨师曾展示过他与部分随从合影的照片，每逢出巡数百人为他一个人服务。

此外，毛泽东的服装、鞋帽都是专门技师精工制作的，今日北京前门大栅栏的内联陞鞋店、王府井盛锡福帽店的橱窗里，还摆放着毛用鞋帽的复制品充当广告。毛泽东的日常服装均经特选材料，多方检验，名师制作。延安时期尚且“衣分三色，食分五等”，进了北平以后，首长们穿几件好衣服是很正常的。至于一件衣服补了几十个补丁纯属故意作秀、无稽之谈，欺骗老百姓而已。

毛泽东的日常用具均为特制，1956 年国家财政拨巨款兴建湖南醴陵群力瓷厂，为毛泽东制作餐具、茶具、文具、烟灰缸等专用瓷器，为了让毛泽东独享“贡瓷”，从两万件成品中精心挑选四十套共一千五百五十六件，其余全部销毁。专用瓷工艺复杂、用料昂贵，原材料选用濒临绝迹的临川高岭土，不含铅、镉等有害物质，手工磨成，瓷质细腻，手工绘制，画面透过釉层溢于瓷表，永不褪色。经 1400 摄氏度左右高温烧成，因胚体薄且制作工艺复杂，最大出品率不超过 20%，因此殊为珍贵。日前上海拍卖行拍卖一只瓷调羹 10 万元，一个小瓷碗 170 万元，一壶十杯的一套酒具 200 万元！足见毛泽东专用瓷的奢侈。

（8）毛泽东的专用住所

毛泽东的专用住所，指从 1949 年进入北京（时称北平）后直到 1976 年毛泽东死亡前，专门为他修建、改建，仅供其本人、亲属及身边工作人员居住的处所。

北京双清别墅：这是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到北京后的第一个住所。这个别墅是曾任北洋政府总理的熊希龄在1917年办香山慈幼院时建造的。它中间是容纳20多人的会客厅，西边是卫生间、卧室、办公室，东边还有办公室和会客厅，再过去是小餐厅和厨房。毛泽东住正房，家属孩子住院子西头平台上的几间平房，其他房间供工作人员住。

当年6月以后，毛泽东白天去中南海办公，接见各民主党派代表人物和各界人士，操控政治协商预备会的筹备工作，晚上回双清别墅休息，后来干脆离开香山，入住中南海。政协筹备会安排就绪后，也没有因安全保卫的原因返回香山居住。

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毛泽东1949年9月21日移居此住所。进入中南海的红墙内，在南海北岸的西侧，从西数第一个大门即是丰泽园。这是一所仿古式的大建筑群。在丰泽园的大院内，被小的院落分割成一些较小的建筑群，作为中央部分领导人办公和居住的地方。每个独立建筑或建筑群都有名称，都挂有匾额。”（参考张耀祠《张耀祠回忆录——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第66页）。

玉泉山一号楼：修建于1953年。毛泽东的卫士马武义回忆说：“1953年9月的一天……汪东兴同志从后门来到主席身边，满面笑容地说：‘主席，给你盖了栋新房子，今天天很好，去看看吧！’‘哦！那好哇，去看看去’”

这座新房子是高而大的平房。包括摆放着4棵芳香佛手的正厅，正厅左侧的警卫值班室，放着钢琴和乒乓球桌的100多平方米的娱乐室，东西向的长走廊，5套内有卫生间，整个室内都铺着厚实的驼毛地毯。

该住所还包括电影厅、会客厅、餐厅以及江青张罗建的一个室内游泳池。“整个游泳室不过百平米，水池只有五六十平方米、齐腰深的水，但有山有流水，有花有草，还有一块双人床大的沙滩。

北京新六所一号楼：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回忆：“1952年春，我跟江青在万寿路新六所打扑克。所谓新六所就是中央在万寿路修建的六栋小楼。中央五大常委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每家住一栋，工作人员住一栋。1959年以后，毛泽东再不曾来新六所居住（权延赤《走下神坛的毛泽东》）”。张耀祠回忆说1953年5月他受命出任中央警卫团团长一职时，其职责之一就包括保卫新六所。

北戴河别墅一号楼：1954年建成。据毛泽东的保健医生徐涛等人当年记载的跟随毛泽东去北戴河休养、办公均住此楼，周围的6、7、8号楼成为1号楼的附属楼，由陪毛泽东来这里办公厅干部及孩子居住，李敏、李讷和毛远新曾住6号楼

中南海游泳池：关于它的修建时间，有两个说法，一个说法来自在中南海负责修缮工作的工程师田恒贵。他说该处原系为方便毛泽东游泳，1955年由中央建筑设计院设计，由北京市第五建筑公司负责施工的室内游泳池。

另一个说法来自专门负责修建中南海游泳池等建筑的工程师王爱深。他说：“中南海室内游泳池是1954年开始修建，1955年秋天完工。

建筑内除游泳池外，还有门厅、更衣室、淋浴室，东南角有供毛泽东休息的一间住房，南面有供毛泽东会客的大厅。因毛泽东喜欢这个地方，经常住宿，1966年7月以后长住这个住所。1976年他死在此地。。

北戴河小别墅：1959年建成，因条件比1954年所建别墅好，毛泽东以后来北戴河时入住这座别墅。

湖南韶山卢家湾一号楼：1958年冬建成。它距毛泽东旧居西北不到1公里，青松挺拔、修竹滴翠，风景优雅，时称韶山招待所。1959年6月25日毛泽东入住，后来韶山招待所新建了一些楼，并改名韶山宾馆，卢家湾一号楼改名松山一号楼。

武汉东湖梅岭一号别墅：1959年年底竣工，次年以后毛泽东来武汉均住这里。包括1号楼，毛泽东住，有会议室、办公室、卧室及内庭院；2号楼，两层楼，警卫、工作人员住，有10多个房间和会议室、餐厅、接待室等；3号楼，毛泽东等人的活动场所，有宽30米，长60米游泳池、舞厅及剧场等。

江西庐山芦林一号别墅：建于1961年7月的单层平顶别墅，主房建筑占地4500平方米，园林面积1万平方米，四合院式主楼中间有340平方米的天井花园。四周是内走廊，面向天井的均为大玻璃窗。大门入口处有宽敞的外廊，连接西边的一个八角亭。

8、挥霍民脂民膏，大造行宫别墅

除了专用住所以外，各地为毛泽东修建近百座行宫的事，至今仍为党国机密，未敢见诸报端。网上有文章揭露，毛泽东仅在大饥荒期间（1960年左右）兴建的奢华行宫就多达61座。包括：韶山滴水洞、上海西郊宾馆、庐山芦林一号、长沙蓉园、成都金牛坝、武汉东湖宾馆、杭州刘庄、汪庄宾馆、南昌八二八、南京紫金山宾馆、济南南郊宾馆、广州南湖、北戴河莲花山别墅等。

邓小平1980年8月18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曾说：“1958年以后，到处给毛泽东同志和其他中央同志盖房子，造成很坏的影响，很大的浪费。”

彭德怀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也提到“好多省都给毛主席修别墅，搞什么名堂？”。

1948年，毛泽东一进北平就选择了帝王的住所中南海。民国时期，中南海从1929年起即为对公众开放的公园，我小学毕业考中学之际曾去过两次中南海。门票是北海的一倍，但中南海允许钓鱼。1948年战事吃紧的时候，中南海内的居仁堂等地曾是傅作义的指挥部暂时驻地。1949年中国接管北平，即将中共中央的办公地点和高级要员住地迁到了中南海，享受着帝王般的生活。毛泽东还在北京近郊香山等地占据了五处高档别墅，这些别墅地处优美的风景区，一旦被毛泽东看中，整座山或整片湖岸、海岸便被封闭起来，专供毛泽东独自享用。

为满足毛泽东出巡的需要，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各省市兴起为毛泽东打造行宫之风，不仅上海、杭州等地争先建造，包头、鞍山、济南等城市也竞相效尤。三年困难时期一边是白骨遍野，数千万人死於“大跃进”，一边是长于阿谀献媚的奴才耗尽民脂民膏为暴君大造豪华别墅。

成都的金牛宾馆所占地盘，原是一片长满青松、银杏、古楠的大林盘，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高官要员及社会名流在这里建有几栋平房别墅。1953年成为中共四川省委的疗养院。1956年，四川省委决定将其建成具有当时一流水平的，接待毛泽东等中央首长、和召开高级会议的庭园式宾馆。宾馆占地四百亩，周围一公里范围内的农户全部迁到东面的跃进村。1957年建成西楼、小礼堂、平房和游泳池。平房属“总统套房”，占地2200平方米，有书房、卧室、客厅在内的两大套房间，室内门窗地板全部使用金丝楠木制成。室内游泳池仿照中南海游泳池建造，长32米，宽25米，深2.5-2.7米。为适应毛泽东的习惯，游泳时水温加热至27度，室温控制在29度。水源使用

地下水，金牛坝抽出的地下水水温在 9 度左右，加热至上述标准温度，一次耗煤 24 吨。园内除保留原有的古楠、银杏等外，还遍植海棠、兰草、山茶等花木。并建立起完备的保卫、医疗及食品检验等机构。

河南郑州的省委第三招待所修建於 1960 年，在远离市区的黄河附近。当时正值河南省内饿殍遍野，民不聊生，而这些宫殿照样大兴土木，用高征购、高积累聚敛起来的财富，在累累白骨的中原大地，兴建为毛泽东及其帮凶享用的宫殿群。

这个行宫除按当时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的人数以每人一个套间盖了一幢大楼外，还别出心裁地给当时中共的七位领袖每人建了一幢别墅，其中毛泽东别墅最为宽大考究。毛的卧室里专门修了一条秘密地道，以便万一遭遇紧急情况时逃跑。建成后因信阳饿死百万人事件案发，中共中央再没来郑州开会，由此那幢主席别墅永远紧锁著大门，从未有人住过。毛泽东死后改为达官显贵下榻的“黄河迎宾馆”。

“四一四工程”即上海西郊宾馆，圈地一千一百三十三亩，是上海最大的花园别墅式国宾馆，始建于 1960 年 9 月。园林、花木、房屋修建、各类男女服务员一百多人，长年为其服务。二十年间，毛泽东总共只住过几天，而一百多人的开销外加维修费用，每年不下数百万。

湖南省委在长沙为毛泽东建的“蓉园”一号别墅，也仅在 1959 年使用过一次，其余时间大门紧闭，外人莫入。

毛泽东生前多次到江西庐山，自然少不了行宫，于是专修了“庐林一号”，其建筑面积相当于蒋介石那座“美庐”的五倍，而美庐也归毛泽东使用。

济南南郊宾馆建于六十年代初，占地面积一千一百六十亩，建筑面积十一万五千八百平方米，素有山东钓鱼台之称。

浙江金华西郊一片树林里，有一座占地三十余亩，建筑面积五百多平方米的“六〇一别墅”，建于经济十分困难的 1961 年。主楼设有地下指挥部，入口处设有厚厚的电动钢板门。不远处还有一个小型铁路站台，并耗资数十万铺设了六〇一铁路专线，火车可直达毛的行宫后门。

毛泽东喜欢杭州的西湖行宫和武汉的东湖行宫，广州的父母官们为了媚上讨好，特别修建了南湖行宫。由汪东兴，丁盛，刘兴元亲自选址，耗时一年，耗资近亿，兴师动众在磨刀坑水库建成了依山傍水、风光旖旎、空气清新，设施豪华的南湖行宫。

在饿殍遍野的 1960 年 5 月中旬，毛泽东在湖南与当时的第一书记张平化谈起韶山，说那里有个滴水洞，风水很好。张平化深谙圣意，便筹划修建韶山滴水洞行宫，代号二〇三工程。整个滴水洞地区对民众封锁保密，方圆五平方公里是老百姓不得越雷池一步的禁区，参照毛泽东在中南海的住房样式，吸取苏联建筑保暖防寒的优点，建造了以三座大楼为主体的建筑群，毛泽东住的那栋楼有主房、副房、会议室、餐厅、娱乐室、豪华的室内游泳池等，同时还修通了韶山冲到滴水洞的公路。后来又增修了防核防空的防空洞。

滴水洞工程建於大饥荒年代，由华国锋主持修建，从 1960 年下半年开工到 1962 年，一、二、三号主体工程完工，建筑面积三千六百三十八平方米。连同韶山冲至滴水洞的公路，整个工程造价一亿二千余万元。滴水洞别墅区建成后使用率甚低，毛泽东仅于 1966 年 6 月 18 日至 28 日在此居住过十一天，堪称一日千万金。1986 年滴水洞始对外开放，如今的游客入住时是否忆起昔日劳民伤财的辛酸呢。

与滴水洞同时建造的领袖别墅有：庐山庐林一号别墅、南昌八二八宾馆、长沙蓉园、成都金牛坝宾馆、重庆红楼宾馆、武汉东湖梅岭别墅、武汉东湖宾馆、郑州省委第三招待所、北戴河莲花山别墅、北京密云水库别墅、哈尔滨花园村一号楼、广州南湖行宫、广州小岛一号楼、南京紫金山宾馆、济南南郊宾馆、青岛迎宾馆、青岛八大关小礼堂、杭州西湖行宫、杭州刘庄宾馆、杭州汪庄宾馆、金华六〇一别墅、上海西郊宾馆等六十一处奢华行宫。有的行宫至今也没有开放，不知里面隐藏着什么秘密。

总之，毛泽东过的是荒淫无耻、穷奢极欲的生活，伪装应该剥去。

(9) 粮食增量法和代食品运动

从1960年起的两年多时间里，在中国广大地区先后开展了两场与粮食有关的群众运动：即“粮食食用增量法”和“代食品”宣传推广运动。前者是在大饥荒已经蔓延，由地方党委和政府发起，得到中共中央认可和支持的一场愚弄民众的运动。后者是中共中央已经知道愚弄无效，巍巍华夏，赤地千里；大好河山，饿殍遍野；但手里已无粮可用，而主动发起的一场救灾运动。

1959年河南省鲁山县创造了一斤玉米蒸五斤馍的经验，把玉米煮到五六成熟时捞出，晾半干后磨面，过细箩，出面率为118.3%。取六分之一的面加水煮成糊，然后掺入下余六分之五的面一起搅匀，装笼蒸熟。每斤玉米平均蒸馍五斤一两九钱，比传统做法增加两倍以上，名之曰“煮后干磨烫面增量法”。

毛泽东亲临视察，并大力表扬的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诞生地河南遂平县，不甘示弱，创造出了更多粮食增量法，计有“玉米增量法”、“大米增量法”、“麦子面增量法”、“玉米芯（即去掉玉米粒后的玉米棒子）蒸馍法”等十余种。

中共中央得知群众竟有如此之“创造”，如获至宝。一方面在元旦社论中继续吹嘘粮食大丰收，用谎言安抚饥饿的民心。一方面积极组织推广“粮食增量法”。

国务院于一月份在西安召开了一次全国性的“增量做饭法先进经验交流会”，各地报纸争相报道，大力宣传找到了不用锄头的增产方法。在中共中央着力鼓吹下，五花八门的“增量法”层出不穷。比如：

辽宁省黑山县创造了“苞米（玉米）食用增量法”，被说成是“做饭技术上的革命”。曾经宣扬亩产十三万斤水稻的广西，掀起了“做饭技术”的“大跃进”，“创造”了双蒸法、温水泡蒸法、夹生蒸饭法、炒蒸法、加水蒸饭法等一批“先进技术”。

还有：

北京市密云县的“烫面”、“双蒸”、“水磨”做饭法

辽宁省抚顺市的“油水混合”的“食油食用增量法”

湖南省的“‘一炒、一泡、一蒸’做饭法”

四川省邛崃县、蒲江县的“火米（蒸谷子）增量法”、“三开一煮法”

武汉市的“蒸米做饭法”

重庆市的“冷水发饭法”

兰州市的“水发面蒸馍法”

西安市的“纯面增量法”和“碗蒸馍增量法”

河南省鲁山县的“煮后干磨法”等等。

以上这些都是“党的喉舌”《人民日报》公开的报道，谁敢说不相信？

不相信党的喉舌岂不就是不相信党的脑袋。劳改队每天晚上的学习时间就是饿着肚子读这些报纸。

通常一斤大米可以蒸出两斤饭，一斤面粉可以蒸出一斤半馒头，这是正常人的做法。中国共产党人可以用一斤米蒸出三斤饭、五斤饭、甚至七斤饭；用一斤面粉蒸出三斤馍、五斤馍、六斤馍。且看那时的花样：

玉米增量法。增量方法有二：

一是先把玉米洗干净放在锅内煮至五、六成熟后捞出晒干，然后磨成玉米面，再次和面时先拿出四分之一的面掺五倍的水，煮成面糊，再把面糊倒出放凉，与剩下的四分之三面粉放在一起搅匀，加上适量的苏打粉上笼蒸，这样每斤可出六斤左右的馍。

二是先把玉米洗干净放入锅内，加上比玉米多六倍的水，把玉米煮至六、七成熟时，用水磨成糨糊，加上酵面，发酵后加上适量的苏打粉摊在笼上蒸，每斤玉米可出五至六斤馍。

大米增量法：首先把大米放在盆里，用两倍的开水烫米后将米盆盖好，一个小时后把泡好的米捞出放在锅内，加上比米多四倍的水煮，在煮的过程中切忌搅动，以免饭糊和影响出饭率。当米煮到露头的时候，再将烫米水依次加入锅内，直到做成干饭为止。这样每斤大米可做出六斤左右的饭。

麦子面增量法。先称一斤面粉，用一斤开水将 70%的面烫熟后放凉，再加入剩余的面和一斤半水放在一起搅匀，发酵后再加上适量的苏打粉，然后将面摊在笼上蒸，每斤面可蒸三斤到三斤半的馍。

玉米芯（即去掉玉米粒后的玉米棒子）蒸馍的办法。先将玉米芯整理干净，用碾子碾碎，磨成细面，然后按照用玉米面做馍的操作规程，每斤玉米芯面可出二斤半到三斤的馍。

炒蒸法：先将米炒成金黄色，淘净入罐，每斤米加水六斤四两，猛火蒸，一气呵成，每斤米出饭五斤。

加水蒸饭法：先将大米洗净入罐，照平时蒸饭方法放水先蒸二十分钟后，再加水一倍蒸四十五分钟，每斤米也可出饭五斤。

双蒸法：将米干蒸半小时后分装入罐，加四斤凉水，再用猛火蒸一小时即可。双蒸法能使每斤米出饭五斤。

温水泡蒸法：先用温水泡米半小时，捞起装入罐，每斤米加开水三斤三两，用大火蒸十分钟后，停火十分钟，再加大火蒸十分钟即成，每斤米出饭五斤至五斤二两。

夹生蒸饭法：先将 40%的米放入蒸笼干蒸四十分钟，取出吹凉，将另外 60%的米掺入搅匀，每斤米加开水五斤，入笼猛火蒸四十五分钟，每斤米可出饭五斤。

究其实，那些千奇百怪的“粮食增量法”之共同特点就是在做饭时大量加水，所谓粮食增量法其实就是做饭加水法。纯属自欺欺人。

当时就有人指出：“无土不砌墙，加水不抵粮”。更有农民说“怪话”：“增量增量，米泡膨胀，饿坏肚子，撑坏膀胱。”

对此，各级党组织以“反击右倾保守思想”为名从政治上予以打击。

中共中央也发文给各省、市、自治区“批转有关经验”，要求“大力推行”“粮食增量法”。有了中央的号令，湖北、河北、河南、安徽、江苏、山东、内蒙、江西、广西、陕西、四川、辽宁和北京、天津、上海等省市采用增量法的伙食单位已高达 50%至 90%。

中共豢养的“科学家”也来凑热闹，中国医学院营养学系找出了“粮食增量法”“可以多做饭”的“科学道理”，以及这种加大水份以增加重量的饭“能增加营养”的“理论依据”。一时间，“粮食增量法”似乎又成了“社会主义伟大创造”和“优越性”的体现。

御用科学家如是说：各种粮食如玉米、高粱、绿豆、小豆、麦、大米、小米等，经过先煮后磨再蒸，每斤粮食能增加出饭二斤以上，是因为粮食胚乳经过水浸煮沸，淀粉颗粒受热膨胀、分裂、体型扩大，重量增加；同时，粮食中的蛋白质经过水浸煮沸，其颗粒也膨胀、凝固，体型扩大，重量增加；粮食胚部含有的脂肪和部分蛋白质，经过热处理，脂肪油滴集聚，蛋白凝固，经碾磨充分游离出来，增加了重量。因此，这些质量的变化是化学的化合作用，决不单是水分的增加。有的人把粮食增量法说成是“只增加几斤水”，这是完全错误的。

“科学家”还说：使用上述方法不但可以增加出饭率，而且做出来的饭营养价值也大大提高，其“科学根据”是：旧的做饭方法由于面磨得比较粗，粮食中的蛋白质、脂肪等不能充分地被人吸收，而采取增量方法做出的饭，淀粉经过水浸煮沸，部分转化为葡萄糖，能供给人们更多的热量和营养；蛋白质经过水浸煮沸，一部分变成凝固的蛋白质，还有一部分转化为氨基酸，这两种东西的营养价值都很高。

中国御用奴才“科学家”之多，为世界之最，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就是痔疮吮痛的突出代表。

但不管如何说得天花乱坠，当时的人们对用“粮食增量法”做出的饭的共同感觉就是：“吃这种饭不经饿！”“多撒了几泡尿”

到1960年底，浮肿依然如故，死亡有增无减。显然不得不承认风光了一时的“粮食增量法”不能填饱人们的肚子，这个“伟大创造”和“做饭技术革命”忽悠不成了，只好另辟蹊径。

1960年1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立即开展大规模采集和制造代食品运动的紧急指示》，并成立以周恩来为首的“瓜菜代领导小组”，又在西安召开了一次全国性的“代食品会议”。总理亲自挂帅“瓜菜代”，世界绝无仅有。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采集和制造代食品运动”在神州大地折腾起来。

所谓“代食品”，又是中共“创造”的新名词，实际上就是中国自古以来每遇灾荒之年，人们在饥不择食的情况下为果腹充饥而吃的那些树叶、草根、野果。只不过六十年代，在“有组织”的运动中，这种“代食品”的范围更加扩大化了，举凡粮食作物（玉米、水稻、小麦、高粱、蚕豆、豌豆、洋芋等）的根、茎、叶、壳、皮、秆，一些树木的叶子和树皮，许多野草和野果，以及其它一切可以作为肚子填充物的东西，都成了“运动”的目标。

在这场“代食品运动”中，又诞生了许多“创造发明”。例如：

青海省乐都县发现了“十六种植物的秆子、二十七种植物的叶子和四十六种配料能加工磨制面粉和制造炒面”；

河南省清丰县马村人民公社宣称“发明了玉米芯制淀粉的方法”，该县还试验出绿豆秧磨粉、红薯秧磨粉、高粱秆磨粉的方法，据说如此一来“任何的饥荒都不用怕了，天大的困难也不在话下了”；

四川省也不甘落后，彭县大宝人民公社的“大搞玉米壳、玉米芯和野生植物淀粉加工的群众运动”取得了“伟大成绩”；

仁寿县富加人民公社“创造”了 100 斤豌豆秆制成 50 至 70 斤淀粉的经验，被四川省委赞许为“不仅能节约大批粮食，而且可以改善提高群众生活，具有十分重要的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

山东省新泰县城关人民公社居然用 9 斤豆秸榨出了 20 斤豆腐，据说这种“豆腐”与大豆豆腐味道不相上下，这当然更成为前无古人的社会主义创举……。

饥饿的炎黄子孙在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把牲畜都不吃的、有些是当柴烧的、有些只能留在地里沤肥用的农作物秸秆变成了宝贝，又一次体现了“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的社会主义优越性”。

当年河南省的党报上曾刊登一首据说是公社社员效法郭沫若写的诗，诗云：“玉米包馍真是好，质量好数量高。老人吃了软又甜，容易消化寿命长。青年吃了力量增，劳动战线比英雄。幼儿吃了眯眯笑，身体健康学习好。大家吃了干劲大，天大的困难也不怕。”这诗还真有点郭沫若溜须拍马的风格。

当时也有人说：“这事我不用去看也不是真的，别说能制面，玉米芯连牲口都不吃。”还有人说：“我活了六十多岁，连听说过都没有，想把柴火搞成面是空想。”当然，这些质疑无一例外都被当成“右倾保守思想”，无一例外地受到大批判。

当时还真有“科技含量高”的“代食品”，那就是被称为“高级代食品”的“人造肉精”和“小球藻”。

“人造肉精”是“舶来品”，据说是二战中德国人用化学方法和微生物方法制造出来的，用以代替肉类供人们食用。不过，制造“人造肉精”必须要是有很纯的菌种，培养时还有很严格的温度和清洁方面的讲究，农村的公共食堂根本无法做到，自然也难以大量生产，所以它充其量也只能供少数“高级人士”享用。

“小球藻”是一种球形藻类，直径仅数微米，小球藻细胞内含有丰富的叶绿素，属于单细胞绿藻，是真核生物。光合作用非常强，是其他植物的几十倍。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食物纤维、核酸等，是维持和促进人体健康不可缺少的营养素，特别是含有令人瞩目的生物活性物质糖蛋白、多糖体以及高达 13% 的核酸等物质。具有增强人体免疫、防止病毒增殖、抑制癌细胞增殖、抑制血糖上升，降低血清胆固醇含量，排除毒素，迅速修复机体损伤等功能。

小球藻中富含 CGF(小球藻生长因子)，能迅速恢复机体造成的损伤，并可作为食品风味改良剂，广泛应用于食品及发酵领域。

小球藻可以人工培养，产量很高。至今日本等国仍在批量生产。

1984 年至 2006 年，在日本 2000 多种健康食品中，小球藻稳居十大健康食品排行榜第一名。

欧洲很多国家已确认小球藻为具有疗效的绿色食品。小球藻完全适合婴儿、孕妇、男女老少，是安全、可靠、无副作用之最佳营养食品。

2001 年 1 月 10 日，中国“神舟二号”太空飞船搭载小球藻上天，进行生态循环科学实验，据说取得许多重大科研成果。

请读者注意，以上所述，是指用科学方法培养出来的小球藻。而非大跃进时期粗制滥造的小球藻。

三年困难时期，云南省最早推广食用小球藻，当时的报纸大力宣传：人吃小球藻能显著节约粮食；用小球藻给浮肿病人治病，……浮肿病人都好了；

用小球藻治疗二十五种疾病，……都没有副作用，……效果良好；产妇缺奶，吃了小球藻后……奶量便大有增加；有一个人眼睛失明已十多年，吃了小球藻并用之洗眼，很快初步复明；有人背上长了一个盘子大的疮，用小球藻涂抹，很快消肿痊愈等等。

以上这些都是中共操控的党报刊载的消息。小球藻有如此好处，胜过了观世音菩萨的灵丹妙药。于是云南省在各人民公社大力推广培养和试用，贵州、湖南、湖北、福建、河南等十余个省市也广泛培植。1960年初，上海等地将其用于猪饲料添加剂。由于粮食空前紧张，生猪存栏量急剧减少，严重影响出口和副食品供应，小球藻的开发一度被认为有助于提高猪饲料的营养成份，可缓解猪饲料短缺的困难。于是迅速推广。至1960年7月底，全国二十七个省、市、区（西藏除外）都已程度不同地开始了小球藻的培养试验和大面积的生产。

时任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胡乔木得悉此一信息后，不经调查，不问实效，灵机一动，脑袋一拍，为了讨好卖乖、献媚求宠，于1960年10月上书毛泽东，建议在全国推广小球藻代替粮食。胡称：**推广小球藻，既可治浮肿，又能“保证不饿死人”**。毛泽东闻听此物有如此神效，胜过太上老君的八卦仙丹，赛过王母娘娘的琼浆玉液。遂于10月27日将胡乔木的信批转全党，指令全面推广。这些都是有文字记录在案的。

毛泽东的批示及胡乔木的报告下发后，全国立即掀起了群众性大办小球藻的热潮，小球藻从猪饲料的辅助食物一下跨入社会主义中国的食物领域。

小球藻生长的关键要素是纯净的菌种和适宜的培养液，群众性运动却“打破常规”，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弄来的菌种，用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二的稀释人尿做培养液。过了十天半月，一池子的水变绿了，还有一点尿臭，至于有效成分的含量呢，既无法检验也无法确证，且无论成分如何，只要水变绿了，连忙欢呼小球藻培养成功了。赶紧写大红喜报，找几只透明的玻璃杯，擦洗干净，端着一杯杯绿色的水，敲锣打鼓地给党委报喜。

党委充分肯定群众的创造，赞美群众的成果，可党委成员无论如何都不喝这种营养丰富的绿水，他们把“绿色营养食品”让给广大群众了，看着群众喝散发着尿臭的绿水，他们在一旁“后天下之乐而乐呢”。

机关、学校、工厂、街道普遍建起了培养小球藻的水池，城市居民更是利用家中的瓶瓶罐罐，培养小球藻。许多家庭让孩子每天在餐前喝一两勺小球藻水液，相信小球藻具有丰富的营养价值，黄皮寡瘦的小孙子会变成聪明绝顶的胖娃娃。据说喝了小球藻的几个小学生后来都取得博士头衔，肚大如酒囊加饭袋，缩着脖子走起路来摇摇晃晃的不可一世呢。

实际上，这只是人们在粮食极度匮乏年代对营养的企望，与真正的小球藻毫不相干。因为菌种不纯、培养液没有经过严格的消毒，不仅毫无营养，大量食用还很可能发生中毒现象。

全国都在贯彻毛泽东的指示，大搞小球藻等代食品，劳改队也不能例外。理化实验室被认为是四川磨床厂的唯一科研机构，培养小球藻和人造肉的任务责无旁贷地由理化实验室承担，而我是理化实验室唯一的技术人员，自然荣幸地担此重任。

我不敢稍有怠慢，先请来泥水匠，在化验室所在地的小院里修建了一个直径三米、深度半米的水泥池子，本来计划在上面搭一个棚子以防止雨水，又怕遮挡了阳光（小球藻是通过光合作用生长和繁殖的），于是就只修了一个

露天水池。水池修好以后浸泡数日，打扫干净，放了一池子自来水，黄季夏干事从四川省劳改局取回来一小瓶据说是小球藻菌种，我连忙到厕所接了一桶新鲜尿液，按百分之一点五的比例倒入池中，然后小心翼翼地加入菌种，用竹竿搅拌均匀。此后，每日搅拌数次，静静地观察其变化。大约五六天后，池水变绿了，有点像淡淡的龙井茶，舀一杯放在鼻子下面闻了闻，尿臭未消，没敢往嘴里喝。我依然每天早中晚观察三遍，绿色渐浓，有点发浑，类似于二十世纪后期成都府河中的水。我还是不敢喝，那毕竟是公物，不能多吃多占。抓紧时间写了一幅大红喜报，用带玻璃塞的试剂瓶盛了绿色的小球藻水，放在托盘里，找几个技术科的劳教分子敲锣打鼓簇拥着向党委书记报喜，党委书记们看了一眼，闻都不闻一下，据说跟着就上报四川省劳改局，通惠汽车修配厂率先培养出了小球藻，我算完成了任务，可是年底也没有评上劳教积极分子。那一池绿水慢慢地越发臭了，免费供应也无人问津，又过了四五天，水里竟然出现了要变成蚊子的筋斗虫（学名孑孓），我趁着雨天，用虹吸管把它放到下水道里了。胆战心惊的再也不敢提小球藻的事，幸好领导没有再过问。

回忆往事，不管当年“粮食增量法”和“代食品运动”进行得如何“轰轰烈烈”，也不管它们被赞誉得如何“意义伟大”，历史的事实是那几年中国人（主要是农民）非正常死亡高达三千七百余万（见杨继绳所著《墓碑》），充分说明它们本质上还是个虚夸和造假的“运动”。在独裁专政体制下，在毛泽东坚持“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等“共产主义创举”的乌托邦狂热下，处在社会底层的民众就不能不成为“要奋斗就会有牺牲”的“试验品”。毛泽东的肆虐深重，数千万民众的命债必须追究。

（10）六十年代的蓉城风景线

成都素以休闲城市著称，讲究的就是吃喝玩乐，尤其是吃，特别是小吃。成都小吃早已闻名遐迩，很多普通的东西到了成都人手里，总要翻新一点花样，搞出一点特殊的风味来，而且大都很便宜。

成都盛行小吃，究其原因：

一是物产丰富。成都地处川西平原，四山环抱，江河纵横，沃野千里，气候温和。且得李冰父子之惠泽，受益于都江堰自流灌溉，无旱涝之灾。盛产粮、油、果、蔬；猪、牛、鹿、羊；鸡、鸭、鱼、兔。唐代诗人杜甫有“青青竹笋迎船出，日日江鱼入馔来”的诗句。南宋诗人陆游有“新津韭黄天下无，色如鹅黄三尺余。东门彘肉更奇绝，肥美不减胡杨酥”的诗句，对天府物产倍加赞扬。得天独厚的特产给吃的艺术准备了优越的物质基础。

二是成都的居民结构很有特色。成都地处西南，虽曾为很多朝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但对外交流不及沿海城市，且缺乏大型工商业，因而少见大富豪，也没有十里洋场，消费水平不高。少城一带满族后裔居多，清朝期间坐吃俸禄，即使无一技之长也能养尊处优，提笼架鸟，游手好闲。民国之后，旗人家道中落，却一时放不下贵族的架子，经济拮据，丰盛的宴席难以问津，只有在价钱便宜的小吃上寻求安慰、别树一帜。

成都居民中还有很大一部分来自近郊区县，久居农村的一些中小地主，积攒了一点钱，在成都买一套平房，安身养老，从乡巴佬跃升为城里人，但毕竟资金有限，不敢挥金如土，对外要绷面子，平时开销还是很节俭的，不敢轻易光顾竞成园、荣乐园、利宾宴、姑姑宴等蓉城叫得响的大餐馆，只好着眼于小吃了。

成都的生意人头脑灵活，用现在的话来说，叫做迎合市场需要，于是价廉物美的小吃应运而生。

成都风味独特、品类繁多的小吃，与素有盛名的川系美饌佳肴一样脍炙人口。从各色小面到抄手、饺子，从腌卤熏烧到凉拌冷食，从锅煎蜜饯到中西糕点，从蒸煮烘烤到油酥煨炖，琳琅满目，各味俱全，种类不下两百种。

这些名小吃，多半是早年由小商小贩肩挑手提，沿街摆摊设铺，经过优胜劣汰逐渐发展起来的。招牌通俗易懂，往往以小商贩的姓氏和设店开业的街道为名，如总府街的赖汤元，荔枝巷的钟水饺，春熙路的龙抄手，耗子洞的张鸭子，洞子口的张老五凉粉，铜井巷素面，长顺街治德号的小笼蒸牛肉等等，今天，有的名小吃已迁新址，但依然沿用旧名。

担担面麻辣鲜香、诱人食欲；宋嫂面以鱼肉为羹、鲜而不腻；钟水饺皮薄馅嫩、入口化渣；龙抄手制作精美，汤浓味鲜；赖汤元皮薄馅细，不沾碗筷不粘牙；还有香甜可口、油而不腻的“古月胡”三合泥；肉馅饱满、鲜嫩滑爽的韩包子；酥脆香甜的鲜花饼；润白晶莹的珍珠圆子；以及牛肉焦饼、川北凉粉、夫妻肺片、油茶、馓子、蒸蒸糕、麻花、发糕、马蹄糕、糖油果子、“三大炮”、叶儿粑、白蜂糕、玻璃烧麦、蛋烘糕、肥肠粉、酸辣粉、凉粉、凉面、小笼包……

以上种种，都是在社会稳定，物资充裕，安居乐业的情况下才会有的。五十年代初期市场繁荣，成都物价相对也较低，担担面、赖汤圆都只要一毛钱一碗，龙抄手也只要一毛二分钱，夫妻肺片一元钱一斤。1957年以后，每况愈下，三年困难时期，这些东西都随着大跃进的蓬勃发展而无影无踪了。近年成都的名小吃部分地恢复，目前正宗一点的担担面20元一碗，价格上涨了200倍，提前小康了。

我喜欢逛市场，了解民情也了解行情。1959年以前，个别劳教人员休息天可以请假外出，我请过几小时的假，到新华书店买书。进入六十年代，加强了敌情观念，所有劳动教养人员平时不能外出，星期天也不再准假。个别因工作需要而必须外出的劳教和就业人员，比如汽车修理的试车人员；供应科的提货、发货人员；采购人员等，须由公安干部带领，走到厂门口值班室，公安干部说一声：我带几个劳动力出去，值班人员登记在册，始能出大门。

我当时正在为厂里筹建理化实验室，需要购买各种化学试剂和玻璃仪器，理化实验室的主管干部是一个十九岁的女孩黄季夏，由她把我这个二十三岁的劳动教养人员带出厂门。因此还有机会浏览三年困难时期的成都市容。

那时候成都市的食品商店比较冷清，擦得干干净净的玻璃货柜里整整齐齐地摆满了印刷精美的食品匣和糖果盒。貌似琳琅满目，实则空空如也，只是一个外包装。柜台里放了一些糖果、点心，旁边贴着一张引人注目的警示“非卖品”！比得上故宫的文物了。令人看了，倒吸一口冷气，白咽一口唾液。

菜市场里，鱼肉鸡鸭全无，连一根骨头都看不到。豆腐、豆芽也销声匿迹了，蔬菜则少得可怜，限量供应。最困难的1960年，一周供应两斤菜

1961年，糖果店里出现一种叫“高级点心”的东西。模样比要糖果票的普通点心精致些，大体上是按传统工艺制造的，基本上保持了1957年以前的风味，价钱却是普通点心的十几倍。我记得，最便宜的十来块钱一斤，贵的则需要三十、五十元钱。在那个年代，一个大学本科毕业生转正以后的月薪是五十三块五毛钱，一斤高级点心的价格，相当于半个多月的工资了。

在食品店里，高级点心有特设的柜台，摆放的很整齐，标明了价格。有专门的售货员，几个年轻姑娘，脸上略施薄粉，穿着白色工作服。高度警惕地看着进来的顾客。人们逛街，到食品店看高级点心成了一种时尚。就像现在人参观车展，围着布加迪威龙（Bugatti Veyron）、迈巴赫（Maybach）一样。步入商店里的人，眼睛盯着玻璃货柜里摆放着的点心，脑子里默默地盘算着价格，心里想着那油酥香甜的滋味，嘴里吞咽着几乎要流出来的馋涎。究竟买不买，还要掂量掂量钱包里有多少银子，仔细地考虑一番。

一个冬日的星期天，我徒步进城，走到总府街一家寄卖行门口，想看看有没有便宜的旧衣服。突然听见一声喊叫，激动、高昂……夹杂着“呼哧、呼哧”的喘气声。我转过身去，只见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人，抓住一个衣衫褴褛的老者推推搡搡，一面着急地喊叫：你怎么这样啊……你怎么这样啊……，大白天的就抢人哪！

那个瘦骨嶙嶙的老者，看上去有六十岁了，穿一身破烂衣服，腰里系着一根布带子，大冬天赤着脚，长长的头发，花白、乾枯、蓬松、遮住大半个脸。老者摆脱那位中年人的牵扯，一面往前颠颠闪闪地疾步小跑着，一面不顾中年人的呵斥，双手捧着一个纸包，埋着头，连咳带喘地拼命吃那包里的东西。中年男人紧追不舍，一边喊，一边从老者手里抢那个纸包。顷刻间，纸包被扯破，几块“高级点心”落到了地上，老者见状，连忙跪在地上，用身子护着落在地上的点心，两只手狠狠地抓拿已经破碎了的桃酥。中年男人眼看着掉在地上的点心都被摔成碎块儿，收不回来了，一下子坐在食品商店的台阶上，流起了眼泪，还在不停地叫喊，怎么这样啊……怎么这样啊……

老者吼着、喘着，跪在地上，爬来爬去，撮起一把一把混着浮土的桃酥、葱油酥碎块，往嘴里塞，看都不看坐在一旁的中年男人。这显然是一个饿急了乞丐抢东西吃。

几个过路人询问坐在地上哭着的中年男人，才知道，他的老父亲病危，临走前想吃块点心，总不能饿着肚子过奈何桥进阴曹地府吧，说了几次，一直憋着这口气咽不下去，做儿子的考虑再三，虽然囊中羞涩，出于孝敬还是下定决心，跑到总府街给老人买高级点心，刚出店铺门，就被这个乞丐抢了。中年男人说：他抢了，我哪里还有钱再买啊？说着说着竟然大声哭了起来……

路人们一面叹息，一面无奈。

素以温文尔雅著称的芙蓉城让人见证什么呢？

还有更震撼人心的。成都人喜欢吃面食，一则物美价廉，二则味道诱人。一毛钱一碗的担担面，奶白色的面条、嫩绿色的豌豆尖，加上酱油、芝麻酱、香醋、盐巴、酥油辣椒、大头菜颗颗或芽菜末、碎米花生、花椒面、味精、蒜泥、姜汁、葱花、芹菜，正宗的用鸡汤，外加油酥过的肉末，一碗担担面配了十几种佐料，端上桌来白绿相间，美味扑鼻，既好看又好吃。

三年困难时期，一碗面要收二两粮票。芝麻酱、碎米花生、鸡汤、肉末成了稀缺物资，干脆免了；酥油辣椒减半，取消了酥油，留下了辣椒；大头菜、芽菜、芹菜躲避困难暂时不用了；其它佐料至少也打了个对折，只有盐巴保留了原来的分量；豌豆尖换成了小白菜或莴笋叶子。尽管如此偷工减料，人们还是很理解店主人的难处，饥不择食，吃起来还是挺香。

不过，1960年在饭馆里吃面可要提高警惕，年轻小伙子问题还不大，中老年人尤其是女士需倍加小心。

饭馆服务人员从厨房里把面端出来的时候，十分警惕，先看看店铺里有没有闲杂人等，然后才敢往外走，她把盛着面的瓷碗放在顾客面前的餐桌上，立即快速撤退，表示这碗面的所有权、管辖权、品尝权、食用权就属于顾客了，顾客就是主人，顾客就是上帝。发生意外，自然由主人兼上帝负责。

上帝拿起筷子来刚要吃，突然从预料不到的方向伸来一只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速度，抓起滚烫的面条从桌子面上转换到两只手捧着，尽量不让汤汤水水滴落在上帝的衣服上，然后唏呼唏呼拼命往嘴里送，刚出锅的热汤面呀，他就不怕烫吗？！

这样的事情不是偶尔见之，也不是珍稀新闻，而是司空见惯、习以为常。惊魂未定的上帝能说什么呢？下次吃面多加点小心吧。

有经验的顾客看到服务员端面出来了就要眼观六路，面放在桌子上的时候，要赶快埋头遮住面碗，并立即用两只手护着这碗面，再一次看看前后左右有没有十面埋伏，确认没人，才可以动筷子，不然就赶快把这碗面倒在事先准备好的搪瓷缸子里，盖上盖子，端回家去慢慢吃。那个年代在饭馆吃面的人都熟悉这些既定动作，否则极可能丢了香喷喷热络络的担担面，还要吓出一身冷汗。

以上都是我亲眼所见，读者当中如果还有向往回归毛泽东时代的朋友，我表示充分理解，各人有各人的信仰，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信仰是自由的，您不妨继续向往，只是我不敢苟同。毛泽东时代的天府之国，吃一碗小面都要提防有人抢，还值得留恋吗？

回锅肉是大众川菜，是全川城镇乡村、男女老幼无人不知的家常菜肴。这个菜需要肥瘦相连、肥多瘦少的猪后腿肉为主要原料，佐以郫县豆瓣、甜酱、红酱油、青蒜苗等爆炒而成。三年困难时期，多以野菜喂猪，缺乏精饲料，猪不长肉，喂了一年也很难达到两百斤，一个个老气横秋，皮包骨头，通常超过一百斤就绑赴刑场了。那时候回锅肉竟成了物以稀为贵的珍品，偶尔遇见一个走街串巷的小贩，挎一个小竹篮，上面盖着一块洗得很干净的蓝布或白布，外面再加一条花毛巾，用以遮挡灰尘和保持温度，竹篮里插着一双筷子，露半截在外面。看见这种装束打扮，无须细问，肯定是卖回锅肉的。1960年的行情是一块钱人民币一片肉，大约三厘米宽，五厘米长，两毫米厚。买的时候，小贩掀开毛巾和盖着的布，让顾客看一眼，确认货真价实以后，取出筷子来，把布和毛巾盖好，然后掀开半边，让顾客用筷子在毛巾的遮挡下探囊取物，这是为了避免挑肥拣瘦，顾客把夹出来的回锅肉放在小盘里，小贩在旁边数着数，一片一片又一片，一元二元共三元，口中念念有词，像是模仿郭沫若吟诗似的。至今回想起来，不知道那是一种什么滋味。我那时每月只有十九元钱的生活费，不敢问津身价高贵的回锅肉，只能躲得远远的，暗暗地咽几次口水。

我喜欢逛书店，解除劳教摘掉帽子以后，休息天可以外出了，每个星期休息那一天，我的时间大部分消耗在书店里。当时成都西御街有一个以科技图书为主的新华书店，春熙路有一个综合性的新华书店和一个外文书店。只要休息，哪怕是落雨，这三家书店我是必到的。虽然那时的工资少得可怜（劳教期间每月19元，解除劳教摘掉帽子1963年前还是19元，1963年后是41元。而我1956年的工资是69元，中共中央的劳动教养政策说得好，“对他们同样实行按劳动成果给工资报酬的原则”我劳教期间的工资仅相当于原工资的四分之一，摘掉帽子工作多年以后还没有达到原工资的60%）我还是买了

数百册专业书籍，摆满了两个大书柜（遗憾的是文革期间我被捕入狱，这些书被一抢而光，无人负责，至今也没有赔偿）。

1961年一个夏天的中午，我在春熙路新华书店看书，数学书柜前面一个人，引起我的注意。他大约三十岁，黝黑的面孔，精瘦的身体，戴着一副黑色塑料边框的眼镜。上身穿着一件白色但已洗得泛黄的棉布对襟背心，肩膀上搭着一条半新不旧的灰色毛巾，下面穿着一条松垮垮的红色短裤（类似于如今的沙滩裤），一副地地道道拉架架车的打扮。他站在那里聚精会神翻阅着一本精装书，我走近他仔细看，原来是中国著名数学家华罗庚教授著述的《数论导引》。《数论导引》是华罗庚先生于1957年出版的数学名著。该书是以英国数学家哈代的同名著作为蓝本而撰写的一部数论教材。在这部名著中，作者由浅入深，缜密而广泛地介绍了古典数论与近代数论的基本内容和研究方法，揭示了数学各分支与数论之间的深刻联系，一度作为国内数学工作者学习数论的必读书籍。这本书我是看不懂的，读者起码是数学系的高年级本科生。我站在旁边端量半天，只见他左手托着书，右手悬在书页上方，全神贯注，旁若无人，中指和食指偶尔轻轻地在空中点一点，晃一晃，似有所得或似有所疑，一个架架车夫的思绪完全徜徉在高等数学的海洋之中，一个被横扫出科学殿堂的年轻人，干着繁重的体力劳动，靠拉架架车维持生命、养家糊口，他也不想今天的饭钱挣够了没有，下午还要不要去拉架架车，车轮上的橡胶带是否需要钉一钉了，竟然还对自己热爱的学科这么痴迷。这就是中国的知识分子，这就是反右以后中华大地上增添的又一道风景线。

从那以后，我对大街上拉架架车和靠卖苦力维持生计的人群更多了一分同情和崇敬。

五六十年代这群人中不乏高级知识分子，四川大学的吴天墀教授就在成都大街小巷拉过多年架架车。

吴天墀（1913-2004）四川万县人，别名浦帆。1938年毕业于四川大学历史系，三十年代即开始发表学术论文，为中国宋史早期研究者。在大学读书期间受知名教授影响参加了青年党，毕业后多年在高等院校从事教学和历史研究。1945年底以学者名流身份被选为青年党监察委员。1949年底吴天墀按规定主动到中共公安机关登记，随即被认定为反动党团骨干，因查不出劣迹未加逮捕，但却由此失去了工作，不得不以拉板车为业，勉强维持一家五口的生活，劳动之余仍在简陋的居室内研读古籍。1961年老伴去世，儿子因忍不住饥饿，伪造票证套购副食品，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发往深山劳改。嗣后，政治运动不断，环境日益恶劣，吴先生忍辱求生，历尽艰难凄苦，直到1978年重返川大讲坛，七十岁时评为教授，为宋史博士生导师。著有《西夏史稿》《吴天墀文史存稿》等多部著作，深受史学界好评。2004年吴先生因病逝世，享年九十二岁。

天府之国首府，蜀汉历史名城，素以物阜民丰、人杰地灵著称。由于有都江堰灌溉，水旱由人，成都平原“沟洫脉散，疆理绮错，黍稷油油，粳稻莫莫”数千年来未闻饥荒。中共接管仅十年有余，成都周围之温（江）、郫（县）、崇（州）、新（都）、灌（县）；金（堂）、简（阳）、新（津）、双（流）、彭（山）等县份，无一不在三年困难时期民不聊生、饿殍遍野。据四川省委书记廖伯康记载，大跃进后三年全川非正常死亡人数高达一千二百五十万，居全国之冠。历史是不容忘记的。

（11）新闻疗法

从 1958 年底开始，大饥荒伴随着庆贺粮食大丰收的锣鼓声一齐袭来。1959 年，报捷的丰收锣鼓渐进尾声，仅仅是《人民日报》年初的时候敲打了一阵，一霎时就偃旗息鼓了，大饥荒却愈演愈烈。

说来也怪，人们越饿对吃越感兴趣，三五个人、七八个人凑在一起谈不上三句话就扯到吃上面去了。好在成渝两地小吃特别多，谈几个小时不会重复，长顺街治德号的小笼粉蒸牛肉、荔枝巷的钟水饺、粤香村的清炖牛肉，三义园的牛肉焦饼、古月胡的三合泥、打金街的韩包子、盘殓市的卤肉，总府街的赖汤圆、冠生园的纸包鸡、陆稿荐的酱汁肉、竹林小餐的蒜泥白肉、丘三馆的鸡汤抄手、春熙路德盛隆的萨琪玛……上至色香味俱全的川、鲁、苏、粤、浙、闽、湘、徽八大菜系，下至路边小摊的豆花饭、帽儿头，走街串巷叫卖的炒米糖开水，一聊可以聊几小时，说的人津津有味，听的人垂涎三尺，叫做精神大会餐，继承了祖上留下来的“画饼充饥”“望梅止渴”的优良传统。

古人云“玩物丧志”，睁开眼睛就想吃、谈吃，不免有失去伟大理想，磨灭共产主义斗志之嫌。

六十年代，中共中央一再宣扬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等待着中国人去解放呢。丧失了斗志怎么去解救欧、美、日、亚、非、拉广大地区受苦受难的民众呢？当务之急是鼓舞阶级斗争的意志。

用什么办法呢？用物质刺激吧，那是资产阶级常用的办法，何况物质极度缺乏，树皮、草根都吃光了，一年一尺八寸布票都难以保证供应，除了空气还没有定量以外，多数东西都要凭本本购买。实在拿不出物质来刺激了。三年困难时期兴起的种种代食品行时了一阵子也成了不齿于人的笑话，再无人问津。

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一贯强调精神力量，还是从意识形态入手，采用新闻疗法取代粮食增量法和代食品运动，于是在 1960 年两大新闻闹腾了半年有余。

（一）平陆事件

1960 年 2 月 2 日（农历正月初六）下午 6 时左右，山西平陆县为三门峡工程配套修建风南公路的六十一位民工突然中毒。必须在三十六小时之内注射二巯基丙醇，否则就有生命危险。平陆附近各县市无此种特药，不得已向北京求援。卫生部闻讯后，积极准备药品，并请求空军夜航空投，中毒民工终于得救。此即平陆事件。

1960 年，高昂的跃进乐曲响彻全国，沉重的饥荒阴影笼罩大地。广播电台不停地播放《社会主义好》，民众的怀疑、不满情绪却与日俱增。大力宣传平陆事件可以转移视线，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向阶级斗争，宣扬阶级斗争是社会主义时期国内主要矛盾的极左论调，歌颂毛泽东，还可部分地抵消饥饿造成的不良影响。因此新闻界、文艺界对此事报道宣传的声势、规模和力度是建国以来没有过的，可谓盛况空前。

劳教分子也毫无例外地天天接受教育，高声朗读连篇累牍的通讯、报道、评论。应接不暇，热闹非凡。追忆当时过程如下：

事件发生第二天，《平陆小报》记者常建华赶到现场采访后写了一篇文章，准备次日见报。报社主编张科进见到稿子后，请示县委书记郝世山，郝回答：“此事不宜报道。”中共各级干部的新闻原则是报喜不报忧，家丑不能外扬，突发多人中毒，有损县太爷的脸面，尤其要严格保密。新闻报道必

须经领导审核、批准，否则不能见报。

常建华碰了一鼻子灰，自认晦气，这篇稿子算是白写了。

2月6日《北京晚报》发表了卫生部通讯员杨树茳写的《千里急救》，当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这一通讯。次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

山西省的记者们如梦初醒，惊叹北京报界手法高超，连呼妙哉、妙哉。从救人角度着力宣扬，家丑变成了共产主义凯歌。

为了扭转宣传上的被动局面，2月7日，《山西日报》在头版显要位置以《崇高的阶级友爱精神，伟大的共产主义风格》和《北京职工千里星夜送药，平陆中毒民工迅速脱险》为主、副标题，刊文介绍首都军民千里救急的事迹。

《平陆小报》连忙在2月8日头版头条刊出题为《毛主席派飞机送来救命药》的长篇通讯。同时刊发了标题为《敌人的任何破坏挡不住我们前进的道路》的评论员文章。接着，短短几天之内，《千里急救》一文迅速被全国各大报纸转载、各省市广播电台播发，掀起了一场全国范围内旷日持久的新闻热潮。“崇高的阶级友爱精神”和“伟大的共产主义风格”，成为这场新闻浪潮的主调。

2月21日，《空军报》在头版发表了该报记者祝作辉的通讯《穿云破雾救亲人》，较为详细地介绍了空军指战员们不畏艰难险阻、连夜驾机、千里送药救人的事迹。次日，《人民日报》在第二版全文转载。

2月23日《人民日报》第四版又刊登题为《平陆县中毒民工全部脱险，深感千里急救之情，平陆派人来京道谢》的文章。《北京晚报》、《山西日报》、《健康报》和一些省报几乎是在同一天里都转载了《穿云破雾救亲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山西人民广播电台等也都播发了这篇通讯，掀起了平陆事件新闻大战的第二次浪潮。

《中国青年报》记者王石和房树民看到关于平陆事件的报道后，深感大有文章可做，他们连夜出发，分头采访，集思广益，采取“蒙太奇”手法，以时间为经、空间为纬，将不同时空的镜头交叉切换，按时间顺序写出了长篇通讯。

2月28日《中国青年报》在显著位置发表署名为“中国青年报记者”的长篇通讯《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及长篇社论《又一曲共产主义的凯歌》。该文一发，立即引起了轰动。次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首都各大报纸都在重要位置全文转载。并配发了社论和编者按语。随后又接二连三地刊登和播发读者来信、读后感和评论。各省、地、县各类报刊及各个电台、广播站的广播不敢怠慢，紧跟其后。掀起了平陆事件新闻大战的第三次浪潮。

《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作为歌颂毛泽东、赞颂共产主义、宣扬阶级斗争的代表作。曾列入高中一年级语文课本，宣扬数十年。2004年以后教材中才剔除了这篇课文。

与此同时，一些党政领导也开始撰文，并见诸报端。

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茄写了《全新的时代，全新的人——学习和发扬平陆事件中许多英雄人物的共产主义精神》

文化部副部长钱俊瑞写了《迅速反映这个伟大的时代》

平陆县委书记郝世山、县长郭逢恒联合署名发表《党给了我们新生命》、《崇高的阶级友爱》等。

谢觉哉、郭沫若还挥笔赋诗抒怀。

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先后发表在全国各级报刊上的通讯、报道、消息、介绍、评论、读后感、抒怀等各类文章达一千多篇，且往往是一文既出，众多转载。平陆事件在全国范围内的报道宣传，创下了报刊史上的空前记录。

在新闻界开足马力、大力宣传的同时，文艺界争相效法。

1960年3月，中央戏剧学院实验话剧院和北京曲艺团分别创作了八场话剧和曲剧《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

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创作了十一场话剧《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

中央音乐学院创作了六乐章大合唱《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等。

北京电影制片厂后来居上，仅用一个月时间拍摄完成电影《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3月28日，北京五十八家影剧院和俱乐部同时上映。北影洗印厂加班赶印约九百个拷贝迅速发往全国各地。

出版业也不示弱，《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的话剧本、戏曲本、曲艺丛书、通讯评论集、连环画以及注音扫盲读物也迅速面世。戏剧剧本发行后，又推动了戏剧演出的大繁荣，北京、山西、河南、河北、上海、天津等地的艺术团体，先后上演了《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的戏曲、话剧、歌剧、舞剧、音乐剧等一百多个剧目。山西省博物馆还组织了《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展览，在省内各地巡回展出三个多月。

3月12日，平陆县人民法院在县礼堂公开审理投毒案。山西新闻电影制片厂现场录影。礼堂舞台上高悬一条横幅，上书“平陆县人民法院公开审理反革命投毒案”十七个大字。

公诉词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张、回二犯确系一贯反动，仇视人民和社会主义事业，民愤极大，罪恶昭彰。为了保卫人民生命安全，保卫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飞跃发展，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九条第二款规定精神，建议法庭对反革命投毒犯张德才、回申娃处以极刑，以清民愤。

在轰轰烈烈的宣传声中，张德才被认定为反革命投毒首犯，回申娃被认定为同案犯，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平陆县人民法院的布告由中共山西省委副书记亲自定稿，在省城大量印刷。执行死刑当日（1960年4月2日），在全国各大中小城市和乡镇同时张贴一万七千余张，这也是空前的。

平陆事件突然发生，导致阶级斗争论调重新高涨，阶级斗争是社会主义时期国内主要矛盾的说法甚嚣尘上。

张德才和回申娃被处决的枪声刚刚响过，《人民日报》和《山西日报》先后在头版显著位置发表了《平陆事件的教训》、《时刻保持高度警惕》长篇社论。

《人民日报》社论指出：“这个反革命暗害事件说明了什么呢？应当从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观察这个问题。”“‘平陆事件’告诉我们，反革命分子并没有完全肃清。这些极少数的反革命分子，都是死心塌地同人民为敌的，他们往往伪装起来，混入我们的队伍，当人们麻痹大意的时候，乘机进行凶恶破坏。”“平陆民工受毒害的事件清楚地表明，肃清残余的反革命分子，以及诈骗、盗窃、流氓等犯罪分子，仍然是一个长期的斗争。”“在以大跃进的高速度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还要继续提高革命的警惕性……对其中敢于进行反革命活动的死硬分子，必须加以严厉的镇压，以保障社会安全，保证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

《中国青年报》的社论《提高警惕，肃清残敌》则强调：“认为在肃反、反右斗争取得胜利后就没有什么阶级斗争了，社会主义建设可以风平浪静了，这种想法是幼稚的，也是有害的。全国众多报刊相继转载上述社论，作为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典型案例。

“平陆事件”被众多的文章引用，成了认为政治斗争是国内主要矛盾的理论家和官员的武器。从理论界到党政部门，从企业单位到人民公社，纷纷召开座谈会讨论学习。霎时间阶级斗争论调无限膨胀，阶级斗争之弦一再紧绷，人心惶惶，个个自危，似乎阶级敌人就在窗外，真的要变天复辟了。

制造恐怖气氛是维护统治的重要手段，是独裁者惯于采用的手法。毛泽东深谙此道，遇此良机，一举两得，岂能不用？这才是平陆事件新闻浪潮迭起的主要原因和目的。

另一个目的，毋庸置疑是转移视线，让善良的人们暂时忘记饥饿，至少是口头上不敢再说饥饿，缓解广大群众日益增长的怀疑和不满情绪。

“平陆事件”之后，各级党政部门籍此清除了很多“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在山西太原，从4月3日起，不到半个月，就从省直属机构及太原市的所有机关，事业单位，各大厂矿剔除了一千多名“五类分子”和政治上不可靠的人。平陆县则从炊事员中清除“五类分子”六十四人，调整富余中农四十四人，增添贫下中农三百七十三人，实现炊事员、管理员中没有五类分子，贫下中农占管理员和炊事员总数的80%。全国各地到底清除了多少“五类分子”，很难统计，更难计算的是隐性的影响。

翻看相关资料发现，随着新闻界和文艺界的介入，“平陆事件”被一再放大，拔高，被赋予了越来越多的政治意义。其中最重大的意义就是非常及时地证明了“社会主义好”这个命题。

当时的新闻界广泛认为，在“三年自然灾害”导致全国范围的饥饿，共产风、浮夸风困扰中华大地、人们对社会主义优越性产生怀疑的时刻，它以无可辩驳的事实，有力地谴责了资本主义，赞美了社会主义，使中国人民刻骨铭心地记住“社会主义好”五个大字。这对克服“自然灾害”带给人们心理上的悲观情绪，鼓励人们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稳定全国的社会秩序将会起到极大的作用。

同时，通过六十一个中毒民工被救事件，让人们感受共产主义协作精神，领会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社会主义新风尚，深深地接受全国一盘棋的思想。一个学习首都人民、发扬共产主义风格的活动在全国掀起，对纯化社会风气，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必将起到巨大的推进作用。

平陆事件在那个年代被当做典型事例，为当时许多理论家和政治家们利用，继续高举阶级斗争的大旗，制造了许许多多人间悲剧，也留给后人许许多多无法弥补的遗憾！

平陆事件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平陆县原纪委副书记李敬斋曾长期关注过此次中毒事件，并于2009年将其所著关于平陆事件的纪实文学《穿越时空的真情》投寄《记者观察》编辑部。《记者观察》编辑部随即派人赴平陆采访，写了《揭秘“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背后故事》。

平陆事件的真相是：

当年12月的一个雨雪天，北风肆虐，民工们又冷又饿，不愿出工，连长坚持“突击”。三排排长张德才却蒙头大睡。当晚副连长仝仁明组织对张的批斗会，斗了一个通宵，当场免去其排长职务。1960年1月19日张德才因

擅自回家再遭批斗，因而对仝仁明极端不满，意图寻机报复。于是张德才找民工回申娃以毒个狐狸弄张皮子为名索要砒霜，回申娃的养父原来开过小中药店，当地农民用砒霜拌种子，店中有存货。张德才拿到砒霜以后决定“干脆把红信放进大锅里，使全连的人都拉肚子，这样就不用上工了。”（张德才被捕后的交代材料）。事发后张德才供出砒霜来源，回申娃成了协同犯，与张德才共赴黄泉。

据平陆事件当事人刘克武和张明亮回忆，张德才和回申娃二人被枪毙后不久，前滩村又发生一起牲口中毒事件。经过查实，是因为饲养员宋千里（年老、嗅觉失灵）误将六六六粉当成水泥，修补牲口槽而致。但当时阶级斗争情绪异常高涨，尽管这个人是贫农、老党员，还是被枪毙了。

在“六十一个阶级弟兄”里，有十多名本是地主、富农成份，中毒期间，他们短暂地享受到了“阶级弟兄”的待遇。但“平陆事件”过后，他们依然没有逃脱厄运。

一个叫回运虎的饲养员，出身地主家庭，恐惧不安，听说饲养员宋千里是个老党员都被枪毙了，便跳井自杀了。

赵铁成，文革中被造反派拉上大街，戴高帽，挂纸牌，游村串巷。

地主子弟景五福，负责看管的柴油被偷，畏惧批斗，投井自杀。

平陆事件的主犯张德才被处决后，仅有的一个女儿张春娥由其大姑张秀花收养。因系反革命子女备受同村人歧视，16岁时跳井自杀了。

伊光正（富农成分）也被戴高帽子游斗批判，经常被打得头破血流；

王东娃（地主成分）也被多次批判，挨打。

刁中队因背有反革命家属子弟的罪名，在村里经常被批斗，他妹妹一次因挖了村里地边上的一些土填猪圈，就被扣上“挖社会主义墙脚”的罪名加以批判。

如此等等，平陆事件并未使一时徒有“阶级弟兄”之名的地富们及其子女们改善命运，他们仍然是阶级斗争的牺牲品，命运何其惨也。

时任平陆县长的郭逢恒如今回想自己在“平陆事件”中的种种经历，感慨说：“很多事儿像是闹笑话，但当时就是那样一个时代”。

（二）马口事件

1960年2月26日黄昏，广东省英德县马口硫铁矿西北部的马口造纸厂意外失火。附近的军民快速奔赴火场，奋力扑救。大火被扑灭了，在与烈火搏斗中十余位勇士光荣牺牲，英雄的事迹经报纸等媒体广泛宣传，在国内外产生巨大影响。即为马口事件。

马口事件发生后，《南方日报》以《向具有崇高共产主义风格的人致敬》为题发表长篇通讯，还配发题为《一课共产主义活教材》的社论。1960年3月22日，中共广东省委、省人委作出《关于学习“马口事件”中抢救国家财产、救援负伤同志的共产主义风格的决定》；公安部发出《关于嘉奖广东省英德县马口硫铁矿公安干警扑灭火灾的英勇行为的通报》；中共广东省公安厅委员会作出《关于开展学习“英德县马口事件”的决定》；中国人民公安部队给广东公安总队韶关大队四中队记集体二等功，并命名该中队为“马口灭火英雄中队”。

当年四月，国家副主席董必武为马口英雄题词：灭火牺牲，精神不死；抢救烧伤，视人如己。崇高风格，波属云委；共产社会，新苗茁起。

这一连串的“报道”“社论”“通报”“决定”“记功”“命名”“题词”要想不轰动都难。

在扑救烈火过程中受伤人员较多，政府动用飞机从南京运送血浆，北京开往广东的特快列车也专门停靠无名小站运送伤员，韶关地区成千上万群众排队几天几夜献血，全国瞩目。

苏联、朝鲜、越南、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家也派来慰问团或发来慰问电，国际声援。

在医务人员奋力救护下，四十三名名伤员康复出院，十三人（八名武警战士和五名公安干部）因伤势严重抢救无效，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此后，珠江电影制片厂根据马口事件英雄的事迹，摄制成电影故事片《英雄诗篇》。有关文艺单位编成话剧、颂歌等宣传演出，出版社编印了画报和专辑。马口事件英雄的壮举传遍祖国大地。“社会主义好”的赞歌响彻云霄。

电影《英雄诗篇》热情讴歌中国共产党，借救火牺牲的采矿车间分队长马德林之口说：共产党员要解放全人类，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要把党放在第一位，忠于党。烈士苏满基牺牲前的最后遗言是：我要争取成为党员。马德林在得知苏满基已死、他自己也生命垂危的情况下，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做苏满基的入党介绍人。苏满基的母亲来到医院得知儿子已经牺牲时说：他是党和毛主席教导出来的。影片中伤员和医生、护士十几次以兴奋的声调高喊：毛主席！毛主席！极力宣扬党的伟大、党中央和毛泽东对马口事件无微不至的关怀。影片还违背常识地描述了当年二月份（农历正月底）北京、温州、南京、南昌到广州一线竟然都有通常夏季才出现的雷雨和暴雨，飞机需穿越空中雷电层冒险飞行。英德县向卫生部求救，北京血库紧急抽调血浆支援广东，说是毛主席派人送来了急需的血浆。（笔者注：此影片在网上仍可看到，写作途中我看了两遍）

1960年正是生活最困难的时期，人们吃不饱，浮肿病蔓延，情绪低沉，精神不振。本来是一个偏远丘陵区普通火灾被传媒拂拂扬扬大力宣传成了惊动国内外的马口事件。利用马口事件讴歌社会主义，转移人们的视线和心境，可以减轻人们的饥饿感，体验党的温暖和伟大、光荣、正确。

当时各地报纸不仅报道马口事件，更主要的是刊载歌功颂德的文章。劳改单位每天都要组织劳改犯和劳教人员、就业人员学习，以便从报纸上感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四川省劳改局编辑出版的小报《新生报》（周刊）是给服刑人员、劳教分子、就业人员看的内部刊物，更在必读之列。

出乎意料的是，《新生报》不加掩饰地透露了马口硫铁矿是劳改企业，奔赴马口造纸厂救火的除了公安干警之外还有劳教和就业人员，其中六位壮烈牺牲。他们是：

霍永全，三十岁，广东南海人，右派，解除劳教就业人员。

刘礼苏，三十二岁，广东顺德人，右派，解除劳教就业人员。

王忠文，二十四岁，广东阳山人，右派，解除劳教就业人员。

江秉清，三十一岁，广东连平人，右派，劳教人员。

汤金生，三十二岁，湖南人，右派，劳教人员。

刘友德，十九岁，福建人，右派，劳教人员。

《新生报》以整版篇幅介绍了他们奋不顾身，英勇救火的事迹，还报道了他们在住院接受治疗期间忍着自身的伤痛照顾烧伤的干警，那几位干警康

复出院了，他们却牺牲了。

事后，广东省公安厅劳改局对牺牲的六位劳教分子和就业人员给予崇高的荣誉——摘掉右派帽子，记大功一次。

《新生报》刊载此文的目的是教育劳改犯人、劳教分子、就业人员，积极表现，向因救火而牺牲了的人学习，争取“光明前途”。

读了《新生报》有关马口事件的报道，我陷入了沉思。我在想：

(1)投入劳改或劳教的人员在被当做阶级敌人施以专政的情况下仍然热爱祖国并具有高尚的道德操守，临危不惧，挺身而出，不顾个人生命危险，奋勇救火。这才是他们的本色，强加给他们的右派帽子是颠倒黑白，是对历史的歪曲，是对个人的侮辱。

(2)所有公开发表的文章在提到马口事件时，保持了舆论一律的基调，在那场灭火战斗中牺牲了十三位干警，他们是：

共产党员马德林、苏满基、沈发福、蔡明庄、郭良珍、罗耀富、邓光福。

共青团员赖智恒、叶会明、曾耀荣、邱启发、胡声荣、阮恩裕。

这十三位都被追认为烈士，广东省专门拨款在英德人民革命烈士陵园建造马口英雄烈士墓，并且给马德林、苏满基、蔡明庄、郭良珍、沈发福等五位烈士塑造半身石像，供子孙后代凭吊瞻仰。

对右派分子参加救火并且牺牲了六个人则通通只字未提。从法律上讲，右派分子没有被剥夺公民权，实际上，一旦戴上右派帽子，即被当做阶级敌人，被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消灭而后快，即使因公牺牲也不能正面报道。这必然是党中央、国务院定的调子，不然全国怎么统一口径呢。

(3)摘掉右派帽子就是最高奖赏了。右派分子为了抢救国家财产连生命都彻底奉献了，得到的只是摘了本来就不该戴的帽子。

(4)我被打成右派分子已经两年多了，扪心自问，我从来没有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更没有反对社会主义的行为。尽管被劳动教养，形同囚犯，仍然忍辱负重、竭尽全力地做好本职工作，没有任何怨言，也该摘帽子了吧？

(5)摘掉帽子与不摘帽子能有多大区别呢？当时《新生报》曾广为宣传的袁明亮（原系四川省某党校马列主义课教师，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1959年国庆特赦一批战犯，与此同时，四川省给六名右派分子摘了帽子，袁明亮是其中之一）摘掉帽子了，被强制留在劳改队就业，不能与家人团聚，也没有恢复原来的职务，更没有恢复党籍。从马口事件看，顶多就是摘帽子，命名为“摘帽右派”，纵然牺牲了生命也不能和平常人为伍，似乎还是在人民行列之外。毛泽东说的“给出路”究竟算不算数呢？

马口事件过去了几十年，无论是书面上还是口头上，宣扬的是十三位烈士。直到2005年，《羊城晚报》的记者追寻烈士遗迹，采访还生存着的英雄时才了解到被掩藏了四十五年的真相。

2005年4月1日《羊城晚报》一则题为《马口事件不止十三人牺牲，埋名六壮士揭出尘封内幕》的报道，揭示当年马口硫铁矿参加救火的总共是七十三人，其中：当地治保主任一人（伤）；公安干部二十八人（死五人、重伤十六人、轻伤七人）；武警二十一人（死八人、重伤十三人）；解除劳动教养仍戴着右派帽子的就业人员十七人（死三人、重伤十二人、轻伤二人）；还在劳动教养的右派分子六人（死三人、重伤二人、轻伤一人）。邓光福和阮恩裕两位武警当场牺牲，其余是烧伤严重抢救无效在医院去世的。右派分子的死亡比率最高，至少表明他们最奋不顾身吧。但由于身份“特殊”，劳教

分子和就业人员的名字始终没有出现在灭火英雄谱中，尘封了四十五年。

记者采访费了很大功夫，先找到火灾发生后首批赶赴一线采访的晚报记者周毅，时隔几十年他还清晰记得，当年在马口接触的被采访对象，都提到了有一批“劳改犯”参与了抢救国家财产。“在那个年代，报道中不好提他们，因此也没有特别详细地了解过”。

又找到当年参加救火的英雄江福燊，他感慨：“其实当年牺牲的，除了十三名英烈还有其他人”，“马口硫铁矿的一些劳教人员，在管教干部的带领下，也赶赴现场灭火。”但江福燊记不清牺牲了几个人，“好几个呢，当时没有提起，后来也都不提了”。

马口灭火战斗中幸存的老英雄黎永端告诉记者，1958年他所在的公安武警部队抽调他和另外四名同志，负责监管三十八个在马口硫铁矿改造的右派分子。黎永端说：我知道他们是“右派”，可一接触发现他们都是好人啊，又有文化，我从来都不会对他们打骂，相处得很好。救火的时候，他们也有参与，还牺牲了几个。

循此线索，记者查阅了大量资料。

《英德县志》记载：马口事件中，八名公安武警战士、五名公安干部共十三人献出生命。

几经周折，记者在英德市档案馆找到了唯一一份记载“马口事件”的档案。记者翻遍了这本“全面、真实叙述了事件过程”的厚厚材料，只找到十三位烈士的名字。另几位为了抢救国家财产牺牲的人员，则没有任何的事迹记录、没有背景材料，也没有记录下他们的名字。

带着疑问，记者先后三次到省公安档案馆查阅《广东革命烈士英名录》、《广东省志，公安志》，查到的都是这十三位英雄的名字。在三大卷发黄的“马口事件”卷宗里，记者查阅了所有的资料，包括当时广东省专门成立的“马口事件”调查办公室日志。所有的调查报告、文件、立功奖励报告、讲话稿，牺牲烈士的名单都是十三人。

最后，记者发现在厚厚的卷宗中有一张由“马口事件”调查办公室油印的“英德马口事件访问材料”，其中写着：干部死五伤十六、民警死八伤十三、劳教死三伤十二、就业死二伤二、治保主任伤一，最后统计马口救火人员共计七十三人，其中死十八人伤四十四人。

后来在在广东省人民医院收治马口伤员表中看到，一位叫汤金生的全身烧伤55%，三月十日凌晨一时死亡，其身份为劳教人员。受伤出院的人员中属于劳教分子的有：黄玉棠烧伤50%、骆佛香烧伤50%、易泽俭烧伤40.5%。

记者再次到省公安档案馆，反复认真查阅，从一份由原韶关地委、英德县委和马口硫铁矿党委联合成立的“马口事件”宣传学习办公室整理的资料中，发现了“马口灭火”牺牲者名单，明确地记载着一批就业、劳教人员在管教干部带领下参加救火，其中三位解除劳教就业人员和三位劳教人员在灭火中牺牲。至此方可确认，四十五年前轰动国内外的“马口灭火英雄”除十三位烈士外，还有六位当时身份为右派分子的热血青年，他们为抢救国家财产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年纪最小的才十九岁。

这六位为抢救国家财产而牺牲的右派分子，由于身份“特殊”，他们的名字始终没出现在灭火英雄的辉煌正史中。算不算英雄呢？该不该也被追授烈士称号呢？

据悉，这六位牺牲者均属错划右派而送劳动教养的，1978年都得到了相

关部门的“改正”。

《羊城晚报》的报道引起了广州市民的关注。

在市民的热议中有人认为：所谓右派称号，是强加在他们头上的，是被歪曲的历史，他们的真实身份是革命干部或学生，在救火现场在政治上他们和公安干警是一样的，理应追授他们为革命烈士。

另有市民坦言：不管这六人当年是什么样的政治身份，他们勇于牺牲的行为，对于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同样有着不可估量的榜样作用。

有人说：他们在蒙受巨大冤屈的情况下挺身而出、忘我冲入火场奋力扑救的精神更值得嘉许，追授烈士称号当之无愧。

也有人认为，现在“很难判断他们的动机和行为是不是一致的”，对追认六人烈士称号持保留意见。我也很难判断持这种莫名其妙观念的人是什么动机？属于什么行为？其动机和行为是不是一致的？

由他去吧，存在就是合理。社会就是多元的，允许各种各样的意见。

议论了一阵，官方无任何表示。

实际上，是否追认六位英雄烈士称号，对他们个人及其亲属而言已没有多大意义了，但是这件事情能在汗牛充栋的尘封档案中被发掘出来，并引起民众的追思与热切关注，昭示了社会有了一丝丝的进步，也是令人欣慰的。

这件事情给予我们的启示远不止这一点。市民对六位有着“另类身份”英雄的态度，和六位壮士的义举本身，都值得我们深思。作为曾经被打成右派分子的人来说，更应该有所启发吧。

（11）我在理化室

（一）筹建

1960年，从建国西街那个狭小的院落搬迁到通惠门的劳改局加工厂，长足发展，人丁兴旺。

随着“反右派”“反右倾”等政治运动成果累累，在毛泽东思想和三面红旗指引下，劳教、劳改人员迅猛增加，监狱规模不断扩大。一个百十来人的劳改局加工厂几个月的时间就达到了四五百人的规模。监狱扩容充分展现了“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无比优越性，是总路线的巨大成功，将被记录在中华五千年的历史之中。

劳改局加工厂为了谋求更大的发展，不满足于生产零星配件，需要开拓主导产品，生产机床

当时成都市只有一家规模很小的机床厂，地址在北郊府青路，名曰成都机床厂，实际还不具备生产机床的能力，据说打算试制外圆磨床。

劳改局加工厂选定技术含量更高的平面磨床，于1960年底开始试制。

一台机床，金属构件占总重量95%以上，按照行业要求，必须对大部分金属材料进行化学分析和物理性能测试，否则不允许生产。因此成立化验室为当务之急。

一天，技术室（科）主管干部冯四苇在晚间学习会上问：“你们谁能搞理化分析工作？”

当时的技术室清一色由劳教分子组成，十几个劳教分子你看我，我看你，一时无人回答。

冯四苇又说：“制造正规机床，必须有理化检测手段，没有理化室就不具备生产机床的资格，上级不发许可证。我们厂要尽快成立理化室，看你们谁能干？”

我环顾了一下四周，想了一想，这十几个人当中绝大部分是学机械的，只有我学的是热处理，虽然不是分析化学专业，相对而言，化学方面的知识略多一些。我本身对理化实验也比较有兴趣。而且理化分析工作是独立的，人员少，技术性强，没有复杂的人际关系问题，在人性被歪曲的劳改队里，也算世外桃源了。

于是，我大胆地回答冯干事说：“我来。”

他看了我一眼，想了大约两三分钟，说：“明天你就开始筹备成立化验室，拿出一个计划来，需要多长时间？多少经费？”

我说：“好的，三天之内交理化室筹建方案，至于经费我说不清楚，因为在劳改队关押了三年，与世隔绝，对化学仪器和试剂的售价毫无了解，需要先做市场调查。整个筹建过程大约需要三个月的时间。

他说：“你好好想想，明天上午到我办公室来仔细研究。”

于是大家接着学习，读了会儿报纸，有几个人心不在焉的谈谈心得体会，九点钟散会，拖着疲惫的身体、无精打采地回到劳教人员住的舍房，不洗脸也不洗脚，躺在地铺上睡觉了。

第二天早上八点，刚刚上班，我就等在冯干事办公室门口。

他准时来了。冯四苇不过三十岁，原来在公安系统办的报纸做过记者和编辑，算是知识分子，把他调到劳改局加工厂技术科，是加强对右派分子的改造。他比较开明，说话也比较随和。只要不违反监规纪律，从来不凭空找麻烦，不多管闲事。

他打开办公室的门，径直走了进去，我紧跟其后，他用手指了指，示意我在对面的椅子上坐下，然后他坐在自己的位子上，开门见山地说：“你有几分把握？”

我笑了笑说：“没有十分把握，我不会毛遂自荐。”

他说：“你很自信哪，根据何在？”

我说：“山中无老虎，技术科这十几个人当中，我学的化学知识要多一点，普通化学，半微量定性分析，定量分析都是苏联的大学教材，课本都还在。在学校的时候我对化学课就比较感兴趣，考试成绩都是五分，对化学实验的操作技巧也有一些体会，老师指定我帮助其他同学做实验。参加工作以后在理化室实习过一个月，对具体的理化实验多少有点了解，平时业务上和理化室联系也比较多。当时的女朋友就是长江电工厂理化室的化验员。所以我覺得可以承担这个工作，有信心做好。”

冯干事听了以后说：“现在你和她还有联系吗？”

这分明是问我和女朋友。我不知道他为什么问这个问题，我后悔刚才竟然脱口而出，说出了多年以来心中的隐痛，我不由自主地闭上眼睛，低下头，轻轻地摇了摇，静默了一两分钟，眼角中噙着泪，叹了一口气，突然情难自禁地眼泪夺眶而出，又摇了摇头说：“她是共产党员，我被打成右派……。”唏嘘之声，再也忍不住了。

这时候，我的脑海里满是刘巩贻的影子，我们是真心相爱的，我们曾经满怀对共产主义的美好憧憬，在一起谈理想、谈未来；讨论如何学习，如何充实自己，做一个有益于祖国的技术人员；我也要和她一样成为共产党员；我们要建立温馨的家庭；我们要把孩子培养成科学家……

谁也没有想到，一对处在热恋之中，以纯真的感情视中国共产党为母亲，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高理想的两个年轻人，被毛泽东掀起的名为整风实为反

右的狂风暴雨冲散了，至今不知道她生死存亡，境况如何。

冯四苇坐在那里不说话，起来自己倒了一杯水，也给我倒了一杯水。

我用袖口擦了擦眼泪，长长地做了一个深呼吸。缓缓地说：“昨天晚上我想了一下，今天就可以把方案写出来，但是需要了解一下各种仪器和化学药品的市场价格，才能编制预算。”

接着我向他说了我设想的筹建计划和步骤，以及需要的条件。

比如，至少需要四间房子。

一间化学分析室，因为时常会产生有毒和腐蚀性气氛，需要通风良好；

一间精密仪器室，放置天平和分光光度计等，需要避震和严防腐蚀性气体；

一间碳硫分析室，内置高温炉和氧气瓶，需要注意安全；

一间储藏室，保管易燃、易爆、和强烈腐蚀以及剧毒的化学试剂。

以上房屋，面积可以不大，但必须各自独立，按照化验室的技术要求进行改造，不能共用一间大房子。

成立化验室第一步是解决当前工厂急需的钢铁材料中碳、锰、硅、硫、磷五大元素的化学分析。顺利的话，三个月正式使用。

第二步是扩展分析项目到有色金属及合金元素，铜、锌、锡、铅、铝、镍、铬、钨、钼、钒等等。大约也需要三个月的时间。

与此同时，准备建立硬度，力学性能，和金相实验室。

再下一步是筹建计量检测实验室，逐步发展到包括理化、金相、计量、热工仪表等与中型机床制造厂相适应的理化实验室。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也就是必须有必要的实验仪器。

我接着强调，房屋、仪器固然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需要有掌握、使用仪器的人。在筹建理化室的同时就要注意挑选、培养人员。至少中学文化，要勤奋好学，要有敬业精神和严谨的科学态度，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

我谈了大约一刻钟，他一边听一边在纸上写几个字。我说完了以后，他接着说：“今天下午我们就出去做市场行情调查，回来以后你就抓紧时间写筹建方案，越快越好，要交给厂长审查，在厂务会议上讨论。

从冯四苇的办公室走出来，我就急急忙忙地在我那几箱书里找有关分析化学的资料，为写理化室筹建方案做准备。我暗暗发誓，将会本着因陋就简的原则，在较短的时间内建立起设备可以简陋、技术必须先进的理化实验室。

六十年代，成都市医药公司就在祠堂街，离通惠门不远，走路也就是十来分钟，当天下午冯四苇带着我走出了劳改队的大门。

很久没上过街了，好像到了另外的世界，东瞧瞧，西望望，街上行人不多，面黄肌瘦者众。成都号称芙蓉城，其居民甚至豆蔻年华的少女却没有一点芙蓉的颜色，反而是面带菜色，有辱了芙蓉这个美名。一边遐想一边走，一会儿就到了医药器材公司。

公司营业面积不小，顾客却不多。营业大厅宽敞明亮，下设化学试剂部、医疗器械部、实验仪器部、玻璃器皿部等。我逐一地观看并了解购买手续，例如购买有毒试剂需要什么介绍信，付款与提货方式等等，还记录了部分产品的规格、型号和价格。冯干事一直和我在一起，跟着我到处看，但是一言不发，不知道他心中默默地盘算着什么。

出了医药器材公司，我对冯干事说：要到新华书店看看，他慨然允诺，

带着我朝位于西御街的书店走去，也只有几分钟的路程。我有将近两年没有进过新华书店了，找到化学专柜，逐一地搜索起来。冯干事则驻足于政治和文艺类书籍专柜，寻找他的兴趣去了。新华书店走一遭，收获颇丰，我买了好几本理化分析方面的书籍（没有要公家报账，从自己每月十九元生活费中开支），和冯干事一起回到了关押着几百名劳教分子的大院。

这一天，无论是吃饭和睡觉，我都在考虑着筹建理化室的事，在冯四苇面前夸下了海口，就不能有丝毫懈怠，一定要建成像个样子的理化室。第二天下午我就把筹建方案包括预算交给了冯四苇。因为上面催得很紧，没有理化室就不准许生产成套机床，所以厂长秦凤梧一声令下：“赶快行动，先把牌子挂出来。”

厂长说了算，立即行动。研究确定把离厂部办公大楼（名曰办公大楼，实际只是一楼一底、总共不过二十间屋子的红砖房）不远的一个独立的小院划出来做理化室，也是一楼一底的砖木结构房屋，楼上是劳教人员的宿舍，楼下的四间房划归理化室。我测量了面积，画了平面图，反复琢磨确定了平面布置。蒸馏水器、干燥箱、分光光度计、定碳炉、通风橱、电光天平、金相显微镜、各型电炉以及室内照明等等都需要电源插座；洗涤槽、硬度计、天平台等都需要水泥砌筑；试验桌、通风橱、试剂柜需要木工制造。我抓紧时间当天即绘制了图纸，向主管干部汇报、解说以后，交给施工单位，力争十天内全部完工。

紧接着就是编制仪器和化学试剂的采购计划明细表，通过多种渠道收集实验仪器，玻璃器皿，化学试剂的产品目录。询问价格，货比三家。比如，酚酞、甲基橙、石蕊、溴甲基酚蓝等是化学分析中不可或缺的着色指示剂，价格不菲，但是用量甚少，规模不大的化验室一年也用不到一克，医药公司开票写的是二十五克一瓶，到成都东郊八里庄库房提货时发现有五克一瓶的，我宁愿多跑一次，返回医药公司，重新开票，换成最小包装，来回一趟十多里路，只是为了给磨床厂节约一点筹建理化室的经费。

所有货物都是自己提货，我不会骑自行车，但是为了提货方便，学会了骑三轮车。普通酸碱试剂的库房在八里庄，剧毒物品和易燃物品的库房在十余里外的龙潭寺，1961年，还处在三年困难时期，食不果腹，我忍饥挨饿骑着一辆小平板三轮车去到处提货。有一次到八里庄取硝酸、硫酸，在回来的路上刚刚进入市区，突然眼前一黑，什么也看不见了，紧跟着心跳加速、四肢震颤。我连忙下车，停在路边，扶着车把手，站在那里，一动也不敢动，心里想着，莫非双目失明了？我才二十几岁，这可怎么办呢？害怕得很。过了三四分钟，才恢复过来，后来有人告诉我，这是饥饿、劳累引起血糖过低造成的症状。从此，我就把每月供应的二两（62.5克）糖果票留下来，需要外出提货时再用，如果糖果票用完了，就忍痛拿出月工资买一个高价点心，以应不时之需。那时我一个月十九元钱，扣除伙食费等，每月只有不到八元钱，买一个高价点心就要一元，用掉了每月可支配收入的八分之一，也是为了磨床厂的化验室。

房屋按照图纸改造好了，化学试剂准备得差不多了，天平、分光光度计、定碳炉、马弗炉、烘干箱、蒸馏水器等仪器就位了，逐一地进行了调试，可以进行实验了。这时离下达筹建化验室命令还不到五十天。在这段时间里，所有工作就是我一个人，名为化验室，实际只是一个光杆司令，而且是一个戴着右派帽子的劳教分子。

1961年3月，我开始做钢铁中碳、硅、锰、硫、磷五大元素的试分析。参照多种文献，反复实验对比，通过对重量法、容量法、比色法的实验和比较，在保证分析精度的前提下，力争既节约时间又节省药品，最后选定了“碳硫联合测定”和“硅锰磷三元素联合测定”，逐步地掌握了操作要领，编写了操作规程。为了磨床厂的化验室，可以说是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如今已经过去五十余年，据我了解，四川磨床厂理化室现在仍然采用当时确定的分析方法和操作规程。

1961年仲春时节，上面又派来了两个人，一位是年仅十九岁的小姑娘，她是即将上任的化验室主管干事黄季夏，另一位是年近六旬刚刚投入劳动教养的黄德渠。黄德渠三十年代四川大学化学系毕业，几经辗转，在四川省中药研究所工作，体弱多病，略有口吃，不善言谈。三年困难时期，为求多买点吃的东西，因经济问题而劳动教养。我见他年老体衰，手脚不太灵活，多少有点帕金森综合症，右手发抖，只能做些辅助性的工作，他是化学系本科毕业，基础知识应该还是扎实的，能够起一些理论指导的作用也好。磨床厂的理化室总算有了三个人，一个高中才毕业的、身份为公安干警的管教干事，加上黄德渠和我一老一少两个劳教分子，建立了磨床厂第一个理化实验室。从开始筹建理化室，我就奉命搬出了劳教人员的集体宿舍，单独住在理化室内一个阴暗的小房间，面积大约5平方米，找了几块木板，搭起了床铺，安放了一张三屉桌，用以冲洗照片（做金相检验需要照相）旁边摆了一个临时做的多层木架，存放才买回来的化学试剂和玻璃仪器。这间房既是暗室又是库房还是我的卧室，虽然很简陋，潮湿黑暗。但在劳教队里能单独居住也算令人羡慕不止的破例优待了。

（二）几位管教干部

黄季夏：黄季夏第一天来上班的时候，给我的印象不好。那天早上，老资格的管教干事魏建芬领着黄季夏来到化验室，魏干事对着我和黄德渠说：今后化验室由黄干事管，你们要服从黄干事的领导。我抬头看了一眼，是一个身材不高、年龄不大的小姑娘，她似乎刚刚洗了头，披肩的长发还没有干，一边用左手拢着一边用右手梳着，看了我和黄德渠一眼，什么话也没说。我心里在想，一个年纪轻轻的女孩子，披散着头发来上班，成何体统？魏干事走了，我就转身进了化验室的另一间屋，坐在那里修理照相机镜头，把这位新来的主管干事晾在了一边。

第二天我还是在那间小屋里琢磨那个照相机镜头，六十年代，什么东西都紧俏，市场上没有金相显微镜，我想在普通显微镜的机身上配一个摄影镜头，把它改装成可以照相的金相显微镜，需要反复的实验。

第三天黄干事主动的找我谈话了，让我汇报化验室的筹建情况和近期的工作计划。我如实汇报，告诉她厂部的要求是对进厂钢材和铸铁确定化学成分，对铸造车间的产品如机床床身，汽缸套，活塞环等确定是否合格，前一阶段主要是筹建，从买第一个烧杯、第一瓶化学试剂作起，目前已经能够测定普通钢铁中的碳、锰、硅、硫、磷五大元素的含量，现在正着手确定合金钢的分析方法，争取下个月尽快测定镍、铬、钨、钼、钒。原来报给厂长的计划是半年正式承接钢铁分析，现在才三个多月，可以开展工作了。当务之

急是培训化验人员，三个月前我向冯干事讲过，现在还没有找到合适的人，请黄干事向上反映一下。第二天是10号，按照劳改队的规矩，干部每周休息，劳教人员逢十休息。一般干部逢十那天也不会上班的，但黄季夏却来了，尽管是坐在办公室看书，却也是按时上下班，这忠于职守的表现给我的印象很好。又过了几天，分配给理化室一个人，名字叫雷贵田，三十岁左右，原来是重庆某炼钢厂的四级化验工，被戴了一个反社会主义分子帽子送劳教，熟悉钢铁分析一般操作，有相当经验。

魏建芬：四川省劳改局王副局长的夫人，河北省人，年近五十，有二十多年的党龄，算是老资格了。1961年调至磨床厂任管教干部，接替原来的冯四苇主管技术室。1961年二三月间，魏干事找我谈话，开头就问：你最近想些什么？有什么思想？我回答说：我没有思想，只有努力工作。她笑了笑说：我来了两个多月，你从来不汇报思想，挺傲慢的。我看你不是糊涂人，怎么会没有思想呢？我说：我认为没有思想最好了，只知道吃饭睡觉，什么都不管，就不会犯错误。她说：我看你对于五七年的反右运动还在耿耿于怀吧，不解决这个思想问题就不会接受改造，对未来没有好处，你要好好想想五七年的后果是怎么造成的，不能对党有埋怨情绪。为什么别人没有被打成右派，你被打成右派，总是有道理的，有原因的。只有靠你深刻的检查找到错误根源才能改正错误。她这番话虽然也是教条主义，但不像某些管教干部那样蛮横，那样开口“反动”闭口“顽固”我就不再开腔了。大概半个月后，她又找我谈话，先是拿出一封我母亲的来信，告诉我不久前寄出的包裹（里面装的主要是食品）被退回了，理由是单位拒收。魏干事随着说：“你妈妈给你寄来的东西被退回了，她心里一定很难受。你给家里回封信，让她把收件人写我的名字，收到包裹后你到我这儿来拿。”跟着又提醒我一定要认罪。我说：魏干事，您想听真话还是想听假话呢？说假话就是我已经认罪了，我罪大恶极，罪孽深重，罪不容诛，罪该万死……。她说：好了好了，我听真话。我说：真话不好听，良药苦口，忠言逆耳。她说：你说说看。我于是说道：凡事都有根源，一个人拥护党还是反对党，都是有缘由的。我的祖父是北京远郊的农民，农闲时到门头沟煤矿下井挖煤挣点儿零用钱，1942年就去世了。我的父亲15岁时离开农村的老家到城里学徒，后来当上了北京仁立地毯厂的主任会计，母亲是织地毯的工人。我的哥哥1948年参军，到过朝鲜，1950年后调到济南军区从事保卫工作。姐姐在北京中央机关托儿所当保育员。他们两个都是共产党员。我解放的时候十二三岁，戴过红领巾，1956年加入了共青团，1957年交了入党申请书，在重庆长江电工厂当技术员。领导对我是重视与信任的，不到两年就让我代替原来的工程师，担任冶金科热处理业务组组长，主持全厂的热处理工作，并直接负责国防产品的研制与工艺。政治上也给以很高的待遇，例如：让我出席重庆市社会主义建设青年积极分子大会，出席团代会，选为厂团委委员，多次评为先进生产者，选入厂职工代表大会主席团，担任全厂青年监督岗岗长等等。经济上，进厂一年半提升了四次工资，20岁时每月收入高达七十余元（当时大米0.085元一斤），这对于一个青年人来说，和众多的劳动人民相比实在是甚为优厚了。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无论从阶级根源来看，还是从历史根源来看，或是从社会根源来看，我不可能，实际上也没有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任何不满的情绪，更不要说产生仇恨的心理了。1957年5月党中央决定整风，

毛主席号召“大鸣大放”。5、6月份的报纸上刊登了一些民主党派的头面人物如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等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座谈会上的发言，我那时候正在忙于试制新产品，对那些发言只大体上瞟了一眼，没往心里去。6月8日整风转成了反右，报纸上天天满版刊登着举国群众对右派分子的声讨和右派分子的检讨。1957年6、7、8月间，所有舆论工具都在中共严格控制之下，以绝对压倒之优势渲染反右派斗争大获全胜。右派分子纷纷落马，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等人连忙低头认罪。在这种情况下，稍微有一点头脑的人都会审时度势、谨言慎行。反右前，毛泽东一再号召“大鸣大放”，多次强调党的方针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事实上呢，反右起了个禁言作用，言者有罪。

长江电工厂的鸣放是7月中旬开始的。首先就是批判储安平的“党天下”谬论。储安平究竟说了什么呢？6月1日在中共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他拿着头天拟好的发言稿照本宣科，储安平说：解放以后，知识分子都热烈拥护党，接受党的领导，但是这几年来党群关系不好，而且成为目前我国政治生活中急需调整的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的关键究竟何在？据我看来，关键在‘党天下’这个思想问题上。”，他还说：“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事无巨细，都要看党颜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

第二天《人民日报》立即报道，基本全文刊载了储安平的发言，题目是《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6月8日起，储安平和章伯钧、罗隆基被毛主席点名批判，谓之曰三株大毒草，于是引发了全民共讨之的批判高潮，长江电工厂的批判会就是在这种氛围下召开的，支部书记主持会议，要求大家逐个发言，驳斥储安平。轮到我发言了，我说：储安平认为党群关系不好的关键在“党天下”这个思想问题上，是错误的。共产党打了天下岂能不坐天下。全国大小单位都由党员当头儿是正常的，党员是无产阶级中的先进分子，不由先进分子当头儿难道由落后分子当头儿？如果把党员当头儿叫做党天下，我赞成这种党天下，我拥护这种党天下。这段发言明明是批驳储安平的论点，绝不是附和党天下之说。第二天，技术科的任光祥写了一篇黑板报稿件，报导座谈状况，用了一个标题“牛立华赞成党天下”。任光祥的故作惊人之笔很容易引起误解，给人造成附和储安平论点的印象，便成了我的罪状。以言定罪未尝不可，但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能任意歪曲。给一个人定罪，必须认定他确有犯罪动机，有犯罪行为且造成了不良后果。在党支部组织的会议上发言，就指定的题目谈了自己的看法，能说有犯罪动机吗？批评了储安平的观点，是犯罪行为吗？我的发言危害了党吗？造成什么后果了吗？动机、行为、后果三者都没有，就说是意欲篡党夺权，我夺了谁的权呢？谁失去了什么权呢？不由分说就给戴一个右派分子帽子，就说是猖狂向党进攻，就强制劳动教养，运动的结果，中共毫发无损，只有我失去了人身自由，失去了基本人权。还被诬称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目前已经三年，我无论怎么检讨自己也想不通。仅仅凭一篇黑板报耸人听闻的标题就认定猖狂向党进攻，篡党夺权。我进攻了什么呢？占领了谁的一寸阵地吗？哪个党员受到了我的攻击呢？把不是敌人的人当作敌人，列为专政对象，扩大打击面，对党毫无利益只有危害。我投入劳教以后，在枪杆子底下只有服从无法认罪。古今中外，冤案总是有的。我相信历史会做出正确结论的。魏干事耐心听了我的陈述，没有

明确表态，只说：你再好好想想，多检查自己，要相信群众相信党。有些想法不能到处乱说，要注意影响，争取早点摘掉右派帽子。

（三）几个女学员

不久厂部又从车间抽出来几个女劳教分子派到理化室学技术，这四个人是：刘抗年（原来是小学教师，被划作反社会主义分子），陈乃贞（重庆电力学校毕业，反社会主义分子），陈亚英（初中毕业，工人，被定为坏分子），王翠蓉（大学二年级学生，反社会主义分子）。理化室总共有八个人，一下子热闹起来了。这应该归功于黄季夏。我注意观察几位新学员，刘抗年老成持重，言语不多，工作认真。我安排她先跟雷贵田学碳硫分析，再徐图扩展；陈乃贞敏而好学，头脑灵活，口齿伶俐，先学一般化验，今后侧重学金相；陈亚英体格健壮，文化程度较差，专业方向是硬度和机械性能检测；王翠蓉重点掌握钢铁中各个元素分析的一般操作。总的要求是一专多能，每个人都要通晓中型机械制造厂常规检验项目，能够独立完成各项任务。初始阶段先练基本功，熟悉各个器械的名称和用途，清洗玻璃仪器，使用天平、电炉、分光光度计的方法和注意事项，认识各种化学试剂等等。大约过了一个月，人比较熟了，我问她们：到理化室来有什么感觉？陈乃贞说：刚来的时候有点高兴又害怕，高兴的是可以学点技术，害怕的是都认为牛立华严肃的很，不苟言笑。我说：对任何事都要求严格是我长期养成的习惯，有时候态度不好，过于求全责备。前几年在重庆新建机械厂就曾把杨容才吵哭了。但只要认真工作肯动脑筋，我不会乱发脾气的。你们来了一个月，现在还怕不怕？他们几个都说：不怕。我们几个的年龄都差不多，关系很融洽。黄季夏干事虽然也是年轻人，而且在理化室她的年龄最小，但她是管教干部，我们是劳教分子，毕竟有一道隔阂，黄干事在的时候，我们都一本正经的，她不在的时候，我们要轻松一点，偶尔还能说句笑话。然而好景不长，总共来了不到两个月，这四个女劳教全部调走了，分配到汽车修理车间当杂工和喷漆工去了。化验室又恢复了老气横秋的样子。

（四）材料试验机事件

1961 年秋，订购的 30 吨级材料试验机到货了，在筹建理化室阶段，买什么东西，只要说明用途和必要性，黄季夏干事都签署“同意”厂长都批示“准予购买”。我的心情也很舒畅，似乎忘记了头上的右派帽子，全身心地投入工作。材料试验机整体全高接近 3 米，需要加高房门，才能将其安放于室内，拆建房门之际只有暂时停放在露天场地。虽有木箱包装，我仍怕它遭受雨淋，额外地加盖了油毛毡，每日巡逻检查。在此期间，我被宣布解除劳教、摘掉右派分子帽子，从法律上说该是享受完全公民权了，但仍被强制留在劳教单位，名曰就业人员，每月还是十九元钱生活费。不几日，材料试验机搬进了房间，跟着就是安装、调校、试车。这时分配到理化室的四个女学员调走了，厂里又派了一名二十几岁的小伙子朱邦国（某中专校毕业），我们两个着手安装。电工接好线以后，开始空载试车，试车期间发现标明“升”“降”“停”的三个按钮不大灵活，要多按几次才动作，我请来电气专业的几位技术员多方检查，都说大跃进的产品就是这样，用一用再说，有的建议在磁力开关的摩擦部位涂一点润滑油。我向干部作了汇报，没有进一步检查就决定正式负载运行。试车途中负载刚刚加到 12 吨（额定满载是 30 吨）磁力开关突然跳闸且冒出了一股烟雾，我顺手拉掉了总闸，切断电源。并对朱邦国说：保持现场原状，等待干部检查。大约过了十来分钟，管教股干部来了，不问

青红皂白，掏出一副手铐，立即把我铐起来，押送到隐蔽在干部食堂背后的禁闭室强行关押。十来天后，听说电工何文博接电源线的时候误把 380 伏当做 220 伏，是造成此次事故的原因。但我仍被关在禁闭室，大约接近三个月才放出来，安排到位于成都市郊龙爪堰（又名周家碾）的劳教农场，种菜、挑粪。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我开始意识到不管如何努力工作，不管摘不摘帽子，都是被当做敌人看待的。尽管查明了事故的责任人不是我，但却任意关押了三个多月，又发配到农场改造了三个多月，因为硬度计出了故障，需要检查修理，才又把我调回到通惠门理化室。想起来不能让人不寒心。不久，厂门口挂出了四川磨床厂的招牌，由于通惠门地处成都繁华地段且场地狭小，难以满足大量生产磨床的需要，劳改局在市郊天回镇附近征地两百余亩，理化室随磨床厂整体搬迁至新址。我被留在通惠门。

（五） 再建一个理化室

磨床厂搬走以后，原址改称通惠汽车修配厂，尔后又改名为四川消防机械厂，有四百余名就业人员，生产消防水泵等器材和消防汽车。仍然需要理化检验，这大概是没有把我调往天回镇的原因。紧接着就投入紧张的筹备工作，厂部决定把原来劳教食堂的大厨房改做理化室，三间房都需要彻底改建，理化室不允许屋顶掉落灰尘。必须设置天花板和通风厨，砌筑水泥工作台放置天平等需要防震的仪器，需要绘制平面布置图，确定电器位置和功率，进排水点等等。虽然不久前筹建磨床厂的理化室积累了一些经验，这次算是轻车熟路，但难度大得多。既要思考整个布局又要协助现场施工，忙得不可开交。经多次反映，厂部派了一位曾担任过中学化学教师的廖宗祥（也是解除劳教人员）和我共同工作。房子修整的差不多了，开使采购各种实验仪器和化学试剂，天天跑化学试剂公司和八里庄、龙潭寺等地的库房，开票、付款、提货。这时又派来了一名干部张邦硕，监督我和廖宗祥的工作，对我们执行管教。这位张干事五短身材、披肩发、薄嘴唇、戴副近视眼镜，据说是高中文化，老公是劳改局的干部，她原来在劳改局当过会计，调到通惠门任管教，她表情严肃，态度冷漠，说话尖酸刻薄，阶级斗争意识极强。她怕理化室的毒烟毒气，所以不常来，大半时间和几位干部坐在与理化室隔窗相望的办公室里打毛线，密切监督着我们的一举一动。理化检验工作属有毒有害作业，按规定是有岗位津贴的，劳改劳教单位全免了，只配了一台风扇说是可以排烟。每逢操作会产生有毒有害气体作业的时候，我和廖宗祥就把风扇打开，张邦硕连忙关门闭户。有时候我们在窗台上放一小杯氨水，再放一小杯盐酸，风扇一吹顿时便会产生浓浓的白烟，算是提醒她们理化检验是有害作业，吓得她们赶忙紧闭窗门，顾不上对阶级敌人的监督了。

（六） 技术大比武

1963 年到 1964 年，全国各行各业掀起一股大比武的高潮。我从《理化检测》杂志上看到川渝地区也有此活动，经请示张邦硕干事允许后，就联系报了名。嗣后，组委会经由四川省机械工业厅理化检测中心发来了有关表格和两小瓶样品（一个是灰铸铁，一个是合金钢）要求在规定期限内上报化验结果并注明采取的化验方法。我和廖宗祥于是忙碌起来，他负责碳硫分析我还是负责硅锰磷分析。我们先仔细检查了所用仪器设备，确认处于正常状态。重新校准了天平。然后取双样连同已知成分的标准样品重复化验两次。取两次结果的平均值，详细写明所用仪器、试剂和化验方法，按时上报四川省机械工业厅理化检测中心。做完了工作，我和廖宗祥忐忑不安的等待着判定结

果。我们只想验证一下自己的工作，没有追逐名次的想法，心情有点兴奋但相对坦然，能获准参加这次竞赛已很满足，我们知道众多国营大企业设备精良，技术力量雄厚，高手如林，能参与其中，了解一些外面的世界，对提高我们的技术水平是极为有利的。大约过了十天左右，省机械工业厅来了开会通知，要求消防机械厂派 1-2 名代表到重庆钢铁公司参加理化检测行业技术竞赛评比大会。消防厂领导确定由管教干事张邦硕参加，为此我和廖宗祥给她演示了两次化验操作的全过程，逐字逐句讲解了操作规程的要点，她才知道钢铁中几大元素的含量是这么测定出来的。几天后，张干事从重庆回来了，我们总算看到了管教干事竟然露出了一丝笑容，她简述了会议情况，让我们做好准备，重钢的理化室主任说了多次一定要到名不见经传的消防厂理化室来看一看，因为在此次参赛的 38 个企业中，多数是国有大型厂矿，如重庆钢铁公司、重庆机床厂、296 厂、456 厂、791 厂、132 厂（以上四个都是大型军工企业）、成都无缝钢管厂、成都量具刃具厂等都是近万人的知名企业。消防厂的理化室只有两个人，设备很简陋，分析方法最简单，化验准确度居第七名，引起了与会人员的高度关注。我和廖宗祥听了以后，多少感到一点欣慰，我们的劳动成果总算得到了社会的肯定。今后重点研究简易快速的分析方法，争取有所突破，给劳教人员争口气。这次大比武盛会以后，厂领导认为理化室给消防厂争了光，对我和廖宗祥曾给予口头表扬，大概也在劳改系统内做了一定的宣传。逐渐地有些单位送样品来委托分析。于是理化室不仅承担了本厂的分析任务还开始承接外单位的劳务委托，为消防厂挣些劳务费，用做理化室的日常开支。

（七）摘掉右派帽子

1961 年 12 月 22 日，冬至那一天，好像是星期五（劳教人员和解除劳教人员十天休息一次，只记得十号、二十号、三十号，几乎没有了星期的概念），下午六点钟，刚刚下班，还没有走出理化室的小院，有人转告管教干事的通知，说是七点钟在干部食堂开会，让我务必参加。我寻思着又出了什么事？通常很少在干部食堂开会呀！

我拿上碗筷到劳教食堂打了饭菜，回到理化室旁边那间 5 平方米的小屋里，慢慢地吃晚饭，然后又喝了一大碗热开水，增加一点饱足感，叫做“饭不够，水来凑”。

六点五十五分我离开那间小屋，锁上门，朝干部食堂走去。进门一看，稀稀拉拉的几个人坐在饭桌旁边的凳子上，相互点了个头，大家都不知道要开什么会，流露着几分莫名其妙的神色。

大约七点十五分，管教科的周以贵科长嘴里叼着一根烟卷进来了，他巡视了一遍食堂里的人，只有六个，说了一声：“来齐了”，跟着说：“你们六个，从宣布之日起解除劳动教养、摘掉右派帽子。每人准备两张一寸的证件照，到管教科办理出门证。”他说话的时候面无表情，态度冷漠，好像有人欠了帐还没还清似的。然后又讲了一大堆套话，什么这是党和政府对你们的宽大，并不意味着你们已经改造好了，不需要改造了。从明天起你们作为就业人员，更需要加强改造，一言一行都要严格要求自己……要给劳教分子起示范作用……坐在屋里的这几个人各有各的想法，谁也没听他那一套。

宣布解除劳教、摘掉右派帽子就这么简单呐，没有一张通知书，也不用签字画押，甚至不用一个一个地喊名字，就凭周以贵一张嘴，“你们六个”头上的帽子一股脑儿就没了？这是真的吗？我不由自主地摸了摸本来就没戴帽

子的脑袋，挠了挠头发。似乎还真有点凉飕飕的感觉。这时候周以贵喊了一声：“散会”。

当天被宣布摘帽子的除了我之外，还有何文清、章计然，以及另外不太熟悉所以没记住名字的三位难友。只有何文清比较激动，周以贵刚刚出去，她就对我说：“牛立华，你有烟没有？”她是四川体育学院的学生，1957年的时候也就二十一二岁，不知道为什么划成了右派，平时很少接触，作为一个女士她是不吸烟的，看来今天她太兴奋了，找不到其它的刺激方式，竟然想吸烟了。我连忙回答说：“有烟”，并邀请她和其他几位一起到化验室小院坐一会儿，时间还早，也就七点半，九点钟才下学习，总不能在干部食堂摆龙门阵吧，这可是劳教分子和就业人员不能轻易进入的地方，似乎是白虎节堂，坐在那个地方总有一种很别扭的感觉。

大家随着我到了理化室，我拿出烟来招待吸烟的朋友，打开电炉烧开水，没有茶叶，只能以白开水待客了。那时候纸烟属于紧俏物资，凭证供应，普通老百姓每人每月大约供应四包劣等纸烟，一毛五分钱左右一包，牌子多半是“都江”“金叶”“草堂”等成都卷烟厂出品的“名牌”。我平时是不吸烟的，为了不致浪费票证的使用权，还是买回来，原价转让给别人，为烟瘾大的难友们准备一点粮草，不料今天派上了用场，我也陪着大家吸了一两支，除了头晕以外没有享受的感觉，还惹得一阵咳嗽。

大家坐在理化室的凳子上好像才从梦里醒来似的，打开了话匣子。

一位难友操着四川话说：“格老子，怎么解除劳教连一张纸飞飞都没得呀？关了三年多，一句话就算放了嗦。”

我说：“你有被放了的的感觉吗？我怎么找不到这种感觉呢？好像还是在笼子里呢”

另一位说：“明天找管教科要，总得有个手续嘛，”

我说：“送我进来的时候就没有书面依据，没有判决书也没有通知书，我没签过字，现在解除劳教也没有履行任何手续，我估计当时定的是三年，现在多关了五个多月。”

章计然说：“摘了右派帽子，换了一项就业人员的帽子，只要还在劳改队里，就还是专政对象。这项就业人员的帽子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摘掉？”

另一个人插话说：“耍杂技的帽子戏法，手了拿着三四顶帽子，换来换去的来回戴。”惹得大家笑了起来。

大家七嘴八舌的摆了一会儿空龙门阵，虽然感觉摘了帽子是个喜事，但是前途渺茫，难以预测，高兴不起来。临近九点，大家各自回自己的宿舍了。

第二天我照常上班，因为铸造车间昨天下午才送来的样品还没有化验呢。

第三天上午，我向主管干部黄季夏请假说：“黄干事，我今天要出去一会儿”她以惊讶的目光看着我说：“你要出去？上哪儿去呀？”看来她还不知道我已经被宣布解除劳教的事，劳教分子要出去，是一种非分的要求。我只好直说：“我摘帽子了，需要照片，办理出门证”她看着我，眼睛一亮，随即说：“哦！好，马上走”。她带着我跟门口的值班武警打了招呼，一起走出了戒备森严的大门，她往另一个方向去了，我到总府街一个小照相馆照了一份登记照。

摘了帽子和不摘帽子有什么区别呢？

戴着右派帽子继续劳动教养的叫做劳教分子，按照中共中央制定的政策，凡是没有判处管制的都有公民权，这个公民权可不是宪法上说的那个集会、

结社、言论等自由，只是在选举“区人民代表”那一天，给一张选票，让这些有公民权的劳教分子，在选票上画个“○”，这些选民，既不知道被选举人是干什么的，也不知道被选举人长得什么样儿，是瘸子还是瞎子？一问三不知，甚至连问都不敢问，画个圆圈就算完成了公民任务，只消几分钟的时间，如果动作迟缓，旁边还有管教干部催促：“快点，快点”。几年一次选举，享受了几分钟的公民权，立即恢复成为专政对象，继续关押在劳改队，严禁离开劳动场所和指定的活动区域。来往信件、包裹均需检查，严禁私自写信。1961年每月有生活费十九元，在劳教食堂吃饭，劳教宿舍睡觉。

解除劳动教养仍然戴着右派帽子的叫做戴帽就业人员，发一张贴有照片的出门证，但是由于干部保管，平时不准出门，周末下午下班以后经主管干部批准，拿到出门证，可以出门，近处有家眷的可以回家住宿，第二天下午必须回厂。生活费也是每月十九元，在就业人员食堂吃饭，就业人员宿舍睡觉。选举待遇和没有剥夺公民权的劳教分子一样。

解除劳动教养摘掉右派帽子的叫做无帽就业人员，选举待遇和生活费与上述两类人员没有区别。只是每天下午下班以后可以无需向管教干部请假凭出门证出入大门，七点钟以前必须回来参加晚间学习。周末近处有家眷的可以回家留宿。其余时间也是严禁外出的。

简而要之，这三类人员的区别是：劳教分子即使保留了公民权也绝对不许出大门，戴帽就业只有星期六下班以后和星期一经主管干部批准才能够出大门，无帽就业人员每天下午下班后和星期日均可凭出门证出大门。其余待遇基本一致。

我解除劳教、摘掉右派帽子还不到一个星期，管教科副科长张育新找我谈话。谈话地点在他的办公室，他坐在办公桌后面，我在他对面的一把椅子坐下来。

他先说话：“党和政府给你摘了帽子了，你是怎么想的呢？”

我说：“我没什么想法，干好工作就是了”

他说：“人家摘掉帽子对党和政府感恩戴德、感激涕零，你好像是无动于衷，麻木不仁，这是为什么？”

我回答说：“我本来就不该戴这个帽子，因为我从来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想和行为。就好像不该挨打，突然被推翻在地打得皮开肉绽，打了四年多，打累了，不再继续打了，让我感谢谁呢？感谢打我的人吗？我平白无故的挨了一顿打，屁股还在疼呢，怎么感谢呢？”

他摇了摇头，不知道说什么了。

接着他问：“你们摘帽子那天，几个人到理化室干什么去了？”

我猛然一惊，是谁汇报了那天我们几个抽烟、喝水的事？幸好没说过激的话。

我回答张科长说：“那天周科长宣布给我们摘帽子的时候，连着抽了两支烟，那烟味儿有点刺激性，勾起了人们的烟瘾。何文清很兴奋，想抽一支烟，问我有没有，我才请大家到我住的那间房子聚会了一个小时左右，抽两支烟，喝点水，摘帽子了，高兴了嘛，也算是感谢党和政府吧”，“要是有了酒就好了，该举杯相庆，可惜没有特殊供应证，买不到”，“几年都不知道酒是什么味儿了”。“抽两支烟，庆祝解除劳动教养，不算犯错误吧？”

张育新没有再说什么。

四、彷徨的 1962-1964 年

1957 年夏季，一个刚刚交了入党申请书的共青团员，响应“伟大领袖”毛泽东的号召，相信毛泽东说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是真话。在党总支书记主持召开的长江电工厂冶金科批判右派分子座谈会上，心平气和地用了不到十五分钟时间讲了一些个人看法。竟被叫做“猖狂向党进攻”并由此戴上了右派分子帽子。被列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推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在劳动教养场所关押到 1962 年 12 月 22 日，经有关部门确认改造好了，予以解除劳动教养、摘掉右派分子帽子，但仍被拘押在劳动教养场所，尚未取得普通职工的名分，被叫做就业人员，按公安部规定划归三类人员（劳改犯、劳教分子、就业人员）之列。从开始戴右派帽子到摘掉右派帽子，历时五年有余，据说是回到人民行列了，但在这高墙大院里仍然被视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吃饭在就业人员食堂，睡觉没有床，两百多人挤在大约 360 平方米的地铺上，就是拉屎撒尿也和干部严格分开，各有各的厕所，严格划清界限。据说这就是“夹着尾巴”做人了。沦落到如此地步，是我真的犯了什么罪吗？我无论怎么检查，怎么深挖犯罪根源，既没有罪恶动机，也没有不良后果。始终找不到一丝一毫向党进攻的蛛丝马迹。历经五年多强制改造，看看周围的同伴，众多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没有一个是心服口服的。但在枪杆子底下，只有委曲求全，谁让我们都生在这个时代了呢。想来想去，虽然白白耗费了几年光阴，往日不堪回首，来日犹可追。我还年轻，通过自己努力，总能在社会上找到一个存身之地，我从来没有政治野心，技术上总还能有个出路吧。在太原机械学院读书的时候，用的课本都是苏联的大学教材，古里亚耶夫编著的《金属学》，康托罗维奇编写的《钢铁热处理》，开篇讲的都是俄国和苏联在金属热处理方面的巨大成就。这对于苏联青年来说，或许有利于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启迪。对其他国家的学生似乎没有多大用处。譬如：我国明朝学者宋应星所著《天工开物》一书载有“钢铁业经炉锤，其质未坚，乘其出火之时入清水淬之，名曰键钢”“又闻，夷人以地洩淬刀剑者，云可切玉”均为有关钢铁热处理的论述。我国考古学家曾发掘出越王勾践所用之剑，出土之际，明可鉴人，刀锋犀利。宋朝沈括《梦溪笔谈》载：“钱塘闻人绍，一剑削十大钉皆截，剑无纤迹；用力屈之如钩，纵之铿锵有声，复直如弦。古之所谓灵宝剑也。”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周礼·考工记》中有“金有六齐，六分其金，锡居其一，是为钟鼎之齐；五分其金，锡居其一，谓之斧斤之齐；四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戈戟之齐；三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大刃之齐；五分其金，锡居其二，谓之削杀矢之齐；金锡半，谓之鉴燧之齐”的记载。均为我国古代冶金技术堪称卓越之纪录。惜清朝末年，国势渐衰，贪官污吏横行，黎民百姓受难。中共 1953 年就曾提出过“向科学进军”的口号，我当时激动了一阵子，除了学好正课之外（多次荣获优等生奖状），还加强了外语学习。专业课老师是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理学院硕士，1951 年放弃了继续深造攻读博士的机会，回国参加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带回了一些英文科技书刊，我为了能看懂老师带回来的书籍，课余自学英语，不料却被批评为具有崇美思想，吓得陈铭谟老师不敢再拿出英文书籍，还连忙向我打招呼让我不要再学英语。于是改为专攻俄语并开始学习翻译技巧，试着翻译俄文小册子《淬火感应器》。毕业分配到长江电工厂后，从 1955 年起继续提高阅读俄文资料的能力，1956 年兵器工业部指定长江电工厂生产硬质合金，当时株洲的硬质合金厂尚未建成，缺乏技术借鉴。我曾打算翻译俄文版的《硬质合金》一书，却因被打成右派而无法进行。投入劳教后，失去一切自由，

在高墙大院内，除了做好本职工作外，还坚持学习外语，勉强可阅读英、俄、日文专业技术资料。1961年解除劳教、摘掉右派帽子后向四川机械工程学会主办的刊物《四川机械》投寄《淬硬钢的磨削损伤问题》《某些水溶性淬火液的冷却特性》《淬火液的温度与淬火裂纹》等论文和译述均获发表。当机械工程学会召开年会之际给我发来了通知，消防厂不准我参加。同年中科院西南分院力学研究所办了一个硬度计实用技术培训班，印有讲义。当时我正在依据苏联才出版的两本硬度计的专著和美国早期出版的《硬度试验法》等编译《硬度计的使用与维修》，（当时我国硬度计的使用已很普遍，但还没有一本讲述硬度计使用技术的中文专著）

于是携带部分初稿到地处成都水碾河附近的中科院西南分院，请他们审阅。接待者是晏祥玉和易林英两位研究员，他们十分热情并表示送北京力学所薛正平总工程师审阅。我当即表示若能够出版，可以不用我的名字，我也不要稿费，实在是想填补现在中国还没有一本硬度计专著的空白。过了十几天，我再次去水碾河，他们告诉我，薛总看了初稿评价较高，建议尽快出版。我明确地告诉他们摘帽右派出版困难，我只提供素材，以他们的名义出版为好，他们表示可以研究。当时我的想法是只要把书出了，我不图名不图利，但必定会引起专业人士注意改善个人处境，争取离开专政机关，做一个普普通通的公民，靠本事吃饭。回到消防厂后，我立即向管教干事张邦硕汇报了全部经过，并请她到中科院西南分院进一步了解。一周后，他和我一起到了水碾河，避开我不知道说了些什么。从那一天起我再到中科院连办公室都不准进了，只能在传达室说两句不痛不痒的话。

我反复地想，中共公开发布的政策说对右派分子没有剥夺公民权，实际上，摘掉帽子三年多仍然视为专政对象。前思后想，中共事无巨细皆为谎言。对一个热爱祖国，憧憬社会主义的没有丝毫犯罪行为的青年强加一顶右派帽子，不经法律程序，无需法律依据，关押了七八年，还要专政，究竟是为了什么？难道做一辈子奴隶就是毛泽东说的“给出路”。残忍的魔头希特勒对犹太等民族施行灭绝政策，对本民族同胞还没有下此毒手，毛泽东掀起的“反右派”运动，无论说得多么义正辞严，多么理由充分，实际上是对知识分子的绞杀。他要的只是驯服工具，是奴才和奴隶。一旦戴上右派帽子似乎一辈子都是奴隶。公开宣布的政策说右派分子有公民权，劳教是行政处分。实际执行的却是无限专政。摘掉帽子三年了看不到一丝光亮，从灵魂到肉体从形式到内容还是专政对象。我没有政治野心，只想在我热爱的专业方面有个存身之地，对共产党的政权没有丝毫损害，竟然被捆得死死的，动弹不得。难道要做一辈子贱民吗？

1964年全国展开了“四清运动”。在劳教单位则是人人检查、暴露真实思想，过好“社会主义改造”关。我写了一份检查，开宗明义第一句话说我不翻案，不因为个人问题否定伟大的政治运动，并说明五七年的后果是我自己造成的，不把责任推之于党。只希望党了解我在长江电工厂的表现，了解五七年鸣放的真实情况，我没有任何推翻共产党的预谋和行为，也没对党造成任何损害，仅仅在党支部组织召开的座谈会上发了几句言就被戴个右派帽子劳教三年多。希望在摘掉帽子三年以后得到党的理解和任用，或者说谅解和宽恕。允许我真正回到人民行列，做一个普通公民。四清运动本来是要人人过关的，我这份检查交上去以后，既未在小组会上宣读，也没有任何批判，对我说来四清运动就是擦肩而过，不了了之了。

五、1965-1966 年的思考

1965 年 1 月 1 日,《人民日报》照例刊登元旦社论,题目是《争取社会主义事业新胜利的保证》全是不着边际的空谈(写作途中,我从百度网上又查阅了几次原文,满篇近乎梦呓,没有一句实话。有兴趣的读者可以从网上查阅。)1964 年,三年困难时期刚刚熬过,才吃了几顿饱饭,进入 1965 年,一年之计在于春,令人不禁想未来怎么办。古人云三十而立,我从五七年起被以凭空捏造的罪名戴了个右派分子的帽子,不经司法程序,不经核实,不容申辩。据说是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给点儿行政处分,实际上是关押在劳改局所属的劳动教养支队,剥夺一切公民权,(连公民最起码的与家人通信的自由也没有,所有往来信件均须经管教干部仔细检查)在枪杆子底下无偿劳动,如今已经七年有余,虽然表面上摘掉了右派帽子解除了劳动教养,但还在劳教支队的管教干部看押下劳动,称为就业人员(中共体制下对劳改期满释放人员和解除劳教人员的专用术语),连普通职工的名分都没有,绝不同工同酬(1956 年我的工资是 69 元,劳教期间和解除劳教三年每月只发生活费 15 元和 19 元。直到 1964 年才调整到每月 41 元,只相当于 1956 年工资的 60%),从精神到肉体从形式到内容仍被视为专政对象,还看不到一点儿出路。我的要求不高,仅仅是依照法律规定做一个自食其力的普通公民。由于这顶右派帽子,委曲求全忍辱负重七八年,竟然还被置于牢笼之内。当时甚嚣尘上的革命口号是:“把他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莫非这就是毛泽东思想?我弄不明白,于是便认真读《毛泽东选集》。不料越读越糊涂,毛泽东说的条条是道,实际上却都是反其道而行之。于是我在触及灵魂的文化大革命初期向当时的消防机械厂厂长张志超(曾任过四川某法院院长)汇报了真实思想,以求解决疑问。

我说:为什么党把一些没有反党思想和行为的人非要打成反党、右派分子不可呢?据我所知,凡因被划为右派送劳教的人没有一个是心服口服的,他们都有缺点和弱点,有的还说了一些错话,但都没有达到反党的程度。却都被认定为向党猖狂进攻,劳教几年委曲求全,摘了帽子还被列为专政对象,实在想不通。满腹冤屈无处诉,续日持久得不到解决,是潜在着的不安定因素。毛主席说的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何时才能够兑现呢?

我还说:1958 年《人民日报》配发了社论《为什么要实行劳动教养》,谈及对劳教分子的处理时明明白白地写着**“对他们同样实行按劳动成果给工资报酬的原则”**。实际上,进了劳教单位不管从事什么工作,每月只发 15 元生活费(含伙食费、服装费、生活必需品等所有费用)摘了右派帽子解除了劳教还是每月 15 元,1963 年因物价上涨才增加到每月 19 元。我 1956 年经国家机械委核定月工资 69 元,到了劳教队从事工作的难度更大,单独创建两个理化分析实验室要参与热处理技术工作和承担热工设备设计和绘图,直到 1964 年才拿 41 元。这是**“按劳动成果给工资报酬”**吗?毛主席说:**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我只希望能够认真执行毛主席的最高指示。

张志超当时既未明确解释也没有严厉批评。只鼓励我好好工作,展望未来。直到进了劳改队几年之后,经历了文革浩劫我才渐渐地明白毛泽东从来没说过真话,他凭借的就是暴力和谎言。

六、回过头来看劳动教养

(1) 劳动教养的由来

许多人都知道二战中德国的“集中营”，前苏联的“劳改营”。其实，中国的“劳动教养”在折磨虐待、草菅人命、无视法律和践踏人权等方面，比起前二者来，都有过之而无不及，乃至更具有特色。应该有所记录。

探本溯源，中国的“劳教”是从前苏联学来的。1924年10月，前苏联制定了苏俄第一部《劳动改造法典》。1933年8月，又通过了第二个《苏俄劳动改造法典》。《法典》规定劳改分为：“劳动改造营”、“监狱”和“劳动教养营”三种形式。当年中国共产党“一边倒”学苏联老大哥的时候，对苏联的既定法律并没有全弄明白，只顾照搬；“劳动教养”听起来容易使人概念模糊，误以为是比“劳动改造”更轻的处罚。实际上，前苏联的“劳动教养”是收容未成年人和女性的，在劳动强度、休假、学习、收入等方面和中国的“劳动教养”差异颇大。中国只是用了“劳动教养”的“名”，干的却是胜过“劳改”的“实”。

中共建国后，早年名为联合政府，实际上是一党专政。中国共产党都是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布重要文件。对于“劳动教养”，起初还“犹抱琵琶半遮面”，未予公开报道，知情者不多。对于这类文件的内容，即使相关的机构，也知之甚少。

中国的劳动教养始于1955年8月，一开始近乎秘密状态，既没有经过人大讨论核准，也没有经过国务院颁布条例，中共中央发了一个《关于彻底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指示》红头文件，在全国公安系统内立了项。但是没有具体的执行细则，也没有落实资金，实际上处于准备阶段。仅仅隔了四个月，1956年1月10日，中共中央绕过政府机构迫不及待地再发红头文件《关于各省、市立即筹办劳动教养机构的指示》。看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有新的战略部署，准备大量关押人了。

公安下属相关行政部门心领神会、闻风而动，迅速建立了遍布各省、市的劳动教养场所。初期收容人数不过十万，对外仍未声张，也未见公开报道，劳动教养在中国共产党的一手操办下，阴悄悄地开张了。

到了1957年，毛泽东的“引蛇出洞”计划从酝酿渐进到实施，他深谋熟虑，未雨绸缪，预见到要有一大批人，将被阴谋或阳谋诱惑到他设定的包围圈里。虽然他的终极目的是想把这些人一网打尽，恨不能一个不留。但是又担心人们一下子看穿他的残暴本性，需要遮人耳目。于是借鉴斯大林的做法，大造劳改营，以各种名目把他视为心腹之患的人长期关押起来，用剥夺自由、摧残自尊、磨灭人性，侮辱人格、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等间接手段达到消灭其肉体的目的。

当时劳动教养场所布局已大体完成，不明不白地关押了十余万人，只不过全都是共产党包办的，没有通过政府。

1957年，毛泽东的阴谋阳谋渐行显露。即将进入牢笼的右派分子主要是民主党派、机关、学校、人民团体和政府机构中的知识分子，或多或少地知道些法律常识，不经由司法机构而由共产党径直下令建立劳动教养场所，关押上百万人，岂不是让毛泽东明知就里却讳莫如深的“党天下”昭然若揭。

1957年7月18日，毛泽东耳提面命，“要搞个劳动教养条例，除了少数知名人士之外，把一些右派都搞去劳动教养。”

周恩来言听计从，不敢稍有怠慢。8月1日公布《劳动教养条例》；8月3日国务院就下达了《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

这个《决定》里并没有写明“右派”二字，但明眼人不难看出，第一条

第二款所谓“罪行轻微，不追究刑事责任的反革命分子，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受到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等单位的开除处分，无生活出路的”，指的就是右派分子。《决定》宣称：这些人都是“应当加以收容实行劳动教养”的。

8月4日《人民日报》公布这个《决定》时，配发了社论《为什么要实行劳动教养》，对这一措施作了解释：“对于这些坏分子，一般地用说服教育的办法是无效的（既然毛泽东思想战无不胜，怎么连改造几个坏分子都无效呢？）；采取简单的惩罚办法也不行；在机关、团体、企业内部也决不能继续留用；让他们另行就业又没有人愿意收留他们。因此，对于这些人，就需要有一个既能改造他们，又能保障其生活出路的妥善办法。根据人民政府长期的研究和考虑，把他们收容起来，实行劳动教养，就是最适当的也是最好的办法。”

社论还说：“劳动教养同劳动改造罪犯是有区别的，它同救济鳏寡孤独的教养院也不相同。”划了两条分界线。劳动教养跟劳动改造罪犯有什么区别呢？社论说：“劳动教养管理机关必须制定一套带有强制性的行政制度和纪律，不能允许被劳动教养的人破坏这些制度和纪律。例如不准他随便离开农场和工厂而自由行动，不准破坏公共秩序，不准破坏生产，否则就要受到处分，情节严重的还要受到法律制裁。”

这些，跟判处了徒刑的劳动改造有多大差别呢？都是在剥夺了人身自由的情况下，在警戒线之内，在枪杆子监管之下强迫劳动，实质上没有很大的差别。

社论中“情节严重的还要受到法律制裁。”这句话颇值得玩味，即当时被劳动教养的还够不上情节严重，没有经过法律程序，还不叫做受到法律制裁。后来的事实表明，这一未经法律的制裁竟然持续了二十多年，超过了有期徒刑的最高年限（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四十九条、第五十条、第六十九条规定，有期徒刑最高不能超过二十年），这个罪行轻微，不追究刑事责任的劳动教养比刑法规定的法律制裁还厉害得多。毛泽东要是不死，可能现在还制裁着呢。

1956年1月10日，中共中央就奉毛泽东的指令发布了《关于省、市立即筹办劳动教养机构的指示》，强调：“把肃反中被审查，不够判刑的反革命分子、坏分子、政治上又不适合留用的，把这些人集中起来，送到一定地方，让他们替国家做工，自食其力。并对他们进行政治、思想的改造工作。”实际上这是共产党取得政权后，依照前苏联实行的那一套，把大大小小给前政权工作过的人员和一部分政治犯、政治上认为不可靠者，集中管理起来。这和斯大林在西伯利亚、中亚等边远、荒芜地区办的“流放劳改营”是一脉相承，根本没有什么两样。

接着，中共中央又在《转批中央十人小组关于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的解释及处理意见的政策界限的暂行规定》文件中规定：“某些直系亲属在土改、镇反和社会主义改造中，被杀、被关、被斗者的家属……可送劳动教养。”这样就明文确认了“株连”有理，把一些无辜的人都送去“劳动教养”了。到了1957年，毛泽东预谋的反右得以实施，以言定罪的歪风骤然兴起、以思想定罪的邪气冒然流行。于是“劳动教养”成了毛泽东维护独裁专政、镇压人民、扼杀民主的工具。正如马克思说的：“惩罚思想方式的法律，不是国家为它的公民颁布的法律，而是一个党派用来对付不属于其党派的法律”

(《马恩全集》第一卷,第16——17页)。

1957年7月,毛泽东甚为得意地玩弄他蓄谋已久的反右“阳谋”,在青岛全国省、市委书记会上,他一边布置反右,一边开始策划处理右派的办法。他说:“把一些右派搞去劳动教养……搞裴多菲俱乐部的教养他一二十年。”此话出口不久,8月3日,国务院紧接着就发布了已经准备就绪的《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1]。这就是以国家的名义,正式推行“劳动教养”这个非法之法的开始。谁都知道这个《决定》完全是针对“右派”的!

《决定》一开始,就堂而皇之地说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00条的规定,为了把游手好闲、违反法纪、不务正业的有劳动力的人,改造成自食其力的新人,为了进一步维护公共秩序,有利于社会建设,对劳动教养作如下决定……”

乍看起来,这个《决定》似乎振振有词,是根据国家根本大法——《宪法》制定的,其实它和《宪法》毫不相干。《宪法》第100条的内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劳动纪律,遵守公共秩序,尊重社会公德。”这一条跟《决定》所谓的《宪法》第100条,文字上迥然不同,《决定》是偷梁换柱后篡改了的内容以及毛泽东强加于“右派”的所谓罪名,风马牛不相及。他们从宪法上找不到相应的条文,也不能自圆其说,就硬着头皮,不顾违宪,擅自用《决定》去篡改《宪法》,在《决定》中写上了宪法100条所没有的文字。他们说这是为了给“不追究刑事责任的反革命分子,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受到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等单位的开除处分,无生活出路”的人一条悔过自新的出路。试问,世界上哪个国家有不经法律程序,不予审判又不容申辩即长期关押的所谓出路?实际上,他们在给别人罗织罪名的同时,却在犯着“篡改”宪法的重大罪行!如果国家根本大法可以听命一个人“篡改”,这《宪法》的存在还有什么意义?难怪中国没有设置宪法法院和宪法维护委员会一类的机构!

这个《决定》是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名义公布,并刊载于《人民日报》1957年8月4日第一版上的。周恩来篡改宪法的罪责难逃,必须彻底揭露其伪善面孔。

仅仅是根据篡改了的《宪法》第100条的内容颁布的《决定》,在1958年,就把数十万“右派分子”投入了劳动教养。他们被流放到边远、荒漠之地,在那里忍饥饿、服苦役,每天要劳动12-14个小时。作为知识分子干部、教师、大学生、工程师和各类专业人才,被扣上“右派”帽子后,每天都得接受只有初中甚或不够小学程度的管教人员的“教育”和“改造”。整天不得不谛听喋喋不休的呵斥、谩骂、和训话,口口声声要大家“低头认罪,接受改造”。在劳教过程中,由于超体力劳动和饥饿,致使甘肃夹边沟劳教农场3000多右派分子,大多数因为饥寒交迫而死亡,没饿死的只剩下600多人。死者中有不少学有所长的专门人才。傅作义万没有想到他的堂弟傅作恭,也在夹边沟送了命。北京最大的劳教农场茶淀农场、兴凯湖农场,饿死的右派分子也以万计。著名翻译家、美学家吕荧,只因为在批判胡风的大会上说了一句:“胡风不是反革命”,就被发配到茶淀农场活活饿死。这位著名翻译家死前已经被改造得骨瘦如柴,衣衫褴褛,盖的被子成了一团破烂棉絮,破棉絮里生满了吸人血的虱子和虻子。这就是所谓的“行政处分”?这就是中国式的“劳动教养”?难道这些被饿死的右派分子都是“罪所应该”吗?对于这些被“行政处分”饿死的人,共产党讲过半句负责的话吗?表示过半点儿

给予赔偿的意愿吗？这些已经被揭露出来的事实，对全国被劳教的右派分子来说，只不过是一鳞半爪，其他没有被揭露出来的，在“宜粗不宜细”的理论下，都被掩盖起来了，又有谁能做出精确的统计呢？

据说，1957年前，全国被劳教的人数只有几万人。1958年，《决定》一声令下，仅仅一年的时间，又赶上当时的“跃进”狂风一吹，全国立即建起一百四十二个劳教场所。在那个疯狂的年代，有的地方大搞县办劳教、社办劳教，乃至生产队也办劳教。大大小小的共产党头儿，想抓谁就抓谁。全国劳教人数很快就收容到了超过百万。1961年，公安部不得不承认：“**扩大了收容范围和收容对象，错收了一批不够劳动教养的人，在管理上和劳改犯等同了起来，生活管理和劳动生产上搞了一些超体力劳动，造成了劳教人员非正常死亡的严重现象。**”拐弯抹角，轻描淡写，避重就轻地道出了一星半点儿真实。尽管发现了严重的饿死人现象，但没有一个人敢说一个不字，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走向死亡！

在劳动教养中，最为恶劣的是“教养”没有期限。同时，却又可以随心所欲地确定期限。1958年被送到茶淀农场的右派，到了1961年底，已经被劳教了三年多，有少数人已经第一批摘了帽子，农场却对大批没摘帽子的右派宣布：“以前教养多久不算了，现在有了期限，重新开始，教养期有的一年，有的二年，有的三年……。”这是“法规”还是“玩笑”？从形式上看，有了期限，有了盼头。实际上期限到了，却又编造种种借口，只解除劳动教养不摘右派帽子，依然是专政对象。这叫什么“法规”！？

有的右派分子已经第二次重新确定教养期为：二年，三年，但一直拖到文化大革命，全国都乱了套，共产党光顾了争权夺利、勾心斗角的全国大斗争，早把服了十几年苦役的几十万右派扔在一边，谁还管你教养了多少年的事？大批被处以劳动教养的右派分子就一直拖到1978年，毛泽东死了两年以后，才陆续落实“改正”政策。整整熬过了长夜难眠的二十一二个春秋！难道这也算国家最高行政机关在实施自己公布的“法规”？世界历史上有过这种“拿人不当人”的“法规”吗？除了德国的“集中营”和前苏联的“流放劳改营”之外，还有哪个国家是如此践踏人权，妄加罪名，搞“刑期无限”的呢？

自从1958年以来，这个劳教《决定》不受法律制约，在全国广泛实行，一直过了22年，当权者觉得实在不像话，才又通过人大的议程形式抛出个《补充规定》。说是：“劳教可以一年至三年，必要时延长一年。”作为全国最高权力机构的人大，这些吃着纳税人供养的所谓“公务员”，经过漫长的二十多年才作出这样一个过时的、走形式的规定，堂堂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这样制定“法规”的？这点儿工作，人大费时22年，该不该算作“不作为”？如果劳教了22年的右派问他们：“我们超期劳教22年算怎么回事？”他们肯定无言作答，死皮赖账了！

1978年，中共中央给错划为右派分子的人落实“改正”政策，当时没摘帽子的右派据统战部说有二十多万，摘了帽子的也有二十多万，大都还在劳教农场，一直被劳动教养或变相劳教着。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40条规定：“有期徒刑的期限，为六个月以上，十五年以下。”这就是说，对于众多被错划右派劳教了二十一二，刑期竟然仅次于“死刑、死缓、和无期徒刑”！这种所谓“行政处分”竟然比“刑事判决”还要厉害得多。这就不得不使人困惑：劳动教养究竟算个什么“法规”？能够制定出这样的“法规”

的国家，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呢？

后来才听说，封建王朝统治时期的“流放”、“充军”、“发配”等惩罚，实际上就是“刑期无限”。“劳动教养”的无期，是不是封建王朝传承下来的？可是，说“行政处分”的是社会主义国家，又没有说它是封建王朝。我们国家究竟算什么社会制度呢？求教高明，谁能解释得清楚？林冲遭人陷害误入白虎节堂，发配到河北沧州，还能结拜鲁智深，在菜园习武，到集市沽酒。在中共操控下的中国，据说是行政处分的劳教人员，手持兵器误入国防部，会遭到怎样的处理呢？

再者，《决定》的第二条有这样一段话：“**对于被劳动教养的人，应当按照其劳动成果发给适当的工资；并且可以酌量扣出一部分工资，作为其家属赡养费，或者本人安家立业的储备金。**”但是那些服了二十一年苦役的右派分子们，谁也没有见到一文这样的所谓“储备金”。究竟是国家最高行政机关国务院说话不算数？还是被什么人贪污了？还是被什么人挥霍了？你要去问，共产党也好，国务院也罢，都好像没长嘴巴，连个屁也不敢放！

从1958年公布《决定》，到1978年侮辱右派告一段落，《决定》的施行说明了一个真相：劳动教养实际上是赋予了每个单位的负责人以一种特权。他们可以不受法律的制约，仅凭个人的意愿，就可以为所欲为地把本单位中认为不顺眼的人，送去劳动教养。这完全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大大有利于某些当权者，借以整治他们随心所欲想收拾的人。这种法规助长了当权者的肆意横行，助其得以任意惩罚百姓。对于弱势群体来说，这是一种伤害他们最深的恶劣罪行。

历史毕竟在前进，随着毛泽东逝世，国家对于被劳动教养了几十年的群体也作了些许“清理”和“安置”。但一个始料不及的问题应运而生，社会上遍地冤、假、错案，又不能有效解决，形成了大量上访者的“上访潮”滚滚而来。由于信访机构设置不合理，党和政府各有一套，两套班子又各行其“是”，都不能解决实际问题。致使上访材料被层层转了下去，最后，把“状子”都转到“被告”手中。于是形成了告状——报复——再告——再报复的恶性循环。（河北省检举大贪污犯程维高的检举人就曾被投入劳动教养农场数年之久。）人民的实际问题得不到解决，上访的人越来越多，而政府又不体察民情，改革机制，为民撑腰，依然是“状子照转”，所以许多违法乱纪的事情层出不穷，如同滚雪球一样，冤案之上又加冤案。鸣屈喊冤者日见增多，地方官员颇为烦恼。于是，“劳动教养”又成了收容“上访者”的一种手段，许多上访者陆续被关进了劳教所。

几十年来，实行劳动教养，其中一个最不切合实际的歪理就是“把他们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说它是歪理，因为被拘押者本来都有自己的生产、生活能力，而被强制关押以后，才被迫失去了原有的生产、生活条件。硬说他们以前不是“自食其力”，实在是“有权者”迫害“无权者”的不讲理说词。不管它合理不合理，反正只有“有权者”给老百姓定罪名的权力，而老百姓没有任何辩解的权利。

要送人去劳动教养，事先就得把这些人集中起来，便于集中遣送和安置。这种集中地就是所谓的“收容所”。

1980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将强制劳动与收容审查两项措施统一于劳动教养的通知》。1982年，国务院转发了公安部《劳动教养试行办法》（国家最高行政机关国务院1957年就正式颁布了《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而

且已经实行了 24 年,却又被它的下属机构——公安部又一次决定要“**试行**”,这简直滑天下之大稽!)办法针对的对象是:“家居农村而流窜到城市、铁路沿线和大型厂矿作案,符合劳动教养条件”的人,这就给农民进城者立了一条规矩。所谓“符合劳动教养条件”,那就是当权者的一句话。说你符合,你就符合!

1986 年,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17 次会议通过了《治安管理处罚条例》。1990 年 12 月,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17 次会议通过了《关于禁毒的决定》。1991 年 9 月,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21 次会议又通过了《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把这些法规要处理的吸毒者、卖淫者、嫖娼者、小偷流氓、“符合劳教者”,通通都纳入了劳动教养的范畴。这就大大地扩大了劳动教养的人数。据说,目前全国被劳动教养的人数已达 400 万人,或者已经超过了这个数字。这是多么骇人听闻的数字啊!

2003 年,青年知识分子孙志刚被收容到广州“收容所”。下一步等着他的大概就是到劳教场所进行劳动教养了。意外的是,他在“收容所”被打死了。试问,如果他在天高皇帝远的劳教农场被打死,又有谁知道呢?无辜的青年知识分子孙志刚用一条命,换来了国务院“撤销收容所”的“令”。但“收容所”并不是弱势群体最终的归宿,他们都是要被送到劳教场所的。现在国家的《民法》和《刑法》对各种犯罪行为都有相应的处理条款,但是我们政权机构有法不依,却仍然死死抱住这个超法律、不受任何约束的“劳教决定”不放,别有用心地灵活运用,转而针对农民和弱势群体了。《中国农民调查》一书中反映的事实,着实令人触目惊心。

如果国家真正是:“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话,我们能够允许这种超乎法律之外,类似“集中营”的劳动教养制度继续存在吗?能够让“有权者”用它来对付弱势群体,乃至打击报复向邪恶势力作斗争的人吗?

附注:

[1]《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百条的规定,为了把游手好闲、违反法纪、不务正业的有劳动力的人,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新人;为了进一步维护公共秩序,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对于劳动教养问题,作如下决定:

一、对于下列几种人应当加以收容实行劳动教养:

(1) 不务正业,有流氓行为或者有盗窃、诈骗等行为,不追究刑事责任的违反治安管理、屡教不改的:

(2) 罪行轻微,不追究刑事责任的反革命分子、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受到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等单位的开除处分,无生活出路的:

(3) 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等单位内,有劳动力,但长期拒绝劳动或者破坏纪律、妨害公共秩序,受到开除处分,无生活出路的。

(4) 不服从工作的分配和就业转业安置,或者不接受从事劳动生产的劝导,不断地无理取闹、妨害公务、屡教不改的。

二、劳动教养,是对于被劳动教养的人实行强制性教育改造的一种措施,也是对他们安置就业的一种办法。

对于被劳动教养的人,应当按照其劳动成果发给适当的工资;并且可以酌量扣出其一部分工资,作为其家属赡养费或者本人安家立业的储备金。

被劳动教养的人，在劳动教养期间，必须遵守劳动教养机关规定的纪律，违反纪律的，应当受到行政处分，违法犯罪的，应当依法处理。

在教育管理方面，应当采用劳动生产和政治教育相结合的方针，并且规定他们必须遵守的纪律和制度，帮助他们建立爱国守法和劳动光荣的观念，学习劳动生产的技术，养成爱好劳动的习惯，使他们成为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三、需要实行劳动教养的人，由民政、公安部门，所在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等单位，或者家长、监护人提出申请，经省、直辖市、自治区人民委员会或者它们委托的机关批准。

四、被劳动教养的人，在劳动教养期间，表现良好而有就业条件的，经劳动教养机关批准，可以另行就业；原送请劳动教养的单位、家长、监护人请求领回自行负责管教的，劳动教养机关也可以酌情批准。

五、劳动教养机关，在省、自治区、直辖市一级建立，或者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委员会批准建立。劳动教养机关的工作，由民政、公安部门共同负责领导和管理。

（2）中国施行“劳动教养”的前前后后

中共建国后为了巩固政权，强化一党专政，灭绝原国民党放下武器抑留在大陆上的军政人员，从1950年到1953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镇压反革命运动，逮捕了两百多万“犯罪嫌疑人”，其中被判死刑立即执行七十多万，判管制、戴反革命帽子交群众监督改造的三十多万，判有期、无期徒刑的一百二十多万，还有数十万罪行轻微不够判刑，或查无实据难以处置，但已抓捕又不愿意“释放”的，继续关押在看守所、拘留所内。紧接着，1955至1957年，在全国党、政、军、群、企事业单位开展了内部肃反运动，又有几十万人被逮捕关押，其中多数人只是由于历史问题而没有现行破坏活动，很难判刑。如在肃反高潮中，肃出了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就涉及数千人，多数被长期关押不放。怎么处置这些关在看守所、拘留所里的不能判刑、不够判刑、当局又不愿意释放的人，成了一个难题。

1955年8月，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彻底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指示》，这个内部肃反文件提出了对近百万长期关押却“欲判无据，欲放不忍”人员的处理办法。那时“捏造事实、编制罪状”的歪风邪气尚未达到“反右”和“文革”期间登峰造极的程度，所以存在着“欲判无据”问题。“指示”明确规定：“对这次运动中清查出来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除判处死刑和罪状较轻、坦白彻底或因立功而继续留用以外，分两种办法处理。一种办法，是判刑后劳动改造。另一种办法，是不够判刑、而政治上又不适用于继续留用，放到社会上又增加失业的，则进行‘劳动教养’，就是虽不判刑，虽不完全失去自由（后来的事实证明，被劳教的人从进入劳教场所的第一天起就失去了一切自由），但亦应集中起来，替国家做工，由国家发给一定的工资。”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出台的第一份有关劳动教养的内部红头文件。从此，“劳动教养”这个名词在中国悄悄地诞生了。接着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各省、市立即筹办劳动教养机构的指示》，于是，劳动教养在全国大张旗鼓地办起来了。

以上两个“指示”都是中共中央内部文件。没有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批准，也没有采用经由国务院颁布这个程序，而是由中共直接发号施令，责成各级政府无条件执行，是以党代政的典型，是严重违背宪法的行为。

《关于彻底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指示》明确规定，劳动教养的对象是在内部肃反中肃出来的不够判刑，又不能留用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

什么是反革命分子？什么是坏分子？中共中央十人小组（中央成立的专门领导肃反运动的组织。成员是：陆定一、罗瑞卿、刘澜涛、周扬、肖华、钱瑛、梁国斌、高克林、李楚离、杨奇清。该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公安部），在1956年3月10日发出《关于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解释及处理的政策界限的暂行规定》。

该“规定”把特务、土匪、恶霸、反动会道门头子和敌伪军、政、警、宪人员中的一些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托派分子、汉奸、现行反革命破坏分子，界定为反革命分子。对坏分子的解释是：“**政治骗子，叛变投敌分子，流氓分子，品质极端恶劣的蜕化变质分子。**”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次提出坏分子的罪名。它界定的坏分子罪名除“叛变投敌分子”比较好理解外，其它三项很难界定、很难掌握（在刑法条文中没有坏分子罪），可以由单位主管随其主观意愿伸缩自如，为以后政治运动中随便给人戴上坏分子帽子，提供了政策依据。

坏分子就是坏分子，为什么要加上“其他”这个限制词呢？上述“暂行规定”中有这样一句话：“一切反革命分子都是坏分子。”原来如此。所谓“其他坏分子”，就是指除反革命分子这个坏分子以外的那四种人。难怪中国的宣传机构把那些进了看守所、拘留所的人统统称为“坏蛋”，由此开始了一系列“扯蛋”活动，逐渐地暴露出中共的法西斯本质。

内部肃反运动和镇压反革命运动相比，肃出来的反革命相对较少，而且大多数人没有反革命现行破坏活动，只是历史上有些“污点”而已，不能逮捕判刑，只能送去劳动教养。

到了1957年夏季，全国有五十五万多人（进入二十一世纪部分档案解密后宣布的数字是三百余万）被打成了右派分子和反社会主义分子。对这些只动口、动笔，没有现行破坏活动的人怎么办、怎么处理？成了当政者不得不思考的问题。经过中央政法领导小组提议，报经毛泽东批准，劳动教养成了处置右派的主要办法。可是劳动教养是中共内部红头文件规定的，还必须使之合法化。于是，由中共中央授意，1957年8月1日，经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十八次会议批准，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第一次以行政法规的形式，确立了劳动教养制度。

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规定的劳教对象，同中共中央《关于彻底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指示》中只对不够判刑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进行劳动教养相比，一下子扩大了许多，劳教对象被扩大得无边无际，为以后的“大跃进”运动中全民大办劳教开了绿灯，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这是周恩来助纣为虐的政绩之一，由此而始，数百万人被强加以名目繁多的罪名投入劳教，轻则被关押二十余年，妻离子散。重则命丧黄泉，踏上了不归路。周恩来罪责难逃。

1957年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规定：

一、对下列几种人应当加以收容实行劳动教养：

(1) 不务正业，有流氓行为或者有不追究刑事责任的盗窃、诈骗等行为，违反治安管理、屡教不改的；

(2) 罪行轻微，不追究刑事责任的反革命分子、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受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等单位的开除处分，无生活出路的；

(3)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等单位内,有劳动力,但长期拒绝劳动或者破坏纪律、妨害公共秩序,受到开除处分,无生活出路的;

(4)不服从工作的分配和就业转业安置,或者不接受从事劳动生产的劝导,不断地无理取闹、妨害公务,屡教不改的。

这四条规定中的劳教对象范围很宽、很广。可以把任何一个有缺点、错误,甚至任意编造一些缺点错误强加于人,不经核查,不必审讯,不容分辩,无需质证,只消“五人小组”签字即可送去劳动教养。

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是在反右派运动高潮中出台的,这下子派上了用场,大批右派分子被送往劳改、劳教场所,进行劳动教养改造。全国五十五万多右派分子中,有多少人被劳动教养?大约是四十五至五十万人(若以全国右派分子三百一十七万计,送劳动教养的应该是二百余万人)。被打成右派分子的人,判刑劳改的是少数,继续留单位的也是少数,绝大多数是被送去劳动教养。

李维汉在《回忆与研究》这本书中有这样一段话:“全国五十五万余名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半数以上失去了公职。相当多数被送劳动教养或监督劳动,有些人流离失所,家破人亡。”

“相当多数”是多少?以安徽省为例,在反右派运动中,安徽省一共有31479人被打成右派分子,除987人外,都送到劳改、劳教场所劳动教养,被劳教、劳改的约为右派分子总数的97%。其他各省市的比例也大体如此,这就是毛泽东说的对右派分子“给出路”。

因为当时专门的劳教场所还很少,多数人都是被送往劳改农场、工厂,和已经判刑的犯人关在一起,被管教干部统称为“三类人员”(劳改犯、劳教分子、刑满就业人员)。

被劳动教养人员没有触犯刑事法律,受到的是行政处罚,可是在实际对待上,同判了刑的罪犯,除了名称以外,没有多少区别。

1958年“大跃进”运动中,被逮捕判刑和批准劳动教养的人员大量增加,看守所、拘留所、监狱,人满为患,于是在地广人稀、荒凉闭塞的北大荒、四川大小凉山、青海、甘肃、新疆等地区广建劳改、劳教场所,继后据说是出于备战的需要,北京、上海、广东、浙江、福建等沿海省市劳改犯人、劳教人员被送往西南、西北各省。以青海省为例,三年内先后有二十多万犯人和两万五千多名名劳教人员从全国各地送来,被安置在五十八个劳改、劳教场(厂)。塘格木劳改农场,先后送来六百多名劳教分子,其中四百五十五人是因右派问题被劳教的,他们和已决犯人混合编组,同吃、同住、同劳动。

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没有规定劳教人员的劳教期限,在众多劳教人员质疑和社会各界人士质询下,1979年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补充规定》才确认劳教期限一至三年,必要时可延长一年。

在颁布上述规定之前,劳教是没有期限的。没有期限等于被判了无期徒刑,可是,对这么多劳教人员总得有个处理办法,于是每年由中央下达对劳教人员解除劳教比例,使劳教人员有个盼头,不至于绝望、避免铤而走险。但是中央每年下达的解除劳教比例很小,下面又不认真执行,实际上被解除劳动教养的人很少。1959年,中央给全国下达劳教人员解除劳教比例为3%,而青海省只给45人解除劳教,占劳教人员总数0.2%;1960年中央下达劳教人员解除劳教比例为5%,而青海只解除805名,占2.37%。被解除劳教的人,在中央提出的所谓“多留少放”的内部政策指导下,绝大多数都被强制性地留在劳教场所,

能够回家、回原单位的人极少。所以有人说解除劳教留场(厂)就业,是第二次劳教。很多1957年被划为右派送去劳动教养的人,二十多年后随着所谓“改正”才摆脱了劳动教养。二十多年,人生的黄金时段,就这样被中共违反宪法的劳动教养条例消磨了。二十多年,其中包含着多少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辛酸和苦难,

以笔者为例,我于1957年7月被重庆长江电工厂党委划为右派,1958年7月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先后在重庆新建机械厂(现重庆康明斯发动机公司)、成都四川磨床厂从事我的本行金属热处理工作,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1961年12月,经当局反复审查确认改造好了,解除了劳动教养,但仍被强制留在劳教场所继续改造。1966年文革乍起又以莫须有的罪名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直到1979年11月,据说当初的右派划错了,后来的有期徒刑也判错了。给予改正和平反。我才有幸回到重庆长江电工厂,一个当初二十岁的共青团员历经二十余年脱胎换骨的改造、九死一生的折磨,变成了须发斑白、未老先衰的单身职工,回厂就任二十几年前的技术员职务,按二十几年前的额度领取工资。这也算是返老还童吧,可不能忘记中国共产党的大恩大德呢。在长江电工厂除承担专业技术工作外,还兼任职工大学、电视大学、夜大学技术课教师,兼任高级职称申报者的俄、日语翻译技巧辅导。先后在省部级刊物上发表论文和译述三十余篇。说起来,我还算是幸运的,和我一块儿划为右派分子的人已经死了十之八九,想想那些押送到青海、北大荒改造的同学,我如今还能享社会主义的福,该知足了。

青海省地处高寒地区,严重缺氧,加上饥饿,还要进行重体力劳动,大批劳教人员被饿死、冻死、虐待致死。三年中死亡劳教人员4159人,占劳教人员数的26.5%,其中三千多人是右派分子,他们没有能活到被“改正”的那一天。甘肃夹边沟农场关押三千多名右派分子,临到1962年,活着出来的不过六百人左右。地处四川峨边凉山彝族自治县的沙坪农场,鼎盛时期关押约两万名劳教人员,1961年只剩下数千名,多数死于饥寒交迫,尸首丢弃在宋家山周围,其中南瓜山最多,引来野狗无数,叼着右派分子的尸骨四处跑,导致当地彝族居民议论纷纷。为平民愤,不得不把该场场长梁村夫抓起来判了七年有期徒刑。

安徽省公安厅原常务副厅长尹曙生离休后曾根据其在青海任职期间所见所闻写过文章,为了让读者了解有关劳动教养的真实情况,现摘录于后:

在送往青海的两万多名劳教人员中,有五千多人是女劳教人员;在死亡的四千多人中,有一千多是女劳教人员。没有死亡的女劳教人员所受到的屈辱、苦难,常人是难以想象的。一些幸存者不愿意去回忆那一段非人的生活。因为太恐怖、太无人道,回忆起来无异于在未愈合的伤口上撒盐。笔者在这里介绍一位女劳教幸存者的情况,并以此纪念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被残酷迫害致死三十周年的原青海省委书记、省长王昭同志。

1971年8月13日,笔者在青海省公检法机关军管会秘书组接待一位三十多岁的女人,她自称是王昭的侄女,是来领王昭骨灰的。我很诧异。王昭1967年被捕入狱,1970年2月12日被残酷迫害致死。公检法机关军管会严格保密,不对外宣布,遗体火化时对殡仪馆谎称是在西宁市东关大街上发现的无名尸体。向中央报告说王昭是因病经抢救无效而死亡。除了公检法机关军管会少数领导知道真实情况外,别人是不知道的。笔者在军管会秘书组当秘书,对王昭被迫害致死情况一清二楚,也知道王昭根本没有家居江南的一位侄女。几经

盘问,她终于说出事实真相。而我对她说的她的不幸遭遇也就一清二楚。是王昭救她于水火之中,使她幸存下来。她来领王昭骨灰,是为了报答他的救命之恩。

恕我不能说出她的真实姓名和确切住址(她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子女都很出众),就叫她张秀吧。1956年她从师范学校毕业,分配到一所小学当语文教员。由于她长得很漂亮,追求她的人很多,其中包括公社管文教的副主任。她不喜欢这位副主任。而副主任则穷追不舍。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她不得不表示自己已经有了心上人,希望他今后不要再纠缠她。这位副主任怀恨在心,寻机报复。机会终于来了。他以检查教学为名,到学校检查学生作业。在检查一位六年级学生的作文时,看到这位同学在参观公社丰产田写的作文中有这样一句话:“我们公社粮食大丰收,收那么多粮食,吃不完,怎么办呢?”张秀作为语文老师,在这句话后面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并在上课时对学生说,你们要相信科学,不要相信那些吹牛皮的话,我们国家现在不是粮食多,而是少,不然为什么要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呢?这位公社副主任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如获至宝,说张秀思想反动,竟敢怀疑伟大领袖毛主席说过的话,煽动学生反对“大跃进”。张秀感到莫名其妙。原来这位学生在作文上写的那句话,是从《人民日报》上学来的。1958年8月4日,毛泽东到河北省徐水县视察时,县委书记张国忠汇报说,该县秋收要收11亿斤粮食。毛泽东说:“秋收要收11亿斤呀!你们全县31万人口,怎么能吃得完那么多粮食?你们粮食多了怎么办啊?……”1958年8月11日,《人民日报》刊登了这条消息。这位学生看了报纸报道,把毛泽东说的最后这句话,改动一下,变成自己的问话。而张秀老师就没有看过这篇报道,不知道毛泽东说过这样的话,否则她也不敢在这句话后面打问号,也不敢在课堂上说那样的话。这位公社副主任将张秀打成右派坏分子,以不适合做人民教师为由,决定送她劳动教养(在“大跃进”运动中,劳动教养遍地开花,机关、工厂、公社、生产大队都可以自办劳动教养。经过正规手续批准的劳教人员近百万,没经过批准的有几百万)。她被送到青海省西宁市劳动教养。由于她长得漂亮,先后被几个品质恶劣的管教干部强行奸污。为此她两次自杀未遂。1961年,王昭由公安部副部长调任青海省委第二书记、省长,大刀阔斧地纠正原青海省委的左倾路线错误,大规模地平反冤假错案,整顿政法部门,撤换公、检、法部门不称职和违法乱纪的领导,并派工作组到劳改、劳教单位进行内部整风。工作组将张秀被几名管教干部强行奸污的情况发了简报,提出的处理意见是,管教干部要处理,张秀也要处理,说她和管教干部发生性行为,是拉拢腐蚀干部的流氓行为。王昭不同意工作组的意见,在政法干部大会上说:“要处分就只能处分那些和她发生过性关系的管教干部,而不能处分她。因为她的命运掌握在他们手里,她不干行吗?她为什么几次自杀?还不是忍受不了折磨?!”

王昭说的话,救了她的命。不久她被解除劳动教养,回到江南老家,1962年,经过申诉,纠正了给她戴右派分子帽子的错误。她重新当上小学教师。

“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王昭首当其冲。那些过去被王昭整肃、受到过处理的地方和军队领导干部,把他到青海纠正左倾路线错误、平反冤假错案说成是复辟资本主义、为牛鬼蛇神招魂,向反对王昭的群众组织提供打倒王昭的“炮弹”。王昭被残酷批斗,非法拘禁,摔断了胳膊。他的警卫员冒着极大的风险,在一个夜晚,乘看押他的造反派熟睡之机,将他救出来,秘密送到洛阳治病。就在他治病期间,青海省两大造反派组织,不断掀起武斗。为了控制《青海日

报》，双方展开激烈争夺。这时，军队也分成两派，省军区副司令赵永夫夺了司令刘贤权的权，控制了驻军部队，下令驻守在报社的“八一八”造反派撤出报社。“八一八”造反派不干，1967年2月23日军队开枪冲进报社，当场打死179人，几天内逮捕近万人。这就是轰动一时的青海省“二·二三事件”。1967年3月2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发出《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把“二·二三”事件定为反革命事件。但是，同时也颠倒黑白地把王昭定为幕后黑手。王昭不服，不听好心人劝阻，执意从洛阳到北京申诉，结果被造反派揪斗。周恩来在接见青海“八一八”造反派组织头头时，要他们在保证王昭人身安全条件下，准许将他押回青海。不久经中央批准被逮捕。张秀通过报纸、电台广播，知道王昭被捕，以后又打听到被迫害致死。为了感恩，她要领走王昭骨灰加以保存，心情完全可以理解。但是我知道，这是万万不能的。我非常严肃地告诉她，你不要再跟任何人提这件事，否则后果很严重，你赶快回去！她接受了我的劝告，泪眼婆娑地离开军管会。

“四人帮”垮台后，王昭冤案得到平反昭雪。其家属从殡仪馆苦苦寻求，才找到骨灰。骨灰运到北京时，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胡耀邦，亲自到北京火车站迎接，并送到八宝山公墓一室安葬。

从尹曙生先生以上的叙述中可以看出送劳动教养是何等容易，中共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又是何等残酷。

（3）劳动教养条例是非法的，却在中国延续了五十多年

“劳动教养”这一行政法规已经存在五十多年。法学界、理论界对其合法性一直质疑不断。无论劳动教养条例从字面上看写得多么冠冕堂皇，它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有关公民权利和义务的条款是径相抵触的。我坚信随着国家民主与法制的逐步健全，总有一天违反宪法的劳动教养制度会废除……

笔者写以上段落的时间是2012年12月，因年近耄耋、疾病缠身，中途辍笔。现在已是2015年。大病初愈后闻讯，2013年11月12日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决定，废

止劳动教养制度，总算离依法治国进了一步。劳教制度已然废止，但对这个怪胎的认识依然不足，其流毒远未肃清，仍有评说的必要。以下就是续写的内容。

1、劳教制度违反了《宪法》。《宪法》第三十三条中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宪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劳教制度违反《宪法》第三十三条和第三十七条，践踏人权，不经过检察院和法院环节，由劳教委员会决定就剥夺限制公民人身自由1—3年，还可延至4年。实际执行中，有相当多数右派分子都超过了这个限定，比如毛泽东钦定的学生右派谭天荣先后劳教了十一年，我因右派而劳教了三年半，虽摘掉了右派帽子，但被强制留在劳教单位，改了个称呼叫摘帽右派、就业人员，被归入三类人员（劳改，劳教，就业人员之统称）。文革伊始又以翻案抗拒改造之罪名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毛泽东死了以后，1979年成都市中级法院在原单位确认右派系错划予以改正后方着手复查。经反复查证，确认系冤假错案，才撤销了原判，宣告本人无罪释放。但我已在深山老林服苦役十三年，无任何补偿）。劳教制度不是

一般的个别事件的违宪行为，而是由政府颁布制度、在全国范围内长达几十年实行的高烈度的违宪行为，其违宪性质是恶劣而且严重的。

2、劳教制度违反了《立法法》。《立法法》第八条规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只能通过制定法律。**”劳动教养是限制公民自由的强制措施，所依据的却不是国家法律，而是国务院颁发的《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这个《决定》违反了《立法法》。国务院没有权力决定可以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

3、劳教制度违反了《行政处罚法》。《行政处罚法》第九条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只能由法律设定。**”劳教制度被归类为行政手段，却越过了行政处罚的界限，强制剥夺人身自由。违反了《行政处罚法》。

4、劳教制度违反了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和国际公约。1948年12月10日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第九条规定：“**任何人不得加以任意逮捕、拘禁和放逐。**”第十条规定：“**人人完全平等地有权由一个独立而无偏倚的法庭进行公正的和公开的审讯，以确定他的权利和义务并判定对他提出的任何刑事指控。**”第十一条（一）款规定：“**凡受刑事控告者，在未经获得辩护上所需的一切保证的公开审判而依法证实有罪以前，有权视为无罪。**”

在《世界人权宣言》的基础上，联合国继后又制定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其中第9条规定：“**除非依照法律所规定的根据和程序，任何人不得被剥夺自由。**”中国政府已经签署了该公约，并一直承诺要实施该公约。劳教制度不依照法律所规定的根据和程序，不经过法庭审判，剥夺了被劳教者的辩护和上诉权利，违反了上述宣言与公约。中国作为联合国成员国和常任理事国，理应遵行《世界人权宣言》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应立即废除违反该宣言与公约的制度。

5、劳教制度剥夺了公民权利，是现代文明的耻辱。劳教制度可以不经过程检察院批准就随意抓人，不经过法院审判就随意剥夺公民的人身自由，尤其恶劣的是，劳教制度剥夺了被劳教者辩护的权利和上诉的权利。只要所在单位的党支部或党委认定。无需法律程序，不受法律监督。这是对公民权利的践踏，违反了现代社会文明准则，是野蛮的法西斯，是现代文明的耻辱。

6、劳教制度是现代奴隶制度。劳教制度不仅剥夺了被劳教者的人身自由，还强迫劳动，虽然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中规定对于被劳动教养的人，应当按照其劳动成果发给适当的工资，实际上，全国大大小小的劳教场所无一例外均没有按照社会薪酬水平支付劳动者工资。笔者劳教前在重庆长江电工厂任技术员，月工资是69元。投入劳教后才知道，被劳教者不管来自何单位任何种职务一律每月15元生活费，1961年摘掉右派帽子解除劳教后被强制留在劳教场所就业，仍然是每月生活费15元。两年后物价上涨才调整到每月19元。原重庆长安汽车制造厂高级工程师刘洪福，1949年参加中共军队，1956年毕业于长春汽车拖拉机学院（2000年与多校合并后改称吉林大学）曾在成都通惠汽车修配厂劳教，1969年转至四川峨边沙坪茶场就业，月生活费21元，直到1979年平反后才回到长安汽车厂，现已八十有六，离休多年了。肖祖贻1956年重庆大学本科毕业，在航空工业设计院任技术员时被划为右派，送劳动教养，1961年摘掉了右派帽子，解除了劳动教养，与笔者同在四川消防设备总厂从事技术工作，1969年他转到四川峨边沙坪茶场，名曰就业人员，月生活费也是21元。直到1979年改正后被

安排到绵阳建材学院任教师。才恢复 1956 年的工资。这是现代奴隶制度。早期奴隶制度中有定期奴隶，如有些债奴就是有期限的奴隶，犹太人有限期奴隶的年限不超过 6 年。劳教制度使被劳教者成了没有自由、被强制劳动、被剥夺劳动成果的定期奴隶。据劳教制度解释，被劳教者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把人抓了，把人关了，列为专政对象，强迫劳动，没有工资，只发少量维持生命必需的生活费。这就是在中国实行了五十多年的劳动教养，如同定期奴隶，却轻描淡写地说是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一种无赖的说法。

（4）劳动教养是毛泽东迫害右派分子的残酷刑罚

1957 年，毛泽东发动的反右运动，从始至终都是他一手掌控，邓小平、刘少奇、周恩来、彭真等具体操作的。当年夏季，毛泽东在上海干部会议上，以及稍后，在青岛召开的全国省、市委书记会议上，在反右派运动还没有完全结束的时候，就两次谈到了处理右派的办法是：“把右派送去劳动教养。”

虽然以前曾用中共中央的名义下达过关于要求各地建立劳动教养机构的文件，那只是针对肃反运动中百分比极小的特定人群的，且并未公开，一般人并不知情。

反右运动中，所谓的“右派”提出了许多关于人治、党治、法治的意见，其中就有对于劳动教养合法性的质询，尽管这些正确意见当时被诬为“向党猖狂进攻”，但也迫使毛泽东、周恩来不得不考虑一下社会舆论。因此，在处理为数众多的右派时，一改以往一切均用“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布命令的惯例，首次出现了处理右派的“法律形式”。那就是从表面上改为“尊重”《宪法》，用“国家”的名义，继而“根据人民政府长期的考虑和研究”（1957 年 8 月 4 日《人民日报》社论《为什么要实行劳动教养》一文中的话），在中国历代的法律中，实在找不出“言论罪”、“思想罪”，最后竟然找出个《宪法》第 100 条。把条文加以篡改，作为依据，用国家最高行政机关——国务院的名义，通过人大的“形式”，才由刘少奇用“主席令”颁布了一个《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作为处理右派的所谓“法律依据”。

这个《决定》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法规”。中共中央也在不同场合一再说明：“……是对劳动教养的人实行强制性教育改造的‘行政措施’，是一种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办法……”；“……劳动教养同劳动改造罪犯是有区别的”…… 等等欺人之谈。

虽说这个《决定》是“长期研究”制定的，实际上谁都明白这是专为收拾右派、应付舆论而草拟的急就篇、是一个漏洞百出的文件。因为是匆匆拟定，这《决定》本身就存在一些问题。首先，它依据的《宪法》（1954 年《宪法》）第 100 条，其原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劳动纪律，遵守公共秩序，尊重社会公德。”那么，哪个右派违反宪法和法律了？哪个右派没有遵守劳动纪律？哪个右派没有遵守公共秩序？哪个右派不讲社会公德了？他们仅仅是根据《宪法》第 89 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来行使自己的权利（仅仅施行其中一项——“言论自由”，还是被“钓鱼”、被欺骗而去“施行”的）。仅仅是响应毛泽东“帮助党整风”的号召，轻信了毛泽东所谓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毛泽东把上述古人训词[1]连在一起，在 1945 年 4 月 24 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做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首次提出，将其作为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以达到党内外团结的原则。1957 年 4 月 30 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召集民主党派负责

人座谈，请他们积极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为消除党外人士的思想顾虑，他再次代表中国共产党重申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合作原则。嗣后号召鸣放之际多次反复强调这几句格言，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57年夏，毛泽东自食其言，倒行逆施。防民之口，严噤其声。在共产党组织召开的座谈会上发了几句言，就被划为右派。以镇压的手段阻止公民行使合法权利，才是真正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毛泽东强行这样做，只是因为他依仗的是手中持有“枪杆子”而已。

1957年，毛泽东还装模作样地说过：“只要他们不当特务，不再进行破坏活动，也给他们一点儿事做。”哪个右派是特务？谁从事过“特务活动”？完全是诬陷不实之词，栽赃陷害之举！四十年代延安整风，毛泽东就毫无根据地随意给王实味扣上叛徒、特务、托派、国民党探子等等帽子。反胡风运动中，毛泽东又给所谓“胡风分子”毫无根据地扣上“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特务、托洛茨基分子、反动军官、共产党的叛徒……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一个地下的独立王国……”。庐山会议上，毛泽东认定井冈山时期即跟随其四处冲杀、建国后任国防部部长的彭德怀里通外国。文革中又诬陷国家主席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他几乎搜集尽、创造尽了世界上这类的词句，给一切他不满意、怀疑的人扣上“莫须有”的大帽子。最后，他的这些疯话，被历史证明都是毫无根据的编造和诬陷。在反右运动中，他又一次玩弄了这一卑劣可耻的手法。使用这种手法固然他觉得得心应手，然而他却全然不想，在相当数量正直人民的心底，他已经失去了被敬如神明的伟大领袖形象，沦为一个疯狂的、好话说尽、坏事做绝的暴君。

《决定》在主要针对右派的第二条中说：“罪行轻微，不追究刑事责任的反革命分子，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受到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等单位开除处分，无生活出路的。”显然，在这里毛泽东又故伎重演，又在没有事实的情况下编造了一些“莫须有”的罪名，牵强附会，含含糊糊地给右派分子扣上了“反革命分子”、“反动分子”等等纯属诬陷的政治大帽子。

《决定》所说的：“需要劳动教养的人，由民政、公安部门、所在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等单位，或者家长、监护人提出申请，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委员会或者他们委托的机关批准。”完全是愚弄人民的假话。毛泽东在不同场合多次声明过，他是一个“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人。在处理右派时，为了扫清那些碍手碍脚的“法规”的羁绊和干扰，以便从上到下充分按照其主观随意性办事，给各级负责人创造一种任意使用权力的条件，才编造了这么一条。这一条的实际内容乃是：“只要单位的书记和负责人说‘你需要实行劳动教养，就可以送你去劳动教养’，不需要任何法律程序。而执行机关公安部门则是：“只要单位送，这里就收，反正咱们都是共产党领导的”。所谓的民政部门根本就没有参与这项工作。至于什么“人民委员会或委托机构批准”一说，更是子虚乌有，在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从来就没有过“人民委员会”这个机构。

“决定”既已出笼，劳教势在必行，对右派分子是怎样实行劳动教养的呢？

1957年底至1958年的4-5月，是集中处理右派的高潮时期，当时，处理右派的单位对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制定的中央政策的理解也不尽相同。兰州的单位送右派去劳教农场（包括著名的夹边沟农场）时，是由单位的人事干部护送的。他们大概认为：对右派既然是“行政处分”，就仍然属于“人民

内部问题”，还是自己人。笔者所在的重庆长江电工厂，对被决定予以劳教处分的人员是由同一个办公室的党员护送到看守所的。而在天子眼皮底下的北京就不同了，对于右派的处理可以说完全体现了毛泽东的意愿。当时的北京，中央、市级机关、团体、企业、学校被划为右派的人有数万之众（时至今日也无法得知或统计到各个单位的确切数字）。一批批人为制造的右派从单位被公安局带走，实行的是空前大逮捕。分别被送到诸如：草岚子监狱、半步桥第一监狱、地藏庵（炮局）监狱、北郊功德林第二监狱等各个监狱。一进监狱就先收走手表、指甲剪、钥匙、水果折刀一类金属类的用品。三十多人挤在一间监房里，窗户一律铁栅栏封闭，门上只有一个20厘米见方的小洞，是打饭用的，也是巡逻者夜间的窥视孔。就这样没有经过检察院、法院的任何司法程序把人逮捕入狱了，完全剥夺了他们的自由。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行政处分”，“和劳改罪犯是有区别的”，“也是给了他们人权的”。

在监狱经过一个时期的拘押和集中（半个月到一两个月不等），凑够一大批人之后，将会被武装押运到不同的劳改场所去“劳动教养”。

已经关押在监狱的右派，说不定哪天的深更半夜，突然会把他们叫醒，让他们扛着行李到院子里集合。这批右派站在院子中间，四周楼顶的探照灯一亮，照得院里通明，隐约可以看到楼顶的阴暗处架着机枪，直对着这群手无寸铁的右派。数九寒天，这批右派也不知道是吓的还是冻的，个个瑟瑟发抖，惊恐万状地排好队，被押上一辆辆大汽车。车厢前后都有荷枪实弹的冲锋枪手把着车门。也许是为了掩人耳目，遣送都是在夜深人静，街上行人极少的时候。遣送队伍相当壮观，前有武装摩托开道，后有押解官的武装吉普车断后，如同押解着一批“江洋大盗”，浩浩荡荡，直奔火车站。上了劳动教养“专列”，前后门仍然是冲锋枪手把门，而且还不断地吆喝着：

“不许乱动！”

“不许开窗！”

“不许讲话！”……

车到农场附近的火车站，下车徒步向农场进发，周围又有全副武装的骑兵，马不停蹄地在前后左右打靶巡视，造成一种恐怖气氛。

北京市公安局特地在黑龙江密山县兴凯湖一侧划出了一大片飞地，共有湿地、水面122.8万亩，东南面隔松阿察河和大兴凯湖与俄罗斯相望；西面靠大、小兴凯湖；北面与八五七、八五六农场毗邻。农场四面环水，周围有武装驻守，插翅难逃。昔日北京大学的学生陈奉孝在反右运动中遭受迫害，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曾在兴凯湖某劳改农场服苦役。历经九死一生，平反后著有《兴凯湖纪事》[2]

笔者算是幸运的，由同一个科室的党员吴世俊护送到隶属公安部门管辖的、安装着钢窗铁门的转运站后，只羁押了两天，就由汽车拉到重庆歌乐山下的渣滓洞，那里是久负盛名的监狱，从1958年起开始接收劳动教养人员。

进了劳教场所，少不了的是电网、高墙，四方岗楼上有荷枪实弹的武装警察日夜警戒。这种剥夺了人权的做法就叫做“行政处分”？这就是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空前的、人数最多的、详细情况不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知的现代文字狱？

进了劳教场所，首先被告知：“给任何人写信，必须一律交到队部，由管教人员审阅后，代为发出；所有‘劳教’人员的来信，先由管教人员拆阅后，

再发给本人。”这就是说，立即剥夺了还具有公民身份的右派分子“通信自由”的权利。

安定下来，悬在他们心头的大问题是：究竟要劳动教养到几时？《决定》中说：“劳动的期限也可以由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酌情批准。”而实际上根本就没有这么一个机构。劳教期限长短秘而不宣，我从1957年7月被戴上右派帽子算起，到1961年12月被宣布摘帽、解除劳教止，历经了四年半。据了解，毛泽东钦定的“右派学生首领”谭天荣，前前后后累计起来劳教期长达十一年，也算是创造了一项吉尼斯世界纪录吧。

1959年8月24日，毛泽东在写给刘少奇的一封信里谈到：“……我认为，积以时日，至少可以争取70%的右派分子改变过来。例如说，在今后七年中（或更多时间），每年争取转变和摘掉帽子10%左右是有可能的。”这大概就是劳教没有时限的一个原则——由他随意掌握。他没有点头，《决定》岂敢擅自规定时限？

到了1962年，在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再次提出要大抓阶级斗争以后，这个“七年（或者更多时间）”自然就又只能当成河里冒泡儿——王八屁。

1961年，中共高官陈毅在北京大学做了一次演讲，他说：反右伤害了一些人，特别是青年学生，感觉冤屈的可以申诉，来找我，我做“包青天”。闻听此讯，我还真欢喜了一阵子，但仍难免疑虑，中共是不会改正错误的。果不其然，陈毅装腔作势地叫了两声就再也不敢提起反右的事了。

1962年（大概是9月29日），北戴河会议后毛泽东针对某几个党内高级干部提出对1957年的反右问题进行甄别，执行“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方针。在中宣部的《宣教动态》增刊第63期上作了一个让右派分子们寒心的批示。批示说：“刘、周、邓三同志阅，请邓查一下，此事是谁布置的？是组织部，中直党委，还是国家机关党委自己？此事出自中央机关内部，右派分子本人不要求甄别，而上级硬要试点，以便取得经验，加以推广。事件出在6-7月间，其性质可谓猖狂之至。阅后付还，查后告我。”这个批语说明，中央上层有人想给右派“甄别”，也是一种对处理右派有看法的反映。岂不知毛泽东的独断专行、刚愎自用，焉能允许别人作出决断？所以，引得老毛大怒之后，再也没人敢提右派甄别的问题。顺理成章，被劳教的右派分子的劳教时日也就又没个时限了。

1962年底，集中在各劳改场所的右派分子们，突然得到农场的通知：“以前劳教的四年不算数了，从现在开始，按新规定劳教有了时限，分为一年、一年半、两年、两年半、三年五种……”这些右派分子听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难道也算国家的“法规”？哪个国家能拿“法规”开玩笑？这哪里还有一点儿国家法规的严肃性？哪个国家有坐了四年牢不算数，再重新从头坐起的？哪个国家能拿“法规”来戏弄人折腾人的？

以后的两三年内，确也有极少数右派摘掉了帽子，然而摘和不摘没有太大的区别，摘掉和没摘的依然还在同一农场继续劳动，实际上等于还是继续劳动教养，只不过获得了一个戏谑的称呼——“二劳改”或“就业人员”。

一直又拖过了最高教养期（三年）五倍的时间——十五年。到了1978年，毛泽东一命呜呼以后，中共中央才终于决定给右派落实“改正”政策，这几十万右派分子竟然被整整劳动教养了二十一个苦难的年头。比《刑法》规定的有期徒刑最高年限——十五年，还多了六年。二十一年的劳动教养期，按刑期，可以排列在“死刑”、“死缓”、“无期”之后，居严重刑罚的第四位。

这就是中国的“行政处分”？究竟是谁违法？世界历史上哪个国家曾经把“权力”和“法律”戏耍玩弄到如此程度的？

《决定》的第二条规定：“对于被劳动教养的人，应当按照其劳动成果发给适当的工资；并且可以酌量扣出其一部分工资，作为其家属的赡养费或者本人安家立业的储备金。”1957年8月4日的《人民日报》社论也公开声称“对他们同样实行按劳动成果给工资报酬的原则”

应该说，这是国家最高行政机关——国务院的明文规定。右派分子在劳动教养期间，已经是家破人亡，一贫如洗了。这一规定可以作为他们的唯一经济希望。但二十一年来，他们始终搞不清这笔储备金是怎么计算的。每月的伙食费，无论你吃窝窝头管饱，还是一天给你三个糜子面窝头；无论每天给你六个乒乓球大的白薯面窝头，还是一天二两玉米面加野菜的红薯汤；无论每天给你根本不是食品的所谓“代食品”，还是一天三碗玉米面混合着白薯叶子熬的粥；奇怪的是都扣除同样的伙食费，价值和价格一律均等。每个月扣除了这昂贵的伙食费之后，剩下的也就能买一条毛巾，一块肥皂。在这种“克扣”条件下，《决定》所说的“赡养费”和“安家立业储备金”究竟积累了多少？如今已经过了五十多年也没有个交代。到底有多少？贪污了多少？还剩多少？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说话算不算数？难道国务院也骗人？哪个没有良心的会狠心骗取这群饿殍二十一年的“血汗钱”？

1959-1960年，农场饿死了一批人（劳教右派），有些人没死也成了饿殍。农场没有条件让他们恢复健康，留在农场必然是“死”路一条，最后决定把他们送回家去“养病”。此时，不但没有什么“赡养费”，什么“储备金”，因为病得不能劳动，连工资也没有了。回到自己破碎的家，还得剥削自己的家人，生活真的是雪上加霜。有的人实在忍受不了生活精神的折磨而自杀了；有的只好再回到农场。在毛泽东的“不给饭吃”的政策下，被逼得主动劳动教养，真是凄惨至极。

1978年，中共中央给右派落实“改正”政策，仅仅将右派分子改称为“改正右派”。不但不补工资，甚至连国务院明文规定的“家属赡养费”和本人的“安家立业储备金”都一文没有了。这笔积累了二十一年的“赡养费”和“安家立业储备金”哪儿去了？是被贪污了？被骗了？没有人说话。堂堂国务院怎么能做出这种赖账的丑事呢？只能说他们本来就是一帮无赖。

1958年开始对右派劳教时，从年龄上说，除了极其少数20岁以下的，年龄较小的是当时的大学生。那时候他们也不过20-24岁，其他大部分是中年人，也有少数年龄大的。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二十一年中，他们已经是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当时正在谈恋爱的，你就是铁鸳鸯，也经不住“极左”政治大棒的打击，不得不划清界限，各奔东西了。“改正”的时候，经历了二十一年苦难岁月的折磨，当年的青年学生，已经成了近五十岁的准老年人了，原来的中年人也快退休了，老年人也该养老了。对于他们个人来说，紧接着，现实又向他们提出一个问题——“安家”，也就是要组织家庭。但客观是无情的，哪里还会有年龄、性格、文化水平、喜好等条件相当的女性会等着他们？在这种情况下，要说他们组织了“美满幸福”家庭的，实在是太少太少了。他们结婚的对象，要么是已婚丧偶，要么是离异的，双方的一个不可否认的共同特点是，绝大部分人都已超过了生育年龄。被毛泽东钦定为右派学生首领的谭天荣，年逾耄耋才有了一个老伴，相互照顾彼此的起居，算是幸运的了。

相当一部分“改正”后家庭，免不了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晚年的精神生活也是凄惨、孤寂、难以对人诉说的。

古代有所谓“宫刑”，可以使人断子绝孙。那么这种具有中国特色断子绝孙效果，无异于鲁迅先生所说的“软刀子”的新式狠毒作法，比起“宫刑”不是高明了许多吗？又该称作什么“刑法”呢？

在长期的劳动教养中，相当一部分人丢掉了性命。有饿死的、累死的、病死的、触电的、上吊的、投河的、卧轨的、工伤的、意外的……

不论是哪一种死，可以说，如果没有劳动教养，肯定他们不会死。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甘肃夹边沟农场关押的三千余名右派，劫后余生者只有六百余人，两千余人命丧沙丘，尸骨无存。他们真的犯了什么罪吗？地处天府之国边缘的沙坪农场三年困难时期死亡了六千余人，尸骨被浮埋在南瓜山，历经风吹雨打，野狗爬食，今已了无痕迹。

这些种种的不幸事件，究竟应该由谁来负责？应不应该有人负责？该由谁来承担责任？当年的反右积极分子，除了吴晗等人在文革期间遭到报应，被关押在秦城监狱，不堪忍受折磨，含恨弃世外，那些靠反右爬上去的高官们，有丝毫忏悔吗？

运动的始作俑者和组织者不承担任何责任，摇身一变成了拨乱反正的施恩者。当年借反右之机以整人为阶梯往上爬的人，爬上去了，没有受到任何行政和道义上的追究和责备。他们依然得势，依然不时闪动着狡诈的目光，又在窥探着动向，又在捕捉新的政治利益。在近百万右派的血肉躯体和血迹中踏来踏去，在数百万右派亲属的哭号的泪河中，曾经挥拳蹬脚，暗下毒手的打手们也不负责。这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社会的道德、人性、法制？

劳动教养这个行政处分也可以“取人性命”吗？致人死亡也不负任何责任吗？一个好好的活人，折腾死你就死了，难道我们又回归到原始社会了？难道我们能和当年的国家社会主义党（纳粹）一样吗？

当真是彻底“改正”了吗？当真“平反”了吗？似乎只有朱镕基做了个不歧视、不欺凌、不压迫的样板吧？他究竟处于什么地位自己心里是明白的。

在历届运动中，在毛泽东“保护积极分子”的政策下，一批批反右积极分子非但在政治、经济、生活上获得了血腥的好处，而且他们仍然一直继续以“极左”的面目活动着。他们积运动之经验，深深地懂得“极左”在任何情况下，只会获得好处。记得有人说过：“革命队伍从来都是由理想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组成。而最后，所有权力和利益的获得者则是机会主义者。”几十年来他们大都做了“官”，弄了“钱”，家有娇妻爱子，宴必美酒佳肴，成了各单位上上下下的主要成员。他们认为给右派落实政策无异于是对他们当年反右中用伤天害理换来的“积极分子”荣誉的否定。更是对他们如今获得的利益、声誉、官阶等的威胁。所以，给右派落实政策他们打心眼儿里不满意。

1978年，给右派落实“改正”政策时，本来处理右派有一种“保留公职，送劳动教养”的二类处理办法。按理说，既然保留公职，就该回原单位，但是有的单位硬是扛住不接收。因为这个活人的回来，就等于在他们身边安放了一面可以显现出他们当年作为“积极分子”丑态的镜子。“拒绝接收”分明是违反政策，然而“保护积极分子”的余荫一直阴魂不散，袒护着他们，使得这批人对任何事件都无所畏惧。所谓的“组织”也奈何不得他们。

当时还听说，为了落实政策的需要，中央批给 10 万进京名额指标。有些有权者却假公济私，把他们的亲友借机搞到北京，有些该回来的右派只得留在外地。

一位右派落实政策后参加了党，当工作需要提拔他担任某个职务时，材料报到组织部门，竟然说：“他有右派的历史问题，不能批。”

有的单位在评定职称时，“左派”说：“他们（右派）二十多年没干工作，那怎么可以评职称呢？”于是，“左派”又升级，又加顶戴。连 A、B、C、D 等字母也不认识者，居然恬不知耻地也戴一顶“高级××师”的职称桂冠。似乎这些“左派积极分子”只是脸皮是特殊材料制成的，无限地“厚”，没有“知觉”，只要有利可图，没有他们不沾的，任何时候都不知道什么是脸红、良心，什么是廉耻！

直到 2001 年，已经落实右派政策二十三个年头，仍然有一个叫做陈瑞华的人，在《中外法学》（此刊听说是北大法学院编的）杂志上撰文说：“在 1957 年的反右运动中，劳动教养制度显示出了空前的生命力，在全国被划为右派的五十五万二千八百七十七人中，劳动教养是处理这些‘右派分子’的主要方式和首要手段。”大加赞扬这个非法之法的“劳动教养”。陈瑞华这个小丑为好人被错划为右派，被人利用“劳动教养”这个“恶法”冤狱二十一年而拍手叫好。绝对不会有好下场。

香港《凤凰周刊》2004 年四季度有一期载文说：黑龙江某地一个劳教农场，直到 2004 年，在农场被教养的右派，因为原单位变更，原住城市没有房（划右后，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没有了房）；还有在大学时，被送劳教，落实政策时，该大学已撤销，无人受理安排，只能继续留在劳教农场劳动，直到退休，也是从劳教农场退的。未来的坟场也是农场。他们把一生葬送在“劳教农场”。对于这，难道不是世界少有的人间惨剧？

由此，忽然想到，右派分子林希翎后来被正式逮捕。在监狱里，有一位审判人员审判她的时候，对她说了一段恶狠狠的话：“你看着吧，共产党还对付不了你这黄毛丫头！我要让你年轻地进我这监狱，而把你关到白发苍苍，我要关你一辈子，我要让你断子绝孙！”

文革期间，时任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的吕昌永，在宣布判处我十五年有期徒刑时也说过类似的话，甚至扬言：“不但要关你十五年，而且要关你一辈子。”在毛泽东当政的赤色恐怖下，公检法当局除了少数人性尚未泯灭的以外，相当多数都成了卖身求荣的走狗，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酷吏。至今没有追究其制造冤假错案的罪责，历史是不容忘记的。

是的，不少右派分子确实被教养得白发苍苍了。林希翎倒没有断子绝孙，而相当数量被教养了二十一二年的右派分子，确有不少人真格的是断子绝孙了！这难道不是一场世界历史少有的人间悲剧？

这就是劳动教养的所谓“生命力”？

这就是所谓的“行政处分”？

这就是所谓的“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方式？

这就是“不是刑法，胜过刑法”的中国特色的《劳动教养》？

质言之，这就是毛泽东的罪行之一，毫无质疑，不容遗忘。早晚是要清算的。

附注：

[1] 春秋战国时期文人创作的《诗经·周南·关雎·序》中已经提到“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

《论语·学而》说“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对此，宋朝大理学家朱熹在其《集注》说“曾子以此三者日省其身，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其自治诚切如此，可谓得为学之本矣”，给予高度评价。于是，曾子这个“吾日三省吾身”就成为小孩子上学必背的格言。

同是宋朝的苏洵，在其《衡论》“远虑”篇中提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为君臣相知，互不猜疑的标准。

[2] 陈奉孝，1936年生人。1954年考入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1957年反右运动中，因组织“百花学社”被打成右派，后被判刑十五年。1980中共有关部门经反复查证确认右派系错划予以改正，1984年司法部门确认徒刑系错判予以平反。随后陈奉孝先后在内蒙和山东潍坊教中学、大学，被评为高级教师和副教授。在“数学进展”和“高等数学杂志”上发表过多篇数学学术论文。1988年应邀去中科院成都分院从事教育软件的开发工作。2002年正式退休。其所著《兴凯湖纪事》可从百度等网站查阅。

(5) 劳动教养的执行机构严重违反宪法也违背劳动教养条例

1957年7月，反右派运动还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我被戴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帽子。从9月份起就在长江电工厂监督劳动，尽管我处处小心谨慎，循规蹈矩。唯恐迈错一只脚，走错一步路，说错一句话。委曲求全地，苟且偷生地消磨着日子。终归还是逃不脱被劳动教养的命运。1958年7月4日被押送到收容劳教分子的看守所。由此开始了长达二十二年的炼狱人生，历尽了千般辛苦，受尽了百般折磨。1980年初才回到原单位，45岁安家，48岁小女诞生，方得以为人之父。年逾古稀之后，耳聋眼花，步履蹒跚，老态龙钟之际，始伏案写作，记录那段苦难的辛酸史，意在旁求俊彦，启迪后人。肃清毛泽东的流毒，振兴我中华。

我进入的第一个劳教场所，是位于重庆歌乐山下的新建机械厂。该厂原就关押着一千余名犯人和已经刑满但仍被强制留在厂内的就业人员。1958年后新增的劳教分子伙同犯人一起接受改造、强迫劳动。两年之后被押送到成都，先后在四川劳改局加工厂、通惠汽车修理厂，四川磨床厂从事劳动。1961年12月解除劳教、摘掉右派帽子，仍被关在劳教单位，换了个名称叫就业人员。从精神到肉体，从形式到内容还是专政对象。文革袭来的1966年，又被以“翻案抗改”（笔者注：中国乃至世界各国刑法中没有这个罪名）的罪名处以重刑，在处于深山老林中的监狱里服苦役十三年，1979年当局据说要“拨乱反正”，经反复查证，确认右派系错划，徒刑系错判，分别予以改正和平反。二十二年的沉冤方得以昭雪。痛定思痛，痛何如哉！抚今追昔，能无黯然。

(6) 消逝的五座劳教营将永远载于史册

写作途中在共识网上读到一篇袁凌先生2014年1月21日撰写的《消逝的五座劳教营》全文转录于后，以飨读者：

2013年4月，山东曲阜一幢底层的教师宿舍楼里，八十三岁的张元勋没有等来劳教营的最后关闭。在和存世56年的劳教制度的年龄竞走中，这位当年的北京大学中文系“右派学生”倒在了终点线前面。这也是诸多“坏分子”和所谓“社会渣滓”的命运。在政治压倒一切的年代，他们的命运被一项法外的刑罚莫名主宰，身入劳教营，甚至成为终身居民。在大饥荒和随后的政

治碾磨与生存剥夺中，无从计算的生命和姓名逝去了，和遍地从生的劳教营一同隐匿。这些劳教营曾经显赫一时，血统延绵至今，却大多隐藏在档案和卷宗的尘霾中。近年来，随着当事人回忆和有心人的发掘，中国“格拉古群岛”（注：右派语，倒用索尔仁尼琴的著作《古拉格群岛》名）轮廓逐渐浮现，尤以夹边沟农场为著名，余者仍影影幢幢，无从清晰勾勒。这些劳教营大多和劳改营混在一起，更为它们的身世蒙上了面纱。

近年来，笔者有机会接触到一些幸存者，分别来自当年显赫一时的几座劳教农场：夹边沟、兴凯湖、峨边沙坪、青海湖、清河茶淀。根据他们的亲身经历和参照文献史志资料，笔者试图粗略勾勒“反右”至“文革”年代中国五大劳教营的轮廓，为劳教制度的深长背影添加可感触的人生注脚。

1、夹边沟农场

西安古城墙南门外不远的一座居民楼里，八十四岁的司继才用钢笔和纸质的笔记本写着厚厚的回忆录。半个多世纪以来，他活过了很多东西：活过了夹边沟农场终结一切的死亡，活过了右派平反，也活到了劳教废除。但生与死的竞走并未结束，他想在生前完成的百万字三步曲回忆录，刚刚写到通向夹边沟的入口。

使他无法放手的是手头的证物：一本当年在夹边沟亲笔写下的日记。这本日记的唯一主题是饥饿和死亡。在这本被岁月翻阅得几乎风化的黑色笔记上，密麻麻的陈年字迹中，笔者看到了有史以来饥饿和死亡联系得最紧密的记载：煮食人肉。

埋人回来的司继才，路上闻到一股肉香，“又带着一种腥味，和说不清楚的什么味。”循味而去，两个犯人在锅里煮肉吃，还招呼司继才同享。日记记载，肉黑乎乎的，皮又有些发白。司继才奇怪哪里来的肉，忽然想到是人，顿时感到恶心。身为小组长的司继才向管教报告后，吃人肉者得到惩戒，但饥饿和死亡不会由此停止。

或许由于含有禁忌，笔记中的记载很简单，司继才也不愿意轻易示人。但他毕竟记下了这个场景，并保留到眼下。这或许是从夹边沟保存下来的唯一一本日志，和罕有的食人一手记录。

在笔记和司继才的记忆中，有大量夹边沟死难者的记录。譬如一个在土窑上写下“坐以待毙”而后真地坐着死去的人，一个为了虚幻的“改造好了可以回家”的宣传活活累死的青年，手里攥着家信；一个前来探亲目睹丈夫被捆绑致死随即自杀的妇女……这些记忆的一部分收入了杨显惠著的《夹边沟纪事》中，夹边沟因此开始为人熟知，成为最著名的劳教死亡营。

在当时的中国劳教版图上，夹边沟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小农场，三千人左右的规模不算太大，即使在甘肃也远非受人注目。特别的是，这3000来名劳教分子绝大多数是右派知识分子，包括傅作义的弟弟、留美博士傅作恭等人，大部分又在三年饥荒中饿死，幸存者只是零头。右派的帽子没有夺走幸存者的叙述能力，围绕这个小地名，集中产生了数种文献，《夹边沟纪事》之外，尚有美学家高尔泰的《寻找家园》、和风鸣《经历——我的1957》和邢同义的《恍若隔世——回眸夹边沟》、王吉泰的《大祭灵》、赵旭的访谈录以及导演王兵的《夹边沟》电影等，形成“夹边沟现象”。杨继绳以描写三年大饥荒为题材的《墓碑》也涉及到夹边沟。这或许是冥冥中的天命对于中国劳教记忆的特殊馈赠。

1957年6月，夹边沟劳教农场开办，由劳改农场转身而来；1961年底，夹边沟农场因为死亡太多被关闭，以后被部队接管。在短命的历史中，夹边沟体现了一个劳教营的全部特性，并发挥到极致：沉重而荒谬的强迫劳动，早已超出所谓“自食其力”的层次；严酷的人身剥夺和暴力镇压，与真正的监狱并无两样，劳改局下设劳教处，劳教犯和劳改犯人混同关押，管教可以为了偷一个萝卜虐死犯人；不毛之地的生存环境，住在戈壁地窝子里，不仅无法脱逃，甚至离开劳教营只有死亡，以致出现高尔基书中记载的“自由人追赶监狱”；“教养”宗旨的欺骗性，所谓的“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意味着没有限定的刑期，面临的是赤裸裸的饥饿和死亡。

根据司继才的讲述，夹边沟死尸成堆的被发现，并非出自上级有意调查，而是内务部长钱瑛司机的一次迷路。据说，当时场长还想把钱瑛等人捆起来，可见素日之骄横。解救了夹边沟幸存者的钱瑛，文革中被关入了秦城监狱，在监狱医院患癌症去世。

今天的夹边沟，右派尸骨已为亘古风沙湮没，多数变成了医学院的实习标本。司继才的笔记本，也没有机会进入反右或大饥荒博物馆。但国人毕竟知道了这个不起眼却惊心动魄的小小地名。

2、兴凯湖农场

1959年4月，北大数学系的右派分子陈奉孝和几千名劳改、劳教男女犯人一起，从北京被转移到中苏边境黑龙江密山县的兴凯湖农场。这是北京市公安局新添的劳教营，和劳改农场合二为一。陈奉孝本人是判刑的犯人，但北大物理系判处劳教的谭天荣和他同批押送。

押送途中大雨如注，全体犯人逗留于密山剧院看电影，期间发生了“反革命密谋叛乱”事件，数名犯人被判处死刑。陈奉孝幸免牵连。

根据姚小平在《老照片》杂志撰文，由于地近苏联，兴凯湖有条特殊规定：越狱的犯人被抓获，可以就地处决。几名试图通过冬天结冰的湖面逃亡苏联的囚徒，遭此厄运。

兴凯湖农场是一片沼泽地，要靠犯人排涝造田，种粮自给，劳动量惊人，一个中队二百多犯人要种近一万亩水田。冬天则要顶着“烟泡”造渠修路，用赤脚踩碎水田上结的冰，搅拌冻土。劳动的强度，同处密山县的云山畜牧场发生的“夺命大豆事件”可为一证：由于在饥饿和秋雨中连夜抢收大豆，一夜之间有7人活活累死。

到处是沼泽和漂浮的草甸子，割乌拉草的犯人们不小心就会遭遇灭顶之灾。犯人住的是和夹边沟类似的地窝子，冬天的“烟炮”会把住处全部埋住，夏天的小蛟则可以叮死人，一个跟管教顶撞的犯人被打光了绑起来喂蚊子，三天后就死去。谭天荣先后关过兴凯湖、清河和团河三个农场，在他记忆中，最苦的是兴凯湖农场。

三年饥荒时期，兴凯湖和夹边沟一样大量饿死人。跟陈奉孝一起分到四分场一中队的75名犯人，到1967年农场解散时活下来的只有29名，绝大多数死于饥荒。陈奉孝尽力记住了24个死者的名字。一个饥饿的犯人甚至捞住陈奉孝刚拉出尚未落地的大便塞入嘴里。一次陈奉孝和另一人抬死尸去埋，挖坑时发现冻土下已经埋了一名死尸，索性两人合葬。兴凯湖埋葬死者的坟地之一叫太阳岗，似乎这些劳教分子真是沐浴着红太阳的光辉遇难的。

2002年，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发现了一份《右派分子死亡情况调查表》，总共94名死亡右派中，有5名来自偏远的兴凯湖，其中包括了中央实验歌剧

院教员和“民建”北京分会副会长。这5人都死于饥荒真正发生之前的1958和1959年。至于饥荒中兴凯湖死去的劳教者，并无文献记载。值得一提的是，李锐、丁玲和作家从维熙也曾经在兴凯湖下放劳动过。

在兴凯湖农场，有两样著名的发明：石棺小号和“三两八”。前者是用于惩罚违规犯人的禁闭室，高一米左右，宽不足一米，长一米五左右，不透光线，形似一具石棺。陈奉孝在其中关押了三个月。后者是饥荒时期北京市狱政的“科学发明”，让关小号的犯人一天吃三两八玉米窝头或稀饭，据说是一位法医研究出来：一个人只要不干活，躺着不动，每天吃三两七钱五的苞米面就饿不死，四舍五入成了“三两八”。据说有犯人如此被关小号一年多，竟然没有饿死，足见此研究成果之“科学”。但科学仍旧难免误差，北京大学物理系右派刘奇弟，因替胡风鸣冤被判刑关押到兴凯湖，1961年在小号中冻饿而死。

《北京市监狱劳教志》记载，兴凯湖农场是北京市劳改劳教局下辖的超大型农场，全场水陆面积13万多公顷，同时管理劳改、劳教和所谓留场就业人员。到1966年因与苏联交恶、防范战备风险移交地方时，前后共关押犯人14729人，劳教人员5635名，还有留场就业人员（所谓“二劳改”和“二劳教”）近15000名。如此规模和人数，只有清河农场堪与匹敌。北京市公安局劳改处的领地可以延伸至遥远的中苏边境，也可见专政力量之无远弗届。整个密山县，密麻麻布满了劳改和劳教农场，成了一片由地主、反革命分子、右派和知青的血汗逐次浸润的土地，直到今天仍然生活着不少当年的“留场就业”人员后代。

陈奉孝刑满后“留场就业”，文革后回到了山东老家潍坊。2010年笔者见到他时，他的腿上还保留着当年“坐老虎凳”硌下的铜钱大小的疤痕。他在兴凯湖农场的同伴谭天荣，则在青岛的一处两居室宿舍中孤身度过晚年。20来年的劳教和“二劳教”生涯，完全夺去了他年轻时的物理学天才和“学生领袖”（毛泽东语）风采，以及爱情和婚姻幸福，但并没有抽掉他衰老皮肤下的硬骨头。

张元勋去世之前，一直在用一根手指，一个字一个字地敲出一本叫《河岸》的回忆录，记录他在清河农场的经历。

3、清河茶淀农场

并非如它的名字寓意的田园。由于僻处渤海之滨，有着半岛的特殊地形，又因盐碱地改良的需要，早在解放之初，它就成了北京市处置抓获的“敌特分子”的中心。1957年下半年开始接收劳教人员，到第二年末已劳教6400余人，在全北京市劳动营系统最多。1983年清河茶淀农场劳教部门撤销，现仍为北京最大的劳改农场。

张元勋1957年来到清河，这里不通车，半岛入口驻扎部队，农场里岗楼铁丝网交织。张元勋所在的劳动营条件简陋，就在营房周围栽上一些电线杆，拉上8号铁电线，圈出几亩地。人粘在网上，电网并不停止运作，有时清早起来，看到电网上有人，大都是晚上想不通的触网自杀者。亲历者杜高根据公安部内部档案记载，清华大学学生右派郭道宏，“不忍饥饿，企图逃跑，爬电网触电死亡，倒毙在离电网一米处”。

劳教犯人中长年展开斗争批判。张元勋的难友文怀沙，经常被小流氓打耳光。前文提到的谭天荣在清河也挨过耳光。文革中遇罗勉前往探望被劳教的姐姐遇罗锦，亲眼目睹一犯人劝说同伴勿唱样板戏词“不怕牢底来坐穿”，

恐怕被人当做是影射，全体犯人立即厉声斥为反动、“攻击样板戏”，“像疯狗一样互相撕咬”，遇罗勉对专政下的人性恶感到震惊。告密揭发成为流行风气，稍微顶撞管教就会上手铐。毛泽东逝世时气氛更紧张，所有管教人员都荷枪实弹。

长年监禁，犯人的性需求成为无法解决的难题。张元勋回忆，一些因流氓罪名被劳教的女青年精神失常，裸体隔着铁丝网对异性看守高呼“来操我吧”，为此不得不把看守换成女性。张元勋同队的一个小青年因为长得清秀，成为多角同性恋的中心，受到开会批斗。最离奇的一件事是，劳动队养的一条母猪半夜里被人强奸，犯科者被当场抓获，母猪杀掉无人吃肉。文革之后，犯事的劳教人员结了婚，与张元勋邻居，沉迷于拉二胡。性压抑导致兽交现象，在劳教人员中并非孤例。

1960年开始，大饥荒不例外地扫荡了这里。犯人一月的伙食直降为6斤棒子面，鲜草铡碎了煮熟，搀和棒子面做黏合剂，和猪食没有区别。和夹边沟一样，劳教犯成堆死去。一天早上张元勋醒来，邻铺的犯人已经无声地死在被窝里。劳动队的厕所在院子里，有时早上起床，院里倒着七八具死尸，是半夜去上厕所一头栽倒的人。

浮肿到膝盖的张元勋也担任了埋尸任务，搭档是一位神父。埋尸的地点在一处河岸堤坝，正是他回忆录名字的来源。饿死的人或浮肿或干瘦，体重变得很轻，“和一只鸡差不多”。幸运的是，他们或许能得到神父的祈祷。张元勋说，河岸上埋葬的饿殍大约有上千人，写出来是一部现成的《悲惨世界》。可惜由于身患多种癌症，他没来得及实现这个愿望。

2002年姚小平在潘家园发现的《死亡右派分子情况调查表》中，全部94人中有84名来自清河农场，其中绝大多数死于1960和1961年，除了高校学生，更有许多中央部委的干部，此外还有和尚、阿訇各一名，都是一代知识精英。死者全部是青壮年，在“劳动教育”的美好名义下被剥夺了性命。在大会上公开为胡风辩屈的美学家吕荧，就死在被称为“等死队”的三分队北砖窑里。这些人的死亡原因一栏，和夹边沟的右派一样标为肺结核、肠炎、肝炎等疾病，实际上都是饥饿。

1962年，清河农场幸存的人员被转移到京郊团河农场“就食”，张元勋和谭天荣都在其中。直到这时，张元勋才确认自己脱离了死亡。死亡危机过后，又被送回清河。

劳改期满的张元勋，先到管教科领取一张释放证，随即又到“留场就业处”报到，释放证被收回。“二劳教”“二劳改”把刑罚变成了终身制。遇罗勉说：“劳教时还有盼望，一就业就永远失望了”。直到文革结束，张元勋才恢复自由身。

2000年炎热的夏天，张元勋用3个月写出了《北大往事与林昭之死》。两年后他查出了癌症。去世之前的张元勋，家里摆放着很多胎质厚重的瓷瓶，是他从泰山的古董市场买来。击节叩问之下，有深远回声。

4、四川峨边沙坪农场

78岁的铁流住在北京东郊，拥有一处庭院，这是他平反之后下海打拼的成果。利用这份家底，他还资助出版了一本记录右派经历的地下刊物《往事微痕》。引人注目的是，他的儿子还是十几岁的少年——他成家生子时已年近60。

铁流是四川人，在反右中与流沙河一起被打成反党小集团，送往峨边县沙坪劳教营。峨边县地处小凉山，是大凉山门户，与前些年因“盲井”事件出名的雷波县紧邻。齐邦媛写的《巨流河》记载，抗战最紧张时期，“雷峨马屏”地区被视为一旦成都陷落中国军民坚壁清野的最后堡垒，可见其地势险要。沙坪农场紧邻大渡河，背靠原始森林，正是前代石达开覆灭之地，农场五分厂海拔达2500米，可谓绝境，正是右派分子“脱胎换骨”之地。

根据《当代四川简史》，1957年四川划右共约60000人。应运而生的沙坪农场成了流放的一大去处，一万多名右派身入此处。讽刺的是，其中包括了不久前负责选址的两位劳教局干部。

铁流在沙坪劳教营呆了大半年，转往筑路支队修筑铁路。沙坪农场的饥饿不同于别处，从建场第一天就已开始。由于此前没有农垦基础，不毛之地涌入大量人口，口粮定额不足，犯人的定量只有一月22斤，还经过层层克扣，到嘴里只是一碗包谷面汤，“流动的速度连狗都追不上”，更不用说支持冬春的大劳动量。管教的训词则是“要想吃舒服，就得拼命开荒种粮，人民政府不会拿粮食白养你们”。

由于高寒的自然条件，农场的土地收不回种籽，口粮标准进一步下降后，死亡随即大量出现。根据林宪君的回忆录，三年大饥荒中全农场死亡人数过半，超过5000人。林宪君亲手掩埋过的死者在百人以上。他所在的小组开始有23人，数月后剩下7人，与其他组合并为20多人后，几月后又减为6人。

所有的死者一律无棺木墓碑，一穴埋葬几十甚至上百人，埋人最多的荒坡几年后种上南瓜，竟然重达百斤，得名“南瓜山”。2007年，铁流重访“南瓜山”凭吊，并赋诗称“千万尸骨化肥水，育出南瓜满山花。”

沙坪农场的饿殍中包括了著名的右派分子董时光。董时光是留美教育學博士，他的哥哥董时进是近来颇为著名的农学家，兄弟在易代之际的去就正好相反：董时进观望而终于离开大陆，在台湾继续研究土改；董时光则从美国回国，受周恩来亲迎，在西南师范大学任教。“反右”中，董时光因“出言狂妄”批评党员和主张教授治校被打成右派，当时同在西师任教、与董时光为朋友的吴宓日记中，多处有董时光受开会批斗的记载。遣送至沙坪农场后，董时光在饥饿面前低下了骄傲的头颅，每次吃完饭都用指头刮桶里残留的浆糊充饥，并回答狱警“比美国面包还好吃”。1958年，董时光和铁流一起调往筑路支队，1961年出差路上饥饿，用一床羊毛毯换了一斤干牛肉一口气吃完，不料肠胃饥饿过久无法消化，肠梗阻暴毙。

一个惊心的现象是，沙坪农场的成年死难者之外，还有数千名少年劳教犯。林宪君曾经在大堡分场带领14名“小劳教”烧木炭，最后只剩下3人，由于无力掩埋，林宪君亲手将数名小劳教的尸体扔进了河流冲走。一次一个小劳教趴在林宪君背上哭诉，希望临死前见妈妈一面，话未说完人已断气，几乎立即发出恶臭，原因是生前已经耗尽了人体的所有养分。

2013年5月，笔者在香港观看了谢贻卉导演的纪录片《大堡小劳教》。这部纪录片通过走访幸存者，还原了当年沙坪农场大堡少年劳教犯分部的饥饿史。1957年末，四川省仿效苏联模式，对轻微违法和品行不良的未成年人实行劳动教养。次年五、六千名十几岁的孩子出现在峨边沙坪农场，最小者只有9岁。

这些孩子的任务是在海拔两千米的山地上开荒，自给自足。由于土地荒寒，“劳动教养”的前景破灭，开荒变成末日晚餐，死神随之降临，据当事

人透露，一共死去 2600 多名未成年劳教犯。荒谬的是，“小劳教”中有些是家长迷信苏联电影《教育的诗篇》，强烈要求把不听话的孩子送来由国家管教的。饥饿降临之时，她们前来要求接回孩子却遭到拒绝，这些孩子以后全部饿死。1961 年大堡作业区崩溃，濒死的孩子被战士背下山。

由于死人太多，沙坪农场场长梁某被判了刑，恰巧与在筑路支队涉嫌“反革命集团案”被判刑的铁流身处同一囚室。铁流回忆，梁对此并无愧色，称身为共产党员和公安干警，执行上级指示是天职，“饿死人与否与我何干？”

和成人一样，从死亡线上逃生的“小劳教”们并不能就此解教，而是“留场就业”，直到 1970 年代由于人满为患逐批遣返，从事底层劳役。

在无名右派和“小劳教”的尸骨上，沙坪农场转产种植了茶树，一直存在到 2006 年，才搬迁至四川眉山。在峨边县的政府网站上，找不到任何关于沙坪劳教营的记载。2008 年，《眉山日报》刊登了一篇报道，记者与沙坪劳教所党委书记、所长一起“重访沙坪”，该报道提到了“搬迁后异常寂寞的所部办公区的瓦片上，已经长满厚厚的绿色苔藓”，却只忙于记叙“三代劳教人”艰苦卓绝、“再创辉煌”的事迹，没有一个字提到比苔藓更卑微的劳教人员的血汗和性命。

该报道还透露，2008 年的沙坪劳教所“是全国最大的劳动教养管理所之一，也是四川最大的劳动教养基地”，并且经营形式良好。数千名右派和未成年人的尸骨，或许终于为劳教营提供了足够的肥料。

5、青海湖劳改农场

1958 年去西宁的路上，火车坐了 3 天 2 夜，陆锦碧的脚肿了。这位长在红旗下的华东政法学院青年教师，因为响应系党支部号召提意见而戴上“右派”帽子，被发配到遥远的青海，在西宁郊外的工厂里劳动改造，由于表现好三年后“摘帽”。

但这只是幻景。由于当了著名法学家杨兆龙的女婿，沾染上“反革命”嫌疑，1965 年他被重新“戴帽”，判处劳教三年，送到青海湖以北、祁连山下的八宝农场。

八宝农场建立于 1957 年，专门关押右派和其它劳教分子。陆锦碧回忆，农场高峰时期有 1 万多人。农场紧邻祁连山下，海拔达到近 3000 米，严重缺氧，夏天沙尘暴不时肆虐，冬天气温接近零下 30 度。场区没有警卫，因为地处荒凉，逃跑的唯一道路是翻越祁连山，有似当年红军西路军失败后的逃亡。陆锦碧来到农场，看到 20 几个锯掉双腿的人，都是逃亡途中被冻掉。

在山岗上，陆锦碧清晰地看到了几年前饥荒的后果。“乱石下面，一个坑接一个坑，每个坑里都埋了好多人。”其中一具破裂的棺材，露出尸骸，是一对下放干部夫妇、李富春和罗瑞卿秘书的坟墓。在青海的亡魂中，有不少因为下放而自杀的“戴帽”干部，“右派管理右派”，来到这里的所有人都具有“流放”性质。

据原青海省公安厅干部尹曙生《劳动教养和反右派斗争》一文记载，三年饥荒中青海劳教人员死亡 4000 多人，其中 3000 多人是右派分子，1000 多人是女性。青海省省属劳改、劳教系统 3 年死亡三类人员（劳改犯人、刑满就业人员、劳教人员）49000 余人，占总数 16 万人的 30%。杜甫笔下“古来白骨无人收”的青海湖，叠压了新的白骨。

由于没有食物，大量劳改劳教犯和移民被遣散回内地，自谋出路，或者自行逃散。一些人在“大逃港”潮流中出境，陆锦碧在自制半导体中听到，幸存者在港台电台中讲述“十万爱国志士，困守祁连山下”。

陆锦碧在八宝农场期间，冬天雪太大，压垮了一座女劳教人员住的草棚子，棚子里的19人全部身亡。这些女劳教大多原是中學生，在1958年“清理大上海”的运动中，她们因为所谓“跳黑灯舞会、贴面舞”被送至青海劳教，葬送了青春。

1966年，八宝农场被撤销，陆锦碧和难友们一路西迁，直至柴达木盆地边缘、昆仑山脚下的伊克高里农场，海拔3800米，遍地是白花花的盐碱，像镜子一样反光，碱蓬是少数仅有的绿色。农场原址是一处河南移民生产队，队员都在大饥荒中饿死和逃亡。

1969年，陆锦碧的妻子杨黎明带女儿前去探望，乘坐押送逃亡者回场的便车到了农场，又乘坐马车才到了分场，气温低至零下20多度，当晚女儿就因为高山反应差点丧命。一家三口在戈壁上割黄麻根取暖，拉大车归来，让杨黎明想到了《伏尔加河上的纤夫》。在这片或许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劳教营里，陆锦碧因为批判文革的“牙膏皮事件”险些被处决，九死一生，文革之后才回到上海。

八宝农场或伊克高里远不是青海仅有的劳教营。据《青海省志·劳动改造志》记载，当时青海的劳改劳教农场共达32个，畜牧场23个。以青海湖为中心，海西有德令哈农场（下辖五个分场，管理5万犯人。德令哈这个听来富于诗意的名字，当时却是严寒、沙尘暴和刑罚的同义词，有犯人被沙尘暴吹至失踪。）、格尔木农场、香日德农场、诺木洪农场、哇玉香卡农场、查查香卡农场、马海农场；海北有浩门农场、青海湖农场和八宝农场；海南有曲沟农场、塘格木农场（文革学生领袖蒯大富、韩爱晶以后曾关押在此）、巴仓农场、吴堡湾农场、新哲农场；海东有甘都农场。农场的总面积达到耕地总面积的23%；监狱系统向国家交售的“爱国粮”，占全省统购粮的接近四分之一。

环绕自古著名的青海湖，形成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劳动营。由于中央“移民戍边”的意图，大量出身不好的农民和水库移民，以及一些逃避政治歧视的“盲流”迁徙至此，构成庞大的罪人群体。当年的劳改局干部回忆，青海一时成了“监狱”的代名词。《青海省志·劳动改造志》记载，仅大跃进后的三年，青海就调入犯人95000人，有25000名劳教人员从外地送来，分散在各个劳动营里，其中有5000多名女性。一位当年的劳改局干部形容，整个青海省几乎成了一座大监狱。

青海一直是江浙地区劳改劳教犯的主要遣送地区。据说当时上海和江浙一带的老百姓，在哄吓孩子时，总是说：“再闹，再闹就送你到青海！”遣送过程一直持续，陆锦碧在青海就担任了后来者的生产组长。到文革结束后遣送仍未终止，且犯人刑满后一律不许回上海。《上海监狱志》记载，1965年上海市第一劳改队整体搬迁至青海。文革后期，打群架入狱的上海犯人王士才，和2500名狱友一批坐闷罐子棚车被遣送到西宁服刑，户口也迁出上海落户青海，陆锦碧担任他们的生产大队长。王士才在青海呆了5年多，1982年刑满，得益于公安部长赵苍璧“犯人哪来哪去”的讲话，回到上海。但在次年的“严打”中，落户大西北的制度又一度被恢复，成为江浙犯人的畏途。1983年以后，上海还向青海调犯2400余人。

2013年，笔者在香港遇到笑蜀，他透露，一个商人曾经无意中得到大量的青海省劳改劳教人员档案材料，笑蜀目击“装满了一个保险柜”。这些材料足够写出一本扎实的青海劳改史，但后来被有关部门没收了。眼下关于青海劳动营的历史，只有《青海省志·劳动改造志》这本不到200页的薄薄小书，和一些当事人的回忆录。

2013年初，北京东北郊的一座养老院里，曾经的“右派”周培桐寂寞离世。生前他一直因腿部缺血瘫痪卧床，身上插着一个尿管，忍受一阵阵的抽筋和瘙痒。周培桐原是中央戏剧学院毕业生，因“小说反领导”打成右派，发配青海八宝农场运输队。农场的水源来自于祁连山冰川雪水，在一次上山运水途中，水车翻倒压伤了周培桐的双腿，数十年后发病。文革中周培桐被遣送回天津烧锅炉，只有过短暂的婚姻，晚年和烧锅炉时的同伴相依为命，临终时孑然一身，在劳教生涯中的译著也没有机会出版。

尾声

劳教制度在“肃反”“反右”中面世后的半个多世纪，难以计数的劳教营。应运而生和消失了。以上列举“五大劳教营”，只是就其典型性提纲挈领，并非排座次。

在政治压倒一切的年代，劳教营遍地。内蒙、宁夏、新疆等“老少边穷”地带，都是大宗流放的去处，其中也包括“革命圣地”延安。在三年饥荒年代，这些地方无例外地遭遇了普遍饥饿，成为一代精英埋骨之地。其中知名者，即有甘肃的会宁、四川的长寿湖、湖北的神农架、云南的大理。此外，还包括像铁流所在的筑路支队和治淮支队、甘肃的引洮工地这样的“流动劳改营”，在饥饿和繁重的劳动之下，造成了大量的死亡和冤案。

以笔者见闻所及，在上海市劳改劳教系统下，即有以关押劳教犯人为主的白茅岭农场，1958年划归上海，直到1973年改为监狱劳改场所。仅在1959至1964五年间，农场普查肺结核22877人次，累计发现2657例，查肠寄生虫人数每次在7000到10000名，劳教容量可见一斑，其中包括500名少年犯和小劳教。

上海市公安局直属的另一个劳动基地是江苏北部，被犯人称为“苏北利亚”，比之于俄罗斯和苏联流放犯人的西北利亚。“苏北利亚”以近海的盐碱地为中心，建立了大丰农场等多个基地，从解放初就开始接收犯人，第一批即遣送犯人2515人。安徽治淮工地是劳改犯的另一大去处，根据《上海监狱志》记载，前后共有8万余名囚徒被遣送治淮。

“反右”之后，苏北劳改犯中增添了劳教的右派身影，还曾成立独立的右派支队，著有回忆录《苏北利亚》的于疆即是其中一份子。“苏北利亚”官方名称为上海农场，直属上海市公安局，1955年又被公安部列为全国大型劳改单位，关押上万名犯人。1981年9月撤销第一劳改总队建制，改为上海市第一劳动教养所，直到眼下才结束历史使命。

文革之前，新疆是劳改劳教分子遣送的另一大去处，仅上海市监狱系统即遣送6000人以上，包括数百名女犯。文革后仍调犯12000余人。中国人民大学的“右派”学生甘粹在南疆的喀什农场度过了20个春秋，劳动营紧邻塔克拉玛干沙漠，住地窝子，开大沟排碱水种棉花，劳动无休无止。三年饥荒期间甘粹目睹了附近一个劳动连队全部饿死，甘粹本人靠亲友接济和“耍死狗”幸存下来。

位于辽宁沈阳郊外的马三家教养院，是辽宁最大的劳教营，由数座劳教院组成，占地近3万亩。根据《院志》记载，从1957至1995年共劳教近10万人，其中女性1万余人。这本《院志》少等地记载了三年饥荒中的死亡情形：1960年10至12月共死亡近100人。2013年春天笔者来到这座劳教城时，仍感萧条肃杀，50余年堆积的历史坚冰尚未消融。

北京市劳改系统除了兴凯湖和清河两大延伸基地外，尚在本地拥有大兴团河和天堂河劳教农场，以及南口的劳改基地，一直使用到劳教制度废除。团河农场在大饥荒的后期，充当了右派分子濒死者救济站的任务，张元勋和谭天荣都曾转移到此地休养。此外南口农场收容了文革前的“反动学生”，学者王学泰即曾在此劳改。文革后北京市还恢复了对于黑龙江齐齐哈尔双河劳教农场的控制，直到最近撤销。

中国的劳改营制度传承于苏联，劳教则是本土独创，二者长期混同在一起，直到1980年代中期，劳教所才划归司法局。因而在数十年中，劳改营和劳教营难以区分，只有局部的差异。

可叹的是，在社会主义理想中被视为“神圣”的劳动，现实中成为不折不扣的惩罚，又加上了死亡的酵母。劳教营沦为不折不扣的法外之地，直到近年，还在发生超强劳动和“大挂”“老虎凳”、“死人床”等丑闻，对外界则讳莫如深。真实只保留在历尽磨难的亲历者心中，和死亡与遗忘赛跑。

此番中央废除劳教，劳教营的喧嚣也归于沉寂，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中，但它们的气息仍在，基因犹存。苏联劳改营的创立者列宁曾说，忘记过去意味着背叛。更真实的说法则是，忘记过去意味着重来。

夹边沟、兴凯湖、清河茶淀、峨边沙坪、青海湖……一系列或熟悉或陌生的地名背后，是无数受难者的墓志。如果我们握不住劳教营亡魂的青烟，至少记住这些地名，以免它们重来。

主要参考文献：

- 《北京志·监狱劳教志》，北京出版社，2006年
- 《上海监狱志》，上海社科院出版社，2003年
- 《青海省志·劳动改造志》，青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
- 《（辽宁省马三家教养院）院志》，内部资料，1997年编
- 《告别夹边沟》，杨显惠，上海文艺，2003
- 《墓碑》，杨继绳，天地图书，2009
- 《往事微痕》系列，铁流主编，民间刊物
- 《又见昨天》杜高，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4
- 《走错房间的右派精英》，铁流，夏菲尔出版公司，2009
- 《往事不堪回首》林宪君，未刊文稿
- 《大堡小劳教》，纪录片，谢贻卉导演，2013
- 《死亡右派分子情况调查表》，北京市公安局1963年汇编，2002年由姚小平发现于潘家园市场

七、宁夏街的日子

（1）逮捕入狱

1966年7月12日，星期二，我像往常一样黎明即起。

宿舍在厂区的中部，一楼一底，长约36米、宽约10米，底楼是厂房，车床、铣床、刨床……昼夜轰鸣，楼上是就业人员的住地。

大约三百六十平方米的空间里住着两百多号人。都是五十年代被强制劳

动教养，六十年代劳教期满被强制留厂的就业人员，按照法律是具有公民权的，实际上衣食住行都在严格的专政管制之下。宿舍里没有床，一律睡在地板上，整个房子的地板就是一个大统铺。每个人的铺位大约 60 厘米宽、200 厘米长，相当于一个小棺材的面积。

两个铺位之间没有隔离，也不准悬挂布帘，左右两边的邻居就像两口子似的挨得很近。

这两百多人一个挨着一个的沿着大房子长度方向排成四排，两排中间留有一条宽约一米的过道，就像是堆码着一排排多年的存货。

宿舍白天关灯，晚上却彻夜灯火通明，便于夜晚查房的公安干警上楼来一目了然，一览无余。

清晨，我从铺上爬起来，穿上衣服，拿着毛巾、牙刷，穿着一双泡沫拖鞋，快步下楼，楼下院子边上有一个长方形的水泥槽子，安着七、八个自来水龙头，终年提供冷水，两百多号人大部分早上起来不洗脸，需要洗脸的无论冬夏都在这儿速成。

我在那儿只用了两分钟就完成了洗漱作业，走到房子背后的一块空地练了十几分钟太极拳。

天还没完全亮，空气中弥漫着轻纱似的薄雾，一抹又一抹血红色的泛光在东北边灰蓝色的天幕上忽隐忽现，西南方有两三堆乌云时聚时散的移动着，看来今天多云间晴，有风。

食堂已经开门了，我迅速跑回宿舍拿了碗筷到食堂花了一角钱、二两粮票买了一碗稀饭，一个馒头。为了省钱，清早这顿是不吃菜的，用不了五分钟，馒头、稀饭一扫而光。回去整理一下铺盖，准备上班了。

我当时在技术科从事机械设计工作。技术科坐落在路边一排平房中间，房子是砖木穿逗结构，柱子是砖砌的，墙是竹篾编的，竹篾两面糊着泥巴，刷着石灰，表面不光但是很白，也还能够挡风遮雨。

说起来是技术科，总揽四川消防机械厂全部技术工作。科长、副科长是不懂技术的公安干部——陈永培、牛泽益，他们不在这间屋子里办公，只有布置或检查工作的时候才来。真正做设计、工艺、技术管理的只有七个被无端劳教数年、解除劳动教养以后被强制留在劳改单位的所谓就业人员。按设计、制造、工艺分工，各司其职，相互配合，其工作效率之高，绝非一般国有企业所能比拟。

一间大约二十四平米的房子里摆了七张办公桌，除了我以外，还有：

徐炳泉，学徒出身，技师，六十多岁，经验丰富，擅长机械制造与维修，解除劳教摘掉反社会主义分子帽子。

余华年，技工学校毕业，三十五岁左右，工人技师，擅长车工、铣工，也能设计制图，解除劳教摘掉反社会主义分子帽子。

陶冶，四十余岁，原重庆通用机械厂生产科长，机械制造专业，解除劳教摘掉右派帽子。

刘洪福，三十八岁，长春汽车拖拉机学院调干生，1956 年毕业，原军工企业技术员，汽车制造专业，解除劳动教养却仍然戴着反革命帽子。

周恩光，三十二岁，上海交大 1956 年毕业，原军工企业技术员，机械制造专业，英语基础不错，也是解除了劳动教养还戴着反革命帽子。

肖祖贻，三十二岁，重庆大学机械系 1956 年毕业，原航空设计院技术员，解除劳教摘掉右派帽子。

七个人当中有一个共产党员，四个共青团员，两个非党人士，党团员比例占百分之七十。本来都是中共内部所谓革命队伍中的同志，1957年反右运动中都被划为敌对分子而强制劳动教养。不过戴的帽子名称不同，因为当时上面说了“工人当中不反右”，让大家无所顾忌地帮助党整风，殊不知风没有整成，反而越刮越歪，伟大、光荣、正确的党给敢于提意见的工人戴了一顶反社会主义分子的帽子，和右派分子同流合污了。历史或家庭出身有点问题的则戴一个反革命帽子，也加入了数以千万计的“地、富、反、坏、右”队伍。

谁知这样做的结果到了1979年右派改正时惹了麻烦，右派可以改正，不是右派不能改正，于是纷纷申诉说，都是因“伟大”的反右运动而进劳改队的，希望跻身于右派行列，竟然争着戴起了右派帽子。经过一番周折，除徐炳泉已经逝世，不知如何处理以外，其余同仁皆得到党的光辉恩赐，关押了二十几年后，恢复名誉、恢复职务、恢复二十年前的工资。至于青春么，自然是无法恢复的了，就算献给党了吧。当时流行的口号就是“把一切献给党”。

1957年或1958年送劳动教养，按三年计算，最迟1961年就该解除劳动教养了，解除劳教不再称为劳教分子，但不能擅自离开劳教单位，经济待遇不变，政治待遇就是改了个名字叫“就业人员”。到了1966年，技术科内这七个人连劳教带就业总共被关押八、九年了。据说劳动教养是对罪行轻微不够判刑人员的行政处分，这一关就是八、九年，比抗日战争时间还长，至今还看不出来释放的迹象，不知还要熬到何年何月。莫非这就是毛泽东说的“给出路”？

那天，离上班时间至少还有半小时，我就匆匆的进了办公室，心里着急，因为需要尽快完成混砂机的设计和图纸绘制工作。总图已经画好了，我打开图纸思索着，审视着一个一个部件，想想还需要做哪些改进，接下来要抓紧绘制零件图。

另外六个同事陆陆续续的来了，一天繁忙的工作就要开始了。这时候屋外电线杆子上的高音喇叭忽然响起了广播：“所有人员八点半到大礼堂集合开会。”

又是什么紧急的事情来了？

近几个月以来，“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

揭露“三家村”，批判《燕山夜话》的文章让人目不暇接。

“愤怒声讨……”“彻底摧毁……”“横扫一切……”的口号越叫越响。

“牛鬼蛇神”的帽子漫天飞舞，不知道哪天就会落在哪个人的头上。

“牛鬼蛇神”一词，最早见于唐代诗人杜牧的《李贺诗序》：“牛鬼蛇神不足为其虚幻荒诞也。”

在我国古代，牛头之鬼，蛇身之神都是人们顶礼膜拜的偶像。古代传说中的不少英雄人物，如伏羲，女娲等都曾被描述为牛首人身或人首蛇身的形象。佛教中，使者“牛头阿傍”和蟒神“摩侯罗迦”俱是后世颂扬的护法神人。唐代文学家韩愈说过，“昔之圣者，其首有若牛者，其形有若蛇者”概即指此。

到了近代，牛鬼蛇神演化成了贬义词，泛指歪门邪道、丑恶荒诞。

文革期间成了广泛用语，毛泽东多次引用，什么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地、富、反、坏、右黑五类，走资派、叛徒、内奸、工贼等等。总之，凡是毛泽东想打倒的各类人物，不管是紧随其右的国家主席，功勋卓越的高级将

领，仰人鼻息的民主人士，天真无邪的青年学生，还是欺上压下的基层干部，忍气吞声的平民百姓，都在这个无所不包的天罗地网之内。可以批斗审查，挂牌游街，关牛棚，进蛇窟，送劳教，判徒刑。甚至如张志新、林昭、遇罗克等较早觉悟的爱国青年，被割喉、枪杀、处死。据统计，文革中冤假错案三百余万，被划为牛鬼蛇神的以数千万计（见《拨乱反正立丰碑》吴林泉，彭飞编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毛泽东死了以后，叶剑英曾披露，文革期间，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狂飚中，死于非命的逾两千万人，受伤害的高达一亿人。

1966 年 5 月，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呐喊声中，曾经无限效忠于毛泽东的共产党员邓拓、吴晗、廖沫沙等北京市的领导层忽而成了反党的黑帮。

1966 年 6 月，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叫嚣下，长期不离于毛泽东左右的干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物一夜之间变成了篡党夺权的反动分子。

在那个天昏地暗、风雨如磐的六十年代，牛鬼蛇神的数量与日俱增，华夏文明遭到野蛮摧残，亿万民众陷于诚惶诚恐之中。

劳动教养单位虽然是封闭性的，但从报纸上连篇累牍发表的文章中，这些关押在“无产阶级专政”铁笼里的群体，也预感到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必将掀起一场政治风暴，来势汹汹，猛烈的程度绝对不亚于 1957 年的反右运动。

1957 年，毛泽东向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开刀，旨在维护一党专政。现在矛头直指党内高层和开国元勋，意欲力保寡人独裁，为传承毛氏天下扫清障碍。

神仙打仗，百姓遭殃。又将有成百万的人被投入监牢，成千上万的人死于非命了。

比较敏感的人似乎看到了即将降临的灾难和个人前途的渺茫，纷纷自杀。检验工李兴贵触电自杀身死，电器维修工赖培荣服毒，技师徐炳泉服毒自杀未遂，李某某持刀自杀（经抢救未死）。短短的时间里连续发生多起自杀事件，使这个劳教场所多了一些阴森恐怖的气氛。

六、七月份召开了两次逮捕大会，余洪熙、左湘、朱元善等七、八个人相继被捕，四川消防机械厂一时杀气腾腾，人人自危，惊恐不安的氛围日益浓重。

我当时还没有绝望，还对毛泽东和共产党抱有幻想。

1966 年 5 月，我和患难之交李诗慧历经三年相恋，携手进入婚姻殿堂。双方都是平生第一次感受异性之间的爱，沉浸在身心愉悦的幸福之中。五月八日，婚假期满，她只身回到远在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峨边县的沙坪农场。我还憧憬着美好的未来，为了小家庭的稳定，下定决心，往后靠技术吃饭，不再关心国家大事，更要远离政治，只求和爱妻一起过平静的日子。我没有做过违法的事情，循规蹈矩按照共产党的要求“夹着尾巴做人”，再大的政治风暴也不至于轮到我的头上吧。

八点半到了，四百多名劳动教养期满，被强制留在劳教场所继续接受改造的就业人员，席地而坐，挤满了“大礼堂”。所谓大礼堂实际上是一个可以挡风遮雨的大房子，长约 42 米，宽约 10 米，前面是砖木结构的“舞台”，供干部训话、批斗、抓捕、宣判之用，偶尔在大礼堂演电影或劳教就业人员自排的文娱节目。后面是劳教和就业人员的厨房，当中是一块空地，铺着灰

褐色的三合土，没有一张桌子也没有一把椅子。

往常这样的大会一般由管教股股长周以贵或张育新主持，今天换成了一车间主任王伟。往常是厂长张志超讲话，今天换成了不认识的人，据说是从成都市西城区法院派来的驻厂工作组的组长。管他是谁呢，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他们换来换去是劳改队的干警，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我们是“二等公民”，专政对象。

会议开始了，王伟高声喝道：“今天是对‘反改造分子’牛立华施行逮捕的大会，把罪犯牛立华押上来！”

咦！今天这个会原来是对着我来的。王伟那沙哑的突如其来的叫喊声让人疑惑和震惊。我犯了什么罪呢？没犯罪呀！我随之站起来，不知道什么时候我身后竟然出现了四个全副武装的彪形大汉，押解着我走到了“大礼堂”的侧门，没有登台亮相，没有宣读逮捕证，也没有让我签字，没有任何文字手续，而是不由分说地由一个武警狠狠地给我戴上了手铐。

我站在“礼堂”门口，闭上眼睛，长长地呼吸了几口气，平静一下情绪。然后睁开眼睛看了看周围，这个我曾经承受精神和肉体折磨长达七年之久的地方，我曾经呕心沥血为四川磨床厂和四川消防机械厂筹建了两个理化实验室的地方，我曾经忍辱负重委曲求全幻想得到理解和任用的地方，我曾经刻苦钻研技术期盼还有机会报效祖国的地方，竟然以“文化大革命”、“触及灵魂”之名，给我戴上了法西斯的镣铐。

我仔细地思索着，这究竟是因为什么呢？投入劳教以来，八年有余，尽管内心不服，因为我没有做过不利于国家和人民的事，也没有任何危及中共政权的行为，本身被冤枉地关押在劳动教养场所，忍辱负重、委曲求全，承受着政治上的巨大压力，身心备受折磨，没有发过怨言。1961年摘掉右派帽子、解除劳动教养以后，被强制性地留在劳动教养单位，从形式到内容，从精神到肉体，仍然被视为专政对象，看不到一点出路。即便如此，我还对中国共产党抱着希望，对毛泽东怀着幻想，仅仅指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求得一块生存之地，没有任何有损于社会的行为。今天，发疯了似的“无产阶级专政”，竟面面向我举起了屠刀。

我无愧于心，无愧于人民，无愧于祖国。我要昂着头走出这个大门，我坚信中国人民迟早会觉悟起来。认清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独裁者的真实面貌，把他们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忽然，管教干事戴付卿来到了旁边，他倒背着双手，用难以名状的眼神上下打量着我，我和他目光相遇，随即垂下了眼睑，看着远方的地面。

大约过了两分钟，我看他走向武警，小声的说着什么。又过了大约两分钟，那个武警走到我的前面，用专用钥匙把手铐打开，松了两扣，这时我才发觉自己的两只手都已经红肿不堪了。

我抬眼看了一下戴付卿，他已转身而去，只看见他的背影慢慢地移动、移动……渐渐地走远了。戴付卿现在还活着，住在成都文庙后街四川省公安厅宿舍大院内，或许他还可以回忆起当时的情景。

在办公室里，我还有装满了两个大书架的书籍，在宿舍里也还有铺盖、衣物，我向看押着我的武警提出需要收检，他怒目而视地吼了一声：用不着你管！

过了一会儿，记不清是谁了，给我拿下来一个用麻绳捆好了的行李卷，丢在旁边的地上，看了我一眼，摇了摇头，一句话没说，背过身子匆匆地走

了。

又过了大约五分钟，押解我的武警下了命令：走！

我弯下腰，用戴着手铐的双手，提起行李卷，往左拐，走出了“礼堂”旁边狭窄的巷道，来到了厂内的主干道，前面不远处停着一辆中吉普。

我不紧不慢地朝前走着，回头看了一下，四个持枪的武警紧紧地跟在后面，他们不是枪上肩，而是横端着明晃晃的刺刀，一副鬼子进城的姿势。

一个除了手铐以外别无寸铁的文弱书生，在他们看来似乎是武功非凡的江洋大盗。这个政权貌似强大，实则心虚到草木皆兵、病入膏肓了，我不由自主地用鼻子哼了一声。

走着走着，对面来了一个熟悉的面孔，平时没有交往，但是彼此都知道是劳动教养就业人员。他走到距我一米多远的地方，用气流和嘴唇的动作发出了“保重”两个字。我条件反射似地也没有让声带振动，回答了两个字“放心”。声音很小，但我相信他能够听到，遗憾的是我不知道这位难友的名字，只记得好像是一名车工，至今四十多年了再也没有见过他。

上了内部既有铁栏杆又用军绿色帆布遮得严严实实的汽车，行驶不过十分钟，车停了。

我下了车，外面的太阳有点晃眼睛。抬头看看，车停在一条比较僻静的巷子里，迎面一个拱顶门洞，安装着铁栅栏门，门楣上钉着一块小小的门牌：宁夏街 186 号。往左右看看，一道长约一百米、高约五米的砖墙横亘于前，墙顶上密布电网，两端均有岗楼。沉重的、灰黑色的高墙，几乎占据了这条街道的一半，隐含着阴森恐怖之气。原来这里就是闻名全川的宁夏街监狱。

宁夏街是成都市一条街道的名称，位于现在一环路以内。清朝雍正六年（公元 1728 年）天津总兵盛瑛之子盛九功率领宁夏骑兵入川，在成都西北角城墙边上的一块空地修建公馆，初名盛家口，公馆落成后，盛九功和随军部下以及他们的眷属居于此地，因宁夏人居多，老百姓称之为宁夏街，因而得名，沿袭至今。

清光绪三十三年（公元 1907 年）大理院正卿沈家本^[1] 奏请改良监狱，聘请日本狱政专家小河滋四郎来华讲学，拟定中国第一部狱政法典《大清监狱律》。并提出各省新造模范监狱一所，作为施行新政的准备。宣统二年（公元 1910 年）四川按察使在成都境内小北门西来寺（今宁夏街成都树德中学所在地以南）勘官地四十亩，按照日本图纸动工修造监狱，分内监（关押已决犯）、外监（关押未决犯）、女监、病监四部，民间号称四大监，民国时期和共产党建政后仍用于关押犯人。历史悠久，扬名全川。

2001 年以后，监狱迁至成都远郊郫县，原房屋拆除后该地块竟然无人愿买，据说死人太多，阴气甚重。后由政府规划修建新城市广场，沉压在累累白骨和无数冤魂上的主体楼高达三十五层，今日已成繁华之商业区。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一段阴森恐怖的历史渐渐地远去了，人们似乎忘记了昔日的四大监。我却难以忘记宁夏街的日子。

那天，我进了宁夏街监狱的大门，在门口略等片刻，举目四望，左侧是传达室和岗亭，前方一条两米多宽的甬道直通后面的深宅大院，右边墙角挂着一个白底黑字的旧木牌“成都市公安局第二看守所”。

押送我的武警打开了手铐，我两只手提着一个小小的行李卷站在一旁。从里面出来两个人，在旁边的传达室办理交接手续，然后喝令：走！

这两个人穿着警服，没带长枪，是否有短枪不得而知，一个在前面带路，

一个在后面紧跟。几弯几拐我当时没记清楚。同年十一月份，离开宁夏街看守所的时候，我有意地数了数，从临街的大门开始到进入监舍，一共要经过八道门，其中需穿过厨房的两道门，逃不过炊事员的眼睛。整个通道戒备森严、令人惊叹，要想越狱必定是难于上青天。

后来听说，宁夏街还真跑过人，那个未决犯（其实应该叫犯罪嫌疑人）头脑灵活，动作敏捷，胆大超人。他被看守所的武警提出监舍，在墙根下面站着等候审讯，看见旁边有一辆自行车和一顶草帽，灵机一动，走上前去，把草帽戴在脑袋上遮住光头，推起自行车大摇大摆，连过几道门，无人问津，据说出大门的时候还和站岗的警卫点头示意，拜拜！成功地逍遥法外了。

我随着领路的干警走到了一个院子，院子面积不小，长约四十米，宽二十余米，足以容纳一千人。院子的三面可以看到五米多高的红砖围墙，上面安着电网，院子的两角儿有比围墙还高出一截的岗楼。

高墙之内阳光洒地，静若平湖，听不到一丝风声水响，喧嚣的省城中居然有这样一块宜于参禅修道的宝地。

进门右手方向，平行地横排着三栋平房，大概就是监舍了。监舍中间巷道的铁栅栏门正对着开阔的院子，像是三只张着血盆大嘴的怪兽，似乎就是古代所说的狴犴了。那个干警带我走到第二栋监舍的门口，迎面看见一块涂着灰白色油漆的木头牌子，上面有三个黑字：二巷道。上三步台阶，顺着一米宽的巷道往里走，巷道两边是单间的监舍，紧紧地关着门，无法看到里面的动静。干警的步伐很快，我也随之加快速度，走到倒数第二间停了下来。

把身上的东西掏出来！他命令说。夏天穿的衣服不多，翻遍了所有的衣兜、裤兜，只掏出 17.25 元钱，他说：钱暂时保管，手表呢？我说：我没有手表，他看了看的确是两手空空，不再追问。

下一步是让我把裤腰带解下来，我不知道这是干什么，莫非进监狱要脱裤子？但是不得不服从，系裤子的皮带和系内裤的棉带都要解下来，我的内裤是松紧带就免了。解下来腰带又不知道往哪儿放，拿在手里犹豫之间，抬头一看，舍房外面的墙壁上有一个挂钩，上面已经有好几条腰带，于是把我的裤腰带也挂了上去。进监狱，腰带、鞋带儿都要解下来，据说是防止自杀，中共豢养的狱卒们想的真周到。后来才知道，在毛泽东光辉思想的照耀下，中共统辖的所有监狱和对一切关押的人员都是这个规矩。国家主席、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刘少奇临死前甚至连裤子都没得穿，只用一个薄被子裹住身子。

他取出钥匙，打开铁锁，拉开铁栓，用力拉开厚重的木门，没有说话，脑壳一扬，冲我用嘴一努，我知道是让我进去，我的前脚刚踏入监舍，后脚还悬在空中，只听得咣当一声，木门被紧紧地关上了，差一点打到我的脚后跟。

紧接着哗啦一声，拉过了钢栓，咔嚓一声，上好了铁锁。

在这深庭大院，寂静的巷道里，咣当、哗啦、咔嚓显得那么突出、震耳、瘆人。

附注：

[1] 沈家本（1840-1913）字子淳，别号寄簃，浙江吴兴人，清末法学家，被誉为中国近现代法学的奠基人，是第一个为中国引进西方法律体系的法学泰斗。主持修定法律期间，仅《刑法》和《刑民诉讼法》就先后译出法、德、俄、荷、意、日、

美、比利时等国法律文献近四十种，以作参考。他精心整理中国古代法律资料，并加以整理考订。曾建议废除凌迟、枭首、戮尸、缘坐、刺字、笞杖等酷刑。参照西方和日本刑法制订了《大清新刑律》。他主张“治国之道，以仁政为先”，“治尚宽大”，“世无无法之国而能长久者”，“为政之道，首在立法以典民”，“以严刑惩罚贪利、曲断、骹法、坏法的司法官吏”。

（2）十七号监舍

我第一次进正式的监狱，不免好奇。先站在门内，上下左右巡视了一道，说了一声：哦，这就是监狱呀。

这是一间长宽三米的正方形监舍，两边是一通到顶的砖墙，右边的墙上贴着一张《监规纪律》，正对着门的后墙上开了一个窗户，长不过 0.7 米，高不过 0.5 米，和住家户不同的是，这个窗户的位置很高，离地面两米开外，上面要接近屋顶的天花板了。窗户靠里面竖排着七根大拇指粗细的钢条，外面是不透明玻璃。回过头来看那个门，完全实木，给人一种十分厚实沉重的感觉，门当中有一个包着镀锌铁皮的喇叭口形的窥视孔，里面看不到外面，外面可以看到里面。房间铺的是木地板，擦得很干净。沿墙根一个挨着一个的坐着十二个人，门旁边靠墙角的位置放着一个有盖子的马桶，盖子上面垛着一个盛有一半水的脸盆。

靠门口坐着的那个人，用比较冷峻的声音喊了一声：“坐下！”墙边上几位室友挪了挪身子，腾出了一个空挡，我挤着坐在那里。

随即用目光扫了一圈，九平方米的监舍之内拥挤着的十二位室友，面无表情，不动声色。

靠门口的那位再次发话：“你叫什么名字？”说着拿出一个本子准备记录，看来大约是个组长或室主任，后来才知道在宁夏街叫“召集”。

监狱里由公安干警指定的一个小组或一个舍房内的负责人，不能叫组长，因为与首长、局长、厅长、委员长的“长”字犯讳，有的叫值日或值星员，又犯了司令员的讳，宁夏街看守所叫“召集”，既不犯“首长”之讳，也不犯“司令员”之讳、中共擅长文字游戏乃至于此，谁说中共没有人才，这就是。

“召集”既然是党和政府定的称谓，必须承认。“召集”问我叫什么，我应声回答：“牛立华”。他立即在本子上写“刘”，四川口音牛(niu)刘(liu)不分，姓刘的比姓牛的多得多，一般听了很容易想到是刘。我伸头一看马上纠正说：“不是刘，是牛，”跟着拉长了声音一字一顿的说：“牛-鬼-蛇-神-的-牛。”这时周围坐着的几位忍俊不禁的笑了起来，有的用手捂着嘴。

这位“召集”姓严，据说是小学教师，因奸污幼女被逮捕，入狱后不苟言笑，说了一声：“接着学习”。坐在我对面的一位戴着眼镜的室友拿起了一张旧报纸，有板有眼的读着。那是《人民日报》1966 年 6 月 1 日“国际儿童节”那天的社论，标题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这篇文章是陈伯达[1]接管《人民日报》后发表的第一篇社论，他亲自参与拟稿并经毛泽东批阅修改，我读过几十遍，其中有些语言十分“精辟”，不妨抄录几句，时隔四十多年再来看看“毛泽东思想”究竟是什么东西。

摘录原文如下：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意识形态、宗教、法律、艺术、政权，最中心的是政权。有了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权，就丧失一切。因此，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无论有着怎样千头万绪的事，都

永远不要忘记政权，不要忘记方向，不要失掉中心，忘记了政权，就是忘记了政治，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变成了经济主义，无政府主义，空想主义，那就是糊涂人。”

马克思是研究经济的哲学家，吸收前人成果（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等等），自成一家之言。其学说风行一时、流传百年，虽不乏谬论，尤其是反社会、反人类的本质，属于历史的逆流，必然会受到摒弃与批判，但在社会科学领域中仍占有一定地位。他的故乡德国莱茵省特里尔镇至今仍有纪念其贡献的马克思博物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及人类历史上存在过的一切专制制度的批判，包括对资本主义早期反人道的剥削现象、金钱至上等异化现象的批判，是有积极意义的。诚然，马克思讲过阶级斗争，也说过无产阶级专政，其主旨是建立幻想中的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平等社会，但他绝不敢说是建立独裁专制社会。

古今中外存在这种幻想的不仅仅马克思一人，中国两千多年前就有“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论说。儒家的重要经典《礼记》中的《礼运》篇描述大同世界的社会景象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近代康有为、孙中山也曾极力倡导。

马克思和恩格斯生前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很多假设是没有经过实践检验的，仅供学术上研究探讨之用，如果盲目用于社会实践，就会产生极坏的后果。当马克思发现有人故意歪曲自己的理论，命名为“马克思主义”时，他非常恼火地说：“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 376 页）

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只不过是西方传统哲学链条中一个小小的链环，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到圣经中的天堂、摩尔的乌托邦、康特拉的太阳城、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等等，都是哲学史上的重要环节。马克思谬误的地方是：他说这个理想明天就会实现，资本主义准备好了一切物质条件。过分地鼓吹阶级斗争及暴力夺取政权，认为只要一“革命”就能实现共产主义。马克思早年的理想脱离了社会实际，他的所谓共产主义，是泯灭人性的，是让人类过蜜蜂或蚂蚁那样的组织生活，成了永远不能实现的主观主义的臆想，或者叫痴人妄想。马克思在晚年已经深刻地认识到，共产主义仅仅是一个假设，是决不能贸然推行的，他曾对热衷于搞共产主义的人提出过警告。

但在这篇《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中，马克思的根本观点却被断章取义地曲解为只是用暴力夺取政权了，陈伯达、毛泽东等自称马克思的信徒，竟然把马克思主义也横扫了一遍，取其糟粕，去其精华，极尽篡改、亵渎之能事。毛泽东并不信仰马克思主义，也不甚了解马克思主义，他的书房和卧室摆放的绝大多数是中国的经史子集等线装书，只是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帜招摇过市，欺骗和愚弄人民而已。马克思曾经指出：共产主义就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649 页），恐怕毛泽东从未读过，茫无所知。否则无法解释他对“自由”极力排斥，对“民主”极力遏制，尤其是对“天赋人权”“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深痛恶绝，终生醉心于“家天下”美其名曰无产阶级专政的的谬论了。

毛泽东晚年常说他是“马克思加秦始皇”（1958年8月19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马克思是装扮成羊头的狼头，秦始皇是冒充狗肉的狼肉。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篇文章的妙处在于泄露了天机，它的确是毛泽东的真实思想，纵观毛泽东从聚众暴动、上山为寇、夺取政权、独揽朝纲到逝世的前一天，他的所有思维、全部精力，无一不是用在争权夺利上。纵横捭阖、尔虞我诈、口蜜腹剑、阴谋阳谋都是为了独裁专政。临死还要钦定接班人，妄图让他的老婆江青、侄子毛远新执掌大权，甚至想让他霸占别人妻子而来的通房大丫头张玉凤[2]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常常自喻秦始皇，痴迷秦始皇的家天下，什么“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为人民服务”、“民主自由”、“革命是解放生产力”、“革命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等等都是愚弄和欺骗人民的口号和谎言。权！权！权！才是毛泽东一生追逐的目标，他一切行为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血腥的权字。历史已经证明，历史必将进一步证明，毛泽东的倒行逆施是自毁声誉、自掘坟墓，其结果必然和他的主观愿望相反。

1966年我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那时，对毛泽东还近乎崇拜，四十余年的历史事实教育了我，让我逐渐认识了毛泽东是披着伪装、说着谎言，极端反动的民族罪人。

谎言只适用于没有发生的、未来的事物。在千真万确的事实面前，在已经过去的历史面前，谎言只能是撒谎者的可耻记录，必将遗臭万年。

读报仍在继续，我一边沉思着一边听，社论说：

“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内激烈的阶级斗争的继续发展。”

社论煽动群众“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把所谓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

这篇社论无异于“文化大革命”的一纸动员令和宣言书，向全国人民宣告一场特大政治风暴已经来临。“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成了“文革”中煽动打砸抢的口号。长达十年令人发指的癫狂和污浊，从这一天的社论拉开狰狞的大幕。从国家主席刘少奇到掏粪工人时传祥，更有无数“专家”“学者”

“权威”“祖师爷”被迫害致死，这是一个长长的名单：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柴沫，作家老舍、数学家赵九章、老报人储安平、翻译家傅雷、乒乓球明星容国团、电影明星上官云珠……据官方粗略估算，十年“文革”中非正常死亡的高达两千万人，受迫害、被株连的人口约一亿人。

我们还在读报纸，忽然听见了脚步声，坐在我斜对面的一个室友侧耳静听，他说：“文武张”。我还没明白是什么意思，一阵响动，监舍的门打开了，门外这个人用手指着刚才读报的那个室友说：“你出来！”他站起身子，扶了扶眼镜，到门口穿上了放在过道里的鞋，跟着来人走了。我漫无目标的问：“喊出去干什么呀？”刚才说“文武张”那位室友主动回答说：“不像是提讯，‘文武张’事儿多，没事找事。”我接着问：“刚来那个干部姓文？”

“不是，他姓张，文武路派出所调过来的，”他很快的回答说。我“哦”了一声，再问：“你贵姓？”他说：“免贵，姓衡，衡孝泉。”他又主动说：

“送你进来的那个干事姓章，立早章。”我才明白是这么回事，两个干事的姓发音相同，为了区别，把从文武路派出所调来的叫文武张，把那个叫立早

章。衡孝泉还告诉我，被喊出去那个人也姓张，张敏，动力机械厂的就业人员，不知道为了什么再次被捕入狱。

说着说着，外面又有了脚步声，舍房里的人立即不说话了，正了正身子，摆出了一本正经的样子。门开了，张敏回来了。这个“文武张”对着我说：“你出来”！我奉命站起来，没有系腰带的裤子差点落了，我连忙把裤子提了提，挽紧一点，然后穿鞋，跟着这位张干事顺着巷道往外走，一边走一边数，这栋监舍巷道两边每边有十间舍房，两边一共二十间。我所在的是十七号。

走出了巷道，下台阶往右拐是一间干部办公室，我随着张干事进去。

他坐在藤椅上，让我坐在一个小板凳上。他说：“你进来干了些什么呀？”他态度很凶，说话很急促。

我想了想，才进监狱十几分钟，我什么也没干呀，连泡尿也没撒。于是如实回答。

张又问：“你说了什么话？”

我暗自回想，刚才说了什么话呢？随即回答说：“我没说什么话。”

他勃然大怒地说：“你老实点，进来就不老实，看我怎么收拾你。”

我再次回答：“报告张干事，我真没说什么。”

他瞪了我一眼说：“你说什么牛鬼蛇神？”

我不由得好笑，哦，原来是这句话，看来在监狱里说话真得十分小心了。我不慌不忙地对他说：“门口那个犯人问我姓什么，我说牛鬼蛇神的牛。”

“为什么要这么说？”他还是气势汹汹的样子。

我说：“本来是黄牛的牛，但是我不敢说，我要是说了，就怕犯错误，革命的老黄牛是形容老干部的，岂不是美化自己。我被横扫进了监狱，就是牛鬼蛇神，大家知道这个流行词，所以说是牛鬼蛇神的牛。”我说完了以后，偷偷地看他的表情。

他听了，愣了一阵，好像抓不到什么把柄，也不好上纲上线，于是以教训的口吻告诫我，进了监狱要严格遵守监规纪律，老老实实的交代问题，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说了一大堆监狱常用语言。

我点头称是，心里想着跟魔鬼打交道真不容易，说话、走路都要小心，到处有奸细，随便说一句话都可能惹来麻烦。

他站了起来说：“回去！”我立即起身，一只手提着裤子，一只手摇摇摆摆的走在他的前面回到了舍房，门没锁，我拉开钢栓，开了门走了进去。又是咣当、哗啦、咔嚓，这回不那么疼人了。

回到监舍里，我看了张敏一眼，他还在继续读报。读的人很认真，听的人不在意，关在里面总要想自己的事情。

过了一会儿，又听见巷道里有响动，哪个监舍门被打开了，跟着杂乱的脚步声，一群人有的走，有的跑。一位室友说：“放风喽！赶快解大便！”

我感到奇怪，怎么不在放风的时候到厕所解手，而非要在舍房里解手呢？岂不是臭气熏人吗？

室友们七嘴八舌的告诉我许多放风的注意事项，和这间舍房传下来的规矩。

放风就在后面的小院，只有十分钟的时间，洗脸、刷牙、解手、倒马桶、洗碗、洗衣服、活动身体，呼吸新鲜空气等等，必须在十分钟内完成，很紧张。厕所的蹲位少，二十多人一下放出去解手，必然要排队，耽误时间，十七号舍房的先驱者们摸索出来的办法是抓紧在放风之前解手，每天安排两个

人负责倒马桶，一个人擦地板，其余的人出去以后可以各干各的事情。十七号监舍关押的人换了一批又一批，这个优良传统源远流长持续至今。

通常放风从一号监舍开始，巷道左边是单号，右边是双号，一次放两个舍房。至于哪两个舍房一块儿放风，由干部临时决定，今天是一号和二号，明天就是一号和四号，后天是一号和六号，再后天是一号和八号。这样做是避免舍房之间相互串通。我想了想，理论上的概率是二十八天才能重复一次。

监狱里的管理真是严谨缜密。以前共产党员坐监的时候往往利用放风的机会传递信息，现在中国共产党执政了，变成监狱的管理者了，要给坐监的人堵死这条路。高！中共内部不乏具有聪明才智的人，可惜全充当了反动统治者的狗腿子。。

轮到今天擦地板的室友开始工作了，他拿起抹布在盆子里浸湿，先擦门，然后从墙根起认真负责地擦地板，擦到谁的面前，谁都会主动地拿起裹成一团的小铺盖卷儿给他腾出空间，九平方米很快就擦完了。

从一号监舍开始放风，轮到我们十七号，大约需要一个半小时。等待放风的这段时间是舍房最轻松的时候，不用读报，不用正襟危坐，十三个人在这九平方米的狭小空间内可以自由自在的走来走去。当天舍房里有五个室友挨着个儿的解大便，马桶的直径有半米左右，高也有半米，既不能蹲也不能坐，只有两手扶着桶沿儿来个骑马蹲裆式，好在中国人多数都熟悉太极拳。在马桶上练中国功夫，大家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了。说不定还能起点强身健体的作用。

室友还告诉我，只有放风的时候才能用水，可以洗碗、洗澡、洗衣服。轮到“立早章”值班不管闲事，要是“文武张”值班，需要注意不能和别人说话，否则会挨骂甚至取消你的放风资格。

终于轮到我们舍房放风了，今天是“立早章”值班，打开门以后，让提着马桶的两位室友最先出门，擦地板的那位端着脸盆紧随其后，其余的十个人陆续走出巷道，来到放风的地方。

宁夏街看守所这三栋平行的监舍是直通式的，每栋监舍的巷道两端都有铁栅栏门，前门对着大院子，出了后门是一个狭长小院。平时两头的铁栅栏门都是紧锁着的，放风的时候，前门紧闭上锁，后门打开。小院的宽度只有五米左右，对面和左侧拦着一道高墙电网，高墙下面有一个安着四个水龙头的长方形水泥槽，院子的长度有三十米，右边是敞篷式的厕所，只有屋顶，没有围墙和隔断，便于看守一目了然。厕所旁边有一间十平方米大小的洗澡房，里面除了一根拖在地面上的黑色橡胶水管子没有其它设施。

两间舍房一块儿放风也就是二十六七个人，我看了看，那两位室友用竹刷把紧张地洗刷着马桶，冲了三道水，称得上一丝不苟，比二十一世纪中国特色的食品加工厂还讲究卫生。厕所里四个蹲位都有人，旁边还站着七八个等着拉屎的难友，如果解一次大便需要三分钟，排在最后的那位至少要等六分钟才能就位，十分钟的放风时间就去了大半，可能还没有解完，放风就结束了。不由得想起了十七号舍房订立的规矩堪称英明伟大，真该喊声万岁。

我在水泥槽那儿从容地洗了洗脸，然后在小院儿里来回的走着、看着。洗澡房里有五个人，脱得精光，用冷水冲着身子，院子里的空间就只剩下七八个人了，一个大高个儿站在监舍门口，背贴着墙，紧皱着眉头，一动不动，既不洗脸、也不洗澡，目光呆滞，旁若无人。其余几个在小院儿里舒展身体、深呼吸，扩胸踢腿。我突然想起了一首五十年代在中国很流行的苏联歌曲《祖

国颂》，歌词是“我们祖国多么辽阔广大，她有无数田野和森林。我们没有见过别的国家，可以这样自由呼吸……人们可以自由走来走去……”

一声哨子响，放风结束。马桶抬回来了，又端来了一盆干净水，依然垛在马桶盖子上。十三个人全部回到舍房，“立早章”走过来清点了一下人数，随后又是咣当、哗啦、咔嚓，舍房的木门紧紧地关上了。

回到舍房里，大家依次坐好，还是拿出那张刊登着《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报纸，由一个人在那里读。舍房里既没有钟又没有表，弄不清是什么时间，估计十一点半了。室友说：要开饭了，跟着告诉我吃饭的规矩。监狱里还是三顿饭，一天七两粮食定量，早晨二两干饭，中午三两干饭，晚上二两稀饭，基本没吃过肉。每人每天大概有一斤蔬菜，新鲜蔬菜的含水量都是比较高的，萝卜、白菜等本身含水量都在百分之九十以上，绿豆芽的含水量高达百分之九十五，经过煮、炒，去掉了一部分水分，可能就只有半斤了，半斤菜分成三顿，每顿就只能摊到一点点了，一小碗饭，一小撮缺油少盐的菜就是最丰盛的午餐。

哗啦一声，是铁栅栏门打开的声音。一位室友说送饭的来了。果不其然，跟着就听见铁轱辘车的声音，衡孝泉站起身来，走到门口，把鼻子贴近门缝用力地吸气，说了一声：“炒绿豆芽儿。”约莫过了半个钟头，送饭的小车才推到十七号舍房，我们已经在里面排好了队，我排在最后。每个人手里拿着两个碗，我只有一个搪瓷缸子。门开了，挨着次序把碗递出去，一个炊事员盛饭，一个炊事员盛菜，我说明是今天才来的，要了一个碗、一双筷子。今天的菜果然是绿豆芽儿，衡孝泉的鼻子真灵。

大家坐在自己的位置，肚子虽然饿了，却舍不得狼吞虎咽，只有这一点饭菜，三口两口吃没了似乎有点欠缺，于是慢条斯理地一口一口地享受，四川话叫韵味儿，一口饭咀嚼几十下才舍得咽下去，这才是真正的细嚼慢咽，符合医生和营养师的要求。

吃了饭午睡，下午两点半继续学习。说是午睡，多半都睡不着。舍房密不透风，房间墙壁、天花板、地板的总面积大约 54 平方米，窗户的面积只有 0.35 平方米，还不到总面积的百分之一，而且是安着玻璃的，厚重的木门是紧闭着的，室内空气不能流通。成都夏日午间气温在摄氏三十几度，闷热难耐。

九平方米睡十三个人，头脚交叉着也很挤，好在大家整天光着脚，不穿鞋袜，脚上没有一点臭味儿，我才知道“人之初，脚不臭”。那个味儿是鞋和袜子带来的吧。

十三个人，个别的穿着背心，多数都是赤裸着上身，只穿了一条短裤，挤在一起，闭着眼睛，浮想联翩。

下午两点一刻，电铃声大作，我为之一惊。同室的难友说：这是午睡起床的信号，我才镇定下来。上午读报纸，下午是讨论、发言。我第一次进监狱，还不熟悉环境，不知道该怎么发言，先看看别人怎么做吧。坐在门口那位“召集”宣布：结合上午学习的社论检查自己。

我从 1957 年被打成右派就开始做检查，写检讨。起初还是认真的，虽然想不通，为什么我不反党偏要说我反党呢，既然党说我反了党，我只好逆来顺受。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渐渐有所醒悟，毛泽东发动反右运动的目的不在于是否有人反对他，而是刻意夸大敌情制造恐怖氛围，防民之口，使中国人皆成为不敢妄言国事的驯服工具，以便任其独霸朝纲恣意妄为。

1958年进了劳教队，做检查司空见惯，天天离不开，人人都要做检查，日久天长检查便成了例行公事。侃侃而谈，面不改色心不跳。但我再也没说过我有罪，由此消防机械厂的所有人都知道牛立华是不认罪的，好在都是朝夕相处的熟人，都明白检讨是儿戏，当不得真。初来乍到宁夏街无缘无故的就要在陌生人面前作检查？还是先听听别人怎么检查再说吧。正在思索之际，隔壁传来了咚咚声音，我不由得一惊。室友说：又打起来了。原来隔壁在开批斗会，上演全武行。十七号监舍的十三个人，虽然年龄从20岁到50岁，文化从小学到大学，案情各有不同。但都不赞成打人，互相无仇无冤被关在一个牢房里就是有缘，各有各的苦，不应该再给别人增加痛苦。尽量说点开心的事，偶尔还说点笑话。东拉西扯的时间似乎过得很快，送饭的车声响了，于是都站了起来活动活动腰腿，准备吃饭。小车推过来了，十三个人早已排好了队，门一开，依次伸出碗去，一人一瓢。端在手里烫，一摇一个晃，走起路来浪，一吹一个鹇，喝在嘴里烫，喝到肚里胀。显然这是中午的剩饭剩菜加水(可能还加了一点米)煮成的。晚饭过后继续学习，学习什么呢？既不准谈案情也不准谈审讯过程，只有天南海北的侃大山，说笑话。九点钟睡觉。第二天如法炮制。

住了几天，人渐渐熟悉了，相互成了难友。那个姓严的“召集”据说被判了七年有期徒刑转移到已决犯监舍去了，十七号监舍的气氛显得更轻松了。不久新关进来一个人，他面带恐惧之色，浑身颤抖体似筛糠。室内诸人尽皆惊愕不语，读报纸的照样念念有词。约莫过了一刻钟，来人的情绪才稍有稳定，原来是个带有命债的杀人犯，过了两三天，他的情绪才渐渐趋于正常。他姓黄，是成都牧马山附近四川齿轮厂的武警班长，共产党员，某日值夜班，见一人奔厂门而来，他立即喝道“站住，不许动”那人继续前行，他没有问明情况，随即举枪、瞄准、扣扳机。子弹出膛，那人应声倒地。枪声惊动保卫科，现场勘察确认该人已死亡。旋即将黄某羁押，翌日逮捕送宁夏街看守所。连续几次提讯，审讯员的态度都很凶，他害怕得很，嘴里不停地念叨可能要判死刑。结婚一年多，小孩还不满三个月，说着说着就嚎啕大哭起来，一边喊着“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呀”。十七号监舍的难友多次劝慰他，无论审讯员多么凶，都不要怕不要乱说，坚持“举枪、瞄准、扣扳机”成了习惯动作。不是故意谋杀，属于过失伤人，顶多坐几年班房，绝对不会判死刑。十七号监舍从来不窝里斗。

附注：

[1]陈伯达(1904-1989)，福建惠安人，1925年加入国民党，在军中和军官学校任秘书、政治教官等职。1927年投身共产党，被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回国后未见重用。1937年赴延安，任毛泽东政治秘书。1943年发表抨击蒋介石之《评〈中国之命运〉》一文，得到毛泽东赏识，在党内地位渐次高升，以毛泽东名义发表的文章多出自陈伯达之手。1966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陈伯达被任命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中共政治局常委，伙同江青制造大量冤假错案。仅“冀东惨案”即有84000余人遭批斗，2955人被迫害致死，株连者不计其数。1970年陈伯达与江青渐生矛盾，毛泽东维护江青，旋即掀起“批陈整风”运动，将陈软禁，名曰审查。1976年陈伯达被捕入狱，1981年1月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同年五月保外就医。1988年10月刑满释放，1989年9月病逝。

[2]张玉凤(1944-)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人。小学文化，1960年在牡丹江铁路局

任餐车服务员，有几分姿色，擅长察言观色、曲背逢迎。1962年，十八岁的张玉凤受铁道部派遣，任毛泽东专列服务员。很快就被调到毛泽东专用车厢任贴身服务员，服务周到、无微不至，深受年近古稀之毛大人的喜爱。随后进入中南海，长期担任毛泽东生活秘书兼机要秘书，日夜陪伴毛泽东。据云，1976年7月15日，毛泽东召见毛远新、华国锋、江青、汪东兴、张玉凤等人，提出毛死后政治局常委名单，毛远新、汪东兴、张玉凤均做了记录，事后有所透露。名单顺序为：毛远新、华国锋、江青、陈锡联、纪登奎、汪东兴、张玉凤。

（3）受髡刑

剃光头在中国古代是一种刑罚，名之曰髡（音 kun）刑，是一种耻辱刑，主要流行于中国古代夏商周到东汉期间。最早的记载见于《周礼》。

古人将髡刑与其他肉体刑罚并列。据《魏书》、《太平广记》等记载，当时的人们之所以重视头发，不仅是遵循“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的孝道，还迷信须发乃人生精气之所在，可视为人身的替代品，因而削去头发不但是对犯人的一种羞辱也是一种对人身的伤害。

公元196年（汉献帝建安三年）夏，曹操率大军兵发宛城讨伐张绣，此时麦子已熟，曹操下令：“大小将校，凡过麦田，但有践踏者，并皆斩首。”行走之间不料曹操的坐骑被麦田中突然飞起的一只斑鸠惊扰，践踏了麦田，曹操要按律执行，假惺惺地举起佩剑欲当众自刎，谋士郭嘉为其开脱道：“《春秋》有言：法不加于尊。丞相统率大军，战事当前岂可自戕？”曹操说：“既然《春秋》有言，那我姑且免死。以发代之”于是用剑割下一绺头发，算作自我惩罚。

强制囚犯剃光头，通过处置身体达到心理震慑的作法，曾一度为某些国家采用。二战以后，联合国根据多数国家意见制定并颁布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及《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等系列人权标准，“所有被剥夺自由的人应给予人道及尊重其固有的人格尊严的待遇。”人格尊严被确认为一项最基本的、不可克减的权利。基于此，强制剃光头这种侵犯人格尊严的作法被普遍禁止。

在美国，联邦法律并无对服刑人员的头发作针对性要求，具体情况由各州自行决定。而根据各州狱政局的规定，仅有纽约、弗吉尼亚、伊利诺伊等十二个州，出于对卫生、安全等考虑，对男性囚犯的头发有长度要求，除最严格的纽约州要求必须短于1英寸以外，其他州大多要求不长于衣领。而如果囚犯因为宗教信仰等原因拒绝剃发，部分监狱还可以做出相应调整

在中国，司法部的官员拿着纳税人的钱不能白吃饭，于是以研究犯人该留什么样式的发型为题开会、研究、讨论、拟稿、印刷、发行，先后颁布过不少文件。如：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依法文明管理看守所押人犯的通知》中，第二条明确规定：“除本人要求外，禁止给在押人犯剃光头，禁止剃有辱人格的发型。”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七条规定：“罪犯的人格不受侮辱。”囚犯依然享有人格尊严权。

司法部颁布施行的《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明文宣布废除早年发布的《罪犯改造行为规范》中关于“除一个月内出监的罪犯外，一律留寸发或光头”的规定。同年，海口、上海等监狱也以书面表示不再强行规定罪犯必须

剃光头。

上海监狱管理局下发了《关于服刑人员自主选择发型范围的通知》，规定上海市各监所的男性服刑人员可自主选择平头、寸发和光头三种发型。

以上有关犯罪嫌疑人和罪犯发型的规定不断更新，这些层出不穷的文件旨在向人民群众展现司法部官员的敬业精神和工作成果，对犯人可谓洞察秋毫、体贴入微，关怀到每一根头发的长短。不然吃饱了就没事干了。

实际情况如何呢？

笔者的亲身经历表明，中共的文件从来是写给别人看的，只要一进了看守所（不含短期羁押的转运站和关押国民党高级将领的战犯管理所以及关押中共高官的特别监狱），不管什么人一律剃光头，这是中国特色之一，是五十年代以来通行的做法。试问司法部的大小官员和狱卒狱警，谁敢说这不是事实？！

《刑事诉讼法》第十二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即在法院判定有罪之前，犯罪嫌疑人应视为无罪，享有公民正当权利，不应该遭受额外惩罚。实际上，不管有罪无罪，已决未决，在枪杆子下面所有法律条文统统形同废纸。

这里选了几张二十一世纪劳改系统内部刊发的照片，从图片（1）（2）（3）（4）（5）中可以看出，无论是监狱还是劳教场所，在押人员一律是光头。应当指出的是，按照中共书面上的说法，劳动教养是行政处罚，被劳教的人除加判管制和明确剥夺公民权的以外，是具有公民权的，公民有人身自由，有选择服装和发型的权利，然而到了中共管辖的劳教场所，管你是不是公民，一律是专政对象，统统剃光头，穿囚服。上述照片不是我拍的，是公安单位展现专政威力引以为荣的写实作品。

文革批斗风盛行时，兴起了中国特色的“阴阳头”，把人的头发剃一半、留一半。一般是剃光左边、留下右边头发；因为黑五类、牛鬼蛇神等都被毛泽东划归左中右的“右”里面。个别凶悍刁钻的行刑者，甚至对眉毛也同样剃一半、留一半。从野蛮时代遗留的民俗里，只有对小偷、妓女、败坏门风的妇女，才采用这样极端践踏人格尊严的方法加以侮辱，戏弄。而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剃阴阳头一度成风，1967年4月10日，痞子本性的投机分子蒯大富得到江青的支持、毛泽东的默许，把刘少奇的老婆王光美抓到清华大学批斗，堂而皇之的国家主席夫人也被剃了阴阳头，在三十万人批斗会上受尽了人格侮辱。

我进入宁夏街的第二天，刚刚吃过早饭，二两糙米饭和一小撮咸菜，文武张和立早章还有两个不知道姓名的武警风风火火地进了巷道，逐一地打开牢门，把昨天才关进来的人喊出来，在巷道里占成一列，然后把各个牢门锁好，文武张在前立早章和另外两个武警断后，只听得喊了一声：走，我随着人流出了舍房走到坝子里，左右一看，一共是十三个人，年龄大约在二十岁到三十五岁之间，其中四个戴着眼镜，互不相识，都没有言语。

院子里东墙跟前面摆着一架外拍相机，旁边放着两个凳子，哦！原来是照登记照，这是必要的入狱手续。

一会儿，来了一个人，身穿蓝布大衣，背着一个黑色帆布包，文武张看见来人，朝他点点头，跟着冲着我们说：按照我喊名字的顺序，过来理发！最先过去的人把凳子摆好，坐了下去，不用围挡，不用镜子，来人直接走过来，拿起推子，三下五除二，几分钟满头黑发纷纷坠地，又用推子沿着嘴巴

扫了一圈，长短不齐的胡子也被扫荡殆尽，只留下参差不齐的一点胡子茬。

紧跟着是填表，姓名、年龄、籍贯、案别等等，在那张纸上着重的是要按左右手十个手指的手印，两个狱卒在一旁严密监督，表格的下半部分呈现出一片斑驳的血红色。

随后就是照相，理发师退位，换了一个也穿着蓝布大衣的摄影师，动作熟练，十三个人只用了十五分钟左右，咔嚓、咔嚓……大功告成，十三个新剃的光头回到各自的舍房。如今过了五十多年，我还没看过那入狱并受髡刑后的第一张照片呢，难免遗憾，它是中国一个特定时期的缩影，应该是有历史价值的。

(4) 如此审讯

1954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颁布了第一部《宪法》。

第八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

第八十七条煞有介事地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国家供给必需的物质上的便利，以保证公民享受这些自由。”

关于法院的审判，第七十六条载明：“人民法院审理案件，除法律规定的特殊情况外，一律公开进行。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

第七十八条明确：“人民法院进行独立审判，只服从法律”。

宪法颁布之时，我曾经为之兴高采烈过。进了监狱，体验了中国特色司法的黑幕，才知道所谓宪法不过是一纸欺骗百姓的空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是在斯大林授意下制定的。1949 年 6 月，刘少奇秘密访苏，斯大林建议尽快成立中央政府和准备宪法。1950 年毛泽东访苏时，斯大林再次建议及时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制定宪法。1952 年 10 月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参加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之际，斯大林再一次强调：为了驳斥国际敌对势力对新中国的攻击，使政府合法化，便于参加国际活动，中国应该提前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制定宪法。并明确建议可在 1954 年进行选举和通过宪法。

斯大林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求中共制定宪法，毛泽东不得不接受斯大林的建议。于 1953 年成立了以毛泽东为主席、朱德等三十二人为委员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毛泽东于当年 12 月率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南下杭州，在号称西湖第一名园的刘庄西湖国宾馆，拟定宪法草案。翌年三月毛泽东返回北京，提出宪法初稿。中共中央决定由董必武等组成研究小组，聘请周鲠生、钱端升为法律顾问，叶圣陶、吕叔湘为语文顾问，对宪法初稿研究修改。六月份公布了这一个宪法草案，进行“全民”讨论。1954 年 9 月 20 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获得通过。宪法的制定过程郑重其事，颁布之时也热闹非凡，可惜一天也没有实行。八个月后就发生了“胡风事件”，成为建国后“以言定罪”之开端，毛泽东丢掉了遮羞布，这部美丽的宪法在独裁专制的体制下名存实亡、不宣而废。

我如实地记录所谓人民法院对我的审讯过程，意在让读者看看中共的宪法不过是写在纸上的条文、装点门面的摆设，看看中国共产党掌控的司法机关是怎样玷污宪法、玩弄法律的。

我被捕入狱是在 1966 年 7 月，在此之前经历了共产党蒙蔽、胁迫和操纵群众，采取断章取义、歪曲捏造、无中生有、任意扣帽子的“反右”运动。也怀疑那种无需调查、不经核实、不容分辩、连一纸法律文书都不要，就把

人送到专政机关劳动教养的违法行为。但是由于当时对共产党的法西斯本质尚未认识清楚，还存有幻想，认为到了法院总归要依法办事，所以审理期间我采取的是低调的妥协姿态。

我认为自己没有危害社会主义革命的行为，也没有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活动，即使1957年被划为右派，长期关押在专政机关，身心备受折磨，也没有一点一滴反对共产党的想法，更没有丝毫推翻这个政权的念头。作为曾经的共青团员，还幻想着祖国的未来是没有剥削、没有压迫、充分民主、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社会。

1957年反右、1958年大跃进、1959年反右倾、1959年至1961年全民大饥荒、1962年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1963年“新五反”和“阶级斗争，一抓就灵”、1964年的“四清”和“社会主义教育”、1965年充满火药味的批判《海瑞罢官》、1966年“文化大革命”等等政治运动的现实，从理论到实践都与共产党曾经倡导的“民主、自由、进步”背道而驰，与毛泽东高唱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大相径庭，因而我开始对共产党有一些怀疑，但仅仅是怀疑，全是一些思想问题，是否“反动”还须待分析。即使都是“反动”的，也是我向管教干部“交真心，说实话”时主动暴露出来的思想，大部分并没有构成言论，而且遵照领导意图进行了分析批判，没有坚持自己的观点，就是惩罚也不会很严重。如果我能在审理期间做到态度良好、表示悔罪，似乎还可能得到宽大处理，最多也就是戴一个帽子。

我满以为司法机关一定能切实调查，认真审讯，严肃地对待法律问题，实际情况却大大出人预料。

按照法定程序，一般审讯过程应该有如下一些步骤：

(1) 公安局预审，预审结案时由被告确认全部犯罪事实，或在预审记录上写出自己的意见。

(2) 检察院进行审查、核实预审材料，确认是否起诉。

(3) 确认起诉后拟定起诉书并将副本发给被告，令其做好答辩准备。

(4) 依法公开开庭审讯、宣判。

实际是怎么审讯的呢？

我于1966年7月12日被捕入狱，7月14日上午成都市公安局的一名预审员黄立鼎提讯，仅仅用了几分钟的时间，问了姓名、年龄、籍贯、案别等，丝毫未涉及具体案情，大概只能叫做立案登记。

过了一个多月，直到8月18日才进行正式预审。这次换了一个预审员，增加了一个书记员，未透露姓氏名谁。

在审讯过程中，我对那些与事实有出入，但还不是不着边际的问题一般均未申辩，仅仅对那些毫无根据或颠倒黑白的所谓控告做了必要的说明。

此次审讯终结时，我见记录不够完整，在某些地方甚至有较大出入，很容易被人误解，因而请求补充和更正。对此，预审员颇为反感。我刚刚写了几个字，他就极不耐烦，幸好书记员让我继续写下去，连连说着：快点！快点！才使我得以对个别问题作了简略的补充。为了不致引起预审员更大的不满，我对记录中的许多失误都没有切实追究。

我认为这是第一次预审，审讯员只蜻蜓点水似的问了几个题目，总共不到半个小时。没有深入问题的实质，以后必然还要审讯，既然付诸法律，肯定需要逐一地澄清全部事实，可以留待预审结案时再做最后认定。

谁知这次预审以后，就没有再进行审讯。而且省略了预审结案这个必要的步骤，省略了由检察院审查并核实材料的步骤，也没有在出庭前把起诉书发给被告。而是突如其来地在 1966 年 9 月 7 日正式出庭了。

法庭就在宁夏街监狱区里面，从我所在的十七号监舍出来，经过长长的巷道和三道铁门，走出监舍大院院子，外面又是一个院子，侧面是一堵青砖砌筑的高约五米的墙，往前走五六米有一排平房，约十一二间，就是审讯室。提出来的犯罪嫌疑人面对青砖站在这堵高墙下面等待提审。

我在墙下面站了大约十分钟，被监狱的看守押送到审讯室。

房间不大，二十平方米左右，前面是一个高约 25 厘米的木制平台，上面一字排开三张办公桌，那是审判员和陪审员的位置。下面的空地中间放着一个凳子，就是被告的位置了，进门后我坐下来才发现那凳子是固定在地面上的，不能移动，意在防止被告愤怒已极时抄起凳子打审讯员。公安司法的官员们自知理亏，为避免挨打，想出了如此妙着，考虑得真周到。

法庭由一名审判员和两名人民陪审员组成，那位四十多岁、肥肥胖胖的女审判员坐在中间，她左边是一位年近古稀、面目清瘦的的老头儿，右边是一位年逾花甲、身材矮小的老太太，左男右女，中规中矩，井然有序。门口站着法警。

开庭伊始，宣读起诉书（此起诉书及后来的判决书等我至今仍保存着），全文如下：

四川省成都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 （66）检劳诉字第 027 号

被告牛立华，男，三十岁，汉族，北京市人，家庭出身资本家。一九五七年在重庆长江电工厂猖狂向党进攻被划为右派，因不服监督改造，一九五八年被送劳动教养，一九六一年十月摘掉右派帽子，解除劳教，留通惠汽车修配厂就业至今。

被告牛立华，因反革命一案，于一九六六年七月十二日，由成都市公安局依法逮捕，预审后移送本院审查起诉，经审查判明其犯罪事实如下：

被告牛立华，解除劳教后，一贯坚持反动立场，极端的仇视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恶毒地全面系统地攻击党的各项方针政策，诬蔑说“三面红旗下面执行过左”“总路线的基本点已经变了，还在喊总路线万岁”“大跃进的成绩是虚的……”。攻击肃反、反右斗争说“肃反扩大化，搞错十万人，翻案是不会停的”“中国现在被划的敌人太多了，以后要出现修正主义”。并狂妄地说“中国不出现修正主义我就自杀”。

被告还极力丑化社会主义，美化资本主义制度，宣扬资产阶级“自由”，说“今天社会就是不自由”。攻击毛泽东思想是言行不一致“理论上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诬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想批判那个就找那个的材料。若不想批判那个，问题再大也不了了之”。

被告因被划为右派分子不认罪，一九六五年以来经常狂妄叫嚣要翻案，说“我要告到中央去”，当其他就业人员劝阻时竟说“我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三不怕烫，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又说“既然党把我看成敌人，视我为草芥，我就视你为寇仇”，反动气焰十分嚣张。

综上所述：被告牛立华，一贯坚持反动立场，恶毒地攻击党的各项方针政策，诬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狂妄叫嚣翻案，在就业人员中造成极坏影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十条一、三款之精神，应依法惩

处。

此致

成都市西城区人民法院

检察长陈清云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六日

台上这位又肥又胖的女审判员用成都方言读完了起诉书，一名法警把起诉书副本交给我，我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当时的感觉是：

(1) 不由得怒火中烧！这份起诉书极尽断章取义、歪曲捏造、无中生有之能事。身为检察长的陈清云，把我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和不同对象说的话，以及从未说过的话，各取一句或几个字，拼凑、编造在一起，捏造了起诉书。非流氓和无赖不会采取这种手段，实属卑鄙无耻。毛泽东说过：“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怎么中国共产党掌控的检察院这么不讲认真呢？

(2) 心中暗自高兴。就起诉书所列的这些罪状，不过是一点言论或者说思想问题，没有任何具体的犯罪事实，按照公开发布的政策，不足以判刑。

我镇定了一下情绪，缓缓地对审判员说：“起诉书的绝大部分内容都不是事实。”

她为之一惊，“啊？”了一声，然后恶狠狠地说：“哪一点不是事实？”

我回答说：“开头这几句话‘被告牛立华，男，三十岁，汉族，北京市人’是事实。”

我接着说：“由此以下，从家庭出身开始，都不是事实。我父亲是会计，或者说主任会计，没有资本，怎么叫资本家呢？顶多算是小资产阶级职员。”

那位老太太很积极，没等审判员说话，她抢先说：“小资产阶级就是资本家。”

胖胖的女审判员看了她一眼，用右手在桌子底下做了个动作，不让她多嘴。接着对我说：“你家里划的什么成分？”

我回答说：“据我所知，大城市没有划成分，你是成都人，成都市划成分了吗？没有吧？北京也没划成分。如果划了，以当地政府划定的成分为准，资本家也好，地主也好，土豪劣绅也好，军阀也好，我全接受。如果没划，就不能任意写一个成分。”

我认为我的回答是客观的，也是尊重事实的。

那位不甘寂寞的老太太又说了一句：“解放以后都划了成分。”

审判员摇了摇头，又用手冲她摆了摆。从此以后那位老太太再也没有说话了。

我当时在想：如果真的尊重人民，尊重陪审工作，尊重人民陪审，就应当聘请有一定文化水准、有一定法律常识、有陪审能力的人担任陪审员。并应根据陪审员的不同情况陪审不同的案件，让陪审员有可能充分了解案情，熟悉审讯过程中的一切问题，这样才能发挥陪审作用。

如果只是在形式上设置了陪审员席位，找一些不懂法规政策的人充当陪审员，又用瞒天过海的手段不让陪审员了解案情，这不但是对严肃的陪审工作的玩弄，而且是对陪审员的侮辱。

事后我才打听清楚，中共统治下的法院在聘请陪审员的时候，并不考虑其文化素养、司法常识、陪审能力。而是从街道办事处烈军属名单中找几

位家庭经济比较拮据的老头、老太太，每参与一次陪审，法院给付 0.5 元钱劳务费，依当年的物价，可以买四斤多大米，够一家人吃两三天的，既照顾了烈军属，又减少了居委会救济金的负担。

这哪里是陪审！完全是亵渎司法、愚弄人民、欺骗舆论的遮羞布。是一党专政，独裁统治的特定产物。

我接着就起诉书所列的内容逐条答辩。但从审判员的谈话及表现来看，她对审讯并不甚感兴趣，好像只是走个过场，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似乎立即就可以判决。我当庭提出：请求调查了解，查清事实以后再行处理。

9 月 10 日。我在监舍内写了一份书面材料，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起诉书中所列的各条罪状，逐字逐句地作了说明，再次郑重地以书面方式请求继续审理。

当时写的那份材料交上去了，我没有留底稿。即使留了底稿，在监狱里十几年，每逢“元旦”、“五一”、“十一”都要搜查，铺盖、枕头都要被翻来覆去地摸一遍，狱卒们特别注意文字记录，查“反动笔记”是他们的主要任务。一张小纸条也保留不下来。写这个回忆录的时候，只能凭记忆追述，对其中的引文重新核实了内容和刊载日期，务求准确有据。论据和语气基本保留原貌，于今看来，论据有些偏颇，似不合现在的时宜，为忠实起见，仍依原样，请读者理解。

当时用的题目大约是“请求继续审理，切望查明事实”，其内容大体如下：（文中引号内的宋体字为起诉书的原文）

“被告牛立华，男，三十岁，汉族，北京市人”——

起诉书中的这段话正确无误。

“家庭出身资本家”——

我祖父是北京远郊的农民，农忙务农，农闲在门头沟煤矿做矿工，1942 年即病逝，我父亲是北京某地毯厂的主任会计，母亲是织地毯的工人。家庭出身资本家一说，不知从何而来？请依照当地政府划定的成分确定，不可随意认定。

“1957 年在重庆长江电工厂猖狂向党进攻，被划为右派”——

在反右运动中，我除了被迫写过检讨以外，没有贴过一张大字报，只在由党支部书记主持、指定的小组会上就指定的题目发过言，至今看来毫无反党之痕迹，却被认定为猖狂进攻，实属诬陷不实之词。如今已成为历史，此处不再赘述。

“因不服监督改造，1958 年被送劳动教养”——

监督劳动期间，我没有受过任何批评，更没有不服监督改造的事例。由于此问题不涉及本次案情，无需多说。

“1961 年 10 月摘掉右派分子帽子，解除劳动教养，留通惠汽车修配厂就业至今”——

我被摘掉帽子、解除劳教的准确时间是 1961 年 12 月 22 日，起诉书误写成 10 月。作为法律文书，不应该疏忽到如此地步吧。

“被告牛立华因反革命一案，于 1966 年 7 月 12 日由成都市公安局依法逮捕，预审后移送本院审查起诉，经审查判明其犯罪事实如下”——

这里说，对于犯罪事实是经过了“审查”的，是“判明了”的。怎么审查的呢？成都市公安局对我的预审是 8 月 18 日，预审时，我对那些毫无根据的所谓控告提出了异议。预审后，我在预审记录上明确地签注了意见，郑重

地请求再审。

既然存在异议,就该认真辨别。成都市检察院既未对被告进行任何询问,也未必对“原告”有所了解,没有调查研究,没有核对事实,8月26日,也就是公安局预审一周以后,即匆忙地拟就了起诉书。

伟大领袖毛主席谆谆告诫人们:研究问题忌带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他还说过:只了解原告一方,不了解被告一方……不了解矛盾各方的特点,这就叫做片面地看问题,这样是不能找出解决矛盾的方法的,是不能做好所任工作的。如果背离了毛主席的这些教导,对原告、被告双方都没有深入了解,没见过一面,没问过一句话,怎么能叫做经过了“审查”呢?没有审查,又怎能“判明”呢?

“被告牛立华,解除劳教后,一贯坚持反动立场,极端的仇视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恶毒地、全面系统地攻击党的各项方针政策”——

不仅“反动”,而且“一贯”;不仅“仇视”,而且“极端”;不仅“攻击”,而且“恶毒”“全面”“系统”;罪行可谓严重。事实如何呢?莫须有。

对于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对于名副其实的以无产阶级专政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制度,对于根据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制定并公诸于世的各项方针政策,我不但没有“一贯极端仇视”或“全面恶毒攻击”,恰恰相反,我是“始终非常信任”和“要求坚决执行”。口说无凭,这都是有案可稽的。

比如,中央政策明确规定,除判处管制劳教的以外,对一般右派分子并没有剥夺政治权利,也就是说应该享有公民的待遇,但在劳动教养场所,不但剥夺了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等宪法规定的公民应该享有的权利,还剥夺了人身自由、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权,极端压制公民应该有的申诉、检举权。

再如,劳动教养条例颁布时,曾公开宣布“**对他们同样实行按劳动成果给工资报酬的原则**”(1958年8月4日《人民日报》)。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十八次会议上讨论劳动教养问题时,刘少奇说:**“他们不是劳改犯,政治权利并未剥夺,劳动多少照给工资,基本上按劳付酬,改造好了再回到社会上去”。**

然而,在劳动教养场所却只给极少的生活费。我1957年在长江电工厂担任技术员职务,月基本工资六十九元。在劳教场所,我还是从事技术员的工作,而且技术难度和责任都有所提高,却只领取十五元生活费。至于回归社会,更属海市蜃楼,摘掉帽子也不准回归社会,仍然被强制关在劳教场所,视为三类人员(劳改单位特定术语,指劳改、劳教、就业人员)。

关于对犯罪分子的改造,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有很多具体的指示。

伟大领袖说过:**“要把犯罪的人当作人,对他们有点希望,对他们有所帮助。当然也要有所批评。”“对一切反革命分子,都应当给以生活出路,使他们都有奔头。”“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政策。”**

1956年初,公安部向党中央汇报,关于参加鹰厦铁路建设和泗洪排水工程的罪犯劳动时间过长、生活较差,出现罪犯死亡的问题时,毛泽东指示公安部要坚决纠正,并明确指出**“要阶级斗争和人道主义相结合”“就是应该把人当人,反革命也是人嘛。我们的目的是把他们改造好,改造应当作为第一位。”**

同年7月15日,周恩来在全国省市检察长、法院院长、公安厅长联席

会议上强调：“我们对犯人，对死刑缓刑、对劳动改造、对管制的，第一应该有人道主义，采取不人道主义的待遇是不对的，应该改正。”

1956年8月，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了为犯人服务的思想，他说：“学校的校长、教员是为学生服务的，不是学生为校长、教员服务的。我们的法院工作、检察院工作是为犯人服务的，不是犯人为我们老爷服务的。”

9月15日，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也再次强调了人道主义。政治报告中明白地写着：“除极少数的罪犯出于罪大恶极，造成人民的公愤，不能不处死刑以外，对于其余一切罪犯都应该不处以死刑，并且应当在他们服刑期间给予完全人道主义的待遇”。

“其次，改造目的的人道，相对于改造手段的人道，它是更加深层、广阔的人道主义。具体说来就是要给予罪犯出路，把他们改造成新人，让他们回归社会成为自由公民。“……对一切反革命分子，都应当给以生活出路，使他们有自新的机会。这样做，对人民事业，对国际影响，都有好处。”“把罪犯改造成能够遵纪守法、自食其力的新人，并让他们回归社会成为自由公民，是保护和尊重犯人权利、对罪犯实行人道主义的最终体现，也是我国监狱改造罪犯的基本目标”。（2015年笔者补记：几十年的事实证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这三个中共曾经的巨头说的话，没有一句是执行了的，全是欺人之谈。）

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指示，或白纸黑字，或言犹在耳，然而在劳改和劳教场所，这些毛泽东和党中央公开宣布的政策均未得到贯彻执行，甚至是反其道而行之，不要说犯人，即使是解除劳教、摘掉帽子的就业人员也是动辄得咎，任意打骂。凡是在劳改和劳教单位工作过的公安干部都心知肚明，所谓让他们回归社会成为自由公民，是连提也不提的口号。摘掉帽子称之为摘帽右派，根本不允许回归社会成为自由公民。我要求切实执行这些政策，难道就是重新犯罪吗？

毛主席教导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我要求认真执行公开宣布的、明文规定的政策，是捍卫党的尊严，维护党的生命，是拥护党的表现，绝对不是恶毒攻击。”

对于党内一小撮野心家那种反社会主义的倒行逆施，对于背离了党的路线的不良现象，对于不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的行为，我产生过怀疑和不满，但由于那时还没有识破这些政治扒手的狰狞面目，所以对他们还没有达到“极端仇视”的地步。表现在我只是口头上提出一些疑问，行动上没有进行抵制。提出疑问的时候，抱的是请求解释或批驳的态度，并不是对他们进行揭露和抨击。而且到后来，由于考虑了个人得失，力图维系新婚之家的平静生活，就连这点疑问都放弃不提了，没有继续坚持。我痛感自己以往对毛主席著作的学习还很不够，一直对这些早就应该仇视的东西没有仇视，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许多问题都被揭露了，我请求检察院用新的观点，用毛泽东思想，对我过去的言行进行审查，如果能用具体的事实说明我反对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我是愿意服罪的。

“诬蔑说‘三面红旗下面执行过左’”——

首先，仅仅认为“下面执行过左”，并不是说“中央路线有错”，没有否定三面红旗的正确性，怎能叫做对三面红旗的恶毒攻击呢？

其次，下面执行是不是有过左的现象呢？请看当时党中央的举措：

1958年11月2日至10日，毛泽东主持党中央召开第一次郑州会议，拟

定了《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着重批评混淆集体所有制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和取消商品生产的极左理念；批评了强调集体生活拆散家庭的做法；批评了“三五年内搞成共产主义”的极左观点；批评了捆人、打人、骂人、辩论人、罚苦工等不良作风。讨论了“高指标”问题；提倡实事求是，不要谎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11月9日）。

1958年11月21日到27日，在武昌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围绕人民公社问题和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问题，着重讨论了应立即纠正高指标和浮夸风。将1959年的预定钢产量从二千一百三十万吨调整到一千八百万吨，在纠“左”方面，比起第一次郑州会议来，又前进了一步。会议期间，云南省委报告反映，这年春夏之间云南发生因浮肿病等引起严重死亡的情况，河北省委反映邯郸地区伤寒疫病流行，主要原因是领导干部只注意生产，强迫命令社员紧张持续的苦战，忽视了群众生活，致使社员过度劳累，身体抵抗力下降。于是又作了“关心群众生活”的决议。

1958年11月28日到12月10日中共中央召开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全会重点讨论和修改《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和《关于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草案）》两个文件。着重指出：有些人企图过早地“进入共产主义”，过早地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过早地否定商品、价值、货币、价格的积极作用，是对于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不利的，因而是错误的。

1959年2月27日到3月5日在专列火车上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又一次强调：公社在1958年秋季成立之后，刮起了一阵‘共产风’。主要内容有三条：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义务劳动太多。三是‘共’各种‘产’。明确指出：上述两种倾向，都包含有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的思想在内，是不对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说：“去年九月起，十月、十一月、十二月，我们的手伸得太长了，我们有个很大的冒进主义。”（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2月27日）。这次会议确定了制止“共产风”、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基本政策，其中最重要的是“队为基础”，“等价交换”，“按劳分配”。在会议结束的时候，毛主席还批评大跃进中要几亿农民写诗的闹剧：“有诗意的人才写诗，没有诗意也要他写，这不是冤枉？你要我在郑州写诗，我的诗跑到九霄云外去了，不行。”（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3月5日）

在短短三个多月里，毛主席亲自主持召开了四次重要会议，主题全是纠正“三面红旗”以来“左”的错误。如果下面执行不是过左，党中央能这样一连串地拟定和下发大举纠错的文件吗？中央都在大力反左纠偏，老百姓说了一句“三面红旗下面执行过左”，本来是紧跟中央的语言，却成了赫然列在第一条的罪状。任何人都不会接受吧。

“总路线的基本点已经变了，还在喊总路线万岁”——

总路线的基本点是否变了呢？直到现在许多人认为没有改变，谁要是说“总路线的基本点已经变了”就是“诬蔑”，因此首先需要把这个问题弄清楚。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明确地宣布了总路线的基本点，当时对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是这样规定的：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条件下，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1959年改成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1962年3月又变成了“按照农轻重的次序进行安排”。总路线中包含的发展国民

经济的总方针几乎每年都在变化，这是毛主席随着情况变化对总路线的丰富和发展。

毛主席曾经教导说：“一般地说来，不论是变革自然或变革社会的实践中，人们原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毫无改变地实现出来的事是很少的，这是因为从事这个现实的人们常常受着许多限制不但常常受着科学条件和技术条件的限制，而且也受着客观过程的发展及其表现程度的限制（客观过程的方面及本质尚未充分暴露），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实践中发现前所未料的情况，因而部分地改变思想、理论、计划、方案的事是常有的，全部地改变的事也是有的。”

按照辩证法的观点，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须得有不同的总路线。例如：1949年以前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1949年以后则转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如果有谁在这时候喊“新民主主义万岁”，不但不是拥护总路线，而且是错误的了。

说明了总路线的基本点是在不断地变化之后，再来谈我那句话的起因。

1965年我曾问过两个人是否知道总路线的基本点及其变化，得到的回答都是“基本点是多快好省”“没变化吧？”。说明他们根本不知道或不记得总路线的基本点，可是在口头上，他们都还在喊“总路线万岁”。我想起了毛主席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的教导“盲目地表面上完全无异议地执行上级的指示，这不是真正在执行上级的指示，这是反对上级指示或是对上级指示怠工的最妙办法。”因此我认为那些对总路线的基本点及其变化都不了解的人，还在喊总路线万岁，绝不能说是拥护总路线。这就是“总路线的基本点已经变了，还在喊总路线万岁”的来源。能说这是恶毒攻击党的总路线吗？

“大跃进的成绩是虚的……”——

起诉书中只写了半句话，下半句是：我怀疑下面对粮食产量有虚报现象。这是我长期存在的思想，这个思想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客观存在的反应。

据报道：

1958年的粮食产量是七千五百亿斤，比1957年增加一倍以上（《人民日报》1959年元旦社论《迎接新的更伟大的胜利》）。

1959年的粮食产量得到了比1958年更大的丰收，农业总产值显著地超额完成了国家的计划（《人民日报》1960年元旦社论《展望六十年代》）。

《人民日报》1961年元旦社论《争取世界和平和国内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胜利》对1960年的粮食产量没有公布，只是说没有完成计划。。

1961年战胜了连续第三年的严重自然灾害，在粮食方面得到了较1960年为好的收成（《人民日报》1962年元旦社论《1962年新年献词》）。

1962年取得了比1961年好的中上年景的农业收成。由于粮食生产的增长，畜牧业生产也比前年好（《人民日报》1963年元旦社论《巩固伟大成绩，争取新的胜利》）。

按照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发布的数据，从1958年到1962年，粮食的平均年产量是七千亿斤左右。当时中国的人口六亿左右，人均粮食可以达到一千二百斤左右，如果这个数字是真实的，绝对不会闹饥荒。

1955年人均粮食产量只有五百九十八斤，1956年人均粮食产量只有六百一十二斤，那时没有饥荒现象，粮食没有定量供应，副食品比较充足，糖、酒、烟、茶可任意选购。大跃进以后，报载人均粮食产量翻了一番，1959年

却开始严格限量供应，1960 年和 1961 年是粮食和农副产品供应极度短缺的两年，1962 年小春作物收获后才略见好转，这是每一个活着的成年人记忆犹新的，容不得撒谎。

我们是相信客观存在的事实，还是盲从于虚伪的谎言呢？法官和审判员难道在那三年里没有忍饥挨饿的感受？

从 1959 年起，党中央和毛主席曾多次强调反对浮夸虚报，难道是无的放矢吗？

莫非只许别有用心的极左派分子弄虚作假，上欺中央，下骗群众，就不许人们产生一点怀疑吗？谁要是有一点点怀疑（请注意是怀疑，而不是四处散布）就要被打成反革命，处以重刑，能说这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吗？

毛主席在 1959 年说过：“去年有些虚夸，四大指标定高了，弄得今年不好宣传，现在有些被动”（《毛泽东文集》第八卷第 79 页）。毛主席 1961 年还说“发那么多表格，报上来说粮食增加了，猪也增加了，经济作物也增加了，而实际上没有增加”（《毛泽东文集》第八卷第 253 页）。伟大领袖毛主席在那三年中都多次承认下面填报和公布的数字不实，怎么不判他的罪呢？老百姓从切身感受中产生一点对那些虚假数字的怀疑，就要被逮捕判刑，从法律上也是说不过去的吧！

还需说明，以上三点并非现行言论。而是从我 1966 年 6 月写的检查材料里摘录下来的，是作为向领导的交代，并不是在下面散布。起诉书将这些都说成是现行反革命言论，有悖事实。

“攻击肃反、右斗争说‘肃反扩大化、搞错十万人、翻案是不会停的’”

这条罪状是从我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和不同对象所谈三段话中各取一句（严格的说是各取几个字），然后把它连在一起，拼凑而成的。为说明真相，须按照本来面目分成三节进行回答：

“肃反扩大化” ----

1966 年 6 月，我在四川消防机械厂毛主席著作学习小组会上说过这样一段话：苏联之所以出修正主义，国内根源是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存在，国外根源是屈从于帝国主义的压力，这是两个基本根源。此外，苏联在“肃反”中所犯的错误也不能不说是一个因素。毛主席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曾引用《左传》中的一段文章《曹刿论战》，肯定了“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是政治上取信于民的重要手段。斯大林的“肃反扩大化”则是失信于民的严重错误，在民众中造成了不满情绪，导致修正主义上台。这段话毫未涉及中国 1955 年的肃反运动，既可以对质，也有文字材料可以查证。起诉书的作者是善于书写整人害人的八股文的，从这段话中抽取了“肃反扩大化”几个字，作为编写这条罪状的“起股”，硬安了一个“攻击肃反”的罪名。

“搞错十万人” ----

这是 1957 年强加在我头上的一条“右派言论”，现在又被翻出来认定为 1966 年的现行言论。是不是我在 1957 年以后说过这样的话呢？并没有，因为我根本没有这种思想。那么，这句话是怎么翻出来的呢？那是 1966 年 5 月，在一次学习小组会上，有人问我 1957 年的犯罪事实是什么，为什么还不认罪。我回答说：我被划为右派主要是两条言论，一是“党天下”，一是“肃反搞错十万人”。这两句话都不是我的原话，也不是我的原意。在当天的会

上，我简略地谈了1957年长江电工厂冶金科的鸣放实况，直到这时，其他人才知道我被划为右派是因为有“肃反搞错十万人”这样一句话。起诉书的作者大概看到发言记录中有“搞错十万人”这几个字，就不顾前后地赶忙把它摘下来，移花接木，把1957年的东西接到1966年，作为编写这条罪状的“中股”，和前面那句话连在一起，于是就成了“肃反扩大化，搞错十万人”。

“翻案是不会停的”——

1965年12月，我向某主管干部汇报思想时曾经说：据我了解，有些人是没有认罪的，但在劳教期间没有翻案的打算。可是在摘掉帽子多年以后，还是被强制性地留在劳改单位，实质上还是被列为专政对象，看不到出路，感到长此下去没有政治前途，老婆孩子也跟着受连累，本来就没有犯什么罪，前前后后竟然在劳教场所关了七八年，今后不知道还要关多久，浑浑噩噩，渺渺茫茫，凄凄惨惨，似乎只有翻案才能解决问题。例如秦灿辉、甘炳炎解除劳教五年多了，以前从未说过翻案，现在却产生了翻案的想法。我认为如果把犯了错误的人长期地当敌人看待，不给出路，只能助长翻案风。另外，毛主席在论及肃反问题时教导说：“过火的，漏掉的，都有”，“我们的方针是‘有反必肃，有错必纠。’”。既然有过火的，而且是有错必纠，一经发现势必要翻案，所以说，翻案是不会停的。翻案并不可怕，允许上诉就是允许翻案的一种形式。司法机关如果能够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量刑适度，就不怕翻案。这是我当时的一种认识，向主管干部进行汇报以求批判，何罪之有呢？

熟谙“党八股”的起诉书作者，只取出了“翻案是不会停的”几个字，和前面的“起股”与“中股”连在一起，便成了“肃反扩大化，搞错十万人，翻案是不会停的”，然后再加上一个攻击肃反、反右斗争的帽子，构成了这条罪状，使人一看，好像是一气呵成的“现行反革命言论”。如果不是实在找不到犯罪事实，又非有意加罪，绝不会采取这种卑鄙的方法吧！

“中国现在被划的敌人太多了，以后要出现修正主义”——

这是1966年5月我向某主管干部暴露的思想问题。

无论从当天的整个谈话内容来看，还是单就这句话本身来看，都是希望中国不要出修正主义。

例如说：你把弓弦拉得太紧，弓就会断。这句话显然不是说弓必然断，而是希望拉弓的人不要把弓拉断。

再说，当时是不是把敌人划得太多了呢？这里仅举两点证明：

1、1947年毛主席认定，国内被划为地主富农的有三千六百万之众（《毛泽东选集》第四卷1214页）；建国后“镇反”“三反”“五反”“思想改造”“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肃反”“反右派”“反右倾”“四清”“社会主义教育”“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接连不断，每次运动都划出了阶级敌人，少则数十万，多则数百万，累积起来全国被列入另册的人高达数千万，如果连同其被歧视的子女，数量更大。文革初期流传着“现在三分之一政权不在无产阶级手里”“三分之一的人都是敌人”这样一种说法，严重夸大敌情，不仅地富反坏右是异类，三分之一政权都沦落到敌人手里，实为荒谬至极。

2、一些执法单位把犯过罪错的人，在其刑满或解除管制、解除劳教以后，长期地留在劳改或劳教场所，不问情况如何，不论有无公民权，仍然被划在敌对范围里，视为专政对象。名为刑满释放“犯”、解除劳教“分子”、摘

帽“右派”。

我认为这种“理论”和做法都不符合毛主席的教导。

毛主席在论述斗争策略问题时，多次强调要缩小打击面，要分别对待，要合乎情理，要给出路。并且指出：“**离开实际情况，错误地扩大打击面是危险的**”。据我不完全统计，仅在《毛泽东选集》第一至第四卷里，有关这些问题的教导至少在四十处以上。在任何运动中，毛主席都强调要团结大多数，争取同盟军。在解放战争、土地改革那种大规模的疾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中，打击面都不超过百分之十。解放十几年了，杀了几百万，关了几百万，敌对分子应该是越来越少了，怎么会认为三分之一的人都是敌人呢？在这种主观唯心的阶级估量下，必然会实行一系列过左的政策，自以为是打击了阶级敌人，加强了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却会引起怀疑和不满，扩大敌人的营垒，招致物极必反，诱发修正主义。赫鲁晓夫就曾以极左的面目出现，执行斯大林的肃反政策，故意把许多人打成反革命。斯大林死了以后，他又以极右的姿态纠偏，大平冤狱，笼络人心。有鉴于此，我认为当时的说法和做法都是有问题的。因而向管教干部暴露思想，提出了自己的怀疑。这是攻击肃反吗？不是。这是攻击反右斗争吗？也不是。恰恰相反，我是希望实行正确的革命路线，避免修正主义。

“并狂妄地说‘中国不出修正主义我就自杀’”——

既然是“狂妄地说”就不是悄悄地说、秘密地说，就会有许多人听到过这句话，就应当能够举出许多人证和检举材料。然而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不是事实。事情的真相是这样的：

1966年6月1日，我主动地找到四川消防机械厂厂长张志超，以极为郑重的态度说：思想问题若不解决是很大的痛苦，1964年我就曾陷入个人主义的泥坑里，感到政治上没有前途，技术上没有出路，生活上堪称窘迫，谈恋爱也被人抛弃，因而悲观失望，几乎痛不欲生，产生过自杀的念头。1964年下半年通过学习毛主席著作才解决了这个问题。但现在仍存在着许多思想问题，一个是我对1957年的“罪”认不下去，我实在检查不出当时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机和目的。另一个最大问题是：我认为现在许多部门没有完全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希望能在这次运动中求得彻底的解决……。这哪里是说“中国不出现修正主义，我就自杀”呢？张志超厂长是唯一的当事人，他应该能够作证。1966年7月我写的书面材料里对这个问题也做了说明，白纸黑字是无法变更的。其次，听其言还要观其行，一个人每天喊一百次“我要为共产主义而奋斗”，但不见行动，能不能吸收他为共产党员呢？显然是不能的。同样道理，即便说了一句“我要自杀”，没有一点朕兆可寻，端倪可察，就立即逮捕并处以重刑，也是不恰当的吧？再退一万步，自杀不是犯罪吧？哪一个国家的法律也没有把自杀列为刑法该当治罪的条目，中国莫非例外？何况在言论上我没有说过这样的话，在行动上则正好相反，不但没有自杀，还在1966年5月结了婚。以后更抱了“活命哲学”的人生观，为了维持小家庭的平静，放弃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理念，准备忍辱负重地活下去。于是在文革初期主动检讨，写了不少检查材料，由此给编造这份起诉书提供了素材。

“被告还极力丑化社会主义，美化资本主义制度，宣扬资产阶级‘自由’，说‘今天社会就是不自由’”——

这里有三个大帽子，一个是“极力丑化社会主义”，一个是“美化资本

主义制度”，一个是“宣扬资产阶级自由”，事实呢？只有一件，就是说了一句“今天社会就是不自由”。我请求检察院再把那些交代材料、检举材料、控告材料翻一翻，还可以再搜集一点补充材料，找几件经得起分析的具体事实。把这三个大帽子的内容充实一下，然后我再回答。

如今只说“今天社会就是不自由”这句话是怎么来的。

那是1965年10月，原单位的一个就业人员张文忆对我进行“帮助”，想了解究竟有哪些思想问题。我曾说：近几年来我在刊物上发表过几篇论文，这是主管干部都知道的，我想在此基础上编写一点有关金属热处理的技术资料，需要查阅参考文献，1957年以前，图书馆的科技书刊基本是自由借阅的，但现在不行了，图书馆控制得非常严格，许多书一般人都借不到，手续繁多，要各种各样的介绍信。我想起马克思写《资本论》曾经在大英皇家图书馆查阅各种资料，如果那时候的图书馆像我们现在的图书馆这样，他就借不到书。他是写反对当时社会制度的书，都还有查阅资料的自由，我现在只是写有利于社会的科技论文，不涉及政治，却没有借阅书刊的自由。我认为现在的社会没有做到毛主席所教导的“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随后我将这次和张文忆的谈话向主管干部作了汇报。仅仅认为某个方面还不很自由，就被定为犯罪，难道整个社会的自由已经十全十美，不容置疑了吗？1958年1月，陆定一召集上海市新闻、出版、文学、电影等单位党内负责人座谈，有人反映：反右以来，大家缩手缩脚，谨小慎微，不敢说话。毛泽东听了汇报后问：为什么知识分子不敢讲，不敢写呢？我们人民的自由已被压死了吗？1962年3月21日，毛主席在第十八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时也承认：“从前老是讲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事实上没有实行，言者还是有罪。”“带来一个缺点，就是人家不敢讲话了。”（《毛泽东传（1949-1976）》下册第1214页）。伟大领袖都承认“人家不敢讲话了”，也就是言论不自由的现象是存在的。老百姓对“自由”提出某些疑虑，难道就是犯罪？

“攻击毛泽东思想是言行不一致‘理论上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

这条罪状中，前面没加引号的部分是起诉书作者的推论，后面加了引号的部分才是我的原话。一目了然，我这句话绝不是攻击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绝没有否定理论的正确性，而是批评那些不以毛主席的革命理论作为行动指南的人，批评那些口是心非的人。关于我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态度，准备另写一个专题，这里仅举几点与这条罪状有直接联系的旁证。

1、我怀疑现在有些人是以毛主席之名而行反毛主席之实（见1966年6月的检查材料）。

2、我怀疑现在有些人执行政策过左，这种左是不符合毛主席教导的（见1966年的检查材料）。

3、我最大的思想问题就是觉得现在某些部门没有完全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1966年6月1日和张志超厂长的谈话）。

4、现在某些人没有坚决执行党中央的政策，毛主席批评过这样的人是“仅仅把箭拿在手里，握来握去，连声赞曰‘好箭、好箭’却老是不愿意放出去”（见1965年12月写给厂长的书面材料）。

其它还有很多，不再一一列举。把以上这些话联系起来，可以看出，我一向反对的就是不按毛主席指示办事的行为，反对那些口头上说的是毛泽东思想，行动上却是另外一回事的人。要求在实际工作中全面地落实毛主席的最

高指示，不要“理论上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这不但不是攻击毛泽东思想，而且是信仰、崇拜、维护毛泽东思想，怎么能成为罪状呢？

顺便提一下，起诉书中的这句话语法逻辑上是不通的，只要弄清楚“理论”、“思想”、“言”、“行”这几个词的含义，就知道什么地方不通了。只能说某某人言行不一致，怎能说某种思想言行不一致呢？

“诬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想批判那个，就找那个的材料，若不想批判那个，问题再大也不了了之’”——

这是1966年5月19日向主管干部暴露的思想。当时尚未宣布改组北京市委，也不知道毛主席主持制定了伟大的历史文件《五一六通知》。我曾说：北京出了这么大的问题，邓拓、吴晗、廖沫沙等北京市的高级领导都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难道彭真没有责任么？往重了说就是有意安插，往轻了说也是官僚主义，怎么没有人敢揭露一二呢？我看中央如果不点他的名，谁也不敢整他的材料。我还在学习小组会上说过：曹禺在1961年写了一个剧本《胆剑篇》，对时政之讽喻不亚于《海瑞罢官》和《燕山夜话》。吴晗原来是紧跟毛主席的，反右的时候，揭露、批判章伯钧、罗隆基立了大功，现在一查，吴晗竟然是几十年的老反革命。而曹禺的《胆剑篇》包含着不少讥讽反右和大跃进的隐喻，却还是亚非作家代表大会（1966年6月27日至7月9日在北京召开）中国代表团副团长，要是安心批判他，问题也少不了。总之我认为当时还没有把一切反毛泽东思想的现象都揭露出来。1966年6、7月间，文化大革命方兴未艾，运动有一个过程，需要时间，这是可以理解的。现在是1966年9月，从监狱里发给我们的报纸可以看到，几乎每天都有新的牛鬼蛇神出现，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跟了毛主席几十年的老革命也成了暗藏的反革命。1966年8月，毛主席发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揭露了原来党内还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他们玩弄“舍车马，保将帅”的伎俩，掩盖了许多真相。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那些平时乔装成道貌岸然的伪君子暴露了真实面目，一切反人民的野心家、阴谋家终究逃脱不了覆灭的命运。毛主席的大字报使我对文革初期有些人尚未被揭发出来的怀疑消除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现在仅仅是开始，新的事物会不断涌现，有待人们逐步认识，认识也是一个过程，需要时间，些许的怀疑或者说认识上的滞后，绝对不能认定为就是诬蔑，所以我认为这条罪状也是不能成立的。

“被告因被划为右派分子不认罪，1965年以来经常狂妄叫嚣要翻案，说：‘我要告到中央去’”——

我不认罪是事实。被划为右派以后，一直想不通，因为我没有说过反对共产党的话，更没有做过反对共产党的事，作为一个共青团员，1957年还交了入党申请书，向往着为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贡献力量。我热爱祖国，在军工企业兢兢业业的工作，小有成就，1956年被评为社会主义建设青年积极分子。1957年，一夜之间被安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名，怎么能豁然贯通呢？但是，即使在被误解、被开除团籍、开除公职、强制劳动教养的情况下，我也没有对党有任何怨言，而是委曲求全，忍辱负重地在劳教场所接受“改造”。正如起诉书透露的，1965年以前没有“翻案”的迹象。但起诉书中说：1965年以来“经常狂妄叫嚣要翻案”也是毫无根据的。1965年社教运动后期，我以书面形式郑重地提出1957年的问题，第一句话就是“我不是翻案”，强调我不因个人问题否定伟大的政治运动，并申明，1957年的后果是自己造成的，不把责任推之于党。这些都有白纸黑字，现存四川消防机械厂，可以核实查

证。

我的确也产生过打算到中央反映情况的想法，但不是要求翻案，1957年的事也不是我想反映的主要问题。当时我想让党中央了解下面某些部门没有完全执行党中央的既定政策，在某些方面造成了不良的政治影响，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对党将有所危害。关于我打算向党中央反映情况的事，只和一个人说过一次，他对我说：即使你亲自到北京也很难遇见中央负责人，下面就把你挡住了，发回四川处理。不但解决不了问题，反而会惹祸。我也就一直犹豫不决。1966年5月我结婚以后，便抱了“明知不对，少说为佳，明哲保身，但求无过”的态度，打消了这个念头。起诉书把不翻案说成要翻案，把只跟一个人谈过一次的事说成“经常狂妄叫嚣”是与事实完全不符的。

退一步来说，想到党中央去反映情况，能说是犯罪吗？这是相信党中央的表现。即便是要告状，谁会向自己不相信的人那里告状呢。如果没有做违背中央政策的事，就不怕人告状。只有大搞“水泼不进，针插不进”独立王国的人，才害怕有人到中央去反映情况，才会把向党中央反映情况说成是犯罪。

“当其他就业人员劝阻时竟说‘我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三不怕烫，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

如果不进行调查，单看起诉书，把这段话和上面那段话连在一起，就会产生这样一种印象：被告经常（不是偶尔，不是有时，也不是时常）狂妄叫嚣（不分时间、不顾场合、不看对象地狂呼乱叫）要“翻案”，要“告到中央去”。这是起诉书的作者想要达到的目的。然而，这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前面已经说了，我想到党中央反映情况的事（不是翻案），只和一个人说过一次，其他就业人员根本不知道这回事，当然也就不存在劝阻我的问题。起诉书的作者又把时间、地点、对象都不同的几段话各取所需地取出几个字拼在一起了。事情的真相是这样的，1966年初，“其他就业人员”（四川消防机械厂技术室的刘洪福、陈章燕、余华年等人）认为我竟敢公开说厂领导没有认真执行党的政策，似乎是“攻击领导”，是“危险”。因而半开玩笑地对我说：厂里烫得很哪（四川方言，意指厉害、凶险，接近的四川方言还有恶燥、燥辣等等），你不怕烫呀？我回答说：社会上的人为了捍卫毛泽东思想，可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我还能怕烫吗？毛主席教导说：“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我们在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斗争的时候必须有这种大无畏的精神。”我所提的各个问题，都是有根据的，有道理的，是要求执行党的政策，并非无理取闹，我怕什么呢？我在学习会上说这些话的时候，许多人都在场，可以问一问他们，究竟是劝我不要给领导提意见呢？还是劝我不要到中央去翻案呢？有谁听说过“我要告到中央去”这句话呢？我请求检察院做一下起码的调查，只要略加调查，就会知道起诉书中的这段话安错了地方，把正确的事变成了罪恶。

“又说‘既然党把我看成敌人，视我为草芥，我就视你为寇仇’反动气焰十分嚣张”——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我主动地在小组会上进行检查，意在表示今后要像毛主席说的“夹着尾巴做人”，谋求平静的生活，不再要什么前途了。我检讨说：1957年被划为右派以后，有一个时期我很想不通，我没有反党，非要说我反党，把我当成敌人送劳动教养，摘了帽子还被强制地留在劳教场所，仍然是专政对象，从而对党产生不满情绪。我还用孟子的话替自己辩解，认为孟子说的“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

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有道理。把自己所以对党不满推之于党对我的打击过重，这种思想是对党缺乏感情的表现，严重地妨碍了思想改造。我这段话完全是批判以往的错误思想，是在小组会上谈的，也是有记录可以查证的，是不容歪曲的。只要稍微动一动脑筋也可以分析的出来，谁会在劳教就业人员的学习小组会上“反动气焰十分嚣张”地狂叫“我就视你为寇仇”呢？如果真的这样叫了，当时就会挨一顿好打，或者关禁闭，劳改队的批斗会是不忌讳整人的。然而在我进行检查的整个期间（从1966年5月底起到7月12日被捕止）还没有哪个人说我态度恶劣或“反动气焰十分嚣张”。这条罪状只能是个别人有意编造的，我请求认真调查。

“综上所述，被告牛立华，一贯坚持反动立场，恶毒地攻击党的各项方针政策，诬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狂妄叫嚣翻案，在就业人员中造成极坏影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十条一、三款之精神，应依法惩处。”——

对这段话，我只能这样回答：综上所述，起诉书中所列各条罪状，均不符合实际情况。我请求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司法人员，进行切实调查，凭借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资料，在毛泽东思想的原则指导下，对过去某些人的工作重新审查，属错误者应切实纠正。

笔者2016年补记：以上是1966年9月写的大体内容，可以看出，那时我还没有认清毛泽东的真实面目和反动本质，还尊称他为毛主席，对毛泽东和共产党还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也没有认清中共把持的公检法就是法西斯工具，还希望通过法庭的答辩澄清事实，实乃幼稚得异想天开，近乎可笑了。但还是把这份答辩交上去了。“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孟子 滕文公下）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且不谈强加给我的罪状不符合客观存在的事实，退一万步来说，即使真的说了反动言论，是否就必须立即逮捕法办呢？

1966年8月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毛主席主持制定的，以中共中央名义颁发的政策指导性文件《十六条》明文规定：

“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要充分揭露，要斗倒、斗垮、斗臭，肃清他们的影响，同时给以出路，让他们重新做人”。

“在运动中，除了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理外，大学、专科学校、中学和小学学生中的问题，一律不整”。

“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的后期酌情处理”。

这是近期党中央颁布的政策，墨迹未干。按照上述既定政策，如果只是单纯地谈了反动言论，一般是不会处以重刑的，何况我还没有散布反动言论呢。

因此我请求继续审理，先逐一地查明事实，再对照中央政策。对于“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则”的起诉和判决，我全然接受，是错我就改，是罪我就认，绝不含糊。

大约半个月以后，成都市西城区法院才不得不又进行了一次审讯。名义上是依法公开的，实际上却是秘密的。干脆把两位人民陪审员取消了，法院节省了一元钱劳务费。

审判员并没有用有力的论据驳倒我的答辩。

例如起诉书中有这样一条罪状“被告因被划为右派分子不认罪，1965年

以来经常狂妄叫嚣要翻案说‘我要告到中央去’”。我答辩说：我曾经想过向党中央反映情况，其中包括个人被划为右派分子的问题，但不是要求翻案，是希望在摘掉帽子多年以后得到党的理解与任用，或者说谅解与宽恕，允许我真正的回到人民行列里来。向党中央反映情况难道是犯罪吗？这件事我只和一个人说过一次，怎么能说是“经常狂妄叫嚣翻案呢”？

对我的答辩，审判员说：“我知道你就要钻字眼儿！”

请想一想，把不翻案说成翻案，把只对一个人说过一次的事说成“经常狂妄叫嚣”，象这样的字眼儿，难道不应当钻一钻吗？这是罪状啊！是决定刑期长短的法律依据呀！

审讯终结时，我见审讯记录不够确切，请求补充。这时审判员把记录甩给我说：“你拿去补充”，她却扬长而去。留下我一个人和那位站在旁边的法警。试想，审讯记录是记载审讯实况的法律文件，需双方确认才能成立，怎好由被告一方任意补充呢？这只能说明审判员的态度是极其不严肃的，好像早已拿定了严加惩处的主意，任凭被告有天大的理由也无济于事。看着她那个急不可耐的样子，我疾步向前，平心静气地对她说：请求进一步调查犯罪事实，暂缓处理，查清楚再处理也不为迟。

但考虑到似乎已很难改变审判员急于处理的决心，故又提出，请念及我全部问题均系主动交代，念及我被划为右派分子以后劳动教养、就业多年一直是努力工作的，七八年中没有因我的责任造成过事故或损失，念及我没有任何反对党和政府的行为，仅仅是思想问题，希望从轻处理。

我之所以这样低姿态，是因为五月份才和相恋了三年的李诗慧结婚，幻想保持住刚刚建立的小家庭，为了她只好卑躬屈膝了。这位中年女性审判员表情冷漠，一言不发。看来仍然是走了一个过场。

1966年9月27日我又呈交了一份书面材料，对审理过程中的一些问题作了说明，再次郑重要求成都市西城区法院查明事实、认真审讯，切实做到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则。我期待着对查出来的“犯罪事实”一条一条地逐一落实，然后再依法判处。

成都市西城区法院对我的请求和说明没有任何回答和批驳，突然在9月30日宣判了。

（5）判决与终审

1966年9月30日上午八点半，我被提出监舍，在监押区院子外面的青砖高墙下等待提讯。我在想，大概西城区法院看了我9月27日写的材料，这回可能要认真审讯了。九点整，法警将我押解到一间审讯室里，室内正前方的桌子后面坐着一个中年男士，最引人注目的是嘴角下撇，眼珠突出，似乎患有严重的甲亢病。怎么不让前两次开庭那个肥肥胖胖的女审判员参加了呢？她虽然不认真，但总了解前期的情况，换了一个人，岂不是要重新来过？他见我进来了，还没有等我坐下，就迫不及待地：“现在宣判”。随即站起来宣读，全文如下：

成都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66）法刑字第448号

公诉人：四川省成都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陈清云

被 告：牛立华，男、三十岁，北京市人，资本家出身，本人成分学生，捕前在本市通惠门汽车修配厂留厂就业。

牛犯立华被控反革命一案，本院依法公开审理完结，现查明：

牛犯在一九五七年整风运动中，因恶毒攻击我党被划为右派分子。在监督劳动中，抗拒改造，一九五八年被送劳教，一九六一年解除劳教留厂就业。但牛犯仍顽固地坚持反动立场，极端仇视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美化资本主义制度，攻击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对我三面红旗、肃反、反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和各项方针政策进行系统全面的污蔑和攻击。不仅如此，牛犯还狂妄叫嚣翻案，并策划其他就业人员翻案，反动气焰十分嚣张。

根据以上事实，本院认为牛犯立华一贯坚持反动立场，劳教就业期中仍不悔改，继续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罪行严重，情节恶劣，应予从严处理。据此，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十条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判处牛犯立华徒刑拾伍年。

如不服本判决，可於接到判决的第二天起，十天内向本院提出上诉状及副本，上诉於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代理审判员	林锦惠
人民陪审员	张万和
人民陪审员	吴穆英
一九六六年九月三十日	

判决书宣读完毕，双方落座。他坐在法官席后面的椅子上，我坐在法庭中间那个固定在地面的凳子上。法警拿来判决书让我签字，我看了一眼，对着读判决书那个未留下姓名的审判员说：“判决未依据事实，既然判决的法律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十条三项，请你说说十条三项的原文，我也好知道犯了什么罪。如果说不出来，请你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拿出来看看，以便了解判决的法律依据。”

他说：“我没带来，你不服可以上诉。”

至此，从西城区法院对一个足以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的案件审讯的全过程，我第一次知道原来是这么一回事，我看多说也无用，就在判决书送达文本上签了“**判决未依据事实，我要上诉。牛立华**”这样几个字。草草收场。

这份判决书我至今保留着呢，法院方面如果也保存着审讯记录、我写的两次书面答辩和宣判记录，敢不敢公然示众呢？

这个判决，尽管是十五年徒刑，是相当重的惩罚，对我却没有起到威慑作用，反而起了一个振聋发聩的作用。原来我还认为司法机关总会依法办事，没有想到中共控制的法院竟然如此污浊。我对西城区法院的信任，被审判员们的行为一扫而光了，那些披着共产党员外衣的司法人员已经丧失了人格、人品、人性，成了地地道道的用笔杀人的刽子手。但那时我还存在着幻想和错觉，对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法西斯本质尚未看清，还认为这大概是个别的特殊现象，因为西城区法院院长就是文革开始后驻四川消防机械厂工作组的负责人。我是由他决定逮捕严办的，审判员们为了顺从领导意图，只好采取这种反常的做法，明明找不到确切的罪证，也驳不倒被告的答辩，还是将我处以重刑。我幻想着中级法院可能会讲一点道理，一方面水平要高一点，另一方面也没有西城区法院和消防机械厂之间这种微妙的人事关系，或许能比较客观而严正地处理问题。于是决定上诉。

宣判后，我又被押送到那堵青砖墙跟前，一经宣判，未决犯就成了已决犯，不能再回原来关押的监舍，这是为了避免互通信息。十七号监舍的室友们对我都很关心，曾经约定，若是判决了，一定要把刑期告诉他们，就是在

高墙上刻写一个数字，有人出来提讯就可以看到。我按照约定，用指甲在青砖上刻写了“牛 15”。算是留给十七号监舍室友们的告别信息。

我在青砖墙下等了十来分钟，“文武张”走过来了。他问：“提讯完了没有？”我回答说：“提讯完了”。他说：“回去”。我连忙跟着他走回了十七号监舍。

刚一进门，大家就围拢来了，连着问：怎么样？怎么样？我说：宣判了，十五年。众人不信，纷纷说：宣判了就不能回原来的舍房，你别瞎扯了。我把判决书拿了出来，上面明明写着“徒刑拾伍年”。室友“大舌头”说：哎呦，我的妈呀，说几句话就判拾伍年嗦。小黄说：我不信，可能是印错了吧？他这句话引得大家一阵苦笑。衡孝泉说：你赶快收拾东西，“文武张”没搞清楚你已经宣判，马上就会回来让你转移舍房，咱们后会有期了。

果不其然，一会儿的工夫，外面响起了急促的脚步声，和开锁的声音，十七号监舍的房门打开了。“文武张”连着喊：牛立华，快点快点。我只有一床薄薄的被子，三四件换洗衣服和吃饭用的搪瓷缸子，早已收拾好了。我走出十七号监舍，穿上鞋，顺手取下挂在墙上的裤腰带，把裤子系好，提着简单的行李，站在一边，等着文武张锁好了十七号监舍的门，随着他快步通过巷道，出了第二栋监舍的铁门。外面早有一个狱警在等着，“文武张”把我交给他，他押送着我，拐弯抹角走了大约三分钟，来到了已决犯的关押地。

这也是一个大院子，迎面是一块水泥砖铺设的空坝子，周围有二十几棵两米多高、枝未繁、叶未茂的小树。靠里面是监舍区，房屋布局十分奇特。一共是五栋平房，排成放射状，如果从空中看，应该是个五条轮辐。轮辐的中心是一个可以容纳五六个人的岗亭，站在里面的武警无需移动位置，只消转转身子和脖子就可以看通五个巷道，用一挺轻机枪就可以封住五个监舍的门。

我被关押在第一栋舍房一号门，紧挨着监舍的大门。房子大约是四米宽、五米长，面积比未决犯监舍大多了。依然是砖墙、铁窗，但是光线不好，阴暗潮湿，地板有多处破损，靠门边也放着一个马桶。我进来的时候房间里已经关了十五个人，来了新人，大家总想听到一些新闻，其实未决犯和已决犯都是在监狱里，除了指定读的报纸以外，没有任何新闻消息，有的只是不同的人对新闻的不同解读和诠释。比如看了报上登载的1966年7月16日毛泽东在武汉畅游长江的消息，有人认为这是毛泽东喜欢游泳，有人认为这是毛泽东展示“我的身体依然健康”，有人则认为这是毛泽东向他的对手显示“大权还控制在我的手里”。

已决犯的监舍里都是短期关押，等待着往劳改队发配，也不准交谈案情，每天还是读报学习，但管理没有对未决犯那么严格。虽然也放风，只是在院子里透透空气，没有洗澡的地方，脏得厉害了，只能趁放风的时候端一脸盆水进来，用冷水擦擦身子，和十七号舍房不同的是，这里有虱子，防不胜防，七尺之躯，无奈小虫，只好漠然视之。

我是1966年9月30日转到已决犯监舍的，中午吃的是一小碗糙米饭、一小瓢南瓜汤。大家期待着国庆是不是能够打个牙祭，沾点荤腥。我是三月不知肉味了，早来的老难友说：他们记得只在春节吃过几片回锅肉。每逢国庆前夕，人民大会堂总要举办国宴，座无虚席，觥筹交错，杯盘狼藉，犯人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民嘛，总该沾一点光吧，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时还说过，“对劳改人犯，我们也用这个办法对待，从团结的愿望出发”，

讲团结，国庆节总该给点肉吃吧。等到晚上六点钟开饭了，从巷道推进来的是一大桶藤藤菜稀饭，而且比往常更稀，几乎照得见人影子，一人也只发一瓢。国庆晚宴就这样泡汤了，又破灭了一个幻想。

第二天国庆节，监狱停止放风，据说这是贯彻毛泽东说过的话：“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中午开饭时间到了，送饭的车子刚来，就飘进来一股辣椒味儿，对四川人来说，辣椒可是个好东西，监狱里几个月没有闻到这样的气味了。炊事员打开门，每人三两米饭，一小瓢米凉粉（流行于四川民间的食品，碎大米浸泡后磨成浆，煮熟，加少量石灰水使米浆凝固，冷却后即成），米凉粉上飘着几点油星和辣椒面，这就是国庆节与民同庆吧。一年才轮到这么一次，这米凉粉越发显得珍贵，要感谢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人道主义了。

我倒没管他吃什么，一心想的是没有犯罪却被处以重刑，究竟是为为什么呢？法院为什么这样不讲道理呢？把无辜的人当做罪犯，对国家有什么好处呢？怎么报纸上说的那么好听，下面执行的却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呢？一心琢磨着怎样写上诉状。

同舍房的难友们听说我要上诉，纷纷劝告我说：上诉没用，这么多年没见一个上诉的减少了刑期，文化大革命以来，刑期越判越重，动不动就是十五年、二十年。法院最讨厌上诉，看守所认为上诉的都是反改造，要开批斗会，有的上诉还遭加刑了。我感谢难友们的关心，但是想来想去总是想不通，我没做任何损害国家利益的事，也没有反对共产党的言行，凭什么要判我十五年徒刑呢？我要上诉，即使加刑也无所谓，顶多是个死。

10月7日上午我写好了上诉状，又反复看了几遍。于10月7日下午三点半钟将这份不足五页，但分量沉重的上诉状，交到按例检查舍房的值班看守手里。

在上诉状中，我除了申明上诉理由之外，并对西城区法院那份判决书列举的所谓罪状，逐一进行了实事求是的澄清和答辩，还特别强调指出：现在全国人民都在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应当以毛主席的指示为判断是非的最高标准，以党中央的政策为处理问题的重要依据，要求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切实调查、认真审讯、依法判案。不料，中级法院对此未作任何回答，反而采取了不经调查、不加审讯、不容申辩、又不准上诉，这样一种极端反常的手段，匆匆忙忙地做了一个维持原判的决定。

当日下午六时许，也就是在我交了上诉状大约三个小时以后，监舍的看守打开房门，喊我出来，我随着他走到院子外面的审讯室，只见一个五短身材，穿着一身藏青色毛哔叽中山服的、约莫五十岁的男人坐在办公桌后面抽烟。我一进门，他甩掉了叼在嘴里的半截纸烟，也不问问我谁，就高声说道：“现在宣判”，跟着干咳了两声，慌里慌张地操着四川口音以很快的速度读了一遍判决书。全文如下：

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事判决书

（66）刑上字第八十三号

被告人：牛立华，男，三十岁，北京市人，家庭出身资本家，本人成分学生。牛犯一九五七年趁我党整风之机进行恶毒攻击，被划为右派分子，送劳动教养。一九六一年解除劳教后，留本市胜利西路汽车修配厂就业生产。

牛犯立华因反革命罪，经成都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以（66）法刑字第四四八号刑事判决书，判处牛犯徒刑十五年。宣判后，牛犯对原判认定的事实，全盘否定，上诉来院。

查：牛犯立华系右派分子，一贯坚持反革命立场，敌视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攻击人民领袖。同时，对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和三面红旗进行恶毒地攻击诬蔑，竭力吹嘘修正主义，美化资本主义制度，妄图实现资本主义复辟。此外，牛犯积极为反坏分子，出谋划策，大肆叫嚣翻案。牛犯在逮捕入狱后，仍坚持反革命立场，顽抗抵赖，拒不交代，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

上述事实，是牛犯借开会暴露思想和借口向管教干部暴露思想公开讲的反革命言论，又有其他就业人员写的大量检举材料，并经反复查证属实，铁证如山。牛犯在上诉中，对其所犯的反革命罪行，全盘否定，叫嚣他“无罪”，“冤枉”，并狂妄地提出“对我的问题暂缓处理，我还要申辩”等等。反动气焰嚣张已极。必须指出，对于这种坚决与人民为敌的反革命分子，只能坚决实行专政，严厉惩办。原审法院判处牛犯徒刑十五年完全正确。牛犯妄图翻案，现在办不到，将来也办不到。如果牛犯胆敢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或者无理取闹，结果只能是受到国法更严厉的惩办，绝不会有好的下场。据此，本院特决定：维持原判，驳回上诉。

此判！

本判决是终审判决，不得上诉。

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

审 判 长 吕昌永

审 判 员 马永年

代理审判员 史纪钧

一九六六年十月七日

书 记 员 熊长碧

他读完了，法警把判决书交给我，让我签字。

我在想，从我将上诉状交到看守所的值班看守算起，到判决书宣读终了为止，仅仅间隔了三个小时。判决书上赫然写了四个人的名字，说是组成了刑事审判庭，既有审判长，又有审判员，还有代理审判员和书记员，局外人看来，似乎郑重其事。但是实际上，根本未进行任何审讯，只是来了一个衣冠楚楚、面色晦暗、貌似带着毒瘾的猥琐之徒，匆匆忙忙地读了一遍判决书，这位宣判人大概就是在判决书上排名第一位、号称审判长的吕昌永，他连原审法院是哪个都没弄清楚，原审为成都市西城区法院，他却在宣判记录中写成了“金牛区法院”，草率到如此地步，当然更谈不上了解案情了。可是，这却被叫做“终审判决”，而且“不得上诉”。至此，我对法院的信任与幻想就全部破灭了。

试想，从下午三点半到六点钟，当中的间隔还不到三个小时，看守拿到我写的上诉状以后，要呈交给看守所的主管，至少看一遍吧。然后要转给成都市中级法院，中级法院要派人到西城区法院调取卷宗，拿回来之后要指定办案人、组织合议庭、阅读相关材料，还要讨论案情、核实有关证据，最后是拟定判决书，交法院领导审核，批复后，由打字员打字、油印，再到院长办公室签章。每个程序都需要时间，区区三个小时，能够把这些事情做完，实在是超乎寻常的高效率，在共产党的机关里是十分罕见的。看来我这个案

子被当做十万火急处理的，荣幸，荣幸。

我从小接受共产党的教育，对毛泽东还相当崇拜，怎么中共及其掌控的法院堕落到这种地步了呢？但当时我还是有些糊涂，对共产党的本质还没有认识清楚，还认为法院这些做法绝不是党中央和毛泽东容许的，早晚会得到纠正。

所以宣判后，我一方面表示，无论何时何地，我都会用毛泽东思想进行自我改造。一方面请求原告及法院保留一切书面材料，不得销毁，以备上级日后调查。

同时提出质问说：“为什么不经审讯就进行判决呢？”

宣判人说：“对你就要实行专政！”

我说：“专政是需要的，我从来不反对人民民主专政。但是专政只能是对敌人采用的手段，首先要查有实据，确证为敌人，才能专政，不能毫无根据地专政，更不能编造罪名专政吧！”

他说：“证据多得很，单是检举材料就有这么多”，他用两只手比划了一尺多高的样子。

我随即说：“既然检举材料有那么多，一尺多高的一摞书面材料，应该有余百万字，单看一遍材料就要花十几个小时吧，何况还需要查证真假虚实，不能凭空认定吧。为什么这样快就判决了呢？”“而且还说是‘反复查证’，这能让人相信么？”

他说：“像你这种态度，不但要关你十五年，而且要关你一辈子。”

后来我才知道，毛泽东活着的时候，遍布中国大地的每座监狱都是进去就别想出来的。服刑期关在监狱里，强迫劳动，刑满释放以后还被强制性地留在监狱里，从事一样的劳动，只不过改了一个称呼，叫做就业人员，仍然是专政对象。的确确实是要关一辈子的。吕昌永这个狗腿子算是了解了毛泽东法西斯的真谛，怪不得能当上审判长。

我对他说：“按照判决书，我的犯罪事实是‘向管教干部暴露思想’，今后有了思想问题，还暴不暴露呢？”

他说：“哪个要你暴露？靠你自己解决”

我说：“是共产党让我暴露的呀，无论在社会上还是在劳改队里，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的领导都要求所属人员‘交真心、说实话’嘛。自己解决就是自我改造了，也就是无需强制。何必还要管教干部？何必把我判处徒刑呢？”

他说：“你少跟我啰嗦！”

他迫不及待地站了起来，走到我的身边，竟然不顾其审判长的身份和体面，拽着我的胳膊，把我拉过去，让我在记录上按指纹。

我请求看一下记录，他才拿给我。

我见记录并没有如实反映宣判情况，而且他已经替我签了名字，这是极不合理也不合法的。本打算不按指纹，但转念一想，这倒是一份很好的材料，今后上级调查时，可以从这份记录中看出成都市中级法院是怎样“审讯”和“判决”的，于是我才按了指纹，以防今后伪造记录。此时，我已意识到中共豢养的这帮“司法人员”是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的，极有可能制造假材料，我按了指纹，起码让他们造假时多了一种顾虑。

这份记录应该保存在成都市中级法院的档案柜里，尽管极不完整，宣判过程中的许多对话都没有记录在案，但是吕昌永将原判西城区法院写成“金牛区法院”和越俎代庖替我签了名字，却是白纸黑字，是他的笔迹，是无法

抵赖的事实。它是中共“公检法”弄虚作假、迫害无辜的罪证。敢拿出来示众吗？

一个重大的反革命案件的审讯与判决，就这样结束了。

看来这个吕昌永深得法西斯统治手段之精髓，我进了劳改队以后，才知道经他驳回上诉的案件很多，都是以反革命重刑犯定罪的，比如，四川大学经济系二年级学生李盛照，六十年代初被吕昌永判定二十年徒刑（1980年始得平反）。吕昌永是迫害无辜的酷吏，仅在苗溪茶场十三队，经他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或延长刑期的就有十余位。吕昌永的手上是沾满了人民鲜血的。“四人帮”倒台以后，这个刽子手仍在成都市中级法院身居要职，中共的头目变了，政权的法西斯本质没变，用的还是那帮人。八十年代，吕昌永年老退休后自办律师事务所，依靠和法院的特殊关系“闷声发大财”了。他这一生在极左路线的卵翼下干了不少伤天害理的坏事，理应处以极刑。我在写回忆录的时候，听说他已经在二十多年前亡故了，这条法西斯的走狗临死前是否有所忏悔呢？

（6）别开生面的批斗会

文革开始后，监狱人满为患，每天都有被统称为牛鬼蛇神的、名目繁多的各类“分子”抓进监狱。1966年9月30日下午，赶在国庆节前宣判的几十名在押犯，陆陆续续地从关押未决犯的看守所转移到已决犯看守所，等待着发配到劳改队服刑。这也算是各级法院向中共建国十七周年的献礼吧。

第二天，也就是10月1日，下午六点多钟，看守所的彭所长召集新到的犯人开会，刚刚喝完了那一瓢清汤寡水的藤藤菜稀饭，就被集中到水泥地面的坝子里，大约有六七十人，列队站好。周围的武警持枪奉陪。彭所长五十岁左右，身高一米七以上，形象端庄。不像多数狱卒那样由于职业的关系脸上总带着一股凶煞之气。不过他有个嗜好，据说是爱训话，隔三岔五就要让犯人集合，听他的演讲。

他开始说了：今天是建国十七周年国庆节，是举国欢庆的日子。今天上午，伟大祖国的首都，举行了规模盛大的国庆游行，伟大领袖毛主席再一次接见红卫兵，伟大领袖毛主席已经是第四次接见红卫兵了，这次接见了一百五十万红卫兵，前三次分别是8月18日，8月31日，9月15日。这表明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身体很好，精力非常充沛，伟大领袖毛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神采奕奕，红光满面。我们在这里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你们在监狱里，也和全国人民一样，应该感谢中国共产党，感谢伟大领袖毛主席……

共产党把无辜的人投进了监狱，还要我们感谢，真乃岂有此理！

好不容易他的话题才离开天安门，说到了看守所。他说：你们赶在国庆前夕被判了徒刑，即将投入劳改，劳改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任务，必须过好三关，第一是认罪关，第二是服法关，第三是脱胎换骨关……。你们被判处徒刑，有的已经认了罪，有的还没认罪，大概还有百分之二十到三十没有认罪，需要到劳动改造单位解决这个问题……

人民政府之所以判处你们徒刑，是因为你们犯了罪，有些罪还是很严重的，人民政府刀下留人，给你们出路，改恶从善，前途光明。刑期的长短是根据你们的罪恶大小决定的，也是根据改恶从善所需要的时间决定的，时间短了，你们就不可能改造好……

说了大约半个多小时，他没喝一口水，可能晚上吃的也是稀饭吧。可我

的小便几乎憋不住了，大概是我们的稀饭水太多了的缘故。

最后他说：今天晚上不学习了（那天是星期六，本来就不学习），天安门广场正在放焰火……我一听，真怕他把话题又扯到天安门上去，我还等着撒尿呢。幸好他很快打住了。

一声“散会”，各舍房的人井然有序地回到了监舍。

我记不太清楚了，大约是十月中旬，星期六那天下午四点多钟，突然由值班看守把各监舍的人放出来，一个挨一个地坐在水泥坝子的空地上，像是开会的样子。

我问关押时间比较长的难友：这是干什么？

他说：不是训话就是批斗会，没事找事，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那天天气晴和，太阳还没有落山，湛蓝的天，远远近近有些稀疏的白云，在黑屋子里关久了，看着天空感觉很晃眼睛，不由得用力眨了眨。

再看周围，有两三百人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席地而坐，大约占了整个坝子三分之一的地面。四五米开外的前面有三把藤椅，彭所长坐在中间，左边坐着不知姓名的看守，右边那把椅子空着没人坐。

彭所长开始讲话了，我很想他从国际到国内，从远古到如今，讲它两个小时，在外面晒晒太阳，多呼吸一些新鲜空气。讲到六点钟回去喝藤藤菜稀饭。

不料，他一开头没谈国内大好形势，直接说认罪问题，没说两句，竟然指名道姓地说：牛立华就还没有认罪。

咦？他怎么知道我没有认罪呢？可能是看了我写的上诉状吧。上诉的人总是不认罪的。

接着他说：牛立华站出来！交代为什么不认罪！

我应声而起，站在犯人堆的前面。心里在想：怎么度过这个批斗关呢？看来只有实事求是、不卑不亢、有理有利有节的对付，尽可能利用这个机会揭露公检法的黑暗，博得大家同情，避免皮肉之苦。监狱里开批斗会是常事，拳打脚踢也属家常便饭，我想了想，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主意已定，从容应对。

我首先坦率承认至今还没有认罪，又说：被判了罪而没有认罪，是很痛苦的，我愿意尽早认罪，一定要遵照彭所长的教导，过好认罪关。然而，过关不是那么容易的，总需要一段时间吧？我在监舍内老老实实的，没有乱说乱动，只是写了一份上诉状嘛。然后可怜兮兮地说：不认罪的还多着呢，怎么只开我一个人的批斗会呢？

旁边那把藤椅上坐着的看守说话了：谁说不认罪的还多？有好多？

我轻言细语地地说：国庆节那天晚上，彭所长给我们训话，教育我们说：还有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三十的人没有认罪，并不是只有我一个人不认罪嘛。

那位看守似乎有点文化，自以为抓住了把柄，立即打断我的话质问道：彭所长是说过百分之七八十的人都认了罪，还有百分之二三十的人没有认罪。你是个知识分子，百分之二三十多，还是百分之七八十多？

看来我必须针锋相对地回答了，我说：一斤大米里只要有十几颗沙子，就可以说“这米里的沙子真多”，要是二十几颗沙子，甚至可以说“这米里的沙子多的不得了”。不一定非要沙子的颗粒数超过米的颗粒数才能说沙子多吧？我就是一颗沙子嘛。

坐在后面的犯人嘀嘀咕咕，偶尔夹杂着轻轻的笑声。

彭所长说：你老实交代，为什么不认罪？

我面对彭所长，和颜悦色地说：我不敢在这儿交代。

彭所长看了我一眼说：为什么不敢交代？暴露你的反动思想才能接受改造。

他说了“暴露”两个字，正合我意，我不紧不慢地说：我没有参加任何反革命组织，也没有杀人、放火、放毒、破坏等反革命行为。按照9月30日才拿到的判决书，我所有的犯罪事实就是：“借开会暴露思想和借口向管教干部暴露思想公开讲的反革命言论”。白纸黑字，一字千钧，看了中级法院判决书，我才知道开会暴露思想和向管教干部暴露思想都是犯罪，所以我再也不敢暴露思想了。我要再暴露思想，岂不是重新犯罪？又多了一条罪恶“借开批斗会之机暴露思想”，可能要加刑吧？十五年刑期已经够长的了，我害怕，我不能再犯罪了。

我扭过身子对坐在地上的难友们说：我在这里奉劝各位“同改”（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规定：劳教之间称呼“同学”，劳改之间称呼“同改”），今后千万不要暴露思想，既不能开会暴露，也不能向管教干部暴露，别重蹈我的覆辙，在中国，言论和思想都有罪，一不留神就可能判刑。各位一定要记住呀，接受我的教训，千万不要再犯罪了。

藤椅上那位看守说：不准打胡乱说（四川方言，胡说八道的意思）。

会场一片安静。

我连忙转身向他说：报告队长（谁知道他是不是队长），我没有乱说，真没乱说，并从衣服口袋里把判决书掏出来念道：“上述事实，是牛犯借开会暴露思想和借口向管教干部暴露思想公开讲的反革命言论”，这是加给我的唯一罪状，没有其它的事实了。判决书上写着的，我不是乱说。

彭所长称得上是“百问不厌”，他说：进了监狱不认罪是不行的，不认罪就是反改造，不会有好下场，你为什么进了监狱还不认罪？。

我回答说：法院判了我十五年徒刑，也就是说我需要十五年的时间才能改造好，学生可以跳级，犯人没有跳级的吧。我现在才服刑半个多月，还早着呢。彭所长说的要过三关，我踏踏实实、按部就班的过，一关一关的过，您放心，我不会在关外散步，一定要过关。如果一进来就认罪了，改造好了，那不是该放出去了吗？何必还要关我十五年呢？十五年，生个娃儿都初中毕业了。

后面坐着的难友窃窃私语，我没听清楚他们说些什么。

我接着说：一进监狱就说罪大恶极、罪在不赦、罪不容诛、罪孽深重、罪有余辜、罪该万死、罪恶滔天，那是假的。认罪需要一个过程。我还没认罪，就老老实实地说没认罪，这才是交真心，说实话，我这辈子在大事情上没说过谎话。

监狱里经常开批斗会，许多时候对被批斗者施以拳打脚踢，也有用绳子捆起来的。这次对我的批斗会算是文明的了，主持人调动不起来斗争的气氛，不时有些人还偷着笑，彭所长也就改变了主意，他坐在藤椅训起话来了，讲了半个多小时，我没记住他说了些什么，只记得最后一句，“散会”。

在往舍房走的路上，不少难友向我点头微笑，在押犯人一天二十四小时要在黑屋子里关二十三小时五十分钟，刑期的包袱沉重，心情总是那么沉闷，今天出来透透空气，听听笑话，多少感觉轻松一点吧。

这次批斗会后不久，关在宁夏街看守所的大部分已决犯就被分批押送到劳改队去了。

我是1966年11月6日离开宁夏街看守所的。

八、红卫兵的崛起与消亡

1966年7月12日-1966年11月6日，我被关押在成都宁夏街看守所三个多月，基本与世隔绝。九平方米的监舍挤着十三个人，哪儿还有活动余地？每天放风十分钟，算是见见天日。深宅大院，高墙电网，岗楼哨兵，处处透露着阴森恐怖的气氛。好不容易以“莫须有”的罪名判了重刑，即将发配深山老林之际，才得以在押解犯人的大卡车上从蒙着深绿色帆布的缝隙中看几眼市容，入狱以来成都发生了莫大的变化。可谓“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风起云涌的红卫兵运动是其中之一。本书限于篇幅不打算叙述红卫兵的全部活动过程，仅记其概要，以志不忘。

毛泽东是红卫兵运动的蛊惑者和发起人

“文革”期间红卫兵的出现貌似突然，实际有着深厚的潜在根源。中共建国后十七年的教育极端扭曲，使受教育者尤其是涉世未深的青少年形成了严重的人格缺陷。

在强制灌输的教育体制下，最明显的是“盲从”。对“领袖人物”盲目崇拜，把政治阴谋家的谎言当做真理，把个别人的片言只语看做金科玉律，当做判断是非善恶的唯一标准。此外还盲从群体，盲从形势，盲从主义，盲从权势，盲从马列。其实是不懂，所以才盲从。

还有一个就是“压抑”。专制独裁的统治压制个性，箝制言论。约束行动，甚至控制思想。人们只能是驯服工具，毫无自由发展之空间。

压抑和盲从促成了逆反心理。由压抑和盲从，再加上数十年一贯的马列“阶级论”和毛泽东“掠夺、暴力、斗争”的邪说发展而来的，就是“文革”时的偏执和狂热，只讲阶级性而泯灭人性的行为根源。

一些尚未脱去稚嫩之气的少年，虽然整天高喊着革命，高喊着造反有理，高喊着大批判，但缺乏最基本的批判能力，他们对一切流行的理论和口号难以判断是非。他们用做批判的标准，只是毛泽东信口雌黄的语录，而不是实践和真理，他们用简单的、一元化的标准来衡量一切，“不是无产阶级的，就是资产阶级的”。在他们的心目中，只要认定为敌人，就该批判。就该推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即使是自己的师长、同学，甚至亲生父母。也不例外。

偏执使他们对待“坏人坏事”对待一切“封资修”的东西只有去仇恨，去打倒。他们认为穿西服打领带就是崇洋媚外，穿花衣服留长辫子就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他们沉迷在“三忠于四无限”之中[1]，认为只要不绝对忠于毛泽东思想就是敌人，对于敌人无论怎样残忍地对待都不过分，甚至唯恐自己不够残忍，以为不残忍就是对敌人“恨得不够”，就是“缺乏阶级感情的表现”。清华附中红卫兵创作的《造反歌》“忠于领袖忠于党，党是我的亲爹娘，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他见阎王！”就集中体现了他们当时的精神风貌。

“文革”爆发前夕，北京一些重点中学激进的中学生们就已经开始响应毛泽东的号召批判课本，批判教师以及罢课、罢考了。“文革”爆发，他们更是变本加厉地打、砸、抢，捣毁一切与“革命”不相容的文物、书籍，毫不留情地揪斗自己的长辈和老师，批判自己过去亲密的伙伴和同学，而毫不

在意对别人造成的伤害。他们认为“爱”只能用在领袖，用在党身上。至于党究竟是什么，领袖是怎么产生的，是否值得爱。巧言令色、轻诺寡信的毛泽东是不是大救星，他是怎么被称为“红太阳”和伟大领袖的，都没有认真的思考。阶级斗争的口号被吹得震天价响，“同志”和“仇敌”可以轻易转换。至于同情、怜悯、理解、宽容，则一概视之为“小资产阶级情调”，“温良恭俭让”“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中华传统美德，早被归在应该唾弃之列。“谁敢反对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成了文革时期红卫兵中最流行的口号。

红卫兵出现后，毛泽东穿上绿军装，戴着红袖章，在北京天安门八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 1100 多万人次，鼓动造反。多次发表讲话，表示了对红卫兵的支持，他俨然就是红卫兵的总头目。

附注：

[1] 三忠于四无限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政治术语。1966 年 5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通过了康生、陈伯达起草，毛泽东修改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通知》的发布标志着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5 月 18 日，林彪发表讲话，鼓吹“毛主席是天才，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自此掀起个人崇拜的热潮，“三忠于四无限”也在此时出现。所谓三忠于是：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所谓四无限是：对毛主席要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1967 年初春，进一步发展成“天天读”“早请示晚汇报”“像章热”、“唱语录歌”“跳忠字舞”等形式为主要特征的向毛泽东“献忠心”活动，狂起于大江南北，遍及全国城乡，这种狂热的个人崇拜所以能在中国大地上风起，和人民群众在文化大革命中理性认识上的盲从、毛泽东对个人崇拜的需要，特别是林彪等人煽动狂热崇拜有着密切的关系。文革结束后三忠于四无限等愚昧活动遭到官方批判，但其流毒尚未肃清。

毛泽东投放钓饵，刘少奇轻易上钩

毛泽东蓄谋整刘少奇由来已久，从 1959 年 4 月刘少奇被朱德等人推举为国家主席时即初露端倪，庐山会议批斗彭德怀后日趋显露，毛泽东竭力鼓吹的大跃进惨遭失败受到刘少奇的诘难后即耿耿于怀，着手编造罪名、寻找借口。毛泽东惯于采用迂回战术，剑走偏锋，他反复斟酌、冥思苦想，决定从不易引人注意的文化、思想方面突破。诛叛臣，清君侧。

1964 年 7 月，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专门成立了一个领导思想文化工作的机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组长彭真，成员有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随后，一大批学术、文艺方面的著作和绝大部分电影戏剧被强加了修正主义等大帽子，遭到公开批判。1965 年 11 月 10 日，上海《文汇报》突然发表文痞姚文元写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点名批判北京市副市长吴晗，说《海瑞罢官》是为右倾机会主义翻案，“是一株毒草”。由此掀起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1966 年 2 月，彭真等人觉察到毛泽东的倒行逆施另有所指，似乎矛头对着北京市委，于是制定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提出：“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意在约束文化领域的大批判，不让它进一步发展为政治斗争。

1966 年 3 月底，毛泽东严厉批评《二月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

是错误的；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如果中央出修正主义，地方要造反”，“要支持小将，保护孙悟空。再不支持，就解散五人小组、中央宣传部、北京市委，不管哪个省市委！”显露了一副独霸朝纲人莫予毒的姿态。

1966年4月10日，林彪、江青主持的《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经毛泽东审阅修改后作为中央文件发给全党。《纪要》宣称建国以来文艺界“被一条与毛泽东思想相对立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杀气腾腾渐露形色，

1966年4月，在毛泽东授意下，大张旗鼓地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等北京市主要领导人，宣扬他们是“三家村”集团[1]。号召全国共讨之！全党共肃之！！全民共诛之！！

1966年4月9日、10日，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批判彭真的“一系列罪行”，罢黜了才成立不久的五人小组，构建了“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为成员，起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批判《二月提纲》。

毛泽东在修改《五一六通知》时，加写了几段火药味异常浓烈的话：

“中央和中央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五一六通知》是一个彻头彻尾黑白颠倒的文件，是全面爆发“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的所谓“指导性文件”。历史已经证明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反动的、反人性的法西斯文件。是毛泽东欲独霸天下的罪证。这已成为公认的定论，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五一六通知》公开宣布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为反党集团。暴露了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已经拉开序幕。

1966年5月25日，在康生及其夫人曹轶欧的策划下，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一个不学无术、趋炎附势的卑劣小人，一个利欲熏心不择手段的无耻女人，伙同其他六位不得志的青年教师，贴出了题为《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的大字报，矛头直指北京市委和北大党委。

北大师生不认同这张大字报，半天之内竞相贴出1500张大字报与之辩论，反应强烈，声势浩大。但是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很快通过康生传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十分赞赏，立即批示“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打破。”当天下午四时，这道圣谕从杭州传达到康生、陈伯达手中。毛泽东还说：这张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北京公社的宣言，比巴黎公社意义更大。指令中央人民广播电

台 1966 年 6 月 1 日全文播发这张大字报，6 月 2 日在《人民日报》以显赫位置全文刊载。同时发表了由王力、关锋、曹轶欧共同炮制的《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从此，一场以整人斗人为主要内容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以北京为中心，迅速在全国蔓延开来。

聂元梓的这张大字报实际上空洞无物，没有揭露出来一点实质性的“罪恶”，只是在“五一六通知”的激励下，一味上纲上线，乱扣帽子。怎么会被昏君钦定为“马列主义大字报”，聂本人直到今天也感到莫名其妙。这张大字报的意义也许不在于内容，而在于它振臂一呼，在响应《通知》对走资派宣战的同时，也发泄出压抑已久的受领导打击的不满，毛泽东则利用这种情绪来发动群众，点燃文革之火，故意把它抬到万众瞩目的吓人程度。

如果说《五一六通知》是想“运动群众”，那么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则代表了“群众运动”的兴起。一旦“群众运动”脱离了“运动群众者”的掌控，那么，这钦定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作者，难免会充当替罪羊！

聂元梓受到毛泽东的高度赞扬以后，日益骄横跋扈，赶走了工作组，自任北大文化革命主任。1966 年 8 月 18 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百万红卫兵时，聂元梓应邀登上天安门城楼，受到毛泽东的亲切接见。

自此聂的头脑高度膨胀，开始一连串“炮打”：炮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炮打朱德，炮打邓小平；赶走工宣队，挑动派性，制造武斗。一连串激发矛盾的恶行干扰了毛泽东的阴谋，引起毛泽东的反感。1969 年她刚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1 月即被发配到江西劳动改造，1971 年初被隔离审查，限制行动自由。狡兔尚未死，走狗便被烹了。文革结束后的 1978 年 4 月 19 日，聂元梓被捕入狱，此时她已 57 岁，法庭以反革命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判处其 17 年徒刑，剥夺政治权利 4 年。

聂元梓出狱后有一个反思：文革真是一场浩劫，死了多少人，耽误了多少事！“文革一开始，我带头写了一张大字报，对文革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现在想来，这张大字报的内容意义是完全错误的，尤其是对陆平、彭珮云、宋硕造成很坏影响……”

这也就是说，毛泽东当年在自己的大字报里高度赞扬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实际上是一张制造动乱、煽动仇恨、祸国殃民的大字报！大字报的作者聂元梓不得不公开认错，低头认罪了。

1966 年 8 月 5 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旁边的大灶食堂外面贴出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全文如下：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文章，写的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 1962 年的右倾和 1964 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

当时文革已经兴起，写大字报已经成了时髦，全国各地的大字报可谓充塞天地。但是毛泽东亲自写大字报，还是被列为头等大事。电台一广播，报纸一刊登，确实给了国人极大的兴趣，又给了国人强烈的震撼。

大字报虽未点名，但国人皆知，矛头直指国家主席刘少奇和总书记邓小平。这时人们才恍然明白，党中央竟然有两个司令部，一个号称毛泽东为首

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一个是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毛主席怒气冲冲炮打之，说明两个司令部已经到了针锋相对、水火不容的地步！之前毛泽东多次说的“中国的赫鲁晓夫”“中央出了修正主义”等等，原来指的就是刘少奇！

于是，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口号风靡全国（后来变成了“打倒刘邓陶”），批判刘邓的大字报和各类文章铺天盖地。与此同时，全国各地开始揭发、批判、揪斗刘邓的代理人（或称“走狗”“孝子贤孙”）红卫兵造反派在全国各地横冲直闯，打砸抢烧，“踢开党委闹革命”“砸烂公检法”成了最革命的行动；好端端的人群被莫名其妙地分成你死我活的两派，在“文攻武卫”的口号下，两派反复厮杀，血流遍地；多少老干部被打成刘邓走资派，轮番批斗，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被整得得皮开肉绽，痛不欲生；多少作家、艺术家、科学家、教授学者被打成反动权威，七斗八斗，被弄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多少国宝级大师、文化精英含恨自杀；多少国家珍贵文物、名胜古迹、精华典籍，被无法无天的红卫兵或砸烂毁坏，或付之一炬！中华文明遭到了空前的大浩劫。

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浩劫，一场动乱，主要指的是毛泽东大字报发表后的66、67、68这三年。69年以后虽然也是极左横行，也有动乱和灾难，但已经大为减弱。

1966年8月5日毛泽东那张大字报的重点内容，就是“五十多天里”北京大专院校出现的悲惨、凄清、恐怖情景。这段话语言之犀利，感情之激愤，力度之强大，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刘少奇邓小平竟然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围剿革命派，实行白色恐怖，真是“何其毒也”，真是罪该万死！即使把刘邓逮捕法办，处以极刑，也是罪有应得！

然而，知晓底细明白真情的人，就会暗暗叫绝——这是毛泽东为了扳倒政敌而精心设置的圈套啊！那一连串骇人听闻的罪名实际上都是莫须有的大帽子！那气势汹汹的语言里遮盖着多少深不可测的阴谋啊！

众所周知，毛泽东批准的聂元梓的大字报一经发表，全国即刻涌现批斗各级干部的狂潮。北京55所大专院校、100多所中学里，那些早已被毛极左思潮煽动起来、唯恐天下不乱的狂势青年们，高唱着“造反有理”的语录歌，掀起了揪斗学校校长、书记和出身不好的教师们的狂潮。许多学校出现了学生群殴校长、教师事件，多名中学校长被活活打死……刘少奇、邓小平家里就读北大、清华、师大附中的孩子们，带回来学校里的恐怖消息。其中打人最凶的，又是那些平时恨上课、恨考试、恨管理的高干子女和散漫青年。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局面将不堪设想！

此时的毛泽东，将一切政务交予刘少奇和邓小平，自己以养病为名到南方游山玩水去了。刘邓心急如焚，6月4日即飞赴杭州，向毛泽东汇报请示工作，报告了北京殴打多名校长的乱象，建议立即向各大中学校派驻工作组，以恢复学校正常秩序。毛泽东不置可否，先是支持学生闹腾，后又说：“你们回去开会研究嘛，我也不是就一定反对。”邓小平请毛泽东回北京主持工作，毛说：“还在治病，无法回京。北京的事，还是有劳二位相机处理。”

6月5日，匆忙赶回的刘少奇在北京主持召开了有各部委和知名高校党委负责人参加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绝大多数领导主张立即向所有大专院校派工作组。会议结束，刘少奇立即把会议的决定以电报传真方式报告给杭州的毛泽东，毛泽东回复同意。于是从5日晚上起，短短半月内，即以北京市委名义，向北京地区所有大学、中学派驻了工作组。6月9

日，刚刚奉毛泽东之命从广州到北京就任第四把手（排名仅次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的陶铸，紧急飞往杭州再次向毛泽东请示文化大革命派不派工作组的问题。毛泽东表态：可以派工作组，也可以不派，不要急急忙忙派工作组（参见《陶铸传》，中央党史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371 页）。刘少奇为了掌握运动第一手材料，派自己的夫人王光美以工作组成员身份进驻清华大学校园。

此后的 50 多天里，工作组代行学校领导职能。尽管在中央文革康生陈伯达等人的操纵下，不少学生反对工作组，一些学校形成两派，还有混乱现象。但总体上说，大局已被工作组控制。一些攻击学校领导、殴打校长和教师、不听工作组劝告继续闹腾的造反派，受到处分和批判。清华的造反派头头蒯大富等人被打成反革命，北京高校的造反派被打成“反革命”“小爬虫”的多达几千人。刘少奇妄图用高压手段将孕育了几十年的反抗情绪压下去。——这可能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围剿革命派”“实行白色恐怖”，即“镇压学生运动”！

1966 年 7 月 18 日，在外巡游几个月的毛泽东突然回到北京。19 日下午便在自己的书房里，毫不客气地斥责前来汇报工作的刘少奇：

“派工作组是错误的！工作组起了阻碍运动的作用。工作组阻碍革命，势必变成反革命！……昨天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运动搞得冷冷清清。有些学校镇压学生运动，谁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运动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谁反对文化大革命？美帝！苏修！日修！反动派！共产党怕学生运动是反动的！有人天天说走群众路线，为人民服务，而实际上是走资产阶级路线，为资产阶级服务！”

毛泽东一顿劈头盖脑的斥责，让刘邓等人惊惧不已，不敢讲话。刘少奇斗胆顶撞了几句，甚至说“可以把我撤职查办，下放回老家种地”，过后便感到后悔，不住地检讨认错。但是不行了，一顶“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帽子已经死死地扣在他的头顶之上，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便应运而生。

仔细分析，这个所谓“镇压学生运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帽子很大，骇人听闻，但却是毛故意设的一个圈套，是“莫须有”的罪名！

“五一六通知”发出后，全国性的文化大革命即轰轰烈烈地开始。文件上说“党里、政府里、军队里、文化教育界里”混进了那么多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形势是如此严峻，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最需要最高领袖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工作，领导全党向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发起攻击。而在这关键时刻，毛泽东却远离北京，让刘邓主持工作。这是为什么？

有人说，毛泽东有病，需要外出诊治嘛。这完全是谎言。是什么病？北京有那么多最高级的医院都看不成他的病？非到南方看病？查查他的行踪记录，让毛泽东的随行人员谈谈，这几个月毛在哪里看过什么病？事实是，毛在风景名胜杭州、韶山滴水洞优哉游哉数月后，当时已经 73 岁的他还一再逞能，7 月 16 日在武汉长江的波浪中游了 30 多里！

毛泽东在 1966 年说过，过去中央分一线、二线，一线同志有些事情处理得不好，有些应当我抓的事情，我没有抓，所以我也有责任。我是过于信任别人了。这件事引起警惕。去年 9 月 10 日提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地方怎

么办?我感到我的意见在北京不能实行。为什么批判吴晗不在北京发起,而在上海发起呢?因为北京没有人办。现在北京问题解决了。

这就让人生疑:既然明明知道一线领导刘邓不行,为什么还让他们主持工作?现在北京“独立王国”的问题已经解决,自己的政令早已畅通天下,自己为什么在关键时刻不在北京主持工作?

那就只有一种解释:故意让刘邓上圈套,“犯错误”!以下三种情况任何一种情况发生都可以“扣住”刘、邓。实乃毛泽东之大阴谋也!

(1)按照中共的惯例,搞运动必然要派工作组。自己是煽动学生起来造反的,而刘少奇肯定会依照惯例派工作组,去疏导、教育、弹压学生,这样一来,一项“镇压学生运动”“资反路线”的大帽子便可扣到他头上!

(2)如果他不派工作组,任由造反派打打杀杀,再打死一批校长、书记,打伤一批教师、学生,学校秩序一片混乱,社会上怨声载道。那就可以给他扣上“领导不力”“纵容反革命”“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大帽子!

(3)虽然就工作组问题刘邓向毛请示过,毛泽东曾表示过同意。但具体工作是他们抓的,谁知道他们派工作组是干什么的?我在外地怎么能管得了?毛泽东是不会承担任何责任的。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刘邓无论如何是逃脱不了的!

于是就引出下面的内容“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的形左而实右”。好像是不经意引出的历史问题,其实这才是关键所在。文有“文眼”,诗有“诗眼”,这一句正是大字报的“报眼”。

62年的“右倾”,指的是在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旁敲侧击地揭露了大跃进的严重错误导致的严重困难,否定了毛泽东的“一个指头”(即大跃进是九分成绩一分错误),提出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论断,让毛“憋了一肚子气”,由此增强了倒刘的念头。

1964年的“形左实右”,指的是在“四清”运动中,刘和毛发生的一系列矛盾。关于四清运动的主要矛盾,运动应该如何搞,两位主席的意见发生激励冲突。尤其是刘少奇多次在公开场合说“毛主席调查研究的方法已经不行了”,让毛泽东十分不满;刘邓二人多次无意中冷落、疏忽毛泽东的做法也让毛十分恼火,认为是“有人在我头上拉屎”。刘夫人王光美搞了个“桃园经验”,毛先是赞同,并指示发至全国逐级推广。后来认定这个“经验”打击了一大片,又表示反对。这一切构成了“形左实右”,即表面看是正确的,实际上是错误的;表面是搞社会主义,实际上是搞资本主义。

62年即存在“倒刘”的念头,64年就决心要打倒刘。但是如何打倒具有一定威望而又盘根错节的刘少奇,毛泽东费尽了心机。以62年的右倾“翻案风”打倒刘,会使人心中不服;用64年的“形左实右”打倒刘,更是缺乏证据。于是文革一开始,让他主持工作派工作组,轻而易举给他弄个“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方向路线错误”,这一下打倒他,就有了“铁证如山”而又冠冕堂皇的理由了!

毛泽东就是以此为突破口,一步一步、步步深入,将刘少奇打成“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中国的赫鲁晓夫”、继而成立专案组,周恩来任组长,编造材料认定刘少奇为“叛徒内奸工贼”,一阵“打倒”“炮轰”“油炸”“火烧”之后,被画地为牢,失去自由,受尽摧残,最后(1969年11月12日)在河南开封一间阴暗的地下禁闭室内裸身惨死。

事实真相是，刘少奇派的工作组确实镇压了学生，多少青年学生被打成反革命，那“白色恐怖”是真的，他确实施行了一条中共历来奉行的封建法西斯反动路线！

刘少奇一贯追随毛泽东，长期具有极左思想，习惯于搞“阶级斗争”。曾对毛泽东推崇备至，极力吹捧、宣扬“毛泽东思想”。张国焘曾斥骂他是毛泽东的功狗。在“土改”“肃反”“反右”运动中，刘少奇都曾作恶多端，草菅人命。一笔笔罪恶记录在案，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早晚都要清算的。刘少奇在“四清”运动中也确实打击了一大片；王光美想把“桃园”经验带到清华大学，肯定伤害了不少教师和学生。但是，这些伤害，比起毛泽东发表大字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后带来的全国十年浩劫、十年灾难，堪称是小巫见大巫！历史不会忘记，对中国人民祸害最大的是毛泽东。

毛泽东的大字报出台了，工作组被撵走了，造反派们平反了，蹦跳起来了，冲杀起来了，整个国家开始遭难了！

总之，毛泽东的这张大字报，和聂元梓的大字报一样，都是制造动乱、打击异己、危害社会的一场闹剧。罪不容诛，十恶不赦。

附注：

[1]1961年9月中共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前线》杂志开辟了一个专栏“三家村札记”，该专栏邀请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三人轮流写稿。从1961年10月到1964年7月，“三家村札记”共发表了60多篇文章。这些文章的内容大部分以说古论今、谈天说地的形式，谈论思想修养、艺术欣赏等问题，个别篇章也批评了当时社会生活中的不良现象，对时弊有所讽喻。文革伊始被认为是“有步骤有组织有指挥”的政治行为，遭到批判。

毛泽东死了以后，1978年8月，中共北京市委作出《关于“三家村”冤案的平反决定》，撤销原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对邓、吴、廖三人所作的结论，为邓拓、吴晗举行追悼会，廖沫沙后曾任北京政协副主席。

文革初期红卫兵是些什么人

最早的红卫兵名称来自于一位清华附中学生张承志的笔名，意为“毛泽东的红色卫兵”，在1966年5月29日清华附中预科651班内所贴的小字报上暂露头角。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文化大革命宣言后，其它中学学生所贴的大字报也赶时髦纷纷书上红卫兵署名。1966年6月2日，清华大学附中校园内出现了一张贴在醒目位置署名“红卫兵”的大字报，大字报的题目是：《誓死捍卫毛泽东思想，誓死捍卫无产阶级专政》。当天，大字报上陆续出现了百余人签名。

中国第一个红卫兵组织是1966年5月29日清华附中的卜大华、骆小海、邝桃生、王铭、张小宾、张承志等人秘密成立的。在他们成立的当日，北大附中以彭小蒙（中共高干彭炎之女儿）为代表的中学生，成立了“红旗战斗小组”紧接着矿业学院附中、石油学院附中等也相继成立了红卫兵。

1966年6月份。一副血统论对联广泛传播，“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种近似于流氓痞子的语言，是不符合正统的语言文明的，但它却朗朗上口，被广大红卫兵小将接受。他们信奉毛泽东“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不是绣花”等论调。那时候林彪虽然还没有成为接班人，

但所谓的林彪语录也已经满天飞，如：“枪声一响，老子就上战场”“完蛋就完蛋，老子今天就死在战场上”等等。“对联”的出现同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遥相呼应。故而流行一时。7月26日，江青在北展剧场接见红卫兵，公开了对红卫兵的支持。彭小蒙在演讲中引用了“对联”，江青插话说：“基本如此嘛。”由此，对联有了“基本如此”的横批。

7月26日，北京轻工学院的汪延群（汪东兴之女）、朱新民（朱良才上将的三儿子）等为代表，到国务院信访室上访，状告工作组镇压学生运动，引起中央文革的重视，戚本禹出面接待了他们并鼓动红卫兵起来造反。于是红卫兵队伍日益扩大。

起初发起组织红卫兵的头领多是中共高官和军队中的高级将领之子女，这一帮衙内自以为根红苗正，有老爹做后台，有恃无恐，无法无天，什么人都敢惹，什么事都敢做。横冲直闯，无所顾忌。矿业学院附中的红卫兵发起者杨冀平是上将杨勇的次子，他与刘歌（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刘春之子）相识，杨冀平动员刘歌于1966年6月18日在矿业学院成立了红卫兵，这是在大学中成立时间最早的红卫兵。

紧接着，北京航空学院的刘克府（又叫朱新华，朱良才的次子）和苏晓前（中将苏静之子）、徐甘泉（中将徐立清之子）、赖锐锐（建材部长赖际发之子）、贺新洲（贺龙之侄）、李明清（李井泉之子）、孙酋玲（交通部长孙大光之女）、王亚慧（少将王智涛之子）等串联，张贴大字报，组织起红卫兵。毛泽东的大女婿孔令华（中将孔从周的儿子）担任了校红卫兵筹委会主任，毛泽东的大女儿李敏也住在北航。

7月28日，江青将清华附中卜大华等人6月24日写的《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再论》和彭小蒙7月26日在北大的讲演稿，交给了毛泽东。清华附中红卫兵富于激情的文章，彭小蒙极具煽动性的演说，一经江青的推荐，立即得到毛泽东的认可，他肯定了红卫兵运动的大方向。8月1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还给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写了回信。8月3日王任重约见卜大华和王铭，公开了毛泽东的回信。红卫兵运动得到了毛泽东的首肯和推动，于是像火山爆发一样，在全国以势不可挡之势兴起。

8月初，全国红卫兵像雨后春笋一样蓬勃发展，中共高级干部的子女都参加了红卫兵：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朱理治的儿子朱佳木，陈毅元帅之子陈晓鲁、陈赓大将之子陈知涯，朱良才上将的长子朱新加，刘志坚中将长女刘平凡、国家计委副主任顾明之女顾小鸥、傅秋涛上将之女傅民族、公安部办公厅副主任李连富之子李纪周（后来官至公安部副部长，2001年因贪污腐化、违法乱纪被判处死缓）、内务部副部长程坦之女程辛联，张宗逊上将之子张新陕，汪东兴之女汪延群，王集成少将之子王小戎、王文轩少将之女王小玲、万里之女万淑鹏，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邓典桃之女邓良宝，小儿子邓良诚，黑龙江省长李范五的女儿李黎力，宋任穷上将之女宋彬彬，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宁一之女刘菊芬，外贸部副部长雷任民之女雷蓉、中央文革副组长王任重之女王小平。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之子乔宗淮，革命烈士子弟姜扬，中将甘渭汉之子甘佩，公安部副部长许建国之女杜安糠、一机部副部长饶斌之子饶凯，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之子刘惜戈、海军副司令方正平之子方忠诚、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叶飞之女叶威威、冶金部长吕东之女吕虹，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之子谭怀远，中联部副部长伍修权之女伍连连，少将宋玉林之女林辉，建工部长刘裕民之女刘莹，公安部副部长于桑之女于延琳，北京市副市长万里之子万仲翔、水电部副部长

刘澜波之子刘安东，党校副校长胡绳之子胡伊朗，江西省副省长黄霖（又名罗永正）之子罗迎难，外交部驻英代办宋之光之子宋扬之，上将苏振华之子苏承德，最高检察院副检察长谭政文之子谭力夫，教育部副部长刘笛峰的养子、烈士子弟刘京……他们不顾政策、为所欲为，到处制造麻烦，竟然枪走西藏宗教领袖班禅进行批斗，到处打砸抢烧，外国使馆密集的东交民巷和苏联使馆附近的一条街，被他们砸了原先的路牌，分别改为反帝路和反修路，与外国使馆工作人员的冲突也时有发生。这种行为与二十年代毛泽东率领一帮痞子、流氓、土匪横行乡里，打砸抢烧杀，何其相似乃尔。

当时青少年幼稚而狂热，单纯又盲从，没受过基本的法制教育，没有基本的法律意识，不受任何法制的约束。整个教育的主题既没有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仁义、良知、慈爱、宽厚、温良、中庸、和谐等义理，给青少年以道德的熏陶；又没有宣扬西方文明的自由、民主、平等、正义、博爱、人权、慈善等精神，给青少年以文化的启蒙。充斥于世的只剩下“砸烂旧世界”“造反有理”和毛泽东一再宣扬的“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斗争哲学。以至当“文革”爆发的时候，这种意识形态的塑造自然衍变成打砸抢和武斗的暴行了。而支撑这些恶行的“理论基础”自然是共产思想鼻祖马克思曾自诩发明的“阶级斗争论”。

在毛泽东的蛊惑和怂恿下，幼稚无知的红卫兵，以简单、粗暴、蛮横的行动打击他们认定的“牛鬼蛇神”，使“打碎”、“火烧”、“砸烂”等口号和行为风行一时。城市的街道、商店、医院、学校等地方许多有影响的老名称、老字号招牌被当作所谓“封、资、修”货色，统统取消与砸掉，换上含有“兴无灭资”等内容的新招牌、新字号。这些由破“四旧”引发的行动，得到毛泽东、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的肯定和赞赏。他们称颂红卫兵的做法“好得很”。红卫兵运动迅速蔓延到全国各地，打人、砸物、抄家之风愈演愈烈。各地红卫兵还将一些遗存千百年的珍贵文物、古迹，或捣毁、或焚烧，造成空前的文化浩劫。

来去匆匆的五大“学生领袖”

毛泽东点燃的“文化大革命”之火，时明时暗的燃烧了十年，无数生灵惨遭涂炭，千古文明满目疮痍。毛泽东死后，大火才渐渐熄灭。如今文革已经过去40年，提起文革史，当局仍讳莫如深，噤若寒蝉。近来少数不明真相的群众基于对现实的不满，在一些别有用心者的蛊惑下，对文革难免萌生些许留恋。韶山树立起十米多高的毛泽东铜像，不时有人顶礼膜拜：穿着西装革履，双手成心形置于头顶，落下时分别在额头、鼻尖、颈部停顿，下跪、叩首、双手摊开，如此反复三次，据说这是跟一位藏传佛教大师学来的。是为了防病消灾，买彩票有可能中头奖。希特勒死了七十多年，纳粹幽灵还没有完全灭绝，倒也不足为奇。需要警惕的是对毛泽东的罪虐缺乏揭露和批判，死灰复燃的可能依然存在。振兴中华实现民主的愿景就只能是空中楼阁、白日之梦。

且来看看文革期间毛泽东是怎样驱使和绞杀五大“学生领袖”的吧。

1、**聂元梓**：文化大革命初期名噪一时的造反派，1966年5月聂元梓任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在江青秘授机宜，曹轶欧精心策划下牵头写的《宋硕、陆平、彭珏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那张大字报贴在了北京大学大饭厅东墙上。矛头直指北大校党委和北京市委。

关于这件事，聂元梓有详细交代，她有一本日记，上面写着许多鲜为人

知的事，写着具体的时间地点，中央文革的人怎样传达毛泽东的指示，她又是如何执行的。这本日记，可能在一个人手上，将来说不定会披露出来。聂元梓告诉过蒯大富有这么一本日记，但没说日记在哪里。

文化大革命不是红卫兵运动，更不是广大革命群众运动，实质上是毛泽东、江青夫唱妇随，运动了红卫兵，运动了广大革命群众。如今有人还在说什么毛泽东早就看出了江青、林彪是坏人，实际上，毛泽东对江青、林彪信任得很。没有毛泽东支撑，林彪会升得那么快么？没有毛泽东作后台，江青能有那么跋扈嚣张么？

这张“大字报”刚刚出笼的时候，并没有像后来那样受到欢呼，据聂元梓回忆，大字报5月25日下午2点贴出，到下午6点，“我们的大字报就被许多咒骂我们的大字报覆盖了。”

5月26日，周恩来、康生、陈伯达等人来北大了解情况，看到校园里贴满了大字报。

5月27日，校团委向聂元梓等人施加压力要他们写出书面检查，聂元梓有恃无恐，严词拒绝。

一石激起千层浪。但如果仅仅这么一块石头，千层浪转瞬就会平息下去的。5月25日下午聂元梓等人贴出那张大字报掀起的些许风浪迅速消失，5月27日北大局势已渐平静。

起初给大字报作者压力很大，想着1957年春积极响应毛泽东的号召，敢于针砭时弊立即被划为右派分子的林希翎、谭天荣，当事者难免不寒而栗。但这次这张大字报的作者之中似乎有人洞悉内部消息，神秘兮兮地散布：“过几天你们就会知道了”。

康生连夜给在杭州休养的毛泽东发紧急电报。

毛泽东看了电报后说：这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毛泽东还向康生说：“**5月25日聂元梓的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国北京公社的宣言书，意义超过巴黎公社。**”并责成《人民日报》北京电台等广为传播。由此风靡全国，一夜之间，聂元梓便成了北京大学的“老佛爷”。

有了毛泽东的御旨，聂元梓的造反劲头开始排山倒海：揪“黑帮分子”、设立牛棚、抄家抓人、大搞武斗。把北京大学闹得天翻地覆。她作恶多端。逼死上百名知识分子，服毒的、上吊的、卧轨的、跳楼的成了北京大学的每日新闻，她的双手是沾满了人民鲜血的。**她对毛泽东发动文革意在扫除异己，禁绝妄议，谋求家天下自作始皇的痴人之梦无所察觉，或者说有所警觉也佯装不知。对毛泽东打着反修防变的旗号，意欲独断专权自作霸主的狼子野心认识不深。**助纣为虐，摇旗呐喊，声嘶力竭，嚣张已极。周恩来曾未敢点名地评价聂元梓：“北大有个女人，很坏。”聂元梓的专横跋扈、胡作非为传到康生的耳朵里，康生说：“聂元梓这个人不太好，在延安时我就知道。可是现在，就是混蛋王八蛋，也要支持。”北京市委书记邓拓点名批评说：“聂元梓是一匹害群之马，不彻底批判，教育不得安宁。”季羨林在晚年所写的《牛棚杂忆》一书中回忆起聂元梓的无知妄行时说：这样一个人，一时竟成了燕园的霸主，集党政大权于一身，为所欲为，骄横恣纵。

严格说来，聂元梓不能计入“学生领袖”之列，文革乍起时她已45岁，早已不是学生，身居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是中共豢养的党棍。是奴才类的典型。

聂元梓1921年出生在河南滑县世代中医兼地主家庭。其长兄聂真1926

年夏初中毕业后赴北京考入北京中法大学理科补习班。1928年6月，聂真回到滑县，冒充老国民党员在浚县登记混入国民党，1929年暑假，打入滑县国民党县党部，担任党务委员职务。在聂真的影响下，七七事变后，只读了两年初中的聂元梓到了山西太原，在国民师范学校参加了“牺盟会”（阎锡山为首任会长）主办的军训。1938年聂元梓到山西晋城，进入华北军政干部学校学习。这年1月，年仅17岁的聂元梓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9年，她被送到延安，1945年与吴宏毅在延安结婚。婚后二人被调往东北，吴曾任哈尔滨市副市长，聂任区宣传部长。结婚十五年育有三名子女。1959年12月，中共哈尔滨市委二届六次（扩大）全会将吴宏毅认定为“反党集团”成员，市委决定并经省委批准，将吴宏毅开除出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送劳动教养。1959年冬，聂元梓与吴宏毅离婚。1969年6月8日，吴宏毅因心脏病复发，抢救无效含冤去世，终年52岁（1982年4月，中共黑龙江省委作出为吴宏毅平反的决定，为死人恢复名誉，恢复党籍）。吴宏毅失势后，聂急于离开哈尔滨，只有初中肄业文化的聂元梓于1960年6月经过他大哥聂真（时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向北大校长陆平推荐，调到北京大学经济系当副主任。1965年他认识了年近七旬的鳏夫老红军吴溉之（副部级干部，时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出于寻找政治靠山的需要，44岁的她以身相许。成婚半年，文革爆发，吴溉之受冲击，聂元梓见无利可图了，当即与其离婚。1968年7月，吴在北京病逝，终年70岁（1979年8月，中共中央认定吴溉之案为冤假错案，为其平反昭雪，恢复党籍，恢复名誉。）

1953年，31岁的聂元梓已经定级为行政12级，属于中共的高级干部了。60年代调到北京大学后因不学无术，歇斯底里地折腾了两年，没有爬上去。

文革前夕，一直在窥测方向寻找向上爬的机会，受到了江青和曹轶欧的赏识，奉命写了一张《宋硕、陆平、彭珏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的大字报。由此聂元梓声名鹊起，不可一世。

1978年4月，被毛泽东钦定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作者聂元梓被捕入狱。1983年3月，57岁的聂元梓被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判处17年徒刑、剥夺政治权利4年，成了阶下囚。毛泽东根据什么确认那张大字报是马列主义的呢？从聂元梓事件可以断言，毛泽东根本不懂马列主义，他自称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只是挥舞破旗吓唬人而已。

聂元梓晚年只落得孤身一人，且患有心脏病、腰椎骨严重错位等多种疾病，凄苦度日了。

王友琴博士所著《文革受难者》中有一段话写得触目惊心：“看起来，文革好像是非逻辑的。但是实际上这一切有其内在的逻辑。检视往事，现在可以看出，一批人在参与迫害的同时，也铺就了迫害他们自身的道路。因为他们参与的迫害，不只是对一些个人的否定，而是对法治、对程序正义、对一个公民应该具有的公民权利的根本否定。当一套可以超越法律置千万人于死地的机构已经建立起来，当一批批可以充当打手的年轻人被准备好了，那么参与建立这套机构和准备这些打手的人自己也会被吞吃掉”

聂元梓的一生是可悲的，其晚景更属凄凉。我把这样的话说给至今仍然活着、仍然不忏悔的聂元梓，愿她此生能够读懂这篇文章。认真忏悔，安心养老，重新做人。

文革的积极参与者们不管说得如何漂亮，聂元梓之流都是为一己私利的

投机分子，他们害人又被别人利用。文革期间毛泽东假他们之手害死了成千累万的无辜人士。如果再有风吹草动他们难免本性难移。继续为非作歹，万万不可怜悯！毛泽东的文革罪虐必须彻底批判。各类走狗的罪恶行为不可轻饶。

追记：2005年，聂元梓在香港出版了《聂元梓回忆录》。现将其为此书写的自序转录于后，供读者赏阅。

聂元梓：该由谁来承担历史的罪错？——《我在文革漩涡中》自序

2005年1月，作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当事人，被人妖魔化为“乱世狂女”、“灾星”而且到处传说早已死亡的我，在香港出版了近四十万字的《聂元梓回忆录》，向世人坦诚披露了自己几十年来大起大落、坎坷多难的一生。这部书出版以后，产生了令我自己都意想不到的社会反响。它不但在香港的销路很好，连国内的地摊上，也有了这本书的盗印本。用流行的话来说，就是往事并不如烟。几十年过去了，人们还是难以忘怀、还在继续探究着这十年动乱是怎样发生的？更让人意料不到的是，不但有很多对文革感兴趣的研究者拿着这本书找到了我，还有许许多多早已相忘于江湖的旧友、甚至包括以前曾反对过我的人，也都相继联系上了。新老朋友聚在一起，过去的疮疤被屡屡揭开，历史的真相逐渐浮现，于是，一些重大事件的来龙去脉越来越清晰了。面对这么多的反馈意见，加之初版书中的不少错漏，使我萌生了重新修订增补回忆录的想法。我虽然拖着病体、年逾耄耋，但这是我在有生之年想干的一件最重要、也是最后的事情了。有人说过，历史永远是胜利者和权力者写就的。在中国，历史的吊诡还在于，你越是想来剔除伪史，恢复信史，而掌权者越是讳莫如深，固执己见。就拿这场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来说，该由谁来承担历史的罪错？是被人称为“五个指头”大拇指即发动者毛泽东的罪错？还是林彪、四人帮的罪错？还是我们这些被判刑囚禁了十多年的“五大领袖”的罪错？以“何其好也”的那张大字报来说，它恰逢其时地出笼以及所产生的疯魔般的效应，绝非简单的“造反”二字所能涵盖的。这里面既有一个老党员对中央“五·一六通知”的正常反应，也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在北大历次运动中所造成积怨的症结。谁又能知道，一个被全国上下视为“造反第一人”的人，仅仅两年之后，就被江青说成是“聂元梓太骄傲，谁的话都不听，叫她反右她反左”而被逐出中国的政治舞台了。在我有期徒刑十七年的判决书上，清清楚楚地写道：“本庭确认，被告人聂元梓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积极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参与推翻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阴谋活动。”十年文革，政治风云瞬息万变，人事沧桑白云苍狗，其后的八年我都是在失去人身自由的监禁中度过的。如果有正常历史思维的话，请问：文革初期，林彪、江青这两个反革命集团形成了吗？如果没有形成，当初我所追随的又是什么“集团”？判决书上为什么非要把我与这后来的两个集团紧紧地捆绑在一起？这里，不妨谈及一桩往事：文革初期，有人在北大历史系贴出一副对联：“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被当时监督北大文革的李讷汇报给毛泽东了。毛泽东说：“什么池浅王八多，明明是池深王八多嘛！”这句话李讷向我传达了，在校内也公布了，按照当时的规格，应该敲锣打鼓，披红挂绿地宣布“最高指示”才对，但我冒天下之大不韪，把这句话给处理了。判决书上还有一个历史公案，上面写道：“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五日，江青派人把被告聂元梓秘密接到花园村‘中央文革’记者站，江青、陈伯达、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等

人密谋，派聂元梓去上海‘造反’。”审讯我时，我要求江青出庭作证或请法庭出示与江青勾结的证据，可他们拒绝江青出庭作证，既无旁证，又无佐证，可以说没有一个能证明是江青指使我到上海造反的相关资料。现在，我自己从香港出版的《王力反思录》上，找到了一条最有力的证据，证明派我去上海的，根本不是江青，而是我们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当时作为中央文革办公室主任的王力在回忆中详述了这一事件：“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的想法，是想把北京的群众组织、学生、工人、机关干部的造反派连在一起，通过聂元梓等人到上海串联，把北京和上海连成一片。主席的设想，组织个班子去上海，最早他想李讷（肖力）要去，聂元梓去，阮铭也去，搞个比较大的班子。聂元梓住在中央文革，叫她负责筹备这个班子。李讷找过我，我介绍她见过聂元梓。江青说李讷去不去，毛主席正在考虑，因为她正在搞农村文革的指示。后来江青又传达毛主席指示，李讷不去，阮铭也不去，班子不要这么大，聂元梓也不要代表北京市的红卫兵组织，只代表她自己和北大的群众组织，用北大群众组织的名义去上海……我跟聂元梓说时再三叮嘱这几条，说是毛主席、中央文革的决定。”

还有一件与我们总设计师有关的话题。邓小平曾说过，什么时候看到我儿子，就想到了聂元梓。所以，这也决定了聂元梓一案不让上诉，不让证人出庭这些违背法律的政治判决。邓朴方的跳楼致残，与我有关吗？且看邓小平的女儿毛毛著《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的讲述：“8月末的一天，是令我们铭心刻骨的一天。邓楠回来告诉我们，哥哥因不堪虐待，趁看押的造反派不注意时跳楼以示最后的抗议”。1968年8月19日工、军宣队进入北大，从此北大的一切权力，特别是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权力，统统归宣传队行使。此时的我，与邓朴方的跳楼有什么关系？更可笑的事，判决书认定：“1968年4月7日，在被告人聂元梓指使下，在校内制造了‘反革命小集团’冤案，致使多人受伤，其中邓朴方下身瘫痪，终身残废。”于是，硬把这件事情的发生时间提前了将近五个月。什么叫“人治”，什么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于此可略窥一斑。现在的邓朴方先生，已经厕身政协副主席这样国家领导人的地位了，他心里应该最清楚，到底是谁逼迫他跳了楼？这里面除了那个疯狂的时代和不正常的体制之外，还应该包括他的父亲、即身为党的总书记参与制定中共中央发动文化大革命“五·一六”通知的邓小平本人。造反、夺权，是有；抵制造反、制止武斗，也有。没想到文革结束后，原指望能洗清加在我身上的诬陷不实之词，反倒变调升级了。几十年过去了，作为一个曾经的劳改假释犯，北京大学却不能依照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对我进行安置。现在我还是一个社会流散人员，户口暂存在北京月坛派出所，吃着民政局的救济饭，借住在民政局的救济房。在纪念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的日子里，连当年国民党的官兵战员，都发给了纪念章，可我这1937年7月在炮火中参加革命（笔者注：聂元梓1937年在国民师范学校参加了阎锡山为会长的“牺盟会”，1938年在山西晋城学校中加入地下党，1939年赴的延安，聂元梓是擅于为自己涂脂抹粉的）、出生入死的老干部，却偏偏被遗忘了。真可用“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来形容了。想想我这一生，“步步紧跟”，却跟出个如此凄凉结局。此情此景，夫复何言？十年文革等同于十年动乱，十年梦魇。可是发动者还是万众景仰的“英明领袖”；党还是“伟大光荣正确的”的党；领导写作“五·一六”通知，举手赞同发动文革永不翻案的领导人反倒成了受害者、甚至还要用文革方式加害别人；有的造反派头头如季羨林，竟还成了声名显赫的“国学大师”、“道德楷

模”。一个国家与一个党的罪错，就这样利用政治“替罪羊”的审判方式，轻而易举地算在几个人和红卫兵群众的身上了。难道这就是官方刻意营造的一种历史记忆？这样的历史距离客观公正又有多远？现在不是天天说要尊重历史、还原历史吗？我认为，历史本身、尤其是亿万民众所亲历过的文革史，不应该是一个任人宰割的羔羊，更不能如黑格尔所说的那样，“倒洗澡水把小孩也倒掉了”。我在文革的漩涡中经历了太多太多，还是让事实来说话吧！

2、谭厚兰(1937-1982)湖南人，女。出生在湖南省望城县的一个贫农家庭。1958年，她从湘潭一中高中毕业后留校工作，同年入党。1961年作为调干生保送到北京大学政教系学习，1965年进入北京师范大学政教系。

谭厚兰和同是学生的蒯大富、韩爱晶、王大宾比起来，她年长9岁，是学生干部。和同是女性的聂元梓比起来，她年轻16岁，还是学生。因此，谭厚兰属于承上启下的一代。

1966年谭厚兰最先响应聂元梓的大字报，在北师大贴出矛头指向校党委领导人的大字报，随后又反对进驻学校的工作组，因而受到批斗，酿成“六二〇事件”。工作组被毛泽东下令赶走后，谭就成了北师大的英雄和公认的学生领袖。8月底，她组建了北京师范大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井冈山战斗团”并自任总负责人。由此名声大噪。

1966年的一天，康生召见谭厚兰，让她去山东曲阜孔庙造反。康生说：“我想了三天三夜，画了一张那里的印象图。”康生把图交给谭厚兰，接着说：“到那里，该砸什么就砸什么。”

曲阜孔庙始建于公元前478年，孔子在山东曲阜安息了两千四百多年，碰到史无前例的毛泽东时代，竟也成了清算对象。

1966年10月间，在中央文革成员戚本禹、《红旗》杂志编委林杰授意下，谭厚兰以中央文革小组名义，带领“井冈山”的200余人，在山东曲阜造孔家店的反。因为孔子是万世师表，刨孔子坟的历史使命理应由未来的教师们承担。

谭厚兰等暴徒一到曲阜立即联合当地曲阜师范学院造反派组成“彻底捣毁孔家店革命造反联络站”召开了捣毁孔庙的万人大会。

从1966年11月9日至12月7日，在曲阜折腾了29天。他们砸毁国务院1961年立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石碑，发了给国务院的抗议信。捣毁孔庙，拆毁孔府，砍伐孔林，破坏书国故址……共计有一千多块石碑被砸断或推倒，砸毁文物六千多件，烧毁十万多册书籍，九百多轴名人字画。五千多株古松柏被砍伐殆尽，二千多座古墓被恣意盗掘，其中包括被列为国家一级保护的国宝级文物七十余件，珍版书籍一千七百余册。刨平孔坟（经陈伯达批准），挖开第七十六代衍圣公孔令贻的坟，对其曝尸批判。年近古稀的专治经学的复旦大学周予同教授被专程押解到场，逼着他亲自动手挖孔子的坟墓。押着当地各级领导干部和高赞非等参加过1962年“孔子讨论会”的学者抬着孔子塑像游街，称之为“为孔老二送葬”。

谭厚兰操持的这场浩劫是破四旧运动损失最为惨重的。

1967年，在江青授意下，谭厚兰率领一千余人冲击农业展览馆的大寨展览会，高呼炮打谭震林的口号，紧密配合毛泽东反“二月逆流”的需要。谭厚兰由此成为“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核心组副组长、北京市革委会常委、北京师范大学革委会主任。北师大“井冈山公社”在全国主要城市都设立了

联络站，影响力日益广泛。谭厚兰与王大宾结成“地派”，插手北京市各高校，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武斗。

进入1968年，各大造反派争权夺利愈演愈烈，武斗屡禁不止。毛泽东担心他“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料想难以实现，遂预谋约束或驱散红卫兵。

1968年7月28日凌晨，谭厚兰等五大“学生领袖”最后一次见到毛泽东。次日，以现役军人为主掺杂着少许工农，号称“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北师大，谭厚兰等被抛在一边。

1968年10月，她作为大学生，被分派到北京军区4627部队农场劳动。

1970年10月，谭厚兰被调回北师大隔离审查，从即时起失去了人身自由，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清算。

1975年，审查结束，她被送到北京维尼纶厂监督劳动。

1978年4月，北京市公安局以反革命罪逮捕了谭厚兰，在监狱中，她痛心疾首，用自己的交代证实了自己的罪虐。

1981年，谭厚兰检查出患有宫颈癌，她被保外就医。9月，又允许她回老家湘潭继续治病。

1982年11月，谭厚兰静静地在痛悔中走完了人生的最后路程。终年45岁，一生未婚，无子女。

3、韩爱晶（1945年9月—），江苏涟水县人，北京航空学院学生。文化大革命初期，刘少奇责成北京市委派工作组进驻各高校控制局面。毛泽东在杭州暗中窥测寻机打倒刘少奇之际，韩爱晶去国防科委“请愿”，要求撤销工作组。在静坐的28个昼夜中，韩爱晶空前活跃引人注目，一跃成为名噪一时的北航红旗战斗队的总勤务员，后又成为北京航空学院革命委员会主任，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核心小组副组长，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成了显赫一时的风云人物。

1967年7月26日，他与北京建工学院“新八一”联合成立了“揪刘火线总指挥部”，以召开批判会和逼刘少奇交出第二份认罪书为名，调集了几十个单位数千名群众围堵中南海各门。逼得周恩来亲自出面软硬兼施才解了中南海之围。

韩爱晶为了扩大影响，先后派出数百人，以“调查组”、“联络站”等名义，在全国35处插手当地运动。他还成立了专门对付部队的“全国动态组”。

1967年7月9日，在北航的一间教室里，小型“审斗会”审斗的是功勋卓著的年近七旬的老师彭德怀，韩爱晶为主持人，他写了自己历史上最肮脏的一笔。

彭德怀被反剪着双手、强按着光头站在台前，韩爱晶从桌子上跳过去，指着彭德怀的鼻子吼：“你反不反对毛主席！？”

“我不反对毛主席，我只是对毛主席无话不谈。”

韩爱晶一拳出去，打得彭德怀倒退几步，跌坐在地上。呼啦围上去一堆人，拽的、打的、踢的，拳脚交加。彭德怀认得其中一个姓陈的红卫兵，说：“小同志，你不要发火，你不懂事……”话未说完，有人连发几猛拳冲着彭德怀胸部打去，彭德怀头撞在课桌上，跌倒时又撞在水泥地面上，发出重重的响声。

彭德怀忍痛喊：“你们怎么这样对待一个快70岁的人！”

会场大乱。有了带头人，原来文明一些的也要表现“革命性”了，胆子小的也“勇敢”起来了。彭德怀被拽起来，打倒；再拽起，再打倒，连续7

次！一个穿皮靴的大个子飞起一脚，向躺在地上的彭德怀右胸踢去，彭德怀深哼了一声，昏迷过去。

第二天，彭德怀伤重不能起床，被送到 267 医院检查。病志记载：“胸部正位像 X 线所见：(1)右第五肋骨中段骨折；(2)右第十肋骨末端可疑不全骨折；(3)右膈角内小量积液(血)；(4)右肺下部分不张。”

在林彪、江青一伙的授意下，韩爱晶率人诬陷和企图打倒徐向前，绑架、迫害了张平化、叶飞、徐海东等人……，同时，他们在北航院内设立了名为“隔离室”的监狱 18 处，先后立案审查了 465 人，其中 170 人受到非法关押，造成 20 余人非正常死亡。社会反应强烈，但敢怒不敢言。

1968 年 7 月，毛泽东为平息众怒，派出由 8341 部队为主组成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强制执行“各派大联合”“复课闹革命”。从此，韩爱晶等逐渐走下了历史舞台。同年底，他被羁押，交代问题。1969 年 11 月被分派到湖南株洲三三一厂监督劳动。1971 年 3 月 8 日至 1975 年 9 月 9 日受隔离审查，继续监督劳动。1978 年 4 月 19 日由北京市公安局宣布以“反革命”罪逮捕。1983 年 3 月 16 日，韩爱晶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先在北京关押，后被送到青海唐格木农场劳动改造。

1987 年，出狱之后的韩爱晶被安排到湖南株洲工厂，该厂的各级领导大部分是北航毕业生，对韩爱晶很照顾，将他分配到厂里技术情报室工作。后调至深圳。2003 年内退后在一公司担任顾问。

4、蒯大富：1945 年出生于江苏省滨海县，祖父是新四军的战士，父母都是 1940 年代的中共党员。

1963 年考入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文化大革命时期成了闻名遐迩的红卫兵头子，是北京五大学生首领之一，人称“蒯司令”。

蒯大富有几件事当时轰动全国，一时成了红卫兵崇拜的“英雄”。

一、他率领清华大学学生造了中央工作组的反，把以王光美为首的工作组赶出了学校。

二、他敢于揪斗薄一波和清华大学的一大帮走资派。

三、他第一个揪斗国家主席刘少奇，任揪斗刘少奇指挥部总指挥。

四、毛泽东多次接见过他，称他为“蒯司令”。周恩来接见他七次以上。他与江青、戚本禹、王力等中央文革成员时常会面。其照片经常与当时的中央首长一起出现在《人民日报》上，令红卫兵们惊羡不已。

五、“四人帮”垮台后，蒯大富被抓起来，判了十八年徒刑，曾长期关押在秦城监狱。

六、他出狱后自办公司，发了财，娶了个年轻漂亮的老婆。

1966 年 6 月 1 日，《人民日报》刊登陈伯达秉承毛泽东之命写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中央广播电台全文播出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全国上下兴起了造反运动。文革初，学生受中央“5.16 通知”鼓舞，有些造反行为，但并不太过分。工作组一进校，立即把很多人打成反革命，在清华大学首要的一个人就是蒯大富。他想不通，自己也是革命干部家庭出身，从幼儿园起受的教育就是热爱党热爱毛主席，热爱新中国。“我实在没有反革命动机呀，我也不相信自己是反革命”。蒯大富被打成“反革命”后曾绝食抗议，被开除团籍并关押了 18 天。蒯大富颇有冤屈的说没路可走了，反正已是“反革命”，干脆同工作组干个鱼死网破。

8月4日，陈伯达等人到清华大学参加批判以王光美为首的工作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为蒯大富平反。蒯大富获得“解放”。康生指示从清华大学接蒯大富参加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文革积极分子”大会。随即蒯大富参与创建清华井冈山兵团并成为第一把手。当上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又称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简称三司）副司令。在毛泽东首肯下，昨日之“反革命”今天成了响当当的“革命左派”。

1966年12月18日，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在中南海西门单独接见蒯大富，听取了汇报，并透露了毛泽东意欲打倒刘少奇和邓小平的信息。蒯大富返回清华后，召开了井冈山总部的会议，传达了这一精神。12月25日，蒯大富率五千余人从清华大学赴天安门广场游行，一路上喊着“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的口号，到达天安门广场后，召开了“彻底打倒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然后分五路以广播车开道在王府井、西单、北京站、菜市口等繁华地带演讲、散发传单、张贴大字报。围观之群众瞠目结舌，沿途之警察不闻不问，只管维持交通，被称为“一二·二五大行动”。多年之后（大概是2006年）有人问：作为一个学生，竟敢揪斗国家主席刘少奇，难道这也是自发行为？蒯大富坦承：不是自发行为，是毛主席暗示去干的，是江青叫我成立揪刘一线指挥部的。

1967年1月6日傍晚，蒯大富给王光美拨电话，谎称王光美的女儿刘平平被汽车撞伤，正在人民医院抢救，需要家长签字。于是刘少奇、王光美驱车来到医院，没有发现女儿，却看到了作为人质扣留的儿子和另一个女儿。后来王光美被扣留并被红卫兵带到清华大学准备批斗，第二天在周恩来的干预下，才得以返回家中。对于此事，蒯大富曾得意地宣称：“为革命造谣是光荣的！”也就是从那时起，蒯大富把“打倒刘少奇”的口号率先推向了全国。

1967年受中央文革指派参与上海“一月夺权风暴”。3月率先批判“二月逆流”。

1967年4月10日，清华大学红卫兵召开万人大会批斗王光美，彭真、陆定一、薄一波、蒋南翔参加陪斗。

1967年4月20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蒯大富当上了北京市革委会常委，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核心组副组长。

1967年6月上旬，北京造反派组成“揪斗刘少奇火线指挥部”，围困中南海，采用喊口号，贴标语，高音喇叭广播，甚至绝食的方法，勒令刘少奇写检查，低头认罪，接受批斗。蒯大富和他的井冈山兵团在火线指挥部充当主要角色。并随时向中央文革和毛泽东汇报情况。

1967年7月25日，林彪接见红卫兵，蒯大富还登上了天安门。27日，武汉“七二〇”事件后在王力授意下蒯大富指挥手下贴出了“打倒徐向前”的大标语。28日，清华井冈山兵团的小报登出了打倒徐向前的声明。29日晚，蒯大富手下一批人抄了徐向前的家。30日，蒯大富在清华井冈山兵团总部召开讨论会。会上，蒯大富把二、四方面军的干部打成“带枪的刘邓路线”，并进一步煽动“打倒徐向前”。主持召开各地红卫兵参加的“目前形势分析会”，提出“揪军内一小撮”口号。

1967年10月17日，蒯大富在《井冈山》报上发表《无产阶级大夺权万岁》，大谈“夺权经”。

1968年5月，蒯大富组织了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文攻武卫总指挥部，指挥清华大学两派武斗。30日凌晨攻击反对蒯大富的群众组织，导致18人死亡，1100多人受伤，30多人终生残疾，直接经济损失折合人民币逾1000万元。清华的武斗引起了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校的大规模武斗。7月27日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进驻清华大学，遭到了蒯大富手下的抵抗，开枪造成5名工宣队员死亡，七百多人受伤。

1968年7月28日凌晨，毛泽东召见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和王大宾“五大领袖”。蒯大富等五大领袖听从毛泽东的指示，返回学校，动员手下放下武器，停止战斗。

1968年12月蒯大富被分配到宁夏青铜峡铝厂（冶金部三〇四厂）任技术员。

1971年11月，以清查“五一六”名义被送到清华大学接受审查。

1978年4月19日，蒯大富在清华大学全校师生大会上，被北京市公安局宣布逮捕。1983年3月10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杀人罪和诬告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先被关押在北京秦城监狱，后转移至青海省塘格木监狱。

1987年10月31日，蒯大富被释放，回到青铜峡铝厂工作。

1988年8月，蒯大富与北京大学78级学生罗晓波在南京登记结婚，后育有一女。

1993年春，蒯大富曾受北京一家街道企业之聘到首都任职，但很快惊动了刘少奇遗孀王光美等中共高层领导，被迫离开北京到江苏常州，后又到深圳受聘于民办及中外合资的一家公司任职。退休后安度晚年，一般拒谈文革往事。

5、王大宾：王大宾出生在四川省凉山地区的一个贫苦的汉彝族通婚的农民家庭，1961年考入北京地质学院探工专业，在校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66年大学毕业前夕，王大宾狂热地投入了那场席卷全国的“造反运动”，并拉起一支庞大的队伍。他在60天内4进地质部，强行翻阅和抢走了一些机密档案，敢于揪斗部领导，并因经常在首都高校乃至全社会抛头露面，很快被中央文革小组相中，成为当时的“五大学生领袖”之一的“地派头目”。

王大宾们造反，也是被逼出来的。文革初期，毛泽东在北京炮制了5.16通知，大力宣扬“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倡导“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点火煽风不久，便借口养病到湖南滴水洞和杭州西湖疗养去了，让刘少奇和邓小平坐镇北京，主持中央工作。对于学生响应毛泽东号召，试着造反的行为，刘邓用的是文革前整人的老一套，无中生有无限上纲打“黑帮”，大鸣大放引蛇出洞抓“右派”。照这么搞下去，无非一场规模更大的反右运动，反对工作组的王大宾在劫难逃。结果刘邓也没有料到这次伟大领袖的主意变了，他要运动群众清洗党内异己。于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驾轻就熟的整人套路就变成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列入名单的右派突然就变成了左派。王大宾们拨云见日一飞冲天，云里雾里进入国家政治舞台的中心，追随伟大导师的革命斗志可以想见。不幸的是，这场史无前例的风暴会把船打到什么地方，连伟大舵手都弄不清楚，无法无天由着性子整烂再说。划船的小伙子们只有卖力的分，天知道他什么“战略部署”。看到船要打翻了找平衡，就把划船的抓来治罪，你说冤不冤？达到目的就兔死狗烹，把所有的灾祸都扣在他们头上，你说惨不惨？

1966年12月，王大宾奉中央文革之命到成都抓彭德怀，他看了周恩来写的手令把“反党分子彭德怀”送回北京，才奉命行事。到了成都在永兴巷彭德怀的住处听了彭德怀几番真情道白，发现完全不是原来听说的那回事，对彭总深感敬佩和同情，竟然拒绝执行命令。公开向中央文革呈文说：彭德怀无反毛主席之心，不宜批斗。后来王大宾被抓捕关押，头号罪状就是“为彭德怀翻案”。文革后判他的刑，头号罪状又变成“诬陷迫害无产阶级革命家彭德怀同志”。欲加之罪，有荒诞甚于此乎？

1968年毛泽东关于红卫兵小将要接受工农兵再教育的指示发表后，这位已任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政委兼司令、首都红卫兵三司副司令、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核心组副组长、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兼政法组副组长的王大宾，被分配到成都探矿机械厂工作。

1971年，王大宾被押回北京地质学院隔离审查，并被开除了党籍。

1978年，他又以反革命罪被捕，一直关押在武汉第一看守所。

1983年，王大宾获释出狱返回成都。

1985年秋，在有关部门的关照下，王大宾又回到了成都探矿机械厂搞钎具，每月工资69元。

1989年10月，在中国地质大学教授张国樑的鼎力推荐下，雄心勃勃地要把经济搞上去的都江堰市一班领导人，借调了王大宾帮助筹建钎具厂。该厂在王大宾等人主持下一直与中国钎钢钎具协会、中国地质大学、中南工业大学等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保持密切的联系，一直走在科研创新的前列。

晚年著有《王大宾回忆录》。比较翔实地记录了文革时期的经历。

文革初期的红色恐怖

1966年6月1日晚，北京电台广播了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等七人写的大字报。被毛泽东称之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从第二日起，北京的大学和中学停止了日常课程，用全部时间来“揭发”和“斗争”学校的领导干部及教师。先是用大罪名如“黑帮分子”“三反分子”等对他们作“口诛笔伐”，紧接着开始使用脏话咒骂。到6月中下旬，很多学校里出现了殴打校长和教员的情况。

1966年6月18日，北京大学数十名教员和干部遭到游街、戴高帽子、撕破衣服、在脸上抹黑墨、罚跪和扭打等等。两天后，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做出批示要求制止这种“乱斗”。后来他被毛泽东指责为把文革搞得“冷冷清清”。7月26日，江青在北京大学的万人集会上宣布6月18日事件是“革命事件”。自此，暴力殴打“阶级敌人”立即开始流行。

北京大学附中成为北京市最早对学校的领导干部和老师进行野蛮殴打的地方。副校长、化学老师刘美德（女）被剃了“阴阳头”（剪去半边头发），被强迫在操场上爬行。还有红卫兵把脏东西塞进她的嘴里。有一天她被拉上一张方桌跪下，一个红卫兵站在她身后，把一只脚踩在她背上，由一名记者照相以后，那个红卫兵把她从桌子上踢了下来。当时刘美德怀孕已经很明显。她的孩子生下不久就死了。红卫兵还用塑料包裹的铁条打她和其他老师。她说，那种铁条打在身上，伤痕不明显，但是“疼得钻心”。

8月1日，毛泽东写信向清华附中“红卫兵”和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表示“热烈的支持”。二者都是在6月2日出现的学生小组，都积极“批斗”原学校干部、教员，并集中攻击文革前的教育体制，大力鼓吹血统论。1966

年8月是红卫兵运动的高潮之月，在全国各学校都建立了红卫兵组织。他们被称为“革命小将”，在文革初期是暴力迫害的主要力量之一。

卞仲耘校长——北京第一个被红卫兵打死的人

在北京，第一个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是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今实验中学）的副校长卞仲耘。时间是1966年8月5日午后。同时被毒打的还有该校副校长胡志涛，刘致平，教导主任梅树民，汪玉冰，一共五人。深受毛泽东思想蛊惑的女中学生，完全丧失了人性。在长达三、四个小时的殴打和折磨中，包括用带钉子的木棒打和用开水烫等残酷手段。致使卞仲耘当场死亡，她的身上遍布青紫，还有几十处血窟窿。另外四人也受到了骨折等重伤。

第二个被打死的，是北京101中学的美术教员陈葆昆。时间是8月17日。一起被打的还有该校十多名教员及领导干部。他们被强迫在煤渣铺的校园小路上用四肢爬行，双手和膝盖鲜血淋漓。一名目击者说，爬行过程中，有一红卫兵用穿着军用皮鞋的脚踩碾一名女教师的手指。陈葆昆被迫害致死。

8月初，中共中央发出[66]395号文件，撤销了刘少奇关于制止“乱斗”的310文件。395号文件只有一句话：“中央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日批发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是错误的，现在中央决定撤销这个文件。”这等于是给红卫兵颁发了暴力许可证。

打死卞仲耘事件发生后的第十三天，即8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百万红卫兵的盛大集会。普通红卫兵在广场上顶着烈日挥动着小红书高呼万岁走过天安门。毛泽东穿着绿军服在天安门城楼上以最高统帅的姿态接见红卫兵，能登上天安门城楼的红卫兵头头全是中共高级干部子弟。大会向全国实况转播。在城楼上，北京大学附中红卫兵彭小蒙（毛泽东8月1日的信中提到她的名字）代表红卫兵讲话。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红卫兵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毛泽东问了她的名字后，发表评论说“要武嘛”。表示了对武斗的支持。会后，《光明日报》《人民日报》发表了《我给毛主席戴上了红袖章》一文，文中注明宋彬彬已经改名为“宋要武”。还把学校的名字改成了“红色要武中学”。

北京大学附中是北京最早发生大暴力行为的学校，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是北京第一个打死人的学校。彭小蒙和宋彬彬在8月18日大会上的瞩目位置，其中包含的旨意十分清楚。8月18日大会前，在北京被红卫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有二人。8月18日会后，被打死的人的数字急剧增长，红卫兵暴力在规模上和程度上全面升级，以致到了8月底，一千余名北京的无辜居民被红卫兵打死了。罪魁祸首就是毛泽东。

8月19日，北京第四、第六、第八中学的红卫兵在中山公园音乐堂“斗争”北京教育局和这三所中学的领导干部。二十多人跪在舞台上。第八中学的副校长温寒江，脖子上套着一根绳子，从两公里外的学校一路跑到中山公园去，绳子的另一端牵在一个骑自行车的红卫兵手里。他被打得浑身是血，昏厥过去。教育局长孙国梁被打断三根肋骨。其他人被打得头大如斗，面目全非。从那时候起，剧场和体育馆这些文化场所变成了召开暴力“斗争会”的野蛮血腥之地。

8月19日晚，北京外国语学院附中（在和平门）红卫兵打死了教员张辅仁和张福臻。为了试验他们是否已经死亡，红卫兵先用冷水浇，又用开水烫，看到尸体全无反应才罢手。该校当时有二百名教职员。该校红卫兵负责人在大会上声称这是“杀二儆二百”

北京第三女子中学（后改名为 159 中学）的红卫兵从 8 月 19 日开始连续殴打和折磨校长沙坪。在学校西小院里，红卫兵用皮鞭和捆着带钉子的木棍等，拷打沙坪到深夜。20 日上午，奄奄一息的沙坪被拖到学校中院，在有全校师生参加的“斗争会”上，在一千六百多人面前，被殴打至死。“劳改队”中的十多名教师和干部也跪在沙坪旁边一起被“斗争”。红卫兵不断揪沙坪的头发令她抬起头来，她的头发被薅下来。散会后，中院地上有一堆头发；旁边还有一摊血迹，是校长熊易华的。她跪在沙坪旁边，头上压了三或四块砖头，额头被打破。数学教师张梅岩（女）被抄家后服毒身亡。体育教员何世瑾（女）自杀。一位目击者说，她后来还看到打死沙坪的红卫兵（女生）在西城区委大院里挥舞铜头军用皮带打人。

北京宣武区梁家园小学校长王庆萍，在 8 月 19 日遭到“斗争”和毒打后被关在学校。她在 20 日早晨坠楼身亡。被宣布是“自杀”。她有三个孩子，分别为 8 岁、9 岁、11 岁。她的大儿子说：妈妈一定是被推下楼去或者是被打死了扔下去的。如果她自杀，她至少会给我们孩子写信留话。

8 月 22 日，北京第八中学负责人华锦（女）被打死。副校长化学老师韩九芳（女）背上被打出两个大洞，引起败血症。她的家人设法救活了她，但是留下严重后遗症，终身致残。历史老师申先哲被打后自杀。初一的班主任赵尊荣是 22 岁的姑娘，也被剃了“阴阳头”

8 月 24 日，北京第十一中学的红卫兵到该校化学教师唐婉森（女）家搜翻，用木棍把她打死。8 月 26 日上午，红卫兵先把一批老教师剪了“阴阳头”，接着在操场上架起火来焚烧学校图书馆的大堆藏书。他们强迫一批教职员围绕火堆跪下，举起胳膊伸向火堆，广播喇叭里大叫“不许后退”，以致他们的手臂都被烤出大水泡。女校长林瑾被红卫兵推到火堆上，整个手臂被烧伤，40 年后伤痕犹在。该校图书馆员沈世敏（女）被剪了头发并在火堆边被烧伤，到医院被拒绝治疗，当晚在家中上吊自杀。数学教师杜兆南被指为“逃亡地主”遣返回乡，卧轨自杀。语文老师王景清跳楼。数学老师李泮清和妻子一起在家中上吊。校医霍岐服安眠药身亡。工友林士慧和陈玉和服毒。这个学校有八人被害。

8 月 25 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二中学红卫兵在校中打死了三个人：语文教员靳正宇；党支部书记姜培良；学生曹滨海的母亲樊希曼。校长高云被命令站在毒日头下，额头上被扎了一排图钉，还被用沸水浇。

9 月 8 日，在北京第二十五中学，语文教师陈沅芷（女）在关押中被打死。除了打她，红卫兵还把她推到架起来的两张桌子上面“斗争”，然后把叠起来的桌子推翻，让陈沅芷摔下来。这个学校的红卫兵还打死了一名校工。

1966 年 9 月 8 日，在北京第五十二中学，语文教师郑兆南（女）被关押在学校，饱受殴打和各种折磨后弃世。时年 36 岁。

在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生物教师喻瑞芬（女）在教师办公室里被击倒在地并遭毒打。接着，在光天化日之下，她被倒提两腿拖出楼门，她的头在水泥台阶上磕击碰撞。一桶沸水浇在她的身上。在楼门口的空地上她继续遭到殴打和折磨。两个小时后她死去了。打人者还不满足。他们强迫所有在“牛鬼蛇神队”中的老师围绕喻瑞芬的尸体站成一圈，轮流打她的尸体。

在北京景山学校，传达室的工友李锦坡被打死。

位于北京宣武区的白纸坊中学(文革中改名为 138 中学)负责人张冰洁(女)被打死。她恳求红卫兵学生：“我有错误，请你们批判。请不要打我。”但是红卫兵继续用沾了水的麻绳和铜头皮带打她，把她打死。

在北京外国语学校，工友刘桂兰(女)在学校礼堂被红卫兵学生打死。教导主任姚淑嬉(女)被剃了头发，遭“斗争”和殴打。红卫兵把她和别的老师的头塞进翻转过来的小方凳的四条腿之间，殴打他们。她住在校内，一天晚上来了五拨学生打她。刘桂兰被打死后，红卫兵强迫姚淑嬉和学校“劳改队”中的其他干部及老师抬她的尸体。一位老师说，她和姚淑嬉被强迫各抬刘桂兰的一只脚，当时她真觉得怕极了。姚淑嬉在学校办公楼三楼厕所的下水道拐脖上套了一根绳子上吊自杀。

在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教员杨俊被打死，教员郑之万(女)跳楼自杀。

在北京朝阳区的第四女子中学(现名陈经纶中学)，生物教师齐惠芹(女)被毒打致死。这个中学的校长潘基(女)，被打得几乎死去。在北京第十女子中学(文革中改名为 157 中学)，教员孙迪在校中被打死。校长陶浩(女)，手被打骨折，成残疾。北京第四十九中学语文老师郑育秋(女)，由于“家庭出身不好”被红卫兵打伤，全身肿烂，抬到第四医院(现恢复旧名叫普仁医院)。医院拒诊。她死在走廊石板地上。

北京南苑红星中学地理教师马耀琮，8 月间被红卫兵打死在校园中。

北京还有一大批中学教育工作者在遭到残酷殴打和侮辱后自杀。

高万春是北京第二十六中学的校长。1966 年 8 月 25 日，该校红卫兵在校中“斗争”了 46 名教师。高万春被五花大绑，跪在铺有碎石的凳子上。他几次被打翻在地又被拉上凳子再打。高万春在这样的“斗争”之后“自杀”，时年 42 岁。

这个学校同时期还有一名老教师跳楼，幸而未死，摔断了腿。

1966 年 6 月 7 日执掌该校的“工作组”组长李淑铮(女)在“工作组”被下令撤出后也遭到残酷“斗争”，她喝剧毒杀虫剂自杀，幸而及时被送进医院没有死。

李培英(女)，北京社会路中学副校长，被打后关在学校中。她浑身被打得血肉模糊，8 月 27 日在关押她的房间的暖气管子上吊死亡。

彭鸿宣，北京工业学院附属中学校长，被打被关，自杀。

萧静(女)，北京月坛中学校长，她在被毒打后跳烟囱自杀。

北京第二女子中学的体育教员曹天翔和语文教员董尧成(女)，被殴打侮辱后，跳楼自杀。

北京第 65 中学的化学教员靳桓跳楼自杀。

汪含英(女)是北京第四中学的地理教师，被剃了“阴阳头”，她的丈夫苏庭伍是数学教员，当时借调在北京第一女子中学，在被“斗争”、抄家和“遣返”即驱逐出家后，他们夫妇一起在北京的香山服杀虫剂“敌敌畏”身亡。

北京第一女子中学的校工马铁山上吊身亡，英语老师傅敏投水未死。

白京武，北京第四十七中学美术老师，在该校“劳改队”中遭到毒打后，投河身亡。

北京第三中学的语文教师石之琮(女)在龙潭湖投水身亡。

北京矿业学院附属中学语文教员朱鸿志遭到毒打后被关在学校教学楼里，夜里在楼外小树林中上吊身亡。

房山县房山中学的校长王哲在饱受折磨后“自杀”。王哲死后，红卫兵强迫该校其他“牛鬼蛇神”跪在王哲的尸体前面，一起被“斗争”。

北京通县第一中学负责人程珉遭到残酷“斗争”后被逼“自杀”。

北京航空学院附属中学一位生物老师割破动脉自杀，姓高，名不详。

北京第二中学一级数学教师路彦被驱逐到农村后死亡，地理教师袁之俊和电工师傅许殿举自杀身亡。当年的学生记得许师傅从学校教室楼上头朝地扎下后尸体横陈在水泥地上的景象，记得他穿的是蓝色的衣服。

在北京第十一女子中学（文革中改名为 165 中学），体育教员哈庆慈（女）遭到红卫兵“斗争”和毒打后，在该校后排楼的四楼跳楼身亡。和她一起遭到残酷折磨的有女校长张燕筹和女教师邓婉璐等人。该校还有一名男性工友在同一时期遭到折磨后跳楼。

清华园中学的校长项凯被关押在校中，被打得死去活来。该校教军体知识的老师李凯从学校的教学楼上跳下来身亡。

北京第十九中学，高中语文老师宋继瑞（女），看到别的老师被剃阴阳头，她在宿舍里用绳子把自己勒死，死时三十多岁。初中化学老师阎凤卿（女），父辈几代开照相馆（颐和园照相馆），有很多老照片，被认为是“封资修”的东西，被抄家，她被关在学校教学楼一楼楼梯下的小间里，那里黑不见光，顶是斜的直不起腰，原来用来放扫帚簸箕之类。她在那里把自己勒死。死时只有二十多岁。

退休教师也被打。贺定华（女），66 岁，退休小学教员，住在北京安定门外六铺炕地兴居 40 号中国农业机械化研究院宿舍北楼二楼。1966 年 8 月 27 日被外馆中学的红卫兵打死。她头发被剪掉，浑身青紫，头颈上有一道很长的刀痕。她的丈夫姚剑鸣同时被毒打未死，被驱逐到安徽宿松县梅墩乡，1968 年 7 月上吊身亡。

北京第三十中学校长王生琯，被红卫兵学生殴打以后，又被从楼梯上推下来导致死亡。这个学校的中共支部书记孙树荣的眼睛被打瞎一只。

北京翠微路中学校长黄国英，被打瞎一只眼睛。

北京第三十一中学的党支部书记宋克被毒打和关押后在 8 月 30 日服大量安眠药自杀，侥幸未死。

北京回民中学校长李玲善被长期残酷“批斗”后精神失常，却被说成是“装疯卖傻”。他在七十年代走失，不知身亡何处。

北京航空学院附属中学校长安丰均遭到多次毒打，被打断了三根肋骨。

在北京的大学和小学，也发生了大量暴力行动，总的来说不如中学残酷，但也极其严重。

1966 年 8 月 24 日下午，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派卡车从 12 所中学运送红卫兵到清华大学（据一名附中红卫兵领导人说是清华大学红卫兵要他们做的），在那里他们殴打了清华大学的学校领导和教授们，还抄了一些人的家。清华大学红卫兵也动手一起打人。在无线电系的几个教师干部被打后，血流在地上。有学生围绕地上的血迹画了一个圆圈并在旁边写了“狗血”两个大字。那一天傍晚，红卫兵拉倒了校园中白色大理石建造的“清华园”牌坊（现在的牌坊是文革后仿照原样重建的）。他们挥舞棍棒皮带，命令“劳改队”中的教授和干部搬走沉重的石块。水利系教授黄万里那天被剪了“阴阳头”，还跪在地上被打，又被抓到牌坊那里搬石块。那天夜里，清华大学和清华附中的校级干部全部被关在“科学馆”中，被一个一个地拉进一个小房间拷打。

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何万福被“斗争”后，8月13日身带遗书在龙潭湖投湖身亡

8月28日，中文系老教授刘盼遂和他的妻子梁秋色（家庭妇女）在市区西单附近自己家中被红卫兵打死。中文系教授叶苍岑和妻子在该校位于市中心西单的教工宿舍内遭到红卫兵毒打，他的妻子被打死。北京铁道学院（现北方交通大学）俄语教授张剑飞，家住铁道学院教师宿舍54区二楼，8月27日晚7点钟被铁道学院红卫兵从家中抓走，和另外10名教授一起被毒打到夜里12点，然后被送去海淀公安局关押。他肋骨折断，大量尿血，呼吸困难，在9月5日死亡。在这种恐怖中，该校一名教授和妻子孙启坤（退休会计）逃出学校。8月27日孙启坤逃到城中人民大会堂西侧南文昌胡同六号弟弟孙菊生家中时，在那里被中学红卫兵打死。北京戏剧学校校长江枫（女）在学校遭到“斗争”，被殴打和侮辱，回到家中又遭14岁的养女殴打后“自杀”身亡。

52岁的戏剧学校教员、京剧名丑、一代表演艺术家叶盛章8月30日遭红卫兵毒打，一夜之间无影无踪。9月3日，有人发现叶先生的尸体漂浮在北京东便门护城河水中……

8月24日，北京崇文区西花市大街小学教员鄂少琪（女）被“揭发”有“对党和社会主义不满言论”后跳河身亡。

永定门小学教员冯杰民被红卫兵“批斗”后用剪刀自杀。

北京中古友谊小学的教导主任赵谦光，在被侮辱殴打后从烟囱上跳下身亡。该校校长白智（女），被学生按了一脑袋的图钉。

北京史家胡同小学校长赵香衡（女），遭到“斗争”殴打，和丈夫沙英一起跳楼身亡。

北京芳草地小学校长石子勤，遭到殴打侮辱后，用剪刀戳自己的脑子自戕，幸而没死，终身致残。

北京第一实验小学王启贤老师被强迫跪在地上，吃煤渣。遭毒打，幸未丧命。

玉泉路小学，有四名女教师被学生红卫兵剃了“阴阳头”，横遭侮辱。

8月27日，北京宽街小学的校长郭文玉（女）和教导主任吕贞先（女）在同一天内被打死。郭文玉的丈夫孟昭江也遭毒打，两天后死亡。

北京吉祥胡同小学副校长邱庆玉（女），也被红卫兵无辜打死。

人为制造阶级仇恨，挑动学生打学生

从毛泽东大力宣扬阶级斗争以来，尤其是文革期间，人们都被打上阶级的烙印，黑五类、黑七类、臭老九、发展到文革极致时期的黑二十一类。被赋予基因的特性，代代相传。黑五类被称为狗崽子，被指定为潜在的敌人，被规定为专政对象，成为所有政治运动的靶子。他们是所有基层单位治保工作的重点控制目标，没有自由活动、通信、交往的权利，必须经常向管理者汇报其行动。对他们可以不经批准就采取隔离、搜查等措施。他们是制度化的被统治阶级、人民公敌。无需审判，他们就被剥夺了选举与被选举，甚至被剥夺了参加早请示晚汇报，写、贴大字报，佩戴毛泽东像章等“政治权利”。文革期间，红卫兵狂热鼓吹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贴遍各处：学校大门、教室门、黑板两侧，无处不在。遗传因子成了毛泽东思想的精髓。1966年8月，清华附中红卫兵暴打了高四的四名“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还命令他们各写100副“对联”，贴到各处。这一“对联”还做成了“歌”。和另一首强迫所谓“牛鬼蛇神”唱的“嚎歌”[1]一样，这副对联也是红卫兵组织成

员的资格评定标准。在北京，作为城市人口主体的脑力劳动者和商业工作者都不被视为“红五类”，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中学生被准许参加红卫兵，被授予了欺侮虐待其他同学的特权。1966年8月4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初二（四）班的红卫兵召开“斗争会”斗争同班同学。在这个班的45名同学中，十名“黑五类出身”的学生站在教室前面被“斗争”，一根长绳子绕过这十名学生的脖子，把她们捆成一串。十名“红五类出身”的红卫兵坐在椅子上。其他既不能算“红五类”也不能算“黑五类”出身的学生则在“斗争会”期间被指定坐在地板上。大标语“打倒狗崽子”贴在教室墙上。他们被命令逐个“坦白交代”他们的“反动思想”以及他们的父母的“罪行”，还必须重复说三遍“我是狗崽子。我混蛋。我该死。”红卫兵用拳头打她们，把墨汁泼在她们身上。该校学生排球队长杨友丽，因为球队得过全国冠军后受过校长接见以及她父亲是所谓“托洛茨基分子”，遭到“斗争”和侮辱。她服安眠药自杀，幸而未死，但身心受到严重摧残。

在北京一零一中学，红卫兵把校门分成一大一小两个，命令“黑五类子弟”出入只许走小门，并称小门为“狗洞”。初三女学生吴芳芳，父亲是北京航空学院教授吴礼义，当时被当做“家庭出身不好”。红卫兵指控她撕了一张毛泽东纸像。（实际情况是一张毛泽东纸像被风吹落，她正好路过拣了起来。）吴芳芳遭到“斗争”和毒打，红卫兵还把她和上文写到的被打死的美术教员陈葆坤关在一起。她因此精神失常，不清楚人事，不能独立生活，始终由她的母亲照料。

在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很多所谓“家庭出身坏”的学生被打耳光被侮辱等等。初一学生万红，父亲在1957年被划成“右派分子”。与她同班的男生红卫兵要打她，她逃入女厕所，红卫兵从厕所拉出来。他们强迫她站在教室里的一把椅子上，用铜头皮带打她。打的过程中还有红卫兵把椅子从她脚下突然抽走，使她摔到水泥地上。晚上不准她回宿舍睡觉，把她关在露天阳台上淋雨。

朱同是高三学生，他的父亲是“右派分子”，父母已经离婚，他也改用了母姓，而母亲不是“右派分子”。但是他仍然被当做“狗崽子”折磨。他被关在地上积水的小楼梯间内像动物一样被全校学生“观赏”。有一天晚上下大雨，他逃出了学校，爬着回到家中，因为他被严重打伤已经不能走路。在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有相当数量的“家庭出身坏”的学生被打被欺负，他们的私人物件被捣毁。多名女学生被剃了“阴阳头”。杨爱伦，高一学生，文革前功课和文艺活动都好，但“家庭出身不好”。她在班里遭到“斗争”，站在教室前面被推来攘去，被强迫写“交代”，还被关押在学校中不准自由行动。一星期后，8月8日，她逃出学校到附近卧轨自杀，被火车撞成重伤，幸而未死，但落下了终身残疾。

高二学生郭兰蕙，父亲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1966年8月20日是星期六，在红卫兵宣布下个星期一要“开会帮助”实际上是要“斗争”她后，她服毒身亡。

在西城区太平桥中学，红卫兵打死了一名初三的不属“红五类出身”的女学生。这个十五岁的女孩子仅仅因为说了一句“毛主席也不是红五类出身”，遭到红卫兵同学用铜头皮带和棍棒殴打。从下午打到傍晚，红卫兵回家吃晚饭了。她挣扎着爬到一个水龙头边喝了很多水后死亡。她的母亲被通知来校中领死尸，未敢表现出一点怨恨和抵触。

离王府井大街不远的第 27 中学，一名初中学生被指控把那时必须随身携带的红色塑料封皮的《毛主席语录》本坐在身子底下。红卫兵在初二教室里毒打她。她被打得昏死过去以后，红卫兵说她“装死”，拿碎玻璃往她眼睛里揉。她苏醒过来，继续被打。傍晚时分她被打死。她的尸体被用草席子卷起来运走烧掉了。问到当时的目击者，他们都记得当时的情景，却没有人记得这个女学生的姓名。

中国人民大学附中，“家庭出身不好”的高二学生宁志平被说成“反动学生”。他被关押在学校里，他的一只耳朵被红卫兵割掉。他到医院把耳朵缝了上去。但是几天以后再次遭到红卫兵毒打，刚缝上去的耳朵被打落。他永远失去了他的耳朵。

1966 年 8 月 25 日，曹滨海，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二中学高三的学生，和前来他家抄家的同班的红卫兵发生争执。据说他拿菜刀砍伤了一个红卫兵同学。结果，曹滨海被公安局关起来，曹的母亲樊希曼在那天被红卫兵抓到学校中活活打死。曹滨海因此精神失常，以后从未恢复正常。

北京第十三中学，学生任春林“家庭出身不好”，他喜欢书法，在旧的《红旗》杂志上练习毛笔字，被该校红卫兵学生发现在毛泽东的名字上写了“墓”字。红卫兵抄了他的家，把一条铁链拴在他的脖子上，强迫他从家里像狗一样爬到学校的“红色刑讯室”中。他被关押在那里并且被多次毒打。那个“红色刑讯室”中关押着该校的校长和一批教员，还有一个所谓“黑五类子弟”、初中三年级学生武素鹏。红卫兵把武素鹏捆在一条麻袋里，用民兵训练用的木枪狠打，把他活活打死。

北京第六中学，高三学生王光华出生于“小业主”家庭，他未得到红卫兵的准许就去外地“革命串联”。他在 1966 年 9 月 27 日回到北京，立即就被抓进学校的监狱之中。他在那儿被十多个红卫兵几次毒打。王光华死于第二天，9 月 28 日，时年 19 岁。红卫兵命令几个在这个监狱中被关了一个多月的老师把他的尸体抬出了监狱，放进火葬场的运尸车。

附注：

[1] 嚎歌最早有书面材料记载的是 1966 年 8 月 18 日(《李伯钊文集·日记摘抄》《“改造”日记·〈1966.8.13—10.11〉》)。曲作者是周巍峙(中国音协副主席、《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曲作者)被迫谱写的。嚎歌有多种版本。根据李伯钊的版本(《牛鬼蛇神号丧歌》)，标明节拍 2/4 拍，演唱风格为“哭丧地”。其歌词是：“我是牛鬼蛇神/我是人民的敌人/我有罪，我该死，我该死/人民把我砸烂砸碎/砸烂砸碎。我是牛鬼蛇神/要向人民低头认罪/我有罪，我改造，我改造/不老实交待死路一条，死路一条。”全国各地皆有具地方特色的嚎歌。

毛泽东蛊惑狂徒打砸抢烧，暴殄天物，恣意妄为，害虐烝民。罪该万死。

1966 年 5 月 29 日晚上，圆明园废墟边，几位来自清华附中的学生秘密集会，卜大华、王铭、骆小海、张晓宾、陶正、张承志等人决定像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青年近卫军”小组那样组成一个组织。在小组名称问题上，有人提议叫“向阳”，有人建议叫“卫东”，但大多数人赞同老名字“红卫兵”，即“保卫毛主席的红色卫兵”。

在名称确定下来之后，他们一起宣读了《红卫兵誓词》：“我们是保卫红色政权的卫兵，党中央、毛主席是我们的靠山，解放全人类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一切行动的最高指示。我们宣誓：为保卫党中央，为保卫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我们坚决洒尽最后一滴血。”无知而狂妄的红卫兵，就在这群大的不过19岁、小的只有13岁的孩子们中诞生了。5月29日这一天，后来被看成是红卫兵组织的誕生日。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授意陈伯达炮制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第一次明确提出“要彻底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1966年8月1日至8月12日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进一步肯定了破四旧的提法。1966年8月18日，召开庆祝文化大革命大会，并举行大规模的游行。这一天，毛泽东第一次接见了红卫兵。

从这天起，受毛泽东接见的30万北京红卫兵小将们走向街头，张贴传单和大字报，集会演说，开始了所谓的破四旧运动，他们的目光从店铺转向包括历史文物在内的更加广泛的目标。红色的风暴席卷了北京的千家万户，在20天左右的时间里就有十万多户抄了家。一切外来的和古代的文化，都是扫荡的目标。中学红卫兵（加上少数大学生）杀向街头，以打烂一切四旧物品为宗旨，把北京城内外砸了个遍。新闻舆论对于红卫兵的行动给予了大力支持。8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会《好得很》，社论指出：“红卫兵小将们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正在横扫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灰尘……”在红卫兵抄家共产中，人民日报又发表社论《不准抹杀红卫兵的功勋》，号召红卫兵对“那些吸血鬼、寄生虫”动手，“把他们的金银财宝、杀人武器、变天账拿出来展览……”

北京破“四旧”运动开始后，很快蔓延到上海、天津和全国各大城市乃至广阔农村。在破“四旧”过程中，北京市有11.4万多户抄家。按周恩来的说法，上海“抄了十万户资本家。”全国上下总共约有1000多万人家被抄，散存在各地民间的奇珍异宝、字画、书刊、器皿、饰物、古籍不知多少在火堆中消失。（注：无法无天的时代！那个时代破坏就是革命，革命就是破坏，革命破坏就是无法五天，无法五天就是彻底的革命）。破四旧运动如火如荼展开了，文物古迹，图书字画等文化遗产，均成为“革命”对象的重中之重。北京在1958年第一次文物普查中保存下来的6843处文物古迹，竟有4922处在1966年的八九月间全部毁掉。（注：今天的中国人还在为几个圆明园的兽头不能回家而义愤难平。我们一直在痛恨英法联军、八国联军破坏、掠夺了中国多少文物，殊不知英法联军百年之后中国人自己做得更绝。真是彼一时，此一时也。中国人最讲究尊祖敬宗，慎终追远，但中国人又实在最对不起自己的祖宗。顾炎武在明清鼎革之际慨叹“亡天下”，以这样一种情愫，假如不幸而生于20世纪之中国，不知当作何感想？其事何必假设？只要看一看王国维、陈寅恪、熊十力他们的经历不就明白了吗？作为一个中国人，如果不是从书本上学来，要说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积淀，不但一些外国人纳闷，我也不相信。德国人战后的反省开始于年轻一代对其父辈的追问、质问，中国人呢？早就把历史变成“天方夜谭”了。难道这就是上下五千年，中华民族在苦难中前行的秘诀吗？这里列举的还只是对死人和古董的破坏，谁来列

举那么多活人、活文化遭受的凌辱和摧残呢？现在中国人倒是知道祖宗的好了，但又有多少人关心他们的遗产在经济以外的价值？）

文物古迹遭遇浩劫，千年文明毁于一旦

1、炎帝陵自宋太祖乾德五年建庙之后，已有千余年历史。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朱元璋诏命遍修历代帝王陵寝，“发者掩之，蔽者葺之”，由此炎帝陵庙也得到全面修葺。1940年中将薛岳主政湖南时，对炎陵殿宇再次全面整修。文革破四旧时炎帝陵主殿被焚，其附属建筑遭严重破坏，陵墓被挖，陵墓内存物抢夺一空，最后全部夷为平地。

2、造字者仓颉的墓园在汉朝廷熹五年（162年）已颇具规模，至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仓颉庙内存有历代碑石，早期的有东汉延熹五年《仓颉庙碑》、是金石学上的珍品，五胡十六国时的《广武将军碑》、唐《仓公碑》、宋代《大宋仓公碑》等。近代有于右任先生、陶峙岳将军、朱庆澜将军题写的匾额、对联等留存于庙内殿堂之上。文革袭来，仓颉庙多处石碑被毁，陵墓遭刨挖，改造成了“烈士陵园”。

3、山西舜帝陵冢启于禹时，陵庙始建于唐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元代末年毁于战火。明正德初（公元1506年）重建。但在明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年）的大地震中又遭毁坏。明万历三十一年（公元1603年）再次重建。清嘉庆二十年（公元1815年）的大地震中又夷为瓦砾，仅存正殿。次年，在乡人倡导下，重建舜庙。舜陵坐北朝南，占地70亩，神道缘坡而上，两旁夫妻柏夹道耸立。行百余步，进陵庙大门，便见方形墓冢，陵高3米，周围51米。陵前嵌有万历年间进士邢其任书写的“有虞帝舜陵”石碑，旁立“有虞氏陵”石碣1块。陵冢上松柏交翠，郁郁葱葱。绕陵北行约三十米，即是皇城，又名离乐城。进拱形城门，内以戏楼、卷棚、献殿、正殿、寝宫为中轴线，东西两侧配以廊房及钟、鼓二楼，构造布局严谨，左右对称。正殿建造于台基之上，重檐歇山顶，斗拱五铺作，面阔五间，进深五椽。殿内泥塑的舜帝坐像，头戴冕旒，身着衮服，神态庄严，栩栩如生。文革期间尽毁。

4、三过家门而不入的上古治水英雄大禹，一生行迹中的四件大事：封禅、娶亲、计功、归葬，都发生在会稽山，留下了世代祭禹的圣地——大禹陵。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不久就“上会稽，祭大禹”，对这座出一帝一霸兼有“天子之气”和“王霸之气”的会稽山表示敬意。汉以后这里成为佛道胜地。毛泽东蛊惑红卫兵将大禹庙拆毁，高大的大禹塑像被砸烂，头颅齐颈部截断，放在平板车上游街示众。

5、世界佛教第一至宝，西藏大昭寺主奉的佛祖释迦牟尼在世时亲自开光的三圣像之一八岁等身像被捣毁。

6、曲阜孔庙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孔子逝世的第二年，即周敬王四十二年（鲁哀公十七年，公元前478年）。据《史记》记载，当时孔子的弟子将其“故所居堂”立庙祭祀，庙屋三间，内藏衣、冠、琴、车、书等孔子遗物。岁时奉祀。汉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年），刘邦自淮南还京，经过阙里，以太牢祭祀孔子。开皇帝亲祭孔子之先。西汉以来历代帝王不断给孔子加封谥号，孔庙的规模也越来越大，曲阜孔庙成为全国最大的孔庙。现存的建筑群绝大部分是明、清两代完成的，占地327亩，前后九进院落。庙内有殿堂、坛阁和门坊等460多间。四周围以红墙，四角配以角楼，是仿皇宫样式修建的。整个庙宇气势恢宏，布局严谨，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的三大古建筑群（孔庙、故宫、避暑山庄）之一，与南京夫子庙、北京孔庙和吉林文庙并称为中国四大

文庙。被联合国教科文卫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孔庙的建筑群贯穿在一条南北的中轴线上。中路从金声玉振坊起，由南向北依次要穿越棂星门、太和元气坊、圣时门、过壁水桥。进大中门后，再经奎文阁、十三碑亭、大成门、杏坛、大成殿、寝殿到最后一座殿堂——圣迹殿，这是孔庙的主体。由大成门向东，进圣承门，达诗礼堂、鲁壁、孔宅故井及崇圣祠、后为家庙，这是孔庙的东路。由大成门向西，进启圣门，达金丝堂、启圣殿及启圣寝殿，这是孔庙的西路。大成殿是孔庙的主体建筑，面阔九间，进深五间，高32米，长54米，深34米，重檐九脊，黄瓦飞彩，斗拱交错，雕梁画栋，周环回廊，巍峨壮丽。擎檐有石柱二十八根，高5.98米，直径达0.81米。两山及后檐的十八根柱子浅雕云龙纹，每柱有七十二团龙。前檐十柱深浮雕云龙纹，每柱二龙对翔，盘绕升腾，似脱壁欲出，精美绝伦。殿内高悬“万世师表”等十方巨匾，三副楹联，都是清乾隆帝手书。殿正中供奉着孔子的塑像，七十二弟子及儒家的历代先贤塑像分侍左右。历朝历代皇帝的重大祭孔活动就在大殿里举行。殿下是巨型的须弥座石台基，高2米，占地1836平方米。殿前露台轩敞，旧时祭孔的“八佾舞”也在这里举行。文革开始后的1966年11月9日，北京师范大学红卫兵头领谭厚兰在康生（一说戚本禹、林杰）的授意下，率二百余人来到曲阜“破四旧”，冲破山东省委、曲阜县委和孔庙管理处的阻拦，进入孔庙驻扎，在当地召开“彻底捣毁孔家店大会”，随后进行了大规模有组织的破坏，孔子像、神龛、匾联、供桌等皆被砸烂，部分石碑被推倒折断，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的大碑被砸得粉碎！孔庙中的泥胎塑像尽被捣毁。被摧毁之前登记在册的文物就有6618件，其中画929幅，书籍2700余本，石碑1000余块，墓葬2000余处。造成无可挽回的文物损失。

7、猛砸孔庙的同时，孔子的七十六代孙孔令贻的坟墓被掘开，暴尸于荒郊。

8、楚庙即项王庙。因项羽曾自立为“西楚霸王”，项羽死后，刘邦命人筑墓地把他安葬在河南谷城西面，立庙祭祀，刘邦曾亲往哭祭。唐代中期，后人在安徽和县东北乌江浦（即项王自刎处）为项王立祠，名“西楚霸王庙”。和县乌江畔项羽的霸王庙、虞姬庙和虞姬墓。香火延续两千余年，“横扫”之后，庙、墓皆被砸成一片废墟。文革后去霸王庙的凭吊者，见到的只是半埋半露的石狮子。

9、在横扫一切的风暴中，霍去病的霍陵也遭了殃。香烛、签筒被打烂之外，霍去病的塑像也毁于一旦。西汉名将霍去病英年早逝，死后其霍陵居然香火旺盛，人们都来祈福，一是纪念他英勇善战，抵抗外族侵略的赫赫战功。二是以为这位名叫“去病”的年轻将军，能保佑生者去灾免病。也正因如此，在“文革”期间，红卫兵认为村民在搞封建迷信，捣毁了霍陵。

10、颐和园是清朝帝王的行宫和花园，始建于1750年，1764年建成，面积290公顷。佛香阁是颐和园内体量最大的建筑。位于万寿山前山中央部位，建筑在山腰一个高21米的方形台基上，南对昆明湖，背靠智慧海，以它为中心的各建筑群严整而对称地向两翼展开，形成众星捧月之势，气派宏伟壮观。佛香阁高41米，八面三层四重檐，阁内有八根巨大铁梨木擎天柱，梁柱之间错综穿逗，结构相当复杂，佛香阁上覆绿剪边黄琉璃瓦，为古典建筑精品。也是举世无双的中国园林建筑代表作。

智慧海是万寿山顶最高处一座宗教建筑，是一座完全由砖石砌成的无梁佛殿，由纵横相间的拱券结构组成。建筑外层全部用精美的黄、绿两色琉璃

瓦装饰，上部用少量紫色、蓝色的琉璃瓦盖顶，整座建筑显得色彩鲜艳，富丽堂皇。尤以嵌于殿外壁面的千余尊琉璃佛更富特色。该建筑虽极像木结构，但实际上没有一根木料，全部用石砖发券砌成的，没有枋檩承重，所以又称“无梁殿”。

文革期间，佛香阁、智慧海被砸，大佛被毁。千尊琉璃佛像尽遭砸坏。毛泽东死了以后，文革结束。才拨巨资重新烧制琉璃，唯因年代相差久远，物料色彩和膨胀系数均不同，难以恢复原貌。只能远观，不能近览矣。

11、王守仁（1472—1529 年），汉族，幼名云，字伯安，别号阳明。明代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和军事家，与孔子（儒学创始人）、孟子（儒学集大成者）、朱熹（理学集大成者）并称为孔、孟、朱、王。其学术思想传播于中国、日本、朝鲜半岛以及东南亚。王守仁墓位于浙江省绍兴市书法圣地兰亭镇以南 2 里许的仙暇山庄内。始建于明嘉靖八年（公元 1529 年），清康熙、乾隆年间曾多次修葺。王阳明文庙和王文成公祠两组建筑包括王阳明的塑像，全部在文革被损毁无遗。

12、文革期间，古城太原的新任市委书记三把火，第一把是砸庙宇。他一声令下，全市一百九十处庙宇古迹，除十几处保留外，在一天之内全部毁掉。山西省博物馆馆长闻讯赶到芳林寺，只捡回一包泥塑人头。

13、张仲景是中国汉代著名医学家，史称“医圣”。建安七年（公元 202 年），张仲景任长沙太守，时值疫病流行，张于每月初一、十五两日不办公务，在太守衙门外置桌椅。冠以“坐堂医生”四字，为贫贱者诊脉处方，广施汤药，不收分文。现在流传的《伤寒论》与《金匱要略》都是他的原著。三国时名医华佗看到张仲景的书后非常称赞。文革除四旧时，医圣张仲景的塑像被捣毁，墓亭、石碑被砸烂，“张仲景纪念馆”的展览品也被洗劫一空。“医圣祠”已不复存在。

14、河南南阳诸葛亮的“诸葛草庐”（又名武侯祠）的‘千古人龙’、‘汉昭烈皇帝三顾处’、‘文韬武略’三道石坊及人物塑像、祠存明成化年间塑造的十八尊琉璃罗汉全部捣毁，殿宇饰物砸掉，珍藏的清康熙《龙岗志》、《忠武志》木刻文版焚烧殆尽。1992 年美籍华人赵连仁先生等捐资重建。

15、陕西汉中勉县“古定军山”石碑，也因诸葛亮是个“地主份子”而被砸毁。

16、书圣王羲之的陵墓及占地二十亩的金庭观几乎全部损毁，只剩下右军祠前几株千年古柏陪伴，书圣变成失去了居所的亡魂。

17、文成公主祖籍山东济宁，相传为唐王宗室江夏郡王李道宗之女。贞观十五年（公元 641 年），唐太宗将文成公主下嫁松赞干布，拉萨之布达拉宫即为迎娶文成公主所修。文革期间，安放在觉拉寺内的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二人塑像被捣毁。今已荡然无存。

18、包拯，字希仁，庐州人（今安徽 合肥），生于宋真宗咸平二年（公元 999 年），卒于宋仁宗嘉祐七年（公元 1062 年），距今已有千年的历史。包拯是我国北宋时期颇有名望的官吏，在普通人心目中他是清官的代表，百姓称之为“包青天”。合肥人代代保护、年年祭扫的“包青天”墓，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毁于一旦。现在的陵园是 1985 年重建的。

19、河南汤阴岳庙乃明弘治十四年（公元 1501 年）建筑，六根柱子托起五架房顶，排列紧凑，吻合严密，衔接巧妙，形如群雁比翼。具有传统民族风格。屋顶覆以绿色琉璃瓦，金龙骑脊，飞檐尖耸，钩心斗角，集力学、美

学、建筑学之大成，岳庙松柏如盖，碑碣如林。建庙以来，收集了历代歌颂岳飞的文章庙志、诗词歌赋和名人笔迹，刻石 200 余方，这些碑刻，诗、词、歌、赋、记，文体俱全。真、行、篆、隶、草，书体皆备。是中原大地上一处弥足珍贵的书法、文学和史学研究的宝库。寝殿壁间镶嵌《出师表》、《满江红》等相传是岳飞手书的碑石，笔法潇洒刚劲，如江河奔腾，若利箭出弦，气势磅礴。其镌刻刀工精细，骨力坚毅，行刀自如，构图庄重，世称珍品。

1966 年文革袭来，岳王庙惨遭浩劫，岳飞等人的塑像、铜像，秦桧等“五奸党”的铁跪像，连同历代传下的碑刻“横扫”殆尽。

20、江南最古老经典的千年建筑物杭州西湖灵隐寺，始建于东晋咸和元年（公元 326 年）。为中国名刹。历经晋、隋、唐、宋、元、明、清历代王朝修葺扩建，占地面积约 87000 平方米，被誉为江南禅宗“五山”之一。清顺治年间筹资重建，仅建殿堂时间就前后历十八年之久，其规模之宏伟跃居“东南之冠”。灵隐寺主要由天王殿、大雄宝殿、药师殿、法堂、华严殿为中轴线，两边附以五百罗汉堂、济公殿、华严阁、大悲楼、方丈楼等建筑。文革初期，周恩来曾派遣一连士兵堆壘沙包、架机关枪驻守，防范红卫兵破坏，仍不免有部份寺内石雕遭红卫兵翻墙入寺敲毁。

21、杭州岳王庙位于西湖西北角，始建于南宋嘉定十四年（公元 1221 年），经历了元、明、清、民国多次修葺扩建。内塑有岳飞彩像，其上有岳飞草书：“还我河山”巨匾。大殿右首是岳飞墓，墓碑刻有“宋岳鄂王墓”字样。墓道两侧有明代刻存的文武俑、石马、石虎和石羊；墓道阶下有秦桧、王氏、万俟卨、张俊四佞臣跪像。墓道前方照壁上，有明人所书“精忠报国”四个大字。古柏森森，庄严肃穆。

“文革”十年动乱期间，杭州岳王庙和岳飞墓遭到了严重破坏。墓阙被推倒，墓地被夷为平地，岳飞的坟也刨了个底朝天。岳武穆被焚骨扬灰。放眼望去，到处是被砸破的断碑残碣，景况一片凄凉。“文革”结束后的 1979 年，始渐次修复。

22、阿拉腾甘得利草原上的成吉思汗陵园被砸了个稀烂。

23、御制皇陵碑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为其父母和兄嫂而修建的。位于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境内明皇陵内。碑高 20 余尺，宽约 6 尺，碑首四周浮雕六条大螭，刻工精湛。有碑文二十六行，每行五十六字。文为楷书，额篆“大明皇陵之碑”。中下部篆书《大明皇陵之碑》，下为云朵。碑文系朱元璋亲撰[1]，记述了他自己艰辛的身世，戎马生涯和夺取江山的全过程。文字通俗易懂，感情丰富，脍炙人口。此碑是研究朱元璋的重要历史资料，也是一件具有重大历史价值的珍贵文物。文革破四旧时，巨大的皇陵石碑被拉倒；石人石马被炸得缺胳膊少腿；皇陵被毁。

24、明神宗万历皇帝及后妃遗骸自北京定陵里掘出，万历穿着龙袍的骷髅吊挂于树上曝尸，然后和皇后骨骸一同焚毁。

25、明思宗崇祯皇帝自缢的景山槐树被锯断；现存为后来再植的新株。

26、海南岛的天涯海角，明代名臣海瑞的坟被砸掉，一代清官的遗骨被挖出游街示众。

27、湖北江陵名相张居正的墓被红卫兵砸毁、焚骨。

28、北京城内的明朝末年蓟辽督师袁崇焕墓[2]，被夷成了平地。

29、黎平故里安葬的是明末名臣何腾蛟，他的祠堂中的佛像被扫了个一干二净，而且把黎平人最引以为荣的何腾蛟墓给挖了。

30、吴承恩的故居在江苏淮安清河下镇打铜巷。他的故居不大，三进院落，南为客厅，中为书斋，北为卧室。几百年来，曾有无数量仰他的人来此凭吊此故居和他的墓。可是现在《西游记》成为“封、资、修”（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里的“封”，吴氏故居也就“被毁为一片废墟”。

31、红卫兵掘开《聊斋志异》作者蒲松龄的坟，教书匠蒲松龄真穷，墓里除了手中一管旱烟筒、头下一迭书外，只有四枚私章。他们对蒲氏私章不屑一顾，尸体被捣毁，弃之于野。

32、中国第一部长篇讽刺小说《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卒于1754年。鲁迅曾对其高度评价“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由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胡适在《吴敬梓传》说：“安徽的第一大文豪，不是方苞，不是刘大櫟，也不是姚鼐，是全椒的吴敬梓。”建于1959年的吴敬梓纪念馆在文革中被铲平地。馆内藏品尽毁。现在的展馆是1985年重建的。

33、山东冠县中学红卫兵在老师带领下，砸开千古义丐武训的墓，掘出其遗骨，抬去游街，当众批判后焚烧成灰。

34、张之洞的墓被刨开。张是个清官，墓里没一点珍宝，红卫兵将张氏夫妇尚未腐烂的尸体吊在树上。张氏后人不敢收尸，任尸体吊在树上月余，直到被狗吃掉。

35、北京郊区恩济庄埋有同治、光绪两朝的宫廷大总管李莲英的墓，凿开的墓穴里只有头骨，不见尸骸，衣袍内满是珠宝，后不知所踪。

36、河南安阳县明赵简王朱高燧的墓被挖毁。

37、黑龙江黑河县有座“将军坟”，“因为属于帝王将相，也遭到严重的破坏。”

38、宋代诗人林和靖的墓也在被毁之列。

39、清末章太炎、徐锡麟、秋瑾，乃至“杨乃武与小白菜”冤案中的杨乃武的墓，都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声中作了牺牲。

40、一位年轻的中学老师领着一帮初中生以“让保皇派头子出来示众”为由，刨开康有为墓，将他的遗骨拴上绳子拖着游街示众。革命小将们一边拖着骨头游街一边还鞭挞那骨头，好像相信康氏灵魂附着在骨头上似的。游完街，康氏的头颅被贴上了标签送进“青岛市造反有理展览会”，标签上写道：“中国最大的保皇派康有为的狗头”。

41、浙江奉化县溪口镇蒋介石旧居，蒋氏生母的墓被上海的大学生率领一帮宁波中学生掘开，其遗骸和墓碑都被丢进了树林。

42、南漳县为抗日名将张自忠建造的张公祠、张氏衣冠冢和三个纪念亭均被破坏。

43、淞沪会战“八百壮士”之首——谢晋元的墓被红卫兵挖掘破坏。

44、发动西安事变的杨虎城将军，使国民政府停止剿共政策，有大功于中共，虽被国民党处决，仍是红卫兵眼中的“国民党反动派”，墓及墓碑都砸毁。

45、新疆吐鲁番附近火焰山上的千佛洞的壁画，曾被俄、英、德等贪婪商人盗割，卖到西方。但那运到国外的壁画毕竟被博物馆珍藏，并未毁掉。而中国人自己干的破四旧却重在一个‘破’字：将剩下的壁画中的人物的眼睛挖空，或干脆将壁画用黄泥水涂抹得一塌糊涂，存心让那些壁画成为废物。

46、山西运城博物馆原是关帝庙。因运城是关羽的出生地，历代修葺保

养得特别完好。门前那对高达六米的石狮子可能是全国最大的。如今，那对狮子被砸得肢体断裂，面目全非；母狮身上的五只幼狮都砸成了碎石块。

47、安徽霍邱县文庙，雕梁画栋、飞檐翘角，龙、虎、狮、象、鳌等粉彩浮雕皆为精美的工艺美术品。房饰浮雕在文化大革命中统被砸毁。文革后省、县拨款数万修葺，尚未完全复原。

48、山东莱阳文庙，大成殿雕梁画栋、飞檐斗拱，气势雄伟……文化大革命期间，大成殿被拆除。

49、全国四大孔庙之一的吉林市文庙，破四旧中严重受损，荒废多年，文革后历时五年方修复。

50、唐代高僧褒禅结庐安徽含山县花山，死后弟子改山名为褒禅山。宋王安石游览此山，作《游褒禅山记》后，褒禅山遂名扬四海。因是‘四旧’，褒禅山大小二塔被炸毁。

51、全国最大的道教圣地老子讲经台及周围近百座道馆被毁。

52、宋代大文豪欧阳修的《醉翁亭记》经另一宋代大家苏东坡手书，刻石立碑于安徽滁县琅玕山脚，当初欧阳修作文的醉翁亭，至今已近千年。前去革命的小将不仅将碑砸倒，还认真地将碑上的苏氏字迹凿去了近一半。醉翁亭旁堂内珍藏的历代名家字画更被搜劫一空，从此无人知其下落。

53、贵州省镇远县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青龙洞，始建于700年前，后经历代王朝扩建，日臻完善。这里山势挺拔，峭壁、巨岩、洞穴和为一体。道、儒、佛三种宗教的寺庙群位列山腰，是中国不同宗教同生共长、和谐发展的重要遗迹。它背靠青山，面临绿水，贴壁临空，五步一楼，十步一阁，翘翼飞檐、雕梁画栋。这些古建筑依山因地，分别采用了“吊”、“借”、“附”、“嵌”、“筑”等多种工艺，硬是在一段悬崖上筑出中元洞、紫阳洞、青龙洞、万寿宫等一片阁楼洞天。它气势雄伟、构思大胆、布局精巧。文革期间，所有佛、道、儒三家供奉之像均被砸坏，现仅餘空房。

54、桂林石刻分布于市区近城的普陀山、月牙山、龙隐岩龙隐洞（桂林碑林）、虞山、象鼻山、文庙等30余处名山洞府。其中，“桂海碑林”的龙隐岩和龙隐洞是桂林石刻最集中、最典型的地方。桂林石刻始于东晋，兴于唐。盛于宋明清。现存唐至清代石刻近2000件，其中唐代石刻28件、造像149龕484尊，五代石刻1件、宋代石刻484件、造像26龕101尊、元代石刻30件、明代石刻352件、清代石刻478件，年代无考的石刻117件，是全国摩崖石刻最多的地方，也居全国宋代题刻之最。著名的石刻有：唐《张浚刘崇龟杜鹃花唱和诗》、宋《元佑党籍》、清刻《五代贯休画十六尊者像》等，具有较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文体有题名题记、诗词曲赋、赞颂歌铭、论说评议、序跋书札等。书体篆、隶、行、草俱全。造像均为佛教内容。桂林石刻内容丰富，种类繁多，形制巨大，集中反映了桂林乃至广西地区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发展历程，具有重要的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文革中，桂林西山唐代石刻、叠彩山等处摩崖石刻佛像头部均被砸毁。

55、珠海陈芳梅溪牌坊群，原有三座，现仅存二座，右边一座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红卫兵用耕牛和拖拉机拉倒，已无法考证受赐人，据说红卫兵要拉倒另外两座牌坊时，梅溪村民都坐在牌坊下，红卫兵才罢手。

56、西哈努克来中国，想去白马寺看中国最著名的古雕塑十八罗汉像，结果已经被砸掉了，是周总理急电叫山西下华岩寺把罗汉拆下来去冒充！

57、北京人都知道拆古城墙的事，已经很少有人知道京城第一皇家名刹

了吧。双塔寺是创建于金世宗大定二十六年(公元 1186 年)的一座著名古刹,是金朝的庆寿宫,元代改称大庆寿寺。因寺内西南隅有两座玲珑秀丽,巍峨壮观的砖塔,左右相拥矗立。老百姓称其为“双塔寺”。元至元四年(公元 1267 年)修建元大都南城墙的时候,与双塔庆寿寺占地发生冲突,元世祖忽必烈下旨,城墙南移:“远三十步环而筑之”,于是双塔庆寿寺保留了下来。1955 年 4 月,拓宽西长安街道路,当时梁思成先生曾建议,可否把仅存的双塔建成一个街心环岛,成为丰富道路景观,人们休憩的一个场所。惜此建议未被采纳,两座矗立了 800 多年的古塔被彻底拆除,什么都没留下来!可悲的是在此之后,北京的城墙、城门、牌楼等古建筑也陆续被拆除;可笑的是多少年之后,在永定门拆除的原址上,修建起世界数一数二的大厦品!

58、1900 年八国联军洗劫颐和园时,曾枪击万寿山顶的那千尊琉璃浮雕佛像。北京的红卫兵小将前去“破四旧”,似乎是为了替八国联军完成未竟的任务。凡是在战火中幸存未毁而他们又够得着的佛像,没有一个幸免。八国联军的兵痞枪击万寿山琉璃佛像是为取乐。而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红卫兵则有着崇高的目标。他们砸佛像,名之曰铲除旧文化,园内佛香阁中的大佛塑像就这样被摧毁了。

北京体育学院就在颐和园附近。两派学生中的一派因保工作组而弄得灰头土脸,决计到颐和园去显示其革命决心。颐和园内的三百米长廊及无数亭台楼阁,几乎每一个雕梁画栋都有精细的画,不是人物、故事,就是山水、花草、虫鸟。人物画都有典故出处,譬如“刘、关、张三英战吕布”。四个人皆属反动派,必须消灭。他们在颐和园内仔细搜索,凡是画了人物的,一律用白漆涂刷覆盖,仅留下花草未被革命。“红八月”过后,颐和园内的人物画,一个不剩,连昆明湖西边游人鲜至的亭台都没逃脱一个“破”字。

59、四川什邡县建于唐代的慧剑寺,有宋代画像和明代高手画的五百罗汉像。在“红八月”中,那些珍贵的古代壁画均被灰浆涂抹而彻底毁掉。

60、北京西山卧佛险遭砸毁。唐贞观十九年(公元 645 年),玄奘法师取经归来后,有人在北京西郊建立了一座寺院,取名“兜率寺”。寺内供奉一尊长 3 米多的香檀木贴金卧佛。元代,忽必烈定都北京,兜率寺更名为寿安山寺,成为皇家寺院。公元 1321 年,元英宗即位,他下旨修缮卧佛寺,“冶铜五十万斤铸造卧佛像”。经过 12 年的努力,公元 1333 年终于铸造成功这尊巨大的铜卧佛。这尊身长 5.3 米、重 54 吨,迄今为止是中国乃至世界最大、最重的铜卧佛,具有非常高的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是一件名副其实的国宝。大佛呈侧身睡卧状,头西脚东,面向南方,右手托在头下,曲肱而卧,左手平放在腿上,双足并拢,神态安详,造型精美。人们称这种姿势为“吉祥卧”。佛的身后环立着 12 尊泥塑佛像,他们就是佛祖的十二大弟子,人称“十二圆觉”。文革袭来,红卫兵抡起大锤朝大佛砸去,此卧佛为实心,难以砸坏,采用髹金彩绘工艺制造的衣纹服饰损坏严重,泥塑圆觉彻底毁坏两个,其余十个也残破不堪。文革之罪孽不容遗忘。

附注:

[1] 《御制皇陵碑》碑文(明)朱元璋 撰

孝子皇帝元璋谨述:洪武十一年夏四月,命江阴侯吴良督工新造皇堂。予时秉鉴窥形,但见苍颜皓首,忽思往日之艰辛。况皇陵碑记皆儒(臣)粉饰之文,恐不足为后世子孙戒,特述艰难、明昌运,俾世代见之。其辞曰:

昔我父皇，寓居是方，农业艰辛，朝夕旁徨，俄尔天灾流行，眷属罹殃：皇考终於六十有四，皇妣五十有九而亡，孟兄先死，合家守丧。田主德不我顾，呼叱昂昂，既不与地，邻里惆怅。忽伊兄之慷慨，惠此黄壤，殓无棺槨，被体恶裳，浮掩三尺，奠何肴浆。既葬之后，家道惶惶，仲兄少弱，生计不张，孟嫂携幼，东归故乡。值天无雨，遗蝗腾翔，里人缺食，草木为粮。予亦何有，心惊若狂，乃与兄计，如何是常？兄云去此，各度凶荒。兄为我哭，我为兄伤，皇天白日，泣断心肠，兄弟异路，哀恸遥苍。

汪氏老母，为我筹量，遣子相送，备醴馨香，空门礼佛，出入僧房。居未两月，寺主封仓，众各为计，云水飘颻。我何作为，百无所长，依亲自辱，仰天茫茫，既非可倚，侣影相将，朝突炊烟而急进，暮投古寺以趋踰，仰穷崖崔嵬而倚碧，听猿啼夜月而凄凉，魂悠悠而觅父母无有，志落魄而佚佯。西风鹤唳，俄淅沥以飞霜，身如飘蓬逐风而不止，心滚滚乎沸汤，一浮云乎三载，年方二十而强。时乃长淮盗起，民生攘攘，於是思亲之心昭著，日遥盼乎家邦。已而既归，仍复业於觉皇，住方三载而又雄者跳梁。初起汝颖，次及凤阳之南廂。未几陷城，深高城隍，拒守不去，号令彰彰。

友人寄书，云及趋降，既忧且惧，无可筹详，傍有觉者，将欲声扬。当此之际，逼迫而无已，试与知者相商，乃告之曰：果束手以待罪，亦奋臂而相戕？知者为我画计，且祷阴以默相，如其言往卜去，守之何详。神乃阴阴乎有警，其气郁郁乎洋洋，卜逃卜守则不吉，将就凶而不妨，即起趋降而附城，几被无知而创。少顷获释，身体安康，从愚朝暮，日日戎行，元兵讨罪，将士汤汤，一攫不得，再攫再攘，移营易垒，旌旗相望。已而解去，弃戈与枪，予脱旅队，馭马控缰，出游南土，气舒而光。倡农夫以入伍，事业是匡，不逾月而众集，赤帜蔽野而盈冈，率度清流，戍守滁阳。思亲询旧，终日慨慷，知仲姊已逝，独存骕马与甥双。骕马引儿来我栖，外甥见舅如见娘。此时孟嫂亦有知，携儿挈女皆从傍，次兄已歿又数载，独遗寡如野持筐：因兵南北，生计忙忙，一时会聚如再生，牵衣诉昔以难当。

於是家有眷属，外练兵钢，羣雄并驱，饮食不遑。暂戍和州，东渡大江，首抚姑熟，礼仪是尚。遂定建业，四守关防，砺兵秣马，静看颀颀。羣雄自为乎声教，戈矛天下铿锵；元纲不振乎彼世祖之法，豪杰何有乎仁良。予乃张皇六师，飞旗角亢，勇者效力，智者赞襄。亲征荆楚，将平湖湘，三苗尽服，广海入疆。命大将军，东平乎吴越，齐鲁耀乎旌幢，西有乎伊洛峻函，地险河湟，入胡都而市不易，肆虎臣露锋刃而灿若星鋠。已而长驱乎井陘，河山之内民庶咸仰。关中即定，市巷笙簧，玄菟乐浪，以归版籍，南藩十有三国而来王。倚金陵而定鼎，托虎踞而仪凤凰，天塹星高而月辉沧海，钟山镇岳而峦接乎银潢。

欲厚陵之微葬，卜者乃曰不可，而地且藏。於是祀事之礼已定，每精洁乎蒸尝，惟劬劳罔极之恩难报，勒石铭於皇堂，世世承运而务德，必彷彿於殷商。泪笔以述，难谕嗣以抚昌，稽首再拜，愿时时而来飨。

洪武十一年，岁次戊午，七月吉日建。

[2] 袁崇焕为明末抗金名将，自请镇守辽东，1926 年曾大败努尔哈赤，1927 年又大败皇太极。史称宁远大捷、宁锦大捷。后清军用反间计，崇禎又听信朝廷内阉党余孽的谗言，袁崇焕被误杀。南明政府曾予以平反。清军入关后，乾隆帝曾下诏说：“袁崇焕督师蓟辽，虽与我朝为难，但尚能忠于所事，彼时主暗政昏，不能罄其忱悃，以致身罹重辟，深可悯恻”。

1952 年 2 月，北京市规划局准备迁移城内所有墓地。叶恭绰、柳亚子、李济深、章士钊联名上书毛泽东，呼吁保护袁墓，毛泽东批示：如无大碍，应予保存。随后，

北京市政府对袁崇焕墓进行了全面的修葺，墓古迹得以保存。文革中尽毁，现存遗址为 1986 年复修所建。

散落在民间的私人古董遭打砸抢

1. 北京著名学者梁漱溟家被抄光烧光。文革过后梁漱溟回忆抄家时红卫兵的举动时说：“他们撕字画、砸古玩，还一面撕一面唾骂是‘封建主义的玩艺儿’。最后是一声号令，把我曾祖、祖父和我父亲在清朝三代购置的书籍和字画，还有我自己保存的，统统堆到院里付之一炬……红卫兵自搬自烧，还围着火堆呼口号……”

2. 南京著名的书法家林散之珍藏多年的字画及自己的作品全部被毁之一炬，他被赶回了安徽老家。当时在上海居住的画家林风眠家被抄家、画被焚烧，又在风声鹤唳中自己将留存的作品浸入浴缸、倒进马桶、沉入粪池。

3. 中央文史馆副馆长、八十四岁的杭州名学者马一浮的家被搜罗一空。抄家者席卷而去之前，他恳求道：‘留下一方砚台给我写写字，好不好？’谁知得到的却是一记耳光。他悲愤交集，不久即死去。

4. 名满天下的上海书法家沈尹默是中央文史馆副馆长，也是八十四岁。他担心‘反动书画’累及家人，老泪纵横地将毕生积累的自己的作品，以及明、清大书法家的真迹一一撕成碎片，在洗脚盆里泡成纸浆，再捏成纸团，放进菜篮，让儿子在夜深人静时提出家门，倒进苏州河。

5. 作家沈从文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军管会的军代表指着 he 工作室里的图书资料说：‘我帮你消毒，烧掉，你服不服？’‘没有什么不服，’沈从文回答，‘要烧就烧。’于是，包括明代刊本《今古小说》在内的几书架珍贵书籍被搬到院子里，一把火全都烧成了灰。

6. 字画裱褙专家洪秋声老人，人称古字画的‘神医’，装裱过无数绝世佳作，如宋徽宗的山水、苏东坡的竹子、文征明和唐伯虎的画。几十年间经他抢救的数百件古代字画，大多属国家一级收藏品。他费尽心血收藏的名字画，如今只落得四旧二字，付之一炬。事后，洪老先生含着眼泪对人说：“一百多斤字画，烧了好长时间啊！”

7. 连遥远的新疆首府乌鲁木齐新华书店的存书也横遭浩劫，通通被烧成了灰。

8. 湖南江永县有一种仅为妇女懂得的文字，人称“女书”。虽流传已近千年，因为不入男子的社会，流传并不广，许多用女书写成的诗歌被妇女珍藏，代代相藏，从未与世人见面。江永县地虽偏僻，破四旧却逃不脱，许多本应成为社会学、文字学乃至民族学研究资料的女书手稿被焚毁。

9. 烧书污染空气，送到造纸厂打成纸浆才是好办法。江浙一带人文荟萃，明清两代五百年，著名书画家大部分出在那里，留存至今的古籍也就特别多。仅宁波地区被打成纸浆的明清版的线装古书就有八十吨！

10. 红学家俞平伯自五十年代被毛泽东批判后，便是钦定的‘资产阶级反动学者’。抄家者用肮脏的麻袋抄走了俞家几世积存的藏书，一把火烧了俞氏收藏的有关《红楼梦》的研究资料。

11. 当时，中国特有的刻瓷艺术家仅剩北京朱友麟一人。周恩来曾规定朱的作品是国宝，不得出口。可是前去抄他家的红卫兵将他的作品砸毁殆尽。不久朱凄惨地死去，国宝亦不复现。

12. 苏州桃花坞木刻年画社的画家凌虚，五十年代曾手缂一幅长达五十

尺的《鱼乐画册》，由中国政府拿去，作为国宝赠送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凌虚化了几十年的功夫，收集到各地上千张古版画，如今被烧了个一干二净。

13. 中国画院副院长陈半丁年已九十，批斗之余，作品被焚烧。

14. 上海画家刘海粟珍藏的书画被抄后，堆在当街焚烧。幸亏一位过路人以工人的名义镇住革命小将，打电话给上海市委，才派人制止。但已烧了五个多小时，焚毁的字画、器皿不计其数。

15. 陕西画家石鲁被拉到西安钟楼大街的钟楼外，当街吊起来，在人群的围观中接受批判。他的“黑画”被一幅幅拿出，批斗一幅即撕毁一幅或在画面上用红笔打个叉。

16. 因江青点名咒骂了名画家齐白石。北京的红卫兵砸了他的墓和白石画屋。又逼着齐的儿子齐良迟刨平齐白石自书的匾上的字迹。

17. 上海画院七十五岁的画家朱屺瞻，家中收藏的名人字画被搜罗一空，七十余方齐白石为他的刻的印章一个没剩。

18. 1952 年，国画大师张大千的前妻杨宛君将张在甘肃敦煌石窟现场临摹的二百六十幅唐代壁画全部献给了国家，自己仅保留十四幅张氏为她作的画。如今抄家者光顾杨宅，那十四幅画被搜走，从此全都没有了下落。

19. 著名的木刻家刘岷（中央美术馆馆长）被勒令交出全部‘四旧’后，默默地把多年的木刻原版摞在壁炉旁，然后，点着火炉，一块一块地投进火炉，全部烧光！

中国的古迹少，博物馆里的文物更是少的可怜，民间的文物十个有九个都是假的，为什么？就是因为以前都毁掉了！中国的美术馆少，美术馆里的作品也大都是现代画，古代书画墨宝极少，为什么？因为书画是最容易毁掉的，扔到火里一烧就没了！”

在红卫兵破“四旧”过程中，康生、陈伯达等人对于被列入“四旧”的文物字画大肆掠夺。这无疑是对破“四旧”运动最大的讽刺。据北京文物管理处文物工作人员事后写的揭发材料，叶群拿走文物字画 1858 件，图书 5077 册，笔 134 支，纸 1451 张，本 159 本，唱片 1083 张。陈伯达拿走文物 432 件，字画 127 件，字帖 301 册，图书 5355 册，笔 159 支，纸 13 卷，本 4 本。康生和江青也是“四旧”的收藏者。1970 年秋，江青约康生去文物管理处挑选珍品。她选了一只 18K 金的法国怀表，表上镶有近百颗珍珠、宝石，并配有四条金链，仅付了 7 元钱。1990 年，康生搜刮的文物移到故宫作“内部展览”，人们才知道康生将大批国宝据为己有，被康生掠入私囊的无价之宝竟多至上千件。

掘墓狂潮

1966 年 10 月间，毛泽东的走狗戚本禹指使北京师范大学红卫兵头领谭厚兰去山东曲阜“造孔家店的反”。11 月 9 日，谭厚兰率领两百余名红卫兵来到曲阜，联合曲阜师范学院红卫兵，发动无产阶级贫下中农声讨孔夫子，要砸烂孔坟。他们先请示了戚本禹和陈伯达，陈伯达批示“孔坟可以挖掉”，于是这里的孔府被封，孔林苍松古柏被伐，坟被扒墓被掘，三孔书籍化纸为灰，无数石碑被砸。

1966 年 11 月 28、29 日连续两天，数十万人聚集曲阜，召开“彻底捣毁孔家店大会”。大会向毛泽东去“致敬电”，“汇报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敬爱的毛主席：我们造反了！我们造反了！孔老二的泥胎拉了出来，万世师表的大匾我们摘了下来……孔老的坟墓被我们铲平了，封建帝王歌功颂德

的庙碑被砸碎了，孔庙中的泥胎和偶像被我们捣毁了……”从1966年11月9日至12月7日，谭厚兰率领红卫兵在曲阜共毁坏文物6000余件，烧毁古书2700余册，各种字画900多轴，历代石碑1000余座，其中包括国家一级保护文物的国宝70余件，珍版书籍1000多册，这是全国“破四旧”运动中损失最为惨重之一。

由于戚本禹称赞掘孔子坟的谭厚兰他们“造反造得很好”，掘坟风此后迅速刮遍神州大地。除了挖不着的，凡史籍中有记载的古人，差不多都在1966年遭到厄运。

“时髦”的改名浪潮：

为了显示“革命”，破“国旧”。红卫兵在神州大地上掀起了改名浪潮。

改名运动始于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时。这天，穿着旧军衣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宋任穷之女宋彬彬把一枚红卫兵袖章给毛泽东戴在了左胳膊上。毛泽东问她叫什么名？宋彬彬回答后，毛泽东说：“是不是文质彬彬的彬？”宋回答说：是。毛顺口说了一声“要武嘛”。从此，她改名为宋要武。

此后，一些人纷纷效仿，把所谓带有“封、资、修”色彩，带有小资产阶级情调的名字，例如什么“梅、兰、竹、云”、“春、夏、秋、冬”的，或者带有孔孟之道特征的“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等等，都改为“革命化”的名字，公安局户籍管理部门则以“报则速批”为原则，表示了对这种“革命行动”的支持。

除了改人名外，地名、店铺、公交车站、单位名称，都掀起了改名风潮。在北京，公共汽车站的站牌全被红卫兵涂上了“打碎旧世界，建立新世界，改掉旧站名，建立新站名”的标语。同仁医院被改成工农兵医院，协和医院被改成了反帝医院，东安市场改成东风市场，长安街被改为“东方红大路”，东交民巷改为“反帝路”，西交民巷改为“反修路”，越南驻华大使馆所在地“光华路”改为“援越路”。

在破“四旧”运动中，位于前门大街享有盛名的全聚德烤鸭店，也受到红卫兵的“革命”，8月19日晚，上千名红卫兵闯进了全聚德烤鸭店，狼吞虎咽一阵之后，将挂在店门口已经70余年的“全聚德”的招牌砸烂，换上了由红卫兵事先写好的“北京烤鸭店”的牌子。红卫兵把原来挂在店铺里的山水画全部撕毁，换上了毛泽东画像，又推举出10名红卫兵当烤鸭店的“治安员”“服务员”“毛泽东思想宣传员”，长驻店铺。8月20日一大早，经过红卫兵小将“革命”的新型烤鸭店诞生了。前门贴着一张醒目的标语：“欢迎工农兵进餐”。

改名浪潮也迅速波及到全国其他城市。造反的学生和工人称之为：“横扫千军如卷席。”

风俗习惯大“改革”

破“四旧”中有破除四旧风俗和旧习惯两项，占了“半壁河山”，因此红卫兵对于这项事业投入了很高的热情。香水、尖头皮鞋、窄腿裤均属于“资本主义的东西”，一经查出，立即实施革命制裁。《人民日报》对此举予以声援，引用红卫兵的话说：“难道工农兵还抹香水、穿尖头皮鞋吗？”在上海，革命小将限令西餐店停业，服装、皮鞋店停止出售“奇装异服”，凡发现行人中穿尖头皮鞋者责令脱下，赤脚走路；穿着或发型显得“时髦”的，就被剪去一刀。与此同时，上海街头的许多西洋雕塑被砸毁，教堂被冲击。

随着破“四旧”运动的深入，涉及的问题越来越多。有的红卫兵小将们提出，要改变现有交通规则，要变右侧通行为左侧通行，他们说右侧通行，不是革命规则，是右派分子们的规则。在中国这样的革命国家，应该是左派处处通行。同时，他们还提出交通路口的指示灯也有路线问题，因为交通规则说明，红灯停绿灯行这也不符合左派的要求，红色代表革命，黄色代表资产阶级，怎么能红色一出现就停止呢，怎么处处与红色作对呢？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红灯行、黄灯停才对！

文革期间，流氓痞子四处乱窜，打砸抢烧遍布城乡，国民经济面临崩溃，千古文明尽遭摧毁。毛泽东却在那里说：**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标是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从来的群众都没有像这次发动得这么广泛，这么深入。**（1967年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

红卫兵解体被驱赶上山下乡

1968年10月，中共召开八届十二中全会，通过了把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的决议。毛泽东以为他胜利了，用不着红卫兵冲冲杀杀了，可以卸磨杀驴了。红卫兵必须解散，不能让他们继续捣乱。于是，1968年12月22日（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是冬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预告，今晚将广播“毛主席最新指示”。刹时间，全国都在收听，以为又有什么特大喜讯。广播响了，原来是毛泽东十多天前对《人民日报》某篇报道写的一个批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收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它人，把自己的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这就是著名的“12.11指示”。

随之，几个奴颜媚骨的秀才翻遍了历年报章书刊，又查找到了几段毛泽东的语录，如1955年说的“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等等。敲锣打鼓地广为宣传。

全国各个大中城市是红卫兵集聚之地，那几年因为“革命”、“造反”导致国民经济日渐凋零^[1]，民营经济衰微破败（从业人员从1955年前的近900万人减少到1968年的15万人，仅占全国城镇总从业人员的0.16%。）。学校完全停课。市场萧条冷落。无法安置滞留在城市中的学生（1966、1967、1968年三年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后来被称为“老三届”的即达千万）。

毛泽东的指示一发表，中共各级党政随即动员落实。这个指示改变了整整一代城市青年和数千万城市家庭的命运。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总人数达到1700多万人，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来到了乡村。这是人类现代历史上罕见的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大迁移。全国城市居民家庭中，几乎没有一家不和“知青”下乡联系在一起。

上山下乡的目的地很多，政府指定“知识青年”劳动居住的地方，通常是边远地区或经济落后、条件较差的县。这一做法很快就成了既定政策。

从表面上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各地政府都组织了欢送，敲锣打鼓，戴大红花。在当时，有一部分青年是“满怀热情”地投入到这场运动中，所谓“紧跟统帅毛主席，满怀豪情下农村，广阔天地炼忠心”。但更多城市青年是被政府强制离家迁往农村的。

年轻的一代在文革的混乱中感到很迷惘，想去农村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但没想到的是，这却是一条悲情的不归路。上山下乡也造成了一些社会问题，比

如浙江省 1979 年底的统计说，到上山下乡运动结束时全省共发生破坏上山下乡案件 2942 起，其中属于一类案件（即迫害女知青案件）2557 起，其中强奸、轮奸 531 起，奸污 1906 起，猥亵、侮辱 99 起，诱逼婚 31 起，占案件总数 86.9%，受迫害人数 3248 人。

上山下乡虽然暂时缓解了城镇的就业压力，毛泽东借此达到了解散红卫兵组织和让年轻人“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目的，但是上千万年轻人的青春被荒废，无数家庭被强行拆散，这场运动也造成了各个层面的社会混乱。由于文革的上山下乡使得本应成为学者专家的一批年轻人在乡间长期务农，八十年代以后出现了知识断代，学术研究后继乏人的现象。中国为这场运动耗费了约 300 亿元，但换来的又是什么呢？“上山下乡”一直持续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末，1977、1978 年大批知识青年开始返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特殊的历史年代为一代青年提供的一条特殊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有宝贵青春的荒废，有美好理想的破灭，有生活信心的动摇，也有一代知青的奋斗业绩。在国家最艰难的岁月，知识青年和当地人民一起，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和共和国一起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刻。较之后来的青年，他们更多一些对人生艰辛的领悟，更多具有吃苦耐劳的品格。“知青”二字已不是单纯字面上的含义，而是那段特殊经历赋予他们的一种“资格”。

在终结上山下乡的时候，党中央的领导人曾对上山下乡讲出“四个不满意”的话语：知青不满意，知青家长不满意，农村农民不满意，社会不满意！。

原上海知识青年金光耀和金大陆都曾亲历上山下乡，他们和 50 余名知青志愿者，历时 4 年，从数以千计的地方志中辑录出的 600 万字史料集——《中国新方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史料辑录》（六卷本）终于要出版了。读者不妨一阅，对那个时代有更多的了解。

附注：

[1] 对那几年经济形势的估计有：1978 年 2 月华国锋在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1978 年 3 月，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词中说：“‘四人帮’使我国国民经济一度濒于崩溃的边缘，科学技术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愈拉愈大。”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指出：“‘文化大革命’把国民经济推向崩溃的边缘，并不过分。”

毛泽东时代——年轻人写个歌被判十年徒刑，差点被枪毙

1969 年 5 月下旬，南京知青任毅，创作出一首表达知识青年思乡情绪的新歌《我的家乡》。全曲深沉、缓慢。歌词如下：

蓝蓝的天上白云在飞翔，美丽的扬子江畔是可爱的南京古城，是我的家乡，啊长虹般的大桥直插云霄横跨长江，威武的钟山虎踞在我的家乡。

辞别了妈妈再见了家乡，金色的学生时代载入了青春的史册，一去不复返，啊未来的道路多么艰难多么漫长，生活的脚步深浅在偏僻的异乡。

跟着太阳起伴着月亮归，沉重地修理地球是光荣而神圣的天职，我们的命运，啊用我们的双手绣红地球赤遍宇宙，憧憬的明天相信吧一定会到来。

这首歌被定性为“反动歌曲”，姚文元、江青作了“要抓紧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要查清作者情况，要对黑歌进行批判”的“指示”，张春桥则要

求上海市革委会成立专门小组负责此案。

任毅被羁押于南京市公检法军管会看守所，作为“重大的反革命专案”进行审理。审讯者逐字逐句地审查《家乡》的歌曲，牵强附会，无中生有，上纲上线，罗织罪状。审讯者指出：歌词的第一段是通过写景来掩盖下面两段的反革命实质。“告别了妈妈，再见了家乡”，是燕雀的啾啾哀鸣，是留恋城市，是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反动；“金色的学生时代……”，是为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统治的 17 年招魂，鸣冤叫屈；“未来的道路……”，是在散布悲观情绪，是对祖国前途的恶意诽谤；“生活的道路……”，是对革命者四海为家的反动，是对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恶毒攻击。“跟着太阳起……”，是渲染农村劳动的艰苦，对广大贫下中农大干社会主义，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披星戴月劳动场面的恶意中伤；“光荣而神圣的天职，我们的命运”，实质是把知识青年到农村去说成无可奈何，形势所逼，是悲观情绪的进一步流露，再一次为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招魂叫屈；“用我们的双手……”使用革命的词藻是为着掩盖其“憧憬的明天”，明天者即资本主义复辟也；“一定会到来”，充分暴露了他希望资本主义复辟的迫切心情。可谓反动透顶。（南京市法院：《关于任毅反革命申诉一案的复查结案处理报告》）

1970 年 3 月 21 日，《新华日报》社革委会向江苏省委呈送了关于《家乡》“出笼”的专题报告，并拟定了批判《家乡》的报道计划。与此同时，对任毅在本市范围内组织批判会数十场。从入狱到 8 月 3 日被判决的 5 个月中，任毅三次被五花大绑拉去在公判大会上为死刑犯“陪杀场”。在当时那种滥开杀戒的恐怖气氛中，足以使所有“陪绑”者有一种末日将临的感觉。因为他们事先并不知道，在同遭厄运的人们中究竟是谁被“立即执行”。1970 年 5 月 20 日，南京市公检法军管会向市委呈送的《关于现行反革命犯任毅的结案处理报告》中称：任犯出身反动家庭，长期收听敌台广播，散布反革命言论，污辱宝书、宝像（这里指毛泽东的书、像），发展到严重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流广毒深，罪大恶极，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狠狠打击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经研究判处现行反革命犯任毅死刑，立即执行。6 月 6 日南京市委研究会议市公检法军管会意见，报省委审批。至此，任毅的性命已处在高悬的达摩克里斯利剑之下而危在旦夕。所幸者，省委在批复中决定判处他十年徒刑，并于 8 月 3 日召开公判大会宣布。

按照“文革”办案“走群众路线”的惯例，任毅的案子也曾放到群众中“讨论”，得出的一致意见却是“该杀”。不应该忘记，当遇罗克、张志新等志士仁人的案件在交由群众“讨论”时，也曾受到同样的“判决”。在专制主义淫威的震慑下，几乎人人自危，自顾尚且不暇，又怎能顾及他人？！专制主义窒息了人们的良知，同时也就使他们变得自私、麻木，多少暴殄天物的罪恶得以假“群众”之名横行。多少无辜的生命遭“群众专政”杀戮，“文革”留下的这个教训，是很沉痛的。任毅后来之所以被判刑十年，据说是因为省委主要负责人考虑到他年纪轻，经历简单，并亲自作了批示。此后，任毅在狱中备尝苦难，1979 年才刑满释放。

第九章 深山老林服苦役十三年

一、川西监狱群一瞥

1948 年底北平和谈之际，中共以平津前线司令部的名义颁布《约法八

章》，入城后张贴于大街小巷。

其中第五条写着：“除首要的战争罪犯及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外，凡属国民党省、市、县各级政府的大小官员、国大代表、立法监察委员、参议员、警察人员、区乡镇保甲人员，凡不持枪抵抗、不阴谋破坏者，本军一律不加俘虏或逮捕，并责成上述人员各安职守，服从本军及民主政府的命令，负责保护各机关资财、档案，听候接收处理。这些人员中，凡有一技之长而无反动行为或严重劣迹者，民主政府准予分别录用。如有乘机破坏、偷盗舞弊，携带公款、公物、档案潜逃，或拒不交待者，定予依法惩办”。

《约法八章》在政治上如此庄严承诺，对瓦解傅作义所属军队斗志，安定北平社会秩序，促使地方势力效法“北平方式”放下武器接受改编，起了极大的作用。湖南的程潜、陈明仁，四川的邓锡侯、潘文华，西康的刘文辉，云南的龙云、卢汉，新疆的鲍尔汉等原国民政府的封疆大吏见大势已去背叛政府相继率部投降了。由是中共兵不血刃占领了半个中国。

然而，中共随即背弃了自己承诺的《约法八章》。

约法八章标榜的是“民主政府”，中共掌权后实行的是一党专政，大肆开展所谓清匪反霸，镇反肃反，以革命之名大肆逮捕杀戮。1950年初，各地尤其是西南、中南等地区，曾经发生反抗中共暴政的行为。个别地区有小股骚乱，1950年3月西南局给中央的一份报告中说，“近一个时期以来，西南川、康、云、贵各省，连续有土匪在各地发动大规模武装暴乱……二月份以来，各地土匪又围攻并占领了包括温江、崇庆、郫县、金堂、新繁及川东之秀山等多座县城。邛崃城遭匪万人之围攻。壁山军分区一夜之间八个区政权遭匪袭击而全部丢失。”此报告所云“大规模武装暴乱”“占领多座县城”“八个区政权遭匪袭击而全部丢失”显系夸大敌情的不实之词。声称形势严峻，旨在请求中央准予调动军队“平暴”，大开杀戒。中共中央闻讯后，刘少奇力主镇压，得到毛泽东默许，在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镇压反革命运动。经过数月，凡被认为对新政权构成威胁的各类旧人员，被名之曰“恶霸”、“地主”、“惯匪”、“特务”，大肆抓捕；对被定为国民党党团及军、警、宪、特骨干分子，和历史上曾经杀害过中共人员或给中共造成过损害的人员，无论有没有现行反抗行为，大部分遭到了严厉的惩罚。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杨奎松2008年著有《新中国“镇压反革命”运动研究》一书，欲知详情的读者可阅读该专著。

鉴于当时政权尚未稳定、土改任务繁重、经济问题突出，1950年6月中共召开七届三中全会，毛泽东在强调必须镇压反革命的同时，告诫党内各地领导不要急躁，切忌四面出击（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切忌四面出击》一文）。

1950年6月，金日成挑起战争，突然袭击韩国，妄图独霸半岛。引起联合国军登陆仁川，及至北朝鲜军队失利，中国在金日成求救、斯大林怂恿下，出兵越过鸭绿江参战之时，毛泽东认为这是一个彻底清除国内旧势力的“千载一时之机”。1950年10月8日中共决定正式出兵，两天以后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并通过了《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又称双十指示），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大规模镇压反革命工作。

毛泽东对公安部长罗瑞卿面授机宜，他说：“在此之前为什么不能大量镇压反革命？是因为时机不成熟，现在情况不同了，财政问题基本解决了，抗美援朝战争也打起来了，因此，你们不要浪费了这个时机，镇压反革命恐怕

只有这一次，以后就不会有了，千载难逢”。中共二号首领刘少奇随后的解释更为形象，他说：“抗美援朝很有好处，使我们的很多事情都好办（如搞土改、订爱国公约、搞生产竞赛、镇压反革命等）。因为抗美援朝的锣鼓响起来，响得很厉害，土改的锣鼓、镇反的锣鼓就不大听见了，就好搞了。如果没有抗美援朝的锣鼓响得那么厉害，土改和镇反的锣鼓就不得了了。这里打死一个地主，那里也打死一个，到处闹，很多事情不好办”。

进入1951年，本无意与中国交战的美国军方，旨在保持南北朝鲜分治（据美国解密档案，美国政府当时将军事干预的目标确定为使朝鲜半岛恢复到1950年6月25日以前的状态，制定了“战争局部化”方针。见《杜鲁门回忆录》第二卷，北京三联书店，1974），未继续向北推进，志愿军得以在朝鲜战场稳住阵脚，中共趁机大肆宣传。由此国内民气上扬，毛泽东抓住时机，一方面宣扬“抗美援朝”的巨大胜利，一方面加大了镇反力度，“定指标杀人”，“批准死刑权力下放”，“颁布镇反条例”，鼓励发动群众消灭反革命分子，主张多杀快杀，实现其攘外必须安内的设想，镇反运动在毛泽东的鼓吹与支持下进入高潮。

在刚刚结束不久的国共战争中，中共在很大的程度上利用了对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不咎既往”的政策，瓦解了国民党数百万军队的战斗力。《约法八章》曾经极大地感染了国民党官兵，促使其起义、投诚，起到了“不战屈人之兵”的作用。然而这一部分人员却始终是毛泽东必欲除之的心病，1950年起，数十万“和平”整编部队的士兵被送到了朝鲜充当炮灰，假手联合国军予以消灭。还有更多的则寻机杀戮之。镇反运动一来，《约法八章》被抛在脑后，成了一纸空文，大批原国民政府起义、投诚人员被打成了反革命。军队连长以上、地方保长以上、国民党区分部委员以上、三青团区队长以上、警察巡官以上，无论有无现行反抗行为，都被列为反革命，当时叫做“反革命政权的社会基础”。多数均被捕入狱，投入劳改。所谓“北平方式起义”的傅作义所部，连级以上军官，一般都判刑十年以上，关在河北省第一监狱。该监狱的档案是有记载的。

按照毛泽东下达的指标，镇反要杀掉五亿总人口的千分之一以上，各地积极响应。广西柳州专区要求杀千分之五，贵州省委（苏振华为第一书记）要求杀千分之三，邓小平主政的四川地区准备再杀六万人（当时四川人口不足六千万，前期镇反已经杀了近十万人）。各地被杀人数超过了当地连年战争中死亡人数。

重庆从1950年第四季度起，一直到1951年上半年，前后进行了三次大批捕。最大的一次就是“三·一三大逮捕”，1951年3月13日一晚上，仅主城区就抓了四千多人。年纪大一点的老重庆至今还想得起来“三·一三大逮捕”。

当时的报纸和广播，关于镇反的消息不绝于耳。

按照《双十指示》的要求：“镇反运动要特别注意对群众的教育作用。”
“对于这些案件的执行，必须公布判决，在报纸上发布消息（登在显著地位），并采取其他方法，在群众中进行广泛的宣传教育。”

“三·一三”大批捕的当天，重庆《大公报》以《四千余反革命分子归案法办》为标题，在头版进行了大篇幅报道。《新华日报》发表社论《严厉惩办反革命分子》。3月26日的《大公报》上刊载了两篇检举亲人的文章，一篇为四川大学学生李国新所写的《我活捉了我的父亲》，一篇为大公报记者杨

本泉采写的《罗思棣检举了做特务的丈夫》。恐怖气氛笼罩山城，谈虎色变，人人自危。

镇反杀人之多引起民众疑虑，大肆逮捕，滥杀无辜造成社会不安，人心惶惶，各界议论纷纷。

耳目甚多的毛泽东闻讯后，一方面充分肯定镇反的成绩，各省杀多少人都是毛泽东亲自确定的，所以对数十万“反革命”被杀兴奋无比，借群众之口说“比下一场透雨还痛快”。另一方面考虑到杀人过多、气氛过于紧张，已经引起社会不安，因而变“大胆放手”为“适当收缩”。毛泽东是善变的。

他于1951年4月20日致电各中央书记说：“我有这样一种想法，即可以超过千分之一，但不要超过得太多，不要规定一般以千分之二为标准。而应将许多犯人列入为无期徒刑，离开本县，由国家分批集中，从事筑路、修河、垦荒、造屋等生产事业。”又说：“苏联过去对许多重罪犯就是这样处理的，此事是否可行，请你们和一些同志商量一下，以其结果电告为盼。”毛泽东在电文中对各地杀人的数字作了具体指示，他说：“例如西南区准备再杀的六万人，杀掉三万左右以平民愤，而将其余的三万人左右各省区负责分批集中生产。”毛泽东还说：“贵州省认为不杀千分之三就不符合准和狠的原则，我倒觉得按贵州人口一千万已杀了一万三，省委要求再杀二万二千至二万五千，我们可以允许他们再杀一万多一点，留下一万多不杀，已经超过千分之二的比例。”毛泽东责成公安部于1951年5月10日召开第三次公安会议，贯彻他的“适当收缩”方针，收回死刑批准权，设立“缓期二年执行”的约束政策。

鉴于民众对滥杀无辜的行为反应甚为强烈，毛泽东有感杀、关、管过多，不利于社会稳定，被迫无奈刹车，并伪装宽厚地批评一些地方杀人太多，各地害怕再受批评，只好瞒报数字。据时任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1]后来给中共中央的报告，镇反中杀了71万余人，关押129万人，管制120万人，教育释放38万人。其中杀、关、管的数字显然是被缩小了的。

有了毛泽东的指示，要将数百万计的劳动力集中起来从事筑路、修河、垦荒、造屋等生产。从1951年起，全国各地大造监狱。由于档案没有解密，难于了解详情，即使名义上公开了，在中国目前的环境下，档案馆门禁森严，一般人也难于查阅。因而具体建造了多少座监狱？关押过多少人员？死亡了多少人员？释放了多少人员？刑满后仍被强制性地留在劳改队多少人员？留了多长时间？所有相关数据均秘而不宣。

中国共产党如果是光明磊落的，如果认为大造监狱也是六十年辉煌成果之一，就不要隐瞒真相，就应该将这些辉煌成就公诸于世，岂不是为中共党史增光添彩，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提供经验么。为什么不敢这样做呢？

四川省除了各个市、县都拥有规模不等的监狱和收容所、看守所以外，五十年代初期，在川西地区也就是原来西康省所属被称之为大小凉山的地区，大量兴建监狱，2009年上演的电视剧《冷箭》就是以1952年押解数万囚犯西进凉山建立雷马屏农场为素材编写的。

中共之所以选择凉山彝族自治州为兴建监狱的基地，在于该地区幅员辽阔、人烟稀少、地势险峻、交通不便，与外界极难联系。且少数民族杂居，语言多有不通，被关押的犯人不易逃脱。大小凉山及甘孜、阿坝、攀西一带矿藏丰富，其中铅、锌、汞、硫磺、石棉、云母等矿藏的开采多为有毒有害作业，驱使犯人和劳教人员开采，强制劳动，封闭管理，无需特殊劳动保护，无条件可讲。潜藏着的阴谋是让这些人慢性中毒，活着的时候在奴役下劳动，

淌乾最后一滴汗、流尽最后一滴血，直至在病痛中死亡，以达到消灭肉体的最终目的。这是比死刑立即执行还残酷的刑罚。这是在边远、荒凉地区修建监狱，刑满后不予释放，强制在劳改企业就业，直至关押到死亡为止的政策大行其道的原因。历史事实证明，散落在凉山州的数万具白骨证明，黑龙江兴凯湖农场、重庆长寿湖农场、甘肃夹边沟农场、北京团河农场等地的无数冤魂证明，毛泽东及其党羽就是这样做的，其用心何其歹毒，手段何其残忍也。

从1951年起，大小凉山域内监狱星罗棋布，空前发展，监狱密度和规模堪称世界之最。部分荒凉地区几乎是一个监狱紧邻另一个监狱，且占地面积宽广，动辄数十平方公里，关押万人乃至数万人。监狱之总体规模较1949年以前扩大了上百倍，似可作为中共掌权以来辉煌成果之佐证。由于环境恶劣、劳动强度大、在押犯人身精神肉体备受折磨，三年困难时期和文革十年中，死亡者不计其数。荒野山间，白骨累累，罪行残酷，令人发指。从五十年代初期到七十年代末期，虽然中共百般封锁消息，但监狱是人群聚集之地，不可能完全与世隔绝，旷日持久，内幕难免泄露。为掩盖历史，从上世纪末起，地处深山之监狱纷纷外迁，名曰便于管理，实为毁灭罪证，隐瞒真相。

鉴于中共对监狱布局和内幕讳莫如深，能够看到的只是冰山一角，现将我知道的原西康地区监狱列举如下，聊作参考：

(1) **莽窝农场**。莽窝农场始建于1951年9月13日，是四川省在凉山地区建立的第一所大型监狱。位于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普格县莽窝镇，距西昌59公里、距普格县城17公里，海拔高度1360-2150米，幅员面积五十余平方公里，山路崎岖，交通不便。从1951年开荒建场，至1958年，数万犯人在山坡上开垦出梯田、梯土17200亩，苹果等林木地2400余亩，以后陆续扩大规模，除农林以外，相继开办了砖瓦厂、石灰厂、煤矿、果酒厂等。莽窝农场以狱卒凶恶，管理严格著称于劳改系统。近期投资数亿，正在迁往西昌市礼州镇。

(2) **雷马屏农场**。雷马屏农场始建于1952年，位于川滇交界处的金沙江畔。三面环山，森林密布，豺狼当道；一面临江，水流湍急，碍难泅渡。监狱地跨雷波、马边、屏山三县，面积五十余平方公里，监狱包含大小山头数十座，只有一条公路与外界相通。总部设在雷波县西宁镇，下属八个大队，四十二个中队，一百六十个分队，中队与中队之间相隔数里或数十里，鼎盛期同时关押三万余人。本世纪初监狱总部迁至峨眉市符溪镇。

(3) **龙日农场**。龙日农场始建于1954年，位于阿坝藏族自治州红原县龙日坝，即传说中的雪山草地。海拔高度3600米，劳改队在此种植小麦、油菜、青稞等作物均因气候不适宜，以失败告终。后改为畜牧场，拥有草场面积31万亩，可用草场面积25万亩。1976年后移交四川省农牧厅，改为“四川省牦牛原种场”。

(4) **盐源农牧场**。盐源农牧场位于凉山彝族自治州海拔高度2300-2800米的盐源县境内，紧邻深不可测、浪高水急的小金河，背靠森林密布的高山，乃插翅难逃之地。两万余名犯人关押于此，开垦荒地，种植粮食和果木，盛产苹果。盐源监狱的狱卒凶狠，捆绑吊打成风，被关押的犯人惨死者众多。

(5) **力马河农场**。力马河农场位于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会理县境内。数千名犯人在那里开荒种地。附近有小型镍矿，劳改队多次议论开采，终因缺乏技术，未能如愿。

(6) **新都桥农场**。新都桥农场在四川康定县新都桥镇,位于贡嘎山西北,川藏公路一侧,规模不大,关押着数千劳改犯人。

(7) **沙坪农场**。沙坪农(茶)场始建于1955年,在四川峨边彝族自治县境内宋家山周围,占地四十余平方公里,海拔1300米以上,高山区海拔2500米,拥有大小山头数十座,背靠原始森林,面临波涛汹涌的大渡河,长年雨雾,寒冷潮湿。历年关押过六万余人。1958年后以“改造”右派分子为主,最多时有两万人,在布满草丛荆棘的荒山上开垦出一万余亩茶园。三年大饥荒时期,粮食定量大幅度降低,繁重劳动却有增无减,导致非正常死亡数千人,尸骨遍山,污染河水,野狗猖狂,引起峨边县彝、汉民众的怨愤、议论和投诉。四川省委不得不派员调查,行伍出身的沙坪农场场长梁村夫因此被判刑七年,曾在四川简阳平泉农场劳动改造。这个动辄指使狱卒打骂劳教人员、克扣粮食、凶狠昭著、血债累累的梁村夫坐了两年班房即出狱,仍在劳改系统为官,任德阳砖瓦厂厂长。1998年病逝。沙坪农场2006年迁往四川省眉山市。以关押戒毒人员为主。

(8) **湾丘农场**。湾丘农场在四川省米易县境内,曾经是四川省文联的“五七干校”。嗣后,大量右派分子集中在这里劳改。白航、张志杰、蓝疆、杨牧等五十年代的诗人俱曾关押在此。

(9) **甘洛农场**。甘洛农场位于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甘洛县大渡河以南之崇山峻岭中,关押着上万名犯人和刑满后强制留在农场的就业人员。

(10) **苗溪茶场**。苗溪茶场为四川省十大监狱之一,地跨天全、芦山、宝兴三县,占地面积四十余平方公里。我在苗溪茶场关押了十三年,详细情况见后文,窥一斑而见全豹,观滴水可知沧海。读者从中或可见中共监狱之惨状。该监狱2000年后迁往成都龙泉驿洛带镇附近。

(11) **西河砖瓦厂**。西河砖瓦厂地处西昌市远郊西河乡,男犯烧制砖瓦,女犯加工服装。

(12) **西昌矿山机械厂**。西昌矿山机械厂在西昌市近郊,关押中、长刑期的犯人数千名。

(13) **西昌冶炼厂**。西昌冶炼厂隶属于攀西监狱,冶炼锌、铅等有色金属。在西昌市近郊。

(14) **雅安交通机械厂**。地处雅安市郊,高墙电网、戒备森严。关押上千名重刑犯,生产各种汽车配件。

(15) **会东铅锌矿**。会东铅锌矿是1958年兴建的劳改企业,位于四川省凉山州会东县境内。集采、选、冶为一体,数千犯人在极易铅中毒的环境中辛苦劳作,形成了年产四万吨锌锭、六万吨硫酸的能力,年销售收入高达13亿元,经济效益居四川省劳改企业之冠。利润大部上缴,为四川省司法局、劳改局积累了大量财富。本世纪初,西部矿业集团公司以二十二亿元之价款,买断80%股权,劳改企业撤离。

(16) **宁南铅锌矿**。宁南县位于四川省西南部,凉山彝族自治州南部东侧,金沙江与黑水河之间。该地区铅锌矿密布,可开采的矿点即达四十余处,但品位较低,地质结构复杂,需消耗大量劳动力。数千被判处徒刑的犯人在井下挖掘,人力运输,极为艰苦。三年困难时期死亡甚众。

(17) **通安铜矿**。通安铜矿在凉山彝族自治州,距会理县城100公里的深山峻岭中,条件艰苦,事故频发,死亡甚多。

(18) **乌坡铜矿**。乌坡铜矿在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县境内。距县城约十

六公里，为依靠人力采挖、人力背运、氯化铵浸出精选的小型铜矿，劳动条件艰苦，属有毒有害作业。死亡者众。

(19) 新康石棉矿。新康石棉矿地处四川雅安专区石棉县境内，建矿五十年来，数万名犯人在此服苦役。兴盛时期年采挖一百余万吨矿石，年产三万吨石棉纤维及多种石棉制品。采挖石棉、加工石棉制品，粉尘十分严重，矿区屋顶均呈灰白色，劳改和劳教人员除了口罩没有其他防护用品，得矽肺病者甚多。2008年四川省劳改局以资源枯竭之名义宣告新康石棉矿破产，在押犯人迁往绵阳等地。

(20) 天全硫磺矿。天全硫磺矿始建于1957年，位于天全县高寒山区，常年阴霾密布，环境恶劣。1958年矿产大跃进，万余劳教、劳改犯被发配到此，从高山上采挖矿石，背运矿石到山下的冶炼厂提炼硫磺，由于设备简陋，经常发生事故，一次大火即烧死数十人。1958年大办钢铁，原始森林被砍伐一空，再加上乱采乱挖，地貌遭到严重破坏。1962年夏天一场暴雨导致泥石流爆发，山洪卷裹挟带着矿渣泥石呼啸而下，劳教和劳改人员住的简易工棚被淹没得荡然无存，死亡两千余人，其惨状较2010年8月甘肃舟曲县之特大泥石流为甚（据多家报纸报道，舟曲当时死亡及失踪一千七百余），天全硫磺矿不得不停办，中共实行新闻封锁，未见公开报道。

(21) 洼里金矿。洼里金矿位于凉山彝族自治州盐源县北部，距县城135公里。该地盛产黄金，清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曾发现一块重达15.5公斤的自然金，由此名声大作，劳改系统进入后盲目开采，掠夺资源，好景不长，现已衰微破败。

(22) 盐源水银矿。盐源水银矿地处四川盐源与云南宁蒗交界处，汞及汞制品毒害严重，劳动条件恶劣，死亡者甚多。

(23) 丹巴云母矿。丹巴云母矿位于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丹巴县，丹巴县处于康巴高原峡谷地带，幅员广阔人烟稀少，面积5649平方公里，总人口只有5.6万，县城在依山临水的山坡上。1952年大批服刑人员被押送至崇山峻岭之中开挖云母矿，五十年来生产工业云母三万多吨。后因严重破坏地表地貌，2003年发生滑坡造成人员伤亡的惨剧，2005年山体大滑坡，丹巴县城一半以上被泥石流淹没。丹巴云母矿已不复存在。

(24) 415筑路支队。成立于1958年4月15日。盖因毛泽东急于修建成（都）昆（明）铁路，沿途山高水急，地貌复杂，险象丛生，施工困难。毛泽东的宠臣李井泉责成四川省劳改局抽调年龄十八岁以上、三十五岁以下的青壮年“右派分子”和“反社会主义分子”八千余人（其中右派分子占七成）组成筑路支队，承担艰险路段施工。共有二十七个中队，四个直属队，从1958年建队到1974年撤销的十六年间，据不完全统计，先后死于工伤、饥饿、逃跑、自杀、枪决的不少于三千人、

以上均系隶属于四川省劳改局、正式挂出招牌的企业，通常用邮政信箱对外联络，掩饰劳改企业的本质。

此外尚有凉山煤矿、四坪煤矿、溪口水银矿、熊尔农场、乌依铅矿、西洛农场、黄联监狱、凉山监狱、会理监狱、西昌监狱、青山嘴监狱、攀西监狱、布拖监狱、昭觉监狱等等。分属于各地市，数不胜数，难以一一列出。

附注：

[1]徐子荣（1907-1969）河南确山人，1927年参加确山农民暴动并入党，任

确山县委宣传部长、县委书记等职。暴动失败后被调往中共中央北方局，在北平从事地下活动，1933年因随身携带大量组织暴动的传单被国民政府宪兵查获，判处六年有期徒刑，1936年被中共北方局营救出狱，先后在晋冀豫边区和中原军区任职，建国后任公安部副部长。1966年文化大革命伊始。即以叛徒之罪名被捕入狱，关押期间，镣铐加身，酷刑不断，备受折磨，1969年惨死狱中。

二、苗溪茶场一览

1966年11月6日，我随成都市宁夏街看守所的两百余名已决犯被押送到苗溪茶场。

那天早上，天还没有大亮就提前开饭，关押在看守所内是没有钟表的，唯看守的命令是从。早饭以后，本来应该是在各个监舍里学习，突然哨音大作，冲破了宁夏街看守所的沉寂，随着一阵杂乱的脚步声，十多个看守在五个巷道里逐个舍房点名，高声喊叫着，让犯人收拾行李，紧急集合。

我和几位新判刑的难友不知道怎么回事，心里有点紧张，几个关押时间比较长的难友说：准备上山。也就是到劳改队去。宁夏街看守所是一个关押未决犯（应称为犯罪嫌疑人），等待审讯、判决的场所，不是久留之地，已决犯都要到劳改队服苦役，准备着活受罪吧，中国有的是深山老林，进去就不容易出来了，刑期长的死活难保。

大约十分钟，一个个愁眉苦脸、满怀疑虑表情的犯人手里提着简单的行李，不言不语地站在坝子里，四面岗楼里的持枪武警高度戒备地监视着犯人的一举一动，十余个看守在四周警惕地注视着院子里手无寸铁的群体，如临大敌。

那天有阳光，也许是在黑暗潮湿的屋子里关久了的原因，天空显得特别亮，空气也特别新鲜，我做了几次深呼吸，紧张情绪一扫而光，地球总是要转的，历史终究是要前进的，管他到哪儿去呢，反正是一条命。

看守所的彭所长出来讲话了，他要求全体犯人一切行动听从指挥，不许乱说乱动，到劳改队要认罪守法，接受改造等等。终于知道了集合点名是准备出发，心里的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至于去什么地方则秘而不宣。

随后按点名编组到院子外面上车，八辆蒙着深绿色篷布的大卡车并排停在外面的场地上，周围站着全副武装的武警。旁边还有四辆中吉普，大概是押解人员的专用车。我听到点名，依次上了第三辆大卡车，每个车上有四名荷枪的士兵，分坐在车厢四角，驾驶室内除司机以外，还坐着一个劳改队的狱警。看守再次清点人数，关上了高高的后箱板。三十个人挤在一起坐在行李上，心中猜测将要把我们送到什么地方去呢，一个人悄悄地说：“我看车牌是川字当头，不会出四川”；另一个人说：“我看来人走路时脚抬得很高，绝对是山区”。

我静静地坐着，似乎什么也没想，又似乎想得很远很远。历历往事如在目前。

1966年7月12日我被捕入狱，在成都宁夏街看守所关押了三个多月，历经了极不认真的审讯，毫无根据的判决，对文革期间中共公检法的恶毒卑鄙伎俩有了初步了解，口头上高喊的“依法治国”原来只是一句欺人之谈，人们对司法公正的种种幻想彻底破灭了。毛泽东常叫嚣他“无法无天”确是中国的现实。

从1958年到1966年，我先后在重庆新建机械厂、成都劳改局加工厂、

成都通惠汽车修配厂、四川磨床厂、四川消防机械厂戴着右派帽子劳动教养、摘掉帽子强制留在劳教单位就业，对城市中的监狱有所了解了。现在要到深山中服苦役，不知道还要受哪些折磨，今后十五年的日子怎么过？共产党啊，共产党！为什么要把毫无反意、毫无罪行的人打成反革命呢？按照毛泽东的说法，运动中团结 95% 的群众，打击面不超过 5%，连绵不断的运动，一个又一个 5%，要不了多久，被打击的人数就会成千上万地增加，这是在扩大对立面、人为树敌。这是制造罪恶，也是在自掘坟墓。

汽车依次启动，东转西拐地开出了成都市宁夏街看守所的大门。透过后车厢没有遮严的篷布缝隙看见了许久未见的成都市容。关押了几个月，市容大变，沿街商铺和民宅的墙壁都用油漆刷成了血红色，中间夹杂着稀稀拉拉的黄色字迹[1]。街上行人稀少，汽车迅速通过市区向西郊飞奔，我们密切注意能够看见的公路标牌和场镇街道两边的字牌，记住沿途的路径。经过温江、崇庆、大邑、一路上坡，从川西平原经过浅丘陵地带、深丘陵地带，进入名山县境山势渐高，使人感到一丝丝凉意。汽车在名山县一荒凉开阔地段突然刹车，汽车停稳以后，荷枪的士兵先行下车，随后，带队的狱警命令车上的犯人下车，依次站好队，有序地到路边的公厕解手。不解手的则站在原地活动活动半麻木的躯体。押解的武警寻找有利地形站在四周，荷枪实弹；附近的高地上，架设着四挺轻机枪，如临大敌，戒备森严。从成都出发大约过了三个多小时，该走了将近一百公里了吧？眼睛好的难友东张西望，在离厕所十多米的公路边上有一块站牌，写着“名山县黑竹镇”。

路上行人不多，看见蒙着绿色帆布的车队，看见全副武装的士兵，看见架设在周围的四挺机关枪，几乎全部停了下来，伸着脖子，用惊诧的眼光扫视着一排排的犯人。或许他们在想，这些犯人怎么不是凶神恶煞的样子呢？其中不少人还戴着眼镜，举止斯文，有的面含稚气，似乎还是孩子，有的步履蹒跚，老态龙钟，怎么都成了犯人呢？他们哪里知道，这就是文革成果、中国特色。

大约二十分钟后，各车清点人数，依次上车，继续开车。至雅安境内山势明显增高，汽车改向北行，至一峡谷，两岸岩壁陡峭，高逾百仞，地势雄伟险峻，峡谷中雾气弥漫，水流湍急，汹涌澎湃，声若雷鸣，一夫当关，凡人难越，名曰飞仙关，实不虚传。恰如李白《蜀道难》所云：“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 / 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 / 黄鹤之飞尚不得过 / 猿猱欲度愁攀援 / 但见悲鸟号古木 / 雄飞雌从绕林间。”过了飞仙关就是芦山县境了。此时车内一位难友小要说：“快到了，苗溪茶场”，满车人用怀疑的眼光看着他，他不紧不慢地说：“芦山县有个规模很大的监狱，能关两万多人，从早上八点出来已经过了四个多小时，没给中午饭吃，说明前面的路不远了，只能是苗溪茶场”，众人半信半疑，默不作声。下午一点多钟，汽车驶进县城，只见到狭窄的街道、低矮的房屋，最高的房子只有两层，市井冷冷清清，行人稀稀拉拉，且大多数中年人头上缠着青色或灰色的布，挽成一坨，大约有几斤重呢，不知是哪个少数民族的装束习惯。汽车行驶了不到五分钟便穿城而过，又在两边是农田的简易公路上颠颠簸簸地跑了一阵，停了下来，果真到了苗溪茶场。车外有些嘈杂的人声，随即喊我们下车，逐一点名，确认无疑后，分组站队。我所在的这一队四十余人，由六七名狱卒带领，顺着一条碎石路往前走，两边有八名武警持枪护送，后面跟着一辆摩托车，煞是威风。一行人步行约十分钟，进入苗溪茶场第十三中队管区，终于到了服刑地点。

苗溪茶场建立于五十年代初中国监狱大发展时期，监狱总部在四川省雅安专区芦山县境内。芦山县位于四川盆地西部，属偏远山区，地处龙门山地震断裂带边缘，距成都市180公里。北部与汶川连界；西邻宝兴、天全二县，站在空旷处可遥望终年积雪、人迹罕至的夹金山、二郎山；东部与邛崃、大邑接壤；东南与雅安相邻。县境南北长86.6公里，东西宽17.2-24.4公里，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北端大雪峰最高海拔5364米，南部最低的河坝海拔621米，落差高达4743米。芦山县境内多高山，海拔3500米以上的北部高山区占全县面积21%，人迹罕至；中等高度山区分布在高山区以南，约占全县总面积的73%，其中灵鹫山[2]在佛教界久负盛名；低山河谷区分布在海拔1000米以下的芦山河、宝兴河两侧，多阶地、平坝，约占全县总面积的6%。芦山全境面积1364.42平方公里，大部分地区人烟稀少，2003年底统计，全县辖9个乡镇、80个村，586个村民小组，总人口118052人。

苗溪茶场内部名称是川西监狱，也叫川西劳动改造管教支队。始建于1952年，地跨天全、芦山、宝兴三县，幅员面积43.24平方公里。支队下属四个大队、二十四个中队、五十六个监管区，一百多个分队，分散在灵鹫山、纱帽山、金龙山、大坪山四座逶迤蜿蜒的崇山峻岭中间，历年在押犯人开垦出来的八千余亩茶园（1958年茶园超过万亩），分布在海拔1000-1400米的山坡上，文革期间最多关押两万余人，几乎占全县人口的五分之一，2000年苗溪茶场整体搬迁至成都龙泉驿时，在押犯人及刑满后被留场就业人员仍高达9519人。

1975年“农业学大寨”运动中，我被推选为十三中队的检查评比代表，在劳改队干部率领下，搭乘汽车用了八天时间走遍了二十四个中队，观摩各队“改田改土”的成果，让我有机会浏览了苗溪茶场的整体概貌。

总的来说，该监狱幅员广阔、人烟稀少，交通不便、与世隔绝，监管严厉、冷酷无情，泯灭人性、阴森恐怖。整个支队依地区划分为四个大队，在押犯人按判刑性质、刑期长短、性别等等编成中队，重刑刑事犯多被关押在海拔较高、地域偏僻、条件艰苦的高山区。场部、狱政管理、制茶厂、机修厂、砖瓦厂、医院等集聚在山下较平坦的地区，场部距县城数公里，有简易公路。其余中队分布在各个山腰，各中队的规模不一，关押人数从三百多到六百多不等。

灵鹫山监管区规模最大，依地势分为苗溪上区和苗溪下区两部分。灵鹫主峰为苗上区最高峰，海拔1575米，清代曾在此建造气势恢宏的庙宇大殿，劳改队进驻后，庙宇被扫荡殆尽，只留下望乡台等遗迹，这里是第四中队所在地。数百名犯人在凄风中张望着各自的故乡，何时才能归去呢？苗上区还有第十五中队、第十六中队，关押重刑刑事犯。我在宁夏街看守所认识的衡孝泉，以“倒卖布票、非法获利”之罪名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即被发配到灵鹫山顶部的第十五中队，惜宁夏街一别再无联系，不知今日尚健在否。中上部有第二十三中队，山腰之间分布着第二中队、第三中队、第五中队、第十四中队、第十七中队，均为茶叶中队。其中二队、十四队、十七队为女队，关押着一千九百余名女犯。苗下区地势较平坦，周围的第一中队关押军犯、第十三中队关押十五年刑期以上的“反革命”犯，均为农业中队。另有基建队、机修队、担任警卫工作的解放军某连部和位于古庙净智寺内的医院。

大坪山区有第六、第七、第八、第九、第十八、第十九等茶叶中队，辖区山峰蜿蜒，岗峦起伏，环境险恶，但土质肥厚，作物产量高。最高的插台

山海拔 1400 余米，均归天全县管辖。

纱帽山有第十一、第十二、第二十、第二十二等中队，全系茶园中队。最高的峰顶海拔 1771 米，终年云雾缭绕。这里茶叶品质最好。纱帽山原系森林区，劳改队进驻后，大肆砍伐，1975 年乘车经过时还能看见山坡上遍布直径一尺余的树桩，昔日之参天大树，毁于一旦，环境尽遭破坏，留下了中共贻害子孙之罪证。

金龙山有第十、第二十一两个农业中队，茶园较少，周围系村民。这里与纱帽山又合称金沙区。金龙山和纱帽山各中队以收容刑满释放被强制留场的就业人员为主。

此外，第二十四中队为茶叶科学研究所，直属场部。茶场还拥有不相连属的双石煤矿和铜头场水电站。多数中队的驻地均有围墙，如中世纪的城堡，个别队高墙上装有电网。

各中队除了种茶，还需种菜、养猪以保证供应，为此还建了一些猪舍、牛圈和看守山林及农作物的简易茅草工棚。队与队之间距离较远、交通不便、管理严格、很少联系，犯人和就业人员更不准相互串通。每个队大约有十余名狱警分别被任命为指导员、中队长、分队长、司务长、管教干事等，每个中队配置十到二十名军队编制的武装警察，统称管理员。毛泽东死亡前，中国所有的监狱都是易进难出，服刑人员中流传着所谓“**风都吹得进来，雷都打不出去**”。只要被判了刑，投入监狱或者被劳动教养，无论刑期长短，哪怕只是一年劳教或半年徒刑，解除劳动教养不准离队，刑满不予释放，一律被强制性地留在劳教或劳改单位，叫做就业人员，表面上的区别是就业人员每月有十几元的工资，实质上仍然被当做专政对象。我在中共的监狱里生活了二十二年，除了 1962 年因监狱生存条件恶劣，死亡甚众，清放了一部分老弱病残的就业人员以外，绝大部分劳改、劳教期满，年龄不大、有一技之长的都被长期留在劳改系统的工矿或农场就业，旧的不去，新的不断地来，监狱人数不断地增加，规模不断地扩大。

苗溪茶场是四川省乃至全国的重点监狱之一，以地形险恶，交通蔽塞，管理严格，难于逃脱著称，文革期间曾关押胡风[3]等知名人士。

此地 1949 年前庙宇甚多，依山傍水而建，原名庙溪。劳改队进驻后破除迷信，拆毁庙宇，加强专政，打造监狱，改名苗溪。灵鹫古刹破坏殆尽，淳朴民风不复存矣。我 1966 年 11 月被押送到苗溪茶场第十三中队，以犯人身份服苦役，直到 1979 年 11 月宣布无罪释放后返回成都，在这个罪恶之地生活了十三年，有责任将这一段历史记录下来。让年轻的读者了解真实的监狱，但愿苦难的中国人不再有类似的遭遇。

附注：

[1]1966 年夏季，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发起“红海洋”活动，带头在闹市区商店、机关、学校的大门、院墙墙壁等视力可及之处喷涂红色油漆，再用黄色油漆书写忠于毛泽东的标语和毛泽东语录。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此风潮迅速蔓延全国各地，乃至当时的商店、机关、军营、学校、街道、工矿、医院、车站、港口等公众场合的大面积墙体都淹没在红色油漆之中，连厕所外墙也不放过，加上红卫兵、红袖章、红宝书、红色政权、红色恐怖，无异于红色邪教。全国库存的红色油漆售罄，各厂加班生产仍供不应求，制造油漆的化工原料告急，需花费大量外汇进口。1966 年 12 月 30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制止所谓“红海洋”的通

知》，延续了半年的红海洋革命行为被视为非法，继续涂抹的活动被叫停，但并未及时清除“红海洋”斑驳的颜色，毛泽东去世后方逐渐消逝，时至今日演绎成了光怪陆离，令人眼花缭乱的广告，只有六十年大庆时，胡锦涛之流大张旗鼓地吹嘘“六十年辉煌成就”，个别地区重现了一霎那“红色海洋”，似乎是回光返照。不过瞬间即逝，没有成灾。

[2]灵鹫山位于芦山县城西北六公里，海拔 1100-1575 米，山上植被茂密，林木参天，幽谷清溪，景色怡人，相传为燃灯古佛参禅修炼之所，燃灯道成，迁往峨眉山，故民间流传“先有灵鹫后有峨眉”之说。灵鹫古刹建筑雄伟，气势宏大，仅寺院禅房即多达一百零八间，1949 年前终年香火缭绕，钟鼓悠鸣，为世界华人中享有盛誉之佛教圣地。中共掌权后，寺院全毁，林木多遭砍伐，劳改队进驻后面目全非，变为名副其实的人间地狱。2000 年监狱外迁，当地政府以发展旅游业为名，招商引资，近年来修建了一些简易寺院，香火渐盛。然虔诚的善男信女已寥寥无几，追名逐利者却络绎不绝。今日之神仙也要向钱看了。

[3] 胡风，中共党员，一个在中国现代文坛上备受争议的人物。上世纪 30 年代，在上海与鲁迅交往密切，与鲁迅共同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四十年代，在重庆主编《七月》、《希望》等杂志，联系了众多作家、诗人。

1954 年，胡风上书中共中央，洋洋 30 万言。提出“对文艺问题的意见”。1955 年，毛泽东发动反胡风集团斗争，审查 2100 人，逮捕 92 人，隔离 62 人，停职反省 73 人，把胡风和他的朋友 78 人（其中党员 32 人）定为反革命分子，逮捕判刑。其后，肃杀范围迅速扩大，全国几万人被牵连进去，是毛泽东一手制造的冤假错案。，毛泽东死了以后，80 年代初，胡风事件始获平反。

三、苗溪茶场第十三中队概况

(1) 房屋建筑

苗溪茶场第十三中队关押刑期十五年以上的重刑政治犯，是苗溪茶场的重点监管区。海拔不高，以种植粮食和果树以及棉花、甘蔗、烟草、花生、西瓜等经济作物，和养猪、养鸭、养鱼等副业为主，供给场部干警农副产品。距场部只有十分钟的路程。

从场部沿着一条碎石路向东南而行，迎面可以看到山上的果树、山腰的耕地和山脚下的梯田，那就进入十三队的地界了。

路边的缓坡上栽种着一丛一丛慈竹，亭亭玉立、绿影婆娑，微风起处、簌簌作响。绿竹掩映下有二十余间平房，木椽、灰瓦、白墙，显得十分幽静、安谧。错落有致的平房前面是一个长方形的院子，院子周围是万年青、七里香等灌木丛构成的绿色篱障，鲜花盛开的季节空气中还弥漫着股股沁人心脾的香气，好一幅山野田园景色。这些都是劳改犯修建的，这里住着劳改队的狱卒及其家属。

狱卒居住区的下面是一个近乎方形的坝子[1]，长宽约五六十米，地面是坚硬的三合土[2]，收获季节用作翻晒稻谷、小麦、玉米、油菜；淫威大发时可容纳三千人召开公判大会、宣判大会；遇上一月一次打牙祭[3]，就是几百名犯人席地而坐的露天餐厅。

坝子的北边是只有砖柱和顶棚的敞开式库房，遇到下雨可以很快地把晒坝里的东西抢收到屋子里。库房的西边是犯人厨房，每到开饭的时候犯人在窗口外排队打饭。

坝子的南边是大约两米高的石头堡坎[4]，堡坎上面是砖柱灰瓦竹木结构

一楼一底的风干房，楼层之间不用密实的地板而是一根根荆竹，上下通风透光，踩上去喳喳作响。楼上用于某些农作物的风干，楼下用做饲料加工，化肥仓库。风干房西边有一排平房，分别是提讯室，外调室和司务长的办公室。

坝子的东面是一堵五米多高的白色砖墙，当中是一道沉重的包着铁皮的大门，门洞上面有岗楼，持枪武警昼夜值班。白墙上写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改恶从善，前途光明”十六个大黑字，黑白煞是分明，阴森严峻、冷漠肃然之气油然而生，显示这里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劳改队。

白墙里面是一个斜倚在山坡上的大院子，东西长约五十五米，南北宽约二十五米。高大的砖围墙依山势而建，围墙上面有电网，院子四个角上均有岗楼，对监舍形成火力交叉之势。

院子因地势高低不同分成三个梯级，每个梯级的落差大约两米。

南墙居高临下，有角门与院内相通，南墙外面是管理员住房和值班室，常驻一个班，有十余名武警，负责监守院子里的犯人。

南墙根下面是一个宽约三米的平地，往下有一个卵石砌筑的堡坎，此地严禁犯人攀登，只供监狱的干警点名、训话、批斗犯人时在上面发号施令。院子里唯一的一株树在这块平地的西边，是一株四米来高的桂花树，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来的，不知道经历过多少灾难没有被砍伐，也不知道被关在监狱里多少年才长得这么高，五十年代初，修建这个监狱时就有这棵树，无人施肥，无人管理，桂花树依然伴随着关押在这里的重刑犯顽强地生长着。每逢仲秋，院子里飘散着沁心入肺的桂花香，凡是进来的人忍不住要深呼吸一口，香气对每个人都是平等的，犯人也享受大自然的恩赐。

高约两米的堡坎下面是一块宽约八米、长约五十五米的院坝，这是犯人的室外活动场所，但是要从监舍到院子必须喊报告，且不准三五相聚、不准交头接耳、不准东张西望、不准东游西逛，如此多的禁令，也就只好无事不登三宝殿了。

坝子的堡坎下面就是监舍了，监舍长约三十米，宽五米有余，是一楼一底的木结构楼房，里面关押着三百多人。监舍面向南，迎面一米就是高约两米的卵石堡坎，监舍的后墙距电网围墙一米五左右。建场初期，山上有很多大树，任由劳改队砍伐，于是修建了这座除了屋瓦以外全是木结构的监舍。1972年拆除一楼一底的旧监舍，在原址修建面积更大的砖柱砖墙的单层新监舍，从旧监舍拆下来的木料竟然没有用完，可见当初是何等地浪费木材。各地上报林业部的数据却是每年植了多少树，造了多少林。曾经当过林业部部长的雍文涛说过一句老实话，他说：要是相信这些数字，我的床上就都是树了。这位部长的脑筋还算清醒。大监舍西边是一排连体平房，头一间是医务室，有一个刑满释放被强制留在劳改队就业、半路出家的卫生员，名字叫廖觉先，负责第十三中队在押近四百名犯人的医疗。其余五间是特别修造的禁闭室，用于关押“不服管教”的犯人。监舍的东边是只有屋顶没有围墙的敞开式厕所，便于岗楼里的武警监视。

以上说得似乎很复杂，其实依山而建的院子里就只有三个建筑物，一排低矮的平房，一座两层的监舍（1972年以后改成了平房），一个敞开式厕所，都在岗楼上的机枪射程之内。

还有一颗孤零零的桂花树。

附注：

[1]西南地区对山间平地的称谓。大到整个成都盆地（川西坝子），小到房屋之间稍大一点的空地。

[2]熟石灰、黏土和炉渣配制的掺和料，与水混合后铺筑地面，经夯实、磨光，质地坚硬，表面光滑，抗水耐磨。为缺乏水泥时西南地区民间常用的地面材料。

[3]旧时地主或老板雇工，每逢农历初二、十六午餐或晚餐必然有荤菜，多半是回锅肉或酱爆肉、烧白、粉蒸肉，犒劳长工和雇工。俗称打牙祭。

[4]用条石，卵石等砌筑或堆码成的保护体，四川俗称堡坎。

（2）狱卒和武警

劳改队的管理人员有两类。

一类是属于司法系统的监狱干警，负责对服刑人员实行管制、教育、改造。按他们各自的职务分别称其为中队长、指导员、司务长、干事等，是直接主管，几乎每天都要与犯人接触。

另一类是部队编制的武警，负责监狱的外围警戒，也就是站岗放哨，服刑人员统称其为管理员。通常不参与对服刑人员的具体管理，主要任务是防止越狱。

十三队的狱警狱卒约二十人。时间隔久了，且我已年逾古稀，记忆力大不如前，一些人的名字想不起来了。现将概略情况记述于后：

中队长张成英，河南人，农民出身，四十年代入伍，五十年代二十三岁即在中共军队中任连长，共产党员。转业后在劳改队任中队长，主管生产。此人性情宽厚，没见过他打骂犯人，只要不违反监规他不多管闲事。犯人慌了悄悄地用衣服等物品向当地老乡换点吃的东西，或者偷吃一点地里长着的瓜果蔬菜，他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装作看不见，或貌似严厉地训斥几句，是一位老好人。

对于文革中大树特树毛泽东的绝对权威，对党内的派系斗争，他有看法但不轻易表露，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哲保身但求无过。偶尔含糊其辞地透露一点难辨真假的信息，从不明白表示个人观点。1970年，跟了毛泽东几十年的陈伯达被软禁、批判，一向玩弄阴谋诡计的毛泽东未敢在报纸上公开报道，张成英从内部参考或小道消息得知此事，自言自语地说着：“自称小小老百姓成了大大野心家，被打入冷宫喽”。关心时政的犯人一听就明白，陈伯达遭整了，但在公开场合不敢议论。

当时监狱里捆绑吊打成风，他不参与，躲得远远的，也不敢反对，唯恐戴上右倾帽子。服刑人员不怕他、不疏远他，但是听他的话，偶有冒犯他也不追究。

有一次收小麦，麦子还没有完全成熟，差四五天才充分乾黄，他错误地估计可能要连阴天，决定开镰收割，割回来以后因为麦穗湿润难于脱粒，我们十几个服刑人员围着一台脱粒机连续干了二十小时，疲惫不堪。下午六点钟，他喊吃了晚饭继续加班。我说：“报告中队长，今天不能干了，在脱粒机旁边打瞌睡很危险，已经有人受伤了，需要睡觉”。麦粒脱不下来，景队长和唐炳南看他的笑话，讥笑他麦子还没有完全成熟就开镰。他心里着急，对我发脾气说：“你什么人？”那意思是说你是犯人就要无条件服从，我愣了他一眼，大声回答说：“**我中国人**”，气得他说不出话来，旁边的十几个犯人都愣住了，害怕中队长要动大刑。张成英却没有对我惩罚。吃过饭他决定当晚不加班了。“牛眼镜”“中国人”由此成了俏皮话，流传了很久。

中队长景益春，河南人，五短身材，体型偏瘦，我在狱中时他已年近花甲，满脸皱折，灰白短发，戴个老花镜。他喜欢喝酒，不常打人，但是爱骂人，尤其是喝了点酒以后，借酒发疯，满口脏话，把犯人骂得狗血淋头，好像挖了他家祖坟似的。他不大过问服刑人员的思想，但是根深蒂固地认为判刑必然正确，犯人必定有罪。不承认冤狱，糊涂到极点，从心眼里认为被关押的反革命必定都是反动的，对毛泽东在文革期间的倒行逆施毫无怀疑。他出身农民，生活节俭，对服刑人员的劳动要求特别苛刻，属于那种“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刻薄地主的角色。他喜欢看犯人没完没了的干活儿，见不得犯人休息一会儿。

有一年夏秋之交，上午八九点钟，我在山上割草，规定每天要割四百斤，背到牛圈过秤，完不成任务就要继续干。头天才下了雨，脚下的泥土松软，山地坡度大，很滑，我把割下来的草紧紧地装在背架子上，把背架子套在身上，猛然一起肩，哧溜一下子滑倒了。右腿膝盖剧烈的疼痛，已经使我站不起来了，幸好工地离队部不远，和我一起劳动的难友田成义（前志愿军排长，懂朝鲜语，翻译。以反革命罪入狱，1979年平反后回了原籍辽宁，在营口一家小型仪器厂当头儿）把我背回了监舍，一开始大小便上厕所都要人背，医生检查的结果是半月板破裂，第二天膝关节部位肿痛难忍。要是生存条件好一点，需要做核磁共振造影，确定破裂方向、大小、形状以后，做半月板切除或修补手术。可是在监狱里，只是当天下午没出工，没有进行任何治疗，幸好十三队有一位姓高的难友熟悉草药，我托他在山上扯点活血化瘀、止痛生肌的草药，捣烂了贴敷在伤痛关节，用一块旧布包扎起来。第二天这位景中队长跑到监舍院子里大声喊我，严厉地说：“地里的活儿不能干，手还能动嘛，出去捆叶子烟”。我只好驾着双拐，一步一挪地走到坝子里的库房，坐在地上整理、捆扎才从地里收获回来的菸叶子，把三四匹菸叶子叠在一起，一串一串地穿在草绳子上，晾在库房里阴干。待到叶子蔫了，颜色由绿转黄了，白天拉出去晒太阳，晚上收回库房吸潮，如此反复两三次，趁烟叶乾而不脆之时，大把大把地捆起来，用草绳子裹紧，堆在木桶里发酵，七八天后就成了金黄色的叶子烟。那时候物资供应紧张，纸烟价钱既高又要定量，而且烟丝里面掺杂着大量菜叶子（卷烟厂门口公然贴着收购甘蓝叶子的布告），大部分山区的农民和劳改队的狱警都抽叶子烟。我忍着疼痛这么干了十三天，景中队长又来了，他说：“你休息半个月啦！可以下地了，准备秋播耕地，那儿多一条牛，还没人使呢，你去牵牛、耕地”。我不敢违抗，只得一瘸一拐地到牛圈牵出来那条老黄牛，使牛耕地去了，使牛的人中午和晚上厨房多给一勺菜，对于一个常年吃不饱的犯人来说，这可是天大的恩赐，虽然耕地是很累的农活儿，但一天可以多吃两勺水煮菜帮子。感谢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制定了如此优越的多劳多得政策，也算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吧。

指导员周金仁，四川雅安宝兴县人，从部队转业后在劳改队当干部，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表现甚为积极，善于投机钻营，文革初始即升为中队指导员。周金仁生性残忍，阴险狡诈，以肆意折磨犯人为乐事，十三队捆绑吊打成风他是始作俑者，可以说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罪不容诛。

俗话说“相随心转”，这个周金仁第一眼给人的感觉就是刁钻凶狠。八字眉、三角眼、塌鼻梁、鼻孔外翻、嘴角下撇，典型的三花脸。

他文化不高，大概是个高小生，嘴里新名词却不少。他没有认真读过《毛泽东选集》，更不用说阅读马恩列斯的著作了，靠背诵几百条毛泽东语录装点

门面。经常挂在嘴边的话是“对于反动派，必须实行独裁”、“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谁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等等。

他能够背诵的最长的一段语录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力，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每当他背诵这段语录的时候，表情总是那么洋洋得意，好像是小学生考上了中学似的。

每逢他当班，晚上集合点名的时候必然要训话，表情凶神恶煞，语言杀气腾腾，最常说的是：你们要规规矩矩，谁要是抗拒改造，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

隔两三个月周金仁就要发表长篇讲话，似乎是让人们记住他是指导员，在所谓政治挂帅的年代，指导员就是党的化身，他文化低，发言稿是犯人写的，南下干部四川日报记者共产党员背负着二十年有期徒刑的反革命犯王地山[1]是主要撰稿人，周金仁只能结结巴巴的念，偶尔还要念别字，比如肆无忌惮念成肆无忌惮，怙恶不悛念成古恶不悛，甚至有一次把泰国念成了秦国。谁也不敢给他指出来，权当笑料而已。

1966年他是第十三中队指导员，苗溪茶场党委书记董霞云偶尔来十三队溜达溜达，周金仁必然老远跑出来笑脸相迎，在书记面前俯首帖耳，唯唯诺诺；场长姜同海来的时候，他更是低头屈膝，做出一副毕恭毕敬的样子。

1967年，周金仁成了响当当的造反派，开始夺权，苗溪茶场的书记董霞云和场长姜同海都被打成了走资派，董霞云被下放到十三队监督劳动，姜同海被下放到太平山区监督劳动。周金仁职务未变，常常披着一件狗毛领子的军大衣，昂着头走来走去，旁若无人，越发显得神气了。

1969年中共九大以后，董霞云和姜同海官复原职，周金仁夺了半天权没爬上去，还是十三队的指导员，只是嘴角比原来下撇得更厉害了，那件军大衣也不见穿了。

1971年9月中旬以前，周金仁讲话的时候必然要高喊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10月份以后，林副主席突然不健康了，敏感的狱中人从他嘴里感知到林彪出事了，随后，大张旗鼓地批判林彪的“克己复礼”[2]、“五七一工程纪要”[3]。他依然是十三队的指导员。

1974年1月18日，毛泽东批发中共中央1974年1号文件，转发由江青主持选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全国开始了“批林批孔”的运动，实际矛头是指向周恩来的，“评法批儒”“批现代大儒”“批周公”等影射文章连篇累牍。周金仁又是个积极分子。

1975年，周恩来病重，邓小平复出，他把毛泽东在不同场合说的三句话，即：“要学习理论，反修防修。要安定团结。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串起来，名之曰“三项指示为纲”，拿着鸡毛当令箭，实际上是打着毛泽东的旗号，否定毛的行为。且邓小平一贯看不起江青，时有顶撞、讥讽之言。毛泽东虽卧病在床，对否定文革、贬低江青如骨鲠在喉，于是发起了“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再次拿下邓小平。周金仁先是大力宣扬“三项指示为纲”，赞扬邓小平，随后又积极附和“誓死捍卫江青同志”的口号，竭力批邓。还是十三队的指导员。

1976年4月4日清明节，天安门广场事件爆发，较早醒悟的群众以悼念周恩来为名，反对秦始皇式的暴政，触动了毛泽东的法西斯统治，华国锋连夜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认定天安门广场上的悼念活动是“反革命事件”。随之，于1976年4月5日晚，出动一万余名民兵和警察手持棍棒封锁天安门广场，殴打群众，并逮捕了数十人。周金仁为此大声叫好，对在押犯人极力恐吓。

1976年9月，毛泽东死了。周金仁装出一副如丧考妣的样子，大力鼓吹“按既定方针办”“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继续批邓”。

当年10月，“四人帮”被捕，周金仁又跟着喊起了“拥护华主席”。

周金仁就是这样一个乏走狗，对在押人员凶狠无比，对顶头上司摇尾乞怜。十三队的捆绑吊打之风是他兴起的，十三队的手铐脚镣是他滥施淫威惯用的工具，十三队折磨人的小监是他督造的，然而他却是劳改机构的不倒翁。

1986年我在重庆第二机床厂偶遇苗溪茶场的采购人员，据说周金仁当上了苗溪下区的大队长。中共监狱之所以刑讯逼供成风，法西斯暴行屡禁而不止，就是因为周金仁这类酷吏当道。酷吏不除，国无宁日。

周金仁至今（此节写作于2013年9月）还活着，已退休，住在芦山县原苗溪茶场场部附近的宿舍区内。有兴趣的读者不妨去采访。

一工区分队长田家伦，转业军人，忠于职守，不甚苛刻。犯人只要劳动积极，能完成任务，他不多管闲事。

二工区分队长唐炳南，兵痞出身，嘴歪眼斜，颧骨高耸，戴着一副矫正视力的眼镜。俗话说眼斜心不正，唐炳南一肚子坏水，整起人来极端残忍，他在犯人面前的口头禅是“死了当毬疼”、“死十个，数五双”，这也是他的心里话。时常想出刁钻古怪的办法整人。唐炳南对精神不正常的病人特别狠，他说：神经病不知道冷热。于是在严冬之际，他让精神病患者脱了上衣，裸露着瘦弱不堪、肋骨突出的胸背，跪在凹凸不平的鹅卵石地面上，寒风凛凛，滴水成冰。直冻得这些人浑身战栗发抖，上牙打下牙。唐炳南手持一根荆竹条子，不时地抽打几下，边打边问：冷不冷？看着被打的人快要倒地了，才让其他犯人把他拖进屋去。隔几天再来一次，他说这是治疗精神病。

1967年到1968年间，唐炳南“造反夺权”，似乎进了监狱革委会，至少在十三队掌了点权。披着一件带狗毛领子的军大衣，趾高气扬地晃来晃去，显出一副吃乾抹净的样子，专拣人多的地方走，犯人见他来了，连忙退避三舍，避鬼神而远之（孔夫子的原话是“敬鬼神而远之”，这里借用，改了一个字）。

犯人常年吃不饱，他是知道的。十三队每年栽种近百亩红苕，可收获二十余万斤，红苕不易储存，从九月底到十一月中旬，犯人的主食从玉米改为红苕，玉米相对容易储存，留下来喂猪。唐炳南没掌权的时候，吃红苕是不定量的，虽然一天吃三顿红苕会胃酸，营养也过于单调，但不定量总有点饱足感，对常年处于饥饿状态的犯人来说，是难得的享受。唐炳南造反得逞，掌了权，他常说：伟大领袖教导我们“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忍”。据此宣布红苕定量，每顿四两玉米折合两斤红苕，吃玉米的时候，每顿有一斤左右的菜，吃红苕的季节，取消了蔬菜，只给一点腌菜叶子烧的盐水汤，一日三餐，每餐只有两斤红苕，还要繁重的劳动，搞得多数犯人腰酸腿软，全身无力，一个多月以后，把不易储存的红苕吃完了，才恢复原状。红苕是犯人种的，众多犯人精耕细作，用心管理，使产量不断提高，一亩地至少收获

两千斤红苕，年成好的时候亩产可达四五千斤，犯人们长年挨饿，指望着红苕收获季节可以吃饱，唐炳南一掌权，实行定量，红苕也吃不饱了，众人只能悄悄地骂他歹毒，咒他不得好死。1969年下半年，他夺来的权，被别人夺回去了。他不当权了吃红苕也不定量了。

大约是1968年1月30日，农历正月初一，唐炳南值班，他巡视监舍，见犯人夏永昌（曾在国民党军中任中尉，1949年起义，1955年肃反运动中被认定为历史反革命，判处徒刑十五年，刑满在即）蹲在监舍门口，左手端着一个小小土瓷碗，右手拿着一双筷子，低着头、乐滋滋的，夹起一根一根深绿色的东西，往嘴里送。遂上前责问：“你吃什么？”夏回答说：昨天在山间河谷割喂牛草时，挖了几株荠菜，回来加了一点盐巴，当菜吃。唐勃然大怒，厉声追问：今天是什么日子？夏不知其意，站起来立正回答：报告唐队长，今天是春节，大年初一。唐炳南大声吼道：你个龟儿子[4]，大年初一吃野菜，你他妈的故意丑化社会主义！夏永昌还想分辩，唐炳南不由分说，马上喊两个犯人，把夏永昌捆起来，夏永昌疼痛难忍，连声哎哟、哎哟的叫唤，唐炳南拿竹竿顺手从地上挑起一块包脚布，让犯人打手塞到夏永昌的嘴里，防止他喊出声音，以免破坏春节的喜庆气氛。此事已过去四十余年，夏永昌大年初一因为吃点野菜被捆得嗷嗷叫唤、唐炳南用包脚布堵他嘴的情景，是中共监狱的法西斯特色，我难以忘怀。

唐炳南主管二工区，四十多个犯人，至少一半挨过他的打，二十余人挨过捆绳子，十多个人戴过手铐、脚镣，百分之百挨过他的骂。提起唐眼镜，莫不恨之入骨。

某日他在工地上训斥犯人，日妈倒娘的乱骂，那个犯人年逾花甲，体弱多病，任凭唐炳南呵斥，默不作声，可以说是服从管教了吧。唐炳南却不依不饶，在这位比他大十几岁的老者面前满口脏话，还扬言：“格老子”看今天晚上怎么收拾你！终于激怒了老人，只见他扬起手中的锄头奔唐炳南而来，一边走一边说：“骂了半天你还没骂够？老子跟你拼了”，唐炳南连声大叫：“狗日的，你敢打国家干部！”“把他捆起来！”在旁边干活的十几个犯人，装作没听见，没有回应。眼看老者高举着锄头越来越近，唐炳南二话不说，撒腿就跑，头都不敢回。

唐炳南现已退休，笔者写这段文字时打听到他仍住在苗溪，唯一的儿子害白血病死去多年，他孤身一人穷愁潦倒，冬天穿一件原本是绿色如今胸前油光光的军大衣，坐在茶馆喝茶。这个作恶多端的狗腿子不知对往事忏悔否。

三工区分队长徐绍华，十三队有三个心狠手辣、嗜好捆绑吊打的狱卒，周金仁、唐炳南、徐绍华。徐也是部队转业，好像是个班长，此人鹰鼻鹞眼，面部骨骼清晰，在部队练过武术和擒拿摔跤，肌肉发达，腰腿矫健。徐绍华在十三队算是年轻的狱卒，资格不老，野心不小，文化不高，诡计不少，生来争强好胜，尤喜沾花惹草。他是当地人，老婆是朴实的农民，心地善良，平时在农村的家里种地、喂猪，带着一个两岁的儿子，两三个月来劳改队住上个把星期，随即返乡，乐得徐绍华一个人逍遥自在。

徐绍华生性狡黠残忍，三工区的犯人至少有三分之一挨过他的绳子，在那个时候，捆人多，表示阶级斗争观念强；对犯人凶狠，表示忠于毛泽东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但是“爱捆人”终究不是什么好名声，他便借他人之手整人。大约1968年2月，我半夜起来解手，遵照十三队的规矩，从被窝里爬

出来披上棉衣站在监舍门口，面向管理员岗楼高声喊：“牛立华报告，解手”，然后顺着屋檐前面的小路径直跑向厕所，解完大小便后再高喊一声“牛立华报告，解手完毕”，即可回舍房，那天我正在往回走的时候，突然岗楼上大吼一声“上来”，我只得上了几步梯坎站到坝子里。这时南墙的角门开了，走出来一个黑影，到了灯光底下才看清穿着一套军装，是个管理员。他厉声问道：你叫什名字？我连忙应答：牛立华。他又问：犯的什么罪？我想了想：管理员通常是不管这些的，只负责武装警戒，今天是怎么了？于是含含糊糊地回答说：“反革命”。他说：为什么要反革命？这我可难于回答了，在颠倒黑白的社会里，革命与反革命谁人又能够说得清楚呢？跟了毛泽东几十年的刘少奇不是从国家主席的位子上一夜之间被叫做叛徒、内奸、工贼了吗？文革期间被莫须有打成反革命的数以千万计，谁又能说得清楚呢？历史会公正判定的，但口头上却没有想好适当的词语回答他。仅一两分钟的时间，他忍不住了，现出了狰狞的本相，从堡坎边上走到坝子当中，手里拿着一根捆人的绳子。恶狠狠大声对我喊道“站好”，随之扯掉了披在我身上的棉衣甩在地上，把绳子搭在我肩上，熟练地展现其残酷的捆人术。山区的二月，寒更半夜。我裸露着上半身、仅穿着一条短裤、光着脚站在冰凉的卵石地面上，手臂上的绳子一阵比一阵紧，像是往肉里钻似的，豆大的汗珠浸出了额头，刺骨之痛令人难忍。夜深人静，为了不吵醒别人，我咬紧牙关，低声呻吟着。那个管理员站到墙根抽烟去了，再也不问什么话了。约莫过了一小时，他才走过来骂骂咧咧地说：不认罪就要收拾你，然后解开了绳子，喝令一声：“下去”。我拣起地上的棉衣，穿上鞋，用仇恨的目光看了他一眼，回到了监舍。躺在稻草铺上，迷迷糊糊回想着刚才的一幕，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天亮起床，几个难友过来问：昨晚上是怎么回事？有人悄悄说：徐绍华搞的鬼。有人说：昨天那个人姓梅，是个班长。我默默地沉思，对于管理员，一向采取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冤狱不是他们造成的，我用不着跟他们讲道理，平时尽量做到“礼多人不怪”，报告喊大声点，管理员叫勤点，不惹事，不出风头，怎么突然找起我的茬儿来了？究竟是谁搞的鬼？百思不得其解。这个姓梅的丘八，一周值一次夜班，连续三周，逢他值班我必挨捆，每次把我捆起来以后，他就躲到一边抽烟，从来不跟我多说话，我和他远日无冤近日无仇，这里面必有蹊跷，我豁出去了，要跟他讲讲道理，要问他个水落石出。捱到三月中旬，夜半，又是那个姓梅的值班，他把我捆起来以后，打开角门竟自回去了。整个坝子里就我一个人被五花大绑着，昏暗的灯光在电线下面晃悠悠的挣扎，山区监狱寒冷的夜晚更显得阴森恐怖，不一会儿，角门吱扭一声打开了，出来一个军人，留着短发，皮肤较白，他走到我前面的堡坎上看了看，问道：你犯的什么罪？我说：“我没犯罪。解放的时候我还是个孩子，在北京市第七中学读书，1949年就戴上了红领巾，以后又加入了共青团，在重庆兵工厂当技术员，给解放军做枪炮子弹。我的哥哥姐姐都是共产党员，哥哥在济南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工作，姐姐在中央机关幼儿园，弟弟在甘肃军区，妹妹在黑龙江建设兵团。我为什么要反革命呢？”听了我这些话，他似乎若有所思，问道：“你为什么被判刑？”我回答：法院说我讲了反动言论，说三面红旗执行左了，大跃进的成绩不真实。粮食产量虚报数字，老百姓吃不饱。他又问：“你为什么要组织暴动？”我吃了一惊，这罪名可不是闹着玩儿的，连忙分辨说：“我在外面都没想过暴动，到监狱里面怎么暴动呢？我又不会开枪，要是暴动非得让管理员打死不可，死了还好些，免得活受罪，打个半死不活

就麻烦了。”“要是你值班，请瞄准点，一枪见红最好”。我故意说些涮坛子的话，制造一种轻松的气氛。他听了以后没说什么，走过来把绳子松开了，这次捆了不到半小时，我随后回到舍房睡了一会儿。过了几天姓梅的那个王八蛋调走了，十三队又消停了一点。事后我才弄明白，真是徐绍华搞的鬼。他平时和那个姓梅的有点交情，对梅说牛立华怎么怎么反动，要组织暴动，让他狠狠地收拾收拾。今天来这个军人是副排长，下来检查工作，我才得以提前解了绳子。徐绍华的歹毒令人忿恨。

大约是1970年大年初一这一天，按照四川的习俗应该吃汤圆，劳改队没有条件，只是配给了200克糯米由大厨房蒸成了糯米饭。十二个人围成一圈蹲在地上，一勺一勺地把脸盆里的饭分成十二份，朔朔的寒风不解人意早已把糯米饭吹得冰凉，然后是分糖，所谓糖不是甘蔗或甜菜提炼的糖，而是十月份吃红苕季节留下的甑脚水，大厨房收集起来存在坛子里，大年初一放在铁锅里熬一道，状如沥青，红褐色，苦中带着微甜，还有点酸涩的感觉，每份糯米饭上倒一瓢，即是文革时期托共产党的洪福具有中国监狱特色的年夜饭，凡有运气享用者还要背几句毛主席语录，感谢他的恩典。三工区有个犯人王义云，四川大邑人，农村泥水匠，砌墙垒灶的手艺不错，性格倔犟，文革伊始被打成反革命投入劳改，偏偏患有胃病，肚子虽然饿得咕咕叫，端着这搪瓷盅子里一年才能见到一次的喜气洋洋的糯米饭却不敢动口，只好拿回舍房悄悄地放在炉子台上，等到煨热了慢慢吃。狱卒徐绍华进来查房了，他走到炉子边，几个劳改积极分子连忙起身让座，他逐一打开炉台上的盅子，开水居多，突然看到了糯米饭，厉声问道：这是谁的？王义云连忙站起来回答：报告徐干事，我胃疼，不能吃冷东西，稍微热一下。徐绍华凶神恶煞地吼道：不准煨煮，你知不知道？王义云低着头不做声，徐又说：你说怎么办？王义云答道：徐干事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徐立即喊：杨应椿，拿去喂鸡！犯人杨应椿应声而起，站在那里犹豫了一两分钟。徐不耐烦地说：快点，端走。杨看了王义云一眼，使了个眼色，意在让王义云告饶，不料王义云一屁股坐在铺上，咬紧牙关不言不语。杨端着饭盅下楼去了。徐跟着喊：回来！众人皆以为徐绍华改变了主意，大年初一可能放王义云一马，谁知杨应椿回来后徐立即让蹲在炉子旁边的李海山抓把炉灰丢在饭盅里搅了一搅，防止杨应椿在路上偷吃。一顿盼了365天的年夜饭就这样让徐绍华搅了局，激起了众人的愤怒也暴露了中共监狱中狱卒的歹毒。

徐绍华三十多岁，夫妻两地分居，独身在劳改队当干部，耀武扬威，与当地老乡多有瓜葛，见了女老乡更加嬉皮笑脸。犯人对此等事不敢多言，上山干活都希望高家山那位寡妇快点来，她一来徐绍华就躲入工棚和老乡摆龙门阵去了，他们响应毛泽东号召“军爱民，民拥军”。犯人乐得免于挨骂，只要完成任务就按时收工。

管教干事向义文，西昌农业专科学校毕业，思维活跃，喜欢写点文章，文笔不错，还能吹笛子拉胡琴。六十年代末分配到劳改农场，起初当技术干部，调到十三队以后当了专职管教干部。新官上任三把火，劳改队的管教干事虽然连个芝麻官都算不上，但火总是要放的。

林彪事件之后监狱里指使犯人办墙报，我也响应号召写了一首应景的歪诗：

“碧空如洗万里晴，残云驱尽玉宇清。全党义愤逐叛逆，举国欢欣除祸星。

狠批野心天才论，怒斥阴谋政变经。狼奔豕突终有报，折戟沉沙恶满盈。”

得到了向义文的肯定，准予抄写刊登。在他看来，十三队关押的都是重刑政治犯，虽然四分之三左右是农民弟兄，文盲和半文盲占多数，但队里也有几十个大中学生，还有几位教授、学者。平均文化程度较其他队还是要高一点，应该显示出十三队的水平来，墙报办得好更是管教干事的成绩。此后，每逢办墙报我必然写一两篇既给向义文捧场也做点文字游戏的稿件。当然大家都经历过政治运动，知道文字狱盛行、诡辩术当道是毛泽东时代的特色，在劳改队写文章难、写诗更难，诗无达诂，读者的心理、情感状态不同，对同一首诗，常常会做出不同的解释。毛泽东主政期间，形而上学猖獗，乱扣帽子之风尤甚。有几个立功心切的“劳改积极分子”随时窥测着，妄图拈别人之过以争取捞一个“靠拢政府”的美誉，或许会减刑呢。例如“碧空如洗”这几个字本出自宋代张元幹水调歌头一词，多人沿用，已相当普及。在中国的劳改队里却有人说：“碧空如洗涉嫌一贫如洗，不当，不当”，幸好管教干事未予追究，我才躲过一劫。

七十年代初，苗溪茶场搞了个“学毛主席著作，促思想改造”活动。由女二队的犯人章治和[5]现身说法，汇报改造经历。会场设在十三队，各中队组织了近三千名犯人，坐地视听，坝子挤得满满的。章氏之演讲不卑不亢，幽默风趣。犯人听一笑置之，干部听后充分肯定。向义文比较敬业，总想搞点成果以彰显个人的工作能力。随即召集十三队的犯人王地山、许诚、牛立华开会，声称十三队也要拿出像样的东西来，掀起一个加速思想改造的高潮。他要我们三个人一人写一篇，三天以后交卷。上面有旨意，不得不服从，乐得三天不用出工，搜肠刮肚的写了将近两万字，按时交了卷。第五天向义文又召集我们三个人开会，劈头就来一句：“我看了两天，全都不及格，语汇贫乏，枯燥无味。你们三个都没有敞开思想。”“这个水平见不得人。”一边说一边摇头。我低着头暗自想笑，连忙用手捂住嘴，心里在想：言为心声，行为意表，我写不出来通篇都是假话的文章，赶鸭子上架，没有灵感怎么会有好作品呢？向干事接着说了一句：比较起来，牛立华这篇稍微好一点，还是不及格。王地山出来谦恭地打圆场，他说：“向干事，您给他点拨点拨，就让牛立华准备发言得了。”向义文听了马上说：“不行，不行。他是全场闻名的不认罪，上不了台”。随即决定由王地山综合三篇底稿重新整理一篇，准备下次典型发言。我一下子松了口气，谢天谢地。

许诚和王地山走了以后，向义文站在院子里对我说：不认罪是个大问题，你解决了认罪问题，公开低头，我给你想办法。我说：向干事，谢谢你，你要是给我搞一份减刑三年的裁定书，我给你退回来。他瞪了我一眼说：为什么？你说说看。我回答：**我接受了减刑裁定书就等于承认了判决正确。欠了十五块钱，只还三块，还要表示感谢，我想不通也办不到。对我的判决既无犯罪事实也没有法律依据，我只能服刑，不能认罪。**他咬着牙用手指着我说：你呀，你呀！

1976年元旦《人民日报》刊发了毛泽东的“词二首”（《重上井冈山》和《鸟儿问答》）。劳改队的墙报纷纷为其唱赞歌，我也写了一篇奉命之作，全文曰：“红日照海内，春色满人间，东风送来华章，字字扣心弦。缅怀峥嵘岁月，纵览驰骋风云，豪情贯笔端。读罢思潮涌，顿觉胸际宽。驾惊风，逐乱云，劈狂澜，能排五洋恶浪，敢攀万仞山。一任蓬雀啁啾，更鼓鲲鹏扶摇，壮志在九天。猛振垂云翼，开拓新纪元”。狱卒们挑不出毛病，几位难友看

了点头微笑，心照不宣。

过了几年，终于等到了右派改正和徒刑平反，我在十三队竹林下面和人闲聊，向义文老远走过来，双手抱拳，连声曰：恭喜，恭喜。走近了以后悄悄说：我原来认为你很固执，现在觉得你有韧性，有了韧性干什么都能成功，可以搞写作。我告诉他：我热爱我的专业。可能还是搞老本行金属热处理，寒暄了几句，随即握手告别。如今不知不觉已经过了三十五年，再没见过面。他也是七十岁的老人了，不知现在是荣升了还是被贬了。在动荡的年代，在专制体制下，能够平安无事就是天大的福气了。向义文年轻，有点文化，人性还没有泯灭，虽然是劳改队的管教干事，但不凶恶，不管是知识分子还是文盲，在他面前敢说真话，即使有点出格，也不致于挨绳子。顶多就是严词训斥。劳改队这样的干部不多。

十三队大约有二十个属于劳改局系统的干部，除了以上六位外还有：丁司务长、宋司务长，黄会计，李干事（主管医务室和灭螺组），追捕组的周干事。主管农业技术的陈伯愚、林健吾，两位均毕业于四川农学院，反右运动皆受冲击，前者在劳改队埋头技术，有敬业精神，在推广杂交水稻等方面成绩卓著。十三队的水稻亩产从两百公斤跃升到五百公斤左右，他居首功。后者混天度日，当了和尚不撞钟，情绪变化莫测，脸色喜怒无常。多数犯人以精神病视之，在工地劳动时有谁喊一声“疯子来了”，立即鸦雀无声。他东转西转、左看右看了一阵，无人理睬，蹭到钟点便悄悄地下山去了。1979年后二人的右派问题都获得了改正。

其他几位干部和我接触不多，将近四十年已淡忘。毛泽东说过一句话“凡是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十三队的干部里，周金仁、唐炳南、徐绍华似乎必定归入左类，我认为他们根本不懂左右，也绝不是忠于毛泽东，拥护共产党。其凶残恶毒是在败坏共产党毁灭共产党，加速共产党的灭亡。这几个畜生不能称为人，泯灭了人性。多数劳改干部属于芸芸众生，当差吃饭，在极左路线驱使下难免做一些蠢事，参与镇压人民，只要知错必改就好。少数（十分之一二）有点觉悟、不苟同于毛泽东错误路线的人，在相互监督、检举告密之风甚盛的情况下，不敢暴露，谨小慎微，明哲保身，无能为力，时间久了也随波逐流了。这就是文革期间的现实。

管理员：每个中队除了公安干警以外，还配置了军队系统的武警，通称管理员，十三队有一个班。既有农村兵也有城市兵。原本都是单纯的善良的年轻人，入伍后特别是到了劳改队以后，被灌输了不少所谓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难免孳生了许多糊涂观念，譬如认为毛泽东的话一句真能顶一万句，除了社会主义外其他国家的人民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三年大饥荒是自然灾害造成的，凡是被判了刑的都是敌人，对敌人仁慈就是对自己残忍等等。多数管理员恪守本职，只管站岗放哨，点名查铺，不多管闲事。少数不甘寂寞的不时搞些恶作剧以戏弄犯人为乐。例如，一年夏天的中午，集体劳动的犯人们已经吃过了饭，回到舍房。单独劳动的夏联松（农民出身，当过志愿军，朝鲜停战后遣返回乡），当日收工晚了一点，一个人蹲在坝子里啃玉米馍馍，管理员的眼睛真好用，在岗楼上高声问道：你碗里那红色的是什么东西？夏联松连忙回答：报告管理员，是几个辣椒。夏联松平时不多言不多语，肯帮忙，人缘好，那天走到万家山工棚，恰遇到摘辣椒，抓给他一把。那个年轻的武警阴阳怪气的命令道：你还吃得舒服呦，把辣椒吃完了再下去。夏联松不敢违抗，只有在烈日炎炎下晒着太阳嚼辣椒，脑壳上的汗不停地往外冒，

管理员不住地催他快点吃。过了有二十分钟，张中队长进来，走到夏联松面前问了问情况，顿时板起面孔吼道：叫你嘴馋，该罚，给管理员认个错，赶快出去干活儿，下回绝不饶你。夏联松只好面向管理员立正，报告：我错了。岗楼里喊了一声：滚下去！他才回到舍房，赶紧要水漱了漱口，然后捞起锄头出工去了。

附注：

[1]王地山（1932- 2010）沈阳人，十六岁参加中共军队，1949 年夏随西南服务团入川，1957 年在四川大学中文系进修期间被打成右派分子，据不认罪，且发表过歌颂中国与南斯拉夫友谊的诗文，曾意图寻求南斯拉夫大使馆政治庇护，自行跑到南斯拉夫大使馆申请赴南留学，南使馆以礼相待，但表示难以接受其政治庇护的要求，只好匆匆离开，不料走出大使馆不足百步，即被中共安插的便衣扭上汽车送到北京市公安局，旋即押回四川，以投敌叛国罪判处徒刑二十年。入狱后镣铐加身，备受折磨，不得已低头认罪，随即被评为“劳改积极分子”，安排在杂物组给干部打杂。八十年代刑满出狱与当地一丧偶的农民结为夫妇，继后平反，调回成都市，在省委机关任一闲职，时有诗文发表，著有《走出豆豆溪》等书，记录了狱中生活。2010 年发现患有癌症，住在四川省人民医院离休干部病房，我前往探视时他已不能进食，靠输液维持生命，老伴精心照料，但愿能够康复。

补记：写作途中惊悉王地山已病逝，火化后葬于妻子故乡芦山县沫东镇。

[2]林彪的书房中挂了一幅“克己复礼”的条幅，出自《论语·颜渊》。毛泽东据此认定林彪为尊孔派，掀起“批林批孔”运动。矛头所向实为周公恩来。

[3]《五七一工程纪要》据云系林彪之子林立果和于新野等人拟定的武装起义纲领，1972 年《人民日报》曾刊载原文，约四千字。该纪要直言不讳地说毛泽东是秦始皇式的封建暴君。

[4]此处的“龟儿子”和下文中的“格老子”均为四川俚语，有人认为不是粗话、脏话，甚至有人说是爱称，但绝不敢在尊敬的长辈或上级面前说这些俚语。

[5]章诒和是章伯钧的女儿，1942 年生于重庆，中央戏剧学院毕业，其父被划为右派后，文革期间她被四川省革命委员会以反革命罪判刑二十年。七十年代末毛泽东进了停尸房，中共声称要“拨乱反正”，把章伯钧的骨灰移入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室。坐了近十年牢房的章诒和被宣告无罪释放，数年后当上了博士导师。2001 年退休，闭门著述，不断有作品问世，治学严谨，文笔细腻。《往事并不如烟》《伶人往事》皆为上乘之作。

（3）狱中酷刑肆虐

临近 1966 年底。文革已经进行几个月了，需要不断地腾空监狱，以关押日益增多的犯人。1966 年 11 月 6 日，二百多名已决犯从成都宁夏街看守所押解到四川芦山苗溪茶场，其中刑期十五年以上的“反革命”被分配到十三中队，共四十余人。第二天清晨即出工劳动，修公路。这四十多个新犯人夹在一百多个老犯人中间，新犯多数是知识分子，在看守所关押了几个月，住的是不见天日的黑牢，过的是半饥半饱的生活，瘦骨嶙嶙，无精打采。走路都打偏偏，既无缚鸡之力，又无劳动技能，不会用锄头，无力挑担子，第一天出工就出尽了洋相。但在枪杆子底下绝大多数人都尽力支撑着，下面就是我亲临其境的一点经历，是“劳动改造”的一个缩影，从记忆中挖出来供读者分享。

李盛照[1]和张文玉[2]共同抬碎石，肩膀压痛了，手掌也磨起了泡，不由得在工地边上坐了下来，略微休息一下相互揉揉肩膀。监工的狱卒马上高声吼道：你们两个要罢工吗！才进监狱就不老实！谁让你们反革命！对你们就要无产阶级专政。两个人连忙站起来，脱开衣服说：肩膀磨起泡了。狱卒大声吼道：第一天出工就抗拒改造！非收拾不可！立即喊几个老犯人拿绳子过来，把李盛照和张文玉扎扎实实地捆了起来。捆人的动作熟练异常似乎是受过专业培训。只听见李盛照大声吼叫：我没犯罪，我向党中央反映情况全是属实的。张文玉则只是哎哟、哎哟的叫唤。捆了大约一个小时，炊事员送饭到工地来了，才给他们松了绑。我在想，这大概就是公案小说里所说的“杀威棒”，捆两个人是为了震慑新犯，让大家知道劳改队的厉害。

中国共产党的监狱始终没有脱掉痞子、流氓、土匪掌权的本性，从井冈山整 AB 团[3]、富田事变[4]、湘鄂西肃反[5]、江西溃逃[6]前大肆杀戮，无不充满着诡谲、背叛、血腥。乃至 1942 年延安整风、1957 年反右派、1958 年反右倾、1959 年反瞒产[7]、1964 年四清、1966 年文革、1968 年清理阶级队伍[8]、1970 年一打三反[9]、1974 年批林批孔、1980 年反资产阶级自由化[10]、1989 年镇压学运[11]、进入 21 世纪以来的“维稳”[12]等。无一不是以皈依了中共的民众为打击对象。中共口头上说的是为人民服务，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文革是触及灵魂的大革命，实际执行的却是极端的法西斯，以暴力和恐怖剥夺人民的言论自由、行动自由直到人的思想自由，维持其为所欲为的反动统治。从我进监狱的第一天起，捆绑吊打就没有停过。每天晚上的学习会上，都会听到被施以酷刑者发出的凄厉的叫声。

是不是这些犯人违反了监规或是有非法活动呢？举几个实例吧。

林其明：四川新津人，中共空军某机场地勤人员，性格孤僻，沉默寡言。1964 年四清运动中查出其祖辈系地主，被空军清退，在新津街道摆了一个钟表修理摊位维持生活。因服务周到，收费低廉，顾客口碑甚好。文革中不知道为什么被打成了反革命，判刑十五年，和我同在三工区劳改，终日愁眉苦脸，不苟言笑。1967 年夏天，十三队的西瓜上市了，队部派了六个人承担往场部运送西瓜的任务，规定每人每天背运六百斤。林其明上午尽量快走，回程几乎是一路小跑，下午他出工时带上了棉衣棉裤，准备完成任务后在向阳坪下的小河沟洗衣服。不知是哪个劳改积极分子向狱卒反映“林其明要逃跑”，狱卒徐绍华立即不再让他背运西瓜。改在田间劳动。当天晚七点开他的批斗会，强令他交待逃跑的动机和目的，他吞吞吐吐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于是被捆起来吊在一棵树上。他疼痛难忍，豆大的汗珠不住往下滴，断断续续地交待要跑到海边，捡一个旧轮胎，然后跳海，飘到哪里算哪里。这分明是谎言，但被徐绍华记录在案，随时让他感到恐怖和威胁。第二天在工地上，我悄悄地问他：你昨晚怎么乱说一通呢？他说：你没挨过捆绳子，捆起来吊在树上，疼痛钻心，精神都崩溃了，控制不住了。此后他更加沉默寡言，只晓得像奴隶一般的劳动。毛泽东死了以后，经复查原判系错案、冤案，林其明被放回新津，老母逝世多年。妻子改嫁他乡，一个性格懦弱，忍辱偷生的老实人，被中共折磨了一生。

薛彪：四川成都人，高中毕业，在一个工厂当工人。1968 年文革正酣之际被打成反革命，据说攻击了伟大领袖，判刑十五年。薛彪年轻体健但没有从事过农业劳动，初进劳改队，只能干些简单的体力活，如背粪、背煤炭、开荒等等，体力消耗大，终日吃不饱，难免有些怨言。某日晚，狱卒徐绍华

让薛彪检查犯罪根源，薛彪站起来一言不发，徐绍华命几个犯人把他捆起来，他还是一言不发，把它吊在房梁上，他还是一言不发，绳子在手臂上缠了几圈深深陷在肉里，刺骨之痛可以想象，薛彪紧紧地咬着牙关，怒目而视，一声不吭。捆了大约半个小时，他闭上了眼睛，看都不看了。徐绍华才让人给他松了绑。从那天以后，狱卒徐绍华总是离薛彪远远的。躲着他那冷峻的燃烧着仇恨之火的目光。

十三队主要作业地点分为四个工区，每个工区四十余人。承担着大田作业，种植水稻、玉米、小麦、油菜等，还有园艺组、蔬菜组、饲养组、灭螺组、杂务组，这几个组老弱病残居多。捆绑吊打的多少视各工区狱卒的好恶而定，二工区的唐炳南和三工区的徐绍华是最恶燥的狱卒，从文革乍起的1966年到1972年底，那六年多，十三队几乎每天都有人挨捆。每到晚上，凄厉的叫声此起彼伏，阵阵哀嚎不绝于耳。阴森恐怖的气氛充斥于整个高墙电网中间，1972年以后，在诸多犯人的抵制下，捆绑吊打的行为略有收敛，但并没有禁绝。残忍的法西斯本质未变，这就是真实的劳改队。笔者在这样的现实中“生活”了十三年，可以说连猪圈里的公平都没有——喂食的猪倌，不会特意地对那头猪虐待。也不会无缘无故的打猪，

附注：

[1]李盛照，四川隆昌人。当年约三十岁，前志愿军战士，朝鲜战争结束后被选送到四川大学，就读于经济系。1957年因宣扬反对个人崇拜被划为右派分子，留校监督劳动，大跃进开始后，天府之国也难免灾荒不断，饿殍遍野。李盛照沿成渝铁路做了些社会调查，据实给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写信汇报四川个别农村灾情，邓子恢办公室给他回了信，让他向西南局反映，西南局收到他的反映后决定将其劳动教养，李盛照拒不认罪继续上告，并控告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执行极左路线，造成大饥荒，饿死人，由此被判徒刑二十年。在苗溪茶场劳改，因不认罪被戴上手铐脚镣关入小监，长达六年之久。毛泽东死了以后始获平反，在四川隆昌县粮食局任职。著有《黑牢写真》，惜未正式出版。2013年李盛照病逝于隆昌。

[2]张文玉，约二十五岁，羌族，初中文化，机械厂工人，因伙同几个年轻人组织马列著作学习组，指责中共所作所为背离了马列主义，获刑二十年。投入劳改后拒不认罪，被调到南充监狱（以关押无期徒刑者为主的监狱），据闻文革鼎盛时期张文玉被判处了死刑。

[3]肃清AB团：AB是“反布尔什维克”（Anti-Bolshevik）的英文缩写，国共合作时期，渗入国民党内的中共党员奉共产国际之命逐渐掌控了大权，如毛泽东（国民党宣传部代部长），周恩来（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朱德（陆军中将）、贺龙（第二十军军长）、叶剑英（第四军参谋长）、林伯渠（国民党总务部副部长）等均在国民党内任要职。1927年1月，国民党江西省党部执行委员段锡朋为首组织了七八个人，号称“AB团”，旨在遏制共产党操控。4.12事变后国共分裂，国民党公开清共，AB团即行解散。1930年11月，毛泽东派他的老乡李韶九为红一方面军总前委肃反委员会主任，李韶九到任后即大张旗鼓地开展了捕杀“AB团”运动，以肃清AB团之名杀死4400余名红军指战员。随后数月之间用各种酷刑逼供，杀人数万。后经查实，竟然没有一个所谓AB团（戴向青、罗惠兰：《AB团与富田事变始末》，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

[4]富田事变：李韶九奉毛泽东之命以肃清AB团之名大肆杀戮，引起红二十军内部人人自危，心绪不宁。乃至爆发了部分官兵针对肃反组织的兵变。12月13

日晨，红二十军在富田镇广场举行群众大会，控诉李韶九刑讯逼供的罪行。被捕人员在会上报告了事件的经过，有人还脱下衣服展示满身伤痕……整个会场群情激愤，人们喊出了“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德）、彭（德怀）、黄（公略）”的口号。公开反对当时江西根据地的最高领导毛泽东，这是富田事变至今不得翻身的罪状之一。由此，富田事变被定性为反革命事件。紧接着“左”倾领导人在全国各苏区掀起了大规模的肃反高潮，短短的几年间，处决了7万多“AB团”，2万多“改组派”，6200多“社会民主党”，红军力量大大削弱。……1949年以后，中央对苏区被冤屈的一部分人进行了平反；1956年中央代表团访问苏区期间，又为8427名被错杀者平了反。遗憾的是，按照规定，这些人既不属于反动分子，也不能称为烈士。至于富田事变的领导者，则因中央代表团的定性，成了铁案。

[5]湘鄂西大屠杀：该根据地为贺龙、周逸群等人1928年创建，鼎盛时期拥有近3万兵力、20万地方武装，势力遍及湘鄂西50余县。1931年3月，夏曦被派任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为排斥异己、独掌领导权，他判定党内军内“混进了大量的改组派、托派、AB团、第三党、取消派”。提出要“彻底改造和充实各级领导机关”，从1932年5月、8月，1933年3月、5月，一直到1934年春天，连续开展四次“肃反”运动。以“鸭子凫水”、“背火背篓”等20多种酷刑，将大批红军将士残杀致死。3万多人的红三军，经过肃反后，加上牺牲和逃亡的，人数下降到3000余人。夏曦杀人如麻，他身边4个警卫员，被他亲手杀了3个。1936年2月28日，长征途中，在贵州毕节县七星关的一条河里，夏曦途中酒后涉水，不慎失足，岸边的人恨其嗜杀成性，无人相救，以致溺水而死，时年35岁。（参见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2007年出版的《贺龙传》）

夏曦，字曼伯，湖南益阳人，是毛泽东就读湖南师范的同学，他曾与毛泽东、蔡和森创办新民学会，交往甚笃，志同道合。夏曦与几位同学游岳阳楼，题写一幅对联：八百里洞庭谁在眼，五千年历史再从头。自视甚高，可与毛泽东的“怅寥廓，问苍茫天地，谁主沉浮？”媲美。夏曦死后，毛泽东曾给夏曦父亲夏揖燮先生写信：“东与曼伯，少同砚讨，长共驱驰，曼伯未完之事，亦东之责也。”

[6]逃离江西前的大屠杀：1934年6月中旬，五次反围剿无法打破，国军包围圈日益缩小，红军最高领导层李德（奥地利人，原名奥托·布劳恩（Otto Braun）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军事顾问）、博古（本名秦邦宪，1907年生于浙江省杭州。1925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因他喜欢读古文自己改名为“博古”。时任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周恩来（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委员兼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决定突围。为保证突围时没有逃跑及投降（当时相当一部分红军是被胁迫加入的农民，时有脱逃者）、为防止逃兵泄露红军机密之类事件，政治保卫局进行严密整肃。这一时期，被撤职审查、虐杀的干部士兵达数千人，这种残酷的历史性大屠杀，直到红军主力突围一个月后，才告结束。（《龚楚将军回忆录》香港明报月刊社，1978年5月出版）

[7]反瞒产私分运动：毛泽东出于政治需要，对“1958年农业大丰收”极力宣扬，并且把稍有异议的人都叫做反对三面红旗的“右倾机会主义份子”。既然肯定是“大丰收”，增加征购、就是理所当然的事。他亲自拟稿于1959年2月22日以中央名义转发全国，认定“公社大队长小队长瞒产私分粮食一事，情况严重……在全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必须立即解决。”而且必须“举行一个坚决的教育运动，才能解决问题。”这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大跃进”期间作出的又一个灾难性的重大决定。

1960年11月28日，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李立向当时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报告

提供了光山县县委书记处书记在槐店公社的暴行以及槐店的基本情况：

光山县槐店人民公社 1959 年受灾，全社平均亩产 172 斤，总产 1191 万斤。公社党委报亩产 626 斤，总产 4610 万斤。县里分配征购任务是 1200 万斤。超过了全公社的实际总产量。为了完成征购任务，他们不惜采取一切手段，大搞“反瞒产”，把群众仅有的口粮搜刮一空。征购入库 1039 万斤。食堂普遍停伙，饿死人现象相继发生。公社党委把食堂停伙死人归于富裕中农进攻，阶级敌人的破坏，归结为两条道路的斗争在粮食问题上的表现，反瞒产斗争持续 8 个月之久。六七十天内粒米全无，造成人口大量死亡。

全公社原有 36691 人，8027 户。从 1959 年 9 月到 1960 年 6 月，死亡 12134 人（其中，男 7013 人，女 5121 人），占原有人口的 33%。全家死绝的有 780 户，占原有总户数的 9.7%。姜湾一个村原有 45 人，死亡 44 人，只剩下一个 60 多岁的老太太也疯了。全社有社、大队、小队干部 1510 人，打过人的就有 628 人，占干部队伍总数的 45.1%。被打的有 3528 人（其中干部 231 人），当场打死群众 538 人，打后致死的 636 人，致残的 141 人，逼死 14 人，打跑 43 人。

除了拳打、脚踢、冻、饿以外，还采取了冷水浇头、拔头发、割耳朵、竹签子穿手心、松针刷牙、点天灯、火炭塞嘴、火烙奶头、拔阴毛、通阴道、活埋等数十种极为残忍的酷刑。

如果不考虑维护“伟大领袖”的“威信”而有意去掩盖历史真相，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性看法：是粮食和副食品的供应明显减少，城乡人民营养严重不足，才普遍出现浮肿病；是高征购和“反瞒产”，夺走了农民最低限度的口粮，才导致饿殍遍野；是“大跃进”和种种“大办”，强迫人民进行超强度奴役性劳动，才使一批批“劳动力”累病、累死；是不留情的“反瞒产”批斗和滥施各种法西斯暴行，数不清的无辜百姓才死于非命。而所有这些，都发生在“大丰收”、“连续大跃进”和“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等等宣传甚嚣尘上之时；都发生在毛泽东意志畅行无阻，“左”倾路线大肆泛滥，“无产阶级革命派斗志昂扬”，人民的民主权利和起码的人权被剥夺得干干净净的条件之下。

历史是不能忘记的也是不容篡改的，毛泽东的罪恶是必须追究的。

[8]清理阶级队伍：（简称“清阶”或“清队”）这是毛泽东亲自领导、周恩来协助进行的文革中的一个重要阶段。“清阶”持续一年多，是文革中持续时间最长的运动。1968 年也是文革中死人最多的一年。在“清阶”中被整死的人数，远多于武斗和文革初的红色恐怖。譬如上海宝山县，文革初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时非正常死亡为 70 多人，而“全县清队中非正常死亡人数达 334 人。”1968 年 1 月 21 日，康生指控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民是叛徒，并凭空捏造了一个“国民党云南特务组”。仅此一案，云南省 1380000 人被牵连，14000 余人被迫害致死，61000 多人被打残。仅昆明地区就死了 1473 人，打残 9661 人。

全国各高等学校是清理阶级队伍的重灾区，湖南大学被乱捕乱关和游斗的就有 300 多人，其中，被迫害自杀死亡的 18 人，长期挨斗折磨致死的 6 人，被错判刑的 16 人。兰州大学在清理阶级队伍中被立案审查的达 450 余人，迫害致死 23 人。清华大学 6000 多名教职员工，五分之一被“审查”，178 人被定为“敌我矛盾”。12 人自杀，包括两位一级教授。北京大学在文革初和“清阶”期间，共有 24 位教授自杀。

[9]一打三反：1969 年 11 月 12 日，刘少奇被折磨至死。周恩来担任组长的“刘少奇专案组”为其“圆满完成任务”举行了酒宴。但文革本身并不因为刘的死亡而结束，1970 年 1 月 30 日，周恩来将《中共中央“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

的送审稿呈交给毛泽东审批。说明“我们几经讨论，认为现在需要发这样一个指示，给在备战动员中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以打击。”次日毛泽东批示“照办”后，该指示下达全国，即所谓“一·三一指示”这是当局大规模地镇压言论、思想罪的高峰。1968至69年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主要是打击共产党执政前为旧政府服务过的所谓“历史反革命”。一打三反则是打击“现行反革命”，既能向上邀功，又能清除异己，还能恫吓反对派。各地文革中的对立派虽已在“清理阶级队伍”时大致解决，最后的镇压，特别是对思想犯、政治犯的镇压，却是在1970年完成的。

据历史学家、国防大学教授王年一披露：“1970年2月至11月共挖出了“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1840000多名，逮捕了284800多名。就全国而言，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被“从重从快”处理的现行反革命就有135000人。

文革结束后最高法院向中共中央报告说：“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中错判死刑最为突出。宁夏错杀70人中，1970年判处的有68人；天津市错杀的28人中，1970年判处的有22人。

[10]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发生在中国八十年代的一场政治运动，被不少人认为是中国共产党继文革后的又一场左倾运动，主要发动者为邓小平、胡乔木、邓力群等，邓小平强调要进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教育和斗争，不光要进行，而且要坚持很长的时间。当时讲二十年，后来又增加到五十年，也就是说，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整个现代化进程中都有这个问题。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作为一项长期的任务，作为改革开放时期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应主要“靠经常性的说服教育”，同时，“必要时采取一些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在这场运动中，巴金等人受到公开批判，王若望、方励之、刘宾雁先后被开除党籍。另外，还有许良英（科学院自然科学史专家、浙大地下党书记，爱因斯坦全集译者、右派），因邓忘记了他的名字得以幸免；八九事件后登记党员时他没有登记，自动退党。当时资历较浅但作品前卫的剧作家高行健也受到批判。这次运动因为遭到众人抵制而告一段落。但后来胡耀邦于1987年被迫辞职，就被邓小平等人指责为“资产阶级自由化”。

[11]八九六四事件：即1989年6月4日中共派出数万野战部队，以坦克、战车、火炮、机枪等重型武器对付手无寸铁的学生。血洗天安门事件。是邓小平的重大罪恶。

[12]维稳：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官员腐败加剧，司法腐败、不作为。社会贫富差距日益扩大，人民基本权利得不到保护等原因，同时信访等法律规定的申诉渠道作用微小，底层人民不得不频繁作超出法律规定的反抗。当代中国的群聚事件既非“造反”（推翻政权），更非“革命”（改变制度），大多是用中央政府的政策法令来抗议地方政府的贪污腐败、不作为或者不公允以及各种各样的违法乱纪行为，伸张自己的正当要求。部分地方政府官员对此十分恐惧甚至敌视，常采取强硬打压的态度，动辄用警察镇压，抓人，阻拦上访，即所谓“截访”“维稳”。“收容遣返”一个访民，地方政府支付数百元费用，于是收容公司、黑监狱应运而生。官方或称之为“公共安全”，实乃压制民主的倒行逆施。“预算报告”显示，2012年“国防支出”预算数是6702.74亿元“公共安全支出”预算数是7017.63亿元，维稳比国防支出还高出315亿元，可见当局对维稳的重视。

（4）因反对滥施酷刑而受酷刑

11月份我初进监狱，对于一切违法乱纪行为只能看在眼里，不敢怒也不敢言。两个多月时间很快就过去了，监狱里的捆绑吊打依然如故，每天晚上

的学习时间批斗之声不绝于耳，哀嚎惨叫此起彼伏。恐怖气氛笼罩着整个监狱。紧挨着我铺位的是一位中学语文教师毛鸿文，头发已花白，大约比我年长二十岁，但精神矍铄，没戴眼镜。某日晚，临近点名报数之际，他悄声对我说：这日子刚开始，以后怎么过呀？不用说狱卒，这几个犯人打手就够受的了。我也悄声说：人过得去，你我就过得去，不惹事，少开腔，咬紧牙关，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我怕他有轻生思想，尽量宽慰他。但总要想个办法告诫一下打手们。

一天在胡家坪劳动时，不知什么原因，刘光宗和李海山吵了几句，我好言相劝，打手李海山余怒未消，恶狠狠地对刘光宗说：看今天晚上怎么收拾你！我多了一句嘴：用文斗不用武斗。李海山听得出来是在说他，当时没再言语，斜着眼睛看了我两眼。我自知多言，但话已出口，收不回来了，也是对李海山平时充当打手气愤不过，一时没管住自己的嘴。当天晚上指导员周金仁训话：用文斗不用武斗，那是对好人说的，是人民内部矛盾，对敌我矛盾既可以文斗也可以武斗，爱怎么斗就怎么斗，主动权在我们手里。你们只能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谁敢乱说乱动，就砸烂谁的狗头。散会后回到舍房里，我找出1966年9月5日《人民日报》那篇《用文斗，不用武斗》社论，故意对着李海山高声念道：斗争那些地、富、反、坏、右分子，也是这样。当夜无话，第二天晚点名，周金仁又来训话，他阴阳怪气地说：《人民日报》是人民看的，谈的是社会问题，你们要正确理解，在社会上用文斗，不用武斗。监狱是专政机关，刀把子在我们手里，想怎么斗就怎么斗。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谁敢反抗就让他尝尝无产阶级专政的厉害！当晚还是无话。我知道大祸就要临头，事已至此不得已也，我还想用伟大领袖的话保护自己，第二天学习会上我翻开了《毛泽东选集》第二卷725页，《论政策》一文中明确地写着“对任何犯人，应坚决废止肉刑”。还强调说：伟大领袖说的是对任何犯人，既包括老犯人也包括新犯人，既包括积极接受改造的犯人也包括还有些思想问题没想通的犯人。毛主席说的是应坚决废止肉刑，不是一般地废止，也不是可废止可不废止。对伟大领袖的最高指示不能够打折扣。不料我搬出来这一句顶一万句的最高指示竟然无济于事，第三天是休息天，上午九点，打扫卫生，周金仁从宿舍出来，端了把藤椅，坐在院子里喝茶，当我们打扫到院子附近时，他突然发话：牛立华，过来。我走到离他坐的地方三米多远处，立正站好说：报告指导员，我来了。有什么事？他从椅子前站起来，愣着三角眼上上下下打量我一番，撇着嘴吼道：你不赞成用绳子捆人，今天就要用绳子教育教育你，说着从窗台上摸出一根绳子来，喊了两个犯人，给我来了个五花大绑。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挨绳子捆。院子里打扫卫生的众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也不敢走近，都在远远的地方盯着我看，我忍着剧痛，暗自思忖，周金仁这个狱卒心毒手狠，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但又执掌着十三队的大权，对他既不能硬顶也不能一味屈从，所以既要表现出十分难受，又不能卑躬屈节地求饶，大约过了半个多小时，食堂开饭了，周金仁才又喊了那两个人给我解开了绳子，那两个人告诉我，解了绳子以后千万要活动活动手臂，一边说着一边帮我伸胳膊，揉手臂，活动关节，用手掌侧面轻轻地密密麻麻地敲打手臂的肌肉，其中一个叫李金友的还在我耳边悄悄地说：“我那儿有一点舒筋活血的药酒，你来喝两口，好好睡一会儿。”（李金友原为四川彭县山村小学的民办教师，年轻力壮，生了一脸麻子，三代贫农出身。因为大跃进那三年吃不饱。他说了“人生下来就有吃饱饭的权利，受教育的权利。

一个社会连这个权利都剥夺了，还像话吗？”等等“反动”言论，1961年以反革命罪判刑二十年，刑满后和当地老乡结了婚，现定居芦山县万家山）

（5）全国武斗成风

文化大革命初起之时，在毛泽东的鼓动下“造反派”应运而生，打砸抢之恶行随之而起。但是狱中犯人与世隔绝，对社会实况一无所知。唯一观察窗口就是“党报”。从党报的连续报道中，我勾连出一些事件的轮廓。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北京师大附中的女学生宋彬彬（中共元老宋任穷之女）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毛问她：“你叫什么名字？”她回答：“我叫宋彬彬”。毛又问：“是不是文质彬彬的‘彬’？”她说“是”。毛说：“不要文质彬彬，要武嘛。”此“最高指示”一下子风靡全国，由此，社会上武斗日益猖狂，监狱内酷刑极度泛滥。武斗显然就是毛泽东挑起的。为了遮人耳目。毛泽东这时候突然指使《人民日报》编写了一篇社论，即9月5日刊出的《用文斗，不用武斗》。社论强调：用文斗，不用武斗，这是党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一项重要政策，我们一定要坚持这个政策，贯彻执行这个政策。

既有号称“一句顶一万句”的最高指示，又有党的喉舌竭力鼓吹，总该执行了吧？实际是怎么落实的呢？

我所在的监狱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新犯人进了劳改队必须集体行动，即使上厕所也要三个人一路，平时是不准擅离一步的，一天突击点名十余次。出工路上有持枪狱卒押送，一会儿点名，一会儿报数，谁也甭想擅自离队。关上几年以后就成了老犯人，才有可能从事单独劳动，比如割喂牛草，捡牛粪等都是一两个人或两三个人，远离队部，早出晚归，各自为战，逃脱了“点名”“报数”之累。一天，吴静被派去割喂牛草，他竟然跑到了天全县辖区，回来以后和几个老犯人不声不响地嘀咕。我出于好奇，凑上去偷听，原来他在讲外面的新闻，吴静说着说着还拿出一张揉烂了的纸标语“枪、枪、枪！给我一支枪！”我才知道外面真的用枪打起来了。怪不得报纸上偶尔透露一点武斗的消息。

在监狱里沉淀在我脑海中的历史碎片，常常使我好奇，成了我频频思考以求究竟的提纲。1979年平反出狱后才有可能涉猎一些资料，对“武斗”做一个轮廓的介绍。

叶剑英在十二届一中全会后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曾披露文革遭受迫害及死亡人数：

（1）规模性武斗事件 4300 多件，死亡 123700 多人；

（2） 250 万干部被批斗，302700 多名干部被非法关押，115500 多名干部非正常死亡；

（3）城市有 4810000 各界人士，被打成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阶级异己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动学术权威，非正常死亡 683000 多人；

（4）农村有 520 多万地主、富农（包括部分上中农）家属被迫害，有 120 万地主、富农及家属非正常死亡；（5）113000000 人受到不同程度的政治打击，557000 多人失踪。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合编的《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事实》载：1984年5月，中央经过两年零七个月的全面调查、核实，重新统计的“文革”有关数字是：420 万余人被关押审查；172 万 8 千余人非正常死亡；13 万 5 千

余人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武斗中死亡 23 万 7 千余人，703 万余人伤残；7 万多个家庭被毁。

“文革”结束后成立的“中共中央文化大革命武斗事件调查组”，于 1978 年 6 月-1979 年 8 月，经向当事人了解情况、整理相关材料、复核有关资料后统计出：从 1966 年至 1975 年间，向当地革命委员会、政法部门、军管会（组）报案、备案，伤亡 10 人或以上的武斗事件有 57227 件，其中伤亡 100 人或以上的武斗事件有 9790 件，地方驻军奉命介入的事件有 2355 件；申报、报案亲属失踪的有 227300 多人。

这几组数据很不一致，按照毛泽东的说法，“文革”属于天下大乱。各级统计机构近于瘫痪，受害的准确人数恐怕永远无法搞清。虽然上述统计数字说不上哪个最准确，但总体上可以反映出，文革对中国来说是一场大浩劫，在数千年中国历史中是一场大劫难。则是确定无疑的。

请看“中共中央文化大革命武斗事件调查组”，公布的文革中最惨烈的十大武斗事件：

青海西宁“二二六”事件：1967 年 2 月 26 日。青海西宁武斗扩大到省委、省政府、军民机场。省公安厅、西宁市公安局被占据，3 所大学、12 所中专、职校、35 间军工企业职工参与造反，从 2 月 26 日到 3 月 5 日持续武斗，曾出动“T55”型坦克等重型武器，造成 2177 人伤亡，死亡 822 人。

黑龙江伊春武斗事件：1967 年 7-8 月，黑龙江省伊春市林业局筹备革命委员会，因派性激发，对立的两大派都以“革命造反派”“毛泽东思想捍卫者”自居，经过 15 天协商，双方均拒不接受在席位上的妥协，又因争夺财权，矛盾激化，发生冲突，开始抢掠市财政、银行。地方驻军参与支左，导致武装对峙。8 月 2 日-8 月 25 日，武斗升级。37 座政府建筑物被毁，两座军营遭炮弹攻击，230 多名官兵伤亡。在武装冲突中，有 3750 多人伤亡，有记录的死亡名单为 1944 人，多数是林场职工和家属。

湖南怀化武斗事件：1967 年 8 月-11 月，湖南省怀化市职工红卫兵造反派占领、接管了怀化劳改农场、劳改工厂。军队奉命进驻，遭到武力阻止。劳改农场、劳改工厂的囚犯们被武装起来编成敢死队，向军队发动进攻。军队奉命镇压“反革命武装叛乱”，造成 37700 多人伤亡，其中死亡 13300 多人，军队伤亡 430 人。

四川宜宾大武斗：1967 年 6 月-68 年 3 月，四川宜宾地区两派群众组织，就“刘结挺、张西挺，是毛泽东司令部战士还是刘邓司令部黑干将”发生激烈斗争。中央文革 1968 年 1 月表态：刘、张是毛主席司令部战士，长期受到刘邓在四川的代理人李井泉、廖志高之流的迫害。当地驻军随即跟着表态，对另一派群众组织实施无产阶级专政，展开了激烈的武斗。参与动用武器武斗的有 17 万多人，有两个团兵力介入，造成 43800 多人伤亡，死亡 21100 多人。军队在宜宾地区实施戒严长达 15 个月。

内蒙古内人党事件：1967 年 10 月 20 日-69 年 5 月底，内蒙古发生“内人党”特大惨案。中共党员、干部、知识分子、农牧民、知识青年（主要来自北京、河北、山东的 66 届、67 届、68 届大专毕业生），有 56200 多人被杀害，多达 377000 多人被关押，受冤案打击迫害的人达 355 万多人，占当时内蒙古自治区总人口的四分之一。

安徽蚌埠、淮南武斗：1968 年 5 月-9 月，安徽省蚌埠、淮南，85 间企业单位的职工发动第二次造反，要揪出“李葆华在安徽的代理人”，包围了两

地的革命委员会，占据了铁路、公路交通长达 12 天。中央文革派调查组，毛泽东派汪东兴带队下去了解情况。中央文革把事件定性为反革命性质，说“搞反攻倒算要追查黑后台”，从合肥等地调动 5 万武装民兵，配合驻军限时缴械自首。期限到后，展开进攻和逮捕。在长达 35 天围剿、追捕中，有 7300 多人伤亡，其中死亡 3433 人，军队、民兵伤亡 525 人，827 间建筑被损毁。

陕西宝鸡武斗：1968 年 12 月—69 年 2 月，陕西省宝鸡地区八间兵工厂展开“清理阶级队伍”政治运动，7 万名职工有 45400 多人（一多半）被列为阶级异己分子、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其中有 297 人被当地军管会宣判死刑立即执行。第二天，全地区发生大动乱，驻军报称发生反革命暴乱，展开追击，于是追击和反追击战斗开始，出动了坦克、装甲车、四筒平射炮、喷火器等投入战斗，死伤 48300 多人，其中死亡 13300 多人，死者中包括军管组组长、政委、宝鸡市革命委员会军代表。宝鸡驻军的两栋营房被炮火击毁。

广西南宁“四二二”惨案：1968 年 4 月—7 月，广西南宁地区两派群众组织 130 多万人参与武斗和自卫反击，军区 5 间武器库的枪支弹药被抢掠一空，包括支援越南抗美战争的武器在铁路线上就被抢掠。4 个月时间，发生规模性武斗 22 起，有 175000 多人伤亡，其中死亡人数 101000 多人，报失踪 33115 人。周恩来派去的调查组中，也有 3 人被枪杀。据说，广西南宁武斗是文革中死伤中严重的。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兵变”大镇压：1975 年 5 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石河子、奎屯梁地区的生产建设兵团发生所谓“集体兵变”、造反，投向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事件，于是出动军队、建设兵团进行整顿、整肃，引发武装对抗，展开激战，石河子地区有 7330 多人伤亡，其中 2170 人死亡。两地报失踪 8137 人。武装镇压中，出动了武装直升飞机。

云南回民沙甸村事件：云南省沙甸村“XXX 共和国”事件，造成 3700 多人伤亡，其中回族村民有 1220 人死亡。施甸地区政府建筑物被炸毁。这是一宗人为造成的政治性冤案，当年中央拨下 2000 多万抚恤金才平息了这个事件。

提起武斗，不得不说说重庆，笔者写作途中有意做了些调查，记录于后：

重庆“八八”海战

那是好些年前的事儿了，那时天比现在蓝，天底下的日子也过得有趣得多。重庆府的男孩子们虽然还不知道什么是 CS，但是他们有好玩得多的游戏，有那么小半年，他们身上背着枪，腰里别着手榴弹，AK 哪、三八大盖哪、半自动哪，什么都敢扛，没准还上着亮堂堂的刺刀，枪里装满了能真正打死人的子弹（要知道，解放军出哨才五发空包弹呢），还用鞋带系上几个备用弹夹拴在皮带上——虽然谁也说不清到底要朝谁开枪，该打死多少人。他们成天猫着腰走路，鬼鬼祟祟的到处比划他们的家什，一付鬼子进村的模样，当然，他们可不是鬼子，他们臂上有红袖章，跟毛泽东手臂上戴的一样，红彤彤的底色印着“红卫兵”三个黄字。可不是嘛，好些漂亮的重庆妹妹笑迷迷的看着呢！

毛老人家知道了，说道：很好嘛，不爱红妆爱武装！武斗有两个好处，第一是打了仗有作战经验，第二个好处是暴露了坏人。-----再斗十年，地球照样转动，天也不会掉下来。我才不怕打，一听打仗我就高兴，北京算什么打？无非冷兵器，开了几枪。四川才算打，双方都有几万人，有枪有炮，听

说还有无线电。这让愣头青们深受鼓舞，鼓捣着成立了好些兵团，虽然规模行事都和土匪团伙差不多，但是打着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就叫做革命了。

话说大四川虽然是天府之国，但是不知道怎么搞的，进入六十年代就常常要闹到吃不饱的地步，据说先是右派捣乱，后来是走资派搞破坏，再后来反革命又出来了不少，形势很是不好。川东的重庆府，半年来更是问题蛮严重。这是公元 1967 年，差不多就是抗战爆发三十周年纪念前后。

重庆的夏天也怪热的。饿坏了肚子，热晕了头的小青年们从头年夏天就开始吵架，一派自称是“八一五”，对立的就叫“反到底”，据说都是坚决保卫毛主席的。两派不知道在哪里没有勾兑好（是不是拥刘、张的问题，这里就不讨论了吧？），大家从吵架变成打架，从钢钎藤帽到坦克大炮，搞得很是开心，比打 CS 还有劲多了。将来有志青年们可以好好考证一下，看看这个导致那么多人去见马克思的分歧到底是什么？

扯远了，还是先说说 67 年的事儿吧。早在清朝晚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就在广东建立了兵工厂，其后，清朝又兴建了金陵、沈阳、汉阳、巩县等史称的四大兵工厂。抗战初期，金陵、汉阳、巩县兵工厂大部分迁往重庆，即为今日仍存在的望江机器厂、长安机器厂、建设机床厂、长江电工厂、江陵机器厂、嘉陵机器厂。西南车辆厂。

六十年代初期，从这几个老厂中又派生出长庆、长风、南溪、宁江、庆江、平山、晋林、双溪、红泉、金光、兴光、永光、华光、陵江、青山、红字、江华、山川、益民等数十个三线厂，名曰机械厂、仪器厂，实为武器厂。遍布于四川各地。直到现在，这些厂还在我国兵工系统发挥着重要作用，生产着大小口径高炮，轻重机枪，自动步枪，各种口径的枪弹、炮弹、导弹、坦克、战车等常规武器。

笔者从 1955 年即在兵工厂从事技术工作，反右后被迫离开，1980 年重返兵工系统，由于发表多篇技术论文、参办过多次技术讲座和培训授课，被推举为兵工学会理事，有幸走访过四川大部分兵工厂，认识一些同行了解一些信息。

望江机器厂的位置正好在重庆下游的长江隘口铜锣峡口，古往今来这里打了无数的仗，漂泊着无数替死鬼幽怨的魂灵，在蔽日的峡谷里，常有猿猴的哀啼。长江水湍湍的流淌，侵蚀着江底的岩石，吐露着数千年的倾诉。

文革武斗的英雄人物就是在这里出场的。

文革期间，重庆红卫兵各“造反派”均扬言忠于毛泽东思想，誓死捍卫文化大革命。实际上却各怀鬼胎，各立山头。分成了势不两立的“8.15”和“反到底”两派。

天下未乱蜀先乱。1966 年重庆红卫兵的两派热血愣头青，在毛泽东思想的煽动蛊惑下，就开始动手打架；五月份开始用钢钎、铁棍、匕首；七月份开始用枪械，从使用小口径步枪、冲锋枪、轻机枪、重机枪、手榴弹到动用坦克、高射炮、舰艇，从巷战到野战，规模越来越大。当时空前的热闹，赶得上国庆节放焰火，谁叫重庆是这么个兵工基地呢？毛老人家大概就是这个时候拍着手叫好的，可见重庆崽儿们干得真不赖。

1966-1967 年间，重庆武斗正酣，“8.15”和“反到底”两派隔着嘉陵江展开炮战，双方的炮兵都是各大兵工厂的校炮员，准且狠，用 37mm 高射炮平射对方的建筑物，嘉陵江大桥两端被沙袋构筑的街垒封锁。街垒里的战士用 12.7mm 的高平两用机枪和 7.62mm 的自动步枪互相狙击对方的活动目标。这

种状态一直持续到“反到底”打过大桥，彻底消灭“8.15”为止。

却说国营望江机器厂，当初是“反到底”略占上风，把“8.15”们封锁在小楼里不敢乱动，很是威风得意。但是纵观全局，进城的道路都被“8.15”们堵得死死的，“反到底”们无法得到粮食百货等必需品，又很是头疼。历史于是开始塑造英雄人物了！在这里，是时势造就了英雄。

1967年的8月1日，正好是建军节。反到底派掌控的长江2014号轮像往常一样拖挂货8—126铁驳，上水航行驶往重庆，货船上载有重庆急需的百货、西药等物资370多吨，当晚停泊在长寿下游的深沱，看来似乎要度过一个平淡无奇的夜晚了。可是造化并不只为庸人设计，也常常和历史开个玩笑。正巧船上有几个很有责任心的“反到底”，深感这船货物对支持“反到底”们坚持“革命”斗争的重要意义，像地下党员一样不动声色地和当地“反到底”组织取得了联系，把情报及时传了出去。

次日凌晨4点多钟，一条大木船划过夏夜的深沉，划破长江的波涛，在阵阵蛙鸣的伴奏中靠了上来，八十来个大汉左腕缠红布，手持钢钎、木棍、杀猪刀等各式武器，跳了上来。但是这帮兄弟们太有幽默感了，他们居然自称是“8.15”的！只听“扑通”一声，一个没有幽默感的“反到底”情报员飞快地跳进水里逃走了，这是这场戏里很戏剧性的一幕，业余的海盗和客串的情报员开了一个很不好笑的玩笑。

8月3号，一代名舰出场了。这条舰原是国民党的江防舰，在长江上混了大半辈子，但是一点名气都没有，怎么也查不出她的准确身份，叫不来她的大号。中共建国后，这条舰识时务，及时投诚我党，量力效用，成为国营望江机器厂的交通艇，命名“望江101”，承担些运输任务，浑浑噩噩地混到了六十年代初，早就忘却了自己曾经是一条军舰。她以为这辈子也就是这样了，可没想到居然最后还要以“军舰”的身份在青史上留名。

早在几个月前，101就被改装成一条真正的“军舰”了。网上能够查到的资料，毫无例外都把101看成是“海战”的主角，但是居然就没有人指出她本来就是一条军舰的事实！

这里，笔者访之故老，把101改装后的装备介绍一下：全舰长约四十米，排水量航速不详，前后各装61式37毫米双联海三七高炮一座，前段另有海四联14.5毫米高射机枪一挺，后段有海二联高射机枪一挺，其火炮口径不大，但是射速很快，该舰的火力配置与中共海军62型护卫艇基本相当，在内河还是很可以骄傲一阵的了。

8月3号下午，101带着她的老搭档嘉陵1号来到深沱，把“俘虏”长江2014号押解回望江厂所在地郭家沱，还顺手牵羊，把也停靠在此地的，由登陆艇改装的运输船“人民5号”也一并俘虏带走了。舰队序列为“嘉陵1号”开路，两个倒霉的“俘虏”居中，101殿后。

4号凌晨2点左右，舰队路过蒋家沱，又将停泊在这里的客运班轮昆仑号和东方红102号挟持加入。凌晨3点半钟，几艘客、货轮船行驶到郭家沱，停了下来。两条客轮因为没什么油水，也缺乏战斗力，很快被放行驶往重庆。被俘虏的“人民5号”本来是一条军用登陆艇，被俘时舱里满载上千条生猪，查证历史，找不出“人民5号”是被蓄谋“俘虏”的证据，只好解释为自愿与101顺路同行。人民5号给久已被隔断交通的望江厂“反到底”带来了猪肉，也带来了烦恼——“这么多猪，天天吃红烧肉也吃不完啊！而且猪会死的。”这是当事人亲口所言。

但是，人民5号宽大的货舱，给了“反到底”头头们新思路。

纵观当时战局，8月3日，两派在位于重庆杨家坪的大型国防企业建设机床厂展开激烈武斗。“8.15”派占据的制高点，谢家湾有名的弧形建筑“弯弯大楼”被“反到底”派用四联高射机枪击中烧毁；8月5日，两派又在建设机床厂制高点清水池激烈武斗，动用了坦克、高射机枪等武器，死22人。当时有文革小报用了“尸横遍野，血肉横飞”的语句。

建设机床厂，其前身是张之洞创办的汉阳兵工厂，“汉阳造”天下闻名。抗战内迁，其厂址正好也在长江边上，直到今天，我军用的各种主要枪械还是产自该厂，从56式、81式到95式，该厂还出产过多种高射机枪。该厂厂史有一段记载：“1967年7月至1968年8月，在‘文攻武卫’口号的蛊惑下，厂内外‘8.15’和‘反到底’两大造反派组织在谢家湾地区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武斗。这期间，工厂失散步枪21409支，子弹4038125发，83名职工（包括临时工）被打死，弯弯大楼等部分房屋被烧毁或炸毁，生产完全停止，工厂遭受严重损失”（国营第二九六厂史编辑委员会编纂，1992年10月第一版〈内部资料〉，第473页）。

据分析，8月3号的战斗，双方动用了四联高射机枪，位于主战场附近的空压厂（现西南车辆总厂，主产轻型坦克、“WS1”自行火箭炮，122履带式自行榴弹炮，551轮式装甲车等）还开出了坦克助战，好在坦克也没有配炮弹，只能当推土机用。据称当时有用钢板置于坦克前进道路上，接通高压电，坦克驶上来外形无损，内部的驾驶员和射手被电击身亡，估计就是此役。

当时的重庆市“反到底”高层是怎么决策的情况，已无文字可证，现在只能是推测。估计8月5日建设厂的“反到底”派吃了坦克的亏后，望江“反到底”得信后急于增援（如前所说，望江厂是造三七高射炮的，大家都知道高炮平射可以当战防炮用的，内战中的中国人，其创造性当然不会输给隆美尔（德语：Erwin Rommel，希特勒的陆军元帅），正好俘虏的登陆艇可以装得下炮。自然也可以把多余的猪运去送给革命战友——建设武斗队“红大刀”，顺便换些半自动步枪、子弹回来。望江厂“反到底”正稀罕这家什呢。于是从5号起，望江厂“反到底”加班加点，确切地说，是“反到底”的王牌，“金猴”武斗队加班加点，改装“人民5号”，准备远航。

据当事人回忆，具体改造工程为：在驾驶台和船舷两边烧焊了钢板，以加固防御；船头和驾驶台左右两侧，各安装了一门陆三七高炮；在驾驶台前，装重机枪一挺；驾驶台后面，装高射机关炮一门；船尾，装海三七高炮一门（主炮火力差不多赶上主力舰101了）；不仅如此，大兴场粮库的50多吨小麦共800多包，也被搬运到轮船上，当作沙包筑成了防御工事（糟蹋啊，这可是一个人每月只有不到三十斤粮票的年代，忠于毛泽东的红卫兵们也太暴殄天物了吧？）。显而易见，“反到底”的头头们，对此行的凶险，是做了充分的估计的。

8月8日中午，“人民5号”武装完毕，“金猴”宣布成立“军工井冈山第一舰队”，“金猴”头头邓长春任舰队司令，坐镇“人民5号”，该舰也挂上了“反到底1号”的帅旗，王三恒任总指挥，朱星德任指挥。下午4点半左右，“舰队”驶出郭家沱码头，径直开往建设厂。舰队序列为：“望江101”、“嘉陵1号”、“人民5号”。又是战斗力最强的101跑前面。“人民5号”的舱里装了三七高炮三门，炮弹一千余箱，每箱二十发，不过大部分都是填沙教练弹，出膛后只相当于同速度铅球的杀伤力，但绝对能砸死人。当然，也

少不了捎带些咱们一直关心的猪和大量罐头、日用品等。

话说从望江厂到建设厂这一段长江航道，当时基本上掌握在“反到底”的对头“8.15”手里，从郭家沱顺长江而上，穿越铜锣峡口，就到了西南最大的造船基地东风造船厂所在地唐家沱。这里是一个大回水沱，所以上游淹死人，都得到这里来捞，以前捞人是免费的，改革开放这些年好像也成为收费服务项目了。这里有“8.15”势力，所以曾被望江厂“反到底”在对面的山上架炮轰击过。“反到底”舰队一出峡口，就遭到埋伏的“8.15”份子很不强烈的攻击。他们手里只有点破步枪，对于有临时装甲的“军工井冈山”舰队来说，连挠痒痒都不够，只能算是捣乱，完全不具备收买过路钱的资格。各舰乱七八糟的开火还击，逮不住开枪的小步兵，就打停泊在唐家沱的船只和造船厂的浮船坞。这是西南地区最大的浮船坞，谁叫它这么醒目呢？“军工井冈山”舰队的还击，打伤了“人民6号”等多艘轮船和浮坞，还打死长航职工2人，打伤多人，总算舰队司令还知道自己不是出来打鸟的，还击只能算是象征性的。

舰队小小的泄愤之后，继续溯江而上，一路上都被冷枪骚扰，但又逮不住目标，很是恼火。舰队到达穹角沱（这里离即将到来的战斗的主战场已经很近了），按计划进行了队列变换，“望江101”在右，“嘉陵1号”在左，“人民5号”在中后，呈三角形继续上行。事实证明，舰队的航行计划是非常缜密的，邓长春等人绝非有勇无谋之辈。因为战斗中对方的火力正好是集中在舰队的右侧。

朝天门是个很有名的地方，是古重庆城的最东端，也就是地图上嘉陵江和长江交汇处的那个尖角。当重庆还是“重庆府”的时候，天子的诏书往往从下游传上来，那时的大小官吏们就穿好古怪的袍服，屁颠屁颠地打开城门，跑到码头上来摆香案，跪接圣旨，所以这个码头就称之为“朝天门”。

站在朝天门码头上，顺河谷东望，能看见嘉陵江和长江的融汇，青青的嘉陵江带着从甘肃嘉陵谷携来的清冽，汇入唐古拉山上融化的雪水与泥浆，泾渭分明。一条细长的融汇线一直伸展到长江的拐弯处，不时被一两艘快艇不识时务地怪叫着搅碎。长江岸边的玄坛庙，是刘湘请来上海的工程师设计重建的，说是“庙”，却又有道教的“玄”，不过和尚们在六十年代中叶被赶走了，流淌千年的碧涛声里，只留下青山中暮鼓晨钟的回响。

南岸的文峰塔，朽坏得只剩下外壳，呆呆地望着亘古不变的茫茫陵谷，弄不清人世的沧桑变幻。那个充满激情和理想的年代，那个充满残忍和愚昧的下午，那段改变了某些人一生命运的年代。光荣与迷梦，胜利与失败，从英雄到狗熊，是淘不尽的迷离，是荡涤不完的幽怨。当“军工井冈山”舰队驶入那条长长的两江交汇线，遥遥望见朝天门码头的时候，站在岸上和舰上的人们，有没有想过历史将如何评价他们即将付出的勇敢和牺牲精神呢？

朝天门，当时顺应改名大潮，也改了个流行时尚的名字——“红港”，所以这段公案，一般也就称为“红港海战”。这时的朝天门掌握在“8.15”手里，他们获悉了“反到底”的行动后，也仓促地作了一些准备。“8.15”们调来“长江207”、“人民28”、“人民30”等几条船，准备在长江里拦截“反到底”舰队。

可是，这几条船的协同并不好，“人民28”、“人民30”号还在嘉陵江的河道里，“长江207”就先到达战场了，它鲁莽地向下游滑了一段距离，准备独自突击从下游驶来的三条炮艇。自打从郭家沱上驶以来，三条炮艇上的“反

到底”们就被黑枪骚扰得恼羞成怒，胸中憋着一口闷气，这次他们总算逮住了像样的目标。每个炮位上都做好了准备。朝天门码头上的“8.15”们也堆好了沙包，做好了简易工事，架好了机枪。

双方都进入了战斗状态，但实事求是地讲，“反到底”一方面战斗欲望并不强，从一开始，“人民5号”就打开广播喊：“港口兵团、长航兵团，你们不要打，我们是到九龙坡卸货的。”在战斗中遭到南岸的轮渡公司修理厂轻武器射击后，“人民5号”还在广播：“王麻子，你娃不要打哟！不然我们打过来，你娃吃不消哈。”

但是历史从来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8.15”是不会坐视“反到底”把“战略物资”运到他们想运的地方的。

迫不得已，“人民5号”拉响了汽笛，战斗开始了，在水里浮游的受够了黑枪的炮手们，手忙脚乱的朝着“敌人”开炮。三十七毫米的炮弹，即便是不会爆炸的填沙教练弹，对于没有装甲的民用拖轮“长江207”来说，也是足够致命的了，它堆再多沙包也没有用。同时，大约几百米之外的红港港务大楼和码头上的机枪，也开始向“反到底”舰队猛烈射击，打得甲板砰砰作响。

“长江207”迅速起火燃烧，侥幸未死的船员跳水逃命，“望江101”主机停车，停在江面上用机枪继续扫射跳水的船员，他们把一路上的火气都发泄到了这几个在水里浮游的重庆崽儿身上。其余两条船继续上行，两岸火力对它们进行夹射，但是效果并不理想，前几天加装的厚厚钢板帮了大忙，“8.15”的轻武器打上去只是几个凹坑。

“人民28号”此时驶出嘉陵江口，用轻武器向“人民5号”射击，对方则用三七高炮还击，“嘉陵1号”也向“人民28号”开火，顷刻之间，“人民28号”就大幅度倾斜，完全失去动力，顺江水漂流到下游数百米的野猫溪岸边搁浅。“人民5号”和“嘉陵1号”集中火力攻击“人民30号”，该船艉部受伤，见势不妙，拼命退回嘉陵江内。水运204、104两艘无武装的小火轮开出嘉陵江口企图施救，被威胁性射击击中顶篷，但仍然冒死靠上“长江207”灭火，当他们登上“长江207”时，发现船上已无活人：有的脑浆迸裂，有的肠子都流出来了……

“反到底”舰队继续上行，在几公里以外的铜元局、黄沙溪江面，又遭到长江电工厂（即国民党时代的第二十兵工厂，抗战和内战中生产了大量步枪弹、机枪弹，）“8.15”猛烈射击，“人民5号”上出现多起伤亡，“反到底”立即还击，将该厂油库击燃。但和“8.15”对射不是此行的主要目的，故舰队迅速通过此段江面，于傍晚七点四十五分到达目的地建设厂江岸，当时建设厂“反到底”派已陷入连煮稀粥的米都没有的地步，随船送来的活猪、罐头和其他日用品无异于雪中送炭。

这场“海战”，当场打死24人，打伤上百人，打沉“长江207”拖轮等船只3艘，打坏12艘，长江航运为之中断。在整个战斗中，“8.15”方面只有机枪和步枪，在火力上根本无法与“反到底”的三七高炮抗衡。“反到底”方面主旨是在运货，在开火上还算比较克制，从一开始就用广播申明了自己的立场。除了“望江101”对“长江207”不可思议的下毒手外，其他的开火基本上只是还击和威胁。

笔者手里没有“8.15”方面详细的火力配备，但是可以根据当时情况推测。双方的火力大体如下：

“8.15”方面：7.62毫米口径的各种枪械（主要是56式半自动，可能有少量仿AK47的国产56冲锋枪）；少量12.7毫米重机枪。（此前空压厂已经出动了坦克参战，而12.7毫米高射机枪正是我军坦克的标准配置，“8.15”搞来少量此枪参战也是情理中的事。估计没有14.5毫米以上的火力，如果有的话，以这三条船的甲板厚度，不可能还有生还的希望，而且14.5毫米多联高射机枪，也正是建设厂的产品，建设“反到底”几天前正是凭借这个大打出手的，作为对手的“8.15”方面恐怕很难搞到。

“反到底”方面：61式37毫米双联高炮至少三座（101两座，“人民5号”后甲板一座），陆用单装三七高炮三门（“人民5号”前甲板及驾驶台左右各一门），“嘉陵一号”是条小舰，但至少也有两门以上的37毫米炮，统计共有37毫米口径高炮至少十一门，另有14.5毫米双联、四联高射机枪多挺。61式海三七炮射速单管160-180发/分，就是说，“反到底”方面如果要认真打的话，每分钟只是主炮群就可以打出将近两千发炮弹，足够击沉“长江207”这样几十吨的小船一两百条了。

“金猴”战斗队拼了老命给“红大刀”送来的物资，在此后的武斗中排上了大用场：八月中下旬，两派在杨家坪（即建设厂“反到底”“红大刀”与空压厂“8.15”“八一兵团”势力交界处）再次大规模交火，参战人数四千余人，激战一周，杨家坪街道房舍尽毁，死亡人数两百人以上，最激烈的时候，一夜就打了高射炮弹一万余发。现在大家恐怕可以理解，为什么“8.15”会拼命在朝天门拦截“反到底”舰队了。“红港海战”是全国武斗最高峰的序曲，不是因为死人多，而是这次“战斗”涉及面广，且承前启后，进一步推动了整个形势的发展。

9月1日，在北京的周恩来听说了这一消息，唏嘘不已：“在越南，万余发炮弹能打下多少飞机！这是国家财产啊，我想了是很痛心的。”

这段传奇，其实经历的时间很短，长江上一阵轰隆隆之后，山川陵谷间又恢复了平静。

混浊的江面上一片火海，被击沉击伤的船只漏出的油污在水面上燃烧，生成厚厚的黑烟，沉船的残骸翻覆在江中，尸体的污血在江水中浮沉飘溢。岸上的勇士们在躲避，把自己藏在任何可以隐蔽的地方，有可能的话，胡乱开上一枪，伤者在呻吟咒骂……两岸围观的人在舔自己的舌头，垫高了脚尖看难得的稀奇，偶尔有脱靶的流弹飞来，齐刷刷的趴下一片，调皮的还去摸摸发烫的弹头。那年头的人，都具备相当的军事素质，知道怎么不容易被打死。活下来的人在几十年后无关痛痒地回忆当年，好像一切都和自己无关。历史真的和我们无关吗？

这是邓长春一生中最踌躇满志的时候。但站在“人民5号”上书写传奇的他，有没有想到历史将会怎样评价这段传奇呢？

邓长春不是个调皮捣蛋的家伙，凡是认识他的，都认为他是个相当能干的人，有相当好的口才和头脑，也有理想和激情，组织能力极强，是天生的领导。但是历史戏弄了他和那一代有激情的年青人。当一切平静下来之后，国家必须对这一切有所交代。

七十年代中期，邓长春等“8.15”、“反到底”的头头们，被招到北京，扣了起来。从此，再没有人知道他们的消息。

好多年后，才听说是关起来了，大概给的是长期徒刑，直到九十年代才放出来。一说到他们，故老口气中全是惋惜与慨叹。

青春幻化，人间白发，江山依旧，英雄老矣。

当年意气风发，本可以好好干一番事业的人物，现在不知蜷伏在重庆哪个不知名的巷子里，数着鬓角的白发，为生计发愁。龙战于野，其血玄黄，大英雄们龙战的筹码，飞洒的血滴，原来是小人物二十余年的青春！

青春墓地埋葬着重庆文革武斗的牺牲者。

在重庆，在和歌乐山遥遥相望的沙坪坝公园里，在荒草和杂木中，有一片人迹罕至的墓地，它被一道长满青苔的高高的石墙围住，似乎与世隔绝。这是一个全国仅有的文革红卫兵墓地，113座坟墓掩埋了640余名当年武斗的死难者。他们中有年仅14岁的少女，有被称为“校花”的女中学生，有年轻的母亲，她们和更多的他们——握着枪和铁棍、刀、匕首等的儿子、丈夫、父亲——交错地倒在这里。过去了将近五十年，如今，坟头芳草萋萋，那个动乱年代曾经的厮杀、哀号、枪声、颂歌和罪恶过去了，被鬼针草、尘土和高墙的阴影层层覆盖。但是，与死者有关的人还活着。重庆文革派性斗争的波诡云谲、血雨腥风，还影响着他们……兹记载几位当事人的回忆，使读者勿忘文革，勿忘历史。

我为文化大革命坐了15年牢：周某某，男，1945年生，原重庆“8·15派”总负责人之一，文革期间周恩来十一次接见，曾任四川省革委会常委，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1976年入狱，1991年刑满释放，现在重庆一家房地产企业帮工，每月有一千多元的收入，勉强糊口。

2014年，笔者在重庆巴南区见到了他，听了他一段叙述。择要追记于后：

文革前，我当时是重庆大学3年级学生。我卷入这场运动是从“四清”工作组留下来继续搞文化大革命，整重大校长、党委书记郑思群开始的。1966年6月，工作组把郑校长打倒，我不服。对郑校长，我印象很深，我从他手里接过奖状；郑校长在食堂当着学生的面，把饭桶边地上的饭捡起来自己吃，讲究身教，以身作则。这样的校长被打倒了，我鸣不平，当场我就被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关在重大阶梯教室隔离审查了一个礼拜。出来后，我自然就成了大家关注的对象。工作组让我出了名。那年7月19日，工作组把郑校长转移，押到松林坡招待所继续关押，转移时被我看见了，郑校长头发零乱，只穿着短裤、背心，打着光脚板，走在水泥路上。一位老革命，7级干部，就被他们这样整过来整过去，连鞋都不让穿，7月份的重庆，有多热啊！我看过，一喊就喊过来几百人，围住工作组的人质问，双方僵持了一阵，不了了之。我再次成为焦点人物，再次被打为修正主义苗子、反革命。但不过半个月，工作组突然宣布郑思群校长畏罪自杀，就在松林坡招待所。我们一面向当地派出所报案，要求调查郑校长的死因，一面自发地围攻工作组。就从郑校长死的那一天开始，工作组就不得人心，重大师生反对工作组就有了群众基础。为啥子叫“8·15”？莫名其妙的，我跟你讲。1966年8月15日那一天，重庆师范专科学校的造反派组织“排炮战斗队”、“轻骑战斗队”的负责人，到重庆大学找到我，要求我们声援、支持他们。我当天就鼓动带3000多重大的师生员工到了师专，开大会声援造反派。这事就惊动了重庆市委，市委就派了副书记、副市长辛易之来师专，他代表市委宣布我们的行动是错误的，命令解散，但大家不服，就在沙坪坝上街游行，口号就是要搞文化大革命，坚决贯彻“5·16通知”精神，坚决执行“十六条”。这就是重庆文革第一次大规模游行的所谓“8·15事件”。此后，各个单位造反派纷纷驱赶工作组，都跑到重大来搬兵声援，由此“8·15”的名声坐大了。“8·1

5”派就这样莫名其妙地形成了。1967年1月份全国各地造反派掀起了旨在夺权的所谓“一月革命”，重庆是2月28日，46个造反派组织发表了《重庆市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公告》，革联会宣告成立，掌握了全市党、政、财、文大权。革联会一把手是驻军首长，副主任由工人代表、农民代表、学生代表分担，我派了一个“副司令”去革联会当副主任，我自己没有当权，但我是支持革联会的。成立了革联会以后，有人认为革命尚未成功，不要当官老爷，因此反对革联会；还有一种人认为自己没有当权，被革联会排斥了，也反对革联会。这些人就把人拉出去成立了“反到底派”，又称“砸派”。“砸派”当时有一个很出名的广播站，叫“完蛋就完蛋”，原话出自林彪。当时，四川的政治局面非常复杂：60年代初，宜宾地委书记刘结挺、市委书记张西挺，不知什么事得罪了李井泉，被李井泉主持的西南局打成反党分子，一直关押。1967年五六月间，刘、张起来造反，复出后任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副主任。重庆两派围绕“刘张”平反复出的问题加剧了分化，“8·15”派反刘张，“反到底”派拥刘张。斗争越来越激烈，开始是唇枪舌剑，随之而来的是拳打脚踢，到后来武斗全面升级、动了真枪真刀。文化大革命演绎成了大革文化命，轰轰烈烈，震撼世界，这是悲剧，防止悲剧重演这个观点我是赞同的。我为文化大革命坐了15年牢，我负了责。1967年4月23日，两派组织在北碚、重钢等地辩论，发展成动拳头、砸宣传车、广播器材等事件。1967年5月23日，两派人员在重庆石油学校发生武斗，双方从动拳脚升级到使用钢钎、铁棍、匕首。是月，武斗之风蔓延全市：重庆医学院、嘉陵机器厂、西南师范学院均发生了使用这些武器的武力冲突。1967年6月5日至8日，西南师范学院两派发生武斗，全市两派分别出动数千人，揭开重庆大规模武斗的序幕。1967年7月8日，两派武斗组织在红岩柴油机厂发生冲突，打死9人，伤近200人。这次武斗中双方首次使用枪弹。这次事件被称为“打响重庆武斗第一枪”。从此，重庆武斗全面升级，从使用小口径步枪、冲锋枪、轻机枪、重机枪、手榴弹到动用坦克、高射炮、舰艇，从巷战到野战，规模越来越大，死的人越来越多，正常的社会秩序完全被破坏。1967年7月31日至8月6日，荣昌县两派共700人左右参加武斗，死亡78人。同年8月8日，望江机器厂造反派用3艘炮船组成舰队，沿长江炮击东风造船厂、红港大楼、长江电工厂及沿江船只，打死240人，伤129人，打沉船只3艘，重创12艘；8月13日，两派在解放碑激战，交电大楼及邻近建筑被焚毁；8月18日，沙坪坝区潘家坪发生大规模武斗，双方死亡近百人；8月28日，北碚歇马场发生3000多人的大武斗，双方死40余人，同一天杨家坪街道在武斗中被毁近半，双方死亡100余人。”1967年7月、8月、9月，山城重庆变成了血雨腥风的战场。

我一直在抚摸身上的刀伤枪伤：陈卓(化名)，男，原重庆某中等学校“反到底派”头头，1969年入狱，1972年释放，现为房地产商人。他回忆说：我本人直接参加了武斗，从1967年打到1968年。我当时是学校“反到底派”的狗头军师(笑)，同学们都喊我“参谋长”。我身体一直比较弱，弱不带兵嘛。我惟一次带兵是1968年6月29日至7月1日这次3天3夜的激战。6月29日，“二和尚”跑到我们学校来搬救兵，他是建设厂技校“砸派”的头头，他指挥的建设厂“砸派”与“8·15派”干起来了。当时武斗打了一年，死的人太多了，战斗队员都产生了厌战情绪、恐怖情绪，都不愿去。我当时出于强烈的派性荣誉感，勉强把200多名战斗队员集合起来，说谁愿意跟我

去的就出列，有 70 多个人出列。我们全副武装，甚至把解放鞋带取下来串着子弹夹挎在身上，省得在战场上换弹夹耽误几秒钟的战机，这是一种拼死到底的态度。当时，我的脑海里不断地浮现着陈辉(革命烈士，死在渣滓洞)的名言：“战士的坟墓比奴隶的天堂更明亮。”当时大家的心情真的很悲壮。我们在杨家坪参战，打了 3 天 3 夜，我们这一边惨败，我带去的 70 多名战斗员当场牺牲了 4 个，还有 7 个被对方俘虏后也全遭枪毙了。“二和尚”在撤退时睡着了，怎么都弄不醒，结果也被对方俘虏枪毙了。与他同时被俘的还有一个同伴，那个同伴是建设厂的子弟，他父亲是“8·15”派的，因此那个同伴得救了，没遭父亲的阵营枪毙。“二和尚”是建设厂技校的学生，是资阳人，无人说情。我一直记得“二和尚”来找我搬救兵时的样子，穿着蓝色学生装，拴根牛皮带，铜扣锃亮，腰间插着一把驳壳枪，脚上穿着解放鞋，挽着裤管，中等个，短发，方脸，威风凛凛，但脸色苍白。这次战斗，我们这一派也枪毙了对方 4 个俘虏，其中两个是我亲自俘虏的。我为此内疚、忏悔、痛苦了几十年，因为我无法忘记他们当时被俘虏的那一瞬间的目光。他们当时端着冲锋枪站在车间一台机床边，混战中我退进了这个车间，一发现他们我凭直觉判断是“8·15 派”的，立即冒诈我是“8·15 派”的，他们把枪背起来向我走近，我马上就……那一瞬间，他们的目光充满了悔恨、恐怖、绝望。两人都只 30 多岁，是工人，我想他们一定有儿女、妻子——这几十年我一直因此而得不到解脱，永远得不到。——这是兽性的恶，在现世中不会也不应该被宽恕。重庆武斗最惨无人道的事就是互相杀俘虏，这是全国武斗过程中最黑暗的一幕，是我们这一批人心灵上永远的污点，它不会被时间磨灭。几十年来，我一直在反思文革，一直在抚摸身体上的刀伤，枪伤。这次武斗结束后几天，1968 年 7 月 9 日，两派在江陵厂重燃战火，双方动用坦克、大炮、轻重机枪激战，附近民宅被炮击成千疮百孔。也是当月上旬，两派还分别在杨家坪、大坪、重庆医学院、二四二部队、五一技工学校发生大规模武斗，双方均出动水陆两栖坦克、舰艇、三七炮、四联高射机枪、野战炮等重武器。上述地区民房、单位建筑、器材设备遭重创，两路口至杨家坪无轨电网友被打烂，全线停运 1 年多。经过上述几次大规模激战，重庆“8·15 派”彻底控制了局势，“反到底派”全体成员及其家属总计数十万人集体分批疏散，逃离重庆，“大清洗”的谣言像瘟疫一样倾压山城。在逃到成都后(成都是以四川大学“8·26 派”为首的造反派天下，“8·26 派”是欢迎重庆“反到底派”的)，弱不带兵的 18 岁的陈卓再次纠合从重庆逃来的 2000 多名红卫兵，因为人多枪少，他们拦截火车一路狂飙杀往四川绵阳、广元，找当地驻军要武器弹药，准备杀回重庆，被驻军拒绝，从而避免了一场更大的惨祸。1968 年 9 月 23 日，重庆市革委、警备区发布命令，严令一切群众组织、团体和个人，无条件上缴一切武器弹药、运输车辆；拆除武斗工事、据点；解散专业武斗队。1968 年 10 月 15 日，两派宣布撤销总部，解散组织。

我跪在地上向死人请罪：法官某某，男，当年 56 岁，原文革武斗中“砸派”成员，已退休，离开家庭，独居在郊区，过着很无奈的日子，自嘲生活混乱，3 次拒绝采访，最后却不过老战友的情面，终于开了口：“提到沙坪坝那个红卫兵墓地，我实在太熟了，不想说，太伤感了(沉默一阵)。当时，我在要害部门工作，因为一个同学的弟弟在化龙桥读书，我经常到他学校去看他，文革前我们就很熟了。后来运动开始，加上观点相近，我自然就加入

了他们学校这一派(砸派)。1967年7月24日,这天下午,他们学校的学生拦截了一辆路过的“8·15”派车辆,并扣押了随车人员和一位军代表。我向来不主张乱抓乱打,经过我的劝告,他们把人放了,但军代表因为时间晚了,当天没走成,继续被扣押。晚上,我得到情报:重庆大学“8·15派”抢了武装部,得到了许多军用装备,并且准备攻打我们这边的学校,因为学校所在地化龙桥是重庆大学到市区的必经之地,所以从技术上考虑,重大“8·15”派非拔掉这个钉子不可。这天晚上,大家都很紧张。凌晨3点钟左右,我看见夜空升起了3发红色信号弹,知道“8·15”派进攻开始了。大约4点钟,我听见枪声,从声音判断,有冲锋枪、机枪,还有极少量的土制炸弹,这些火力一直在外围打到天亮。我们这一边都是冷兵器,仅有4支小口径步枪,其中3支不能用,只有1支可打。对方不摸底,以为我们沉着打埋伏,直到天亮了才冲进来,打死了10个学生,他们也死了1个。我和另一个同学躲在宿舍房顶,那同学脑门上中了一枪,死掉了,我成了“8·15”派的俘虏。从7月25日到国庆节前,我当了2个多月的俘虏。我被押到沙坪坝公园挖过十几次墓,主要是处理掩埋那些对方不愿处理的尸体,都是高度腐烂、臭气熏天的尸体。我们要跪在这些尸体前,首先低头向尸体请罪,然后清洗创口,注射福尔马林,给尸体打扇子驱赶蚊虫、苍蝇。管理我们这些俘虏埋尸的人叫郑志胜,他是重庆大学的学生,因为出身成份不好,为了证明自己革命的彻底性,他要求来墓地负责,当时“8·15”派想在那里建自己派别的烈士陵园。郑志胜为了挣表现,一方面非常真诚地同情己方的死难者,一方面绞尽脑汁残酷折磨俘虏,所以我们背后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尸长”。有4次,我记得,郑志胜等我们挖好坑,把薄木放下去后,突然叫我们全部跪在坑边,他指挥别人从背后向我们开枪,我以为自己要陪葬了。他耍的这一招叫“假枪毙”,但都不知道哪一次是真哪一次是假,我自己就亲眼目睹过他毙掉过一个女俘。郑志胜后来分配到新疆工作,文革结束后被抓回来,因为有血债,开始就关押在我同学的单位,大家都知道我过去在郑志胜手下当俘虏的经历,没少怂勇我趁机整他一把,但是我没有整过他一次。我始终认为,我和他之间没有个人恩恩怨怨,都是毛泽东手下的红卫兵,大家遭罪都是文化大革命造成的。这段非人的经历对我的影响太大,我目睹了一个人在极端状态下人性恶的、丑陋的一面,它粉碎了自己也粉碎了别人的世界。这里看不见希望。这肯定影响了我后来的生活。我对什么都看得无所谓,一生就这样子,无所谓了。

“校花”之死: 重庆沙坪公园红卫兵墓地上有一块最完整的碑文,极具代表性,摘抄如下: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吐嘉华。毛主席最忠实的红卫兵、毛泽东主义战斗团最优秀的战士张光耀、孙渝楼、欧家荣、余志强、唐明渝、李元秀、崔佩芬、杨武惠八位烈士,在血火交炽的八月天,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流尽了最后一滴血,用生命的光辉照亮了后来人奋进的道路。/不周山下红旗乱,碧血催开英雄花。披肝沥胆何所求,喜爱环宇火样红。你们殷红的鲜血,已浸透了八一五红彤彤的造反大旗。啊!我们高高举起你们殷红的血旗。/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绝不丢,你们铿锵的誓言啊,已汇成千军万马、万马千军惊天动地的吼声。你们英雄的身躯,犹如那苍松翠柏,巍然屹立红岩岭上,歌乐山巅。立碑者系“重庆革命造反战校(原二十九中)”。笔者从29中校友录上查到了唐明渝等3个同学的地址,通过她们辗转找到了陈国英,她是欧家荣、唐明渝、余志强、李元秀、崔佩

芬、杨武惠等6位死难者的同学，是当时唯一的幸存者，她十分友好地接待了突兀来访的记者。一提起当时二十九中的“校花”唐明渝和唐明渝的其他3位同学，陈大姐不禁唏嘘起来，她说：“唐明渝当时才16岁，身高一米六几，热情大方、漂亮，特别擅长跳舞。我喜欢唱歌，就因为这个原因，我和她加入了战斗团，唱歌跳舞搞宣传，大家都觉得挺好玩，根本就不可能想到死亡。结果一下子，4个女生，两个男生都死了，杨武惠死的时候还只有14岁。”陈国英回忆道：“1967年8月4日，中午，很热，我正在家里午休，我家当时就住在今天的女人广场。3个女同学来叫我，说去帮‘8·15派’的一个指挥部搬家，从杨柳街财贸俱乐部搬到外贸大楼，中午1点钟左右，我们开了一辆解放牌汽车，停在俱乐部门口，东西都装完了，是一些棉絮、文具用品、纸张，没有一件武器。因为天气很热，我们5个女孩子嘴里都含着冰糕，大家都穿短袖衬衫、裙子、凉鞋。我们上了车，还在含冰糕的时候，枪响了。我因为是最最后一个上车的，听见枪声，火力很猛，我想如果不跑，肯定会被打死，所以我立即跳车，跑进俱乐部大院，两个好心的陌生人给了我一件军衣，叫我快穿上，我穿好了军装，他们就托着我翻围墙，翻过去后我搞不清方向，居民赶紧给我指路，我朝着俱乐部反方向的路，从杨柳街——五一一路——依人巷，一口气跑到了重医附二院，到医院后我才知道自己受伤了，一对长辫子被枪打断了，右手臂被子弹射穿，左手臂也被子弹拉开了一道口子，当时满身是血，脑子里一片空白。”出院以后，陈国英退出了战斗团宣传队。1969年3月17日，陈国英清楚地记得，她和29中的同学下放到乌江边的彭水县插队落户，坐船去的。“我是那条船上年纪最小的，那时很绝望，我是哭得最凶的一个，真的很伤心。”江水茫茫，辞别山城，两年来的血雨腥风化作无尽的伤怀，18岁的陈国英18年后回到重庆，“想起来，就像做了一个恶梦。”

朱孝云，女77岁，退休工人，寡居。1967年8月4日，她当时还不到40岁，17岁的独生子余志强死了。三十多年来，她一直没去过墓地看她的爱子，她也一直坚持没有换过房间，她说：“怕娃儿回来了找不到我。”2001年3月11日上午，好心的陈国英大姐领着记者，在临江路的一个老式门洞里找到了朱孝云，她听见陈国英亲切地喊她“姨妈，我是余志强的朋友，陈国英”就一把紧紧地抱着陈国英，“儿一呵”地恸哭起来。34年过去了，这位痛失爱子的母亲却无时无刻不在怀念17岁的独生子，因为无力，她才没有了恨，才无奈，才隐忍。她打开被层层包裹的儿子的共青团员证，抚摸着儿子生前的一张照片，不断地泣诉，“我的娃儿好乖啊！他死得好可怜啊！”17岁的余志强身着海军衫，英俊、迷人。满头白发的朱孝云每天守在门洞里，卖0·2元钱一包的棉花糖，勉强度日，打发余年。

两个少年目睹母亲被误杀：席庆生，男，1952年生，某民营企业高级职员；席庆川，男，1954年生，重庆某影视厅的摄影师。1967年8月24日，他们兄弟俩目睹着母亲黄培英被杀。尔后，兄弟俩在沙坪坝公园亲手掩埋了母亲。那一年，母亲才33岁。“1967年8月24日，母亲带着我兄弟俩从九龙坡区滩子口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的家里出发，准备到李子林投奔亲戚，因为双方武斗越来越厉害，算是逃难吧。上午10点左右出发，抄小路走到毛线沟屠宰场对面，大约11点，这时突然枪响了，第一枪打我，因为我走在最前面，母亲在中间，他(席庆川)在后面。我们身边的子弹乱飞，打得地上的土扑扑地扬起来。我有武斗的经历，赶紧喊卧倒，自己同时就卧倒在地，这时

刻我就听见母亲“啊”地一声倒下去了，我转过来一看，母亲正痛苦万分地撑着胸部，我不顾一切地扑到她身边，大声地叫妈妈、妈妈，抱着她的头，她手上的血汨汨地流下来，两眼直直地盯着我，没有说一句话。我马上撕开身上的白汗衫，准备包扎，这时，对方又用高射机枪朝我们扫射，我马上脱掉白汗衫朝对方狂舞，表明我们是和平居民。但枪声未停，我又卧倒在地，弟弟躲在海椒地里。枪声一停，我又爬过去看母亲，她完全断气了，子弹从左乳下射进，从右腰部射出。我兄弟俩当时都没哭，绝望了，茫然了，极度恐惧之下不可能有眼泪。路边的农民这时从门洞里探出头来，朝我们招手，我们跑进门，背后山坡上的机枪又猛烈地叫起来了。我们俩抵着土墙浑身瘫软在地，我们一直躺了几个小时。下午五六点，我们沿着河沟，猫着腰，一会儿爬，一会儿跑，一会儿躲，逃到了大路上，继续朝李子林方向跑。当时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找到亲戚。然而，我们赶到了李子林才发现，这里的一大片房子都已经遭到炮击毁坏了，空荡荡的，连人影都找不到了。我们只好沿着公路继续走，临时找了一辆架架车，拉着刚刚逝去的母亲，被大批逃难的居民裹挟着朝钢花电影院方向移动，这一年，我15岁，弟弟13岁。后来，席庆生，席庆川兄弟俩亲手把年轻的母亲埋在沙坪坝公园无名的墓地里。从此，每年清明节，兄弟俩都要去那里烧纸，默哀。再后来，扫墓的行列里多了几个人，是他们的儿女。席庆生说：“那以后，我凡遇到什么事，就跑到墓地看看母亲，坐一坐，吸一根烟，什么都淡了。”兄弟俩告诉记者，文革结束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什么人去沙坪坝公园凭吊，不过最近四五年，去的人越来越多了，今年春节还有不少人去那里烧纸、哭诉。“人们开始强烈地怀念死在那个年代的亲人，”席庆生说，“我想拍一部电影，以纪念死在那个年代的人。记录那个时代。”啊！那不堪回首的毛泽东时代。

四、劳改纪实

（1）服刑人员的组成

苗溪茶场十三队关押的都是刑期十五年以上的政治犯，这是我一来就听说了的，住了一阵逐渐地熟悉了，才知道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政治犯”的帽子是很容易被戴上的，下面就如实记录一些监狱里关押着的、罪大恶极的政治犯。

1、几位老者

1966年11月份从成都来苗溪两百多人，到达时间是下午，苗溪茶场的狱警念着花名册，按犯罪性质和刑期长短点名分组，刑期十五年以上的反革命犯大约有四十余人站在一边等候，我站在队伍里用眼睛来来回回地看，这四十多人中以三十岁左右的占多数，刑满以后就都是年近半百之人了。分完了组，还剩下十来个老头儿，几个狱警嘀咕了一阵，把他们也归入了我们这一列，几分钟后到达十三队。过了几天之后才知道那几位老者的刑期都不够十五年，不具备划入十三队的资格，因为到达苗溪当日分完了组，已临近下午三点钟，看他们年老体衰的样子，恐怕难于走到他们该去的大坪山，若是走到半路真的爬不动了，会给狱警增加许多麻烦，所以监狱长决定，暂时寄押在山下面的十三队。择机上山。

这几个老头儿编成一个组，没有让他们上山干活儿，白天就在十三队的坝子里劳动，晚上住在楼下的舍房内。出于好奇，许多人想知道，这么老了不在家里抱孙子怎么反起革命来了？下面就是几宗简单的记录：

吴根祥（音）：成都郊区人，孤身一人的五保户，六十五六岁，一米六左

右的个儿，衣衫褴褛，胡子巴茬的略带口吃，不知道为什么成了反革命被判了五年有期徒刑。某日晚九时许，管理员逐室点过了名，几个人依着次序上厕所，“XXX 报告解手、XXX 报告解手转来”之声不绝于耳，吴根祥站在监舍门口，一个小伙子声音十分洪亮地喊道：XXX 报告解手转来。吴根祥随即喊：“吴吴根祥报报告解手转转来，略停了一分钟，他又补充一句“噢，我还没没屙”惹得舍房里还没睡着的人一阵大笑。岗楼上的管理员不禁骂了一声：你个老糊涂。吴根祥提着裤子赶紧一颠一跛地向厕所跑去。

刘大爷：成都人，六十三岁，在一个巷子里经营日杂用品，十来平米的面积，堆满了扫把、撮箕、泡菜坛子、碗筷等物品，附近都是老邻居，生意还过得去。老头儿看守店铺，老伴买菜煮饭，儿子进货，儿媳带孩子，一家人和和睦睦，小日子过的还不错。文革初期某日，儿子出去进货，回来时在卤肉摊子上给老爸买了点猪头肉，老头笑嘻嘻了，拿出老白乾儿来准备喝上两口，来来往往的人进进出出，看着刘大爷独自酹酒，都冲他笑笑，刘大爷喝得二昏二昏的流露出一幅怡然自得的样子。这时远处响起了咚巴-咚巴、咚巴咚巴咚巴；锵锵起锵起、锵锵锵锵起锵起的鼓乐声，有人问道：刘大爷，你看谁来了？刘大爷一副醉态，摇了摇头说：“我不认得，我就认得我的儿”继续喝他的酒。不一会儿，敲锣打鼓的人走近了，原来毛泽东又发布了“最高指示”，街道组织的秧歌队正高举着毛泽东的画像四处宣扬呢。这下子刘大爷犯了攻击伟大领袖之罪，被判了七年有期徒刑。

我写回忆录时联想到，1981 年 2 月 14 日，邓小平欣然命笔，以“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为题，为英国《镜报》集团董事长罗伯特·马克斯韦尔策划出版的《邓小平文集》写了序言。如果有谁说“邓小平不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是否也是犯罪呢？唉！说他们是儿子或不是儿子都要犯罪，做中国人真难。

曹克明：四川大邑安仁镇人，年五十许，为人仗义。1965 年四川美术学院雕塑系教师赵树同、王官乙带领 5 名学生奉命到大邑，以泥塑群像的形式表现地主压迫盘剥农民的情节，激发群众落实毛泽东“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理论。四川省委派彭县川剧团演员到现场按照创作组的意图，虚构情节编造故事，现场造型表演，摄影存档，作为素材。然后聘用当地部分老乡当模特，现场制作了 114 个等人大小的彩塑《收租院》群像。曹克明为模特之一，由于形象逼真，曹克明由此被称为刘文彩的“狗腿子”。文革兴起，曹克明被抓捕，判了十五年徒刑。毛泽东死了以后，经反复查证，大邑地主庄园内的“水牢”“地牢”等等情节都是虚构出来的。法院遂以量刑过重的名义改判曹克明为五年徒刑（那时他已被关押了近 14 年）。曹克明出狱后到县法院去申述，法院的办案人员对他说：《收租院》不否定，我们就不敢给你平反。曹克明又到上级法院去申述，上级法院也是同样态度。曹克明喊天天不应，喊地地不鸣，1982 年，悲愤交加走投无路的曹克明到大邑县人民法院门口自杀身亡。

银兆良：一位须发皆白的老者，成都市人。文革初期入狱，因攻击伟大领袖被判刑十五年，年老体衰，难以在山上劳动，只能打打草鞋，干点儿杂活。平时不多言不多语，一问三不知，谁都不在意。1978 年毛泽东死了以后，平反冤假错案逐步展开，某日来了两位外调人员，追问银兆良：“你为什么说秦始皇见了毛主席要甘拜下风？”这是银兆良被判刑的主要罪状。银兆良不紧不慢地回答：“秦始皇只能平定六国，毛主席是全世界人民的伟大领袖，秦始皇见了毛主席当然要甘拜下风喽。”两位外调人员无言以对。银老头的幽默

回答引得在押犯人笑了好几天。1979年初，银兆良被宣布无罪释放，时已年逾古稀，只能回家抱孙子去了。

2、曾经的志愿军

田成义：辽宁营口人，高中文化，懂朝鲜语，1950年参加中共军队，随即入朝，在志愿军司令部任译电员，对彭德怀十分敬重，朝鲜停战后回国，1959年听说彭老总在庐山会议上写了万言书，他认定彭说的是实话，报纸讲的大好形势则是一派谎言。由此田成义竟成了攻击三面红旗的反革命，文革期间被判刑十年押送到苗溪茶场第四中队劳改。他入狱后伙同另外两个犯人王X X和刘X X逃跑，当日即被抓回，挨了一顿打，加刑五年，转入第十三队继续劳改，毛泽东死了以后的1979年底始获平反，得以返回辽宁营口，年近五十才结婚安家。

李尚鹄：我到苗溪茶场时他已年近五十，面色黝黑，不修边幅，加以浓重的络耳胡，人称李包公，原系志愿军某团作战参谋，转业后在四川永荣矿务局工作。因反对总路线、大跃进等三面红旗，赞扬彭德怀为民请命，以攻击伟大领袖、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之罪名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李尚鹄性格直率，为人善良，由于长期劳改，且年逾花甲，已心灰意冷，常暗自叹息，1979年我离开监狱之时，他仍在苗溪茶场十三队服刑。最可爱的人沦落到如此地步，该属谁人之罪呢？

熊绍武：贫农出身，1934年生，1950年参军入朝鲜作战，曾任炮兵副排长，共青团员，作战勇敢，立有战功。1957年转业后到供销社工作，反右运动伊始，党支书动员共青团员带头鸣放，他说：“共产党让我翻身，又当了干部，我没有什么鸣放的。”老支书便深入启发，几次个别谈话解除了顾虑，便在会上说：“目前农民对统购统销有些意见，认为统得太死，购粮过多，有些人反映不够吃。”忽悠之间，反右之风狂飙，供销社单位小，捉不到大鱼，为了完成指标，便把这位曾是最可爱的人大会批，小会斗，说他是向党猖狂进攻的右派分子。他一万个想不通，找到那位面容慈祥的老支书：“是你一再让我给党提意见，如今竟这样整治我！”老支书一脸尴尬：“这都是毛主席、党中央的号召，怎么，你还不服？”于是，被开除公职和团籍，送去劳教。进了劳改队。他一直认为受了愚弄，心怀愤懑。此时他在415筑路支队里结识了一些知识分子，他们向往马列主义、民主社会，曾商议组织马列主义学习组，研讨如何走社会主义新路。后来，东窗事发，未见任何行动，便被定性为反革命组织，由此熊绍武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

夏联松：1933年生，富农家庭出身，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17岁的夏联松应征入伍，赴朝作战。在部队中一贯积极，不畏艰苦，乐于助人，群众关系很好，不久即成为共青团员，多次受奖，家庭也成了“光荣军属”；他进入劳改队后还保存着当年穿过的军大衣和印有“赠给最可爱的人”字样的搪瓷口盅。转业后回乡当农民，仍按富农待遇，当时阶级斗争尚未发展到“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夏联松和一位贫农女儿结了婚，小两口勤俭持家，努力劳动，生活温饱有余，但厄运还是未饶过他。一次，一个贫农出身的小偷到他家偷猪，被他捉住打了一顿，“社教”运动中因富农打贫农被认定为阶级报复，判处有期徒刑15年，他自然也想不通。从小就紧密追随中国共产党，甚至出生入死，怎么转业后却变成了阶级敌人呢？想不通归想不通，进了监狱就只能当犯人。中国农民的忍辱负重习性造成了他在劳改队低头认罪、委曲求全的形象。

3、几位精神病人

我所在的三工区当时有四十余名服刑人员，其中十二人患有轻重不同的精神病或精神分裂症，整个十三队关押着将近四百名重刑“反革命”，其中大约有五六十名这样的人，在劳改队里被叫做“疯子”或“半疯儿”。精神病患者约占在押人数的百分之十五。

我国《刑法》第十八条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责令他的家属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在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制医疗。间歇性的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时候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中共的监狱是从不承认医院鉴定的，长期以来中国精神病鉴定概由司法机关进行，也就是说，即使毫无精神病症状，只要司法机关说是精神病，就可以“被精神病”，将其强制送往精神病院，剥夺其人身自由；即使有明显精神病症状，司法机关说不是精神病，也可将其关入监狱，让他承担刑事责任。

各界人士从1985年即开始呼吁：是否为精神病，不应由司法机关认定，应由有资质的医疗机构确定。历经二十七年的讨论，2012年10月26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确认从2013年5月1日起，精神病由医疗机构鉴定，精神障碍的诊断应当由精神科执业医师作出，精神障碍的住院治疗实行自愿原则。法律条文有了，能否执行尚需拭目以待。

文革期间，中共一概不承认监狱里关押着精神病患者，不管医院如何鉴定，也不论是否对社会有所危害，笼统扣一个反革命帽子，精神病人就成了政治犯。对于因政见不同而入狱的人，除了被冠以反革命帽子外，还采用种种非人手段横加折磨，妄图使其成为精神病，意志比较脆弱的人精神真的错乱了，成了真正的疯子。

迫于枪杆子的威力，和棍棒、镣铐、绳索等酷刑的威胁，监狱中的精神病人大都很规矩，他们对于生活已经没有要求，对于未来已经没有希望。有时候窃窃私语，不知道说些什么。有时候嘻嘻傻笑，不知道想些什么。他们的喜怒哀乐非常人所能理解，他们的苦痛辛酸较常人更深更烈。哀莫大于心死，这些人的心受了深深的伤害，已经死了，而其血肉之躯则在劳改队里继续忍受着非人的折磨。

我以虔诚的心，记录几位患有精神病的难友。

舒开昌：四川人，年近花甲，伤残军人，没结过婚。入狱前在荣军疗养院疗养，以攻击伟大领袖罪判刑十五年。据管教干部讲，舒开昌反对毛泽东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打倒刘少奇的时候他竟然要求改名字叫舒少奇，诋毁毛泽东。我听了以后感到很奇怪，舒开昌认字不多，只会写自己的名字，怎么过问起政治来了，怎么反对打倒刘少奇呢？原来他当过新四军，刘少奇当时是新四军的政治委员，在中共的军队里，士兵不仅服从首长还崇拜首长，即使从来没见过首长的面，刘少奇在新四军士兵的脑海里印象仍很深刻，他不知道刘少奇曾经是毛泽东的一条狗，只知道刘少奇是他的首长。

舒开昌参加过无数次浴血战斗，参加渡江战役占领南京，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从头到脚四十余处伤痕，对中共夺取天下是立了功的。由于没有文

化，始终没有提拔成干部。他脑部受过伤，有时神志不清，生活可以自理，不打人不骂人，只是常常伴随着笑声自言自语。像这样的人，本应念及为中共夺取政权吃过苦、流过血，让他在荣军疗养院养老，为其送终也就是了。可那时的部队领导人为了执行毛泽东的所谓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狠抓阶级斗争，强化敌情观念，在荣军疗养院也要查出反革命来，竟然对这位因负伤而患有精神病的老年残废军人下毒手。

不赞成打倒刘少奇，是一个公民的意见，没有违法；扬言打倒刘少奇也是个人意见，只要不恶意地侵犯他人也不违法；应该允许自由表达。这在民主社会是很正常的，然而在号称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具有最广泛民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却都可能成为坐牢的理由，舒开昌便是其中的一例。那些灵魂卑鄙、心怀叵测却担任共产党要职的人，以整人为职业，以害人为乐事，以他人的鲜血和生命作为进身之阶，毫无人性地给这位有功之臣戴上反革命帽子，投进监狱，让他在深山里服苦役。

我很想了解舒开昌的身世，有时候善意地和他攀谈，他始终讲不清楚，也就无从了解了。我跟他开玩笑说：“你是国民党的荣军”，他气冲冲地说：“你才是国民党，光会打败仗”，被充分洗脑的“反革命”表现出对国民党的藐视与鄙视。我又说：“你现在是反革命”。他不以为然地说：“你才是反革命”。尽管共产党把他投进监狱，以反革命罪判处十五年徒刑，强制劳动，其内心深处仍然怀着对共产党的自豪感，对共产党把他打成反革命毫不在意，在他的脑子里共产党和反革命这两个概念已然混淆不清了。

可怜啊，一个为共产党立了战功的伤残军人，一个被关押在共产党监狱里仍视共产党为其精神支柱的精神病人，一个在共产党监狱里受着精神和肉体双重折磨的老人。

1979年我平反出狱，舒开昌还在服刑，那时他已经六十多岁了，听说后来没有人为他申诉，八十年代初期死在狱中。

他这一生在共产党的军队里卖了几十年命，身上带着为共产党夺取天下留下的累累伤痕，头上戴着因为不赞成打倒他迷信的老首长——新四军政委刘少奇而由共产党强加的反革命帽子，蹒跚地走向天堂了。

母胜才：四川筠连人。孤儿，读了小学后即在家乡务农，满十八岁由公社推荐参军，公社由此减轻了抚养孤儿的负担。

母胜才入伍后在某野战部队当炊事兵，做饭、养猪，有时候还要上山砍柴。他身高1.8米，不胖不瘦，年轻力壮，且从小在农村养成了勤劳俭朴的习惯，工作甚为出色。1968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登峰造极之际，母胜才要求入党，写了申请书恭恭敬敬地交上去以后却不见动静。一年过去了，其他人入党了；两年过去了，又有人入党了，他还在党外徘徊。

这位淳朴的农民战士不由得想了想，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原来入党的是城镇兵，他们的表现不是很好呀？干的活儿也没有他多，没有他累，可是他们和指导员、连长的关系好，回家探亲的时候想着指导员、连长，返回部队时给首长带土特产和五粮液[1]。自己呢？举目无亲，单靠部队那点有限的津贴也买不起五粮液，再怎么干又苦又累的活儿也入不了党，思想渐渐苦闷。

那时候江青在毛泽东的庇护和扶持下正如日中天，无德无才有后台，从一个绯闻不断、媚俗取巧的三流演员摇身一变，成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文化大革命的旗手，可谓红得发紫，热得烫人。然而民众对她的印象怎么也好不起来，时常有些影射的传闻，军队中也流传着殷纣王宠妲己、烽火戏诸

侯的故事。

母胜才长期未能入党，又听了一些有关江青的传闻，迁怒于江青，在毛泽东选集的空白之处以粗俗的文字、歪歪曲曲的笔划，谩骂毛泽东这位夫人。那时候，同事之间是要互相监督的，军队也不例外，早有好事者偷偷地翻阅母胜才的毛泽东选集，发现这些文字后如获至宝，往上打小报告，于是母胜才被捕了，以污蔑伟大领袖治罪，写了不到二十个字，被某军事法庭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

投入监狱初期还看不出明显的精神病症状，只是沉默寡言，常常发呆，与周围的难友很少说话，大家都在服刑，各有各的苦恼，也就没有多管他。母胜才对农活儿比较熟悉，喊他干什么就干什么，一般都能完成任务。过了大约三四年，他的精神状态有所变化，干农活儿的时候嘴里嘟嘟囔囔，听不清说些什么。休息的时候，一个人独坐，不和任何人往来，常常咬牙切齿、摇头晃脑，看起来像是想不通、气不过的样子。目光呆滞，面无表情，双眼发直，若有所思。这分明是精神分裂症的初期表现，及时治疗有望痊愈。但是中共的监狱里不承认精神病，往往被叫做“装疯”，得到的不是治疗而是恐吓、辱骂、折磨，甚至捆绑吊打，母胜才的精神病症状日益严重，挨打的次数也日益增多，他真的疯了，被逼疯了。

“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怎么对待关押在监狱里的精神病人呢？轻者在严格监督下干又脏又累的劳动，重者则关在黑屋子里与外界完全隔绝，任其“自绝于人民”。母胜才被关了黑屋子，幸好他年轻，原来的体质比较好，在黑屋子里熬到毛泽东一命呜呼也没有“自取灭亡”。

大约是 1978 年的夏秋之交，“拨乱反正”的口号时有所闻，但监狱里多数冤案受害者还没有平反。

母胜才因为谩骂文化大革命的旗手江青而获“反革命”罪，被处以重刑。毛泽东死了不到一个月，伟大领袖的老婆、喧嚣不可一世的革命旗手江青便成了反革命，被抓进监狱，即将面对的也是重刑。骂反革命分子的人自然该属于有先见之明的革命者喽，母胜才因而得以列为平反的对象。比较早地要被平反了。

某日下午，来了两个年轻的军人，奉上级命令到劳改队接母胜才回原来所在部队，苗溪茶场十三队的狱警不得不把母胜才从黑屋子里放出来。那天我在山上放牛，下午回队部领取饲料盐，恰恰看到母胜才从黑洞洞的禁闭室出来，一年不见判若两人，关进黑屋子之前是身高马大的青年人，现在呢？只见他瘦骨嶙嶙，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神情恍惚。乱蓬蓬的头发，长可披肩；三四寸长的胡须，遮住了瘦削的脸颊；煞白的脸色，呆滞的目光；闭不拢的嘴，抬不起的头；两只手自然下垂贴不紧身子，两条腿微微张开禁不住抖动；弓着腰，驼着背；怎么看也不敢说这是一个二十多岁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

中国共产党号称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人道主义很美妙，到了中共手里，加上“革命”两个字就变味儿了，人道主义就成了法西斯主义。苗溪茶场第十三队以管教严格著称，以指导员周金仁为首的几个心狠手辣的狱卒，不知道残害了多少人，他们的手上是沾满了人民鲜血的。

两个来人大约曾经是母胜才同一班组的战友，见此情景，茫茫然、愤愤然不知所措。昔日欢蹦乱跳的小伙子进了中国共产党的监狱，据说是要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改造世界观，怎么变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了呢？那两

位战士目瞪口呆地看着昔日的战友，足足两三分钟不知道说什么好。而后，眼睛里含着泪，颤动着嘴唇喊了两声“母胜才！”“母胜才！”。母胜才站在原地一动不动，一言不发，旁若无人，毫无反应。“平反”对他来说已经没有意义，“战友”对他来说恍若隔世之人。两个军人低声商量了一阵，不敢接人，忿然离开十三队，大步流星地走了，头也不回地走了。

隔了几天开来一辆军用吉普车，来了三个军人，带了一套新军装。好说歹说给母胜才理了发，洗了脸，换了衣服，搀着母胜才上了吉普车，急速地开走了。以后再无音信，他的病治好了吗？如今还活着吗？

吴明新：四川仪陇人，进入监狱前也是军人，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青海部队任汽车司机，驾驶榴弹炮牵引车。不知道在什么情况下他受了伤，失去了两个右手手指，由此不能继续开汽车了，于是被转业。回到贫困的家乡，靠有限的残废救济金维持生活，家有年迈的老母亲，自己也没有娶妻生子的条件，一直打着光棍，面对困难，他的精神失常了。有一天他竟然把才领到的救济金烧了，据说还辱骂了当地的干部和共产党，这可是很容易上纲上线[2]的罪名，公社书记乃当地一霸，抓的反革命越多，越可显示其忠于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路线，吴明新成了公社书记加官进爵的又一块垫脚石，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吴明新投入劳改后拒不认罪，加刑五年。在苗溪茶场十三队，他被安排在二工区，遇上了心毒手狠的狱卒唐炳南。吴明新右手失去了食指和中指，斡割草等农活常常完不成任务，唐炳南说这是“偷奸耍滑”；吴明新通常都是斡背粪、背牛圈肥等又脏又累的农活，规定了重量和趟数，他能完成任务，但是一边走一边念念叨叨的，有时候突然冷笑两声，怪吓人的，唐炳南说这是“装疯卖傻”，需要“狠起收拾”。所谓收拾就是戴铐子、捆绳子，吴明新在唐炳南手下，一年至少有半年是白天出工，晚上回来就戴手铐；几乎每个月都要挨绳子，夏天裸露着上身挨捆，冬天把棉衣脱了挨捆，天寒地冻的时节跪在凹凸不平的鹅卵石地面上挨绳子，直冷得他浑身发抖，嘴唇发紫，怦然倒地，被抬进屋里解开绳子半个多小时才缓过气来，难友们实在看不过，多方反映，中队长把吴明新从二工区调到三工区，换个环境，摆脱了唐炳南的魔爪，才活了下来。我和伍大云（国民党空军起义人员，中共执政后被判刑十五年）、陈长龠（国民党海军起义人员，中共执政后被判刑十五年）贺心禹（成都市第九中学老三届高中生，文革中被判刑十五年）等人当三工区的值星员，对精神病患者尽量安慰，不让他们惹事，也不让别人欺负他们，相对过得比较平静。我离开十三队以后，再也没听到吴明新的消息，或许渐渐地被人们遗忘了吧。

王文才：四川成都人，五短身材，1965年毕业于成都纺织工业学校，分配在四川棉纺织一厂任质量检验技术员。

成都东郊麻石桥附近的四川棉纺织一厂（川棉一厂）女工居多，引人注目。在文革中是一个闻名全市的武斗战场。这个厂文革期间也分成了两派，属于保守派的有产业工人战斗军“川棉师”，属于造反派的是川棉“红旗师”。川棉一厂在文革中发生过两次大规模的血腥武斗。一次在1966年12月31日，川棉师和红旗师发生武斗，附近的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各分团前往增援，有上万人围聚川棉一厂，双方受伤数百人。这就是当时有名的“12.31”事件。另一次发生在1967年5月3日至5日，是成都市空前的大规模武斗，有数万人参加。5月6日成都132厂（制造飞机的大型国防企业）两派冲突，全市造反派前往声援，发生枪击事件，开了在武斗中使用枪支的先例。死于非命者近

五十人，其中有川大无线电系学生程遵华，北京地质学院学生李全华及红卫兵成都部队的成员，最小的谭平富（劳动人民新村小学学生）、范培瑾都只有13岁。武斗是毛泽东挑起的，1966年8月18日在天安门城楼接见宋任穷的女儿宋彬彬时，他说：“要武嘛”，然后又下令军队“支左”，借机发放一百万支枪。乃至武斗规模越来越大，1967年夏季达到顶峰。

武斗既需要易于冲动的无知青年冲锋陷阵，也需要善于鼓噪唇舌的说客呐喊助威。王文才中专毕业，有点文化，就被川棉一厂的造反派任命为写作班子的成员，他教师家庭出身，胆小怕事，只管抄写北京等地传来的大字报，油印成小册子，不设一谋。但在派性斗争中被对立的派别寻找借口打成反革命，抓进监狱。他想不通，绝食抗议，国内出版的小说中，如《红岩》《上饶集中营》有关于国民党统治下的监狱中绝食的描写，监狱往往采用炒回锅肉，炒鱼香肉丝，阵阵肉香刺激食欲，诱使绝食者进食；派能言善辩之士，反复劝解，宣扬“蝼蚁尚且贪生”“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等活命哲学，说服绝食者吃饭。中共不用这些笨办法，直截了当，先把绝食者隔离，使其孤立无援，饿三天，然后把绝食者捆在木板上，往鼻子里插一根橡胶管子，灌米汤，让他死不了活受罪。王文才被反反复复插了几回橡胶管子，鼻子被扯豁了，绝食无效，只有起来吃饭，留下了后遗症，成了豁鼻子，说话瓮声瓮气的，1969年以反革命罪判刑十五年，押送到苗溪茶场十三队，进来不到半年，神经失常了，被编入“疯儿”一伙，在枪杆子底下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完不成任务难免挨打。王文才就这样在监狱里过了十多年，毛泽东死了以后文革宣告结束，1980年王文才得以平反，2012年有人在成都东门大街看见过他，精神病尚未痊愈，需要家人监护。一个性格懦弱的年轻人，被中国共产党整成了疯疯癫癫的孤寡老人。再说一遍“伟大、光荣、正确”吧，免得忘了。

刘光宗：四川省名山县百丈镇百丈人民公社社员，1940年生，初中文化，大队会计，大跃进时期，公社普遍成立食堂，社员群众的粮食交给食堂集中使用，铁锅被收缴，拿去大炼钢铁，各家各户不许开伙，发现炊烟缭绕立即搜查批斗。刘光宗的父母年事已高，体弱多病，住家离公社食堂三里多路，一日三餐都要往食堂跑，来回走路的时间就要几个小时，家里的猪没时间喂了。两位老人肠胃不好，忌食生冷，平时多以面条、稀饭充饥，食堂一律是大锅饭，老人颇不适应，请求公社书记开恩，准许回家煮饭，遭到一顿大骂，被安上一个反对公社食堂的帽子，再也不敢要求自己煮饭吃了。

刘光宗对此十分不满，但是既不敢怒也不敢言，仗着他有点文化，悄悄地写了《食堂开饭记》，记录了公社干部特殊化，开小灶多吃多占，普通社员吃玉米粑、水煮厚皮菜，公社干部吃大米饭、鸡鸭鱼肉；普通社员中的强劳力每人每天一斤粮食，弱劳力只有七两粮食；公社干部及其家属不定量，敞开吃。

这本日记没有向外透露，偷偷地写，秘密收藏。平时对公社书记毕恭毕敬，满脸赔笑，但因为内心对公社食堂不满，难免在言语之间有所流露，公社书记的儿子初中毕业了，安置在大队当了会计，刘光宗被贬到民办小学当教师去了。

某天，烈日当头。外面树上的高音喇叭播放着“大海航行靠舵手”，刘光宗刚下了课，随着众人向食堂走去，当天的菜是豆芽汤，刘光宗端着碗看着上面漂浮着的几根豆芽儿，恰恰广播中正唱着“万物生长靠太阳”，他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发豆芽儿就不要太阳”。谁知这下子惹了大祸，犯忌了，污蔑

了世界革命人民心中的红太阳。不几天，公社开会，当众宣布刘光宗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立即逮捕。刘光宗丢下年迈的父母，抛妻离子进了监狱。由此成了背负着十五年有期徒刑的现行反革命犯。

到了苗溪茶场第十三中队以后，终日闷闷不乐，常常暗自落泪，不到两年，听说他老婆提出离婚，年幼的儿子也被带走了。刘光宗不哭了，可是不知怎么他就成了精神病，劳改队叫“半疯儿”。于是按照监狱的规矩，隔三差五的就要挨一绳子、戴几天手铐。1979年我离开了苗溪茶场，他还以戴罪之身在那里服刑，至今境况不明。要是还活着的话，也快八十岁了。

苗溪茶场第十三中队三工区还有：

赵梓勋（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少尉副排长，主管营房建筑，大跃进导致三年困难时期，其父母在四川农村双双饿死，赵梓勋悲愤至极，精神失常，嘴里常嘟嘟囔囔。众人皆不知所云，据阶级斗争观念强的首长说是扬言造反，于是被认定为反革命分子，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进入劳改队后，还不时声称他手下有十万精兵，要远征欧亚，帮助老百姓收割粮食，让人们吃饱饭……。）。

曾朝文（体型瘦小，沿街叫唱的流浪艺人，以宣扬封资修之名义定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投入劳改后异常积极，时常检举别人，如谁谁偷吃了一个苹果，谁谁拿衣服跟老乡换了两个包谷馍馍等等，但语无伦次，颠三倒四，乱七八糟，狱警不信，众人厌烦，皆以精神病对待，但他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犯）。

刘秉清（成都某中专校才毕业的学生，因文革兴起尚未分配工作，参加了红卫兵，伙同小青年们四处造反，不知怎么就成了反革命，投入劳改不会干农活，只能从事背粪，背石灰等简单的重体力劳动，经常嘿嘿嘿的傻笑，他也是背着二十年有期徒刑的反革命犯）。

韩锡智（中师毕业，刚刚分到成都某小学任教师，1967年以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初进劳改队时无反常表现，能跟大家一起劳动。大约一年过后，目光渐显呆滞，终日不语。某晚，多数犯人均已睡觉，他突然从地铺上站起来高声喊“打倒毛泽东！”，惊煞了整个舍房。狱警徐绍华吩咐，马上用绳子捆起来关入小监，不到三个月，听说韩锡智带着花岗岩脑袋见上帝去了，十三队又逼死了一位精神病人）。

附注：

[1]五粮液为一种浓香型白酒，产于四川省宜宾市，已有数百年历史。用小麦、大米、玉米、高粱、糯米五种粮食发酵酿造而成，香气沁人，滋味醇厚，清冽甘美，柔和协调。多次在国际酒类展览会获奖，为中国名酒之一。

[2]毛泽东主政时期特别是文革期间，欲批判哪个人都会上纲上线。所谓纲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所谓线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人不分老少，事无论巨细，话不管多少，一旦被上纲上线即可认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

（2）劳动场所

苗溪茶场绝大部分中队以种植茶叶为主，通常称之为茶叶队。第十三中队是二十四个中队里最大的农业队，种植水稻、玉米、小麦等粮食作物和棉花、甘蔗、烟草等经济作物，以及瓜果蔬菜，鸡鸭猪兔等农副产品，以低廉的价格供应场部和各中队狱警、家属之所需。

在毛泽东高唱形势大好而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农副产品的价值哪怕是歪瓜裂枣也远远高于烫金精装的红宝书。文革期间出版社门庭冷落，无书可出。能够大量印刷、发行的只剩下了毛泽东著作，其中《毛主席语录》被称为红宝书，它辑录毛泽东语录 427 条，短则十几字，长则上百字，全书 8800 字。在中共党内和中国民间每次开会、发言、写文章、作检讨乃至日常会话中，一再被引用。它以大约五十种文字、五百个版本发行，总印数高达五十余亿册！（“文革”结束时，中国只有八亿人口，全球人口也只有三十多亿）。大字本、小字本、横排本、竖排本、精装本、简装本、线装本、袖珍本充斥在每个角落，人手数册，泛滥成灾，食之无味，弃之有罪。

毛泽东死后被开膛破腹处理成僵尸，“红宝书”则大部分当作废纸进了造纸厂。

夏日炎炎西瓜上市，十三队的犯人每天都要往场部路边的小卖部送瓜，摆满毛泽东著作的条案无人问津，堆着西瓜的地摊前面热闹非凡。一本《毛主席语录》0.45 元，作者捞足了稿费，不贵也贵。一斤西瓜 0.07 元，酷暑中清凉解渴，堪称质优价廉。

第十三中队大约有一千多亩田土，其中三百亩为可以种植水稻的小块梯田，其余均为坡地。四百余名服刑人员按作业区和专业分成小队，有一工区、二工区、三工区，水田组、蔬菜组、果园组、饲养组、杂务组等。劳动地点比较分散，大致有五个山头。

一工区在万家山，这是一条东西走向的山梁，南面山坡比较陡且系背阴，不宜种植庄稼，稀稀拉拉地生长着一些小柏树。只有零星的小块土地种了一点玉米，红苕，山坡下面就是十三队队部。万家山的北坡是芦山县芦阳公社万家山生产队所在地，山梁的西半段被劳改队占用，山上有旱地百余亩，修建了一个可容纳八十头猪的猪舍和一个可关养十五头牛的牛圈。山下有水田四五十亩。万家山耕作区土质黏重，无水源。夏、秋季靠积存的雨水，冬、春干旱，人畜用水均需人力背负着容量百斤的木桶从山下背上山，劳动强度甚大。工区队长田家伦是个转业军人，忠于职守，对犯人并不苛刻。

二工区在管家窝，地势比较低洼，原系管姓人家聚集之地，苗溪监狱进驻以后，管家人等被迁移至异地，一百余亩田（水田）土（旱地）俱归劳改队所有，常年驱使四五十名犯人在此服苦役，管家窝也有一个猪舍和一个牛棚。工区队长是兵痞出身、残忍歹毒的唐炳南。

三工区占据了两个山头，其一名曰胡家坪，其二名曰美女晒羞，不知何时当地的文人骚客依照该处地形起了这样一个既雅且俗的名字，劳改队沿用至 1966 年，后改为向阳坪。这两个山头都比较陡峭，但山上有小股流水，山下有一宽约三米的河沟。胡家坪有百余亩田土，山上建有三个猪舍、一个牛圈。美女晒羞有旱地数十亩，多半是文革以后新犯人增多开垦出来的荒地，在山梁上修了一个猪舍。工区队长是野心勃勃、凶狠恶毒的转业军人徐绍华。

四工区是水田组，其劳动地点分散在各个山梁的下部，犯人的年龄较小，经常在水田作业，容不得老弱病残。队长是由国军投降到共军的高松。

蔬菜组的主要土地在十三队山下周围，二十几个犯人承担着种植蔬菜的任务，新鲜菜上市供应劳改队的狱吏、狱卒和武警，剩下的供应犯人伙食团。主管干部是肥头大耳，体态臃肿的贺干事。

饲养组由年近花甲的狱卒林上清主管，统辖三个牛舍，六个猪舍，大约五十名犯人。通常是队部认为不会逃跑且比较熟悉农活的人。这个组的犯人

大多数要住在外工棚，也就是住在牛圈和猪圈旁边，以便照料牛照料猪，看守地里的庄稼和饲料。不关在高墙电网戒备森严的大院之内，就有了一点自由。

第一是可以吃饱。在山上集体劳动的犯人下午六点收工以后，住在山上的几个人掰十几个包谷，用小磨子一推，芭蕉叶一包，放在锅里蒸熟，香喷喷的玉米粑就可以饱餐一顿了。有时候煮点南瓜、土豆，红苕，胡豆，最差的时候煮几窝厚皮菜也可以填饱肚子。

第二是可以不学习。学习本来是一件好事，可以长知识、明事理。对于罪犯来说学习有助于挖掘犯罪根源触及灵魂地改造。但这有一个先决条件，即的确是犯了罪。文革期间中国监狱里关押的大多是冤假错案，无罪可认。所谓学习就是检举揭发，刑讯逼供，捆绑吊打。不学习成了令人称道的乐事。

第三可以看电影。大革文化命时期，全国八亿人只有八齣样板戏可以演，在毛泽东死亡之前，传统的戏剧、电影、音乐、歌舞、相声，曲艺、乃至魔术、杂技均被认定为大毒草，一律禁止。监狱文化生活十分枯燥，既无书报杂志也没有广播音响，偶尔看到一本小人书（连环画），据说还是封资修。场部大约每个月演一次露天电影，各犯人中队半年左右可能演一次有“教育意义”的电影，诸如《平原游击队》《上甘岭》等。从1972年到1979年我有幸住了几年外工棚，下午时分站在山坡上一看，场部的坝子里牵起了银幕，工棚的几个人协商，留一两个人值班，天一擦黑，拿起手电筒跑下山去了。《叶赛尼亚》《望乡》《追捕》就是这样看的。场部的露天电影是演给干部及其家属看的，不受是否有“教育意义”的限制，才能看到进口片。

杂务组，木匠，瓦匠，铁匠，理发的，杀猪的，打草鞋的，炊事班的，守库房的都在杂务组，文化参差不齐。老木匠是农村来的，擅长制造水桶、扁担、锄把、犁杖和桌椅板凳。粗识文字，不善言辞，脾气温和，乐于助人。打草鞋的是几个残疾人其中有一位教授。张怀正（原四川省商业厅厅长）在犯人伙房当炊事班长。守库房的是原南充地委农村工作部部长张宣和，不知道怎么得罪了造反派，判了十五年徒刑。原分在三工区，什么农活也不会干，中队长照顾他体弱多病，让他看库房免得日晒雨淋。在三工区时，某日晚上学习，许诚、张武林等为了挣“表现”相继大放厥词，批判我不认罪。屋外下着小雨，室内昏暗的煤油灯闪烁不定，我坐在稻草铺就的地铺上用被子盖着脚，低头闭目养神。突然不知是谁大喝一声：牛立华！我抬起头来左右望了望，诧异诧异的一语未发，白天劳动实在太累了。我想了想才说，感谢大家对我的批判，感谢张武林和许诚两位同改，不认罪是很痛苦的。我正在深刻反省，力争早日认罪……。九点了，学习结束，明天继续。张宣和睡在我对面的地铺上，一边整理铺盖一边看了我一眼念道：何当共剪西窗烛，共话巴山夜雨时。李商隐原诗为“却话巴山夜雨时”，他念做了共话，别有一番新意。充满着对未来的希望和深厚的友情，我心领神会。（笔者注：张宣和、李莎、张怀正等中共厅级干部坐牢数载，经查明均系文革期间派系斗争制造的冤案，七十年代末皆获平反。如今均已谢世。）

灭螺组：芦山县是血吸虫病的重灾区。毛泽东1955年喊出“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口号以后，苗溪茶场在十三队抽调了八九个老头儿，查找水田钉螺（血吸虫的中间宿主）算是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刁正俗是灭螺组成员之一。他祖籍山东，生于1914年。在山东大学任教，专攻植物分类学。四十年代以学者身份加入国民党，并被选为立法委员。六十年代初，中共以历史

反革命罪判处他二十年徒刑，1975年毛泽东突发奇想，将关押着的国民党战犯特赦，立法委员属战犯之列，于是刁正俗被特赦出狱，安置在重庆北碚中药材仓库当保管员。劳改期间他曾利用查找钉螺的机会搜寻水田杂草，带着老花眼镜在草纸上描绘写生图，形态逼真、层次分明、比例准确。经友人推荐，刁正俗1982年调入渝州大学。1983年《中国常见水田杂草》一书出版，破格晋升副教授。1990年学术专著《中国水生杂草》出版，全书65万字，收载主要杂草420个品种，自绘标本写生图322幅，数十年心血凝成的巨著出版后引起轰动，国外学者尤为重视，已译成英文，流行于境内外植物分类学界。1994年，刁正俗年届80晋升为教授。不久终因年老体衰不幸病故。

(3) 镣铐、绳子和禁闭室

1、手铐和脚镣

手铐和脚镣是各个国家都有的刑具，手铐束缚两手，脚镣限制行走速度，用于防止犯罪嫌疑人或犯人逃跑、行凶。

使用刑具无可非议，只要世界上还有暴力犯罪现象，就需要有限制罪犯活动能力的工具。

中共对刑具的使用颁布了相关文件，兹将《监狱、劳改队管教工作细则》相关规定抄录于后：

“戒具是国家执法机关为防止犯人自杀、逃跑、行凶或进行其它破坏活动而依法备置的拘束人身的工具，是对有危险行为的罪犯的人身所使用的防御性器具。对罪犯使用戒具，主要适用于防止罪犯干一些伤害人民群众的过激行为，起到约束的作用。

中国监狱或其他劳动改造场所使用的戒具仅限于手铐、脚镣、警绳、电击警棍四种。

罪犯在劳动改造期间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使用手铐或脚镣：

- (1) 有行凶、逃跑、纵火、暴动、闹监、抢夺武器行为的。
- (2) 有破坏劳改场所设施、秩序和国家物资等行为的。
- (3) 罪犯在押解途中的（成批调动除外）。

遇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使用电击警棍：

- (1) 追捕逃犯遇有抗拒时。
- (2) 处理罪犯暴动、骚乱、聚众闹监和结伙斗殴事件，警告无效时。
- (3) 遇到罪犯行凶报复或袭击，需要自卫时。

在追捕逃犯时可以使用警绳，但在劳改场所内禁止使用警绳或其他绳索捆绑罪犯。

对年老患病，残疾犯人以及未成年犯在一般情况下禁止使用戒具；对女犯，除特殊情况外，也不得使用戒具。

对罪犯使用戒具，必须事先报请监狱主管领导批准，遇有特别紧急的情况，可以先加戴戒具，但应立即补办报批手续。

罪犯加戴手铐、脚镣的时间，除经人民法院确定执行死刑等待执行的以外，一般为七天，最长不得超过十五天。

凡加戴戒具的犯人均不应再参加监狱内的劳动。

犯人在戴戒具期间，所在中队的干部应加强对他的教育，在危险行为消除时，应即解除戒具，不得把戒具作为处罚犯人的手段。

严禁对罪犯滥用戒具，或者把戒具当作刑具使用。”

这个文件和中共其它文件一样，徒托空言。是写在纸上的，是写给别人看的，实际执行情况与文件大相径庭。譬如《监狱、劳改队管教工作细则》中规定“罪犯加戴手铐、脚镣的时间，除经人民法院确定执行死刑等待执行的以外，一般为七天，最长不得超过十五天。”我即被无端关在小监里戴了九个月反铐。苗溪茶场十三队的李盛照、王地山、费宇鸣、刘忱等戴脚镣的时间都是以年数计的。

无论是哪个监狱，包括地处京畿要地、直属中央管辖，监禁周扬、陆定一、吴晗等中共高级干部的秦城监狱，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毛泽东 1972 年对秦城监狱虐待在押人员下的断语）也大行其道，那些荒山野岭中的监狱更加肆无忌惮，自不待言。手铐脚镣司空见惯，捆绑吊打家常便饭，直到现在酷刑也未禁绝。

中国共产党管辖的监狱在刑具的使用方面有独创，略作介绍如下：

一是名称变了。

不叫刑具，叫戒具。把刑字去掉，换了一个戒字，远离刑讯逼供这几个字，同样实现刑讯逼供要达到的目的，似乎只是给犯人带一个戒指，这戒指不是钻戒，也不是金戒或银戒，而是硬邦邦、冷冰冰、恶兮兮能够伤筋断骨的钢铁手铐。据说这是中共所谓的革命人道主义。

这戒具，不是戒烟、戒酒、戒毒，而是戒掉人格、戒掉自由，让戴戒具的人记住个人不拥有对身体和精神的所有权，就如同奴隶社会要对奴隶施以去除须鬣的耐刑，削去头发的髡刑以及鲸、劓、刖、宫等肉刑一样。

二是结构变了。

一般的手铐是由两个可以开合的金属卡环和中间一根大约 30 厘米长的链子或连接板组成，表面比较光滑，多为钢制，外面镀铜镀铬，这个叫“洋手铐”。中共监狱中多半用的是“土手铐”，由粗钢锻打而成，凡有锻工的监狱均可自制，结构简单、成本低廉。两个端部有孔的半椭圆形铁环，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椭圆形的空间，中间穿一根铁栓然后上锁。土手铐的空间尺寸比手腕小，粗钢对手腕硬性挤压，犯人的两个手腕挤在这个椭圆环里贴的紧紧的，没有一点空隙，两只手不可能有活动的余地，微血管被阻断，导致双手麻木，皮肤溃烂，长期带铐会落下残疾。时隔五十年，我的手腕两侧疤痕犹在。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发明，毛泽东思想的体现，推广于全国各地监狱。

聪明的中国共产党人如今是否明白，**酷吏无助于改造思想，肉刑只能够萌生仇恨。**我国古籍《左传》中《曹刿论战》一文有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是“忠之属也，可以一战”对于狱政，**量刑适度惩戒得当，才能服众。**一味严刑苛法滥用肉刑，只能激起忿恨和反抗。中国历史上的酷吏周兴、来俊臣均遭骂名千载。毛泽东妄图用酷吏维持其反动统治必定遗臭万年。

脚镣是一种用于束缚犯人双脚使其不能走快的警用狱用器械，通常由镣环和镣链两部分构成，将镣环套在犯人的双脚脚踝上，镣环上配有锁具或者铆钉孔，可以通过锁具或者铆钉将镣环固定在犯人双脚上，镣链是连接双脚镣环的金属链。脚镣可以防止犯人逃跑，由于两脚之间的连接很短，犯人难以迈开步幅，且走动时候有声音，能提高监护人的警觉。

脚镣的束缚作用有两种：

一种是重量束缚，即所谓重镣。脚镣重量不低于三公斤，使犯人双

脚由于拖着重物而不能走快；此种脚镣多用于重刑犯，中国有关狱政管理的文件中规定，对被判处死刑、等待执行的囚犯，采用九公斤重的铆钉式死镣；此种脚镣对犯人脚踝伤害较大，犯人常使用旧布缠绕保护脚踝。行走时戴脚镣的人可以用绳子系在锚链中间的环扣上，然后把绳子套在脖子上，或拴在裤腰带上，分担一下脚下的重量。

另一种是步幅限制，即所谓轻镣。通过控制镣链长度限制犯人步幅，使其不能走快；西方国家普遍使用的脚镣就属于此种类型，铝合金质轻而链短，通常此种脚镣的整体重量为两公斤左右。常可见到犯人戴着脚镣一路小跑，但由于步幅很小，行动还是受到了较大限制。

中共监狱里的脚镣也有所创新，重量增加了，从七、八公斤到三、四十公斤不等。苗溪茶场十三队的“反革命”李盛照（前志愿军战士，朝鲜停战后入四川大学经济系学习，1980年平反）戴了七年十四公斤重的脚镣；胡世富（半文盲，木匠，1980年平反）戴的是二十公斤重的脚镣；费宇鸣（四川江油建设银行干部，1981年平反）、王地山（四川大学中文系学生，南下干部，1980年平反）戴的是十二公斤脚镣。据说云南昭通监狱有一副六十四公斤的脚镣，两个硕大的脚箍之间有七节锚链。王志仁（重庆某兵工厂技术员，1980年平反）自称戴过这副脚镣、陈礼昌（三十年代参加中共的老党员、云南昭通新生电机厂厂长、1980年平反）据说也戴过这副脚镣，他们平反后回忆此事时，称这个脚镣为“定海神针”，戴上它不出半日脚关节就会被磨破，根本不能行走，只能两脚在地面上一寸一寸地平移，其重量大概可以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了。

无独有偶，四川省旺苍县看守所也有重量与此接近的脚镣。

有的地方，脚镣中间不是锚链而是一块形如汽车钢板弹簧、长约尺许的扁钢，或者是一根钢筋，雷马屏农场的狱卒管它叫“一字镣”。人们可以想象戴着这种脚镣的人如何走路，这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发明。

细心的读者可能会问，上述戴脚镣的人都平反了，是不是戴脚镣有这个功能呢？千万别误会，绝对不是。

中共监狱五十年代初期关押的大多是“历史反革命”即国民党连级以上军（官）警（察）伪（军）宪（兵）特（务）；地方保、甲长；三青团干事；一贯道点传师以上骨干分子；吸毒贩毒人员等等。这些人出于历史原因多数是认罪的，虽然参加起义或投诚时，中共承诺“既往不咎”，尔后却被抓进监狱，内心难免不平，但败军之将即使不认罪也不敢明言，只能忍气吞声，任人宰割，否则可能惹来杀身之祸。所以他们在监狱里往往被狱卒、狱警、甚至监狱长认为是“接受改造”的一类，把他们的表面服从看作是改造的成果。据此可以评上“劳改积极分子”，虽然胸前不能戴大红花，也没有奖状，更没有奖金，但是连评几年劳改积极分子，有可能减刑一年半载。这些人即使对共产党有深仇大恨，也不动声色，表面上看来似乎是认罪服法的，他们一般不会戴脚镣、手铐。

1957年以后，监狱里关押的大多是在中共政权机关工作过的干部、教师、工人、农民、解放军和志愿军官兵以及青年学生等等。其中不乏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本来都是共产党内部人士和同盟军，或者是社会主义的拥护者、建设者。反右和文革等政治运动把他们送进了监狱，既没有犯罪事实，也不符合法律准则，因而内心不服。当时流行的逻辑是：没有罪也要认罪，不认罪就是重新犯罪，稍有不满意就叫做反改造，反改造也是重新犯罪，于是没有

罪也变成了有罪。为了逼使这些人认罪，惯常以手铐、脚镣伺候，或者扎扎实实地捆一绳子，吊起来打一顿。此乃笔者囚禁狱中时的家常便饭，手臂和手腕上的伤痕历经四十余年，至今犹在。

1926年参加中共的铁道部长刘建章在秦城监狱就是镣铐加身；北京市委常务书记刘仁、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等人，文革期间关押在秦城监狱，不仅戴手铐、脚镣，还时常受刑讯逼供，竟然被酷刑折磨致死；著名历史学家、反右积极分子吴晗的头发被全部扯光；志愿军司令彭德怀的肋骨被打断三根；西南王李井泉被关押得：“记忆力衰退，第一次见面时，他不认得我们几兄妹，完全忘记了我们的名字，讲话的能力也严重退化，半天讲不出一句话。”（见李井泉之子所著《青山无言——回忆父亲李井泉》）。

天子脚下的秦城监狱和批斗会尚且如此，深山老林里的魔窟可想而知。上述那些戴脚镣的人，在毛泽东死了以后能够平反，是因为他们本来就没有犯罪，绝不是因为戴过脚镣。

三是戴法变了。

前已述及，手铐脚镣各国皆有，用于限制罪犯的活动能力。近年来，西方国家倡导人性化管理，美国、西班牙、比利时等地试行“GPS虚拟监狱”，试用电子手铐，以减少钢制手铐对罪犯人格的损害，但尚未普及。在暴力犯罪依然存在的情况下，传统镣铐作为限制罪犯活动能力的工具还难以完全废除。

中共之手铐脚镣，并非只用于限制罪犯活动能力，更多地用于折磨、残害、刑讯逼供，纯属肉刑。以“超法西斯”（中共某高干关押秦城监狱后做出的判断）手段维护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具有众多特色，在镣铐的戴法上多有创新。现将笔者所闻所见记述如下：

前铐：这是最常见的戴法，也是最人道的戴法。即两手在胸前戴铐子。戴前铐，两手上可举过头顶，下可伸到两腿之间，可以拿勺吃饭，拿碗喝水，可以自己解裤腰带，可以洗手洗脸。

除了前铐以外，还有在其他国家没听说过、中华几千年封建王朝和国民党的监狱里也没用过、中国共产党独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戴法。

背铐：又称反铐、后铐，即把两只手反在背后，紧紧地戴上铐子。

“前”“后”一字之差，滋味迥然不同。手背在后面，戴上中间没有链环的中国特色铁铐，两手紧紧地贴在一起，下可触及臀部，上可抬到腰间，左右只能在两胯之间，活动范围小多了。手可以拿勺、拿筷子，但是移动不到前面来，够不着嘴，拿起来也没用，所以吃饭只能像猪、狗一样用嘴去啃，甚至连狗都不如，狗还能用爪子爬（pao）两下子，戴着背铐却无能为力。1968年，我在小监里戴了九个月的反铐，对个中滋味有切身感受，容后文详述。读者把两手背在身后试一试即可体味中共之“人道”是何等之人道。

双背铐：双手反背在身后，用两副手铐将受刑者的左右上臂和左右手腕铐在一起。

苏秦背剑：又称扁担铐，一只手从肩膀上举到脖子后面，一只手从下方伸到背后，然后将两只手铐到一起。此为更“人道”的戴法。

胯下之辱：又名骑马铐、抱腿铐，一只手从前方伸到两腿之间，一只手从后面伸到两腿之间，用铐子把两只手紧紧地箍在一起。1958年，甘肃省镇原县副县长张万寿因对大跃进的某些做法持保留态度，被毛泽东的爪牙、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打成反革命，入狱后，专门给他带上十多公斤重

的特制镣铐。因“认罪态度不好”，还给他戴过“骑马铐”。张万寿站不起来，蹲不下去，几天几夜疼痛难忍，喊叫声惨不忍闻。共产党的副县长尝到了伟大、光荣、正确的共产党监狱整人之凶狠。1962年，他被甄别出狱以后，谈起此事还唏嘘不已。

烟杆儿：四川省灌县（今都江堰市）看守所及雷马屏农场等监狱常用的戒具和戴法，其他监狱似乎尚未普及。张先痴所著《格拉古轶事》（溪流出版社2007年5月版）一书中有细致的描述。远远望去，佩戴这种戒具的人貌似老农嘴里叼着一根烟袋杆儿，近处细看，原来他的脖子上带着一个钢箍，两手带着钢铐，钢箍与钢铐之间用一根烟杆儿粗细的钢棒栓连在一起，最短的钢棒只有20厘米，最长的钢棒大约50厘米。狱卒的心越狠，烟杆儿越短，佩戴着短烟杆儿的人，两手只能在下巴颏附近左右移动。

手脚并铐，一个人腰弯着，将其右（左）手和左（右）脚铐在一起，不要一小时，腰部就有断裂的感觉，三个小时就会昏厥过去。

还有一种手脚并铐，人坐在地上，两腿并拢微弯曲，两手腕与两脚腕贴紧，用两副铐子把手腕和脚腕铐在一起。

连物铐：将罪犯的右手铐上，而后用手铐将其左手连在刚性物体（钢水管，铁栏杆等）上，使其不能挪动地点。

抱物铐：先将罪犯右手铐上，令其抱住物体（树木，电杆，栅栏）再将其左手铐上。也可采用后铐的方法。多用于现场展示，震慑他人。

四马攒蹄铐：手铐和脚镣并用，武力逼使犯人俯卧在地上，将罪犯的双手背铐后再和脚镣（或用手铐铐住双脚）连接在一起。

以上各种手铐、脚镣的戴法，非身临其境，实难想象。高唱实行革命人道主义的中共酷吏用尽心机折磨摧残在押人员，其歹毒残忍远在希特勒纳粹匪徒之上。

四是用途变了。

通常手铐和脚镣用在逮捕和押解途中，只起限制罪犯活动能力之用，关押在看守所或监狱的犯人一般是不戴手铐、脚镣的。被中共大肆宣传“惨无人道”的渣滓洞、白公馆也只是对死刑犯戴手铐、脚镣。其他犯人不戴刑具的，他们还可以在监狱里绣红旗，排演节目（见小说《红岩》的相关章节）。在中共的监狱里，手铐和脚镣既然叫做“戒具”就等同于富贵人士戴的戒指了，一旦认为谁需要戒掉什么，就赏给手铐一副或脚镣一副。参加劳动的犯人，出工前“管教”人员把手铐打开，让这个犯人上山从事繁重的劳动，收工回来，狱卒会不失时机地马上给他戴上，不会遗忘。关禁闭的犯人终日被锁在黑屋子里，且大多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一天二十四小时戴着手铐、脚镣。

2、绳子

绳子是日常生活用品，数万年前，人类开始制作简单工具的时候，便会用草或细藤条之类的植物绞合搓捻成绳子，用它捆野兽、缚牢茅草屋、做腰带、系草裙……再后，出现了“结绳记事”，绳子对人类文明发展可谓起了极大的作用。

在古书中，它除了释作名词的绳索之外，还常以其功用引申出“约束、捆绑、限制”等意思，作动词用。

《尔雅》中有“绳之谓之束之”句，此处的“绳”字即捆绑之意了。现代中文中，“绳”字作动词用的已经极其少见，“绳之以法”或“以法绳之”为仅存的成语，是以法律去约束、制裁犯法之人的意思，出自《资

治通鉴》。

捆绑通常的作用是限制被捆者的活动能力，古今中外均有用绳子捆人的记载，古代西方对奴隶有用绳子捆住双手的，中国历史悠久，捆人的花样不断翻新，中共掌权后，天才地、创造性地把限制活动能力的捆绑发展成一种作用于肢体、关节的酷刑。主要通过绳具使受难者的肢体处于非正常状态，包括牵拉关节、韧带和强迫反关节来给受难者制造痛苦。捆人方法是狱警的必修课，1958年大跃进以后，捆绑技术愈加长进，文革期间几达登峰造极。

中共制定的《监狱、劳改队管教工作细则》中，对警绳的使用也有明文规定：“劳改干警在追捕逃犯时，可以使用警绳。在监内一律禁止使用警绳，或用其他绳索捆绑犯人。”和前面说过的一样，这也是遮人眼目的一纸空文。实际上，在中共管辖的监狱里，绳子是比手铐脚镣更普遍的刑具，更残忍的手段。苗溪茶场十三中队至少一半以上的犯人挨过绳子。捆绑的花样繁多，残酷无比。就笔者所见，记录如下：

小绑：只绑双手，身体其它部位不着绳索。被绑者伸出双手，通常是手心相对。用细绳在两个手腕部位紧紧地缠绕三至五圈，再将绳子穿过两臂之间的空隙，紧紧缠绕三至五圈，然后打结。多用于临时捆绑，可牵引行走。或用于吊在树上、房屋的横梁上，施以暴打。苗溪茶场大坪监管区有一名叫高万志（音）的犯人，大约二十五六岁，逃跑被捉回后，吊在树上，管理员亲自动手，用乱棒将其活活打死。施刑者后被调离，不知如何发落。

押解式捆绑：又叫“穿小麻衫”，犯人从颈到肩至大臂都被捆绑，小臂与双手不绑，大臂被向后缚紧，且与颈、肩、上身固定在一起，无法活动，小臂和双手可在一定范围内活动。这是为了让犯人在押解途中既无充分自由，又能勉强自理生活（比如吃饭、喝水等）。顾名思义，此种捆绑方式常用于长途押解。

四马攒蹄：以暴力迫使人匍匐在地，将其两手和双脚用绳子捆在一起，被捆者不能走动也不能爬动，常用于逼供，或“展示”以震慑他人。

五花大绑：这是监狱中最常用的捆绑方式。通常用棕绳或麻绳，先把绳子（七米左右）对折，或在对折处作一小绳圈；把绳圈搭在被绑者的后脖颈上，然后向前顺两肩拉过，像献哈达一样，绳子垂在胸前；再把绳子从两腋下穿至后面，在上臂缠绕两或三圈，下臂缠绕两圈，把绳子两头拉到后背中间合并，向上引过后脖颈的绳圈，再将穿过后颈绳圈的绳子用力向下拉，同时把被缚人的小臂尽量向上托送，使被绑者两大臂反向叉拢，双腕在背后向上交叉，尽量托至两肘之间；用拉下来的绳子牢牢捆住手腕，最后打死结。

无论哪种捆绑方式，被绑者的苦痛程度与捆人者的力气大小、狠毒程度密切相关。文革期间，在毛泽东“对敌人要狠”；在雷锋“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的煽惑下，狱卒们大多无所不用其极地大逞淫威。逮捕人的时候，横眉怒目、咬牙切齿，对准被捕者的腿肚子冷不丁地横踹一脚，将人踢倒在地，掏出绳子来，像捆柴一样随意折腾，有时候几个凶狠的狱卒合力捆一个人，被捆人当场昏死过去的屡见不鲜。可不能小看绳子，一根轻柔的绳子就可以要一个人的命。

在中国共产党管辖的监狱里，捆绑是司空见惯的刑讯逼供和突显淫威的惩罚方式，以我所在的苗溪茶场十三中队为例，在1966年至1972年这个阶段，几乎每天都有人被捆绑，每天都会听见被捆绑者凄厉的叫声，大年初一

也不例外。

比捆绑更残酷的是捆绑加悬吊。

这是最常用的刑讯方法，大致有如下几种：

正吊：受难者两臂向上，用绳子紧紧捆住双腕，更有甚者是用铁丝捆住受难者的两个拇指（笔者 1962 年在四川磨床厂集训队见过用这种惨无人道的方式逼迫一个年轻人承认偷了别人的毛衣），悬吊在横梁或树枝上。在身体重量（包括施刑者可能另外施加的重量）的牵拉下，手腕或拇指部会有剧痛，同时胸腔因牵拉而变形，长时间的悬吊可造成受难者呼吸困难，这与十字架致死的生理类似。

倒吊：即把受害者的脚腕或大脚趾（其它指趾关节会因承受不住身体重量而被完全拉断）用绳子或铁丝捆紧然后悬吊起来。这种方式，会使受难者的头部充血，长时间倒吊有可能会出现昏厥和七窍流血的情况。遇上凶狠的狱卒，还会对被倒吊的人施以毒打，以显示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

悬浮吊：某些劳教所或监狱使用的一种特殊悬吊方式，就是将受难者吊到仅仅足尖着地的高度，使受难者既不是完全靠手腕或拇指承受全身重量，又不能完全靠脚掌或脚趾尖支撑身体，美其名曰悬浮吊，人性灭绝的狱卒以此为乐事，这是中共创造的用刑方法。

猴子抱桩：将受难者两手前绑（也可只绑拇指）抱住被迫弯曲的两膝，从膝弯处插进一根棍子，在棍子两端用绳索吊起（也可将棍子架到一定高度的其它器具上）。这时受难者的臀部、阴部和脚心完全暴露，利于施刑者使用其它迫害手段。受难者在这种姿态下，手腕（拇指）、膝关节、腰部、颈部都将因身体各部分的重量受到挤压、扭曲和牵拉，痛苦异常。

大挂：将受难者双臂反绑（或双拇指反绑）吊起，用其自身重量造成肩关节脱臼。肩关节是人体四肢大关节中活动范围最大、最易脱臼的，所以这样用刑时间不长就会给受难者造成最大痛苦，甚至终身残疾。

坐飞机：有的地方叫“鸭儿凫水”，与大挂类似，是将受难者四肢同时反绑吊起，受难者的身体横悬在空中。

其它捆绑、悬吊类的酷刑还有“吊半边猪”（只吊受难者一侧的肢体）、“仙人指路”（绑吊双脚和一臂）等等，都属于上述悬吊酷刑。

中国监狱里针对犯罪嫌疑人和在押犯人的酷刑数不胜数，我知道和介绍的不过是冰山一角。由于中共酷吏的灵魂深处本就残忍，又中毛泽东思想之毒甚深，由是变本加厉，毫无人性，惨无人道，他们的发明也就层出不穷，惯于利用手铐、脚镣、绳子对人摧残折磨。四川雷马坪农场唐家山中队马湖分队一位姓王的管教在一次讲话中指着几棵弯曲的大树，穷凶极恶地说：“我们雷马坪农场先后关押改造了几十万人，这几棵树子就是吊人吊弯的。”中共酷吏的残忍阴暗心理可见一斑。还美其名曰革命的人道主义。

从 1958 年我被关押入狱起，到 1979 年出狱止，亲眼所见，亲身感受，监狱里和劳改场所滥用刑罚、捆绑吊打之风极为普遍，文化大革命期间达到顶峰。被打致残、致死的屡见不鲜。我离开监狱三十余年了，“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的口号充斥于报纸和 CCTV 等传媒，看守所内狱警、狱霸滥施淫威，有加无已；“躲猫猫”死，“喝开水”死，“洗澡死”等离奇古怪的传闻依然不断，不时出现于公开出版的报刊；近几年又多了城管暴力执法，军警滥施刑罚，监视公民住所，不经检察院就非法拘禁异见人士等违宪行为。充分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之风貌，不得不为记以戒。

必须指出的是，酷刑是被联合国人权法律严厉禁止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下设了禁止非法拘禁工作委员会和禁止酷刑工作委员会，每年都收到大量来自中国的案例。还必须指出的是，即便中国自己的法律，对酷刑也是禁止并且规定为严重犯罪行为。中国的刑法中有绑架罪、非法拘禁罪和刑讯逼供罪，还特别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犯此类罪从重处罚。《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规定：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刑法》第二百三十五条的规定：过失伤害他人致人重伤的，应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警察法》第二十二条第四款规定：警察不得有刑讯逼供或者体罚、虐待人犯的行为；警察有上述行为的，应当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但是，不可思议的是，在中国，法律形同虚设，酷刑屡禁不止，非法拘禁至今延绵不绝。施酷刑于人者长期逍遥法外，甚至加官进爵，据称他们是坚决贯彻毛泽东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毛死了数十年恶行仍屡禁不止，但在公开场合却口口声声说依法治国，岂不发人深省么。

2015年补记：2015年7月17日晨见《广州信息时报》刊载一信息，摘录如下，供读者参阅：

越秀区检察院经依法审查查明，苏某生于1976年，大学专科文化。2013年1月，苏某在担任某看守所管教工作期间，于1月2日上午，对关押在监室人员卢某因违反监规而加戴械（戒）具（脚镣），当日晚上，卢某又因与同监室人员发生纠纷，并于次日被苏某加戴手镣（铐）。苏某对其使用双手、双脚紧铐的同时令卢某其中一手从大腿间穿过与另一只手铐上（俗称穿针）方式对其加重惩罚。

在被加戴镣铐期间，苏某指使同仓监管人员以值班检查为名，实行进一步拉紧械（戒）具，致使卢某双手腕、双脚受损，形成环状损伤。1月7日，苏某发现卢某双手和双脚受损后，没有向所领导报告和履行带其到看守所医务室就医的职责，仅简单吩咐医生林某到监仓走廊巡视监室时顺便从监室窗口查看，并让同仓人员用药水为卢某进行简单伤口处理，致使卢某伤势进一步严重（经鉴定，其损伤程度属轻伤二级）。

2013年3、4月间，苏某为了掩盖其犯罪事实，要求看守所医生林某在《广州市××区看守所在押人员健康档案》本所诊治记录中虚构1月10日和1月14日两次为卢某看病记录（经鉴定，诊疗记录内容下方在押人员签名栏中“卢某”笔迹与陆（卢）某笔迹样本不是同一人所写）。

案发后，苏某因涉嫌虐待被监管人罪于2014年4月被取保候审。该案经越秀区检察院侦查终结，该院认为，苏某的行为已构成虐待被监管人罪，但鉴于犯罪情节轻微，且已对被害人卢某赔礼道歉，并取得其谅解，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于是于近日决定对苏某不起诉。

笔者注：区区短文不足六百字，错字连连，中华文化被糟蹋至此，谁之过呢？法律被玩弄于司法人员股掌之间，又是谁之罪呢？

3、禁闭室

1958年，我进入中国的监狱以后，才知道在每个阴森恐怖的监狱中除了集体居住的监舍以外，还都修建有单独关押犯人的禁闭室，各地的叫法不一样，有称小监的，有叫独居的，有叫小号的。

中共颁发的《监狱、劳改队管教工作细则》对此也有规定：

“第六十条 监狱、劳改队应当根据实际需要，设置禁闭室。每间禁闭室的使用面积不得少于3平方米，室内高度不得低于3米，窗子不得小于零

点8平方米。门窗、电灯都应装置防护设备。室内要防潮保暖，通风透光。北方烤火区要有防寒设备。

第六十一条 禁闭室用于处罚违犯监规纪律的犯人。但犯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也可以作为防范措施，使用禁闭室：

- （一）对加戴戒具仍不能消除危险的；
- （二）在监内重新犯罪，正在进行审理的；
- （三）报处死刑待批的。

第六十二条 受禁闭处罚的犯人，需由中队填写‘申请关押禁闭审批表’，报监狱、劳改队的主要领导批准。

禁闭期限，除死刑待批和正在审理的犯人外，一般为7至10天，最长不得超过15天。

第六十三条 关禁闭的犯人，粮食定量按不参加劳动犯人的标准供给，不得克扣并保证供应开水。每天要放风两次，每次半小时至1小时。禁闭室应当保持清洁卫生，经常消毒。

对关禁闭的犯人，除死刑待批和有特别危险的以外，不再戴戒具。

第六十四条 犯人在禁闭期间，中队要指定专人负责教育，并对其表现情况，随时记载。各级主管管教工作的领导干部，应当经常检查禁闭室的工作情况，发现问题随时解决。”

无需赘言，这些条文也是纸上的东西，实际执行的完全是另外一套。下文和本书第八章第五节《狱中之狱》对小监有如实的记述。当年苗溪茶场十三队的狱卒周金仁、唐炳南等都还活着，退休后仍住在苗溪茶场，似应可作证。

小监大多是“保密”的，相当一部分在劳改场所关押了五六年的人员，直到离开那个劳教或劳改场所也不知道小监的位置和内幕。我有幸坐过四川磨床厂的和苗溪茶场十三队的小监，也听难友说过其他监狱的情况，现披露一二，立此存照。

四川磨床厂位于成都市闹市区，今蜀都大道北侧，通惠门公交车站对面，西邻西安路，东邻同仁路。磨床厂关押着绝大多数是有公民权的劳教分子和就业人员，进门右侧是办公楼，靠里面一点，有一排南北走向的平房，那是干部食堂，隐蔽在干部食堂后面就是小监所在，小监和干部食堂是共用一个屋顶的，中间隔墙把小监和食堂分做了两个部分，中间有一条大约一米宽的通道，十个小监连成一排，每间的面积约为三平方米（一米五宽，两米长），高约两米。没有床铺，没有桌椅板凳，有门无窗，门中间开了一个距地面一米六左右、宽约22厘米、高约15厘米的通气孔，外面钉着拇指粗细的钢条。室内没有灯，通道里有电灯。吃饭有人送，大小便到小监外面的厕所，权当放风。这是我住过的条件最好的小监，大约是沾了天府之国芙蓉城的光。监管人员是狱警从就业人员中挑选出来的所谓“靠拢政府”“接受改造”的积极分子。1962年我无辜地在那里关了两个月，监管人员是罗明和陈亚英（女），罗明现居重庆，陈亚英目前居住在成都四川磨床厂内。均年逾古稀，尚健在。四川磨床厂1963年迁至成都外北天回镇附近，通惠门原址建了几栋商品楼，已面貌全非。

成都动力机械厂兴建于六十年代初，位于驷马桥附近，老地名叫荆竹坝，占地数百亩，关押着数千名（规划可关押一万人）劳动教养分子和解除劳教仍被强制留在劳改企业的就业人员。在厂区一角，紧靠武警连队驻地，有一

个神秘的院子，小院的大门紧锁着，间或有两三位狱警出入。这里没有挂牌，被称为集训队，是监狱中的监狱，闲杂人等一律不得靠近。院子深处修建了一排平房，中间是个较大的屋子，可容纳二十人，供训话、开会之用。靠东是较小的空房和办公室。靠西为漆黑的禁闭室，一间比一间低矮、阴暗，最里面的一间，高度一米左右，人只能像狗一样钻进去，蜷伏其中交待问题。那是用来关押“反改造分子”的。谁是反改造分子呢？全凭管教干部一句话。

苗溪茶场十三中队在修建监舍的时候专门修了一排面积特别小的房子，一共十间，内部尺寸（长、宽、高）是 $1.8\times1.3\times2.0$ 米。用来单独关押“危险”的犯人。我在其中日夜戴着背铐关了九个月，详细情况见本章第十二节。苗溪茶场除每个队都有小监以外，还在场部附近、两山之间的夹沟内修建了直属场部的集训队，专门用来监管各个分队集中起来属于“场级”的“反改造分子”，据闻惨不忍睹，死不胜数，惜未能亲身体察。原四川日报记者共产党员王地山在集训队关押数月，落下终身残疾。2000年苗溪茶场迁至成都龙泉驿，定名为川西监狱。昔日之小监已荡然无存，想看也看不到了。

雷马屏农场每个中队都有小监。其中有一个是废弃的羊圈，地面上还散落着羊粪，面积较大，每间大约五平方米，通常关押二至三人。房子的高度很低，不足两米，有门无窗，无灯无电。现居成都的张先痴曾在小监关押，其著作《格拉古轶事》述及此事。

峨边沙坪茶场太阳坪中队的小监是堡坎下面的红苕窖，木栅为门，高约0.8米（坐进去上身无法挺直，不能仰头）深约1.5米，宽约1.5米（双臂不能水平展开）。里面还放了一个粪桶。原重庆市公安局秘书蒋柏龄（重庆市公安校毕业，1951年参加工作，中共党员，1979年右派改正后兼任律师，2008年病逝）曾日夜戴着手铐在此小监中关押数月，其遗著对此有简略叙述。

新华硫磺厂（地处四川省兴文县）的小监，高1.5米，长1.8米，宽1.5米，为石条所砌，无窗，终年暗无天日，从不放风，吃喝拉撒睡全在这魔窟之内。原成都日报记者晓风被关了三个月，放出来的时候衣服长了霉菌，关节不能正常活动。堪称人间地狱。

1979年5月25日《人民日报》对张志新之死的报道中说：“她被关在一个长宽高仅为一米的“小号”里，只能坐、不能躺、不能站。几天过后这个顽强的女子终于精神崩溃。”党报的报道，容不得质疑吧。

位于黑龙江严寒地区，直属北京市公安局管理的兴凯湖劳改农场，始建于1955年8月，对内称北京市第二劳动改造管教支队，对外称北京市地方国营兴凯湖农场。曾大量关押右派分子，北京大学的谭天荣、陈奉孝，著名作家丁玲，中共老地下党员、知名右派葛佩琦等均在該地关押多年。兴凯湖农场的小监别具一格，宽0.8米、长1.5米、高1.0米，是中共的独特设计。尤其值得书写一笔的是关在里边的人每天只供应三两八钱（约120克）玉米面，据称这是生理学家通过理论和实验确定的科学数据，堪称人道主义之最（详见百度网站刊载之陈奉孝所著《兴凯湖纪事》）。

原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技术员、如今居住在北京的耄耋老人蒋绥民回忆，新疆农三师五十四团第八大队私设的小监是宽窄不足两米、深度略大于两米的地窖，底部有少量稻草，用临时扶梯把人丢进里面，上面加盖上锁，终年不见阳光，无法辨别昼夜，里面阴湿寒冷，稻草腐臭难闻，每天给一壶水、两个二两玉米面做的窝头，维持生命。每天上下午各放风一次，由监守人员放下扶梯，爬上来解手，不准有一点耽搁，解完手立即下去，蒋绥民在

此地窖中戴着手铐关了一年多，享受共产党的“人道”待遇。右派改正后曾任北京勘测院党支部委员、纪律检查委员，尚健在。

以上例证只是说明不仅四川监狱有小监，辽宁、新疆等地的监狱也有小监，都是毛泽东思想的体现。那时候流行的口号是全国一盘棋。

2012年，媒体爆出法西斯式的“棺材仓”。该种小监在湖南省邵阳市龙溪监狱内。狭小的空间，四周全部由厚重的钢板焊接而成。双层铁门，门上开了一个送饭用的小窗口，地面是水泥浇筑的，在左侧留了一个排泄孔。囚室长2米、宽1米、高1.6米，里面漆黑一片，空气污浊。没有灯光，没有被褥，只有苍蝇、蚊子和虱子。

医生指出，假如一个人长期被关在狭窄空间，身体屈曲，筋络无法舒展，会令关节硬化，失去活动能力，同时也会引致肌肉萎缩、手脚无力。关节硬化和肌肉萎缩很难完全复原，即使离开恶劣环境，手脚也只能恢复部分功能，落下终身残疾。再加上墙壁、地板太硬，没有软垫，皮肤长期受挤压容易溃烂。

著名人士李旺阳曾多次被关押在“棺材仓”里，2012年不堪折磨，弃世而去。

据了解，位于城市的监狱，都有小监。位于山区的监狱，除了场（厂）部直属的集训队以小监为主以外，各个中队都有小监。

在监狱内设立小监，本无可非议，为了防止互通案情或串供，为了防范个别人员的变态行为，设立单人房间有时是必要的。问题在于，中国共产党所属监狱中设立的小监并不是关押人或隔离交往，而是灭绝人性地从精神上、肉体上折磨人，还美其名曰无产阶级专政，实乃世界之奇闻，中共之特色。

希望司法部门的有识之士，无产阶级专政的忠诚卫士，将中国这一特色作为一个课题，切实调查，如实描述，为中国监狱发展史增添光辉的一页，让世界人民了解中国小监的内幕，让“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彪炳史册。

（4）劳动改造和劳动光荣

共产党从成立那天起就高唱“劳工神圣”“劳动光荣”。把神圣和光荣的花环戴在工农大众头上，是为了让他们在战时冲锋陷阵为其争夺天下，在平时埋头干活儿为其积累物质财富。中共的高官们除了在植树节做做样子铲两锹土浇一桶水照几张照片，大肆宣扬外，没见过参加什么劳动。在中共统治之下，凡是犯了“错误”的，便都要去“神圣”一番“光荣”一阵，于是教授打扫厕所、专家清扫马路、医生拉板车就成了“反右”和“文革”中的新风景线。在中国的监狱里，犯人是在枪杆子下面以血肉之躯服苦役，劳动是惩罚，是折磨，是受罪。似乎与神圣和光荣沾不上边儿吧？

（5）劳改犯的生活状况

监狱古已有之。各个国家，各个地区，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统治者，都设有监狱。

杀人、行凶、爆炸、投毒、绑架、强奸、抢劫、盗窃、诈骗、走私、贩毒、交通肇事、贪污受贿、扰乱社会秩序等法律明文规定的犯罪行为，均应依法惩处，乃至入狱关押，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生活在监狱里的人叫犯人，犯人者，犯了罪的人，当了犯人，也离不开一个“人”字，也就是说，不论因为犯什么罪入狱，包括本来没有犯罪，

被诬陷的冤假错案（这是文革期间中共监狱内关押最多的），均应以人相待。

中共之监狱则另有特色，笔者在中国监狱中生活了二十二年，在这里记录的是1966年到1979年四川省苗溪茶场第十三中队的犯人生活实况，意在让读者对中国特色劳改队有个概略的印象。

就从衣食起居说起吧。

1、衣不蔽体

按照规定，在监狱里必须统一着装，即穿囚服，颜色和样式与普通老百姓的着装有明显的差异，主要是为了便于识别和防止外逃。当时监狱每年发放夏服一套，胶鞋一双；每三年可申请领取棉衣裤一套、棉絮一床、被套一床（以上均须交旧领新）。褥子是没有的，以稻草代替，春秋服和内衣是需要自备的。囚服是用价格最便宜的平纹蓝布缝制的，当时大约三角钱一尺，毛泽东当政时期，据说棉花大丰收，棉布供应却十分紧张，需要布票才能购买，化学纤维制品尚未普及且价格昂贵，劳改犯是没有条件使用的。囚服样式以省布为原则，上下装均没有口袋，省去了包包布。上衣左胸前用白漆喷涂“劳改”两字，老远就看得很清楚。

农场多为室外劳动，肩挑背磨，日晒雨淋。一套单衣，如果天天穿，不消两个月即破烂不堪。

春寒料峭，按当地耕作习惯，开春之前，所有冬水田要重新糊一道田坎，再冷也要下水，老农民说，以往给地主干这种活的时候要选择晴好天气，还需要有酒有肉，有老姜红糖水。中共监狱里的犯人，无论是阴雨霏霏还是寒风阵阵，狱卒一声令下，只能脱掉棉衣，挽起裤脚，站在水田里，弯着腰往田坎上糊泥巴，尽管冻得发抖，身上起一块块红斑，奇痒难忍，在枪杆子下面，只能咬咬牙，打几个冷颤。

夏季炎热，大多数情况下，犯人均赤膊劳动，只穿一条短裤。

六七月份，玉米和甘蔗等作物长到一人多高的时候，需要壅筑，即在根部培土以防止倒伏，不管天气多热，干这个活，身上必须裹一块厚实点的布，把上半身遮挡得严严实实，否则裸露的部分就会被叶子边缘划出无数血淋淋的口子，汗水滲起，毛焦火辣的疼。

九月上中旬打谷子（水稻人工脱粒）时，不少人只在腰间围一块塑料薄膜，连内裤都不穿，光着屁股干活儿，尽露清白之体。好在荒山旷野人烟稀少，除了劳改队几乎没有外人。

到了冬天，将破衣烂衫统统裹在身上，以御严寒，再冷的话，腰间栓一根带子或捆一根草绳。但在干锄地、挖土、开荒等农活的时候，需要甩开膀子用力，大多脱了棉袄只穿棉裤。干背运等农活的时候，需要快步行走，多半要脱了棉裤只穿棉衣。宁愿皮肉受苦也要为监狱节约衣裤，劳改犯成了雷锋式的艰苦朴素爱国模范。

山区劳动离不开背运，春夏乾旱背水上山，收获季节背粮入库，冬日农闲背粪积肥，修建房屋则要背砖、背瓦、背石灰、背木料。干这些活儿最需要的是垫肩和背垫，前者用于防止竹子编的背褡磨破肩膀，后者用于避免木制背桶擦伤后背。垫肩用旧布自己缝制，背垫需攀岩附壁寻找棕榈，割山棕皮自行缝扎。这两件东西比衣服还重要，属于必备物资，政府是不管的，均需自己动手。

为了减少监狱的开支，监狱允许自带服装，鼓励家属送衣被鞋袜。但狱方规定自备服装必须经狱卒严格检查并打印劳改标记才能穿用。苗溪茶场是

用白漆喷涂“劳改”两字，有的劳改队是喷涂在后背，约七寸直径的圆圈，里面嵌着一个“劳”字或“教”字，远远望去像古代兵勇戴着护心镜。通惠汽车修配厂就闹过这样的笑话，某日，一劳教分子穿着背后有“教”字的衣服开着一辆刚刚修好的摩托车到厂区外面的公路上试车，速度开快了点，一个年轻交通警察打手势示意停车，不得不停，那位交警跑过来看了看说道：你这个教练也合适点吗！再开这么快，罚你的款，搞得这位劳教哭笑不得，连忙认错，劳教居然当了一回教练。

强制喷字执行了一段时间，被关押的人多方抵制，比如，在自备服装的左前胸缝上一个大补丁，喷上字以后，把补丁拆掉做包脚布用，“劳改”两个字就跑到脚底下去了。由于多种原因，强行喷字行不通，1968年以后，除了监狱发的劳改服以外，不再喷涂劳改标记了。

六十年代，三面红旗漫卷西风，国民经济面临崩溃，恐怖气氛笼罩全国，冤假错案大行其道，众多监狱人满为患。监狱关押的多数人是经济拮据的工农兵，且为刑期十五年以上的“反革命”犯，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者众，谁又能有多少经济来源呢？只能一件衣服补了又补，我有一条长裤，大小小补了四十几个补丁，一件上衣也有二十几个补丁，形状各异，颜色杂陈，远处看去，像是云游和尚穿的百衲衣，1979年平反时没有带出来，留给其他难友继续补去了。多数犯人衣着尽皆如此，当地老乡形象地戏称犯人为“霉和尚”（犯人一律光头，没老婆，也是被叫做霉和尚的原因）。

多数劳改犯是不穿袜子的，特别冷的时候用旧布把脚包起来。春夏秋冬四季尽量不穿鞋，经常光脚走碎石路，脚底下早已磨出了老茧，小刺是扎不进去的，大刺扎进去也不致于流血，拔出来就是了。

长途行走需要穿鞋，劳改队一年只发一双布面胶底鞋，雅安地区多雨，山间小路怪石嶙峋，非常费鞋，必须节省着穿。多数犯人不得不把每月一元零花钱存起来，买一双橡胶雨鞋（当时的价格大约5-7元），将近半年的零花钱就花光了。

十三队有一个由四五个残疾囚犯组成的草鞋组，例如失去一条腿的张泽厚[1]，双目近乎失明的张紫葛[2]都在草鞋组。他们一个月要完成编制四五百双草鞋的任务，基本上可以做到全队犯人每人每月一双。

遇到天雨路滑，不但要穿鞋，还要在草鞋底部绑上铁脚码子（粗钢锻打而成，马蹄状，带钉，可以防滑），否则寸步难行，能够得到一副适用的脚码子，至少要偷着乐五六天。

听老人说，以前给地主干活，除了吃饱饭，拿工钱以外，围腰，草鞋，叶子烟是东家必须供应的，栽秧、打谷的时候有酒有肉，咬一口腊肉坨坨，嘴角流油。中共管辖的劳改农场，吃饱饭是白日梦，每月只发一双草鞋，围腰和叶子烟都免了。在枪杆子下面看押着的犯人对此十分理解，宪法总纲第一条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当时的公社社员是国家的主人，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劳动一天只挣一角多钱甚至几分钱的工分，围腰、草鞋、叶子烟都要自己花钱买，起早贪黑为公社干一年活儿，年底结算不但领不到工钱，还欠公社的口粮钱（苗溪茶场第十三中队邻近的芦阳公社万家山生产队有三分之一的农户年底结账是欠债）。劳改犯每月有一元钱的零花钱，每月还发一双草鞋，比国家主人的待遇还好，岂不是要感谢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伟大领袖大造监狱的辉煌业绩吗。所以那时要天天唱：“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地位

高……”

2、食不果腹

在农场劳动的犯人，囚粮由国家供应，每人每月 36 斤。这个定量远高于欧美等国中产阶级主食用粮的实际消耗，他们每餐不过两片面包，折合每月用粮不过 10-14 斤。中共的宣传部完全有理由说，社会主义国家监狱里的犯人都比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吃的粮食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多么优越呀。但绝对不敢说人家一天都吃了些什么。在加拿大，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每天早晨喝一杯加奶的“星巴克”咖啡，再来一个吐司煎蛋或两片夹肉面包；午餐往往是夹肉三明治或比萨饼；晚餐通常与家人共享，牛肉、鸡肉或火腿是少不了的；下班时他还可能捎带一盒“哈根达斯”冰淇淋，临睡时要喝一杯酸奶；至於牛奶，那更是比水喝得还多。加拿大每年人均消费奶类约 200 斤，在西方发达国家中属于中等偏上水平；在西欧，这一数字是 178 斤；在美国，是 248 斤。如果主副食能有这样的配搭，料想每月也吃不了多少粮食。

回到现实中来，我所在的劳改队里除了主食以外，缺油少盐的烂菜叶子也要定量供应，一个月能吃上半斤肉还得感谢党和政府的人道主义，至于牛奶、鸡蛋，那也叫“中国梦”或者白日梦，我在苗溪茶场十三年，没吃过一个鸡蛋，没喝过一口牛奶。在副食品极度匮乏，劳动强度又非常大的情况下，36 斤粮食还饿得发慌就是必然的了。

我在苗溪监狱十三年，倒还没听说克扣囚粮现象，除了少量鼠耗和仓储损失以外，基本上每月按定量供应，以玉米为主，一日三餐，每顿将近四两粮食。通常做成玉米面馍馍，椭圆形，蒸熟了以后有八九岁小孩儿拳头那么大。某日，几个犯人开玩笑，以一个玉米馍馍为赌注，看最少几口能把一个玉米馍吃完，结果最佳成绩是三口半。表演者游玉玺（半文盲，十五年徒刑）先拿着芒果形的玉米馍掂来掂去，想了想，看准了，从中间横着咬了一大口，玉米馍便成了哑铃形，慢慢咀嚼咽下去以后，再左边一口，然后右边一口，只剩下了中间的一小块，算半口。这三口半就可以吃完的玉米馍，能够提供四个半小时繁重体力劳动所需的热量吗？回答是否定的。也就是说，文革期间的劳改犯，常年处在入不敷出的饥饿状态中。

大跃进以来，《人民日报》报导中国水稻亩产十几万斤、农业连年大丰收以后，毛泽东兴奋异常，以其远见卓识立即责成中国科学院研究“粮食多了吃不掉怎么办”的解决方法。1958 年 8 月 4 日，毛泽东在河北省徐水县视察，徐水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告诉他，徐水全县夏秋两季一共计划收获十二亿斤粮食，平均亩产两千斤，人均拥有三千八百七十斤，计算的十分精确。毛泽东听后，高兴地问道：“你们全县三十一万人口，怎么吃得完那么多粮食！你们粮食多了怎么办？”还说：“农业社社员们自己多吃嘛！一天吃五顿也行嘛！粮食多了，农民可以半天耕作，半天休息，搞文化、学技术。”

那时候，毛泽东讲的每一句话都赛过圣旨，即使信口雌黄、胡说八道也叫最高指示。这年八月北戴河会议上，有一份特殊的文件，即由化学工业部党组提供的《粮食多了怎么办？（参考资料）》。中国科学院党组立即召开会议，要求把粮食如何转化为工业产品的问题作为重点课题加紧研究。

但是实际上，徐水县当年收获粮食只有一亿多斤，人均不过四百斤，强行征购入了国库，农民已无口粮。张国忠这样的奸佞阿谀之徒加上毛泽东那样的暴君昏君之最，使徐水的老百姓蒙受了巨大的灾难，这个离北京只有一百多公里的县份浮肿病大肆蔓延，饿死者尸横荒野。若追究其责任，张国忠

和毛泽东都该千刀万剐。“大跃进”后，张国忠因作恶多端，积怨甚深，屡遭贬职，仍难以平民愤，于1961年被定为“反党分子”，开除党籍，划入黑五类之列。毛泽东则标榜自己一贯正确，仍然把持着党的领导权。自命为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大跃进以来，各省非正常死亡人数猛增的报告不断地传入中南海，毛泽东似乎忘记了他刚刚说过的“粮食多了怎么办？”忘记了他信口开河地让农民一天吃五顿饭，改口发出“闲时吃稀，忙时吃乾，平时半稀半乾，杂以番薯青菜之类。”的最高指示（《党内通信》1959年4月29日）。提出了“低标准，瓜菜代”的口号（中共中央《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1960年8月10日）。

饿，是世界贫困地区的普遍现象，许多人都感受过。饿一顿两顿，甚至饿一天两天，都可以忍受。若是天天饿、月月饿、年年饿呢，谁都难以承受。在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毛泽东时代，饥饿是严酷的现实，但饥饿两个字却是犯讳的大忌，中国有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有每天都要唱几遍的歌词“毛泽东思想是不落的太阳”，有《人民日报》刊载着的粮食连年大丰收喜讯，怎么会饥饿呢？饥饿两个字是绝对不允许说出口的。曾记得，1947年5月，国民党统治区的学生，吃了饭，打着饱嗝儿，拉着横幅，举着旗子，喊着“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口号，通城游行，煞是热闹。六十年代，中共掌权，报纸上刊载着粮食亩产几万斤的丰收消息，宣扬着到处莺歌燕舞的盛世美景。黄皮寡瘦的民众尽管肚子空空的，谁也不敢说饿，更不敢上街游行，谁说饿，谁就是攻击党的粮食政策，就有可能被劳教、劳改。谁敢上街游行，立即抓起来以反革命处置。

中共的宣传机构是禁言饥饿的。但是读报纸、看新闻的时候，若是细心一点就会发现破绽。

《重庆市政府网》曾发布重庆城市居民收入增长计划，第一阶段（1979-1991年）摆脱贫困，解决温饱；第二阶段（1992-1996年）城市居民收入高速增长，深化改革，全面攻坚；第三阶段（1997-2001年）城市居民收入平稳增长，实现总体小康；第四阶段（2002-2008年）城市居民收入加速增长，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扎实迈进。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好像是已经全面小康了吧？在重庆，退休金从两百元增加到三千元，一碗小面从两角钱涨到了六元钱。一张从两路口到解放碑的公交车票从八分钱提高到两元钱。这就是事实，究竟是小康还是大康呢，老了，感觉迟钝了，现实是购买力不仅没有提高反而降低了，中共中央又说2020年实现小康，看来还要接着做几年美梦。

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后，国家统计局副局长邱晓华曾著文赞颂中共经济发展十大跨越，他说：“本世纪末，我国国内生产总值首次突破一万亿美元，人均GDP超过800美元，人民生活从温饱跨入小康。”（笔者注：邱晓华在这里说“人民生活从温饱跨入小康”，他说这话的时间是1989年。笔者写这篇文章注解的时间是2015年12月1日，CCTV和各大报纸正在大张旗鼓地宣传十三五规划，扬言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但愿十八届五中全会的豪言能够兑现。到时候可别再来新的说词和文字游戏了。）

尽管以上两者的说法不一致，但是，他们都承认改革开放以前存在着温饱问题，至少1991年前还有相当多的城市居民处于贫困状态，不温、不饱。城市居民尚且如此，劳改队里的犯人可想而知。当然，文革期间的中国监狱

比1960年前后的监狱在能否吃饱饭这一方面已经好得多了，那时候饿死人的事是时常发生的，《夹边沟纪事》记录了甘肃夹边沟农场关押的三千余名右派分子历经三年“改造”后只存活了六百名的惨状。笔者去过的四川沙坪农场关押两万名劳教人员饿死了六千余名的事实，虽被当局竭力掩盖，也难免偶有消息透露。1966年我入狱后只知道监狱中饥饿难耐、捆绑吊打成风，还没听说大量饿死人，这也算是共产党执政的一大进步吧。

在押人员怎么解决饥饿问题呢？可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向家里索要

这部分人不多。一是家中本不富裕，尤其是农村户口的公社社员，劳碌一年所挣工分不足以糊口，甚至倒欠公社粮款，无力负担；二是多数家庭均已妻离子散，求告无门；三是自己已给家庭带来株连之祸，难于开口；四是家庭成员受中共蒙蔽，或划清界限，或误信中共宣传，以为监狱生活能够吃饱、穿暖，因而拒绝援救。据我数年观察，能够收到家庭资助的不过百分之二三。且有段时间监狱只收衣物，拒收食品，所寄现金、粮票一律交狱警保管，犯人身上严禁携带现钞，使用时需写报告申请，诸多不便。

变卖衣物

老年犯人坐牢多年，只剩下一把老骨头，没什么可卖的了。文革后进来的人，有些还有毛衣、呢裤等值点钱的东西，找当地老乡或刑满释放的就业人员，换点东西吃，一件纯毛毛衣顶多换十斤挂面。这等事要避开狱卒和屁眼虫（劳改队用语，指伪装积极，时常检举别人的人），一旦被发现，难免挨一顿批斗，不过不至于挨打，毕竟是自己的东西，没有侵害他人利益，且吃饱了是给监狱干活，狱卒们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坐了几年牢，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房无一间，地无一垄，多余的换洗衣服也差不多吃进肚子里了，成了真正的无产阶级。

饥不择食

七八月间，田边地角偶然可见野地瓜，香气诱人，连忙摘取，吞入口中，遗憾的是数量太少，十天半月碰不上三五颗，且只有大手指姆那么大，填不饱肚子。

九月份收获红苕，十月份驾牛耕地、打土，准备种小麦，土地中多多少少有一些挖红苕时没有捡干净的小红苕，在地里劳动时，一旦发现如获至宝，赶快捡起来塞在临时缝制的口袋里。耕地的人捷足先登，打土的人复查一遍，直到小麦出苗以后松土时都还能捡到手指姆粗细的红苕根。找机会或煮或烤或生嚼，聊以充饥。

四川号称天府，冬季地不封冻，田边土坎仍有少许野菜，只要看见，立即折腰摘取，在河沟里洗净，或生吃，或盐渍，或煮熟，吞而食之。夏季雨后偶尔能捡到野生蘑菇，颜色浅且有香味者，大都可以食用。遇见颜色深，形状奇特的，则不敢入口，多半是毒菌。

屋檐下面的麻雀，水田里的黄鳝，池塘边的青蛙，粮仓附近的老鼠，都是劳改犯的上等食品，不过这种机会难得，若能遇见，则添了一道荤菜，不亦乐乎。彭世同擅捕麻雀，郑万果[3]擅抓黄鳝，余大周[4]擅捉蛙、蛇，众人羡慕他们的口福。

某年夏天，我们六个人在胡家坪山上劳动，中午时分，派我回队部领取午饭，我匆忙下山，领取了六个玉米馍和半桶南瓜汤，放在背篋里赶紧背上山，走到半路，忽见水田旁边有一条菜花蛇，我悄悄地靠近，谁知那蛇十分

警觉，突然从一块水田窜向另一块水田，它没有事先考察地形，如果向西逃窜，一溜水田，我只能无功而返，它向东逃窜必经中间的小路，恰合我意，我猛地一弯腰，同时伸手抓去，刹那间抓住了离蛇头不远的七寸之处，换手抓住蛇尾向空中猛抡，五尺多长、重约三斤的菜花蛇身子直了，落入我手，南瓜汤顺着我的脖子流了一地，小木桶里只剩了几片南瓜，幸好玉米馍还在背篋底部。我三步并作两步走，到了胡家坪猪舍，先把衣服脱下来洗了晾在竹竿上，然后向大家汇报捕蛇经过，并为撒了南瓜汤而抱歉，众人说：划得来，划得来，于是连忙扒蛇皮，破蛇腹，取蛇胆，炖蛇汤。不一会儿，六个人围坐在地上，啃着玉米馍，吃蛇肉，喝蛇汤，奶白色的蛇汤鲜美无比，好不快活，似乎是进了广东彬记蛇餐厅一样。

顺手牵羊：

我刚进劳改队的时候，虽然也饥肠辘辘，但碍于知识分子的面子和传统的道德教育，脑子里积淀着陈腐旧套，尽管树上有成熟的苹果、柑橘，菜地里有萝卜、茄子，瓜田中有西瓜、香瓜，总认为那是公家财产，动不得。饿极了，偷偷喝一瓢冷水，多跑两趟厕所，悄悄地忍过去了。按照弗洛伊德的学说，人的第一需要就是生存，生存的首要条件就是吃饱，如果腹中无食，看着能够充饥的东西却不肯动手，岂不是违背了弗洛伊德的学说，也不堪称为万物之灵的人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别人的话可以不听，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如果不听等同于犯罪。想通了，我就开始活学活用了，行动就跟上了。1969年以后觉悟总算提高了，只要是能吃的东西，全往嘴里塞。春天，树上还没有结果子，虽然有暗暗的花香，却不能充饥，田地里的可食之物也寥寥无，只有勒紧裤带，继续忍受。到了夏秋之交，再不动手就是傻子了。偷吃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集体劳动，互相监督，有时还有狱卒监守，不能轻举妄动。只有乘单独劳动的机会，譬如割草、捡牛粪的时候，眼疾手快看准了路边的南瓜、茄子，猛然一镰刀砍下来，背到山边无人处，削去皮嚼而食之，虽然苦涩不堪，但可填填肚子，也是一种享受。树上的果子是不容易吃到的，每片果林都配备了老弱病残的犯人看守，瓜田李下，多有防范，犯人之间是讲究义气的，不能给别人找麻烦，只有趁看守不在的时候摘一两个，或捡几个掉在地上的烂果子。

偷吃狗肉

孔子有曰“鱼馁，肉败，割不正，不食”。孔夫子被打倒了，这句名言还在。腐鱼臭肉是不能吃的，那里面可能有肉毒碱菌产生的肉毒碱，剧毒，吃了会中毒、会死人。至于割不正，有人解释为必须把肉切的方方正正才吃，想必是错了，肉片、肉丝、肉糜都不方正，不都是挺香的吗？孔老夫子似乎是指来路不正当的肉不可食。中共监狱里的犯人虽然饿得心发慌，馋得几乎流口水，绝大多数人对来路不正的肉还是不敢吃的。十三队附近的老乡有少数人家饲养护院狗，当地人不吃狗肉，给犯人提供了机会，四五元钱就可以买一只，杀而食之。不过这种机会很少，一要跟老乡熟悉，二要借用猪舍的锅灶，三要逃避狱卒的监督，四人数不能多。一年有那么一回就很幸运了。

菜蔬

诚然，粮食少可以多吃瓜菜等副食品，照样有饱足感，劳改队吃什么菜，有什么副食品呢？也如实记录如下：

苗溪茶场每个中队都要种菜，供应狱警及其家属和犯人日常之需。十三中队海拔不高，离场部近，又是农业队，除了本队数百名人员伙食以外，还

担负着部分外调蔬菜的任务。

十三队有个专业蔬菜组，二十多个人，围绕着队部附近的十多亩土地，重点种植细菜，葱、姜、蒜、辣椒、西红柿、茄子、黄瓜、莴笋、豇豆、扁豆、丝瓜、冬瓜、蒜苔、芹菜、韭菜等等，主要供应本队干部食堂，有时给场部和大队送一部分较为稀缺的蔬菜。

各个工区的土地以种植粮食作物为主，也预留了十几亩蔬菜地，栽种一些大宗菜，如萝卜、胡萝卜、甘蓝、青菜、土豆。供应干部食堂和犯人食堂。

分散在每个工区的饲养组种植青饲料，常见品种有甘蓝、苋菜、红苕、苜蓿、白菜、萝卜、南瓜等，在满足喂猪需要以后，还有多余的情况下，也可能抽调一些给犯人食堂。

蔬菜来源充足，品种也算不少，但每人每月的伙食费只有9元，当时玉米0.10元一斤，大米0.12元一斤，每月36斤粮食，主食占去约4元，猪肉0.74元一斤，每月供应半斤，需要0.4元，还有食油、食盐、佐料、煤炭费等等，剩下的菜金就只有三元了，平均每天只有一角钱，每顿饭只有三分多钱。这是万万不能超过的，国家政策马虎不得，毛泽东说过：“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毛泽东选集》第二卷1241页），超过了供应标准就违背了政策，岂不是跟党玩儿命吗？所以必须定量供应。正常情况下每天每人大约有三斤蔬菜，主要品种有：产量较高且价格低廉的萝卜、甘蓝、青菜帮子和厚皮菜。红白萝卜拿去喂猪和供应小厨房（干警食堂），萝卜缨留给大厨房（犯人食堂），甘蓝（通称莲花白、卷心白或洋白菜）裹得比较紧的白色部分也喂猪和送小厨房，最外层的青绿色老叶子给大厨房。

今日之读者，吃过甘蓝者多，吃过甘蓝老叶子的可能极少。四川省的劳改农场，如雷马屏、莽窝、沙坪、盐源、苗溪……等地的犯人食堂均以此菜为主，通称莲花白老叶子为“老梭边”，大概老叶子与“老爷子”谐音，不得不有所忌讳。谁敢吃老爷子呢？

甘蓝最早见于西班牙，近代传入我国，栽培不过百余年，由于适应性强、供应期长、产量高、耐储藏，且味道鲜美、营养丰富。抱子甘蓝、羽衣甘蓝、花椰菜、紫甘蓝皆为其变种，可谓品种繁多，物美价廉，已成为人们喜爱的大宗蔬菜之一；选用白色卷心菜，加几粒花椒、少许乾辣椒，用热油大火猛炒的炆莲白，颜色嫩白，香辣脆鲜；加适量白糖、米醋、酱油、味精烹制的糖醋莲白，色泽红亮，酸甜爽口；皆为普通的家常菜。

中共监狱里的菜则另具特色，原料不同、做法不同、口感不同、味道不同。原料是甘蓝外层的老叶子，呈蓝绿色，故有人称之为“莲花青”，又名“老梭边”表面有蜡质和粉状白霜，质地坚韧，纤维粗糙，味道苦涩，不能当做蔬菜上市，即使喂猪也不能用这种单一的老叶子，否则猪不吃，不可能长肉，必须掺入一半以上的白色部分或其他饲料。劳改犯则没有猪那种选择饲料的权力，也没有增重的指标，从地里砍下来的整窝卷心菜，逐一取出白色的心部，上好的送小厨房，次等的留在猪舍用来喂猪，外面的青绿色老叶子多半送犯人食堂，到了大厨房以后，丢进水池浸泡约一个小时，以除去施肥、打农药残留的怪味，勤快的炊事员有可能换一次水，遇上懒一点的炊事员则只有保留原汤，捞起来一阵乱刀砍成碎块，然后堆到大锅里煮上个把小时（老梭边不能炒，只能煮，炒的咬不动，煮的时间短了也咬不动），临起锅时加盐，每一百公斤菜叶子加一公斤左右的菜籽油，刚出锅的时候菜汤里能看见几点油星，用大铁勺搅动两下，油星瞬间即逝。盛在碗里呈暗绿色，吃在嘴里坚

韧苦涩，牙口不好的把它嚼不烂，据说经饿。就这样的菜，每人只有一勺，打菜的时候生怕炊事员的手发抖，那怕是一点汤呢，最好也不要洒出来。有时收工晚了，多数人都开过了饭，厨房还有剩菜，遇见对路的炊事员可能给两勺菜，当然需要点点头，陪个笑脸，以图下次。

开饭的时候，犯人集合排队，向岗楼上的管理员报告人数，1977年以前还要背一段毛泽东语录，经管理员批准打饭以后，列队在厨房窗口，一只手拿着一个大土碗或瓦钵，另一只手拿着一个搪瓷缸子或铝锅，炊事员见一个大碗就舀一瓢乌绿色的菜，再往碗里扔进一个黄色的玉米馍，另一个炊事员站在大水桶旁边往搪瓷缸子里倒一小盅温吞吞的开水。领来饭菜以后，通常蹲在坝子里或狼吞虎咽或慢慢咀嚼，十分钟后再次集合站队，清点人数，面向管理员立正，背毛泽东语录，据说不背语录则难于消化，腹中胀气，容易放屁。然后值星员报告人数，列队回舍房。遇上下雨或太阳十分毒辣，经管理员允许可以把饭菜端回舍房慢慢吃，这就算管理员开恩了。

不久前看到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索尔仁尼琴（俄罗斯）著《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描述了斯大林主政时期苏联劳改营里的犯人生活，那里的犯人是在饭堂里吃饭，有粗木桌子，有能够并排坐五个人的长条凳，在盛着热汤的大木桶里有时还能捞到几条可以解馋的小鱼。比起中国的监狱来，可以算作天堂喽。

我入狱二十二年，经历了五六个劳教劳改单位，走遍了苗溪茶场的二十四个中队，无论是重庆、成都等大城市的监狱工厂还是荒山僻野中的劳改农场，一概是只有厨房没有饭堂，既没桌子又没凳子，夏天找个荫凉地方，冬天找个避风地方，还要注意不能超越警戒区，蹲在地上或坐在地上就把饭吃了。遇见人性还没有完全泯灭的狱卒，允许犯人把饭拿到监舍里面吃，就算是人道主义的享受了。

3、打牙祭

吃肉，四川俗称打牙祭，盖因农村寒苦人家平时很少吃肉，过年才杀猪，端午、中秋才割点肉吃。个别嘴馋又聪明的家人，便以初一、十五（有些地区是初二、十六）需要祭祀祖先，以保阖家平安、人财两旺为名，到农贸市场割一块肉摆在供奉着祖先牌位的神龛前面，假巴意思地点上钱纸蜡烛香，顶礼膜拜，祭祀完祖先之后，那块肉就拿来祭自己的牙齿，大快朵颐了。名为祭祖，实为解馋，这个主意深得人们赞赏，渐成习俗，打牙祭之风从明朝中叶即流传开来，遍于四川，广及全国。地主家请长年甚至也要把初二、十六打牙祭写进合约里。

中国的监狱很少吃肉，我坐班房的时候（1966-1979年间），每月吃一次肉，大约半斤，一般是猪肉。1960年以前入狱的老犯人告诉我，三面红旗最行时那几年，打牙祭只有二两肉，两三个月才打一次牙祭，不但解不了馋，还把肚子里的馋虫勾出来了，心里更慌，有一年，半年没见过荤腥，现在的生活大大提高了。这个人是“劳改积极分子”还是“反改造分子”呢？他“歌颂”现在生活大大提高了，又“攻击”三面红旗没了肉吃，孰是孰非难得糊涂，由他去吧。

打牙祭这一天，是犯人的黄道吉日，比七月一号中共过生日还兴奋。一般头天晚上通知猪舍，不准半夜喂饱食，第二天早晨把判处死刑的猪背下山来。

那时候喂猪以青饲料为主，精饲料（玉米，麦麸，米糠等）所占比例很

少，也不兴添加各种各样的生长刺激素，猪长得很慢，喂一年才长到一百三四十斤，四百来名犯人再加上几十名狱卒、狱警、管理员（武警），大小厨房打一次牙祭需要杀两头猪。

有一年夏天，我上山割草时膝关节受了伤，半月板破裂，疼痛难忍，走路需要架双拐，不能在田间干重体力活。景中队长刻薄成性，他是看不惯有人休息的，即使拄着双拐也不会放过，腿脚不方便可以做手上的活路嘛！他安排我在紧挨着厨房的晒坝劳动，有机会看到了杀猪的全过程。

从山上猪舍背下来的猪，四只脚是被捆紧了的，侧卧在地上，只能呼哧呼哧的喘气，嘴角流着口水，偶尔发出一两声有气无力的尖叫。

我走过去看，只见厨房水池旁边的空地上放着一个椭圆形的大木桶，还有一个很敦实的条凳，大约五尺长，两尺高，面板有三寸厚，一尺宽，四条腿十分粗壮，看着就很结实。条凳下面放着一个脸盆，里面盛着清水和少量食盐，据说是接猪血用的。

左边的石板上摆着杀猪用的各式工具——尖刀、屠刀、砍刀、刮刀、刨子、挺棍、抓钩、挂钩……，件件闪着锃亮锃亮的寒光。厨房内大锅里的水已经烧开了，冒着热气不停地翻滚着。

杀猪匠来了，众人纷纷点头示意。他没文化，原来在农村以骗猪、杀猪为业，不知为什么被判了十五年徒刑，据说是反革命，到了十三队还是干老本行。在外面杀猪杀成了反革命，在监狱里杀猪是改造思想，莫名其妙。

杀猪匠系着围腰，戴着袖套，掏出火镰，打燃火（文革期间物资匮乏，火柴定量供应，犯人没有票证，买不到火柴，只有用火镰），点着了一支自己裹的叶子烟，杀猪匠属于技术工种，相当于工厂里的技师或者高级工程师，总要有个架子。抽完了烟，他喝了半碗水，喊了一声“开干”！

四五个帮手都是膀大腰圆的小伙子，走到猪的旁边，有人将一根杉木杆子插进猪捆着的四条腿中，“嘿”地一声齐吼，四个人一起用力把猪抬了起来，放在条凳上。跟着，一系列快速动作，捉前脚，抓后脚，揪尾巴，提耳朵，摁猪头，各司其职，几个劳改犯代替人民政府对猪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不能让猪乱动，只能侧卧在板凳上，专等杀猪匠操刀……

但是待杀的猪仍不肯罢休，从被揪住起，就敞开喉咙拼命嚎叫，使出浑身的劲又蹬又踢。不过再冤枉也没人理，立即执行绝不含糊，对猪没有死缓的规定。要是那个下令割掉张志新的舌头再执行死刑的毛远新在现场，可能就要先割舌以禁其声再下毒手了。

杀猪匠看了一眼，一边朝前走一边口中念念有词，听不清是在背诵毛泽东语录还是念什么咒语，右手拿着一尺多长、亮晃晃的屠刀，他往刀刃上啐了一口唾沫，左手在刀上面轻轻一抹，又用手在猪的颈部拍拍摸摸，像是寻找着血管的部位，然后站好马步，眼睛一眯，猛吸一口气，左手像老虎钳一样紧紧地扭住猪拱嘴，**将猪头紧靠左腿，又大喝了一声：“用点力！按紧喽！”提醒站在条凳两边的助手集中精力。**随后，右手把杀刀端平，刀口朝外，迅速地往后一收，然后**对准杀口一用劲**，说时迟，那时快，“吱溜”一下子，锋利的屠刀已经挺进了猪的喉咙，此时猪尽力垂死挣扎，比刚才的动作猛烈得多，又跑来了两个人，才把它按住。按是按住了，但是阻挡不了它发出的惨叫，穿云裂石般的高亢凄厉，吓得远处的小孩子捂上了耳朵。只见杀猪匠又用力往前一送，**略一停顿，杀刀向内微收改向，再使力一顶，猪叫声变沉闷了**，杀猪匠用脚将接血的盆子往前一推，右手腕子微微抖动，屠刀在猪的

喉咙位置旋转了几下，随即将刀往外一拔，刀出血喷。冒着热气带着腥味的暗红色猪血冲出了刀口，哗哗地喷涌在盆里，装着盐水的盆子周边全红了，鲜血足足装了大半盆，上面浮起一层泡沫。

猪血放完后，猪的头和四肢越来越蔫，猪的嚎叫声渐渐地弱了，变成了哼哼声，最后只能“呼哧、呼哧”的，大概这就叫做苟延残喘吧，刹那间，那猪的四肢猛然一蹬，临死还要表示最后的抗议，随即停止了呼吸，再也不动了。

杀猪匠转过身来，把屠刀放在旁边的石板上，端起杯子含了一口水，漱漱口，把水吐在地面上，喘了一口气，拿起尖刀在猪的后腿上割开一块皮，然后用一根四五尺长的铁通条从割口捅进去，猪的背和两边都要捅透，再用手捏起割口，鼓起腮帮子，费力地往猪身内吹气。眼看着每吹一口，猪身子就膨胀一分，最后直把猪吹得滚圆滚圆的。杀猪匠觉得差不多了，便用一根麻绳将割口扎牢实，松了手，用木棒将猪全身狠狠捶打一通，让空气贯通到猪的各个部位。之后，人们七手八脚把猪放进大木桶里，一桶一桶滚开的沸水倒进去，蒸汽弥漫在木桶上方，猪泡在沸水里一动不动，半沉半浮，“死猪不怕开水烫”。

猪泡好后，人们又把猪抬到条凳上，便开始刮毛了。有的用手、有的用刨子、有的用刀子……

一袋烟功夫，猪毛就被褪得一干二净，浑圆的猪体雪白雪白的，可以做沐浴露或增白粉蜜的广告了。

看了杀猪的全过程，我萌生了一个想法，原来人是最残忍的动物。以前当小孩子的时候，常听大人说老虎如何厉害，其实，人比老虎厉害得多。人抓住老虎，扒了它的皮，山大王拿来做虎皮交椅，显示其威风；官宦人家做虎皮褥子，彰显其高贵。赖昌星送给厦门海关关长杨前线一张虎皮，价值七十余万。人杀了老虎，剔出它的骨头泡酒，是谓虎骨追风酒，北京同仁堂的传统产品，据说可以除风祛湿，舒筋活血；虎肉可炖汤，补脾胃，强筋骨、益气力；虎鞭有暖肾壮阳，益精补髓之功效，可治疗阳痿早泄，属名贵的中药；虎牙可以做饰品，戴上它避邪；虎尿还拿来做法引子，动物园有售，一百毫升标价二十五元，比鲜柠檬汁还贵，据说可消炎镇痛；只是还没听说过吃老虎屎可以治病的。近年，老虎成了禁猎动物，这些东西越来越少了。早年见《中医药杂志》载文说，狗骨可以代替虎骨入药，或许有点意思。这几年喝狗骨酒的人大概挺多，乃至起了点转基因作用，御用文人成了犬儒，内府将军成了狗官，警察队伍里警犬越来越多，城管中也增加了不少狗腿子，在主子脚下摇尾乞怜，在百姓面前狂吠乱咬，也算是中国特色吧。

闲话不谈也罢，且接着说劳改犯如何吃肉。

打牙祭当天上午杀猪，精心挑选四五个动作灵活的人，配合杀猪匠一起忙活一两个小时，杀猪、放血、刮毛、卸头、开膛、破肚、刚才还活蹦乱跳、扯开喉咙大吼大叫又拼命挣扎的猪一命呜呼了，被大卸八块了。

指导员、中队长来了，腰柳、臀尖、五花、三岔、前蹄、后膀、宝肋等精华部位的肉，和猪腰、猪肝、猪肚、脑花、肥肠、筒骨等适合小炒或炖汤的，优先小厨房各取所需，剩下的过了秤归大厨房，紧跟着就是炊事员的事了。

杀猪的消息，无需传媒，早已传遍十三中队的各个角落，在山上干活的犯人手脚比平日麻利，猪肉还没吃到口，积极性就调动起来了，看来红烧肉

的香味儿比背毛泽东语录还鼓舞人心。这天不会加班，下午准时收工，加快脚步往回走，六点钟左右，分散在各个山头劳动的犯人都来到队部所在地的坝子里，集合排队，报告人数，每十二个人一组，围坐在晒坝的三合土地面上，若是夏天，太阳还没落山，地面有点烫，只能蹲着，别为了吃肉让屁股受罪。

值班干部再一次清点人数，避免吃双份，干部确认人数无误，命令厨房开始发饭。每组派一个人从厨房端出两个搪瓷脸盆，打牙祭这天不吃玉米馍，吃大米饭，每个脸盆里有六份饭，二六一十二，由值星员或大组长把这十二份饭分到每个人摆在地上的大碗里，然后把脸盆还给厨房。

准备分肉了，三十几个脸盆摆放在厨房里的大案板上，当班炊事员数一遍，再数一遍，炊事班长核实确认无误，从大锅里把红烧肉（有时是回锅肉）一瓢一瓢地分在脸盆里，这个过程大约需要十几分钟。

围坐在坝子里的犯人默默地等待着，这时候如果能放一段乐曲就好了，比如“祝福毛主席万寿无疆”“毛主席永远和我们在一起”“千万颗红心在激烈的跳动”等等，都是当时最流行的歌曲，放一遍用不了十分钟。

炊事班把肉分好了，干部再次下令，依照次序，每组派一个人到厨房端肉，这时候，围坐着的人每人拿出一个小碗或小盘，摆成一个圆圈，到厨房领肉的人小心翼翼的把盛着肉的脸盆端出来，放在圆圈的中心。已经一月不知肉味儿的鼻子早就有了感觉，不由得再猛吸几下，十二双眼睛也瞪大了，盯着那半盆肉，可是谁也不能动筷子，因为还要二次分配。

由值星员或这十二个人公认比较公正的人担此重任。他再数一遍地上摆着的碗或盘子，然后一手拿筷子，一手拿一个小勺，先把盆里的肥肉一块一块地选出来，逐一放到盘子或小碗里，再一块一块地分瘦肉，夹肉只能用筷子，不能用小勺，小勺只起托送作用，不能沾盆里的汤，肉分完了分葱葱蒜苗等作料，最后用小勺分油汤，这个程序大约需要五分钟。

脸盆里的肉和汤都分光了，转移到了十二个小碗里，是不是可以开始吃了呢？且慢，还有一个重要程序。

分肉的人是选出来的，他的操作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完成的，但是怎么确认他没有一点私心呢？谁能保证他没往自己的碗里多夹了一片肉或夹了一片比较厚实的肉呢？谁能肯定他一点私人关系都不讲，没有往他熟悉的小碗里多放了一勺油汤呢？还是用制度来约束吧。据了解，六七十年代的中国监狱，至少原西康省大小凉山地区的监狱，在押犯人打牙祭的时候，都遵循没有形成文字也没有经过人大常委会通过但被一致公认的规矩，创造了拈阄法、背向定位法等。

拈阄法：用12张颜色相同、大小相等的纸片分别写上1.2.3.……12等十二个数字，折成小纸团，随机推举一人，把地上的小盘小碗重新排列一遍，并确定顺序和指明哪个是1号，经大家认可，制造小纸团的人把纸团投掷在地上，然后每人拈一个，制造纸团人最后拈，以防作弊。一切停当后打开纸团，按顺序由值星员对号发放小盘或小碗。

如果是冬天，室外零度左右，肉已经冷了，倘若当天气温在零下，肉就快冻上了，开始吃吧，红烧肉变成了凉拌肉，再不吃的話就成了猪肉冻，一个菜三种吃法，也算是中国劳改队的特色吧。

背向定位法：有时候遇上值班的狱卒觉悟特高，不许拈阄，理由是：毛泽东号召要斗私批修，不能斤斤计较。在枪杆子底下，犯人无奈，只得另辟

途径。分肉程序不变，分好以后，让一名犯人转过身去，以看不见装着肉的小碗为准。此时由其余十一人中的一人重新调整排列碗的次序，并指明哪个是1号，还要确定取物方向是顺时针还是逆时针，这一切通常不用语言表达，往往以手势示之。众人无异议后，由背向圆圈的人任意喊一个名字，此人即为1号，取走1号碗，然后依确定的顺序逐一拿走地上的碗。此法省去了做纸阄的程序，似有创意，可以推广。

读到此处，您可能觉得这些犯人过于自私。吃一点肉竟如此斤两必争，近乎可笑甚至可鄙。奉劝诸君且慢结论，文革期间，苗溪茶场第十三中队关押的是刑期十五年以上的“反革命”犯，即政治犯，并非地痞、流氓、恶棍、土匪之类，也不是杀人、放火、抢劫、强盗之流。当时坐牢的有三十年代参加中共的晋绥干部，四十年代参加中共的北大学生，有坐过渣滓洞的左翼作家联盟组织干事，有黄埔四期的国民革命军人，有知名学府的大学教授，有诲人不倦的中小学教师，有冲锋陷阵的前志愿军连长，有年逾花甲的老中医，也有许多农民、工人、战士、学生，还有不少莫名其妙被关进监狱、自己也说不清楚为什么的人。他们见过大鱼大肉，吃过美酒佳肴，甚至有人在人民大会堂赴过国宴。也曾经斯文过，礼让过。古人云：衣食足而后礼仪兴，他们在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状况下，还这样彬彬有礼的分匀净那半盆肉，已经是很难得了。

不信？饿你三天，看你见了吃的东西是什么样子。

再举一个例子：叶企孙（1898—1977），上海人，物理学家、哈佛大学博士，清华大学教授（后合并于北大），清华物理系的创办者，理学院院长，近代中国科学事业的奠基者之一。上世纪二十年代，他在测定普朗克常数这一实验物理学的重要课题上，获得当时的最佳数据，曾长期在国际上沿用。中国许多知名物理学家，如赵九章，王大珩，陈芳允，钱三强，周光召，朱光亚，邓稼先，杨振宁，李政道，钱伟长，钱学森等均出自他的门下，中共命名的两弹一星元勋二十三人，其中十九人是他的弟子，世人尊称其为大师的大师。1948年他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这是当时科学家的最高荣誉。“文革”来临，叶企孙卷入重大冤案，连普通国民党员都不是的叶先生，竟被诬为是国民党CC系（中统）在清华的核心人物，长时间受迫害，曾被投入监狱。由于查无实据，连一点蛛丝马迹也没找到，又放回北大，但冤案的制造者不肯认错，仍以“特务嫌疑”之莫须有的罪名，对叶先生继续监控，陷害。本来风度翩翩的名教授，精神失常，双腿浮肿，小便失禁，整个身子弯成了九十度。叶企孙晚年十分凄惨，当时不少人在海淀中关村一带见到过这种情景：一位头发稀疏的老人，弓着背，穿着破棉鞋，踉跄街头，有时向摊主伸手，要两个虫子蛀过的小苹果，边走边啃，碰到熟知的学生便说：‘你有钱给我几个’，所求不过三五元而已！声誉满天下的物理学家，沦落到如此地步，沿街讨要，又是怎么造成的呢？

1987年，叶企孙逝世十年后始获平反。1992年，海内外百余位知名学者自愿集资，联名向清华大学呼吁为叶企孙建立铜像，1995年铜像落成，一代宗师的半身胸像安放在清华新区第三教学楼的门厅里，音容宛在，典范永存。然其时，昔人已乘鹤远游逾十八年矣。

犯人打牙祭采用的拈阄法，背向定位法是公开、公平、公正的体现。有民主选举，有纪律约束，有群众监督。如果端上来随便吃，一阵哄抢，拳脚相加甚至头破血流都是可能发生的事。

身陷囹圄的“反革命”们，固守着传统的道德观念，讲礼仪，顾廉耻，守纪律，重诚信，为了求得公平，约定了规矩，心平气和地分了肉，谁也没有怨言，众人高高兴兴的打了牙祭。岂不值得赞许吗。

两千多年前，老子在《道德经》中说：治大国，若烹小鲜，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伤人。非其神不伤人，圣人亦不伤人。夫两不相伤，故德交归焉。这段话有许多人诠释，释义各不相同，我看重的是“以道莅天下”“故德交归焉”这两句话。凡事遵循其道，才能彰显其德。长年处于饥饿状态，一个月才见到半斤肉的人，在人的本能刺激下，难免不眼馋，要是没有“道”，岂不要乱作一团吗？毛泽东喊了那么多年的“斗私批修”“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实际怎么样呢？住在中南海里的几个人，无一不是尔虞我诈，勾心斗角，表面上号称亲密战友，暗地里拼得你死我活。毛泽东就是阴谋诡计的始作俑者、刘少奇、周恩来等莫不如是，六十多年来大量的历史事件足以证明。

国家如果有了大家认同的规矩，切实执行，人民就会安居乐业，社会才能不断前进。《诗经》有曰：“邦畿千里，唯民所止”，真正的以民为主，制定民主的宪法，切实实行宪政，而不是口头上空喊宪政，才是维稳的良策，兴邦的要津，治国者应该能从犯人分肉中得到一点启发吧。

附注：

[1] 张泽厚，1906年生，四川岳池县人，早年毕业于上海艺术大学西画系。1930年执教于西南大学，后到上海参加“左翼作家联盟”任组织干事。左联的重要诗人，艺术学学者。先后主编过《文艺评论》、《艺术周报》、《文艺新地》等刊物。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年加入民盟。1948年因支持华蓥山武装暴动被捕，关押于重庆渣滓洞。1949年侥幸逃出，他身中8枪，受伤9处。治愈后，只剩单腿，需拄双拐行走，五十年代任川北大学副教授兼政治教研室副主任、南充市文联主席、民盟南充市委员会委员。1957年被划为右派，判刑二十年。1982年平反，任岳池县政协常委，著有《伟大的政治》、《艺术学大纲》、《怒吼吧！中国》等书。1989年8月病逝。

[2] 张紫葛，1919年生，湖北松滋人。据云武汉大学毕业，曾短期任宋美龄机要秘书。四十年代中期，张紫葛任新疆学院教授、新疆日报副社长兼总编辑、新疆警备司令部高级参议等职。中共建国后张紫葛曾任西南师范学院、西南政法学院教授。1957年，张紫葛被划为右派，批斗时，右眼左耳被打瞎打聋。次年以“反革命”罪逮捕判刑十五年。与笔者同在苗溪茶场十三队劳改。在狱中时，张紫葛左眼尚可视物，但佯装盲人，终日与张泽厚相随打草鞋。时有检举他人之不齿行为，众人皆远之。

七十年代末，张紫葛得以平反，先后在西南政法学院、西南民族学院任教，期间出版了《在宋美龄身边的日子》、《心香泪酒祭吴宓》、《在历史的夹缝中——忆张治中先生》等上百万字的著作。其中多有不实之词，引发争议，有人谓之“无中生有”“别有用心”之作。

张紫葛2006年10月病逝。

[3] 郑万果，四川荣县人，原志愿军战士，身高腿长，性格开朗，乐于助人。文革伊始被打成“反革命”，判刑十五年。妻离子散，老父病逝；家有慈母，年逾古稀，心盼儿还家，潸潸泪似麻。1980年春，郑万果在山上攀崖割草，不慎失足，跌入深谷，命丧异乡。第二天在胡家坪山下一巨石旁找到其遗体。时狱方已得到姗姗

来迟的平反通知书，无从送达了。

[4]余大周，四川郫县人，在中学读书时曾参加三民主义青年团，任宣传干事。1957年划为右派分子，在成都动力机械厂劳动教养，1963年某日库房失火，余大周提水桶救火，被诬为火上浇油（那只旧桶原来装过柴油），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后查明救火是真，余大周1979年底得以平反，安排在郫县第五中学从事后勤工作。因长期坐牢，身心备受摧残，患严重肝炎转化成肝癌，1980年7月病逝，终身未娶，享年50岁。

4、四害猖獗

1955年11月间，毛泽东在杭州和天津分别同十四位省委书记等人讨论并商定了《农业十七条》，其中第十三条为“除四害，即在七年内基本上消灭老鼠（及其他害兽），麻雀（及其他害鸟但乌鸦是否宜于消灭，尚待研究），苍蝇，蚊子。”

1956年1月8日毛泽东召集谭震林、陈伯达、廖鲁言、柯庆施、李井泉、吴芝圃、张仲良、舒同等二十五人在杭州西湖边上的大华饭店召开专题会议，将十七条扩展为四十条，定名为《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1957年10月26日《人民日报》全文公布，其中第二十七条为：“从1956年起，在十二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老鼠、麻雀、苍蝇和蚊子。”1960年3月18日毛泽东在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中提出：“再有一事，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虫，口号是‘除掉老鼠、臭虫、苍蝇、蚊子’。”

这个文件经中共顶层官僚反复讨论，前后用去两年多的时间，由于是在毛泽东大举反对“右倾保守”的气氛中制定的，那些沐猴而冠、尸位素餐的昏聩官僚头脑普遍发热，提出的各项指标大多超越实际可能，除了农业合作化、收回土改时分给农民的土地一项，采用强制执行的手段，得以完成外，其他各项均未如期实现。中共似乎得了健忘症，当时大张旗鼓，轰轰烈烈宣传的《农业发展纲要》竟然连废纸也不如，没有人再提起了。

1966年底，我住进了四川著名的监狱——苗溪茶场，这里除了老鼠、臭虫、苍蝇、蚊子以外，还多了跳蚤、虱子、蟑螂、白蚁、血吸虫等品种。它们对毛泽东的最高指示置若罔闻，面临绝种的威胁毫无畏惧之感。1967年，十二年的大限已过，无缓期执行之说，“四害”理应绝迹，但是实际上，“四害”之类日益繁衍昌盛，较之1956年有多无少，其中一部，未经法院核准就大摇大摆地进了监狱，甘心与重刑犯为伍。害得我等苦不堪言。

老鼠：生命力强，繁殖力强，适应力强。考古发现，早在人类出现以前，老鼠即在地球上存活繁衍。七十年代在我国安徽潜山发现一种动物化石，专家们确认为啮齿类，被命名为东方晓鼠。近年在湖南衡东县古新世地层中发现的钟健鼠完整头骨，更加证实了这种论断。

1945年，美国在广岛和长崎投下两颗原子弹，对当地的生态造成了严重破坏。事后发现，那里的老鼠几乎没有受到核辐射的影响，没有畸形，还能正常的繁育。

老鼠是一种难以大范围灭绝的动物，地球上现存老鼠约150亿只，是人类总数的两倍多。

老鼠对人类危害甚大，糟蹋粮食，啃咬衣物，传播疾病，污染环境，列为四害之首，该当如此。但要在十二年之内基本消灭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国

土内的老鼠，则是无知昏君的痴心妄想。有人辩解说，毛泽东的动机是好的，非也！他从来不关心民众的疾苦和生命，他一生痴迷的是权力，1957年在莫斯科扬言打核战争，为了全球实现共产主义，中国六亿人死三亿人也在所不惜。毛泽东自己说过“社会实践及其效果是检验主观愿望或动机的标准”（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825 页）。从发出灭鼠令到现在已经五十多年，老鼠依然猖獗，近年媒体相继报道，洞庭湖、鄱阳湖、甘南草原、黄河源头、青海牧区、内蒙草场等地鼠害愈演愈烈。实践证明，毛泽东的所谓十二年内灭绝老鼠和他扬言的“超英赶美”“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实现共产主义”等妄想一样，纯属欺世盗名，荒诞无稽之谈。大轰大嗡地挖鼠洞，投毒饵，水浇，烟薰，到处追杀，打死老鼠后割下鼠尾，作为战利品上交。只能短时间减少老鼠的数量，不能根除鼠害。云南玉溪市疾控中心提供的一份资料，能让我们对老鼠的繁殖能力有一个更具体的认识：灭鼠后，鼠类数量的回升速度取决于存留下来的鼠类数量，若一次灭鼠 30%，一个半月老鼠就能恢复到原来的数量；如一次消灭 70%，七个月左右时间就能恢复；如果一次杀灭 90% 以上，则需要十四个月才能恢复。换句话说，一片区域如果有一百只老鼠，被消灭九十只以后，只要过一年多时间，老鼠数量又会恢复到一百只。

鼠害是需要控制的，真正务实的做法是把灭鼠任务列入日常工作，坚持不懈，虽不能灭绝老鼠，但可将鼠害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或做到局部地区无鼠害。我的朋友沈世英先生（浙江农大毕业，灭鼠专家，著有《草原灭鼠的理论和实践》等书，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即以定期巡检、择机放药的方法，保证重要档案存储地和高级宾馆不见老鼠危害。

至于监狱，尤其是农场，一般不准使用剧毒药饵，鼠害频繁是长期存在的问题，监狱从未采取过任何灭鼠措施，只能任其恣虐。狱卒的住地大多养得有猫，用以避免鼠害，犯人的宿舍养了些虱子、臭虫，毫无避鼠之作用。牛圈猪舍里，白天即有老鼠招摇过市，犯人监舍内，晚间老鼠任意横行。尽管外面有岗哨监视，有机枪瞄准，三五成群的老鼠却视若无睹，在房梁上跑来跑去，如入无人之境。根本没把解放军和机关枪放在眼里，实乃岂有此理。我在苗溪茶场十三队坐了十三年牢，鼠害无一日不在。

臭虫：是一种以吸食人和鸡、兔等动物血液为生的寄生虫，住了十多年监狱，我怕臭虫。不是因为它那红猩猩的颜色，也不是因为它有难闻的气味，而是因为它吸血、骚扰、影响睡眠、传播疾病。

臭虫吸血独具特色，白天休息，多隐匿于床架、帐角、墙壁、天花板、书籍、被褥、草垫、床席等的缝隙中，和糊墙纸的后面。夜间要等到人们熟睡以后才出来活动，临近拂晓最为猖獗，咬人时先将毒素注入人体体内，让人麻醉，等它吃饱了、喝足了，躲藏起来后，毒性才发作，人感觉皮肤发痒时，臭虫早已逃之夭夭了。

冬天，臭虫通常停止吸血和产卵，深藏在木板等各类狭缝里，难觅踪迹，幼虫得不到血食，可活三十天以上，成虫在不吸血的情况下至少可活六七月。我曾把捉到的臭虫包在纸里，放置了九个月，打开看，纸上很多褐色的点痕，那是它排出的粪便，臭虫饿成了一个个半透明的薄片，但是还活着。夏秋两季臭虫活动频繁，是吸血和繁殖的旺盛期，“红军”半夜出动，劳改犯苦不堪言。

劳改队的臭虫多到什么程度呢？把任一床草席取下来，卷成圆筒形在地面上猛戳，立即可以见到大大小小的臭虫纷纷落下，八方逃散，一分钟可以

爬行 1-1.5 米，数量不会少于三百个，一间舍房面积约三十五平方米，上下铺共住五十人左右，五十床草席，臭虫总数应在一万五千以上，整座监舍潜藏着近十万“红军”。

犯人们想尽办法消灭臭虫，有人试验，摘取新鲜的四季豆叶子，放在草席底下，第二天清晨可以看到每张叶子上都会有十余个臭虫趴在那里不动，是叶片上的细毛阻碍了爬行还是特殊的气味吸引了臭虫？其原因至今未明。这个办法颇灵验，但只能约束少量臭虫的活动，不能消灭它。还是寻找药杀法为上策，农场时常使用农药，犯人（几个关心监舍卫生、文化程度较高的值星员）偷偷地做起了试验，敌百虫和敌敌畏杀灭臭虫的效果不明显，马拉硫磷、倍硫磷效果显著但有剧毒，需小心谨慎。若遇到果蔬或庄稼需要打这类农药时，报告干部，请求用少量农药消灭监舍害虫，除少数心地特别坏的狱卒外，一般都能获准。通常利用中午饭后短暂的休息时间，报告管理员，背一个喷雾器进来，由专人挨着床铺喷射农药，如果可能的话，七八天后再来一次，以杀灭近几日刚孵化出来的幼虫，基本可管两三个月，但由于众多犯人衣物都堆放在床头，很难一一清理，虫卵隐蔽其中，不易灭绝。直到 1979 年我离开监狱，臭虫还在那里爬，不知以后是否搬离了苗溪，没有了犯人，它们喝谁的血呢？

昨日读京华时报电子版，据称，退隐江湖多年的臭虫今年夏天复出，除了居民家里外，还登上了京沪高铁。昵称为“散步 112”的网友，日前在视频网站上发布了一条自己拍摄的“吸血臭虫”的视频。他在微博中写道：“当心了，动车卧铺上有吸血臭虫！2013 年 8 月 28 日晚，北京到上海 D313 车 06 车厢 13 号下铺和 15 下铺，早晨起来发现床铺上七八只吸血臭虫，被捏死后一个个鲜血淋淋，白天发现身上一串被咬的包，奇痒。”

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曾晓凡证实，网友展示的小虫确实是臭虫，他表示，与前两年散发性的被咬伤的情况相比，今年已属密集型，可能是经过三到四年的沉寂以后，臭虫开始扩散或者其危害要逐步扩大的一种趋势。

另据深圳新闻网 2013 年 9 月 15 日报道：平湖街道富民工业二区多数工厂发现了臭虫，记者采访了惠世友、海和电子、伟联电子、华强印刷、雅捷精密模具、维达力实业等六家公司，据惠世友公司人力资源部负责人钱由兴说：“能想的办法都想尽了。”该公司自从 2006 年工厂搬到平湖，每年 6 月到 10 月份，他们就跟虫“战斗”。“我们在员工中评比卫生宿舍，换床板、装空调，给宿舍熏硫磺、撒敌敌畏都没用。今年请了两家专业杀虫公司，最后这家因为没效果，都不敢来要钱了！”虽然平湖街道的多家公司都采取了不少“消灭”臭虫的方法，但臭虫仍顽固存在，记者访问多位业内人士，有人认为，深圳流动人口多，卫生状况日益恶化，三百多家消杀公司竞争激烈，不少公司低价抢生意，使用伪劣药剂，多次消杀不见效果。

看来，二十一世纪的专业公司还赶不上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劳改犯人了，这社会是进步了吗？根本原因在于中共一贯弄虚作假，专业公司以营利为宗旨，灭绝了害虫岂不是砸了自己的饭碗。

苍蝇：苍蝇是一种杂食性、孳生适应力非常强的昆虫。人粪、畜粪、腐败动物、发酵植物、厨房下脚料等垃圾、污水等环境为其主要孳生地。这些恰恰是劳改农场全都具备的，每个工区都有猪牛圈，每个比较连片的土地都有露天粪池，监舍大院内的厕所也是敞开式的，都为苍蝇的生存和繁殖提供

了良好的场所。所以监狱内家蝇、麻蝇、丝光绿蝇、大头金蝇、灰腹厕蝇、丽蝇等应有尽有，成了苍蝇的乐园。好在犯人白天在山上干活，苍蝇一般是不跟着人走的，几十亩地上有几十个人，来几十个苍蝇也等同于无，晚上天黑了，苍蝇回家睡觉了，不会干扰犯人的政治学习。犯人与苍蝇和平共处，关押重刑罪犯的禁地成了苍蝇的天堂，它们可以自由地选择栖息地段（不受户口制约），毫无顾忌地飞来飞去（无需外出证明，不买车船票），各取所需地选择食物（不定量供应、不要票证），不受限制地大量繁殖（没有计划生育），仿佛是提前进入了共产主义社会似的。贪生之蝼蚁，可知道犯人活得还不如苍蝇吗？

蚊子：蚊子之可恶，在于吸食人血。苗溪茶场十三队的蚊子是出了名的，这里地势低洼，水田密布，杂草丛生，给蚊子的繁衍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再加上数百名虽然多数骨瘦如柴但是血还没有被榨乾的犯人，给它们提供了丰富的食料，因此引得蚊子成群结队而来，在这里安家落户了。

写作途中查阅有关资料我才知道，原来蚊子的始祖早在一亿七千万年前侏罗纪就已演化成形，始于南美洲，其化石证据发现于白垩纪的岩层当中。而人类在地球上的繁衍史不过几十万年到四五百万年之间，如此看来，蚊子维持生命、繁殖后代的能力不可小视，要想在十二年内消灭这个物种，不是无知妄言也是痴人说梦。至今北京、上海、成都、重庆等地的居民仍然普遍地使用纱窗、蚊帐、电子灭蚊器、杀蚊喷雾剂、乃至蚊香等防范蚊虫肆虐，据网易新闻报导：“广州市城管委1月16日举行2015年爱国卫生工作会议，会上通报称，去年广州暴发严重登革热疫情，全市各级财政用于灭蚊的费用近2亿元，为历史之最。”毛泽东五十余年前的豪言壮语又成了虚妄之词。难怪有人说“毛杂种没一句实话”。

目前世界范围内已知的蚊子种群有3500余种，中国大陆已查明不少于300种，以家蚊（学名库蚊）、疟蚊（按蚊）、花脚蚊（伊蚊）居多。

蚊虫是乙型脑炎、登革热、疟疾、丝虫病的传播媒介。有百害而无一利。

家蚊体积较小，但嗜血成性，主要在黄昏以后叮咬人畜，一般在室内或住室附近活动；疟蚊翅上有黑灰相间的斑点，停息时，头部贴近物面，腹部向上抬起，身体与物面成30-45度斜角，疟蚊白天多栖息于牲畜棚圈，而以牛舍为主，黎明晨曦间和傍晚攻击人类；花脚蚊不惧阳光，攻击性很强，胃口也很大。不论黑夜白天都会叮人吸血。花脚蚊不仅凶恶，而且善飞。一般蚊子飞程只有数十至数百米，最远不超过1-2公里，花脚蚊能飞行5-7公里，而且速度极快，还可以随心所欲地做前后滚翻、俯冲、急转弯、突然加速或减速等高难动作。1968年我在小监里关押过九个月，两手戴着背铐，无法驱赶或拍打蚊子，只能看着它在空中做飞行表演，花脚蚊的飞行技巧胜过当代空军校级军官。

每晚七点，犯人照例政治学习，暑热之际，大都光着上身，只穿一条短裤，一百多人拥挤在不足二百平米的狭窄空间之内。监舍里昏暗的灯光恰恰满足了蚊子的趋光性；脚臭、汗臭则是蚊虫喜爱的美味；裸露的肌肤虽然黑了点、瘦了点，却可供蚊子饱餐一顿。因而引来蚊虫无数，也引得“啪”“啪”之声不时响起，那不是为谁的发言鼓掌，而是拍打蚊子的声音。起初有人一边打蚊子一边骂“狗日的”，“他妈的”……后来谁也不敢骂了，因为无论是发言还是读报，伟大领袖的名字都是频繁出现的，稍不小心，“狗日的”三个字恰巧落在毛泽东三个字前后，遇见好事者，马上就会上演一齣武打戏，打

蚊子的人被安上了辱骂伟大领袖的罪名，轻则拳打脚踢，重则绳子上肩，甚至于要戴七八天手铐。

1969年以前，监狱里是不准使用蚊帐的。理由是影响管理员夜间查铺，犯人不该对此妄加议论。1968年秋，苗溪茶场十三队连续死了两个犯人。症状相似，病人软弱无力，面色苍白，伴有阵发性上腹剧痛，顽固性呕吐，据说是疟疾。1969年五月中共九大召开之际，每人发蚊帐一床，长宽高为1.9米×0.5米×0.7米，远处看去，像是一口口纱布棺材。蚊帐也罢，棺材也罢，总能遮挡一部分蚊虫骚扰，还要感谢伟大领袖对犯人的关怀，众人无从报答，只有每天多背两遍毛泽东语录“对于反动派，必须实行独裁，压迫这些人……”

说起蚊子猖獗，苗溪茶场远远赶不上兴凯湖农场。笔者摘录一段关于兴凯湖农场蚊子的如实描述，以飨读者：

这一个多月兴凯湖的蚊子多的叫你难以想象。每个在兴凯湖农场呆过的人，不管是犯人、劳教人员还是干部都知道这一点。在关里，白天蚊子是不出来叮人的，兴凯湖的蚊子可不一样。犯人夏天穿的都是白色囚服，干活时蚊子趴在身上能把白囚服“变成”黑囚服，犯人干活必须把袖口、裤脚扎死，用一块布把脸包起来，光露着眼睛，手因为不停的干活，蚊子落不上，露在外面不要紧。这年八月份我参加了修场院。场院里的杂草长的半人多高，里面的蚊子滚成蛋。用铁锹一铲，蚊子象一窝风一样向你扑来。有一个叫王锦泉的犯人，此人是原绥远省人，是傅作义部队的一个连长，罪名是历史反革命。北平和平解放后，傅作义和他手下的高级将领董其武等人作为“功臣”受到了共产党的优待，成了新中国政府的高级官员，部队则全部被整编了，大部分中、下级军官后来都被以“反革命”的罪名在“镇反”、“肃反”运动中送进了监狱和劳改队，前面写的牛连乡就是一个，王锦泉又是一个，我接触过的傅作义部队这样的下级军官不下十几个。王锦泉经常发牢骚说：“共产党说话不算数”，“傅作义把我们卖了”等等。在修场院时不知为什么他跟带工干部顶了几句嘴，干部下令把他捆起来丢在场院边的沟里，蚊子叮的他一边打滚，一边象杀猪一样的叫。等收工时叫几个犯人把他拖出来，脸上全是血，肿的象个发面馒头，白囚衣也成了红的了，这全是他打滚时压死叮在他身上的蚊子吃的他的血。收工回去，塞进小号，三天后就死了。兴凯湖的蚊子能吃人，没到过这个地方的人可能不相信，可凡是早期到过兴凯湖的人都了解这一情况。那时晚上犯人都把劳改被子里的棉絮抽出来，利用被面和被里做成一个象棺材一样的小蚊帐，钻进里面睡觉，屋地下还用蒿子点起来熏着，就连吃晚饭也要钻进象棺材一样的蚊帐里去吃。

除了蚊子以外，还有两种咬人的东西最可恶，一种是瞎虻，就是叮牲口的牛虻，牲口的皮多么厚，都被这小东西咬出血来，何况人，一叮就是一个小三角口子，直流血。再一种就是“小咬”。小咬这种东西比蚊子小得多，但毒性很大，专门往人的眉毛、头发根里钻，人被他咬以后，肿起来好几天下不去。过去民间有一种顺口溜：“东北有三宝：人参、貂皮、乌拉草”，可兴凯湖的犯人也有一顺口溜：“兴凯湖有三宝：瞎虻、蚊子和小咬”。（摘自陈奉孝：《兴凯湖纪事》）

毛泽东1956年发出十二年内基本消除四害的指令，如今已经过了五十七年，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老鼠、苍蝇、蚊子、臭虫的数量有所减少但并没有完全灭绝，每到夏季，各类蚊香、灭蚊蝇灯、杀虫剂仍然是畅销产品。在农村“四害”依然猖獗，个别湖泊、草原地区鼠害相当严重。以毛泽东为

首兴师动众集中了二十几位中共省委书记以上的高级官员，住在西湖边上高级宾馆里编制的《农业发展纲要》烜赫一时，既未明令废除，也从未执行，又怎么解释呢？

5、住不如畜

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曾经制定和颁布过《监狱建设标准》，全文十五页，接近二万字。文字冗长，排序紊乱，重复累赘。有兴趣的读者可从百度文库中下载阅读，此处择要摘录数条如下：

监舍楼寝室：寝室宜设在监舍楼较好的朝向，有条件地区在寝室内设卫生间，以有利于对罪犯夜间监督。其标准数据依据如下：

每间寝室关押男罪犯时不应超过 20 人，关押女罪犯和未成年犯不应超过 12 人。寝室内床位不应小于 80 厘米，床位为双层时，室内净高不应低于 3.3 米，床位为单层时，室内净高不应低于 2.8 米，

每床床长 1.9 米，床宽 1.0 米，床间距及过道按每床面积计算 1.90 平方米

学习桌：桌宽 0.60 米，桌深 0.45 米，座位空间 $0.6 \times 0.7 = 0.42$ 平方米，所占面积 $0.6 \times (0.45 + 0.7) = 0.69$ 平方米

每罪犯所占使用面积 $1.90 + 0.69 = 2.59$ 平方米

房间布置实例：

A：5.4 米 $\times$ 6.3 米，墙厚 240 毫米，使用面积为 $5.16 \times 6.06 = 31.27$ 平方米，按住 12 人计算， $31.27 \div 12 = 2.61$ 平方米（使用面积）

B：3.9 米 $\times$ 5.4 米，墙厚 240 毫米，使用面积 $3.66 \times 5.16 = 18.89$ 平方米，按住 8 人计算， $18.89 \div 8 = 2.36$ 平方米（使用面积）

物品储藏室：每人平均 0.3 平方米；每人藏物空间 $0.50 \times 0.6 \times 0.45 = 0.135$ 立方米；每个藏柜平面 $0.5 \times 0.6 = 0.30$ 平方米，分四层；藏柜占储藏室面积 1/3；每人物品储藏使用面积为 $0.50 \times 0.6 \times 3/4 = 0.225$ 平方米。

伙房和餐厅：按二级食堂标准，使用面积指标为 1.02 平方米每人。

盥洗室：宜设在监舍楼的尽头，洗脸盆或盥洗龙头，每 6 人设一个。

浴室：每 16 人设一淋水喷头，每一淋水喷头（含更衣）占使用面积 3 平方米。

晾衣房：按每 100 罪犯 30 平方米，平均每罪犯占使用面积 0.30 平方米。

卫生间：男厕所小便器或槽位每 16 人设一个，洗手盆至少设一个，污水池设一个。女厕所中大便器每 15 人设一个，女卫生间每 10 人设一个，两项平均为每 13 人设一个厕位，洗手盆至少一个，污水池设一个。。

每监区设置一 6 平方米的**理发室**。

图书阅览室：每 100 人设 10 个阅览座位，每座位使用面积 1.5 平方米。

家属会见室：每 50 个罪犯设一会见位，每个会见位使用面积 $1.8 \times 2.5 \times 2 = 9$ 平方米

按每 100 罪犯设一个**同居室**，每间使用面积 14 平方米。

禁闭室：按每 100 人设一间，禁闭室每间使用面积为 6 平方米，放风场使用面积为 4 平方米，合计每间禁闭室 10 平方米。

此《监狱建设标准》编写的何等细致，分门别类面面俱到，人平房屋使用面积精确到小数点后三位，对盥洗室中的脸盆、浴室中的淋浴喷头、厕所中的大小便器配置数量都做了严格规定，似乎是不可更易的严格标准。

实际情况又是怎么样呢？

我 1958 年因被冠以右派之冕开始深入监狱，1979 年宣布无罪释放、摘帽脱冕，才得以走出牢门，历经二十二年，先后在重庆新建机械厂、四川省劳改局加工厂、通惠汽车修配厂、四川磨床厂、四川消防机械厂、成都宁夏街监狱、四川苗溪茶场等单位关押和服苦役。本回忆录第六章、第七章对重庆、成都两地监狱的囚禁状况有所记叙。此处不再赘言。

四川雅安专区芦山县境内的苗溪茶场是全国著名的劳改队，四川十大监狱之一，颇有代表性，胡风，杨成荣（杨成武的弟弟）等钦点要犯曾在苗溪茶场关押。我在该监狱前前后后十三年，理应更详尽地如实记录，将真实情况公诸于世。

虽然中共出于毁灭罪证的需要，从本世纪初开始，原四川省大小凉山地区的监狱陆续迁移，苗溪茶场的犯人转移到成都龙泉驿附近，更名为川西监狱，因为时间还不算太长，旧址仍在，比如十三队的监舍和禁闭室就还没有拆完，尚未彻底消痕灭迹，只是如今承包给私人变作了养鸡场。感兴趣的读者若能仔细追寻，大体仍可看出当时的犯人是在什么环境下生活的。现据实追忆如后：

1966 年 11 月，我们一行五十余人在武装押解下，从成都宁夏街看守所来到苗溪茶场第十三中队。

当时的监舍是木结构的两层楼，我被安排在楼上，举目张望，屋顶、梁柱、椽瓦一览无余，没有天花板，灰黑色的屋瓦之间有些地方透露着亮晃晃的缝隙。环顾四周，楼中间是一条通道，宽约 1.5 米，没有床，两边是连地铺，粗木地板上铺着些稻草，上面是草席和垫褥，深蓝色居多，大半补着各色补丁。文革前，这个楼里关押两百人左右，一层楼就是一个长条形的大房间，长约 36 米，宽约 5.5 米，中间有梁柱，无间隔。关押约一百人，每个铺位的宽度 0.7 米。文革启动，大量犯人不断涌入监狱，还是这座楼，关押的人数已超过三百，我进来的时候，每个犯人所占使用面积就只有 $1.9 \times 0.48 = 0.912$ 平方米了，远远低于《监狱建设标准》规定的 2.59 平方米。

0.48 米的宽度睡一个人不成问题，铺位狭窄，冬天挤着暖和，夏天可以分担蚊子的肆虐。

如果是睡一天两天，睡一月两月，倒也罢了，这里关押的是十五年以上徒刑的政治犯，实际上要睡十几二十年的。一个活人的躯体、所有的换洗衣服、铺盖鞋袜、锅盆碗盏等生活用品都要拥塞在这不足一平方米的狭小空间里，过上几千个日日夜夜，非身临其境难以想象其艰难。

猪和牛的圈养密度也没有这么大，说中共监狱关押的人过的是猪牛不如的生活，这就是事实根据之一。言之有据是我写此书时必然秉承的原则。

1973 年拆掉了旧楼房，在原地修建了新监舍。是砖木混合结构的平房，监舍总长三十米，宽六米，分作五个单间，每间关押四十至六十名犯人，舍房中间是宽约两米的通道，两边设上下铺，房间多长，铺就有多长，一层铺睡十几个人，每个人占据的使用面积大体是 $1.9 \times 0.55 = 1.045$ 平方米。新监舍比旧监舍的铺位面积大了 0.133 平方米，犯人的生活质量又显著提高了，共产党又伟大、光荣、正确了 0.133 平方米。

前曾述及，文革期间，中共管辖的监狱里精神病患者占相当比例，少数人入狱前即有轻度精神分裂症，多数是入狱后在精神和肉体双重折磨下经不起摧残而引发的。我所在的三工区，总体人数波动在 45-52 之间，轻重不同

的精神病患者约 11-13 人。对于他们，狱卒明明知道这些人的精神不正常，但却称之为“装疯”，个别人性泯灭，心存歹毒的狱卒甚至以虐待精神病患者为乐事。

犯人之间有各种各样的矛盾，但对精神病患者的同情是一致的，绝大多数人对精神失常的难友多含怵惕惻隐之心。明白事理的犯人，对狱卒是鄙视的，对精神病人是忍让的。对狱卒的无端责骂，切齿痛恨；对精神病人的骂骂咧咧则听之任之。他们是中共暴政的受害者，他们的嬉笑怒骂是紊乱神经的外部显示，与常人的感情表达方式不一样，故此一笑了之。在睡觉的铺位分配上，把他们安置在下铺，约六米长的通铺，两端由身强力壮的无病者居一头一尾，当中的十个铺位以精神病患者的严重程度依次排列，轻者靠外侧，重者居里侧，尽量防止夜间发生意外的可能。生活上尽量照顾，为他们减少痛苦。在中共统治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有哪里能像犯人这样关心精神病人呢？

物品储藏柜是写在文件上的，监舍促狭，容纳不下。实际的监舍中没有桌椅板凳，没有任何家具。犯人的物品很少，每个铺位的头顶上有一个类似于火车硬座车厢的行李架，是自己用竹子编的，可以存放少量物品。

监舍拥挤，学习桌无处可放，所以免了，给政府减少了开支。好在当时只学习毛泽东语录，六十四开本，占地方不多，每人必备的毛泽东选集四卷本用塑料薄膜包好，放在脑袋底下当了枕头，睡上十几年，说不定它发出的神功元气直达头颅，不断地注入毛泽东思想，有助于洗脑，或许刑满释放后就成了活雷锋。至于写检查交待材料，趴在铺上也可以办到，写检举材料属于见不得人的勾当，只能偷偷摸摸，找个犄角旮旯鬼鬼祟祟地做。

盥洗室从来没听说过，高墙电网围着的监舍大院内，1973 年以前只有一个人工挖的小水沟，断面大约 0.2×0.2 米，流着从山上下来的水，沟中之水时清时浑，只能趁水比较清澈的时候接一点洗洗衣服，山坡上是否有牛在撒尿，谁也说不准，所以不能入口，在押犯人极少刷牙，我就十三年没刷过牙，耳顺之年满口牙齿尽皆脱落，是否起因于此有待考证。至于洗脸，绝大多数也是免了的，三百人一起洗脸，只有一个接水点，排不上号，好在人脸有一种“自洁”功能，一月两月不洗脸看不出脏来，哪天出工走到小河沟旁边，捧两把水抹两把就算是讲卫生的了。何况一个月只有一元人民币零用钱，要是天天洗脸刷牙的话，牙刷、牙膏、香皂、毛巾就把钱花光了，还是留着找机会跟老乡买个玉米粑，解决肚子饿的问题更迫切、更实惠。

1973 年修建了新监舍以后，在高墙外面居高临下建了一个蓄水池，从山上流下来的水在池中沉淀、过滤，用一根自来水管将水引入监舍大院之内，在厕所旁边，管理员的视角之内，也是机枪的射界之内，安装了一个自来水龙头，就靠这个水龙头给关押在监舍大院内的三百余人供水。较以前方便多了，又要感谢一回党和伟大领袖对劳改犯的恩典。

浴室很大也很敞亮，露天的，胡家坪工地下面的小河沟是也。水流随季节变化有三五米宽，卵石河床，清澈见底，四至十月可下河洗澡，用不着淋浴喷头，一年四季可洗衣服。唯此河沟属三工区地界，其他工区的犯人受监规束缚，不敢串工地，对此得天独厚之享受，只能望河兴叹，羡慕有余了。其他工区的犯人夏天只能打一盆水，在厕所旁边的空地上冲一冲，冬天基本上不洗澡，实在需要的话，在烤火炉边上热点水，擦擦身子。有人为此受过批判，说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不知道批评者是否见过著名资本家荣毅仁或

李嘉诚是这样洗澡的。

晾衣房也是露天的，在监舍大院的坝子里，栽了几根木杆，牵着钢丝，天晴时供犯人晾衣被。若老天不作美，突然下起了雷阵雨，犯人在山上干活，跑不回来，只有心里惦记着。如果那天监舍内有人留守（病号或干部指定写交待或检举材料的人），可以报告管理员，获准后，快速把晾晒的衣被统统收回来，等犯人劳动收了工，从山上下来，逐件认领。倘若监舍内没人，或者当天的管理员没有人性，不准上堡坎，只有任凭雨淋，权当又洗了一遍，只是晚上被子还是湿的，有点难过。

厕所是个敞开式的，有柱子，有顶棚，无遮拦。便于岗楼上的管理员监督，厕所没有大便器，只是开了一条抹了水泥的窄沟，具有中国特色，下面有个粪池，定期由犯人用粪桶背走，做肥料。

犯人一律光头，不准蓄发，没有理发室，四百来人配了一名兼职理发员，除了给犯人理发（只能用推子，不能用刀剃，怕犯人用刀自杀）以外，还要给狱卒狱警和干部家属理发，在杂务组劳动。理发员技术不错，是受过专业培训的，科班出身，通常带着工具上山，在田边地角给犯人推光头，一小时至少做 25 个活路。

图书阅览室是没有的，《监狱建设标准》所云：“图书阅览室每 100 人设 10 个阅览座位，每座位使用面积 1.5 平方米。”纯属空中楼阁，吾料“中国梦”也很难梦到，那年头，书是危险物品。1972 年以后，在管理员眼皮底下的坝子里，竖了一个读报栏，两面张贴《人民日报》，有兴趣的犯人可以利用下午收工后、晚上学习前仅有的一点时间站在那里看报，多数时候是一边啃着玉米馍一边看报，天黑了看不见为止。有关批林批孔，批判党内大儒，批判三项指示为纲，反击右倾翻案风等文章，我都是在阅报栏读到的。至今仍有印象，终身受益。

家属会见室更是稀罕事，从未听说过，我在苗溪茶场十三年，只有许诚（天全县政府干部，由右派而劳改）的老婆从离芦山不远的天全县来过一次，许诚那年检举他人有功，评上了劳改积极分子。罗国章（二十岁左右，才工作不久的小学老师）的妈妈从成都来过一次，在干部监督下会见了二十分钟。周继恒（学生，坐了十余年牢，得了肝癌，临近满刑时病逝，未婚，不足三十五岁）死亡后，他的老父亲（教师，年近古稀）从成都来到苗溪茶场医院，泪眼纵横地看了看亡故的儿子。除此之外，极少有人探监。

至于《监狱建设标准》写着的“按每 100 罪犯设一个同居室，每间使用面积 14 平方米。”更属天方夜谭。14 平方米，岂不成了宾馆的标准间了吗？哪一个中共监狱在文革期间有这样的设施呢？白日做中国梦！

伙房是必须的，仅仅是厨房和料理间而已，我走了那么多劳改队，没见过哪个有犯人餐厅，重庆、成都大城市的监狱都没有，何况穷乡僻壤之地。

《监狱建设标准》所写的：“按二级食堂标准，使用面积指标为 1.02 平方米每人”纯属海市蜃楼。中共颁发的类似文件多如牛毛，全是假话。1975 年，我走遍了苗溪茶场二十四个中队，无一例外，露天晒坝就是餐厅，没有任何桌椅板凳，开饭时岗楼上有武警持枪保卫，闲人免进，绝对安全。

禁闭室按《标准》规定每一百人人设一间，苗溪茶场十三队四百来名犯人，少的时候十间禁闭室，多的时候十八间禁闭室，远远超过了《标准》的指标，这大概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每间禁闭室面积规定为六平方米加上放风的空地共十平方米，实际上，苗溪茶场十三队的禁闭室内部面积只有两

平方米多一点，远远低于《标准》的规定，窗户都是用木板钉死了的，从来不放风，没有一寸空地。我在禁闭室关了二百七十多天，详细情况见本书第九章第五节。

6、秦城监狱恐怖见闻

笔者注：读了我如实记录的狱中生活以后，有些人可能难以置信，高唱实行革命人道主义的中国共产党，能这么歹毒残忍吗？请看《秦城监狱恐怖见闻》。秦城监狱离中南海不远，直属中央，通常关押高级干部。天子身边尚且如此，隐藏在深山荒漠中的监狱可想而知。

该文作者是首任中央文革办事小组组长穆欣。穆欣曾任《光明日报》总编，1966年5月28日列入中央文革小组名单中。1967年9月江青诬陷穆欣是“特务”，从此穆欣被关进秦城监狱八年。1979年12月调任外文局副局长，1980年7月兼任人民画报社社长、总编辑。1984年4月离休，因病于2010年9月3日逝世，享年90岁。穆欣生前所写文章《秦城监狱6813号犯人》，详尽披露了秦城监狱中令他终生难忘的所见所闻。以下即是原文：

1968年1月13日上午，穿着空军制服的军人把我送到秦城监狱。经过例行的姓名、籍贯一类的问讯，就是一场侮辱性的检查，然后里里外外全部换上黑色的“囚服”，外面是一套臃肿不合身的棉衣。监管员把我引向牢房的路上，冷冰冰地说：“这里不用名字，你的代号是‘6813’。”很快走进里院一座三层的楼房，“犯人”正在开饭。

走过漫长的走廊，监管员把我引进走廊尽头靠边的一间牢房，是这幢楼房的第1号。这间房大约是专门给新进来的“犯人”住的，同别的牢房相比较，它有两层很厚的木板门（以后移住的牢房多是单层的铁门，有的外头加一层木门）。门的顶端嵌着玻璃的圆洞形监望孔，是供卫兵和监管员窥视室内动静用的；下面靠近地面有一个6寸见方的、可以打开的小洞，是“喂”囚犯的地方，这里传递饭碗、菜碗、茶缸和递送发放的生活用品，或向外边递送所写的交代材料。钢筋水泥的墙壁足有一米厚，厚墙上安的是不透明的玻璃窗，室内光线阴暗，使人感到阴冷憋闷。室内面积约有3米来长、2米多宽。靠近左面的墙壁，横放着一张用粗糙的木板草率钉起来的木板床，只有1尺来高、3尺来宽，长度5尺多点，上面铺着一条有许多污渍的薄褥子，一条破旧的军用棉被。里墙窗下的铁丝网里面是暖气片。虽然正在隆冬（这天是农历腊月14日），伸手摸摸，只感到一点点低微的温度。靠近右手最里面的角落，是一个铁铸的简陋的蹲式马桶，大部份埋在地下（在其他牢房里边，近门处另辟一小室，里边有抽水马桶和带水龙头的小砖盆）。这些就是“新居”的印象。

过一会儿送来了午饭：一个大点的搪瓷碗里放两个窝头，一个小搪瓷碗里是菜，还有一个搪瓷茶缸里是开水，再就是一把小铁勺。这里的伙食特点是常年吃不好、吃不饱。麦面和大米是极难见到的稀罕物，很长时间都是一天三餐5个窝头，随饭给3次开水。早餐一个窝头、一碗玉米粥、一点咸菜，午、晚的菜，不是“开水煮白菜”，就是“白菜炖开水”，少油缺盐，淡而无味，有时根本就没放盐。过了不久就是过年，这天“改善”了一次伙食，午饭给4个皮厚馅少个头小的包子，还不如平时两个窝头耐饥（偶而发过苹果，个头比核桃大一点），故意吊人的胃口。伙食如此糟糕，主要是监管员不把在这里受审的人当人看待。据说监管员中有一句流行的话：“大黑不吃小黑吃”。

“大黑”是对受审人员的蔑称，“小黑”指猪。蔬菜不洗不摘，三刀下锅。饮

食卫生极差，经常发生食物中毒的事。（耐人寻味的是：获释以后报社补发工资的时候，还被扣除在这里的“生活费”1298.32元。）

监狱的气氛是静谧的。安在房顶、用铁丝网罩着的电灯，通夜亮着。到达这里的第一夜，心潮澎湃，是无法入睡的。自己的事情倒不忙想了，一个人被打入监牢就什么都不怕了，在恐惧与无畏的搏斗中，后者已经占了上风。最思念的是亲人的命运，受了重伤的妻子是否脱了险境？子女们如何生活？年过古稀的老父如何生活？弟、妹的遭遇又会怎样？监狱故意与人作对，从1967年9月6日凌晨被绑架离家，直到1972年6月30日，将近5年根本不让家人探望。既不许见面，也不许写信，音讯杳然，生死未卜，格外悬念。

监狱的夜里反倒不那么平静，不时有一些声响冲破漆黑的夜空传来。“犯人”中有些人还是孩子，病痛的呻吟，绝望的呼叫，令人心悸。在我们这座楼房的顶层，有一个操广东口音的姑娘，日夜不停地大声“广播”，就像广播电台的广播员一样，连续讲些听不懂、或者虽然听懂了对其所讲内容却未留下任何记忆的话。在近旁相邻的一座楼上，有一个年轻的姑娘连续不停地唱歌，不分昼夜地唱着，而且总是重复着那几句歌词。常识告诉人，她们不堪这里给予的侮辱和损害，被迫害得神经失常了。这个时候，监狱正处在军管时期（1967年11月实行军事接管，1973年春季才结束军管，由军队重又交回公安部接管），林彪、江青、康生、谢富治一伙，把这里变成了残酷迫害革命干部的场所，大搞法西斯式的审查。来到这里接管的军人，只会做一件事，不择手段地折磨人、侮辱人、搞点叫人哭笑不得的小动作，丢尽了人民解放军的脸。当然这都是“长官意志”造成的，“长官”的谎言扭曲了他们的灵魂，把所有的受审人员都当成十恶不赦的敌人。当然也与他们自己的素质有关，遇事不懂得想一个“这是为什么？”

这次冤狱来得突然，弯子转得太陡，一时难以适应，有过许多遐想。这座监狱原是建国后修建，专门囚禁国民党战犯和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的反革命分子的。自己加入共产党已逾30年，经过漫长的革命生涯之后，忽然被当作敌人关在这种地方，囚禁在共产党的监牢里，思想上无法接受，心情是异常愤慨的。

在思考的过程中，酝酿了一首激励自己的小诗：“君既来之则安之，‘在劫难逃’应识时；私、疑、偏、忍除未尽，毁、贬、诬、陷总有辞。撞鬼怕鬼鬼益狂，见怪不怪怪自逝；‘塞翁失马’福抑祸，笑问铁窗恢可知？”这样的意境成了自己的精神支柱，激励自己比较平静地坦然度过2807个孤寂而严峻的日日夜夜。

曾见一份调查秦城监狱当局肆意破坏社会主义法制，采取法西斯手段残酷迫害革命老干部情况的材料，揭发这里打骂、体罚成风的事实：“拳打脚踢、‘喷气式’、扭胳膊、揪耳朵、撕头发、撞墙、棍子打、大铁钥匙捅、罚站、脖子里塞雪球、冬天夜里拉出去冷冻，等等，形式多种多样。杨奇清同志1968年遭到毒打，肺部受了严重内伤，以致过早逝世。

这份材料还揭露了这里滥用镣铐等戒具的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改造条例》中有明确规定：‘犯人可能有逃跑、暴行和其他危险性行为的时候’，经批准可以使用戒具。‘但在上述情形消除的时候，应当立即消除。’在这里，对并无上述情况的受审人员滥用戒具，有的几年也不解除。康生还曾直接插手。1968年1月3日，他在一个报告上批：‘刘仁、崔月犁、冯基平、徐子荣等这伙反革命敌特分子，出卖党、政、军核心机密，叛党、叛国，罪该万

死。对他们不能用一般对犯人的方法对待，要防止他们自杀，打击敌人的顽固态度，将他们铐起来，进行严厉地、突击地审问工作，使敌人彻底的缴械。对这些人应向他们宣布逮捕，送进监狱。’根据已查到的材料，刘仁、崔月犁同志自入狱即带手铐，直到1972年1月22日才去掉，长达4年之久”。

就我个人说，整个被关押的日子里，还未遭受过镣铐和皮肉上的痛苦，却受到严重的精神摧残和药物的毒害。

表面上看，监狱当局似乎对受审人员很“爱护”，说是要防止自杀，入狱后先没收了皮带和一切绳带性质的用物，免得用来勒脖子上吊；把木、竹制的筷子都换成勺子免得扎喉咙寻死；金属的餐具换成搪瓷、塑料的，免得发生意外；等等。可是实际上，这帮心狠手毒的伪善人，却在暗中故意使用“启发”、“暗示”、“刺激”诸种卑劣手段诱导某些人自杀。

1969年2月16日是农历除夕。这时我住3楼83号牢房。这天午夜，监管员发现关在隔壁牢房里的人自杀。他们不是悄悄地把死者运走，故意大喊大叫，叮叮当当，把整幢楼上已经熟睡的人全都吵醒。这不是故意“启发”人们的邪思，刺激人们的感情么？

这年4月2日，我从3楼搬到1楼27号牢房。一进门，便见已经蒙上尘埃的白墙上，印着几个血手印。显然，这里面的“房客”出了事。他们原应及时消除墙上的血迹，却故意保留下来让人“观赏”，当然是别有用心的。在这里住下来，又在床头墙壁上发现有人在自杀前用指甲划刻的“遗言”。具体的词句忘记了，只记得那意思是讲自己受了冤屈，以死向党表示自己的清白。因觉察他们不怀好意，便分几次在卫兵脚步声走远了时仔细看完，此后再也不望一眼。卫兵没有见到我观看过，又不见有任何哀伤表现，以为我未“发现”墙上的“秘密”，监管人员故意对我设下一个小小的圈套。有一天上午放风回来，刚到门口，就见室内有几个专以害人为能事的监管员，正朝床头墙壁指手划脚地议论。见我进来，其中一个故意指着床头责问：“你在这里乱写些什么，故意违犯监规！”我明白了这班奴才的用意，连往那里望都不望一眼，冷峻地摇摇头说：“我没有任何地方写字，也不想知道那里写了什么！”不论他们再说什么，我都轻蔑地望着他们默不作声。这班披着人皮的豺狼，卑鄙、堕落，竟然如此的无聊、无耻，他们亵渎了人的尊严。他们感到无趣，一起退走。我怒目望着他们离去的背影，不禁在内心里诅咒起来：“老子为什么死？我要勇敢地活着，比你们活得更长久、更快活，好看到你们的下场！”

监狱里设有医疗所，也有医护人员。医生的职责本是救死扶伤。但在这所监狱里，某些医生不论是自觉自愿或者被迫，却在执行林彪、江青一伙“医疗要为专案服务”的方针，伤天害理，不仅不为人治病消灾，反而给“无病者‘种’病”、使有病者早亡。

自己身体素来比较健康，秦城冤狱开始时未满48岁。此前参加革命工作30年间，很少同医药打交道，仅因割治砂眼于1949年在广州住过两周医院，以往就连感冒之类的小病都很少见。自从进了秦城监狱，竟被他们在饭菜、开水中暗用药品“种”了许多病。

他们最先折腾我的牙齿，后来又对胸骨制造病痛，而给我服得最多的是兴奋剂。有些药吃下去使人暴躁，有的服后产生幻觉，最讨厌的是经他们“种”下的长期不愈的皮肤病。

从进秦城不久直到林彪垮台，前后将近4年，他们经常连续给我服兴奋剂。每月总有10至15天，什么时候都很兴奋，昼夜都不眨眼，毫无睡意，

也无特殊疲倦的感觉。他们这样做，意在毁坏我的头脑，不但影响记忆力，还可能导致不能再写文章。

1972 年底传达了毛泽东、周恩来不许对受审查人员实行法西斯手段管制命令下达后停下来，可是临出狱时他们暗中又在饭菜中下了药，害得到家后连续几天一直处于兴奋状态中。因被连续毒害数年，头脑受到了极大伤害。押进秦城之前，关在卫戍区的时候，光明日报报社全部职工 200 多人，还曾默写出所有人员的姓名，也能记得各人的面貌；及至从秦城出来回到报社，连编辑部的人名也记不全了。自己从事读、写几十年，这时有许多字都忘记了，以后连续抄录了几本书才恢复记忆。开头看电视只能观看新闻节目，形像化的东西难以容受，电视剧和电影故事片看了心烦。延请中医治疗、调理了 1 年多，方始恢复正常。

过去胸骨从无异常感觉。1969 年后，几乎每天午饭后都觉得胸骨疼痛，时轻时重，每次疼痛一阵自行消失。自己说不来是什么毛病，一般还能挺得住，便不理睬。有一天午后，胸骨痛得特别厉害，坐在那里强忍着，脸上汗水直流。卫兵不停地从口望孔里张望，意在等我喊“报告”求医。我却强力忍着，默不作声，睬也不睬。最后他倒忍不住了，伏在门上问道：“你病啦？给你找医生吧！”我才点头示意。须臾有人来把牢门打开，领我到医务所，医生决定透视。监狱里看病，只给发药，从不告诉是什么病。透视完了，医务人员故意低声嘀咕，却又让你听见“癌”一类的字眼，叫你惶惑不安。因为每次疼痛发作都在饭后固定时间，我已怀疑是恶作剧，是因服药造成的。有两天午饭时把菜全部倒掉，届时疼痛便未再现。知道疼痛确由饭菜中来，癌的疑虑不攻自破。如今出狱已近 20 年，其间胸骨从无异感。

入狱时牙齿是齐全的，过去曾经修补过一颗牙齿，已经稳定多年。入狱后不久，他们使用药物折腾牙齿，左边 3 颗白齿，周期性的疼痛发作，时间长了逐渐动摇。1972 年底传达毛泽东、周恩来的指示后，饮食方面有所改进。例如饮水，本来按惯例应当供应充足的开水，可是直到 1972 年 12 月，还是随饭给 3 次饮水。此后又在饭外增加 3 次开水，每天 6 次。可是每次给水，又搞名堂：这次喝了或许就会引起牙痛；下次给水喝了也许立即止痛，也可能牙痛愈烈。这既是肉体上的摧残，给水时的戏弄又是精神上的折磨。折腾几年之后，终于把 3 颗牙拔掉。但又一直不给补，两边相邻的牙齿受其影响，也渐动摇。而从拔掉那天开始，又以“病号饭”为名，强给喝了几天名为“汤面”而却有“汤”无“面”（只几根面条）的“面汤”，让人连续多天挨饿。

他们擅自规定受审人员“一侧睡”，就是夜里只准面向牢房的观察孔睡觉，不准仰卧，不准翻身，更不准背向观察孔坐、卧。直到 1972 年 7 月 28 日才宣布废除。从 1968 年 4 月 2 日到宣布废除时，我一直右侧睡了 1578 天，养成不易改掉的痼习，若加改变，就难以入睡。至今已经过了 20 多个年头，依旧未能矫正过来。

他们还强制受审人员遇事必须高声喊“报告”。不管要同他们谈什么事，不喊“报告”就都置之不理。自己生性倔犟，不愿自甘卑贱，拒绝服从这种带侮辱性的规定。从 1968 年 1 月 13 日进去，到 1975 年 5 月 14 日，始终没有喊过“报告”一次。他们为了将人制服，就在一切事情上刁难。我的一把牙刷，1967 年 9 月 8 日在北京卫戍区用起，整整用了 1267 天。早就用得没有毛了，多次要他们换，但如不喊“报告”就不给换。我就用这把牙刷继续刷牙，直到 1971 年 2 月间，他们看到上边一根毛也没有了，才给换了一把新

的。

1969年4月下旬，“九大”开会后期，距我住的一层27号房间左侧不远，拘押进来一个男青年。在放风时听他自言自语地叫喊，自称上了陈伯达的当，说陈叫他做了一件什么害人事情，然后把他送到狱中来。他进来就整天高声喊叫冤枉，因为反抗卫兵的干预又常发生争吵，监管员用尽一切手段，没有把他压服。过了两天，大约由于从他身上没有逼出口供，在还相当寒冷的初春（暖气早已停掉），拿走他的棉被，也不给他饭吃或者总不给他吃饱。就在窗外高音喇叭传出广播电台欢庆“‘九大’成功”“圆满”闭幕的时刻，他却昼夜不停地大声在室内哀叫：“毛主席！林副主席！我饿呀，我冷呀！”形成极大的讽刺。狱卒怕被别人听见“影响不好”，关掉他的窗户。他那些凄厉的喊叫声，仍然穿过牢房门窗的缝隙，冲破寒夜的宁静，在漫长的走廊里回荡。不论这个人的情况如何，不管他作了什么样的坏事，从牢狱当权者对他的态度来看，他定是一个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受害者。他所发出的凄厉的哀叫，引起所有“犯人”的同情，也引起人们的遐想。

自己本来无罪，他们以莫须有的罪名将我投入牢狱，不过为的灭口（用兴奋剂毒害头脑也是为了灭口）。因此关进监牢以后，很少问讯。将近8年间，只在1969、1971和1972年有过3次“审讯”。

进秦城1年多，1969年4月中旬，“九大”开会期间，中央专案组和报社造反派各3人首次“提审”。一见就要我“向毛主席请罪”。说“现在外面每天向毛主席‘早请示、晚汇报’，你应向毛主席请罪！”我说：“有错无罪。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他们提出要我写一篇自传，还有50份各地向我“外调”的问题要我答复。这次并未谈到什么实质性的问题，“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之类的套话也没有讲。不大工夫就结束了这场戏。

又过两年，1971年5月下旬，开始一次延续106天的马拉松式的“提审”。来的人中有中央专案组中一个叫张宏学的人（张卉中称他“审判员”），报社的杨罗王3人，还有驻报社军宣队队员。他们一上来就提出两大问题，是逼我“交代”在《光明日报》工作期间，在报纸上放过什么毒；一个是逼我“交代”报社“五一六分子”名单。

关于前者，我说前后在报社工作10年，其间报纸上发表的新闻、文章约计1.2亿多字，不记得都是什么内容，也无法对每个字、每句话负责。

关于后者，我说，不知道“五一六”为何物，说不上谁是谁不是。只能把所知道的干部情况说一说，由你们判定谁是谁不是。我就按照报社人员花名册，自上而下，从副总编、编委、部主任起，照实历述他们的简况、优缺点，逐个“介绍”。他们非常不乐意地皱着眉头、耐着性子听了一天。第2天，我仍继续往下讲，他们再也忍不住了，杨罗王们拍桌子大喊：“是叫你交代‘五一六’，不是叫你给干部作鉴定！”我就闭起嘴巴，不再说话。这时，那位姓王的拿起姚文元的《评陶铸的两本书》，念其中有关“五一六兵团”的一大段话。念完了，他们说，“要你交代的就是这个五一六兵团的名单。”这种无中生有的事，怎么回答？任凭杨罗王们大声叫、拍桌子，我都不再说什么。结果，又僵持下来。

本来，我被绑架前，天安门观礼台出现的“炮轰周恩来”大标语，署名就是“五一六兵团”。其后听说，所谓“五一六兵团”就是江青一伙唆使的一些人。在我被投入监狱后，他们却又利用“五一六”来诬陷干部、残害异己。1967年9月10日，谢富治接见中学生代表时曾说：“五一六兵团非常反动，

又非常渺小，他们人数不超过 50 人，其中相当多是受蒙蔽的年轻人，真正的坏人不超过 10 几人，可能有点后台老板、走资派。”可是以后他们在全国范围大抓“五一六”，它像“叛徒”、“特务”、这些字眼一样，成了陷害无辜的一项大帽子。杜保同被他们非法绑架押回内蒙之前，就被吴法宪扣上“五一六骨干分子”的帽子。他们在《光明日报》职工中就打了 108 个“五一六”分子(也有人说将近 100 个)，这些无端被加上罪名的人都没有“根”，如今过了几年之后，他们又来秦城找“黑后台”，抓我这只“黑手”，岂不好笑？

他们蛮不讲理，连续追逼。当时也被囚禁在秦城监狱里的师哲同志，以后回顾在这里所受折磨时说：“有真理的却无起码的生存权利，无真理的却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在 10 年浩劫中，一切事情都是这样是非颠倒的。每逢这帮人前来“提审”，望着那几个一本正经地坐在那里喋喋不休、信口开河时，心里都浮现出这样的想法：“我和他们的位置坐错了，应当颠倒过来！”

逼交名单的事卡了壳，他们又回到报纸内容的问题上，指责我在报上“放毒”，宣传“揪军内一小撮”，“反军”、“乱军”。以后翻来覆去就在这个问题上纠缠。如前所述，1967 年 7、8 月间的中央告武汉军民书、《红旗》八一社论提出这个口号，毛泽东有批评，王力、关锋被追究。但是这个口号原是林彪本人先提出的，怎么能要报纸负责？所以我只说报上发表了含有这个口号的文章，自己有责任，有错误；他们硬要说是“罪行”，就又顶起牛来。其实，他们表面整我“反军”，实际上是要逼我承认“反林彪”，但是他们又不便明讲转递杜保同揭发叶群“黑材料”的事。这样扯来扯去，延续了 106 天，已到 9 月初。最后一天临完的时候，他们还提出一些问题要我继续“交代”。可是，隔不几天，他们极力卫护的“林副统帅”折戟沉沙，这次以追查反林彪为主题的“提审”只得告吹，这伙“审判官”再也不见来了。

“提审”停下来，又过了一年多，直到 1972 年底，他们又到监狱里来逼供，改在历史问题上纠缠。这时我已陷入冤狱 5 年多，他们派出许多人员，耗费巨量财力，并没找到任何证据，只好伪造“证据”栽诬。这次“提审”断断续续又延续了很长时间，他们伪造两个“证据”、提出两个问题。给我看的“证据”是两张照片。因为是无中生有的捏造，照片上有破绽，不堪一驳。参与“提审”的杨罗王中有两人以照相为职业，但这两张照片伪造得并不高明。要求看原件，他们不敢拿给我看，仍旧反复纠缠，直到作结论的时候。

1972 年初，接连曾有两个重要人物病逝，一个是全党和全国人民敬重的元帅、诗人陈毅同志，1 月 6 日病逝；一个是靠篡党夺权手段爬上高位，身后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决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的谢富治，死于 3 月 26 日。1 月初旬看到陈毅追悼会的报导，拿起报纸一看，感到异常悲痛，不禁热泪滚滚，强自抑制才没哭出声音。隔没多久，刊有谢富治死讯的报纸来了，看一眼就扔到床板上去。谢富治这个被人称作“犹大”的热衷权欲而摒弃了任何道德准则的人，死讯传出只能让人舒口气——人们不止是“无动于衷”。自己对待陈、谢死讯上的这种鲜明的差异，势必引起监管员的注视，并且会留下深刻印象，作为难得的“罪证”上报。俗话说得好：“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一旦在迫害狂那里挂了号，日后必然难得有好日子过。

这个时候，1975 年 4 月，报纸上又有类似情况的两则新闻出现，而且隔得更近。4 月 2 日，我国人民尊敬的董老——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董必武在北京病逝；4 月 5 日，人民公敌蒋介石在台湾死了。监狱当局乘机又以《人民日报》来做手脚。他们送来刊有董老逝世新闻的报纸之前，暗中给我吃上

抑制流泪的药品(女“犯人”在狱中会见前往探视的子女以前,许多人都给吃过这种药),使人怎么难受也流不出泪水。但到送给刊有蒋介石死讯的报纸之前,故意又给吃下相反作用的药。纵然如此,对人民公敌蒋介石的死也不会有丝毫的“难受”,更不会流眼泪。他们观察到这一点,又叫“狱卒”们把浓烈的刺激眼睛、容易流泪的硫酸液倾洒在囚室门口地上,还用扇子往屋里扇,力图逼出你的眼泪,可以上报你的“反革命感情”。结果,这一招也不灵验。其实,即使采取这种手段逼出几滴眼泪,不是也和他们伪造的那些“证据”同样毫无用处嘛!

机关算尽,终归徒然。拖到1975年5月14日,早晨忽见张宏学跑来,让我收拾东西(其实就是四卷《毛选》,一本《语录》和一件故意留作8年冤狱“纪念品”的破烂衬衣),知道这是要释放我。因为这里的“犯人”已有许多人出去,每天都有成批的人出狱。当天中午回到家里,见到朝思暮想的家人和一些亲友,自然感到无限喜悦、宽慰。

但是,人从狱中出来了,“案子”却远没有了结。江青那张垂天大网依然罩在头上,心情依旧感到压抑。据说在我出狱那天,张宏学们那个中央专案组向报社领导小组成员讲的四条:(一)有人讲,穆欣是特务,经过审查,他不是特务;(二)中央没有给我们审查他是不是“五一六”的任务;(三)他在中央文革小组的工作,中央了解;(四)他犯过执行修正主义的错误。在这种情况下,随处可以看到不少敌视的眼光,报社头头每天还得给姚文元送去一份有关我的“动态”的报告。

经过孩子们奔走,得到北京市委谭庄同志的帮助,我于6月21日住进友谊医院检查、治疗,原想可以安静几天。不料刚到第5天,张宏学们就找到医院里来,像催命鬼般进行新的折磨,又在结论问题上做手脚,继续施加压力,逼令在他们诬陷自己的结论上签字。在我住院期间,从7月21日到8月8日,先后给我看过5个内容互异的结论稿,每一个都说我是“人民内部矛盾”,可是一直还是把我当敌人来看待。拒绝他们这种强加于人的诬陷,他们就秉承上司的旨意威胁说:“再不签字,就以拒绝签字论!”或者同你软磨:“今天如果你还不签,我们就不走!”既然8年的监禁都不曾压服,这时哪个还会屈从他的淫威。拖到翌年10月,江青一伙垮台,张宏学也再未露面。办结论的专案组又换了两班,经过许多周折,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1979年12月15日,方才有了一个彻底平反的结论:“穆欣同志的历史是清楚的。”“撤销中央专案小组办公室1975年8月6日结论,所谓整叶群‘黑材料’等,均系林彪、‘四人帮’妄加罪名,蓄意迫害。对林彪、‘四人帮’强加给穆欣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和莫须有的罪名统统推倒,予以彻底平反,恢复政治名誉;对因穆欣同志问题而受株连的家属、亲友和干部,应予平反,恢复政治名誉。有关材料,按党中央规定处理。”

7、《夹边沟记事》拾遗

《夹边沟记事》是2008年花城出版社再版的图书(初版见于1998年,当时名曰《夹边沟纪事》)。该书作者杨显惠1946年出生于兰州,1965年由兰州二中上山下乡赴甘肃省生产建设兵团安西县小宛农场。1971年入甘肃师范大学(现西北师范大学)数学系读书。1975年在甘肃省农垦局酒泉农垦中学做教师。1981年入天津作家协会专职写作至今。《夹边沟记事》早已被当局列为禁书,不过该书出版较早,民间尚有部分流传,难以禁绝。

此书以纪实的手法展现六十年代的夹边沟农场,让人们感知反右时期的

中国，重新认识已知的“历史”在时光积淀的尘埃下，掩盖了多少触目惊心的过去。“到处莺歌燕舞”的颂扬声中隐藏着多少沉痛的哀怨。此书掘起了受难者的尸骨，将现实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才使我们不致在这段历史上成为睁着眼的盲人。《夹边沟记事》或许能告诉我们，无论在哪里，丑恶和罪孽是掩藏不住的。历史是不容捏造的。《夹边沟记事》可以说是知识分子的苦难史，从中我们既可以看到中国知识分子面对苦难的韧性和对人格的坚持，也可以看到他们性格中的软弱与不合时宜，这也许是几千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致命伤。杨显惠先生的著作作用朴实无华的文字，记录了那个时代的悲剧，所有读过该书的人无不感到心灵震撼和情感的升华。笔者仅补充一些有关写作背景的资料，让人们永远记住夹边沟。

夹边沟农场位于甘肃省酒泉县城东北约 30 公里，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这里曾是安置右派进行劳改的场所。据曾在此地劳改的如今已获改正的右派分子司继才回忆：“夹边沟农场前前后后送来了大约 3500 名右派，1958 年 11 月发冬季衣服时，具体人数是 3136 人……，在这之前很多人自杀了，夹边沟农场总的活下来的不足 600 人。”（这一段话发表在《凤凰周刊》总第 351 期的《司继才口述：我的夹边沟记忆》一文中。）先介绍司继才其人，司继才，1928 年出生于山东，1943 年去延安，参加了八路军，1944 年入党，1956 年任人民解放军第 4 军第 10 师宣传科长，1957 年任兰州西北工程局党委宣传部部长，整风时曾任整风办公室主任，但不久他自己也被打成右派，被送到夹边沟农场劳改，幸亏当年他的一个下属薛占云在农场任管教人员，对他比较照顾，所以能幸存下来，他曾在农场搞过宣传，还能抽空记点日记，把所知的记下来，记下一些过去鲜为人知的事，另杨显惠的《夹边沟记事·在列车上》也有有关于司继才的记载。因为司继才当过领导干部，农场领导就让他当劳改队的队长，虽然当了队长，但他不伤同类，遇到不平的事还向农场管教人员据理力争，所以难友们对他比较信任，有问题愿意向他反映。这时，夹边沟总部约一千多名右派已被转移到高台县明水乡。原来计划在明水再开辟一个新农场。一千多名右派在这里辛苦劳动了半个多月，但后来可能是因为各种条件没有成熟，所以开辟新农场的计划撤销了。来到这里的右派因长期饥饿，农活又重，所以大批死亡，农场领导不得已，停止右派劳动。右派们每天吃完食堂供应的用树叶和菜叶煮成的糊糊之后，只能在零下十几度的严寒中蜷缩在地窝子里。还有点力气的人到外面挖点野菜，捋点草籽，有的把抓来的蜥蜴煮一煮充饥，但大多数人连捋草籽的力气都没有，只能奄奄一息，等待死亡。按照毛泽东的说法这就叫做给右派分子安排的出路。有一天，右派分子李天庆向队长司继才反映说：大家都饿的一点力气也没有了，可是从兰州铁路局送来的右派分子魏长海等三个人面色还有一丝红润，行动尚属敏捷。李还看见魏长海等人煮过什么东西吃，他们看见李走来，很快就藏起来了。李天庆感到这几个人形迹可疑，所以请司继才队长调查一下，司继才答应了。几天后，司继才找到李天庆说：老李，你的怀疑还真对了，那几个家伙还真没干好事。我问他调查出什么情况了，他叫我跟他去看看。我跟着他走到山水沟口。山水沟外边是一片广阔的沙滩，突兀起一峰又一峰的沙包。沙包的斜坡上散布着许多坟堆。这里掩埋着我们到明水后死去的右派的尸体，是农场组织的掩埋组干的。这埋尸的工作做得不好，也就是挖个浅浅的坑，把尸体拖进去，再覆上一层薄薄的沙土。因为大风刮走了沙土，有些尸体暴露出来，布条子和头发在寒风中簌簌飘动着。我问了一声，你叫我到底看什

么？司继才不回答，领着我在坟堆中前行几步，指着一具完全暴露的尸体说，你把被子撩开看看。我知道掩埋尸体的程序：所有的尸体都是用自己的被子裹着的，脖子、腰和腿的部位用麻绳系紧，用马车拉到这里掩埋。眼前的这个尸体却像被人动过，脖子和腰里的绳子被利器割断了。我撩开松松垮垮盖着的被子，发现死者棉衣的纽扣也是解开着的。掀开衣襟，我不由得呀了一声，吓了一跳：死者的胸脯上有一道长长的竖着的豁口。你看清了吧，这不是狗吃的吧？司继才问。我说，不像狗吃的，狗吃的伤口没这么整齐。说到这里，我突然明白司继才的意思了，我的头皮刷的一下麻了起来，我惊悚地问，老司，你是说……，后边的话我没敢说出来。司继才后退两步。司继才说，怕什么，你怕他什么呀。他走近一步，弯腰，双手拉了一下豁口，说，你看，你看看这里边。我从他的两手之间看下去，胸腔是个空空的大窟窿。司继才又说，看清了吗？我说看清了，他才松了手。他把死者的衣襟拉了一下，盖住豁口，又把被子拉过来盖上，把绳子系好，还刨了几下，把旁边的沙子盖在尸体上。然后，他像洗手一样，抓了把沙子，搓了搓手。接着他就大骂起来：这帮王八蛋，一点人性都没有啦！你当他们煮的什么？他们煮的是内脏呀，是人的心肝肺呀。这些死人的身上没肉了，长期的饥饿和劳累把身上的肉消耗干了，胳膊和腿就剩下干骨头了。没吃的，他们就想出开膛剖腹的主意来了！我没说话，我还没有从惊愕中挣脱出来，头皮还在发麻。我前几天向司继才反映情况，只是觉得他们行踪可疑、蹊跷，但根本没想出他们会干出这样的事来。司继才领着我又看了一具尸体，也是被人动过刀子的。我还翻了翻尸体上拴的一硬纸牌子。纸牌子是掩埋组的人挂上去的，为的是将来死者的家属来找尸体便于辨认。牌子写着名字，并且是编了号的。至今30年过去了。但我还清楚地记得那个人的名字，他叫王夷悟。王夷悟原来是天祝县医院的医生。被打成右派，但他在劳改期间没有受太大的苦，因为来到夹边沟之后领导叫他在医务所当医生。由于他在医务所又有新的右派言论——他说夹边沟死亡那么多人是因为营养不足，饿死的——因此，在我们迁移到明水前被撤掉了医生职务，下队劳改。他是前几天死去的。由于突发感冒，他劳动的时间不长，死的时候身上的肉还没有耗干。还不像别人那样干。也正因为如此，他尻根子的肉被人用刀子割去了，那个部位呈现着两个窟窿，小腿肚子的肉也叫人剔去了，露出白色的骨头。后来，司继才分头找魏长海几个人单独谈话，连哄带吓，他们都承认了，魏长海等痛哭流涕表示要痛改前非。大家知道他们把死人的心、肝、肺挖出来煮着吃，都表示义愤填膺，痛骂他们道德丧尽。但等到讨论应该怎样处理时，有人说应该处以极刑，有人说应该判刑，但有人提出不同意见：魏长海犯了什么罪？他杀人了吗？他抢劫了吗？一个姓章的历史学教授引经据典说：“古人云仓廩足而后知礼节，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至今，未尝闻之……”。农场管教人员赵队长知道这件事，就带几个人来把魏长海五花大绑紧紧的捆起来毒打一顿后关了起来。李天庆知道如果紧捆时间一长，血脉不通，就会出人命。他感到自己是首先告发的，心里不安，于是在地窝子喊了两遍，求大家去向赵队长求情，把魏长海松绑，放出来，但没人应声。他又去求章教授，章教授只翻了翻眼皮没有动。李天庆明白了：经过长期的劳累和饥饿，他们已经看惯了同一个地窝的伙伴一个一个的倒毙，一个个尸体被抬出去，他们连自己也不知道能不能活着走出明水。人们的同情心丧失殆尽了，他们没心管别人的事了。于是李天庆找到司继才，和他一起去求马队长，把魏长海松了绑，放了出来。过了

不久钱瑛来到这里。钱瑛是《洪湖赤卫队》里韩英的原型。建国后，1954年钱瑛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部第一任部长兼党组书记。她坚持真理，不避风险，平反甄别了许多被定为“铁案”的错案。钱瑛有句口头禅：“不怕鬼！”我们都把她看作救命恩人。钱瑛发现夹边沟农场的犯人，纯属一种偶然。夹边沟农场和其它关押右派的劳教农场的情况，甘肃省对外一直是绝对保密的。钱瑛当时到甘肃张掖地区视察，检查灾情，准备到高台县去。那些日子她一个村一个村地查，发现有些村里人都死完了。现在才知道三年灾害时，甘肃饿死了140多万人。那天天上飘着雪花，司机开着车迷路了，车里坐着钱瑛和警卫员，还有一个张掖地区的干部，一共是4个人。他们突然发现前面沟里有烟轻轻飘出，就开着车往有烟的地方走去。到了沟边上一看，沟坎下面横七竖八的足有二三百具尸体，这些尸体被码着摞着。钱瑛的警卫员就在沟坎上面大声喊：“你们这里是什么单位？怎么这么多死人？”近处有个管教人员说：“我不知道，你问场长去。”当钱瑛他们继续往沟里走时，农场哨兵就大声喊：“不能下去！”我（司继才自称）和（另一个右派）官锦文听到喊声，赶快走了出来，因为我们的洞穴直接对着钱瑛他们。这时只见（农场管教人员）刘振玉往钱瑛他们那里走了过去，一边走一边吆喝着说：“把这些人给我抓起来。”老太太钱瑛迎了上去，拿着拐棍就对着刘振玉抽了过去。钱瑛的警卫员一下把枪拔了出来，对着刘振玉说道：“你知道这是谁吗？这是钱瑛。”刘振玉一听是钱瑛，一下慌了。官锦文此时大声喊了起来：“钱大姐，快救我呀，快救我呀！”钱瑛朝官锦文看了一眼，然后说道：“这是谁？”后来才知道这是官锦文。钱瑛于是让官锦文领着在各洞穴和地窝子里查看，发现这里还躺着很多人。钱瑛问刘振玉，还有多少人？刘振玉说，还有五六百人吧，需要5个车皮。（实际明水这里根本没有五六百人，只剩二百多人了）。钱瑛于是马上给酒泉地区打电话让把那儿的公交车全部调来，并且宣布第二天就全部放人，赶快救人救命。接着她跟着刘振玉走进了他的房间，觉得屁股下面很软，让人查看，发现刘振玉的房间里有28条毛毯，在他的箱子里搜出了200多个各式手表，在刘振玉老婆的房间也搜出了几十条毛毯（注：这些都应是农场的管教人员从死去的右派的尸体上扒下来的）。但是，钱瑛走后明水和夹边沟又进行审查研究，拖延了差不多一个月，才将犯人放了出来。司继才在文章中最后说：“反右运动给全国无数家庭带来的灾难是说不完的……”大跃进期间，中国饿死了三千七百万人（见杨继绳所著《墓碑》）。1962年春，在七千人大会上，发动大跃进运动的毛泽东作了轻描淡写的检讨后，就离开北京，外出巡视去了。他把这一烂摊子推给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来收拾。刘少奇等人按照“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允许农民耕种一小块自留地，实行包产到户。半年多以后情况稍有好转。1962年秋天，在中央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又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毛还大力批判所谓“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就在这种形势下，钱瑛和中央监委的同志分析了全国情况，认为无理闹翻案的人确实是有的，但只是少数，主要是该平反的没有平反。安徽省，在大跃进期间，中共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强迫命令，大刮“五风”，使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饿死几百万人。当时，省委书记李世农提出不同意见，却被打成右派，另一个省委书记、副省长张凯帆因主张开仓赈济饥民，解散集体食堂，把刮共产风时没收农民的房屋和自留地还给农民，开放市场，由此被毛泽东点名批判为“混入共产党内的投机分子。”对于这样的“铁案”，

钱瑛和中共监委的同志也大胆的给予平反，他们还平反了许多冤假错案，但是他们的这些正义行为却在文革中被说成是大罪。“四人帮”一伙以钱瑛和中央监委违反了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大刮翻案风为借口，撤消了经中央委员会庄严选举产生的中央监委，对中央监委的十五位常委，除书记一人外，都加以残酷迫害，其中被迫害致死和含冤逝世者八人。中央监委副书记钱瑛也被迫害，于1973年7月26日含冤去世。（以上据1980年12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王从吾、袁任远、郭述申、帅孟奇撰写的《刚正无私的共产党员钱瑛同志》。）1960年，钱瑛曾解救了夹边沟幸存下来的600名右派，他们活下来了，但文革中钱瑛自己受到迫害，却没有人能够解救她。她死了。这就是可诅咒的毛泽东时代。

五、狱中之狱

（1）关入小监

1968年8月11日，星期日，照例吃两顿饭。下午四点，各监舍的犯人由当班的值星员清点人数，排队，然后向岗楼上的持枪管理员报告，请求准予出去打饭。

按照监狱的规定，做任何事情之前，必须背一段毛主席语录。值星员先小声的向身后集合的犯人说“对于反动派”算是告诉大家背哪一段，然后喊：“最高指示，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排着队的犯人跟着用鼻子和嘴发出一种混合的声音：“对于反动派，必须实行独裁，压迫这些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如要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背诵完毕，值星员再次立正，面向岗楼上的管理员报告，几工区多少犯人出去打饭。报告完了用不着等回答（一天从早到晚，无数人报告无数次，管理员懒得回答，虽然是有点儿不礼貌），可以直接列队走出围墙大门，到厨房的窗口每人领取一个比拳头还小的玉米馍，一瓢莲花白（学名结球甘蓝，俗称洋白菜，圆白菜）老叶子或者萝卜缨煮的菜。

等到这个小队的四十几个犯人都拿到了玉米馍以后，一齐端着碗走到围墙外面那个岗楼底下，再次列队背毛主席语录，“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犯人值星员立正，向武装管理员报告刚才出去了多少人，现在进来了多少人。懂事的值星员都是老犯人，专选字数少的语录，免得耽误大家吃饭，肚子已经饿得咕咕叫了。这一群犯人嘴里背的是毛主席语录，眼睛里看的、心里想的却是那个黄澄澄的玉米馍和那碗乌绿色的菜。

岗楼上的管理员一般不管犯人含含糊糊念叨的是什么东西，可能他连听都不愿意听，只要是犯人站好了队，人数不差，就算完成了规定的仪式。只要刚才出来的人数和现在要进去的人数一样多，管他们嘴里嘟囔什么，一律放行。睁大眼睛监视着刚才出来的这群犯人一个一个的回到高墙电网之内是他们的责任。

吃过饭以后，犯人都回到了监舍之内。那天，空中灰蒙蒙的，看不见蓝天，也看不见白云，一片晦暗，特别的闷热，预示着将有一场暴风雨。

我穿着一件短袖汗衫，一条短裤，站在监舍门口往外看。几个内勤组的犯人从外面抬了三张条桌，端了七八把木椅子进来。平时干部给犯人训话，和每天晚上的集合点名都是站在那个堡坎上面，有时候一训话就是半个小时，也没见端桌子、椅子，今天有什么隆重的事呢？

跟着，指导员周金仁进来了，还有小队长唐炳南、徐绍华、田家伦，场

部来的外号叫小爬虫的那个比指导员还大一级的教导员，记不得他姓什么了，大约是高中文化，诨名儿叫小爬虫，在劳改队里就算是有文化的狱卒了。和另外三四个不熟悉的人，阵容十分强大。

一声令下，犯人全体集合，列队站在那个坑坑包包的院坝子里，各小队分别报告，一工区（小队）报告：“应到四十六人，实到四十六人，报告完毕”二工区报告：“应到四十七人，实到四十七人，报告完毕”三工区报告：“应到四十二人，实到四十二人，报告完毕”……跟着一个一个小队的报告，一会儿的时间，苗溪茶场劳动改造管教支队第十三中队所有关押在高墙电网之内的犯人集合完毕。将近三百人，密密麻麻的站到这个狭长的土坝子里。三个岗楼上的哨兵都把身上背着枪拿下来，改成了似乎临战的持枪姿势。

周金仁主持今天的大会，开宗明义第一句话：“牛立华，站出来！”

原来是喊我，是祸躲不脱，劳改队里司空见惯了，我闻声即起，昂首阔步向前走，站到了前面的土台子上，面对着下面站着的一大片犯人。

周金仁凶神恶煞的叫喊着：“牛立华思想反动，现在宣布关小监。”

紧跟着却没有任何检举揭发，既没有指出我有什么违法行为，也没有揭露我有什么犯罪事实，既没有说我违犯了哪条监规，也没有说我在监狱里做错了哪件事。那个歪眉斜眼的二工区小队长唐炳南拿出一副特制的手铐，把我的两只手搬扭到背后，紧紧地铐了起来。

不知道后面坐着的哪个公安干警喊：“低下头来！”

我往左边看了一眼又往右边看了一眼，思索了一下，略微抬了一抬本来就昂着的头。

这时候，下面的犯人队伍中有人响应了，对着我吼道：“脑壳啄起”（啄起，四川方言，发音是 zhuaqi，雄起的反义词，脑壳啄起也就是低头）。我扭身回头，扫了一眼坐在后面的几个狱卒，大声说：“我不能向犯人低头！”心里在想，你们披着人民公安干警的外衣干着摧残人民的事，才是对人民有罪的犯人。不料想这句话被当做反改造的典型，借助于管教干部之口传遍了好几个支队，惹得其他队的犯人路过十三队时多次打听哪个叫牛立华？是否三头六臂青面獠牙？

当时我之所以喊出了这句话，大致出于如下几点：

一、个性使然，“士可杀，不可辱”。

二、扪心自问，我从来没有做过不利于国家的事，也没有反对过共产党，却被当作了反革命，被无端地批斗，心里有一股怨愤。

三、我对劳改队里动不动就以手铐、脚镣相威胁，十分反感。

四、周金仁和唐炳南、徐绍华这三个狱卒心狠手辣，以折磨犯人为能事，我要让他们知道人是有血性的，不是可以任意宰割的，暴力是不能使人折服的。被揪出来批斗，免不了要挨打或绳子捆，与其低头哈腰不如昂首挺立，反正是一顿毒打。

五、手铐脚镣，捆绑吊打是劳改队的家常便饭，多数犯人被抓出来批斗的时候，迫于淫威都低着头，个别不肯低头的，被狱卒按一下脖子，虽然心里愤愤不平，表面上还是低下了头，还真没听说过谁敢在批斗会上公开扬言不低头，我就要冒着挨打的危险，发一发反抗的心声。

六、那时我对共产党和毛泽东还存在幻想，还相信毛泽东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相信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写在纸上的东西是当真要执行的，不是做做样子糊弄老百姓的。认为下面的做法违背了中央的政策，我要以身试

法，大力呼吁纠正这个歪风。

我的话音刚刚落地，旁边的一个狱卒（没看清楚是谁）横脚一踹，我没有提防，又被反铐着两手，失去平衡，一下子跌倒在地。紧接着就是一顿乱脚猛踢，似乎只有踢两脚才能表示无产阶级专政。我倒在地上，力图站起来，试了几次，竟无法完成。

这时候从底下跑上来两个“劳改积极分子”，一个叫王经文，一个叫彭世同。王经文，中学文化，地主家庭，是1950年四川省天全县民众自行组织的反共队伍的后勤部长，该组织后来被共产党武装歼灭，主要头目均被镇压，王当时只有十八岁，从轻发落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彭世同，初中文化，是1960年肚子饿得受不了因而不满共产党统治自发组织“反革命”集团的头目之一，破案后被判处二十年徒刑。他们两个把我从地上拉起来，一左一右站在我的两侧，一只手按我的脖子，另一只手反提着手铐往上拉，成了背后戴着手铐的“喷气式”，对我横加折磨。

周金仁在上面讲话，内容却与我无关，无非是说不接受改造就没有好下场之类的话，恐吓而已。

接着宣布散会，把我关在了小监里面。这时候大约下午五点多钟。

(2) 小监的生存环境

当晚，因手铐卡得很紧，陷在肉里，刺痛之痛，令人难忍。

手铐卡紧造成的血痂一般十天左右可以脱落，变成深色疤痕，通常三四年可能消失，严重的终身不褪。1968年至今，时隔四十余年，我的两个手腕上还遗留着当年手铐卡紧造成的疤痕，当初手铐卡紧的程度可想而知，历史是不容忘记的。

小监里面没有灯，已经是漆黑一片了，我默默地想着，中共占领北平的时候我还是一个十二岁的孩子，是共产党让我进了市立中学，基本上接受的是共产主义教育，新中国第一批少先队员，带着红领巾长大的，而且对共产党从感恩到信仰、崇拜都是出自内心的。

参加工作以后在军工企业任技术员，工作上兢兢业业，多次被评为先进生产者，优秀共青团员，出席重庆市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即使1957年被无端地打成右派分子，送劳动教养，也还没有对共产党完全失去信心，仍然努力地工作着，幻想着祖国和个人美好的未来。

作为一个科学技术人员，从来没有过政治野心，只想以自己所学为祖国服务，有一点成名成家的思想，在劳动教养那种十分艰苦、恶劣的条件下，偷偷的自学外语，可以阅读俄、日、英文有关专业技术资料。还在省级刊物上发表过多篇论文和译述，想着有一天能够自成一家著书立说。这些个人的意愿和祖国的繁荣富强没有任何矛盾，从来没有侵害过执政党的利益，怎么会成了“反革命”而且是极端危险的反革命，进了劳改队还要戴上背铐关在黑屋子里呢？难道自称代表人民利益的政权竟然那么害怕人民、那么脆弱？一个手无寸铁的文弱书生会让他们胆战心惊到如此地步，未免也太可笑了吧。看来这一帮当权者的言与行是相悖的，背离度越来越大了。

突然阵阵闪光打断了我的思路，紧跟着滚滚惊雷声震瓦屋，猛然间外面下起了瓢泼大雨。那一晚，心绪烦乱，辗转难眠，我默默地念着：

心怀耿耿报国忠，身受拷打入囚笼。几经昏迷几度醒，一滴鲜血一片红。横眉怒视群魔舞，侧耳倾听四海风。胸中自有霹雳火，隐耀雷鸣闪电中。雨住了，冥冥的暗夜中，我想起了乔治·奥威尔的小说《1984》[1]，想

着想着又昏了过去。

第二天早晨，犯人炊事员送饭来了，他打开铁锁，开门看了我一眼。我的两手被拷在身后，无法拿碗，这个炊事员姓氏名谁我不知道，大约五十岁，一头白发，外号叫白毛儿，心眼比较好，给了我一个瓦钵，把玉米馍馍和菜倒在瓦钵里，一句话没说，把门关上，挑着担子走了。

这时候天已经亮了，我巡视了一下小监的概貌。这是一间长宽大约1.8x1.3米的房子，空间的高度有2米。三面是抹着白灰的整体砖墙，前面也是砖墙，只是左边有个厚重的实木门，门高1.5米，宽0.6米。右边离地面1.4米左右开了一个长宽大约0.7x0.3米的窗子，窗子上自然少不了一根一根手指粗细的钢条，铁窗外面不是玻璃而是木板，木板下方留了一个0.15米见方的洞，可以起一点通风透光的作用。房子里没有一根电线，没有灯，只能靠铁窗下面的洞和木板与木板之间的缝隙透一点光线进来。靠窗子一方紧挨着右边墙壁安了一个固定的木板铺，宽0.6米，离地0.3米左右，上面铺着已经霉烂了的稻草，时时散发着令人窒息的气味儿。靠门的一角，放着一个没有盖子的木桶，算是室内厕所。从此吃喝拉撒睡就都在这不足三平方米的斗室之内。

早饭送来了，怎么吃呢？没有筷子，没有勺儿，更没有刀叉。就是有也无法使用，因为我的两只手反铐在背后，拿着筷子也够不着自己的嘴。所以只能像猪狗一样低着头用嘴去拱、去啃。“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一直在宣传“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现在可是“新社会”，从毛泽东到每个狗腿子，嘴里都喊着“人道主义”，却把人当作猪狗。是伟大，是光荣，还是正确呢？

1968年内，关我的这间房子先后关过两个人，头一个不久就一命呜呼了，据说死亡原因是“自我摧残身体”。第二个也命在旦夕，四天前大部分犯人出工了，管教干部把他押出去却没见他回来，不知道弄到什么地方去了，或许是送医院了，也许是上了天堂，总之以后不见下文，也没有人敢问。不管关的是死人还是传染病人，小监是从来不打卫生的，更谈不上消毒，他们走了以后，我就被关进来，睡在他们曾经睡过的稻草铺上。

这天中午，炊事员又来送午饭，随着来了一个干事（劳改队里的公安干部除了队长、指导员，都叫干事），炊事员打开门，这位干事忙着往旁边躲，他不敢正对着门，因为一股热风混合着臭气随着打开的门喷涌而出，熏得他不由自主的要往门后面躲。由于他站在门后边，只能侧身斜着眼睛往里看，我则正对着门口怒目而视。他在亮处，我在暗处，我看他看得特别清楚，他显露着一副高度警惕的样子，好像我能够把他吃了似的。

我转身拿那个瓦钵（早晨用过的，没有水，所以没有洗），准备交给炊事员盛菜和玉米馍馍。这位干事鼓了鼓勇气、壮着胆子喊了一声“出来”。

小监面对高墙，中间是1.5米宽的过道，我迈出小监的门，站在过道里，太阳有点晃眼睛，我一句话没说，看他要做什么。

他走到我身后，拿出钥匙把手铐上的锁打开了。由于昨天下午手铐戴的非常紧，铁铐陷在肉里，已经和手腕连在一起了，他这一开，撕裂人心的痛，我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气。

锁打开了，放松了一扣，又重新锁上了。我又回到小监里，身后的门重重地关上了。

如果不放松，肿胀的手有溃烂的可能，那就残废了，不能给劳改队干活儿

了。共产党的监狱干部常说他们施行革命的人道主义，大概放松一扣手铐就是人道主义的体现吧。

我戴着背铐把那个瓦钵放在木板铺沿上，蹲着身子像猪狗一样一口一口地吃完了玉米馍馍和菜。然后斜靠着墙坐在地铺上。

监舍里的犯人都出工去了，院子里死一般的寂静。高墙外面不时传来阵阵蝉鸣，知知不休的声音，像是告诉人们世界上还有生命。

牢房，冤狱，鸣蝉，不由得想起了骆宾王，想起了他的《在狱咏蝉》我一个字一个字的追索着默诵：

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深。不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

我喜欢骆宾王的诗文，今日尤其赞赏《在狱咏蝉》。

过了一会儿，我听见从远到近的脚步声，走到我住的这个小监门前停住了，却没有开门，我警惕的听着，干什么来了？

一阵乒乒乓乓的声音之后，奉命而来的这个人用木板把铁窗下面的那个通风口封死了，屋子里顿时暗了许多。

在十三中队，这样的小监一共有十间，都集中在一栋平房里，这栋平房邻近围墙的头一间房是宽三米、进深四米的医务室，有一个刑满释放被强制留在劳改队就业、半路出家的卫生员，名字叫廖觉先，充当这三四百犯人的“保健医生”。挨着医务室就是特殊设计的小监，前面五间面对院子，犯人收工以后，需要看病的，要路过这五个小监的门口才能到医务室。后面的五间面对的是高墙和电网，除了给小监送饭的炊事员和倒马桶的犯人以外，一般犯人是允许到后面走动的。

我被关在后面，本来就已经十分僻静，现在把通风口也给堵死了。我听着外面的脚步声从近到远，没听见在其它房间钉木板、封窗口的声音，也就是说，那几间房的通风口仍然保持原样，看来劳改队的几个头头给我特殊待遇，把我当作了钦犯，如临大敌。日夜带着背铐，关在小监里，还不放心。似乎留一个通风口就还能呼风唤雨摧毁这个号称坚如磐石的无产阶级专政政权似的。我能得到这样的另眼看待应该自豪了。

小监是狱中之狱，如果不是亲临其境，很难想像“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能够创造这样的生活环境。后来才知道，柬埔寨“纯正的共产主义者”波尔布特、罗马尼亚“坚定的共产主义者”齐奥塞斯库，也和“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一样，在屠杀、镇压、残害人民的罪恶活动中都设立过这样的集中营。这就是号称“共产主义”“马列主义”政权的法西斯共性和特色。

五十年代我看过一部电影《上饶集中营》，里面有监狱中的生活状况，六十年代看过小说《红岩》、《烈火中永生》，其中也有监狱环境的描写，都是共产党写国民党的监狱。看过这部电影、读过这两本小说的人不在少数，现在我如实地记述一下苗溪茶场第十三中队的小监生活，有兴趣的人们不妨回忆对比一下，看看谁才是残暴的法西斯。

名曰小监，空间自然不大，我身高 1.73 米，躺在铺板上，头和脚可以同时接触到两端的墙。

空间狭小，房门日夜上锁。阴暗潮湿，终年不见阳光。从来不放风，世界上绝大多数的监狱都要安排放风的时间，有的一天一次，有的一天两次，著名的法西斯监狱和“极端残忍”的渣滓洞、白公馆、息烽都要放风。中共

的监狱独具特色，据说著名的秦城监狱也是不放风的，号称实行革命人道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可谓开创了一代监狱新政。

水是生命之源。正常的人每天都要喝水，每天都要用水。小监是没有水的，关在里面的人不可能洗脸、刷牙，不是一天两天，而是天天如此。至于洗澡更是连想都不能想的事，四川有句俗话“磨皮擦痒”，牛在树干上来回蹭，猪在圈里反复磨擦砖墙，都是这个动作。我在小监里，身上痒得厉害了就在墙上磨擦，每天都要做无数次这样的动作。通过身体力行真切地体会到了“磨皮擦痒”这四个字比毛泽东语录还准确、实用，我在小监里只要身上一痒，就活学活用。

据医生说，衣服是要勤洗勤换的，进了小监可从来不换衣服，我在小监关了九个月，进去的时候是八月份，穿着汗衫和短裤，雅安号称雨城，“巴山夜雨涨秋池”，夏秋之际晚间多夜雨，白天出太阳，湿度大，气温高，屋子里湿热难当，一身酸臭，衣服粘在身上，两只手被固定在背后，只有靠全身扭动、抖动甚至跳动，让粘在身上的衣服换换位置。暑往寒来，十二月份雅安地区的气温降到了零度左右，我还是穿着八月份那套汗衫和短裤，冷得浑身发抖。经多次要求，临近元旦才允许我到原来关押的监舍里拿了棉衣、长裤。无奈之下，把破棉衣披在身上（戴着背铐，无法穿），把两条腿伸到棉裤里，这叫做感受党的温暖。

活人要吃饭也要排泄，这不足二点五平方米的狭小空间，既是卧室，又是饭厅，还是厕所。木制马桶上没有盖子，十天八天才有人来倒一次马桶，马桶保持原汁原味，从来不冲洗，夏秋之际，粪便生蛆，腐臭熏天，秋冬虽冷，恶臭依然。好在“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矣。

小便好办，大便要脱裤子，很简单的动作对于被反铐着的人来说也成了难事。拉屎以后擦屁股本是举手之劳，在小监里可办不到。一是无法举手，戴着背铐的两只手够不着自己的屁股，想擦也没法儿。二是没有卫生纸，关进小监四个月以后，我被获准拿了一套《毛泽东选集》进来，是小监内唯一的纸制品，我对他老人家的著作敬重如圣贤，一字千金，据说毛泽东思想是改造灵魂的，舍不得擦屁股用，那纸也比较光滑硬脆，估计用来擦屁股既擦不干净也不舒服，还不如不擦。再说，用毛泽东选集擦屁股可是亵渎红太阳的罪名，杀无赦。免了吧，既节约又省事。要是在全国推广，一年就可以节约数百吨卫生纸呢。我被关了九个月，过了两百七十多天拉屎不擦屁股的生活，这也要感谢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那位伟大领袖。

犯人是准蓄发的，一般每个月由专职理发员推光一次。关在小监里省略了这道工序，由着头发自由的生长，不洗头不理发，头皮很痒，因为戴着背铐，没有办法挠，只有在门框上来回的蹭脑袋，蹭完了前面蹭后面，蹭完了左边蹭右边，日久天长，门框下面积累了一层很厚的头皮屑，这小小的玩意儿还会发霉，长出了灰白色的毛，不细看像是地面上铺了一块法兰绒毯。

小监内苍蝇蚊子飞扬跋扈，故意欺负我，两手被铐在身后无法动作，只能任它嚣张。苍蝇的个头挺大，翅膀震动起来特别有力，嗡嗡的声音驱除了小监里的寂静。我眼睁睁看着它们自由自在的飞翔，随着它们在空中遨游的踪迹做颈部运动，也算是一种锻炼，直到现在七十多岁没有犯过颈椎病。

白天是苍蝇的天下，晚上蚊子当仁不让，苍蝇蚊子轮流坐庄。蚊子比苍蝇残忍，它要叮人吸血。怎么才能制服叮人的蚊子呢？冥思苦想，无计可施，我怎么那么笨呢？某日灵机一动，有办法了，叮咬前面，可以用嘴去吹，把

它赶跑，遗憾的是不能驱除出境，它还在小监里嘤嘤地飞舞。要是叮在背后，只能用背撞墙，让蚊子在旁边休息一会儿。堂而皇之的七尺男儿，竟在这些列为四害的孽障面前束手无策，其人也可悲乎。

小监里没有灯，天气好的时候，上午九点到下午四点左右，窗户缝透进来的光线提供了自然的照明，可以看书写字，其余时间我则闭目养神与黑暗相伴。为了记住日子，我每天用手指甲在墙上划一条痕迹，应该有二百七十条左右，如果那个房子还没拆的话，希望有机会回去看看，寻找一下旧日的踪迹。

在小监里关久了，已经适应了戴着背铐吃饭。没有水，却是个大问题。幸好劳改队的饭菜缺油少盐，不至于过分口渴，但是人就那么怪，除了需要吃饭，免不了还要喝水。开始的时候我试着对送饭的炊事员说：给点水吧。那个外号叫白毛儿的炊事员没有回答，但是第二天早晨八点送饭以后，将近十点钟的时候，他挑着担子进来，加送一次开水，用一个容量一升锈迹斑斑没有盖子的搪瓷杯装着，放在马桶对面的墙根附近，足够一天喝的了。我始终记着这位没有留下姓名的难友。由此每天有了一升左右的水可以自由支配，我感谢这位犯人炊事员，按照中共的逻辑，是不是还需要感谢党、感谢毛主席呢？

但是好景不长，送饭的炊事员换了，后来这个叫徐国权，四川邛崃或大邑县一带的农民，据说还是共产党员，不知道因为什么被打成反革命，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因为在劳改队里表现良好，被狱警安排到厨房劳动，荣任犯人食堂的炊事员，这个差事虽然不入流，最大的好处就是天天能够吃饱饭，一般犯人很难谋求到这个职位。他来给小监送饭，不送水了，我两三次求他给关押在小监里的人送一点水。一天中午外面有脚步声，我知道送饭的来了，起身等着开门，可是不像往常一样按着房间的顺序送饭，而是把我这间房跳过去了，送完了所有房间以后才走到我的门前，一会儿门开了，丢了一个玉米馍馍在我的瓦钵里，随手舀了一瓢菜汤，我说：菜呢？他气冲冲地回答：你不是要水吗！眶当一声，把门关上了。我心里默默地念道，人啊，人！古人云：恻隐之心人皆有之，这些中国人的传统美德已经被异端邪说冲击得所剩无几了。在他这个曾经是共产党员的犯人身上表现尤为突出。同样在监狱里，都被打成反革命，竟然还要互相残杀，这种人性的扭曲是谁造成的呢？无疑是毛泽东的斗争哲学和恐怖统治。

北方有句俗话，好吃不过饺子，舒坦不过躺着，睡觉是一种享受。带着背铐睡觉却是一种折磨。仰卧肯定是不行的，岂料俯卧也不行，背在后面的两只手很快就会痛得难受。只能够勉强侧卧，一夜之间翻来覆去的辗转难眠。长期地一天二十四小时戴着这种中国共产党人发明的背铐，才能感知这个政治集团口口声声高唱的人道主义完全是骗人的东西。

附注：

[1] 《1984》是英国左翼作家乔治·奥威尔于1949年出版的一部政治寓言小说。与英国作家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俄国作家扎米亚京的《我们》，并称为反乌托邦的三部代表作。奥威尔刻划了一个令人感到窒息和恐怖的，以追逐权力为最终目标的极权主义社会，通过对这个社会一个普通人生活的细致刻画，揭示了任何形式下的极权主义必将导致人民甚至整个国家的悲剧。

(3) 面临的抉择

中共监狱里的小监是为了折磨人至死而设定的，然而人的生存能力是很强的，人的适应能力也是很强的。但需要坚强的意志和坚定的信念。

面临着生与死，我该怎么办呢？

一是**低头认罪**，可是我找不到自己犯了什么罪，既没有参加任何“反动”组织，也没有杀人、放火、放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反革命行为，没有书写或张贴过反动标语、传单，没有呼喊过反动口号，没有收听敌台和里通外国。我多次向公安、司法部门的官员表示，只有能够举出具体的事实，是罪我就认，是错我就改。可没有人能够举出哪怕是一点点犯罪事实。没有犯罪事实，怎么认罪呢？

回想 1957 年，面对一阵阵狂呼乱吼、歪曲捏造，起初我还据理力争，后来在朋友们的劝说之下，在“胳膊拧不过大腿”、“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的情况之下，低头认罪，写了检讨。于是授人以柄，自己都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划为右派自然是理所当然、名正言顺的了。毛泽东说过：“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这一次我就要认真一下，没有罪就不认罪。

二是**以死抗争**，监狱里死人的事是常有的，有病死的，有死因不明的，也有自杀的。拉出去，挖个坑一埋了事，殊途同归。死亡证明上填写的都是各种各样的、协和医院都没见过的疑难病症，万一有家属来问，必然是“病情恶化，医治无效”，跟毛泽东死亡时中共中央发布的讣告里所用的措辞一样。享受如此殊荣，还能有什么话说呢？

我不想死，更不能死，我要活，我要做人。如果现在以死抗争，只能博得部分人的同情，并不能唤起更多人的觉悟，人死了，许多事实无法澄清，许多黑暗无人揭露，对人民来说是一种罪过，所以我不能死。

坚持活下去的想法出于我对未来的信心，1957 年初，我基于虔诚的信念和对中共的顶礼膜拜，交过入党申请书，认真地学习《党章》，学习《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学习《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特别是经历了反右以后再读《联共党史》体会更深。**

《联共党史》是在斯大林主持下编写的，是苏联大镇压达到顶点的 1938 年出版的。《联共党史》把苏联共产党的历史描绘成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生死搏斗的历史，尤其突出斯大林的个人作用，把所有与斯大林意见相左的元老、功臣、干部和革命的同路人斥之为“机会主义”“人民公敌”“叛徒”“卖国贼”“特务”“暗害者”，为大规模屠杀、实行社会恐怖制造理论根据。

《联共党史》写着：从 1917 年到 1938 年，短短的二十年间苏共内部即有七次大的“路线斗争”，无数人被处以极刑，成百万的人被投入劳改营或流放到西伯利亚。直到斯大林去世，众多的受害者才得以平反、昭雪。斯大林践踏法制，编造谎言，党同伐异，摧残人性，屠杀无辜的共产党员和平民，制造了空前的旷世灾祸。仅 1937-1938 一年间即判刑一百五十七万人，枪杀六十九万，监禁七十万。到 1953 年有一千万人被送进古拉格群岛，约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五，这跟毛泽东为肃反、反右预定的指标十分接近，难怪有人说毛泽东和斯大林是一丘之貉。

中共还没有编写党史[1]，但中共与苏共同属中央集权、个人独断的“社会主义”，其发展过程惊人地相似。共产党从成立的第一天起就相互勾心斗角，毛泽东利用“反托派”、“肃清 AB 团”、反陈独秀、反罗章龙、反李立三，以

非常手段树立自己的权威。遵义会议后毛泽东采用种种“高招”，“权谋”，制服张国焘，压制王明、秦邦宪，排挤张闻天，控制王稼祥，驯化周恩来。1949年以后的十余年，先后除掉了“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肃清了“胡风反革命集团”，打倒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彭德怀”，通过所谓反右派运动剥夺了民主人士的话语权，及至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跟随他几十年的刘少奇也被戴上了叛徒、内奸、工贼的帽子，成千累万的干部被划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泽东在走斯大林的老路，其残暴较斯大林有过之而无不及。其后果必然是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昔日的战友、同盟者、同路人、同情者统统赶到对立面，他在走斯大林的老路。最后必将落得个孤家寡人，遗臭万年。成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我那时却还幻想着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或许会发现错误，改弦更张。甚至认为毛泽东可能是受了身边一些人的蒙蔽，一旦他了解下情必然会纠正这些危害革命、破坏生产、镇压百姓，也严重败坏党的威信、损害党的领导、不利于长治久安的倒行逆施。期待着毛泽东所说的“有反必肃、有错必纠”。因为我的确没有反对过中国共产党，也没有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和法律。从另一方面来说，即使这一切都是毛泽东造成的，也就是说他在重蹈斯大林的覆辙，今后也会有人出来收拾残局，所有被毛泽东迫害的无辜必将得到平反昭雪。那将是毛泽东的悲剧，毛泽东是个聪明人，难道会一意孤行、死不悔改？

我要活着看这个世道怎么变化，看毛泽东究竟还要干些什么，还能干些什么。

每天早晨起来以后，尽管小监里没有水，不能洗脸刷牙，无法讲卫生，我总是用反铐在背后的手慢慢地把被子叠得整整齐齐，以此表示我热爱生活，不会颓废的心境。

临近节日，比如五一、国庆、元旦、春节等，监狱都要进行大检查，所有的在押犯人把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行李拿到院子里，无非是一块垫褥，一床被子，几件衣服和吃饭用的碗、盆、锅。三百多人的行李摊在坑坑包包的泥土院子里，像是摆地摊儿。各工区的狱警一件一件地看，重点是文字材料，但凡发现写着字的纸或小本子一律没收，带回去“研究研究”。众犯人不忍怒也不敢言。

我在小监里关了一个多月没有提讯，除了每天送饭的炊事员和十天半月来一次倒马桶的犯人以外，无人问津。我很想乘大检查之机出去透透空气。

9月30日，监狱大检查，我在小监里听见外面人声嘈杂，随着脚步声越来越近，知道有人来视察小监，一会儿，门开了，狱卒周金仁（指导员）站在外面，我戴着背铐斜依在铺上看了他一眼，随即收回目光，一语不发。他问：“你想好了没有？”我回答说：“想什么？”他说：“要认罪，给我写检查材料。”说着喊我出来，用钥匙打开了手铐。我没有纸，没有笔，跟他说了，他让一个犯人送来了一只沾水钢笔，十来张拟稿纸，一瓶蓝墨水，关上门走了。

手铐打开了，两只手可以活动了，可我该怎么写呢？认罪吧，自己都找不到犯罪事实。不认罪吧，小监里的非人生活、继之而来的种种折磨，的确难以长期忍受。我本着“调子尽量放低，原则不容放弃”的思路，写了下面一份材料：

《一、概况

我于1966年7月12日由成都市公安局逮捕，同年9月30日被成都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罪判处徒刑十五年。如此长刑，必有重罪。但我既未参加任何反革命组织，也没有杀人、放火、放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反革命行为，没有任何反动笔记、文件，没有书写和张贴反动标语、传单，没有呼喊反动口号，没有收听敌台广播或里通外国，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没有任何违法活动或抗拒表现，更重要的是我一直都是拥护毛主席的，从来没反对过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尽管原单位的某些人采用种种手段制造材料，又通过“审理”人员千方百计的拼凑罪名，必欲将我置之于死地，他们煞费苦心也没有举出任何具体的犯罪事实，为了达到判刑的目的，于是便加给我这样一条唯一的罪状，即“借开会暴露思想和借口向管教干部暴露思想公开讲反革命言论”，匆匆判处，投入劳改。

二、罪状能否成立？

如前所述，按照判决书，我唯一的犯罪活动就是“借开会暴露思想和借口向管教干部暴露思想公开讲反革命言论”。我认为这条罪状成立至少需要三个条件：（1）讲的是反革命言论；（2）确系有意散布；（3）符合政策规定。三者缺一都不足以判处十五年有期徒刑。现就此分述于后：

（1）讲的是不是反革命言论？

判断言论是否反动，应以毛主席著作为最高的衡量标准。凡是反对毛主席、违背毛泽东思想的，才能叫反动言论。纵观我自社教以来，甚至可追溯到解放以来的一切言论，从来没有反对过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恰恰相反，我反对的是不按毛主席指示办事、不执行党中央既定政策的行为；反对的是阻碍社会进步、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消极因素。虽然起诉书的作者采用了或斩头去尾、或拦腰截断、或歪曲原意、或无中生有的手法，把他们认为最“恶毒”最带“攻击性”的“反革命言论”拼凑在一起编造了一纸罪状，明眼人却不难看出其中的破绽。例如被赫然列为第一条的反革命言论是，“三面红旗下面执行过左”，我承认这种看法有些不合六十年代的时宜，但仅仅认为下面执行过左，决不能断定就是对三面红旗的恶意攻击。对起诉书中所列的其他言论，只要依照客观事实略加分析，便可察觉我怀疑的是背离毛泽东思想的错误路线，反对的是盲目的、形式主义的、对革命不负责任的工作作风，信仰的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正确的科学的革命理论，拥护的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审理期间，我再三提出可以动员全厂的人进行检举，把我的一切言论收集起来，全面地而不是断章取义地，以毛主席著作为判断是非的最高标准，依照客观事实逐一地进行分析，指出哪些是反动言论，反动性在什么地方，只要这样做，我就完全认罪。但原审法院并没有这样做，既未切实调查，也未认真审讯，连事实都没有搞清楚，就不加分析地、笼统地扣一个反动的帽子，并据此判处十五年徒刑，这怎能让人接受呢？

（2）是否为有意散布？

在一个时期内，我的确产生过错误思想（没有构成言论），也说过一些错话（构成了言论），主要表现在对劳动教养政策和实践严重脱离不甚理解，对“三面红旗”的成果持怀疑态度。

劳动教养不经过法律程序，无需审讯，不核对事实，不容许答辩。只要该人所在单位写一份材料，不经当事人过目和认可，上报所谓劳动教养五人小组，即被强制劳教，这符合我国宪法的规定吗？。

劳动教养，按照公开颁布的政策是最高行政处分，也就是没有剥夺当事

人的公民权。然而劳教单位的管理却与监狱相似，不准离开劳动场所，不准迈出劳教单位大门一步，来往信件均需经过管教人员的严格检查，甚至家属寄来的包裹不通知本人即被退回，从精神到肉体，从形式到内容都被列为专政对象，难道人民向人民实行专政？

颁布劳动教养条例时，《人民日报》曾发表一篇社论《为什么要实行劳动教养》，其中说：“对他们同样实行按劳动成果给工资报酬的原则”，实际上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我劳动教养之前在原单位任技术员，月工资 69 元，在劳动教养场所同样从事技术工作，技术难度和工作量有增无减，每月却只发 15 元生活费，1961 年摘掉帽子、解除劳教以后也只有 19 元，直到 1964 年才提高到 41 元。这能叫做“同样实行按劳动成果给工资报酬的原则”么？

按照明文规定的政策，对于刑满释放的人员只有在无家可归、无业可就、本人自愿申请的条件下，才允许留在劳改单位就业。对于解除劳动教养人员更不能强制性的留在劳教场所。但是实际上，除了 1962 年释放了个别老弱病残以外，绝大多数劳动教养人员解除劳动教养以后均被强制留在劳教场所，工资和劳教没有区别。也就是说只要进了劳教或劳改场所，一辈子也回不到人民行列里来。周恩来在 1957 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里说：对大多数右派分子，社会主义改造的大门还是敞开着。为什么公开发布的政策和现实有这么大的区别呢？……

（3）是否符合政策规定？

且不谈强加给我的罪状不符合客观存在的事实，退一万步来说，即使真的说了反动言论，是否就必须立即处以十五年有期徒刑呢？

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以中共中央名义颁发的政策指导性文件《十六条》明文规定：

“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要充分揭露，要斗倒、斗垮、斗臭，肃清他们的影响，同时给以出路，让他们重新做人”。

“在运动中，除了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理外，大学、专科学校、中学和小学学生中的问题，一律不整”。

“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的后期酌情处理”。

《红旗》和《人民日报》1967 年元旦社论也曾指出：

“对于思想反动但无违法行为的右派分子采取讲事实、摆道理的斗争方式”。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指示得更为明确：

“凡是利用大民主或其它手段散布反动言论，一般的由革命群众组织同他们进行斗争，严重的公安部门要和革命群众相结合，及时进行调查，必要时酌情处理”。

按照上述既定政策，如果只是单纯地谈了反动言论，一般是不会处以重刑的，何况我还没有散布反动言论呢。遗憾的是中共的所谓政策从来都是忽悠人的。

综合上述三点，可以有证据地说：判决既未依据事实又不符合政策规定。

对于起诉书和判决书中强加给我的各条罪状，我将在适当的时候逐条具体辩答。如果原告和原判法院至今仍确认判决是合理的，则请驳倒我的答辩，用真凭实据揭露我的罪恶，用充分理由说明判决依据。只要证据确凿、理由

充足、符合政策，我是完全认罪的……》

十月四日，心狠手辣的周金仁又来视察，打开门以后，他站在过道里，厉言荏色地问：“写好了没有？”

我说：“还没有。”

他以呵斥的口吻说：“三天还没写完，写的什么？拿来我看看。”

我说：“等写完了再拿给你看吧。”

他凶神恶煞地嚷着：“拿来我看！”

我只好把还没有写完的东西拿给他，只有三页。他看了不到两分钟，恶狠狠地说：“出来！”跟着又给我戴上了背铐。

接着近乎歇斯底里吼叫：“不认罪，关死你！”随后用脚踹我的小腿，我两只手被铐在身后，站立不稳，跌倒在地，艰难地蠕动着身体爬进了小监。后面的门眶唧一声，重重地关上了。跟着咔嚓一声，上了大铁锁。

附注：

[1]1991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始编纂出版《中国共产党历史》，2011年修订再版，第一卷（1921-1949）第二卷（1949-1978）相继问世，全书一百七十余万字。该书并非以历史事实为依据，而是“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中央有关重要文献为依据，以新时期党历次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有关党的历史的论述为准绳，并在撰写中得到中央领导同志亲切关怀和精心指导，若干重要问题的表述均经中央批准，”（引号内的语言摘自党史的官方简介）。不依据史实而依据当权者的长官意志编写的东西能叫历史吗？中共和毛泽东是惯于颠倒黑白，歪曲历史的。

（4）戴着背铐写自述

狱卒周金仁那句话“不认罪，关死你！”不是说着玩儿的。

监狱里死人是常事，精神上的摧残、肉体上的折磨、常年处于饥饿状态、繁重的体力劳动、捆绑吊打的威胁、恶劣的生存环境、简陋到几近于无的医疗条件，都是死亡率高的原因。在周金仁、徐绍华、唐炳南等法西斯狱卒看来，死一个人不如死一头猪，平时对犯人极尽摧残折磨之能事，唐炳南的口头语之一是“死十个，数五双，当个毬疼。”被关在小监里的犯人属于“反改造”之列，更可以任意残害，以表示他们效忠于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路线。

除了死以外，精神失常更可怕。我所在的三工区四十二个犯人有十二位是精神病，那些监狱的干部骂他们是“装疯”，对这些难友无所顾忌地捆绑吊打、摧残折磨，惨不忍睹。

我当时的想法是：

一、不能死，我要活着看这个世界怎么变化。

二、保持镇定的情绪，不能精神失常。

周金仁既然说了“关死你”，我就要做好思想准备，必须有坚定的求生信念，他越想让我死，我越不能死。

我坚信中国的政局必然会有变化。极左统治不会长久。

一是毛泽东幡然悔悟，改弦更张。对国家、对人民、乃至对毛泽东自己，这是最好的结果，但是这种可能性不大，因为毛泽东误入迷途，骑虎难下，几十年形成的世界观一时难以改变，积重难返。他将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

远。

二是毛泽东造孽多端，树敌颇多。他独揽大权，把个人凌驾于党和政府之上，今日在朝害文，明日在朝害武，独断专行，朕即天下。总有一天会有人起来造反。

历史上的嬴政焚书坑儒落得骂名千载，二世而亡。毛泽东出于反动的劣根性，以暴虐治国，自誉为马克思加秦始皇。一次“反右”，将五十五万志士仁人推入苦难的深渊；将三百余万社会中坚列入另册，冠以黑五类之恶名；打倒在地还要踏上一只脚。他作恶多端，多行不义必自毙，绝不会有好下场。

他知道刘邦诛杀韩信、彭越、英布的后果是结发夫妻吕雉及其家族被陈平、周勃一网打尽，却还一意孤行，戕杀功臣，置刘少奇、彭德怀、贺龙、陶铸于死地，为江青、毛远新、李讷[1]等执掌天下扫清道路。这些罪行总归是要清算的。

他读书尤其是《资治通鉴》、《二十四史》等史籍不可谓不多，知道“民可载舟，亦能覆舟”，但是利令智昏，痴迷不悟，一心做他的家天下皇帝梦，压榨百姓，盘剥黎民。一味倒行逆施，堕落成彻头彻尾的反动分子。

他知道斯大林生前的“大清洗”留下了深深的积怨，乃至死后被掘坟暴尸，却还步其后尘，大量制造冤狱、镇压百姓，迫害无辜，实行独裁残暴的法西斯主义。他顽固地认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只有暴力才能维稳，于是随意杀戮，任意宰割。岂不知视民众为草芥者必将被人民视为寇仇。

但是他毕竟已经七十五岁了，还能横行多少年呢？他一旦死亡，类似苏联的历史就会在中国重演，人民不允许披着马克思外衣的法西斯独裁者及其后继者继续祸害国家。

我要活，活着看毛泽东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那一天。

有了坚持活下去的信念，还需要保持健康的心态。

坐监本来就是痛苦的，终日戴着背铐关小监更是非人的折磨。在多重压力下，被关小监的人，精神失常的概率很大。怎么避免呢？除了乐观、坚定以外，需要找点事做，或者找点书读。小监里无事可做，那就找书读吧。文革期间的监狱，除了毛泽东著作以外，不准保留任何其它书籍，经过多次请求，允许我拿了一套四卷本毛泽东选集、钢笔和部分纸张，从1968年11月开始，在小监里真正的闭门读书了。

小监里没有电，自然也没有灯，幸好铁窗外面钉着的木板不那么严丝合缝，木板之间的缝隙能够透进来一点光亮。遇上晴天，早上九点左右，就可以借着这点光亮看书、写字了，下午四、五点钟已难于分辨字迹，每天大约有七八个小时的白天，十六七个小时的黑夜。

白天，我用铐在背后的手把被子叠成一个方桌形状，把书摊开，放在这个“软桌子”上，一篇一篇地找到需要阅读的页面，用两本书压住书的两边，然后侧着身子逐字阅读。读完了这一页，又要把身子转过来，戴着背铐翻到下一页，继续阅读。就这样在小监里把毛泽东选集通读了几遍，毛泽东在我脑子里的形象渐渐清晰了。毛泽东生性不安于现状，具有政治野心，睿智机警，善于在错综复杂的逆境中寻找出路。然而此人城府甚深，心毒手狠，口蜜腹剑，阴险残忍。即使对同志和亲属，他也当面是人，背后是鬼。毛泽东选集里有不少话语是貌似正确的，甚至可作为箴言警句，然而他的所作所为却与这些箴言警句背道而驰，可谓好话说尽，坏事做绝。地地道道的衣冠禽兽。

坊间曾经流传过两本小册子《窃国大盗袁世凯》《人民公敌蒋介石》，还差一本《混世魔王毛泽东》。我若能活着出去，将努力填补这个空白。

通读了几遍毛泽东选集，我依然关在小监里，除了每天送饭的炊事员和十天左右来一次倒马桶的犯人以外，见不到其他人。

无人过问也无人提讯，一天一天地过着夜长昼短的日子，没有人说一句话。在黑暗里静静地坐着的时候，耳畔似乎回响着“关死你”“关死你”“关死你”那恶狠狠的吼声。

虽然我想活，艰难地支撑着日益羸弱的躯体，死神却随时可能降临。恶劣的生存环境，让我不得不考虑万一死了怎么办，我需要写一份自述，简略地记录我的历史，便于死后让父母、兄弟姐妹、亲朋好友了解我是无辜的，我是无罪的。

有了纸和笔，对于正常人来说就可以写文章了，两只手被特制的铁铐铐在背后的人能够写字吗？我艰难地摸索，先把一本《毛泽东选集》放在棉被叠成的“桌子”上，再放一张纸，然后脱掉披着的棉衣，把紧紧铐在背后的两只手从后面移到腰部右侧，歪着脖子、扭着身子，让目光看得见铺着的纸和握着的笔。这种写字的姿势很难受，脖子酸，手腕痛，但是为了写自述只好忍受，我庆幸终于戴着背铐也可以写字了。

自述篇幅不能过长，但是篇幅过短又说不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怎么压缩也需要三、五万字。一张十六开的拟稿纸通常容纳五百字，写四万字就需要八十页，既难以藏匿又不便邮寄，劳改队随时都可能检查，如果刚写出来就被查获，就起不到应有的作用了，我必须缩小字迹，压缩篇幅。经过试验，可以在一张十六开的横格纸上写五千到六千个汉字，每行横格写三行字，字迹小到不用放大镜仍可看得清楚。

从1968年12月开始在小监里戴着背铐写自述。

先打腹稿，几天的思索和背诵，自述的初稿已烂熟于胸。总的体例是给党中央的一封信，除了前言和结语以外，主要内容分成十二个部分：

- 一、概况
- 二、罪状能否成立？
- 三、为什么要将我判罪？
- 四、有关五七年的一些问题
- 五、被打成反革命的经过
- 六、审讯过程
- 七、对起诉书及判决书的回答
- 八、投入劳改以后的简况和被关入小监的原因
- 九、关入小监后的想法和做法
- 十、几点请求
- 十一、我的愿望
- 十二、我对毛主席的态度

全文约四万余字，压缩在八页十六开的横格纸上，平均每页五千余字，在小监那个恶劣的环境里，戴着背铐，每天只能写一页，八天写完一份，为了不至于被查获，一共写了三份，用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写完以后我如释重负，一份藏在睡铺下面的稻草里，一份藏在脚上穿着的鞋帮里，一份藏在棉衣里。身在小监，心在天外，痛苦地也是坚强地活着，等待着传递出去的时机。

前已述及，中共接管北平政权的时候我还是个十二岁的不懂事的孩子，青少年阶段基本上接受的是中共的教育，满脑子都是共产主义理想，刚刚建立少年先锋队我就积极申请加入，成了新中国第一批少先队员，时刻准备着做共产主义接班人。对共产党感恩戴德，对毛泽东顶礼膜拜。

“解放”初期，共产党高喊着为人民服务的口号进城，也做了一些赢民心的事，虽然“解放”后运动不断，“镇压反革命”[2]；“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三反五反[3]”；批判电影《武训传》[4]；揭露“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5]；批判胡适；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乃至“统购统销”；“农业合作化”；强制推广“双轮双铧犁”，硬性摊派苏联花布等等已经暴露了强权政治、一党专政的弊病，但是建国初期还保留了一点“联合政府”的痕迹和民主的口号，利用大棒加胡萝卜的策略，顺利地完成了所谓社会主义改造，扬言跑步进入社会主义，1956年调整了职工工资，生活水平有些许改善，周恩来做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毛泽东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口号，整个国家似乎处在欣欣向荣的阶段。因而1956年共产党在民众中的威信可谓处在顶峰时段，我加入了共青团，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个人笃信共产主义的观念也达到了顶点。

尽管1957年以后对中国共产党的所作所为有一些怀疑，文革中对司法机关的黑暗有一些了解，仍然没有对毛泽东完全失去信仰，甚至在被捕入狱、被打成反革命、判处十五年有期徒刑以后依然对共产党和毛泽东存有幻想。青少年时期接受的共产主义思想可谓根深蒂固，所以在小监里写的这份材料仍然是忠实于共产主义理想、拥护毛泽东的笔调。

这个《自述》当时写了一式三份，其中一份（寄回家那份）现在我处保存；一份被人发现，几经周折，现作为档案存于重庆长江电工厂干部处；另一份在我给家里寄出并得知确已收到的信息后自行销毁。

附注：

[1]李讷（1940-）毛泽东和江青所生女儿，1966年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毛和江安排其供职于《解放军报》报社，化名肖力（小李的谐音）。任职不久，李讷发扬造反精神，于1967年1月13日张贴“解放军报向何处去”大字报，揭批报社领导，火烧《解放军报》。1月17日此壮举得到毛泽东首肯，旋即被任命为解放军报总编领导小组组长（相当于总编辑），掌控该报社七年之久，并为第六任中央文革办事组组长。李讷前面的五任：穆欣、王力、宋琮、王广宇、阎长贵，先后被江青、陈伯达等人投入监狱，成为阶下囚。李讷在文革中秉承毛泽东和江青的旨意起了推波助澜作用。1973年进入中共十大，1974年任中共北京平谷县委书记，1975年任北京市委副书记，青云直上，不可一世，成了毛泽东的爪牙、帮凶，其罪当诛。毛泽东死亡后，李讷一度赋闲，后调入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九十年代退休。还保留了高干待遇。

[2]解放初期，国民党残余势力和部分地区民众对中共政权时有反抗，江西、四川、贵州等地甚至相当激烈，刘少奇力主武力剿杀，从而揭开了镇压反革命运动的序幕，各地相继处死、关押、管制了成千累万的人，意在巩固政权、加强统治和心理震慑。抗美援朝伊始，毛泽东认为此乃彻底清除“反革命”的“千载一时之机”，加大了镇压力度和规模，全国杀掉近百万人，大部分解放初期按照“约法八章”登记的国民党员、三青团员和相当一部分起义、投诚人员都被逮捕入狱。朱自清的儿子

子朱迈先，早年积极追随中共，抗战期间受中共指派参加国民党军队，解放战争后期策动桂北国民党军政人员起义成功，既无民愤也无血债，却在镇反运动中被当做历史反革命判处死刑。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杨奎松著有《新中国“镇压反革命运动”研究》可供参考。

[3]1951年底到1952年10月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和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斗争的统称。“三反”运动的实质是清党，排除异己；“五反”运动的实质是打击私营企业，没收其财产。此项运动巩固了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地位，为改造私营企业主做了准备。运动中捕风捉影、刑讯逼供，抓捕18万人，12万党员被开除党籍，13万余人非正常死亡（在批斗中上吊、跳楼、投河、服毒和不堪忍受折磨致死，民生公司创办人实业家卢作孚、冠生园食品公司创办人冼冠生即为其中之典型案例）。

[4]1950年，孙瑜导演、赵丹主演的一部歌颂历史上传奇人物武训“行乞办学”的影片获准公演，上映后反应不一，有人认为武训值得歌颂，有人认为武训不足为训，这本是文艺界不同意见的正常争论，毛泽东却严厉指出：《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性质，宣传了反历史唯物主义的反动思想，必须严肃批判。其真实的意图是整训知识分子。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写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是建国以后毛泽东对思想、文化界展开一系列大批判的发轫，也开启了以简单的政治视角粗暴干涉电影的先河。这场历时一年的运动也是江青初露峥嵘的序曲。

[5]中共内部权力之争，1954年高岗和饶漱石被认定为反党联盟。高岗自杀身死，饶漱石被长期监禁。刘少奇借此排除异己，掌握了部分大权。这次斗争没有涉及党外人士，伤人不多。

（5）活着出来了

1969年5月下旬某日中午，送饭的炊事员打开了小监的房门，仲夏的阳光照射到室内，眼前为之一亮。我戴着背铐领取那个玉米面馍馍和菜汤，按照常规，炊事员发完了饭菜立即关门上锁，这天却不见动静。我好奇地抬眼一看，门外站着一个不认识的人，高大魁梧，仪表堂堂，四方脸型，肌肤略显松弛，透露着养尊处优的神态，大约五十多岁，他正在不动声色地上上下下打量我。

他看了我一两分钟，开口问道：“你犯的什么罪？”

我回答说：“我不知道犯了什么罪”

他又问：“那你怎么进了监狱？”

我半闭着眼睛说：“不是我想进来的，是被抓进来的，据说是反革命”

“你被捕以前是干什么的？”看来他想刨根问底。

我说：“兵工厂的技术人员”。

他又看了我几眼，没说什么，随着退后一步，这时候炊事员从旁边过来关门上锁，我则把盛着玉米面馍馍和菜汤的瓦钵放在地铺的边上，弯着腰低着头像猪狗一样啃起了中国特色劳改犯的午间套餐。

第二天下午两点钟左右，昨天来过的这位监狱干部带着理发员来到小监，开了门以后，让我站出来，跟着理发员给我剪掉已经蓄了好几个月的长发和胡须，理发员走了，他引着我来到一棵大树的阴凉底下，他坐在藤椅上，给我安置了一个小凳，我不知道要干什么，只好任其摆布，坐在小凳上等待下

回分解。

他先发话：“你叫牛立华？”

看来昨天他见过我以后查阅了我的档案，或许还向其他狱警探询过有关我的情况，今天是有备而来。

我听他说了我的名字之后，“嗯”了一声，给以肯定的回答。

他接着说：“你谈谈怎么被判刑的”。

我于是把那一段让我念念不忘因而烂熟于胸的话在他面前背诵了一遍：“我于1966年7月12日由成都市公安局逮捕，同年9月被成都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罪判处徒刑十五年。如此长刑，必有重罪。但我既没有参加任何反革命组织，也没有杀人、放火、放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反革命行为，没有任何反动笔记、文件，没有书写和张贴反动标语、传单，没有呼喊反动口号，没有收听敌台广播或里通外国，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没有任何违法活动或抗拒表现，更重要的是我一直都是拥护毛主席的，从来没反对过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尽管原单位的某些人采用种种手段制造材料，又通过‘审理’人员千方百计地拼凑罪名，必欲将我置之于死地，他们煞费苦心也没有举出任何具体的犯罪事实，为了达到判刑的目的，于是便加给我这样一条唯一的罪状，即‘借开会暴露思想和借口向管教干部暴露思想公开讲反革命言论’，匆匆判处，投入劳改。”

我说了大约两分钟，一边说一边看着他的表情。他低垂着眼帘，目光侧视却全神贯注地听着。待我说完他紧接着问了一句：“你暴露的什么思想？”

我回答说：“这要从1957年说起”。

他在藤椅上动了动身子，看了我一眼，抬起右手示意我继续说。

我说：“好的。我从小接受的是共产主义教育，带着红领巾长大的，曾经天真地发誓做共产主义接班人，以后又参加了共青团，热爱党，热爱祖国。那时候我笃信党的教义，1957年曾经交过入党申请书，准备着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毕业分配到重庆长江电工厂，扪心自问，工作是认真的，有成名成家思想，努力钻研技术。有初生牛犊不畏虎的精神，对苏联提供的工艺参数作了有益的改动，在试制新产品的工作中小有成就，进厂一年半提升了四次工资，被推举为重庆市社会主义建设青年积极分子，厂共青团团委委员，共产党待我不薄，我当时初恋的女朋友是共产党员，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我本人从来没有想过反对共产党，做梦都不会有。但是1957年，一夜之间被划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个别人断章取义、无中生有、歪曲捏造，不做调查、不容分辩、不经核实地给我扣上了右派帽子，送劳动教养。”

“在这种情况下，我忍辱负重、委曲求全，先后为四川磨床厂和四川消防机械厂建立了两个理化实验室和热处理工段，做了大量技术工作，还利用业余时间在省部级刊物上发表多篇技术性论文和译述。1961年摘掉右派分子帽子，解除劳动教养，但是被强制性地留在劳改单位就业。从精神到肉体，从形式到内容仍然被列为专政对象。”

“1964年举国展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就是‘四清运动’。从1957年7月算起，我已经被关押了七年，摘掉帽子、解除劳教也有三年了，仍然留在劳改单位，叫做‘就业人员’连‘职工’两个字都不能用，看不到有任何出路。那时候我还不到三十岁，毛主席和共产党多次讲过‘给出路’，据说右派分子虽然被划作敌我矛盾但是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周恩来在1957年的

《政府工作报告》里明确提出对大多数右派分子‘社会主义的大门是敞开着’，这些话言犹在耳。现实的遭遇却是从带上右派帽子那一天起就被列为专政对象，摘了帽子仍然是专政对象，究竟何年何月才能够回到人民行列里来呢？”

“痛苦之余，我在‘四清’运动中写了一份材料，开宗明义第一段话是：‘我不翻案，不因个人问题否定伟大的政治运动，明确表示 1957 年的后果是我自己造成的，不把责任推之于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但是我请求党和政府查明 1957 年的实际情况，了解我从来没有反对过党的领导这一千真万确的事实。希望在摘掉帽子多年以后得到党的理解和任用，或者说谅解和宽恕，允许我真正地回到人民行列。’”

“我自己认为这是信任党和政府、顾全大局、谨小慎微的真实倾诉，对共产党没有任何危害。材料交上去以后，劳教单位未置可否，既没有肯定的答复也没有批评教育更没有批判斗争。隔了一年多，‘文化大革命’来了，这份材料却成了所谓叫嚣翻案的罪状，在找不到任何犯罪事实的情况下，以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

他听了以后沉思了一两分钟，缓慢地说：“我有一个朋友，这个人很老实。”又重复了一遍：“很老实。”

他接着说：“1957 年，我和他都是矿党委委员，因为对一个党员的处理和党委书记的意见不一致，他被划为右派，想不通，不认罪，扬言上告，说了一些过头的话，后来被判了七年有期徒刑。所以说……”

我没等他说完欲言又止的下文，便紧跟着说：“我明白，我不是有罪不认。是找不到犯了什么罪，不但我找不到，欲加之罪的那些人，也就是说四川消防机械厂、成都市公安局、成都市西城区检察院、西城区法院、成都市中级法院等单位兴师动众、煞费苦心也没有找到我的犯罪事实，所以判决书上只概括了一条罪状，即‘借开会暴露思想和借口向管教干部暴露思想公开讲反革命言论’。思想也算犯罪？言论也能定罪？这恐怕有悖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吧。”

略停顿了一下，我继续说：“被判了罪而没有认罪是很痛苦的事，我愿意认罪，就是找不到犯罪事实，不知道该怎么认，认什么罪。只要能够举出具体事实，是罪我就认，是错我就改，绝不含糊。”

他听了未知可否，随后问了一句：“你什么时候关禁闭室的？”

我说：“去年夏天，准确地说是 1968 年 8 月 11 日下午五点左右。”

“为什么呢？”他继续问。

我说：“我投入劳改以后，没有违反过任何监规纪律，没有任何违法行为。也没有想过逃跑。吃的是劳改犯人的伙食，住的是戒备森严的监狱。劳动上我是积极的，进监狱一年多学会了大部分农活，春播秋收、栽秧打谷、驾牛耕地、割草积肥，我没有落于人后。关禁闭室的唯一理由就是‘不认罪’。认罪需要一个过程，判处十五年徒刑意味着需要十五年才能够改造好，一进监狱就立地成佛，不现实吧？十三队去年来了一个犯人尹显慧，投入劳改没几天就在大会上表示如何认罪，怎么老老实实地接受改造，结果找机会逃跑了，至今还没有抓回来。‘不认罪’不是关禁闭的理由，究竟为什么日夜戴着手铐关禁闭，要十三队的管教干部和指导员周金仁才知道，我搞不清楚。”

他很沉得住气，一直不打断我的说话，等我讲完了，他慢条斯理地讲了许多大道理，让我好好改造，平时要服从监管干部的管教，努力劳动等等。

随后又把我押送回了小监，继续带着背铐关禁闭。

事后我才知道，和我谈话的这个人叫宋晓光，以前是某劳改煤矿的党委书记，文革中被批斗，据说犯了思想右倾错误，被下放到苗溪茶场当一般干部使用，以观后效。人虽然被打倒了，原来的等级高，威信还在，他说的话在苗溪茶场十三队还有别人不可替代的作用。

过了大约三四天，下午出工的时候，狱卒徐绍华打开了小监的门。我是三工区的犯人，他是三工区的主管干部，关我禁闭那天他在场，但是自从我关进来以后，九个月没有见过他的面，这一天他开了门没说多余的话，只说了一句“出去劳动”。随后给我打开戴了八九个月的铐子。在此之前听说过，反铐戴到一个月以上，肩关节多半会发生错位，打开铐子后不能急于把手臂移到前面来，如果急于求成很可能脱臼。我小心翼翼地移动双手，只觉得肩肘之间一阵阵剧痛，勉强把手臂移到左右胸侧，休息一会儿再缓缓前移，进二退一，伴随着抽筋似的疼痛，逐渐地把手臂从后背移到了前胸，但两只手还是靠不拢，只好任他去吧。狱卒徐绍华催促着我快点走，把我押送到胡家坪工地。

山上的犯人正在栽红苕，看见我来了，不由得露出惊讶的目光，可是没有一个人说话。徐绍华到工棚歇凉去了，犯人值星员许诚给我安排背红苕藤的活路，我拿起背篋往苗圃走去，一边走着一边自言自语地说：“好久没到这方来”[1]。相熟的难友看我出了小监还是那么乐观，纷纷点头示意但还是不敢说话，个别胆子大的只说一句“长白了”，“长胖了”。我心里想，那是长期不见太阳的惨白，黑牢禁闭的浮肿。然而还是感谢难友们的一番好意。

我总算活着出了小监。

附注：

[1]《好久没到这方来》是一首非常流行的四川民歌，歌词有“好久没到这方来哎，唱起歌儿过山崖哎，站在山坡望一望，凉风悠悠吹过来哎。好久没到这方来哎，这方的姑娘长成材哎，呀儿海棠花儿香，么妹担水送茶来哎… …”

（6）一场虚惊

出了小监，第一件事就是把《自述》藏好，一份藏在铺底下的稻草里，一份缝在棉衣里，一份用塑料薄膜包好埋在楼梯过道的下面。只要交出去一封就算没有白费心机。不料其中一份被人发现，竟然引起一场虚惊。

那是1970年9月，一天上午，我正在工地劳动，大约十点多钟，狱卒徐绍华上得山来，匆匆在工地转了一遍就坐下来找我谈话。他劈头盖脸地问：“你最近写了什么东西？”

我惊了一下，最近没写什么呀，是谁做的虚假汇报呢？莫非我刚刚寄出去那封信被监狱发觉了，怪不得家里没有回信呢，但在没有确证前，不能承认。于是佯装思索一阵回答说：我最近没写什么东西。

他楞着眼睛说：“没写什么东西！人民政府没根据不会问你！”

我暗暗的想，真的没写过，不怕他诈唬。但要设法套出他的话来，搞清楚他突然问询的原因。他似乎有所警觉，我也东支西吾地拖延时间，十二点了，收工。

回到监舍大院，领取了玉米面馍，三下五除二吃完了，连忙跑到监舍的楼道下面，用手一刨，糟糕！我藏的那份材料不见了。那份材料除了说明我

的身世和反右运动、文革运动中的个人遭遇以外，还对公检法和监狱的违法行为做了无情的揭露，一旦追究起来，后果不堪设想，那时候杀一个人就像割一根韭菜一样。但事已至此，愁，无济于事，听之任之吧。好在我上个月乘外出背粮之机寄回家里那一份没被发现。只要家里能收到，知道我这么多年没干过任何伤天害理的事就行了。

下午继续在山上干活，约莫四点钟，徐绍华来到胡家坪，继续找我谈话。这一回不等他多问，我说：“写过东西”，他问：“上午为什么不交代”我说：“上午徐干事问我最近写过什么东西，最近真的没写过，1968年关在小监的时候写过，已经两年多了，一时想不起来了”他进一步追问：“写的什么？”我说：“就是不认罪嘛，具体内容我也记不清楚了，徐干事看看就知道了”他说：“他妈的，字写得那么小，看都看不清”听了他这句话，证明拿在他手里的就是我埋在楼道里的那份《自述》，心里反而踏实了，我笑着回答说：“用放大镜嘛”

从那次谈话以后，我就等待着处理。集训、吊打、加刑、枪毙皆有可能。即来者则安之，老子不怕。要紧的是确认家里是否收到了那封信，如果没收到，还要想方设法尽快再交一次，否则夜长梦多前功尽弃就可惜了。

六、中共九大——愚人节的滑稽戏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是1956年9月15日至27日在北京召开的。

除了1026名正式代表、107名候补代表以外，还邀请了五十九个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劳动党和人民革命党代表团以及国内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列席大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也列席了会议，可谓盛况空前。当时国内各大报刊都及时报道宣传，刊载代表们的发言。时至今日，中共历次党代会也没有达到过这样的水平，也可谓绝后了。

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国内的主要矛盾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的办法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实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大会作出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必须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的重大战略决策。强调在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的情况下，国家的主要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全党要集中力量去发展生产力。

大会通过了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和新党章。规定了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强调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

中共召开第八次党代会期间，绝大多数人民，尤其是党团员和中青年，都是兴高采烈的，怀着满腔热情准备着为国家的独立、进步、民主、富强贡献自己的力量。

八大期间，我在重庆长江电工厂冶金科，科里的同事们多数都自费订阅了《人民日报》增刊，九点左右报纸来了，人们喜笑颜开地阅读着、讨论着，对中国共产党怀着崇敬和信任，对未来充满着希望。

八大过后，好景不长。紧跟着就是以言定罪甚至无言也妄加罪名的“反

右派运动”，接下来就是“大跃进”大饥荒，随着“反右倾”，“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四清”，“文化大革命”大浩劫。利令智昏的毛泽东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中共党内你整我、我整你，你死我活，忙得不亦乐乎，老百姓跟着受罪，党章里写着的五年召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规定早已被毛泽东抛到九霄云外，只顾听山呼万岁去了。

1956 到 1969 年，隔了十三年，突然听到了中共要召开九大的消息。打倒了刘少奇，外无战事，内无纷争，该与民修生养息和平建国了吧。

毛泽东选了一个好日子，1969 年 4 月 1 日，愚人节这一天，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了。

我那时戴着背铐关在苗溪茶场第十三中队黑暗潮湿的小监里。平时只有晚上才广播的高音喇叭，在“九大”召开的那几天里，几乎是终日播报，好像不管什么话多重复几遍就是真理似的。

听得最多的就是由陕北小调《荞麦花》《芝麻油》[1]改编的《东方红》，“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一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呼而嗨呀，他是人民的大救星”。被共产党奉为无产阶级战歌，甚至曾作为原苏联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歌的《国际歌》唱的是“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东方红》反其道而行之，完全背离了《国际歌》从来就没有救世主的提法，大唱特唱“大救星”，把人都搞糊涂了，一个说没有救世主，一个说有大救星，不知道哪个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或许原本就都是愚弄人、欺骗人的鬼话。

白莲教的“明王出世”，洪秀全的“原道救世”，都是自誉为救世主来到凡间普救众生的，其实只不过是梦想当皇帝、蒙蔽群众、煽惑百姓的邪教而已。

“九大”期间还有一首歌紧随着《东方红》播送，歌词大致是：“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这首歌以同一旋律不同节奏的男声、女声、独唱、合唱的形式反复四遍，可谓不厌其烦。毛泽东坐在“九大”会场的交椅上听着这首歌，自然是别有一番滋味儿在心头吧。九大过了几十年，我反复琢磨，无论如何联想，使多少劲也看不出毛泽东怎么继承、捍卫、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什么崭新的阶段，看到的只是毛泽东大力强化个人独裁，不顾一切地歪曲篡改马克思主义，实行封建加法西斯主义。

再一首歌就是《大海航行靠舵手》。1964 年 6 月周恩来在哈尔滨陪同朝鲜的崔庸健出席晚会时听了东北演员王双印[2]演唱的这首歌曲，随即用心良苦地着力推荐，并亲自修改歌词，定稿为“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雨露滋润禾苗壮，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鱼儿离不开水呀，瓜儿离不开秧，革命群众离不开共产党**[3]，毛泽东思想是不落的太阳”。在这首歌里，毛泽东既是舵手，又是太阳，还是雨露，结尾一句“毛泽东思想是不落的太阳”与造神运动中的山呼“万岁”，相互呼应，可见周恩来对毛泽东是何等的奴颜媚骨、投其所好、阿谀逢迎。1967 年林彪取两句歌词“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首次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题词，更给这首歌增添了政治色彩，于是传唱大江南北，红极一时。

除了每天播放这几首歌以外，再就是宣扬中共九大是团结的大会，胜利

的大会，而对会议的内容则秘而不宣，不知道葫芦里究竟装的什么药。

2003年，《炎黄春秋》和《振华军事网》刊载了迟泽厚写的九大亲历记，读来颇有感触，择要摘录如下，以鉴史知今。（小标题和极少注释是笔者加的）

（1）何时召开党代会，任凭毛泽东随心所欲

1969年4月1日至24日，即在全国（台湾省除外）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先后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实现了“全国山河一片红”半年之后，“在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的时刻”，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了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八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规定：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每五年举行一次。“八大”是1956年开的，到召开“九大”时，已经过去十三年了。

毛泽东不发话，谁也不敢提召开九大的人事。

为什么不能按时或稍微早些召开“九大”？

江青在一次接见群众组织代表时揭开了其中奥秘：开会的时机要有利于“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她念了“文革”中“揪”出来的、以刘少奇为首被认定是“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者”等一长串名单，说这些人都是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如果是在“文革”前召开“九大”，那么，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将进入第九届中央委员会，有的还会进入核心领导机构，这样，就会大权旁落，“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岂不也要落空？

江青讲到“现在”，不无得意地说，经过这场“文化大革命”，这些人都现出了原形，一个个都被斗倒批臭，问题自然都解决了，再开“九大”，进入中央的自然都是“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人了。

其实，推迟也罢，提前也罢，两千多万党员的意见是起不了丝毫作用的，任凭毛泽东随心所欲。一切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需要而定，对“无产阶级司令部”最有利的时机，就是最佳的开会时机。

（2）滴水不漏的保密工作令境外媒体惊讶

在1969年4月1日晚由新华社发布“九大”开幕的新闻公报之前，关于会议的筹备情况，对外采取了极为严格的保密措施。

出席“九大”的代表并不是选举产生的，而是由各级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推荐出来的。其中不少是红卫兵造反派的头头，向来习惯无拘无束，因此很难对群众保密。为了切断与外界的一切联系，除极少数军政高级领导干部中的代表外，全体代表都在大会之前的三个多月，便以省市自治区为单位秘密集中，进行全封闭式的学习，随时准备出席大会。

广东省的代表集中在四面环水与省委机关一桥相连的小岛宾馆。眼看年关将近，进京还没消息，韶关地区的一位瑶族代表不干了，他提上自己的小包，不辞而别，桥头的哨兵把他拦住。学习班负责人闻讯大吃一惊，他问这位代表：“你不想到北京开会见伟大领袖毛主席吗？”这位代表一本正经地说：“快过年了，我家里就我一个男人，我不回去，过年的猪谁杀呀？”。在这位老老实实的农民代表心目中，那长肥了的过年猪可比毛泽东的位置重要得多了。

一日复一日，一月又一月，终于盼来了进京通知。参加“九大”的代表分住北京饭店、前门饭店和京西宾馆。大会秘书处设在京西宾馆。各宾馆警卫森严，大门紧闭，代表一律不准外出；室内电话全部撤消，靠街的窗户不得打开，晚上必须拉上窗帘，执政党的会议比地下党还秘密。

终于等到4月1日下午举行大会，会场在人民大会堂。

六十年代的人民大会堂，只用于举行大型会议和中央领导人办公、接见活动，从不对外开放。平时四周遍布岗哨，不准群众接近，偏偏它又处于北京市区中心，过往群众无不对它充满了神秘感。

一千五百多名代表和几百名大会工作人员齐集人民大会堂，要想不让外界察觉，实在是一件不容易事。大会的组织者在这方面可谓煞费苦心。上千人的大会最难保密的是乘车和进入会场，大会秘书处为此作了周密部署：住各宾馆的代表一律乘大交通车，每车四十五人，定车定人，各代表团按顺序登车。登车前，各代表团在宾馆楼下大厅集中列队候车，大交通车每次开来两辆，车门面向宾馆，刚好挡住大门，车刚停稳，门卫便打开紧闭的大门，代表们迅速登车，此后每隔三四分钟，就有两辆大交通车开来。如此每个宾馆只需有六七次，约半小时左右即可将全部代表接走。行车路线是精心安排的。以住在北京饭店的代表为例，从他们的住处乘车直开人民大会堂，距离不到一公里，行车时间只需两三分钟。但为了掩人耳目，代表们的车子却背道而驶，向东开到东单，转而向南到崇文门沿前门东大街、西大街西行，再右转北新华街，兜了个大圈子，最后开进人民大会堂侧门院内停车，代表们就可隐蔽从容地由便门进入会场。

会场用厚厚的深色窗帘把门窗遮盖得严严实实，看不到任何灯光人影，功夫下到这般地步，堪称滴水不漏。

当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员，以高亢激动的声音播出“九大”开幕的新闻时，确实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一些外国通讯社、报纸迅速报道了大会消息，或发表评论，对没有预先得知开会消息感到有些惊讶。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一些中央领导人对此都深感高兴，好像是打了一场大胜仗。

（3）选举主席团轻松活泼，形同儿戏

一般光明磊落的大会，多半是在上午召开。中共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反其道而行之，于临近日薄西山的下午五时开始。

毛泽东首先宣布大会议事日程，接着选举大会主席团，共一百七十六人，名单已提前发给全体代表。毛泽东问大家赞成不赞成？下面报以暴风雨般的掌声，于是举手通过。

然后是选举主席团主席、副主席和主席团秘书长。这时毛泽东面带微笑地说：“什么人合适呀？我提议林彪同志当主席团主席，大家同意不同意？”代表们发出会心的笑声。林彪赶紧伸着脖子，把嘴向扩音机前凑了凑，大声说：“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当主席团主席！”毛泽东又说：“林彪同志当主席，我当副主席，好不好？”林彪连忙站起来，笑着对大家说：“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当主席团主席，大家同意请举手！”代表们笑着，哗啦一下子高高举起右臂，林彪高喊：“通过！”会场又响起热烈掌声，接着是高呼“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

毛泽东接着说：“那就林彪同志当主席团副主席，赞成的请举手！”代表们再次举手，热烈鼓掌。

毛泽东又说：“我提议周恩来同志当主席团秘书长，赞成的请举手！”代表们又举手，鼓掌。毛泽东高兴地说：“好，通过！”

（4）个人崇拜较之追星族有过之而无不及

4月1日开第一次全体会议，毛泽东致开幕词，口号声此伏彼起，讲话二十几分钟，竟被打断数十次之多。一些人也不管毛泽东讲到哪里，甚至一

句话还没讲完，便站起来领呼口号。那时的口号都是成系列的，一喊就是一串，不能中途停下，有人领喊，大家就得跟着呼喊，而且要喊出精神来，不然就是缺乏“阶级感情”。

一些党龄较长特别是来自军队和地方干部中的代表，盲目个人崇拜浸透了骨髓，深感听毛泽东讲话之机会极为难得，都全神贯注聆听“伟大领袖”讲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然而，他们的愿望却被无尽的口号声浪所破坏。

毛泽东一开始就讲党的历史，从“一大”讲起，这是一个很有讲头的大题目。但是，会场的气氛却对他的讲话造成极大干扰，他也逐渐有些不耐烦了，不得不草草打住。最后，经大会秘书处整理的毛泽东讲话稿仅有六百四十九个字。他实际讲话时间大大短于呼口号的时间。

会议开了二十多天，终于要闭幕了。

4月24日，一个代表投票后，走向主席台，两手一撑跃了上去，快步走向前排中央，依次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握手。霎时间，许多青年代表从投票队列或座位上向主席台跑去，躲在主席台后面的警卫人员纷纷出来阻挡，但还有不少人成功跑到毛泽东等人面前握上了手，成了“最幸福的人”[3]。最后，工作人员组成一道人墙，才使局面得以控制。大会结束时，毛泽东等人刚一离席，坐在前排的许多代表蜂拥而上，把台上的茶杯、铅笔、纸张全部抢光。土匪与痞子的本性暴露无遗。充分彰显出党代表的本色。

(5) 选举结果尽在掌握之中

毛泽东在4月11日和4月23日两次会上都谈到党内“反对派”，或曰“对立面”的问题。他点了十个人的名字：陈云、朱德、李富春、李先念、聂荣臻、叶剑英、陈毅、徐向前、邓子恢、张鼎丞。

但是，毛泽东却主张把这些人作为对立面选进九届中央委员会里。他说：“不把这几个犯错误的老同志选进去不好。党内有几个反对派有什么要紧？你反你的嘛！”

许世友忿忿不平地说：“反一两年可以，反几十年怎么行！不过，你们要坚决听主席的，主席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办！”

毛泽东还说：“开‘七大’时，王明、张闻天他们就不相信我们，以为非把他们打倒不可，结果，选了他们还是犯错误。但是，如果不选他们，可能坏得更快。他们不改怎么办？地球还不是照样转！”。

但是，把这些“对立面”选进中央委员会，并不是无条件的。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主席团秘书处作出规定：既要保证这十个人当选，又不能让他们得到高票，据说这样才能使这些人认识到自己错误的严重性，促使他们转化。为此，秘书处给各代表团下达任务，代表团把任务下达给各代表，哪些人投这些人的票，哪些人不投，严格按“任务”投票，不得有误。明确了自己的任务后，必须以“三忠于”的高度、以党性保证，按照要求投票。有的代表团还作了演练。对此，秘书处还不放心，于23日晚以大组为单位进行了“预选”。

24日下午正式选举，到会代表1510人，毛泽东获全票，周恩来获1509票，林彪为表示不能与毛泽东平起平坐，与叶群投了自己的反对票，获1508票。风头正健的江青获1502票（虽然只少了八票，但这八个敢于在江青名字上面打“×”的人，却有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的危险。江青是很看重这八票的，事后曾秘密作过调查），张春桥获1496票。十名“对立面”得票情况是：朱德809票，陈云815票，李富春886票，陈毅867票，徐向前808票，

聂荣臻 838 票，叶剑英 821 票，邓子恢 827 票，李先念 922 票，张鼎丞 1099 票。朱德得票率约 53.6%，刚刚超过半数。

(6) 毛泽东与“王八蛋”齐名

选举中还有一件趣事，当监票人王良恩宣布中央委员候选人、工人代表王白旦以全票当选时，会场立即响起一片议论声。

在这次选举中，只有两个人得了全票，一个是毛泽东，另一个就是工人代表王白旦。

此人在政治上的崛起颇有传奇色彩。他 1935 年出生在太行山区，是地地道道的农民，1949 年后，先后在太原钢厂和齐齐哈尔钢厂当工人，劳动积极，人缘好。绰号“王八蛋”，他毫不在意。

1969 年九大召开以前，上级把一名参加九大的名额分配到齐齐哈尔钢厂，条件是：必须是有七年以上党龄的炼钢工人。那时厂革委会中意的人选，要么不是党员，要么是党龄不到七年，阴差阳错的，王白旦就成了九大的代表。

更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他不但当了代表，还一下子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原来，当时王白旦只是一名普通的工人，在全国没有名气，谁也不会想到他会被选上中央委员，也都没有刻意把他的名字划掉，而他自己也不懂得谦虚，全部选票一律打“√”，选了自己，结果使自己成了一百七十六名中央委员中，得票数唯一与毛泽东平起平坐的人。当大会宣布王白旦以全票当选时，全场顿时议论纷纷，怎么王八蛋跟伟大领袖得票一样多呢？

散会后许多人都愤愤不平地大骂这位工人太不谦虚：“你比林副主席还能！”

九大闭幕，王白旦成了中共中央委员，一下子当上了齐齐哈尔钢厂的党委副书记。毛泽东死了以后，经过审查，还真没找到他和四人帮有丝毫勾结的证据。王白旦又回归原位，当了炉前工。

附注：

[1]《芝麻油》是一首暗喻性爱的情歌，歌词有“芝麻油，白菜心，要吃豆角抽筋。三天不见想死人，呼而嗨哟，哎呀我的那三哥哥”。《荞麦花》的歌词也甚为低俗，“荞麦花，开满地，那天遇见一个当兵的，一把拉奴到高粱地，呼而嗨哟，亲了一个豆芽子嘴”。1943 年冬陕北农民李有源将就上述民歌曲调改填歌词，又经过延安诸多音乐人整理、删修，成了歌颂毛泽东的《东方红》。

[2] 王双印（1932-1999）哈尔滨歌剧院独唱演员。1964 年 6 月，周恩来陪同朝鲜的崔庸健到哈尔滨访问。在迎宾晚会上听了这首歌曲。经周恩来极力推荐，对歌词和曲谱进行了改写，随即《大海航行靠舵手》唱红全国，王双印也成为全国人大代表、中共黑龙江省委委员、省文化局副局长，风光一时。“四人帮”垮台以后，王双印被开除党籍隔离审查，在万般无奈下跳楼自杀，幸被一棵大树挡住，未失去性命。审查了十年，1987 年宣布恢复党籍，不幸的是夫妻双双年逾花甲先后患脑梗塞，半身不遂，口齿不清，生活十分艰难，在痛苦中拖到 1999 年去世。

[3] 这句歌词把群众比作鱼，共产党比作水。是极为荒谬的。中共是 1920 年成立的，中华民族旧石器时代即在这片土地上繁衍，距今已数十万年，有文字记载的也有五千年，那时候中国没有共产党，也就是还没有鱼儿离不开的水，难道那时的广大群众都成了干鱼。岂不是对中华民族的恶意毁谤。

[4] 九大前后那几年，跟毛泽东握手比摸老虎屁股还难，有幸握到了以后，不

能洗手，否则把仙气洗掉了，闹了不少今人难以想象的笑话，《人民日报》刊载了多篇报道，应该载入史册。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翻阅一下。

七、劳改轶事

(1) 历时三年冒险交出了一封信

在小监里写了一式三份《自述》，幸好当时没被发觉。

1969年5月从小监里放出来以后被编在严管组，集体劳动。出工排队点名，收工点名排队，在工地上有狱卒监督，一日几次清查人数，出工、收工的路上有狱警押解，干了一天的重体力劳动以后，被关在舍房里不能外出，没有单独活动的机会。

劳改犯人每月最多可以交一封信。均须经过分队干部严格检查，不准超过三百字，不准透露监狱内任何信息，不准说监狱里吃不饱，不准说监狱里捆绑吊打，不准谈案情，甚至不准向家属如实相告被判了多少年徒刑。

那时中国所有的劳改队无论是座落在车水马龙的城市还是座落在荒凉冷僻的山区，对外均以信箱相称。比如，成都的消防机械厂是成都市216信箱，成都动力机械厂是217信箱，芦山县的苗溪茶场是雅安631信箱。外地寄往苗溪茶场的包裹、信函均只送达到场部，各中队每月到场部收取一次，经过狱警拆开并严格检查后发放给犯人。一般只准寄衣物，不准寄食物。假如个别犯人的亲属或朋友寄来罐头，必须打开，狱卒用勺子伸进去搅拌，确认无异物，才允许领取；寄来的药物也要打开瓶子，把药片或药粉倒在桌子上，拨来拨去，看是否有所夹带，狱卒确定无疑后才有可能发给本人。还时常发生家属寄来包裹却没有收到的现象，明知有鬼也不敢多问，否则“吃不了兜着走”。

犯人交寄的信件送到分队长那里后，可能需十天半月凑够一定数量，或分队长到场部办事才顺便丢到邮筒里，等芦山县邮局的邮递员取走大约就二十来天了，劳改队没有一个公开安放的信筒或邮箱，个人绝无交信的可能。要想把写好的《自述》寄出去真是难上加难。

我需要想办法把信交出去，让家里的父母知道他们的孩子没有犯罪，知道反右和文革的真实情况，知道我从来没有反对过中国共产党（我的哥哥和姐姐、姐夫是党员，弟弟妹妹中好几个共青团员），也没有做过危害国家的事。判处重刑的罪名是“莫须有”，历史将宣告我无罪。

要想私自交信，必须有单独行动的机会，当时对我来说是完全不可能的。找其他有单独劳动机会的犯人或就业人员呢，也办不到，谁也不愿意为一个交情不深的人承担风险。刑满释放留场就业的人员星期日休息时经干警批准可以到芦山县城，县城有邮政局可以交信，但是我认识的就业人员极少，辗转托人又担心暴露，而且我才被关了九个月的小监，再加上被批斗的时候曾高声喊出“我不能向犯人低头”，由此而扬名各个中队，提起我的名字来令人谈虎色变，更没有人敢于为我交信了，看来只有自己想办法了。

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了，我焦急而又耐心地寻找机会，一天一天又一天，等了一年有余，竟然无隙可乘，难、难、难。

机会终于来了，那就是外出背粮。

十三队犯人的口粮由国家粮站供应，每人每月36斤玉米，将近400人的口粮有14000多斤，劳改队是舍不得用汽车的，需要派人到粮站背回来。

粮站在芦山县思延乡，是河谷平坝地区，距离十三队十二公里左右，山

路约七公里，平路约五公里。去的时候背着背架子从十三队出发，先走一段上坡路，翻越高家山，沿着山间的崎岖小路下山，山下就是宝兴河，穿过河上长约一百米的铁索桥，再走四公里就是思延粮站。背架子是中国西南山区民众常用的背负工具，据说已有两千年历史，用硬质木料制造，由弯弓、撑架、拄拐等组成。比北方常用的背篋适应性强，可以背一丈多长的物件也可以背割下来的乱草，可以背石头也可以背砖瓦，可以背活猪也可以背人。背篋的重心在人体之外，有一个扭矩，背起来费力，背架子的重心可以调整到人体中部垂线上，扭矩为零，背起来显得省力，用拄拐支在下面随时可以歇肩，尤其适应陡峭的山路。

每次背粮派一百二十人，每人要背负 120 斤左右，往返一共二十四公里，早晨七点多钟出发，下午五点多钟才能回来。回来的时候上坡路居多，又是负重行走，没有一个人不累得气喘吁吁，即使冬天也是汗流浹背，体力弱一点的难于承担这样艰苦的劳动，每逢背粮，多数犯人都有畏难情绪，狱警只好点名硬派。我身体比较瘦弱，又戴着眼镜，看起来显得斯文，一般来说是不会派我背粮的。他不是心疼我，一是怕我乘机逃跑，二是怕我背不动，万一过铁索桥的时候摇摇晃晃的掉到河里，人死了是小事一桩，过二十年又是一条好汉，损失了一百多斤玉米可不得了，那是国家财产呀。

1970 年 7 月，正是暑热之际，要去粮站背粮，早上七点集合，凑了一百零几个人，还差十来个，狱卒徐绍华的眼神在犯人队列里扫来扫去，寻找着可以派遣的人员，这时我大声说：“报告徐干事，我去”，他看了我两眼，一挥，让我站到运粮队列。我之所以明明知道这是又苦又累的差事还要主动报名，就是想出去走走，看看监狱外面的世界，进劳改队快三年了，一次都没有出去过，太郁闷了，当然更想找个机会出去看看有没有交信的可能。

人数凑齐了，列队到工具室和库房保管室，准备好背架子和麻袋。带队的狱卒是徐绍华和高松，另外派了四名武警持枪押运，大队人马立即出发，直奔思延粮站。

去的时候很轻松，背上只有一个空背架子，不过五六斤重，外面的空气似乎也比劳改队的空气新鲜，虽说是翻山越岭却一点也不累。

高家山林木茂密，山顶上小杉树、小柏树错落成林，据说原来有许多参天大树，1958 年大炼钢铁的时候全砍光了，现在只能看到胳膊粗的小树。山腰间散落着一些耕地，坡地里的玉米已经有一人多高，间或看到一两个农民在地里劳作，都离我们的队伍很远，他们对过路的劳改队已经见惯不惊了。向阳的山坡上稀稀拉拉的农家住户掩映在箭竹和慈竹丛中，旁边是几块菜地。这里的农民很少下山，大都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

高家山位于峡谷边缘，翻过高家山就是铜头峡，1966 年苗溪茶场的犯人在这里修建了一座装机容量 1000 千瓦的小型水电站，供给监狱的电力。（1993 年在铜头峡动工修建了一座装机容量 8 万千瓦的中型水电站，属四川省电力局管辖，已投入运行）。

下了高家山就能看见宝兴河以及横在峡谷两岸的铁索桥了，我一直在大城市生活，从来没有走过铁索桥，心里有点发怵，先看看别人怎么过吧，只见当地的老乡无论老少、无论性别、踏铁索桥如履平地，出来背粮的犯人虽然有些不适应，但绝大多数都走过多次，也都毫不犹豫地走了过去，这给我增加了一点胆量，别人能过我就能过。

我大胆地走上铁索桥，才走了二十米就感到桥身的晃动，心里不免着慌，

低头一看，三四十米深的河谷中激流汹涌，桥上的木板年久失修，空档不断，一失足就会坠入深渊，两腿不禁发颤，我慢慢地靠边，用一只手扶着铁索，犹如抓住了救命的稻草，缓缓地移动着脚步，真后悔报名背粮。这时候后面有经验的难友大声提醒我：“不要靠边，走中间”，“抬起头来，不要看河水，看对面”。我回到了铁索桥的中间，小心翼翼地往前走，后面不断地有人上桥走动，铁索越加晃得厉害，我在众人的鼓励和保护下终于提心吊胆地到达了对岸。难友们对我说：“第一回都这样，破了胆就好了”，还说“走边上更危险，上下两根铁链子之间的距离很大，没有防护网，心里一发慌，身子一歪，很容易掉下去，走中间即使摔倒了，身子也在桥上，爬起来就是了”。这话很有道理。

过了铁索桥，地势豁然开朗，思延乡一马平川，全乡面积 24 平方公里，约占全县面积的 2%，人口竟占全县的 10%，是芦山县著名的产粮区，盛产水稻、莲藕、生猪，我们沿着平坦的土路加速前行，大约一个小时到了粮站。

粮站当天不对外办公，宽敞的院子里都是劳改队来的人，四个武警持枪站在院子的四角，狱卒徐绍华守着过秤，几个犯人忙着撮玉米、装麻袋。狱卒高松手里拿着一根木棍，既可以当拐杖用又可以当武器用，他比较爱打人的，犯人见了他都尽量离远点。他在院子里来回走动、东张西望，监视着一百多个背粮的犯人。粮食装好了，每人一袋安放在背架子上，一声令下“出发”，犯人们把载有一麻袋玉米的背架子背上肩，鱼贯而行，点名报数，陆陆续续地走出了粮站。

一个多小时以后到了铁索桥跟前，这里叫铜头场，背粮的人在这里放下背架子短暂休息，恢复一下体力，等会儿过了铁索桥就要一路上坡了。铜头场只是长不过二十米，宽约二米的一条乡间街道，街道东侧有四个店铺，一个卖油盐酱醋，一个卖文具纸张，一个卖糖果卷烟，一个卖毛巾鞋袜等杂货。西侧是一个建有围墙的小学校，来往行人很少。再往北有几户农家小院，距离这里已经是百米开外了。

让我眼睛一亮的是文具店的门柱上挂着一个绿色的邮箱，真有点喜出望外，下次背粮我还要来，就在这里交信。我仔细看了看周围的地形，从思延乡到铜头场的大路（大约三米宽的土路）是东西走向的，铜头场在大路的左侧，南北走向，街道两侧都有房屋，在大路上不拐弯看不见街上的人物和动静，只要躲过了狱卒的视线，交封信不成问题。

铜头场地域狭小，容纳不了一百多人，后面的人相继地来，前面到的陆续起身，到了铁索桥我不敢往上走，这时候难友伍大云[1]说：“你在这儿等着，我背过去，回来帮你背”，我闪在一边看着他们过桥。伍大云几分钟就走过去了，把他的背架子放在对岸，跑回来帮我背粮过桥，我空手跟在他后面亦步亦趋地走过了晃晃悠悠的铁索桥，心里对伍大云十分感激。

到了河对岸，我接过自己的背架子开始负重上山，一百多人的背粮队伍，年龄大小不一，体力强弱有别，有的走得快，有的走得慢，前前后后拉开了大约五六百米的距离。两名狱卒和四个持枪武警走在队伍的后半部，出来背粮的大多数都是关押了很久的犯人，从来没有发生过背粮途中逃跑的事，他们的监视略有放松。真正想越狱逃跑的人也不会选择这个时机，前后都有人，相隔不过三五米，况且只有独路一条，谁脱离了队伍马上就会被发现。

我在队伍的中间吃力地一步一步往前走，每走二三百米打着拄拐喘口气，休息一两分钟。平时在队里劳动也要背运，天旱时背水上山，追肥时背粪下

地，盖房子时背砖瓦石灰，收获时背玉米、背油菜、背麦子、背红苕等等，山区的运输基本是靠人力背运，可以说是必须锻炼的基本功。力气大的人能够背一百五六十公斤，我的最高纪录是背三十五匹砖，大约九十五公斤。但平时背运的距离一般不超过两公里，外出背粮是负重长途跋涉十二公里，而且大部分是上坡路，有的地方还十分陡峭，每登一步都要付出极大的体力，遇到比较高的梯坎，要登几次才能跨上去。背粮的路上，可谓筋疲力尽，汗水长流，衣服早已打湿，索性光着膀子只穿一条短裤，脑门上系着一圈稻草，它的作用是让头上的汗水沿着稻草往下流，以免流在眼睛里看不清楚路。路一步一步地走，汗一滴一滴的流，早晨出来之前吃了一个玉米馍和一勺菜，中午在粮站干啃了一个玉米馍，连一口水都没有喝，七月的天气暑热未尽，肩上一百多斤，脚下十多里路，直走得口干舌燥，毛焦火辣，腿酸脚软，可是山间的路上哪里找得到水喝呢？脑子里想着前面就是梅林，不料此时臆想望梅止渴竟然无济于事，嘴里仍然乾乾的，一点口水也分泌不出来，只好默默地忍受，还要背着一百多斤继续往前走。当时心里想，上辈子不知道造了多少孽这辈子要受这种折磨。

下午五点钟左右总算到了队部，交了粮食如释重负，第一件事是舀一瓢冷水饱饱地喝上几大口，然后拖着精疲力尽的身子回到监舍，用毛巾擦擦汗，倒在地铺上张口闭眼休息几分钟，那个累劲儿笔墨难以形容。

背粮是很苦的，但下次我还要去，发现了邮箱是这次背粮的最大收获。

估计八月中旬又要去思延粮站背粮，几天前我就把一份写好的自述装在信封里，掂了掂分量大约不会超重，然后封好、贴上八分钱邮票，准备着随时可以交寄。

听说明天背粮，我十分兴奋。那天我穿了一件劳改服，把信装在衣服里面专门缝制的口袋里，戴了一顶破草帽，准备好个人的背架子和大家一起出发了。

到了粮站，我对难友谢显荣[2]说：“今天我准备在铜头场交封信，你给我掩护着点”。

装好粮食以后我和谢显荣争先出发，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几位体力比较好的难友随即跟上，第一方队只有十来个人，在我俩的带动下越走越快，大家想着走快点到铜头场可以多休息一会儿，逐渐地和后面的队伍拉开了距离。狱卒要照看大队人马，离我们大约有两三百米，因为地处平坝，视野开阔，走在前面的十来个人仍在视力所及的范围之内，狱卒身上有枪，子弹的速度是人步行速度的几千倍，所以他们也不着急追赶，乐得我们自由自在。

到了铜头场，我把背架子放在街沿上，手里拿着草帽往小商店走去，谢显荣在路口转弯处盯着后面的来人。我走到文具店门口，回头看了看，把信取出来，用草帽遮掩在胸前，然后一个箭步跨上文具店的台阶，举手之间，把信迅速地投入邮箱，随即转身离开文具店，慢腾腾地来到了糖果店门口，犯人身上没钱，什么也买不成，只能看着糖果饱饱眼福，做出一副走来走去闲逛的样子，信交出去了，心里的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踏实多了。后面的人这时候陆续来了，跟着，狱卒也到了，清点了一下人数，催着继续赶路。

这次我不能再让别人帮我背粮过铁索桥了，要自己闯一回，但心里还是有点害怕。我请难友张志彬（身高马大，外号人称张大汉）在桥头把守，暂时拦住后面的来人，等我走过桥中间再放人通行，以尽量减少桥身的晃动。我鼓起勇气背着 120 斤玉米踏上了索桥，眼睛看着前方，脚下稳步移动，过

了桥中心胆子就大了，加快了步伐，终于闯过了这一关。

紧接着的负重上坡，路还是那么长，坡还是那么陡，天气还是那么热，背上的麻袋还是那么重，人却不像上次那么累了。投入劳改三年，在监狱里备受折磨，家里人党团员居多，他们不了解真实情况，弟弟妹妹们总认为我这个做哥哥的犯了弥天大罪才被判处重刑，今天终于交出了一封信，几天之后他们收到信就会知道我离开北京到四川的十多年始终是爱国的，长期以来也是热爱共产党的，我没有犯任何罪。这是最大的收获，想到这儿力气似乎增大了。就这样一路想一路走，心情舒畅但也是汗流浹背地回到了戒备森严的劳改队。

这封信是1968年写的，到1970年交寄成功，历时两年。家里收到以后，不敢声张也不敢申诉，两个妹妹抄写了一份，那八页密密麻麻的原件变成了七十二页厚厚的一本，至今我还保存着呢。

附注：

[1]伍大云(1926-2012)，成都人，曾在国民党空军任士官，从事空中摄影工作，1949年随驻新疆空军起义。六十年代以历史反革命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为人豪爽仗义，乐于助人。文革结束后出狱，定居成都，以修理自行车、制造三轮车等业，膝下二男二女，目前在蓉颐养天年。在狱中我们交往不多，但难友之情深不可忘。

补记：写作中惊悉伍大云于2012年7月15日在成都病逝，终年八十六岁。

[2]谢显荣(1928-2013)，陕西人，曾任中学教师，重庆永川交通局职员。文革中以反革命定罪，1980年平反后在成都做服装生意，小本经营，诚信待客，口碑甚佳，成都晚报曾有报道。目前在成都养老，喜读古书，时常背诵古文，至今仍做笔记，好学如谢君者鲜矣。

补记：本书尚未脱稿，痛悉谢显荣于2013年10月在成都病逝，终年八十五岁。

(2) 监狱里的打手

我是1966年入狱的，1979年平反出狱，在苗溪茶场第十三中队服了十三年苦役。2011年开始写回忆录，离开监狱三十年了，旧闻存留在记忆中，真人真事难以忘怀，新闻刊登在报纸上，浮光掠影谎话连篇。

近年来被关押在监狱或看守所内的服刑人员或犯罪嫌疑人意外猝死的事件层出不穷，大多被高唱实事求是的官方冠以离奇古怪的名称，实乃中共之特色。

2009年2月中国云南传出了“躲猫猫”[1]事件。

2009年3月9日最高检察院副检察长姜建初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公开承认“牢头狱霸”问题长期存在。

2009年3月14日《羊城晚报》报道，广东儋州市第一看守所内的“狱霸”毒打羁押人员至死[2]

2010年2月3日报道河南焦作的“狱霸”蒋振海被执行死刑的消息[3]。

2010年1月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日记体、纪实体长篇小说《狱霸》[4]。

2010年2月27日《新京报》报道河南青年王亚辉在鲁山县看守所内“喝开水死亡”[5]

质言之，从1957年到1979年我接触监狱生活和自身坐牢，还真没有发现“牢头狱霸”。近几年所以不断出现“牢头狱霸”而且愈演愈烈，乃至祸及

人命，大约是胡温新政的硕果，三十年改革开放的辉煌成就之一。

我坐牢的时候没有“牢头狱霸”，但是有不少打手。

打手可分成文武两类，武打手生性残忍，以捆绑吊打为能事，以虐待他人为乐事，使人饱尝皮肉之苦。我所在的三工区就有李海山、杨应椿、丁国臣属于此类。十三队有这样的打手十来个。所谓文打手是有那么一点文化，专门躲在阴暗的角落里窥探人们的言行，或拈过拿错、或歪曲捏造、或断章取义、或无中生有，再无限上纲，而后大批大斗，增加罪名，这种人在毛泽东时代很受宠，比武打手危害更大。三工区的许诚、王经文、胥义方、张武林属于此类。

1966年进监狱的新犯第一次出工劳动就领略了由狱卒周金仁导演的“下马威”，把新犯人李盛照和张文玉扎扎实实地捆了一顿，痛得他们龇牙咧嘴、哎哟哎哟的叫唤，大家明白这是杀鸡给猴看。从那以后，十三队的监舍里无论冬夏几乎没有一天停止过捆绑吊打，没有一天不听见被打者的哀嚎，即使大年初一也不例外。

难友毛鸿文（一位中学语文教师）一怀愁绪地悄悄对我说：“今后的日子怎么过呀？光是这几个打手就够我们受的了，看来是活不出去了。”

我宽慰他说：“我见过城市里的监狱，重庆的新建机械厂和成都的四川磨床厂都是监狱，打人的事情只是偶尔发生。没想到山里的监狱竟然这么残酷，也许是文革兴起来的，外面都在武斗，监狱里也消停不了，慢慢的忍耐吧，尽量少惹事，多干活，少说话，一定要活下去，我不相信中国就这样”。

我接着说：“我们慢慢想办法把这几个打手搞下去，压压这股歪风”。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真难。第一次公开反对捆绑吊打的回合我失败了，其结果是被关了九个月的小监，差一点丢了命。

1969年5月我从小监里出来以后继续斗争。这时候进监狱已经快三年了，对周围的环境和狱卒的秉性、作风有了更多的了解。多数难友知道我被关小监的原因之一是反对捆绑吊打，维护犯人的尊严，所以多了一分尊敬，有了一点群众基础。一定要充分利用这些有利条件，好好地治一治打手。

中国北方老百姓中有句俗话“软的怕硬的，硬的怕愣的，愣的怕横的，横的怕不要命的”。四川的劳改队里“皮砣子，嘴壳子，笔杆子”算是歪人。在痞子流氓圈中生活就要有“我是流氓，我怕谁？”的气概。豁出命去，什么都不怕。就是要斗一斗打手，煞一煞歪风。

监狱里的打手是怎么产生的呢？和其他事物一样是应运而生的，是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必然产物，是极端独裁者实行暴力统治的必然手段，是斗争哲学制造恐怖、残虐生命的必然表现。打手是残忍成性的狱卒一手培植起来的，丧尽天良的狱卒们利用犯人做打手，监控、压制、威胁多数服刑人员，在监狱里造成一股恐怖气氛，便于实行美其名曰的“无产阶级专政”。实质就是法西斯，是对人类文明的践踏，是对历史潮流的反动。

狱卒不可能和犯人一起生活，而这些打手也是犯人，和其他服刑人员同吃同住同劳动，随时随地可以了解其他服刑人员的一言一行，偷偷地向狱卒汇报，狱卒则给他们一点甜头，评一个“劳改积极分子”、安排轻巧点的劳动、甚至减刑一年半载。平时纵容甚至怂恿这些人充当打手，假手这些人代替狱卒，实施狱卒不便亲手做，或亲手做难于推脱责任的坏事。比如狱卒恨哪个犯人，又找不到加罪的理由，便指使充当打手的犯人歪曲捏造，寻隙滋事，利用开批斗会的方式捆起来毒打一番，若是打死了，是犯人动手，可以编

一个“躲猫猫”的故事，狱卒顶多落个管理疏忽的罪名，记过、警告罢了。

打击打手就等于打击狱卒，“无产阶级专政”的阶下囚要打击毛泽东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豢养的狗腿子，势必会有相当的难度。

哪些人充当打手呢？

文革期间监狱里关押的服刑人员大体有三类。

一类是文革开始后入狱的，多数在学校、机关、工矿企业或部队等单位上过班，相当一部分是共产党员或共青团员，大都是冤案。这部分人满腹冤屈，无处可诉，性格懦弱点的逆来顺受，忍气吞声；脾气刚烈点的往往因为不认罪被划在“反改造分子”之列，属于受压制的对象。除少数投机分子“卖友求荣”以外，绝大多数不会充当打手。

再有一部分是六十年代饥荒严重时入狱的，多数是因为吃不饱，或家里饿死了人，被逼得出来抢劫，或者因为饥饿难当喊了反对共产党的口号、写了不利于共产党的标语、说了暴露黑暗统治的话，他们对共产党和毛泽东的倒行逆施多有了解和体会，除了个别投机取巧的以外，通常也不会充当打手。

监狱里的打手多数是六十年代以前入狱的老犯人和个别品质恶劣、人性泯灭的投机分子，解放前多半和共产党势不两立，甚至伤害过中共人士，他们自知身有重罪，尽管对共产党心怀不满，甚至刻骨仇恨，但在进监狱以后却表现得俯首贴耳，见了干部点头哈腰，毕恭毕敬，表面上惟命是听，服从管教。充当打手或多或少可以捞到一点好处，有可能减刑。

打手或牢头狱霸绝对不是服刑人员之间的事，不是内部自发产生的，不是犯人与犯人打架斗殴。

在我坐牢的时候，确切地说，从1966年到1979年这一段时间，犯人之间相互打架的事几乎没有，至少我没看见过，顶多互相吵骂，因为是集体劳动，有人发生争执，旁边的人立刻就会劝解或阻拦，打不起来。打手也不敢在劳动场所轻易打人，他们知道多数犯人恨打手，一旦动手打人，旁边人就会以劝架之名揍他一顿，毕竟寡不敌众，打手们知道众怒难犯。

打手敢于打人都有狱卒在场，所谓狗仗人势或者说狼狈为奸。那时候的打手和现在所谓的牢头狱霸完全是狱卒制造出来的，没有狱卒的支持、包庇、怂恿、暗示或明示。再厉害的犯人也不敢随便打人。

打手和牢头狱霸的存在是一种歪风，是监狱的劣迹，是司法腐败的具体表现。牢头狱霸，古来有之，中国有外国也有，那是监狱史上最野蛮、最残忍、最黑暗的现象，与现代国家文明司法制度水火不容。是否有牢头狱霸，可以见证那个国家的文明程度。不管它打着什么主义、什么思想、什么理论的招牌；高唱三个代表或五个代表；和据说是为公、为民的发展观；号称多么先进、多么革命、多么科学、多么和谐；监狱里有打手或牢头狱霸，必然是黑暗的反动统治。

下面说说苗溪茶场第十三中队三工区的几个打手，和怎么制服这几个打手的。

(1) **李海山**，年约四十、初中文化、中等身材、皮肤黝黑、一脸横肉，长期劳改从事担抬等重体力劳动，背有点驼，后颈突出。1949年前在重庆裕华纱厂当稽查，强吃霸占、巧取豪夺、奸淫妇女、劣迹斑斑。1951年被捕入狱，判处无期徒刑，后改判有期徒刑二十年。李海山本属与共产党势不两立之人，如今成了阶下囚，对共产党是恨之入骨的，但他自知罪孽深重，民愤极大，共产党饶他不死已属不易，所以入狱后虽仇恨在心却伪装老实，表面

上见了干部点头哈腰，卑躬屈节，事事顺从，是十三队狱卒徐绍华手下的出名打手，他的枕头底下藏着一根棕绳，每晚的批斗会他都看徐绍华的眼色行事，一旦有人被拉出来批斗，只要徐绍华一喊“拒不交代就收拾你”，李海山就会像恶狗一样窜出来，施展拳脚，拿出绳子来捆人。他捆人的动作十分熟练，也十分凶狠，把绳子搭在被斗人的肩膀上，狠狠地在两只手臂上缠绕五六圈，然后把两手反在背后把手腕合拢再紧紧地捆住，或吊在房梁上，或吊在树上毒打。三工区至少十多名难友受过被他捆绑毒打的折磨，有的因此而残废。多数难友对其切齿痛恨。

想什么办法制服他呢？慢慢地寻找机会。

1970年春节过后不久，早晨起来出工，每人背一背篋煤炭上山，送到胡家坪工地新猪舍用于煮猪饲料。有一段山路很陡，大家一步一步地往上爬，一个一个累得气喘吁吁，到了猪舍把煤炭堆成一大堆，随即准备下地干活。李海山的手上沾了一些煤灰，他顺手在猪舍的门框上抹了一把。这个猪舍平时住四个犯人，清一色的反革命分子，被判刑十五年到二十年不等，不知道谁讨好卖乖，春节时在门上贴了一副红底黑字的对联，左边是“拥护共产党”，右边是“热爱毛主席”。李海山的手指姆印恰恰抹在了“毛主席”这三个黑字上。我赶快喊猪舍里的几个犯人出来看，告诉他们这是李海山才抹上去的，大家做个见证。

在那个年代，玷污毛主席这几个字是弥天大罪，四工区的服刑人员李尚鹄（前志愿军连长）用一张旧报纸包胶鞋，那时候的报纸几乎每一版都有毛泽东像，他没有留心，让毛泽东包了破鞋，这下子捅了大祸，拉出来批斗，被狠狠地捆了一顿。李海山犯事的情节更严重，看来打手就要挨打了，好不容易找到这个机会灭灭它的嚣张气焰。

当天晚上我向狱卒徐绍华汇报了李海山涂抹对联一事，不加油不添醋，如实禀报。

第二天徐绍华上山了，到猪舍门前看了看，门框的对联上果真有三个黑灰色的手指姆印，于是把李海山喊过来。徐绍华问他：“是不是你抹上去的？”李海山回答说：“不是”。我上前一步说：“我亲眼看见是你抹的”。他对着徐绍华说：“今天早晨我监督牛立华，他和我吵架，他报复我”。我笑了笑说：“你问问徐干事，明人不做暗事，我是昨天晚上汇报的，吵架是今天的事，昨天怎么报复今天？指导员说了，谁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我就要检举你”。我接着大声说：“老实告诉你，昨天当场有人见证是你抹的，休想抵赖”。猪舍里的几个犯人平时也恨李海山，这时候纷纷作证说：“昨天背来煤炭以后，李海山在门框上抹了一把”。徐绍华狠狠地瞪了李海山一眼说：“出去劳动，晚上学习再说”。于是各干各的活儿去了。

当天晚上学习，徐绍华对李海山涂抹“毛主席”的事只字未提，看来火力还不够，还要将他几军才能够把这个作恶多端的打手拔掉。

转眼到了夏天，晚上九点钟所有犯人站在坝子里集合点名，向值班狱警报告，随后管理员上楼再次清点人数，跟着就要睡觉了，多数人都脱了衣服只穿着一条短裤，钻到蚊帐里了。外面的广播还没有停止，正在放文革时期一天要放几十遍的歌曲：“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一个……”说来也巧，正当此时，李海山一边用手拍了一下大腿，“啪”的一声，一边骂了一句“他妈的，狗杂种”。我看了他一眼，大概是打蚊子，但是不早不晚“狗杂种”三个字正好落在“中国出了一个”这句歌词的后面，与原歌词的三个字恰恰合

拍，也还合辙押韵。我大声说：“大家听到了吧，广播里放的什么歌曲？李海山在骂什么？今天已经点过名了，不许说话了，明天再说”。大家明白我这是抓住把柄，提醒和加深印象，等着明天批斗打手李海山吧！

第二天早上起来我就向徐绍华报告昨天晚上发生的事，并说李海山多次污蔑伟大领袖。当天晚上七点钟照例学习，徐绍华还是不提李海山的事。

我不得不主动出击，在当晚学习会上高声发言道：“李海山多次污蔑伟大领袖，涂抹写有‘热爱毛主席’的对联，昨天晚上明目张胆地用下流的语言辱骂伟大领袖。指导员在大会上多次强调，谁污蔑伟大领袖就砸烂谁的狗头，李海山应该老实交代”。

李海山是狱卒徐绍华的狗腿子，现在狗腿子被抓住了把柄，徐绍华左右为难，既不能不让人检举，也不能公开地出面袒护，又舍不得这条替他咬人的恶狗。

我继续发动攻势，用文革时期最流行的语言说道：“李海山解放前是反动派的狗腿子，横行霸道，无恶不作，解放后被关在监狱里，表面上伪装积极，骨子里却留恋当稽查的日子，可以欺压百姓，胡作非为。现在是共产党的天下，粉碎了你的美梦，判了你二十年徒刑，你心怀不满，刻骨仇恨，无论怎么伪装也掩盖不了你的反动本质，狐狸尾巴总是要露出来的，你多次公然诋毁伟大领袖，毛主席是世界革命人民心中的红太阳，你往太阳上抹黑，还满怀仇恨地一边拍大腿一边咬牙切齿辱骂伟大领袖，实属胆大包天，罪该万死。我们强烈要求砸烂李海山的狗头”。

接着，我瞟了徐绍华一眼说：“我看谁敢包庇你这个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

徐绍华坐在旁边把头上的帽沿儿往下拉了拉，一语不发。

这时候周围的犯人七嘴八舌地喊了起来，有的检举说：李海山曾经说买《毛主席语录》[6]不如买一包“大前门”[7]。有的揭发说：李海山把毛主席像章戴在内裤上[8]。跟着有人补充说：李海山戴毛主席像章是脑袋朝下的。这还了得，毛泽东在犯人的内裤上脑袋朝下，成了什么玩意儿？

没看清是谁大声喊：“李海山站出来！”李海山不得不站起来接受批斗，在座的服刑人员看见今天李海山成了批斗对象，无不拍手称快。

谢老陕从地铺上起来走到李海山跟前指着他的鼻子骂道：“你狗日的坏透了，今天就要收拾你”说着说着给了李海山两个着着实实的耳巴子。

有人喊：“把李海山捆起来”。挨着李海山铺位的人连忙找绳子，平时李海山藏在枕头下面的棕绳不见了，这个狡猾的家伙意识到自己要遭批斗，把绳子转移了。

我问李海山：“你多次污蔑伟大领袖是有意还是无意？不要绕弯子，直接回答”。

他动了了嘴皮，没有说出来。

我跟着追问：“说！有意还是无意？”

他不敢说无意，说无意就是抗拒、抵赖。也不敢说有意，有意就是故意犯罪，污蔑伟大领袖在那个时代可是杀头的罪名。

在批斗会上我从不出手打人，也不轻易饶人。我再次喊：“你说，有意还是无意，不强加于你，你自己交代”。

他想了一想，吞吞吐吐地说：“我…我… …思想反动”。

我听到这儿马上说：“好了，李海山承认思想反动，他的所有行为都是受

反动思想支配的，也就是有意的。李海山恶意污蔑伟大领袖的犯罪行为是思想反动的大暴露，我们要求政府严厉惩处，绝对不能姑息”。

由于没有找到绳子（监舍内是不准有绳子的，李海山的那根绳子是狱卒徐绍华特准的），没能把李海山捆起来吊打，但他平时的威风被扫尽了。李海山是聪明人，经过这次批斗会，他也看出了众怒难犯，文革中被抓进来的一批人文化程度较高，不容任意宰割，多年来他在监狱里充当打手，臭名昭著，积怨甚深，不得不有所收敛。

通过对李海山的斗争，找到了一种制服打手的方法，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在那个毛泽东是红太阳普照大地的年代，随便一句话、一个动作都可以被无限上纲，归结为反动。用这个办法整打手也是很有效的。

（2）**杨应椿**，年约五十、山西人、富农家庭、身高 1.8 米、初中文化，日伪占领山西期间充当伪军某县大队长，横行乡里，欺压百姓。1947 年混入八路军、参加共产党，摇身一变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连指导员。1949 年随军入川任汉源县粮食局局长。1955 年肃反时被查明汉奸身份，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投入劳改。杨应椿善于察言观色、见风转舵、为人狡黠、恃强凌弱。平时不多说话，爱唱小曲，一天到晚贼眉鼠眼地盯着别人，劳改队的狱警看不惯哪个，他就讨好卖乖，千方百计地整哪个，打小报告、借机捆人。

有一天，大家集中在胡家坪的山坡上铲草皮[9]，一位体弱的难友站在陡峭的斜坡上费力地铲着草皮，杨应椿在山坡下面喊：“上！上！把上面那片草皮铲下来”，那位难友看了看上面的地形，实在难以攀登，没有理睬，还在原地挥着锄头干活儿，杨应椿破口大骂：“你狗日的，装疯迷窍，看今天晚上怎么收拾你”。我看了看陡峭的山坡，再往上爬的确有点危险，万一站不稳从十七八米的高处摔到地上，怎么说也要受伤。于是对杨应椿说：“算了吧，不在乎那点草皮，伤了人就麻烦了”。杨应椿大声武气地对我说：“他狗日的不听老子招呼，我今天就要他上”。我出于打抱不平，对他说：“你先上，我跟你一块儿上，你起个带头作用嘛”。他使劲瞪了我一眼，气愤愤的没有说话，但从那眼神可以看得出来对我十分不满。他是值星员，从那以后专派我去干又重又累的活儿，我尽量忍着不让他抓住把柄，寻找机会把这个祸害人的狗腿子整一整。

阳春三月，万物生发、百花初绽，人们脱掉了棉衣，浑身轻松了不少，遇上个阳光明媚的天气，心情格外舒展，似乎忘记了紧紧箍在头上的反革命帽子和犯人这两个字。一天收工的路上，没有狱警看押，杨应椿扯开了喉咙唱着：“三套黄牛一呀一套马，不由得我赶车的人儿笑呀么笑哈哈……大轱辘车轱辘轱辘转，转到了咱的家”。这本来是中共作曲家时乐濛[10]四十年代配合陕北土地改革[11]创作的独唱歌曲，满足了自耕农对发家致富的向往和心理需求，曲式借鉴河南梆子“大起板”的音调素材，有浓郁乡土气息，一时颇为流行，是他的成名之作。然而文革期间被说成是歌颂富农经济，是刘少奇路线的产物，贫农哪能有三套黄牛一套马呢？毛泽东是反对生产资料私有的，成立人民公社的时候，大牲畜都充公了，养几只鸡都犯法，从公鸡尾巴上拔几根毛绑个掸子也要被批斗，谁还敢保留耕牛和骡马？大办公食堂的时候连锅都给砸了，拿去冒充炼出来的钢铁上缴国库了，谁家敢有大轱辘车？

当天晚上的学习会上有人检举杨应椿大声武气地唱《三套黄牛一套马》，赞颂刘少奇反革命路线，公然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的理论，妄图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这都是文革期间惯用的词句，想加在谁的头上就加在谁的头上。于是平时作恶多端的打手不得不站起来交代，接受批判。

由于忿恨他的人很多，大家七嘴八舌地纷纷发言揭露他反对伟大领袖的罪恶。文革期间要想整人是很容易的，任何一句话都可以无限上纲，比如有人说“今天太阳真晒人”，这句话本来是说天气热，然而要想批斗他就成了罪状，毛泽东是革命人民心中的红太阳，说太阳晒人就是诅咒伟大领袖。你要是说“今天阴天没太阳”，也可以“分析”成“反动言论”，没太阳就是否定毛主席的光辉，岂不是弥天大罪？

那天晚上杨应椿成了众矢之的，只好低头弯腰，连连认错。

我突然想起了电影《平原游击队》中日军中队长松井率领鬼子进村时的音乐，那是编剧和导演采用日本陆军进行曲的一段旋律加以丑化改编的，曲调近乎滑稽。小孩看了这部电影以后很快就学唱“松井的队伍，进村来了，进村来了”。杨应椿一时兴起也时常哼哼这个曲调。我当即发言：看了电影《平原游击队》以后，小孩儿学唱松井的队伍进村来了，是孩子不懂事。但是杨应椿应该知道那是日本陆军进行曲《同期之樱》和《拔刀队之歌》的旋律，别人唱是不知者不为罪，杨应椿原来甘心当汉奸充任伪军的队长，现在唱这个旋律就是留恋过去，极端反动。

在场的狱卒徐绍华听我这么一说，才知道那段音乐还有这么一个背景，问题似乎严重了，于是当场宣布撤销杨应椿的值星员，从明天起监督劳动深刻反省。这个打手终于被打掉了。

（3）**丁国臣**，三十多岁，头脑灵活、动作敏捷。1949 年被国民政府征招入伍，普通士兵。当年 12 月 7 日，临近成都“解放”前夕，中共党员十四人、民革成员四人、民盟成员五人、其他民主人士十三人，共计三十六人在成都通惠门外十二桥被国民政府枪杀，行刑时丁国臣奉命在杀场外围警戒站岗。1951 年以杀害中共成员之特务名义被判刑二十年。投入劳改后内心虽不认罪，自称当时只有十八岁，是奉命站岗，并未参与枪杀，但是他深知自己属于罪在不赦之列，表面上乔装积极，在狱警面前俯首贴耳，善于见风使舵，不时讨好卖乖、充当打手。

他看到李海山和杨应椿这两个打手都犯了众怒，被群起而攻之，就悄悄地自行收敛，私下里在我面前诉苦，说是狱警的指使，不得已而为，以后绝对不先出手打人。其后几年，在各种各样的批斗会上，他也会跟着起哄，多半是瞎嚷嚷，喊几声空洞无物的口号，极少动手打人，也算是改邪归正了吧。

（4）**许诚**，四川省天全县人，大约生于上世纪二十年代末，比我年长六七岁，他 1949 年以前在重庆一家小报充当过记者，迎合民主潮流，写过几篇抨击国民政府的文章。中共掌权后被留用，当了个一般事务员，记者当不成了，生活也还过得去。1957 年，他也响应党的号召，提了些不痛不痒的意见，得到的报偿是被划为右派分子，遣送原籍监督劳动，找了个当地农民做老婆，生了一个小女孩，因为原籍的乡亲们大多沾亲带故、知根知底，五十年代民风尚属淳朴，整人之风尚未泛滥成灾，许诚基本上没遭多大的劫难，苟且偷生而已。待到文革初起，地富反坏右成了斗争的靶子，许诚没有逃脱，被安了个反革命的罪名判了十五年有期徒刑，送到苗溪茶场十三队劳改。我和他在一个队，一个工区，一个监舍里共同生活了十多年，都是先遭划成右派而后逮捕入狱，照理说应该相互理解，心照不宣、同病相怜，坐牢本身是

一件痛苦的事，难友之间不应该相互增加额外的痛苦，应该互相宽慰、开导。但我从进劳改队起就发现人心叵测、险象丛生，特别是某些所谓的知识分子，出于保护自己，往往损害他人，调子唱得比谁都高，用词比谁都左，批斗起别人来夸夸其谈，无限上纲，似乎自己不是被中共关在监狱里的反革命分子而是中央党校的马列主义理论家似的，把别人都说成是反改造，他自己就成了劳改积极分子，有可能减几年刑，至少可以获准从事轻巧一点的劳动，少挨点打骂，许诚就属于这一类。我和他交手的第一个回合是1967年初。按照劳改队的规矩，每年都要写一份年终总结，当众宣读，征求意见，小组鉴定，记录存档。过场走的煞有介事，实际上是既糊弄人又糊弄鬼。其根本目的是让每个犯人感到有压力、有监督、随时表现均可能记录在案，年终要过关。我投入劳改以来公开声称我没有认罪，但是从来不宜扬我无罪，而是强调只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我立即认罪。我在总结中用了相当篇幅讲应该认罪、深挖犯罪根源等等，空话连篇言之无物。没有承认自己犯了罪也没有揭露公检法的违法行为和监狱的黑暗，这并不伤害任何人。也不影响其他人的改造，更无损于劳改机关的威信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稳定。何况干了一天重体力劳动都很累，天气又很冷，狱卒徐绍华和在座的犯人们谁也没有注意听我宣读年终总结，多数人懒得没事找事。许诚似乎揪到了邀功谄媚的机会，我读完了以后，他抢先发言，开口就说：牛立华毫不认罪，判了十五年徒刑，必定对党和政府深怀仇恨。被判了刑狂妄叫嚣无罪就是罪上加罪……我听了以后对他说：判了刑，没有认罪很痛苦，我很想马上认罪，希望给我介绍一些改造经验，请问你被判刑以后是不是深怀仇恨？如果是的话，又是怎么消了仇、解了恨的呢？如果你没有仇恨，就是说你的确犯了罪，事实俱在，罪有应得。我现在还没有找到罪在何处，我要向劳改积极分子学习。政府判了我十五年徒刑，想来不是莫须有，思想转变需要一个过程，需要一点时间，我进劳改队才一百多天，天天想着如何认罪，政府判了我五千五百多天徒刑，需要长时间改造，我争取尽量早一点过好认罪关。在没有找到犯罪事实之前，我遵纪守法，等待上级机关复查，难道还有什么错误吗？没认罪就老老实实地承认，比那些心怀愤懑口头上却说着罪在不赦，罪不容诛，罪该万死，罪孽深重，罪大恶极的假话要好得多吧？我之所以敢挖苦许诚，在于初进劳改队看到中共公安司法部门的黑暗，横下了一条心，脑袋掉了不过碗口大的疤，没什么可怕的了。许诚听了我这番数落之后，略有收敛但禀性难移，在狱中十多年始终当他的“劳改积极分子”，无非就是没戴手铐脚镣，干一点轻巧的活路，也没捞到减刑。1979年我平反后特意找他谈了谈，他当时尚未平反，咬牙切齿地大骂共产党坏透了。我坦率地对他说：如果出于信仰。向某组织或某人检举他人，无可非议。除此之外一切检举揭发都是出于私心，伪装积极，损人利己……无需多言。1980年他也获得平反，在雅安编纂《雅安科技报》，据王地山告诉我，许诚未满六十岁就因病去世了，实属可怜。

(5) **王经文**，四川省天全县人。据说1950年参加暴动被判的刑。因身材矮小，体质羸弱，劳动上无从表现，好在他有点文化，会写检举材料，于是就成了十三队著名的屁眼虫。入狱后即表现积极，整天贼眉鼠眼盯着他人，狱卒对谁印象不好他就检举谁。狱卒也需要这样的狗腿子，以便随时了解犯人群体的动态。训话的时候常常举些实例，好像狱卒的眼睛无处不在，犯人在厕所拉屎都有人监督，谁也不敢乱说乱动。时间长了，大家都知道王经文爱打小报告，有时就故意当着他的面发几句牢骚，让他报告，借以挖苦讨厌

的狱卒或给他们一点警示，让他们不得不有所收敛。

(6) **胥义方**，四川省雅安市人。高中毕业考入黄埔军校 24 期。目前已年逾耄耋，仍健在，现居成都。据云，其祖为宋赵皇室后裔，于靖康之乱时被边将保送入蜀，投靠雅州胥氏豪族。历任两届西康省政府官员，家藏祖传《历代帝王名将法帖》、吐蕃《白马康塔》羊皮经、孤本《雅安县志》、青衣羌国宝鼎、国王印等珍贵文物。室内摆满了古董，诸如关云长的青龙偃月刀、唐宋诗词拓本等，真假莫辨。曾著有《川康军阀演义》一书，内多虚妄之言，只能当作演义，不可作为史料，2009 年由中国文化出版社印刷出版。胥义方入狱后初期，被视为反改造分子，又因其曾任国民党某电台台长，所以长期被单独关押，我和他素不相识，概无来往。毛泽东去世后，他才来十三队，也是在小监单独关押，不参加任何劳动，与众人概不接触。在监狱里，对这类人物除非十分熟悉的以外，通常都不闻不问，避免惹事。某日胥义方被从小监理放出来了，分配在三工区集体劳动，当晚，收工回来吃了饭以后在水槽边洗碗，胥义方从身上摸出两个橘子，鬼鬼祟祟地塞到我的手里，似乎很想和我套近乎拉关系似的。当时我已经入狱五年有余，算是老犯人了，且当上了三工区的值星员，单独劳动的机会很多，与各个工棚犯人的关系都不错，偷吃两个树上的橘子、梨、苹果是手到擒拿的事，且不到饿得心里发慌，我一般是不偷吃任何农副产品的。所以对胥义方这种举动有一点反感和警惕。隔了几天，晚上学习时，胥义方突然发难，检举我和尚在小监关押的李盛照暗自传递纸条，据说他在小监洞口看到李盛照从他隔壁的小监里丢出一个纸团，我走到近旁弯腰捡起来了，不知道写的什么内容。并大言不惭地说，他在小监还没放出来就已经检举，因为时间短促，和我素不相识，认不准究竟叫什么名字，放出来就是安排他认人的。我听了以后坚决否认，在监狱里相互传递纸条是严重的违反监规，必遭严惩。其他犯人对胥义方的所谓检举也十分讨厌。我看他拿不出有力的证据，便抓住机会把他臭骂了一顿，揭发他摘橘子，拉拢我，在我面前吹嘘他是黄埔军校的等等，众人跟着帮腔说胥义方在干活的工地上不老实，东张西望，乱打听，有逃跑嫌疑。徐绍华看这个笨贼犯了众怒，也失去了利用价值，不但没表扬他靠拢政府，还教训了他一顿。打手没当成还背了个骂名。

(7) **张武林**，四川省成都市人。年龄不大（1966 年入狱，不过二十多岁）城府很深。我和他同在十三中队三工区，众人人都知道，我是不认错的右派，不认罪的反革命，张武林是官僚家庭出身，但都不知道他犯的是什么罪，据说是在担任小学教员时奸污幼女，投入劳改后从不透露丝毫信息，在犯人面前欺软怕硬，以爱打小报告闻名，在干部面前点头哈腰极力逢迎，善于看干部脸色行事。每天晚上的学习会上，他那沙哑的声音总要喊几分钟，批判这个批判那个，歪曲捏造上纲上线，多年被评为劳改积极分子，众人皆避而远之，他就慢慢地孤立了。狱卒看到他已经失去了利用价值，便不大理睬了。

三工区的几个打手也是十三队有名的打手，被打倒了，其他工区的打手也老实多了。

附注：

[1]躲猫猫也称捉瞎子或捉迷藏，一种儿童游戏，两千年前即流行于希腊。一个人蒙住眼睛，其他参加游戏的人藏起来，约定在一定时间内蒙眼人找到并抓住任一游戏参与者为一局。2009 年“躲猫猫”一词在中国广泛传播，则是一桩司法丑闻

引起的。

2009年1月29日午后，云南玉溪北城镇24岁男子李莽明因经济窘迫伙同他人进山砍树卖钱，当日下午四时许即被发现，旋被刑拘，羁押在云南晋宁县公安局看守所，关押十一天后因“重度颅脑损伤”突然死亡。晋宁县公安局负责人对此解释说：李莽明系与同室羁押人员在看守所内玩游戏“躲猫猫”不小心撞到墙壁而死。家属要求观看监舍内的录像，看守所告知以监控设备失修，不能看录像。

看守所内的成年在押人员居然有那么多闲情逸致，玩起了只有小孩子才玩的“躲猫猫”游戏？实乃中国特色、天下奇闻。此说引起死者家属和群众质疑、舆论哗然，招致广大网民激愤，要求查明真相。云南省委不得不出面敷衍、派人调查，将死亡原因更正为“李莽明被同室羁押的‘牢头狱霸’故意伤害致死”。三名凶手移交司法机关，看守所的相关负责人以看管不严，玩忽职守受到撤职、记过等处理。“躲猫猫”一词随成为2009年中国现实生活中的网络流行语。

三年前，该看守所一健康男子李荣林在羁押十日后“多种心脏疾病突发”死亡。公安局给死者家属三万元“安埋费”了事。此案至今未结论。

[2]57岁的广东揭阳某农场下岗职工罗静波涉嫌犯罪于2009年2月28日被广东儋州市公安局刑事拘留，羁押在儋州市第一看守所。3月2日下午四时左右罗静波被同监室多名疑犯殴打致颈椎断裂，抢救无效，于次日死亡。

[3]蒋振海因非法拘禁罪被判刑两年，在河南焦作市公安局看守所服刑，2006年11月29日晚蒋振海强制同监室的杨森等人彻夜劳动。次日蒋振海继续体罚杨森等人，令其长跪，克扣午饭，晚间，蒋振海又用“飞”（面对墙，深弯腰，头低下，令后背贴墙，两臂上举，手贴墙）、“洗澡”（光着身子浇冷水）、“吃麦仁”（把头浸在注满水的便池内）等极具特色的方式惩罚年龄未满20岁、身体瘦弱的杨森，并拳脚相加多次殴打，杨森不堪折磨当晚身亡。经反复审判后蒋振海被判死刑。

[4]《狱霸》的作者白露（化名）原系山西财经大学学生，1992年因故意伤害罪被判刑十年，历经两个看守所、三个监狱，耳闻目睹中国特色监狱之风貌。1999年因“表现良好”提前获释，随即以日记形式回忆、记载监狱中的所见所闻，2006年春与某公安专栏作家刘念国合作编写《狱霸》一书，经多方审查，一再删改，2010年1月得以出版。书中披露了九十年代中国监狱底层的状况，和牢头狱霸滋生的缘由与背景。

[5]2010年2月18日，河南青年王亚辉涉嫌盗窃被河南鲁山县公安局拘押，2月21日警方告知王的家属，王亚辉在看守所内“喝开水死亡”。家属发现王的尸体遍布伤痕，背部、手臂有大块淤青，头部有破洞，乳头被割掉，生殖器有损伤，警方对此未作解释。

[6]文革期间，服刑人员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给劳改单位创造了财富，每人每月有一元钱人民币（那时候挂面0.6元一斤）的零花钱。强制每个服刑人员买所谓的红宝书《毛主席语录》，不管有没有文化，认不认字，人手一册，售价0.45元。

[7]“大前门”是中国著名的香烟品牌，1916年推出，至今畅销不衰。六十年代大前门0.45元一包，和《毛主席语录》一个价。

[8]文革期间人人佩戴毛泽东像章，监狱里的犯人也不例外。一般戴在胸前，从事农业劳动的犯人常常光着膀子干活，像章没处戴，别着像章的上衣也成了负担，挂在树上说你让毛主席上吊了，放在地上说你让毛主席趴下了，施肥的时候说你让毛主席吃大粪了，都有可能招来一场横祸。于是都尽量不戴。

[9]昔日的原始森林，劳改队进驻以后占山为王，不消几年大树即被砍伐殆尽，只留下一些灌木丛和杂草。每年冬季上山贴着陡坡地面把这些灌木和杂草连着薄薄

的泥土一铲而光，堆在一起点火焚烧，谓之积肥。实则严重地破坏生态，制造水土流失。

[10]时乐濛（1905-2008）河南伊川人。1934年毕业于河南开封师范学校艺术系，翌年在郑州任音乐教师。1938年赴延安，入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师从冼星海学习指挥和作曲。日后创作歌曲500余首，比较出名的有《三套黄牛一套马》、《长征大合唱》、《歌唱二郎山》、《英雄们战胜了大渡河》等。曾任解放军艺术学院副院长，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等职。

[11]“土地改革”是中共在农村实行的一项重要政策。用暴力没收地主和部分富农的土地，把土地分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包括那些不务正业乃至因吃喝嫖赌而失去土地的流氓无产者和地痞无赖），挑动欲分土地的土改积极分子打死地主，然后动员青壮年农民参军，名曰“保卫胜利果实”，实际则是为毛泽东争夺天下卖命。战事紧张时又动员留在农村的老汉和妇女组织担架队、小车队，纳鞋底、缝服装，“支援前线”，纯朴的农民被毛泽东充分利用甚至献出了生命。及至夺了天下，毛泽东进了中南海当上了“伟大领袖”，在一片山呼万岁声中通过“合作化”、“人民公社化”又把土地收归国有了。农民为国家创造了财富，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今仍然处于社会的底层。

(3) 炮兵参谋尹显慧之死

1968年春，苗溪茶场第十三中队又增加了十几个新犯人，分别安插在几个工区。

照例，带队的干部向在押犯人交代，要加强对新犯人的监督，不准他们脱离集体单独行动，发现异常要随时向干部报告，还特别指定几个老犯人一对一地密切监视新犯人的一言一行。

我那时到劳改队也不过一年多，属于半新不旧之类，既要接受监督新犯人的指令，又必然在老犯人的监督之下。

过了不到一个月，一个星期日的下午，大约五点多钟，上面传来了命令，全体犯人带小凳在院坝里集合。一阵忙乱，各人拿各人的坐具，有的是一块小木板，有的是自己钉的小板凳，有的是一条腿的独凳，形状各异，高矮不等。言论、出版没有自由，坐在屁股底下的东西还真体现了伟大领袖倡导的“百花齐放”。

中队指导员周金仁先行开场，都是日常讲的那些话，离不开恐吓和谩骂，以及要认罪，要接受改造等等，然后喊上来一个新犯人，让他讲“低头认罪、接受改造”。新犯人给老犯人现身说法，我觉得很新鲜，真要好好听听。

因为我一直没有认罪，也找不到自己究竟犯了什么罪。不认罪却被判了重刑，是一件很矛盾、很痛苦的事。如果能够得到一点启发，能让我认罪，岂不是天大的好事嘛，所以我安心领教，做了洗耳恭听的思想准备。

上来的这个人就叫尹显慧，五短身材，貌不出众，口齿清楚，条理分明。看来是做了一番准备的，讲话稿也是经过审核的。细细地听，也就是把个人臭骂一顿，对伟大的党赞扬一番。企图歌功颂德，却又言之无物，一味曲意逢迎，难免言不由衷。讲了半个小时，没有什么可取之处。当时我就产生了一点鄙视他的感觉，坐在我旁边的难友大概也和我有同样的感受，悄悄地说了一声“屁眼虫”，透露出看不起这种人的情绪。

尹显慧在一工区，劳动地点在万家山，主管狱警是田家伦。我在三工区，劳动地点在胡家坪，主管狱警是徐绍华。按照劳改队定下的规矩，即使同一

个工区的犯人也不准交头接耳，互通案情，不同工区之间的犯人更不准彼此串通，相互来往。各在各的监舍，各在各的工地。犯人当中也有不少“特务”，发现谁和谁串了工区，谁和谁说了话，都有人向管教干部汇报，这种人即属于“屁眼虫”一类。我和尹显慧不在一个工区，素无来往，即使面对面的走过，也没有说过话，顶多用藐视的眼光瞥他一眼。

春末夏初，是栽插红苕（甘薯，不同地区又称白薯，红薯、番薯、山芋、地瓜；四五月份栽插藤蔓，九、十月份收获块根）的季节。一天收工过后，从一工区传来了尹显慧逃跑的消息。

栽插红苕的时候，一部分人整土地，用锄头在地里垒出一条条高宽一尺有余的埂子，按规定一个人一天必须完成三分地的任务，干这个活儿的从早到晚不敢懈怠。少数人在红苕苗圃里剪红苕藤，并负责运到地边。然后工地上的犯人一起动手把四五寸长的藤蔓栽插到土埂子当中。剪红苕藤的任务一般派老弱犯人去干，新犯人有逃跑的危险，不允许从事离开众人监视的单独劳动。由于尹显慧身体瘦弱，进劳改队不久即现身说法，大讲认罪，卑躬屈膝，接受改造，众人信以为真，以致放松了对他的监视。

据说那天他光着上身，只穿了一条短裤，上午剪了两背篋（竹子或藤条编的背在背上运送东西的用具，四川农村使用竹背篋非常普遍）红苕藤，下午接着干，在地里干活的犯人等了半天不见有人背红苕藤过来，这才慌忙去找，哪知踪迹全无，不知道什么时候尹显慧逃之夭夭了，连背篋也没有留下。

赶快报告劳改队干部，他们也慌了手脚，一边骂骂咧咧，一边安排追捕。霎时间，摩托隆隆，分几路出动，然而忙了半天不见效果。

监狱内犯人逃跑是常发生的事，我所在的劳改队每年都有数起，然而绝大多数是跑不出去的，中共政权对于“人民”的管制尚且十分严密，有严谨缜密的户口制度，有几十种票证的约束，走到哪里都需要粮票和各种票证，否则连饭都吃不成。无论到什么单位都需要介绍信，否则进不了大门，大大小小的旅店、宾馆都属于特种行业，没有介绍信休想入住。对犯人来说，逃跑自然有更多的风险。我不主张逃跑，而且还劝说过个别有外逃想法的难友，提醒他们现在是高度集权的“无产阶级”专政，有庞大的公安系统，有现代化的交通工具，有技术含量高的通讯设备，个人本事再大也难以对付如此众多的专政机器。这次尹显慧逃跑，我真替他担心。

那时候还不知道尹显慧是以什么罪名被判处二十年有期徒刑的，但是知道了他认罪是假，意在寻机逃跑是真，口头上认罪仅仅是韬晦之计，是麻痹干部的手段，不过采取的方法的确有损人格，难以恭维。

随后我被关入小监，1969年5月我从小监里活着出来，不久，尹显慧被押送回来，关在我曾经住过的那个小监隔壁了。

尹显慧抓回来了，劳改队的干部兴高采烈，兴奋之余，难免口无遮拦，透露了一些尹显慧的情况。

原来他是兰州大学数学系的高材生，原籍四川省新繁县，家庭出身良好，毕业后服从分配在中共某炮兵部队担任参谋，副团级，共产党员。三年困难时期天府之国虽然风调雨顺也难免受难，尹显慧认为造成困难局面的原因并不是中共中央再三宣传的“连续三年特大自然灾害”。川西平原得李冰父子两千多年前修建都江堰水利工程之泽惠，自流灌溉、旱涝保收，本无灾害之虞，那几年却也在饥饿中挣扎，甚至饿死许多人。他认为当时的中共中央尤其是毛泽东犯了严重的错误，于是企图改组共产党，组织“中国共产党革命委员

会”，为此上书中央，让毛泽东悬崖勒马、改弦更张。一片重振共产主义的好心却成了攻击伟大领袖毛泽东的罪名。

在那个时代参加中共军队，是要经过严格政治审查的，尹显慧能够在炮兵部队担任参谋之职，必然是“根红苗正”。党章虽然规定党员可以向上级直至中央申述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但那只是文字游戏，和宪法一样，绝对不能信以为真。尹显慧却天真地把那些写在纸上的东西当作了金科玉律，上了虚伪党章的当。

君不见彭德怀跟了毛泽东几十年，在庐山会议上给毛泽东写了一封语气相当委婉的私人信件，陈述自己对大跃进的观点，并没有在会议上宣扬，毛泽东都大发雷霆，罢其官免其职，让老彭在北京郊区挂甲屯种地去了。以后又假手红卫兵恶意批斗，打断了彭德怀的三根肋骨。随后交给毛泽东钦定的专案组秘密囚禁，八年铁窗，百般折磨，终置其于死地。一个追随毛泽东几十年的开国元帅，关键时刻敢于横刀立马的元帅，竟然冤死在毛泽东的手里。

君不见刘少奇这位“毛泽东思想”的吹鼓手，平时谨小慎微地做毛泽东的奴才，对毛泽东言必听、计必从，也参与过不少整人害人的活动，整王明，整高岗，整彭德怀都有他的份儿，助纣为虐，为毛泽东独霸天下效尽了犬马之劳。仅仅因为对毛泽东打着三面红旗而不顾人民死活的倒行逆施表示了一点异议，其实是为了巩固中共的统治、巩固毛政权，不料惹恼了昏君、暴君。毛泽东就置宪法于不顾，利用无知的红卫兵揪斗国家主席。为虎作伥几十年的刘少奇到头来落得个叛徒、内奸、工贼的下场，被永远开除党籍，终至惨死在河南开封的囚禁室里，死了竟然连家属也不敢收尸。

尹显慧，一个小小的炮兵参谋竟敢如此大胆，即便是出于忧国忧民，出于捍卫共产主义，出于为了维护共产党的政权、巩固共产党的统治，但是批评了毛泽东，岂不是在太岁头上动土，看来难逃厄运。

1969年初秋，尹显慧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这是苗溪茶场第一次枪毙人，不免要隆重一番。

先把尹显慧从小监里放出来，给他剪去长了几个月的头发，换了一套蓝布劳改服，然后关押在一个冬季用于储存红苕的地窖里。这个地窖在一条小路旁边的竹林下面，平时犯人出工可以路过，尹显慧进去了，这个路段戒严了。俨然是首长驾临的待遇、一级警卫。地窖外面除了持枪的武警昼夜二十四小时值班以外，还派了两个犯人把守洞口，兼任送水、送饭、倒马桶。饮食上有特殊照顾，即不再吃犯人的伙食，享受劳改队干部待遇，一日三餐有鱼有肉。以后苗溪茶场还枪毙过潘启云[1]，郑远惠（女）[2]、张家凤（女）[3]等人，都没有受此殊荣了。

十天以后，在苗溪茶场第十三中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执行大会。除了十三中队全体犯人大约三百名以外，其他各队也派出了代表，两千多人密密麻麻的坐在这个坝子里。会场前面用竹竿和木板搭建了一个临时的舞台，灰色的天幕，侧幕和耳幕都是劳改服的蓝色，舞台上悬着白底黑字大横幅，一律的冷色，颇显苍凉、悲切。苗溪茶场的场长姜同海[4]，书记董霞云和一帮大小喽罗坐在上面。

十三中队平时常驻一个警卫班，那天至少来了一个排，会场周围三步一岗，五步一哨，附近的高处还驾着机关枪，如临大敌，大概做贼心虚担心有人劫法场。

大会开始，宣读罪状，无非是一贯坚持反动立场、攻击伟大领袖，妄图

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罪大恶极等等，结尾是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跟着，八九个武警蜂拥而上，其中两个一左一右驾着五花大绑的尹显慧离开会场。苗溪茶场的头子姜同海在台上声嘶力竭地宣扬无产阶级专政，坐在地上的两千在押犯人和就业人员默不作声。大约半小以后，就在离会场不到二十米的公路上，一声枪响，接着又是一声，再一声。三声沉闷的枪响，又一个爱国的热血青年去了。

这时候十三中队的一个姓贺的干部走到本队犯人队伍的跟前，高声喊着：“胡世富、牛立华、黎正信、龙兆云……”一共是十个人，我们跟着他走出来，离开会场才知道是让我们处理尹显慧的尸体，这相当于陪杀场或者说是企图用死人来吓唬活人，亏他们想得出来。这十个人大概是劳改中队指导员周金仁等人心目中的反改造分子，是按照名单精心挑选出来的。

对犯人来说，劳改队干部的话就是命令，相当于最高指示，不得违抗，只有硬着头皮服从。我们几个到工具房拿上锄头、铁锹往杀场走去。贺干事又下令：“你们六个去挖坑，你们四个抬人。”我在抬人之列，龙兆云悄悄的跟我说：“快点！”我莫名其妙，他又说：“走前头，抓脚。”我明白了，走后头必然是要抓着尹显慧的手，看着被打烂的脑袋，惨。

不到三分钟，我们就到了杀人现场，尹显慧的尸体头西脚东顺着公路安详地躺着，旁边有八个持枪的武警“守灵”。我和龙兆云快步上前，一人提一只脚。尸体还是软的，脚还是温热的，另两位难友则一人抓住尹显慧一只手。公路北边就是山，山坡上有一片小柏树林。那六个人直接上山挖坑去了，我们四个提着尹显慧的尸体一步一步地往山上爬，终于到了预定的地点。

将近六十岁的丁司务长（劳改队的干部，管理犯人的伙食等事务）在山坡上指挥挖坑，老头儿连说了几遍“挖深点，挖深点”。隔一会儿又说：挖深点，挖深点。老头儿心眼儿好，怕山上有野狗骚扰尹显慧。那个贺干事也是农民出身，肥头大耳膀阔腰圆，平时看不出来有什么刁钻古怪，那天却异常活跃，一会儿喊黎正信过来给尹显慧系一系衣服上的扣子，一会儿喊我给尹显慧把鞋穿周正，他用尽心机，让我们几个多接触尹显慧的尸体，意在给我们留下更深的印象，多吓唬吓唬。他不懂，人到了这个地步，心是横了的，我们十个人没有一个害怕，只有对法西斯的愤恨和厌恶。为了反击这个姓贺的走卒，我们一对一句地说起了笑话，胡世富说在坟包上种一窝南瓜，肯定长的又大又好吃，黎正信说种一棵苹果树，结的苹果必然鲜红鲜红的，又脆又香，跟着大家一阵哈哈大笑。我突然意识到悲和喜在某些时候是可以相互转换的，悲痛至极可能狂笑，快乐至极可能流泪。我们的笑声扰乱了狱卒的沉思，经过这一搅合，这位酷似猪八戒的贺干事在山坡上来回的转悠，低着头，一句话不说了。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坑挖好了，真的不浅，至少有一米。我们把尹显慧的尸体轻轻地头朝北脚朝南安放在墓坑之中，一锹又一锹用刚挖出来的新鲜土掩埋了，是无需棺材的软埋，让尹显慧的身体直接挨着他深爱的祖国大地。

这座山叫万家山，朝南的山坡上只有这一个孤坟。

当天晚上，惯例学习，三工区的主管干事徐绍华洋洋得意地组织犯人座谈枪毙尹显慧的心得体会。他是跟着刽子手一块儿到杀人现场的，谈话中间他说尹显慧反动透顶、顽固不化，直到要被枪毙的一瞬间还喊口号。我们才知道尹显慧为了他理想中的信念临危不惧、坚贞不屈。这才是真正的爱国主

义者、真正忠于祖国、忠于人民的战士。后来听说尹显慧临刑前被押上大卡车到芦山县城示众。那天街头拥挤着看热闹的男男女女，尹被五花大绑，由两名狱警挟持着，高昂着不屈的头颅，双目圆睁，毫无惧色，视死如归，从容就义，多年后仍传为佳话。

1984年，曾经在苗溪茶场十三队坐过牢，平反后在四川省委工作的王地山在雅安寻访当年苗溪茶场十三队一工区主管干事田家伦时，回忆起尹显慧临终的情景。田家伦说，尹显慧的最后一夜由他负责看守，两个人都没有睡意，谈了一整夜。尹对他说：“我们都曾是军人，我以军人的诚实和直率谈谈自己的遗言。极‘左’势力在中国统治得太久了，给人民带来无穷的灾难，但它不会永远统治下去，镇压人民的人必然会遭到历史的唾弃。天快亮了！我虽看不到那一天，你一定会看到的，应该清醒地看到时代的走向”（王地山著《走出豆豆溪》）。这是一个共产党员在共产党的监狱里上杀场之前说的话，是那么从容，那么镇定，临死还忧虑着国家的前途，还期冀着黎明的曙光。谁说共产党里没有好男儿，能够在黑夜里看到共产党必然要灭亡的尹显慧就是好男儿。斩不尽杀不绝的好男儿会得到永生的。

尹显慧的糊涂之处在于他没有看清那些党的领袖们其实都是不信仰共产主义的。他们和洪秀全不信仰天主，邪教不信仰玉皇大帝一样。斯大林、毛泽东只是拿了共产主义的鸡毛当令箭，让别人皈依共产主义，做他们的奴隶。他们实行的是地地道道的封建主义、奴隶主义、法西斯主义。

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等一大批中国共产党的开国元勋都死在了共产主义的屠刀之下，无数为共产主义奋斗了多年的地下党员、“革命”干部，无数被蒙蔽而笃信共产主义的青年，都被关押在共产党的监狱中受迫害乃至献出生命。而那个残暴至极、一心想做奴隶主的毛泽东却被打扮成杰出的伟大的共产主义革命家、人民的大救星，甚至还当世界革命人民心中的红太阳，是不是该引人深思，从中得到一点启示呢？

尹显慧牺牲四十年了，不知道他家里还有什么人，有没有为他申诉，其后有没有平反。

尹显慧大约是1937年生的，如果活着今年该是七十五岁了。

附注：

[1]潘启云，1937年参加共产党，1949年随晋绥部队入川。文化不高，能力不强，只混了一个闲差，任重庆市商业部门副局长。六十年代，自恃资格老，敢于辱骂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旋被判处徒刑，先后在四川简阳平泉农场、芦山苗溪茶场劳改。1970年以攻击伟大领袖罪判处死刑，在苗溪茶场执行枪决。

[2]郑远惠（女），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1970年以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污蔑伟大领袖之罪，在苗溪茶场被执行死刑，时年不过三十岁。

[3]张家凤，六十年代军事院校毕业，容貌姣好，多才多艺。在某部队工作期间被有妻室儿女之“中国人民解放军”首长奸污，导致精神分裂症，不时辱骂该首长，旋即以反革命罪被判处徒刑，在平泉农场、苗溪茶场等地劳改。服刑期间精神分裂症日益严重，继续辱骂管教干部等人，1970年9月30日以污蔑伟大领袖罪被执行死刑。

[4]姜同海，苗溪茶场场长，也就是监狱长。平时威风凛凛，道貌岸然，善言辞，说话有条理，也有一定的文化和理论水平。在等级森严的体制下，监狱干警见了他都是点头哈腰、毕恭毕敬。实际上，这个深受共产党重用的监狱长品质恶劣、道德

败坏，是个十足的衣冠禽兽。他多次利用职权奸污多个年轻的女犯，不仅贪女色，还好男风，1974年因鸡奸军犯败露，勒令反省期间上吊自杀而死。

(4)猪舍倒塌了，小李死了

1973年，我被安排在胡家坪工地放牛。

胡家坪有两个猪舍，相距大约八百米。

靠东头的是七十年代新修的，猪圈和住人的房子以及饲料间都是砖木结构，瓦屋顶，可存栏一百头猪。我当时在三工区徐绍华手下，偷偷跟犯人王义云、胡友发学了点泥水工，曾参与砌筑砖墙砖柱工作。

靠西边的猪舍是五十年代末期修建的，猪舍和牛舍是砖木结构，薄瓦屋顶，可容纳六十头猪和十五头牛。

饲养员的住房紧挨着猪圈，面积大约五平米，放得下一张自己用木头捆绑而成的单人床，和一个盛放精细饲料用的直径0.8米、高约一米的大木桶，木桶上的盖子就相当于圆桌了。

住房外面是饲料间，大约二十平米，靠里面是砖砌的灶台，嵌着两口可容两担水的大铁锅，中间是操作料理的空地，饲料间外面有大约十平米的空间，还摆着一张自制的桌子和几个板凳。因为这个工棚邻近一条山间小路，往下走除了到十三队队部以外，还可以直达场部、机修厂、医院、甚至芦山县，往上走是女二队和十七队，山间小路相当于城市里的交通要道了。桌子板凳就是为了便于过往行人走累了休息一会儿，劳改队十天半月难得遇见过往行人，所以有人过路感觉很新鲜，特别是上面的女二队的就业人员逢周末准许下山，走到这里都要小坐片刻、男女授受不亲，闲谈几句也开心。

这两间房都是杉木构架、土墙，草屋顶，年久失修已经属于危房了。住在这个工棚里的劳改犯反映了多次，十三队的主管和领导还没列入议事日程。

当时住在胡家坪老猪舍的是四个人。

我放牛，住在牛圈旁边的瓦屋里，兼任着胡家坪工棚的负责人。

饲养员小李（二十六岁，农民，文革中响应毛泽东的号召造反，不知道什么可以反，什么不许反，糊里糊涂地成了反革命），住在紧挨着猪圈的草房里，负责喂猪、打扫猪圈等等。遗憾的是我忘记了他的名字，实在对不起这位难友

赵梓勋（三十余岁，原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尉，转业后在建筑行业工作，身高马大，饭量惊人，因不满粮食定量政策，攻击了共产党，以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投入劳改后常常自言自语，嘟嘟囔囔的听不清说些什么），住在饲料地东部边缘的草棚子里，承担种饲料和看守饲料地防止老乡夜间偷盗的任务。

雷文辉（羌族，二十一二岁，小学文化，以反革命定罪，有期徒刑十五年），住在靠西边的茅草棚里，负责办饲料，也就是从饲料地里把饲料收回来泡在水池里洗干净，中午和晚上还要回队部领取住在山上这四个人的饭菜，其余时间协助种饲料。

放牛的活路是最轻松的，早晨起来把十一头小牛吆上山，我头戴一顶斗笠，身披一件蓑衣，脚穿一双草鞋，看着牛在山坡上吃草，还可以坐一坐，躺一躺，下午五点钟前后把牛赶回圈里，帮助同一个工棚的难友做点农活，直到天黑。

我们四个人比较团结，既有分工又有协作，我本着“吃得亏，打拢堆”

的原则，逢年过节拿出一元钱卖点菜油、豆瓣，尽量安排好大家的生活。

喂猪的饲养员压力最大，每个月要给猪过秤，完不成预定的增重计划就要受批评，做检查，遇上干部生气，马上撤职、取消住外工棚的资格，搬回高墙电网的大院里，既不能吃饱饭又要干繁重的体力劳动，天天晚上还要开批斗会，看惨不忍睹的捆绑吊打，听被打者凄厉悲怆的鬼哭神嚎。

几天前，胡家坪猪舍的饲养员是投入劳改两年多的犯人杨文礼，因为连续两个月没有完成让猪长肉的任务，挨了一顿骂，被调回队部了。

小李是新犯人，身强力壮，农民出身，熟悉农活，手脚麻利，在家里就喂过猪，不知道什么原因也被打成了反革命，判了十五年有期徒刑，投入劳改才半年有余，能够捞上住外工棚的差事，有点出乎意料，住外工棚有自己种的瓜菜，可以填饱肚子，是个令人羡慕的美差。他一上任就摩拳擦掌，准备好好干一番，向主管干部保证超额完成任务。

七月的芦山，酷暑难当，下了一整天雨，仍然没有驱走闷热。淅淅沥沥的雨时大时小，房屋多处滴漏，不得不在地上摆些盆盆罐罐承接上天恩赐的雨水。大家的心情随着阴沉沉的天而感觉特别郁闷。山上没有电，为了节约点灯的煤油，早早地就各自睡在铺上了。

临近半夜时分，雷文辉听到房屋垮塌的声音，跑到牛圈旁边大声喊我：“牛眼镜！房子塌了！”

我正睡得深沉，听到他的喊叫，揉揉眼睛，戴上眼镜，看了看牛棚安然无恙，回答说：“天塌了也就那么回事，明天再说。”

隔了几分钟，雷文辉又来喊我，声音提高了八度：“猪舍塌了，真塌了，你起来看看嘛。”

我听说房子真塌了，一骨碌翻身起床，只穿着一条内裤跑出来，打着手电筒一看，砖木结构的猪舍没有垮，五十几头猪无一损伤。稻草和杉木杆子盖的饲料间和住房全塌了，喊了几声小李的名字，没有回应，不见踪影。真的出事了，不免心里有些紧张。我连忙让雷文辉去喊赵梓勋，他打着手电筒，噚、噚、噚地朝东边那个草棚方向跑了。

我围着垮塌的草房大声呼叫小李的名字，一只手打着电筒一只手拉扯垮塌下来的杉木条子。

不到三分钟，雷文辉和赵梓勋跑过来了，我让他们和我一起共同把垮了的木料和朽烂的谷草拉开，先从小李住的那间房开始，找到小李是当务之急。

天空还下着小雨，我们都光着膀子用力地移动着垮塌的屋架。

赵梓勋说：“小李可能不在，说不定到老乡家去了。”

我想了想说：“不会，他是新犯人，胆子没有那么大。才住外工棚几天，跟附近的老乡还不熟悉，平常也没有发现他和老乡有来往。一定要找到他，可能被垮塌的顶棚压在床铺上了，救人要紧。”

山区阴雨天的夜晚，一片漆黑，一边打着手电筒一边拆除破烂的屋架和腐朽的草棚，实在是一件难事，不免有点畏缩的情绪，手脚不够麻利。我一边用力拉着杉木杆子一边严厉地大声嚷着：“快、快、快，人命关天。”强调必须尽快拆除倒塌在地上一片狼藉的木料和乱草，找到小李。

他们两个继续寻找小李，我跑到山头，一边用手电筒朝对面的山头划圆圈，一边拼命地大声狂叫：“猪舍塌啦，压死人啦”，赶快向队部传递信息。用尽气力喊了好几分钟，终于得到了回应，对面也用手电筒划起了圆圈。胡家坪山头和十三中队队部山头的直线距离至少有 300 米，中间还隔着一条小

河，又处在午夜时刻，风声雨声交响在山谷之间，喊应了对方真的不容易。

这时候赵梓勋和雷文辉已经清除了小李那间住房上的覆盖物，屋里真的没人，雷文辉也随着赵梓勋说：小李肯定上老乡家玩去了。我们三个走近仔细地观察，床上的铺盖掀到了一边，我用手摸了摸床铺还有点温热，枕头下面压着手电筒，于是肯定地说：“他刚才就在床上，绝对没有出去。”山区的夜晚离开手电筒寸步难行，估计小李被压在外面的饲料间。雷、赵二人见手电筒在枕头底下，也就同意了我的判断，三个人转到饲料间，同心协力地继续清理废墟，寻找小李的下落。

对面山上，几只手电筒的亮光晃动着，在朝胡家坪方向移动，队部来人了，他们需要走下对面的山坡，蹚过一条小河，再上胡家坪这个山。

我们继续清理倒塌的木料。大约过了二十分钟，指导员周金仁带着卫生员廖觉先和一名狱卒上来了。这时候雷文辉弯着腰惊叫了一声：“在这儿！”众人围过来看，我拿着两只手电筒为他们照亮，雷文辉摸到了小李的手臂，卫生员赶忙给他注射了一针据说是可以延缓生命的强心剂，慢慢地清理压在小李身上的一切杂物，只见他光着膀子光着脚趴在地上，后脑受了严重的砸伤，已经停止了呼吸。

我看着小李的尸体，吃晚饭的时候还是活生生的小伙子，有说有笑，一下子就命丧黄泉了，头上还戴着反革命帽子，不禁茫然若有所失。

周金仁看猪圈去了，我和赵梓勋打开了炉灶，烧点温热水，用毛巾给小李擦干净脑后的血迹和沾满灰尘的身子。雷文辉在小李的住房找出来一条军绿色的长裤、一件浅蓝色衬衣，和一双前面有窟窿的解放鞋。我们三个人沉默不语，趁着躯体还没有硬化，慢慢地给他穿上这套他入狱之前穿过的、入狱之后舍不得穿的衣服和露着脚趾头的破胶鞋，总不能让他光着身子或者穿着劳改服从牢狱走向天堂吧。

已经十二点过了，周金仁等人什么话也没说，下山去了。我和雷文辉、赵梓勋把难友的尸体移到一个门板上，抬进了牛舍和我住房之间的过道里，避风遮雨。

我们三个人很疲倦也很伤感，但是谁都没有离开临时的太平间，而是坐在尸体旁边守夜，山上老鼠很多，没人值守的话，尸体容易被老鼠咬伤。一个年轻的生命就这样走了，不能再让他受到一丝一毫的侵犯、伤害。

小李是新犯人，投入劳改的时间不长，平时很少接触，按监狱的规定绝对不准互通案情，所以基本没什么了解，他调到胡家坪喂猪还不到一个星期，这么快就永远离开了我们。

我们三个人谁也没有说话，不知道该说什么，也不知道能做什么，更不知道我们的未来是什么，就这样伴着一盏飘飘摇摇的如豆孤灯和实实在在的亡人小李，默默地坐着，直到天亮。

天光大亮，我们把煤油灯移在小李的脚下，让它继续燃烧，或许这微弱的灯光多多少少可以慰藉难友的亡魂。

三个人烧了点温热水洗了澡，然后再次到垮塌的现场查看。小李床边的酱油瓶还端端正正的摆着，没有倒，里面还有平时舍不得吃的半瓶酱油。床铺上也没有被砸的痕迹，只是稀稀拉拉地散落着朽烂的谷草，昨晚垮塌的屋顶落在了比床铺高得多的大木桶上面，人如果睡在床铺上顶多受点轻伤，绝对不会牺牲。估计他睡觉比较惊醒，听到了房子垮塌的动静，急忙往外跑，跑到饲料间，落下来的横梁恰恰打中了他的后脑，如果慢一秒或快一秒，横

梁都不会击中要害部位，也没有生命危险，莫非真的死生有命？小李！小李！你就这样走了。一路走好吧。

第二天早上八点半左右，饲养组的主管干部林上清拄着拐棍上山来了。林干事年近六旬，在十三队除了丁司务长就属他年纪大了，他管辖的几十名犯人分散在各个山头上的猪舍、牛舍，绝大多数都是劳改多年的，不会越狱逃跑，所以管理起来比较轻松。他平时不大上山，只有每月给猪过秤的时候他要现场监督，偶尔到各个工棚看看饲料生长情况。他不像十三队的黑心狱卒周金仁、唐炳南、徐绍华那么凶狠残暴，总的来说还算通情达理，多少还有点人性。

林老头上山来直奔猪圈，看了看五十几头猪依然活蹦乱跳，见到有人进猪圈，纷纷哼哼地叫唤，林老头吩咐赵梓勋赶快煮饲料，马上喂猪，不能让猪饿着。然后吩咐雷文辉跑步通知胡家坪新猪舍，让他们快点来人吆20头猪过去饲养，通知万家山猪舍接纳14头，管家窝猪舍接纳12头，向阳坪猪舍接纳10头。56头猪全都安排了。

我站在一边冷言冷语地说：“猪的运气好，有人关心，吃饱了就要换新地方了，小李呀，你放心走吧，没人管你喽。”

林老头一听不是滋味，可又说不出什么来，想了一想，慢腾腾的走到尸体旁边看了一眼，对着我吩咐说：“让队部的木匠找几块木板钉个棺材，你们找个地方挖个坑，下午就把他掩埋了。”

我说：“林干事，你看看，好可怜，临死连双鞋都没有，露着脚趾头进丰都城喽。”

林干事回头又看了一眼，对我说：“回队部领一双胶鞋。”

约莫过了一个时辰，万家山、管家窝、向阳坪、胡家坪新猪舍来接猪的人都到了，虽然有的还不认识小李，却都先走到小李的身边看了看。二十六岁的小伙子刚刚住上外工棚就命丧黄泉，不知道他有没有老婆孩子，他的爹妈有多难过。几个难友在小李身边默默地站了四五分钟，低着头，蹙着眉，有人还含着眼泪，大家想到了漫长的刑期，想到了劳改队恶劣的生存条件，不知道哪天死神就会落在自己头上，心中难免惨然。

来的这几个人，遵从林干事的布置，不准挑肥拣瘦，按照预定的数量把猪吆走了，林老头也慢条斯理地下山了，胡家坪老猪舍一下清静了。

我这才打开牛圈的门，把饿了半天的牛吆上山吃草。雷文辉和赵梓勋在胡家坪山脚下一个丁字路口的拐弯处挖坑。

中午，我把牛赶到两山之间的一条深沟里，小水牛夏天中午要在水里泡一两个小时，不用看管。我快步跑回工棚，薄木板棺材送来了，胶鞋也换了，我们三个把小李安葬在路边才挖好的深坑里，把他床边那半瓶酱油和他平时用的碗筷放入坑中殉葬。坟包堆得很高，看看意犹未尽，三个人商量以后，到半山坡挖了一棵小柏树，栽在坟包正中。但愿这棵常绿的树，根深叶茂，延续小李那年轻的生命。

(5) 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是谁人规定的？

1972年11月5日，氤氲黯淡，淫雨霏霏。那天是星期日，不出工，三百多犯人都被关在监舍里，舍房外面的院子空无一人。三个岗楼上的持枪武警从不同方向监控着萎缩在地铺上的犯人，只有不时传来的“报告”声，打破沉闷的寂静。“报告，XXX解手”，接着是踢踢踏踏的脚步声，向厕所走去。“报告，XXX解手回来”，那脚步声从厕所回到了监舍。

早饭过后，雨住了，天未晴。十点钟左右，管教干部走进了监舍大院，随后内勤组的犯人抬了两张桌子放在院子的堡坎上，还铺上了一块蓝布，似乎有人要郑重其事地做长篇大论的演讲。接着一个人拿着一张毛泽东的大幅画像走进来，一下子又凑上了三四个人、七手八脚地把画像贴在桌子后面的白墙上，舍房里的犯人不肯出来，只拥在门口往外看，猜测着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儿。进监狱这么多年，头一回把毛泽东送到高墙电网围着的监舍大院里来了。一会儿，又在那棵桂花树旁边拉起了一个横幅，上面写着“传达毛主席重要指示”，人们觉得很诧异，那时候毛泽东说的每一句话都是重要指示、最高指示，这回又有什么新指示，惹得监狱里如此兴师动众呢？

一声哨子响，狱卒唐炳南高声喊“集合！”。各个舍房里的犯人纷纷跑出来，上台阶，按着固定的次序站好队，由各工区的犯人值星员清点人数，逐一向站在台子上的狱卒报告，报告完毕，将近四百名犯人站在坝子里等待着训话。唐炳南走到岗楼底下，拉开了监狱的大门，周金仁一副卑躬屈节的样子陪着苗溪茶场场长姜同海从大门慢步走了进来，姜同海穿着一身灰色毛料中山装，头发梳得很光，表情严肃地站在了桌子后面。周金仁咳嗽了一声，随后说：现在由姜场长宣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重要指示。

姜同海站在桌子后面，两手拿着一张纸，举在胸前，扫视了一下坝子里站着的犯人，用山西地方腔调高声念道：“最高指示，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是谁人规定的？应一律废除。”既无前言，也无后语，并没说毛泽东是在什么场合、什么时间说的这句话。我不禁有点莫名其妙。

接着又念了一段周恩来给公安部和卫戍区的批示：“请公安部会同卫戍区将我在国务院当面提出过要清查北京监狱待遇问题，再在年内做一次彻底清查，凡属主席指出的‘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和虐待、殴打都需列举出来，再一次宣布作废，并当着在押犯人公布，如有犯者，当依法惩治，更容许犯人控诉。”

姜同海念完了，用尖厉的目光扫视在场的犯人，停顿了大约两三分钟，犯人们默不作声、毫无表情。他开始说话了，他说：我场全体干警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执行中央方针上基本是做得好的，但在一段时期内也有少数打骂犯人、刑讯逼供等法西斯审查方式的现象发生，今后要坚决执行毛主席重要批示，彻底纠正这类行为等等。紧接着，十三队的指导员周金仁向犯人训话，他说共产党一向施行革命的人道主义，毛主席施仁政，关心在押犯人的改造，针对极个别地方殴打犯人的行为发出了最高指示，说明共产党是光明磊落的，永远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你们不要有任何幻想，必须认罪服法，接受改造，服从管教。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说，对于反动派必须实行独裁，压迫这些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如要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绣花，不能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就是暴力，是一个阶级对一个阶级的专政，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毛主席还教导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我们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不允许利用毛主席的最高指示翘尾巴，对于反改造分子我们绝不施仁政，绝不手软。这里是监狱，无产阶级专政就是要将敌人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忍。无产阶级就是不能让敌人有好日子过。

这个周金仁色厉内荏，用杀气腾腾的语言掩盖其内心的空虚，文革期间，

毛泽东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句句都是最高指示。今天说：“要武嘛”“好人打好人，误会。好人打坏人，活该。”明天说：“用文斗，不用武斗”。现在又说：“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是谁人规定的？应一律废除”。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只有他一个人可以随心所欲地乱说，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周金仁本属狗腿子之流，主子发话了，不得不传达，可不准捆绑吊打怎么显得出来狗腿子的威风呢？“无产阶级专政”不靠法西斯手段怎么能维持得下去呢？他翻来覆去地说了半天，道不出个所以然来，毛老头子是不是糊涂了？竟然说了实话，把一贯执行政策叫法西斯，这不是把共产党的头子说得比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还坏吗？

听了周金仁的传达，台下站着的这三百多名服刑人员感觉很突然，毛泽东承认是法西斯了，是真的还是假的呀？左右看了看，面面相觑，等待着且听下回分解。

散会以后，犯人铁匠荀旭光拿着榔头、鑿子、钢锯进来了，奉命给戴着脚镣关押在小监里的李盛照等人开镣。李盛照坐在地上开始感受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带给他的恩赐。脚镣是用铆钉铆死的，要用榔头、鑿子一点一点的把铆钉鑿断，榔头每打一下，李盛照都要龇牙咧嘴一回，打了十余下，再用钢锯拉拉扯扯地锯了半个多小时，才卸除了一只脚上的脚镣，然后再卸除另一只脚镣。约莫用了一个半小时，总算把两只脚上的铁镣打开了。李盛照用仍然戴着手铐的两只手撑着地面，慢慢地站起来，刚一迈步，身子一晃，扑腾一声又坐在地上了。戴惯了又冷又重的脚镣，一下子被卸掉了，脚底下突然取消了十几公斤重量，感觉轻飘飘的，掌握不住平衡，有些不适应了。李盛照从地上爬起来，在别人搀扶下，终于站稳了，然后慢慢地往前走，像个鸭子似的，摇摇摆摆，围观的人一语不发，只是默默地摇头，或者忍不住叹一口气。心里诅咒着中共法西斯的残忍。

给关在小监里的人卸掉脚镣，依然戴着手铐，这就是苗溪监狱贯彻最高指示的唯一具体行动。

我在想，毛泽东绝对不会无缘无故地发出这条“指示”，一定是监狱里的黑暗与残暴被透露出去了，不得不收敛一下，当时却无从打听。我出狱后，过了十余年才从相关资料上看到这桩事由的原委，起因于刘建章的夫人刘淑清告御状。

铁道部副部长刘建章是1926年参加中共的元老，他是王任重等中共高干的入党介绍人。文革伊始即遭批斗，1967年2月被关进秦城监狱，手带铐、脚上镣，体罚、虐待、殴打、逼供，五年有余不准亲属探视。其妻刘淑清是1934年入党的老共产党员，多方求告，1972年6月8日专案组始允许探监。

她来到戒备森严的秦城监狱，看见与之相依为命四十年的刘建章衣衫褴褛，面容憔悴，弓腰驼背，骨瘦如柴，说话吐字不清，站在地上两脚发抖，手臂不能抬高，夫妻不禁相对而泣。共产党的监狱对入党四十年的老共产党员竟然下如此之毒手，是什么原因呢？国民党的牢房也没有这么折磨人呀？刘建章1928年在吉林延边曾因随身携带数百张写有抗日讨蒋檄文的传单被捕，关押在延吉监狱，后以“共产嫌疑”罪判处一年监禁，不久即出狱，继续以小学教师身份为掩护，从事地下工作，那时携带讨蒋檄文，人赃俱获，只判了一年徒刑，而今一个老共产党员毫无罪证却被披枷带镣在中共管辖的监狱里关押了五年多，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刘建章趁看守不注意，小声告诉刘淑清说，他几次写申诉材料上呈毛泽

东、周恩来和党中央，均被专案组人员当场撕毁，秦城监狱还关押着陆定一、刘仁等众多中共高级干部，同样受着殴打、虐待。刘建章让刘淑清写一封信，设法上交毛泽东，冒死申诉并反映监狱中的惨状。

王光美当时也关押在秦城监狱，其子女记述了探监的情况：“1972年8月18日，我们第一次去监狱见妈妈。五年啦，我们每时每刻都在盼望这一天……可是，真见到妈妈的时候，她竟不认得，不会叫，木呆着。妈妈已经瘦弱不堪，满头灰白头发，连腰也伸不直，穿着一身旧军装染的黑衣服，神情麻木、迟钝……”（摘自《刘少奇的最后岁月》，九州出版社）。此段记述似可做中共监狱折磨人之佐证，天子脚下的监狱对共党高官尚且如此，深山老林里的监狱对一般民众可想而知。

刘淑清是中共的高级干部（全国铁路工会的执行委员），她知道给毛泽东写信并递交上去是十分困难的，万一逆触龙须，必然是一场大祸，彭德怀就是前车之鉴。她和刘建章一共生了九个子女，都还要在毛泽东这个红太阳的光辉照耀下生存呀，为此不免忧心忡忡。但是看到参加中共几十年，为毛泽东夺取江山几度出生入死，而今却落得关在中共的监狱里，镣铐加身，遍体鳞伤，苟延残喘，命在旦夕的丈夫禁不住义愤填膺，她和子女们商定下决心冒死上书。可是中南海门禁森严，毛泽东又神出鬼没，居无定所。万一这封信落在别人手里，往好里想是石沉大海，往坏里想可能招来变本加厉的迫害。递交给毛泽东虽然也可能被置之不理，也可能罪上加罪，引来杀身之祸，但是若遇到毛老人家那天玩得高兴，贴身秘书逗得老人家身心愉悦，龙颜大喜，偶发善心，或许还有一线希望。如今是死里求生，豁出身家性命也要把这封信交到毛泽东手里。

想来想去，刘建章的大女儿刘润芬自告奋勇，她在外交部工作，和毛泽东安插在外交部的那两个小人物王海容[1]和唐闻生[2]关系不错，这两位女将岁数不大、资格不老、但身份特殊，可以进出中南海，有机会和毛泽东直接接触，上可通天。

经过刘润芬耐心相求，苦苦哀告，王海容和唐闻生答应找机会试一试，也算是她们深入斗争第一线了解下情的成绩。这封刘淑清1972年7月20日写的鸣冤信，总算在当年临近年底的时候由王海容和唐闻生送到毛泽东书房兼卧室的案头。

毛泽东看了以后，若有所思，秦城监狱关了哪些人他心知肚明，文革中煤炭工业部长张霖之被活活打死，邓拓、田家英、柴沫、阎红彦相继自杀，陶勇死得不明不白，1969年刘少奇、贺龙、陶铸死于非命，毛泽东都了如指掌。据说刘少奇在被关押期间因受伤病之累行动不便，趴在地上挪动身体伸出手臂捡饭吃，毛泽东竟然在书房里看实况录像。

毛泽东深知，多数老干部对文革不满，林彪事件发生以后，怨愤情绪日益激烈，刘淑清的上书，反映的不仅仅是刘建章的问题，而是代表着一种思潮，需要认真对待。

毛泽东是善于捕捉机会的，林彪之死就是再好不过的机会，此时正好把罪责完全推到林彪身上。

毛泽东随即传王、唐二人再进中南海，询问了一些情况，当着她们的面拿出刘淑清写的那封信来，大笔一挥在那封信批示：“**请总理办，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是谁人规定的？应一律废除。**”

毛泽东坦然承认这是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但是却把他自己的责任推得

一干二净，大言不惭地问“是谁人规定的？”。让受迫害的老干部怨恨死人林彪去吧，老毛又骗了一次糊涂虫，当了一次救世主。

这是毛泽东的一贯伎俩，对狱政管理，他说过许多好听的话，“把人当人，反革命也是人嘛”、“勿用刑讯，严防诬陷”、“禁止一切不人道的待遇”、“采取镇压、压迫的方法他们宁肯死”等（见《公安史话》2007年9月所载公安部原政治部副主任董玉峰著《一场反法西斯式审查方式的斗争》）。早在1940年毛泽东就说过：“对任何犯人应坚决废止肉刑，重证据而不轻信口供。”（《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725页）1948年，他在晋绥干部会议上讲话时再次强调：“在人民法庭和民主政府进行对于犯罪分子的审讯工作时，必须禁止使用肉刑”（《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1250页），施行了吗？没有，那只是写出来给别人看的。1942年，在延安以整风为名，实为消除异己的政治斗争中，康生秉承毛泽东的旨意掀起“抢救运动”[3]。虐杀王实味[4]，大搞逼供信，在延安这个弹丸之地抓出了一万五千多名“特务”，被逼自杀者累累。事后毛泽东出来“道歉”，还说他的意见是“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幕后的刽子手摇身一变成了宽仁厚德的长者。康生替他背了恶名，由此得到重用，这个心毒手狠的刽子手以后成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中共东北局书记宋任穷的女儿宋彬彬[5]，时年十九岁，北京师范大学附中[6]高三学生，登上天安门城楼给毛泽东敬献红卫兵袖章，毛泽东问了她的名字，听说是文质彬彬的彬彬以后，大声武气地说了一句“要武嘛！”。十三天前，也就是8月5日，宋彬彬以北师大女附中革命造反派副主席的身份统领红卫兵打死副校长卞仲耘[16]，毛泽东一句“要武嘛”肯定了宋彬彬等“革命小将”的暴力行为。由此掀起了以打砸抢为基本特征的文革法西斯风暴，刘少奇、彭德怀都难逃厄运，众多学者名流、专家教授、走资派以及臭老九、黑五类，被戴着高帽子或五花大绑、游街示众、轮番批斗、皮带抽、钢钎戳、开水烫，乃至发展到真刀真枪，甚至坦克上街的武斗。事后统计文革中非正常死亡两千万人，遭受批斗陷害者高达一亿人（1978年12月13日叶剑英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

法西斯专政的始作俑者就是毛泽东，而今他却装作毫不知情似地在一旁说起了风凉话，反问“是谁人规定的？”，其阴险狡诈无人可比。

刘淑清秉笔直书，冒死告御状的事随后传为佳话。毛泽东的最高指示下达以后，秦城监狱的伙食费从每天五角钱调整到六角五分钱，狱卒的态度稍有缓和，医疗条件略有改善（仅限秦城监狱，其他监狱依然如故）。一大批被关押过的老干部对刘淑清感激备至，敬仰十分。1987年刘淑清去世时，不少老干部拄着拐杖亲自到八宝山参加祭奠，挽联、挽幛挂满四周。文革期间也关过监狱的开国上将吕正操为悼念她写道：投石天开惊四野，迁客囚友躬折节，斯人仙去重如山，生者长怀刘大姐！

附注：

[1]王海容，1938年生，湖南长沙人，出身名门望族，其祖父王季范是毛泽东的表兄，曾携青年王海容赴中南海拜见毛泽东，深受毛泽东喜爱。1958年投考北京化工学院因成绩不好，未被录取，复读一年。1964年王海容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俄语系，经周恩来举荐在外交部工作，1970年周恩来直接提名王海容任礼宾司副司长，1972年提升为部长助理，1974年任命为外交部副部长。文革期间，王海容来往于外交部和中南海，不可一世。曾颐指气使地呵斥周恩来。毛泽东去世后，王海容失势。

现在北京养老，享受副部长级待遇，终身未嫁。

[2]唐闻生，广东恩平人，中共外交部官员唐明照之女，1943年生于纽约，1950年随其父回国，1962年考入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专业，毕业后经周恩来遴选为外交部翻译。1966年夏。年方23岁、风华正茂的唐闻生陪同毛泽东畅游长江，展露其青春体态，受到毛泽东特殊关爱，旋即被任命为外交部美大司司长。唐闻生1971年入党，在毛泽东最后一次出席并主持的第十次党代会上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经常参与毛泽东接见外宾等国事活动，并充任毛泽东与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毛泽东死后调离外交部，现已退休，终身未婚。

[3]抢救运动；在1943年3月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提出：“抗战以来，国民党对我党实行特务政策，在社会调查部和党校都发现许多特务。现在我们要学会识别特务与贤才。”于是在延安展开了大张旗鼓的审干运动。嗣后康生称之为“抢救失足者”。在狂风暴雨般的运动中延安一万五千余人被抢救成“特务”，西北公学揪出特务分子、嫌疑分子602人，占全校排以上干部的57.2%；干部大队496人揪出特务和特嫌373人，占75%以上。未能经受“老虎凳”、“压杠子”、“鞭打”、“凌空甩地”等二十四种肉刑折磨而自杀的仅延安一地即有五六十人之多。

[4]王实味（1906-1947），河南潢川人。曾就读北京大学，忧虑时事，不满当局，在其处女作《休息》中扬言：“我们青年的使命就是要用我们的力捣毁一切黑暗的渊窟，用我们的热血浇灭一切罪恶的魔火，拯救玷危的祖国，改造龌龊的社会。”多年因政治原因流徙奔走。1926年在北京大学期间加入共产党，因个人恋爱横遭时任支部书记的段纯干涉而愤然退党，1937年只身赴延安，再次入党。王实味在延安主要从事翻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原著工作，四年间单独或合译近两百万字书稿，当时王实味的津贴是四元五角（边区主席林伯渠四元，毛泽东五元）。1941年毛泽东策划清剿王明等一批曾经留过学的党人，开始整风，起初毛泽东频吹自由之风，鼓励大家提意见，延安办起了各种各样的墙报，丁玲、肖军、王实味、艾青等在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口号下主张暴露黑暗，针砭延安时弊，几成时髦之举。王实味发表了自以为是批评官僚主义、纠正党风的《野百合花》和《政治家，艺术家》等杂文。毛泽东看了以后认为这篇杂文的矛头不单是指向他意欲打倒的那些理论权威，而是攻击了他和延安的等级制度，在一次中央高级干部学习会上说：“王实味是托派”，由此展开了对王实味的批判，康生插手后将王实味坐实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暗藏的国民党特务”，还揪出了一个王实味、潘芳、宗铮、陈传刚、王汝琪“五人反党集团”。罪名有了，于是王实味被逮捕、关押。1947年延安撤退时经王震批准“秘密处决”，时年41岁的王实味被砍杀、掩尸一枯井之中。

1991年2月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经长期取证后认定“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和“五人反党集团”查无实证，予以平反，蒙冤半个世纪的王实味又被称为“同志”了。

[5]宋彬彬，中共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的女儿。1966年北京师大女附中高三级学生，1966年四月加入中共，预备党员。文革初期甚为活跃。

1966年6月1日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北京大学被毛泽东“赞扬”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支持攻击北京大学的负责人，还号召“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第二天中午，三个学生在北京师大女附中也贴出了该校第一张大字报，宣称要“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对该校领导作了类似的攻击。在这张大字报上领头署名的学生是刘进（高教部副部长刘仰峤之女）、宋彬彬、马德秀（京城某官员之女，昔日打砸抢的造反派头目，今日成了副部长级的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书记）。

同年6月该校成立“革命师生代表会”，领导小组由七人组成，宋彬彬为副主席之一。

1966年8月5日红卫兵批斗学校领导卞仲耘、胡志涛、刘致平、梅树民、汪玉冰。这五个人跪在操场高台上被打的时候，宋曾说：“煞煞他们的威风也好”。当日，

卞仲耘被打死，胡志涛等人身受重伤。由此大兴暴力之风，据《北京日报》1980年披露的数字，从八月下旬到九月五日止，仅仅半个多月，北京市遭活活打死的就有一千七百二十二人，不包括在暴力下造成的大量自杀者和失踪者。

1966年8月18日宋彬彬登上天安门给毛泽东敬献红袖章，凭借毛泽东一句“要武嘛”改名“宋要武”。

1966年8月20日《光明日报》发表署名宋要武（宋彬彬）的文章《我给毛主席戴上了红袖章》，宋名声大振。

1966年9月6日，用宋要武的名字发出《致革命同学的公开信》（华夏文摘增刊第420期）信中说：“我们严正警告混进南下串联队伍中的混蛋、王八蛋们，你们恶毒地攻击我们伟大的党中央和毛主席，我们是饶不了你们的！你们把屁放了，想跑了，别他妈的妄想。”典型的红卫兵语言，活脱脱的宋彬彬本色。

1980年宋彬彬移民美国，改名宋岩，2007年回到母校，大肆吹嘘在美国如何取得博士学位，对文革中的劣迹只字不提，毫无忏悔之意。

[6]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是京城历史名校之一，始建于1917年，由于临近天安门和中南海，且师资力量雄厚、教学设备完善，故中共众多高级干部子女就读该校，毛泽东的女儿李敏、李讷；毛泽东的儿媳邵华；刘少奇的女儿刘亭亭；邓小平的女儿邓榕、邓楠；叶剑英的女儿叶向真；林彪的女儿林晓霖；陈云的女儿陈伟华、陈伟力；罗瑞卿的女儿罗点点；宋任穷的女儿宋彬彬等均为该校学生，高干子女占50%以上。

文革初期这些所谓高干子弟喊着“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口号率先组织红卫兵。冲击党政机关，揪斗单位领导，入室抄家，刑讯逼供，以狂放不羁、心狠手辣著称。是谓“破四旧”之能手，打砸抢之先锋。受到毛泽东的支持，迅即风靡全国。北京之“联动”、沈阳“红后代”、武汉“三字兵”、济南“黑字兵”等均属此类。后因这批土匪习性颇深、且目中无人、出言狂妄的小流氓，辱骂“伟大领袖”，惹恼中央文革，被毛泽东强令解散。

（6）轰然一声、壮烈一举

五十年代末，毛泽东喊过“农业学大寨”的口号，七十年代中，发展成了风靡一时的政治运动。197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会上发出“全党动员，大办农业，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的号召。

昏君毛泽东听信了陈永贵花言巧语的蛊惑宣传，做起了“中国梦”。痴迷造成一个由大寨村到大寨县，再到大寨省、大寨国的滚雪球效应，妄想用这种办法解决建国二十余年中国人仍然缺吃少穿、面黄肌瘦的问题。

由此苗溪茶场掀起了“改田改土”的高潮，第十三中队的狱警好大喜功，扬言要把陡峭的胡家坪山坡改造成保水保肥的梯田。

对于耕地面积偏少、人口众多的中国来说，农田基本建设理应受到重视，把它列为全国的头等大事也理所当然，然而这是一件需要切切实实努力的工作，需要科学规划，科学施工。绝不是大轰大嗡敲锣打鼓空喊口号就能奏效的。

文革伊始，中国科学院的许多专家都被关进了牛棚，毛泽东说知识越多越反动，卑贱者最聪明，谁还讲科学呢？

文革后期，山西省昔阳县的大寨成了阶级斗争的样板，毛泽东钦点半文盲陈永贵当上了国务院副总理。

第十三中队派出几个原籍山西、河南的狱警到大寨参观了一天，顺便回乡探望父老，和乡亲们欢聚了五六天，大口喝酒，大块吃肉。返回苗溪以后不负使命，发誓要削平胡家坪的山头，喊的口号是“立下愚公志，改造大自

然”，倒也中听。于是集中了一百多名犯人改田改土，还从第一中队借调了一个曾经当过工程兵的军犯，姓黄，可惜我和他极少接触，记不得他的名字了，也不知道他犯了什么罪，被判了七年有期徒刑，已经服刑四年有余，故事就发生在他身上。

小黄二十几岁，思维敏捷，手脚麻利，性格开朗。平时喜欢说笑，还喜欢写点文章。在劳改犯人苦中作乐的魔术表演中，他串演小丑，嘴里叼着一根假烟卷，表情生动，逗得愁眉苦脸的犯人哈哈大笑。在悼念周恩来逝世的墙报上，刊出过他写的几首小诗，颇有文采。也看得出他有一点褒周贬毛的情绪，惹得那几个当过记者、时刻窥视他人、擅长投机取巧的“劳改积极分子”蠢蠢欲动，要批判他、斗争他。幸好狱警的文化低，看不出门道，又念及他是年轻的军犯，未予追究。

改田改土，轰轰烈烈，不计成本，不讲科学。胡家坪原本是果粮套种的坡地，每亩土地栽种了四十株苹果树，品种有国光、元帅、香蕉、红玉、紫魁、秦冠等等。林间空地种植西瓜，小麦、黄豆、花生、玉米，油菜、萝卜、红薯等农作物。农业学大寨一来，据说要“以粮为纲”，正在盛果期的苹果树被连根挖掉，送到厨房当柴火烧了。从远处山上开采了大量块石，用以砌筑堡坎，修建梯田。小黄承担开山放炮的任务，炸药、雷管都在他手上掌握着。

1976年夏，不知何故，改田改土悄然偃旗息鼓，昔日一派大轰大嗡的景象不复存在，各个中队只保留了小规模工程。砍尽了苹果树的胡家坪坡地变成了光秃秃的荒山，被挖得高低不平的耕地上，零零落落地堆积着乱石，往年可以收获数万斤苹果的树早已化为灰烬，连一片落叶也没有留下，秋收成了泡影。农业学大寨的丰硕成果依然刊登在《人民日报》上，据说又是一个丰收年。

改田改土的队伍解散了，小黄回到第一中队继续服刑。

一天上午，第一中队的干部宿舍区，忽然传出沉闷的爆炸声。

农业学大寨，要开山取石，听到爆炸声是经常的，并不引起注意。但改田改土半途而废，已经不再开山放炮了，为什么又闻爆炸声呢？按惯例，放炮一般安排在中午，这次爆炸是上午八点左右，似乎反常。爆炸应该在山上，这次却在干部宿舍的小院里，异乎寻常。集中劳动的犯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惊眉诧眼，莫名其妙，狱警在侧，未敢议论。

小道消息是可以不胫而走、不翼而飞的。当天下午一中队发生爆炸的新闻就传到了我所在的第十三中队。经过几天道听途说，小黄的壮烈一举渐渐清晰，并迅速地传遍了苗溪茶场二十四个中队和邻近的老乡聚集地区。综合那几天的传说，排除孤证，追记1976年苗溪茶场爆炸案如下：

苗溪茶场第一中队是关押军犯的农业队，昔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上至大校，下至列兵，共三百余人，成了今日的阶下囚。开荒种地，养牛喂猪，为场部附近各中队的狱警和管理员提供各类副食品。从中队长、指导员到管教干部、司务长一律是转业军人。这些也当过几天兵的，在毛泽东思想毒素的熏陶下，不同程度地泯灭人性了，其中某狱卒中毒尤甚，以无产阶级专政者自居，动辄打骂犯人。骂起人来，语言粗俗，日妈操娘，不堪入耳，把犯人的列祖列宗都搬出来，统统骂个没完；打起人来，心毒手狠，拳脚并用，棍棒交加；腰间常别着警绳，尤其嗜好捆人，其暴虐凶狠在第一中队是出了名的。小黄在他手下，已经受过多次拳打脚踢，愤懑已极，但未敢反抗。

事当凑巧，某日下午小黄在厨房不远处劳动，见到一只肥猫，竟然跑到他的脚下转来转去，周围有人说：逮住、逮住。说时迟，那时快，小黄一弯腰，一伸右手，那只猫的脖子被小黄抓个正着，那猫挣扎之际，猛然一口，把小黄的左手咬出了血，小黄情急之下掐着猫脖子的右手一用力，那猫已无力挣扎，奄奄一息了。这下惹了大祸，劳改队里的犯人除了臭虫、虱子随身饲养，苍蝇、蚊子自由驰骋以外，是没有宠物的。猫、狗、鸡、鸭、兔等都是狱卒们的私有财产。怎么办？一不做，二不休，三两个人一合计，既然猫已经死了，把它杀来吃了，消痕灭迹。

三天以后，猫的主人露面了，正是那位凶残卓著的管教干部。小黄被那位干部喊到了干部宿舍外面的坝子里，不由分说，一阵拳打脚踢，狱卒练过擒拿掇跤，小黄这个工程兵自然不是他的对手，况且偷吃了人家的猫，自知理亏，又是犯人身份，容不得反抗，被打得眼冒金光，浑身颤抖，只管连连告饶。请求宽恕一次。

孰料这位干部余怒未息，死了一只猫犹如死了他的八辈祖宗，恨不得要人披麻戴孝。刹那间从腰带上抽出一根警绳，横扫一脚，把小黄撂翻在地，紧接着左脚踏上小黄的后背，用熟练的动作把小黄捆了个扎扎实实，然后单手提著小黄身后的绳子，让他站起来。随后，从屋里端了一把藤椅，坐在门口抽起烟、喝起茶来了。坝子里不时有干部走动，看了一眼，狱卒捆犯人是司空见惯的事，谁也不以为然，不闻不问地走开了。偶尔有犯人从附近经过，斜瞄了一眼坐在藤椅上的干部，又紧盯了几眼小黄，什么也不敢说。

小黄被捆得龇牙咧嘴，不出一声；怒目而视，仇恨如火。

那位管教干部坐了一会儿，不时地斜着眼睛看看小黄痛苦的表情，慢腾腾地站起来，锁上门，走了。

捆人的和被捆过的都知道，绳子捆在身上疼痛难忍，丝毫不亚于老虎凳等刑具。医学告诉人们：疼痛是机体组织受到物理化学等因子刺激所产生的病理生理变化，是外因刺激人体神经元和疼痛感受点发出的机体病变或损伤信号。绳子紧紧地勒在身上，阻断血液循环，造成软组织损伤，肌肉断裂，皮肤破裂。疼痛不止，意味着损伤严重，乃至不可恢复，所以一般捆绳子不超过一小时，或者松一松，捆一捆，反复折磨，避免造成永久性伤残。这一次小黄被那位心存歹毒的管教干部足足捆了两个多小时，松了绳子以后，两手已经不能复原，一两个月以后，确认成了终身残疾，一个健壮的小伙子，两臂不能伸直，手无缚鸡之力，也就丧失了谋生的能力，如今才二十几岁，这后半生怎么过呢？

据说小黄偶尔流露过悲观、愤恨、复仇的想法，难友们也曾尽力劝慰，他还是走向了极端，不惜一死宣泄胸中的怨气。

出事的这一天早晨，他预先在自己的身上捆绑了炸药，接好了雷管和引线。手里提着一个绿色的军用背包，里面也装着雷管和炸药。他去找那个管教干部，企图与他同归于尽。不巧，那个狱卒出去了，找了几次都不在，狱卒的老婆在另一间屋里没出来。小黄一气之下，闯进狱卒的居室，用火柴点燃了引线。然后迅速退出，往监舍方向跑去。跑了数十步，只有几秒钟的时间，轰然一声，回头看，尘烟弥漫，那间房屋倒塌了半边。他继续往前跑，这时有人在喊：跑了！跑了！抓住！抓住！

没有命令，在田间劳动的犯人是不能离开劳动地点的，只能远望，不敢擅动。

监管区内的狱警和武警几乎是倾巢而出，大约十多个人，狱警手里拿着短枪，武警则手持自动步枪，相互保持着距离，威风凛凛地朝小黄奔跑的方向追赶。

小黄是做了牺牲准备的，所以毫无畏惧，只见他快步爬上堡坎，蹭、蹭、蹭，攀上风干房的屋顶，迎风而立，猛然间扯开了衣襟，露出了捆在身上的炸药。追赶到堡坎下面的一群人，慌忙卧倒，一个个像遇到空袭警报似的，趴在地上，不敢轻举妄动。一个胆子大点的鼓起勇气朝上叫喊：下来！下来！但见小黄抬起头来，从容地望了望远方的天际，转了一个身，霎时，又是轰然一声，他的肉体 and 灵魂一起升上了天空。他的躯体分成了无数段，散落在周围的大地。他的灵魂在云端缓慢地飘升。

在监狱里，狱警和关押人员的矛盾是客观存在。前者是专政工具，后者是专政对象，根本是对立的。中共掌权以来不断地制造冤假错案，毛泽东就自称“无法无天”，在一党专政的体制下，无法可依，有法不依的事件司空见惯，1957年以后尤为严重。因此在监狱里关押着大量无辜的受害者（毛泽东死了以后，数百万人得到甄别平反，可为实证）。作为狱警，本属执行机构的工作人员，冤假错案不是他们制造的，他们只负监守之责。按理说，只要被关押人员没有违反监规纪律，就不应滥施淫威，妄加惩罚。但是实际上，除少数天良尚未丧尽的狱警（这部分人往往被斥为右倾），还保持着些许人性和正义感以外；多数狱警和狱卒都深受毛泽东阶级斗争谬论之毒，以对“敌人”凶狠为荣；还有少数本性就属痞子、流氓一类，他们不见得信仰毛泽东的邪说，但却往往以极左面貌出现，以凌辱虐待犯人为乐事，或以此妄图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后两类狱警，实际上是在激化矛盾，扩大对立面，毁坏中共声誉，玷污政府威信，他们才是中共真正的敌人，也是毁灭中共的蛀虫。然而，在毛泽东统治时期，乃至在毛泽东死了之后其流毒并未肃清的数十年内，这两类人是颇受重用的。劳改队的各级领导大多由这些人担任，这就是刑讯逼供、捆绑吊打等法西斯暴行一度愈演愈烈的原因。中共官方文件多次宣扬废止肉刑，那是写在纸上给别人看的，从来没有认真实行。1972年，毛泽东针对监狱管理曾发出最高指示：“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是谁人规定的？应一律废除。”在那个“一句顶一万句”的时代，最高指示也只能引得一阵敲锣打鼓，扭扭秧歌，最终成了废纸，被扔在垃圾堆里了。传达了最高指示以后，监狱里的部分狱警依然我行我素，虐待凌辱在押人员的事件仍时有发生。苗溪茶场第一中队的管教干部为了一只死猫大打出手、滥施酷刑，把一个年纪轻轻的军犯捆成了双手残疾，就是明证。因此遭到强烈报复，乃至发生了这场惨烈的爆炸。

这种极端的突发事件是非常少见的，因此引起了巨大的冲击波。尽管苗溪茶场采取种种措施封锁消息，但已经发生的事实是永远封不住的。一段时间闹得沸沸扬扬，无论干部和犯人虽然都没有公开宣扬，私下的议论却是禁止不住的。犯人们看得很清楚，作恶多端的狱卒虽没有被炸死，也吓出了一身冷汗，他老婆受了轻伤，不断地抱怨，说他凶暴残忍才遭此大祸，如果不改，不定哪天就会丢了老命。

爆炸事件发生以后，苗溪茶场组织干部学习，强调这是阶级斗争尖锐化的反映，于是进一步加强防范措施，各中队的管教干部强化了对犯人的监控，对住在外工棚的人员进行逐一审查，限制其活动范围。对有可能爆炸的物品建立和执行更严格的管理和回收制度，由干部直接保管等等。

邻近各个中队的干部，探询犯人的反应，得到的回答大都是说反改造分子自取灭亡。说这话的人心里想的却是小黄那么年轻，没把那个凶残的管教炸死，划不来。有的认为小黄虽未炸死那个恶棍，也替犯人出了一口恶气。有的赞扬小黄的行为不亚于舍身炸碉堡，实乃当代之英雄。

爆炸事件发生以后，那些平日嚣张不可一世的狱警有所收敛。捆绑吊打的现象有所减少，其效果比毛泽东发布“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是谁人规定的？应一律废除。”还灵验得多，这是小黄的年轻生命换来的。

八、动荡的一九七六年

(1) 周恩来病故

1976年1月9日，农历丙辰年腊月初九，农谚说：腊七腊八，冻死寒鸦，四川雅安地处南疆，虽不至于冰冻三尺，却也是一年中最冷的季节。当日，晦暗的空中断断续续地飘洒着雪夹雨，阵阵寒风挟带着湿雪吹向荒山野岭，更平添了些许肃杀之气。

那天下午我正在胡家坪山下割草，全天要完成四百斤的任务，完不成就挨骂，甚至挨批斗。好在上午我已经割了二百四十多斤，只要再割一百六十斤就可以交差了。我低着头、有时蹲着、有时跪着，不顾雨雪打湿了褴褛的棉衣，左手抓着草从，右手紧贴着地面挥动镰刀，一窝一窝草夹带着少许泥土躺在了旁边，越堆越多。天气虽然很冷，还是微微出了汗，五点钟以前一定要把割下来的草背到牛圈，过完了秤，还要抽时间磨刀，为明天的任务做准备。

大约下午两点钟，十三队队部方向的高音喇叭突然响了，紧接着播报周恩来逝世的讣告。我停止了割草，坐在山坡上，凝神静气地听着，周恩来于昨日上午九时五十七分因癌症医治无效逝世。后来得知，这个讣告是中央电台一月九日四点十二分、也就是在周恩来逝世十九个小时以后首次播出的。又经过大约十个小时，共计费了三十个小时，才传到四川雅安专区芦山县苗溪茶场。

讣告全文一千字左右，充分肯定周恩来“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对建设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对建设和发展战无不胜的人民军队，对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创建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对巩固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发展革命统一战线，对争取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胜利，争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胜利，巩固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对加强国际革命力量的团结，反对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建立了不朽的功绩”；讣告号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团结一致，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反修防修，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为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而奋斗。”

从1974年1月18日毛泽东批文，支持江青在全国开展“批林批孔”运动以来，半年多的时间内，中央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批所谓“现代的儒”、“党内的大儒”，批“克己复礼”，批“周公”。以“影射史学”的阴暗手法表露了毛泽东与周恩来之间的矛盾，昭示了毛泽东欲为实现“家天下”扫清障碍，打倒周恩来的妄想。

历经十年文革，忧国忧民的中华儿女，对毛泽东在文革中的倒行逆施已渐有察觉、日益不满，由是对周恩来寄以厚望和同情。听到周恩来先于毛泽东去世，难免悲愤。惊闻讣告后，我情难自禁地流出了眼泪。坐在冬日山坡寒冷的湿地上，默默地吟诵了一首七律——《悼周恩来逝世》：

风瑟瑟兮雨淅淅，长星陨落恻我心。闷郁悲歌难成句，轸怀英烈功绝伦。
光明磊落昭日月，正气凛然贯古今。誓将悲泪化疾雨，涤荡乾坤慰忠魂。

这首诗，是我当时心情的真实表述，对周恩来的评价应该是很高的。现在看来有点过甚其辞了。如今他已去世三十六年，盖棺是否论定了呢？没有。近三十年披露的大量历史事实表明，周恩来是一个极为复杂的人物，毛泽东之所以能够祸害中国数十年，与周恩来助纣为虐、为虎作伥是分不开的。近年已有不少专著和评述问世，初步揭露了周恩来的伪善面孔，笔者暂不赘言，历史是会做出公正评论的。

2015年再记：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当年保密的资料，逐渐泄露，我看到了一小部分，感触颇多，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现将与论定周恩来有关的部分摘录如下，供世人评说吧。

1942年抗日战争艰难时期，共产党著名特工潘汉年（见本书第五章第10小节讲述葛佩琦遭遇的一段之注解）。被毛泽东派到上海和汪精卫秘密接触并与日本占领军谈判，达成了停火协议，即新四军停止对津浦线铁路桥梁的破坏，让日军运输线畅通，日军则停止对新四军的“清乡”、“围剿”，给新四军活动空间。日本投降后，潘汉年与日、汪秘密接触的事情被关押在狱中的前汪精卫政权官员揭发。潘汉年唯恐暴露却又把这段秘史讲给不该知情的顶头上司陈毅，毛泽东闻讯大怒，当天下令秘密逮捕潘汉年，并给法院“不判死刑”的指示。潘汉年被监禁七年后以汉奸罪接受审判，判刑十五年。实际上潘汉年在秦城监狱被囚二十年，然后改名换姓转移到湖南第三劳改农场继续监禁，两年后病死，妻子董慧也受牵连陪监终生。

潘汉年案到1982年才得以平反，此时潘氏夫妇早已双双离世多年了。支持潘汉年无罪的证据在审判时就已经确切掌握。最高法院院长谢觉哉说：“谁能救得了岳飞？”意指既然宋高宗要治岳飞以死罪，大理寺也只好以“莫须有”定案。在高等法院内部，谢觉哉则明确对两位审判官说：“潘汉年案是中央交办的案子，我们只是办理法律手续。”周恩来对潘汉年怀揣毛泽东的密信意欲与汪精卫勾结的阴谋是知情的。中联部部长罗青长还找到了当时潘汉年与中共中央来往电报的收发记录，证明潘汉年是奉命行事；薄一波认为总理应该出面纠正这起冤案。可是周恩来却指示薄一波、罗青长等闭口，从此再也不要向任何人谈起潘汉年这个名字。后来周恩来签字批准了高等法院对潘汉年的判决。

这件危害民族的罪恶。毛泽东是始作俑者，给潘汉年安一个罪名，让他老死狱中，是毛泽东封口之需要。法院、检察院只能奉命制造冤案；明知内幕的政府总理却佯装不知，眼看着跟随他多年的老下属蒙冤入狱，公平正义在哪里？就凭这些，也会颠覆周恩来在我心中的形象。

周恩来在毛泽东面前放弃原则、卑躬屈节、甚至为虎作伥是一个常态。潘汉年案绝不是一个孤立的例子。一旦破除了对周公的迷信，还真发现不少周公隐疾。

1968年3月18日，正是文化大革命的混沌时期，周恩来与造反派在人民大会堂开会，江青进来当着众人的面，气势汹汹地吼道：“总理！成元功（周

恩来的卫士长)是你身边的一条狗,孙维世是你身边的一条狼!”她向造反派们表达了切齿痛恨孙维世的态度。红卫兵闻风而动,抓捕批斗孙维世。孙维世在监狱受尽凌辱折磨致死。尸身上一丝不挂,手腕上锁了一副手铐。

孙维世是中共烈士孙炳文之女。孙炳文在黄埔军校时就与周恩来是党内同事,1927年牺牲。1937年16岁的孙维世到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投奔革命。门岗不让进,她就站在那儿,直到周恩来经过门口,孙维世才上去相认。周恩来邓颖超把她收为义女。孙维世有表演天才,年轻漂亮,在延安舞台上曾与江青同台演戏,夺去江青的彩头,令江青不快。

1939年孙维世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就读戏剧表演和导演专业。1949年在毛泽东赴莫斯科谈判期间,孙维世任代表团翻译,毛泽东没有让江青随行,孙维世被安排与毛泽东同居一室,强遭蹂躏。江青于是再添嫉恨。回国后孙维世向干爹哭诉,周恩来只能略施劝慰,随后命其嫁给了电影演员金山,文革期间再陷虎口,被关押入狱。

江青对孙维世进行迫害,虽然毒辣,却也有毒辣的动机。令人不解的是,那张逮捕孙维世的命令,竟是周恩来亲笔签署的。

至于卫士长成元功,江青破口大骂是她认为成元功阻止她与周恩来见面,掩护周恩来背着她开黑会。这纯粹是江青无中生有的猜疑。然而周恩来没有为自己的忠诚卫士长做任何辩解。成元功被逐出中南海警卫处送去劳动改造八年。

与其说是周恩来屈服于江青的雌威,不如说屈服于赋予江青雌威的毛泽东的淫威。他战战兢兢侍奉毛泽东,小心翼翼讨好江青,已经到自贱自轻的地步。中国有个俗话说:“打狗要看主人面”,周恩来做得更进一步,“敬狗全看主人面”。

周恩来曾向邱会作传授做官经,他说:“中央政治,就是处理好主席、林副主席、江青的关系。”(《邱会作回忆录》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版)。为了迎合毛泽东,周恩来可以牺牲任何人。让无辜之人,罹无妄之灾。

文革期间,被投入监狱的上层人物,大多是由周恩来下令逮捕的。包括贺龙、王光美、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等。周恩来曾经在电话里语重心长地说:“光美同志,要经得起考验啊。”一腔慈悲为怀的声调。可是不久他就发出逮捕令,翻脸不认人。最后中共中央专案组罗织罪名要求处王光美死刑,周恩来是签了字的。狡黠的毛泽东批了个“刀下留人”,王光美才得以苟全性命。

1968年9月25日,周恩来还亲笔起草了由他本人和陈伯达、康生、江青共同签名上送的报告,把刘少奇所谓历史上三次叛变的“罪行材料”送给毛泽东、林彪审阅。报告称:“刘贼少奇是长期埋伏在党内的大叛徒、大工贼、大内奸、大特务、大汉奸,现在专案组所掌握的人证、物证和旁证材料足以证明刘贼是一个五毒俱全、十恶不赦的反革命份子。”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周恩来亲自宣读这份报告,以增加这报告的严肃性、真实性、可信性。终于将与其共事数十年的刘少奇置于死地。王光美至死不看关于周恩来的电影和颂词报导,概缘于此。

周恩来的批语还有更情感丰富的话,以批刘辩明心迹:“我们要首先欢呼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没有这场大革命,怎么能够把刘贼及其一伙人的叛党卖国、杀害同志的罪状,挖得这样深,这样广?当然我们还要挖下去,不能有丝毫的松懈,不能失掉警惕,如果挖

不完，我们要交给后来人！我们要万分感谢林副主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毛泽东思想、毛主席声音（语录）广泛地传达到几百万解放军和几亿劳动人们中去。没有几亿劳动人民和几百万解放军战士掌握毛泽东思想，如何能够发动这场有亿万革命人民参加的自下而上又自上而下的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思想的传播，毛主席声音的传达，毛主席指示的执行，这是考验我们够不够做一个共产党员，能不能保持革命晚节的尺度。在这点上，我们要向江青同志学习！我更要向江青同志学习！

江青阅后在此处批示道：“向恩来同志学习！共勉励，保晚节！”

在这些历史细节中，周恩来跌落到他人格上的最低点和陷入道德污泥最深处。不管他内心如何挣扎，终于还是把灵魂彻底出卖给毛泽东，充当专制朝廷的大祭师。用刘少奇的血，献祀于文化大革命的祭坛。

周恩来既有明知错杀也要杀人的冷酷之心，也有明知谬奖也要捧人的阿谀之态。他有一句名言是“宁犯政治错误不犯组织错误。”

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荒唐宣传：“林彪与毛泽东在井冈山会师”“林彪领导南昌起义”其源概出于周恩来。1967年9月9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纪念秋收起义40周年大会，周发言：“我要告诉你们，八一南昌起义，不是我周恩来领导的，是林副主席领导的，我周恩来不过是参加了而已。”

周恩来为了突出林彪新晋升的副统帅地位，可谓表演的淋漓尽致。在接见群众的场合，周恩来总是让毛泽东和林彪在舞台上双双亮相良久，充分享受雷鸣般的掌声和海潮般的万岁欢呼，在舞台中央定位后。周恩来才拖着一大串高干，缓缓出笼，本分地挤在舞台后排。周恩来还把伪装谦恭延伸到篡改历史，把属于他人的功劳编成花环挂到当时只是连长的林彪脖子上。谄笑着歌颂林副统帅。

在这次大会上，周恩来还有失态的举止。他用一种歇斯底里的态度，向毛泽东、林彪宣誓效忠。他说：“同志们，我很理解大家的心情。你们热爱毛主席，热爱江青同志，这是完全正确的。我完全理解你们的心情，但是，我要告诉大家，我周恩来热爱毛主席的心情不比你们差。我周恩来一生犯了许多错误，但我是拥护毛主席的，拥护林副主席的。不信请同志们看一下，我周恩来的心是红的。”说到这里，周恩来突然用手敞开了衣服的前襟。不愧在天津南开中学时就有演戏本领。

幸亏周恩来身边没有一把刀子，否则他说不定象纣王的宰相比干一样，一刀子自己开了膛，向满朝君臣展示自己并无谋反之心。

国家总理发誓赌咒向一个党的主席表示效忠，这个国家怎么了？这个国家的总理怎么了？这个党怎么了？这个党的主席怎么了？

只要其中一个不“怎么了”，就不会发生上述闹剧。

如果事关毛泽东的错误和丑闻，周恩来有着本能的反应，立刻扑上去遮丑。他本人的功能就是一块遮羞布。

1961年，国家统计局贾启允等三人，让各省填写了一个有关粮食和人口变动的统计表，经汇总以后，全国人口减少了几千万！这份材料只报周恩来和毛泽东两人。周恩来看到后通知周伯萍：立即销毁，不得外传。不久周恩来再次打电话追问周伯萍：销毁了没有？周伯萍回答：在我们三人共同监督下销毁了材料和印刷板。周恩来这才放心。周恩来为了掩盖毛泽东的弥天大罪，鬼鬼祟祟，毁灭证据。他这个总理不是为平民百姓当差的，他只是毛泽东的家臣而已！历史不会原谅他的这种罪孽。

大饥荒发生后，周恩来做过几次长篇讲话，巧舌如簧宣传中国是世界上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的国家（见七十年代初期《人民日报》社论）。喋喋不休地重复“连续三年特大自然灾害”“苏修逼债”造成全国大饥荒的鬼话。一直蒙蔽百姓，回避“到底饿死了多少人”这个锥心刺骨的敏感问题。

周恩来当了一辈子中国的大管家，一辈子让国民忍受食不果腹的日子，一辈子让民众逆来顺受各种迫害。

周恩来为毛泽东歌功颂德不遗余力。相对刘少奇、林彪而言，周恩来搞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工程出道晚了些年头。但是他一旦投入这个行业，就弄得风风火火。1964年他亲自做总导演调动全国人力物力拍摄大型音乐舞蹈革命历史剧“东方红”。作为国务院总理，这实属不务正业玩忽职守。他不能解决人民温饱，却热衷于制造精神鸦片。用舞台上的辉煌，掩盖现实的失败，给贫瘠萧条的中国制造虚假繁荣。周恩来在历史上的逆向行动，成为文化大革命史无前例的大反动的前期预热活动。

从延安整风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看到了一个罕见的政治现象，就是周恩来与刘少奇政治角色的转换。刘少奇在延安整风时期是毛泽东的新宠，当时毛泽东打击的是王明、周恩来、张闻天。由刘少奇提议授予毛泽东“最后决定权”，把毛泽东推到党内不受制约的地位。毛泽东逐步走向专制独裁，造成一系列恶果。直到毛一意孤行酿成全国大饥荒，造成许多农民被饿死的惨状，才唤醒了刘少奇的些许人性。他冒着风险，推行了以“三自一包”为中心的调整经济政策，在七千人大会上顶撞了毛泽东，刘少奇当面对毛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上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毛无语应对。从这时起，毛就萌生了置刘于死的杀机。

毛泽东矫情地拿着党章和宪法向刘少奇讨发言权的时候，毛、刘已经由同盟关系彻底分裂了。微妙的是周恩来以和事佬的姿态插入纠纷，他搁置二人政争的是非问题，只是从“尊重主席”的角度劝说刘少奇做检讨。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周恩来一再向毛泽东谄媚，表示要站在毛泽东一边，支持毛打倒彭、罗、陆、杨；打倒刘、邓、陶；卑躬屈节地加入了无产阶级司令部。刘少奇则成了“叛徒内奸工贼”，惨死于河南开封幽禁之中。

1968年9月25日，周恩来摆出一副义愤填膺的样子在刘少奇“罪证材料”上批道：“刘贼是大叛徒、大工贼、大内奸、大特务、大汉奸，真是五毒俱全、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分子！”

以“社会主义”命名的社会制度存在着结构性的缺陷，没有舆论监督和权力制约机制。几乎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都是专制主义。毛泽东做的更绝一些，他把一党专政演变成绝对的个人专权。中国的政权成了一架劣胜优汰的独裁机器。它压制扼杀群众智慧，放大最高统治者的愚蠢。窒息了自由思想，绞杀了人类的良知，终极目的是要把民众改造成十足的驯服工具。刘少奇因为尚未完全泯灭人性遭受灭顶之灾，周恩来依仗其日益彰显的奴颜媚骨和逢场作戏勉强得以寿终正寝。但直到断气一刻心中也不踏实，毛根本不出席周的葬礼。

四人帮倒台后，邓颖超急忙向华国锋提出要整理周恩来文件的要求。她把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所批示的文稿调来，经她过目之后监督烧毁，一如1961年周恩来焚烧大饥荒文字材料。这位与丈夫心心相印走过革命江湖的大脚老太太，十分清楚丈夫的作为经不起历史的考验，留着白纸黑字的文件只能自取其辱。但是邓颖超老太太也陷入唯心主义认识论，不明白毁灭历史

证据不等于毁灭了历史本身。顶多给考证工作带来些麻烦。历史事实是不能用一把火烧光的，善恶从它发生的那一刻起就凝固在时空的框架上了。

认真地说，上个世纪初许多共产主义的革命家，也都曾是忧国忧民的志士，并真诚相信共产主义，认为走苏俄的道路可以救中国。但是这些仁人志士一旦进入这架逆淘汰机器，最终被改造成为奴性十足的驯服工具。窒息了自由思想，丧失了人性。专制机器最为显著的效能是：压制扼杀群众智慧，放大最高统治者的愚蠢。

周恩来从 1956 年“反冒进”遭到毛的批评之后，就日益毫无原则地臣服，奴颜婢膝地谄媚。从反右派、大跃进、大饥荒、到文革大浩劫，不管毛泽东如何荒唐，周恩来一直和毛保持政治上的一致，但是毛泽东却从来没有真正信任过周恩来。周恩来感到忠臣难做，一肚子委屈。所以在做最后一次手术，被推进手术室之前，忽然大喊：“我不是投降派！”这是一个久被压抑的懦夫突然闪过的一声哀鸣。既是对毛泽东借“评水浒”影射他右倾投降的自辩，又是对批林批孔批周公的抗议。不过周恩来最后的这点小挣扎，已经对他本人的历史定位没有多大意义了。

转载：2017 年，网上透露了《解密时刻》是是非非周恩来—高文谦访谈文字实录。

高文谦 1980 年代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周恩来生平研究小组组长。参与《周恩来年谱》《周恩来传》《毛泽东传》等中共官方史籍著作的编撰工作；1993 年初，以访问学者名义赴美，先后担任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华盛顿伍德·威尔逊研究中心和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所访问学者。现定居美国纽约。

访谈录作者：萧雨，杜林，昱杉，李肃。

现转载于后以飨读者。

开场白：从 19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起，周恩来就是党员。从 1927 年开始，他一直身处中共党政军最高决策机构。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总理，直至 1976 年去世为止。在将近六十年的政治生涯中，他亲身经历无数次中共党内的政治斗争，他亲自参与了所有的这些斗争，在他亲眼目睹周围无数的达官显要一个个在党内政治斗争风浪中丧失权力、丧失人身自由、乃至丧失生命的同时，他自己却不仅可以屹立不倒，而且还享有“人民的好总理”的美誉。周恩来是如何做到的呢？今天的《解密时刻》为您揭示一二。

解说：1969 年 11 月 12 日，中国共产党副主席、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在河南开封的一间陋室里孤独、凄惨地死去，死得无声无息。他的尸体被秘密火化，火化单上的名字写的是“刘卫黄”，职业一栏写着“无业”。

就在一年前的 1968 年 10 月，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二中全会批准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将这位中国共产党第二号领导人、毛泽东亲自选定的第一位接班人“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这份报告不仅宣布了当时被称为“党内头号走资派”的刘少奇“政治生命”的死亡，而且为当时对刘少奇的人身迫害提供了合理合法的依据。在这次会议上宣读这份报告的，就是报告的起草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总理周恩来。

李肃：文革的时候，毛泽东要打倒刘少奇，周恩来是个什么态度？

高文谦：开始，毛并没想把刘少奇像在“九大”的时候那样给搞死。一开始只是想把他从接班人的位子上拿下来，从第二号人物拿到第八号人物。

周那时候还都是要保刘的，因为毛那时候也讲，刘、邓是人民内部矛盾嘛。

解说：1966年8月1日到12日，中共中央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决定开展文化大革命，同时刘少奇在党内的地位由第二位下滑到第八位。不过，刘少奇还保留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国家主席的职位。毛泽东尽管在8月5日发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矛头直指刘少奇，但是他此后也曾经制止贴刘少奇的大字报。毛泽东在1966年八次接见红卫兵，刘少奇都参加了。11月3日那次接见时，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还特别走到刘少奇跟前，询问了他的工作、生活情况。

在这期间，周恩来的确有保护刘少奇的言行。例如，周恩来在1967年初曾经告诫造反派说：“不要揪人，……刘少奇、邓小平也不能揪。……刘、邓、陶（铸）是中央常委，我还得保。”

但是，毛泽东听说刘少奇并不服气，听说刘少奇还和一些省市负责人商讨对付中央文革的办法，并且有意要和毛对抗，改组政治局。终于，毛泽东下定了彻底打倒刘少奇的决心。

周恩来称刘少奇为“刘贼”，落井下石

高文谦：毛就开始在历史问题上来做刘案。一旦定成历史问题，定成一个叛徒的话，那就是敌我矛盾了。只有这样，才能对党内外有一个交待，证明文化大革命是完全正确的和非常及时的。

随着毛下决心要抛弃刘的时候，周的态度那就变了。周当时是中央专案审查委员会主任。中央专案审查委员会是在66年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打倒“彭罗陆杨”的时候成立起来的，专门审查他们四个人。

解说：“彭罗陆杨”指的是当时被打倒的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彭真、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中宣部长陆定一和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这个中央专案审查委员会，后改名为中央专案组，直属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领导，在毛泽东的直接控制之下，专门负责高级官员的案件处理，权力巨大，最鼎盛时期的工作人员达数千人。该机构于文革结束以后的1979年解散。周恩来生前一直担任中央专案组的总负责人，并且兼任刘少奇专案组组长。

李肃：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周恩来发挥了什么作用呢？

高文谦：最后把刘案给搞出来，直接是在江青的指导下，但是周参与，而且周是江青的上级。江青把材料搞出来之后，要到周那里去，周最后也就认可。

解说：中共党史专家司马清扬在《周恩来与林彪》一书中写道：刘少奇专案组成立之后，所有关于刘少奇的罪证材料能否上报都是由刘少奇专案组组长周恩来决定的。没有周恩来的同意这些材料根本上报不了。

司马清扬还引述文革史专家王年一的话说：送给毛泽东看的只有证明刘少奇有罪的“人证物证”，而证明刘少奇没有罪的人证和物证却没有送给毛泽东看。对毛要打倒的人，周恩来总是可以递上让毛满意的材料。

1968年9月25日，周恩来向毛泽东和林彪提交了关于刘少奇的审查报告。

高文谦：我看的档案材料，刘案的审查报告，上送给中央的报告，是周恩来亲自起草的。用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四个人联名向毛、林报告。周在这个里面称“刘贼”，亲笔写的“刘贼”，给刘那时戴了五顶帽子。

解说：周恩来在刘少奇的“罪证材料”上做了一大篇批示。他写道：“刘贼是大叛徒、大工贼、大内奸、大特务、大汉奸，真是五毒俱全、十恶不赦

的反革命分子！”

“我们要首先欢呼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没有这种大革命，怎样才能把刘贼及其一伙人的叛党卖国、杀害同志的罪状，挖得这样深。这样广？”

据中共党史专家司马清扬在《周恩来与林彪》一书中透露：“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的李锐说：大约在 1983 年至 1984 年间，中组部奉命销毁一大批档案材料。在销毁之前，中组部部长陈野苹让我看了一个原属于刘少奇专案组的绝密件。这个绝密件中有两份原稿，都写的是给刘少奇定罪的结论，一份是由江青主持草拟的，一份是由周恩来主持草拟的。由周恩来主持草拟的那份结论计有四条，是周恩来亲笔写下的。比较起来，周恩来给刘少奇定的罪名，要重于江青给刘少奇定的罪名。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关于刘少奇问题的决议，基本上就是按周恩来所亲笔拟出的那个结论来定调子的。”

李肃：作为中央专案委员会主任这个角色，对于刘少奇的这个案子，他最后下的批示，他起草的这个东西，有没有落井下石之嫌？

高文谦：刘本身已经落难了，从毛的接班人已经成了阶下囚了，你还要用伪证，在政治上宣判刘少奇的死刑。这本身就是一种落井下石。

如果说周恩来在文革中很多污点的话，他审理“刘案”，最后代表中央做“刘案”的审查报告，而且亲笔写的那些话，这是他最大的一个污点。

李肃：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对周恩来怎么看？

高文谦：王光美刚从秦城监狱里出来的时候，她对外界的很多情况不了解，因此她的儿女们，刘源啊，刘平平啊写过一篇纪念他父亲的文章。最后在这篇文章里，王光美说：“总理，你真好。”这是在前半期，王光美不了解情况的时候。后半段，王光美出来之后，了解很多情况之后，对周，我听说，意见就很大。90 年代，国内有一部周恩来的电影，讲周恩来在文革，是王铁成主演的。王光美全家拒绝观看。

周恩来推荐林彪当副统帅，感到“很大幸福”

解说：周恩来到底为什么没有对落难的刘少奇施以援手，反而落井下石，其真实原因我们也许永远不会知道。刘少奇之死发生在被称为“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第三年，成为文革中最大的冤案。刘少奇被打倒后，林彪成为中共党内排名第二的领导人。

李肃：周恩来一直是在林彪之上，在党内的地位，在军中的地位也是如此。到了文革中间以后呢，林彪跃升为毛的接班人，成了第二号人物，周成了他的下面了。那时候叫林副统帅。周是怎么接受林彪作为自己的上司的？

高文谦：周这个人的组织纪律观念非常强。党一旦定了什么样的事情之后，他也会去照办，作出什么决定，他会去服从。所以在文革中林一确定地位后，他十分注意处理好跟他的关系。

解说：1966 年，在中共决定开展文革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亲自拟定政治局常委候选人名单，把林彪列在第二位。当时包括林彪在内，中共有五位副主席。为了突出林彪的副统帅和接班人地位，周恩来主动提出不再提及自己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头衔，从而也避免提及其他几位副主席的头衔，使林彪成为唯一的副主席。为此，周恩来曾经在文革初期多次公开自豪地提及这件事，说林彪“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最好，跟毛主席跟得最紧的，我推荐他为副统帅”。

1969年4月，中共召开“九大”，林彪的接班人地位被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当时毛泽东有意让周恩来也担任副主席，周恩来一口谢绝，为的是突出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周恩来在4月14日的全体会议上说：“我们不仅为着我们伟大领袖，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主席而感到无限幸福，我们还为有了众所公认的毛主席的接班人，林副主席而感到很大幸福。”

他还修改朱德和毛泽东在井冈山会合，建立“朱毛红军”的历史，把中共南昌暴动中只是一个连长的林彪说成是率领部队和毛泽东会师的领导人。他说：“林彪同志南昌起义失败后，带领部队上井冈山，一直在毛主席身边战斗。所以我说南昌起义的光荣代表应该是林彪同志。”

高文谦：周在写报告的时候，都是毛、林并列。每天晚上写到半夜三更，而且多少年这么写下来之后，从66年一直写到71年。

林彪事件之后还有个小插曲。林彪已经摔死了，周恩来一晚上没睡觉，还给毛、林写报告，报告里面写的是毛，信封上写的“毛主席，林副主席”。笔误，吓得一身冷汗。然后专门把他的小秘书纪东给叫过来，说：“你看看，我犯了这么个错误，你以后要替我来把关啊。”

实际上信根本就没有送出去，但是你这个事情就可以看出来，他已经都习惯了。

解说：文革史专家宋永毅说，周恩来和林彪的关系好过他和毛泽东的关系。林彪当年的“四大金刚”之一、前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的儿子程光曾经回忆说，林彪一再关照他下面的“四大金刚”和叶群，要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和周恩来合作。这是他特地关照多次的，说周恩来就代表我。

高文谦：林彪是中共打下红色江山头号的功臣，但是建国以后就闭门养病了。周利用总理之便，经常去看望，关照，问候。周去看林彪时，林彪每次都把周送到大门口，也是表示对周的尊重吧。

林彪事件之后，从毛家湾抄出不少周和林彪之间的信件和照片，最后都被汪东兴送给周，周一把火都给烧了。

李肃：在政治上周恩来和林彪曾经是盟友吗？

高文谦：两个人一文一武，共同支持毛发动文革，那时候江青还没有成气候。

解说：文革初期，林彪和江青同属文革派，协助毛泽东斗倒了以刘少奇为首的“走资派”。随后，他们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勾心斗角、明争暗斗的事情时有发生。

1970年8月，中共在庐山召开九届二中全会，林江两派激烈对峙。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与江青手下的张春桥发生争辩。林彪在会上没有点名地批评了张春桥，引发全会对文革派张春桥的全面围攻。毛泽东没料到文革这么不得人心，因此被触怒。他后来说：“他们名为反张春桥，实际上反我。”这使毛泽东和林彪这两个昔日的政治盟友反目。

李肃：在毛泽东和林彪发生矛盾的过程中，周扮演了什么角色？

高文谦：周实际上是被夹在当中。

李肃：左右为难？

高文谦：左右为难。在一开始的时候，周还试图和稀泥。

高文谦：但是毛这个人是这样的，不得罪人，一得罪人，得罪到底。一开始是集中对陈伯达。陈伯达那时还要保留中央委员呢，后来就根本关到秦

城监狱里去了。然后从他转到黄吴叶李邱敲山镇虎，逼林彪出来作检讨。

李肃：但好像林彪没有正式做出检讨，是不是？

高文谦：没有正式。毛对林彪之所以非常地恼火，之所以抓住黄吴叶李邱不放，就是因为林彪不检讨。林彪看得非常清楚，一旦检讨，事情就没完没了，等于你输了理了。实际上林彪在庐山会议上没有做错什么事情，他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不指名地点张春桥，事先都和毛打过招呼的，两个人在小会议室里，开会前。结果呢，没想到林彪这么一讲话，在全会引起的反响非常大，所有的人都说，林副主席讲得好，包括四方面军的人，是毛非常看重的，许世友、陈锡联，在林彪讲完话后，走过去去跟林彪握手去。毛一看这么多人对着中央文革，所以那时候江青带着张春桥、姚文元8月25号到毛主席那儿去，紧急求见毛。而且张、姚都下跪啊，大哭，据说把毛的裤腿儿都哭湿了。

高文谦：周的本意是希望毛林不要（对立），能够缓和一下。这样子我们可以共同搞经济建设，但毛那个时候已经决心要和林彪分道扬镳了。

解说：1971年9月13日，一架中国的三叉戟式飞机在蒙古温都尔汗附近坠毁。机上包括林彪、叶群夫妇、儿子林立果在内的八男一女全部丧生。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至此，毛泽东亲手扶植起来的第二位接班人也被他亲手打倒了。

李肃：在林彪出事以后，周恩来对林彪的子女是怎么对待的？

高文谦：林彪的子女实际上就剩下一个林豆豆（林立衡）。林立果已经一块儿摔死了。对林立衡的待遇前后是有一个变化的，开始的时候林立衡是住在玉泉山，而且中央文件说她是立了功的，但是非常快的就把她就立案审查。

林立衡在压力大的情况下，最后就讲了好多林彪说毛的黑话。这句话也是比较要害的：“毛主席身边也有叶群那样的人。”你想想，大家都知道叶群指代的是谁？那都很清楚了。从那以后，林立衡的处境就大坏了。

在这个过程中，林立衡专门给毛写过信，要求跟毛面谈。毛把这封信就批给了周。周一见了林立衡，劈头盖脸就是一句话：“你一个小孩子家，胡乱写什么呢？我都看不懂。”

你说林说毛的黑话和“毛主席身边也有叶群这种人”，周会看不懂，听不懂？他说他听不懂。

邓小平复出，周恩来奉旨行事

解说：“九一三事件”后，中国政坛发生了文革中的另一个重要事件，就是一度被打成“资产阶级司令部”第二号人物的邓小平复出。

李肃：邓小平的复出，按照官方的说法，周恩来发挥了很大作用，周恩来真的发挥了很大作用吗？

高文谦：并非如此，实际上恰恰相反，邓的复出，是毛用邓制约周的一招棋。林彪事件之后，周的势力在上升，而且掌握实际权力，而毛的身体又不行了。那么毛考虑，制衡周最好的就是邓。

解说：在毛泽东打倒刘少奇的同时，他对“刘邓司令部”的二号人物邓小平却网开一面。1968年，在开除刘少奇党籍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先后两次为邓小平讲好话，说“不要开除党籍，最好嘛还能够做点工作”。在另外几个场合，毛泽东曾经几次指示要把邓小平和刘少奇区别对待，并且指示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直接管理邓小平的事务，保护了他的人身安全，为日后重新起用邓埋下伏笔。

周恩来对待被打倒的邓小平，完全是按照毛泽东的旨意行事。1969年秋，邓小平被发落到江西。周恩来事先打电话给江西党政领导人，过问对邓小平一家的生活安排，还对他们说，邓小平下去“是到农村锻炼”。

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在回忆父亲的书中说，邓小平被送到江西的时候，江西省政府的办公室主任亲自接机，亲切地称邓小平为同志，说“毛主席叫你来江西，我们非常欢迎”。邓小平一家人在江西住的是原福州军区南昌陆军步兵学校少将校长的两层小楼，被称为“将军楼”。邓小平在一公里以外的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监督劳动”，厂内专门为他设立了一个休息室。

在下放江西期间，汪东兴还亲自帮助邓小平的女儿和儿子上了大学。

“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在1972年1月再次明确表示，邓小平和刘少奇不一样，是人民内部矛盾。8月14日，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来信批示说“邓小平同志……没有历史问题”，“有战功”，“没有屈服于苏修”。于是，周恩来于1972年12月18日要毛泽东的亲信纪登奎和汪东兴写信提议恢复邓小平的工作，再拿着这封信去请示毛泽东。1973年3月9日，毛泽东批示同意恢复邓小平的党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在同年8月举行的中共十大上，邓小平再次成为中共中央委员。

李肃：周恩来和邓小平之间，他们是盟友呢，还是对手？

高文谦：毛的如意算盘最开始是想用邓来制衡周，进而想用邓来取代周，完成权力格局的换马，这当然是在周病重之后了。但是实际上的情况没起到这么一个作用。非常快的，周邓两人就成为一个盟友了。

为什么能成为盟友呢？也和当时的政治环境有关，因为林彪事件之后，江青这一派坐大。周那时候在朝里面就他一个人。邓出来之后，虽然毛是想让邓来制衡周，但是周也有意识地做了邓的工作。譬如说，邓小平从江西回北京之后，第一次见周，到玉泉山去，周就跟他谈了张春桥的问题，说张春桥是叛徒，主席不让查。

以我对周的了解，周轻易不会讲这种话，但是他要看准了人。他讲这种话也是跟邓交心的话。换句话，也是帮助邓复出以后所面临的局面。当然周和邓之所以结盟，也和江青咄咄逼人有关。不断地对邓发难，把邓也推到周的那一边去了。

解说：毛泽东让邓小平复出以后还曾经考验过邓小平对周恩来的态度。1973年11月到12月间，毛泽东为了压制周恩来，对周恩来同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谈判中的表现横加指责，指示中共政治局召开会议批判周恩来对美外交的“右倾投降主义”。

高文谦：江青就是把这个问题说成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上纲上得非常高，那就等于周要（被）打倒了。周这个人就是这样，你让我检讨，我就去检讨，毛最后一看，也不想彻底整垮他。但毛又想通过这个事情来敲打周，所以毛在选择邓来列席政治局扩大会议，是大有深意的。深意是什么？就是通过这件事情来考验邓。

李肃：考验邓对自己的忠诚度？

高文谦：对，考验对自己的忠诚度。第二，对周是不是能下得去手？最后邓就讲了那一番话：总理啊，你这个人，别人跟主席都是可望而不可及。你呢，跟主席是可望又可及，只有一步之遥，今后希望你注意这个问题。

李肃：警告他不要夺权？

高文谦：对，警告他不要有非分之想。其实这个事情对周就是很冤枉了，

周一辈子也没有想过自己要当一个第一号人物，但是毛始终对这个事情放心不下。但是这个话最后通过邓的嘴讲出来了。毛一直在观察着邓，邓是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最后一个发言的，毛在这个过程中始终问王海容：“小平同志发言没有？”“还没有。”又问王海容，（王说）“没有”。最后听说小平同志发言了。邓发言了，毛是非常高兴，等于在周邓之间打了一个楔子。

解说：毛泽东得知邓小平发言之后高兴地说：“我知道他会发言的，不用交待也会发言的。”于是，1973年12月12日，毛泽东在中共政治局会议上宣布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和解放军总参谋长。邓小平再次进入中共最高决策圈。

让毛泽东始料不及的是，以江青为首的文革派与邓小平发生了严重矛盾，使文革前关系并不密切的周恩来和邓小平在文革后期结成了政治联盟。

周恩来批朱德是中央常委里的“定时炸弹”

朱德曾经是和毛泽东一起被中国人喊过“万岁”的中国领导人。周恩来不仅是朱德的入党介绍人，在他领导的中共南昌暴动中，朱德是主要军事领导人之一。

高文谦：周和朱的关系是很好的。朱这个人是与世无争啊，而且他的资格很老，德高望重，周一般也很尊重他。周又是朱的革命引路人。当年旅欧的时候，周介绍他，朱德和孙炳文，就是孙维世的父亲，在德国入的党，所以周和朱德两个人相知是非常深的。

解说：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泽东的授意下开会批评朱德，原因是他对批判“彭罗陆杨反党集团”持消极态度。

高文谦：在会上唱主角的是林彪。林彪讲朱有野心，想当领袖。还有一个人唱得也非常高，是陈毅。陈毅讲，朱德想黄袍加身。真是子虚乌有。朱德在建国后，长期赋闲在家里。

李肃：周恩来在批判会上是怎么表现的？

高文谦：周那个时候也跟着批，周跟林彪和陈毅所不同的是，把自己也摆进去了，说：“我在历史上就一直反毛。反毛的话，你朱德历史上错误也非常多。你也多次反过毛。你是中央常委里的‘定时炸弹’！”

解说：周恩来在发言时指责朱德多次犯过路线错误，“反对毛主席”。还教训朱德说，“毛主席说过，你就是跑龙套，可是你到处乱说话。你要谈话，得写个稿子，跟我们商量。”“你是不可靠的，是不能信任的。”

高文谦：这个话的份量也很重啊。那个会场上简直是乱七八糟。从这里你就可以看出中共高层政治生活是个什么样子。完全是在政治上非常残酷，人性完全没有了。其实周跟朱的私交是非常好的，两个人相识是非常深的，但是在会上也是要指着鼻子这么样的讲：“你是中央常委的‘定时炸弹’。”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共产党里面讲党性就没办法讲人性。

周恩来保陈毅，就是保自己

解说：毛泽东在文革中的政治高压让大批党内元老不满，也深感自身处境的岌岌可危。这种积蓄已久的情绪终于在1967年2月周恩来主持的怀仁堂碰头会上爆发出来。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元帅率先发难。

高文谦：陈毅大闹怀仁堂，这是文革中一个重要的关节点，陈毅讲得最厉害。陈毅讲到“延安整风”，影射林彪，而且提到“延安整风”涉及毛。就是说“延安整风”的时候是他们这些人最拥护毛主席，刘、邓、彭、薄。现在历史证明怎么样？我们这些人都是挨整的。

事后，张春桥和王力两个人对了笔记后去向毛汇报大闹怀仁堂的过程。毛一开始像听笑话似的，脸上还有笑容呢，但是王力注意到，就是当陈毅讲到“延安整风”的时候，毛的脸就变了。结果最后毛大怒啊，用江青的话说，“发无产阶级之震怒”。就是说，你们还想翻“延安整风”的案，“你们把王明，把张国焘，把刘少奇都给请回来。陈毅，你当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我和林彪重新上山打游击去。”

李肃：周恩来和陈毅的历史渊源应该是很深了。

高文谦：两个人早在红军的时候就共事。建国以后，陈毅又是同在外交系统，是周恩来的左膀右臂。陈毅是个性情中人，豪爽，说话也幽默，因此周很喜欢他的个性。我当时在周恩来研究组的时候采访过的一些周的老秘书说，在国务院这些副总理里面，就是陈毅跟周走动得近。陈毅经常是不请自来，到西花厅就串门去了，招呼也不打。像别的人进西花厅，还要事先打个招呼，陈毅经常踩着步自己就过来了，所以两个人的关系还是不错的。

毛对整陈毅实际上并不是像对贺龙，对刘少奇，对彭真那样，在政治上非要把他们剪除掉。毛那时又开始缓和了，这不是 67 年 2 月份嘛，67 年 5 月 1 号的时候，又让陈毅他们上天安门了，要表示团结吧。

解说：1966 年文革开始以后，陈毅在中国外交部受到批判。毛泽东当时的态度是，对陈毅既要批判，又要保护，即“一批二保”。1967 年 5 月 1 日，在天安门城楼上，周恩来特别安排陈毅与毛泽东合影留念。毛当时对陈毅说：“我是保你的。”正因为如此，周恩来在保护陈毅的问题上也勇气十足。

高文谦：毛自己就讲得很清楚，当面对周讲，点明了：陈毅一倒，你也就不差不多了。所以在 67 年夏的时候，周为了保陈而苦战。周知道，他和陈毅的关系是一损俱损，保陈毅就是保自己。因此周甚至于讲出来，在人民大会堂他们要冲人民大会堂揪陈毅的时候，就是外交部的造反派，他讲：我就站在人民大会堂门口，你们要冲的话，就从我身上踏过去。

周恩来与贺龙，始保终弃

解说：与“保陈毅”的态度不同，毛泽东在贺龙问题上的立场可谓一波三折。在文革前，贺龙是负责中共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军委副主席，与林彪不和。贺龙在中共军中的资历比林彪老得多，但是在中共党内和军内的地位却在林彪之下。

文革之初，林彪在军中发起了“打倒贺龙”的风潮。毛泽东开始并不以为意。他对贺龙的印象一直不错，因为贺龙在历史上曾经帮过他的大忙。延安时代，毛泽东与王明为了中共党内的领导权争得你死我活的时候，贺龙站在了毛的一边。贺龙也曾力排众异，支持毛泽东与江青结婚。贺龙当年说：“堂堂一个大主席，讨个女人有什么了不起，谁再议论我枪毙了他。”

高文谦：毛一开始，还是希望贺龙跟林彪搞好关系，所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要贺龙到林彪家去谈一次话。

李肃：也就是说，毛泽东开始的时候，并不是想要真正地打倒贺龙？就是说，如果你要跟林彪搞好关系的话，我可以一起再用你们。

高文谦：对，结果两个人谈崩了。谈崩了之后，毛那个时候就有一个选择了：是林彪，还是贺龙？

解说：周恩来是元帅贺龙的入党介绍人，两个人关系密切。中共南昌暴动中，周恩来是最高领导人，贺龙则是暴动的总指挥。他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 20 军是暴动部队的主力。文革之初，贺龙落难，周恩来有心要保。1966

年底，贺龙在北京东交民巷的家数次被抄，周恩来建议贺龙夫妇搬到北京西郊为中共领导人修建的别墅——新六所去休息。然而，这时的毛泽东在政治上倒向了林彪。

高文谦：贺龙的问题为什么会升级？和刘少奇的问题升级那是一样的情况，是形势所迫。在夺权之后，军队开始乱了。在这种情况下，毛的态度就开始变了。当周看到后来事情不简单的时候，他也开始保持距离了。

李肃：现在中国的官史普遍的一个说法是说周恩来主动地保护了贺龙。贺龙跑到中南海周恩来的西花厅去避难，周恩来把他主动给藏在了那个地方，避免他受冲击，事实是这样吗？

高文谦：恰恰相反。贺龙去中南海西花厅是不请自来。

贺龙被造反派揪得东躲西藏，在新六所也救不了。所以贺龙一看，干脆回家算了，等着你们揪我去了。

结果他们两个人（贺龙和夫人薛明）坐着车，从新六所，就是万寿路，回到他们家，他们家是在反帝路（东交民巷）。在这个过程中，经过中南海，薛明说，你看看，咱们当时到新六所也是总理让咱们去的，既然咱们回家也跟总理打声招呼吧。这么着就去了，所以说不请自来啊。到了总理家的时候，周当时不在家，周恩来的秘书周家鼎在，马上跟总理报告。总理一看说，既然来了就住下吧。所以在贺龙住下来的过程中，在生活上，周，主要是邓颖超，对贺龙夫妻嘘寒问暖，但政治上绝不谈任何话题。

李肃：但在后来的时候，周恩来把贺龙给送出去了，根据中国官史的说法，他是把他送到西山去，到军队里给保护起来了，这是事实吗？

高文谦：对。林彪那时候也给周打电话去，让周交人。周在这种情况下，就代表中央和李富春一块儿找贺龙谈话，等于就是宣布贺龙隔离审查。话说得比较委婉：我送你到西山象鼻子沟去，那是军委前指（中央军委前线指挥部），送到那儿休息一段时候，秋天我去接你回来。实际上就是把他正式隔离了。

开始的时候，周曾经还派人去看过。贺龙还真信周这句话，每天一个人在西山的前指那儿，一个人也没有，就看通往山下的一条小路，只要上来一辆车，就看是不是总理来接他来了。结果就到了秋天，也就是67年的秋天，实际上贺龙被正式立案审查。

解说：1967年9月，林彪的妻子叶群在文革碰头会上提出专案审查贺龙。周恩来表示附议。

高文谦：审查报告就是周写的。

李肃：审查报告又是他写的？

高文谦：对，因为周曾经兼任贺龙专案审查组的组长。

解说：周恩来还在贺龙的审查报告上写下数百字的批语，大骂了贺龙一通。

高文谦：周对贺龙的问题，基本上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始保终弃。开始是保的，后来弃了。同样的一种情况，他是看毛的脸色行事。

解说：1969年6月9日，贺龙病逝。不到两年后，发生林彪事件。毛泽东说，看来贺龙的案子假了。周恩来听了，马上派人把贺龙的遗孀薛明从贵州接回北京。

1975年6月9日，贺龙的骨灰安放仪式在北京举行。周恩来此时已是病入膏肓。当人们劝阻他不要出席时，他说，我已经对不起贺老总了，我不能

不来啊！他不仅亲自致悼词，而且据说向贺龙的遗像一连鞠躬七次，还哭着对薛明说，我没有保护好他啊。

李肃：薛明对周恩来有没有什么评价？

高文谦：这个也是跟王光美的情况一样的，开始刚一出来，以为这就是林彪、四人帮迫害的。后来了解情况多了之后，知道周在这里面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所以，后来薛明对周也是有非议的。

有一个流传非常广的一个讲话，讲她当年跟贺龙时怎么样子被迫害的。其中讲到贺龙那时候在山上，水上去不去，连水都不够喝，他们只好接雨水喝，而且吃饭营养也严重不足。贺龙是个糖尿病患者，吃不饱之后，就到处发颤，血压高，所以最后就恶化，走着走着路就倒地下，呕吐。在最后的时候，明明是严重的糖尿病患者，还给他打血糖，这么着他就死了。

周是中央文革碰头会的牵头人，当时各个专案小组，都定期向中央文革碰头会汇报被审查人的思想，生活和身体情况。

李肃：也就是说贺龙当时的惨境，周恩来应该是知道的？

高文谦：不是所有，但是基本上应该知道的。周在文革中不是什么人都保，他首先要看毛的脸色。第二，他要不得罪林彪，不得罪江青。在毛、林、江，甚至于包括康（生），在这几个人之间，哪一方都不得罪的情况下，找到一个平衡点，他去保。如果得罪了其中任何一个人，他就不吭声了。

结束语：对于毛泽东有意要保的人，周恩来会坚决贯彻执行。正如周恩来在文革初期所说的：“主席领导我们，要我们做的，没有别的话好讲。我保了多少人，刘少奇、邓小平、王光美……，但我还不是‘保皇派’，我奉命‘保’。”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迄今为止，我们在史料中还找不到一例毛泽东要打倒的人被周恩来保下来的事例。1949年中共建政以后，刘少奇、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陶铸、彭德怀、高岗、陈伯达等与周恩来同时代的中共领导人，或遭到清洗、迫害，或被打入冷宫，几乎无一幸免，唯有周恩来可以像毛泽东一样始终大权在握，全身而退。

中央党校专家解答周恩来之谜

今天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分享给大家，文章很长，看完需要耐心，当然，最重要的是观点和一些新的素材。作者：中央党校 吴洪森。

对周恩来的评价，综观各种见解，可归为三类：一是以中国官方为代表，努力塑造周恩来光辉形象；其次是民间犹爱周恩来的某些人，认为周恩来有人情味。三是把周骂得一钱不值，指他卑鄙无耻、毫无人性，在毛泽东面前摇尾乞怜，为虎作伥。曾任毛私人医生多年的李志绥就说周在毛面前低声下气，是个人格低下的人。这三种评价都可以用到周恩来头上，各自都可以找到一些事例来印证，但都不能对矛盾现象自圆其说。笔者经过近二十年的怀疑思考和材料收集，觉得可以对周恩来的矛盾现象，做出综合解释了。为着行文方便，将基本上依照历史本身的行程，进行分析。

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之谜

一九二四年，周恩来从法国途经莫斯科回国抵达广州。他一到广州，就被任命为刚成立的黄埔军校政治部代理主任（不久便是正主任）兼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军衔为中将。周时年二十六岁，可谓少年得志、意气风发。他到底何德何能，出国所谓留学数年，归来便获如此重任？

其实一切的关键在于周恩来归国途中，怀里揣着一封推荐信。写信人是第三国际执委书记、斯大林密友、保加利亚共产党领袖季米特洛夫。收信人

是当时苏联派到中国协助孙中山训练军队、建立黄埔军校的鲍罗廷。鲍罗廷一见此信，二话不说，就任命周恩来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兼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并授中将军衔给这位从未上过战场的青年人。

季米特洛夫当时还是世界共产党情报局主席，周恩来恰恰是中共特务组织创办人。他在法国以及在德国留的什么学，受的甚么训，不是十分清楚吗！对第三国际来说，周恩来是操纵中共的工具，而对中共来说，周是第三国际的代表。当时中共完全受莫斯科和第三国际控制，他们赏识谁，谁就能在中共占据要津，这已是公开的秘密，就连中共党史也无法遮掩这一事实。

周恩来旅欧期间除了成为季米特洛夫亲信之外，还利用旅欧支部，建立了以他为首的帮派体系。这一帮派体系对他一生的重要性，我们只须看看名单就知道：朱德、叶剑英、邓小平、陈毅、李富春、李立三、李维汉、聂荣臻、蔡和森（归国后任政治局委员、一度任中央书记）、恽代英（归国后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陈延年（陈独秀之子、广东区委书记）、向警予（蔡和森之妻，归国后任政治局委员）、蔡畅（蔡和森之妹，中央委员）。（上述名单凭记忆所及）

不倒翁之谜

国共合作破裂，蒋介石在上海对中共大开杀戒，中共开始公开筹建自己的武装力量。周恩来的背景和作用，就变得异常重要起来。他遵照第三国际指示，和朱德、贺龙、叶剑英等策动南昌起义（在这之前，周恩来领导的中共广东省委已经下设军事部，因此中共军队的真正创始人是周恩来）。不久，毛泽东搞了秋收起义。毛的草根性和自发性，使他选择到偏僻山区占山为王。

周恩来遵循第三国际指令去攻打广州，仅至半途，人马已损七八成，余部只好由朱德率领去井冈山借毛泽东占据的地盘躲避。周恩来仍去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策划城市暴动、搞暗杀。按苏联观点，社会主义革命要取得成功，只有发动城市起义。周恩来虽然屡战屡败，人马十损其九，却始终坚定不移执行第三国际的指示，当时斯大林对毛泽东盘据山区非常不满，指责其是“富农路线”。周恩来奉命从上海赶去江西瑞金，亲自坐镇，派陈毅夺了毛泽东兵权，撤了毛的职务并逐出政治局。盲从斯大林的结果，连江西根据地也瓦解了，不得不撤退转移，进行长征。由于连打败仗，士气低落，人心涣散，每天都有大量士兵开小差。十万人的队伍跑到遵义，只剩下二万人，这支队伍面临彻底瓦解。

中共每次出现重大失误都有人被抛出当替罪羊。第一次是陈独秀，第二次是瞿秋白，第三次是李立三。二、三次左倾路线的具体领导人和执行者都是周恩来，但他在党内的地位丝毫未动摇。至于这第四次所谓王明路线，周在军事上的责任更大。奇怪的是，毛泽东和王稼祥在遵义会议发难时，矛头直指博古，未伤及周半句。

周恩来在遵义会议上，起先只是做和事佬，让剑拔弩张的双方心平气和讲话，会议开了一天一夜之后，到第二天，周恩来转而支持毛泽东。新成立的领导核心三人军事小组中，周恩来依然名列其中。排名顺序是毛泽东、王稼祥、周恩来。周恩来垮不了的原因，查看一下参加遵义会议成员的名单就知道，周恩来的势力几乎占了八九成，毛泽东如同时挑战周恩来肯定赢不了，说不定自身还要遭遇厄运。再说，即使他能赢，所赢的结果，只能是这支溃不成军的部队一分为二，变成周恩来的军队与毛泽东的军队，那同样意味着大家都将被蒋介石消灭。其次，这支军队需要苏联物资上的援助，要使这份

外援不断，领导层必须要有莫斯科信得过的人。

毛泽东果然不负众望，取得长征胜利。胜利的得来并非像中共所宣扬吹嘘的那样，是由于毛的英明指挥，毛确实也打了一二次小胜仗，但最终能摆脱蒋介石围追堵截，靠的是心狠手辣的大阴谋。长征起先的意图是兵分两路，突围到新疆或内蒙古中苏交界处，在那儿背靠苏联建立根据地。蒋介石当然不会让中共图谋得逞，马不停蹄沿着中共的逃跑路线围追堵截。毛接手指挥权后，以党中央名义电令红四方面军，继续按原定计划北上，还装模作样约定了会合地点，使红四方面军行踪完全暴露，吸引了蒋介石调军围追，他和周恩来却悄悄溜向陕北延安。张国焘所率领的红四方面军，在人数上比毛的红一方面军要多得多。被骗作诱饵的红四方面军几乎全军覆没。毛、周为了遮掩自己的卑劣用心，反过来倒打一耙，说张国焘擅自率军逃跑，另立中央，给张国焘安上个阴谋家名号。

毛泽东到延安脚跟甫稳，喘息方定，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王稼祥踢出局。毛不相信来自莫斯科的人，但对两虎共存的局面来说，又必须要有一个能起缓冲作用的中间人物，这个人物既不能与莫斯科关系太深，（太深毛泽东不信任），又不能有自己的势力和组织系统（周恩来不放心），但在党内却要有相当资历。毛泽东挑选了刘少奇，刘原先一直从事地下工作，地下组织已基本上被蒋介石捣毁，他与毛共过事，到过莫斯科开会，在党内无自己的势力，却有相当资历。这是一个可以充当中间人的角色。毛把刘少奇扶植上来之后，经过数年经营，曾打算清洗一批周恩来的势力，这就是所谓的延安整风运动。对于这场半个世纪前的整风运动，中共直到至今讳莫如深，有关档案拒不公开，至今只传闻周恩来在整风时作过检查，看来他的实力并没有受到重创，因他的地位依然稳固如旧。

刘少奇最恨谁？

直到如今，海内外舆论仍把中国文化大革命看作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的权力争斗，或者是毛泽东路线与刘少奇路线的斗争，如果真是这样，文化大革命开始半年，刘少奇就被打倒了，毛已取得了权力斗争的胜利，为什么迟迟不结束文化大革命，一直持续到他去世，由别人来结束？如果持续的目的是铲除刘少奇的残余势力，为什么被打倒的各级干部，在林彪垮台后绝大多数都“解放”，重新被起用？

把文化大革命看作毛刘之间的斗争，显然无法回答这样的问题。还有：头号走资派刘少奇被交给红卫兵狠斗乱打，最后惨死狱中；二号走资派邓小平却被保护起来，下放在江西农场养老；三号走资派陶铸下场和刘少奇一样；四号走资派谭震林大闹怀仁堂，当面拍桌骂江青，却安然无事。这些现象又该如何解释？根据上文所述，免受红卫兵疯狂冲击的都是周恩来嫡系。俗话说，打狗看主人。毛泽东如对周的嫡系也同样毫不留情，那等于是同周及其派系公开决战，毛可把刘少奇轻易置于死地，却无把握能击垮周的势力。因此不能不有所忌讳，只能借打刘余风，顺势扫一下周的阵营，不敢直接对阵开战。中共直至如今仍羞羞答答不愿公开承认毛周之间在文革的争斗，甚至很荒谬地坚持说周是毛的亲密战友。他们如此宣扬时，显然忘了这是有损于周的“光辉形象”的。

毛发动罪恶的文化大革命，周始终是他的亲密战友，岂不同样罪责难逃！可是他们也无法为了周的“光辉形象”，去宣扬他和毛之间的冲突。因为在文革中，周恩来确实做了大量支持维护毛泽东的事。他只在一个地方竭力抵抗

毛：即全力维护他那帮派体系的地位和权势。这是他至高无上的原则。为了这一原则，他可以迎合毛泽东，也可以抵抗毛泽东。为了这一原则他可以牺牲任何社会正义与理想。至于这帮派体系之外的人，因他这一原则遭受牺牲更是不在话下。在刘少奇问题上，最清楚不过地暴露了他这个有着“光辉形象”的“伟人”，实际上是个权欲私心极重、保护自身第一、而又性格懦弱的人。

如前所述，刘少奇在中共党内并没有自己的帮派势力，他是靠毛提拔又大肆吹捧毛起家的，文革中打倒他及其叛徒集团也仅仅六十一人，其中地位最高的只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兼北京市长彭真和原任公安部长、文革前调任总参谋长的罗瑞卿。其余大多属文教宣传系统。刘少奇凭这几个毫无实力的人马就反毛泽东，莫非利令智昏？或者他反毛只是毛的猜疑从而蒙受沉冤？据目前所掌握的材料，刘少奇虽然没有明目张胆反毛，但架空毛的举动确实已有数年。大跃进失败，全国陷入大饥荒后，61年召开七千人大会。会上刘少奇虽然未点名，却直截了当地说领袖不是神，也有犯错误的时候，我们不应该盲目跟随，喊万岁是封建主义等等。毛被迫在这次会议上作了检讨，并宣布退居二线，不再过问经济问题。

文革前，毛想把姚文元的文章放在《人民日报》或《北京日报》发表，被置之不理。这表明刘、彭已不把毛放在眼里。与光杆司令相差无几的刘少奇哪来的这份力量，竟能迫使毛泽东收敛气势，处于半退隐状态？结论很简单，刘脱离了毛的阵营，和周恩来结成了联盟。（六零年后，邓小平把中央书记处工作全部交给副手彭真处理，自己一心玩桥牌，在政治局会议上一言不发，坐得离毛远远的。这表明周派早就预谋让刘少奇充当与毛直接冲突的马前卒）。他们俩结成联盟，中央高层权力就基本被控制住。

七名政治局常委之中，毛只剩下林彪一个死党，而林彪自建国以后，几乎从不过问政治，政治局会议极少参加。一个原因是他脊髓神经受过枪伤，身体十分虚弱，怕风怕光怕冷怕热，另一方面他深知伴君如伴虎，自己又有功高震主之嫌，不如退避三舍。如此，在政治局常委之中，毛实际上成了孤家寡人。至于军队中的势力，刘少奇虽没有半点，但周恩来却至少和毛泽东旗鼓相当。而在八大元帅之中，周恩来的势力远大于毛泽东。（原是十大元帅，毛在庐山会议砍去了他的忠臣彭德怀，罗荣桓在文革前病逝。因此十大元帅到文革时只有八人：朱德、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

按照周刘的盘算，他们采取逐步架空毛的战术定可稳操胜券。在党内高级干部中，毛的威信大挫之后，刘少奇的威信逐年上升，至文革前已达到和毛并驾齐驱的地步（老百姓家中挂的领袖头像也是毛泽东和刘少奇并列）。可是他们设计的棋步中，走了一步最大的错着：他们为了麻痹毛，为了遮盖自己的用心，在架空毛的同时，却在舆论方面大捧特捧、大吹特吹毛泽东。毛是个权力第一的人，他怎么会满足于舆论上做个帝王？65年窃听器事件使毛感到自己的地位危险，下决心搞文革反攻。

窃听器事件，最早是文革初期红卫兵揭露杨尚昆罪行的大字报披露的，但详情披露得不清楚，大字报只是说杨尚昆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搞特务手段，在毛主席的办公室安装窃听器。据李志绥的书中说，窃听器事情暴露的过程是这样的：毛的专列停在长沙车站，车上的随从人员下车到月台上散步。通信兵XX在月台上见到张玉凤，就模仿毛泽东的口音和张玉凤开玩笑，该通信

兵所模仿的话是毛泽东在车厢里和张玉凤打情骂俏的话。张玉凤大惊失色，立即返回车厢报告毛泽东。毛泽东将该通信兵叫上车厢询问，该通信兵说是罗瑞卿布置的。毛再问罗瑞卿，罗瑞卿说是杨尚昆根据政治局会议的决议要求他在毛的车厢安装窃听器，以便政治局成员及时了解毛主席的指示好贯彻执行，罗瑞卿并且拿出政治局有关该决议的文件给毛泽东看。毛看了之后没做声，似乎没当一回事，但回到北京就决定搞文革并说服了林彪支持他。

毛为了方便自己部署反击，以提拔罗瑞卿去当总参谋长的方式，赶走了老跟在自己身边的公安部长。罗瑞卿以为毛可被甜言蜜语蒙住，文革前夕还在《红旗》杂志上发表文章大肆吹捧毛。他们以为毛被架空，自己又被塑造成毛思想的最佳继承者，如此毛将无反击之力了。他们低估了毛泽东。毛泽东精心部署的反击方式是他们没有料想到的。毛利用对手为了麻痹自己所搞的个人崇拜，借力打力，干脆走出北京，躲在上海和杭州，直接通过广播电台来发动文化大革命。毛命令中央电台广播北大聂元梓的大字报，煽动千百万无知的民众和狂热的青年造反，让全国迅速处于瘫痪状态。在刘少奇周恩来等竭力吹捧，毛此时在民间已如同神。民众只要知道有谁竟敢不敬这位神，非蜂拥而上，咬死他撕烂他不可。为了以防万一，毛在号召全国造反的前夕，以拉练演习的名义，将北京卫戍区的部队调走，密令林彪把三十八军开入北京。

对林彪来说，不参与这场权力斗争，不调军救驾，刘周得势照样会清除他。因此林彪从六三年起也参加了神化毛的大合唱，不能让接班人的形象专利只属刘周一派。毛调兵入京，与其说真的决心同周恩来作军事决战，还不如说是摆开一个决战的架势。毛深谙周恩来的性格。果然，周恩来看出他意料的反击和毛打算蛮干的架势面前，惊慌失措一阵之后，可耻地退缩了，他选择了抛弃刘少奇，以求自保。周恩来的退缩使毛乱中求胜的险棋轻易就得逞了。俗话说，会打架的，不如不要命的。毛泽东小时候被他爹打过几次，在他念初中时还被她爹揍过。有一天，他爹又要揍他，毛走到池塘边说，你再打，我就跳下去淹死。他爹被他的眼光吓住了，从此以后不敢再打他。

这次胜利，对毛的一生极其重要，使毛尝到了破罐子破摔豁出去干的甜头，毛不按常理出牌，爱走极端，和此事件有莫大的关系。中共为周辩护的观点称，周这么做是为了顾全大局。中国那时工厂停工，学校停课，到处枪炮轰鸣打内战，死了不知多少人，哪里还有什么大局可顾？民间尚有不少平头百姓，为了捍卫刘少奇不惜丢掉性命，相比身居要津、手握大权的周恩来，谁更有社会正义、更关心国家命运？周恩来背叛了刘少奇，也背叛了众多敢于以生命作抗争的民众。所谓的顾全大局，戳穿了只是为了保全他自己和官僚小集团利益。周恩来的懦弱，毫无政治理想和为人原则，在危急关头首先明哲保身的性格，使毛泽东轻易获得了搞掉刘少奇的胜利。但毛泽东并不善罢罢休，对毛来说，只有搞垮周恩来，绝对权威的地位才能真正巩固。

因此，就在刘少奇迅速垮台的同时，毛就部署了对周的攻击，第一次是利用一个名叫“联动”的红卫兵组织，在北京街头贴大字报，揭露周恩来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大屠杀期间被捕后，在报上刊登伍豪（周当时代号）脱党启事以求释放。依文革时的极左政治，凡被捕发表脱党声明的，便是叛徒。对这一经历，周恩来自己是这样解释的，他被捕后，国民党士兵并没有认出他，以为他是一般党员，他的黄埔学生、白崇禧的弟弟白洋闻讯到狱中把他领出来释放了他。至于脱党启事，他说根本不知道，是他出狱之后，白洋为了对

上有所交待以他名义登的。北京街头大字报所公布的叛徒材料，假如揭露的是别人，被揭露的人立刻会被打入十八层地狱，但揭露到周恩来头上，却是贴大字报的该红卫兵组织“联动”头头，被安上反革命罪名全数逮捕。

外界不知情的人，还将此事件解释为，毛泽东不能忍受红卫兵胡来搞到他的亲密战友周恩来头上。事实上，大字报的材料就是江青、康生提供给红卫兵的，整个事件都是毛泽东躲在杭州一手策划的。北京街头的大字报出笼之后，在江青康生的挑唆下，红卫兵还冲进中南海包围了国务院，将周恩来围困了一天一夜，无论周怎么劝说，红卫兵就是不肯撤走。结果军队中有人出来保周了（据周三年后亲口告诉到北京来访的美国记者斯诺，说军队中有人听说他在中南海被围困，就带兵入京和红卫兵发生了冲突，军队开枪打死了人）。

在杭州密切关注事态发展的毛泽东，看到有火并危险，就翻手将贴大字报和发动围攻中南海的联动头头以反革命罪抓起来，以表明他和此事件无关。这使毛泽东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周恩来在军队中势力和影响不搞掉，是不可能打倒他的。因此，毛泽东在文革中第二次搞周恩来的行动，就是通过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王力、关锋、戚本禹提出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口号，想以此把周恩来在军中的力量肃清。但遭到周恩来的军中势力激烈抵抗，大有决战之势，这就是文革中著名的大闹怀仁堂和武汉兵变。

有关怀仁堂“右派造反”事件已经广为人知，这里按下不表，我们来看看半年之后，67年夏天发生的武汉兵变。毛要军队支持地方上的左派，武汉军区偏偏支右，毛派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王力到武汉发动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政委钟汉华干脆把王力抓起来。他们听说毛本人也到武汉督阵，就发动几十万市民包围武汉机场，要把毛拦截下来，毛见势不妙，赶紧脱身。要周恩来出面去平息事态。周到了武汉对陈再道说，把军权交出来，跟我去北京包你没事。陈大麻子就乖乖跟着周去北京。去了之后果然没什么事。因为毛泽东见势不妙，抛出王、关、戚作牺牲品，称揪军内一小撮是毁我长城，要王关戚“还我长城”，这三个傻瓜就被投进监狱了。

揪军内一小撮虽然放弃了，但军内的分裂已经形成，为了平息和安抚军界，也为了巩固“四人帮”的地位，毛只好以牺牲林彪来换取军队团结。军队中的运动搞不成，毛就动脑筋在舆论上搞跨周恩来，这就是批孔批周公的由来。但同样是以毛的失败告终。周是如何粉碎毛的进攻的，这方面材料中共丝毫未透露。因而海外舆论就把毛的被迫退让看作是江青瞒着毛在搞周恩来，把罪名全泻到江青头上。其实江青在受审时已一语道破：“我是毛主席的一条狗，他叫我咬谁，我就咬谁。”第三次反周，毛动用江青亲自出马。毛此时手中的大牌已出尽。而周恩来只是炮制了《红都女皇》事件作为反击，江青落得个里通外国，出卖党和国家机密的罪行，立刻威信扫地、气焰难再。

毛的取胜仅仅靠天相助，比周多活了八个月，但他还是无力也无足够的时间全扫周的势力，只是打倒了邓小平。这场胜利且又是那么短暂，毛一死，接管天下的还是周的势力。所以说，毛周争斗的结果，最终取胜的还是周恩来。然而，无论作为人还是作为政治家来说，周恩来真的胜利了吗？不少人为周辩解道，当时周若同毛公开对抗，不但保不了别人，连他自己也要垮台。可是至少从目前公开的事实来看，根本不应得出这种结论。

从毛在文革中多次想打倒周恩来，却不能成功来看，我们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周恩来若多一分勇气，多为全民族利益着想一下，而不是为虎

作伥，中国百姓何至于遭受十一年之久的文革苦难！假如周同刘少奇一样也迅速垮台，文革也可早早结束，可偏偏这个怯懦的人又拥有那么大的权势，两军相持不下，民众陪绑陪斩十一年。周恩来一生如有后悔，定会后悔抛弃刘少奇，作可耻退让吧！刘少奇惨死狱中之际，口里叫骂、心中最恨的恐怕不是毛泽东，而是周恩来吧！

周恩来的演技

一九七零年夏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九届二次会议上，毛泽东突然借故批判陈伯达，并株连林彪，向与会者传递了毛对林彪不满的信息。会议结束后，周恩来并没有马上返京处理事务，而是留了九十九名党政军高级干部下来，听他讲话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报告。会上周不谈当前形势，却回顾历史，披露了当年派陈毅去夺毛泽东军权的事实。

这段历史与会者毫无所知，他们一直以为周是毛的亲密战友，现在听到周抖出这段往事来，极为震惊。当然周在抖出之前有段引子，说毛泽东思想用词虽然通俗易懂，但学一遍二遍是不能真正理解的。然后就交待了自己曾犯过的严重错误，最后总结自己犯错误的根源，是由于年纪轻轻就当大官，官瘾重，怕违背莫斯科指示丢官，就盲目执行莫斯科路线。周恩来称这是他一生中最严重的教训。周恩来在这次讲话中，明的方面至少披露了二条信息：他在党内的地位曾高于毛泽东；他和毛泽东之间有过严重的过节。当时令听众吃惊的是，周使用了“做官”、“官瘾”之类的词，此类词在中共建国后通常只被使用在旧社会的官僚头上，也就是只被使用在敌人头上，共产党称自己的官为干部。这种禁忌直到七九年底才打破，那时《光明日报》发表一篇文章标题是《不可按长官意志支配经济》，引起举国轰动。轰动的不是文章的内容，而是标题中的“官”字，百姓说这下不得了，共产党干部也被称为官了。因此这篇谈尊重经济规律的文章，居然在全国起到了精神解放的作用。此后，老百姓用官来形容共产党，已成流行词汇，不觉有什么特别了。可以想见，周恩来七零年在讲用会上使用这一词作自我批判，听众会吃惊到何等程度。

表面上看来是周恩来严于自责，但在座者都是中央委员，都是官场上混出来的，头脑岂有如此简单？且周恩来挑选留下的听众都是实力人物，充充门面的工农兵委员，他是不会邀请他们来听此报告的。好几年之后，一位在场的听众、某军区头头回忆此事时说：“我当时非常震惊；一是第一次知道这段历史的震惊，二是感到有点不对劲，好像毛主席和周恩来也不那么友好。但当时不敢多想，这种事想多了，万一不慎说出口来，会给自己惹大麻烦。后来到了批林批孔运动，江青明显想把火引到周总理身上去，我对庐山会上的报告就恍然大悟，看来总理早知道毛主席要搞他。”这才是周恩来所谓严厉自我批判的真正用意。

他在会上再三反复强调毛的话不是一下子就能理解的，实际上是暗示听众对这次庐山会议要往深处多想想。周明白毛在军中不满和对抗的压力之下，不得不牺牲林彪，这样他与毛之间，将处于直接冲突了。他要让中共高级干部事先有个心理准备，当毛想清除他时，他们将支持谁，周恩来特别强调自己当年怕丢官就盲目服从最高指示，这实际上暗示在场的官僚，你们不要因怕丢官就盲目服从最高指示，一旦铸成大错，终生后悔。周恩来另一不寻常举动是，作完报告之后，送了一份抄件交庐山档案馆保存，并且只是作为一般保密文件保存，实际上就是允许他的讲话流传。

类似的高姿态，表现在周恩来身上已有好多次。在遵义会议上他同样也

是以自我批评的方式达到了目的。当博古和毛泽东、王稼祥、彭德怀等争执不下，博古坚决不肯认错让步时，周恩来站起来发言了，他说军事失利，作为军事部长的他应该承担主要责任，因此请求党中央解除他军事部长的职务。周恩来这一高姿态表演，既使博古失了靠山，又使自己博得赞扬，博古被迫让步交权，事实证明博古交权就完蛋，周恩来依然稳坐中央核心。以道德面貌、谦谦君子的形象遮盖自己的真正目的，是周恩来的拿手好戏。当然我们也不能说他毫无道德。当不损害他的根本利益时，他能表现出道德，可是一旦利益攸关时，道德就成了他的手段。他玩得是如此娴熟，表演得如此成功，活着时，几乎没人能辨别出来。

周恩来“人情味”的表现同样如此。试举一例：西安事变中，周向蒋介石表达了中共的几点主张，周讲完之后并非如同外界所说的，拿出协议书伙同张学良威逼蒋签字，而是话锋一转，聊起了家常，话题自然转到孩子身上，蒋介石说已和经国断了音讯很久，很想他。周恩来装作不知情的样子，说这件事我们可以通过苏联关系，一定替蒋校长找到并送回令公子。谈判关键时刻聊起了家常，无意中谈到了孩子，难道是偶然的巧合？这分明是周事先精心谋划的结果，即使蒋介石也未必能当下识破他的用心，否则就不会接他的话题了。协议就是在这种表面上充满人情味，实际上暗含威胁的气氛下签订的。这就是周恩来！他即使处在优势地位，给你下药时也一定裹着糖。

周恩来还有个形象是铁面无私。中共最爱宣传周恩来清正廉洁，从不徇私情。与以权谋财、贪污腐败的官僚比，周恩来确实是廉洁的，我们不会否认这一点。可是周的私心不表现在钱财和帮助亲友上，不等于他就没私心。他的私心表现在权欲上，表现在只重自己的官位，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作为总理，亵渎了总理的职责，其祸害甚至比贪官污吏更大，如果不贪财就是好官就值得赞扬，那么“四人帮”中的张春桥，其清正廉洁的程度丝毫不亚于周恩来，中共为何把他投入狱中？显然中共在这方面是双重标准，首先取决于你是谁的人，其次才是品质问题。

周恩来有时还以铁面无私来掩盖他的冷酷无情没有人性。如本文开头提到的孙维世一案，周恩来的理由肯定是：“既然党组织掌握了材料，认为她和苏联勾结，我作为一个党员必须服从组织的决定，不能因为她是我的继女就袒护她。”实际上呢，他心里很清楚，毛泽东、江青想通过孙维世打开缺口，搞到他与苏联仍有勾结的材料。周恩来为了显示自己心中无鬼，就批示同意逮捕孙维世。

同类的表演，周做过无数次。长征刚开始时，红军把印刷机都拆下来带走，却偏偏要抛下早已失去权势，又重病缠身的瞿秋白，这分明是置他于死地。通知瞿秋白留下的就是周恩来，他是党中央决定的名义通知他的。牺牲瞿秋白，对周恩来而言，就是少了一个能证明他领导革命多次失误的重要证人（瞿秋白在国民党牢狱中写《多余的话》，未伤及周恩来及任何共产党人半句）。被抛离长征队伍的还有周恩来的密友陈毅。陈毅得罪了博古和苏联顾问李德，周恩来同样没替老友说一句话。

还有，为了不暴露长征行踪，出发前，他们杀了上万名被怀疑不可靠的士兵和下级军官。这就是闻名中外的万人坑事件。周是当时主要领导人之一。在利害攸关时，周这个人就毫无道义。抛弃牺牲朋友，是周的一贯表现。正因为他骨子里是个极自私而又懦弱贪权的人，文革开始，他抛弃刘少奇、贺龙

等行为就不足为奇了。当然，他也有过许许多多所谓顶着压力，保护受害者的故事，其中没有一个会因此动摇他的权位，反而使他更得人心，在与毛较量中，又多了一个筹码。

◇结论：

近半个世纪，一些人通过对舆论的彻底垄断，拼命为自己吹嘘，美化自己的道德形象，似乎只有领导人才有高尚的道德，高尚的情操。事到如今，他们手中只剩下周恩来这一条“光辉形象”了。然而这个“光辉形象”是那样苍白，那样经不起历史的检验。以这样的形象作为全民的道德资源，中国的道德水准怎能提高呢？

（2）朱德逝世

1976年7月6日下午三点零一分，朱德去世了。戎马一生年近九旬也属寿终天年了。我那时还关押在中共的监狱里，无从悼念，老人一路走好吧。

中共前国家副主席、人大委员长朱德死因成谜，外界流传“意外”感冒和“投毒灭口”不同版本。《同舟共进》2012年第7期发表周海滨采访朱德唯一儿子朱琦的夫人、原农行天津分行行长、年过八旬的赵力平口述历史，证实朱德“意外”感冒情节，并表示随后的医疗组治疗时，“打这个针可能不利，可能越打越坏”，但医疗组拒绝换药。朱德在“意外”感冒十余天后不治身亡。

当时中共中央专门为朱德成立了医疗组，组长是中央军委副秘书长苏振华，副组长是李素文。成员有姚连蔚、吴桂贤、刘湘屏等。刘湘屏是谢富治的老婆，同江青关系密切，当时充任卫生部部长。她在三楼住，每天都要来看朱德一次。康克清对儿媳赵力平说：“她的态度和神情，都使我感到她对朱老总缺少真诚的关心。有一次，我听见她问负责朱老总医疗的主管医生‘还能拖多久？’大夫说反正现在正在抢救，情况不太好。”刘湘屏和江青去看望朱德。江青说：“总司令好！”朱德没吭气也没抬手，没反应。

赵力平的女儿是医生，跟奶奶康克清提出来，说朱德打这个针可能不利，可能越打越坏。康克清就跟医生说这个药是不是换换，他们不听，说是专家组确定的治疗方案，不宜改变。1976年7月6日，朱德去世，终年90岁。

赵力平表示，其实，朱德平时身体很好，不吸烟也不喝酒，喜欢运动，每天还做自编的体操，自己吹着口哨掌握节奏。谁也没有料到，会因为这次接见外宾的“意外”引起感冒而去世。

据学者陈破空在《中南海厚黑学》一书中披露，会见外宾当晚，朱德突发重病，紧急送医就诊。按照惯例，当班医生需从中央保健局调到朱德病历，然而，情形如此紧迫，却竟然调不到病历。原来，两天前，朱德的病历已经被神秘调走。朱德病情日重一日，十余天后不治身亡。事后，朱家觉得事有蹊跷，要求查证，却得知那位给朱德治病的当班医生，已经突然死亡。朱德夫人康克清后来逢人便说：汪东兴一日不开口，真相一日不得大白于天下。汪东兴是毛泽东的亲信，当时任中共中央警卫局长。朱家暗示：朱德死于谋杀。

毛泽东与朱德之死

从井冈山时期即有朱毛之说，提起朱德，中国的老百姓不禁会在心目中出现一个大致的轮廓，因为他早已被中共塑造成了一个性情敦厚、文化不高、性格懦弱的老革命形象，并深深地扎根于老百姓的心目中。而毛泽东，则被描述为一个智慧超群的军事天才。苏区几次反围剿、八年抗战、国共之间的辽沈、淮海、平

津三大战役似乎都是毛泽东指挥的。被颠倒的历史终归需要扶正。这里将为您讲述一个与您印象中完全不一样的真实的朱德，同时也从另一个角度，让我们重新审视毛泽东的真实面目。

在中共的残酷党内斗争中，经常出现荒唐无稽的变数。记得文革前的小学语文课本里，有一篇课文叫《朱德的扁担》，说的是在井冈山，朱德坚持走几十里山路，和士兵们一起去挑粮食。可是到了文革的第二年，《朱德的扁担》一下子变成了《林彪的扁担》。在井冈山纪念馆里，曾有一张 1929 年红四军向赣南、闽西进军的布告，落款中有“军长朱德”的字样，排在毛泽东名字的前面。文革开始时，相关人员便千方百计抹去了“军长朱德”四个字。只留下毛泽东，把毛泽东吹捧成红军的唯一缔造者。

话说朱德，并非一个没有文化的鲁莽之汉。不像周恩来出身官僚、毛泽东出身地主，朱德 1886 年出生在四川省仪陇县一个佃农家庭。父辈倾力供他读书，1905 年参加科举时，他连中二元，后又到德国留学三年，获得了世界顶尖学府格丁根大学（Georg-August-Universität Göttingen）的文凭，让没有获得洋文凭的周恩来、邓小平等人自惭形秽。1909 年春，他加入滇军，后来得到著名滇军将领蔡锷的器重，升任旅长，并在西南军阀倾轧中独霸一方。朱德也绝非是中共一些人所塑造的老好人形象，他年轻时酗酒、抽鸦片、一身江湖气，养了四房妻妾，曾经心狠手辣地暗杀掉富滇银行行长顾衡斋。

1922 年朱德加入中共，此前已有十余年的军旅经验。早年他在中越边境与土匪斗了数年，采用了“以动制动”的特殊战术，成为后来中共游击战术的雏形。然而因为军阀的背景，朱德不被中共信任，一度无兵无权。1927 年中共南昌暴动失败后，周恩来想起了朱德的军阀背景，任命他为南下部队司令。在之后的八个月里，朱德把这支八百人的溃军扩展到上万人，并于 1928 年 4 月到达井冈山，遇到了毛泽东“秋收起义”的残部一千余人，合并成红四军，由朱德任军长，毛任党代表，这就是中共党史中所说的井冈山会师。红四军后来被改编成红一方面军，军事上由朱德指挥，经历了实质为西逃的长征、辗转抵达延安。随即以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名义赴晋冀鲁豫与国民党军合作，开拓抗日根据地，1940 年后返回延安，抗战胜利后与国民党打内战等。

朱德为共产党打江山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因此很多“功劳”归在了他的名下，加冕总司令众老军心服口服。这就让绝对的独裁者毛泽东如同骨鲠在喉一般。另外，朱德和周恩来一样，曾经有过在毛之上的地位，因此毛泽东掌权后一直处心积虑地打压朱德。北平天安门解放初期挂的是朱毛两人的巨幅画像，1950 年后才由毛泽东一人独守城墙。1965 年 5 月，在批判朱德的大会上，林彪指着朱德说：“你一天都没做过总司令，南昌起义后是无政府……。解放战争是主席指挥的，你是不行的……”然而事实上，被林彪、周恩来等人吹捧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精髓，大多都是抄袭朱德的东西，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所谓的游击战“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1928 年，朱德在井冈山提出了“十六字诀”，一年以后，毛泽东在他的《红军第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中，抄袭了这十六个字，从此归入了“毛泽东军事思想”。1937 年，朱德倡导德国军事家鲁登道夫的“总体战”，后来被中共归入了“毛泽东军事思想”中“人民战争汪洋大海”的内容。1938 年，朱德在延安《前线》周刊上零散地发表了他的《论抗日游击战争》一书的部分章节，毛泽东立即把朱德刚刚论述过的东西剽窃过来，转手在中共《解放》周刊上刊登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的文章。这样，朱德又白白给“毛泽东军事思想”当了一块垫脚石。

既然朱德既非莽夫，亦非老好人，难道几十年来他就甘心被毛泽东役使吗？问题就出在他那无法回头的政治抉择上。最初加入中共时，朱德因出身于旧军阀受到歧视，后来他在军事上树立了自己的地位。到井冈山后，朱德虽然名为军事第一把手，但他察觉到毛的独裁权欲，除军事之外的其它权力都被毛抓在手里，这就使朱德不可能做出“取而代之”的举动，只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与毛周旋。1931年，周恩来进驻苏区，一度撤了毛的职，朱德开始产生弃毛随周之意。但是周恩来的那种苏联忠实恶犬的嘴脸和大开杀戒的屠夫行径，令朱德不寒而栗。两个魔头相比，最终他选择了重归毛的阵营。1935年“长征”尾期，朱德的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仅剩下一万余人，形同乞丐。而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仍拥有四万兵力，装备充裕，并且敢于顶住中共中央和莫斯科的压力，没有全面执行惨绝人寰的“破坏旧社会结构”的命令。于是，朱德不但有了投张而脱离毛、周的想法，并且一度离开中央红军，随张国焘的左路军行动。无奈张国焘的政治权术低了一等，钻入毛、周的圈套，导致两万多人红四方面军西路军被青海军阀全歼，张国焘也因此成了失败的替罪羊。其后，在毛泽东与王明之争中，由于朱德向来反感苏联，只好站在毛的一边。干掉了王明之后，毛泽东基本上形成了独裁，此时朱德只图保住实力地位，以度来日。

由于朱德在党内、特别是军内人脉深广，许多老军头都尊崇朱德。毛泽东虽然心怀忌恨，但始终不敢明目张胆地加以清除。1976年，病入膏肓的毛泽东，尽管终日卧床，陷入半昏迷状态，仍念念不忘清除宿敌。当时朱德的身体尚健，中共大部分人都相信，朱德能活过毛泽东，然而就在毛死亡前的两个多月，朱德突然暴毙，对其死因有多个版本，说法不一。一个版本是被一些人称为康克清的说法：朱德在6月份会见澳洲总理时，“服务人员”有意把冷气开到超低，足足冻了他个把小时，结果造成重感冒并导致心脏衰竭，在医院，他还被注射了导致肾损坏的卡达霉素，10天后死亡。另一个惊悚而广为流传的版本是“投毒灭口”之说：据说在朱德追悼会上有一个规定，任何人不得揭开盖尸体的党旗。当时所有人包括朱德的亲友都遵守这条“铁的纪律”，唯独福州军区司令员、中将皮定钧违反了规定。结果，露出来的朱德尸体，面容焦黑，连裸露的双手也是焦黑焦黑的，呈现出经典的中毒征兆。次日，皮定钧急乘专机返闽，临近到达福州上空时飞机撞山，机上7人都被烧成了焦炭。登机人中有2人是毛的卫戍军8341部队的人员，事后查出其中6人的手枪有开火的痕迹，所以不少人推测，飞机上可能发生了灭口与反灭口枪战。但是不论朱德死于谁手，毛泽东达到了死前清除宿敌的目的，毛朱一辈子的斗争，至此划上了句号[1]。

朱德文革初被批判

中共中央的档案馆里，有一份标号为“19660523”的会议记录。此份文件记录了1966年5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在23日的会议中对朱德的严厉批判。地点：人民大会堂河北厅；主持人：刘少奇。

在批判会上，时任中共人大委员长朱德，被说成有野心，想披黄袍。周恩来批朱德不可靠，是常委中定时炸弹。朱德感到很无奈，他说：“我不是有野心？我八十岁了，爬坡也要人家拉，走路也不行，还说做事？事情我是管不了了，更不要说黄袍加身。”

据悉，此会议是在毛泽东的授意下进行的，目的是警告与会者——即使朱德这样的老师也必须俯首帖耳，绝不能成为“文革”运动中的绊脚石。

朱老总的临终遗言

“朱老总于1976年6月26日进北京医院。6月27日晚朱老总对前去探

望的苏振华说：我革命几十年了，不懂得什么叫‘文化大革命’。但我不糊涂，现在搞得党不像党，国不像国。我快要走了，我要问主席，‘文革’，革了谁的命？建国十七年都错了，谁是个头。一心为党为国的老同志都成了‘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这个党还是一个“伟大的党”吗？”

“6月28日下午对汪东兴说：现在谁主宰着国家的命运。这类人是党内野心家、阴谋家。谁把这批人扶上来的？这批人穷凶极恶，篡夺党权，谁是他们的后台？我死也不安心，中国全断送在这批人手里！”……“7月2日对李先念说：一个伟大的创举，搞社会主义，可以不抓生产，天天斗呀斗。生产为什么不能抓？这是什么主义？什么人的指示？好端端的一个国家搞成这副样子，还是‘莺歌燕舞’吗？……这笔账怎么算？先念，要坚定些，历史会作出判决的。”“我沉默太久了，这是一种内疚。”

朱德简介：朱德，1886年12月1日生，四川仪陇人。1909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1922年加入中共，历任中共军委副主席、解放军总司令、国家副主席、中共人大委员长等。1955年被中共授予元帅军衔。1976年7月6日在北京去世，终年90岁。朱德与其独子和么孙三代人均不得善终。朱德1976年蹊跷死在毛泽东之前，朱德独子在文革中曾遭迫害，致病，于1974年死亡，终年50多岁。朱德么孙朱国华在1983年邓小平发动的“严打”运动中，以“流氓罪”被枪决，死时25岁。

附注：

[1]据传毛泽东预感到自己要死之时，曾于1976年8月9日在病床口授，张玉凤记录，章含之整理成文。该遗言全文一千六百余字，其中有曰：“我要死了。万岁是你们强加给我的。我其实只要活到一百岁，中国的事情就会搞定。我既无此天年也无此天命，还是抓紧搞定了大局。周恩来朱德终于都在我前面走了，我已无大顾忌了……”此遗言说明了毛泽东生前最顾忌的就是周恩来和朱德死在其后。

(3) 毛泽东死了

1976年9月9日，正是收割水稻的大忙时节，平常七点钟起床的在押劳改犯那天早晨不到六点钟就被一阵阵哨子声催起来了。

跟着是集合、排队、背诵毛主席语录，由于监舍的院子里只有一小股顺着地沟流来的水，其中难免混着牛尿猪粪，三四百人中绝大多数是不刷牙、不洗脸的，既节约时间又简化程序。

当班的值星员向岗楼上的武装管理员报告人数以后，挨着次序到食堂领取一个玉米面馍馍、一瓢水煮菜。睡了一夜，昨天晚饭吃的那点东西早已消化殆尽，饥肠辘辘的犯人几分钟的时间就狼吞虎咽地把早饭吃光了。跟着又是集合、排队、背诵毛主席语录、向岗楼上的武装管理员报告人数、获准后出监舍大门，到山上干活去。

这时候还不到七点，太阳还没有出来，天却大亮了，看来是个大好的晴天。

以生产粮食为主的苗溪茶场第十三中队趁着好天气赶忙收割水稻。

凡是参加此项作业的，七个人编成一组，有规定的任务，一天要收回2200斤稻谷，完不成不能收工，必须抓紧时间。犯人们都知道这个规矩，叫苦也没有用，否则可能招来一顿棍棒抽打，或是带上手铐。这是在有中国特色的监狱里服苦役。

出工的路上传来了一个消息，万家山猪圈死了一头老母猪，已经由负责喂猪的犯人背下山来，交给食堂了，也就是说今天晚上要打牙祭了。虽然病死的老母猪肉煮不烂，咬不动，而且有一股腥臭味，可对于平时缺油少盐的犯人来说也算是一顿油荤，记得还是公历八月十六星期日吃过一次肉，半个多月不见荤腥了，免不了馋得很，老母猪之死成了当日的早间新闻。

昨天（公历九月八日，农历八月十五，是中秋节），文化大革命以来中秋和端午都被划入四旧之列，已被扫除多年，在监狱里更没有人敢于提起这个中国人民的传统节日。中秋月满象征团圆，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犯人离乡背井，高墙、电网、铁窗割断了和父母、妻子、儿女的联系，岂能想着团圆。再说，吃月饼的习俗来源于元朝末年汉族人民反抗蒙古人的残暴统治，用月饼传递起义的信息，相互送月饼约定中秋夜杀鞑子，这不是造反吗？更属莫大的忌讳。所以监狱里决然不能过中秋节。和平时一样，一天三顿玉米馍馍、水煮菜和繁重的劳动、残忍的折磨。

在出工的路上，我大声地向一路出工的各组犯人打着招呼，要求大家早点动手、快点干活，争取五点钟以前完成任务，回来吃老母猪肉。那时我是三工区的总值星员，负责安排四十几个犯人的劳动，可以发号施令。

劳改队地处山区，一块块梯田分布在山腰。每个组都按照昨晚我布置的地段迅速地到达指定的田间，动手干活了。一开始，七个人下到田里全都是手操镰刀割稻子，大约十分钟以后，开始打谷子了（四川称水稻为谷子）。山区梯田难以机械化作业，那时连脚踏式滚筒脱粒机都没有，全靠人工。两个打谷手准备好拌桶（厚实的木板做成的方形敞口木桶，长宽约 1.4-1.6 米，高约 0.6 米，上大下小呈倒梯形，三面用挡蓆围住，用于水稻脱粒）。打谷手一左一右站在拌桶前面，通常是右边这个先动作，手持谷把子，高高扬起，用力地朝拌桶内侧啪地一声打下去，紧接着左边这个人做同样的动作，打下去以后回手起来的时候让谷把子碰到挡蓆上，震落沾附在谷草上面的稻粒。一右一左如此交替，三重三轻，在远处听起来很有节奏，蹦蹦、蹦蹦、蹦蹦，嘭嘭、嘭嘭、嘭嘭，稻穗上的谷粒基本上就被脱干净了。金黄色的谷粒落在拌桶里，枯黄的谷草堆在拌桶旁边。一张拌桶七个人，分工很明确，年轻力壮的充当打谷手，手脚麻利的两个人继续割稻子，保证供应。一个人把割下来的水稻传送到拌桶前面，叫做递把子。一个人收拾脱粒后的谷草，捆成一把一把的晾晒在田埂上，一个人负责运输，把打下来的谷子装麻袋，背回队部过秤，倒在晒坝里交任务。从早上干到中午，背谷子那个人从队部食堂领出来七个玉米馍馍和一盆菜，大家就在田边吃饭，饭后有烟瘾的掏出火镰，打燃火，抽一支自己裹的叶子烟，休息五六分钟，接着干。这一天因为出工的时候打了招呼，要求抓紧时间，手脚麻利点。各个组在下午四点钟以前就完成了定额。为了不致于误了打牙祭，不再超额了。

胡家坪工地得天独厚，山脚下有一个宽约五米的河沟，平时水深一米有余，水流不徐不湍，清凉沁人，清澈见底，河床为大小卵石，毫无泥沙。才在水田里劳累了一天的犯人，汗水和泥水混在一起，散发着一股腥臭的味道，这时候纷纷脱了个精光下河洗澡，一边洗一边喊叫着，用胸腔里的声音驱赶着疲劳，山间的小溪顿时成了天体浴场，人声、水声充填了沉寂的山谷，回荡在空中。

忽然悬挂在临近队部的高音喇叭响起来了。在河沟里的犯人停止了说话，也停止了动作，光着屁股或坐或站的泡在小溪里，不由自主地看着远处

的高音喇叭。来了！听！一个缓缓的低沉的声音“各位听众，本台今天下午四点钟有重要广播，请注意收听”，连播两遍。隔几分钟又重复连播两遍上面的内容，前后一共播放了十余遍，算是预告吧。

什么重要广播？大家静静地等待着。从播音员的语气里可以感觉到即将播出的新闻必定是一个噩耗。泡在小河沟里洗澡的人默不作声了，似乎在思考着什么。

1976年是多事之秋。3月8日下午三时许，一颗重约四吨的陨石脱离公转轨道直冲地球，巨大火球从天而降，轰鸣之声百里可闻，陨石在高空爆裂，数千颗大大小小的碎块纷纷坠落在中国东北吉林市近郊500平方公里境内。主石重1770公斤，冲击地面时造成蘑菇云状烟尘，砸穿冻土层，形成深6.5米、直径2.2米的巨坑，震力相当于1.7级地震。隔了一个多月新华社才播报这条电讯，4月22日临近黄昏之际，毛泽东在贴身护士孟锦云给他读报时得知了这条一个多月前的新闻，刚刚经历过“四·五”天安门事件的他，心神未定，故作沉稳。让孟锦云打开平时关着的窗户，由人搀扶着走到窗前，多次仰望天空，陷于沉思，不止一次的和孟锦云以及身边工作人员谈起史书中有关陨石雨的记载和天人感应之说。

5月29日，云南西部龙陵县发生两次强烈地震，第一次在20时23分18秒，震级7.3。第二次在22时0分23秒，震级7.4。该地区地广人稀，伤亡二千余人，倒塌房屋四十余万间，毁掉装机容量240万千瓦水电站一座，小型水电站三座。当时报纸仅登载了简短消息，新闻封锁，只能播报莺歌燕舞，着力掩盖天灾人祸。

7月28日，冀东工业城市唐山发生7.8级猛烈地震，死亡二十四万二千余人，重伤十六万四千余人。整个城市被夷为平地，交通中断，通讯瘫痪，物资匮乏，损失惨重。国际社会迅速做出反应，美、日、欧等地均发出了愿意提供援助的声音，《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强调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不可战胜，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极大优越性，拒绝接受任何形式的外援。

8月16日和23日，四川北部松潘、平武一带发生两次7.2级强烈地震。震区处于强烈上升的剥蚀地带，岩石破碎，风化严重，震后连续暴雨。崩塌、滚石、泥石流等灾害频繁，乃至河流壅塞，交通阻断，农田被毁。中央急调数万册《毛主席语录》空运灾区，鼓励人民自力更生，重建家园。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当时未见报道。2006年也就是地震三十年后，政府披露伤亡不足千人。

年初的陨石雨，年中的三次大地震，按照中国古代传下来的“天人感应说”，这意味着将帅陨落，灾星入地。1月8日周恩来逝世，7月6日朱德逝世，还有谁呢？人们心里纷纷猜测着，就是他！却没有一个人敢说出来。

四点整，电台报时，接着广播讣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极其悲痛的向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宣告：我党、我军、我国各族人民敬爱的伟大领袖，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伟大导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名誉主席毛泽东同志，在患病后经过多方精心治疗，终因病情恶化，医治无效，于1976年9月9日零时十分在北京逝世……”。

听完了这段讣告，我心里一惊，这个自认为无往而不胜的毛泽东，这个前几年还号称能活一百多岁的毛泽东，这个妄想做全世界人民领袖和导师的祸害了中国几十年的毛泽东终于死了。中国要发生变化了，会重演斯大林死后的历史吗？

我年轻的时候对毛泽东曾经无比信仰和崇拜，然而也就是他，掀起“反右”“文革”等反动的政治运动，把一个戴着红领巾长大的、热爱党、热爱祖国的共青团员、军工企业的青年技术员，打成了右派，投进了监狱，关押了二十余年。

他说的每句话都是那么正确、感人，甚至动听、入耳。公开发布的政策字面上也还算合情合理，然而实际上执行的却总是有悖于初衷，有悖于人民的意愿，也有悖于那些白纸黑字。几十年的经验告诉我，毛泽东一贯口蜜腹剑，表里不一，翻云覆雨。尤其是1949年以后，一系列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政策，无限地压抑人民的个性，严重地束缚生产力的发展；一系列政治运动在全国制造了大量的冤狱，也极大程度地毁坏着共产党的信誉，不断扩大对立面，把昔日的同志、同党、同仁、同路人、同情者都划入敌人之列。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他自己最终成了孤家寡人。他死了，对这个残暴已极、反动透顶的独裁者总有一天要清算其罪恶，盖棺方能论定。

我镇定了一下情绪，环顾左右看看周围的人，大多平静如常、表情冷漠。此时有一个小伙子忽然高兴地在河沟里跳了起来，他是成都九中的高三学生，贺心禹。出身教育世家，有天赋、有思想、有见地，属于高才生之列，字写得很漂亮，具北魏体风格，白话诗写的也不错，还能模仿着写旧体诗，填词作赋。文革中因为帮派之间不和，被打成反革命，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当时他还不到二十岁，如今投入劳改八年多了，快三十岁了。毛泽东死了的消息传来，引发了他的兴奋，张扬着两臂，赤身裸体地从水中弹跳起来，幸好没有引起多人的注意，我立即对他说，你娃小心点，今天可不是平常日子，千万要注意。他没有言语，也不再跳跃了。

还在河沟里的几十个犯人，继续洗澡，谁也不说话。这时候高音喇叭里仍然播送《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这篇文章大约两千多字，播放一遍要二十几分钟，内容都是一些口水话，无非是毛泽东怎么怎么伟大，怎么怎么正确。要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等等。

大家在河沟里洗好澡，穿上衣服沿着山间小路列队往队部也就是监舍方向走去。

高音喇叭里播送着哀乐，中国现在用的哀乐源自陕西北部安塞地区的民乐《绣荷包》和《珍珠倒卷帘》，当时广泛流传于晋陕一带民间送葬，以唢呐吹奏为主。1942年移灵安葬刘志丹时，由延安的音乐工作者马可、安波等五人组成哀乐创作组将这两首商调式送葬曲改编成正式的哀乐，1949年以后又由军乐团指挥罗浪配置了和声，沿用至今。演奏一遍大约一分钟。

哀乐缓慢而低沉。犯人们可没踩着它的节奏而是大步流星地往前走，早一点回去填一填饿着的肚子，还有那可能嚼不烂但总算一道荤菜的老母猪肉。

中共历来执行森严的等级制度，可以说集奴隶制度与封建制度之大成。用不用哀乐，播放多长时间，都要遵循既定的治丧规格。一般只有在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去世，如党中央主席、总书记、国家主席、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国务院总理以及中央政治局常委去世，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才用哀乐。有的用三十秒，有的用一分钟，周恩来逝世只有发布讣告时用了三分钟哀乐，其后

的播报用的是一分钟，二十一年以后邓小平逝世用的也是一分钟。1976年毛泽东去世竟然放了六分钟哀乐，算是最高规格了。六分钟大体相当于那天我们从河沟走到劳改队队部的时间，所以我记得比较清楚。

回到了劳改队队部，犯人都集中在晒坝里等待着开饭，我环顾左右看了看，第十三中队的干部，从指导员、中队长、到各工区的主管小队长、管教干事几乎全体出动，站在台阶上面监视着犯人的一举一动，俨然这是非常时期，严防在押犯人有什么出格的举动。犯人呢，表面看来和平时毫无二致，都小心翼翼的、循规蹈矩的，每十二个人围成一圈，蹲在地上，手里拿着碗或小盆，等待开饭。似乎毛泽东的死讯还不如早晨听到今晚有肉吃的消息时那么震动人心。虽然是一头老母猪。

大部分监狱干部的脸上显得比平时严肃冷峻，精神高度集中，两只眼睛转来转去地盯着毫无表情的犯人，只有四工区的主管高松，手里拿着一根棍子，从高高的台阶上走下来，在晒坝里来回走动，不时地用棍子指指点点，清查人数，嘴角上偶尔还露出一丝微笑，看不出他有什么悲痛的表情。

高音喇叭里反复播送《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和哀乐，播放第三遍时突然听到“现在广播周恩来同志治丧委员会……”嘎然而止，谁也没说话，有的人略一惊讶，张嘴瞪眼，也只是一瞬间的事。可以想见当时的中央广播电台紧张忙乱到什么程度。据时任中央广播电台副台长杨正泉后来说，当时接到姚文元的紧急电话，要求把哀乐播放时间从六分钟缩短到三分钟，工作人员慌里慌张地在库房里找了一盘标注为“哀乐三分三十五秒”录音带，是周恩来逝世时播放的录音带，未经仔细检查，就匆忙放送，以致造成滑天下之大稽的失误。这就是中央广播电台的真实水平。

治丧委员会大约有三百多人，念一遍名单需要十分钟左右，谁也没有注意听。犯人们埋头吃饭，狱警们在台阶上警惕地盯着晒坝里的几百名被他们想象成的危险人物。

《名单》播送完了接着播送《公告》，《公告》规定了从9月9日到9月18日全国下半旗，停止一切娱乐活动。规定了9月11日到9月17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有组织地进行吊唁、瞻仰仪容活动，确定9月18日下午三时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宣布谢绝外国政府、兄弟党来华吊唁。

《公告》后接着是国际歌。这一整套节目播送一遍大约需要一个小时，从九月九日晚上起，周而复始地反复播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竭尽全力制造着沉痛、悲哀的气氛。

一连几天，监狱里加强了戒备，犯人们更加谨慎小心，平时在山上干活的时候还要说些笑话，多半带点儿荤味儿，也就是拿男女之间的那回事博大家开心。这几天则沉默寡言，不管是真是假，个个哭丧着脸，如果显出一丝笑容，难免招来杀身之祸。

按照《公告》的规定，9月18日下午三时全国各机关、部队、厂矿、企业、商店、学校、街道都要组织群众收听追悼大会的实况，进行追悼。监狱里也做了布置，全体犯人下午不出工，在监舍的坝子里收听广播，要求服装整洁，严守纪律。

下午两点，监舍院子里的高台上摆了三张桌子，旁边的桂花树上新绑了一个高音喇叭。后面的白墙上挂了一张毛泽东的画像，第一次在监舍院子里挂画像是1972年11月，传达针对在押犯人的最高指示，即所谓废除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这次毛泽东是二进宫了。

两点半了，我把监舍内所有睡着了的犯人喊醒，逐一检查穿的衣服是否符合规定。作为长期关押的犯人，又处在那个举国穷困的时代，都没有多余的衣服，上面也只能要求服装整洁。大部分犯人包括几位患有精神分裂症的难友都很听话，穿着洗干净了的劳改服，可有那么五六个人却穿着比平时还褴褛的衣裳，我知道他们以此表示对追悼毛泽东的不满，可是要让上面检查出来却很可能惹麻烦，这几天监狱里的捆绑吊打稍微消停了一点，那几个心狠毒辣的狱卒正在寻找发泄的对象呢。

我点着那几个难友的名字，马 X、贺 XX、李 XX、陈 XX、王 XX、经 XX，要求他们换衣服。有人还是抵制，说：“换什么衣服吗？老子没衣服。”

我想了想说：“伟大领袖逝世，要把最好的衣服拿出来穿。”

一个人问我：“什么是最好的衣服？劳改服就最好。”他身上穿着的就是脏兮兮的劳改服。

我说：“什么最好？重大节日穿的就是最好，重大节日，知不知道？”

这句话管用了，那几位难友心领神会，连忙说：“该换，该换。”我们这个监舍四十几个人都穿得比较整齐。列队集合的时候，其他监舍有穿着破烂衣服出来的，让狱卒发现了，狱卒一边骂一边狠狠地踹了两脚，不得不回到监舍换了衣服。

七八个监狱的干警在周金仁率领下来到了收听实况广播的现场，臂缠黑纱，胸戴白花，一字排开站在了桌子后面。

下午两点五十分，高音喇叭响了，一个低沉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现在… …，”

三点整，追悼大会准时开始，由毛泽东钦定的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主持，首先是就地肃立、静默致哀三分钟，喇叭里传来了哀乐和哭泣声。

台上的监狱干警如丧考妣，低头含胸，隐约啜泣，但目中无泪。

台下的在押犯人不声不响，闭目养神，心驰天外，似修道参禅。

据说那天北京各界组织了上百万群众汇聚在天安门广场追悼毛泽东，从开始奏哀乐就有人泣不成声，这哭也有传染性质，一个人带头哭竟传染了一片，进而扩散到整个广场，又通过广播散布到全国。

哀乐停止，哭声随之消失，像是被先进的科学仪器精确地自动控制着。

接着由军乐队演奏国歌和国际歌。

随后，由时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致悼词。他操着浓重的山西口音念着由专设秘书组七月下旬毛泽东病危期间拟稿、毛泽东逝世后经中共中央和文革领导小组反复审定的文稿。悼词强调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重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无比正确，肯定粉碎刘少奇、林彪反革命复辟阴谋取得了胜利；点名批判以苏修叛徒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 …

读完悼词，王洪文宣布全体肃立、向毛泽东遗像三鞠躬。

下午三点半追悼大会结束。

临时挂在树上的高音喇叭被取下来了，那张画像也卷起来拿走了，祸害中国几十年的毛泽东时代也该结束了吧。

(4) 彻底剥除毛泽东的伪装，揭露其无法无天的罪恶行径

中国有句成语“盖棺论定”。是指人死后装殓入棺，盖上棺材盖，才能下结论。这是因为活着的人会有很多变数，随时会发生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故，只能在人死后对其一生的是非功过作出评价，韩愈遭贬时有一首《同冠峡》

诗：“行矣且无然，盖棺事乃了。”“盖棺论定”有它的道理，人没死之前，确实不能轻易下结论。

毛泽东生前要尽了阴谋阳谋，玩弄种种权术，排除异己，陷害忠良，重用奸佞，笼络了一大批阿谀谄媚之辈，趋炎附势之徒。个人崇拜之风肆意横行，山呼万岁之声不绝于耳。历经了数十年的积淀，谎言重复千遍，把无恶不作的混世魔王吹成了高山仰止的伟大领袖。愚弄和蒙蔽善良的中国人民。

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缘起于四十年代，发端于刘少奇等人对毛泽东的吹捧。

1945年4月23日，刘少奇在中共七大上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时，对毛泽东大加颂扬，第一次把“毛泽东思想”写进了党章，并强调以“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刘少奇由此而被毛泽东认定为中共中央的第二把手，甚至说“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前的各次会议没有悬挂过领袖像，1945年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场主席台上方拉起了一条横幅“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会场前方并排悬挂毛泽东和朱德的画像。1949年2月12日庆祝北平和平解放大会在天安门城楼上首次出现毛泽东和朱德的巨幅画像，1949年7月7日天安门城楼上再次悬挂朱、毛画像。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时就只有毛泽东一个人的画像了。从那时起，毛泽东被越捧越高，从“大救星”到“红太阳”“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个个光环套在他的脖子上。把一个祸国殃民的混世魔王装扮成了普渡众生的救世活佛。

毛泽东一生追求的是权力，地位，女人。为了达到目的，巩固终身制独裁统治，不择手段，搞阴谋，设陷阱，栽赃陷害，借刀杀人，无所不用其极。暴虐无道，靠恐怖树立权威。毛泽东统治期间，千百万优秀党员，知识分子精英，没有死在对敌斗争战场，却死于毛泽东的暴政。

毛泽东生活糜烂，道德败坏，喜新厌旧，移情别恋，未婚先孕，晚年喜欢“老牛吃嫩草”，被他“宠幸”过的少女，都是他孙女、曾孙女辈的，缺少起码做人的道德底线。中央纪检部门对毛泽东搞三宫六院，强占良家妇女的违法乱纪、绯闻丑事，一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习以为常，不敢批评监督，有些人还投其所好，充当“太监”，为他“拉皮条”提供方便。

毛泽东生前常自喻为“马克思加秦始皇”，其实很不恰当。马克思是探讨资本与生产力关系的学者、可称为愤世嫉俗、妄自尊大、浮想联翩的激进思想家；毛泽东是心狠手辣的政治流氓、权欲熏心的混世魔王；二人的性格修养、精神气质迥然有别，几乎不可同日而语。作为草莽“造反派”、“山大王”，毛泽东的人生经历、为人处事与天潢贵胄秦始皇亦相去甚远。毛泽东充其量只能相当于生性残暴独断专行的斯大林，装神弄鬼哄骗世人的落地秀才洪秀全而已。

历史是不容长期歪曲的，毛泽东死了以后，许多人提出应实事求是地评价他的功过。

中共中央于1980年10月13日在北京召开过一次“四千人大会”（实际参加人数约5600人，其中有当时在中央党校学习的1548名学员。）在这次大会上，党内高层老干部敞开思想、自由发言，对党史和毛泽东的功过发表看法。中直机关一位70岁的老党员说：“我入党以来，真正解放思想，这还是第一次。会上我们敢于比较深刻地批评我们党的领袖，也就是说，敢于摸老虎屁股，这

是前所未有的,至少像我这样的人是没有的。这次所以敢于比较深刻地批评已故的和还健在的党主席,不是过去没有觉悟,没有看法,而是不敢讲。这不是偶发的,是酝酿已久的思想大解放。

历年《中共党史文献汇编》中辑录有中共领导评价毛泽东的言词。现摘录部分,聊做参考:

1978年12月13日,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叶剑英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指出: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不是革命,是十年浩劫,是人为的十年动乱,在这场浩劫中死了两千万人。文化大革命中受牵连人数超过1亿人。其中,中央政治局委员22人;中共中央委员、候补委员96人;中央书记处书记13人;国务院副总理12人;中央六大区第一书记4人;中央监委委员34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60人;全国政协常委74人,中央军委副主席5人;各民主党派负责人11人。文革十年造成了约三千万冤假错案”。

1980年,在中央讨论建国后若干历史问题的预备会上,当涉及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的事时,与会者意见分歧程度到了几乎无法进行下去时,中共元老陈云站起来,一字一字响亮地说:“建党他有份,建国他有功,治国他无能,文革他有罪。”陈云说完之后看了看四周。静了一阵之后,作解释地说:“如果说中国共产党是他缔造的,那么,李大钊、陈独秀怎么说?所以他只是有份儿。”接着又说:“二战结束后,日本比我们还要困难的多,可是,就那么十几年,人家就成了世界经济强国。我们呢?天天搞阶级斗争,政治运动没完没了,把国民经济搞到了崩溃的边沿。这是不是治国无能?”陈云继续说:“在抗日战争中,我们在战场上牺牲的高级将领,就只有左权同志。可是,在这次“文革”中整死了多少?上亿人挨整,整死了几千万中国的精英。过去,敌人想杀害的人,想破坏的事,他们都没有成功!可是在“文革”中,却把这些人都杀害了、破坏了。他这是不是有罪?”陈云在说最后几个字时,特别慢而有力。他的话音一落,全场立即鼓响了热烈的掌声。

邓小平出于不可告人的心机,连忙打招呼“宜粗不宜细”“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于是,历史上重大问题的议论到此戛然而止。

1981年6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在邓小平操控下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决议是有了,人们的思想却是一纸决议不能统一的。批判毛泽东的呼声始终不断。

1985年1月中央政治局商讨过关于重新评价毛泽东的问题,仍有不少老干部声讨毛泽东:

彭真(中共八老之一,首任北京市委书记)多次在会议上说:“毛泽东身上封建主义残余很浓,是个农民革命家。说毛泽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有很多违心成分的”。

夏衍(历任文化部副部长、中国文联副主席等职)概括毛泽东的错误是16个字:“拒谏爱谄,多疑善变,言而无信,棉里藏针。”

方毅(中国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国家科委主任、国务院副总理)则说:“历史上最大的暴君要数他。”

陆定一(历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提出了“两段论”:“开国有功,建国有罪”!(注:陆定一的观点基本上是跟陈云一致的:即都认为毛泽东是“有

罪”的，而不是什么“犯错误”问题。他主张“两段论”，即以“反右运动”划线。从“反右”、“大跃进”、“彭总冤案”、“反右倾”一直到“十年浩劫”，整整二十年里，毛泽东都是“有罪”的。这个说法也是站得住脚的。不说别的，“大跃进”就饿死了四千万，这笔账也应该算在毛泽东头上。无论从“人性论”角度看，还是从“以人为本”这一高度看，能说毛泽东没有罪吗？在毛泽东眼里，中国人民的生命如同蚂蚁，是最不值钱的。）

薄一波（国务院副总理）说：“文化大革命档案应逐步开放，让人民知道。毛泽东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生前多次说自己是封建主义的叛逆者、农民运动造反者，是斗争领袖。事实上，称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在什么地方，他自己也不会相信”。小平、陈云、彭老（彭真）多次在会议上说：毛泽东身上封建主义残余很浓，是个农民革命家。说毛泽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有很多违心成分的。建国后，把斗争作为内外路线，搞到几乎亡党亡国的局面，这段历史留给下一、二代作结论。

张闻天说：“（毛）很英明，但整人也很厉害，同斯大林晚年差不多；从中国历史学了不少好东西，但也学了些统治阶级权术。”

周恩来临终前曾对邓颖超表达了他的遗恨，说他“不该一次次给毛泽东抬轿子，把这个独裁者捧成终身领袖，让他统治中国造成严重灾难”。

林彪在世时也曾说毛泽东在文革前就是“言行不一，爱搞权术”，文革期间“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此二人之言有如“鸟之将亡，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是真实的内心自白。

朱德于1976年6月26日进北京医院。6月27日晚对前去探望的苏振华说：“我革命几十年了，不懂得什么叫‘文化大革命’。我不糊涂，现在搞得党不像党，国不像国。我快要走了，我要问主席，‘文革’，革了谁的命？建国十七年都错了，谁是个头。一心为党为国的老同志都成了‘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这个党还是一个‘伟大的党’吗？”

6月28日下午朱德对汪东兴说：“现在谁主宰着国家的命运。这类人是党内野心家、阴谋家。谁把这批人扶上来的？这批人穷凶极恶，篡夺党权，谁是他们的后台？我死也不安心，中国全断送在这批人手里！”

7月2日对李先念说：“一个伟大的创举，搞社会主义，可以不抓生产，天天斗呀斗。生产为什么不能抓？这是什么主义？什么人的指示？好端端的一个国家搞成这副样子，还是‘莺歌燕舞’吗？……这笔账怎么算？先念，要坚定些，历史会作出判决的。”“我沉默太久了，这是一种内疚。”

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顶撞过毛泽东，他当面对毛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上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

从朱、刘、周、陈、林等和中共不少高层人士的言论中可以看出，他们对毛泽东的独断专行、恣意妄为是早有觉察、甚至不满的。但在毛泽东面前谁也不敢吭声，毛泽东一向刚愎自用，容不得一星半点儿异议，且阴险歹毒心狠手辣。众人屈从于毛泽东的淫威，只求自保。做个“忠臣良将”，捧着毛泽东。没有一个人是真正为国家、为人民服务的公仆。

凡对毛泽东的倒行逆施略有微词或有疑虑者，皆遭诛杀或迫害。

1954年7月，胡风向中共中央政治局递交《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被毛泽东认定为反革命，于是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胡风运动，文学艺术界两千余人被关押批斗，1955年5月16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判处胡风有期徒刑14年。关押在秦城监狱。1965年12月底，胡风夫妇被送到成都

西边的芦山县苗溪劳改农场监护劳动。1970年1月，胡风以“写反动诗词”和“在毛主席像上写反动诗词”（其实是在报纸空白处写诗）的罪名，被四川省革委会加判无期徒刑，且不准上诉。毛泽东死了以后，在各界为胡风平反的呼吁声中，中共于1978年12月对这桩错案进行了“拨乱反正”。为胡风等人恢复了名誉。1980年9月29日，中央发出76号文件，对“胡风反革命集团”予以平反。1985年6月8日，胡风因病逝世，终年83岁。1988年6月18日，中央办公厅发出《关于为胡风同志进一步平反的补充通知》，至此，胡风一案历时八年，先后三次才从政治上、历史上、文艺思想及文学活动上，获得彻底平反。

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彭德怀以私人信件方式向毛泽东反映大跃进的得失，尽管对毛十分尊重，语气极为和缓，毛自知理亏，竟然恼羞成怒，给彭德怀扣了一个“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罢官免职，在京郊挂甲屯软禁，文革期间又怂恿红卫兵对其拳打脚踢轮番批斗，乃至惨死。

刘少奇身为国家主席，三年困难时期在湖南宁乡调查数十天后向毛泽东反映大跃进的弊病。毛泽东认定他是妄图否定“三面红旗”“走资本主义道路”。被确认为“叛徒、内奸、工贼”，撤销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出党，惨死在河南开封的一个地下室。毛泽东死了四年之后，中共中央方为其平反。一度被中共中央决议认定为“叛徒、内奸、工贼”的刘少奇又被中共中央决议称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了。

批判毛泽东的要求连绵不断

85年1月，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建议，决定鉴于党内对毛泽东有关功过的评价、对毛泽东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争论，在目前政治环境下，如果争议继续，会导致党内分裂，影响中心工作，也难得出经受历史检验的评价，留待15年或20年再作结论。

1986年7月，在北戴河中央政治局、中顾委的联席会上，邓小平就《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若干争议（指“文革”）作了阐述：

他说：作为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对毛泽东作一生政治评价，我们是违心的，是搞了中庸，是照顾到当时的政治环境，顾及到部分同志的思想和情绪。我们是错的，这错误要由我们的一代来负责，主要由我来承担。但要说明，我们是清醒的。毛泽东作为主席，集党政军大权于个人身上，政治生活不正常，党内机制不能正常展开，我们都有责任。毛泽东从部署、策划，到展开文化大革命，到要达到的目标，我们大多数人是不知情的，连周总理都难知道。这当然毛泽东要负很大责任。中央对文化大革命予以全盘否定，并定为浩劫，是符合事实的、是严肃的、是尊重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作风，实际也包含了对毛泽东的评价。党内对文化大革命结论的争议基本没有。

陈云最后提议：邓小平同志的意见，作为一项建议性决议讨论表决。出席联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中顾委常委、中央军委委员共56人，表决结果：52票赞成，2票反对，2票弃权，通过。

决议通过后，要求批判毛泽东的呼声仍然不断。

彭真在党内说：毛泽东自己承认他不是个马克思主义者，只是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追求者。毛泽东承认他看的旧书要比马克思的书多千倍、万倍，称毛泽东是个旧民主主义革命家，是较符合的。

万里还透露了中共十五大之后，党内元老、党外知名人士、民主党派，

都曾向中央政治局提出要求：对毛泽东一生再评价；从建国、治国思想路线上，对毛泽东思想进行拨乱反正；改建毛泽东纪念堂；把毛泽东肖像从天安门上除下来。

时至今日，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批毛之事未见下文。民众要求批毛的呼声接连不断，既得利益集团继续扬幡招魂，毛泽东的流毒远未肃清。不彻底批判毛泽东，无论是什么样的改革都只能是南辕北辙。不彻底批判毛泽东，中国不可能融入世界民主潮流。

笔者现追记毛泽东的部分罪恶如下：

毛泽东的人生观

1913年，20岁的毛泽东进了湖南高等商业学校，因功课跟不上而退学，转入湖南省立高中，半年后，毛觉得课程难度大，且校规繁琐，再次退学，据说自学可以成才，于是到图书馆借书来看。他在德国哲学家泡尔生

(Friedrich Paulsen) 所著《伦理学原理》中译本上作了大量批注。直言不讳地表述了他的人生观和处世理念。其核心是“我”高于一切。毛在批注里写道“道德之价值，必以他人之利害为其行为之动机，吾不以为然”。“吾人欲自尽其性自完其心，自有最可宝贵之道德律，世界固有人有物，然皆因我而有。”“吾人唯对于自己之义务，无对于他人之义务也。”“吾只对吾主观客观之现实者负责，非吾主观客观之现实者，吾概不负责焉。既往吾不知，未来吾不知，以与吾个人之现实无关也。吾自欲遂行也，向谁负责任？”毛泽东的这番话把“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的嘴脸暴露无遗。他还写着“身后名非吾之所喜悦，以其属之后来，非吾躬与之现实也。”“吾人并非建功业以遗后世。”毛泽东完全不屑于追求“流芳千古”。泡尔生说：“毋杀人、毋盗窃、毋欺诬、皆良心中无上之命令。”毛不以为然地说：“此等处吾不认为良心，认为人欲自卫其生而出于利害之观念者。”照毛的意思，人不干这些坏事，只是出于个人利害考虑。

毛的这种盲目自大、狂妄已极的道德观，极端自私的个人主义，支配了他一辈子。凡事皆以个人利害为准，这才是“毛泽东思想”的真谛。他在口头上喊着“为人民服务”，实际上视人民为草芥，上自国家主席下至劳苦大众，都是他任意驱使的奴才。他利用一切阴险狡诈的手段拉拢一批有利用价值的人为其所用，也将自己的所有才能和毕生精力都用来实现个人的霸业。给国家制造灾难。对中共，从打家劫舍到夺取政权毛泽东是有功的；对于国家，毛泽东无功有过；对中国人民，他只有罪！而且罪该万死。

毛泽东有一定的聪明智慧，某些方面确有过人之处。在黑暗之际他能看到光明的所在；绝望之际不失奋斗的信心；身陷逆境能找到适宜的出路。他擅长编造政治谎言，惯用流氓伎俩，高喊着“为人民服务”的口号，乔装作以天下苍生为念，实则权利之争，心狠手辣，不惜牺牲天下人性命。他无治世之才能，确有乱世之本性。只堪称为一代枭雄。

历史上，纣王的无道和秦始皇的残暴，都无法和毛泽东相提并论，希特勒和东条英机也相形见绌，希特勒和东条英机主观上不会消灭自己的民族，而毛泽东却是在灭亡自己的民族。现在把毛一生的罪恶分成五个阶段略表如下：

1、井冈山时期（1927—1936）

1927年8月中共在汉口召开了由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主持的“八七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委员李维汉、瞿秋白、张太雷、邓中夏、任弼时、

苏兆征、顾顺章、罗亦农、陈乔年、蔡和森和候补中央委员李震瀛、陆沉、毛泽东等 22 人。会议决定在湘、鄂、赣、粤四省发动秋收起义，会后党中央派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彭公达和省委常委毛泽东到湖南组织暴动，意欲攻占长沙。暴动失败，战斗中总指挥卢德铭牺牲。暴动部队由 1 个师缩编为 1 个团，10 月初，部队逃窜到江西宁冈县，被官府通缉，溃不成军。毛泽东率残部 700 余人逃往湘赣边界茂密的丛林，与井冈山地区割据一方的王佐、袁文才团伙结合，做起了土匪。一切生计皆靠打、杀、抢维持。随后他仿效宋江借林冲之手火并王伦的办法，利用彭德怀的鲁莽，在毫无证据表明王、袁二人有叛变嫌疑的情况下，以请吃饭为名，除掉了原来的当地头目袁文才和王佐，实现了他占山为王的梦想。杀了王佐、袁文才后，毛泽东装模作样地叫嚷这两个人不该杀，和延安时期他认定王实味是托派而遭冤杀后叫嚷“还我王实味”一样。是奸猾狡诈之举。

毛泽东在江西之时（时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借口“肃反”杀“AB 团”清除异己。肃反的淫风恶浪袭向主力红军。在不到 30 天内，红一方面军有几十个团长被杀，4000 余名指战员被抓。有的老红军回忆说，在当时政治保卫局所在地附近河滩上，尸横遍地，河上腥红。总共杀了“AB 团”七万多人、“社会民主党”六千二百人、“改组派”两万多人。1991 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是这样写的：**肃清“AB 团”和“社会民主党”的斗争，是严重臆测和逼供信的产物，混淆了敌我，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各个根据地的肃反，都程度不同地犯了扩大化的错误，给革命事业造成严重危害。**党史的这段记述总算透露了一点被长期掩盖的毛泽东的历史罪恶。

2、延安时期（1937—1946）

这是毛泽东成年后行为上作恶最少的十年，因为他名义上归顺了国民政府，因此不能无法无天，不能肆意作恶，以换取政府不再围剿，换取国民政府为其提供军饷（从 1937 年到 1941 年皖南事变前，八路军和新四军归属于国民政府第十八集团军，军饷和部分军需物资均由国民政府提供，详情见国内网站所载《抗战期间国民政府给中共的经费和物资有多少？》一文）。这十年，国难当头，国民政府全力以赴，官兵在前线拼死抵抗，保卫家园。正面战场，都是国民政府官兵在奋不顾身浴血鏖战。毛泽东早在洛川会议上就明确提出保存实力、实际执行“联日反蒋”方针而以国共合作为其表。“**一分抗日、二分应付、七分发展、10 分宣传**”为其总策略。

八路军中朱德、彭德怀、左权发动“百团大战”打着第十八集团军的旗号破袭正太、同蒲铁路和汾（阳）离（石）公路，扰乱日寇进攻。是抗战的具体行动和英勇表现。毛泽东却对“百团大战”横加刁难，认为暴露了八路军的实力。直到 1959 年庐山会议时“百团大战”仍被列为彭德怀的罪状之一。1959 年 7 月 31 日毛泽东在庐山召开政治局常委会批判彭德怀时还说：“**抗战时一些同志认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后来才统一认识：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否则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

抗战期间中共是否以抗日为先呢？日本靖国神社[1] 统计有二战在华战亡人员数字可供参考：死于国军之手 318883 人。死于苏军之手 126607 人。死于中共军队之手 851 人（其中百团大战 302 人，平型关战役 167 人，1938 年晋察冀秋季反围剿 39 人，39 年冀中冬季反扫荡 27 人，40 年春反扫荡 11 人，115 师陆房突围 16 人，加上其他零星战斗死亡，合计 851 人。）以上数

据足可说明抗击日本的主力军是国军。中共极力宣扬的不过是电影《铁道游击队》、《平原游击队》、《地道战》、《地雷战》、《小兵张嘎》，小说《吕梁英雄传》、《新儿女英雄传》而已。

中日这场全面与持续的历史大决战，总共进行了八年一个月又三天，双方总共进行过 22 次会战(双方兵力在十万人以上)，1117 次以上的重要战斗(双方兵力在一万人以上)，以及 38931 次的小型接触战。国军伤亡了 360 万人(其中陆军阵亡、负伤、失踪 3211419 人。空军阵亡 4321 人，毁机 2468 架。海军舰艇损失殆尽。)，中国平民死亡了 3560 万人，接近六千亿美元的财产以及无数的文物遭到日军的摧毁与劫掠。

22 次大型会战为：

1. 松沪会战 1937 年 8 月 13 日--11 月 11 日
2. 太原会战 1937 年 9 月 13 日--11 月 (国共两军合作抗战)
3. 南京保卫战 1937 年 12 月 1 日--12 月 13 日
4. 徐州会战 1938 年 1 月 --5 月 24 日
5. 兰封会战 1938 年 5 月 21 日--6 月
6. 武汉会战 1938 年 6 月 --10 月
7. 随枣会战 1939 年 5 月 1 日--20 日
8. 第一次长沙会战 1939 年 9 月 14 日--10 月
9. 桂南会战 1939 年 11 月 13 日--1940 年 10 月 30 日
- 10 枣宜会战 1940 年 5 月 1 日--6 月 18 日
11. 豫南会战 1941 年 1 月 25 日--2 月 7 日
12. 上高会战 1941 年 3 月 15 日--4 月 9 日
13. 晋南(中条山)会战 1941 年 5 月
14. 第二次长沙会战 1941 年 9 月--10 月 1 日
15. 第三次长沙会战 1941 年 12 月 23 日--1942 年 1 月 6 日
16. 浙赣会战 1942 年 4 月--7 月 28 日
17. 鄂西会战 1943 年 5 月--6 月
18. 常德会战 1943 年 11 月 2 日--12 月
19. 豫中会战 1944 年 4 月--5 月 25 日
20. 长(沙)衡(阳)会战 1944 年 5 月--8 月
21. 桂(林)柳(州)会战 1944 年 8 月--12 月 10 日
22. 湘西会战 1945 年 4 月--6 月。

其中只有太原会战是国共两军合作抗战，其余 21 次会战均为国军抗日。

日本投降后，毛泽东却宣扬抗日战争是他领导的，要谨防蒋介石从峨眉山下摘桃子。

1959 年庐山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毛泽东再次谈话，明白透露其借“抗日”夺权的策略：“抗战胜利后国共和谈期间中共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是为了争取时间，准备夺取政权。日本投降早了一点，再有一年我们就会准备得更好一些。”这些话庐山会议是记录在案的。至于中国老百姓要多死多少人，多受多少罪，那就不在毛泽东考虑之列了。

总之，抗战期间毛泽东在后方集中精力于以延安整风之名在党内夺权。部队化整为零，只在白区、游击区扮成老百姓骚扰日军、用偷袭方式打死日本人后撤走，招致日军报复百姓，中共借机大量招兵买马，基本不与日军正面开战。还派潘汉年与汪精卫暗通款曲。

1941年春到1944年冬，正是抗日前线战斗紧张之际。毛泽东却躲在延安处心积虑地忙于延续三年多的“延安整风”运动，“延安整风”是毛泽东为了从张闻天手里夺取总书记之职，掌握最后决定权，肃清王明和张国焘的势力，剪除异己，独霸朝纲。第一次公开展示自己的权欲。毛怂恿康生，在延安这个贫瘠的弹丸之地挖出了一万五千多名“特务”，乃至造成人人自危的局面。为求自保不得不屈从于毛泽东的淫威，让党内潜在的对手臣服，让不同的声音沉寂，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这是毛迈向独裁的第一步。

关于延安整风中共一直百般颂扬，但对具体经过未敢详细报道，始终噤若寒蝉。欲了解延安整风真相，请看韦君宜晚年所著《思痛录》中“忆延安整风”一节。

《思痛录》是中共老党员韦君宜晚年写的回忆录（韦君宜原名魏蓁一，1917年农历10月26日生于北京。女。作家。清华大学肄业。1936年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到延安。后任新华社《中国青年》杂志编辑，晋绥《中国青年》分版主编。建国后，历任《中国青年》总编辑，《文艺学习》主编，作家出版社总编辑，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总编辑、社长，中国文联第四届委员，中国作协文学期刊工作委员会主任。2002年1月26日12时在协和医院病逝，享年85岁。）韦君宜的《思痛录》是继巴金《真话集》之后又一本说真话的书，反映了很多延安整风抢救运动时期的真相与怪状。以下为书中“延安整风”内容摘录：

我是抱着满腔幸福的感觉，抱着游子还家的感觉投奔延安的。

去延安之前，我有过个人的不幸——我的爱人孙世实同志为党的事业贡献了年轻的生命。但是我觉得到了延安便一切都会好了，党将爱抚我，抚平我的创伤，给我安慰和温暖，鼓舞我拿起投枪来继续战斗。到延安以后也的确是这样的。当时在中央青委，领导干部冯文彬、胡乔木同志放弃自己应当享受的“小灶”待遇，和大家一起吃大灶。我们每天紧张热情地工作。我当《中国青年》的编辑，稿子弄好，不分什么主编和编辑，大家互相看，互相修改。以后我怀着打算牺牲的决心到前方去，又回来……那时候我们传唱过两句苏联的歌：

人们骄傲地称呼是同志，
它比一切尊称都光荣。
有这称呼各处都是家庭，
无非人种黑白棕黄红。
这是我们心里的歌。

现在有人说，那种感情是一个人年轻时幼稚单纯的感情。我想，那其实不是一个人的，而是我们的民族的精英当时都处在那么单纯到透明的时代的感情啊！不止我们这些年轻人，我就见过足以做我的父辈的也和我们一样！（谢老觉哉、李老六如、鲁老佛如、钱老来苏、董老必武……我是都见过。也认识的。）

到1982年，有一个去美留过学的中年人告诉我：他在美国见到几位世界知名的美籍老华人科学家，他们在美国的地位极高。其中一个科学家告诉他：“我是‘一二·九’，那时候的学生。说老实话我当时在学校只是一个中等的学生，一点也不出色。真正出色的，聪明能干、崭露头角的，是那些当时参加运动投奔了革命的同学。如果他们不干革命而来这里学习，那成就不知要比我这类人高多少倍！”我间接地听到了这位远隔重洋的老同学的心里话。

他说的全是事实。我们这个革命队伍里有好多当年得奖学金的、受校长赏识的、考第一的，要在科学上有所建树当非难事。但是我们把这一切都抛弃了，义无反顾。把我们的聪明才智全部贡献给了中国共产党的事业。

中国革命的胜利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最重大的事件，对世界革命的发展具有深刻的影响，我能置身其中是很荣幸的。但在这场斗争中，我也深感道路之曲折。我在边区第一次受到意想不到的打击是“审查干部”，后来改名“抢救运动”。

我第一次听到“审查干部”这个名词是在绥德地委的院子里。组织部长白治民按照中央的部署给我们作报告。我记得那是一个风和日丽的天气，我们自搬凳子，沐浴着阳光坐在空气清新的大院里，完全是一次机关里的普通会议。白治民站在我们的面前。他说：“现在要审查干部了。我们是党员干部，当然应该亮出自己的历史来接受党的审查。”我当时一听就想：这是当然的，还有什么疑问？我的一切历史（极其简单的历史，一个想革命的学生投奔延安）早就全亮出来了。还要多详细我就补充多详细，那还有什么说的？可是，接着他讲的是：“如果党怀疑我们是特务，是特务的，那就要如实交代，不允许任何不老实……”

天！审查干部是在说干部，怎么扯到特务上去了？当时我还以为他是失口说错了话，要不就是他没把中央文件看清楚，这分明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概念，两回事，怎么搅在一起？

可是，转眼之间运动就掀起来了。

当时我和我的爱人杨述在地委编《抗战报》。领导上告诉我们，绥德师范学校发现特务窝，要我们即往报道。几天内绥德师范就被封锁了，门口站上了岗，不允许我们再进去。我们两人本来都是在绥师教过书的，这里竟有那么多特务，实在使我们震惊。当时只有埋怨自己政治嗅觉太迟钝，敌我不分；只有一面赶紧接受阶级教育，一面抓报道，天天连夜看材料。

开始时，那材料的轮廓大致是：绥德分区由共产党接收时，有相当大一部分原国民党的省立绥德师范的教师留下来工作。这批教师中有一个暗藏的特务系统，他们发展了一批学生特务，特务的范围在绥德本地的师生中间。一下子，本地人都成为受怀疑的对象。我们到绥德师范去听特务“坦白”会。在大礼堂里，只见一个比桌子略高的学生上台去坦白，自称是“特务”。还记得一个叫白国玺的小青年上去说：是特务组织指示他，叫他在厕所墙上胡乱画猥亵的画。又一个学生说，他搞的“特务破坏”是用洗脚盆给大家打饭打菜……后来呢，“运动”越搞越深入，绥德师范的“整风领导小组”给我们交来了他们“深挖”出来的特务材料，让我们登载。原来绥德师范还存在着特务美人计。领导人就是杨述所熟识的一个语文教师，队员是许多女孩子。据说这些女学生竟接受了特务的口号：“我们的岗位，是在敌人的床上”，而且按年级分组，一年级叫“美人队”，二年级“美人计”，三年级“春色队”……当时真把我吓了一跳，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呢？我不认识那个被称为“美人队”的队长，私下向另一个熟识的教师打听，他说：“是个20岁的姑娘，喜欢说笑，哪里想到她会是川岛芳子！”可是那位被称为“特务头子”的语文教师栾丁生就在大会上讲：“刘瑛（她的名字）走了，后来不大容易找到她这样的特务女性……”

真的是特务女性啊！于是我们把一个女学生刘国秀写的标题为《我的堕落史》的文章登了报。我是深信不疑的。而这样的文章一登，后面来稿就越

来越踊跃，越写越奇。特务从中学生“发展”到小学生，12岁的、11岁的、10岁的，一直到发现出6岁的小特务！这已经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但是我仍然不怀疑。直到有一次，我们报社新来了两位年轻的文书，其中一个人的小弟弟，就是新近被登报点名的小特务。我问她：“你弟弟怎么会参加了特务组织啊？”对这样的一个理应惊心动魄的问题，她只报以淡淡的一笑。她说：“他啊？你只要给他买些吃的，叫他说什么他就说什么！”

是这样！这个比我年轻的本地青年的话，才稍稍开了我一点窍。那么，这些小孩子的事有些可能是编的了？但是我依然没有想得更多。直到后来，有一个从榆林（国民党统治区）回来的女学生，被我们的一位文书拉到报社来闲坐。她是《我的堕落史》里的人物之一，于是我想采访一下，发现些新线索。我问：“那位刘国秀的文章，你看见过没有？”她也是淡淡地笑了笑，说：“看见过。……我们当时看了觉得真奇怪。她说的什么呀，反正我们一点也不知道。”她两句话带过去了，表情既不慌促，也不着急。我看出她把这篇文章只当信口胡诌，并不以为意。我这个比她大几岁的人才又一次心里不能不琢磨。这……这是真的吗？那些“美人队”、“春色队”的奇怪名称，庞大的半公开的组织，这些年仅15岁至17岁的土里土气的县城中学女生……这像真的吗？

但是我还不敢否定这些编造，我还在每天为搜集这些“材料”而奔跑。

接着运动从学校发展到社会，开斗争大会，斗争所有从原来的国民党统治下的绥德留下来给共产党工作的干部。他们大部分都成了“特务”。这已经够使人吃惊了，然后来了更使人想不到的事情——运动引向了外来干部，引向我们这些不远万里来投奔革命的知识青年。

第一次会议还是在绥师开的。我坐在下面，上去一个“坦白交代”的人，一看，想不到是绥师的教师——一个从四川来的大学生郭奇。他说自己是特务，有暗藏的手枪。他说他的特务上级就是韩某人，还有胡某人。听到这些，简直使我震惊得几乎从椅子上摔下来。这些人都是我所熟识的人啊！他们都曾是成都地下党的负责人，被国民党追捕过。他们经手送了多少人来解放区，怎么自己却成了国民党的特务，而且还暗藏着什么手枪？郭奇本人就是由他们送进解放区来的，他们怎么竟会是有意送了这个特务来搞破坏？这太出人意料了。可是郭奇就站在上面，他的确是这么说的。他还说那个韩某人是“大阎王”。而我所知道的这个人，是个“一二·九”时期的北京大学学生领袖，一个朴素沉着的人。

这已经使我心里震动极了。我简直难以相信，又不能不相信——证人就站在那里！接着，会议的主持人宣传部长李华生又上去讲了一番号召特务们迅速坦白的話。他面对着台下的全体群众——有本地干部和外来干部，几乎是把全体都当成特务的样子，要我们坦白，然后说了一句最吓人的话：“四川伪党的问题中央已经发现了，要追查到底！”

“四川伪党”！那么整个四川省的共产党都成了假的了！那时候，我的头脑是那样简单，我甚至没有去设想这种估计是何等荒谬。四川是国民党由南京退出后的主要根据地，四川的中共地下党是天天面临着杀头坐牢的危险，说他们全体是特务，这等于说共产党所坚持的革命原则和马列主义毫无吸引力，不能吸引一切爱国青年，所有的爱国青年全被国民党吸引去了！而且全当了特务！这是什么样的逻辑啊！是反共逻辑！但是当时的我却没有胆量这样去想。我听了，只是觉得害怕，非常怕！

我们工作的绥德地委也掀起了运动。一开始，是听每一个干部在大家面前背自己的历史，人们听着。他讲一段，别人就提一段“问题”。判断他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一定会当特务。我记得其中有一个记者，是一个上海绸缎庄伙计，因参加量才补习学校而投向革命的。在抗日战争开始时，他加入了一个以“战时青年别动队”为名的战地服务队。于是主持会议的李部长就说：“别动队”就是国民党特务组织。他振振有词的讲出许多根据，那都是我们这些青年所完全不知道的。就这么白天批斗，夜间叫他写材料，硬逼成了特务。还有一个上海来的小伙子，光是背家庭历史，就背成了特务，后来他说他母亲是妓女，父亲是大茶壶……

对我来说，最糟糕的是杨述就是四川地下党的。起初他曾存侥幸之心，因为过去川东、川西是分开的，韩某人他们是川西的，他自己是川东的，指望着还不致被株连。哪里想到，后来“伪党”的范围越扩越大。在又一次的地委全体干部会上，记得也是李部长代表地委作报告，讲“当前反特斗争的形势”。他说，现在延安党中央那边，已经查出国民党有一种“红旗政策”，这个政策就是尽量把共产党员转变为国民党党员，让他们回到共产党内，去“打着红旗反红旗”。特别是凡捉去的共产党员，如不肯具结当特务，就决不释放出来。所以，凡是释放出来的，无例外地都是特务。国民党在监狱里“短促突击”，两个小时就把你变成特务了。

这一下子打垮了多少为共产主义而坐牢的人！我无法估计。反正，当时杨述可是挨上了。他是1939年在重庆被捕的，因为身带文件走入群众大会会场，门口恰恰碰见检查的人，他当场就把秘密文件吞进肚里，知道已难幸免，就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被捕而去。这是当时许多群众亲眼所见，有目共睹者证明的。后来，由周恩来同志出面，把他作为八路军驻渝办事处的公开工作人员，保释出来了。但是，就是这样，还是根据上边宣布的那一条“红旗政策”的逻辑，被打成了国民党特务！后来，他就被押进了“整风班”，关押起来。整风，整风！毛主席的整风报告说得多么有理，怎么这里却是这样干的？

当时，地委书记天天拍桌子大发雷霆，李部长天天来找我，叫我劝杨述赶快“坦白”。我一个人带着个才一岁多的孩子住在空窑洞里，没有人再理我。许多知识分子干部纷纷“坦白”。包括曾被捕的和没有被捕的。我记得有一个画家李又罍，是因为进入陕甘宁边区后，凑巧他哥哥到边区边缘地带出差（好像是个科学考察队之类），他请了几天假出去看望了一下哥哥，就成了特务罪证。还有一个陈伯林，什么罪证也找不出，只因他是四川的党员，才从外县被叫回绥德，第一次谈话就“指出”他是特务，于是他就“进城坦白、下马投降”了，而且还为此受到了“表扬”。甚至，在绥德师范礼堂的斗争大会上，有人向一个被怀疑者提出：“你没有特务关系，怎么能从上海到北京坐得上火车？”对于历史上找不出任何疑点的我，也有人说：“你的父亲现在还在北平，又有钱，不是汉奸才怪！你和他什么关系？”

太荒谬了！太可怕了！到这时候我已经完全懂得了这是胡闹，是毫无常识又对共产主义毫无信心的奇怪创造。这分明是在替国民党发明创造了许多国民党自己都从未想到过的“政策”。奇就奇在后来被俘的国民党大特务康泽、沈醉等，都从来没有回忆起他们有过这么一个“红旗政策”、“短促突击”，而当时我们的上级却是言之凿凿。而且不止在1942年，一直到“文化大革命”还在继续这么干。对于刘少奇主席的定罪，不就是这样吗？说一个

人信仰共产主义好几十年，出生入死为共产主义奋斗过，还不能忠于共产党，却在国民党的两小时“短促突击”之后，就立即变为特务，能拼生舍命忠于国民党。既如此，你的共产主义还有什么力量？又如何能够在国民党势压全国的时候争取那么多青年跑到延安？这种荒谬到不可理喻的说法，却形之于文件，而且在党内流行这么多年。为什么左的影响会如此之大？在1942年，我却不曾懂得。

我只觉得这样来怀疑我们是太冤枉了。

我一个人在空窑洞里抱着孩子流泪。杨述被关在整风班里，但天天凌晨要他们整队到无定河边去冒着寒风干活（这正是北国的12月）。有一天，天还不明，我睡在炕上怎么也睡不着，突然，窑门轻轻启开，是他进来了。我又惊喜又害怕，抱住他问是怎么回事。他低声说：“我偷偷逃出一会儿，回来看你。你千万不要相信，我决没有那些事。”我说：“当然不会信。你快走，免得出大事情。”他急急忙忙走了。我哭了半天。

又过了一阵，简直所有的外来干部都沾上特务的边了。宣传部长还和我谈话，说延安来的情况，柳湜、柯庆施都是特务。组织上也已决定杨述是特务。在这时，我突然产生了信念崩塌的感觉。我所相信的共产党是这样对待自己的党员的，我坚持，为了什么？我曾上书毛泽东伸冤，也无结果。我还指望什么？于是，我答应了李华生，自己去整风班，“劝说”杨述。

我怎么劝说的呢？到了那里，他从大炕上被叫起来，我们俩人在一张木板桌边会面。一人一条木凳，旁边还有别人。我见了他，只说得一句：“形势非叫你坦白不可，你就坦白了罢。”说罢就大哭起来。他也放声痛哭，说了一句：“好的。”我就走了。

后来我就在绥师礼堂听到了他的“坦白”。他说：他就是在被“短促突击”的时候突击成为特务的。但是他既没有特务上级，也没有下级。国民党给他的任务是做“路线特务”，即专门破坏共产党的路线。凡是他以前被“批判”过的言论，全是他进行这一破坏的具体措施。（什么言论呢？当时的批判者把他发表的杂文归纳起来，定为“六大论”。即“良臣择主论”，意为好的干部应选择一个好的领导干部；“南开中学论”，意为我们的中学应提高教学质量，办成像南开中学那样；“曹操的本领论”，意为领导者应宽宏大量，能够容人，不可察察为明；“党内人情世故论”，意为在共产党内有共产党本身的一套人情世故，不可不知；“久假不归论”，意为一个人长期习于一种他未必全信的思想习惯，久之也可以变化其真正思想。还有一论我忘了。）他这种奇特的“坦白”，竟然也算过了关。然后下面由别人继续坦白。李又罍也坦白了，说自己哥哥是来和他接特务关系的。我们的邻居梅，也坦白了，他竟全抄杨述的创作，自称是“策略特务”，专门破坏共产党的策略的。如此等等，无奇不有。而当时的地委居然报到中央，认为这是一大胜利。

天真的我们，还以为这是地委几个人干的，杨述跑到延安去上诉。后来才知道，原来延安的情况比绥德更厉害。我们多年相知的一些朋友都被打进去了。四川省委书记邹凤平被迫自杀。鲁艺有一位艺术家全家自焚。除了“四川伪党”还有个“河南伪党”。除到处开会斗争和关押人之外，还公然办了一个报纸，叫《实话报》，上面专门登载这一些谎话。有一个和我同路来延安的河南女孩子叫李诺，被公布在这张报上，简直把她说成了特务兼妓女。这份报纸真应该保存影印下来，像《解放日报》一样地影印下来。为什么不

影印呢？无论那是对还是错，都应当影印。作为史料，传之后世。

来到延安，知道好几对夫妻，都因为这次运动而离异。他们都是青年时代在革命队伍里相恋的好伴侣，可是到了这个时候，一方“听党的话”，相信对方是特务，而且一口咬定对方是特务，自然就把对方的心给伤害了。由此造成的伤痕，比对方移情他人还难弥合，于是到事情完了之后就离婚了。我听到杨明生说：抢救运动起来之后，说四川是“伪党”，从四川来的党员被一网打尽。当时还发明了一个帽子，叫“不自觉的特务”。把那些实在无“毛病”可挑的青年都归入此类。他的妻子经别人说服之后，承认了自己是“不自觉的特务”，她的特务关系是由杨述转交给杨明生的。她去说服杨明生：“我都是特务了，你还不是特务？”杨明生只能苦笑：“你是特务吗？”我还知道我们的同学裴××奉命审讯特务，他明知此人不是特务，竟两人共同编造了一份口供，送了上去。

这是干什么啊？可是上级硬是这样干的。一些信念不那么牢固的人实在不能不遭遇一次信仰危机。后来我回到延安，有一位从天津跟我一起出来的吴英（她原是我妹妹的同班，比我低两班的南开女中同学），见到我，说起她在延安行政学院被禁闭，连上厕所都要排队出来才行。她忽然说：“我那时想起来就埋怨你，你不该带我到这里来，早知这样，我也决不会来。”实在使我这个“先觉分子”无言可对。还有一个叫丁汾的女孩子，外来知识青年，当时在绥德担任区长。抢救运动中把她也打成了特务，理由是她的父亲是国民党的专员。后来，在案子甄别平反之后，我去参加平反大会，只听她站在台上哭诉当时受冤屈的心理状态，她竟说：“我真后悔当时为什么要背叛我的家庭出来革命！我真应该跟着我的父亲跑的。当时我就想过，如果能再见到我的父亲，我就要对他说：把这些冤枉我的人都杀掉吧。”听了她这话使我心惊胆颤，如冷水浇头。我倒不是怕她来杀我，杀共产党，我知道她虽然说得狠，其实不会那样做的。我们谁也不会那样做。我气的是这样“为丛驱雀”，硬把她驱赶到这等地步。我怕的是她这样惊人的坦率，把心里动过的这些念头都公然在大会上说出来，这得了吗？光为这句话，就可以把她又逮捕起来的啊！即使今天不捕，这笔账记上，以后遇上“运动”随时都可以要她的命！除了这种令人惊恐的自述之外，还有非常幽默，可入笑林的。绥德西北抗敌书店有一个干部叫杨春熙，过去是在天津当小职员的，又在盛世才部待过。这时被打成了特务，罪状是参加了国民党的复兴社。在甄别平反大会上，他说的故事是：当时，他被囚禁多时，怎么也编不出一个能与别人对上口径的口供，无法可想。正在此时，他有一回在放风的时候遇见了书店经理常××（陕北本地干部）。经理趁人不注意，悄悄对杨春熙“串供”说：“你就说我是复兴社支部书记，殷三是宣传！”（殷三是个由武汉去的大学生）杨春熙有了“交代”材料，正在高兴，忽然一想不行，忙又问道：“我是什么呢？”常经理一皱眉，好像为他这样点都点不透的傻气生了气，吐出三个字道：“你组织！”于是他就照这么招供，才通过了。当他后来告诉我们的时候，听的人无不笑不可抑。简直同“和尚、包袱、伞”的笑话差不多，但这是怎样的含着眼泪的笑啊！

在杨述“交代”之后，我们仍在《抗战报》工作。我们的小女孩因为我无带孩子的经验，又在这种困苦环境之中，无人理睬和照管，竟不幸夭亡。杨述从延安告状回来，孩子已失去了。我自己也弄得一身是病，还得勉强工作。这时我患了美尼尔氏症，有一次出去，在采访绥德小学教师的一个大会

会场上，我竟发病，扶着人家院子的墙，呕吐不止，头晕眼花，站也站不住。别人叫来杨述，把我弄回宿舍。我躺在炕上，不能转动，不能坐起进食，连大小便都是杨述伺候的。就在这时候，宣传部长不知怎么想起一个重要的规划，就是宣传都要建立办公室。他指定要把我们住的那间窑洞改为办公室，限我们克日迁出。杨述对他说，我实在病得不能动。却听到他在院里跺着脚喊：“决定叫搬，就是不搬？叫人替他们搬出去！”于是由杨述架着我，搬到地委大院角上一间破房里。炕已经被老鼠钻塌了一个大角，顶棚也一条一条地吊着。没入帮我们收拾，简直是被驱逐出来的。我住在这个与老鼠为邻的破屋里，病倒慢慢好起来。晚上，我穿件破褂子，脚上穿着捡来的别人不要的破鞋，在这个院角徘徊。月光明亮，万感萦心。我究竟身犯何罪，会弄到今天这个样子？于是我走着转着，旧习复发，吟成了一首既不能发表，也不能示人的话：

小院徐行曳破衫，风回犹似旧罗纨。

十年豪气凭谁尽，补罅文章付笑谈。

自忖误吾唯识字，何似当初学纺棉。

隙院月明光似水，不知身在几何年。

这种事情不止在绥德地委发生，我们还参加过驻绥德的抗大分校的斗争会。那个分校，校长、副校长都是老红军，他们是怎样搞的呢？有一次我听到副校长讲他们的批斗原则，他说：“别人说反对逼供信，我们就来个信供逼。我们先‘信’，‘供’给你听，你不承认，我们就‘逼’！”这个副校长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闹得全家惨死，我不知道他曾否回想起1943年他自己说的这些话！在抗大会场上还发现一个上台坦白的女“特务”华逸。杨述说：“她会不会是小华呀？清华纪毓秀的朋友，我们曾同声赞美的革命女青年。”两人一琢磨，她就是！但当时谁敢上前相认！从这时起，我虽然仍相信共产主义，相信只有共产党能救中国，但是我痛苦地觉得，我那一片纯真被摧毁了！

如此天翻地覆闹了一场，伤了许多人。结果呢？结果是在党内刊物上说是有两个案子是真的，还把那两案的情节正式重新发表了一次。一个是钱惟人案（从前的天津志恒书店创办人），这个案子不久又说也是假的。还剩下惟一的“真的”是蔡子伟案。可在建国之后不久的报纸上我就看到了这个人的名字，已经是一个负责干部。自然也是假案。这就是全部结果！

在中央党校的一次大会上，毛主席说：“整风整错了的同志！是我错了，我向你们道歉。”说罢举手齐帽行了一个军礼，又说：“我行了礼你们要还礼，不还礼我的手放不下来呀！”有这几句话，我们就全都原谅了，而且全都忘掉了。因为我们自认是为了革命才来延安的，革命还正在进行，党中央把我们弄错了，但是毛主席本人都道了歉了，还不就算了吗？大家总是一家人呀。当时有一位作家吴伯箫，他在延安挨整的消息传到了“蒋管区”，传说是他已被整死，西安为他开了追悼会。延安一听这消息，立即要吴伯箫亲自出来“辟谣”。于是吴伯箫也就真的出来写文章，自称在延安愉快地生活和创作，从来没有挨过整云云。这些话，我不认为是吴伯箫在压力之下勉强写的。他是一个极其老实忠厚的好共产党员。写这样的文章，我想是他出自内心，愿意为了维护党的声誉忘却个人的一切不幸的。只可惜的是，到“文化大革命”期间，“四人帮”又把他打倒了一次。他现在已经去世了。在他的追悼会上，我不能讲这些话，我只能在我未死之前替他说出来。

还有那个邹凤平。1945年春在党校，各地来的同志分别召开“山头会议”以总结工作经验。四川来的也开了一次，我随杨述去参加。只听主持会议的同志低声沉重地说：“现在，邹凤平同志已经死了……”他说不下去，在座者一片唏嘘之声，简直开成了个追悼会。谁不知道他是冤枉的呢？谁不知这次运动是错误的呢？哀悼的泪水说明大家的思想并不糊涂。到底我们为什么会犯这样的错误呢？有不少的解释。例如说：情况太隔膜啦，做这种工作是瞎子摸鱼，不会不出错啦，大家都是为了革命啦……所以大家就谅解了。当时，我曾和杨述两人议论：“现在只在边区里边这样干，我们这些人还能忍受，能谅解。以后如果得到了整个中国，再这么干，可千万不行了。成亿的老百姓不会答应的。”

直到1988年，我们又经过了无数冤苦，我才从蒋南翔临终的遗稿上，知道他早在当年（就在经历过执行错误政策之后）就明确了认识，提出了明确的反对意见。但是，这个反对抢救的意见送到了中央，结果却是“留中不发”，认为错误。并且给提意见者以批判。文革期间蒋南翔被批斗关押。1988年病逝。

本书作者注：以上是韦君宜先生所写《思痛录》中有关“延安整风”的片段。

延安整风素来为中共尤其是毛泽东称道，但对其细节却噤若寒蝉，似乎见不得人也见不得天。彭德怀和陈毅在庐山会议和怀仁堂略一提起延安整风往事，毛泽东便勃然大怒。从韦君宜的《忆延安整风》一文中才可看出延安整风原来是一个心理变态的狂人发动的一场整人害人以制造恐怖气氛而树立个人权威的手段。与井冈山时期大杀“AB团”，长征途中大杀“动摇分子”，反右时大力迫害知识分子，文革浩劫中恣意虐杀社会精英如出一辙。都是毛泽东的罪恶。无数历史证明，毛泽东阴险歹毒，罪恶累累。不容忘记也不可轻饶。

1945年秋日本投降，朱德、刘少奇力主抢占东北

1945年夏，轴心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结成的法西斯国家联盟，由纳粹德国、意大利王国和日本帝国等组成）败局已定，1945年7月26日美国、英国和中国发表了《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投降。7月28日，日本政府发表声明，拒绝接受《波茨坦公告》。8月6日，美军在日本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日本伤亡惨重，惶恐不安。8月9日美军在日本长崎投下第二颗原子弹，日本政府摇摇欲坠，临近崩溃。苏联为攫取实际利益趁机对日宣战，百万苏军攻入我国东北三省（当时为日本文官和汉奸组建的满洲国，日军关东军驻扎于北满地区）。

刘少奇、朱德认为东北广袤千里，物阜民丰，实为较延安更具优势的战略要地。趁毛泽东不在延安之际，提出抢占东北“机不可失，时不再来”。遂于8月11日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之名义接连发布大反攻命令（8月10日午夜至8月11日晚6点，18个小时之内，朱德连发七道命令，）要求驻河北、辽宁边界的冀热辽军区即刻兵分三路向辽宁、吉林进军。军区司令曾克林接到命令即率七千人抢占山海关，进驻沈阳。为掩盖由关内派兵抢占东北之实，部队改称为东北人民自治军。8月14日，日本天皇裕仁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向盟军投降，抗战结束。1945年9月15日，苏联驻长春最高司令马林诺夫斯基元帅应延安之邀与曾克林乘坐苏军专机飞抵延安。当天下午朱德主持中央政治局在杨家岭召开会议听取曾克林有关东北大好形势的汇报，

当晚通过电报将情况报告给正在重庆谈判的毛泽东、周恩来。中共最终确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决策，朱德等的战略部署促使中共抢占先机占领了东北广大农村。及时快速地开辟了东北战场，成为撬动整个国共战争期间战略布局的一根重要杠杆。此时毛泽东在重庆喊着“蒋委员长万岁”，口头上表示愿意放弃武装斗争，要和平建国。与国民政府虚与委蛇签订了“双十协定”。但毛泽东回到延安后立即露出真面目，发出所谓“摘桃子”之论。实际上中共的既定方针是以东北为依托一心造反夺权。于是从内地抽调十万人枪紧急出山海关抢占地盘。造成了内战一触即发之势。

根据档案和历史事实（外电报导和资料），在此十年中，毛泽东的罪行可简要概括如下：与政府虚假合作，全力发展共军军事，扩大兵源，蓄谋保存实力；非法抢占（割据）东北并接收日军军事物资，改编日伪军；一心准备战后反政府的夺权内战；勾结日寇，诬蔑政府不抗战；伪报战绩，蛊惑民心；为在党内夺权不惜“借刀杀人”（消灭西路军和新四军）；制造大量冤案，迫害无辜；投毒或暗杀同僚（刘志丹、王明、项英事件）；为筹军费在陕北大刀种植罂粟向敌占区和政府管辖区出卖毒品等等。（以上详见辛灏年著《谁是新中国》；苏联和第三国际记者著《延安日记》等书）

附注：

[1] “靖国”出自《左传僖公二十三年》的“吾以靖国也”，意为使国家安定。

日本关于祭祀战死者的传统是在“御灵信仰”（指的是那些因为国内外战争而命丧黄泉者的灵魂很可能会怀着怨恨回来报复，现世之人出于恐惧，为了消解怨恨而祭祀这些死者的灵魂）的基础上，和在“怨亲平等”的原则下友好地不分敌我地祭祀战死的军人。

明治2年(1869年)，东京招魂社落成，以纪念戊辰战争中为恢复天皇权力而牺牲的军人。明治12年(1879年)，东京招魂社改名为靖国神社，延续至今。

3、全面内战和土改时期（1947—1956）

曾克林等出关以后乘坐由闷罐、平板和客车车厢组成的40节“混合列车”长驱直入，接收锦州，进驻沈阳。并占领沈阳近郊苏家屯的军火库。随后中共从山东军区抽调十万部队火速出关，刘少奇主持从延安和晋绥地区抽调各类干部二千人在林枫率领下急赴东北，抢占地盘。

驻守在伪满洲国的日本关东军大约在七十万人左右，加上满蒙伪军和伪满警察共约百万之众。从投降日伪军那里缴获的大量武器装备，直接或间接的落到了中共手中。具体数量缺乏详实统计，综合各方报道，大体上有步枪等单兵武器约70万支，轻重机枪12000-14000挺，火炮约4000门，坦克装甲车辆约600辆，汽车约2000辆，还有680座军用仓库及松花江区舰队的全部舰艇。肖劲光在旅顺接受了放在大孤山的15车厢武器，东北局军工部长何长工通过与苏联代表卡瓦洛夫谈判，以“一吨换一吨”的方式，用当地农副产品将囤积在满洲里准备运往乌拉尔去的大批苏军缴获的日式装备接收了下来。朱瑞通过当年克拉辛炮校的同学关系，与苏方达成口头协议，苏方每天夜间向中共发送日军的武器装备和弹药，中共则用农产品折价交换。在两个月的时间里，苏军经图们向中共运送了数十列车的日军旧武器、火炮和弹药。由此东北共军实力大增。1945年底，关内各解放区进入东北部队总数为

107959人，1948年8月，即辽沈战役前，不到三年，东北野战军扩大了十倍，发展到兵员总数1039737人。是谁在准备挑起内战，不是昭然若揭了嘛。

抗战胜利后的前三年，中共殚精竭虑与国民党争天下，即所谓“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对大陆而言，八年抗战刚结束又遭遇骨肉相残，中共叫“解放战争”。如果把争权夺利的内战都叫“解放战争”，那么中国自古以来改朝换代，历经夏、商、周、秦、汉、晋、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老百姓至少被“解放”了几十次！再解放一次也不稀罕。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当时的中国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国民政府是世界公认的合法政府，武力推翻合法政府如果可以用“解放”二字来粉饰，并且合理合法的话，那么推翻任何政府同样也应该是合理合法的了。很显然，强盗逻辑不能普遍适用。

内战打赢后的第一步是没收地主的土地，大部分地主都被枪决，其后裔被戴了几十年地主分子的帽子，列为“黑五类”。依照的是哪部法律的哪一条呢？如果仅仅因拥有土地和财富就该死，那么现在穷人劫杀富豪也应该是合法的吧！党内大量的权贵哪一个不贪婪成性呢？动辄亿万财富该不该拿来共产呢？

解决完地主就轮到企业家（资本家）遭殃，他们的企业以公私合营的名义被没收。所谓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是暴力抢夺，是为了中共高层一部分人而无条件的牺牲另一部分人的利益，这不是革命而是强盗行径，既不伟大也不正确，更不光荣。因为后人不能复制和效仿。

4、大跃进时期（1957—1966）

解决了农村士绅和城里的企业家，毛就开始收拾社会精英——知识分子。打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幌子“引蛇出洞”，半年后收网，将敢于仗义直言的知识分子关进牛棚。从此，良知、道德和正义便从大陆人的心中抹去，为他树立“三面红旗”扫清障碍，也为三年大饥荒埋下伏笔。

1957年后，全体国民都成了听命的奴才和卖命的奴隶，毛的个人野心极度膨胀，全国成立人民公社，大炼钢铁，大跃进，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其实是跑进了人间地狱！成立人民公社无非是要控制农民种出来的每一粒粮食，然后再用粮食也只有用粮食，去换取苏联的军工产品和武器装备，同时还把用粮食换取的少量外汇慷慨地赠给多个国家的反政府组织，包括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在全国各地亩产万斤的谎言下，仅两年多的时间，高征购暴力搜刮农民的口粮，使得三千多万中国农民活活饿死！当时的中国一穷二白没有外汇储备，赠给外国的一美元就是一条中国人的生命！而苏联的军事装备，则是用几千万条人命换来的！毛的疯狂之举是为了实现自己称霸世界的妄想！在河南信阳，“三年自然灾害”饿死了一百万人，这还是官方估计的数字。这三年信阳并无天灾，农民也不是没有种出粮食来，而是全被官府收走，并且不准外出乞讨，所有路口都有民兵把守，以至当地饿殍遍野，死了没人埋，半夜去路边割人肉充饥实乃不得已！这样的政府，古今中外闻所未闻！制造这起人间惨案的罪魁祸首就是毛泽东！它比南京大屠杀更加残忍，活活饿死还不如被一枪打死，饿死的人数也比南京大屠杀多出好几倍！中共将此人为惨剧称为“信阳事件”，毛泽东说是由于“阶级敌人的疯狂反扑”，呜呼斯言！仅凭这个“信阳事件”，比较毛和日本人，谁的罪恶更大？“七千人大会”之后，魔鬼的疯狂被迫稍有收敛，否则还会有更多农民的生命被换成武器和外汇。

大跃进失败后被迫退居二线的毛泽东，不甘大权旁落，通过林彪秘密实施了一个惊天大阴谋，他们物色了一个当兵的孤儿，摆拍了几百张“做好事”的照片，向全国隆重推出一个只会“做好事”只会读《毛选》的雷锋，掀起了“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把一切献给党”的高潮，由此重拾威望，制造个人崇拜，为发动文革除掉刘少奇做准备。

5、文革时期（1967—1976）

对于文革，中共也曾承认是“十年浩劫”，邓小平说过：“文革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毕竟毛是邓的上司，对毛和文革的评价无法做到客观和公正，也因为邓本人是共产党中的一员，否定毛就等于否定党。所以至今中共不愿也不敢否定文革。实际上“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毛泽东蓄意发动，为巩固其独裁地位，扼杀民主的极权专制行为；是利用个人崇拜制造的迷信，煽动狂热的年轻人，摧毁现有体制和历史文化，给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浩劫”。这里面根本不存在反革命集团，林彪和江青不过是毛的打手和棋子。他们的所作所为皆受毛泽东的直接控制。江青就曾在审判她的法庭上公开叫嚷：“都是主席让我干的”，“我是主席的一条狗，主席让我咬谁我就咬谁，打狗还要看主人嘛”。

文革打死冤死的人，从国家主席到平民百姓，从世界冠军（容国团）和尚喇嘛，从大元帅到小市民，人数远远超过一百万（1978年12月13日，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叶剑英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指出：在这场浩劫中死了两千万人。）一些人因不堪忍受精神与肉体的双重折磨，无望地“自绝于人民”。

毛泽东为了搞掉政治对手刘少奇，为了泄愤（在“七千人大会”上被迫做检讨），全然不顾民族大义，再一次将国家推入灾难，视人命如草芥！什么“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什么“四人帮”，后台老板都是毛泽东，他们只不过充当了毛的打手而已。毛正是依仗林彪的配合才敢于发动文化大革命，向刘少奇公开叫板：发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又利用王、张、江、姚四人帮大搞个人崇拜，妄图树立毛泽东的绝对权威，谋求家天下。

毛泽东欲除掉刘少奇的想法，始于进北京初期，毛刘在中南海内的寓所相距不过200米，却从不往来，其芥蒂之深可见一斑。大跃进失败后毛泽东除刘之心更趋明朗。1961年3月，毛泽东在广州主持召开中南局、西南局、华东局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会议，讨论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初稿。他让人打电话叫刘少奇到广州。北京回答：少奇同志正在主持西北、东北、华北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工作会议，能不能晚两天来？毛听后大发脾气，写了一个纸条子给陶铸，让陶铸到北京把刘少奇叫来。广东省委正在为陶铸准备专机之时，刘少奇不请自来了。刘少奇被打倒后有人调出毛给陶铸的那个条子，只见上面写着：“是哪个皇帝骑在我头上拉屎，现任命陶铸为特命全权大使到北京接驾。”原来是陶铸当时出于息事宁人，看到条子后立即给邓小平打了电话，说主席生气了，让少奇同志赶快来吧。刘少奇就立即来到了广州，这张条子当时在中南海档案馆，后移存中央档案馆，至今应该还在吧。这个条子充分说明毛泽东不可一世，把自己凌驾于“群臣”之上。在他看来，已经丝毫不必考虑自己的工作作风。也反映了当时的政治气候。共产党内部没有民主可言，生态环境不亚于封建王朝。

请注意，事情发生在 1961 年 3 月，它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毛、刘之间的不正常、不平等的君臣关系。1966 年刘少奇被毛泽东谋杀，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凡毛泽东认为有碍于其帝王之尊和家天下之梦者，必诛无疑。

林彪后来也未能逃脱毛的毒手，被逼走天涯折戟沉沙。

“文革”将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 and 灿烂的文化也一并“革”掉，其实就是灭亡了一个民族，因为历史和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

多行不义必自毙，毛的一生恶贯满盈，1976 年终于呜呼哀哉了。尸骨未寒，老婆和侄子就被投进大牢，唯一留下的儿子是个精神病，名义上的孙子毛新宇也是个弱智。毛泽东的谬论必须批判，毛泽东的罪行必须清算。

毛泽东秉承商鞅的驭民术，严刑苛法镇压人民，巧取豪夺盘剥百姓。

毛泽东青年时期写过一篇作文《商鞅徙木立信论》（见《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 1990 年 7 月出版）。透露了他对商鞅的崇奉，他赞颂商鞅是首屈一指的政治家。毛泽东直到晚年仍时常翻阅宣扬商鞅论点的《商君书》。一本薄薄的《商君书》，不到三万个汉字，讲的是专制君主统治人民的手段和秘诀，集法家的丑陋和阴损之大成。《商君书》过去一直是太傅教太子的教材。毛泽东读《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是大肆宣扬的，以显示其学识渊博，吓唬文化不高的工农兵。读《商君书》则少事声张，但对书中所谈驭民之术却用到了极致。

《商君书》的要点是治国之术。商鞅认为治国之术的核心一是毁商，二是弱民。《商君书》有曰“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意思是说，要想国家强大，务必削弱和限制黎民百姓各方面的能力。如经济能力、结社集会能力、知识能力、参政议政能力。商鞅主张禁止私人粮食贸易，限制商业活动。严密的户口管制把黎民百姓禁锢在一小块土地上，没有迁徙自由，让他们只能成为君主的驯服工具。人民的衣食住行，统一由官家管起来，吃大食堂。粮油盐统购统销，各种生活必需品限量供应，除了国家，老百姓没有任何渠道和办法搞到生存的必需品。毛泽东全都照着做了。

《商君书》还有曰“民，辱则贵爵，弱则尊官，贫则重赏。”意思是，让人民处于屈辱、低贱的位置（笔者注：例如将百姓分成三六九等，戴上门类繁多的各种各样的帽子，被称作贱民、黔首等），他们就会渴望和重视统治者赐予的地位。让人民处于能力弱小的状态，他们就会畏惧官员。让人民在贫穷中挣扎，他们就会服服帖帖，统治者就容易低成本的调动他们做任何事。

《商君书》认为，“有道之国，在于弱民”。通过以弱去强，以奸驭良，实行流氓政治；实行一教，即统一教化，钳制思想；通过剥夺个人资产，让民众依附国家；通过辱民、贫民、弱民，使人民贫穷、软弱，实现民弱国强。如果还有强民依然没杀光，还有杀手锏——发动战争，通过对外战争，外杀强敌，内杀强民。这一点，就是中国历朝历代君主治国驭民心照不宣的诡秘暗器，是他们不惜以民生的代价来化解内忧外患矛盾，维持其统治的看家本领！

为什么中国的土地一直是国家所有？为什么中国皇帝说话就一句顶一万句？为什么中国一直有法不依，人治大行其道，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为什么中国民众没有话语权，为什么文字狱在中国愈演愈烈？为什么中国总要寻找借口发动对内斗争和对外战争？为什么中国的太平盛世都和老百姓的生活改善无关？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为什么春秋之后中国人彻底失去了

独立的个性？为什么特别强调把一切献给党？同样的问题可以继续罗列，但答案只有一个，就是君主专制！就是严刑峻法！

纵观毛泽东建国后数十年的所作所为，从未离开过商鞅的驭民术。即：

愚民：统一思想，禁绝妄议。让民众丧失独立思考能力只能做驯服工具。。

弱民：官强民弱，便于统治。无法无天，酷吏一句话就可以将人治罪。

疲民：为民寻事，忙于生存，疲于奔命，使人民无暇顾及其它事

辱民：毁民自尊自信，唆之相互检举揭发，使民众终日活于恐惧氛围中。

贫民：除生活必须，剥夺余财，人穷志短，没有更高精神追求。

五术若不灵，便监禁、奴役、斩尽杀绝之。

毛泽东在文革中把这些手段用到了极致。口头上却高叫“为人民服务”。

商鞅的“辱民”，是一个什么景象，历代时光久远，不那么清晰，从二十年代的“农民运动”可见一斑。

要“辱民”，先用“以奸治善民”之计。二十年代的湖南农运堪称全国的样板，基层农民协会办事人，大都用奸人，即所谓的“痞子”毛泽东称之为“那些从前在乡下所谓踏烂皮鞋的，挟烂伞子的，打闲的，穿绿长褂子的，赌钱打牌四业不成的，总而言之一切从前为绅士们看不起的人”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有这么一段话：“我这次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所得到的最重要的成果：即流氓地痞之向来为社会所唾弃之辈，实为农村革命之最勇敢、最彻底、最坚决者”。

痞子们一旦手里有了权：“他们在乡农民协会(农协之最下级)称王，乡农民协会在他们手里弄成很凶的东西了”。他们任意给人定罪：喊出“有土必豪，无绅不劣”的话，有些地方甚至五十亩田的也叫他土豪，穿长褂子的叫他劣绅”。

他们“将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总之所欲为，一切反常，竟在乡村造成一种恐怖现象。”毛泽东均称之为“好得很”。

“辱民”。就是让百姓们屈辱的生活，没有自尊和思考，没有“体面的工作”和“生活的尊严”，整天生活在恐惧之中。

商鞅主持制定的“连坐”，邻居犯法不检举揭发要受刑罚，这样人人自危，人人监视人人。

“弱民”。不能让人民强大。即不能让民众有思想有主见有本事；弱民自然是那些被洗脑后惟命是从，唯唯诺诺，人云亦云的愚民。

商鞅认为选拔官员不能选那些讲良心道德的，假如用谦谦君子来管理奸民，那天下必然大乱。要用厚颜无耻、心狠手辣的流氓来当头领，他们会把恐吓和欺骗手段用好用足，善良的人民只得忍气吞声，兢兢业业夹着尾巴做人，那就天下秩序井然，秦国也就强大了。

后代众多无知者，盲目跟着吹嘘秦的统一大业，说什么春秋战乱，人民受害；但是没有见到学者出来统计，到底是统一杀人多，还是分封制杀人多？

再看统一“有功”的曹操，这家伙特别中意屠城，对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横加屠戮，毛泽东就是现代屠夫，提出要给曹操平反，一堆卑鄙无耻的小人们，如郭沫若之流，也宣扬曹操是什么“知人善任”搞“五湖四海”，招贤纳士“不拘一格”的“英雄”。杀人多就是英雄，也是《商君书》的“价值观”。

有野史记载，曹操为立嗣事以御民之术考察其二子，曹植对：“忠于曹家、热爱曹家、永不背叛曹家，一切以曹家利益至上，主张三国鼎立就是反曹家。”

曹丕看了，把“曹家”逐个改为“人民”递于曹操。曹操拈须良久，遂立不意决。事后，曹植问杨修：“老师，难道能把人民当傻子不成？”杨修叹道：“人民不是傻子，但有的人民比傻子还傻！”

秦统一了六国，按现在某些人的标准，是强盛大国，是和谐社会，是维稳楷模，是太平盛世。为什么陈胜吴广揭竿而起群雄响应，秦朝不过二世就灭亡了呢？从商鞅以来所制定的惨无人道的刑罚，一直在盛世流传。肉刑一直是衙门破案的主要手段，为什么压制不住民众的反抗呢？。太史公有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见《史记·项羽本纪》）此言不虚也。

不少国人津津乐道秦国的统一伟绩，从不思考当朝人民是怎样活过来的，他们有过一个什么悲惨的血泪时代。孟姜女为什么哭倒了长城。

清代的龚自珍说，秦朝看来是个强国，是盛世；但是，这种盛世，表面看来很强大，但人民并不幸福，它这个强盛撑不了多久。一旦有先进的思想和有才能的人出来，就会有成百上千的人出来围剿，来监督，把它的暴虐无道扫入历史的垃圾堆。

龚自珍有曰“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呼喊抛弃千年陈规陋习，除旧图新，别浸沉在“大国盛世”的荒唐梦境里，强国弱民不是真正的强大。

毛泽东妄称他个人是中共缔造者

从上世纪四十年代起，毛泽东被逐渐神化，他入住中南海后日滋月益，文革期间达到顶峰。一个土匪、痞子、流氓披上华丽的外衣，戴上堂皇的冠冕。不惜歪曲事实篡改历史，吹捧成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让我们撕开层层面纱，看看真实的毛泽东吧。

现依照公开披露的历史资料（笔者注：是有据可查的历史资料，包括苏联解体后解密的档案，不是道听途说，也不是被篡改过的伪史），展现一下它的真实面貌。

中共党史确认建党发起人为南陈（独秀）[1]北李（大钊）[2]。

实际上，“建党伟业”是苏联以“共产国际”名义操办的。**中共不是中国人自己建立的革命党，而是由俄共领导的共产国际所组建的秘密组织，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是不折不扣的外国代理人。从建党的目标、策略、组织机构、领导人选、运行经费等无一不掌握在共产国际手中。中共第1~6届代表大会都由共产国际的代表主持。**

1917年3月3日（俄历2月18日），俄国爆发二月革命，3月15日，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被迫退位，俄国社会革命党推翻了统治俄国长达三百多年的罗曼诺夫王朝，结束了沙皇专制制度，成立了以克伦斯基为首的临时政府。同年四月，侨居瑞士的列宁，依靠德皇威廉二世供给5000万金马克（约相当于九吨多黄金的价值）和精良武器的大力支持下，回到俄国，聚合了两千多名追随者，用暴力推翻立足未稳的临时政府，建立了一党专政的苏联（详细情况可参阅在普京倡导下由祖波夫等四十余位俄国历史学家主编的《二十世纪俄国史1894-2007》，该书被认定为俄罗斯11年级（高中二年级）学生用的历史教科书）。

1919年3月，野心勃勃的列宁为输出革命，达到称霸全球的目的，在莫斯科成立共产国际，企图在全世界推行无产阶级专政。1920年3月，列宁派27岁的维金斯基（俄国人，1893-1953年）以共产国际之名义来华组建中国共产党，维金斯基来中国之初，意在联络有共产主义倾向的代表人物，但不

知找谁是好，经柏伟烈（北京大学俄文系俄籍教员）介绍，他认识了李大钊、张国焘等人，随后李大钊向其推荐了上海的陈独秀。维金斯基拿着李大钊的信到上海找到陈独秀，筹谋建立共产党。

1920年8月，陈独秀与杨明斋、李汉俊、陈望道、李达等人在维金斯基参与指导并包揽全部费用的情况下，在上海渔阳里六号陈独秀家中成立了临时中央，陈独秀自任首领。

1920年9月1日，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的《对于时局之我见》一文中，曾称“吾党”为“社会党”，透露了建党信息，后来采纳李大钊的意见改称为“共产党”。

1920年10月，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三人闻讯陈独秀已组党，遂发起成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李大钊为负责人，罗章龙、刘仁静、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缪伯英（女）、范鸿劫、张太雷等先后加入，成员大多为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骨干。

1921年7月23日至31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三号李汉俊的住处秘密召开。共产国际派马林（荷兰人，1883-1942年）和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尼克尔斯基（俄国人，1889-1938年）蒞会指导并提供全部经费。出席大会的代表共十三人（一大期间对代表资格无严谨的界定，谁是正式代表谁是列席代表，纷说不一、争论无休。传闻难以为据，本文采用即来者均称为代表的说法），领取了见者有份的二百大洋补助[1]，被后人追称为中共创建人的李大钊和陈独秀均未出席此次会议。张国焘被推举为大会执行主席。李达为会务主管。毛泽东既不是筹备组成员也没有参与筹建工作，也没有履行入党手续，经李达允许参加会议而已，人生地疏，只在会上做了一次应景式的简短发言。谈何缔造者？

中共成立后，从1921到1927年4月间，先后召开了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陈独秀连续五届被选为总书记（即最高领导人）。中共一大通过的党纲载明中共是共产国际下属的支部。也就是说，中共成立伊始即宣告是不折不扣的外国代理人。从建党的目标、策略、组织机构、领导人选、运行经费等无一不掌握在共产国际手中。陈独秀对共产国际凌驾于中共之上的行为和瞎指挥深感不安。强调中国共产党应当由中国人当家作主，此点为共产国际所不容。1927年，共产国际指令中共加强党内工人和农民的比例，采取激烈手段抢夺地方政权，在大中城市组织武装暴动。陈独秀认为共产国际的上述指令不适合中国国情，未予置理，由此引起苏联强烈不满，指责陈独秀为右倾机会主义。于是共产国际派出罗明纳兹在汉口原俄租界三教街41号（今鄱阳街139号）召开了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时任中共总书记的陈独秀被拒之于门外且受到大会批判。自认为参加了中共而未受重视的毛泽东化装成国民党军官，从长沙去武汉参加“八七会议”，讨好共产国际。会期只有一天，毛泽东趁机大骂陈独秀是叛徒、反革命，博得苏共认可。

同年，一向被人冷落的向忠发受中共派遣赴苏联参加十月革命庆典，此间他给共产国际和苏共中央写了两封密信，贬低中共领导层中的知识分子，受到斯大林重视，由此着意改组中共。随即在莫斯科郊外一乡间别墅秘密召开中共六大，在斯大林授意下，向忠发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掌权后立即推荐与其关系密切、党内职务仅为候补委员的毛泽东任中华苏维埃主席。“毛主席”的称呼即由此时兴起，祸害了中国近半个世纪。

1927年，国共分裂，中共拉起武装到山区打游击，军事上也是由共产国际派来的人直接指挥。德国人李德（中文名）就是共产国际派到江西苏区当军事指挥员的，他指挥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还跟随红军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1929年，因收回中东路苏联经营权事件，爆发了中苏之间激烈的局部战争（中方的军队是张学良的东北军），尽管中国的军队遭到惨败，但中共仍然喊出了“武装保卫苏联”的汉奸口号。所以，苏俄是中共的祖国，斯大林是他们的领袖。

1931年11月7日，在中共武装割据的江西省就创建了国中之国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都”瑞金，向忠发提议让毛泽东任“中央政府”主席。政权运作期间，颁布了“宪法”，发行了货币，设计了“国旗”，同时将其所属控制区域称为“苏区”。

1937年，毛泽东在陕北洛川冯家村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2]，公开扬言：“要冷静，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要避开与日本的正面冲突，绕到日军后方去打游击，要想办法扩充八路军、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要千方百计地积蓄和壮大我党的武装力量。对政府方面催促的开赴前线的命令，要以各种借口予以推拖，只有在日军大大杀伤国军之后，我们才能坐收抗日成果，去夺取国民党的政权。”“有的人认为我们应该多抗日，才爱国，但那爱的是蒋介石的国，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祖国是全世界共产党人共同的祖国即苏维埃（苏联）。我们共产党人的方针是，要让日本军队多占地，形成蒋、日、我，三国志，这样的形势对我们才有利，最糟糕的情况不过是日本人占领了全中国，到时候我们也还可以借助苏联的力量打回来嘛！（《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

1943年，共产国际在解散前给中共发来“御旨”（据说由王稼祥带回），明确了毛泽东在中共内的领导地位。毛泽东假借苏共的支持在中国做起了儿皇帝。

附注：

[1] 二十年代上海每百斤大米约为8-10元，当时熟练工人月收入30-40元，可维持一家四五口人的生活。年轻作家丁玲月收入约70元，鲁迅月收入可达420元，陈独秀月薪400元，主编《新青年》另有200元编辑费。

[2] 1937年8月22日至25日，中国共产党在陕北洛川冯家村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朱德、毛泽东、任弼时、关向应、凯丰、张国焘，以及各方面的负责人彭德怀、刘伯承、贺龙、张浩、林彪、聂荣臻、罗荣桓、张文彬、肖劲光、林伯渠、徐向前、周建屏、傅钟等22人参加了这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毛泽东根本不懂共产主义

毛泽东常自吹自擂地标榜是共产主义者。一些阿谀谄媚的御用文人投其所好，肉麻地吹捧为“共产主义的领路人”。笔者翻阅了部分文献，找到了一些毛泽东语录，他是怎么认识共产主义的呢？

1、1957年11月6日毛泽东在苏联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会议上的讲话中说：社会主义制度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一个不以人们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不管反动派怎样企图阻止历史车轮的前进，革命或迟

或早总会发生，并且将必然取得胜利。此段语录只是空泛议论，故作姿态而已。

2、1958年夏，在中共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说：大概十年左右，可能产品非常丰富，道德非常高尚，我们就可以从吃饭、穿衣、住房子上实行共产主义。一贯溜须拍马的刘少奇7月初在北京石景山发电厂同工人谈话时说：

“中国进入共产主义不要好久，你们大家都可以看到共产主义。”如今已经过了六十年，共产主义还只存在于幻想和谎言之中。毛泽东和刘少奇吹起的肥皂泡早已破灭无存了。

3、1958年8月4日，毛泽东在河北省徐水县视察并做了很多指示。河北省委和徐水县委立即贯彻落实。8月26日在《徐水报》上公开发表了《规划》。将奋斗目标规定为：1959年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并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到1963年即进入伟大的共产主义社会。如今徐水是保定的市辖区。城镇居民月收入不到两千元。昔日的县委书记张国忠被认定是“反革命”，管制了二十多年，再也不敢吹嘘他的共产主义了。

4、1958年冬，毛泽东不仅坚信中共已经找到了向共产主义直接过渡的途径，而且感觉到通过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国将比苏联更快地进入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11月21日在武昌会议上，毛泽东表示，即使中国先到达共产主义社会的大门口，也不进去，而要等待苏联。武昌会议的记录犹在，中共敢公布吗？

5、1959年8月16日，庐山会议闭幕，毛泽东做总结说：“庐山出现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消灭，斗争才会止息。毛泽东当时预测最多五十年中国就共产主义了。如今已过了六十多年，共产主义还只是停留在口号上而已。

6、六十年代初期，毛泽东曾说：“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转载自《人民日报》1970年元旦献词）

7、1963年9月至1964年7月中共连续发表九篇文章评论苏共中央《给苏共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简称“九评”）。

毛泽东在修改《九评》文稿时，加了一段很重要的话：“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解决。几十年内是不行的，需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才能成功。

1972年毛泽东对来访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坦言：遍布北京的高调红色标语口号都是“放空炮”，不必当真！

以上各点都是当时的传媒大力报道过的，白纸黑字历历在目。关于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期，毛泽东先后说过“十年”“二十年”“半个世纪”“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一百年到几百年”，毛泽东有关共产主义的论述还有很多，恕不一一例举。都是所谓“高瞻远瞩”“科学预见”。现在看来全是信口雌黄，胡说八道。毛泽东根本不懂共产主义，只能摇着一杆旗子，装腔作势故弄玄虚，欺哄老百姓而已。

共产主义犹如虚无缥缈的海市蜃楼，可望而不可即。毛泽东死了以后，依然是独裁专断的继承者们尽管有着博士的头衔，谁也说不清共产主义是什么样子，试问当今那些共产主义理论家，到了共产主义社会，目前宪法允许

并提倡与鼓励的民营经济业主、土地经营者是不是又要被共产？又要被戴上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帽子，列为专政对象，推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呢？。有不消灭私有制的共产主义吗？

毛泽东生前被中共吹捧为“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也自誉为“马克思加秦始皇”他不止一次地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把马克思说成了一股子占山为王打家劫舍的味道。

马克思何许人也？他 1818 年出生在德国一律师家庭(祖父和父亲都是律师)，中学毕业后就读于波恩大学和柏林大学，研读法律专业。1841 年获哲学博士。毕业后担任《莱茵报》主编。1847 年 11 月欧洲共产主义者同盟召开代表大会之际，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一个同盟纲领。宣称推翻资本主义并最终建立一个无阶级的社会。马克思执笔写了初稿，1848 年 2 月 21 日《共产党宣言》在伦敦第一次以单行本问世。当时，马克思不到 30 岁，恩格斯刚满 27 岁。两个小伙子，没见过飞机，也没听说过相对论，没有手机和互联网，没有对当时世界各个国家的组织形式和经济发展做缜密的研究，依靠从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等流行的论说中寻章摘句，凭空虚构了一个乌托邦，扬言“消灭私有制”，“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然后“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公开宣布：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马克思当时这些假想，犹如《镜花缘》中的“女儿国”“君子国”，完全是幻想和虚构。**马克思主义诞生于德国，德国人承认马克思的论点是当时流行的学说之一，但并没有采纳它治国理政。**1917 年苏联（全称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宣布建立以共产主义为目标国家，宣扬鼓吹了 74 年，步入穷途末路，终于在 1991 年 12 月正式解体。中共却将其捧为圣条，写入宪法。170 年前两个年轻人闭门造出来的“理想国”，业经苏联和东欧诸国试行了几十年，均遭唾弃。如今却成了亚洲泱泱大国强迫人们信奉的国教，岂不是愚昧无知吗？！

毛泽东吹嘘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比洪秀全自称是上帝的儿子、耶稣的弟弟还荒诞无稽。原来都是忽悠老百姓的。

1958 年 12 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责成印发《三国志》中的《张鲁传》，还专门写了一大段批语，让中央委员们认真学习。与会的中央委员感到很突然，怎么号称马列主义者的伟大领袖信奉起满嘴符咒的张天师来了？原来毛泽东认为张氏的五斗米道就是共产主义，他在批语中是写明了的。一个乱世贼子竟被中共吹捧、神化了几十年

毛泽东嘴里的共产主义纯属自欺欺人。所谓的马克思主义也只是招摇撞骗的幌子。既然中共自我标榜为遵奉马列主义的政党，按理说，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议应该是符合马列主义的吧。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认定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邓小平主持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认定刘少奇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两个中央全会的决议截然相反，究竟哪个是马列主义呢？或者说哪个都不是马列主义吧。看来谁有权谁就什么都可以是，说谁是什么谁就是什么。全是骗人的东西。

毛泽东被中共颂之为“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笔者注：“天才地”“创造性地”

“全面地”三个副词最早出现在 1966 年 8 月的十一届十一中全会公报上。林彪在 1966 年 12 月的《〈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中照抄了三个副词，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批示“可用”。此后即由李劫夫谱曲，传唱大江南北，风靡一时。毛泽东一死即被甩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毛泽东妄自尊大打杀功臣

把敌人化为朋友是一种智慧。把朋友推向敌人是一种愚蠢。毛泽东利令智昏，他得势之前曾经多次强调统一战线，并把它称之为革命的三大法宝之一。也确曾利用它吸引了许多意在振兴中华的志士仁人，拉拢了不少幻想实行民主政治的上层知识分子。他当政以后却背信弃义，独霸朝纲；杜绝言路，蔽聪塞明；穷奢极欲，好大喜功；痴心蠢动，妄想频生。把昔日的朋友乃至和他共同奋斗了几十年的刘少奇彭德怀等都打成敌人折磨致死，一系列倒行逆施只搞得众叛亲离。毛泽东执政以后一直都在树敌，最后只能落得个孤家寡人。

《孟子·离娄下》有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毛泽东自以为是，高人一等，视人如土芥。自己又屡屡干些愚蠢的事，祸国殃民。焉能不四面树敌。

毛泽东的帝王思想由来已久，进了北京中南海以后，个人私欲无限膨胀，毛泽东把一切功劳都算在自己头上，他位列至尊笼罩在巍巍乎令人仰止的光环之中。重用奸佞，贬低功臣。作为开国元勋的十大元帅（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除罗荣桓长期生病，中年早逝外，其余九位均遭受过不同程度的打击与迫害。简记如下：

1、朱德：青年时期到昆明考进云南陆军讲武堂，加入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1911 年 10 月参加辛亥革命武装起义。1915 年 12 月参加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战争。1917 年 7 月任滇军旅长，1921 年春任云南陆军宪兵司令部司令官，云南省警务处长兼省会警察厅长等职。

1922 年 8 月赴德国格丁根大学留学。当选为中国国民党驻德支部执行委员，在此期间结识了周恩来和其他共产党人，随即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 年 7 月到苏联学习军事，1926 年夏回国，1927 年 7 月参加领导八一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他率领余部转至湖南南部，发动农民起义，建立苏维埃政权。1928 年 4 月率部近万人上井冈山，同毛泽东执掌的秋收起义残部千余人会合，成立了工农革命军（不久改称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由此朱德被称为“红军之父”。

七七事变后，毛泽东坐镇延安，朱德率八路军（1937 年 8 月 22 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宣布由原西北主力红军，即中国工农红军一、二、四方面军改编而成“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彭德怀任正、副总指挥。1937 年 9 月 11 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按全国陆海空军战斗序列，又把八路军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朱德任总司令，彭德怀任副总司令。）与国军配合开辟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1955 年受元帅勋。朱德文革伊始即被抄家、1969 年在中共九大上被多次批斗后发配到广东从化软禁，林彪逝世后才回京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只负责礼仪性地接待来访贵宾，并无实权。1976 年 1 月周恩来逝世后朱德的健康状况急剧下降，一次接见外宾后患感冒住进北京医院，终因年老体衰身患多种疾病抢救无效逝世（一说治疗组用药不当，

中毒身亡)；

2、**彭德怀**：以勇猛著称，在“井冈山突围”“保卫延安”和“抗美援朝”作战中出生入死，屡立战功，既有“红军之狮”的美誉，也有毛泽东的“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的赞扬。五十年代即身居国防部长之职。只因对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略有微词，上书进谏，为民请命。1959年被毛泽东冠以“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党集团”“里通外国”等罪名，随即撤销一切职务，软禁在京郊挂甲屯。文革初起又被发送到四川搞所谓三线建设，暗地里授命宠臣李井泉对其严加监控。1966年被红卫兵押送北京西郊五棵松北京卫戍区的营房里，轮番批斗，拳打脚踢，经医院检查确认两根肋骨骨折。多次要求住院均被拒绝。1973年4月因严重便血，经周恩来特准才住进301医院，内外科会诊确认已是直肠癌中晚期。1974年9月彭德怀病危，终日昏迷，11月29日含冤逝世。

3、**林彪**：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在国共决战的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独揽其二，从中国的最北方打到中国的最南方，横跨大半个中国，区域广阔居全军首位。中共建国后长期以养病为名不问政事。1966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需要借助军队支持，他开始倚重林彪，对林彪竭力提拔。林彪地位开始直线上升。1969年被毛泽东称为“亲密战友”在九大通过的党章中林彪被明确为“接班人”。但林彪对毛泽东的独断专行极为不满，偶有流露。毛泽东有所察觉遂私下散布流言蜚语，制造舆论，意欲除之。林彪深知毛心毒手狠，于1971年9月13日乘三叉戟飞机仓惶出逃，与妻儿一同坠死于蒙古荒漠；

4、**刘伯承**：1912年2月考入重庆蜀军政府开办的将校学堂，早年为川中名将，1927年与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等领导了南昌起义，后入莫斯科高级步兵学校，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30年夏回国，先后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参谋长等职、刘伯承足智多谋，有“军神”赞誉，在八路军中有“党内孙武”的美称。千里跃进大别山，敢战无后方之战，可谓史无前例，刘伯承指挥了酣畅淋漓的席卷大西南战役，用时间之短，作战区域之广，歼敌数量之多，非大才者不能为。刘伯承为毛泽东打下了江山，中共建国后却屡遭冷遇。1958年即被毛泽东认定为“军事教条主义”、强令其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做检讨，文化大革命后被撤销一切职务，1972年刘伯承双目失明长期住在医院，1973年丧失思维能力，1976年生活不能自理，1986年10月与世长辞；

5、**贺龙**：是伙同周恩来等人发动南昌起义的首领之一，红四军和湘鄂西根据地的创建者。1967年毛泽东听信谗言于9月13日批准成立“贺龙专案组”。贺龙被诬为1929年和1933年曾“投敌叛变”，具有阴谋篡军反党、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认定为“篡军反党分子”，开除党籍、军籍，关押在京郊西山一个破落的小院内，置于三十多名荷枪实弹的士兵看守之下。1968年严重的糖尿病并发症日益显露，贺龙在多种病痛折磨中脑缺血失语，仍被关押，1969年含冤去世，为文革中丧命的第一位元帅；

6、**陈毅**：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1923年回到北京入中法大学读书，加入共产党。1927年南昌起义失败后与朱德等整顿余部转战江西、广东交界地区。1928年4月与朱德率部到井冈山和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残部会师，构成了第一支红军。1934年红军西窜，陈毅被留在苏区东躲西藏，历尽艰辛，组建了新四军。曾参与华东及淮海战役。1967年2月，陈毅被认定为“二月逆流”的干将，分配到南口机车车辆厂接受工人阶

级再教育，后被移送至石家庄软禁，1970年7月陈毅感到腹部隐痛并伴有腹泻，请求到北京看病，毛泽东未予批准，1971年1月因剧烈腹痛方准予住院，手术中发现是结肠癌已局部转移，1976年1月6日逝世；

7、**徐向前：**山西五台人，黄埔一期毕业。共和国元帅，1967年初即被视作“二月逆流”的黑干将，被撤职抄家。1969年到二七机车车辆厂“蹲点”，10月被战备疏散到河南开封，毛泽东死亡后徐向前才返回北京，因身患重病长期疗养，1990年3月心绞痛频发住进301医院。虽经医生全力抢救，无力回天，1990年9月逝世；

8、**聂荣臻：**1919年赴法勤工俭学，1924年聂荣臻奉命进莫斯科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回国后曾任黄埔军校教员。共和国元帅。素以深谋远虑，谨言慎行见长，毛泽东曾称其为厚道人。“文化大革命”中，戎马一生的聂荣臻也没有能够幸免，不断冲击多次批斗，“炮轰聂荣臻”、批判“华北山头主义”、“二月逆流”等等莫须有的帽子把聂荣臻压得难以抬头。被撤销一切职务，直到毛泽东死了以后才于1977年8月复任中央军委副主席，1987年因病离休，1992年5月14日22时43分，聂荣臻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9、**叶剑英：**早年入云南讲武堂。1920年参加了孙中山组织的驱逐桂系军阀之役。1926年7月参加北伐战争。初期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总预备队指挥部参谋长。攻克南昌后，任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二师师长，后任四军参谋长。曾参与筹建黄埔军校。1927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8年冬赴苏联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特别班学习。1931年到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1934年10月随中央红军参加长征，任军委第一纵队司令员。1937年任国民革命军八路军参谋长。10月，任八路军驻南京代表。1941年2月返回延安，长期担任中共军队之总参谋长。

文革开始后对毛泽东重用江青、张春桥等人迫害老帅颇为不满，1966年2月在怀仁堂拍案大怒。毛泽东谓之“二月逆流”。叶剑英随即被撤销一切职务，勒令休养。林彪坠机身亡后复出。毛泽东逝世后，叶剑英联合华国锋、汪东兴，出谋划策，设计逮捕“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1980年叶剑英被确诊患有帕森金氏病，随后病情加重且伴有多种并发症，终因年老体衰于1986年10月22日逝世。

十大元帅九位皆遭贬职，或批斗、或软禁或折磨致死。贬低别人意在抬高自己。毛泽东的目的在于褫夺军权，彰显个人为最高统帅，为实现其家天下美梦扫清障碍。

毛泽东当政时期昔日同僚皆被批斗

五十年代，中共中央的顶层头目是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除毛泽东位列至尊外，其余六个人都曾经受过批斗、抄家、关押、迫害。毛泽东心毒手狠，追随毛泽东五十余年，身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被认定为叛徒、内奸、工贼，折磨致死。被毛泽东称为亲密战友，认定为接班人的林彪仓惶出逃坠机身亡。毛泽东一意孤行，失道寡助，到头来连自己的老婆都保不住，成了地地道道的孤家寡人。

毛泽东的众多秘书纷纷离他而去

曾经担任过毛泽东秘书的三十七人中，多数均中途离他而去。曾受命担任了毛泽东保健医生二十二年的李志绥著有《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对毛泽东的品质、作风、待人接物生活习惯等有所透露。1988年代移居美国。1995年于美国伊利诺伊州家里浴缸中去世。

兹举田家英一例，看看毛泽东是怎么利用秘书的。

田家英(1922年-1966年)，本名曾正昌，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县人。1936年在成都参加抗日救亡工作。1938年奔赴延安入陕北公学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年，毛泽东让田家英担任儿子毛岸英的国文教员。1948年，26岁的田家英成为毛泽东的秘书。此后在毛的身边工作长达18年之久。他除一直任主席秘书，还兼任中央办公厅秘书室主任、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他掌管着毛泽东的个人存款、印章和亲友的往来信件。毛泽东写文章和诗词时经常引经据典，一般都要田家英查找和核对。1956年，中共“八大”召开，毛泽东决定致开幕词。自己拟了两次稿都不满意，于是由田家英花了一个通宵赶写出来。毛泽东对田家英起草的稿子只加了三百多个字，其他基本没有什么改动。宣读时，这篇文风酷似毛泽东的开幕词竟被三十余次热烈的掌声打断。

田敬重毛，视毛为导师、父辈，田家英长期在毛身边工作，而且目光敏锐，思想活跃，书生意气，所以对毛的弱点也看得很清楚，并因此忧心忡忡。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曾和担任过毛泽东秘书的李锐谈到“主公”常有出尔反尔之事，有时捉摸不定，高深莫测，令人手足无措，真是很难侍候。今天跟上去，也许明天挨批，毛泽东还特别喜欢让人写检讨，留个把柄等等。

田家英具有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美德——骨气，对卑躬屈膝的奴才深恶痛绝，早在1941年，就在延安的《解放日报》上发表《奴才见解》一文，痛批奴才：“**鸣鞭自傲的奴才，他会觉得残酷就是道德，谄媚就是学问，屠杀是他的本能，没有人供他们杀戮，他们会失业的。这些人就是伏在主子胯下，舐着他人血迹，使自己发肥的总管。**”他厌恶“防制异己，压迫文化，束缚思想，箝制舆论，以刑杀为威，以收括为务，践踏，奴役，纳贿，贪婪……的奴才。”

田家英一生最感动人心的篇章是他的以身殉道。他选择在毛的书房内自缢，本身就是一种宣示——与毛路线决裂的宣示。他面对三面红旗导致的灾难，曾多次进言，建议毛泽东体察民情，改弦更张。私下说过“如果可能从头再来，我会尝试另外一种社会主义”，可见他对毛牌社会主义早就失去了信心。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田以生命为代价，谱写了一曲毛时代中国知识分子以死向极权抗争的悲歌。可惜，在中共党内，特别是党内高层，这样的人太少了。

田家英的悲剧是毛氏极权体制和极端人格导致的必然结果。在极权统治下，任何人都难以逃脱被整肃的命运，伴君如伴虎。毛泽东自己钦定的接班人，几乎无一幸免。刘少奇被整死，高岗自杀，林彪一家魂断异域，邓小平两次被打倒。毛泽东的秀才班子和几个秘书，也都莫名其妙地被无情抛弃。师哲（长期担任毛泽东的俄语翻译兼秘书）被关押入狱，毛泽东死后才平反。田家英、柴沫、周小舟在文革时期相继自杀；李锐被毛泽东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开除党籍；陈伯达从1939年就给毛泽东当秘书，以毛泽东之名发表的重要文稿多出自他手，1966年毛泽东任命陈伯达为中央文革组长，在全国掀起“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热潮。1969年中共九大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排名毛泽东、林彪之后，康生之前。1970年，他在庐山会议上被毛泽东点名批判，且被冠以“反共托派分子”的罪名，堕入秦城监狱。后来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

田家英被整总算还有一个“篡改毛主席著作”的理由；一贯紧随毛泽东的陈伯达被投入监狱，唯毛泽东意志是从的胡乔木被打倒，则连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都拿不出来。王力、关锋、戚本禹更离谱。这几个中央文革的干将从走红到被关进监狱，也就一年多的时间。最搞笑的是戚本禹，已经被铐了起来，还摸不着头脑，说：“开什么玩笑，要逮捕我？”“为什么要铐我，我究竟犯了什么罪？什么都没有，对我宣布就把我铐起来，这是哪一条法律呀！”他忘记了毛泽东常说的无法无天。

“这是哪一条法律”？其实，独裁者想惩处任何人，只根据一己之意志和政治需要，从来不需要理由，而政治需要的核心就是维护独裁者一人之权力的需要，说出去的理由只不过是借口而已。

1966年5月，田家英被列入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一党，遭到迫害。

5月22日，田家英被勒令停职反省，罪名为“一贯右倾”、“篡改毛泽东著作”，工作由戚本禹接替。

23日上午，田家英自缢于中南海毛泽东的书房，时年44岁。

毛在杭州听到这个消息，冷冷地说道：“死了人都要我管吗？他选择了自绝于人民的道路。”还有一种说法是，毛只说了三个字：“小叛徒”！可见，毛对田家英的心结之深。

补记：上面的文字写于2015年。2017年翻阅有关档案时发现对田家英之死的记载颇有差异，择要摘录于后：

中共中央一直宣称，毛泽东的政治秘书田家英是1966年5月自杀身亡的。据中共中央组织部（外调1978—7—006162）号档案记载：田家英接到中央要人和他作最后一次谈话的电话后，约一小时在寓所永福堂，用五四型手枪开枪自杀。当天下午，是以化名，由公安部出面送去火化的。

1980年3月，田家英获得了平反昭雪。胡耀邦、邓小平、陈云、彭真都就田家英家属来信的要求，做出批示。其中指出：田家英是自杀吗？为什么有关档案会失落？对这些问题，汪东兴要有个如实交代。

1980年4月1日，中纪委常务书记黄克诚、中办副秘书长姚依林，代表中共中央、中纪委，就田家英死亡问题，找汪东兴谈了话，给予汪东兴选择如实交代田家英死因和有关档案失落原因的机会。汪东兴当时先硬后软，冲着黄、姚二人说：没想到清算到主席身上，连我现在什么职务都没有了也不放过。

最后，黄克诚，姚依林限汪东兴在三天时间内作出回答，反思。

1980年4月4日，汪东兴向中央办公厅提交了对田家英死亡事件的交代报告。该报告被列为中共中央档案局（1980—4—009014）号档案。兹将该档案中的汪东兴笔录摘要如下：

我接主席指示，要我到田家英寓所能否跟田谈一下。5月23日上午10时，我和内卫到永福堂田家英寓所，向田传达了主席的关怀，问他有什么想法？田冷漠地笑了一下，说：十八年了，我思想一贯右倾，一贯反马克思主义，一贯和主席唱反调，一贯和彭德怀、彭真、杨尚昆搞在一起。主席为什么留我在身边？我问田：还有什么想法？田说：不能违背事实讲话了。彭德怀、彭真、杨尚昆，还有一批和主席南征北战的领导同志，他们怎么会是反党，反马克思主义？让历史见证。我说：不要执迷不悟，否则下场比彭德怀、彭真、杨尚昆还要惨！田家英立即回答：请报告主席，我田家英对主席了解

了，主席也会对我田家英了解。我接受还要惨的结局。说着，田家英把杯子用力朝地一摔，表达了他和主席的决裂。当时气氛激烈，内卫朱国华失控，朝田家英开了一枪。我即招呼警卫上前行，田家英已死，随即向主席、总理作了报告。

从汪东兴这份如实程度可疑的交代材料，也仅能证实田家英不是自杀，而是他杀，但他杀的内幕仍是一团迷雾。当年，胡耀邦、陈云、彭真、黄克诚等提出：在一定范围内公开田家英死亡事件，对汪东兴追究刑事责任，对内卫朱国华的死因立案调查。

但叶剑英、李先念、王震、胡乔木等都反对公开事件，提出：事件搞到毛主席身上，搞大了，很多疑团都会提出来，怎么办？毛主席的声誉岂不全毁了！

直到1985年，胡耀邦、彭真还坚持应该查明田家英之死的真相，十年、二十年后还是要公开的，并指出：田家英的死，毛泽东是要负很大责任的，否则无法对历史做出交代。

另据中办（1980—5—00797）号档案记载：华国锋就有关档案失落事件，在1978年7月，曾两次追问过汪东兴。汪东兴说：田家英当时从身上拔出手枪时，我暗示内卫下手的。主席是知道整个过程的，曾说：他要走自己的路，就走吧。主席又指示：不要在死人身上做文章。华国锋还说：汪东兴也隐约地告诉他，田家英知道内情很多，这个人很危险，主席一直不放心。

笔者说明：我在写自传时，凡涉及历史事件均力求言之有据。田家英之死中共中央先后有几种说法，自缢，自我枪杀、内卫朱国华自发射杀、汪东兴暗示朱国华击毙。全有中共中央文件为证，究竟哪个符合事实呢？望读者明辨。依愚见，凡标榜为XX主义的人物们事无巨细皆有谎言。听其言需观其行。

毛泽东以暴力和谎言维持其领袖地位

我今年已82岁，历经日本侵略，国民党统治和共产党专政，这三个时期各有特色。日本占领北京时期中国人成了亡国奴，身受异族侵略压迫，处处低人一等。那时我是小孩子不懂政治，也不敢胡言乱语。1944年汪精卫逝世，全校师生佩戴白花，父亲才告诉我汪精卫是汉奸，不该为他带戴白花。1945年抗战胜利，全家人欢乐了一阵子，但一部分据说是重庆来的接收大员贪污腐化之风日益蔓延，“五子登科”[1]盛行。加之国共两党的战事愈演愈烈，乃至物资匮乏，物价飞涨，民不聊生。中国的老百姓历经多年战乱只求修生养息过个安定日子，却不可得，于是怨声载道。中共进入北平初期，国内战争尚未结束，毛泽东含而不露，蒙蔽了众多百姓。意在稳定政局博得民众拥护。及至大西南平定以后，特别是朝鲜战争爆发后，“镇反”“肃反”“三反”“五反”等一系列政治运动连绵不断，毛泽东暴虐无道的本性日渐显露。但我因身受过日本军国的奴役压迫，目睹过国民党官员的贪污腐化，共产党进城初期勤政爱民，高喊着“为人民服务”的口号，高唱着“团结就是力量”的歌曲，扬言“向着法西斯蒂开火，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当时我深信不疑，于是相继加入少先队和共青团。准备着做共产主义的接班人。

重溯中共发展史，凡重大事件的描述皆充满谎言，长征、遵义会议、延安整风、1957年反右、1958年大跃进、1959年反右倾、连续三年大饥荒和接踵而来的十年大浩劫。……一系列违背共产主义初衷的倒行逆施，莫不如是。在明摆着的历史面前，不得不思考毛泽东所有的承诺都是谎言。不彻底

否定毛泽东，中共所有的花言巧语无论说得多么好听绝对不可信。

毛泽东有一句名言“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现以中共长期标榜的长征是“北上抗日”等事件为例，看看他是如何认真的吧。

长征是北上抗日吗？

长征虽是逃窜，却显示了饱受屈辱的中华儿女为争取生存空间，不畏强敌，虽屡战屡败犹不服输的民族精神，平均年龄不到 30 岁，以劣势装备无后方作战，历经艰难险阻，其间共经过 15 个省，翻越 20 余座崇山峻岭，跨过 30 条急流险滩，穿过人迹罕至、沼泽遍布的草地，翻过荒无人烟、终年积雪的高山，历时两年，行程约二万五千里，牺牲了十余万年轻的生命（红一方面军从江西出发时是 86000 人，到达陕北 7000 余人；红四方面军出发时有 10 万大军，最后零零散散到达终点的不过 3 万人。）终于突出重围抵达陕北。堪称世界军事之奇迹。

中共高级将领粟裕曾著《回顾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此文刊载于 1981 年 7 月 26 日《解放军报》），中共赣州市委党史办曾编写《北上抗日先遣队的悲剧》，一些长征的亲历者也撰写过诸多回忆录。现择要摘录部分，俾使读者了解长征的真相，中共之特色。

1934 年 7 月 15 日，毛泽东、朱德等署名发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宣言全文约 2600 字。第一次提出“北上抗日”，该宣言现由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

为什么要发这样一个宣言呢？是真的要北上抗日吗？且看事实。

1927 年国共合作破裂以后，中共大举武装割据，占山为王、打家劫舍，烧杀抢掠，听命于苏联操控的共产国际，自立政府号称苏维埃。从 1933 年 10 月，国民党对江西苏区（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展开第五次“围剿”，由于采取了构筑碉堡群包围“苏区”、步步为营的战术，不给红军打游击战、运动战的机会，红军屡屡受挫。1934 年 4 月，“中央苏区”北方门户广昌失守，红军元气大伤。中共已无信心守住江西“苏区”。6 月 10 日前后，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商讨“突围”事宜。当时提出两个方案，第一方案是向东北方，从沿闽、赣边界转移到沿闽、浙、赣边界游击，可以威胁国民党心脏地区江、浙一带。第二方案是向西南方赣粤边境突围。这两个方案均未将“北上抗日”考虑在内。次日，秦邦宪（博古，1907 年生，早年读过苏州工科专门学校，1925 年后入莫斯科中山大学，是党内留俄派首领。1931 年 9 月后在共产国际支持下成为党内头号人物，当时为中国共产党实际最高领导人，即中共“总负责”）、他和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以及朱德、周恩来、项英、龚楚[2]等红军主要头目开会研究突围的准备工作。秦邦宪提出以“抗日名义”派两支先遣队，为红军主力突围试探。

1973 年，朱德在回答军事科学院有关北上抗日先遣队的提问时，曾指出：“是准备退却，派先遣队去做个引子，不是要北上，而是要南下。也就是说，“红军抗日先遣队”并无抗日的任务，也无北上的意图。中共组建“红军抗日先遣队”，纯为突围打个招牌，与“抗日”毫不相干。

秦邦宪，实际是个听命于共产国际的书呆子。“抗日先遣队”的招牌固然响亮，可日本人当时尚未进山海关，远在三千里之外，老百姓不明白中共离那么远如何抗日，政治效果几乎为零。军事上更行不通。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败局已定的时候，蒋介石绝对不会因为共产党提了个“北上抗日”的口号和出动了一小股部队，就撤除大量兵力，放松对中央苏区的“围剿”。

在当时整个红军作战严重失利的情况下，中央苏区老根据地几万主力红军都难以存身，却要求这支六千人的“北上抗日先遣队”（其中还有一半新战士，总共只有一千多条枪），深入到国民党占领的闽浙赣皖腹心地区去“最高度地发展游击战争”“建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纯属完全脱离实际的臆想。果然两支先遣队均以失败告终，无谓地损兵折将，削弱了红军的实力。秦邦宪提出以“抗日名义派先遣队”只给了中共一个用以自我吹嘘“北上抗日”的虚名。也算是他的一件功劳吧。

1934年12月，中央红军取道湖南广东交界到达贵州黎平。从出发时的八万多人锐减到三万。痛定思痛，怀着悲愤的心情在黎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去向及立足点。会议决定“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那时秦邦宪、周恩来一伙没有再提“北上抗日”的口号，只图找个存身之地。

附注：

[1] 《五子登科》是张恨水编著的长篇小说，《五子登科》记述了北平接收专员金子原(重庆飞来客)从下飞机踏上北平地界开始到最后逃出北平，以其发家历史为线索生动真实地反映了国民党接收官员的腐败行为和恶劣行径！在文中把接收专员拥有“房子、车子、女子、金子、票子”形象地称为五子登科！

[2] 龚楚（1901—1995年），字福昌，广东乐昌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参加了党的许多重要军事活动（如南昌起义及百色起义），并在红军中担任过许多重要职务，最高曾任中央军区参谋长，因不满红军以打土豪之名绑票勒索残害百姓，尤其是长征前夕大规模杀戮同志，于1935年5月脱离中共。在香港定居40年之久，曾出版《我与红军》《龚楚将军回忆录》；1990年，以年近九旬的高龄返回大陆定居，1995年在家乡辞世。

长征有讲不完的故事。你听说过有好几个“革命者”是乘坐着滑竿儿长征的吗？作为红四方面军的一把手张国焘是其中之一。

张国焘当时是中共早期领导。有40人的卫队，叫警卫排，此警卫排长可不一样，下放到作战部队就是团长。张行路就是坐滑杆，他和女秘书杨岳卿各坐一乘滑杆。16名轿夫来自通江县刘记轿行，老板是刘汉章，抬一天给八块大洋。轿夫有力气，有技巧，前后二人同起同落，快慢一致。长长的楠竹抬杆一抛一落，坐在凉椅上的人闪闪悠悠相当受用。红四方面军到北川县时轿夫们都编入了红军。35年5月过草地时女秘书杨岳卿被敌机炸死，张国焘悲痛不已。轿夫加入红军后不发枪，一直把张国焘抬到保安。轿夫老板刘汉章过草地时也被敌机炸伤，下落不明。他儿子当轿夫班班长，一路打仗下来，到1949年已是陈赓部下的团长了。

中央红军长征中，周恩来得了肝脓疡，走不得路。有一段路程他只好躺在担架上由别人抬着前进。1954年，当年为周抬过担架的杨立三去世，周参加了他的葬礼，并亲自抬棺，以彰显其君子风度。

长征前夕，贺子珍在江西为毛泽东生了一个儿子，不幸因先天不足而夭折。

长征途中贺子珍在贵州又生下一个女孩，这是毛泽东的第七个孩子，婴儿被送给当地的老乡，后下落不明。1936年，毛泽东的第八个孩子（即李敏）在长征终点陕北保安出世。长征途中贺子珍不断怀孕，不便行军，因此只能乘坐滑竿儿。毛泽东与王稼祥也不时乘坐滑竿儿与周恩来同行，声称

共商国是。

1935年1月，红军夺得遵义，再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联络王稼祥、说服张闻天，争取周恩来，扳倒秦邦宪和那个苏联派来的洋人李德。由张闻天取代秦邦宪，成“总负责”。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三人小组负责军事指挥。张闻天负责起草并主持通过了遵义会议决议。此决议也没提“北上抗日”，只确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

进入四川后发现国民党军力强大，无法立足。只好边打边走，边研究落脚点。6月12日，中央红军与张国焘率领的四方面军在成都西北约一百多公里处的懋功地区（今阿坝藏族自治州小金县）会合。双方均未考虑北上抗日。张国焘主张西进，到青海、新疆寻求发展，或沿长江东下于武汉周围创建苏区。张闻天等主张先在川西北建立根据地再徐图良策。也未谈及北上抗日问题。

然而，由于兵力不敌国军，在成都西北建立根据地的设想无法实施，红军被迫出川。9月17日，红军闯过天险腊子口，抵达甘肃岷县哈达铺。20日下午，毛泽东、周恩来等到达哈达铺。从当地邮政代办所查抄到一张《大公报》，从报纸上获知陕北有红军和根据地的消息，进一步探听才得知陕北有上万刘志丹领导的红军，并且有一块不小的苏区。此时，中央红军总共才不到一万人，一路逃窜以抢掠为生，情绪低落。毛泽东闻听有立足之地，马上说：“有一万红军就去，何况还有那么大的一个苏区呢。”随即派出贾拓夫率领一连战士和一部电台，作为前哨，出发寻找陕北红军。在陕西甘泉县，他遇见陕北党的领导人郭洪涛和红十五军团政委程子华，完成了与陕北党组织联络的任务。

10月19日，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保安县吴起镇，与刘志丹领导的陕北红军会合。长征结束。

10月24日，中共中央在甘泉县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说：“（在长征路上）得到了新的材料，知道陕北有这样大的苏区和红军，所以决定去陕北……以陕北苏区来领导全国革命。”这时仍未提及抗日二字。

又过了一个月，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联合发表了一份《抗日救国宣言》，才捡起了抗日这个口号。

总而言之，“红军北上抗日”一说是中共在北上结束以后编造出来的。

再来看遵义会议

中共一向宣传这次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幼稚走向成熟。把毛泽东抬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

实际上遵义会议的确改组了政治局常委，由张闻天取代博古任总书记；毛泽东仅为政治局常委。遵义会议确定“由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会后成立了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三人小组，周恩来任组长。

就在遵义会议之后行军途中，林彪、彭德怀和刘少奇、杨尚昆，或写信、或发电（报），或发牢骚，均表达过对毛泽东的意见。没有什么“大家都拥护毛泽东同志正确领导”一说，更没有确认毛泽东为最高领导。四十年代后对遵义会议的宣传，又是一个有悖于历史的吹捧毛泽东的谎言。

延安整风是毛泽东弄权使谋鼓吹个人崇拜的开始

1941年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表面上打着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

股的幌子，目的是斗倒张闻天、王明、王稼祥等留苏派，树立个人的绝对权威。

他在延安整风开始时说：“过去不但没有关于党史的研究，甚至整个党的历史没有哪个人考虑过。”

毛泽东的说法不符合历史事实。早在 1926 年，蔡和森写的《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一书即已问世。后来又有瞿秋白的《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论》（1929 年），李立三的《党史报告》（1930 年）。张闻天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和华岗的《大革命中的中国共产党》，内容也都包括党史。这些早期党史著作“直抒己见，不为尊者讳，没有清规戒律的限制，没有审查制度的约束，对问题有不同看法，属于个人观点。错误虽在所难免，有些史实也不够翔实、不尽正确，但基本上是秉笔直书，继承了中国史传不虚美、不隐恶，追求实际的优良传统。”毛泽东对他人的著作之所以全盘否定，在于他预谋以整风为名编纂一本有利于他个人的“新党史”。

1938 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决定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1940 年 4 月，七大代表已从各地选出。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任弼时负责七大筹备工作。似乎七大召开在即。但毛泽东 1940 年下半年改变了想法，认为“为确保七大成功，有必要统一全党认识”；并亲自主持搜集中共六大以来的历史文件，编写《六大以来》文献集，作为开展党内路线斗争、统一全党思想的“基本武器”。

1941 年 2 月，毛泽东选中善于察言观色、妙笔生花的胡乔木为自己的政治秘书，参与編集《六大以来》和起草《历史决议》。确定效法斯大林编《联共党史》的方式，即先设定党内一直存在两条路线斗争，毛泽东代表一条正确路线，其他人都是错误路线。选材的标准，就是证明毛泽东一贯正确，别的中央领导人一贯错误。胡乔木自己承认：“编辑《六大以来》，并不是有文必录，对于毛泽东有错误的文献，如毛泽东反 AB 团的《前委通告第一号》（1930 年 2 月 16 日），毛泽东提出“肃清富农领导、肃清 AB 团、根本改造赣西南党”给中央的信（1930 年 10 月 4 日）等，均不收入。却收进《中央政治局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1931 年 3 月 28 日），把反 AB 团和富田事变的责任从毛泽东转移给中央。毛泽东导致西路军覆灭的有关文电，如下令“打通苏联通道”的《十月份作战纲领》（1936 年 10 月 10 日），“组成西路军，创立河西根据地”的《作战新计划》（1936 年 11 月 8 日），以及西安事变后中央军委对西路军的重要指示电，均未收入。以掩盖毛泽东的错误决策，把西路军覆灭的责任转嫁给张国焘。

1943 年 3 月 20 日，延安整风进入中期，毛泽东在中共总书记张闻天率“延安农村工作调查团”到晋西北进行调查研究时，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以“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为名，作出《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减的决定》。《决定》以毛泽东为“政治局主席”，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人组成书记处，毛泽东为“书记处主席”，并规定“主席对书记处会议所讨论的问题有最后决定权。”这个《决定》取消了原来的总书记和政治局常委，抹掉了 1935—1943 年担任了八年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张闻天的名字。撤销了周恩来、王稼祥等人的领导职务，确立了毛泽东自 1943 至 1976 年三十三年终身主席的绝对权威地位。并从此进入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时期。

延安整风期间，一方面编造鼓吹毛泽东一贯正确的新党史，一方面指使康生大搞“审干”和“抢救”运动。有意制造恐怖氛围以利于树立毛泽东的极

权，在延安竟然揪出了一万余名特务。

延安整风审干的严酷情况、不断反映到共产国际。1943年12月初，季米特洛夫（1935年至1943年期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给毛泽东来电指示：“我认为发动反对周恩来和王明的运动，指控他们执行了共产国际推荐的民族统一战线，说他们把党引向分裂，这在政治上是错误的。”

1943年12月中央书记处召开工作会议，传达了季米特洛夫电文。延安整风才开始降温。

1944年春夏之际，审查、抢救运动进入到甄别阶段。据1994年出版的《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透露，1943年至1944年一年内，延安清出的“特务”共15000人，经甄别后确认，一个特务未发现。

“毛泽东思想”这一说法，首次出现在王稼祥的文章里。1943年7月8日《解放日报》发表王稼祥《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指出：“中国民族解放整个过程中——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正确道路就是毛泽东思想，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其著作中与实践中所提出的道路。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

竭力鼓吹“毛泽东思想”的第一人是刘少奇。1943年7月，刘少奇在《解放日报》上撰文《清算党内的孟什维克主义思想》，写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在客观上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中心构成的”。“一切干部、一切党员，应该用心研究二十二年来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应该用心研究与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及其他方面的学说，应该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来武装自己。”中共七大会议上，刘少奇提出将“毛泽东思想”正式写入党章。

随即周恩来发表讲话，“我们党22年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串著整个党的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

刘少奇、王稼祥、周恩来等中共高层领导人一齐发声追捧毛泽东，为毛泽东定于一尊、走上神坛、高度集权铺平了道路。毛泽东思想一经载入党章，今后只能以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不允许再有其他人和思想的空间了。

1945年4月20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制造了毛泽东历史上一贯正确的神话；同时制造了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和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

1945年4月中共召开“七大”，“七大”会场最醒目之处是主席台上方的一条大横幅：“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毛泽东被选为所有最高机构——中共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书记处的主席。自中共问世以来，毛泽东第一次公开包揽了全部最高领袖的头衔。

朱德的秘书陈友群谈及，1950年中宣部起初拟订的五一口号中，最后两条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毛泽东在后面亲自加上“毛主席万岁！”。其帝王思想昭然若揭。

毛泽东的帝王思想由来已久，在其诗词中偶有流露，如青年时期抄袭的咏蛙诗和长征途中“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等等。延安时期偏安一隅便和丁玲在窑洞里密谈设置文武百官和三宫六院。进入北京初期略有收敛，入住中南海后就又飘飘然起来。苏共二十大给了他当头一棒，1956年9月，中共八大修改党章，没有再提“毛泽东思想”。毛泽东随即反扑，以反右倾之名义将周恩来陈云压制下去，紧接着用阴谋和阳谋大举“反右”，禁言禁声，大树个人绝对权威。

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说：“有些人对反对个人崇拜很感兴趣。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崇拜，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行。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反对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问题不在于个人崇拜，而在于是否是真理，是真理就要崇拜，不是真理就是集体的领导也不成。……有人反对列宁，说列宁独裁。列宁回答很干脆：与其让你独裁，不如我独裁好。”显而易见，毛泽东开始放弃反对个人崇拜的初衷，甚至欣赏起个人崇拜了，由此一发不可收拾。

疯狂发行《毛主席语录》（红宝书）纪实

1959年10月，林彪就任国防部长以后，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而写的《高举党的总路线和毛泽东军事思想红旗阔步前进》正式刊载于国内各大报刊。从此，林彪就成了“高举”的代表。

进入60年代，调门又进一步升高。说什么：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是当代的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主席的书，“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19世纪的天才是马克思、恩格斯，20世纪的天才是列宁和毛泽东同志”。“毛主席是世界最大的天才”。

1963年6月，毛泽东主持制定《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就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反对个人崇拜的问题进行专门阐述，他说：近几年来，有些人违反列宁关于领袖、政党、阶级、群众之间相互关系的完整学说，提出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即反对个人崇拜），是错误的，有害的。……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实际上是把领袖同群众对立起来，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统一领导，涣散党的战斗力，瓦解党的队伍。

1964年秋，赫鲁晓夫遭遇“克里姆林宫政变”，被迫下台。美国记者斯诺曾经问毛泽东：“苏联人说中国正在搞个人崇拜，是否属实？”毛泽东回答说：“赫鲁晓夫之所以下台，可能就是因为他没有个人崇拜。中国确有个个人崇拜，也需要有点个人崇拜。”由此在中国个人崇拜之风愈演愈烈。

1961年4月，林彪曾授意《解放军报》应当经常选登毛主席语录，该报即从5月1日开始在每天的报眼上刊登。后根据总政治部领导指示，送编200条语录于1964年1月5日印成16开本的《毛主席语录200条》正式出版。

1965年8月1日出版第二版，内容作了修订，共收语录427条，共8.8万字。第一版有32开本纸面平装、64开本精装加红色塑套两种装帧，第二版起全部为64开红色塑套装，以后又出版了100开、128开本、256开本。在64开本书前有林彪手书的题词：“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在再版本的题词后又加了“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总政版《毛主席语录》出版后，从1964年9月开始向地方供应纸型，人民出版社先后出版多种版本，均在内部发行，不卖给外国人。

1967年3月28日，国务院外办发出通知说“不卖给外国人”的规定是错误的，“不符合主动积极地对外宣传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并称“对外赠送《毛主席语录》（中、外文版）就是向世界人民宣传毛泽东思想。各涉外单位，应将此作为头等重要的政治任务。”

据有关部门统计，总政版《毛主席语录》从1964年到1976年，全国共出版汉文版4种，少数民族文字（8种文字）版8种，盲文版1种，外文版

(37种文字)和汉英对照共38种,总印数105549.8万册。据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统计,截至1967年10月,世界各国以65种文字翻译出版毛泽东著作853种,其中有20个国家的20种文字翻译出版《毛主席语录》,共有35种版本。

“文革”10年,全国用于印制毛泽东著作的纸张仅1966年至1970年的5年内就用了65万吨,比1950—1965年“文革”前16年书籍用纸的总量(59.34万吨)还多5.66万吨。这仅是由国家出版社正式出版的毛泽东著作的用纸量,“文革”期间群众组织等私自编印的毛泽东著作用纸则多得无法统计。

毛泽东死了以后,1979年2月12日,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停止发行〈毛主席语录〉的通知》内称:“林彪为捞取政治资本而搞的《毛主席语录》本,断章取义,割裂毛泽东思想,自发行以来,危害很大,流毒甚广。为了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自即日起,新华书店、国际书店现存的中文版、民族文版和外文版《毛主席语录》本一律停止发行。”从此,《毛主席语录》在书店的门市部中消失。已经发行出去的大都作为废纸由造纸厂回收打成纸浆。也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毛泽东之昏言昏语集录

文革期间,除了官方大量印制毛泽东的著作以外,民间还流传过各种各样的毛泽东语录,兹抄录部分如下:

毛泽东之昏言昏语(一)

- 1、知识越多越反动。
- 2、医学教育用不着收什么高中生初中生,高小毕业学三年就够了。华佗读的是几年制?明朝的李时珍读的是几年制?
- 3、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资产阶级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 4、农业大学办在城里不是见鬼吗?农业大学要统统搬到乡下去。
- 5、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贫下中农管理学校。
- 6、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
- 7、不要考试,考试干什么?一样不考才好呢!对于考试一概废除,搞个绝对化。
- 8、去搞阶级斗争,那是大学,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什么北大、人大,还是那个大学好!我就是绿林大学的,在那里学了点东西。
- 9、《红楼梦》我看了五遍,也没有受影响,我是把它当历史读的--- ---《红楼梦》里阶级斗争很激烈,有好几十条人命。
- 10、从前我在学校里是不守规矩的,只是以不开除为原则的。考试嘛,五、六十分以上,八十分以下,七十分为准。好几门学科我是不搞的,要搞有时没办法,有的考试我就交白卷,考几何我就画一个鸡蛋,这不是几何吗?因为是一笔,交卷最快。
- 11、中国知识分子有几种。工程技术人员接受社会主义要好一些。学理科的其次。学文科的最差。

毛泽东之昏言昏语(二)

- 1、以阶级斗争为纲,纲举目张。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 2、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
- 3、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一句话:造反有理。

4、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要进行多次。要斗私批修。

5、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镇反,还杀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贯承认;可惜的是,你们说得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太谦虚了,何止100倍啊。

6、摆设盆花是旧社会留下来的东西,这是封建士大夫阶级、资产阶级公子哥儿提笼架鸟的人玩的,花窖要取消,大部分花工要减掉。

7、武斗有两个好处,第一是打了仗有作战经验,第二个好处是暴露了坏人。-----再斗十年,地球照样转动,天也不会掉下来。

8、我们杀了七十多万人,东欧就是没有大张旗鼓地杀人。革命嘛,阶级斗争不搞彻底怎么行?

9、镇压反革命,杀一百万,极有必要。一九五七年右派进攻,反了右派,反造不起来了。反革命杀了一百多万。匈牙利没有杀反革命。六亿几千万人,消灭那个一百多万,这个东西我看要喊万岁。

10、我才不怕打,一听打仗我就高兴,北京算什么打?无非冷兵器,开了几枪。四川才算打,双方都有几万人,有枪有炮,听说还有无线电。

11、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

12、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要大捕大杀几批。

13、我这次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所得到的最重要成果,即流氓地痞之向来为社会所唾弃之辈,实为农村革命之最勇敢、最彻底、最坚决者。

14、假如办十件事,九件是坏的,都登在报上,一定灭亡。

15这样的一场世界大战中国可能会死掉四亿人口。但是中国用三分之二人口的牺牲,却换来一个大同的世界还是值得的。死掉四亿人,还剩两亿人,用不了多少年,中国就又可以恢复到六亿人口了。

16、原子仗现在没有经验,不知要死多少,最好剩一半,次好剩三分之一。

17、人要不灭亡那不得了。灭亡有好处,可以做肥料。

18、为了世界革命的胜利,我们准备牺牲三亿中国人。

19、勇敢分子也要利用一下嘛!我们开始打仗,靠那些流氓分子,他们不怕死。有一个时期军队要清洗流氓分子,我就不赞成。

毛泽东之昏言昏语集(三)

1、一些同志认为日本战地越少越好,后来才统一认识: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否则便成爱蒋介石的国了。国中有国,蒋、日、我,三国志。

2、要冷静,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要避开与日本的正面冲突,绕到日军后方去打游击,要想办法扩充八路军、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要千方百计地积蓄和壮大我党的武装力量。对政府方面催促的开赴前线的命令,要以各种借口予以推拖,只有在日军大大杀伤国军之后,我们才能坐收抗日成果,去夺取国民党的政权。

3、有的人认为我们应该多抗日,才爱国,但那爱的是蒋介石的国,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祖国是全世界共产党人共同的祖国即苏维埃(苏联),我们共产党人的方针是:要让日本军队多占地,形成蒋、日、我,三国志,这样的形势对我们才有利,最糟糕的情况不过是日本人占领了全中国,到时候我还可以借助苏联的力量打回来嘛!

4、为了发展壮大我党的武装力量，在战后夺取全国政权。我们党必须严格遵循的总方针是“一分抗日，二分应付，七分发展”。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得违背这个总体方针。

5、我曾经跟日本朋友谈过。他们说，很对不起，日本皇军侵略了中国。我说：不！没有你们皇军侵略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就不能团结起来对付蒋介石，中国共产党就夺取不了政权。所以，日本皇军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好教员，也可以说是大恩人，大救星。

6、没有什么抱歉。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国带来了很大的利益，使中国人民夺取了政权。没有你们的皇军，我们不可能夺取政权。这一点，我和你们有不同的意见，我们两个人有矛盾。

7、日本的侵略也可以说是好事，帮了我们的大忙。请看，中国人民夺取了政权，同时，日本的垄断资本、军国主义也帮了我们的忙。日本人民成百万、成千万地醒觉起来。包括在中国打仗的一部份将军，他们现在变成我们的朋友了。

毛泽东之昏言昏语（四）

1、消灭麻雀。忙时吃干，闲时吃稀。

2、要考虑取消薪水，恢复供给制。

3、现在看来搞十几亿人口也不要紧，把地球上的人通通集中到中国来粮食也够用！将来我们要搞地球委员会，搞地球统一计划，哪里缺粮，我们就送给他。

4、粮食多了怎么办？国家不要，谁也不要，农业社员们自己多吃嘛！一天吃五顿也行嘛！

5、大概十年左右，可能产品非常丰富，道德非常高尚，我们就可以从吃饭、穿衣、住房子上实行共产主义，城市乡村一律叫公社，不叫工厂，大学、街道都办公社，如鞍钢叫鞍山公社，不叫工厂。

6、大城市要分散，乡村就是小城市，每个公社都将路修宽一点，可以落飞机，每个省都搞一二百架飞机，每个公社平均两架，大省自己搞飞机工厂。

7、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

8、赶超英国，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只需两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

9、为五年接近美国，七年超过美国这个目标而奋斗吧！

10、七亿人口搞七亿吨钢。三至七年之内建成一个工业大国。

11、民法和刑法那一类法律都不需要了。民法刑法那样多条谁记得了？一搞大跃进，就没时间犯法了。

12、有一回哥老会抢了我家，我说，抢得好，人家没有嘛。

13、除了大办水利以外，还有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铜、铝、煤碳、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人很多，这样一来，我看搞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人。

14、一九五九年第一次庐山会议本来是搞工作的，后来出了彭德怀，说你操了我四十天娘，让我擦娘二十天行不行？这一操，就被搅乱了，工作受到影响。

15、打麻将十三张牌，基本靠手气，谁知道搞钢铁这么复杂？9000 万人上阵炼钢，比 6000 万人要好。有一点损失，我也一点不痛心，横直没有经验。……9000 万人上阵，表明了它的全民性，建设速度大大提高了。

过了五十多年再看这些昏言昏语，国人无不嗤之以鼻。

转载：写作途中读到王友琴博士撰写的《刘少奇和文革暴力》一文，对中共高层之尔虞我诈、毛泽东的阴鸷诡谲，鞭辟入里。深受启迪。特转载于此

王友琴：女，1952年出生，曾作为知青下放云南，1979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88年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博士学位。1988年赴美，曾在斯坦福大学和芝加哥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化系任教。

王友琴长期从事文化大革命研究，致力于真实记录文革场景和普通人的苦难。坚持不懈地收集了将近700个文革死难者的材料，于2001年建立了“中国文革受难者纪念园”网站，2004年出版了《文革受难者》一书。她说，“……探索和记录历史事实，是学者的责任。普通人的受害是文革历史的重要部分，当这些事实的说出受到种种阻碍，更需要学者的努力。”这样的责任感和道德勇气，以及具有史料价值的著述，使她受到许多人的尊敬和推崇。

以下即是转载内容：

刘少奇和文革暴力 作者：王友琴

刘少奇，1898年生，1966年文革开始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共中央副主席，最高权力圈子中的第二号人物，1966年8月失去权位，1967年在中共报纸上被称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1969年10月被中共中央作为“叛徒，内奸，工贼”“永远开除出党”，遭到长期囚禁和折磨。1980年2月中共中央为刘少奇平反，并宣布刘少奇已在1969年11月10日死亡。

1, 百姓之死与高官之死

“文革受难者纪念园”没有被封锁之前，笔者曾经收到两位读者的来信。他们说，“网上纪念园”展示了大批身为普通人的文革受难者，他们的名字和悲惨遭遇，三十年来媒体从未提起，现在网站上被明确记录和公布，是非常重要的突破；同时，他们也问，为什么这个网站没有列出身居权力高位的文革被害者，其中第一个就是刘少奇，还有陶铸等人。

确实，1966年8月以前，刘少奇是仅次于毛泽东的第二号人物，陶铸则在刘少奇失去权位的同时上升为第四号人物，都在文革中被囚禁和折磨，然后悲惨地死去。

“网上文革受难者纪念园”所记录的受难者，一般来说，都是普通人，不在权力阶层中居于要职，这些普通人在文革后虽然得到“平反”，但是他们的名字和故事，从来不能在媒体上被公布和记录。

百姓之死的被隐瞒或被忽略，使文革的大图景因此而改变。普通人民遭受的痛苦和迫害长期不被记载，文革的罪恶在历史记载中因此变得轻浅。在笔者看来，千万普通人被迫害致死，才是文革图景的中心，因此笔者在过去十多年中，尽力查访这些普通人的名字和故事。

刘少奇不是普通人，但是也是文革的受难者。他的特殊地位，使他的名字广被人知。但是他遭受了怎样的折磨，他自己怎么看待他的遭遇，却成为极难澄清的事实。在民主制度的国家，获选而上台的领导人，广被人们所了解，他们失去了普通人所能具有的很多隐私权。在没有选举制的国家，情况恰恰相反——最高权力圈子始终是神秘的，领导人物绝对不被大众所了解。

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保持神秘性乃是为了保持未获人民批准的权力。这种神秘性有助于强化那种权威。最高权力圈子不是人民投票选举的，也不受新闻媒体的监督。他们需要跟人民保持距离。

文革中,普通的"牛鬼蛇神",被交给普通的"红卫兵"和"造反派"们"斗争",折磨,甚至杀戮;但是刘少奇和陶铸这样的高层领导人物,却一直被另行监禁,是放在当时最高权力中心的直接控制下的。

也就是说,高层权力圈子的某人如果也成了"牛鬼蛇神",仍是要跟与他们"斗争"的"群众"隔绝开来的。刘少奇被打倒之后,数十万北京的学生和市民,在中南海外面举行了一个月的"揪刘"行动,这一行动得到文革高层领导人的鼓励支持,却始终没有让这些"造反派"见到刘少奇本人。刘少奇只被交给他身边的中南海造反派"批斗",这是有纪录片为证的。

至今,中国政府仍然不公开文革档案材料,即使跟普通人有关的档案都不准人们阅读,更遑论高层领导人,如刘少奇的了。

斯坦福大学的退休历史教授范斯莱克,在他的中国历史课上曾经讲到,对中国上层领导人的行为,我们好像是在一个舞台前,幕布只升起来了一点点,我们只能看到一些脚在舞台上移动,却看不到,也听不到其它部份。

这是一个形像的比喻:"我们只看得到一些脚的移动"。

2, 一个被删去的细节:瘫痪后被绑在床上的最后六个月

在毛泽东死去四年以后,刘少奇死去11年以后,1980年春天,中共中央为刘少奇"平反",并且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仪式。同时,在官方报纸上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刘少奇生平及革命功绩的文章。

就在那期间,一位老作家和老共产党员,告诉笔者一件事情:由于一篇和她有关的文章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她去访问该报总编辑胡绩伟。他们在延安时代就认识。在胡的办公室里,她偶然听到了这位总编辑和刘少奇的妻子王光美在电话上的谈话。

她说,胡绩伟和王光美在谈修改一篇将要发表的文章,是关于刘少奇的。那篇文章中写到,刘少奇在被隔离囚禁以后,瘫痪了,还被绑在床上六个月,直到死亡。《人民日报》要删去写进文章中的这一细节,胡在电话上告诉"光美同志",请她同意这样做,为了"党的形像"。

这位老作家对笔者提到这件事的时候,非常激动,她说不敢相信有这样的事情:一个人已经瘫痪了,不能走了,还要绑在床上,还是党的副主席,真是不像话。她说,她为这个党感到羞耻。

其实,报纸删去这个细节,也是应该感到羞耻的。

笔者查阅了1980年给刘少奇平反前后的《人民日报》,果然没有读到任何文章中谈及刘少奇最后六个月是被绑在床上的。这一个细节,已经被删除了。

在同年年底发表的刘少奇的儿女的文章《胜利的鲜花献给您》(《工人日报》,1980年12月5-8日)中,也没有提到绑在床上的这个细节。

但是,六年以后,在1986年出版的高皋,严家其所着《文革十年史》书中,写道:"没有人帮他换洗衣服,没有人扶他上厕所大小便,以至把屎尿拉在衣服上。长期卧床,造成双下肢肌肉萎缩,枯瘦如柴,身上长满了褥疮。……并用绷带将刘少奇双腿紧紧绑在床上,不许松动。"(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178页)。

《文革十年史》在上市以前就被禁止公开出售。两位作者在1989年流亡国外。笔者曾经询问他们上述引文资料来源。他们说一定有出处,只是写作此书的材料都留在北京无从查找。

1996年出版的《文革档案》(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一书中,也有这个细

节(286页)。这本晚出的书里保留了这个细节,显然因为不像发表在《人民日报》上那么醒目,或者因文革已经过去多年,刘少奇的事情不再被人注意,所以出版物审查者未再注意这样的细节。

也许在有些人看来,刘少奇是否被绑在床上,相比于他被迫害至死,似乎仅仅是个细节问题罢了。

但是,《人民日报》删除这个细节,在保卫"党的形像"方面,确乎是有作用的。

把一个已经瘫痪的人绑在床上,没有任何实际作用,唯一的解释,是故意的残忍,是虐待!

在刘少奇子女的文章《胜利的鲜花献给您》中,其实还提到了一些别的细节,也相当可怕。其中一个,1967年9月,把刘少奇的妻子逮捕并且把刘少奇的子女赶出家以后,在中南海刘少奇的家里"连夜筑起一堵高墙",不准刘少奇再步出房门。

中共其它高层领导人包括毛泽东也住在中南海。在那里连夜动工构筑一堵禁闭墙,一座监狱,一方面当然是毛泽东等人可以为所欲为的,虽然听起来就象春秋战国篡位和夺权的故事,另一方面,难道也是因为他们喜欢就近欣赏刘少奇的悲惨境况

《胜利的鲜花献给您》一文中还有另外的一句话,"他们又把爸爸服用多年的维生素和治糖尿病药D860也停了"。停止糖尿病的药,比停止维生素,会带来严重得多的后果。

《文革十年史》中写道:(1969年10月)"患有糖尿病的刘少奇,由于失去生活自理能力,长期卧床,又没有人为他清洗,身上又脏又臭。临离开北京时,看护人员索性把他的衣服剥去,包裹在一床粉红色的缎面被里,被上蒙了一条白色床单。"(181-182页)这本书的作者之一高皋是一位医生,比一般人对疾病更有知识。

连夜筑墙禁闭,禁止糖尿病用药,也是很残酷的手段,但残酷程度,都没有把已经瘫痪的老人绑在床上那么直观,具体,一听就懂。所以,《人民日报》首先删除这个细节,因为这确实是最为阴森可怕的一个细节。可以说他们"删"得非常符合他们的用意。

《人民日报》在1978年以后的否定文革的过程中起了正面的推进作用。实际上,当时的中国,也只有他们能公开地发表声音,绝大多数人民只有沉默。但是《人民日报》依然投鼠忌器。而且,在多年刊登满篇谎言之后,没有人会对这样的删改大惊小怪。

这只是笔者极偶然听到的一个情节。

作为红墙外的老百姓,应该问,还有什么被删节了?还有什么从来都没有写下来?

实际上,不会有回答,而且,在下文中可以看到,这种对历史事实删节和对文革罪恶的删节,继续在进行。

3, 解释刘少奇之死

从官方媒体公布的材料中,可以看到刘少奇的最后经历大致如下:

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刘少奇从第二号人物变成了第八号。不久以后,学生"造反派"贴出攻击刘少奇的大字报,喊出"打倒刘少奇"的口号。

1967年1月,刘少奇在中南海里面被"斗",刘的专用电话被拆除。4月,

刘少奇的妻子王光美在清华大学被 30 万人"斗争"。刘少奇则被《人民日报》不指名地称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7 月,几十万"革命造反派"在中南海墙外"揪刘"一个多月。8 月,刘少奇和妻子在中南海中遭到大会"斗争"并且被殴打。9 月,刘的妻子被逮捕关进监狱,子女被赶出中南海,刘被新筑的高墙禁闭在原住处。

1968 年夏,刘少奇病重。10 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宣布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把他"永远开除出党"。

1969 年 10 月,刘少奇处在随时可能死亡的病危状态,被送到河南开封,放在开封政府的大院内,继续监禁。11 月 13 日,刘少奇死亡。

7 年以后,1976 年 9 月毛泽东死亡,毛死后又过了三年半,刘少奇得到了"平反"。他的罪状,也都一风吹了。

人民不准询问:这一切是到底为了什么?中国官方很快就有一套关于文革和刘少奇之死的理论:主要责任在林彪四人帮,不要追究毛泽东的责任。

接着,在 1980 年新发行一百元钞票上,印上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的四个侧面头像。有人觉得这种排列很奇怪,为什么周恩来在刘少奇之前,文革以前周排在刘后面的,也有人说,周在林彪死后,也是第二号人物,和刘一样。其实,这也是一般人无可置喙的,人们不过议论议论罢了。在没有电脑互联网以前,普通人不可能用书面文字讨论这样的问题,只在口头谈谈而已。

官方把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称之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伟大的共产主义者","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钞票上,他们四个人紧紧相依,亲密无间,好像阴谋,迫害和谋杀,从来没有在他们之间发生过。

有一本名为《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的巨型画册,在 1988 年出版,编辑者是"中共中央研究室"和"新华通讯社"。其中有"刘少奇生平大事年表"一章,关于刘少奇在 1967 年,只有一句话:

"1967 年 7 月 18 日,趁毛泽东离开北京之机,江青,康生,陈伯达擅自组织批斗刘少奇和王光美的大会。"(《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1988,285 页)

已经 1988 年了,还在如此煞费苦心地制造这样的谎言,为毛泽东的责任开脱。这是为了什么?

如上所述,打倒刘少奇,是一个长期策划运作,并且不惜发动全国性运动乃至内战的一个过程。从刘少奇失去第二号人物的位子到他死亡,其间有三年多的时间,全国的所有人都被动员起来高喊"打倒刘少奇"的口号。1967 年 7 月中旬那几天毛泽东不在北京,就能说明这一切不是毛泽东策划的吗?

何况,据毛泽东的保健医生李志绥说,1967 年 7 月 18 日在中南海举行了对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的"斗争会"后的第三天,毛泽东叫李乘专机飞到杭州来见他,面陈在中南海的批斗会情景(The Private Life of Chairman Mao, 489—491)。那天的"斗争会"拍了纪录电影。那记录电影从未公开放映过,当时摄制的目的显然只供最高领导人观看的。至于那天对刘少奇的暴力攻击,低头弯腰,殴打,都是当时所有"斗争会"的程序,已经在文革中普遍使用。也就是在那以后,刘少奇开始被单独监禁,直至死亡。

到了 1999 年,新版的一百元钞票又改变成只有毛泽东一个人的头像了。也许岁月流逝,年轻一代已经不知道刘少奇是谁了,何必还要提这个人,以及可能因此引起对文革的记忆和疑问呢,毛泽东一个人足以象征,代表权威。

历史如果不被纪录,不被分析,就会在人们的记忆中退色,消失,或者被歪

曲成另一幅图景。随着时间推移记忆淡化,谎言反复讲述,不同声音被禁止,对刘少奇的官方解释,就这样延续下来了。

4, 中国古代君臣相害的延续, 还是斯大林主义的中国版本

刘少奇一案, 是第一号人物和第二号人物之间的残酷斗争, 应该怎样解释呢,

一种思路, 可以追溯到中国古代的专制传统。在中国历史上, 皇帝和大臣之间的谋害, 杀戮的血腥史实, 是大量的, 特别是在新朝代初创的年代。

春秋时代, 吴王杀伍子胥, 越王杀文种, 都是例子, 成语所谓“狡兔死, 走狗烹”。对皇帝立有大功的大臣, 后来被杀的, 可以数出一长串。秦代有李斯, 汉代有韩信, 明代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害死了从小一起放牛的大将军徐达, 处死了宰相胡惟庸, 并且从此取消了宰相制度。太平天国一在南京建都, 称“万岁”的洪秀全就杀了“九千岁”杨秀清。

这是军事杀戮, 获取政权以后的又一次杀戮, 可以称为“第二次杀戮”, 是杀戮内部高层领导, 最高领袖的战友。与土匪的内部火并有所不同, 这些杀戮是通过某些司法程序的, 如审讯和判刑, 对被杀戮者, 也都诉诸文字的罪状罗列, 也就是说, 要找到一些理由和根据, 尽管理由和根据, 实际上都可能是伪造的。

司马迁《史记》的《李斯列传》载:“李斯者, 楚上蔡人也。年少时, 为郡小吏, 见吏舍厕中鼠食不洁, 近人犬, 数惊恐之。斯入仓, 观仓中鼠, 食积粟, 居大庑之下, 不见人犬之忧。于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 在所自处耳!’乃从荀卿学帝王之术。”他到秦国, 辅佐秦始皇攻打吞并天下, 被任命为丞相。之后他又建议焚书坑儒。秦始皇死后, 他帮助秦始皇的小儿子胡亥夺得皇位。两年后, 李斯以叛变罪被判决死刑。“二世二年七月, 具斯五刑, 论腰斩咸阳市。斯出狱, 与其中子俱执, 顾谓其中子曰:‘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 岂可得乎!’”

司马迁记载了李斯被杀前说的话。我们不知道司马迁怎么了解到李斯关于带狗打兔子的临终谈话。不过李斯是当众被处死的, 所以有这种可能性。刘少奇死前说过什么, 至今没有任何报导。这是很奇怪的。现在官方报导的刘少奇最后的话, 就是“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这是由他的妻子王光美在文革后给他平反时说出来的。他们被强制分开, 直至刘少奇死亡, 中间有两年多的时间。他在最后的两年里说过些什么, 从来没有见到任何记载。显然, 他所受到的监禁非常严密, 没有同情者可以接近。在这方面, 文革也比暴秦还要残忍。

在二十世纪, 最高层领导人之间的这种血腥杀戮, 发生在苏联, 中国, 柬埔寨的红色高棉内部。斯大林是这方面的鼻祖。斯大林在“农业集体化”和“肃反”中残酷迫害了千千万万的普通人民, 而且, 最高权力圈子“政治局”中, 除他本人之外的其它六个成员, 都被他清洗了, 不是被迫自杀, 就是被刺杀, 或者被判处死刑。这六个成员是托洛茨基, 季诺维也夫, 加米涅夫, 李可夫, 托姆斯基, 布哈林。

1937 年布哈林被投进监狱。1938 年 2 月, 对布哈林和李可夫为首的“右派和托洛茨基联盟阴谋集团”进行了公开审判。布哈林在审判中承认了某些被指控的罪行。他被判处死刑, 在 1938 年 14 日被枪决。有人分析, 布哈林承认有的罪行, 是因为他的小儿子才两岁, 为了保护家人, 他不得不这样做。也有人说, 那是布哈林上了斯大林的当, 以为合作认罪可能保全性命, 他帮助斯大林制造谎言, 但是仍然被处死。

1967年刘少奇被禁闭在中南海的时候,他的最小的女儿只有六岁。刘少奇分别在1966年10月和1967年7月作了两次"检讨"。他没有对抗文革,但仍不能免除他被"打倒"。

斯大林的另一个手法,是起用某个人来清洗别人,然后再起用另一个人,把这个人打下去。在最高圈子里,他一直使用这样的手段。斯大林先与布哈林联合行动清洗了托洛茨基,然后又是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然后是布哈林自己。斯大林的秘密警察头目也如此数度替换:先是雅戈达,然后杀了雅戈达任用叶若夫,又杀了叶若夫任命贝利亚。

中国的情况相似。1966年5月4日到5月28日,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文革的指导性文件"516通知",清洗了高层领导人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李雪峰在1998年发表的《我所知道的"文革"发动内情》中写道:

"5月11日下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由刘少奇主持。少奇,小平,总理都坐在主席台上,毛主席仍在外地没有回来参加。……听见有人在后面拿着什么材料念。彭真一听就火了,态度激昂,回过身来朝着后面大声说:'谁是第一个喊叫万岁的!'证明历史上是他先喊主席'万岁'的。坐主席台上的少奇马上制止,吵架就停了。"(李雪峰在彭真被"打倒"后接任彭的北京市领导人的职务。原文发表于《百年潮》,1998年,第四期。收入《我们都经历过的日子》,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年,37-38页)

在刘少奇主持的把彭真清洗出去的会上,彭真表白他是第一个喊"毛主席万岁"的人,结果无济于事。还是被批斗、关押。毛泽东死了以后才得以重见天日。

一年以后,轮到刘少奇来做这样的辩白了。

据刘少奇的子女说,1967年4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戚本禹攻击刘少奇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刘少奇非常气愤,对他的儿女说:"我不反革命,也不反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是我在'七大'提出来的,我宣传毛泽东思想不比别人少。"(见上引《胜利的鲜花献给您》)

刘少奇在1945年提出了"毛泽东思想"这个说法,对抬高毛泽东的权力地位有大功劳。但是,取代他的第二号人物的林彪在1960年代发明了一大套关于毛泽东的辞令和生活仪式以及规则,比如"四个伟大","顶峰","万寿无疆","天天读",挥舞小红书,到处建立毛泽东的巨型塑像,到处张贴毛泽东语录,等等。彭真和刘少奇在这一方面要跟林彪竞争,显然是劣势。

林彪红极一时,被称为"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在共产党党章里写进了他的"接班人"地位。不过他在其位只有5年,然后遭到毛泽东的废黜,1971年9月乘三叉戟飞机逃亡,飞临蒙古温都尔汗上空时,飞机坠落机毁人亡。

重要的是,尽管在旁观者看来,这种权力圈子中谄媚最高统治者的竞争,显然已被证明会给竞争者带来灾难,但他们却依然竭尽全力。

这样的历史让人惊异:毛泽东不但可以使千千万万普通中国人被饿死,被打死,被枪毙,被"斗争",被侮辱,而且,对政权的第二号人物,从刘少奇到林彪,也都能让他们悲惨地死去,而且极其顺利,不遭到任何抵抗。这在历史上也是罕见的。

毛泽东若不在1976年死亡,一轮一轮的清洗还会继续下去。似乎只有他的死亡才能停止这种恐怖。苏联也如此,斯大林死亡后,最为积极执行他的恐怖政策的贝利亚被处死,此后政治局委员们不再被杀戮。

这是偶然的相似吗？

不过也不尽然仅仅是相似。中国的皇帝虽然杀戮“功臣”，却并不曾也不可能像毛泽东那样动员全国上下，包括老人和孩子都来挥拳高呼“打倒刘少奇”。斯大林虽然杀害政治局委员，但是并没有像毛泽东那样让全国的学校都停课三至六年，让学生参与“揪刘”和对刘少奇的“革命大批判”。毛泽东为其“打倒刘少奇”的事业而让老百姓付出巨大经济和道德代价的做法，是古代皇帝和斯大林都望尘莫及的。

5, 毛泽东对文革的细节性指导

毛泽东是文革的发动者和领导者。他对文革不但作整体性控制，也做细节性指导。

毛泽东亲自撰写“516 通知”这样的文革纲领，在天安门城楼上八次接见红卫兵，提拔无限吹捧他的林彪当“接班人”，建立以他妻子江青为第一副组长的“中央文革小组”，发动“打倒刘邓陶”，支持所谓“一月夺权”，组织“革命委员会”，发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等等，这些无疑都是对文革的总体性的指导。另一方面，他显然对指导细节也相当有兴趣。

1968 年 7 月 28 日，毛泽东接见北京五所大学的五个“造反派组织”的领袖。谈话的主要内容是毛泽东派“工人宣传队”进入大学。就在结束谈话之前，毛泽东的话题忽然转到了刘少奇的身体上，他说：“听说刘少奇也救活了。刘少奇，薄一波几乎死了，得了肾炎，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四种病。四，五个医生抢救，两个护士才救过来，脱离危险期了，你们听说了吗？”

这段话有文法错误，但基本意思是相当清楚的。毛泽东的长篇谈话就结束于此。这段话和前面的谈话内容并不相衔接，突然转到刘少奇身上，显然是因为毛泽东的心里在牵挂此事。这一谈话发生在刘少奇被连夜建筑的高墙隔绝一年之后，距离刘的死亡也还有一年多的时间。看来毛泽东对刘少奇的情况了解得很清楚，连有几种什么病都记得很清楚。

在刘少奇的子女的文章《胜利的鲜花献给您》中提到，1972 年他们给毛泽东写信，请求见父母。毛泽东批示让他们到监狱见母亲，批示的开头一句是“父亲已死”。

从这个情节可知，毛泽东对刘少奇死后子女探监见母亲这样的细节，也是亲自控制的。

另一个例子，是林彪乘飞机出逃时，其女林立衡没有随从，而是向上报告了她父母的动向。但她后来也被监禁。据《我所知道的叶群》（官伟勋，中国文学出版社，北京，1993，180 页）说：“1974 年 7 月 31 日，毛主席收到林豆豆的信，做了批示：“解除对林立衡的监护，允许她和张清林来往，她和死党有区别。”

张清林是林彪夫妇生前为其女儿选好的“对象”。这段批示也显示毛泽东亲自控制林的女儿与其对象来往这样的细节。那时候林彪已经死了三年。

这样的细节令人可以推断，为禁闭刘少奇而连夜筑墙，停发他服用的糖尿病药，他瘫痪后还把他绑在床上，以及最后在浑身发臭的情况下运送到开封囚禁，也都可能直接来自毛的命令，而不是下面的人自作主张的。

还有一个例子。1966 年 7 月毛泽东决定撤销工作组，北京大学“工作组”组长张承先遭到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学生的皮带抽打，戴高帽子，坐“喷气式”（指被反剪双手弯腰低头被斗的姿势）。8 月 17 日，毛泽东的指示被传达：“张承先可以和工作组一块出来（指离开北大）。张承先有心脏病，有错误不要整

死。”(见《北京大学纪事》，65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张承先文革后发表的文章也提及此事。)张承先地位没有刘、林那么高，是一个省部级干部。

毛泽东就是这样直接地，细致地控制某一个人是否应该“整死”。

上述几例，仅仅是我们现在能看到的，被大大删节过了的历史事实。毫无疑问，大量更多的阴暗恐怖的细节，则由于明显有损于毛泽东或者共产党的形象，而始终被掩盖着，或以某种手段永远抹掉了。

对迫害过程中细节的这种关注，体现了毛泽东的个人风格。这种关注的后面是一种对迫害过程的欣赏，他不仅欣赏对从普通人直到他的战友、辅臣的生杀予夺，也欣赏受害者及其家人的丝丝痛苦。

这种施权力于他人并欣赏对方的痛苦的心理倾向，可能很多人都有，并不奇怪。但是，在常规情形下，残害、施暴于他人，是被法律、道德制约并制裁的。在中国的专制底下，毛泽东有无上的权力，没有法律也没有任何人能制约他，他内心的残忍恶劣的愿望可以肆无忌惮地发泄。文革更是给这种迫害心理提供了宣泄和暴露的极大机会。

毛泽东年轻时代就崇尚不受制约，为所欲为的哲学。1970年，他告诉美国记者斯诺他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斯诺不懂这句歇后语的意思，理解为毛泽东觉得自己像一个孤独的云游世界的和尚。)后来审判“四人帮”的时候，毛泽东的妻子江青在法庭上还傲慢地引用毛泽东的这句话。

“无法无天”，就是既不遵循法律，也不受制于道德。传统中国人相信，每天行为是善是恶，都在“天”的监察之下，对“天”的畏惧使人对自己的行为有所约束。奉行“无法无天”的哲学，那么就没有任何恶行是不敢做的了。毛泽东向往并实施“无法无天”，也许正是传统在中国崩解的一个明显例证。他用“无法无天”所作的自白，提供了一个角度来解释为什么从1966年到1971年，毛泽东不但害死了无数普通的中国人，也把他身旁的两个第二号人物刘少奇和林彪都“整死”，他却从来没有感到惊恐、负疚或罪恶感。这种自觉追求的“无法无天”哲学该是他的精神支柱之一。

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中描写那些以迫害人为职业的“肃反”工作人员时，有一段议论，他说，弗洛伊德把人的基本欲望归结为饮食和性是不够的，应该加上一项：权力。他引述了托尔斯泰是怎样描写当一个人对自己面前的另一个人有生杀大权时的那种快乐，这也就是那些“肃反”人员所得到的快乐。

关于这一点，索尔仁尼琴只写了短短的一页。他并没有试图建立新的弗洛伊德式的心理学理论。不过，不但苏联的故事可以给他的说法提供大量证据，中国文革的故事也可以为其提供大量证据。仅本文提及的几例毛泽东很琐碎的批示便显示，对毛泽东来说，生杀予夺是相当有乐趣的事情。

6, 刘少奇和文革暴力

1966年8月，刘少奇从第二号人物一下子跌到第八的时候，他被指责为派出“工作组”，压制了学生运动，阻碍了文革。这种说法当时占有绝对强势。由于没有清算文革历史，这种说法在文革以后还有相当影响。

刘少奇子女写的《胜利的鲜花献给您》中还在强调，派工作组到大学中学的决定是刘少奇请示毛泽东以后作的。刘少奇的子女要说明，对刘少奇的指责不符合事实，刘少奇没有自作主张去作毛泽东不喜欢的事情。他们在为其父辩解时所用的逻辑是，如果派工作组是毛泽东同意的，就不是刘的错。他们不把法律和道德当作评判事情的准则。

事实上,如果承认文革是罪恶,那么对刘少奇以及继任他的位置的林彪来说,他们的主要罪责应是他们在第二号人物的位置上时,都充当了毛泽东推动文革的第一号助手,也就是第一号帮凶。

事实非常清楚,派工作组就是为了发动对教员和学校领导人的攻击。若仅仅是为了"压制学生运动",依靠原来的学校领导人足矣。1957年,大学领导人把大批学生划成"右派分子"并对他们实行严厉处罚和迫害,非常顺手,毫不困难。

上文已经说到,刘少奇主持召开了制定"516通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派工作组到大学和中学,就是为了贯彻"516通知"的精神,到教育界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那里"夺权"。

没有工作组的发动和领导,学生们怎么敢起来攻击学校当局,学校都是由共产党党委领导的。在共产党中央的支持下,学生才开始大规模的攻击学校领导,把他们统统说成是"反革命修正主义黑线"。

刘少奇的妻子王光美参与清华大学工作组。他们撤销了时任高教部长,清华大学领导人的蒋南翔的职务。

刘少奇的一个女儿当时是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一中学高中一年级的学生,17岁,她最早开始在中学里攻击学校领导人,并当上了该校文革委员会的头头。

北京的中学在6月初停课,工作组也在那一时期进入学校。刘少奇1966年6月20日和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一中学的工作组成员的讲话中说:

“刘超,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是可以肯定的了。”“先斗刘超还是早了,先攻敌人的弱点,再攻敌人的中坚,先打最容易打的仗,要孤立主要敌人,那几个都是受到刘超指挥的,要争取几个人起义。首先要争取学生,教员也要争取”“要斗刘超,现在不斗。不是不斗,积极准备斗,不是停下来,是积极准备。”

刘超是北京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的校长及中共支部书记。他在两个星期里被国家主席定性为"敌人",既不能自我辩护,也无处可离开,更不能反抗。

以堂堂国家主席的地位,把一个中学校长称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敌人",亲自指挥,策划工作组以及他的17岁的女儿攻击这位校长。这样冷酷无情,违背法律程序的迫害,直接来自刘少奇。

这不是刘超一个人的遭遇。在1966年6月7月,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的时候,全中国学校的老师校长都受到攻击。在笔者所作的调查中发现,不但在北京,连遥远的云南边疆思茅专区,交通落后,学校稀少,也把所有的中学教员都翻山越岭召集起来,集中居住,不准回家,命令他们"交代问题"。

北京大学是全国最早派进工作组的。工作组6月初进校后,立即"揪"出了一大批人"批判""斗争",很快发生了教员自杀的事情。1966年6月18日,在北京大学发生了未经工作组允许的殴打"黑帮"的暴力事件,后被称为"618事件"。那一天,在全校范围内,一些学生和工人"斗争"了几十个已经被工作组"揪出来"的"黑帮分子":把他们拉到高台上下跪,撕破他们的衣服,给他们戴高帽子,把厕所的污物篓子扣在他们头上,对他们拳打脚踢,等等。

笔者访问过"618事件"的受害者胡寿文老师,他那时是北京大学生物系讲师。他说,几个学生冲到他前面,把一根绳子往他脖子上一套,拖了他就走。胡寿文那时35岁,腿脚还很灵便,但他跟不上学生的移动速度,跌倒在地,那几个学生并不因此止步,继续拖他,绳子勒住他的脖子,胡寿文不能喘气,几乎

昏死过去，他滚爬中用双手使劲拉住绳子，才稍微松弛一点绳子的紧勒，没被勒死。

虽然那天被暴力“斗争”的人，也都是工作组的攻击对象，但是北大工作组不允许不经过他们批准的“批斗”行动。工作组为此写了第九号简报，报告他们如何制止这种现象。刘少奇向全国批转了这个简报，并且写下批语说：

“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情况，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处理。”

这个批语表明，刘少奇不反对“斗”，但反对“乱斗”。

一个多月以后，毛泽东的妻子江青等来到北京大学，在全校万人大会上宣布“618事件”是“革命事件”，工作组错了。紧接着，1966年8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文件（编号是中发〔66〕392号）撤销载有刘少奇上述批语的文件。

这是文革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大规模的暴力迫害立即从北京大学兴起并迅速发展至全国。“618事件”中使用过的暴力手段被广泛运用并且大大强化。前一阶段被工作组“揪”出来的人首先遭到残酷虐待和拷打。8月5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红卫兵学生打死了副校长卞仲耘。8月下旬，暴力迫害发展到北京每天有三位数的教育工作者和普通市民被红卫兵打死。尸体堆积在火葬场来不及焚烧。这是文革中最血腥的阶段之一，这是中国和世界文明史上少见的残酷事件。

刘少奇也在此时失去了他的第二号人物的地位。事情的发展过程很清楚：发动暴力迫害和罢黜刘少奇，是同时发生的。

刘少奇并没有反对毛泽东的文革计划。他积极推行“516通知”，甚至亲自组织北师大一附中“斗”校长刘超，他只是反对北大“618事件”，反对“乱斗”。当他因工作组之事被毛泽东指责之后，他很快作了自我检讨，他没有表示异议——至少我们至今看不到这样的史料。

刘少奇平反后发表的文章里，描写了1967年8月5日，刘少奇在中南海被“斗争”后押回办公室时，他拿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表示抗议。

这一抗议似乎义正词严，场面也够戏剧性，但读者们却会质疑：这时候刘少奇想到宪法了，他早干什么去了。在此之前，多少违反宪法的事情都发生了，他是国家主席，他说了什么，难道刘少奇真的以为，那部宪法并不需要实行，而是要等到他这个国家主席失去自由了，才需要实行。

老百姓并不糊涂。不过，这种质疑不会被发表在报纸的“读者来信”里。

7、“揪刘”的“造反派”的下场

1967年7月8日，在中南海的红墙外面，发生了当时称作“揪刘行动”。以大学生的“革命造反组织”为首，据说有二十万“革命群众”，驻扎在中南海墙外，要求把刘少奇“揪出中南海”。

发起这一行动的是北京建筑工业学院的“造反派”，他们甚至举行了“绝食”行动以制造轰动效果（假的）。

当时的场景是颇为壮观的。中南海西侧的府右街人山人海，水泄不通，锣鼓喧天，口号声歌声不断。贴在红墙上的大标语一张纸只写一个字。刚成立不久的新权力机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给学生提供大量纸张印刷报纸和传单。全市各个单位的“造反派”都前来支持。大卡车从郊区的大学校园运来食品，宣传品和广播器材。学生组织的报纸上还留下关于这一行动的一篇纪实文章，题目叫做“三十一天慨而慷”。（这是从毛泽东的诗句“天翻地覆慨而慷”演化来的。）

三十一天慷慨激烈的"揪刘"行动,学生们成为一时的风云人物。和他们在红墙外的行动配合,红墙内对刘少奇的"斗争"残酷程度在升级。但是学生只得到了刘少奇的书面检讨,始终连刘少奇的面也没有见到,也未有机会进入中南海。

可笑而又可怕的是,1970年,在新一轮"清查516运动"中,1967年的"揪刘"变成了"围困中南海反革命事件"。

"清查516运动"的逻辑是:当时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已经被"打倒",戚本禹曾经出面直接支持"揪刘",学生领袖在"揪刘"中和他接触,所以就是参与了"反革命活动"。在当时关于这一事件的正式"报告"中,一方面继续把刘少奇称作"刘贼",另一方面,对组织"揪刘"的学生,作结论为"以'揪刘'为幌子,用'绝食'手段,造舆论,拉队伍,搞暴乱事件,以反总理为目标,矛头直接指向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进行反革命夺权。"(北京建工学院调查组,1971年2月25日,油印打字稿)

一批"揪刘"的积极分子被"隔离审查"和"斗争",被强迫"交待问题"和"认罪"。在这个过程中,北京建筑工业学院机电系二年级的女学生董临平上吊自杀。她20刚出头。她是该校"造反派组织""红卫兵八一战斗团"的头头之一。

文革的沉重铁轮可以碾死第二号人物刘少奇以及曾经攻击刘少奇有功的20岁的年轻大学生。

董临平的死亡,其实和刘少奇的死亡有内在联系。一个有权力的人,在整个社会奉行非正义的时候,也可能会成为牺牲品,而如果他未曾试图制止非正义,则他只是他自己的祭品。(原载《民主中国》2003年6月号)

毛泽东是历史上头号暴君

暴君在历史上多如过江之鲫,尤其是在专制主义传统根深蒂固的东方国家。进入二十世纪以来,一大批新的暴君粉墨登场,这些暴君都是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以革命和理想的名义对人们实行暴政。他们一般以建立新制度、新秩序为号召,并且有一套煽动阶级仇恨,民族仇恨或宗教仇恨的意识形态为理论根据。二十世纪暴君之多、之残酷都远远超过了以前的世纪,这正是二十世纪人类遭受无与伦比的苦难与浩劫的主要原因。毛泽东就是二十世纪新型暴君的一个代表。人们以往有一个错觉,认为希特勒才是人类历史上头号暴君。但事实证明,这个头号暴君的称号轮不到希特勒,或者说在毛泽东之前希特勒才是头号暴君。毛泽东出现之后,头号暴君非毛泽东莫属。

毛泽东之所以是人类历史上头号暴君,首先是因为死于毛泽东独裁暴政下的生灵的数量远远超过了任何别的暴君,当然也超过了希特勒。

希特勒独裁统治德国十二年,又发动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战祸——第二次世界大战。即使这样,希特勒应该为其死亡负责的生灵也就三千多万。第二次世界大战总共造成六千多万人的死亡,其中一半即欧洲战场和大西洋战场死亡的三千多万人应该由希特勒负责,这三千多万人包括近两千万苏联人,五百多万德国人,被希特勒实行种族灭绝的五百多万犹太人,加上其余欧洲各国阵亡者二三百万人。至于亚洲和太平洋战场阵亡的三千多万人则应由日本法西斯军人负责,与希特勒没有任何关系。

而在毛泽东二十七年的独裁暴政下,因各种原因被迫害死的无辜的中国人远远超过三千多万人。仅仅由于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导

致的三年大饥荒就饿死三千多万中国人，另有两千多万人死于毛泽东时代开展的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和政治迫害，如中共建政之后的土改、镇反、反右派、反右倾，四清运动以及文化大革命。总之，毛泽东在他统治中国的二十七年里，最少祸害死了七千多万中国人。

一个暴君欠下如此多的血债和人命，毛泽东在人类历史上绝对是首屈一指，再没有任何人能与他相比。论个性的残暴与歹毒，波尔布特与萨达姆无疑都超过了毛泽东，但因为他们统治的都是人口较少的小国，所以，他们再残暴歹毒，滥杀无辜，其祸害死的民众也不可能赶上毛泽东。在毛泽东之前，希特勒当然是人类历史上头号暴君；但毛泽东出来之后，希特勒只能屈居第二，他的罪行已被毛泽东远远超过了。

毛泽东之所以是人类历史上头号暴君，还因为他所迫害的对象非常广泛，社会各集团差不多无所不包，这一点也超过了历史上所有的暴君。如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一下子活埋了四百六十五个儒生，对知识份子和文人可谓残暴之极。秦始皇制定的严刑峻法，残酷镇压老百姓，说明他对民众也是残暴无情的。不过秦始皇对于帮助他统一六国的文臣武将，还大多是善待的。所以秦始皇并没有大开杀戒迫害功臣的记录。明太祖朱元璋也是历史上有名的暴君，他统一中国之后，几乎杀光了跟随他南征北战的文臣武将，在残杀功臣方面，朱元璋可谓历史上第一人。朱元璋也搞过一些文字狱，杀害了一些文人。他对贪官污吏也深恶痛绝，凡贪赃白银六十两以上者即处死，而且剥皮实草。不过朱元璋是爱护民众的，他对贪官污吏惩处如此之严酷，就是为了让官员们爱护和善待百姓。因此之故，尽管朱元璋对功臣和官员残暴无比，普通民众却对他歌功颂德。

毛泽东执政之后不仅大肆迫害残杀开国的功臣和他的老战友，像彭德怀、刘少奇、林彪、贺龙、谭政、许光达等一大批开国元勋被迫害致死，而且还株连其亲属，害得他们家破人亡。从中共建政到文化大革命，毛泽东还发动了多次思想文化批判斗争和政治运动来摧残迫害知识份子，厉行最严酷的思想文化专制主义，学者、文人、艺术家被迫害致死者无以数计，著名的有吴晗、邓拓、翦伯赞、吕振羽、李达、老舍、杨朔、赵树理、傅雷、叶以群、饶玉泰、熊庆来、赵九章、肖光琰、熊十力、严凤英、孙维世、上官云珠、盖叫天、马连良、周信芳、李广田、顾圣婴……，中国的第一个体育世界冠军——从香港回国报效的容国团也在1968年被逼自杀身亡，连毛泽东多年的秘书——田家英也因说了几句毛泽东不爱听的真话被逼自杀。

在毛泽东时代，中国知识份子命运之悲惨，远远超过了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包括秦始皇时代。对于普通民众，毛泽东也缺乏起码的仁爱之心，不要说他对上亿中国“黑五类分子”的迫害前所未有，就是对死心塌地忠诚于他、政治上对他没有任何威胁的普通农民，毛泽东也没有基本的怜悯之心。1957年11月，他在莫斯科会议上就公开讲：“不怕打第三次世界大战，不怕人类有三分之一甚至二分之一在世界大战中死亡。”他还大言不惭地说，“中国有六亿多人，死上一半还有三亿多呢，我怕谁！”是啊，一个连自己国内人民死上三亿多都不怕都敢赌的人，还能怕谁？只能是西方的政治家怕这样的独夫与好战狂人。

在毛泽东心目中，三亿多中国民众的生命无足轻重，他不怕牺牲掉三亿多中国人民的生命来跟西方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毛泽东如此冷血的豪言壮语，令本来就冷血的各国共产党领袖们听来都不寒而栗。这样的豪言壮语，是希

特勒都说不出的，只有毛泽东敢夸这样的海口。好在第三次世界大战并没有打起来，没有满足这个暴君渴血的欲望。

但两年以后，毛泽东人为制造的大饥荒就造成三千多万中国农民的死亡。面对着这场空前绝后的大饥荒，毛泽东的处理也是空前绝后，冷血至极。在他明知道中国饥荒空前严重的情况下，他不仅不向国际社会寻求粮食援助，而且继续大量增加对外的经济和军事援助，从1959年到1961年，中国对外援助总额达12.6亿元人民币。由此可见，在毛泽东心目中，几千万中国农民的生死轻如鸿毛，也就是说，毛泽东对中国普通民众也是残忍冷酷至极。

在迫害知识份子上，毛泽东的手段也远远超过了希特勒。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很快就开始了焚书和迫害知识份子的活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卢森堡、爱因斯坦、佐拉、罗曼·罗兰、贝特兰·罗素、列夫·托尔斯泰等众多思想家、科学家、文学家的作品被付之一炬。但希特勒只是“焚书”，并没有“坑儒”，他还不想自己的双手沾满德国知识份子的鲜血。希特勒只是从德国大学和科研机构里解聘了一批学者和教授，逼着他们另谋出路。希特勒在迫害德国知识份子时，起码还有几分君子风度：即这些被解雇的德国学者、教授和艺术家可以随便出国定居，所以爱因斯坦、托马斯·曼和亨利希·曼等一大批一流的学者、艺术家通过德国外交部办理移民手续，移居国外。在12年纳粹统治期间，不仅没有一个德国的学者、思想家与艺术家被迫害至死，也没有一个德国的知识份子遭到批斗与侮辱。而到了毛泽东这里，他迫害起中国的知识份子文人来，其手段比希特勒要卑劣残酷得多。

文革期间，连老舍、吴晗、翦伯赞、吕振羽、李达、季羡林这样的作家学者都受到残酷的批斗和凌辱，戴高帽游街，被皮带抽打，甚至遭受自己的学生的拳打脚踢。残酷的精神和肉体折磨，逼迫不少知识份子含冤自尽。他们并没有希特勒统治下德国知识份子的幸运，因为毛泽东决不允许任何一个中国的知识份子移民海外。别说移民海外了，当年轻仅因为有一点海外关系就可能成为受到迫害的充分的理由。毛泽东从没有批准任何一个学者知识份子自由离开中国大陆，他们只能在这个地狱一般的国度里面饱受各种迫害与摧残。极个别冒着极大风险偷渡出逃者，立即就会被毛泽东的独裁政权宣布为叛国者。1966年11月，著名音乐家马思聪就是因为受不了残酷的迫害，先偷渡到香港，然后移民美国，立马就被毛泽东政权宣布为叛国者，缺席判处死刑。由此可见，作为东方的暴君，在迫害知识份子上，毛泽东连希特勒的君子风度都没有，实在无耻卑劣至极。

毛泽东的残暴，不仅指向了中国差不多所有的集团与阶层；而且更可怕的是，他的独裁暴政使中国民众残暴野蛮化，严重毒化了国民的性格。在共产党开国前后，毛泽东已经教唆、驱使农民进行了血腥残酷的暴力土改，农民们将无以数计本来善良本分的地主富农活活打死，甚至活埋。成千上万的地主家庭在肉体上被彻底消灭，包括白发苍苍的老人和懵懂无知的幼儿。那些残忍嗜血、无法无天的农村地痞无赖暴徒就成了共产党在农村进行暴力土改的积极份子。毛泽东血腥残酷的暴力土改使中国农民本来就匮乏脆弱的善良仁慈急剧流失，野蛮兽性疯狂滋长。

文革期间，农民被煽动起来的兽性再一次疯狂爆发，北京大兴县与湖南道县农民对地富、四类分子的疯狂屠杀令举世震惊。仅在北京大兴县，从1966年8月27日至9月1日，就屠杀无辜地富、四类分子325口，最大者80岁，最小者才38天，有22户人家被杀绝。从1967年8月13日到10月17日，

湖南道县无辜地富、四类分子及一般群众被杀和被逼自杀 4519 人。受道县杀人事件影响，全零陵地区当时共有 7696 人被杀，1397 人被逼自杀，致残 2146 人。其中未成年人 826 人，年纪最大的 78 岁，最小的 10 天。与杀人事件有直接牵连的 14000 多人，差不多都是农村干部和群众。

道县大屠杀中很多四类分子全家被杀绝。自从清末沈家本修订刑法、废除族诛以来，从清末到北洋政府、再到国民党，无法无天的暴民与暴君也没有将罪人全家杀绝的“壮举”，况且大兴与道县的被杀者本来就没有犯罪，被杀仅仅因为他们的家庭出身。毛泽东暴政纵容唆使下的农民的残暴可谓旷古少见，于此可见毛泽东的暴政将部份中国农民兽性化到何种地步。

文革期间，中国全民各阶层都像野兽一样乱打乱杀，残忍至极，见不到起码的文明与人道。学生批斗、侮辱、打死老师司空见惯，群众批斗、侮辱、打死干部习以为常。各派群众武斗棍棒刀枪大炮并用，死伤枕藉，血流成河。同学之间、战友之间，同事之间、乡里乡亲之间，甚至亲人朋友之间都成了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死敌。人们挖空心思琢磨出各种非人的酷刑凌辱折磨人，毛泽东对张志新动用的酷刑折磨可谓世界历史上空前绝后的惨毒下流。当时 960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到处都是冤狱与屈死的冤魂。

文革是毛泽东指挥唆使下全民野蛮的大爆发，大多数人都不同程度地参与过各种各样的犯罪与暴行。一句话，毛泽东通过暴力土改、文革使中国民众残暴野蛮化，使中国人远离了文明与人道。这一点，又是斯大林与希特勒无法相比的。

斯大林当年对富农的残酷迫害与对苏联党政军干部、知识份子的大清洗大屠杀都是通过国家专政机器实行的，没有将苏联普通民众卷进这些暴行中。

希特勒最令人发指的暴行——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也是瞒着国际社会与德国人民秘密进行的。希特勒知道要灭绝一个民族影响实在太恶劣，因此那些灭绝犹太人的奥斯维辛集中营、达豪集中营都是由德国秘密警察、党卫军负责从事屠杀犹太人的罪行。不要说普通德国人民，就连德国国防军的高级将领都不知情。德国人民知道纳粹灭绝犹太人的暴行，是在 1945 年春天苏联英美盟军解放了这些集中营之后。也就是说，普通德国人民对于屠杀、灭绝犹太人既不知情，更未参与。

因此，斯大林与希特勒的暴政并没有使苏联或德国全民残暴野蛮化，它们的后遗症也远远不如毛泽东的暴政更可怕，更深远。就因为斯大林与希特勒并没有使苏联或德国全民残暴野蛮化，所以，很快这两个暴君就被自己的人民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而永远不能翻身。而毛泽东 27 年的独裁暴政早已使中国人的心灵远离文明与人道，将残暴深深地烙印在这个民族的性格中，所以这个历史上最大的暴君不仅没有在中国遭到应有的清算，而且至今仍被一些中国人顶礼膜拜，这才是这个国家最大的悲哀。因为这就潜藏着中国重新被暴政荼毒的祸根。

德国人与苏联人永远抛弃了现代的暴政，中国人因为民族的心灵已被毛泽东深深地毒害，随时还有暴政降临的巨大风险。君不见今日毛左法西斯分子一再呼唤、盼望文革吗？环顾全球，有哪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面临着法西斯化的巨大的现实危险？可怜的民族！可悲的国家！你何时才能真正走出毛泽东暴政的可怕阴影呢？

毛泽东与希特勒作为人类历史上两个最大的新型暴君，与古代的暴君相比，他们还有一套粗制滥造的意识形态信条为其万恶的暴政辩护。两个人都

是斗争哲学的狂热信徒，都相信斗争是万物之源，斗争推动着社会的进步，历史的发展。毛泽东的人生哲学就是他自己说的“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因为毛泽东迷信斗争，所以在国内搞阶级斗争扩大化，七斗八斗没完没了，晚年的他更是斗得中国国无宁日，民不聊生。

希特勒公开宣称：斗争就是一切，美德存在于流血之中。不过他俩的斗争哲学也有重大差别：毛泽东迷信的是阶级斗争，希特勒信奉的是种族斗争。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祸害的主要是中国人，五千多万死于毛泽东暴政下的绝大多数是中国人，而死于希特勒暴政下的绝大多数不是德国人而是外国人。希特勒必须为之死亡负责的 3000 多万人，只有 500 多万是德国人，剩下的基本都是外国人。虽然外国人也是人，站在整个人类角度考虑，单个个体的生命一样重要，但现在人们考虑问题毕竟还要从国家民族的利益出发。

对中国人来说，毛泽东的罪孽确实超过了希特勒。希特勒并没有大规模迫害德国人，他的主要罪孽是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欧美各国人民 3000 多万人的死亡。毛泽东的主要罪孽则是在中国搞内斗，让中华民族搞自相残杀。如果再加上毛泽东为夺取政权进行的残酷内战中的牺牲，则毛泽东一人背负了近 9000 万中国人的性命。一个独夫欠下如此众多国内人民的性命，毛泽东是人类历史上头号暴君是板上钉钉、永难翻案的事情。连中共元老方毅都说，“历史上最大的暴君要数他。连朱元璋也不如他。”信哉此言。

毛泽东集古今中外骗术之大成

毛泽东集古今中外骗术之大成自号“阴谋加阳谋”，他当面是人背后是鬼，不但骗敌人也骗自己人，不但骗普通民众也骗党内同僚，不但骗友人也骗亲人，不但骗中国人也骗外国人。毛泽东行骗一生骗尽天下人。

上世纪四十年代，当国军追剿共军，胜利在望之际，毛泽东、周恩来向美国特使马歇尔高唱“和平”与“民主”的调子，请求美方施压于蒋。美方上当，强力压蒋。蒋被迫停战后，共军养精蓄锐，伺机反扑，竟至东北战事逆转。

七十年代初，中共处境空前孤立，不仅在国际上如此，在共产主义阵营也如此。毛假意联美抗苏，意欲为自身脱困，美国人轻信了毛泽东夸大的“苏共威胁”，竟许诺为毛泽东政权提供“安全保障”。基辛格、尼克松等人的迷失，使没落的毛泽东政权捞到救命草。

众所周知中共的崛起和毛的发迹，自始至终，在俄国人的扶持之下。

从中共诞生之日起，苏共就派出顾问，提供金援，力挺中共，这是中共先后能在江西和陕北立足的根本保障。仅在延安时期，苏联向中共提供的援助，每月就高达 30 万美金。按年换算下来，相当于现在的每年 5 千万美金。军火支援更是不计其数，尤其二战后期，苏军攻入中国东北，击溃和迫降日本关东军之后，将收缴的军火大量转移给中共军队，使中共的实力突增马上可与国军决战。

中共建政后，苏联更是倾力援助，所有的重点项目从技术、资金到人才竟都依赖苏联支援，当时毛泽东说过：没有俄共，就没有中共。但当中共建了政成了气候，最后的结果竟是与苏共翻脸决裂，成为国际社会的“大惊奇”，即便在西方看来也难以理解？

想当初俄国人在几番犹豫之后全力挺毛，认定它权力越强越能成事，于是毛泽东羽翼渐丰，势不可挡，然而正是这个毛泽东肚子里早有了一盘“阴毒的棋”，如何利用俄国人，如何玩弄俄国人？如何抛弃俄国人？甚至干得

出鸡鸣狗盗的勾当，干脆从俄国人那里偷走核技术！

当赫鲁晓夫推倒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在苏联倡导改革之时，毛自感它在中共党内的独断专行难以为继，为自身权、欲、谋，干脆与苏联撕破脸皮，过往交情一笔勾销，恩断义绝。如此忘恩负义的、厚颜黑心，古今中外无出其右者。可怜“北极熊”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其悔恨可想而知。

为了反苏绝苏，毛不惜在中国国内发动文革浩劫，意在揪出“中国的赫鲁雪晓夫”，刘少奇等人惨遭清洗的同时，整个中华民族陪着遭殃，红色恐怖、鬼哭狼嚎、经济崩溃、饿尸遍野。真像曹操所说“宁叫我负天下人，不叫天下人负我”，毛之“黑心肝”活脱脱如此。

毛泽东自称不信神鬼，是“无神论者”。但他一生迷信，经常抽签，以决行止。众所周知的是：1949年，进京前，毛曾到五台山抽签。据传，经此抽签，他定下进京时间（9月9日）和防卫安排。如果这些还仅仅是传闻，那么，曾由《广州日报》连载披露的，却是不争的事实：文革爆发前不久，毛到杭州灵隐寺抽签，抽得上签：威命不可挡。遂决意发动文革。

毛泽东自誉天不怕，地不怕，也不怕鬼神，号称大无畏。实际上，毛临死前的表现与官方喉舌一贯塑造的伟人形象大相径庭。据其身边以泪洗面。每一念及死神将至，就如临地狱，神情悲厉而恐惧。

毛的私人医生李志绥记录：毛最后一次从昏迷中醒来，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李医生，还有没有办法？李说：我们会想办法的。毛脸上立即显露两道欣慰的红潮，然而，就在这一瞬间，心电图的曲线变成平线，毛死亡。

这一情形表明，毛在死神面前，也不过就是一个平常人，号称“胸怀世界人民”的“红太阳”，临死前，何曾想到人民、祖国、世界，甚至何曾想到一个多月前发生的唐山大地震，以及那场大灾难夺走的数十万生命。在死神降临的那一刻，毛顾及的，仅仅是他自己，顾恋他那苟延残喘的生命。独夫民贼的最后镜头，不过如此。

精于控制的毛泽东临死前玩了个左中右平衡术，打倒邓小平，剥夺叶剑英军权，似压制右派，未授权于江青、张春桥等，表面上怠慢左派，对叶、邓等留有后路，以观后效，大讲“周勃铲吕安刘”故事，是暗示叶剑英等：如果你们成事，可打我的旗号。对张、江等文革派则公开支持，尽管未授实权，确许之形同顾命大臣，则是暗示希望你们成事，那自然代表我。

毛却把大权交给中间派，“老实人”华国锋，毛赌的是如此一来任何一派得势都将仍持毛旗，号令天下。果然如此，直至今日，中共党内部无人敢出头否定毛。换言之，即便毛泽东已经身死，他却仍然雄居党内权力斗争的不二赢家，死毛主宰活共。

一个未能解开的谜团是，以毛一代奸雄，不可能不留正式遗嘱，毛临死留下一个绝密文件柜，钥匙交由其机要秘书张玉凤保管，毛死后，江青曾向张索要钥匙，张不给，后来张将钥匙交给了汪东兴。华国锋与江青摊牌，汪站华一边，江落败，之后华、叶、汪等决定，毛的绝密文件柜永久封存。

可以推想，毛的绝密文件柜必暗藏中共最重大机密，其中就极可能包括毛的正式遗嘱。据内线人透露，毛泽东亲自指定的接班人并非华国锋而是江青，在江青之后，还指定了一个隔代接班人即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华国锋至多是毛认定的过渡人物而已。

1976年四五事件后，毛泽东任命华国锋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在外界看来那就是接班人态势，但却忽视

了一个关键细节，毛并没有委任华在中央军委中的任何职务，比如中央军委副主席。

而中共党内的政治生态名义上是党指挥枪，实际上是枪指挥党，谁能掌握军权，谁就能掌握党政大权。以至于，当要对四人帮动手时，在军中无职的华国锋，竟要去找找到已被毛死前勒令挂职养病的叶剑英，当时叶名义上还是中央军委副主席，尽管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并非叶剑英，而是陈锡联。

毛对华的保留分明另有意图，江青一派垮台后，由华国锋主导的中央官方喉舌宣传，毛对华曾有手谕，“你办事我放心”。然而 1981 年在法庭上，江青大声道出毛的完整手谕，“你办事我放心，有问题找江青。”

从一个侧面佐证，江青才是钦定的接班人，毛死前没有明确树江，毛是要考验江，以为只要他安排的差不多，布置妥当，江自有办法。毛指望江青能如同当年的慈禧太后，时机成熟时便发动政变杀掉大臣，夺权。机关算尽终有一失，他万万不曾料到，断送毛氏家族世袭统治的竟是那个“老实人”华国锋。在毛身后，华竟先发制人一举发动政变，逮捕江青、毛远新等毛家亲属亲信，自立为英明领袖。

毛泽东是中共的标志，影响中共至今，否定毛就意味着否定共产党，历任中共头目都竭力保毛，目的是要保住共产党，保住他们自己的既得利益。中共充满了暴政、杀戮、谎言、欺骗等本已不堪的形象，不论怎样进行精美的包装，都无法掩盖背后的血腥和残酷，对此，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已然洞见。

揭毛是打开未来中国的一把钥匙，有朝一日毛像从天安门城楼上卸落，毛尸从天安门广场移除，毛脸从人民币上抹去，东方古国必是另一番天地。

转载网文：毛泽东到底算什么人？（笔者注：网上批判毛泽东的文章很多，顺手摘取一篇，不意味我赞赏他的全部观点和文笔）

赫魯曉夫一針見血地說：“我一看到毛就像看到斯大林一樣，是一個模子里澆出來的。”毛澤東是典型的農民和封建帝王，是農民中的農民，帝王中的帝王。總司令朱德的秘書陳友群談及，1950 年中宣部起初擬訂的五一口號中，最後兩條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中國共產黨萬歲！”毛澤東在後面親自加上“毛主席萬歲！”

他不具有現代理論與思想，他也不是以現代管道來領導國家的。毛澤東是靠本能與直覺去管理社會，隨性隨意作出重大決定，最重要是他基本是參照中國古代帝王治理方法去管理國家，山呼萬歲顯君威，殘害忠良殺功臣，與人爭鬥寵奸佞，鼓勵告密設東廠，重複謊言文字獄，隨心所欲毀倫綱。沒有寬容、妥協、規則，秩序、公開、公正，誠信、民主、自由等現代社會和民主的生活方式，他是一個熱衷於帝王政治、宮庭政治、密室政治、愚民政治、不講民主科學、厭惡自由法治，是個無法無天的人，他天才地創造性全面地繼承捍衛和發展桀紂始皇的法家治國思想，並把它推上一個嶄新階段，從政治、經濟、藝文全部領域，毛澤東都創下了中國歷史上最驚人與天、地、人鬥的瘋狂歷史紀錄。

毛澤東時代是一個極端專制、萬馬齊喑的時代，他的屬民生活在落後、貧窮、充滿了階級仇恨和瘋狂鬥爭的氛圍中，他的偏執、濫權和邪教式的狂熱讓社會最終不可避免地走向狹隘、愚昧的死胡同，而且都因此給中華民族帶來了深重的災難和浩劫。他缺乏高貴的氣質、寬厚的愛心，也沒有悲憫的情懷、承擔的勇氣。他有堅韌的生命力卻沒有人性的良知，他蔑視人格尊嚴

缺乏人文關懷，心狠手辣鄙夷媚嬌、討厭乞憐，置人於死地而後快。

他不按常理出牌，不受規則約束，跳躍性思維，毛澤東性格固執，他聲稱“性不好束縛”，認准一個道理，絕不隨波逐流，會一條道走到黑，撞了南牆也不回頭。毛澤東的發家歷史很清楚，那就是靠造反起家，靠造反治國。

造反的管道就是發動群眾、依靠群眾、掌握羣衆，他是精於搞羣衆運動的，堪稱羣衆運動的領袖和大家。雖然後來他奪權成功，登上王位。但秉性不改，在後來長達 27 年執政期間，總是習性未變，野性長存。自古都是當家不鬧事，而他偏偏另類，當家仍然愛鬧事，羣衆運動一茬接著一茬，帽子棍子齊飛，亂他自己的黨、亂他自己的國、亂他自己的軍、亂他自己的政、亂他自己的民，陰謀陽謀，人人自危，樂此不疲，從未停止。

他是中國現代歷史上最為邪惡的魔鬼。他和全世界所有官僚專制或者政教合一體制下第一代首領一樣，有著他們一樣共性，即都極具有個性，極富煽動能力，超強語言才能，懂得權術，精通謀略，有很強的人格力量，斯大林如此，霍梅尼如此，希特勒如此，薩達姆如此，金日成如此，卡紕菲如此，波尔布特也如此。他們都是真正的惡人之王。

所以毛澤東最憎恨的對手、改革家赫魯雪夫就一針見血地說：“我一看到毛就像看到史達林一樣，是一個模子裏澆出來的。”他的陰鷙詭譎、唯我獨尊、既不拘小節又查微觀細、既蔑視傳統又固守陋習的多重性格，既是解釋家又是試驗家。既是運動員又是裁判。他年輕時翻天覆地馳騁大地，年老時呼風喚雨指鹿為馬，有時激揚文字顛倒黑白，有時隨心所欲無法無天，他是中華大地上的魔鬼。他兼具農民的粗鄙和舊式詩人風流倜儻的氣質，他的集帝王至尊與農民領袖於一身的衝突組合。我覺得毛澤東，如果以奪權登基這方面來看，他絕對是成功的，但如果從國家建設，制度創新而言，他最後是以失敗告終的，人亡政息，可憐可悲。他一生作惡，斷子絕孫。立志稱王，詭計多端。殘害忠烈，偏執偏信。最終成為孤家寡人，子亡妻囚。

毛泽东是当之无愧的魔中之王。

转载网文：重新评价毛泽东刻不容缓 张清扬

最近，有人在网上发布了央视文艺节目著名主持人毕福剑的一段在私人聚会上调侃的视频，其中涉及他对毛泽东的一句评语：“可别提那个老 XX（bi-yang）的，他可把我们害苦了！”虽说带了点脏字（东北男人的口头语，相当于“他妈的”，并非恶意谩骂），糙了一点，但透露的却是历史的实情和老毕的真情。于是，网络上一下子就炸开了锅，尤其是毛粉，义愤填膺，祭起文革风，穷追猛打，恨不得把“污辱伟大领袖”的毕福剑撕成两半，强烈要求央视严惩老毕，将其开除，据说他们把央视的电话都打爆了。其实大家心里都很明白，许多毛粉是在起哄，借机表现自己，以便获得当权者的青睐，因为他们深知当政者还要靠老毛这张神主牌来维持其一党专政的合法性，即使装模作样也要违心地敬毛。而大多数网友则在网上为老毕的真话欢呼叫好，说认识了一个真实的老毕，没想到在“喉舌”央视里还能有独立人格的自由思想者，失敬了，希望能和他交朋友。

其实，毕福剑骂毛的话算个屁事！这是我们这个假面人社会的普遍现象。莫说老百姓私下口头骂毛，那些体制内的人（包括领导人）有谁不是公开场合说一套，私下说的又是另一套。徐才厚还公开说他的最大缺点是清廉哩！最有名的私房话出自前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之口，他曾私下对自己的弟弟说：“什么共产主义，这都是哄哄老百姓的空话。”即使在能留下记录的网

络（博客、微博）中，那些批毛、骂毛的帖子还少吗？毛粉若真想替老毛捡骂，可能要累得个贼死！大家从《博客中国》网站博文的评论栏里就会感受到真正的民意，可以说，强烈要求清算毛的罪恶乃当今之汹涌澎湃的主流民意，是难以阻挡的历史潮流。

让我们来清理一下在毛死后出现的批毛、骂毛的过程和各种语言层次。

1981年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开启了批判毛泽东的先河，该决议承认毛泽东晚年犯了严重错误，并要彻底否定毛泽东发动的文革。《决议》是邓小平主持通过的，只着重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没有从根本上否定毛泽东的空想社会主义的极左路线。那时，公审毛的亲信四人帮（实际上加他是五人帮），全国人民异常兴奋，而积极紧跟老毛参与文革的老左派正受到审查，新的毛左派尚未出生，正是彻底否定毛泽东的最佳时机。然而，邓小平出于私心（感激老毛饶了他一命）和胆怯，不愿挑起这一历史重担。

的确，邓小平并不认为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是对毛泽东的最终评价。回忆审视那个荒唐、混乱和血腥的年代，该决议对留恋毛泽东时代的极左思潮的遏制，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有着极大的意义。十二年以后，1993年邓小平在上海会议上坦诚地说：“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对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及功过的评价，是受到当时党内、社会上形势的局限的，部分历史是不实的，不少同志是违心地接受的。历史是我们走过来的，不能颠倒，不能改变。对毛泽东一生功过评价，一直是有争论的。我对彭（真）老、（谭）震林、（陆）定一说了，你们的意见是对的，但要放一放，多考虑下局面，可以放到下世纪初，让下一代做出全面评价嘛！”（注：彭、谭、陆的意见乃要求彻底清算毛的罪恶）

陈云则进了一步，说毛泽东“建党有份，建国有功，治国有过，文革有罪”，正式把毛泽东定性为罪人，要求把毛从神坛上请下来。

后来有体制内的学者辛子陵的著作《千秋功罪毛泽东》问世，该书的影响很大，毛泽东是中华民族罪人的形象开始在人们心中确立。随后又有体制内的历史学者高华所著《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揭露毛泽东通过种种权术登上中共权力巅峰的过程。更有近期茅于軾所写的《把毛泽东还原成人》，均引起社会的正面反响。评毛泽东的书籍和文章可谓汗牛充栋，但主调都是负面的，彻底颠覆了毛泽东原有的光辉形象。

曾兼任过毛泽东秘书的李锐更进一步评价毛泽东是“功劳盖世，罪恶滔天。”

于是，党内人士公开认定毛泽东是罪人，已无人反对或质疑！在党内定性的指引和鼓舞下，党外的知识分子加入到了公开批判毛泽东的行列，他们比较理性，所用语言也较文雅，批到顶也不过是罪魁、暴君（毛就自诩是历史上的暴君秦始皇），并将其列入现代史上的三大恶魔：斯大林、希特勒、毛泽东。但到了平民百姓那里，话就很“糙”了：用谐音称呼“蠢贼洞”，以暗语“纪念堂里的那块腊肉”损他，骂他老流氓（政治 + 生活），老混蛋，老B养的……各种骂人的话应有尽有。

试想，在他统治时期，杀戮、整死、饿死等非正常死亡的人达数千万人，制造了无数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人间悲剧，在他的教唆之下发生的惨无人道兽行令人发指，不忍卒闻，老百姓骂他几句难道不应该吗？是中共的继承人为了一党专政之私，非要将他作为合法性的神主牌供奉，不愿与这个民族

的罪人切割，才造成了现今社会思想严重混乱的局面，并滋养出了一群投机和愚昧的毛左，要特别指明，当中共党内处于批判毛泽东的高潮时，现今的毛左还不知道在哪个娘胎里躁动哩！

毛左派是邓小平只改经、不改政的瘸腿改革的副产品。邓的无原则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和“白猫、黑猫抓到耗子的就是好猫”，放手让权力介入市场，催生出权贵资产阶级，把中共推进到全面腐败的深渊，造成社会不公和严重的贫富不均，撕裂了社会。于是毛左破土而出，拿起老毛的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和公有制武器，向当权派开战，这是毛左积极的一面。然而，他们的致命错误却是不反思中华民族身上所遭受到的重创，要重回毛泽东的极左路线，呼吁二次文革，所以，他们不敢否定毛泽东借以作恶的中共一党专政制度，只反贪官，不敢批评当今圣上，相反，还要察言观色，阿谀奉承一番，并拒绝当今的普世价值，他们注定得不到民众的拥护，必将以失败告终，好在他们是名声很臭的少数。

之所以老毕骂毛出现轰动效应，关键在于老毕的身份。在毛左派的心目中，央视是党的喉舌，是神圣的殿堂，怎么可能出现骂毛皇帝的大逆不道之人呢？这还了得！且慢，毛左派不要太激动，央视并不仅老毕一个人有良知，例如“名嘴”白岩松就是个很有思想的人物，他的一些批判性言论比老毕的“糙话”要深刻多了；还有，主持《实话实说》节目的崔永元也是一个带头讲真话（当然，不一定都正确）的人，开办这个节目的本身也反衬出在当前讲实话是一件很难得的稀罕事。后来，由于这档节目与当前的政治氛围很不协调，黯然收场，小崔在矛盾的环境下也得了抑郁症，主动离开了央视。

上述两极分化的议论反映了当今社会认知上的巨大分裂，预示了这个社会所隐藏的巨大危机，它极大地妨碍了中华民族前进的脚步，当权者再也不能拿死人压活人了。当政者若认识不到其严重性，那个中国梦是做不成的！

邓小平给中共留下的批毛任务，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现在应当是中共的继承人完成其遗愿的时候了。

（5）秘制水晶棺，修建纪念堂

毛泽东死了以后，由他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上台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建议并决定保留毛泽东的尸体、修建纪念堂[1]。

1956年4月27日，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一百五十一个中共高级干部在遗体火化倡议书上签字，确认死后火化，不保留遗体。华国锋不是曾经喊“两个凡是”吗？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时候却不“凡是”了，出于狼子野心，公然违背毛泽东死后火化的约定，要大兴土木建造纪念堂，永久保存毛泽东的死尸，对此，时任中共领导的各位委员们谁也不敢表示异议。于是1976年9月10日也就是毛泽东死去的第二天，匆忙下令给北京、上海、辽宁、四川的玻璃厂，同时研制盛放尸体的水晶棺。与此同时，紧急派出六人专题小组，赴越南求教保存胡志明尸体的诀窍。为防止保存遗体万一失败，责成北京工艺美术学院派二人到英国伦敦蜡像馆学习蜡像制造技术，叶剑英指示尽快做出蜡像，以便必要时以假乱真。

中国古代帝王将相多以梓、楠木为棺。这两种木头，质地温润柔和，木理文静典雅，不易变形，百年不朽。制作棺材的材料，除木材之外，还有铜、石等等。铜棺自然昂贵，石棺若选用大理石花岗石等优质石料，再加以雕刻

打磨，也是只有帝王可享用的。历史步入当代，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不仅给人类带来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也同时带来一种极具创意的葬具——水晶棺。

人类历史上第一具水晶棺是供奉列宁的。他缔造了无产阶级专政，是共产世界的始皇帝，自然要以不朽之躯光照万代。

迄今为止，近代世界保存遗体始于社会主义苏联，曾经保存遗体的有十二个人，简况如下：

1、苏联的列宁（1870-1924）。苏联共产党主席、第一届苏维埃政府主席因病逝世。按照苏俄当时的技术水平，以天然水晶制棺，绝非易事。估计用的是称之为人造水晶的高铅玻璃。更困难的是遗体防腐：既要瞻仰，便不能像古埃及木乃伊那般用香料麻布缠裹起来，还要保持庄严安详，栩栩如生。奉命参与其事的医生们害怕试验失败惨遭不测，一个个虚与委蛇。惟有一名犹太籍生物化学家泽巴爾斯基敢冒风险，配制出一种神奇防腐液。从此，他便成了已故领袖的首席御医，年年岁岁与尸身为伴。每周两次开棺，把遗体送进消毒室检查、涂药。每十八个月把遗体放入防腐液浸泡两周。但遗体之腐烂不可阻止，上世纪三十年代，替换了部分开始腐烂的皮肤和双手指骨。嗣后，尸体继续腐烂，只好再截去一条腿和部分左手，代以假肢。至六十年代，遗体再次大面积腐烂，势不可挡，即便像致力于核弹、航天研究那般不惜工本，也莫可奈何。不得不将头颅取下，安装在人造躯体上。手术精湛，天衣无缝。没人能看出丝毫破绽。躯体已腐烂换成蜡制品，头颅迄今未换，尚在棺中。苏共解体后，部分档案公开，对列宁的评价有待更正，分布在前苏联各地的多处列宁塑像已被砸毁。要求将其尸体撤出红场的呼声日高，且拭目以待。

2、中国的孙中山（1866-1925）。国民党总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曾拟议效仿列宁保留尸体，苏联赠送了一口棺体为金属、棺盖为玻璃的“水晶棺”，后因防腐处理不及时，苏联送的棺材也不符合要求，尸体已难长久保存，未能如愿。如今只留下了衣冠冢。

3、保加利亚的季米特洛夫（1882-1949）。保共总书记，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死后由苏联协助处理尸体防腐，睡了数年玻璃棺，后被移出土葬。

4、蒙古的乔巴山（1895-1952）。蒙古部长会议主席、元帅。由苏联为其防腐保存遗体，现陵墓拆除。

5、苏联的斯大林（1879-1953）。苏共中央总书记、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去见马克思时，老泽巴爾斯基正在坐牢，但他所发明的神奇防腐液和遗体处理秘技却流传下来。斯大林停止呼吸两小时后，遗体就被送到列宁墓下面的特别生物实验室进行解剖和初步处理，然后再运去参加规模盛大的追悼仪式。其后，防腐处理进行了三个月，同时赶制出新玻璃棺。由于初期防腐处理及时，斯大林遗体状况较佳，本当永垂不朽，却不料八年后的1961年深秋，为了加速推行“非斯大林化”，苏共22大正式通过决议，将斯大林遗体移出列宁墓。此时，已是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第六个年头了。克里姆林宫卫队开启玻璃棺，把斯大林请出来，安放到一个普通木棺内。匆忙之中，没忘记把元帅礼服上的黄金纽扣换成铜的。遗体覆以黑纱，露出脸和半个胸部。然后钉上棺盖，由八名军官抬到克里姆林宫红墙下一个刚掘出的土坑边。简短默哀后，埋进墓穴。有人证实，新土上又倾倒了儿车混凝土。那意思是永远埋葬，再也不可能爬出来了。

6、捷克斯洛伐克的哥特瓦尔德（1896-1953）。捷共主席、捷克斯洛伐

克共和国总统。死后由苏联为其保存尸体睡了两年多玻璃棺材。1956 年被火化安葬。

7、越南的胡志明（1890-1969）。越南劳动党主席，国家主席、总理。遗体保存在玻璃棺中。在他的遗体脚边，放置了一双用废旧轮胎制作的“抗战鞋”，以示死者生前之克俭。（这与毛泽东穿了几十年打了 73 个补丁的睡衣颇有异曲同工之妙。）但以举国之力建造的陵墓、玻璃棺以及尸身防腐的巨额费用，不能不使人生出某种反讽。

8、中国的毛泽东（1893-1976）。中共中央主席、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当了 27 年皇帝的毛泽东于 1976 年 9 月 9 日驾崩，9 月 10 日中共“一号工程”紧急下达：赶制水晶棺，以供万世瞻仰。

上面只是一句话，下面可就为难死了。

毛泽东逝世当日，遗体只进行了一般性防腐处理。按照中共高层最初安排，遗体将在吊唁活动结束后火化。因毛生前曾号召火葬，并带头在文告上签字画押。始料不及的是，内部党争激烈，次日中共中央又做出保存遗体供万世瞻仰的决议。朝令夕改，这就给紧急召来的专家学者们出了天大难题。要长期防腐，须死后两小时取出内脏，并把全身血管，包括毛细血管洗净，然后注入防腐剂。现在血液没有及时放掉，要做长期防腐为时已晚。别无他方，御医们只好立即往遗体里灌注常规性防腐剂福尔马林。灌到文献要求的 16 升，无人敢叫停，一直把毛尸灌得全身肿胀，表皮光亮，防腐液如汗水般从毛孔中渗出。此刻的毛泽东，形象怪诞，全身肿胀，脸如气球，颈头同粗，两耳外翘。毛的贴身秘书张玉凤指责道：“你们把主席搞成这个样子，中央能同意吗？”在寒冰般凝结的气氛中，有人吓得几乎虚脱。于是，人们又用毛巾垫上棉花揉挤毛的脸和脖颈，试图将液体挤到深部和胸腔里去。有位年轻医生用力稍大，把脸右侧皮肤擦掉一小块，吓得浑身发抖。多亏一位沉着冷静老专家，用棉花棒沾上凡士林和黄色颜料细心涂抹，总算看不出来了。经长时间揉挤，毛面部退肿，两耳外翘已不明显，颈部还粗。但灾难总算过去，勉强可供瞻仰了。

接下来，就应该对遗体进行永久保存的处理了。遗体保护小组的专家们完全束手无策。

本应向苏联讨教，但苏联是毛泽东生前最痛恨的“修正主义”，水火不容，还在乌苏里江上打了一仗。于是，只好转而向其真传弟子越南求助。越南人不仅掌握了苏联遗体防腐的全套秘籍，且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中苏冲突中，越南一向骑墙。这次故伎重演，只传授初期保存技术，对中期和长期技术秘而不宣。既给了中国面子，又不致得罪苏联。

如此，只有“自力更生”了。高层一声令下，一批处于被监视劳改的专家学者即刻“解放”。有人上午还在“五七干校”放牛啃窝头，下午就被紧急装上飞机，到北京后方知是毛主席召唤。于是全身心地投入尸体保存的研究。

列宁遗体，二十年后开始大面积腐烂，四十年后烂光，仅剩一颗头颅。

对此，中共中央已有万全之策，早就做了一具真假莫辩的蜡像，烂光了又如何？

供瞻仰的尸体有了，制造水晶棺就成了当务之急。

世上仅苏联有制造水晶棺的经验，可现在两国交恶不相往来，上哪儿打听去呢？有人记起孙中山逝世时，曾向苏联订购了一具水晶棺，没用上，便寻到香山公园某库房，找到这具尘封已久的水晶棺。一看之下，大失所望：

不过是镀镍钢框架玻璃棺，哪里是什么水晶！而且玻璃不厚，易破碎，密封隔热性能都不好。据驻外使馆提供的资讯，列宁、胡志明的水晶棺也是金属框架支撑，还有光学缺陷，看来也不是真正的水晶。称之为水晶棺，不过是特种玻璃的一种过誉之词。但是，“一号工程”明确指令的是“一个世界一流的水晶棺”，谁又敢降格以求，用特种玻璃取代？于是，“水晶棺”这一美称这一传说这一关于肉身不朽的痴迷，因一位绝代君王之死而不敢不成为现实。

那些年，用中共自己的话来说，“国民经济已到了崩溃的边沿”。我国天然水晶蕴藏量极为有限。南美巴西独占全球总量百分之九十，剩下的零头，分散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三十多个国家，其稀少可想而知了。中国最好的水晶集中在江苏东海县 105 矿，是一个保密单位，因天然水晶是国防战略物资。既是御制水晶棺，则无所不用其极，所用矿石要晶莹剔透，无丝毫杂质，每立方米所含气泡还不能超过 2 个。在军队看守下，选矿工人们不眠不休，从数万块矿石里一块块精选出超级水晶 32 吨，用飞机火车分批送至北京。

研制工作交付给北京、上海和辽宁三个保密厂协同完成（中途又增加了四川某研究所）。为稳妥起见，试制时没敢用天然水晶，而以 K9 人造水晶代替。五个月后，北京玻璃总厂试制的 1 号棺送交审查。博物馆大展厅，水晶棺里是一个穿好衣服的人体模型，头是毛的石膏像。灯光亮起，不料棺壁上出现了几个映像。中央领导们紧张了，转过来再转过去，说“怎么看见有五个‘红太阳’啊？这个问题一定得解决。我们只能有一个‘红太阳’。”由此 1 号棺被否定。紧接着的 2 号棺也失败在“红太阳”的数目上。天无二日，自古皆然，但连影儿也不能有，就有点困难了。于是请来享誉国内外的光学专家会诊。经不懈努力，3 号棺终于成功。“红太阳”不仅活着是唯一的，死后也是唯一的。

接下来，就是用昂贵的天然水晶真刀真枪地做 4 号棺了。

时间紧，任务急，北京玻璃总厂研究决定将任务分解，水晶棺的造型方案、内照明系统、棺体的光学冷加工（研磨、抛光、成型）等工作由北京六零八厂负责。北京六零三厂和北京六零五厂负责水晶棺棺体的光学玻璃和水晶板材毛坯生成。

就在北京六零八厂紧锣密鼓开展工作的同时，中央考虑到从毛泽东逝世到水晶棺制造完成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为此安排赶制了一个有机玻璃的棺罩，临时供人们瞻仰，这个棺罩采纳了中央工艺美院一位教授的梯形设计。有机玻璃棺罩制作完成后，中央对其外形的展示效果比较认同。于是，有了水晶棺整体的雏形。第一道工序是选取优质天然东海水晶做原料，熔炼成大型石英玻璃板材。北京六零五厂是生产石英玻璃和硅材料的顶尖企业，北京玻璃总厂、北京六零三厂等一些单位也一起会战。熔炼大型水晶件，一般退火需等 3 年，才能完全消除水晶玻璃的内应力。六零五厂老技工徐兆彩发明了新工艺“打砣、模压、拼接”，解决了这一难题。约 2 米长、1 米宽的水晶大板，是 20 公分见方的小水晶板一块块焊接出来的，焊接这活儿由老技工石维成来干。水晶熔点超过 2000℃，必须在熔化的一瞬间完成焊接，他用氢氧焰喷射灯紧盯焊缝操作，厚厚的金属防护服上冒着烟，得专人往他身上浇水，双脚都泡在了水里。最终完成了水晶棺板材。

北京六零八厂虽然有先进的冷加工设备，但只能加工直径 1 米以下的光学元件，尚不能对水晶大板材进行切割、研磨和抛光等机械加工。专家们最终在北京第一机床厂找到了加工金属件的德国 2 米导轨精密磨床和 8 米龙门

铣床，六零八厂和一机床厂的技术人员现场改造、加工，困难难以想象；水晶材料硬度高于钢铁等金属，几乎没有韧性且易破碎，要用直径一米、1000公斤重的粗磨盘压上去，一点点进行研磨……水晶板材的毛坯厚100毫米，要加工成厚度45毫米，需要反复翻个磨削，但吊车难以吊住，吊住也怕吊坏了……水晶板抛光时的热度高达80-100℃，一旦遇冷就会炸裂……水晶棺有5块板，但合在一起时要严丝合缝，纹丝不动，如同光胶一般——即两块板的结合面中间没有一丝空气间隙，在大气压下被“粘胶”在一起……这些在列宁水晶棺上都未曾遇见过。

一道道技术难题被一一破解着。当时唐山大地震的余震不断，一天晚上又突发，厂房顶棚啪啪作响，刷刷往下掉东西，操作台上的工人立即退刀、停机，然后爬上机床，轻轻地趴在水晶板上——只想着千万别砸坏玻璃！

最终，北京六零八厂加工的水晶棺样品在1976年11月27日摆到了模拟瞻仰厅，通过了抗8级地震、密封、充气、降温等诸方面的试验，与全国送来的20多个水晶棺一起“竞标”，被一举选中。

为了应付地震、战争、破坏、损耗等意外事件，又制做了5号棺。

1977年毛泽东逝世周年前夕，一具世界史上名副其实的水晶棺终于制成。

水晶棺的内照明和光学整容，也是技术难题。中央领导小组从全国各地调来医学、物理、摄影、照明、光学等各方面的专家，对各单位提出的多种方案进行考核、评议，最后筛选出北京六零八厂的水晶棺内照明、光学配色整容方案进行实验。北京医科大学提供了一个保存了十多年的人头标本，该标本面部黑灰，皱纹很多、很深。六零八厂将它进行了投光配色，模拟瞻仰路线进行调试观察。结果这个标本竟面部红润丰满，皱纹明显减少，仿佛刚刚去世一样。光学整容方案最终获一致通过。为保证棺内温度，照明灯采用的是冷光源，使用了当时最前沿的光纤传导技术，并根据电光源专家蔡祖泉的建议，以亮度高、色温好、使用寿命长的氙灯为光源，可靠性非常强。

在瞻仰遗容的展厅地下室内隐藏着一具与毛泽东年龄、肥瘦相仿的男屍，用作各种防腐药剂的试验。毛泽东去世一周年时，他的遗体安卧到水晶棺里，迄今40年，尚未发现严重的腐烂和损坏。

（资料来源：北京六零八厂参与水晶棺研制人员、毛主席纪念堂管理局原局长、医学博士徐静等主编的《伟人安息的地方》）

9、安哥拉的阿戈斯蒂纽·内图（1922-1979）。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党主席、共和国总统。内图执政期间得到苏联支持，自称马克思列宁主义，实行一党专政。内图逝世后，由苏联为其保存尸体。安哥拉于1990年公开宣布放弃社会主义，成立多党政府。内图尸体现状不明。

10、圭亚那的福布斯·伯纳姆（19XX-1985）。圭亚那人民全国大会党主席、总理、总统。圭亚那1970年独立，首任总统是客家人后裔锺阿瑟，1974年宣布执政党为“社会主义政党”，锺阿瑟1980年退休，伯纳姆接任，伯纳姆1985年病逝于苏联，苏为其尸体做防腐处理，连同水晶棺运回圭亚那。1992年执政党更迭。伯纳姆尸体现状不明。

11、朝鲜的金日成（1912-1994）。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家主席。遗体保存在水晶棺内，未开放瞻仰。

12、朝鲜的金正日（1941-2011）。金日成的儿子，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防委员会委员长、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2012年耗资一亿美元，修葺平

壤锦绣山太阳宫，其遗体与金日成之遗体并列宫中。

保存尸体的十一个人，毫无例外地都是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者或者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

时至今日，仍然保留着遗体的有列宁、胡志明、金日成、毛泽东、金正日，都在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看来唯物主义者，无神论者，共产党人最重视死尸。活着的时候造孽多端要人喊万岁，死了遗臭万年要住水晶棺，配备专职科研人员，每年花费大量人力、物力、耗资数百万美元对容易腐烂的尸体进行维护。生前高唱的口号却都是“为人民服务”、“解放全人类”、“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岂不是莫大的讽刺。

附注：

[1] 纪念堂位于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南面。原中华门旧址、南北长 260 米，东西宽 220 米，占地 57000 多平方米，总建筑面积为 28000 平方米。1976 年 11 月 24 日奠基 1977 年 5 月 24 日落成，主体呈正方形，外有 44 根福建黄色花岗石建筑的明柱，柱间装有广州石湾花饰陶板，通体青岛花岗石贴面。屋顶有两层琉璃飞檐，檐间镶葵花浮雕。基座有两层平台，台阶全部用四川大渡河旁的枣红色花岗石砌成，四周环以房山汉白玉万年青花饰栏杆。生前暴戾恣睢，死后劳民伤财。近年批毛呼声不断，毛像下墙腐尸出堂为期不远矣。

（6）华国锋当政

华国锋（1921-2008），山西交城县人。十四岁小学毕业，考入交城县“商业职业学校”，未及毕业即离家出走，上山参加阎锡山为会长的牺牲救国同盟会游击队。1938 年加入共产党，1939 年十八岁的华国锋被任命为牺盟会特派员，1940 年十九岁任交城县抗日救国会主任，抗战结束后任交城县委书记，1949 年随周小舟南下，先后任湘阴县、湘潭县县委书记，后升任湖南省长。1971 年调国务院任组长。林彪事件以后任公安部部长，1973 年进入政治局，批林批孔运动中任国务院副总理，1976 年 1 月 8 日，周恩来逝世。1 月 21 日和 28 日，毛泽东先后提议，并经中央政治局通过，确定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同年 4 月 7 日，也就是“天安门事件”[1]被镇压后根据毛泽东提议，中央政治局通过，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此后任中共中央主席等最高领导。1981 年离开中共领导层，常住北京，享受国家主席待遇，2008 年病逝。

中国历代帝王非常看重身后事，青史上要留名，大地上要留形。三皇五帝之前者无影无踪只留下一些文字描述，褒贬不一；三皇五帝之后的诸多皇帝大多着意修建陵寝，凸兀峥嵘，催人折节下跪以仰其高。古代的，如秦始皇陵，唐太宗昭陵，明孝陵，十三陵，清东陵；近代的首推南京中山陵。毛泽东秉承共产遗风效法列宁，造了个水晶棺，僵硬的尸体经种种药物处理后仰卧其中，以供瞻仰膜拜。

华国锋生前多次表示：死后不与中共其他头目的骨灰共处一室。其子女和当地政府遵照华国锋生前的遗嘱：“让我回卦山吧，那里树多，清静。小时候在那儿，打游击也在那儿……”于 2009 年动工在山西交城以北三公里左右的卦山南侧修建了一个占地十公顷（相当于十四个足球场）的陵园（陵墓建筑面积 4260 平方米）投资一亿元以上（不计陵园绿化区，仅计陵墓工程，据说造价 1200 余万元），陵园仿照中山陵，坐北朝南，依山而建，居高临下，俯

视交城。花岗岩石砌筑的阶梯宽十二米，共 392 级（比南京中山陵还多几级），两侧白玉栏杆相护。直达墓顶。墓道两侧是两大山崖，如同张开的鸡翅，山坡上遍栽松树、柏树、椿树、杨树、柳树、槐树、枣树等多种树木。鸡头位置（华国锋属鸡）设立花岗石墓碑，造型如鼎，鼎高 5.5 米，上镌烫金大字。中共死人之墓地，唯此为大，管窥一斑，可见全豹。华国锋为人一世之狼子野心昭然若揭也。

华国锋，政工出身。历任政委、书记等职，深谙共产党斗争内幕。此人“面带猪相，心头嘹亮”，表面看着老实厚道、木讷少言，实则城府甚深、含而不露，外忠内诈，唯我独享，以狡黠的处世手段得以使毛泽东、叶剑英等阅人无数、老谋深算的政客也未识破其真面目，因而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未伤毫发反而不断升迁。

抗战时期华国锋曾任交城县委书记，1945 年任阳曲县委书记，隶属中共晋中区管辖，当时周小舟为晋中区领导人，二人得以相识，华国锋在周小舟面前颌首低眉，卑恭顺从，曲意逢迎。1953 年周小舟升为湖南省第一书记，随其南下的华国锋被任命为湘潭地委书记，周仍为华之顶头上司。湘潭地委书记是一个非同寻常的要职，因为是毛泽东的故乡。1957 年，周小舟对毛泽东发动的反右斗争很不理解，认为这是“深文周纳，罗织成罪”。遂借口“多日失眠，精神不佳”，请求中共中央允许其“休养”。周小舟于 1957 年 10 月赴青岛疗养，华国锋在湖南积极反右。数年后在“宣传华国锋”热潮中，中共湖南省委发表《华国锋同志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卓越继承者》记述了华国锋在反右斗争的积极表现。反右后，1958 年 7 月华国锋从湖南省委统战部长升任湖南省副省长、湖南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庐山会议”风云突变，与彭德怀一道主张为“大跃进”纠偏的湖南第一书记周小舟倒台，华国锋立即写出文章《论周小舟右倾反党集团的政治基础》，成为湖南批判彭德怀路线的带头人，深得毛泽东赏识，华国锋借此机会升任湖南省委书记。

六十年代初，就在毛泽东退居二线后心有不甘、公开指责“中央有的机关搞独立王国”的时候，华国锋以特殊的方式表达对毛泽东的“忠心”。他在韶山突击修建了一座毛泽东陈列馆，搜集到不少毛泽东亲属的稀有照片，跑了趟京城直接送给毛泽东。又在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授意下，耗资一亿，为毛泽东修建占地五平方公里，建筑面积三千余平方米、可防原子弹袭击的滴水洞行宫，毛泽东闻讯甚为高兴。1966 年 6 月毛在此行宫住了十一天，隐居密谋“文化大革命”。

文革初期华国锋也难免被冲击、批斗，因善于随风转舵旋即被“解放”，1967 年任革委会副主任、主任。为讨好毛泽东，1967 年 12 月 26 日（毛泽东的生日）开通了长沙到韶山的铁路，在韶山火车站树起了高 12.26 米的毛泽东塑像。

1969 年，在极左路线登峰造极的中共“九大”会议期间，华国锋成为中共中央委员。

1970 年，文革中期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兼革委会主任。

1972 年，毛泽东提名华国锋任公安部部长。并主导“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1974 年 10 月 3 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前往长沙，直到 1975 年 2 月 3 日才回北京。在长沙住了 114 天，华国锋精心安排、照料毛泽东的饮食娱乐，毛十分满意。

1976年2月3日毛泽东提名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

1976年4月“天安门事件”中，虽有“四人帮”和毛远新煽风点火，毛泽东钦定镇压，但华国锋也是决策人之一，他的手上是沾着血的，也因此得到毛泽东的宠爱。

1976年4月7日，昏聩的毛泽东垂死之际迫不及待地指定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

在毛泽东和“四人帮”掌权的时代，搞一次运动他升一次官。可以想象，在这些极左的政治运动中他如何表现的。有一丝一毫的老实厚道吗？老实人、厚道人在那个年代能连续升官吗？

毛泽东在世期间，华国锋多次当着江青和张春桥的面信誓旦旦地保证：“江青同志，我永远听你的，当你的忠实助手。对毛主席的一家，我们世代都要忠于和爱护，在任何时候都不做损害主席一家的任何事情”。正因如此才深得毛泽东青睐，

进入1976年，毛泽东的病情日益加重，口齿含混不清，据说只有贴身秘书张玉凤能够听懂他的话，与人谈话时，常在纸上写几个字以为重点之意，有人专爱收集这类纸条，奉为圣谕。

1976年上半年，毛泽东在病榻上仍然掌握着大权，不时召见军政要员，甚至要人搀扶着接见外宾，以显示其存在。

1976年4月30日会见新西兰总理马尔登，华国锋和乔冠华陪见。会见只进行了几分钟，外宾走后，华国锋单独向毛泽东汇报国内近日情况，毛在听取汇报过程中写了三个纸条：“照过去方针办”、“慢慢来，不要招（着）急”、以及“你办事，我放心”。汇报后华国锋来到福建厅时，很高兴地给乔冠华看了那三张毛泽东亲笔写的条子。

当晚，政治局开会传达毛泽东会见外宾谈话及其他“最高指示”。在会上华国锋只让大家传阅了两张纸条。那张‘你办事，我放心’没有拿出来，乔冠华莫名其妙，以为是华国锋谦虚所致。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死了以后，华国锋随即拿出毛泽东的手书“你办事，我放心”，凭借这个纸条大造舆论，报纸上大张旗鼓地宣传这个“最高指示”。毛泽东用铅笔在一张白纸上潦潦草草写的几个字似乎成了“遗诏”。成了华国锋领袖地位的重要支柱。一个号称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无需经过任何法律程序和民意表决，由一个病入膏肓、连话都说不清楚的老人主宰着，华国锋靠着这个老人用颤颤抖抖的手写的一张纸条，“名正言顺”地当了钦定的国家领导，自誉为“英明领袖”。华国锋夺权之蓄谋终于得逞，可谓用心良苦。这能叫做老实厚道吗？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那些日子里，报刊上每一个版面上都能见到用黑体字印刷的毛泽东的“最高指示”：“你办事，我放心。”

一首署名“胡工”的《毛主席放心，我们放心》的诗，广为流传，抄录如下：

“你办事，我放心！毛主席亲手写金文。你办事，我放心！毛主席和华主席心贴心。毛主席放心，全党放心，全军放心，全国人民皆放心。毛主席放心，我们放心！华主席不愧为党的接班人！毛主席放心，我们放心！华主席不愧为革命航船掌舵人！放心！放心！放心……莫道画皮重重！有华主席号令，“四人帮”一举扫尽！”

“放心！放心！放心——有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我党兴旺发达，无产

阶级大业后继有人！放心！放心！放心——有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神州更壮丽，人民倍精神！昆仑矗天立，大字金粼粼：你办事，我放心！东海放声歌，天下一强音：你办事，我放心！

在一片“放心！放心！放心！”声中，华国锋走上天安门城楼。

1980年12月3日，在审判“四人帮”的法庭上，江青回答问题时曾说：主席那天晚上给华国锋写的“你办事，我放心”后面至少还有六个字“有问题，找江青”。对此，华国锋未予否认也未敢承认。

华国锋上台以后，一首赞颂华国锋的由山西小调改编的歌曲“交城的山，交城的水，交城有个华政委”风靡大江南北。

一向趋炎附势的文艺工作者紧跟形势，画家靳尚谊和彭彬等人创作了大幅油画《你办事，我放心》。国画界自然也不甘落后，李延声精心绘制了中国画《你办事，我放心》。张华清（油画），徐匡（版画），谌北新和黄乃源（油画）亦步亦趋。那一段时间里，这几幅画印制了数千万张，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天津市革命委员会以及各地的类似组织巧立名目用公款大量订购，送给军属、烈属、知识青年、劳动模范、工会会员、共青团员、少先队员等等，几乎家家户户都悬挂着不同版本的《你办事，我放心》。既是为毛泽东招魂也是为华国锋立碑。

仔细阅读报刊可以发现，在毛泽东去世之后报刊上强调的是“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之类的话，因为宣传大权掌握在姚文元手中，不可能提“以华国锋同志为首”；在粉碎“四人帮”的第三天，即1976年10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出版〈毛泽东选集〉和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的决定》中，《人民日报》第一次提出“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中共中央政治局”；1976年10月10日，两报一刊社论《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第一次提出了“我们要最紧密地团结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不久，“华国锋同志”被“华主席”所代替，成为“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

《解放军报》1976年10月29日发表社论《华国锋同志是我们党当之无愧的领袖》。文中称华国锋为“英明领袖”。

从此，“英明领袖”成了华国锋的专用词。

“英明领袖华主席”的标准像遍街皆是。

附注：

[1] 1976年清明节前后，北京市上百万群众聚集于天安门广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献花篮、送花圈、贴传单、作诗词，悼念周恩来，4月4日，华国锋召集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开会，认定群众的行动属于反革命性质，并在当晚开始清除天安门广场的花圈和标语，抓走许多群众。“联络员”毛远新把政治局的会议情况向毛泽东作了书面汇报，毛泽东圈阅批准了这个报告。4月5日，北京广大市民纷纷抗议，在“还我花圈，还我战友”的口号下形成了天安门广场大规模的群众抗议运动，当晚7时半，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在广播讲话中说，天安门广场有坏人“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要认清这一政治事件的反动性”。九时半，出动1万名民兵，3000名警察和5个营的卫戍部队，带着木棍，包围天安门广场，对留在广场的群众进行血腥镇压，并逮捕了众多市民。是谓“天安门事件”

九、八人帮解体，四人帮覆灭

1、毛泽东再三失算

本书第五章曾就毛泽东的人生观及其形成做过简略叙述，他在青年时期一度看过《共产党宣言》等有限的几本马恩著作（他只能看中文，当时国内流传的马恩著作中文译本十分稀少）。只是寻章摘句取其皮毛用来装点门面，并未触及要义，还不能算作马列主义者。后来自称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纯系沽名钓誉，欺世惑众之谈。终其一生开口闭口什么都打着“马列主义”的旗号，装腔作势，故弄玄虚，只能用来吓唬文化不高的工农兵和驾驭依权附势的幕僚而已。但是，毛泽东确实熟读过《二十四史》《资治通鉴》《三国志》等驭世经典和《隋唐演义》《水浒传》《荡寇志》《金瓶梅》《西游记》等诸多野史杂篇，对中国封建皇帝的治国权术领略得出神入化，运用得游刃有余。如果时光倒退几个世纪，他一定会成为今朝御用文人笔下的“千古一帝”。怎奈斗转星移，人类文明已经进入二十世纪，世界各国都在向民主道路迈进，即使是专制国家，除了两三个还在苟延残喘以外，也改变了“家天下”的世袭体制，但是毛泽东骨子里的皇权思想并没有解除，他在世时，一直为实现家天下而奋斗。

五十年代，毛泽东安排长子毛岸英到朝鲜战场，就是历代皇帝搞的太子亲征。因为毛岸英的资格阅历太浅，除了1944年8月至11月在白俄罗斯第二方面军某坦克连充当过见习生外，没有一丝战功和太多的政治资本，太子亲征建功立业才是毛泽东搞世袭的真实意图。如果真的想让子女做表率保家卫国，他应该命太子下连队去当普通士兵，依能力和战功擢升，为什么要安插在志愿军司令部里充当机要秘书呢？显然，一方面是为了监督彭德怀，另一方面也是为毛岸英镀金。怎奈毛岸英进入朝鲜才一个多月即因违反隐蔽纪律暴露了目标，招来了敌方空军轰炸，惨死于凝固汽油弹的火海，安葬于朝鲜平安南道桧仓郡。只给毛泽东美丽的家天下之梦增添了一块冷冰冰的墓碑。

如果毛岸英不早逝，而是从战场荣归，他会一跃而进入中共高层，中共元老们从整个集团的利益出发，在毛有生之年推举他接班，如朝鲜金家王朝那样，是完全可能的。果若如此，也许就避免了文革惨剧的发生。因为毛泽东发动文革，虽然表面上高叫“反修防修”，其真实动机却是借群众运动来扫荡一切对毛家天下有异议的障碍，这个障碍就是由中共元老们组成的群僚，其中最大的障碍是以刘少奇为首的文职官僚系统，这个庞大的官僚集团，已经在批评毛泽东的七千人大会上体现了震慑力，迫使毛泽东当众检讨、退居二线。所以用高层开会的办法解决刘少奇是不行的，军事政变也不行，因为老军头们不一定都支持他横行霸道，只有假借民意造成天下大乱，群众造反，斩草除根地消灭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或可实现他的个人野心。所以，文革就是戕杀功臣，排除异己，震慑百姓，继续谋取家天下的一个巨大阴谋。

1966年，毛泽东和江青所生女儿李讷年方27岁，才从大学毕业即被派驻《解放军报》随即担当起总编辑之职。由此报社内超过60%的干部群众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其中有的被投进监狱，长期关押；有的被开除党籍、军籍，监督改造；只搞得报社内人人提心吊胆，个个忐忑不安；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惨剧不断，噩耗频传。李讷34岁任中共北京市平谷县委书记，35岁调任北京市委副书记。扶摇直上，权倾一时，炙手可热。无奈体弱多病，严重的肾衰竭，迫使她大多在轮椅上度过。难以继位。她从政时间不长，但作恶多端。对她所造的罪孽还是应该记录在册的。

毛岸英“为国捐躯”了，二儿子毛岸青是个精神病，亲生女儿扶不起来，但是亲侄子还在，毛泽东又将家天下世袭的计划落到毛远新头上。

1968年，毛远新27岁，从哈军工毕业闹了一阵造反夺权后，被指定充任沈阳军区政委、辽宁省革委会副主任，实际上成了东北地区的太上皇，甚至陈锡联（上将军衔，沈阳军区司令）、曾绍山（中将军衔，辽宁省革委会主任）等人，也要唯毛远新的马首是瞻。

1975年，毛泽东病入膏肓行将就木之际，把毛远新召唤到北京，指定为“联络员”，在政治局会议上代表毛泽东发布“最高指示”。

毛泽东的生平与朱元璋至少有两点极为相似：（1）毛与朱都是农民出身，都靠农民造反争夺天下；（2）坐稳天下以后即为皇权世袭扫平障碍杀戮功臣。毛泽东这种心理，在莎士比亚悲剧《麦克白斯》中有很深刻的揭示，麦克白斯说：“他们把一项没有后嗣的王冠戴在我的头上，把一根没有人继承的御杖放在我的手里，然后再从我的手里夺去，我自己的子孙却得不到继承”。麦克白斯这段话，在中国官场政治权势斗争中就是架空的意思，毛泽东最痛恨的就是被架空，最有条件架空他的当然是他的接班人，所以他生前一直都在担忧接班人欺君罔上。他曾经选过刘少奇、林彪、王洪文等五六个接班人都不可靠。最可靠的还是个人的老婆孩子，毛泽东的资深同伙陈云说过一句话“还是我们自己的子弟靠得住，不用担心将来会有人挖我们的祖坟。”这句话从延安时期就担任共党组织部长陈云的嘴里说出来不是偶然的，这也道出了毛泽东的心声。当他选定了毛远新接班后，还是不放心，因为还有一个最大的威胁没除掉，这就是周恩来和他身边的老师。毛泽东临终前还念念不忘批林批孔批周公，批《水浒》，痛斥孔子诛杀少正卯，痛斥宋江架空晁盖，均系剑指党内大儒的影射之作。1976年1月周恩来先于毛泽东去世，他才深深地出了一口气。中南海里突破执行了多年的禁放烟花爆竹戒律，响起了一阵鞭炮声。

以毛泽东的帝王意识，他不会将权力交给任何一个非嫡非亲的人。毛泽东呜呼哀哉之前仓促选择华国锋做党政军一把手，是个不得已的过渡安排，预想中的继位顺序大体是：华国锋→江青→毛远新，终归要落到毛氏天下。

文革后期重新启用的中共元老们，有可能干预朝政的时限顶多二十年，也就是说只要再过二十年，最老资格的长征干部也会寿终正寝了，按中共所谓的选举制，华国锋只须执政四年，把军队的实权全部抓到手，辅佐抗战干部江青上台。让江青过一把瘾，到时候两鬓开始斑白的毛远新也就够资格接班了。

毛泽东的失误就在于他生前没有把军权问题处理好，有几个老军头居然还活得挺硬朗，而且叶剑英还是军委副主席。因为有老师在，军队的中下级官员就不可能服从一个资历浅的军委主席，更没有可能听从一个从来没有打过仗的、绯闻不断的三流影视女星的调遣。如果毛泽东早一点把军权交给华国锋，给他几年在军队中培养自己羽翼的机会，就不会有华国锋投靠老军头这个结局，历史也许会另一个样子。但毛泽东直到咽气之前，还迷恋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还紧紧地抓住军权不放，结果失去了天时地利人和，他终身佩戴的、不时拿出来胡乱挥舞一阵的刺刀也戳破了毛氏天下的美梦。

2、八人帮瞬息解体

“四人帮”这个称谓发端于毛泽东，是文化大革命时代的专用词汇。四人帮是毛泽东亲自纠合起来的非组织性帮派，是他豢养的鹰犬。是贯彻其倒行逆施的主要推手。毛泽东是四人帮的总后台。非官方修史者常以五人帮名之。

1965年，在毛泽东授意下，江青以修改样板戏为掩饰到上海勾结张春桥指使姚文元写了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此文被毛泽东当成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号角，是扫荡北京市委及“彭罗陆杨反党集团”[1]的导火索。由此展开了清除“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前哨战。此后，江、张、姚三人皆被毛泽东确定为中央文革小组的主要成员，历经四年兴风作浪，到中共九大时三人全部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并担任重要职务。

王洪文是吉林长春人，1935年生。只念过三个月私塾，因家贫自幼在农村放猪，1951年4月参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编入第27军第80师，南渡鸭绿江参加朝鲜战争。1952年随部队调防江苏无锡。1956年复员，在上海国棉十七厂当保全工，鉴于既是党员又当过兵，被提拔为保卫科干事，与张、江、姚素无瓜葛攀连。

文革乍起，王洪文伙同上海玻璃机械厂木工潘国平、良工阀门厂钳工陈阿大等三十余人发起组织“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1966年11月9日，工总司在文化广场召开成立大会，公开提出“我们要夺权”的口号。随后在上海制造了“安亭事件”、“解放日报事件”、“康平路事件”，骚乱叠叠，甚嚣尘上。

1967年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社论，提出：“1967年，将是全国全面开展阶级斗争的一年”，“将是无产阶级联合其他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这篇社论是按照毛泽东1966年12月26日在生日便宴上的谈话精神撰写并经他亲自审定的。由此“造反有理”的口号风靡全国，夺权！夺权！夺权！的叫嚷喧嚣于大江南北。

王洪文、潘国平、徐景贤等上海的造反派头目在中央文革小组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等人的鼓动下，于1月4日夺了《文汇报》的权，5日夺了《解放日报》的权。1月6日以全市各造反组织的名义，召开了“打倒市委走资派大会”，在上海市掀起了以“造反夺权”为主要内容的“一月风暴”。数万工总司成员聚集在人民广场，在凛冽的寒风中、稀疏的雪花下，批斗了陈丕显、曹荻秋等市委、市府领导人。责令他们跪在木箱上请罪，出尽了洋相。会后，市委、市府的所有机构被迫停止办公，权力落到张、姚等人手里。王洪文由此混迹于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毛泽东闻讯后，对上海造反派的夺权活动表示支持。1967年1月8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这个方向是好的。……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夺权是全国性的问题，要支持他们造反……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你们不要相信死了张屠夫，就吃混毛猪。以为没有他们就不行，不要相信那一套。”在毛泽东指使下，中央文革小组为中共中央、国务院起草了致上海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并号召全国学习上海“造反派”的经验。

1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认为“一月风暴”是“今年展开全国全面阶级斗争的一个伟大开端”，号召“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手里，自下而上地夺权”。由是全国各省市夺权成风，为此邮电部发行了全国山河一片红纪念邮票（当时面值8分，因画面有错，印刷量极小，乃至成为珍稀品种，如今市场价飙升为400万元）。

王洪文带头造反有功，成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领导之一，声名大振。1969年在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1971年1月，任中共上

海市委书记。1973年5月，奉毛泽东之命调中央工作。同年8月，在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经毛泽东提名当选为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兼中央军委常委。由此，他和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内沆瀣一气，充当毛泽东的爪牙，趾高气扬，不可一世。

这四个人并非志同道合，王洪文胸无点墨，讲求吃喝玩乐；张春桥阴险刁钻，擅长舞文弄墨；江青狂妄浮躁，自称是毛泽东的一条狗，让她咬谁就咬谁；姚文元长于歪曲捏造，煽动蛊惑。他们的骄横跋扈引起多人不满。

毛泽东对此有所察觉，为平息众怒，1974年7月17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批评江青等人说“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将江青等四人当成一个宗派提出。1975年5月3日深夜，毛泽东在他的住所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故作姿态地对江青等四人说：“（你们）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要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此后“四人帮”就成了王张江姚等四人的代称。

在1975年的第四届人大前夕，四人帮曾妄图组阁，但他们的能力难孚众望，资历明显不足，极度不得人心，受到周恩来、邓小平以及一帮“老臣”们的强烈抵制，迫使毛泽东不得不寻求平衡。

晚年的毛泽东虽然表面上批评过四人帮，也说过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1975年5月3日，他在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时说：“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作，但有问题要讲明白。”（原载《伟大的历史性胜利》一文，见1976年10月25日《人民日报》）今天看来，这显然是政治策略说辞，分明是包庇纵容、姑息迁就，哪里是解决问题的意思？毛泽东所说的“解决”，同采取强力措施的“解决”是全然不同的两个概念。

他在第四届人大之后并没有削弱四人帮的势力，而是选定89岁的朱德为委员长，宋庆龄、刘伯承等二十二人为副委员长，多数为老态龙钟、步履蹒跚、病体恹恹、风烛残年之辈[2]。

在“二月逆流”中大闹怀仁堂与四人帮结下嫌隙的叶剑英，既未入选副委员长也不是副总理，只任了个国防部部长，按行政级别低了几个档次，还立即被毛泽东安排离职养病，由与四人帮关系密切的陈锡联代行职务。四人帮实际上操控着党政大权。1976年周恩来逝世后，毛泽东以“反击右倾翻案风”为名将与四人帮素有芥蒂的邓小平打倒，旨在为江青和毛远新当政扫清障碍。毛泽东逝世前，将华国锋确立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兼国务院总理。意在找一个折衷人物缓冲四人帮和老干部之间的矛盾。四人帮在毛泽东逝世时的具体职务是：王洪文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央军委常委；张春桥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姚文元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掌控全国的舆论；江青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以“毛泽东妻子”的特殊身份成为四人帮的核心，权倾一时。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死亡后，能够觊觎王位的大致有四类人，即毛左派，虚名派、元老派，韬光养晦以待时机派。以下一一述之：

（1）江青和毛远新，自以为承毛泽东之余荫得天独厚，文革中招揽了不少爪牙且掌控着要害部门，似乎可顺理成章轻而易举地继承王位。却不知毛泽东悖理逆天的恶行早已引起人们忿恨诅咒，四人帮飞扬跋扈的专横早已为人们诟病多时，毛泽东死亡后，他们就只能是坐在火山口上，等着灰飞烟灭。

王张江姚毛（远新）皆缺乏自知之明，空怀着痴心妄想，满脑子黄粱美梦，但手无军权，缺乏帮衬，虽然野心勃勃，但失尽民众的支持，欲夺天下只是想入非非。

（2）华国锋，自恃握有毛泽东的手谕“你办事，我放心”图谋皇位久矣。其实，这张小纸条是1976年4月30日毛泽东就华国锋汇报处理四川省两派联合问题时随手写的，根本不是什么“遗诏”。张玉凤、乔冠华均曾对此做过说明。华国锋虽被毛泽东临死前树为接班人，但徒具虚名，人脉稀疏，缺少实力，韬略不足。文不及四人帮，武难抵叶剑英。靠阿谀谄媚、检举告密得宠于毛泽东，靠处事圆滑、左勾右攀混迹于官场。欲稳定个人地位，尚需借助他人。

（3）叶剑英，时年已79岁，中共军队的缔造者之一，属开国元勋之列。平生没直接指挥过大的战役，没掌控过各野战军，没有自己的嫡系，也没有派系背景，但曾长期任中共总参谋长，稳坐中军，出谋划策。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都曾对他颇为器重，蒋介石允许他带佩剑进入住地，可谓三朝元老，国之重臣。

“文革”一开始，他的女儿叶向真和女婿刘诗昆被抓，后来儿子叶选平、叶选宁、女儿叶楚梅与女婿邹家华也相继被捕入狱。1967年众老臣对文革不满“大闹怀仁堂”时，激怒的叶剑英一拍桌子，左手手指骨折（他是“左撇子”）。叶对文革的态度，无需多言了吧。

毛泽东重病期间，王震来到西山探视叶剑英。在谈到“四人帮”时，王震说：“我看，干脆把他们几个抓起来，问题不就解决了！”叶剑英没有明确表态，只伸出一只手握成拳头，竖起大拇指向上晃了两晃，然后把大拇指倒过来向下按了按，其寓意不言自明，投鼠忌器也。

叶剑英一生拥有过六位正式夫人，三位知名不具的女伴，晚年收纳了一位比他小60岁的女护士，身居安乐窝中，已无政治雄心，只望颐养天年，虽曾大闹怀仁堂与四人帮结怨甚深，但叶剑英平时深居简出，不问政事，故不为四人帮所重视。毛泽东逝世时他仍是中央军委副主席，握有军权，与几位中共元老仍时常联系，欲谋取天下者不容忽视。

（4）邓小平当时还在软禁之中，寓居北京宽街私宅，被监视居住，限制行动自由。文革期间他曾几次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写信，据说党员对党组织是要说老实话的，且看邓小平的“老实话”。

1968年6月20日至7月5日，邓小平在隔离审查中向中央写了《我的自述》，全文约三万字，国内各大网站均可查阅。《我的自述》经由江青转给了中央，转给了毛泽东。为节省篇幅这里只摘录几句：

“1952年我到北京工作以后，特别是被‘八大’选为中央总书记的十年中，我的头脑中，无产阶级的东西越来越少，资产阶级的东西越来越多，由量变到质变，一直发展到推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变成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之一。”

“书记处成员前后就有彭真、黄克诚、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多人出了问题，这是与我长期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不突出毛泽东思想的错误密切关连的，结果我自己最后也堕落到这个修正主义份子的队伍中了。”

“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我不是站在无产阶级方面，而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不是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社会主义道路方面，而是站在资产阶级路线和资本主义道路方面。”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就同刘少奇提出了一条打击革命群众、打击革命左派、扼杀群众运动、扼杀文化大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我完全拥护把我这样的人作为反面教员，进行持久深入的批判，以肃清我多年来散布的流毒和影响。”。

“我愿在我的岁月中，悔过自新，重新做人，努力用毛泽东思想改造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对我这样的人，怎样处理都不过份。我保证永不翻案，我热烈地欢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够了，不再多摘录了，读着感觉恶心。这就是毛泽东时代的现实。这就是一个老资格的、被称作伟人的共产党员的情操和骨气，这样的人要是被法西斯匪徒捉住，不需要老虎凳、辣椒水，只消一副手铐、两个耳光，他就会双膝跪地喊爹喊妈的彻底交代，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吗？邓小平写的类似信件还多，为节省篇幅，恕不一一列举。总的来说就是“韬光晦迹。卑躬屈节，臭骂自己一顿，伺机反扑。”毕竟他曾是中共第一代核心“毛刘周朱陈林邓”之一，“人还在，心不死”，岂能善罢甘休。

邓与叶剑英关系较好，都属于被四人帮排挤之列。1976年10月6日晚11点左右，叶剑英让警卫长马锡金给他的侄子叶选基打电话，第一个透露了“那四个人已经被抓起来了”的消息。7日早晨叶选基骑自行车到王震家，王震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即派他的儿子王军到北京医院，当时胡耀邦、万里、廖承志在北京医院住院，王军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们，于是四人帮已被拘捕的信息在北京部分高干之间就传开了。当日下午从吕正操处得到信息的贺平（当时是邓小平的女婿）连忙骑车到老丈人家，翁婿之间不敢大声说话，躲在洗手间打开水龙头，附耳低言。邓小平有点耳背，让他大声重述了一遍，随后长出了一口气说：“这下子我可以安度晚年了”。

三天以后，邓小平给华国锋写了一封信，内容如下：

东兴同志转呈国锋同志并中央：

我衷心地拥护中央关于由华国锋同志担任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的决定，我欢呼这个极其重要的决定对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意义。不仅在政治上思想上华国锋同志是最适合的毛主席的接班人，就年龄来说可以使无产阶级领导的稳定性至少可以保证十五年或二十年之久，这对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来说是何等重要啊！怎不令人欢欣鼓舞呢？最近这场反对野心家、阴谋家篡党夺权的斗争，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后这样一个关键时刻紧接着发生的，以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战胜了这批坏蛋，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这是社会主义道路战胜资本主义道路的胜利，这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胜利，这是巩固党的伟大事业的胜利，这是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革命路线的胜利。

我同全国人民一样，对这个伟大斗争的胜利，由衷地感到万分的喜悦，情不自禁地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我用这封短信表达我的内心的真诚的感情。

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万岁！

邓小平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日

1976年毛泽东逝世初期，上述四派均不具备合理继承大位、统揽实权的绝对优势。比较而言。前两派略占上风。

四人帮蠢蠢欲动，华国锋擦掌磨拳，叶剑英含而不露，邓小平暗藏野心。

明争暗斗乃中共痼疾，夺权大战一触即发。

华国锋起初是想拉拢王张江姚的。如果他们沆瀣一气、狼狈为奸，今日之中国当是另一番颜色。但两派成员皆为各怀鬼胎、权欲熏心之流，失败就是必然的了。

1976年9月11日凌晨，在毛泽东的遗体尚未入殓之时，华国锋与江青、毛远新、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汪东兴、陈锡联不仅手拉着手而且十指相扣站成一排，在毛泽东遗体前合影（图8-8-7-1），这是中共建党以来独一无二的顶级人物十指相扣显示“同心协力，牢不可分”的照片，在世界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可见华国锋与王、张、江、姚等关系之密切，该照片成了“八人帮”之佐证。

这张照片是中南海专职摄影小组组长杜修贤拍摄的。杜修贤对此有过详细叙述。1976年9月10日晚间，大内总管汪东兴令杜修贤带上足够的胶卷跟他走一趟，杜不敢怠慢，紧跟着到中南海毛泽东死前的最后住处。四下无人，他在过道里等了大约40分钟。既不敢进又不敢退，正在犹豫之间，内门忽然开启，他看到华国锋、陈锡联、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毛远新陆续从里面的房间出来，有的一边走一边剔着牙，像是才吃过饭，似乎还有一股酒气。姚文元走过来的时候说：“我几次打电话找你，今天要你完成一个**重要任务**”。江青看了看说：“你就带了一个闪光灯？又是平版光”。随后汪东兴来了，把杜修贤召唤到停放毛泽东遗体的大房间里，并叮嘱其他人员一概免入，就连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毛泽东的贴身丫头张玉凤等也不得进入。接着，他们八个人走进来，围绕停放着毛泽东遗体的床走了一圈后，排成一行在遗体前照像。照完后又照八个人手挽手、十指相扣的合影。总共照了二十几张，照完以后，遗体即被转移至人民大会堂，等着万民瞻仰去了。杜修贤心中纳闷，曾想：说是中央顶级首长很正式的向遗体告别吧，叶剑英和李先念都在北京城里很近的地方却没有到场。说是负责医疗组的中央领导人向主席遗体告别吧，姚文元、陈锡联并不是医疗组成员，为什么又参加呢？而且整个拍照过程都安排在夜深人静时进行，令人感觉笼罩着一层神秘的色彩。

杜修贤回到摄影部后，值班记者告诉他，汪东兴、姚文元来过多次电话（当时中国还没有手机，用的都是固定电话），可见照这个像是有预谋的。过了两天，江青、姚文元、汪东兴都曾向杜修贤询问，要这次照片的样片。杜修贤暗想，三个人同时要看一个活动的照片样张，这还是第一次，可见此次活动的重要性。于是连忙冲洗了三份样片，分别送去。每份有七、八张。江青首先选定了六、七张，其中有合影两张，一张是八个人手挽手的，一张是没有挽手的。江青表示很满意，责成杜修贤修版、放大，赶快冲印八份，分别送给八个人。杜修贤点头照办。

毛泽东逝世后的头一个月内，国内政治形势变化十分微妙。表面看来老实敦厚的华国锋，一直在权衡与比较着各种政治力量，并在其中小心谨慎地拿捏着分寸。这张照片显示，他与被称为“四人帮”的几个人曾经走得很近。

身穿一套深蓝色毛式服装的华国锋站在最中间，以显示自己的实际掌舵地位；他的右手牵着江青，左手牵着毛远新，俨然是毛家天下的顾命大臣；毛远新的左边是掌控着报纸电台等舆论工具的姚文元，再往左是握有军权的陈锡联和毛泽东的警卫局长汪东兴；江青的右边是政治明星王洪文，最右侧站着的是筹谋着总理位置的张春桥。世界各地向已故领导人遗体告别的照片

可谓不少，但手牵着手、十指相扣在遗体前默默宣誓的，古今中外仅此一张。十指相扣意味着“同心协力、共谋大业、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在中共统治下，在各派明争暗斗、阴谋篡国的白热阶段，照这样的照片是有很大大风险的，至少有拉帮结派之嫌。华国锋和江青、汪东兴等人当时无所顾忌，似乎稳操胜券即将隆登大位，只等着万民朝贺了。

后来因江青集团意欲独揽大权，触动了华国锋的权欲，他担心自己可能被江青、张春桥等排挤甚至打倒。且华国锋深知叶剑英等军中实权人物对毛泽东晚年意欲独霸天下极为不满，与王、张、江、姚不共戴天，自己虽假借“遗诏”取得了“合法”地位，但只身入虎穴，身单力薄，需拉拢几位老师，依靠军方，才能巩固其得之不易的领袖地位。殚精竭虑权衡利弊的结果使其下决心抛弃江青。故一面兴师动众造“纪念堂”、高叫“两个凡是”，显示其“忠”；一面想方设法制服野心勃勃意欲独霸朝政的“四人帮”。于是照像之后仅两三天就与汪东兴密谋，联合叶剑英、李先念等人，终于在10月6日晚以宫廷政变的方式秘密抓捕了王、张、江、姚和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八人帮宣告分崩离析，只留下了一张变了颜色的照片。

八人帮解体了，照片上的王张江姚毛被捕入狱，汪东兴极力维护华国锋的威信，他有一段著名的话：“邓小平也反对四人帮，但是他整治不了四人帮。他哪里是我们华主席那样的本事！”华国锋坐稳了位置，当上了英明领袖。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华国锋说：“汪东兴同志在粉碎四人帮中立了很重要的功劳。可以说，没有汪东兴同志的部署和安排，我们是不是一枪未响、一滴血未流就解决了问题的。”1977年8月，在十一大上，汪东兴当选中共中央副主席。

宫廷政变过后，留下一张八人手牵手的照片，汪东兴心里总有点不自在，为了灭口，消除他曾经和四人帮勾结的痕迹，放风说杜修贤是摄影界的一霸。随后杜修贤就成了重点审查对象，被限制了自由，并勒令交出所有的为“四人帮”拍摄的照片、底片。杜修贤没有严格从命，暗自留了一张底片。为躲避查抄，将这张底片转移保存。1978年12月邓小平复出，汪东兴备受排挤，杜修贤为求自保，考虑再三，拖到1980年2月中共中央十一届五中全会前夕，经由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将该照片和亲笔写的拍摄过程转呈给中共中央纪委。不能否认，这是导致华国锋和汪东兴下台的因素之一。

汪东兴当上中共中央副主席后，居功自傲。叶剑英曾倚老卖老地说：“汪东兴充什么大头，在小平同志眼里，根本没有他的地位和说话的机会。和我们相比，他还是一个乳臭未干的三流政客，他能当什么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简直是开国际玩笑。就是再打一百次仗，也轮不上一个警卫员出身的人当什么大头呀。他连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的本事都没有，我们根本就不和他一般见识。”

邓小平复出后，毫不掩饰地对华国锋说：“你可是不能尽听汪东兴的话。他的思想僵化得很，在党中央的领导同志中威信不高。主席晚年虽然有错误，但是那些错误与他身边人员的素质不高有很大关系，汪东兴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在毛主席那里，只能是帮倒忙，而帮不了好忙。”“他动不动就打着毛主席的旗号进行活动，这是很令人讨厌的事情。”“现在要提防这个人来垄断毛主席的文件，不要让他干涉的东西太多。”

邓小平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稳定以后，通过政治局会议，免去了汪东

兴十五、六个兼职，尤其是汪东兴失去了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和中央警卫局局长的职务。此后不久，华国锋和陈锡联也被相继解职，晾在一边“安度晚年”去了。

3、四人帮彻底覆灭

有关四人帮的传闻，在多位“当事人”的回忆录中有所记载，由于时隔多年，诸多当事人年老体弱、记忆衰退，或有难言之隐，记录不实和相互矛盾之处颇多。文天祥所书《正气歌》有曰“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3]，赞颂尊重史实，秉笔直书的史官。流传千古，人所称道。中共执政讲究的是历史要为政治服务，正气近于荡然无存，敢于如实记录历史者鲜矣。

请看中共党史出版社对《中共党史》的介绍：“该书的编修，始终以历史决议为指导，以新时期党历次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有关党的历史的论述为准绳，并在撰写中得到中央领导同志亲切关怀和精心指导，若干重要问题的表述均经中央批准，代表了目前对这 29 年历史研究的最高水准。该书规模宏阔、编纂工作历经十六年、十数次易稿，是党史界和党员干部群众瞩目的重大工程。”

公开标榜以历史“决议”为指导，以有关“论述”为准绳，重要问题的表述均经“批准”。这个指导，那个关怀，就是不说著述史籍应该以史实为依据，以据事直书、确凿可信为原则。背离了史实写出来的文字还能叫历史吗？

再请看中共党史主要撰写人之一、1968 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众所周知，66、67、68 那三年文革正酣。各高校处于半停顿状态，没学什么正经）、曾在中共中央党校学习了一年半、《中国共产党历史》课题的首席专家、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张启华女士的高论：“我们写这段历史一定要跟中央保持一致，一个是要跟《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保持一致，再一个就是跟中央文件、中央领导人的讲话和精神保持一致。”“档案肯定要看，但看的目的是搞清来龙去脉，不能泄密。也有些档案是看不到的，这没有办法。”

跟这个“文件”保持一致，跟那个“讲话”保持一致，还要跟领导人的“精神”保持一致，这不就是唯上是从的奴才吗？看不到档案，不能泄密，还写什么历史？！持此种观点的“史学家”们还能写出忠于史实的历史吗？他们编的“史书”尽管洋洋洒洒数百万言，装帧精美，堪称金玉其外；内容空泛，难免败絮其中。究竟有多少可信度呢？

笔者写回忆录时在搜集资料过程中发现，伪造历史比比皆是，仅举数例以飨读者。

1976 年 10 月 6 日晚中国拘捕四人帮后，叶剑英曾指示“保密两个月”。号称“国家主人”的老百姓茫然无知，当局对四人帮突然消失，守口如瓶，云遮雾障。

不料，10 月 12 日伦敦出版的《每日电讯报》在头版头条位置以通栏大字标题报道了来自中国的重大新闻《毛的遗孀被捕》该文出自英国驻华记者尼杰尔·韦德之手，仅是消息报道，没有额外议论，基本没有失真。一时轰动世界，各大报刊纷纷转载。

英国《泰晤士报》1976 年 10 月 14 日刊载了法新社记者乔治·比昂尼克的报道“据北京可靠消息，毛泽东的遗孀和 30 多名极左集团领导人在举行阴谋会议伪造毛主席遗嘱时被捕”。显然这就是假的了。这篇纯属编造的“新

闻”，成了历史长河中稍纵即逝的泡沫，浮游一阵便无影无踪了。

美国的知名作家罗斯·特里尔(Ross Terrill)在纽约出版的《A BIOGRAPHY OF MADAME MAO ZEDONG》(直译应为《毛泽东夫人传》，中译本定名为《江青正传》，张宁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一书中，也想当然地编造了拘捕江青的经过。特里尔这样写道：“一小时后，一队摩托车和一辆军用吉普车悄悄地驶过北京动物园附近空旷的街道，来到一圈灰墙上的一座高大的铁制大门前——这是官园……自动步枪对准了卧榻。江青瘫倒在地板上，大声悲号起来……她转过泪水模糊的脸喊道：“主席尸骨未寒……”

描述有声有色，似乎惟妙惟肖，很有戏剧性。可惜全是臆造，事实上，当时江青不在官园居住。拘捕她用的是国产特制红旗牌防弹车，根本没用摩托车和军用吉普。

在编造历史方面，中国专家的想象力也绝不亚于外国记者。所国心先生在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报告文学集》中描述道：“7日凌晨2时左右，天空一片漆黑，有十几辆军车驶出营区大门。赵营长荷枪坐在指挥车上，戴着耳机，无线电天线在挡风玻璃前摇曳。车队行驶十分钟后，已接近中南海……”

情节纯属虚构，文字概是胡编。时间、地点、人物全是假的。作者为了赚几个稿费。乱放一通。

即使当事人的回忆、记录，也有错讹。比如摄影记者杜修贤记载，八人帮的照片是9月11日夜间在中南海202大厅拍摄的，事实上，毛泽东的遗体11日凌晨即从中南海移送到人民大会堂准备供人瞻仰了。对此，8341部队政委武健华有文字记载，显然杜修贤记错了。11日应更正为10日。

为尽量忠实于历史，笔者尽力收集资料，反复考证，将拘捕四人帮的大体脉络和过程追述如下：

因条件所限且我已年逾八旬，难免仍有疏漏，恳望得到读者纠正。

1976年9月9日零时十分毛泽东病逝。

9日凌晨2时许，中央政治局在中南海202楼（即毛泽东生前住地）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治丧问题。江青在会上大哭大闹，扬言毛泽东是被邓小平气死的，要求政治局继续批邓并立即作出开除邓小平党籍的决定。政治局多数成员认为治丧问题是当务之急，其余问题日后再议。确定了发布讣告、成立治丧委员会、谢绝外国政府、兄弟党来华吊唁、11日开始组织民众在人民大会堂凭吊遗容、18日在天安门广场开追悼会等等事宜，会议匆匆结束。

9日清晨6时，汪东兴从“202”给8341部队政委武健华打电话，通知中央警卫局科以上、8341部队团以上干部，于当日清晨7时在中南海西楼大厅开会。宣布中南海处于紧急状态。

9月10日中共中央宣布中国各地处于高度戒备状态。

9月10日，王洪文在中南海紫光阁擅自开设“中央办公厅值班室”，王洪文让秘书廖祖康带着米士奇（王洪文办公室秘书）进驻中南海。随后，米士奇奉命在紫光阁给全国二十七个省、市、自治区党委打电话。

9月10日深夜，华国锋与王张江姚在中南海聚会，内容秘而未宣，会后照了“八人帮”合影。

9月11日下午四五点钟，华国锋称身体不适，乘车去位于东单的北京医院就医后，转了一圈，随即驶向西黄城根9号李先念的临时住所。甫才坐定，未及寒暄，华国锋就说：“我是到北京医院看病为名来的，只能呆几分钟。我实在太忙，离不开，请你去找趟叶帅。‘四人帮’的矛盾必须解决，请叶帅

考虑，用什么方式、在什么时机解决为好。”并说：“我可能已被跟踪，不能多留。”说毕即匆匆离去。

9月12日，叶剑英到人民大会堂参加吊唁和守灵，上午休息时在福建厅与汪东兴就政治局势交换意见。两人都感到局势的严重；叶指出“现在双方都在搞火力侦察，选择突破口寻找时机”

9月12日，陕西省委书记李瑞山接到了中共中央办公厅的长途电话，当即亲自作了记录。“1976年9月12日上午十点多。中办米士奇电话：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主席丧期发生重大问题及时报告。有重要问题不好解决及时请示。随时与“中央办公厅值班室”米士奇联系。”

9月12日，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接到同样电话后认为情节可疑，便立即打电话报告了华国锋办公室。经汪东兴查明情况，华国锋、叶剑英两位副主席均不知“中央办公厅值班室”一事，对王洪文不经其他中央负责人同意便向全国擅自发令极感震惊，并立即采取两点紧急措施：

一是以中央政治局的名义通知王洪文，立即关闭未经中央同意开设的“中央办公厅值班室”。

二是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打电话通知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军队系统，凡重大问题，均应向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请示报告。

9月12日下午，华国锋与汪东兴探讨怎么按照毛主席生前部署妥善处理“四人帮”的问题。汪东兴态度明朗，表示坚决支持华国锋解决“四人帮”的意见。

9月14日，李先念前往西山去看望叶剑英。为摆脱“四人帮”跟踪，李先念先到香山植物园游览，观察没有“尾巴”，这才驱车上了西山。为防窃听，叶剑英特地打开了收音机。李先念转达华国锋口信，说：华要我来听听你的意见。他说，毛主席对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早有交代，但是用什么方法解决？在什么时机解决？他请你拿主意啊！随后为保密起见，二人各持铅笔在白纸上写简短字句，交流意见。李先念走后，叶剑英把军科院第一政委粟裕大将、军院长宋时轮上将找来，告诉他们此事。粟裕、宋时轮听说要剪除四人帮，心情为之一振。叶剑英住地离军科院很近，他们悄悄地加强了对叶剑英住地的外围警戒，确保叶剑英的人身安全。

9月14日，江青打电话找华国锋大闹一场，要求立即召开政治局常委会，她和毛远新等人人都要参加。

9月15日，叶剑英又到人民大会堂守灵，并会见前来吊唁的重要宾客。会见后，叶在东大厅南侧一间办公室，再次同汪东兴交谈，叶提出“我们如果不采取紧急措施，中国革命就会遭受挫折，甚至倒退失败”。

9月16日，经姚文元修改审定，“两报一刊”发表了一篇题为《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的社论，用黑体字推出了一个“毛主席的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

9月16日，叶剑英突然搬离西山住地。原因是王洪文几天前从中南海搬至西山，就住在邻近的楼里，居高临下可以监视25号楼。叶剑英意识到“西山不宜久留”，悄悄搬进玉泉山9号楼，没过两天，王洪文迁回了中南海，叶剑英随即又返回了西山住地。二人玩了一场捉迷藏。

9月16日，华国锋主持在国务院会议室开会，参加的有李先念、吴德、陈锡联、纪登奎和陈永贵等人。他讲了要按照毛主席生前部署解决“四人帮”的问题，话音刚落，纪登奎就说，对“四人帮”也应该区别对待，其他人没

有发言，显然不能再深谈下去了。华国锋意识到范围大了不行，只能个别串连。

9月17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召开。会议一开始，江青便抢先说：“主席处的文件清理保管工作，因汪主任忙于主席的丧事，无暇顾及。我提议把所有的文件、手迹、文稿及各种材料的清理保管工作统统交毛远新负责，远新有时间，又熟悉那里的情况。”

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马上表示同意，并说毛远新是最合适的人选。

汪东兴随即发言说明：“主席这里的文件、文稿、手迹、信件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只能由党的有关组织来保管，不应交任何个人来负责，毛主席生前确定的这些正确原则，现在仍应继续坚持。”

身为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华国锋和叶剑英相继表示，所有文件、手迹、文稿以及各种材料，按惯例仍由中央办公厅负责清理和保管。引起王张江姚强烈不满，但也只能耿耿于怀。

同日华国锋和陈锡联、苏振华谈话。争取二人支持。

9月17日晚上8点多钟，汪东兴、武健华和秘书高成堂一起来到毛泽东生前在202号的住处，把卧室和书房的进出大门贴上了加盖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办公厅公章的封条，并向负责看管的张玉凤交代：“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已经作出决定，把毛主席这里的文件全部封存，未经中央批准，任何人都不得违反规定。”

当晚10时左右，江青来到中南海“202”，看到毛泽东的卧室和书房大门均已被贴上封条，气得火冒三丈，大发雷霆，她质问张玉凤：“这是谁干的？”张玉凤回答说：“是汪主任带人来封的。”

江青咬牙切齿地说：“好啊，汪东兴，你搞突然袭击！”江青回去后，马上给华国锋打电话大闹了一场。但已无济于事。

9月18日，天安门广场举行百万群众追悼毛泽东大会，站在天安门城楼中央主持大会的依然是王洪文，致悼词的是华国锋。9月19日，江青打电话给华国锋，要求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常委会，讨论“重大问题”，但却不要中央副主席叶剑英参加会议，并提出让她、姚文元、毛远新必须列席会议，华国锋表示立即研究。行动上却一再拖延时间。

9月21日，叶剑英来到华国锋住处商讨初步方案。叶剑英提醒华国锋：汪东兴住在中南海，而且是管8341部队的，目标大，他的行动是‘四人帮’严密盯死的。所以要一动不动，得让江青等人摸不着汪的动向。

还说：“华国锋当时集党、政、军三权于一身，也不能随便走动”由叶剑英负责在中间来回穿插。

从多人的回忆和口述史料看，商议过程中，华、叶、汪三人的确未曾同时碰头；不过，华汪之间还是有几次直接面商的。

9月21日，叶剑英在北京西山住地同聂荣臻派去的杨成武（聂荣臻当时重病在身，杨成武时任解放军第一副总参谋长）谈话，杨成武转达了聂荣臻有关采取断然措施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意见。

9月21日，张春桥在北京单独接见徐景贤，听取他们在上海、湖南、安徽等地制造和购置大量武器装备的情况汇报。

9月23日，王洪文打电话给王秀珍，要上海搞40万民兵，还要用大炮武装民兵。

9月24日或25日，叶剑英在住地同粟裕谈话，告知要解决“四人帮”

问题。要他摸一下北京周围部队的情况，粟裕知道解决“四人帮”的时机已经到来。他了解了部队情况，向叶作过汇报。

9月26日晚，国务院放映电影。电影散场后华国锋邀约李先念和吴德在小礼堂旁的会议室谈话，交换对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意见。华国锋说：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已经不可避免。吴德表示支持华的意见和所下的决心。解决的办法，一是把他们抓起来，二是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把他们选下去，然后把张春桥等调到外地，架空江青，剥夺其实权。并表示自己偏重用开会的方法来解决。华、李二人认为：在政治局开会投票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大体有把握；但在中央全会投票解决“四人帮”，似乎没把握。十大选举中央委员时，“四人帮”利用手中权力，把许多属于他们帮派的人和造反派头头塞进了中央委员会，在中央全会上投票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江青一旦大吵大闹，难以收拾，很可能导致分裂局面。采取隔离审查的办法才是上策。三人一直讨论到凌晨5点，认识一致了。关于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时间，华国锋提出“早比晚好，愈早愈好”，李先念、吴德均表示赞同。考虑到毛泽东治丧活动刚刚结束，全国民众情绪还未调整过来，三人初步议定：国庆节后准备10天，然后动手。随后，华国锋委托李先念将密商结果通报叶剑英，叶表示完全同意。提醒说：务必考虑周全、细致入微、绝对保密。

9月27日，张春桥派秘书肖木到上海传达他的话：“上海还没有真正经受过严重考验。林彪、邓小平要搞上海，都没有搞成。林彪搞成的话，上海有大考验，要打仗。”

9月28日，江青来到北京清华大学大兴分校。在苹果园内，在秋天的阳光下，苹果正熟。有人要给江青摘苹果，她话里有话地说：“苹果留着吧，留在最盛大的节日时吃吧！”当她要离开时，神秘地说：“你们等着特大喜讯，准备学习公报！”

9月29日夜11时，华国锋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江青再次要求：毛泽东的文件、档案应交毛远新清理、保管；中央办公厅的群众来信来访工作和材料，交由他们在“北大”组织的人去处理。江青还提出：“毛主席逝世了，党中央的领导怎么办？”王洪文、张春桥则要求安排江青当党中央主席。华国锋强调今天主要讨论国庆节的活动安排。其他问题择日再议。会议草草收场。

9月30日晚，中共中央在天安门城楼上举行首都各界人士国庆座谈会。会后，华国锋、李先念、吴德等人到国务院小礼堂看了一场电影，看完电影，三人又在小礼堂旁边的小会议室再次商谈了解决“四人帮”的时间和可能发生的问题。

10月1日国庆节，没有浩浩荡荡的游行。没有嘉宾满座的招待会。没有火树银花般的焰火。没有撼天动地般的欢呼声……

10月1日，华国锋、李先念商谈解决“四人帮”的问题。考虑到舆论工具操纵在“四人帮”手里，如果采取通常解决党内矛盾的方式，在会场上将这几个人抓起来，他们就会利用手中的舆论工具进行宣传，势必在社会上造成混乱。所以，华国锋再次强调采取先把人隔离起来的办法解决。李先念表示赞同，他对华国锋说：“你是中央第一副主席，这场斗争是你领导的。只要你领头干，是会有人支持你的！”

10月1日，江青到清华大学发表演讲，扬言要“开除邓小平的党籍”，要“斗”下去，要提高警惕。离开时，她散布说：10月7、8、9日将有“特

大喜讯”的传闻。让人们“等着特大喜讯，准备学习公报”。

10月2日，应陈云要求，叶剑英派侄子叶选基将陈云接至家中，征求对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意见。此前，叶还在住所同邓颖超谈过话。

10月2日下午3时许，叶剑英来到中南海汪东兴的办公室交换意见。叶剑英指出：该摊牌了，不能失掉时机，兵贵神速，乘人之不备。要以快打慢，尽早采取果断措施。叶剑英随后马不停蹄到东交民巷会见华国锋，再次强调事不宜迟。

10月2日下午，汪东兴送走叶剑英后，立即通知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祠和中央警卫局副局长、8341部队政委武健华到他的办公室开会。汪东兴直接对他俩说：“中央已经下了决心，对‘四人帮’采取行动。”汪东兴要两人先琢磨出一个行动方案。务求妥善周密，不能走露一点风声。

10月2日临近晚间，华国锋秘密召见了北京卫戍区司令吴忠，获得了支持。

10月2日晚9时，汪东兴来到华国锋在东交民巷的住地。华对他说：我和叶帅商议了，由你先拿出一个执行办法来，我们来议定。

汪回到中南海后，又召来张耀祠、武健华，进一步商讨方案，直到3日凌晨4时。对解决“四人帮”的顺序、处置、待遇、行动时间、隔离地点、保密措施、分工配合以及所需车辆、工具等等都提出了细则。为此，成立了两个小班子，一个准备有关文件，包括“四人帮”历史和现行罪证，由李鑫负责；另一个负责对“四人帮”实施隔离审查。人员由汪东兴亲自从中办和中央警卫团挑选并个别谈话。所需物资由武健华筹办。

10月2日，王洪文私拍“标准相”114张。其中穿便服、中山装的53张，穿军装的16张，办公照片21张，室外单人像24张！并当场责成摄影师杜修贤：“先各印一张八寸的送来，我挑选一下。选中的，要仔细修版，大量冲印！”

隔了两天，他选了标准相，指令按周恩来标准像的样子进行了七次修改。

原来，“四人帮”已经排定夺权后的“座次”名单，以江青为党的主席，王洪文当第一副主席兼军委主席，张春桥当总理，姚文元当委员长。所以他们抓紧时间，纷纷抢拍个人标准相和“历史性”合影。

10月2日，东北发现异常行动，毛远新通知孙玉国把沈阳部队一个装甲师调往北京。叶剑英获悉之后，立即去电，命令该装甲师停止前进，返回原地……

10月3日上午，华国锋来到中南海。汪东兴即刻向华国锋讲述今日凌晨才拟定好的计划。华国锋觉得这个方案是“可行的”，但建议把时间“再缩短一些，争取提前解决。”汪东兴也赞成提前行动，以防江青这几个人“铤而走险先动手的可能。”

10月3日，王洪文在平谷县“吹风”。他说“要把眼睛睁得大大的，看着修正主义！”“不只是邓小平搞修正主义，出是可能的，不出是奇怪的。”

“今后还可能出什么唐小平、王小平之类，要警惕！”所谓“吹风”，就是给下边透点信息。因为是在基层“吹风”，话就可以讲得比较随便。只要在一个基层单位说了一番话，很快就会通过种种“内参”渠道把漏出的口风“吹”遍全国。

10月4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四人帮”写作班子“梁效”的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文中说：“毛主席的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

金光闪闪，字字千钧，是中国共产党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前进的指南，胜利的保证。”“谁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对没有好下场的。”

粉碎“四人帮”以后，许多史书作者把这篇文章看做是“四人帮”下战书，杀气腾腾，剑拔弩张，公开向华国锋宣战。这篇文章促使华国锋加快了解决“四人帮”的行动进度。

10月4日下午，叶剑英来到汪东兴的办公室。汪把抓捕“四人帮”的行动方案向叶详细作了汇报：确定以召开会议的名义把王、张、姚召到中南海怀仁堂，名义是：一是讨论《毛选》第五卷出版问题；二是研究毛主席纪念堂的方案和中南海毛主席故居的安排。姚文元不是常委，就在文件上特定写明请他来做会议的文字工作。解决顺序是：先解决王、张，再处置江、姚。毛远新区别对待，就地监护。江青、毛远新本来就住在中南海，手到擒拿。迟群、谢静宜等人由卫戍区负责解决。汪东兴还谈了他准备好的具体行动方案，从执行人员的挑选、隔离审查的地点、时间，以及每个细节的详细安排。叶表示赞同这个计划说：“兵法上有这样的话，‘计熟事定，举必有功’‘凡谋之道，周密为宝’。我看这个计划比较成熟，安排也相当周全了，必会成功。”叶剑英随后神情严肃地说：“这件事，要绝对保密，行动要越快越好。时间拖得越久，越危险！”

10月4日下午，华国锋等三人最终敲定了方案。

所谓“中央的决定”，实际上就是由他们三个人作出的。

华国锋是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当时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没有华国锋的参加，拘捕“四人帮”很难以中央的名义进行。

叶剑英是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手握军权。没有他的参加，没有军队的支持，也难于成功。

汪东兴则掌握着中南海的控制权。在中南海拘捕“毛的遗孀”，没有汪东兴的参与是很难进行的。

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这三人，在当时“三足鼎立”，缺一不可。

10月4、5日，上海异常动向。上海民兵在东海舰队机关附近修筑工事。苏振华上将给叶剑英元帅打来电话，报告上海民兵的不正常的集结。“注意他们的动向！”叶剑英马上意识到，这表明上海的民兵在准备动手。

10月5日叶剑英要杨成武告诉聂荣臻，事情已商量好，请他放心。

10月5日，又传来苏振华的急促的电话声音：“上海民兵闯入吴淞口炮台！”叶剑英问道：“他们奉谁之命？”苏振华回答：他们说。“奉王洪文的手令！”“上海城里的红纸被抢购一空，据说，准备庆祝‘盛大的节日’！”

“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许进入吴淞口炮台！”叶帅对着电话话筒，大声地吼道。

10月5日，叶剑英注意到《光明日报》的文章及诸多情况，于下午找到华国锋紧急磋商，建议提前行动，华国锋与叶剑英商定：将原定国庆节后10天再动手的计划，提前到6日晚8时实施，对“四人帮”进行隔离审查。

当日下午，华、汪检查了中南海内准备关押“四人帮”的地下工程。

汪东兴于6日上午以中共中央办公室名义发出密件（即诱骗王、张、姚于6日晚8点到中南海怀仁堂正厅开会的通知）。

10月6日上午，风和日丽。江青让摄影师拍了17张单人半身照。吩咐

摄影师道：“马上给我冲洗、放大，急用！”

10月6日下午3时，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接到汪东兴的电话，要他马上来一趟。张耀祠来到汪东兴办公室时，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副局长武健华也奉命到达。汪东兴直截了当地对他们说：“中央决定，粉碎‘四人帮’！”“立即按计划行动。”

3点30分，汪东兴召来五个行动小组成员，每组四人均为膀大腰圆、训练有素、身手矫健的武警（负责抓捕江青的小组中临时增加了一名女队员，即江青的护士长马晓先），分别在指定地点待命，组与组互不见面。汪东兴逐一向各组宣布了任务和两条纪律。第一、一切行动听指挥，没有汪东兴的命令不得随便开枪。第二、从现在起，以小组为单位活动，四人不得分开，随时待命。负责抓捕王洪文的第二小组组长纪和富提出：万一有人开枪，可不可以还击？汪东兴回答：若有人开枪就往死里打，打死不负责。

10月6日晚7时半，叶剑英、华国锋来到怀仁堂。环视一遍后，端坐在正厅中央的沙发上，迎接着“背水一战”。二人不停地看表。他们的秘书、卫士和汪东兴隐藏在屏风后面，紧张地监视着整个大厅。

7时52分，王洪文最早陷入预伏圈，刚踏入怀仁堂正厅，藏在门后的四个行动队员从两侧拥上，首先将其手提公文包击落在地，然后紧紧挽住其双臂，按下他的头，从后边抬高手臂，做了个“喷气式”，王洪文全力挣扎，无奈寡不敌众，且他的双脚已被提离地面，用不上劲，只能束手就擒。随即被推推搡搡押到叶、华面前，由华国锋宣读中共中央对王洪文隔离审查的决定。然后被挟持到过道后面的卫生间附近，带上背铐，蒙上眼睛，塞进汽车，在中南海内跑了一两圈，将他囚禁在中南海的地下监禁室，关押了大约半年后，转移至秦城监狱。（笔者注：网上有多篇文章写道：“王洪文被捕时曾挣脱束缚，大吼一声，扑向叶剑英……”概属无稽之谈。试想，在精心挑选出来的四名身手不凡的毛泽东生前保镖挟持下，王洪文能挣得脱吗？）

7点55分，张春桥入瓮，没有丝毫反抗，华国锋宣读隔离审查命令，张春桥被带上手铐，脸色阴沉，一言不发，然后被黑布包头乘车在中南海内跑了两圈，行驶到地下室，被关在另一个房间内。

8点25分姚文元姗姗来迟，临行匆匆，没戴假发和帽子，到达中南海后，还没进入怀仁堂即在怀仁堂东侧门厅被捕。武健华宣读中共中央的隔离审查令。与此同时，另两个行动组由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率领，在颐年堂后院拘捕了毛远新，在离颐年堂不远的春藕斋拘捕了江青。毛远新被戴上了手铐，江青没带手铐，算是中共对毛夫人的优惠吧。二人均未明显反抗。

10月6日晚8点30分，“四人帮”被顺利解决，前后仅用了35分钟。

江青被关押后，曾气势汹汹地对看守人员说：“你们去告诉叶剑英，他只要敢放我出去一个月，这个天就会翻过来！”她之所以这样说，是以为自己在人民群众当中有着崇高的威望，深受老百姓的拥护爱戴。因为在被逮捕之前，她每到一处，人们总是高声呼喊：“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其实人们这样喊口号，一方面是出于对毛泽东淫威的畏惧，因为她是毛泽东的夫人；另一方面是出于无奈，因为在当时的政治高压之下，如果不装出对领袖夫人有感情的样子，谁知别人会给自己穿什么小鞋。当江青的这番话传到叶剑英那里，这位老师呵呵一笑，说：“你们也去告诉江青，我只要放她出来一天，群众就会将她打成肉泥！”

叶剑英说得不错。当人们得知江青等四人被捕之后，奔走相告，欣喜若

狂。当时正值秋高气爽、菊黄蟹肥之际，人们以吃三公一母的螃蟹为乐事。一边喝着香醇美酒，一边用小锤敲打着螃蟹，口中还念着“看你横行到几时”。人们纷纷走上街头，举着粉碎江青等丑类的漫画，声讨“四人帮”的滔天罪行，欢庆人民获得了“第二次解放”。人们早就对江青之流恨之入骨，早就盼着有这么一天。长于随风转舵的郭沫若还应景填了一阕《水调歌头·大快人心事》，全国各大广播电台随时插播，广为流传。

江青在关押之地的电视屏幕上看到人们对她的憎恶场面，也终于不再嚣张，低下了她那不可一世的面孔。其实当时老百姓也都明白，四人帮是毛泽东着力培植起来的，四人帮如此猖狂祸害全国，是得到毛泽东全力支持和怂恿的。江青就曾在审判她的法庭上公开叫嚷：“都是主席让我干的”，“我是主席的一条狗，主席让我咬谁我就咬谁，打狗还要看主人嘛”。

1991年6月初美国《时代》周刊向全世界报道了这样一条消息：据6月1日没有透露姓名的“北京方面的消息”说，江青“上吊自杀”了。

中国的新华社于6月4日发布了简讯：本社记者获悉，‘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江青，在保外就医期间于1991年5月14日凌晨，在北京她的居住地自杀身亡。江青在1981年1月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83年1月改判无期徒刑，1984年5月4日保外就医。”

张春桥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1983年1月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97年12月减为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10年。1998年1月保外就医。张春桥因患胃癌，于2005年4月21日病亡。

王洪文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王洪文因患肝病，于1986年送医院治疗。1992年8月3日在北京病亡。

姚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1996年10月刑满释放。2005年12月23日，姚文元病亡。

这四个毛泽东的走狗相继死亡，终结了“四人帮”的祸害，但其余毒远未肃清。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文革”，永远值得反思；“文革”的深刻教训，永远值得汲取。

附注：

[1] 1966年5月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揭发出“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阴谋反党集团”。上述四人被革职审查，这是文革期间毛泽东认定的第一个“阴谋反党集团”都是顶级的实权人物。彭真是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罗瑞卿是总参谋长兼公安部部长、陆定一是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杨尚昆是中央办公厅主任，毛泽东褫夺四人权力后，遂使陈伯达、江青、康生操控的“中央文革小组”一跃成为实际的最高权力机构，取代了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从组织上保证了毛泽东掌握文革控制权。同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决定，批准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撤销彭、罗、陆、杨四个人中央书记处书记和候补书记的决定。毛泽东死了以后，中共中央于1979年至1980年期间分别为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作出了彻底平反的决定。

[2] 四届人大常委会组成名单如下：委员长：朱德89岁。副委员长：董必武89岁，宋庆龄85岁，康生77岁，刘伯承83岁，吴德62岁，韦国清62岁，赛福鼎·艾则孜60岁，郭沫若83岁，徐向前74岁，聂荣臻76岁，陈云70岁，谭震

林 73 岁，李井泉 66 岁，张鼎丞 77 岁，蔡畅 75 岁，乌兰夫 69 岁，阿沛·阿旺晋美 65 岁，周建人 87 岁，许德珩 85 岁，胡厥文 80 岁，李素文（原沈阳市南塔第二副食门市部蔬菜营业员，小学文化，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42 岁，姚连蔚（原西安市昆仑机械厂车工，中专文化，造反派小头目，后来接受采访时，他吐露了真言。姚连蔚说：“我能一步登天，自己做梦也没想到。过去选代表，上面把阶级出身、民族、宗教信仰、工作单位、性别、年龄、籍贯、海外关系这些都确定了，要下面按图索骥……）40 岁。（笔者注：从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人拟定并付诸实施的这个名单看，像个执掌泱泱大国最高权力的办事机构吗？似乎更像垂暮之人的养老院吧！称毛周皆为愚弄人民的骗子，还有怀疑吗？）

[3]《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载：齐国臣子崔杼因庄公与其妻有染，设计杀了庄公，立庄公的异母弟杵臼为君，是为景公，崔杼也自封为相国。齐国太史公如实记载了这件事，崔杼大怒，杀了太史。按当时的惯例，史官是世袭的。于是召来太史的两个弟弟，他们也如实记载，都被崔杼杀了。崔杼召来太史第三个弟弟说“你三个哥哥都死了，你难道不怕死吗？你还是按我的要求，把庄公写成得暴病而死吧”，太史三弟正色回答说：“据事直书，是史官的职责，失职求生，不如去死。你做的这件事，迟早会被大家知道的，我即使不写，也掩盖不了你的罪责，反而成为千古笑柄”。崔杼无话可说，只得放了他。太史的弟弟走出来，正遇到南史公执简而来，南史公以为他也被杀了，是来准备前赴后继秉笔直书这事的。当他看到史书已如实记载后，才回了自己的家。于是史书上便留下了这样的话：“周灵王二十四年，齐庄公六年，春三月乙亥，崔杼弑齐庄公光于其府……”。

（8）英明领袖“抓纲治国”

1976 年 10 月 6 日华国锋秘密纠集叶剑英、汪东兴等人以宫廷政变方式抓捕了四人帮。在 1977 年 8 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英明领袖”华国锋的巨幅画像赫然与“伟大领袖”毛泽东的巨幅画像并列悬挂在主席台中央，继后一段时间华国锋的标准像出现在各种重要场所。“照过去方针办”代替了“按既定方针办”；“抓纲治国，一年初见成效，三年大见成效”的口号响彻天空；一个新的个人崇拜时段开始了。

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前的各次会议没有悬挂领袖像，1945 年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并排悬挂毛泽东和朱德的巨幅画像，此后的八大、九大、十大均只悬挂毛泽东一人的画像，十一大出现华国锋与毛泽东的标准像并列，以后的各次代表大会主席台中央均采用镰刀斧头的标识，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江泽民、胡锦涛都未敢在党代会上悬挂自己的画像。1977 年华国锋立足未稳却自诩为“英明领袖”，大量印制标准像，其幼稚、狂妄、贪婪权欲与不自量力可见一斑。

十一大通过决议确定的方针是：高举毛泽东伟大旗帜，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十一大充分肯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宣告该“革命”胜利结束。。这次代表大会追认了粉碎“四人帮”的历史功绩，确认了华国锋为党中央主席。强调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提出了全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口号，但是毫无明确的目标和具体内容。这次大会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和华国锋的错误影响，未能完成从理论到党的指导方针上根本拨乱反正的任务。走了个过场而已。

十、文革期间死于非命的罹难者

叶剑英在 1978 年 12 月 13 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据

不完全统计，文革期间全国遭受残酷迫害的人有一个亿（占全国总人数的九分之一），冤枉死亡的人数超过二千万，损失了国民经济八千亿人民币。

打倒“四人帮”后，有关部门经过两年七个月的调查，核实“文革”有关数字是：七百四十五万人受迫害，四百二十万人被关押审查，一百七十二万八千人自杀，其中高级知识分子被逼跳楼、上吊、投河、服毒死亡达二十万人（参见《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事实》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合编）。

中共掌控的中央电视台在 1998 年改革开放二十年大型文献记录片中披露：文革十年造成了约三千万冤假错案。

作为唯一的执政者，中共中央理应对这场浩劫造成的灾难认真调查、翔实统计，予以公布，并追究元凶，惩罚罪魁祸首，向全国人民谢罪。遗憾的是至今已经过了五十年。当局仍然含含糊糊，百般遮掩，甚至公开宣扬“不能用前三十年否定后三十年，也不能用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改革，正是对旧政的否定。平反冤假错案是对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的否定；给地富反坏右摘帽是对以阶级斗争为纲方针的否定；实行农村承包制是对农业生产集体化行政化的否定；允许个体私营经济发展是对 1956 年社会主义改造的否定；如此诸多的否定是客观需要，是拨乱反正的体现。

1949 年建国以后，特别是 1956 年社会主义改造到 1976 年文革结束的二十年间，毛泽东随心所欲制定的执政方针，政策，并在此方针政策下形成的管理组织结构如人民公社，指挥的生产活动如大跃进，发动的政治运动如反右等等，都是错误的。更不用说文化大革命了。不否定这些错误，就不可能有改革。所谓“拨乱反正”的前提是“拨乱”。1981 年 6 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文化大革命”和以前的“反右倾”“大跃进”“消灭私有经济”等等错误，作了彻底否定的结论。按照两个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的说法，莫非这些都是不容否定的吗？要取消六中全会的结论吗？1982 年及以后的宪法肯定了“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解体了“人民公社”，批判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等谬论。在“拨乱反正”中，全国共平反纠正了三百多万名干部的冤假错案，四十七万多名共产党员恢复了党籍，数以千万计无故受株连的干部和群众得到了解脱。这些都是对前三十年种种倒行逆施的绝对否定。莫非也否定错了吗？

笔者认为，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实事求是，无论前三十年还是后三十年，成功了的就予以肯定；失败了的就果断否定；错误了的就切实改正。无数历史事实证明，“两个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的说法是荒谬绝伦的，也是愚蠢至极的。是庇护某党“一贯正确”的托词，文过饰非的借口。纵观历史，两个三十年保留的共同点就剩下了“一党专政，个人独裁”，或许这就是“互不否定论”者的梦寐以求。人们啊，警惕！全国人民务必团结起来粉碎妄图复辟“个人独裁”称霸天下者的美梦。

21 世纪初，网上陆续刊登了一些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和悲惨自杀的案例，以下所载挂一漏万的文革死难者名录。主要是根据网上发布的材料整理而成的。限于篇幅这里只摘选了文革罹难者的百万分之一，意在提醒读者勿忘国难之殇，勿忘文革浩劫。

文革受难者被迫害致死，大致有三种：一是直接被殴打、枪杀、折磨致死的，一是殴打折磨后得病而死的，另一是殴打折磨后愤而自尽的。在当局

极力封锁掩饰下，现有材料对受难者死亡状况的记载，往往含糊其词，特别是正式出版物只说“不幸逝世”、“含冤而死”，最多写个“迫害致死”，回避了具体的死亡状况。要弄清具体情况，常要查找各种知情者的回忆材料，而这些材料的说法也并不总是一致的，比如京剧名家马连良。一说穿好全副戏装后在剧场后台服毒自尽，一说心脏病突发抢救无效死亡。有待多方核对。笔者所作的记录，如有出入，还望得到大家的指正。

(1) 文革中被残酷迫害致死的人

卞仲耘（1916-1966），安徽无为县。1941年加入共产党，1945年齐鲁大学（成都）毕业，1949年调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先后任教导员、教导主任、党总支书记兼副校长等职。文革开始。批判“黑帮”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加给卞仲耘的主要罪名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三面红旗”。有一张贴在她卧室门上的大字报，这样写道：“狗恶霸，卞毒蛇，你他妈的听着，你再敢骑在劳动人民头上耀武扬威，我们抽你的狗筋，挖你的狗心，砍你的狗头。你他妈的别妄想东山再起，我们要断你的孙，绝你的种，砸你个稀巴烂。”这就是文革开始后高中女学生所使用的语汇。文化大革命还是大革文化命呢？

1966年7月31日，师大女附中成立红卫兵组织。8月5日再次召开批斗原学校领导大会，卞仲耘被红卫兵活活打死。校工用手推车将卞仲耘的尸体送到学校附近的邮电部医院，在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负责人邓榕（邓小平之女）等虎视眈眈下，医生开具了“死因不明”的死亡证明书。

丰子恺（1898-1975），浙江省嘉兴人。美协上海分会主席、上海中国画院院长、是中国现代画家、散文家、美术教育家、音乐教育家、漫画家、书法家和翻译家。被国际友人誉为“现代中国最像艺术家的艺术家”。

1966年6月，上海中国画院出现了第一张批判丰子恺的大字报。大字报是针对丰子恺发表在《上海文学》1962年八月号上的随笔《阿咪》的，这猫名叫“猫伯伯”。在丰子恺故乡，伯伯不一定是尊称，称鬼为“鬼伯伯”，称贼为“贼伯伯”。故“猫”也不妨称之为“猫伯伯”。大字报居然说，“猫伯伯”是影射毛主席，因为江浙一带口语，“猫”即“毛”之谐音。这之后，丰子恺被诬为“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黑画家”“反共老手”等等，甚而成为上海市十大重点批斗对象之一。“牛棚”，是我们经常看到的文革中的一个字眼，丰子恺没逃过“牛棚”一劫。

十年浩劫期间，丰子恺被加上莫须有罪名，遭到残酷迫害，身心备受摧残。1970年初他患重病，卧病半年。病愈后，他仍坚持作画，并从事翻译。但由于长期受折磨，患了肺癌。1975年9月15日，丰子恺在阴霾蔽日的情情况下含恨长逝。

王任叔（1901—1972）笔名巴人，浙江省奉化县人。早年毕业于宁波第四师范，1925年在奉化中学教书时，加入共产党。

纵观中共党史，从成立之日起内部纷争即连绵不断。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等从苏联归国，在共产国际驻华代表米夫的支持下，将李立三赶下台，但他们又推行更左的路线，导致许多党、团员被捕被杀，损失严重。1932年1月26日晚，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欧阳立安等三十六名高层干部在上海东方旅社三楼召开会议，商讨请求共产国际纠正王明路线的错误，会议开到一半时，大批国民党军警包围了东方旅社，与会者全部被捕。成仿吾、郑振铎都曾怀疑这一事件有人告密，王任叔在搞创作的同时暗中调查“东方

旅社”事件的真相，渐渐地，他将疑点集中于康生身上。曾在上海的《大美晚报》上发表过杂文《谨防小人》和《对奸人的棒喝》等，着重指出：“小人是无所谓原则也无所谓人格的一种人渣，只要达到目的而不计手”“明枪易躲，暗箭难防”。该文影射了康生，引起忌恨。

1959年康生点名批评王任叔，指出他和蒋介石是同乡，且王任叔曾在国民党任过职，从而导致他作为文学界的代表人物，与史学界的尚钺，经济学界的孙冶方开始共同受严重批判，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被剥夺文学创作权利后，他转向史学研究。1960年，在“反右倾”运动中再度受批判，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翌年起，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东南亚研究所编译室主任。1966年初完成160万字史学专著《印度尼西亚历史》的初稿。“文化大革命”中又遭批斗、隔离审查。1966年被抄家，受尽折磨。1968年开始有大字报宣传王任叔是郁达夫被害事件中向日本人告密的叛徒，使得他遭到更严重的迫害。1970年3月被遣返家乡，安置在村西头的两间旧茅屋里，严重的摧残使得他精神崩溃。1972年7月25日病逝。1979年6月中共为其平反，恢复政治名誉。

田汉（1898-1968），湖南长沙人。中国话剧作家，戏曲作家，电影剧本作家，创造社主要成员之一，歌词作家（国歌歌词作者），中国现代戏剧的奠基人。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兼党组书记。田汉一生从事于文艺事业，创作话剧、歌剧60余部，电影剧本20余部，戏曲剧本24部，歌词和新旧体诗歌近2000首。“文革”伊始，田汉被关押在秦城监狱，当糖尿病、尿毒症和冠心病一齐发作时，还被逼趴在地上把自己的小便喝掉。1968年12月10日被逼致死。

刘仁（1909-1973），四川酉阳人，土家族。1927年加入中共，曾在内蒙古、张家口、北平等地从事秘密工作。1935年被派往苏联学习。1937年回国后，担任中共晋察冀中央分局秘书长、城市工作委员会书记和城工部部长，是北京地下党的主要负责人。1949年后，曾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北京市副市长。1966年11月刘仁被点名批斗。1968年1月定性为“反革命敌特分子”，关进秦城监狱，终日带着沉重的手铐脚镣。刘仁被关在监牢几年时间里，吃饭都得举着被手铐铐着的双手匍匐在地，从门下面的那个小洞去掏窝窝头。睡觉时被规定脸必须朝外，铐着的双手就得一直压在胸口的同一侧，刘仁的两只手腕被手铐磨得露出了骨头，脚也被脚镣磨烂。1972年其妻子甘英第一次获准探监，当时刘仁已被摧残得不象样子，探监结束所带回刘仁的衣物已全部发霉，毛裤、棉裤上有大小便的残痕，上衣有斑斑血迹。1973年刘仁终因忍受不住种种折磨含恨去世。

刘少奇（1898-1969），湖南省宁乡县人，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中共八大以后毛泽东蓄谋已久搞掉刘少奇，且看其步骤：

1966年8月中共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毛泽东发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迫使刘少奇处于被批判的境地。

10月23日，刘少奇按照毛泽东的要求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检讨，自己承认是错误路线，使其在党内的声名扫地。

12月18日，经毛泽东批准，名为王光美专案组实为刘少奇专案组成立，周恩来为组长。

12月中旬的一天，张春桥向蒯大富转达毛泽东的授意，暗示他把“打倒刘少奇”的事捅到社会上去。

12月25日，清华大学的造反派头头蒯大富率五千多人，浩浩荡荡开到天安门广场，举行了“彻底打倒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发动了“打倒刘少奇、邓小平大行动”。会后，这五千多人兵分五路，开向西单、王府井、北京站等繁华地段，沿途呼口号、搞演讲、贴标语、撒传单。主要口号是“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彻底打垮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猖狂反扑”等，这些口号还用大标语醒目地贴上了天安门城墙。

1967年1月6日王光美被造反派骗出中南海扣押在清华大学，遭批斗。

1月7日刘少奇之子刘允若被抓进监狱。

1月中旬中南海内的造反派冲进刘少奇住处抄家，批斗刘少奇，在室内贴满侮辱刘少奇的标语。

1月13日深夜，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约见刘少奇，见面就说：“噢，少奇来了，坐，坐”，态度十分和蔼。刘少奇请求辞去国家主席职务，毛泽东未置可否，避开刘少奇的话题，王顾左右而言他。毛泽东建议刘少奇认真读几本书，还特意介绍了法国学者海格尔写的《机械唯物主义》和狄德罗的《机械人》。临别时，毛泽东亲自送刘少奇到门口，要他“好好学习，保重身体”。当夜刘少奇回家后向王光美说主席态度很好，他大概可以过关了。刘少奇此时还看不出毛泽东的真实意图，刘少奇堪称十足的蠢货。

三日后，刘少奇住处再次受到冲击，专用电话线被扯断，从此与外界失去电话联系。刘少奇和王光美站在一个破桌子上接受批斗，中南海外，数十个高音喇叭发出刺耳喧叫“打倒刘少奇”“打倒刘少奇”……。毛泽东在中南海内的住处菊香书屋离刘少奇的住处不过两百米，竟然不觉得吵闹。

1967年4月1日，国内各大报纸登载了署名戚本禹的长篇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公开点名批判刘少奇。

4月6日晚，中南海的造反派高喊着口号冲进刘少奇办公室，向他宣布如下勒令：必须自己做饭、打扫卫生、洗衣服、改变作息时间(过去刘少奇追随毛泽东的生活习惯，夜间工作，上午休息)，并按戚本禹文中所列的所谓“八大罪状”提出质问。

7月18日晚，造反派再次抄家，并把刘少奇和王光美分别揪到两个食堂内批斗、殴打。

8月5日，为了与天安门广场举行的百万人大会相呼应，再次批斗刘、邓、陶。刘少奇、王光美被架进会场，强按下刘少奇的头，把他的手扭到背后做“喷气式”，批斗两个多小时刘少奇被打得鼻青眼肿。

批斗会后，刘少奇被押回办公室，他让机要秘书拿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严正抗议说：我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受宪法保护，我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谁罢免了我的国家主席？要审判，也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你们这样做，是在侮辱我们的国家，我个人也是一个公民，为什么不让我讲话？

刘少奇可能忘记了，1957年被打成大右派的章乃器先生曾手持宪法当面质问他：公民基本权利何在？那时刘少奇不予理睬，此时困境中的刘少奇诉诸宪法，的确是太迟了。

一部据说十分伟大的宪法，为什么不能保护从普通公民到国家主席的尊严和生命呢？

尽管秘书当夜就写了汇报，但刘少奇的抗议没有得到任何回答。

刘少奇得势的时候和毛泽东一样，无视宪法的存在，整高岗，整饶漱石，

整彭德怀，土改、镇反、肃反、反右的时候都将宪法置于脑后，迫害起别人来积极得很哪，他的手上也是沾满了他人鲜血的，属于罪不容诛一类，现在想起宪法来了，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

8月7日，刘少奇给毛泽东写信，抗议给他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书面提出辞去现任职务，并告诉毛泽东“我已失去自由”。未见回复。

9月13日，刘少奇的孩子们被赶出了中南海，王光美被捕入狱，刘少奇则被强迫解下腰带，被“严加看守”起来。

1968年7月，刘少奇突然发起高烧，他的病转成肺炎，引起多种并发症，随时有死亡的危险。当时的中央办公厅负责人对医护人员说：“现在快要开刘少奇的会了，不能让他死了，要让他活着看到被开除出党，给九大留活靶子。”

对刘少奇来说，活着已是一种折磨的惩罚，毛泽东不时地在中南海的书房里看刘少奇生存状况的录像呢。

刘少奇还是要坚持活下去，他要活着看到事实证明他不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司令。

1968年10月5日，他挨完批斗躺在地上半死不活，有人给他带消息说他大儿子死了。他终于托人带话给毛，“你替我给主席捎句话，我离开北京和爱人孩子去延安种地。去老家也行，我愿意做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准备求饶认错投降保命。可惜现在才明白过来，实在太晚了，毛已决心置其于死地。

1968年11月24日是刘少奇七十岁生日，毛泽东精心选择这一天派专人通知刘少奇：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日期是10月31日）议定刘少奇为“叛徒、内奸、工贼”，宣布“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刘少奇听了宣读后，气愤得浑身颤抖，大汗淋漓，呼吸急促，长期积压在心头的忿恨和非人折磨留给他的疾病，一起爆发出来，血压陡升到260/130毫米汞柱，体温高达40℃。他一声不吭，攥紧双拳，那双乾涩的、快要裂开的眼睛，喷射着怒火……。他是否想起他曾经说过“党的决议就是法”。如今也应验在他身上了。悔不当初，然而，为时晚矣。1968年八届十二中全会通过的认定刘少奇为“叛徒、内奸、工贼”，这样一个违背宪法的党的决议，送了刘少奇的命。

1969年10月17日，随时都可能死亡的刘少奇被专机送往河南开封。死的时候要离毛泽东远一点。

11月8日，专案组下令：凡北京陪同来的人，立即撤回北京，北京带来的药也不准用。专案组的人临走之前还特意去火化场看了看。

11月10日晚，刘少奇再度发高烧，第三天早晨6点40分发出病危通知，五分钟后，即公元1969年11月12日6时45分，刘少奇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有人根据刘少奇的表现称其为毛泽东的“功狗”（“功狗”一词出自《史记》，比喻杀敌立功的人），未经任何法律程序到头来落得个“走狗烹”的下场。

得悉刘少奇确已死亡的信息后，毛泽东口头批示：“自作孽，不可活。”林彪批示：“骨朽人间骂未消，烧掉”。周恩来批示：“照林副主席说的办，以火焚之”。

刘少奇的被迫害致死，不值得同情和怜悯。但也不可否认它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人的罪恶之一。

刘善本（1915-1968），山东昌乐人。1935年考入国民党空军航空学校，

毕业后编入远程轰炸机大队并赴美国接受训练，1946年6月他驾驶B-24轰炸机飞抵延安投奔共产党。是为国民政府空军降共第一人，随即被派往东北任航空学校副校长。1949年加入共产党，中共开国大典之际，刘善本曾带头驾机飞越天安门广场耀武扬威，1964年授予少将军衔。“文化大革命”不久，刘善本被诬为“假起义，真特务”，1968年3月被抄家，专案组对其连续审讯、批斗，3月8日晚刘善本被活活打死。时年53岁。

事后，迫于舆论压力，毛泽东扬言追查，刘善本专案组副组长随即服毒自杀，主要责任人空军学院革命委员会筹备组组长白云，打死刘善本当天在学院值班，亲自修改上报材料，捏造事实，隐瞒真相。并指使专案组人员集体签名写出《刘善本何许人也》的大字报，继续造谣污蔑。此事惹恼了毛泽东，白云被中央军委撤职但仍保留少将待遇，一直活到96岁。是耶非耶？谁予评说。毛泽东之阴险狡诈隐在其中，力图逃脱杀害刘善本之罪责，不可不察。

何其芳：1912年2月5日生于重庆万州，193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现代诗人、散文家、文学评论家。1938年，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做过朱德的私人秘书受到极大器重。1944—1947年两次被派到重庆，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从事文化工作。历任中共四川省委委员、宣传部副部长，《新华日报》社副社长等职。1949年后历任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和书记处书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等职。

1956年在反胡风的政治运动中，何其芳紧跟毛泽东。言词刻薄，恨不能置人于死地，与胡风激烈交恶。

如此积极的何其芳在“文革”中也未能幸免，被打为“走资派”。受到拳打脚踢式的批斗，被罚跪、扫厕所，历经磨难。1969年后被下放到河南干校劳动改造，在那里喂猪。“文革”中，造反派认为中国科学院文学所所长何其芳不能用这个好听的名字，于是给他改名“何其臭”。以后每逢开批斗会，都让他自报家门。开始他不适应，仍报何其芳，立即受到斥责：“你能叫何其芳吗！你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你‘芳’在哪里！”他马上改口：“何其臭，何其臭！”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了。他被查出是晚期的癌症。1977年7月24日，何其芳永远离开了人世。

邵荃麟（1906年-1971年），浙江慈溪人。出生于四川重庆。早年就读于上海复旦大学经济系，参加学生爱国运动。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国文艺理论家、现代文学评论家、作家。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主席、党组书记。1962年7月，他在大连主持召开了“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强调“现实主义深化”，提倡人物形象多样化，除正反两类人物形象外，还应该写中间状态的人物。这对于克服农村题材小说创作的浮浅单调现象起了积极作用。但后来却因此受到公开批判。1964年底，邵荃麟因所谓“中间人物论”受到了严厉的批判。“文化大革命”中遭残酷迫害，于1971年6月10日含冤病死狱中。他从1925年起直到“文革”被剥夺各项权利止的40年间，经历了现代史上几个时期社会政治的动荡、分化、改组，他从中共革命的青年参与者，进入中高级领导层，几度沧桑，最终沦为阶下囚而丧生。毛泽东死了以后，1979年9月21日，中共为邵荃麟举行了追悼会，宣布恢复名誉，平反昭雪。1981年4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出版了《邵荃麟评论选

集》。

连阔如：1903 年生于北京市安定门外一满族镶黄旗旗人家中。6 岁入私塾，因家境贫寒，多次辍学。13 岁先后进照相馆、杂货铺、中药店当学徒。22 岁在北京天桥摆卦摊谋生，1927 年拜评书艺人李杰恩为师。从此开始评书艺术生涯，在各书茶馆说评书。1947 年开办“连记杂货店”，兼做广告。雇佣三人。

1949 年 7 月，作为北京曲艺界惟一代表，出席第一届全国文代会。因说评书《夜渡大渡河》受到周恩来表扬。9 月，在人民新华广播电台演播评书《红军万里长征渡乌江天险》。10 月，任大众游艺社社长，组织演员在前门箭楼演出新曲艺。1951 年 3 月 12 日，受彭真市长委派，前往朝鲜慰问志愿军，表演评书《武松打虎》等节目，深受欢迎。归国后，到四川、西藏宣传动员抗美援朝工作，沿途演讲，历时 8 个月。1953 年 9 月，参加中国文联第二次代表大会，同年应邀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人民大学、中国戏曲学院等高校授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史研究所办评书艺术讲座，并且在河北省电台演播新评书《李有才板话》《三里湾》和《暴风骤雨》。1955 年 4 月，每天 18 点，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表演评书《水浒》《东汉演义》；每天 13 点 30 分，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表演评书《秦汉演义》《三国演义》。听众如云，连阔如被人称为“净街王”“跑马连”。12 月，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北京分会。1958 年 2 月 19 日，连阔如被划为“右派分子”。3 月 16 日，有关广播电台评书节目停播，从此连阔如结束了在各广播电台长达 21 年的说书生涯。

1959 年挂靠在北京宣武说唱团“改造”，郁郁不乐，60 岁退休。1971 年 8 月 18 日因肠癌逝世。

严志弦：(1905-1968)，江苏武进人。1926 年大学毕业，1930 年受聘于东吴大学，开始了他的教学生涯。1935 年翻译出版了 H. G. D e m i n g 原著《普通化学》成为当时国内多数大学的教材。1937 年起在复旦大学任教，先后编辑出版《无机化学教程》《络合物化学》《定性分析原理》等多种备受欢迎的专著，其中部分被外国学者译成英、俄文出版。严志弦曾出国讲学，深受好评。“文革”初期，严志弦惨遭迫害。他呕心沥血建立起来的络合物化学实验室亦毁于一旦。1968 年 5 月 15 日，红卫兵把打得只剩一口气的严志弦架到家门口撂在地上，用力砸门狂呼乱叫后扬长而去。他的妻子出来看到，早晨出去一个活人，回来还没进门槛，就咽气了。悲痛欲绝，泣不成声，求天不应，告地无门。一代宗师就这样被暴虐吞噬了生命。

陆洪恩(1919-1968)，上海市人。1941 年毕业于国立上海音乐专科学校，出国深造后于 1950 年入上海交响乐团，1954 年起任乐团指挥，1956 年，首次全国音乐周在北京举行，陆洪恩率上海交响乐团赴京，在陈毅和周恩来建议下，上海交响乐团为各国驻华使节作了一次专场演出。陆洪恩身穿燕尾服，手持指挥棒，在金碧辉煌的大厅里热情洋溢地指挥着中国首个交响乐团，为各国使节演奏了多部世界名曲。当他的指挥棒在空中划了一个潇洒的圆点、结束最后的演出时，全场报以雷鸣般的掌声。他转身向各国朋友致意，心中充满着一个中国人的自豪！

此后的几年中，他曾为招待苏加诺总统等各国首脑人物演出，还与苏联、捷克、波兰等音乐家联合演出，虽然十分忙碌，但也是他最有成就感和最快乐的时候。陆洪恩就任上海交响乐团常务副团长，并自己作曲、指挥演奏。

那欢快明朗的旋律在上海上空回荡，把一个知识分子对祖国的赤诚之心袒露在千千万万人民面前。他的指挥艺术和他的音乐作品令当年上海的许多交响乐爱好者久久不能忘怀。

1965年1月，陆洪恩和上海交响乐团的人一起到上海附近的奉贤县农村参加所谓“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精神受了刺激，在上海精神病院住院接受治疗，确诊为精神分裂症。两个多月后病情有所缓解，遵医嘱继续服药。他能回团上班，但不再担任指挥。1966年5月再次发病，因发病时曾有所谓“攻击江青”“反对文革”“贬低样板戏”等反动言论，5月28日被逮捕。关押期间，多次遭受刑讯逼供，病情随之加剧。某天开饭时，看守把他的饭菜倒在地上，喝令他趴在地上像狗一样舔着吃。这位著名音乐家怎禁得住这般凌辱人身尊严的胡作非为，陆洪恩再也无法忍受了，当着看守的面破口大骂：“巫婆！什么文化大革命，大革文化命！大革人的命！”看守听着不由一愣，随即把他拖出去，又是一顿暴打。如此折磨导致他的精神分裂症日益严重。1968年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决死刑执行枪决。1981年陆洪恩被宣告无罪。

有专家查找资料时发现：希特勒时代曾规定，“侮辱元首者，拘留两星期”。中国文革时代，远未到“侮辱”程度，就可能被枪毙。把精神病病人的话当作“反革命”言论，把人们的政治异见作为罪证判处重刑甚至死刑，都是文革中由上面指挥而普遍发生的事情。在这个意义上说，陆洪恩是典型的文革受难者，他的悲惨遭遇，说明了文革的残暴。

尚小云：1900年出生于河北邢台南宫县。幼时家贫，刻苦学戏，师从名家，兼容并蓄。初学老生，继之以武生、花脸，最后才改旦角。尚小云在近六十年的舞台实践中创造出了“文武并重，歌舞兼长，清新英爽，洒脱大方”的京剧尚派艺术。以文武兼擅驰名。与梅兰芳、程砚秋、荀慧生并称“四大名旦”

1966年5月，尚小云正在为编演革命现代京戏《秦岭长虹》和改进戏校教育奔走。想不到6月1日那篇大动乱宣言书《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出台，戏校就和全国一样像炸开了锅。大字报铺天盖地，“打砸抢”风起云涌，尚小云被扣上了“资产阶级反动艺术权威”“旧戏霸”“封、资、修黑尖子”等政治帽子关进“牛棚”，遭受各种残酷的批斗，他的家多次被抄，门被糊上了封条。夫人和儿子都受牵连同他一起关进“牛棚”，每人每月只给极少的生活费。1973年，尚小云获得了“解放”，回到了自己的家。但八年的折磨，他坚持每日练功的雄健身体被摧残了，先是全身伤痛，继之左眼失明。1976年春日的一天，尚小云在家中突感身体不适，家人送他往医院抢救，终因心脏病猝发，于4月19日逝世。一代艺术大师就这样悄悄地陨落了。

张学思（1916—1970），辽宁海城人，张作霖之子，张学良之弟。1933年4月加入中共，1938年赴延安，1940年率队到晋察冀任冀中军区司令部参谋处长。1943年起任冀中军区副参谋长兼作战科科长。1944年调任晋察冀军区平西军分区参谋长。建国后任海军参谋长。1967年9月11日凌晨4点突遭逮捕，罪名是长期潜伏的危险分子。在狱中遭受连续十三天严刑逼供残酷折磨。1970年6月末，蒙受不白之冤，死于非命。

张霖之（1908—1967），河北南宫人，1929年考入国民党陆军第二十一师军官教导队，同年12月加入中共，在该部任共党秘密支部书记，曾组织直南暴动。建国后任南京市副市长，重庆市市委书记等职，1957年起任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为官时颐指气使，作威作福，人称酷吏。文革伊始毛泽东钦

定为走资派，彭真死党，三反分子。在北京矿业学院戴着三十公斤重的铁帽子横遭批斗、毒打，四十二天遭疯狂批斗五十余次，1967年1月22日凌晨，滴水成冰的北京，张霖之死了，尸身被扔进火葬场的一间小屋子，斜卧在一块冰冷的水泥地上，前额塌陷了，后脑勺上有个血迹风干的血洞，脖子上留下了累累勒痕。这就是妻儿见到的最后的张霖之，文革中第一个死于暴力的部长。张霖之与毛泽东毫无渊源，既不是江西的，也不是延安的。他是中共北方局一手培养的干部，也就是刘少奇的嫡系。毛泽东煽动红卫兵批斗张霖之，意在给刘少奇一点脸色看，可惜刘少奇执迷不悟，应对无方，最终也惨死于毛泽东手下。

贺 龙（1896-1969），湖南桑植人。1914年参加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1927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同年参加南昌起义，加入共产党。撤出南昌后逃往山区，创建湘鄂根据地。1935年率部长征。抗战开始任八路军120师师长，开辟了晋西北根据地。1949年率华北野战军第十八兵团由陕入川，任西南局书记。1954年调中央工作，1955年授元帅衔。1965年为罗瑞卿鸣不平受到冲击，1966年9月5日上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休息室接见贺龙时说：“你不要怕，我当你的保皇派。”此后贺龙即避居在中南海西华堂周恩来寓所院落之内。1967年1月19日周恩来和李富春约见贺龙正式谈话，让贺龙迁居到北京西山，并检查其所犯错误，周恩来许诺“秋天我来接你”，实际却是软禁，周恩来从此未见贺龙之面。西山的住所十分荒僻，三面环山，只有一条小路与外界相通，除贺龙及其妻子薛明和监守他们的警卫战士外，终年不见他人。贺龙患有高血压、糖尿病，因生活条件恶劣发展成脑缺血失语症。1967年9月13日毛泽东批准对贺龙立案审查。伙食标准降低，医疗更无保障，贺龙多次向周恩来写信求救，不见答复。1968年10月13日毛泽东在中共第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宣布，他对贺龙不保了。由此生活条件每况愈下，连温饱也做不到了，甚至没有被子和枕头，只能用手臂为枕，睡在木板上。1969年6月9日含冤去世。

赵丹若（1892-1966），浙江嘉善人。191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化学系。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任教期间曾随鲁迅等保护进步同学，反对当局迫害学生。1930年赴美国康乃尔大学研读分析化学及农业化学，获博士学位。回国后，任中央大学、南京药学专科学校教授。1949年受聘为复旦大学教授。是我国分析化学专家。三十年代首先在国际上提出阴离子系统分析法，发表《阴离子系统分析》、《稀有元素之定性分析》等论文及多部专著、译著。文革浩劫难逃迫害，1966年8月8日上午，赵丹若被毛泽东蛊惑起来的红卫兵批斗，戴高帽、罚跪、满脸涂黑、游街，毒打。“斗争会”开了八十分钟，年逾古稀的赵丹若突然倒地，气绝身亡。

陶 铸（1908-1969），湖南衡阳人。早年当过店员，1926年入黄埔军校五期，同年加入共产党。1933年在上海中共中央工作，当年5月被捕，1937年被营救出狱。参加过辽沈、平津战役。1960-1966年任中共中南局第一书记。1966年8月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名列毛、林、周之后，跃升为中共中央第四号领导人。毛泽东之所以在文革初期大力提拔陶铸是因为延安整风期间陶铸曾经受过刘少奇的打击，与刘当众争吵，芥蒂甚深，且陶是林彪部下，此时正好利用陶铸作为打倒刘少奇的先锋。孰料1959年后陶即认同刘少奇的务实路线，刘也与陶主动修好，因此陶未能充任毛指派的角色，反而庇护刘、邓。毛恼羞成怒，这个才提拔了不到五个月的陶铸随即被毛视

为最大的保皇派。1967年1月毛泽东支持江青、陈伯达公开批斗陶铸，认定其为叛徒。1969年11月30日陶铸在幽禁他的合肥“秘密病房”中以手掌猛力击墙，含恨而死。陶铸的后代将其击墙时留下的手印镌刻在墓碑上了，供后人观览、深思。

曹宝禄：1910年11月3日生于北京朝阳门里南小街大雅宝胡同贫民家庭。13岁时拜弦师尚福春为师，学唱梅花大鼓和京韵大鼓，16岁出师，即在天桥畅宜园等茶馆卖艺。1930年，拜金晓珊为师，学唱单弦牌子曲和联珠快书。四十年代已成名于曲艺界。曹宝禄是一位全才的八角鼓表演艺术家，除了单弦还擅长联珠快书、岔曲、腰截、群曲以及拆唱牌子戏等曲种，并精通梅花大鼓、京韵大鼓的众多曲目、他的单弦艺术特色是唱腔跌宕激越，行腔流畅，韵味隽永，悠扬动听。他吸收了荣、常、谢等各家之长，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世称“曹派”。他的传统曲目《风波亭》《续黄粱》《白猿偷桃》《穷逛万寿寺》《翠屏山》、《武十回》《五圣朝天》等拿手唱段，脍炙人口，家喻户晓。他的代表曲目还有联珠快书《蜈蚣岭》《碰碑》《闹天宫》，拆唱牌子戏《胡迪骂阎》《双锁山》等等。

北京解放后，曹宝禄积极参加曲艺改革工作，热情演唱新曲目。1951年到1952年，先后两次参加赴朝鲜慰问团，任曲艺服务大队副队长。受到周总理亲切接见和表扬。

五十年代初，主持排演曲艺剧《柳树井》，培养了一批青年演员，奠定了北京曲剧的基础。1952年担任新组建的北京市曲艺团团长。

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停止演唱。文革时期蒙受冤屈。作为专政对象送到南口农场劳动改造。1972年，转送到天堂河农场继续改造，身心备受摧残。之后长期患病多次住院，1988年11月，病逝于北京。

梁思成：1901年生于日本，原籍广东新会，梁启超之长子。14岁入北京清华学堂，1924年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获硕士学位，1927—1928年在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进修，1946年受聘美国耶鲁大学教授，联合国大厦设计顾问建筑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赠授文学博士。1946年创办清华大学建筑系。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在清华教学二十余载，为国家培养了大量优秀的建设人才，可谓桃李满天下。在学生们的心目中，他已经成为一座永远的丰碑——学问大家，人格典范。梁思成195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文革浩劫中，梁思成被毛泽东蛊惑起来的造反派打成“反党分子、混进党内的大右派、反动学术权威”受到残酷批斗。后又以“国民党潜伏特务”的罪名单独关押于陋室，与外界完全隔离。梁思成历来体质欠佳，二十二岁时遭遇车祸，造成左腿骨折，从三十二三岁时起，上半身就箍着钢架子。一身是病。虚弱到不能站立和走动的梁思成，每到斗争会时，都要坐在一辆全清华最破的手推车上接受批斗。每次斗完，梁思成都如死人一样长时间缓不过气来。他曾经绝望地对家人说：“抗战八年，我跋山涉水，先长沙，后昆明，再李庄。面对饥饿与疾病，我过关斩将，终于迎来了胜利之日。现在看来，我是过不了文革这一关了。”他一语成谶，不幸而言中。1972年1月，一代建筑学宗师溘然长逝。

补记梁思成轶事：1944年，美国空军对日本本土进行空前规模的大轰炸，当年，梁思成为了劝阻美国空军对奈良的摧毁。他面对布朗森上校恳切地说：“上校先生，要是从我个人的感情出发，想到千千万万中国人蒙受的深重灾难，我是恨不得马上炸沉日本四岛的。然而，上校先生，您大概知道，

“建筑”这一词在英语里叫“Architecture”，原是“巨大工艺”的意思。所谓“巨大”并非指它面积与体积，而是指它是人类社会科学、工程技术和艺术发展的综合体。因而，建筑又是“社会的缩影”，“民族的象征”。但它绝不仅仅是某一个民族的，而是全人类文明结晶的积淀。我图上所标上的地方，保留着东方最古老的建筑。像奈良的唐招提寺，法隆寺，那是全世界最早の木结构建筑，一旦炸毁，那是永远无法补救的。就像希腊的巴特依神庙，现在只剩下一些短柱了，它辉煌壮伟的原样，现代人谁也无法见到了。外行人往往误以为完全可以重修再建。然而，在巴特依神庙的残址上，再竖起几根石柱，补上精美雕塑，那就像给维纳斯补上断臂，那还能是巴特依？还能是维纳斯吗？”

一个著名的建筑专家，一个遭受日本侵略的中国学者，呼吁保留建立在日本领土上的、体现人类文明的古代建筑，分外使人感动。布朗森上校是个懂得艺术的人，他被说服了。不过他告诉梁思成，空袭计划须经上级将军批准，“他是位西点军校出身的三星将军”。听了这话，梁思成抽出一只红笔，在两处打了三个星的地方，又各加了一颗星，说：这两处，京都和奈良，可是东方古代建筑艺术上的“四星将军”啊！

当布朗森上校把梁思成的报告和地图送到三星将军手里时，将军展卷凝神，长时间沉默，他在缜密地思考。

于是，好几次美军飞机飞到奈良上空，没扔炸弹就飞走了……

奈良因其完好地保持有众多的古代建筑以及占有全日本十分之一的“国宝”级文物，而被宣布为世界历史文化名城。

五十年代初，梁思成等建筑学家根据北京作为中国政治中心的性质，预见到北京的长远发展，提出将新的政府行政中心区放在旧北京城的西郊，即“新北京”一带。那里有足够的面积，更利于兴建交通便利四通八达的现代化都市。他们主张把经过历代王朝修建的、世界上少有的历史名城保留下来。在改建中保持它的传统风格。为保护北京城的完美布局，清华大学建筑学家梁思成与陈占祥拟定了《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建议保留城墙，清理护城河，引永定河水，夏日放舟，冬季溜冰；城墙宽阔的顶部辟为空中花园，如一条绣带环绕京城；十几座城门楼改造成文化馆、图书馆。在京西五棵松一带另构新城作为行政中心，南起丰台、北至圆明园福海，形成一条新的南北中轴线，与老北京的中轴线平行，由长安街东西一路贯之。梁思成的夫人、也是清华教授的林徽音闯进北京市长彭真的办公室力诉城墙不该拆之理时，彭拿出了毛的批示：“城墙是封建象征，是皇帝挡农民的。”

（笔者注：中南海是皇家花园，内中的各色古建筑是皇帝的住所和休闲娱乐之地，毛泽东入城后即抢先入住，且戒备森严。怎么就不说那是皇帝住的、是挡农民的了）。梁、林建议得到的结果是梁思成被批判，北京的许多古建筑被相继拆毁，历经五百余年构建的古都风貌荡然无存。

徐舜寿：1917 年生于上海，祖籍浙江湖州。16 岁考入清华大学机械工程学系，继后又考入中央大学航空机械特别研究班。毕业后在国民党空军中教授飞行原理课程。1944 年赴美国实习并在华盛顿大学进修，1946 年回国在第二飞机制造厂任职。1948 年拒绝迁往台湾，1949 年投奔中共。当年 12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6 年中共在沈阳成立飞机设计室徐舜寿被任命为主任设计师。成功地自主设计了高亚音速歼教—1 型喷气教练机。随后，他又主持了初教—6 型教练机和强—5 型强击机的总体设计。1957 年“反右”斗争开

始后，许多技术干部蒙受不白之冤，有的被撤职，有的被划为右派。徐舜寿深感痛心，善意地向党委提出意见，由此被定为右倾。在“大跃进”中，让他组织设计超音速战斗机时，他从实际出发，直言劝阻。在反“右倾”检查时，徐舜寿仍然坚持认为：“搞设计必须有科学程序，前后衔接，逐次接近”。他的这些观点，后来都已被证明是完全正确的，当时却受到了无端批判，并被撤销了党内职务。文革爆发后，他马上“靠边站”了。随着动乱的加剧，“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走资派”、“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特务”等莫须有的罪名横加在他的身上，他被无休止地、残酷地批斗、审讯、逼供、关押、强劳、殴打，被强行服用残害身体的药物……1968年1月6日，徐舜寿在被残酷迫害后溘然长逝。没有留下一句话就离开了这个世界，也离开了他一生钟爱的航空事业。他所受的非人折磨，史料有所记载，令人不忍卒读，至今当局严禁传播！遗体火化时，火化工人说：“这个人是非正常死亡的。正常死亡的人火化后的骨灰应是白色的，而这个人火化后的骨灰是发黑的！”

彭德怀（1898-1974），湖南湘潭人。湖南陆军军官讲武堂毕业。中共开国元勋，共和国元帅。抗日战争中，他发动百团大战，意在改善共产党游而不击的声名。保卫延安战役中，为毛泽东取得了喘息的机会，朝鲜战争中，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守住了北纬三八线，争取到和谈。彭德怀历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第一任国防部部长，中共第六至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59年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因写信给毛泽东指出大跃进中的问题和弊病，被毛泽东打为“彭、黄、张、周反党集团”之首。文革中惨遭非人迫害，1966年12月22日北京地质学院的红卫兵受江青、康生、戚本禹的指使将彭德怀从成都抓到北京，秘密囚禁。阴冷潮湿的囚室，门窗紧闭，玻璃上还糊了一层纸，照不进一缕阳光。无休止的批斗、审查与铁窗生活，使他患了直肠癌。又因为肋骨被打断不治引发左侧偏瘫。数次给毛泽东、周恩来写信被置之不理。76岁的老人于1974年11月29日死在一间狭窄的暗室中。从此，后世既不会忘却毛泽东为他唱的赞歌——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惟我彭大将军！——也不会忘记毛泽东诛灭敢为民请命的忠良之冷酷无情。

如果彭德怀在庐山进谏的“万言书”被采纳一二，就断无接踵滥觞于茫茫九州的遍野哀鸿，活活饿死4000万人的亘古悲剧。毛泽东之罪孽深重罄竹难书。

潘天寿：1897年生，浙江宁海人。现代画家、教育家。历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浙江美术学院院长。1966年文革爆发，潘天寿成了浙江美院第一批被揪斗的对象。被关进牛棚监禁达三年之久。他在杭州的家被抄得底朝天，“革命干将”们拉走的珍贵书画文稿达六、七车之多，连笔墨纸砚也抄了去，作品被列入墨画名单。回杭州途中在一张香烟壳纸背面写下最后一首诗：“莫此笼樊狭，心如天地宽。是非在罗织，自古有沉冤。”1971年5月，被定案为“反动学术权威、为敌我矛盾”。潘天寿当晚大量尿血，昏迷不醒。病中被造反派押回宁海老家，交给当地群众作为“活靶子”批斗，百般凌辱……9月5日凌晨，突然气喘得厉害，双腿剧烈地抖动，汗如雨下。黎明前，一代国画大师潘天寿带着“士可杀不可辱”的傲骨，带着“自古有沉冤”的无声呐喊溘然长逝！

董希文（1914-1973），浙江绍兴人。1949年参加中共。著名油画家、美术教育家。曾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1952年创作了著名的油画《开国大典》

颇受好评，是国家文物局规定的“作品一律不得出境”的六位大师之一。《开国大典》画历经多次修改。1954年抹掉高岗，代之以两个话筒。“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中国革命博物馆通知董希文在画面中去掉刘少奇。此时，新生的共和国已经历了1957年的反右斗争和1959年反对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斗争，政治空气十分紧张。董希文本人也经历了被打成“右派”，留党察看两年，下放干校劳动改造的磨难。“文革”中，他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在北京钢厂接受劳动改造，因过度疲劳，胃溃疡穿孔，在做了胃切除四分之三的大手术后不到半年，又回到了劳改农场，数月后被诊断为癌症晚期。接到抹除刘少奇的任务后，董希文颇费思量。由于刘少奇位于中间，去掉后的空缺一定要有“人”来填补，而且还要牵动旁边的人。董希文抱病奉命到博物馆亲自进行修改，在刘少奇的位置上改画了董必武。1979年，中共中央提出要恢复《开国大典》原貌。因董希文已经病故，于是决定由阎振铎、叶武林对复制品进行修改，刘少奇、高岗又出现在了油画上。依中共之作风，此画不知还要被修改几次。九泉之下的董希文作何感想呢？

虞光裕：1918年生，江苏金坛人。1941年从中央大学航空工程系毕业后在成都航空研究院任技术员。1944年被派赴美国麦克唐纳飞机工厂和英国格罗斯特飞机工厂实习，并参加国民政府与英国合作的飞机设计工作。1949年他毅然放弃国外良好的科研条件和舒适的个人生活，拒绝了去台湾的命令，经香港、南朝鲜，辗转三个月，于1949年8月初安全抵达天津。不久即奉命主持我国第一台喷气发动机的设计研制，建设我国第一个航空发动机试验基地。曾任中国航空研究院发动机研究所总设计师。在“文化大革命”中，虞光裕遭受迫害，强制劳动改造。1970年5月25日，在拆卸旧锅炉时，被重物砸伤，因流血过多，不幸死亡，终年52岁。

焦菊隐（1905年-1975年），出生于天津。1928年燕京大学毕业后任北平市立二中校长。1935年秋，焦菊隐赴法国留学，1938年初被授予巴黎大学文学博士学位后，很快回国。1941年，任广西大学文法学院教授，积极参加抗日活动。焦菊隐先生以戏剧导演大师立于世。他是中国将莎翁名著《哈姆雷特》搬上舞台的第一人，也是把《罗密欧与朱丽叶》改编为京剧（《铸情记》）的第一人。1952年6月12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成立，曹禺任院长，焦菊隐、欧阳山尊为副院长。在北京人艺，焦菊隐担任导演先后排演了郭沫若的《虎符》、《蔡文姬》、《武则天》，老舍的《茶馆》，田汉的《关汉卿》《名优之死》等。

1966年“文革”开始，焦菊隐首当其冲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老反革命。被无休止的批斗，被多次抄家，多年保存的书籍文物大量流失，而批斗也不断升级。被囚禁在人艺北四楼排演场大牛棚。文革的政治运动终止了焦菊隐的学术进程，摧毁了他的一切梦想，在生命的最后十年里，他被剥夺了创造和言说的权利，曹禺回忆那时的焦菊隐是“沉默的、几乎不会说话的上年纪的人”，两人都在“牛棚”“铺挨着铺”。1975年2月28日凌晨，焦菊隐离开人世。

文学艺术界是十年浩劫的重灾区，受批斗者数百万。依毛泽东的偏见，各行各业中凡出类拔萃者必有反骨，他只需要唯唯诺诺的奴才。文艺界的连阔如（评书艺人）曹宝禄（单弦艺人）严凤英（黄梅戏演员）丁果仙（山西梆子演员）均为贫苦出身，文化程度也不高，生前都拥护共产党，在各自的岗位上积极努力脱颖而出，深受广大人民群众欢迎，毛泽东时代均遭迫害死于非

命。一幅画、一出戏、一曲单弦、一段相声、一首诗歌、一篇小说、一部电影都可能被认定为“猖狂进攻”“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十恶不赦”“罪该万死”。是不是可诅咒的时代呢！

文革中死难的大师级人物有：

书画艺术家：潘天寿、丰子恺、王式廓、董希文、陈半丁、秦仲文、陈烟桥、马达、倪貽德、肖传玖、吴耘、张正宇、吴镜汀、叶恭绰、刘子久、乌叔养、符罗飞、贺天健、彭沛民、郑野夫、李斛、沃渣、王颂咸、李又罍、张肇铭、李芝卿

作家、诗人：田汉、阿英、赵树理、柳青、周立波、何其芳、郑伯奇、郭小川、芦芒、蒋牧良、刘澍德、孟超、陈翔鹤、纳赛音朝克图、马健翎、魏金枝、司马文森、海默、韩北屏、黄谷柳、远千里、方之、萧也牧、李六如、穆木天、彭慧、姚以壮、邓均吾、张慧剑、袁勃、徐嘉瑞、李亚群、林莺、沈尹默、胡明树

文艺评论家：冯雪峰、邵荃麟、王任叔、刘芝明、何家槐、侯金镜、徐懋庸

翻译家：董秋斯、满涛、丽尼

电影艺术家：蔡楚生、郑君里、袁牧之、田方、崔嵬、应云卫、孟君谋、徐韬、魏鹤龄、杨小仲、刘国权、罗静予、孙师毅、夏云瑚、冯喆、吕班、王莹、赵慧深、瞿白音

京剧表演艺术家：周信芳、盖叫天、荀慧生、马连良、尚小云、李少春、叶盛兰、叶盛章、高百岁、裘盛戎

话剧艺术家：章泯、焦菊隐、孙维世、舒绣文、兰马、高重实、万籟天、白辛、伊兵

戏曲艺术家：张德成、李再雯、竺水招、苏育民、顾月珍、筱爱琴、韩俊卿、丁果仙、阎逢春、徐绍清、蔡尤本、刘成基、白云生、韩世昌

曲艺家：王尊三、王少堂、张寿臣、俞笑飞、江枫、连阔如、肖亦吾、固桐晟

音乐家：郑律成、马可、黎国荃、向隅、蔡绍序、陆洪恩、费克、舍拉西、查阜西、李淦、张斌、王建中、沈知白、李翠贞、阿泡、杨宝忠

各界知名人士：邓拓、老舍、陈笑雨、陈梦家、言慧珠、叶以群、刘盼遂、赵慧深、罗广斌、严凤英、杨朔、储安平、傅雷、翦伯赞、上官云珠、容国团、周瘦鹃、李广田、吴晗、顾而已、闻捷、刘绶松、范长江、王重民、陈琏、李平心、熊十力、顾圣婴。

文革时期死难者的阴魂未散，毛泽东之肆虐是不能忘记的。

不对文革从思想上、政治上、行为上做彻底的清算，只批评演员，不涉及编剧和导演，文革的阴魂就会始终盘旋在中国人民的头上，不一定什么时间，就会在中国人的心窝上再狠狠扎上一刀。当局的某些人希望全民对文革浩劫“失忆”，让惨痛永远埋葬在九泉之下，让人们遗忘历史。相当部分文革遇害者及其家属因为曾长期生活在恐惧和威吓中，今天仍心有余悸，怯懦地选择了沉默和回避，“忘记过去、一切向前（钱）看”。撩揭这块伤疤，打破沉默，做一个“记录者”，写下对历史的反思是否会遭当权派的怨恨呢！作为经历过噩梦的耄耋老人，书写一段血染的真实历史，是为了警醒后世，也是为了正告前前后后的当权者。我无惧无悔。

(2) 文革中自杀的知识精英

最近浏览了文革中悲惨自杀的案例，我进一步去了解和思考这方面的问题。于是，就有了下面这个名录。所谓知识精英，是指知识分子中比较有影响有成就的部分，他们是文教、科研、艺术、医学、体育等领域中的中坚和骨干。限于条件，我们还无力做全体受害者的名录，那就先从这些人做起。这个名录是我对网上查找到的材料所作的初步梳理（包括核实、筛选、补充），目的是让自己、也让周围的朋友，对当年运动的真相、对我国人民特别是知识阶层所付出的沉重代价，作更多的回忆和思考。十年文革，惨案无数，“非正常死亡”的人数以千万计，有人估计其中死于自尽的至少也有几十万、上百万之多。编制个百人名单，完全是挂一漏万之举。但是，在缺乏全面普查、在有关当局压根儿不想开放档案、不想做任何反思的情况下，我们这些草民也只能通过这种“举一知万”的办法，来记录历史，记录下这个万恶的年代。梳理并编制这一名录的过程，我的心情一直是压抑和沉重的。我仿佛再次看到了当年的恐怖和残暴，众多鲜活的生命，众多年富力强充满创造活力的生命，竟然如此无奈又如此壮烈地毁于一旦，这是多么巨大的悲哀！任何一个普通人的自戕，都是让人悲痛的；何况那么多国家民族的精英和栋梁之材，其中不少还是所在领域的权威、泰斗、大师级人物啊！他们的离去给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民族带来的损失，更是无可估量的，那是历经几十年、甚至几代人的时间都无法弥补的！文革的罪孽刻骨铭心，永世难忘。

这些知识精英走向死亡之路的共同点，就是悲壮二字。他们的死，和平常年代中的“自杀”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有人貌似惋惜地说：为什么一定要走这条路呢？再忍耐一下、坚持一下，不就可以迎来拨乱反正的一天了吗？持此种观点的人要么对当年的恐怖和残暴毫不了解毫无体会，要么就是被“逆来顺受”、“好死不如赖活”的传统思维浸透了骨髓，而这种人生哲学正是国民劣根性的重要表现，它让国人几千年来始终在“做稳了奴隶”和“做奴隶而不得”的状态中徘徊。

让我们这些过来人再回顾一下当年的惨状吧，让没有经过这场浩劫的年轻人也来了解一下当年的情景吧，那些被毛泽东煽动起来的野蛮和残暴，已经到了何等疯狂的地步！

所谓批斗，就是要当事人在群众大会上双膝跪地（不是地板，而是水泥地、沙石地、煤渣地、甚至是玻璃渣地！），或是低头弯腰、两手向后翘起（所谓喷气式！），颈上悬挂着大块纸板、木板、甚至几十斤重的钢板，上面写着“x x 分子 x x x”的大字，在酷暑烈日之下、或是凛冽寒风之中，一跪（或是一站）就是几个小时，周围是震耳欲聋的“打倒”口号和呵斥之声。身旁的暴徒随着会场的气氛，不断地拳打脚踢，或是手执棍棒器械、或是挥舞铜头皮带鞭子绳索，劈头盖脸地抽打。。。

所谓游街，就是给当事人套上用一串字纸篓子糊的特大高帽子，上面书写着“x x 分子 x x x”，颈上也是挂着大块的纸板、木板或是钢板，还要边走边敲打面盆之类的响器，边走边喊“打倒 x x x”（自己的名字）之类的口号；还会给被批斗者剃个阴阳头（头发剃一半留一半），甚至用黑墨汁、蓝墨水、红墨水，满头满脸浇灌一气，弄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然后像牲口一样被架着游街示众，走遍大街小巷，“革命派”在后面又呵斥又喊口号，极尽侮辱之能事；还往往引来某些围观者的恶弄，吐唾沫、丢石子、泼脏水。

所谓审查，就是日夜不停地无休止地逼供，审讯者吃饱睡够了轮番上阵，被审者夜以继日地、不让吃不让喝不让睡地接受审问，通过疲劳轰炸、呵斥

拷打、虐待折磨，直弄得你神志恍惚、体力衰竭，然后逼迫你、诱使你招供，交代“反党罪行”、“反革命计划”、“反革命同伙”，如有不从，照例又是拳打脚踢、鞭棍交加。

以上叙述实在还不能写尽当年人们所遭受的全部侮辱、折磨和迫害。那真是史无前例的凶残和野蛮！如果说封建专制和法西斯年代的凶残，总还有一定的场所（比如在审讯逼供或牢房之中），而文革中的野蛮凶残则已遍及城乡各地各个角落，简直无处不在。只要拉起一个团伙、紧跟“领袖”的部署、打起“革命造反”的旗号，就可以整人、打人、残害无辜。在“**无产阶级专政就是群众专政**”的口号鼓动下，在“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的最高指示下，人的尊严扫地以尽，人的生命如同草芥，置身于此情此景，叫人还怎么“忍耐”、怎么“坚持”？人总还有一口气嘛，何况中国的文人向来有“士可杀不可辱”的传统、“宁为玉碎，勿为瓦全”的气节，“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的情操。面对此等野蛮、残暴、非人待遇，他们毅然慷慨赴死，誓以生命作最后的抗争，这不正是十分值得人们敬重的决定吗？当然，各人的情况会有差异和不同。有一种人原来曾经执掌过实权，比如某些（不是全部）大学的党委书记，某些单位和地方的党政头目，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害过人、作过恶，文革之初他们又想故伎重演、把祸水引向普通群众、在普通群众中抓“牛鬼蛇神”；后来风向一转，他们竟被更有实力的当权派抛了出来，成为运动的替死鬼，在绝望之中选择了自尽。正像复旦大学党委宣传部原任部长徐某后来总结的那样：他们的前半生是整人，后半生是挨整。这种人的死，也很可悲，但却悲而不壮。他们是特定制度的牺牲品和陪葬品。是文革的祭物。

知识精英群体总体上的悲壮情怀，是值得我们永远铭记的。这些精英的离去，归根结底是罪恶的制度和蛮横的运动发动者、操控者所造成的，罪魁祸首就是毛泽东。如实记录下死难者的事迹和遭遇，如实记录下文革的种种残暴和丑行，让一代一代的年轻人都能了解过去，都来总结和思考历史的教训，从而杜绝历史悲剧重演的可能。只有这样，才不至于愧对这些含恨离去的人们，只有这样，才能把他们的悲壮和不幸，化为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财富，有助于创建一个公平正义、珍惜生命、尊重人权的社會。愿我们都来为此而努力。

以下即为文革中自杀的部分知识精英名录（共 107 名，以简体字姓氏笔划为序）

1、上官云珠（女）：1920 年生，江苏苏州人。著名电影演员。曾在《乌鸦与麻雀》、《一江春水向东流》等片中饰演角色，被誉为“艺苑新葩，倾国倾城”由此蜚声影坛。1949 年后在上海电影制片厂工作。1956 年 1 月受到来上海视察的毛泽东“亲切接见”，旋即以“按摩医师”名义入中南海小住，由此招致江青忌恨。文革初期，江青操控“上官云珠专案组”对其残酷批斗，多次毒打，反复抄家。上官云珠盼望领袖出面救她。可是一句顶一万句的毛泽东硬不肯为她说一句话。1968 年 9 月，江青指挥的专案组要上官云珠交待与毛和其他首长的关系。整她的造反派们心毒如蝎，严刑逼供。上官云珠坚守秘密死也不说。1968 年 11 月 22 日上官云珠被轮番批斗，日夜交替，写不完的交待，受不尽的折磨，致使她心力交瘁。当晚，面对高楼外茫茫黑夜，几经踟蹰，冲出窗外。一代名伶魂归九天。善演怨愁角色、号称“悲剧皇后”的上官云珠，从此香消玉殒，结束了她的悲剧人生。

2、马思武：1905 年生，广东海丰县人。著名音乐家马思聪的二哥。早年留学法国，回国后曾在外贸部上海办事处工作，文革时任上海外国语学院出国培训的法语教授。1967 年 1 月马思聪无法忍受运动中的迫害，秘密逃离中国，他的许多亲戚朋友因此受到株连。1968 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马思武被指控曾经帮助马思聪“叛国投敌”。7 月 10 日在学校的主楼“君儒楼”中被批斗殴打，一直折磨到深夜。第二天，马思武从楼顶跳下自杀身亡。他死后，在中国住了三十年的法国夫人只好离开中国，两年后在法国去世。

3、马连良（1901-1966）原籍陕西扶风，生于北京：9 岁入北京喜连成科班，23 岁自行组班，发展成为独树一帜的“马派”表演风格，历久不衰。代表剧目有《借东风》、《甘露寺》、《清风亭》、《四进士》、《失空斩》等。二十年代，他与余叔岩、高庆奎、言菊朋并称前“四大须生”；后三人去世，他又与谭富英、奚啸伯、杨宝森并称后“四大须生”。1931 年马连良在天津与周信芳同台演出，因他们技艺精湛，各具风采，被誉为“南麒北马”。

1966 年，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革命就是暴力，就是抄家、打砸抢。马连良的家被红卫兵洗劫一空。他多年收藏的古董、字画、以及所有的摆设、玉石盆景都被砸碎在地。当管辖该地段的派出所王所长闻讯赶到马家的时候，只见大门敞开，一拨一拨的红卫兵都忙着抢东西，整座四合院面目全非，地上全是残物碎片，惟独不见了人。所长急了，东找西寻。终于，从他家厕所里找到了人。马连良瘫坐于地，面灰如土，穿的白衬衫全被撕破，脸上、身上都是伤。想到昔日舞台上的马连良，是何等的清秀俊逸。这个爱好戏曲的所长，心痛如刀割。他也豁出去了，当着满院子的红卫兵，搀扶着马连良回到自己的卧室。

“离店房逃至在天涯路外，我好比丧家犬好不悲哀。”这是马连良在京剧《春秋笔》里的两句唱，二黄闷帘导板接回龙。在疾风骤雨的气氛中，惶恐的

主人公化装更名，由差官陪同，向远道逃亡。这里，马连良的演唱、做派、脸上、身上、台步、手里头、脚底下，全是戏。不拘一格，纵横如意。每演至此，掌声四起。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竟有一天，身在家中却成了丧家之犬，且无路可逃。

1966 年 6 月 4 日，马连良听到广播里已把周信芳打成“反革命”，联想到自己主演的《海瑞罢官》天天在受批判，急火攻心，一向甜润嘹亮的嗓子突然嘶哑起来——马连良预感到自己大祸临头了。果然，第二天，北京京剧二团团部就有人贴出了马连良的大字报。从此，这位中国京剧艺术的顶级大师被赶出了摸爬滚打一辈子的京剧舞台，随后一病不起，住进了医院。一个月后，他被造反派从医院里拖上大批判的舞台，开始蒙受屈辱的折磨。马连良在京剧舞台上的地位高，住牛棚的“地位”也高，造反派给他设置了一个阴暗狭窄的禁闭室。他竟然没死，不过此时已气若游丝，全身浮肿，已是心脏病晚期，10 月 1 日，马连良被释放回家，造反派却不允许他去治病。1966 年 12 月 13 日中午，马连良步履蹒跚地排队买了碗面条，还未等转身，就先扔掉拐杖，再扔了装着面条的碗，仰天一跤，如一片枯叶缓缓倒下。人送到了阜外医院，终因心力衰竭，1966 年 12 月 16 日，马连良遽然长逝。

4、孔 厥：1914 年生，江苏吴县人。著名作家。抗战时在宜兴任《抗战日报》编辑，1938 年去延安，入鲁艺学习，加入共产党。后任研究员，开始文艺创作。建国后作过报纸编辑、电影编剧，出版过多部作品，并被选为

作家协会理事，他的长篇小说《新儿女英雄传》极力美化中共。文革中遭受迫害，1966年投陶然亭湖自杀。

5、毛启爽：1907年生，江苏宝应人。1929年去美国哈佛大学电机工程研究院深造。回国后曾在浙江、复旦、沪江、交通大学执教。中共执政不久，就送女儿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他热爱祖国，努力工作，被任命为上海科技大学教务长，无线电系主任、教授。在1966年“横扫牛鬼蛇神”的高潮中，被批斗、殴打、辱骂，还剃了“阴阳头”。批斗后的那个周末，他没有回家，在宿舍将电线捆在手腕上，触电自杀身亡。他死去的第二天，整个校园贴满大标语，把他的姓名打着红色的大叉，声讨他“自绝于人民”。

6、邓拓：1912年生，福建福州人。1930年加入中共，因参与“广州暴动”和“福建事变”，两次被国民政府逮捕，均获释出狱。1937年进入五台山，任晋察冀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撰写了大量热情讴歌和宣扬毛泽东思想的文章。1942年首次提出“毛泽东主义”，1944年主持编辑出版中国第一部《毛泽东选集（晋察冀版）》。建国后任人民日报社长兼总编辑。六十年代初，邓拓应《北京晚报》之约，撰写《燕山夜话》专栏杂文。不久，与吴晗、廖沫沙合作在《前线》杂志撰写《三家村札记》杂文。这类杂文爱憎分明、含蓄委婉，旁征博引、妙趣横生、切中时弊，富有寓意。深受读者欢迎。“文化大革命”开始，毛泽东以此作为打倒彭真、刘少奇的突破口，邓拓、吴晗、廖沫沙被打成所谓“三家村集团”，邓拓身心受到极大摧残。1966年5月17日晚写下《致北京市委的一封信》和《与妻诀别书》后，于18日蒙冤自尽，是为文革中以死抗争的第一人。

7、叶以群：1911年生，安徽歙县人。著名文艺理论家。早年留学日本，1932年入党，同时加入“左联”，并任组织部长。解放后曾任上海电影制片厂副厂长、上海文联副主席、上海作协副主席等职。叶以群著述颇丰，一生谨奉“遵命文学”，到头来还是被柯庆施、张春桥等打成了叛徒。1966年8月1日晚他在绝命书中还要求子女“读毛主席的书，听共产党的话！为党立功！”。翌日清晨，叶以群走到阳台上，在徘徊了足足三个小时之后，鼓起了最后的勇气，从上海繁华地段华山路枕流公寓六层楼跳下，告别了尘世。

8、田保生：国际法学家，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长期在国民政府外交部工作，四十年代在联合国办事处任职。建国后响应其恩师著名学者钱端升的召唤回国，在外交学会从事国际法的编译工作。他质朴诚实，埋首苦干，举凡奥本海国际法巨著，希金斯和哥伯斯合著的海上国际法等英文原著译成中文，都有他一份辛劳。1957年被划“右派”，忍辱负重，苟且偷生。文革中又被连续批斗，残酷折磨，他不堪法西斯式的凌辱，与妻子双双自杀。毛泽东死了以后，中共方予“摘帽改正”。82岁的钱端升（57年也被打成右派，自身难保）才得以告别得意门生的亡灵，手抚骨灰盒老泪纵横哀痛难止。有谁能理解他那时的心情呢？

9、田家英：1922年生，四川新都人。1938年赴延安，1948-1966年任毛泽东秘书，掌管毛泽东的存折、印章、稿费，兼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为毛泽东起草了不少重要文稿，如《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等，参与编辑《毛泽东选集》，《毛泽东诗词》，深受毛泽东赏识和器重。但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田家英赞同彭德怀致毛泽东信件中的某些观点，虽未被划入“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却引起毛泽东不满。田家英也对毛泽东的所作所为有所怀疑，积淀多年的崇敬

之心有所动摇，言语之间偶有不肯屈从的表现。文革伊始，毛泽东认为田家英对中共高层内幕了解太多，对其个人在中南海干的龌龊勾当也通晓十之七八，留在身边难免败露，必欲除之而后快。1966年5月22日令田家英停职反省，交出全部文件，搬出中南海。田家英深知毛的为人，料定自己已坠入深渊，断无生路，于1966年5月23日含冤自绝，吊死在毛泽东卧室兼书房外面的走廊上（一说为遭汪东兴随身卫士朱某枪杀，朱随即失踪，至今未见正式定论）。

10、卢锡铨：1923年生，江苏常州人。1944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任北京大学化学系副主任、副教授，曾担任化学系党总支副书记，书记。抗日时期曾为帮助来华抗日的美军做翻译，为此在“清理阶级队伍”时遭迫害，1968年6月24日喝敌敌畏自杀。妻子林芳为化学系器材室职员，于7月19日随之自杀。

11、白辛：1920年生，吉林永吉人，赫哲族，原名吴宇洪。著名剧作家。他先后创作或改编了20多部歌剧、话剧和电影文学剧本，影响较大的有《冰山上的来客》、《赫哲人的婚礼》、《焦裕禄》等。文革开始，白辛看到别人被批斗、受蹂躏的惨景，虽然当时还没有冲击到他身上，但想到自己创作的电影《冰山上的来客》已被江青点名之后，便对身旁的朋友说：“我可不能让他们这么折磨我，我决不受这份罪。”1966年9月的一天，他带上一瓶酒，一听罐头，一瓶敌敌畏，来到松花江上一个无名小岛，壮烈而潇洒地走了。死时坐依在一棵树上，那不屈的身躯没有倒下。赫哲族的刚强汉子以自己宝贵的生命来对抗文化专制，捍卫着人的尊严。

12、乐松生：1908年生于北京，祖籍浙江慈溪。其先祖乐良才为当地知名郎中，明朝永乐年间进京，经营药材为生，救死扶伤，诚信待客，传至四五代后，康熙己酉年在北京前门外开设同仁堂，经营有方，为宫廷内府供药，名声大震。乐松生1948年接任同仁堂国药店经理，是为第十三代传人。中共掌权后，乐松生积极迎合，带头认购国债、中共出兵朝鲜时捐献飞机一架、1954年捐献房产多处、率先公私合营，由此，乐松生受过毛泽东、周恩来接见，并引以为荣。当选为市人大代表和市政协委员，并出任北京市副市长，躲过了“反右”一劫。文革袭来厄运难逃，红卫兵（由高干子女组成的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西城纠察队，简称西纠也称联动，文革中抄家武斗之风即始自西纠）冲进了他位于崇文门旁的院子，先是给他挂牌子“彭真的红人反动资本家乐松生”，接着是批斗殴打，而且把他的母亲和夫人梁君谟叫出来一起打，他和夫人在被毒打中满地爬行躲避。两位女眷竟然被活活打死，他也遍体鳞伤。后来虽然经过医治活了下来，但压力过大和思念亲人的极度悲伤，让他在一年多后选择了自杀。死时年仅60岁。虽然他把价值连城的企业给了国家，但这一切保护不了他，依然有如此悲惨的下场。

13、孙锦：水利专家，“九三学社”四川省主委，1957年“反右”初期，只因说了一句“只有百分之百的不说话才是最大的安全”就被衍生为“对党心怀不满”的结论，被四川水利厅党组书记金鉴铁定为“最阴险的右派”。“文革”批斗中，一再被打翻在地并踏上一只脚，最后死于“毛泽东思想革命造反派”脚下，家破人亡。（老骥在《乱世天堂》中为之作了如实记述）。

14、老舍：1899年生，本名舒舍予，北京人，满族。著名小说家，剧作家。抗战期间曾主持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工作。中共建国后长期追随共产党，歌功颂德。历任全国文联副主席、作协副主席、北京市文联主席等

职。代表作有长篇小说《骆驼祥子》、话剧《茶馆》等。曾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1966年8月23日在北京市成贤街孔庙内遭红卫兵批斗，被打得遍体鳞伤，头破血流。第二天清晨，老舍独自走到离家不远的北京太平湖边，静坐了一日，当晚投湖自尽。著名作家汪曾祺的小说《八月骄阳》专门写老舍投湖之死，一腔愤懑深藏在凄清和冷寂中

15、许政扬：1925年生。浙江海宁人。1945年考取光华大学中文系，1946年转燕京大学中文系，后任天津南开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员，讲授中国文学史、宋元文学史、唐宋诗词等课程，学有所长，业有专攻。文革开始后，他被列入中文系的“反党集团”，遭到“斗争”，被罚在烈日下拔草，多次被抄家。1966年8月，他不堪凌辱自沉于住处旁小溪。时年41岁。骨灰没有被保留。文革后为他举行“骨灰安放仪式”的时候，骨灰盒子里装的是他校注的《古今小说》一书。

16、刘克林：1924年生，湖北新化人，著名记者。1946年燕京大学新闻系毕业后长期在重庆和香港《大公报》任职。建国后历任上海、北京《大公报》总编室、评论部、国际部主任。1963年调中共中央宣传部国际处，曾以新闻专员名义随周恩来出访亚、非、欧各国。文革开始后被连续批斗，于1966年8月6日堕楼而死。

17、刘盼遂：1896年生。河南淮滨县人。古典文学专家，语言学家。1925年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问教於王国维、黄侃门下，1949年起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任古典文学教授。1966年自杀身亡（一说被红卫兵打死后将尸体浸入水缸，诬为自杀）。与刘盼遂一同赴死的，还有他的夫人，据说她当天外出买菜回来，看到丈夫已魂飞天外，于是默默走入屋中，在水缸中自沉。笔者不知道今天的读者看了这样的“故事”，会不会感觉到历史的沉重！有没有当年的亲历者或亲闻者来证实一下这个“故事”呢？是否有人会站出来“忏悔”呢？我们有众多的历史研究工作者，难道我们鲜活的历史，总是要等到成为后人手里的“考证学”时，才会慢慢得到澄清么？抑或就此不了了之呢？呜呼！这就是毛泽东时代遗留的痼疾。

18、刘绶松，1912年生，湖北洪湖人。著名文学史家。1938年毕业于西南联大。1949年后任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刘绶松为人谦和，谨小慎微。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作协武汉分会副主席，《长江文艺》副主编等职。著有《中国新文学史初稿》等。“文革”中遭受迫害，1969年3月16日被批斗后与妻子张际芳（中央大学教育系毕业）一起自缢身亡。

19、孙梅生：山西人，北京师范学院数学系系主任、教授。为人谦和，很有幽默感，以教书出色闻名。1966年夏天，他遭到造反派无端批斗，在学校后操场外的“丰沙线”铁道上撞火车自杀。有人看到，他先坐在铁轨旁边看报纸，火车来了，他迎着火车冲上去，火车把他撞死了。孙梅生的一个同事听到此讯非常难过和震惊，匆匆跑到铁轨旁，想和孙梅生遗体告别。只看到了孙梅生肝部以下的半个身体。他的肝脏流出在外，而且只剩下一条腿。没有敢看第二眼，因为太可怕了。

20、伍必熙：复旦大学新闻系教授、主持系务的副主任。文革初期遭受冲击，1967年在该校第八宿舍跳楼自杀。尸体无人收拾，在宿舍楼下的水泥地上整整放了近一天。

21、言慧珠（女）：1919年生，北京人，蒙族。著名京、昆剧表演艺术家。言菊朋之女，梅兰芳之徒、俞振飞之妻。解放後曾任上海市戏曲学校副

校长，擅演《玉堂春》、《游园惊梦》等。“文革”中遭批斗、殴打、抄家，平生积蓄被抢劫一空，肉体和精神均受到巨大伤害。被誉为京剧“八大坤伶”之一的言慧珠，不堪凌辱，又不甘舍弃为之献身一生的京剧昆曲，1966年9月11日晚，接连写下三封绝命书後，身着戏装自缢身亡。演绎了一曲让人闻之悲痛欲绝，睹之惨绝人寰的悲剧。

22、陆近仁：1904年生，江苏常熟人。早年赴美国康乃尔大学深造，获博士学位。返国后在清华大学、北京农业大学任教，一级教授，著名昆虫学家，中国昆虫形态学的创始人之一。“反右”和“文化大革命”期间，很多有才华、多成就、敢直言、讲真理的专家、教授，受尽凌辱与迫害，陆近仁也未能幸免。1966年8月遭到连续批斗，被罚跪、挂牌、游街。他不堪忍受非人的折磨，9月1日和其妻子吕静贞一起悬梁自尽。

23、李 达：1890年月生，湖南永州人。中共的主要创建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中共一大、二大代表。大革命失败后脱党。建国后，长期担任武汉大学校长和中国哲学学会会长。文革中遭批斗迫害，1966年8月24日自杀身亡。

24、李广田：1906年生，山东邹平人。著名作家。1935年毕业于北大外语系。1948年入党。历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副教务长、云南大学校长、昆明作协副主席。一生著作颇丰，文字技巧和思想内容日趋洗练和成熟，常于诗情画意的描写中，透露出富于哲理的意趣。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他的名字可以和朱自清、冰心等列在一起。“文革”中遭残酷迫害，被监禁，被拷问，被批斗，被挂牌罚跪，被拳打脚踢……1968年11月2日夜里，他突然死在昆明市郊外的莲花池内，头部被击伤，满脸是血，脖子上有绳索的痕迹，腹中无水……，待人发现时，他已直挺挺地站立了好几小时，死而不倒！昂了首，望着天。

25、李立三：1899年生，湖南醴陵县人。1921年加入中共，领导过著名的安源工人运动和五卅运动。1928年至1930年曾任中共政治局常委兼秘书长。建国后任中央政府委员、劳动部长。主张维护工人利益，工会独立。与毛泽东意见相左。文革开始，李立三在短短两个月中遭受十四次无情批斗殴打，于1967年6月22日服安眠药自杀。死前留下《致主席》的遗书。

26、李平心：1907年生，江西南昌市人。历史学家。1946年与马叙伦、许广平等筹组中国民主促进会；解放後任华东师大历史学教授，并当选为上海历史学会副会长。文革前夕即遭围攻和迫害，1966年6月20日含冤自杀。

27、李丕济：1912年生，河北宁河人。水利专家。早年留学德国，后任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对国家水利建设颇有贡献。曾经主编《水力学》教材，还为多座大型水库做过水工模型试验。清理阶级队伍时被关在水利馆大楼，1968年11月29日跳楼自杀。

28、李再雯（女）：生于1922年，祖籍山东，为著名评剧白派创始人白玉霜养女，艺名小白玉霜，14岁起登台演戏，在京津一带享有盛名。建国后主演大量现代戏，蜚声海内外。1967年遭批斗毒打，12月21日含冤吞食安眠药自杀。时年45岁。

29、李希泰：1916年生，山西省灵丘人，西安交通大学电工教研室副教授。早年曾经留学美国，1957年被划成“右派分子”。文革中被强加种种罪名关押“审查”，甚至毫无根据地诬称他“书写反动标语”。李希泰不堪忍受，于1970年7月12日上吊自杀身亡。

30、李季谷，1895年生，浙江绍兴人。著名历史学家。1917年毕业于浙江省立第一师范，1918年赴日本留学。1926年任北京大学教授。1928年赴英国剑桥大学留学，获硕士学位。回国后仍任北大教授并兼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文史系主任。1938年任西北联合大学教授、历史系主任。抗战胜利后，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1949年随国民政府从杭州撤退到宁波后，他悄悄留下来，辗转到上海，以后长期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任教授。著述主要有《西洋近百年史》、《日本通史》等。文革中被长期批斗并被关入“牛棚”。1968年7月25日，被审讯折磨至深夜，随后在校园里投河自杀。

31、李翠贞（女）：1910年生，上海南汇县人，著名钢琴家。早年毕业于上海音专，1934年李翠贞赴英国皇家音乐学院深造，以优异成绩结束学业，并于1936年9月被吸收为英国皇家音乐协会会员。1940年回国后长期任教，建国后任上海音乐学院教授、钢琴系主任。李翠贞在文革中遭受了极大的屈辱，红卫兵强迫她趴在地上钻过桌椅，还用墨水涂她的脸。这位高雅的、讲究修饰的女士不堪如此屈辱，她选择了尊严的方式结束生命，把门窗封好，防止邻居中毒，交代了所有缴纳和未缴纳的费用清单。穿上最漂亮的衣服，并且精心的化了妆，服了安眠药再拧开煤气……1966年9月9日，当地居委会派人撬开门以后，看到李翠贞面朝房门坐在沙发上，身穿旗袍脚穿高跟鞋，目瞪口呆，宁静而安详。

32、何基：1916年生，江西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1968年8月11日，在学校大规模“游斗”教师时遭到残酷折磨和侮辱。八月酷暑，气温40℃以上，一百多位教师被迫跪在水泥坪和校园的主干道上，黎仲明、熊化奇、周天柱在批斗中昏厥致死，何基目睹如此惨状心中难安，当晚自杀身亡。

33、陈璉（女）：1919年生，浙江慈溪县人，系蒋介石高级幕僚、有“文胆”之称的陈布雷之小女。1939年在重庆国立二中读书时，被中共发展为地下党员。1947年，热恋多年新婚不久的袁永熙陈璉夫妇，因私设秘密电台被捕，陈布雷多方求情，方被释放。此事非同小可，惊动了蒋介石，蒋命令陈“严加管教”之。自尊心极强的陈布雷，顿觉家门失色，颜面丢尽，不久自杀身亡。1949年后陈璉曾任林业部教育司副司长、全国妇联执行委员。1957年，时任清华大学副校长的袁永熙被打成右派。于是陈璉成了“右派家属”，子女成“右派子女”，为此她感慨道：“革命是多么残酷啊！同志一转眼间会被当作敌人！”为划清界限，陈璉被迫选择了离婚的绝路。谁知仍摆脱不了不清白、说不清的干系。“文革”开始后，陈璉即被定性为国民党的“残渣余孽”，被诬蔑是叛徒、特务。在残酷的批斗与侮辱中，她的精神崩溃了。1967年11月19日，从十一层楼上纵身跳下，竟也追随其父选择了自杀的方式谢幕，一念繁华一念灰，两代悲歌，同为一曲。

34、陈又新：1913年生，吴兴（今湖州）人。小提琴演奏家。1938年毕业于上海音专，长期从事小提琴演奏和教学，建国后曾赴英国皇家音乐学院深造，回国后任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主任、教授。文革中遭迫害，1968年跳楼自杀。

35、陈子晴：1926年生，江苏无锡人，西安交通大学应力教研室副教授。文革中被批斗和关押，罪名是“污蔑、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陈子晴于1970年7月4日上吊自杀身亡。

36、陈天池：1918年生，浙江诸暨人。化学家，教授。1941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化学系。1949年获美国路易斯安那大学理学博士学位，后任科罗

拉多大学研究员。1950 年回国。历任南开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化学所研究员，中国化学会第二十届副秘书长。在有机磷化学和农药化学研究领域成果显著，1964 年获国家新产品发明二等奖。文革袭来，以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之罪名遭受批斗、殴打。1968 年 12 月 20 日不堪残酷迫害自缢身亡。

37、陈同度：1904 年生，天津人。生物学家、教授。早年留学美国霍布金斯大学，获博士学位，回国后在南开大学、北京大学生物系任教。主持编写了北京大学生物系用的《生物化学》教材，在 1968 年“清理阶级队伍”斗争中遭受残酷折磨，8 月 28 日服毒自杀。

38、陈邦宪：1914 年生，江苏嘉定人。著名医学教授。1938 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部，在重庆等地从事医务工作。1947 年留学美国哈佛大学，获硕士学位。随后回国，任圣约翰大学教授、仁济医院院长。1954 年起任上海第二医学院卫生学教研室主任、教授，文革中被诬为反动学术权威，愤而服毒自杀。

39、陈传纲：1912 年生，湖北武汉人。早年在复旦大学读书，1938 年加入共产党，从事白区学生运动和抗日救亡工作，1940 年进入延安。曾受王实味案牵连长期蒙冤。中共建国后，在中国政法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任校级领导，文革前任上海复旦大学副校长和党委副书记。1966 年 6 月被上级抛出来，宣布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随后服大量安眠药自杀。

40、陈昌浩：1906 年生，湖北武汉人。原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总政委、红军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1936 年西路军奉中共中央命令“打通连接苏联通道”深入不毛之地，失败后转辗到达延安，1939 年去苏联。1952 年回国后任中央编译局副局长。文革开始后不断被揪斗，1967 年 7 月 30 日服大量安眠药自杀。

41、陈祖东：1912 年生，浙江湖州人。水利专家。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随后去美国、印度考察工程建设。曾在上海龙华机场任总工程师，解放后任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他是陈立夫的堂兄弟，在“清理阶级队伍”中被残酷批斗审查，1968 年 9 月 20 日在圆明园遗址上吊自杀。

42、陈笑雨：1917 年生，江苏靖江县人。著名文艺评论家。解放后历任《文艺报》副主编、《新观察》主编、《人民日报》编委兼文艺部主任。文革初期即在报社蒙受数次批斗，并在一次“牛鬼蛇神”游楼时逼他下跪请罪，还有人打了他一记耳光，且揪撕他的头发让他抬头看看“我是谁？”在这种深受侮辱的情况下，家属也只好划清界线，他面临一种前有埋伏、后有追兵、四面楚歌的困境……1966 年 8 月 24 日，笑雨先生没有回家，迳自来到从钓鱼台流出来的清水河边。当人们寻他不见，想起他走出报社大门时，曾把一个书包扔在收发室，打开书包找出一个本子，上边赫然写着两行字：“死了比活着好，死了更干净。”当尊严与侮辱相碰撞时，笑雨先生义无反顾，选择了尊严。

43、陈梦家：1911 年生，浙江上虞县人。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16 岁开始写诗，师从徐志摩、闻一多，1931 年出版《梦家诗集》，为新月派重要成员之一。1949 年后在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曾任考古所学术委员，《考古通讯》副总编，在考古及古文字研究方面著述甚丰，颇多创见。陈梦家在 8 月 24 日夜里写下遗书，服安眠药自杀，由于安眠药剂量不足，当时未死，十天后自缢身亡。

44、张昌绍：1906 年生，江苏嘉定人。著名药理学家。早年毕业于上海

医学院，1940年获英国伦敦大学医学院哲学博士。长期在上海医学院（后改为上海第一医学院）任教授兼科主任，建国后还任中国科学院药物研究所学术委员、《中华医学杂志》、《生理学报》、《药学学报》的编委等职。文革中遭迫害，于1967年12月服毒自杀。

45、张宗颖：1917年生，浙江杭州人。著名政治活动家张东荪的三儿子。1950年社会学科被取消后，在天津某文化用品公司工作。文革中怀疑他家有电台而遭批斗迫害，1966年和妻子吕乃朴一起服毒自杀。

46、张宗燧：1915年生，浙江杭州人。张东荪次子，193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并留校攻读学位。1938年获英国剑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并先后去丹麦、瑞士进行科学研究。1939年回国任重庆中央大学物理系教授。1945年以英国文化协会高级研究员身份赴英国剑桥大学进行科学研究并讲学，是第一位在剑桥大学开课的中国人。1947年赴美国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院、费城加尼基工业大学工作。1948年秋回国，在北京大学任教。并任中科院学部委员。张宗燧是一个为学严谨的完美主义者，常说从事研究是人生的最大享受，也是他生命的支撑点。因此当获知多年积累的研究笔记，在文革浩劫中被抄家抄走而遗失时，伤心欲绝，从此无以入眠，身体逐渐衰弱。张宗燧率真坦荡，既有科学的直觉，又无法苟且政治之歪曲。而无休止的斗争折磨，更使他无以忍耐。一个极为自信的学者，竟堕入极度的失望之中，于1969年6月30日服用过量安眠药自尽，结束了辉煌而又委屈的一生。

47、吴晗：1909年生，浙江义乌人。少时聪颖，成年后师从胡适。学业有成，28岁时即被云南大学聘为教授。1949年后，曾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文学院院长。后又任北京市副市长。五十年代，为了满足他想研究明史及明朝皇帝的计划，极力主张挖掘明成祖长陵（后改为挖掘定陵）。文化大革命之前，曾伙同康生，利用职权，强行从中国大陆文物收藏家手中廉价收购珍贵文物。吴晗一贯追随毛泽东，主张拆除北京城墙和北京的古建筑，甚至提出过改建故宫的构想，为此与梁思成、林徽因等争吵。1957年积极反右，得以公开加入中共，1959年响应毛泽东“发扬海瑞精神”之号召，写了《论海瑞》、《海瑞骂皇帝》和京剧《海瑞罢官》。受到毛泽东夸奖并赏赐亲笔签名之《毛泽东选集》一套。文革伊始，吴晗被诬为“反党”，投入秦城监狱，受到残酷迫害，头发尽被拔光。年近花甲之吴晗不堪凌辱，于1969年10月11日自杀身亡。其妻、女也相继自杀。

48、吴希庸：1911年生，辽宁省辽阳人，北京铁道学院（现名北方交通大学）教授。曾经到法国学习经济并获博士学位。文革中，被指控为“特务”，遭到“批斗”和毒打。1968年9月21日服毒自杀。

49、吴恕求：1925年生，南开大学外语系教授。1948年7月毕业于清华大学。1955年至1957年在苏联莫斯科大学学习。文革初被无端批斗、毒打，1966年7月9日服毒自杀。

50、吴维均：北京农业大学植保系副教授，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审查”，1968年3月6日割腕自杀。

51、汪篪：1916年生，著名史学家。1934年就读清华大学，毕业后随国学大师陈寅恪研究隋唐史。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文革初期即遭攻击，又被诬撕毁大字报，1966年6月11日喝敌敌畏自杀。

52、良卿法师：1895年生，俗名戚金锐，法名永贯，河南省偃师县人，7岁时，于邻县宜阳铁佛寺出家。1919年在宜阳灵山寺受俱足戒。受戒后长

期担任职事，循序升至监院。在他任灵山寺当家师期间，力图振作，修缮寺院，整理寺规，常住僧增加至五十余人。良卿法师任灵山寺住持。后依佛教习俗云游四方。1933 年入住洛阳白马寺，1945 年住镇江金山寺。1947 年住杭州姚祥寺，1949 年往普陀山住文昌阁。1950 年住宁波观宗寺。1951 年移居上海市福缘寺。1952 年住西安南五台、西安卧龙寺。1953 年应扶风佛教徒迎请，驻锡法门寺任住持。法门寺香火日盛，声名远扬。当良卿法师为自己十几年的心血换来的果实而感到欣慰的时候，大风暴来临了。1966 年夏天，文化大革命爆发，红卫兵多次光顾法门寺。有人在寺院上殿檐口处发现了一块刻着字并有七个圆孔的石碑。众人用力一掀，摔落于地，铮铮作响。红卫兵和造反派们当然不知道，这块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碑能发出钟磬般的音节。碑身上面镌刻着中国古典音乐发展历史和演奏技巧的七音碑，被无知的暴徒砸烂了，然后又抛到一个石灰窑给彻底地火葬了。这是中国音乐史上的一个悲哀，也是世界音乐史上的一个重大遗憾和损失。当法门寺被折腾得天翻地覆之后，造反派和红卫兵大队人马又开到真身宝塔之下，他们要在这佛祖的安息之地挖出“秘藏的电台”。71 岁的良卿法师上前劝阻，被打得头破血流。随后，法师披上五色木棉袈裟，浇满煤油，在真身宝塔前惨烈自焚。火光冲天，烈焰滚滚。挖掘地宫的红卫兵们丢下手中锄镐工具作鸟兽散，宝塔下的地宫及佛指舍利得以保全。1981 年 8 月 24 日子夜，一声轰然巨响，屹立千年的陕西扶风县法门寺真身宝塔突然崩塌。1987 年 4 月，陕西省考古工作队到了法门寺，对塔下的地宫进行发掘，发掘出佛指舍利及佛经等宝藏，成立了法门寺博物馆。1997 年 7 月 12 日，是良卿老和尚焚身三十周年忌日，法门寺为他建造的纪念塔是日揭幕，以此纪念老和尚保护寺院之功。

53、谷镜研：1896 年生，浙江余姚人。著名病理学家。早年留学德国，获医学博士学位。1927 年他经手创办了复旦大学病理学系，多年来逐步建立起教学和科研的队伍，编写了教材，积累了一批资料和标本，建立了国内第一流规模庞大、病种齐全的病理标本陈列室。文革时他是上海第一医学院病理教研室主任，一级教授。他在身处逆境、惨遭迫害，身患重病的弥留之际，仍念念不忘祖国的医学事业。1968 年遭受迫害后服毒自杀。

54、沈乃章：1914 年生，曾留学法国，北京大学哲学系心理学教授。文革中被挂牌、批斗、抄家，受尽侮辱后于 1966 年 10 月 9 日自杀。他儿子被遣送到山西插队，在其他同学相继离开农村后，感到十分绝望，1972 年也自杀身亡。

55、沈知白：1904 年生，浙江吴兴人，音乐理论家，教授。长期在音乐学院任教，著述颇丰，曾任上海音乐学院民乐系主任，中国音乐家协会常务理事。1968 年 9 月 15 日自杀。

56、邹致圻：1911 年生，清华大学机械系教授，1968 年“清理阶级队伍”中遭迫害，于 12 月 10 日跳楼自杀。

57、严凤英（女）：1930 年生于安徽安庆一个贫农家庭。十岁开始学唱黄梅调，黄梅调来自社会底层，历来被视为轻贱下流而遭禁锢。黄梅调艺人更为族人所不容，被视为败坏族风，只能在乡镇跑跑码头，受尽了凌辱和摧残，过着近于乞丐的生活。进入五十年代，严凤英在众多名师帮助下大胆革新，剔除陈词滥调，提升舞台美感。把一个地方小调演化成了家喻户晓的黄梅戏。著名音乐家贺绿汀在一篇文章中说，黄梅戏的演出，无论是音乐、戏剧、舞蹈都淳朴、健康，但是又很丰富、活泼、生动。“从演出中，我们仿佛

闻到农村中泥土的气味，闻到了山花的芳香。”有人评价她说：“没有严凤英，黄梅戏或许仍然能够发展，但不可能在全国众多剧种中迅速崛起”，1955年，严凤英主演的《天仙配》拍成电影，在全国上映，创造了当时中国大陆票房最高记录。严凤英一生主演了60多个剧目，其中，《天仙配》、《女附马》、《牛郎织女》三部黄梅戏电影，犹如三座艺术丰碑，使黄梅戏走出安徽，跨出国门，享誉东南亚。1966年，正在旌德一带农村巡回演出的严凤英接到通知，赶回合肥参加那场“触及灵魂”的“大革命”。继之《红安徽》报发表了《向文艺界的阶级敌人发起猛攻》的社论，说严凤英反对“伟大的旗手”江青，围攻了“革命样板戏”，是“一起极其严重的反革命事件”，指控她为“现行反革命”。造反派对其人身滥加侮辱。1968年4月8日，严凤英不堪忍受残酷折磨，愤而服安眠药自杀，时年38岁。死后尸体被解剖，猥琐而又残忍的军代表刘万泉扬言是在体内寻找“有无与美帝苏修联系的发报机”。他站在解剖台的“下方”，而且恬不知耻地说“严凤英，我没看过你的戏，也没看过你的电影，今天我看到你的原形了！”——这是多么丑恶的灵魂，多么肮脏的内心，多么令人憎恶、恶心的流氓嘴脸！事后刘万泉评为“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但不久他的上司对他的所作所为和群众的责骂之声有所耳闻，开始感到不安。就把他调到另外一个省保护起来。亵渎尸体的罪犯至今未予追究，文革之罪孽远未肃清。

58、孟秋江：1910年生，江苏常州人。著名记者。30年代中期开始从事新闻工作，1935年和范长江同去西北地区采访，发表大量有广泛影响的通讯。抗战爆发后，作为《大公报》记者奔赴前线，写了大量战地通讯，给全国人民以重大鼓舞。1938年起改入《新华日报》，并发起成立国际新闻社。1941年加入中共。抗战胜利后回上海任《文汇报》采访部主任。建国后，历任天津《进步日报》经理、《大公报》副社长、中国新闻社理事、中共天津市委统战部副部长等职。文革中遭受迫害，1967年3月16日跳楼自杀。

59、杨必：1922年生，江苏无锡人。钱钟书夫人杨绛的妹妹。早年在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毕业，后留校任教，院系调整后在上海复旦大学外文系，副教授。世界文学名著《名利场》的中译者。1968年在“清理阶级队伍”中被迫害自杀。

60、杨朔：1913年生，山东蓬莱人。著名作家。解放后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外国文学委员会主任，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党组常委。“文革”开始后，被中国作协的造反派列为重点批斗对象。1968年7月底他要求上书毛泽东和要求与单位领导谈话，均遭拒绝。绝望中于8月3日吞服安眠药自杀。

61、杨嘉仁：1912年生，广东香山人，著名指挥家。三十年代留美，1940年回国后曾在多所大学的音乐系和上海音专任教、担任合唱指挥，后任上海音乐学院指挥系主任、教授。1966年遭受迫害，9月6日与妻子程卓如（上海音乐学院附中副校长）一起开煤气自杀。

62、周小舟：1912年生，湖南湘潭人。1927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35年毕业于北平师范大学国文系，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赴延安，毛泽东见周小舟思维敏捷，文笔流畅，随留任其为秘书。1939年周小舟被派至山西、冀中发展根据地。中共掌权后，周小舟随军南下，执掌湖南，任省委第一书记。

1959年庐山会议上被无辜打成“反党集团”成员，毛泽东念及同乡曾给周小舟一信，信中说：“迷途知返，往哲是与，不远而复，先典攸高”，

并明示周小舟，只要写检讨，检举彭德怀，仍然可以回湖南工作。周小舟含着泪说：“主席，我不能写这样的检讨，彭总的意见书中有许多材料是我告诉他的，是我们动员他找主席谈的。我以为以他的身份向主席谈可以起作用，他才写的，我怎么能批彭总呢？”毛泽东挥手说：“你走吧！”。周小舟被贬后，郁郁不乐，文革伊始又多次遭受残酷批斗，苦不堪言。1966年12月26日毛泽东生日那一天周小舟含恨服大量安眠药，以死为毛泽东“祝寿”。

63、周华章：1918年生，清华大学基础科学部教授，曾参与运筹学、自动控制、计算机科学等专业的创建。文革中惨遭批斗，1968年9月30日在其住所跳楼自杀。

64、周瘦鹃：1895年生，江苏吴县人。著名作家。曾主编《申报自由谈》、《礼拜六》等副刊，有长篇小说《新秋海棠》等，系“鸳鸯蝴蝶派”代表人物之一。1968年8月12日在苏州跳井自杀。

65、周醒华，资深中学校长。三十年代就读于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以后长期在上海从事中学数、理、化各课教学。1960年起任上海继光中学（原麦伦中学）校长，后调新成立的上海模范中学任校长。1968年在“清理阶级队伍”中被“隔离审查”，跳楼自杀身亡。

66、范长江：1909年生，四川内江县人，著名新闻记者、新闻活动家。沈钧儒的女婿，参加过南昌起义，1931年起在北大哲学系学习，并参加学生救亡运动。1935年作为《大公报》特约通讯员，去西北地区采访，所写的旅行通讯首次报道了红军长征，影响巨大。1936年西安事变后赴延安采访，积极致力于抗日救亡宣传，参与创办中国青年记者学会、国际新闻社等进步组织。1939年加入中共，1942年去延安，先后担任新华日报华中版社长、新华通讯社总编辑、《人民日报》（华北版）总编辑等职。49年后历任新闻总署副署长、《人民日报》社长、国家科委副主任等职。文革中遭受冲击，批斗，辱骂、拷打接连不断，1970年10月23日在河南确山投井自杀。

67、范造深：1913生，天津广济医院（精神病专科医院）院长，文革中遭到非人凌辱，于1967年与妻子双双自缢身亡。他的妻子是河北师范学院校医。

68、金仲华：1907年生，浙江桐乡人，著名报人、国际问题专家。1934年与胡愈之等创办《世界知识》杂志，任主编。1935年任生活书店编辑部主任，与邹韬奋等创办《大众生活》周刊。抗战爆发后，加入“保卫中国同盟”，先后在上海、武汉协助邹韬奋编辑《抗战》和《全民抗战》杂志。1938年赴香港编辑《世界知识》和主编《星岛日报》，40年代曾任香港《文汇报》主笔。建国后，历任上海市副市长、全国人大代表、上海《新闻日报》社长、中国新闻社社长、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等职。文革中遭受迫害，1968年4月3日在书房上吊自杀。

69、赵九章：祖籍浙江湖州，1907年生于河南开封。193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38年获德国柏林大学博士学位。曾任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卫星设计院院长等职。1985年获国家进步奖特等奖，1999年被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赵九章是知识渊博、勤于思考、业绩卓著的中国气象学家，地球物理学家，空间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兼“反动学术权威”。中国航天科技曾评出过一批功臣，名单所列前五名依次是：赵九章、钱骥、钱学森、王大珩、陈芳允。赵九章位列第一。他是国民党元老

戴季陶的外甥，曾与蒋介石之子蒋纬国同在德国攻读气象专业。凭他的社会关系和自身的学业条件，若要留在国外，是轻而易举的。可他还是选择了自己的祖国。1966年，文革袭来，人格被扭曲，科学被践踏，知识分子惨遭荼毒。仅中国科学院自杀的一级研究员，就多达二十余位。据后来有人统计北京地区170位高级研究人员，有131位被打倒或被审查。在《竺可桢日记》里记录了科学院各研究所受到迫害的就有：施雅风、刘东生、潘菽、童弟周、曾呈奎、张玺、蔡邦华、刘崇乐、柳大纲、曹天钦、赵忠尧、钱人元、陶愉生、熊庆来、杨钟键、裴文中、黄汲清、钱三强、何泽慧、赵九章等家。在《中国院士》一书中有一个统计：“文革期间中国科学院被抄家的达1909户，被迫害致死229人。其中学部委员级的有：熊庆来、邓叔群、赵九章、叶渚沛、张宗燧、刘崇乐、曹日昌、丁瓚、周仁、黄汉武、姚桐斌、李璞、司幼东、萧光琰、余柏年、陈绍澧、雷宏叔、伍钦荣、叶企孙、饶毓泰、许宝騄、谢家荣等。1966年10月，赵九章被毛泽东蛊惑起来的造反派专政了，不分昼夜的批斗，惨无人道的折磨。挂牌游街，拳打脚踢，烟烧火燎……夜深人静之际，他一边望着天上的星星，一边流着长长的泪水……1968年10月一天夜晚，赵九章独自一人伏在走廊里的一张桌子上，写着他一生中的最后一份检查。时针已指向两点。他工工整整写完最后一份检查的最后一个字，起身走进属于自己的卧室，刷了牙，洗了脸，烫了脚，做完平常每晚睡觉前该做的一切，然后他轻轻拉开抽屉，拿出一个纸包，把平时攒下的几十粒安眠药全部倒进嘴里，这才静静地躺在了床上……恍惚中，一个六十一岁的老人沿着自己曾经走过的人生之路重新走了一遍，最终得到的都是迷茫、疑问和困惑。他对这个世界已经绝望了，无话可说了。

70、罗广斌：1924年生，四川忠县人，曾就读于西南联大附中，解放前参加反抗国民党的地下斗争，是“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的幸存者。建国后曾任共青团重庆市委统战部长。与杨益言合著的长篇小说《红岩》影响巨大。文革中受到迫害，於1967年2月跳楼自杀（一说为他杀）。

71、胡正祥：1896年生，江苏无锡人。著名病理学家。1921年毕业于美国哈佛医学院，后在美国麻省总医院继续学习病理学五年。回国后历任北京协和医学院副院长，病理系教授、系主任等职，在病理学研究中颇有建树。曾任中华医学会理事、中华医学会病理学会主任委员、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文革中作为“反动学术权威”遭批斗迫害，1968年11月12日红卫兵造反派登门抄家并毒打胡正祥夫妇，胡用剪刀自杀，其妻子随即自杀。胡教授的家被造反派占领，变成了红卫兵的总部。

72、赵慧深：1914年生，四川宜宾人。著名表演艺术家，以在《雷雨》中成功饰演繁漪闻名。“文革”中，被打成“三反分子”，屡遭批斗；又因曾在《马路天使》中饰演过妓女小芸而受到造反派的嘲弄和侮辱，于1967年12月4日含恨自杀。

73、阎红彦（1909-1967），陕西安定县人。1924年入陕北军阀井岳秀部当兵，1925年参加共产党，1927年随部参加清涧起义失败，逃往山西组织武装，创建晋西游击大队，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苏维埃政权。嗣后参与邯郸、鲁南、挺进大别山、郑州、淮海等战役，屡建战功，1955年授上将军衔。建国后任四川省委书记、四川省副省长兼重庆市委第一书记、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兼昆明军区第一政委等职。文革初期，阎红彦对毛泽东的真实意图不了解，乃至怀疑、抵触，招致毛泽东极为不满，因而指使红卫兵对其围攻、批斗、

抄家，致使阎红彦身心备受摧残，于1967年1月8日服安眠药自杀身亡。

74、姜永宁：1927年生，广东番禺人。著名乒乓球运动员。1952年获香港乒乓球赛男子单打冠军后，即应邀代表广东省参加第一次全国乒乓球比赛，获男子单打冠军。1955年，他再一次取得全国乒乓球赛男子单打冠军；1954年，参加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乒乓球赛获男子单打第三名；1955年，参加第五届世界青年友谊联欢节运动会乒乓球赛获男子单打第二名，并于1956年荣获中国乒乓球运动健将的称号。1957年至1965年，任国家乒乓球队教练，后担任北京队总教练。文革中被以种种莫须有的罪名横遭迫害，1968年5月16日在拘留室上吊自杀。

75、闻捷：1923年生，江苏丹徒人。著名作家，诗人。解放后曾任新华社新疆分社社长、中国作协兰州分会副主席。他的代表诗作不仅有田园牧歌的主题，更有为政治服务的主题，特别是1959年以后，他的诗作使他获得“大跃进运动的战鼓”的称号，被誉为新中国的红色诗人。文化大革命爆发后，闻捷因为与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张春桥素有嫌隙，成为上海作协第一批被整肃的对象。文革伊始即遭批斗。随即被隔离审查，他的妻子杜芳梅出身于陕北米脂县的望族，大家闺秀，是一位美丽、贤淑、庄重、热情的女性，夫妻感情甚笃，被人们誉为才子与佳人的完美结合。闻捷被关入牛棚后，杜芳梅被勒令检查，因不堪忍受侮辱与折磨，愤而跳楼自杀。继后闻捷又遭诬陷，被张春桥说成是“阶级斗争新动向”。他感到无路可走了，在1971年1月13日那个寒冷的夜晚，他先把通往孩子房间的门窗缝隙用纸糊牢，写好遗书后心如刀绞地打开了煤气……死时才48岁。十馀年后，作家戴厚英据此写成长篇小说《诗人之死》《人啊，人！》。其中《人啊，人！》曾重印10次，并被译成了英、法、德、俄、意、日、韩等许多语种。

76、席鲁思：1896年生，湖南永州人。著名古典文学专家。早年曾任教湖南大学，抗战胜利后长期任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文革初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遭到批斗，他声言“士可杀，不可辱！”1966年9月愤而绝食致死。

77、俞大綱（女）：1905年生，浙江山阴人。1931年毕业于沪江大学，1934年赴英国牛津大学进修，获文学硕士。继后又在巴黎大学、哈佛大学深造。1948年返国，先后在中央大学、中山大学任教。1952年院系调整后任北京大学教授。俞大綱先生是曾国藩的曾外孙女，陈寅恪先生的表妹，我国著名化学家、教育家曾昭抡先生的夫人。其兄俞大维，曾任台湾国防部部长。亦是现任中共政治局常委俞正声的堂叔。1966年毛泽东挑起文革浩劫，蛊惑红卫兵打家劫舍，破坏文物。年逾花甲的俞大綱教授被毫无人性的红卫兵剥去上衣跪在地上，遭受皮带狠命抽打，遍体鳞伤，残不忍睹。她悲愤难抑，随即服毒自尽。其时曾昭抡教授因1957年被划成“右派分子”，在武汉大学进行改造。66年8月当他得知妻子已自杀身亡时，请假回京料理后事，但未获批准。曾昭抡悲痛欲绝以头拱地，面北而泣，直至泪尽泣血，昏死过去。67年12月，曾昭抡在精神苦痛，病魔摧残和残酷批斗下含恨逝世，时年68岁。曾昭抡死后无人收敛，任其在床上慢慢变质。幸有一侄子来探望叔父，才将其拉到火葬场火化，而后将其骨灰撒入长江，随水漂去。1969年，曾昭抡的二妹、林巧稚的高徒、曾任北京第三医院院长兼北京市卫生学校校长的曾昭懿，因“家庭出身”被红卫兵批斗后关押在宿舍反思。房门被从外面锁死，造反派又忙于批斗别的牛鬼蛇神，曾昭懿被活活饿死于宿舍中。曾、俞两家一代人杰遭此荼毒，皆因毛泽东发动文革之罪孽，后人须臾不可忘记。

78、项 冲：中国人民大学国际经济教授。文革中受到迫害，逃往上海兄弟处。他的兄弟处境也很艰难，不敢让他久留。他只得回到学校。后来服杀虫剂敌敌畏自杀（时年 60 岁左右）。

79、姚 臻：1921 年生，早年毕业于大同大学，长期从事宣传文化工作。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文革开始后中宣部被钦定为“阎王殿”，首当其冲。1966 年 7 月上吊自杀。

80、徐 韬：1910 年生，江苏徐州人。著名电影导演。30 年代同赵丹等人一起投身戏剧活动，1932 年参加左翼戏剧家联盟，1935 年加入中共，执导过《娜拉》、《钦差大臣》等名剧。1946 年任昆仑影业公司编导，为《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副导演。建国后任上海电影厂制片厂、海燕厂导演，执导过《海魂》、《草原上的人们》、《乌鸦与麻雀》、《搜书院》、《关汉卿》等多部影片。文革中受到批斗和迫害，1966 年 6 月 21 日投钱塘江自杀。

81、容国团：1937 年生，广东中山县人。著名乒乓球运动员、中国第一个获世界冠军的运动员。自幼居香港，1957 年 19 岁时回大陆。1958 年获运动健将称号。1959 年第 25 届世乒赛上，获世界冠军称号，1961 年世乒赛又参与获得男子团体冠军。以后担任女队教练，为女队获世界冠军作出重要贡献。“文革”中被诬为“修正主义苗子”“特务”遭批斗。1968 年 6 月 20 日目睹了批判贺龙、荣高棠的大会后，写下了“不要怀疑我是敌人”的遗书，用一根绳子将自己吊在龙潭湖畔一棵大槐树上自缢身亡，年仅三十岁。

82、顾圣婴：1937 年生，江苏无锡人，著名女钢琴家。1957 年参加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钢琴比赛荣获金质奖章。1958 年 10 月参加日内瓦第十四届国际音乐比赛，获女子钢琴赛最高奖，有“天生的肖邦演奏家、真正的钢琴诗人”之美誉，名震世界乐坛。她父亲因潘汉年案牵连，含冤病死狱中。文革乍起钢琴家刘诗昆被造反派打得头破血流，小提琴家马思聪被红卫兵逼着吃草……顾圣婴被诬“里通外国”，又因是“历史反革命子女”，受尽迫害。1967 年 1 月 31 日与母亲秦慎仪（早年毕业于大同大学西洋文学系）、弟弟顾握奇（上海天山中学的数学教师）在上海愚园路 1355 弄 73 号家中开煤气全家自杀。

83、顾而已：1915 年生，江苏南通人。著名电影艺术家，执导过《小二黑结婚》、《天仙配》等优秀影片。文革中，因三十年代与江青有过交往、了解江的风流韵史而备受迫害。1970 年 6 月 18 日，在五七干校一个工具棚门梁上自缢身亡。

84、高景星：1914 年生，武汉协和医院院长。毕业于燕京大学和协和医学院，骨科医生。抗日时期（1940 年）曾在国民政府军队医院服务，文革中被作为“历史问题”并且怀疑是“潜伏特务”，遭到追查、抄家以至毒打，肋骨和指骨被打断，1968 年 6 月 5 日从手术室五楼平台上跳楼自杀身亡。同案被迫自杀的还有：范乐成（武汉医学院副院长、高的同学）、孙明（南昌妇幼保健医院院长、高以前的同事）、王林祥（南昌某医院医生）。

85、唐 亥：1911 年生，湖南长沙人。早年参加革命，曾在新四军作文化宣传工作。文革时任中央民族学院艺术系主任，1968 年被关押“审查”。妻子徐垠为民族学院汉语系主任，分别遭关押“审查”，期间跳楼自杀，不久唐亥也自杀离世。

86、陶 勇：1911 年生，安徽霍邱县人。幼年丧父，家庭贫穷，以放牛、做窑工维持生计。1929 年参加共党游击队，1932 年入党，历任红军班、排、

连长，抗战期间任新四军第三纵队司令，1946年任第三野战军二十三军军长，1952年任东海舰队司令员，1955年授中将军衔。陶勇为人豪爽，语言粗鲁，1967年1月21日上午陶勇和老战友、上海警备区司令员一起“骂文革的娘”，下午两点半在一深不没顶，宽不及肩的井中发现陶勇溺水，抢救无效身亡。该部政委刘浩天中将事发不到两小时即宣布“陶勇畏罪自杀、抗拒运动，是叛徒行为。”随后陶勇的夫人朱岚即被关押、批斗，被打得遍体鳞伤、肋骨折断，同年九月朱岚被逼跳楼而死。有人认为其死皆因辱骂文革而受到毛泽东忿恨所致。

87、龚维泰：1931年生，北京大学俄语系俄语语言教研室讲师。1968年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指控为“叛徒”（中学时参加中共外围组织“民族解放青年先锋队”被国民党抓过，后来放了），遭到“隔离审查”以及野蛮批斗。1968年11月7日夜间，他被关押在北京大学第一教室楼中时，用刮脸刀片割断股动脉，血流尽而死亡。

88、韩俊卿：1916年生，女。河北雄县人。著名河北梆子表演艺术家。幼年家境贫寒。亲生父母无力抚养，将她送予远亲。不料她两岁那年当地遭遇春旱秋涝，庄稼颗粒无收，生活陷入绝境，养父母又把她转送给河北梆子艺人韩月恒夫妇。五岁开始习艺，苦练基本功，十二岁岁时已成为兼演青衣、花旦、刀马旦、彩旦、武生等多种行当的小坤伶。韩俊卿身世凄惨，在旧社会历经苦难，备受侮辱；1949年后，她的生命和艺术都似乎焕发了青春，1952年10月参加文化部举办的全国第一届戏曲观摩会演，她获表演一等奖。1958年任天津市河北梆子剧院副院长兼小百花剧团副团长。195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她还曾任中国戏剧家协会理事及天津分会副主席。但在毛泽东错误路线统治下，在极不正常的政治氛围和社会环境中，她没有逃脱被吞噬的命运。文革伊始即屡遭批斗。1966年8月29日，上午她被造反派们逼迫赤足上街游斗，那条用炉灰渣铺成的粗糙路面，把她那双从小缠裹过的双脚扎得皮肉出血。继后又被红卫兵揪到4寸宽窄的小条凳上罚跪，剪去她满头乌发散堆在地上。一块写满“反动艺术权威”、“走资派”、“假劳模”等字样的木牌，用两根细铁丝吊在脖子上，随着她轻微的呻吟，大颗大颗的汗珠就从那里滴下……良久，屋子里的声音消失了。医生检查后说是喝了敌敌畏加火柴头。由造反派夺了权的这家医院有不成文的规定，凡属自杀的“牛鬼蛇神”，不准抢救，“死了活该”。于是，尚未完全断气的她被推进了医院的太平间，在此结束了她的人生。

89、程应铨：1919年生，清华大学土木系讲师，颇受梁思成器重，称其为清华建筑系的四大金刚之一。由于在城市规划方面见地独到，被推举为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委员。1957年因为提出“保护古建筑”，被划为“右派”，妻离子散，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时又遭审查迫害，当年12月13日投水自尽。

90、程国英：1922年生，哈尔滨人。1951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清华大学建筑系美术教研组副主任。擅长油画、水彩画。文革伊始即以宣扬“封资修”之罪名屡遭批斗。1968年11月12日在清华园荷花池南边土坡上自缢身亡。

91、蒋荫恩：1910年生，浙江慈溪人。资深报人、新闻教育家。1935年毕业于燕京大学新闻系。1936年任上海《大公报》记者。1937年任上海《大美早报》新闻翻译兼文艺副刊编辑。1941年任桂林《大公报》编辑主任。

1942 年起从事新闻教育，先后在成都、北平任燕京大学新闻系主任、副教授、教授。1948 年去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从事研究工作，1949 年 10 月回国，继续担任燕京大学新闻系教授兼系主任。1952 年院系调整到北京大学，任中文系新闻专业教授。1958 年转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任教授兼副系主任。为民主同盟中央宣传委员会委员。1968 年 4 月被迫害上吊自杀。

92、储安平：1909 年生，江苏宜兴人。著名政论家。1932 年毕业于上海光华大学，后曾留学英国 3 年，攻读政治学。1938 年回重庆，先后被聘任《中央日报》撰述、编辑，复旦大学教授等职。1940 年以后曾在湖南办报、在重庆办刊。1946 年起在上海创办并主编政论半月刊《观察》，倡导民主建国，影响广泛。50 年代初加入九三学社和中国民主同盟，为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全国人大常务委员。1957 年中共号召帮助党整风时出任《光明日报》总编辑，因在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的批评发言被定为“右派”。“文革”中再次成为造反派折磨的对象，任意打骂侮辱。1966 年某日留言诀别友人后失踪，下落不明，一般认为已自杀。

93、曹亨闻：1910 年生，浙江临海人。新闻史学家，教授。1937 年获英国伦敦大学新闻学硕士，并参加反帝大同盟，宣传抗日。1939 年起一直在复旦大学新闻系任教，主讲中国和外国新闻史。文革中被诬为“英国间谍”，遭无端迫害，1968 年 6 月 19 日自杀。

94、崔雄昆：1919 年生。文革前是北京大学教务长，中共北大党委常委。文革伊始任校文革常委，“斗批改委员会”负责人。1968 年 7 月毛泽东派“工宣队”进驻北京大学，9 月下旬，“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开始，全校干部和教师被迫集中食宿，不得擅自回家。崔雄昆也成为“运动”打击对象。1968 年 10 月 16 日他从集中居住地出逃，投北大红湖游泳池自尽，时年 49 岁。

95、黄国璋：1896 年生，湖南湘乡人。地理学家、教育家。早年赴美国芝加哥大学地理系攻读研究生，1928 年学成归国，任南京中央大学地理系教授。1936 年任北平师范大学地理系教授、主任。抗战期间，任西北联大训导长兼地理系主任。1944 年底，与许德珩等发起组建九三学社。抗战胜利后，复任北平师范大学教授、地理系主任、理学院院长。1952 年院校调整后任陕西师范大学地理系教授、主任。“文革”中受迫害，1966 年 9 月 6 日与妻子范雪茵双双上吊自杀。

96、黄绍竑：1895 年生，广西容县人。著名爱国将领和民主人士。新桂系三巨头之一，和李宗仁、白崇禧并称，28 岁当军长，30 岁任广西省主席。民国政府浙江省主席。曾参加辛亥革命、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及国共和谈。建国后曾任政务院政务委员、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常委等职。1957 年因响应中共“鸣放”号召，如实陈述了农村饿饭死人等等视察见闻，毛认为他是在“向党进攻”并大怒，圈之为“大右派”。文革中又遭无端迫害和批斗，1966 年 8 月 31 日下午，黄绍竑到西总布胡同 5 号看望李宗仁，面露惊慌之色，在座的程思远对黄绍竑说：“看来你有心事。”黄说：“我不为自己打算，我担心的是德公。”就在这一天，黄绍竑含冤自尽，终年 71 岁。

97、舒绣文：1915 年生，安徽安庆人。话剧和电影表演艺术家。30 年代起就参加进步演艺活动，40 年代先后演出《雷雨》、《棠棣之花》、《虎符》、《天国春秋》、拍摄《一江春水向东流》等作品，影响巨大，与白杨、秦怡、张瑞芳并称为话剧舞台上的四大名旦。与当时在重庆之周恩来过从甚密。1949 年

参加第一次文代会，后随军南下。1957 年调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成功地塑造了《骆驼祥子》、《关汉卿》等名作中的人物。195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舒绣文曾先后被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三届全国妇联执行委员会委员，全国文联委员，中国剧协和中国影协常务理事。文革中被诬为“特务”（抗战时期的首都重庆，电影制片厂实行军队编制。女演员舒绣文也得了个校级的军衔。于是就成了“反动军官”）遭受迫害，1969 年 3 月 17 日在监狱中自杀身亡。

98、谢家荣：1898 年生，上海人，我国第一代地质矿床学家，地质教育家。九三学社会员，中央研究院首批院士，中国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早年赴美深造。先后在斯坦福大学、威斯康辛大学作研究生，获理学硕士学位。归国后，任中国地质学会首届理事会书记和会长。长期从事地矿研究。1936 年，任北京大学及清华大学地质系主任。桃李满天下。编著《地质学》教材，出版著名论著《煤之成因与分类》、《中国之石油》，编制了《中国各种储油区域油苗、油页岩及地沥青分布图》，最早提出陆相生油理论。1938 年—1949 年，主持矿产测勘处。指导发现了淮南八公山煤田、福建漳浦铝土矿、安徽凤台磷矿、南京栖霞山铅锌银矿、甘肃白银厂铜矿等一批重要矿产，1950 年—1956 年，担任国家地质部总工程师，同期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发表《中国的产油区和可能含油区》、《石油地质的现状、趋势及今后中国勘探石油的方向》等一系列前瞻性著作，为大庆油田的发现提供了理论依据。1957 年响应毛泽东“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号召，善意地对个别领导人的工作作风提了些意见，被打成右派。此后埋头于成矿理论研究，开始撰写《中国矿床学》。文革开始即因反动学术权威而惨遭批斗，因不甘屈辱，1966 年 8 月 14 日夫妻双双饮恨自杀。

99、萧光琰：福建福州人，著名化学家。年轻时留学美国，1945 获美国芝加哥大学物理化学博士学位，后任芝加哥大学研究员、美孚石油公司研究化学师。1950 年满怀热情回国，历任中国科学院工业化学研究所、石油研究所、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是我国最早从事石油化学研究的科学家。文革中被关押，1968 年 12 月 10 日在连续残酷殴打后自杀身亡。三天后，他的妻子美籍华人甄素辉和 15 岁的女儿萧络连一起服药自杀。

100、饶毓泰：1891 年生，江西临川人，为中国物理学界泰斗。从事物理教学和研究工作 50 余年。1921 年获得普林斯顿大学硕士学位，1922 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同年 8 月回国，创办南开大学物理系，任教授兼系主任。30 年代起任北京大学物理系主任、理学院院长，直至建国后调任南开大学教授，为中科院学部委员、全国政协委员。文革中遭迫害，1968 年 10 月 16 日上吊身亡。

101、焦启源：1901 年生，复旦大学生物系教授、研究芳香植物的专家。1968 年在“隔离审查”中投河自杀身亡。

102、董铁宝，1917 年生，江苏武进人。力学家、计算数学家。1939 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四十年代留美，获伊利诺伊大学博士，并参与第一代计算机的设计研制。1956 年绕道欧洲回国，在北京大学数学系任教授，并在中科院力学所、计算机所等处兼职，参与过多项国家重大建设项目的研究。“清理阶级队伍”中无辜被隔离审查，1968 年 10 月 18 日自杀。

103、傅 雷：1908 年生，上海南江县人。著名翻译家。学贯中西，文学、美术、音乐、外语“四位一体”，著作等身。1958 年因向党提意见被划

为“右派”。1968年8月30日，造反派上门抄家四天三夜；9月2日，傅雷与妻子朱梅馥被揪到大门口站在长凳上戴上高帽子批斗，受尽人格凌辱。9月3日夫妇双双自缢身亡。遗著《傅雷家书》情真意切，感人肺腑，不可不读。

104、傅其芳：1923年生，浙江宁波鄞县人，中国著名乒乓球运动员、乒乓球教练员。曾担任中国国家队乒乓球教练，对中国乒乓球运动的发展做出了相当的贡献。与容国团、姜永宁并称当代中国的乒坛三杰。文革中遭诬陷批斗，1968年4月16日在北京体育馆自缢而死。

105、傅乐焕：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教授，清史专家。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的侄子。1947年，赴英国留学。1951年学成，坚拒傅斯年让其赴台湾大学或史语所工作的安排，返回他想象中自由幸福的大陆。1966年5月，文革初起之时，傅乐焕受叔父的牵连，被作为“安插在大陆的特务”遭到连续批斗、关押和残酷的折磨。傅乐焕身心痛苦至极，哀伤至极，在走投无路，生不如死的凄惨境况中，他最终选择以死明志，以死抗争，以死证明自己“士可杀，不可辱”的传统士大夫气节与骨气。5月23日在北京陶然亭投湖自尽。

106、熊十力：1885年生，湖北黄冈人，著名哲学家，国学大师。少年时游学四方，独具才思。以后参加反清革命团体，投身武昌起义和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失败后潜心学术研究，1922年起长期在北京大学任教授，也曾短期在武昌大学、浙江大学等校讲学。1949年作为特邀代表参加首届政协会议，以后又选为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生平著作等身，后汇编为《熊十力全集》，共十册。他对“文革”毁灭文化的行径极为愤慨，直言相谏。1968年5月24日绝食身亡。

107、翦伯赞：1899年生，湖南桃源人。维吾尔族。著名历史学家。有《中国史纲》等十八部著作行世。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后曾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学报》主编等职。文革中被反复批斗，于1968年12月18日偕妻戴淑宛双双在北大燕南园寓所服毒自杀。

编后说明：

文革中愤而赴死的受难者很多，限于条件，本名录着重收集知识界中较有影响的、较有代表性的部分受难者。如果说1957年的“反右”，给知识界带来了致命的伤害，那末，十年文革就使知识界的精英几乎全军覆没。这也促使我们更加怀念这些不幸离去的知识精英，一定要记下他们的名字和事迹，让他们永垂史册。现在已有许多人在做这样的事情，但愿有一天会有个更加全面而完整的名录，以便更加完整地记载这段惨痛的历史，更好地缅怀所有悲壮辞世的先驱、先贤、先烈们。邓拓先生诗云：“莫谓书生多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过东林书院》），岂止是血斑斑？是“落花无数水流红”啊！这血染的涛声，必将永远激励着祖国正直而有良知的人们，让我们永远记住那些死难的英灵们，他们是永恒而不朽的。

书写至此，我的心在隐隐作痛。文革这段反人类的悲剧，不是某些政客轻描淡写，就可以从人们的记忆中抹去的。文革必须彻底否定，发动和操控文革的人必须承担罪责，直接打人迫害人致死的凶手必须认罪并得到惩处。不明辨文革的大是大非，所谓中国的发展进步都是虚幻的，“中国梦”就只能是痴人妄语。

十一、“文革”一邪恶对正义的戕害，必须彻底否定

五十年前，起源于中南海的狂飙妖雾卷地而起，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耀，山岳潜行；多少老谋深算的宠臣权贵，多少武功显赫的开国元勋，多少权镇一方的封疆大吏，顷刻间都失去了正常的判断能力，他们乖乖地低下头颅，接受命运的安排，身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临死前留下的只是无可奈何的一句话**“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文革”发生之初，许多在权力舞台上沉浮多年的高官、中共中央委员甚至政治局委员、各大区第一书记，几乎都没有搞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不知道毛泽东玩的是什么阴谋诡计，更不必说挺身而出质疑这场涉及全民族命运的文革，号称人民公仆的好男儿，在毛泽东的淫威之下，没有一个敢于公开说出自己的态度。

千百次历史事件证实：在历史的逆浪前面，说出了真话，曾直指皇帝新衣的，不是达官显贵，而是几个生长在百姓中间的小人物。文革袭来，暴戾恣睢，”他们或被长期囚禁，或被残酷虐杀，付出了青春和生命的代价，但一部“文革”史因为有他们的存在，才有了一点人的气味。历史应该铭记这些人的名字——王容芬、刘文辉、遇罗克、陆洪恩、张志新、李九莲、钟海源、陆兰秀……他们比那些高居庙堂之上的官僚政客、比那些曾被毛泽东视为宠臣的大人物更为重要，他们当年对“文革”的质疑才是我们民族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他们身上显示的道德勇气也是人类文明赖以生生不息的根本动力

五十年前翻滚的浊浪依然在历史中喘息，生者的头顶不是自由的蓝天，死者的亡灵未得到应有的告慰。五十年后“文革”仍是一个大大的禁区，欲纪念都不得其所，更不要说公开的反省和讨论了。其中隐含的逻辑仿佛是不准公开言说的东西就是不存在的。强权迫使全民族遗忘“文革”，恰恰证明“文革”不应该被遗忘。人民拒绝遗忘，更拒绝有选择的遗忘。关注“文革”首先要关注李九莲、陆兰秀、刘文辉、遇罗克那样的冤死者和王容芬那样的幸存者，他们从一开始就洞穿了那场绵延不止十年的闹剧的奥秘。

我们永远不能忘记。不能忘记文革浩劫，不能忘记毛泽东的深重罪恶。不能忘记文革伊始即对其持批判态度的先知先觉者们。

1、王容芬，一个中国人应该知道的名字

2008年春夏之交，旅居德国的王容芬博士，给胡锦涛总书记写了一封公开信。信中说：“到今年6月，文革就42年了，这个历史大案该了结了。不了了之，后患无穷。真要促进改革开放，就应当以史为鉴，与时俱进，尊重百姓人权，摒弃暴力路线，彻底否定文革，接受《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设立反人类罪法庭，将文革发动者及其爪牙宣布为反人类暴力组织，将文革罪犯及顶风作案复辟文革的现行反人类罪犯押上法庭，绳之以法。只有这样，才能告慰文革中的千百万死难者，取信于民，建立和谐社会，推进改革开放。”

从反人类罪的角度来看文革并要求实现相应的法律正义，这是迄今为止对文革最激烈和彻底的否定。虽然很少有人相信这封信会打动那些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却只能抱残守缺的低能儿和贪婪成性、权欲熏心的官僚和衙内，从而对文革作彻底的清理。但这样的言论日积月累，不断地发表出来，一定会逐渐渗入到民族的历史意识中，从而在不远的将来导致对文革评价的真正突破。

1966年，王容芬19岁，是北京外国语学院东欧语系德语专业四年级的女学生。对德国历史和文化的学习或许给她判断文化大革命提供了某种参照。

那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百万红卫兵。王容芬在天安门

广场听了林彪和毛泽东一起接见红卫兵时的讲话，怎么林彪声嘶力竭的讲话和学校播放的希特勒讲话录音那么相似呢？她觉得眼前发生的这一切令人费解。从天安门广场回来，她的心情异常沉重……“这个国家完了！这世界太脏，不能再活下去。”“不忍了，豁出去了，把想说的话说出来！”那几天，脑子里什么都装不进，就这么几句话绕来绕去。鬼使神差似的，她开始动手写信，给党中央、团中央、团校，还有伟大领袖本人：“请您以中国人民的名义想想，您在干什么，后果又将如何？”“这不是群众运动，这是一个人用枪杆子运动群众！”她还质问毛泽东，到底要把中国引向何处？对文革的彻底否定导致王容芬决定与中共切断联系，她在信的结尾郑重声明：退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她当时认为自己将有一番壮举，郑重地走到天安门广场——她认为那是神圣的地方——向人民英雄纪念碑行过注目礼，然后走进当时的棋盘街邮局，从自动售票机买了邮票，贴上，发出，大概一共六、七封，把一封同样内容用德文写的信带在身上，她知道纳粹德国当年秘密反抗希特勒的青年学生都被处死，她也完全明白这封信会给自己带来什么样的命运，于是她到王府井药店，买了四小瓶敌敌畏喝了下去，要以死来抗争。她幻想着，有人会第一个发现尸体，然后，“一个女学生以死抗争‘文化革命’”的事迹会传遍全世界……。

但王容芬没有死成，醒来的时候，她已经躺在公安医院里了。三天以后，她被押解到北京市功德林监狱，收进一号监房。

1966年9月正式被捕、在狱中关押、受刑、折磨了十年之久，拖到1976年1月，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才以“反对文化大革命”“攻击伟大领袖”“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罪名宣布判处王容芬无期徒刑。

1969年夏秋之交，中共中央极力鼓吹“要准备打仗”。元帅们纷纷匿影藏形，犯人们也向外省疏散：王容芬记得那次包了整整一列火车，停在丰台外边的一个小站，每三个人铐在一起，两边有士兵用刺刀架着。在临汾下车的时候，周围好象有上百架机枪，枪口都朝着站台。犯人不许低头，必须仰起脸来蹲在那儿。随之，从临汾继续疏散，这回是乘卡车。车上六名女犯，十二名押解大兵，每人背上都有两把刺刀顶着。说起刺刀，在北京提审的时候，也有两把刺刀架在脖子两旁，一直送进审讯室，出门的时候这两把刀又原样搁在你肩上。护送到监舍门口。

王容芬在山西一关就是十年。晋城四年，宣判以后转移到榆次监狱关押了六年。在山西期间。王容芬经历了多次严刑逼供。共识网上曾刊载过她写的部分回忆录，摘录如下：

【山西的审讯员我可不敢恭维，不知哪儿弄来那么一帮子，好象没上过几年学。在他们眼里连看《资本论》都不行：进监狱初期，我随身携带的书籍中还有一本《资本论》第二卷。狱卒发现了，对我训斥道：“《资本论》是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的。社会主义社会看这种书反动透顶！”于是，书被没收了。

对我的审讯要点，是转弯抹角的揪后台。按照他们的逻辑，我“作案”的时候19岁，学生，共青团员。怎么会没有人在背后指使，那怕揪出个把老师也行。他们让我交待从小到大所认识的人。我先是拒绝，后来干脆写了好几百。他们问：“这里边谁对你影响最大？”我说，“我觉得我对他们影响大。”她们说我顽抗，日夜轮番审，连续50小时不让睡觉。有一次我脱口而出：“想

起来了，那是个外国人。”他们高兴极了，忙说：“哪国的？叫什么？写在黑板上！”我转身写了：“俄国、拉赫美托夫”几个字，他们忙问：“现在还在外语学院么？”……（笔者注：拉赫美托夫是俄国作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怎么办》中一位坚定的革命知识分子形象。他具有高度的自觉，虽家道富有，却放弃物欲，主动过极艰苦的生活。他深入底层，当木匠、石匠，还在伏尔加河当纤夫，获得了平民的拥戴。拉赫美托夫最惊人的行动是睡“钉毯”——为了磨练意志）

他们知道受了愚弄，就给我用刑。我因为“捣乱”受过好多次刑。

关押在北京时还好，属于比较文明的一种，只要循规蹈矩，基本不会挨打。挨骂是常有的事，听惯了也就无所谓了。

到了山西，无产阶级专政才显露了峥嵘。刑具是从苏联进口的，狼牙铐，中间有三个链。戴上之后，越挣越紧，不过不挣没事，梳头、解手都行。脚镣不同等级不同斤数。还有一种文明的刑具，叫橡皮衣，穿上以后从外边打气，犯人就喘不过气来了，这种刑我没用过。据说难受得要死。有人绝食抗议。对绝食的犯人鼻饲：插个管——不插出血对他们说来可能就不为插管——棒子面粥撒把盐，往里面硬填。还有捆绑吊打等多种刑罚。

到山西以后，我没挨过打，这次受刑用的是铁匠铺打出来的那种小铐，背到身后，吊把大锁。这种铐我上过不止一次，最长的一次差不多戴了半年。那次是因为山西本省的一个帮派头头，从窑洞走烟的窟窿里给我扔过来一个条子，让我出去以后到中央替他告状。这纸条我看过就放在身上了，没有在意。看守翻的时候还没来得及销毁。我见条子被他翻出来了，就一把从他手里抢过来，丢进嘴里。他双手卡住我的脖子。叫：“吐！吐！”接着又来了三、四个看守，都是男的，压在我身上，使劲卡，想让我张嘴。我咬住牙不放，他们就找来钳子，从嘴两边夹——现在我这两边的牙没了，就是那次夹掉的。——我觉得自己已经死过去了，谁知硬让他们把嘴撬开了。嘴一开，进了一口气。就着这口气，我把那纸条咽下去了。当时满嘴都是血，溅了他们一身一脸。就为这一撬，这条命才缓过来，要不当时就完了。人晕过去了，大小便已经失禁了。】

毛泽东死了以后，1979年3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经反复查证，确认系冤假错案，将王容芬无罪释放。

为了一封信，王容芬在毛泽东的监狱里耗尽了她的青春岁月。进去时她是一个19岁的花季少女，等到出来时她已经33岁，牢狱在她身上留下了永难磨灭的痕迹，她明显比实际年龄要老得多。

出狱后，她没有消沉，重新捡起了德文专业，成为翻译德国著名思想家马克思·韦伯（Max Weber）的专家，有多种译著问世，为中国知识份子提供了抗衡极权主义的思想武器。她是幸运的，比起那些因为揭穿皇帝的新衣而遭枪杀的遇罗克们，她毕竟活下来了，见证了“文革”的潮起潮落，看到了造神运动的陨灭。

2、青年思想家刘文辉壮烈牺牲

刘文辉1937年11月16日出生于上海，在兄弟姐妹九人中排行第五。父亲刘宗汉为银行职员，抗日战争胜利后曾任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科长、专员，1954年从船舶工业局退休，1956年在肃反运动中被定为“历史反革命”，1958年由法院正式判决定罪，并处以“就地监督劳动，管制改造”。1952年，刘文辉读初二时因家境困难主动辍学，进入沪东造船厂船体车间当学徒工，他

好学上进，喜动脑筋，群众关系好。不到三年满师后任放样技工；1956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当选车间团支部书记，又担任工长，考入上海市总工会办的中专夜校进修。

1957年，中共中央开展全党整风运动，刘文辉响应号召，写了一些揭露该厂领导官僚作风和生活腐败的大字报，结果被厂方打成“右派分子”，撤去工长和团支部书记职务，开除团籍。反右运动后期，中共中央决定工人不宜戴右派帽子，厂方鉴于刘文辉没有任何劣迹，才按政策为其平反、恢复团籍。此后，刘文辉考上大学夜校，并开始大量阅读政治和文史书刊。1961年12月，刘文辉被调到浙江省舟山群岛的嵊泗机械厂当辅助工。

1966年8月8日，毛泽东主持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被吹捧为是继“五·一六通知”后，从全局指导“文化大革命”的又一个纲领性文件[1]。紧接着便是八月恐怖。

这时的刘文辉29岁。他以忧国忧民的心态奋笔疾书，于1966年9月28日，写成《驳文化大革命十六条》万言书。

他直言不讳地指出：“文化大革命强奸民意，疯狂迫害民众，是全民大迫害”，“当权者人人自危，登天安门城楼掀起疯狂的红卫兵运动，宣扬穷兵黩武，高唱世界革命，控制报刊广播，操纵全国舆论，对内专政暴行，镇压知识份子，焚书坑儒，推行愚民政策，比秦始皇更犹过之处，人人唯唯诺诺不敢言，陷社会暗无天日，使神州大地百业俱毁，遍地饥饿赤身，穷山荒乡，白丁文盲。工人不干活，农民不种田，学生不读书，教书者牛棚劳役，形形色色流氓高喊革命口号。武斗伤民，残酷迫害，抄家捕人，惨无人道……”他呼吁“民主主义者在抗暴斗争的旗帜下联合起来”。他和弟弟刘文忠一起复写了十四份，以匿名信形式分别寄给北大、清华、复旦等十四所著名的大学。刘文辉当然知道自己这样做意味着什么，他将为此献出生命，他对弟弟说，自己甘愿做当代的谭嗣同、中国的普罗米修斯。他的理由很简单，如果不去撞枪口，“全让毛泽东一人专制独裁，为所欲为，中国迟早会退到封建旧社会去！”“古今中外，反封建反独裁，必然有人以身许国，抛头颅、洒热血，唤起自难而软弱的民众奋起反抗，那末，今天就从我刘文辉开始吧！”

尽管刚刚发布的《文革十六条》赫然写着：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要充分揭露，要斗倒，斗垮，斗臭，肃清他们的影响，同时给以出路，让他们重新做人。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的后期酌情处理。

这个臭名昭著的十六条和中共中央发布的其它文件一样，都是遮人耳目的文字游戏，从来是不执行的。

仅仅因为写了一封信，反对了《十六条》，没有任何具体犯罪事实的刘文辉在文革伊始就被枪杀了。

1966年11月26日，月黑风高之夜，刘文辉和刘文忠一起在家中被捕。1967年3月9日，刘文辉被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3月10日被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3月23日在上海文化广场召开万人公判大会后执行枪决，时年尚未满30岁。

刘文辉是因反对文革而被处死的第一人，文革初期他还写过两本小册子《冒牌的阶级斗争与实践破产论》和《通观五七年来的各项运动》，但是在红卫兵抄家时连同他的书籍与文字札记一起被抄走，下落不明。

1967年3月20日，刘文辉在被处死前三天写下一份遗书，藏在被子中

被监狱还给家属后得以传世，他的遗书上说：“我相信死后我国的民主主义者、共产党中的现实主义者朝着世界潮流行驶，中国是会有希望的，那就是民主、自由、平等。……毛泽东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对中国人民是有功绩的，但自 55 年后就转化到反动方面去了。整个世界在变化，但他竟这样昏聩、刚愎自用、居功自傲，自诩为救世主，以至内政、外交竟是乱弱难定，估计越来越冒险，将成为我国家的灾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是强制人民服从己意，清除异己，其方式退居幕后，暗施毒箭，指使亲、宠、奸，把天下搞得昏天暗地，愚弄群众，混淆是非，独夫欲名，玩亿万性命，冒天下之大不韪，孤注一掷，拼其伟大理想之实现。我坚决反对锁国排他主义、军国主义、反民主自由，反经济实业、焚书坑儒主义、阶级斗争恶性报复为奴役人民的手段，反对所谓解放世界三分之二的人民之谬论。所以作为匹夫有责，我就愿意敢与毛斗争。这才是死得其所，重于泰山。……等毛政权倒台后，作为烈士的我必能恢复光荣，洗涤家庭所蒙受的污垢。”

刘文辉的文化不高，所著文章语句未臻流畅，叙述不免粗略，用词未必贴切。但字里行间显示着一个热血青年的拳拳爱国之心。他是一个敢于向独裁专制暴君发起挑战的无畏勇士。

1982 年 1 月 6 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针对刘文辉家属的多次申诉作出终审判决，“宣告刘文辉无罪”。又是一个无人负责的冤案。

3、遇罗克之死

遇罗克（1942 年 5 月 1 日—1970 年 3 月 5 日），男，北京市人。1959 年从北京市第六十五中学毕业，生前是北京人民机器厂工人，做过代课教师等多种临时工。1966 年文革乍起，遇罗克对红卫兵的打砸抢烧等“革命行动”颇为不满，认为那是一种泯灭人性、摧毁文化的行为。对文痞姚文元发表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略有微词，指责姚文元吹毛求疵、牵强附会，乱打棍子、乱扣帽子。遇罗克于 1966 年下半年写了著名的《出身论》一文，批判中国共产党当权以来一直强调的阶级出身论、血统论，批判当时在红卫兵中广泛流传的那副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他是那个时代少有的几个清醒而坚强的思想者之一。《出身论》触及了特权阶层的要害，对姚文元的批驳干扰了毛泽东的阴谋诡计，据说毛泽东亲自下令予以枪杀。1967 年 4 月 14 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戚本禹公开宣布《出身论》是大毒草。1968 年 1 月 5 日，遇罗克被捕，被扣上“大造反革命舆论”、“思想反动透顶”、“阴谋进行暗杀活动”、“组织反革命小集团”等罪名。

1970 年 3 月 5 日，在“一打三反”运动高潮中，遇罗克在北京工人体育场被宣判死刑，并立即执行，时年 27 岁。1979 年 11 月 21 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告“遇罗克无罪”无罪者被处以极刑。谁是凶手呢？。

4、音乐家陆洪恩死前慷慨直言

笔者在本书第八章中曾述及陆洪恩先生的悲惨命运。即使在黑暗、残酷的“文革”牢狱中，海外归来的上海交响乐团指挥陆洪恩不愿苟全性命，临死前夕他慷慨直言二十五分钟：“我想活，但不愿这样行尸走肉般地活下去。”

“不自由，毋宁死”。“文革”是暴虐，是浩劫，是灾难。“我不愿在暴虐、浩劫、灾难下苟且贪生。”“文革消灭了真诚、友谊、爱情、幸福、宁静、平安、希望。文革比秦始皇焚书坑儒有过之无不及，它几乎要摧残尽大陆知识份子，几乎要斩断整个中华文化的生命链。”“如果社会主义就是这样残忍无比的模式，那么我宁做“反革命”，宁做“反社会主义分子”，不做乾

纲独断、一味希望个人迷信的毛泽东的“顺民！”四天后，他被枪决。当时同狱的年轻政治犯刘文忠多年后写下回忆录《风雨人生路》，记录了这位音乐家生前掷地有声的这番话。

5、巾帼英豪李九莲和钟海源

李九莲，1946年出生于江西赣州一工人家庭。其父是位老共产党员，其母为家庭妇女，哥哥姐姐都是大学毕业的国家科技人员，两个妹妹一个是一般干部一个是工人。加上她自己，兄妹五人都是共青团员。李九莲当时是江西省赣州市第三中学团委宣传部长，学生会学习部长。

1966年，出于无限信任和崇拜毛泽东，她满怀激情地参加了“文化大革命”，是第三中学“卫东彪”造反团的唯一女生副团长。她参加过武斗、游行，到北京天安门广场接受过毛泽东的检阅。先后被选为赣州市、赣州地区、江西省的学“毛著”积极分子，一度对“批判刘少奇”和“打倒走资派”，达到十分狂热的地步。

1968年，她与同时高中毕业的少数出身较好的同学，被分配到赣州市的一些工厂当徒工。真正地接触到社会实际，她很快就发现有很多问题和现象，与自己“造反”时想像的不一样。生产衰退，人民困苦，文化艺术凋零，青年一代的痛苦彷徨与颓废等等事例，像潮水般向她涌来。

1968年5月25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发出《转发毛主席关于〈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的批示的通知》。

紧接着就刮起了一场“三查”风。“查叛徒、查特务、查现行反革命”。即所谓“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在“无产阶级专政就是群众专政”的口号下，私设的公堂和牢房比比皆是。刑讯逼供成了“最最革命”的主要手段。全国各地成千累万的干部、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一夜之间就被铸成了“反革命”。多少人被打成残废，多少人惨然丧生，又多少人妻离子散。这一切，使李九莲不禁自问：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究竟要干什么？

1969年春天，她为此写了独自珍藏的七千多字的30篇日记，在这些日记中，她对有着重重困难的青年、干部和家庭的被迫上山下乡，深表同情。对在所谓的“二月逆流”中受害的老帅老将们，深表不平，说这是“宫廷里指鹿为马”，“中央不是按历史来决定问题的，而是按你对毛林的态度而定的”。对“红海洋”和“三忠于”的愚昧活动，她也极为反感。对“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她认为“不见得”。她觉得林彪“越来越像个奸臣”，隐喻毛泽东成了“残冬的太阳”，“余晖是明亮的，略有温暖的，然而实在是无力的、不持久的；

1969年2月29日，她给高中同学时的恋爱对象曾昭银写了一封信。其时曾昭银已在福州部队当兵。李九莲在这封信中说：“经过多年的复杂生活，碰到一系列事物，想到了很多问题，首先对国家前途发生怀疑。我不明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底是什么性质的斗争，是宗派斗争，还是阶级斗争？

接着，李九莲还写了这样一些话：“刘少奇好像有很多观点是合乎客观实际的；对刘少奇的批判是牵强附会”；因此对“今后的天下到底属于谁？林彪到底会不会像赫秃一样？现时的中国到底属于哪个主义？”等项问题发生怀疑。这是她写给男友的第一封信。并未向他人透露。

在谈到自己的“人生态度”时，李九莲向其恋人写道：“马克思说过：‘使人生具有意义的不是权势和表面的显赫，而是寻求那种不仅满足一己私利，且能保证全人类幸福和完善的理想。’我决心按照马克思所说去度过自

己的一生，所以不能保证自己不走向反面，成为‘罪犯’。”

最后她告诫对方：“此信万勿给予他人”；下款“你明白的人”。

然而这个应该“明白”的人却装着“不明白”。满脑子飞黄腾达的权欲之梦。他陡生“检举立功”之念，立即把这封信交给了上级。于是，当地政府1969年4月30日深夜，将李九莲抓进了赣州市公安局。（李九莲被捕后，曾昭银并没有飞黄腾达。1977年2月 曾昭银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刑十五年。刑满释放后，以倒卖玉米为生。2003年，曾昭银死于中风并发症。）

李九莲在看守所坦然地复述了自己的许多“活思想”，并交出了信件底稿和日记，赣州地区革委会副主任、“支左”部队首脑（后来这位副师长曾升任福建三明军分区副司令员）认定李九莲是“现行反革命分子”，其矛头是“直指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是直指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是在刘少奇的罪状公布以后为刘少奇进行辩护的……按毛主席的《公安六条》，她全都够格了”！于是，李九莲被捉进了插翅难飞的监狱。

地委某负责人主张教育释放，分管政法工作的军代表专程向江西省革委会主任程世清做了汇报。程世清说：“属敌我矛盾，要从严处理”。可当时下面的人考虑到李九莲还年轻，出身又没问题，只判刑五年。

1971年9月13日，“伟大领袖的亲密战友”出逃并摔死于温都尔罕了。按说，这不但应该立即开释李九莲，而且应该大大地赞扬李九莲。

但这么做却让当时抓她的那些人陷入了两难的境地，因为那样就等于承认当年是错抓了她。他们怎么肯轻易认错呢！他们向李九莲严密封锁林彪出逃的消息，继续把她关押了将近一年，直到72年7月，才把她开释出狱。中共赣州地委给她做的结论是：“性质是现行反革命犯罪，但交待态度好，出身好，年轻……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调外县安排工作，拘留期间不补发工资。”他们并派人告知李九莲：“这样处理，你还是人民队伍中的一员，还可以革命。”

李九莲当时信以为真。欣然走出了牢门。然后回家辞别了父母，离开了赣州，到了毛泽东当年搞过农村调查的兴国县，又到了这个县的崇山峻岭中的画眉坳钨矿，山上山下地挑矿砂，每月“工资”十六元。

很快，严酷的现实又一次使她大失所望：敌伪时代的矿警等人可以参加工会，她这个“年轻、出身好”的却没有资格；三年零八个月的拘禁、拷打、虐待，摧残了她的健康，使她有心而无力从事那种繁重的体力劳动，而附近一所中学因为没有英语教员，孩子们都上不了英语课，她要求去补这个缺，可有关人员回答说：宁可荒废孩子们的外文课，也不能答应她的请求。原来她是被列为阶级敌人的。是专政对象。

这时她才知道，赣州地委和公检法部门欺骗了她！

她接连向赣州地区、江西省、中央有关部门申诉，并到北京上访，要求改变这个“是非颠倒”的结论。

1973年11月，公安部和江西省公安局，把李九莲的申诉状转到了赣州地区公安局，要求对她的问题进行复查。地区公安局拖延了三个多月，它的一位负责人对这份申诉状和上级领导机关的批示看也不看，就在上面批了四个字：“此信暂存”，然后束之高阁。她不服这样的结论，曾先后到南昌、北京上访，始终想不通只因一封私人信件，就坐了三年牢，变成了五类分子。

1974年春天，“批林批孔”。多次通过正当途径申诉均如雪落沧海的李

九莲，不得不请一些较好的同学，帮她写出一张《反林彪无罪》的大字报，张贴在赣州公园的围墙外，要求赣州地委和公检法机关为其修改“现行反革命”、“敌对矛盾”的结论，为她的三年冤狱彻底平反。

这一举动，立即涌起广泛的同情与声援的热浪。赣州市和赣州地区数以万计的工人、干部、学生、市民、知识分子，纷纷集会和张贴大字报支持李九莲。他们还自发组织了“李九莲问题调查研究会”（下或称“李调会”），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宣传活动，并在群众集会上，与地委书记杜昭等人进行了激烈的唇枪舌战。地委不但断然拒绝了这一情理兼备的要求，反而以“反革命翻案”、“破坏批林批孔运动”等新加的罪名，于1974年4月19日深夜，将其秘密逮捕，押往兴国县。

兴国县委领导拒绝受理。他们推辞说，李九莲在赣州市张贴大字报，她的家又在赣州市，这件事理该由赣州市研究处理。两地互相推诿。“李调会”的众多群众又涌向拘禁李九莲的所在，强烈呼吁释放李九莲。林彪坠死以后，程世清被确认为林彪死党，隔离审查关押在秦城监狱。毛泽东派他的前警卫员陈昌奉主政江西。他以省委名义下令：不准释放李九莲！赣州地委随即派人去兴国县，把李九莲押回赣州。1975年5月，赣州地区“公检法”仍以兴国县法院名义，判处李九莲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另有四十多人因同情李九莲被判刑，还有六百多人受刑事、行政、党纪处分，全市九个中学，有两个中学的副校长被开除公职，三个中学的团委书记被撤职，两个中学的工宣队长被退回原单位。

当时华国锋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李九莲因为冤案一直得不到洗雪，绝望的她将矛头对准了华国锋。痛骂华国锋是“资产阶级野心家”。

1977年2月22日，中共中央以“中发[1977]六号”文件的形式，转发了一份《会议纪要》。《纪要》主张：“对攻击毛主席、华主席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要坚决镇压”；“对极少数罪大恶极、证据确凿、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者，则杀之”。

1977年4月，李九莲所在的珠湖劳改农场党委，就根据这个“文件”，给上级写了一份《报告》。《报告》历数了李九莲的一切“罪行”，特别强调了李九莲“恶毒攻击英明领袖华主席，攻击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为了誓死保卫华主席，保卫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捍卫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对那些攻击华主席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要坚决镇压的精神，我们认为劳改犯李九莲已构成犯罪，其罪恶达到了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要求对李九莲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这份报告，依次得到了鄱阳县法院和鄱阳县委、上饶地区中级法院和上饶地委、江西省高级法院和省委政法领导小组的认可。在这各级领导机关的讨论和决定或批示中，也都一律强调李九莲犯有“恶毒攻击英明领袖华主席”罪，一律同意判处李九莲死刑，立即执行。

要求立即判处死刑的报告，被送到了江西省委。省委常委会讨论是否作同样批复时，发生了一场争论。省委常委秘书长王泽民、省军区政委张力雄等不同意见判处李九莲死刑。但是，讨论到最后，到会的常委中的多数人同意“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报告，王泽民、张力雄们只有三票，无力挽狂澜之既倒。消息传出，赣州地委为彻底肃清李九莲在赣州地区的影响，并进一步打击“李九莲问题调查委员会”，要求省委将李九莲的死刑改到赣州执行。

省委立即批复同意。

1977年12月14日，赣州市体育场举行三万人参加的公判大会。会场中心高悬着华国锋的巨幅画像。李九莲身穿黑色囚衣，脚戴镣铐，五花大绑，行刑者用竹签穿透李九莲的下颚和舌头，还在她的嘴里塞进半截竹筒，以防喊口号。游街后，在通天岩刑场枪决。此案堪称草菅人命的旷世奇闻，依法治国的典型特色。读者以为如何呢？

钟海源

在赣州市为李九莲鸣不平的无数人中，有一个小学教师，叫钟海源。她真正做到了为李九莲两肋插刀。

事实上，她并不认识李九莲。

她在李九莲的大字报上写道：“李九莲，您是我们女性的骄傲。”

她自动找到调委会，请求为李九莲的平反干点事。

调委会的人问她：“你知道不，陈司令员下了五点指示，来这里工作，后果你不害怕吗？”

“赣州市那么多人为李九莲讲话，别人不怕，我为什么要怕？”

钟海源原是地区广播站的播音员，批林批孔后不要她干了，才调到景凤山小学当老师。

在钟海源的坚决要求下，调委会同意她来做广播员。每天从早上一直干到晚上十点半。除了播音，一有余暇，她还帮着刻钢板，抄大字报。

当地委指示：“凡在调委会工作的人本单位一律停发工资”，很多人被迫离开了调委会。可钟海源却依旧天天来，带着自己的两岁女儿。

1975年5月，公安部批复：“赣州地区李九莲问题调查委员会”是反革命性质组织。调委会主要成员一一被捕。全赣州市笼罩着一片恐怖气氛。调委会消失了，所有老百姓被迫保持了沉默。

唯有钟海源在自己家里起草了《最最紧急呼吁》、《强烈抗议》、《紧急告全市人民书》等传单，自己刻，自己印，自己到赣南剧院散发。当局念她是个女人，又带着个两岁小孩，没抓她，只把她收进了学习班，检查交代。不料，钟海源态度死硬，坚持认为李九莲无罪，拒绝检查，还口出狂言，恶毒攻击领导。于是被捕。1976年四五事件后，她在监狱里公开说：“华国锋不如邓小平。”结果，她被判处十二年有期徒刑。

为了替李九莲说话，她坐了牢，让自己的独生女儿失去了母亲。

这还不算，在监狱里，她仍然继续宣传李九莲无罪，调委会无罪！不只一次二次地与审问她的公安干警辩论。每次都遭受严刑拷打，但即使嘴巴被打出血，头发被揪掉一大把，还是不改口。

负责她的案子的公安不得不对其他人表示：“这个女人厉害！赣州女犯里，没见过这样的。”

最后，她在被打断小腿骨的情况下，居然站了起来，拖着沉重的镣铐，在监狱的墙上写下了“打倒华国锋！”的反动口号。

公安部曾帮着江西省委镇压了为李九莲奔走呼号的赣州人民，钟海源本能地对当过公安部长华国锋嗤之以鼻，即使后者当了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也不改变。于是在李九莲被杀四个月后，1978年4月30日，钟海源也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罪名是“恶毒攻击华主席”。

与李九莲不同，钟海源听完死刑判决后，毫不犹豫地签了名，然后把笔一甩，扭头就走。法院的人喝住她问：有什么后事要交代？

她平静地说：“跟你们讲话白费劲，我们信仰不同。”昂首离去。

钟海源死刑的当天，还有更为惨烈的一幕，当时江西这个“红色南昌”有个野战医院，住着一位飞行员，高干子弟（历史应该可以查到这个人的姓名），患肾功能衰竭，急需移植肾，且必须从活体上取。当时他们的消息说，女肾比男肾好，尤其是年轻女人的肾更好……于是，医院通过部队领导转告行刑的一位副营长，不能一枪打死，要留活体取肾。后据行刑人员讲：他把钟海源提上卡车时，觉得她体重也就五六十斤，象个七八岁的孩子。因长期缺少阳光，她的皮肤洁白的几乎透明，脸上浅蓝色的毛细血管都能看见。为了保护她的肾，游街时，一个头戴白口罩的军人示意押解人员按住她，从后面给钟海源左右肋下各打了一针。那针头又长又粗，金属针管，可能是给大牲畜用的，直扎进她的体内……竟然连衣服也不脱，隔着短大衣就捅进去，钟海源嘴被堵住，全身剧烈地颤抖。到了刑场，架到指定地点，副营长故意朝她右背打了一枪，然后由早已等候在那的几个医务人员，把她迅速抬进附近一辆篷布军车，在临时搭起的手术台上活着剖取钟海源的肾，一缕缕鲜血溢满了车厢底板，滴滴嗒嗒溅落在地上。也许是车厢里太滑，一位军医用拖把来回擦着地板上的血，之后又挤进一个塑料桶里，几次之后，竟盛满了半桶血。这个时候，她的肾也和铁矿一样，属于国家所有，国家可以自由支配。

一个优秀青年，就这样被判决死刑，并侮辱折磨残害，连遗体也不放过。这就是那个时代的特征。关于活体取肾的详细经过可从下列网站查阅，原文近一万字，此处未转载。

<http://www.mala.cn/thread-2140016-1-1.html>

1980年1月，新华社著名记者戴煌得悉李九莲事件后，写了一份《内参》，胡耀邦看到后批示中央政法委书记彭冲，最高法院院长江华，公安部部长赵苍壁，“请予妥善处理。”此案方得以重新审查。历经多重周折，1981年4月才宣布李九莲和钟海源一案平反昭雪。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刘复之在人民大会堂一个会议室召开的座谈会上说：这可以说是一个大冤案。1989年，作家胡平将李九莲冤案写成长篇报告文学作品《中国的眸子》。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5-1曾出版。

6、英杰俊彦陆兰秀血染苏州

陆兰秀：祖籍江苏吴县，1917年出生于苏州书香门第，1937年考入武汉大学化学系；1940年4月，在武汉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便被任命为武汉大学的女生支部书记。以后两次被国民政府逮捕，每次都坚贞不屈，拒绝填写自首书。抗战胜利后，返回南京。1946年6月，在“下关惨案”中再次被捕，得到周恩来和邓颖超直接营救。1948年，她打入国民党国防部，获取大量重要军事情报。传递给中共，为解放南京作出贡献。1949年开国大典时作为建国有功者应邀参加观礼。嗣后在煤炭工业部、全国科协等单位任职。

1965年，陆兰秀调回家乡，任苏州图书馆馆长。不久，文革祸起，她从实践中逐步认识到这是一场完全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内乱时，便不顾个人安危，口诛笔伐，冒死进谏，撰写了一系列理论文章，并上书毛泽东，以全盘否定的态度，批判“文化大革命”，公开要求为刘少奇平反，对知青上山下乡提出质疑和整改意见。从1968年5月起，受尽造反派的批斗、关押、殴打，使她身陷囹圄，遍体鳞伤。三年中，她写下了14万多字批判‘文化大革命’的几十篇论文、杂文和意见书、‘忠告信’等。其中，1969年11月，陆兰秀交出了以《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几点体会》为总题目长达2.9万字的八篇文章，

即《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关于干部问题》、《关于什么是毛泽东思想问题》、《关于消灭工农差别的问题》、《关于外交政策和外贸关系问题》、《关于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方面的问题》、《关于对现阶段文化大革命形势的认识》、《给革命家长和各级领导同志的一封信》以及她在以后写的《再论阶级和阶级斗争》等多篇论文和杂文，纵论了中国政治、经济形势的各个方面，义正词严地从理论上系统地批判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非常精辟，也非常刺目，充分反映了她的理论深度、超人胆识和威武不能屈的精神”。

在论阶级和阶级斗争时，陆兰秀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已经历了二十年的今天，地主阶级早已失去了他们的土地；资产阶级经过社会主义的改造，失去了统治和不合理的分配所得，所以也失去了成为剥削阶级的条件，更由于为防止他们的反抗，已对他们进行了二十年的专政和教育。在目前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社会主义阶段，采取一些新的办法，来消除过去暴力革命时期遗留下来的对立情绪，适当处理和他们的关系，是完全可以的，也是应该的。”文章接着就批判“文化大革命”在阶级关系上造成的严重混乱：把几乎所有的领导干部都打成走资派，把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视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文化大革命造成了和全世界无产者相反的是非标准，失去了共同语言。现在世界人民，完全不能理解我们的事业就像我们不理解毛主席、党中央的意图一样。”

陆兰秀从现实斗争中体察到：要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必须从理论上正本清源，破除林彪一伙制造的现代迷信。为此，她又在造反派的反复折磨当中，忍着伤痛，强撑着日益虚弱的身体写下了《多思》、《居中》、《人之初》等长篇理论文章，批判林彪一伙神化领袖的反马克思主义行径。《多思》这篇文章，首先批判林彪为《毛主席语录》所写的《再版前言》，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只有一个，但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处理各种问题的方法并不相同。把无产阶级使用暴力夺取政权的手段，来处理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是完全不恰当的”。批判了林彪所鼓吹的“毛主席的指示句句是真理”，应该“句句照办”的谬论时指出，“毛主席在不同的时期的政策，对同一个问题在不同阶段所说的也不同。那么到底听毛主席的哪一句话好呢？”文章还说：“从这里可以联系到当前的文化大革命，说全国人民都对毛主席无限忠诚，并把毛主席的语录叫做最高指示，说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这是把毛主席说成古代封建帝王了”。陆兰秀意识到，要反对神化，就必须反对理论上的僵化。她在《居中》中指出：“马克思主义不是天生神圣的东西，而是马克思经过科学分析总结出来的一种科学理论。这种理论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日益补充、完善的。所以对某种理论和政策，包括马恩列斯和毛泽东的某些理论和政策，提出不同的看法，只要是科学的探讨，称不上叛逆、反革命之类。叛逆者，是古代帝王自以为神圣，对于自己的臣民所加的罪名。在科学探讨上，从来没有什么叫叛逆的。”陆兰秀作了当时没有别的人做过的事情，她上书毛泽东：“为了世界革命人民不致迷失方向，为了马克思主义的事业不致中断，请即结束文化大革命，解放全国人民，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对人民进行正面的共产主义教育。全国人民都会感激您。”她在《告全国人民书》中指出：“文化大革命使历史大幅度地开倒车，人们如果不觉悟，不奋起抵制，不采取积极的行动，这种历史倒退，还将不断地倒退下去，使整个国家遭到毁灭性灾难”。

当刘少奇一夜之间被戴上“叛徒”、“工贼”的帽子，要被打倒时，陆兰秀站出来坚决反对对老一辈革命家的迫害。当广大知识分子遭受残酷迫害时，陆兰秀尖锐批判对干部的法西斯审查方法，要求恢复党的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陆兰秀相信颠倒的历史总有一天会被重新颠倒过来。她要求毛泽东纠正错误，责问到：“你可以把迫害人民的一切责任推给下级，但文化大革命是你亲自领导，是逃避不了的。你把坚持共产主义立场的人长期关押，受尽折磨和凌辱，你又扮演另外什么角色？你曾否想过，等你演毕反面角色，卸装归来，你到何处去找你原来的马列主义真身呢？”陆兰秀在狱中多次绝食抗议，要求结束文化大革命，她说：“我死于狱中之日，也就是历史为文化大革命定案之时”，“我为全人类的解放献出生命在所不惜”。1969年11月22日陆兰秀在《给革命家长和各级领导同志的一封公开信》中说，“从66届毕业生上山下乡起，到今年已第四年了。把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农村去，立志务农，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革命的家长们，你们觉得这样做对不对？中国已有百分之八十的农业人口，农村人口不是嫌少了，而是嫌多了。”她在信中还说：“现在毛主席从文化大革命这种反面教育出发，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们单纯幼稚，他们热爱毛主席，把一切时髦的口号都当成真理，而不能分辨什么叫马列主义，什么叫修正主义。于是，他们在反面教育的美丽词句蒙蔽下，被送上了歧途。而他们的父母呢，或者单纯得和他们的子女一样，把谬误当成真理；或者不敢提出反对意见，怕在反面教育的强大压力下，被当作阶级敌人处理，更害了子女。”她从政治的角度分析了老百姓不敢抵制知青上山下乡的原因，她对当前社会做了进一步分析后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议，她说：“做家长的、做老师的、做领导的，请考虑一下，能不能让这些青年都到工厂、矿山当工人？……如果革命的家长们，各级领导同志们，认为我的意见是对的，或至少方向是对的，就请把城市里的历届毕业生和各单位精简下来的青年分配到工厂去学工。”陆兰秀在《信》中最后说，“请求革命的家长和各级领导同志一面这样办，一面给毛主席打报告，写决心书，向毛主席表态。我一定和大家一起，再给毛主席写汇报，把情况讲清楚。……全国革命家长、各级领导同志一起来做工作，群起而促之，相信毛主席是会接受大家意见的。”然而，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直到1979年才停止，历时11年。

1970年3月，陆兰秀在经受了长期野蛮专政之后，预感来日无多。她口吐鲜血，仍挣扎着写下了措辞激烈的《陆兰秀的遗书》，明确指出：“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所谓文化大革命，陷全国人民于水深火热、苦难深重之中，证明文化大革命不过是一场极大规模的、有计划的匈牙利事件，扼杀了中国的共产主义前途。毛泽东犯此严重错误后，又拒不接受人民意见，拒不解放全国人民，包括受其蒙蔽、充当其御用专政工具或变相专政工具的人员在内。凡我中国人民、中华民族儿女子孙，都应世代牢记这一切的沉痛教训，清算这场祸国殃民的文化大革命，并且永载史册，以儆后人。”同时，她还写了一份《意见书》和《忠告信》，要求周恩来总理接管全国政权，要求毛主席作深刻检查，并庄严宣告“只有共产主义可以救中国”，显示了她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坚定信念。

陆兰秀是一位伟大的先知先觉者。陆秀兰完全了解她这样做会有什么后果，1969年11月7日，她在狱中给丈夫写了诀别信，在信中说：“能够为人民利益贡献自己的生命，是人生最大的光荣。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我也

不可能得到这样的条件，用自己的生命，换取一些老大难矛盾的最后解决，这应该是我们一家的光荣。所以你不要难过。”

陆兰秀所有这些闪耀着真理光芒的文字都作为“罪证”被扣押在案，苏州市召开四万人大会，悍然以“现行反革命”罪将陆兰秀处以死刑。刑前游街示众，为防止陆兰秀在大会上和游街时有所表示，竟卸下她的下颌骨，口里还塞满了破布，使她不能出声。当天下午4时40分，这位坚持共产主义理想，不迷信神权、不屈从暴力的革命者，血染苏州南郊横山山麓，其遗体交给苏州医学院解剖。陆兰秀被杀害以后，这位一生追求真理的女英雄，身后遗留下来的只有七大卷所谓的“罪证材料”，14万字的批判“文化大革命”的论文、杂文和意见书。

陆兰秀生前曾经预言，“后人看了我写的材料，一定会给我平反”。果然，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1978年5月陆兰秀的冤案得以初步平反，1982年4月2日，中共江苏省委和江苏省人民政府为陆兰秀彻底平反，作出《关于追认陆兰秀同志为革命烈士的决定》，陆兰秀的党龄从1940年入党时算起，并由中共苏州市委举行追悼大会，在苏州市横山烈士陵园建立陆兰秀烈士墓碑，汇集陆兰秀的遗稿作为革命斗争的史料，并将陆兰秀的事迹印发全省，号召所有共产党员向陆兰秀烈士学习。1993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当代女杰陆兰秀的传记《殷殷关山血——当代女杰陆兰秀的一生》，李锐先生作序言，题为《千万不要忘记陆兰秀》，使人们受到极大震撼和教育。

7、张志新的生前死后和中共新闻、司法的特色

张志新：1930年生于天津一个大学音乐教师家庭；其父张玉藻曾参加过辛亥革命，其母郝玉芝毕业于山东济南女子师范学校；她上有三个哥哥，下有三个妹妹。张志新1950年高中毕业后被保送到天津师范学院教育系学习。朝鲜战争爆发后她投笔从戎，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当时部队急需俄语翻译，她被推荐到中国人民大学学习俄语。1952年张志新提前毕业，留校工作。期间与时任人大哲学系团委书记的曾真结婚。1955年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7年，他们夫妻同时被调往沈阳工作；1962年，张志新被调到辽宁省委宣传部当干事。工作业绩不突出，也没有什么纰漏。堪称一帆风顺。

1966年8月，“文革”中因为批判林彪，“四人帮”及其在辽宁的死党的极“左”罪行。并指出毛泽东晚年错误，于1969年9月24日被捕入狱，先判处无期徒刑，后改判死刑。

1975年4月3日，张志新在沈阳被处以极刑。割断喉管后枪决，时年45岁。

1979年3月9日，辽宁省委常委听取了有关调查组的汇报。当时的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说：“张志新案件是奇冤大案。她的死是非常惨的。张志新同志是一个很好的党员，她坚持真理，坚持党性，坚持斗争，宁死不屈”。并号召党员、革命者向她学习。

1979年3月21日，中共辽宁省委召开大会。为张志新彻底平反昭雪，追认她为革命烈士。称誉她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

1979年6月，全国各大报纸开始报道张志新冤案，尤以《光明日报》的系列报道影响为大。

4月4日，辽宁省委宣传部在沈阳回龙岗革命公墓礼堂，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会场四周摆满了花圈。烈士的母亲在墓碑上题词：“探求真理，贵

在实践，忠骨毁灭，浩气长存”。

1979年5月，在《光明日报》记者部工作的陈禹山，得知张志新被平反的线索，立即向部主任汇报，得到批准后，连夜动身前往沈阳采访。历时4天不停地采访记录，陈禹山写了长篇通讯《一份血写的报告》。其中披露了一些张志新的“反动言论”：

“中央文革到底是集体领导还是江青在那（里）自己说了算？江青历史上到底是干什么的？”……

“把很多电影、戏剧都批了，现在就剩下了几个样板戏，唱语录歌，这样搞下去祖国的文化艺术不是越来越枯竭单调了吗？因此，我对江青就有很多想法。”

“林彪说，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这种局面不会维持长久，这样下去，局面是不堪设想的。”

“我对林彪提出的‘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列主义发展的顶峰’的论断，很反感，顶峰不是到头了吗？”

“林彪是促进党内‘左倾’路线发展的主要成员，是影响‘左倾’错误不能及时纠正的主要阻力。我对林副统帅没有什么信赖。”

“文化大革命以来，我对那些事都想不通，好多人打倒了，是否都是叛徒、特务？”……

“走资派要当敌人来打，我思想上就是不通。老干部总是给党做了些好事，做了些工作。”

对彭德怀同志上书言事被定为“反党”，她认为应当平反；关于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的案件的处理，她指出这是不公正的……

在狱中关押期间，趁放风之机多次呼喊反动口号，要打倒伟大领袖……

《一份血写的报告》在光明日报刊出以后，引发了全国轰动。

“从1979年6月5日发表《一份血写的报告》开始，到9月12日登载《论张志新这个典型的时代意义》结束，3个多月，仅《光明日报》即刊登有关张志新烈士事迹的长篇通讯、怀念文字、理论文章、编者按语、新旧诗词、照片、绘画、歌曲、题词以及各种报道86篇（幅），约15块整版，14万字。”（根据《光明日报》原副总编马沛文回忆录，载《光明日报40年》，191页）。

《辽宁日报》《共产党员》等刊物连续几个月的报道，更使张志新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

我当时尚在狱中，看到的报刊资料有限，对于相关张志新的报道不全信也不是全不信。陈禹山的文章大体上是忠于事实的，对于细节的描述也不是一点瑕疵都没有。这也为后来张志新案出现的乱象埋下了伏笔。

当年的报道虽然披露了大量事实，但受当时宣传工作纪律的限制，在事实选择与思想倾向上问题都很多。隐瞒真相、掩过饰非者有之。着力渲染、过甚其词者也有。随着时间的推移，事件亲历人所著回忆录的逐渐披露，《夹边沟记事》《兴凯湖纪事》等纪实作品相继问世，中国监狱内幕才逐渐暴露。

笔者写这一段文字时看过许多有关张志新事迹的报道和专著，读后总感到由于报道者与写作者或是调查不深入，或是立场有差异，或是动机有问题，或是受到某种约束。所记录的事实与真实发生的事件不相符，有的出入很大，甚至相互矛盾。建议读者 慎思之 明辨之 。不可轻信任何一方。

如张志新临刑前是否被割断喉管，陈禹山初次报道时隐约其辞，只写了

“把她按倒在地，惨无人道地剥夺了她用言语表达真理的权利”。许多读者打电话追问“到底是什么意思”，陈禹山和编辑部干事吴力田无法搪塞，只好如实告诉读者，是指割断了喉管。一位读者听后，在电话里问道：“鲁迅先生的《纪念刘和珍君》一文在谈到被害的刘和珍君的一位战友时写道，这不但是杀害，简直是虐杀，因为身体上还有棍棒伤痕。当年有棍棒的伤痕而被枪杀的叫虐杀，而今我们割断气管再去处决，这叫什么杀？假如鲁迅活着，他会含蓄掉吗？他会怎么写？”在众多读者的追问声中，陈禹山才在以后的文章里明确表述了“几个大汉，把张志新按倒到地，在颈背垫上一块砖头，不麻醉不消毒，就用普通刀子割断喉管”的细节。此文发表后，引起了轩然大波。有咒骂陈禹山撒谎的，有撰文《树啥不好？树一个婊子张志新！真是特色》唱反调的，有说张志新曾被关小监以致精神失常的，有说这事纯属捏造等等。随之，引起了读者怒不可遏的“娘杀孩子”讨论，引出了“谁之罪”的全民“天问”：割喉管的人是无罪的，押打张志新的人是无罪的，公安局、法院、省委宣传部那些揭发张志新的人都是无罪的……因为在当时那种专政政治下，谁都是在执行上级指示、“中央精神”，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那么到底谁有罪呢？

曾有人直接了当地说：把张志新案件作为重点宣传，丑化了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于是，张案报道讨论在三个月后奉命停止。

2014年，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退休狱警写了一篇文章。该文的标题是《亲历张志新服刑与惨死过程的狱警披露真相》。全文一万余字，不仅有割张志新喉管的细节，还有更多类似事例。此处仅摘录其中一个细节：“割喉现场帮忙的几位干警，在张志新平反后影响了一次提升工资。他们很不满，说“判刑的没事，签字的没事，动刀的没事，开枪的没事，站着看的却倒霉了。”

对张志新的惨遭枪杀，最初党报党刊把这一切归罪于林彪、四人帮及其同伙，审判毛远新时，法庭判决毛远新对张志新的死负有重要责任。那么，谁应负主要责任，谁要负次要责任呢？《光明日报》撰文说“应集体负责”，这等于无人负责。所以至今为止，还没有第二个人为张志新案件受到法律制裁。

在中国，很多人都怀着期盼依法治国和司法公正的梦想，中共最高层领导也多次强调“司法腐败是最大的腐败”。张志新生前并没有什么丰功伟绩，死后竟被被一些政治人物利用来达到特定政治目的。也算是中国司法的一大特色吧。

中国的法律和司法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是政治家手中的玩物。1957年反右方兴未艾之际，毛泽东就在上海会议、青岛会议上给右派分子准备了出路，“把右派送去劳动教养”“把一些右派搞去劳动教养……搞裴多菲俱乐部的教养他一二十年。”后来多数右派的确就是被教养了一二十年。毛泽东死了以后方获“改正”。

1979年9月审判四人帮之际，邓小平在一次听取审理工作汇报时说：“有些人罪行严重，要判无期徒刑。黄、吴、李、邱、陈伯达，可以作为一案，王、张、江、姚，包括毛远新，作为一案，作为篡党夺权、阴谋政变的集团来处理，不要一个人一个人去写，要把他们的主要罪行写出来。审判‘四人帮’时，要把主要罪行，祸国殃民的罪行提出来。他们的罪行，不在于小的罪过，而在于祸国殃民、阴谋政变、篡党夺权。”（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7月第一版，551-552）

之后的判决果然如是。怎么判？判多少？全凭当权者一句话，哪个法官敢不奉命？这能说是依法治国吗？

张志新这样的冤案，与先后被处死刑的遇罗克、李九莲一样，是时代的悲剧。为什么共产党打天下的时候，连拥有八百万军队的国民党都不怕，为什么拥有强大的国家政权以后，却怕人说话，脆弱到连几句真话都不敢听了呢？

当年的乒乓球运动员徐寅生、曾写过一篇文章，将每一场乒乓球甚至每一个攻守回合的胜利都归之于毛泽东思想的胜利。由此大红大紫，后提升为国家体委副主任。既然当时中国的各项成就都归功于毛泽东。一切过失、错误和罪恶难道就跟毛泽东一点关系都没有吗？国家的不幸，不是个别人行为，是整个国家机器运作的结果。毛泽东是罪不容诛的祸首，这才是千真万确的历史，是不容回避的。人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彻底批判文革，认真拨乱反正、改弦更张，才是当今的正道。

8、禁言文革意在掩盖历史

前人说过一句话“忘记历史等于背叛”。一个民族如果忘记了历史，她也注定将失去未来。

中国历史悠久，从盘古、女娲、后羿等神话时代算起约有 5000 年；从三皇五帝算起约有 4600 年；自夏朝（中国第一个王朝）算起约有近 4100 年；从秦朝（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算起约有 2200 年。

学习历史是为了正视现实。我们为人处世都要从“**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四句话中得到启示[2]。学习历史，是为了汲取教训振兴中华。

中国对记载历史有着优良传统。自西周起，就设有太史官职，专司记载国家大事；旧时有“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之说。先后流传下来用词精炼、微言大义的《春秋》；记事翔实、文笔优美的《左传》；纵贯古今、包罗万象的纪传体通史《史记》；熔铸百家的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和各个朝代编纂的断代史。中华民族繁衍昌盛历五千年，史籍浩瀚博大精深。到清朝中叶，上起传说中的黄帝（约公元前 2550 年），止于明朝崇祯十七年（公元 1644 年），计出版了史籍 3229 卷，约 4000 万字，用统一的体例编写。为世界之极品。中华之瑰宝。

毛泽东生前嗜书，在他专属的中南海菊香书屋内藏书即有九万二千多册。他逝世后，由专设小组整理、编制藏书目录，用了整整三年时间。菊香书屋中央是一长方形大书案，摆放着书籍；周边则是书架，也装满了书籍。有精装的马列主义的精典书籍；也有线装本的经史子集；有鲁迅、茅盾的杂文随笔，也有记载轶闻琐事的稗官野史；有文学典籍和书法字帖，有军事著作，也有哲学方面的著述。大部分书似乎从未看过，或只是偶尔翻阅，崭新的陈设在那里，显示书屋主人博览群书、学富五车。书屋中央的书案摆放着似乎是常看的书。有的书还用镇纸压着，书签隔着。这些看过的书主要有《二十四史》，《资治通鉴》，《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等；《资本论》只看了个开头，未继续往下看。《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等小册子上面留有許多批注。似乎是真的看过。藏书中鲜见有自然科学、法律、经济研究方面的书，大概书屋主人对这些不感兴趣吧。

“文化大革命”堪称史无前例，触及灵魂；暴虐无道，祸国殃民；十年

浩劫，贻害无穷。对这段历史本应认真研究，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3]。今年是文革发动五十周年，文革结束四十周年。却未见一部资料翔实，论述深刻的文革史。只见《环球时报》急急忙忙发表了一篇标题为《“文革”已被彻底否定》的文章。大肆散布“文革在中国不可能重演”、“我们早就对文革说拜拜了”、“文革那一页彻底翻过去了”的观点。似乎文革成了忌讳之词，要人们彻底忘记文革。

秦皇汉武已作古两千余年，唐宗宋祖也逝去千年以上了。毛泽东还在《二十四史》等史籍中寻踪觅迹，透析评说。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文革才过去四十年，怎么就成了敏感词，为什么要极力掩盖，禁言禁声呢？

诚然，1981年6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文化大革命作了总结和评价。其中说：“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七六年十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造成的危害是全面而严重的。文化大革命在理论和实践上是完全错误的，它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见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文本）

对于犯有严重错误（应该是罪孽），使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的毛泽东怎么处理呢？他的画像还高挂在天安门的宫墙上，他的腐尸还陈放在天安门广场中央的水晶棺材里。

曾几何时，身为政治局委员的薄熙来在重庆以权代法，唱红打黑，败坏法治，私设刑堂，在王立军事件和薄谷开来故意杀人案件中滥用职权，大搞政治迫害，把直辖市整得成了一个独立王国，让人依稀回到了文革。你能说“文革在中国不可能重演”吗？中纪委已通过法律程序，判处其无期徒刑，终身剥夺政治权利，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他的人还在，心死了吗？

2016年5月2日，一场名为“在希望的田野上”的大型演唱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演出。号称“五十六朵花”的少女组合当晚演唱了《社会主义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等多首红歌，重点演唱了文革期间甚为流行、宣扬个人崇拜达到极致的《大海航行靠舵手》，舞台幕布中打出了“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1970年5月20日林彪声嘶力竭在天安门代毛泽东宣读的反美声明）[4]等特殊时期政治口号。

2016年6月19日，河南举办了纪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动五十周年大会。

据报道：与会人员“在‘纪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五十周年’‘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永放光芒’‘革命理想高于天’巨幅标语下汇聚，尽显中原人民豪气。文革造反派红卫兵领袖、原河南省委常委陈红兵作了《文革是当代人类进步的灯塔》主题发言。宣扬‘1975年宪法是文化大革命胜利的最重要的标志，文化大革命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光辉灯塔。’原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

局长张勤德出席大会并做了总结发言，公然否定十一届六中全会，他说：“所谓的那个全会决议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了彻底的否定是错误的。大会一致认同《关于实事求是修改和纠正〈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的建议》。

《环球时报》的总编辑是否看见了相关报道呢？视而不见，凭一篇闭门造车的文章就能断定“文革在中国不可能重演”“文革已被彻底否定”“文革那一页彻底翻过去了”吗？

诚然，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决议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做了彻底否定。审判四人帮时，江青曾在法庭上公开叫嚷：“都是主席让我干的”，“我是主席的一条狗，主席让我咬谁我就咬谁，打狗还要看主人嘛”。

如果用毒瘤来形容文革，否定的是一个毒瘤的扩散部分，它的原发病灶还在那儿，基本没动，身体状况应该属于带瘤生存。懂些医学知识的人应该知道它意味着什么。

1976年9月9日后发生的粉碎四人帮，不过是中国历史上并不鲜见的清君侧。不同的是，历史上的一些“清”，是君王在位时进行的，而抓江青等人则是在毛泽东逝世后才动手的。其原因叶剑英向王震等人做过说明。

否定文革的决议，就是在清君侧这个意识基础上作出的，又怎么能“全面否定”？“全面否定”岂不是在太岁头上动土，犯了大忌吗？因此，否定文革只能“半面否定。”是这一半否定另一半，这批人否定那批人。一丘之貉，相互咬斗而已。

如果文革没有批斗走资派，仅仅是大破四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没有邓小平的“我一生最痛苦的时候就是文化大革命”，半面否定文革恐怕也难。1957年的反右，全面否定了吗？复查证明99.99%都是错划，不是还在一味扬言“反右斗争是必要的和正确的，仅仅扩大化了吗”？1958年的大跃进，最后饿死三千七百万人，全面否定了吗？不是至今还在极力掩饰吗。《墓碑》被禁，便是明证。

1993年1月15日，邓小平在上海西郊宾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曾经说：。

“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对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及功过的评价，是受到当时党内、社会上形势的局限的，部分历史是不实的。不少同志是违心地接受的。历史是我们走过来的，不能颠倒，不能改变。对毛泽东一生功过评价，一直是有争论的。我对彭（真）老、（谭）震林、（陆）定一说了：你们的意见是对的，但要放一放，多考虑下局面，可以放到下世纪初，让下一代作出全面评价嘛！毛泽东的功过是摆着的，搬不掉，改不了。有人担心对毛泽东全面评价，会导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功绩被否定，会损害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我看，不必担心。我建议，对毛泽东一生的评价，可以在我们这一代走后，作全面评价。”

2004年7月胡锦涛与万里谈话时说：当年中央政治局和小平同志的意见、决议是存在的，我个人是理解的，迟和早要解决好的。这是建国后很主要的政治问题、党的组织问题。我们这一代人或许能在没有束缚的情况下处理好。当前工作千头万绪，待解决的问题、矛盾较多，如能在较平和的政治气氛、环境下解决对毛泽东的一生评价，就能有较大的共识。

邓小平不肯在他活着时全面评价毛泽东，接下来的人也不肯。于是，改革开放继续走，关于文革、关于毛泽东先放那儿，民间说好说坏只要不影响稳定和谐，没有人问：谁动了我的奶酪？就不动你。你整大了，打着标语横幅上街，

那横幅上面尽管写满了拥护毛泽东，拥护共产党。照样抓你。

耐心等吧，等到“我们这一代走后”，应该对那一段历史有全面评价了吧？

虽然文革已经结束了四十年，可种种迹象告诉我们，现实中具有文革意识，为文革大唱赞歌的人还不少。而且符合文革特征的现象不但没有绝迹，反而频频出现。发动和操纵文革的罪魁祸首还在受着顶礼膜拜。这充分说明文革并没有被彻底否定，文革那一页还没有彻底翻过去。因此，我们必须保持警惕，居安思危，绝不能高枕无忧、麻痹大意，以为文革已被彻底否定并不可复返。只有全民清醒了，文革才可能真的不会卷土重来！

《环球时报》那篇认为文革在中国不可能重演，让大家放松警惕的文章恰恰就是一个文革没有被彻底否定的证明！

附注：

[1]文革十六条即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全文如下：

一、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

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

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说过，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作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实践证明，毛泽东同志的这个论断是完全正确的。

资产阶级虽然已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无产阶级恰恰相反，必须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二、主流和曲折

广大的工农兵、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的干部，是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有魄力、有智慧。他们用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大鸣大放，大揭露，大批判，坚决地向那些公开的、隐蔽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进行了进攻。在这样大的革命运动中，他们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沿着这个大方向继续前进。

文化革命既然是革命，就不可避免地会有阻力。这种阻力，主要来自那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也来自旧的社会习惯势力。这种阻力目前还是相当大的，顽强的。但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毕竟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挡。大量事实说明，只要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这种阻力就会迅速被冲垮。

由于阻力比较大，斗争会有反复，甚至可能有多次反复。这种反复，没有什么害处。它将使无产阶级和其它劳动群众，特别是年轻一代，得到锻炼，取得经验教训，懂得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不平坦的。

三、“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

党的领导敢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将决定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命运。目前党的各级组织，对文化革命运动的领导，存在着四种情况。

(一)能够站在运动的最前面,敢于放手发动群众。他们是“敢”字当头、无所畏惧的共产主义战士,是毛主席的好学生。他们提倡大字报、大辩论,鼓励群众揭露一切牛鬼蛇神,同时也鼓励群众批评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这种正确领导就是由于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由于毛泽东思想领先。

(二)有许多单位的负责人,对于这场伟大的斗争的领导,还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因而处于软弱无能的地位。他们是“怕”字当头,墨守旧的章法,不愿意打破常规,不求进取。对于群众的革命新秩序,他们感到突然,以致领导落后于形势,落后于群众。

(三)有些单位的负责人,平时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他们更是“怕”字当头,怕群众起来抓住他们的辫子。实际上,他们只要认真进行自我批评,接受群众批评,是会被党和群众谅解的。不这样做,就会继续犯错误,以致成为群众运动的绊脚石。

(四)有些单位是被一些混入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持着。这些当权派极端害怕群众揭露他们,因而找各种借口压制群众运动。他们采用转移目标、颠倒黑白的手段,企图把运动引向斜路。当他们感到非常孤立,真混不下去的时候,还进一步耍阴谋,放暗箭,造谣言,极力混淆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打击革命派。

党中央对各级党委的要求,就是要坚持正确的领导,“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改变那种处于软弱无能的状态,鼓励那些有错误而愿意改正的同志放下包袱,参加战斗,撤换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那里的领导权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

四、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

要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乱子。毛主席经常告诉我们,革命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去识别那些是对的,那些是错的,那些作法是正确的,那些作法是不正确的。

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以便群众阐明正确的观点,批判错误的意见,揭露一切牛鬼蛇神。这样,才能使广大群众在斗争中提高觉悟,增长才干,辨别是非,分清敌我。

五、坚决执行党的阶级路线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党的领导要善于发现左派,发展和壮大左派队伍,坚决依靠革命的左派。这样,才能够在运动中,彻底孤立最反动的右派,争取中间派,团结大多数,经过运动,最后达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

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极端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充分地揭露和批判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把他们最大限度地孤立起来。

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注意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同拥护党和社会主义,但也说过一些错话,作过一些错事或写过一些不好文章不好作品的人,严格区别开来。

注意把资产阶级的反动学阀、反动“权威”,同具有一般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人,严格区别开来。

六、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必须严格分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不要把

人民内部矛盾搞成敌我矛盾，也不要把敌我矛盾搞成人民内部矛盾。

人民群众中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现象。几种不同意见的争论，是不可避免的，是必要的，是有益的。群众会在正常的充分的辩论中，肯定正确，改正错误，逐步取得一致。

在辩论中，必须采取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的方法。对于持有不同意见的少数人，也不准采取任何压服的办法。要保护少数，因为有时真理在少数人手里。即使少数人的意见是错误的，也允许他们申辩，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意见。

在进行辩论的时候，要用文斗，不用武斗。

在辩论中，每个革命者都要善于独立思考，发扬敢想、敢说、敢做的共产主义风格。革命的同志，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不要在枝节问题上争论不休，以便加强团结。

七、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

有些学校、有些单位、有些工作组的负责人，对给他们贴大字报的群众，组织反击，甚至提出所谓反对本单位或工作组领导人就是反对党中央，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反革命等类口号。他们这样做，必然要打击到一些真正革命的积极分子。这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决不允许这样做。

有些有严重错误思想的人们，甚至有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利用群众运动中的某些缺点和错误，散布流言蜚语，进行煽动，故意把一些群众打成“反革命”。要谨防扒手，及时揭穿他们耍弄的这套把戏。

在运动中，除了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理外，大学、专科学校、中学和小学学生中的问题，一律不整。为了防止转移斗争的主要目标，不许用任何借口，去挑动群众斗争群众，挑动学生斗争学生，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的后期酌情处理。

八、干部问题

干部大致可分为以下四种：

（一）好的。

（二）比较好的。

（三）有严重错误，但还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四）少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在一般情况下，前两种人（好的，比较好的）是大多数。

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要充分揭露，要斗倒，斗垮，斗臭，肃清他们的影响，同时给以出路，让他们重新做人。

九、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开始涌现了许多新事物。在许多学校、许多单位，群众所创造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等组织形式，就是一种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新事物。

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是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自己教育自己的最好的新组织形式。它是我们党同群众密切联系的最好的桥梁。它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机构。

无产阶级同过去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遗留下来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斗争需要经历很长很长的时期。因此，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不应当是临时性的组织，而应当是长期的常设的群众组织。它不但适用于学校、机关，也基本上适用于工矿企业、街道、农村。

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产生，要象巴黎

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候选名单，要由革命群众充分酝酿提出来，在经过群众反复讨论后进行选举。

当选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可以由群众随时提出批评，如果不称职，经过群众讨论，可以改选、撤换。

在学校中，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应该以革命学生为主体，同时，要有一定数量的革命教师职工的代表参加。

十、教学改革

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育方针和方法，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

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必须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

在各类学校中，必须彻底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学制要缩短。课程设置要精简。教材要彻底改革，有的首先删繁就简。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也就是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的斗争。

十一、报刊上点名批判的问题

在进行文化革命群众运动的时候，必须把对无产阶级世界观的传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传播，同对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的思想批判很好地结合起来。

要组织对那些有代表性的混入党内的资产阶级阶级代表人物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进行批判，其中包括对哲学、历史学、政治经济学、教育学、文艺作品、文艺理论、自然科学理论等战线上的各种反动观点的批判。

在报刊上点名批判，应当经过同级党委讨论，有的要报上级党委批准。

十二、关于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的政策

对于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只要他们是爱国的，是积极工作的，是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是不里通外国的，在这次运动中，都应该继续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对于有贡献的科学家和科学技术人员，应该加以保护。对他们的世界观和作风，可以帮助他们逐步改造。

十三、同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相结合的部署问题

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单位和党领导机关，是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重点。

文革使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更加丰富、更加提高了。必须把两者结合起来进行。各地区、各部门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进行部署。

在农村和城市企业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地方，如果原来的部署是合适的，又做得好，就不要打乱它，继续按照原来的部署进行。但是，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提出的问题，应当在适当的时机，交给群众讨论，以便进一步大兴无产阶级思想，大灭资产阶级的思想。

有的地方，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中心，带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清经济。这样做，如果那里党委认为合适，也是可以的。

十四、抓革命，促生产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为的要使人的思想革命化，因而使各项工作做得更多、更快、更好、更省。只要充分发动群众，妥善安排，就能够保证文化革命和生产两不误，保证各项工作的高质量。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把文化大革命同发展生产对立起来，这种看法是不对的。

十五、部队

部队的文化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按照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的指示进行。

十六、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行动指南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实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要在广大工农兵、广大干部和广大知识分子中，开展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运动，把毛泽东思想作为文化革命的行动指南。

各级党委，在这样错综复杂的文化大革命中，更必须认真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特别是要反复学习毛主席有关文化革命和党的领导方法的著作，例如，《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党委会的工作方法》。

各级党委，要遵守毛主席历来的指示，贯彻执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先做学生，后做先生。要努力避免片面性和局限性。要提倡唯物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和烦琐哲学。

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将取得伟大的胜利。

[2] 这句话是北宋大儒张横渠说的。张载（1020年—1077年），字子厚，凤翔郿县（今陕西眉县）横渠镇人，北宋思想家、教育家、理学创始人之一。世称横渠先生，尊称张子，封先贤，奉祀孔庙西庑第38位。其“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名言被当代哲学家冯友兰称作“横渠四句”，因其言简意宏，历代传颂不衰。

[3] 唐贞观年间，李世民在大臣房玄龄、杜如晦、魏征等人的辅佐下，以隋亡为教训，励精图治，在政治、经济、军事以及民族关系等方面实行了一系列正确的治国措施，使得国家政治清明、军事发展、社会安定、思想文化繁荣、国力日益强大、民族关系缓和、中外友好往来增多。史称“贞观之治”。“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为李世民的名言。

[4] 1969年，中苏双方在黑龙江的珍宝岛和新疆的铁列克提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中国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同时交恶，国内政治派系斗争混乱，经济上面临崩溃。毛泽东颇感不安。中国急需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改善关系，以便改善内外交困的窘境。

1970年春，中国主动邀请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夫妇来华访问，向尼克松总统传递“我们的大门始终是敞开的。”等信息。随即又邀请美国乒乓球队来华，不断地摇动橄榄枝。终于迎来了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博士于1971年7月9日12时秘密来华。《5.20声明》就是在这一段时间出笼的。全文附后和网友分享！

附录；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毛泽东 1970年5月20日

目前，在世界范围内，正出现一个反对美帝国主义斗争的新高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帝及其追随者不断地发动侵略战争，各国人民不断地用革命战争打败侵略者。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但是，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美国侵略者在越南、老挝打不赢，阴谋策动朗诺—施里玛达集团的反动政变，悍然出兵柬埔寨，恢复轰炸越南北方，激起了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的愤

怒反抗。我热烈支持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反对美帝及其走狗的斗争精神，热烈支持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的联合声明，热烈支持柬埔寨民族统一战线领导下的王国民族团结政府的成立。印度支那三国人民加强团结，互相支援，坚持持久的人民战争，一定能够排除万难，取得彻底胜利。美帝国主义屠杀外国人，也屠杀本国的白人和黑人。尼克松的法西斯暴行，点燃了美国革命群众运动的熊熊烈火。中国人民坚决支持美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我相信，英勇战斗的美国人民终将得到胜利，而美国的法西斯统治必然失败。尼克松政府内外交困，国内一片混乱，在世界上非常孤立。抗议美国侵略柬埔寨的群众运动席卷全球。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成立不到十天，就得到近二十个国家的承认。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人民抗美救国战争的形势越来越好。东南亚各国人民的革命武装斗争，朝鲜、日本和亚洲各国人民反对美日反动派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斗争，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各国人民反对美以侵略者的斗争，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北美、欧洲、大洋洲人民的革命斗争，都在蓬勃发展。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印度支那三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反对美帝及其走狗的革命斗争。美帝国主义看起来是个庞然大物，其实是纸老虎，正在垂死挣扎。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越南人民、老挝人民、柬埔寨人民、巴勒斯坦人民、阿拉伯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怕美帝国主义，而是美帝国主义怕世界各国人民，一有风吹草动，它就惊慌失措。无数事实证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弱国能够打败强国，小国能够打败大国。小国人民只要敢于起来斗争，敢于拿起武器，掌握自己国家的命运，就一定能够战胜大国的侵略。这是一条历史的规律。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

9、转载：人们可以相互原谅，但历史从未宽恕任何罪恶

近日在网上阅读了著名历史学者章立凡先生一篇著作。感人至深，颇受启发。转载于此，共赏析之。以下即是全文：

近年屡见所谓“新左派”对于被彻底否定的“文化大革命”大加褒扬，另外还有一种论调，歪曲“宜粗不宜细”的本义，欲将“文革”的历史束之高阁。笔者是曾经沧海的过来人，特提取出其中的一些记忆，愿我们的民族永远记住这段滴血的历史。

恐怖之夜，走脱罗网

1966年8月18日，按当今的说法，肯定是个商家“大顺大发”的开张吉日。当日毛老人家临时换上不合身的绿军装，神采奕奕地登上天安门城楼，检阅红卫兵小将的队伍，向全世界昭告“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张。

当女红卫兵宋彬彬幸福地为领袖戴上革命的红袖章时，老人家亲切地问她叫什么名字。当他得知是“彬彬有礼”的“彬”时，似不经意地说了一句：“要武嘛。”于是宋彬彬从此改名“宋要武”，引为无上光荣。

我的父亲章乃器是毛泽东在1957年钦点的“右派头子”，我自然是没有跟着去山呼“万岁”的资格。据父亲分析，毛主席肯定要有出人意料的大动作。但这“动作”之快，是他没有料想到的。

我读书的清华附中是“红卫兵运动”的发祥地，毛老人家曾亲自写信，对“造反有理”表示热烈的支持。于是本校风光无限，成为全城红卫兵的“老大”，改名“红卫兵战校”。

其后数日，全城处于“破四旧”的狂热之中。8月23日清华园内抄家和暴力事件已不时发生，本班红卫兵到老师家中“破四旧”，回来还得意洋洋地说：有只很大的古董花瓶被他们打碎，王老师十分心疼云云。我见形势紧

张，晚上偷偷跑到大学校园一个僻静的电话亭，与父亲通电话，得知家里也有红卫兵来贴大字报，但他说自己能够应付，并嘱咐我暂时不要回家。

8月24日晚上，清华大学校园里一片疯狂。前清大学士那桐题额的标志性建筑“清华园”门坊已被推倒，校领导刘冰、艾知生、何东昌及“大右派”钱伟长、黄万里等“牛鬼蛇神”，被用皮带抽打着，在现场汗流满面地搬运砖石……。本校一对姐妹花的母亲，是一位蒙古王爷之后，人称“善格尔公主”，在清华园一带拥有不少房产，也被披头散发地拖来批斗。有位中学女红卫兵，一路用皮带抽打一名“反动大学生”（据说其父是上海的基督教牧师），当有人提出要“文斗不要武斗”时，她理直气壮地回答：“是毛主席叫我打的！”这时我才明白，“要武”的暗示竟有如此大的威力。

当晚回到宿舍，里面空无一人，新置的蚊帐已被撕碎，床上铺着一张墨迹未干的大字报，将贱名打上红叉，责令：“反动分子狗崽子，滚蛋！快滚蛋！”

既然不受欢迎，于是收拾行李，遵命“滚蛋”。不料本校四门紧闭，未经“革委会”许可禁止出入，已成“关门打狗”之势。若不设法逃走，则皮肉之苦难于幸免。

我在运动初起时，曾勘测全校地形以防不测，发现校园围栏有一处不密，栏下有空间与校外小河相通。情急之下，于夜幕中钻出围栏，连淌两条小河，走上校园西侧的马路，刚好有一趟末班车经过，迅速登车远去。此时天降小雨，坐在车上，仔细品味着“惶惶然若丧家之犬”的滋味，不知进城之后，有什么样的命运在等待着我。

我不敢去灯草胡同章宅，便去了汪芝麻胡同母亲的住处（父母已分手多年），刚下公共汽车，便见一群红卫兵蜂拥而上，查问乘客“是什么出身”。走在黑夜的凄风苦雨之中，暗自庆幸“又逃过一劫”。回到家中，母亲告知本胡同的邻居张洁凤、傅毅茹、周康玉等几位小有资财的寡妇均已在抄家时被打死……

我将从宿舍带回的大字报和破蚊帐给母亲看，她很是不解，以为同学间何至于有如此仇恨，要我明天回学校，好好向大家解释一下。看来她对于严酷的“革命形势”还很木然。

当晚心中记挂着父亲的安危，一夜没有睡好。次日一早，决定按照母亲的意思，回学校看看。同时叮嘱母亲，探听一下父亲的情况。

回到校园碰见的第一个人，是本班的辅导员，一位高年级的工农子弟。此人一向很革命，将我视为另类。一照面就板起脸宣布：“从现在起，不许你随便走动！”快走到宿舍楼时，遇见一位本班同学，是革干子弟，曾与我一道给校领导贴过大字报，算是有过“战斗友情”的。他摇晃着一条皮带，半开玩笑地对我说：“你拿上这个，回去教训教训你爸。”

我没有回宿舍，径直穿过操场，向教学楼走去。走到楼前时，见两位女红卫兵正在用皮带狠狠抽打门房周大爷。据说他曾是圆明园一带的地主，因家道败落，解放前就把地卖光了，后来便在学校当门房糊口。周大爷平日与世无争，好写几笔“精气神”之类的毛笔字，每逢冬至起九，便画上一幅“九九消寒图”挂在门房里，每日涂黑一个梅花瓣度日。他最大的乐趣无非是炖上一锅红烧肉，喝两口小酒。

此时本班同学已经在楼上望见我，招呼着要我上楼，但声调中暗藏玄机。我见周大爷被打的惨状，知道上去不会有好果子吃，便没有进教学楼。

昨晚尚可钻栏而逸，此刻却是大白天，故技不可重施。于是鼓起勇气，

大摇大摆地走向校园西侧的旁门。此处有一位高年级的红卫兵站岗，他迟疑了一下，将头偏过，任凭我大步流星地扬长而去。

闯关成功，心情不亚于伍子胥过文昭关。回家见到母亲，她已去过灯草胡同，父亲那里宅门洞开，外面邻居正在议论，说是“带走了，带走了”。由是判断，他已遭厄运，生死未卜。关于父亲九死一生的经历，已写入他的《七十自述》。

惨剧在北京的大街小巷中每天发生，狂热的背后，是中国“明哲保身”的旁观者们特有的冷漠。疯狂持续了多日之后，革命的高烧开始减退，于是我又回了一趟学校。

在校园里，见到一位被指为“作风不正”的高年级女生，被剃成了“阴阳头”。走进教室，只见两位“出身不好”的女同学王淑瑛、孙淑绮也被“剃度”，坐在角落的“另席”上，其他同学讪笑着跟我打招呼。问那位要我用皮带抽父亲的男同学，如当时我留在学校，是否也会遭到同等待遇？他笑着回答：“不会的，我们只想好好和你谈谈。”我冷笑一声道：“只怕未必。”

韩家鳌

此后得知，本校万邦儒、韩家鳌两位校长，在8月24日晚遭到毒打。8月26日晚，物理教师刘澍华在斗争会上被毒打后，从锅炉房的高烟囱向内跳下，他的两条腿骨插入体腔，尸体缩短了许多。同时高年级的“反动学生”如郑光召（郑义）、郑国行、徐经熊等，皆在被打之列。郑光召身强力壮，是本校高年级学习、体育“尖子学生”，只因贴大字报保过校领导，被剥去上衣，光着膀子用皮带狠抽。他不服罪名，将一枚毛主席像章穿过皮肉，别在胸前，结果被打得肾脏出血。据老同学史铁生回忆，上述两位本班的女同学，也在被打之列。

“文革”结束多年后校友们聚会，同学们多为以往的伤害相互致歉（包括那位叫我用皮带抽父亲的同学），了却恩怨，重续友情。但孙淑绮同学从不露面，可见当年感情伤害之深。

万千惨景，一堆烂帐

从学校二次脱身后的几天里，我每日在街上毫无目的地乱走，大街上不时有满载抄家物资的卡车呼啸驶过。曾几次冲动想去找父亲，但一见到周围随处可见的暴力，便只有止步。直到半个月之后，才打听到父亲的下落，他被红卫兵押去参加吉祥戏院的“打人集会”，是从那里出来的唯一生还者。

我见到不少老年“黑五类”，被剃了“阴阳头”，被红卫兵押送着“遣返”回乡。在西单的大街上，见到两名女红卫兵，用绳索套在一名五十多岁的妇女颈上，用皮带抽打着，象狗一样牵着走，那妇女身着的白色短衫上，好几处用墨笔写着“反革命”……

我不知这名妇女能否活下来？但有人亲见，另一名被诬以“反革命”罪名的年轻女子，抱缚在柱子上用铜头皮带抽打脊背，此女一声不吭，拒绝诬服，直到贴身衬衫抽烂；于是有人提议抽“前面”，遂被翻身反绑柱前，狠抽胸乳，没打几下，女子惨叫一声，立时断气。我认识的一位老人家的女儿，因为家庭出身不好，本人又长得漂亮，同班的女红卫兵便专门用皮带抽她的脸……这些都属于性变态的虐行。

记得一本精神病学书上讲，特定环境下的人群，会在某种诱因下，引发集体精神失常现象，称之为“精神病流行”。当年闭关锁国的中国大陆，就类似这种发病环境，各种矛盾找不到宣泄的孔道，一旦被人诱导，便集体发

狂，使全国成为恐怖的大疯人院。

一位朋友访问德国后对我说：与经历过纳粹时代的老一辈谈起中国“文革”，他们特别能理解。红卫兵成为“文革”的第一批社会打手，就类似“冲锋队”。小将们是“无知者无畏”，但充其量只是帮凶角色。北京和全国各地发生的普遍暴力，不是什么自发的“群众革命行动”，各街道派出所都向红卫兵提供了本辖区的抄家对象名单。据《北京日报》1980年12月20日披露的数字，从8月下旬到9月5日止，北京市共打死1762人。但社会暴力造成的大量自杀者，显然未被统计在内。

纳粹冲锋队

母亲所住胡同里，那位和善慈祥的傅毅茹老太太，家住独门四合院，热心邻里公益，曾被推选为街道主任。她年轻时应当是个美人，平日白发修齐，衣着整洁，保持着老年妇女的风度。老太太已故夫君是位旧时的小官僚，于是列入抄家名单，从褥垫下搜出短刀一把（我怀疑是有人栽赃），顿时罪在不赦，惨死于红卫兵的皮带之下。另一位周康玉女士也是独居小院，据说是天津名门周家的后裔，平日十分低调，但既属于“大资本家”眷属，自然在劫难逃，打成半死以后，挣扎着上了吊。

死者已矣，苟活者活罪难逃。大街小巷中，一下子平添了许多挂着黑牌扫街扫厕所的“牛鬼蛇神”，其中许多是白发苍苍的老头老太，我所见到的最高龄者，是一位已超过九十岁的老先生。印度和日本从事贱役的贱民们，在我们这个文明古国中，又增加了不少同类，街道卫生大为改善。

这条胡同是东城区财政局所在，该局临时成为抄家物资仓库之一。我曾见一对老态龙钟的夫妇，大约属于“小业主”阶层，推拉着老北京拣破烂用的四轮“地坦克”，上载一堆破旧的生活用品，步履蹒跚地到财政局请求上缴，说是红卫兵命令送来的，但该局不收。问“哪儿能收？”，答“自己问去。”于是又艰难地挪走。由是得知，某些抄家对象还要服“送货上门”的劳役。

抄家过后，北京的大小拍卖行里，堆满各种抄来的高档硬木家具（文物除外），以极低廉的价格出售，据说有识货者乘机购入，发了一笔小财。至于拣垃圾获得珠宝、黄金、银圆者，更有人在。

某日母亲得到街道通知，每户发给小票一张，持票可购抄家物品一件。这属于“革命群众”待遇，她不敢不去。稍后带回一件三层的精巧食盒，说是周康玉家的，作价五毛。这件物品一直使人有杀人同谋的负罪感，只好当作那个荒唐年代的一件“文物”，保存至今。

这场社会财富再分配，居民廉价分得的，只是几滴余沥，聊为封口之资罢了，真正的大头在国库那边。一个有宪法的泱泱东方大国，不靠发展生产力来增加社会财富，却靠制造“阶级斗争”来剥夺公民的私有财产，殆非为政之正道。

一言夺命，女童丧母

前面说到，母亲的几位邻居，在抄家时被红卫兵打死。其中最年轻的一位是张洁凤，她曾是美洲著名侨领司徒美堂的夫人。

现在的年轻人，很少知道这位司徒老人了，但在上个世纪的华人社会和洪门袍泽中，他是位大名鼎鼎的人物，与陈嘉庚先生齐名的华侨领袖。司徒先生原籍广东开平，早年在美国当劳工谋生。他身强力壮，为人豪侠仗义，逐渐成为美洲洪门的“致公堂”的掌门人之一。国父孙中山先生早年在美国从事革命活动，得到司徒先生从组织到资金的支持，孙先生还担任了“致公

堂”的“红棍”（相当于执法者）。因此老先生的革命资历，至少与国父是同一辈分。

司徒老人身为革命大老，反对小辈蒋介石的独裁，故受到毛泽东的礼遇。他曾作为美洲华侨代表，参加新政协和开国大典，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等要职。1955年老人逝世时，廖承志致悼词，周恩来、林伯渠扶灵，备极哀荣。

张洁凤也是广东人，但不是老人的原配。据说她曾是一名贴身使女，属于苦出身，后来收房成为夫人。老先生逝世时她还很年轻，年方三十左右，文化不高，人长得小巧玲珑。她享受着国家对知名人士遗孀的待遇，每月有七十多元的生活补贴，与她家原先的警卫员同住在一个小宅院里。

一位年轻孀妇，自然有再嫁的权利。于是她不时参加一些舞会之类的交际活动，以选择未来的生活伴侣。记得那时经常与她结伴前往的，有一位林光明女士（又名林妹殊，即前些年大名鼎鼎的气功师郭林），以及母亲的老同学黄瑞华（黄绍竑前妻）。后来张女士终于觅得意中人，是一位在云南工作的工程师。

老先生没留下多少遗产，张洁凤作为知名人士遗孀，如果再婚，就意味着必须放弃国家的生活补贴，这是一件很艰难的事。于是张女士采取变通办法，到云南与工程师秘密结婚，生下一名可爱的女婴后，带回北京生活，对外说是抱养的。

“寡妇门前是非多”，至少那位前警卫员一家是瞒不过的。内情逐渐透露出来，于是街坊四邻对她的“生活作风”开始有所议论。如今自由开放的少男少女们，恐怕无法理解在那个禁锢人欲的年代，一位顶着“知名人士遗孀”名分的女子守节之艰难。这爱和被爱的权利，对于张洁凤竟是致命的。

抄家一开始，街道便招来红卫兵，诬称张洁凤是“坏分子”，剃阴阳头、抄家、批斗，厄运一下子降临到无助的女人头上。她被扯开双臂悬吊在房梁上，轮番用皮带抽打……张洁凤很快奄奄一息，哀求看在年幼的女儿面上，饶她一命。但当场民警对红卫兵示意：“革命哪有不流血的？”于是再遭暴打，当即撒手人寰，撇下年仅六岁的小女孩。

小女孩成为无母的幼雏，孤苦伶仃地靠邻居的一点施舍活着。有时她在胡同里遇见我，照例会叫一声“小东哥哥”，但我所能给予的，仅仅是抚摩一下稀黄的头发，安慰两句。我没有随身带食物的习惯，也没有钱。

在那个荒唐的年代，“黑五类”中最荒唐的品种，莫过于“坏分子”。这是一个模糊不清的概念，任何不为体制或世俗所容，而又无法扣上地、富、反、右“帽子”的人，都可以被划为“坏分子”，是一种“百搭”身份。而张洁凤从未被戴上过任何“帽子”，只因过得比别人幸福了一丁点儿，就招来杀身之祸。

终于有一天，我在胡同里见到心酸一幕：那位头发花白的工程师从云南赶来，牵着女孩的手，各人手里拎着一个包袱，蹒跚着沿胡同向大街走去，准备离开这块伤心之地。远远跟在后面监视的，是街道上的几位“小脚侦缉队”。

女孩望见我，又令人心碎地叫了一声“小东哥哥”，我心中百感交集，望了望虎视眈眈的街道干部，欲言又至，保持着距离慢慢前行。

这是我走得最长的一段路。拐出胡同时，趁“小脚侦缉队”看不见的空挡，我迅速上前，将所知张洁凤惨死真相，对女孩的父亲叙述了一遍。此时街道干部又跟了上来，警惕地注视着，我无言地目送父女俩上了无轨电车。

一年后工程师携女儿从云南来看我和母亲。据他说，家难发生后，接到司徒家的亲戚（著名画家司徒乔之弟妇）来信，方赶来接走女儿。这次是专程来解决遗留问题，他已经找到了当年的红卫兵、民警以及有关单位，但问题没有解决。

“文革”结束后，某日我接到一名女孩的来信，说她和爸爸到了北京，约在北海公园前门见面。我一时竟搞不清来信人是谁，如约前往，方知是张洁凤的女儿和丈夫。女孩已长成少女，大人则更加苍老。劫后重逢，望着相依为命活到如今的一老一小，如同恶梦醒来，良久竟相对无语。

得知张洁凤仍未落实政策，我帮忙出了些主意，起草书信向统战部和侨务部门申诉。张洁凤毕竟是知名人士眷属，终于发还财产、配给住房，给女孩安排了工作。父女从此定居北京，但死者永远不能复生。

张洁凤在海外洪门中，肯定够得上“祖师奶”级的辈分，敢于冒犯她的人，难免不落个装进麻袋、沉到水底“种荷花”的下场。她选择留在中国大陆，做一名幸福的普通女人，然而伟大时代竟不容热爱生活的小女子活下去，她为爱情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我不知道，那些置人死地的民警、街道干部和红卫兵们，今生能否摆脱良心的折磨？我无法想象，一名眼看着母亲被活活打死的六岁女孩，心灵上创伤能否愈合？我很想知道，张洁凤弥留之际，想对至亲至爱的女儿和丈夫说些什么？

母女携手，化蝶双飞

母亲当年在中国公学读书的时候，有几位要好的女同学，其中一位名叫张为璇，我称她为张阿姨，她的女儿刘小迁，是我幼年的玩伴。

张阿姨戴着一副厚厚的深度近视眼镜，是一位胖胖的、和蔼可亲的知识妇女，一口吴侬软语。她也是个普通人，但其父张一麀却大大有名。

张老先生曾是袁世凯的重要幕僚，但因反对袁氏称帝，几与袁氏割席，被从大总统府秘书兼政事堂机要局长的职务上调离。晚年老先生定居苏州，父亲因“七君子案”被捕入狱后在苏州关押，他与李根源、陶家瑶等苏州耆宿，都曾予以声援和关照。“七君子”出狱时，老先生也是保人之一。“八一三事变”后，他与李根源、马相伯等组织“老子军”，誓死抗敌。抗战期间他是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素以持论公正著称，受到周恩来的尊敬。

张阿姨家道殷实，夫君刘先生是一位工程师。女儿刘小迁是个白白净净的小姑娘，小我一岁，曾与我在幼儿园同学，常在一起玩“过家家”游戏，我当“爸爸”，她当“妈妈”，女儿自然是洋娃娃。小孩子还不懂得“家庭”是怎么回事，有一次到张阿姨家玩，我曾正式宣布将来要与小迁妹妹结婚，被母亲当场训斥，闹了个大红脸。

后来刘先生工作调动到邯郸，而北京市要将“复杂分子”通通清走，将伟大首都搞成“水晶城”，不允许张阿姨继续居留。于是她听从我母亲的建议，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母女获准移居苏州老家。小迁那时已是个身材高挑的少女，走后我再也没见过她。

张阿姨与母亲保持着通讯联系，“文革”爆发后，人人自顾不暇，音问中断。不久伟大领袖支持革命师生搞“大串联”，我因为“出身”不好，一直拖到1966年11月，才到学校“革委会”开出一份介绍信，揣上父亲给的二十元钱，挤上比沙丁鱼罐头还要憋闷的火车南下。

行前父亲要我去一下苏州，看望他的老朋友周瘦鹃；母亲则嘱咐一定要去

看张阿姨，然后到上海看望舅舅以及她的另外两位同学。

在苏州下车，住进“革命师生接待站”后，立即梳洗一翻，准备去张阿姨家。我那时已处在模模糊糊的青春萌动期，想起马上要见到小迁妹妹，不知她如今出落成何等俏模样，心情多少有些兴奋。

张阿姨家原住在苏州城内吴殿直巷，老宅早已易主。她给母亲的信，都注明“苏州富郎中巷××号顾乃文转”，顾氏为当地名医，与张家是世交，张阿姨回乡定居，便成为顾家房客。到达观前街附近的富郎中巷时，天色已晚，我立在一座黑漆大门前怔住了——门上贴着红卫兵的大封条。

不得已向路旁一位小姑娘打听，孰料她竟嗲声嗲气爆出一条惊人信息：“顾——乃——文？——他死嘞！”我心知不好，赶快解释是找顾家房客。经一位好心邻居指点，我在附近的一座破院子里找到了张阿姨，但不见小迁，据说是随学校参加学农劳动去了。

顾氏为姑苏世家，宅第中亭台楼阁，曲径回廊，当然是抄家的重点对象。他不堪斗打侮辱，跳楼自杀了。张阿姨虽是房客，但因为家中陈设讲究，又是名人之后，连带着也遭抄没，如今已是家徒四壁。

张阿姨做了蛋炒饭给我充饥。她现在全靠丈夫寄来的工资，维持母女生活。谈起北京家中情况，我据实相告，她说人活着就好。张阿姨谈吐乐观，我觉得可以放心向母亲复命了，不过没能见到小迁，心中多少有些惆怅。

我在苏州打听周瘦鹃下落，很快得知这位鸳鸯蝴蝶派作家兼盆景名家，当红卫兵摧毁了他呕心沥血培育的盆景之后，便殉了那些至美灵物，在自家花园投井自尽，落了个“人琴俱亡”的结局。

上海的舅舅平安，但母亲的两位同学皆遭抄家。行至杭州，“革命师生接待站”设在“南屏晚钟”的净慈佛院大殿里，庄严佛像已荡然无存，仅发现一尊雕工精美的汉白玉观音，横倒在后院的山坡上，但已经没有了头。接待站的伙食很好，但每天烧饭的燃料，是一箩筐接一箩筐的佛经雕版……。到南昌后我无心再走，折回首都。

张阿姨与母亲的通讯时断时续，到了“清理阶级队伍”的1968年，突然消息全无。母亲得到一个不确切的传闻：张阿姨和小迁一同上吊自杀，但始终不肯相信。她们既不是“黑五类”更不是当权派，没有必死的理由。

“文革”结束后，人们开始寻找在浩劫中下落不明的亲友。我在董竹君、许宝騄两位前辈的热心帮助下，辗转找到了张阿姨在北京的弟妇。当向这位老太太说起我母亲是张为璇的同学时，她平静地回答：“我还记得令堂，可惜为璇早已不在人世了。”这本是我心中预料的答案，但还不甘心，又问小迁妹妹下落。老太太一下子痛哭失声：“为璇把她也带走了！”

原来“清理阶级队伍”时，刘先生被圈禁审查，工资被扣，音讯全无。张阿姨生活来源顿时断绝，这意味着将失去最后的自尊。她不能过那种四下哀求“嗟来之食”的生活，毅然带着爱女走上不归路。待到刘先生解除审查，已经家破人亡。

与周瘦鹃先生一样，张阿姨属于那种极有教养、斯文安逸的苏州人，一辈子从未伤害过任何人，也禁不起任何伤害。母女两代闺秀，象两件洁白细薄的精巧瓷器，任何震动都可能是致命的。

我这位儿时玩伴，十七岁的花季少女，就这样无声无息地牵着母亲的手，象蝴蝶一样从这个疯狂的世界悄悄飞走，消失得无影无踪。她比我晚一年来到这个世界，但生活还没有开始就已经结束。除了亲友的哀痛之外，甚至

没有给社会留下任何记忆。

多年来一直想不明白，是什么样的母亲，能忍心让女儿殉葬？我不敢想象当晚母女相对投缳的细节。今天忽然醒悟：“质本洁来还洁去”，是女儿自愿选择追随母亲，保持做人的尊严。

行文至此，悲泣不能自抑……

所有这一切，都是以一场“大革命”的名义进行的。

法国大革命的殉难者罗兰夫人说：“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名义而行！”将“自由”换成“革命”，有什么区别吗？

鲁迅笔下的狂人，从千年礼教的煌煌典籍之中，“仁义道德”的字缝之间，好不容易解读出“吃人”二字。那场“光焰无际”思想照耀下的“大革命”，省却了无数繁文缛节，直接张开血盆大口，不但当场吞噬活人，更吞下一代人心。

我不断忏悔曾经对师长的伤害，我不再记恨任何无知者的伤害。人们可以相互原谅以往，但历史从未宽恕过任何罪恶……

转载：《文革对中国灾难性的影响》 蒋祖权 2016-01-01

2016年——距离1966整整50年。

50年前，中国内地一场持续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绝不仅仅是因为一个人发了疯。

十年文革之中，有多少人自杀？有多少人被杀？至今无法确认。《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给出的文革数据是：420余万人被关押审查，172万8000余人死亡，13万5000人被以反革命罪处决，武斗死亡23万7000人，703万人伤残，7万1200余家庭被毁。

1978年12月13日，叶剑英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说：[文革期间，全国整了1亿人，死了2000万人。]

1980年邓小平对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说：[永远也统计不了，因为死的原因各种各样，中国又是那样广大，总之，人死了很多!]

一场文化大革命，吞噬无数生命。

让中国人在一个没有战争的年代，投进了一场规模庞大的自相残杀。

而在某人心底，也许只是为了打倒一个人而已。

文革在中国历史上留下的困惑和耻辱，同一个宣称千年文明的礼仪之邦，将永远难以对称。

如今那个疯狂的年代已经成为过去，但这并不意味着那个年代的病症已经好了。

在赤裸裸展露人性中最丑恶自私的极端疯狂之后，文革对中国社会带来的灾难性影响，50年以来一直在延续之中。

我认为：文革开启了中国的全民互害模式，文革之后，互害模式进入社会各行各业。文革开始后的50年里，中国从全民[政治互害模式]变异升级到全民[经济互害模式]。

先来看看，文化大革命到底是一场怎样的疯狂。

1949年以后，随着各种人造运动的不断发明更新，随着各类阶级斗争的不断发展扩大，人们开始相互揭发，相互批斗，公开诬陷，大量编造各种无端罪名，人们主动如痴如醉，丧失人格于无形之中，扭曲人性到灵魂深处。最后终于升级成为疯狂的文革，也注定升级成为疯狂的文革。

自1966年开始，到1976年结束的十年文革之中，从国家主席到平民百

姓，从在校学生到退休老人，都有被揭发，被诬陷，被批斗，被打倒，被打残，被打死的机会。文革之中有上百种五花八门，登峰造极，空前绝后的罪名，总有一款适合你。一句话，一个表情，都可能会成为一种罪行。文革时期，南疆一单位组织人们向毛主席表忠心，职工李亚长说：「我誓死保卫毛主席，毛主席活，我活，毛主席死，我死，誓死保卫毛主席的铁打江山。」因为这句话，他被定成为「反革命罪」。

文革之中，湖南道县，将 12 名地富分子及子女，用绳索捆起来，捆成一团，中间放上炸药包，点燃导火索，让这 12 个人坐「土飞机」。随着一声巨响，大块大块的血肉落雨一样飞来，有几个被炸断了手脚，炸掉了屁股的，还没有死，痛得在地上乱滚，这时民兵们一涌而上，用锄头、马刀将他们彻底消灭。

文革之中，师生同事之间，亲朋故友之间，夫妻父母子女兄弟之间，相互检举胡乱揭发，公开诬陷残暴迫害，置人于死地之举，在此十年之间，变得习以为常。

文革之中，有些随声附和的人，也只是保了一时的太平，一样躲不过各种突如其来的人祸。有些助纣为虐的人，也只是暂时得势，最后也难免落入自己挖过的陷阱。

文革之中，谁敢站起来保持独立的人格，谁敢站出来维护生存的尊严，绝对只有死路一条。人性道德的底线，在文革之中被彻底摧毁。

曾任人大委员长和国家主席的刘少奇，无疑是文革之中的关键人物，也是文革这场史无前例的灾难之中最具说服力的人物。

文革前，刘少奇曾经主持批判过彭德怀。文革一开始，刘少奇又主持批判朱德。文革之中，极力主张「不要法治要人治」的刘少奇，在尝尽了人治的滋味之后惨死，而因刘少奇问题受株连的案件就有 2 万多件，被判刑的达 2 万 8 千多人。

当然，一些积极参加批判彭德怀和朱德的人，在文革之中也遭到了同样的批判。

文革之中，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和夫人戴淑宛，学贯中西的傅雷和夫人朱梅馥，作家杨朔，女钢琴家顾圣婴与母亲和弟弟，黄梅戏演员严凤英等等，众多文化名人，不堪忍受屈辱与折磨，为了维护尊严选择自杀，愤而离世。

文革之中，从美国回来的老舍也选择了自杀。1966 年 8 月 23 日，老舍先生和其他 28 名作家及京剧演员被红卫兵押到北京文庙，跪在焚烧京戏服装和道具的火堆前被毒打了几个小时。1966 年 8 月 24 日夜，曾经一马当先，批判俞平伯，批判胡适，批判胡风，批判「丁、陈反党集团」，批判章伯钊，罗隆基，徐燕荪，吴祖光，赵少侯，刘绍棠，邓友梅，从维熙等右派的老舍，写了《骆驼祥子》《茶馆》《四世同堂》，写过《看穿了胡风的心》《都来参加战斗吧》《扫除为人民唾弃的垃圾》的老舍，在北京西城太平湖投水自杀。

文革之中，陈布雷之女陈璉也选择了自杀。（陈布雷，民国总统府国策顾问，蒋介石的文告和演讲大多出自其手。其文：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 曾被广为传诵。其女陈璉，中共党员，1947 年被捕，1948 年经陈布雷保释。1948 年 11 月，陈布雷自杀）。陈璉怨叹父亲走的是幽明异路，时隔 19 年之后，1967 年 11 月，陈璉跳楼自杀。

文革之中，和平解放北平的第一功臣——傅冬菊(傅作义之女)，也被作为阶级异己分子揪了出来，遭到残酷批斗。文革后，傅冬菊晚景凄凉，病困交加。傅作义的弟弟傅作恭(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水利工程学博士)，被傅作义召回中国大陆，在文革之前的反右运动中，傅作恭与 3000 多名右派分子一起，被押解到甘肃酒泉夹边沟劳教农场，在那里有 2500 多名右派分子被活活饿死，其中就有傅作义的弟弟傅作恭。1974 年傅作义病死北京，不知其临终之前曾有何感想。

文革之中，最早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是陈伯达，1970 年九大后第一个被扫进秦城监狱的也是陈伯达。

文革之中，起草第一张大字报的是康生，1978 年被第一个开除党籍的也是康生。

文革之中，第一个从局长级提升为政治局委员的是江青，1980 第一个被押上审判台的也是江青。

文革之中，拼命整死[接班人刘少奇]的是林彪，1971 年[接班人林彪]又不明不白地死了。

文革之中，曾经热血沸腾，斗私批修的红卫兵小将们，1968 年后被上山下乡运动淹没，文革中上山下乡总人数达到 1600 多万人，其中有很多女知青惨遭凌辱。

但是，也有很多幸免于文革的人物，像郭沫若这样的文化人，在文革之中就安然无事。1967 年 6 月 5 日，在亚非作家常设局举办的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25 周年讨论会上，郭沫若致了题为《做一辈子毛主席的好学生》的闭幕词之后，感觉到意犹未尽，即席朗诵了一首诗：[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也献给各位同志和同学：亲爱的江青同志，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你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你奋不顾身地在文艺战线上陷阵冲锋，使中国舞台充满工农兵的英雄形象！我们要使世界舞台也充满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1976 年 5 月，郭沫若写了《水调歌头》批邓。1976 年 10 月，四人帮被捕，郭沫若马上又写了《水调歌头》骂四人帮。学术上的东西，郭沫若都写进了《中国史稿》和《甲骨文合集》，人格上的东西都写进了文革。如今像他那般做学问的越来越少了，而像他那般做人的却更多了。

还有像钱学森这样的科学家，在文革之中也安然无事。大跃进之中，他三次论证亩产万斤，为粮食卫星提供科学依据。文革之中，他为确保卫星能唱《东方红》而砍掉了实验项目。改革之后，他论证人体科学，用党性保证人体特异功能的骗术都是真的。有人说他用党性而不是用人格为特异功能担保，还是留了一手的。其实，一位科学家，连续三次鼓吹亩产万斤之后，还有什么人格。

像这样的人，还有很多，有的人今天依然健在。身体虽然安好，良心始终不知，奴性还能自动升级，人格注定早已不在。

文革的尾声，也是令人啼笑皆非。

1976 年毛泽东治丧期间，通知全国停止一切娱乐活动。山西万荣有一家正好赶上儿子结婚，那时办喜事都提前采买肉菜，豆芽，豆腐，粉条等等，即便一家一家通知亲朋改期，买好的菜蔬也没法等，那时没有冰柜冰箱也无法冷藏冷冻，文革年间吃喝困难，这家人只好硬着头皮办喜事。婚礼两天后，公安局来人，逮捕了这家父子。文革之中逮捕人犯都要游街示众，胸前挂一

个大牌子，写上罪名，公安局讨论这两个犯人的罪名时，有说叫[随便娱乐犯]，有说叫[破坏悲痛犯]，都觉得不合适，最后大家决定，政委文化水平最高，政委拿主意吧！政委果然不负众望，牌子制作完成，这对父子牌子上的罪名非常醒目——[幸灾乐祸犯]

文革就是这样疯狂的，从国家主席到平民百姓，文化大革命把大家共同组成了一个互相残杀的圈子。

最后上面的人说，下面的人干的事情不能都由我们上面负责，下面的人说，要我们下面的人负主要责任不合理。

一上一下，如此一配合，文革的灾难和罪责就这样无耻地放过去了。谁能知道，这对将来的中国会带来怎样的后患。

历史上，皇权时代的中国也是人治社会，每隔一段时期就要改朝换代一次，每临改朝换代也都注定有一场残杀。

皇权时代的中国历史之中，有压迫，有屠杀，也有反抗，也有因果报应。

中国皇权人治时代，就是今天你杀我，明天我杀你，你方唱罢我登场，唯一的公平就是天下可以轮流抢，大家可以相互杀。

中国历史就是这样，从秦末杀进三国，一路杀过魏晋南北朝，出隋入唐。大唐开国，兄弟相杀，而后母杀其子，女皇登基。到了宋朝，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削弱武将，免去了一场自相残杀，之后换来举国被蒙古屠杀。然后朱元璋再举兵杀蒙古人，然后李自成再举兵去杀朱元璋的大明。后来满清又把中国杀了个遍，接着洪秀全又杀遍了半个中国。

俄国人也杀进来过，日本人也杀进来过，他们走了之后，中国人接着继续相互杀。这个杀来杀去的时间虽然很长[上下 5000 年]，但整个过程和方式始终简单明了。

我把它称为[循环互害模式]，历史上简称恶循环。历史上的中国，单纯依靠互相杀来杀去，当然不可能找到公平公正的生存方式，但是也没有冲破人性道德的最后底线。

那时的政权还是打算传给皇家子孙后代的，权力与财富的占有者们，也以能够在中国这块土地上长期世袭为荣，那时还没有像今天如此这般，把财产和家属转移出这块土地。皇权时代对人性的破坏，还是控制在一定道德底线范围之内的，所以太平天国才能被剿灭，义和团也没能发展成 ISIS。

1949 年之后，中国历史这种简单明了的[循环互害模式]，发生了复杂的变化，迅速增加了很多必须相互残害的规则，统称为阶级斗争。发展到 1966 年终于形成一个全新的互害模式——我把它称为[政治互害模式]，历史上一直到为止，简称为文革。

文革的出现，是中国几千年人治时代，开始失去道德底线和人性控制的标志。

十年文革，如此亿万人之间的互相诬陷迫害，如此任意胡编乱造的大量罪名，如此赤裸裸进行的残酷屠杀(官方统计以反革命罪被处决的就有几十万人)，在人类历史之中也是首次出现。

文革的出现，是中国几千年人治时代，在经历了太平天国与义和团之后，没能纠正历史发展方向，没能改进社会管理方式的必然人祸。

十年文革，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从此，开启了中国大陆的全民互害模式，文革虽然在 1976 年宣告结束，而这种在文革之中丧失了道德底线的互害模式却没有结束。文革之后，这种[政治互害模式]开始变异，开始升级，

开始进入到中国内地的各行各业，进入到房屋道路桥梁的建设之中，进入到食品加工，服装加工等生活必需品的生产之中，进入到药品之中，进入到水源之中，进入到空气之中，进入到每个人的呼吸之中，达到了全面覆盖的程度。

这种防不胜防的互害模式，我把它称为[经济互害模式]。使用苏丹红，三氯氰胺，地沟油，瘦肉精等有害物质的人说，这些食品有毒，我不吃，卖给别人吃。使用甲醛，可分解致癌芳香胺染料的人说，这些衣服可能致病致癌，我不穿，卖给别人穿。偷工减料的开发商说，我建的这些房子有问题，我不住，卖给别人住。我修的那些桥也很危险，我不过那些桥，让别人走。医生说，过度输液降低免疫力，损害肝肾，大量使用抗生素有风险，很多高价药品的疗效一般，很多身体检查其实根本不需要。

梦想多难兴邦的中国，在经过了文革那种放弃人格，丧失人性，不惜置他人于死地的全民[政治互害模式]之后，又开始升级进入到了全民[经济互害模式]里面。五十年里，在这种只顾自己暂时利益，不管他人是死是活的互害模式之下生存，即使人们的物质和肉体侥幸保持完好，也都注定了精神与人格的缺失。

人治社会一旦失去道德底线，注定更多的互害模式变异与升级。只要根源还在，危害就会继续。中国从古代的[循环互害模式]，到文革的[政治互害模式]，到今天的[经济互害模式]，这样一路继续升级发展，最终结果很可能是将几千年来各种不同互害模式合为一体，同时用在某个时代的人身上。

今天，回顾这肉体与灵魂从疯狂到麻木的五十年，从文革的诬陷揭发，批斗杀害，丧失人性道德底线开始，到后来的举国拜金，唯利是图，丢失诚信。从食品有毒，奶粉有毒，到每一口呼吸的空气都被污染。从集体围观跳楼自杀，到冷漠对待 6000 万留守儿童和大量弱势群体，等等皆必然全民互害之中。试问如今谁人不在其中？试问将来谁人能够幸免？

今天，回顾过去那场残害了几代人的文革，其实也是在祭奠今天残缺与迷失的自己。

任何一种病症，灾祸和危险，只要根源还在，危害就会继续存在，还会不断升级成各种灾难模式，还会继续带来更多的互相伤害。

第十章 “改正”与“平反”

一、右派“改正”

1979年2月，立春已过，乍暖还寒。一天下午六点钟左右，我刚刚从山上干活儿回来，有人告诉我说，指导员让我到司务长办公室去一下，不知道有什么事。我还饿着肚子呢，天大的事也要吃了饭再说，没管他那么多，先去厨房拿了玉米馍馍和莲花白老叶子煮的菜，三下五除二吃完了，没回监舍，径直走到那间房子门口。

喊了一声“报告”，里面回答“进来”，我应声而入，只见指导员周金仁和两个不认识的人坐在椅子上，围着一个火盆取暖。我进去以后，坐在墙角旁边的一个小板凳上，等待询问。

周金仁毫无表情地对着我说：“外调”，并抬手指向那两个人。

我透过眼镜看了他们一眼，都穿着流行的蓝色毛料中山装，五十上下的年纪，像是什么机关工作的干部。我心里想，平反冤假错案大概轮到这儿了，暗自有点激动。我感觉到他们也打量着我，那天的我，剃了光头，没带

帽子，下面穿着糊着泥土的粗布棉裤，上身是多处露着棉花的旧棉袄，腰里系着一根草绳，光着脚，穿着一双带窟窿的解放鞋，露着两个脚趾头。

我先说话：“请问，你们是法院的吗？”

其中一人回答说：“你先别问这个吧，我们来了解一下你的情况。”

我说：“哪方面的情况？”

他说：“判刑、劳改的情况。”

我点点头，“嗯”了一声，随即说：“我既没有参加过任何反动组织；也没有杀人、放火、放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反革命行为；没有任何反动笔记、文件；没有书写或张贴反革命标语、传单；没有呼喊过反动口号；没有收听敌台或里通外国；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没有任何违法活动或抗拒表现；更重要的是，我从来没有反对过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尽管原单位的某些人采用种种手段制造材料，又通过‘审理人员’千方百计地拼凑罪名，必欲将我置之于死地。但是他们也没有举出任何具体的犯罪事实。为了达到判刑的目的，无中生有地加给我这样一条唯一的罪状，即‘借开会暴露思想和借口向管教干部暴露思想公开讲反革命言论’匆匆判处，投入劳改。”

这一段话，是我投入劳改以来念念不忘、烂熟于胸的。随时都可以毫无停顿、一气呵成，以默念语录的速度背诵出来。

他们听了以后说：“你为什么不用写一个申诉呢？”

我说：“我写过。1968年就写过，已经十一年了，应该在劳改队的档案里。”

1968年我被单独关押在小监期间，曾经戴着背铐写过一份书面材料，总共八页，约四万多字，每张十六开的拟稿纸上容纳了五千余字，为防止搜查，写了一式三份，藏在三个地方，其中一份被某犯人发现，上交劳改队意图邀功请赏。据说当时队部十分重视，由大队指定专人反复研究，尽管内容是明显的翻案，公开扬言无罪，还揭露了不少狱卒狱吏违法乱纪、刑讯逼供的行为，由于事实俱在，论据确凿，有理有利有节，居然安不上罪名，只好不了了之。我估计那份材料仍然保存在苗溪茶厂第十三中队，所以做了上述回答。

“哦，十年了，怎么后来没有再写呢？”其中一个人继续问。

我回答说：“我那次写的还没有得到回复。在劳改队写申诉是要挨批斗的，要遭打骂和绳子捆。不管你有没有理由，理由如何充分，都叫做翻案、抗拒改造。近二十年来，合理申诉成了犯罪，我被判刑十五年的罪状里就有一条‘叫嚣翻案’。经验告诉我，写多少都没用。所以没有再写。”这时候十三队的指导员周金仁就在旁边坐着，听了这些公然揭露劳改队恶行的言论，低着头一言不发，无以辩驳。

我接着说：“况且中共中央《十六条》明白地写着‘即使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的后期酌情处理’可这个‘后期’始终没来，我却在运动‘初期’就被提前处理了，判了十五年有期徒刑。不久前召开的中共中央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才宣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结束，我已经坐了十几年监狱，就等着这个‘后期’呢。我不以个人问题干扰党中央的伟大战略部署，我等待着‘后期’酌情处理，等了十三年多，‘后期’终于来了。用不着再写申诉了吧？”

那两个人对视了一下，其中一个说：“你谈谈1957年的情况吧。”

我说：“好的。我从小接受的是共产主义教育，带着红领巾长大的，曾经天真地发誓做共产主义接班人，以后又参加了共青团，热爱党，热爱祖国。那时候我笃信党的教义，1957年曾经交过入党申请书，准备着为共产主义奋

斗终生。毕业分配到重庆长江电工厂，扪心自问，工作是认真的，有初生牛犊不畏虎的精神；努力钻研技术，有成名成家思想。在试制新产品的工作中，通过实践，修改了苏联的工艺规程，小有成就。进厂一年半提升了四次工资，被推举为重庆市社会主义建设青年积极分子，厂共青团团委委员。给了我很多荣耀的光环，共产党待我不薄，我当时的女朋友是共产党员，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我本人从来没有想过反对共产党，做梦都不会有。但是1957年，一夜之间被划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个别人断章取义、无中生有、歪曲捏造，不做调查、不容分辩、不经核实地给我扣上了右派帽子，送劳动教养。”

“在这种情况下，我忍辱负重、委曲求全，先后为四川磨床厂和四川消防机械厂建立了两个理化实验室，做了大量技术工作，还利用业余时间在省、部级刊物上发表多篇论文和译述。1961年摘掉右派分子帽子，解除劳动教养，但是被强制性地留在劳改单位就业。从灵魂到肉体，从形式到内容，仍然被列为专政对象。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又以莫须有的反革命罪判处十五年有期徒刑，实属冤案。”

我提高了声音、忿忿然地说：“这是历史的严重失误，时代的惨痛悲剧。历史将宣告我无罪，时代必改弦而更张。”

说着说着，我的情绪不由得激愤起来。

这时候那两个人说：“好了，好了，不要激动。你抓紧时间写个材料吧，重点是1957年的实际情况，最好今天晚上十点钟以前写好。”

我回到监舍，伏在铺上写材料，临近十点钟写完了，一共九页，大约四千字。

于是站在监舍门口对着岗楼上的管理员高喊报告，说明出去交材料，经准许后走出监舍大门。

到了办公室，那两个人正伏在桌上费力地看着什么。见我来了，招呼我坐下，然后问道：“这个是不是你写的？”手里拿着几张纸让我看。

我只瞄了一眼，就知道是我1968年关在小监里写的那份材料，果不其然被保存在劳改队我的档案里（现在此件存于重庆长江电工厂人力资源部）。于是给予肯定的回答。

他们说：“这字太小了，看不清，需要放大镜。”一张十六开的纸我写了密密麻麻的五千多字，看起来是要费点劲。

我把刚写好的材料交给他们，走了出来。

第一次外调就这样结束了。

1979年5月28日，我正在山上驾牛耕地，准备栽种红苕。有人通知让我早一点把牛收回来，五点钟以前到队部去一趟。下午四点多钟，我把牛赶回牛圈，喂了淡盐水，关在圈里，匆匆下山。

到了劳改队队部，直接走向那个时常用于外调的办公室，照例要喊报告，那天办公室的门是开着的，我看见上次来过的那两个人坐在里面，我一进门，他们两个站了起来。其中一位年纪稍微大一点的指着另一个人对我说：“这位是长江电工厂落实政策办公室杨玉林主任，”杨主任接着说：“这位是保卫处李春生处长。”向我说明了真实身份，我分别点头示意。

落座以后，杨主任说：“我和李处长受重庆长江电工厂党委的委派，向你传达关于原划为右派分子的复查情况和处理意见。”随着将一份打印的文件交在我的手上。

我拿过来草草地看了一遍，全文大约两千多字，我对内容未仔细推敲，着重看了结论。那份文件的最后一段这样写着：“复查认为，牛立华确有错误，但不应划为右派分子。鉴于1966年9月牛立华在四川消防厂因翻案抗改被控反革命罪，又被判刑劳改一案，现提请成都市西城区法院对原判进行复审。若能纠正，则撤销1957年和1958年7月对牛立华所做的划为右派分子的结论及处理决定，给予改正，恢复政治名誉，根据其从事的专业和本人意见，可以回厂分配适当的工作，恢复原来的工资待遇和工会会籍，对其亲属档案中涉及此一问题的材料应抽出并销毁。”

这个《复查情况和处理意见》是在1979年那个大环境下写的，那时候极左的思想还没有彻底清除，刘少奇、彭德怀等人都尚未昭雪，对毛泽东的错误还没有评议、批判。所以对某些问题的结论以及文字、逻辑等方面都含有左的痕迹，不尽如人意。但是二十二年多的冤狱终于要平反了，当时我对共产党仍抱有希望，所以从大局出发，对文中的不实之词没有深究。

我拿起笔来，签了如下意见：

我看了长江电工厂党委关于对我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复查情况和处理意见，深感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得到继承和发扬，时隔二十多年远在千里之外，能把问题查清实非易事，我觉得复查工作很细致，所述情况基本符合我的实际。五十年代中期，我对党的确有过怀疑甚至不满情绪，但绝无仇恨心理。五七年至今已二十二年，这二十二年的情况也可以证实，即使被劳动教养、被判以重刑，身心受到残酷折磨，我也没做过不利于祖国、不利于党的事。

今后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我决定以自己的毕生精力，贡献给祖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事业。倘能恢复政治生命，将给我这一夙愿的实现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

别无它求。

牛立华 1979年5月28日[1]

他们看了我签注的意见，颇有赞许的神色，但没有明白表露。因为错误的判决尚未撤销，我的身份还是重刑反革命犯。

李处长走过来对我说：“你在这里安心等待，保养好身体，我们也会争取问题彻底解决，切实落实党的政策。”

出得门来，已经到了开饭的时间，先把玉米馍馍和水煮莲花白老叶子拿到手，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周围的难友过来打听消息，争相看那个《复查情况和处理意见》，我让两三个人看了一下，连忙收了起来。难友们传来传去都知道“牛眼镜”要平反了，多数难友和我的关系都不错，因之显得很高兴。和我有芥蒂的那几个“劳改积极分子”见了我则更为畏惧。

回到监舍里，躺在床上冷静地回忆起往事，1957年的情景历历如在目前。

二十三年过去，就个人来说，从二十岁到四十三岁，人生的黄金时段被消耗在共产党的监狱里了。如果真的做了反对共产党的事，该当坐牢，我不会有怨言。大丈夫做事，敢作敢当。任何封建的统治者都要消灭异己，镇压动摇其统治的人，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而毛泽东策划和发动的反右运动却是把成百万的、拥护他甚至崇拜他、真心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志士仁人投入监狱，这是为什么呢？今后怎么避免再发生类似事件呢？

当年划我为右派时，没有人同我核对过任何材料，我也没有看到过任何

书面资料，更没有征求过我的意见。以致二十多年来我从来也说不清楚自己的罪状到底是哪几条。今天看到长江电工厂的《复查情况和处理意见》，才知道害了我二十几年的妄加罪名原来都是些凭空捏造的无稽之谈，荒唐透顶。中国共产党的文字狱堪称前无古人，但愿后无来者。

我一生都认为，对真理的追求比占有真理更为艰难，为寻求真理所付出的代价总是比占有它要高昂得多。

二十多年来，我可以说一刻也没有停止过用逻辑和事实来分析和检验我1956年到1957年的思想，探究为什么响应毛泽东的号召，根据他老人家的指示，从党和社会主义的利益出发去思考问题，会成为党和社会主义的“敌人”。

我们的民族为什么竟然不能依靠科学的逻辑，和历史的经验，早一点根据苏联的教训推知并且防止一场长期的灾祸，而非要等到多数人身受其害以后，一部分人才开始有所憬悟，一部分人还在执迷不悟，甚至还需要启蒙。

虽然从理智上说，我实在无法找到自己思想深处有向党进攻的意识。但是1957年夏季出于对党和毛泽东的无限信任和忠诚，也出于赶快过关，逃避无休无止的恶意指斗，在反右高潮中，我还是违心地承认自己犯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自己给自己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

那时我感到我是一个人格破裂的人，我的感情和理智相悖了，行动和思想分离了，我第一次对我曾经信仰和崇拜的党说了假话，竟然给自己扣上了“猖狂向党进攻”的帽子，虽然是顺着党的意旨说了假话。这假话害得我在监狱里呆了二十二年，九死一生。

我唯一可以自慰的是，无论是打成右派，还是劳教、劳改，在漫长的二十二年中，在地狱般的生存空间里，我手上没有别人的血，也没有别人的泪，但是我自己心头上的伤口却一直没有愈合过，它日日夜夜流着我自己的血。

二十二年，八千多天就消磨在共产党的监狱里了。人生有几个二十二年呢？

附注：

[1]这个《意见》带回长江电工厂后，曾由厂办公室打印、并张贴于各个车间门口，我至今保存着一份。

二、无罪释放

进入1979年以后，冤假错案的平反消息不断增多，最先平反的是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共产党高层干部和走资派，把制造冤假错案的一切罪过都推到林彪、“四人帮”身上，竭力避免涉及毛泽东这个真正的罪魁祸首。

获得平反的老干部们，官复原职或晋官加爵，重掌大权，补发全部工资。这部分人的平反工作阻力不大，进展迅速。

随着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深入，陆续有一些平民百姓的案件得到昭雪、甄别，进展却十分缓慢。

那些冤假错案的制造者并没有被推翻和打倒，昔日高喊“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誓死保卫江青同志”的“革命”派，摇身一变，成了“彻底打倒四人帮”“狠批林彪的反革命罪行”“揭穿白骨精的阴谋诡计”“拥护华主席，拥护党中央”的“革命”派。就是这些见风转舵喊口号，一直对人民行使法西斯专政的狗腿子，双手浸透着人民鲜血

依然把握着手中的权利，局长还是局长，书记还是书记，审判员还升成审判长了。

城头变换了大王旗，毛泽东的遗孀成了阶下囚，曾经被当作死不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重掌大权，公检法系统基本上全盘未动。原来大笔一挥判这个十年，判那个二十年用笔杀人的刽子手还在当法官，这是平反冤假错案的阻力，也是不可能进行政治改革的原因，政权的性质没有变，中共封建法西斯的本质没有变，平反就不会彻底。

关押了一万多犯人和就业人员的苗溪茶场，1979年9月以前获得平反的不过十数人而已。

1979年9月17日下午两点多钟，我又被召回队部接受外调。这次来的也是两个人，一个黑头大耳、脑满肠肥，一个鬓发花白，清瘦矍铄。

办公室煞有介事似的被布置成法庭的样子，进门左手两张桌子连在一起构成了一个长条，上面还搭着一幅半新不旧的蓝布，那两个人坐在桌子后面等待着我的到来。侧面靠墙的一张桌子算是旁听席，是苗溪茶场第十三中队指导员周金仁的位子。屋子正中放了一把椅子，大概是给我预留的。

我进去以后，毫不客气坐在了那把空着的椅子上，抬头看了看那两个人。那个黑头大耳的站起来说：现在宣读判决书，请站起来。我看周金仁和那位清瘦的来人都站起来了，于是随着起立。

我环视了一下房间，没看见音响设备，看来是不会奏国歌或哀乐了。毛泽东死了三年，也用不着背语录了，站就站一会儿吧。

他读道：

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79)刑申字第129号。

牛立华，男，四十二岁，北京市人，原在重庆长江电工厂任技术员。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九日，成都市西城区人民法院（66）成西法刑字第448号刑事判决书，以反革命罪判处其徒刑十五年。牛不服上诉，本院以（66）刑上字第83号刑事判决书判决：维持原判，驳回上诉。牛仍继续申诉。

现经本院复审查明：牛立华一九五七年被划为右派分子，经审查系错划，已予改正，故原判认定在劳动教养就业期间的翻案抗改的反革命罪行不能成立。据此，本院依法判决如下：

- 1、撤销成都市西城区人民法院（66）法刑字第448号刑事判决书和本院（66）刑上字第83号刑事判决书；
- 2、将牛立华立即无罪释放。

一九七九年九月十日

他读完了以后示意我坐下，随即全体落座。

他问道：“你有什么意见？没有意见就签字。”

我拿过来那个判决书仔细看了一遍，回答说：“我有意见。”

他看了我一眼，原以为坐了二十多年班房，得以撤销原判、无罪释放，必定会对共产党感恩戴德，听我说有意见，不免诧异。

我郑重其事地说：“第一、无罪释放和彻底平反有什么区别？”

他答道：“没有区别。”

我说：“那请你改成彻底平反。”

他冷冷地说：“没有这个提法。作为法院，我们只判断有罪或无罪。”

我看了看旁边的桌子，那上面有一份1979年9月15日的《人民日报》，一篇文章的醒目标题是“吴晗同志彻底平反”，报道9月14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

公墓为吴晗[1]及其夫人袁震[2]召开追悼会的情况。于是指给他看，并说：“这是党报，中央认定的提法。”

他无言以对。

我接着以缓慢语调说：

“第二、这份判决书所说，**错划右派已予改正，故原判认定在劳动教养就业期间的翻案抗改的反革命罪行不能成立**。这个理由是站不住脚的，也是不符合事实的。”

“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未予改正，只要没有犯罪事实，也不能任意判处有期徒刑。反过来说，即使是地地道道的模范共产党员，若是犯了罪，也该依法惩治。”

“判处有期徒刑应该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则。而不是以其身份、以有没有右派帽子、改不改正为依据。”

“按照判决书的说法，要是我的右派没有改正，岂不是反革命罪行就能够成立？所以这份判决书的提法是不科学的、不严谨的。”右派与反革命之间不存在必然的“因”“故”关系。

我继续十分严肃地说：

“第三、成都市西城区法院原判决书据说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十条三项之规定，判决有期徒刑十五年的。我上诉后，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原审法院判处‘完全正确’。也就是说，中级法院仍然认定我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十条三项确定的罪恶。”

“既然现在确定是无罪，就必须彻底否定强加给我的所谓第十条三项之罪名。”

“经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明文规定是：

‘第十条 以反革命为目的，有下列挑拨、煽惑行为之一者，处三年以上徒刑；其情节重大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

（一）煽动群众抗拒、破坏人民政府征粮、征税、公役、兵役或其他政令之实施者；

（二）挑拨离间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或人民与政府间的团结者；

（三）进行反革命宣传鼓动、制造和散布谣言者。’

第十条只有三项，整个三项之中并没有‘翻案抗改’这个罪名。也就是说，成都市西城区法院和成都市中级法院原来的判决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是违法的。你们现在拿来的这个判决书只认定‘翻案抗改’这个于法无据的罪名不能成立，并没有否定原判决书篡改既定法律的条文，任意妄加的所谓第十条三项之罪名，是极不认真、极不严肃的。”

我接着更加放缓速度一字一顿地说：

“我认为，撤销原判的理由应该改成：**原判认定的‘翻案抗改的反革命罪行’纯属诬陷不实之辞，牛立华既无犯罪行为，也无法律依据，确系假案、错案、冤案，应予全盘否定**。这才是实事求是的，认真拨乱反正的态度。”

在我说话的过程中，他的表情冷峻气愤，几次耸肩张嘴，想要打断我的话，总算忍住了。

我刚刚说完，他就迫不及待的气势汹汹地开了腔：“给你平反，你还要钻字眼儿！”

似乎平反是他的恩赐，不仅不容质询，还要感激涕零、山呼万岁。

我冷静地缓缓地说：“法律文件是严肃的，应该钻字眼儿。请你把我的意见记录下来。”

他对着旁边那位头发花白的书记员说：“不给他记！”

我立刻挺起胸膛、附加手势、先手掌朝上指向书记员，然后眼睛看着书记员，食指频频点着黑头大耳的宣判人，严肃认真地说：“请你把我的意见和他刚刚说的‘不给他记’这句话记下来。书记员的职责是如实记录法庭的真实情况，不应该有所遗漏。”

这位年约五十余岁的书记员站起来对我说：“老牛！我们替你高兴，二十多年不容易呀。”

他指着和我问答的那位说：“这位是成都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的张庭长，刚才宣读的判决书是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拟定的，我们来此出差，中级法院委托我们代宣。我会把你的意见转告中级法院。你抓紧时间办理各项手续，早一点和家人团聚吧。”

听他这样一说，我也不好再继续深究，中国的现实如此，法官的素质如此。共产党执政三十年从来没有认真地讲求法律，毛泽东常常毫无羞耻、自鸣得意地宣称他是“无法无天”，下面的狗腿子们自然更是无恶不作了。毛泽东虽然死了，其流毒尚未肃清。要改变现实，依法治国，大概还需要几十年的努力。

我于是在送达通知上签了字。

退场了，周金仁走在最前面，黑头大耳的张庭长紧随其后，我走第三，书记员走在最后，走着走着他在后面拉了一下我的衣角，我们放慢了行走的速度，他悄悄地对我说：“回成都到我这儿来一趟，西城区法院，吴钧涛。”我点头称是，然后加快脚步，返回监舍。

从这一天起，我就被无罪释放了。

当天晚上还是住在监舍里，周围的难友纷纷表示祝贺。没有酒，没有肉，没有烟，没有茶，甚至没有一杯开水。有的只是难友们饱含深情、期许、羡慕的眼光。

附注

[1]吴晗（1909-1969）浙江义乌人，著名历史学家。1943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多次在集会上发表评论，抨击国民党，并组建秘密印刷厂翻印毛泽东著作。1949年以后任民盟北京市主任委员，民盟中央副主席，北京市副市长。

1955年追随毛泽东批判胡风，吴晗每会必到、带头发言，精神亢奋、情绪激动、用词刻毒；以显示其对胡风最具深仇大恨，不共戴天。

1957年反右运动中吴晗发表《我愤恨，我控诉》一文，秉承毛泽东的旨意积极批斗章伯钧，罗隆基等民盟中央领导人，他明知章罗二人理念相左，政见不和。却吮痂舔痔般地追随毛泽东，在反右斗争中立了大功，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9年，毛泽东提出要学习明代著名清官海瑞“刚直不阿，直言敢谏”的精神，作为明史专家的吴晗紧跟毛泽东、亦步亦趋，随即发表《论海瑞》，《海瑞罢官》等作品。毛泽东对此大加赞许，并赠亲笔签名《毛泽东选集》一套以资鼓励。吴晗受宠若惊，洋洋得意。

不料时过三秋，1966年5月，在毛泽东亲自督导和指挥下发起对《海瑞

罢官》的批判，吴晗被毛泽东钦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分子”，吴晗被正式揪出来批斗，为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祭旗。不久，吴晗遭红卫兵抄家，他几乎每天都要接受揪斗，饱尝难以忍受的痛苦与屈辱。又被红卫兵绑在烈日下的枯树干上，抡起皮带抽他，脖子里被灌入晒得滚烫的沙子，鲜血顺裤管流下。

1968年又以“叛徒、特务”的罪名横遭逮捕关入秦城监狱，残酷迫害，满头鬓发几被拔光，花甲之躯肌无完肤，妻女先后死于非命，众叛亲离无处伸冤。

1969年10月10日。夜，漆黑；风，凄人；一股肃煞之气笼罩着古城北京某监狱。行将归天的吴晗，苦苦挣扎着不肯离去。呼吸越来越困难了。他双手紧紧扼住自己的下颚，笨拙的身子在被他热血浸泡过的干草上急剧地抽搐、颤抖，两条干瘦的小腿伸开、蜷回、又伸开，灵魂在挣脱躯壳的最后时刻是那样不情愿。或许，这颗痛苦的灵魂在彻底绝望之前，还想回到清华园的绿草地、回到北京市政府那张明净的办公桌前，回到定陵那神秘深邃的地宫中再走一趟，向他们一一告别、辞行。

然而，这一切都不属于他了。今天，属于他的，只有无奈的悲愤和无尽的悔恨。他默默地走了。留下的多半是斥责之声和少许的怜惜。

[2]袁震（1906-1969）湖北老河口人，清华大学著名才女，早期中共党员，因生活艰苦，感染肺结核，久治不愈，多年卧床不起。吴晗被其才华、见解、品德折服，始终不渝地关爱、照料、追求，袁震病情逐渐好转，二人于1939年在昆明结婚。袁震身体欠佳，婚后未育，夫妇二人接受朱德夫人康克清建议，从孤儿院领养一女孩，取名吴小彦，后又抱养一男婴，取名吴彰，夫妇感情甚笃，阖家欢乐。吴晗专心著述，袁震悉心协助，二人常共同推敲、字斟句酌。吴晗多次对友人说“我的每一篇文章都有袁震的心血”，吴晗与袁震的爱情故事一时传为佳话。

1966年文革爆发，吴晗饱尝批斗之苦，1968年3月被捕入狱，一个月以后袁震被“群众专政”押送“劳改队”。长期患病的袁震还要承受非人的折磨，进入1969年，一件件更加悲惨的事向这个家庭不断袭来。3月17日，袁震被允许从劳改队回家看病。当晚，住同院的万里听说袁震回家的消息，特地送来了一碗红豆小米粥。谁也没有想到，这竟是她“最后的晚餐”。备受折磨，痼疾在身的袁震，当天夜里突然病情加重，大口喘气，全身抽搐。小彦和吴彰立即把母亲送到北京某医院，但由于她是吴晗的家属，同时又是右派，医院把她视作敌人，没有进行抢救，翌日凌晨，一生苦难的袁震撒下了两个未成年的孩子，与世长辞了。直到小彦去太平间为她更衣时，袁震的双眼还半睁半闭，面颊上残留着几滴清泪。养女吴小彦悲愤至极，导致精神分裂，含冤自杀。养子吴彰由吴晗的亲戚继续抚育，后送往美国求学。

三、狱吏对平反人员的态度

宣布无罪释放的第二天，我到苗溪茶场场部管教股办理手续，接待我的是李世莲股长（现已退休，居住在成都外北四川磨床厂，2012年我曾和她简单交谈，明确地告诉她，昔日坐监的反革命，才是真正的爱国志士。她无言以对），李世莲是一位四十多岁的女士，苗溪茶场党委书记董霞云的夫人。这两口子还不算是十分刁钻古怪、整人成性的歹人。董霞云在文革期间曾经被打倒，当时下放到十三中队当一般干部，每天带犯人上山劳动，我和他多次

接触，虽然他不干活儿只是在一边监守，有时也难免和犯人说几句话，态度不是很粗暴，对犯人也并不很苛刻。当然在他们的心目中，犯人都是有罪的，他们迷信法院的判决、迷信毛泽东极左的错误路线、也迷信毛泽东本人、深中其毒。是毫无独立思考能力的蠢才，也是维护毛泽东反动统治的帮凶，镇压人民，竭力保持个人官位的奴才。

李世莲见到我，客气地让我坐下，第一件事就是告诉我，从今天起搬出高墙电网的监舍，到场部附近的就业人员宿舍住宿，在就业人员食堂吃饭，等待分配，每月领取三十元生活费。

我听了以后，不假思索地立即回答说：“我不去。”

她有点惊讶，问道：“为什么？”

我说：“就业人员是刑满释放人员的专用术语，我不是刑满释放，是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我从宣布无罪那一刻起，身份就恢复到原来没有犯罪的状态，等同于国家干部，我可以在监狱里吃劳改食堂的饭，在监狱里和劳改犯住在一起，但是绝对不能和就业人员一起被视为刑满释放者。”

她听了以后找不到适当的理由驳斥，只是连声说王某某、张某某、李某某、郑某某等都在平反后搬到就业人员宿舍去了。你还是去吧，那里条件总要好一些，平反了，不能跟犯人在一起吧？

我说：“他们是他们，我是我。党中央下决心解决各个时期的冤假错案，拨乱反正，平反的人会逐渐增多。作为监狱，应该有一个统筹的安排，让平反的人感受到重回党的怀抱，感受到党的温暖，感受到是在认真的落实政策。虽然只是个过渡期，等待分派，也不能把平反的人当做刑满释放的就业人员对待。平反不能等同于刑满释放，这是必须坚持的原则。我宁愿在监狱里住，那是我考虑到现实国家困难而做的选择，但绝对不能被强制性地安排在就业人员宿舍。”

当时的劳改队有没有住处呢？有。我所在的十三队就有空余的房间，狱政科和管教股之所以把平反人员安排到就业人员宿舍，实际上还是一种歧视，还把这些当做人当做半个犯人，对此我不得不严正地抗议。这不是单纯的维护个人利益，是维护法律的尊严。

她在思索，然后说：“还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们研究一下，明后天回答你。”

我回到犯人居住的监舍，继续和难友们住在一起，还是吃着犯人的伙食，一顿一个玉米馍、一瓢老腌菜。朱干事（朱庆丰，大队管教干部，平时讲话爱引经据典，众人给他起了一个诨名“朱马列”）问我：你快去场部办手续吧，怎么还在十三队呀？我说：我去过了，李股长让我搬到就业人员宿舍，我没同意。平反和就业应该有原则区别。他点了点头，皱了皱眉，没有再说话。

过了两天，十三队的管教干事通知我，搬到场部附近机修厂旁边的一个房子，在干部食堂吃饭，人事关系暂属机修厂。

房子虽然窄小，只有五平方米左右，但是个独门独户的单间，离干部食堂不远，食堂只有一个厨师，七八个干部吃饭，伙食自然是物美价廉。劳改犯人种的菜，不管什么品种一律按两分钱一斤划给食堂，劳改犯人喂的猪、养的鸡、鸭、鱼、兔也是廉价供应。所以即使一天三顿都吃鸡鸭鱼肉每天的伙食费也不超过五毛钱。

在我之前平反的那七八个人，原来被纳入就业人员范畴，如今也都搬出来另外居住了，房子没有区别，政治地位变更了。

他们见了我说：“还是你‘牛眼镜’有办法。”

我说：“咱们在劳改队遭了十多年的罪，挨打受骂、以无罪之身饱受凌辱，只能忍气吞声。平反了怎么还能任人宰割呢？我们不是争名誉，也不是争待遇，争的是人间正气。”

机修厂有一个女厂长，据说是中专毕业，还算通情达理。她让我到机修厂上班，当热处理工，三班倒，需要做夜班，基本是体力劳动，烧以煤炭为燃料的热处理炉，搬运工件，装出炉等等，说是照顾我的专业。我劳改十几年都在山上种地，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现在平反了，让我到机修厂干活，美其名曰照顾专业，那么多年怎么不照顾一下呢？岂不是故意唱反调。

我学的是热处理专业，原来在军工企业任技术员，反右以后在劳动教养单位也从事热处理方面的技术工作，为重庆新建机械厂设计过多台热处理炉，编定各种零件的热处理工艺等等。现在她把我当做一个劳动力使用，明显的不合理。我到车间看了看，设备十分落后，难以保证产品质量，于是想在平反后等待分配阶段给他们设计一台热处理炉，从看了车间的第三天起就着手收集数据，进行必要的计算，准备绘制全套图纸。同时我还告诉她，我要是上班，机修厂就应该支付工资，按多少算呢？我1957年的工资是六十九元，现在又过了二十多年，即使不考虑技术水平的提高，物价的上涨，至少也要恢复到这个数值吧。而我现在拿的是三十元生活费，不是工资，请机修厂研究好了再定。我把这些想法告诉她以后，她不再强制我上班了。

机修厂隶属场部，有一个李指导员，五短身材，经常穿一套绿色的旧军装，似乎是个军队转业的干部。一天下午来到我的住处，我正在看《当代》，《十月》等杂志。毛泽东没死之前，这些杂志是禁止出版的，那时监狱里没有图书馆，除了毛泽东的选集和语录之外，监狱里是不准看其他书籍的，平反了才有条件看看毛泽东死了以后才恢复出版的报章杂志。看见有人来，我连忙招呼，房子里既没有桌子也没有凳子，只能客客气气地请他在临时搭的床铺上坐。他看了看，倒背着手走了两步，没有坐。

他说：“你是牛立华吧？”

我知道他是指导员，看样子来者不善，但还是心平气和地回答说：“我是牛立华，有什么事吗？”

他斜着眼睛、不屑一顾似地说：“你没有参加劳动吗？”

我说：“今天没有。”

他气势汹汹地说：“你原来是干什么的？”

我爱理不理地说：“原来是军工企业的技术人员。”

他以近乎命令似的口气说：“还是要参加劳动。”“不劳动者不得食，不劳动不发给你生活费。”

我看了他一眼，懒得跟这个不学无术、专事整人的家伙费唇舌，只说了一个字：“好。”

他趾高气扬的走了。

当天下午五点多钟，场部农业队的就业人员王德均告诉我：“李指导员喊你明天到工地挖红苕”，我笑了一声，未置可否。

第二天天气好，我到河边洗铺盖去了，没去挖红苕。

晚上，这位李指导员又来了。我依旧请他坐，他还是不坐。我坐在床铺上看他要干什么。

他眼睛望着天说：“王德均给你带信带到没有？”

我说：“带到了。”

他瞪着眼睛对我说：“你怎么没去挖红苕？”

我看他这个样子，气不从一处来，这些狱卒有一种职业病，以整人、教训人为乐事。平时拿犯人不当人看，颐指气使，说骂就骂，说打就打。我来到场部才两三天，他就看不惯我没有干活儿，找碴儿收拾我来了。看来要教训教训他才行。于是我对他怒目而视地说道：“你去了没有？”

他一时不知所措，嘴角动了几下，才茫然地说：“你能跟我比吗？”

我冷笑了一声，随后说：“我怎么不能跟你比？政治上你我是平等的，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从平反的那一天起我就恢复了政治名誉，现在的身份就是国家干部。职务等级上我比你高，你现在的工资是五十来块钱吧？我二十多年以前的工资就是六十九块钱，至少比你现在还高三级，在军工企业，我也当过预备役军官。比文化吗？语文、数学、物理、化学都比你强，外语么，英、俄、日语我都懂一点，你能把字母认完吗？跟你比什么呢？你能跟我比吗？”

“说起挖红苕，如果气候突变，需要抢收农作物，为了减少国家财产损失，不管挖什么，也不用你说，我会走在你的前头。十三队的人都知道，所有农活我全都会干，劳动上从来没有落在别人后面，你去问问十三队的张成英和周金仁吧。”

我以训斥的口吻对他说：“你就知道在犯人面前作威作福，张牙舞爪的迫害人民，党中央决定平反历年冤假错案，拨乱反正。你呢？对于已经平反的看不惯，你这不是对我个人，而是故意唱反调，你是跟党中央背道而驰。”

我用手指着他的鼻子说：“你要搞清楚点，我现在是等待分配，不是你手下的普通劳动力，更不是犯人，想怎么使唤就怎么使唤。建议你好好学习学习，改造一下你的思想，跟上形势，不然要犯错误的。”

他再也呆不下去了，气得摇头晃脑的走了出去。

在此期间我给远在北京的父亲和十余年前的朋友写了几封信，通报了平反的消息。期盼着和家人团聚和朋友们聚会。

考虑到还有许多善后问题要到成都四川消防机械厂处理，也需要做一些准备。比如我身上穿的是劳改服，在监狱十多年既没钱也没有布票，不可能添置衣服，一条裤子补了几十个补丁，棉衣的面子早就磨破了，露着棉花，从远处看好像穿的是老羊皮袄，为了不至于损害社会主义监狱的形象，不影响成都市容，总要适当地遮盖遮盖吧。

我找到管教股李世莲股长，要求发给布票。

她看了看我穿着一身半新不旧的劳改服，虽然洗得很干净，肩膀上已经补了两块补丁。

她说：“你领过劳改服就不能发布票了。”

我说“李股长，你就让我这样进城吗？这衣服上可印着劳改两个字呢，走到大街上把我抓回来怎么办？”

她说：“你买不要布票的衣服嘛。”

那时候毛料服装不要布票，一套要一百多元。

我听了她的建议以后说：“李股长，我把这个月的钱扣除伙食费以后的余数全交给你，你给我买一套不要布票的衣服吧。”

她想了想说：“你要布票，必须把领的劳改服退回来。”

我连忙答应：“可以，你看是在这儿就脱呀，还是我回去脱下来洗干净拿

来呢？”

她说：“你身上穿的就是今年发的新劳改服呀？”

我说：“今年四月份发的，苗溪茶场的劳改服都是质量最差、价格最便宜的蓝布，我们要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肩挑背磨、雨淋日晒，为了保护衣服，平时大多光着膀子干活，要是天天穿，用不了一个月就要烂，现在已经过了半年多了，只补了两个补丁，该知足了吧？建议你们以后用稍微结实一点的布。”

她无言以对，给我写了一张纸条，找司务长领了六尺布票[1]。第二天我到县城买裤子，卖主要收八尺五寸布票，好说歹说，多给了一元五角钱，买回了一条蓝咔叽布长裤。

随后花七分钱买了一包蓝色染料，拿回住地，加足够的水和少量食盐，用脸盆在炉子上煮沸，把被子拆了，土白布的被里洗干净以后在染料里煮半小时，到河边用清水漂净就成了崭新的蓝布。请住在隔壁的裁缝做了一件蓝布罩衫，套在烂棉衣外面，遮住劳改两个字。这样总可以进省府成都了吧。

衣服做好了，我找到机修厂的金队长，要求回家探亲。

我开门见山地说：“金队长，我离家二十五年了，被关押在公安机关二十三年，坐了十多年牢，你说该不该回去看看老父亲和弟弟妹妹呢？”

他说：“该回家看看，你父亲多大岁数了？”

我说：“快八十岁了，我1954年离开家以后就没回去过，这么多年，家里人为我提心吊胆的。”

他说：“你自己安排时间回去吧。”

我问道：“探亲假的路费该怎么报销呢？”

我当时真没钱，回一趟北京，光是来回硬座车票至少要一百多元，我的确拿不出来。

按照国家规定，夫妻两地分居的每年允许单方探亲一次，父母在异地的每四年允许探亲一次，路费按标准报销。

这个金队长一听说要报销路费，身子挺了一下，忙不迭的说：“你不是本场职工，不能享受探亲假，不能报销路费。”

我笑了一声说：“机修厂那位女厂长和李指导员让我上班干活，下地挖红苕，还说不劳动就不发工资，让我干活的时候说我是本场职工，要求报销探亲路费就不是本场职工了，这说得过去吗？你是主管机修厂的大队长，希望给我个明确的答复。”

他嗫嗫嚅嚅地说：“我们研究一下，研究一下……”随后却不了了之。

附注：

[1]1953年开始实行棉布定量供应，初期居民每人每年定量32尺，可以做两套单衣，或一套棉衣，或一床棉被，据说这个定量是统计部门根据历年消耗的实际数字确定的，可以满足一般老百姓的基本需求。1957年以后据说农业大丰收，特别是1958年大跃进，报纸上说棉花产量翻了一番，布票的定量却逐渐减少，由起初的32尺降为24尺，再降为18尺，1960年每人每年只有1.8尺了。做一条裤子（含衬布和包包布）需要9尺布，五个人的布票加起来才能够做一条裤子。1979年恢复到每人每年6尺，1982年才恢复到每人15尺，1984年棉布不再定量。

四、等待分配和善后问题

(1) 回到消防机械厂

从1979年9月16日被宣布无罪释放，我就老老实实地在苗溪茶场等待分配。

因为长江电工厂党委在《关于对牛立华原划为右派分子的复查情况和处理意见》中明白地写着“恢复政治名誉……回厂分配适当工作，恢复原来的工资待遇和工会会籍……”

我耐心地等待到十一月，突然通知我到达州地委组织部报到。我才猛醒，不该在苗溪茶场坐等，而应该主动和长江电工厂联系，并抓紧与四川消防机械厂协商平反后的善后问题。

长江电工厂是划我为右派分子并决定送劳动教养的单位，四川消防机械厂是文革时逮捕我以致坐牢十三年的单位，他们都对这桩冤假错案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1979年11月中旬的一天，我黎明即起，从苗溪茶场步行到芦山县城，然后乘长途汽车到雅安，中午花了一毛钱买了一碗小面，又花了一毛钱买了两个包子，就算是丰盛的午餐。随后乘坐从雅安到成都的汽车直奔四川消防机械厂。

下午五点多钟，在路上跑了将近一天，有点疲倦，好不容易到了位于成都市通惠门的四川消防机械厂。我是文革伊始在这里被捕的，所有的罪状也是这里捏造的，坐了十几年牢，受尽了屈辱和折磨，总算大难不死，活着回来了。

走到大门口就被传达室的人拦住了。

一个人高声问道：你找谁？

“我找张志超”我紧跟着回答。张志超1966年的时候是四川消防机械厂厂长，对我也比较了解，当然是找他了。

那个人回答说：他死了好几年了。

我猛然一惊，1966年我离开通惠门以后在深山老林里服苦役，精神备受摧残，肉体饱尝折磨，转眼间已经过了十三年，竟然没有死，转了一圈又回到通惠门了。张志超没有受过什么罪，放着好好的厂长不当，怎么就死了呢？人有旦夕祸福，真的难以预料。在中共公检法系统，这个人还没有完全泯灭人性，还有点良心。年不过花甲，死得早了点，可惜了。

我对传达室的值班人员说：“我原来是消防机械厂的，文革初期被送进监狱，现在平反了，回来办理手续，你看该找谁呢，请你传达一声。”

他给管教科打了个电话，不一会儿来了一个管教科的干事，此人我认识，五短身材面容冷峻，但是想不起他的名字了。就是个小狱卒吧。

他见了我不冷不热地说：“马上要下班了，你明天再来吧。”

我说：“今天晚上住在哪儿呀？”

他不加思索地回答说：“我们这儿没有招待所，你去找宾馆吧。”

我说：“我很愿意住宾馆，但才从监狱出来，没钱，你住宾馆的费用先拿来，还要给我开一个住宾馆的证明，没有证明宾馆不让住，这是公安部门的规定，你该知道吧。”

他看了看我，没说话。想了三四分钟才慢吞吞地说：“只有在就业人员宿舍住。”我知道消防厂没有招待所，不给他出难题，也就答应了。随后问道：“吃饭怎么办？”又说：“我是消防厂捏造罪名上报公安部门抓走的，我在监

狱里受了十多年罪，现在证明了是冤假错案，从宣布无罪释放那一天起，我就应该是消防厂的员工，你们能推出去不管吗？”他冷冷地说：“先住下再说，明天你到管教科来一趟”随后我跟着他往厂里边走，一别十几年了，旧地重游，厂区面貌有了很大的变化，空闲地少了，杂乱无章的盖了些房子，显得十分拥挤和凌乱。

我随着他三弯两拐走到一幢就业人员宿舍，他推开门，没跟任何人打招呼，对着空气说了一声：这屋里有空铺没有？屋里的两个人立马站起身来异口同声地回答：有。并以惊讶的目光看着我。我跟这两个人不熟悉，但有似曾相识的感觉，于是点了点头，随即扫视了一遍房间，大约12平方米，两边摆着四张用角钢拼焊的上下铺，没有任何家具。带我来的那个干事问了一句：你的行李呢？我扬了扬手里提着的帆布包，没说话。他看了我一眼随即说，到总务科领两床铺盖，于是我又跟着他转了一圈儿，抱着铺盖回到刚才来过的那间宿舍。这才坐在床沿上，三个人摆起了龙门阵。

第二天上午九点我到了管教科，管教干事赵崇宣看来早有准备，还给我倒了一杯白开水，给我介绍旁边一张桌子前面坐着的是黔书记，我点头示意。他先说话：我是近两年到消防机械厂的，但是听说过你的事情，现在党中央决定拨乱反正，我们按照党的政策处理遗留问题。你有什么想法呢？

我说：第一，我被捕的时候办公桌的抽屉里和办公室的大书架上放着许多书。都是技术性的，今后还用得着，应当发还吧。

黔书记说：我们查一下，是你的都会还给你。

我接着说：第二、党中央有关平反冤假错案的文件中说明：在什么范围内搞错的，在什么范围内平反。我被捕的时候，兴师动众开大会公开宣扬我是反革命。平反了也应该开个大会，当众宣布是错案吧。

第三、文革伊始中央即颁布有关文件规定，在运动中，除了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理外，其他问题一律不整。**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的后期酌情处理。**消防机械厂的当权派当时出于什么动机和目的拒不执行中央政策，运动初期即将我逮捕入狱，大肆制造恐怖气氛，制造冤假错案呢？即使不追究他的法律责任，也应该让他站出来亮个相，承认个错误吧！

他们无言以对。

我继续说：第四、现已查明我之所以坐牢是冤假错案，按政策有什么补偿呢？

他说：你在长江电工厂的右派改正通知书上，签过“别无它求”吧？

我说：是的，我说话，签字都是算数的。别无它求是指超过政策规定以外的要求。毛主席说过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拨乱反正也有政策吧。文革十年浩劫，冤狱成千累万。经济面临崩溃，国家困难重重。就我个人而言。从二十岁到四十三岁皆因冤假错案的迫害而劳教、劳改，至今孑然一身，事业无成。房无一间，钱无半串。我没有更多的额外要求，只要求真正的拨乱反正。

此时，管教干事拿出一份中央文件，放在桌上翻开来并用一张纸遮住了上半页，只露出了“以外，经济补偿问题慎重从严掌握……”我看了一眼，想了大约两分钟说道：这是中共中央1979年5月颁布的四十七号文件吧？你不用捂着盖着的，我看过这个文件。他说：这是发给地师级的文件，谁拿给你看是犯错误的。我说：我向他转告你的提醒，让他今后不再犯同样的错误，但

四十七号文件没错吧。其实，这个文件不是军事秘密，虽然发送到地师级却没有有限定只有地师级以上的人才能看。我接着又说了一句，你也不是地师级，我也不是地师级，你这不是拿给我看了么。凡涉及落实政策的具体规定，当事人都要看的。四十七号文件明白地写着，属于全民所有制的员工平反后补发工资，属于集体所有制的适当补助，无就业单位生活困难的酌情救济（时间已久记忆不准，大意如此）。他说：就业人员不是全民所有制的职工，只能按集体所有制对待。经领导研究给你500元补助是最高额度了（当时可以买4000斤大米）。

我说：消防机械厂是四川省劳改局所属企业。劳改局是政府机关，不是集体所有。集体所有制团体能办劳改企业吗？我只要求认真执行拨乱反正的各项政策。

黔书记发话了，他说：我很希望妥善地解决所有遗留问题。我把你提的要求向劳改局汇报。过两天再回答你。

我看再谈也无济于事，随之悻悻地走出了办公室。进了技术科（逮捕前我所在单位）我一进门，引起了屋里人员的注目，但我认识一个人余华年，其余全换了新人。我走到余华年的座位前和他寒暄起来，我拿出了平反通知书，全办公室的6、7个人围拢来看了一阵，我和余华年坐在一起小声地谈了谈这十几年的大体经过，问了他成都的变化，他告诉我“你走了以后。两个书架没有及时查封，处在无人管理状态，后来厂里有了图书馆，合并到一块儿去了。你的那些书……”

（2）吴钧涛的点拨

吴钧涛受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之托在苗溪茶场宣布对我平反的决定时，曾叮嘱我回成都后到西城区法院来一趟。想必是有话要说，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一位通情达理的长者，所以回成都的第三天我就赶到西城区法院拜会他，在一间大约三十平米的办公室内找到了他，房间内有六张办公桌，都有人在座，我俩在靠墙的长木椅上坐定，他先开口，问我近况如何，我说：已接到通知，让我到达州地委组织部报到，据说安排在邻水县农机厂。他说：长江电工厂不是曾表示让你回去吗？我说：改正结论上是这样写的，但最近没有联系，突然通知我到达州报到，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前天回的成都，消防厂表示如果我愿意回来的话可以安排工作，可以解决成都户口。我没有明确表态。吴钧涛说：目前最重要的是落实工作单位，其他善后问题都是次要的，也不是两三天就可以解决的。你在邻水县有亲属吗？我说：没有，我从没去过邻水县。他说：你到邻水县农机厂，人生地疏，单身一人，许多问题不好解决，还是回长江厂好。国营大厂，老领导，老同事对你比较了解。我和长江厂落实政策办公室杨主任交谈中得知厂里多数老同事对你的印象不错，评价还比较高。我建议你首选回长江厂。随之，他告诉我他是四川大学法学系1952年毕业的，1957年也被划为右派，改正后才回到法院，以后要依法治国，独立审判就好了。出于不影响他的工作，我匆匆告辞。

（3）走访四川省劳改局

在消防机械厂等了几天，毫无音信。于是某日下午两点多钟到滨江路一号四川省劳改局探听消息。门口有个接待室，大约20平方米，里面簇拥着十二三个人，显得很热闹。只见屋子当中站着一个二十四五岁的年轻人，时而双手叉腰，时而双手交叉在胸前，气势汹汹的似乎是在训话，靠门口方向的十几位，衣衫褴褛，面带菜色，大多五十岁左右，一副卑躬屈节的样子，看来是

从劳改队出来上访的。我进得门来跨前一步，不声不响地站在一旁。看了半个多小时，都是平反后的遗留问题或善后问题，譬如家属户口无法随迁、本人原所在单位已经撤销、生活无着、经济补偿问题等等。问题难免五花八门，回答却是千篇一律。都是让上访人员找所在劳改队解决，他说，劳改队解决不了的自然会报告劳改局，局领导会仔细研究。劳改局不管鸡毛蒜皮的事，只管政策的原则问题。他看我在旁边站了半天没开腔，伸出一个手指头指着我问：你什么事？我和颜悦色地回答：1957 年我被错划为右派分子送劳动教养，1961 年摘掉右派帽子解除劳教，在成都消防机械厂就业，文革初期被成都市中级法院以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1979 年原单位确认右派系错划予以改正，法院宣告原判认定的反革命罪行不能成立，当庭宣布无罪释放。我回消防机械厂解决善后问题，要求按照中共中央宣布的 79 年第 47 号文件落实政策。他们说我不是职工，只能按就业人员对待。我认为他们的说法是错误的。请劳改局依照党的政策复查确定。他说：你本身就是就业人员，历史上曾经是右派分子嘛，消防厂没说错。我说：那是被歪曲了的历史，我不承认。他提高了声音说：你不承认是你的问题。历史上总是右派分子嘛，解除劳教在消防厂就业，就是就业人员，总有这一段历史吧。我也提高了声音说：那段历史是被颠倒了，是错误的。党中央说的拨乱反正，就是要把被颠倒了的历史颠倒过来，重新恢复历史的真实面貌。我的实际身份一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军工企业的技术人员。随后高声说，所谓右派分子、就业人员、反革命分子等都是强加的不实之词，是颠倒黑白。为什么改正和平反以后还这样称呼和对待呢？我以右派之罪名劳教，又以反革命之罪名劳改，复查证明这两个罪名都是没有根据的捏造，应该从历史中彻底抹去。为什么平反以后连个职工都不能算，只能按就业人员对待呢？他指着我的鼻子说：你小声点！我也指着他的鼻子说：响鼓不用重锤，你这个破鼓非重锤不响，我进来看了半天。你一副了不得的样子，一直在训斥人，我们来劳改局上访是为了解决问题，不是无理取闹，更不是来挨训的。我知道你解决不了问题，你顶多是个科员，工资不到 50 块钱吧，可以告诉你，我二十多年前的工资就是 69 元，比你至少高三级。你不要以为在劳改局就不得了。应该把来访人员反映的问题记下来，提供给领导研究。我们不是要求立马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只希望按照中央政策拨乱反正。如果提的不对或要求过高，可以批评、解释。而不是像你这样拒之于门外。你看看这几位上访的人，跟你爸爸的年龄差不多，你在这儿双手叉腰，趾高气扬的要什么威风，你在家跟你爸爸说话就是这个态度吗？领导派你接待来访，不是让你过官瘾，训斥人的。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有损政府形象。简直是浪费时间，我没闲工夫在这儿跟你瞎扯，你可以把我提的问题记下来。我住在消防厂，有事可以找我。说着转身出了接待室。随着六七个人跟出来，互不相识，只简单地寒暄了几句，他们说：你今天帮我们出了气。我说：咱们要了解相关政策，不提过高要求，也不低声下气，有理有利有节，还要有耐心。说罢匆匆离去。

（4）转载：曲啸之流的卑劣表演（转载时略有删节）

原载：阿波罗新闻网 2012-08-26 讯 作者：阎润涛

曲啸在美国演讲遭遇毁灭性提问，心理崩溃！

曲啸是中国 1949 年以来的三大演说家之一（当时的排名顺序是：曲啸，李燕杰，彭清一）。但曲啸属于“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以至于早一点来美的留

学生不知道曲啸何许人也。当时留学生能否按时回国，是政府担心的大事，便考虑曲啸先生来美国给大家做思想工作，提高大家的爱国热情。完成学业后都回国工作。

曲啸由国务院刘中海先生陪同来到美国给留学生做巡回演讲。但出乎他本人所料，在美国第一站就发生了令他不得不中断演讲计划的场面。这个事件导致了曲啸教授立刻心理崩溃。曲啸教授回国后也没有休养过来，不久就大脑出了毛病。几年后半身不遂，躺在床上达十好几年，直到去世。国内几乎没有人知道曲啸到底为何突然间大脑出了毛病。而阎润涛本人亲自经历了这个事件，有必要交代一下，虽然有点迟。

（一）曲啸求我讲故事

“老阎吗，我今天求你一件事，而且很急。你今晚在家吗？”这是我们学校“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会长在跟我通电话。他说：今天有客人来，是大使馆教育处刚给他打来的电话，说国务院派来到美国到各大学巡回演讲的二位，因为吃不惯西餐，提出要求到同学家里吃饭。他问大使馆教育处的领导这二位想吃哪类中国饭，二位说当然水饺最好了，其它也行。只要是中国饭就可以了。另外，二位提出招待的人最好是性格开朗的、好客的，千万别是书呆子类型的，这样，大家可以边吃边聊。

这位会长想了想，认为阎润涛符合这几个条件，他就打电话跟我商量这个事。我说，不论是谁，更不管他的观点，党派，只要喜欢吃我做的饭，我就高兴。所以，热烈欢迎。但需要告诉我时间，会长说下午3点半到机场，估计4点多一点就可到我家一起包饺子了。

4点刚过，会长便带领二位看上去非常精明的仪表堂堂的风度翩翩的穿着西装戴着领带蹬着皮鞋拿着文件包的领导模样的年龄属于中年晚期的国务院赴美演讲团团员到了我家。会长说他有急事不能作陪，便离开了。

我的任务是包饺子，就立刻忙着包了起来，还问了一下他们二位是否也愿意一起动手，边干活边聊天。至于他们姓甚名谁，什么职位，对我无关痛痒，也就没问及，只要饭后他们喜欢我的水饺就够了。

倒是二位觉得应该来个介绍，然后再包饺子。所以，其中一位就说：“会长告诉了我们您的名字是阎润涛，在读博士研究生，因为您这名字比较不常见，我们就记住了。我们也介绍一下吧。我叫刘中海，在国务院工作。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曲啸教授，是心理学教授也是法学院教授，著名的演说家，还出版了犯罪心理学专著。这次国务院派我来，主要是陪同曲教授来美国给中国留学生们做巡回演讲，我只是陪同，做个伴而已。曲教授是中央宣传部调研员。你们出来的早，没听说过他的大名，但在国内，他和李燕杰齐名，是青年人的良师益友。”

刘中海先生滔滔不绝地介绍了曲啸教授的名气，但我还是满头露水，不明白一个法学院教授怎么会全国出名，刘中海介绍的比我现在能回忆出来的还多很多，印象中他说曲啸是中国政法学院的副教授，这个副字在前，我敢保证我不会记错。因为我当时想：一个副的，怎么那么出名？还到美国来做巡回演讲？我在国内，别说研究生了，就是上大学时就有两个一级教授非常喜欢我，那时的一级教授全国也不过百人，可他们也没有成为什么全国人民的良师益友。他一个副教授怎么这么厉害啊？当然，要是看气质，曲啸教授身材魁梧，模样酷似将军胜过学者，一米八的个头，玉树临风，典型东北汉子形象。而刘中海先生的言谈举止跟周总理还真有那么一点像，是不是近朱

者赤，我就知道了。

曲啸终于听完了刘中海的介绍，然后他也介绍了刘中海，说刘中海同志可是周恩来总理的秘书，工作经验丰富。

我借助这个机会，便想听听刘中海这位周总理的秘书讲讲周总理在日常生活中的小故事。而这些故事是在银幕上报纸上看不到的，就是属于名人轶事一类。透过这些跟凡人打交道的小事，才能窥测到伟人的另一面。刘中海还没开口，曲啸就跟我说：“我们来到美国可是不容易的，国家外汇很少，拿出来让我俩到美国，我们就要尽最大可能了解美国才对。所以，还是你讲给我们你们在美国看到的听到的故事，这样我们才有收获。”

看到刘中海也认同般地点头，我说：“您是法学院教授，那我就讲两个最近发生的案件吧。一个是我们这所大学的校长被法院判决败诉的案子，另一个是北卡州州长败诉给了一个混子的案子。”

曲啸立刻追问：“两个案子的最后结局是怎样呢？”我告诉他：“结局都是一样的，就是赔偿损失后辞职。”曲啸愣了一下，然后说很想知道细节。我就把我们大学校长因为开除了橄榄球教练而吃了官司的案子大概说了几句。本来都认为那次比赛一定能赢的，结果那个教练心理压力太大导致胡乱指挥，结果输得很惨。校长做出了开除其任职的决定。因为这个教练的合同期还差两年，所以他就拿着校长的开除信找律师告状了。法院当然判决校长败诉，因为合同上没有必须赢球的前提啊。结果，校方赔偿教练100万美元。

曲啸毕竟是学法律的，也是心理学教授，他立刻发现这个案子不合逻辑，因为校长不会明知故犯啊。我告诉他：“您说得对，但校长有他的算盘。他的名声非常好，深受教职员工和学生的好评。大家都看了那场球赛，他认为把教练开除，是符合民意的，为大家出气。大不了法院判给那个教练一笔钱，他滚蛋了，那笔钱也就是小事一桩了，因为捐款的人不缺。可万没想到，法院判决赔偿100万美元后，判决书上标明校方不能开除该教练！这下可就麻烦了，本来校友们决定捐款这笔钱的，可知道赔了钱后还是不能开除那个笨蛋，那不等于赔了夫人又折兵了？校长也太无能了，比那个笨蛋教练还笨啊。忍两年，那个教练不就完了吗，这么干还是要等两年。这样就没人捐款了，这100万美元就找不到出处，校理事会开会决定换校长。”

曲啸教授立刻给出评论：“从这个事件可看出中美两国的文化心理差异。中国人比较讲究案子是否公平。可美国人更崇拜强者。校长败诉了，反而得不到大家的同情。典型的成者王侯。”从曲啸教授的评论中我发现他是个非常精明之人，喜欢总结规律的人。

曲啸说还想听下一个案子。我就把北卡州发生的大案讲了几句。就是有一个河，河边上本来有个牌子上书《禁止游泳》。可那个牌子被人拔走了，一个无赖无所事事没有工作，就到河里游泳，脚被扎破了，他不看医生，直到脚子烂了，才告到法庭。因为他每一步都有照片，照片上有日期，算是证据确凿，法院判决州政府败诉，没及时检查牌子，赔偿那个无赖120万美元。

曲啸一听愣了很久，他说：“那州长就不上诉？就查不出那个牌子就是那个无赖拔走的？”我告诉他：“州长当然上诉了，但市中级法院维持县法院的判决。他上诉到高级法院，就是州法院，州法院也是维持原判。他就没辙了。另外，即使那个牌子是那个无赖拔走的，也不能免除州政府没有及时发现这一条。”

曲啸一言不发，苦苦思索。过了一段时间，他告诉我：“阎同学，你今天

给我上了一堂司法独立的法律课。虽然法院判决太过分，但这个司法独立对政府的约束力太大了。”

刘中海先生听着有点不大乐意，觉得这不符合党的原则。他虽然没有立刻表达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但他几次欲言又止。他在猜测我们这些留学生在这样的大染缸里泡几年，回国一旦掌握权力，就有和平演变的必然。他在思索着这个道理。当我提议让他讲点周总理的故事时，他似乎脑子没有空间思考往事，继续眯着眼睛思索，没有答复我的问话，可能他根本就没听进去我说什么。诚然，刘中海先生包饺子的速度还是可以的。水饺包完了，我在厨房煮，他们在外客厅的沙发上悄悄谈论着什么。吃饭的时候，刘中海先生就问我一些有关留学生奖学金的数目和开销，访问学者们的生活情况。我便一一作答。

吃完了水饺，在刘中海先生去厕所的空间，曲啸教授悄悄跟我谈：“阎同学，我这次来其实压力很大的。我回去后必须给我的听众们一个交代。但我这么到处演讲，对美国也就是走马观花。你能不能帮我个忙？”我一听立刻明白了，便告诉他绝对没问题。他说：“那太好了，散会后你到我们的旅馆，我们俩谈谈。你把你看到的，听到的，美国哪些方面不如中国的例子告诉我一些。我来的时候有个想法，就是说美国的物质生活比较发达，但精神生活不如中国。但我没有例子啊。你给我讲点这方面的例子。你看行不？”

“绝对没问题。你要听多少美国不如中国的例子？”

“越多越好啊，要是很多，那就救了我的命了。”

“那这样好不，反正今天是周六，明天是周日，闲着也是闲着，咱俩就来个通宵。我保证给你讲一夜，而故事没有重复的。”

“真的？那太好了。我还担心找不到同学帮我这个忙呢。不是说不想帮，而是大家找不到例子。咱俩还真是有缘，什么是无话不谈的朋友，这就是了。”

“你一夜不睡身体顶得住？”

“哈哈，阎同学，论身体我可是不会败给你的。我啥毛病都没有，当真是健壮如牛啊。咱就来个通宵达旦，只要你给我讲我就听。不过，咱俩可是说好了，讲的内容必须是美国哪些地方不如中国。”

“一言为定！”

看看表还有时间，曲啸教授就让我先讲一点美国哪些地方不如中国。我就慢慢地谈了起来。比如，美国虽然没有世袭制度，但个别家族还是代代为官的，比如肯尼迪家族。而中国早就结束了世袭制，毛岸英即使活下来也不会把江山交给他的。我敢肯定，未来的江山决不会交给高干子弟的。这一点，你回国后可以大胆宣传美国腐朽的变相的世袭制。此时刘中海先生从厕所里出来了也参加了我们的讨论。刘中海先生说：“周总理多次讲过，我们的政权永远是工农大众的。”曲啸教授立刻让我接着讲。我说，美国虽然科学发达，可还是有矿工到地下挖煤的，你看，去年就发生了矿难，有两人被埋在里边，政府出动了力所能及的力量，连夜打洞，挖出来的俩矿工还是死了。这在中国不会发生的！过去没有过矿难的报道，现在没有矿难，将来也不会有的。曲啸教授说这个很重要，可以告诉国内。刘中海先生说：“周总理一直要求安全第一，所以不会有矿难发生。资本主义国家就是追逐利润，怎么会管矿工死活？”曲啸教授很高兴说他回国后要讲这一点。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永远都不会有像美国这样不顾矿工死活的矿难（笔者注：万吨煤的矿工死亡率中国长期居世界第一）。然后他让我继续讲。我告诉他俩最近报纸上登载了一个

案子，是一个保姆遭到了雇主的性侵犯。这种事，在我党领导下根本不需要法院解决，党组织就彻底解决了。把保姆当成第二个老婆，就是变相多妻制，这在我党领导下是不可想象的，这种糜烂现象将来也不会发生。曲啸教授点头赞同，对我对未来的预测非常认同。看看表，时间到了，我们就开车去听曲啸的演讲了。

（二）曲啸心理崩溃的前前后后

我开车把二位拉到会议室，令曲啸教授心理崩溃的事件就开始了。联谊会会长通知大家去听国内来的曲啸教授演讲，但几百人的留学生中只有二三十个人去听了。原因有两个：一个是曲啸在国内很红，但来到海外的人没几个知道他是何许人也。另一原因是大家都厌烦了几十年的政治说教，对爱国教育的说教不怎么感冒。但有两位“爱国华侨”教授参加了。这两位教授是从台湾到美国留学并留下来当教授的，由于他俩恨透了蒋介石的国民党，也就非常热爱共产党。这样，他们俩不参加台湾的联谊会，而专门参加大陆（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来的学生学者联谊会。由于他们俩的热情，其中一人便成了联谊会的顾问，仿照当时邓小平给胡耀邦当顾问的头衔办理的。也就是说，不论谁被选为会长，他都是深受大家尊重的长者和领导。他的名字就是大名鼎鼎的近代历史学家汪荣祖教授。

事就出在了汪荣祖教授的幡然醒悟。

虽然大家从刘中海先生的开场白里知道了曲啸教授的名字在国内已响彻云霄，但一开始也觉得刘中海先生在讲大话空话，一个大学副教授怎么可能成为全国人民妇孺皆知的人物？估计有点忽悠。

曲啸教授的演讲非常精彩，第一句话就说：“当年我也有跟你们一样出国留学的机会，虽然那时只能是去苏联。可是，我却被打成右派，还进了监狱。”紧接着曲啸讲了他在监狱里受的各种磨难，听到这里，大家立刻聚精会神地倾听他的遭遇。曲啸先生绝对有演讲天赋，那声音时而抑，时而扬，时而顿，时而挫，时而高亢，时而柔和，时而激愤，时而婉约，时而高山流水，时而天地含悲。

比如当他讲到当时如果他有200块钱，他就可以给他心爱的女人治病，他的女人就不会离他而去的时候，演讲进入了高潮。高潮一过，他又开始讲一些小事。突然间，又有了更令听者心理震颤的故事，就是在劳改农场里一位当地女孩给他送大饼，他后来就娶了那女孩当老婆，也就是他演讲时依然在任上的妻子。

他爸爸让苏军卡车压死了，非但没有给一分钱赔偿，反而把他定为反革命，因为他爸爸被苏军卡车压死了，猜测他心里必然恨苏联，反苏就是反党，就是反革命，坐牢22年。

曲啸的演讲由于是亲身经历，又经过了无数次演讲锻炼早已熟记于心，几乎找不到哪怕一点点破绽和前后逻辑不符的地方，甚至连一句病句都很难找到。

对于经历过三年大饥荒、文革动乱的我们大多数人来说，他的故事虽然震颤，但毕竟他没有我们当年亲自看到的被活活打死的地富反坏右那么悲惨，我们听起来也就是赞叹他的演讲能力，对得起他那法学家兼心理学家的头衔。

坐在我旁边的汪荣祖教授受不了了，他几次想打断曲啸教授的演讲而提问题，可是当时不是在教室演讲，是一个小屋子，汪荣祖教授在曲啸教授的右边靠后，他没看到汪荣祖教授举手提问。汪教授也就不再提问了，也许他

要问的问题曲啸教授在他后面的演讲里很快就逐一给出答案了。

当我们听到故事的最后，那就是他被胡耀邦平反一切冤假错案而得到昭雪了，我们以为他的演讲也就结束了，突然间，但听曲啸教授一个“但是，”才知道他的演讲还没完。他后面的演讲应该不算是演讲了，而是对年轻人的教育了。“党就是妈妈，妈妈打错了孩子，孩子是不会也不应该记仇的！”听到他这句话，大家沉思着。也就明白了曲啸教授来美国巡回演讲的目的了。这也是他开始演讲时我本能地预料到他最后要说的话。我看了一眼刘中海先生，他此时的眼睛仔仔细细观看留学生们的表情。本来会议到这里也就该结束了。可突然间，汪荣祖教授说他要发言。大家对汪教授要说什么早就知道了，反正每次大家开会他都发言，告诉大家国民党蒋介石是何等独裁何等残忍。对他的发言大家也没有啥反感，早已习惯了，再说了，只要大家有难处的时候，他会尽力帮忙的。

汪荣祖教授脸色通红，跟过去判若两人。他非常震惊的内心世界在他的发言中表达得淋漓尽致。他说：“我过去只知道蒋介石国民党是如何独裁，如何玩政治，不诚实，专门欺骗台湾人说共产党是多么独裁，多么血腥，多么残酷地对待不同政见者。对国民党的宣传我从来都反着读，绝不相信国民党的骗子把戏，而真心相信大陆共产党的报纸，因为那些报道都是跟国民党的说法相反的。可是今天，曲啸教授的演讲，当真是血泪的控诉，句句血，声声泪！一个青年学者平白无故就坐牢22年！而这些，我在台湾时也看到过类似的报道，但报道的事件没有这么邪乎，没有这么真切，没有这么令人愤怒。”

听到这里，我看了看刘中海先生，他已坐不住了，他的脸色苍白，表情显示着后悔、吃惊、恐惧与遗憾。我忍不住去看曲啸教授，他的嘴唇在颤抖，他的腿也在颤抖，突如其来的打击如同晴天霹雳打得他晕头转向。他不知道是该坐下听，还是继续站着等待问问题的讲完后给出回答。

相比之下还是刘中海先生比较镇定自若，在汪荣祖教授停下来的一刹那，便立刻站立起来，想停止汪教授的评论。可汪教授摆手给他往下压的手势，意思是他还没有讲完。他继续着他幡然悔悟的评论：“什么党是亲娘，可如此长期地打自己的孩子，那还是亲娘吗？比后娘都残忍，还有什么资格要求被虐待的孩子忠诚于她？母亲这样对待自己的孩子，在任何文明国家都是非法的，都要受到法律的制裁的。”汪教授如此愤怒令我震惊。我震惊的不仅仅是他的愤怒，也不是他的表情，而是他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怎么可能如此无知。想来想去是他的偏见造成的。当真是：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但这也表明，汪荣祖教授的内心是真诚的，他是个想说实话的历史学家，而非为了利益不择手段的政客。

联谊会会长一看唯一的办法就是停止汪荣祖教授的继续发言，就在汪教授间歇的一刹那，他立刻站起，说二位刚下飞机，匆匆忙忙从国内来到美国，十分疲劳，明天他们还要赶路呢。会议到此结束。

按照跟曲啸教授谈好了的计划，我还是去了他们的旅馆。把二位送到旅馆后，我有心想离开，可觉得还是需要跟曲啸教授谈谈，看他还需要不需要我给他讲他想听的故事，毕竟言而有信乃做人的基本道德，便跟随着他们进了屋。刘中海先生把门插好，便看着我和曲啸。我知道他在想什么。曲啸的脸色还是苍白得像白纸，似乎眼球都不转了，在突如其来的打击下痛苦地挣扎着。

“阎同学，以你的看法，那位所谓的爱国华侨是真的痛恨国民党？而非潜伏到我们留学生内部拉拢同学，在关键时刻不惜暴露了身份？”刘中海先生警惕地探问汪荣祖先生的用意。我实话实说，告诉他汪教授绝对是可靠的历史学家，不是什么特务，他对大陆的不了解产生的误会被突如其来的真实报告给打醒了。

刘中海先生点头认同了我的看法，然后他说：“我认为曲啸先生的巡回演讲不能继续下去了。这个后果是没有预料到的，但是在情理之中的。我刚才在车里想，即使在国内也未必没有人跟汪荣祖的观点一致，只是没人说出来而已。所以，曲啸教授的演讲如同一把双刃剑，到底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实难预料。你认为呢？”曲啸看着刘中海一句话也没说，没有回答他的问题。我看得出来曲啸教授内心的痛苦已到了极点。这表明他的演讲生涯结束了。刘中海先生回去后一定会向上级如实汇报在美国发生了什么，因为终止曲啸的巡回演讲他需要跟大使馆教育处商量的。曲啸教授明白他的利用价值已没有了。对这一点，曲啸教授刘中海先生和我三人当时的想法应该是一致的。

我知道曲啸教授此时再也没有必要让我给他讲一夜美国哪里不如中国的故事了，便想跟他们告辞，毕竟下一步他们该如何不是我应该参与的。别把自己太不当外人。“你们好好休息，我回去了。如果有需要我帮忙的地方，立刻打电话给我。”我便把电话号码写在桌子上电话旁边的小本子上。刘中海先生问我：“你知道在美国可以更改机票吗？”我便问他更改机票是退票还是更改日期，他说可能要终止巡回演讲，就得把定好去各地的机票退掉。我不知道详情，便提议这个事最好跟大使馆有关人员联系。我便告诉他如何从旅馆里往外打长途，然后我就离开了。跟曲啸教授握手道别时，他还在苦苦思索。

我回家的路上开始担心起曲啸教授来了。按理说他是经历过监牢炼狱的磨练的，应该经得起任何打击的，但文革开始时我们县的县长焦旭臣的例子在我眼前晃动。焦县长可是经历过战争的人，是在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军人，可文革一挨斗就自杀了。

人，包括焦旭臣甚至很多将军，为何在战争中屡屡受伤竟然挺了过来，而经不起文革挨斗而自杀呢？其实，懂得“温水煮青蛙”的道理就不难理解了。在战争年代或监狱里，他们是一步步走的，慢慢就有了面对死亡的思想准备了。人，不论是谁，包括死人堆里出来的和炼狱里出来的，都无法战胜没有思想准备的突如其来的打击。

曲啸回国后基本上不再参加活动了，不久就大脑里得了病，1991年到南通演讲，病倒在演讲台，从此半身不遂，随后失去了说话能力。

我当时担心曲啸教授的心理崩溃会导致精神崩溃而使身体垮掉是有道理的，他那极端心理崩溃的眼神在苍白的脸上折射着死人般的昏暗，令你感到寒冷和哀凉。那已不是失望，那是绝望。想必他在来美前已计划好了回去后大展宏图，继续红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然后便是中央委员……曲啸教授可没这么说。但他在汪荣祖教授没发言前的兴高采烈和我给他介绍“美国哪里不如中国”故事的期待，可以看出他在此次赴美巡回演讲是何等志在必得。

（三）后记

希望大家转贴这篇短文，故事里的主人公只有曲啸教授不在世了，而刘中海先生和汪荣祖教授都在世。希望他们能看到此文，尤其是刘中海先生，我离开旅馆后曲啸教授是如何度过那段时光的？彻夜未眠？你们二人是立刻

回国了？还是在美国旅游了一段时间散散心？曲啸教授在美国是否已由心理崩溃转成精神崩溃了？还是回国后经历了被冷落的打击才大脑出了毛病？希望刘中海先生能补充一下后面的故事，因为大家都不知道曲啸教授那么健康突然就大脑出了毛病，最后导致半身不遂。毕竟曲啸教授成了那一代知识分子的一个代表，他早期的经历已由多次演说详细介绍了，后边的故事我只能写这么多，剩下的由刘中海先生补充，便是对当年“全国青年人的良师益友”、“共和国三大演说家之一”曲啸教授的崇拜者们的一个交代，也解答了他们对“曲啸热”突然冷却下来后的历史疑问。

我跟曲啸教授只有几个小时的接触，只知道他是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区人，1953年东北师范大学教育系，1957年在大学即将毕业的时候，被打成了“右派”。头顶这个沉重的“冠冕”，他到辽宁新民师范学校当了一名教师，但更大的厄运等待着他，不久他被开除公职并送劳动教养。1965年，被遣送回辽宁成为一名小学教师时，他已在嫩江草原当了4年的牧马工，“文革”开始后，他再次被揪出来，成了所谓“现行反革命”。1968年，被判20年有期徒刑。1979年，曲啸被无罪释放，他的历史冤案平反之后，重新登上高等院校及社会的讲坛，以《心底无私天地宽》、《人生的价值》、《信念的力量》等数十个专题，在国内外作过2000多场演讲报告，在全社会引起强烈的反响和广泛的关注，成为中国当代知名度最高的演讲家之一。

1982年，他被任命为辽宁省营口市教育学院副院长。这之后走上演讲台，结合自身的遭遇讲理想、人生和爱国主义。

1985年，他从辽宁调往北京，成了中共中宣部局级调研员。2003年8月6日曲啸去世。

(5) “改正”了什么？

当我执笔写回忆录的时候已年近耄耋，1957年承蒙“伟大光荣正确”的党给我戴上了右派帽子乃至投入监狱服苦役二十二年，1979年又承蒙“伟大光荣正确”的党给予“改正”，现已“改正”了三十余年。仔细想来，究竟改正了什么呢？

1981年6月27日至29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明确地写着：“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

毛泽东死了以后对反右进行的复查证明，99.99%的右派均系错划。也就是他们并没有进攻却遭到了无端反击，这种反击就不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了吧？

如果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还改正什么呢？所谓改正就只能是糊弄黎民、忽悠百姓的一个说辞罢了。

且看我得到了什么改正。

恢复名誉：《墨子·修身》有曰：“名不徒生，而誉不自长，功成名遂。名誉不可虚假，反之身者也。”名誉是指社会对一个人的品行、思想、道德、作用、才干等方面的社会评价。而不是当局一纸空文所能决定的。宋代的岳飞被害于风波亭，当朝免不了也要张榜公布长篇大论的罪状，民众却称赞他是精忠报国的英雄，岳武穆得以流芳百世。秦桧身为南宋宰相、烜赫一时，少不了阿谀奉承者歌功颂德，充斥着赞誉有加的溢美之词，民众却唾弃其卑

劣行为, 铸铁为像, 令其跪拜于岳王庙前, 留下的竟是遗臭万年。

恢复职务: 1956年我20岁, 职务是技术员。1979年改正时我已43岁, 尽管被划为右派期间曾长期从事技术工作, 为重庆新建机械厂设计台车式退火炉、煤气发生炉, 绘制了冲天炉全套图纸, 编定全部热处理工艺规程, 为四川磨床厂和消防机械厂组建了两个理化实验室, 自修了英、俄、日语, 在省部级刊物上发表过多篇论文和译述。回到长江电工厂还是二十余年前的技术员职称。叫做落实政策。

恢复工资: 1956年我的月工资是69元, 冤狱期间从事繁重劳动是没有工资的, 创造的剩余价值都被用来发展监狱, 以便关押更多的蒙冤受屈者, 也算是为毛泽东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建功立业了吧。1980年回到长江电工厂后工资仍是69元, 可物价却比1956年高了许多。实际购买力显然是降低了的。这也叫落实政策。

恢复青春: 这是我最需要的, 然而是无法实现的。1957年反右时我才走出校门, 幼稚无知, 以党为亲, 无忌无讳, 率性而为, 未能识破毛泽东的阴谋、阳谋, 误入罗网; 历尽牢狱之灾, 九死一生, 受尽迫害。1979年改正之时, 饱经多年冤狱的屈辱和折磨, 两鬓已经斑白, 弓腰驼背, 病态丛生。这又怎么补偿呢? 还有一件令人死不瞑目的事, 1966年5月我与同样蒙受冤狱之灾的李诗慧历经三年苦恋结婚, 不满十天即被文革风暴冲散。1973年我在狱中, 她迫于形势重新组建了家庭。1980年已经有了两个小孩, 为人之母了。我只留下了半阙残诗“蜜月十日生死恋, 冤狱八载天地暝”。二十三年过去, 年近半百, 仍孑然一身。枕孤衾寒, 欲语无处诉。又怎能弥补这终生的遗憾呢? 此恨绵绵无绝期……

认真回想, 受迫害的后果全部保存, 究竟改正了什么呢? 闹了半天, 什么也没有。只留下了残破的噩梦和迷茫的幻影。

五、重返电工长江厂

1980年3月11日上午9时回到阔别了22年的长江电工厂, 先到招待所, 接待室的服务员看我衣衫褴褛, 急着说明这里不是旅店是内部招待所, 要有介绍信才能住宿。我于是拿出了法院载明无罪释放的判决书, 她看了一会儿, 抬头又看了我一眼, 吐了吐舌头, 连忙给落实政策办公室打电话。接电话的人似乎只说了一句话就挂了机, 匆匆地跑到招待所来了。见了我的面, 流露着惊讶的表情, 她大概在想, 一个朝气蓬勃的小伙子怎么转眼就弓腰驼背了呢? 她看了看判决书, 愣了一两分钟, 随即跟招待所打了招呼, 安排一间清静点的房间, 所有费用均由落实政策办公室结算。交代好了她才自我介绍说姓蒋, 五十年代就在长江厂, 认识我。但我早就想不起来了, 看她十分客气, 细心。于是连连称谢。住下来以后, 当天下午总工程师张文达到招待所探望, 几位五十年代比较熟悉对反右过程也有所了解的老工程师也来了。第二天上午党委书记梅松、副书记赵育修来了, 并连连跟招待所打招呼, 一再对我说有什么困难尽管提, 招待所的几个服务员都觉得奇怪, 一个破衣烂衫的半老头子, 怎么这样受重视呢? 1957年, 长江电工厂打了三十几名右派和反社会主义分子, 我是第一个回来的, 风华正茂的小伙子变成了两鬓斑白的老头子, 大家来看看稀奇罢了。以后五七难友王志仁、王树良回了厂, 我们三个都是坐了二十几年牢, 仍然是单身。其余二十几位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同仁, 五七年一别再没有见过面。他们都是拉家带口的。长江厂只答应解决本人户口, 不管家属, 只有在当地就业。第三天保卫科长李春生到招待所来了, 对我说:

已经知道你被分配到达州邻水县农机厂，张总以研制新产品需要有专业特长的技术人员为理由给党委书记写了报告，要求让你回厂。我们正在和达州地委联系，目前还有点困难，需要省委组织部撤销调令重新分配。厂党委正在想办法，你最好暂时不要到达州报到，等一阵再说，并建议我回成都以后找找陈功文（他五七年时是我的学生又和我同住一间宿舍，我当时是共青团员，他是团支部书记，反右积极，五八年后调至四川省国防工办），请他帮个忙。在长江电工厂停留几天后，我即赶回成都着力于落实工作单位和争取解决平反后的遗留问题。我先到四川省国防工办，传达室连忙给陈功文打电话：陈部长，有个叫牛立华的人找你。不到三分钟他从办公室跑了下来，打量我一阵，对面露惊讶之色的传达室女孩说：这是我老师。随即走出大门，乘公交车到了他家。虽然我们在长江电工厂期间同处一室两年有余，但经历了“反右”和“文革”，他在反右运动中是受命于上司的打手，他成了四川省国防工办的党委组织部长，我则是才出监狱的阶下之囚。断绝来往二十余年，互不了解，人心叵测，我还没说话，他开口就说反右和文革都是大浩劫，可能文革期间他也受了冲击，一肚子怨气。我简略的谈了一下这二十几年的经历，然后直奔主题，谈及了省委组织部的调令。他说：你不必到邻水报到，我给省委组织部X部长打个电话，重开一个调令就是了。下周你就可以回长江厂办迁移户口。

（1）回厂初期

二十几年的冤狱终于在中共中央拨乱反正的大潮中得到化解，我对共产党是怀着感激之情的，对厂党委、保卫处、落实政策办公室等单位的工作人员千里迢迢到监狱等地认真调查，想方设法让我回厂工作。也是十分感谢的。留有小诗一首，抒发我那时的心情：**罪问莫须妄罗织，幸有青天断曲直。重挥金钺劈枷锁，更跨铁骑换征衣、踏平蜀地崎岖路，赋尽燕山壮丽诗。莫道寒霜浸两鬓，攻关跃马争先驰。**这首小时被刊载在《长江报》上，让更多的人了解我的心境，更好的鞭策我努力工作。

（2）评定技术职称

初评工程师：1980年3月从监狱回到长江电工厂。重操旧业。初期是尽快熟悉业务，一方面大量收集和阅读有关专业书籍，一方面深入生产现场，看看我坐监这二十多年技术上有何重大变化，设备上有何重大更新，还存在着哪些不足。深入观察13车间、23车间、25车间、253车间、工具车间的热处理工段等，由于时间隔得太久，人员变动很大，原来的老人有的已经逝世，有的业已退休，有的调离本厂，现在从业的同行我大多不认识，都需要一个相互了解的过程，才便于协同配合，技术人员不与工人诚心合作，是难于取得成绩的。所以回厂初期，很难得看见我在办公室，终日泡在车间里。四月中旬，上面来了文件，说是要评定技术职称。和我同年龄段的人大多是助理工程师或工程师了，我还是24年前的技术员，总工程师张文达找我谈话，要我填写职称申报表，提交相关论文。我禀告张总说：“我才放牛、种地回来，哪有什么论文哟，还是下回再评吧”他说：你原来不是挺爱写文章的吗，找两篇，拿来我看看。我只得遵命，在图书馆查阅旧期刊，找出来一篇《高频喷镀》（刊载于《金属热处理》1958年某期）一篇《对某些水溶性淬火液冷却特性的讨论》（刊载于《四川机械》1962年某期）。总算交了差。长江电工厂是1905年建立的老兵工厂，拥有评定工程师的资格，经厂职称评定委员会确定，批准我为工程师，颁发了有国务院科学技术干部局签章的“工程师证书”。

事情告一段落后，有几位四十年代大学毕业的老高工告诉我说：“你这个工程师来之不易呀，张总承受了很大的压力，有好几个人向张总反映，‘牛立华才出监狱就评工程师究竟有什么水平？’张总拿出你五十年代写的论文，把他们挡了回去。你可要好好工作，不蒸包子争口气呀。我仔细想了想，回厂以来看到的技术人员之间大多守着自己的专业，各搞一摊，貌合神离，见面点头哈腰，转过脸去冷若冰霜。五十年代初期那种同舟共济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复存矣。反右、文革的余毒仍在，不知何日方能肃清。”

（3）职工大学任教

1956年，我进厂不久，全厂一万多人，大多相互关照，师徒之间形同父子，工友之间宛若兄弟。读书之风甚盛。厂里办得有夜校、扫盲班、初中班、中专班，下班之后一家人往往有几个要去上学。当时我在业余中专班讲授物理，学生反映较好，被评为优秀教师。及至1980年我出狱回厂，当时的学生大多成了业务骨干或者混成了中层干部。长江电工厂也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办起了七二一职工大学，夜大学和电视大学相关专业，据说是要从工人中培养工程师，学校急需热处理专业教师。职工大学校长何清玉（1964年大学本科毕业）希望我来兼职授课，我从“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礼记·学记》）这个概念出发，教书有利于促进学习，答应了何清玉。于是从1981年开始兼职授课，三个班，每周上课九个学时。当时大学高考恢复不久，编写教材者趋之若鹜，我翻阅了当时流行的一些教材，如北钢余永宁的《金属学原理》、宋维锡的《金属学》、以及大连工学院、西安交大、重庆大学、成都工学院等院校的实用教材。当时个人认为上海交大钱苗根等人编写的教材适于本科，河北农业大学王建安编著的教材适用于专科，深度适中，概念清楚，文笔流畅。由于电视大学的授课教师（清华大学的柴副教授）选用了上海大学史美堂编写的教材（此书初版错讹颇多，我草草翻阅即发现一百余处，而且有些是概念性的错误。鉴于读者意见太大，再版时不得不做了多处修订），各地职工大学争相仿效，长江电工厂职大也确定以此教材为准，我只得服从多数。电大班以电视讲授为主，我多次强调要学生注意听柴老师讲授。学生颇有微词：“柴老师是部队转业到清华的吧？”其实柴老师讲课是很认真的，大约电视授课审查者太多，录制过后还要多方审阅，当时文革遗风远未肃清，教师授课生拍说错一句话，只有照本宣科，哪里是讲授，基本是诵读，根本不能即兴发挥，因材施教，难免枯燥乏味。学生不愿意听，当然更谈不上吸收消化了。每个老师都希望学生能取得好成绩，柴老师也不例外，所以在期末复习时对重点内容多有提示，学生是听不出来的，因为他（她）们本来就不专心听课。我却额外注意，认真记录。工大和夜大由我出题，在本校考试。电大班是全国统一出题，学生到南岸区专用教室集中考试。热处理课考试头天晚上，我向校长提出，想去看看学生复习情况。何校长委派张副校长偕同前往，还专门向厂部要了一辆桑塔纳轿车。我们到达以后，学生蜂拥而上。我笑着说，我来看看临阵磨枪，效果如何？学生答曰：不快不光，心头发慌。我说：我来给你们讲几道题，帮你们把枪磨光一点，拿出笔来做好记录。学生于是聚精会神，我一一讲解，大约两个小时，把柴老师重点提示的十余道题应该如何答，仔细说了一两遍。我这次讲的不是传授知识，只是应试技巧，或者说投机取巧，作为一个教师也是无奈之举。第三天学生返回长江厂，见了我鼓掌大笑，连声说：牛老师

真会打定子（四川方言，猜题之意）。大约十余天后，何校长双手抱拳，连说“恭喜，恭喜”，我也抱拳相迎，答之“同喜，同喜”并问：“喜从何来呀？”他说：咱们学校的热处理课全市第一，最高分 96，最低分 84，没有一个不及格的。我暗自好笑。从那以后我连续在职工大学兼课九年，直到退休。给工大学生讲课，促进了我的学习，促使我更深刻地理解教材内容，巩固了我的专业基础，极大地有利于解决生产中遇到的实际问题。通过讲课认识了厂内更多的同行，无论哪个车间都有工大、电大的学生，我到车间通过和他们的交流可以了解到真实情况，更快地找到问题的症结，从而奠定了良好的工作基础。

（4）评定高级职称

时光荏苒，日月如梭。不知不觉就到了 1987 年，我从一个在深山中服役的劳改犯，成了军工企业的热处理工程师。说实话，那几年我付出的努力要比别人多一些，清晨六点披衣而起收看电视大学的英语讲座，七点在上班的路上边走边吃早餐，两个包子而已。上午大部时间在车间，下午回到办公室看书，思考。晚上下班后匆匆吃完饭到图书馆看看书报，然后回家为电大、工大、夜大学生备课，星期休息多半是上午图书馆或情报所（那几年中科院西南分院在重庆藏书比较丰富，且有许多热爱专业的科技人员，定期出版各类文摘。我因为常去，和几位都很熟悉。）下午新华书店或外文书店。整个八十年代是我技术上长进比较快的年代，是奋起直追的年代。

1980 年 6 月我参加了一次四川省兵工学会热处理专业年会，和众多同行见了个面，五十年代也曾参加过几次类似年会，我既非名牌大学又没有突出成果，理所当然地没有留下深刻印象，早被人遗忘。此次参会基本是旁听，我没有发一言，但通过认真观察和倾听，对当时兵工系统的热处理技术水平有了初步了解，可以断言，二十多年基本上是原地踏步，如果是突飞猛进的话，我在深山老林里种了十几年地就无法适应了。正因为进步不大，现在我奋起直追还赶得上。从 1981 年起，每年开会我都会带一两篇文章，或宣读或交流讨论，个人受益颇多，也给众人留下了较深的印象。其中《淬硬钢磨削损伤的实质与分析》《硅酸铝耐火纤维使用技术概述》《对盐炉快速启动法的认识和讨论》《论易切削黄铜中的铅》等四篇荣获重庆市自然科学优秀论文奖。《对枪弹底火击穿机理的讨论》《单相黄铜的晶粒度与塑性》相继刊登于《轻兵器》《四川兵工学报》等刊物上。还翻译了数十篇俄、英、日等国的技术资料，刊载于《铜加工》等国内知名期刊上。先后应邀参加了重庆金属学会，重庆有色金属学会，机械工程学会，四川兵工学会，并担任学会理事等职（纯尽义务，分文不取）。在重庆市工会主办的高级技工培训班和四川兵工学会主办的热处理技师深造班讲课。多多少少为推动重庆市热处理行业的技术进步做了一些工作。1977 年华国锋主政，声称“一年初见成效，三年大见成效”。邓小平登基后也喊过一阵子“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1987 年上级发布文件，专业技术职称中出现了“高级工程师”这个新名词，于是各地纷纷贯彻，长江电工厂为此成立了技术职称改革办公室。我也随大流，填写了一张申请表。一天，厂部小秘书跑来对我说：牛老师，你的高工申报表还压在杨主任的抽屉里，没有往上报，你去问问吧。我于是走进杨代吉的办公室说道：我的职称申报表在你这儿吧？我不打算申请了，下回再说吧，你把表

退给我行不。他笑了笑说：好好好。跟着拉开了抽屉。找出了那张只有一页的申报表，摆在桌上又看了一遍，随后拿起来，好像是要还给我。我瞥了一眼道：杨主任，你还是签个意见嘛，就说是我主动要求退回的。他想了几十秒钟说：我签了意见就只能转给职改办了，你找他们退吧。我立即应声：好的。看着他签了字。大约十分钟后我跑到三楼职改办，问蒋大姐：蒋老师，我的职称申报表来了吧？我不打算申请了，把表退给我吧。她很惊讶，随即对我说：这次申报的人虽然很多，但资历和能力都超过你的人不是很多，你是怎么想的？我看先别退，等评定完了再说吧。”我还是坚持请她退表格。她说：好吧，想转了再交回来，月底截止。我接过了那张表，回到二楼办公室仔细看了一遍。

“本人申请”一栏，我是这样写的：“我参加工作不久，即于反右斗争中身陷逆境。为摆脱烦恼，潜心自修大学课程，颇有所得。然今日看来，部分内容已属陈旧，且遗忘过半，故基础理论仍嫌不足。粉碎四人帮后，得以落实政策，回到长江电工厂。结合工作需要，着重学习专业基础，重温外语，主要从事金属材料及热处理工艺工作。对所承担任务均能较好地完成。并在厂职工大学兼授金属热处理专业课，反映良好。业余时间翻译多篇俄、日文技术资料，在省部级刊物发表。几年来撰写过一些技术论文，其中三篇获重庆市自然科学优秀论文奖。如按一般标准要求，自信可承担高级工程师应承担的技术工作。如按高标准要求，则尚有较大差距。倘名额有限，自应优先考虑水平更高的人选。”申请人 牛立华（签名） 1987年7月24日

杨代吉在“单位领导小组意见”一栏写的是：“经领导小组研究：按文件规定和厂职称办口头指示，56年以前毕业的中学毕业生，应从事实际技术工作25年，才符合申请高级技术职称的条件。牛立华同志从事实际技术工作只有19年。但该同志，属于右派错划，有个特殊情况，请厂评审委员会酌定。”负责人 杨代吉（签章） 1987年7月28日。

（笔者注：这页申报表的复印件至今我仍保存着。白纸黑字不容篡改。杨代吉将专科毕业写成中学毕业，料来不是笔误吧？从事实际技术工作只有19年也毫无根据，从1955年3月进厂截至1987年7月连续计算工龄（这是中共中央文件明确规定的）应为33年，若扣除1958-1979年劳教劳改时间（这是杨代吉等私自篡定的），则工龄就只有12年。19这个数字不知从何而来。）

我从蒋大姐处取回申报表后，复印了一份。大约过了十分钟，蒋大姐从三楼跑下来对我说：领导说不能随便把表退给本人，你还是还给我吧。我立即拿出原件还给了蒋大姐。第二天，我在工大讲课，课间休息时我对一个学生（四川兵工局局长林奇的儿子，时间太久忘记他的名字了）说：你回家时间问你父亲最近是否在重庆，我想找他反映一个问题。第二天学生跑来告诉我，林奇最近都在重庆，随时可见。翌日我赶到兵工局求见，林奇很客气，但说马上要出去开会，且职称改革的事由局党委书记吴绍澄分管，于是将我带到书记办公室。吴绍澄看了看我带去的职称申报表说：你的情况我了解，五七我在长江电工厂干部科，知道当时的反右过程，你跟吴承厚（教育科教师，共青团员）、张思起（理化室技术员，共青团员）等几个年轻人都受了委屈，我那时候才进厂，尽管同情，什么也不敢说。现在平反了，开开心心地安度晚年吧。他给我倒了一杯茶，继续说：长江厂是职称改革试点单位，

你这种情况属于特殊问题，试点单位发现后应该及时向局里汇报，局里了解后统一研究处理，这不仅仅是职称评审，而是拨乱反正落实政策的问题。中共中央文件明确规定右派改正工龄连续计算，长江厂为什么要扣除劳改时间呢？明天我到长江厂去，详细研究后再答复你。要相信党的政策。随后又问了问我的家庭情况，表示关切。我看他很忙，不时有人来找，于是匆匆道别。

大约过了一周，厂长段成远（1957年中专毕业生，四人帮倒台前长期从事内查外调等政治工作，一向是极左派。1980年后回归技术口，充任研究所所长，1985年升任厂长）找我谈话，要我给申报高级技术职称的人补习外语，以应付兵工局组织的外语统一考试，因为文件要求具有高级职称者至少精通一门外语还要熟练掌握一门外语。申报者多为五十年代末期和六十年代初期的大学毕业生，毕业时外语考试及格，但二十多年外语成了禁区，似乎学习外语就是里通外国，谁都怕担一个崇美、崇修的罪名。我的外语全是偷偷自学的，自知水平有限，所以婉言推拒。无奈段成远执意游说，我只好从命。段成远之所以找我，在于当时文件规定凡在省部级以上刊物发表译文五万字以上者，可免试外语。长江厂近两百名申报高级技术职称的人员中，只有张京晖（厂技术情报室主任，主要工作就是翻译、摘编英文技术资料，曾发表译文和综述多篇）牛立华（技术科工程师，粗通英、俄、日文笔译，发表过译文数十篇）符合免试外语的条件。我不便执意推辞，于是出现了专科生给本科生补习外语的奇闻。

第一批应试俄语者21名，上级发来一份复习提纲，取自论述金属零件无损探伤的原著，大约六万余字。我第一次试讲，先朗读，再逐句翻译。观察听众情绪时发现，木然者居多。于是改变方法，将复习提纲拆散，每人2页，要求诸位各自译成中文后，三天内交卷。在此期间我抓紧时间翻译复习提纲全文。收上卷子后，逐一阅读，只有两个人的译文差强人意，如果打分的话，顶多40分。多数人的译文读不懂，还有两个人没好意思交卷。当时众人对我还有很多怀疑，不相信、不放心（我完全理解，这很正常甚至是必然的）。于是请王大宾工程师的女儿（四川外语学院俄语专业硕士，曾随团赴苏联参与进口图-114飞机的谈判）赶译了复习提纲。我仔细阅读该译文，她的外语水平肯定高于我多少倍。但据我体会，翻译要达到“信、达、雅”，首要的是母语运用，然后是专业知识和外语水平。众人两相比较后，一致决定采用我的译文，按段落背诵，考试时只要看试题的前两个单词，回忆对应于译文的哪一个段落，把译文大意写上去，就能考个八九不离十。这不是复习外语，是投机取巧。但效果不错，21位应试者平均74分，在兵工系统算是偏高的成绩了。厂长满意，同仁欣喜。我的高级技术职称由于兵工局打了招呼，再无谗言碎语了。

职称评定期间流传着一副对联：

“早高工，晚高工，早晚全是高工。先火化，后火化。先后都要火化。”

大概就是群众的看法吧。过几年说不定又要评什么特高工呢。徒具其名，不涨薪水。叫总统都是白搭。

第十一章 饱经沧桑方不惑

（1）中共两个《历史决议》都是有悖历史的捏造。

中共党史上有两个《历史决议》。

一个是 1942 年毛泽东假借延安整风，高叫“反对主观主义”、“反对宗派主义”、“反对党八股”的口号，矛头对准留学归来的、亲莫斯科共产国际的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以纵横捭阖、阴谋阳谋的手段彻底打倒了王明，降服了博古，贬低了张闻天，驯服了周恩来；通过对丁玲、王实味等人的批判和“抢救运动”，在中国共产党内树立了毛泽东个人的绝对权威。开启了“一党专政，个人独裁”的政治局面。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高华著有《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资料翔实，论述清晰。建议读者参阅。

另一个就是邓小平从 1978 年起，历时一年零六个月，以反自由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名，树立只有邓小平能够“完全正确理解毛泽东思想”，扼杀了从四五运动、“四人帮”垮台到三中全会以来产生的自由、民主思潮的萌芽，构建邓氏独断专权的独立王国。

这两个有悖于历史的“决议”束缚了广大党员的思想，成了阻碍改革的巨大障碍。

中国要前进，面对两座大山——毛泽东和邓小平。这两座大山如果不彻底扳倒，中国要进入世界先进国家之列是断然不可能的。现在，对毛泽东的批判稍稍撕开了一丝裂隙，对邓小平的批判仍然是左遮右掩，禁律森严。当局把一个从来不讲理论、不懂理论、当然也没有理论的人，生生奉为“理论家”，扯起了一面所谓“邓小平理论”的旗子，还把它当做“指导思想”；把一个屠杀人民的刽子手奉为神灵，写进宪法，写进党章；把一个将改革开放引到邪路的人奉为“总设计师”……每一个中国人都应当深思——为什么会是这样？

现在摆在中国人面前的一切——权贵集团操控中国的命脉，贪腐横行，环境恶化，都是来源于邓小平改革路线，都是邓小平路线造成的恶果。

如果不彻底批判邓小平，清算他的罪恶，中国人民必将彻底沦为任人宰割的奴隶，中国必将被历史、被世界淘汰。

本着上述精神，我写回忆录的时候汇集了一些文章，其内容只能说明一部分问题，因为邓小平的罪恶太过严重，涉及方方面面。供大家参考。

本文辑录了部分学者在座谈《历史决议》中的发言。参加发言的人员有：郑仲兵、李洪林、徐友渔、卢跃刚、卢弘、陶世龙、张思之、阎长贵、朱正、肖冬连、孟繁华、刘家驹、林蕴晖、何方（书面发言）等人，都是中共理论界的权威人士。他们的发言揭露了《历史决议》的诞生过程和中共本色。

郑仲兵：今天邀集朋友们来评说三十年前出台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意在回顾和反思那段历史，自然是不带任何政治功利目的的纯史学意义的民间的自由的讨论，也无意针对其它机构召集的有关讨论。请大家随意发言。

本人不是这个《决议》的参与者，但当时在中宣部理论局工作，对前后一些历史情况不能不有所了解，为抛砖引玉，我想说些对《决议》的看法。

多年来，官方和一些学者的著述，都把《决议》说成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拨乱反正的产物，说它是在邓小平和胡耀邦主持下搞出来的。

其实不然。恰恰相反，它是邓小平继 1979 年 3 月 30 日在理论务虚会所作《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报告后反“自由化”的产物，是邓小平“坚持

四项基本原则”的历史版，完全是邓小平意志的使然和意志的反映，与“三中全会精神”——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相悖谬的。

1978年12月，中共召开带有历史转折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1979年1月—4月（中间休会一个月），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兼中宣部长的胡耀邦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务虚会以实践检验真理以及理论、政策、是非的标准，对中共建政30年的历史，特别是文革十年，以及毛泽东的责任和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总结。我认为这是中共历史上仅见的生动活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会。

但是，在胡乔木、邓力群等人的鼓噪下，邓小平把它看作是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泛滥，在务虚会的第二阶段做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腰斩了理论务虚会，从而也腰斩了方兴未艾的思想解放运动。与此同时，还取消了民众表达自己思想和诉求的“西单民主墙”，抓捕了魏京生、傅月华等人，取缔了从反对“四人帮”暴政而自发产生的民间组织和刊物，这一系列违背三中全会精神甚至违反宪法的言论和行为，给予正处于思想解放运动高潮的理论界和知识界的打击，更甚于“两个凡是”的社论和凡是派对真理标准讨论的压制。因此，在党内党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弹。

为此，10月下旬，邓小平提出三项动议，并在政治局常委会上做出决定：一，修改党章，把“四项基本原则”写入总纲；二，修改宪法，取消公民的“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权利；三，起草《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用他的“完整准确的毛泽东思想”，用四项基本原则，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三箭齐发，异曲同工，都是为深入反自由化。

中央文件说，《历史决议》“是在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领导下，由邓小平、胡耀邦主持进行的”。其实《历史决议》自始至终都是完全在邓小平个人掌控中进行的。而具体负责文件起草和修订工作的，也是反自由化最积极的胡乔木和邓力群。如邓力群在《十二个春秋》中说的：“起草工作由胡乔木负责。起草小组的组织、安排，同上下左右的联系、交流都由我负责”。起草小组的笔杆子主要是邓力群挑选的，有关人员有郑惠、卢志超、滕文生、郑必坚、廖盖隆、袁木、邵华泽、石仲泉、李洪林、龚育之等，前四名都是邓力群主政下的书记处研究室的干部。李洪林因曾著文评析“长官意志”与胡乔木观点相左，便不让他参预执笔。邓小平、胡乔木、邓力群形成严密的三位一体，胡耀邦根本插不上手。邓力群说：“每次稿子送到他（按：指邓小平）那里，都看、都想，都提意见。大多把胡乔木和我找去，讲他的意见。我把他的意见记下来，回来向起草小组的人传达，有的还在书记处研究室传达，每次传达后，都由卫建林帮助整理。前前后后，邓小平发表意见有十五、六次。”

据不完全统计，从1979年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做出正式决定起草《历史决议》，到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正式通过《历史决议》，中经一年零六个月。邓小平指示性的谈话有19次之多（其中直接找胡乔木和邓力群谈话有6次），再加两次和外宾的谈话，涉及《历史决议》讲话共21次。

这中间有一个重要插曲，即1980年11月10日—12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做出决定，同意华国锋辞职，由胡耀邦任中共中央主席。

1981年2月上旬，胡乔木他们搞出准备交六中全会讨论的决议稿，胡耀邦看后十分不满意（《十二个春秋》中说：“胡耀邦同志看后认为这种思路不行”）。不得已，提出由他组织人再搞出一个决议稿。邓力群即报告邓小平。

邓小平口头上表示：“好嘛，两个摊子，各搞各的嘛。”但是，当胡耀邦在一个月后，真的拿出新的决议提纲时，邓小平竟没有经过政治局或常委会讨论比较，就粗暴地把耀邦的方案否了。

经过是这样的：3月初，胡耀邦完成了《口头汇报提纲（草稿）》（铅印本）。耀邦以实践的标准对历史问题的是非曲直做出明确判断，并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基础上，提出当前的任务和今后的做法。应该说，这是对历史问题应有的比较正确、负责的态度。耀邦把题目也改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共分九个部分。

邓力群即把耀邦的方案报邓小平和在外地休息的胡乔木。胡乔木即表示不赞成。

3月7日，邓小平把邓力群找到家里，说：“胡耀邦的第二方案不考虑了。”也不说明任何理由。而表示保留前面提到的，胡耀邦十分不满意的胡乔木、邓力群搞出来的送六中全会审查的决议稿。邓小平对已任中央主席的胡耀邦采取如此轻蔑的态度，可见其跋扈和专权的地步。然而我们的一些朋友至今仍以为决议是在胡耀邦的主持下搞出来的。

本来历史已经给那些“问题”做出了结论，现在却倒过来了，“决议”要把结论强加给历史。对起草这个决议，邓小平不仅划了框框，定了调子，而且正是邓小平一连串讲话内容的集中，可以说，它不折不扣地反映了邓小平个人的意志。

首先，邓小平反复强调，“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邓小平甚至还用了三个最——“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来强调这一条。

众所周知，对于中共历史，特别是文革十年的反思的成果，第一步，也是出发点，就是认识到要打破政治以及经济、文化思想上的专制主义，这也是改革开放的出发点。其中最突出的就是领袖和国家、领袖和政党、领袖和人民的关系，这就是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中国能不能走上人类文明的共同大道，登上现代化的殿堂，关键在于能不能摆脱毛泽东的阴影。这也应当是回顾中共历史的根本出发点。从这个出发点来反思，就必须打破现代迷信对人们思想的奴役，搬掉毛泽东的神像，使这个党和全国人民一起，从毛泽东的独裁统治和毛泽东思想的奴役下面解放出来。

这个问题，在四五运动中，在真理标准讨论中，在理论务虚会中，在四千人讨论中，都有重大的认识成果。但是，邓小平坚持“一句顶一万句”，利用强权，力排众议，扼杀了这些积极进步的认识成果，坚持自己创造的“准确完整”。这样既可以把“非毛化”的责任，推给实践派——批毛者；又可以承继毛的专制主义政治道统，为自己进一步专权鸣锣开道。

在叙述和总结历史过程时，邓小平还公然用诡辩和谎言来糊弄事。

1，接受陈云谋略，增加建政前二十八年的叙述。邓小平虽说不提“路线斗争”，但事实上是按着路线斗争的思路，把二十八年的历史曲折都推给陈独秀、张国焘、王明等当年共产党的领导人的“左”或右的错误，从而神化了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和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共产党。

2，要求把1957年以前写成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完全正确无误的历史。连三大改造，都说成是“伟大成就”，并为之后“一切进步的基础”。

3，1957年以后反右运动被说成还是必要的，只是扩大化的问题。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被说成“急于求成”，“没有经验”的问题，而且为了掩盖

错误，邓小平提出先写成绩，再写错误。在此之前，连起草人胡乔木都觉得为难，他说：“唉呀，不写缺点通不过啊，造成这么大危害，不写，怎么说服党内外呢？”邓小平这么一支招，邓力群说，“稿子的全貌有了改观，总算解决了问题。”（《十二个春秋》166页）

邓小平甚至把毛泽东完全错误估计形势的《1957年夏季的形势》一文当作“完全正确”的“毛泽东思想”，要人们去继承和发扬。就是这篇文章提出：“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因此才有了残酷打击近百万知识精英的反右运动。还提出“单有1956年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于是十年之后出现了祸国殃民的文化大革命；于是出现了延续二十年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毛泽东极权独裁政治局面。

4，承认文革“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算是毛泽东的“晚年错误”。但是，邓小平还强调“毛泽东同志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而把责任都推给所谓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后来觉得不够，又加上康生、谢富治两人。《决议》给文革的定义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里竟然连毛泽东的名字都舍不得点，只含混地说是“领导者”。更严重的是，究竟是谁利用谁的问题。这个问题，阎长贵先生已作了很好的论证。

5，根据邓小平意见，决议后来还加了一个部分：“粉碎四人帮以后四年的历史。”完全是邓小平的权术，即通过起草《决议》达到一箭双雕的功效，既打击整肃了“自由化”的势力，又能逼宫——逼使华国锋下台。

华国锋被迫提出辞职是1980年12月，而在1980年9月，邓小平个人通过胡乔木将华执政四年的问题，作为专门一个部分写进决议稿，并送常委会“审阅”。

华国锋表示反对。他认为没有经过常委会讨论，不符合组织手续。他还援引毛泽东在七大的做法——七大只总结抗日战争以前的问题。华的反对显然是合情合理的。邓小平不仅没有理睬他的意见，还把稿子下发，发动四千高级干部大讨论，为华下台制造舆论。邓力群在《十二个春秋》中承认：经过四千人的大讨论，把华国锋问题写上决议，“这对于华能否继续当党的主席成为一个关键。”（171页）

不仅如此，邓力群在9月下旬，先后在科学院党委、中办和中直机关党委借谈历史决议，专门讲了华国锋问题。一次是半天，一次是三个多小时。

11月16日，政治局召开会议，批判华国锋，华国锋被迫提出辞职。12月5日，政治局会议同意华辞职。最岂有此理的是，邓小平在六中全会预备会上说：“华国锋的名字这里需要点（按：指写入《决议》），因为合乎实际。如果不点名，就没有理由变动华国锋同志的工作。”

官家媒体总是冠冕堂皇地说：《历史决议》是按民主程序、自由讨论的产物。不仅吸收了三中全会以来思想认识的成果，而且听取和吸收了各方面的意见，先有四千高级干部的讨论，最后又有几十人的讨论，几易其稿，最后才修改落实定稿。其实这都是假象。

四千人（加上中央党校1500学员，应有五千多人）大讨论，四十多位同志讨论，确实提出了很多很好的认识和意见，而且对毛泽东问题和毛泽东思

想的想法，占很大分量，但都被排斥掉了。四千人大讨论是在1980年10月份进行的，11-12月初邓力群在中央党校做题为《向陈云同志学习做经济工作》的报告中，就严厉斥责党内高级干部在讨论《历史决议》稿时“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自由化言论”。

我记得，方毅说：毛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暴君；万里说，如果有人敢对毛有不同意见，那么你就站着进去就会爬着出来。（按：大意如此）

王若水主张不写“毛泽东思想”，只写“毛泽东的思想”，这样可以包括他正确的思想和错误的思想。胡乔木就予以否定，他坚持提毛泽东晚年错误，与毛泽东思想加以区别和对立。周扬不赞成。陆定一写信建议：“要作历史问题的决议，需要把这些年来的路线斗争编一本书”，“不然，有些人将要来翻案的。”邓小平也予以否定。

许多人认为，决议的目的，是接受毛泽东错误历史的教训。就是纠毛的错，所以叫“历史问题决议”。其实，邓小平的意图与此完全相反。是要纠纠错的“错”。邓小平直言不讳地说，写决议“中心是两个问题，一个是毛泽东同志的功绩是第一位还是错误是第一位？（按：当然是前者）第二，我们三十二年，特别是文化革命前十年，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按：当然是前者）”。现在的《历史决议》，邓小平是如愿以偿了。邓小平说：“这个稿子是根据一开始就提出的三项基本要求（按：是邓小平提出的）写的。现在的稿子，是合乎三项基本要求的。”《历史决议》是以邓小平个人的意志代替十亿中国人对历史的反思。这种以一个人的思想来统一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一个人的头脑替代十亿人的头脑的作法，本身就是专制主义的。

显然，决议不是三中全会精神的产物。恰恰相反，它是与三中全会精神相悖谬的。它是阻滞人们解放思想的，哪里找得到一点实事求是的精神？不是拨乱反正，而是拨正反乱。

六中全会通过《历史决议》后，政治思想领域的形势便开始逆转。

过了一个月，1981年7月，邓小平就开始批《苦恋》，胡耀邦被迫承担涣散软弱的罪责。

1982年邓力群在邓小平纵容下，夺了中宣部的权，变思想解放部为思想压制部。不久王震也夺了党校的权，并横扫党校胡耀邦势力。

1983年，邓小平指使胡乔木、邓力群借茬儿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报告会，批判周扬、王若水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整肃《人民日报》。

同年，十二届二中全会后，邓小平发动、由邓力群出面开展了清除精神污染运动（被称为“小文革”），大批思想解放运动的先锋遭整肃或边缘化；直到1985年学潮、1986年学潮，邓小平借机整掉了胡耀邦。

这就是《历史决议》所开辟的道路。

最后，我想到李洪林先生最近说的令人振聋发聩的话：“写历史决议就是人为制造历史。为什么要造出决议？决议就是要人服从，让思想服从决议，这怎么行？”

李洪林：我是那个《决议》起草组的成员。当时我在中宣部，工作比较忙，只是起草组开会的时候去一下，具体写东西很少。1980年有人反对批“长官意志”，说“长官能没有意志吗？”我写了一篇文章《人民要公仆，不要长官》，在《人民日报》发表，批评了为“长官意志”辩护的人。胡乔木看了这个文章很不高兴，就把我找去谈话，让我再写一篇文章，强调领导的重要性。其实我批的是以长官自居的干部，并没有批领导，所以我没有再写。他很生

气，专门开了一次起草组的扩大会，请了一些理论界的名人来参加。胡乔木专门讲话批评我那篇文章，说我只强调民主，不强调集中，会助长极端民主化。他特别强调“人民也会犯错误”。但那个会开的不怎么好，他发言后，别人并没有跟着起来围攻我，我也没有痛哭流涕地检讨，但也没有起来反驳他，因为我一直对他还是尊重的，虽然不同意他的观点，也只是静静地坐在那里“洗耳恭听”，概不表态。结果这次批判会只得不了了之。批判会以后，他就不再给我分派写作任务，不过开会时起草组照样通知我，我也照样去参加。

后来开四千人大会，对决议草稿征求意见。我作为起草组成员，也参加了。当时起草组成员分别参加各组讨论，我参加人大常委这个组，彭真是组长。我还有个发言，主题是批评“宫廷政变”。我说，粉碎“四人帮”是一次宫廷政变，这是不合法的。当时“四人帮”已经是众叛亲离，打倒他们，大家当然都高兴。但是那种做法是不对的，这会给党内生活和国家政治生活造成一个很坏的榜样。所以我说这只能是最后一次，以后千万不能再这种突然袭击的手段去解决问题了（可惜这些话说了也白说，不但《历史决议》里头没有采纳，而且政变手段以后还是照用不误，两任总书记都被非法搞下台了）。

我参加《决议》起草的过程就是这样。

对于这个《决议》本身呢，刚才仲兵也讲了，我觉得他对这个决议实质的分析，可以说一针见血，的确是那么回事：不是按照三中全会已经确定的改革开放的方针往前走，而是邓小平讲了四项原则以后，要用一种决议的方式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全党。如此深刻地发掘出这个“历史决议”背后的政治动机，三十年来还没有人做过。

1945年在延安通过的那个《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把毛泽东的地位正式树立起来。1981年在北京通过的这个《历史决议》，是把已经垮掉了的毛泽东重新树立起来。因为毛泽东是中共一党专政的化身，要坚持一党专政，就必须维护毛泽东这座尊神的形象。邓小平的“四项原则”其实就是毛泽东的衣钵，这是中共的传家宝，和贾宝玉佩戴的那块“通灵宝玉”一样，是万万丢不得的。邓小平不愧是毛泽东当年亲手培植的总书记，他深深懂得：在毛泽东的威信彻底崩溃之后，在三中全会确立改革开放的方针之后，如果不赶紧祭起毛泽东留下的传家宝，摆脱了毛泽东阴影的中国人民就会进一步摆脱一党专政，走上自由民主的大道。所以他才在三中全会闭幕刚刚三个月之后，就发表了“坚持四项原则”的讲话。其实四项原则没有一点新东西，全是毛泽东的遗产，但它又是通过邓的润色，并且用邓的语言表述的。

这个决议整个起草过程，邓小平一直抓得非常紧，曾多次向起草组面授机宜。他唯一念念不忘的，就是“毛主席的旗帜不能丢”。在这个决议里，虽然不能不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却用更浓的色彩去粉饰毛泽东。所以更确切地说，第二个历史决议所呈现的“圣像”，就是邓小平在高举毛旗。“圣像”是要人们膜拜的，专制体制是要树立个人权威的。“圣像”上虽然有两位尊神，但是老的权威已经不在人间，所以真正树立起来的是新的权威。新的权威是谁？自然是高举毛旗的邓小平。这就是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庄严通过这个决议的政治需要之所在。

邓小平讲的那个“四项原则”，我也是起草组的，“四项原则”是他在理论务虚会上讲的。理论务虚会应该说是胡耀邦上任中宣部长的第一个作品，也是他在思想领域的一个杰作，确切地说是绝唱。这个会思想解放的程度，

是中共执政以来绝无仅有的一次。理论务虚会刚开始第二天，胡耀邦和胡乔木就把我找去，让我起草华国锋的讲话。因为那个会是中央召开的，所以原来的安排是华国锋以中央主席的身份在闭幕式上讲话，以表示这个会议的规格之高。当时他们就找了我一个人来起草讲话稿，没有成立起草组。胡耀邦和胡乔木都讲了讲。他们整个调子都很解放，讲的很详细，我记的也很详细。后来我一边开会，一边抽空起草讲话稿，基本都是按照他们讲的大意写的。

务虚会第一阶段开了一个月，胡耀邦的开幕词讲的非常好，大家情绪高涨。开会不久，周扬到邓小平那里去，又带回来邓对务虚会的指示：“不要设禁区，不要下禁令”。因此会议开得更加活跃。在这种解放思想的气氛下，我有一个长篇发言《领袖和人民》，主题是：“不是人民必须忠于领袖，而是领袖必须忠于人民。”通篇发言都是批毛的，同时也批评了华国锋。这个期间我已经起草好了华国锋的讲话稿，胡耀邦和胡乔木两人看了一下提了点意见。我又写出第二稿，排成大字版送上去。

不久务虚会就休会了。

没想到，这个期间“西单墙”上贴出了一张大字报，使局势突然逆转。“西单墙”是78年夏天开始的，79年1月份，魏京生贴了一张大字报：《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这个大字报本来也没有什么出色的内容，但明显是针对邓小平的。他写这个大字报的时候，西单民主墙的积极分子，包括刘青，都不赞成。刘青当时是《四五论坛》的，他们好几个人都劝魏京生，别写那个大字报，邓小平正在搞拨乱反正，你批他干嘛，转移目标嘛。但是魏京生坚持把这张大字报贴出去了。

本来邓小平是支持西单墙的，原来有些老干部反对“西单墙”，但是邓小平支持。他说，不要鸦雀无声。叶剑英也是支持的。所以“西单墙”办的很兴旺。一些人虽然不高兴，也没有办法。然而魏京生这个大字报是个转折点。1月下旬，彭真把这个大字报送给邓小平，邓小平一下子火了。结果，不但魏京生被抓起来，“西单墙”也被取消了。这个事情是胡耀邦告诉我的。魏京生被判了15年之后不久，胡耀邦把我和阮铭找去帮他搞一个文件。我们说魏京生写了一张大字报就判了15年，怎么能这么处理？太重了。胡耀邦说，我也不赞成，但这是小平定的，我也没办法，彭真拿着魏京生的大字报去找小平，把小平说服了。

促进邓小平转变态度的因素，当然不光是魏京生的大字报。不过这张大字报很像足球场上的“临门一脚”，把比分扳过来了。当时上海、四川等地纷纷给中央打电报告急，说我们这儿办不了公了，乱套了。这些告急电报都在向中央施加压力。所以，如果说魏京生贴大字报是“临门一脚”，那么社会上的乱象就是足球场上的混战。这场混战刚好使足球滚到了魏京生跟前，这才成全了他的“临门一脚”。

那个时候是中国的思想最活跃的时候，也是社会上最乱的时候。压制了几十年的矛盾，一下子松开，当然什么都要泛起了，这是难免的。那个时候有一种说法是“四过头”：“发扬民主过了头，引起了社会秩序混乱。思想解放过了头，引起了思想混乱。落实政策过了头，引起了阶级阵线的混乱。重点转移过了头，丢了纲和线。”反对三中全会路线的人，抓住这种“四过头”的说法，指责三中全会是“逆风千里”。正好在这个时候，务虚会上刮起的思想解放的旋风席卷全国，所以这个会必然成为众矢之的。

务虚会复会的时候是三月下旬。这时，事情已经完全变了。原来是华国

锋要在闭幕会上讲话，现在改成邓小平讲话。其实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讲话，都是别人起草，他们拿到会上去念，谁念都一样。但这次却不一样，因为政治风向变了。原来我给华国锋起草的稿子，已经不符合当时的政治需要。所以另外给邓小平专门成立一个新的起草组（吴江，我，滕文生，宋振庭），由胡耀邦和胡乔木带领，到邓小平家里听他的指示。

这次邓小平对我们谈话的调子，和他先前“不要设禁区，不要下禁令”的指示完全相反，是180度的大转弯。他一方面批评社会上的乱象，一方面批评党内，就是他常说的“一手硬一手软”那个意思，同时也批评了理论界。他整个谈话的基本精神就是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我当时一边听一边想，政治家转弯真快！说变就变。我还发现邓小平真是“钢铁公司”，绝对的一言堂。连胡耀邦到他面前，都不可能有二话，更不要说别人了。

记得1962年我随田家英去湖南调查的时候，毛泽东曾在武汉接见调查组。他看上去一点架子都没有，谈笑风生，大家毫无拘束。可是到了邓小平跟前，只能规规矩矩接受指示。这两个人都是扭转中国历史的领袖人物，都是说一不二的“一言堂”。邓小平是表里如一，斩钉截铁，毫不含糊。然而毛泽东这个“马克思加秦始皇”，看起来却是那样慈祥，那样平易近人！难怪田家英生前长叹：“伴君如伴虎。”毛的城府如此之深，真是深不可测！

这个新起草组从邓小平家出来之后，再就没有事了，根本就没有开过会。邓小平的讲话稿实际上是胡乔木一个人给他写的，连起草组都没有讨论过。我是一直到人民大会堂听邓小平讲话时，才知道它的全文。

邓小平白天刚刚做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来京参加务虚会的各省宣传部长马上连夜把这个“新精神”传回本省，于是全国的风向立刻变了。我在河北呆过，听河北的朋友讲，省委闻风而动，人民公社刚发还给社员的自留地，又收回了。

如果用左右摇摆来形容中国政局的话，就是“左易右难”。往右摆，得费九牛二虎之力；往左摆，如顺水推舟。就跟弹簧门一样，总是向着左边，你要往右拉开一点很费劲，可是你一撒手，它马上就弹回去了。其实“左比右好”已经是中国共产党的传统。左是“正路”，“宁左勿右”就是党性强。“四人帮”往左边跑得太远了，搞的太厉害了，所以叫“极左”。因此才要“拨乱反正”。什么是“正”？左就是“正”。就是这么个局面。邓小平的讲话，中央根本没有讨论过，他个人拿出来就讲，却比中央正式通过的三中全会决议更有权威。一篇个人讲话没有经过中央讨论做出决议，自然没有法定效力，然而却能风行全国，可见党内左的传统是多么深厚，可以说已经成为这个党领导骨干的本能。

文革中有一句“表忠心”的流行语：“把毛泽东思想融化到血液里”。在毛泽东领导下成长起来的这些高干确实达到了这个境界，“党性”特别强，听到风就是雨。三中全会刚刚使中国进入温暖的春天，“四项基本原则”掀起的反右风暴就横扫中国大陆，政治形势很快就逆转了。

第二个《历史决议》我认真看过，还参加了中央组织的传达组到河北省传达过。我分到沧州地区，在全地区三级干部大会上讲了两遍。第一次讲中央人事更动，集中说明胡耀邦对中国历史转折的伟大贡献，当选党的主席是众望所归。第二次针对与会者强烈反映的左倾流毒，着重讲解三中全会路线，支持大家解放思想，批评了农村的左倾回潮风。但我没有传达邓小平反复强调的“毛主席的旗帜不能丢”。

邓小平的“宜粗不宜细”就是为了文过饰非而掩盖历史。写历史要有“史德”，中国的史学传统是秉笔直书。“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都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正气，是我们中国史学最可贵的传统。历史无非是写真实，按照事实老老实实写出来就是了，做什么“决议”呢？决议是政治性的东西，要大家都来服从。对历史作个决议，这本身就是按照某种政治需要来改写历史，粉饰历史，抹杀历史，或者凭空捏造历史。所以，不论第一个《历史决议》还是第二个《历史决议》，都是为当时领导者的政治需要服务的。当初我参加起草组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经过三十年的风风雨雨，现在才明白过来。

徐友渔：我也谈点看法，就是大家集中谈论的决议的内容。讨论和形成决议的过程，正是争论、提倡思想解放的那段时间，上上下下各种人思想都很活跃。那时候我正在北京读研究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哲学系。按道理党内上层讨论决议，跟一个小研究生根本没有关系，但我们那时候有个特殊的渠道，对于决议讨论过程的情况有一定了解。社科院哲学所在当时是非常活跃的，不只是一般的研究学术的机构，更像是与意识形态有关的地方。哲学所所长是个从军队调来的军级干部，叫孙耕夫，据说文革中吃了不少苦头，副所长是在真理标准讨论中介入比较深的邢贲思。他们可能没有参加起草这个决议，但非常深地卷入了对决议讨论的过程，他们又是哲学所带研究生最多的人，是毛泽东思想研究专业的导师，他们听了情况马上就回来给自己的学生讲。我当时和这个专业的七八个同学住在一起，还有同寝室的，所以对党内那种气氛有一定了解和体会。

我当初的感觉是这样的（加上事后的判断），当时党内意见是尖锐对立的，一方面是保守的势力非常强，左的观念根深蒂固；但另外一方面，由于文化革命刚结束，那种想彻底否定毛泽东的声音也常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有一个不成熟的判断，如果邓小平尊重党内大多数人的意见，往否定毛泽东那边走，完全有可能得到党内的支持，是走得通的。比如我们的所长孙耕夫，他参加讨论，每次他回来都讲：“毛泽东差点把国家搞垮，做了那么多坏事，整死那么多人，现在他死了，难道大家嘴一撇就过去了？”我从他的言论中看，他绝不是民主派，也不是自由派，也不是最左的人，他代表很大一部分人，他们就是这么想的。最后决议定稿的时候，给我的感觉就是给了他们当头一棒，那种急转弯他们实际上是很难接受的。他们不想改变这个制度，也不想改变共产党的领导，但很多人被毛整得很惨，文革中受的苦，一肚子话想说出来。最后演变成决议、四项基本原则、务虚会气氛和方向的逆转，对他们来说我们能感觉到他们心理上接受不了，但是没办法。这是我当初感觉到的那种气氛。

为什么在文革刚结束，人们对左倾路线的痛苦还有强烈感受，党内大多数人、党内主流意见是要把毛泽东的错误说清楚、批判彻底的情况下，邓小平、陈云等人决定要维护毛泽东？我做了一个分析，我觉得我党有一个传统，高级干部特别善于模仿毛泽东，毛泽东有一种实用的“政治智慧”，邓小平对待毛泽东，是模仿毛泽东对待斯大林。毛泽东受了斯大林那么多的气，但最后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时候，毛不但要保，而且要把赫鲁晓夫搞臭。他其实很清楚，他不是保斯大林，而是保他自己，保他和斯大林所共同缔造、维护的那个政治制度。其实在毛的心目中，未尝不希望有人骂斯大林，但他在盘算政治利害得失时还是非常理性的。邓小平在这点上继承了毛的“政治智慧”，

他被毛泽东多次打倒，他未尝没有想有人出来骂毛的想法。但同时他有这种“政治智慧”，毛说斯大林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把“刀子”，邓看到了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搞专政的一把“刀子”。

三十年前中共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本来是一个很好的契机，可以借着对于文化大革命的批判和清算，拨乱反正，把源远流长的左的错误比较深刻地批判一下，把自1949年以来，甚至更长时间以来的各种经验教训好好总结一下，对于造成错误、损失的原因有一种比较正确、深刻的认识，避免以后再重复错误，再走弯路。可以借此比较正确地摆正党和国家、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摆正党内领袖和下级、组织和个人的关系，如果能做到这样，那么中共就会得到人们的拥护，国家也会在法治的轨道上长治久安，这是多么好的一件事啊！但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为邓小平等人继承。他们的眼界和胸怀不足，他们只关心这个党要永远掌握权力，所以最后弄出来的决议虽然不得不讲一点文革的错误，但还是在拼命维护毛泽东，使得正确评价毛泽东这个必须完成的历史任务没有及时解决，没有在一个难得的、也可以说是最好的时机得到解决。

卢跃刚：1981年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三七开评价，采用的策略是：早年肯定，晚年否定；革命肯定，建设否定；抽象肯定，具体否定；宏观肯定，微观否定；政治肯定，经济否定。成绩七分，说得大实际小；错误三分，说得小实际大。实际上是把毛泽东“大卸八块”，为我所用。

当年的“非毛化”至少有三个标志，一是逮捕“四人帮”并且作为“反革命集团”审判，二是解放邓小平及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毛迫害的老干部，三是真理标准讨论。

长期以来，真理标准讨论的定评是思想解放运动。这个评价是概念化的。那么真理标准讨论的本意是什么？首先要看当时中共面临的是什么问题。打倒“四人帮”以后，中共首先面临的是“拨乱反正”，彻底解放邓小平等被毛泽东打倒的老干部，平反包括被折磨致死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国防部长彭德怀、副总理贺龙在内的几十年的冤假错案，实现中共的工作重心转移。如果不摆脱毛的束缚，所有问题都无法解决。所以，政治问题一解决，真理标准讨论就结束了。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真理标准讨论针对的是“两个凡是”，为什么真理标准讨论具有明显的机会主义特征，仅仅是一次在既定政治框架中的有限度的党内开明派的思想松绑运动。1979年理论务虚会戛然而止并且转向就是明证，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共高层四千人大讨论定的调子也是明证。

其实在中共党内，谁也不要说谁是“凡是派”，就维护毛维护某些原则而言，大家都是凡是派。让华国锋、汪东兴等独享凡是派的桂冠不公正。《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没有浓重的“凡是”特征？反右不是只能说“扩大化”？只不过此一时彼一时，此凡是不是彼凡是罢了。毛泽东尸骨未寒，接班人华国锋就主持逮捕毛夫人江青为首的“四人帮”，毛决定邓下台不到一年就恢复邓小平的工作，不是对毛最大的不恭不敬？

邓小平多次谈话，为《决议》定调子，认为《决议》核心是评价毛，毛的调子定的好坏，关系到《决议》的好坏。本质讲，是个策略。道理很简单，不非毛化，没法搞经济体制改革。

邓小平则一方面是举毛旗，一方面又非毛化；否经济，不否政治和意识

形态。但是，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纯经济问题吗？中国的经济主张也好，经济理论也好，经济政策也好，是纯的吗？是政治经济。只要改革，就是非毛化。只是不好或不敢这么说罢了。

这就带来了一个后果。就是邓在政治上树毛（当然很多时候也只是个说法），经济上非毛，言行不一，使中华民族精神分裂，社会断裂。这就带来了问题。今天我们在处理复杂的问题的时候，很难找一个统一的价值标准，都带着策略的、技术的特点，这样看待历史，看待具体的问题，使很多问题就混淆了，就是名实、言行完全割裂。

共产党的理论很清楚，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互相作用，政治经济是为一体。反自由化为什么最后不在思想领域上反，一定要反到经济领域、科学领域去？从清污到 86 年底的反自由化最后都要干下去，实际是它的内在逻辑，就是要反对“干自由化”的。“干自由化”是什么？在我看来就是非毛化，是邓小平确定的经改和政改目标。83 年耀邦、赵紫阳、方毅、万里阻击清污，87 年阻击反自由化，胡乔木和邓力群看的很清楚，为什么说最大的威胁不是那帮思想异端的秀才，而是经济领域“干资本主义的”？

这只是粗略地谈谈，要详细分析，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卢弘：对于中共中央的两个“历史问题决议”，不少人认为：都有“历史局限”。早在 20 年前，即 1991 年，我就听到这一说法。说这话的是萧克将军。

萧克当时是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的“执行会长”，实际指导着研究会的工作。研究会副刊《炎黄春秋》杂志，由我担任首任主编。有一次，我当面向萧克报告办刊方针和编辑思想时说：对于国内党内的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我们都以党的两个“历史问题决议”为准，按照它来定稿件的取舍是非。这时《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作出不到十年，正被人们奉为必须遵行的文件。萧老听到后却明确指出：不必这样。这两个“历史问题决议”，都有着历史局限，都只反映了当时的历史条件和政治需要，并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你们可以尊重它，但不必以它为准，更不能被它所限。你们记住一条，就是实事求是，一切以事实为准，按照事实说话，只要符合事实，言之有据，就应该如实说。

按照萧老这一指导思想，我们连续编发了一些重要文章，其中一篇是徐向前元帅对党史研究者的谈话，讲了些党内军内有争议的问题。此文发表后我们受到指责，不应将内部谈话公开发表，我们为此将作检讨。萧老得知后向有关部门说，此文是他让发表的，由他承担责任，保护了编辑人员。这样的事还有很多，表明他不唯上，不唯书，也不唯文件，只唯事实的有胆有识精神。《炎黄春秋》正是遵循这一精神，才越办越好，备受瞩目。

陶世龙：简单介绍一下我在五柳村网站转发有关讨论的情况。2011 年 8 月 27 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发表三十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时，我即注意到有与会者通过腾讯微博发布消息，当即转发了部分微博，其后又将有关微博和其它网上的有关材料选录编博客文件在五柳村发表。但微博在报道了不到十个人发言后，不再有消息。从胡德平先生的开幕词来看，座谈的宗旨是着重在回顾历史，并非针对当前政策。后从郭道晖先生处得知，是因发言者超出了预定回顾历史的范围，而是针对现实问题的多，并互相感染有愈来愈激烈之势，而将微博掐断了。

8 月 28 日收到杨继绳先生发来在这个座谈会上的发言，当即与杨先生商

定全文在五柳村发表。（因为他在发言中对《决议》批评较多，并指这个决议在很多方面违背了历史事实，估计不会给他公开发表。）郭道晖先生的《实现由革命党到宪政党的转型，建设宪政社会主义》，因原说要发表此文的《南方周末》已明确告诉他不发表了，便也交给我发出了；王海光先生说他的发言是即席发言，以“历史地看待《历史决议》”为标题让我发了。

过了一些时候，胡耀邦史料信息网作为主办方发出的独家报道，我也作了介绍；还介绍了蔡霞的《进行深刻检讨 以防文革重演》。此外，转发了王希哲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30年座谈，王希哲认为，不应用《决议》去压制不同意见。

8月30日我将收录的杜光的评论，有关微博和其它网上的材料汇集编为一个专题[纪念《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发表三十周年]。

后来我又发表了高瑜的《邓小平搞〈决议〉的核心是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中国仅有思想解放还不够》，也是因为感到现在社会上对《决议》的问题认识不足，还有不少人误以为《决议》是胡耀邦的想法，这个澄清的工作还需要作。

综合观察各方观点，我认为《决议》在三十年前是对政治禁区的一次突破，文革中我因写过普及太阳黑子知识而定罪，如无这个决议，下面是不敢去推翻的。而这种感受掩盖了其维护专制主义的一面。经过三十年的实践和历史真相的更多揭露，《决议》消极的一面就突显出来了，已成改革的障碍，如不加分析笼统地肯定《决议》，就会成新的凡是。我先后发出杨继绳、郭道晖、王海光、高瑜等人的文章，也是因为与他们的看法基本一致。他们谈得很好，我就不再多说了。

张思之：听了几位的背景介绍和情况分析，结合《邓小平年谱》看这份“决议”，有几点突出印象：

一、这是在邓的直接指挥、具体操持下搞出的一个编年体的资料汇集，基本上没有着力于陈述、分析、总结“历史问题”。

二、“历史”决议，掺杂上眼前的事件与问题，例如批华国锋，明白无误地是在为邓的政治需要服务，这是干什么？

三、历史上一系列的重大问题，或叙述片面，或予以歪曲，或公然回避。其中极为重要的如：关于抗日战争那段历史的说法根本有违事实。抗美援朝，只字未讲。不说“三面红旗”这个“纲”，按“目”分述，又略去了发动“大跃进”，强建“人民公社”的动机及其危害后果，饿死4千万人的惨痛历史竟敢勾销！刘少奇不是说“人相食，要上书的”吗？再如思想领域里的反胡风，反胡适，特别是反右派连同反右倾，法制领域的重大史实诸如镇压反革命中的乱杀等等，对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无不发生了重大的历史性作用，但在“决议”中不是走了样，就是回避了事！

因此，它是一个只讲了一些“历史”，但回避了、歪曲了重大“问题”的邓记“决议”！特别令人不安的是，“决议”对毛的评价从根本上是不正确的。仅以他搞“文革”来说，与赵紫阳的所谓“错误”相比，按照中共思路，他为什么不是“分裂”党？“两个司令部”之论难道是刘、邓搞出来的？“炮轰”都可以干，岂止干“分裂”？“决议”说“林、江”是两个“反革命集团”，可他分明是林、江的前脑与后台，仅仅划为“反革命家属”，用他惯用的句式也来套问一次：“够吗”？“决议”说“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毕竟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

我不得不提出问题：在长达二十余年的时期里，在一系列极其重大的问题上，犯了那么严重的、无法宽容的错误，怎么还那么“伟大”，而且还是个什么“战略家”？历史上还有比这更为荒唐的“决议”么？

我参观过希特勒国家社会主义党屠杀犹太人、吉普赛人的纪念碑、园地，感悟历史不仅应反思，而且要彻底。我们有一个反思后的提法，即“两头真”，似已得到很多赞同。不过我以为“真”的提法有点模糊。是否还应再进一步，反思是否达到了“两头‘对’”。如果虽不“假”但并不那么正确，也还是立不起来。

写出实事求是的“历史决议”，难度大。关键在于有没有正气与勇气。据说中共有“一支笔”，是下笔有神的才子，这并不够，因为犹缺“董狐笔”！千古以来，谁不赞佩、景仰他那笔里的浩然正气，真个是“顾此耿耿在，仰视浮云白”。

我从不怀疑，这一大段的历史，会有当世“齐太史”重写。

邓小平之所以要歪曲历史，在于邓小平其人

在人们印象中，邓小平为人果断，沉稳干练，说一不二，刚愎自用。

倘若深入细致观察，却发现他有另外一幅面孔。邓的后半生，其实被多种矛盾复杂的心结所纠缠，欲罢不能。这些情结从各个不同方向影响着他的政治决策。在整个八十年代，中共“逢双反左，逢单反右”，左右摇摆，出尔反尔，即根源于他的相互冲突的“两个基本点”：改革开放，四个坚持。路向矛盾的方针正如两匹南辕北辙的奔马，在撕裂邓的灵魂和事功。

1979年，作为一道鸿沟，把邓的生涯一劈为二。粗略地说，前半生邓的事业是协助共产主义的魔咒笼罩中国，后半生邓的事业却是在中国解除共产主义魔咒。这两项事业的方向是完全相反的。这是悲剧人物邓小平一系列情结和矛盾举措的深部根源。

观其一生，邓的根本转折点在文革。文革风暴掀开了这个政权过去被精巧覆盖的黑暗和污秽，邓也被它扫到了社会底层。除了本人遭致的迫害外，他无疑也目睹乃至亲身体验了他协助建立的这个体制的种种弊端和荒诞，于此，他立定志向当有朝一日重返朝政时，要鼎故革新，扫除弊政，挽国运于既倒。

鬼使神差，上苍果真把中国的国运放在了他肩上。

毛的哀乐骤然鸣响，邓的使命翩然降临。然而，正当邓着手其自诩的民族中兴的宏图时，他发现自己陷入了多种两难困境中。

如果要懂得邓晚年的许多矛盾的政治决定及其基本困局，不能不剖析邓晚年的“五大情结”。这些情结支配了邓的举措，控制了这个复杂政治人物心理状态，提供了洞察他矛盾行止的基本线索，它们分别是：

1. 后半生与前半生事业逆反的情结，2. 毛泽东情结，3. 文革情结，4. 胡赵情结，5. 天安门情结。

让我们分别检讨之。

一、前半生对后半生

邓的改革能走多远？这是一开始就困扰着邓，也困扰着中共的基本问题。作为邓本人，他的基本政治利益逻辑上应当使他走向何方？正如前述，邓的前半生和后半生的方向是冲突的。同时，与此相关，对中共而言，党内的合法性和党外的合法性也是冲突的。

诚然，前后两段生涯的逆反，是驱使邓出尔反尔、进一步又退一步的基

本心结。但是，这并非必然如此的，若把逻辑推到底，从利益的角度看，无论于国于己，邓都应当有充分的动机把改革推向彻底，扩展到政治领域才是。遗憾的是，以邓的睿智，他并未能看透这点，即：虽然前后方向逆反，但他的前半生和后半生所占的分量却是不同的。且不说对中国乃至世界而言，前者为灾难，后者乃福祉。即使仅仅对邓自己的利益和名声而言，前半生虽然历时较长事功宏大，但邓却不是主角，他只是协助毛泽东的一个配角。后半生虽然历时较短，但邓却是赫然主帅，并因此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的历史性人物。即是说，前者归属于毛泽东时代，后者才真正开创出了一个独立的邓小平时代。后者是他国际声誉和历史地位的源泉。孰重孰轻？他本来应当有个掂量，不难作出抉择的。

但是，正如常例一样，要一个人放弃在青年时代就确立并伴随了五十多年的意识形态，否定自己的大半辈子，是极其痛苦的，甚至是不可能的。更何况与这一意识形态相连的，已经成为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中共了。邓在支配党，党也在制约邓。这已经不是邓一人抛弃历史包袱的问题了。邓要获得党外的合法性，势必就要失去党内的合法性。反之亦然。而更要命的是，在原有架构下，邓还只能依靠这个利益集团来推行改革，而真正彻底的改革，实质上就等于要求这个党自己投票赞成逐步结束自己的生命。其结论是可想而知的。

这是他个人的遗憾，也是中华民族的悲剧。

二、毛泽东情结

毛泽东是邓小平政治主张的克星，同时又是邓的早期从政生涯的启明星。

毛带给了邓及其家人以浓重的阴影和“剪不断，理还乱”的恩恩怨怨。

作为一个毛式左倾路线的两次受害者，作为因毛氏红卫兵批斗致残者的父亲，邓当然已经清楚地看到并切身体会到毛的思想和政策给中国带来的巨大灾难，从感情上对毛作出否定应是顺理成章的事；然而，作为毛创建的政权和利益集团的继位者，作为毛早期的党内追随者，从理智上他却不得不洗刷毛的大部罪行，而把它转嫁到毛夫人及其同伙身上。作为一个实际的政治家，他无疑已经清楚地看到，中国问题的症结根本上正在于制度和意识形态，但是作为自己前半生为之奋斗的、执政合法性源泉的马列毛主义的信奉者，他又不能“砍旗”，只能“挂羊头，卖狗肉”，在原有意识形态旗帜下改变其内涵。即是说，仍然使用马列毛的话语系统，但是通过把强调重心的移位，通过把部分语句反过来说，通过颠覆原有的内容等方式，邓为自己的政治转向作了实用主义的辩护。

但是，辩护仍是危险的。

邓的两难悲剧在于，他必须用反(马列毛)意识形态的经济方式才能挽救党，而公开声称反(马列毛)意识形态又必定摧毁共产党。因此，非毛化和非意识形态化只能做，不能说。这就是他提出的“不争论”方针的奥秘。

毛泽东与邓小平，虽同为共产党，但作为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历史上的两个象征符号，却代表了两种不同的路向和治国风格。毛吟诗作赋，耽于梦想，不守常规，蔑视法制，置几亿生灵的日常生活于不顾，大起大落，折腾了中国近三十年。邓低调求实，少说多做，乾纲独断，毅力非凡，把中国向世界打开，聚焦经济，提高了普通人的生活水平。然而，不可原谅的是，也正是邓，把坦克车开上大街，血腥镇压了和平示威的民众。这是连毛也不敢公然下手的罪行，势将成为他永远抹不掉的历史污点。

从邓的继位者当今的作为中，我们不难看出他们如何在毛邓这两极之间摆动。它预示着：毛邓两个符号在今后中国还将多次相互交战，起伏涨落，支配相当多中国人的政治想象，框限中国未来的政治格局。

今后中国人及希望开拓新局的政治家面临的使命，在于解脱毛邓魔咒，超越毛邓的视野，用党外的合法性来取代党内的合法性，彻底突破共产话语系统，开拓一个崭新的政治符号空间。

三、文革情结

文革是邓的炼狱。

作为邓一生事业的最低点，文革同时也是他反省自己前半生的起点。这一特殊的际遇使他看到了共产党治下的中国之令人吃惊的贫穷悲惨的真相，也亲身感受到毛氏乌托邦文革路线在实践上的荒谬、残酷和血腥。有鉴于此，对文革的翻案成为他后半生事业的原点。

没有文革，就没有人所熟知的“这个”邓小平。

经过文革炼狱的烧烤，邓小平已非过去的邓小平了。

文革带给邓的遗产，一方面是使他看清了共产意识形态的失败，从而令他出山后放弃教条，推行求实经济政策，并打开国门，使中国逐步进入主流国际秩序。另一方面由于他深受毛式“大民主”之苦，因而对民众运动深怀恐惧，对“大民主”有一种特殊的过分敏感，从而为他在“六四”时施行“铁血政策”埋下了伏笔。

也就是说，邓式改革开放时期的基本成就和罪过，都与邓的文革经验直接相关。

本来，文革期间无法无天的经历使邓复出后誓言厉行法治，渐行民主，恢复社会的基本秩序。在一九八零年八月十八日，他曾发表了一篇有关民主法治的不错的讲话，指出类似斯大林和毛泽东那样的严重破坏法制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并强调中国走上民主法治道路的必要性。然而，他无法看清的是，作为最后的“底线”，他提出的“四个坚持”是与法治完全冲突的。把一个垄断性的党及其意识形态凌驾于任何法律之上，缺乏对党和政府权力的限制和平衡，逻辑上必定走向严酷的专制和典型的人治。

1989年的事件戏剧性地昭示了这一点。

四、胡赵情结

胡耀邦与赵紫阳，作为邓的左右臂，在当年，构成了中国最高层的“铁三角”。也许，这是其时中共所能找到的最开明的统治集团了。

无疑，邓对胡赵是相当信任的，甚至可说是情有独钟。他竟然公开声称，天塌下来，有胡赵撑着。胡赵对此知遇之恩和提拔信任也怀有某种铭谢之情。更重要的是，三人之间，在对毛式主要遗产的反叛上，在经济改革的理念上，是大体契合的。而胡的热情诚恳，开朗豪爽，大刀阔斧；赵的精明能干，思路开阔，厌恶教条，与邓的务实主义正好相得益彰。在政治改革方面，二人走得比邓稍远。因此，八十年代前期的中国，在这一“铁三角”的推动下，以“真理标准”问题为开山斧，拨乱反正，平反冤狱，对外开放，对内搞活，……把偌大神州，搞得风生水起，虎虎有声，蒸蒸日上，成为中共49年执政以来仅有的一段“黄金时代”。

然而，这种“君臣”式的“铁三角”，却隐藏着某种致命的结构性危机。祸根在于权力的名与实不符，以及权力和责任的不统一、不对称。

所谓名实不符，系指最高权力的名义与实际是分裂的。它们不是统一于一人身上，而是分处于两个不同人身上。名义上的最高权力者是胡，实际上最高权力者为邓。

所谓权责不统一、不对称，系指权力与责任分离。这意味着最高指令的发出者可以不负与该指令相应的责任，而须由执行者负责。即，邓拥有最高权力而不需承担该权力相应的责任，责任由胡赵承担；但是倘该权力运用获得成就，则荣誉仍归于邓。譬如，1988年的所谓“物价闯关”，赵曾犹豫，决心是邓最后下的，然而最后失败的责任却须由赵全部承担。

但是，权力的运转自有它趋向名实相符的逻辑。光绪当年的“百日维新”，除了是其思想倾向的结果外，从权力运作的逻辑看，也是虚君（仅有名位者）寻求名实相符的实权的自然趋归。胡赵当然也不例外。

上述结构性困难一旦遇到危机时刻，就会突然显现出来，产生结构崩塌的效应。如在1986年底和1987年初，在胡耀邦推行邓式“新政”过程中，爆发学运。党内保守元老趁机发难攻击“新政”，邓亦隐感胡“功高震主”，因此也就顺水推舟，放开闸门。胡（为邓路线的后果）承担责任黯然下台。“铁三角”顿失一角，已呈不稳。1989年，类似事件以悼胡为导火线在更大规模下重演，赵亦戏剧性地被罢黜。从此，邓失双臂，“铁三角”已收缩为孤立一点。“新政”的颓势已不可避免了。

邓对胡赵的感情是复杂的。平心而论，他曾力排众议，力荐二人担负重任，对他们有很高的期许，视之为自己想法的最好阐释者和执行者。然而，当政治危机惊涛拍岸，风起云涌时，当二人在政治改革方面超出了他划的界限时，他为自保，也为防止逸出邓式轨道而抛弃了他们，（当然，赵在最后一刻也已挣脱了邓的笼罩，亮出了独立的姿态）。从邓偶尔流露出的悔意以及他对二人的整肃留有余地，人们不难想象，事过之后，在垂暮之年回首事功，这两个人当已化成他的两块心病，在清夜咬噬他的灵魂。

五、天安门情结

天安门是邓小平的滑铁卢。

1989年，当邓小平望着天安门广场上如海的人流、标语、旗帜，当他听到那一阵阵的呐喊如潮汹涌时，在他的视野里，出现的是1966年同样这个广场上的红卫兵人潮，是毛泽东和林彪的身影在这些人潮的上空若隐若现。这些勾起他旧痛的影像在支配着邓的判断，影响着他的决策，那致命的、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决策。

仅仅才是五年之前，仍是这些学生，自发的在游行队伍中打出了“小平，您好”的横幅，邓亦在城楼上向他们微微招手致意，构成了一幅邓事业巅峰的盛世图画。然而转瞬之间，他与青年、民众间的蜜月就结束了，横亘其间的，是千年古城北京极难现身的铁甲怪兽——坦克。

表面上，他的坦克和军队“战胜了”赤手空拳的学生和民众，但是这场战斗没有胜利者。

邓小平失败了。他惨淡经营的后半生事业，骤然被抹上了一笔浓重的血腥。天安门，将成为一个狰狞的黑色符号，与邓的壮观的改革事功一起，永远载入历史。他的形象将被一劈为二，一半为白，一半为黑。并将成为历史学家永恒争议的话题。

中共失败了。在全世界的聚光灯下，这个政党的残酷真相已赤裸裸地无可逃遁于天地之间。从此，它的宣传工具已被废了武功，无人理睬。它的统

治合法性已被自己的坦克车碾碎了。

中国失败了。一百年来念念有词反复萦绕在中国人心中的梦，又一次被击成碎片。同时，中国历史，又一次闻到了血腥味。而闻过血腥味的历史，常常会染上循环性的嗜血症。天安门事件，再次给中国当代史投注了一股暴戾之气。他开启了典型的国家恐怖主义的先例，从而为将来可能出现的无边的暴力循环注入了“第一推动力”。

本来，随着中国人世代交替的变迁，随着改革开放的进展，上一代或上两代中国人在国共内战中结成的重重恩怨和仇结已经在逐步化解、淡化乃至消泯。但是，天安门事件，给中国社会再次注入了极化的种子，仇恨的种子，造成了新的危险的社会张力，种下了新的一个世代的仇结。从而，使全国和解社会宽容的降临更加遥遥无期。整个中国重新成了绷紧的弦，内蕴着血腥暴戾之气。

虽然，为挽救自己的政治声誉，为扭转中国在六四之后的全面倒退，1992年，邓以自己耄老的巍巍之身，南下“巡视”，疾呼“不问姓社姓资，加快改革”，从而在中国掀起了一阵更加疯狂的“淘金热”，并且因胡赵时期奠定的基础以及遭逢国际资金流入的历史机遇，导致了中国经济的奇迹般起飞。

然而，只要你踏上中国大陆，就不难发现，这里发生的，基本上是一场空前规模的无规则游戏。深入考察，你会体会到，无论对官方还是民间，它的“解放”机制，蕴涵在如下未曾明言的前提里：在大街公开杀人之后，一条最难的心理“禁忌”和防线都冲破了，那么，还有什么不可做的“禁区”呢？于是，姓社姓资、道德规范、法律条文，礼仪廉耻，亲情信用……通通丧失了约束力。一个空前的制度化的腐败和伦理真空降临中国。除了政治禁忌，其余百无禁忌。

这种价值系统的崩溃，这种嘲笑一切，撕毁一切的痞子态度，这种毫无敬畏感、毫无神圣性的社会，也许会使中国几代人付出难以想象的代价。

出路何在？

我想，能够拯救这个民族、并在中国重建某种人类基本道德(禁忌)系统的，也许正是在于冲破当前中国的最大禁忌、冲破百无禁忌时代的唯一禁忌：六四事件。

人们注意到，正当邓的丧钟响过，一纸邓为六四事件道歉的“遗嘱”流传海内外。天安门的幽灵再次降临中国。

或许，“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是六四情结在缠绕着邓弥留前的心灵，使之不能宁静瞑目，必欲完成妥当而后安。

或许，是邓的家人预留后路，为邓开脱，为己消灾。

或许，是异议人士为打破僵局，为下一步中国的革新规划一个动力源。

.....

无论是真是假，无论动机何在，但有一点却是千真万确的：它表明，六四都是中国人绕不过去的一个巨大创痛。我们无法不面对它。它是近代中国史留给我们的巨大的十字架。

要之，六四将为这个民族输入某种宗教感，输入一种神圣性的资源。

当六四真相被昭告于天下后，殉难者的血，将洗涤净化国人的灵魂。

殉难者的魂魄，将化成永恒的十字架，高悬在中国大地上空，借以昭告国人：天地之间，是存在神圣之物的，有些东西，是值得人们永远敬畏的。

在正义的基地上，才谈得上真正的全国和解。才能义无反顾地大步融入

民主潮流。

（2）牢记文革教训

二十世纪历史将以最沉重的笔墨记载人类的两大悲剧：法西斯暴行、“文革”浩劫。

凡是这两大劫难的亲身经历者，都在努力忘却它，又无法忘却它。文学家与史学家有各自不同的记载方式：史学家偏重于灾难的史实；文学家偏重于受难者的心灵。

在延绵不绝的历史时间里，十年不过是眨眼的一瞬。但对于一代中国人有如

度过整整一个世纪。如今三十岁以上的人，几乎没有一个人的命运不受其恶性的支配。在这十年中，雄厚的古老文明奇迹般地消失，人间演出原始蒙昧时代的互相残杀；善与美转入地下，丑与恶肆意宣泄；千千万万家庭被轰毁，千千万万生命被吞噬。无论压在这狂浪下边的还是掀动这狂浪的，都是它的牺牲品。哪怕最成熟的性格也要接受它强制性的重新塑造。坚强的化为怯弱，诚实的化为诡诈，恬静的化为疯狂，豁朗的化为阴沉。人性、人道、人权、人的尊严、人的价值，所有含有人的最高贵的成分，都是它公开践踏的内容。虽然这不是大动干戈的战争，再惨烈的战争也难以达到如此残酷——灵魂的虐杀。如果说法西斯暴行留下的是难以数计的血淋淋的尸体，“文革”浩劫留下的是难以数计的看不见的创伤累累的灵魂。以下记录几位中国先哲的名言。

1、巴金的《随想录》中有曰：

“只有在经历了接连不断的大小政治运动之后，只有在被剥夺了人权、在牛棚里住了十年之后，我才想起自己是一个‘人’，我才明白我也应当像人一样用自己的脑子思考。”

“原来我才逐渐明白，住了十载‘牛棚’，我就有责任揭穿那一场惊心动魄的大骗局。不让子孙后代再遭灾受难。我边写、边想、边探索，越写下去，越认真，也越感痛苦。”

“为什么会有人那么深切地厌恶我的《随想录》？……因为我要人民牢牢记住‘文革’。

“太可怕了！十年的折磨和屈辱之后，我还不能保卫自己叙述惨痛经历的权利。十年中间，为了宣传骗局，推销谎言，……使用了那么大的力量，难道今天只要轻轻一挥手，就可以将十年‘浩劫’一笔勾销？！”

“有话不说，将骨头全吞在肚里化掉，我并无这种本领。”

“为什么不能写自己感受最深的事情？在‘文革’的油锅里滚了十年，为什么不让写那个煎骨熬心的大灾难？……那么回过头来看‘文革’，我们到哪里去寻找它的遗迹？才过去20年，就有人把这史无前例的‘浩劫’，……尽量忘记干净。”

“十年‘浩劫’教会一些人习惯于沉默，但十年的血债又压得平时沉默的人发出连声的呼喊。我有一肚皮的话，也有一肚皮的火，还有在油锅里反复煎了十年的一身骨头。……，在心头越积越多，我不把它们倾吐出来，……我永远闭不了眼睛。”“账是赖不掉的！”“为着你们我愿意再到油锅里受一次煎熬！”

“只希望这种悲剧在中国不再发生！”

2、韦君宜的《思痛录》中言道：

“真正使我感到痛苦的，是一生中所经历的历次运动给我们的党、国家

造成难以挽回的灾难。同时，在‘左’的思想的影响下，我既是受害者，也成了害人者。”

“历史是不可能被忘却的。十多年来，我一直在痛苦地回忆、反思。”

“这已经到了人和人互相用嘴咬以维持生存的程度！”

“参加革命之后，竟使我时时面临是否还要做一个正直的人的选择。这使我对于‘革命’的伤心远过于为个人命运的伤心。我悲痛失望，同时下决心不这样干，情愿同罪，断不卖友。”

“这一部用血泪凝成的历史，……只希望这种悲剧在中国不再发生。中国的可怜老百姓，太容易高呼万岁了”

“反右运动中，我曾对……说：‘如果在 12•9 的时候我知道是这样，我是不会来的。’”

“所有这些老的中的少的，所受的一切委屈，都归于‘四人帮’，这够了吗？我看是不够。”

“人家那种残酷的游戏，终于迫使他（注：指韦君宜的丈夫杨述）对于自己这宗教式的信仰发生疑问。这点疑问是不容易发生的啊！是付了心灵中最痛苦的代价的！”

3、季羨林论文革

季羨林在《牛棚杂忆》中对文革的描述用了四个“最”：“最野蛮、最残暴、最愚昧、最荒谬”。

在《季羨林散文全编》的《卷首语》中，对文革的描述又作了新的概括，将原来四个“最”字提升为六个“极端”。

“这是一场极端野蛮、极端残酷、极端荒谬、极端愚昧、极端灭绝人性、极端违反天良的空前绝后（这仅仅是我的希望）的人类悲剧。”

将“最”字改为“极端”，在字义上并没有什么区别，作为“定语”而言，两者都是“最高一级”的修饰词，即使变成“最最最”只是加重语气而已。但增加的两个词语：“极端灭绝人性”与“极端违反天良”，虽然增加了一个角度：人性的角度。这两个词语基本上是一个意思，“灭绝人性”就是“违反天良”。

如果说：“野蛮、残酷、荒谬、愚昧”这四个词，对“文革”的定性，只是一种“表象”的描述，是浅层次的；那么“灭绝人性”与“违反天良”，也不能就此说就是揭露了事物的“本质”，也不是什么属于很深层次的。

我以为四个“最”也好，六个“极端”，都不如“反人类”三个字确切。

（3）冷眼观察“胡温新政”

编者按：此文当是 2012 年之前的时事评论。作者不详。但其观察与剖析，今天仍有借鉴意义。

1、从“胡温新政”到“温家宝现象”

2003 年曾有“胡温新政”一说。那一年中国突发“非典”，刚上任的胡锦涛、温家宝二人即时罢免了对隐瞒疫情负有责任的北京市长和卫生部长两位高官，力主向社会公开疫情，举国动员全力抗灾，还亲临一线现场指挥，一展“亲民”风采。这一举动以及此后“尊重宪法”、“依法执政”、“行政体制改革”等政策宣示被人们普遍解读为“胡温新政”即将到来的标志。

事后证明，所谓“胡温新政”实为夸大其词。“第四代”掌权近 8 年来，在政治建设或政体改革层面，胡温政府的主动作为其实相当有限，甚至可以说无所作为，还根本谈不上有任何突破邓小平理论、超出江泽民模式之处。

即使是颇受好评的由 2003 年“抗非典模式”发扬光大的汶川、玉树“抗震救灾模式”，也不过是对江朱政府“98 抗洪模式”的直接承袭，并无多少救灾制度上的创新意义。

事实上，“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这两届中共中央整体性地呈现出一潭死水的现状，坚持消极改革、积极维稳的方针，很明确地以只救急、不改制为总体执政目标，甚至偶尔还有一些返毛复古的政治动作，60 周年国庆大典居然抬出了“毛泽东思想万岁”的文革标语。不仅“胡温新政”子虚乌有，胡温二人的建设性合作关系充其量也只维持了一到两年——那还是他们新官上任三把火、对“一把手行情”尚不十分洞悉、对角色定位尚不十分清晰的上台兴奋期。当二人逐渐找到了做主席当总理的自我感觉，胡锦涛甘当“维持会长”，温家宝成为“消防队长”，他们的政治蜜月期也就随之结束了。此后，人们能够观察到的，只有孤掌难鸣的“温家宝现象”，并没有双头合璧的“胡温新政”。

温家宝曾公开赞成“普世价值”（注：但温家宝并未使用“普世价值”这一党内激烈抨击的词汇，他的表述是：自由、民主、平等、博爱、人权、法治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却遭到了吴邦国、贾庆林、李长春等几位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媒体长达两年多的合力围剿。胡锦涛既未公开支持、也未直接批评温家宝的言论，但誓言要将“中国特色”进行到底，“不折腾”，更“绝不改旗易帜”。而温家宝也并不示弱，他利用“两会”记者招待会“与网民对话”、“与大学生座谈”、接见国务院参事等各种机会，反复申说“公平正义”、“法比天大”、“不害怕民主”、“言者无罪”、“包容的雅量”、“人民的尊严”、“独立思考，自由表达”等温氏观点。他似乎不太合群，其“另类”言论几乎无人附和，“出格”表现也极少有人追随。显然，这些观点仍是围绕“普世价值”的具体阐释与发挥，或可视为温家宝对其高级同僚的曲折回应与迂回抗辩。

今年 4 月 15 日（胡耀邦忌日暨“八九风波”爆发日），温家宝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再回兴义忆耀邦》的文章。他对那位因“反自由化不力”而蒙冤去职、其猝然辞世又引发了惊天事变的前总书记罕见地予以高度赞扬，毫不掩饰地表达了对“耀邦同志”由衷的钦佩、敬仰之意和真挚的亲近、怀念之情。严格说起来，这篇文章算不上“出格”，至少并不比引发众怒的“普世价值”更出格。因为胡耀邦不比赵紫阳，虽然同样是在高位“没有站住”、来不及成为“领导核心”，但胡耀邦不是党的异己分子，中共中央亦曾以官方名义对胡耀邦作出过高度评价。问题仅仅在于，其他在任的高层人物均一律忌讳“自由化”、避谈胡耀邦，从来就没有任何人以个人名义公开发表过涉及胡耀邦的讲话或文章（如有这样的文章，也应当是在离退休之后发表的），这几乎已成惯例。

因“六四”之故，胡耀邦的名字还不可能真正脱敏，胡耀邦的政治观点、功过是非、倒台经历、身后事端以及复杂的邓胡、胡赵关系牵涉到诸多党史黑幕，仍属当局禁忌，并不容许人们自由评说。

许多人认为温家宝的文章在发表之前或曾交给其他常委圈阅并得到了胡锦涛的支持，这似乎不大符合胡温二人的行事风格，应该不是事实。看起来，这仍是一宗孤立的温氏个人行为，与“中央领导集体”、更与“政治改革信号弹”没有什么关系。相反，倒是反映了体制内部的张力加剧，更反映了胡温二人在观念上、主张上和个人关系上的不和谐有所外化。如果说胡锦涛热捧

《张居正》暗示了他对当朝宰辅的不满，那么，温家宝盛赞胡耀邦则明示了温心目中最好的总书记是当年那位热诚、开明、亲民、廉洁的胡耀邦，而非眼前这位刻板、平庸、懦弱、低能的胡锦涛。

2、温家宝想表达什么？

在当今中共高层，温家宝属于比较“另类”的一员。之所以显得“另类”，首先就在于他比较孤独，比较孤单。并不是温家宝太出色，而是其他人太庸碌。反过来说，若高层人人都如温家宝一样言行，也就无所谓“温家宝现象”了。

由于中共政治缺乏起码的公开性和透明度，人们无从了解真实的高层运作内幕，以及他们之间的政见与利益之争，所以，大人物们稍有“出格”言行，总是让人津津乐道且众说纷纭，难免会出现一些过度的解读。“温家宝现象”也不例外。

有人认定温家宝是“作秀”“演戏”，有人认为是“放风”“试探”，也有人认为是派系冲突、权力斗争。这些说法均不尽合情合理，或有过度解读的成分。“温影帝作秀”是流行最广的一种说法，持此说法者，既有国内的毛左派、官场内反感温式作风的人士，也有海内外的异议人士。“作秀”的意思无非是说，其实温家宝内心讨厌“普世价值”、不欲“政治改革”，也不是真心诚意“亲民”，而是刻意把自己伪装成一位支持“普世价值”的“亲民总理”，以便鱼目混珠、欺世盗名。但这一流行最广的说法也最不合理，最缺乏对事实的解释力。温家宝为什么要放着四平八稳的“盛世”宰相不做，却要屡屡“作秀”让自己置身高层边缘、陷入体制内孤立？

至于“放风”“试探”——意在为重启久已停滞的政治体制改革作舆论铺垫似亦不确。按照体制惯例，如果“中央”有意政改，这样的风应该由“核心”本人、或由主管意识形态和宣传事务的部门来放，而不该由只有办事权而没有“理论创新”之权的总理来放风，却又由中宣部和《求是》杂志来消风。若说温家宝的特异言行是出了派系冲突、权力斗争，此一解读又过于简单。温家宝不比薄熙来，他是当今体制内最没有派系色彩的人物，在中央党政军系统和地方系统均缺乏过硬的人事奥援，也没有不可摆脱的恩怨纠葛，却处于“团派”与“太子党”两大势力均不便得罪、且均须拉拢的关键位置之上。他一无丢官罢职之虑，二无更上层楼之望，倒是应该超然于隔岸观火之地、轻取渔翁之利才对。

网上传闻中共高层曾有过三次“倒温风潮”，这恐怕也有夸大其词的成分。当今的中共政局处在一种难破难立的僵持状态，权力斗争更多表现为相互掣肘、相互拆台等“台面下的斗争”。以私人关系求进、以表面“和谐”求稳、以年龄到线离位，这是当今高层人事的显规则。除非出现“非常事态”，除非大局万不得已，无人敢于破此规则，轻易搅局。

高层所追求的乃是“集体安全体系”，大家可以实际上并不团结，却不能公然闹分裂。以反腐名义拿下一个政治局委员已经大损党国体面、大伤官场情面，若要以意识形态理由扳倒一个民望甚高的总理，恐非脆弱之极的本届当局难以承受之重。他们冒不起这个风险。

在我看来，温家宝所要表达的，不是作秀的清议，而是真切的期待；不是领导集体的愿望，而是一己孤独的夙愿；不是发起政治改革的雄心，而是对体制僵持的失落；不是进取心，而是挫折感；不是登高一呼、奋起争权的派系动员而是官场寂寞、徒唤奈何的自我独白。

温家宝曾自比屈子，且感叹“机会不多了”。此种意蕴，正如他在都江堰抗震前线对空军军官说：“是人民在养着你们，你们自己看着办”；亦正如周恩来在进手术室时呼喊“我不是投降派”，胡耀邦在非正常去职后放声痛哭，赵紫阳在天安门广场向全国人民说“我老了”，朱镕基在离任前向媒体表白，不求被后人评为一个好官，只盼人们认可他还算是一个清官。在中国官场，温家宝并不是特例，而是那些身在夹缝、有心无力的二号大人物的常例。他所表达的是“我已经尽力，已经没办法了”，是心中尚有残梦、却对体制无能为力失望，是功无所成、愿无所遂、志不可得、身心疲惫的悲凉心情。

3、“六四后遗症”与中共体制的僵化

要理解“温家宝现象”，不能就温论温，或就胡温论胡温，而必须深入中共的体制背景与现实困境。自“六四”事件、苏东巨变之后，中共高层即陷入深度恐惧之中：不仅是对未来“清算”的恐惧，而且是对任何国内外变局、动荡乃至一切“政治事件”的恐惧。当然，这也是对“深化改革”的恐惧。这种恐惧已深入骨髓，呈现为“集体无意识”。这使得政坛上、官场上充斥着大量的数不清的“政左经右型”人物，也使得黑恶化的政治短期行为盛行不衰。在“六四后遗症”的症状之下，贪腐谋私、甚至画地为牢各自为政，都已经算不得“出格”，但欲对官僚体系动大手术、对政治体制作真改革，却必定是“出格”的和众所难从的。因为那会让所有的掌权人物——改革者和被改革者们——都感到风险来临，都有可能让他们同时失去政治上虚幻的安全感和利益上真实的保护网。

当然，共产党不是铁板一块。岂止不是铁板一块，而且正在静悄悄地经历着深刻的分化与蜕变。中共政体的条块系统早已不复如旧，除了军事和宣传这两个“口”仍保持着自上而下的“条”的外观，党务（人事组织）、政法、纪检，尤其行政与财经系统（即温家宝所在的系统）则至多只剩下半个“条”，其众多的神经末梢已大部被“块块”所侵蚀。“政令不出中南海”业已成为制度性常态。而各个“条”的最高端也并非都能够“有机统一”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比如说，李长春或郭伯雄固然可以不买温家宝的帐，习近平或周永康也未必一定就买胡锦涛的帐。而另一方面，每个大权在握的人若想要自己坐得稳，他也就必须让其他大权在握者都能坐得稳。中共虽仍然拥有一套“集权”或“独裁”体制的正式建构，但它的实际功能已经大为衰减，而且无人敢于去触犯这套正在衰变的体制，不可能对其愈来愈大的系统张力予以主动的消除、对其愈来愈多的功能障碍进行全面的修复。在当前的格局下，这是极不可行的，因为条与条、条与块之间只有相安才能无事，也只有无事才能相安。

在僵化而又脆弱的现行体制之中，官场便形成了以权谋私易、以权谋国难的复杂困境。秉公效忠党国者，或者“出类拔萃”者因容易惹起是非，必难觅用武之地。所以，无论是温家宝的右倾言行，还是薄熙来的毛左行径，均难以在当前政局中有所作为，遑论建功立业。

与这些颇显异端的政坛人物相比，胡锦涛这种类型才是更顺应这个时代、更适宜这套体制的人物。中共掌权 60 年，胡锦涛是唯一真正接班来的既定“接班人”，这不是偶然的，是僵化的体制呼唤着、维护着平庸的领袖。后“六四”时代的党国体制已不再需要那些有远见卓识或雄才大略之辈，最佳的领袖人选正是这样的人物：只顾眼前、不管将来；只打官腔、不表真情；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胸无大志、得过且过；知难而退、有所不为。

然而，“温家宝现象”或“薄熙来风暴”的出现也不是偶然的。这说明，僵化的体制正在、或已经接近了它的“稳定”极限。右派与左派、官场与民间，均已对眼下这场基于恐惧的政治平衡感到有些不耐烦了。也许，只需有一些来自体制外部的冲击，僵局就将瓦解，而一场不可避免的动荡、或一场真正的政治变革，已经离我们并不遥远。世界的民主潮流正在不断地涌动，虽然时快时慢，但总是汹涌澎湃地奔流向前。

（4）认真识别什么是“社会主义”（原文作者未公布姓名）

一、本来对“社会主义”早就没有什么“思”什么“想”，因为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有如当年陈景润先生所解“哥德巴赫猜想”，令多少名家大师都说不清，仿佛记得某任总书记和总设计师都讲过连他们都不清，何况我们小民百姓！

二、然而近段时间，我每天必读的《南方都市报》，连续用几个版面，挑起了这个话题，就是：于幼军先生在其两卷旧作《社会主义五百年》之后，近时又推出其新作《社会主义在中国》。

对此，有人不以为然，有人不屑一顾，然而却引起了我的关注。因为该书作者并非书斋学究等闲人物：这个两年前在隆重庄严神圣的最高代表大会宣布留党察看的前中央委员，前文化部党组书记，前山西省长，也曾是我们广东的文宣总管和我们深圳的一市之长。如此高官，以戴罪之身，隐匿两年，闭门思过，呕心沥血，笔耕不辍，推出新作，闪亮复出，怎不令人眼前一亮？

于幼军先生引我关注还有一层意思，于幼军因咎获罪前，本是中国当代政坛冉冉升起的新星，此前我曾读过《炎黄春秋》上一篇于幼军怀念任仲夷的文章：《任仲夷——我的忘年之交良师益友》，感知其亲受任老苦心栽培，深受任老改革理念民主意识影响，预感他的不合主旋律的异端思维会影响他的前程。然乎？

二、于幼军的新作《社会主义在中国》，据闻洋洋 58 万言，煌煌 461 页，我无暇拜读，或许以后也无心拜读。读 5 月 22 日的《南方都市报》与此相关的三篇文章，却重新触发我关于社会主义的零思碎想。

首先，什么是真社会主义？

其实，什么东西都有真有假：《西游记》中有真假悟空，《红楼梦》中有真假宝玉，《水浒传》中有真假李逵，《三国演义》中也有真假孔明……我们从小所学的国际共运史也告诉我们有真假马克思主义，真假社会主义。

围绕着于幼军的“社会主义”新作，一篇访谈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政治学教研室主任王占阳教授，题为《走向普遍幸福主义新文明》的文章提要，给社会主义作了这样的界定：

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就是具有普适性、普惠性的而不是少数人所独享的自由、平等、民主、法治、人权等等。

世界上各种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往往非常大，但至少在口头上大家都要追求“大家好”——普遍幸福主义。

西方社会主义概念首先是指社会保障。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概念也以保障民生为要义。

只是社会保障制度在全球范围内的普遍推广和深入发展就足以证明，20 世纪以来，世界上不是只有少数国家走向社会主义，而是社会主义已经成为了人类进步的主要方向和文明主流。

也就是说，真社会主义是自由、平等、民主、法治、人权的社会，而不

是阶级仇恨、特权森严、专制独裁、无法无天的社会；

真社会主义是“大家好”——普遍幸福主义的社会，而不是贫富悬殊、官民对立、城乡两界、彼此防范的社会；

真社会主义是“以保障民生为要义”的社会，而不是春节晚会农民工也哀叹“老无所依”、红色陪都的农民孩子以自来水当中午饭、祖传老屋半夜三更遭特警暴力拆迁、街头小贩挑担摆摊挨城管殴打追赶的社会……

按照该文被访谈的王占阳教授的说法：什么是真社会主义？就是：普遍富裕+普遍民主=“大家好”——普遍幸福主义。

王先生进一步阐释说，社会主义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所主张的“普遍自由”，也就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马恩所讲的民主自由就是全体社会成员共享的民主，马恩终身最基本的政治主张就是实现普选制，一人一票，议员支薪。

有了普选制才能保障普遍富裕和普遍民主。

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有了民主想不搞社会主义都不行。

计划经济无法实现普遍富裕，专制制度无法实行普遍民主，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就是社会主义。

马恩关于未来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核心主张有五条：

一是实行普选制，形成社会主义议会；

二是基于普选制的分权制衡；

三是实行法治；

四是保障人权与公民权，并提出不是国家教育人民，而是人民教育官员；

五是国家公职人员原则上只享有巴黎公社时技工的生活水平。

马克思所主张的社会主义原来是这样的社会主义！而不是空喊的口号。

那些被称为反社会主义分子们所反的，难道反的是这样的社会主义？这样的社会主义还反它干什么？

如果说，过去我对社会主义还有疑虑的话，现在我可成为了真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徒了！

看来，真社会主义还真是个好东西！

除了马恩主张的真社会主义，还有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

年青时曾读《共产党宣言》，仿佛记得马恩当年就曾批判过各式各样的社会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封建社会主义、基督教社会主义、工场社会主义、农民社会主义、无政府社会主义……说他们的屁股上盖着各色各样的徽章。

可惜马恩两位老先生没能活到二十世纪，没能见到打着他们的旗号的各式各样的社会主义：

有操着法西斯大棒疯狂屠杀异族人的希特勒社会主义。

有掌着镇压反革命大权大肆屠杀本党同志的斯大林社会主义。

有对本国实行民族灭绝几年间灭绝四分之一总人口的波尔布特社会主义。

有父传子子传孙家天下的金太阳社会主义。

有和老婆开夫妻店的齐奥塞斯库社会主义。

有掌权四十年又传位老弟的卡斯特罗社会主义。

据说，伊拉克的萨达姆，利比亚的卡扎菲，津巴布韦的穆加贝，还有缅甸的军政权等等，都宣称他们搞的就是社会主义。……

马恩老先生播下的社会主义龙种，却收获了形形色色的毒蛇和跳蚤。上

述种种社会主义，而今安在哉？“谈笑间，檣櫓灰飞烟灭。”

看来，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是不是社会主义，不在于挂的什么招牌，打的什么旗号，喊的什么口号。

譬如上节所列之形形色色伪社会主义，全打的社会主义旗号，如：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朝鲜社会主义民主共和国……与此相反，有些国家不打社会主义的招牌，甚至挂着封建君主的羊头，却贩卖着社会主义的什么肉，比如：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瑞典王国。

依稀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之初，我们的国家领导人陆续走出封闭的国门，到西欧、北美、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参观考察，看到那里工人农人的生活，不是饥寒交迫，不是水深火热，而是享受着完善的社会福利和政治自由，引发了他们的种种感悟。那位当时的总管说：我的工资还不如英国的搬道工；那位从南泥湾出来的人说：他们过的生活，就是我们追求的社会主义，只是少了共产党的领导。

在英国、在瑞典、在西欧北美，我们长期认为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甚至有些还挂着封建王室招牌，而我们认为具有社会主义的要素的东西在那些地方似乎已经成为主流。

我的乡梓先贤，不久前作古的谢韬先生，作为中共的革命老人，前些年在那篇引起争议的《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中，给我们介绍了北欧瑞典王国的社会主义：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瑞典虽是小国，瑞典社会民主党虽是小党，但它是民主社会主义的典范，它的经验具有普世价值，是对人类文明的伟大贡献。在民主宪政框架内，瑞典社民党依靠自己政策的正确，代表了广大人民的利益，得以连选连任、长期执政的经验；在经济建设中把效率和公平统一起来，实现同向分化、共同富裕的经验；正确处理劳资关系，调动工人和企业家两个积极性，实现劳资双赢的经验；有效地防止特权阶层出现，杜绝官员以权谋私、贪污受贿，长期保持廉政的经验。为我们在改革开放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成功的范例。

三年前，我自费随旅游团去西欧十余国掠影浮光，亲身体味了一番这些老牌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滋味：

在那里，国与国之间，甚至如德国、法国经历两次大战世代为仇的国家的边境，没有关卡，没有哨所，没有海关，没有铁丝网，没有巡逻兵，没有高速公路收费站，甚至连一块国界碑都没有，让一切人在这里自由顺畅进出……从这国到那国犹如从王府井到长安街。这不正是我们追求的社会大同么？

在那里，导游告诉我们，有的国家实行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制度，你一出生就被国家包起来，至到把你送进坟墓，当然，你得向国家缴纳高额的税赋。哪怕你失了业，你也可拿着失业救济金去国外游一游。这不正是社会主义的保障民生么？

在那里，每个地方的自来水都是可以直接饮用的，如果你因此而生病，地方政府将会被告上法庭。

在那重，很多名胜古迹如科隆大教堂、巴黎圣母院、古罗马斗兽场等……虽然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旅游参观者，却不收一分钱门票。

在那里，你在街边一站，汽车就会停下，司机就会微笑着请你先走，或

者问你需不需要帮助。

在那里，休息日的珠宝名表店的橱窗照样开着，你看不到保险门，看不到保安员。汽车停在路边虚掩着车门也不需要上锁。

在那里，还有蔚蓝得透明的天空，清新得醉人的空气，秀色可餐的草地上悠游的牛群羊群，立马可饮的森林边洁净的河水湖水，当然还有一座座悠久的教堂，一条条古老的街市……

从这里，我看到了社会是可以和谐的，世界是能够大同的。

从这里，我看到了社会主义到处都在生长着。

奥巴马竞选的系列政治主张，不正是被西欧北欧式的社会主义和平演变？

那些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社会未必是社会主义，那些不挂社会主义招牌的社会未必不是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已经不是少数几个国家的招牌，而是已经成为了人类进步的主要方向和文明主流。

再回过头来说于幼军先生的《社会主义在中国》。

于幼军先生能在全世界列宁、斯大林式社会主义式微之际，重新提出探讨社会主义在中国的课题，这确实需要审时度势的胆识。

于幼军先生说的社会主义在中国，讲的是 1919~1965 的史实，可见他对自文革至今的四十六年的变革，尚未进入他的视野，或者还缺少触及的勇气。

我不是史学家，也不是社会主义研究者，只是社会主义中国的亲身经历者。

就拿我们亲身经历的社会主义中国来说，前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和后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就大不一样。

比如：前三十年，经济上是越穷越革命，贫农最光荣；“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连新修的正统党史也不得不承认，在那和平年头，一两年就饿死了一两千万人，而领导干部却享受着“特需供应”；政治上是运动连着运动，一次政治运动，官方承认的冤假错案就以百万计，人被分成了“红五类”和“黑五类”等三、六、九等；外交上是打倒美帝！打倒苏修！打倒各国反动派！要去解放援助三分之二的世界人民！我们则天天自豪地高唱最红的红歌《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反动派被打倒，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

后三十年，总设计师宣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号召“要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虽然有人至今还在唱《社会主义好》的红歌，然而，右派分子被改正平反了，国民党反动派和我们称兄道弟了，帝国主义也夹着皮包回来了，而最关键的是我们的肚皮可以吃饱了。我们又被告知，我们还没进入社会主义天堂，至今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至于中高级阶段，还没被告知，据说还要经历十代二十代的奋斗才能实现，不但与我无缘，似乎离我孙子、外孙儿都还很遥远。

虽然近时又有“中国崛起”、“中国模式”之说，又令我想起了前三十年社会主义的神话。

对于中国当今的社会主义，执政党高级干部如于幼军者，对此领域都尚未触及，我也只好到此打住，按下不表。

而有一点却不得不表，有人借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抵御社会主义的“普世价值”。

其实，按照他们所信奉的“矛盾论”，矛盾有普遍性和特殊性，普遍性是一般，特殊性是个别，只有在承认普遍性的前提下才能存在特殊性。这就是说，普遍富裕+普遍民主=“大家好”——普遍幸福的普遍价值和普遍规律是第一位的，“中国特色”则是第二位的，任何以“中国特色”来抵御普世社会主义的说辞，都不是真社会主义。富裕、民主、幸福的真社会主义，可望而又可及。不是一句获得感就可以忽悠的。马恩关于未来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核心主张有五条：

一是实行普选制，形成社会主义议会；

二是基于普选制的分权制衡；

三是实行法治；

四是保障人权与公民权，并提出不是国家教育人民，而是人民教育官员；

五是国家公职人员原则上只享有巴黎公社时技工的生活水平。

可惜某些人高唱的社会主义却反着来。那只能是假的吧。

(5)“逆向淘汰”将毁掉中国！（作者 佚名）

1979年，数学家迈克尔·布林忽然考虑到儿子将来的前途，最终决定离开苏联，前往美国。于是，通过层层安检和几近羞辱的盘查，最终辗转维也纳，再到巴黎，然后坐上飞往纽约的航班。后来，他的儿子谢尔盖·布林，成为了科技巨头 google 的创始人。

这几乎是另一个版本的爱因斯坦。1940年，爱因斯坦因为不堪法西斯化的德国，以及对犹太人的迫害，最终定居在美国，并为其成功研发出人类第一枚原子弹，也因此提早终结了二战。

以当时原子弹无可比拟的威慑力，美国应该是唯一一个有机会统一全球的国家。然而，美国的领土并未因为战争扩大分毫，因为属于人民的国家，对领土没有欲望，我想这也应该是爱因斯坦选择美国的原因。

同样，google 公司也始终坚持“永不作恶”的宗旨。而且，它对人类的贡献，应该也是不亚于爱因斯坦的。目前在机器人，无人驾驶，生物技术，以及量子计算机等方面，引领着人类前进。

然而就是这样一家公司，由于拒绝向中国政府提供用户隐私数据，最终不堪刁难，于2009年退出了中国市场。随后，笑称中国人愿意拿隐私换便利的百度，霸占了中国的搜索市场。为中国网民提供了一个“卖假药”，为黑医院拉皮条，竞价广告大行其道的一个肮脏平台。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逆向淘汰，恪守原则的被迫离开，而贩卖用户隐私的生存了下来，并利用垄断优势，不断恶化市场。这种规则蔓延成势，便有了中国层出不穷的毒奶粉，毒疫苗，毒药酒以及毒食品事件。

如果说企业的逆向淘汰，是恶化了中国的商品市场，那么知识分子的逆向淘汰，直接恶化了一个国家的道德风气。

2015年，清华历史系教授秦晖的《走出D制》，在出版后不到一个月，便被勒令下架。次年，其本人也在校园内遭遇了一场蹊跷的车祸，而在此之前，也屡传“清华要整秦晖”的传言。最终，这位百科全书式的知识分子，迫不得已离开了清华。

巧合的是，在秦晖的《走出D制》一书中，有一位叫陈兰彬的历史人物，是清政府的一名外交官。此人明知洋人厉害，但回国却始终数落洋人的不好。因为他知道，这既迎合圣意，可以升官发财，又迎合民意，收获民粹追捧。因此，整个大清朝都沉浸在天朝上国的美梦中，直到国际联军破门而入。

而在秦晖被清华学术圈排挤的时候，同为清华教授的胡 x 钢，相继出了《中国：决胜百年目标》，《中国国情与发展》等陈兰彬式的书籍，开始混得风生水起。一边不断巡回演讲，一边吹嘘中国综合国力已全面赶超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掀起了一股“厉害国”的舆论风潮。

结果中国人又开始做天朝上国的美梦，倒是警醒了美国那边的右翼分子。在他们看来，这些数据和论证，都是出自清华教授，中国顶尖经济学者的文章，还能有错？于是贸易战来了…

作为知识分子，我觉得必须得是个有道德洁癖的人。这种洁癖首先体现在对真理的追求上，能坚持说真话，把真相带给公众。其次，是对正义的追求，这点与 google 的“不作恶”类似，不与恶为伍，不同流合污，是每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最基本的操守。

但是这些年，中国的高级知识分子，禁言的禁言，打压的打压。张维迎遭全网封杀；茅于軾被扣上汉奸的帽子；贺卫方被彻底禁声。敢于说真话的人已经比熊猫还稀少，倒是像胡 x 钢和周公公这种满嘴跑火车的人，各个混得人模人样。

中国知识分子界的逆向淘汰，以致整个国家浮夸浮躁，假大空盛行。不仅如此，由于中国的经济泡沫，和每年高歌猛进的通胀率，中国的富人们，也无不纷纷加入移民的大军。

招商银行和贝恩管理顾问曾联合发布调查报告，中国个人资产超过亿元的大陆企业主中有 27% 已移民，另外还有 47% 正在考虑移民。而胡润研究院和中国银行私人银行也曾联合发布调查报告，个人资产超过 1000 万人民币的高净值人群中，近 60% 的人士已完成投资移民或正在考虑。

这其中有裸官的子女，有追求财富安全的企业家，以及类如迈克尔·布林那样，给子女争取一个美好前途的知识分子。因为苏联式的国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的政府垄断了一切优质资源，除非你同流合污，才能从中分一杯羹。但美式的民主国家，一切资源都对人民开放，优质的教育，公平的商业竞争，开明的政治，良好的环境…

资源就如同水，而人恰如鱼，你若掐着源头，没有人会愿意在污浊的泥水里像泥鳅一样活着，或许这才是中国陷入逆向淘汰的根本。

易中天教授曾这样评价过中国的逆向淘汰社会，他说富人和知识分子选择离开，便带走了财富和知识。一个国家若留不住知识和财富，那么剩下的会是什么？贫穷和愚昧！贫穷和愚昧的人需要什么？他们需要一个皇帝。

因为这些人普遍缺乏独立的人格，对现代文明一无所知，没有追求平行权力的意识，也只有这些人，甘愿被权力奴役，又毫不自知。

资中筠也曾表达过对逆向淘汰的忧虑，因为有能力的人，都选择了离开，而并非留下来成为推动改革的力量，那么中国也就丧失了优化机制。

当然，我亦无比绝望，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小人得志的国家。因为正直，且有能力的人永远敢于挑战威权，只有无才无德的奸妄小人，才会通过依附权力来弥补自身不足。而依附权力之人，永远行奴才之事，欺下媚上，鱼肉弱小。所以，权力不死，小人永远有机可乘，而正义之士，始终将被逆向淘汰。

（6）张雪忠的犀利评论

（张雪忠：华东政法大学教授，著名的宪政研究学者，律师）

既然权贵和腐败是专制政治的必然产物，那么由当权者推动的任何不触

及制度的“反腐”行动，都不可能是真正的反腐或反权贵，其结果只是由新的一拨人，取代原来一拨人的权贵地位。

如果一个国家总是顽固地拒绝人类社会通行的普世价值，并且迟迟不肯建立以自由、民主和法治为基础的宪政制度，那绝不是因为这个国家有什么特殊的国情，而是因为这个国家有一个特殊的政府：这个政府本身极其败坏和不得人心，以致于根本无法通过公正的法律和诚实的手段，来维持自己的存续。

反腐败也好，反权贵也好，都不是政治改革的契机或前提。恰恰相反，政治转型才是反腐败和反权贵的前提。只有首先进行政治改革，才有可能防范新的腐败，并逐步清理旧的腐败。没有政治转型的反腐败，从来就没有成功的先例，并且最终都会沦为权力斗争。

没有民主，就不可能遏制腐败；不能遏制腐败，就不可能改善民生；不改善民生，就谈不上社会发展。一切问题根源，就在缺乏民主；一切问题的答案，就在于实现民主。我从来不相信，中国人竟会低贱到连享有民主权利的资格都没有；我一直都以为，那些剥夺中国人民主权力的人，才是中国人真正的敌人。

一个国家的主权者应该是全体国民，而不是其中任何一个政党，一个政党只包含一小部分国民，这些国民并不能因为组成了一个政党，就可以取得国家的主权，进而取得支配其他国民的权力；既然全体国民是国家主权的享有者，那么他们就应该是一个国家之内的自治者，而不是被治者。

如果我们真的希望中国成为一个自由、民主的法治国家，我们就应该努力在自己的手里建成这样一个国家。一个最不负责任、最没有出息的民族，总是喜欢把最艰巨的任务留给下一代。一个能够切实保障个人自由、政治民主和社会公正的宪政中国，是我们所能给予自己的孩子们的最好礼物。

40多年前，一个心理失常的领导人发动了一场政治运动，害死了成千上万的人。今天，一些受害者的家属却对这个迫害狂尊崇有加，这实在是令人称奇的心理现象。其中最荒谬的理由是“他缔造了这个国家”。**谁也不可能缔造一个国家，这个国家一直就存在着，他只不过是攫取了它的统治权而已。**

在我未成年时，一直是我的父母养活着我；在我成年之后，我开始通过诚实的劳动养活自己。我从来不认为这个党、这个政权或这个体制，曾养活过我哪怕是一秒钟。有些人认贼作父、自我作贱，竟然认为自己一直是由这个党、这个政权或这个体制养活的；我很想问问这些人：你们对得起生你养你的父母吗？

一些中国人为表达对日本的抗议，竟理直气壮地毁坏和抢夺另一些中国人的合法财产，这是多年来爱国主义教育的恶果。中国的爱国主义教育实质就是党化教育，它不但扼杀人的理性，使人失去独立思考和分辨是非的能力，还使人逐渐失去宽容和善良的美德，不再懂得尊重和关爱自己身边的每一个人。

当前的中国，迫切需要启动去马克思主义化的进程，这并不是要禁止它的传播，而是要取消其在中国的神学地位，恢复中国人理性和良知的至高无上的权利。让13亿中国人，以一种全民自虐的方式，臣服于一个西方人的哲学，并成为一种终其一生也无法实现的幻想的奴仆，这既不合乎理性，也不合乎道德。

向一个本身不正义的制度索要正义完全是行不通的；实现正义的前提是

努力改变目前这种不公正的制度。不过，当事人及其律师的努力和付出，仍然很有价值：它可以将制度的野蛮与不公，以具体的方式展现出来，并让更多的人看清问题的实质！

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在没有赢得批评政治人物的自由前，绝不会急着去赞扬他们或他们的老婆。

如果在一个国家领导人可以指令学者如何研究哲学，那么哲学在这个国家基本上就已经死亡了。同理，如果一个国家领导人可以指令人民如何生活，那么这个国家人民的生活基本上就已经死亡了。

今天，决定性的因素已不是他们在做什么，而是我们该做什么。

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在专制国家，唯一有说服力的改革信号，就是释放在押的政治犯和良心犯（南非、韩国、缅甸和台湾地区莫不如此），衡量改革是否真诚的标准，就是看是否开放两禁。那些能从一份会议公报中解读出改革信息的人，一定是具有特异功能的超人，因为他们能从“无”中看到“有”。

任何一个国家若抗拒民主政治，真正的原因绝不会是因为民众素质太差，而只能是因为官员素质太差。只有一种不民主的政治制度，才能让大量粗鲁、愚蠢、贪婪和野蛮的官员身居高位，不受约束地作威作福。

对于那些经过选民投票而取得国家领导权的日本政治人物，中央电视台接二连三地贬之为政客；对于那些未经国民授权而窃取国家权力的政治人物，这些人本质上就是一帮政治强盗，中央电视台却极尽逢迎和吹捧之能事，由此可见，只有那些把灵魂出卖给了魔鬼的人，才适合担任中央电视台的负责人。

对公共事务，无论是单纯的评论，还是实际的参与，都是具有公共涵义并需接受公共舆论检视的行为。因为他人没有“行动”，就说他人欠缺批评行动者的资格，这是没有道理的。我诚恳地提醒有意参与公共事务的朋友：千万不能指望自己的言行能免于批评；你唯一能做的，是努力让它们经得起批评的考验。

我只想指出，从薄、徐、周和令等人的落马，人们可以发现，那些曾经大权在握，长期统治着中国的高官（及他们的家人），不但权欲熏心，贪腐成性，而且连杀人越货的勾当都干得出来；他们连自己的孩子都教育不好，却整天以十三亿中国人的道德导师自居，整天在嚷嚷着要领导中国人提高道德素养！

(7) “两头真”现象（本文转载自百度）

自从2008年老伴去世，杜润生基本一直住在医院，但仍在为农民发出声音。

2011年1月，《财经》杂志刊发了对这位98岁老人的专访，该刊记者在纸上提问：“您曾经说，中国要过两大关：民主关、市场关。在您看来，农民的出路在哪里？”杜润生用笔在“民主关”“市场关”之后写下了三个字：“自由关”。

杜润生的秘书李剑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老头儿”的语言能力早就明显下降。2007年，当南方周末采访杜润生时，所有的交谈只能通过纸笔来完成，但他偶尔挤出的话语却清晰有力。记者递纸条问他：中国的改革最需要警惕的是什么？老人不假思索，用洪亮的山西太谷口音说：权贵资本主义。

“早年实现自我，中间失去自我，晚年又回归自我。”这是2000年，原

新华社副社长李普撰写《悼胡绳》时，援用蔡仲德评论他老丈人冯友兰的话，评价原社科院院长胡绳。《炎黄春秋》副社长杨继绳据此归纳出“两头真”——意即“年轻时代为追求真理真诚地参加革命，离休以后大彻大悟，真诚地面对社会现实”——这个词迅速成为党史研究热词。原中顾委委员、文艺理论家周扬等人，都曾被评价为“两头真”。

2004年，原中顾委常委、国务院原副总理张劲夫更主动“对号入座”，发表《我也是个“两头真”》：“年轻时，面对要当亡国奴的危险，提着脑袋找共产党，加入革命行列，真心抗日救国；年老时，经历了党内外诸多有疑问的事，真心反思，以求弄通，不当糊涂人。”张劲夫是目前仍在世的原中顾委常委。上文为其自编的《嚶鸣·友声》文集自序，其中收录了原安徽省社科院院长欧远方的3篇文章《前苏联垮台的教训是什么》、《封建残余是社会发展的障碍》和《反腐败呼唤政治体制改革》。

蒙受13年牢狱之灾的原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反思文革时，也检讨自己：“我做中央宣传部长这么久，我的工作犯了很多错误，斗这个斗那个，一直没有停。许多是毛泽东同志嘱咐的，我照办了，我有对毛泽东同志个人崇拜的错误，也有一部分是自己搞的，当然由我负全责。”“……要让孩子上学！……要让人民讲话！……”1996年5月，病危的陆定一留下这样的遗言。晚年的陆定一，住在北京医院十余年。《陆定一文集》编者陈清泉曾回忆，1990年底，陆定一为这部文集写了一篇长达万字的自序，就此搁笔，至去世，这位担任中宣部部长长达22年的“党内才子”，再也没有公开发表文章。“他晚年对新闻工作不满意。”他的儿子陆德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作为至今仍被大学教材采用的“新闻”一词的定义者，陆定一反对笼统提“新闻为政治服务”口号。

在陆定一去世10年之后，陆德整理发表了陆定一晚年的一些反思，其中提及：对历史问题的处理和政策上，应“宜粗不宜细”，但对历史教训的分析和总结上，则应“宜细不宜粗”；惩治党内腐败，光有“自律”不成，还要加上“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的作用；党的“双百”方针，应该用“二元论”来解释，不应用单纯阶级斗争的“一元论”理论来指导；“自由”是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核心价值部分，对自由和民主的分析，应是“扬弃”，而不是“抛弃”。

老人们还往往回溯到自己最初的理想上。出生于五四运动前夜的任仲夷，和他的至交好友经济学家于光远，都是因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而选择追随共产党。2000年的一天，任仲夷和几个老干部吃饭，突然放下筷子问：“你们说说，年轻的时候，我们追随共产党究竟是为什么？”见大家面面相觑，他又自言自语地说：“还不是为了建立一个民主、自由、富强的国家吗？”

（8）应为社会主义正名

此文为国务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前副总干事长何方的文章，读了何老的文章使我震惊和恍然大悟，原来今天的英、法、德、奥、瑞、芬等甚至整个西欧，搞的才是社会主义，是民主社会主义。而那些自称是社会主义的国家其实并不是社会主义。这个大问题澄清了，其它许多问题也就都清楚了。真社会主义是好的，不好是假社会主义。

1991年12月26日，也就是在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的第二天，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最后一项决议，宣布苏联停止存在。自此，苏联正式解体，一个曾经傲视世界的超级大国彻底消亡。

和平静的俄罗斯不同，在苏联解体 20 周年之际，中国社会各界围绕苏联解体发生了激烈争论。其原因，就是因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从苏联学习来的。就像 105 岁的中国学者周有光先生所说的，今天的中国“略作修正，未脱窠臼”。

“苏联垮台不是因为外来敌对势力的武装侵略或和平演变而垮台的”，国务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前副总干事何方先生坦率地说，“**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权是被人民抛弃的。**”

今年 89 岁高龄的何方先生，上世纪五十年代曾经担任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研究室主任，在张闻天大使领导下在苏联工作了五年。八十年代后期到九十年代，他在国务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从事国际问题研究，苏联是关注的重点，又曾任中苏和中俄友协副会长，先后多次访问过苏联和后来的俄罗斯，对于苏联解体既有近距离观察，也有深入的思考。

何方先生没有孤立地看待苏联解体，而是将其放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背景下来审视。在他看来，“民主社会主义国家探索的道路是基本正确的，共产党领导下的斯大林模式则是错误的和失败的。这就是二十世纪作为人类社会历史重大特点的社会主义运动已经做出的结论。”

何方先生呼吁，按客观标准为社会主义正名，“恢复有史以来人民心目中的社会主义名誉。”

苏维埃政权是被人民抛弃的

马国川：20 世纪历史波谲云诡，其中苏联解体是一个震惊全世界的重大历史事件。在苏联解体 20 周年之际，各界人士都在热议和反思：为什么一个曾经与美国比肩的超级大国竟然一夕崩溃？您对这个问题有何思考？

何方：1990 年 4 月我曾经率中苏友好协会代表团访问苏联，回来后就在政协小组上断言“苏联气数已尽”，受到一些同事的批评和质疑。1991 年 3 月，我再次访苏，亲眼看到苏联开始崩溃。当时社会秩序极度混乱，我们作为苏联科学院的客人有时竟然一天吃不到饭，只得晚饭时混到一个学校师生队伍中排队领取一大勺菜饭。

苏联为什么会解体？俄罗斯共产党主席久加诺夫归纳的最好，根本原因是由于苏联共产党及其领袖对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实行三个绝对垄断。结果是，经济没有搞上去，还和美国进行军备竞赛；政治上专制恐怖、完全脱离群众，意识形态僵化，使社会处于窒息状态。

马国川：苏联共产党一再声称代表人民利益，为什么会蜕变成为一个垄断权力的专制政党呢？

何方：这和列宁的建党学说有关。**列宁的建党学说比较显著的特点是：一党专政、不讲民主、高度集权、绝对服从、铁的纪律、严格保密、依靠暴力、忽视人权等。**这种政党一时和在一定条件下确实有战斗力，所以能够用“十月革命”（政变）取得政权。后来斯大林和苏共也正是依靠这些才建立起两个超级大国之一的苏联，并保持了七十年的存在。

可是，在这样的政党领导下，不但离马克思设想的“自由人联合体”越来越远，还导致经济落后。据西方几个权威机构联合调查，苏联解体前的 1989 年，国民生产总值只有 5120 亿美元，不到美国的十分之一。**俄罗斯官方也承认，苏联的粮食产量直到垮台时也没有超过沙俄时的最高水平。另外，苏联的政治独裁、专制程度和滥杀无辜却大大超过沙俄，文化也长期凋敝，所以共产党领导和苏维埃政权终被人民抛弃。**

马国川：其实，苏联存在的七十多年也有很多成绩，例如，实现了工业化，取得了卫国战争的胜利，打败了希特勒等。因此，现在国内一些人士坚持认为，并非苏共本身有问题，而是由于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背叛了苏共，搞垮了苏联。

何方：一两个人就能够搞垮一个超级大国？这是典型的“英雄史观”，并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据我所见所闻，苏联人民就不这样看。他们认为，沙俄经济在一战前，无论总体还是人均，还都处于欧洲前列，落后的是技术和制度。只是“十月革命”后，列宁、斯大林创建了苏联模式，违背人类历史发展的两大潮流——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才使苏联走向落后。例如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三国，二战前的经济水平不低于瑞典、芬兰等邻国，地理条件还优越些，但加入苏联后很快就落后了。1980年当瑞典、芬兰人均产值已达一万五千美元左右时，它们只不过四千美元左右，还是苏联各共和国中最高的。至于自由、平等、民主等就更谈不上了。这不值得深思吗？

在苏联解体期间，我有一次去了列宁格勒，那里正酝酿投票改名问题。我曾问到坚决主张改名的一位二战中卫城英雄，为什么要恢复旧名。他以沙皇时物质文化生活在欧洲的地位和后来的苏联相比，无限伤感地认为“十月革命”搞错了，说二月革命后多么自由呀，要是此后只着重于实行民主、发展经济，俄国现在决不会处在全欧洲平均水平之下的落后地位。

民主社会主义国家探索的道路是基本正确的

马国川：在您看来，苏联走的是一条历史歧途，苏联共产党的垮台和苏联的解体都是必然的。

何方：是的。我们还可以把苏联解体放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背景下来考察。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兴起于十九世纪，在二十世纪共产党执政的、号称社会主义的国家并非只有苏联一家。但是这些国家都学习苏联模式，经济上消灭私有制、实行单一的公有制、计划经济，国内商品短缺，对外闭关自守；政治上坚持一党专政和党管一切，实行高度集权的一元化领导体制的人治和个人崇拜，民主限于形式，实际上不讲自由、平等、人权、公正；意识形态上实行一党垄断和严格管制，禁止思想信仰、新闻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暗箱作业，思想僵化，不容说理，禁止争鸣。因此，这些国家普遍经济不发达，社会不成熟，政权不稳定，时间一长，就难以为继，非垮台不可。

马国川：事实上，在苏联解体之前，东欧各国的共产党已经纷纷下台。

何方：苏联和东欧各国的共产党不是因为外来敌对势力的武装侵略或和平演变而垮台，而是在同资本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竞赛中自行崩溃的。

以往的宣传把民主社会主义称为“修正主义”，实际上，它同样是一种社会主义实践。1919年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彻底分裂后，主要分成两大流派，一是宣布实行社会民主主义的第二国际和各国工党、社会民主党，一是宣布实行共产主义的第三国际和各国共产党。双方都承认信仰马克思主义，开头时还都自封“正统”，但却互不承认，势不两立。在二战之前，社会民主党已经在瑞典、芬兰等北欧执政。二战后，工党、社会党长期在英国、法国、德国、荷兰、奥地利等国家执政。这就使不但北欧，而且整个西欧也都成了民主社会主义。

马国川：那么，民主社会主义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实践的结果怎么样？

何方：1951年，“法兰克福会议”通过的宣言提出，“民主社会主义的

目标和任务”是“扩大民主，把权力交给人民”，“使自由人能以平等地位在社会中共同工作”。民主社会主义的原则是“自由、平等、博爱、民主”，经济上实行混合所有制和有国家适当调节的市场经济，建立体现平等原则和博爱精神的社会福利制度，允许意识形态多元化，上层领导和广大群众对马克思主义或者原来就不信仰或者已经迅速淡化。

民主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党执政的国家，是二十世纪两种社会主义模式在进行竞赛和比较。实践检验的结果是，民主社会主义取得程度不同的胜利和成功。以瑞典、芬兰为例，这两个国家在二十世纪初还是欧洲最落后的国家，而且气候条件恶劣，但到20世纪70年代，它们的富裕程度已名列欧洲前茅，真正做到了经济繁荣、政治民主、自由充分、福利完备、社会稳定，消灭了等级制和特权，总理、部长在工作时间配用专车的不到五人，首相或总理的家庭也不配备服务人员。更没有工资的“含金量”差别极大和什么正部长级的副部长、以及医疗、住房、用车等分类的“正部级待遇”、“副部长待遇”这些怪名堂。基本上消灭了三大差别，做到了普遍富裕。

无论按文明和现代化的哪条标准衡量，共产党领导的国家都大大落后于民主社会主义国家。这决不能以起点低、底子薄为借口，看一下南北朝鲜的差距就行了。所以两相比较和衡量，民主社会主义国家探索的道路是基本正确的，共产党领导下的斯大林模式则是错误的和失败的。这就是二十世纪作为人类社会历史重大特点的社会主义运动已经做出的结论。**“苏联东欧的变化是历史发展的进步”**

马国川：对于苏联东欧的变化，至今在国内激烈争论。一些人士认为，这是社会主义事业的挫折和历史的倒退。

何方：坦率地说，我不同意这种观点。苏联东欧原来的社会制度算不得是社会主义，后来的变化倒是历史发展的进步，因为它结束了阻碍社会前进的经济模式、专制体制和思想禁锢。而且事实上，这些国家的人民也是基本上认同这一看法的，否则他们也很容易再和平演变回去，只要选举那些持过去共产党观点的人再执政就行了。这也不是空口宣传哪个制度优越性大的问题，而是完全可以由实践逐步证明的问题。这些国家变化的时间并不长，但绝大多数已开始显示出比变化前要优越，不但建立了较前民主一些的制度，经济发展也快了许多，而且原有的社会保障制度大多得到保留，不少国家还有所充实和增加。俄国经济从1999年开始起飞，年均增长6%，到2006年经济总量增加了70%，但人均实际收入却大大超过这个增量。最近，俄罗斯正式获准成为世贸组织新成员，这将有助于俄罗斯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为俄经济健康稳定发展提供助力。

2010年1月，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在国务委员会会议上发表讲话说，“我们的人民既然选择了自己道路，就绝不会再回到原苏联时期的政治体制。我们将拥有一个现代的政治体制，这个政治体制要建立在可遇见的未来的基础之上。”他还说，“不会回到原苏联时期，不完全是因为经济关系，俄罗斯国内没有一个人愿意再回到原来的政治体制中去，我们正在沿着自己选择的道路向前走。”

马国川：现在苏联确实有些人怀念苏联，怎么解释这种现象呢？另外，在最近的国家杜马选举中，俄罗斯共产党被认为是最大赢家，得票率近20%，而四年前它的得票率仅在11%左右。

何方：许多人留恋过去也很自然，但多是老年人，全民大多数并不要求

重新回到过去。许多人怀念苏联的大国地位，一些老年人则留恋苏联时期某些更为平均的社会福利政策。

马国川：俄罗斯的民主转型并不顺利。不久前俄罗斯就爆发了转型以来的最大规模游行示威，抗议选举舞弊，抗议普京与梅德韦杰夫的政治“二人转”。您怎么评价这种现象？

何方：向民主制度过渡，没有哪个国家会完全顺利。俄罗斯现在还算不上民主国家，人民还没有经过较彻底的启蒙，还处在半不成熟状态。普京和梅德韦杰夫的“二人转”，就说明俄国政治和群众觉悟还包含威权主义成分。反对杜马选举舞弊的游行示威，既说明选举有舞弊，不够公平和透明；也说明俄国人民已有相当的民主权利。在共产党当权的国家就没有游行示威的自由。至于俄共得票率上升，一是说明俄共路线和苏共相比已有根本变化，更多地反映了选民要求；二是说明选民对统一俄罗斯党的不满在增加，因而改投俄共。

恢复社会主义的名誉

马国川：从世界范围看，社会主义五花八门。据统计，自称社会主义的国家，曾多达七十余个，遍布亚非欧拉美。在您看来，如何区别社会主义？

何方：什么是社会主义？这至今还是一笔糊涂账。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精神和二百年来对社会主义的研究与实践，我个人的理解是，社会主义国家或社会，大体要具备以下几个基本条件。

第一，发达的生产力和丰富的产品，这样才有可能实现社会主义的一些基本要求和条件，如消灭三大差别，建立完善的福利制度等。

第二，混合所有制和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由于发展生产和市场经济的需要，社会主义初期必须以生产资料私有为主，然后逐渐发展到马克思说的社会占有（亦即个人所有）和按劳分配为主。这和以国家或人民的名义占有和分配社会资源不是一回事。

第三，自由、民主、平等、人权、宪政、法治。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而自由则是民主的前提和基础。不实行宪政法治，也会成为没有正常社会秩序的无政府主义。而法治又必须排除等级制和特权，建立在平等公正的基础上。所谓平等，是指政治法律上的平等、社会生活和人格上的平等、公民在谋求利益和自身发展上的机会均等，而不是物质享受和社会责任上的平均或等同。

第四，高尚的道德文化和健全的社会福利。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具有高度的精神文明和完整的社会保障，有发达的科学文化，良好的社会制度和风俗习惯。社会讲求公开性和光明正大，反对暗箱作业和阴谋诡计。根据平等原则和博爱精神，建立一套健全的社会福利体系，使人人享受到幸福，社会处于和谐、稳定。

马国川：这四条标准中，第二、三条最容易引起争议，因为一些人至今认为，社会主义就应该一大二公，自由、民主、宪政等也被斥为资产阶级的专利。

何方：怎样对待市场经济和单一公有制（实为国有制），近百年的社会主义实践有重要的教训。事实证明，不实行市场经济、坚持单一公有制的社会主义是迟早要垮台的。

民主和社会主义，在涵义上几乎等同。没有民主的社会主义，只能是君主专制主义或法西斯主义。不讲自由，只讲愚民政策和镇压，当然也不是社

会主义。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贫富差距过大也不是社会主义。所以过去斯大林模式的国家实行的不是社会主义，这是苏东巨变已经作了结论的。

马国川：与您提出的四条标准不同，长期以来，国际共运中始终只认一个标准，就是只看它是不是由共产党领导。

何方：确实如此。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当时主管工业的副总理王震去英国进行调查访问后，对陪同人员谈到他的观感时就说，“我看英国搞得不错，物质极大丰富，三大差别基本消灭，社会公正、社会福利也受重视，如果加上共产党执政，英国就是我们理想中的共产主义会。”

只要是共产党领导，不管实际上是残暴统治、万马齐喑、饿殍遍野、居民外逃，也还是社会主义。否则社会主义因素再多，但不是共产党领导，就只能是资本主义。这真是一种完全违背马克思主义和蛮不讲理的狭隘宗派主义！因此，必须改变这种只看标签的办法，而按客观标准评定一个国家的性质看它所含的社会主义因素有多少。社会主义因素多的国家，不管它是由什么党领导和人们怎么称呼，都应定为社会主义国家或走向社会主义的国家。离上述标准太远的国家，即使一切完全由共产党控制，也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只有按客观标准为社会主义正名，才能恢复有史以来人民心目中的社会主义名誉。

这是一篇很有说服力，又有理论价值的文章。此文仅转献给那些关心国家命运的朋友

（9）普京在莫斯科“悲伤墙”落成典礼上的讲话

2017年10月31日，为悼念前苏联黑暗统治时期政治镇压受害者而修建的纪念碑“悲伤墙”在莫斯科揭幕，俄总统普京出席揭幕仪式。这座青铜雕像是俄罗斯第一座国家级纪念碑，整体是一座弧形的墙，形似一把巨大的镰刀，由许多参差不齐、面目不清的人形构成。雕塑家 Georgy Frangulyan 说，这个设计的含义是，一个压迫性的国家机器像割草一样扼杀了许多无辜的受害者。在墙中间有一些缝隙，他希望人们能够走进去，用自己的肩膀亲身感受历史的重压。

这个纪念碑通常被人们叫做“悲伤墙”，是巨型青铜的雕塑。反映了一群在前苏联，遭到斯大林等当权者迫害的人们样子。为这些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建造纪念碑的想法，在戈尔巴乔夫主政时期，就曾经被讨论过。

普京说，十月革命百年之际，这个地点的开放显得尤为重要。希望这个日子，能被俄国社会，用来作为划分曾经造成国家与人民分裂的戏剧性的历史事件，与当下的分界线，并成为我们克服这种分裂的象征。

以下是演讲全文

今天（2017年10月30日）是个特殊的值得纪念的日子，已经25年了。是我国各民族共同纪念政治清洗受难者的日子。对于我们所有人，对于未来的世代来说，了解并记住我们历史上这一悲惨时期是非常重要的。

当时各个阶层、全体人民：工人、农民、工程师、军官、宗教界人士和国家公职人员、学者、文化界人士都遭遇了残酷的迫害。大清洗不吝惜人才，不吝惜为祖国做出贡献的人，不吝惜对祖国无限忠诚的人，每个人都可能以杜撰的、荒唐的罪名被指控。几百万人被控为“人民的敌人”，被枪毙或遭受精神折磨，饱受监狱、集中营和流放之苦。

这段可怕的过去不能从民族的记忆中抹去，尤其是不能以任何方式、以任何最高的所谓人民的利益为名而正当化。

在我国历史上，同在其他国家的历史上一样，不乏那些复杂的、矛盾的时期。人们争论，寻求各种方法解释这样、那样的事件。这是寻找真相和真理的一个自然的过程。但当论及大清洗、上百万人的死亡和苦难时，就到布多夫斯基（Б у т о в с к и й п о л и г о н）那些受害的兄弟们的墓碑前去看看就足够了，成千累万的冤魂沉睡在墓碑之下。这样的地方在俄罗斯有很多，也就明白了任何要淡化或抹掉这种罪行都是不可能的。

政治镇压对于我们的全体人民、对于全社会来说都是悲剧，是对我们的人民的沉重打击，包括它的根基、文化和自我认知。直到现在我们依然在承受着这种迫害的后果。

我们的义务是——永远不忘记。

记忆本身、评价这些黑暗的历史事件所持立场的清晰和明确将是避免历史重演的强大的警示。

所以，两年前俄罗斯联邦政府通过了关于永久纪念政治迫害受害者的国家政策的基本要旨（К о н ц е п ц и я），设立了纪念基金会。

关于设立纪念碑纪念政治迫害受难者的构想是在多年前的“解冻”时期提出来的，但相关材料只是最近几年才准备充足。

今天，我们在首都的中心地段为“悲伤之墙”揭幕。这座纪念墙是宏伟的、感人肺腑的，不论是它的内涵，还是它的造型。它唤醒我们的良知和情感及对受害者的深切同情，促使我们诚实地思考那段历史。

诚挚地感谢纪念墙的设计者——Г е о р г и ю В а р т а н о в и ч у Ф р а н г у л я н у，感谢莫斯科市政府承担了大部分资金支出，感谢那些为创立纪念碑而做出贡献的公民。

最后，我想请求娜塔莉娅·德米特里耶夫娜·索尔仁尼琴娜允许我引用她的话“了解，记住，审判，这之后才可能原谅，”我完全赞同这句话。

是的，我们及我们的后代应该记住大清洗的悲剧，记住它的根源。但这并不意味着清算。不允许再次将社会推向危险的对立境地。

现在，对于我们来说重要的是信任和稳定。只有以此为基础我们才能解决我们的社会和国家所面临的问题，俄罗斯，它是我们的唯一。

再次感谢纪念墙的设计者，感谢所有参与创建此纪念墙的那些人。这座纪念墙对于我们、对于我们今天的整个国家是重要的，对于年轻人、对于明天、对于俄罗斯的未来更重要。

谢谢！

普京的发言并没有什么慷慨激昂的高调。仅仅概述了当年政治迫害的严重后果，强调这种罪行不可能洗白。并表示：“在十月革命一百周年到来之际，这一地点的开放则显得尤为重要。”

普京说：“这段可怕的过去不能从民族的记忆中抹去，尤其是不能以任何方式、以任何最高的所谓人民的利益为名而正当化……”

11月7日，所谓十月革命100周年纪念之际。俄共举行庆祝游行和招待会，不过总统普京选择缺席这些活动。据11月3日媒体报导，普京在电报中对这一纪念日表态说：“在这个具有纪念意义的年份，社会活动家、学者和媒体代表对这一时期进行深刻、全面的反思，表达各种各样、有时相反的观点和评价是理所当然的”“同时我相信，即使是最激烈的论战也应基于事实和文件，基于对过去客观、尊重的态度。”

对于普京的低调，外界有分析认为，这反映了普京的矛盾心态。一方面，

他或许难以完全否定那段历史，而另一方面，列宁、斯大林的残暴和对人民的迫害已经被充分曝光。共产党执政对俄罗斯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重创是显而易见的。另外，苏共垮台和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各地树立了许多政治迫害受难者纪念碑，而“悲伤之墙”是第一个全国性的纪念碑。这表明，今日的俄罗斯政府承认苏共政权过去的犯罪行为。普京 10 月 30 日的讲话更明确地印证了这一点。

相较于普京的反思态度和“冷处理”，中共则有高调的表现。据报导，中共某官员在俄罗斯访问时盛赞十月革命的成果。共青团中央 11 月 7 日在微博上宣称：“我们来了，我们成功了……”古巴前独裁者的相片赫然在目……

成功不是喊出来的。俄罗斯媒体指出，共产革命令俄国浪费了一百年的时间。这还不包括近两千万生命的非正常死亡。那么中国呢？

普京的两番表态，就是打在中共脸上的巴掌。今日，在红色政变的发起地，从官方到民间，各个层面的反思以及扭转黑暗的努力，在进行着。许多苏共领袖如列宁和斯大林的雕像被推倒；许多受难者的纪念碑，被树起。大批的历史档案，被公开。普京陈述的苏共罪行，一桩桩、一件件，不也都发生在中共治下的中华大地吗？土改、整风、三反五反、反右、文革、六四、镇压法轮功、迫害维权律师、制造冤案错案、活摘器官、封杀真相。八千万生灵消逝，辉煌文明被践踏。中共之罪，有过之而无不及。

自从共产主义幽灵在欧洲上空飘荡，到一个个共产党政权建立，再到苏联、东欧剧变和全球去共产化，众多的东西方学者、专家和民众一直致力于揭露共产主义的本质和罪行。共产党集邪恶之大全，共产党政权在不同国家的罪恶有目共睹：生灵涂炭、真相封闭、信仰迷失。

十月革命，引发了长达一个世纪的人类浩劫。百年过后的节点，实为深刻反思的时刻。唯有清醒，才能自救。然而，中共罔顾事实，自欺欺人，难掩尴尬。硬要死撑红旗，继续压迫人民，以谎言洗脑、以暴力压迫，以恐怖维稳，这样的政党，将面临何种结局？历史的审判，从来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谴责和抛弃这个邪恶的党，才是对生命永远的救赎。

(10) 从建国 60 周年大阅兵想到的

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第 14 次大阅兵，是进入 21 世纪以来第 1 次大阅兵。

中共一贯认为枪杆子无所不能，和平时期军队的主要作用就是威慑，而阅兵就是一种常用的威慑手段，是国家使用不流血的军事方式来解决军事问题和政治问题的重要工具。阅兵历来被中共认为是树党威、扬军威的最好方式。更是对国内外敌对势力的震慑。

建国 60 周年大阅兵于 2009 年 10 月 1 日上午 10 点正式开始，阅兵式结束后，领导人发表讲话，随后阅兵分列式进行。

由 10 万各界群众、60 辆彩车组成的 36 个方阵和 6 节行进式文艺表演将依次通过天安门广场中心区，与广场上 8 万青少年呈现的背景图案相呼应，在长安街上展现共和国流动的历史进程。群众游行分为“思想篇”“成就篇”“未来篇”三大篇章和七个部分。游行队伍中着意展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的巨幅画像。1949 名青年高擎国庆游行历史上最大的五星红旗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随后是 2009 名青年簇拥的巨型国徽。

纵观中共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担任过中共中央主席的有陈独秀、向忠发、瞿秋白、秦邦宪、张闻天、毛泽东、刘少奇、华国锋、赵紫阳、胡耀邦、江泽民胡锦涛。担任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有毛泽东、刘少奇、华国

锋、李先念、杨尚昆。

邓小平只当过一阵子中共总书记（当时毛泽东任中共中央主席）并没有当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为什么只选了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四个人的巨幅画像呢？毛泽东是“一党专政，个人独裁”的始作俑者。邓小平是“刚愎自用，独断专行，指派军队血洗天安门广场”的幕后指挥。胡锦涛读书时期即被任命为政治辅导员，是监督他人言行，众人皆侧目视之的人物。刻板、平庸、懦弱、低能的胡锦涛担任总书记的那两届中共中央整体性地呈现出一潭死水的现状，坚持消极改革、积极维稳的方针，很明确地以只救急、不改制为总体执政目标，甚至偶尔还有一些返毛复古的政治动作，60 周年国庆大典居然抬出了“毛泽东思想万岁”的文革标语。2004 年 10 月胡锦涛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称：“朝鲜和古巴政治上是正确的，他们的经济困难是暂时的，我们应当向他们学习政治”，同时胡氏还公然谴责哥尔巴乔夫是共产主义的叛徒。俨然是个专制独裁的卫道者，改革开放的绊脚石。江泽民知道，他自己无论资历、贡献、在党内的威望，还是从个人的理论水平和驾驭全局能力讲，远远不如毛泽东和邓小平。尽管讲了十几年的第三代的“领导核心”（从 1989 年起到 2002 年党的十六大下台），但在 2003 年全国人代会改选新的国家领导人以后，就再也听不到“核心”的说法。恐怕在今后的史书上，也不会再提什么“三代领导核心”这一无聊的、庸俗的、带有明显封建烙印的东西。至于“四代、五代、……”这种沿袭封建意识的妄想更只能是邯郸一梦[1]。

江泽民担任国家主席期间，于 1991 年 5 月 16 日签署《中苏国界东段协定》、于 1994 年 9 月 3 日签署《中俄国界西段协定》、于 1999 年 12 月 10 日签署《关于中俄国界线东西两段的叙述议定书》、2000 年 12 月 25 日签署《中越北部湾划界协定》、2001 年 10 月 27 日签署《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等等一系列重大割让国土“背叛国家罪”事件。造成中华民族新的耻辱和国土丧失，致使中华民族以签约形式，损失了一百六十余万平方公里疆域和 3.2 万平方海里水域。这是江泽民任国家主席期间，在中华民族历史上集中签署卖国条约最多的时期。上述四人皆为“一党专政”之宿将，镇压民主之能手。依靠这样的人及其“理论”改革开放，还名之曰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实属痴人说梦。

回忆中共进入北平之初最流行的歌曲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和《团结就是力量》。歌词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共产党辛劳为民族，共产党他一心救中国，他指给了人民解放的道路，他领导中国走向光明，他改善了人民生活，他实行了民主好处多”“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力量，这力量是铁，这力量是钢，比铁还硬 比钢还强。向着法西斯蒂开火，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向着太阳 向着自由，向着新中国发出万丈光芒。”两首歌都宣扬共产党是向往民主、向往自由的党，是要“向着法西斯蒂开火”的党，是要“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的党。然而，毛泽东进入北平以后，自以为坐上了皇帝宝座，施行的是比古今中外历代暴君都要残暴的统治。不仅对广大民众一味盘剥、残酷镇压，对帮助他夺取天下的功臣也大开杀戒，诸多从井冈山时期就追随他的名臣宿将都在“文革”期间被迫害致死。毛泽东的罪恶是不可轻饶的。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民主的潮流势不可挡。噩梦醒来已是朝霞满天，书写了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正以排山倒海之巨流，涤荡着一切污泥浊水。

一个民主、自由、繁荣、昌盛、文明、和平的中国在扫除了害人虫、肃清毛泽东的遗毒以后，必将以崭新的面貌屹立于世界东方。

附注：

[1] 《邯郸梦记》为戏剧家汤显祖所著杂剧四梦中之佳作，写于1601年，它借助《枕中记》黄梁一梦的故事，再现明代官场之虚幻，是一部寓思想性、艺术性、哲理性为一体的剧作。

唐沈既济《枕中记》里说，卢生在邯郸旅店住宿，卢生入睡后做了一场享尽一生荣华富贵的好梦。醒来的时候小米饭还没有熟，因有所悟。后世说的“黄梁梦”或“邯郸梦”，都从此而出。

(11) 转载：天地翻覆——中国文化大革命历史 原作者：杨继绳

本书作者注：个别词句后本人不揣冒昧加了极少数注，意在给年轻的读者参考。不妥之处请原文作者和读者原谅。以下即《天地翻覆》的原文：

道路·理论·制度

1966年及以后的10年里，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以不同角色、不同程度地被卷入了那场文化大革命，每个参与的人都有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他们的生活、命运和心灵都受到了重要影响。这场运动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影响更为深刻。

毛泽东开始认为半年、一年、三年文化大革命就可以结束。但在进行过程中出现了原来没有想到的情况。他没有想到1967年8月全面失控，不得不抛出文化大革命的坚定支持者王力、关锋、戚本禹；他没有想到1968年军队内部出现不可调和的争斗，不得不抛出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他希望“九大”以后转入“斗批改”，没有想到林彪和他出现分歧，最终酿成震惊世界的林彪事件。实践的反复碰撞，使文化大革命早已偏离了它初期的目标，只能在进退维谷的泥潭中挣扎。林彪事件之后，毛还是想将运动拨回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方向，但此时文化大革命已失掉民心，人们把希望的目光投向了周恩来。这样，继刘、林之后，周又成了毛的革命对象。一个新问题接着一个新问题，用后一个错误纠正前一个错误。文化大革命是问题导向，是摸着石头过河，这一摸就是十年。如果不是毛逝世，还不知道文化大革命如何收场。

文化大革命像钱塘激潮，一波又一波地涌动。每一波都是多种力量互动的结果；每一波都有一批人被政治恶浪吞没；每一波都制造了一批新的“敌人”。随着文化大革命原动力减弱、抵制文化大革命力量增强，观望者增多，文化大革命波涛逐渐衰减，最终波平浪静，直至文化大革命失败到完全被否定。

一波又一波的反复，一次又一次的折腾，老百姓像面团一样被反复揉捏，苦不堪言，而毛泽东却以鸟瞰人寰的气魄说：“试看天地翻覆！”用“天地翻覆”作为本书的题目，辛酸自有人知。

文化大革命发生、进程、结局和后果的深层动因，要在文化大革命前的17年的制度中寻找，要在当年奉行的意识形态和毛泽东坚持的道路中寻找。

文化大革命中充满了权力斗争，而且权力斗争的野蛮、黑暗、残酷，表现得淋漓尽致；但在权力斗争的深层还有中国向何处去的道路之争，权力是实现政治道路的工具。

有一些研究者认为文化大革命纯粹是一场权力斗争。其根据是，刘少奇

收拾大饥荒的残局取得了成效并在党内赢得了威望。毛泽东大权旁落。于是就发动文化大革命剥夺刘少奇的权力。

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经不起分析。第一，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毛7月23日的一次讲话就把掌握兵权的彭德怀元帅搞下了台。1965年底到1966年上半年，毛召开几次会议就把彭、陆、罗、杨四个位高权重的高官打倒了。毛要打倒刘少奇何必兴师动众搞文化大革命？第二，毛把文化大革命当作他平生最得意的两件大事之一，另一件大事是把蒋介石赶到了台湾，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如果文化大革命的目的仅是夺取刘少奇手中的权力，能和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同等重要吗？第三，毛说文化大革命要七八年一次，第一次已经把刘少奇打倒了，权力拿到了手，为什么今后还要过七八年再来一次呢？毛、刘当时都是六七十岁的人，再过七八年他二人可能都不在世了，他们之间还有什么权力斗争？第四，毛泽东并没有“大权旁落”，如果真正大权旁落了，他能力排众议发动文化大革命吗？

不可否认，整个文化大革命过程，从中央到基层都充满了权力斗争，而且权力斗争的尖锐性、残酷性、野蛮性表现得淋漓尽致。但是，在政治家那里，权力不是赏心悦目的玩物，而是实现政治目标的工具。政治目标就是中国的政治方向，即“中国向何处去？”。在这一点上，毛、刘分歧已久，而且各自形成了一支队伍。

走社会主义道路，利用政权的力量，统筹全局，实现社会公平，在这个基本问题上中共领导人没有什么不同（本书作者注：中共少数顶高层领导例如毛泽东等，口头上说的是“走社会主义道路”“为人民服务”，实际上都是为个人谋求九五之尊、当皇帝、坐天下。他们的目标如果真的一致，都是为了“实现社会公平”，就不会因为个人争权夺利而斗得你死我活了）。但是，在什么条件下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过渡的速度是稳一点还是快一点？毛和刘是不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刘少奇提出“巩固新民主主义的秩序”，即经过一段时间发展资本主义，提高了社会经济水平以后，再搞社会主义。毛认为，资本主义一旦发展起来，就会造成复辟，只有不停顿地继续革命，才能实现共产党的既定目标。他坚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日，就是进入社会主义革命之时。

刘少奇也强调阶级斗争，但他的斗争目标是地、富、反、坏、右、腐化堕落的基层干部和不听话的知识分子（本书作者注：刘少奇难道不腐化堕落吗？单是妻子就换了六七个，最小的只有16岁）；毛当然是1949年以来打击各路“阶级敌人”的始作俑者，但他的斗争目标重点在党内，在高层，因为只有党内高层才对中国发展方向有决定性作用。无疑，三年大饥荒是加剧毛刘分歧的重要原因。毛不甘心“三面红旗”的失败，还想再找机会建立他的乌托邦。他要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没有城乡差别，没有工农差别，没有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所有的被压迫者都获得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平等权利。他要建立一个“一大二公”的、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的、政企不分的社会组织，依靠这样社会组织进行集体化的大生产。要建成这样的社会组织，就必须限制社会分工和商品生产，限制按劳分配原则，在经济上建自给自足。他坚信“小生产是产生资本主义的温床”，商品经济对社会、对人的思想有强烈的腐蚀性，按劳分配是社会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他认为，如果放任小生产发展、追求物质利益，放弃战争年代的革命精神，党就要变修，国就要变色，资本主义就要复辟。他这种设想在1958年提

出来过，经过试验失败了。文化大革命中又重新提了出来，而且在实践中有些比1958年更彻底。

如果说，毛泽东建立制度的出发点是“善”，那么，用政权的强制来实现虚幻的“善”，最终必然酿成了空前的“恶”，必然将民众推向被奴役的境地。

其实，社会主义这个“善”，只是知识分子设计的一种美好的愿望。属于集体主义这个大范畴的社会主义，是以抹杀个人的权利为前提的，是违背人性的。毛泽东为了建成社会主义，他试图改变人性。用强权将社会主义目标构建的制度必然是极度集中的严酷制度。社会主义理想在几百年的实践中处处碰壁，没有成功的先例。社会主义在中国也是一再受挫，而且前景渺茫。毛泽东不从社会主义这个乌托邦的本身中找原因，而归罪于“修正主义”，归罪于“阶级敌人”。

毛搞阶级斗争就是为他建立这种乌托邦扫清道路。令毛忧虑的是，不仅刘少奇抵制他的政治路线，刘少奇周围的一批人都站在刘的一边。刘少奇这些人并没有达到背离社会主义的程度，但他们确实看到了社会主义在实践中的困难而畏缩不前。刘少奇等人收拾大饥荒的残局的作法（“三自一包”、“三和一少”）与毛的路线背道而驰。毛对这些不符合他的路线的作法称为“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把不同意走他这条道路的高级干部称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修防修”是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任务。毛认为，要按他这条路线走，就得让千百万人接受他的路线，就得动员千百万人齐心协力。大规模发动群众搞文化大革命，不仅是为了打倒刘少奇，主要是为了实现他的路线，建立他设想的美好社会。所谓“反修防修”就是为毛泽东的主张扫清障碍，所谓“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就是改造人性，为乌托邦清理心灵的基地。（本书作者注：归根结底，毛泽东所谓斗私批修等等都是对别人的要求，不允许任何人有一点私心杂念，全都做他的驯服工具。他则随心所欲，任意妄为）

毛泽东企图按他的梦想在中国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这个梦想一旦付之实施，“即使怀抱着建立人间天堂的最美好的愿望，但它只是成功地制造了人间地狱——人以其自身的力量为自己的同胞们准备的地狱。”毛泽东所指引的中国道路在大饥荒年代已经制造了人间地狱。为这条道路来扫清障碍的文化大革命，必然再一次制造人间地狱。

毛泽东选择的道路有着明确的意识形态背景。在文化大革命中，这种意识形态鼓动起狂热的群众运动。全民的疯狂、对政治贱民和不同观点的人的空前凶残，是因为意识形态迷惑了全体民众，毒化了整个社会心理，否定了传统道德。

文化大革命是大规模的急风暴雨般的群众运动。这场群众运动下扫政治贱民，上打官僚集团。每个阶层，每个单位、每个地区，每个家庭都卷入其中，夫妻因观点不同而吵架，父子因看法不一而翻脸，至亲好友为路线不同而分道扬镳。1966年秋，我到贵阳串联，一下火车，一群小学生就围上来质问：你是什么观点的？我在湖北串联听说，夫妻二人正在包饺子，一边包着一边谈文化大革命，谈着谈着，就吵了起来，把包好了的饺子掀翻了。文化大革命卷入人数之多，参与者投入之深是空前绝后的。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主动参加的，政治贱民们为没有参加而苦恼。有人说，文化大革命不是群众运动，而是运动群众。但是，群众是怎样被运动起来的？当然是靠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和崇高权威。但毛还得用意识形态来号召和鼓动群众。文化

大革命前十七年，通过教科书、媒体、会议等一切形式，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向每一个人灌输官方意识形态，对与官方不一致的思想不停地批判，对外来思想严密封锁，使得官方意识形态控制了每一个人的头脑，指导每一个人的行动，充满了全社会的话语体系。由于官方意识形态渗透到中国人的灵魂中，很多人是怀着极大的政治热情参加运动的，很多人有“革命是劳动者的节日”（列宁语）那种快感。意识形态不仅使单个的人对政权心悦诚服，还造就全社会的群体意识。社会群体意识鼓动着成千上万的人向着意识形态指引的方向狂奔。不按照这个方向狂奔的任何人，都会被浩浩荡荡的狂奔群体踏成肉泥。

这种意识形态来源于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同情劳动者，反对压迫和剥削，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因而具有极大的魅力。它那严密的理论体系也使很多知识分子臣服。它的道德魅力和美好前景，让千百万人愿意为这个“主义”献出一切，包括生命。

剩余价值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石。剩余价值学说就是揭露资本主义剥削。这是一种片面的理论，马克思认为生产力是由三个要素构成的：劳动力、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剩余价值理论没有把资本、科学技术、企业经营管理当作生产力的要素，从而得出资本剥削劳动的结论。

要消灭剥削就得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从消灭剥削这个角度来说，他的概括是有道理的。马克思还指出，资本主义最根本的问题是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他说这是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解决的“固有矛盾”。要解决这个矛盾，就得消灭私有制。“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毛泽东高举“造反有理”的旗帜，反剥削、反私有制、反资本主义，这些主张和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

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认为，人类的历史是一部阶级斗争的历史，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是人类社会必须经历的五个发展阶段，通过这五个阶段最终进入共产主义社会，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是实现历史规律的必要。当时官方教科书一再强调，历史发展规律是不可抗拒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阻碍历史规律者必然被历史前进的巨轮碾得粉碎。这就是说，历史发展规律是“天律”。这种历史决定论不仅被理论界否定，也被二十世纪的实践否定。但它在中国造成了巨大的灾难。“人们能够通过认识历史规律来控制 and 计划社会的发展。”这一看法必然导出极权主义的政治。

按照这个意识形态。地、富、反、坏、右、国民党反动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等，都是阻碍历史发展规律的绊脚石，清除他们是为了实现“天律”，是“替天行道”。在这个神圣而高尚的意识形态的指导下，只有阶级情分，没有私人情分。“亲不亲，阶级分”，背后告密和当面揭发不仅是必要的，还是光荣的。儿子出卖父亲、妻子出卖丈夫是“大义灭亲”；学生打死老师是因为“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对政治贱民的屠杀当然不会有负罪感。这种意识形态把人性中凶恶的一面全都煽动起来了，还穿上了崇高而正义的外衣。

所谓阶级，本来是一种经济范畴。如果消灭了私有制，私人不掌握生产资料，就不应该有阶级了。1936年的苏联完成了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就认为苏联社会中“人剥削人的现象已经被永远铲除。”剥削阶级已经被消灭，

工人、农民、知识分子都是全新的社会成员。旧的阶级特殊性正在消失。然而，像苏联这样以集体主义为宗旨的政权是扼杀个性、违背人性的，必然有出自人性的反抗。没有强力镇压，这样的政权一天也不能维持。革命队伍以外的敌人消灭了，就在革命队伍内找敌人；经济范畴的阶级消灭了，就在政治范畴和思想范畴上划分敌我。1937年，布哈林—托洛茨基派的一些人被判处了死刑。紧接着开展了对高层大屠杀的“肃反”运动，以后揪出了一个又一个“反党集团”。苏联一方面说消灭了阶级，一方面不停地镇压。他们这样做了，但没有形成一套理论。1956年的中国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中国共产党不仅没有放弃阶级斗争，还逐渐形成了一套阶级斗争的新理论。这套理论的发端与1956年苏共20大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有关。中共认为苏共正在向修正主义偏离。中共的新理论1964年基本成型，著名哲学工作者、中央党校教授艾思奇说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阶段”（也称为马克思主义的第三个里程碑），“毛泽东思想就是这个阶段的马列主义”。艾思奇的这一说法来自中央高层。1962年2月13日至3月2日，周恩来在广东从化组织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他在2月25日发言指出：毛泽东思想是对资本主义时代产生的马克思主义和帝国主义时代产生的列宁主义的发展。1964年，艾思奇在多次内部报告中传播“第三个里程碑”的观点。两三年后，“第三个里程碑”进一步发展成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个理论的要点是：

一、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立统一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

二、在社会主义社会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

三、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

四、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必然反映到党内来，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必须充分揭露他们，批判他们，整倒他们，使他们不能翻天，把那些被他们篡夺了的权力坚决夺回到无产阶级手中；

五、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最重要的，就是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就是“斗私、批修”，因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要用无产阶级的思想去战胜资产阶级利己主义和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核心内容是在共产党已经掌握政权之后、特别是在经济上已经消灭了私有制以后，还要进行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大革命。

毛泽东认为苏联变修了的原因之一是用物质利益作为激励人的手段。为了防止人的自私、贪图享乐的本性使人的思想蜕化、政权变质，毛泽东强调“精神”，强调“突出政治”，强调“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强调“精神可以变物质”。在政治领域要“兴无灭资”，在私人领域“要斗私批修”。毛泽东企图用这个意识形态改造人性，塑造出不追求个人利益、一心为公的“全新的人”，只有有了“全新的人”，才能造就“全新的社会”——他心中的乌托邦。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矛头指向了领导干部。在全社会普遍存

在官民矛盾的情况下，这个理论有相当广泛的群众基础，连著名哲学教授冯友兰也站到支持这个理论的行列之中。

虽然一再声称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不是毛泽东一个人的思想，但毕竟是和毛泽东的名字联系在一起。毛泽东是毛泽东思想的人格化。意识形态强化了毛泽东的权威，毛泽东的权威又强化了意识形态。长期以来，毛泽东不仅是最高的政治权威、最高的军事权威，还是最高的意识形态权威。在皇权时代，士以“道”自重。他们以“道”来批评政治，并希望按“道”来建立政治社会秩序。“道”就是那时的意识形态。可见意识形态的权威高于政治权威。明末学者明确提出“势者，帝王之权也，理者，圣人之权也。”可以用“圣人之权”批评、限制“帝王之权”。毛泽东集“理”和“势”于一身，既是“帝王”又是“圣人”，没有独立于毛泽东之外的批评政治权威的“理”。这样，全国只有一个人是大智大慧的哲人，其他人不是政治愚民，就是被迫的政治哑巴。这就实现了中国人全体一致地喜笑怒骂。意识形态一旦成了人们的信仰，人们就会为实践这一意识形态赴汤蹈火。信仰是很多人参与文化大革命的动力，在文化大革命中无论是高级官员还是大知识分子，虽然自己被批得体无完肤，但还要争先恐后地批判他人。他们在被迫自杀时，还要留下向毛泽东表忠心的遗书，要求子女听毛主席的话。这些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都被意识形态所俘获，普通百姓就更难逃脱意识形态的天网了。

意识形态成了宗教，毛泽东就成了向全民布道的主教。在文化大革命中常见的几十万人集会上，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大手一挥，广场上就掀起狂热的浪潮，这是罗马教宗望尘莫及的壮观场面。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胜过宗教的狂热。

在意识形态煽动起来的狂热的群众运动中，人们没有个性，也没有理性。他们变成一个群体，他们获得了一种集体心理，这使他们的感情、思想和行为变得与他们单独一人时的感情、思想和行为完全不同。只要他们公认的领袖发出号召，千百万人会真诚地、奋不顾身地、争先恐后地做出种种荒唐事。夫妻可能反目成仇，父子可能两军对垒，忠厚善良的人会血口喷人，正派廉洁的人被舆论压迫得承认有罪，滥杀无辜被认为是“除恶务尽”，……。在做这些荒唐事时，平和谦逊的人们也会变成野蛮的暴民。不管这些人在群体行动中如何残暴，然而他们都是专制者最恭顺的臣民：在专制者面前，他们像虔诚的教徒一样，用种种的宗教仪式，不停地向他们的上帝表达忠心。

用传统观念看来，文化大革命中道德堕落到极点。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那种把整体目标置于一切之上，为整体目标的实现不顾一切，也是一种道德观。正如哈耶克说的：“像国家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这一类运动背后所蕴含的道德情感的强度，也许只有历史上伟大的宗教运动与之相比。”，不过他又说：“哪里存在一个凌驾一切的共同目标，哪里就没有任何一般的道德或规则的容身之地。”共同目标就是共产主义（它的初级阶段是社会主义）。群众无私地投入领袖设定的伟大目标，是极权制度的一个特点。

二十世纪人类的实践使得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大厦轰然倒塌。中国的大饥荒和文化大革命破除了中国人对它的信仰。但是，这个意识形态留下的精神垃圾还没有清除。以这个意识形态为旗帜的官僚集团、把这个意识形态当作精神支柱的人们，还在倒塌的废墟上留连不舍，企图用废墟上的破砖烂瓦来重建它昔日的辉煌。这是徒劳的。物质在大厦崩溃以后可以按原样重建，心灵的大厦崩溃以后是不可能按原样重建的。21 世纪还有人宣称“理论自

信”。其实，他们说“理论自信”，实际是“理论心虚”。这正如中国民间的一个歇后语：“走夜路吹口哨——为自己壮胆”。

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制度化就是共产党的官僚专制制度，文化大革命产生的根本原因就在十七年的制度之中。文化大革命灾难不能仅归结为毛个人品质，必须在社会制度中找原因。

毛处在特权制度金字塔的顶端，他享受着最优厚的特权；毛掌握着至高无上的权力，他当然会被权力这种最强的腐蚀剂所腐蚀。但是，如果把文化大革命归结于毛的个人品质和操守，那就过于简单。用对执政者个人的道德的批判来研究政治与历史，不可能穷究事情的本质。所以，我在这本书里不评价毛泽东的个人道德操守。

前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在论及“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时说：“要是只把这归结在某个人的错误或林彪、‘四人帮’的邪恶狡猾上，就太简单了。”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说：“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

文化大革命前的制度是产生文化大革命的根本原因。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在中国皇权专制的土壤上构筑的苏联式权力结构。这个制度实行了高度的经济垄断、政治垄断和思想垄断。在经济上以国家所有制为主的基础上，把每一个人的生产和生活都纳入了国家计划之中，国家政权的控制力深入到了社会的每一个毛孔。尽管当时是中国皇权专制的尾声，但这种制度对社会、对民众的钳制比历代帝王更为严密细致、更为深入广泛。在皇权专制年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只不过是皇家的愿望，实际上皇家权力很难深入到中国版图的每一点、落实到每一个人。那时还有蛮荒之地，化外之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依靠现代武器、现代交通工具、现代通讯技术和组织手段，国家的权力深入到一切山野村落、一切车间田头，深入到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深入到每一个人的大脑和肠胃。行政权力的扩张，已经到了尽头，到了极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是一种极度集中的严酷制度，我不能为这种制度取一个名称，totalitariansystem（译为“极权制度”）可以作为它的近义词。

多少年来，说中国人是“一盘散沙”，即中国人是原子化的个体。这些“原子”文化水平低下，对外界知之甚少。毛泽东用意识形态和组织手段把这些“原子”聚集起来，就成了他手中掌握的“原子弹”，他可以用这“原子弹”来对付任何人。中国人口10亿，即在1后面9个零。毛泽东是1，是被视为救星的伟大导师和领袖；9个零是缺乏自我权利意识的群众，他们为毛的乌托邦作出无私的奉献。没有这9个零，毛泽东不能成为伟大的领袖；没有毛泽东这个“1”，9个“零”就毫无意义。这就是极权制中领袖和群众的关系。

这个严密而严酷的制度是由数百万官僚组成的权力金字塔构成的。由于社会被行政权力完全吞噬，官僚集团几乎是治理国家的唯一依靠。这就是官僚政治。

王亚南说：“官僚政治是一种特权政治。在特权政治下的政治权力，不是被运用来表达人民的意志，图谋人民的利益，反而是在‘国家的’或‘国民的’名义下被运用来管制人民、奴役人民，以达成权势者自私自利的目的。”

在极权政治条件下，特权更为严重。

皇帝通过治官来治民，治官是皇帝的主要职责，也是皇帝最大的难题。中国古语说：“天下难治，人皆以为民难治也，不知难治者非民也，官也。”毛泽东也面临这个难题。毛泽东是这个官僚集团的一员，他又不同于他以下的官僚群体。他是董事长，不是总经理和部门经理。他需要官僚集团实现他的意志，但官僚们有二重性：他们有恪守职责的一面，也有为自己、家庭和“山头”谋求利益的一面，官僚集团有独立于最高统治者之外的利益。前者为“公”，后者为“私”。

毛泽东看到官僚们“私”的一面不断膨胀，他身边的大量事实也证明蜕变在发生、在加速。他怀着深深的忧虑。

毛泽东虽然是这个制度的缔造者之一，但他对这个制度并不满意。他发现，这个制度建立起来以后，和他的初衷不一样。中央部委的“条条”和地方政府的“块块”交织成禁锢社会的锁链，官僚们通过这个严密的锁链对社会、对百姓实现了前所未有的钳制。1958年毛曾通过下放中央部委的权力来打破苏联体制，结果造成混乱。文化大革命中他再一次下放权力。但这种排斥市场的“行政性分权”，多次进入了“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循环。毛泽东对这个制度不满是多方面的：他对等级制、官僚高高在上不满，这和他骨子里的民粹主义、和他年轻时一度相信的无政府主义相抵触，也和他终生相信马克思主义相抵触。他对官僚们用物质利益作为调动积极性的手段不满，他担心这种作法会把社会引向人欲横流的境地。他对官僚们欺压百姓和特权腐败不满，他担心特权和腐败会使掌权者成为人民的对立面，他当然熟悉“民可载舟，亦可覆舟”的古训。

1964年7月14日发表的《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即“九评”中的第九篇）一文，毛泽东下了很大功夫参与修改、定稿，甚至亲自改写了一大段话：“苏联特权阶层控制了苏联党政和其他重要部门。这个特权阶层，把为人民服务的职权变为统治人民群众的职权，利用他们支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权力来谋取自己小集团的私利。这个特权阶层，侵吞苏联人民的劳动成果，占有远比苏联一般工人和农民高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收入。他们不仅通过高工资、高奖金、高稿酬以及花样繁多的个人附加津贴，得到高额收入，而且利用他们的特权地位，营私舞弊，贪污受贿，化公为私。他们在生活上完全脱离了苏联劳动人民，过着寄生的腐烂的资产阶级生活。……他们唯一的考虑，是如何巩固自己的经济地位和政治统治。他们的一切活动，都以特权阶层的私利为转移。”毛泽东批评苏联，也警示中国。

1964年12月12日，陈正人上报了《在洛阳拖拉机厂的蹲点报告》，几天以后，毛泽东在这个报告上批示：“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已经变成或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能依靠他们。我们能依靠的，只有那些同工人没有仇恨的又有革命精神的干部。”请注意，毛泽东提出了“官僚主义者阶级”。

毛泽东说的“特权阶层”包括“官僚主义者阶级”和附着在“官僚主义者阶级”上的、被“官僚主义者阶级”捧为“学术权威”的知识分子。“特权阶层”的主要部分、核心部分是“官僚主义者阶级”。

无独有偶。南斯拉夫的密洛凡·吉拉斯在《新阶级：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分

析》(TheNewClass: AnalysisoftheCommunistSystem)中写道:“共产主义革命是以取消阶级为号召开始,但最后竟造成一个握有空前绝对权威的新阶级。”“这个新阶级的贪婪而不能满足,就像资产阶级一样。不过,它并无资产阶级所具有的朴素和节俭的美德。新阶级的排斥异己正像贵族阶级一样,但没有贵族阶级的教养和骑士风格。”“这个新阶级的极权暴政和控制,如今已变成了驱使全民流血流汗的桎梏”吉拉斯指出,该阶级的权力并非基于拥有财富,而是对于国家所有财富的控制。吉拉斯在《新阶级》里的宣判:新阶级将留下“人类历史上最可耻的篇章。”这个新阶级就是官僚特权阶级。

虽然毛泽东和吉拉斯都认为共产党政权里有一个新阶级,但他们的出发点和解决办法完全不同。

吉拉斯的《新阶级》认为:“共产主义对于我是一种理想的幻灭”,造成这一幻灭的主要原因之一,即是斯大林式的“暴政”和“原始与简单化的教条主义的共产主义”。吉拉斯的最终理想是突破斯大林主义的暴政,走向“民主社会主义”。而毛泽东却维护斯大林,企图建立一个超越斯大林体制的乌托邦。在这一点上,毛泽东比吉拉斯落后了一个时代。毛对这个制度的一切不满和忧虑没有触及造成这些问题的根本:为实现共产主义乌托邦而建立的极权制度。

毛泽东企图从国家理论的探索中找出路。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号召干部读六本书: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国家与革命》,这几本书都分析了国家的本质。可见毛泽东对国家问题的专注,他希望更多的人研究国家问题。

人们痛恨国家,又离不开国家。痛恨它,是因为国家是阶级压迫的工具、是官僚主义的温床。在毛泽东推荐的这几本著作中说国家机器“像蟒蛇一样把活生生的市民社会从四面八方网罗起来(缠绕起来)”,是“与社会分离而独立于社会之上”的“寄生赘瘤”,还有“国家是祸害”、“砸烂旧的国家机器”、“国家消亡”等说法。为什么又离不开国家呢?因为国家有三重性:阶级国家;官僚国家;公共国家。人们痛恨的是阶级压迫的国家、官僚特权的国家,但不可缺少管理公众事务的国家。

国家是人类的社会性的产物。人类是高度社会化的动物,他们在一起生活、娱乐、寻求食物和配偶,个体之间难免有冲突,有纠纷,这就需要权威来判断曲直,定了曲直以后还不服从,就得由权威来惩罚。柳宗元说:“夫假物者必争,争而不已,必就其能断曲直者而听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众;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后畏;由是君长刑政生焉。”作为一个群体社会,需要有一个组织机构来处理公共事务。如果没有公共国家,则公共事务无人管理,是非曲直难以分别,内部分争不可调和,对抗外部的侵犯没有力量。所以,人类不能无政府。政府、军队、警察、监狱,都是公共产品,都是保证人类社会活动正常进行的公共必需品。

什么是阶级国家呢?就是“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的国家,就“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就“是用来镇压某一个阶级的暴力组织。”林彪说得更明确:“政权是镇压之权”。镇压谁呢?镇压对政权有威胁的人,镇压不服从者。

什么是官僚国家呢?恩格斯说:“官吏既然掌握社会权力和征税权,他们就作为社会机关而驾于社会之上。•于是制定了官吏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法律。

一个微不足道的警察却有大于克兰代表的‘权威’。”于是，官僚们就“由社会公仆变成了社会的主人”。在没有权力制衡的专制制度下，“社会公仆”变成“社会的主人”是不可避免的。官僚们一旦变成了“社会的主人”，由于人性恶的一面，就必然对被统治者进行压迫和盘剥。

国家机器，这是一个能量强大的怪物。一旦没有国家机器这个权威，不仅公共事务没人管理，而且人类会在自相残杀中消灭。但是，它一旦建立起来，就会成为社会的“赘瘤”，就会伴生出庞大的官僚集团。无政府主义的信仰者其所以经久不绝，是因为国家机器会产生阶级压迫和官僚特权；国家机器其所以必要，是因为人们畏惧破坏力很强的无政府状态。文化大革命的过程，就是在无政府状态和行政权威反复较量的过程，最终行政权威取代了无政府状态。可惜这种行政权威还是官僚集团的行政权威。

当时中国所面对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官僚集团，而是庞大的官僚体系嫁接在极权主义制度树干上，从而形成了极权主义官僚体系。在极权主义官僚体系的统治下，不仅在官民之间存在着紧张关系（第一重紧张关系），在官僚体系内部也存在着紧张关系（第二重紧张关系）。第二重紧张关系是因为干部任命制、上级决定下级的命运造成的，也与“打天下”过程中形成的派系、“山头”有关。处在极权主义官僚体系顶端的毛泽东，处在两重紧张关系的焦点上。他常用第一重紧张关系来制衡第二重紧张关系，用民粹主义的口号来缓和第一重紧张关系。用民众的力量来平衡极权主义的官僚体系，就是鼓励群众造官僚的反。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两重紧张关系互相交织、互相纠结，使政治斗争失去了是与非、正确与错误的界线，广大参与者成了角斗场上左冲右突的群氓。

毛泽东多年没有找到解决官僚集团的方法，文化大革命前的种种针对官僚集团的斗争都是通过官僚集团实行，都是通过政权体系自身来解决官僚集团的问题。他发现，过去的那些作法就像自己拿刀为自己动手术那样，不可能切除病灶。毛最终找到的办法是，他自己直接成为底层群众的代表，甩开官僚集团，直接发动群众、指挥群众“砸烂旧的国家机器”，“火烧”官僚，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毛泽东要发动群众清洗官僚集团，实现“天下大乱”，就需要造反派。毛也不能让无政府状态长期存在，要恢复秩序实现“天下大治”，就得要官僚。造反派是毛泽东的左手，冲击官僚体制需要他们；官僚集团是毛泽东的右手，恢复秩序需要他们。

文化大革命初期毛挥动他的左手，鼓励造反派冲击官僚，让造反派将官僚们“烧一下，但不要烧焦了”，在官民矛盾十分尖锐的条件下，哪能“烧而不焦”？文化大革命后期毛泽东挥动他的右手，让官僚们遏制造反派，但要求官僚们“不要整他们”，在造反派和官僚已经结下深仇大恨的情况下，重新掌权的官僚哪能不整造反派？文化大革命，这是一场毛泽东、造反派、官僚集团之间的三角游戏，这场游戏的最终结局是：胜利者是官僚集团，失败者是毛泽东，承受失败后果的是造反派。被毛当作“砸烂旧的国家机器”的工具、用来敲打官僚集团的石头——造反派，最终被这架不可能停止转动的官僚机器压得粉碎。

历史上的大劫难会带来历史的大补偿。对文化大革命的补偿因素就在文化大革命遗产之中。然而，由于官方利用政治权力规避毛泽东和极权制度对文化大革命的责任，官僚体制没有改变，历史的大补偿的得利者是官僚集团，

广大群众继续吞咽专制制度的苦果。

无论从意识形态层面、道路层面和制度层面来分析，文化大革命必然失败。在各省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实现了“全国山河一片红”时，就可以判定文化大革命已经失败，因为革命委员会完全是旧制度的复归，没有一点制度创新；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最重要的伙伴林彪出逃以后，进一步表明文化大革命失败，毛泽东因此健康大为恶化；邓小平出山后搞“全面整顿”，加速了文化大革命的失败；1976年的“四五运动”，表明文化大革命已经丧失民心，文化大革命失败已成定局。

文化大革命终于失败了。毛泽东死后不到一个月，以他妻子为核心的四个文化大革命领导人被捕。文化大革命一度摧毁的旧制度，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已完全恢复。

中国人为文化大革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叶剑英在十二届一中全会后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曾披露文化大革命遭受迫害及死亡人数：

(1) 规模性武斗事件，4,300多件，死亡123,700多人；

(2) 250万干部被批斗，302,700多名干部被非法关押，115,500多名干部非正常死亡；

(3) 城市有4,810,000各界人士，被打成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阶级异己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动学术权威，非正常死亡683,000多人；

(4) 农村有520多万地主、富农（包括部分上中农）家属被迫害，有120万地主、富农及家属非正常死亡；

(5) 有1亿1,300多万人受到不同程度的政治打击，557,000多人失踪。

叶剑英提供的这组数字，学界有不同的看法，还有其它不同的受害者数据。文化大革命中受害的准确人数恐怕永远无法搞清。虽然数字不能确切，但可以确切地说，文化大革命对中国来说，是一场大劫难。此外，文化上的严重破坏和经济上的巨大损失无法估计。

恩格斯说：“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文化大革命这场大劫难也会带来历史的大补偿。而补偿的因素就在文化大革命的遗产之中。文化大革命到底留下了哪些遗产呢？

第一，摧毁了官方长期塑造的共产党和官员的美好形象。文化大革命前那种对党组织的盲目信任、对官员的盲目尊敬已不复存在。文化大革命打破了1949年、特别是1957年以来，共产党不可批评的神话。对共产党奴隶式的服从已被怀疑和批评取代。官方用“信任危机”来概括这种现象，而这种对政治权力的不信任恰恰是从臣民社会走向公民社会的必要条件。

第二，摧毁了长期灌输的意识形态。文化大革命依赖意识形态而发起、而运行，文化大革命的失败使意识形态大厦崩溃，中国人从此摆脱了几十年的精神桎梏，从荒唐的意识形态神话中觉醒。老百姓再也不相信官方宣传的五阶段的历史发展规律，多数人不相信共产主义。官方认为这是“信仰危机”。这种对精神枷锁的“信仰危机”正是思想解放的必要条件。

还有“信心危机”，群众对文革中和文革前的那种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丧失信心，从而产生制度改革的要求和对新制度的探索。

正是官方感到的“三信危机”，使得群众思想空前活跃，普通百姓的独立

意识开始形成。1976年的“四五运动”，1978年的西单墙，1989年的北京政治风波，都是打破精神桎梏后的思想解放运动。这种思想解放运动不仅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必要条件，也是以后推进中国民主化的重要条件。

第三，“以阶级斗争为纲”这把残酷的屠刀在文化大革命中罪恶昭彰。它不仅伤害普通百姓，也伤害到整个官僚集团特别是邓小平这类高层。丢弃“以阶级斗争为纲”这把屠刀，实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第四，“无法无天”的“群众专政”被人摒弃。它不仅伤害了普通百姓，也伤害到高层官僚。官僚们复职以后重视法律建设。虽然官僚们构建的法制与真正的法治社会相距甚远，但毕竟迈开了走向法治社会的一步。

辉煌一时的意识形态的大厦已经是一片废墟，铁桶般的极权制度已经百孔千疮。多数民众已经觉醒，一批有理智、有抱负的官员准备行动，改革开放的列车轰隆而来。从此中国进入了加速现代化的重要时代。这就是历史对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的补偿！

不幸的是，文化大革命的最后胜利者还是官僚集团。官僚集团掌握着文化大革命责任的追究权、改革开放的主导权和改革成果的分配权。

对文化大革命责任的追究决定了改革开放的干部队伍。邓小平强调，“跟随林彪、江青一伙造反起家的人，帮派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绝对不能提上来，一个也不能提上来，已经在领导岗位上的，必须坚决撤下去。”“跟随林彪、江青一伙”实际就是跟随毛泽东。如果邓小平提出的这个用人标准是正确和必要的的话，他们却采取了双重标准。文化大革命后清查“三种人”时，对“恐怖的红八月”中骨干人物却大加保护，在改革开放以后有一些人还走上了领导岗位，因为他们是官僚的后代。而对普通人，中共中央下了一个文件，要求对文化大革命的头头“记录在案”，还要求今后选拔领导干部和选派出国人员，必须看这些档案。为了落实这个文件，各单位对文化大革命期间在校的大学生进行了普遍的调查，对一些人限制使用，从而压制了一大批优秀人才。

改革开放的主导权决定改什么，不改什么。为了维护官僚集团的利益，他们只搞经济改革，不搞政治改革。他们虽然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但继承了造成文化大革命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还是那个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还是文化大革命前那个政治体制：一党专政，高度集权、权力至上。正是靠毛泽东的这些政治遗产，使得毛泽东时代的官僚集团（包括他们的后代和亲友）在改革开放中成为新的权贵。

官僚集团掌握了改革成果的分配权，使得改革成本的支付和改革收益的分享错位：劳动者、普通公务员和知识分子付出的改革成本最多，分享较少；对改革成本支付较少的权贵集团却享受最多的改革成果。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条件下，权贵们都抢占一切有利的先机：普通百姓子弟上山下乡的时候，他们的子弟参军；普通百姓子弟务工务农的时候，他们的子弟被“推荐”上大学。第一波出国镀金的是他们，利用父兄的权力地位下海经商成为亿万富翁的也是他们。

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官员复职以后，没有记住产生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却牢记了对造反派的仇恨。他们不怕当“还乡团”，除了对造反派进行无休止的报复以外，搞起特权和腐败来超过文化大革命以前。不同的是，文化大革命前整个社会贫困，改革开放以后社会财富更多了，特权和腐败有着更

充裕的物质条件；文化大革命前没有民间资本，改革以后有私人大老板，权力和金钱可以互相交换；文化大革命前没有市场经济，有了市场经济以后，权力可以控制市场、操纵市场、参与市场竞争。哈耶克说：“一个富人得势的世界仍比一个只有得势的人才能致富的世界要好些。”文革以后的中国，恰恰是得势的人致富的世界。

“革命我有功，文革我有苦，改革我有权”，毛泽东静静地躺在水晶棺内，造反派被打入了十八层地狱，官僚们志得意满，为所欲为。他们千方百计地阻止民主进程，有选择地引入市场机制。三十年改革建立的制度名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质是“权力市场经济”，即权力控制市场、操纵市场。在权力市场经济制度下，大大小小的权力中心像一个一个吸引力极强的黑洞，把社会财富吸引到与权力有亲密关系的社会集团之中。权力市场经济最根本的问题是不公平，不公平的社会不可能和谐。在权力市场经济制度下，权力的滥用和资本的贪婪恶性结合，是这个社会一切罪恶的渊藪。建立一种制衡权力、驾驭资本的制度是全社会必然的要求。这个制度就是宪政民主制度。

(12) 转载：对他做出正确评价是中华民族必须迈过的一道坎

原文作者徐友渔 林中奇谈一选刊版 2018-09-09

文化大革命对于中国是一场浩劫。文革中那么多人——包括国家主席刘少奇——被整死，那么多人受苦不过含冤自杀，那么多人被当成阶级敌人消灭；文革中冤狱遍地，冤假错案不计其数，正直、清白的人被当成是叛徒、特务，不小心打碎毛泽东石膏像或把印有毛画像的报纸垫坐，就是反革命；文革中武斗发展成毛泽东欢呼的“全面内战”，群众组织用正规军用武器开战，无辜的、无组织的群众被武装组织甚至军人开枪屠杀；文革中数千万青年人无学可上，被发配上山下乡吃苦，虚耗大好青春，耽误自己并殃及家人。

对于这一切，理应追究文革的发动者毛泽东有没有责任，有什么样的责任？

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承认，毛泽东发动文革是犯了严重错误。却又说“但是，毛泽东同志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毛泽东同志是经常注意要克服我们党内和国家生活中存在着的缺点的……他在犯严重错误的时候，还多次要求全党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还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这是他的悲剧所在。”

照这样的说法，对于文革这样的大灾难，毛的责任只是认识上的局限和偏差，是好心没有办好好事。

我认为，仅仅用认识上的偏差和错误不能解释毛泽东的罪过，我们不能回避这样的问题：毛泽东做了那么多错事、坏事，有没有他个人的道德品质问题，其中涉及到人命关天的部分，该不该受到法律的追究？

毛泽东发动文革，打倒刘少奇，正统的解释是，他对中国出现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估计过高，把刘少奇当成中国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是，就算我们同意毛泽东的看法，认为刘少奇搞了修正主义，而且也同意毛泽东的看法，应该打倒刘少奇，在这种假设下我们还是要问：毛泽东有没有权力把一个与自己一道革命、共同战斗几十年的同事整得那么惨？对于刘少奇在极痛苦、极悲惨的状况下死去，毛泽东有没有个人责任？

“打倒刘少奇”，这是一个政治概念，但这只意味着剥夺刘少奇的职位和权力，这完全没有准确地说明毛泽东在文革中对刘的所作所为。事实上毛是

“诬陷和整死刘少奇”，毛通过中央专案组诬陷刘是“叛徒、内奸、工贼”，专门挑选刘少奇 70 岁生日那天宣布把他永远开除出党，在精神上残忍地打击和折磨他，重病中的刘少奇赤着身子，被人用被子一裹放上担架上飞机押送到开封，最后惨死在那里。

有人会说，毛大概不知道刘临死时的惨境，这不可能。从邓小平女儿的书中可以看出，邓下台后的情况，包括生活上的小事，毛关注备致，了解得一清二楚；从陈伯达的回忆中可以知道，对于被关押的高级人员，他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工作人员不敢不报到毛泽东那里。毛对刘的境况的关注，只会超过而不会小于对邓、陈的关注。对刘少奇生命处于绝境的情况不向上报告，下级执行人员中有谁敢负这样的责任？

其实，很多罪责是不能用“认识”轻易开脱掉的。错误认识和实际上发生惨剧，二者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必然的联系，其间有若干重要的环节，涉及法律、道德、常识、人性等等，在任一个环节坚持良知和常识，遵守法纪，都会阻断错误认识导致惨剧。如果仅仅是主张“毛泽东比马克思、列宁更伟大，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那么这种认识方面的问题是可以讨论的，但如果把这个主张推演为“谁反对毛主席谁就是反革命”，从而要受到严厉惩罚，就像张志新、王申西、史云峰因此被枪毙那样，就远远不是认识问题了。再打一个比喻，如果有人真正认为“犹太人是惟利是图的、低劣的民族”而只是停留在嘴上和纸上，那么这个完全错误和荒谬的主张可以说是个认识问题，但基于这个主张把犹太人送进集中营和毒气室，还能说仅仅是认识错误吗，难道希特勒仅仅是犯了认识错误？

除了整死刘少奇，文革期间毛泽东可以在法律意义上定罪的另一明显事例是纵容、支持和推动武斗。毛对于武斗中成千上万的人死于枪下负有直接责任。

1967 年夏季，毛泽东向军方发出指示，给左派发枪，武装左派。

1968 年春季，毛公布了他的论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继续。”请注意，那个时候的国共关系与今天的国共关系迥然不同，那是“革命与反革命”、“你死我活”的关系，是必须“用战争来解决问题”的。

1975 年，毛发布“重要指示”，其中说：“无战争经验已经十多年了，全面内战，抢了枪，大多数是发的，打一下，也是个锻炼。”

很难设想，毛泽东作为被全体中国人无限热爱和拥戴的领袖，怎么可以把一部分中国人说成是共产党而把另一部分中国人视为与之不共戴天对立的国民党，怎么可以下令叫军队送枪给一派去消灭对立的一派。

有人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因为他有一个高尚的社会理想，要实现社会乌托邦，他的动机是好的。就算如此吧，问题在于毛泽东有没有资格、有没有权力为了自己的理想就把亿万人推到一场劫难中去？我们要问的是：哪怕你的理想是好的，你有没有权力拿人来搞共产主义实验？你是否可以搞政治清洗运动，甚至命令林彪“武装左派”，发枪给一派以镇压和屠杀另一派？你有没有权利把中国几千万青年学生推入一场残酷的政治斗争？哪怕是要锻造一代新人，你有没有权力把一千多万中学生流放山乡，让他们背井离乡、远离亲人，吃苦受罪？认识和理想是一回事，牺牲民众的利益、剥夺人的基

本权利是另一回事。

其实，身受其骗和身受其害的人根本不认为毛泽东的问题只是认识问题，他们早就提出了毛泽东的个人道德和品质问题。以下仅举几个见诸于文字的例子。

罗瑞卿的女儿罗点点在《红色家族档案》中写到，毛泽东完全清楚罗瑞卿是无限忠于自己的，但“想不通毛泽东为什么要整罗瑞卿，毛泽东从来没有认为罗瑞卿有野心，是坏人。所以，除非是毛泽东品质有问题，否则他为什么会白白冤枉一个好人……”当然，这里没有明说但大家都知道的是，为了换取林彪的支持，毛毫不犹豫地牺牲自己的爱将罗瑞卿。

林彪身亡后，毛泽东陷入空前尴尬的境地，因为正是他本人，给了林彪“接班人”的崇高地位。但毛泽东居然毫无惭愧的表示，反而借他给江青的一封信证明他早就对林彪有认识，自己还是洞察秋毫、一贯正确。徐景贤在《十年一梦》中记叙了毛在这封信上玩弄的手法：他让周恩来把这封信出示给林彪，并在林彪看后当面烧掉，但万万想不到的是，他却叫秘书抄了一份。徐景贤写下了当时人们普遍的疑虑：“毛主席既然对林彪‘早有察觉’，为什么仍旧坚持选拔林做接班人，而且把这一点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他还委婉地提示：“这封信从烧毁到公布的过程，也是耐人寻味的。至于写信人、送信人、读信人、烧信人、藏信人各自持什么心态，就只有留待读者和研究者自己去细心揣摩分析了。”

刘少奇的儿子刘源在《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中写到，1962年7月，刘和毛发生了一场争执，刘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上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毛却愤怒地反问刘：“你顶不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毛对千百万中国人的死活持何态度，由此可见。

其实，毛泽东的人品如何，作出结论并不困难。人们既可以从他的政治斗争手法中认清他——比如在“反右”斗争中搞“引蛇出洞”，也可以从与他最接近的人的评价中了解他——比如林彪下级的“五七一工程纪要”或毛的私人医生的回忆录。不敢正视毛泽东的道德品质问题，一定要把恶魔说成是伟人，只能表明维护他的人自己的道德有问题。对毛泽东作出正确评价是中华民族必须迈过的一道坎，毛逝世已经30多年了，难道我们还只能生活在一个巨大的阴影之中？

选自徐友渔：文革反思四 原标题：不能回避毛泽东的道德和法律责任

（13）转载：从《中国的陷阱》到《中国：溃而不崩》

不论是古代还是今天，不论对于内部生存者还是外部观察者，中国都是一个神秘之国，对这个社会提出切中肯綮的论断难上加难，敢于预言其未来和前途者往往铩羽而归。但是，论说中国又是一件具有极大诱惑力的事，各种人物都愿意对此一试，于是，我们读到在五四时期访问中国的西方哲人罗素的《中国问题》，中国政坛一代枭雄蒋中正的《中国之命运》，也读到文化大革命中无畏青年杨曦光的《中国向何处去？》

进入21世纪之后不久，世界的目光越来越聚集于中国。一方面，中国迅速成为经济体量位居世界第二的巨人，令人艳慕与仰视，另一方面，它对人權的粗暴侵犯以及对人类政治文明准则公然的敌视与否定，令人不安与惊愕。对中国的描述和评价出现两极化的趋势：“太平盛世”的赞誉和“即将崩溃”的预言各不相让。

何清涟、程晓农合著的《中国：溃而不崩》对中国这个病入膏肓、腐而

未朽的社会，对这个外强中干的泥足巨人作了全面的体检和准确的诊断，对中国的未来做了理性而审慎的预言。作者的立场与“太平盛世”论截然对立，但对于“即将崩溃”的预言也未能苟同。

作者用大量的事实和数据说明，在虚假的繁荣背后，掩藏的是深刻的、不可克服的危机，而暂时闪光的 GDP 数据，是以牺牲社会公正与平等、损害生态环境安全、透支未来的发展与福利换来的。中国的发展是不可持续的，危机早已出现。由于问题产生于制度，目前不存在化解危机的办法，将来也没有解决问题的良方。

作者进一步深挖根源，指出，所谓“中国模式”，其本质就是共产党资本主义。它把共产党的权力垄断和市场的运作结合在一起，为所欲为、所向披靡、“创造奇迹”；同时让当权者无所顾忌、无所限制地化公为私，搜刮民脂民膏。“中国模式”的一时喧嚣、现政权的表面强大，以及目前这种经济发展方式的不可持续，统治权就本质和长远性而言没有合法性，全部秘密就在于这个共产党资本主义。这个说法，和许多西方学者使用的概念“市场列宁主义”是一致的。

我估计，本书鲜明的观点、犀利的剖析，不会让所有的读者轻易地接受。许多关心中国问题、观察中国现实的人，由于种种原因，总是与中国的现实有距离和隔膜，或者由于生存条件与利益关系，“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我只想提醒一点：其实，早在 20 年前，作者已经在其引起轰动的《中国的陷阱》一书中，对中国的问题作出了明确的诊断。在那本书中，作者对于借改革、开放名义进行的猖獗的寻租活动、疯狂的“圈地运动”、骇人听闻的资本原始积累作了大胆的揭露，对于中国的下一步发展作出了不容乐观的预言和警告。20 年的事实证明，作者的不祥预告全部不幸而言中，而且，事态的恶化发展与作者敲响的警钟相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我相信，本书对于中国问题诊断的准确性，用不到 20 年，不但会得到证实，而且会得到更加广泛的肯认。

面对同一个中国，不同的人为什么会有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评价和结论？其实，社会生活是如此纷繁复杂，对同一个时代、同一个国度、同一个运动，人们能找到一百个理由谴责，也能够找到一百个理由赞扬，遑论对于处在社会大转型阶段的中国。对一个时代和社会做出正确判断，既需要知识，也需要良知和见识。剧变中的中国呈现出多个面向，既有拔地而起、鳞次栉比的高楼，也有被殴打抓捕的访民，既有曾位居世界第一的奥运会金牌，也有成千上万食用毒奶粉而受害的结石宝宝。中国漫长的历史、众多的人口、低下的国民素质，都可以成为为缺点、错误甚至罪恶辩解的口实。那些带着渡假、消遣、猎奇心态到中国来采访和写作的人，完全有理由惊叹北京、上海的夜生活超过东京和巴黎，那些满足于官方统计数据国际组织的官员，拿出“中国第一”的报告似乎是有根有据的。

如何论断中国、诊断中国？如何面对中国社会矛盾的现实，如何鉴别莫衷一是的意见？如果现实本身不能自动提供答案，那么我们可以在历史中寻求启示。

苏俄的十月革命以“新生事物”的名义吸引人们的赞誉，其粗暴、混乱和不人道长期得到原谅，像罗素、胡适这样的大思想家和学问家都对布尔什维克的苏俄一度神往，但最后，他们基于大镇压和大审判的事实作出了经得住历史检验的结论。

希特勒统治的德国以纪律和效率，劳工福利和社会净化（相当于今日中国的“扫黄打非”），其震撼力超过北京奥运的柏林奥运令世界瞩目，但最后证明为正确的是卡尔·雅思贝尔斯、汉娜·阿伦特这样的批判者和反抗者，而不是那些讴歌法西斯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和著名学者。

只有进入历史，才能对人类迄今为止在政治文明的指导性原则方面达成的共识具有信心。现在的形势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欧洲很相似，那时西方对自己的制度和理念都失去了信心，而德国、日本的法西斯势力正在崛起，西方政要自乱阵脚和称赞法西斯的短视言论不绝于耳，中国思想界、知识界学习西方的势头戛然而止。今天，西方社会的福利制度和民主制度受到来自内部和外部的挑战，中国模式似乎是另一种文明的替代方案。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溃而不崩》既是一份诊断，也是一副清醒剂。本书作者兼具经济学家的实证态度和历史学家的长远眼光，在苏联东欧的转型参照之下对中国现实进行深透分析。读完此书后人们会产生一种感觉：只要有直面现实的勇气，认识中国并不是太难。应该说，目前对中国形势和世界大势的认识，对中国知识界的见识固然是一种考验，但它的难度和挑战性，并不如梁任公一辈面临欧洲凋败之局遭遇的考验那么严峻。

人们会问，丧失道义、百弊丛生的现实，难道不是蕴含着否定自己的契机吗？苦难深重的中国人，不是相信“压迫越深、反抗愈甚；蓄之既久、其发必速”吗？对于这个问题，本书作者表现出了理性的、审慎的现实主义态度，没有单纯为义愤所支配。作者清醒地看到，虽然当前的问题和危机是难以化解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统治中国的现政权会立即，或在短时间内崩溃，中国社会的病理状况是衰朽和溃伤，随着时间愈发加深的衰朽和溃伤。中共现政权可以凭借对社会不计成本的控制，对民间力量变本加厉、毫无节制的打压，以及巨大的惯性在可见的将来存活。

作者持之以恒地以中国社会、政治、经济为研究对象，从《中国的陷阱》到《中国：溃而不崩》，中间刚好经历了20年。这20年，见证了作者思想和认识的深化——从呼吁以深化改革的办法来化解困局到对于已患不治之症的清醒诊断；这20年，也见证了中国老百姓和知识分子态度和情绪的转变——从抱有最后一点希望到完全绝望。从上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开始，“改革”在大约20年的时间内是中国人民的希望之所在，是维系信心的一面旗帜，人们把落后的、丑恶的现象归结为某种改革尚未进行或者进行得不彻底，归结为保守派的阻扰和反对，人们以为推动和捍卫改革必然带来进步，就是在维护广大老百姓的利益。但是，人们很快就发现，改革不过是为当权者提供了把权力兑换为经济利益的良机，改革成了这些人瓜分国有资产的游戏和盛宴。从《中国的陷阱》出版到《中国：溃而不崩》发行的20年，就是人们越来越不愿意谈论改革，“改革”这个词汇的正面意义丧失殆尽的过程。

是改革在行进的中途变了味并且越来越变味，还是改革从一开始就是中国共产党为了挽救自身的统治地位而采用的权宜之计？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但至少可以说，即使在中共开明的领导人那里，改革的“救党”功能与“救国”功能也是没有厘清的。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党的地位和党的利益当然是第一位的，对他们来说，党的利益自动地就等同于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改革开放搞了40年，中国被搞成了一个不加掩饰的以血缘为经度，以亲朋为纬度，国家的所有资源均为党产的红色帝国。这不是改革方针政策的变质变味，而是改革逻辑的必然展开，改革本性的顺理成章的显现。

粗鄙的共产党人不去理会这件事的讽刺意味：他们当初打出大旗，上面写着“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经过无数的失败与灾难，他们的生存策略变为“依靠资本主义挽救中国共产党”。必须承认，40 年的经验证明，中国共产党人在这方面干得还不错，内部是一个核心、高度统一、很少杂音，在外部也有点财大气粗、颐指气使的模样，时不时还上演一出万国来朝的好戏。

但是，正如本书所揭露和剖析的，这个外表强大光鲜的红色帝国其实已患沉痾，赤裸裸的敛财和镇压所付出的代价是失去政治合法性。也许，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共已经创造了一个奇迹：它的政权居然在六四大屠杀之后存活下来，并在全球化浪潮中攫取了巨大的收益。但是，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一个失去合法性的政权虽然可能活得超出人们的预料和忍耐，但它绝不会长久存在，人类历史没有，也不可能有这样的奇迹。 徐友渔 2017 年 5 月于纽约

（14）转载：中国的出路

粉碎“四人帮”对中国发展的意义怎么估计也不过分！因为在此之前就是那个人类历史上超级荒诞的“文化大革命”！现在回想起来，就是说破了天，善良的中国人也不会想到，“人民的大救星”毛主席会忍心把他们带入到如此灭绝人的本性的长达十年的灾难之中而“运动”得如此疯狂颠痴，如此高潮迭起！

所以，如何避免此类一定会留给万代后人耻笑的悲剧加闹剧，理所当然的就应该成为我们这一代人的应尽义务——所以，中国这个“老大帝国”的政治进步问题，理所当然的就应该成为我们这一代人所必须要关心的问题。

记得 1986 年，中央组织部曾经成功地召开了一次“第三梯队建设理论讨论会”，那是中央工作部门有史以来召开的第一个“理论讨论”性质的大型会议。这个会讨论的主题实际上是政治体制改革。当年参加这个会的今天在座的就有若干人。现在，二十四年过去了。大家都垂垂老矣！深深困惑中国的，依然是政治体制改革！今天，既然有机会，就说一些看法，作为思想资料提供出来。数了一下，一共十三点——唉，其实说也无用。可是无用还是得说。

一，中国两千多年迄今的主要时间，都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国家，或者说，是一个“中央专制”的大一统国家，文明传统延绵五千年而百折不绝，人口繁衍世界第一而无可动摇；现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又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民生产总值每年以接近百分之十的速度增长，税收和财政收入增长高达两位数的年份更是超过了十余年！可是，境内外的思想理论界对这个庞然大物的前景却普遍不看好，认为它可能在某一个早上会轰然倒下，而后便“烽烟七十二，反王三十六”，不知有几人称“孤”、几人道“寡”，“藏独”、“疆独”等等揭竿而起，内乱，内战，社会失序，百姓遭难，国也不国，党更不党，从而一发不可收拾。我觉得这个看法有道理。

二，为什么它可能“轰然倒下”？是因为它坚持了一个没有前途的制度，它排斥普适价值观。

三，前些时候，有些热心人开了个纪念《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三十周年的座谈会，我有幸聆听了，挺好的。中共历史上有两个决议，第一个在 1945 年，距建党二十四年，第二个在 1981 年，距第一个三十六年。我心存疑惑的是，又一个三十年过去了，中国旧貌换新颜了，可是还有条件再形成一个或名为“改革开放以来若干现实问题的决议”吗？政治上有这种权威吗？思想上有这种共识吗？理论上有这种指导吗？甚至，经济上有

这种基础吗？再往前追溯到上世纪这个时候，正是清末民初，风起云涌，改朝换代的时候，是“立宪”还是“共和”，好象也比一百年之后的现在好掰扯。一百年过去了，“革命党”携带着他们的激情远去了，“保皇党”也不“恭请圣安”了，但是，选择中间的选项还是这么多。可是，选择任何选项的成本却都是大的吓死人！所以，还有基础吗？

四，没有基础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以为，是当政者，以及相当一批党政干部，以及以各种面目出现的很多“智囊”、“精英”和“企业家”们基本上已经“进化”成了既得利益的占有者——形成了一个“特殊利益集团”。美国马里兰大学教授奥尔森 1982 年出版了一本书，叫《国家的兴起和衰落》。这本书的要点是：任何一个国家，只要有足够长时间的政治稳定，就会出现特殊利益集团。这个集团会对这个国家最重要的公共政策，国家的经济发展、社会发展、资源配置、利益分配、政治机器，包括行政和法律，越来越知道该怎样操纵，懂得在操纵时怎样找到冠冕堂皇的理由加以调整。它们会变得越来越精明、成熟、有技巧，它们获得的利益也就越来越持续、越来越丰厚；同时，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行政、法律等各方面的体制、政策、组织，也越来越符合特殊利益集团的安排；进而，使得这个国家发展的新动力越来越被抑制，政府部门越来越僵化，社会矛盾越来越积蓄和尖锐；最终，导致国家和这个特殊利益集团同归于尽。奥尔森说的是“任何一个国家”，包括那些多党的、三权分立的、法制健全的欧美国家都在里面，所以它肯定不是针对中国的。但是中国一定是这个“奥氏理论”的典型标本！中国当前是“稳定第一”，而且这个方针已经实行二十多年了，而且中国共产党已经“领导”了一个甲子了，你不让他生成“特殊利益集团”都难！

五，毋庸置疑，中国的国内问题很多，很严重，所以很多人认为它最大的危机来自于国内。可是，我倒是不这么看。我以为，中国当前的危机主要的是来自于国际，而且越往后越是如此。依据嘛，大略有四：

一是世界已经是“地球村”——并且越发是“地球村”了，在中国发生的事都是“村”里的事——并且越发是“村”里的事了；

二是以欧美为首的“国际社会”，也就是“地球村”的“村委会”经过了二战，经过了冷战，再经过了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的二十年“乱战”，对中国当政者在政治进步上顽固的抱残守缺已经不抱希望；

三是那个“村委会”所倡导的普适价值观与人的天性相符，具有“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魅力，对中国当政者所坚持的主流意识形态年年月月日日时时地产生着既铺天盖地又细润无声的冲击和侵蚀作用；

四是“村”里诸事都难为你，什么政治歧视、经济陷阱、贸易摩擦、科技封锁、人权抨击、军事戒备，无所不包。所有的游戏规则都不是你制定的，而你要与那个“村委会”制定的所有的规则“接轨”！

除此之外，在打了十年的“反恐”之后，美国正在高调返回亚洲，俄罗斯则一心融入欧洲，南海各国对你的“搁置争议”不屑一顾，还有一个台湾问题、朝鲜问题、钓鱼岛问题、中印边界问题，等等！看起来大家都和你结成了“战略合作伙伴”，实际上“村”里人没有谁可以算作你的“铁哥们”，你的那些老问题，没有一个真正得到了解决！我说，在度过了江泽民的十三年（其中三年是续赵紫阳的未了任期）和马上就要度过的胡锦涛的十年之后，对于习近平来说，恐怕不会有第三个太平十年了！

六，即便如此，众所周知的，中国却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没有国家安全战

略的大国。毛泽东时代，它的国家安全战略先是“一边倒”，接着就是毛的“世界革命中心”或“世界革命领袖”“战略”；1989年“六四”以前，国内百废待理，国际雾里看花，国家安全战略实际上处于混沌时期；从那时至今又是二十二年了，在国家安全上，大概还是没有脱出邓小平“韬光养晦”那四字真言的桎梏。原因何在？我以为，从整体上看，中国的国家安全始终是意识形态驾驭之下的骡子。这个“骡子”累啊！它被罩着眼睛，压在它身上的是那个“上是黄泉下碧落，两处茫茫皆不见”的意识形态！它的依据经常只是最高领导人的只言片语，而后就是在这些只言片语划出的圈圈里作道场，并且很难越出雷池一步！它没有独立思考，没有科学论证，缺少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基本依托。作为大国，中国的国际环境是最恶劣的！这么多“研究室”、“研究院”、“研究所”和“研究中心”，又是“部级”、“副部级”、“司局级”，可是谁又能跨上“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骏马纵横捭阖一番呢？可怜啊！悲哀啊！

七，总之毛病都归到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上。中国的政治制度叫“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的政治体制实际上是“一党制”。我以为，这个“社会主义制度”基本上是个“形而上”的问题——绝大多数中国人搞不清什么是“社会主义”，也搞不清现在搞的是什么“主义”，更没有兴趣去搞清它们——只要能过上好日子，什么“主义”都是可以接受的；问题的关键还在于这个“一党制”。“一党制”起源于前苏联，搞了七十三年，垮掉了。到现在还原汁原味地搞的，只有中国、朝鲜和古巴。对于这个“一党制”，我们这个“地球村”的“村委会”肯定是认为不好。但是中国还是坚持。中国坚持当然有他的道理，因为在这个体制下，中国取得了辉煌的令世人瞩目的经济建设成就。这一点的确是事实，是谁也否认不了的。但是，很遗憾，人们同时还看到了普遍存在的社会不公、党以代政、机构庞大、官僚特权、腐败遍地、贫富悬殊等等；还总是记得曾经发生过的暴力土改、五七“反右”、三年饥荒、“革”文化大革命、“六四”开枪等等！只有一个党，风险太大了！好起来还可以，万一坏起来，那可怎么得了！就跟投资不能把鸡蛋都放到一个篮子里一样，一个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伟大民族总不会就心甘于一——或者说，就愚蠢到——把自己的全部幸福都托付给一个政治团体的“英明”、“正确”上去吧！更何况实践已经证明，它的确不是经常的“英明”、“正确”的。所以，“一党制”不行，并且是肯定不行。

八，中国是需要政治改革的。这一点，现在连胡锦涛总书记也不否认了。但是，中国的政治改革改什么？在中国，这是个十分古旧的问题。我说它古旧，是因为至少在一个世纪之前，就由辛亥革命用实践提出来了。开始时我说，一百年过去了，这个“选择中间的选项还是这么多”：是“立宪”还是“共和”？意即是“专制”还是“民主”？现在我发现，其实我说的不大严谨——“立宪”是“君主立宪”的简称；应该说，这个“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本质上都是要民主而不是要专制，“君主立宪”也是君主虚位、议会立法、内阁行政；至于“民主共和”就更不用说了——我的意思是说，在一个世纪以前，我们的辛亥革命的“革命党”老祖宗们和辛亥“被”革命的前清的亲贵王爷们实际上就都摈弃了“专制”——不管它是“皇权专制”还是“政党专制”，也不管这个“摈弃”是自发的还是被迫的。总之，在辛亥年间，这个“专制”就已经被排斥在革命的“选项”之外了！可是，我们搞了一百年，一百年之后，当我们再次推进政治改革（一百年之前叫“革命”）的时候，

这个“专制”却堂而皇之地成了我们选择中间的一个“选项”——是继续坚持“专制”，还是逐步实行“民主”？痛苦。荒唐。无奈。

九，刚才我说了“一党制”和“专制”。这里再专门加上两句话以强调我的看法：第一句话，“一党制”和“专制”的内涵不完全一样，在理论上“专制”不等于“一党制”，在操作上“一党制”绝对等于“专制”。第二句话，中国是需要政治改革的，政治改革的对象主要是“专制”或曰“一党制”。

十，可是在今年的“两会”闭幕式上，吴邦国还是高调讲了“六个不搞”。当然，国内国外有相当多的人都认为他讲的唐突了。地球天天在旋转，社会天天在进步，人类天天在接受新事物反思旧事物，那六个声明说“不搞”的东西，“村”里的很多人都在搞嘛！而且搞的时间都很长了嘛！而且搞的都还不错嘛！怎么就不可以有一点借鉴意义呢！这“六不搞”实在是有问题，而且实在是在常识上都有些说不过去，所以不必我在这里饶舌批评。但是，积极地看，作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的吴邦国的高调讲话，虽然不是解决了什么问题，但是却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方向。是啊，既然规定了国家是“六不搞”，那么中国的政治改革怎么改？答案就只能有一个了：只能眼睛向内——向党，作党内的文章了！就是说，“村”里人搞的东西，国家不能搞，党内还是可以搞搞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三个代表”，当然具备这个素质。我觉得，这倒是也符合我们历届党的领导人关于“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是搞好我们这个党”的一贯思想精髓的。方向很明确：中国的政治改革，要面向党内，要从党内开始。

十一，我生而逢时，幸而是中国人，又幸而是中国共产党人，而且到我是三代共产党人——我的外婆、外公和父亲、母亲以及岳父、岳母两代人都“为共产主义奋斗”了一生，我自己也有了三十八年的党龄，年过花甲，也快“一生”了，所以，我又幸而是“救党派”。我以为，虽然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不搞政治改革是等死，搞政治改革是找死”——“选择任何选项的成本都是大的吓死人”；但是，政治改革还是要搞，好的选项还是要选。中国的当政者一定要确立这个基本态度。

十二，这一条原本是我对“从党内开始的政治改革”的若干具体建议，这里就省掉了。在这个场合，我想说的是，我想起了蒋经国。是的，想起了蒋经国！我们几个朋友聊天的时候，有一位女性朋友说：大陆为什么就不能出一个蒋经国！一言一出，举座默然。都知道历史是不能复制的，也都知道全世界找不到两个完全一样的人物，可是我真的希望中国能再出一个蒋经国！台湾的民主改革，是蒋经国生前伟大的政治举措。蒋经国在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毅然决定放开党禁、报禁，解除“戒严”，他不畏惧国民党内的反对势力，不担心新闻自由后国民党会遭到清算，不担心放开党禁后会天下大乱，乃至不担心国民党会丢掉政权！当国民党大佬、“国策顾问”沈昌焕对蒋经国说：“这样做，国民党可能失去政权的！”蒋经国淡淡地回答：“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他的声音不大，语气轻微，但这一句话，如同万钧雷霆，振聋发聩！后来有人评论，“有的政治家，生前大权在握、唯我独尊，死后却身败名裂、万夫所指；有的政治家，生前仿佛是缔造历史的伟人，死后其头上的光环却日渐暗淡；有的政治家，在台上之时风光无限，其实只不过是历史上的匆匆过客；而有的政治家，生前推动了历史的进程，死后其历史作用日益彰显，是当之无愧的历史伟人。蒋经国，应该就是这样一个人物。”国民党是个“百年老党”，历史旧账不胜枚举，蒋经国又是靠蒋介石一步一步走上权力顶

峰，是个标准的“世袭”的“蓝二代”，可是国民党就出了个蒋经国！中国共产党有八千万党员，有九十年的奋斗历史，出类拔萃之辈聚若河汉——又一位女性朋友说：“不信就出不了个共产党的蒋经国！”我深以为然。

十三，对于中国，的确是没有第三个太平十年了！对于中国的当政者，的确是没有第三个太平十年了！政治改革的紧迫性空前的严重！中国共产党的前总书记赵紫阳说过：“我们现在不培植反对党，一旦垮了，国内会大乱的，这是最危险的。现中央不考虑这一点，不愿看到这一点。”（引自2001年11月11日的《杜导正日记》）赵紫阳真是高瞻远瞩！真是深谋远虑！真是忧国忧民！真是爱党爱国！根据中国国情，我再补充一句：中国培植反对党，从党内开始。至于现有的那几个“民主党派”，本来就是由统战部安排的，在一个相对不长的时期内，就由统战部继续安排，继续“风雨同舟、荣辱与共”也罢，以后会怎样，看他们自己的造化了。

今年是辛亥革命百年纪年。一百多年前，满清王朝有选择“君主立宪”的机会，可是那些皇亲国戚们为私利所累，愚顽不化，最终失去了这个机会，求“立宪”而不可得！孙中山先生有言：“**历史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顺昌逆亡，中外历史上已经有太多的先例。我希望历史不要重演——正面反面都不要重演。

崔武年（中共中央组织部青年干部局副局长）于2011年10月8日

（15）重要文章：二十一世纪人类的选择——民主社会主义 作者辛子陵（原名宋科，1935年生，河北安新人。1950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助教、军政大学政治研究室副主任、军事学院出版社社长、国防大学《当代中国》编辑室主任等职。著有《千秋功罪毛泽东》为批判毛泽东的始作俑者之一。）

1836年至1852年，德国有一个密谋起义的工人团体——共产主义者同盟。其思想领袖、裁缝魏特林“口袋里装有一个能在地上建成天堂的现成药方”。

（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49页）这是共产主义的星星之火。因理论不完备，同盟会求助于知识分子马克思和恩格斯，由马克思执笔，恩格斯协助，于是就有了《共产党宣言》。

1848年《共产党宣言》发表后，虽然震撼了欧洲各国的统治者，却没有为人民群众所广泛接受。恩格斯后来回顾当时的情况时说：《宣言》“虽曾被译成法文、英文、法兰德斯文、丹麦文和其他文字，但是它对其他民族却没有发生任何影响。”（梅林著：《马克思传》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二版396页）

“从1852年科伦共产党人被判决时起，便结束了德国独立工人运动的第一个时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一卷第241页）以共产主义为旗帜的德国工人运动第一阶段从此画上了句号。

1849年欧洲革命失败后，德国的社会主义只能秘密地存在。只是在1862年马克思的学生拉萨尔才重新举起社会主义的旗帜。。。。。。正如我们看到的，拉萨尔的社会主义是非常温和的，但是，它在舞台上的出现却标志着德国社会主义发展第二阶段的起点。（恩格斯：《德国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88页）

马克思、恩格斯为了改变曲高和寡的状况，1852年11月17日解散了共产主义同盟，他们没有建立共产党，转而支持拉萨尔领导的温和的社会主义运动，这是马克思、恩格斯政治上的重大转变，由共产主义者向民主社会主义者的重大转变。在他们指导下，1869年8月，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政

党—德国社会民主党诞生。这个德国工人运动第二阶段就是民主社会主义阶段。

为什么叫民主社会主义呢？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创始人李卜克内西解释说：没有民主的社会主义是臆想的社会主义，正如没有社会主义的民主是虚伪的民主一样。民主的国家，是按照社会主义原则组成的社会唯一可能形式。正因为我们弄清了社会主义同民主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我们才称自己为社会民主党人。这个称呼，包含着我们的纲领。（《不要任何妥协》三联书店 1964 年版第七、八页）

此后，欧洲国家新建的工人政党都叫做社会民主党（个别的叫工党），而不叫共产党。

恩格斯在 1894 年 1 月 26 日致意大利劳动社会党领导人屠拉梯的信中引用《共产党宣言》中的文字，将《共产党宣言》作了重要修改。

原文是：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着整个运动的利益。。。。共产党人为着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奋斗，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还坚持着运动的未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 479、502 页）

修改后的文字是：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社会主义者始终代表着整个运动的利益。。。他们为着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2 卷 515 页）

这一重要改动表明，恩格斯认为“社会主义者”才是无产阶级眼前利益和长期利益的真正代表，“共产党人”没有被欧洲工人运动所接受，应该退出历史舞台。自从 1864 年成立国际工人协会以后，在马克思起草的各种文件中，“共产主义”这个概念便被“社会主义”一词所取代。马克思不再拘泥于暴力革命，提出改造资本主义社会有两条道路：在新堡和巴塞罗那，在伦敦和柏林，工人的组织不可能在一切细枝末节上都是完全一样的。例如，在英国，工人阶级面前就敞开着表现自己的政治力量的道路。凡是利用和平宣传能更快更可靠的达到这一目的的地方，举行起义就是不明智的。在法国，层出不穷的迫害法令以及阶级之间你死我活的对抗，看来将使社会战争这种不良结局成为不可避免，但是用什么方式来达到结局，应当由这个国家的工人阶级自己选择。国际不会就这个问题下达什么命令，甚至未必提出什么建议。（1871 年 7 月 3 日《马克思同“世界报”记者谈话的记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七卷 638 页）

1871 年巴黎公社与法国资产阶级政府血战后，欧洲大陆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普遍采取了让步政策，这使马克思和恩格斯进一步看到了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于是他们多次发表关于和平过渡的意见，使他们的学说更全面、更能反映欧洲国家的实际生活。1872 年 9 月 8 日马克思在阿姆斯特丹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说，告诉国际工人协会荷兰支部的追随者和工人们：

我们知道，必须考虑到各国的制度、风俗和传统；我们也不否认，有些国家，像美国、英国—如果我对你们的制度有更好的了解，也许还可以加上荷兰，一工人可能用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 179 页）

1866 年爆发世界经济危机。危机过后，资本集中有了惊人的发展。大规模投资银行和股份公司的出现改变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结构。随着一个新

的银行制度的出现，资本积累不再依靠企业家个人的节俭、储蓄来自我筹集资金了，而是依靠全社会的储蓄。

吸收社会的资金办企业，股份公司就应运而生了。在欧洲大陆，首先是钢铁工业，接着是化学工业、机器制造业和纺织工业，一个部门接着一个部门变成了股份企业。马克思非常看重这一变化，认为股份公司“在资本主义体系本身的基础上把资本主义的私有产业实行扬弃”。“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以内的扬弃，因而是一个会自行扬弃的矛盾，那显然只是作为一个过渡点，以便进入到一个新的生产形式中去”（《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二版，第504页）资本家不再拥有私人企业，而只是拥有私人财产，这份私人财产是用货币量化的企业资产的一部分；他们不再是企业主，而只是企业的股东，公司利润中一定部分的合法债权人。股份公司造就了组织和指挥生产的经理、厂长阶层，使企业的所有权和管理权相分离。管理者阶层掌握着企业的经营权，使资产阶级的统治虚幻化。这一项分离是一场和平“革命”，使和平过渡到一种新制度成为可能。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说：“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削者就要被剥夺了。”（《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31页）

这就是在教科书中我们常讲的“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

在股份公司出现之前这个论断是正确的。因为除了无产阶级起来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剥夺剥夺者之外，社会生活还没有提供解决这个矛盾的别的方法。

这是马克思写《资本论》第一卷时的历史局限性。股份公司打破了垄断，创造了与“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社会化”相匹配的生产资料社会化的占有形式。马克思不是抱残守缺、维护过时论断的“权威”学者，而是对历史负责任的革命家。在研究了股份公司之后，他马上作出了新的结论：

在股份公司内部，职能已经和资本所有权相分离，劳动也已经完全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剩余劳动的所有权相分离。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展的这个结果，是一个必然的过渡点，以便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所有，不过这时它已经不是当作一个分立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当作共同生产者共有的财产，直接的社会财产。（《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中文版第502页）

股份公司的出现，使马克思不仅找到了把生产资料“当作共同生产者共有的财产，直接的社会财产”的形式，而且找到了“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所有”，即“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过渡点，这就是股票。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第三卷时所设想的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新形式，是让每个人都能占有一定的企业股份，具体地讲，这种公有制是以职工持股和小股民持股与大股东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特征的股份私有制来实现的，是以全民持股制为实现形式的生产资料所有权的社会化。股份公司的出现使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出现了社会主义的因素。恩格斯认为：“由股份公司经营的资本主义生产，已不再是私人生产，而是为许多结合在一起的人谋利益的生产。如果我们从股份公司进而来看那支配着和垄断着整个工业部门的托拉斯，那么，那里不仅私人生产停止了，而且无计划性也没有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

卷第 270 页。)

政治上，英国、美国、德国等逐步实行了政党政治，工人阶级政党在议会中有了一定的席位。例如，德国社会民主党所得的选票逐年增多。1893 年恩格斯说：“如果选举到 1895 年才举行，那么我们将会得到三百五十万张选票。全德国的选民是一千万，其中参加投票的人数平均是七百万。如果在总数七百万选民当中有三百五十万选民拥护我们，德意志帝国就不能再像现在这个样子存在下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第 629 页）工人阶级利用合法手段掌握政权成为可能。恩格斯甚至预言德国社会民主党到 19 世纪末就可能担负起管理国家的使命。资本主义就这样完成了向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资本论》第三卷是马克思皓首穷经研究资本主义几十年的最终结论，经过恩格斯十年的编辑和修订，于恩格斯逝世的前一年—1894 年六月出版。

经济上的股份公司—马克思认定：这是“生产者共有的财产，直接的社会财产”，但它不是消灭私有制，而是用股权分散的个人所有制代替寡头私有制，作为公有制的实现形式；政治上的议会道路—不是打碎旧的国家机关，而是通过选举进去掌握它，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晚年虽没有明确写成文字，但已勾画的轮廓分明的民主社会主义道路。

马克思 1883 年逝世后，恩格斯继续领导国际工人运动达十二年之久，并于 1889 年成立第二国际。恩格斯具体指导德国社会民主党进行合法斗争，强调德国社会民主党在选举中获得成功对整个国际工人运动将会有很大的意义：

可以设想，在人民代议机关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只要取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就能够按宪法随意办事的国家里，旧社会可能和平地长入新社会，比如在法国和美国那样的民主共和国，在英国那样的君主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第 273 页）

1895 年 3 月 6 日，恩格斯在（《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中对马克思主义的整个理论体系进行了最后的反思和修正：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历史要做的还要更多：它不仅消除了我们当时的迷误，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条件。1848 年的斗争方法（引者注：指《共产党宣言》中说的暴力革命），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陈旧了，这一点是值得在这里较仔细地加以研究的。

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在 1848 年要以一次简单的突袭来达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

旧式的起义，在 1848 年以前到处都起决定作用的筑壘的巷战，现在大都陈旧了。

如果说在国家之间进行战争的条件已经起了变化，那么阶级斗争的条件也同样起了变化，实行突然袭击的年代，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着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在罗曼语国家里，人们也开始愈益了解到对旧策略必须加以修改了。德国所作出的利用选举权夺取我们所能夺得的一切阵地的榜样，到处都有人模仿；无准备的攻击，到处都退到次要地位上去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第 595，603，607 页）

说完这些话还不到五个月，1895 年 8 月 5 日他就去世了。如果盖棺论定，这是恩格斯对欧洲各国革命策略问题的最后意见。他期待的是通过工人

阶级的合法斗争取得政权，保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应该说，这是恩格斯对欧洲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最后遗言，是对《共产党宣言》“旧策略”的重要修改。这样，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就有了两条社会主义道路：暴力社会主义道路和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第一卷是暴力社会主义的理论根据；《资本论》第三卷和《“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则是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晚年是摒弃了暴力革命道路主张和平进入社会主义的。把暴力革命说成是马克思主义正统是违背马克思和恩格斯本意的。

恩格斯逝世前，指定他的忠实学生倍倍尔、伯恩斯坦为他的著作的遗嘱执行者。伯恩斯坦发挥了恩格斯关于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思想，进一步提出了社会主义的实现途径在于“民主”，而不是“专政”，是“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而不是靠“暴力革命”进入社会主义。1898年和1899年，以伯恩斯坦发表著名的《社会主义问题》和《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革命党的任务》为标志，第二国际社会主义政党内部开始反思以往的社会主义运动和理论。

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了社会主义运动的分裂。十月革命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的胜利大大加强了暴力革命派的地位，列宁另树旗帜，1918年1月18日，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派改名为共产党，并成立了共产国际（第三国际）。暴力革命派攻击“和平过渡是修正主义道路”，批判伯恩斯坦说资本主义可“和平长入社会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其实伯恩斯坦只是重复了恩格斯说过的话。

欧洲各国社会民主党人忠实地执行了马克思主义和恩格斯的遗教，以民主社会主义道路为正宗，保护私有制，团结资产阶级，实行以职工持股、小股民持股与大股东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办法，体现生产资料的社会化。这是他们成功的关键。社会民主党人尊重马克思主义，但不拘泥于马克思主义，没有意识形态的枷锁，一切从实际出发，广泛吸收历史上和现实生活中改良社会的先进思想，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民主社会主义理论。

1951年6月20日在西德法兰克福召开了国家社会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宣告了社会党国际的成立，通过了基本纲领：《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和任务》（通称《法兰克福宣言》）。这个纲领系统地总结了社会党的理论和实践，第一次以“民主社会主义”的形式表述了社会党国际的思想理论体系。《法兰克福宣言》认为：在许多西方国家“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已经奠定。在这些国家中，资本主义的弊端正在消失，社会产生了新的活力。社会主义原则的价值正在行动中得到证实。”即是说这些国家已经基本上不是资本主义国家了，而是民主社会主义国家了。民主社会主义事实上是社会民主党领导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阶级团结资产阶级推动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运动。代表们把这个新成立的国际组织看作是“1864年在卡尔·马克思参加下成立于伦敦的那个国际组织在历史上的新阶段”。

列宁主义是布朗基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布朗基（1805-1881）是19世纪法国秘密社团领导人。第一国际内的暴力革命派，巴黎公社的军事领袖。布朗基主义的要义是坚信不管生产力发展处于什么水平，只凭革命暴力就可以创造出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新世界。恩格斯在晚年是厌弃布朗基主义的，他说：由于布朗基把一切革命想像成由革命家所实现的突然变革，自然也就产生了起义成功以后实行专政的必要性，当然，这种专政不是整个革命阶级即无产阶级的专政，而是那些实现了变革的少数人的专政，而这些人又

事先服从于一个人或几个人的专政。（《流亡者文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第 580-581 页）

列宁及其继承者斯大林发展了布朗基主义，把对一个国家的领导变成了无产阶级专政，把无产阶级专政变成了共产党专政，把共产党专政变成了党的领袖集团的专政，把领袖集团的专政变成了最高领袖一个人的独裁（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奠定了暴力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体制。这种极权体制窒息了社会的生机，也窒息了执政党的生机，导致经济、政治和科学文化的全面衰退。前苏共党员、现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一语中的地指出：“苏联和苏共垮台的基本原因是对财产、权力和真理的垄断。”（1995 年 8 月 10 日答记者问）

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从“左”面修正了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革命取得成功后，忽视或有意不执行马克思关于在“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第 832 页）这句最重要的话，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失败的理论根源。后来社会主义国家形成定制的那种政府垄断生产资料，名义上属于全民实际上人民没份的占有方式，是对《资本论》的误解或曲解。取消“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这一条，就割断了人民群众与国家资产的血肉联系，所谓“全民所有”就成了欺骗民众的空话。共产党不仅“代表人民”在政治上当家作主，而且在经济上“代表人民”握有全部财富。人民中原来有财产的被剥夺了，没有财产的依旧没有财产。无论怎样进行宣传鼓动，人民就是提不起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来，国家陷入停滞衰退的困境。中国的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功，就是因为执行了“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大政策。然而邓小平等改革开放的领路人却背着沉重的十字架，被“左派”指责搞了修正主义，犯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错误。我们要绕开那些并非马克思主义传人的二三流的神殿，直接向马克思请教，向卓有成效地重建个人所有制、实现了共同富裕、消灭了三大差别民主社会主义国家学习，理直气壮地、光明正大地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

两条社会主义道路经过一个世纪人类的选择，当暴力社会主义由于固有的理论阙失以及在传播中扭曲变形，在苏联社会主义阵营各国造成国家权力异化，专制独裁，官员腐败，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彻底失败，经济衰退，民不聊生，导致苏联解体，东欧巨变，十月革命的灯塔熄灭，主流社会主义运动的大潮消退之后，原是社会主义运动一个支流的欧洲民主社会主义以新的面貌、新的成就、新的实践和新的理论走上了历史的前台。

欧洲社会民主党人把他们开创的民主社会主义道路，不卑不亢地展示在世人面前。这条道路不是宏篇巨著的经典文献，不是虚无缥缈的未来理想，是活生生的、现实的市民社会。他们凭藉议会民主政治、混合所有制经济、市场机制和福利保障制度这四大法宝，成功地实现了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对接，在西欧和北欧建设起了民主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民主社会主义的先驱考茨基说：

社会主义也只能从资本主义中发展起来，资本主义的职能发挥得愈好（资本主义是构成社会主义的基础，是构成社会主义的出发点），社会主义就愈容易建立。那种认为为了建立完全新的社会大厦，必须把一切现有的东西都消灭掉的说法是再荒谬不过的了。这种消灭旧东西的做法只意味著消灭新东西所必不可少的前提，它不是为新东西创造条件，而是强迫我们再一次重新建

立旧东西。它不是使我们前进，而是使我们后退。（考茨基：《唯物史观》第一卷，1927 年德文版）

这就推翻了《共产党宣言》中关于打碎旧世界，同一切传统的东西决裂、在“空地”上建设社会主义的极左理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是继承和发展的关系，而不是推翻和消灭的关系。这个真理已经为西欧民主社会主义的闪亮崛起和前苏联暴力社会主义的黯然消失所充分证明。

二十世纪末，社会主义已在大多数欧洲国家竞选执政、使欧洲和平进入民主社会主义的历史性成就告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天之灵。欧盟 15 国中英国、法国、德国、瑞典、芬兰、奥地利、葡萄牙、荷兰、意大利、丹麦、希腊、比利时、卢森堡等 13 个国家是社会民主党或工党执政。社会党国际以红玫瑰为徽记，世人惊呼欧洲红潮涌动。2003 年 4 月 16 日，欧洲各国首脑云集希腊雅典。在卫城遗址的见证下，欧洲联盟成员国以及十个新成员国的国家首脑共同签署了一项入盟条约。从此，捷克、爱沙尼亚、塞浦路斯、拉脱维亚、立陶宛、匈牙利、马耳他、波兰、斯洛文尼亚和斯洛伐克等东欧国家加入了欧盟大家庭，宣告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西欧分裂的局面的终结。欧盟的魅力来自入盟国人民对欧洲民主社会主义的认同。一个经济繁荣、政治稳定和社会和谐的新欧洲的出现，给纷扰的世界平添了几分亮色。全世界那些企图保留他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前途的改革者们，都把目标转移到民主社会主义运动上来。

社会民主党人对人类历史贡献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化解了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不共戴天的仇恨，化解了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不共戴天的仇恨，使社会主义运动成为和平地、理性地进化过程。社会民主党人成功地创造了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框架内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道路。过去我们局限于暴力革命的狭隘经验，指责人家是“修正主义”，现在看来应该给修正主义恢复名誉，因为社会民主党人不是对资产阶级没有斗争，不是单方面的让步，不仅“修正”了社会主义，而且修正了资本主义。1965 年，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学习社会主义国家的长处，克服自身发展的困难，曾聚集美国费城召开过一次震撼全球的“世界资本主义大会”，并发表《资本家宣言》提出：

借鉴社会主义人民当家作主的经验，实行从生到死包下来的福利资本主义；借鉴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经验，实行国家干预的计划资本主义。（卞洪登：《资本营运方略》，改革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227 页）

我们习惯称之为发达资本主义的西方国家，都已成为新资本主义，不同程度地民主社会主义化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英、德、法、瑞典、挪威和美国纷纷出现全国性的劳资协调，以阶级妥协取代原先势不两立的劳资对立，有识之士开始提倡用公共建设来解决失业问题，也就是说以国家的积极介入来解决市场经济失灵的危机。领导美国走出 1929 年世界经济危机的罗斯福总统就大胆引进了民主社会主义政策。民主社会主义又称第三条道路。第三条道路既是美欧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美欧巩固同盟国关系的要求。以英国工党首相布莱尔和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为代表提出的第三条道路是修订版的民主社会主义，2000 年 6 月 3 日，克林顿参加了在柏林召开的第三条道路（第三次）首脑会议。他在会上说，“我们要经济增长又要社会公正。”把效率和公平作为第三条道路的旗帜。

我们相信市场经济必须同社会责任相结合，从而创造长期的经济增长，

稳定和全面就业，而国家必须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维持稳定，支持健全的公共财务措施，坚决制止通货膨胀；国家也应促进金融市场稳定，提高透明度和提倡公平竞争。（阮宗泽著：《第三条道路与新英国》，东方出版社 2001 年 12 月，第一版，第 290-291 页）

最近点算结果，美国参众两院有 61 名民主党议员是“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Democratic Socialists of America, DSA）简称 DSA, 虽然目前还不是一个政党，但结合了许多左翼组织。DSA 是社会党国际（Socialists International）及其附属青年部（Young Democratic Socialists）的成员】。美国民主党的经济理念，植根于马克思和凯恩斯的经济思想，主张政府引导市场经济，适度的国有化，实行全民医疗保险，政府办学校，减免穷人税收，提高福利，提高最低工资，更多地关怀弱势群体。共和党上台后也不改变民主党的社会政策。这是因为社会福利制度具有能增不能减、能上不能下的刚性特点，谁削减社会福利谁丢掉选票。工人和普通老百姓是能够通过投票阻止不利于自己的政党上台的。民主社会主义把美国“赤化”了。2000 年冬，布什、戈尔竞选总统的时候，记者访问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里根时代的主要经济顾问弗里德曼，这位 88 岁的自由市场经济学大师出语惊人：无论布什还是戈尔入主白宫，“美国都会溜向社会主义”，区别只不过是，如果布什掌权，可能溜得慢一点，戈尔掌权，可能溜得快一点。（《南方周末》2001 年 11 月 8 日第十五版）

民主社会主义最伟大的成就，就是在老资本主义国家通过生产力的大发展和调节分配，基本上消灭了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和体脑力劳动的差别，铸就了民主社会主义的辉煌。这一成就使苏联模式的暴力社会主义黯然失色。这是促成苏联和东欧国家“和平演变”的根本原因。

社会革命党人用团结资产阶级发展先进生产力的办法，实现了差别日益缩小的共同富裕。在民主社会主义国家已经没有农村和农民了。据 2003 年 9 月一位旅行者随机采访的资料，在法国小城波尔多市，百分之七十以上的普通市民月收入为 1500 欧元（欧元与人民币的比价为 1: 9），在郊区和乡间工作的人（原来的农民）月收入为 1000-1200 欧元，白领阶层月薪为 1800-2000 欧元，医生、律师、教授收入更高些，有的月薪达 8000 欧元，大企业的股东、上层管理人员、葡萄庄园主的收入则远远高于这个水平。随着知识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产业结构不断升级，产业队伍的构成也在改变，主要表现在以体力劳动为主的蓝领阶层急剧缩小，以脑力劳动为主的白领阶层迅速扩大。二十一世纪初，德国蓝领工人只占工薪阶层的百分之六。被《共产党宣言》当作革命主力军与资产阶级对峙的工人阶级变成少数了，这少数人的生活水平也超过了罗马尼亚总统。工人阶级用不着起来革命，随着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就这样“解放”了。三大差别的缩小，不是寄托在资本主义的彻底灭亡上，而是寄托在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上。

当过德国社会民主党顾问的民主社会主义理论家 J. A. 熊彼特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一书中认为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经济变动的一种形式，永远不可能是静止的，它不断地从内部使这个经济结构革命化，不断毁灭老的，又不断创造新的，资本主义将向社会主义进化。他的关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引起劳资关系的变化将导致资本主义灭亡的论点、经理阶层作用的突显将导致资本家退出生产经营舞台的论点，都得到社会民主党人的引用和阐发。他的创新理论和进化社会主义的完整表述，被战后社会民主党人奉为

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

社会民主党人认为，19 世纪 30 年代到 20 世纪 20 年代英国曼彻斯特那样压迫工人阶级的老资本主义社会是“野蛮的资本主义”。从 20 世纪 30 年代以后，经过社民党的努力，不断改良的资本主义使“社会主义纲领的重要部分都付诸实施了”。这种已经变化的社会，在社民党执政事情是民主社会主义社会，在其他党执政时期是新资本主义时候。这里举一些数据说明这一点：2004 年，政府财政总支出中用于教育、卫生、社会保险等公共开支的比例，美国政府是 42%，英国政府是 49%，加拿大政府最好，是 52%，中国政府财政总收入中用于教育、卫生、社会保险等公共开支的比例是多少呢？7.4%。就教育而言，中国一年用于义务教育的经费才 1500 亿元，而官员公车消费、公款吃喝、公费出国年花费达 9000 亿元。2005 年 12 月 7 日《报刊文摘》报道：公车一年花销 3000 亿元，“远远超过我国的军费开支，超过全国教育经费和医疗经费之和”。在《2000 年世界卫生报告》中，中国医疗财政分配的公平性在 191 个国家中排名 188 位。唯独行政管理费开支，中国“赶超英美”：从 1978 年至 2003 年的 25 年间，我国行政管理费用已增长 87 倍。行政管理费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在 1978 年为 4.71%，到 2003 年上升到 19.03%，而英国占 4.19%，美国占 9.9%，加拿大占 7.1%。我们还好意思讲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本质永不变，只有我们中国才是社会主义吗？还好意思讲资产阶级政府都是压迫、剥削人民的，只有中国政府才是“为人民服务”的吗？还好意思讲我国那些更多统治色彩、更少服务色彩的官员特权是由于学了美国、走了资本主义道路造成的吗？应该有勇气承认，美国政府、英国政府和加拿大政府，在为百姓谋福利方面，比中国政府做得好！这些国家的政府官员在清正廉洁方面比中国官员做得好！中国离民主社会主义差得远！中国的执政党一个向英国、美国和加拿大的执政党学习，民主执政、廉洁执政，扎扎实实地为全体国民谋福利，从善如流地完成向民主社会主义的和平演变。这种和平演变将使百姓得到了越来越多的福利，使官员丧失了越来越多的特权。以“保卫革命成果”的名义抗拒和反对这种演变，所“保卫”的不是百姓的福利，而是官员的特权。这种和平演变不是输给了杜勒斯，而是输给了恩格斯；不是输给了帝国主义，而是输给了民主社会主义。

民主社会主义超越了意识形态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孰优孰劣的百年争论，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优点捏合在一起并消除了各自的弊端，兼顾了公平和效率，是被实际生活证明行得通的办法、政策和道路，是积极的中性化。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和平、理性、建设、不输出革命，不强加于人，没有批判的锋芒，只有示范的魅力，不损害任何阶级、阶层的利益，不威胁任何国家和地区的安全，所以它赢得了全世界的青睐。美国历史学家威尔·杜兰说：资本主义的恐惧迫使社会主义放宽自由，而社会主义的恐惧也使资本主义增加平等，东方是西方而西方也是东方，不久两者就要碰头。（《世界文明史》，东方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1 卷【下】第 1180 页）

历史正在这样发展。这个碰头的交汇点就是民主社会主义（新资本主义）。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正在成为人类共同认可的道路，将人类带入一个和平发展的新世纪。

（16）邓小平政治遗嘱和辛子陵的推介（全文）

记录于 1992 年 8 月 28 日，会议召开于北京景山后街邓家小院，参加会议者有江泽民、李鹏、乔石、李瑞环、朱镕基、刘华清、胡锦涛和姚依林。

遗嘱由当时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负责记录。遗嘱的内容是：今天找你们来，是我心中有些话想对你们说，人老了，清醒的时候越来越少了，我想趁我还清醒的时候，给你们交代一些事情。你们有跟我快四十年的了，从二十多岁的小伙子，也熬成了六十多岁的老头子了。而锦涛今天算是第一次面谈，第一次面谈就给你们交心，是不是很冒失？是很冒失。我这辈子就是冒失过来的。早年不到二十岁，不懂法语、俄语，身无分文就冒失去闯法国、俄国。回国后，又冒失地到冯玉祥军队去工作；后来又冒失地去广西搞百色起义，到苏区又冒失地被打成反党分子；解放战争时冒失地挺进大别山。八大以后，毛点我当总书记，我却多年不向毛汇报工作。文革和文革以后，那就更冒失了。这些事情你们都知道，我就不罗嗦了。我把你们找来，要向你们交代一些我认为应该交代的话。你们知道，年初我去了一趟南方，后来让郑必坚执笔弄出个“南方谈话要点”。很多人讲，这是邓老爷子的临终遗嘱，或者说最后的政治交代。这话不确切。我今后不会再说太多的话了，但真正的政治遗嘱是不会像这样弄得满城风雨的，真正核心的政治交代怎么能大张旗鼓地宣扬？！今天，我倒想小范围的真正讲一下我的政治遗嘱，或者说是真正的政治交代。

首先，我对我们国家的政体现状并不满意。我是这个政体的创建者之一，这十几年也算是这个政体的守护者、责任者，但我也是这个政体的受害者。每当我看到樸方残废的身体，我就在想，我们政体的名字叫中华人民共和国，但共和国最本质、最核心的东西是什么呢？应该是民主与法制，而我们所缺的恰恰是民主和法制！为改变现状，这些年我做了一些工作，这个问题并未解决，十几年后，你们当政时也未必能解决。其实解决的办法是存在的，这就是向美国的宪法学习。

美国成为超一流强国，靠的就是这个东西。中国要成为一流国家也得靠这个东西。向美国学习，应该理直气壮，你比别人差嘛，就应该承认自己的不足。当然，这里边有很多技巧，不要急。但你们有责任去努力、去学习、去实践，这是历史的责任。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把中国真正建成权力来源于人民，法制公平的宪政国家。这也是孙中山的梦想。只有这样，才能说长治久安。

第二，台湾问题。香港问题解决之后，中国最大的统一问题就是台湾。台湾问题的关键所在是现在政体上差距太大。解决这个问题我是看不到了，你们那一代也未必能解决。但我想有三点你们要把握好：一是不到万不得已绝不动武，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二是大陆的经济要奋起直追，你一直穷下去就永无希望。三是在政体上大概一国两制还不够，一种可能的方式是联邦制宪政之路。中国经济强大了，政治上又有了民主和法制的共和体，台湾问题才有可能迎刃而解。

第三，发展问题。上面两个问题的基础还是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而这个问题的核心是发动老百姓去干，而不能只是政府去干。要千方百计让全国老百姓的脑袋来代替总书记、总理的脑袋，我们再聪明也聪明不过人民，我们的政府管得太多了，要尽可能少管。经济上，老百姓和市场都比我们的计划聪明。我想，只要坚持开放改革，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放手让老百姓去干，也就是坚持不断地发展经济民主，每年增长超过7%是有希望的。坚持下去，持之以恒，等你们交班的时候，中国或许就成了小康国家了。

第四，中美关系。中国对外关系中最重要的是中美关系，回顾一百年来，

对中国欺负最少的大国就是美国了。退回庚子赔款，让中国人到美国留学不说，八年抗战，美国的援助比苏联的援助多得多！抗美援朝与美国打仗，是金日成和斯大林强加给我们的。美国是第一强国，中国的发展和统一都绕不开美国，世界和平与发展也离不开美国。现在为了稳定和发展，我们只能韬光养晦，绝不冒头。没办法，我能力不够，手段也有限嘛。到了你们这一代，办法可能会多一些。我们要学习美国宪法，美国人会不开心吗？为了民富国强，我们党让人民当家作主和富强的理想不变，但名字是否可以考虑改为人民党、社会党之类呢？我想名字一改，中美关系马上会改善。总之，到了你们那一代，手段会多些、办法也会多些。你们也要开明些，灵活些，要有所作为，不要像我们这一代这么僵化和死板。只要为了国家和人民利益，实事求是地去做，就经得起历史的考验。

第五，“六四”问题。“六四”是改革开放过程中的必然现象，社会成本很高。这个问题，今后会有人来翻旧帐，说你动用了军队，也死人了，责任是躲不开的。但也还有历史责任，则在于国家是前进了还是后退了？国家是混乱破败了还是稳定发展了？真正对历史负责任的人，不怕这种责任。尤其要做领袖，更得要有担当。到了你们那一代，也不知会出什么样的事情，或许是“六四”，或许是“七四”，但你们一定要有历史责任感，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只要对中国进步发展有利，该怎么干就下决心怎么干。回答“六四”这类问题，根本的方法不是去争论，而是实实在在地把国家搞好，让人民生活一天天好起来。有人告诉我，党内人才一代不如一代，我看得以什么标准衡量，论文采飞扬，我不如毛泽东，论意志坚定，你们可能比不了我。但论科学理性，论勤学努力，论民主长处……总之，不要怕事，不要怕祸。要敢闯、敢干、敢负责任。当然，也不要一朝权在手就惹事生非。要不惹事、不生事、干实事、敢负责，有了这种态度，历史也会对“六四”有个理性的说法。

第六，制度建设。除了政体要在宪法制度上下大气力外，还有党内、政府内的政治制度搞一些持之以恒的建设。像今天我们只在小圈子里选江泽民，小圈子里选你们，这是历史条件，没有办法。但这种作法绝不能长期不变。最终的领导人还是靠人民来选，不能靠小圈子和枪杆子。最好是先从基层的民主抓起。今后我们再也不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古语说是得民心者得天下，我看得靠实事求是的本领，靠真理和民心民意来维持完善政权。你们要有这个观念，今后主要是靠老百姓的税收来养政权，你要老百姓养你，你就得代表民意和服务民意。此事从上到下搞，风险太大，但必须试验，不搞的风险更大。合理的办法是从下而上慢慢演进，先把基层工作做通，农村包围城市，这样风险较小，就像八十年代农村改革那样，先从大包干抓起，而后是乡镇企业，再而后是城市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制度改革也可以摸着石头过河。不要急，但也绝不能不去开拓进取。

辛子陵声明（2018年9月24日）

《邓小平政治遗嘱》来自互联网，不知何人发到我的微信上，既已在网上流传，则自然解密。经我反复研读鉴定，这个文件是真的，不是伪造。我用纸媒向世界公布，政治责任和法律责任由辛子陵负，与出版商无涉。

本书作者的观点：关于《邓小平政治遗嘱》的真伪本人难以断定。兹引述三段中共高层头目的讲话似可供参考：

1、美国人民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我党的奋斗目标，就是推翻独裁的国民

党反动派,建立美国式的民主制度,使全国人民能享受民主带来的幸福.我相信,当中国人民为民主而奋斗时,美国人民会支持我们。(毛泽东 1944 年与到访延安的美国代表团的讲话)

2、蒋介石说,中国不能搞民主,中国需要的是一个中央集权的政府,使中国走向稳定,只有稳定了,中国才能走向富强.这是什么强盗逻辑啊。(周恩来 1946)

3、共产党要夺取政权,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这是一种恶意的造谣与诬蔑。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但并不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刘少奇选集》上卷第 172 页)

毛、周、刘都是中共的顶层人物,历史业已证明,他们说的话信口开河而已,当不得真的。邓小平的话就那么可信吗?

以下是辛子陵对《邓小平政治遗嘱》的推介和诠释以及对习近平的进谏。我

认为辛子陵先生的愿望是好的、对当局者的判断、期望与希冀却是很不现实的。且拭目以待吧。

习近平摆脱内外困境的出路是执行邓小平遗嘱 辛子陵

内容提要:习近平早已感觉到共产党变成了“老虎党”之后,已不能完成救民于水火、扶大厦之将倾的历史任务。必须执行邓小平政治遗嘱,以开天辟地的魄力重新建党。中国共产党改为中国社会党,习近平将摆脱“老虎党”的羁绊,丢掉历史的包袱,高扬民主社会主义旗帜,学习美国宪法,走美国联邦制宪政之路。披荆斩棘,重组干部队伍,重构政权机关,重修法律制度,台湾以联邦制的形式与大陆和平统一,将充分表达习近平不组社会主义阵营,不搞共产主义革命,不走毛泽东、斯大林道路的诚意,做中国的华盛顿,打消美国 and 民主国家对中国的疑虑,从政治上化解贸易战;剩下纯粹的经济问题就容易解决了。

打碎刘云山的“三个自信”

刘云山在十八大政治报告中加进的“三个自信”是捆绑习近平的三条法绳。刚上来的接班人习近平只能接受,加一个“文化自信”,变成十九大的政治口号,到处呼喊。谁提政治改革,就是政治上不坚定,缺乏“三个自信”的表现。“改旗易帜”的大帽子镇住了全党。

邓小平遗嘱中说:“我们要学习美国宪法,美国人会不开心吗?为了民富国强,我们党让人民当家作主和富强的理想不变,但名字是否可以考虑改为人民党、社会党之类呢?我想名字一改,中美关系马上会改善。”一言九鼎,石破天惊。把刘云山的三个自信打得粉碎。

党的名字一改,道路、理论、制度都得变,邓公帮助我们找到了政治改革的突破口,改旗易帜势在必行。改变党的名称不是灭党,是党弃旧图新,民主转型,有序地整编党的队伍。孙中山创建的国民党开始并不叫国民党,叫兴中会,反清起义时叫同盟会,护国讨袁时改为中华革命党,北伐前才改名国民党。如果改名就是灭党,孙中山把自己的党灭了三次。

共产党必须改名有三个理由:一违理论,二违宪法,三违世道人心。

第一个理由是恩格斯明确否定了共产主义,共产党失去了存在的理论根据。1886 年 2 月,1892 年 1 月和 7 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2 卷第 316、372 页)恩格斯用大致相同的语言三次明确:“共产主义不是一种单纯的工人阶级的党派性学说,而是一种目的在于把连同资本家阶级在内的整个

社会从现存关系的狭小范围中解放出来的理论。这在抽象的意义上是正确的，然而在实践中却是绝对无益的，有时还要更坏。” 恩格斯晚年则根本放弃了共产主义理论。1893年5月11日恩格斯73岁时对法国《费加罗报》记者发表谈话，否定了年轻时设计的共产主义社会模式。他说：“我们没有最终目标。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吗？您在我们这里连它们的影子也找不到。”

共产主义理论可以在沙龙里高谈阔论，但绝对不能实践，不是治国安邦的理论，谁要是用它治理国家，不仅无益，而且有害。恩格斯说共产主义理论抽象正确，具体错误，以绝对的语气否定了它的实践性，否定了它的可行性。他好像预见到后代共产党人可能在“共产主义”的口号下干出蠢事，谆谆教导后人，共产主义理论是不能实践的，小规模实践犯小错误，大规模实践犯大错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坚持要把共产主义理论作为改造世界的理论，作为行动的指南，这是中苏两党长期犯“左”的错误，饿死几千万人，费尽移山心力，建设了一个贫穷社会主义、票证社会主义的根源。

第二个理由是我们宪法中有了保护私有制的条文，《共产党宣言》的基本主张是消灭私有制，共产党的名称违反现行宪法第十一条和第十三条，威胁整个国家多种所有制共存的根本制度的稳定。

第三个理由是党患了绝症，无可救药，改名重组是唯一出路。共产党曾经是个代表人民利益、受人民拥护的好党。但是，终没有逃过黄炎培与毛泽东在“窑洞对”探讨过的那个周期律。建国以后走向独裁专制，改革开放以后走向腐败堕落。江泽民20年腐败治国、网罗党羽形成的高级干部队伍，已经不能依靠，不能使用，高级干部85%以上腐化变质了。据第17届中央组织部长李源潮调查：大陆官方内部权威机构统计资料表明，截至2012年3月底，第17届中央委员会204名中央委员中，竟有187人有直系亲属在欧美等西方国家居住、生活、工作或已经加入所在国国籍，比例高达91%；而167名候补委员中，也有142人亲属已移居海外，占85%；甚至127名中纪委委员中，亦有113人亲属已移居海外，比例占到89%。这些随时准备流亡的贪官被称为“弃船派”。官场体制性的、近乎疯狂的贪污腐败和社会的两极分化，摧毁了社会和谐的基础。据斯诺登披露：中国官员在国外存款达4.8万亿美元，约为30万亿人民币。这是个什么概念呢？中国搞全民免费医保每年需要1600亿，没收贪官的海外存款，够13亿百姓全民免费医保190年！

据最近一份内部文件统计，在31个有编制的省级党委中，不合格数达23个。在29个中共中央部级党委中，18个不合格；66个国务院部级党委（组）中，不合格数为42个。至于层级稍低的各级中共党委，不合格数更是触目惊心。这就是目前中共党组织面临崩溃危机的真实情况。习近平对高级干部十谈“不忘初心”，要依靠这些“同志”振兴中国共产党，简直是对牛弹琴。

罗宇给习近平的建议是：“中国大陆现存的体制是反人民的，一切坏事都是共产党领导出来的。对这个体制的邪恶，你我都有刻骨铭心的记忆。你现在有机会改变这个反人民的体制。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这个邪恶体制干的坏事，从改革开放初期的“大平反”可见一斑。胡耀邦平反历史上的冤假错案，无时效限制，也无对象限制，从文化大革命上溯到土地革命战争，红军内部肃反的自相残杀，直到党成立初期陈独秀、瞿秋白的冤案；人无分级别，从刘少奇、彭德怀等数十位国家领导人，到上百万党

内外干部，数千万工人农民，上百万知识分子，四十多万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数万宗教界人士，数十万资本家、工商业者，以及华侨和台湾同胞留在大陆的亲属，十八万以上的“现行反革命”，数千万地富反坏分子及其子女，数十起大革命时期红军根据地的冤假错案，都陆续平反改正，给他们恢复名誉，让他们的后代抬起头来，挺起胸来，不再受歧视。共产党这件外衣，沾满了亿万人的血泪。民间的概括是：以革命的名义杀人，以人民的名义共产，以改革的名义分赃，以维稳的名义封口。表现了对共产党的厌恶、痛恨和绝望，世道人心希望共产党退出历史舞台。

作为大政治家的邓小平，留下走美国人道路的遗嘱，和毛泽东走俄国人的道路针锋相对，说明邓与民心是相通的，对中国的世道人心有深刻的理解，知道共产党已经不可救药，特别是毛泽东留下的党国体制是与 21 世纪的世界民主潮流不相容的，必须改革。改革初期，邓小平谨慎地在政治上保护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到他晚年，根据自己一辈子的政治阅历，他觉得有必要在政治上亮明自己的观点：毛泽东决定中国“一边倒”的战略，在当时是有道理的，但放在长远的历史中观察，是不正确的。40 年前，邓小平是在经济上拨乱反正，1992 年这个政治遗嘱，是在政治上拨乱反正。他不想留下一个瘸腿改革的中国；一个经济繁荣实行宪政民主的中国，是他的理想。但江泽民辜负了邓小平，封锁邓的政治遗嘱不向全党传达，后又炮制“三个自信”反对这个遗嘱。在共产党走到历史终点的时刻，中共明争暗斗的两派，谁执行邓的遗嘱谁胜出，谁反对邓的遗嘱谁出局。

习近平面临的危机和真实的处境

习近平处境非常险恶。时下中国有两大危机：外有中美贸易战步步紧逼，内有房地产泡沫面临破裂。

中美贸易中美国的巨额贸易逆差，尽管是历史形成，不是习主政五年造成的，但，是他属下的宣传口十九大后大吹大擂，惹出了一场贸易战。贸易战全面开打，美国全部征收 25% 关税，而中国出口额不减，美国政府将白白获得 25% 的关税收入，而且美国消费者也不会因购买中国商品而增加支出；另一方面，中国从美国进口的产品大多无法替代（比如大豆等农产品），加征关税后，中国百姓不得不付出更高的价格购买。这样一来，中国百姓等于变相替美国进口商向美国政府交关税，又替中国进口商向中国政府交关税。中国外交部曾声称，将不惜一切代价反击美国的制裁。经济学家贺江兵指出：“13 亿中国老百姓将成为官方‘不惜一切’的那个‘代价’。”再看美国的关税政策，中国民众对川普一片欢呼，支持美国对中国打贸易战，因为美国是跟中国体制打，不是跟民众打。随着美国对中国施压加大，要求中国履行 WTO 的承诺。中国为避免美国的制裁，宣布对一些产品减税，并声称是为了让中国消费者得到好处。政府宣布对进口癌症药减税时，癌症药价格由上万元减到几百元，很多癌症患者和他们的亲人这才发现，自己买的天价药大部分是给中国体制交了税。买不起进口药治疗导致患者死亡的人家大骂政府没良心。特别不能忽视的是川普政府正将与中国的战略对抗从经贸领域扩大到军事、意识形态等多个领域。如果人民生活由小康退回到计划经济时代，吃饭要粮票，买大豆要凭医生开的得了浮肿病的条子，习近平将成为万夫所指的历史罪人。这个舆论江派控制的媒体正悄悄在造。最近中宣部的“六不讲”从反面证明了这一点。

房地产政策是历届领导人经济政策最大的失误和失败，各省市靠卖地盖

楼创造 GDP，只拿很少资金干别的，对中国制造业、科技业和整个实体经济造成致命性打击。现在有 35 亿套房子卖不掉。房地产绑架了整个国民经济。房地产泡沫才是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的金融风险。一旦泡沫破裂，后果不堪设想。经济学家向松祚指出：因为全部银行贷款和社会融资，超过 70%是用房产和土地做抵押。房产和土地价格一旦大幅度下跌，银行和金融体系将面临崩溃。房地产是个很长的产业链，它的上游是建筑材料，主要是钢铁、水泥，还有煤电、运输等，都是资金密集型产业。房地产泡沫破裂带来的危害不仅限于行业本身，而会影响到其他许多行业，使中国经济大半瘫痪，不仅几千万建筑工人失业，中国将有半数从业人员失业在家。根据各种估算，我国房地产总市值已经超过 GDP 的 400%，高居全球榜首。我国居民手里的全部财富，房产占比接近 80%。历史上日本房地产泡沫破裂，房地产价格持续下跌 20 年，从最高点跌去 90%。中国如走到这一步，我们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将风光不再。那时江派会将全部责任推给习近平，让习近平下台以谢天下。

这两大危机都压在了习近平身上。江派从各方面准备条件和力量逼习近平下台。这就是习近平时下的真实处境。

十九大以后的事态发展证明，习近平与江泽民妥协，依靠收编他的干部是干不成事，稳不住局面的。江派官员不作为，等着出事，甚至反作为，继续镇压法轮功，封闭基督教家庭教会，拆除教堂十字架，强迫寺庙升国旗，和尚走正步，强拆民房，强征土地，打压上访群众，停发教授工资，把老人遗体从棺材里拖出来，种种劣迹，不胜枚举。其深层目的是给习近平积累民怨。这是一种“温水煮青蛙”式的渐进政变。

民不聊生，民怨沸腾，民变蜂起，这是改朝换代前必演的戏码，成为历史规律。今天正在一幕一幕地上演。

据清华大学教授白重恩最近的调查研究，中国五项社保的法定缴费之和已达工资水平的 40%，有些地区已接近 50%。中国社保缴费是北欧五国的 3 倍，是 G7 国家的 2.8 倍，是东亚邻国的 4.6 倍，然而即使这样，社保仍存在巨大亏空。印度的财政收入是 2000 亿美元，解决了 12 亿人口的免费医疗。中国的财政收入是 2.2 万亿美元，是印度的 11 倍，却至今没有解决 13 亿人的免费医疗问题。关于国民收入，德国每小时人均工资 30 美金，美国 22 美金，泰国 4 美金，中国只有 0.8 美金，位列世界倒数第一。

这里我补充一个材料，埃塞俄比亚是世界上最穷的 10 个国家之一，但他们早就做到了从小学到大学一路免费，连教材都由政府免费提供。学生读大学，食宿都由政府“垫资”。学生大学毕业，工作一年半后开始在 10 年内还清政府“垫资”（4 年约合 8000 元人民币），如果毕业后找不到工作，国家不向学生索要这笔费用。埃塞俄比亚还对穷人实行免费医疗，拿着“贫民证”就可以在村镇诊所享受免费医疗。非洲国家都能做到上学免费，医疗免费，我们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国家却不能做到。百姓心生怨愤，认为习近平口惠而实不至，内外颠倒，非不能也，是不为也。能否先解决国内问题，后援助非洲，对百姓大方一点，援外量力而行呢！

今年有四件事导致民怨沸腾。

一是毁棺拖尸事件。今年 5 月，江西上饶市一个月收缴五千多副棺材。有的老人躺在自己的棺材中，不让当局抢走，却被强行从棺材里拽出，棺材被拖走砸毁。一段网上视频显示：江西吉安一老人去世，家属亲人正在哭丧时，突然有数十名身穿制服的人强行闯入，打开棺材盖，将尸体拖出抬走，

留下一旁穿麻戴孝的亲人们哭天抢地，已入殓的棺材也被销毁。

江西省委书记刘奇称，殡葬改革是“破千年旧俗、树一代新风”的社会改革，要“敢于担当、攻坚克难”！

二是假疫苗事件。7月18日，吉林长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曝假疫苗丑闻，主要责任人高俊芳等18人已被逮捕。高俊芳能够成为“疫苗女王”，是托了当时吉林省省委书记张德江的福。当年，张德江陪同江泽民到访长生生物，不仅成就了高俊芳日后的飞黄腾达，留下的合影成为其违规造假，毒害民众的护身符。长生公司向山东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出售了25万多支劣质百（日咳）白（喉）破（伤风）疫苗，已注入21万多儿童体内！

消息传开，骂声遍中华：“心彻底被伤透了。连孩子的疫苗都可以造假，我的厉害国，你还有啥不敢！”“政府已经没有公信力了，这是多可怕的事，全靠压制，火山既然是活的，能压制多久呢？”“请老川普赶紧把这个地球上最邪恶的政权抹去吧！”

三是P2P爆雷事件。8月6日，网上有消息称，“（北京）金融街近200家P2P公司（负责人）跑路了。”这些P2P公司都有半官方背景，才在投资者中建立了信任。这波“爆雷潮”先是从南京开始，然后蔓延到上海、杭州、北京、深圳等地，涉及资金数千亿，造成的“金融难民”可能达上千万人。不少投资者倾家荡产、血本无归。杭州31岁的个体户王倩（女），生前将辛辛苦苦赚来的26万多元，投资P2P票票喵平台。8月6号，票票喵运营团队发布退出方案，这意味着平台倒闭。随后，王倩和其他受害人一起到杭州和上海维权，讨要血汗钱，亲身遭遇了暴力维稳，并被本地警方监控威胁。

王倩感叹：“钱其实没有那么重要，还年轻能赚，能活下去，但是这口气实在受不了。这个国家太令人失望，钱被诈骗，立案快一个月，一点进展没有……还没开始维权，派出所就锁定你是维稳对象，限制你。”“因为我从小接受到的教育是爱国爱党，有极高的集体荣誉感，一下三观全毁，我没有力量跟他们抗争，平民太弱小，真的太累，看不到希望了。”9月7日凌晨，王倩吊死在浙江金华一景区的树上。

四是拆迁引发的官逼民反事件。9月19日上午，广东肇庆市怀集县蓝钟镇佛甘村发生血案，屋主李姓兄弟四人将“动员”拆迁的政府官员砍死，死者分别是副镇长和国土所所长，随后用汽油焚烧他们来时乘坐的汽车。李氏兄弟被捕，只剩下母亲一人，民间纷纷捐款援助屋主一家。

屋主烧车时喊道：“我们四栋是交了钱的，现在又来说要拆，政府逼民反。”据村民透露，政府早前答应每户交两万元就可以不拆房子。这家四个儿子分别交了两万元，共交八万，但政府转脸不认账，仍然要拆，四兄弟忍无可忍，激起民变。有村民还说：“那些房子都是农民种大半辈子田存钱盖的（有政府批准建房的文件），不容易啊，砍死那些狗官是迟早的事。”

最近，出现了民变峰起的信号。2016年爆发几次大规模老兵赴京上访维权事件后，当年10月，中央下发24号文件，要求各地优抚安置老兵，将政策落实到位。但习李政令不出中南海。因地方财政困难，各地新官不认旧账，拖延推诿不办。2018年6月23日，中国再次爆发退伍老兵维权的流血事件。数千警察包围在镇江市政府大楼外面露宿的上千名维权老兵和军嫂，断水断电，暴力清场，黑夜中强行将他们赶到一所中学控制。据老兵微信群里的消息，23日的镇压导致3名老兵死亡，老兵奋起反抗，夺过警察的枪，击毙镇江警察8人。有15个老兵被打成昏迷，在医院救治。还有很多被打伤的老兵

分散在各医院，但都被警察看守。事态闹大，惊动中南海。中央出面安抚老兵，发给了一批补偿款，处分了镇江党政领导人，才使事件暂时平息。

法广引述博讯网报道，中国各地的维权老兵和 P2P 受害者多达上千万人，近来通过网络传播消息，各路维权者将在 10 月 1 日到 7 日期间下午 3 点起，每天在全国十几个省会城市走上街头，喊出“要赔偿！要生存！要公平！要正义！”的口号。有一处施暴镇压，将会激起全民大起义。这是习近平主席要深切关注的。一定要善待这些维权者，拿出一半的维稳经费为这些人解决问题，而不要留着钱作为镇压和善后的经费。凡主镇压者都是要制造“六四”逼你下台。我冒昧地提醒您，尽管美国不断地出招，咄咄逼人，但主要矛盾在国内，主要危险也在国内；尽管国内各地不断出事，按下葫芦瓢起来，但主要矛盾不在社会，在党内，主要危险也在党内。请习主席一定要清醒。

7 月里微信传播的政治流言大捧江泽民，把习近平糟蹋的不成样子，是一场舆论政变，几乎掀起政局动荡。习近平的威望全靠报纸和新闻联播支撑，民意支持率降至新低。继续妥协下去，或是被江派推翻，或是被体制改造，成为权贵贪腐集团的代表和保护者，参与坐地分赃，在百姓的骂声中挨到任职到期，黯然下台。

天佑习近平，给了你这样的机遇。有邓公遗嘱这把尚方宝剑，足以压倒江派和毛左反对“改旗易帜”的叫嚣，依靠人民和军队的支持，是可以保证办成办好这件大事，和平有序地完成国家民主转型的。根据邓公遗嘱，改变党的名称，学习美国宪法，实行两党制、议会制、总统制和联邦制，把中国带出毛泽东制造的这个专制死局，使人民真正地得到解放。谁给人民带来希望人民拥护谁。习近平将成为再造共和的历史伟人。

英雄所见略同

邓小平遗嘱关于学习美国宪法的讲话给我们指明了政改的方向。英雄所见略同。习近平也是主张学习美国、尊重美国、联合美国的，隔代成为遗嘱的执行人不是偶然的。2014 年 3 月，习近平就战争问题对军委领导干部的讲话中说：“处理好中美关系是【我们】对外战略的支撑点。”他说：

“重新认识二战、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的意义，实质上就是重新认识美国。战后、特别是我们执政后一个很长时期，我们对美国的认识发生了偏差。未能处理好我们跟美国的关系，是我们遇到诸多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对美国有一个准确的了解，对我们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战的历史进步作用之所以比一战更为显著，是因为有一股人类的进步力量加入到战争进程来了，这股进步力量，除了苏联，还有美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美国对战争性质演变的作用要大于苏联。1941 年 8 月 12 日，德国法西斯对苏联发动大规模闪电战已经一个多月，而珍珠港事件尚未发生，美英首脑罗斯福、邱吉尔在纽芬兰湾的威尔斯亲王号战列舰上秘密会晤，并共同发表了一则声明，史称‘大西洋宪章’。正是这所谓的大西洋宪章，加上苏联的被迫参战，彻底改变了二战的性质和走向：一场新强盗反对老强盗的二战，变成了世界文明进步人类反对野蛮、落后人类的二战。

“自此，一直到二战结束、联合国成立、发布《联合国宪章》，基本上就是沿着大西洋宪章的思路走来的。西方世界因为美国取代英法发挥了主导作用，也发生了根本性改变，游戏规则变了，过去数百年来凭借武力通过掠夺殖民地资源谋求经济、政治霸主地位的旧游戏规则，被自由主义的在各国独立自主基础上通过自由贸易增长财富的新游戏规则所取代。美国是这一新游

戏规则的倡导者和捍卫者。五十多年来，不仅世界大战没有发生，而且还造成了 20 世纪后五十年的经济、科技、文化大发展。事实证明，这一游戏规则是符合历史进步潮流的。

“我们在上世纪 70 年代末、80 年代初决定改革开放，实质上就是默认这一游戏规则，根据中国国情实行这一游戏规则。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游戏规则的正确。所以，二战的伟大意义，不仅仅在于消灭了几个法西斯战争机器，更在于战后有了一个新的国际秩序。也因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战争胜利的一方是否秉持正义，不看他宣扬的如何，而是看战后他是否能给一个地区、一个国家乃至整个世界带来进步、文明和发展。在二战中以及二战后，美国是秉持正义的国家，这是没有异议的。我们的宣传部门在制作节目回顾二战历史时，不应该回避这一事实。

“我们为什么要反美？是美国要侵略我们？不是。是因为美国反共，是的。美国不赞同共产主义学说……更是竭力反对共产主义者在各国的‘社会革命’实践……这是显而易见的……美国在它自己国内，就是在政治上极力压制共产党的……但是，我们是不是清楚，反对共产主义，不仅仅是西方国家执政者的诉求，也是那里的多数学者和普通民众的诉求……这种诉求在二战前和二战中也并不怎么强烈，但在冷战期间，尤其是苏联彻底崩溃之后，共产主义几乎就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了……共产主义在一些国家的糟糕实践，为反对者提供了有利且有力的证据。

“我们通常将冷战的双方称作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对抗，说得再直接一点，就是苏联跟美国的对抗。苏联挟社会主义阵营的强大声势，在上世纪 50 年代，确实是咄咄逼人，四处出击，大有横扫全球的架势。但是，人们忘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反对美国，反对的是什么？反对的是美国主导的国际社会新游戏规则。反对这一新游戏规则，实行另一套游戏规则——共产体制，这就是冷战的实质。……于是就有了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现在看来，对中华民族来说，这两场战争意义不大。尤其是在中国的改革开放经历了 30 多年之后，我们已经认可了二战后形成的国际社会游戏规则，而且获得了很大成绩，回过头来再审视那两场战争，真的意义不大。

“有人喜欢用所谓的地缘战略解释朝鲜战争，什么战略屏障、唇亡齿寒。但那是以反美、反西方为战略前提的，问题是，我们真的一定要反美反西方吗？坚持社会主义就一定要跟美国、跟西方势不两立吗？很长一个时期，我们把社会主义当作区别敌我的政治标准，当作了解放全人类的终极目标，当作了一种战斗武器，上世纪 50 至 70 年代就是这样的。这是对社会主义的一种曲解。

“我们新的国家大战略的基本点是：承认迄今为止仍然有效的上世纪 40 年代确立的联合国精神，包括从《大西洋宪章》到联合国一系列准则性文献所体现的人类现代文明精神；承认人类普世价值和普世规则；接受经济、政治、文化全球化一体发展的格局；发展并巩固国与国正常关系，接受国家发展的最终目标是民众的富裕、安逸、文明。”

这是对上世纪 50 至 70 年代，即毛泽东时代内政外交的全面批判。读者可能会觉得对内政的批判着墨不多，习近平反对国际上的“共产体制”，批评“共产主义在一些国家的糟糕实践”，有这两句就够了。“共产主义在一些国家的糟糕实践”，指的就是毛泽东的“三大改造”和继之而起的大跃进和公社

化运动，饿死了 3755.8 万人。最后用民众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的“富裕、安逸、文明”代替了虚无缥缈的“共产主义大目标”，从此，我们的追求与人类现代文明趋同，不再是异类。

这些真知灼见因为违背了刘云山的“三个自信”，长期被封锁不让人民知道。习近平的大战略江派通不过，连“普世价值”都不能达成共识，习近平说了不算。江派对习近平，给大帽子戴，在意识形态上寸步不让，都得听他们的。这就是习近平的真实处境。

做中国的华盛顿

党内意识形态的斗争十九大就明朗化了。起草十九大报告时，刘云山拼老命也要坚持“科学社会主义”这个原教旨主义的术语为主调，反对民主社会主义，以此为交换条件，准许“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入党章。习近平做了妥协，但坚持写上“21 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这是民主社会主义的另一种表达），虽然只有几行字，表达了习近平对民主社会主义锲而不舍的态度，为日后解决这个问题埋下伏笔。

十九大后，习近平和刘云山都谈“马克思主义”，但内涵是不同的，出现了“一马各表”的局面。两条社会主义道路经过一个世纪人类的选择，科学社会主义以“最最革命”的姿态，树旗帜，拉队伍，在世界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但由于固有的理论阙失以及在传播中扭曲变形，在苏联和东欧各国造成国家权力异化，专制独裁，官员腐败，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彻底失败，经济衰退，民不聊生，导致苏联解体，东欧巨变，十月革命的灯塔熄灭。

共产主义运动大潮消退之后，欧洲民主社会主义以新的理论、新的实践、新的成就和新的面貌走上了历史的前台。欧洲社会民主党人把他们开创的民主社会主义道路，不卑不亢地展示在世人面前。他们凭借宪政民主政体、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混合所有制、社会市场机制和福利保障制度这四大法宝，成功地实现了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对接，在西欧和北欧建设起了民主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苏联东欧各国剧变后也都走上了民主社会主义道路。21 世纪民主社会主义成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主流，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成为 21 世纪的马克思主义。

十九大后，习近平意图领导党在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旗帜下和平民主转型，把党改造成为像瑞典那样的社会民主党。在宪政民主框架内，瑞典社民党依靠自己政策的正确，代表了广大人民的利益，得以连选连任、长期执政的经验（从 1932 年到 2006 年共 74 年中，瑞典社民党执政 65 年，其中连续执政 44 年）；在经济建设中把效率和公平统一起来，实现同向分化、共同富裕的经验；正确处理劳资关系，调动工人和企业家两个积极性，实现劳资双赢的经验；有效地防止特权阶层出现，杜绝官员以权谋私、贪污受贿，长期保持廉政的经验，为我们在改革开放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成功的范例。

十九大开过快一年了，《人民日报》、《求是》杂志以及省一级的党报党刊没有一家、没有一处发表解说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全党的意识形态对习近平提出的 21 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进行有组织、有领导的抵制。大肆宣传刘云山的“三个自信”。有了“三个自信”，新的道路不准探索，新的理论不准提出，新的制度不准出现。马列毛邓三科已经穷尽了道路、理论和制度的真理，中国的一切都已经尽善尽美。饿死 3755.8 万人，“六四”镇压学生，迫害法轮功和活摘人体器官，都属于“三个自信”的范畴，遇到这种情况照方

抓药，习近平跟着“自信”就行了。在马列毛邓三科的道统系列中，习近平排在老七。要习近平安于老七的定位，不许超越“先贤”，在道路、理论、制度方面提出任何新见解、新主张都是不能允许的。刘云山要借助道统力量，把习近平压在五指山下。

习近平的救党主张被认为是“改旗易帜”的邪路。受到江派为代表的党内权贵贪腐集团的激烈反对。权贵贪腐集团已经鸠占鹊巢，盘踞中央和地方各级组织，鸠与鹊共生共长。买官卖官的风气一旦形成，注定了这个党贪官越来越多，清官越来越少，贪官排斥清官，贪官占了多数，共产党成了“老虎党”。有人问王岐山：中央委员会为什么不通过官员公示财产的硬性决议，逼全党执行？王岐山说：“这样的决议通不过，都是他们的人。”可见中央委员会中“弃船派”的比重与十七届差不多。这些人宁可看着亡党，也不公示个人财产。观察习近平能否压倒“老虎党”，不是打了多少只老虎，是看能否做到官员财产公示。时至今日，连个官员公示财产都做不到，习近平、王岐山对这个党绝望了。川普总统与美国政府，是把习近平与“老虎党”作了区别的。公布贪官在美国的财产是对习近平反贪打虎的支持。与其等着“老虎党”弃船，不如将他们赶下船。以 15%党内健康力量为骨干，大量吸收新鲜血液，改名重建。有人会说，没有共产党还会有中国吗？毛泽东还是一个革命者时说过：“依我看没有任何党，照样有中国，没有任何党，地球照样转。”

现在的趋势是习王改造不了贪官占多数的“老虎党”，“老虎党”要改造他们。先把王岐山逼出中央委员会，使反贪打虎停下来，保住老虎王；第二步就是逼习近平下台。颠倒是非，指功为过，连“一带一路”在党内都受到指责，这是逼习下台的信号。

30 年盲目发展钢铁工业，2006 年中国钢产量四亿一千七百五十万吨，包括英国的欧盟 25 国钢产量是一亿九千八百九十万吨，包括美国的北美自由贸易区（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钢产量一亿三千三百五十万吨。英国加美国，欧盟加北美，总共产钢三亿三千二百四十万吨。中国一国的钢产量，超过了英美加上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 28 个国家。这要在 1959 年，毛泽东得乐疯了，尾巴要翘到天上去。毛泽东那时就想赶超英国，他老人家那个思想解放的程度，没敢想过钢产量超过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 25 个国家，更没想过超过欧洲还加上美国等北美三国。

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富贵病”，其特点是生产过剩而不是生产不足。中国加入了 WTO，融入世界资本主义共同市场，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生产率发展到世界第二，才荣幸地得了这种“富贵病”。我们钢产量四亿吨，自己用不完，又卖不掉，这叫产能过剩，这叫经济危机。中国有资格闹经济危机了，说明中国的经济发展起来了。用历史眼光看，走出了短缺经济、票证经济，这是好事。但如何解决产能过剩，得拿出办法来。习近平 2014 年 11 月 4 日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八次会议，研究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规划，发起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设立丝路基金。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顺应了时代要求和各国加快发展的愿望，提供了一个包容性巨大的发展平台，具有深厚历史渊源和人文基础，能够把快速发展的中国经济同沿线国家的利益结合起来。要集中力量办好这件大事。

“‘一带一路’贯穿欧亚大陆，东边连接亚太经济圈，西边进入欧洲经济

圈。无论是发展经济、改善民生，还是应对危机、加快调整，许多沿线国家同我国有着共同利益。”

孙子兵法曰：见日月不为明目，举秋毫不为多力，闻雷霆不为聪耳。在常人看来山穷水尽的情况下找出道路拿出办法来，这才是高明的领导人。请问指责一带一路的衮衮诸公，谁能为中国三亿吨过剩钢铁找到销路？把钢铁生产发展到如此巨大的规模，是你们的“政绩”，如今不向你们追究盲目发展造成生产过剩的责任，为诸公擦“屁股”，为几亿吨钢铁找到了销路，反倒成了习近平第一条大罪，这是不是太不厚道，太失君子之风！

科学社会主义为什么失败？因为它创造不出高于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率。列宁在《伟大的创举》一文中曾经盲目地自信：“资本主义可以被彻底战胜，而且一定会被彻底战胜，因为社会主义能造成新的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列宁这篇文章的副题是《论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他想通过发动群众加班加点、不领工资的办法创造比资本主义“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布尔什维克的政治鼓动很快就失灵了。经过七十多年的拼命努力，苏联也没有创造出高于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率来。1967年苏联官方公布的国民生产总值为当年美国的——32715亿美元——67%，此后再未公布。据西方权威机构联合调查，苏联解体前1989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只有5120亿美元，不到美国的1/10（美国同年的国民生产总值是64319亿美元）。这样一种落后的“科学社会主义”样板，理所当然地被历史淘汰，其高级阶段共产主义随着苏联的解体自然也就幻灭了。

把科学社会主义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源头，就是把毛泽东的“三大改造”作为改革开放的源头，前后30年混为一谈。这是陈云提出，邓力群和刘云山坚持的，是首要的“道路自信”。十九大报告的主调是科学社会主义。过去美国主流观点认为，中国不会挑战美国的意识形态，但是现在他们认为中国目前的意识形态回到毛泽东的模式上去了。“回归毛泽东”，理所当然地引起西方的警惕和敌视。西方本来认为通过支持中国开放，让中国融入资本主义世界，弃冷战之思维，走民主之新路，实现和平共处，共同发展。别有用心的毛左理论家，高调“三个自信”，就是要在道路、理论、制度上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继承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那一套“左”的东西，坚持“共产主义”，坚持“解放全人类”，引起了极大地误解和混乱。在国内，“共产主义”高调越唱越响，前有周新城在党刊撰文重提“消灭私有制”，后有吴小平鼓吹“私营经济离场论”，引起严重地社会动荡；在国际，十九大被严重误解，“一带一路”被认为是毛泽东的世界农村包围世界城市的理论、道路的延伸，中国一旦崛起，还得在世界推行“解放全人类”的共产主义革命。法广认为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北京走得太远了，是国际政经秩序的挑战者和破坏者。

对中国友好的知名学者郑永年指出：一带一路“统治世界”的宣传，不排除有故意替习近平四处树敌、制造外患的因素。这个分析是中肯的。美国媒体人、阿波罗网评论员“在水一方”说：十九大习近平同江泽民曾庆红妥协后，曾庆红用自己掌握的媒体左右舆论如鱼得水。宣传口执行的是没有刘云山的刘云山路线。以舆论绑架当局整体“左转”，有意挑起中美矛盾，离间习近平主席与川普总统的个人友谊，使习近平在国际上陷于孤立，在与江派决战时失去美国这个强大的奥援。

对于中美贸易战，不能就事论事。贸易战不止是贸易摩擦问题，是意识形态问题。9月24日，沃尔茨堡大学教授费多丽（Doris Fischer）接受《德

国之声》采访时说：“中美贸易战的实质是共产政权和自由国度的政治制度之争。现在北京提出‘中国制造 2025 计划’，试图成为科技领头羊，在工业产业链中占据主导地位，但并无意改变其政治制度，这令美国感受到实质的威胁。”川普在联合国等重要场合谴责共产主义，主要是对中国崛起不放心。担心再过若干年，美国和欧盟面对的将是 21 世纪的毛泽东，甚至是 21 世纪的斯大林，世界再陷入冷战。西方的共识是：如果现在不对中国下手，西方将失去抑制共产主义的时机。看前面习近平讲话，尊重联合国宪章，尊重二战后美国主导的世界自由贸易体制，反对共产体制，宣传口对中国崛起的宣传制造出这么大的误会来，应该深刻反省。中共改名，真可能出现邓小平预料的效果：名字一改，中美关系马上会改善。

习近平早已感觉到共产党变成了“老虎党”之后，已不能完成救民于水火、扶大厦之将倾的历史任务。必须执行邓小平政治遗嘱，以开天辟地的魄力重新建党。中国共产党改为中国社会党，习近平将摆脱“老虎党”的羁绊，丢掉历史的包袱，高扬民主社会主义旗帜，学习美国宪法，走美国联邦制宪政之路。披荆斩棘，重组干部队伍，重构政权机关，重修法律制度，台湾以联邦制的形式与大陆和平统一，将充分表达习近平不组社会主义阵营，不搞共产主义革命，不走毛泽东、斯大林道路的诚意，做中国的华盛顿，打消美国 and 民主国家对中国崛起的疑虑，从政治上化解贸易战；剩下纯粹的经济问题就容易解决了。

2018 年 7 月，台湾国民党元老连战访问北京。7 月 11 日习近平与连战会晤。连战提出：希望允许国民党在大陆建立组织。首先在广东省、福建省、海南省建立中国国民党支部，并参与五年后的政府竞选。习近平表示：将会充分考虑连战这个建议，并尽快在年内答复。

国民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在抗日战争中是保卫国家、战胜日寇的主力，为中国争得了世界“五强”的地位，成为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将来中国实行议会制和两党制，中国国民党是最有资格入选的。如果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完成 1946 年开启的和平统一大业，用和平代替内战，用竞选代替敌对，用监督代替对抗，一个统一的民主中国崛起于东方，中华民族将峰回路转，揭开历史的新篇章。（2018.10.1）

后记

2012 年春夏之交，反右五十五周年之际，不禁回想起 1957 年毛泽东假借“整风”之名，效法秦始皇焚书坑儒，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反右”运动。全国三百多万知识分子被沉入罪恶的深渊。把一个戴着红领巾长大的、热爱祖国、热爱党、笃信社会主义、热爱专业的军工企业的青年科技人员，在毫无过错的情况下诬陷为敌对分子，不仅推翻在地，还要再踏上一只脚，恶狠狠地狂呼“叫你永世不得翻身”。害得我被专政了二十二年，发配到深山老林服苦役，毛泽东死了以后才得以重见天日。为了让人们了解毛泽东的罪恶，避免重蹈覆辙。让未来的执政者不再成为历史车轮的绊脚石，让子孙后代不再为了思考而坐牢，让中国不再发生为了呼唤自由而失去自由，为了争取民主而遭遇镇压的悲剧。我以耄耋之身开始构思回忆录。2012 年底动手撰写，历经近六年，2018 年冬完成初稿。虽反复增删披阅，深感详略未必得当，语句未臻流畅，叙述不免粗略，用词尤欠推敲。且个人观点必有偏颇之处，疏漏、片面、甚至错讹都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斧正。

从 20 岁到 43 岁，我的人生黄金时段基本上是在监狱里度过的，在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生存环境中，终日与手铐脚镣相伴，受捆绑吊打之刑。至今五十余年手腕上铁铐卡紧之疤痕、绳子捆绑之印记犹在。因青壮年时期历尽了千般辛苦，受尽了百般折磨，导致疾病缠身。年逾古稀后，每年都要住院数月。经多家医院用 CT、核磁共振、超声等现代仪器检查，现有高血压、糖尿病、粥样动脉硬化、冠心病、颈动脉斑块、脑血管梗阻、心力衰竭、视网膜黄斑病变、眼底出血、右眼失明左眼视力仅 0.15、腰椎错位难于站立等十多种疾病。在朋友们的鼓励支持下终于完成了回忆录的写作。回忆录的第十一章引录的大量文章是辨别真假社会主义的试金石。仔细阅读就会发现，中共从毛泽东把持权力之始就背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主张的共产主义。毛泽东常恬不知耻地自称为“马克思加秦始皇”实乃遗臭万年之谬论。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史博德(Fred E. Schrader)先生是德国著名学者，史博德是极少数能辨认马克思笔迹的人，也是当今世界极少看过马克思全部手稿的专家。史博德的毕业博士论文研究的就是马克思 1850 年到 1860 年思想转变的手稿。2002 年—2012 年间，他作为柏林科学院马克思和恩格斯新全集编委会成员，负责整理、编辑出版马克思未刊历史笔记。前几年受聘来华讲学。

史博德认为：马克思思想在共产主义国家被接受的其实是很少的一部分，主要是“国家革命”、“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之类，这些都是 1850 年以前马克思继承傅里叶、圣西门、欧文等人关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思想。列宁特别欣赏这一套，列宁主义就是沿着这么一条线发展起来的。可是 1850 年之后，马克思对英国的经济状况缜密研究以后，马克思的思想发生了巨大改变。他越来越觉得，政治革命、暴力革命是行不通的。暴力革命也只是换汤不换药，把政府换掉了，但是资本主义体系是不可能被政治革命打碎的。他说，我们不能想象未来社会是什么样的。他强调社会自身演进，反对国家来支配生产和分配。

认真阅读马克思就会发现，甚至在共产党宣言里，他都承认私有制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在手稿里，他特别讲私有制在 18 世纪对社会推动和生产力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所以私有制才能被全社会所接受。还有，私有制对个人的发展、对人的自由也是很重要的。他认为，哪怕你是个拿薪酬的工人，你都是个自由的人。特别是 1860 年以后，马克思越来越排除了“资本主义必将总崩溃”的结论。他说，要改变一个社会当然是可以的，但是不可能从外界用政治手段一下子来打碎它，只有在不同领域的空间里来寻找改变社会的可能性。马克思自己排斥的观点，最后却被列宁等人强化。传到毛泽东这一代，不知怎么就变成了“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1] 我翻阅了一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没有找到马克思这句话的出处，只有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在其墓前一次讲话中赞扬马克思敢于对前人的学说提出质疑，推陈出新是谓造反有理。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这句话是否毛泽东的私货，望读者明察。

附注：

[1] 这是毛泽东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在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六十寿辰大会上的讲话中说的，公开发表于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日的《人民日报》。